

第二卷・1953-1955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向社會主義過渡

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

林蘊暉 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二卷

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
(1953—1955)

林蕴晖 著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2

*Moving toward Soc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1953—1955) (in Chinese)*

By Lin Yunhui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全球发行及总代理：中文大学出版社

<http://www.chineseupress.com/>

BookinG 制作

「把当代中国惊心动魄的岁月转化为历史著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愿望，也是对中国历史学家的考验」。（总序·金观涛）

-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总约六百万字，是目前最具规模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著述
- 十余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家，历时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历史纪录，通史与专题结合；注重国际与国内重大历史事件关联，揭示中央决策与地方、基层之间的互动
- 倚重档案、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

一套资料翔实、忠于史实、摒除党派观点的中国当代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约六十万字、八百页；完整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至 1981 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全貌。

「这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作者不但一律以中俄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为基本原料，而且也大量地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每位作者都以批判的态度检查史，对于史料中互相冲突记载，详加考订，以建立最可信的史实。」

——余英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退休讲座教授、
克鲁格人文奖得主

「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后，不仅发现其叙事详尽，更发现其已突破中国官方机构对资料的垄断和保卫，有丰富的文献档案以为基础，史实的可信度极高。每册独立，各有作者，但前后仍有脉络可循，容易阅读。这一套大书的出版是这几十年来近代史学界的一大盛事。」

——陈永发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点：

- 十一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家合力撰写：各卷作者均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国史研究专家，多次研讨，分工撰写，历时七年。
- 全景式历史纪录，通史与专题结合：既有反映高层决策和斗争的重大事件揭示，又有表现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社会风貌和流行思潮的生动画面；各卷独立成篇，又首尾相贯。

·倚重档案、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以中央及地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重大史实作出详尽考订和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目前最具规模、足以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未来走向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著述，是中外各图书馆、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学者和教师的必备参考用书。

十卷目录及出版七卷的内容和作者简介：

第一卷 断裂与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49-1952）

（即将出版）

杨奎松

第二卷 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

1953年至1955年，在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期间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变革，都是以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主线而展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引起了人们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反思。作者依据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对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由此引发党内的「倒刘」风波和「高饶事件」，以至实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作了详尽的述和分析。此外，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苏联给予的援助和贡献，以及这一时期的国防建设和外交活动，也有精辟的论述。

林蕴晖，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学者，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共和国年轮（1953）》、《刘少奇之路——辅助建国（1949-1956）》、《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并主编《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合着《凯歌行进的时期》（1949-1989中国系列之一）、《人民公社狂想曲》；并主编《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一至二十一册。

第三卷 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56-1957 年被称为「多事之秋」。作者充分利用十几个省市的档案、俄国解密档案、当时的报刊杂志、当事人的口述记录和回忆录，以及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的目标和结果、苏共二十大在中国的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中共八大的作用和局限，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整风反右运动的起因、转变和结局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过程，作出翔实的描述和分析。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名誉研究员。研究兴趣为苏联史、冷战国际史，对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史有专门研究，代表著作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苏联专家在中国》、《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和论文多篇。

第四卷 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

究竟毛泽东提出的超英赶美战略，如何在中共高层取得统一，又何以得到基层群众的积极响应？一再缩短的赶超时间表是如何编织出来的？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有多少中共省级领导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8 年的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为甚么要拿粟裕开刀？1959 年在庐山罢黜彭德怀的真实原因何在？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为挽救危机，中共中央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本卷依据第一手资料，作出详尽叙述和剖析。

林蕴晖，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学者，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共和国年轮（1953）》、《刘少奇之路—辅助建国（1949-1956）》、《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并主编《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合着《凯歌行进的时期》（1949-1989 中国系列之一）、《人民公社狂想曲》。

第五卷 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

从 1962 年起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是一个色彩纷呈、复杂变幻的时段，有人称其为「变局」。这种「变局」，是在大跃进运动遭受

重大挫折、外部世界对中国施加愈来愈大压力的局势下，中国人在理论、观念、政策作出一系列求变求存的调整和应对而发生的。它根本改变了 60 年代中国历史的走向：那些最为重大、最为精彩的政治变动和思想流转，都发生在这个时段；同时，它又开启了更为激烈变动的十年。

钱庠理，毕业于国内重点综合性大学历史系，史学硕士。长期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著有多部关于毛泽东研究和当代中国历史的著作。

第六卷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本卷简明地描绘出 1966 年 5 月至 1969 年 4 月文化大革命的全景图像与过程：从 1965 年底批判《海瑞罢官》至 1969 年 4 月召开九大期间，文化大革命从发动到形成高潮，从夺权到天下大乱，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到最后召开九大。作者批评文革研究中不实事求是、为尊者讳、粉饰历史、大而化之等弊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史料出发，力求还历史之本来面貌。

卜伟华，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曾编辑多种中共党史数据丛书，合着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等书；也是最早从事文革研究的学者，发表过〈红卫兵运动与「文革」前的学校教育〉、〈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北京红卫兵运动大事记〉等论文多篇。

第七卷 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

（即将出版）

高华

第八卷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

1972 年至 1976 年文革结束，发生了一系列至今仍众说纷纭的重大政治事件，例如毛泽东曾考虑哪些人当接班人？周恩来为甚么要做痛苦的反省？中阿、中越为甚么翻脸？谭甫仁中将为甚么被刺杀？公安部长李震是自杀还是他杀？毛是否因「红都女皇」事件要把江青

撵出政治局？周恩来对美国人说了些甚么而被批判？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是防备谁？批邓是毛的决策还是「四人帮」的挑拨？「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是毛的遗嘱吗？谁首倡粉碎「四人帮」斗争？「四人帮」有没有政变计划？作者利用档案数据，一一严肃考辩，揭示个中真相。

史云，在重点大学毕业后历任大学讲师、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问题的教学与研究，特别专注于 1970 年代以来的中国研究。发表过多种有关中国当代经济体制变革、周恩来经济思想、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大革命人物的研究著述。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冷战国际史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史。主编有《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等书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第九卷 革命的终结——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6-1978)

(即将出版)

韩钢

第十卷 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 (1979-1981)

文革结束后，中共怎样清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重新阐释自己的意识形态，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找到正当性？人们的思想如何不断获得解放？数以千万计的冤假错案如何得以平反？如何促成华国锋下台，确立邓、胡、赵新体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怎样起步的？改革为甚么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党内党外何以会出现民主化思潮？中共提出政治改革又何以迅速地退缩？对于历史大转轨中频繁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争论和冲突，作者都尽可能依据第一手资料作出详尽叙述。

萧冬连，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当代中国史学者。主要著作有：《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共和国年轮（1961）》；合着有《强国的方略——中国五十年社会主义战略的演变》；合编有《中国改革大词典》。

总序：世纪视野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金观涛

经过差不多近七年的努力，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终于分批出版、与读者见面了。对我来说，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一直把能否出版一套忠于史实、观点开放的中国当代史视为对中国历史学家的考验。

把当代中国人经历的惊心动魄岁月转化为历史著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愿望。我们这一代人和人民一起经历了苦难，又见证了启蒙时期思想的风雨雷霆，这一切理应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然而我深知这一工作又是多么困难。

首先，作者必须掌握尽可能完备的史料，特别是档案文献。近年来，出版了大量回忆录和口述历史数据，但是很多重大事件以及与中共高层决策有关的档案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为写作带来困难。在历史学家的写作中，除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史料外，更为复杂和重要的，是对史料的辨伪和确定其在决策过程中起过的作用，只有少数长期关注该领域的专家才具备这种能力。十分幸运的是，本套书的撰写正是依靠了这批有深厚档案功底、又长期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家。他们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及市县档案资料馆，搜集整理档案并对史料辨伪。史料之丰富、辨析之充分，正是本套书的重要特色。

历史研究者的目标是追求历史的真实，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搜集史料、整理档案只是第一步。历史学家在研究和写作中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如果不能做到对历史场景的同情了解，不能在内心重演历史事件展开过程以及理会当时支配事件展开的普遍观念，就无法接近历史的真实。本套书以 1949 年至 1981 年中国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论述主线，这三十余年正是毛泽东思想支配中国的时期，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令人很难理解的现象，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由于本套书的作者都是中国近几十年巨变的亲历者，完全了解这

些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氛围，这就使他们具备了某种比西方史家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优势。当然，作者要发挥这种优势，仅仅停留在感性阶段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某一种意识形态中走出来、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以获得超越的视野。开始注意到支配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与重大社会事件的互动，特别是这些事件是如何从中央决策到地方、再到基层展开的，是本套书的另一特色。由于各卷作者是独立写作，分批出版，虽然现在对全套书作出整体评价尚为时过早，但是，我可以不无自豪地说，中国人终于开始为不寻常的二十世纪中国撰写大型历史著作了。

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不设主编、以便各位作者在写作时有更大的自由，并表达多元的价值。由此带来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统一风格，使十卷著作组成连续的整体。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动笔之前充分讨论各卷内容，每年举行一到两次工作会议，切磋写作中碰到的问题。至今，我仍不能忘怀一次又一次的国史写作讨论会。窗外是北国的寒冬，大家众集在不大的会议室中不分昼夜地讨论，最后形成会议纪要。这一场景使我想起 1970 年代末青年时代和朋友的彻夜长谈。很多时候，大家就某一观点，细节甚至是提法，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使我十分感动的是，无论在讨论中发生多大的争论，甚至是立场和价值上的分歧，最后都能在忠于历史事实之上得到统一。根据时段，本书大约以两三年为一卷，每卷由一位或两位作者撰写，而其它作者都把自己对该时段的见解和史料提供给该卷作者，整个写作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今日中国学术界罕见的真诚合作精神。在此意义上讲，这套书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

组织编写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我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所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这套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沈志华和李丹慧夫妇，从确定撰写计划到寻找适当的作者以及整体工作的协调，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其次，我要感谢青峰和先后在《二十一世纪》编辑室工作的同事黎耀强先生、林立伟先生、张志伟先生、朱敏翎小姐和张素芬小姐。他们在青峰的带领下，以巨大的热忱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投入编辑出版工作，否则，如此繁重而浩大的编辑出版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还要感谢中大中

国研究服务中心为本书作者提供的支持和热情周到的服务。最后，我要感谢方正兄，该书从酝酿到出版，一直得到他在精神上和各方面的支持。他虽已退休数年，但仍念念不忘这套书的出版，认为它对香港中文大学有重重要性。在这些中大同事身上，我仍可以感受到高锲教授任中大校长时期那种注重中国研究在当今世界意义的「中大精神」。

这套书出版之时，我也到达退休年龄，将开始人生的新阶段。我想指出的是，由于可以看到的档案和其它种种限制，这套书只写到1981年。如果不谈此后发生的波澜壮阔的80年代启蒙运动，以及出此引发的1989年震惊世界的事件，我们仍无法理解今日中国和世界。在这一意义上，仅仅由前十卷组成的二十一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不完备的，写史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从来就有忠于事实和敢言的历史传统，但很少有史家为当代写史，故这套书的出版是一种新现象。它说明中国历史学家已走出仅仅用春秋笔法褒贬益损，并展示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历史反思意识已经产生，并开始指向新的深度。我期待着后继者。

200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 录

总序 金观涛

导言

第一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一 最初设想：先搞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

- 1 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
- 2 “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部署

二 转变战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

- 1 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向何处发展
- 2 开展大规模建设面临的难题
- 3 毛泽东重申国内主要矛盾
- 4 利瓦伊汉南下调查献策
- 5 总路线的完整表述

三 效仿苏联：总路线的目标模式

- 1 总路线与列宁过渡时期学说
- 2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第二章 粮食统购统销和对私有制改造的全面启动

一 农业互助合作的最初方针

- 1 农村整党和对农业集体化的宣传
- 2 1952 年冬的互助合作高潮
- 3 调邓子恢做农村工作的总司令
- 4 务必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
- 5 保护与改变私有的辩证

二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

- 1 粮食供求的紧张形势
- 2 周恩来致电陈云商讨对策

- 3 毛泽东天安门城楼拍板
- 4 中央召集全国粮食紧急会议
- 5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
- 6 乡村干部和农民对统购粮食的反应
- 7 发展互助合作方针的改变

三 对私营工商业的全面改造

- 1 实行统购统销后的私营商业
- 2 对私营商业由排挤到改造
- 3 加快私营工业的公私合营
- 4 由“吃苹果”到“吃葡萄”
- 5 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

第三章 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

一 「生产力起来暴动」

- 1 合作化与粮食征购同时并进
- 2 农民杀猪宰牛

二 “停、缩、发”三字方针

- 1 中共中央两个紧急指示
- 2 方针是三字经
- 3 在坚决收缩方针下的浙江整社

三 毛泽东批「小脚女人」

- 1 重释“停、缩、发”方针
- 2 批中央农工部的“右倾”
- 3 各级党委纷纷检查“右倾保守”
- 4 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 5 猛烈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四 农业合作化的“大风暴”

- 1 1955年夏季以后合作化的急速发展
- 2 上下互动一再提前的时间表

五 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加快

- 1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 2 加速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决策
- 3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热潮

- 4 资本家交出企业的心态
- 5 手工业合作化的加快发展

六 单一公有制模式的建立

第四章 贯彻总路线的思想动员

一 统一党内思想的两个会议

- 1 「新税制」引起风波
- 2 严厉批评「党内资产阶级思想」
- 3 过渡时期有「两个联盟」

二 大张旗鼓宣传总路线

- 1 周恩来报告总路线
- 2 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
- 3 在职工群众中进行宣传
- 4 对广大农民的宣传教育

三 「大仁政」与「小仁政」之争

- 1 梁漱溟呼吁不要忽略农民
- 2 毛泽东严厉批评「小仁政」

第五章 高岗、饶漱石事件

一 高岗与刘少奇的矛盾

- 1 建国初年的高岗
- 2 高、刘在政治上的分歧

二 「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

- 1 毛泽东在会前的重要举措
- 2 「批薄射刘」的后台

三 “讨安伐刘”的组工会议

- 1 会议重点：检查中组部工作
- 2 张秀山何以到会发言
- 3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和会议决议

四 高岗的会外活动

- 1 传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
- 2 散布安子文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

- 3 领头去看望在西山休养的林彪
- 4 南方之行
- 5 私自散布人事安排的意见

五 毛泽东决定端出高岗

- 1 权衡利弊，强调团结
- 2 召开四中全会的方针
- 3 四中全会概况和决议
- 4 毛泽东缘何缺席四中全会
- 5 两个座谈会的揭发批判

六 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 1 周恩来指示会议重点
- 2 批出了一个「反党集团」

七 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

- 1 全国党代表会议的结论
- 2 高岗之死与毛泽东的感叹
- 3 当事人对强加罪名的答辩
- 4 被重新安排却未平反的「五虎将」
- 5 彭德怀对「彭、高联盟」的申辩

八 “高饶事件”的不同传说

第六章 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 1 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 2 借鉴苏联经验和争取援助
- 3 苏联援助协议的签订

二 “一五”计划的出台

- 1 国家计委的建立和五年计划的编制
- 2 “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
- 3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整体布局

三 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的展开

- 1 工业化建设拉开序幕
- 2 重点建设，稳步前进

- 3 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 4 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的确立

四 工业化基础的初步奠定

- 1 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
- 2 「一五」计划的完成
- 3 苏联专家与 156 项工程

第七章 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

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 1 召开全国人大的酝酿和准备
- 2 毛泽东主持宪法起草
- 3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4 全国政协职能的转换

二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1 历史经验的总结
- 2 两个主要特点
- 3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三 中央集权领导体制的建立

- 1 中央集权与党政关系
- 2 政权性质的转变
- 3 国家对社会的掌控

第八章 由思想批判到肃反运动

一 由《红楼梦研究》引发的文艺批判

- 1 「红学」家俞平伯的新作
- 2 「小人物」挑战「红学」权威
- 3 质问《文艺报》编者
- 4 号召向资产阶级唯心论开火
- 5 一场政治性的围攻
- 6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 7 对俞平伯的公正评说
- 8 毛泽东的胡适情结

二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 1 两种不同的文艺思想
- 2 在重庆和香港对胡风思想的批评
- 3 1952年的文艺界整风
- 4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 5 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基调
- 6 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
- 7 胡风冤案的最终平反

三 丁玲、陈企霞「反党」事件

- 1 匿名信招来横祸
- 2 由反党小集团到右派反党集团
- 3 丁玲历史结论的一波三折

四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事件

- 1 扣押扬帆的诱因
- 2 潘汉年被疑为“内奸”
- 3 以“莫须有”做出的宣判
- 4 迟到的平反昭雪

五 1955年的肃反运动

- 1 对敌情的严重估计
- 2 肃反运动的全面展开
- 3 对肃反运动中偏差的检讨

第九章 国防现代化的开端

一 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 1 建设多军兵种任务的提出
- 2 国家财政与现代化建设的矛盾

二 军委高干会和「三大制度」的实行

- 1 一次“全军的党代表会议”
- 2 军队现代化的重大制度改革
- 3 开展正规的军事训练

三 中国的国防战略

- 1 第一次三军联合作战
- 2 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

第十章 寻求和平共处

一 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1 毛泽东调整对外战略
-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 3 中印、中缅总理联合声明

二 日内瓦会议与印度支那停战

- 1 日内瓦会议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契机
- 2 中国代表团的与会方针
- 3 在朝鲜问题上形成僵局
- 4 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的签署

三 万隆会议求同存异

- 1 五国总理在科伦坡倡议
- 2 中国政府的参会立场
- 3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 4 中国代表团为求团结而来
- 5 关于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声明
- 6 求同存异的历史性文献

四 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

- 1 扩大与亚非众多国家的交往
- 2 中日关系由民间突破
- 3 谋求同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
- 4 同苏联东欧各国关系的发展

五 第一次台海风波和中美大使级会谈

- 1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 2 打开中美接触之门

后记

附录

大事记

参考文献

索引

导言

1953 至 1955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变革，都是以毛泽东提议为中共中央通过，并于 1954 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主线，围绕这条总路线而展开的。

对这条总路线的历史评价，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的论断是：「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¹

此后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²1985 年，邓小平在谈到历史经验时又着重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³1987 年中共十三大，赵紫阳在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⁴

随看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提出，人们很自然地开始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反思。即在 1952 年结束本来准备实行十五年到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从 1953 年就直接向

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 17。

²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 年 9 月 1 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 2—3。

³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 年 8 月 28 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 137。

⁴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 年 10 月 25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 9。

社会主义过渡，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在 1980 年代后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重新认识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了学术界讨论的热点。1990 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的《党的文献》第 6 期发表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状况概述〉，列举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一是「既是水到渠成，又有重要发展」；二是「基本方向正确，但搞早了或搞急了」；三是「战略思想的重大转轨」。⁵ 具体情况是：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最早提出质疑，1988 年，他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中指出：“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⁶

1989 年，林蕴晖在《凯歌行进的时期》一书中指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先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进而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如同列宁在 1921 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当年称这是一条迂迥的道路，或称间接过渡的战略。而过渡时期总路线，则是绕过了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通过直接消减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如同列宁在 1918 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样，企图别其功于一役，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即在经济落后国家实行直接过渡的战略。如果说，列宁 1921 年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是由直接过渡的战略转向间接过渡的战略；那末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则是由原先的间接过渡战略转向了直接过渡的战略，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轨。⁷

1991 年出版的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都肯定总路线是对七届二中全会路线的发展。《七十年》写道：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党在历史关键时刻采

⁵ 施肇域：〈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状况概述〉，《党的文献》，1990 年第 6 期，页 63—67。

⁶ 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动态》，1988 年第 802 期，页 8；《探索与争鸣》（上海），1989 年第 1 期，页 24。薛暮桥此文在《求是》1989 年第 1 期刊登时对此段作了修改。在 1996 年出版的《薛暮桥回忆录》中改写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看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而不是原先认为的那样，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然后再采取步骤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认识上当然是一种深化，也反映了历史的必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再加快前进的步伐，导致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页 216。

⁷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 311—312、318。

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是适时的和必要的」。⁸薄一波则认为，总路线是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新发展。他写道，「〈决议〉提出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总路线将这两个「转变」融为一体，结合进行。应当说，这是根据实践的要求和经验，对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新发展。」⁹

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在 1990 年代中后期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的写作时，提出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是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减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当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¹⁰胡绳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更明确认为：以为农业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民粹主义」思想，并说毛泽东也染有「民粹主义」的色彩。¹¹

尽管薛暮桥和胡绳两位先生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就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路线的认识来看，都认为是性质不同的两条路线。胡绳先生的观点，虽然曾受到一些人的非难和抨击。¹²但他关于“毛泽东当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观点，却在二十一世纪初出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

⁸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 319—321。

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 229。

¹⁰ 林蕴晖：〈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页 143。

¹¹ 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页 1。

¹² 沙健孙批评说，胡绳认为，“毛泽东曾经‘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这是对毛泽东的误解，在理论和事实上都站不住脚。”沙文认为：“毛泽东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领导了以 156 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他再次强调：『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当他讲到“一张白纸，没有负担……”这番话的时候，也是想以此论证“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个观点，这同民粹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应当以小生产为基础的思想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沙健孙：〈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 年第 3 期，页 5。沙健孙还认为：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同时，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适时的和必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指出，“历史证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沙健孙：〈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几点思考〉，载李文主编：《国史论丛「当代中国史研究」十年文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 218—220。

《毛泽东传（1948—1976）》中得到了呼应。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设想的关系，《毛传》作者是这样表述的：

改变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

请注意，这里用的是「改变」，具有“转折意义”。明确表明，二者是不同的。对这条具有转折意义的总路线的历史评价，《毛传》作者写道：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指总路线学习宣传提纲——引者注）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¹³

¹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以上评述没有直接点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是从总路线学习宣传提纲中引出了一个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而这个理论观点恰恰是总路线的核心。作者评价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中心是阐明，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成熟”，并对尔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请看，尽管《毛传》作者从不同角度，使用了与胡绳不同的表达方式，但终究是明白无误地点出了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总路线，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并对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所以，就实际内涵而言，是不是可以认为《毛传》作者与胡绳的表述是异曲同工，只不过胡大师说的是字字见血，直截了当而已。

一 毛泽东何以放弃建设新民主主义的路线？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甚么原因使他在 1952 年秋就放弃建设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提出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笔者以为：

第一，担心新民主主义会发展成资本主义。

担心走向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农民走向资本主义。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逐渐趋于中农化，少量土地集中和雇工现象开始出现。少数农户上升为富裕中农，个别的也有成为新富农的。中农的基本愿望是：发家致富。土地改革一方面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另一方面又使逐步富裕起来的中农不敢冒尖。老解放区原有的互助组织因不利于个人劳动发家而开始趋于涣散。这使中共党内不少人产生忧虑，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农村向何处去？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

完成土地改革较早的东北地区。1949年1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对农村党员出现雇工的现象进行了讨论，东北局书记高岗在会上发言说：有些农村党员开始雇长工。许多党员不了解许不许群众雇工，许不许党员雇工，我们的回答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是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为此，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队是不对的。¹⁴12月31日，东北局组织部在〈农村支部工作指示〉中明确提出：今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则是提倡以个体经济为基础，在自愿两利原则下组织起来，逐渐地由个体经济向集体方向发展。¹⁵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在〈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中更表示出对农村经济向着富农方向发展的担忧，报告中说：「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看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而是向看富农的方向发展。」据此，山西省委提出一个对于私有基础应采取「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的方针。¹⁶

在党内对是否现在就应对农民的私有制采取「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的方针出现争论时，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山西省委的方针。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正是遵循这一方针制订的。

1953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更明白道出了他对农村自发发展资本主义的担忧，他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吗？」¹⁷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在强调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抓紧农业互助合作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的同时，更要求「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¹⁸

¹⁴ 高岗在东北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1949年12月10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398。

¹⁵ 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农村支部工作指示〉（1949年12月31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页397。

¹⁶ 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1951年4月1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530。

¹⁷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299。

¹⁸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5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298。

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说：“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秩序，发展资本主义。¹⁹因此，毛泽东把土地改革以后，中农不敢「冒尖」，看成是一件好事。他说：我国土地改革以后，土地不值钱，农民不敢「冒尖」。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情况不好。我们认为，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丑，这是一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在政治上已经压倒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从1950年起，到1955年、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有争论。砍掉合作社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那些同志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代表了富裕中农想「冒尖」的心理。²⁰

把个体农民要求发家致富看成是自发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新民主主义制度，将导致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这是导致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转向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而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

第二：以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无条件地优越于生产资料私有制。

新中国建立之初，没收官僚资本为国营经济，由于广大工人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热烈拥护，由于革命胜利激起工人阶级高度的荣誉感、责任感，国营企业确实生气勃勃，生产情况明显超过私营企业。1951年开始试办的以土地入股、土劳分红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政府给予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生产也确实比多数单干农民要好。但这绝不表明国营无条件地优于私营；集体无条件地优于单干。因为，当年存在的广大私营工商业户，绝大多数并不是如同已被没收的官僚资本那样拥有现代机器的工厂企业，而是个体经营、手工劳动、行业繁多并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个体工商户；真正属于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户，其中虽有少数不法资本家，但多数是守法经营的，他们有着长期生产经营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着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至于个体农民私有制，它不仅与主要靠手工劳动的农业生产相适应，更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要求生产者有自主处置的

¹⁹ 转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页185。

²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页114。

权利，因此仍是有利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且由于土地改革结束不久，多数农民的生活开始上升到中农的水平，初步具有了独立生产的能力，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还远没有释放出来。

当时，一方面夸大了「五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消极面，夸大了农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把国营企业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绝对化。如认为：「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 15% 到 30%」。²¹因此，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各方面供求关系的紧张，就把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作为既不必增加投资，又能收到立竿见影成效的发展生产的最好快捷方式。毛泽东在 1953 年 10 月 15 日的谈话中正是这样说的：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要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和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²²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更将此说成是普遍规律。他说：

²¹ 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1954 年 6 月 30 日），载《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 239。

²²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 年 10 月 15 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 300—301。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适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拖拉机。相对来说，他们的拖拉机比我们多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是靠行政命令的，是从上而下地恩赐的……。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中间整整间歇了五六年。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向合作化的道路。²³

可见，把先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当成是「普遍规律」，无疑是导致急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 为甚么没有一条刘少奇路线？

对土地改革以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是否应立即削弱和否定私有制？中共党内是有过争论的。1950年初，刘少奇就针对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是否允许农村党员雇工的问题指出，「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大早了。」「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因此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²⁴1951年3月，刘少奇曾明确提出，党的任务「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²⁵同年7月，他尖锐批评山西省委提出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指出：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

²³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和谈话》，下册（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页571—572。

²⁴ 刘少奇同安子文等谈话，1950年1月23日。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页399—400。

²⁵ 刘少奇：〈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1951年3月），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页174。

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²⁶

但是，上述思想和主张在遭到毛泽东批评和否决后，刘少奇很快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并为此多次作自我批评。

1988年，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九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胡绩伟先生感叹说：「如果真有一条刘少奇路线该有多好啊！」²⁷问题是在共和国历史上，何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条刘少奇路线？

从历史层面看：在长达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过程中，每当重大战略转变关头，在中共领袖的集体中，毛泽东都曾表现出他杰出的智能和才能，显示出他的意见总是高人一筹，起到了力挽狂澜的历史作用。因此，毛泽东提出的主张，往往被人认为比别人也比自己站得高、看得远。

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使毛泽东的道路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成为全党的共识，同时也开始造就了毛泽东即真理化身的形象，并在组织上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策权。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在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的同时，规定：“（书记处——引者注）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²⁸这就使其它中央领导人实际上失去了与毛泽东的平等地位。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等其它中共领导人都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绝非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不同意见只在过渡条件和步骤上。刘少奇的主张是：先机械化，再合作化。但当毛泽东把农村的现实发展提高到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的原则高度时，就使党内的不同意

²⁶ 刘少奇：〈关于华北互助问题的批语〉（1951年7月3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页527—528。

²⁷ 胡绩伟：〈刘少奇「路线」异想〉，《求是》，1989年第2期，页24。

²⁸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十七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页345。

见失去了正常讨论的氛围。

在中国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共领导人的认识也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自己的目标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单一公有制+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1955年11月16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讲的一段话是颇具代表性的。他说：

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于用甚么方法，采取甚么形式，用多少时间来改变这两种所有制，特别是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可以根据各国的客观条件来决定的。²⁹

当年对社会主义的这种共识，无疑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能够为其它中央领导人接受而不再坚持异议的共同理论基础。这种历史的局限，不是任何个人可以超越的，这就是二十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不可能有一条刘少奇路线的根本原因。

三 高岗、饶漱石事件——战略转轨过程中一个「插曲」

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结论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活动是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化和深刻化的反映。」「他们的这种反党活动无疑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愿望。他们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³⁰西方多数学者依据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回忆录的说法，是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指毛泽东1949年抵莫斯科访问时，斯大林将柯瓦廖夫（Ivan Kovalov）的告密信交给毛泽东一事，因此，“斯大林一死，毛开始反击高”。³¹

²⁹ 刘少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1955年11月16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177。

³⁰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页537。

³¹ 特里尔（Ross Terrill）著，刘路新、高庆国等译：《毛泽东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页274

历史表明，高岗、饶漱石事件，既不是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反映，也与斯大林无关，而是毛泽东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取代新民主主义建设路线这一战略转轨过程中发生的「插曲」。

高岗和刘少奇的政见分歧源于 1949 年春，当时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到天津，帮助中共天津市委正确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刘在指出城市工作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同时，强调要团结和帮助资产阶级，以迅速恢复生产。为解除资本家的思想顾虑，刘少奇说过，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封建地主的剥削不同，「今大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³²的话。此后，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有干部反映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问题上，东北地区也存在“左”的倾向，1949 年 5 月，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对东北局的城市政策有所批评。对刘少奇关于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解释，高岗认为是「右」。1950 年初，刘少奇与安子文等人关于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更与高岗的主张相左。薄一波回忆：“据高岗说，他收到少奇同志的谈话纪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³³

1951 年，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关于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则明确表态支持山西省委，否决了刘少奇的意见。³⁴同年 10 月 14 日，高岗上送的关于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则受到毛泽东表扬。毛为中央起草批示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要求各地党委仿效。同年，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高岗与邓子恢发生分歧，³⁵刘少奇、李立三基本赞同邓子恢的意见，毛泽东，则对李立三主持的工会工作作了严厉批评，最后李立三被戴上了「经济主义」、「工团主义」、「主观主义」三项帽子，并被免职。高岗无疑又得了一分。

1953 年初，因「新税制」仓促出台，引起物价波动。作为主持

—275。

³² 黄小同、李文芳：《刘少奇与天津讲话》（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页 151。

³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 198。

³⁴ 毛泽东：〈关于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1951 年 10 月 17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 476—477。

³⁵ 邓子恢认为，工会与行政基本立场一致，但具体立场应有所不同，工会应更多地考虑工人的利益；高岗则认为，工会与行政的立场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否认行政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存在矛盾。

中央财经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因此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指责「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逢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³⁶同年6月15日，全国财经会议开幕两天后，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总路线，严厉批评所谓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³⁷

在此之前，毛泽东还交代高岗查证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当年具体执行此任务的张秀山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³⁸

由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分歧，到组织上对刘少奇不信任的表示，联系到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为「右倾」（这虽然是周恩来起草文件上的话，知情人不难看出，同样是批了刘少奇在1951年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的「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高岗都明显站在上风。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意欲重选接班人的意图，显然也为高岗所领会。

正是在以上的大背景下，高岗多方面散布刘少奇的「右倾」错误，财经会议和此后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也因而出现「批薄射刘」、「讨安伐刘」的局面。因高岗问题受株连被打成东北局「五虎将」之一的张明远认为：「财经会议真正引导批评薄一波并涉及到刘少奇的，正是毛主席6月15日的那篇关于总路线的讲话。」「高岗的错误并不在于他借批薄来

批刘，而在于他『跳得高』，可是，既然是毛主席的号召，谁能不跟着“跳”呢？」³⁹

无可讳言，高岗在会外散布攻击刘少奇的言论，以及有关人事安

³⁶ 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8月12日。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92。

³⁷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3年6月15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页251。

³⁸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页321。

³⁹ 张明达回忆，未刊稿。

排的意见，不能不被认为是非组织活动，这在共产党内是犯了大忌。因此，当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高岗的不当活动后，毛泽东不得不以增强党的团结的名义，公开批判高岗，以平息党内纷争。不意，高岗因自感冤屈而自杀。事隔多年之后，毛泽东感叹说：

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⁴⁰

四 社会主义「高潮」是怎样兴起的？

关于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最初的表述：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正式发表的公开表述，将十年到十五年改为「相当长的时期内」。但实际进程仅三年多时间，在 1956 年春夏对个体农民和资本家的私有制改造就基本完成了。因此，对当年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出现的原因，也是史家探究的热点之一。

农业合作化所以加快，一个重要动因源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个体农业的矛盾，高度分散的农业难以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而合作化又被认为是最便捷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办法。但「高潮」所以兴起，绝非单一动力的结果。毛泽东在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时，提出的速度也只是 1960 年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即使 100% 的个体农民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后，不少省委向中央报告可以在 1957 年实现初级化，这既证明毛泽东提出反「右倾」的正确性，又表明再快一些也是可能的。于是，1955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提出 1958 年春季以前，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表。会后，各省又纷纷表态要提前完成。据此，毛泽东在 1955 年 11 月 30 日代中共中央起草给甘肃及其它省、市、

⁴⁰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 310。

区党委的电报中说：

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备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到40%以上，则可以肯定1956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这对今后的工作极为有利。⁴¹

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是，1952年底完成的土地改革，共没收征收约7亿亩土地（约合4700万公顷），分给了约3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总人口的60%到70%。农民分得土地后，欢天喜地地说：「过去头顶地主的天，脚踏地主的地，现在都成为我们的了。」他们唱道：「分了地，出了气，翻了身，见了天。」⁴²因此，经过土地改革获得翻身的绝大多数贫下中农认为，共产党不会唬弄农民，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指的路肯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会往坏的方面变；加上「高级社是天堂，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喝牛奶，吃面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宣传；再有传达上级精神，组织现场参观，基层中共支部进行动员，骨干带头，对重点户（上中农）分工包干

做思想工作等一系列组织措施，于是，相当一部分农民抱着「人随王法草随风」的思想，顺着潮流走；看到富农「出租土地无人要，想找雇工没人当，投机买卖断门路，放债剥削怕告状」的境况，一部分上中农认为「迟不如早，早不如快，早入社早光荣」；有的怕重划成份被定成富农，也只得被大风刮进去了。

如果说反「右倾」和层层规划摊派数字，造成了一种政治压力，那末一系列宣传组织工作则造成了一种「高潮」的形势，而农民中的不同阶层怀着不同动机参加合作社的行动又为已经点燃的火势加薪添柴。可见，195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掀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正是这样一首由上下左右合力吹奏的「交响乐曲」。尽管中共八大才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但其决定性的步骤应该是在1955年就基本完成了。

⁴¹ 毛泽东：〈中央答复甘肃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的两个报告的电报〉（1955年11月3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页464。

⁴² 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页559、561。

五 政治、思想领域的整合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公有制（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经济基础由多元转向一元化，必然要求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趋于一致。

早在总路线公布之初，中共党内的广大党员、干部就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感到疑惑，既然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已提上日程，人民民主专政是否已不再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政权？中共中央于 1953 年 12 月 19 日下发的〈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明确回答：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出于策略考虑，要求暂时不必公开宣传。到 1956 年 9 月的中共八大，刘少奇在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则作了公开说明，他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样的政权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⁴³

与之同时，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国家政权对社会全面掌控的社会体制。这种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是通过城镇街居制度、单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农村集体化制度，以及城乡分割户籍制度的逐步建立实现的。这一系列制度建构了一个覆盖城乡的社会控制网络，社会高度地组织化和行政化。这种体制以国家垄断稀缺资源为基础，以深入到社会基层细胞的中共组织为权力核心，并且通过高度统制的意识形态得到强化。

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整合，则是通过一系列批判运动来实现的。

如果说，1953 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批判薄一波的「新税制」，是为了把中共党内高层的思想统一到总路线上来，那末，同年 9 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对梁漱溟的批判，无疑是使中共党外的民主人士意见归于统一；由批评红学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发的对胡适派

⁴³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页 242。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大规模批判，则是在 1950 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基础上，在全国范围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由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进而展开的肃清暗藏反革命运动，更明确申明在共和国内就是要使「舆论一律」。

龚育之先生在 1990 年代对历史研究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他解释说：「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过去的历史，不是去任意改写历史的原貌，而是对历史的原貌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⁴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 1953 至 1955 年共和国史，正是本着这一原则所作的努力。

⁴⁴ 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页 436—437。

第一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1953年，是中国进入大规模有计划建设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年。对于当年就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薄一波回忆说：“当时许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认识到或深刻认识到，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本身就是过渡性质的，也就是说，已经乘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航船。”⁴⁵在中共党内，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高层人士「都没有认识到或深刻认识到」，显然是别有原因的。

一 最初设想：先搞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

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确定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却是经过长时间摸索才搞清楚的。最初陈独秀的主张是两次革命，即无产阶级先帮助资产阶级搞民主革命，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从李立山到王明则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即民主革命在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间不必经过一个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中国革命曾因此先后遭受重大挫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在中国，无产阶级应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政权，第一步先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第二步才可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这与当年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可谓异曲同工。列宁称新经济政策是有别于

⁴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页228。

战时共产主义的间接过渡战略。

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起，新民主主义建设仅仅只有短短三年（1949 到 1952 年），毛泽东在 1952 年秋就改变了原有主张，提出从现在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亦即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在共和国的历史，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变更。

1 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

1949 年 9 月，为建立新中国举行的、有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据此通过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在对《共同纲领》草案的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在总纲中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前途规定出来。毛泽东在 8 月 26 日明确表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⁴⁶周恩来在向大会说明《共同纲领》的特点时解释说，新民主主义一定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地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

⁴⁶ 转引自熊华源、汤桂芳：〈《共同纲领》诞生记〉，《党的文献》，1989 年第 5 期。1949 年 6 月至 8 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期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 7。1949 年 7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即进入社会主义。”顾龙生编着：《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 267。

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⁴⁷

刘少奇在会上发言也指出，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果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就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毫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因为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如果不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去，就要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允许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种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它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⁴⁸在政协会议期间，当有的代表向毛泽东提问要多少时间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毛泽东回答说：「大概二、三十年吧」。

49

中共中央领导人所做的上述解释和回答，应该说，态度是真诚的。其基本依据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国情的认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在《论联合政府》中又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

⁴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16—17。

⁴⁸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页435。

⁴⁹ 转引自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页21。

想。这就是说，在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以后，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应该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以创造建立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文化条件。

对有些人为共产党人不但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资本主义的发展感到不解，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在中共七大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指出，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同民粹主义的区别，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⁵⁰

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又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的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

⁵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275。

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51

因为，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和近代化，也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渐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还认为，正是在这里划分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界限。他在 1944 年 8 月 31 日致秦邦宪的信中曾就此作过明确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⁵¹

如果说，在 1945 年中共七大时，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还须时日的话，那末到 1948 年秋，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这时，如何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何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成为面临的现实了。在 1948 年 9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发言，他说，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的问题，要弄清楚，不然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总的方针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讲过了，现在要具体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他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将包括：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份。他还指出：「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⁵²

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表示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分析，他说：「新民主

⁵¹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页 322—323。

⁵²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 238—239。

⁵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 1—8。

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宣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⁵⁴对何时开始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插话说：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就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建国纲领作出决议。决议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指出：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古代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就是说，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量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

⁵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146。

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了现代工业经济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他们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守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容许其存在及发展。国内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及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得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方面，都要依各地、各业及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而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的。但是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多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第五，占国民经济总量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

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中央、省、县、区、乡的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总之，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形态、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决议还明确阐明，中国共产党何以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旧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主义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表现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及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正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决议规定革命在全国范围胜利以后，党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2 “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部署

鉴于百业凋敝，灾害严重，工人失业，农民背井离乡，生产事业尚待恢复的情况，中共中央于 1950 年 6 月举行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以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土地改革；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大量节减国家机构的经费开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当时，由于社会经济的改组和支持战争的开支巨大，一时给社会带来很重的负担，造成许多人对现状产生不满。民族资产阶级为私营工商业在生产经营上遇到困难而惶惶不安，有的人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变了，要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形容自己的心境是：「挂红旗五心（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许多资本家因困难削减生产、消极经营，少数人将资金转向香港。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批评了「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法，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毛明确阐明：「不要四面出击」，是党的战略策略方针。⁵⁵

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总战略，通盘部署了1951年的全面工作。会议确定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刘少奇把这个战略思想称为是党的总计划；周恩来称它为党的总方针，要求各方面工作都要同这个总方针相配合。会议决议强调：「“三年准备十年计划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以上干部都明白。」⁵⁶

为使全党高级干部对中央的决议精神有深刻理解，毛泽东在1951年3月30日的一则批语中专门向刘少奇提出，请他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向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干部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于同年5月7日和7月5日，先后向出席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干部和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作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央这个重要思想。

首先是三年准备，准备甚么？刘少奇指出，军事上，包括把朝鲜战争打赢，把全部土匪肃清，还要解决西藏问题、台湾问题。政治上，要把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搞好，在农村里完成土改，发展生产，组织互助组；在工厂里搞好爱国主义竞赛，管理好工厂。经济上，对国内的各种资源、国内市场、国外市场，都要搞清，建立全国的统计；还要调整公

⁵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页254、260。

⁵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39。

私关系。文化上，要准备人才。把现有的知识分子很好地利用起来。

第二是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刘少奇说，工业农业都要发展。现在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其次是发展工业，开始还是要搞一些轻工业。我们所以不先发展重工业，是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农村是工业的市场，依靠农业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依靠农业积累资金。所以要先发展农业。农业、轻工业发展了，建立重工业就有了基础。

第三是十年建设。刘少奇指出，十年经济建设计划时期，四个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资产阶级和我们有矛盾、有斗争。这就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只要我们不侵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给他们以活动范围，使他们有利润可赚，就基本上可以合作。十年经济建设期间，总的说，五种经济成份都要发展，各得其所才能合作，因此基本关系不能有大的变化，但是五种经济的发展和比重会有变化，其结果：一是近代工业比重逐渐增大，农业和个体经济缩小；二是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逐渐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逐渐缩小，作用也缩小；三是反映到政治思想上，加强了工人阶级、共产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加强了国家的作用。同时证明社会主义工业优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合作社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刘少奇称，这种变化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的变化。

第四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说，经过十年建设出现上述经济政治变化以后（也许再搞个五年计划），才可以采取步骤进入社会主义。现在不能提这个问题。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可以宣传；作为实践，十年内讲不到，十年之后看情况，也可能还要等几年。所谓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第一步是实行工业国有化，除小工业外，所有工业都是国有的。商业也是一样。第二步是农业集体化，消灭农村的富农阶级。进入社会主义主要是这两步。他认为，这十年建设阶段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但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是过渡阶段，也是准备阶段，为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作准备，准备进入社会主义。

刘少奇在讲话中申明，这大体上是个人的意见，中央没有讨论，不是定见。但是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950年全国政协一届二

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多次讲话，以及同一时期刘少奇、周恩来等在谈到何时开始搞社会主义的讲话来看，其基本意思是与此相同的。因此，有理由认为，刘少奇在这里表达的大体上是那个时候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共同的意见。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设想，不只是使全党更加明确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中心目标，而且把七届二中全会先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再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构想进一步具体化了。

二 转变战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

先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终究是一种预先的设想。现实生活则存在着各种变量。早在1949年冬到1950年春，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开始进行，原先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农村的发展方向问题就被提了出来；经历「三反」、「五反」运动以后，毛泽东重申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久就改变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

1 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向何处发展

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比较早。相当一部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抗日民主联军解放的地区，在1947年12月到1948年2月就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动群众开展了平分土地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东北的新解放区也先后开展土地改革，并于3月以前基本结束。少数开始得较迟的地区，在1949年春耕前也完成了土地分配，按人口每人分得三至五亩土地。

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他们起早贪黑，施肥除草，尽心耕作，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好收成。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东北农村的面貌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一般

农民的经济生活普遍有所上升：绝大多数(约占农户总数的70%左右)开始过上了以往中农的生活，家中粮食有了多余，结束了「糠菜半年粮」的穷日子，变成了「早晨金皇后(玉米疙瘩)，中午一六九(白面)，晚上玻璃秀(小米稀饭)」的好时光；生产必须的牲畜、大车、衣物、房子也均有增加；其中一小部分农民，除了添车买马之外，已有开始雇用长工，并发生了「单干情绪高，发了财没用处」的苦闷。一部分(约占20%左右)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大体属保持原状。另一小部分(不到10%或因缺乏劳动力或因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与马力，或者好吃懒做，经济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出卖土地或出租土地，开始借贷，开始去做雇工了。当然，出卖、出租土地与借贷的农民，并不都与经济下降有关，但确有一些是出于经济下降的原因。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变，农民的思想状况也发生变化：

少数上升比较快的要求买马拴车，其中许多人要求「单干」，对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要求他们组织起来感到苦恼。他们认为：只有单干才能「侍弄」好地；单干才能发财。因而，认为国家把他们编进互助组，是为了「拉帮」穷人，是因为他们发展太快了要他们「等一等」。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发了财有啥用？」于是，少数人进城吃「坛白肉」要「再来一壶」，有的买了貉(?原文为反犬+豪)绒帽子，不将资金投入扩大生产，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心怀苦闷，不如生产不积蓄，够吃够喝就行了。

那些经济虽然上升，但因车马不够拴一付犁杖的农民，虽然对某些换工插犊违反自愿两利的缺点有意见，但他们仍愿意参加变工，因为不参加变工就种不上地。他们希望通过变工使自己发展起来，将来买马拴车，实行单干。

有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民，则抱有农业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有的欠了别人的粮食，却说：我欠了你的粮食，但过不几年，还不是一同和你进入「共产社会」；看到别人买马，则说：将来走入社会主义，你不是一样没有马吗？！

在农村的中共党员及村干部中，不少党员经济发展很快，有些党员开始雇了长工，要求退党；有的党员因马多想雇工扩大经营，但又觉得党员不应剥削人，结果把马分散，参加互助组，说自己好好工作，生产上自己不准备发展了；有的党员到县里受训，听了党员不应剥削别人的党课后，回家准备出卖牲口，解雇长工、感到没有前途；许多党员不了解共产党允不允许群众雇工，许不许党员雇工。

对农村在发展中提出的这些新问题，领导农村工作的县区干部思想上也不明确。有的问：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究竟甚么样？农民应该经过怎样的道路走向富裕？甚么叫组织起来？除了组织起来以外，农村还要干甚么？

于是，农民有了独立生产能力以后，是否允许单干？允不允许富裕中农冒尖，上升为新富农？党提倡组织起来的方向与农民向往单干的现实在农村工作中如何统一？党员成为富农怎么办？等等问题就提到了中共党组织面前。

最早看到农村变化并提出明确对策的是时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洛甫）。1949年5月17日、22日、23日，张闻天分三次致电东北局并毛泽东，报告了他对农村工作的意见。张认为：东北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多数农民生活有改善；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农业人口向城市工矿转移；土地的所有与使用有趋于更加合理的新调整。「这些趋势是农村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要求向上发展的各种不同的表现。」

据此，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发展供销合作与劳动互助，进一步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为农村集体化准备有利条件；对农村已出现的阶级分化的情况，既不要粗心大意，熟视无睹，也不要过份夸大阶级分化的危险，表示恐慌，或采取不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以限制；凡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有利于工矿副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分业发展的租佃关系及土地买卖，不应反对；继续在各方面帮助贫雇农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并保护他们不受新富农的过份剥削。

对于农村的劳动互助，要反对强迫命令与放任自流两种偏向。承认

农民自发的插犍换工是组织起来的初级形态，并应帮助没有参加的农民组织起来，但组织形式可以各不相同，不能千篇一律到处生搬硬套。同时应该承认，有足够牛犍与劳动力的农民，有不参加插犍换工而独立耕种的权利；他们的土地不够耕种时，可以租入土地或出卖牲口农具。

党在农村的工作，不是强迫命令农民组织起来，而是着眼于农业技术上的改良与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以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党在农村中一方面允许少数新富农的产生与某种程度内的发展，同时必须为农村的合作化而奋斗，以争取农村社会主义前途的胜利。因此，应教育农村的共产党员成为合作运动的先锋与骨干，新富农的道路与共产党员是不相容的，农民党员如有向新富农转化的趋势，应事先予以警告，否则可自由退党，或开除其出党。¹

张闻天的意思很明确，已经出现的两极分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于有利于农村分工分业和生产力发展的土地租佃和买卖关系，不要反对更不要采用行政干预；党应帮助贫苦农民通过劳动互助组织起来，但不应强迫命令，也不要千篇一律地到处搬用，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指导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

身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持有另一种看法。1949年12月上旬，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长和县委书记参加的大型农村工作座谈会，对土改后农村情况的新变化，生产变工互助等问题进行讨论。12月10日，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高说，我们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使绝大多数的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则需要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仍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为此，高岗在批评农民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平均主义思想的同时，着重批评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路线」；他在承认要允许单干、允许雇工、允许借贷、允许土地买卖的同时，着重强调要在资金贷款、农具和良种供应、劳模评比等方面给变工互助组织以「优先」和「优待」；他在承认现时的变工互助必须是小型的，并且仍以农民个体经济为基础，与苏联

的集体农庄不同的同时，又提出互助合作在获得生产工具的改进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根据当地农业与副业生产的需要，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与干部的强弱，依据群众自愿的原则，“逐步提高为联组”。他指出，原则上不允许党员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

以上表明，高岗强调的重点是组织起来；他提出的各种措施，都旨在极力扶持互助合作的发展，遏制农民单干向往富裕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

东北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在1949年12月结束以后，高岗的总结发言于1950年1月4日在《东北日报》全文发表。《东北日报》还按高岗总结发言的精神以〈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为题发了社论。

同年12月31日，东北局组织部根据上述精神写了一个〈农村支部工作指示〉，并对共产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请示。1950年1月22日，中央组织部根据党当前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根据东北地区土改后农民的具体思想状况，从如何有利于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出发，对东北局组织部的〈农村支部工作指示〉提出意见，认为农村党员雇工或不雇工、是否参加变工组织，应该有他自己的自由，党组织不要强制，他们的党籍也不能因为雇工或不参加变工组而加以停止或开除。其理由是，如果在今天就过份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以及党员必须参加变工组织，并要求起带头作用，那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这种现象在松江省和黑龙江省的某些地方已经发生。而且，各地的经验已经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就不敢雇工，党员对生产消极，群众中的生产热情，就绝不可能动起来。据此，中组部的意见指出，对党员进行教育，当然要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要明确说明「单干」与「雇工」也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要告诉各级干部：「在今天农村的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地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15高岗：〈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1949年12月10日），《新华

月撤，1950年2月号，

页949—952。《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页398—399。

1月23日，经刘少奇签发，中央组织部将这个意见发给了东北局，希望他们进行讨论。就在这一天晚上，刘少奇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谈话，对怎样区分中农与富农、农民能单干是好还是不好、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条件、现阶段对富农经济的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1，

首先是怎样划清中农与富农的界限？刘少奇认为，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现在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现在这种农户在东北大概不会超过10%。其中真正够得上富农的，所占比例必然更少。这种有三马一犁一车的较为富裕的农户，几年之后，可能并应该发展到80%呢，其中能发展成富农的可能有10%。其余20%的农户是缺少车马的贫农。所以，现在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

如何看待今天农民要求变工互助？刘少奇认为，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他说，据说东北有7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参加变工互助的农户所以会有这么多，主要是因为个体经济的破产，农民不得不变工。将来经济发展了，个体农民都能独立生产，变工互助势必要缩小。他认为，这是好现象。它表明经济发展了，农民成为中农的更多了，能够单干了，这是应有的现象，70%的农户有了三匹马，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因此，现在既要宣传变工互助的好处，又要允许他单干。他还说，农民发展生产有了三匹马，还是可以变工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他还参加变工，才表明是真正自愿了。

有一种主张，就是通过变工互助以便将来发展成集体农庄。刘少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是巩固不了的。苏联开始集体化也没有机器，但是在国家计划生产之下，各农场已订了货，一二年内机器工具一定会来，因此集体农庄也就巩固住了。没有这

种条件，只有马和犁，坚持几年也是不可能的。刘少奇的意见是，我们现在的变工互助，供销合作社，具有教育农民的集体观念的作用，将来加上机器工具的条件，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

那末，对现实的富农剥削和农村出现两极分化怎么办呢？刘少奇针对当时工人失业，农村经济凋敝的现实，直接了当地说，现在必须有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今年关内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所以，现在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去限制。这不是自流。要等他发展到一定程度，三、五年之后，将来再限制，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交公粮等。但现在不要限制，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如果说，这就是放任自流，那么在现时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对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他都有三马一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对于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

党员成为富农后党籍怎么办？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首先是，凡雇人劳动，扩大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不能叫做剥削。而且，现在是私有制的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有暂时的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农庄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但是，一般的不会都能这样。他说，即使将来东北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而且，这一万人中可能会有五千是愿意留在党内的。现在才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并不是鼓励党员去单干。

很明显，刘少奇在这里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作了严格的区分，把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与党的现行政策作了严格的区分，把政策是否允许与共产党员是否应该又作了区分，特别是把多数农民

还不能单干的现实与若干年后才能发展成为富农的可能作了区分，其根本着眼点在于：尽可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就是党在农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在农村还基本上处于贫困境地的情况下，就耽心农民富了怎么办、党员富了怎么办？显然是过早了。即使真的出现了富农党员，也宜于「冷」处理，而不要「热」处理。

当时，与东北局高岗意见相同的还有华北地区的山西省委。山西省的大部分地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根据地。这里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抵御灾荒，坚持抗战，早就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经历。在山西南部的长治地区，大部分农村组织起来的农户都在5070以上，有的达到70—80免，个别村子有9070的。1947到1948年，相继完成土地改革以后，生产逐步恢复到抗战以前的水平，农民对组织起来的兴趣逐渐淡漠，以至使原有互助组织处于消沉、涣散、解体的状态。中共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对此十分重视，1950年分别派出调查组到农村调查，写出了〈老区武乡农村考察报告〉、〈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基本观点是，为避免农村两极分化，阻止互助组织涣散解体，要加强领导，进一步将农民组织起来。省委认为，调查组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

1951年3月，中共山西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对农村问题经过讨论认为，老区赓村，在继续改良生产技术、推广新式农具的同时，必须稳健、积极地提高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只有如此，才能基本扭转变散的趋势。」据此决定：在长治地区各县，每县试办几个农业合作社，采取按土地和劳动两个标准进行分配，征集公积金和积累公共财产。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长治地委随即召集全区互助组代表会议，落实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并将有关规定具体化，主要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分配标准，土地分红不得超过30%。，劳动分红不得少于50%[^]，公积金10%。，公益金5%。，教育基金5免；社内统一计划生产，统一调配劳力；社员退社，不带公积金、公益金和教育基金，土地及其它投资可全部带走。根据会上报名的情况，长治地委批准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的意见和做法，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在研究了山西的报告，并对比研究了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农业集体化的经验，认为有必要对山西提出的问题作一次实地调查。经华北局领导批准，政策研究室的调查组于3月下旬到达山西平顺县农村。通过对各方面情况的了解，调查组对办社中的若干问题，如：公积金的性质、社员退社应不应该将公积金带走、土地和劳动分红的比例、在没有拖拉机的情况下办合作社的作用等，提出了不同看法。调查组认为，互助组织仍是私有基础，公积金退社可以带走。山西省委明确表示支持长治地委的意见，指出分歧的实质是：「如何对待农民私有基础的问题」。省委认为，退社不带走公积金，虽然还不能根本改变农民的私有经济基础，但是对这一基础的一个否定因素，适当地动摇和否定私有制是可以的。

4月17日，山西省委正式向华北局写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专题报告，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18报告说：山西老区的互助组织，基础较大，历史较长，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畜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

接着，报告指出，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不是说目前已发展了多少富农，而是指富农已经是农民自发的一个趋势）。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另一方面的情形是，也有「不少」的互助组织，产生了新的因素。于是，报告断言：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办法是：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变涣散的趋势。那么，依靠甚么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呢？报告提出，最根本的问题有二：一是征集公积金，增强公共积累（按土地应产量征集；为全组成员所有；出组不带）。二是采取按劳动力和土地两个方面进行分配，

但土地分配的比例不能大于劳动力分配的比例，并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

报告在闲述公积金出组不带的理由时强调指出：增强公共积累，按成员享用，这一原则在互助组内的实践，虽然没有能根本改变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所以公积金应当是出组不带。

最后，报告总结说：总之，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的因素，在互助组织逐步地增强，它将使老区互助组织大大地前进一步。本来，华北局对于农村工作已有布置。3月17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了〈华北春耕中应当注意的八件事〉，明确指出了：乘春耕开始的时机，抓紧整顿和广泛发展劳动互助的组织；在已有互助基础的地区，则应在农副业结合的基础上，与采用新农具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相结合，以巩固与扩大互助组；至于在互助组内新出现的积义仓和伙买公共农具等现象，可在农民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较高的地区，适当予以提倡，但还不能普遍号召推广，更不可强迫一般互助组照办。现在，山西省委不只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写来了正式报告。由于问题涉及党的农村工作方针，华北局主要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认为有必要请示党中央分管日常工作的刘少奇。

在薄一波等汇报了山西省委的意见后，刘少奇指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认为，农村两极分化不可怕，农村还要继续向两极分化，分化到一定程度要组织贫农向富农斗争，待有了机器再实行集体化。目前应当巩固和确保私有，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意见是错误的。

刘少奇对山西省委这种急于否定农民个体私有制的倾向非常重视，他认为这是一种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对正在进

行的经济恢复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极为不利，必须引起全党注意，特

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重视。因此，从5月7日到7月5日的近两个月时间里，他在多种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阐明，现在是搞新民主主义，将来才能搞社会主义；必须先搞工业化，然后才能搞农业集体化的道理。

7月5日，刘少奇将向马列学院一班学员讲授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的课程。为使已经出现的急于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倾向，引起党内高级干部的注意，从理论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他决定将山西省委的报告印发给马列学院的学员，并为此写了批评农业社会主义的著名批语(后来被史家称之为「山西批语」)。刘少奇指出：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的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当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19

19(建8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像编》，页42。

山西省委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并不认同，陶鲁笱回忆说，山西省委此时专门派人驻京，准备检查。但省里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长治地区的干部从心里并不认为搞初级社试点是错误的，也不认同「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提法。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没办法了，王谦(长治地委书记)等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时间是在刘少奇公开批评山西省委以后。这封信还附了1950年至1951年上半年〈中共长治地委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几个报告，以及王谦从华北局五省互助会议回来后写的〈关于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全面介绍了长治地区试办农业初级社的情况。26

毛泽东得知华北局与山西省委的不同意见后，要杨尚昆通知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到他住处谈话。毛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气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²¹这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和政协共同纲领关于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决定。薄一波后来回顾当时的情景说：「他〔指毛〕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少奇同志还通过范若愚同志向马列学院一班收回7月5日下午在春耦斋发给他们的材料（即『山西批语』〔引者注〕」。²²

²⁰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笱访谈录〉，复的文1&，2008年第5期，页73。

²¹据说，毛这段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经过工场手工业阶段形成新生产力的谈话，是他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查了《资本论》后为他提供的。实践证明，陈伯达在这里为毛出的是一个馊主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手工工场比独立的手工业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指的是：手工工场实行了分工或分工的深化，工人反复进行同一操作，动作熟练，从而加速；由于劳动的方法不断得到完善，节约了变换劳动工具和移动工作地点的时间；为适应单一操作，工具不断得到改进，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具的改进、简化和多样化，又为机器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而农业则不同于工业。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同类作物甚至多种作物，在同一时期基本上是处在同一生长阶段上，需要进行同一种操作，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由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操作，也不可能由一个劳动者不断进行同一种操作。因此，工业劳动者基本上都要完成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各种主要操作。即：从播种、施肥，浇水，锄草，到收割。由于农业生产过程的这种特点，即便是实行集体劳动，也无法实现类似手工业工场中那样

全面的专业分工。农业生产，确有一部分农事活动，靠个人或一家一户的力量难以独立完成，需要进行互助协作的。但这只是农业生产全过程的个别环节。因此，简单协作并不可能产生新生产力。把马克思工场手工业的原理简单地照搬到农筑中来，是不准确也是不科学的。

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185—192。

不久，陈伯达奉命来到华北局刘澜涛的办公室，他向华北局的负责人和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陈说，对于〈供同纲！！〉中「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的规定，毛泽东认为，一边保护，一边也可以动摇。现在保护它就是为了逐步动摇它。毛泽东提出这样的质问：为甚么不能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对于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设想通过互助合作，用零敲碎打的办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质问：为甚么不能直接过渡，还要经过甚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1年9月，由陈伯达主持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肯定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经由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实行土劳分红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生产数据归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这也就是把个体农业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过渡形式和具体道路。23

紧接着土地改革以后（这时中国大陆的土改尚未全部完成），就要「趁热打铁」，通过以土地入股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始向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过渡，就实际上否定了允许私有经济在农村有一个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政策。

2开展大规模建设面临的难题

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顺利进行，使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工

23键业集体化重要文件集编〔1949—1957〕，上册，页37。

作有可能按照预期开始。毛泽东在1952年8月4日举行的政协一届常委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指出：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建设。这时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当然是国家的工业化。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臻于富强的关键所在，也是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备条件。

但是，实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对总体卜. 还很落后的中^来说，不能不碰到诸多矛盾，突出的是资金、物资和人才的短缺。24为使国家便于把有限的资金、物资和技术人才集中使用到重点建设I：去，就有必要强化国家实行集中统一调度的职能，1950年3月中央政府实行统一财经以后也确实显示了集中统一的效能。这与上亿户个体农民经营的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不能不产生矛盾，因为它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市场，是自由贸易。

在农村，一方面要求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能为工业化建设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另一方面又担忧农民自发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倾向。1952年，东北局农村工作部的农村调查中称：「新富农出现后，发展生产两条道路的竞争，在农民思想上，特别是在有三、四个马的富裕农民中走那条道路，就更加踌躇徘徊（因为他们有了单干条件），他就趋向单干的路，这也是必然的。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三马以上的户逐渐增多。我们劳动互助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所以单干户逐年增多，参加换工互助的户逐年减少，这是严重的自流现象。」25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在〈关于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和对策给毛主席、中央的报告〉中也说：「农村阶级分化之所以如此迅速明显，从党的领导作用方面来说，与互助合作开展不力，党在农村的政治工作不强，有极大关系；但是，其实际社会原因：在于个体农民自发发展着资本主义。这种自发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农村雇用劳动，债务剥削，土地买卖，租佃和典当，均有了发展；要求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政

策措施，给以必要的限制。不能放任自流、任其泛滥。」26同年7月，

中共河北省邯郸地委更惊呼：「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严重滋长，已经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27

与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主要是如何使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自1950年合理调整工商业以后，私营工商业进入了一个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得高额利润。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随后，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斗争揭露出的问题，强化了人们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一面的认识；行贿、受贿等在市场流通领域发生的流弊，也使人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活动范围的限制。这又促使中共中央领导人进一步考虑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用、限制问题。

以上表明，在有计划经济建设开始的时候，国家要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才资源，而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则需要贸易自由。如何处理国家建设同农民个体小生产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有计划建设同自由贸易的关系，就成了当时要有一个明确方针的重大问题。

3毛泽东重申国内主要矛盾

早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和毛泽东都曾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此后不久，1949年

7/1，刘少奇对这个判断曾有所补充和修正，指出，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在这个时期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将会逐渐加紧，但仍将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28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

再次强调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势力是人民的敌人’指出：「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当时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也是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29

农村富农经济的发展和一部分资本家的非法经营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看法的改变。1952年6月6日，他在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上批示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39 这虽然是重申七届二中全会的判断，但已趋向于把解决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主要任务提上现实日程。

鉴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鉴于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的国营企业和新建国营企业的力量日益发展，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43.87%，私营占56.27%，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67.3%，私营下降到32.77%，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国家政权和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也因此获得巩

28刘少奇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名义给苏共中央、斯大林写的信，1949年7月4日。

29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页397—400。

30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批语〉（1952年6月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202。

固和加强。在毛泽东看来，上述变化表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力

量对比，无论是政治上或经济上工人阶级都已占据优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已经找到了改造个体农业的过渡形式，^{1*}此，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步骤已成为必要并且已有可能，于是提出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与苏联政府领导人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³¹和苏联给予援助的问题。8月18日，周恩来在向斯大林报送的〈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就曾提到，根据目前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主要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确定从1953年起开始进行以五年为一期的国家建设，并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在这个提纲中，就提出了有关对私人工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在国家手中，在个体农业中积极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方针政策。³¹

周恩来于9月24日由莫斯科返回北京。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的情况汇报。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会议在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时，毛泽东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

31 〈编后节，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页693—694。³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3236—237。

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¹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³²毛还说：资本主义的「性钙也变厂，[^]新式的资本」：义：公私“钙，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

公开，财政公开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卓头上，离小'开共产党了」。「他们的丫头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以让其参加。」33

同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圈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斯大林征求意见。10月20日，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畏信，对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步骤、时间和实现的条件作了详细阐述。信中说：

「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人企业只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而在一九四九年国营只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人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在商业中，全国商品总值的经营比重，国营加合作社经营现在也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私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一，但在零售商业中私人还占百分之六十七。……在工业和商业中，国营比重现已超过私营很多。此外，铁路全部国营，银行几乎全部国营' 进出口贸易私人经营者也很少，全国主要商品已由国家控制，生产手段的生产国营已占百分之八十二点八。这是现在的情形。我们估计：再过五年，即我们执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后，在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再过十年，则私人工业会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在绝对数上则还会有些发展，因此，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和政府合作。

在十年以后，全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资款等，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

33 《毛泽东传0949—19760' 上册' 页237。

宁举人民共和^史第二卷11953—“551^{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一草甸社贫王我过；及的&

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

「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

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在中国，除开近代工业和农业外，还有广大的手工业。现在手工业的生产量超过机器工业的生产量，人民必需的制成品大部还是由手工业供给的。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业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分则会要被机器工业所挤垮。但我们在小手工业者中的情形和农民中的情形不一样，我们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建立了或即将建立党的组织，而我们在手工业者中则一般没有党的组织。因此，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会有更多的困难，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

刘少奇特意说明：

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³⁴

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中共代表团，表示赞同中共中央的意见。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³⁵斯大林的表态，无疑是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极大支持。

此后，毛泽东进一步在党内进行酝酿，他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论这个问题。11月3日，他说，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要有步骤：一要消灭，一还要扶持一下。1953年2月中旬，毛泽东沿京汉线南下视察。在专列上听取河北邢台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玉美汇报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情况后，毛得出结论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³⁶专列到达武汉，毛泽东接见了中共中央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少数领导人，着重向他们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记录，毛的谈话要点是：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35刘少奇：〈关于与斯大林会谈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央的电稿〔1952年10月26日〕〉，载《建国

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页533—534。36张玉美：〈毛主席邀我同车行〉，载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室、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河

北省档案馆编：《领袖在河30》（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74。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甚么？他们如何生活？X：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口、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I：作给饭吃。37

接着，毛泽东沿长江而下到达安徽省的安庆。在与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等的交谈中，毛泽东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扳起指头向大家说：假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已经完成了匕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卜项任务都做完」’，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38

1953年2月26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在湖北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毛说：甚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二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39

但是，直到1953年春，除了2月间中共中央将1951年12月〈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过修改作为正式决议，明确经由土地入

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将个体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外，对如何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国有化企业，从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中看，基本上还是到一定时候由国家采取征收的办法实

37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一存：湖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页2-4。

38傅大章：〈关于毛泽东同志1953年2月视察安庆时讲话的回忆〉，《理论战线》（内部刊物），1993年第96期。

39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1965年12月30日。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页249。行阙有化。至于如毛泽东所设想的走什么：‘逐步过渡的途径还有？进一步探索。

4利瓦伊汉南下调查献策

为了确切掌握建国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变化，研究和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具体途径，中共中央指派中央统战部部昆利瓦伊汉，率领包括由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负责人参加的调查组，于1953年3~4月间到武汉、上海、无锡、常州、济南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利瓦伊汉回忆说，通过调查研究，使我们对建国后私人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地位、作用等重大问题，获得了明确的认识：

第一，经过前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组，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已日益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相对削弱，但它仍然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对国计民生仍然有相当大的作用。到1952年，私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虽有下降，但仍占39.7%。在华东地区，其比例则高达60.7%。；在商业方面，1952年私商在全国零售总额中占64.7%。，华东地区占到73.17%。在整个私营企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占25.7%。，生活资料的生产占75.7%。这说明，当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可以为国

家生产产品，帮助物资交流，而且可以维持工人就业，为国家积累资金，训练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干部，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第二，尤其重要的是，三年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有显著发展，包括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使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1952年，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等占当地大型私营工业的比重，上海为59.57%，天津为70.7%，武汉为65.57%，西安为70.7%，沈阳为55.97%，广州为32.87%。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些形式，国家掌握了私营产品的主要部分，对稳定物价、发展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公私合营企业在当时发展还较微弱，其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5.77%，但在若干行业中其比重则较大。调查表明：各

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在各种不同方式下的联系和合作，而公私合营则是社会主义成份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份的合作并居于领导地位，因此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属半社会主义性质。在过渡时期的头三年，通过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控制力量日益增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地受到控制和削弱；这些私营企业已经不再是纯粹私人资本主义性质，而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的、并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了。其中的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它是由社会主义成份直接领导、同私股代表共同经营的企业，是最有利于领导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因此最值得我们重视。

第三，由于头三年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缺乏系统的总结和认识，不论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中级或高级形式，在政策思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生产经营、利润分配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加工订货缺乏计划性，资本家反映「来时涨死，去时饿死」，「来时急如星火，去时却如清风」；工缴利润偏高偏低，产品检验偏宽偏严，公私之间争议矛盾很多。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我们的工作更为薄弱，问题更多，对资产如何评估，公股代表如何领导，公私双方如何改善合作共事和搞好企业生

产，企业利润如何合理分配等等，都缺乏共同遵循的明确方针。不少同志对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从而对如何领导和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缺乏明确的方针和积极的态度。

4(1

调查组通过邀请各地党委和财经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结合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于5月间形成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5月27日，利瓦伊汉将报告上送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

40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页739—741。

报告详尽地分析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充分利用那些足供利用的资本主义的积极措施，以及目前存在而亟待解决的问题。报告指出：目前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上是「政治、经济工连之间不统一，财经国营内部也不统一」，「国营不顾私，各依需要，各行其是」，「限制干涉有人，解决问题无主」，继续下去也就是「继续乱下去’对公’私、劳、资各方都不利」。我们是分散主义，而资本家却是比我们统一的，因此就要给他们以钻空子的机会，据反映，上海资本家的战略是：「倚靠工商联，团结工商局，中立劳动局，孤立职工会，打击税务局」，值得我们注意。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统兼兼顾（公私，劳资均需要），而关键的关键更在于我们有统一领导。

报告结论：经验似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绩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它部分。所以建议：在目前集中地或着重地来解决我们同这一个主要部分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问题。41

关于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具体途径，一直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在考虑的问题。刘少奇在1948年所作的关于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中就曾谈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刘说：「甚么是国家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所谓适当条件，就是使资本家也愿意接受国家监督，如国家与资本家订合同，他们就愿意接受，不愿意而强制则等于没收。」「……在蒋介石被打倒后，中国资产阶级是孤零零的。因此，只要我们的条件适当，中国的

41利瓦伊汉：〈辟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给中央并主席的报告〉0953年5月2701，载《利瓦伊汉选集编辑组编：碎维汉8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页263—267。

资产阶级是可能接受我们的监督。只要我们的环境安定，又保证他们办厂、做生意的一定的利润，他们一般是可以接受我们监督的。有些资本家在我们监督下才敢于发财。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42陈云在，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谈到调整公私关系问题时说：「只有在五种经济成份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43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也曾谈到公私合营、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使私营工商业的性质发生改变。1952年10月，周恩来在问若干资本家代表谈话时也说：「将来用甚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但整个来说，具体途径都还没有摸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利瓦伊汉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利瓦伊汉回忆说，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他，说这份报告「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刘少奇、周恩来看了这个报告，也都作了赞扬。刘少奇说，中央

统战部的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周恩来说，我这段时间也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即利瓦伊汉[^]引者注)的报告解决了问题」。45

42《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劝，页52—53。

43陈云：〈辆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1950年6月6日〕，载《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页93。44周恩来：〈阁结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国民经济〉〔1952年10月25日〕，载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共中央文谏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页238。45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下册，页742、748。

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资本主义工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与1951年提出的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把个体农业逐步引导到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过渡形式一起，构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生产数据私有制改造的完整途径。

5总路线的完整表述

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一次作的完整表述、是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6月15日的讲话提纲，就写在利瓦伊汉为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内容是：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讲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

义企业。逐步

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份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⁴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史学界认为，最早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这段文字，就是出自这个提纲。现在有材料证明，这个文字表述的时间还要早一点。即在这年4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写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提纲中就有了这个内容，提纲写道：「农村工作总的精神，是生产的恢复和逐步组织起来的路线。」进而指出：「在十年

⁴⁶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1953年6月1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页252。

至十五年或更多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⁴⁷是否可以认为，在利瓦伊汉的调查报告之前，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已不再考虑像刘少奇给斯大林报告中所提的等将来采取一步国有化的办法，但具体途径还有待摸索，这正是中共中央委派利瓦伊汉南下调查的由头。

毛泽东在6月15日的正式讲话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作了全面阐述。他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之前，毛泽东曾说过，过渡的起点是1953年。在这里，明确提出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关于完成的时限，毛说：「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

接着，毛强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毛批评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毛泽东着重批评了「右倾」。他认为，「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最初写在周恩来1953年2月4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里。原文是：「以上这些成就（指建国三年来取得的成就[^]引者注），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毛批评说：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句话是1952年1月5日，周恩来

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讲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政策时说的话，周说：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要在国家经济领导之下的。因为他们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是有可为的方面亦有不可为的方面：有被允许发展的方面亦有被禁止发展的方面的。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容许发展；凡不利或者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不容许发展；凡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就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是《共同纲领》规定了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才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48

47毛泽东关于II村工作问题提纲手稿，1953年4月17日~20日。

48周恩来：〈「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1952年1月5日）〉载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82。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一化”）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毛批评说：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三是「确保私有财产」。此说出自1951年2月1日和3月II日，华东军政

委员会和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春耕生产十大政策的布告。核心是保护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获得的果实。布告规定：「凡在土地改革中地区农民分得之土地财产，非土改区农民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中退得之所有财物，政府一律予以保护，佃权予以保证，如有不法地主非法倒算胜利果实，借故夺佃者，依惩治不法地主条例严惩不贷。」1951年11月12日，邓子恢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做工作报告，当谈到1951年农业取得全面丰收的原因时说：首先是由于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正确政策，削弱与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其次是人民政府及时颁布了春耕生产十大政策确保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安定了他们的生产情绪。1952年3月22日，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布〈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十大政策的布告〉，进一步完善了对保护农民私有财产的规定，即：「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分得的土地、房屋、农具、粮食等斗争果实，一律归新得户所有，产权财权已定，不再变动，并允许各人自由经营，自由处理。」⁴⁹以上表明，「确保私有财产」，是出于保护农民获得的土改成果不受侵犯提出来的。

毛批评说：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⁵⁰第一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以上被批评为「右倾」的几句话，其实都是在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以毛说的和做的。这几句毛的思想，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和此后经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而是毛泽东所作的批评，实际是把建设新民主主义同向社会主义过渡对立起来，是对自己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批判，并对此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长远的影响。

对如何用逐步的方法，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

说：这对农业、手工业的集体化、合作化，比较好懂。如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好多人不懂。因此，毛着重讲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他说：

「我们根据过去四年的经验，资本主义企业中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私营商业，可以逐年桥掉。……向两边挤：（一）商业资本向工业挤，他们剩下的钱可以搞工业：（二）店员我们接受过来，先救济后就业。私营工业^社会主义因素也可以逐年增长。两种国家资本主义，都有社会主义因素。高级是公私合营，是半社会主义性质，或者社会主义因素更多一点。低级的是加工订货，两头和中间都卡住了。……不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十五年原封不动，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是逐年增长的。不要总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一块鐵板，看成是不变化的。」

「几年来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或者说多数，是可以教育的。他们是民主人士，可以教育。荣毅仁说，资本家分三种人，一是自愿进社会主义的，二是被拉进社会主义的，三是被社会主义扫掉的。他希望头两种人多些。」

「资本主义企业的数量不可忽视^其作用是不小的。它有工人和店员三百八十万，而国营企业也只有工人和店员四百二十万1超过它不多。资本主义企业数量很多，目前少不了它，而我们又有办法逐年把它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企

业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统蓄兼顾完全必要，以便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做国营企业的工”，集中力量搞国防’搞重工业。对资本主义企业不是置之不管，而是做教育工作，使资产阶级削尖脑袋要来找我们，可以逐步改造。」

「要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敌对阶级，不这样看就要犯错^。另一方面要看到资产^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不要忘记一个政治伴件就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因而我们有本领有能力来改造他们。」

「我们已经有了半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的经验1这给了资本家

一个榜样。过去我们是汉文帝的办法西向让三，南向1里再，不得已做了皇帝。今后公私合营每年都要发展。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在经济上大为优胜，就有可能吸引大批资本家要求合营。现在有了政治条件和经济优势这两条~使得资本家不能不服我们，不能不接受我们的领导，愿意同我们合作，愿意接受合营。现在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统一领导免得政出多门。」⁵¹

毛泽东的长篇讲话，概括起来，核心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那种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所以被批评为「右倾」，恰恰是不符「使资本主义绝种」这个根本主张的。

1954年2月6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报告说：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党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2月10日，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此后不久，这条总路线的内容，以国家总任务的形式写入了国家宪法。当年9月20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写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

⁵¹毛泽东：〈在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0953年6月15日1、参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页21—22。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⁵²最终完成了这条总路线由醞釀、提出到定型的全过程。对这条总路线的提出，中共党外人士的反应，以宋庆龄的意见最具有代表性，1955年11月，宋庆龄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及其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⁵³

三效仿苏联：总路线的目标模式

1总路线与列宁过渡时期学说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内容的理论依据，毛泽东曾明白地说过，「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54

所谓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指的是些甚么内容呢？在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的，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引用了列宁以下一些言论，主要内容是：

第一，过渡时期的社会基本经济形态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共产主义；与之相应，存在着三种基本力量，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无产阶级。而农民的小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得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简），页520。

53吴江：《政治骇浪六十年》（内部印行，[^]（^{^^}），页70。樽引自姚力文、刘建平：〈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炎黄春10[^]2009年第2期，页9。

5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页389。

以保存和复活的基础。农民经济有非常广阔、而且深厚的资本!;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

第二，过渡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

彼此进行极残酷的斗争。

第三，过渡时期的任务和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消灭任何人剥削人制度的基础，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使社会全体成员都成为劳动者，创立社会主义社会。

归结到一点，就是认为列宁过渡时期学说的基本思想是：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和直接目的，就是要把两种经济结构变成单一的经济结构。即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经济，而且要根本改造农民的小商品经济，以铲除任何人剥削人制度的基础，建成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

应该说，上述各点是列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阐述并进行实践的过渡时期学说的基本点《这些论点主要反映在1919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列宁曾称此为「直接过渡」的思想。同时，又应该说，这是列宁晚年摒弃了的过渡时期学说。因为，以上各点反映的是列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思想，而从1921年起，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并明确说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⁵⁵由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摆脱马、恩原有设想的框框，对过渡时期学说的重大修正，是一个战略性的改变。其主要的不同之点有：

第一，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过渡时期的首要任务不是立即按社会主义原则直接改组整个社会经济，而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基础的大工业。

1921年，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又说：当时（指1918年⁴引者注）我们把经济工作捉到⁴位，”⁴从一力⁴来看的。当时认为⁴

以不经过使旧经济适应社会主⁴经济的准备时期而直接过渡到社会1-义。我们曾经以为建立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一个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

列宁强调指出，在俄国的广大农村，到处都是几十里的羊肠小道，确切

些说是几十里几十里的无路地区，这样就把乡村和铁道隔离了开来，即和那联结文明、联结资本主义、联结大工业、联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隔离了开来。这些地区还「到处都为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性所统治」。「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情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不久，列宁又指出：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我们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了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党第七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既已提出提高生产力和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正确地对待这一任务，并且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一任务。

第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改造，不是采取革命的方式，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而应采取「改良主义式」的方法，通过曲折、迂回的中途途径实行过渡。」

1921年10月，列宁在回顾十月革命后党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时说：我们那时就认为革命的发展、斗争的发展，可能是通过比较短的道路，也可能是通过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但是，在估计可能的发展时，我们多半（甚至我不记得有何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可能这种推断并不总是公开表建的，但始终是默然意会的。接着，列宁指出，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

丫芊~^，口0)11^一&113"-

【。】？工I土我30；/!；

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列宁还曾指出：群众已经感到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

列宁把1921年春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称之为是「完全另一种改良主义式的办法」。他指出：所谓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振兴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振兴的程度而使它们有可能受到国家的调整。因此，与原先的革命方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列宁认为，在有千百万小农的落后国家，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采取一系列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包围」行动来解决这个任务。

第三，不再强调小农是资本主义复活的基础，而强调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认为不应当在小生产基础上奢想向集体化过渡，强调关心农民的私人利益，要通过商品交换建立工农之间巩固的经济联盟；强调作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是引导小农走向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

对于引导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在这个过渡时期，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善于采取满足农民经济要求的办法，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当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当大机器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就应当保证他们有经营自由。他还指出：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空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源改造过

来，那他当然是一个空想家。列宁认为：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周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经营自由。第二，需要供货商品和产品。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写道：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不可能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至于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列宁认为，作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是使私人利益、私人买卖利益与国家对此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并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好形式。他在〈论合作制〉中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把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做好。「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它特别聪明的办法。

第四，过渡时期中，在无产阶级国家的调节下，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容许自由贸易和发展资本主义，可以容许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进行经济竞赛。

1921年以后，列宁多次谈到，虽然1918年就提出过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有何种关系的问题。列宁认为：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

因此，列宁在〈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中写道：无产阶级国家只要不改变本质，在一定范围内，在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手续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是可以容许自由贸易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无疑，这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但

这显然不是原先那种政治斗争，而是一场经济斗争。在这方面，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学会经商。列宁说：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获得了完满结果的革命胆略和革命热忱与做一个干练而又有知识的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列宁强调指出：以为一个人既然作买卖，就有本领做商人。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对的。俄国农民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为了善于做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他说，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整个时代。

第五，党的工作重心不应该再放在政治斗争方面，【1/1】一应当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

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中明确提出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他在谈到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的根本改变时指出：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已经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此项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国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数据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非常困难的。

由上可见，不论从要过渡到的社会主义的标准或模式，还是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或道路来看，新经济政策同战时共产主义相比，都是一种新的、发展了的理论，其核心是「容许自由贸易和发展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对列宁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不能不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把列宁针对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阶级斗争白热化时期所讲的一些观点，当作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误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为了恢复面临枯竭的国民经济的一种暂时的、策略性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理论、新战略；误认为它并不改变以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经济为过渡时期首要的直

接目标。因此，从1929年起，斯大林就在实际上改变了新经济政策，采取强制手段征购农民的粮食，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富农，到1936年宣布以单一公有制和统一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已经建成。

2「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毛泽东早在1936到1937年间，在阅读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时，对书中谈到列宁、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论述写了这样一段批语：「苏联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生的基础是富农的存在。其它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只有通过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但有用内部力量解决此矛盾的可能。」表明斯大林的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模式对毛泽东来说，在那时已基本定型。他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在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同时，就把斯大林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成「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反映在〈总路线宣传提纲〉中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列宁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正是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的以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中心，建立以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目标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而不是列宁晚年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允许多种所有制结构存在、允许自由贸易，鼓励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以创造建立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基础的新经济政策思想。

基于上述的基本理论，〈总路线宣传提纲〉对过渡时期的任务，作了如下的具体阐述：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

义工业，并且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改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以建立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概括起来说：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对此，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一大段话解释说：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有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藉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多种工业和农业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56

这就表明，当时的基本思路是，只有把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个体劳动者的小生产私有制全部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单一公有制，才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这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理念又是完全一致的。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领导之下苏联宣布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无疑成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

1953年2月，毛泽东就曾号召全党、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他说：

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应该擷取甚么态度。尼？应该掾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牾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57

正是根据这个精神，中共中央专门下达了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全党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现在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1953年7月到1954年12月的一年半时期内，都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到第12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这个学习计划，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经验。」58

同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更明确指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学理论，我党的路线，基本上就是联共党史第九章的路线。」59「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当年最响亮的口号。因此，在〈总路线宣传提纲〉下发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第九至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关著作的高潮。这次学习运动，在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种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实行生产数据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结构（以国家占有为形式的全民所有制，以苏联集体农庄为组织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就是由国家实行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全社会的经济生活都由国家实行统筹〕。这集中反映了二十世纪50年代初仿效苏联的影象，也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延及了几代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56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批语和修改〉〔1953年12月7日、1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405。

历史的发展表明：无论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作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和搞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还是把苏联社会主义当作样板，都小—合乎中国国情，更不利于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创造性地探索中国 卍己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

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1981年6月27日，中共“卍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有过以下的论断：「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60经过二十年之后，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0949-19760》对此有了新的说法。《毛传》写道：

「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指〈总路线宣传提纲〉^引者注）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X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主义这个问题所达

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数据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⁶¹

以上评述，首先肯定了总路线是对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路线的改变；随后，作者没有直接点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但从〈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引出了一个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数据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而这个理论观点恰恰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作者评论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中心是阐明，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并对尔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毛传》对总路线的这段评述，是很值得人们关注的。

第二章

粮食统购统销和对私有制改造的
全面启动

一农业互助合作的最初方针

1 整党和对农业集体化的宣传

1 毛泽东：〈中央印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的通知〉（1951年12月1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578。

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在1951年12月下发的時候，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把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从1951年冬到1952年春，农村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对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的宣传。各地农村广泛进行了社会主义新道路与资本主义旧道路的对比教育；中共农村基层组织，还结合「三反」、「五反」开展了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批判在互助合作中的「右倾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1952年2月，政务院通过的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作了具体部署，除要求在全国范围应普遍大量发展互助组外，强调在群众互助经验丰富而又有较强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

7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49—1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章怪食统构统销和对私有制改造的全面启勅

合作社。具体指标是：老解放区要在今、明两年把农村4分之八、凡卜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新区要争取三年左右完成这一任务。2

根据中央的精神，《人民日报》从1952年初起，集中报导了各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展情况，专题介绍了一批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为使农民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道路的好处有直观的感受，1952年4月底到8月中旬，中央政府专门组织了由农业劳动模范组成的中国农民代表团去苏联参观访问。当年9月，《人民日报》在《苏联农民的道路就是我国农民的道路》的总标题下，集中发表了中国农民参观代表、团员到苏联访问的观感。其中有：山西的李顺达，山东的吕鸿宾，吉林的金时龙，辽东的吴凤歧，黑龙江的杨显亭、郭玉兰，内蒙古的莫日格策，松江的邓国章，河南的赵黑孩、辛自修，云南的李能，河北的郁善交，湖北的饶兴礼，广东的汪汉国等劳动模范和农村工作干部，大家异口同声地盛赞苏联集体农庄的高度集体化生产和大机器作业，农庄庄员过的美好生活，农业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只有集体化，才能使农民不走痛苦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走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

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说：

苏联集体化的农业真好。苏联地大，经过集体化之后，把土地集中起来，能充分地使用劳动力和机器。从苏联的经验看来，要集体化就要把小块土地联成大块，要制造大机器，要把劳动力组织起来。

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进一步发展就是集体农场。我们要把集体化的好处多多告诉自己的农民。我们要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多多积1公共财产，好好使用新式农具。我们要在广大农民中间树立集体化思想，同时要发展工业，制造农业机器。我们的农业要保证给工业足^的原料，而工业将供给农业以机器。全国全凶丰收模范耿14锁说：

苏联集体化农业的好处说不完。我们那袞常受旱涝的威胁。但在苏联，坡地不早，洼地不涝，都长得好庄稼。因为苏联不靠天吃饭。伟大的斯

大林改造自然计划改变着气候。防风护田林带、水渠和人造雨，使土壤保有充足的水分。这是我们亲眼见到的。

我们到过的乌克兰，那里集体农场有土地一两万亩的算小的，有一、二十万亩的很平常。我们看到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做着比人工效率高得不可比拟的工作。……集体化和机械化以后，劳动效率何止提高十倍。集体农民的生活真是令人羡慕。他们吃的是面包、肉-牛奶，星期天穿的不是咻叽就是烂子，睡的是钢丝床，房子里有自来水、电灯、收音机，柜橱餐桌齐备，每个集体农场都有俱乐部、图书馆、无线电转播站、电影场。集体农民一面工作一面唱歌。那里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大家都很快活。这种生活只有集体化才能得来。看了之后，真使人羡慕。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这种生活在中国实现。要使农民大伙认识这种好处，捐起手来干。

吉林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人韩恩说：

一看苏联农村，就觉得我们的道路是广阔的。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初步的集体化。苏联的集体农场是由无到有，由小到大。苏联今天的道路’就是我们明天的道路。……只要大家努力，那么苏联的集体农场离我们是不远的。

苏联集体化的经验告诉我们：由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到集体经营的农业，需要许多条件。第一是党的正确政策。第二是国家工业化，由工业供应集体化所需要的农业机器。第三是国家的指导和帮助，如通过国家农场和拖拉机站在大规模生产、使用机器和先进科学耕作方法方面给农民示范。

全国全面丰产模范卜’，鸿宾说

我们所看到的二十一个集体农场，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大部分都是从共耕社发展起来的。也有犯过急性病，建立过平均主义的农业公社。但那是个别情形。格鲁吉亚共和国卡布列提区

莫洛托夫集体农场成立时才28户，现在200多户。我们的互助组去年转为生产合作社。有些不明事理的人说，快吃「大锅饭」了。我们这次参教，看到苏联集体农场也不吃「大锅饭」。相反的，多劳动多得，少劳动少得，工作有定额，超产有奖励。中国农业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3

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团长张林池也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

在参观学习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农业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只有集体化才能使农民不走痛苦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走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4

1952年冬的互助合作高潮

随着决议草案精神的传达，各种教育运动的催化，宣传舆论的导向，激起了农村干部和贫苦农民的极大政治热情，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互助合作运动在1952年得到了飞速发展。据统计：1952年底，全国互助组发展到802.6万个，参加农户达4536.4万户，占总农户数的39.9%，比上年翻了一番。以土地入股、土劳分红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3634个，参加农户5.72万户，占总农户数的0.17%。5

运动的急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不顾实际的急躁冒进倾向。主要表现是不少干部和贫苦农民反映出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把集体化比作「归大堆」；有的则认为集体化是第二次土改，抱着「生产不如斗争，发家快」的动机积极参加。在华北地区，不少地方办社存在着「宁多勿少，宁大勿小」、「越多越好，越大越好」的错误思想，违反农民意愿，胡乱地多办社、办大社；有的地方盲目扩充公共财产，将牲口、农具等全部归公，有的甚至连棺木寿材、老羊皮袄也归了社；有的地方还发生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河北省大名县五区堤上的两个社，在街上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向群众宣布：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走社会主义的在桌上签名入社。咱村就这两个社，不入这个入那个，凭你自由选择，反正得入一个。6文集村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

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他们把村里所有的磨坊和大车控制在社里，以不人社不让使用的办法强迫群众入社。这些错误做法，造成了群众的思想混乱和生产情绪低落，有的地方已发生卖牲口、砍树、杀猪、大吃大喝等现象。

东北地区，盲目追求高级形式，忽视初级形式和消灭单干的倾向也有发生。一些干部、党员说：只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与集体农庄才是新道路，其它都是旧道路。有的提出「组织起来消灭单干，谁要单干政府来见」等口号。有的地方不分党内党外错误地提出「反雇工、反剥削」的口号。中南地区也出现了冒进倾向，在发展互助合作中相互攀比、互不服气；一部分积极分子与劳动模范为争光荣而盲目带头；有的因政府对互助合作组织扶持过多，群众眼红，为争得政府扶持而组社。已建立的互助合作组织，自愿互利政策贯彻不力，平均主义思想相当严重，不尊重私人财产权。

产生以上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容易出现大轰大嗡，但重要的是对甚么是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甚么是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同现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区别与联系，没有弄清楚。

3调邓子恢做廛村工作的总司令

为加强农村工作，1952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省以1：委员会建立农村工作部。各级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帮助党委掌握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方针，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中央同时决定，由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陈伯達、廖鲁言为副部长）。

邓子恢于1953年1月抵京赴任，毛泽东亲自约请这位早年在闽西就在一起战斗的新任部长谈话，交代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与邓子恢一同受到毛泽东接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对当年的情景有如下记述：

毛泽东说：你们好啊，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主持全国的农村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央这个文件，大概你们都知道了。文件正式提出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行互助合作的时候，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折它。接着又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我们计划在10至20年之内完成这个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你们有甚么意见呢？

邓：好啊，我们就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你要做农村工作的总司令。

邓：不敢不敢，总司令是主席你，我们给你当助手。

主席问当前情况如何，邓老说：中南区的互助合作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全国老区和东北等地互助合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搞得很好。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学习。

主席说：杜润生同志，你所了解的农村情况如何？

我说：土地改革以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很单薄，也有思想顾虑。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

邓老插话：河南提出允许「四个自由」，发布告示，让农民放心。这个布告还是好的，起作用的。

我接着说：现在到了春耕时节，但农村有点不安定，主要是对合作化还不摸底，不知怎么发展。在新区，人多地少，经济规模更小了，但是政府下达的要求又非常多，基层干部叫做「五多」（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反映强烈。

毛听了以后说：这些情况很重要，你们第一件事情就抓这个吧07

要把几亿农民组织起来，逐步走上集体化，这是很大的事情，也很复杂，在某种意义上讲，比工业化更困难。邓子恢告别毛泽东出来与杜润生说：看来合作化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大方向了，我们不好再说甚么。但是十五年还长，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在细节方面，即在步骤和政策策略上多用心，多替中央操心。8邓子恢这番话，显然是表达了一种不宜操之过急，要在十五年内逐步过渡，稳步前进的心情。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看·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页25—26。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页26。

2月9日，邓子恢到部机关与大家见面，并发表讲话。他告诉大家：我刚来时，毛主席告诉我，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点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针对机关有的干部不安心做农村工作的情况，邓子恢说：我们干部中有一种思想，看到国家搞工业化，就认为农村工作没有前途，想跳出「农门」入「工门」，

这种想法不对。要知道，工业化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农业要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开辟市场。我们的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然后指出：在农村，各地情况不同，工作基础不同，工作不能强调统一，不能希望一个命令普天下执行，要从实际出发，尊重下面的意见，使他们敢于给我们提意见，反对我们也没有关系。9

邓子恢根据中央的路线、方针，根据他对农民群众的深切了解，明确阐明了引导个体农民走向农业集体化的思路。主要之点是：

第一，互助合作运动要从农民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他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农业集体化的「复杂」和「困难」，就因为其基础是个体农民。个

体经济必然产生私有观念，组织起来很不容易。正如列宁说过的，消灭农民的私有观念，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第二，农业增产，主要靠农民的积极性。他认为，我国农业产量三年就恢复到了抗战前的水平，首先是因为土改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增产任务，也还是靠农民的积极性。为此，他提出了三条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办法：

其一，要认真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和应得的权益，这是我们与农民搞好关系的重要一条。他认为，农民爱国，是因为国能保他的家（私有财产）。如果不能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就不可能这么爱国，也不一定跟毛主席走。我们一些干部因为在土改中否定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就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也不尊重了。在互助组、合作社里，侵犯农民的所有权，是不对的。工农联盟受农民拥护，就因为农民的财产受保护。

其二，要固定农民的负担。他认为农民爱国慷慨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限度就不一定了。不管哪种负担，都要有分寸、计算到农民的负担能力。

其三，买卖公平，贸易自由。他说，现在很多事情搞不好，如供销社包收棉花、可又包不了，农民拿扁担打供销社干部；提倡养猪，农民养了又卖不出去，阉家买不了，又不让私商收购；对生产计划不要吹得太高。把价格弄好，价值法则就可以起作用。靠价格政策就可以指导农民按国家计划生产。不能要求农民一定种甚么，一定增产多少，不要替农民订生产计划。农民计算得很清楚，干部不要自以为很聪明。农民不积极，一切计划都是空的。搞不好，会暴动。

第三，对农民只能说服，不能强迫。他认为，离开了群众的需要和可能。就不会有真正的说服教育。说了不服怎么办？只有等待农民觉悟，决不能强迫。在互助合作这件事上，放任自流的情况是有的，但现在主要是要求过高，操之过急。工业化还要十几年，你急甚么？这事不能只靠宣传鼓动。还要群众自己的体验。农民要根据多次切身体验，对自己确实有利，而且能办得到，他才干。群众有先进，有中间，有落后，不能认为干部懂了，积极分子懂了，大家就都懂了。宣传工作，主要在先进分

子中起作用。

第四，互助合作，必须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邓子恢指出，土改后农民还有很多困难，最适合组织低级的互助组，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自然会要求更高的形式。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仍然是要坚持的。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发展互助合作。没有拖拉机，集体农庄决不要搞，只会搞坏。在现有条件下，农业合作社超过三十户就不易搞好。上边要求过急、过高，乡村干部很难办，成了「豆饼」，两边压他。乡村干部脱离了群众，也就是党脱离了群众。这是天大的事情，一定要注意。要按部就班地安排工作，使农民能安安稳稳地从事生产。不然，出了问题，就要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去稳定局面。那样，工业化又怎么搞呢？「左」了，急了，很危险，会动摇国家的基础——农联盟。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时候，减产20%多，牲畜死亡一半（1000多万头），农村动荡，不得不抽调大批干部下乡。我们不能重犯这个错误。⑩

邓子恢所阐述的这些思想的中心，就是：承认和保护土改后农民的私有经济，在此基础上调动积极性，引导农民组织起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步过渡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农业。

⑩参51《邓子恢传》，345—457。

4 务必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

邓子恢刚上任，便敏锐地发现，1952年冬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思想混乱，影响了农业生产。3月8日，他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其它负责人一起向中央作了汇报，说明去冬今春在农村中虽然有些地方存在着放任自流现象，但主要的倾向是比较普遍地发展着的急躁冒进倾向。因此建议：在农民中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打消他们怕「归公」的忧虑，安定农民思想；对干部加强教育，克服急躁

情绪。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决定立即采取措施进行纠正。

3月8日当天，中央发出〈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中央指出，目前各大区已经提出的这些数字「现在看来都嫌过高」。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农业增产主要还是靠农民群众积极性与互助合作，靠兴修水利与若干新式农具和初步的技术改良。如果计划一开始就订得太高，完成不了，将大大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关于互助合作发展计划，中央认为，「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因此，〈指示〉分别提出了压缩计划指标的要求，互助合作在五年之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80%左右，新区控制在70%左右；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均控制在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新区平均控制在12%左右，常年组新区控制在30%左右。¹¹

3月14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的批示中，又一次明确指出，在互助合作方面如果采取急躁冒进态度，上级计划过大，要求过高，必使下面发生强迫命令现象，结果不仅影响农业生产降低，而且将要影响我党与农民关系，影响工农联盟之巩固。¹²

3月16日，195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¹³指出：当前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是加紧春耕的准备工作和开始进行春耕生产，其它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并结合春耕生产来进行。凡是影响和妨碍春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的任何工作，均应改变，推迟或缩小甚至取消原来的计划。〈指示〉强调：在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时，不要忘记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体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正确地解决农民的个体与公共利益的问题，稳步地循序渐进。任何急躁冒进的方针都会损害春耕生产，因此都是极有害的。针对农村工作中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再次指出：「在农村中取消雇用自由、借贷自由与贸易自由，企图完全排除富农发展的可能性，这在今天对发展生产也是不利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3月17日，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向毛泽东呈送书面报告。说明：自去冬以来，比较普遍发展着的主要倾向，是急躁冒进和对互助合作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这一特点认识不足。具体表现是打击单干农民，侵犯中农利益，强迫编组，满足单纯的形式主义，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试办合作社贪多贪大，增加公积金和公共财产，因此；在个别地方造成牲口落价、杀猪砍树、大吃大喝、破坏生产的严重现象。为此，报告提出：应使干部从思想上明确：中国农村还是广大的小农经济占优势，要改造这种小农经济，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必须配合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长期耐心的工作。当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中央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指出：最近各地均发现在农业生产工作中，有许多突出的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这种错误屡纠屡犯，实有一重大原因，这就是党政机关在布置任务时对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这些本质的特点认识不足，不予照顾。因此’应教育广大干部，使他们深刻认识，在向农村布置任务的

丁平/廿：（、1巾一&1IV，》一 1。』千工，土我^及

时候，在农村进行工作的时候，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时刻记住并11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多强调自「而上，集中群众要求，因地制宜，而不可强调12上而下’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1519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再次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它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而为其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16

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邓子恢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起草、经毛泽东审改的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社论将中央上述一系列指示精神概括为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按照中央指示切实将生产任务当做当前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反对工作上的平均主义和分散主义。第二，按照中央指示「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改进对农业生产运动的领导方法，使之符合于农村经济的现实状况，反对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央就同一问题接连发出如此之多的指示，是很不寻常的，足以反映当时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问题的严重，也足以反映中央对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视和紧迫。

根据胡乔木〔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的提议，中央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以及人民日报社论三个文件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毛泽东定名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并亲自代中央起草了按语。按语指出，这些重要文件「提示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时所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各级党委务须指定一定时间组织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包括从事政治工作的、财经工作的、文化工作的、人民武装工作的各方面工作人员，来一次认真的学习。中央希望通过这一次学习，能将上述各种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在全体规模上提高一步，以保证党在农村战线工作中的不断胜利」。1953年4月1日，《当前农村工作指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毛泽东写的这段按语、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对邓子恢和他主持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协助中央做的大量纠正偏左工作的肯定，以及对他们提出的许多重要见解的评价。

中央这一系列指示的下达贯彻，尤其是《当前农村工作指南》的发行，引起各级党组织的重视，使党的政策在各地农村得到了广泛宣传，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5 保护与改变私有的辩证

就在纠正急躁冒进的大背景下，4月13日至2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在会上首先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用十年、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引导几亿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的设想，提出了改造小农经济的长期部署和当前措施。

会议期间，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时，毛泽东说：允许富农经济存在，不是不加限制。互助合作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增加，也就是限制富农发展。甚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富裕中农怕「冒尖」，我才高兴。并对「确保农民的私有制」的说法提出批评，他说：保护是可以的，「确保」是不可能的。¹⁸

邓子恢将毛泽东的谈话原原本本在会上作了传达，对如何具体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会议的最后总结中作了全面阐述。他说，今天农业生产的发展，要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有两条道路、两种办法：一种是让农村资本主义漫无限制泛滥发展的道路；另一种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

17《当前农村工作指南》〔1953年4月1日〕收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彙编》，页131。18参见《邓子恢传》，页461。

中的困难，使大家富裕的道路，|”]时也就是缩小富农的剥削范围，又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和中心环节：领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大家富裕的道路。他认为，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克服生产困难，减少自然灾害，促进生产；另一方面在互助合作过程中就为将来集体化准备了条件。他根据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精神，对如何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提出以下重要思想：

其一，要按部就班，慎重稳进。他认为，对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当开始。但是，要在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众多的农业人口中完成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今天的互助合作，对于农民小私有者，一方面要改造他们，一方面又要

适应他们，适应是为了便于改造。过急不行。因此，互助合作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根据群众的切身体验，根据干部的领导能力，由低到高，按部就班，慎重稳进。绝不能单纯凭主观要求，只照我们的理想去干。其二，互助合作是改造经济，不是阶级斗争。因而同过去搞战争动员、搞土改不同。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来对待互助合作运动。

其三，要兼顾贫农和中农的利益。一方面要照顾中农，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否则，会使贫农对上升增加顾虑；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贫农吃亏。

其四，吃大锅饭必须反对。他强调，合作社吃大锅饭必须反对。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是共产主义，今天办不到。硬要搞，一定搞坏。合作社必须是按土地、牲口、农具、劳力来分配，分到的粮食由各人自由支配。

共同消费一定要纠正。共同生产也不能「时时互助，事事合作」。

其五，当前主要危险是急躁冒进。他认为，急躁冒进和放任自流两种偏向今天都存在，但就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险。

其六，尤为重要，必须把向社会主义过渡，同继续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统一起来。他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是总方向，不能怀疑。所谓「确保私有制」是对的，因为对农民的生产和

数据的私人所有制是要积极加以改造的，农民现在的这种私人所有制必须逐步由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来代替，小私有制能确保。似乎又不叫大就能一下子改变过来，而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完成。对农民的私有制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去解决，不能过急。分了土地给他，就不能又随便剥夺，必须依法保障这种所有权。他强调，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否则，就会造成群众恐慌。据此，他提出，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还必须做到：第一，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二，相对地固定负担；第三，限制富农剥削，允许富农存在。因此，笼统提出「四大自由」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但是雇用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

贸易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又是允许的。

总之，他强调必须把当前政策和发展方向联接起来又区别开来，既稳定农民积极性，又有利于按总的方向前进。这就是保护私有权与改变私有制的辩证统一。19

会后，邓子恢对有的地方在互助合作工作上出现自流苗头，又及时指导纠正。1953年9月，东北农村工作部报告中提到，由于对党的政策宣传上的片面性，引起了对小农经济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和领导上放任自流态度的萌芽。邓立即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批转各省农村工作部，指出：右的自流倾向和「左」的冒进倾向，同样都会破坏互助合作而助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必须始终注意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克服「左」右偏差，以保障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同时，邓又建议中央批转华北局给中央的报告，并代中央起草批示。10月4日，中央批转了〈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及当前工作任务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总结这次纠正互助合作运动偏向的经验，积极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同时明确指出，华北局「确定当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

中心环节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从全国范围来看，互助组依然是适合广大农民群众生产要求和文化水平的一种合作形式。

20

由于及时纠正了偏差，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从全国范围来看，1953年互助组虽然由上年的802.6万个减少为745万个，但参加互助组的户数则略有增加，由上年4536.4万户增加为4563.7万户。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秋收的时候有1.5万多个，包括农户27.5万户，平均每社18.2户。21

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

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农产品不能满足国家高速推进工业化需要的矛盾立即暴露了出来。市场机制，是千千万万个体农民和私营商业生存的基本条件，国家为保证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粮食和，产品，不得不选择从排斥市场机制入手，即对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

1粮食供求的紧张形势

195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3278亿斤，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的9.3[^]。但全国人口平均粮食占有量只有570斤。由于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在旧中国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因此，随着土地改革获得土地的农民，在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同时，首先要使自己的生活会得到改善。根据统计：1949年全国农民的粮食消费量人均均为370斤，1952年增加到444斤，平均每人增加74斤。1952年全国农村人口为50319万人，共增加粮食消费量370多亿斤。²²可见，农民手中积存的余粮还是很有限的，据1953年河北省委对丰润县农民手中的商品粮和余粮的调查，全县农民平均每人积存余粮仅30斤左右。²³所以，整个来说，粮食生产量虽有较快速度的增长，但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是农民用于自身的消费和储备，国家需要的商品粮不仅没有随着生产量的增长而相应提高，相反却在下降。粮食上市量及征收量占生产总量的比重：1951年为28.27%、1952年下降到25.7[^]。²⁴

从中国历史上粮食产量所提供的商品率来看，1953年城市对粮食的需求量并没有超过1936年30%的粮食商品率。195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390亿斤，以30%的商品率计算，商品粮即可达1,000亿斤。因此，对这时粮食商品率陡然下降的原因，金觀涛、刘青峰着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有如下分析：

1953年春天，土地改革已全部完成，而粮食供给短缺则出现于1953年秋

季。当时国家需要商品粮700亿斤，而田赋（农业税）只有275亿斤，两者相差431亿斤。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是土地改革必然带来的后果。经过全国土地改革，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七亿亩土地和其它生产数据，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大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本来，这700亿斤作为地租的粮食大部分可转化为向城市提供的商品粮，供求保持平衡，但现在这些粮食却大多为自耕农自己消费或存在家中。²⁵

随着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开始实施，1953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比1952年增长75.96%，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30%（其中重工业增长

²²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页68。²³新华社河北分社22日讯：〈中共河北省委对丰润县农民手中的商品粮和余粮的调查〉，

《内部参考》、第250号，1953年10月26日。²⁴《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页68。

²⁵金觀潘、割青峰：《开放中的变迁一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页420—421。

³⁷，轻工业增长27%，对外贸易总额比1952年增长25.27%。工业和基本建设迅速增长，必然带动城市人口和工资总额的较快增长，1953年城市人口为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比1952年增加663万。新增的城市人口，除自然增殖外，主要是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他们则由过去粮食的生产自给者转为由国家供应粮食的消费者。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经济作物区不断扩大，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和其它缺粮农民有近1亿人口，也需要由国家供应粮食。²⁶粮食商品率的下降和需要国家供应量的迅猛增加，这就是粮食供求紧张的主要原因。在1950年全国统一财经以后，粮食市场是由国营公司定出的粮价牌价来调控的，即国营公司利用雄厚的资本，根据社会需求和经济政策制订出一个市场牌价，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牌价时，国营公司就大量抛售；当市场价格低于牌

价时，国营公司就大量收购，以此来平衡粮食价格，使其不致有过大波动。但到1953年粮食市场需求明显大于供给时，一方面农民出于惜售心理，将粮食待价而沽，国家无法按合理价格收购到足够的粮食；另一方面，由于市价高于牌价较多〔当时湖南、江西、山东、河北等主要产粮区市价高出牌价30—50%〕，不仅私商见有利可图，参与抢购、囤积，而且大量农民也进入粮食流通领域，参与贩运。于是出现粮食投机商与国营粮食部门争夺市场的严峻局面。例如：

26《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页69。

江苏省苏南地区，投机商利用变相提价，拦路收购等方式争购新稻，1952年10月、11月间，个别地方的私商收购比重高达90%以上。江西省吉安市，1952年12月18日到22日五天内，上市的稻谷全被私商收去。1953年，江苏省徐州专区各县，当黄豆上市时，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即以合理的价格挂牌收购，而私商王雨农、马彦清、陈生、黄荣等从无锡、苏州等地赶来抢购。他们与当地的粮商和粮贩子联合在一起，深入农村进行抢购，其中王雨农在邳县、新沂等县的集镇安排十多家代理店，抢购黄豆50多万斤，陈生用抬高价格的办法，一次购进黄豆6万多斤。私商还在农村用预付款的方式购买青苗、禾花谷，1953年“黄不接”之际，湖北潜江县腰河乡被私商买去1000多斤；浙江省温州专署请在温州蒲门乡36个村调食，化74%的青苗或禾花谷。粮食投机商预购青苗的价格，一般比牌价低20—30%，有的则低达40%以上。¹¹

粮食投机市场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国家统购统销计划的实现，致使粮食供需矛盾更加尖锐。从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如河南省洛阳、许昌地区，群众纷纷出售棉花、生猪，抢购小麦。到12月份，情况更趋严重，抢购粮食之风由局部地区蔓延到河南全省。1953年上半年，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粮食。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竟发生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购买粮食。抢购粮食的风潮，导致粮食的国家牌价与市场严重脱节。1953年春天，江苏省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7%，有的地区高出307%。河南、江西、安徽、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的粮食市场一般高出牌价10—207%。

由于市场价高于牌价，在产粮区国家也难以购到粮食。如江西赣州地区稻谷牌价每百斤5.05元，私商抬高到5.50—5.80元，使国家粮食收购量由原占上市量的70%²⁷，下降到29%²⁸。湖南、湖北两省的产粮区，国家收购的粮食所占的上市量也由60—70%²⁷，下降到10—30%²⁸。到了夏季，情况更趋严重。在受灾地区、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有的地区有数千人以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队争购粮食。

据《内部参考》报导，中南地区的商人和农民所以把他们的资本大量投入粮食市场，原因是1952年新粮上市以来粮食调整过季节差价；调整商业后，不少地区粮食的收购差价达到百分之十几，农民自然愿买不愿卖。而中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粮良差价高达44%²⁹，私商成车皮的从中南把粮食外运。再加上有的工商行政部门对粮食市场管理废弛，更加剧了抢购粮食的争利现象。²⁹

27 《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页69。28 《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页70。
29 新华社中南总分社讯：〈中南粮食巾一场呈现紧张混乱局面〉，《内部参考》第100号，1953年；1月22日。

国家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全国1952年的粮食征购量比1951年增加14.67%²⁷，销售量却增加了44.77%²⁸。1953年10月，全国粮食销售量比1952年同期又增加31.37%²⁹，其中大米销售量增加59.5%²⁹。粮食主产区的东北地区，1953年10月比1952年10月粮食销售量增加43.27%²⁹；中南地区增加44.97%²⁹。一方面粮食销售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是收购量完不成计划，到1953年9月，全国粮食收购量只完成计划的80.1%²⁹，西北地区只完成计划的46.7%²⁹。30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粮食储备已严重不足，市场供应形势日趋紧张。

由于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商品，如果任粮食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发展下去，就会出现某些地区供销严重脱节并导致物价全面上涨的局面，这不仅影响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更会影响社会的

稳定。

2周恩来致电陈云商讨对策

30(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页70。

31 啄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84’ -

鉴于1952年7/1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只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长8.97%。；而因城市人口和工业就业人口增加，需要支出粮食587亿斤，比上年度增加31.67%。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31 针对粮食供求紧张的形势，中共中央在1953年上半年51出一系列缓解性指示的同时，毛泽东要求中财委拿出一个解决办法。中财委会同粮食部经过研究，草拟了〈粮食收购办法〉、〈粮食计划供应办法〉、〈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办法〉和〈节约粮食办法〉，并于6月15日提交全国财经会议粮食组讨论、修改。经过讨论，大家认为，问题很大，办法不多，难以为继。最后汇总出八种方案：0〕「只配不征」，即只在城市搞配售，农村不征购；（力「只征不配」，即只在农村搞征购，城市不配售；^「原封不动」，即继续自由买进，自由卖出；「临渴掘井」，即先自由购卖，实在买不到时，再去重点产粮区征购；⑤「动员认购」，即层层下达控制数字，而控制数字不告诉农民，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认购量不达到控制数字不散会；（^）「合同预购」；、，、「不搞统一办法，由各地方自行其是」；（^）「又统又配」，即统购统销。32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有的提出，为减轻中央的压力，增加地方及时处理粮食问题的机动权，建议粮食由中央统筹统支改为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地区的调剂由地区间互相协商。有的主张维持原来的办法，但可略为增加一点地方的机动数。事关体制的变动，为慎重起见，周恩来致电在浙江莫干山疗养的陈云33，倾听他的意见。周在电报中说：

三年来，在粮食问题上采取慎重政策，由中央统一集中管理，得以渡过

难关。自去年下半年，由于疏忽，加以今年部分地区发生灾荒，致粮食紧张。今后若干年，此基本情况尚难改变。会议中乃有改变管理与供应制度的提议，同时亦有主张维持原办法，可略增加地方机动之数者。……此事关系颇大，你过去考虑较深，请提出意见，以便中央通盘考虑作出决定。请视身体情况简覆。34

早在1951年底，陈云在考虑1952年的财经工作方针和任务时，就曾提出可否采取征购粮食的问题，并为此向中央报告说：「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贝I」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1952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

成功，即于1952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35后因地方负责人感到粮食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故而1952年未作征购试点。此时，接到周恩来的电报，陈云不得不作进一步的思考。在认真分析了财经会议上地方负责人的不同意见后，陈覆电周恩来说：

六月二十三日电悉。关于粮食的管理与供应，我主张维持原办法，但要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略增地方机动性。如果把由中央统募统支改为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则各大区、各省为了各自保护自己方面的需要，余粮者必然希望更少调出，缺栈者必然要求更多调入，其结果很可能发生下迷两种情；；兄：

- （一） 上缴粮不能达到中央要求的数量，使我们处于被勋地位。
- （二） 地区之间的调剂，因一方要得多，另一方供得少，而不能达成协议，仍然要求中央作决定，甚至形成地域之间互相封锁（此种情况一九四八年在北满，一九四九年在馈浙之间都发生遏），市场发生混乱，后果可能更坏些。

如果本次财经会议或在中央主张榨取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办法，我建议，为慎重起见，必须先对下述两点作出决定：（一）各大区、各省上缴中央粮食数量（连同品种）的具体方案（我现在还说不出中央究竟掌握多少为好），（二）各大区之间调剂的数量-品种的协议草案。在此两点未确定前，以暂缓实行新办法为稳妥。36

周恩来和全国财经会议接受了陈云的意见，继续维持原来中央统簿统支的办法不予变动。但是，不解决粮食自由市场的问题，国家仍无法改变粮食收进少，销售多的局面。1953年7、8、9三个月，国家收进粮食共98亿斤，超过原定计划7亿斤；销售粮食124亿斤，超过原计划19亿斤。37粮食缺口在继续扩大。3毛泽东天安门城楼拍板

1953年7月23日，陈云提前结束疗养，返回北京参加后期的全国财经会议。会后，随即集中精力与粮食部和中财委有关负责人研究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根据各方面提供的有关数据，陈云对粮食的购销情况作了精密的计算。这就是：本粮食年度原定的340亿斤粮食收购计划，到9月底只购得近100亿斤，10月到12月要收购160亿斤，明年1月到6月要收购80亿斤，才能完成计划。重要产粮区东北，原定上交粮食42亿斤，因灾只自认上交14亿斤。其它地方也有完不成计划的。这样，本年度粮食收购计划显然无法完成。另一方面、本年度的粮食销售数量需要567亿斤，比原计划480亿斤要多87亿斤。加上收购比原计划减少30亿斤，差额将达到117亿斤。即便收购计划全部完成，87亿斤的差额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38

对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自问：增加粮食税向农民多征公粮？不能，因为国家实行的是「少征多购」的方针，公粮的收入只能减、难以加；减少由国家在市场上的粮食销售量？也不能，因为城市和集镇人口的吃粮必须按数供应，农村灾民和缺粮户的口粮也必须由国家供给，这样才能保持市场的稳定；减少粮食出口？这也不行，每年32亿斤的出口粮，主要是用来向苏联等国家换机器和向锡兰（现斯里兰卡）换橡胶的，否则

国家就不能取得外汇购买急需的物资和设备；能不能减少库存的储备粮？同样不行，若是从老库里挖历年存粮来弥补差额，其结果将会是吃净卖光，这是十分危险的。可见，不采取断然措施，粮食的紧张形势不仅无法缓解，且范围将会不断扩大，由乡村到大城市，这不但造成人心恐慌，建设计划也将受到严重影响。经反复斟酌，权衡利弊，陈云认为：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才是解决问题的可靠办法。39

38 《陈云传》，上册，页844。

39 《陈云传》，上册，页844—845。

据杜润生回忆：「陈云提出是否可以实行计划购销，即统购统销，农村统购，城市统销。他在1953年连续召开了几个会议。最初酝酿召

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一”】“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章粮食统购统销和对私有制改造的全面启动

99

集掩食部部长章乃器、商业部部长曾山、中央农工部的我，一起商量。曾山没意见，章乃器不大赞成。我建议可不可以改采购为『随税派购』，即不封闭市场，不要取消私商，生产正在发展，过几年农民吃饱了就会卖的。陈云未置可否。他开会是为了多方听取不同意见，再决定取舍，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当时陈云也认为『双细是两难相衡取其轻的措施。』

~

为慎重起见，陈云打电话给正在外地的薄一波，征求他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

财经会议后，我离京去外地做农业初级社的调查研究时，陈云同志曾通过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的选择，但希望在农村征购时不要过头，除给农民留足口粮、种籽、饲料外，最好还给留点机动粮。41

陈云的意见，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大力支持。于是，陈云决定向毛泽东汇报，听取他的意见。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的会见厅里，陈云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粮食征购和配售的办法。毛泽东听后表示赞成，当即拍板定案。并嘱：由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由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薄一波回忆说：1953年10月2日凌晨，毛主席审改了陈云同志起草的通知，并决定于当晚七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2日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首先报告了粮食问题的紧张形势，然后提出，农村征购、城市逐步采取粮食配售、严格管制私商、逐步消灭粮食贩子等应对办法，以及关于召集全国粮食紧急会议要做好的准备工作。陈云的意见在会上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表示：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毛说：「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付出粮的，一面是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毛还指出：「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是农民不满，第二是市民不满，第三是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宣传问题。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报纸一字不登。」42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通知〉规定：华东局谭震林，中南局李先念，华北局刘澜涛、刘秀峰，西南局李井泉，西北局马明方，东北局张秀山必须参加会议。43

4中央召集全国粮食紧急会议

10月10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在北京举行（为了保密，会议对外未用「紧急」二字，以免引起恐慌）。陈云在会上作了报告，⁴⁴其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1〕详细分析了粮食购销形势。陈云通过对1953年粮食供求关系具体的分析，提出：由于粮食的需求量逐年上升，不可能减少，而农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量也在增加，因此粮食供求紧张将是一个

⁴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页295—297。

⁴³练云俯，上册，页846谈到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时说：「通知规定华东局谭霖林，中南局李先念，华北局刘澜灏~刘秀峰，西南局李井泉，西北局马明方必须参加会议。」唯独未提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张秀山参加会议的详情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¹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页302—303。

[^]陈云：《昧云文[^]!》，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页203—217。

长期的问题。「现在，全国粮食问题很严重，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还要更加严重。」「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如果波动两三个月粮食贩子就可以增加几百万。」对粮食市场混乱的后果，陈云说：由于吃的消费在劳动者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约占收入的60—70[^]1，粮价一涨，物价就要全面上涨，物价一涨，工资就要跟着上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人心恐慌，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老百姓叫好的物价稳定这一条，就有丢掉的危险。因此，应该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解决。②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陈云提出，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一是国家与农

民的关系；二是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三是国家与商人的关系；四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在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陈云说：

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抹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伏。

在对中财委拟的八种方案逐一进行比较，对其利弊作了说明之后，陈云得出结论说：「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它办法都不可行」。而重点是征购。他进一步解释说：「粮食不充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乱的局面必然越严重，我们也就越是被动。」如何实行统购统销。陈云说：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甚么毛病，会出甚么乱子。全国有26万个乡，100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因此必须细致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使农民不致因不能自由支配粮食而影响生产情绪。对于征购办法，陈云提出征购与征收公粮一起进行；征购数量也比照农民所缴公粮为标准；关于征购价格，应实行公道价格，既对农民合适，也对国家有利。使农民可以得到一部分季节差价，即征购价格略高于市价。在充分估计向农民征购粮食的难度之后，陈雷说：

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关于征购的依靠对象，是区乡干部和党、圈员。对于城市的粮食定量配售，陈云提出按人口发给给证〔来不及发给给证的先用户口证〕，配给等级开始可以粗一点，以后再细。

实行统购统销后，如何管制私商和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陈云提出：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国家对与粮食有关的私营工商业应加强管理，除了粮食加工厂、食品加工厂可继续加工但不准从事粮食买卖外，对于从事粮食投机的粮食贩子则予以严厉取缔，对从事粮食买卖的私商，则逐步将其改造为国家销售粮食的代理店。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陈云提出，既要改变过去统一管理时地方上没有积极性不負責任的毛病，也要改变分管以后所发生的只顾局部和地方，不顾整体和国家的毛病，在粮食问题上应确立中央统一筹划、地方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邓小平在陈云报告之后作了补充发言，邓指出，农村征购，城镇配给，严格管制市场和集中统一管理的四项政策，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他着重说明了只有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才能真正巩固工农联盟，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保障国家建设计划的实施。

参加会议的各大区有关负责人在讨论中一致表示，赞同陈云提出的方案，认为实行征购和配给，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

谭震林根据华东地区在会前的讨论，结合陈云提出的方案，认为征购配给，势在必行。谭说：华东粮食购少销多，紧张局势由北向南

发展，最严重的是山东，已过了陇海路，再不采取措施就要「百万雄师下江南」了。基本原因是农民惜售和私商捣乱。对粮食管理，赞成由中央统一管理和统一调拨；地方负责征购，保管和供销，做到分级负责。

李先念介绍了中南地区各省对征购、配给的态度。李说：最初是两湖拥护。两广犹豫，河南动摇，江西'态度不明；以后河南、江西也拥护，唯两广收购尚好，且系新区，要求缓办半年。李认为，外省征购-配售，必将波及两广捧食市场，故仍以同步进行为宜。最后两广亦赞同。李对中南的粮食形势分析说，湘'豫、赣三省保产，两广和鄂三省增产，全区较1952年的粮食产量增加4.27%。总的形势是好的。但进入新的粮食

年度，购少销多的形势仍在发展，粮食紧张。原因是：农民生活提高，粮食消费量增加；私商囤积；中农余粮多，但贮存观望，等待高价。结论是：必须采取行政手段，干预分配，实行征购和配给，以扭转粮食局势。

李井泉代表西南地区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对粮食采取征购配给的方针。李指出，国家采取的定额征购，不是余粮征集制。国家控制的余粮只占80—90%。，还有10—20%的余粮在农民手中，加上农民历来有互通有无的习惯，因此，全部一下子卡掉，完全关闭粮食自由市场，恐不可能。李认为，应该允许有限制的粮食自由贸易。对私商问题，不准私商自由经营粮食，是杜绝捧食投机的有效措施，完全赞同。

刘澜涛认为，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体现。刘说，华北地区7、8、9三个月小麦收购仅完成56%。，销售计划则大大突破。北京天津这三个月里销售的粮食占全年计划的一半，市场上投机猖獗，牌价、市价脱节。因此，急待采取措施，以稳定局势。对于粮食征购和配给政策的贯彻，刘认为，有国家的法令，合理的价格，征购数量有一定的限度，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全党动员，全力以赴，只要政策执行端正，就既取得到粮食，又可得到农民。

乌兰夫说，内蒙古粮食较好，对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可以超额完成。主要问题：一是收购价格较低，应适当提高，以维护生产者的利益；二是运输难，可规定一个义务运输里程，超过义务运输里程的国家付给运输费用。

东北的张秀山、西北的马明方都表示拥护中央对粮食采取的措施。张秀山还结合东北的具体情况提出，东北农产品价格较低，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偏大，应作出调整。⁴⁵

10月12日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有关全国粮食会议的问题。13日，全国粮食会议由陈云作总结报告。陈云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的意见。陈说：「毛主席昨天晚上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章乃器先生提出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我们把『征购』也

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接着，陈云就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对付私营粮商、粮食管理等问题分别做了说明，重点谈了计划收购问题。陈说，关于计划收购的数量，需要专门开会研究全国粮食收支的平衡问题，这次会上提出的数字，不作最后定案。关于计划收购的覆盖面，陈说：「毛主席提出来，是50%的样子。就是说，在农村50%的人口中间，进行计划收购。他又说，这五十里头又有重点，其中25%是粮食更多一点的，就应该更多收购一点；其它25%就少一点。」关于计划收购的价格，陈云提出：「对农民来说，收购价格应该是合理的、适当的，不要使农民感到又要计划收购，又是杀价」；「对国家来说，不能长期赔本」；对城市人民来说，粮价要稳定，「变动次数不宜太多」。此外，关于计划收购方式、标准和办法，中央和地方在粮食管理上的分工等问题，陈云也都一一做了说明。邓小平也再次到会讲话，着重讲了粮食问题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

5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1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一化”）——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章 粮食统购统销和针对私有制“改造”的全面启动

《决议》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概括为：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计划供应（简称

统销），亦即是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控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管理四项政策。〈决议〉认为：「上述四项政策，是互相关联的，缺一不可的。」实行上述政策，不但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更加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⁴⁷

上述认识表明，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看来，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已不单是解决粮食供求矛盾的一项措施，而是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直接联系起来，成为对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步骤，于是，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农业合作化的方针也随之改变。

为了顺利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中共中央比较充分地估计了可能出现的问题，详细考虑和制订了具体的政策和办法。

⁴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页479。

关于1953年粮食的征购数量，主要从两个方面作了计算：一是国家需要掌握多少粮食。根据1953年的粮食供求情况，估计国家需掌握700亿斤商品粮，才能有把握控制市场，满足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居民的需要。二是农民能够拿出多少粮食。1951和1952年农民每年实际拿出的粮食均在600亿斤以上〔1952年农民缴纳公粮和卖给国家及私商的粮食共约670亿斤），而1953年产量又略高于1952年，加上过去三年丰收，农民手中存有余粮。因此，计划征购431亿斤（加上农业税收粮食275亿斤，国家掌握的粮食可达705亿斤），估计能够完成。根据这个计划，农民仅比上年多拿出30亿斤粮食，比上年增长4.48%。，不到当年粮食总产量的17%。平均每户多拿出约26斤，若抛开要吃返销粮的缺粮户、非种粮户以及经济作物区、牧区、林的近1亿人口，则每个农户提供的商品粮比1952年增加就不止30斤了。

关于征购的具体办法，中央规定：①统购价格必须合理，国家规定统购价格时，以大体维持现有的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以不赔不赚为原则。②统购价格和统购粮食种类，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以便于合理地规定地区差价和调节品种比价，消除粮食投机的。③统购价格必须固定，以克服农民存粮看涨心理。在既定的收购数字和收购价格下，农民可分期交粮，分期取款，对于后一种情况，可由银行给予较为优厚的利息。④实行统购时，必须加强农村的物资供应，使农民出卖粮食所得之现款，能够买到生产和生活必需的物资。⑤统购面应稍宽，不宜过窄，才有利于完成统购任务。⑥实行统购必须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采取由上级下达控制数字（即指针）和群众民主评议相结合，乡、村两级的控制数字应公布，使群众心中有数。

统销的具体办法为：（一）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人员，可通过其组织实行计划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本购买。（二）在集镇、经济作物区、灾区及一般农村，则应采取由上级颁发控制数字和群众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使真正的缺粮户能够买到所需要的粮食，而又能适当控制粮食的销量，防止投机囤积。（三）对于熟食业、食品工业等所需粮食，旅店、火车、轮船等供应旅客膳食用粮以及其它工业用粮，则应参照过去一定时期的平均需要量，定额给予供应，不许私自采购。

11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94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1月23日发布。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决议》和《命令》从12月初开始贯彻实施。

根据中央《决议》提出：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首先在党内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向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讲清道理。然后通过他们去向农民讲清道理……必须大量抽派得力的能够掌握政策的干部，到农村去。中央局、省委、地委及各级政府的负责同志在计划收购的时间

甲入！丹：四疋一10—10， 16】，工，土我回；厌

第二草筏贫赖-1刊刺？1逸的10玖？力

内除留少数人处理日常工作外，应亲自到下面去，研究情况，掌握政策，创造并及时推广经验，尽可能地减少偏差和错误。特别是对于农村大约10%的落后地区和落后乡村，尤须十分注意掌握，并派得力干部坐镇，因为这是最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各省'市、区根据中央的要求从11月底和12月初开始组织力量，深入农村开展动员组织工作。中南地区及其所辖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的中共党政领导机关，绝大部分都由第一把手带头，组织大区、省、地、县、区、乡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共330万人，经过短期培训，深入农村进行工作。华北地区仅山西一省就投入130多万人，其它各大区和省组织的人力，也都以百万计。

具体的工作方法和步骤是，分别召开乡以上各级干部会议，以区或乡为单位召开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进行学习动员。然后以乡为单位召开中共基层党组织和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再召开群众大会。按照中共中央拟订的〈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宣传要点〉内容，集中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以及统购统销同总路线、总任务的关系。除通过各种会议，进行讲解外，还利用其它多种形式，配合宣传。如：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出动82个电影放映队，把宣传内容制成幻灯片，走村串户进行放映；还组织大批戏刺、音乐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等文艺队伍，深入居民区或田头地角，用演唱等艺术形式，向农民宣传中央的政策。四川省还出版发行宣传材料300多万册，散发农村。广西省灌阳县一区，利用图片、实物举办展览会，深入农村，巡回展出。形象地说明：国家为甚么要收购粮食；增产节约，把更多的余粮卖给国家；卖粮得的钱用到哪儿最好。该区仁合乡中共党支部书记范双德说：「起

先不懂得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的道理，看了展览后，受到了教育，保证回去发动群众，出宝余粮。」结合多种形式的宣传，逐步动员农民自报出售余粮数和开展民主评议工作。这时'再由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带头响应，出售余粮。如：东北辽西省双辽县朱家村共产党员费连发是互助组长，他动员全组14户提前出售应宝余粮；吉林省蛟河县大西屯劳模军属、人民代表王思惠把应宝的2500斤余粮卖出后，义带动全村农民多宝余粮，其中仅14户就比原订计划多卖8630斤。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把自己1000多斤余粮卖出后，上告毛泽东，表示坚决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48

全国粮食的统购工作，到1954年2、3月间各地相继结束。原定从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应获得粮食709亿斤。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这一粮食年度内，国家实际收入粮食784.5亿斤，超过计划75.5亿斤，使库存有了较大幅度增加，粮食供求紧张的形势终于缓和下来。

中央在部署粮食统购统销的同时，由于食用油、棉花、棉布的供求关系也趋于紧张，并且短期内难以缓和。因此，趁粮食统购统销之机，于1953年11月1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对油料实行计划收购、食油也相应实行计划供应。根据粮油统购统销的经验，1954年9月14日，政务院接着发布〈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规定：生产出来的所有棉布「一律由国营中国花布公司统购、统销，不得自行出售」；棉农应「将所产棉花，除缴纳农业税和必要的自用部分外，全部卖给国家」。自此以后，「私营棉花商、贩，一律不得经营籽棉、皮棉的收购和贩运业务」，其从业人员将由有关部门安置。

6 乡村干部和农民对统购粮食的反应

48所引资料均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81-83。

实行粮食统购、名为征购余粮。实际情况是：1952年全国人口平均粮食

占有量只有570斤，全国农民人均年消费粮食4^斤，还要从事家庭副业，如养猪、家禽和少量的农产品加工和扩大农业再生产用、因此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余粮。如前所述，1953年河北省委对丰润县的调查，全县农民平均每人积存余粮仅30斤左右。而征购的办法，虽说是说服教育在先，但把粮食统购与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联接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政治压力；所谓民主评议，更形成一种群众

压力；基层干部动用粗暴的行政手段，也并不鲜见。对当年的情形，薄一波有过一段回忆，他说：

正如陈云同志所预计的，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

了聚幕闹事的事件。毛主席在1960年说过：50年代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有两次同农民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第一次是1953年。当时，从经济方面来说，华北地区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把农村初级市场统死了。粮食统购以后^{除忻州、运城、唐山等少数地区以外}，绝大部分地区的初级市场陷于停顿状态。这给农村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山农民间的余缺调剂停止了，原来部分缺粮农民能通过调剂解决的问题，现在得由国家背起来；^{商业}销售受到重要影响，销售计划完不成，农村货币回笼不上来；

^{不少商版停止活动}农村的土特产都收不上来。49

因此，这种与农民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措施，不能不引起农民以及与农民有密切联接的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和抵触。

1953年10月召开的湖北省党代会就反映：「在讨论农民自发趋势联接到征购时，一般农民出身的干部顾虑很大，固然已认识到国家掌握粮食的重要性及不掌握粮食的危险：但都认为我们依靠农民取得了胜利，农民出人出粮出负担，贡献大，有功劳，今天又要征购其余粮，是整农民，是过河拆桥，这样不但将影响其生产积极性，且将引起农民不满，这也

说明，有些干部对征购措施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把农民利益同国家利益还不能统一起来。」⁵¹¹

据新华社四川分社反映：「四川省各县在11月上旬先后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布置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从会议反映出来的情况看，一般区乡干部对此抵触甚大，思想斗争剧烈。^乡干部最||遍的反映是：统购统销使农民吃广亏。他们说：农民一年;’’，到，即使有点余粮，政府也不该打他们的主意。认为党对农民的态度已经『变』了。有的甚至说^『土改搞地主，五反搞资本家，统购统销搞农民。』他们怕因此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发生大吃大喝破坏生产的现象；怕破坏了工农联盟。关于统购统销工作应依靠谁的问题。他们认为：过去在农村中搞工作，可以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现在搞这工作，不管贫雇、中农，都『吃射』，那么又依靠谁呢？团结谁呢？他们耽心统购任务完不成，有的甚至怕农民会『造反』，发生流血事件。有的还怕国家把粮^统购调走后，将来本地发生灾荒没办法；有的又顾虑过去自己曾向农民宣传过『保护私有』，『四大自由』，现在搞统购统销，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⁵¹

这种不满在中共党内上层也有反映，其中不赞成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意见，以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薛迅、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为代表。⁵²据河北省委关于「薛迅同志在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报告中称，薛迅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是向农民「进攻」，「死也不赞成」。薛迅主张以「打掉私商、预购、储备和在自由市场收购来取得粮食的办法代替中央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直到1957年，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对统购统销政策持不同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7发展互助合作方针的改变

关于在农村实行互助合作的方针，1953年春曾强调农村工作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互助合作要稳步发展、并仍以发展互助组为主。毛泽东在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阐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

曾召见邓子恢、杜润生等谈话，对甚么是新民主主义、甚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向他们作了说明。毛说：「新民主主义就是在桥

51新华社四川分社讯：〈陕西省产麦区广民对统购思想上抵触很大〉，《内部参考》，第277号：1953年11月26日。

52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335。

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5—1956）向社会主义过渡

二、李劫人：《李劫人“私”》第2：适的“启勋”

111

上，就是过桥，不是跳过去，要一步一步走过去。说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不正确。意思是说，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渡时期。」对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杜润生回忆说：

我们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阶段」，是五种经济并存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因而不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就开始对非国营经济成份加以削弱。毛主席在此次会见时还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自愿的。我们国家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面就有改造农民的任务。……谈到这里，主席留我们吃饭。席间，他又讲了一个重要观点：共产党必须一贯坚持搞好工农

联盟，但建立联盟的基础过去靠民主革命土地革命，今后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合作化。53

这说明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毛泽东对农村的关注点已移到合作化这一方面了。

粮食统购政策的实行，所面对的是千千万万的个体农户，不仅是头绪太多，而且要说服农民将余粮按固定收购价交给国家，也非易事。而如果使农民都参加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来，粮食统购的对象由个体农户转为合作社，则粮食统购工作就好做得多了。毛泽东在10月2日讨论粮食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进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基于上述认识，中共中央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就明确把实行粮食统购工作与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联接起来，把它看成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步骤。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立即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以改变春天确定的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环节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并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指导思想明显与现实形势不合拍，仍停留在保护个体农民利益的新民主主义立场，必须予以批判。

为开好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于10月15日召见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邓子恢正在南方调查研究，不在北京），要求加'决互助合作的发展，并以发展合作社为重点。他说：办好农业

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办好一到两个合作社。要分派数字，摊派。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以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甚么不可以？可以的。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

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宝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

1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一”⁵向社会主义过渡

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上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55

当时，邓子恢正在外地考察，廖鲁言、刘瑞龙(农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先后去信向他通报了毛泽东10月15日的谈话精神，邓当即感到毛泽东对今春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看法有变，并要将发展互助合作的中心环节由中央刚明确的互助组转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于是，邓赶忙给中央写报告，表示同意中央提前召开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重新议定互助合作的发展计划。但他仍向中央提议，合作社户数一般仍应

有控制，贯彻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的原则。

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由廖鲁言主持于10月26日到11月5日举行。会议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在会前的谈话，与会者听后一致认为，毛泽东对这一次会议的指示是切合时宜的，完全拥护；认为今春农村工作会议纠正了各地互助合作运动中存在的急躁冒进倾向是有成绩的，但在此后，各地又都轻重不同地产生了小心拘谨与稳步不前的现象。因而，毛泽东的指示「恰切而及时地纠正了这种现象，把今后运动引向积极发展」。各大区负责人在会上汇报了本地区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提出今冬明春的和五年的发展计划，认为毛泽东关于总路线的指示大大提高了与会人员的思想水平，更加强全体党员今后在实际工作中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的重视，使人们今后再遇到各种错误观点时，有了批判的武器。与会者检查了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所谓「松劲自流」现象，指出，在今春纠正互助合作运动的急躁冒进倾向后，各地都曾一度发生轻重不同的松劲自流现象。主要表现为干部在纠正偏向与进行组织整顿之后，畏缩不前，该发展的也不积极去发展了，该宣传的也不积极去宣传了。会议简报点名批评了河北省大名县和山西省黎城县，指责大名县去冬今春一轰而起搞了40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纠偏时又一轰而散，只留下50余个，这种地方的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的

55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5日、11月49〕，载《毛泽东文，第六卷，页298—30】。

113

第二章粮食统购统销和对私有制改造的全面启动

互助合作积极性，已受到挫折，&至迷失了方向。会议最后讨论了第二个互助合作决议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

会议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央农村工作部均及时整理成简报，报送中央领导。根据会议反映的情况、毛泽东于11月4日再次约见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批评了当年春天的反冒进，并明确提出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题，要以这个为纲。他说：「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毛尖锐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他说：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贷款，发救济粮……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毛强调说：

「有句古语，『纲举目^』。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

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申一切都有统属了。」

「总路线就是逐步^^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

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⁵⁽¹⁾，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一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了。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56

廖鲁言在11月5日会议结束时，向大家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也就是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总结。

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应的高涨。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为着进一步

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决议〉认为，农民〔主要是中农〕本身具有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而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步上涨，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就愈来愈带着明显的、不能忽视的性质。由此可知，党对于改造个体的小农经济，发展农业的互助合作，必须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而不能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决议〉具体指

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试办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显示出十大优越性：

第一、解决了互助组中难以解决的矛盾，特别是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第二、实行土地统一经营，能够因地制宜，进行较合理的、有计划的分工分业的劳动，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集中经营，就有更大的劳动力量和经济力量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和基本建设，有效地逐步扩大农业的再生产；第四、能够节约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发展副业的生产事业，从而加强农民的经济地位；第五、实行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能够大大地鼓励农民对于劳动和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六、能够有力量保证贫农和中农的团结，也就能够更有效地与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活动和贫富分化的现象作斗争；第七、能够逐步地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在供、产、销方面更好地和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便于逐步地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第八、可能更多地和更快地带动个体经济向互助组发展，并为更多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开辟道路；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得到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很好的学校；第十、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时候不感到突然，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变化所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据此，中央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日益变成为我们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的环节。各级党委有必要更多地和更好地注意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准备逐步试办

和逐步推行、继续贯彻「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以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前进。目前许多地区的党委在这方面注意太少，缺乏领导或没有领导的状态，必须加以改变。

在重申了农业合作化必须遵循自愿、互利的根本原则；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及若干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具体政策的同时，〈决议〉规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数字。即：从1953年冬季到1954年秋收以前，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由现有的14000

多个发展到35800多个〔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各大区提出的计划总数为32500个〕。其中、华北由6186个发展到12400多个；东北由4817个发展到10000个，华东由3301个发展到8300多个；中南由527个发展到3600多个；西北由302个发展到700多个；西南由59个发展到600多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即到1957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争取发展到80万个左右，参加的农户应争取达到农村总户数的20%左右（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各大区提出的计划总数是70万个左右，占农户总数的16.7%）。57

三对私营工商业的全面改造1实行统购统销后的私营商业

据1952年统计，中国私营商业有坐商187万户，人员437万；摊贩222万户，人员253万；还有行商30万户，从业人员33万，共约有720多万职工和大小老板。58

1952年「五反」运动以后、公、私商集总体上就呈现公进私退的局面。国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后，更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联系，排除了资本主义商业在这些商品的流通和分配方面的活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私商所占比重显著降低。到1953年底，国营批发商业的比重达到70%左右。国营商业在全国零售商业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4.11%，上升到1953年的41.47%。这样，旧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国营商业对整个市场的统一管理和对私营商业的领导和监督得到了加强。私营零售的主要部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进货，而必须依靠国营商业、合作社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在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时，陈云就说，这是一个关系到城乡生活的许多方面的重大措施。实行这些措施后，中国市场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范围已经大大缩小」。「这种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改组，为国家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前提。」其直接结果是，国营商业排挤和代替了私营批发商。59具体情况如：上海市私营商业共有214个行业，总共114000多家，从业人员有539000多人，流动资产共值3万多亿（人民币旧币，下同）。其中批发或以批

发为主的有11000户，从业人员64000多人，资金2万多亿；零售或以零售为主的有103000多户，从业人员475000人，资金1万多亿。1952年国营和合作社与私营商业的比例是：总的销售额中公占44.387%，私占55.177%。、批发中公占54.897%，私占45.117%。但到1953年第四季度，国营和合作社商业与私营商业的比重已有了较大的变化，总的情况是「公六私四」，批发是「公七私三」，零售是「二八」比例。1954年第一季度情况更有发展，国营和合作社继续上升，私营批发不但被排除，继续迅速萎缩，甚至一部分或相当数量的接近垮台。零售方面，国营和合作社也较快上升。总的销售情况公私比例恐怕是七三比例，批发是八二

李定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1页192。

比例以上，这还是保守的估计1 保守的估计能是八五与一五比例零已到一七比例，这也是保守的估计

武汉市的报告中称，私营商业方面，根据十二个5点行业大中型户的统计，10)3营业额较9月份平均减少16.37%，11月份较10月份继续下降22%。原因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主要商品的流转已掌握在国营公司手里，国营的批发阵地扩大了；从本年8月份起武汉市对主要粮食和杂粮的大量贩运，从运输工8上加以限制，实行统购政策以后，城乡之间的资本主义联繫更少了，许多小土产和副食品产地的国营商业与合作社也控制较紧，代替了私商的城乡贩运；在外贸方面，一方面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减少，另一方面有进出口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也直接与中央对外贸易部打交道，这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武汉的自由市场；再就是加强了市场管理和粮食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措施，使农民和中小城市的商贩进城的也减少了许多。61

公、私商业的急剧进退，也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中央商业部在1953

年工作的基本总结中说：下半年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的公私比重，在批发和零售方面都在迅速前进，这种前进是必要的。但从去年11、12月起，前进步骤上快了一些，对若干被代替了的私商未能及时提出妥善安排的方针与办法，在国营商业与合作社还来不及经营的次要商品方面未能及时利用私商，使城乡交流发生了某些阻滞现象。62

2对私营商业由排挤到改造

1953年以前，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曾对私商采取「排挤」或「代替」的政策，设想通过发展合作社商业，减除商业资本家的中间剥削，

60郭建(上海市财委副主任)：〈关于上海市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54年3月11日)载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280。

61水世阅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湖北卷·武汉分册)》(北京：中共

党史出版社，1990，页146—147。6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上册，页605。

促使商业资本转向工业。1953年夏季以后，国营商业扩大了对工业品的加工、订货和包销的范围。随着粮、棉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经营粮、棉等农产品及棉纱、棉布等人民生活必需的工业品的私营批发商，全部由国营商业所取代。市场关系的这种变化和改组，一方面为国家对私营商业实行改造创造了前提，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中的公私关系趋于紧张。到1954年春夏，大城市中有10余万从业人员的私营批发商因得不到货源而没有买卖可做；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扩大了经营范围和零售额，私营零售比例迅速下降〔北京市1953年11月底统计：7—10月，国营商业上升13.40%，私营商业下降12.95%〕，排除私营商业坐商(包括部分零售商)800多户，职工3058人(其中包括零售商资方350

余人），被排除商户的转业困难很大，除100户左右可能自行转业之外，700户无法解决而歇业。63上海市，1954年上半年有60个主要私营零售商业行业的营业额仅相当于1953年同期的507.左右；70个主要行业中经营困难的有55个行业641，城市中的私营零售商惶惶不安。国家扩大对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集镇中的私商营业额日益缩小；由于供销合作社对一般土产一时无法全部经营，私商又难于下乡，某些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的流通出现阻塞现象。这说明对私商采取简单「排挤」或「代替」的政策，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部分代表谈话时就曾指出：「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1953年12月，商业部长曾山在全国工商联会议和在京各省商业厅长联席会议上曾报告说：「只要在私营零售商中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办法是能够容纳许多零售私商为国营公司推销商品的。我所了解的毛主席给我们商业工作者指示的精神

中，对私营零售商，也可以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65只是当时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过渡形式。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在商业领域出现了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在总结前一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陈云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66。

〈指示〉指出：「中国私营商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大〔坐商和摊贩共有七八百万人）。对他们盲目地加以排斥，一律不给安排，不给生活出路，势必增加失业人口，造成社会混乱。这是必须防止和纠正的。」〈指示〉确定对私营商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逐步改造政策，但对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办法有所不同。

对批发商还是由国营代替，但不是一次全部代替也不是排除不管，而是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采取「留、转、包」的不同处理办法，对以零售为主而兼批发的，一般转为零售商；专业的批发商或以批发为主而兼营零售的，其中凡继续经营者，让其继续经营；凡为国营商业所需要者，可

以为国营商业代理批发业务；凡能转业者，辅导其转业；经过上述办法仍无法安置者，其职工连同资方代理人可经过训练，由国营商业录用。其职工已由国营商业录用的私营批发商，原有资金应受工商行政机关指导，使用于有益事业。资方实职从业人员，除能自找职业或年老而可维持生活者外，要求参加工作者，只要没有政治问题，经过训练后，可由国营企业陆续吸收，分别安置于没有机密性的商业、粮食、银行和合作社等门市营业单位以便进行改造。67

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6月底，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武汉、西安、重庆七大城市的资本主义批发商共转了14444户，从业人员11422人，资金4282万元。转业方向，主要是转向工业：上海转业的441户中，转入工业的户数占837。；武汉的171户全部转入工业；北京转入工业的户数占93呢；广州转入工业的户数占95%；天津占63先，转的行业多数是与原来经营的业务相近或有联系的工业。68

对城乡私营零售商，明确了改造的主要形式是代销、经销。代销和经销的商品都是国营商业已全部或大部掌握货源的商品，都执行国家规定的零售牌价；代销店要把全部销货款交给国营商业，只领取一定的手续费；经销店则用现款向国营商业进货，从规定的批零差价中赚取商业利润。这个〈指示〉在各地得到贯彻执行，到1954年底，在全国商业企业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基本代替了私营批发商业。粮食、油料和棉花基本上脱离了自由市场。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53年的58.6%下降为25.67%。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六大城市纳入经销、代销形式的私营零售商有47256户，占六市私营零售商总户数的25.17%。69

1954年对私营商业改造的进展，引起对市场关系的进一步改组。其中由于国营和合作社的零售商业前进太快，由于为了「割断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对非统购的农副产品也禁止私商收购贩运，不允许小商小贩下乡，城乡市场关系再度出现紧张状态。

如：北京市国营、合作社商业的实际发展大大超出了已定得过高的计划指标，在大力排除批发商、按行业改造零售商过程中打击面过宽，较多

地压缩了零售商的营业额，造成私营零售商业销售额逐月下降，第一季度已有800多户私营零售商发生困难，到第三季度私营商业零售额比1953年同期减少了437。。同时，全市实际营业的摊贩户数比1953年减少2000户，营业总额与每户月均营业额比1953年下降三分之一；城内摊贩的营业额下降二分之一，给摊贩的生活带来很大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中央卷1》，上册，页195。《中
8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七册^^205。

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申第二卷“巧）一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章侵蚀统购统销和对私有制改造的全面启动

123

困难。7(1在排挤批发商过程中对头道、二道和专营、兼营没有注意区别对待，对二道批发的利用、改造不够，对自行歇业的批发坐商、批？步摊贩和行商的人员没有及时做妥善安置。在处理批发商的同时，对有些行业国营商业的业务工作又赶不上。由此导致城乡交流出现问题：一是统得过死。改造私营批发商后由原来联接城乡的千条线变成了两条绳，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分工后又由两条绳变成一股绳，国营商业单独负责、任务很大，工作赶不上去。二是商品流转环节不合理。商品的供应和调拨系统不是按经济区划而是按行政区划，人为造成种种复杂的环节，不仅影响商品及时供应，而且大大增加了运费、提高了成本。三是

商品流转环节多，发生阻塞现象。有的干部说：「现在简直是由一条绳变成一根竹竿，节节不通。」⁷¹城乡交流方面和商业工作方面这些不合理现象，严重障碍了城市工业品下乡，造成对农村物资供应中的不必要的脱销或积压，增加了商品流转费用。

武汉市市长宋侃夫谈到当时武汉市的市場紧张情况时也说：一是城乡交流不畅，主要是城乡间的物资交流和物资供应不正常。对市场安排不够合理，有组织有领导地利用自由市场的作用不够，有些限制得太死，造成城乡脱节，物资交流受到阻塞。二是公私关系紧张，主要是私营商业垮得多了点，快了点，使工人店员失业人数激增；由于私营商业营业额下降，收入下降，但开支并未减少，影响了流动资金周转，造成进货困难。⁷²

鉴于上述情况，1955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向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报告说：

1954年入秋以来，城乡上出现了若干严重的情况，这就是：第一，城市私商的营业额大部下降，经营困难，失业增加[^]不少私商有赔累，靠吃老本维持。批发方面，国营商业所占经营比重，已达百分之八十八以上，私营批发商已大部为我排挤代替。对已排挤的批发商从业人员，各地虽根据中央7月指示部分地进行了安置，但很多还未安置或未安置妥当，问题还待进一步解决。在零售方面，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所占经营比重，已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四。私营商业的零售营业额，据八大城市1954年第四季度统计，只有上年同期的百分之六十三点[^]。1954年全年，私营商业的总营业额¹包括批发和零售，为1953年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五三，下降了将近一半。不论批发和零售，私商营业均日益萧条。据调查，天津52个行业9573户中，赔累者4391户；武汉440户中，赔累者250户；广州28个行业4185户中，赔X者2544户。赔累户数占总户数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私商生活难于维持的，1954年11月仅上海一地即达12万人。惶惶不安的情绪继续发展。第二，农村私商多数无法经营，农民要的某些必需品不容易买到，国家要的农产品收购也有困难，农民的生产情绪很不安定[^]农村情：；兄相当紧张。据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初步估计，一年来

农村私商被排挤了的有69万户、100万人左右，这个数目约占1953年底农村全部私商从业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社会主义商业在农村中的零售比重，从1953年底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二，到1954年底上升为百分之六十点二八。1954年一年内，供销合作社的零售额超过计划34亿余元，超过原计划将近三分之一。这个数目主要是在农村。农村中许多无法维持的商贩，转业无路，有的流入城市，增加城市的困难，能够勉强维持的，营业也日渐清淡。同时，农村里食油、粉条、豆腐、熟食等供应不足，粮、煤油和其它工业品，有的也供应紧张，到处排队，有的要跑得很远才能买到。农民反映「合作社忙死，农民等死，私商困死」。因为农民有钱买不到东西，就不愿意责出自己的农产品。这样，回过头来又影响着1954年下半年国家棉花、烟叶、油料等收购计划的完成，从而影

响工业生产和工业品的供应。特别严重的是，不少地方，农民杀牛、杀母猪小畜的现象相当普遍：积肥不热心，春耕准备不积极，生产情绪不高。

可以看出，目前城乡的情况是紧张的。城市紧张，农村更紧张。城市紧张主要表现在公私关系方面：乡村则收购、供应、公私关系和农民同国家的关系都很紧张，这种情况除部分地区外，是普遍存在的。不少地区已引起注意，并开始着手解决。必须指出，这种情况如果让其继续发展下去，将不仅严重地影响城乡经济的活跃，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由于农民滋长着不满情绪，也将严重地影响工农联盟，以至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正常进行。

上述李先念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把当时的严重情况描述得淋漓尽致，以期引起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针对上述问题，李先念向中央建议，对公私商业采取「统筹兼顾，统一安排」的方针。具体意见是：

鉴于工农业产品的主要货源已为国家掌握，私营批发商业已大部为国营商业代替，国家已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市场，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商品

的流通，因此，在城市零售阵地上，社会主义商业前进过多的部分，应该考虑作必要的退让，使所有私营零售商能够在可维持的水平上继续经营，以维持生活，并服务于商品流转，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贯彻逐行逐业安排改造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等各种形式加以改造，使他们逐步过渡为国营商业的分销处、门市部。

农村的小商贩担负着收购、分配和短距离运输等三种重要的社会任务，他们是劳动人民，性质上有别于商业资本家（城市小商小贩也有相似的性质），但是他们分散落后，无领导，无计划，自发性很大、在目前情况下维持也有困难。鉴于目前农村商业人员，包括全部私营商贩在内，人数并不算多，因此，在农村除了少数商业资本家可用经销、合营等形式加以改造外，对于上述小商小贩改造的方针应该是，根据自愿的原则，在供销合作社领导和计划下，通过各种形式加以组织，使之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分担农村商品流搏的任务，并逐步过渡为供销合作社商业。李先念指出：必须看到，我们在掌握了批发环节的基础上，把私营零售商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把乡村商贩组织在供销合作社周围，这实质上将是大大地前进一步。我们提出将农村商贩「包下来」，将批发商吸收过来，并在零售阵地上作适当的退让，对公私商业统筹兼顾，统一安排，其目的不但是为了缓和目前的紧张情况，而且也是为了有利于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李还强调说：应该懂得，工人阶级当了政，必须负责对各阶级的生活出路进行适当安排，这样做是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还要看到，目前零售商已经受到若干的限制，特别是为国家经销代销的部分，性质上已有很大改变，因此对公私比重的概念，不能不作新的了解。社会主义商业有无前进，主要应看对整个社会商业的计划领导程度，对私营商业改造的进展程度，而不能仅仅计算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本身的营业额。这一点是重要的。

关于在农村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政策，李先念指出，统购统销的措施，使农民经济生活发生极大的变革，要求产品归自己支配，是农民的一般倾向。如果他们不知道国家究竟要统购多少，如果对于他们努力增产的部分，国家统购时不给予必要的照顾，其结果就必然要影响农

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因此，李建议：政府应规定一个适当的数字并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使农民大体上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卖出多少，自留多少，国家供应多少，从而情绪稳定，心中有数，放手发展生产。李还认为：对于农民的经济生活，不能限制过死过严，不能企图单纯用行政手段，过多地加以干涉。如果那样，不仅在经济上行不通，政治上也将遭受损失。我们的做法应该是：顺应广大农民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要求，积极地引导他们努力生产，逐步进入合作化的道路。73

1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3—1957））——向社会主义过

第二章 统制和对私制？《适当的自由》

127

4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李先念的报告，决定改以中央《关于进步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营商业，改进农村购销工作的指示》74，下发各级党委和政府贯彻执行。

这样，对私营商业，尤其是城乡小商贩的改造工作，又大大向前推进了。步。1955年秋，纯粹私商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在32个大中城市占25.9%，在农村集镇剩18.7%，在批发上只剩9%了。到1955年8月为止，全国公私合营商业440户，合作小组（包括饭店）8629户，经销代销及批购零销商701322户，占私商总户数的23.74%，从业人员1064704人，占总人数的27.24%，资本额3.69亿元，占总资本的35.92%。

75

3加快私营工业的公私合营

在对私营商业加快改造的同时，也加快了对私营工业改造的步伐。1953年，全国私营工业15.02万户，职工人数223.09万人，生产总值131.09亿元。在此以前，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主要是收购、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等初级和中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很少。1953年底，公私合营企业只有1036户，其产值只占13.39%。

76

1954年1月，中财委召开会议，就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问题进行讨论。当时认为，加工订货虽然实行利润「四马分肥」〔即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已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这主要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并不触及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在加工订货形式下，企业基本上仍由资本家管理，劳资矛盾、公私矛盾及由此引起其它矛盾，难以获得有效的处理，限制了工人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等的教育改造。当时认为，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份同资本主义成份在企业内部的合作，公方占据领导地位，生产关系发生重要变化：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和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掌握企业的领导；资本家丧失了原有的支配地位，处于被领导的地位，这样，劳资矛盾、公私矛盾能够朝着有利于劳方和公方的方向解决，有利于改进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同时认为，四年来加工订货等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表明，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条件正在成熟。国家对私营企业实行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它们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后，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约占私营工业产值三分之二的轻纺企业，其原料供应和销售市场更受到严格限制，资本家因企业经营渐感困难，客观形势也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公私合营。

基于以上认识，会议提出：要在今后若干年内（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可能更短一点）积极而稳步地将国家需要的、有改造条件的十个工人以上

的私营工厂，基本上（不是一切）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具体做法是：采取「驴打滚」、「翻几番」的方法，发展一批，作为阵地，加以巩固，再发展一批，经过几滚几翻，实现上述目标。⁷⁷

会议确定：1954年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应以「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为工作方针。计划将产值共15亿（占1953年私营工业总产值131亿的11.49%）的651个私营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合营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全国影响最大的上海。利瓦伊汉在会上报告说：「今年公私合营工作的重点放在上海，其它地区则可少

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审编：《陈云年谱1905—19950，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页246。

15陈文斌、邵纬生上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76《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页207。

搞一些。因为上海是全国经济的中心，对全国影响大，各地资本家也都是看着上海的，因此，上海的工作一定要做好，一定要稳重，并希望从上海取得一套工作经验。」⁷⁸会议还就发展公私合营的具体做法和有关政策提出了意见，即发展公私合营，要以国家投入的少量资金、干部，去充实原有企业并进行技术改造。合营的条件，必须依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条件、供产销平衡的可能、干部和资金的准备，以及资本家的自愿，稳步前进。

3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以及中财委〈关于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并认为中财委对扩展公私合营工业所提出的政策原则及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工作方针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希望各中央局、各省、市委据此进一步研

究和制订各大区、省、市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正式计划，各省、市委并应据以制订分期的具体执行计划，按中财委报告中所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执行。79

中共上海市委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就对上海市的私营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作出计划。上海私营工业共有29836户，职工在16人以上有动力设备、31人以上无动力设备的大型工业5700余户，职工100人以上的大型厂567户。计划在1954、1955两年内首先将轻工业、纺织业100人以上大厂，重工业及名牌货50人以上厂共616个分批进行合营。然后再以两年时间，以国营、合营厂为核心，继续通过产销联营、生产联营、专业公司、合营、合并等形式，将全市5700余个大型工厂进行整顿，全部变为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在1957年前，即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101，完成对私营大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1经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学习，加上私营企业的经营内外条件的变化，不少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也都认识到实行公私合营已是大势所趋。因此，纷纷带头申请合营。

早在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召集的座谈会上，毛对上海安达纺织公司总经理刘靖基说：「刘先生你回去要带头啊！」刘在当时举行的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言就表示，他的安达纱厂等企业要争取早日公私合营。上海荣家资本集团的代表荣毅仁表示，他所有的企业随时准备实行公私合营。811953年12月，以刘靖基为首的安达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正式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提出要求公私合营的申请：「我们的企业，现在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级形式，为了使企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企业和个人都能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对发展生产更为有利，对国家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因此我们已经在12月9日的本公司董!&联席会议上提出讨论，一致表示拥护总路线并决议自觉的争取公私合营」。82天津启新水泥公司总经理周叔钹向中共启新公司党委和启新董事会一再说，实行公私合营「启新一定要起带头作用」。他和股东们谈话说：「早晚要合营，晚合营不如早合营」。「毛主席问过我，把企业公私合营，你们舍得舍不得？我说现在舍不得也得舍。」在取得股东们同意后，

周叔饒正式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并阐述了启新已具备公私合营的充分条件：劳资关系比较正常；工资比较合理；公司的股票中，国家银行已占1770，再加「五反」退补款，国家不用拿钱就可以公私合营了。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市私营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初步意见！！〉（1953年12月31日），载《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册，页263—264。《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页209。

〈安达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刘靖基关于要求公私合营给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申请书〉（1953年12月），载《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I》，上册，页268。

江苏省常州市大成纺织公司总经理刘国钧，在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言表示争取公私合营，回到常州后即提出申请并一再说、他的大成公司要成为总路线公布后在江苏实行公私合营的第一家企业。大成公司的资本中可以作为公股的财产很少，为了减少国家的投资，刘国钧主动提出以大成公司的私股调换南通大生纺织公司的公股。经调换后大成公司的公股达到10免左右，于1954年6月1日公私合营。

南京中国水泥厂总经理姚乃焯等资方人员得知毛泽东9月7日的谈话，找来抄件看后说，水泥是重工业，在经济建设中作用大，迟早都要公私合营，坐待被动不如主动申请。姚说，对于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心中是又喜又忧的。喜的是合营后生产经营上的许多问题都可由政府解决不用劳神了；忧的是个人的职位、薪金、股权、股息等怎么解决心中没有底。尽管疑虑很多，他们还是向南京市政府送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书。

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陈铭珊说：「在党的教育下，我看到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势在必行，走在前头总比落在别人后头光彩。」经他在董事会一再动员，董事一致认为，信谊药厂接受加工订货和包销的

产品已在957。以上，原料和销路都靠国家，不走公私合营的道路是没有前途的。

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经理周信沛回惊当年的思想状况一说：「总路线公布引起我们很大的震动。在这以前我也知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终要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但希望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总路线公布是宣布了行动纲领，走社会主义已成为时势之必然。所以在俞佐宸同志参加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回来后，我就代表永耀公司与和丰纱厂、太丰面粉厂、冷藏公司、四明电话公司的负责人一起于1953年底率先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⁸³

扩展公私合营，涉及公私、劳资、各行各业多方面的复杂关系，涉及资本家的法权益，需要妥善地慎重地加以处理。1954年7月，中财委总结了几年公私合营工作中的政策和经验、制订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同年9月2日经政务院审定公布，中财委副主任利瓦伊汉对〈条例〉作了说明。〈条例〉的基本精神是确立社会主义成份对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地位，同时保护资本家的合法权益。具体规定：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要接受公方领导；私股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私方代表也负责参加经营管理，有关公私关系的问题，应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处理。对于私营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一般均参酌原有情况量才使用，使他们各得其所。对企业原有财产的估价，应当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企业合营后，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个别企业如果出于私股方面的要求，经公私双方协商同意，也可采取保息的办法，即私股方面每年领取定额的股息，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也不负企业盈亏的责任。⁸⁴这样，就使全国对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作有章可循，推动了各地公私合营工作的顺利进行。

据统计，1954年全国有905家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当年产值25.6亿元（原计划合营500家，产值17亿元），超额完成了计划。加上1954年前已合营的企业共有1746家、产值占全部私营企业工业总产

值的337。，也就是说私营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实现了公私合营。各省、市的具体扩展情况如下：北京市合营了21家工业企业，还合营了同仁堂药店、瑞蚨祥绸店等16家商业企业。上海市1954年批准了211家企业公私合营，连同以前合营的共有244家企业，总产值在全市工业中的比重由5.67。增至20.37。，公私合营企业的股金由1953年的3800万元增加到2.5亿元。江苏省1954年合营了60家企业，有职工1000人以上的16户，500到1000人的7户，100到500人的29户，100人以下的8户。棉纺织业是江苏私营工业中规模最大的行业，共有48家，199年合营了2家，1954年合营24家，这26家合营企业的产值占全行业48家总产值的85.217。。天津市合营了77户私营工业大厂，如占全国

83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慰， 页209-210。

1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091^51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章粮食统购统销和对私有制^^造的全面启动

5!

水泥产量第一的启新洋灰公司，全国最大的制碱企业永利制碱公司，全国著名的精鹽制造企业久大盐业公司；还有恒源、北洋，达生~仁立、东亚五家天津最大的私营棉毛纺织厂。武汉市在1954年以前就合营了许多大型企业，1954年合营了18户之后、和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私营棉纺、搪瓷、火柴、卷烟、制漆、砖瓦行业等繁荣企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

重庆市经过1954年的扩展，属于中央管理一级的企业16户实现了合营，市级管理的企业81户中合营了43户。85

对1954年公私合营的扩展工作，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1955年1月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成绩，贯彻了「合营一批较重要的和较大的企业」的方针并超额完成了计划；改变了国民经济中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成份增长了，为今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打下了基础。同时指出，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上，存在着宁「左」毋右，「左」比右好的思想倾向。具体表现：在清产定股工作上「扣得紧一些」，估得低一些；在人事安排上，「排挤资本家」的思想较为严重，资本家有职无权的情况是普遍现象；在利润分配政策的执行上，存在着尽可能不分、少分或明分实不分的情况；在工作中贯彻公私双方充分协商的精神不够，遇有意见不一致，有的公方代表即拍着桌子说「你不服从公股领导吗？」有的认为「资本家一身全是资本主义思想」，「能协商成啥？」总之，「目前情况是：左的右的情绪都存在，但左的情绪是主要的，要扭转左的情绪批判右的情绪。」86

4由「吃苹果」到「吃葡萄」

85(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慰，页213—215。

86陈毅：〈在全国扩展公私合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5年1月7日)载《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下册，页766—768。

如前所述，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所贯彻的是「合营一批较重要的和较大的企业」的方针，当时被称为「吃苹果」。从扩展合营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看起来合理、实际上带来了一系列矛盾。这就是一个行业大中小厂都有，把大的都合营了，这就打乱了资本主义工业原有的内部联盘，使大遭分散落后的中小企业生产上出现严重困难。加上国营经济部门没有贯彻统筹安排的方针，反加工订货的任务都交给了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大厂，不顾私营的中小企业，更加深了矛盾。1954年下半年起，不少行业已陷入困境，部分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歇业。有的

资本家不出面，由工会主席带着工人向政府请愿，使工人同政府和中共党组织闹矛盾。

1954年12月，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和地方工业部联合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各地方代表纷纷提意见，说中央光吃「苹果」，把一大堆「烂葡萄」甩给了地方，又小又烂，怎么办？如果不先安排好私营企业的生产，不但工人不满，资本家惶惶不安，扩展公私合营工作也无法开展。会议领导小组向周恩来、陈云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资本家的企业在人民民主专政下应该受到照顾。生产的东西也是在国内用嘛。工人阶级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国营企业的工人是工人阶级，资本家工厂的工人也是工人阶级。你只照顾大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小企业的工人干甚么？

12月2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调整和安排工业生产问题讲话指出，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工业，和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总任务，对中央和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四种工业，应保证社会主义成份不断稳步增长的条件，采取统赛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既要有所不同，又要一视同仁，以反对资本主义无计划地盲目发展和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并将各种经济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周提出的具体措施是：（一）逐行逐业分配任务，进行改造。（二）利用原有工业，控制基建和工业投资。（三）逐步提高技术，改造落后。（四）根据需求和可能实行裁并、迁移。（五）掌握国家订货，纠正加工订货的盲目性。（六）控制手工业盲目发展，加强对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管理。（七）扩大私营工业出口品种，提高出口规格。（八）统一领导，分业管理。⁸⁷

⁸⁷《当代中国的经济管30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I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1，页64。

根据周恩来讲的精神，陈云提出解决私营工业生产困难的三条方针九

项措施。12月31日，陈云在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上讲话说：解决工业生产中的矛盾要遵循三条方针：

第一，公私之间的矛盾。国营能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的，就让出一部分。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样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使私营工业逐步顺利地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第二，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应该是奖励先进，照顾落后，淘汰有害（如坏药）。

第三，地区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维持上海、天津，照顾各地。因为上海、天津是老工业基地，不仅是日用工业品的主要产地，而且是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枢纽。维持上海、天津，对全国是有利的。

为此，陈云提出了以下九项措施：一是通过逐行逐业分配原料、分配生产任务计算设备能力、安排生产计划等办法，来进行逐行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要利用原有工业设备，控制新建和扩建，控制国家基本建设的投资；三是私营工业的生产，要提倡提高技术、淘汰落后。对落后的先要促使其提高，如果提高不了，将来就要淘汰。四是根据需求和可能，用各种形式来安排私营工业的生产。既要有临时的办法，又要有长远的办法。全国现有私营工业134000户，其中较大的就有17000户，如不组织起来很难管理。可采取母子联合、逐步合并的办法；五是减少盲目加工订货。今后加工订货，必须经过国营商业部门或者省、市管理加工订货的机关；六是对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要加以管理和控制。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得太快了，就会出毛病；七是要扩大私营工业的出口品种，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八是要加强国家对私营工业的业务领导。私营工业行业多，有轻工业，有重工业，而且规模小、户数多，都交中央各部来管理不行，有些部管国营还忙不过来。除地方工业部外，要成立一个新的领导结构，原则上按「一条鞭」的办法，分业管起来。所有中央和地方机构的任务是，研究计划平衡，管生产，管改造，不管厂；九是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顾国营，不

管私营的倾向；另一种是私营工业自己不想办法，坐待国家给办法的倾向。88

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1955到1957三年的扩展公私合营计划：具体要求：1955年，产值17亿元，户数2508户，职工20万人，国家的现金投资5940万元。1956年，产值18.5330亿元，户数5126户，职工21.37万人。1957年，产值19亿元，户数6712户，职工20万人。89

由于明确了扩展公私合营要按行业通盘规划，统一安排，分别情况实行个别合营；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进行联营合并，再行合营，从而缓解了先前只吃「苹果」、不吃「葡萄」的矛盾。1955年底以前，私营工业有3091户转为公私合营，产值占全部私营工业产值的49.79%。

90

对1955年秋全行业公私合营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进展，毛泽东曾作过生动形象的概括，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91。

5把个请手工业者组织起来

个体手工业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手工业产品，在全社会的生产和人民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49年建国之初，全国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为585万人（另有农民兼营性手工业者1200万），产值为32.37亿元，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6.97%，占工业总产值的23.097%。仅山西省从事手工业和赖以生存的有就近200万人，约占当时山西省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从产值上看，据浙江省统计，在

1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0955—“巧）——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0年的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72.37%、现代工业占9.27%、手工业占18.57%。据解放初期河北、平原、苏南、浙江等省、区的调查，在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中，手工业产品占70—80%；西北地^高达95%左右。92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还是国家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来

源。至于走街串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修理、服务性手工业，更是发挥着它的独特作用。然而，这种个体手工业存在着分散落后、资金不足、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路等弱点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将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共同纲领》也规定了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组织起来，发展合作事业。

从1949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在《共同纲领》规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经济方针的指导下，国家根据需求和可能，一方面帮助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另一方面积极引导个体手工业向集体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合作社处于典型试办阶段。手工业合作社在典型试办中，摸索前进，稳步发展。

1950年7月，中财委召开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总结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合作社工作的经验，提出先整顿后发展，引导合作社走上正轨的方针。刘少奇、朱德到会讲话。刘少奇强调，手工业合作应从生产中最困难的供销环节入手，保持原有的生产方式不变，尽量不采取开设工厂的方式。⁹³朱德也强调先不要改变所有制形式。⁹⁴会议明确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是联合起来，凑集股金，建立自己的供销机构，去推销自己的产品，购买原料和其它生产数据，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会议选举成立了合作社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领导管理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运输、渔业等各种类型的

157

第二章粮食统销！4统销和对私有制改造的全面启动

合作社。同年11月，全国合作总社临时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薄一波为主任，程子华等人为副理。

全国合作总社的成立，加强了合作社工作的领导。在各地供销合作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到1950年底，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1326个，社员26万人。⁹⁵为总结手工业合作社的组社工作经验，推动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全国合作总社于1951年6月召开了全国合作社第一次工业生

作会议，会议讨论了生产合作社的章程、准则，明确供销合作社是低级的合作形式，通过这一组织形式才能逐步走向机械化和集体化的生产合作社。会议通过的纪要指出：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具体的发展道路是由个体到集体，由手工工具到机械化，由小生产到大生产；生产合作社主要在中小城镇和农村进行组社，对象为手工业生产者，组织形式以供销性的合作为主；供销合作和集体的生产合作，是两个不同阶段，是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会后，薄一波、程子华将会议情况向中央作了专门报告。

经过一年的发展，全国已有2000多个生产合作社。主要行业是：织布和针织、铁木农具、服装缝纫、建筑材料、木材工业、造纸等。但除在个别地区的个别行业中生产合作社开始占有一定比重外，从整个手工业生产来说，其比重还是很小，绝大部分地区和绝大部分行业都还有待着手去进行组织。为总结经验，推广典型，明确方针，确定任务，全国合作总社于1952年8月召集全国合作社第二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与会者经过讨论认为，一年来的主要经验是：组织与领导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根据地方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选择行业应进行行业排队和商品排队，确定组织什么行业制造什么商品，一定要使它在生产上站得住脚。具体条件包括：拥有适当的生产工具和必要的生产设备；有相应的流动资金来源；有一定数目的熟练技工；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有一定保证。会议对1951年拟订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作了修改，进一步明确了以下原则：

《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一卷，页4。

（一）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基本组织原则，是要改变手工业的生产关系，改革手工业的生产制度。这就是：合作社内部不是劳资关系，而是互助合作关系，社员必须直接参加劳动；合作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组织社员劳动，按工资比例入股，实行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度和劳动返还金制度；合作社不应剥削雇佣劳动，因生产需要雇用的技术人员和职工，

一般不应超过社员人数的15先，并根据条件，争取他们入社；合作社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

(二) 组织对象。重点是中小城镇和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手工业者和家庭副业手工业劳动者，手工业资本家不得入社。

(三) 组织形式。除集中生产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外，供销合作社通过发原料、收成品的办法，把手工业者当作劳动者，而不是单纯作为商业经营者，按行业逐步组织起来，是组织分散的手工业者一种好的组织形式。

(四) 手工业合作社的首要任务是搞好生产。为此，必须实行分工协作和定额管理，不断扩大产品产量，增加产品品种，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收益。

(五) 必须在合作社内部对手工业者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思想和政策教育，逐步改造小生产者的自由散漫、保守主义、平均主义、自私自利和行会等思想。改造思想又必须与改造生产相结合、不断改进生产，改变生产方式。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手工业合作社在整顿中得到稳步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发展到2678个，社(组)员人数25.24万人，产值2.5亿元。⁹⁶这一阶段，各地都试办了一批典型社，其中有曾经受到全国合作总社表扬的闻名全国的「四大名社」——「三把郎头」起家的上海市铁床生产合作社、217户手工业红炉主组织起来的山东省潍坊市新胜红炉生产合作社、24名木杆秤工人组织起来的武汉市度量衡生产合作社和「破铜脸盆」熬糖起家的北京市第一食品生产合作社，都是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的旗帜，为各地组建手工业合作社树立了榜样。

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个体手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1953年，个体手工业的总产值由1952年的66.7亿元上升到82.3亿元；从业人数由1952年的645.7万人发展到693.1万人。⁹⁷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对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1953年11月至12月，全国合作总社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朱德在会上作〈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

朱德指出：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根据1952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手工业生产者约一千多万人，生产总值达一百多万亿元〔人民币旧币〕。农民所使用的工业品，大部分是手工业生产的，约占农民所需量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左右。我国手工业技术也是很高的，不少产品不仅驰名国内，而且在国外也有相当的市场。手工业的行业与品种很多，几乎包括人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轻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因此，把为国计民生所需要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有计划地指导他们生产，提高生产力，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会起很大的作用。

朱德说：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个体手工业经济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改造为集体所有制。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改造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帮助他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组织形式。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大力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但具体步骤，一般地应该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的生产小组逐渐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条件具备时，也可以一开始就组织生产合作社。但要防止盲目地强调集中生产，盲目地将小社并为大社，盲目地要求机械化，以及订立许多繁杂的制度等，以免影响合作社的发展。要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与可能，以及手工业者的要求，采取不同的形式加以组织。绝不要规定一个死格式到处硬套，那样是会妨碍或限制合作社的发展的。

96 《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一卷，页5。

朱德强调说：组织起来后，就要巩固，只要适合国民经济的需要，就要使它们长久存在。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是可能长期存在的，不仅在过渡时期，就是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会存在的。这是由于它们有着自己的许多特点：首先、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能利用当地原料与大工厂的废料。

中国物资丰富，当地的原料是很多的，如藤子、竹子、条子、苇子、木材、丝麻等。大工厂的废料也是很多的，如废钢废铁、破衣烂布等。这些东西，一经手工业者制造或加工之后，就变为很有用的物品，不仅供给了本地的需要，有的还可以出口。其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大机器工业所不能代替的技术，特别是一些传统的、特种的工艺品，如雕刻、刺绣等，是不能完全由机器来生产的。有的同志说：「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第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主要是供给当地需要的，它可以节省很多运费；同时它又是与农民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它不仅供给了农民的必需品，而且换回了粮食与原料，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失业问题。从以上几点看来，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工作，对于巩固工农联盟有重要的意义，不单是：「为了解决一部分人的生活问题」，更不是「包袱」。

98

刘少奇听取会议情况的汇报后，就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组织对象与生产关系的改变、组织形式、半机械化与机械化、组织领导、资金来源、学徒的期限和待遇、发展计划等问题作了指示。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试办手工业合作组织的经验，明确提出三种组织形式：一是手工业生产小组，其特点是不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只是有组织地接收订货和推销产品。这是组织手工业者的低级形式，也是手工业者最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二是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其特点是，除在供销环节上组织起来外，已开始购置公有的生产工具，进行部分的集中生产。这是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比前一种形式具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三是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其特点是生产资料“部分或全公”，生产由分散变为集中，部分实行或完全实行按劳分配。这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根据生产资料公有程度的不同，又分为半社会主义性质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两种。会议要求采用多种多样的适合手工业特点的过渡形式，把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逐步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高级形式；会议提出，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根据当地手工业的具体情况

况，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丁工业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采用群众所能接受的组织形式，由群众自愿地组织起来；必须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既反对要求过高过急，贪大贪多，盲目发展，也反对放任自流，停步不前。

1954年6月22日，中央向各地转发了全国合作总社党组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中央认为，报告提出的发展计划和各项工作意见是正确的，希望各地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切实办好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为广泛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进行必要的准备；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手工业的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手工业视为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国民经济各有关部门、供销合作社和全国工会系统，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给予必要的援助，采取具体措施协助手工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进一步推动了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达到4.17万多个，比1953年〔4806个）增力 17倍多，社（组）员113万多人，比1953年00万人）增加2.7倍；当年产值11.6亿元，相当于1953年〔5.2亿元）的1.2倍。

为了研究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这一工作更加健康的发展，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传达了陈云在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上有关手工业改造的讲话。他说：「对于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要加以管理和控制。」「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得太快了，就会出毛病。」99会议讨论了手工业同地方工业

陈云：〈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1954年12月31日），载《陈云文选》，第二卷，页270—271。

中举人氏头^^)^^中一唇11""—上”，’ 1。“工X土我

一竿筏《？无称^^订私萄刺”适的^面启动

143

的发展、同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何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等问题。会议确定当年的中心任务是：把手工业主要行业的基本情况继续摸清楚，分别轻重缓急，按行业拟定发展计划；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社（组）；在此基础上，从供销入手，适当发展新社（组）。会议在以下一些问题上统一了思想：

（一）关于供产销平衡问题。

第一，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同地方大工业的发展、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统^兼顾，就原料、产品品种和数量、销售地区、劳动力等作合理安排。按手工业产品的产销情况，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由县、省和全国平衡的三种。这三种产品均应纳入地方工业计划。

第二，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根据手工业产品的供需情况、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和人民消费习惯，对手工业的各个行业分别采取适当发展提高（如陶瓷业、一些手工艺品行业等）、利用〔如纺织业）、限制〔如铜器、锡器制造业等），及逐步转业或淘汰的方针。

第三，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必须对手工业者和农民兼顾，城市和农村兼顾，这一地区和那一地区兼顾，手工业中已组织起来的和未组织起来的兼顾，以保证劳动力各得其所，合理安排。

（二）关于农业兼营手工业和小手工业资本家的分工管理问题。对与农业未分离以前的手工业，一般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领导；在手工业生产集中、农民兼营商品性手工业，以手工业为农民主要生活来源的地区，建议组织手工业.和农业混合社，以手工业联社领导为主，或手工业和

农业分别组社，社员跨社。

对小手工业资本家的改造问题。根据中共中央1954年11月批转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手工业工人中工会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精神，即对雇用十人以下的小手工业资本家，在合作社基础较强的条件下，可以个别地直接吸收其参加合作社，要求各省、市选点试办，摸索经验。

(三) 1955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是，对手工业的九个重点行业(棉织、针织、制糖、造浆造纸、铁、木、陶瓷、皮革、特种手工艺品)，进行调查，摸清基本情况，拟定供产销和手工业劳动者的安排计划，逐级进行综合平衡，以便进行改造。

1955年还要按照以下四项标准对社(组)进行整顿和提高，即：(1)组织纯洁，有一定民主管理制度；(2)生产正常，比较有计划；(3)财务制度不乱，没有贪污；(4)产品质量不低于合作化以前。

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

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并作了重要批示，明确了手工业在过渡时期内，支持农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辅助大工业产品不足和特种工艺品出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再次肯定手工业是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各地继续对当地各种手工业进行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务期在两年内把手工业重要行业的基本情况彻底摸清；要求各地、各部门贯彻对手工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手工业工作的领导，并抓紧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或赛委会)，以利于有准备、有步骤、有目的地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上半年，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得到控制，全国手工业社(组)发展到4.98万个(较1954年底增加8100个)，社(组)员143.9万人(较1954年底增加30.9万人)。100

100 《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粉，第一卷，页¹⁰⁰。

第三章

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

一「生产力起来暴动」

1合作化与粮食征购同时并进

据1953年11月份统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状况是：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约479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3.7%，比1952年增加了207.5%以上；1953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1.4万多个（还有农民自发建立的4000多个社没有计算在内），参加的农户有27.3万多户，占组织起来总农户的57.1%，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¹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的决定，

以及中央接着批准发出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等精神的迅速下达，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在农村也很快掀起了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热潮。各省区则纷纷追加原来议定1954年发展合作社的数字，追加的结果，连原有社数在内：东北12500个，华北17000个，华东10000个，中南4000个，西北1000个，西

（1953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1954年1月14日），载《当代中国农业合作编辑室肇：《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页177。

南1000个，全国总计45000余个，较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议定1954年秋前达到35800个增加了10000余个。²

对当时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势头，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4年2月向中央报告说：经过此次购粮工作对农村资本主义自发趋势的抑制、及空前规模地宣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加上各级党委对互助合作的抓紧领导，和大部分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就的吸引，除一些工作落后的乡村外、在广大地区的确出现了群众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局面，酝酿成立互助组成了群众性的运动；在某些互助合作基础较强的地方，则出现了互助组要求转社的热潮。如果领导得当，避免可能发生的偏差，今年的互助合作运动将获得较大的、较健全的发展。报告同时指出，有些地方、一部分专、县、区领导机关对群众的热情缺乏分析。不了解相当大一部分群众是基于一时的热情，接触到办社的具体问题时是可能发生变化的，有的是抱着「走社会主义的路，迟走不如早走」的心理、甚至有的是表面积极而内心顾虑甚多的。只笼统地表面地看到群众的热情，忽视尚处于观望状态和落后状态的群众的思想顾虑，就轻易而又急迫地批准办社，必将造成建社工作中的夹生现象。因而要求各地党委一定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应简单地从计划数字出发；要把具体政策交代给群众，坚持自愿原则，防止主观主义的贪大贪高的错误倾向；在加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的同时，要扭转忽视互助组的倾向，防止

打击单干户的偏向。3

但运动的发展远较领导机关的估计要快。3月中旬'全国各地已建立和正在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7万多个，超过2月追加计划2.5万多个。从3月中旬到4月中旬全国又增加了大约2万个新社，一冬一春，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原来的1.4万多个发展到9万多个，参加农户共计170万。4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达到了原定计划1954年秋前组织3.5万个社的两倍半还多。显然反映出急躁冒进倾向又开始抬头。2月27日，山西省委在向华北局的报告中举例说：

最近一个月来，部分农村工作干部中已开始暴露出某种程度的胜利冲昏头脑的征象和急躁冒进的情绪。这从2月2日长治地委关于当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看得很清楚。比如：某些干部在发展农业社的工作中，表现好大喜功、不顾条件是否成熟，盲目地贪多求大：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强迫命令现象，讽刺单干户为「自发户」。供销社不供应或少供应「单干」社员以生产、生活必需品。'例如晋城三区贾泉供销社规定社员入了农业社每人供油七两，入了互助组供油六两，「单干」的供油五两。而当地的党组织对此不但不加以纠正，反认为供销社这个规定好得很，说它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5

对于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差，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各地党委早有察觉，并及时地提出了全力巩固的要求。1954年3月2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就曾下达了〈关于收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转入生产的指示〉，肯定了「华北局根据当前的情况，提出停止发展、全力进行巩固、转入生产的措施，这是正确的」。强调：「切实巩固住这个胜利，力争所有新建社都有必要的质量，把所有新、老社都办好，为将来更大发展打下结实的基础、乃是当前互助合作运动最重要的任务。」要求各地：「切实掌握当前的情况，防止少数干部单纯完成任务，追逐发展数目的作风，务须避免因勉强赶工而在生产当中出现严重的混乱现象。否则得不偿失。」6

2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辟于目前各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1954年

2月，载《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4编》，页181。3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辟于目前各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1954年

2月14日）：载《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4编》，页181—182。4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页228。〈山西省委关于发展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1954年2月27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选编（1949—1957）》，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238。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辟于收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转入生产的指示〉〔1954年3月20日〕，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选编1949—1957》，上册，页235。

4月2日至18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主持召开全国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拟定：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计划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1957年计划发展到130万个或150万个，东北和晋、冀、鲁、豫四省及其它老解放区合作化的程度达到50%以上；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实现合作化。会议强调：进一步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必须抓紧三个主要环节：一是巩固现有的九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打好基础，巩固前进的基地；二是依靠贫农〔包括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富农剥削；三是在国家帮助下不断改进技术措施。根据各地的经验，会议总结了四条指导原则：一是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绝不能因形势有利而忽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二是把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目前农村合作化的中心环节，在未具备必需的条件以前不要轻率地转变到高级社；三是组织

形式、发展速度、社之大小、技术改革等都要根据各地自然条件、政治经济条件、工作条件来决定，不能公式主义地一般化，或勉强向别的地区看齐；四是要妥善解决中农与贫农、新老社员、合作社与互助组、合作社与个体农民、社与社之间的矛盾，使之团结合作，发展生产。8月5月1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上述报告，6月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中央肯定了报告所提各项意见是正确的。然后，强调指出：在实行计划经济建设，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的时候，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生产。否则，农业的发展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城市工矿人口商品粮食日益增长的需要，不能适应工业对棉花、油料及其它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不能适应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就势必引起人民不满，打乱国家整个建设计划，造成严重困难。9这个批示，无疑又成了推动各级干部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的一种暗示。

这年年中，农业合作社达到11.4万个，参加农户外29.7万户，平均每社20户。秋收后，入社农户增加了一倍。10

为总结经验以指导以后运动的发展，并根据新的情况重新审定1955年春耕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指标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的发展计划，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0月10日召开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于月底结束。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央报告说：

全国的互助合作运动，在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胜利影响下，一年来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春发展到十万个，秋前已新建社十二万佃户互助组也有很大发展。原建的十万个社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不同程度的增产，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已为群众所公认。

各地计划在1955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六十万个。这个计划是大致合适的，建议中央予以批准。这六十万个社建成以后，在老区将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农户入社；在晚解放区，将做到大部分的乡有社，

至少是区区有社。如果这六十万个社办好了，那就可以有把握地做到：在1957年组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使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主要农业区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 1

〈中央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
〔1954年6月3日〕，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1〕》，上册，页246。《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册，页233。

〈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1954年11月〕，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1〕》，上册，页259—260。本来，1954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拟定1955年发展到30万至35万个初级社、1957年发展到130万至150万个、1960年前后争取全国基本上实现合作化的计划，比1953年12月中央决议规定的1957年发展到80万个的计划已大为加码。由此，掀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到1954年10月，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原近10万个发展到22万个，翻了一番还多。这时，又提出1955年春耕前发展到60万个合作社，组织507。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使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主要农业区成为主要形式的要求。这种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的计划加码，使春天原定种种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措施受到极大冲击，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快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到1954年12月底，总数达到48万个。其发展势头愈来愈猛，在盲目贪多的同时，一些地方又出现追求大社的倾向。有的地方一下子由几十户社员扩大至一二百户，还有的提出要办600户、700户以上的大社。与之相伴的是一些干部违背办社的自愿原则，采用强迫命令的粗暴做法。山东省曹县一些干部在建社工作中提出：「思想教育不是万能的」，「群众的觉悟不能等待」，「运动要暴风骤雨」，「猛虎下山，饿虎扑食」，「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哪个运动还能不死人，看死的是甚么人」，等等。结果，办合作社一森而起，造成了极为混乱的局面。辽宁省复县有的村为追求入社农户的百分比，采取连续开会「攻碉堡」，强迫农民签字画押等做法。浙江省吴兴县善连区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

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跟他们一样！」加上1953年粮食统购时，个体农民定产比合作社还高，农民怕吃亏，也只好跟着入社。¹²就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快速发展的同时，1954年秋后的粮食统购工作也已展开。这年夏季，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和河北省，雨量集中，持续时间长，发生了数十年罕见的水灾。尽管灾区人民在中共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奋力抗灾，解放后几年来兴修的水利工

¹²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4月。参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第2期，页7。程也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全国被淹耕地仍达1613万公顷。经排水、救苗和补种，成灾面积为1131万公顷。受灾人口达6000万。由于受灾面积较大，造成当年农业生产未完成计划，粮食总产量3390亿斤，比上年增加53亿斤，完成计划的94.2%。：棉花2130万担，比上年减产220万担，完成计划的77.57%。¹³为了以丰补歉，维持城市、工矿区、经济作物区和灾区的需要，中央确定粮食统购工作要「贯彻多购余粮的方针」。粮食统购工作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本来就被看成是克服个体小农经济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两项根本措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广泛宣传，更增强了各级干部头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观念。由于这两项工作都存在时间紧、任务重的矛盾，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简单、粗暴、强迫命令就势所必然了。如在统购工作中，强迫农民按通知书规定的数量出贡粮食，否则便被扣上「犯法」、「自发势力」等帽子；有些地区，由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称粮食，不卖的农民就被当场捆起，以至发生吊打群众等严重事件。这样，1954年统购粮食的任务超额完成，总数达到1036亿斤，完成原计划的1107%。，多购了94亿斤，¹⁴这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迅速翻番的快速发展结合在一起，不能不引起农民的极大恐慌。

2农民杀猪宰牛

由于在农村购了过头粮，农民们埋怨「一年辛苦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现在整死人了」。新华社编发的《内部参考》报导说：浙江

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133人。15农民们担心「年年有征购，以后日子怎么过」。一时间，「家家谈粮食，户户说征购」。办社过程中出现的强迫命令，在牲畜和大型农具入社作债等问题上对中农利益的侵犯，使农民对合作化普遍产生了「吃大锅饭」、「合伙平产」、「二次土改」的误解，产生了对生产数据「归公」的恐慌。于是，1954年冬农村出现大量耕牛死亡和出卖、宰杀牲畜的现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

1955年初，《内部参考》多次报导说：据不完全统计，陕西省去年共死耕畜近20万头。其它如羊、猪、鸡死亡现象也很严重；16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估计：近两个月来，四川省死亡的耕牛约有3万头，占全省现有耕牛数〔450万头〕的0.667。；17湖南省据64个县不完全统计，自去年12月下旬至今年1月上旬，共死牛22560头。死亡原因：除天冷寒冻缺饲料外，主要是在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对耕牛入社压价过低，付款期限过长，引起农民群众不满和疑惑所致。18

中央商业部1954年12月发出的〈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反映，第四季度以来，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收购计划大大超过，11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1；跌。这种情况几乎在全国各大市场均有发现。如热河省出现大批宰杀耕牛，山西北部牲口向绥远倒流，四川农民养猪数字大减。19

中共热河省委报告，入秋以来牲口市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反常现象：各种牲口价格普适下跌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大批牲口有行无市。国营公司第三季度收购牛15877头，超过计划199.17%。，超过去年同期6.5倍；收购羊114842只，超过计划99.47%。，超过去年同期10.2倍。第四季度两个月又十天，已收购牛171442头，羊168276只，其中有

一部分是耕畜母畜。有些地区还发生宰杀耕畜现象。宁城县报告，全县杀驴149头；凌源十区七个村杀驴21头，杨大营子一个村即杀了10头，其它一些地区也发生杀驴现象。甚至有的农民因政府明令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先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有的养畜户见国营公司不收购耕畜，便先打掉牛牙再牵到市场出售。2(1

华南分局也向中央反映：在购粮运动的后期（去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猪价陡降的现象。中山县之张家边一个乡即杀死母猪70多头，小猪仔的价格从过去60万元〔旧币〕到100万元一担的正常价格陡降至14万元一担。粤东潮安县九区发现一天即杀母猪40多头，普宁县曾发现用一只大母鸡换两头小猪，9000元卖一只20斤重的小猪。台山县有一农户将刚生下的10头小猪全部弄死，揭阳县亦发现个别农民将小猪淹死。各地蕃薯价格飞涨，从平时每担2万多元涨至4、5万元，个别地方（东莞县）则曾涨到8万元一担，潮阳县曾出现1200余人排队抢购，惠阳县亦发生500多人抢购蕃薯50担，滋长蕃薯地区（如中山县）的农民到数十里以外远道争购。有些农民说：「明年甚么也不种，只种蕃薯，既不统购，价钱又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下降还表现在：春耕生产准备很差，农具添修不多，厩肥由于猪牛羊

中央批搏〈中央商业部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1954年12月），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1^页427。镇村工作通讯》：1955年第32期。

1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向社会主义遇渡

的减少而少于往年；水利、治虫计刺也没有完成；很多农业社的出勤申-大为降低。除合作社派工或工分不合理外，主要原因是社员们反映吃

不饱，无力干重活。21

浙江的情况是，因购粮任务重，挖粮挖得多，全省毛猪减少了120万头，占原毛猪数的30%。盛产火腿的金华专区减产40%。部分地区发生抛荒现象，金华的兰溪、龙游、义乌等5个县共有数千亩。开化县虹桥区一个乡就有70户逃荒。全省已发现7次二、三个村范围的骚动。22

以上种种表现，本质上是农民同共产党、政府、基层干部，以及乡村同城市之间关系紧张的反映。第三章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155

销等经济工作，可以抽一个短时间去发展合作社，但无经常而有系统去领导合作社的生产活动。’现在全国已办起三十八万个新社（老社尚有十万），这批新社大部没有立住脚，没有人帮助这些社先月初建时的种种困难，此时正赶上全国搞统购统销，部分农民抵触情绪很重，此种情绪和他们怕「归公」的思想顾虑结合在一起就出现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例如不积极积肥，大批出卖牲畜，宰猪杀羊，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用于抢购不急用的用品，甚至用来修坟买棺材等等。这些现象提醒我们必须警惕小私有者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动摇态度’。24

二「停、缩、发」三字方针

1中共中央两个紧急指示

鉴于农村出现的紧张状况，中共中央先后就农业合作化和粮食征购工作下达了两个紧急指示，以稳定农民情绪，搞好春耕生产。

1955年1月初，邓子恢向刘少奇汇报了农村的紧张情况。他说：现在看来，有些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农业生产合作社数量大了一些。

1月4日，又以国务院第七办公室23的名义，向周恩来总理写了简报。其中说：

去年十月间中央批准全国[^]省共办六十万个合作社，下边积极性很高，将计划提高到七十多万个。现在看来，真正办好六十万个都是不容易的。原因是[^]区[^]干部几乎全年十二个月都在做统购统销为了使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邓子恢向中央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制订一个全国性的章程，明确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半社会主义性质，使干部不致乱立法，群众不致乱猜疑。二是发一个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明当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已接近60万个社的计划，除新区一些地方还须发展一些外，整个运动应转向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工作阶段，以避免将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两种紧张合到一起，引起更多不利生产的现象。

邓子恢在向中央提出上述建议的同时，在写给刘少奇转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南方视察）的一封信中，还对[^]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0）的内容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对邓子恢报告的情况十分重视，并立即将他提出的意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政治局采纳了邓子恢的两项建议。1月10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的草稿，刘少奇让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修改后，再以国务院名义颁布试行。

〈通知〉指出，现在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48万余个，其中30多万个是秋收前后建立的新社，由于11、12两个月全党正集中力

量进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整顿和巩固这40几万个社，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最近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原因固有多端，但必须了解，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当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想早抓一把的思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晓得针对农民的实际思想状况，反复进行思想教育，细致地进行组织工作，认真地解决社内的重要经济问题，及时组织好当前生产活动，其结果，必然会造成

工作中的夹生现象，影响合作化运动的继续前进，并可能引起不利于生产的严重后果。「鉴于以上两点，中央认为有必要重申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对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并指出对不同地区应区别对待，即有的应该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有的应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有的要切实帮助整顿社的工作，在不伤害积极分子的热情、而又保证新建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25

1月15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指出：近几个月来，不少地区发生大量出卖耕畜，畜价?孟跌，和滥宰耕畜的严重现象，有的省估计至少杀了三十万头，有的省估计耕畜减少百分之二十。这些估计虽然不是很精确，但已可看出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不及时扭转，不仅今年春耕受到阻碍，而且今后几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亦将受到严重影响。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把保畜工作列为当前重要工作之一，认真贯彻保护耕畜政策，采取有效办法，做好保畜工作。26

中央的〈通知〉、〈指示〉下达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势头并没有减弱。2月上旬，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8万个。这时，全国财经会议正在举行。会议集中研究了当前的农村情况和粮食购销问题，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棉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草稿。在刘少奇主持下，由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参加，对草稿内容经过慎重研究、修改定稿。〈指示〉严肃指出：「13前农村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应该看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其中固然有少数富农和其它不良分子的抵抗破坏，但从整个说来，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指示〉分析说，产生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但应该说，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

感到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对于许多统销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也有意见。据此，中央决定：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的粮食年度内的粮食征购任务减为900亿斤，并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制度。同时决定，把农村合作化的步子放慢一些。中央要求各省市，立刻讨论这一指示，并将这个指示连同分配到县的具体购销数字，于接到指示后五天内下达到县；各县要将分配到乡的购销数字和具体政策，于接到省市的指示后十天内下达到乡；各乡要用最快的方法传达到每家农民，使人人心中有数，积极进行春耕生产，热心安排全年的家务，为争取1955年的丰收而努力奋斗。27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召集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谈过一次话，批评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不要重犯1953年的错误。28这时，面对农村出现的紧张状况，使毛泽东也稍微冷静了一些。3月3日，他亲自签发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的关于粮食购销工作的紧急指示。

〈中共中央1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

〔1955年3月3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页76—82。

杜润生：〈五十年代初期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见面〉，载中央文献研究室、湖怀毛泽

勒编辑组编：《缅怀毛泽东》，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页380。

2方针是「三字经」

毛泽东在签发粮食问题紧急指示的同时，约邓子恢谈话说，五年实现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他提出，到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90。

3月中旬，毛泽东又一次听取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汇报农村工作。针对当前农村的紧张情况，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在谈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并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它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29

杜润生回忆当年听了毛泽东的谈话以后的心情说：「这次谈话以前，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主席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19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毛主席还对谭震林说，到明年十月可停下来整顿一年。此时，我们以为主席和我们之间，不存在重大分歧了。」30

为使中央的「停、缩、发」三字方针有效地贯彻下去，刘少奇从3月到6月，曾分别约见各省市负责人了解情况，阐释中央的方针；主持中央会议，研讨具体措施。

3月18日，刘约见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各发展三分之一的意见。

29杜润生：〈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见节，载面怀毛泽莉，下册，贯380。30杜润生：〈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见彭，载^8怀毛泽彭、下册，页381。

4月6日，刘约集中南各省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时说：办好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树立旗帜，建立信仰，总结经验，培养干部，对农民，对我们，都很重要。今后的方针，应该是巩固地向前发展。合作化的要求是又快又好，以好为第一，因为好了就可以快。这一批办不好，就不能快，为了快，必须把这一批办好，所以合作化的快慢，决定于这一批办得好不好。

4月8日，刘约集北京、天津两市及华北各省负责人谈话，向他们说：河北省已经建立10万个社，山西省入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4270，这是很大

的成绩。目前主要问题是把现有的巩固好，只要巩固好现有的，就会有农民要求入社，所以，为了发展，就要巩固。今年明年少发展些，因为干部没有训练出来，经验不成熟，再快了就要发生危险。

在谈到粮食收购问题时，刘说：决不能依靠在初级市场用价格政策收购粮食来完成任务。价格也的确可以指挥市场，但如果单纯依靠价格政策，就会造成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得利的是商人和少数富有者，吃亏的是劳动人民，这是资本主义的路线。我们不走这一条路线，而走社会主义路线。实行统购统销，就是为了使若干基本生活数据不涨价，以保证广大人民的必需。

4月9日，刘约集东北各省负责人谈话说：东北地区合作社已经发展了很多，今年主要是巩固，把现有的办好，不要多发展，甚至可以停一年，只要把这一批办好，将来就快了。

在谈到农村建党问题时，刘说：农村发展党要与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合起来。所谓觉悟高，就是对合作化事业积极，能爱护公共财物，关心公共事业，愿意多尽义务，而不是自私自利。这样的人就可以发展入党，每个合作社要有一批这样的人才能办好。

针对有些地方脱产干部过多的情况，刘指出：不能无限制地脱产，要加以控制，太多的要逐步减少，但不能因而削弱党的工作。

关于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要依靠贫农的问题，刘认为：依靠贫农在内容上现在和过去不同，现在要包括新中农。新中农不能不依靠，因为他们人数多，贫农现在只有20%。，依靠20%是不够的。新中农过去是贫农，由于土地改革和党的领导才上升起来，因此是可以依靠的。

4月19日，邓子恢向刘少奇汇报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谈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67万个，大大超出了原定的发展计划。当前农村形势仍然相当紧张，不少地区人心不稳。

刘问：为了稳定局势，把全国67万个社收缩为大约57万个，是不是必要？你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邓谈了依靠贫农（包括新中农）、照顾贫农利益的问题，去年没有解决好。对中农作适当让步，但不能损害贫农的根本利益。

刘问：甚么是贫农的根本利益？

邓一时答不上来。

刘说：应该教育干部教育贫农，使他们看清楚贫农根本的利益，就是把中农团结起来，把合作社办好，共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要光看眼前利益，不要因小失大。

刘还问道：斯大林那篇〈胜利冲昏头脑〉文章你看过吗？

邓说看过。

刘说我们也有，你写文章批嘛！

4月2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邓小平、邓子恢等到会，杜润生汇报了农村情况，谭震林作了补充，主要是讲浙江。与会者的发言：都主张把当前农村工作的重点，放在已经办起来的社尽量巩固下来；发展过多的省份，要收缩一些。刘少奇最后发言说：今后一年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现在全面停下来，秋后看情况再定，个别县、区、乡未办的，有条件的可以试办。全国合作社已经发展到67万个，其中发展过多的省份有超过两三万的，主观力量控制不了，要收缩一些。能巩固住五十几个社，即是最大胜利。他强调：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对待中农，所谓强迫不强迫，自愿不自愿，就是对待中农的问题，强迫也是强迫中农，自愿也是叫中农自愿。为了保证中农自愿，可以把速度放慢一下，明年春天停止发展，做好巩固工作。中农看见社办好了，就会自动来敲门，那时候我们把门打开。他们自愿，我们欢迎，这可以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31
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当前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32

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4月21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致开幕词，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的方针。他解释说，停止发展，是为了把现有社巩固起来，有条件巩固的要尽一切力量巩固。

会议刚开两天，即4月23日，刘少奇便邀集各省与会同志谈15。刘向他们指出：农业合作化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巩固办好已经建立起来的一批

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说：为了发展，就要巩固。因为已不可能再快，干部没有训练出来，经验不成熟，如果再像1954年冬天⁵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是冒险的。

此后，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就农村形势是不是紧张、造成紧张³长的¹：-1.：要原因是甚么、农业合作化有没有冒进现象、为甚么干部的冒进情绪比较多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5月6日，邓子恢作会议总结，他肯定了农村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分析了造成紧张的原因，对贯彻中央方针提出了四条要求：第一条，秋前一般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现有的合作社，站稳脚跟再继续前进，不要连滚带爬地前进，擦不完的屁股。第二条，发展较快、问题较多的省份适当收缩，把有名无实的社、问题很多陷于瓦解的社，尽快帮助转为互助组或个体经营。第三条，新区秋后适当发展，发展多少，7月或8月再研究一下。第四条，办好互助组、照顾单干户。会后、邓子恢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

3在坚决收缩方针下的浙江整社

对于全国各地进行的整顿和巩固合作社的工作，中央农村工作部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和帮助河北、浙江、山东等省收缩合作社的工作，而重点又是放在浙江。

³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⁰⁸⁹⁸⁻¹⁹⁶⁹¹》，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¹¹⁹⁸⁶；，页^{336—339}；《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编：《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¹⁹⁹⁶¹，页^{481—482~486-487}。^

³²润生：〈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见面〉，载《缅怀毛泽^{^^}》，下册，页³⁸³。

浙江的情况在当时比较突出。由于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贪多求大求快情

绪，加之当时在「清除饶漱石右倾错误」中不适当地提出有「富农路线错误」，助长了干部中的「左」倾情绪，促使浙江的合作化运动盲目地高速发展。1954年秋收前，浙江全省的合作社还只有3800个，到1954年12月初达到39300多个，增长10倍；到1955年4月，合作社达到50950个，加上4850个自发社，合作社总数达到55000多个；入社农户接近全省总农户的30%。如此急速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引起严重的强迫命令问题。一些地方进行了所谓「反富农运动」，将一些中农划成地主、富农成份而进行斗争、清算或没收其财产，用这种方法来推进合作化运动。个别地区甚至提出「斗争富裕中农，向中农进攻」的口号，由此出现了严重违反自愿互利原则、任意侵害中农利益的问题。

秋后开展的粮食统购工作情况是，1954年浙江全省粮食产量141亿斤，连征带购51亿斤，占总产量38%。每人留粮477斤〔原粮〕，浙江农民口粮加种子粮平均每人每年要540斤。由于征购任务重，引起农民顶牛。有些地方提出「斗争富裕中农，拔钉子」的口号。农民说：「搞别的工作，共产党总有个路线，搞粮食，也没路线了。」当时造成的严重状况是：统购中顶牛，死134人。龙游县直接为粮食供应饿死4人，发生数起农民偷偷把小孩送去政府的事件，县委雇了4个保姆在养。衢州地委副书记去开化县一个村了解情况，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皮，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情况严重的有39个村。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渔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光了。」农村已发生多起骚乱。³³

对于浙江农村十分紧张和动荡的形势，除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直接派人了解情况外，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等也都先后向中央反映了大量的关于浙江「情况紧张」的材料，并要求中央帮助浙江省委采取措施，迅速缓和稳定局势。

1955年3月24日，邓子恢会同党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邀请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开会研究，商定了对浙江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即按照毛泽东的「停、缩、发」三字方针，和浙江要「收缩一些」的精神，共同拟定了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

部的建议电文。电报起草好后，邓子恢稍作修改，经谭震林、江华、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过目同意，然后委托陈伯达送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很快回电话说：「主席同意」。34于是电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于3月25日发往浙江，全文如下：

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

据已知材料，你省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与发展着，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除粮食工作之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6免。发展到[^]。几），也是促成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单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报成绩。省农村工作部顾虑到收缩会引起脱离积极分子的错[^]1这是对的，但如果群众是不自愿的，社[^]巩固不下去，让积极分子长期脱离群众，我们最终还会连积极分子与群众一起脱离，并造成社会生产的巨大损失。因此正确的方针只能是：有条件办好的一定争取办好，不可冒退；没有条件办好的，应打通基层骨干和办社积极分子的思想，团结住他们，和他们一道领导群果实行改组，一道领导好退社的农民进行生产，无论他们是退回互助组或个体经营，都应该把他们的生产搞好，始终保持良好联餐，不伤感情，为将来办好合作社而继续努力，在这些地方为了帮助基层骨干和积极分子下台，可由我们代为出头转困。要向群众说明：合作化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因此要完全依照群众的自愿来进行；基层骨干和积极分子的工作方式不当，是有缺点的，这与上级要求太高有阂，不能只怪他们，使他们以后好继续向群众进行

33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

4月。参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第3期'页8。

工作。对省以下各级干部，亦应该逐级由上面领导同志把发展过猛的责

任担当起来，使下面同志能够无顾虑地进行工作。对于退社和解散社的经济问题的处理，要照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深入典型，创造经验，作出公平合理的原则规定，使大家不伤和气，将来好再联合起来，避免可能发生的各种纠纷。闻你省现行的合作社经济政策，某些地方土地报酬显低，社员交公粮后即无剩余，树木及养蚕副业也过早入社，这些都是不妥的，望迅速研究改正，以利团结中农，巩固贫中农的联合。有些合作社有条件办下去，但因粮食紧张，贫农缺乏口粮、种子，中农不愿拿出生产抵垫费用，国家应在销售粮食方面，在低息贷款方面给以支持（贷款要由银行做出切实的计划）。

估计你们在加强了领导条件下，能巩固3万个社，保持1070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继续合作下去，虽然走了一小段曲折的道路，仍应承认是很大的收获，而不是失败，如能巩固的多一些当然更好。这个缩成数字不必下达，只作为省委内部掌握的计划，对下级只说明‘能巩固多少算多少’确实办不好的不要勉强维持，能巩固的要力争巩固，要实事求是。你们意见如何，希速电告。

中央农村工作部1955年3月25日

（此报得译震林、江华两同志同意）35

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的电报发出后，邓子恢出国访问。谭震林继续召集中央书记处二办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开会研究具体办法。江华也参加了会议。经研究决定，派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和中央书记处二办副处长袁成隆去杭州，向浙江省委口头解释电报35〈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1955年3月25日）载键国合作化史料集编》，页239—240。

内容的精神。此外，谭震林和江华还分别用电话亲自向浙江省委传达了这次会议研究的意见。

杜、袁二人到达杭州后，发现农村紧张状态确未平息，若干地区正趋向高度紧张。4月5日，杜润生在浙江省委书记霍士廉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传达了由谭震林主持的北京会商的意见后，说：（浙江引者注）去冬发

展合作社，战略上勇敢是正确的，但战术上是缺乏准备的。」有一批合作社，中农不向社投资，闹着退社；贫农缺口粮，要向社预支款项，情绪也不稳定。「这一批合作社是上马难下了；不下马，误了春耕生产，并影响工农联盟。」他建议：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巩固的全力巩固，须收缩的坚决收缩。既要防止一轰而退，也不可勉强维持，以免平均使用力量，使该巩固的也巩固不了。省委会议一致表示同意，「全力巩固，坚决收缩」，并决定召开全省四级干部会议进行布置。在会议举行前，杜润生曾专程回京向谭震林请示：浙江收缩措施是否可行？谭震林作了肯定的答复。江华也从北京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督促省委采纳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³⁶

4月8日，杜润生在浙江省委召集的县委书记会议上作报告，他在分析了农村紧张情况后提出：现在有三条办法：第一，一哄而退；第二，尽量维持，尽量巩固；第三，全力巩固，坚决收缩。他建议采用第三条办法，要巩固的全力巩固，要收缩的坚决收缩，防止一哄而退，但必须坚决收缩。³⁷4月11日，杜润生、袁成隆二人联名向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书记处二办写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在《瞭报》报了浙江农村紧张情况后，提议：「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下粮食之马」，「下合作之马」。「除全面端正自愿，互利政策外，还需要实行一个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即丢掉虚假成绩，集中力量巩固真实成绩，以免全面勉强维持，把力量分得四散，甚么也办不好，使紧张局面拖延下去。」³⁸

《邓子恢传》，页485—486。

〈杜润生在浙江省县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4月8日〕，载《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索编》，页240—242。

〈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1955年4月11日），载《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集编》，页242—243。

对于中央两部门的电报和杜、袁二人的意见，浙江省委十分重视。在省委书记霍士廉主持下，省委会议一致同意「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并立即召集全省县委书记会议，部署缓和农村紧张状况的工作。杜润生在会上作报告，再次阐明合作化运动中「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霍士廉代表省委作报告说：「为了集中力量办好能够办好的合作社，并使领导上能腾出手来领导互助组和个体农民进行生产，就必须贯彻『全力巩固，坚决收缩』这条方针。」于是，自这次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之后，浙江开始了合作社的巩固和收缩工作，具体分为着重于收缩和着重于巩固两个阶段。

收缩工作，从4月中旬开始到5月下旬结束，历时一个多月。首先是抓了统一各级干部的思想。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之后，各县普适召开县委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多数县还召开了乡党支部书记会议或区、乡、社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统一干部认识。同时，各县派出一批领导干部，深入重点乡，进行巩固和收缩工作的试点。随后，各级干部纷纷深入农村，一面广泛宣传自愿互利原则，让政策直接同群众见面，一面打通骨干思想，减少阻力。这样，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全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53144个，减为37507个，减少了15607个，大部分转为互助组。

对于这次收缩和巩固合作社的效果，霍士廉5月8日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电话汇报说：「在各专区许多乡区内，宣传了互利、自愿的合作政策，进行整社，效果是好的。」「好的社，社员满意，信心提高了，并未动摇，更有条件帮他们办好了。」「问题很大的社，很快解决了问题。农民由社榷组或转为单干经营，解除了顾虑，增加了肥料和插秧株数。」进退两难的社，也有不愿散的，应当积极帮助他们办好。对干部和群众都是一次很好的政策教育：一；唤醒了干部。过去干部不知政策过左侵犯中农的害处，听到群众意见后，知道了；二，群众了解了党的政策。有些贫农原以为合作是要合伙平产。有的中农以为是二次土改。现在消除这种误解；三，端正了合作政策。中农怕露富，有钱都用于买粮食。解决合作政策思想后，有所好转。整个情况证明，政策上宣传上补了课，对

浙江情况有积极意义。不仅对那些必须缩的社需要，对于应巩固的社也需要，对广大群众更需要。39

5月9日'浙江省委在给中央的书面汇报中也说：各地经验证明，政策和群众见面之后，对缓和当前农村紧张情况，特别是转变中农的生产情绪，效果非常显著。中旬，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肯定了前段合作社的整顿工作。同时指出，在整顿初期工作中的偏差，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乡。

6月，谭震林到浙江视察合作社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21日'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浙江合作社已由5.3万多个退到3.8万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28%退到18%。目前合作社的生产都很好，极大部分增产有把握，大部分经营管理也好。但互利政策未贯彻，不仅社干积极分子有抵触情绪，而且县、区、乡干部也如此。……全省确定抽出1.2万个干部，争取在7月份里派下去，开始全面贯彻政策，求得在秋收前做好。如果这一环作好了，这批老社不仅可以完全巩固下来，而且还能扩大新社员。

40

7月25日，浙江省委常委林乎加在给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话汇报中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

整个来说，这次整顿工作是做得好的。1955年7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编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情〉41统计，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贯彻「停、缩、发」方针后，在原有67万个合作社中，收缩的

省份主要是：浙江减了15607个，河北减了7000个，山东减了4000个，其它各省均无大的变动，有些省份略有增加，由于有增有减，巩固下来的有65万余个社，实际减少2万多个社。42

三毛泽东批「小脚女」

1重释「停、缩、发」方针

对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毛泽东是同意的。他在3月3日签发粮食购销的紧急指示时，还告诉邓子恢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占总农户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粮食征购已经到了极限，征购任务是900亿斤、多一斤都不行，合作化进度也要放慢。3月5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带回的、反映河北省安平县一个村在搞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简单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介石）走」一类大帽子压群众入社，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一封群众来信，批给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指出：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433月110，黄炎培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有人从家乡来，反映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说吃不饱；一些村干部工作作风不好，总是疑心农民家有藏粮，致使民间有怨声。14日，毛泽东覆信黄炎培说：「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444月初，毛泽东离京到南方视察。在视察途中，他看到麦子长得半人高，认为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生产消极的只是小部分。在上海，毛听柯庆施汇报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柯庆施反映的意见给毛留下深刻印象，使他联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45在此同时，毛泽东得到的信息还有：

一是农村粮食销量经过整顿明显下降。

年初，农村杀猪宰牛，全面紧张，这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共同认识。3月3日，中央关于粮食购销工作的紧急指示下达后，增加了对农村的粮食供应。但3、4月间，粮食销量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合理指标，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发展。例如山东省3月份销粮3.15亿公斤，平均每日1050万公斤；广西4月上半月每日销粮463.5万公斤；江苏省3

月下旬每日销粮1500万公斤左右。不少省份销往农村的粮食，如以每人每日供应0.5公斤计算，等于供应了全省农村人口的70—80%，好些县份，供应的人数竟占全县人口的95%以上。⁴⁶而且有迹象表明，正是销量愈多的地方，叫喊「缺粮」的呼声愈凶。显然，其中一

毛泽东：〈关于注意处理群众自愿入社问题给林缴的信〉！1955年3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47。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1955年3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15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I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373。〈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1955年4月28日〕，《新华月报》，1955年第5号，页169。

部分人的缺粮是虚假现象；更重要的是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心中无底，存在一种不正常的紧张心理；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制造人为紧张的情况。有的地区对农村粮食统销工作及时作了整顿，粮食销量很快降了下来。如：江苏苏州专区有56个乡，经过统销补课工作，群众要求供应数量普遍缩减，一般下降30%、个别下降到70%。⁴⁷山西闻喜县宋店乡原来要求国家多供应5085公斤粮食，经过整顿以后，不仅不再要求国家增加供应量，而且余出了3100多公斤机动粮。山东梁山、郓城、巨野等县的7个乡又5个村整顿的结果是：给243户缺粮的农民补发粮食29500多公斤，同时有620户农民自动提出取消和减少23.75万多公斤粮食的供应量。⁴⁸

上述这些材料给毛泽东的印象是：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又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引起的。这么讲是错误的。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

二是党外民主人士反映农民苦的呼声。

就在4月28日毛泽东批发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的前几天，民主人士彭一湖（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全

国政协委员)于4月24日请黄炎培转国务院一封信,就他的家乡所在的湖南省东部地区农村中的一些情况反映说:

一、留粮点过低。一九五四年办统购的时候,由于给农民留下的镥食数量少,使农民吃不饱,体力不足,生产情绪低,影响了生产,农民无力养猪,副业也受到打。二、定产量的'问题。一九五二年查田定产的时候,由于对平地水田的产量定得过高,加之一九五四年雨水过多,实际产量降低,使规定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出现空额。统购时由于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使农民留粮进一步减少。三、区乡干部作风问题。一些区乡干部遇事不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为了完成任务,往往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去执行,引起群众的反感。

黄炎培为报送彭一湖的来信给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信中,谈到他对粮食问题的一些看法,黄说:

以我综合各方面报告,推想起来,到底有粮者叫是少数,无粮者叫是多数,而且前者是跟随着后者而发生的。要分别处理,但断不可不处理。

49

4月26日,黄炎培再次致信毛泽东反映农村粮食问题,信中说:根据最近收到的各地人民来信,最严重的还是农村粮食问题,我曾选取可靠性较高的五封信送给陈云同志,并与其长谈四小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此时正临「农忙」,人为的丰和歉将取决于这一关头,似须经过正确了解后及时处理。

三是党内信息反续有倾向性。

对中共党内干部向上反映问题的心态,薄一波曾有过这样一段分析。他说:

在我们党内生活中,还常常有这么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喜欢人云亦

云，你说这个事很好，就到处都是报喜的；你说这个事有问题，就到处都出问题了~而且越讲越严重。这种现象对于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决策是很危险的。50

情况正是这样，在中央抓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过程中，各地又显然对问题的分析作了另一方面的倾斜；结合农村情况已有缓和以及粮食销量下降的情况，毛泽东得出这么一种印象：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的进攻，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彭一湖、黄炎培这些讲农民苦的人，自以为代表农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农民，是不愿搞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四是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4月2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的国家计委〈关于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的报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工农业生产赶不上国家建设的需要，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适应增长中的社会需要和国家建设的需要。这将是较长时期内的基本情况。

有关资料表明，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三年的基本情况是：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一年比一年降低：1953年增长30.27%，1954年增长16.37%，1955年只增长5.77%。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来自农产品的原料不足。其次，三年来的市场情况，主要是粮食、食油、副食品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逐渐感到紧张。这些生活必需品，都是农产物或是农产物的加工品。再次，国家资金积累的速度不快，不能适应更大规模的建设的需要。根本原因，是工农业生产水平比较低。外汇虽然由于压缩进口而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但从根本上说是不足的，这也因为可以出口的农产品和土特产品难于大量地增加。这些情况集中起来，就是国民经济的一个主要部门农业，它的发展落后于以工业为领导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上述种种主客观因素，促使毛泽东对引起农村形势紧张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作出新的判断。他确信农民对生产并不消极、不能把春季农村的紧张形势归咎于合作化搞快了，只要把粮食征购指标压低一些，便可缓和紧张情势，换来农民对合作化的支持，而不必放慢农业合作化的步

伐。

4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对谭震林表示，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5月5日晚，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和准备作会议总结的内容，毛泽东告诫邓：「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⁵¹邓子恢并未领会毛泽东的意图，第二天在会上没有传达毛泽东的这个

⁵¹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稿，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424—425。话，他的总结报告仍按毛泽东3月间的谈话精神，说：现在根据中央

席决定，今后：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5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粮食部副部长）开会，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周恩来也在座。

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毛问邓子恢：到1957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邓子恢仍坚持3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说：三分之一也可以。

他接着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

还说：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⁵²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明显流露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自年初以来所做工作

的不满。

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53召集华东、中南、华北等十五个省市54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会议从下午一时开到晚上十时。

毛在听取省市委书记汇报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状和发展计划时，提议江苏和浙江比赛，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山东、河北、浙江三省发展太多了的缩多少，由他们自己定。于是，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等省的书记，在会上重新报了1956年春耕前的发展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怨气，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⁵⁵毛泽东听信这些汇报，认为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他在会上重新解释了原来提出的「停、缩、发」方针。毛说：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甚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沉。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装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甚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毛的这个解释，显然是要把工作的重点转到了「发」字上了。

⁵⁵(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册，页314。

在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毛泽东说：「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

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
「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剧，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56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

经过讨论，毛泽东提出新区各省1956年秋收前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指标：河南7万、湖北4.5万、湖南4.5万、广东4.5万、广西3.5万、江西3.5万、江苏6.5万，共计34万个。毛说：这也是「自愿互利」。发展农业合作社对国家有利，对你们各地区也有利，如果你们自愿，那就拍板，把这个数字定下来。

因为与会的主要是华东、中南各省市委书记，所以毛泽东指定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去东北、西北、西南、华北分别召开一个会，把会议精神传达一下，讨论和解决这些地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

毛最后强调指出：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57

1955年5月17日的这次会议，对尔后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毛泽东传》有如下评说：「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是在农业合作化决策方面出现的一个大转折，是毛泽东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方针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58

2批中央麤工部的「右倾」

毛泽东在5月17日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引起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重视。5月28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央表示，应按毛泽东在

5月17日会上指示的新区大发展的精神，重新修改为中央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件。6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它泽东于6月8日再次南下杭州），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汇报。刘少奇说：「建社有很大成绩。要估计到我国和苏联情况不同。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一两年内减产。我国显然不同，社一建起来，百分之七十五都增产〔去年〕；减产的，整顿后第二年也增产了。对农业合作化事业要有充分的信心，对成绩要有充分的估计。」59会议提出，今后的一年内还是应当大发展，方针是：要把现有的社巩固起来，同时注意发展新社的工作。会议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的今后一年合作社将由现有的65万个发展到1956年秋收前的100万个的计划。刘少奇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实际情况是，不只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已落后于毛泽东变化了的考虑；6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未能跟上毛泽东5月17日讲话的精神。6月下旬，毛泽东外出视察回京，他觉得农村工作部报中央的计划数字，只比原有65万个社增加半倍多，少了一点，建议翻一番，即增加到130万个左右，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农业合作社，以作榜样。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转达给邓子恢，邓表示了不同意见。6月17日11日，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等人谈话，在听取邓子恢汇报农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子恢，说邓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检讨了前一段工作中，他对农村情况的分析是欠全面的，对「收缩」强调得过份一些，对新区没有采取大发展的方针，是消极的。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似邓子恢仍坚持尊重中农「自愿和建社容易、巩固难」的观点。邓子恢这一坚持，引发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为了掌握更具体的情况，毛决定调阅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材料，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杜润生回忆说：「过了几天，田家英直接给中

央农工部互助合作处〔二处〕打电话，说主席要这几年合作社发展的数字。7月18日，毛主席给我批了一个条子，说：储将上次农村工作会议〔四五月间〕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我就送去一些文件，以后廖鲁言他们又送去一些，是各地合作社的典型材料。」62

与之同时，毛泽东还派他身边的警卫战士回他们自己的家乡（有河南、广东、广西、湖南）去作调查，看了他们的报告和听取他们的汇报；还找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笱了解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给他的印象是：农民具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7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毛在这份简报上写下了他的意见：

在发展问题上，「不进」与「冒进」。目前不是批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棧的可能性。……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

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能忽视^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63

毛泽东写的这段批语，鲜明地定下了他批判中央农村工作部「右倾」的基调。

7月31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

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64的报告，回顾了农业合作化的历史，阐述了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指导方针。但是，报告的基调是批评农村工作中的所谓「右的错误」。

报告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而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落后于群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这是「错误的方针」。报告批评农村工作部对浙江省猛烈发展的合作社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是「胜利吓昏了头脑」，犯了「右的错误」。这些论断，不只在实际上否定了春季整顿巩固合作社以来，中央对农村形势的正确估计和各项整顿措施，而且也否定了农村工作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等正确的指导方针。

63 《中国广业合作史资料》~! 训! !年第5期，页' 8。

64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0955年7月31日I，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418-443。

报告论述了合作化大发展的紧迫性，强调国家工业化对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年年增长的需要，同农业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如果不基本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就会使工业化遇到绝大的困难，就不可能完成工业化。报告提出，在目前我国还不能向农业提供大量机械的条件下，「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认为只有通过合作化形成大规模经营的农业，才有使用农用机器、化肥、电力的可能。报告强调，无论是为满足工业化对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扩展国内销售市场，还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都必须尽快实现农业合作化。报告批评了那种认为合作社的大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的观点，强调占全国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只要把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吸收入社，合作社的大发展是能够巩固的。报告向全党指出：「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这是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

一个新的突出的特点」，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会上，邓子恢做了检讨，说：在今年4、5月间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时，我对当时情况的分析是欠全面的，方针显然是比较消极的，对收缩过份强调了一点。这个缺点经过主席在5月17日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指示已经改变过来。当时所以产生这个缺点，主要是对农村中社会主义优势这个主流估计不足，而对运动中所产生的缺点则估计过份。经过主席与中央各同志的帮助，我今天才了解这一缺点，今后应力求避免再犯。8月1日，会议结束，毛泽东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4月时，中央一个意见，子恢一个意见。农村工作部没有执行中央的意见。现在证明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安徽发展了几万个合作社，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明夏，全国可大发展。准备工作加巩固工作不会冒险。准备工作第一项就是批评错误思想。集体主义比分散主义、个人决断好，应该服从这条纪律。各部门不能乱发命令。65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定下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的基调，并把在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和进度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的思想来批判，这就助长了中共党内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急躁冒进情绪，成为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起点。

3 各级党委纷纷检查「右倾保守」

从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小脚女人」开始、在中共党内迅速刮起了一场反「右倾」的台风。「右倾」，在历史上就是对革命的动摇，对阶级敌人的投降；现在就是不搞社会主义，自觉不自觉地在搞资本主义。这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是一个根本的政治立场问题，是绝对不能含糊的。因此，各层领导、党员、干部无一不纷纷表态，与这种「右倾」思想划清界限。普遍反映出一种恐右心理。8月以后，各省普遍召开中共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检查「右倾」思想，并迅速向中央报告。66毛泽东均一一亲自过目，写出有针对

性的批语。

湖北省委报告说：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完全拥护党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并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检查了半年多以来省委的工作和指导思想。省委认为，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我们是有右倾思想的，表现在有些怕多、怕乱。过去总是认为晚解放区要比老区少一些慢一些才对，缺乏向老区看齐的积极性。当然「抢先」是错误的，但能做到而不积极去做，正是右倾保守思想在作祟。省委认为，主席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指示，是过渡时期各项工作的指针，一切工作都应充分发挥潜力，克服困难，尽一切可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度，必须反对在困难面前消极动摇的右倾思想。67毛泽东8月13日批示：「关于为甚么『有些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不是比土地改革时期的劲头更大，热情更高，而是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消极和怕困难的情绪』的问题，应当加以分析，给予明确的回答。」68

辽宁省委报告说：在检查一年来我省合作化运动发展状况时，会议一致认为：我省合作化运动基本上还是正常、健康的。但在后来，由于局部地区发生了农村紧张情况，我们一时对全面情况掌握了解不

66各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⁶⁶：册，

页377—404、429—432、472—473。6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⁶⁷第五册，页301—302。6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页300。

够，同时又把紧张的原因过多的归咎于合作化运动的「过粗过快」。所以3、4月间曾一度做出「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决定，未能紧紧地通过巩固工作把合作化高潮继续引向前进，在6月11日讨论发展问题时仍表现了小手小脚，不够大胆，缺乏应有的积极精神，以致使许多农村干部在数个月来对发展合作化的热情和积极性受到一些挫折和压抑。正如主席所指出的，我们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其根源在于：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认识的不全面；对党在农村中的崇高威信和领导能力估计不足，对农村中广大的贫农和非富裕中农所具有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不足；

思想方法上存在片面性。8月16日、毛泽东批示指出：「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强调二者的紧密联接，而不可只强调前者，减弱后者。因为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69

安徽省委报告说：会议中揭发的材料证明，「小脚女人」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是损害了我们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并认为安徽地区有「小脚女人」，有「改组派」，也有大脚。为了使小脚放大，「改组派」变成天足，必须在结合学习主席的指示当中继续深入检查，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小脚女人」的丑态，才能正确贯彻主席的指示。8月31日，毛泽东写的批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70

浙江省委向中央检讨说：今年4月我们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错误的，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解散1.5万个社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缩小；农民自发倾向一度有所发展；大大地挫折了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一度迷失了前进方向，滋长了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和自流倾向。……实现农业合作化全面规铲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尤其是整顿和发展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页30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页331。

瘴的基层组织。因此必须全党动员起来，从上而下，从内到外，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9月8日，毛泽东批示指出：「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个错误方针是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浙江省委建议的，因此应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主要责

任。」 71

山西省委报告说：今年4、5月间，在高潮面前，曾经暴露出我们在指导思想上有过摇摆和右倾保守情绪的，与会人员都作了检讨。有的说，毛主席要求我们走在群众运动的前头，而我们却要求群众放慢脚步来等待我们。有的同志说，运动’已经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而自己的指导思想仍然停滞在试办阶段，不敢放手地依靠党支部和群众中大批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丙而就只能像一个小脚妇女走路。

河南省委报告说：从实际情况来看，在1954年的冬季，走合作化道路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和阶级斗争的焦点。当大部地区已经出现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时，我们的指导思想却发生了问题，在思想上辨不清方向，掌握不住问题的本质和形势的主流，在发展计划上发生了犹豫。一句话，就是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面前立脚不稳。会议揭发了各种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和纠正。

山东省委报告说：到会干部自觉地检讨和批判了右倾思想，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远景和方向，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以乡为单位通过分析条件、逐户排队，做出了发展与巩固农业合作社的全面规划，会后绝大多数干部都欢欣鼓舞，情绪高涨，信心很足。

广东省委报告说：几年来生产的发展，农村党员中，已有一些由贫农上升为新中农的上中农，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加上思想教育薄弱，在他们中有一些人就产生了浓厚的资本主义思想，对合作化抱着消极态度和一种抵触的情绪。这种思想如不加批判、整顿，要加强党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是困难的，因此，结合传达中央对合作化运动的新精神，在党员中展开思想检查，批判右倾，反对富农思想。选拔那些阶级觉悟较高，对合作化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具有高度热情的贫农或下中农的党员积极分子到支部的领导岗位上去。这实际上就是结合合作化的大发展去进行的农村整党工作。

层层检讨「右倾」，开展思想批判加组织整顿的做法，造成了必须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一种紧张的政治氛围，形成了一股推进合作化运动的冲动力。

4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关于毛泽东向邓小平提出：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是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前还是之后，已出版的书籍有两种说法：

《毛泽东传》中说，在7月11日毛泽东与邓子恢等七人谈话之后，7月15日邓子恢再次反映不同意农业合作社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的意见。于是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⁷²当事人之一的杜润生则坚持说，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前，并没有发生130万个还是100万个的争论。所以，当邓子恢在会上检讨以后，毛泽东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争论再起，是8月3日的事。对这一过程，杜润生在他的《自传》中做了详细的叙述：

那是在8月3日这一天（不是人们相传的7月31日会议之前），毛曾找邓子恢谈话，提出合作化速度可以再快一点1100万个再添30万佃，搞130万个合作社，即由翻半番改为翻一番，看怎么样？邓说回去考虑考虑。邓再次去见主席之前，找了部农合作处处长李友九商量，李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计划为好、因为这是中央刚定下来的，办好这一批社具有重大示范作用。那时天已很晚，我已经睡觉了，邓如果找到我，我可能会劝他中国之大计划伸缩空间也大，不必再争这点数字。几年来事实说明定数字的任意性是显而易见的，不必通于拘泥。

7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页362。

72 《毛泽东传〔1949—1970〕》上册、页380—381。

当晚，邓子恢去见毛主席，讲了干部与群众思想都准备不¹应该巩固一

批发展一批。已经办的社人均收益要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对农民有吸引力了，那时可以加快。如果第一批不办好，会影响以后农民接受合作社的愿望。应当以苏联为鉴，苏联集体化时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如超越现实条件，会大伤元气〔前几个月邓老刚从东欧访问回来〕。100万的数字是反复商量、经中央同意才定下来的，我们争取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超过，不要再修改了。

邓子恢还谈到合作社要求很多条件，包括群众觉悟水平、干部领导水平，落后地区还缺会计，账目混乱，仅培养会计就需要时间等。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百万就行，多30万就不行？我看不见得。觉得邓说的那些根本不是理由，是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混淆了，因此认为是路线问题。

此次谈话之后，在8月下旬，事情出现了某些变化：

8月26日，毛泽东给邵小平、杨尚昆的批示：目前各地关于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转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写上「请农村工作部办」。这样，就停止了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指导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工作。

8月2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通知：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可能召集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它问题的中央会议。这表明争论就是在这之前刚刚发生的了。

接着邓小平召集廖鲁言和我商量筹备会议事项，他传达主席原话，说：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靠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并说中央决定召开全国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以上都参加。小平还交代由陈伯达起草决议并说明，要邓子恢准备检讨发言稿等。我说，我也应该作一个检讨，小平说：好嘛。73

从杜润生叙述的过程，尤其是何以引出8月26日毛泽东给邓小平、杨尚昆批示：目前各地关于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停止了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指导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工作来看，好像杜的说法更符合逻辑一些。当然也存在一些矛盾，如：9月8日，毛泽东

在浙江省委报告上的批语中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同志现在也已经认识了自己的这个错误（指『坚决收缩』——引者注），并且已经做了自我批评。」74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上写的批语说：「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75从这些文字来看，又似乎在8月1日以后并无矛盾进一步激化的迹象。因此，毛泽东何以提出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还有待进一步的史料左证。

几个月来，邓子恢力主合作社要稳步发展的理由，主要是：第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应，「一五」计划只能为工业化打下初步基础，农、技术改造可能刚起步，合作社必须花大气力搞好经营管理，特别是按劳分配、劳动组织方面的工作，才能有较显著的增产。在此阶段，合作社过多过猛地发展，是不适当的。第二，现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工作很繁重，如果再多发展，无论群众觉悟水平还是干部领导能力都跟不上去，可能使巩固和发展两方面的工作都做不好，并会影响生产发展，降低合作社在农民中的威信。第三，目前农业合作化主要是打好基础，老区需要时间做好巩固工作，新区适当发展一批新社，并集中力量办好，以便训练干部，示范群众，为以后实行全盘合作化做好准备。邓子恢认为，这样做，虽然从当前一个具体环节上看，似乎缓慢一些，但从整个合作化来看会是更快一些和更好一些。76

8月1日省市委书记会议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相继召集扩大会议等多种形式的会议，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检讨和批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页36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页40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343—344。

「右倾保守」思想，争相表示要提前实现或大大超额完成发展合作社指标的决心。为了实现高指标，各省纷纷行动起来，迅速从各方面抽调大

批干部分赴农村，充实办社的领导力量，检查敦促合作社的大发展。在批判「右倾保守」、强调「全党办社」的氛围下，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面对合作社迅猛发展的形势，中央决定将原拟召开的省市区党委书记及地委书记会议，改为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以便全面部署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

从8月到10月，毛泽东根据各省上报的贯彻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情况报告、办好农业合作社的典型材料，先后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做了三次修改，77增写了几节尖锐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右倾思想」的内容。78中央将报告的修正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立即印发给各级党委、党组、党内干部直至农村党支部。

5猛烈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10月4日至】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薪。〈决录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性质进一步升级，确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指出它「在实质上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强调「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决^！）对不同地区规定了合作化的进度，除某些边疆地区可采取比较缓慢的步骤外，对绝大部分地区都规定了很高的指标，使已经超速发展的合作化运动进一步升温。

77毛泽东：〈关于修改、印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批语和通知〉〔1955年8月、10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页321。

78杜润生说：现在人们看到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一文是经过两次修改的，10月发表的并不是7月31日报告的原文。其中新补充了许多问题，如批评我们从富农、富裕中农立场出发，批评惊惶失措，批评下

马~上马一字之差，辟于办大社和高级社，肯定了苏联集体化是成功的（这点是专门针对邓子恢谈话的1等’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0，161。

毛泽东在认识上发生的急速变化，以至把问题提到如此严重的高度，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之所以被大家接受，除了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崇高威望外，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当时所面临的复杂情况，使大家公认：毛泽东的选择是当前唯一正确的选择。因而刘少奇等人在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从各个不同侧面对毛泽东的决策作了论证。

刘少奇发言的主题是：农业合作化，是我国当前阶级斗争中决定谁胜谁负的基本问题。

他说：我们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这个革命，就它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比民主革命更广泛更深刻得多的革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农业合作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国当前阶级斗争中决定谁胜谁负的基本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比起土地革命问题，牵涉面更多，震动的范围更大，影响更深。因此，赞成社会主义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目前主要的也是以对待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态度来划分界线的。我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人民政权的手中，广大群众拥护着我们的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并不一定直接表示反对社会主义，甚至也不直接表示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但他们却时常借口农民问题来同我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当广大的农民群众已被说服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大批大批地加入合作社的时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派别和资本主义分子都必然要集中地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就是最近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反对农业合作化那股谣风的来源之一。但是我们有些同志，由于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不够，没有用心倾听在农民中占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的意见，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来分析这种谣风，所以他们在这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紧要关头，表现了不可容许的动摇。我们从这里应当得到一种严重的教训：共

产党员要善于分别社会上各种人的意见，在听到各种叫声的时候，要注意各种叫声的来源，要注意是甚么人在叫，是代表甚么

人在叫。要增强我们抵抗各种谣风和错误意见的力量，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动摇。79

周恩来发言的主题是：我们怎样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他说：不能认为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对于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都已经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有一些原来是抱着赞成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态度来参加党的，一到同党走完民主革命这段路他们便不愿继续前进了。有一些同志平日熟悉的只是民主革命的纲领，全国解放以来又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注意去熟悉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而迷失了方向，丧失了对新鲜事物的感觉，表现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某些动摇。有一些同志虽然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但是由于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于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对于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客观过程也缺乏认真的研究，因此他们就在这样或那样的工作上发生抵触情绪，并在革命高潮面前惊慌失措起来。必须认清，在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与过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来比，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这个阶段，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集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上。一面接受领导，接受改造；一面又抵抗领导，抵抗改造，这就是今天资产阶级的特点。接受领导和改造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不是心甘情愿的；抵抗领导和改造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的表现。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党内曾经出现过依靠商人亦即依靠资产阶级、农村允许四大自由亦即允许自由剥削的资产阶级论调，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周号召：全党同志要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在实践和思想斗争中锻炼自己，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80

陈云发言的主题是：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是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

他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必须用各种方法来增加农业的产量，使农业能够尽量适应、至少不太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增加农业产量的方法是很多的。如：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等。但是大规模的开荒，不是近几年能办到的；兴修水利，短期内也不可能大量增加灌溉面积。就目前的需要和可能来说，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无疑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陈云认为，只要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成几十户或更多户的联合经营，就能使个体农民难于单独进行的种种增产措施，得以实现。如果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建设的头一二年内，没有拖拉机，仍旧使用畜力和现有农具，一般可以增产20%的话、那末，单单这一项，在全国农民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增产粮食六七百亿斤。在目前，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增加农业产量的办法。也只有把小农的经营组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有可能在具备了客观条件以后，使我国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大规模的经营。把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面，这不但是目前增加我国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而且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主要方面。只有在农村社会主义化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确实战胜了资本主义。81

邓小平发言的主题是：我们所要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工农联盟。

他说：农业合作化问题是摆在我们党面前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不只是牵涉到我国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事，还因为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的意见，存在着思想的混乱。对合作社问题抱着右倾观点的同志的重要论据之一是怕破坏工农联盟。究竟农业合作化是有害于工农联盟呢？还是有利于工农联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目的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是为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彻底胜利，在现阶段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既然我们所要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工农联盟，

79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11日。80周恩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11日。陈云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7日。

1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3—1955）一向社会主义过渡；度

那么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我们的党就应当明确地提出合作化的道路是农民继续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生活的唯一道路，并且用事实来向农民证明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就应当明确依靠贫农的方针，热情地支持广大贫农和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合作社中树立贫农的优势；就应当不断地用说服的方法，并通过事实来克服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动摇性，同时采取各种经济措施（例如实行统购统销、办供销合作社、办信用合作社等）来割断他们同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扩大社会主义阵地，缩小资本主义阵地，这样来达到团结中农一起走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巩固的工农联盟。反之，如果我们迁就富裕中农，抹杀贫农和下中农的利益，那就是既损伤了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性，也不能使还在动摇的中农坚定起来。结果决不会是甚么工农联盟的巩固，而只能是彻头彻尾地破坏了工农联盟。82

彭真发言的主题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他说：在过渡时期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很尖锐的，阶级关系是紧张的。当前突出表现在工农业关系、粮食征购、农业合作化等方面。这些紧张情况，本质上都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社会主义的大工业和大农业的生产方式矛盾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现在抵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逆流不但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党内的支持者。他们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对个人发财很热心，对社会主义则很冷淡，如有的富裕中农说

的那样：「有了剪发头，赶上大犍牛，社会主义顶个球？」这样就在党内形成了一种相当紧张的关系，在党内发生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一部分区、乡干部、党员中如此，在高级干部中也有这种情况，目前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正是农村这种尖锐斗争在党内的反映。83
陈毅发言的主题是：毛泽东的理论贡献。

191

第三章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

他说：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不只解决了三年来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对农业合作化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更有着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力，在于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依靠着千^万群众的革命意志，对实际生活进行科学分析，拿出真凭实据，从说明历史掌握现在到预见将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仅能预见革命高潮；而且能领导群众去预备和推进革命高潮，以至掌握革命高潮，使革命达到圆满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起了各方面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作用是起了伟大的理论家的作用，这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杠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是再一次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又以革命实践丰富马列主义理论的活生生的典范。这就使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实践上有了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他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善于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善于用心作群众实际生活的调查研究，善于运用中国革命的历史知识和斗争经验与当前斗争相结合，善于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透过现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而我们则囿于狭隘经验的小天地里看不见群众运动中的新世界。84

这些领导人的发言，基本上反映了1950年代，中共党内领导层对在中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对毛泽东本人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的意见何以很快为中央最高决策层和中央全会接受，并在全党迅速展开反「右倾」的最根本原因。

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曾对邓子恢竟为几十万个社数去同毛泽东争辩表示吃惊，认为何必去「闯祸」？邓子恢曾解释说：不是几十万个社的间

题，要紧的是办合作社要不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怎么能不讲清楚呢。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也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共同认识，邓子恢在六中全会作了诚恳的检讨。

邓说：中央农村工作部在我主持之下曾于1953年及1955年春，先后犯了两次原则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对民主改革如何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清，精神准备不足；对集体化同机械化的关系存在

陈毅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3日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为题公开发表。

着不正确的理解，错误地认为要有机械化才能集体化。到了今春当整个合作化运动已取得巨大发展，局部地区出现了高潮，全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本来应该采取一个积极发展的方针以推动这个高潮，但我对合作化运动发展却采取了相反的，消极的、错误的指导方针。这种错误方针是同中央方针完全相反的，是违背中央路线的，是脱离群众的，特别是在收缩方针的影响下有些地方发生了强迫群众退社，强迫群众解散合作社的严重情况，大大挫折了干部和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助长了富裕中农的动摇，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这种极其严重的错误行为，应该完全由我负责。提出这种错误方针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思想上的右倾。即：对于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对于富裕中农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动摇抵触情绪缺乏阶级分析，把富裕中农的抵触情绪看成是所有中农的情绪，因而惊慌失措。这是我的右倾思想的主要表现。其次是对党在农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强调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就是我的右倾思想的另一表现。85

杜润生在会上检讨说：1953年的错误，是热心于帮助个体经济，而不热心于支持合作经济。错误地认为前者是大量存在的，是现在的生产依靠，

后者还是小量的。因此，只空喊合作化是个工作方向，而没有具体制订出行动计划，所做的还是那种对小农经济「好行小惠」之事。不深刻了解：土改以后的新的农民问题就是农业合作化问题。我这次所犯错误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对群众社会主义要求估计不足，在合作化工作中主张消极退却方针。这还是从1953年残存下来的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思想作祟。这种思想，实际上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这些富裕中农，要在「土改后歇一歇」，反对国家干涉他们的「自由」。在这时候，我主张合作化缓慢发展，正好迁就了他们倾向资本主义的要求。86

85邓子恢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1955年10月。转引自蒋伯英：《邓子恢与中国农

村变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页485—487。86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略》1页¹⁰。

半个世纪之后，杜润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当时背景之下，邓子恢和我本人，在经过一场争论之后，是接受了毛主席主张的，以此为逻辑前提，做出一系列检讨，并非达心之举。」87

在会上检讨的还有彭德怀。杜润生说：「会议一共有248篇口头和书面发言，全部都是拥护主席和党中央的方针，自我反思一些问题的。但出人意料的是彭德怀做了一个检讨，他曾向毛主席当面提出过，也是不赞成发展太快，反对冒进的。」88

会议由毛泽东最后做结论。他对这次会议定性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

应，都要有全面规划。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是希望通过由农业合作化带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快速发展。毛还点名批评邓子恢，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过去邓子恢同志有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⁸⁹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

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⁹⁰

四农业合作化的「大风暴」”

11955年夏季以后合作化的急速发展

8月间，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开会检查「右倾」思想的同时，纷纷提高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指标。

安徽省委报告表示：大家一致认为，有信心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中央给我们翻一番的任务。我们打算今冬明春再办36000多个社，连同老社共计80000多个，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33.7%。到1957年。。⁹²

辽宁省委报告说：会议研究修订了明后两年合作化运动的大体发展规划，计划今冬明春新建15000个社，共吸收36万户，占总农户15.7%；原有社扩大，可增加21万户，占总农户8.77%，即在1956年春前新老社共达45000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将达到总农户的55.7%左右。在此基础上，1957年春耕以前则以扩大为主，建社为辅，再发展农户30%左右，则合作化比重即可达农户80—85%。。⁹³

湖北省委报告说：在批判右倾思想，分析各项条件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我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划为，到明年秋前发展到7万个社，占

全省农业人口的257。左右，1957年冬发展到12万个社、占全省农业人口的507。左右。94

山西省委报告说：会议确定1955到1957年全省合作社发展的速度如下：1955年社数由31786个增至42000—44000个，入社农户占全省总农户数的417。增至51—557。；1956年社数增至52000—54000个，入社农户达全省农户总数的67—707。；1957年社数达到56000—58000个（即达饱和状态），入社农户达全省农户总数的75—80呢。按照上述速度，全省41000多个自然村，到1956年即可村村有社，1957年全省农村基本上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后，将消灭富农，农村阶级面貌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95

河南省委报告说：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农村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去年冬季在我省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估计今冬明春就会形成全省范围的高潮；明确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通过了全省在1957年底以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8万个，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60呢以上，在今冬明春发展到10万个社，入社农户达到占总农户的307。的指标。96

浙江省委在检讨了执行「坚决收缩」的错误后，表示：为了坚决执行主席指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我们重新研究制订了农业合作社发展和巩固的计划。具体规划是：浙江全省农村总户数约为494万户，如按照全部人社，每社以40户左右计算，则共需建立11万个左右的社，我们的初步规划是：在1955年秋季到1956年秋季以前，发展到65000个左右〔现有的37500个在内），组织总户数的407。左右（现有在内）；到1957年秋季之前，发展到10万个社左右，组织

90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页195、208。91毛泽东在7月3，日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道：「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

的大风暴就要到来。」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改为「高潮」。《毛泽东传（层一197&》，上册，页386。92〈安湫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1955年8月）’载（^业集体化重要文件弃编《1949—19571》，上册，页387。93〈辽宁省委关于传达讨论毛主席「广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指示的报告〉11955年8月12日），载（建国以来臃业合作化史料集编》^页290。

总户数的70先左右；到1958年秋季之前，采取以扩社为主，新建社为辅的原则（新建社约为3000到5000个），组织总户数的859。；到1960年秋季以前，组织总农户的907。以上，基本上完成对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97

甘肃省委报告说：会上经过对错误思想的批判，修正了发展计划。确定1956年春播前，全省新建11101个新社，加原有老社共18252个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23先左右。1957年冬季前，社数发展到35000个，入社农户达到45呢以上。98

福建省委报告说：我省农业生产社现在已发展了19000多个社，社员41万多户，占总农户157。。计划今年秋至明年春耕前发展19000个社（连原社共38000个社），社员将发展到占总农户的35呢以上。99

云南省委报告说：经过大家讨论商定的全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划是：今年秋收前完成由原有7100个社发展至30000个的计划，明年春耕前再发展5000至10000个，则全省入社农户占总农户237。左右。明年秋冬发展21000个，占农户407。左右，到1957年发展至73000多个社，连同老社扩大、并社，全省348万多农户中，入社农户194万多，占总农户557。左右。我们今秋发展23000个合作社的运动，估计9月中旬可基本结束。100

就在这些报告先后上报的过程中，各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刚刚制订的计划。据统计，从6月到10月，全国就新建合作社64万个，使合作社总数接近130万个，仅四个月就基本实现了「翻一番」。中共

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了更大的「风暴」。2上下互动一再提前的时间表

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刮起的这场「大风暴」，绝非仅仅是由上层推动的结果。因为毛泽东在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规划是：

在1958年春季，全国将有2亿5000万左右的人口[^]5500万左右的农户（以平均四口半人为一户计算）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就是全体农村人口的一半。那时，将有很多县和若干省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将在全国各地都有一'』、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变为全社会主义。我们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即在1960年，对于其余一半农村人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时，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改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数目，将会加多.。在1960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101

在这里，毛泽东给的时间表是，到1960年全国农村的农户基本上都参加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如前所述，在8、9月间各省上送中央的报告中，不少省份就提出可以在1957年实现初级化。这既证明了反「右倾」的必要性，又表明再快一些也是可能的。于是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第二个时间表：

第一，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先进的地方，合作化程度在1955年夏季已经达到当地总农户的30%到40%。，大体上可以在1957年春季以前先后发展到当地总农户的70—80%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页438[^]

第二，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合作化程度在1955年夏季已经达到当地总农户的10%左右或#20%左右，大体上可以1958年春季以前先后在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第三，在「I：助运勅基础比较薄弱、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还很少的地方，实现合作化需要更多的时间。1(12

这样，实际上就把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提前到1958年春季以前，即提前了近三年时间。

但在各省领导人返回以后，各省又普遍将计划加码，根据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各省区计算，大多数已达到5070以上，少数省区也可以于1955年冬到1956年春达到409。以上，因而提出1956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即达到757。以上。

据此，毛泽东在1955年11月30日代中央起草的一则电报中说：

看^各省群取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令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远对今后的工作极为有利。1(13

实际情况再次突破了毛泽东的预见，1955年底，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年中的63.4万个增加到190.5万个，入社农户由年中的1692万增加到7545万，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由年中的14.2*7。增加到63.37。（其中高级社由年中的529个增加到1.7万多个，包括的农户由年中的大约4万增加到475.5万，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由年中的0.0337。增加到4^。

104

1955年夏秋，在大办农业合作社的这股热潮中，广大农民究竟是怎么想的，何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农民的各个阶层都被席卷进来了呢？这显然是有原因的。中国的贫苦农民，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

得土地的。经过土地改革获得翻身的大多数贫下中农，认为共产党不会唬弄农民，相信共产党，^&主席指的路肯定是向好变，不会往坏变。加上「高级社是天堂，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喝牛奶、吃面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宣传；加上传达精神，组织参观，党内动员，骨干

带头，分工包干等组织措施，从1955年冬季开始，全国农村掀起了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国农村》发表的一则报导中写道：「『我吃毛主席的，穿毛主席的，为甚么跟着毛主席走不要我。』山东历城坝子乡贫农尹传庚三次要求入社未获批准，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吉林省通化县城沟村68岁的关德祥〔贫农〕，听了全村合作化规划的宣传以后说：『听毛主席的话，得好好劳动走合作化这条道，我们老俩口子虽然都老了不能干硬活，可是还能给合作社看门、照料牲口。』」他这代表了绝大多数贫农的心声。中农的心态显然不同，他们中的多数是遵循了「人随王法草随」的古训，顺着潮流走；或者鉴于富农已处于「出租土地无人要，想找雇工没人当，投机买卖断门路，放账剥削怕告状」的境地，一部分富裕中农抱着「迟不如早，早不如快，早入早主动」开始跟进；还有的怕重划成份定成富农，只得「被大风刮进去了」。如果说，反「右倾」和层层规划摊派数字，造成了一种政治氛围和压力，那末一系列宣传组织工作则造成了一种「高潮」的态势，而农民中的不同阶层怀着不同动机参加合作社的行动就为已经点燃的火势加薪添柴。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高潮」、正是这样一首交响乐曲。这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1955年冬季的急速发展，连始作俑者的毛泽东本人也难以跟上的原因。

鉴于这种情况，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影〉中又提出，农业合作化的进度，1956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入社农户达到80—85%左右；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在1960年基本完成，或缩短一年，争取于1959年基本完成。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

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49—1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三章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

展纲要》又要求：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其余地区，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于是，紧跟着大办初级社的热潮，又出现了并社、升级的高级化热潮。据1956年5月底统计，全国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达11013万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1.27%。其中加入高级社的7472万多户，占农户总数的61.97%。1956年底，入社农户达1178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10742万户，占农户总数87.87%。¹⁰⁶基本上完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对1955年夏季以后农村形势变化的意义，毛泽东当时作了如下的评估¹⁰⁷

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霾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變了樣，成了另外一種氣候，幾千萬戶的農民群眾行動起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實行合作化。……這一年過去，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¹⁰⁷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又說：「本來的安排是用十八年的時間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促就很快。農業發展綱要上寫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現在看樣子今冬明春就能實現。」¹⁰⁸事實上，在毛說這句話的時候，高級合作化已經基本完成了。

¹⁰⁶《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冊，頁406。

107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页729、730。108《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册，页407。

上述的两段话，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当年的喜悦心情。但是，历史实践证明，农业合作化不仅没有给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预期的效果，而且它的急速发展为尔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至于当年毛泽东与邓子恢的争论，尽管不是实现合作化的目标之争，而是发展速度之争，但如杜润生所评说的：「分歧所在，实质上是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的认识分歧。一方以邓子恢为代表，多少是照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另一方是毛泽东1951年所提倡仿效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段的主张，在夺取政权之后，先尽快改变所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这意味着要跳过十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定战略部署，历史证明是跳不过去的，即使跳过去，还会回来的。」109

五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加快

1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的浪潮，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讲话，专门讲了农业合作化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他指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繫，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毛进一步论证说：

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

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

109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页65^

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大仁慈1

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先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这是一件很好的事1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110

为先做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的工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闭幕不久，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领导人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人在颐年堂举行座谈会，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人既明知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社会主义道路不得不走，又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惴惴不安，犹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理状态，向他们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殷切期望工商业者安下心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首先向他们说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它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为使大家在农村正在刮起的「大风暴」中安下心来，毛泽东向他们说明：「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

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为打消资本家的思想顾虑，毛泽东鼓励大家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毛说：「农民搞合作化，对于私有制总有些恋恋不舍。《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离家时还爱惜家具是有理由的。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关于资本家的个人前途，毛向他们指出：「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一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泽东希望在座诸公团结一批觉悟较高的核心人物，掌握自己的命运。毛向他们说：「我想劝一些人，每个大中城市有那么些几十个、百把两百个觉悟比较高的核心人物，经过他们去说服大多数人，这样比我们去说更好。要有一些人早下决心拥护共产，因为迟早是要共产的。」「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V11

毛泽东做了主题讲话之后，请参会的各位发表意见。

章乃器：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毛泽东：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章乃器：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黄长水插话：还有下一代）。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

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闰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年11月27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488—491。

毛泽东：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凡：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黄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尼，还是不挤垮好。尼？现在不先一齐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躅尘：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承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

黄长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五千多人，每周三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一万人。

麦加了学习的，达法就少了。

毛泽东：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遏且^。总路线宣传以后，情沈有些转變，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

毛泽东：整个提法还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还留下一些尾巴。112

这次与工商界头面人物的座谈，重点是务虚。为使他们摸到共产党更具体的底，10月29日毛泽东又召开第二次座谈会。为使更多的人参会，会议地点改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事先给彭真、邓小平写信说：

明曰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4，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29日，除第一次参加座谈的陈叔通等代表人物外，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陈云是中共中央对资改造十人小组的组长，经过全面比较、反复思考，他逐渐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较为成熟的意见。所以，这次会议开始，毛泽东请陈云做主题发言。

陈云说：关于私营工商业安排和改造的方法，几年来取得了六条经验：

（一）生产安排必须按行业进行全国统簿。（二）要全行业安排就必须

进行企业改组，该合并的合并，该淘汰的淘汰。（三）由于企业改组牵涉的面很大，许多行业必须全行业合营。（四）在全行业合营的情况下，要有计算利润的新方法，对资方人员也要有适当的安排。（力：）必须组织专业公司来领导安排生产、企业改组和合营。（六）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有一个全面规划，要计算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定出改造的速度和步骤，在工商界和工人中进行教育。114

随后，毛泽东讲话，他再次讲了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希望资产阶级分子安下心来。毛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

「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其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毛还详细说明了资产阶级实行的赎买政策，他说：「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毛希望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与会者向更多的人广为宣传。在这个会上，毛还提出了赶超美国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超过美国。」「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毛要求全国工商联、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努力适合客观发展规律，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进步更快一些，缺点错误更少一些。115

1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0905—19951》，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1^页27卜272。115（毛泽东传0949—19761）^上册，页444—447。

毛泽东的讲话，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与会者纷纷发言表态。陈叔通说：听了主席的指示，大家都很兴奋、愉快和感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人民的政府，哪一件事不是先向我们说得清清楚楚而后去做的，而不是突然的。经过这几年的教育和具体事实证明，大家都看见了并承认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思想也就有了转变。现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工商界应当体会到这个新形势，在工作中也要提高一步，向前一步，以适应这个新形势。

李烛尘说：民建会同志们商议发出一个文件，号召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会员，先行一步，以积极带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行动，迎接这样一个高潮的到来。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工商界执委全体起立，欢呼）。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应该作好准备，迎接这个高潮。

荣毅仁的发言，则以荣氏企业的发展历史，说明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人、对国家都是有利的，要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说：

我是一个资本家。我家从1905年办工业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申新棉纺厂的历史也有四十多年。我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1933年至1935年间，由于国际间的不景气，以及接连的国内战争的影响，企业非常困难。日本人企图通过英国银行来霸占企业，宋子文也企图并吞，但在工人和同人的支持下渡过了困难。在解放前夕，我们受到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压迫，加上主持者采取投机的办法，内部矛盾，形成外强中干。要不是解放，申新的情况如何，很难预料。解放后，同业之间非常团结，相互合作，关系很好。棉纺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个别的公私合营，一直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步步地前进、发展，从困难到好转。上海棉纺业的生产、福利、利润是逐步好的，其它行业也是好的。逐行逐业改造，大中小都得到安排。在解放初期，由于发生困难，索时我们确曾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

好的。当初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时，有些工商业者怕受束缚，后来则争取加工订货，现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工厂接受了国家的加工订货。从国家建设的发展来看，第一个五年

计划投资七百六十六亿元，私营工商业的资产只不过三十三亿，相差很大，上海申新的资本不过七千万元，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1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大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所以1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不舍呢？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所以我的企业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我并不满意，我还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广大工商业者密切联系，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共产主义。

黄长水、胡子昂的发言都谈到、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是正确的，愈来愈多的私营工商业者愿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接受改造。同时也说，私营工商业者接受改造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困难还很多。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愈深入、愈具体、愈前进，我们的工作随之愈复杂、愈细致、愈艰巨。但表示：有决心、有信心去逐步克服困难，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16

116陈叔通等人的发言，均转引自《毛泽东传0949— ，上册，页’

117《毛泽东传（^^一^?。》’上册’页451。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很是欣慰。但对李烛尘等人提出工商界也要掀起一个改造高潮的主张，进行了说服。毛说：不要搞一阵风，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个不好，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引起误会，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愈少愈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流」的那个「自然」，而

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发展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能办好。2加速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决策

毛泽东两次与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主要是做好舆论准备，而要具体实行还得有一个总体规划和「章程」。因此，中共中央准备召集专门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于11月初南下杭州主持起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决议。11月10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八人座谈，为起草决议做准备。12日，毛泽东让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询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17日，毛泽东将起草好的决议草案派人送回北京。毛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说：「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118

1955年11月16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集中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刘少奇先后在会上讲话。

陈云的报告，首先分析了几年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的进展情况。指出：几年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有很大进展。工业方面，实行加工订货的大型企业已占百分之九十三；到6月底，已实行公私合营的有1900多个厂，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八。商业方面，在32个大、中城市的零售额中，国营和合作社营已占百分之五十二左右，纯粹私营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在农村集镇零售额中，国营和合作社营已占百分之六十-

围：——~~~~~

118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1955年11月178。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注册，页437。

经销、代销占百分之十，农民贸易占百分之十，纯粹私营的只占百分之十八。批发商业的比重，国营和合作社营已占百分之九十一，私营只占百分之九。可以讲，我们已经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把资本主义工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消除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在国营商业掌握了货源的主要行业，已经把私商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合作化的轨道，制止了私商的投机倒把。

随后，陈云说：新的情况要求现有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转变。为了进一步搞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他提出了全面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六点规划：第一，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国营与私营之间，私营与私营之间，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今天与明天之间都需要统一安排。必须统筹安排生产，否则，改造是无法进行的。第二，各行各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不改组就不能安排。改组的办法是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即按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处理。第三，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便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对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要给饭吃，工资一般地不降低。要尽可能使用资本家，不应该让有经营能力的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第四，实行定息。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实行定息以后，工厂的生产关系有了很大改变，国家对工厂的关系，资本家对工厂的关系，都改变了。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而企业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这样，资本家得到了好处，我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第五，组织专业公司。为了把几十万、几百万户的私营工商业组织起来纳入国家计划，为了安排生产、进行改组与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

营需要有专业公司。专业公司有经济任务，也有政治任务。它主要的任务是：管理加工订货，管理生产，指导技术改进，负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职工和资本家进行教育。第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规划应分行业，分先后缓急，分地区，分进度。陈云着重指出：从「三反」「五反」后，好多国

家工作人员怕和资方接触，这是不对的。要有来往，又不腐化，要懂得怎样做统战工作。

周恩来的发言，着重就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平转变等问题发表意见。他充分肯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爱国、和平建设、增加生产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批评有人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积极性的错误观点，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是由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现在我们还应该利用它积极性的一面，一直利用到这个阶级被消灭为止。同时也要限制它的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利用得愈多，消极方面限制得愈大，就愈利于对它的改造。我们要把它的积极的一面利用到最后，把它消极的一面加以消灭，将这个阶级的分子改造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工人。周还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不论是没收或挤垮都是不适宜的。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和平赎买、和平转变。用赎买的办法花钱最少义不损害生产，对工人阶级，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利的。为做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他还强调要积极宣传，做好准备，不能性急。「不要事情还没有做，一听到风传，来一个破坏生产，那就很不好了。」周恩来说：「农业合作化不是要防止『三叫』吗？不要人叫、牛叫、猪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当然不能用这『三叫』了，但是如果弄得人叫，机器不叫，企业停产、减产，就对我们不利了。」¹²⁰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首先指出：中央决定开这个会，是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不然会使党的领导陷于被动。接着，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刘说：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于用甚

么方法，抹取甚么形式，用多少时间来改变这两种所有制，特别是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可以根据各国的客观条件来决定的。

关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采用赎买的办法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刘少奇还通过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不同条件的对比，作了历史的、理论的说明。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没收和挤垮的办法是不大好的，而采取和平改造与赎买政策，则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有利于国家和工人阶级。他还指出，在资产阶级分子中培养一批核心进步分子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只是采取退的办法，而且要采取教的办法，统一战线的办法；要在资产阶级里面产生那么一部分人，他们积极赞成社会主义，通过他们的宣传，去影响其它的资产阶级分子。他强调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决定胜负的斗争，是一个起质的变化、起决定性变化的斗争。因此，必须重视，各方面要配合，党委要抓紧领导，不能马马虎虎，不能随随便便。要紧张起来，谨慎小心，不要有本位主义，不要有个人主义，要团结一致，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样，就可以取得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结果。¹²¹

利瓦伊汉在会上着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实现和平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关键在于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要认真加强对人的改造，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在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上，要把原则性灵活性结合起来，宽紧得当，四面不透风是不行的。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要逐步抓紧予以消灭，而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给以宽大待遇，对他们要实行赎买，包下来，给予工作，给以出路。他还指出，由于党的正确政策和工作，我国阶级斗争的趋势将不会沿着愈来愈激烈、愈来愈复杂的公式发展下去，说服教育和批评是人民民主

¹²¹刘少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1955年11月16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176—183。统一战线内部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认为对付资产

阶级的办法就是斗争为主，斗争、斗争、再斗争，而且愈来愈厉害的看法，同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和党的政策，都是不符合的。122

11月24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指出，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他再次强调了加快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显著进步。在批评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错误思想时，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毛还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指出：应当在党内进行广泛的解释和教育，使广大党员提高认识，取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主动权。123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决议〉明确阐明：「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

李维汉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11月23日。参见利瓦伊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页98—108。李定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¹谓，页244—245。

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决议〉具体规划：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和小手工业、小商业采取合作化及其它形式的改造，在一五计划期间内，争取达到907。左右，并且准备在二五计划期间内，争取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124

会后，《人民日报》¹连续发表社论，论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必要性，强调工业方面个别合营的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今天全面改造的要求；商业方面只采用经销代销办法，也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客观形势的需要。只有在统赛安排的基础上，结合全行业的生产改组和经济改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才能把工业方面全行业的生产和经营完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在商业方面，通过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过渡到国营商业，是对资本家零售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好的一种过渡形式。125

3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热潮

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在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会议以后，立即返回本地召集有关会议，研究制订本省、市、区工商业的改造规划。北京市：调整了对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公私合营的原则和步骤，即：对全部或绝大部分由国家进行加工订货的行业，首先进行合营；对生产有严重困难，户数又多的行业，在¹安排生产中进行合营、改造或淘汰；部分原料和部分产品由国家控制的行业，放到第二批合营；对大部分产品自销的和对国计民生关系不很大的行业，放到最后合营；对一些主要是为公家服务、投机性很大、国家又完全有力量代替的行业，则直接完全由国家经营，吸收其工人；对有些产销十分困难、生产落后的手工行业，则吸收其工人，有步骤地予以淘汰。依据上述原则，对十人以上工业改造的规划是：除1954年以前已合营29户，占总产值的13免以外，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126户、产值6218万元，占总产值287。，累计为417。。

1956年计划合营388户，产值5870万元，占总产值，累计为687。；1957年合营538户，产值5046万元，占总产值237。，累计为91[^]。其余四至九人的小型工业，户数很多，这些业主，大都是技术工人出身，现在也参加劳动，故绝大多数可以走合作化的道路。126

关于私营商业的改造规划：全市私营零售商共有31个行业，42000户，从业人员近7万人，资本额3300多万元。其中雇用职工两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商业户约2600户，从业人员16700人，资金约1900多万元。1954年底以前，重点试办公私合营10户。1955年底，合营户数可达500户，占资本主义零售商总户数207。左右；连同其它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共占私营零售商总户数30呢左右，销货额占私营商业零售总额40呢左右。计划至1956年底，公私合营总户数达到1500户，占资本主义零售商总户数的607。左右，连同其它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共计占私营零售商总户数的407。左右，销货额占私营商业零售总额的707。左右。1957年内对剩下规模较小的一批商户在联营并店的基础上进行公私合营，1957年底公私合营户数将达2000多户，占资本主义零售商总户数的807。左右，连同其它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共计占私营零售商总户数的607。左右，销货额占私营商业零售总额的907。左右。对摊商的改造，准备暂时主要采取「联购联销」组和「联购分销」组的形式，计划1956年发展至占摊商总户数40呢左右，1957年发展到707。左右，1958年发展到907。左右。127

上海市：

到1955年10月，全市公私合营的工厂396家，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457。。国营商业已掌握了批发总额的957。；为国营商业经销代销的私营商业已占私商营业额的40呢。私营工业中，还有27000多家没有公私

合营，它们占全部私营产值的55.7%、厂数的98.7%、职工人数的65%，这些工厂多数是技术设备落后的中、小型工厂。私营商业54000多户中，公私合营和全业代销的比重更少，很大数量的小商小贩还完全没有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市委决定，今后的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步骤，决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私合营以前的准备阶段。在加强对各种经济成份的管理和使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前提下，进行各个行业的全业合营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做好经济改组工作。第二个阶段是公私合营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公私合营以后的阶段，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继续对资本家进行人的改造。128

隔了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报告说：在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后，上海工商界人士反应强烈，许多资本家说：「森森烈烈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来到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也已到来了，这是工商界莫大的喜事」。根据现有条件来看，上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1956年工业方面，全行业合营，可以完成80%左右；商业方面，全行业合营、合作化形式和经销代销，也可以完成80%左右。1957年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可以全部完成。129

天津市：

1955年第三季度，全市公私合营工厂已有295户、其中294户与原有私营工业相比，生产总值占44%以上；在现有私营工业的总产值中，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产值占87.7%，在大型工厂中已占94%。在私营商业中批发商已基本消灭；零售商业中国营已占44%呢，在私铃零售商业中代销、经销、批购的销货额占到62.7%。根据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指精神，天津市确定了一个轮廓式的全面规划：计划从现在起到

1957年，争取把全市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按行业实现公私合营。13(5武汉市：

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1956年内合营27个行业，348户，占总户数的

83.82%。，占私营工业产值的91.68%。，占私营工业人数的89.37%。

1957年内合营66户，占私营工业户数16.18%。，占产值的8.32%。，占

人数的10.077%。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造，要求1956年达到总户数的75%。，1957年达到总数的85%。。131

江苏省：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本省具体情况，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二年，即1956和1957年，基本上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任务。具体规划：

在工业方面：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达到7437户〔累计数，下同〕，占全部私营厂户数的70%。，职工194710人，占职工总数的85%。，产值14.6137亿元，占总产值的90%。

在商业方面：计划改造私营商业231528户，占私营商业总户数的69-36%[^]，从业人员332523人，占总人数的72.57%。，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79.97%。。

132

以下. 数例，基本上都是规划到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基本上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12月5日，刘少奇在主持中央召集的一个座谈会上还说，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央的设想是：到1957年争取90%的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1962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各地的实际进展远远超出了上述规划和设想。

就在中共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会议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同时，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召开一届二次会议，传达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听取了陈云、陈毅两位副总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统一起来，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改造，在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对工商联这次会议极为满意，他在11月17日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133

全国各地，首先是各大城市的资本家通过各种渠道传来的讯息，以及报纸广播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对于资本家说来，现实的道路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这样’「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在形势急遽发展和社会舆论(包括子女亲属)的不断敦促下，资本家别无选择，只有采取主动态度，才能及早摆脱生产经营的困境，争取较好的安排。于是’很快在全中国范围刮起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风暴」。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风暴」首先是从北京刮起来的。自从1955年12月份以来，私营工商业纷纷申请公私合营，到1956年新年，已掀起热潮。1956年1月4日，以北京市工商联主委、同仁堂经理乐松生为首的全市327家药店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8日，连同药

133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1955年11月1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页445。业在内的20个行业、300多家商店一道被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时，各区资本家和工人到处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结队游行，仅1月9、10日两天’就有5万多职工和2万多私方人员参加游行。大街小巷的私营工厂、商店，张灯结彩，纷纷挂上了「迎接公私合营」、「庆祝公私合营」的红幅。134

针对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中共北京市委认为：「北京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已经到达顶点。全部资本家都已经卷入这个高潮，热烈地要求合营，极力表示他们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趁热打铁，过去那种由政府派下工作组，一行一业，分期分批实行公私合营的做法，已经不能与这种形势相适应了，而必须采取由资本家和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公私合营的群众运动的办法。」135于是，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在1月8日、9日、10日三天内连续批准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户的公私合营，四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户已有3990户公私合营，占四人以上工业户的95.7%；私营商业已有13973户合营，除了一部分连家铺以外，已全部合营。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热潮的推动下，北京市的郊区农民和全市手工业者也分别进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接受各行各业热情洋溢的喜报。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1月1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批转了北京市委〈关于最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情况的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日益普遍地形成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全行业公私合营，不仅是私营企业中广大职工当

2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一！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三章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

221

前的迫切要求，也已经成为资本家在党的政策教育之下和职工推动之下的几乎普遍的愿望。从庆祝合营的爆竹声中和锣鼓声中我们可以听出群众要求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脉搏。北京市委由于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具有敏锐的感觉，因而及时地、正确地改变了自己的工作规划和常规的做法，采取了对申请合营的迅即宣布批准，先接过来再进行清产核资等工作的积极方针和办法，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136

《人民日报！对北京市进入社会主义的报导，中共中央关于北京市委经

验的介绍，不能不使其它城市的领导和工商业者再稳住阵脚，而不跑步前进了。

1月14日下午四时，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工商界上层人士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市工商联全体执、监委员，各区工商联主委，各同业公会主委，市民建国会委员等三百余人。市委书记陈丕显致开会词说：今天下午市委召集你们开一个座谈会，通知你们比较局促。昨天晚上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建、工商联三十余位负责人座谈会，说你们对改造步骤有意见，这意见主要由9日北京完成了全市工商业的改造任务，上海在10日注销消息，大家提出上海要学习北京先进经验。北京的先进经验，市委研究了一下，确是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北京先进经验告诉我们，对全市公私合营工作的原有计划冲破了，把许多成规冲破了，这不足奇怪。如这是对的话，把成规冲破，我们也服气。北京在几天内申请合营完毕，几天内就批准合营了。我们上海，在座的很多是市人民代表，原来都同意人代会确定的分三个阶段，北京原也准备两年完成，结果在1月上旬就完成了两年的任务。市委领导确有落后于实际的情况。因此，开座谈会与大家商量。昨天民建和工商联的座谈会把两年内完成的意见否决了，我的脑子原还犹豫不定。在革命的高潮时期，就是要听群众的意见。群众运动就是会冲破成规的，革命运动就是会把原来不易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今天’市委并没有确定七天、十大或一季度的意见，还在按成规办4`。现在要大型座谈会决策。

会上、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全国工商联和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上海市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等三十二人热烈发言。荣毅仁说：「从目前申请合营的热情来看，我们最快的在一星期内争取全市公私合营(热烈鼓掌)。」胡子婴说：「上海群众条件完全具备了，情绪热烈，而我们停留不前，主要是我们不了解情况，清规戒律很多。二星期内只要领导有决心，没有问题、可以完成。」汤蒂因说：「我们兴奋的情绪可以从鼓掌声中看出。北京的先进经验如不学习，那就要脱离群众了。」这时’盛丕华再次发言，他说：「因发言的人很多，队伍很长，时间有限，有人提出征求意见，看『七天是否同意』就行了。」

（对此建议，全场起立高呼：「同意」。经久不息的鼓掌。接着高呼：「毛主席万岁！」欢呼声、鼓掌声历时数分钟之久。》陈丕显最后总结说：各位工商界同志们，今天的座谈会是从来没有道样开过的热烈的座谈会。大家的意见，讨论的情绪，使我非常感动。这说明会场的情绪，代表了工商界几十万人的情绪。你们所提出的一星期内提早完成合营工作，我在这里表示：市委没有甚么可以不同情不拥护你们意见的。毛主席告诉你们，也告诉我们，工商业的改造，工商界的命运，要自己掌握。就这道理来讲，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一个星期的要求。但这里先要讲清楚一个问题，今天是市委召开的座谈会’批准手续是人民委员会的事情。学习北京的办法，马上挂合营的牌子。当然，这个工作量还是很大，两年计划不是一年完成，从1956年算起，是二十天内完成，从今天算起，是一个星期到十天完成。这速度是干社会主义、干革命的速度。这样的速度才叫做革命的高潮。这工作要做好，大家要全力以赴，一方面搞好这一星期的工作，一方面要做好许多工作保证。相信上海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在个把星期内面貌一新。137

136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956)》，页45。

〈中共上海市委召集工商界上层人士座谈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问题的记录〉（! ^年^月! 4日）、载《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0，上册，页569—601。

1月16日，上海市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市委决定上海市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提早完成，准备在六天内（! 月20日以内）将全市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

同日〔1月16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市、区领导小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宋侃夫指出：武汉市改造工作原决定两年的时间分批进行，后来改为一年，又提前至半年，

现在群众与资本家的情绪都很高涨，推动我们加快，同时为了生产的正常进行也需要加快速度，否则动荡不安，生产就会受到影响。目前高潮已经到来，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来办好自己的事情，光靠干部的力量是不够的。过去提出的公私合营条件现在都不值得考虑了，一切清规戒律都需要打破。根据北京经验，条件只有两个：山只要不是抓走的人就可申请；（力申请了的都可批准。清产核资北京采取「先合后清」的#法，由资本家自己负责’自清、自估、自核，工人最后参加审核，手续简单，这对资本家也是一种很好教育，使他们感到政府对他们的信任，同时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考验，北京的经验，资本家一般定的都还合理，偏高偏低只是个别现象。在政策方面，北京提出三个字：「定、宽’了」。「定」就是安定情绪，生产营业一律照常；「宽」就是生活数据等从宽处理；「了」就是对原企业债务（如五反退补，资本家与职工借支等），在合营核资中尽可能了结，不要拖很多尾巴。摊贩的合作小组开始时只先搞一个统一组织，仍在原地经营，各计盈亏，不要盲目变动，影响人民生活习惯。关于改造形式问题，工业方面的小厂和商业的小店，北京反映大都不愿搞合作商店，本市也可以考虑，合作商店的形式不宜搞多，对小厂小店可采取「以大带小」的办法进行合营。手工业北京也是几天就搞完了，我们也可以加快些，条件放宽些，小业主也可以参加合作社，春节以前本市应该掀起规模更加巨大的高潮，做到家喻户晓，只有森森烈烈的运动，才能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138

经过讨论，决定武汉市的改造进度：1月26日以前全部合营完，包括工业、商业、手工业。19日以前，市里召开资本家头头会，各专业局召开干部大会，各区召开干部、职工、资本家的会。有干部就及时派下去，干部不够的，可运用厂店的民主管理委员会。派下去的干部，五天内提出计划。各区负责统一战线的区委书记，在这一时期应集中力量搞好改造工作。

1月17日，武汉市委向全市各区、局发出通知，指出：由于北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天津和西安两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全部合营，全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的最巨大规模的高潮已经到来。为了迎接高潮的到来，市委已同意市领导小组关于全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2月2日以前全部完成公私合营的意见，各单位应根据市区领导小组联席扩大会议的决定，努力争取提前完成。139

1955年12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扩大会议曾就天津市对资改造全面规划作出决议。12月25日，天津市工商联会召集工商界骨干分子座谈会，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烛尘在会上作「工商界朋友们要抛弃一切顾虑，积极接受改造，为完成我们的光荣历史任务而努力」的长篇发言，140在天津工商界得到热烈响应。加上北京经验的影响，天津全市也很快积极行动起来了。

全国各大中城市争先学习北京市的经验，庆祝胜利的大会也接踵而来。1956年1月21日，上海市举行各界人民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宣告：「上海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同日，天津市也召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欢呼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跟进，资本家和私营企业职工申请合营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宣布全市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庆祝大会此起彼伏。一时

间，中国大地上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喜报频传，呈现出一片沸沸扬扬废除私有制的社会景观。举世为之瞩目。到1月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集中的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七大城市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都相继地实现了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在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在声势浩大的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大多数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在党的政策教育与资本家中进步分子的推动下，跟着大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行列。但是，全行业公私合营毕竟是一场改变生产数据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深刻的变革，资本家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资本家，一方面认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内外矛盾可以解决，自己的前途也有

保障，成为「半公家人」了，因而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存在对失去祖传家产的惋惜。有的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有的人写出了暴露出内心世界的〈祭厂文〉等；个别顽固分子还有转移财产、消极怠工、暗中阻挠别人申请公私合营等抗拒活动。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都纳入了公私合营等各种形式。到1956年底，全国原有的8.8万余户私营工厂，有997。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除少数企业转入地方国营工业以外，其余按行业合并组成3.3万多个公私合营企业。与1955年底以前历年公私合营的总数相比，猛增十倍之多。在商业方面，全国原有的240万余户私营商业，有82.27。实现了改造，其中除少数转入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以外，其余分别组成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原定用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规划一再提前，结果在1956年内就提早实现了。

4资本家交出企业的心态

在敲锣打鼓、申请公私合营的热潮当中，资本家们的心态是复杂的。北京市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根据12月初对588户资本家思想动态的调查：表现横极要求合营的约占37免，能够接受合营的约占587。，不肯合营的或者有比较严重的抗拒行为的约占57。。」141应该说，这个分析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薄一波在谈到当年的情况时说：「1955年冬天，敲锣打鼓、申请公私合营的滚滚人流中，虽然心情复杂，难于一概而论，但是希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却是许多人的共识，这是抹煞不了的。」142

1956年1月，在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全部申请公私合营的前夕，新华社记者访问了申新棉纺织印染总管理处总经理荣毅仁。

记者：作为一个资本家，为甚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荣毅仁：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应该先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起。

这是真心还是假？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他们曾来找我问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讲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我直接用英语谈话，有的来看看我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冒的资本家。我坦白地告诉他们，解放前我不但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而且当时还有点害怕哩！

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稍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我的父亲和伯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创办和发展了自己的企业。这些年代，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我父亲一羣人梦想着办工业，救国图强。当战争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加上连年内战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我们的企业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父亲一辈曾经把希望寄托给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可是蒋介石上台后对我们的第一手，却是无端通缉了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诈了十万银元。1934年，当申新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以价值三四千万元的财产

抵押给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签订借款五百万元的合同。当时官僚资本的头子宋子文想乘机挤掉申新，吃掉我们的企业；当银行只付了二百八十万元时，他就强制停止继续付款。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还把我七十岁的父亲荣德生绑去四十多天，勒索了二十多万元美金的金，还给所谓「破了案」的警备司令送了更多的酬劳。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马路上美国兵横冲直撞，北京的女学生被强奸。我父亲的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了。就是我的爱人，虽然当时所想的只是如何过安乐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容忍外国兵对自己同胞姐妹的污辱吗？那时，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强盛的祖国。而蒋介石国民党只会给祖国带来更多的屈辱。

谁来建设独立强盛的国家呢？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是共产党。

解放前夕，我们一家对于共产党的到来是感到惶恐的。我们几个兄弟中，

有的跑到泰国去办工厂，有的躲到香港去了。我的父亲因为恨透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坚决不愿离开祖国。我也不愿做白华，和他一道留下来了。我们企业的流动资金当时已经枯竭，解放以后又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这个时期申新能够维持生产，全部依靠爱护民族工商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贷款、加工和收购，依靠职工群众的团结和积极生产。政府帮助我们建立了总管理处，统一领导过去分散经营的各个工厂，并且指导我们逐步改进经营管理。生产因此得到发展，纱锭的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从1951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年的盈利就达到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使我们的企业完全摆脱了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面。而我弟弟在泰国办的工厂却破产了。

重要的还在于解放以后六年来，国家强盛了。这是每一个从旧中国过来的中国人最感到骄傲的。我经常接触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党的每一次分析，党的每一个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了。农村土地改革的结果，棉花产量超过历史上最高的水平，我们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我们曾经有过的对帝国主义的畏惧。接着，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哪能有今天？

记者：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甚么？得到了甚么？

荣毅仁：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而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敬，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甚么，我还是过得很好。143

曾被誉为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企业大王」的刘鸿生，在1956年9月也同记者谈了自己的心情。刘说：解放以后，刘氏企业开始公私合营，到了1956年初全部公私合营了。有的朋友说我心中实在是舍不得的。我告诉你实话：作为一个资本家，要放弃自己的企业是有些心痛的。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国营企业这几年来在不断地壮大。同时，公私合营也并不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西南、西北几个企业由于有官僚资本投资，很早就公私合营了。那些企业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梦想。这几年来上海的企业也在很快的发展。我有过几十年办厂的经验，因此深知照目前规模发展，即使我在年轻力壮时的精力，要想独自担当下来也有困难。我过去总担着心事，怕这份家业要败在孩子手上。他们说说不定会变成瘪三。……我还没有在中国看见

2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巧53—55）——向社会主义过渡
过了三代仍然兴旺的资本家。尽管我对孩子们的教育是十分严肃的，但是我仍然担着这份心事。如今，我在国内的孩子们都各有岗位，他们在新社会中都逐渐地真正熟悉了专门业务。

你问我为甚么拥护共产党？我是一个企业家，我的企业，无论水泥、毛纺、码头、火柴、煤矿、银行业目前都在发展着，规模远较过去大得多。共产党能推动企业，能使中国变成工业化的国家，这是我过去五十年的梦想，我为甚么不拥护它？解放以后，我和我的家属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

我拥护共产党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资本家。现在我身体不好，不能陪你去黄浦滩头看看。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杨树浦到南码头，沿着黄浦江一带是各国的码头，一长串的外国兵舰插着各式各样的国旗。人们走过这里，会不知道这儿究竟是哪国的土地？我自己是搞码头企业的，往往站在码头上摇头。如今呢，这一带地方每个码头上都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你想想看：一个看过上海五十年变迁的中国人，他心中会不高兴吗？ 144

1956年曾经有人形容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的无可奈何表现。对这种情形，周恩来充分理解，他在1956年11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谈到荣毅仁时说：

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威，如弃敝屣，没有一点痛苦，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145第三章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229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期间的资产阶级确实存在着这种矛盾的心态。但是应该说，对于那些拥有大型企业的资本家来说，更多地是出于爱国、出于相信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的心理接受的。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146邓的这一席话，就是对这个历史事实的明确肯定。

5手工业合作化的加快发展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加快，直接影响到手工业改造，从这时起，手工业的建社速度也明显加快了。据统计，1955年6月到12月的半年内，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由5万多个发展到6.8万多个，社（组）员由145.9万多人发展到200多万人，占手工业从业人员785万人的25.477%。：产值20亿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27.067%。。147

根据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反右倾」的指导思想，1955年11月24日，陈云向有关部门打招呼：「手工业改造不能搞得太慢了」，「如果手工业这方面的改造速度慢了，那就赶不上了」。12月5日，中央召开座谈会，

刘少奇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各条战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同时，批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刘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到1957年达到70%。到80%。12月20日，刘少奇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的汇报，提出：手工业改造不应比农业慢。与其怕背供销包袱，还不如把供销包袱全部背起来好搞些。他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在1956、1957两年搞完，说「时间拉长了，问题反多」。148

144杨友：〈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的自述〉〔1956年9月），《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号，页76-79。

14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429—430。

146邓小平：（！？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15日）：载0；小平文选，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86。147季龙主编：《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页329。14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429—430。

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赛委会于1955年12月9日召开全国重点地区手工业组织检查工作座谈会，检查「与总路线不相适应的保守思想」，提出「加快发展，迎接高潮，全面规划，计划平衡」十六字发展方针。12月21日至28日、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提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要求1956年组织起来的社（组）员达到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74%。，1957年达到90%，1958年全部组织起来，大大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积极地进行手工业

的技术改造。

鉴于手工业分散、面广、行业复杂、社会经济性质不同，同工业、农业、商业各方面都有密切联繫的特点，会议根据有利于改造、有利于生产的原则，明确提出了划分改造的范围和改造的方针、政策。具体意见是：（一）不雇用工人或虽雇用工人而不超过三人的个体手工业，全国约有880余万人，其改造的根本方向是走合作化道路。但其中个别行业，从生产协作关系来看，随私营工业一并改造更为有利，可结合私营工业一并进行改造。

（二）农民兼营商品性的手工业，全国约有1000余万人，其中凡本人劳动收入以手工业为主的，由手工业部门改造；凡农业收入与手工业收入接近或手工业收入虽不多但工艺性较大的，农业和手工业可分别建社，社员可以跨社；凡农业收入大和非商品性的农家副业，由农业方面改造。

（三）雇用工人四至九人的私营小型工业，全国约54万人。这些小型工业，主要通过公私合营进行改造。有些行业主要是手工操作，大工业人数很少，或从生产协作关系上看不适宜于公私合营的，也可以走合作化道路。

（四）半工半商、工商界限不甚分明的行业。凡以制造产品为主的，通过合作化道路进行改造；凡以贩运商品为主的，则应割归商业部门改造。

（五）服务性的行业。凡利用资金、设备获取利润而工艺性较小的行业，由商业部门改造；凡工艺性较大、商业性较小的行业，原则上由手工业部门改造。

为适应大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采取以城镇和集中产区为重点；全行业改造和分期、分批、分片建社相结合的方法；在建社过程中，实行边调查、边安排、边发展、边整顿的方针。149

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刚结束，1956年新年一过，北京市在郊区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带动下，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就走上街头，提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口号；全市各区的手工业者也相互串联，酝酿建社。中共北京市委为了积极主动领导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在1955年12月召开的全市党员干部动员大会上，市委书记彭真就提出，手工业合作社明

年翻一番，到9万多，占人数807。左右。在此前后，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连续召开手工业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第五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精神，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制订手工业改造规划。为了统一领导，加强力量，市手工业管理局、手工业合作总社和劳动者协会共同组成了联合工作办公室，专司手工业改造工作。同时又新建立了17个手工业专业联社，连同以前建立的共有17个。另外，从各方面抽调300多名干部，组成若干工作小组，充实到市、区手工业部门。还培训了一大批财务、统计人员及600多名老社骨干，作为建社办社的力量。1956年1月10日，市手工业合作总社再次召开手工业干部扩大会议、具体布置工作方针和步骤，要求有关方面积极做好组织工作。

1956年1月初，在郊区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热潮的推动下，北京成千上万的手工业劳动者络绎不绝地到市手工业总社和各区办事处递交申请书，要求参加合作社。他们提出：「人家庆祝合营大联欢，我们盼望合作化坐卧不安。」「你们迟组织一天，就增加我们一天的苦恼。」有些手工业户索性把工具、资金、生产数据集中起来，自动组织合作社，申请要求批准。面对这种形势，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改变

过去一行一业、分批分期发展的做法。在1月11日下午，召集7个城区3个近郊区的手工业者分别在22个地方集会，由区委领导和其它负责干部代表市委、市政府当场批准申请登记的手工业者为合作社社员，并告诉大家市手工业总社已组织了17个专业联社，负责按行业组织合作社。决定公布后，老社员打起锣鼓，手捧大红「喜」字向新社员贺喜；新社员以热烈掌声和「遵守社章，提高生产」的口号作答。老社员一齐高呼，「庆祝手工业合作化」，「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11、12日两天，北京市有53882人入社，加上过去组织起来的社员共计8.9万人，占手工业总人数的95.67%，基本上实现了全市手工业合作化。15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于1月17日迅速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手工业管理局和生产联社发出电报，推广北京市手工业全行业合作化的经验。指出：「北京市正确分析了当前新形势，

确定了必须改变原来以区为单位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的建社方法，采用了全市按行业同时全部组织起来的新办法，因而就在最短时间内全部完成了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这对全国，特别是对各大中城市的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具有重大的示范、推动作用。」¹⁵¹

于是全国各地纷纷效法，手工业改造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一起进入「高潮」。到1956年6月底，全国手工业部门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有10.4万个，社(组)员468万人。¹⁵²1956年底，经过调整，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为9.91万个，社(组)员达到509.1万人，占当时归手工业部门改造人数550.1万人的92.7%。¹⁵³单一公有制模式的建立

由1955年秋、冬开始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风暴」，使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人所有的小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基本上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实行公私合营和定息后，资本家已不再是原来企业的占有者，而是合营企业的职员，所领固定定息已同原来企业的利润脱钩，只由国家根据合营时核定的私股资产付给，除此之外，公私合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基本上没有甚么不同，实质上具有了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的性质。

根据1956年6月的统计，全中国1.2亿农户中，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已经有1.1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1.79%。其中，有3500万户加入了初级合作社；有7500万户，即大多数，加入了高级合作社。畜牧业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也已经有了发展。全国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组织。加入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或者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已经占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90.7%。个体渔民、个体盐民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现在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个体小商业也已经实现了合作化，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代购的业务。¹⁵⁴

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国民收入中，1956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比重由19.17。

上升到32.37%；集体所有制经济由1952年的53.47%上升到1956年的71.87%；公私合营经济由1952年的7.39%上升到1956年的7.17%。与之相应的是，私营经济由1952年的6.9%下降到1956年的0.17%。以下；个体经济由1952年的71.87%下降到1956年的7.17%。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和公私合营三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达到93.7%。

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1952年的41.57%上升到1956年的54.47%；集体所有制工业由1952年的3.27%上升到1956年的27.27%；公私合营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页207—208。

工业由1952年的47.0%上升到1956年的27.27%；私营工业由1952年的30.77%下降到1956年的0.047%；个体手工业由1952年的20.69%降到1956年的1.29%。前三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已达到98.87%。在批发商业与零售商业中，1956与1952年相比，商业企业商品批发额：国营商业由1952年的60.5%上升到1956年的82.7%；合作社商业由1952年的2.7%上升到1956年的15.27%；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由1952年的0.57%上升到1956年的2.77%；私营商业由1952年的36.3%下降到1956年的0.1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国营经济由1952年的16.27%上升到1956年的34.7%；合作社经济由1952年的18.27%上升到1956年的30.1%；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经济由1952年的0.47%上升到1956年的28.3%；私营经济由1952年的65.27%下降到1956年的7.67%。前三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达92.47%。155

与经济结构变化相应的是，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宣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它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156

在此期间，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须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若干的主要产品的指针已提前完成，这对改变中国经济落后面貌，奠定国家工

业化的初步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系列的根本性的变化，表明过渡时期总路线赋予的「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任务已基本完成。1956年9月举行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宣告：「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157

随着单一公有制的建立，全部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就统统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使原来还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市场调节因素，基本上退出了经济生活领域。这样，中国的经济体制中原有的双重调节机制，就变成了单一的计划调节机制。

伴随着单一公有制基础的建立，被正式宣布实质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根据中共中央加强对中央政府领导的决定，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基本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批判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达到了毛泽东强调的「舆论一律」。

这样，由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实现。这是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反映，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

毛泽东对在不到四年时间就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很满意的，他在会见苏联客人米高扬（八0351351.！^!^^!!）时说：

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158

毛泽东所以「开始高兴」，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将因此

而获得大大发展的空间。毛说：

2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一”？5）——向社会主义过渡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59

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无论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作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还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看作唯一模式，都不利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探索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和道路，也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章

贯彻总路线的思想动员

如前所述，像薄一波这样一级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对现在「已经乘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船」，「都没有认识到或没有深刻认识到」，那末，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首先把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总路线上来；同时，在党内外大张旗鼓地对总路线进行广泛宣传，就成为必要了。

一统一党内思想的两个会议

为统一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毛泽东首先抓住了「新税制」引起的问题，严厉批评「新税制」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1 「新税制」引起风波

1952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政务会议的决定，发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通告〉：「根据全国财政经济情况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本委报

经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核准，在保证税收、简化纳税手续的原则卜一，将现行税制加以若干修正，决定自1953年1月1日起实行。」同时公布了〈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商品流通税税目、税率表〉、〈货物税税目、税率表〉和〈合并计征后营业税分级税率对照表〉。同日’财政部依据〈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的规定，公布了〈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施行细则〉。税务总局还根据〈通告〉的精神，向所属各级税务机

关陆续发出了一系列贯彻实施的具体规定。

为配合宣传，《人民日报》发表了〈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修正税制的目的是「保证税收，简化纳税手续」。指出：过去在税制中采取的「多种税，多次征」的办法，已经不适合于现在的情况了。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公私经济比重的变化，新的商业网的建立及经营方法的改善，国内市场上的商品流转规律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大量采取加工、调拨及代购、代销或包销的方式，私营商业则趋向于组织联合采购、深购远销，各地城乡物资交流蓬勃发展，产销直接沟通，这种变化是经济上的重要进步，是对旧中国经济改造的必然结果。为了适应于这种变化，继续保护与培养税源，修正了的税制规定，加工收益税率统一调整为5%，代购、代销或包销一律按进销货计税，并规定工业的总分支机构从产制、批发到零售，交纳三道营业税；商业的总分支机构，则从批发到零售只交纳两道营业税。社论强调说明：「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指出，这次修订税制主要增加了国营商业及合作社的税收负担，并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及对合作社减征营业税20%的优待，使国营商业、合作社与私商完全处在同等待遇之下。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照顾私营企业，一方面促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经营，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转费用」。¹

1 〈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人民日报》社论，1953年12月31日。

「修正税制」赶在1953年元旦开始执行，目的是为了在新年的生产和购销旺季多征税。由于仓促出台执行，事先未作宣传解释，而将原有的产制、批发到零售的三道营业税，集中到商品第一次批发或调拨环节征收，实际1：就将税收加进了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进而导致零售商品提价，以维持零售商原有的利润水平。这一方面引发抢购商品，另一方面导致私商观望。加上调整商业中适当扩大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又同时出台，致使商店和企业趁机搭车涨价。因而，市场物价一时出现剧烈波动。这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北京市委、西南财委、河南财委、天津财委纷纷向中央报告「新税制」引起的混乱，以及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

山东分局的报告称：「在执行新税制当中物价的调整过于仓卒草率，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混乱，群众不满。……加之调整幅度较大，变更多端，造成了人为的市场极度混乱，为几年来所未有，各地意见很多」。由此引发：「私商疑为物横波动，发生抢购现象」；「奸商投机有空即钻」；「市场恐慌私商观望」；「内部思想混乱，外部群众不满」等等。报告强调指出：「以上情况我们认为是严重的，政治上损失是大的」。

2

北京市委报告称：

最近一月之间（从去年12月4日到今年1月3日），有些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接连两次涨价后，市场曾一度很乱，群众怨言和议论很多……一、去年12月4日根据中央调整商业的指示，北京市有4479种商品提高了零售价格（批发价格与工商界利害关系很大，其它市民对此不甚注意），因改变了若干税制，今年1月3日又调整了1370种商品的价格，两次调整后，几种牵涉人民生活很大的货物零售价变动情况如下，计：面粉涨价6.3%（第一次加1.97%，第二次加4.49%，

〈山东分局向明同志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中物横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电报〉（0953年1月9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1953~1957年财政卷》|北京：中国物横出版社，2000，页430—432。

大米涨8.89%（第一次加1.0%，第二次加7.8%），小米涨2.37%，玉米面涨3.7%。

由于在一个月內两次力口价，最近一次大米白面又上涨较多1时间匆促。事前缺乏准备，事后缺乏统一解释，波动很大。1月2日本市埋商由于上海私营埋厂来电通知代销卢涨价20%~私商即纷纷争购上海埋，有些埋版

又拒绝出售〔贸易公司事前不知，毫无准备〕1月3日上午本市质易公司、合作社因受上海影响并且接到了商业部指示，会促计算价格准备调整价格，盘点货物又未营业，市场一度很混乱，私商有的不敢出售货物，有的趁机抬价，群众普遍不满，怨言很多……

三、此事系全国性问题，我们认为物价一月涨两次，政治上很不利，调价时应适当注意照顾到劳动人民生活，应有较久的全盘计划~事前通知下级主管部门，据财经部门干部报告，上海已涨价了，他们还不知，因此很被动：同时他们认为，此次税制改变，并非加税，如粗粮（小米、玉米面）由交易税改征货物税1税率未变，涨价是不对的：面粉的批发价与零售价因为改征商品流通税，增加小麦货物税和完税价格提高的原故1适当提高是可以的，但这次涨的有些过多。现在阴历年快到了1劳动人民需要多买点白面、大米过节^而小米、玉米面又是他们的主要食粮~涨价对他们的生活影响较大，因此，他们就很不满^3

华北财委也报告说：「根据新税法与中商部调价的指示，我区国营商业提高批发及零售牌价的商品共1500种左右，其中尤以面粉、粮食上提最多」。4

各地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应。1953年1月15日，毛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指出：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铍1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5

薄一波回忆说：「周总理收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份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总理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我看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

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个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⁶

于是，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并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解决发生的问题。经过努力，执行「新税制」中所发生的较大问题，很快采取了补救措施，得到妥善解决。

2月10日，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粮食部副部长陈希云三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由吴波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会上，毛泽东尖锐批评说：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

毛泽东：〈辟于新税制问题[^]周恩来等的信〉0953年1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页2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页234—235。

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7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块。8

对毛泽东如此严厉的批评，薄一波说：「毛主席这些批评的话，比信中又进了一步，语气更为严厉，批评重点仍侧重于『事先没有报告中[^]1，而且把错误提到了『右倾机会主,的高度，当时听起来，不免感到震惊。』

四十年后，薄一波回顾说：修正税制本身虽然是一项业务工作，但检讨起来，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缺点。主要表现在：

1. 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确有操之过急、工作过粗的毛病。新税制从9月财经会议酝酿到年底出台，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为了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实施，为了抢在春节前一两个半月的旺季多收点税，许多该做的工作没有去做，或虽然做了但做得很粗。比如，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在有的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对某些具体条文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之后，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也未予认真考虑。关于变更纳税环节，财政部是在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通过方案后才确定这样做的。到起草〈通告〉时，有关同志向我报告后，我没有进一步去研究，也没有再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就会促把方案报送给总理和政务院了。新税制方案公布前，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没有向毛主席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以致他「看报始知」，这更是不应有的疏失和错疾。

2. 修正后的税制，有些具体条文修改得不适当。意见最多的是，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由于担心物价引起波动，未能及时调整出厂价格，以及其它一些相应的措施没有跟上，致使2000多户被合理批准免缴批发营业税的专营批发商，得到了一些便宜，工威税负相应增加，这样乍一看来，新税制就给人一种似乎偏袒了资本家的印象。还由于取消了对供销社的一些优待条件，使得供销部门的意见也很大。新税制公布时正赶上商业系统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正在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个别商品确实因为实行新税制的缘故而提了价。宣传解释工作又没有跟上，因而使人产生了误解，以为修正税制是又要涨一次物价。人民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物价飞涨吃了苦头，记忆犹新，十分珍惜解放后经过几年努力赢得的市场繁荣、物价平稳。当时正值年关，人们在心理上十分害怕物价上涨。由于这种种原因，新税制公布后，在很短的时间里确曾引起过一些混乱。

3^开于「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当时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了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原稿上有这样一句话：「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我在修改时，把这句话简化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看来，这是多余的，以不改为好。这次修正税制主要是对流通环节的，货物一上市，就只能对物不对人了，商品按照一定税率平等纳税是应该的。它不同于所得税，可以根据收入区别不同对象去纳税。

我作为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应当承担这次修正税制工作中所犯错讲的责任。好在新税制执行的时间仅半年，许多问题一暴露出来就采取了措施加以纠正，直至停止执行。当然，也应当看到，新税制确曾起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1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颀》，上卷，页235—237。

2严厉批评「党内资产阶级思想」

问题并不像薄一波想得那样轻松。在毛泽东看来，「新税制」的问题反映了党内相当多数的高级干部，思想仍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在继续搞甚么新民主主义，与他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相距甚远。因此，他决心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以「新税制」为靶子，展开一次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以唤起党内高级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本来是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对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在1953年5月6日给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信中指示：

五月二十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甚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

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再開）。是否可行，請酌定。11

但是，1953年6月1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6月11日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前已决定由薄一波同志准备，现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¹²因此，全国财经会议实际成为由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163人。会议的议程是：第一，财政问题；第二，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第三，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会前，毛泽东于6月5日指示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问题的五份文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的回信；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印发与会人员，表明毛要把「新税制」问题作为会议中心交付讨论。财经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6月12日，周恩来在预备会议上作报告，介绍国际形势、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和会议所要进行的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周恩来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各地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解决的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周强调说：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一个过渡的制度，这个社会是一个过渡的社会，这个过渡时期的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社会主义成份，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增加社会主义成份，走完了这个过渡阶段就到达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能不能胜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已经把帝国主义加来的压力打退了。能不能恢复经济的问题亦已解决了，三年的经验证明，我们能恢复。目前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我们已得的胜利，能不能建设新中

国，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13

会议开幕的第三天〔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系统阐述，尖锐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提法，是不符合总路线的右倾思想的表现。这显然是对包括「新税制」错误在内的定性。

《毛泽东传》的作者也指出：「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14时任东北局第二副

书言己的张明远在回忆录中说：「周总理在财经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这次重要讲话，学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成为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15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会议有三项议程，一开始就集中到「新税制」的讨论和批评，其它两项议程（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问题），基本上没有展开讨论。「新税制」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原定半个月的会，足足开了两个月（从6月13日到8月13日）。对「新税制」的批评，现在可以看到的有陈云的发言，周恩来的结论，毛泽东的讲话。

对陈云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棘云冲》开头是这样说的：「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着重谈了最近财经工作中的错误和自己的责任以及今后工作的意见。」「这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陈云在发言中首先谈到：『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16《陈云年谱》则有更细的叙述：「新税制的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当初对税收减少缺

乏分析。当初之所以没有过问新税制的制订，薄一波也没有来问我，是因为去年年底，高岗尚未到中央就任计委主任，要帮助他搞出五年计划草案，以便提交中央全会，为此向中央声明过，中财委的工作交薄一波负责。但这不等于说我对新税制的错误没有责任。我的责任在于没有指出1950年调整税制的教训，去提醒薄一波。在几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的国家，税制改革影响到各个阶级、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相互间的关系，也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必须十分慎重。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有许多是事务性的，但如果没有人做这些工作，中财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有的，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17可以看出，陈云对

15张明远：《我的回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页373。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882。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0905—19951》，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171。

「新税制」的错误，只是按毛泽东6月15日关于总路线的讲话的精神，指出其结果：「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夺主义经济」。认为原因是：「当初对税收减少缺乏分析」。没有对错误上纲上线。

8月11日，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结论，是经毛泽东审阅改定的。结论指出：「修正税制的错误，是违反党的二中全会决议在这个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错误。」「这正是在经济战线上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正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18

8月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二是要「反对分散主义」。毛说：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

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藉以教育干部。」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毛在例举了二中全会决议关于依靠工人阶级，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关于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规定后，指

2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5—1956）——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四章贯彻总路线的思想动员

249

出：「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当作新闻，其实是旧闻。薄一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

这是违反党的决议的。」毛泽东号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换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I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19

毛泽东这个讲话，不只严厉批评了薄一波在「新税制」问题上的错误，还点了他在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上的错误；并要在全党展开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无疑是要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作一次全面的思想清理，以扫除与总路线不合拍的思想障碍。

对这次全国财经会议在统一党内思想起到的作用，毛泽东说过：「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20

此后不久，1953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对农业互助合作不积极，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言不及社会主义。毛强调，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从中央到县、区委各级书记，都要把精力集中到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来。21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对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使全党干部对从现在起全国的工作重心就是消灭私有制这一点开始明确了起来。

3过渡时期有「两个联盟」

在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中共党内一部分人对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作还要不要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确定，对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没有必要了，也有人认为统一战线工作是包袱，主张干脆取消、丢掉这个包袱。

为了研究、部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检查和总结民族工作，中共中央统战部拟于1953年7月召开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7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把党的统战工作当作包袱，主张干脆取消是不对的，是应该批判的。他说，「干脆取消」，应该是干脆不取消；「丢掉包袱」应改为不要丢掉包袱。首先要肯定民主党派、各种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是可以改造的，这样做统战工作才有信心。如果认为他们大多数是不可改造的，那么做统战工作就没有信心了。毛还明确指出，过渡时期我们有两个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就是劳动人民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剥削者的联盟，跟资产阶级的联盟。头一个联盟为后一个联盟的基础，没有头一个联盟，我们就没有力量。必须有这个联盟；才有力量去联合那些可以合作的剥削者，他们才会来同我们合作。

19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8月12日。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90—94。20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1，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1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304。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I，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302、305。

7月18日，刘少奇在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他根据政治局讨论的精神，阐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长期性和重要性，深刻阐明了两个联盟的思想。

他说：党内有一些同志认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似乎不是那么必要的，而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或者认为从现在起就可以降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缩小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甚至可以不要统一战线工作了。这些观点是和党中央的观点不一致的，是不正确的。党中央认为统一战线工作是一种必要的工作，过去是必要的，现在是必要的，将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必要的，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

他指出：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工农及其它劳动者的联盟，这是我们阵线的基础，是最重要的，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革命能不能胜利，政权能不能巩固，国家能不能工业化以及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都决定于这个联盟。另一个是劳动人民和一部分可以联合的剥削者及其代表的联盟，即在工农其它劳动者联盟的基础上，再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结成联盟，此外，加入这个联盟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宗教界人士等。这就是目前我们说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了实现我们伟大的目的，我们不仅需要在劳动人民内部有巩固的联盟，而且还要和一部分剥削者结成联盟。而后一个联盟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前一个联盟的。在劳动人民内部结成联盟，党内认识是一致的，没有争论的；但和一部分剥削者结成联盟的问题，党内有些同志还有不同的认识，还有分歧。目前我们所说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的是指后一种和一部分剥削者结成联盟的那种工作。

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剥削阶级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取直接剥夺的方法；另一种是采取逐步改造的方法，就是统一战线的方法，即经过教育、说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进行安排等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引导那些能够服从社会主义改造或不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总的方面来讲，党的这种统一战线工作只是实现党的总任务的总斗争中的一个方面的工作，是一种配

合的辅助性质的工作，但从消灭我国现存的剥削阶级来讲，这种统一战线的方法，即和平过渡的方法，又可能是主要的方法，而直接剥夺的方法则可能是次要的方法。所以，统一战线工作对党的总任务、总斗争来讲是配合的，对消灭现存的剥削阶级的方式来讲则可能是主要的。

所以，结论是：这种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取消，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一种必要的工作，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必要的。取消统一战线工作是不对的，轻视统一战线工作也是不对的。221

经过统一战线的工作，使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和平过渡的目的，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组织保证。

二大张旗鼓宣传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传达和宣传，首先由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报告，接着是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并发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向全国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于是在党政机关、工农群众、工商业界、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学习总路线的活动也随之展开。随着中央宣传部编写的总路线宣传学习提纲的下达，全国范围宣传学习总路线的活动进入高潮。

1 周恩来报告总路线

中共以外的上层人士，听到中国从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是1953年9月的事。9月8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四十九次

2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117—124。

第四章贯彻总路^的思想动员

扩大会议，23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

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概括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解释了甚么是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周指出，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场革命，党的方针是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报告论证了提出总路线的必然性，指出：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平、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报告阐述了体现总路线精神的「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即：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

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周解释说，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相应地发展轻工业，设法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我们只看到重工业而不看

23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有时因会议内容比较重要，这两个会常常举行扩大会议，邀请一部分在京的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到轻工业，那就会犯错误。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否则无法增产粮食。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感到粮食不足。但是，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必须相应地扩大商业。对于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有步骤地进行。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报告还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周说：「现在这样做，还不是多数人都懂得的，我们要做很多的教育工作，把这些道理说清楚。共产党当然首先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同时还要动员工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业家，大家来做这件工作。」24

2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

1953年10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会前〔9月7日〕，毛泽东约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等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

的方针政策，以解除工商界人士存在的疑虑。毛泽东指出：

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04-117。
关于改造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毛说：

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

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毛明确肯定了私营工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积极作用，向他们说明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利润分配原则：

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

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所得税34.5%；福利费15%；公积金30%；资方红利20.5%。。，毛强调指出：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全国各民族、工人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²⁵

毛的这个谈话，实际上成为这次工商联大会的指导思想。

在大会开幕式上，大会主席陈叔通致开幕词，他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要为实行国家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利瓦伊汉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向与会代表详细阐释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若干政策原则；在私营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基本经验；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等问题。利瓦伊汉说：各位代表，四年来，我们已看到工商业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到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好处，要求人民政府更有计划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我们相信，由此前进，再过若干年，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生产的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才能使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更大地获得满足，认识到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最后完全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必要性。到了那个时候，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了，消费资料仍然私有：而

一切对人民有过贡献的人们，他们的工作和地位，也就会获得适当的安排：同时，他们的子女也受到

国家的教育，获得贡献其智能于国家的广大机会。毛主席在1950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曾经指出：「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就是他们的光明大道。26

与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11月12日大会通过决议，郑重宣告接受和拥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会后，以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为内容，工商界广泛开展了学习、宣传总路线的活动。

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工商界展开传达学习后，资本家对总路线的反应，整个来说，公开反对的不多，但是发牢骚、感到失望和对前途悲观的居多。据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1953年11月14日的综合报告称：

国庆口号公布以后，资本家波动很大，但程度不一；正面都是歌颂拥护，但背地牢骚满腹。其中尤以中小资本家为甚。资产阶级对总路线是不满的，实际上又无可奈何。他们形容自己的处境是「上了贼船」，「跟着走，能有出路，逆着办，只有下水」，「船在河中只好认头」。资本家自问「1949年为甚么不讲总路线」？认为「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也没有办法」。有人说：「别再总了，政府就明着说吧」；「政府对资本家一刀一刀的来」，就是「慢慢把你吞掉」。他们要求保

持现在的秩序，不甘接受「逐步过渡」：回忆起1950年「黄金时代」，不胜依依，认为「那年头是睡在西蒙丝休上」，「甚么国法、纲领也不在心上」，「现在是睡在炕上」，已经退居一等，最好不要再「过渡」了。新民主主义「很优越」，今年如此，明年仍然如此。但一提总路线，就「越来越紧」，言下悲叹：「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资产阶级不愿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不跟国家打交道，「晚睡晚起，自由自在」，加工订货已经「不大自由」，公私合营就要被「溶解掉」。「代购代销是进去了一点」，加工订货是「进去了一半」，公私合营「就全进去了」。公私合营是「借地插秧」，公股比例一天比一天大，到时候「那有你的份」！公私合营强调领导与被领导，「所谓领导，只有服从」，「讲协商，也要跟着走」，「利用」太「难听」，无利时就「一脚踢开」，改造是「名词儿」，「套着是真事」。27

关于大中小企业资本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态度，报告也作了分析’指出：第一类是中上层中长期和政府合作的资本家，认为总路线是「大势所趋」，自己「先走了一步」，「晚合不如早合」、合营「可以当国家干部」。第二类是中小企业主，这是资产阶级的多数。自称是「武二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合作化「没有我的事」，公私合营「没有我的份」，内心矛盾很大。第三类是小业主、认为总路线与己无关，手工业搞合作化还能干几年。万一没有出路，可以敛起棉袄打倒轮，再当工人。表现了小私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性格。第四类是商业资本家，怨天尤人，非常不满，认为国家「待遇不平」，前途「黑漆一片」。

重庆市的资本家反应：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变了。有的资本家曲解政府的政策，如光裕磁号资方徐裕山说：「政府对小贩是利用，对中等工商户是限制，对大工商户是改造。」认为私营商业无前途，因此有些私商急欲转向工业和搞公私合营，永昌五金号资方说：政府指出的方向虽很明确，但因我们不够条件，只有自生自灭。有

〈天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天津市资本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反映的综合报告〉（1953年11月14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册，页98。

258

1, 11上百万义

“早做觉悟”的思想动员

259

的资本家对国家的政策采取抗拒的态度，有的资本家则想依赖政府「包袱」。28

3在职工群众中进行宣传

1953年11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下达〈关于学习、宣传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示〉，要求：务必使每一个职工和家属懂得，只有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才能满足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工人阶级对实现这一伟大艰巨的历史任务，担负着主要的责任。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要讲清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资产阶级自私自利腐朽思想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号召全体职工群众发扬中国工人阶级勇敢、勤劳、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用自己的忘我劳动创造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总路

线的教育最主要的步骤，是要落实到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的行动，把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胜利完成。

28(内部参考) 第277号，1953年11月26日。

在学习宣传总路线过程中，据中共河北省委的反映：几年来，党在厂矿企业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广大职工的思想觉悟已有很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职工生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在总路线教育中暴露出，在部分职工中也沾染了和滋长着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这主要表现在：（一）经济主义思想。（二）出租土地或房屋、雇工、放高利贷，进行剥削。据石家庄车辆修理厂十个支部和焦厂一个支部的重点了解：380名党员工人中，有出租土地、出租房屋、兼营商业、雇长工、放债等行为者共157人，占党员总数的41.7%。（三）当小老板或计划当小老板。（四）违反粮食政策：如抢购面粉、囤积粮食、从私商处购进粮食高价贩卖等，各地均有所发现。河北省委计划针对上述现象分别向党员进行支部教育、向团员进行团课教育和向工人进行政治教育’详细、具体、全面地讲解党的总路线。29

4对广大艇民的宣传教育

由于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正遇到关系到农民根本利益的粮食统购统销，因此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总路线更是整个宣传运动的重中之重。1953年11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帮农民算三笔账〉、〈领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巩固工农联盟是实现总路线的保证〉四篇社论。这些社论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阐述国家为甚么要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与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有甚么关系；为了支持国家搞工业化，就要多交粮食给国家，而要多打粮食，必须组织起来的道理。社论还指出，农业合作化后，实行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劳动所得，除了纳税、缴纳

合作社的公积金和谋当地的公共福利以外，都归农民各家自享自用；谁劳动得最好，谁的收入就最多，谁的日子就过得最好。这样的结果是大家富裕，没有穷人，鳏、寡、孤、独也能够得到社会的照顾，所以，这是全体农民的唯一光明大道。

然而，广大基层干部多出身于农村，执行的是反帝反封建和对私人资本保护的政策，因此在思想上不容易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也不容易理解！”农民自发势力」的危害性。这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学习总路线中自然就反映了出来。中共湖北省委反映在省党代会上讨论总路线时，在土改运动中培养提拔起来的县、区、乡干部，与封建主义的思想界线较明确，但与资本主义的界线不明确，在部分干部中滋长着资本主义思想，有的有雇工、放高利贷等剥削行为。在讨论农

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 953—！ 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四章贯彻总路线的思想动员

2(11

民自发趋势联系到征购时，一般农民出身的干部顾虑很大，认为共产党依靠农民取得了胜利，农民出人出粮负担重、贡献大、有功劳，今天又要征购其余粮，是整农民，是过河拆桥，这样不但将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将引起农民的不满。

中共中央中南局批转了湖北省委关于省党代会思想情况的简报。

毛泽东阅后极其重视，于1953年11月4日为中央代拟了〈中央关于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抓紧了关于

党的总路线在干部中的教育，及时地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糊涂观念，这在目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完全必要的。湖北和中南党内的这种思想情况，在各地都是存在的，请你们务必抓紧对党员首先是干部进行教育和批判，并将情况和结果向中央作报告。产

中共中央华东局在1953年12月20日的有关指示中也指出：各地在通过宣传总路线和贯彻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均暴露了土地改革之后，我们对农村党员及干部的经常教育，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教育很差，相反的在宣传生产致富、劳动发家、「四大自由」等问题的时候，又没有划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界线，因此引起了干部思想上的某些混乱。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要去占领。各地党委必须有意识地通过宣传总路线和贯彻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澄清党内及干部中的混乱思想，逐步占领农村的思想阵地。³¹

各地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采取了多种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中共云南省委的报告说：「我省自去年十月开始，农村中以粮食统购统销为重点大张旗鼓宣传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一工作现已取得了显着成绩：不但已经完成了粮食统购任务，而且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开始受到了总路线的教育，发扬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土改后农村中盲目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有所克服，进一步孤立了城乡资产阶级。乡村干部和党团员中，原曾有40免至50呢以上的人，已经或打算从事种种投机剥削，在经过总路线的学习提高觉悟后，绝大多数得到了挽救，运动中也新生了一批积极分子，这就使得因自发势力影响导致乡村组织涣散的倾向开始得到克服。」另一方面，报告也指出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警惕和纠正，这就是：「过去一段，干部作风上滋长着新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必须引起警惕。必须纠正『资本主帽子到处配戴的不良作风。农民恨剥削，所以容易引导其社会主义积极性，但农民也最怕戴剥削帽子，而这帽子又使一些农民不敢说话。所以有些农民的积极是假象，事实上，思想补谏做得好、生产搞得好的县，也不过3070的乡较深

人。富农要献田给农会、责牛等怠工行为，中农分家以减少余粮数目，杀猪浪费现象严重已不是个别现象。宜良全县积肥只等于去年同期的1/2至2/3，不少群众以假报积肥数目去应付县委检查执行『增肥二；^的号召，甚至个别贫农如玉溪五区潘某，宝粮后把房子、毛厕都卖了，等着过社会主义生活，并说：『社会主义像土改一样，不消去开会也有一份』。农村生产自流，而干部倒只看到好的、积极分子的一面；加上新『五多』，不少地县委领导上忙于开大会，作风重新漂浮起来，这是很危险的。」³²

河北省委报告说，通过普训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党'团员受教育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如蓟县五区统计，496个党员中，自己明白也能宣传的只占257。；自己明白但不能宣传的占407。；思想不通的占35呢。又如赤城县，只有60呢的党员受到教育，在受到教育的党员中，领会较好的占607。；思想模糊的占207。，有抵触情绪的占207。。³³不仅

〈中共中央转发西南局批&云南省委关于在农村深入细致宣传总路线的指示〉〔1954年4月19日），载《中央文件集集（^》：第五分册，页1500。

〈河北省委关于进一步深入和加强对农村党员进行总路线和粮食政策教育的几点指示〉（1953年12月）：载《中央文件弃集”^由》，第五分册，页1426。

农村基层党员对总路线的了解和认同不乐观，就是更高级别的干部情况也是如此，据河北省委1954年1月的学习总路线情况通报说：「少数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对总路线学习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³⁴「邯郸地委在互助合作干部会上举行了一次测验，25个县委级干部，不及格的占2/5；张家口地委在县书县长会议上测验时，康保县四个人中，三人弄不清总路线的主体两翼，延庆县委书记认为党的农村工作路线是以贫农为领导。党的领导干部对总路线的认识竟是这样糊涂，是非常不应该

的。」 35

对这个阶段宣传学习总路线的成效，1954年2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总结说：「在这条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以后的几个月中，党向全体党员干部，向国家工作人员，向工人阶级，向农民群众，向国内各阶级和民主党派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这个宣传教育工作，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获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热诚拥护，使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国内树立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使资本主义的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批判。」 36

三「大仁政」与「小仁政」之争

1953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报告总路线后，与会人士进行了讨论，著名爱国人士梁漱溟在讨论发言时，突出提到要重视农民的问题，并说工农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从而引发了一场「大仁政」与「小仁政」的争论。¹梁漱溟呼籲不要忽略广民

9月9日上午分小组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梁漱溟在会上发言说：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伯钧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活，我于此深表赞同，没有甚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就能倍增。

下午召开大会，由周恩来主持，他提议通过大会发言以交流委员们在各小组发表的意见。梁漱溟建议，请各小组召集人把各组内讨论情形在大会上统一汇报，以代替每个人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梁漱溟所在的小组由章伯钧把大家发表的意见讲了个大概，其中包括梁的发言。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宣布第二天的大会由个人发言。周恩来在离开会场时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好不好？」梁回答说：「好。」梁以为，如果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到大会上再重复一，就没有意思了，而且小组会上几乎全是非共产党人士，他所说的话是就党外广大群众而说的，而现在是领导党的负责人要他在大会上说话，他就应该说一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梁漱溟连夜作了发言准备。但第二天〔10日〕下午大会发言甚踊跃，而且许多人是外地来的，如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讲得很好，因此会议中间休息时，梁漱溟便写了一张条子给周恩来，说会议应该尽量让外地来的人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况且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他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发言。周恩来说，让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请梁明天在大会上发言。

2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一”“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四章贯彻总路线的思想动员

265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按已作的准备发言。他说：

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人或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或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而说各有所侧重罢了。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个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的。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容不能容，又趣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地，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

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38

这就是梁漱溟的所谓「九天九地」说，也正是引起毛泽东对他进行严厉批评的导火线。^

2毛泽东严厉批评「小仁政」

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中曾有人提出，国家搞重工业，让私人资本搞轻工业；也有人认为，现在国家还很穷，人民尤其是农民生活还很苦，国家应与民休息，实行工业化势必要从农民身上实施资金积累，伤害农民利益，于是呼籲共产党实施仁政。毛泽东听到梁漱溟的意见后，认为这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反对总路线、反对工业化，问题严重。

9月11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总结报告。他说：这次会议是有收获的，各位朋友提了很多意见，其中有很多好的意见，应引起各主管部门的注意。然后，他重点讲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前途；国家建设等问题。

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四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并通过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列席了本次会议。在彭德怀报告后，毛泽东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梁漱溟11日发言的不点名的批评。^

梁漱溟听完毛泽东的这番话，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他觉得自己是拥护总路线的一员，只不过是说了点心里话，想贡献给领导党，提醒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会有损总路线，有损工农联盟。于是，当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说明情况。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中还特别指出，他发言时毛本人不在场，希望毛给个机会，由他当面覆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在会场上当面交毛泽东。毛泽东约他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举行的晚会之前约二十分钟时间。由于时间很短，梁在简说自己发言的本意后要求毛泽东解除对他的误会。毛泽东则坚持梁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十分失望，但态度坚决，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冲突，不欢而散。梁漱溟并不作罢，他还想再寻觅机会在大会上覆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来评议。9月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覆述了9日和11日分别在小组会和大会上的发言内容，并以此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9月17日，周恩来首先对梁漱溟作了批评，在追溯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情况后批评说：梁说总路线很容易作不好，实际上就是不要我们搞工业，就是使中国不能工业化，违背《共同纲领》，不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中国如果不能工业化，农民的生活有甚么办法能够进一步改善，乃至走上社会主义彻底改善呢？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对梁的那套主张，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应该断然地拒绝。39接着，毛泽东在会上对梁漱溟作了份量更重的批评。毛指着梁漱溟说：

「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1“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I“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

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你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

梁漱溟在现场听到这些话后，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倔强好胜的个性驱使他要求当场发言作答。会议主席嘱他作准备，明天再讲。9月18日下午’梁漱溟拿着准备好的稿子再次在大会发言。他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我是恶意，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

26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一[^]55)[^]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四章贯彻总路线的思想动员

,

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40

这时，会场上有一些人不愿再听梁讲，而梁则迫不及待地要讲清楚事情

的来龙去脉，相持不下。于是，梁把话头指向主席台，特别是毛泽东，以争取发言权。梁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甚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这时同毛泽东你一言、我一语地顶撞起来，使会开不下去。最后，大会对是否让梁漱溟继续发言付诸表决，除毛泽东等少数人举手赞同他讲话外，大多数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41

从9月16日到18日，毛泽东批评梁漱溟的话还讲了很多，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那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共概括了十五个问题。其中就「九天九地」问题批评说：

照梁先生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共产党及其它）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

40汪束林：《漱溟与毛泽东》’贯24—

41汪束林：《杰漱溟与毛泽东》1页25—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甚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哪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大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之上、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哪一种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又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为甚么落后呢？主要是因为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混进来当了干部，把持了乡村政权，有些人还混到共产党里来了。在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当中，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它还有些是蜕化变质的干部。所以，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要清理。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乡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对于梁漱溟所以要作如此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解释说：

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线。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那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1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1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甚么好处1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甚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42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除了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外，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如何相应发展亦应有计划；建国运动不能因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而忽略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于农民必须在教育上多下功夫等等。这本来是对如何贯彻总路线的有益建议，却被毛泽东指责为反对中共的总路线，是「要照顾农民」，对农民「施小仁政」，而不施发展重工业的「大仁政」，是要「毁灭中国工业」。梁漱溟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涉及采取何种方法将小农经济现状所决定的农民的眼前利益同国家工业化所代表的农民的长远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的问题。然而，对梁漱溟的批判被引向了他的政治历史问题，偏离了论争的焦点，致使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如何切实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使其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妥为结合的问题，实际上没有深入讨论下去，也没有求得很好的解决。43

其实、影响远不止此，从1949年以后的历史来看，这场政治批评，可以说是1957年反「右派」的先声，它对中共以外的民主人士向执政党进言献策，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十四年后，梁漱溟对当年这秦公案的引发和影响，也曾有过反思。他说：

犹如为统一中共党内干部的思想，毛泽东抓了薄一波「新税制」进行批判一样，为使中共以外的民主人士的思想，统一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泽东抓住了梁漱溟这个典型。

事后，梁漱溟并未因受到严厉批评而受任何处分；梁漱溟当时给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副主席陈叔通和秘书长利瓦伊汉写信，要求请长假，闭门思过，利瓦伊汉派人告他，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但参不参加自便。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批评造成的影响，有的学者指出：梁漱溟应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邀，在政协常委扩大会发言中郑重提出建国计划

毛泽东主席当时何以如此严厉地批判我？我至今觉得还是一个谜。我的狂妄固然使他生气，因而在气头上也同我一样，说了若干过头话，极端的诘鲁把事端拔高、扩大了许多。这些暂不一一论及。问题是我一开头的所谓「九天九地之差」的发言，何以一下子成为出于恶意的反动言论呢？我以为可能是毛主席从国家建设大局不容怀疑的准则出发、且以阶级的眼光分析之，联繫我几年来常有站在政府之外说话的种种表现，便断定我的话别具用心，实则代表地主阶级反对新政权的大政方针是也！毛主席作为最高领导人，当然一经敲定，便不容再改。而我又不自量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反驳、顶撞，致使出现几乎不可收拾的场面。如

42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日—18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113—114，115。

2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3—1955〕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果这一推断可以成立，那么我的发言其立场不对，错得很大等等暂且不论，或者说即便的确是错了，作为一个领导党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持

甚么态度，采取甚么办法对待更好、更妥当呢？我认为几十年来客观事实的发展、变化证明毛主席在1953年对待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采取那种办法，是不妥当的。它十分不利于广开言路，特别是不利于领导党听取来自党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我以为，我当时的发言，仅仅是有一点点不同意见。还谈不上是反对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1953年不过是针对我一个人的严厉批判，所幸并未戴上甚么政治帽子，值管。多年来还是有一顶不戴帽子的「政治帽子」。但几年以后，便有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几十万人真的戴上了正式的政治帽子。而后又有拔白旗，反右倾，直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从毛主席作为领导党主要负责人的指导思想观察，我以为这中间有联系，有发展，其恶果是逐渐形成而越来越大的。⁴⁴

44汪束林：《梁漱溟问答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刚8）1页146—147。

45《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页375。

但是，当年掌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则另有评论，他认为毛泽东发火固然不对，但在辩明要不要搞工业化这个大是大非上，毛对梁漱溟的批判是必要的和正确的。1991年8月28日，胡乔木在谈〈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时说：「同梁漱溟的争论，薄老的书（指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⁴⁵引者注）没有提。在这个问题上要为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毛主席发火不对，但为甚么发火？当时关键是对待工业化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搞工业化哪里来的资金？同梁的争论主要在这里。梁说农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活不下去了。毛主席觉得这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非作不可的事。梁漱溟讲得那么尖刻，毛主席气得很。」⁴⁵第五章

高岗、饶漱石事件

就在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新税制」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要开展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过程，中共高层发生了一股「倒刘（少奇）」风潮。史称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对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事件经过的真实情况，其性质是否属于「反党」，长期以来人们多有疑问。现在看来，这实为毛泽东由放弃新民主主义，转向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战略转轨过程中有意重选接班人而爆发的一场较量，最后高岗、饶漱石出局。

一高岗与刘少奇的矛盾

1建国初年的高岗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方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被派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谢子长、刘志丹一起，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

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同年11月，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红四十二师随后全面展开了创建甯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

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区革命武装。会议确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不久，谢子长因病逝世。

9月中旬，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立即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为统一红军的领导，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期间，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在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斗争，在所谓「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人及红二十六军、陕甘边区一批干部逮捕扣押，并无辜杀害了一些党员干部，使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在此关键时刻，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当了解到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骨干被错误关押的严重情况后，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¹从而使刘志丹、高岗等人得救。1936年4月，刘志丹在红军东征〔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军山西〕期间，率红二十八军攻打山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在创建陕北和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先后谢世之后，鉴于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地位，自然在党内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并受到毛泽东的器重。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党中央委任高岗为书记。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为着统一整个西

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0893—19490，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484。北工作的领导，决定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七人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

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的问题时，就曾赞扬过高岗。毛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²当时，中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西北局。高岗在党内的地位可见一斑。此后，高岗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又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而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个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同年11月任北满军区司令员。这一时期，东北局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方针的争论，³高岗与林彪、陈云等都是坚持正确意见的代表。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底任东北军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8年底，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入关。高岗于1949年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引文按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原文，在其后重印时，最后一句删去了高岗的名字，改成「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简），页822—8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0905—19951》，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页373—374。

由于东北全境解放较早，有一定工业基础，又背靠苏联，1949年8月，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时就曾带来一批苏联专家留在东北。由于这些条

件，所以东北的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工业建设较全国其它地区都开始得早，并取得较好的成绩。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对支持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作出了贡献。1951年10月25日，朝鲜政府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曾对人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持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⁴

鉴于1953年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为通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加强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调中央工作。从1952年8月至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第一书记为林彪，因病休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一书记为彭德怀，当时在朝鲜战场)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它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可见，高岗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从延安整风到共和国建立之初，一直是步步高升的。自延安整风形成的中共领导人的排名，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人们的共识是刘少奇为毛泽东

⁴《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1~页476—477。笔者专就此情节访问洪学智上将。洪老说：朝鲜政府第一次为彭老总授勋的地点在平壤，后来授勋才在桧仓。第一次授勋只有彭老总一个人，当时正是彭老总在平壤和金日成首相研究同美方谈判的问题。彭总授勋回到志愿军总部桧仓后，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朝鲜政府这次给我授勋，我是作为志愿军的代表接受下来的。若是论功行赏，应该赏给「两个麻子」，一个高麻子~一个洪麻子。林蕴V访

问洪学智的谈话记录，1999年4月5日。的接班人。但据李锐⁵说，到建国之初，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已经改变。李说：习仲勋跟我说过~1949年进城后谁接班？就是高（高岗⁶引者注）。那已经很明显了嘛！高是国家副主席，又是国家计委主席。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行，实际是经济内阁。高很得意。有一次，他见到我，对我说：李锐啊！你看，我这个人管经济啊，啊唷！非常得意。⁶

2高、刘在政治上的分歧

从历史上看，高岗与刘少奇并无瓜葛。在政治上出现分歧，是全国解放前后的事。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又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⁷

就在二中全会闭幕不久，1949年4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指导当地负责人贯彻二中全会方针，纠正城市工作中的「左」的偏向，迅速恢复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刘少奇在同天津资本家代表人物谈话中，为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向他们历史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剥削问题。刘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1947年夏秋到1948年冬，李锐曾任高岗的政治秘书。

李锐谈毛泽东与高岗，林蕴晖访问李锐的谈话记录，2004年11月28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428、1431。

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对建剩消除去以后1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1剥削的工人大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戚多刹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马I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近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将生产力空前提高1比有史以来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1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趁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8

刘少奇说这番话的意图，显然是为了解除资本家害怕清算他们剥削行为的顾虑^鼓励他们迅速恢复生产，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贡献。但是，对建国后作为执政党的工作中心，毛泽东仍认为是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经济。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据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回忆说：

5月份（指1949年^引者注），毛泽东把我从天津召到北平，向他汇报天津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等情况。我将在天津四个月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完了之后，毛泽东留我和他一起吃晚饭。……我们边吃边聊。突然间，毛泽东停下筷子，问我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甚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9

看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并不知情，他继续在按二中全会的精神指导工作：

其一，1949年5月31日，根据东北局社会部部长邹大鹏反映东北城市工作中有宁「左」勿右的偏向，刘少奇起草并签发了〈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电文以刘少奇到天津巡视，发现天津存在

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人民政府合作的资本家的现象，指出：「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¹⁰

高岗对刘少奇在天津有关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讲话，不予苟同。他对东北局几个常委说：「少奇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右的，华北局执行这方面政策中有右的倾向，就与这些讲话有关系。」

其二，是关于土改以后农村出现新富农和富农党员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农村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党员发展成富农也可允许，不必急于处理。根据刘少奇多次谈话的精神，1951年6月29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一文⁹提出：「没有强大的国营工业，就不能有全体规模的集体化。」⁸「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这样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⁸「此外，在目前的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也是错误的。这要直接破坏互助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¹²这些观点也与高岗相左。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批评说，对待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

⁸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5月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刘少奇论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107。⁹黄克诚：《黄克诚自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17。¹⁰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十九册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页70。11张明远：《我的回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页334。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页190。

农民群众从小生产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13这里所指的，无疑是刘少奇、薄一波的观点。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右倾思想》的报告。在「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的部分，不指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薄一波有关先机械化再合作化，以及对待富农经济政策等观点。高岗指出，党内有的同志认为：「农村共产党员的任务不是提倡农业生产互助及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作用，逐渐地吸引农民一步一步地走向集体化，相反，他们认为农村共产党员的责任是在经济上升之后带头雇工，使自己达到富农的地位，让农民感到有『奔头』。」高岗接着批评说：「那种让农民自流发展，让农村经过深刻的阶级分化之后，再来一次大的革命，或者等到将来有了机器在一个早晨下个命令实行集体化的观点，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如果不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而去积极发展富农经济，则农村政权必然蜕化为富农政权。如果共产党员都去雇工，放高得贷，则农村的党必然蜕化成为富农党。这就将是人民政权和党的组织在农村资产阶级进攻面前的完全失败，而这当然是所不能允许的。」，4毛泽东认为高岗这篇讲话很好，指示胡乔木作文字修改，公开发表。这个报告后来在《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印成「活页文选」发行全国。张明远（东北局副书记）回忆说：「在对待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争论中，高岗得到毛主席的全力支持，大获全胜。后来高岗在东北局传达了毛主席

席对刘少奇的批评，说：『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不能支持你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编0949—19571》，

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40。14高岗：〈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1952年1月10日），《华月报》，1952年2月号’页14、15。

们。』『你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的觉悟、作了广大群众的尾巴。你们被富农经济的假象迷惑了眼睛，至今毫无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这是危险的。』」15

由上可见，高岗与刘少奇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政策上的分歧，正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高岗与毛泽东则是完全一致的。

二「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

1毛泽东在会前的重要举措

从1953年初对「新税制」作出严厉批评以后，毛泽东在组织上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使高岗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周恩来的地位受到削弱，刘少奇受到指责。

15张明远回忆’未刊稿。

16有材料说^毛泽东曾对人^牢骚说：「甚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办公的地方），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办公的地方）！」「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现在’政府部门又成立甚么党的总干事会，他要干甚么？」赵家梁、张晓赛：《高岗在北^》（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1，页74。

1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勒)〔1953年3月1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1，页58—60。

其一，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对毛泽东因「新税制」批评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意见，周恩来不敢怠慢。162月19日，他召集邓小平、利瓦伊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等座谈，讨论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意见。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为中央主持起草了一个决定。这就是在3月1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17

主要内容是：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¹⁸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三、重新规定了现在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它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这样，周恩来事实上就只管一个外事口了。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于3月24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销，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它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19

此后，又对政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作了分工。5月15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规定：

出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0所属的铁道、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0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20

以上表明，在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之后，一方面政务院总理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周恩来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它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另一方面又把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划归了高岗领导，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对周恩来权力的极大削弱，而对高岗权力的加强。

其二，指责刘少奇擅自签发中央文件，并指示暗查刘少奇的历史。

5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命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毛在信中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杨尚昆于当日将情况向毛作了书面报告，毛又写了如下批语：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8月1日（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渎的，是破坏纪律的。21

由于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刘少奇负责。毛在这里所作的指责，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刘少奇的。

更为严重的是：1953年春天，毛泽东要高岗亲自查看沈阳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经过，张秀山（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有过一段详细说明：「1953年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300。

21毛泽东：〈关于用中央名义发文件、电报问题的信和批语〉〔1953年5月19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选》，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页229—230。

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它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²²

由「新税制」问题引起权力的重新分配，组织上对刘少奇不信任的表示，联系到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评（这虽然是周恩来起草文件上的话，知情人不难看出，同样是批了刘少奇在1951年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的「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高岗都明显站在上风。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意欲重选接班人的意图，显然也为高岗所领会。这就是高岗在此后积极「倒刘」的直接背景。

2「批薄射刘」的后台

关于1953年6至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按当事人薄一波的回忆，7月13日，领导小组举行扩大会议，由薄作第一次检讨，「从此会议中心转为批评我(薄一波自称一引者注)的错误」。23意在说明，有人利用对「新税制」的批评进行「鼓动」，导致会议转向，造成「批薄射刘」的局面。

事情似乎并不完全如此。如前所述，在财经会议召开之前，有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全国财政会议前已决定由薄一波同志准备，现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24二是6月5日，毛泽东指示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问题的五个文件印发与会人员。这就决定了「新税制」作为会议讨论的中心，置薄一波于被批判的地位。周恩来在6月12日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也表明了这个意思。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解决的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

会上的发言，起初只是针对中财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如中央对地方照顾不够，统得过多、过死等。李先念在发言中举例说，下边连针头线脑都没权掌握，困难很多。中央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发言批评薄一波不支持东北建设。高岗事先对东北代表交代说，东北代表不要先发言，要谦虚谨慎、提意见时不要太尖锐。因此，张明远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中财委对东北在抗美援朝中负担过重的问题重视不够，中央调拨的物资不能及时到位等。256月15日，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对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的批评，不能不导致人们对薄一波的批评升级，并联系到党内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于是就有毛泽东要薄一波在会上做检查的指示。

7月12日夜，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信中说：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辟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着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比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

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26

7月13日’薄一波在扩大的第十三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第一次检讨。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薄一波成了「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

22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30》（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页321。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239。24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1953年6月2日。

25张明远：《我的回忆（上）》，页379。

2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240。

批评持续了约两个多星期，由对「新税制」的批判，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观点的批判，联想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讲话，从而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当时有些人发言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维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说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饶漱石的发言也很激烈。

关于高岗在会上的发言，据张明远回忆：高岗的发言稿是他找几个人研究后，由马洪起草的，经过张闻天修改，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言词并不尖锐。据高岗说，他的发言稿不但请周总理看过，还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也给少奇看过，他还同少奇当面交换了意见，他向少奇表示，为了弄清是非，即使因此受处分，去当县委书记，也要坚持原则斗争到底。还说这一次少奇同意了他的意见和发言。27

1953年8月10日，高岗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发言，涉及「批薄射刘」的内容是：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上，一波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合作互助运动的方针，认

为这是一种空想，而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薄在1950至1951年时，曾宣传说：中国主要是贫农，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这当然是对的。但他对农业发展道路的看法则是错误的。薄说，要发展农业生产，就要提高农民的积极性，而现在农村障碍农民积极性的是怕冒尖的思想，要使农民不怕冒尖，就要发展富农，这样农民才有奔头；如果农民对当富农还有顾虑，共产党员就可以雇工。并说，有十万八万党员当了富农，有甚么可怕！到社会主义时，他们愿意跟着党走’那自然好，不愿跟着党走，还可以开除出去。在1950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也宣传过这种观点，在座的参加会议的同志还记得，我就起来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席批评说这是走法国的道路。

27张明远回忆~未刊稿。高岗的发言，毛泽东看过，并作了多处修改，其中凡提到薄一波的「个人主义」之处，都改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赵家梁、张晓!?: 《高岗在北京》^页131。

薄在1951年党的生口写的纪念文章中，把合作化的道路说成「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有很多人说，现在土地没有国有化，又没有拖拉机，因此就不能搞合作化。李立三也有这种观点。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之后，实现集体化之前究竟走甚么道路呢？薄避而不谈，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的思想，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的道路上走。

据称，高岗发言以后，薄一波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上纲太高，难以接受。高岗把毛主席改过的发言稿给薄看，薄无言以对。28

在8月11日的总结会议上，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除检查「巩固新民主

主义制度」等错误观点外，还检查了关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29

财经会议期间，会内会外曾出现一些流言：「批薄另有后台」，「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等。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这次会开得不错，各大区能把意见摆出来，对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有人说这次批评薄一波另有后台，说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这话不对。如果说有后台的话，这个后台是谁呢？那就是我。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上的事情我都知道，总理的总结代表了 my 意见。30

2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3—1956 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五章高岗、饶漱石事件

289

三「讨安伐刘」的组工会议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历史上被认为是继当年6月的财经会议之后，高岗与饶漱石相互勾结，大搞阴谋活动的一次会议。证据是饶漱石同张秀山在组工会议相互配合，搞「讨安伐刘」的反党活动。张秀山，当时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原组织部长），说饶漱石同他相勾结，指的是张秀山在会上的发言。那末，已不再担任组织部部长的张秀山何以到会发言，事先高、饶是否有预谋？张的发言究竟讲了些什么？厘清这些事实，对这次组工会议何以发生「讨

安伐刘」的问题，以及高岗、饶漱石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1会议重点：检查中组部工作

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以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为主题的。根据当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决策，刘少奇在会上的报告向全党提出，党现在的任务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¹并写进了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

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是以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党的干部工作而召开的。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关于审查干部问题；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以及关于干部培养训练问题。

毛泽东抓问题从来强调「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³¹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免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评继续搞新民主主义为右倾。11月，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再次批评「确保私有」，「四大自由」是资产阶级观念。重申：「要搞社会主义。」都是要使全党明确甚么是「纲」。

因此，搞新民主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也就不能不是这次组工会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会前明确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听取大区的意见。显然是要会议首先端正指导思想。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从召开预备会议起，就明确提出检查中组部的工作是毛泽东的指示，并一再动员各地代表认真准备对中组部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回忆说：

9月12日预备会议上，安子文同志提出主席指示，他个人也要求检查一下中央组织部工作，并要各地酝酿准备。会后，安子文同志曾个别问我：

张秀山带来甚么意见没有？……他要我打电话征求张秀山、陈伯村同志意见。

9月13日上午，少奇同志召集会议明确会议内容，并指出第一次组织会议是基本正确的，有某些不妥当的提法已纠正，或在此次会上加以改正。也谈到要检查工作问题。在这之后，我给张秀山同志写过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谈词干部及安子文同志要张秀山、陈伯村提供意见。

9月23日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表示，主席一再指示，对中组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都应坦诚提出，摆在桌子上，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安子文同志也再次着重说明要大区认真醒铍，准备对中组部的检查意见，并说到已告郭峰，征求张秀山、陈伯村同志意见。32

2张秀山何以到会发言

对本来不打算参加组工会议的张秀山，何以到会发言，张本人为澄清事实，专门写有详细经过。张回忆说：

31毛泽东：〈关于广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1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120。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打电话给我¹征求我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我在电话中对安说[^]郭峰去参加会议，有甚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我就不说甚么了。

安子文又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¹要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说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我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大概是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¹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峰和王鹤毒分别向我转远说：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33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10月10日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并指定东北局由张秀山与会。张临行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要张秀山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电报。张到京后，曾向安子文谈了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告饶漱石已向安谈过，就不到会发言了。饶漱石表示同意。但在10月13日晚'组工会议领导小组开会，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讲，张秀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领导小组决定让张在14日大会上发言。会后，饶漱石亲自到张秀山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当晚，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问张秀山，听说你要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讲些甚么？张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要谈的意见(将原来的八点概括为五点)向毛作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的思想方法问题。张问毛泽东，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拿到会上去讲？毛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34张在发言前曾向刘少奇请示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刘少奇说，就先讲吧。35就这样，张秀山被推上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台。

如前所述，张秀山事先准备了八点意见，向毛泽东汇报时概括成五点。后来被作为「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正是这五点意见：

一、1950年前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

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1950年1月，安子文作报告讲到党员雇工问题时说：

党员生产发展了，要雇人应允许。最近我在答复东北局的信中说：「这种党员应暂仍保留党籍的说法有毛病，是应该保留，而不是暂仍保留。」这点过去不明确，今后明确了。

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矛盾。不允许剥削，抽象原则是对的，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

允许剥削与应该剥削是两回事，应教育党员办厂雇用工人（即剥削），应该教育办厂的党员对工人应有正确的态度，得了利不要吃喝完了，要扩大再生产，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再交公。这样经过几年生产就发展起来了。

农村强调组织起来，党员生产情绪就不高。

33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页302。

应允许所有的人（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干雇工的自由。现在的变工互助不可能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段。

党员不干事，群众也不敢干。

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

张秀山认为，安子文讲话的精神是：党员不雇工，群众也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也就是说，农村党员可以当富农，城市党员可以办厂。这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而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心，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很冷淡。这种观点与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这是一种右倾思想。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这次会议后，各地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

三、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二中全会曾决定领导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这也是与上述右倾观点有关系的。因为有右倾思想，也就不会以二中全会决议去检查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结合得不好，甚至发生脱节的现象。

四、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

所以产生以上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央组织部对革命胜利后，投机分子、脱党、退党、叛党分子侵入革命队伍，没有足够的警惕，有时反而轻易地信任这些人。这就是说，有些敌我不分，或者是对敌我界限划分得不够严格，这也是右倾思想。

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张觉得也是有缺点的。这里讲的不是一般的主观性、片面性的问题，而只讲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纯，对党内问题的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的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是用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存在着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非不清，对外敌我不分或者叫做敌我界限模糊。36

张秀山发言后，刘少奇向张表示：「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张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37

这里需要交代的是，关于高岗对张秀山到组工会议上发言的态度。9月

末’高岗对张秀山转来给中组部提意见的信^①曾表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郭峰说：组工会议期间，「10月2日，去高岗处。当时，高岗正在准备去杭州休养。我把张秀山同志意见内容向他谈了一下，并提出有些已经改正的问题（如工人阶级问题……）似乎不应再提，我谈到安子文同志说将要张秀山同志来京参加组织会议时，他即把书面意见拿去翻阅，这时王鹤寿同志为了工业计划问题去谈，他即将张秀山的书面意见给王鹤寿看，并说秀山尽提些大问题。王鹤寿看后也提到有关纪律等问题、不应谈。于是，高岗即向我说，告诉秀山，他最好不谈，我看这次会议展不开，可用大区与会议同志名义谈，要把这些材料深刻加工，有把握的就说，没有把握的不说，不要乱扣帽子，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³⁸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页304—308。张秀山：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0(309)。

郭峰：〈关于我与张秀山同志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经过情况〉，
1954年4月25日。

2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①第二卷“——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五章高岗’饶漱石事件

295

直到张秀山在发言前的晚上，张秀山对将去杭州的赵德尊说：「你到杭

州见到高岗时，向他汇报一下，说我那几条意见给毛主席汇报了，主席同意我讲。」³⁹

可见，张秀山在组工会议上的发言，既非高岗事先与饶漱石的合谋，也非饶漱石与张秀山的合谋。

3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和会议决议

10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他把〈《#共（布）党史简明教粉结束语》印发到会人员阅读、研究。毛写道：

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¹已经有所了解。此事〈印发结束语〉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请告诉刘、饶及胡乔木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二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⁴⁰

联共（布）党史六条结束语的内容是：

（一）首先，党的历史教导说，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

³⁹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家：10，页304。赵德尊后来说：「我到上海，正碰上马洪休假在上海，共同参观了几个工厂[^]以后一起到杭州休假，自然都要去看望仍兼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到住处就吃饭，同桌的还，有华东局的谭震林。毛主席对张秀山的话[^]我也遵，向高岗传达了。按照党的组织观念，我不能不照样传达。也因此，我就成了高岗在东北的『五虎¹：将』之一。」赵德尊：《赵德尊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1, 页116。

40毛挥东：〈给杨尚昆的信〉〔1953年10月22日I, 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页371。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 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本阶级的领导者，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和领导者。

(三) 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四) 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担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和领导者，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

(五) 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六) 最后，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繫，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繫，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41

毛泽东特别提出要与会人员学习、研究这六条结束语意图何在？对照毛泽东批评薄一波「新税制」的错误，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是「在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右倾思想的表现；对照毛泽东支持张秀山在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上的发言，是否要人们着重领会：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就必须「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要能公开地老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改正这些错误呢？

10月23日，毛泽东分别在刘少奇和饶漱石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上各

加了一段话。在刘少奇讲话稿加的一段文字是：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此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且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42

在饶漱石的讲话稿上加的一段文字是：

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们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43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这就是1953年从财经会议、组工会议到此后的农村工作会议毛泽东的一贯指导思想。第二组工会议的进程，正是围绕这一指导思想进行的。

10月27日，刘少奇出席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并讲话。对中央组织部过去几年的工作，刘少奇认为：「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同时也指出了中组部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在谈到缺点错误时，刘少奇对会议提到的几个问题，如农业生产互助组、「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党员发展成富农如何处理等问题，比较系统地作了自我批评和情况说明，再次主动承担了责任。

对农业生产互助组问题，刘少奇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一个时候有过一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主观上的想法落后于客观上的可能和需要。一点是我认为农业生产集体化的时间要慢，一点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中间的过渡形式没有找到，所以我就以为互助组不能直接过渡到集

体农庄，而把互助组和集体农庄看成没有甚么联繫的两回事」，而这「不是毛主席的想法，毛主席的想法是农业生产的集体化要很快地搞，其形式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并对给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示和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作了自我批评。会议中提到的「半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指1951年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形成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草案〕〉中关于党的性质的一句话：「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从理论上讲，把「乡村半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确实很不妥当，但以前党的文件上也使用过。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决议草案沿用了这个提法。后来中央发觉这个问题，在当年12月23日发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中作了纠正。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明了情况，并承担了责任，说：「这件事情主要由我负责，应该放在我的账上，而不应该放在安子文同志或其它同志账上。」

在谈到党员发展成富农⁴⁴如何处理的问题时，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央组织部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经过我的。」他说明了就富农党员问题给东北局答复的过程和当时的想法、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同时也检讨说：「由于我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问题有一种不妥当的想法，所以在处理富农党员的问题上，可能在和个别同志谈话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应该说，所有说得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

刘少奇在讲话结束时，强调了开展批评，是为了增强团结。他说：

希望这一次到会的各地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同志到处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和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要巩固全党的团结⁴⁵是

赵家梁、张晓赛：《高岗在北京》，页157说⁴⁶关于富农党员的问题，高岗说毛主席有指示。说着叫机要秘书董文彬找来文件给郭峰看，其中有中央文件，也有毛主席的电报。主席开始说对发展富农党员要慎重，

后来的电报说不要发展富农党员。

要努力的，要做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讲了，全党过去是团结的，今天也是团结的，那么是不是高枕无忧了，就看不到缺点了，或者看到有些缺点而把它掩盖起来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们的缺点，要做工作
1要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 45

会议通过决议，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两项决议作了修改和补充。一是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决[^]〉中一句「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改为「中国人民革命是由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取得胜利的」。二是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时期。」三是对〈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作了补充规定，即规定在未经党中央批准，不得接受资本家、富农和其它剥削分子入党。 46

这无疑是为纠正上述刘少奇所检讨错误的一个正式结论。

四高岗的会外活动

关于高岗在这场「批薄射刘」风波中起的作用，薄一波说，在财经会议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同志『放炮』，进行不适当的责难」。 47 ， -

参加会议的张明远则认为：

关于财经会议期间的「批薄射刘」风波，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高岗一手策划的，是他篡党夺权阴谋的大暴露。

就我所知，在会议期间高岗确有一些活动对「批薄射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我认为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足以操纵会议的进程。实际上，真正引导批评薄一波并涉及到割少奇的，正是毛主席6月15日的那篇关于总路线的讲话。会议期间，毛主席也当众直言自己是批薄的后台。这年10月15日和11月4日，毛主席接见农村工作会议的同志时仍强调财经会议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批评是正确的。其中多次批评「四大自由，保护私有财产」等观点，认为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总路线问题。

我认为，高岗的错首吴并不在于他借批薄来批判，而在于他「跳得高」，可是，既然是毛主席的号召，谁能不跟着「跳」呢？48

高岗「跳得高」的表现，被后来列为「反党罪行」的主要有：（一）传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二）散布安子文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三）领头去看望在西山休养的林彪；（四）南方之行；（五）私自散布人事安排的意见。

1传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

据东北局领导成员张秀山、张明远说，高岗从中央开会回来，或在常委中间，或是几个人闲聊时候，就散播过一些中央内部的情况和言论，如：毛主席在一些问题上对刘少奇不满意，毛主席讲过，「七大」以后把刘少奇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刘少奇不够成熟，左右摇摆，掌握政策不稳、在不少政策问题上出了毛病。一是土改时平山会议「左」的错误；二是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和平民主新阶段到了，现在的中心任务已由战争转入和平，这是战略转变等等。高岗说，刘少奇的错误在东北引起了思想混乱，造成一些人对和平的幻想，而对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缺乏思想准备。说当时林彪有战略眼光，没有执行刘少奇的方针。中央准备在「八大」调整机构，高岗说毛主席和他交换意见时，说对刘少奇、

彭真不能让人放心；说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回来以后，毛主席一直没给他分配重要工作。将来政府采用议会制还是部长会议制？1953年上半年，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为一线、二线的问题，在中央少数人之间进行酝酿。毛对高岗说他讨厌接待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让少奇去当国家主席吧，他喜欢那一套。」

毛主席说刘少奇等人对他搞封锁，许多事不向他请示和反映，说北京黑暗，不如西藏光明。1953年5月，毛主席两次批评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并因此大发雷霆。高岗看见毛泽东大发脾气，深为震惊。他曾向东北局的同志谈及此事，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高岗说，自从把各大区的书记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内部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刘少奇、彭真、薄一波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蒙蔽毛主席了。现在除了周总理是中立态度，林老（林伯渠）和董老（董必武）因年老体衰不大管事之外，中央其它许多同志都对他们（指刘少奇等人）不满意。

高岗说过，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刘少奇对干部有私心，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濂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刘少奇支持他们。

毛泽东对高岗说的这些有关刘少奇和中央体制问题的意见，高岗不仅和东北局的人谈过，也和林彪、陈云等私下交换过看法，而且在不少高级干部中散布过，议论过中央调整机构及人事变动的问题。⁴⁹

王鹤寿、陶铸等也都谈到高岗与他们讲过对刘少奇的意见、如高岗说，他与刘少奇1949年7月访苏，刘少奇的报告很长，斯大林不愿听，很喜欢听他作报告。说斯大林不满意刘少奇，对他很重视。斯大林称他为「张作霖」，有问题总是问「张作霖」的意见怎样？高岗到北京后，说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发言甚少，主席甚么事都问他，现在真是忙不过来，而刘少奇又没有甚么工作，等等。

2散布安子文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

在财经会议期间，受人瞩目的会外活动，就是高岗散布一个「有薄无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对此事的前后经过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

3月初（指1953年^{引者注}），高岗向安子文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同他的谈话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同志未经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名单。政治局委员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写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凯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同志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安子文同志将这个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向饶漱石谈过。高岗又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名单准是刘少奇授意向他进行试探的。于是，他抓住这件事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而无林彪^{引者注}〕，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50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的说法与薄一波略有不同：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高岗找到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说毛主席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正式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又同饶漱石谈过。在高岗看来，安子文是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313。

到少奇的人，他认定这个名单是到少奇授意搞的，便到处散布政治局委

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德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大做文章，在党内进行挑拨。51

高岗秘书赵家梁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说高岗有意让安子文搞这个名单，又藉以攻击刘少奇，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真实情况是：

一九五三年四、五月间，安子文拟了一个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名单上有薄一波，没有林彪。一天中午，毛主席让他的机要秘书亲自给高岗送阅这个名单，并立即收回。往常，他遇事总会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告诉毛主席，但这次却没有。毛主席在中央的小会上严屎批评了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主席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外传泄密。

高岗认为，安子文没有那个胆量，敢撞自搞这个名单，那是刘少奇让搞的。高岗觉察到毛主席在这件事情上对刘少奇的不满。但是，他没有听从毛主席的交代，利用与一些干部个别交谈的机会，讲了这个名单问题，藉以攻击刘少奇。

十一月下旬，中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叶钊英、谭政从广州来京开会，问及毛主席「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很生气，在中央的小会上追问是谁泄露出去的？并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会上追查清楚。会议结束时，毛主席让高岗单独留下，问他：你看是谁泄露出去的？高岗依然不敢承认。他当面欺.骗毛主席，陷自己于被动境地。X

以上几种说法的共同点是，高岗确有散布「有薄无林」名单一事。不同点有二：一是名单的来历，薄一波和《毛传》都说安子文是从高岗口中得到毛泽东提出改组中央政治局的信息，才草拟名单的，随后送给高看过；赵家梁则说名单是由毛泽东传给高岗的，名单的由来与高无关。二是薄一波说，名单中「有薄无林」，是高岗「编造」的；《毛传》写的是高岗「散布」。这两处不同，都与问题的性质有关，尤其是后者，《毛传》的编者用「散布」而非「编造」这个词，显然是经过慎重推敲

的。

3 领头去看望在西山休养的林彪

林彪因为生病正在丙山休养，没有参加财经会议。一些大区负责人想去看望他，高岗便出面联络，并带领大家去了。据张明远说：后来得知，几个大区和一些部队的负责人去了不少。有一次我有事去高岗家，他不在，正好还有两个同志〔王鹤寿和陶铸^{^^}引者注〕在那里，我们就一边闲聊一边等待。他们说到去林彪那儿的情况，一位同志〔王鹤寿[^]引者注〕说：「林总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刘少奇这些白区的人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刘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说：「少奇在一些政策上有些错误，但不能说他一贯错误。」他（王鹤寿）说：「中央的情况……你不了解。」 53

53张明远：《我的回10，页381；赵家梁、张晓霁：《高岗在北京》，页135。对探望林彪一节，张明远回忆的未刊稿有更为详细的记述：我听王鹤寿说，他们去看望林总，谈了财经会议的情况，林总的水平很高，看问题深刻，对少奇的问题提得很尖锐，认为刘少奇在毛主席身边确实很危险。王鹤寿还说，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少奇在许多政策问题上把握不稳，「看来，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高体衰，少奇一贯不稳，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正确的，是可以信赖和拥护的……」我说，少奇的确在一些政策上有错误，但说他一贯不稳，我不赞成。王鹤寿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情况复杂得很……。我无心和他争论，不再说甚么。这次集体看望林彪[^]高岗事前事后是否向毛主席请示报告？我不知道。有人说这本来就是毛主席的意思，也有人说毛主席从这件事以后开始怀疑高岗背着搞地下活动。值得深思的是，无论在当时或是后来，都没有人提起这件事情。会议结束后，王鹤

寿对我说，这次会议只能开成这样，有些问题这次会议没有解决，薄一波受了批评，他们不会甘心，东北要更加谨慎，防止他们打击报复。几天后18月15日前后），高岗也对我说了类似的话。

这次活动，明显地表露出在对刘少奇的看法上，林彪与高岗是一致的。关于林彪尖锐地提出：「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的问题，毛泽东在此期间从不同角度，也提到过同样的问题。

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分别接见各大区负责人，东北局被接见的是高岗和张明远。对毛泽东当时的谈话，张明远的记忆是：

关于财经会议，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开的不错，大家有意见敢讲，但也有人反映，这次会议有人操纵，与中央唱龄台，有两个司令部。我批评了他们，这样讲不对。没有两个司令部，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情况都知道。」

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现在看来，全党思想是否一致，还需要做工作。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路线，行动才能保持一致。」

他重申此次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必要性之后说：「东北的工作有成绩，搞得不好，是因为东北的条件好，不能认为别的工作差。各大区各有各的成绩和缺点，不能认为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接着，他又说：「有人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谭震林对我讲，中央要警惕有人反对毛主席，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党权、政权、财权都在白区党的手上、而不在我手上〔『党&指中央组织部，长期由安子文负责；『政,指政法委员会，由彭真负责；『财权』指财经委员会，薄一波负责，他们都是原华北局的干部〕；说白区党有篡权的危险。我批评了谭震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党内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但要注意团结。没有甚么『白区党』、『苏区党』，也没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54

毛泽东在高岗、张明远面前以批评谭震林的口吻提出与林彪说的同一个问题「白区党」的人掌握着权力，是耐人寻味的。4南方之行

1953年10月3日到11月2日，高岗到南方休假，是「高饶事件」中又一个备受瞩目的重要活动。赵家梁在接受笔者访问时，详细地谈了高岗在上海、杭州、广州三地逗留活动的经过。关于高岗与林彪、陈正人、陶铸等人接触的情况，赵说：

10月8日高岗到杭州不久即去看望在此养病的林彪。他们上次见面是8月间在北京西山，那次去的人很多，谈得也很深。他这次顺便向林彪介绍了政治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两个会议情；兄。

24日上午‘梅行’马洪、杨英杰、张有萱、勇龙杜和我六人在割庄小楼上向高岗汇报。不一会儿‘陈正人’来了。他一进门就旁若无人、很兴奋地嚷嚷：「高主席呀！这下可好了！组织会议可热闹啦！把盖子揭开啦！」陈正人所说的「盖子揭开」，是指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安子文受批评，并联系到割少奇的情况，里面也夹杂着他自己的看法。他滔滔不绝地说，高岗偶尔插几句话主要是询问情况，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25日抵达广州，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高岗住的小楼在陶铸的西邹。他与陶铸很熟，交谈较多，其间自然会谈到刘少奇的问题。27日傍晚，在海军司令部礼堂晚宴，听说这次招待是叶剑英、谭政等同志安排的，他们都与高岗有所交谈。55

直接与高岗交往的几位，后来在检查中也都有交代。如：陈正人说：9月我去杭州休养。10月高岗到杭州来了，我见过他四次。第二次他来看我，他当时很有兴趣谈的是将来部长会议主席问题。他开始仍假装拥护林彪搞，问我的意见。我是主张主席兼任。他

高岗秘书赵家梁谈高岗问题，林蕴晖、沈志华访问赵家梁^^录，2005年2月2日。

说主席是不会搞的，以后就造出林彪不如高岗的谣言了。并说他和主席谈过，要林彪搞，主席不同意。他又吹嘘了自己一番，说他不能休养太久，因为主席要等他回去才能休息。

刘亚楼说：10月20日，高岗去广州前，我去看他，他正与陈正人谈话。大概说了少奇在土改、合作化、对资产阶级政策等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又说：有一天深夜他和主席谈将来部长会议主席人选问题，他在桌子上写了个林字，主席在桌子上写了个（…）字（我未听清）。

陶铸说：高岗到广州，住的时间不过三、四天，我们那时正开华南的党代表会议。在广州期间陪他参观了两个大学，在他参观虎门回来的晚上，找我谈了三个钟头的话（第二天他就要走），谈的话我认为他较系统的一套反党纲领：

…说目前全党要抓四箇工作，即集中力量搞重工业（这实际就是想以计委来领导一切），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实际想掌握军队），审查与调整干部（以此进行他的宗派政策），修党史。谈到干部问题时说，中央现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说主席对组织部工作很不满意，要张秀山到组工会议去讲话，说他不赞成李雪峰任组织部副部长，而提陈正人任组织部副部长。在说到修党史时，主要是诬蔑少奇，造谣说有人认为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少奇同志领导的，这种二元论的看法，他要坚决反对。

0继续诬蔑少奇有宗派。我不同意。他最后说并加手势：「你不信杀我的头」。

部长会议主席问题。高岗捏造中央要把政务院改为部长会议，并问我你们下面看法以为谁搞最适当，我当时反问：是否一定要变为部长会议那样的形式？如果一定要那样，最好主席兼。他说主席不愿兼，你看林彪搞怎样？我说：我个人赞成。我又反问中央与主席的意见如何？他说主席不同意。我说既是这样那就不好提，也不能提。他说：大家多向主席

讲不好吗？

以上表明，高岗这次南方之行，接触的主要人物还是林彪、陈正人、陶铸等人，要说反对刘少奇的话，大体上也超不出财经会议期间议论过的问题。这在高岗关于党史和八大的谈话中可以得到证实。⁵私自散布人事安排的意见

赵家梁说：值得提到的是，在去广州的专列上，高岗与我和梅行两人多次聊天，内容广泛。现在回想起来，他是有意让我们领会他的思想、看法和打算。归纳起来，他讲的主要内容是：一、明年的工作；二、党史问题；三、八大代表问题；四、老党员培训问题。他只讲自己的意见，没有谈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

关于1954年的工作，主要抓四项，一是经济建设，二是编写党史，三是八大代表，四是宪法、人大。他说这是别人提出来的，他觉得不错，是为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

高岗认为，准备八大的一个大问题，是要搞出一个完整的党史稿子。我们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说，是个艰难曲折的、然而胜利光辉的历程。苏联党曾经搞过几次党史，最后写了个简明教程。我们应该写出个象样的、反映实际的党史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⁵⁶是个片段，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我们的党史内容，肯定要比苏联的更丰富。不过牵涉到各个方面、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要写好它，不容易。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对统一党的思想、教育全党、全国人民，都是头等大事。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抗战前的历史，不能分切成两大块，一块是根据地的，一块是白区的。实际上，白区的部分在全党来说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和根据地对等起来提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地的党史，过去只讲南方的，不讲北方的，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一讲革命，就好像只有南方，北方只是「痞子」、「流寇」〔说到这儿，他有些愤愤不平〕。至于白区和根据地的党，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扯皮促退的一面。当年北方局先派郭洪涛，后来又派朱理治到陕北的历史情况，大家都知道，把陕北根据地搞得一塌糊涂。要不是党中央、毛

主席及时赶到，及时抢救，陕北革命根据地险些儿被断送掉(他自己也差点被活埋)！当时陕北革命，名义上是北方局在领导，实际上北方局只搞它的城市白区工作，没有搞根据地工作。相反的，

3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一。”！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对根据地是有害而无利。上海的中央，主要是搞白区的工作，对江西苏区也是害多利少。这个历史，没有认真总结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党的历史，实际上主要是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或者说，应该以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为主线；白区工作有作用，有成绩，但也不大，不能与根据地相提并论。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史。南方是这样，北方也是这样。

关于党的八大代表问题，不能像七大时那样。七大时，毛主席照顾各个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压了下来，当时只选了林彪一个，其余像邓华、萧华、刘亚楼他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师凑，很难得的人才，毛主席有意让别人上去，把他们压下来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这次八大，应该从实际出发，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上去。现在全国统一了，再以照顾山头为主，那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应该以全国通盘考虑为主，适当照顾山头。

高岗还历数了各省的省委书记，说他们各有千秋。毛主席从各省的工作实绩来考察，认为比较「鼓」出来的有这么几个：广东的陶铸、山东的向明、河南的张玺、山西的赖若愚。他说，在东北的几个省委书记中，比较能干的、「鼓」出来的是赵德尊和郭峰，尽管有的书记比他们资格老、年龄大。中央各部的部长中间，也有这个问题。主要是要从工作实绩来考核，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要通盘考虑。

高岗认为，对老党员的培训问题十分必要。他讲了陕北农民领袖崔田夫的轶事。抗战前，崔田夫到北京，北方局安排他住在旅馆里。第二天早上起来，茶房送来一杯水，一把小刷刷，一小管「糊糊」。崔田夫心想，

那管「糊糊」大概是早点，小刷刷做啥用？猜不透。他把「糊糊」挤出来，咽下肚，凉凉的，有点甜，不好吃，又把水喝下。他觉得城里人真怪，这么一点东西，咋能填饱肚子？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给他刷牙漱口用的。可是他从未见过，从未用过，也没人跟他说过。崔田夫从北京回到陕北，就跟大家说这件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还说，北京可怪啦，房子在马路上走，走得可快哩。大家都十分惊讶。原来，当时北京的有轨电车，农村人不曾见过这「怪物」，自然也不认得它，以为是房子在跑。高岗一边讲，大家一边跟着笑，又都感到这里面包含着一个严重的老干部的培训问题。第五章高岗，^漱石事件509

高岗又说：我们农村党员占很大比敢，老干部也还有不少缺乏文化、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和现代生活习惯。这种情况很不适应解放以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学不行。卿，東北工业部部6「鹤港从鞍山回来讲三大工程建设，讲轧钢机的地脚螺丝，一两吨重的东西，上-下对孔，摆正水平，不能有分毫差距。我们从未听说过，新鲜得很。到中央开会时给大家一讲，都没听过、没见过。新东西，该学的多着呢。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学，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建设知识也要学。但不提高文化，甚么也学不成。如果只满足于批批点点，浮在面上，那不行，要掉队，要误事！

高岗还讲了他对二些中央同志的看法，讲得比较多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他说：七大时，实际匕确定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但后来，毛主席对少奇感到失望，不满意。尤其是这几年，少奇没有帮主席甚么，没有做甚么工作。而且不少意见与主席不「合拍」，毛主席深感少奇不是个好帮手。中央也有不少同志有这个意见。少奇不那么稳。「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他提出来的。土改时，中央工委的决定有「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富农可以入党的问题，东北顶了他。农业合作化，对山西的批示是右倾表现；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来套。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总之，「左」右摇摆，很不稳。要不是毛主席领导

掌舵，而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险的。有些理论性的东西，回北京以后，再好好琢磨琢磨。在干部问题上，少奇有摊摊，主要是原来华北的那些干部安插在各个方面，乘八大之机，肯定要安排他的人。不是从全局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这是很危险的。

高岗在讲主席对少奇不那么满意时，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是直接听毛主席讲的，有一种深为忧虑的心情。显然，他所谈的这些问题，都是他经过长时间思考的，很可能也对林彪、陶铸等人谈过，并且征求过他们的意见。57

关于八大选中央委员的问题，高岗与王鹤寿、陶铸、陈正人、刘亚楼等也都谈过。高还对他们说，主席说，中国的马林科夫〔060！〃〃〃〃（）还未定，要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51^6111110。58

高岗这一席谈话，可以说是财经会议「批薄射刘」和组工会议「讨安伐刘」意图的总概括。它集中反映的是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苏区党」和「白区党」的权力要重新分配。

由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革命走的是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成员，基本上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并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因而，大多数缺少文化和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而长期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坚持斗争的干部，则不少是知识分子，他们对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了解，比长期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干部相对要熟悉得多，因而在建国初期很自然地在政府机关占据了更多的领导岗位。

从建国的指导思想来看，农民出身的干部，更多地反映出还不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他们惧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出现两极分化，希望在小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化迅速走向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即先为毛泽东、后为刘少奇批评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59而另一部分对城市、对现代社会和经济了解比较多的干部，则比较冷静地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太赞成采用急进的方式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改造，主张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和发展，然后再

逐步对社会和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两种素质和思维不同的分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1950年代初期，中共高层第一次权力角逐的深层原因。

五毛泽东决定端出高岗¹权衡利弊，强调，结

1953年12月，毛泽东将去南方休假，于是向中央有关成员提出酝酿他外出期间，由谁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的人选。

早在中共七大之后的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就曾委托由刘少奇代理主持。1947年撤离延安之前，中共中央分成两路：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亲自率领；另一路由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率领。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也由刘少奇代理主持。因此，如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就不需要大家再作酝酿，现在毛泽东提出要大家酝酿，显然有他的考虑。

1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彭德怀、高岗、邓小平、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会议。毛泽东说：「今天的会只有一个议题，我要到外边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同志主持，还是由书记处几个同志轮流主持，大家意见如何啊？」

周恩来首先表态：「按照过去的惯例，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都是少奇同志主持工作，这次当然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嘛！」

刘少奇说：「不妥，不妥！我看还是轮流好些。」

高岗马上表示：「我赞成轮流，轮流好些。」

邓小平、陈云赞成由刘少奇主持；朱德、林伯渠、饶漱石等人表示轮流好。

3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化53—[^]55）——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五章高岗' 饶漱石事件

彭德怀也表示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彭说：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60

毛泽东见一时难以统一意见，便说：「此事今天不作结论，以后再议！」高岗从会议室出来，在去停车场的路上，和邓小平边走边谈，高岗说：「少奇政治上不稳，不宜主持中央的工作，还是轮流好。」邓小平说：「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应该由少奇主持。」当时高岗没有回东交民巷的家，而是去了陈云处，对陈云在会上没有支持他的意见，发了脾气。61

以上表明，要把刘少奇从第二把手的地位挪动一下，在中共高层一时还难以得到认同。对此后毛泽东与有关领导人的互动，史料有如下记载：12月17日，「下午五点'〔陈云〕同邓小平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至晚八点，毛泽东请周恩来前来一起谈话。」12月18日，「晚，〔陈云〕同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62陈云后来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讨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高岗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件事情是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63事隔多年以后，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

60彭德怀自述'附录二：关于高饶联盟问题'未刊稿。61赵家梁，张晓赛：《高岗在北京》，页184。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191。

63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3月28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1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885。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陈云向毛泽东汇报高岗问题的内容，似乎还有更多。据卫鹤寿说：1953年12月，高岗问他：你是不是到上海检查工作？高说：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你如能到上海检查工作，就从那里到杭州林总（指林彪，引者注）处讲讲这个情形，希望他能和主席讲一讲。王鹤寿说，我听后大吃一惊，回答说，我不能去，林总如有甚么意见林总会讲的，我不应到杭州讲这件事。后来高说，那我就写封信去吧。我说，这件事既不应去讲，也不应该写信。他随后说，那就考虑考虑再说吧。我知道此事后，确实感到他的行为太超出了范围。因而就将此事报告了陈云同志。

毛泽东何以这时下决心把高岗端出来，显然是经过反复权衡的。在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高岗在私下进行串连活动之前，为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先期由广州到京的叶剑英、谭政拜见毛泽东时，曾问及高岗散播的「有薄无林」的中央政治局

64邓小平：谢起草烂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断的意！（1980年3月—1981年6月）、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93。赵家梁、张晓赛：《高岗在北京》，页114—116谈到高岗与陈云的关系时写道，1953年春夏，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自己年纪大

了，身体也不好，「万一我不在了，怎么办？」这话，他对高岗说过，也对其它人说过。这次，高岗也赶紧把毛泽东的担忧及自己对设总书记等问题的看法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拍一下大腿：「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陈云的说法是，高岗为了拉拢他，对他「封官许愿」讲了「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之类的话。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偈垫背的」。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已死无对证了。

名单是怎么一回事。对此，《高岗在北京》一书的作者写道：

（当时引者主）毛泽东非常惊讶，也很生气：你们从哪里知道的？后在中央的小会上，毛主席追查此事，没有人承认。毛泽东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小会上查清楚！」高岗心里明白，是他在广州时泄露出去的。但是，他没想到毛泽东会如此重视、如此生气，所以他不敢承认。这更激怒了毛泽东、为有人对他阳奉阴违，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把高岗单独留下，强压怒火，和颜悦色地笑问：「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高岗很紧张，还是没有勇气当面认错，只含糊地说：「饶漱石？恐怕不会吧？」其实，毛泽东心如明镜，而高岗一错再错，并且一次又一次失去认错、改错的机会，使自己愈来愈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毛泽东如此重视这件事，不仅是因为高岗不听招呼，违犯了纪律，他怀疑高岗还背着他散播了别的言论，怀疑他到广州与某些军界人物进行了「串连」。而高岗的吞吞吐吐，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也更令他气恼。65

当党内高层把高岗的这些活动一一摆到毛泽东的面前，就使高岗在党内处于极大的被动地位。即触犯了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属非组织活动，在党内是犯了大忌。而刘少奇，从财经会议到组工会议，一直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公开检讨，显得光明磊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若不对高岗加以处置，就把自己推到了「倒刘」的前台。而要「倒刘」，又明显不会

为党内的多数接受。于是，毛泽东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据《毛泽东传》披露：

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以来，毛泽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工作。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二十日，与彭德怀、冼伯承、陈毅、贺龙、叶钊英五人谈话：与冼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

65赵家梁、张晔II：《高岗在北京》，页121。

怀谈话。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冼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66

期间，毛泽东派陈云沿高岗南方之行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接触过的干部打招呼。据《陈云年谱》记载：12月19日晚，陈云「受毛泽东委托，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

「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67「在杭州，陈云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嘱咐的话，并把高岗如何利用四野旗帜、如何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等问题告诉了林彪。林彪答复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指陈云）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彪又问陈云：『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云说：『我不配，不要当。』林彪说：『那末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岗可能自杀。』陈云立刻回到上海把他同林彪谈话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问陈云：

『难道副主席只要刘少奇一个？不要恩来？』陈云说：『我当时理解林彪说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的意思，是林彪自己不想当副主席。』1954年1月9日，陈云由武汉返回北京。」68

在经过上述一系列准备后，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

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毛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69毛的这一句话，就把高岗打入了另册。

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会议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70

2 召开四中全会的方针

毛泽东最初建议中央作一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的时候，并未提出召开中央全会的事。所以，刘少奇主持起草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并经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以后，就等着毛泽东最后审定；然后以中央正式文件下达了。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给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71

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72

1月8日晨三时，毛又另写一封信给刘少奇个人，内称：

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73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交杨尚昆带回的信以后，于1月12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商议召开四中全会的有关问题，决定将经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后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讨论。据此，刘少奇于15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通知〉说：

根据中央政治局1954年1月12日的决议，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为：一、审查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问题；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74

70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页280—281。

71指跟随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宪法的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毛泽东在此处特意写明林彪的态度，表明高岗已被孤立。

72毛泽东：〈关于建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给刘少奇等的信〉（1954年1月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页432—433。7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页434。

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318。

1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通知〉今日已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1月20日可送交主席。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刘的信。高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对此，毛泽东1月22日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毛向刘说：「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代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重申：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75

毛还专门交代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覆信了。」值得指出的是，为在四中全会上平衡两种力量，毛泽东在1月7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写信建议召开四中全会的同日，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刘也在全会』：作自我批评。毛泽东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毛交代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76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准备向四中全会作工作报告的同时，对自己在全会上要作的自我批评也进行了认真准备。1月16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除说明四中全会的开会通知已经发出外，对这两项准备工作的情况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刘说：

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1月20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甚么不好，如何？请主^指示。77

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主要是正面强调党的团结，欢迎犯错误的同志作自我批评，而不开展批评的方针；以及毛泽东交代与高岗谈话的任务，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3日，又约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了话。向高、饶二人，阐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希望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向全会作彻底交代和深刻检讨。78

在此期间，刘少奇再次对四中全会的各项文件进行修改，于1月下旬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程赴杭州送毛泽东定夺。1月27日，毛泽东对四中全会有关各项事宜最后拍板。他在当日写给刘少奇及书记处的信中

说：「关于文件修改及我的一些意见，请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79
1月29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杨尚昆介绍毛泽东对召开四中全会的意见，以及对刘少奇在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这样，召开全会的各项准备全部就绪。中央书记处决定四中全会于2月6日举行。

75毛泽东：〈关于高岗来信和七届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11954年1月2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页440。7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节，第四册^页433。

【

整个看来，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方针是，各打五十大板：以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批评高岗、饶漱石，主要是高岗在组织上的错误；讓刘少奇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检讨政治上的错误。以说明，高岗、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工会议以外的非组织活动是错误的，但他们攻击刘少奇政治上犯有错误本身并不错。

3四中全会概况和决议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52人。全会公报说：「毛泽东同志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全会。」80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刘少奇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三

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三、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

在谈到增强党的团结问题时，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并根据他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现在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¹

刘少奇指出：现在专门提出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中央政治局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考虑到目前党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才认为有向全党着重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极大的必要。」

这就是，在国内人民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包围。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步骤来逐步地消灭剥削制度，消灭依靠剥削制度生存的剥削阶

级。这是一场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将被消灭的和已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帝国主^人相勾结，共同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而这些敌人的破坏活动的首要目标，就是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团结。「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否认阶级斗争的事实和阶级斗争必然会在我们党内找到某种反映的事实，而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否认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在我们党内找到代理人。」事实上，

联共党内有过托洛斯基（「！！了！」⁰¹分子、季诺维也夫（（[；]！13.21讲；^{分子}和布哈林（“^{。^1.811^31-111^分子}，还有过像贝利亚11.^1111? . 这样的人；我们党内有过陈独秀和张国帘。

刘说：「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分裂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除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但是，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刘少奇最后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为此必须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他强调：「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曾经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嗅觉，『对于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这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⁸¹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在全会上作了发言，从不同角度不指名地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批评，希望他们检讨错误，悔过自新。朱德发言说：党内要大大提倡团结。历史一再证明，当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团结一致的时候，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就能充分地得到发挥，革命事业就大大地向前发展；反之，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就削弱，革命事业的发展就受到损失，受到挫折，以至于失败。我们应当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指示下，提高阶级觉悟，清除那些不健康的现象，增强党的团结。

他还指出，目前不利于党内团结的是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个人主义、

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计较个人的地位荣誉，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以功臣自居，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接受批评监督，甚至产生一种极端危险的思想，认为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政权是军队建立的。这种完全错误的思想如果不受到坚决的制止，任其存在和发展下去，就可能走到破坏党的团结的地步，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他强调说：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82

81刘少奇：〈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1954年2月6日〕，载《中共党史

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册，页256—260。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647—648。

周恩来发言说：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质量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

周指出：我们所反对是那种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中央威信的言论和行动，我们并不反对干部中间进行有关增强党的团结和提高中央威信的意见的媾酿和交换。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言论和行动，正是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今后，特别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党的团结。这样，就可以避免给个人主义野心家以利用和挑拨的机会。周强调：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83

陈云的发言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

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兼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甚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兼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妨碍党的团结，不幸发生党的分裂这样一种危险，如果我们不严格地防止它，那并不是不可能的。

原来设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兼之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愈做愈大，味道也愈来愈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

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51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

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末，出了李国蕉、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甚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们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陈最后强调说：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千万不要「伤风」。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保证。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

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84

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四中全会和全会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同时，也是对我们全党同志，主要是对我们高级干部的最大帮助。它是一副消毒剂。邓说，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全党高级干部都来照照镜子、洗洗脸是很必要的。85

2月10日，是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说：多年来，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尽力去完成中央托付给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中表现了一些缺点并犯了一些错误，我想利用中央全会这个机会，来加以检讨，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说明。接着他就：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关于1951年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决议中，对工人阶级领导的解释有所不当以及关于党员发展成富农如何处理的问题；关于全国总工会李立三的错误问题；1949年6月，对主张供销合作社赢利实行分红的批评问题；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老区土改中发生的左倾错误问题；1943年延安审查干部工作中的错误问题；1946年2月1日，中央在一个指示中对时局的发展，有过「和平民主阶段」的估计问题；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的问题等八个问题中自己的缺点、错误作了检讨和说明。

全会经过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说：

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

阶级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对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86

84陈云：〈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1954年2月10日），载《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页230—234。85邓小平：〈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1954年2月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01—208。

〈决议〉定下的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的基调，对事情的发展和后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4毛泽东缘何缺席四中全会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会议公报称：「毛泽东同志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全会。」

毛泽东以休假的名义没有出席中央全会，这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其真实原因何在？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记录了1954年1月28日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含蓄地表露出一些难以言明的隐情。现全文照录如下：

1月28日

山文件政治局基本通过，各中央局一人，军委副主席，来电和信印发全

会各同志。

组一委员会雾查意见，作若干修改[^]交政治局[^]不要冲淡了中心。

凯（丰）、杨〔尚昆）、小平。

不一定所有意见都加上，要加了有益。

可成为另外决议。

修改经过，由杨给以说明。

0文件应交XX(俄文[^]金)，报告、决议（登党刊）。

自我批评’交？登？

请考虑。准备登、交，在必要时。

对尤金是否说内容？说就要泄密。

[^]……〕会后考虑，书记处或说，或不说，或另一次说1同我们党是息息相关的。看情况急否，即三种可能情；兄。「冲」：

1几位主要同志不衡，可保证。

2到会人不衡[^]事先招呼好[^]这可以。

3他（指高岗）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

4他攻到，自己拉开，牵涉多人（可能不大，但准备着），则会期拉长，开小会，报告主席，甚至需主回处理。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谈话的方针：听他说，避免「对质」。按决议精神「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

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

全会方针：

照主指示，只作正面说明I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

「无改悔之心1有蒙混之意」[^]陈毅）。

19日，信送来，交割（少奇），到约周〔恩来）、陈（云）、小（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谈话。四个方案：

1、去杭 不好处理。

2、主回[^]”也不好处理。

3、由主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4、主指定刘、周与谈，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具体提议：如主同意第一方法，则请回高，并告到周：来信已转，不必来’委托甚么人谈。招呼一一可以不发生问题。准备有人衡，可以避免。攻势“^^也不要紧，力求避免主回。

0会议3天为好，必要4天，看情;; 兄。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救」。

争取：逐步改变，改变环境，决议^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薄〔一波）亦要作批评（财经错^）。

林概应讲。

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分配人帮助。对林，由陈（云）、李I富春）：薄’小平帮助。

他力免不冲，自己是不愿扩大的，如向彭真攻，让其攻下去’也可以过去。自己避开’说不清楚。扩大’开小会；请主回’极力避免。

其目的在过关。

小平可以参加。87

从毛泽东与杨尚昆的谈话内容看，涉及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对高岗要来杭州与毛面商一事如何响应，谈话提出了四个应对方案。即：1、讓高岗来杭州，不好处理；2、毛泽东回北京，也不好处理；3、由毛泽东指定书记处与高岗谈话；4、具体指定刘少奇、周恩来与高岗谈，邓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最后毛同意，由杨尚昆回复高岗，来信已转，不必来，毛已委托甚么人与之谈话。并告诉刘少奇、周恩来。

二是与高岗谈话的方针：听高岗自己说，避免「对质」；按决议精神，只作「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检讨一

次不好，可作二次，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

三是对高岗或与会人员是否会在四中全会上「冲」（发动攻击）作了预测：1、几位主要同志（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不冲，可保证；2、到会人，事先招呼好，可以不冲；3、高岗攻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4、高岗攻击刘少奇，他自己把问题扯开，牵涉很多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准备着），这样会期就得拉长，或开小会，甚至需要毛泽东亲自回京处理。应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四是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只作正面说明，会上说话的人不要太多，会议开三天为好，必要四天，看情况而定。会上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的目的在于「过关」。先给大家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目的。方针是：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争取高岗逐步改变，决议通过后环境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达到「和平会议」，极力避免毛泽东回京处理。可见，毛泽东缺席七届四中全会是有原因的。

5两个座谈会的揭发批判

尽管四中全会决议，把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但终究没有撕破脸皮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所以，总体上还算是一次「和平会议」。然而，全会闭幕以后，事情出现突变，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面对面地核实他们「分裂党」的有关事实。由此，「高饶事件」急转直下，形成了无法挽回的死局。

高岗问题座谈会于1954年2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高岗在15日的会上作了检讨，共有四十三人在会上发言。16日，周恩来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陈云发言，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陈说：

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当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88

陈云的发言，使高岗绝望。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7日〕，高岗在住处自杀〔未遂〕。17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

87杨尚昆：《杨尚昆日^’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100—103。

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本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2月25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他说：

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1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圃失陂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说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因而：（一）认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二）企图以

这种荒谬理论来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并准备八大代表团，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资料；同时，又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高岗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有宗派，实际是掩盖着自己的宗派活动；以便打击中央领导同志，使自己获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高岗伪造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所谓「名单」有某无某，污蔑中央领导同志不赞成某同志担任中央某部工作，不支持某同志在某省工作中的正确领导等等，以挑起党内的不和。他利用某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的个人意见，制造各种流言，广为挑拨。……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央请示，就与个别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指刘少奇、周恩来^{引者注}），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是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和护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活动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周恩来指出，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来看，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和国家。

周进而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的思想 and 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由此，周恩来得出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他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89

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修改过的。毛在1954年2月28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的信中说：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远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毛泽东同意加上的文字是：

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二步地变成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

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由把四中全会开成一个「和平会议」，到把高岗问题的性质定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到转向面对面地揭发对证，毛泽东何以作出如此重大的改变，目前无据可考，实为一大疑案。

中央政治局于3月1日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要〉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

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举行的同时，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陈、谭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二十六人。主要是对证了饶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的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发言。

邓-陈、谭给中央的报告说，座谈会研究了1953年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期间破坏中央领导威信和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在这个期间中，饶漱石的活动完全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极阴险的野心家，并且在实际上与高岗形成反党的联盟。」

报告指出，1953年2月饶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权位的目的，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他和高岗同时利用安子文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机构成员的个人意见，捏造和宣扬某某等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某一中央领导同志则是这个宗派或「圈圈」的支持者。饶向别人说，财经会议已经斗了这个「圈圈」中的薄一波，在财经会议后将斗争这个「圈圈」的另一个人。这就证明他和高岗一起企图在党内制造混乱和分裂。就在财经会议还未结束时，饶不经中央任何人预先知道和同意，毫无理由地制造各种借口，在中央组织部内部发动对安子文的斗争。因为在他看来安子文就是他们认为所谓「圈圈」中的分子。饶发动这个斗争，一方面是采取蛮横办法以达到征服和排挤安子文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以此来表示自己以最积极的行动，支持和参加高岗分裂

党和夺取国家最高权位的斗争。

联繫饶历史上多次在党内争权夺位的错误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代。91

89〈周恩来同志在辟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54年2月）’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册，页267—269。90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和修改〉（1954年2月2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页452。

六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1954年2月，中共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虽说没有像以后的党内斗争引起那么广泛的株连，事实上也有株连的问题。东北局高干会上报中共中央的「五虎上将」一案，就是典型一例。所谓高岗在东北局的「五虎上将」，指的是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五人。张秀山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明远为第三副书记，赵德尊为东北局委员、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长，马洪原为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秘书长），郭峰为东北局委员、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1953年11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未到职〕。有关此案，除1955年毛泽东、邓小平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谈及外，其具体详情均未有披露。

1周恩来指示会议重点

在高岗问题、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与东北局来京参加

高岗问题座谈会的林枫（东北局第一副书记）、张秀山、张明远三人谈话，对如何开好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了指示。

周恩来指示的要点是：

对高岗的揭发必须彻底，要有集中的、历史的认识。要打破高岗「一贯正确」，「政治上对、组织上错」，「东北正确，到北京不好」的观

、，
高岗的错误与东北局每个人的错误要区别开。会议重点在揭发高岗，联接自己作检讨。对高岗要深挖毒瘤，这样会伤害大家一些健康的肌虯，要正确对待；

东北局所负责任与中央不同，中央是失察。中央失察与东北局责任不同。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犯有原则性错误。个人检讨要深挖，陷下去的要拔出来，陷下去的不要有顾虑，不要计较有人责备。

东北不少干部受高岗影响。但好处是有朝气，中央可以多说好的方面，对干部要使他们了解社会存在黑暗面，党存在黑暗面和缺点，警惕性、经验不够。他们历史经验不足，要使他们知道个人主义发展、就成小集，习气。要鼓励他们开展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认清其罪恶，鼓舞大家。分清东北局的责任、个人责任，启发大家，强调团结。92

1954年3月26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沈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517人，列席的有170人。会议由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主持，会议领导小组由东北局委员和省、市委书记组成。原东北局秘书长马洪、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安志文作为高岗事件的知情人，也来沈阳参加会议。

周恩来亲自到会，在会上作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报告。周恩来详细介绍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同时指出，东北解放以来，东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包括东北局〕，基本上是遵照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进行工作的。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周恩来还指出：东北局过去基本执行了中央的干部政策，不能因为高岗

的问题，就说过去提拔的干部都提错了，也不能说过去处分的干部都处分错了。对于过去分配和使用干部不适当或错误的，应作具体研究和具体处理。对于在高岗问题上犯了错误的同志，以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都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彻底揭发和批判这些同志的错误，分析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只要犯错误的同志，以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能够和高岗划清界限，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能彻底改正就要欢迎，并要给以诚恳的帮助。在检查和肃清高岗的影响时，必须注意区别哪些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哪些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为，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和党内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区别破坏党的非法活动和一般性的自由主义。

周恩来因有外事任务，在沈阳停留了两天随即返回北京。此后，会议由林枫主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2批出了一个「反党集团」

高干会在揭发批判高岗的同时，张秀山、张明远等东北局负责人先后在会上作了检查，听取大家批评。

在中共党内斗争中，自1937年批判张国蕙及此后的延安整风，总有一些人为表现自己更加革命、与犯有错误的人划清界限，就会站出来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罗织罪名，打击别人。这次东北局高干会也不例外。就在张秀山、张明远接受批评的过程当中，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桓在发言中说，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为高岗亲信，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五人是高岗的「五虎上将」。93于是在会上引起森动，纷纷抓住不放。

如果说，周桓的发言只是一种个人行为，那末，罗瑞卿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在会上的发言、林枫作为会议主要主持人作的会议总结，其份量就不同一般了。

罗瑞卿在发言中首先认定：「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

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是长期的、有计划的」。其根据是，「高岗的这种活动至迟是在1949年就开始的，到现在的时间有五年之久。开始还是在小范围活动，以后逐渐扩大……。他们活动的口号，或者叫做活动纲领，一方面强调陈北特则、陈北先、『东北一贯正翻。所谓陈北特网、『东北先进论』、和陈北一贯正确论』，实际上是要拿来和中央竞争领导地位，把东北地区 and 中央对立起来。」接着，罗断言：「高岗反党反中央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这样，顺理成章地就引出东北局内有一个高岗的反党宗派集团。罗瑞卿点名说：「正如会议许多同志所指出的，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他的主要领导成份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等同志参加了以高岗为首领导核心的反党小集团，他们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⁹⁴ 林枫在发言中指出，会议「进一步揭发了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蓄谋已久，其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早已积极进行」；「会议也揭发了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实际上积极参加和支持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罪恶的派别活动」。林枫说：「在高岗离开东北以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然后表示：「这些同志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罗瑞卿同志已在发言中作了详细的分析，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⁹⁵

4月24日，会议通过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

〈决议〉正式肯定：「根据同志们揭露的事实，证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为了达到他们的卑鄙的个人目的，不顾党的纪律，在不同程度上与不同范围内追随高岗污蔑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中央威信，挑拨党内是非，制造党内不和，实行派别性干部政策，因而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这些同志一方面在高岗的指使和支持下，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后，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

据此，会议向中央作出如下〈建议〉：

东北局转报中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它党内职务。

4月25日，东北局向中央上报了上述〈决议〉和〈建。5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和〈建议〉，并下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志愿军并转军以上党委和中央各部委，中央

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中共中央转发，1954年5月4日。林彪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中共中央转发，1954年5月4日。

人民政府各党组。中央指出：「〈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三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它党内职务问题向中央的建，已经由4月28日政治局会议批准。现将东北局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及上述两个文件和林彪同志、罗瑞卿同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发言一并给你们。」这样，「五虎上将」冤案就此铸成。

七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

1 全国党代表会议的结论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62人，全国党组织选出的代表257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并作结论，陈云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一百人。

邓小平的〈报告〉首先指出，过渡时期是「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

「城乡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性质的，有的是经济性质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无论是外国帝国主义或者是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知道要进攻中国人民，最厉害的办法莫如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要利用共产党内最不坚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经过他们来分裂我们党、腐蚀和瓦解我们党，以便最顺利地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报告〉结论说：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发生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中，当然不是偶然的。」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用以达到这个方法的是进行阴谋活动。这就是这个反党联盟的最主要的标志和纲领。」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表明，他们已经远不是一时地和在个别问题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既然适应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企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报告〉还断言，高岗在东北局「组成一个反党的宗派」。「在高岗指挥下积极参加高岗的反党活动的有原中央东北局干部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积极支持高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则被定为饶漱石的「追随者」。96

对高岗、饶漱石有没有一个「反党联盟」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

以下述理由作了解释，他说：

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甚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97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

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1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甚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甚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训

毛还说：

如果说，没有文字协议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议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1.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议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99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

联盟的决议》。指出：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郑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

98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结论1) 〔1955年3月31日〕、载《毛泽东

文集》第六卷，页397—398。9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结论1) 〔1955年3月3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398。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 101

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2高岗之死与毛泽东的感叹

据高岗秘书、时任「管教小组」组长的赵家梁回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高岗看了以后，反复申诉他不同意的内容，主要是：没有「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位」、没有「反周」、没有搞「军党论」，与洋人的关系也没有「挑拨离间」、「里通外国」。「散布和夸大刘少奇的缺点、错误」是有的，但不是「有计划」和「利用各种机会」，也不是「寻找矛盾」，「今天反这，明天反那」。特别是对于说他「有野心」、「搞分裂」、「阴谋篡党夺权」，他一直不服、不承认。4月

29日，高岗向中央写了〈我的反省〉。但交上去两个多月，中央没有来人跟他谈话，也没有任何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高岗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心情愈来愈焦躁不安。102

高岗曾于1953年7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事件的通报，深知「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和「人民公敌」等结论的严重性。因此，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东交民巷8号住所吞服大量安眠药〔速可眠胶囊〕，自杀身亡。

对于高岗的死，毛泽东是很有感慨的。1959年8月16日，他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讲话中曾带有一种自贵的心情说道：

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103

毛泽东对高岗自杀在公开场合进行自责，显然是不无原因的。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谈到高岗问题时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也确实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辫子。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例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天津讲话还是有缺点错误。最近报刊上好几篇文章都说，天津讲话没有错误，高岗夸大事实，但少奇同志确实有讲得不妥当的地方，起码语言不准确。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

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1043当事人对强加罪名的答辩

在中共党内斗争中，被批判的人事实上是被剥夺了发言权的，只能接受无理批判，无权进行答辩。但事实终究是不容歪曲的。

高岗在被管教期间，对自己的问题，有过如下检讨：「在『有薄无林』名单问题上，我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听毛主席『到此为止，不准扩散』的话，没有考虑到『扩散』^后果的严重性，跟一些人讲了，闲了乱子。而在毛主席发现追查时，又没敢承认错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这是我的最大错误。中央召开四中全会，强调党的团结问题是非常正确的，我对毛主席是忠心的，从来没有过反对毛主席的一丝念头。我与刘少奇不是个人之间的问题，是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张秀山说：高岗认为他过不了刘少奇这一关。要他承认反对毛主席、篡党夺权、搞阴谋等罪名，他坚决不能接受。

作为「高、饶联盟」的重要证据，是指高岗与饶漱石勾结让张秀山到组工会议发言，「讨安伐刘」。对此，饶漱石在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的座谈会上检讨说：

据安子文同志最近对我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对于这一点^我在事先确无所知。反之，他发言中列举若干具体事例批评安子文、薄一波两同志，则恰与我的宗派主义情绪相投。加以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故在他的发言稿印出之后，我未再行阅读过（因为我的眼睛不好，不能写，不能多看，因此，这些东西拿到我秘书那里我都没有看）。反之，在当天张秀山及其它各大区同志发言之后，我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步……所以，我#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联1客

105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页314。

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派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在此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的反对刘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贵：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与高岗同志的反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有甚么重大政治野心。同志们对我的这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11)6

张秀山在谈到当年这桩冤案时说：说到高岗在东北局搞宗派，有一个「五虎将」，这是不够客观的。我们之间都是工作关系。因为我在历史上与高岗有着长期的工作关系进行株连，还可连得上。张明远与高岗有甚么联系，无非就是多干了些工作。马洪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年青同志，1952年时，就随着高岗调国家计委工作了。尤其是郭峰、赵德尊两人，还是在高岗去中央工作之前，才到东北局来的。赵德尊是由黑龙江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任农村工作部部长。郭峰是辽西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任组织部部长。当时他们都是较为年青、有能力的干部，作为培养对象调来的。而且由一个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当一个部接，这也是很正常的人事调动。这种人事调动安排，从各方面看，也是适当的。当初高岗说过他们是年青优秀的干部，这也是事实。但是批判高岗时，也就因为这些把他们打成「五虎将」里去了。这种搞法显然不实事求是。107

张明远说：就我个人而言，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来看，与高岗都没有任何个人「宗派关系」……。相比之下，我同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同志的关系远比高岗更密切……。一位同志告诉我，当年在中央讨论我们几个人的问题时，彭真曾说过，他对我比较了解，在工作上作为高岗的助手，和高岗接触多，跑上跑下，出主意，这都是正常的。但要说跟着高岗反党反中央，「我看不会」。彭真的话是实事求是的。

其它几个人，张秀山虽然与高岗从30年代就一起工作，但他到东北，是受中央的委派，而不是高岗拉山头。这一点，刘少奇对陈伯村的谈话很说明问题。他在东北的工作情况来看，他对高岗也并非言听计从，而是有自己的见解，在一些问题上甚至与高岗发生争论。无论在北满时期还是在东北解放以后，他所主管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把他划为「五虎将」，是因为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但据我所知，张秀山一直是不想去会上发的。是安子文一再坚持要他讲，刘少奇也要他一定去讲，毛主席又说同意他的意见，支持他到会上去讲。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去讲的。就算他的发言有问题，甚至有错误，也不能说是「反党活动」。因为他是在党的会议上对工作提出意见，而不是在会下乱讲；是当着刘少奇、安子文的面讲，而不是在背后散播。他的行为没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这怎能说成是「反党活动」？至于张秀山「配合饶漱石」，更没有根据，他的发言除征求过东北局几个同志的意见外，事先根本没有与饶漱石商量。

郭峰被打成「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将」，按毛主席的说法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紧嘛！」事实是，郭峰原是辽西省委书记，任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仅一年多时间。没有任何根据说他是高岗的「心腹」。1953年秋，中央同时调郭峰和宋平分别担任中组部和劳动部的副部长（这两个部都是饶漱石任部长），饶漱石向部里的同志打招呼说：郭峰〔宋平）是新来的副部长，今后部里发的文件要先送他（指郭或宋）看过以后，再送给我。就是这样一句话，后来被歪曲成「中组部要以郭峰为核心」。108其实，郭峰根本没来得及去上任，就被打成了「五虎将」。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讲话中讲到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时说：「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页397。

马洪是一个才智出众的青年干部，高岗的许多报告和文章多出自马洪的手笔。但这一点不能成为他是「高岗的亲信」的理由。

赵德尊原是黑龙江省委书记，到东北局任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还不到一年，他与高岗更谈不上有甚么特别的关系了。

这些事实说明，把我们几个人划入「高岗反党集团」，打成「五虎将」毫无根据，真可谓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199

4被重新安排却未平反的「五虎将」

1954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局长和东北局委员及其它党内职务问题向中央的建议〉下达以后，张、张、马、郭、赵均被降职使用：张秀山被贬为辽宁盘山农场副场长，张明远到中科院任办公厅副主任，马洪贬到北京第三建筑公司任副经理，赵德尊贬到东北制药厂任副厂长，郭峰贬到旅大机械五金总厂任副厂长。后被添加到「反党集团」的陈伯村〔东北局原组织部副部长，后调任中共旅大市委副书记〕，则被贬到哈尔滨市水泥厂任厂长。

经过二十五年之后，张、张、马、评、赵、陈六人在1979年先后得到了重新安排：张秀山，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张明远，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马洪，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峰，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赵德尊，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陈伯村，任国务院水电部副部长。

109张明瑰回忆，未刊稿。110张明远回怆，未刊稿。111张明41：《我的回慷》，页434。

中央在重新安排这几人的工作时，陈云对张秀山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110薄一波在与张明远谈话时说：中央对五个人的工作安排，不受过去问题（指「高饶事件」）的影响，高岗是高岗的问题，你们是工作关系，没问题，后来东北追查历史根源，搞了张、张、赵、马、郭没

道理，风马牛不相干。川

对此，张明远感叹说：这就是说，仅仅在安排工作时不再提及这个问题，或者不受这个问题的影响，但这个问题究竟是否存在呢？后来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依然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仅仅是「不再提了」，这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112

对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何以决心拿高岗开刀？张明远有过这样一段分析：

「高饶事件」发生在建国初期历史转轨的时期，从战争转到和平建设；从以夺取政权为主要目标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建设时期。

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个转变的问题上，在党内，在中央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这本来是正常的，完全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通过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总结经验，探索发展经济的规律，达到统一认识，统一步调的目的。遗憾的是，在实际上采取了错误的作法。

全国胜利以后，毛主席潜意识里的帝王思想、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小农意识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抬头，搞个人崇拜，搞一言堂，对领袖的意见只许赞成，不许说半个「不」字。动辄就把不同意见与路线斗争联接起来，上升到不适当的高度，斥之为「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把持不同观点的人说成是「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挥舞「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反对中央领导」的大棒来压制、打击对方，从政治上加以批判，组织上进行清理。当时在他心目中，刘少奇就是这样一个「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1952年秋至1953年春，毛主席私下里对高岗说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意的话，并说对于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实在不行，就只好请他「挪挪位子」。在财经会议一开始，他提出「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说这个总路线是照耀我们一切工作的灯塔，而把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的主张当作资产阶级右倾观点来批判。接着又提出，为了保障总路线的贯彻，召开组

112张明速回慷’未刊稿。

织工作会议，对组织工作进行检查，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3年夏秋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期间，发生了所谓的「批薄射刘」和「讨安伐刘」风波。他还要求各地党委在财经会议结束以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讲清楚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然而，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正如他自己所说：「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响应者寥寥」。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国家大规模建设刚刚起步，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提出，全国上下人心思安，迫切希望加快建设，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团结一致贯彻落实总路线，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毛主席正是看到了这个形势，也迫于这个形势，果断决定暂时停止与刘少奇的争论，转而强调团结。他声言「我和少奇同志是一致的，反对少奇就是反对我」。这样一来，就把紧紧追随他的高岗推上了「破坏团结」、「分裂党」、「攻击中央领导」的境地。这正好给刘少奇一个台阶，既可以使这场争论体面收场，又可以维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威望。但这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众人都知道毛主席对高岗特别信任和器重，知道他实际上与刘少奇的确存在着严重分歧。而毛主席这样作，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他知道在地方，在中央，在军队，有不少人支持高岗，特别是有彭德怀、林彪、陈云这些有威望的人支持。因此必须有更充分的理由（或说是罪名），才能把高岗搞掉。于是，不知是否经过中央讨论研究，他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北京有一个地下司令部」，为高岗问题定了调子；接着在杭州把「有人要造反」、「要打倒我」的舆论捅给了苏联人。¹¹³这样一来，谁还能高岗说话，又有谁敢为高岗说话呢？更何况高岗本来就有不少错误，有许多「辫子」可抓。加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流毒，以及多年形成的对毛主席的无限信赖，人们早已习惯了照领袖意志办事，再说那是「要造反」的大罪，谁不跟着毛主席痛打落水狗，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因此，我认为，如果说1953年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是毛主席和刘少奇

关于建国方略的第一次交锋，或者说是他想搞掉刘少奇的一次尝试的话，那么，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向刘少奇算总账、发动总进攻。高岗不过是在毛主席与刘少奇斗争中的第一回合中落马的一个马前卒或是急先锋罢了。114

张明远的这段分析，是有道理的。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当年把高岗、饶漱石打成「反党联盟」，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怀疑和不满。事隔多年之后，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炮弹」，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重新搬了出来，刘少奇也因三次被捕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毛泽东打倒。

5 彭德怀对「彭、高联盟」的申辩

关于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的谈话中说到，高岗「有四个大区的支持」，这就暗含着高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彭德怀时，毛就曾说：「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至1953年三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115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不能为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平反时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116针对上述臆断，彭德怀在1962年向中共中央申诉的「八万言书」中专门就此问题作了长篇说明，叙述了高岗数次与他谈到刘少奇的「错误」和他本人态度的详情。为澄清这一历史冤情，现将彭德怀的自述摘抄于后：

第一次是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进行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高岗以中共中央军委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

113指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

(【~”

和驻华大使尤金（?! ! 化! ? . ! ^）时的谈话。

民军高级干部会议，会后，高岗在与彭德怀谈话时，突然把话题转到彭真在东北犯错误的事，紧接着说彭真「是接受了少奇同志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幻想国民党不会进攻，以后国民党进攻了，又幻想抵（抗）一下就会和平，这就完全陷人被动」。彭回应说：「少奇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论『和平民主新阶段』讲过了一点份，有时也有一点偏。」第二次是1952年4月底在沈阳，高岗向彭「说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是如何接待他的，又说斯大林怎么拉他看电影，还说『斯大林是不喜欢刘（指少奇同志）的，同时对周（指周恩来同志）的不积极抗美援朝也是不喜欢的。』我说，那就不是事实，谁喜欢谁关系不大，只要中国人民喜欢就行。高又说，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事务主义，政治路线不明确，对于抗美援朝这样大的事情没有个全面计划，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切事务都是被动的，毛主席也不喜欢他。我说，周公这个人，吃得少做得多，耐劳耐怨，平易近人，在中国知识分子！^层中、有广泛的人事关系。至于工作上有事务主义，是他的缺点。高又说：『斯大林要撤彭德怀的职。』我说：『这可能是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没有打好的原故吧。我现在很疲劳，撤消我志愿军的职务休息一下也好。』」

第三次是「1952年夏天，我在北京医院割瘤子出院以后，就住到中南海了。当时中央书记处有人提出要我当参谋总长（可能是周恩来同志提的），我当时拒绝了这个工作。……因此我向主席提议让高岗来当参谋总长。同时也提出邓小平同志，因为他同军队内的联繫比较多些。当时主席是称赞了邓小平同志，并说因工作情况抽不出来。……当时主席问我：『高岗这个人就没有缺点吗？』我说、高岗就是对犯过错误的同志视恶如仇，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狭隘性。」

第四次，「大概在1953年9月4日左右…一，高岗来我处，谈了些财经会议的经过。他说：『过去财政问题上有许多错误，对薄一波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斗争。可是他坐在那里好像满不在乎，看来对人民没有甚

么感情。』我说对于财经工作我们现在的经验还很少，还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把经验积累起来。高义问我对财经工作有甚么意见没有？我说：没有摸过，外行。」

第五次「在1953年12月里（大概时间），军委准备开一次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军委会准备的报告草案，在主席处进行了讨论。在讨论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案没有思想性。主席当时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我当时表示以高为主（高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我参加。最后主席又重复说：『还是以彭为主吧。』」大约过了三天时间，彭到了高岗家里，准备看一看修改得怎么样了。高说还没有看，「接着高又把小桌上放的是甚么文件给我介绍了一下。其中有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地工作会议讲话和少奇同志在延安作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记录等。他问我看这些文件没有？我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但是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我听某某同志提起过，『有点偏』。高接着说，是呀！偏到资本家那边去了。他又说让我看看这些文件。我说，现在没有时间看」。

「可是，第二天高岗带着秘书到了我的住处。他一进门就说『对报告草案没有多少修改，今天谈了以后再修改。』……他在这里又提起少奇同志来，他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说甚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象话吗？他把刘澜涛安在华北，某某安在华东，林枫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而代之。』我当时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我说，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我当时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那是1937年，我和少奇同志由临汾回延安开会，在运城兵站住了一晚。当时少奇同志给我介绍了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及工作能力，那次对我印象极深。高又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我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他又举少奇同志的讲话来作例子说，

浑队干部在战争时期是要坐第一排的，现在是和平民主新阶段时期，就要让别人坐第一排了，难道这也是对的吗？』我插话说有些老干部当时听了很不舒服，其实那是打譬喻说的。高抢着说：『这不是走火，也不是譬喻打的不好，而是有意打击老干部。钊的

3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0955—1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讲话是影响了华北和东北的工作，松懈了战争准备。』我说，你有机会时，可以在书记处把你的这些意见说一说，或者个别向主席谈一谈。高说，还不是时候，只要自己心里有个底就行了。我当时对高岗的这些话也产生点怀疑，但是当时没有向他提出来，事后又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这是严重错误。高岗又提到了中央决定增补中央候补委员，说军队方面大概是五个人，并问我那些同志合适？又说某某和某某看来是可以的。我说某某可以考虑，但是具体名单须同军委副主席们商量后再报给中央吧。』

接着，彭德怀讲述了他与高岗发生的一次争执。彭写道：

1953年12月'正在召开军队系统的高干会议期间'我参加了由主席在頰年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我第五个发言，当时我很激动，心里想：就是轮流的话，轮到你朱总司令或高岗时'就敢肯定不出问题吗？所以我当时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甚么推辞的。尼？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持了。

第二天晚饭后，高岗来到我处，他的脸色很难看，似乎在生气。他先问

了问高干会议的情况，然后就转到了昨天在主席处开会的上面来，他说：「你昨天为甚么赞成由刘少奇代理’而不同意我的意见呢（或者说是由他代理，而我没听清楚）？」他说这话的时候，看来是责问我的样子。我当时就冒火了，突然说：「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他见当时没有甚么便宜可得，也气势汹汹地走了。我当时想，这次得罪了他，以后不会再来了，不来拉例！因为我素有一个不怕得罪人的坏习惯。

553

第五章高尚’饶漱石事件

彭德怀检讨自己对高岗攻击刘少奇的一些不寻常的的言语，没有及时「向主席和中央睡报，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基于上述，彭德怀对「高、彭联盟」，「彭、高联盟」的说法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认为与事实不符。他以沉痛的心情向中央申明：

以上我同高岗来往的经过和谈话，是抱着以对党忠实的态度来回忆和写出来的，自问是真实的’可以作为中央对这个问题分析的参考。再者，揭露高、饶反党联盟的是陈云同志^他可能了解其中底细，因此陈云同志是最好的见证人。邵小平同志是第一个到我处谈高、饶联盟问题的，111看我当时是否将高岗的言论和行勋向邓小平同志作了如实反^的？而且在高、饶反党联盟未被揭露以前，主席外出时，我就反对书记处工作轮流主持，而同意少奇同志主持，这也可以说明我究竟同高岗有甚么关系，事情也比较明白。118

笔者所以引用如此多的文字，目的是要还彭德怀这位从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功勋卓著，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共和国元帅一个政治上的清白。

八「高饶事件」的不同传说

高岗事件的前后经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长期不得其详。在国外更流传有种种说法，其中以前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1956年11月31日“化化”）的回忆录最为注目。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的大体内容是，高岗为讨好斯大林，曾向斯大林提供过中共中央高层的内部情

——

117关于邓小平找彭谈话的情况，彭德怀回怆说：在高干会议结束前一两天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来到我处，即提出了高、饶反党联盟问题。问我的看法怎样？我当时就把高岗近来的大概情况如实告诉了邓小平同志。

118彭德怀自述’附录二：关于高饶联盟问题’未刊稿。

报，后来斯大林出胃广高岗，把这个情报交给了到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于是’在斯大林1953年3月逝世以后，毛泽东很快就把高岗端了出来。这个说法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斯大林当时任命了一位战时曾当过人民委员的铁路专家（指柯瓦廖夫【1930年10月31日】——引者注）来担任此职〔赫鲁晓夫说成是驻华大使（引者注）〕。我记不起这位专家的名字了，只记得曰本人在华北失败后，斯大林曾派他去指导满洲织路的重建工作，兼任我们驻满洲的全权代表。我们是信任他的，斯大林把他视为亲信。

我们的这位代表开始向我们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不满。据他说，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凯少奇、柯恩来等人。提到的人里面没有毛，但毛对在中国领导班子中散布反苏情绪的那些同事也未采取任何4普施。斯大林把大使送回来的某些文件拿给我们传阅’因此我了解其中的内容。

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

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我们那位代表报回来的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只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他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友好表示。你如果想在历史上寻找类似事例，不妨把这件事同科楚别伊向彼得大帝报告马泽帕叛变的有名例子相比较。彼得为了把马泽帕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就把科楚别伊对他的告发告诉了他。结果马泽帕处决了科楚别伊，和查尔斯七世联军反对俄国。普希金在他写的《波尔塔瓦》一诗中讲了这个故事。

斯大林针高岗干的事正是彼得对科楚别伊干的，而毛对高岗干的事则是马泽帕对科楚别伊干的。

毛先是在领导班子内把高岗孤立起来。我们驻北京的代表报告说，他们曾在一次聚会上遇到许多青年人，这些人喝醉酒后就开始怒气冲冲地对我们的外交官谈论起「你们的人高岗」这一类话来。那时高岗还在政治局里，但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已经被打入了冷宫。后来，我们得知毛把他软禁起来了，再后来，听说他服毒自杀了。

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

斯大林为甚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正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他信不过任何人，甚至也信不过他自己。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贪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然而，我认为毛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斯大林。他看出来斯大林总是企图证明自己高人一等。我相信毛是看穿了斯大林这种「外交手腕」的，对此他内心感到恼火，并且产生了警惕。119

赫鲁晓夫的这个说法，在西方盛为流传。

英国学者威尔逊（^&^。!!）在他的专著《僵史巨人毛泽东》（^，化6』口16、5，一中，对高岗事件如是说：

毛非常清楚斯大林对他的不信任。……

到12月份（指1949年^引者注），毛第一次准备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一位同僚已先他抵达那里〔1949年

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高岗为代表团成员

赫鲁晓夫^；”13^！01111化1；116^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懂后的8言一一赫鲁晓

夫回慷录绩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1^页378—380。

引者注）。显然，他的这位同僚正在俄国人的支持下，巩固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东北地区的地位。这个人就是高岗。……

3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门953—化55)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五章高萄’饶漱石事件

357

所以，1949年12月16日毛去莫斯科时，对他以前的朋友和救星的作用心存疑虑。当斯大林把他当作心腹朋友时，毛一定感到很意外。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苏联大使关于毛与高岗争论的报告交给毛，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

东西感兴趣。』接着赫鲁晓夫自己解释道：斯大林为甚么要出贵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针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赫鲁晓夫是对的。毛在访问前没有理由设想斯大林对他已有好感，谈判的结果又在他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感。由于这一原因，高在东北的表现和行为一定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但是，毛必须等到斯大林死后，才能对付这个危险的竞争对手。

这一时期，毛泽东试图通过清除他的宿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1953年底他发动了反对高岗的运动。在建国后的头四个年头，由于没有发生甚么事情，毛对高岗的野心没怎么注意。抗美援朝战争使得中国比以往更加依靠东北地区作为战争的直接后方。1953年春斯大林的逝世使高岗失去了外部力量的支持。从这时起，毛就开始作出了处理高岗的战略安排。

12(1

英国学者霍林沃思（(：&巧”(^!叩~。!!!!)在《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

0\^000111(11\16 0.^0.111^1//^）中说：

虽然高岗与苏联的关系很好1但他还是受到控告，说他与贝利亚即让人痛恨的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子 有勾结。这些说法并没有完全为人所疑。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但在清洗后生存下来的高岗的朋友们还是声称：高岗只不过是「应邀」向贝利亚汇报过当时在东北铁路上工作的白俄分子的活动^当时东北的鐵路正在按苏联铁路轨道的标准进行改造。高岗以前的一位助手说，1949年高岗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曾经提出，他愿意支持把满洲搞成一个与苏联有密切联盟关

系的独立国家，实际上也就是搞成像苏联在亚洲的卫星国蒙古那样的国家。据说，高岗当时断然拒绝了这种主张，使得斯大林十分恼火，最后放任这条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说是高岗曾听到过这个建议。这是斯大林因高岗缺乏热情而对高岗的报复，但他的动机是甚么，却依然让人费解。毛主席显然因为高岗没有对他说过斯大林的主意而感到生气。这件事很可能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与高岗之间的裂痕，因为本来几个月以前在工业和经济、党务等问题上，他们之间就已有过重大分歧。高岗以前的一位支持者提到的另一个传说是：虽然高岗与苏联的关系很好，但斯大林还是用某种古怪的方式暗示毛泽东，说是高岗与自己的关系过于密切，已经到了危害主席健康的程度。……121

美国学者特里尔（！^^化！^）的《毛泽东传》^00：^810^^说：

高与斯大林交往而凌驾于毛之上。他给苏联人以特别情报（这与斯大林赠高一辆小轿车不无关系）。结果^按赫鲁晓夫的说法，高被看作是「俄国特务」。

斯大林让人把高和苏联驻北京大使关于中国内幕的谈话记录转交给了毛。「天晓得斯大林怎么想到会这样作」，这是赫鲁晓夫的恰当评价。大量迹象表明，斯大林认为高在中国的地位正在下降^这位苏联老板想和毛搞好关系。

斯大林一死，毛开始反击高。122

霍林沃思（（：^^！^出化^池）着，高湘泽、尹赵，刘辰诞译：《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0，页66—69。

特里尔（！^”丁饥;III着’刘路新、高庆国等译：《毛泽东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1，1274-275。可见，以上几种说法，基本上都源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关于柯瓦廖夫一事，当年为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谈作翻译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是这

么说的：

毛泽东在莫斯科因受到斯大林的冷遇，曾对前来的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柯瓦廖夫走后，毛高兴地对师哲说：「他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师哲接着写道：

我向主席解释说：「柯瓦廖夫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就会受到指斥或受到处分的，柯瓦廖夫将采取甚么办法摆脱窘境，还得等等看。」不出所料，柯瓦廖夫回去之后写了一封污蔑中国的长信。斯大林收到信后，即刻转交给我们，并说：「这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

后来，在毛主席和斯大林一次谈话中，谈到派专家的事。主席提出是否可把柯瓦廖夫派给我们。斯大林马上说：「柯不是专家，不懂建设，我们将给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¹²³

在高岗问题被揭露后，确有说他挑拨中苏关系这一条。毛泽东也讲过高岗讨好斯大林以及斯大林送高岗小汽车的事。但这并不是毛泽东要解决高岗的真正原因。因为：

其一，从1949到1953年这一期间，高岗正处在受重用和步步上升的阶段，由他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组织经济内阁，使他正处于中国政坛的顶端。为使高岗早日来京上任主持组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1952年9月23日，毛泽东曾亲自致电高岗催促。电称：请你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可来，盼告。¹²⁴可见高岗当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其二，如果真的怀疑高岗与苏联有甚么不正常关系的话，毛泽东也不会

及时把高岗问题向苏方进行通报。

1953年12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肌? .丁""^!），前来中国参加由苏联援助扩建的鞍钢三大工程落成典礼。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化出!!），在谈话中，毛泽东暗示中国党内有人反对他。据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125

据俄罗斯披露当年的苏联档案，1954年2月2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刘少奇与周恩来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尤金于当日向莫斯科报告说：

今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邀请我就中共中央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决议(草案1)〉进行会谈。刘少奇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昨天已将即将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问题的决议草案转交给我。在这次会谈中，他和其它同志想让我了解迫切准备这样的文件和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全会的事实和原因。

刘少奇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共内部暴露出派别活动，这些活动在较大范围内相应涉及党的高层工作者。这些派别活动的领导

123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慷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页483。

3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五章高岗、饶漱石事件

人之一就是高岗，然后就是饶漱石〔中共中央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由此，在党内出现了严重的状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全会。

全会将对上述人员的宗派活动进行认真的讨论，对与此相关的人员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刘少奇同时强调，在全会上将不具体指出参与宗派活动人士的姓名，在中共中央全会决议中也将同样不提及具体的姓氏。全会的过程将反映出高岗、饶漱石以及与其有联系人士是如何表现的，相应决议的性质将取决于他们的态度。为此，刘少奇说，所涉及的问题由周恩来做更详细、具体的介绍。

周恩来的谈话则由高岗的活动在客观上具有敌对中共中央的性质开始。周恩来说，正如毛泽东多次指出，党是领导军队的力量，应当是统一的，牢不可破的组织。而高岗对此认识恰好相反。他在党的高层工作者中广泛散布，似乎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党取决于军队的观点。高岗就是如此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高潮和低谷、紧要关头与失败。高岗按自己的方式，错误地理解党在困难时期的发展历史。高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党的观点不同。……

高岗当时在陕北领导着游击斗争，红军主力和中共领导机关也将那里作为根据地，因此在当地建立了最大的解放区。……

周恩来强调，高岗不能正确、并错误地认识在革命进程中的自我，以及中共的历史。……周恩来说，高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1、众所周知，高岗负责了陕北地区的游击运动，红军主力和党的领导机构在1935年移师那里作为根据地。但高岗试图认为，如果没有他领导的游击区存在，那么党和红军也就没有开展革命的落脚点，革命也就会

因此而丧失。……在「七大」后，高岗违背党的纪律，继续暗地散布党分为两部分的观点，竭力把由刘少奇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中曾遭到的失败和所犯错误的责任归咎到刘少奇身上。

2、因在一系列问题上与刘少奇有分歧，高岗竭力煽动对刘少奇臆造的错误，而且这一切不是公开的，是在暗地中。他不愿意同刘少奇见面，进行襟怀坦白的交流，不把自己与刘少奇的分歧向中共中央提出，而是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暗地散布对刘少奇的各种臆测和污蔑。高岗的这些行为对党的团结与统一事业带来了危害。为达到自己的宗派目的，高岗企图利用一些犯过错误的领导同志，在自己周围结成联盟和派系。例如，他企图利用在解放国民党统治的满洲期间犯过严重错误的彭真〔政治局委员〕，前财经部长薄一波和其它同志。周恩来强调，高岗自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特别是1953年，更变本加厉地散布对刘少奇的污蔑。高岗不仅对刘少奇本人进行污蔑，而且还污蔑其它同志，极力在工作人员之间制造矛盾，搬弄是非。高岗的这些反党活动是为达到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功名主义目的。

3、高岗在党内具有较高的威望，其中在华北〔此处原文有误，应为东北〔括号内为引者注，下同〕的工作中曾有过不少功绩。中央领导器重并信任了他，但高岗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领导对其良好的态度，为追求个人的功名目的，抬高自己的地位。为突出自己，高岗千方百计地夸大别的同志的错误和缺点。他企图利用高层中一些人具有骄傲情绪和功名主义思想情况，而这些人则陷入了高岗的诡计。例如，他向一些人说，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周恩来强调，当指出，高岗企图劝说的许多人对此曾给予了回击，最终的结果使高岗自己暴露了出来。

谈到高岗如此积极反对刘少奇的原因问题，周恩来强调，高岗的所作所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益，他想要在党内占有更高的位置。众所周知，「七大」以后，刘少奇是毛泽东最亲密的和信任的人。毛泽东到外地去，都是由刘少奇代替主持中央工作。高岗想到，除了刘少奇外，自己没有其它的竞争对手。因此高岗认为，如果得以打倒刘少奇，那么他自然就

可以取代刘少奇的位置。

周恩来说，不久前，毛泽东鉴于自己的健康状况、工作劳累过度及年龄的原因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减少自己目前的工作量，以便能有更多的精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主要实际工作问题，因此毛泽东请书记处成员考虑设立党的副主席或党的总书记职务。高岗极力反对此项建议¹因为他清楚，如果赞同决定，设立这样或那样的职务，党的副主

席或党的总书记职务显然会被选举为刘少奇。高岗在私下谈话中表示，自己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周恩来说，高岗的宗派活动在现在得以暴露，为党的团结与统一带来巨大的损害。周恩来继续通告，毛泽东准备在12月份休假，而刘少奇知道高岗对自己的态度，建议毛泽东不在期间，由高岗在内的7人，集体轮流主持领导工作。毛泽东当时还询问了谁合适在他休假期间代替他，（所）有人都同意刘少奇，只有高岗一人表示反对。

周恩来强调，作为政府的副主席，高岗认为，这对他来讲还太少。他竭力想成为毛泽东在党内的副手、然后成为国家元首。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去年夏天召开的财经会议期间和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组织工作会议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同高岗一起工作的陈云对其宗派活动从前就有所知晓。周恩来说，高岗的宗派活动曾有广泛表现，但关于他想成为毛泽东在党内的副手这一情况，只是在最近才为人所知。谈到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周恩来说，饶漱石曾在上海工作，1952年调到北京。他同高岗一样有功名主义倾向，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但与高岗有所不同的是，他做得更隐蔽。到北京工作后，他与高岗联繫，并加入了高岗的宗派集团。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与该部其它所有工作人员对立，指责许多工作人员，包括自己的副职(安子文)是在犯政治错误，强加许多臆造的错误并百般加以夸大。尽管刘少奇在政治局中负责组织工作，饶漱石从不向刘少奇汇报任何问题，对其不予理睬，采取躲避中央的做法。特别是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1953年9月），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得以积极地施展。在这次会议上，饶漱石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看法同中央的观

点对立，会议则是由刘少奇主持的。饶漱石的宗派活动导致了会议气氛的不健康。为改变局面，毛泽东召见饶漱石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其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此后，饶漱石在会议上继续从事宗派活动。周恩来说到，饶漱石是仅次于高岗的人物。

周恩来说，高岗、饶漱石以及其它人的宗派活动，客观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周恩来通告，全会决议的草案已散发给中共中央委员。高岗和饶漱石清楚决议所指的，是他们的所为，并在当前尽量同许多同志进行谈话、交流。在这些谈话和交流中，他们承认自己所犯的部分错误，对内心的功名目的避而不谈。根据周恩来的看法，在全会上，高岗可能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只是为了蒙混过关。周恩来说，不排除在全会上一些人揭发高岗从前与其进行的反党谈话，高岗可能会拒绝承认这些事实，进行抵赖；同样不排除他采取胆怯的做法，声明自己被逼到绝路，除结束生命外，别无选择。周恩来说，从高岗方面来讲，这种情况不能排除，因为他将在所有人面前受到揭发。例如，高岗在与陈云谈话时表示，准备去任弼时（前中央书记，1951年去世）去的地方。周恩来说，毛泽东指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以及其它人同高岗谈话，目的是给高岗一个摆脱其目前陷入困境的机会，并加以改正。毛泽东指示，无论是报告中，讨论时，还是在决议里都将对高岗、饶漱石不指名道姓。在中央全会上对高岗、饶漱石不准备做任何组织结论。周恩来说，如果高岗、饶漱石在此次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党将继续，并观察他们在未来是如何表现的。周恩来在谈话中强调，「贝利亚事件」迫使他们高度重视加强党的警惕性的必要性。也正是这个事件唤醒中共中央如此严肃地提出高岗的宗派活动问题。

谈话结束时，刘少奇，周恩来请求将这绝对保密的信息通报给苏共中央。谈话进行了三个半小时，出席的有朱德、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以及苏联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В. В. Васильев）。谈话是由瓦西科夫担任翻译的。126

1954年2月13日，尤金再次向莫斯科报告了他拜会刘少奇、周恩来及刘、

周主动与他谈及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内容。尤金说：

今天，受莫斯科的委托，我拜会了刘少奇、周恩来。我向他们通告，苏共中央对中国同志通报给他们的，有关中共中央就党的团结与统一特别全会的信息表示感谢。……

后来，刘少奇、周恩来主动向我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团结与统一问题全会的结果。……如同计划的一样，全会没有指出具体姓

名，主要是在全会召开前已向许多中央委员通报了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事实，而其它人是在全会工作过程中通报的。在发言中，有充分根据和原则地批判了具体的现象，而且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清楚说的是甚么，谈的是谁。许多同志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了全会决议中所提到的他们所犯的错误。在高岗和饶漱石的发言中，有自我批评的成份，但很不够彻底。较之高岗，饶漱石做了更多的自我批评。

刘少奇说，全会结束后，一批中央委员继续同高岗、饶漱石进行谈话，力争使他们更深刻地、从原则上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至于高岗，直到现在仍然威胁说他准备自杀。同时，他表示自己准备好离开领导岗位，做一个老百姓。一部分同志指出了高岗执迷不悟，继续从事严重破坏活动的危害性。作为对刘少奇的谈话的补充，周恩来强调，无论是高岗，还是饶漱石，都竭力回避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行搪塞，两人甚至企图把自己的反党活动尽可能拉拢更多数量的人，指责他人的错误和反党言论。但他们企图恶意攻击的这些同志都做了自我批评，而高岗、饶漱石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从整体上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没有诚意。

在详细谈到饶漱石的行为时，周恩来说，饶漱石的工作范围一直比高岗小，只限于华东〔上海〕。……与高岗不同，饶漱石的问题将会在不久得以解决……。话题转到高岗的行为上，周恩来说，就高岗的工作量和范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比饶漱石大。高岗先在西北，后在东北负责主要工作，最后在北京担任重要职务。他与党的工作者具有广泛的联系，直到现在还在他们中间享有威信。许多同志没有完全认清高岗的本来面目。利用这一切，一方面，高岗回避承认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

他企图用威胁的办法向中央施加压力，准备用自杀的方式结束其生命。饶漱石是一个口是心非、善于隐藏的人，当向他指出宗派活动事实后，他惊惶失措。高岗则是另外一种性格，表现相反，竭力威胁并用无赖的方式加以抵抗。最近一段时间，高岗在个人精神上有崩溃的迹象。

周恩来继续说，高岗承认计划打倒刘少奇，并以此为目的，在党的成员中做了相应的工作，但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打倒刘少奇的目的是为「取代他的位置。高岗承认自己有功名主义倾向，但从整体1：说，他不是钻营家。高岗在谈话中表示，按照你们的看法，我是贝利亚，还是张国焘？高岗承认自己存在个人主义成份，但他声明自己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私自利者。

周恩来说，同高岗解决问题要比饶漱石困难、复杂得多。他要么以自杀相要挟，要么散布不符合事实的情况，要逮捕他的说法。周恩来指出，如果高岗或其它人在自己的反党宗派斗争中走得太远，蓄意危害党的事业，那么在他们面前，党不会停止对那些人的逮捕，无论他们在过去有过甚么功绩。周恩来说，尽管高岗有错误行为，中央在审查他的问题上严格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一切犯过错误和有错误认识的人，应当采取「治疗」，而不是逃避的办法。

谈话进行一个多小时，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和师哲出席了谈话。127

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尚未开会之前，毛泽东让刘少奇、周恩来如此详细地向苏方通报高岗的情况；全会结束不久，又再次主动向苏方通报高岗、饶漱石的现实表现和应对方案，显然是完全把苏共当作最亲密的兄弟党和老大哥来看待的。说解决高岗是怀疑高岗与苏联的关系，显然也是没有根据的。

另一种说法是，高岗事件完全是毛泽东设计的X个「圈套」。即：「毛早就有搞掉高的想法。他先利用高和高手下的人打刘，然后利用高打割这一点，来清洗高。」128人们在弄清「高饶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
擦一厨济□

!稀!簧!鸚!

渝箐钹鰯

!島!雜!堀!恋!梔!涪!矚!稀!箐!鑽!鰯!

“燻”蹠”梔”漫”熾”瑤”滔”退”鰯”

#揀#騎#蠱#蹠#恋#氈#跣#閥#護#鰯#

#□#□\$▽\$(∩)\$箭\$俚\$怀\$涪\$耀\$跣\$鰯\$

—, —8—1—ü

% %一&瘡& &

’瘡’矚’護’駢’

(□(髮(一(熾(駢(

%娥%漫%緞%鑽%

% % % % %□&

&箭&髮&梔&瑤&瘡&矚&瘞&鑽&

’⊙’止’蠱’吁’梔’瑤’瘡’矚’跣’閥’護’駢’鰯’鰯’

(樛(燻(蹠(髮(一(涪(漫(熾(瘞(瘞(閥(護(駢(鰯(

(((((切(

栖廐h斬)髮)一)佞)恋)梔)緞)虢)蟻)言)駢)鰯)

))) □*□*□*□*揀*樛*佞*刀*吁*啼*梔*漫*滔*言*

+(∩)+島+雜+髮+一+緞+滔+

, 蹠, 雜, 氈, 涪, 虢, 瘞, 閥, 護, 鰯,

, □-刀-吁-啼1堀1梔1梔1漫1稀1箐1□□□□

+一+刀+吁+啼+堀+娥+恋+換+昀+梔+矚+稀+滔+

-言. 閥0蹠1髮1吁1堀1箐1耀1钹1閥1

箐1耀1钹1閥1

2(∩)2噪2燻2梔2氈2钹2鑽2□5□5□6□6蟻6退6

;□ <漫=稀=箐=耀=钹=閥=鰯=

= >▽>換>昀>梔>熾>

? ? ? ? ? ?熾@瑤@矚@稀@退@鰯@

@ @ @ @ @ @□@

B噪B揀B言B閥B鰯B

;漫=赫=钹=阙=鰓=鸚=

丝C喃C钹C駢C

F▽F●F湊F漫F谏F钹F

G噪G嶼G檫G燿G箭G滔G蕘G阙G

H箭H雜H一H吁H城H帀H怀H恋H瘵H稀H箒H葶H言H谏H钹H護H

J□J蕘J言J退J護J

栖廐h躄F退F

Z誣0髮¼一2佺6佺i佺

堀, 寿. 寿®寿° 寿v媯0崑Ú崑

]滔^葶^言^躄^

(髮0髮Ö髮0髮à髮° 鸚¼鸚° 一¼一0一Ú一ö一

佺2佺6佺<佺>佺j佺v佺æ佺ê佺

N N□0(ㄟ)P噪P檫P燿P箭P瘵P P P钹Q阙Q□R▽R戀R箭R斃R矚R稀R言R躄
R钹R

刀P刀è刀i刀î刀ô刀ø刀ù刀

堀(堀*堀, 堀4堀6堀@堀0堀Ö堀

寿寿”寿, 寿. 寿®寿° 寿Ö寿0寿Û寿à寿ì城Î城>吋@吋0崑Ö崑0崑P崑

帀&帀. 帀0帀D帀T帀V帀~帀

^ ^膺^吁^喃^緞^滔^躄^鸚^

梘柄帀¶帀E帀Ê帀Ð帀Ú帀\开^开b开d开

^吋_帀_恋_換_躄_退_護_鸚_

开Q开^开®开° 开’开, 开À开Â开R怀n怀p怀t怀’怀¼怀¾怀Ä怀Ê怀Ð怀Ô怀
P怀

`言a谏a鰓a

恋@恋D恋N恋R恋j恋1恋¬恋’恋ò換ú換ù換

攀J的T的V的Z的ø的

e雜f吁f喃f城f f[] g

椀8椀@椀B椀F椀H椀1椀²椀’椀, 椀0椀8椀<椀B椀F椀”椀^椀Ö椀Ú椀

梘拖帀Ú帀F怀’怀à怀

愀@恋B恋D恋j恋l恋|恋

振6振X振8振, 摘0摘Ü摘*洧<洧v洧æ漿| 燙: 熨î 痧ð 痧r 瑤D瑤>甄ú

初k喃k甦k燙k

攘V攘l攘p攘ò攘ô攘

k谏l鑽l鰾l

甦O甦\$洧(洧È洧D洧ò洧ö洧@洧B洧*漿2漿x漿| 漿ç漿| 漿â漿ä漿î漿ð漿

t钹t鑽t燻u脛u摘u瑤u痧u瑒u稀u緞u耀u荒u鰾u鷗u

瑒: 稀<稀¼稀æ稀è稀ò箒ò箒

z z z | | 鷗~

綴z綴â綴X耀\耀b耀f耀ú

渝x燙x鷗x

瑒瑒&礪(礪\礪^礪

稀4稀8稀: 稀<稀À稀È稀æ稀è稀@竺H竺° 竺¼竺T箒b箒d箒f箒 · 箒-箒° 箒

² 箒p箒à箒ò箒ô箒B紀D紀<緞>緞l緞N緞r緞t緞

| | | | 箭}脛} 燻~ 髮~ 一~ 熨~ 瑤~ 護~ 鰾~ 鷗~

綴綴, 綴. 綴0綴2綴6綴^綴v綴z綴~綴綴 · 綴ª 綴-綴®綴² 綴0綴p綴â綴æ綴

耀

耀B耀T耀X耀f耀

舀l莠T莠V莠X莠Z莠ü

耀耀| 耀ª 耀° 耀' 耀¶ 耀° 耀d 脛f 舀H荒

謀ô謀è謀ì 謀H谏ú

莠莠N莠V莠X莠\莠^莠b莠E莠l莠è莠ì 莠ö莠p莠

蜀d蜀f蜀|蜀

謀4謀6謀>謀F謀l謀n謀p謀x謀z謀

謀®謀² 謀¼謀ò謀ô謀ð謀谏(谏*谏. 谏0谏4谏R谏T谏f谏r谏v谏~谏ü

柳佻 佻 儀 佻 市 佻 漿l

賢Z賢f賢j賢r賢t賢~賢

賢l踮T踮r輻v輻ô輻Ü輻P輻à輻ð輻ò輻x退

退D都H都J都R都δ都ô都ö都ú都<钹>钹

鎗@鎗N鎗P鎗X鎗\鎗`鎗 鎗

鎗ô鎗P鎗à鎗ä鎗æ鎗ê鎗"鎗\$鎗>鎗B鎗D鎗F鎗H鎗P鎗R鎗\鎗`鎗d鎗Ä鎗E鎗D鎗销F销

賢2踮(退J都p钹

销\需0護○餃à駢â駢>鬚î鬚

護*護. 護h護j護p護r護t護x護

鬚鬚\$鬚1鬚N鬚`鬚l鬚p鬚v鬚x鬚|鬚

鬚ç鬚○鬚`鬚^鬚-鬚®鬚²鬚ò鬚ô鬚δ鬚ò鬚

鰻鰻"鰻&鰻f鰻r鰻v鰻~鰻

鰻鰻ç鰻`鰻²鰻'鰻À鰻Ò鰻Ö鰻Ü鰻δ鰻. 鴉4鴉6鴉: 鴉@鴉D鴉2鴉4鴉h鴉j 鴉

龜F龜H龜V龜X龜r龜t龜

梔捩鰻æ鰻ê鰻ì鰻ð鰻F鴉h鴉j鴉P鴉

○ § 卍 § □ § 吁`堀`刀◎漫◎切

○ 燻○ 侏○ 堀○ 護○ 駢○

§ ㄨ § § 蟲 § 稀 § 茆 § 蔘 § 言 § 諛 § 退 §

`蟲`揀`橡`騎`蟲`侏`吁`堀`梔◎黧◎

& ò n " \$ H J 2 P â N ò

¾ " (H J

○ | ` æ è

ç ○ P â " H l N V X Z Ê Ò Ì Đ

币ò怀ò蠓ó言ó駢ó

÷ □ ÷ ▼ ÷ □ ÷ 稀 ÷ 舀 ÷ 茆 ÷ 蠓 ÷ 諛 ÷ 鑽 ÷ 閥 ÷ 護 ÷ ÷

梔ø梔ø黧ø瑤ø蔘ù蠓ù閥ù鴉ù ù ù

吁ē堀ē城ē怀ē茆ē諛ē踮ē钹ē鑽ē護ē

耀ń蠓ń言ń諛ń

栖廐h廐ń ń ń ń

ō ō ō ō ō雜Ö一Ö

(鬃, 鬃¢鷓| 鷓0鷓Ü鷓à鷓â鷓æ鷓è鷓J丁N丁| 丁®丁R企Z企\企`企b企d企H儁J儁
¢儁Q儁

刁\$刁&刁*刁2刁4刁6刁N刁V刁X刁Z刁¢刁Q刁Ú刁â刁æ刁î刁ô匆

唁Ü唁ä唁æ唁è唁ê唁ü

刁

刁\$刁&刁

刁

匆

堞”堞. 堞8堞

囿1 囿x 囿 | 囿

囿Ú囿â囿ä囿æ囿è囿ê囿 (威*威@威1威P威X威\威`威

崮崮Q崮x币z币â币i 币

弁”弁\$弁, 弁. 弁2弁f弁n弁p弁 | 弁

梃拙弁¼弁. 态0态| 态ª 态

愁愁@愁B愁N愁P愁X愁Z愁®愁¶愁¼愁¾愁à愁ä愁ê愁ì愁\$ 難& 難, 難. 難< 難

@難F難J難¾難Â難Ä難È難Ô持Ö持´ 摑¶摑^ 攬` 攬

替Q替` 替ª 替-替´ 替, 替E替ò替ô替ö替ø替p替è替ê替ö替

柳

柳”柳(柳*柳>柳Q穉| 穉ô穉ö穉b洁f洁h洁l洁n洁r洁”漆(漆| 漆ª 漆-漆®

漆

梃居 難2持& 攬H疇

柳

柳*柳. 柳4柳8柳: 柳>柳-柳ü柳x 桴D桩¾穉ô穉ö穉

熿ò熿ö熿R猓0猓(玼, 玼

瓶| 瘁\$码` 礁b礁d礁ø礁J豪*竺, 竺D竺F竺À竺¼筵B缙T眺X眺ø茁N薑ú

熿ò熿ú熿. 猓6猓8猓<猓>猓B猓n猓v猓x猓

玼\$玼(玼, 玼0玼2玼J玼1玼d玼f玼

瘁

瘁\$瘁&瘁v瘁z瘁 | 瘁

瘁Q瘁 瘁n省p省

码"码. 码6码@码B码P码X码Z码^码ä码æ码`礁h礁

梔戔豪(豪4豪<豪@豪D豪J豪N豪b豪j豪l豪p豪r豪v豪

竺竺*竺. 竺D竺F竺ò竺ú竺ü竺

縁(縁2縁X縁^縁r縁x縁

縁ü縁p縁F緇H緇E緇Î緇

老\$老*老4老>老H老N老X老b老l老v老

眇\$眇T眇X眇

梔宸薑1薑° 薑¼薑ò薑ô薑ö薑ú薑 (蛭, 蛭f蛭r蛭v蛭~蛭

蹇È蹇Ê蹇Î蹇Ð蹇ø蹇ú蹇ì "ì jì lì ú謁p謁d谁1谁ä敷ì 敷0蹇8蹇:蹇<蹇
>蹇J蹇l蹇n蹇r蹇t蹇

軹, 送:送<送>送ç送Q送Â送Ê送Ì送Ð送

𨮒, 𨮒2𨮒4𨮒<𨮒@𨮒D𨮒f𨮒n𨮒p𨮒r𨮒t𨮒v𨮒

𨮒 𨮒° 𨮒¶𨮒¼𨮒¾𨮒Â𨮒î𨮒ö𨮒ø𨮒ü

谁:谁|谁ä敷æ敷è敷-蹇° 蹇-郢

鋤F鋤H鋤Z鋤f鋤j鋤r鋤t鋤x鋤

锁锁²锁'锁ò锁è锁ê锁ì锁î锁ò锁

页餽"餽, 餽. 餽

餽H骋N骋x骋

骋ç骋! 骋 骋ª 骋-骋' 骋Â骋Ê骋Î骋Ò骋0病4病ú病ü病p病

鴉0鴉8鴉ø鴉ú鴉ü鴉p鴉

页H骋J骋Î骋Ò骋ò病>鯨@鯨

鴉

N R ø ú ü þ

駘! " ä æ n p < @

Â Ä ê ì r v x z " ° ² ´ ð ò

4 6 F H d h j l

梔逢Ā蹇 z " ð ò j l . ô F J l

! è! ê! ö! ú! F

。 2。 6。 >。 B。 D。 F。 H。 1。 1□P□R□T□X□b□j□v□|□~□

併À併È併Û併æ併ð併ö併侖, 侖6侖B侖h侖n侖~侖ü

併¼併| 侖 · 侖^a 侖⁻侖Æ侖È侖ð ʅò ʅú

夔a葦a鑽a鰓a

匂(匂0匂J匂T匂r匂x匂

匂匂ç匂\$盲, 盲H盲N盲R盲\盲d盲j盲z盲~盲

盲Q盲°盲À盲È盲Ì盲ô盲ü盲F峪J峪R峪V峪

韶&韶*韶4韶6韶8韶:韶D韶1韶X韶Z韶`韶

囡\$囡0囡2囡r囡t囡

堂, 堂2堂Â堂È堂ä堂ê堂

夂`夂d夂f夂ü

囡f夂h夂ð夂ò夂媯ú媯t媯x媯

忞6忞^挂@勗

拇è拇V禄Z禄

耨D耨F耨`耨

夂Q夂-夂² 夂¼夂Ê夂ò夂ø夂Û夂ð夂ö夂4媯@媯D媯J媯1媯P媯^媯b媯° 媯

¶媯° 媯Â媯Ä媯È媯Ê媯Î媯Ò媯Ö媯ð媯ö媯ú媯p媯N媯X媯\媯d媯f媯p媯t媯

媯Q媯-媯° 媯¼媯æ媯è媯ú媯p媯

專&專. 專4專<專D專1專R專X專j專1專

專~崂\$崂*崂, 崂D崂H崂V崂Z崂

崂崂 · 市° 市N异P异1异r异t异

忞(忞*忞, 忞2忞r忞z忞|忞

懽6懽8懽1懽v懽x懽z懽

懽懽Q懽| 懽 · 懽^a 懽⁻懽² 懽' 懽Î懽Ò懽Ö懽Ú懽æ懽i 懽î懽ô懽o懽ü懽\$挂&

挂0挂:挂@挂B挂1挂R挂X挂\挂

搂搂\$搂^搂f搂

搨8搨>搨N搨T搨

昂&昂H昂N昂X昂`昂

拇, 拇¼拇À拇Ä拇B拇ä拇è拇ì拇~禄\$禄0禄2禄:禄D禄F禄J禄1禄P禄V禄Z

禄

乐, 乐8乐P乐X乐Z乐^乐b乐j乐l乐p乐

乐O乐`乐^乐Ä乐E乐ä乐i乐î乐ð乐

耩0耩6耩8耩:耩<耩B耩v耩x耩D耩H耩`耩1耩

耩°耩¼耩ò耩ú耩à耩é耩ì耩î耩ò耩ú耩ù耩

症&眠b眠0砂T磳V磳

稂B纒0尗T尗

脂H脂1脂x脂|脂

洳8洳>洳P洳X洳|洳~洳

漂d漕j漕O漕^漕Ä漕Ê漕Û漕à漕

猥T猥X猥Z猥\猥`猥h猥x猥

甌(甌0甌T甌X甌`甌d甌

眠眠&眠(眠, 眠. 眠b眠d眠h眠j眠ì眠ð眠

磳N磳R磳T磳V磳ì磳ò磳ö磳ú磳ù磳ù

稂~稂4稂6稂D稂J稂Z稂^稂d稂h稂|稂~稂

笱H笱J笱|笱

笱O笱^笱°笱'笱, 笱¼笱Ä笱Ê笱Û笱ø笱Ü笱P笱æ笱é笱

籩2籩6籩D籩1籩O籩^籩, 籩¼籩E籩Ê籩ä籩è籩ø籩p籩

纒<纒@纒V总X总h总1总¬总®总*尗. 尗0尗4尗H尗P尗T尗X尗1尗t尗v尗

脂脂~脂*脂. 脂2脂6脂H脂ù

梔扈脂1脂x脂

苳ò苳ö苳ø苳ú苳2苳6苳8苳:苳

蓐

蓐p蓐r蓐x蓐z蓐

蜂v蝶z蝶Ä蝶E蝶褂\$褂&褂*褂D褂J褂1褂P褂, 褂¼褂Ö褂ø褂ù褂

订Ä订E订ø订ä订è订ð订ò订ù订

谓|谓~谓

谗

谗*谗2谗6谗<谗>谗F谗J谗1谗Z谗\谗^谗`谗h谗j谗|谗

谗谗ㄉ谗 谗 谗 谗 谗
 莉p慕&褂(褂D褂F褂O褂
 谓J谗ㄉ谗 谗 谗
 輦, 适. 适t鄂
 輦D輦O輦, 适. 适c适ㄉ适à适â适\鄂^鄂ú鄂p鄂æ鄂î鄂: 鈇<鈇t鈇v鈇|鈇~
 鈇
 驛t驛v驛ò驛ô驛ù驛
 鴈ú鴈ù鴈8鴈: 鴈è鴈ì鴈î鴈ô鴈ö鴈ú鴈î鴈ô鴈®鴈° 鴈i 鴈î 鴈
 飴À飴p鬣v鬣*鬣i 鬣
 ˘ ˘ 椅 ˘ 髡 ˘ 矜 ˘ 稀 ˘ □ □ 止 ˘ 噪 ˘ 湊 ˘ 焮 ˘ ˘ □ ˘ 昫 ˘ 梘 ˘
 ˘ 疇 ˘ 蟲 ˘ 換 ˘ 髡 ˘ 鑽 ˘ 閥 ˘
 8 : V X p
 碧(* J 1 V X | ~
 梘戍 8 :
 f h ~
 " 2 " 4 " n " p " ò " ô " ¶
 ü °C\$°C r °C t °C À °C Â °C † ☹
 七: 七<七`七b七d七f七~俗
 儻"儻(儻*儻
 刃0刃8刃Z刃ù
 唢R唢V唢^唢b唢
 勾<勾B勾d勾l勾r勾|勾
 吃吃&吃*吃. 吃2吃8吃@吃B吃r吃v吃z吃
 唢<唢N唢R唢b唢r唢t唢z唢
 嘯^a 嘯² 嘯^o 嘯À嘯. 圃6圃V圃Z圃v圃z圃
 圃Ä圃ì圃î圃D圃ø圃ú圃p莖r莖
 娃c娃ㄉ娃 娃 娃 娃 娃 娃 娃 娃 娃
 婁: 婁B婁D婁F婁H婁J婁N婁P婁`婁d婁~婁
 專1峽T峽i 峽ô峽ö峽ú峽i 弃ò弃ô弃ø弃 悵®悵î悵D悵P悵à悵ø悵ú悵`儻b

儻d儻f儻

儻° 儻² 儻Ä 儻E 儻Ü 儻P 儻à 儻æ 儻ø 儻ù 儻& 控 (控>控J控N控T控X控\控ç控|
控· 控° 控

梔杼圃囧娃| 娃Â娃

婁

婁

婁i 婁i 弃à 儻â 儻X 控\ 控

糊¶ 櫂Ê 氈b 浹d 浹~ 浹

炅8 炅0 会2 会ª 会¶ 会È 会Ò 会Ä 枞E 枞” 糊\$ 糊

糊| 糊° 糊² 糊° 糊Ü 糊ä 糊i 糊ð 糊ú 糊

櫂” 櫂* 櫂0 櫂8 櫂@ 櫂N 櫂X 櫂` 櫂h 櫂r 櫂x 櫂

櫂| 櫂ª 櫂° 櫂´ 櫂* 氈, 氈f 氈n 氈

氈² 氈À 氈Â 氈È 氈Ì 氈Ò 氈X 浹^ 浹b 浹f 浹~ 浹

漉6 漉> 漉J 漉T 漉n 漉v 漉

漉\$ 漉& 漉, 漉4 漉6 漉8 漉< 漉> 漉P 漉X 漉v 漉

漉\$ 漉& 漉* 漉2 漉8 漉< 漉F 炅J 炅

炅| 炅À 炅Ä 炅È 爍D 爍Ò 爍Ô 爍Ö 猓ö 猓ú 猓¼ 球Â 球 (磬2 磬> 磬@ 磬B 磬D 磬b

磬d 磬p 磬t 磬

磬Â 磬Ê 磬” 瘡* 瘡B 瘡J 瘡N 瘡P 瘡T 瘡X 瘡^ 瘡b 瘡ª 瘡² 瘡´ 瘡¶ 瘡Î 瘡D 瘡\ 眈^

眈Â 眈Ä 眈x 研z 研À 研È 研ä 研æ 研ê 礲ò 礲ô 礲ö 礲

籀\ 紉` 紉紉ç 紉| 紉· 紉

梔歌磬2 磬b 磬d 磬Î 磬· 研À 笱D 笱Ò 笱

縉Ò 縉z 緗@ 考< 烏b 烏¼ 范ù 蕓æ 藁

羸Ò 羸Ö 羸Ì 调> 賄1 郇X 饶Ò 程ú

考Q 考ª 考¬ 考¶ 考À 考Ê 考D 考Ö 考Ú 考2 脛4 脛\ 脛b 脛

烏| 烏° 烏, 烏È 烏D 烏Ò 烏P 烏è 烏ð 烏ø 烏ù 烏8 范@ 范B 范F 范J 范N 范ø 范

羸Ê 羸Î 羸Ò 羸Ö 羸H 褱J 褱· 讬ª 讬² 讬´ 讬H 諳J 諳\ 諳^ 諳E 调Ê 调4 较6 较< 较>

较B 较D 较~ 较

较1 郇t 郇v 郇x 郇z 郇~ 郇

緞Ω耀Ω黉 A 瑤 A 瘡 A 殤 A 稀 A 緞 A □ B

Γ Γ Γ Γ □

梳拏鑿ê鑿ô鑿ù鑿p鑿

饶&饶2饶:饶>饶D饶1饶R饶| 饶®饶° 饶' 饶, 饶À饶Â饶Ä饶鎗¢鎗² 鎗¶鎗ò
鎗Ø鎗ú鎗

阌, 阌. 阌0阌6阌8阌@阌D阌T阌^ 阌1阌r阌| 阌

Z Z 噪Z 島Z 温Z 騎Z 吁Z 帀Z 黉Z 焮Z 箒Z 耀Z 舀Z 蕘Z 言Z 谏Z
跬Z 退Z 钋Z 護Z 鷗Z

阌¨ 阌ª 阌®阌' 阌¼阌¾阌À阌Ä阌Ì阌â阌Ð灑ò灑ð灑ù灑p灑
馱®馱° 馱' 馱¶馱z鬃|鬃鬃¢鬃î鬃ö鬃ø鬃ù鬃À鯁Ä鯁È鯁Ò鯁
馱ù

梳拒鎗Ö鎗Ø鎗D阌H阌P阌T阌

E 騎Z 躡Z 侷Z 吁Z 護Z 鰓Z

馱®馱E鬃À鯁B馱-馱` 驥E驥°

馱&馱 (馱4馱6馱: 馱<馱-馱' 馱è馱ì 馱î馱ð馱&驥*驥E驥È驥Ê驥Î驥²

P 燻P 蠱P 一P 啗P 帀P 昀P 瘡P 耀P 蟻P 退P 護P

Σ 止Σ 樛Σ 箭Σ 雜Σ 刀Σ 楠Σ 漫Σ 言Σ 钋Σ

Υ (Υ)Υ 擗Υ 騎Υ 鬃Υ 啗Υ 帀Υ 昀Υ 濟Υ 瘡Υ 緞Υ 耀Υ 舀Υ 言Υ

Φ (Φ)Φ 止Φ 樛Φ 躡Φ 刀Φ 漫Φ 殤Φ 舀Φ 谏Φ 鑽Φ

Φ Φ Φ Φ X(Υ)X Ω Ω

δ □ δ □ κ 緞 κ κ 箒 λ 耀 μ v v

α □ α 堀 α 帀 α 戀 α 換 α 舀 α 蕘 α 谏 α 鑽 α 阌 α 護 α α α α
α α α β

β (β)β 止β 噪β 刀β 吁β 啗β 堀β 帀β 怀β 瘡β 舀β 蔞β 跬β

γ (γ)γ 止γ 一γ 城γ 帀γ 昀γ

δ 梳 δ 漫 δ 箒 δ 耀 δ 蔞 δ 言 δ 退 δ 護 δ

ε ε ε 一 η 侷 η □ θ

栖廐h禮 θ 躡 θ θ (γ)ι 止ι

κ 燻 κ 蠱 κ 吁 κ 堀 κ 殤 κ 箒 κ

μ 𠄎 μ 𠄎 μ 言 μ 鈹 μ 𠄎 v 𠄎 v 𠄎 言 v v v v v (𠄎) ξ 揀 ξ 檫 ξ
燿 ξ 盪 ξ 𠄎 ξ 𠄎 ξ 雜 ξ 換 ξ 𠄎 ξ 澣 ξ 稀 ξ 𠄎 ξ 𠄎 ξ

o (𠄎) o 燿 o 𠄎 o 𠄎 o 刀 o 𠄎 o 換 o 𠄎 o 𠄎 o 𠄎 o 𠄎 o 𠄎 o

π 𠄎 π 盪 π 𠄎 π 𠄎 π 𠄎 π 𠄎 π 𠄎 π □

栖廐h 𠄎 π 𠄎 π 𠄎 π

v v v 𠄎 φ 盪 φ 𠄎 φ 𠄎 φ 一 φ 換 φ 𠄎 φ 澣 φ 𠄎 φ 𠄎 φ 𠄎 φ

φ φ φ x 𠄎 x 𠄎 x 𠄎 x 𠄎 x 𠄎 x 𠄎 x 𠄎 x 𠄎 x 𠄎 x

B 𠄎 F 𠄎 x : ² 𠄎

o

, . l n ì ð ü

𠄎 𠄎 & 𠄎 (𠄎. 𠄎 B 𠄎 F 𠄎 j 𠄎 n 𠄎 À 𠄎 Â 𠄎 v x r v x z |

æ è 4 8

ç | ° ² ò ö ê ì î

3 3 3 𠄎 И И 𠄎 𠄎

M 𠄎 П 一 П 𠄎 П 𠄎 П 切

A B (𠄎) B 雜 B 𠄎 B 𠄎 Г 澣 Г

E 𠄎 Ж 稀 Ж 𠄎 Ж 𠄎 Ж 𠄎 3 𠄎 3 𠄎 3 𠄎 3 𠄎 3 𠄎 3

Й (𠄎) Й 𠄎 Й 𠄎 Й 刀 Й 𠄎 Й 𠄎 Й 𠄎 Й 𠄎 Й □ К

M 𠄎 Н 揀 Н 𠄎 Н 𠄎 Н 𠄎 Н 怀 Н

O O O 𠄎 П 雜 П 𠄎 П 𠄎 П 怀 П 𠄎 П 𠄎 П 澣 П 𠄎 П

P 𠄎 P 揀 P 𠄎 P 怀 P 恋 P 𠄎 P 澣 P 𠄎 P

栖廐h П 澣 P 𠄎 P 𠄎 T

Ь 𠄎 Э 𠄎 Э 怀 Э 𠄎 Э 𠄎 Э 𠄎 Э

a 𠄎 В 雜 В 𠄎 Д 𠄎 Д □ Ж 𠄎 Ж 退 Ж и 𠄎 й

𠄎 φ 澣 φ 𠄎 φ 𠄎 φ 𠄎 φ 𠄎 φ 𠄎 φ 𠄎 φ

φ 換 X 𠄎 X 𠄎 X 𠄎 X 𠄎 □ 𠄎 □ 𠄎 □ 𠄎 □ 𠄎 □ 𠄎 □ 𠄎 □ 𠄎 □

Ш □ Ш 𠄎 Ш 檫 Ш 燿 Ш 盪 Ш 換 Ш 𠄎 Ш 𠄎 Ш 𠄎 Ш 𠄎 Ш 𠄎 Ш 𠄎 Ш

Ш 𠄎 Ш 𠄎 Ш 𠄎 Ш 𠄎 Ш 𠄎 Ш 𠄎 Ш 𠄎 Ш

Ъ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Ь Ъ Ы Ь Ъ Ъ Э 畵 Э 雜 Э 髮 Э 喃 Э 媵 Э 囍 Э □□□

栖廐h屨 Э 怀 Э 熾 Э 瑤 Э 瘖 Э 稀 Э 钹 Э 鑽 Э

Э □ Ю □ Ю 噪 Ю 畵 Ю 媵 Ю 怀 Ю 蟻 Ю 言 Ю 谏 Ю 踞 Ю 喃 Я 堀 Я 谏 Я 鑽 Я 閱 Я

Я 畵 а 樛 а 蕘 а 蔞 а 護 а 鷗 а

б □ в □ в □ в 閱 в 護 в 駮 в 鰓 в в в в в 噪 г 畵 г 盪 г 踞 г

堀 г 怀 г 毳 г 滂 г 緞 г 蟻 г 閱 г 護 г

д 盪 д 畸 д 髮 д 侏 д 駮 д 鰓 д

д д д д

е □ е 卮 е 燿 е 盪 е 雜 е 昀 е 滂 е 漫 е 熾 е 瑤 е 殭 е 稀 е □□□□

栖廐h稊 е 緞 е

ж □ ж □ ж 箭 ж 雜 ж 髮 ж 一 ж 侏 ж 吁 ж 喃 ж 媵 ж 換 ж 榭 ж 摘 ж 瑤 ж 殭 ж

稀 ж 耀 ж 蟻 ж 谏 ж 退 ж 帀 э 恋 э 鰓 э

и (г) и 媵 и 囍 и 恋 и 換 и 殭 и 緞 и 钹 и 鰓 и

к к (г) к 噪 к 蟻 к 言 к □ л л

л 昀 м 榭 м 稀 м 箒 м

м 侏 н 吁 н 喃 н 媵 н 囍 н 怀 н

о 一 п 刀 п 緞 п 耀 п 護 п 鰓 п 鷗 п

р 髮 с 一 с 侏 с 吁 с 蔞 с □□□

栖廐h衢 к 言 к 稀 м 箒 м

м 喃 н 堀 н 昀 о 舀 о

歛 с 蟻 с 箒 т 蕘 т 言 т 鑽 т 閱 т 護 т 駮 т

ч 囍 ч 帀 ч 漫 ч 殭 ч 緞 ч 蕘 ч 蔞 ч 踞 ч

ш 一 ш 侏 ш 刀 ш 吁 ш 榭 ш 摘 ш 毳 ш 滂 ш 言 ш 谏 ш ш ш ш

ъ 卮 ы 噪 ы 畵 ы 燿 ы 蟻 ы 言 ы 谏 ы 退 ы

@_L_B_L_T_徭V徭

各1 呶Ä 呶 噪 噪 ¼ 噪 ¼ 噪 < 固 @ 固 " 婁 " 媵 Ü 嶮 b 弄 @ 恧 " 恧^a 恧 ú

э 鑽 э 護 э 盪 ю 箭 ю 耀 ю 蕘 ю

徭

徭T徭V徭~徭

刃r 刃t 刃ì 刃î 刃

勺\$ 勺& 勺D 勺F 勺

勺, 勺° 勺Â 勺È 勺Ð 勺Ö 勺P 勺ä 勺i 勺ò 勺ú 勺

圉< 圉B 圉D 圉H 圉

圉祛 圉À 圉Â 圉Ä 圉x 圉 | 圉° 圉¼ 圉ö 圉ü 圉

娄 娄" 娄d 娄f 娄h 娄l 娄

媪 媪 (媪ç 媪| 媪" 媪ª 媪-媪° 媪H 媪J 媪

弄@ 恇B 恇D 恇H 恇" 恇ª 恇à 恇ä 恇

悞æ 悞i 悞X 悞\ 悞

悞² 悞´ 悞â 悞æ 悞è 悞é 悞2 挑4 挑6 挑: 挑> 挑@ 挑B 挑D 挑F 挑H 挑X 挑Z 挑挑O

挑u

悞 悞æ 悞é 悞i 悞X 悞\ 悞è 悞é 悞* 挑2 挑

珣 | 珣& 甄^ 硃\$ 稜

挑D 畎H 畎^ 畎b 畎h 畎j 畎n 畎p 畎v 畎 | 畎

畎ç 畎ª 畎-畎® 畎° 畎´ 畎¶ 畎° 畎Ø 畎è 畎E 棟È 棟Ì 棟Ð 棟F 栏H 栏J 栏N 栏

鼍 鼍" 鼍V 鼍Z 鼍

洄< 洄D 洄p 洄v 洄

滌B 滌D 滌h 滌l 滌

爝ç 爝" 爝ª 爝-爝° 爝b 爝f 爝Ü 爝P 爝

珣" 珣X 珣` 珣b 珣l 珣n 珣t 珣~ 珣

珣| 珣" 珣° 珣¼ 珣À 珣Ö 珣Ø 珣â 珣è 珣é 珣ò 珣ô 珣ø 珣

甄" 甄f 甄j 甄l 甄p 甄

甄î 甄Ð 甄Ò 甄Ô 甄4 眇6 眇8 眇< 眇O 眇| 眇X 硃\ 硃- 硃® 硃° 硃´ 硃

稜" 稜> 稜@ 稜

筭´ 筭¼ 筭à 筭è 筭i 筭ð 筭^ 筭` 筭b 筭d 筭. 约2 约H 约1 约N 约R 约

繩\$ 繩& 繩Â 繩È 繩Ø 烏Ú 烏\ 茄` 茄 | 茄~ 茄

萄 (萄, 萄. 萄2 萄` 萄f 萄-萄° 萄ð 萄ö 萄p 萄

萁T 萁V 萁f 萁h 萁j 萁l 萁

薪\$ 薪 (薪0 薪6 薪r 薪t 薪¶ 薪¼ 薪

笄i 笄ø 笄4 约 纜ò 緘0 耄Ú 烏\ 茄^ 茄| 茄~ 茄ì 茄² 萄^a 萵¹ 萵| 萵^a 萵¹ 萵° 萵^a
萵æ 萵. 螭2 螭ì 裊0 尅

萵萵H 萵1 萵| 萵' 萵Ö 萵P 萵â 萵ê 萵ö 萵p 萵

螭螭* 螭. 螭2 螭d 螭j 螭| 螭' 螭, 螭° 螭1 裊r 裊, 裊° 裊Æ 裊È 裊P 尅R 尅1 尅p
尅¾ 尅À 尅è 尅ê 尅

眷P 眷à 眷â 眷æ 眷: 谄< 谄

谄r 贄v 贄¾ 贄Â 贄æ 贄è 贄ê 贄î 贄^a 跬¹ 跬° 跬² 跬' 跬¶ 跬F 軌N 軌P 軌T 軌Ä 軌È
軌à 軌â 軌ä 軌æ 軌0 逢Ú 逢v 鄧z 鄧: 录> 录@ 录B 录D 录F 录b 录d 录, 录¼ 录P 录æ
录

鑽

鑽Ä 贄R 逢@ 录, 录° 录¼ 录X 鑽\ 鑽à 鋤

霄. 霄0 霄. 饴0 饴À 饴& 鬣N 臧

鑽H 鑽J 鑽T 鑽X 鑽\ 鑽â 鋤ä 鋤è 鋤î 鋤1 阡p 阡' 阡¹ 阡

霄. 霄4 霄6 霄8 霄> 霄@ 霄

頎頎. 饴4 饴v 饴~ 饴

駮駮" 駮& 駮

P X n v |

琮琮è 琮ê 琮^

ô ì ô ö ú ü

琮琮" 琮\$ 琮P 琮æ 琮è 琮ê 琮

4 < F P f n v ~

8 D l R T \ ^ f h l * 2 j l

T(T. T1 TRT

T ㄒ TÊ TÐ TÒ TÖ TÛ Tâ Tð Tø Tú Tü T. 佻8 佻Æ 佻È 佻Ð 倅Ö 倅b 当d 当
办> 办D 办1 办T 办v 办| 办

办° 办¶ 办¾ 办Ä 办ä 办ê 办(包. 包B 包J 包| 包

𠂇N 𠂇X 𠂇v 𠂇~ 𠂇

啥& 啥2 啥ü

峒ü峒b峒~ 舛X戇>探c探Q探

搅~搅&搅`搅ú

啥<啥H啥T啥r啥z啥

函, 函8函N函\函f函r函

函函^a 函⁻函[®]函[°] 函, 函[°] 函¼函Â函Ä函Ú函â函 (坚, 坚. 坚0坚x坚z坚
坚¶坚¼坚” 彡\$彡 (彡*彡, 彡. 彡

娅娅Q娅[°] 娅¼娅6婊8婊\婊b婊

克X克Z克È克Ê克6峒>峒@峒D峒1峒ü

峒Ê峒D峒ê峒ì 峒î 峒ð峒ü峒

帅\$帅&帅*帅, 帅0帅X帅`帅j帅n帅v帅 | 帅

帅Ü帅P帅à帅ä帅æ帅ì 帅ò帅ô帅ø帅ú帅

舛J舛1舛v舛 | 舛ô舛ö舛

悼~悼\$悼 (悼, 悼x悼

悼Q悼' 悼¼悼r戇z戇 | 戇~戇

戇>探@探B探F探c探Q探

搅&搅6搅8搅>搅@搅D搅1搅`搅d搅

焯, 焯¼焯H燻ê販. 礲² 税

簏 | 红

红8緘¼緘F茅ú

枞枞| 枞` 枞Ü枞â枞È櫟Ê櫟ú櫟ü櫟À斃Â斃Ê斃Ì斃2沔4沔P灤R灤Â灤Ê灤Ä
滢Ê滢Ì滢0滢ì 滢î 滢ð滢ø滢p滢

焯R焯V焯X焯Z焯^焯`焯

燻~燻N燻P燻R燻V燻p狍

礲F販H販â販è販

砵

砵<砵@砵. 礲ü

梔戮礲0礲2礲6礲H税J税1税N税^a 税[°] 税² 税[°] 税¼税À税Â税Æ税

簏H簏P簏R簏T簏V簏Z簏

緘緘\$緘&緘*緘, 緘1者N者1肋t肋

舅R舅X舅j舅t舅 (茅0茅@茅B茅F茅J茅`茅b茅¼茅Â茅È茅Î茅ù茅
菩菩”菩J菩N菩T菩Z菩

菩| 菩0藺6藺8藺@藺B藺D藺B藺F藺F藺N藺

梔宸茅H茅`茅b茅8藺`藺Û藺4藺f蚩

諒F輅j邨邨z黎閱\$閱, 閱n閱

项^a 饼P雅R雅ð鬍ò鬍B鵠ú

迨è諒è諒B赧D赧

蕙° 蕙, 蕙@輅B輅l輅n輅B迨D迨

锅閱, 閱H閱N閱P閱R閱T閱Z閱^a 閱-閱8饼: 饼饼`饼^a 饼² 饼

雅”雅\$雅 (雅P雅R雅è雅è雅®鬍° 鬍² 鬍¼鬍æ鬍î鬍ð鬍ò鬍

鵠鵠”鵠B鵠F鵠^鵠h鵠Æ鵠È鵠Ò鵠Ú鵠Û鵠P鵠â鵠æ鵠

鸚\$鸚&鸚. 鸚8鸚D鸚J鸚b鸚ù

梔店鵠D鵠^鵠`鵠, 鸚*

鸚h鸚n鸚z鸚

鸚`鸚^a 鸚-鸚®鸚¶鸚â鸚è鸚î 鸚ð鸚ò鸚ö鸚ú鸚ù鸚

龕R龕T龕f龕j龕l龕n龕¼龕¾龕 (

8 : P R V X

埧< > R T ´ ¶ È Î æ è ö þ

< > \ d f h j p t v °

Ä Æ È Ê Ð Ò Ú Þ â

& (* , ☉ ^a È Ê î ð * , ^ d v x

梔扒 T È Ì Î Þ â * , ò ^ ` D h ê ¾ À

𠂇 (𠂇*𠂇ò𠂇ö𠂇<肩@肩

丌F丌j丌ú

丌Â丌Ä丌È丌Ê丌Ì丌Ú丌Û丌4俩<俩>俩B俩D俩H俩

分| 匆^a 匆®匆² 匆° 唆Â唆D叹J叹1叹T叹

堆”堆<堆B堆R堆V堆j堆n堆

夆6夆>夆@夆B夆D夆H夆J夆l夆`夆d夆t夆|夆Ì夆Ò夆Ö夆Ú夆ð夆ô夆

烧h烧p烧r烧t烧Ê烧D烧ù烧

媯媯T媯V媯Ü媯u

梘扌丌ㄣ丌\$俩

撵〃撵V撵Z撵ú

帆ϕ帆ㄣ帆!帆n弄p弄P弄â弄

构构, 构. 构

撵〃撵2撵4撵>撵@撵B撵D撵V撵Z撵v撵

撵Â撵Ä撵Î撵D撵0昆2昆V昆X昆ò昆ô昆*勹, 勹f勹h勹

枣t枣v枣°枣¼枣2稠4稠D稠F稠1稠n稠`槁b槁

槁D槁F槁ú槁ü槁

穉N穉P穉°穉¼穉E穉È穉Ò穉Ô穉à穉ä穉æ穉ù

梘扌撵v撵z撵

穉æ穉è穉8涿:涿V涿X涿ㄣ涿x漆8涑ú焯'甞n昉®昉°昉^砵`礅^礅Ê筵ú

穉è穉4涿6涿8涿<涿V涿X涿ㄣ涿!涿`涿-涿4漆6漆x漆|漆!漆`漆ä漆æ

漆

焯Î焯D焯Ú焯P焯ò焯ø焯E斐Ê斐, 甞. 甞0甞4甞N甞P甞T甞X甞'甞¶甞, 甞¼

甞h昉1昉®昉°昉Ö昉Ü昉ì昉î昉

礅礅6礅8礅`礅^礅ð礅ò礅8稻:稻<稻@稻F稻H稻Ê筵Ú筵è筵ì筵ò筵

箴0箴4箴8箴B箴

箴²纤'纤N緋P緋V緋X緋j緋l緋r緋t緋è緋ê緋l纜p纜t纜v纜x纜|纜

箴0箴4箴8箴<箴>箴B箴

禊Î禊D禊8訓`訓\$軋ú

纜X耆Z耆¶耆°耆D耆Ò耆Ô耆Ú耆P耆â耆ø耆ú耆ù耆

蚤Î禊D禊B訓F訓R訓Z訓²訓'訓"諷&諷'諷¶諷, 諷¼諷ò諷ô諷^諷d諷諷ϕ諷

軋〃軋:軋B軋j軋r軋

逆

墜〃墜D墜1墜N墜P墜R墜V墜Z墜^墜

锒锒F锒H锒j锒1锒¼锒À锒È锒D锒®闾¶闾Ô闾ù

顺h顺À顺Â顺\$松6松8松:松<松>松@松B松D松

顺0顺2顺J顺R顺T顺Z顺\顺d顺h顺1顺

顺¬顺° 顺´ 顺¼顺À顺Â顺N銚V銚X銚Z銚\銚` 銚Ú銚Û銚À馴Â馴

松6松D松ú松ù松8鯨:鯨1鯨P鯨

鸩\$鸩(鸩8鸩:鸩@鸩H鸩^鸩f鸩

鸩Q鸩δ鸩ò鸩ô鸩ù鸩p鸩

鸩>鸩B鸩\鸩` 鸩δ鸩ø鸩ô鸩ö鸩1

鸩\$鸩&鸩8鸩:鸩>鸩B鸩ô鸩

à ”

瓨H瓨J瓨\瓨^瓨h瓨1瓨

p v z | ~

8 : x z

à â ä è ” Z \ p

(J R h n t | ~

° , ° ¼ ò ú ü Þ à â è ð

梘戠 \$ è ê ì

D&H&J&N&b&d&Ä&Î&ö&p&

J&1&b&d&Ä&È&Ê&8

<

ö

r□V□X□F

B‡F‡H‡J‡n‡p‡n≤r≤t≤v≤´≤¼

H‡J‡n‡p‡t≤v≤2⊕

○(○*○NOPO`○b○° ○²○Ï○ò○ô○ö○2∏6∏Û(○)à(○). 𠄎𠄎2𠄎𠄎h𠄎𠄎1

𠄎𠄎~𠄎𠄎

6万8万v万x万¶万, 万∅万Û万p万ä万ô万ú万p万

、

丸

莧

馗
亶
躄
付
仃
仞
令
仞
合
伍
仞
仞
估
倂
倂
偷
咱
傾
帶
兔
兕
刺
劫
尢
加
劦
劦
嘸
嘸
嘸

嘍
囂
磨
彈
塔
埭
堪

柳恋昔

蘼
熈
劇
蝮
蝮
蜺
硯
詭
諛
輶
鈔
鞞
鞞
鮪
鮪
鮪
鮪
仞
仞
尅

邵
丛
咬
啣
嗦
埙
埴
坞
夹
ú

堇, 堇T堇V堇`堇j堇l堇p堇r堇t堇x堇 | 堇~堇

堪
埙
塔
埶
埴
埴
塬
塹
场
塌
塶
砖
塾
墀
夹
奄
奩
奈

寸
硎
尅
扇
屨
岴
岐
嵐
岵
岬
岫
岵
嵒
嶠
嶂
嶟
摧
嶸
嵌
嶂
嶮
嶷
峯
峴
峽
峩
巖
嶝

幔
贻
建
乃
悒
恣
恪
恬
悦
恣
怡
怒
懈
懊
宸
扈
搂
拒
搜
搞
擒
担
攸

梘戾备@备

娇

柳恋夹

忝

媿

宄
扇
屈
嵇
嵒
嵌
嵎
嵐
峽
堯
幄
弼
怗
懈
成
掬
搜
搞
支
旌
檣
榘
檣
檣
檣
檣
毋
沫
ú
攸

腊
腐
蝼
腭
腮
眼
腩
腾
膊
臄
膘

柳恋沫

滦
焮
颀
现
盾
瞽
矜
砭
砮
砷
砮
昉
犸
糝
紕
紕
紕
紕
紕

貔
豨
迈
迟
逢
迢
铮
针
钞
阙
闾
间
陲
阴
驄

ú

肋℄肋”与&与f菱j菱ê菱î菱ð菱ô菱

膘
腰
舳
舳
萃
荪
荇
蒹
菰
庵
菽
萄

觉
试
訖
詮
诘
诚
訛
諱
溢
謫
谣
貌
貲
賤
赏
赔
贤
赋
賤
賄
賃
贤
贬

诎D诎P诎à诎â诎æ诎î诎ð诎ò诎\$贽, 贽ù

榘尫贽2贽: 贽^贽d贽f贽n贽

柳回贬

贲

贺

贊
赤
赦
赧
越
越
趯
趯
趯
趯
踴
踴
踴
躅
輶
輶
迂
迂
迂
迈
迈
迈
逢
逆
遜
逌
逌
逐
逐
遞
遞
遑
遑
遑
邨
邨
邨
罄
醞
醞

越
鮓
魮
鯈
鮓
鯈
鯈
鯈

駘駘\$駘>駘B駘D駘H駘B擧F擧j擧n擧p擧â擧\$鯈(鯈*鯈ú
樞逢Ā愜駘j擧n擧*鯈, 鯈B鯈D鯈
柳磬Ī愜駘

鮓
魮
鯈
鯈
鯈
鯈
鯈
鯈
鯈
鯈
鯈
鯈
鯈
鯈
鯈

鸨z鸨|鸨ä鸨æ鸨° 鸨6鰲t鰲v
鯈. 鯈B鯈D鯈j鯈l鯈¼鯈À鯈Ì鯈î鯈u鯈p鯈

𩺰
𩺱
𩺲
𩺳
𩺴
𩺵
𩺶
𩺷
𩺸
𩺹
𩺺
𩺻
𩺼
𩺽
𩺾
𩺿
𩻀
𩻁
𩻂
𩻃
𩻄
𩻅
𩻆
𩻇
𩻈
𩻉
𩻊
𩻋
𩻌
𩻍
𩻎
𩻏
𩻐
𩻑
𩻒
𩻓
𩻔
𩻕
𩻖
𩻗
𩻘
𩻙
𩻚
𩻛
𩻜
𩻝
𩻞
𩻟
𩻠
𩻡
𩻢
𩻣
𩻤
𩻥
𩻦
𩻧
𩻨
𩻩
𩻪
𩻫
𩻬
𩻭
𩻮
𩻯
𩻰
𩻱
𩻲
𩻳
𩻴
𩻵
𩻶
𩻷
𩻸
𩻹
𩻺
𩻻
𩻼
𩻽
𩻾
𩻿
𩼀
𩼁
𩼂
𩼃
𩼄
𩼅
𩼆
𩼇
𩼈
𩼉
𩼊
𩼋
𩼌
𩼍
𩼎
𩼏
𩼐
𩼑
𩼒
𩼓
𩼔
𩼕
𩼖
𩼗
𩼘
𩼙
𩼚
𩼛
𩼜
𩼝
𩼞
𩼟
𩼠
𩼡
𩼢
𩼣
𩼤
𩼥
𩼦
𩼧
𩼨
𩼩
𩼪
𩼫
𩼬
𩼭
𩼮
𩼯
𩼰
𩼱
𩼲
𩼳
𩼴
𩼵
𩼶
𩼷
𩼸
𩼹
𩼺
𩼻
𩼼
𩼽
𩼾
𩼿
𩽀
𩽁
𩽂
𩽃
𩽄
𩽅
𩽆
𩽇
𩽈
𩽉
𩽊
𩽋
𩽌
𩽍
𩽎
𩽏
𩽐
𩽑
𩽒
𩽓
𩽔
𩽕
𩽖
𩽗
𩽘
𩽙
𩽚
𩽛
𩽜
𩽝
𩽞
𩽟
𩽠
𩽡
𩽢
𩽣
𩽤
𩽥
𩽦
𩽧
𩽨
𩽩
𩽪
𩽫
𩽬
𩽭
𩽮
𩽯
𩽰
𩽱
𩽲
𩽳
𩽴
𩽵
𩽶
𩽷
𩽸
𩽹
𩽺
𩽻
𩽼
𩽽
𩽾
𩽿
𩾀
𩾁
𩾂
𩾃
𩾄
𩾅
𩾆
𩾇
𩾈
𩾉
𩾊
𩾋
𩾌
𩾍
𩾎
𩾏
𩾐
𩾑
𩾒
𩾓
𩾔
𩾕
𩾖
𩾗
𩾘
𩾙
𩾚
𩾛
𩾜
𩾝
𩾞
𩾟
𩾠
𩾡
𩾢
𩾣
𩾤
𩾥
𩾦
𩾧
𩾨
𩾩
𩾪
𩾫
𩾬
𩾭
𩾮
𩾯
𩾰
𩾱
𩾲
𩾳
𩾴
𩾵
𩾶
𩾷
𩾸
𩾹
𩾺
𩾻
𩾼
𩾽
𩾾
𩾿
𩿀
𩿁
𩿂
𩿃
𩿄
𩿅
𩿆
𩿇
𩿈
𩿉
𩿊
𩿋
𩿌
𩿍
𩿎
𩿏
𩿐
𩿑
𩿒
𩿓
𩿔
𩿕
𩿖
𩿗
𩿘
𩿙
𩿚
𩿛
𩿜
𩿝
𩿞
𩿟
𩿠
𩿡
𩿢
𩿣
𩿤
𩿥
𩿦
𩿧
𩿨
𩿩
𩿪
𩿫
𩿬
𩿭
𩿮
𩿯
𩿰
𩿱
𩿲
𩿳
𩿴
𩿵
𩿶
𩿷
𩿸
𩿹
𩿺
𩿻
𩿼
𩿽
𩿾
𩿿
𪀀
𪀁
𪀂
𪀃
𪀄
𪀅
𪀆
𪀇
𪀈
𪀉
𪀊
𪀋
𪀌
𪀍
𪀎
𪀏
𪀐
𪀑
𪀒
𪀓
𪀔
𪀕
𪀖
𪀗
𪀘
𪀙
𪀚
𪀛
𪀜
𪀝
𪀞
𪀟
𪀠
𪀡
𪀢
𪀣
𪀤
𪀥
𪀦
𪀧
𪀨
𪀩
𪀪
𪀫
𪀬
𪀭
𪀮
𪀯
𪀰
𪀱
𪀲
𪀳
𪀴
𪀵
𪀶
𪀷
𪀸
𪀹
𪀺
𪀻
𪀼
𪀽
𪀾
𪀿
𪀽
𪀾
𪀿
𪀽
𪀾
𪀿

□

鴉\$鴉&鴉(鴉*鴉, 鴉z鴉|鴉'鴉||鴉P鴉â鴉ä鴉æ鴉^a 鰲-鰲P

j 1 , T 鴉x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ú

J P j n r t

鴉

鴉

鴉

裕
亶
鏢
彭
庠
忬
玢
钺
滅
婁
斲
眈
壕
礮
恠
埖
梓
歛
絕
桃

汇报

(* Z b d f h

l

p

t

柳恋

扛

叔

(* J l

n

p

r

柳佂 佂 仪 佂 币 佂 槩ĩ

∈ ∈ R ∈ T ∈ Z □ ü

| ∅ R ∈ T ∈ ` □ ° □ P ---- T ----

& < . < 0 < 2 < 4 < 8 < t < v <

徠 d 佂 1 佂 r 佂 z 佂 ô Xj Ü Xj æ Xj è Xj ò Xj ö Xj > 匈 F 匈 Ä 呷 呷 Ô 嘈 Ö 嘈 Î 圈 D 圈

垠, 条4条1条N条

条条 佂 条&变(变*变ü

梘拔 Xj Ö Xj ò Xj ö Xj ü 匈

条4变F 娆H 娆h 娆j 娆 (师 〇 师 佂 师ª 师- 师ü 师0 弈4 弈r 世

𠃉è棧:滄>滄

滄J滌~滌ú

变2变D变F变F烧J烧h烧j烧

烧è烧ò烧(专0专^专f专h专p专È专Ø专Ú专Û专b专â专` 密f密|密

密0师8师:师<师Q师²师´师¼师¾师À师Â师Ä师Æ师È师ò师ô师ø师ù师

弈弈\$弈0弈4弈B弈à弈è弈ì弈z悒

悒·愈ª愈”戈\$戈V戈X戈&挈. 挈`挈b挈

毡Q毡|毡:滄F滄^滄h滄j滄t滄v滄x滄

滄. 济0济°济¼济~滌

熈\$熈&熈Æ熈È熈2狎4狎~狎

狎·狎ª狎Ú狎â狎ì狎î狎ú狎ü狎Ø琿Ú琿, 瓢. 瓢t瓢v瓢ò瓢Ø瓢

瘿p瘿r瘿|瘿¬瘿®瘿° 瘿@眈F眈`眈b眈ĥ眈Û眈B眈à眈æ眈ì眈Z硃\硃^硃j

硃B硃à硃\$碓*碓4碓ú

碓*熈Ú狎â狎ú狎ü狎d琿Ø琿Ú琿®瘿° 瘿@眈B眈D眈F眈`眈b眈B眈

硃Z硃\硃d硃\$碓Z碓^碓”秆\$秆\秆Q秆ú

碓6碓N碓P碓Z碓^碓¢碓Q碓¬碓´碓¶碓, 碓”秆\$秆8秆:秆\秆^秆j秆~秆

笄”笄\$笄R笄T笄

纒<縈>縈P纒R纒

脉T兴Z兴\兴^兴

苳”苳*苳2苳4苳6苳

苳苳”苳R苳`苳b苳j苳1苳t苳ä苳ü

梔护秆R笄Z笄1笄ò笄x纒Â縈

纒:耆Q耆´脉\兴^兴

苳D苳0苳x苳ä苳è苳ð苳ô苳2蓁6蓁1蓁P蓁X蓁ú

蓁蓁2蓁6蓁>蓁@蓁1蓁b蓁h蓁p蓁r蓁v蓁x蓁|蓁è蕝ì蕝ð蕝ô蕝b蜈f蜈B蟹

D蟹z蟹

计\$计&计>计@计^计`计

计0晷2晷x晷

踈\$踈*踈, 踈. 踈<踈>踈@踈D踈H踈1踈Z踈`踈b踈p踈v踈x踈ô踈ö踈è踈è

踈一辘®辘ì辘î辘è辘î辘ò辘ù
 柳公 ㄟ 仪 ㄟ 币 ㄟ 繫ĩ
 梘塘蕈\蕈^蕈b蕈d蜈f蜈B螫D螫
 種Ù種\$计&计b计
 计ô计, 踈. 踈v踈x踈
 迥ç鄒Q鄒X钗Z钗ú
 迥F迥H迥^迥j迥n迥t迥v迥|迥
 迥¼迥À迥Ø迥ä迥æ迥ú迥f鄒h鄒t鄒v鄒
 钗钗<钗>钗X钗Z钗j钗1钗¼钗¾钗Ú钗Û钗2钗4钗®钗° 钗È钗Ì钗
 鑄2锈:锈<锈D锈
 锈è锈ò锈ò锈ô锈ö锈ú锈T闕Z闕
 闕P闕æ闕è闕ì闕霈”霈&霈*霈, 霈6霈j霈r霈t霈v霈x霈ù
 梘拘钗j钗1钗*钗ô钗
 鑄*锈^闕P闕Z資è資
 鰈
 鰈B鰈F鰈^鰈b鰈d鰈h鰈
 霈z霈®霈’霈°霈¼霈, 须. 须4须6须
 資R資X資v資^資
 資0駢2駢6駢8駢^鬃
 鬃È鬃Ê鬃à鬃é鬃î鬃ö鬃ú鬃
 鰈
 鰈&鰈2鰈B鰈F鰈^鰈h鰈ú
 2 < * > * @ * B * D * ò

柳公□侏□仪□币□繫ĩ幼也可看出「圈套」之说’难以自圆。

第六章

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近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炽热追求的目标。

1953年，中国人民终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中共中央批准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¹确定走苏联走过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当时是经过慎重比较的。

1 〈80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

从十六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走向工业化基本上有三条路：一是英国、美国，从轻工业起步的发展道路；二是日本和德国，在英、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实行轻重工业并重的发展道路；三是苏联，为在短时期内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了一条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对于苏联在二十世纪30年代工业

36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 11-1 向社会主义过渡

化的发展速度和建设成就，在全世界是得到公认的。194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界就有人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是「先图强，后致富」：否则外国一入侵就会毁于一旦。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毛泽东于1944年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化！！”5.861；”）的多次谈话中，曾经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2

新中国建国之初，中共中央领导人鉴于国民经济基础薄弱，资金缺乏，也曾有过先从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和轻工业起步，以便为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发展积累资金的设想。3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防安全问题更加突出，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中国实行封锁、遏制政策，国际环境也随之恶化。

2董志凯等：《1951年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页115。

3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1951年7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949-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283—284；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页106。

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是，1952年，中国的工业虽然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7%，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7%。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邻国印度，以1950年的数字为例，人均钢产量，中国为1.1公斤，印度为4.1公斤，美国为577公斤；人均发电量，中国为8.2千瓦小时，印度为14.3千瓦小时，美国为2153千瓦小时。从1860年上海建立江南造船厂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旧中国的机械制造业竟没有造出一个火车头和一艘海轮。毛泽东曾有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甚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

369

第六章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紧张的国际形势，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较多地考虑为国防现代化所必须的重工业建设。鉴于旧中国的轻工业相对说

来还有一些基础，当时由于销路和原料的限制，设备利用率还很低，增产潜力还很大，考虑到农业增产当时只能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劳动和资金投入，因此，国家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也有客观可能。经过权衡比较，中共中央选择了苏联所走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关于工业化的标准，大体上也参照了苏联的标准：数量上，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60%；质量上，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发展速度，大体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时间实现，也就成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依据。

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当时既存在着相当大困难，也有着一定的有利条件。从政治上看，新中国建立了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机构，共产党和政府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具有强大的动员号召能力，这是战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曾有过的；从经济上看，民主革命彻底清除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封建制度、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通过统一财经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经济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如：通货膨胀率比较低、社会就业率比较高等），这在战后发展中国家以至发达国家也是少有的。从国际环境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固然给中国的工业化带来很大困难，但是有可能得到苏联大规模、全面的经济技术援助，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的。不利条件是：

第一，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的现状，决定着资金的积累主要靠农业。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改造，农业在相当长时间基本上无力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因而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的落后状况，不能不使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和稳步发展受到极大制约。

第二，由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又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因此也就造成了国民经济计划的不确定性。因为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在上年底最迟当年初就定下来，而农业的收成如何，要到当年的九月秋收时节才能明了，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八月十五(农曆中秋节^引者注)月光明」。这样，就决定了计划的不稳定性。

第三，工杆技术干部培[^]不及和劳勅力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不是短期内能得到解决的。建国初期，全国人1—²中文盲高达90呢。据测算：第一个化年计划期间，工业和交通运输两项需要增加技术人员39.5万人，五年内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业生仅有28.6万人（其中三分之二为中专生），相差近11万人。

第四，人口相对过剩严重，而消费水平又不断提高。由于人多地少和经济落后，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据统计，1952年全国共有农业剩余劳动力（全劳力和半劳力）4039万人，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6.87。。第一个五年计割期间，又是中国自1840年代鸦片战争以来百年社会动乱结束后的人口增长高峰期，五年内将净增人口7171万。由于人口多，增长快，加上长期生活水平太低，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人民的生活消费需求将大大增加。因此，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将长时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以上这些不利因素，对经济建设和工业化进程，将长期起着制约的作用。

2借鉴苏联经验和争取援助

为实现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好转和各方面工作的实际情况，就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会议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周恩来、陈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薄一波（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宋劭文《中财委计划局局长)组成，负责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由于数据不全，又缺乏经验，加上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苏联可能给予援助的项目尚待谈判，因此，直到1952年6月才向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提交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1)及其〈总说明〉。

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提出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并保证国家经济向社会主义前

进。五年计划的方针是：经济建设的重点是工业，工业建设又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五年建设的布局是：要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与目前实际情况相结合。因此要充分利用东北及上海的工业基础，并继续培养与充分利用这些工业基础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基地创造条件。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点四，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七，五年货币发行量增长一倍。五年基本建设投资505亿元。军事工业以平时100个步兵师、战时300个步兵师的装备和弹药为基础。

此后，由周恩来亲自主持进行综合调整形成《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同时起草了《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这两个文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认为可以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要求的基本依据。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启程赴苏联访问。主要任务是将五年计划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并争取苏联的援助。代表团成员包括：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驻苏联大使）、粟裕（副总参谋长）；其它主要成员有：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中财委计划局局长宋劭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炮兵副司令员邱创成、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邮电部副部长王诤、外交部政治秘书师哲、东欧司司长徐以新和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共六十五人。⁵

周恩来一行8月17日抵达莫斯科。20日，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陪同会见的有莫洛托夫³；¹51¹01010¹、维辛斯基（八！化；丫.^^? !!!!!^）。对此次与斯大林的会谈，

周恩来在向中央发出的电报中说：

（中国代表团 引者注）在说明我们报告和商谈的程序时

斯大林同志插话并答复问题甚多，提到感谢苏联的援助时，斯说，我们在朝鲜作战和橡胶两事上，也是援助苏联。

对工业资源的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数据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事，肯定地回答愿尽力之所及予以帮助，只对专家问题，觉得人数太多，说要按需要派。关于军事装备和军事工业，他强调我们应着重自己生产飞机，从修理经遏装配到制造，并从小到大，以利培养干部，掌握技术，否则单有工厂没有人才，绝对不行。6

最后，斯大林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1881.8.18）、米高扬（1903.5.13）、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在代表团将《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及中国国防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

俄文译本送交苏方后，9月3日，斯大林约中国代表团第二次会谈，

苏方出席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1901.12.1）、贝利亚

（1899.12.1）、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1898.12.1）

（1901.12.1）、维辛斯基、库米金；中方出席的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周恩来首先向苏方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经济情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针和主要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事项等。斯大林对周恩来的情况介绍给予了积极的响应，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接着谈了对五年计划的意见。

关于五年计划，斯首先问：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百分之二十，是勉强的，还是有后备力量的。周答以我们对此尚无经验。我们许多计划常常对潜在力量估计不足，故今徒五年计划，可能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还要看苏方能否供应我们这样数量的工业装备。斯说：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五年计划中，每年要超过百分之一，其数量总是比过去大的。次之，在五

年计划中，你们未将民用工业与军事工业和装备计算在一起，这是不应该的。只有将它们放在一起，才便于掌握情沈和调度。在你们的材料中没有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最后肯定意见，需要两个月时间加以计算之后，才能说可以给你们甚么，不给你们甚么。据我们自己经验，五年计划至少有一年准备，审查方案还要两三个月。即令如此，也还可能有错^，预先估计到各种情^和困难是不可能的。谈到最后，斯具体指出：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百分之十五，每年生产计划应定为百分之二十，要动员工人来完成和超过这一计划。意外情沉总会有的，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

关于代表团行动问题，斯问用，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你恐不能留在这里等。周答’我们来时预定我和陈云同志在9月中就要回去，李富春同志和一部分同志留下。7

9月6日，周恩来两次致信莫洛托夫，一是向他提出：中国在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从苏联进口装备、普通货物和非贸易支出所要支付的外汇，同中国对苏联出口和非贸易收入二者之间，将出现四十六亿多卢布的逆差，因而需要请苏联政府给予中国贷款。二是提请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种技术数据，以帮助提高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准。同时，周恩来还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订货单、委托苏联帮助设计的建设项目名单、聘请各类苏联专家名单等文件数据送交苏联方面。

9月15日，周恩来出席《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帘》等文件的签字仪式。在安排好代表团与苏联政府的谈判议程和方针后，周恩来指定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领导各组继续进行谈判。随后，周恩来、陈云’粟裕一行十七人于9月22日离开莫斯科，24日返抵北京。

3 苏联援助协议的签订

周恩来、陈云回国后，由李富春领导的中国代表，转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萨布洛夫^{0^3^}；！！！2.5&!
^ [0^

接待。李富春对中国情况和「一五」计划纲要向苏方作了详细说明，并将有关中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等有关资料的俄文译本交给苏方进行研究，征求他们的意见。按照苏联国家计委和李富春商量的意见，9、10两月，苏联政府有关部、局着重研究中国「一五」计划和需要苏联援助的项目；中国代表团成员则分别向苏联有关部、局介绍有关的具体情况。从11月开始，中苏谈判逐渐进入实质性阶段，就中国「一五」计划的方针和建设任务交换意见，具体讨论需要建设的项目、可以缓建的项目和苏方可能援助的项目。

经过双方多次谈判，1953年3月30日，米高扬约见李富春，就中国「一五」计划草案和苏联援建项目代表苏联政府比较系统地发表了意见。米高扬说，苏联政府认为，除了这次在国家计委会谈的项目以及苏联过去已经确定的援助项目外，苏联还可以承担其它项目的设计、设备交付以及其它方面的援助。这里有三张表：一张是民用工业的表，一张是国防工业的表。这两张表上所列项目的企业规模、设计工期、交付设备的日期等方面的要求，都已印在表上。还有一张是有色金属的几个项目，苏联政府需要在研究地质资料和设计方案后，再商量为有关企业的建设提供部分设备或全部设备的问题。

关于中国工业的发展与建设问题，米高扬说，企业规模不应太大，炼油厂搞100万吨就不算小了，中国要在一个地方建设300万吨的炼油厂，按现时的技术水平是不经济的。钢铁厂，你们提出建设两个年产200至300万吨的钢铁厂’太大了。从经济合理性上看，建设120至150万吨的钢厂比建设300万吨的钢厂花钱少而时间快，好管理。将来有扩充条件时，再进行扩建。扩建改建比较经济合理，可以少走弯路。还说，工厂与工

厂之间应该相互配套，不能指望一切产品都在一个工厂生产。中国提出的设计项目，有些可以不建新厂，用改建、扩建现有的厂代替新建企业就可以了。这样投资少，收效也大。

关于设备供应问题，米高扬强调，不能完全依靠进口，哪怕是大规模的工厂，也有些机器是简单的，可以自己生产。例如，有色金属冶炼、黑色金属冶炼，甚至机器制造等，有许多设备自己完全可以生产。他建议，计划供应的设备中，苏联供应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中国自己制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这样既减少进口，又培养了人才，提高了技术。

米高扬表示，苏联对设计工作、派遣专家、接受实习生、留学生等都提供优惠条件，允许无偿给予中国新产品的制造许可证。还同意派出电气化、黑色和有色冶金、机器制造、造船工业、黄河和嫩江总体设计等五个综合组的专家。

4月4日、米高扬再次约李富春商谈。米高扬通报了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一）从中国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考虑，中国「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二）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因此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调低到百分之十四至十五为宜；（三）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四）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五）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工业，以补充大工业的不足；（六）要十分注意农业的发展，不仅要大量生产质量好、价格低的农机具和肥料，还要保证工业品对农村的供应，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七）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八）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

会谈中，米高扬也提请中国供应苏联或替苏联从国际市场上采购物资的清单。米高扬说，苏联供给中国设备，也要求中国供给苏联相应的东西。由于西方国家对苏联实行封锁和禁运，苏联从国际市场上采购有色金

属、橡胶等战略物资，需请中国帮助采购。有些中国能够生产的物资，希望中国供应苏联。具体要求是：从1954到1959年从中国得到钨砂16万吨、锡11万吨、钼砂3.8万吨、铜2.5万吨、铋3万吨、

橡胶9万吨、羊毛2万吨、麻6万吨等。至于1953年交付的物资，则按已经决定的来做，没有甚么改变了。他还建议中国在海南岛利用当地的热带气候种植橡胶。8

李富春表示，苏方经过七个月的研究，对中国的「一五」计划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将向中央汇报。

周恩来、陈云对李富春委托宋劭文返回北京汇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表示满意。中共中央覆信李富春说，赞成苏联对我国五年计划提出的建议，赞成苏方提出的一、二、三号清单设计项目，认为砍掉的部分砍得好！因为砍掉的主要属于没有地质资料的、自己办得了的和几年后才能用得上的。除以上三类外，其余设计项目苏方充分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应感谢他们。中央的覆信，还对扩建、改建重工业厂矿、派遣专家与苏方商酌。覆信授权李富春对协议文字进行斟酌，并代表中国政府签字。李富春于4月25日致电中央报告再次与米高扬商谈的结果。4月30日，中共中央电示李富春：

我们同意你在来电和来信中所提的各项意见。请你即向米高扬同志表示：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议》、〈协议的议定书〉、〈协定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附件〉、〈议定书附件〉及〈两个清单的附注〉等八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和长期的援助。

中国党和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完成这些文件中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并即委托李富春同志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9

经过中苏双方协商，1953年5月15日和6月4日，李富春和米高扬代表中

苏两国政府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议定书》上签字。这些文件表明，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已用条文形式固定了下来。

8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页68。9转引自《李富春传》页443。来。根据《协议》，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中国的50个，总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再次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又追加15个项目，10使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达到156个。

10关于1954年10月由赫鲁晓夫；“(! ^."!^^!!”)：，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签署多项协议及援助项目的确定，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曾发生过一段插曲。1954年9月25日晚上，米高扬在确认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所讨论的为北京谈判准备的全部协议草案和其它文件草案已经吸纳了主席团成员的所有意见后，随即向赫鲁晓夫报告说：「我认真地、从头到尾地阅读了准备在中国讨论的全部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中央主席团昨天会议上的所有意见，文件已经全部印完。」米高扬建议不再召集主席团会议进行表决，而由赫鲁晓夫和他本人带头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派科瓦利1□1.1^—1，连夜专程送主席团各成员传阅签字。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后，米高扬便确实7顺序。米高扬告诉科瓦利，最后到伏罗希洛夫(! ^!!! ^旭丫.义。!^^~)那里去，因他住在郊外别墅，而且年事已高，很少出来活动，估计不会有甚么意见。传阅和表决一直很顺利，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都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文件，并签名同意，他们指出，「文件对发展和加强苏中友谊和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午夜十二时以后，科瓦利最后来到伏罗希洛夫的别墅，伏罗希洛夫正穿着睡衣&前靡等待。他把文件看了约一个小时，随后说：「向米高扬报告，我反对。」说完就去睡觉了。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对伏罗希洛夫的表态十分惊讶，立即决定第二天上午召集主席团会议。9月26日上午十一时，全体中央主席团II成员出席了会议。赫鲁晓夫要求伏罗希洛夫谈谈反对的理由。伏说：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党和中央委员会，今天并没有因为我有不同意见而逮捕我，把我送进监狱，而是让我自由表述意见。我认为，目前随处“151”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战争而造成的可怕后果“我国人民无力承担在中国的这样一番大事业。需要设计和供应如此复杂的设备，谈何容易！这需要成千上万的专家去工作。此外，就在不久前我们还解释说，我们宣布对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作战：目的就是收复旅顺口和俄日战争期间沙俄丧失的领地，而现在我们又要把它们交出太“。或许“应该就这件事问问大家的想法：即使不问，至少也得让人们对此有所准备。」对此，赫鲁晓夫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赫强调说：现在所说的原沙俄领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只是根据租赁协议，也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由双方“共同使用。后来根据中国政府1952年9月15日的请求，有关旅顺口的协议已经延长了。赫指出，如果不是建立在经济互利、相互需要和彼此承担义务的坚实基础上，那么两国之间的任何友好条约都不可能是长久的。「这是一个重要时期，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庆祝自己建国五周年之际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改变其几百年的落后状态，而我们不能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即将来临的五年采取最重要的措施：那么，我们就将失去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机遇。」赫还表示“没有这些实际内容，苏联派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庆典、同毛泽东的会谈，将变得毫无意义。在赫鲁晓夫的带动下，其它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发表大致相同的意见。最后，伏罗希洛夫勉强在文件上签了字，会议遂告结束。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页190—192。

这156项工程，事实上就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干。当年的苏联政府，从勘测、设计、设备的供应和安装，直到技术力量的培训，都给予了巨大的援助。当然，这种援助并非单向的，也不是无偿的，而是通过贸易方式在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实现的。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其稀缺的廉价的农产品、稀有矿产资源和国际通用货币等等。而且，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政权的巩固，都有力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无论如何，

如陈云在1980年代回顾这段历史时深情地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¹¹

二「一五」计划的出台1国家计委的建立和五年计划的编制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以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加强国家经济建设工作的统一和集中领导。任命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志文、马洪、薛暮桥为委员。秘书长马洪、副秘书长王光伟〔1953年9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任命：李富春、贾拓夫为国家计委副主任〕。

II陈云：〈对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的几点意见〉（1981年3月）载《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286。

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编制计划应遵循的几条原则：第一，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来从事国家经济建设，这是制订计划的出发点，并且要以此来考虑国家工业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分布和比例。第二，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建设的重点，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速旨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第三，必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反对保守主义。第四，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计划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第五，必须广泛吸收群众特别是各部门中先进人物参加讨论计划，以提高计划的科学程度。¹²

关于「一五」计划的草拟工作，周恩来、陈云从苏联回来以后，1953年1、2月间，陈云等根据在苏联商谈的情况，对「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就重新作了一次计算。1953年6月，在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协议签

订之后，国家计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参考苏联国家计委对中方「一五」计划草案提出的意见，对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规定的各项具体任务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总结和修改。195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云任组长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成员有：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13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毛泽东下了「军令状」，要求从2月15日起，用一个月时间拿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初稿。

为使编制工作快速有效地进行，陈云要求各部门「指定部长或副部长一人专门负责搞五年计划。被指定的同志一定要亲自动手」。有关时间要求，陈云说：国家计委「要求各部甚么时候将有关指擦交出，由富春同志通知」。对具体编制工作需要注意的问题，陈云指出：

一是基本建设投资愈算愈多，而财政上的钱不[^]用。各部要切实计算每个项目的投资，以及少搞些项目和延长一些项目的完

12《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1，页32—33。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1905—[^]? 》），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页196。「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1953年6月已由国家计委接手，这时中央再度指定陈云负责，而不由国家计委主席高岗牵头，显然是有原因的：一是陈云已管多时，又直接参与了和苏联的谈判[^]对全盘情况比高岗熟悉；二是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已不点名地揭露和批评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非组织活动，

成时间。总的原则是要灭去那些杂七杂八的，但不能灭去那些重要的和必须搞的项目，特别是141个已定的项目不能威。

二是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我们要搞工业建设，又要维持市场供应。但保证141个项目的完成是第一位的任务[^]维持市场供应是第二位的任务，

二者不能并重：可是也不能把市场搞得大紧张，要使社会不出岔子，要使民生稳定。

三是农业发展速度。现在整个看来，买油排队，猪肉供应不足，都说明农业增产超不上国家建设的需要。要真正根本解决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第一个五年计划还不行。如果农业发展速度超不上，计划就很难平衡。必须把农业发展速度提高些。摆在面前的最有效办法是实行农业合作化。这是投资不用太多，又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同时也可以考虑从总投资中挤出一些钱来增加对农业的投资。14

由于苏联援助建设的项目已经确定，设计和设备安装的时间已大体排好；朝鲜战争已经停了下来，军费和意外支出都已减少；经过1953年一年的建设，也摸到了一些经验，编制详细具体的「一五」计划草案的条件基本成熟。经过紧张的工作，陈云领导的八人工作小组¹⁴1954年4月15日将五年计划纲要初稿报送中央。陈云致信毛泽东报告说：

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名为一九五三¹⁵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纲要〕已于四月十五日印好，送给尚昆同志了，大概他就可以送给你。此外，还有一些附件尚未完工，完工后也当送上。

因为等待这本初稿出来，所以从前你指定的八人小组〔中有高岗〕尚未开会，待下星期才能开第一次会来讨论这个初稿。

同时有些数字，计委方面也仍在斟酌，会有若干改动。15

14陈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研究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问题会议上的讲话¹⁶录¹⁷1954年

2月19日¹⁸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国家计委召开会议研究五年计划编制问题给刘少奇的简报¹⁹1954年2月23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下册，页890—891。15陈云给毛泽东的信，1954年4月16日。参见《陈云传》，

下册，页892。

4月22日、5月3日、5月6日，陈云先后三次主持纲要草案编制工作小组会议，对初稿进行讨论。会后，陈云、李富春、贾拓夫、张玺等对大家提出的意见按问题逐个进行研究，对纲要初稿作了修改，随即上报中央。6月29日至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陈云就「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主要指针，主要产品的产量，基本建设的规模，编制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以及存在的缺点和补救办法等问题作了汇报。同时建议，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不要过早出台，继续坚持边执行、边观察、边调整。他说：现在所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大体轮廓已定，但各种数字的小变动是一定会有的。由于间接计划部分很大，因此这个计划应经过地方党委在更大范围内加以讨论。

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初稿进行了认真审阅。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广州集中，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审核。11月，由陈云在京主持中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广州审议五年计划草案提出的意见，会议用一天的时间，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等问题。与之同时，地方党委也展开了讨论，并着手制订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在综合中央和地方意见的基础上，陈云、李富春等再次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补充和修正。整个编制工作先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直到1955年2月才告结束。

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于1955年3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提交同年7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认为：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这个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16

2 「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

方针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据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

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围绕上述基本任务，「一五」计划提出了以下十二项具体任务：

(1) 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

(2) 随着重工业的建设，相应地建设纺织工业和其它轻工业，建设为农业服务的新的中小型的工业企业，以便适应城乡人民对日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3) 在建设新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生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任务的完成，主要地还是依靠原有的企业。

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联合中农，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推动农业生产的合作运动，以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来初步地改造小农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对农业进行初步的技术改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同时也发挥单干农民潜在的生产力量，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开垦荒地，加强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以保证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和棉花生产的进一

步发展，逐步地克服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注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广泛地开展关于保持水土的工作。促进畜牧业和水产业的发展，增加农业特产品的生产。

⑤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涨，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主要是铁路的建设，同时发展内河和海上的运输，扩大公路、民用航空和邮电事业的建设。

⑥ 在国家的统筹安排的方针下，按照个体手工业、个体运输业和独立小商业等不同行业的情况，分别地用不同的合作形式把它们逐步地组织起来，使它们能够有效地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服务。

(刀继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正确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对它们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根据需求和可能，逐步地扩展公私合营的企业，加强对私营工业产品的加工、订货和收购的工作，并稳步地和分别地使私营商业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执行代销、经销等业务。

⑧保证市场的稳定。继续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增加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随着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应地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对生产增长赶不上需要增长的某些主要的工业农业产品，在努力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地实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

(^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积极地培养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人材。

(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建设。

(^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继续加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互助和合作，促进各少数民族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根据上述任务，「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为：

基本建设。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五年合计为427.4亿元，其中工业部门为248.5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8.27。。在工业基本投资中，对制造生

产数据工业的投资占88.87%，对制造消费数据工业的投资占11.27%。五年内，工业方面新建和改建的限额以上施工单位共694个，加上农林水利、运输邮电、文教卫生等，全部限额以上施工单位达1600个，此外，还有限额以下施工单位6000多个。

从基本建设投资的区域布局来看，为了改变原有工业布局的畸形状况，「一五」计划作了妥善部署，一方面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它沿海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强调东北工业基地的改建，在694个限额以上的工业基本建设项目中，有222个放在了东北和沿海地区；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加强内地工业基础的建设。

(!)工农业。工农业总产值计划由1952年的827.1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1249.9亿元，增长51.17%，平均每年增长8.67%。

工业。工业总产值计划由1952年的270.1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535.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4.77%。其中生产数据的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7.8%，消费数据的生产平均每年增长。另外，手工业总产值则计划由1952年的73.1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117.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97%。

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的发展速度安排较快，平均每年增长8.1%，国营工业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将由1952年的52.87%上升到61.37%；另外，合作社营工业则由3.27%上升为4.47%，公私合营工业由5%上升为22.19%；而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则由39%下降为12%，其产值将由1952年的105.3亿元降至1957年的65.6亿元。

农业。农业及副业总产值计划由1952年的483.9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596.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37%。其中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3%，棉花平均每年增长4.69%。五年内，全国将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农户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东北各省、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和其它老解放区的入社农户可能达到半数左右；在经济作物地区和城市郊区，将努力争取先一步合作化。

回运输和邮电。五年内国家对运输和邮电部门的投资总额为89.9亿元，占国家经济文教事业支出总额的11.77%，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为82.1亿元，占国家对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9.27%。由于铁路是国家运

输的主要力量，在现代运输工具中、铁路负担了80%以上的运输任务，因此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为56.7亿元，在加强和改造现有铁路的同时，新建铁路干支线约4084公里，使铁路货运量在五年内增长85.97%，货物周转量增长1017%，客运量增长51.37%，旅客周转量增长59.57%。五年内，由中央投资公路10000公里以上，新增加通车里程约7000公里。在邮政方面，五年内邮路总长度将增长45.2%。

(^)商业和对外贸易。社会商品流转额1957年将比1952年增长80%左右。从公私比重变化看，国营商业将由1952年的15.87%上升到1957年的20.57%，合作社营商业将由18.27%上升到34.47%，私营商业所占比重将由66%下降至45.17%。

口)教育方面。五年内将新建高等学校60所，使总数达到208所，1957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将比1952年增长127.47%。但是中等专业学校的在校学生数1957年仅比1952年增长5.67%。另外，五年内将派遣留学生10100人(其中9400人派往苏联)，培养熟练工人92万余人。在科研方面，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研究人员将由1952年的1200余人增加到4600余人。在普通教育方面，「一五」计划的发展重点是中学，特别是高中。1957年在校高中学生将比1952年增长180%；在校初中学生将增长78.67%。小学在校学生1957年将比1952年增长17.97%。

化)人民生活方面。五年内，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月增长33%，其中工业部门增长27.1%，农林水利部门增长33.57%，基本建设单位增长19%，国家机关增长65.7%，文教卫生系统增长38.27%。农民的生活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农村购买力1957年将比1952年提高一倍。

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基于国民经济各部门是密切联繫、互相制约的，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实现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孤立地发展重工业。因此，在「一五」计划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用于农林水利部门的占7.6%，用于运输邮电部门的占19.29%，用于银行贸易部门的占37%，用于文化教育部门的占7.29%。

同时十分注意市场的稳定，强调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使国民经济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关于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反复测算，又鉴于1953和1954连续两年农业生产因受灾不能完成当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最后确定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4.77%。其中70%靠原有企业挖掘潜力，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4.37%。要求1957年达到：钢412万吨，发电量159亿度，煤11300万吨，棉布16372万匹、粮食3.856亿斤，棉花3270万担。18同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这仍然是较快的。

「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其中部分要在「二五」计划期间进行〕。对于兴建这些项目，苏方不仅提供贷款，而且从资源勘探、厂址选择、技术设计、机器设备、建筑安装到人员培训、试车投产，都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一五」计划时期，苏方派来我国的技术专家达3000人。我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达7000多人，实习生5000人。但是，计划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凡能自己解决的绝不依赖外援。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财政中来自国外的贷款，只占国家总收入的2.7%。这些贷款，从1955年开始，就以我国对苏贸易顺差分年偿还。在苏联帮助设计和装备的项目中，仍有20%至30%的设计工作量和30%至50%的机器设备由我国自己负担。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十分缺乏经验。「一五」计划的制订，只能主要借鉴苏联的建设经验，同时注意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虽然制订的过程长了一些，但由于经过反复的经济技术论证，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中期发展计划。

3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整体布局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除体现在「一五」计划的投资比例上，更体现在156项19重点工程的产业结构上。有关数据显示，156项工业建设的主体是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当时主要

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将国家安全放在紧迫的地位加以考虑；二是根据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中的瓶颈部门；三是既考虑到利用原来的工业基础，又考虑到备战和改善过去地区布局不平衡。具体项目是：

国防工业44项。它们是航空工业12项（《〈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页23说是13项）：南昌飞机厂；株洲航空发动机厂；沈阳飞机厂；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西安飞机附件厂；西安发动机附件厂；陕西兴平航空电器厂；陕西兴平机轮刹车附件厂；宝鸡航空仪表厂；哈尔滨飞机厂；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厂；南京航空液压附件厂；成都飞机厂〔成都航空发动机厂〕。电子工业10项：北京电子管厂；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等。兵器工业16项。航天工业2项。船舶工业4项。

冶金工业20项。它们是钢铁工业7项：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吉林铁合金厂；富拉尔基特钢厂；武汉钢铁公司；热河（承德、钒

钛厂；包头钢铁公司。有色金凝13项：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碳素厂（电极厂）；洛阳铜加工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株洲硬质合金厂；杨家杖子钼矿；江西大吉山钨矿；江西西华山钨矿；江西岢美山钨矿；云南锡业公司；云南东川铜矿；云南会泽铅锌矿。

能源工业52项。它们是煤炭工业25项：峰峰中央洗煤厂；峰峰通顺三号立井；大同鹅毛口立井；潞安洗煤厂；辽源中央立井；阜新海州露天煤矿；阜新平安立井；阜新高丘一号立井；抚顺西露天矿；抚顺东露天矿；抚顺龙凤矿；抚顺老虎台矿；抚顺胜利矿；通化湾沟立井；兴安台二号立井；鹤岗东山一号立井；鹤岗新安台十号立井；兴安台洗煤厂；双鸭山洗煤厂；城子河洗煤厂；城子河九号立井；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平顶山二号立井；焦作中马村立井；铜川王石凹立井。电力工业25项：北京热电厂；石家庄热电厂；太原第一热电厂；太原第二热电厂；包头四道沙河热电厂；包头宋家壕热电厂；阜新热电厂；抚顺电厂；大连热电厂；丰满水电厂；吉林热电厂；富拉尔基热电厂；佳木斯纸厂热电厂；

鄆州第二热电厂；洛阳热电厂；三门峡水利枢纽；武汉青山热电厂；株洲热电厂；重庆电厂；成都热电厂；云南个旧电厂；西安热电厂；陕西户县热电厂；兰州热电厂；乌鲁木齐热电厂。石油工业2项：兰州炼油厂；抚顺第二制油厂。

机械工业24项。它们是：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电镗厂；沈阳第二机床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第一重型机械厂；哈尔滨电碳厂；哈尔滨轴承总厂；洛阳滚珠轴承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湘潭船用电机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

化学工业和轻工业共10项。其中化学工业7项：太原化工厂；太原化肥厂；吉林氮肥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兰州氮肥厂；兰州合成橡胶厂。轻工业(包括医药)共3项：华北制药厂；太原制药厂；佳木斯造纸厂。20

上述项目的类别，充分反映了以基础工业为主的指导思想，以改变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的面貌，为实现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奠定基础。

从地区的分布来看，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实际建设的150个项目中，国防工业的44个项目大部分放在内地，布置在中部和西部地区35个，其中21个安排在四川和陕西两个省；106个民用工业项目，布置在东北地区50个，中部地区32个。

当年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

新建工业在地区上做这样的部署是费了心思的。当时，着重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就近资源。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主要摆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①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在落后地区摆点大项目，可以带动那里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②军事上的需要。开始编制计划时，

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 蒋介石集团还在妄图反攻大陆，这就迫使不得不把新建的工业企业布置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其它都没有摆在敌人飞机可以轰炸到的沿海地区。按照上述要求布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重要项目的厂址，要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方案，经过反复踏勘比较后才能确定下来。李富春同志不辞辛劳，亲自率工作组下去选择厂址。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都亲自过问，并下去看过一些厂址。当时，国家建委负责审批大项目的计划|1任务书和初步设计。审查威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园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的甚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可见，从国防考虑，从安全考虑，是当时确定厂址的主要因素之一。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 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990页298—299。

三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的展开

1工业化建设拉开序幕

1953年是工业化建设启动的第一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74.3亿元，占当年国家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一。其中工业建设投资38.5亿元，占51.777%。，铁路、交通、邮电占16.97%。开工新建的大中型项目136个，其中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南昌飞机制造厂，沈阳、上海、湘潭等地的电机、电缆厂。北京、石家庄、西安三个棉纺织业基地，等等。增加职工人数110万人，占五年增加职工422万人的26%呢强。

在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努力和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持下，在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下，1953年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都超额完成了当年的建设计划，各条战线喜报频传，建成或部分建成的重大项目有38个。1953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1952年开始新建的无缝钢

管厂、大型轧钢厂和七号高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这是新中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要工程，大大加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起步时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鞍钢全体工人写信向毛泽东主席报喜，毛泽东覆电祝贺。苏联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庆祝大会。在此期间建成的还有：海州露天煤矿，抚顺、西安、乌鲁木齐和郑州的发电厂，丰满水电站，黄河的引黄济卫工程，河北省的独流减河工程及官厅水库的主要工程等。新建铁路辅轨589公里。工业总产值达450亿元、完成计划的1187.0。比上年增长30.3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80亿元，完成计划的107.77.，比上年增长83.77.。全民所有制职工增加264万人，超过计划一倍多。

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由于各部门、各地方的建设热情很高，从上到下都想多上些项目，加上缺乏经验，对国力和经济发展可能逢到的速度了解不够，因而把工农业增长的指标定得高了一些，基本建设的盘子定得大了一些，导致市场紧张。即周恩来说的「小冒了一下」。这主要表现在：

在财政方面，预算收入打得过满，在增加收入时考虑不周。1953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薄一波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报告提出：1953年的预算总收入为233.5亿元，比1952年增长23.3%，总支出也是233.5亿元。上述预算收入不仅过满，而且已将1952年的财政结余30亿元列为当年财政收入，并且按照这个收入盘子安排财政支出。但是由于1952年的财政结余已经作为财政金库存款放在中国人民银行，而人民银行已经将其作为信贷资金贷放了出去，这就犯了「一女二嫁」的错误，使预算的盘子打大了。到1953年6月，国家财政赤字根据预算收支计算已近30亿元。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支持大规模经济建设，财政部于1952年9月决定修正税制，以保证税收增加。1953年1月1日，「新税制」开始施行。由于「新税制」加重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负担，加上时逢年关和宣传工作没有跟上，引起市场紧张和部分国营企业的不满。

(力在基本建设方面，投资摊子铺得过大。由于1952年基本建设工作不

够理想，各部门、各地方都想在1953年多搞些基本建设，因此在编制1953年预算时，就将上年的财政结余30多亿元列为当年收入，扩大了基建规模。又看到国营商业部门1952年的库存比1951年增加了24亿元，因此又通过压缩库存、挤出流动资金来安排基本建设。同时，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益，也盲目地上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项目。结果，1953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计划比1952年增长了75.5%，但是实际比上年增长83.77%，职工总数比上年增加了15.87%，工资总额增加了31.87%。而同期重工业产值则比上年增长377%，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77%，其中粮食产量仅比上年增长1.87%，棉花产量反而比上年下降9.97%。由于基本建设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数据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大大超过了农副产品的增长速度，结果使得1953年市场供求关系紧张。

0在商业和金融方面，为配合基本建设的资金需要，银行和国营商业部门过度压缩了商业库存和流动资金，引起生产和流通的不正常。1952年底，由于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库存增加，由于对物资储备和平抑物价的作用认识不足，在国家强调经济核算和基本建

设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认为商业库存过多（1952年底，国营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比1951年增加72.77%，达到75亿元），因此，国营商业部门于1953年1月共同决定压缩库存和流动资金（当时称之为「泻肚子」），并估计可以挤出30亿元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支持工业建设；银行则计划收回商业贷款20亿元，支持财政动用上年结余。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国营商业部门纷纷压缩库存，一方面对国营工业企业的某些产品和农副产品少购少销或不购不销，另一方面则大力推销库存商品甚至降价销售。这样做的结果，一是引起部分国营企业产品积压或减产，某些商品市场脱销；二是导致市场上出现「公退私进」的局面。

在农业方面，出现为追求高指标而强迫农民的急躁冒进倾向。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地方政府在编制农业计划时，由于缺乏经验，既将指标订得过高，又将计划变成指令层层布置，下达到农户；同时，为了落实1953年的农业增产指标，基层干部又受宣传的影响，将合作社作为增产的主

要措施加以推广，由此造成农村中的命令主义、「五多」现象（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和不顾条件地大办合作社。这既干扰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对于上述冒进的苗头，中共中央在当年6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及时有了察觉，会议批评了基本建设工作中的盲目性和冒进倾向，强调指出：国民经济计划，既应起动员群众的积极作用，推动各种经济事业不断前进，又应有可靠根据，符合实际可能。对于不同经济成份应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它经济成份，实行间接计划；对于不同经济成份、不同规模的企事业和不同工作水平的部门，计划应有不同的要求。同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要求通过增加生产，扩大收购和销售，加速资金周转和做好税收工作等来增加收入；厉行节约，坚决削减军事、经济、文教、行政一切可以消灭、可以推迟的事业拨款，精减军政机构，节约行政经费，节约粮食，以防止国家财政出现赤字。8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会议结论，总结当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经济建设应该遵循「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他指出，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应极大地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发展生产，保证需要。在生产实际发展的基础上，区别轻重缓急，逐步解决日益增民的场需要。二是重点建设，稳步前进。国家财力必须集中使用在建设的主要方面、反对百废俱兴；必须有足够的后备力量，以保证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建设的完成。三是既要加强集中统一，又要发挥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集中统一，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因地制宜，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搞好生产。四是为了减少盲目性和少犯错误，必须向一切有经验和知识的人们学习。

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此后，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国家计委也对1953年的年度计划作了调整，压缩支出，增加收入，经济情况迅速好转。到1953年底，财政收入经过努力达到222.9亿元，财政总支出为220.1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尚有2.8亿元的

结余。与此同时，还纠正了税收、商业、银行、农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冒进倾向。

2重点建设，稳步前进

中共中央对1953年经济建设经验的及时总结和「重点建设，稳步前进」方针的提出，对「一五」计划的继续执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54年，重大建设项目411个，当年新开工的176个。其中有：156项重点建设之一的华北制药厂，该企业建成后，可以基本上满足当时国内对青霉素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青霉素主要依靠进口的状况；西南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四川省龙溪河狮子滩发电站，这个电站建成发电后，重庆地区的工业用电成本将可以降低四分之三。开始和继续施工的新建铁路17条，当年铺轨的有12条。新建和改建公路20条。对1954年的经济建设的总体要求是：第一、基本建设，要注意投资效果，使新建和扩建企业尽快投入生产；第二、要努力提高现有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和效率；第三、无论基本建设或工业生产，要努力实现各方面的配合和协作，克服「一切只顾自己，万事不求别人」的孤立观点和分散主义现象。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要求，利于地方积极性

的发挥，政务院对财政管理体制作了改进。即在保证国家集中主要财力进行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原则，给地方一定的机动财力和管理权限，使他们有可能因地制宜地安排一些开支。

当年夏季，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发生了数十年、上百年来罕见的洪水。淮河正阳关最高水位比历史上最大洪水年1931年的24.62公尺高出1.79公尺；武汉关最高水位比长江百年来最高水位28.28公尺高出1.45公尺，自6月28日起，整整100天洪水都在警戒水位以上。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长江中下游和淮河两岸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抗洪斗争。几年来建设的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淮河水利工程等也发挥了显著作用，保住了沿江城市 and 荆江大堤，减轻了广大农村的灾情。全国被淹耕地1613万公

顷，经排水、救苗和补种，成灾面积1131公顷；受灾人口6000万人。尽管如此，1954年总的经济情况基本上还是好的。全国工业总产值519.7亿元，比上年增长16.37%。基本建设投资完成74.98亿元，完成计划的95.77%。在继续施工与当年新开工的411个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中，有39个建成投产。其中有规模巨大的鞍钢薄板厂和六号高炉，沈阳风动工具厂等；新建、扩建、续建的发电工程有17处发电或局部发电。新建铁路铺轨831公里，新建公路3662公里。全国的机械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40个制造系统，能制造1900多种比较重要的产品，在数量上能满足国内建设的一半需要，并且已经能够生产火车机车、大型机床、电机、现代采煤机械、地质勘探机械等大型设备。

经过1953、1954两年的努力，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要在以后三年内完成「一五」计划规定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重工业建设，还有747%的任务要在以后三年完成；1955年工业建筑和设备安装的工作量，比1954年将增加一倍以上；建设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就要求有更多的资金投入。中共中央指出，解决国家资金积累的缓慢同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的矛盾，最主要的办法是在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收入和在保证建设事业的条件下厉行节约，同时严格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和标准；1955年的计划应本着：全国平衡、统筹安排、增产节约、重点建设的方针进行安排。据此确定，195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4年增长7%，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7.7%（低于前两年的速度，也低于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年平均增长14.7%的速度）；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98亿元，比1954年增长31.57%，占五年计划总投资额的22.97%；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有1079个，其中苏联为我国设计的91个。全国继鞍山钢铁公司之后的第二大钢铁基地——武汉钢铁公司、全国最大的化学工业基地——吉林化工区；均于当年开始施工。为确保1955年计划的完成，中央要求各级党政部门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和国营企业部门应如同对待法律一样来执行国家计划，并按季作出书面检查，报告中央。经过各方面努力，1955年基本建设效益较好。当年完成投资93亿元，为计划的95.7%；固定资产交付率达86.27%。当年实际施工的741个重大

建设项目，建成投产的有102个，投产率为13.87%。开展节约运动，降低了非生产性建设的设计标准，根据对3280个较大的建设单位的统计，节约资金达10亿多元。全国工业发展状况比较好。除新的工业企业陆续投入生产外，主要靠抓现有工业企业生产潜能的发挥，使工业设备的利用率和企业的计划管理水平有了提高；通过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交流先进工作经验，使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大为提高，合理化建议不断提出，既促进了生产增长，又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尽管「一五」计划的前三年经济发展不够平稳，1955年的工业增长速度又大大低于五年计划的要求，但综合三年的平均速度仍高达17.4%，高于计划要求年平均增长14.77%的水平。到1955年底，已经完成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51.7%；计划五年内施工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项目中，要求建成455个，1955年底已有253个建成投产或部分投产〔其中全部投入生产的134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19个〕；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有106个正式施工，已经投产的29个（其中全部投入生产的17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2个）。由于许多新建工业企业或工业生产单位都采用了苏联先进的技术装备，如：机械工业中哈尔滨量具刀具厂、沈阳第一机床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电力工业中已建成的富拉尔基热电站、抚顺火力电站及丰满水电站，新建的煤矿矿井等，这些新的工业企业陆续投入生产后，工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26.77%上升到33.67%；全国工业〔包括手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35.67%上升到42.5%。三年中，试制和生产了几千种过去不能制造的新产品，1954年成功制造了第一架飞机。「一五」计划规定发电量平均每年增长17.7%，而1953至1955年，发电量实际平均每年增长19.9%，成为当时世界上电力增长最快的国家，使中国发电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1949年的第25位上升到第18位（超过了印度等国）。从1953年开始

酝酿的第一座横跨长江天堑的武汉长江大桥已正式动工兴建；全长2255公里的康藏公路建成通车；兰新铁路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到1955年底，

公路建设已提前完成「一五」计划，成为最早完成「一五」计划的部门。但是，这三年的实践表明，经济建设要继续高速发展面临的困难也是相当大的。

首先是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尽管到1955年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已占33.69%，但在工业生产中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部分仍然很大，约占全部总产值的50%左右，占轻工业产值的80%左右。1953、1954年农业生产因灾歉收，使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由1953年的30.27%下降至1954年的16.3%及1955年的5.77%。这说明农业生产收成好坏直接影响工业生产增长的快慢。

其次，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工业产品的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发展的需要。1954年，仅煤炭、钢材、化肥等50种主要工业品，国内生产不足的就有23种，其中5种产品，加上进口仍不能平衡。1955年，各工业部门的供需和生产协作，更趋紧张，突出表现在：地质工作薄弱；煤、电、油供应紧张；钢铁、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建筑材料等产品数量不足，品种不够，规格不多，质量不高；机械工业还处在由修配到独立制造的转变过程中，根本不具备以最新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能力。这类矛盾，在当时发展比较快的部门也很突出。如：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但与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相比，又远远赶不上需要，尤其是设备的增加赶不上生产的发展。网和机器制造业历年有不少增长，但钢铁冶炼部门的增长速度落后于机器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机器制造业又落后于基本建设需要的增长。随着生产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日益扩大，铁路运输，特别是主要区段的运输困难较多。这种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是靠短期突击所能解决的。

3 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从1953到1955年，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也有了快速发展。

（“！”中国科学院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11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成立了以郭沫若为院长的中国科学院，22主要任务为：「有计划地利用近现代科学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以提高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中科院的各研究机构，是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其所属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当时，全国能从事科学研究并有一定成就的自然科学家近七百人，这些科学人才就是中科院各研究所的主要骨干。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发布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确定中国科学工作的总方针是：「发挥科学的功能，使之成为思想改革的武器，培养健全的科学建设人才，使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密切配合，真正能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保健和国防建设。」23中科院遵循这个方针，积极培养与合理地分配科学人才，调整

陈伯达为第一则院长兼党组书记”竺可桢和陶孟和在建院初期就参加了领导工作，李四光1950年6月回国后参加领导工作。1950年12月，物理学家吴有训1897-1971力被任命为副院长。

饶临照、谷羽主编：《中国科学史》，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页13。与充实院属科研机构，指导建立地方科研机构，加上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部门的科研机构，逐步构成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加强了科研队伍的组织建设，很快为中国科学事业由近代落伍逐渐走向振兴打下了初步基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还十分重视组织科学技术团体的工作。从1949年5月到1950年8月，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召开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为使广大科技工作者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会议通过组织方案，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

普及协会。这两个全国性科技团体，在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推动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普及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与工业建设一样，中国科学院建立以后，为加强自身建设，迅速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也开展了向苏联科学技术和组织领导经验的学习。1953年中科院派出由二十六位专家组成的访苏代表团，了解和学习苏联科学院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的经验；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了解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状况和方法；科学研究计划制订的程序和效果；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机构的分工与配合；研究所和大学及产业部门的关系等等，并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交换意见。这对中科院的工作确有很大的推动。中苏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活动，对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和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培养，也有很大的帮助。随着国家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掀起了高潮。有的地方提出「技术一边倒」的口号。虽然中共中央在〈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的错误的指示〉中指出：「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我们正是要提倡重视技术」，「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²⁴对纠正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发生的片面性，如只订阅苏联的报刊而不再订阅西方的报刊等，起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

24寅育之：〈中国共产党为科学而奋斗的历史篇章〉、《红旗》，1981年第15期。页19-27。

发生过不小的偏差。最突出的是把苏联的政治干预学术，哲学代替科学的错误做法当作是寅现党的领导，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的正面经验照搬过来。如在生物学研究中，把苏联的李森科(丁.0上)^!^。)学派说成是「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和「联系实际」的；给西方的

摩尔根(丁.过!^^巧3!!)学派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唯心主

义」和「伪科学」等帽子，并对那些对李森科生物学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进行政治批判，不允许他们讲授和研究摩尔根遗传学，有的连书也被销毁。此外，还照搬苏联的做法，批判了化学中的「共振论」和「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等等。

为使科学研究工作适应国家建设和今后发展的需要，1953年9月和11月，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先后就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检讨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从国家建设的要求看，现有科学基础和力量还较弱；在团结现有科学家和培养新生力量方面也存在不足；在贯彻理论联繫实际的方针上，有急于求成和片面强调联繫实际的倾向。对于当前科学工作的方针、任务和重点，报告提出，应遵循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工作的经验，积极支持国家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努力；并提出具体落实的各项措施。

中共中央对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十分重视，于1954年3月作了长篇批示。批示首先阐明了科学工作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生产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的时候，必须大力发展自然科学，以促进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并帮助全面了解和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我国科学基础薄弱，而科学研究干部的成长和科学研究经验的积累，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发奋努力急起直追。

团结科学家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批示对中国科学家队伍作了分析，指出：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在科学工作上做出一番成绩贡献给国家，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

第六章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401

富。必须重视和尊敬他们，争取和团结一切科学家为人民服务。25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发挥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的积极性，关心与帮助他们的研究工作，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安排顺利的条件。针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出现过的偏差，中央强调对科学家进行思想教育是一项长期耐心的工作，必须在尊重他们的科学工作、发扬他们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不伤害他们自尊心的前提下进行。

批示认为，中国科学研究的体制，应该是以中国科学院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同时发展生产部门和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批示强调培养新的人才、扩大科学研究工作队伍的重要性，提出了建立研究生制度的任务。批示还要求科研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在青年科学工作人员和老科学家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逐渐改变在科学工作中党组织力量薄弱的状况。

26

这个批示，是在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中共中央制订的第一个系统阐明发展中国科学研究工作政策的基本文件。

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示发到全国以后，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部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贯彻执行。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国务院组织法，中国科学院成为国务院领导下的国家最高学术机关，不再是政府的一个机构。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中国科学院的组织形式也有相应改变。由于当时设立院士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央认为中国科学院分学科成立学部，聘任有成就的科学家为学部委员，将有助于更好地团结全国科学家，领导并推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学部委员制度也是为向院士制度过渡做准备。经过积极筹备，经国务院批准，中科院聘任233位学部委员

25中国科学院当时还积极争取和协助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如

李四光经过艰苦历程，终于在1950年5月回到中国。核物理学家赵忠尧《1902—1998》等三人被驻日美军扣押在日本一个多月于1950年11月终于回到祖国。数学家华罗庚（1910—1986）物理学家葛庭燧（1913—2001）曹日昌（1911—1969）李薰（1913—1983）等人回来后也都在中国科学院内担任了重要职务，而力学家钱学森（1911—）却因种种阻挠，50年代初期返回的愿望没有实现。

26 《中国科学院》，上册，页39。（在中国大陆的前中央研究院院十，基本I：邵被聘为学部委员，分别建立数理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学部。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举行学部成立大会，提出了全院的十项重点任务：一、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二、配合新钢铁基地建设的研究；三、液体燃料问题的研究；四、重要工业地区地震问题的研究；五、配合流域规划与开发的调查研究；六、华南热带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七、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研究；八、抗生素的研究；九、中国过渡时期国家建设中各种基本理论总体的研究；十、中国近代、现代史和近代、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至此，全国科学研究体制逐渐形成，为尔后全面发展科学事业，制订科学长远规划奠定了基础。

在国家「一五」计划建设期间，中科院组织有关专家为钢铁工业生产、石油化工生产、光学精密仪器研制、合成橡胶开发、稀有元素的提炼、抗生素的研制、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家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调查等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教育事业的发展

1953年5月，中共高等教育部党组就全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方针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认为培养干部应完全与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需要相适应，首先要保证重工业、国防工业及与此密切相联系的地质、建筑等方面的技术干部的供应。高等教育的方针，应以办好高等工业教育和大学理科为重点；兼顾目前需要与长期建设需要，高等工业学校应以本科为主，专科为辅；综合大学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必须加强领

导，着重发展理科；高等政法、财经学校及社会科学、哲学、文史等科系应适当集中，进行改造，为以后发展准备条件；建立和加强与科学院的合作，结合学校的教学工作逐步开展科学

27 舞育之在〈我所知道的陆定一〉文中回怆说：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基本上都聘为学部委员；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多数也被聘为学部委员。胡先验是个例外，胡原是院士：但被排除在学部委员之外。袭育之：《党史札记末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页190、214。另参陆定一：《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页494—49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化3—！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六章 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403

研究工作，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科研人才；进一步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吸收优秀的产业工人入学，培养工人出身的专家和工业领导骨干。同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当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继续进行。为使高等学校在地区布局上更加合理，1955年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将沿海地区一些高等学校的专业、系，迁至内地组建新校；或将少数学校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建校；同时加强内地原有学校。在院系调整的同时，根据国家建设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需要，对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也进行了调整。据1957年统计，高等学校共设置323种专业。专业的课程除了基础课、专业〔技术〕基础课外，还增加了专业课或专门化课，加强了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论文〕等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环节。「一

五」期间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为16.22亿元，占总投资的3.37%。因此，教育事业的发展，整个来说是比较快的。据统计：1957年的在校学生数，高等学校达到44.1万人，比解放前最高年〔1947年〕的15.5万人超过28.6万人，增加1.8倍，比1949年的11.7万人超过32.4万人，增加2.7倍；中等学校达到708.1万人，比解放前最高年〔1946年〕的187.9万人超过520.2万人，增加2.8倍，比1949年的126.8万人超过581.3万人，增加4.6倍；小学达到6428万人，比1949年的2439万人超过3989万人，增加1.6倍；幼儿园入园幼儿达到108.8万人，比解放前最高年〔1946年〕的13万人超过95.8万人，增加7.3倍。28各级各类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教学质量普遍有所提高，部分学科〔主要是外语和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平衡。但从教育事业的发展来看，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比较好的时期之一。

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的方针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出以后，1953年9月10日，中共文化部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

〈报告〉提出，在过渡时期，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应该是：积极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学艺术创作，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

28何东3主编：《当代中国教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页56。

民，鼓舞群众努力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并逐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9月23日至10月6日，全国文联在北京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文代会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中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准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是现在才开始有的，实际上，从1919年「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当前我国已进入过渡时期，在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正日益迅速地增长着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了更广大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但不束缚作家在

选择题材、表现形式和个人风格上的完全自由，而且正是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藉以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毛泽东为戏曲活动指示的「百花齐放」原则，应当成为整个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方针。为此，一方面必须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继续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必须反对文学艺术1：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它一切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第二次文代会分析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文艺发展上的问题，认为在文化工作的领导上，仍然存在着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的缺点；认为党的组织应当更多地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来组织他们的创作，更多地发动作家、艺术家相互间在创作上的自由竞赛，发动他们中间的正确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动正确的社会舆论来推动和指导创作，创造适宜于发展创作的气氛，为作家的艺术劳动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做不是削弱党和政府对文学艺术的领导，恰恰是更好地实现这种领导。文代会肯定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同时指出了在文艺批评中存在的偏向。其主要表现是：往往没有把整个倾向是反人民的作品与整个倾向是进步的但存在缺点甚至错误的作品加以区别；没有把作家对生活的有意识的歪曲和由于作家认识能力不足或表现技巧不足而造成的对生活的不真实的描写加以区别；在批评时，一律采取揭露、打击态度，导致了人们对批评的憎恶情绪。文代会要求批评家对于作家要有同志般的爱护态度，要把严正的批评和热情的鼓励、对作家的严格要求和对他们的创作命运的关心结合起来。

实际上，继电影《武训传》受批判后发生的一系列批判运动、在文化艺术界造成的思想混乱，在戏剧界也有明显反映。忽视艺术规律，庸俗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教条出发简单粗暴地裁决作品等现象，日益突出，导致文艺剧目极度贫乏。1956年就曾流行这样的说法：「翻开报纸不用看，『梁祝姻缘』《白蛇传》。」²⁹

为推动文化工作的发展，文化部继1952年底举办了由23个剧种的37个剧团、由1600多人参加演出82个剧目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之后，在1953年举办了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1954年，华东地区举办了

有35个剧种的158个剧目参加的戏曲观摩演出；1956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来自全国41个话剧团体，2000余人参加演出50多个剧目。30浙江昆苏剧团的《十五贯》演出以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人民日报》专门发了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指出：一出《十五贯》不仅使日渐衰微的古典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就卫生工作提出了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³¹1953年底，全国县医院和县卫生院已由解放前的1437所发展到2102所，工矿企业医院由解放前的150所发展到367所；全国医院病床数较解放前增加了4倍多。全国已新培养出6万多名高、中级卫生人员，60多万

29张庚主编：《当代中国戏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页41。

30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仿十年文艺大

事记0919—19790，1979年10月[^]未刊稿，页141、145、161。31黄树则、林士笑主编：《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1，页3。

名初级卫生人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速止「350个卫生院和30多个医院，培养「2000多名民族卫生干部。32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医疗卫生工作也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今后的工作墨：点和任务。中央卫生部党

组于1953年10月向中央报告说，卫生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目前的实际情况、确定今后卫生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加强工业卫生工作和城市医疗工作，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对人民群众危害最大的疾病，农村卫生事业应与互助合作运动相结合，有步骤地开展。中央于1954年4月批转了这个报告。

鉴于中央「团结中西医」方针，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刘少奇于1954年7月9日向中央文委党组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医问题的指示；11月23日，中央又对中央文委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作了批示。为改变长时期以来在社会上存在的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况，中央提出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纠正对待中医的武断态度和宗派主义情绪，巩固地建立中西医之间相互尊重和团结的关系，使中医固有的医药知识得到发展，并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医药卫生界对违背党的团结新旧医方针，散布弯医是封建医、不科学、只能起精神的安慰作用以及「十年消灭中医」的错误观点和言论公开进行了批判，指出如何对待中医，首先是一个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关系到广大人民生命健康的问题。为使中央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有效落实，各级党、政和卫生行政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

鉴于全国人口增长过快；年平均增长率2[^]》，节制生育问题极为迫切而又存在着不同观点，1953年下半年，邓小平就指示有关部门改正禁止进口避孕药和用具的做法；1954年12月，刘少奇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就这个问题进行座谈，他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党是赞成节育的」。节制生育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和保护人民健康。

32 《当代中国的卫生事勒'上册，页8。

他要求先把党内思想统一起来，同啤以卫生常识的形式进行宣传指导，并组织好有关药品和器具的生产、供应。

医药卫生事业在这个时期取得显著的成绩。1955和1956年，先后成、又了由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研究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医学科研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医学科研工作。城乡卫生医疗网初步建立起来，1956年由私人开业医生组织起来的农村联合诊所已由1950年的803所发展到51000所以上，在群众医疗保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公职人员、大学生和工矿企业职工享受到公费医疗和劳动保护；国家采取减免收费的办法，加强对严重危害农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的治疗；烈性传染病、肺结核和性病初步得到控制。

4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的确立

「一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宏伟，但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都有限，要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建设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其突出矛盾表现在：

一是国家的建设资金不足。「一五」计划安排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是427.4亿元，其中工业投资248.5亿元。在执行「一五」计划期间，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大量增加，国家的其它开支如军政费用，以及预备费等，又不能再减少。在基本建设中，既要重点抓好工业建设，也要对国家其它方面的建设事业作出统筹安排。既然工业建设资金有限，就不能撒「胡椒面」，只有集中使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效益。

二是技术力量和经验缺乏。据初步计算，五年内工业和交通运输两项需要增加技术人员39.5万人，但高等学校及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仅为28.6万人，相差11万人。要想多培养，一下子也来不及。这就要求，把有限的技术力量集中起来，首先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

三是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特别是苏联帮助设计的156项重点工程，都是技术比较复杂、投资较大、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项目。建设这些项目不是一省一地的需要，而是全国的需要；也非一省一地力所能及，必须由中央及有关部门集中统一管理。

这说明，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客观需要。

统一管钾一、首先是统一计划工作的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建立以后，1953年2月13日，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指出，为适应国家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各文教部门，必须迅速加强计划工作，建立起基层企业和基层工作部门的计划机构，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财经委员会应担负计划任务，有关计划业务，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指导。1954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划机构的指示〉，要求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建立计划委员会。〈指示〉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必须建立和健全计划机构，并把计划机构逐渐建立到基层工作部门和基层企业单位。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各省（市）、省属市及县人民政府，应设立计划委员会，吸收党委、政府和财经、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九人至十五人组成。各级计划委员会在业务上同时受上级计划机关及国家计委的指导。从而开始从上到下建立了计划委员会的机构，加强了经济工作中的直接计划管理工作。

其二，建立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侧重集中的财政体制。为集中必要的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规定，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举凡关税、盐税、烟酒专卖收入，以及中央和大行政区管理的企业收入、事业收入等，都归中央的固定收入。此外，还有按税种划分的地方固定收入、中央同地方的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的调剂收入。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范围，其中中央基本建设投资属于中央财政支出，由财政部拨款。这种财政体制，侧重于集中统一，又保持一定的分散性和灵活性，能使中央的财政收入得到保证。从「一五」计划时期实际执行的结果看，中央支配的财力约占75%，地方支配的财力约占25%。

其三，人力、物力的统一调配。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强调必须为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厂矿配备足够数量和一定质量的干部。在目前工业建设干部极端缺乏而现有干部的分布和使用又不尽合理的

情况下，要妥善地、合理地解决干部问题。为此，规定了统一调整，重点配备，大胆提拔的原则。〈决定〉要求，由党的组织部

门会同有关方面，对全国地委以上党政机关和各厂矿的主要干部，及其它适合于转入厂矿工作的干部，进行一次统计，以便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统一制订分期分批调配干部的计划，报经中央批准实施。为了保证重点建设，当时从全国调集一万名优秀干部走上基本建设第一线，又从文教、科研部门和原有企业中抽调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充实新建单位。与此同时，有计划地抓紧人才培养，采用出国留学、实习，由大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培训等多种方式，较快地造就出一批建设骨干。在物资分配方面，从1953年起，在全国范围实行计划分配制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通用物资由国家计委平衡分配〔即统配物资〕，专用物资由各主管部门平衡〔即部管物资〕。到1957年，统配物资、部管物资达到532种。

其四，基本建设项目以中央各部门为主进行管理。凡重点建设项目，都是由中央业务主管部门从人、财、物的调度到设计施工〔有不少部有自己的施工队伍〕、生产准备的安排一抓到底。地方的基本建设，主要是搞一些农林水利、城市公用事业、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建设，但项目仍须由中央各部指定，设计施工任务由国家下达。

以上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适应了当时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主要技术、管理干部，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体制也暴露出它的缺点，由于工业建设都由中央各部门「条条」为主进行管理，各部的投资都集中用于工矿企业的建设，对城市建设缺少考虑；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

四工业化基础的初步奠定1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

到1955年9月，鉴于有些经济部门1955年预计完成的主要计划指标有可能达不到「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当年水平，中共中央在10月4日下达〈关于编制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示〉中指出，1955年上半年国民

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不够好，各部门、各地方要切实加强第叫^度的工作，^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5年度计划。明确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在编制1956年度计划草案时，必须具体地分析情况，利用^种有利因素，发掘潜力，克服困难，在全国平衡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计划指标，努力争取实现。33

任务重、时间紧的矛盾愈来愈突出，出路何在？国家计委要求各部门和各地方把1956年的计划「订得更积极些」，中共中央要求「尽可能地提高指标」。

就在实行工业化计划任务吃紧的时候，从1955年夏季以后，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发展，从而引起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新构想。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商定的《农业十七条》，提出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确定以此作为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随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以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动力量，在各项工作中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他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34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明确阐述了这一个基本思想，他说：

这件事（指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合作社^引者注）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现在提到全党如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它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

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它经

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35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说，凡是办得到的，能够办的都要争取办，并要争取多，争取快，争取好。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曾决定以反对右倾保守，作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思想。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一百多人参加中央座谈会，他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说：

在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前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主席说过，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加快我们的发展I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也是客观要求我们加快发展。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战争）打起来，我们的困

3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223—224。

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因此必须加快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

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一切工作要办得又多、又快、又好，要求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需要，是稳步前进。

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线前进，几条路线比较一下，要选择一条比较合理的、正确的路线。上'中、下三策，哪个合理，哪个正确，就选哪一个0

要站在群众前头，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要鼓励群众，不要：发冷水。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较大成绩I这就是现在中央所实行的路线1这就是稳步前进。另一条是按常规走路，照老样子前进，时间拉得很长，群众没有气，成绩不大，这是保守主义路线。我们有不少同志却正走着这条路。

计委做平衡工作，期望平衡一次，安定一个时期。主席说，客观事物，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不断平衡，不断衡破，这是我们前进的规律。衡破了平衡是好事，不要怕。（周恩

来：湖塘的死水是臭的，活水才不臭0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就恰恰要犯错误。

搞工业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I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特别是重工业千万不可骄傲，因为我们既无经.验又未搞好~工业体系还未建立起来。有人说：「可不可以让农业等一下工业，不要走得那么快。」这种说法是右的。不能叫农业等，而是工业要赶上去。农村合作化了就更有利于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准备明年九月召开八大，中心问题就是这些。希望各部门立即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发现新的工作方法，改进工作，反对保守主义，加强全面工作规划，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使八大的工作和各部门各地方的工作结合起来。36

周恩来也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他在座谈会上表示：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周说：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半个月后，他又说：〈农业十七条〉成为一个推动力量。政府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它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钢的生产由1800万吨改成2400万吨。过去没有设想那样多。我们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37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再次传达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38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人民日报》于1956年元旦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的任务和多-快、好、省的要求。社论说：「五万万中国农民热烈地欢迎和要求农业合作化……这个事实，把所谓『农业的发展必然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中国人口太多是件坏事』等等悲观论调一扫而空。」「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突破了原来计划的指标向前猛进，这就给予了可能，也提出了要求，使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这样，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四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这样做，我们就第六章工业化建设的起步4。

完全有可能；在工业建设和文教建设方面，也提早完成和超额-成第一

个五年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

为使以农业发展为推动力，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成为现实，毛泽东继续抓紧农业发展规划的

工作。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同与会者商量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初稿。接着，中共中央邀请了在北京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共1375人，分组进行了讨论，做了一些修改。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正式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月25日，中共中央将这个纲要〔草案〕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

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实际上是向全国人民，特别是五亿农民发出了新的号召，为使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每年以 $\hat{\wedge}$ 和①呢以上的超高速度实现粮食达到1万亿斤、棉花1万万担的目标而奋斗。

反对「右倾保守」的巨大压力，要多、快、好、省地办一切事业的要求，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五」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号召，十二年宏大规划的鼓舞，使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热潮中已经膨胀了的空气更进一步地膨胀起来。

关于1956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1955年夏季国务院在北戴河曾提出一个接近实际的计划指标，确定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控制数字是112.7亿元。10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计划控制数字：全国工业总产值483亿元，粮食总产量3742亿斤，棉花产量2995.8万担，基本建设总投资112.59亿元，社会商业零售总额444—451亿元。

1956年1月10日至2月7日，全国第三次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1956年计划草案，座谈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轮廓，还讨论了工业与农业、生产与分配、基建与资金、国家建设与地方 \sim 建设的关系以及改造与安排等问题，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要求粮食、

棉花的产量每年分别以87%、107%以上的速度递增，以保证到1967年分别达到：1万亿斤、1万万担的高指标，立即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引起连锁反应，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季提出的指标和经中共中央业已批准的控制数字，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中央各部召开的专业会议，在「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口号的鼓动下，纷纷要求把远景计划所规定的八年至十二年的任务，提前到三年至五年内完成。这种种因素不能不使这次讨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受到直接的严重影响。2月22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国家计委报告说：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在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新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保守主义，计划既要积极又要可靠的指示和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精神编制的。主要内容是：

(一) 工业总产值535.7亿元〔比原控制数字提高了52.7亿元〕，比上年增长19.77%，已达到五年计划中的1957年水平。在46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7种要以四年完成五年计划。

(二) 农业总产值606.8亿元，比上年增长9.3%。粮食3989亿斤（比原控制数字提高247亿斤），增长8.47%，棉花3556万担（比原控制数字提高560.2万担），增长177%。

(三)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7.35亿元（比原控制数字提高34.76亿元），比上年增长70.6%。即一年要完成五年计划总投资额的35.7%左右。

(四) 铁路运输比上年增长9.97%，内河航运增长36.27%，海上运输增长24.27%，汽车运输增长35.4%。

(五) 社会商业零售总额477亿元（比原控制数字提高26亿元），较上年增长。

(六) 高等学校招生18.3万人（比原控制数字增加5.7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44.4万人（比原控制数字增加22.5万人）。

国家计委在报告中直截了当地说，要完成1956年的计划任务，是十分繁重和紧张的。

3月25日，国务院批准下达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就在计划会议讨论上述计划指标的同时，1月13日，国家计委给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1956年国家统一分配物资平衡情况简报〉及时提出了1956年物资供需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其中突出的有：钢材缺75万吨、镀锌钢板缺5.5万吨、大口径无缝钢管缺4万吨、金属切削机床缺3569台、钻探机缺1509台，等等。原因是：1956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必然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超过生产的增长，导致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简报〉要求，各级物资分配部门，分别主次缓急，进行全面平衡，早作安排。

由于计划指针过高，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过大、1956年4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开始过多地动用国家的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紧张局面。由于在生产、基本建设与物资供应之间无法平衡，招致许多工地发生停工待料和不能按期开工。5月份以后，随着开工单位增多，这一矛盾更加突出。这种紧张状况另一面的突出表现是：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忽视节约和忽视安全生产，以致不断发生严重的设备事故和人身事故。急躁冒进的倾向在农业方面的表现是，许多农业合作社的增产计划过大，片面地着重粮棉而忽视副业，生产和非生产的投资都过多，一部分合作社的规模过大，对社员的干涉过多，要求过高，对社员收入的增加和女社员的健康注意不够。由于上级计划偏大，要求过急，企图使十二年规划中的种种好事在两三年内办完，许多合作社举办了许多非生产性设备，购买了许多贵重的文化娱乐用品，在生产性的开支方面，过早过急地兴建力所不及的基本建设，从而使社员负担过重。在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改革方面，如推广双季稻、良种、旱播密植、双轮双铧犁、打井等方面，不少地方在步骤上要求过急，计划上订得过大过死，方法上强迫命令，引起农民不满。

在1955年底，当毛泽东提出在各项工作中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构想时，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在当时是同意的。但是，整个来说，除毛泽东一人外，其他领导人当时都是处于被动的跟进状态。由于周恩来、刘少奇等处于实际工作的领导第一线，严峻的事实促使他们最早进行冷静的思考与周密的科学计算。就在人们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陶醉，第三次计划工作会议正在加多加快的思想指导下把1956年的计划指标订得很高的时候，周恩来首先明确强调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他在1956年2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发言说：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甚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发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39

实际上在这前两天，即2月6日，周恩来就约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一起研究正在举行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中提出的计划问题。周恩来指出，既然现在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经过酝酿，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会议同意李富春关于在工

39 《周恩来传11949—19761》‘上册’ 页261—269。

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的解决意见，实施应一压的方针。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应缩，其中：（一）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690，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无；（二）双轮双铧犁产量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40后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对这次压缩高指标的会议，风趣地称之为「二月促退会议」。

从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出现严峻形势后，国务院立即采取了动员生产，压缩基建，以求平衡的应急措施。4月14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度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的补充报告〉。国务院指示要求，在基本建设项目及其进度的统一安排过程中，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如果只看到施工力量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设计、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情况，采取全面铺开和齐头并进的作法，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的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落空的危险。因此，各部门、各地方要特别注意设计、设备、材料和施工力量等主要环节的全面的和综合的平衡，在确保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安排和调整基本建设项目和它的建设进度。工业生产必须摸清供销情况，设备能力、技术力量和协作的条件，进行综合平衡，在努力节约使用原材料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上，使群众要求增产的热情同供产销的平衡相结合。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果断地提出：反右倾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41他在同李富春、李先念就1956年的国家预算和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交换意见时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急躁冒进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稿。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利瓦伊汉和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系统全面地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已经出现的不平衡问

题，提出了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会议完全赞同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提出的意见，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42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下马。就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提议中央宣传部就此方针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康生、李先念、薄一波，胡乔木列席会议。此次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共中央会议的有关决定，基本通过〈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中的意见对报告加以修改。经过此次会议讨论后的报告稿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的上述指导方针，周恩来立即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商议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研究继续压缩实践证明仍不实际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他针对有人不同意削减预算一事，说明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预算高了就应削减的道理，指出：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强调要打破预算不能修改的观念，预算数字一定要减一减。经过讨论，周恩来综合李富春、薄一波在会上提出的意见，确定按57。削减预算，其中把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在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等的努力下，在即将提交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草稿中，明确指出：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6月12日，国务院召集全体会议讨论这个报告〔草稿〕时，会上有人不同意在报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周恩来对此作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他说：

这段话是比较精炼地说出来的。我们这样提，如不解释，会发生一些误

解。反保守的好处已经说过了，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43

6月15日，刘少奇主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会议审议批准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讨论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全国人大常委工作报告。

李先念在关于1955年决算和1956年预算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在工业生产方面，除了对于没有完成产量计划的产品需要急起直追，争取完成计划以外，特别需要注意纠正一部分企业片面地追求「多」和「快」；而没有同样地着重「好」和「省」的。他在列举了种种表现以后指出：由于片面地追求「多」和「快」，生产中的安全在许多企业中也受到忽视，人身事故和设备事故比去年同一时期有了增加。因此，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他强调：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一切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4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585。

4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587。

第六章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在通过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中明确写上了：「在执行1956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

在此之前，陆定一根据刘少奇的布置，指定中宣部王宗一同志起草反冒进的社论。在社论初稿写好后，陆定一于6月12日致信刘少奇：嘱写社论，已由部王宗一同志写好。我们认为可用，转送上请阅正。

胡乔木、刘少奇对社论初稿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随后，刘少奇函告毛泽东：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

但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多数人认为应当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时候，毛泽东则另有主张。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据当年列席会议的邓力群回忆：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的计划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二十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⁴⁴

这次会议表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开始出现了

明显的分歧。因此，当反冒进的社论送给他审阅时，毛泽东在稿纸上批了「不看了」三个大字。45

这样，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刘少奇审定，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的社论。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页7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534—539。这篇社论的要紧之处，不在于它罗列了城乡经济文化建设中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也不全在于它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提出反对急躁冒进的问题，而在于它尖锐地指出：急躁冒进的问题「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已经成了「一种思想倾向」；在于它尖锐地提出反对甚么，「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在于社论把问题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强调「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这对近一年来一直强调反对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显然是一种纠正。

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策和会同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得到了一定的压缩，更重要的是使近一年膨胀了的炽热空气，开始压缩和冷却下来。鉴于「多、快、好、省」的口号从年初提出以后，在实际工作中人们追求的只是多和快而忘记了好和省，没有起到预想的积极作用，因而周恩来等在修改提交八大审议的「二五」计划建议草稿时，删掉了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以致此后有一年多时间人们没有再提及「多、快、好、省」。

中共八大接受了中央6月会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制订的一个注意到综合平衡、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这样，如何安排好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衔接工作的任务又提上了日程。

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高达243亿元，国家经委把投资压缩到

150亿元，各方面反对甚烈。周恩来认为，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他指出，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是使积累和消费关系正常与协调的根本途径。基本建设规模下不来，积累就下不来，财政也就必然会继1956年之后再度出现较大赤字，物资供需紧张状况也会继续存在。因此，1957年的计划控制数字必须下决心把基本建设投资压下来。

10月20日至11月9日，国务院共开了十次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出现在主要应该批「左」，以及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的方针性意见。

他说，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又说，我们国家很大，人口多，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必须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保持平衡。针对有些干部的担心，周恩来指出，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1956年度各种计划指标到底怎样，我们觉得应该说冒了。虽然后来控制了一下，纠正了几项，但「上马」就跑，而且是千军万马，齐头并进，「下马」不那么容易。在三大改造高潮下，各部门提出的计划都是大的，从乡政府到各部门的司、局都想多和快。2月的财政、计划会议是促退会议，但已不能挽回。从2月的促退会议以后到现在，国务院会议每次都在「下马」，总是下不好，速度、质量都受了影响。⁴⁶由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的共同努力，政府各部门领导人从思想上比较清醒地认识了急躁冒进的危害，一致认为原来提出的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速度快了，应当放慢，从而进一步统一到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上来。这一系列努力的结果，就为1957年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7年应当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刘少奇在会上就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意见。尽管毛泽东当时并不同意，但他没有表示反对。这样，「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⁴⁷就被八届二中全会通

过并在会后贯彻执行。

会后周恩来出访亚欧^{^^}一个国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由陈云副总理主持，根据八届二中全会决定的方针具体编制。关于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问题，当时争论很大。12月27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据再次摸清的情况，商讨进一步减少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陈云强调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要敢于负责，勇于负责，他说：经济工作还是大家讨论，我们做决定，我们向中李负责。我们责无旁贷，少奇同志管党的工作，小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总司令也不管这些事，总理忙得很，首先是我们几个人（指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引者注）负责，我们肩上担负着六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明年的投资削了以后，不仅明年平衡，将来也可以平衡。会议决定将基本建设投资再压缩到114亿元，待进一步提交中央讨论。48

195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央指示，为了缓和目前经济生活和财政收支的紧张局面，必须适当调整1957年度基本建设的规模。原定在1957年开工的建设项目，要进行具体分析，重新排队。随后召开的第四次全国计划会议，根据统筹兼顾和全面安排的方针，调整了1957年计划。7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提出〈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1957年度的指标安排是：工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03.4元，比上年增长4.5[^]；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为611.5亿元，比上年增长4.97。；基本建设投资为111亿元，为上年的79.47。；职工总数为2226万人，比上年减少14万人。大会批准了薄一波的报告。

2 「一五」计划的完成

「一五」计划规定的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1956年就已提前完成。经过适时而恰当调整的1957年国

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良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任务。这样，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完成，为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具体成就是：

一、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效，初步展开了工业新的布局。五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其中国家投资491.1亿元，超过原计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332。4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636—637。

划的。为了奠定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五年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用于工业部门的占52.47%，其中用于重工业的占88.97%，轻工业占11.17%。五年新增固定资产达到460.3亿元，其中工业新增固定资产达到200.6亿元。五年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达1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比原定计划增加227个。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重大建设项目，到1957年底，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此期间，建立起以前未有的新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和矿山设备制造、高级金属钢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等。在我国中部地区建立一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基本化工和国防军工企业，初步铺开了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1957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93.47%、大中型项目投资率为26.47%，都为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

二、工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工业结构也有改善。工业总产值比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指标超过21%呢，比1952年增长128.6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37%。生产资料生产比1952年增长了2.2倍，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35.67%上升到48.47%。轻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了83.27%，五年计划规定的46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有27种提前一年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钢产量达到535万吨，完成计划的1377%、比1952年增长296%呢，煤产量达1.31亿吨，完成计划的1107%，

比1952年增长98.7%。没有完成计划的有原油、机车、食用植物油、火柴、卷烟、糖等6种产品。在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1957年钢材自给率达86%，机械设备自给率达60.7%。以上，全国工业工程技术人员达到16.7万人，比1952年增长1.9倍。1957与1952年相比，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2%，12个工业部门的工业产品成本降低了29.7%。

三、农业生产增长较快。1957年农业和副业总产值完成五年计划中1957年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完成计划102.7%，比1952年增长19.7%。棉花总产量达到3280万担，完成了计划，比1952年增长26%。其它经济作物大都没有完成计划，除油料和黄红麻比1952年还有减少外，其它都比1952年有较多的增长。

五年内全国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灌溉总面积达到4.1亿亩，其中新增1.1亿亩。

四、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迅速。195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67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6.67%。五年内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共约1万公里。到1957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25.5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工程艰巨的康藏、青藏、新藏公路连续通车。

五、在科技教育方面，由于经济建设高潮中技术人员极为短缺，形成全社会重视科学教育的风气，科学教育获得较快发展。高等学校经过院系调整后，1953年有181所，1957年则发展到229所，增长26.5%；全国科研机构共有580多个，研究人员2.8万人，比1952年增长2倍多。

六、在商业外贸方面，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额474.2亿元，比1952年增长71.39%（计划为80%左右）。市场物价基本稳定，通过国家有计划的调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有所缩小。以1952年为100，1957年全国农产品采购价格指数为122，全国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为101.6。对外贸易也有较大发展，195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52年增长62.7%。在进出口贸易结构上，继续实行进口替代政策，随着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工矿产品在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18.7%上升到1957年的

287。。

七、 在人民生活方面，1957年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34.27%。其中城镇居民为205元，比1952年提高38.57%；农民为79元，比1952年提高27.47%。到1957年底，我国职工人数为2451万人，比1952年增长55.17%，城市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5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达到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7%。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生活也有较大改善，由于农业税的征收额一直稳定在1953年的水平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民1957年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20%左右。1957年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比1952年增长2倍多。

八、 五年中，中央政府除1956年出现财政赤字外，其余各年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整个来说，「一五」计划实施的经济效益是好

的。期间，全国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7%；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7%。与同期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非常快的。据麦迪逊（八叩”！^化^）计算，1950至1973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97%，其中苏联东欧国家年均增长5.77%，非洲国家年均增长4.57%，拉丁美洲国家年均增长5.27%，亚洲国家和地区〔不包括日本〕年均增长5.27%。49美国学者费正清【1^1*31在其主编的^I】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7%。（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产出和工业产出每年分别以3.8%~18.79%的速度递增。由于人口年增长率为2.47%，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为6.57%，这就意味着每隔11年国民收入就可翻一番。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相比，当时产出增长速度仅和人口增长相当（二者年增长率均为17%左右）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7%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例如印度，也是大陆型的农业经济国，最初的经济状况和中国相似，但它在50年代的人均产出增长率还不到2%。」50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经济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苏联援建、改建和扩建的150个项目的建设以及为其配套的项目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业畸重沿海的状态，迅速展开较为合理的工业布局，建立起较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但也隐藏着一些问题，主要是：重工业生产过于突出，轻工业生产相对落后；社会主义改造步伐过快，管理体制管得过多过死，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基础薄弱的问题日益突出，适应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一五」计划建设的基本经验是：搞经济建设要坚持综合平衡、稳步前进；计划必须建立在客观实际可能性的基础上做到既积极，又稳妥可靠；在制订和执行计划中，主要应该强调防止和反对急躁冒进的「左」的思想。这同1955年夏季以后形成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相比，明显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种指导思想。在探索实践中，出现不同意见是合乎情理的、完全正常的。历史证明，由于党内没有能够按照正常秩序来处理这种不同意见，使正确意见不断受到压制，错误意见占据了主导地位，整整左右了1957年以后中国二十多年，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走了很大的弯路。

3苏联专家与156项工程

中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顺利完成，尤其是156项中的重工业建设项目完成投产，苏联专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据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考证，1950至1956年来中国的苏联专家，据俄国档案记载，就有5092名。⁵¹

早在1948年春，东北全境即将全部解放前夕，鉴于大量调动部队围歼长春、沈阳，锦州守敌，进而入关南下，以及迅速恢复东北经济，为解放全国建立巩固后方，迫切需要全面修复东北铁路网。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苏联政府于1948年5月13日讨论决定，派交通部副部长柯瓦廖夫（¹⁰力为全权代表，率专家小组赴中国东北组织落实恢复

第六章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妃匕铁路运行的措施。5月15日这个决定由斯大林签字批准。6月、柯瓦廖夫率领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220名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组成的铁路专家小组，携带必须的技术设备和各种材料抵达东北。1949年1月8日，毛泽东专门致电斯大林，对柯瓦廖夫帮助恢复铁路和其它经济工作，以及制订到1949年恢复长江以北3000多公里铁路的计划表示感谢。⁵²但苏联专家真正大批来华，则是始于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之后。八年抗日战争和随后的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的国民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要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亟需苏联给予大力援助。经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与斯大林多方联系协商，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于1949年6月抵达莫斯科，在与斯大林会谈中，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向中国派遣专家。据俄国档案披露，会谈记录如下：

关于专家。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价格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以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斯大林说，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俗话所讲的，哪家没有丑孩子，在好人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国家的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我们不允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

傲慢和轻视的态度。53

当年8月14日，刘少奇离开莫斯科时，随行来到中国的有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

但要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这个数字是远远不够的。1949年10月，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化化出），恢复^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既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1951年7月，周恩来在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时，也明确表示：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54为适应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建设的需要，周恩来在1952年8月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苏联援助问题时，一次就提出要苏联派遣800名专家，使斯大林感到为难。9月21日，周恩来再次致函莫洛托夫，要求1952至1953年向中国派237名技术专家。55

当时急需的技术专家，首先是基本建设工程的设计力量。据有关数据显示，到1953年，中国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最多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担负起国家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重任。所以，与第一批苏联援建中国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就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快东北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1951年又聘请了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设计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56为了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财经委员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要请苏联帮助。57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方提出了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进一步要求。1954年11月25日，苏联部长会

第六章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议通过〈关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苏联专家和关于另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企业学习的决薪〉。〈决议〉规定了派遣专家的任务：

交通建设部和交通部必须于1955年第一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设计师和建设人员63名，其中为建设新的铁路线宝鸡—绵阳和成都—昆明段派往中国的专家，从铁路路基设计、水文地质勘探、大地测量和计算、供水和排水工程、岩石爆破工程、供电工程、通讯工程，直到施工组织，共有36个专业；

电站部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13名的专家小组，期限为一年，帮助中国进行长江水利资源勘察和测算，包括农业部专家和技工，河运部专家和技工，地质部、科学院、测绘总局各1名专家；

建设部、冶金和化学企业建设部必须在1955年上半年向中国各派出11名专家，期限为二年，根据双方协商的专业范围，为中国11个联合企业提供技术援助；

莫斯科市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顾问，帮助制订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其中城市设计工作专家2名，供水和排水系统工程专家、天然气供应工程专家、集中供暖工程专家、城市公共交通工程专家、工程设计方面的专家、建筑工程专家各1名；

石油工业部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就地了解目前炼油

厂的情况，并同中国方面一起弄清同炼油厂改造有关的问题。在上述专家回来之后，苏联对外贸易部和石油工业部在一个月的期限内，就帮助中国改造炼油厂以从油母岩中提炼人造液体燃料的问题同中国举行谈判，并向部长会议提出提案。58

据中国的档案文献，至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聘请了11527名苏联和其它国家的专家，其中苏联专家占897。59即约10260人。另据苏联统计，1959至1960年苏联又分别派遣699名和410名工业技术专家来华，再加上1958至1960年来华教师的数字(计107名)，这样，到中国工作的非军事专家大概有11476人。60据沈志华教授提供的另一组数字是：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和顾问，1949至1953年有5000多人；1954至1958年多达11000多人；1959至1960年最少，不到2000人。61

由苏联政府派遣来华的专家，都极富当年被称为的国际主义精神，极其热情认真地来帮助中国兄弟。1950年3月21日到23日，总顾问阿尔希波夫（А.В. Аршипов）召开专家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在政府主管部门工作的顾问和专家负责人，他们有：负责统计工作的专家叶若夫（苏联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财政部顾问库图佐夫（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副部长）、计划工作顾问费多托夫（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冶金专家组组长波别多诺斯采夫（乌克兰共和国黑色冶金部干部）、煤炭专家组组长斯图加廖夫（苏联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银行专家科罗乌什金（苏联国家银行副行长）、在东北担任专家组组长的尼科诺夫〔苏联国家计委干部）、在司法部门工作的苏达利科夫（苏联司法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以及铁道桥梁专家西林、水利专家布科夫、医学专家哈利托诺维奇等。顾问们从各自角度反映了中国当前面临众多的棘手问题。在热烈讨论以后，阿尔希波夫充满信心地说：「很明显，问题很多，需要一个个地解决。中国同志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人材不够，所以请我们来支持。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不是为了夸夸其谈，而是为了工作，工作！真心实意地工作，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人民！」他还说：「中国朋友完全信赖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信赖。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提出每一项建议时，一定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切

不可粗心大意，匆忙下结论。我们的工作不允许我们犯错误！」62
在不同岗位上的苏联专家确实不负中苏两国人民的厚望，他们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1953年7月1日，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正式移交生产。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建成这样大的露天煤矿，得益于苏联帮助做了全部设计，供给了各种主要的设备，更因为苏联政府派来了大批专家，进行风-体施工指导。十分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自己是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把它建成的。63

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开工生产。这三大工程，从勘察设计、自动化机械化设备的供应，到建筑、安装、开工生产的技术指导和人材的培养等方面，从头到尾都得到了苏联的巨大援助。设计工作非常浩繁，1950年，当鞍钢还在进行恢复工作的时候，苏联政府就开始为大型和无缝等工厂进行总设计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城市的大批最优秀的冶金工厂的设计专家都参加了这一工作。苏联为大型、无缝两厂所作的设计，和为这三个厂所制造的订货，都是采用了苏联的最新科学和技术成就。因此，这三大工程全部是自动化的，机械设备全部由电气来操纵。在鞍钢三大工程建设最紧张的时候，苏联政府几次派专家从莫斯科赶到鞍山来帮助解决建设中的困难问题，使三大工程得以顺利完工。54

1954年建成的哈尔滨量具刃具厂，也是从整体布置到设备制造、产品图纸、各种产品的技术操作规程和生产组织管理设计，都是由苏联设计完成的。在建设中采用工厂化、机械化的方法，就是由法依瓦基和达达林则夫两位专家的建议和具体帮助的结果。在专家的倡议和热情帮助下，才敢于打破季节性的限制，第一次在哈尔滨实行多季施工。既加快了施

工进度，又保证了工程质量。苏联供给的设备，虽附有详细的安装说明，但只依靠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是不可能安装好的，也要靠苏联专家的帮助。卡兹洛夫专家到厂后，发现板牙车间部分机床安装的位置不妥当，就帮助设计重新调整。前后两个月的时

63薛奇(东北煤扩管理局副局长)：〈阜新海州露天煤碘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华月船11953年第8号’页129。

64新华社报导：〈苏联对鞍山三大工程的伟大援助〉〔1953年12月26日1，《新华月10~1954年第1号’页143。

间、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卓间两」?：次，拿#胶尺亲自问工人一起测量，并亲自动手帮助搬动机床，直到使每一工序、每个机器都符合安全合理、光线充足和整齐美观的要求才定案。5兹洛夫说：「假如由我自己排的话，也许一禾就排好了，不过我们的目的是教会中国同志不会的’东西，现在中国同志会排机器了，这才完成了我们的任务。」专家们为了达到「中国也有大量的自己的专家」的目的，特别注意职工的技术培训工作。卡尔德林建议在厂里组织二百名各种技术工人学习技术。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苏联专家亲自为车工写学习提纲，给工人讲解，并在已开工的比较特殊的机床上为工人示范操作。在施工过程中，即使大雨滂沱，也会看到两位建筑专家的身影。他们穿着草色雨衣，撩起裤腿，有时爬在高空厂房的钢架上，检查每个螺丝眼；有时扶着油滑的扶梯到上下水道的深井去。当他们爬在最危险的地方时，翻译人员和职工常常为他们捏一把汗，但他们却忘了一切’并说：「风雨是阻挡不了我们的，我们如果等待和观望，那就会做自然的俘虏。」专家法依瓦基虽已是头发斑白的老人，但在冬季施工中仍经常在工地亲自操作示范。当工人们感谢他的帮助时，他却谦逊地说：「应该感谢工人群众，至于我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珠。我希望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献给中国的建设事业，我也希望把自己的一切本领教给中国同志，使中国人民有无数自己的专家，甚至比我更好的专家。」65

仅据有关部门1954年的总结，苏联专家帮助建设和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在有色冶金方面，苏联专家帮助建设的企业已投入生产的有鞍山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等五个单位，还有若干单位正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着紧张的施工和安装工作。在黑色冶金的生产中，专家帮助试制成了一百多种新钢种，并制成了中国过去从来不能生产的大型钢材和无缝钢管。仅鞍山钢铁公司，苏联专家五年来提出三万多条重大建议，其中一项对初轧机的根本改造，就将使产量提高107%。苏联专家

65王阴田（中共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委员会书记）：〈在苏联全面的援助下〉，《新华月报》，1954年第12号，页134—135。

4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3—1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六章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435

还帮助建设完成并已投入的已有好几个重要单位，帮助制成了数十种铜铝材料。根据专家的建议，在有色金属冶炼过程中，正确利用尾矿和冶炼剩下的废物，从中提炼出许多种贵重的稀有金属。

在煤矿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展了煤田地质勘探工作，提供了大量煤的储藏量，为新井建设做了良好的准备工作。苏联专家建议的新采煤法，已被90%的国营煤矿实行，提高了回采率。苏联专家还帮助制订了现有矿井的恢复和改建方案，发挥了这些矿井的潜力。如华北各省66对已经或即将报废的煤井中，44对在专家的帮助下进行了改建，

使这些矿井的寿命延长了十年或十年以上，产量提高两倍以上，不仅节省了大量资金，而且为国家增加了许多资源。

苏联专家帮助建设的火力电厂，已完工投入生产的有鄞州电厂等11个单位。在专家的指导下，火力电厂的建筑安装工程已基本上实行了机械化，现在建设一个12000千瓦的电厂，只需14个月就可以完成，几年来，火力电厂所采取的主要技术措施都是在专家的帮助下进行的。苏联专家帮助拟定的「电业技术管理法规」是解决电力生产各种问题的锁鑰。水力发电，在中国完全是一项新的工作，专家帮助编制了技术经济调查报告规程、初步设计及技术设计编制规程等重要文件，为这个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石油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帮助发现了许多新的油田。整顿了油井勘探工作，纠正了一部分技术人员不注意充分利用现有油井的错误思想，恢复了一切能够恢复的旧井，改善了采油方法，增加了采油量，例如玉门油矿，解放前采取率为30%，1954年提高到69—70%，大大提高了年产量。⁶⁶

在技术干部的培养方面，重工业部设计公司撰文说：我们的技术干部所以能够很快提高，是和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譬如新黏构设计标准就是由于苏联专家秋尼索夫在思想上技术上耐心地教育，具体地帮助，我们才很快学会的。我们开始不知道怎样做总平面设计，

⁶⁶薄一波：〈苏联专家对我国工业建设力一面的帮助〉《1954年12月29日在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新苹月船》1955年第1号，页223。

苏联专家札瓦斯基便在工作中随时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开办了专门的训练班，培养了总平面设计人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还学习了新的采光算法、采暖算法、工厂建筑设计原则、平屋顶的设计、苏联的制图方法，以及如何进行标准设计等先进经验。特别是工程地质方面，全部是向苏联学习的。譬如勘探改用了苏联式绞机和原状取土法；地耐力的确定改用了土壤分析；学会了土壤分析、水质分析的操作和要求，

现场的记录和描述，报告书的内容等。在测量方面，学习了苏联的三线水平测量、巴保夫平差，以及苏联的接图方法等。我们就是这样依靠苏联专家，学习苏联经验，才得以迅速提高了干部的技术水平。67再如：1953年7月15日破土动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此前苏联就派出了总顾问希格乔夫和第一批技术培训和土建专家进行现场指导，以后又陆续派来近200名各方面专家，从产品工艺、技术检查到设备安装、生产调度，都有苏联专家把关，还配备了技术科长、车间主任直到各车间高级调整技工的全班人马。他们手把手地教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安装、调试及组织生产，直到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线开出第一辆中国制造的汽车。68

在航空事业方面，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对于中国航空工业如何从修理飞机过渡到制造飞机，提出了许多根本性建议，并设想了非常具体的途径和方法。四十多年后，中国航空工业创始人之一段子俊回忆说：「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是功不可没的。」69

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中，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和工人共同创造了「大型管柱钻孔法」这种世界上最新的桥梁建筑技术。这种新的施工

4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3—1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法采用，解决了使用旧的「压气沉箱法」所不能解决的在畏江深水建筑桥墩的严重困难，不仅避免了旧的施工法的危险性，并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建设资金，给桥梁建筑史揭开了新的一页。7(1
鞍山钢铁公司是苏联援助改造的重点企业，该公司关于1957年专家工作的总结报告说，苏联专家一年里共提出】76项改进各方面工作的建议，亲自指导和帮助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对鞍钢的生产建设起了很大作

用。基本建设方面：专家帮助进行了新烧结、新选矿、新焦化、浮选车间、三号高炉、二连轧车间大石桥镁矿厂等项基本建设工程的施工、验收、试车调整和开工准备工作，因而保证了新工程及时顺利地投入生产。改进生产方面，在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不仅提高了数量和质量，而且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并改善了重轨钢质；试轧成功85种新产品，进一步满足了国家建设的急需钢材；改进了隧道窑热工制度，使成品率提高了25%。并试制成功铝镁砖。管理工作方面：专家帮助研究制订了1957年的生产计划和完成计划的措施，帮助公司领导处理了难以解决的重要问题，例如矿石和炼钢原料不足问题、二初轧主传动事故问题、改进运输工作等等。总之报告认为苏联专家所给予的帮助是全面的、巨大的，是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1957年计划的重要因素。⁷¹

⁷⁰〈新华社记者评述大桥建成的巨大政治和经济意义〉，《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2号，页146。

⁷¹1957年鞍山钢铁公司专家工作总结。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全宗500'目录2.1^案卷20。

⁷²《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页78。

⁷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299。

156项重点工程〔实际建设的是150个项目〕，其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工的有146项，在1955至1962年间陆续建成投产。⁷²苏联专家对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真诚帮助和重大贡献，中国政府和人民是铭记在心的。薄一波说：「每当回顾『156』项工程的建设，总是想到不要忘记斯大林，不要忘记苏联人民，不要忘记那些来华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

⁷³第七章

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

1953到1955年间，是新中国政治体制由建国初期的创建走向完成的阶段。其标志就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新一届内阁的组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多党参与的政治体制，其性质也由人民民主专政转为无产阶级专政。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1 召开全国人大的骚乱和准备

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在政治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明确在合适的时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因为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任务更为紧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具备。到1952年底，不仅全国大陆已全部解放，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朝鲜战局也基本稳定了下来，按全国政协组织法规定，‘一届政协1952年秋即已到期’因此‘是由二届政协继续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还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有必要作出明确决策。

在1952年10月刘少奇访苏时，中国共产党曾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一事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中共中央认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信誉很高，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共同纲领》就是适应这个时期的临时宪法，因此似乎没有必要急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出一部与《共同纲领》内容相同的宪法。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经毛泽东看过）中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在1949年开过以后，已有三年了，

最近就应该召开第二次会议。而如果在最近不召开人民政协的第二次会议，那就应该在明年或至迟后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为人民政协在全国有很好的信誉，各民主党派也愿意召开人民政协，而不积极。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选举的准备工作也还有些不[~]因此，我们考虑在明年春夏之间召开人民政协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而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到三年以后去召开。

在中国党内有人提出了制订宪法的问题。当然，如果要制订宪法就应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在中国是否需要制订宪法也还可以考虑。因为中国已有一个共同纲领，而且它在群众中、在各阶层中均有很好的威信，在目前过渡时期即以共同纲领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可以过得去的。如果在目前要制订宪法，其绝大部分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还是要重复共同纲领，在基本上不会有甚么改变[^]不过把条文的形式及共同纲领的名称加以改变而已。因此[~]我们考虑在目前过渡时期是否可以暂时不制订宪法，而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共同纲领则可以在历次政协全体会议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以修改补充，待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有了基本的改变以后，即中国在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再来制订宪法。而那时我们在基本上就可以制订一个社会主义的宪法。1

在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两次会谈中，斯大林都坚持应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订一部正式的宪法，哪怕这个宪法是承认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的宪法。斯大林说：

如果你们不制订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各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的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经选举产生的，人家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它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也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你们应从敌人（中国的和外国的敌人）那里拿掉这些武器，不给他们这些借口。我同意你在信中所提出的意见，把共同纲领改变成宪法[~]基本大法，这种宪法自然是一种粗制品，但有一个宪法，

比没有好。

斯大林还提议：「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²

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于1952年11月间作出决定，着手酝酿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12月24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三次扩大的会议上，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就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交换意见。周恩来解释说：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建国之初，考虑到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立即实行的条件，因此，《共同纲领》又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则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

²刘少奇：《关于奥斯大林会谈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央的电（1952年10月30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页536。

代表大会的职权。现在，这种过渡时期已经过去了，我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为着适应这一新时期的国家任务，就必须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求进一步地巩固人民民主，以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为此，中国共产党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所规定的职权，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来推迟到1954年〕，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³与会

各委员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表示赞同。认为在三年来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在开始大规模建设的同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完全正确的和适时的，符合全国人民要求的。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二十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周恩来对这个决议草案作了说明。会前的1月11日，毛泽东曾召集十八位民主人士参加座谈会；12日，周恩来召集政协委员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针对两次座谈会中反映出的意见和疑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3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作了解释和说明。

毛泽东说，就全国范围来讲，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供同纲冲〉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毛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毛说：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0949—1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页274。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在谈到争民主的问题时，毛说：中国人（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就是争这个民主：。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

关于现在办选举、制订宪法有没有困难，毛说，困难总是会有的，但是比起我们已经做过的几件事，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恢复经济，困难都要少一些。经过我们努力，训练好干部，安

排好工作，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是可以把选举工作搞好的。关于制订宪法，毛在11日的座谈会上就说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几天功夫，由十九个代表〔每省一个人〕就搞出来了「临时约法」。我们的〈供同纲冲〉经过大家讨论，实际上搞起来，前后也不过一个月。4

周恩来在会上也说，起草宪法虽然有困难，但是可以解决的。宪法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只是规定现在要做的事情，我们将要制订的宪法是现阶段的宪法。

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现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决议于一九五三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制订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5为了进行起草宪法和选举法的工作，〈决影分别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以朱德、宋庆龄等三十二人为委员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以安子文、李烛尘等二十三人为委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于1953年2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这个《选举法》的主要特点在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方面。它既以一定人口的比例为基础，同时又适当照顾地区和单位，在城市与乡村间、少数民族与汉族间，都作了不同比例的规定。使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选举的方法，规定只在乡、镇-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等基层政权单位实行直接的选举，在县及县以上则实行间接的选举。只在县以上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在基层政权单位则一般采用举手表决的投票方法。这是由中国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实际条件决定的，是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充分保证人

民民主权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全国进行基层选举的单位共为21.4798万个，进行基层选举地区的人口共为5.71434511亿人，登记的选民为3.23亿人。全国各地共选出566.9144万名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妇女代表占。全国基层选举的胜利完成，大大推动了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接着，县、市、省相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1226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使中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够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实现其庄严的使命。

2毛泽东主持宪法起草

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同时，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带着一个精悍的班子⁶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南下杭州，着手宪法的起草工作。从1953年12月下旬到1954年3月中旬，毛泽东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在杭州集中精力起草宪法草案。6期间修改的稿子就达七八次之多。毛泽东在

⁶参见王芳：〈警卫领袖的回忆〉，《百年澜》，2007年第1期，页21—26。

起草宪法过程中，非常注意吸收外国的经验。他多次讲，我们的这部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因此他除比较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外、特别注意研究和借鉴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1936年颁布的《苏联宪法》、斯大林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以及东欧民主国家的宪法。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毛泽东比较看重1946年颁布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在参阅苏联、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斟酌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正式形成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于1954年3月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

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和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张澜、黄炎培、程潜等民主人士共二十六名委员出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正式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会议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修改，以便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作为草案公布。会议还决定，除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讨论外，还要会同全国政协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分发给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展开讨论。

宪法草案初稿在北京500多人中进行了讨论，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8000多人中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收集了不包括疑问的5900多条意见。1954年6月，毛泽东领导的起草委员会又根据上述意见完成了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审订。毛回顾这部宪法起草经过说：

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个多月。最初第一个稿子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二稿，是在西湖两个月，那是一个小组起草的。第三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良多力量，全国有八千多人讨

4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5—1955）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七章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

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¹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抹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

6月14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提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毛说，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同时在讨论中还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被采用了。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的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毛认为，这次起草宪法草案的一个成功经验，是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今后，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他说：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关于宪法的意义，毛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

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7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4年6月1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页316—317。关于中国的奋斗目标，毛说：我们的总任务，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不一样了。

对宪法草案删去傅作义等提出在宪法中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一节，8毛泽东解释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甚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9

在表决前，李济深、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二十一人发言，认为中国人民要求立宪已经有五六十年了，但是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民主的宪法。如今，中国人民多年来流血牺牲奋斗所寻求的目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就要如愿以偿了。这将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是真正名符其实的人民宪法，也是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宪法。在宪法中体现了建设性、和平性、团结性和进步性。张治中用三句话概括宪法草案的特点：「第一，结构谨严而明确；第二，内容完整而充实；第三，措词简易而明确。」10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随后，中共中央也发出〈关于在全国人民中进

行宪法草案的宣传和讨论的指示》，让全国人民参与对宪法草案的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为了便于组织全国人民学习和讨论宪法草案，各地还成立了「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

1954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关于在宪法草案的宣传和讨论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提出：「这次宪法草案的宣传和讨论，应当像总路线宣传一样，尽力做到广泛深入，家喻户晓。为此，应当动员大量的宣传力量，包括干部和党的报告员、宣传员等，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小会和大会讨论的主要目的还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使大家真正了解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及其对于各阶层人民自己的切身关系，而不是去组织对宪法草案内容的争论。在讨论会上，如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记录下来，并汇报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7月，中宣部又发出〈关于要各地注意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提出对宪法草案的意见的通报〉，指出：「据北京市及华北其它地方反映，有不少地方在宪法草案的宣传和讨论中，虽然注意了向群众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但对于发扬民主，发动人民群众提出对宪法草案的补充和修改意见这方面则注意得不够。此种现象值得各地加以注意。」「北京市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已决定在宪法草案的宣传讨论的最后一阶段，在群众已经初步了解宪法草案的主要内容和制订宪法的伟大意义的基础上，继续在机关干部、工矿企业、街道居民积极分子、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组织一、二次小型讨论会，采取逐条宣读、逐条发表意见的办法，发动大家积极提出对宪法草案的意见（无组织的城市市民和农民中，这样做较困难，也无必要，故未规定这样做），有些单位已采用这一方法，并已收到很好的效果。」〈通报〉说：「北京市的这一经验值得各地注意和参考。」¹²

至9月上旬全民讨论结束，全国各界共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提出118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

9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9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对宪法草案作最后的审议。在会议一致通过最后的修改之后，毛

泽东发表讲话。他说：「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五百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八千多人讨论，然后是三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千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算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字都是认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甚么时候发现就及时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¹³

在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讨论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机床边、矿井下、田野里的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有来自课堂、实验室、医院、研究机构、文化部门的知识分子代表；有来自军营和边防的解放军官兵代表；有来自内蒙古草原、西藏高原、天山脚下、西南边陲的蒙古、藏、哈萨克、维吾尔、彝、苗、壮……等少数民族代表；有共产党员、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其中既有亲历近代中国政治风云的白发长者，又有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妇女代表147人，占代表总数的11.997%，少数民族代表177人，占代表总数的14.447%。代表们济济一堂，共商国家大事。大会的任务是：制订宪法；制订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他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持，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他号召全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他满怀信心地宣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的一定能够达到。¹⁴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从国家的性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说明了宪法的基本内容。他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全体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共产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它法律中起模范作用，全国各族人民要为保证宪法的完全实施而奋斗，为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¹⁵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我们的目擦是：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报告全面阐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的布局和意义。总结了建国五年来，尤其是1952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以后，国家在工业化建设，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

改善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如实地作了说明。周恩来说，五年以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进行了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他表示相信，即将由大会产生的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宪法规定的各项原则，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一定能把我国的各项事业推向新的更大的胜利。¹⁶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代表们在讨论会上对五年来的政府工作表示满意，大会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

大会依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利瓦伊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艾则孜等十三人为副委员长。选举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大会通过决定以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会议决定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十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任命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等十五人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至此，大会圆满完成了它所担负的各项重大历史任务，于9月28日胜利闭幕。这次大会的整个进程，显示了我国政治的民主性质和全国

14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349-350。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册？一19690，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327。

人民在民主基础上的团结一致，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4全国政协职能的转换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曾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召开，全国政协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如要存在，其职能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何区分，就是又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

政治协商会议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实际上是历史上形成的统一战线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这个问题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就提出来了，中共党内一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模糊认识的，即把统一战线看作包袱，主张干脆取消、丢掉。1953年5月16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召集统战工作会议的请示〉。会前，刘少奇听取了统战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对会议准备讨论的几个主要议题的汇报。在谈到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題时，刘少奇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后对民主人士的安排，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对他们是热诚的。因此，对他们的工作要做得好一点。其实他们的要求并不很高，有些人只是要求有吃有用，有些人还要求榜上有名，有些人则要求与闻政事，也有的人要求有权。对前三条要尽可能给以满足；要有实权则需要有条件，他要有做好工作的能力，真心同我们合作，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因此，对党外人士的安排必须恰当。对几年来有进步需要提升者，应予提升。当谈到统一战线组织是否需要考虑改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称时，刘少奇说，改不改名称由他们提为好，我们提要改，他们不同意怎么办？名称改也好，不改也可以，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弄得他们不愉快，如改而弄得他们不愉快，不如不改。刘少奇向与会人员指出，要把统战工作的必要性讲清楚，要善于

向党委负责同志做宣传工作。刘说，党内确实有些人觉得统战工作可以不要。统战工作到底搞多久，这在党内有些同志中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在党内讲清统战工作的意义，必要性和长期性。应当明确，我们要把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导到社会主义，统战工作要做到社会主义。做统战工作的干部要立场坚定，作风较好，还要有灵活性。为了解决统战干部的问题，可考虑采用开训练班的方法，要好好培养教育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口

基于以上认识，中共中央认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以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仍应作为独立的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以便多方面团结各方面代表人士和民主党派，为实现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人民政协的组成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要扩大团结面，把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华侨及其它爱国分子中必要的人选吸收到这个统一战线组织中来。一切参加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在政治上应遵循政协的章程，但在组织上各自保持其独立地位。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组织是领导关系，统一战线组织对各参加单位的关系，是协商关系。政协对人民政府的关系，是协助和建议的关系。

召开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由一届政协常委会负责进行。1954年10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有关召开第二届政协会议的一些建议。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研究协商，一致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即：（一）二届政协的组织形式，由一届政协的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个层次，改变为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两个层次，但要适当扩大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名额；（二）地区和军队由于已选出代表参加全国人大，今后不再作为参加人民政协的单位；（三）不再制订新的供同纲节，以原组织法为基础，另行起草人民政协章程。经政协常委会多次讨论，决定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由十一个党派、八个人民团体、九个界别单位和一部分特邀人士组成。在筹备二届政协一次会议期间，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对人民政协章程草案作过多次协商讨论，争论比较集中的是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问题。一些人对人大召开

以后，政协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抱有

怀疑；一些人对政协性质的改变表现出疑虑和不满，感到从此政协成了「清谈馆」，不会再有多大作用；一些人担心《宪法》上没有规定人民政协的地位，政协以后如何工作没有法律依据；一些人则认为政协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力，要求把政协同人大并重。

为了统一党内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思想，在二届政协一次会议开幕前，毛泽东召集参加政协的部分党内外人士进行座谈。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政协进行政治协商。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于政协的性质，毛泽东说，政协不能搞成国家机关，因为人大和国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如果把政协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成二元了，民主集中制就讲不通了。他强调说，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发挥在这个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作用。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18毛泽东的意见为大家所接受。

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委员由一届政协的180名扩大到559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陈叔通作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章伯钧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的说明。〈会议章程〉总纲明确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贯彻《宪法》的实施，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周恩来在报告中根据政协章程总纲的规定，把今后政协的任务归纳为五点：第一，协商国际问题。第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组织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第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间相互关系问题，并联系人民群众，向国家有关机关

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第四，协商和处理政协内部和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问题。第五，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努力进行思想改造。他相信，根据上述五大任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即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和解放台湾、保卫和平的斗争中，将要继续发挥作用。

会议通过了〈关于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推举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等十五人为副主席，王芸生等六十五人为常务委员。

经过二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正式确定的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以及政协与人大、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为长期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历史经验的总结

刘少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作了说明。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为新中国诞生而英勇斗争的历史性成果。1840年代中国抵抗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式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最早的代表是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1898年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企图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立一个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这次变法运动，在当时受到许多人的赞成和拥护，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却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派镇压下去了。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

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组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

^ 《早81&制度的确立

南京临时政府，并产生了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但是不久，袁世勋领导的反动派篡夺了国家的权力，临时约法被撕毁。中国所有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要宪法的。但在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却总要用一个所谓「宪法」来挽救他们的统治。清王朝在将要垮台前夕，于1908年公布了一个「宪法大纲」；北洋军阀中最后一个所谓大总统曹锟，在垮台的前一年（1923年）也公布了一个骗人的「宪法」；1946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搞过一套假民主的闹剧，公布了一个「宪法」。所有这些，都理所当然地遭到人民的反对。历史证明，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确立了人民自己的统治，才有可能制订一部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宪法。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宪法草案总结了五年以来国家机关工作的经验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对国家的政治制度作出了更加完备的规定。他说，宪法草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将成为我国的国家根本法，它将在我国的国家生活中起巨大的积极的作用。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地位，决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使他们必须担负更大的责任，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它法律中起模范作用。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同各民主党派、同党外的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为《宪法》的实施而积极努力。19

2两个主要特点

19割少奇：《割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167—168。

《宪法》肯定了建国以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并且用法律的形式把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与作为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共同纲领》相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的特点，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

《宪法》在确立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承认过渡时期社会既有的多种经济成份，四个阶级共同行使国家权力的经济、政治特点，法律依然保护资本家所有权和个体私有权；同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肯定了实际生活中已经开始进行重大社会改革。《宪法》序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在总纲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把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得到人民拥护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在根本大法中确定下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人民民主原则，反映在《宪法》中对人民代表大会制订了比《共同纲领》更为完备的规定。在总结建国五年来国家机关工作经验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经验的基础上，《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的唯一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它的常设机关，并详细规定了由它们分别行使的立法、监督、任免及有关决策的职权。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就是说，国家执行机关，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一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接受代表大会的监督，并由它决定罢免。确定人民代表大会制为国家政治制

度最根本的特征，这就向人们郑重表明：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大事，都不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来决定；一切重大的问题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全国性的重大问题，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在它闭会期间，经过它

的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地方性的重大问题，经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这就是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能够对于国家重大问题作出正式决定并直接监督其实施的国家权力机关。

《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权范围作了专章规定。国家主席的职权是：对外代表国家，接受外国使节，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对内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的主要成员，授予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等等。这就是说，国家主席实际上是国家的最高代表，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当然，国家主席的大部分职权的行使，需要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定，也就是以集体决策为基础的。《宪法》还规定国家主席在其认为必要的时候有权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将该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务院或其它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本身的制约，国家主席这一职权并不具有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的特殊权力。

人民民主原则还反映在《宪法》明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更完备的规定，特别是对公民享有的劳动、休息、劳动保险、接受教育等权利作了明确规定，使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获得了《宪法》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和颁布实行，标志着建国初期即已着手的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

3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僚法》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比《共同纲领》更为完整的规定。根据《共同纲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的总精神，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进行了大量工作。

1950年7、8月间，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组成中央西南、西北各民族访问团，分赴西南地区的云南、西康、四川、贵州，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访问。访问团历时数月，行程数万里，走遍西南、西北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偏远贫困地区，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共产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征求他们对民族工作的意见。这次访问活动对于加强和改进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建国一周年前夕，周恩来总理特意邀请各少数民族代表，其中包括各级军政人员、工人、农牧民、军烈属、教师学生、文艺工作者以及活佛、王公、阿訇、堪布、喇嘛、土司、头人等159人，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参观访问，加强了他们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的信念。

对于民族间和民族内部存在的纠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本着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公正合理地予以调解，使许多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民族纠纷，如冤家械斗、草山纠纷、边界争议、部落间的矛盾等，相继得到圆满解决。在经济上，人民政府在建国初期百废待举的困难情况下，仍抽出必要的人力、物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事业，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有关重要问题作出决议，其中，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作为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的两项中心工作。据此，中央人民政府制订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案，加紧筹办中央民族学院；同时，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于1952年8月公布实施。

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纲要〉明确民族区域自治的总原则为：各民族自治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自治区的建立，得依据当地民族

关系，经济发展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而定，既可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区；也可以一个大的少数民族众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区，在该自治区内的各个人口很少的其它少数民族聚居区，则实行区域自治。〈纲要〉还对民族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原则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关于民族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纲要〉规定：可在国家法令规定的范围内制订本自治区单行法规；依照本民族大多数人民和与人民有联繫的领袖人物的志愿决定内部改革事务；依据中央有关权限划分的规定来管理本自治区的财政；在国家统一的经济制度和计划下自由发展本自治区的经济事业；采取适当办法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艺术和卫生事业，等等。

〈纲要〉是根据中国少数民族的特点而制订的具有全国指导意义的实施办法。它将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正确地结合，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既有利于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又有利于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发挥各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管理自己事务的积极性，促进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推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因而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欢迎。到1953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已建立起相当于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區47个，还有相当数量的相当于区、乡级的自治区。这些自治地方内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为1000万人。除了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内蒙古自治区外，已建立筹备机构准备成立的相当于省一级的自治区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此外，还筹备在甘肃、青海省内的回族、藏族和蒙族聚居区建立自治区，等等。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民族区域自治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国策和基本制度，它对国家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根据多年的实践，《宪法》把自治地方划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这样，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不仅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得到正式确认，而且更具有可行性。在回、藏、壮、维吾尔等人口较多、聚居地区较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的工作在加紧进行。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1956年4月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于1958年3月和10月相继成立。这样，到1958年底，在全国15个省、区已建立民族自治地方87个，除省级自治区外，有自治州29个、自治县（旗）54个，包括35个民族成份。实行自治的民族人口，已占全国有条件建立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的绝大多数。同时，除西藏以外的民族地区，都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实行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新建的八条铁路干线中，有五条在少数民族地区或直接与少数民族地区相联接。五年计划中公路修建的重点，相当大部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这些铁路和公路的修建，大大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闭塞的状况，增进了各地区的物资交流和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并为以后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基本原则，《宪法》也作了明确的规定。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具体指出，过渡时期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是：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共同来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的共同事业的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配合起来，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一方面指出，不进行社会改革，少数民族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就不可能获得完全彻底的解放，社会不可能向前发展，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另一方面又指出，对社会经济结构和汉族地区不相同

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坚持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可考虑不再采取激烈的阶级斗争方法去进行，而采取比较和平的方法即经过曲折迂回的步骤和更为温和的办法去进行，以便十分稳妥地推动这些地区向前发展。文件还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必须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三中央集权领导体制的建立

1中央集权与党政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主权制的人民民主国家，采取中央统一领导下地方适当分权的结构形式，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实行单一制结构形式，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体制形式为巩固国家的统一，实现国内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正确处理国家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具有其它单一制国家那种中央集权的一般特征。即：中央政府对各行政区域单位有直接统辖指挥的权力，是最高行政管理的决定者；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均须依据中央政府的政令开展。中国自己的特点是，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同实行官僚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的区别所在。在国家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的规定上，相对官僚集权制国家来说，也比较灵活。《共同纲领》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

在国家行政管理的层次上，新中国建立之初曾实行大行政区制度。这是因为广大新解放地区，为了实施军事管制建立社会秩序，在中央与省之间设立了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大区军政委员会。在社会秩序安定之后，又召集各大行政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同时产生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原军政委员会宣告结束。

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是比各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同时又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在领导实施民主建政、推动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2年下半年，中央考虑到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必须充实和加强，拟调各大行政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般由中共各中央局书记兼任〕及各大行政区其它一些领导人到中央工作，并逐步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的机构与职权。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将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改变它原来相当于一级政府机构、任务与职能，确定各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该地区进行领导并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的机关。这是对国家行政管理层次的第一次重要调整。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为了集中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适应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实行这一变革后，在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中，地方行政机关分成三级：省〔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县、市及后来的自治州、自治县），乡〔包括乡、镇及后来的民族乡〕人民委员会。至此，单一制中央集权的体制就基本确定下来。

与之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关系上也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决定的，也为所有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所接受。共产党的这种执政地位，决定了它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是通过国家政权组织来实现的。在建国之初，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中共八大党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五位书记中，有四位分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政务院总理职务。中共的许多高级领导人被选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分别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及政府中的其它重要职务。在大行政区一级，中共各中央局的第一书记一般也同时担任军政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主席。这种领导人员「党政合一」的形式，既是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表现，也是建国初年创建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客观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党的机关即是国家权力机关，中共党的职能可以混同于政府的职能，更不等于党可以直接对政府发号施令。

为了实现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建国之初就在中央人民政府内设立了中国共产党委员会。194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

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实现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以便统一贯彻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依据党章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负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组成党组。党组必须保证执行中共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党组由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组成，其职能主要是使政府各部门中党的领导人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执行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建国初年成立的有政务院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党组，均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政务院党组下又分设政法、财经、文教、监察等分党组及各部、会、院、署、行的党组小组，并设党组干事会统一领导全党组的经常工作。这时，在如何实现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是比较清醒的。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在国家机关的最高领导人、政务院党组干事会²⁰书记，在党组干事会成立时就指出：党组工作不要在形式上管得那么多，行政上的事还是经行政机构去办。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也规定：政务院机构中的党组会议不要代替行政会议；要健全政务院各部门的行政会议制度、办公制度和汇报制度，要保有一定的必要的形式，不可党内外不分，要使党外负责人加强责任感，在其职权范围内敢于做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第一副书记董必武具体²¹明说：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党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的工作，使政权机关接受党的政策，来实现领导的；党无论在甚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为

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组织的职能。董必武还指出：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应给予确定的指示；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去工作。21

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又就党政关系问题指出：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国家政权，而我们党在政权中又居于领导地位。所以一切号令应该经政权机构发出。这点中央已经注意到，各地也应该注意。由于过去长期战争条件，使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常常以党的名义下达命令，尤其在军队中更是这样。现在进入和平时期，又建立了全国政权，就应当改变这种习惯。他指出：党政有联系也有区别。党的方针、政策要组织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贯彻。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22

同年6月，鉴于各地人民政府正在筹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逐步代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泽东提出：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23

10月18日，董必武就县、乡政权建设写信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向饶指出「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11月，董必武在政法委召开的会议上再次指出：「党是领导政府机关的，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但并不是直接指挥国家政权。」12月4日，毛泽东在给董必武的信中明确表示：「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毛还在信中注明：「可以连同你此信和我答复你的几句话，一起抄发。」

1951年2月，刘少奇也指出：各级人民政府的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动应向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作报告，并接受其质询和审议。重要的工作和活动还须先经过人民代表会议的讨论和决议，然后大家团结一致地去加以执行。24

以上表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避免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倾向是有所警惕的，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则。

20 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员：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陈云为副书记，罗瑞卿、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刘景范、李克广、利瓦伊汉、齐燕铭为干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21。

21 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页190—191。

22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174—175。

2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19。

24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页58—59。

但从1953年初因执行「新税制」引起市场一定程度的混乱以后，毛泽东认为，这是政府工作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分散主义所致。他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政府工作必须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党作决定，政府执行，否则就是脱离党的领导，是「分散主义」。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尖锐提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决定撤销由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规定：「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它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如属于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属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²⁵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一、二、三、四办公室。此后，这四个办公室又扩大为与国务院对口的多个工作部门。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规定在各级党委增设新的党委工作机构，如工业

交通部、财政贸易部、文化教育部、政法工作部，等等。这些与政府工作部门相对应的党的工作部门，主要职能是对相应的政府工作部门尽到以下责任：出管理干部；0检查党的决议、政策、指示的执行情况；管理党的基层组织；指导工作。地方各级党委对于中央国家机关及其各部门设在地方的下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行双重领导制度，即这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既受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同时又受所在地方的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根据这些机关、单位的性质、分布情况等特点，双重领导的方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中央管理为主，由地方负责监督〔如铁路、邮电系统〕；一种是以地方管理为主，由中央负责监督〔如法院、文教系统〕。中共中央还决定，在交通、地质等工作性质复杂、分散、流动性较大的部门，建立政治工作机构。

【 2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页67~69-70。

这样，从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撤销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政务院各部党组直接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开始，到1955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建立与政府工作部门相对应的党的工作部门，就实际上形成了中共党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直接指挥政府工作的格局。

2政权性质的转变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成员和国务院成员的组成，与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成员和政务院成员的组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中，共产党员4人，26民主人士3人；27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共产党员3人，28民主人士2人；29在政务院所辖34个委、部、会、署、行等机构中，担任正职的共产党员20人，民主人士14人。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副主席均为共产党员，39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也全为共产党员，31原国家副主席和政务院

副总理中的民主人士均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32新组建的国务院各部、委35个正职中，民主人士13人，占37.27%；国务院组成人员共47人，民主人士13人，占27.66%。³³

出现这种重大改变的原因，是因为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国家政权的根本任务发生了改变，即由建设新民主主义转变为向社会主义

过渡，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也由原来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

早在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以后，中共党内的广大党员、干部就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感到疑惑，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19日下发了〈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作了如下解释，〈指示〉说：

关于现阶段我国政权性质问题，各地在学习总路线时有很多讨论，有些同志在向一般干部作报告时宣布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央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省级以上高级干部了解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但对一般干部这样解释和宣传却是不适宜的，发展这一讨论也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

（一）从实际上说，现在的政权的统一战线的组成并没有妨碍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相反地是有利于这一领导的，并没有妨碍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相反地是有利于这一事业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继续保持，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而如果广泛地宣传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势必引起许多民主人士的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慌心理，这在目前时期就是不利的，不策略的，必须将对党内省市以上高级干部在到此问题时加以说明和目前有些地方那样对很多人普遍讲的办法加以区别，我们应取前者，不取后者，尤其不要引用中央同志的话。

（二）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书中都已明确说明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

联合专政，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说明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的领导地位是适合的，不加修改并无不便，如目前即加以修改反而不便。因此，各地领导机关应注意控制这一问题的宣传，停止在广泛的干部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实质上由共产党一个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宣传和讨论，如已宣布过的应予停止，并说明理由。34

第一届全国人大选举的国家领导人的成员，正是依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不能分掌的原则进行安排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推进，关于政权性质的改变已不再是可以回避的问题。因此，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专门对此作了长篇解释。他说：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在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专政是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因为它只是实行了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改变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这样的政权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人们会问：既然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那末，为甚么又有其它阶级、其它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呢？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甚么还要继续存在呢？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同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异常清楚的道理吗？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即劳动者先锋队与人数众多的非无产者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界等等），或与大

多数劳动者建立的特式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

主义而建立的联盟。」35列宁所说的阶级联盟的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不一样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36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国家性质实质上已是无产阶级专政一节，千家驹先生有过如下回忆，他说：「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有一次毛泽东主席与民主党派人士闲谈时，毛主席说：『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当时我终以为毛主席一句开玩笑的话。现在想起来，才知道这是一句真话。」37

3国家对社会的掌控

1949年之后，中国建立起一个国家政权对社会全面掌控的社会体制，学术界称之为「总体性」社会或「全能主义」社会。38在这种社会体制下，国家控制了绝大部分稀缺资源和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场所和领域，国家权力扩张到整个社会，并逐步渗透到家庭和个人生活等私人领域。社会高度行政化，民间社会不复存在，个人依附于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共在全国城乡发动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与彻底的社会改造。在农村，通过剿匪反霸、废除保甲制、土地改革、构建基层政权等社会改革运动，重构了农村的社会结构、网络和关系，大地主、劣绅、特务、土匪、国民党党圃、反动会道门等新政权敌对势力被彻底肃清、家族宗法组织、神祖祀会等传统社会网络基本瓦解，以土地改革积极分子-为主体、高度认同新政权的政治精英开始成长，中共组织和行政权力成功楔入乡村社会。39在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之际，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革命运动，这场以城市为中心延伸到乡村的连动，给了国民党潜伏势力和派遣特务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也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在社会上为非作歹的恶霸流氓和黑恶势力。

4『与此同时，采取坚决措施扫除各种游民活动，大量的以乞讨、偷窃、诈骗、赌博、凶杀及其它不正当手段维生的城市游民被收容改造，400多万流落在各个城市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全部被遣回乡，彻底取缔妓院，全面禁烟、禁毒，废除封建把头制。对全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全面的整合改造，所有接受美英等国资助的学校、医院、教会全部收回自办，全部接办公立学校，继而接收私立学校并将其改为公立，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巩固政权、恢复治安和实行社会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城市中所有的传统小区组织和民间势力进行了摧毁性的打击。41

全面控制的社会体制是以国家政权机关对社会资源高度垄断为基础的。新中国建国后的最初几年，虽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但由于个体、私人经济大量存在，由于城乡自由市场的存在，仍然存在一个广泛的私人生活领域，存在自主经济活动和自谋职业。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对粮食和食用油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完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在全国基本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统包统配的城市就业制度，实行以城乡分割为基础的户籍制度，国家统一录取并统一分配工作的高等教育制度。这样，国家就获得了对社会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权。这些资源不仅包括物

39陈益元：〈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建设与鹿村社会变迁——以1949—1952年湖南省醴陵县为

个案〉，《伎学集刊》，2005年第1期，页46—52。40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页45—61。41

华伟：〈单位制向小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战略与管?！》

2000年第1期，页86—99。

资、资金，也包括权力、威望、机会等。一个社会成员要取得最基本的

生存条件，就必须从国家获得相应的资源。民间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⁴²

国家政权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是以一系列社会制度为依托的。这些制度包括城镇街居制度、单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城乡分割户籍制度，以及农村集体化制度〔合作社与人民公社〕。

（“！”）城市街居制

中共接管大城市后，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对基于保甲编成的区级建制进行了合并改组，重新配备行政干部。经过几次反复后，区的行政地位最终确定为一级政府。国民政府曾经试图在街坊一级建政，终告失败，中共则成功地把社会控制和市政管理深入到城市社会的最基层，其具体制度是街居制。

所谓街居制，就是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市、区政府之下如何设置组织未有定论，授予了地方的创制权。全国各城市的街道组织有三种类型：一是设街政府，如武汉市、大连市、郑州市、太原市、兰州市、西宁市。二是设街公所或街道办事处，如上海市、天津市，以及江西、湖南、广东、山西等省的一些城市。三是「警政合一」，在公安派出所内设行政干事或民政工作组，如北京市、重庆市、成都市。基层群众组织也名称各异。1954年1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全国城市基层组织大体统一，设置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⁴³到1956年，居民委员会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普遍建立了起来。

街道办事处为市政府或市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是城市的基层行政组织。居民委员会的性质定为「群众自治组织」，但实质上成为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延伸，成为「中央—省市—区县—街居」这一垂直行政体系的末梢。⁴⁴居委会经费由政府统一拨发，承办基层政权交付的很多事情。除了办理无单位居民福利、调解纠纷、维护治安等社会性管理功能，还对居民中的被管制分子和其它被剥夺政治权利分子进行监督管制，

「带有人民民主专政的特征」。45城市街居制使国家封城市社会的控制无所不在。

(之)单位制度

所谓单位制度，是国家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的组织形式。单位可归为三种：第一种是党政机关和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第二种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单位。第三种是事业单位，包括公立大、中、小学，公立医院，公立的科研院所、博物馆、影剧院等。单位是国家体制的延伸，也叫「国家单位」，每个单位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如省部级、地局级、县处级、科级。所有城镇正式就业者，都隶属于某个不同级别、不同类型但内部结构大体相同的单位，绝大多数城镇人群都是生活在「单位」之中。

单位制度源于根据地时期形成的对「党的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所谓「革命队伍」是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公职人员群体，一个人参加革命，进入一个单位，便成了「公家人」。1949年以后，中共将这种特殊管理体制普及到全社会，单位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机构的代名词，成为城镇公职人员（包括干部和工人）的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单位所覆盖的人口迅速扩张，成为城镇社会体制的主体，在单位体制以外的城市就业人口所剩无几。46单位不仅对其工作人员支付工资，还履行住房、医疗、食堂服务、商业服务、子女入托，甚至子女中小学教育等社会性服务功能，

42参见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随患〉，《战略与管冲1

1998年第5期、页1—17。43崔乃夫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页124。

44卢汉龙、李骏：〈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的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页188—195。45《当代中国的民政》：页124。
46华伟：〈单位制向小区制的回归——中国城11？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想，〈战略与管？！〉12000年第1期，页88。

所谓「单位办社会」。单位还管理职工的恋爱、婚姻、计划生育。离开单位的认可和证明，个人的许多社会活动就无法进行。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几乎都依赖于「单位」，其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的高低也与其所在单位有密切关系。单位级别愈高，职工福利待遇愈好，地位也就愈高。一个人要调动单位，不仅手续烦琐，而且机率较低。许多人终其一生，只在某一个单位就业，所谓「一次分配定终生」。一旦进入单位，就成为公有制体制内一员，取得区别于农民的「单位人」身份，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因而单位也具有了一种身份意义。47在单位制下，个人对国家的依附体现为对单位的高度依赖，国家对城市居民的行为控制，主要不是通过基层小区组织，而是通过一个个的单位来实现。法定小区被蚕食，沦为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此后，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作为一种配套组织，管理着无单位的城市边缘人群。

人事档案制度

国家职工大体区分为两种身份：干部与工人。干部与工人两种身份界线分明，包含着待遇和社会地位上的重大差别。干部处于社会分层的上层，两种身份之间的流动率很低。所谓人事管理，主要是指对干部的管理。战争年代，一般把担任公职的领导骨干称为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干部外延大大扩展，不专指领导骨干，还包括所有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公职人员，诸如大中小学教师、文艺工作者、公安司法警察、科学研究工作者、医护人员等，都在干部之列。可分为国家行政干部、党务干部、军队干部、人民团体干部、专业技术干部、企事业管理干部等六类，囊括所有体制内政治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所以，人事管理是新中国行政管理和政权建设的核心。

干部人事的管理包括对干部的录用、调配、任免、使用、升迁、交流、培训、考核、奖惩、监督、工资、福利，以及离休、退休、退職等全方位活动。干部管理的首要原则是「党管干部」，所有干部都由中共各级党委管理。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实行分级管理的制度，一般「下管两级」。中共各级党委均设有组织部，统一负责管理干部，在各级政权机关（人大常委、政府、检察院、法院）和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都设立人事管理机构，协助党委组织部门管理本系统、本部门人事，形成覆盖全国的干部人事管理网络。

人事管理的一个重要制度是严密的档案制度。中共历来重视干部档案，但战争年代中共机关辗转频繁，干部档案很难完整建立和保存。严密的干部档案制度是在中共执政以后建立起来的。干部档案以干部个人为立卷单位，档案涉及内容广泛，包括个人简历、自传、鉴定、考核、学历、职称、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审查、参加党团、录用、任免、转业、工资待遇、奖惩、退休、退職等材料。档案管理，具机密性，本人无法接触自己的档案，对档案内容没有知情权。档案制度固然是干部管理和使用的必备条件，但也是对干部队伍实行控制的极为有力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说，档案是一个公职人员的「生死簿」。

户籍制度

建国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就着手在城乡部分要害地区建立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全国城乡普遍建立起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国以后，每年都有大量农民迁入、流入城市，1956年出现一个高峰。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开始实行统包统配的劳动管理制度，城市就业压力急增，国家开始收紧城门，1956年底至1958年初，国务院连续四次发出指示，「防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力度不断强化，从「劝止」农民进城，进而在大城市设置收容所，收容「盲目流入」的农民并集中遣返原籍。481958年1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47 莆冬连：〈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载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国专题史稿》，第五卷（四川：四川、民出版社，204！[^] 页718—719。

1956年12月3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1月12日~国务院发布〈辟于制止企事业单位盲目招收工人和职员的通知〉；|2月1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广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8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中发生的问题的通知〉。第九十一次会议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49这个条例是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唯一的法律依据。

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实质是严格控制人口的迁移和流动。1955年11月7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确定「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标。中国的户籍人口由此分割出两种：「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50每一个「非农业人口」的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由公安派出所登记和发放。国家对「非农业人口」实行粮油定量供应的制度，每户拥有一个「粮本」，粮油关系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跟着户口走，城镇居民户籍变动必须随之迁移粮油关系。附着在城市户口之上的，还有住宅、副食品、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护、婚姻、征兵等具体福利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把每一个人定格在一点，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地域流动，尤其严格地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农民要想进城，不仅要改变居住地，而且要变更户口种类，即从农业户口变成非农业户口。除了考取国家正规大中专院校、少数应征入伍的农村战士提拔干部、少数农村干部转为脱产国家干部以外，这种变更的机会微乎其微。由于没有粮油供应关系，农村人口即便自发流入城市，也无法在城里生存。

农村集体化制度（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

传统的中国农村具有相当的自治权利，国家权力「止于州县」，从来没有有效地控制农村。近代以来，统治者试图将政权下移，但没有哪一种

制度能像中共政权那样，把国家权力如此有力地深入农村，对农村社会实行如此高的组织化和超强控制。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使国家政权成功地楔进农村，不过，农业合作社仍然是独立的经济组织，政府的管理仍然是一种外部的干预。农村经济和社会的高度组织化行政化的体制在农村普遍建立，是在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人民公社有四个主要体制特征：一是「政

49参见1958年1月9日罗瑞卿关于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说明。

50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页5。

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又是国家基层政权组织，还是农村社会组织。在这里，政企重合，国家与社会重合；二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规定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但公社和大队在生产和分配上握有最终决策权；三是「统一经营、集中劳动、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这是生产队的基本生产经营方式。农民必须以其绝大部分劳动时间从事集体劳动，并从集体经济获得主要生活来源；四是「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这是给予农民的小自由，作为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来源的补充。51人民公社控制了农村两大基本生产要素——土地与劳动力。集体之外无土地，公社之外无农民。农民失去了传统中国农民拥有的一些自治权利，如：支配自己土地及产品的权利、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和集市交换等，只有依附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国家通过人民公社获得了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的基本条件。人民公社制度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相结合，把八亿农民成功地挡在城市之外，束缚在十六亿亩土地上，并且固定在一个个结构相同的生产队，农民的活动半径很少超出十公里。52

上述一系列制度建构了一个覆盖城乡的社会控制网络，社会高度地组织化行政化。这种体制以国家垄断稀缺资源为基础，以深入到社会基层细胞的中共组织为权力核心，并且通过高度统制的意识形态得到强化。它

虽然实现了近代以来从未实现的国家的重新整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能力，有利于国家主导型的初期工业化，但造成了国家权力的无限制扩张，社会自身组织力衰退，民间社会消失。民众对国家高度依附，无力抵御国家权力的侵犯。它使中共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畅通无阻，很容易引起全民性共振。它也严重地限制了社会的流动，由此演化为一个等级身份制社会。

51参见董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广村的回顾与前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页9—11。

52董冬连：〈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共！——史研究》，2005年第1期，页21—31。

第八章

由思想批判到肃反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就明确宣称：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要求在党员、党外积极分子中间和在社会上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加强党对人民的思想领导，正确开展思想斗争。强调对许多旧亲点，特别是封建观点，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批驳它；对过去许多问题，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解释。总之，首先要肃清帝国主义的思想 and 封建主义的思想；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

体系，即非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要承认其客观存在及合法性，另一方面要适当地进行批评，以便在人民中间正确地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即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

1刘少奇在1951年5月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78—91。

位，进而加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领导地位。11951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批判，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进行的。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之后，则进一步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份的同时，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

强调：「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2然而，从1954年由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发的思想批判，却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整肃，造成了多宗冤案。

一由《红楼梦研究》引发的文艺批判

1954年底开始掀起对胡适派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是由这年10月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讨论引起的。

1「红学」家俞平伯的新作

俞平伯，原名俞铭衡，1900年生，早年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9年从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大学任教。1922年他同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刘延陵等创办的《诗》月刊，是「五四」以后最早出现的诗刊。他是当时著名的新诗人之一，稍后又是闻名文坛的散文小品作家。在革命的艰苦年代，俞平伯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一位进步的爱国学者。抗战时期，日伪办的北京大学多次邀请他去任教；他断然拒绝。抗战胜利前夕，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著名人士在重庆秘密建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当即参加了这个革命组织。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地参加反饥饿斗争。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出世以后，即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爱和社会上的强烈反响。研究《红楼梦》成了专门学问，称为「红学」。「旧红学」的「索隐派」把《红楼梦》看成是影射清朝人物事件和清朝政治的，滥加猜度附会。「新红学」批评了「索隐派」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订《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材料，却去搜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改变了研究的方法，即采用杜威(化^!^")的实验主义方法，求证的结果，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辨》。

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开始于1921年。1922年写成《红楼梦辨》，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并称为「新红学」的代表作。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所持的中心观点与胡适相同，但「有时也微持异议」。如俞说，「曹雪芹此书虽纪实，却也不全是信史」，「虽是以真事为蓝本，但究竟是部小说，我们却当他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气」。1925年，他在《红楼梦辨》的修正（载《现代评论》，卷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胡适的「自叙传」说。他说：「我以为文艺的内涵，无论写实与否，必须决定于作者生平的经验；同时，我又以为这个必非作者生平经验的重现，无论其作风偏于写实。」他认为文学创作是「经验的重构」，「既同出于经验里，又非同经验的重现」，「一切文学皆为新生的，而非再生的」。这是「没有例外」的「通则」。「此通则应用于《红楼梦》的研究」，说「取材」于曹家「可以讲得通」，若说贾即是曹，一人一事的去附会，「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实和「索隐派」「用的是相似的方法」。全国解放后，俞将此书删改、增订，易名《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1953年10月，俞平伯在《红楼梦》的著作年代中说，「自1923年《红

《红楼梦辨》出版以后，我一直反对那『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考据法，因而我对这旧版自己十分不满。」「现在还通行的自传说」，「实有重新考虑的必要」。1954年，他在香港《大公船》连载发表近十万言的〈读红楼梦随笔〉；在《新建》上发表了他研究《红楼梦》成果的总结性文章〈红楼梦简论〉。文章分为：「《红楼梦》的传统性」、「《红楼梦》的独创性」和「着书的情况」三个部分。以实证和考据的方法，对〈(红楼)〉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穿凿附会、影射推测等主观臆想作了评说。文章最后强调：

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观点还它的庐山真面，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批判它，使它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同时灭少它

流弊的发生。考证研究的工作都配合着这总的目的来活动。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伟大的文学天才负责，我们必须对广大的人民负责。³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出版后，〈〈文艺〉1953年第9号「新书刊」栏目内作了报导，推荐说：「研究《红楼梦》，向来有一个浑名，叫做『红学』。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

2「小人物」挑战「红孽」权威

1953年9、10月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大会提出，作为思想战线上重要一翼的文学艺术，在过渡时期中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以文学艺术的方法来促进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反对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逐步增强和巩固，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的逐步完成。大会认为，应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过渡时期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195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的李希凡、蓝翎⁴两位青年学者，先后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膨胀〉〈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与《文艺报》「新书刊」评论的不同看法。作者认为：「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就《红楼梦》的『传统性』『独创性』和着书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绍。其中某些见解和方法，较之他的〈《红楼梦研究》〉一书向前跨进了一步，但评价《红楼梦》的基本观点仍旧是前书的继续与发挥。」「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对旧红学进行了批判，在〈红楼梦简论〉中也曾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学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自然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从《红楼梦研究》到〈红楼梦简论〉，俞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观点与方法基本上没有脱离旧红学家们的窠臼，并在〈简论〉一文中更进一步地加以发挥。」李、蓝对俞作的具体意见：一是认为「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二是认为「俞平伯先生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际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三是认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很明白地确认过「《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总之，俞先生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

李、蓝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应该说是正常的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作为青年学者，在当时敢向「红学」权威提出挑战，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3 质问 〈〈文艺粉编者

《文史哲》发表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不久，便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9月中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找到《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文史哲》上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在《人民日报》已将文章排出小样后，主管文化宣传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以及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等，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认为不宜在《人民日报》转载，商定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第18期转载时，主编冯雪峰写的编者按语指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

3 樽引自孙五明：《红葶：1954》（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20031，页28。

4 李希凡，1927年2月生，北京通县人；蓝翎本名杨建中，1931年生，山东单县人。

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又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李、蓝〈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也加了类似的编者按语，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看的。同时我们更希望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未予转载，以及《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十分不满，他在《文艺报》的编者按旁批道：「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在《光明日报》的编者按旁批道：「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在毛泽东看来，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他认为，党内存在的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是不能容许的。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专就此事给中央政治局和其它有关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指出：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挠。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挠「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接着，毛又交代说：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这是继对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又一次把文学艺术领域的不同学术观点提到政治问题的领域，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的一场严重斗争，而《文艺报》的编者按则被认为是党内出现的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代表作。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指责冯雪峰对李、蓝文章加的编者按，是对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抱着「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对待青年作者则是持「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毛泽东在审阅袁文时还加了下面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繫，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很显然的吗？」在另一则批示中，

II毛泽东：〈关于《红楼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352—353）。

12毛泽东：〈对《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54年10月2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页589。

毛泽东写道，《文艺报》「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在如此严厉的质问下，被迫进行检讨。II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检讨〉一文。对于这篇检讨，毛泽东看后又作了批注。在冯文谈到自己在古典文学领域内对胡适唯心论观点一向不加以注意一段，旁批：「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在文中谈到对资产阶级思想失去敏锐的感觉旁批：「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在文中「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精神」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文中「不自觉地存在于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旁批：「应说自觉。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文中说到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旁批：「应以此句为主去批判冯雪峰。」14

对毛泽东如此严厉地批评冯雪峰，周扬也感到震惊。15

4号召向资产阶级唯心论开火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主要负责人陆定一，读了毛泽东给中央领导的信后极为重视，意识到毛泽东的意图在于从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他在与中宣部有关领导多次议论后，于27日就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内称：

看到了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近两年来，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已开始注意……。但上述各种工作都不但做得很不夠，并且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两年来，在团结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并鼓励他们进行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他们中间，有些人并已开始尝试用新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但对于长期统治古典文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方法不但没有进行批判，而且根本没有加以注意，一任他们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观点来解释古典作品，在青年中散布毒素，而我们的作家竟熟视无睹，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直到李希凡、蓝翎那两位青年作者自动地出来批评俞平伯的错误观点后，仍未引起注意，相反地，却以种种理由不使他们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文艺报》在转载他们的文章前面所加的「按语」中，不但对俞平伯的错误观点一字未提，而且对李、蓝文章的价值和意义加以贬低。「文学遗产」16登载李、蓝文章前面所加的「按语」中多少表现了与此类似的态度。这是一连串严重的错误。

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关

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六十余人……。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清除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界的影^是一个迫切的重要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

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红楼梦》和整个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线，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1以引导青年正确地认识

《红楼梦》。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革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于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使他们感到害怕，从此放弃研究工作……

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该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它学术部门去。事实上，这次讨论只要一展开1势必会波动到其1也学术部门。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除了在文学方面外，在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三十多年来都有相当深的影响，解放后也没有对它进行过有系统的批判，因此，从各个方面来彻底地批判这种思想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准备用一两年时间来对胡适派思想从根本上彻底清算，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我们打算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刻在各文艺和学术刊物，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和其它学术研究机构^的党员^部中进行传速，根据指示的精神^检查刊物的编辑思想和研究机关的研究方针，纠正文艺和学术刊物缺乏思想性

斗争性、缺乏自由讨论的空气和研究机关离开思想斗争闭门研究的书呆子倾向¹以及由此而来的忽视甚至阻拦新生力量的关门主义作风，使各个思想学术部门的工作，能够经过这次的检查和讨论而提高一步。¹⁷

毛泽东当天指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1月3日《光明日报》登载郭沫若〈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11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的文章，详细阐述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方法和观点与胡适唯心论的因果关系〉。11月26日，《光明日报》刊登魏建功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观点的意义〉，以更加激烈的言辞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

12月1日’毛泽东找周扬谈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问题。2日’周扬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组织计划的报告，明确批判以胡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是：一、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人的实用主义），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三、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四、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五、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六、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七、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八’《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九、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为领导这次讨论，决定成立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组成的委员会。3日’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联席会议，传达学习讨论毛泽东10月16日那封信的精神，郭沫若作〈三点建议〉、周扬作〈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对毛泽东有关批判胡适思想的指示精神作了阐述，并据此对如何贯彻作了部署。会议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郭沫若指出，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他说：「这不仅仅是对于俞平伯本人、或者对于有斑斑点点研究进行讨论和批判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他希望文化学术界能够很好地来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的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部门，

17陈清泉、宋91涓：《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1，页389—392。

18毛浑束：谢周擤关于批判胡癡问题组织计划的请示的报告》〔1954年12月3日），载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页620—621。

4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第二卷（！953—^55）^向社！”主义过；度

第八聿由思想批判到肃反运动

489

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作家们、科学家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19周扬说：「文艺上的思想倾向的斗争总是反映阶级斗争的过程的。从1949年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的国家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即社

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阶段。对资产阶级唯心论及其在文艺上的反现实主义倾向的斗争就成为思想战线上一个比以前更加迫切的严重的任务。」「假如说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涉到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的问题，那末，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就关涉到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的问题。……批判地接受旧的遗产，这就是我们建设新的文化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决不能容忍资产阶级学者、作家用唯心论的观点来曲解和贬低我们祖国文学遗产的真正价值以及对这些遗产采取诽谤的虚无主义的立场。」「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和研究古典文学作品，阐明它们的真正价值，就必须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正确地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一切优良传统，在整个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这就是目前思想工作和文艺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从这次思想批判运动中我们大家都感到过去文艺战线上没有斗争的风平浪静的状态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只是一种严重的病态。」他强调：「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²⁰

在此同时，各地的文化部门、文艺团体甚至各民主党派也都纷纷举行座谈会、讨论会，以〈(红楼[^])研究为引子，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北京和各地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边倒的批判，没有自由讨论，据新华社湖北分社25日电讯〈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批判研究〈(红楼[^])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存有急躁情绪〉说，该系「要求党团员在座谈会上面对面给教授们提意见。教授们先自我检查」。215—
场政治性的园攻

郭沫若和周扬的发言都曾指出，在学术研究上应展开自由[^]论、自由争辩。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同

时，也交代了有关政策：

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抹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说明问题，应当力求生动‘辞句明白’善于分析具体的事实。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的文章。在已经做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意见，仍然允许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界减少顾虑，敢于大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知道甚么是真正对的，甚么是真正错的，以便达到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批判的目的，或达到学术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目的。

但是，由于把这场讨论定性为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随着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展到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场学术性的讨论和批评，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政治性的围攻。理论界、学术界不少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为表示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限，不得不纷纷发表对俞平伯的批判文章，

19郭沫若：〈三点建议〉，《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20周扬：〈我们必须战斗〉，《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0日。21《内部参考》，第273号，1954年11月30日。

其中虽然也包含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但整个来说是一种政治批判。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第一、认为俞平伯是胡适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和实践者。

有的文章说：「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胡适之，为了抵抗马克思

主义的宣传，在政治上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在学术上提出了反动的实验主义的『考据学』。」「胡适之所提倡的学术路线，其反动的目的就是阻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把他们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向『国故』堆里去，脱离现实，避开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上，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就正是这条路线的忠实的追随者和实践者。」「《红楼梦辨》在否定《红楼梦》社会内容的同时，也就否定了它的社会作用，亦即它反封建的倾向性。」「这样就给《红楼梦》注射了消毒剂，清除了它的『危险』作用，这对于封建阶级是大大的有利。……对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这正是『五四』以后洋场绅士的本色。从这种反动的虚无主义的否定论出发，必然会引导到丧失民族自信心。」

第二、认为俞平伯的思想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

有的文章认为：「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影〉〉的立场、观点、方法，除了直接受了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外，同时在其一切基本方面也继承和发展了……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的严重影响。这就是说：俞平伯先生的〈〈红楼〉〉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是买办资产阶级意识和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按其思想本质来说，这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进攻的一种具体表现。』

第三、认为俞平伯的著作使胡适的实验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借尸还魂。

有的文章认为：「『新红学』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但在解放以后，在新的政治条件下，俞平伯先生非但没有对过去的研究工作和他的影响作深刻的检讨，相反的却把旧作改头换面地重新发表出来，这就是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新作除了提供了一些新的考证材料并将个别的字句和表面结论稍加修正之外，而骨子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俞平伯先生以隐蔽的方式，向学术界和广大的青年读者公开地贩卖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使

它在中国学术界中间借尸还魂。」

以上对俞平伯的种种政治性的指责，当然不能完全由写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个人负责，它是简单化地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不同学术观点的结果，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事实上的的一种「奉命文学」的表现，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中、也有人公开持不同意见，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就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6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为肃清胡适思想在各个领域的影响，批判文章涉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教育思想、语言文字学等方面。但批判内容更多的是着眼于胡适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具有代表性的内容有：

「胡适根本不懂得科学，但他是反动哲学唯心论实验主义的信奉者，他跟着他的老师美国的实验主义者杜威一道，把最基本的科学方法也作了唯心论的歪曲。他大胆地假设一些怪论，再挖空心思去找证据，证实这些怪论。那就是先有成见的牵强附会，我田引水。我的假设就是结论，结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观的、片面的、武断的产物。胡适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和态度，否认了屈原的存在，否认了《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否认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否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存在，否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宣扬实验主义的胡适，不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

「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唯一『贡110，就是从世界上铜臭气最浓的国度里，运来了最庸俗的东西——实用主义。应该指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中国大规模走上庸俗化的道路是从胡适开始的，而实用主义就是产生庸俗化状态的直接原因。」胡适「这个把身体和灵魂都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学者』，今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了！多年

以来，他给予中国学术界的毒害，其范围之广与程度之深，实在是无法估计的。」

「如果认为胡适早年是好人，后来才反动，那固然是十分错误，如果认为胡适在政治上反动，学术上不无可取，那更是胡涂透顶」。「他十几岁留学美国时就投靠了美帝国主义，卖国勾当五十年如一曰」。「胡适不但在政治上反动，在学术上也是反革命，反科学，他的一切『著作』都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

「在思想领域内，胡适是中国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第一个也是头号的罪人」。「实验主义的唯心论的反动本质，不管它采取甚么表现形式，都是只能证明它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最反动的流派之一」。

「胡适的良主，的目的，是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牵着人的鼻子到『故纸堆』里，这就是改良主义者胡适进行反革命沾命的手段」，「胡适改组政治主张『好人政府』等等，是骗人的幌子，它藏着反革命的实质」，「胡适的买办文化的作用是为帝国主义『征服中国人的心』」，「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他是做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胡适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只是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寻找方便的道路，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心理基础。这就是他全部反革命活动的社会作用」。

这种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显然偏离了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的方向。对此胡适在大洋彼岸曾有如评说：

胡适虽然在「文化」实质上并没有被打倒，但从「人事」形式上确是被彻底打倒了。「群起而攻之，搞臭一个人」的批判机制的功效极限亦在这里。这种批判运动方式决不可能在学术科学上真正打倒胡适，但能做全扫除掉「胡适牌」所有「文化垃圾」的实际工作。政治的权威的全部批胡作业也就此告诉人们一个取舍的标准，实践上的有效目的也无非是替知识阶层在认识上进而在心理上架起一道防线。甚么是「胡适的」，

即敌人的观念意识、哲学形态：甚么是「我们的」，即革命的人民应采取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模式。这道防线要深入沉潜于每个知识个体的经验世界，渐渐化作为一种无意积淀，随即滋生出一种本能的反应或者说培养出一种敏锐的警惕。别人一提及「胡适的」或「胡适」这个名词，或自己一见到胡适的书，便心生恐惧、厌恶与憎恨，便知警惕、防范与隔离。批判胡适、禁止胡适的书与文章，就是说要批倒「胡适」这个名字所象征或包含的思想文化内容与意识形态结构，自觉与它们画清界限，分出敌我。

7对俞平伯的公正评说

三〇一年之后，在1986年1月20日举行的庆祝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的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讲话说：

俞平伯先生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早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白话新体诗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独特风格的散文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对小说、戏曲、诗词的研究，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为学术界重视的成果。

俞平伯先生在全国解放前夕，积极参加进步的民主运动，从此，对党是一贯亲近和拥护的。他在全中国解放前的二十八年和新中国成立那年起的三十七年中，在任何环境里孜孜不倦地从事对人民有益的学术活动和文艺活动，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它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的成份，怎样估计高？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

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原则。按照四项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接受这一类历史教训，我们要在学术界认真实行双百方针，提倡在正常的气氛下进行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和辩论，团结一切爱国的、努力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的学术工作者，共同前进，共同追求真理。28

28胡绳：〈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上的讲话〉，《学衡评论》，1986年第2期，页3。

1990年10月16日，新华社发布了俞平伯先生逝世的消息，在介绍了俞平伯简要生平之后说：「俞平伯先生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进步的民主运动，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七十年来，他不倦地从事学术活动和文艺活动，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他为〈《红楼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把它推向了一个新阶段。」29

尽管这些都来得晚了一些，但终究是给俞平伯还了一个历史的公正。

8毛泽东的胡适情结

至于对胡适的批判，毛泽东在当时也认为批判中有了一些偏差。他曾经说过：

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30

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

代表时又说：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到底贪恋甚么？批判嘛，总没有甚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一〇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31

29《光明日报》1990年10月17日。

30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上讲话的记录，1957年2月16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298—299。

31朱庄：《毛泽东与胡适》，《炎黄春秋》（北京），1999年第11期，页31。

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由对《红楼梦》研究引发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虽然涉及了思想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诸多名流，但毕竟还是限制在思想理论的范围内，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则很快升格为「反革命集团」，开了「文字狱」的先河。

1两种不同的文艺思想

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身处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不同地区，由于斗争环境、斗争经历等的不同，思想观念也就存在很大的差异。胡风的文艺思想，正是一部分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化工作的代表。这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显然是不一致的。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叫张光莹，湖北省蕲春县人。1902年生。20年代初接触新文学运动，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反战同盟并加入日本共产党。30年代中期结识鲁迅、凋雪峰等人，先

后担任过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书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作出了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创办和主编《海燕》、《七月》、《希望》等文艺刊物，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家包括延安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在当时大后方的进步青年中有相当的影响，是坚持抗日、坚持民主的一支文艺力量。他的主要成就是文艺理论批评，共出版了《〈谏！〉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等八本文艺理论批评集。他通过编刊物和文艺评论，培养和扶植了一批作家，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流派和创作理论。

胡风文艺思想的著名观点是：「到处有生活」、「写真实」和「主观战斗精神」。他认为，「他们(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引者注)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就：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就是还没有接受这个革命思想，在被这个革命思想所引导的斗争发生之前、在某一，联上和人民有着联系的知识分子作家，由于对实际的『观察』，即鲁迅所说的『由于事实的教训』，虽然更为艰难，但依然有可能在相应的程度上进入人民的内容，汲取人民的要求流在自己身里，因而把握到历史现实的真实的本质的。『一部文学史』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鲁迅就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站了出来的。因为，革命思想正是提升了历史现实的内容所形成的，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甚么历史唯物论，也不会有甚么现实主义了。」他认为：「如果一个作家忠于艺术，呕心镂骨地努力寻求最无伪的、最有生命的、最能够说出他所要把捉的生活内容的表现形式，那么，即使他……没有经过大的生活波涛，他的作品也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的真实。因为，作者苦心孤诣地追求着和自己的身心的感应融然无间的表现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追求人生，这追求的结果是作者和人生的融合，同时也就是人生和艺术的融合了。这是作家的本质的态度问题，绝对不是锤字练句的功夫所能够达到的。如果用抽象的话说，那就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的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缺陷。」这些论述也是胡风关于写真实或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观精神（创作力量）与客观

现实1创造对象)的结合」，「深刻地认识生活对象，勇敢地征服生活对象，由这来提炼出一个人生世界，创造出一个艺术世界」，这是胡风关于创作过程的基本概括，他强调的是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这就是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说。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在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中概括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强调：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兵服务，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艺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坝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

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也就是说，文艺是服从于政治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其中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对「人性」、对「爱」都要作阶级分析，是「歌颂」还是「暴露」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我们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彻底改造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胡风是个文学家。毛泽东是革命家、战略家。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文艺思想存在着差异，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是很自然的，完全可以理解的。

2在重庆和香港对胡风思想的批评

胡风的文艺思想，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受到文学界的共产食员和进步作家的质疑。林默涵说，茅盾当年就曾表示了不同意见。茅盾后来说：

早在四二年底，胡风就提出了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他认为当时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主要是由于作家们在主观热情上的衰退，以及由此而生的创作倾向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不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着目的倾向。如果战斗热情虽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谓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随风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出内容或主题，那么客观主义就化装成了一种主观主义。」胡风认为克服这种精神状态和创作倾向的办法，是要求作家奋发「主观战斗精神」，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和融合」，并说这就是现实主义。当时胡风的观点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因为他对广大进步作家精神状态的估价是偏激的、不公正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他如此强调作家的个人意志的作用，强调发扬「主观战斗精神」，也并非通向现实主义之道；而且他所反复谈论的作家要「自我斗争」，却不见体现在他自己的身上。32

但是，胡风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1945年1月，胡风编的《希望》创刊号在重庆出版，发表了舒芜的长文《论主观》。胡风在编后记中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林默涵说：

《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篇文章引起了党所领导的重庆进步文艺界许多同志的注意。当时我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希望》创刊号出版后，报社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曾在一起交换过对刊物的意见，看法不尽一致。……

当时，周恩来同志和重庆的党组织一直把胡风看作是进步作家，对他的刊物和观点很关心。于是在1月25日，由党的文委负责人之一冯乃超主持，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座谈对《希望》杂志文章的意见。到会的有：茅盾、邵荃麟、冯雪峰、蔡仪、胡风、何其芳、刘伯羽和我等人。茅盾首先发言，他对《论主观》很不赞成，提出了

批评意见，认为文章对大后方文艺界情况的分析不符合实际。茅盾生气地说：洋洋几万言，实际上是「卖野人头」。说完就退席了。后来冯雪峰等人讲了几句，会没有再开下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八月底，毛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随行的胡乔木找胡风、舒芜谈话，批评了舒芜〈论主观〉的观点。从胡风给舒芜的信中可以看到，胡风对当时文工会党组织召开的座谈会和胡乔木对〈论主观〉的批评极为反感，他称茅盾是「抬头的市伶」，称他人是「抬脚的市伶」，称胡乔木等同志为「官们」、「老爷们」……

茅盾也回忆说：

〈论主观〉发表后，并未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只是在文艺界组织的一些座谈会上交换意见，但我发觉只要有人对该文的观点有所批评，就会引起一些人的反驳，而且会唤到一股相当强烈的宗派气味。当时胡风是理论权威，而在他背后支持他的观点的还有另一位理论权威冯雪峰，因此，在延安的文艺理论家何其芳、林默涵等来到重庆之前，重庆的文艺理论界是相当冷清的。黄药眠写过一篇批评〈论主观〉的文章，却被朋友退了回来，说是「此文有碍于某权威的『权威』，各文艺杂志恐『荒不便发表。』」

也在那个时候，有好几位朋友告诉我，胡风骂的「客观主义」，就是指的我和沙汀。如此说来，我和沙汀竟是造成那「堕落的和反动的文艺倾向」的罪魁祸首了！然而他们只是在背后到处散布，却不见付诸文字，我也只好置之不理。反正我的作品是不是客观主义的，自有公论；而且那时我正忙于写〈清明前后〉。

直到四五年底，重庆进步文艺界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舒芜的〈论主观〉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也对冯雪峰进行了批评。我在会上也发了言。但胡风并未从中得到教益。冯雪峰在周恩来找他谈话之后，有所转变，不再赞成胡风的「主观战斗

精神」了，但并不彻底。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二次批评，也是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批评，是在香港。1946年9、10月间，国共谈判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一批在南京、上海等地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转移到香港，准备在香港继续开展宣传文化工作。为检讨过去的文艺工作，并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望，由共产党文委领导在香港出版的《伏众文艺丛刊》，先后刊登了邵荃麟：〈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乔冠华：〈文艺创作与主观〉、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船等〉，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评。邵荃麟批评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说，「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是「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越阶级的东西，因此，就把它看成一种创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这首先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相背离了」。乔冠华指出，国民党统治区新文艺的主要缺点，「不是反映中国革命的现实太客观了，而是：根本没有认真地企图去反映这一现实……。人们自以为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去涂抹、歪曲、篡改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斗争的客观事实，把客观上本来是活的生动的人物写成麻木不仁，把小资产阶级追求和搏斗的心情放到工人大众的『心』⁸，在本质上，不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胡绳批评说，用主观精神去描写工人，结果「被写做工人『精神世界』内容的思想情绪和所写出来的实在的工人生活就显得是不能兼容」。原因是作者并不真正了解工人，「结果就只能把他所了解的知识分子的一套拿出来去垫空子了」。对上述批评，胡风认为这是对手「在发动各种卑鄙的手段（包括文字上的武断宣传）来抵抗、反攻」。

以上表明，中共党内外的文化工作者与胡风的争论由来已久。

1952年的文艺界整风

在电影《武训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作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

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论断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1年9月至11月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进行检查。

根据毛泽东的结论，会议认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进入城市以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篡夺了领导。主要表现是：（一）遭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

34转引自林默涵述，黄华英整理：〈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林默涵问答录之一）⁰~¹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页6—7。

的严肃性。在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艺术家的合作当中，表现无原则的团结，对他们的各种错误思想没有认真地加以批评。不少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家任意曲解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拒绝改造思想，拒绝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文艺更多地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趣味。要求将工人阶级思想降低到小市民水平。而党的文艺干部在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包围下，有许多人随波逐流，表现出自己的立场是同他们一致的或接近的。（二）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由于领导工作上放弃思想斗争，许多作家就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而这正是目前文艺工作缺乏生气，创作不旺盛，许多作品不饱满的根本原因。（三）严重的自由主义，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缺乏学习。为此，会议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藉以澄清艺术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

中央宣传部将关于开展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决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迅速得到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正确的。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学习动员大会，八百余人听取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以及周扬、丁玲的报告。文艺整风的主要内容是，重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确立毛

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造所有艺术家的思想。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显然是一项重要内容。

就在这次文艺整风中，1952年5月23日的武汉《长江日报》，发表了〈论主观〉的作者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舒芜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并点名批评与胡风思想一致的吕荧、路翎。《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时，胡乔木加了编者按语，指出胡风「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面对这新一轮的批评，胡风要求到北京参与讨论。1952年7月，胡风由上海来到北京。关于胡风的问题，周扬在7月2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

我四月下旬到上海，彭柏山同志（现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过去和胡风“系较好”）即告我胡风知道我朱很愿和我见面。我和柏山，一道亲自到他家去了饭，谈了三个小时之久。我指出他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在这个基本上，他的理论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正相违背的。此外，我指出他在文艺理论上十分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他很激动地把《文艺报》的一期内部通讯及编者按语给我看，他认为《文艺报》的这种作法是无理的。……他又谈到您给他谈过他跟别人不合作的问题，他说他一向都是和我们合作的。我说事实并不是如此，我现在不谈我们两人之间过去的关系，这已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作为党员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我只提两次文艺上的争论，一次是一九四〇年左右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他把我们共产党员作家和当时被疑为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向林冰相提并论，左右开弓，而他的整个观点是反对民族形式的。另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到四八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他不但没有很好地考虑共产党员作家（这些作家

过去又都是和他比较接近的)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相反,对这些善意的批评采取一律骂倒的态度。我根据这两件事说明,他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是不合作的。

至于胡风思想座谈会的开法,周扬报告说:我们准备由中宣部先召集少数党内的文艺干部讨论胡风的文艺理论,指定林默涵为中心发

言’雪峰、丁玲等同志都准备发表意见,党内讨论意见一致后,即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文艺座谈会,由胡风首先作自我检讨性的发言,然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批评他的文章,选择一两篇好的在报上发表。

7月27日,周恩来在周扬信上批示,对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的开法表示同意,提出:「不要希望一次就得到大的结果,但他〔指胡风^引者注)既然能够并且要求结束过去二十年来不安的思想生活,就必须认真地帮助他进行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在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同日,周恩来覆信胡风,让胡风先与周扬、丁玲接洽,并表示:「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胡风所记周扬与他的谈话内容有:「周扬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的指示,说不要先存一个谁错谁对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地谈谈。林默涵同志也传达过周总理的指示和胡绳同志的意见,也是说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定见。」。

座谈会从9月6日到12月16日先后开了四次。到会的除胡风、舒芜、路翎外,有周扬、冯雪峰、丁玲、胡绳、张天翼、邵荃麟、何其芳、林默涵、严文井、王朝闻、田间、陈企霞、艾青等。由于胡风显然没有做出令与会人员满意的自我检讨,实际上仍是一次批判会。周扬在会上指出,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虽说政治态度上无问题,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是决定于文艺理论;要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1953年2月15日,中宣部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

报送的〈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而对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十分轻视的。

（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化遗产。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报告称，与会者希望胡风能够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检讨。胡风表示愿意考虑，但是实际上仍然多方为自己的思想辩护。

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指定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和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写文章对胡风进行公开批评。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中宣部决定在批评文章发表前，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一个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就是于1953年1月29日在文化部召开的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座谈会」。随后，《文艺月报》在1953年第2、3期上，连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1953年1月30日，《文艺月报》第2期发表林默涵题为〈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一文，指出：「在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之前，应该说明：胡风曾经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他的文艺思想，也不是全部错误的，在某些个别的问题上，也含有正确的成份。但个别问题上的某些正确看法，并不能改变他的文艺思想的根本性质的错误。」文章断自一：「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文章认为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是：

第一、非阶级观点。

文章认为：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根源，是在于他一贯采取非阶级的观点来对待文艺问题。他不是从阶级的根源去考察各种文艺的现象，而是离

开了阶级关系去寻求文艺现象的原因。说胡风的这一错误，显著地表现在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看法上。

第二、否认思想改造。

文章认为，胡风不承认我们的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工农兵的问题，由此也就否认文艺工作者的根本问题是思想改造，是由一个阶级变为另一个阶级的问题；相反地，却抽象地要求作家去加强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不是首先改造作家的主观，而是加强他们的主观。显然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分歧。说胡风认为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人民，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并且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企图抹煞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两者之间的区别，抹煞两者的生活之间的区别，而这正是他抹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和无产阶级文艺的区别的逻辑的结果。

第三、否定民族文化。

文章说，胡风是民族遗产的极端否定者。他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中，用了很多的篇幅来攻击民间文艺，不加分析地把民间文艺一概看成封建文艺……。文章认为胡风的错误，就是不了解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一方面是剥削者的、另一方面是劳动人民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看不到劳动人民的革命要求必然通过种种方式，正面地或曲折地在文艺中反映出来。这是一种对于人民、对于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观点。

文章最后结论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的相同点；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虽然这篇文章是以个人署名的名义发表，但却代表着文艺界领导层的看法。因此，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加上编者按语全文发表了。2月15日，《文艺船》第3期又发表何其芳批胡风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评，引起了不同反响。1953年2月25日，一位

参加1月19日听取林默涵报告的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毛泽东当即将这封来信批给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此#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424月日，熊复将调查结果报给毛泽东。报告说：「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又说：「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缺点，如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43

4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关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不同认识，周恩来在1951年底曾约胡风谈过一次话。根据胡风自己说，周恩来批评他「也有点宗派主义」。周向胡提出：（一）你还是要合作，不合作不好，工作得大家一起做。关于30年代文艺问题，可找周扬好好谈谈，可能的话，开个小型座谈会；（二）你的组织应该解决，可找丁玲、周扬谈谈；（三）现在中央很忙，主要抓大事，抓经济，抗美援朝，来不及抓文艺。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艺情况，你可以写个材料给中央，谈你对文艺的看法。44此后，胡风一直考虑着上书中央，系统反映文艺问题，解释自己的思想，但又感到时机未成熟。中宣部召开「胡风文艺理论讨论会」后，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届文代会，胡风虽应邀参加并仍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和文联委员，但处境并无改变。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与周扬等人有历史纠葛，而现在处于领导地位的周扬等人在整他。195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公报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忘记了共

产党员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在胡风看来，周扬等领导的文艺界正是这种状况。于是，他决定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上书。

从1954年3月到7月，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的积极参与下，胡风完成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7月22日，胡风通过当时负责文教工作的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送了他的报告（简称「三十万言书」）和一封信。胡风在信中说明了他所以要呈送报告的原委。他说：

革命胜利了以后，阶级斗争展开了规模巨大和内容复杂的激烈变化的情势，但在文艺实践情况上反而现出了萎缩和混乱。这个反常的现象是早已引起了党和群众的普遍的关心的。许多使人痛苦的事实说明了这里面包含有严重的问'题。我，把阶级事业当作第一生命走了过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责任正视这个事实，研究这个事实，向党提出我的意见，使党中央更多地掌握情沉转入到主动的地位上面检查问题的。过去我也曾希图这样做，但一次一次都没有坚持到底。我自己的错误和努力不够应该负责任。但到了今天，客观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再也不应该忍受下去的地步，而阶级斗争又在向着更艮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不会容许这个应该担负起专门任务的战线继续瘫痪下去，如果我再不正视问题，就更不能有任何借口原谅自己了。

两年多以来'我自己终于被一些同志正面地全面地当作了文艺发展的唯一罪人或敌人，不但完全被剥掉了发言权，还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中间，我曾经尽能有的真诚做过努力，但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虽然对于文艺实践情；兄的担忧和对于劳动的渴求总在咬嚼着我这个老工人的心，虽然一些同志甚至把从抗战初起周总理对于我的领导关系和思想影飧都否定了，但我没有一次怀疑过党中央对我基本上是信任的，没有放弃过要依靠党来解决问题的信心，一直相信斗争一定会展开，我的发

言掉和劳动条件一定会被恢复。然而，只有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受到了批判以后，我才无限痛切地感到了非马上正视我所处的这个环境，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因为这非马上首先正视我自己，向党交代问题，争取参加斗争的条件不可。但由于我的问题是从客观情况所产生的主要现象之一，完全不是个人问题的性质，我就只能直接向党中央提出我的报告。

胡风在报告中说：几年来文艺界的根本问题是周扬等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是他们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泽东英明的决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他们的影响。他在报告中写道：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值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判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影子，这个世界观就被送到了遥遥的彼岸，再也无法可以达到，单单这一条就足8；句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农兵生活袞去之前逐渐麻痹了感受机能：因而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汲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农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1脱离了劳动，无法使现实内容走进自己的内部，一天一天枯下去，衰败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话或反话。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的经 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这就使得作家

即使能偷偷地接近一点生活，也要被这种沉重的复古空气下面的形式主义和旧的美感弄得「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动」。因而就只好「非礼毋言」，以至无所动无所言了。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完全依靠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找「典型」，因而任何「重要题材」也不能成为题材，任何摆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其为「典型」了。而所谓「重要题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斗争被「服了」的落后和黑暗等等，等等。这就使得作家甚么也不敢写，写了的当然是通体「光明」的，也就是通体虚伪的东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后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进的先明，使作家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甚么现实主义，还有甚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这就是后来把「三十万言书」作为「反党纲领」而进行重点揭露批判的「五把刀子」说。

5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基调

中共中央收到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没有实时处理，当年10月展开批评《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后，再次把胡风问题提了出来。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经毛泽东修改）的报告中，就专门有一部分讲到「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46李#：〈文坛悲歌—胡风集，冤案始末〉，《百花洲》，1988年第4期，

页68。

1955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并为此写了一个文字说明送毛泽东审阅。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内容是：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

1月12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后退陆定一「照办」。1月15日毛泽东在周扬关于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又写了：「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的批语。这样，就把本来称之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上升到「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

中央宣传部经过研究，1955年1月20日就胡风的报告内容向中央写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三十万言书」的理论部分是：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借「现实主义」之名来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抹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学的作用，否认作家深入群众生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否定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形式。指责胡风认为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

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片面夸大我们文

艺工作中的缺点，诬蔑现在文艺界的领导是「疯狂」的「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认为胡风关于文艺工作组织领导的意见，是主张取消作家协会等团体的刊物而改办所谓「会员刊物」，实际上是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统一领导的原则，取消作家的统一组织，使文艺运动成为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动。认为胡风报告的其它部分，主要是对宣传、文艺工作方面许多党员负责同志特别是周扬同志的恶毒的人身攻击，所讲的「事实」，许多是捏造的、不符事实的，以诬蔑和挑拨离间为目的。

〈报告〉认为，胡风错误的文艺思想是有他长期的历史根源的。指责他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着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并以他的这种思想为中心形成一个小集团、顽强地同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相对抗。〈报告〉认为胡风及其一派的错误思想，主要表现在：（一）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否认艺术服从于政治的原则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否认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二）不承认革命作家的根本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即如何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问题，而是加强固有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三）抹煞作家的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作用，否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应具有先进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四）否认文学反映人民的重大政治斗争和表现现实中近切题材的意义，片面地强调描写自发斗争；（五）轻视民族遗产，否定文艺的民族形式。最后结论是：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 and 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因为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群众中所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就比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更加危险。

〈报告〉提出，过去虽然对胡风思想进行过一些批判，但由于批判不彻底，没有发动更多的人来参加斗争、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此，在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问时，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

想进行彻底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报告〉提出了具体部署。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又加写了：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连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这又进一步把胡风的思想与当前的阶级斗争挂上了钩。而「反党反人民」则成了批判胡风思想的基调。

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的报告。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要求「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工作来看待」。51于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从1955年2月1日起就在报纸上全面展开了。

6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

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很快演变成一场清查「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最初提出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概念，是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的文章时由胡乔木加的编者按语，其中说：1945年发表舒芜〈论主彭的文艺刊物《希》，「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1953年1月，林默涵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一文中又一次提到「胡风为首的小集团」。但他明确说明：「并不是说他们有甚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他们的小集团作风的表现，是在于他们的强烈的排外性，凡是跟他们不同的意见，不论来自何方，都加以排斥和打击。自我批评对他们是不适用

的。把自己一小伙人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就是说，只认为他们是文艺思想上的小集团。

1955年开始的批判，虽然已经出现无限上纲的情况，但并未有从政治上否定胡风的说法。而当〈论主！！〉的作者舒芜，为了证明胡风当年是充分肯定他的观点，在4月间将胡风40年代写给他的信交给前来约稿的

《文艺船》编辑后，事情立即发生了激剧变化。

舒芜拿出的信，文艺界领导人十分重视，尤其是信中使用晦涩的暗语，对一些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作家抱着憎恨的态度，最引人注目。周扬和林默涵决定将这批信由舒芜整理分类，配合胡风上送的检讨〈我的自我批判〉并加写按语，在《文艺船》上发表，用以证明胡风的检讨并非讲真话，而是在掩饰自己的错误，企图蒙混过关，以便将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高潮，再往前推进一步。周扬随即将这些材料报送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舒芜整理出的信和胡风的检讨，断定胡风等人是一个「反党集团」，并亲自将原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重新起草了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

〈辟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5月13日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5月2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写道：「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指由舒芜整理的1943到1950年的第一批材料[^]引者注），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大都是50年代的信件[^]引者注〕。」在结束语中，毛泽东更由原来定性为「反党」提升为「反革命」。他写道：「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它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删。』」

6月10日《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了第三批材料。《毛泽东传》作者在讲到第三批材料的按语时写道：由于这部分材料侧重于揭发胡风的所谓「反革命」阴谋，毛泽东对这批材料看得特别仔细，并加写按语达十七处之

多。在这些按语里面，说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他们的策略手段是「往往以攻为守」和所谓「清君侧」等等。这些论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这些不正确的论断出发，毛泽东提出：「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参与审查胡风案的王文正在回忆录中提到：「我认为，在这些话中，最实质性的恐怕就是三个字：『清君侧』，这才说到了胡风之所以被打成『反革命』的实质。」

关于定胡风「反革命」的问题，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

6月1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将这三批材料汇集成单行本，定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全国发行。

这样，胡风文艺思想的问题就正式升格为「反革命」问题，原来被认为「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也升格为「反革命集团」。5月初，由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共同组成胡风问题的项目组，开始集中在全国各地调查胡风等人的历史情况，收集他们的有关信件。胡风及其夫人梅志于5月17日凌晨被捕。5月1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胡风被捕前后相继被捕的，北京有：路翎、牛汉、徐放、绿原、谢韬、刘雪苇、鲁煤……；天津有：阿珑、鲁藜、芦甸……；上海有：

贾植芳、任敏、张中晓、耿庸、王戎、何满子、罗洛、王元化、彭柏山、李正廉、顾征南、许思华、罗飞、张禹、默林、满涛……；南京有：化铁、欧阳庄……；杭州有：冀沅、方然……；湖南有：彭燕郊……；湖北有：曾卓、郑思……。56

关于在全国范围处置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中共中央随即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达指示。5月2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对处理胡风反党集团的指示，指出：

胡风集团，现已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根据现在所知的材料，胡风集团的分子散布在相当广大的地区，不仅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大城市，安徽、山东、东北、广西、西康、内蒙古等省区，而且中等城市如无锡、苏州、江阴等地，都有这种分子。胡风集团的分子不仅混在文化界里，而且混到党内，有的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例如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前上海市文牧局长剡雪苇，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谢韬，中央宣传部工作人员绿原、李嘉陵等。这个集团的分子也混进了青年团、人民解放军、人民空军、北京市公安局、南京电业局、《人民日报》以及党和国家的其它机关。这个集团也在学校中以青年为对象发展组织。参加胡风集团的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反革命分子，都已明了自己已经加入了一个反革命组织，但其中有不少人是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或者是极为可疑的分子，则是可以肯定的。必须指出，把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看作仅仅是犯了思想上或政治上的错误是不对的。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问题看作仅仅是文艺界内部的问题也是不对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实际上老早就蒋匪帮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阴谋反革命活动的一部分，而在解放后则是它们所谓「敌后建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各地党委（和党组）必须提高警惕，领导全党为肃清胡风集团及其思想影响而斗争。应该彻底查清胡风集团在各地的组织和活动的情势，并坚决加以处理。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核心分子，除个别交代得比较彻底以外，均应抹取离职反省的办法，如再不肯彻底交代，则应加以逮捕审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般分子，应令他们坦白交代，重新做人。对于受胡风集团思想影响的人，应根据五月十三日、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编者按〉，和其它材料（主要的是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舒芜所揭露的〈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以及不久就要发表的类似舒芜揭露的材料），组织他们学习。应在省市所在地和其它大中城市，召集党的干部做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报告。在一般中小城市，以及机关、学校、部队凡发现胡风集团活动的，均须分别召开党的干部会，或党员大会，作同样的报告。各地应经过文

联召集文艺工作者开会，报告和座谈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影响的学校中，应向学生作同样报告。凡是胡风集团分子人数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专门委员会处理胡风集团问题，并与中央公安部杨奇清同志直接联系。57

6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给各地党委的指示〉：

一、《人民日报》已于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四日两次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密信，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其中特别是五百万能看报的知识分子）揭露这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特务分子集团的真相。这种揭露已经引起了广大人民对胡风集团及类似胡风集团的暗藏在革命队伍内的各种反革命分子的警惕，并开始起来揭露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应该知道，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其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¹他们中的有些人虽然有各种缺点和错误，但都是属于好人这一类的。没有这些占绝大多数的好

56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百花洲》，1988年第4期，页’

57陕西省档案馆’全宗123’目录40，案卷I，《1—3。

人，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不可能得到的。但同时，这些机关厂矿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占百分之几，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他们用两面派的手法，并利用了我们警惕性的不高，利用我们党员中的思想错误、对党不满、自由主义、个人

主义，钻进我们的队伍，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老虎睡在一起是不行的。必须把这些暗藏着的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坚决彻底肃清他们。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公开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了，现在的反革命分子，很多是用像胡风集团这样的两面派手法进行活动的、而对于这种玩弄两面派手法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全党的警惕性是很不高的。胡风集团居然能混在左翼阵营里二十年，直到现在才被发觉，就是我们警惕不高的明证。直到现在，党内党外有一部分人，还认为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特务，在文化教育机关以外是没有这种特务的，因而是可以不加警惕的，甚至以为这不过是文艺思想问题，或文艺界派别斗争问题，中央是小题大做，认为胡风总还有些〔功绩〕，胡风的意见总还有些对的地方等等。在二批材料发表之后，胡风集团的分子，顺着我们来骂胡风，但既不揭露自己，也不提供有阐胡风和他们自己的政治背景的材料，企图蒙混过关，保存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力量，我们有些同志也就不加警惕，相信他们。反革命造谣说共产党仗势欺人，说对共产党是连意见也提不得的等等，有些好人对这种谣言，也将信将疑。这些都说明，党内党外还是有一些人，对于暗藏的反革命，还是没有足够的警惕性的。

为了更进一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央已经准备好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其中显示出胡风集团的重要分子阿撒原来是军统特务：显示出一九四六年阿撒和胡风是知道蒋介石匪帮反共战争的军事部署的，并且因为蒋匪要彻底消灭我们而感到异常高兴。至于胡风本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被国民党逮捕两次，均被释放，到日本又被日本政府逮捕后释放，抗战时期他和国民党的张道藩、凯百闲、潘公展等（分子往朱甚密，并单独被蒋介石接见过。为了各地有所准备，中央决定推迟到六月十日发表这批料，同时发表社论。主要目的，就是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胡风集团这一类的暗藏的反革命提高警惕。

三、望你们在六月十日以前，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甲、根据第一第二两批材料，和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在党内和党外一切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做报告和举行座谈、讨论，民主党派亦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动员他们讨论。使所有能看报的人都读

过好几篇文章，让他们自由发表各种意见，以便他们能在第三批材料发表之后，核对自己的意见，因而更加提高警惕性和积极性。

乙、在六月十日以前，把已经发现的胡风分子和与胡风集团有连带关系的分子中问题严重应该隔离起来的一批人，予以隔离反省或拘留，（其中有当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应依照法律办好手续）并进行搜查，以免他们在六月十日以后销毁证据。

丙、凡是隔离反省和拘留的人。停止给他们看报纸杂志，以便审讯时我们对他们仍可利用报纸上已经发表的材料。

四、在第三批材料发表后，各地应将六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三批材料合印一个小册子，通令所属凡能读报的人都要人手一册，组织阅读、报告和座谈讨论。每个省市并应指定几个机关作为典型，由省市市委亲自掌握，组织讨论，揭露胡风分子和其它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分别好人坏人，和坏人中的坚决分子与可以改悔的分子，予以正确处理。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我们的方针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要时刻记着，（宁右勿左）和（宁左勿右）是一样错讲的。

五、为了进行上述工作，各省市委不管所辖范围内有无胡风分子，应一律在党委的一个书记或一个常委或宣传部长的主持之下，成立五人小组，包括宣传、公安、监察、组织等部的负责人，来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并与审干工作，镇反工作，文教机关人员清理工作恰当地联系起来。五人小组的名单须报告中央。党委书记和党委对此事应积极注意抓紧领导。

六、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藉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它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

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58

全国范围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團」的工作迅速展开，有关部门当年报称，截至1955年5月底，根据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广西、安徽、陕西、四川、内蒙等22个省市统计，共发现胡风集团分子及其有关人员234名，其中：干部分子55名；一般分子61名；嫌疑和受思想影响的分子118名。在234名中已逮捕19名，隔离或停职反省43名；贵令交代42名；尚未触动129名；自首〔起义〕1名〔舒芜〕。59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60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1956年底，正式定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團」分子

58陕西省档案馆'全宗123'目录40'案卷1'页5-0。59陕西省档案馆'全宗123.目录40'案卷1'页5—13。

60对被捕人员的情况，1955年任上海「胡风项目」办公室审讯员的王文正在回忆录中也有记载，其中有：牛汉〔《人民文学》编辑〕；谢韬（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缘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徐放（《人民日报》文教部记者）；路翎（小说家'剧作家'当时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191年获释）；阿珑（作家，被判有期徒刑12年，1967年病逝狱中）；杜谷（中国青年出版社（行势杂志社编辑）；鲁藜（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张中晓05岁，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文艺编辑。后因肺病保外就鞏~1960年代病逝）；罗洛〔26岁，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文艺编辑。1956年底，因证据不足被釋放，后以「支持边疆」名义送往青海）；王元化；默林；何满子；耿庸（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彭柏山（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军原副政治委员，后转业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在河南被迫害致死1；刘雪苇（华东军政委员会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贾植芳（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王戎〔作家和诗人〕；

李正廉；罗飞；张禹；满濂；许思华（泥土社的老板）；顾征南；尚丁的78人（内共产党员32人），其中钊为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5月，78人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被捕的92人中，1965年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6年判处阿珑、贾植芳有期徒刑12年。1965年底，胡风被假释出狱。「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胡风被加判无期徒刑，收监关押。

对胡风一案，当年直接参与审查胡风案件的王文正在回忆录中作过如下评说：

依靠信件〔文字〕定罪，这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个十分显着的特点……。

这为以后几十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河——法律被抛在了一边，权力、专政和法律在这里被划上了等号。

胡风事件，使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下子失去了他们最实责的东西——独立思考。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估量的精神损失。61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出版事业管理处系统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曾任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秘书。尚丁被捕后，黄炎培当面向周恩来表示质疑，经周恩来过问，经过一年的审查，尚丁被无罪释放）；冀沔（浙江省文联创作组组长）；欧阳庄06岁，南京下关电厂中共党支部书记121；化铁（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空军部队的气象参谋）；吕癸（作家，「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漏网的胡风分子」逮捕入狱，最后冤死狱中）；曾卓（湖北《长江日报》社副社长、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林祥志〔早年的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在四川广村组织过农民暴动。1966年冤死狱中1；受胡风事件牵连的还有：耿庸的妻子王皓，关了整整一年，1957年又要将她划为右派，含恨跳进了黄浦江；阿壖妻子张瑞的妹妹、粉碎「四人帮」后成为大型文学

丛刊《十月》主编的苏予；冀沔的内弟、受迫害得了精神分裂症而死的股为良；因贾植芳受到牵连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被流放到青海，饿死异乡的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1947年曾在胡风主办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后来因此受到牵连服药自杀身亡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思；曾出版过胡风作品的上海海燕出版社经理、后来自杀而死的俞鸿模；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的学生施昌束〔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章培恒、范伯群…一。参见沈国（！采写：《我所亲历的胡风案——法官王文正口述》。绿原在〈胡风和我〉一文中提到当年被捕的还有：阎望、董甸。（！！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页29-64。61沈国凡采写：《我所亲历的胡风案——法官王文正口述》页205、16、117。

7胡风冤案的最终平反

1976年粉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后，197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对胡风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胡风对1965年的判决不服，于1979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胡风一案进行了覆查。1980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党组向中共中央作了「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建议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予以平反」的覆查报告。9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覆查报告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共中央郑重指出：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造成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件错案的责任在中央。

胡风于1985年6月8日病逝。1986年1月15日举行追悼会。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在悼词中说，胡风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

1988年6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决定对1980年的覆查报告中保留的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经覆查，这个论断与胡风的原意有出入〕、「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等三个政治性结论予以撤销。

〈通知〉说：

在我国革命文学阵营的发展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因而妨碍了革命文艺界的团结。形成这种情：；兄的原因很复杂，时间长，涉及的人员也教多^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状态和变化。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看，总的说来，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

对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

至此，胡风的政治名誉得到全面彻底的恢复。人们在研究胡风事件的教训时认为最重要的是，今后再也不能因为文艺思想问题，就对作家、理论家进行政治甚至刑事的处理。文艺思想不能搞一个主义，这样势必会发展到搞文艺专制主义。要允许多种思路、多种声音的存在。要提倡真正的民主精神和学术自由，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品格。这是胡风一生的

文学活动为我们提供的历史教训。

三丁玲、陈企霞「反党」事件

由文艺批判引起的另一重大案件，是丁玲、陈企霞的「反党」事件。

63中共中央办公摩：〈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1988年6月18日。

1匿名信招来槿祸

陈企霞本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李希凡、蓝翎文章的发表过程并不和他相干。但在1954年10月整顿《文艺报》过程中，陈企霞也被牵连其中，批评他「骄傲自大」、「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岗」等等，并因此受到处分。陈企霞与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原来就有矛盾，所以，陈受此次打击，认为完全是周扬公报私仇。于是，陈企霞在1955年3月下放劳动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匿名信，陈述1954年「中央对《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所进行的批评，是文艺界领导『推卸责任』，『嫁祸于《文艺报》』，同时，也是中央『偏听偏信』的结果」，希望中央为自己和《文艺报》恢复名誉，并整治周扬。1955年初夏，在全国范围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把有人向党中央「告状」的一封匿名信，看成是为1954年毛泽东批评《文艺报》后受到处分的陈企霞和受到批评的丁玲（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叫屈」、「辩护」，并断定匿名信的作者就是陈企霞，其「阴谋」是转移正在展开的同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的目标。

追查匿名信事件也随之在作家协会内部大张旗鼓地展开。

据有关史料记载：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7月下旬，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报告认为：

「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的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XXX^XXX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严重的。」「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整她。』」「在文艺界负责的党员干部中，冯雪峰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这表现为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关系极不正常。

近年来，特别是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和检查《文艺110的错误后，冯雪峰同志是有进步的，他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已较前有所克服。但他的文艺思想中，则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许多地方跟胡风思想相同，而冯雪峰同志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又是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之一，因此，对他的文艺思想作一次检查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于是，作家协会食组从1955年8月到9月连续举行十六次扩大会议，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揭发批判，认为已形成了一个以丁玲为首，以丁、陈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断言：「他们的反党活动实际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起了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的作用。」8月19日，陈企霞被认为「与托派关系极深，有严重的反革命嫌疑」，由公安部逮捕「隔离审查」〔1956年5月22日释放〕。

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提交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报告〉认定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反党活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并认为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决定对他们的政治历史进行审查；对他们反党的错误要看其对错误认识的态度再作处理。这个报告随后呈送中共中央。中央于12月批发了这个报告。

2由反党小集团到右派反党集团

丁玲1933年5月被捕一事，在延安时期党组织曾作过审查，1940年10月4日，由陈云（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李富春签名，为丁玲做出过结论。此次再作审查，虽未发现新的问题，但却作了「丁玲被捕后有变节性行为」的论断。丁玲表示不能接受。对所谓四条「反党」的错误，她也一一作了申辩，并提出了证人。陈企霞对前一段将他隔离审查和说他反党提出申诉。1956年6月，中宣部机关党委根据丁玲、陈企霞的申诉，决定对事实进行核查。调查的结果证明，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如原报告认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作家写出一本书，以此为资本，向党闹独立。实际情况是，丁玲在文学讲习所向学员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作为一个作家首先应有作品，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来，那算甚么作家呢？她的意思是要求青年作家努力写作，写出好作品，不要徒有虚名，不作无作品的作家。关于《文艺》主编问题，原来主编是丁玲，陈企霞是副主编，后来丁玲提议陈企霞也提升为主编，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周扬表示同意后，刊物上才并列出了丁玲、陈企霞两个主编。表明事先已经请示了领导。关于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指周扬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具

体事实。胡乔木本人也表示没有这种感觉。所谓不尊重或反对党的领导，是指丁玲和周扬的关系。周、丁之间在工作和作风上有些不一致。对周扬的一些意见和做法，丁玲有些不同看法，有时在同志间有所表示。但对个人有些意见，决不能说是「反党」。既没有反党的事实，「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但是，1955年9月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央已经批发，1955年底又向全国作了传达，这样，在1956年要据实纠正它就需要经过上级组织讨论后才能决定。

基于主要事实已经调查清楚，人们对丁玲的看法，也逐渐发生改变，把同情转到了丁玲身上。1957年5月，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在中国作家协会，「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批判和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自然被提到整风的议程。这时，作协党组大多数同志意识到，根据整风精神和作协机关群众的要求，如果不首先处理好「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

顾顺章拿来一张八行信纸那样大的一张白纸，我就在上边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缀加了一句，「未经甚么审讯。」这成为后来反复审查的诱因。徐庆全：〈丁玲么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百年潮》，2000年第7期，页30—31。

题，机关的整风便不好开展。6月6日，作协党组召阅扩大会议，讨论「丁、陈问题」，党组的几位领导人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出席会议的同志发言踊跃，除认为应该撤销原报告结论，清除造成的后果，肃清影响外，要求领导认真检查，得出教训，避免今后重犯。丁玲本人也对领导发生这样的错误提出质问，陈企霞从被「隔离」释放后即认为这是「政治迫害」。与会者发言的尖锐言辞和丁、陈本人提出的问题，使领导者们难以接受又无法回答。会议因此陷入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就在这一错案将要纠正之时，原来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纠正错误的整风运动，突然转变为共产党向「资产阶级右派」（对党提出尖锐

批评意见的人)进行反击的运动。形势的逆转，立即使丁玲等的申诉和向领导提出的尖锐批评变成丁玲等向党发动新进攻的根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在休会多天之后，于7月25日复会，批判丁玲等「向党进攻」，指责「反党小集团」要翻案等等，并将冯雪峰、艾青等都划为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8月7日，《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题，公开报导了1955年作协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四条错误，把丁、陈1956年的申诉活动称为「利用国际反共浪潮，配合右派的猖狂进攻」，「里应外合的向党实行攻击」。8月11日《文艺》又以〈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为题，作了相同内容的报导。9月16日，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作总结发言，除肯定丁玲等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党集团」外，还宣布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一贯对党不忠的人」，说她「早在1933年在南京向国民党自首」，「背叛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于是，被定为「右派反党集团」的七人：丁玲被划为极右分子，冯雪峰被划为极右分子或右派分子，其余陈企霞、艾青五人均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即被开除出党。此后，主持核查工作的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珽和张海、崔毅、黎辛等人也以「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受丁玲一案牵连被划为右派和受党纪处分有近六十人。陈企霞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唐山一农场劳动改造。丁玲先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诬为「叛徒」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被释放，遣送山西农村。

3 丁玲历史结论的一波三折

1976年粉碎江青「四人帮」以后、1978年12月，因丁、陈一案被划为右派的中宣部原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珽等人经中共中央常委批准，得到彻底平反。陈企霞也于1979年得到平反。丁玲冤案的平反则历经了一个漫长过程。1978年7月18日，丁玲所在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公社，根据中共

中央（了^11号文件，为丁玲摘去了右派帽子。1978年底，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丁玲返回北京。

1979年初中国作家协会开始对丁玲问题进行覆查工作。关于「反党集团」和右派问题，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明确结论：

一、撤销1958年5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

二、撤销1958年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丁玲党籍的决议〉，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

三、恢复丁玲同志的原工资级别（行政七级），建议适当安排工作；

四、对丁玲同志亲属、子女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予销毁。但对丁玲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的历史问题，却一时难以达成一致

意见。1979年5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覆查办公室提出的结论意见是：经覆查，丁玲同志1933年被捕问题，中央宣传部曾在1956年10月24日做过审查结论，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1975年5月19日中央项目审查小组办公室又重新作了结论，定为叛徒。但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未超过1956年作结论时的根据。因此认为，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撤销

1975年5月19日中央项目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

对此，丁玲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并要求：「确认一九四〇年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应该维持这个结论。」此后，丁玲直接向中央提出申诉，中央组织部据此再作审查，1984年3月，中组部作出〈关于对丁玲同志申诉的复议报告〉、上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认为：

1. 对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五月被捕至一九三六年九月逃离南京的这段历史^经过多年的审查，她的被捕情沈，与她本人交代相符^应当肯定审查清楚了。

1. 一九五六年以来的审查结论都是依据以下三点认定其问题的性质：

（！）与叛变的爱人冯达同居：^国民党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0写了一个「申明书」。前两点，丁玲同志到陕北后就向组织上交代了，且已写

入一九四〇年中央组织部为她作的结论里，结论时考虑到丁玲的实际状况，即：（丁玲当时是有名的女作家，她被捕后中外界知名人士发动营救，国民党没有敢杀她，反而给「优待」。这种情况是特殊存在的。

（丁玲自述她那时身陷困境，有身不由己的实际情况：同时与冯达原来就是夫妻，因而与冯同居。但最后她还是断然抛弃了冯，回到革命队伍，因此，在结论中没有看做是她被捕中的错悞。我们意见，对这两个问题仍维持一九四〇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

关于丁玲同志写「申明书」的问题，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只有她本人的交代，没有直接证据。「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词，说「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是属于为了应付敌人，一般性表示对革命消沉的态度。另一方面从丁玲同志整个被捕情况看，她被捕后拒绝为敌人做事，写文章，曾想逃跑、自杀均未成，最后她终于想方设法找到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被捕中并没有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行径。事实表明，她并不是「消沉下去」，相反是积极设法逃脱牢笼，继续革命。据此，可以认定丁玲同志写「申明书」问题，既不属于自首性贻误，更不是变节性质。

我们意见，对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以此结论意见为准。在《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也将这个问题加以澄清。68

经中央书记处批覆同意后，1984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正式下发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九号文件。《通知》指出：1955、1957年定丁玲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1955年12月、1958年1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两个报告，「应予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明确结论：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至此，丁玲、陈企霞一案总算画上了圆满句号。

四潘汉年、扬帆「反革命」事件

就在胡风问题迅速升级的同时，1955年4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在北京被捕，与此前已被扣押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一起被作为「内奸」立案审查。

1 扣押扬帆的诱因

扬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12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三」前后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9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秘书、军法处科长、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长。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关于1954年扬帆被扣押审查一事，公开出版物中多有传说与江青、康生有关，主要是与江青的历史积怨所致。对此，当年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说：「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事情。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怀疑与江青、康生等人有关，其实并不是那样。当时江青根本没那个地位。至于康生，他当时并不在中央，是山东分局书记，1957年才调回中央。」真实情况是，1951年初春，中央公安部认为广州市公安局已被敌人控制，将市公安局陈泊、陈坤两位副局长逮捕送北京审查。由此对上海市在「以特反特」的公安工作上也产生了怀疑，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后，进一步审查饶漱石的政治问题，认为饶漱石在上海有包庇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国民党「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作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当然难逃干系。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扬帆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后任局长)

兼社会处处长主持肃特工作。为有力打击国民党潜伏上海的特务活动、肃清反革命分子，公安工作历来有「以特制特」的惯用策略，即利用一批反正投诚的叛徒、原国民党特务作为「特情」人员，协助公安机关开展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根据这个原则，上海解放后曾在公安局社会处下设立了一个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委任胡均鹤为主任。

胡均鹤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后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在酷刑下自首叛变，成了「中统」特务。1939年在上海被汪伪汉奸李士群「特工总部」逮捕，又投靠李士群，成了李的重要助手。李士群为给自己留后路，曾指派胡均鹤与中共代表潘汉年联系，表示愿意为中共提供一些情报和帮助中共做些事情。1942年，潘汉年、刘晓、王尧山等中共重要干部由上海撤往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就是经李士群安排胡均鹤派专人护送从镇江越过日伪封锁线安全抵达淮南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胡均鹤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弃暗投明，派人到香港和中共代表潘汉年联系，表示愿意立功赎罪。潘汉年遂将胡均鹤的历史情况和要求电告华东局情报机关，请他们同胡聯繫。华东局情报机关研究后，报请华东局和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于1949年4月决定将已来到江苏省丹阳县（时为解放军进攻上海的前线指挥部所在地）的胡均鹤留下作为「特情」人员，准备让他到上海参加镇反工作。胡均鹤当即呈交了一份「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指国民党『中统』、『军统』）1人员表」，这显然对上海的镇反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经中共中央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同意，胡均鹤被带到上海参加工作。因此，在扬帆组建「情报委员会」时，经华东局、上海市委领导批准：胡均鹤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主任。此事的经过，扬帆曾有明确说明：「1949年5月10日、23日，华东局有关领导同志就此事两次报告中央主管部门，并说明用此人是华东局批准的。」

「这个问题，不仅经过饶漱石同意，中央主管部门也来电明明白白说：『由扬帆同志带往上海，协助肃反工作。』」据有关资料表明，胡均鹤和情报委员会的其它人员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1000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400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

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80余部。

此后，经请示华东局、上海市5和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公安局还「逆用」了两部被破获&国民党特务的电台，即继续用该台原来的密码和联络方法同国民党特务机关保持联系，以获取敌方的情报。对这一事情的经过，扬帆曾有详细说明：1950年6月中旬一举破获国民党保密局隐藏在上海周围的二、三、四、五、六、七、八等七个潜伏组电台及国防情报组、无锡独立台、苏州潜伏台等，逮捕了大批特务分子，缴获电台十余部及手枪、密码等物。经请示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中共中央批准，我们曾「逆用」其中的两部，即：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甚至发报手法，以达到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通过这两部电台发送到敌人手中，迷惑敌人，扰乱

72马福龙主编：《复史教训与资贵启示—潘汉年冤案前前后后》（上海：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20001，页19—20。

他们的阵线。7《台由潘汉年直接指挥。1950年8月，潘汉年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那个军统潜伏电台交给你们公安局『逆用』。」潘汉年的自述：接指下，「逆用」台在继续与台方面保持联系期间，及时向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线索，为破获：代号马行嘉特务案、陈天昊特务案、罗炳干潜伏电台案三起敌特案件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这时，1950年冬天，中国南方广州市公安机关发生了一起被控制使用的「特情」人真叛变投敌事件，引起了中央公安部领导的警觉与重视，并发出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引以为戒，提高警惕。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到上海视察公安工作，有人向他反映上海公安机关在控制使用「敌情」人员工作中也存在类似南方某市公安部门不久前发生过的那种隐患。罗瑞卿对任命胡均鹤为「情报委员会」主任一节，大为不满，在对上海市公安机关提出批评的同时，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认真检查。负责检查工作的人员在事后报告称上海市公安局「重用」了一批起义投诚或自首立功的「特

情」人员，特别是对于「情报委员会」的工作有过于「放手」、「使用不当」、「内外不分」的现象，任命胡均鹤为主任更是「原则性的错误」；让一大批投诚自首的特务、反革命分子留在社会上当作「工作关系」使用，控制措施不力，其中有些人钻了空子干了一些坏事。还提出被控制的「敌台」有掌握不力运用不当的问题。并怀疑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杨树浦电厂（即「二六」森炸），可能同「逆用台」曾向敌方提供「情报」有因果关系。检查报告的最后结论是：「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

但在当时，对上海市公安局所述所谓「政治性」错误，还只是被界定《问题的范畴之内。罗瑞卿在一次全国性公安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反投诚人员的工作中有很多成绩，对缺点错误也检查改正了，这是和某市公安局不同的地方。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更指出，对于公安工作出现的问题，应根据隐蔽战线的特点和规律实事求是来分析，不能简单地对待。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对饶漱石的问题作进一步审查中，认为饶漱石在主持华东局工作期间，在镇反反革命问题上不依靠和发动群众，片面地强调依靠公安机关和所谓「以特制特」，犯有右倾错误。5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召开华东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四中全会决议的报告〉指出：「有人怀疑高、饶是否已和敌人有了组织联繫，从饶的历史材料中的若干疑点看来，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有彻底查清楚的必要。」〈报告〉还指出，饶漱石的问题之一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方针，把上海市委控制到失去了一级党委的作用，一切有关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公安、外交、工业生产、职工运动、统战工作、思想改造等问题，不经他的允许，市委均无权处理」。问题

社会部联络部任部长时，由于他善于利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取得成绩，时任苏皖边区政府秘书长的张恺帆同志同他开玩笑，顺口说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客，尽是鸡鸣狗盗徒。」传

来传去，到了解放初期检查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时，有人把「三千客」改成「三千三」。《历史教训与宾贵启示——潘汉年冤案前前后后^{^^}》，页31—32。《潘汉年在上海》，页378中有如下说明：原来，上海解放初期在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取得很大成绩，有一位干部当时同扬帆开玩笑，说他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工作，物色了各类人物为我所用，就像春秋战国时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一样。而且说他比孟尝君养了更多的食客，不止三千而是三千三。于是有人当场附和随口就谗出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结果引起了众人的一阵大笑。据说就是这两句打油诗的传播而变成定论。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中写道：「不怀好意的人就利用『三千[^]这个艺术的夸张语，向上面打『小报告』，硬说公安局变成了窝藏反革命的地方了。此事被当时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柯某〔柯庆施——引者注〕所闻，立即兴师动众，组织了项目小组，大张旗鼓地宣扬：潘汉年、扬帆同饶漱石勾通一气，包庇了大量反革命分子。」陈修良：《潘汉年非凡的一妇（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1，页74。

之二是「解放后对上海镇反反革命运动，他表现了没有决心和勇气，不是采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动员一些力量来肃清反革命的方针，而是采取了『以特反特』和神秘主义的错误做法，不敢长期发动群众」。于是，扬帆的问题也就复杂起来。中共上海市公安局党组根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指示，于1954年9月集中全局科以上干部开会，揭发扬帆在市公安局工作期间犯的「错误」。同年10月上海市公安局党组根据会议揭发的材料，认为扬帆问题严重，向公安部报告说：

「在反特斗争、镇压反革命方面。由于扬帆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次有关镇反的方针政策，和各个时期的重要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割裂歪曲，甚至竟狂妄到公开抵制和抗拒。因而使当时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无法贯彻，拖延了社会改革改造工作的顺利进展。」

「在对待组织和干部政策方面。扬帆千方百计地将一大批敌特反革命重要骨干分子用于内部，授予大权，并包庇纵容一大批敌特反革命分子，

阻挠发动群众肃清特务和彻底镇压反革命，实质上维持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旧秩序，同时，他又与饶漱石相互利用，采取各种手法抵制中央和华东局，向党委闹独立，并在公安系统内部采取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培植个人势力，专横独裁，搞独立王国。」

报告认为：扬帆的「错误和罪恶决不是偶然和一般性质的，而是系统的和极为严重的。由于这些罪恶，影响到镇压反革命和社会改革改造工作不能顺利进行，搞乱了公安队伍对敌斗争的阵营，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使党和人民的利益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另一方面从扬的个人历史、思想体系和敌我不分、处心积虑掩护特务分子这些事实来看，政治上也是值得引起极大怀疑的」。报告建议：「采取适当措施，进行政治审查，在审查期间，限制其自由活动，并组织力量项目专办。」

1954年12月31日，扬帆由上海被送往北京扣押受审。1955年12月12日被正式逮捕。主要罪名仍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三千三百余人」。潘汉年被疑为「内奸」

在扬帆被捕的一周以前，4月3日，潘汉年就疑为「内奸」被公安部在北京饭店逮捕。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担任过《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坚持革命文化活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1年后，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之一。1933年夏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底参加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遵义会议后，被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1936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被任命为中共与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代表。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后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1949年夏到1955年春，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兼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对饶漱石政治问题的审查、强加在扬帆头上「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不可避免地把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和上海市委副书记，主管公安、政法保卫工作，并主持上海市政府日常工作的潘汉年牵连到这场政治旋涡中去。而潘汉年在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主动交代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则加快了事发的进扭。

1955年3月15日晚上、潘汉年离开上海去北京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同行的中共上海市委代表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共六人。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这次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是处理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会议在听取邓小平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以后，接着进行讨论。一些代表先后在会上表示了态度，检讨了自己与高、饶的关系，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表示了

充分的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不能不引起潘汉年的思考。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扬帆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饶漱石、扬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繫上了。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扬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段重要的历史长期未向党中央报告。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的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现在胡均鹤已经被捕，饶漱石、扬帆的问题也基本上有了结论，中央又三令五申要每一个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

题，并表示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潘汉年感到再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决心响应毛泽东号召，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彻底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

4月1日，潘汉年找陈毅面谈，详细讲述了十二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向党解释，当他回到华中局和后来到了延安时，正值党内整风审干，担心此事会被严重怀疑而无法弄清，因而没有向党报告。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陈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答应一定向中央汇报，同时安慰他思想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晚，潘汉年由公安部正式逮捕，关押审查。并把潘汉年、扬帆二人连在一起，称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1955年7月7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报告，追请人大常委会批准对潘汉年的逮捕。7月1日，在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党内指示中，正式在中共党内宣布了潘汉年、扬帆「反革命」事件。7月16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代表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作工作报告中，正式说明：

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7月27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的大会发言，讲到潘汉年、扬帆的「具体罪行」说：

反革命分子甚至还钻到党的领导部门以至公安部门中来。上海市前副市长潘汉年长期间同敌伪的特务机关相勾结。前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在共产党叛徒饶漱石和潘汉年共同指使下，背着中央，使蒋匪特务机关的活动得到了护身符。

潘案发生之后，党内曾有许多人表示过怀疑。周恩来一直是中共地下党工作的领导人，潘汉年被捕后，周恩来就要李克农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清查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的文电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这个小组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为组长，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为组员，查阅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的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是怎样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三个月，最后，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7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七个疑点，提出了五条反证，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五条反证是：

（一） 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 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沪副领事刻户根本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

（三） 潘汉年提供了许多决策性情报：①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1941年6月13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延安于6月20日收到。②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在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都是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

（四） 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事。日本投降后，中央一度决定要搞武装暴动，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毛主席也同意这个决定。但两天后，心里感到不踏实，就召集会议，提出重新考虑。他说，上海工作不错，里应外合，可以占领上海。但占领城市后怎么办？根据当时情况，上海周围只有部分地方武装，新四军主力来不了。即使占领了上海，以后还得退出。大革命时期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占领了上海，但蒋介石一来又失败了。毛主席说服大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停止武装起义。这个决定，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件事前前后后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而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露出去，我

们上海的党组织还不是被一网打尽？潘汉年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许多机密，但都未出事，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至于说上海「二六」轰炸是他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陈云同志说，那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国民党在上海统治了那么多年，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儿还不清楚，还用你给他指目标啊！

（五）潘所饜的重要关系，当时〔1955年一一引者注）还正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

报告据此提出了「慎重考虑潘汉年的问题」的建议。当时，在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阶级斗争愈尖锐的思想观念指导下，这个报告提供的反证，未能引起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视，报告所提的建议更未被接受。据有关资料披露，李克农连送三次报告，都没有回音。所以，1980年代初，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人看到李克农写的报告时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克农同志写出这样的报告，是冒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

3以「莫须有」做出的宣判

对潘汉年一案的处理原则，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曾说过一段话，即：机关、学校、部队里清查反革命分子时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政策。他举例说：「甚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57年底到1958年春，潘汉年、扬帆一案审理工作已基本结束，有关办事机构也已解散，但一直未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宣判。原因是有关审理、调查材料虽然早已呈报，但因毛泽东未有批覆，具体审理机关也就不敢擅自结案处理。1960年春，潘汉年随国民党战犯一起由功德林监狱移居北京北郊昌平区东的秦城监狱。经过近七年的时间，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到潘汉年的问题。他说：

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0：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毛的这段话，为有关部门再次准备为潘汉年结案提供了契机。公安部很快向中央呈送了潘案的结案处理报告，中共中央1962年5月30日

批准一广公安部的根佻，业批示说：「潘汉年是一个暗藏在党内很久的内奸分子。他的行极&为严敢，论罪是该杀的。但是，由于是从内部奄出的，因此给了'宽大处理。」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潘案，当庭宣布化^刑卞1号刑事判决书。内称：「潘汉年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在1940年前后，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在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起『二六森炸』（指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森炸^引者注1）三条罪名，认定潘汉年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判处被告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服刑期满后，交由公安机关管制。」这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这样，审查达八年之久的潘案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随后，最高法院下达「执行书」，说明「有期徒刑15年」。扣除从1955年4月3日被捕之日起到1963年1月9日判决之日已关押的7年9个月零6天，规定1970年4月3日为刑满释放期。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出「刑事裁定书」，宣布潘汉年在狱期间很有悔改表现，遵守监规，认罪服法，服刑期超过刑期的二分之一。根据宽大处理的原则，裁定潘汉年假释出狱，交由公安部管制。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出狱被安排在北京南郊的圃河农场（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劳改农场），并在这里得以与夫人董慧团聚。

与潘汉年同案的扬帆，到1965年8月才被判决，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3月，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

组的名义下令再次将潘汉年等收监：「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5月22日潘汉年夫妇再次被收监，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又经过项目组一二年的审查，在没有增添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13日，项目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关于内奸分子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补充报告〉和〈关于内奸分子潘汉年判刑意见的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改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报告由江青转报毛泽东等审批。直到1975年5月，潘汉年和董慧再由秦城出狱，被下放到湖南省公安厅米江茶场劳动改造，剥夺公民权。同年，扬帆被押送到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劳改农场「安置」。

对胡风一案牵连的众多人数，过去的著作已有所披露。但对潘汉年「罪案」引起的株连，现有公开出版物还很少涉及。据1982年中共上海市委潘汉年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的材料，从各单位上报的数字来看，仅上海市1955年起因潘案株连被逮捕的有800人；受到其它处理的有100多人。这900多人中、在市级党政部门工作的干部有170人，其中中共党员91人。当年与潘汉年一起战斗，在香港、上海等地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人员，几乎无一幸免。其中有十年内战时期坚持上海地下斗争的中央机关、中央军委、中央特科的干部，如：张唯一、陈曼云、王绍鏊、季崇威、舒日信、徐强、李云、吴成方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社会部从延安派出的干部，如：乔立青、黄景荷、刘人寿、董慧、谭崇安、侯德华、张志申、叶钟英、俞守中等；重庆、桂林等大后方和香港、华北等输送的干部，如：张建良（华克之）、高志昂、陈建邦、关露、恽逸群、翁从六等；中共江苏省委支援的干部，如：史永、何萃、赵铮、赵子辉、袁锬田、陈永箴、王大超、薛若梅等，都遭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株连和磨难。

4迟到的平反昭雪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覆灭。潘汉年心里重燃起雪清沉冤的希望，他在写给妻子董慧的一首诗中留下了如下诗句：

85 优史教训与—责敢示—潘汉年冤案前前后后^^， 页140—141。

， 当有风先闻：

^一脉贯古今！， 欣闻四害平；， 何日见清明？

倘有千般罪堪叹 须有沉冤二十载

翘首望云天

但潘汉年竟未能等到这一天，1977年4月14日，在长沙蒙冤病故。夫人董慧也于1979年2月23日突发脑溢血逝世。

「潘、扬事件」的平反，由扬帆开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扬帆的妻子李琼向中央组织部写信寻问扬帆是否还活着？经有关部门同意，扬帆的家属获准去湖北探望扬帆。后经覆查，1980年4月，扬帆冤案得到初步平反，结论是，「原判认定的事实失实，定性不准、判处不当，撤销1965年的判决书，宣告扬帆无罪释放。」直到1983年8月才又作出新的结论。平反决定指出：

扬帆同志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对党是忠诚的，对革命事业卓有贡献。解放后，在上海公安局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公安保卫任务，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过去认定扬帆同志是内奸、反革命分子，包庇重用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使用敌特电台给台湾敌人提供情报引起敌机轰炸上海等问题，均不是事实，应予否定。1955年后，对扬帆隔离、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扬帆同志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潘汉年的平反则更为曲折。中共“1”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许多当年与潘汉年出生入死、共同战斗的老同志，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关怀、对同志和战友的责任，纷纷向中央反映，要求覆查潘汉年案件。其中陈云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中央特科时期潘汉年就曾在陈云领导下工作，长征途中根据中央指示潘又跟陈云到莫斯科完成中央交给的特殊任务。现在’陈云作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有责任彻底搞清楚潘汉年的问题。

三中全会刚开过，陈云便先后向廖承志、刘晓、胡立教、夏衍、史永等了解潘汉年的情况，并委托长期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刘晓协助收集解放前潘汉年在上海随蔽斗争的材料。1979年10月24日，陈云做结肠癌切除手术。手术前，当姚依林问有何交代时，陈给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提出潘汉年一案需要重新审查。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四千人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稿。11月3日，廖承志在小组会上发言正式提出：潘汉年问题是个冤案，潘汉年不是「内奸」、「叛徒」；因为潘汉年在解放前对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地下党的情况，都是很清楚的，这些地方的地下党没有一个机关是因潘而遭到破坏的。因此，我正式严肃地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要重新审查。此案牵涉的人很多，而且都已获得平反、解放了，只剩得一对夫妇，虽然已经死了，但也应予昭雪、平反。廖承志说，潘汉年的冤案若能平反，内含的意义，远远超过还一个党员以公正，而是对战争年代在白区从事革命工作的广大地下党员的特殊经历、特殊斗争方式的实事求是的承认和肯定，能安抚一大批「白区党员」多年来受怀疑、受审查、受委屈、受伤害的痛楚的心。

1981年3月1日，陈云就「潘案」覆查问题，再次致函当时已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及邓小平、李先念、赵紫阳，重申了他提出的对潘汉年案子需要覆查的意见。信中写道：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患结肠癌决定动手术时，曾写了一个条子给耀邦同志，认为潘汉年的案件需要覆查一下。我认为他当时并未真心投敌，否则不能解释到晓领导下的上海党组织为甚么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潘汉年同案人的材料¹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确证。现在，所有与潘案有阕的人

8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页254。

89武在平：《潘汉年—屡建奇功的一代英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页360。

都已平反。因此’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覆查。如同意，可交中纪委办理。

陈云同时附上廖承志给他的信。中共中央接受了陈云、廖承志等人的建议，3月3日，胡耀邦批示：「按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央纪委覆查潘案。」
9，

中纪委在公检法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下，覆查了潘案的全部材料，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调查和取得了大量的人证物证，二十多年前李克农关于潘汉年案的报告成为覆查、平反的有力线索和重要证据。经过一年五个月的努力，终于以确凿的材料证明：把潘汉年定为「内奸」、「特务」、「反革命」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据此，中共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对潘汉年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指出：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过许多重要贡献。1955年以后被错定为『内奸』，受到错^的处理，蒙受冤屈20多年。现在，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潘汉年案的覆查结果，中央确认潘汉年同志不是内奸，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潘汉年同志1906年生，江苏宜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

91(潘汉年在上海)，页446。

「《上海解放以后^引者注）他积极协助陈毅等同志，领导上海市人民，为战胜美蒋封锁、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

及其它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和进行对敌隐蔽斗争，做了大量工作。」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知〉全面否定了1963年强加给潘汉年的三条罪名，明确指出：（一）关于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问题。经覆查，潘汉年在：1936、1937年间，是我党同国民党谈判的正式代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是坚定地按照党中央的谈判方针行事的。在此后几十年中，也无任何事实表明，潘汉年有勾结国民党给我党造成危害的行为。「因此，所谓潘汉年同志『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

（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问题。经覆查，潘汉年是根据中央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的指示，在敌占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敌伪组织开展工作的。他进行这方面活动的情形，是向中央作过正式报告的；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还支持过他的工作。他执行这项特殊任务所采用的一些特殊手段，都是组织上允许采用的，而且工作很有成效，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实确切证明，潘汉年同志没有『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充当了日本特务』，而是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特殊使命」。至于「秘密会见汪精卫」的问题，已查明是在执行任务中被李士群（汪伪江苏省长，特务头子）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不可能向组织上请示。潘与汪精卫见面接触以后，我党在政治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三）关于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和「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问题。经覆查，事实上不存在所谓掩护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当时破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潜伏电台，「与潘汉年同志毫无关系」。「因此，所谓潘汉年同志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的罪名，应予否定。

〈通知〉指出：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浪^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作出错误的决定。中共中央郑重宣^：

「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¹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彻底纠正。」

「⁴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1982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宣布潘汉年无罪，撤销1963年的原判。

所谓「潘、扬反革命事件」，终于真相大白。⁹²

五 1955年的肃反运动

早在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就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在两三年内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并着手部署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这时，党内发生高岗、饶漱石事件，在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指导下，高岗、饶漱石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1954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第六次公安会议的报告时就指出：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大规模地展开，各项社会主义改造正

⁹²中共中央的〈通知〉中决定：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覆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

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1983年4月18日，胡耀邦在上海市委「潘案落

实政策清理小组」的工作报告上批示：（一）我赞成加快进度。加快进度的法门就是把主要情节弄清楚了就可以下决断，不必在个别不关重要的枝节问题上多费精力。（二）一切原则错了或基本错了的人，应妥为解决他们的政治和生活问题。生活要基本恢复原待遇，并作必要的补助，以便他们安度一个较愉快的晚年。这所费无几，要讨债市委下决心拿出来。（三）胡均鹤等人我主张就放出来，并给以适当的生活照顾，不要再等弄清楚再办。从1982到1985年，上海市委「潘案落责政策清理小乱圆满完成了清理覆查和落实政策的工作。《历史教训与宝贵启示——潘汉年冤案前前后后微》页174。在逐步深入，阶级斗争正在趋于紧张化和复杂化，国内一切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已被消灭与将被消灭的阶级中不断生长的反革命分子是必然要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对我们的事业进行更加凶恶的破坏的。因此’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今后不是灭弱了、缓和了，而是更加复杂更加剧烈了。随着胡风因文艺思想问题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潘汉年、扬帆被看成是「内奸」，这样，本来决定审查干部的工作就转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1对敌情的严重估计

前述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国内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远离实际的严重估计，认为：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1955年6月3日，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加写的一段话中就提出，要通过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它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毛泽东传》作者认为：由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揭露和追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1955年6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作报告，就开展全国性肃反运动的必要性作了说明。他指出，一年以来，敌情有许多

变化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1954年冬天起，农村的斗争很紧张。这一时期农村中发生了多起骚乱和暴动事件，1954年全国13个省发生了反革命暴动事件8起，较大的群众性骚乱事件19起。1955年第一季度，在17个省又发生了反革命暴动案件5起，较大的骚乱事件28起，反革命暴动未遂案18起。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卷（1955—1956）——向社会主义过渡

凶杀暗害活劫极为严重、1954年全国共发生凶杀暗害事件6347起，死伤干部、群众8327人，加上骚乱、暴动及其它事件，伤亡的数字达到13000人，绝大部分事件发生在农村。这一时期，各地普遍发现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最近湖南！现有自称「中国农工党」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到处散发「告全国农民书」，河北、四川、湖南的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收到了这种反动传单。

第二，这一时期斗争的特点，明显表现在我们同混入内部的敌人的斗争更加紧张了起来。「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加紧了他们的特务间谍活动，1954年以来，敌人派遣的特务间谍分子较之以往任何一年都多，他们正从各个方面加紧他们的破坏活动。」「1954年敌人杀死杀伤我干部群众13900人，我们仅杀了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10500名；1954年全年我们逮捕了33万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但刑满释放的犯人就有35万。已经释放的罪犯，不少又继续多次犯罪。」

罗瑞卿指出：「过去镇反运动的主要特点是，着重肃清残存在社会上的比较公开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对于暗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打击得很少，在许多方面则是根本没有触动。当前斗争的最主要的特点是，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已经发展到要着重清理内部，这就是说肃清暗藏在内部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仅必须同社会上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同时进行，而且已经成为此次斗争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这就不能不使当前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极其深刻化和复杂化。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被发现，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勾结敌人包庇大批反革命分

子的严重事件的被发现，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发现，就是当前斗争深刻化复杂化的一个显着的标志。」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我国大陆全部解放以后，曾经进行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把一个很大部分的公开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但是，这种第八章由思想批判到肃反运动551

公开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也还有一个不小的部分没有肃清；至于大批的采取两面派方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那我们就更没有来得及加以坚决的揭露和处理，相反的，他们却欺骗我们，钻进我们的「肝脏里」来了。这是因为：第一，我们的党的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和经济机关，在接收工作人员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第二，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其中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彻底的清理；第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采取两面派的欺骗手段来进行破坏活动的，辨别和清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很多人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警惕性是不高的，很多人简直丧失了警惕性。

基于以上分析，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一个广大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第一，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首先是教育500万知识分子和干部，提高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第二，利用胡风事件，在全国各个工作部门和各条战线上，经过坦白检举，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取得另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线索，为今后的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和干部的审查与清理工作做好准备。

2肃反运动的全面展开

中央指示下达以后，肃反运动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一级党的、政府和群众团体的机关首先展开。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

导和便于清查反革命分子，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企业，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和配置了专职人员（中央规定：专职肃反人员至少不应低于占全体人员的百分之十）。

这次内部肃反运动采取分批进行。1955年7月开始，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共有570多万人参加第一批肃反运动，1956年7月基本结束；第二批肃反运动从1956年开始，主要在县区干部、工厂矿山职工、中小学教职员、警疗卫生机关的医务人员中进行，共有

860多万人参加，第二批和第三批1957年底基本结束；第四批一直搞到1958年底。

运动一开始发展就很迅猛。根据32个单位〔29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55年7月底〔一部分单位是8月初）的统计，已在1022659人中展开了坦白检举运动，共已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29230名，另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名，并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其中许多是以反革命分子为核心组织起来的。

8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运动证明了：敌情是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确已钻进了我们的各个部门和各种机构，对反革命分子麻木不仁「宁右勿左」的右倾思想是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的护身符。必须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才能有成功的保证。〈指示〉估计，在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约占5%左右。据此要求：进一步地展开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求得在这次运动中达到在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中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不完成任务不要收兵。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从1955年7月1日到11月底，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共收到检举材料1413464件。根据23个省、市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统计，在642302件检举材料中：属于检举反革命问题的143838件，

占检举材料总数的22.39%。；反革命嫌疑问题的86657件，占13.49%。；检举各种坏分子的46062件，占7.17%。；一般政治历史问题317402件，占49.47%。；其它问题48343件，占7.57%。另有材料称，在运动中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仅据17个省、市1955年7至10月份不完整的统计，向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自首的分子即有145000余名。

肃反运动同时也在军队中展开。据称，到1955年底为止，已有264万余人，其中干部占646000多人参加了这个运动。据不完整的统计，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16864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649%，其中12876人为排以上干部，占干部数的1.99%。此外，还揭发出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14247人，其中干部占10903人。1956年6月28日到7月5日，中央肃反十人小组召开了各省市及军队、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对第一阶段的肃反工作进行了讨论。会上对中央提出暗藏反革命分子占5%的比例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个比例的规定助长了「左」的倾向发生；有的还对如此大规模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的必要性提出质疑。7月5日，罗瑞卿在会上做总结发言，针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罗瑞卿说，关于5%左右的问题，现在看来除了云南定案完毕后，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可能达到甚至超过5%以外，其余各地都不到5%。云南是否真有这么高，也还值得研究。昨天向中央汇报时，毛主席的最后意见是提为2%左右较妥当，机关可能多点、工人、学生是少点，北京大专学生中只占0.17%，工人中占1%多，各省市在2%左右的较多。军队算上士兵比例更小，也是0.17%左右。中央的意见，现在不要讲5%左右，讲2%左右。当然，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有多少算多少，不要硬套。有的同志说，中央提出的5%左右不妥当，助长了「左」倾的偏差。我们不大同意这种意见。我们认为，5%左右是个很重要的规定，是道很重要的防线。如果没有这道防线，则「左」的偏向还会更

大。开始时很多地方说没有那么多，但是运动一起来又都冲破了5%先。5

免左右的规定防止了斗争面的过宽。另一方面，5呢左右也起了防右的作用，我们说有57。左右的反革命分子，你为甚么不积极开展肃反呢？57。只是个估计，不能恰巧和实际情况一样，不能对每个地方有多少反革命都一个一个估计得十分准确。中央国家机关中有人认为57。的提法不妥当，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好。

关于大张旗鼓地搞运动的必要性，罗瑞卿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将来要在书面总结中回答，今天做个初步回答。就是对第一批运动的估计问题，现在没有解决，意见不一致。例如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中反映，中央国家机关中有人有意见，一共有七条意见。有的对，有的不妥当。主要是：运动搞得对不对？健康不健康？应该不应该搞肃反？花不花得来？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呢？还是缺点是主要的？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会影响今后的肃反工作。今后的肃反任务还是很大的，中央和毛主席已经讲过，党、政、军、民所有机关团体内部肃反一定要彻底搞完，一定要搞到底。要是说肃反运动错误是主要的，则要助长反革命分子的气焰，也要助长右倾思想的气焰，积极分子就会抬不起头来，以后搞运动就没有劲了。要是说搞肃反运动没有必要，那么，全国应该参加肃反运动的1800万人中，现在只搞了500多万人，大头还在后头，还要不要搞呢？

罗瑞卿强调：必须认识到，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发动这个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运动是有巨大成绩的，至少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毛主席指示说成绩有三个：第一，确实查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确实有27。左右的敌人，全国已经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有38000个（军队除外，加上军队则为40000人），38000个萍革命混在200多万人中，那是不得了的。有的说，么史反革命多，现行反革命分子少。把历史反革命搞出来也很重要，这样可以把界限划分清楚，如果不把历史反分子搞出来，不把界限划分清楚，对这些人就无法进行争取-团结、改造工作，就无法使用这些人。第二，查清楚了很多人的问题。如果100个对象中有10个是反革命分子，其它90个都不是，这其余90个人中根据第一批肃反的经验，绝大多数都是有些问题的，如历史问题、思想问题，

或者早已交代了的问题等，有的人长期被怀疑，搞不清楚，现在都搞清楚了，可以得出结论，这样便于使用他们，可以加强团结，使党更加巩固。第三，清查出了2免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警惕性，使干部知道内部并不安宁，内部有反革命。如果不把这些反革命清查出来，我们这里是否也会发生波兹南事件呢？那就很难说。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剧烈的，我们愈胜利，敌人的破坏就愈加厉害的说法，并不一定是完全错误的。斯大林的错误被揭发以后，右派民主人士乘机攻击我们，想阻止肃反运动的开展，本质上就是想推迟社会主义，想保留反革命。

如果这38000个反革命不查出来，就等于38000个细菌在我们身上。这些细菌将来会分裂滋长，它们可以发起酵来，就会发生波兹南事件。波兹南事件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人，不能麻痹，美国国务院每年拨款1亿2500万美元来搞这种事，他们通过混在我们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来搞。

罗又说：我们说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巨大的，并不等于说没有缺点错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错误主要是斗争面宽了，伤害了些好人，有些好人自杀了。这些错误都值得警惕。有错误不要掩饰，有「左」的错误，也有右的错误。毛主席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而且要按照法律办事。对于错误的原因要加以研究。有的同志埋怨说政策界限下达太迟了。我们说，中央关于肃反的政策，早就是很明确的，至于具体的政策界限的规定，没有经过实际斗争的实践，一开始是不可能搞出来的。关于打人骂人、搞车轮战等，我们从来都是反对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不可能完全那么规规矩矩，特别是打了反革命，原因也很多，说明肃反有其复杂性，也有其艰巨性。肃反好比打枪，不可能完全瞄得那么准，有些反革命分子是两面派，更不容易瞄准。我们肃反干部中有《十五贯》里的过于执，但也有况锺、有的同志比况锺还厉害，调查研究工作比况锺还细致。错误的性质：是暂时的，是局部的，是可以纠正而且容易纠正的。101

8月12日，中央十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报告说：

照中央指示我们在6月28到7月5日召开了各省市及军队、中央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

1955年‘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共有5738473人参加了第一批肃反运动，总的说这批现在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已经接近结束。就已经知道的结果，也可以看出第一批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很巨大的，开展这个运动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或者基本上是健康的。

第一，确实查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现在全国已经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有38875人（军队除外，加上军队则为41811人），估全国参加运动人数2717681人〔军队除外，加上军队则为5738473〕的1.437。%，将来全部定案完毕~估计反革命分子的比例将要达到1.57%以上。

第二，查清楚了很多人的问题。才良据各地汇报，这次运动中被错斗的好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和严重思想问题的，真正没有甚么问题捕风捉影搞错了的只是极少数。据北京、河北、上海的统计前者都在90%以上，后者都不到10%。。把这些好人中的问题一些还是长期被怀疑的问题，弄清了做了结论，这也是一大成绩。这样就便于使用他们^可以加强团结，使党更加琴固。此外经过这次运动，各地都大约有20%以上的人员坦白了各种问题，并收到了大批检举材料，为今后审查干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运动中间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斗争面宽，伤害了些好人，有些地方发生打人、骂人、搞车轮战等违反政策的现象，自杀死人的情况也比较严重。但是所以产生这些缺点和错^，有些是由于我们经验不够，有些是肃反工作的复杂性、尖锐性带来的和群众运动中在所难免的。1956年开始的第二批肃反运动，按照各地规划今年内要在大约860万人中间展开。据6月份统计，已经开展了运动的大约有180万第八章由思想

批判到肃冬运动557

人。这批运动的特点是比较快、比较准。原因是有了准备，有了经验，有了明确的政策界限的规定。已经开展了运动的，绝大多数地方都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发动了群众。展开了以宣传政策界限为中心的政治攻势，并且和有把握的必要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运动表现健康有力，反革命分子动摇瓦解，投降起义的空前增多，确实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省的要求。

关于此后运动的进展情况，中央十人小组先后多次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

报告》，1956年8月12日。陕西档案馆全宗123，目录40，案卷1页128—132。

1957年10月22日至31日，中央十人小组召开全国肃反会议。会后向中央报告说，到1957年10月为止，全国已经在18454319人中〔包括军队〕开展了运动，占1955年规划总数的99.677%。已经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100233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557%。另外，还查出不以反革命论处的普通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反动分子65022名（大部分是第一批的），两项合计，共165255名，占总人数的0.97%。如果单独从党政民系统第一批省市以上机关的运动来看，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32273名，占总人数2866523人的1.017%，加上不以反革命论处的普通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反动分子38509名，两项合计70782，占总人数的2.467%。此外，全国还查出重大的反革命嫌疑分子9389名，反动小集团3251个〔第一批数字〕。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有5038名，混入团内的有3368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名单的16名，属于省委管理名单的244名。运动中还有1772242人交代或查清了各种政治历史问题，其中问题性质比较严重的将近13万人。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按1955年的规划，全国尚未开展运动的只剩下60000人了，但全国工薪人员共2400万（军队在外），如果要全部都进行肃反，就还有800多万人尚未开展运动。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根据国家统计

局的数字，尚没有进行肃反的人员，从方面看，初小教职员大约有'00万左右，公私合铃企桨单位大约有500万左右，乡干部大约有60万左右，其它的零散罕-位、新建扩建单位以及民主党派等等约!00多万。会议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确定了在所有单位和所有工薪人员中都应当进行肃反运动，所有角落都应当打扫一下的方针，对今后的工作重新做了部署，大体上拟定今冬明春主要在小学教职员和乡干部中进行肃反，即作为运动的第四批。1(13

1958年9月22日，中央十人小组再次向中央报告说：从1955年夏天开始的内部肃反斗争，到今年8月份为止，全国已经有31195390人参加了运动'共查出反、坏分子375332名。还有8万多件项目正在定案；还有2652358人正在准备开展运动。运动是分四批进行的。1957年底以前的第一、二'三批运动，现在已经基本结束。在参加运动的18612999人中，共查出反、坏分子257551名(其中包括社会镇反从内部逮捕的59589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分开来说，地方的比例是1.65^，军队比例是0.1137。。在处理的过程中，各地都正确地贯彻了中央的政策，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好。根据已经处理的247142名统计，刑事处分71774名，占29^；劳动教养41763名，占16.97。；安置监督生产的(包括少数开除的)49057名，占19.97。；由社会镇反处理的59589名，占24.17。；自杀病亡的1717名，占0.697。。以上五项合计223900名，占处理总数的90.557。，留用的23242名，占百分之9.457。。从上述处理结果看，由于各地坚决地执行了中央关于必,把反、坏分子的707。—8070清理出去的指示，因而，这一次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多少年来清而不理的问题，进一步纯洁了内部。

103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各省市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以及某些肃反清查对象的若干政策规定〉两个文件，1957年12月10日。陕两省档案馆'全宗123，目绿40，案卷2'页60—66。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提供的统计，

这次运动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内部，清查出反革命分子81000人，其中现行犯3800多名，130多万人弄清楚了政治历史问题（据1958年9月22日中央批转的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全国肃反会议情况的报告统计：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257551人，其中包括社会镇反从内部逮捕的59589人）。

1958年开展的第四批运动，全国规划数字15232749人，已经开展运动的有12582391人，占82.57%。已经定案的反、坏分子117781人。据各省、市、区同志预计，1958年年底可以结束运动。

《中共组织史数据》第五卷综述称：据统计，在原定列入审查范围的县级以上机关、厂矿企业全体干部和农村区助理员以上干部中，被列为审查对象的高达17.57%，按照当时规定的政策界限审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竟占11.87%，其中有不少冤假错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有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才予以彻底平反。

3对肃反运动中偏差的检讨

由于对敌情所作的严重估计，又把审干和肃反这两件虽有联繫但性质不同的事情搀在一起，政策界限不清，肃反运动发生了斗争面很宽和「逼、供、信」的偏差。

1956年9月19日，罗瑞卿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就曾说道：「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社会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好人。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党中央最近决定：对于运动中错斗、错捕、错关、错判的人，必须认真进行检查，做好甄别、平反工作，切实加以妥善处理，绝不可因为是个别的、少数人的问题，就加以忽视。」

根据上述精神，各地和各部门对肃反对象的材料逐个进行甄别并做出相应的结论。

中央国家机关对第一批肃反对象经过甄别，据1956年11月统计、原审查

的7231人中：属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共1216名，占已甄别定案对象总数的16.89%。因为政策界限改变，过去算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今天不算的共363名，占57%。查出反革命嫌疑重大的分子，

应交公安保卫部门长期侦察的364名，占57%。以上都是魔于应当进行斗争的，合计占肃反对象总数的26.87%。应当进行批判和斗争，但不齧敌我问题的占16.47%。应当列为「调查对象」的占52.417%。属于斗错了的：旧账重算的有253名，占3.57%；属于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或检举不实而被错斗了的有69名，占0.97%。其中，斗争面宽的偏差，在高级知识分子方面是比较严重的。运动中被列为肃反对象的高级知识分子有882人，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14.17%。（个别单位在运动高潮时期曾达30%以上），高级知识分子中共查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106名，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1.67%。下降面达776人，占高级知识分子曾被列为肃反对象总数的887%。这说明，运动中对高级知识分子中的敌情估计过高。运动中的另一个错误是，高潮时期发生过打人、骂人、诱供、通供等「左」倾错误。一段时间内，在3422个斗争小组中发生打、骂等「左」倾现象的有844个，占小组总数的24.77%。发生假案，冤枉了一部分人。运动中还错捕了一些人，已捕的479人中，属于可捕可不捕的129人；完全捕错的33人；尚未判明的15人。

广东省报告说：经甄别定案，应该斗争的，占30.227%；可斗可不斗的，占48.457%；完全斗错的好人，占6.3%。运动的缺点和偏差，主要是：第一、打击面宽，错斗了一些好人，运动高潮时某些单位曾出现一些非法斗争的现象。全省总共列为肃反对象的8765人，占运动总人数6.687%。个别地区和单位确定肃反对象还更宽一些。如省直属单位参加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共1469人，被列为肃反对象的就有152人，占10.37%。第二、定案工作初期粗糙，结论偏高，处理偏严，如：第一次定案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4185人，占总人数117%。处理情况是：逮捕839人，劳动教养2212人，两项合计占72.9%。

1957年5月，中央十人小组再次召集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五人小组

负责人会议。会议听取了各省、市、区的运动情况汇报，讨论了政策界限补充解释和第一批运剿的总结〔草稿〕，传达和讨论了中央指示。关于甄别定案工作的进展情况，十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甄别定案中下降比例较第一批显着减少，全国平均下降50%左右，江西只下降15.27%，山西下降29.57%。但也有少数地方还很高，如新疆下降80.77%，广东下降73.57%。全国第二批共捕了3186名，在已经甄别定案的3108名中，应该捕的2417名，占77.87%，可捕可不捕的501名，占16.17%，错捕的190名，占6.17%。（第一批错捕的占21%。安徽、福建、陕西、甘肃、黑龙江、内蒙等七个省、区共捕了150名，没有发现错捕的。北京、天津、贵州、江西都只错捕了1人。搜查一般都没有进行。自杀的也大为减少，第二批自杀已死的共1817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0.029%。第一批自杀已死的占0.079%。1(37

为进一步做好甄别善后工作，中央十人小组曾专门下达指示指出：

凡是当作反革命分子错斗了的好人，经过覆查确实没有政治问题的，都应该诚恳地进行赔礼道歉，在甚么范围斗争的，就应该在甚么范围公开承认错误，恢复名誉（只能在较大的范围，不能在较小的范围）。

对于那些曾经加入过反革命组织、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同反革命分子有过政治关系或者平素有反革命言论的人，经过斗争，虽然决定不把他们当反革命论处或者最后认定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可是因为他们在运动中所以被清查或被斗争，都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因此，在原斗争范围内宣布上述这些人的最后结论的时候，除了应该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以外，不要进行赔礼道歉。如果对于结论还有意见或不满意的，应该耐心听着他们的意见。只要意见是合理的，就加以采纳，不合理的，要进行耐心的解释和教育。如果对他们采取过粗暴的态度和非礼的行为，应该承认不对并向其道歉。

107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肃反连动的进报情况和当前任务的报告〉和〈关于&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的补充解释〉¹1957年6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全宗123，目录40，案卷49¹页49—63。

56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¹第二卷（，1953—1955）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对于当时只是对于他们的反动思想进行斗争并没有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人，不要道歉，如果斗争方式粗暴的，应该为方式不好道歉。

凡是依法进行搜查的，一律不要道歉，只有违法搜查的，才应该赔礼道歉。被搜查的对象，最后查明是好人的，对于被搜查的东西一律再退还，损坏的要赔偿，无法赔偿的，要恳切地赔礼道歉。同时还应该在适当范围公布，恢复名誉。

在运动中使用过打骂，或者使用过其它变相肉刑逼供等非法手段的，应该承认这种行为是违犯法律、违犯政策的，并进行适当的检查和检讨。

因为我们工作上的错误而引起自杀的好人，应该适当承认错误，并且向其家属道歉。不是因为我们工作错误而自杀的，特别是那些畏罪自杀的，不要道歉。对于自杀的人，如其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应该给予适当的救济。¹(18

鉴于各方面对肃反工作反映的意见，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在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主持下，对肃反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不久，中共中央又作出整风决定，号召党外人士用大鸣大放的方式帮助共产党整风，期间，人们对肃反运动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意见。

如：

邵力子说：要搞肃反由公安部搞，不要搞运动，群众运动偏差大。又说：在未判罪之前，都应作无罪看待，无罪关人是不对的。周炳林说：肃反偏差不能认为很小，北大就有三个人投未名湖而死，肃反中，单位愈大，

偏差愈大，损失愈大。追呀！逼呀！斗呀！闹得一塌糊涂。卢作孚之死，对国家有多么大的损失啊！109陈其尤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说：在机关中工作的民主党派的个别成员，肃反时被逮捕了，陈认为，不及时宣布拘留原因、不及时通知其家属，这不是保密问题，而是是否守法的问题。总之，宪法公

563

第八章由思想批判到肃反运动

布以后，有逮捕条例可循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肃反中还有机关管制这种办法也是不尽合法的。陈提出，国家的民法、刑法应及早制订并切实遵行。110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刘世楷（无党派）说：思想改造、肃反运动太粗暴，我不赞成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应该用于取得政权以前，取得政权以后问题就要搞得细致。肃反应让公安局去调查逮捕，怎样能让大家乱斗？教授被斗后还有甚么脸见人？给旧知识分子扣个反动帽子实在不恰当，他们在旧社会有甚么话就随便乱说惯了；解放以后积极分子就把这类随便说的话收集起来作为斗争的材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11

上海市各界民主人士对肃反有如下反映：孙国辉说：反革命分子不过百分之零点儿，假使不由群众参加，由公安部门来搞，再加上正确领导，就不会像苏联那样糟。曹仲洲（无线电工程专家）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例如解放时宣布「既往不究」、后来却大究特究。要使人心服，就必须言行一致，凭一时策略上的收效而失大信于天下，未免不值得。112辽宁省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反映说：肃反是私立公堂，虽非打得血肉横飞，也是谈虎色变。肃反运动在作法上粗暴，违反宪法，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因此说不上甚么成绩和是否必要的问题，问题在于以法治国，还是以党治国，如是以党治国也就没有「鸣」「放」的问题了。113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教授在谈到知识分子参加争鸣时说：武汉在肃反运动中，对高级知识分子采用了「极粗暴办法，把斗争、禁闭等办法

施诸他们身上，对他们的人权不重视」。运动中，「把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起来，对于思想、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加区

110 《北京日报》：1957年5月10日。

111 《宣教动态》，第51期、1957年5月12日。

112 《零！！》第477期' 1957年4月17日。

113 肃反情况简报：〈各省' 市' 自治区党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情况(之四1)〉，陕西省楼案馆，全宗' 23，目录40，案卷47，页31—33。

5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川55—“^向社会主义过渡别，打击和斗争面太广，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并称：「被斗被关是在大庭、广众中进行的，但是在查清不是反革命分子，给他们做结论、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或向他们道歉时，却在房间里『暗中』来做」，没有「在群众中公开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信用」等等。因而使他们直到现在「还是顾虑重重，思想有压抑和束缚」争鸣不起来。

湖南工学院教授冼玉清则写了一首名《肃反嘴》诗，题跋写道：日来省政协全体会议讨论人民内部矛盾，谈至肃反偏差，人有余愤，因将具体事写成小诗，聊示惩前毖后之意耳。

大胆怀疑三字狱~冤沉海底几时伸？可怜肃反偏差者，竟把亲人作敌人。

卢汉、余心清、李一萍、于振瀛等在视察工作时对劳动教养的做法也颇有意见，提出：劳动教养是违法的，是共产党在法律之外，搞了一个整人的办法，与劳动改造没有甚么区别。这是一个带全国性问题。

这些意见，在当时显然不能被接受，而被认为是对肃反连动的攻击，因此，后来不少人因此而被错定为「右派分子」。第九章

国防现代化的开端

中国大陆解放以后，为适应解放台湾和保卫国防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就进入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时期。即把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单一兵种（步兵）的人民解放军，建设成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多军兵种组成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经过195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努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有了长足的进展。

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1建设多军兵种任务的提出

当革命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胜利结束的前夕，人民军队的建设方向问题就被提了出来。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明确宣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全国政协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21日。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6。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根据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¹“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

海军，以巩固国防。」

遵照〈供同纲令！〉的规定，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11月，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的领导机构先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任命：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萧华任空军政治委员；萧劲光任海军司令员；陈锡联任炮兵司令员；许光达任装甲兵司令员；周士第任防空部队司令员，锺赤兵任防空部队政治委员；罗瑞卿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鉴于战争年代入伍的干部、战士，主要来自农村，缺少文化，为了适应新时期建设任务的需要，1950年8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指示〉要求：自1951年1月正式开始，务求在三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小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1952年，中央军委再次决定，全军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中心的训练任务。从当年6月15日开始，全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向文化进军的运动。经过这次学习运动，人民解放军全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有了提高。

1950年6月，中央军委确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军事院校的基础上，改建、新建一批适应培养现代作战人才各类院校。11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军事院校及部队训练工作会议，讨论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学计划，教材、器材供应计划和学校编制等问题。朱德到会讲话。会议确定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的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的兵器及其它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的联合作战与协同动作，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我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4刘伯承元帅奉命创办军事学院前后经过：1950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常时有人向刘伯承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此前，中共中央曾铤非正式地征求过刘的意见¹，刘听厂之后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当啰。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X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10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亲笔写信给刘伯承，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刘伯承看完信，高兴地说：「古语说得好，『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啊！」10月27日，刘伯承杂渝赴京。I《刘伯承传》编写组：《刘伯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页547—549。1刘伯承到京后，周恩来先后三次接见他，向他传达了毛泽东对教学方针的指示[^]强调要搞好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并与其详尽研究了陆军大学临时党委的组成、干部配备和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的内容等问题。在此期间，朱德也接见了刘伯承，对如何办好陆军大学问题作了重要指示。11月13日，刘伯承向毛泽东呈送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建议将陆军大学改名为军事学院，校址暂设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并对学院的组织机构、训练方针和开学时间等问题提出了意见。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11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1951年2月4日又任命刘兼

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授旗阅兵式和开学典礼,宣布正式成立。(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页480。1

毛泽东称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重大转变的标志之一。1952年5月,后勤学院在北京成立,李聚奎任院长。1953年1月,总高级步兵学校在南京成立,宋时轮任校长兼政治委员;9月,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陈赓任院长。1952和1953年,毛泽东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别给这四所院校颁发了训词。指出:

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修级的阶段。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举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是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率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地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做司令机关的工作,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

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⁶

训词还指出：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如此。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⁷

训词提出的上述要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办好军事院校的指针，也是全军实现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指针。到1953年底，全军共创办各级各类院校107所，对新时期军队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国家财政与现代化建设的矛盾

1953年6月举行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解决上半年出现的财政赤字〔人民币旧币二、三十万亿，相当现人民币二、三十亿〕问题。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以开源节流的办法解决赤字。当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国紧缩支出12.5万亿元，其中要求军费减少3万亿元。毛泽东还提出今后的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不得超过30%的比例。⁸〈通知〉具体要求：「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又要军队实现现代化，又要大

⁶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313—314。

⁷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页351—。

⁸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1950年为41%呢，年为43%⁶1952年为31%呢，1953年为34.27%。。胥光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304。

57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49—1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九章国防现代化的开端

571

力缩减军费开支，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矛盾。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黄克诚说：

又要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又要使国家机构费用（包括军费）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一个很大的难题。可这又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现在军队就得要从这种矛盾中找出最合理的方案。

彭德怀认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是军队工作的依据，中央在8月28日发出的〈通知〉，也是依据。」这两个依据都是军队建设必须达到的13标。为此，必须修改1952年制订的五年军事建设计划。当时朝鲜战争尚未停战，因此计划对于技术军兵种的发展规模都很大，如：空军要发展到150个飞行团，6229架飞机，建153个机场。但到1953年底实际只能完成72个飞行，其它军兵种的发展状况也大致相同。要削减计划，首先要使各军兵种领导人取得统一的认识。

1953年8月21日，在扩大的军委例会上，彭德怀就曾向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传达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说，毛主席认为，朝鲜战争重起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较大的可能是长期拖下去，停而不和，或久

拖而后和。彭说：在目前〔美国〕要重新进行战争或扩大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根据这种看法，中央已经确定，全国的工作重点是集中到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上。而这一计划的重点，是要用一切办法擦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彭向大家提出，全国的工作重点转换了，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必须转换过来，原来拟订的军队建设五年计划，虽然中央在去年7月已经批准，但是技术军种、兵种的发展计划，显然要求过高；原来准备向国外购买的武器装备，也显然过多，现在必须修改。全国的常备军员额过大，机关臃肿超编，非队列人员近60万人，必须加以精简才能把有限的军费用到军队基本建设上来。总之，朝鲜停战以后，军队的建设要巩固地前进。

为使高级干部更具体地了解全面的经济情况，开阔视野，提高思想认识，彭德怀请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向在京的各大单位军政首长作报告，介绍当前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高岗说，1953年的财政赤字达25万亿元之多，占当年国家财政预算总收入195万亿元的12.87%。为此中央才下决心发了一个紧急通知。就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向大家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即：「目前全部国家机构费用（包括军费、政费在内）最高不能超过国家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彭解释说，这就是说，军费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将要比1953年减少。即使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长，军费的绝对数，也不会增加多少，因此，必须下最大决心来对军队实行精简整编。

在随后召开的扩大的军委例会上，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介绍了军队员额的情况。他说，过去三年多虽然前方一直在打仗，但是为着尽快争取国家财政情况基本好转，军委硬是把军队复员转业260多万人。目前全军包括今年入伍的40多万新兵，总共还有480多万人，其中队列人员有422万多人，非队列人员（主要包括伤病员、待分配人员、家属、小孩、保姆等）有57万多人。继续保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显然是非常不适宜的。会上，对如何精简进行了讨论：

有些人主张多减一些。认为，只要看准形势，就应抓紧时机，尽量减少常备军，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增强国家应付战争的潜在力量。例如苏

联在打败14个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后，从1920到1924年，把原有的550万军队减少为56万，裁减9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1945年到1948年年底，把原有的1236万，减少到287万，裁减四分之三，军区机构由33个减少为21个。这说明，摸准国际气候以后，少保留一些常备军，不会有甚么危险。

另有一些人认为，我国目前情况与苏联不同，不应减得太多。因为人民解放军不仅需要继续保证有把握打败帝国主义重新发动的侵略战争，还要准备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任务。

彭德怀归纳大家的意见说：

第一、我军建设现在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既不是相当稳定的和平环境，也不是战争即将爆发的临战状态。因此，对军事工

作的安排，不能像1950年春天那样，许多部队都去搞农业生产|「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也不能像朝鲜战争爆发时那样，把一切工作都集中于加强部队的现实战斗力，而不注意军队的基础建设。

第二、常备军的建设，只是国防力量的一部分。国家常备军加上国防科学技术工业能力和国家的动员潜力，才是国防力量的全部。考虑平时军队建设的时候，必须注意有利于国防工业的加强，有利于国家动员潜力的积蓄。

第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国家防御力量的物质基础。没有现代化工业''没有现代化交通、通讯等设施，就不会有现代化国防，也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军队。即使有一支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也不可能在现代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

从上述观点出发，彭提出军队精简的原则是：国家武装部队的总^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太少会削弱国家现实的防御力量；过多则增加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为了在裁减人员的同时，能够保持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建议：多减机关，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

士，少灭干部，增建学校。对于各军种、兵种的人员定额，彭提出，步兵可减少几十万人，空军、防空军、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和铁道兵等都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不增不灭，海军可以略有增加。

经过充分讨论，分析利弊得失，最后统一了意见。9月8日，彭德怀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建议修改1952年的军队建设五年计划，常备军总定额为350万人，在两年内实现；技术军兵种五年不再扩大，只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多培训技术人才。报告还提出军委和大军区两级编制，公安部队的整编、分工，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和军事训练等问题，拟于11月下旬举行一次军事会议，由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出席，讨论解决上述问题。10月毛泽东很快批准了彭德怀的建议。二军委高干会和「三大制度」的实行

1一次「全军的党代表会议」

关于召开一次军事会议的建议经毛泽东批准后，彭德怀于1953年10月3日主持军委例会，讨论会议的具体开法。彭提出，这次会议既要检查过去四年的工作，又要讨论今后五年建军方针和发展道路，就应当尽量给到会人员创造畅所欲言的气氛，使大家不受会议形式的拘束。他建议会议的名称，定为「军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彭德怀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10月5日，军委下发通知，将会议要讨论的问题给各大单位发去提纲，要求各大单位党委根据提纲先行讨论，并将意见于11月10日前摘要上报军委，以便军委研究。

毛泽东对军事会议极为关注，11月10日，毛致信彭德怀说：

军事会议快开了，你是否准备写一个书面报告。要写，现在就要着手了。我觉得有一个简明扼要的书面报告为好，讲时可以发挥，使人好去传达，免致传错会上讨论时也眉目清醒些。如你无暇写，可要萧向荣照你的意见去写，请酌定。

军事会议的末尾，有一段时间让人们人们对军委几年的工作加以评论，将下

面对军委各部相互之间的不满意见尽量讲出来，然后加以分析4比判，以期弄清问题、统一意志，极有必要。这样做的结果，估计是会好的，不会损伤甚么同志。如你同意，这个问题应列入议程，并在你的报告中提到。我记得军委召开会议的通知内，已将检讨过去工作的意见写上去了。如这样做，请叫各部门同志作精神准备。11

关于会议的具体安排，彭德怀正式向毛泽东做了报告：会议议程，拟分为四段：第一段，报告和讨论四年军事总结和今后建军中的

10 《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页504—507。

11 《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页509。

若干基本问题，以及关于组织编制问题。对军委和军委各部门的意见，也在这段会议中提，以便统一认识；第一段是关于军事训练和军校工作的专题发言和讨论；第三段是关于政治工作条例的发言和讨论；第四段是关于干部和超额干部处理的专题发言和讨论。毛泽东批示：照办。

1953年12月7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正式开幕，到会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军委直属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123人，一直开了五¹一天，于1954年1月26日闭幕。对这次会议的隆重，陈毅形容说：「这样大的会议，在延安也没有召开过，等于全军的党代表会议。」会上，朱德致开幕词，彭德怀代表军委作〈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聂荣臻代总长作〈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总结〉报告，张宗逊副总长作军校与军训工作的报告，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作政治工作的报告，总干部副部长赖传珠作干部工作的报告。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发言。最后，彭德

怀作会议总结，朱德致闭幕词。

彭德怀的报告，关于四年来的军委工作，首先对周恩来主持下的军委工作取得的成就，作了高度评价。彭说：

四年来工作的结果，统一了全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使我军开始了从分散走向集中统一，从简单的兵种走向诸兵种合成军队，从落后的装备改变为比较现代的装备；特别是在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军队的作战中使我军获得了新的作战经验’这是极为宝贵的。可以说，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关于今后的军事建设，彭指出：

全军干部对于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这一目标是明确的，是积极热情的，但如何建设它，应采取怎样的具体步骤等重大问题，却不是很明确的。具体表现有两种思想倾向：一种是墨守成规，满足于自己过去的经验，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了的主客观条件，盲目地、骄傲自满，不虚心学习，不认真研究，不加分析，企图以不适合今天情况的老一套的工作方式来解决新的问题；另一种是急于求成，不考虑主观的力量和可能的条件，片面地或局部突出地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甚至把五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内才能完成的事情，要提前到两、三年内完成。他们不了解要建设起现代化的军队首先必须掌握现代的军事业务和技术，掌握科学知识。他们不了解国防现代化是离不开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和技术水平的，不了解我们今天应尽量腾出钱来，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为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打下基础；不了解在我国工业基础还很薄弱、技术水平不高的今天，虽然我们可以得到苏联帮助，解决相当一部分的装备问题，但还不可能立即解决严重的干部和技术问题以及供应、修理、补充等问题。

报告明确结论：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历史时期内，在现有基础

上，有步骤地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根本的任务。

据此，报告阐述了军队建设十个方面的工作要求：第一，确定全国武装部队的总人数〔包括公安部队在内）为350万。要求在这个总定额内，各军种、兵种部队按照规定的数量不再继续扩大，并且对机关、学校中的冗员大量裁减，以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第二，关于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工作职责。第三，关于若干制度的改革和确立问题。在今后两年中，要改变志愿兵制为义务兵役制，改变供给制为薪金制，实行军衔制度和颁发勋章奖章制度。第四，认真办好学校，提高干部质量。「干部决定一切」这个真理，对于我军今后的建设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在今后四年中，必须培养出一批与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应的军事干部和其它各类干部。第五，关于军事训练问题。过去的技术装备比较简单，现正在逐渐改变；过去主要是在战场上练兵，现在则主要依靠进行正规的军事训

练。第六'关于各级司令机关的建设。要逐步做到指挥人员与参谋人员的轮换与合一，以提高参谋工作的质量与指挥的质量。第七，关于部队政治工作问题。必须继续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特别注意部队的思想领导，更须进一步与各项业务和军事技术相结合，给业务和技术的提高以有力的保证。第八，后方勤务的组织和工作建设问题。第九，关于巩固国防和国防建设的若干措施问题。第十'关于党委领导和首长负责问题。在组织方面，应按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员会集体领导和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在下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第一，明确了军事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精神，根据国内外的情况，会议规定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主要是防御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军事

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

第二，明确了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道路。会议认为，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有现代化的装备和现代化的交通及交通工具，这些不是单靠国外订货所能解决的，必须建设我国自己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此，会议确定军队总定额，各特种兵以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巩固提高为主，减少国外订货，选择重点建设，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全部国家机构费用最高不超过国家总支出的30%的指示。以便挤出钱来，发展重工业。这是建设现代化军队应走的正确道路。

第三，明确了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会议认为，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任务是繁重的，工作是复杂多端的，军队的编组、制度的建立、条令的制订、国防工程的建设都是重要工作，但最主要的、长期的、经常的工作则是训练干部。因为，虽有现代化的装备，现代化的组织编制、制度，现代化的工程建筑，如果没有坚强的、现代化的指挥干部和专家来掌握使用，则上述一切均成废物。要把现有的干部变成坚强的能够掌握现代装备技术的干部，比之解决装备、组织编制、工程建筑、建立制度等，其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因此，应明确确定：训练干部的工作，是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军队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的中心。

会议还就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问题、军队组织编制、加强团结、改善领导等问题统一了认识。还讨论了关于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重大问题。

会后，《八一杂志》发表《训练干部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工作》的专论，着重阐述了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训练干部是建军中头等的重要的工作的精神。强调必须紧紧掌握这一环节，切实把它作为建军中的长期的、经常的中心任务贯彻下去。专论指出，为了完成训练干部这一严重而艰巨的任务，必须采取学校培养训练和在职培养训练两种方法，而学校训练又是主要的。因为学校是专门训练干部的场所，可以使干部得到较全面、系统的知识，更快地提高干部的水平；还可以起到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纪律和统一

训练的作用。这样，学校就带动着部队向着现代化、正规化的道路前进。因此，办好学校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的重大意义，它像是我们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重工业」。完成这一任务，不仅要依靠学校本身的努力，而且要依靠全军的共同努力。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干会议，明确统一了上述思想，尤其是强调要把训练干部的工作，作为现代化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来抓，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2军队现代化的重大制度改革

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是人民解放军制度建设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

将原有的志愿兵役制改变为义务兵制，可以为国家训练好强大的预备兵员，以适应现代化建军和作战的需要；可以缩减常备军，节省人力物力，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可以为军队实行统一的编制和正规

的制度打下基础，克服因志愿兵役制度不合理（志愿兵役制在过去是合理的）产生的许多消极与不利的因素，使现役军人的服役、待遇、婚姻、家庭、复员就业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还可以使全国公民都能根据宪法公平合理地为国家服兵役。实行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和对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将有利于确定数十万以军事工作为职业的军官在军队中的地位和社会上的荣誉，解决军官的家庭及个人的生活问题，克服由于长期供给制所产生的依赖思想、平均主义和浪费的弊端；对全体军人更能够鼓励上进、激发荣誉感和责任感，增强纪律性，以保证高度集中统一，提高工作效率，推进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早在1952年11月13日，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就曾传达过中共中央的一项决定。彭说：在昨天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已经确定，军队在1954年1月要准备实行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他解释说，实行这些制度，对我军来说，是一项重大改革，也可以说是「我国当前国防建设的

根本起点」。军委应当召开专门会议详细讨论一下具体准备工作。在随后召开的准备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对军队实行这几项制度改革，不仅一致赞同，而且表现出异常兴奋和一种迫切感。彭德怀总结大家的意见说，我们有些旧制度不改革，已经不利于今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应付现代战争。但是，要建立这些制度，首先要收集数据，研究情况，起草条例等，工作量很大，涉及问题很多。这些工作须由各主管部门负责去做。会后，军委决定，为加强领导，聂荣臻担任军衔实施委员会主任、兵役法委员会主任和编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担任薪金委员会主任，张宗逊担任勋章条例委员会主任，贺龙负责军服样式和军衔标识符号的研究审定。¹⁴

但是，各种条例的制订并非易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最初打算在1954年实施的改革，条件尚不具备。1954年7月20日，军委向中央提议，在兵役法颁布前，于1955年1月，先实行薪金制度的改革。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1954年11月19日，由彭德怀签发国防部命令，宣布在1955年1月1日军队开始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在经过充分准备，反复酝酿讨论的基础上，1955年2月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2月12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7月30日，经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1955年9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二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审议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建议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名单和提出请授予勋章的第一批名单，通过了《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关于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决议》，决定授予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

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决定授予朱德等131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117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570人以一级解放勋章。同日，毛泽东发布授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两项命令。

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接着，毛泽东主席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对人民解放战争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有功人员。

14依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页516。

同日，国务院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典礼。周恩来总理分别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随后，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分别举行了给各级军官

的授衔授勋典礼。全军于10月1日开始佩带军衔肩章、符号。这次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有：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5名，被授予中将军衔的175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792名。

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三大制度的实行，是中国人民武装力量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措施，它激励着全体军人和军官更高度地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努力。

3开展正规的军事训练

中国政府根据1950年2月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和协议，于1951年5月派出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购买武器装备。经过四个月的谈判，苏联同意卖给中国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双方于1952年10月签订了协议。到1954年10月，这些武器装备（其中有些武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全部运抵中国，同时国内军工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遂得到初步改善。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空军建立了20多个航空兵师和其它勤务部队，海军建立了少量的水面舰艇和航空兵部队，陆军各技术兵种也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1953年，人民解放军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到1955年底，人民解放军利用进口和国产的武器装备，装备了步兵、骑兵、航空兵、地面炮兵、高射炮兵、边防内卫部队，要地防空部队、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共186个师、海军9个舰艇支队。陆军淘汰了大部分杂式装备，主要武器装备按编制配齐。

在此期间，中央军委抓紧了共同条令的制订工作。1950年秋，中央军委指示军委训练部成立编修委员会，编写共同条令，随后批准了

18《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页43。据有关资料披露：1950年代初期，从苏联购买的武器装备有：1951年10月中旬，中苏双方达成协议，根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在三年内供应中国60个陆军师的装备。具体落实情况是：1951年提供了4个师的装备；1952年供应了16个师的装备；1954年底，剩下的40个师的装备才全部到位。这60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是完全按照苏军的编制配备的，即每师有三个步兵营；一个炮兵团（装备有122毫米榴弹炮1762毫米野炮、120毫米迫击炮各一个营一12门炮）；一个坦克自行火炮团（装备有了一34坦克24辆、76毫米自

行火炮16辆)；一个独立高炮营(装备有37毫米高射炮12门)；一个独立反坦克炮营(装备有57毫米反坦克炮12门)。全师步兵武器13938件，炮303门；汽车261辆，特种车84辆；马车517辆，马1136匹。空军的装备，从1949年10月到1954年初，人民解放军空军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团，拥有3000多架飞机(包括有：米格-15歼击机、拉-11歼击机、圆-2森炸机，伊尔-10强击机、教练机等)，全部购自苏联。海军的装备，1951年从苏联购买36艘鱼雷快艇，63个海岸炮兵连252门火炮；1952年，经双方谈判达成协议，从1952到1957年，苏联向中国提供舰艇255艘(驱逐舰8艘，中型潜艇12艘，小型潜艇8艘，教学潜艇1艘，鱼雷快艇120艘，基地扫雷艇12艘，截潜艇24艘，江河扫雷艇30艘，海洋巡邏艇40艘)；18个飞行团的飞机；50个海岸炮连的火炮。1953年6月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海军《六四协定》：在1953至1955三年内，苏联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成品舰32艘(包括驱逐舰4艘，中型潜艇2艘，小型潜艇4艘，鱼雷快艇22艘)；半成品舰49艘(包括护卫舰4艘，中型潜艇3艘，大型潜艇4艘，基地扫雷艇4艘，江河扫雷艇10艘，大型鱼雷快艇24艘)，合计81艘，27234吨。此外还有飞机148架，火炮155门，鱼雷542条，水雷1576个，浮水炸弹60枚，以及炮弹、通讯、雷达等设备。1954年6月，中国又购买了2艘苏联旧潜艇；10月两国签订补充协议，增加转让制造「6602」鱼雷快艇12艘，「6603」潜艇2艘，「6604」猎潜艇10艘。第三次购买苏联海军装备，是1955年初苏军从旅大撤走时移交中方的一般性装备(其中有鱼雷快艇39艘，护卫艇6只，辅助船18只，伊尔-28森炸机64架，伊尔-28教练机12架，里-2运输教练机2架，180毫米海岸炮1个连14门)，130毫米海岸炮28门，另130毫米列车炮14门，100毫米海岸炮8门，85毫米高射炮96门，37毫米高射炮26门，总计2.7亿卢布。同年10月，又从苏联购进6架别-6式水上飞艇。王亚志口述，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弥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与中国的军队装备—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之四)》，《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页32、37~40—43。

该委员会提出的编写指导方针和具体原则。共同条令主要是参考苏军条令，结合人民解放军当时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编写的。1951年2月1日，总参谋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和〈队列条令（草案）〉颁布全军试行。两年多后，由于解放军的装备和编制体制有很大改变，中央军委又指示编修委员会对这三个条令进行修正，并于1953年5月1日正式颁发试行。在制订共同条令的同时，各军兵种还先后翻译、颁发了苏军一些专业和勤务部门的条令、条例、教令、教程、教范，如《步兵战斗条令》、《骑兵战斗条令》、《高射炮兵战斗条令》、《空军战斗条令》、《海军战斗条令》、《实弹射击教令》等，供部队试行。试行过程中又进行了一些修改。解放军贯彻各项条令、条例后，改进了作风，加强了纪律性，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以及组织指挥和协同作战的能力。¹⁹

从1953年6月起，全军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要「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和中央军委颁发的战斗训练命令，积极开展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正规训练是以苏军为榜样，以干部训练为重点进行的。从训练的指导思想，到所要达到的目的，中央军委都规定得非常明确具体。各部队根据统一的训练大纲，认真执行各项规定和要求。

军事学院从建立时起，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训练方针：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且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刘伯承院长就培养现代化诸兵种协同作战指挥员的教学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在题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

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它诸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斗条令，应用技术、战术，在各种情况下的协同动作。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具体地说，就是严格地制订与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

事，使军队像一部大机器一样，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

现代化与正规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现代化必须正规化，正规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有了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还要有正规化国防军队生活秩序的建设，才会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规可言，更无诸兵种协同动作可言。

在学员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军事学院于1951年组织了陆军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示范演习〔又称河川战斗演习〕，以增强学员对合成军队指挥作战理论的理解。1954年，更组织了集团军进攻转海岸防御首长司令部演习，检阅了学员指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为提高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1955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由叶剑英元帅担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地区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抗登陆战役演习。从1956年开始，解放军总部每年都组织有诸军兵种参加的不同规模的军事演习。全训师每年进行从单兵战术训练到师的合练。1957年，人民解放军参加了中国、苏联、朝鲜三国军队共同组织的方面军首长司令部演习，学习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知识和方法。

从1954到1957年，陆、海、空三军大多数部队都按正规化训练的要求进行训练，并取得了显着成绩。在执行战备任务和军事演习中，显示出良好的军事素质。

1954至1959年，中央军委根据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全军院校进行了调整，撤销了大部分文化学校，建立了政治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和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军兵种的高等

19《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页37。

院校。到1950年代末，全军各级各类院校共160多所，初步形成了诸军

兵种院校齐全的初、中、高级院校相衔接的军官培训体系。全军院校学习苏军办校的经验，贯彻教育与作战相结合的原则，为国防建设培养了大批军政指挥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干部。21

三中国的国防战略

1第一次三军联合作战

人民解放军在1955年1月实施的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是第一次三军联合作战。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对盘踞一江山岛的国民党军发起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经过十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全歼守军，占领全岛。2月8日至26日，渡海登陆作战部队又乘胜进占披山、上大陈、下大陈岛和北麂山、渔山、南麂山列岛等浙江东南沿海岛屿。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显示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强大威力，取得了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宝贵经验。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东海中，由南江、北江两个小岛组成，面积为1.7平方公里。在南起鳌江口、北至三门湾口的110余海里的浙东南沿海海面上，罗列着1100余个大小岛屿，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岛链。台州列岛的上、下大陈岛居于这条岛链的中心地位；一江山岛处于上大陈岛的北面，离浙东的海门镇（今椒江市）很近，为上、下大陈岛的前哨阵地，在这条岛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国民党军于1949年退守这些岛屿后，就同人民解放军形成隔海对峙的态势。国民党军企图把这条岛链变成反攻大陆的跳板，袭扰大陆的基地，护卫台湾的屏障。1953年时，国民党军在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已有1个主力师、6个突击大队，并有海军舰艇10余艘经常在大陈岛海域游弋，总兵力达2万余人。此后调整兵力部署，使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形成以上、

下大陈岛为核心，以一江山、头门山、披山、渔山、南麂山等岛为外围的海上防御体系。国民党军还经常从台湾派出空军作战飞机，协同海军舰艇，袭扰东南沿海地区。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袭扰破坏活动、1954年1月，华东军区提；I；陆、海、空三军联合攻打大陈岛的战役计划，经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批准后，立即着手进行作战准备，并组织参战部队加紧渡海登陆作战训练。5月中旬，华东军区派出渡海登陆作战部队，先后攻占大陈岛以北的东矾列岛。6月初，美国第七舰队派出十二艘军舰，在大陈岛以东海面举行军事演习，美军飞机也飞抵大陈地区上空，为国民党守军壮胆；国民党军又向南麂山岛增兵一个团，企图阻挠解放军继续解放沿海岛唤。

为了实现中央军委解放浙江东南沿海岛屿的决心，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对攻打大陈岛的具体作战方案进行认真的讨论。决定，首先攻占一江山岛，以此作为大陈岛战役的第一个步骤。在攻打一江山岛时，要对披山岛实施佯攻，以便有效地箝制大陈岛上国民党军。中央军委批准这个方案。7月下旬，华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指示，对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作了精心的部署，并且确定了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步兵二十军六十师1个团又I个营，地面炮兵1个多团，高射炮兵1个多团，火箭炮兵2个营及喷火兵、工兵各1部；海军航空兵7个大队；海军第六舰队、鱼雷艇、登陆运输船艇各1部和部分海岸炮兵；空军航空兵15个大队又1个夜航中队。这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参战的军兵种多，加之陆地、海上、空中的战场情况随时变化，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合指挥机构。8月，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军区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华东军区空军副。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和参谋长马冠三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为参谋长。下设三个军种指挥所：空军指挥所，由聂凤智任司令员；海军指挥所，由彭德清任指挥、马冠三任

副指挥；登陆指挥所，由二十军副军长黄朝天任司令员、海军舟山基地

政治委员李志明任政治委员。22

浙东前线指挥部依据渡海登陆作战方案的要求，把战前海上练兵铲分为军种分训和三军联合训练两个阶段，按照先技术后战术、由简入繁的原则组织实施。参战部队指挥员根据这些军情和地理特点，深入细致地研究了一江山岛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具体打法。在9月的一次陆、海、空军参战部队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上，张爱萍在细心倾听各种意见之后，宣布如下决心：渡海登陆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掩护参战三军进行战前训练，同时创造孤立、围困、封锁大陈国民党军的战场条件；第二阶段为实施渡海登陆作战阶段，即以六十师的4个步兵营，隐蔽进入头门山、高岛一带的进攻出发海域，尔后在海、空军和炮兵的支持下，对南、北江两个小岛同时实施登陆突击，主要突击方向是北江岛的西部和西北部，辅助突击方向是北江岛的东北部和南江岛的西部；登陆突击应在白天满潮时进行。他强调指出，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必须从解放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出特定条件下的特有打法。并解释说：这次渡海登陆作战，第一，登陆地段只能选在登陆条件较差的岛岸突出部，以避免麇部滩头地段国民党军的火力封锁，这样，既可出敌不意，又能利用地形，直接而又迅速地登上岛岸各主要阵地，割裂对方防御体系，各个歼敌。第二，解放军是首次举行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缺乏经验，夜间登陆突击难度大，而白天能够准确掌握登陆点，减少因登陆地段狭窄而造成的混乱，有利于三军协同作战。至于担心白天渡海登陆可能遭到国民党空、海军袭击的问题，由于人民解放军已有夺取制空、制海权的把握，也就可以放心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方案是完全正确的。

1955年1月18日八时正，人民解放军开始实施第一次火力准备。十四时，第二次火力准备开始。在登陆突击的关键时刻，三军参战部队都严格遵循主动支持、保证登陆兵顺利实施登陆战斗的协同作战原则。在整个登陆突击的作战过程中，陆军与海军之间，陆军与空军之间，步兵与炮兵之间，海军与空军之间，协调一致，衔接自如，形成了压倒对方的整体力量，保证了登陆部队顺利上陆。整个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

战，人民解放军共打死国民党军519人，俘虏567人，击沉军舰3艘，击伤4艘。登陆部队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有393位烈士长眠在这东海之滨。

23

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一举成功，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显著提高。这一胜利，改变了台湾海峡的斗争形势，也使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宝库中，增加了三军协同作战的新内容。

2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系中央人民政府的下属机构。随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解放军领导机关的编制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国防部长。为加强中共中央对军事工作的领导，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建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日常工作。

195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通过了全国各大军区的划分方案。为适应新形势下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的需要，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决定，将全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军区改划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共十二个大军区（1956年又增设福州军区）。

22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 页256—257。

23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页269。

为确定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国防建设以及与此有关的重大问题，中央军委于1956年3月6日至15日再次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认为总的趋势基本上是向着有利于世界持久和平的方向发展的，只要我们继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继续扩大和平共处的活动，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可能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另一方面，只要帝国主义制度存在，垄断资本主义集团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目前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正在进行着异常广泛的世界规模的战争准备。从1954年度到1957年度，美国的直接军事费用就占总支出的60%以上。它陆、海、空军的很大一部分，都直接驻扎在国外的基地上，并且现在还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因此，在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的形势下，我们仍然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作好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这是我们军事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为了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突然袭击，为了切实执行《宪法》赋予人民解放军的「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光荣任务，会议深入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会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政策，都规定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爆发之前的战略方针是防御的，而不是主动进攻、对别国发动战争的。但是，我们的防御决不是消极防御，而应该是积极防御。积极防御的方针，应该是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立即给予有力的回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因此，在平时就必须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以便减少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所加于我们的各种破坏和损失，并保证处在第一线的部队能够适时地进行战斗，掩护全国由平时迅速转入战时状态。要在战略部署上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以便在战争一旦发生之后，能够在战役和战术上适时地组织积极的

反攻和进攻，配合守备部队消耗和消灭敌人，完成战略防御任务。只有采取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防御方针，才能够在战争的初期将敌人的进攻阻止在预定设防的地区，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策，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从而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上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

会议认为，为使军队的建设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必须克服军队党内存在的严重的保守思想，改进领导方法。指出，军队党内的保守思想，主要表现在领导方法、干部问题、发挥军队的潜在力量和提高军队建设的质量等方面。例如，人民解放军已基本上按照现代化军队的要求组织起来，已经把整个军队组织成一部完整的复杂的机器，这就需要掌握这部机器的各级领导人员具有新的知识、新的办法来使用这部机器，使各个部门按照统一的意志自动运转，发挥力量。可惜的是，我们还是拘守着领导单一兵种或游击队的老经验，来领导这个已经变化了的现代化合成军队。结果：上面常常顾此失彼，下面常常不知所从，经常出现各自为政、无人负责、互相矛盾、互相脱节、互相抱怨的混乱现象。又如：由单一兵种转为现代合成军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建设新的军种和兵种，需要建立培养各种军官的学院和学校，需要建立统率机构和各种各样的业务机构，需要大量的干部。但是，我们在干部提拔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保守思想，被许多清规戒律所束缚，不敢引进新生力量。再如：建设现代化合成军队需要大量的有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一般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军队的党没有很好地认识这一点，没有把中央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认真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在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信任、待遇等方面都作了许多不必要的限制和歧视，致使许多知识分子不安心于军队工作，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和力量。会议强调，为提高军队建设的质量，必须克服领导上被动和脱离实际的现象，必须克服保守思想。在领导方法上，要采取适合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的措施。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关于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确定，强调要克服军队党内的保守思想，对当时正在起步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57年1月，中央军委提出了新的训练方针：「在人民解放军原有基础

和优良传统基础上逐步提高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新式武器条件

5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第二卷^55)^向社会主义过渡

下及夜间和复杂气候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贯彻这一方针1当年召开的军委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特别强调了「干部当兵」的原则，要求干部深入基层1摸爬滚打'亲自实践。各军区、各部队结合自己的情况，具体区分了训练任务和训练重点^许多高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部队训练，使训练出现了持续发展的好形势^

从1954到1957年，陆、海、空三军大多数部队都按正规化训练的要求进行训练，并取得了显着成绩。在执行战备任务和军事演习中，显示出良好的军事素质。24

第十章

寻求和平共处

1953年7月，以朝鲜和中国为一方、以美国为一方的双方代表在北纬38度线的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这场较量的结局有力地表明：尽管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处于尖锐对立，但是，依靠战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新的世界大战可以推迟；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最突出的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从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基本估计出发，中国政府力争通过外交方面的积极活动和斗争，打破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为已经开始的国民经济大规模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 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 毛泽东调整对外战略

自1947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形成对峙局面以后，冷战被推到高潮，危机迭见。然而，美苏相互对峙，又都担心发生全面冲突，都有缓和与达成暂时妥协的要求。朝鲜停战协议签字，为美苏乃至东西方两大集团通过和平谈判以缓和紧张局势提供了机会。

即使在冷战格局下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极其尖锐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并不把世界看作「铁板两块」。他们认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是世界各国的主要倾向。关于朝鲜停战后的国际局势，1953年6月5日，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分析说：「两大阵营的对立当然是基本的」，但「当前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四个方面」。「这些矛盾的发展都有利于和平民主方面。现在已经很明显，这些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将来会更加发展。」「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如果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毫不畏惧，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够击败战争挑动者。朝鲜战争的事实已证明得很清楚。」美国在朝鲜打了三年一无所得。「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

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跟美国走的没有几个国家，和平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V

1954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与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瓦西科夫（В. И. “化” “~）谈话时指出，尽管美国政府正在关闭同苏联和其它民主阵营国家的谈判大门，然而英国政府却表示它赞成这些谈判。自诩为反共老兵并立下77 功劳的丘吉尔（W. Churchill），也仍然对美国人宣称他是赞成与共产主义者谈判，赞成与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瓦西科夫回忆毛的谈话时称，毛以嘲讽的语气评论说，显然，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就连像丘吉尔这样的保守反动人物也开始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交原则了。2 据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外政策的中心由原先的「一边倒」转向推动世界和平运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一则打破美国的战争计划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0〕》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305。

2（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档案号：0100，卷. 47, 11. 379, 瓦西科夫

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4年7月5日）。参见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九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

；：2004年，未刊，页2238—2240。

I

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二则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广交朋友，为正在进行的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争取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毛泽东把他娴熟的统一战线策略用于国际上，确定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在确定敌我友时，以对待和平与战争的不同态度为标准。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周恩来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三种类型，即「和平中立派」；「维持现状派」；「主战派」。中国的方针是，团结以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西北欧具有中立倾向的

国家和正在进行独立斗争的民族所代表的「和平中立派」；争取以英、法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孤立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战派」。对待美国，一方面坚决反对它的侵略政策和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不主动挑起冲突，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间的争端。朝鲜战争最终以停战谈判而结束，也增加了毛泽东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信心。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改善和发展中国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是外交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由于西方国家的歪曲宣传，以及旧中国政府在某些历史时期曾对周边国家推行过歧视和欺压政策，加上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华侨国籍问题和这些国家内部的共产党武装问题，中国周边的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对新中国还存有一些恐惧和疑虑的心理。为了消除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增进这些国家与新中国的交往，需要制订适合于同这一类型国家交往的新方针。

中国同印度在1950年4月建交，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并未解决，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享有某些英国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特权就是其中之一。为此，中印两国在1953年底开始谈判。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中方代表团成员也参加了会见。针对当时中印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始这一

谈判，现在实现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3

1954年4月29日，两国政府代表团在经过充分协商后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议》，明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进了这个协定。其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结成一个有机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

3中印、中缅总理联合声明

1954年6月25日至29日，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同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分别举行会谈，签署了联合声明。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宣称：有关各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并倡议将其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周恩来总理25日到达新德里时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与印度政府和人民的友谊。中印两国9.6亿人民的和平友好是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与尼赫鲁总理的第一天会谈中，周恩来就以明确的语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我们对印度是如此，对印度尼西亚、缅甸，甚至对巴基斯坦和锡兰也是如此。现在所提出的对老、柬的政策也是如此。我们要使吴努先生相信，我们要把这一政策贯彻下去。」「关于东南亚和亚洲的和平，愿与尼赫鲁总理交换意见，并听取尼赫鲁总理的意见。」尼赫鲁回答说：

3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118。

「完全同意阁下的意见。如果把我国最近签订的协议中的五条原则适用于东南亚的国家，那么就会创造一个很大的没有战争恐惧的和平区域。我提到和平区域的意思就是这个区域中的国家都是独立的，在这个区域中没有军事基地，没有干涉，也没有侵略，而是鼓励和平。」周恩来立刻说：「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⁴

26日，尼赫鲁为周恩来举行招待宴会，他在欢迎词中高度评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说：我们两国不久前已经获得了自由和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我们的命运的机会。目前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驱散今天压抑着这样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战争、恐惧和憎恨的阴影。最近，印度和中国签订了一个关于某些事项的协议，在签订这协议的过程中，我们定下了某些原则，这些原则应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规范。这些原则就是承认每一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以及和平共处。这些原则不但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其它国家也适用，对其它国家来说，这些原则很可以作为一个榜样。假如这些原则在更广的范围得到承认，那末，对战争的恐惧就会消失，国际合作的精神就会得到发扬。周恩来在会上致词说：今年4月间，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议的签订，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中印之间的友谊，而且体现了两国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这就提供了国际间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的范例。亚洲人民都要求和平。目前对于亚洲和平的威胁是外来的。但是，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外来的力量可以自由决定亚洲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深信，亚洲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将使战争挑拨者的计划归于失败。我希望，中印两国为着维护亚洲和平的崇高目的而更加紧密地合作。⁵

中印两国总理在会谈中讨论了两国共同有关的事项，特别讨论了东南亚的和平前途和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6月

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81，页191—192。⁵《人民日报》，1954年6月27日。

28日，中印两国总理签署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的联合声明。同时指出：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如果这

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两国总理承认，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上述各项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任何一国又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应成为和平的障碍或造成冲突。有关各国中每一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这就会缓和目前存在于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并有助于创造和平的气氛。

紧接着周恩来于6月28日由新德里飞抵仰光对缅甸进行访问。两国总理就两国共同有关的事项作了自由的和坦诚的讨论。

会谈中，吴努谈到两国之间的一些他称为「不愉快事件」的事情。周恩来说：刚才吴努总理说到的许多具体事情，有许多是传说，有许多是出于误会。并对吴努谈到的缅甸华侨问题、两国边境的少数民族问题、缅甸共产党问题等，一一讲明了中国政府所持的态度。周恩来说：

我在德里记者招待会上说的一段话是：革命不能输出，同时，一国人民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容许外来干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根据上述的五条原则是可以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请吴努总理研究一下中印联合声明，明天我们联系看中缅关系也可以发表一个东西，这对于改进两国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刚才吴努总理说明的许多具体事情，有许多是传说，有许多是出于误会。在缅甸有许多华侨，情形很复杂。对此，阁下知道的比我仔细。在这些华侨中有些台湾分子挑拨造谣。侨民问题是很复杂的。中国在南洋的侨民都应该遵守驻在国的法律。但是情况很复杂，许多事要与驻在国商量。在这件事常常出问题。中缅两国边境接壤之处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有许多亲戚朋友分住边界的两边，常常来往，这些人中难免没有坏分子。在这件事上也常常发生相当数目的问题。第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共产党，虽然革命的道理一致，但是必须要符合当地的情况才能得到人民的赞成，否则就不能得到人民的赞成。因此，信仰虽然相同，事情是各办各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以大家公认的道理根据

中国的实际情沉办事。否则，就要犯错，得不到人民的赞成。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轮出必败。各国共产党必须依靠自己才能成功，而不能期望外来的帮助。当然，从事挑拨的人还是会继续像过去那样说的。由于以上三种原因，引起了一些误会，使中缅之间的关系复杂化。我们应该建立互信才是。我们愿意看到缅甸独立，有自由选举绝大多数人民赞成的制度，并愿与缅甸友好合作。这是中国的政府的一贯政策，在这次中印联合声明中又予以重申。不应该由于传闻和误会而使我们两国之间产生隔阂相反地，应该消除误会。我们不反对缅甸政府作友好的埋怨，我们也愿作友好的答复，辨明是非。我们两国过去几年来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我们承认，缅甸是表南亚国家中首先承认中国的，我们也感谢缅甸在联合国中对我们的支持。缅甸反对美国，反对美国在缅甸建立基地，这都是值得称赞的。我想缅甸政府也会承认，敌视中国的有阂部队企圃在缅甸边境建立军事基地并接受美援，而中国政府却认为这些军队既在缅甸境内，因此就等待缅甸政府采取步骤来消减这些军队。我们从未在文件或是公开地说过不愉快的话，而是采取了容忍和等待的态度。在国际关系中很少看到如此友善的态度。我们知道缅甸政府的困难，因此采取等待的态度，这说明我们对缅甸采取了很大的尊重和忍耐，这一切说明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是有基础的。我们应该继续加强这种支好关系。⁶

第二次会谈开始时，吴努先作了解释：缅甸的人口只有1800万，而中国的云南省就有1600万至2000万人口，因此缅甸的人口只及中国

⁶中国外交部植案馆，203—00007—03' 页37—45。

的一省。缅甸对于中国是有一些恐惧的，并希望中国尊重缅甸的领土完整，请阁下原谅我们这种恐惧。周恩来回答说：我可以当面和直率地告诉吴努总理，新中国的政策是和平政策，我们愿意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条原则与世界上

一切国家友好相处，何况缅甸和中国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国家。至于说领土，中国的地方已经很大，人口已经很多。我们立国的政策就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现在作此声明，吴努总理是可以相信的。用一句话来说，经过更多的接触以后，缅甸会了解，中国虽然大，人口多，但是是容易相处的。吴努兴奋地说：我非常高兴地听到阁下讲的一番话。阁下这次来访起了很好的作用，消除了缅甸人民中对 中国抱有的恐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假如我们第一次的会见就消除了这样大的一部分恐惧，那么接触的次数愈多，消除的恐惧也就愈多。

这次会谈解除了吴努原来存在的许多疑虑。会谈后，中缅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明确阐明两国总理同意中国和印度所协议的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并认为，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两国政府重申：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它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

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原则，在亚洲和世界各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博得了国际舆论的极高评价。1954年7月1日，苏联〈真理报〉社论指出：周恩来和尼赫鲁在德里的会谈是为了和平而举行的。正因为如此，亚洲和世界各国的舆论都对这次会谈的结果表示欢迎。各国的舆论相信，这次会谈将促进世界和平事业。

此后，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又进一步阐明了在国际关系中实行五项原则的必要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虽然是为处理与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提出的，但提出之后，它很快就被中国领导人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普适准则。1954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到这五项原则。他说：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

境。五项原则也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他表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社会主义可以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他还特别指出：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于11月1日发表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不仅适用于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也被正式用于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从当时的国际格局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全局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既是直接针对美国的遏制政策，突破美国的封锁和孤立，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主动开展活动，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又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具有法律性和道义性，主张世界各国在相处中互相监督，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内容的最具生命力的长远政策。从那时起，经过半个多世纪实践的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已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二日内瓦会议与印度支那停战

1日内瓦会议：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契机

鉴于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亚洲紧张局势有所缓和。1953年9月，苏联政府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议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

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10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赞成这一提议。

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召开，讨论德国统一、欧洲安全和奥地利问题。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就欧洲问题

达成协议，但最后决定，于当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邀请美、英、法、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大国外长参加，同时邀请与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它国家派代表参加。会议委托苏联政府把这个建议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2月27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昭！昭！！）时说：柏林会议有一点收获，就是要举行日内瓦会议，从远东的具体问题来解决一些国际上迫切的问题，尤其是远东和平问题。这就是一个成就。还有，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也被推进了一步。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会议的。它可以推进国际和平，首先是朝鲜和越南的和平。3月3日，中国政府正式答复苏联政府，接受邀请，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中国位列五大国之一被邀请参加日内瓦会议，虽然与苏联政府的努力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是反映朝鲜战争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一直视中国为苏联的附庸，然而，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独立地承担起抗美援朝的使命，与美国进行了一场重大较量。中国也是唯一给予了胡志明领导的越盟的抗法斗争以重要支持的国家。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要缓和亚洲紧张局势，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不可能越过中国。

美国原来拒绝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会议，担心由此增加国际社会要求承认新中国的压力。但法国已经被八年的印度支那战争拖得精疲力尽，急于召开这样的会议寻求体面地从战争中脱身。英国更是担心印度支那战争的扩大危及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地位，担心引发与中国的正面冲突从而危及香港，同样坚持召开日内瓦会议。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同意中国参加，但坚持要在公报上写明，中国参加并不含有对中国外交承认的意思。然而，不管美国如何声明，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步入了国际政治舞台，其意义非同小可。

由于美国的孤立政策，中国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比较狭小，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十几个，不少国家包括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抱有偏见和不友

好态度。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本身就是一个胜利，为其在国际上展现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外交姿态提供了平台，并且有可能开创一个先例——绕开美国控制的联合国，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2中国代表画的与会方针

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大国抱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对美国来说，列为会议两大主题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它以冷战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也是它的亚洲政策的两大战略支点。早在1952年12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化&!!

?..!!”)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IX518611110^6^，

在进行朝鲜战

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他说：「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深受这番话的

影响，1954年4月7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失手，接下去就会失去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动摇由日本、台湾、菲律

宾结成的「岛屿链」，进而波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但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而且一再呼颢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和它采取联合行动，以军事对抗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1(1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它在亚洲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朝鲜战争一直持消极态度，也不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它担心，一旦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同

中国的战争，最终危及它在香港等地区的利益。4月25日，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英国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不准备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对法国在日内瓦为达成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英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

对中国来说，朝鲜停战后，在战略安全方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美国继从北部边疆威胁中国之后，又从南部边陲威胁中国。日内瓦会议前夕，中国领导人对美、英、法各方之间的矛盾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法国是印支战争的直接参加国，但美国和英国同印支局势也有密切的利害关系。这三个国家在如何解决印支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当时，法国已感到难以承受印支战争的重负，试图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实现所谓的「光荣解决」，以便保存其在印支的一部分势力和影响，但其实现和平的决心并不大。美国从遏制共产主义、遏制中国的需要出发，力图把法国在印支进行的殖民战争转变为美国的反共战争，并乘机排挤法国的殖民势力。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声称一旦失去印支，接着便会失去整个东南亚。英国没有卷入印支战争，但它对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十分关心，对美国企图扩大印支战争抱有警惕。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在亚洲有重要的殖民利益，并担心卷入同中国的新一轮对抗。美国试图说服法国和英国参加由它策划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越南采取集体干涉行动；但法、英两国表示，只有在谈判失败后它们才会考虑集体干涉的方式。鉴于朝鲜停战谈判已经表明美国无意从朝鲜撤军，无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要想通过日内瓦会议打破在朝鲜问题上业已形成的僵局是困难的，但通过这次会议争取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则是可能的、紧迫的和必要的。如能实现印支和平，美国在一个时期内将无法在亚洲找到制造战争借口的地方。结论是，日内瓦会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就印支问题达成协议。

基于以上的基本分析，3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拟定的与会方针是：尽一切努力，务求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力求不使日内瓦会议无结果而散。在代表团出发前夕，周

周恩来出席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在会上说：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甚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甚么就说甚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关于朝鲜问题，周恩来提出的基本方案是：我方应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口号，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在会上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同时也估计到这些建议，显然都不可能为对方所接受。争取到最后，我们应在维持南北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提出的方案是：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即使不能达成任何协议，也要使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谈判不致完全中断，形成边谈边打的局面，以增加法国内部

11 《周恩来年谱19761》’上卷’ 页361。

的困难和法美间的矛盾，而有利于印度支那人民解放斗争局势的开展。应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统一、民族独立、自由选举的口号以及法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反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的主张。他预计到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是有可能的，提出：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具体问题上，就地停战不如划定南北停战线如十六度之类，但这需要再经过多次战斗才能换取这样有利形势。

周恩来还考虑到，除以上两个议题外，根据会议情况，还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其它迫切问题。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贸

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

12

从3月下旬至4月上旬，准备工作在国内、国外同时紧张进行。4月上旬，为了摸清这次会议的底细、协调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行动，周恩来先后在北京和莫斯科同朝鲜、越南、苏联三国领导人举行磋商，交换对朝鲜问题、印支形势及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的看法，协调彼此的立场，确定应采取的对策。中、苏、越三方都认为必须大力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莫洛托夫建议中国多去些人，主要是学习、练兵。当时苏联代表团是200人多一点，中国代表团确定派去180多人。

4月19日，毛泽东主席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为秘书长。代表团顾问有：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乔冠华、上海外事处处长黄华、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欧非司司长宦乡、情报司司长龚澎、军委作战部处长雷英夫、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中央指示，代表团在会议上要加强外交活动，以破坏美国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并要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刚飞离北京，取道苏联，经柏林，于24日抵日内瓦。他在机场发表声明指出：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国代表团抱错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13

26日，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在旧国联大厦开幕。

3在朝鲜问题上形成僵局

日内瓦会议的第一阶段，从4月27日至6月15日讨论朝鲜问题。参加会议

的有：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于5月3日返美，由副国务卿史密斯〔化〕8.501油〕接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入她。!!^）、法国外长皮杜尔（。巧〕81(131110、中国外长周恩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以及南朝鲜、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的外长和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荷兰的代表。会议决定由泰国、苏联、英国三国首席代表逐日轮流担任主席。

南朝鲜代表卞荣泰首先作了背离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主题的发言。接着，南日发言说，朝鲜人民期望这次会议将有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他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三点方案：一、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于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恢复朝鲜国家^的统一。杜勒斯发言，要求实现所谓联合国统一朝鲜问题的决议。

28日，周恩来发言首先指出，日内瓦会议肩负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的重任。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外长们坐在一起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任务是复杂的。但是举行这个会议的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中国代表团希望参加这次会

12周恩来手稿，1954年2、3月间。搏引自《周恩来传》必一川^》，上卷，页154—155。

1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哀362。

议的全体代表们都为着实现这一任务作出真诚的努力。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我们从不侵略、也不会侵略任何国家，但也决不容许任何人对我们进行侵略。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

同时，我们也要求其它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并抱有互相合作的愿望，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基于巩固远东和平的利益和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极为重视。在揭露了美国侵略朝鲜和侵占中国的台湾，以及美国和大韩民国公然违反停战协议的某些重要条款的种种事实以后，周恩来郑重表示：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南日外相所提出的关于恢复朝鲜的国家统一和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的三项建议。

莫洛托夫发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在这里讲到希望亚洲各国齐心协力以实现亚洲的和平。苏联代表团完全同意这种意见。苏联代表团认为，南日外相提出的建议，可以作为对于朝鲜问题采取适当决定的一个基础。

皮杜尔和艾登先后发言，主张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选举。

会议的情况如毛泽东早就料到的，朝鲜战争在三八线停下来是反映了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的现状。这种力量对比，在停战九个月中没有产生多少变化。美国根本不准备再向前跨进一步，达成任何新的协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柏林会议上已经告诉莫洛托夫：朝鲜问题会议可以开，但其么协议也达不成。一些西欧国家对朝鲜问题也不热心。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周恩来说：朝鲜那个地方没有关系，我不感兴趣，反正打不起来，问题在印度支那。在这种形势下，朝、中、苏三国代表依然继续努力，争取开出一个结果来。5月22日，周恩来就南日提出的方案提出补充建议：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督。但这个建议仍被美国等国拒绝。

由于与会代表大多数的发言都是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的，风马牛不相及，这样谈了一个半月，美国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一项积极的建议。美、英、法密商会议不再开下去了。莫洛托夫及时掌握了这一动向，并告诉了中国代表团。

6月15日，举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苏联和中国代表团，本着一贯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和协商精神，在会上接连作了建设性的重大努力，先后提出了三个有助于达成协议的新建议，以期在最后时刻挽救会议免于破裂。南日在会上提出一个关于保证朝鲜的和平状态的六点建议，以期打开会议的僵局。周恩来表示完全支持，同时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莫洛托夫除表示支持南日提出的建议外，还建议由所有与会者发表一项共同宣言：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业已同意，在等待朝鲜问题在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国家的基础上最后解决期间，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

会议休息四十分钟后，美国代表史密斯第一个发言，他根本不提南日的建议，而以朝鲜停战协议已有规定为借口，拒绝莫洛托夫提出的关于共同宣言的建议。澳大利亚代表卡西（化化&!^0&86^1发言说，他还没有充分时间来研究南日外相的建议，并含糊其词地说，莫洛托夫外长的建议「大致上」是可以同意的。比利时代表斯巴克（?加^

^6111-1 发言说：他希望即使会议没有得到成功，战事也不会再起。他还表示，希望不久将来能再来看看能不能在和平统一朝鲜方面达成协议。他表示不能接受莫洛托夫外长的建议，理由是因为刚才美国代表反对这一建议。大韩民国代表卞荣泰拒绝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然后，泰国代表旺亲王（?!^化\^30&!!^^!!)宣读了十六国（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军队侵略朝鲜的十六国）共同宣言，宣布他们决心使会议在未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

莫洛托夫立即起来对所谓「十六国共同宣言」的本质作了揭露，他说，我们正面临结束我们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结束会议的动议是由那些刚才代表十六个在朝鲜作战了几年的国家宣读宣言的人提出来的。他们不愿意接受苏联的建议，又提不出反建议。现在完全清楚了，这些代表团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他们企圖把反民族、反民主的南朝鲜政权强加于北朝鲜，并且他们要利用日内瓦会议来达到这个目的。然而，这些企图没有实现，这就是再也没有任何可能达成协议的

原因。

周恩来接着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经过泰国代表所宣读的十六国宣言的态度和立场。十六国宣言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为了作最后的努力，他建议会议通过以下协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周恩来的建议，引起会场出现一场戏剧性的对话。

比利时代表斯巴克发言说，莫洛托夫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建议已经包括在停战协议中，表示希望以后将在「更有利的环境下」恢复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接着又说：为了消除任何怀疑，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

莫洛托夫当即表示，他愿无保留地支持刚刚得到比利时代表赞成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

会议主席艾登接着发言说，据我了解，我们面前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比利时代表认为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所普遍接受？

斯巴克和艾登的发言，一下使美国代表团乱了阵脚。就在会议没有人表示反对意见的片刻，美国代表史密斯慌忙站立起来，他假装没有听懂周恩来「建议的范围和实质」，说他不准备在未向美国政府请示的情况下同意这个建议。

由于美国的无理阻挠，会议主席艾登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没有投票的规则。我们在这里是靠共同协议来行动。我们现在不能在任何一个文件上达成协议。我想建议会议，同意只把这些发言记录下来，作为会议记录的一部分。

这样，尽管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对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会议却使美国无理阻挠、破坏会议的丑态暴露无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持的和解态度和合情合理的告诫则为大多数与会国家所赞赏。

4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的签署

1954年4月19日，中国代表团出发去日内瓦的前一天，周恩来再一次会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曾对他说：日内瓦会议不会在朝鲜问题上有什么进展。「但是不管怎样，朝鲜总是一个僵局，要再打起来是不容易的。因此它必须另外找一个作战的地方，那就是印度支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更主要的目标就是要避免印度支那战争的停火，要阻挠日内瓦会议就此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在法国，就是在议会中，和平的呼声也是很强大的。」「我们的结论是：一、美国要侵入亚洲，这是肯定的；二、亚洲各国和人民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自救的问题，这就是要团结友好，反对侵略，不参加军事侵略性的集团；三、要告诉英法等西方国家，他们面临着两条任选其一的道路，要么搞好和亚洲人民的关系，从而保存他们的一部分利益，要么他们拒绝这条道路，选择同美国一道走的道路，从而就会失掉一切而且还会永远被亚洲人民所唾弃，这确是两头失塌。」¹⁴所以，中国代表团尽力在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争取有一个积极的结果。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几经推迟，直到5月8日才开始讨论。参加会议的有：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相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文同、法兰西联邦印度支那三成员国的代表¹⁵越南国代表阮忠荣、老挝王国代表

萨纳尼空（? ^";? 3^!^。^）¹⁶柬埔寨王国代表泰普潘（丁印? ^! !）。
根

据会前协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由艾登和莫洛托夫轮流担任主席。

¹⁴周恩来和赖嘉文谈话记录，1954年4月19日。参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360-361。

会议所以在5月8日得以开始，是因为越南人民军在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帮助下组织实施的奠边府战役在7日胜利结束，共歼敌精锐部队21个营10个连共1.6万余人。法军越南西北地区司令、奠边府法军守军司令德卡斯特莱（^”^^^（：“！”！准将为越人民军所俘；毙、俘敌上校高级军官10名，少校以下军官353名以及军士1396名。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对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不能不是一个推动，为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越’中、苏等国的代表有了很大的主动权。

会议开始后，皮杜尔首先发言，他企图歪曲印度支那的历史和抹煞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并提出仍以战胜者自居的停战建议。

范文同接着发言，建议通过邀请高棉和寮国抗战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同时提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八点建议：一、法国承认越南、高棉和寮国的主权与独立；二’自越’棉’寮三国领土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三、在越、棉、寮三国举行自由普选；四、越南政府代表团就越南政府愿意依照自由意志的原则与加入的条件而加入法兰西联邦的问题发表声明，棉、寮两国也应发表相应的声明；五、越、棉、寮三国承认法国在这些国家内现存的经济与文化上的利益；六、交战双方保证不对在战争时期和另一方合作的人起诉；七、实行互相交换战俘；八、在执行一至七项前，应先停止敌对行动，并由法国和三国中的各国缔结适当^]协议。

艾登和史密斯相继发言，都建议以法国提案作为讨论的基础。

周恩来发言指出，印度支那问题的实质是必须承认越南、高棉和寮国人民有充分权利获得他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民主自由，并在他们各自的祖国的土地上过和平生活。印度支那战争是法国殖民主义者挑起的一个企图重新奴役印度支那人民的殖民战争。而美国干涉者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目的决不限于夺取印度支那，它还企图以印度支那为基地来对整个东南亚进行侵略。他说，中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

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得和平和安全。周恩来表示：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范文同的声明和建议，他的建议可以成为本会议讨论印度支那战争和恢复和平问题并通过适当决议的基础。

莫洛托夫发言支持范文同的建议，并建议建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条款加以适当的国际监察。

法国代表皮杜尔发言，主张只解决军事问题，而不解决政治问题。随后，根据参加会议国家的协议，于5月17日举行限制性会议。29日，会议通过了英国代表团提出的三点建议：一、双方司令部的代表应即在日内瓦会晤，并在当地也开始接触；二、他们应研究在停止敌对行动后军队的部署问题；三、他们应尽快向会议提出报告和建议。

但是，经过近一个月的讨论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各方争执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越南停战后如何为法越双方部队划分集结区。法方主张划在18度线，越方主张划在16度线，双方的要求差距甚远。二是如何对待老挝和柬埔寨问题。越南提出，老、柬两国的问题应作为整个印支问题的一部分加以考虑，必须按同样的方式在印支三国实现停战。法国等方提出，老、柬问题应与越南问题分开处理；它们不承认老、柬存在当地的抵抗力量，认为那里只有越南撤军问题。

日内瓦会议开得如此艰难，根本原因是美国对法国和英国施加压力，反对对越盟方面作出任何妥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敦促总统通知巴黎，如果法国默认共产党接管印度支那，那将影响它作为三大国之一的地位」，「美国给予法国的援助将自动终止」。¹⁵但会议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印支战争当事国法国已被八年战争拖得精疲力竭，指望借助日内瓦会议从印支战争的泥潭中「体面」脱身。日内瓦会议在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之前，法国外长皮杜尔就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接触，表示愿意经苏联安排与中国代表团见面，并在会外设法直

接与中国代表|专1成员来往。因此’如果中、苏、越方面采取适当的策略，提出法国可以接受、美国也无法公开反对的停战方案，会议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而这一适当策略的根本点，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国际统一战线，要联合法国、联合英国，联合东南亚国家，联合印度支那成员国，达成印度支那和平，来孤立美国，主要孤立美国主战派」。在参加日内瓦会议之前，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情况了解得尚不全面。中国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老挝的王国政府和抵抗力量双方、柬埔寨的王国政府和抵抗力量双方都没有来往。参加会议后，周恩来了解到，早在法国入侵前，印支三国就存在着明确的民族和国家界限；至今，在这两国大多数人民心目中，老挝王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仍是合法政府；而两国的抵抗力量寮国和高棉实际是比较弱小的，两国的抗战局面主要是靠越盟打开的。根据两国的现实情况和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周恩来感到必须及时调整政策和谈判方案。为此，中国代表团主动与柬、老王国政府代表接触，使他们了解到，中国不仅支持越南的抗法斗争和统一，也同样支持柬、老两国的独立和统一，赞同它们奉行和平中立政策。5月30日，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电，向中央提出：「印度支那三个成员国的民族和国家界限是非常显明而严格的。这种界限在法国建立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在三国人民当中也是如此看待的，过去我们在国内没有看得这样严重。」「柬埔寨、老挝两个王国政府在大多数人民看来仍然是合法的政府，并且是被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承认的政府。」「这次在日内瓦会议的接触中，我们才懂得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必须严格地以三个国家来对待。」印度支那谈判能否有所突破的关键，是怎样看待印度支那三国的关系问题。越南曾希望抗法战争胜利后三国组成印度支那联邦。因此，在第一阶段的谈判中’中’苏’越

第十章寻求和平共处

方主张印度支那问题要通盘解决，小能分开处理。通过谈判，周恩来感到越南关于组建印度支那联邦的考虑是不现实的。周恩来请中共中央就

此意见电越南劳动党中央。6月14日，越南劳动党中央电覆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这个问题明确后，周恩来就可以提出下一步的谈判策略了。

会议在僵持中到了6月中旬。6月12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法国代表团人心涣散，已无心谈判。15日，西方集团终止了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并决定于16日终止关于印支问题的谈判。关于印度支那的谈判也到了破裂的边缘。

6月16日，中国代表团在限制性会议上以5月27日中国代表提出的六点建议和5月29日会议通过的决议为基础，提出了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六点建议。中国代表团指出：根据本会议5月29日的决议，印度支那敌对行为应该早日和同时停止。研究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就必须从这一原则出发，以便作出具体安排，使老挝和柬埔寨的停火同越南的停火同时实现。6月18日，几乎所有各国代表团都认为中国代表团16日的建议是富有建设性和协商精神的，只有美国代表罗伯逊（参议员）宣称这个建议是美国不能接受的。19日，会议就关于停止在柬埔寨和老挝的敌对行动问题达成协议。

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周恩来迅速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推动有关各方朝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除苏、越两国外长外，他先后同英国外相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澳大利亚外长卡西，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朗宁（参议员），瑞士联邦政府主席陆巴特尔（参议员）和政治部长彼蒂彼爱（参议员），英国议员威尔逊（参议员）和罗布逊—布朗，挪威、瑞典、芬兰三国驻瑞士公使，老挝王国外交大臣萨纳尼空，柬埔寨王国外交大臣泰普潘等进行了会晤。法国主战派内阁拉尼埃政府垮台后，统治集团中主和派势力抬头。

激进社会党人孟戴斯—弗朗斯（参议员）被国会推选为新

总理。他在组阁时允诺迅速结束印支战争，声称如果到7月20日还不能就印支问题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新政府就辞职。随后，他自兼外长，亲自率团到日内瓦谈判。6月23日，周恩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会

晤了法国新任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就有关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进行自由交谈。周恩来从交谈中了解到法国经不起越南战争的消耗，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急于拔出陷在越南的这只脚。但是法国又是个宗主国，死要面子。只要能使它在形式上体面地撤出越南就满足了。此次谈判成功与否，对孟戴斯—弗朗斯的地位能否稳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对越南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周恩来心中有了底，并将这个底交给了越南，说服裨文同不要在16度、17度在线计较，给法国一点面子’换取法国军队的撤出是很合算的。周恩来说：法国撤出，全越南都是你们的。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返回中国，在广西柳州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就印度支那问题和整个国际形势详细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议确定了主要方向是争取和的方针，胡志明主席完全同意南北划线的方案，并估计对方最多只能让到17度线，并据此修定了原先的谈判方案。

7月7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项问题的报告。周汇报说：这次会议，我们采取的方针是联合法国、英国、东南亚国家、印度支那三国，即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国际力量，孤立美国，限制和打破美国扩大世界霸权的计划，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促成印度支那的和平。根据既定方针，中国、苏联和越南代表团在会议上就是要实现印度支那停战。两个月来的会议取得了若干成就。它使国际紧张形势缓和了一步，使美国扩大世界霸权的计划受到阻碍。照现在的趋势，实现印度支那停战的可能性是大了，是要达成协议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难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

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甚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至于说具体步骤，就是恩来同志所讲的，过去跟胡志明同志他们达成一致去做的和这一次谈好的那些东西，在谈判中该讓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所以我们应当批准过去这些活动。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20

随后，周恩来又访问了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取得一致。7月12日，周恩来返回日内瓦，继续与有关各方磋商，推动谈判进程，直至法、越双方达成妥协，确定以17度线为界。7月10日，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抵日内瓦。17日，孟戴斯—弗朗斯发表广播演说，认为印度支那问题可能达成协议。

各国代表之间举行了多次会外会谈以后，18日继续举行限制性会议。21日，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代表及越南志愿人员和寮国战斗单位代表谢光宝，印度支那法兰西联邦部队总司令部代表及老挝王国部队代表戴尔特尔(! ^:^^111^分别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议上签字。越南志愿人员和高棉战斗单位代表谢光宝、柬埔寨王国部队代表刁隆(! ^;叫&^)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议上签字。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由九国代表参加的辟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

2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大会上的讲话，1954年7月7日。参见《毛泽东传（1949—）》，上册，页559—560。

议的最后宣言，并决定将老挝王国政府、柬埔寨王国政府、法兰西共和

国政府的声明列为最后宣言的附件。最后宣言指出，会议坚信：本宣言和各项停止敌对行动协议中所规定的条款的实施，将使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从此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在国际的和平大家庭中起它们的作用。日内瓦会议的每个与会国家在对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的关系上，保证尊重上述各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予任何干涉。与会各国同意就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向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彼此进行协商，以便研究为保证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被尊重所必需的措施。美国代表史密斯在会上宣读了美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单独宣言，声明美国不愿同与会各国一起参加保证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共同工作。美国拒绝在最后宣言上签字，显得十分孤立。随后，各国代表先后发言。

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的发言高度评价了日内瓦会议的成就，他指出：日内瓦会议九个代表团经过七十五天的工作，终于克服了最后的阻挠，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获得一致协议。深信已达成的这些协议不仅将结束八年的印度支那战争，把和平带给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人民，而且也将进一步缓和亚洲及世界的紧张局势。毫无疑问，我们会议的成就是很大的。印度支那的停战再一次证明了和平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世界上赞成和平共处的国家愈来愈多。任何制造分裂、组织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实力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亚洲人民所要求的决不是分裂和对立，而是和平和合作。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 and 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延续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到此闭幕。

7月23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离开日内瓦回国，临行在机场发表谈话，再次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愿为维护世界和平努力的诚意。他说：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其它重大国际问题开辟了道路。我深信，只要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坚持不懈地努力，世界和平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与有关各国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共同努力。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印度支那战事得以停止，结束了法国在该地区的

殖民统治，推迟了英国直接武装干涉印度支那的计划，使国际形势得到进一步的缓和。这不仅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巨大胜利，也巩固了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为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打破美国孤立和遏制政策的重要一步。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和老挝、柬埔寨两个近邻的关系有了良好开端。会议期间，中、英宣布互换代办，中英关系有所突破。中法关系也取得进展，会后法国国内不断出现要求承认新中国的呼声。中美两国代表也在会议期间就双方公民回国问题进行了接触，这是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先声。日内瓦会议的实践还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政策。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建立起来的这个统一战线，不仅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还争取了主张和平的国家，影响了希望维持现状的国家，孤立和分化以美国为首的战争集团。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中国从事外交活动的范围扩大了，方式也更加灵活了。

三、万隆会议求同存异

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亚洲和非洲二十九个独立国家的政府代表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共商加强合作，并肩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际和平的大计，它标志着殖民大国主宰亚非命运时代的告终。

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是一个里程碑。如果说日内瓦会议是为了消除殖民主义留下的祸根和解决朝鲜与印度支那战争所带来的问题，那么万隆会议则是要讨论如何最有效地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维护亚洲和非洲新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

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解决越、老、柬问题的态度，以及在处理中印、中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和平共处的诚意，在东南亚国家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愈来愈多的国家所

认同。这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万隆亚非会议的召开。

1 五国总理在科伦坡倡议

在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提议召开亚非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这件事，是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在访问中国时向周恩来提出来的。印度总理尼赫鲁1954年10月18日至30日来华访问。他同周

周恩来进行了四次会谈，在会谈中告诉周恩来：南亚五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总理准备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周恩来立刻断然回答：「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这个会议是为扩大和平区域而努力的，因此有助于和缓紧张局势。」周坦然地说：「虽然参加会议的各国情况不同，而且会议遇到的问题是复杂的，但是终能找到共同点。」缅甸总理吴努在11月30日至12月16日来华访问。他同周恩来进行了五次会谈，在会谈中提出希望周恩来能亲自参加亚非会议。周恩来说：「东南亚国家为和平而中立的态度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同情。我们完全支持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三国总理关于扩大和平区域的主张。一旦和平区域扩大、形势就会起变化，战争即可推迟或制止。」

但是，正如吴努估计的那样，在这年12月28日和29日召开的科伦坡五国茂物会议上，是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八二五：一五二〇三二二二叫。二）后来

回忆：「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于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国总理的茂物会议，决定邀请包括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亚洲和非洲国家，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亚非会议，宗旨是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探讨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争取民族主权、结束殖民主义与保卫世界和平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被邀请的有亚洲和非洲所有具有独立政府的国家：阿富汗、柬埔寨、中非联邦、中国、埃及、阿比尼西亚、黄金海岸、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北越、南越、也门二十五国及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五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接受邀请，绝不牵涉到或甚至意味着它对任何其它国家的地位所抱的看法有任何改变。它仅仅意味着，这个被邀请国是一般地同意会议的目的的。他们也牢牢记住这项原则：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绝不应受到任何其它国家的干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加国在会议上所表示的意见对任何其它国家都无约束力，也不应认为是被任何其它国家所接受，除非后者希望这样。会议的基本目的是，使有关的国家能够更好地了解彼此的见解。五国总理希望，这种澄清将使所有被邀请的国家都能接受对他们的邀请。发起国的联合公报是颇具匠心的，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现状，发起国既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增进亚非各国的相互了解，促进各国间的亲善合作和睦邻友好，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又表明亚非国家之间还存在互不信任、相互戒备和严重分歧。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五个发起国发出邀请书。2月10日，周恩来覆电印度尼西亚总理欣然接受了邀请，并指出：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中国对于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感到荣幸」。

2 中国政府的参会立场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仅由亚非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性会议，因此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对于这次会议，中国从一开始就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绝大多数亚非国家热烈支持，期待会议取得成功；苏联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不过，直至大会开幕，会议的前景仍不容乐观。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亚非会议抱着敌视态度，而与会各国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当时，美国政府正力图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控制，扩展针对社会主义的军事集圃。它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将通过这次大会扩大影响，打开同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因此，美国官方及其宣传工具不但极力贬低亚非会议的意义，散布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的悲观论调，还竭力挑拨其它亚非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声称共产党的「颠覆活动」是对亚洲稳定的「威胁」，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的谎言。美国政府还要求国会增加对亚洲的拨款，以拉拢和分化与会国家。万隆会议前夕，杜勒斯不辞劳苦，积极对参加会议的国家做工作。杜勒斯在和菲律宾代表罗慕洛谈话时表示，他希望菲律宾代表团能在会上提出建议要求台海双方停火，他还告诉罗慕洛他连这个建议的草案都准备好了。杜勒斯还向美国驻土耳其、埃及、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泰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使馆发电报，让美国驻那些国家的使节积极做这些国家政府的工作，敦促他们在万隆会议上呼籲台海双方放弃使用武力。此外，杜勒斯还试图说服英国政府运用它在英联邦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对会议施加影响。他对英国驻美大使麦金斯说，万隆会议不仅对台海危机的发展十分重要，而且关系到美英两国本身的一些重要利益，因为它对泛亚运动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一运动不仅是冲着美国来的，而且也是冲着英国来的。所以，他向英国大使表示，希望英国政府运用其传统上对一些亚非国家的影响，缓解台湾海峡危机和遏制泛亚运动的发展。

与会各国不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不同，而且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主张亦不同。最明显的是，一些国家赞同印度奉行的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主张亚非国家应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¹⁽¹⁾；另一些国家加入了美国操纵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或受美国的很大影响，将共产主义视为主要的威胁。在与会国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只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越南六国，其它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外交承认。这些情况意味着会上的分歧和斗争难以避免，而中国在会议上的一举一动也将极其敏感。

中国政府对参加亚非会议非常重视，毛泽东在一次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³！¹。仿出。）谈话时说，中国的朋友们决定在亚非国家会议

采取这样的立场，即不把自己打扮成会议的领袖，而仅作为会议的参加者。我们建议尼赫鲁和吴努应充当会议领袖的角色。这从削弱美国破坏这次会议的立场的观点看是有益的。毛泽东指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是大大削弱了。美国现在威胁中国，说要封锁中国沿海，对中国发动战争，等等。但是美国人封锁我国沿海不像朝鲜战争时那样容易。现在他们这样做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日本开始采取或多或少比较独立的立场，不希望封锁中国，日本想同中国通商，想从美国的压迫下挣脱出来。如果再考虑到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都采取独立的立场，不希望美国在他们国内占据统治地位，那便十分清楚，不仅美国，而且英国在东方的地位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大大削弱了。²⁵

为作好参会的准备，从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研究、制订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于4月4日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参加万隆会议的方案，全面准确地分析了形势，制订了周密细致的预案。方案指出，尽管存在着不利方面，有利的和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亚非国家和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利害关系、共同的愿望和要求，这就为会议提

25八80? 中(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

^5, 00. 28, 11. 5142, 0. 307^ . 5—11: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5年1月8日)。参见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 《中苏关系: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选编》, 第十卷(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 20041, 未刊, 页2323—2329。

供了共同基础。中国代表, 参加会议的总方针是: 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 促进民族独立运动, 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力求会议取得成功。围绕总方针, 方案就与会各国共同关心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殖民主义、促进经济合作与发展等十一个问题, 提出了中国政府的主张。作为预案, 方案准备了两个纲领: 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约或和平宣言, 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 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 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准备采取的具体做法是: 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 不突出中国的特殊问题; 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共同要求出发, 再联系到中国的要求; 中国支持他们, 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 不提出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话题; 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进行的攻击、诬蔑, 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 以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 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 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 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4月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并批准了周恩来主持制订的参加会议的方案及有关文件, 最后还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4月6日, 国务院第八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 通过他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 并宣布在周恩来出国参加亚非会议期间, 总理职务由陈云代理, 外交部长由张闻天代理。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是: 首席代表周恩来, 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顾问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

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因为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会前先到仰光，处理中缅两国之间的一些问题，代表团在4月7日离开北京，第二天到达云南昆明。

3「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为送中国代表团去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中国政府向印度航空公司包租了由美国洛克希得飞机厂制造的。一69型命名为「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客机。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图谋乘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途中，通过破坏中国代表包租用的印度包机，暗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和破坏亚非会议。中国政府在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一阴谋后，由外交部于4月10日九时半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英国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保障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4月11日十二时十五分，「克什米尔公主号」载着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采访亚非会议新闻的中外记者十一人由香港起飞，前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的海面时，突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机上人员除副驾驶员狄克希特、领航员派塞克、维修工程师卡尼克三人幸免外，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锺步云，新闻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斐德，以及机组人员：驾驶员杰塔、飞行工程师顿哈、飞行事务员杰苏查、助理飞行事务员毕门塔、空中小姐蓓莉等十六人全部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周恩来由于应邀访问缅甸而临时改变出国航线才得以幸免。事后查明，这是一起针对亚非会议、以周恩来为目标的政治谋杀案，系由台湾特务机关制造。

这一破坏活动在一些亚非国家中引起一定程度的混乱。中国政府一方面给予揭露和谴责，另一方面表示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团结的精

神反击帝国主义的挑战，确保亚非会议的顺利召开。

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美蒋特务破坏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座机一事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严重责任。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声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定要同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起在亚非会议中为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美国和台湾统治集团的卑劣行为，只能加强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共同行动。

北京各界人民4月17日举行追悼大会，追悼石志昂、李肇基、锺步云、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以及王明芳、斯塔列茨和严斐德等烈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在追悼大会上讲话。她严正指出，石志昂等十一位烈士是被蒋介石特务谋杀的；这是一种卑鄙的暗算，是一种没有人性的杀人的阴谋。不仅如此，他们的目标还是要谋杀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我们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全体人员。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也是他们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计算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阴谋。帝国主义妄图用这种卑鄙无耻的阴谋来达到吓倒亚非各国人民、破坏亚非会议的目的。但是，人民是吓不倒的。只要亚非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阴谋提高警惕，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是一定会被粉碎的。中国人民向全世界控诉：谋杀石志昂等十一位烈士的凶手，就是蒋介石的特务分子。这十一位烈士的牺牲是为中国而牺牲，为亚非会议而牺牲，为和平而牺牲的。我们一定要为十一位烈士报仇，要杀人的凶手受到应受的惩罚。4中国代表画为求谏结而来

美蒋特务的破坏、威胁，既损害不了中国的威望，也影响不了中国代表团为促进亚非团结反帝的决心和勇气。4月16日，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按原计划飞抵雅加达。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除中非联邦以外的29个国家340名政府代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化^。)致开幕词。会议选举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经商定，会议议

程是：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治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和合作。开幕式过后，举行了三天大会，由各国代表团团长作一般性发言。随后四天，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分别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各有关的实质性问题，并起草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与宣言以及会议最后公报。在头两天的公开发言中，各国代表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就明显暴露出来，核心问题是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究竟应如何处理与世界上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的关系。在发言中，有的国家代表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国家代表提出苏联在东欧搞的是「新式的殖民主义」，有的国家的代表试图说服亚非国家与美国等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有的国家又因一些具体问题表示了对中国的疑虑。会场的气氛愈来愈紧张。在大会偏离正确航向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两次拨正了船头，推动会议走向成功。

19日下午，在最后一次公开发言的会议上，周恩来登台讲话。这立即引起各国代表和记者们的极大关注，每个人都意识到他讲话的基调将决定会议的方向和进程。如果他打算正面回击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对中国的责难，那么，大会就将陷入一场毫无结果的政治纷争。针对会议的情况，周恩来利用短暂的午休时间赶写了一个「补充发言」，将原定的发言稿当场散发。他开门见山地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

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

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接着，周恩来就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所谓颠覆活动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政策。他说：

「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¹「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甚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会议既不要排斥任何人，为甚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旬。」「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44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然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甚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堙幕。」

周恩来指出：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

可以在这里提出来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人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周恩来表示，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最后，周恩来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正是这份一挥而就的演词使两天来的大会达到高潮。周恩来这一入情入理的发言，照顾大局善与人同的和解精神，提出的「求同存异」这一为与会者都可以接受的指导原则，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赞同，大会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从而使会议绕过了暗礁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美国记者鲍大可（八.003^8301610评论道：

周恩来选择了这个时候来发表他在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在长期静观之后在这个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忧解难、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从这一刻开始，究

竟哪一个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也没有疑问了，那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他确实确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9

5关于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声明

会议转入秘密阶段后，各国代表继续辩论前两天提出的问题。

21日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开会的时候，锡兰代表团团

长、总理科特拉瓦拉（亿！！！！^&^~!!^忽然退出会场，单独在他的别墅里临时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公开宣称台湾应该取得独立国地位，他建议把台湾托管四年或五年。他还提出同共产主义无法和平共处，要「解散共产主义团体」的主张。当时，同这位总理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几个国家的代表。亚非会议再次遇到了挑战：是讨论一国内政问题还是互不干涉内政，讨论维护共同利益的问题？是讨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是非长短，还是讨论如何争取和维护独立，捍卫和平，在新兴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加强互助合作的问题？会议处在十字路口。

面临这一挑战，周恩来从容不迫，高屋建瓴，首先在会上简明表示中国不能同意科特拉瓦拉总理的一些言论，但不准备展开争论，并保留下次会上发表意见的权利。体会之后，周恩来就在会场找科特拉瓦拉总理单独进行了长谈，向他介绍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政策主张。这一席诚恳又坦率的交谈减少了疑虑和对立，科特拉瓦拉总理对中国的态度表示理解，同意不在会上展开争论。周恩来还分别向许多国家的代表团长耐心介绍情况，解释问题，阐述中国的政策、立场。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争取了一位又一位国家首脑对中国立场的理解。

23日，在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主持的八国（东道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午宴上，周恩来向大家专门介绍了围绕着台湾局势的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武装干涉造成的。中国政府为了缓和这一紧张局势，愿意问美国政府举行谈判。中国不愿意同美国打仗。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曾经通过印度政府警告美国，如果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扩大，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历史的真相是美国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美国军队咄咄逼人，飞机和炮弹都越过了鸭绿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志愿军才开到朝鲜战场。印度总理尼赫鲁当场证实了这些情节。从而，使有些国家的代表对美国诬蔑「中国好战」的真实背景以及中国既维护主权、又谋求和解，既坚持原则、又重视协商的立场有了新的认识。

就在这次八国会谈时，缅甸等国建议中国公布自己的立场。23日下午，周恩来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声明。声明说：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³⁰ 中国政府总理的这一声明，在万隆、在全世界立刻博得了广泛的同情与赞赏。吴努说：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巴基斯坦总理阿里^{0113111111&八10}说：它在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方面立即产生影响。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说：它使我们有了对于将来的希望。科特拉瓦拉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声明。埃及代表团发言人说：这个声明完全符合亚非会议的目的。菲律宾的罗慕洛和伊拉克的贾马利^(^!。^,& ? .化瓜^)也说：中国的建议是肯定令人感到兴趣的。³¹

²⁹鲍大可（八.00^{^83^610}着，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62。

³⁰《周恩来年谱0949—19760，上卷，页470。

³¹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页26。

4月25日周恩来接见美国《民游衡騷011、周刊记者，说：「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民有权提出这个要求，并实行这个要求。至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那是美国的干涉造成的。」「为了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提议，中国和美国应该坐下来谈，解决这个问题。」³²断中国总理的声明，美国记者鲍大可评论说：「他的这个声明实际上是一个放得很巧妙的试验气球，而不是一个建议。他没有提出甚么具体的东西。他没有说他愿意在哪里坐下来，同谁谈，他又到底愿意谈甚么。

他没有说清楚他心里真正想的是甚么。但是在有二十个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可以被认为是重大和平行动的声明，毫无疑问，万隆的大部分代表确实是这样看他的声明的。」 33

6求同存异的历史性文献

为了使会议取得可能达成的最大限度的协议，中国代表团同与会各国作了最大努力。当时，会上形成两派观点：一派支持中立主义，赞成与共产主义共处；另一派支持集体防御，主张与西方结盟来反对共产主义。当这场带着情绪和感情色彩的辩论展开之后，一些代表悲观地认为，会议已成僵局，大家永远也达不成协议了。尽管中国实际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但周恩来按兵不动，经过长时间观察，4月23日，他再次登台发言。周恩来说：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籲和平，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他申明：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反对针对共产主义的「集体防御」；主张亚非国家「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他建议，为了避免误解，可以使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一词代替「和平共处」一词；五项原则的写法也可以修改，项目可以增减。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议案，一个包括七条内容的「和平宣言」。即：（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三）「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四）「承认种族的平等」；（五）「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六）「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七）「互不损害」。「此外，我们在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申明：「这一个议案的题目叫和平宣言，这是采用了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希望「这个文件能够为我们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接受，因为它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提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

立场」。34周说明，这七条来自各代表团提案中大家都能同意的东西，周还联系每一条谈了中国的邻国关心的一些问题。有一位代表后来说：「他给人人都送了礼，至少每一个邻国都得到一份。」周恩来的发言再次打破僵局，促使争论各方达成了协议。会议最后确定的十项原则，就是在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七项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各与会国代表团团长商定会议最后公报后，24日下午举行了隆重的闭幕会议。在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大会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中写道：

「的确，一切国家都应当有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自由选择它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和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各国应当在消除不信任和恐惧、彼此以信任和善意相待的情况下，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作为和睦的邻邦彼此实行宽容和平相处’并发展友好合作。」

「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不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己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紫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

3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1》’上卷’ 页471。

33 鲍大可：《周恩来在万隆：美纪者鲍大可记亚非会彰， 页62。

3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1〕， 上卷， 页469。

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与经济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

任何其它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与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力。亚非会议宣布它确信按照这些原则的友好合作对于维持和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将会做出有效的贡献，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将有助于促进大家的共同繁荣和福利。」 35

《公幸^》的一致通过表明，即使与会各国代表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和其它分歧，并且还有外来因素造成的种种隔阂和疑惧，但是，只要从亚非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以亚非各国团结反对殖民主义的事业为重，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进行友好协商，他们就能够为维护和平和促进友好合作作出贡献。因此，亚非会议的成功。可以说是求同存异精神的重大胜利。它为世界其它地区探讨解决共同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

在闭幕会议上，各国代表对一致通过的会议公报作了高度评价：

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汗（^! !!^&『\1011&111111^! ;!!!）说，

我们怀着很大的希望来参加这个会议，我很高兴地说，我们怀着更大的希望离开这里。他说：「这种建立在世界一大部分地区合作的基础上的、得到世界大多数人民支持的贡献，无疑地配得上人们认为它具有的历史意义。」

缅甸总理吴努说：「在这个为猜疑和误解所包围的纷争的世界上，在它的任何地区取得些微的谅解，都必须认为是个进步。」「无庸讳言，会议有时陷入看来似乎是僵持的局面，但是，各位卓越的代表所表现的稳健、忍耐、坚韧和熟练的技巧，使我们得以找到脱离这种局面的途径和寻求一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会议正是和平共处的具体表现。」

埃及总理纳赛尔1^31八.^!化^说：「我们的会议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在我们的会议作出的决议中所表现出的团结和和谐将大大有助于国际和平和合作。」「各代表团的忍耐与和解的精神帮助我们的讨论避免分歧而走上友好和建设性的道路。」

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个会议是亚非历史1：的新的一章。」会议主

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闭幕词中说：如果我把我们的联合公报称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的话，这是因为我们可以期望我们的意见不单受到我们两洲的重视，而且还受到全世界的重视。我十分虔诚地希望，当世界其余地区对我们的决议加以适当的注意的时候，他们也将表现我们这次会议所表现的同样令人钦佩的具有善意、容忍、节制和智慧的精神。他最后说：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的进步前途的灯塔。36历时一周，代表半数以上世界人口的亚非会议胜利闭幕。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积极开展会外交往，与各国代表团举行广泛的谅解性会晤。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也是一些与会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担心的问题。中国在海外的华侨2000余万，东南亚国家占多数。有的国家如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华侨占人口相当比重。这些国家受西方国家的挑拨，担心中国会利用华侨搞「颠覆活动」或对他们有领土要求。为了消除误解，4月22日，周恩来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³⁵共同签署了关于华侨双重国籍的条约。其中规定，要求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300万华侨在两年之内决定是要中国国籍还是要印度尼西亚国籍。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双重国籍问题是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问题。」现在，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根据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经过友好谈判，获得了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能在亚非会议期间获得解决，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们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周恩来保证，中国政府「将坚决执行今天签订的条约」。37周恩来同时宣布、准备同其它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协议。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东南亚国家因华侨问题引起的对中国的戒心。缅甸总理吴努说，他深信中国没有领土

35 人民日报，1955年4月25日。

36 各代表发言，参见〈亚非会议情况〉，《新华月报》，1955年第5

号，页25—27。3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468。

野心，中国最大的愿望是求得和平。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说，这在亚非会议与会国之间激发了互相信任的精神。

为了消除人们对中国的误解，周恩来诚心欢迎有关国家代表到中国看看。周恩来对泰国旺亲王说，中国不会侵犯泰国，欢迎泰国派代表团去云南访问，中泰还可像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那样签订条约，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周向菲律宾罗慕洛表示，欢迎菲派代表团到中国沿海各省，特别是福建、广东访问。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总理决定应邀访华，其它一些国家代表也准备访华。

第一次亚非会议，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赋予的使命，为促使会议取得成功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亚非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战后世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亚非会议的成功也标志着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从此，中国不仅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而且也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重要成员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四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

1扩大与亚非众多国家的交往

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成功，更在会后突显了出来。周恩来后来说，万隆会议最主要的精神是反殖民主义，这个精神在亚非各国起了很大的影响。会后一年间，亚非各国反殖民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许多原来由于某种需要而倒向西方阵营的国家选择了不结盟政策，或者减少了对西方的依赖，而增加了外交政策的平衡性和灵活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亚洲国家最响亮的口号，体现在50年代签订

的许多条约和国际政策的声明中。同中国的交往也与日俱增。1955年，到中国访问的有63个国家的约4760人，1956年来访者来自75个国家约5200人。来访者的国度从亚洲扩展到阿拉伯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其中包括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1956年2月）亲王、老挝王国首相富马（化如加，1956年8月）亲王、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丁加，1956年9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1956年9月）、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1956年10月）等政府首脑。又有一批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挪威（1954年10月5日）、南斯拉夫（1955年1月2日）、阿富汗（1955年1月20日）、尼泊尔（1955年8月1日）、埃及（1956年5月30日）、叙利亚（1956年8月1日）、也门（1956年9月24日）等国先后与中国建交。1956年12月至1957年1月，周恩来率团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阿富汗。

这种形势的发展，使美国企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联盟体系的计划遭到了彻底破产。许多亚洲国家公开谴责美国的这种企图，认为建立这种联盟的目的只是为了加剧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缅甸总理吴努说：建立地区性的军事组织「势将增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他宣布，他的政府将不会参加这个军事联盟。柬埔寨王国明确拒绝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宣布坚持和平和中立的政策。印度尼西亚抵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情绪更加强烈，它甚至建议正式成立一个公开表示与中国友好的中立集团。印度总理尼赫鲁也指出，建立军事联盟只会「增加局势紧张和对局势的恐惧」。

本来，美国拼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就名不符实。追随美国加入该组织的只有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三个亚洲国家，而且这三个国家加入该条约组织的目的与美国并不一致。泰国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固然有对中国疑惧的因素，但它对「老挝以东」事态发展的关切同样重要。泰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卷入与己无关的冲突中去。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与其说是因为对国内共产主义的恐惧或害怕哪一个共产党国家，不如说是由于与印度的分歧日益严重，希望在与印度的

冲突中得到支持。菲律宾加入这个组织，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限制美军在该国的活动范围，如何利用联盟体系来镇压国内的游击队，以及反对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威胁。美国希望利用这些国家来包围中国，显然是靠不住的。随着对中国的了解的加深，这些国家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巴基斯坦是第一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又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中国十分重视同巴基斯坦的关系。然而由于巴美结盟，巴的对华政策不能不受美国的影响，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台湾问题上，支持美国的政策，中巴政治关系一度处于低潮。但中国政府并没有把巴视为西方盟国加以指责，而是耐心做工作。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交备忘录，对巴美谈判军事协议和巴将参加军事集团一事表示「异常关切」。1954年2月13日，巴基斯坦驻华使馆照会

中国政府，说明巴没有敌视中国的意图。

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中巴两国总理第一次接触。周恩来当面向阿里总理表明，中国对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以及同美国签订军事协议表示关切和不安。指出，美国不仅要利用巴领土来挑拨巴印关系，也会以巴为基地来包围甚至进攻中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阿里表示，巴基斯坦是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也怀有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他郑重声明，巴基斯坦参加两个条约组织和签订巴美军事协议是为了防御邻国的侵略，并不针对中国。他还庄严保证，如果发生美国的侵略战争，巴决不参加，例如朝鲜战争，巴就没有参加。周恩来随后在万隆会议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了阿里的保证，阿里当场欣然确认。

这次会议的接触，包括争论和坦率交谈，使两国总理建立了信任。5月21日，周恩来在北京对巴驻华大使阿哈默德说：巴基斯坦总理的这个口头保证我们是相信的。巴大使声明，一旦时机成熟，巴希望能摆脱两个条约组织。周恩来说，目前要摆脱它们是困难的，但必须摆脱。

1956年10月，巴基斯坦新任总理苏拉瓦底访华。这是巴政府首脑首次来

访。周恩来同他进行了四次长谈。巴总理再次表示，巴对中国没有恐惧，两国间没有利害关系，希望同中国友好，不怕英美因此生气。周恩来再次提出巴参加两条约组织问题。周说，中国对巴基斯坦没有恐惧，只担心美以巴为基地来威胁中国。周恩来并没有要求巴退出两组织，而是说希望巴能起作用，使巴参加的条约的侵略性质逐步消失。

巴基斯坦与印度长期不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升级，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希望中国表态支持自己。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不偏不倚，劝其妥协和讲和。苏拉瓦底这次访华，再次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周恩来向苏拉瓦底转告毛泽东的意见：我们愿意劝说印巴和好，互相协商，互相妥协。周恩来说，这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有好处，我即将访问印、巴，对双方履行劝和使命，我也许会一事无成，但我不灰心。周恩来还说，我们也希望巴劝美国不要同中国为敌。苏拉瓦底显然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主动承担义务说，一定要劝说美国同你们交换意见。中国对待巴印分歧采取不偏不倚、劝其和好的政策，逐步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理解和赞许。1968年4月，巴美军事协议终止，1972年12月，巴又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1979年3月，巴与土耳其同时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中巴友谊与日俱增，成为「全天候」的朋友，并且成为中美关系解冻的重要牵线搭桥人。

当时除了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南越保大政权外，泰国和菲律宾是对中国最怀敌意的国家，但中国政府采取了多做争取工作的方针，力争改善双边关系。对泰国倾注了更大期望，毕竟泰国是中国的近邻，自古关系密切，在东南亚地区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政府认为，泰国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虽参加了美国策划的军事集团，但也受到美国的压迫。因此，中国的方针是和平共处，求同存异，耐心多做工作。1954年10月和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请他们转告泰方，中国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泰国建立友好关系。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上，周恩来针对泰国代表关于中国云南傣族自治州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的说法，进行了澄清和批驳。会外，周恩来又主动与泰国外长旺亲王接触，向他摆事实讲道理，阐明中国云南傣族自治

州的性质，表示欢迎他访华。

在万隆会议的影响下，泰国朝野对中国的和平共处政策逐渐有了认识，疑虑有所减少。加上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启动，泰国日益转向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同中国达成和解可能是安全的最好形式。同时，泰国追随美国对中国禁运，出口锐减，经济上遇到困难。加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开始解除对中国的禁运，泰工商界要求同中国做生意

的呼声日高。中国本着积极争取、细水长流的方针，主动约束了对泰国的批评，对泰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

1955年下半年，中方同泰总理取得联系，建立了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同泰总理指定的官员之间的接触渠道，并且达成了和平共处、发展贸易、文化交流等四点书面协议。两国总理通过这一渠道传递了相互理解的信息。泰总理表示，泰国政府业已并将逐步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

1955年12月，在泰总理同意下，由国会议员和商人组成的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秘密访华，实地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会见了代表团，阐明了中国的政策。1956年1月，经泰政府批准的由议员、商人和记者组成的泰国人民促进友好代表团公开访华，打开了中泰交往的大门。

菲律宾几乎参与了美国策划的所有反华活动，如参加侵朝「联合国军」，在联合国投票赞成美国诬蔑中国为「侵略者」和对华「禁运」等提案，发表「支持美国协防台湾的声明」，搜查、拘捕和驱逐华侨等。中国对此提出了抗议和给予抨击，同时做菲政府的工作。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与菲律宾的罗慕洛进行了友好接触，尽管在会上双方有过争论。1955年10月23日，周恩来会见访华的偶尼拉纪事报》01/7^!^^记者时，再次表示了对菲人民友好的愿望。对周恩来的谈话，菲总统麦格赛赛(!^!!^!!^!明幼^^)通过发言人强调菲方对改善两国关系要考虑很多因素，特别是菲美关系，菲在外交上不承认「北京政权」，但从1955年起，菲各界每年都派人组团来华访问，中菲民间往来和贸易关系逐步打开。

中国同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关系，也保持着这种低调接触。战后至1956年马来亚和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还被英国划为直属殖民地。两国华人华侨都占相当大的比重。在马来亚占人口1/3，在新加坡占70%以上。美、英利用这个问题挑拨马中关系和新中关系，散布对中国「扩张」的恐惧感。马来亚从1948至1950年发生了大批驱逐、监禁甚至杀害华侨事件。新加坡有人反对华侨取得新加坡公民资格。1950年代，两国逐步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走上独立，但华侨问题依然是障碍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1956年8月下旬至10月，周恩来会见两国贸易考察团时，阐述了中国的对华侨的政策。10月9日，中国公开发表了〈周恩来总理就新加坡中国人的国籍问题对戴维-马歇尔的谈话〉，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愿意看到新加坡的中国人取得新加坡公民资格，完全效忠于他们所在的国家。³⁸这个谈话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引起良好反响。两国华侨观念也逐步转化，自愿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人逐步增多。新加坡、马来亚为解除对中国的「禁运」作了积极努力，中马、中新之间的经贸往来逐日增多。

2 中日关系由民间突破

这个时期，由于美国的影响，中国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还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中国也积极以各种形式进行往来，其中以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联系和友好往来的历史。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新中国成立时，日本正处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日本某些领导人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1951年9月，美日双方在旧金山签订〈汉日安全条约〉；1952年4月，日本又同台湾当局缔结所谓「和平条约」，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政府的这些行为理所

38马歇尔(!)3“^!^!!^~), 新加坡劳工阵线主席, 前首相。1956年10月9日, 周恩来接见马歇尔时, 向他阐明了中国关于新加坡中国人国籍问题的四点政策: 一、中国政府愿意看到新加坡的中国人取得他们自愿取得的新加坡的公民资格, 完全效忠于他们所在的国家。中国政府相信, 这将有助于促进他们本身的利益, 有助于新加坡的稳定和安宁, 有助于中国同新加坡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二、任何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 只要他们自愿地取得新加坡公民资格, 就不再具有中国公民的资格, 当然, 他们所固有的种族联系和文化联系仍然继续存在。三、任何取得新加坡公民资格的中国人,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在根据新加坡法律放弃新加坡的公民资格以后, 取得中国公民的资格。四-任何具有中国公民资格的偶民应当尊重当地政府的法令, 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 但是他们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尊重而不被歧视。(周恩来年谱《1949—19760, 上卷, 页625。

当然地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存在着严重障碍的情况下, 中国领导人高瞻远, 认为改善中日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 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坚持把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指示, 对日关系要「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在两国官方关系一时难有进展的情况下, 决定通过「民间外交」, 使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在两国无邦交的情况下, 在各个领域逐步加强友好往来, 并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创造条件。为推进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 中国方面采取了主动步骤, 并获得日本政界、经济界、文化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响应和日本广大人民的支持。1952年2月24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南汉宸致函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 表示愿在4月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期间, 与日本代表磋商。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立即表示同意, 派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三位代表出席, 这三人有着日本参、众两院议员的身份。他们冲破日本政府不准进入「共产圈」的障碍, 分别绕道巴黎、丹麦到达莫斯科, 后又应南汉宸之邀于5月15日由莫斯科来到北京, 一时被誉为「三勇士」。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中国的日本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因而在北京受到特别的接待和欢迎。6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随后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筹备会议」，并到各地参观。消息传到日本，得到日本国民的普遍支持，三议员7月回国时，在东京羽田机场所受到的欢迎，像是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士。尽管后来他们以违反签证法而被问罪，但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由此打开了。这年10月，又有十四名日本各界代表绕道欧洲，辗转到达北京，参加「亚太地区和平会议」。

协助在华日侨归国和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也是这个时期中国政府为加强中日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而采取的另一重大步骤。日本侵华战争失败后，数万名日侨滞留中国。到1952年底，回国者仅500余人，在华日侨仍有3万余人。1952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一项计划，协助日侨归国，并组成了中央日侨事务委员会。12月1日，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了中国政府保护守法日侨和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回国的一贯立场，表示欢迎日方相当机关派人来与中国红十字会协商。中国的声明在日本朝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日侨家属及各界人士纷纷致函毛泽东和中国政府表示深切感谢。吉田政府不得不表示将采取「积极措施」，决定委托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三团体组团赴华。

1953年1月31日，以岛津忠承为团长，平野义太郎、高良富为副团长的日本三团体代表团抵达北京，与中国红十字会（廖承志为首席代表）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从3月23日开始，到最后一批日侨离华，总计有32000多名日侨分期回到日本。同时，应中方要求，日本陆续把愿回国的数千名旅日华侨送回中国，并把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抓去的中国劳工在日死难者的遗骨送回。这两件事以民间形式得到解决，对两国人民的感情是很大的安慰。

在中国协助日侨回国期间，朝鲜实现停战，东北亚局势走向缓和，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同中国开展贸易。日本政界和经济界要求吉田政府实行自主政策，发展日中贸易呼声强烈，主张封锁中国的势力被迫后退。日本

政府不得不逐步放宽对华出口限制。7月2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翌日’参议院也通过类似决议。9月30日，以池田正之辅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10月29日，与中国贸易促进会签订了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

1954年8月，中国政府宣布特赦日本战犯417人。新中国国庆五周年之际’由日本自民党、社会党等各党派人士组成的40多人议员团和以安培能成为首的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等应邀访华，参加中国国庆庆典。10月11日周恩来在接见来访者时，表示中日两国应该迅速实行邦交正常化。建议与「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日本」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10月12日，中国政府在同苏联代表团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准备采取同日本关系正常化的步骤。并表示，如日本政府也抱有积极态度，那么，它在争取和平和独立发展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将会得到中苏的「全面支持」。

1954年10月底，以李德全、廖承志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冲破美日政府的阻挠，应日本赤十字社的邀请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

第一次进入日本的大型中国代表团。按照周恩来行前的指示，代表团在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中，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念旧恶，希望与日本人民和平共处，长期友好，共同防止战争再起的心愿。代表团所到之处，反应热烈。从此’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从经济交往扩大到政治交往，日本各党派和各界友好人士陆，陆续来访，来访人数逐年增加。日本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与中国人员来往最多的国家。

1954年12月7日，日本首相吉田茂辞職，鳩山一郎就任新首相。鳩山一郎对改善日中关系较为热心，表示愿意制订新的对华政策，包括使日本向中苏开放。12月21日，周恩来表示准备采取适当的步骤恢复官方关系，如果日本政府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的话。

1955年3月，中国派出贸促会副主席雷任民率团赴日，与日本贸促会签订了第三次民间贸易协议。4月，又在北京签署了第一次民间渔业协议。4月，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同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等人

会见，高崎是日本企划厅长官，这次会晤带有官方性质，双方都表示今后要积极发展关系。此后，中方采取了一个具体的步骤。8月17日，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奉命通过秘密通信的方式向日方驻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一提议，为了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认为两国政府有必要就两国贸易、海外侨民地位及其它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中国政府欢迎日本政府派团来京。同一天，周恩来在会见日本人士时表示，中国不认为旧金山对日条约是签订中日和约的一个障碍，发出了一个明显的和解信息。11月4日，沈平奉命再次致信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重申了8月17日中国政府的建议。

毛泽东本人也亲自关注中日关系的进展，多次会见来访者。1955年10月2日和14日，毛泽东两次会见来访的久原房之助（此人为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10月15日，毛泽东又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会见以上林山荣吉为首的日本议员代表团，毛泽东同他们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友好谈话。指出：战后国际形势变了，中日两国的地位变了，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对日本人民为摆脱占领和争取独立的努力，是衷心同情的。对目前日本的处境表示「谅解」，并说我们根本不责备你们没有与我们建立国交。中国愿看到日本力量强大起来，把美国的手顶走。此前，毛泽东曾多次讲过不相信日本这样一个民族会长期受制于美国，因而寄希望并推动日本的独立斗争。11月，由日本原首相片山哲和日本「总评」主席藤田藤太郎等率领的日本护法联合会和日本工会代表团的访华，受到了隆重而热情的接待。11月14日和15日，周恩来与片山哲举行了会谈；16日毛泽东的会见，使片山哲的这次访问达到高潮。陪同会见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彭真等中国几乎所有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同片山哲就维护和平、反对战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见后，片山哲在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动情地说：毛泽东爱好和平的谈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就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代表团成员远藤三郎中将率日本旧军人代表团来访。后来，远藤三郎冲破重重阻力，率十四名前日本高中级军官，于1956年8月来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的接见。这些人来访前虽有某种

悔罪之意，但心怀疑竇，来华之后，亲身感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宏气度，深为感动，不少人后来成了日中友好运动的中坚分子。

对于中国政府的明确呼籲，日本政府反应谨慎。对鳩山一郎来说，发展经贸和文化关系是一回事，发展官方政治关系则是另一回事。要采取一项大胆和主动的行动，来恢复日中邦交，是一件冒风险的事。一方面，冷战对峙，美国的反对如此强烈；另一方面，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由此引起的分歧和争论将使他难于应对。因此，对于沈平的几次信函，日本政府未予作答。1956年2月3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众议院外委会被质询时，他竟说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接到中国政府要求复交的正式建议，并说，恢复两国官方关系，条件还不成熟。

为了澄清事实，中国外交部于2月11日发表了中国政府的正式建议，并公布了自1955年7月至11月间，两国政府全部来往信件。3月29日，鳩山一郎首相在众议院回答质询时，表示必须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如果周恩来总理愿意举行谈判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加以拒绝。对此，中方表示欢迎。4月18日，周恩来致函鳩山首相，正式邀请他访华。

此后，中国政府又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友好举措：从快宽大处理在押的日本战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颁布命令，公布了全国人

大〈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決定〉：「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6月，中国政府宣布，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于起诉，分批释放回国；只对45名重大战犯从宽判处有期徒刑，在服刑期间，准其家属来中国探视。中国宽大战犯之举，在日本深得人心，许多释放归国的战犯，后来都在「日中不再战」的口号下，积极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

随着中日民间往来的扩大，1950年代中期，日中友好在日本已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国民运动。日本公众舆论日益转向支持同中国发展关系。根据1957年4月3日公布的由政府组织的全国民意调查表明，日本国民中63.77.的人支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36.47.的人要求日本政府恢复与北京的官方关系，只有2.17.的人反对同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最值得

一说的是，在日本应同哪国保持特殊关系的问题上，赞同中国的有367。，与赞同美国的人旗鼓相当。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日益需要取得中国大陆的广阔市场。日本来访者也不断增加，1955年为800人，1957年底达到1600人。

从1953到1955年签订的三次民间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也逐步有了进展：第一次协议只完成57。；第二次协议完成38.87。；第三次协议由于规定双方互设民间商务代表机构，实现了民间协议，官方挂钩，结果完成了协议额的677。，比前两个协议前进了一大步。两国间的贸易额从1955年的3400万美元，增加到1956年的1.5亿美元。在广大日本人士的推动下，日本众议院于1956年12月12日，通过了一项促进中日贸易的决议，缓和对华「禁运」，互设通商代表部。促进日本贸易的国会议员同盟、日中贸易协会等一些团体组织，形成了强有力的压力集团。尽管中日建交还有待时日，但日本政府对日益增长的中日友好交往的情势，再也不能忽视。

3谋求同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

西方国家关系的建立，受到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制约，在一个时期内，双方分处不同的阵4，相互敌对。然而，这并不等于中国领导人排除了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兴趣和可能。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他认为，在美苏之间，横隔着一个由欧'亚、非许多国家组成的中间地带，美国在征服这些国家之前，是不可能进攻苏联的。这里的「中间地带」概念，包括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事实上预见到美欧之间可能出现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这正是中国实行区别政策的依据。

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把冷戰推向白热化。西方许多国家追随美国加入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尽管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依然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会是「铁板一块」。1952年4月30日，还在朝战僵持之时，周恩来就指出：「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他正确地估计到，

一些国家可以加入侵朝战争，但是否会参加对中国作战是很值得怀疑的。他说：「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³⁹充分地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分歧和矛盾，集中地孤立和削弱美国的力量，破坏它的战争计划，这是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国内统一战线策略在国际上的运用。中国领导人认为，西方国家存在主战派和维持现状派之分，美国是主战派，但从朝鲜战争看，它处在「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矛盾之中；英、法等国是维持现状派，它们要争取和平，就要同美国闹别扭。西方国家要恢复经济就要找市场，同中国发展贸易。周恩来在1954年8月12日指出：「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即和平和贸易⁴⁰引者注），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⁴¹

在寻求同西方国家结成某种统一战线的考虑中，中国首先重视的是英国。这是因为英国在对华政策上已经表现出某种独立性。英国小一顾美国的阻挠，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谈判在1950年就已

毛泽东所理解的西方国家，不完全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指的是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那些国家。中国同

3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良236。4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407。

经开始。但它在台湾问题上「脚踏两只船」。朝鲜战争爆发后，它又加入「联合国」军和对华禁运。中英建交谈判因此陷于停顿。英国有一个杜维廉⁴²（⁴³丁化化⁴⁴）常驻北京，英国把他视为临时代办，中国

只承认他是谈判代表。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与英、法两国在结束印度支那危机问题上的分歧，首次暴露在中国人及苏联人面前，周恩来从中看到了解

决印度支那危机的可能性，于是，进行穿梭外交，推动各方达成了有关协议。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之间富有成效的协商，还使周恩来看到，争取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是可能的。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英、法两国领导人都向周恩来表示过改善关系的意向，英国尤为积极。4月30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邀请周恩来总理与英国外相艾登会面。周恩来与艾登谈及中英关系。艾登说：英国是承认中国的，只是中国不承认我们。周恩来说：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我们。艾登说：我这次把在华代办杜维廉带来，为的是与中国代表团接触。周恩来说：我也把欧非司司长宦乡带来了。看来，双方都有备而来。5月3日，宦乡与杜维廉进行了交谈。6月1日，艾登宴请周恩来，表示双方应该努力进一步改进中英关系。他说：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的，你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维廉来？周恩来当即欣然表示同意，将像英国派谈判代表到北京那样，中国也将派谈判代表去伦敦。41双方商定互设谈判代表办事处。1954年6月17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中国将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相同。7月和9月，两国互派临时代办，英国驻北京代办仍为杜维廉，中国驻伦敦代办为宦乡。两国互派代办，使中英关系向前迈进了一步，它不仅使中英之间原来的「半截子」关系变成了对等关系，而且扩大了代办的权限，其任务除建交谈判外，还包括处理侨务和商务问题，代办享有完全的外交待遇。

互换代办，这是中国建交史上的一个创造。它实质上是一种「半建交状况」，因为英国在承认中国问题上只做了一半。宦乡被派驻伦敦，毕竟使中国在西方国家首都有了一个官方代表，这是一个不小的突破。不过，当时虽然估计到中英正式建交的困难，但并不想使这种代办关系长久「临时」下去，而是希望由此推动英国再跨出一步，正式建交。

英国国内的对华舆论也明显转缓，与美国有所不同。1953年底，英国反对党工党中央执委通过一个决议，要求来华访问。1954年5月，中国以外交学会的名义发出邀请，工党立即接受邀请，决定组成以前首相艾德

礼¹⁶⁰¹⁶⁰¹八【11化）为首的代表團来访。工党虽是反对党，但它组团访华是得到英国外交部支持的。英方接受邀请如此干脆和迅速，甚至不愿顾及美国人不满意，说明改善中英关系是双方的要求，英国更是采取了主动。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次来访很重视，不仅希望由此推进中英关系，而且把它看做打开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一次努力。工党代表团来华前夕，周恩来于1954年8月12日专门为接待之事讲了一次话，确定在双方会谈中应持「求同存异」态度，以「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周恩来甚至期望：「我们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将首先从英国开始。这说明，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8月15日至25日，艾德礼率团访华期间，中方给予了较高的礼遇。毛泽东主席于24日接见了艾德礼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一次友好的长谈。毛泽东重申了他关于「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美国是在拿反共做文章，其目的是要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他说，中英双方都要和平，不愿打仗，都要建设自己的国家，因此也要做生意。这些共同的要求是双方可以合作的基本条件。毛泽东还提出，让中、苏、英、法等国倡议搞一个集体和平公约，希望英国多做美国的工作，让美国也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周恩来在同艾德礼会谈时表示：中国愿意促进

41 《周恩来年谱0949—19761》，上卷，页364、374。

中英之间的和平合作，只要英国在联合国投票赞成驱逐国民党集团，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英就可以互换大使。

然而，在中美尖锐对抗的形势下，英国人始终不愿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尽管它可以同美国闹点别扭，但不会走得太远。当时设想从英国开始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的条件还不成熟。不过，在和平与贸易这两点上同西方国家建立某种统一战线关系，还是有所进展。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已与瑞典、丹麦、瑞士、芬兰、挪威五国建交的基础上，与英国、

还有荷兰〔1954年11月9日〕建立了代办级半外交关系。在其它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多个欧洲国家中，中国也与其中一些国家进行了接触。1950年代中期以后，有些欧洲国家虽然受到美国的压力，没有承认中国，但也开始试探同中国建立某种关系，主要是贸易关系。对此，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如谈建交，则坚持中国既定的建交原则进行谈判；如〔西德〕建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则可先同这些国家开展民间往来和半官方接触，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贸易和文化先行，以民促官，逐步推动双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本着这样的灵活方针，中国同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联邦德国等国进行了有益的接触。双方在人员往来及贸易和文化交流上打开了一扇大门，打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完全隔绝的局面，也使美国对中国实行的禁运和孤立政策受到很大冲击。

4同苏联东欧各国关系的发展

1950年代上半期，是中苏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和日趋密切的时期。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严峻形势下，中苏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当时，中苏同盟对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起了重大作用。共同的斗争增加了中苏之间的信任感，特别是在中国决定抗美援朝后，斯大林消除了对中国走「民族主义道路」的疑虑。在这一背景下，苏联开始【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对于苏联系统的巨大援助，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一向十分感谢，并力所能及地作出回报。为了向苏联购买建设物资并偿还苏联贷款的本息、中国除用黄金和国际硬通货支付外，还向苏联出口了它所十分需要的许多矿产品和农产品。其中许多矿产品是苏联通过其它途径很难得到的重要的战略原料，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所必不可少的。可见，当时中苏经济合作基本是互利的。为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和同盟关系，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还对中苏之间存在的问题作了处理，纠正了

苏联对待中国的一些不平等做法。1952年秋，周恩来访苏期间，双方通过会谈决定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无偿地移交中国。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国内经历了一场权力斗争之后，赫鲁晓夫取得了主要领导人地位。在这期间，苏联的内外政策都出现「解冻」迹象，中苏关系格局也发生了改变。赫鲁晓夫深感无论是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抑或巩固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控制，都需要得到中国党和毛泽东的支持。因此，他上台后调整了对华政策，比较注意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中国，并积极推动中苏合作。1954年初，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回国，途中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会见了赫鲁晓夫，提出加快大规模援建项目的请求，表示在邀请苏联及各国领导人参加新中国建国五周年庆典之时，中苏签署经济协议和把旅顺港移交给中国的协议，具有特殊政治意义。赫鲁晓夫当场表示，苏联方面将履行它的义务。

随后，赫鲁晓夫开始亲自处理同中国的经济关系，着手重新审理每一个援华工程项目，他对于苏共领导层有人提出实施这些项目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本国造成的不良后果的种种论据，逐一解释，努力使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明白，目前正处于苏中最高级重要会晤的前夕，这次会晤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及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那才能够巩固两国的联盟与友谊，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其它领域的进一步密切合作。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团启程访华之前，又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苏中协议的最后文本及其它与此有关的文件。他在会上强调指出，如果苏中两国

间的友谊不是建筑在实事求是、互相需要和彼此负责的基础上，那么任何国家之间的条约都不能长久。「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五周年之际，请求我们帮助克服其几百年落后状态这一重要时期，不帮助中国在未来的五年内实现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根本大计，那我们就将错过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时期。」面对一些反对意见，赫鲁晓夫不作让步，坚决使主席团成员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最终统一了

苏共领导层的思想。45

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他带来了一个发展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的庞大计划。在此期间，中苏正式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包括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再增建15个工业企业并扩大原有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苏联追加提供总价值为4亿多卢布的设备；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署了关于合作建设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和从西宁到乌兰巴托并连接苏联的铁路的协议。赫鲁晓夫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协议，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将该基地归还中国，并将其中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原来建立的四个中苏合资公司（新疆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采掘公司、新疆石油开采冶炼公司、大连船舶修造公司、民航运营公司）的苏方股份移交给中国。此外，赫鲁晓夫上台后，乃至访华期间，苏联再未援引1950年2月的秘密〈补充协议〉向中国提出东北和新疆两个势力范围的要求。

赫鲁晓夫的对华新政策使毛泽东感到了过去没有过的平等气氛。不仅因为赫鲁晓夫所作的许多实质性让步，使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曾使毛泽东感到屈辱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而且，赫鲁晓夫专为对华援助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华，这本身就表现出一种平等姿态和诚意，说明苏联新领导视中国为平等伙伴。而赫鲁晓夫在对华援助方面带来的一份礼物，对于正在仿效苏联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展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中国，无疑是一个重大支持。

中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苏联领导人的这次来访，欢迎的场面热烈，接待规格超常。中国的党政重要领导人都参加了中苏会谈，气氛热烈而轻松。赫鲁晓夫还率团到华中、华东、华南各大城市参观访问，归国途中又参观了东北的一些城市，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洋溢着兄弟般友谊气氛。中国人视苏联为老大哥，中苏关系真正进入了「蜜月」时期。毛泽东后来说：「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他取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461954年10月11日，毛泽

东致函周恩来，提到在中苏签署的有关文件发表时，「要写社论一篇」，以示重视。两个星期后，毛泽东偕中央其它领导人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作长篇致词，称赞中苏「情同手足的友谊」。

1956年5月，苏联正式照会中国政府，认为1950年2月的秘密〈补充协议〉已不符合苏中之间的友好现状，建议加以废除。中国随即覆照表示同意。

1950年代初期，在中苏非贸易支付中，由于清算办法不合理，中方吃亏很大。1956年7月，经过谈判，苏方同意加以纠正，并将过去多收的款项退还给中国。随着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两国贸易额也有很大增长。从1950到1957年，中苏年贸易额从14亿卢布上升为54亿卢布，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的比重增至50%多。

应该说，赫鲁晓夫当政初期继续执行了斯大林对中国友好的政策，使中苏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当然、即使在这时，双方领导人也并非没有分歧和猜疑，成为后来分裂的潜在种子。

这个时期，中国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有重大发展。其中‘中国同南斯拉夫党的关系的恢复和国家关系的建立具有突出意义。

1953年6月，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外交关系，打开了苏南关系的僵局，这成为当时震动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1954年7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向周恩来解释苏联采取的主动改善苏南关系的政策时，承认苏联过去对兄弟党的某些做法不对，并在苏南两党关系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他征询周恩来对此事的意见，周恩来表示，苏联这样做是正确的。是年秋，苏共中央又派专人来华，直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通

45详见本害第六章注10。

46转引自麟冬连：《伍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86。

报他们准备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希望中国采取一致行动。泽东与周恩来商议后，同意了苏方的意见。当初南斯拉夫宣布承认新中国之时，中国政府碍于苏南关系的恶化，未与南建交，但也未断然拒绝，留有余地。1955年1月11日，中南双方发表了建交公报，中南关系随苏南关系的解冻而得到发展。

五第一次台海风波和中美大使级会谈

1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朝鲜停战和印支停火使亚洲地区的形势得到缓和。不过，中国同美国对峙的局面并没有改变。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他把结束朝鲜战争作为其任内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却并不打算因此缓和同中国的关系。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美国在远东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中国与苏联紧密结盟，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在不直接实行干涉的条件下，增加对中国的压力，等待时机，或是促使中苏分裂，或是直接颠覆中国政府。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决心继续采取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继续阻止中国统一台湾。在美国的战略防御链条中，台湾被视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因而长期把它的第七舰队横在台湾海峡，并且企图把台湾从中国领土中分离出去。反对美国侵占和分离台湾，是1950年代中国外交斗争的焦点之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94年以后，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五十年。1945年8月，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了中国。1949年5月26日，蒋介石政府在大陆溃败后，退守台湾，从而形成了台湾与大陆分割与对峙的局面。这迫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进攻台湾的计划。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条件，如有空军，「把握更大」。7月中旬，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向斯大林

说明了准备在1950年进攻台湾的设想，要求向苏联购买200架左右的面、1请代训飞行员。斯大林爽快地答应。8月18日中苏草签了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刘少奇还向斯大林试探性地提出请苏联出动空军和海军援助攻台的课题，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难以承诺，说这样做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从而引发关苏之间的战争。

1949年10月下旬和11月初，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夺取福建沿海金门岛和浙江沿海登步岛的战斗，两次战斗均遭重挫，尤其金门之战失利，充分暴露了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技术手段的缺乏。这使毛泽东再次考虑请求苏联海空军援助问题。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向斯大林委婉地提出，请苏联「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斯大林虽未一口拒绝，但面有难色。他的疑虑不在蒋介石残部，而在美国的干涉。正当中国政府紧张筹划进攻台湾战役之时，美国政府内部正在加紧策划分离台湾。1948年秋，美国酝酿从中国大陆「脱身」的同时，开始把台湾分开来考虑。1949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批准一项对台政策，规定其政策目标是「不让台、澎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要将「该岛屿与中国大陆隔开」。在此后的一年中，美国对台政策目标一直不变，只不过在策略上有过变化。美国曾一度想甩开蒋介石，在岛内扶植其它亲美势力如吴国桢、孙立人等，但未能如愿。美国也曾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使台湾「自决」或由「联合国托管」，也遭失败，最后不得不回到「有条件支蒋」的老路。同时与蒋介石保持一定距离，发表声明：「美国无意承诺以任何武装力量保卫该岛。」

、此时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不愿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一方面也不愿关死与中国政府交往的大门。1949年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处于中共控制之下」。杜鲁门决定，准备放弃台湾，接受中共可能接管台湾的现实。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正式就台湾问题公开发表声明，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决定，表示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争。同时，国

务卿艾奇逊(!) ^!!。八(: ^ ^!!) 答记者问, 阐释杜鲁门声明。1月12日,

艾奇逊发表讲话, 把台湾划在美国远东防线之外。

杜、艾声明有双重考虑, 一方面为接受中共即将夺取台湾的现实作舆论准备, 以便在国内政治中免受攻击, 一方面在毛泽东访苏期间, 再作姿态, 企图拉住中共不要过于倒向苏联一边。

杜鲁门的声明和艾奇逊的讲话, 不可能达到分裂中苏的目的, 反倒使斯大林稍稍减轻了对美国的担心。他终于同意毛泽东就癡当时机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 同意将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 一半用于购买进攻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 但他最后仍尽量避免承诺利用苏联飞机和军舰来进攻台湾。1950年上半年, 中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苏联人的帮助下, 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和海军迅

速地组建, 攻台战役正引而待发。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处于一片惊恐之中。然而, 自1950年2月以后, 形势起了变化。杜鲁门关于准备放弃台湾的决定, 受到来自军方、国会以及国务院内部一些人的反对。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 使艾奇逊分裂中苏的目标受挫; 中国政府接管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房产, 挤走最后一批美国驻华人员, 使美国以停止支蒋换取保留在华据点的企图成为泡影; 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 ^(: &"! ^"!!!) 的兴起促使杜鲁门政府转向更加强硬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美中央情报局作出新的估计, 认为中共攻台可能拖到下一年, 在此期间, 如美大力扶蒋顶住, 有希望从长部署抵制中共的方略, 武装「保台」的主张逐渐占据上风。麦克阿瑟(! ^叫^ \1" 八吡化) 在5—6月两次提出备忘录, 称台湾如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 其位置对于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台狩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被抬高了。5月间' 杜勒斯提出台湾中立化方案, 其中包括美国派第七舰队驻扎台湾水域、防止海峡双方动武。此时' 美国武装干涉台湾的政策呼之欲出, 只待找一个借口。

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27日杜鲁门趁机宣布派遣第七睦队侵入台湾海峡, 并且自食其言, 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

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由联合国考虑」，俨然以台湾的占领者自居。杜鲁门宣布出兵台湾，这对于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政府，无异于一根救命稻草。6月28日，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欢迎美国「协防」台湾。

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后，又以各种「顾问团」、「考察团」名义，派出武装人员进驻台湾。7月30日，麦克阿瑟飞往台湾，同蒋介石达成秘密协议，设立「美国驻台军事联络组」，美台海陆空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8月4日，美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

美国侵占台湾，使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计划遇到了新的更大的障碍。6月3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8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指示：台湾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这时，中共中央的战略考虑是，估计美国可能在台湾海峡、越南和朝鲜三个方面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就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技术条件而言，选择朝鲜战场对中国最为有利。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之后，进攻台湾的战役计划无限期地推迟了。然而’台湾问题也由此国际化、复杂化了，不只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较量，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较量了。

抗美援朝战争三年间，中国不可能用更多的力量来处理台湾问题，主要通过外交途径谴责美国对台海的侵占。尽管当时中国在联合

国的合法席位没有得到恢复，仍然取得把中，控诉美国侵略案列入联合国议程，并且派遣了伍修权为中国政府代表，赴纽约联合国总部。1950年11月28日，伍修权利用联合国讲坛，严正驳斥了美国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和「台湾中立化」的方案，谴责美国侵占中国领土。这场历时三十天的外交斗争，使更多的国家了解了中国政府维护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更多的人关注台湾问题。

1953年朝鲜停战后，台湾问题再次突出地提到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解放台湾和东南沿海岛屿，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未竟事业，尤其是中国真正实现独立和统一的最终标志。虽然由于国内国际形势所限，尤其是美军横在台湾海峡，在军事上实行大规模渡海作战条件还不具备，但是在政治上如果不及时地提出这个问题，默认两岸分割局面的固定化，将对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极为不利。

日内瓦会议后，亚洲地区的三个热点有两个相对稳定下来。朝鲜和平问题虽然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局势已经「冻结」；印度支那危机由于日内瓦会议的成功，短期内大大减少了重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惟独台湾问题依然存在。如果中国不在近期内有所作为，世界舆论将会淡化台湾问题，把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把美军在台湾海峡的存在看成既成事实。这是中国领导人担心的局面。

中国更为担心的是美国的行动和用心。美军以策应朝鲜战争为借口侵入台湾海峡。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军不仅无撤退之意，而且加紧了在台湾的活动。从1953年底开始，美国军政要员相继访台：1953年11月，副总统尼克松（！^；！^3^！.^^。！！）；1954年3月，国务卿杜勒斯；同年5月，国防部长威尔逊（(^3!""]^^XV；15010；5月和6月，美国将军范佛里特（“泛”^^1? 1660。同时，新闻界开始传说，华盛顿正在认真考虑与台湾缔结共同防务条约问题。中国认为，美蒋防务条约一旦缔结，将为美国阻止中国解放台湾提供借口，甚至导致台湾从中国永久分离出去的结局。

1954年7月，中共中央研究了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作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毛泽东给正在日内瓦的周恩来发去电函，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是不妥当的。如果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解放台湾的宣传立即突出起来。7)1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8)11日，朱德在建军节讲话中强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8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郑重宣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

决不容许他国干涉。」同日，中国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和解放军为完成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8月22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发表宣言，拥护中国政府的决定。解放台湾的政治和宣传攻势拉开了帷幕。除了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外，这场攻势的直接目的是为，阻止X蒋签约。为达此目的，中国还发动了对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的军事攻势，以表示为捍卫领土主权不惜一战的决心。9月3和10日、先后开始炮击金门和马祖。10月10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控诉美国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同时声明：中国决定解放一江山、大陈岛等沿海岛屿。然而，中国的反对并没有阻止美蒋签约。美国政府决定「冒一定风险采取强硬路线」（杜勒斯语）。朝鲜战场上中突之间的兵戎相见及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疯狂，使美国政府对华采取了更加敌视和僵硬的政策，此时正在西太平洋地区谋求一系列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双边和多边条约体系，在美国的弧形战略防御图中，台湾被视为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关于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还举棋不定。美国一方面要继续控制台澎，阻挠中国统一；一方面又担心被国民党拉下水，卷入一场它想避免的与中国大陆的直接冲突。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保持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到1954年8月下旬，美国的态度有所变化。面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攻势，美国则以武力相威胁。8月3日，杜勒斯叫嚷美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8月17日，艾森豪威尔宣布第七舰队要干涉中国解放台湾。8月19日，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斯图普（！^^！!!!^）率军舰6艘驶入大陈岛一带海面，并出动600多架次飞机在大陈岛海面上空活动。同时，加快了与蒋介石签约的磋商。12月2日，美国国务卿在台湾签订了〈台澎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在这项条约中得到了美国协防台澎的承诺，但也作了两大让步：其一是条约的适用范围限于台^与澎湖，其含义是不包括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其二是蒋介石使用武力必须与美国人「共同协议」。蒋介石失去独立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美国则通过条约加强了对台湾及国民党政权的控制。

为反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国采取外交斗争与军事斗争相配合的

方针。12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揭露这项条约「是一个露骨的侵略条约」。在军事上，发动收复沿海岛屿的战役，消除蒋介石从事间谍和骚扰活动的沿海据点，并藉以表明中国不承认美蒋条约和解放台湾的决心。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收复大陈岛的门户一江山岛，迫使美国撤走它的舰队。美蒋一片惊恐，西方称之为台湾海峡危机。1月25日和28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紧急决议，即所谓〈福摩萨决议案〉，授权艾森豪威尔「使用武装部队协防台澎」，对国民党所占大陆沿海的岛屿，美国总统则有处理的机动权。美第七舰队主力向台湾海峡和浙东海面集结。

美国剑拔弩张，似有与中国再次正面交锋之势。其实，美国并不愿为帮助蒋介石固守沿海岛屿而陷入与中国的冲突。就在解放军收复一江山岛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急切呼籲通过联合国斡旋「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他还利用一些国家害怕战争的心理，鼓吹「停火」。英国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避免可能引起全面敌对行为的任何事件」。新西兰1月28日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和干涉中国沿海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1月31日，安理会决定讨论新西兰提案，并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

解放沿海岛屿是中国的内战，中国政府决不允许他国及国际社会干预。如果把国共之间的较量国际化，正好中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2月3日，周恩来电告安理会，拒绝派代表参加对新西兰建议的讨论。2月6日和8日，周恩来两次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一切努力都不能容许落入两个中国的圈套。如果要举行国际会议，美国就要直接出面同中国谈，决不允许蒋介石参加任何国际会议。2月5日和9日，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两次向周恩来转达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口信，说新西兰建议，只是一个开端，目前超越新西兰提案不可能，劝中方勿排除在联合国赞助下处理问题。周恩来当即予以驳斥，重申了他在答复印度大使时表示的立场。中国政府要求讨论的问题是，由于美国的介入造成的台湾海峡及

远东的紧张局势，而不是属于中国内政的国共争端。2月14日，周恩来在苏联代办举行的晚宴上指出，争取和平，和缓国际紧张局势是中国的坚定不移的外交政策，但是，割裂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干涉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政和侵犯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只能助长侵略和导致战争，是不能带来和平的。52

美国的军事讹诈和外交图谋均遭失败。2月5日，不得不宣布：协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2月12日，人民解放军在大陈岛登陆，2月下旬，浙江沿海岛屿全部收复。

此时，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关于沿海岛屿的分歧更加明朗化。杜勒斯等人关于两个中国的想法已经酝酿成形。2月间，杜勒斯在同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的会谈中，坚持说存在着两个中国，正如同存在着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两个越南一样。3月，杜勒斯跑到台湾告诉蒋介石，美国把台湾同中国大陆之间的冲突看成是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4月24日，美国又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福德（八〇一化一. 11^&&）和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到台北，试图劝说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想把美国栓在金门、马祖，由金门、马祖之战引发中美之战，遂其反攻大陆之梦想；同时担心一旦失去金门、马祖，会引来国际托管台湾的更大压力。由于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蒋介石当局的态度，美国没有公开宣布其「两个中国」的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准备另寻「停火」办法。

2打开中美接鲤之门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政府一方面针锋相对地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又多次表示，愿与美国缓和关系，并为此做出努力。

中美接触的大门，是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打开的。美国敌视中国的僵硬态度，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规定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不论谁都不准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这条纪律中可

52 《周恩来年谱1949—1956》，上卷，页447—449。

想而知。但是，美国也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即美国的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还关押在中国。美国公众舆论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认为这些在押人员的命运受到了美国政府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摆布，他们将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美国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美国统治集团内也有人对其政府敌视中国的僵硬态度不满。日内瓦会议初期，在杜勒斯未抵日内瓦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宴请美国代表团。在私下谈话时，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副国务卿史密斯流露出一种批评美国政府的看法，他觉得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莫洛托夫及时地向周恩来通报了这一情况，并说，史密斯在二次大战中是美国在欧洲作战的将军，很有地位，他的这种观点，值得重视。5月3日杜勒斯返回美国后，史密斯为美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快要结束前，史密斯有一天在酒吧间端着酒，主动找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中国代表团很重视史密斯这一举动。周恩来：「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第二天会间休息时，周恩来在酒吧间向史密斯走去，并要向他伸出手时，史密斯左手拿着雪茄，右手急忙端起咖啡，表示无法握手，他笑容可掬地和周恩来打招呼，从中国的古老文明到中国瓷器，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又讲了一些好话。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周恩来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周恩来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周恩来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咪咪地走开了。这样，史密斯既遵守了杜勒斯规定不握手的纪律，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钦佩。

尽管美国统治集团中以杜勒斯为代表的势力化持对中采取敌视政

策，但美国政府在，内公众与论的鹏力卜1又想要回被扣&”1-：中国的美国人。当时英国已和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它受托于美国，照管美国的在华利益。这时，发国企图既能要求遣回那些在举人员、X不同中国政府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于是，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政府决定通过参加会议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杜维廉来接手办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

中国代表团得到这个消息后，周恩来连夜召集代表团研究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周恩来认为中国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中国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愿望，开辟接触的渠道。于是，中国代表团决定告诉英国代办，现在中美双方都有代表团在日内瓦开会，有关中美双方的问题可以由两个代表团进行接触，没有必要通过英国作为第三者插手。5月26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向新华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国际新闻社等通讯社记者发表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押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而且表示，中国

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6月3日，周恩来就5月下旬美国通过英国和苏联要求中国释放犯罪的美籍侨民，并承认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某些政策是不现实的一事，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中国代表团已经答复英国方面，中美双方可经英国介绍直接接触。「如

19971^页332。对此，当年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作了澄清，王炳南说：「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1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始终在周总理左右。开会时，每次都是我陪着周总理进入会场。……会场座位是按每个国家的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的。中国(：！^”八^(：在前，美国05八，0排在后，和薛联代表圃在一起：距离我们很远，国联大II会议大厅有好几个人口处1我们同美国代表团不是从同一门进入会场，不可能碰在一起。会议中间有15分钟的休息…一。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而且，

当时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因此无论从客观和主观都不存在总理主动去握手而遭到拒绝的可能。在一些美国人的回忆录中，甚至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录裏都写到此事，实际上是以讹传讹。」同上书，页21—22。

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将「首先联繫到中国留美学生被扣问题」，也闡明中国将区别对待犯法的美网侨民和其它美国人。

美国统治集團也想要摸摸中国政府的情况。杜勒斯尽管外表上激烈反共，内心却有兴趣探索同中国缓和紧张关系以及使在押人员获释的可能途径。当时美国的一些盟国认为，中美双方如能接近一些，将会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在美国内外都希望中美进行接触的气氛下，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代表会晤。这样，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上，终于架起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

通过英国代办杜维廉的安排，中美两国代表就两国侨民问题，于1954年6月5日至21日举行了初步商谈。中国政府指定驻波兰大使王

炳南为代表；美国政府则指派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伍^16X13^! !”^”）为代表。6月5日举行第一次会谈，双方商定了会谈的方式。10日第二次会谈时，约翰逊提交了美方认为是被中国政府拘留的美国侨民与军人的名单，要求中国方面给予这些人早日回国的机会。王炳南答复说：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是会得到保护的。他们可以在中国境内居留，从事合法的职业。如果他们为了某种原因要离开中国回美国去，只要他们没有未了的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他们随时都可以走。实际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有1485名美国侨民离开了中国。至于极少数美国人在中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他们被扣押是罪有应得的。你方交来的名单，我们将进行研究并将在下次会谈中答复你们。关于美国政府扣留的中国留学生问题，我们准备在下次会谈中提出。

在6月15日第三次会谈时，王炳南答复说，中国方面同意因犯罪而被扣

押的美国侨民和军事人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他们的家属通信，他们的家属也可以邮寄小包裹。中国政府是按他们所犯的罪来量刑的。判刑后，如罪犯表现好，中国政府可以考虑灭刑或提前释放。

我们曾经这样做过。至于约翰逊先生上次会谈中交来的名单，一经中国代表团收到这些人员的材料，当与美国约期会谈。接着，王炳南严正指出：中国现在有5000多名留学生在美国，有不少留学生要求回国，但遭到美方的百般刁难。当他们向美国政府申请离境时，美国政府却通知他们不得离开，甚至威胁说，谁要违反这一命令，将被判处5000美元以下罚款或者5年以下徒刑，或者同时予以两种处罚。这是毫无道理的。约翰逊表示，扣留中国的学者完全是按美国的法律行事的。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确曾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王炳南对此表示，这条无理的规定应予废除。

6月21日，举行第四次会谈。王炳南首先建议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中方的合理建议，遭到美方的顽固拒绝。约翰逊说，美国政府将单独发表声明，肯定中国侨民依照美国的法律和规章，有完全自由到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所谓「依照美国的法律和规章」，实际上就是不肯放中国留学生回国。此后，7月16日和21日，双方派联络员又接触了两次。中方代表是外交部科长浦山，美方代表是国务院中国司政治事务官詹金斯（八纽！！化）。双方审核了各自提交的名单。中方代表向美方提出六名已经获准出境的在华美侨的名单，同时要求美方提供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情况，并再次询问美方是否同意中国方面在上几次会议中提出的请第三国使节代管双方侨民利益的建议。美方代表用外交辞令对中国批准六名美侨出境表示感谢，但他没有进一步提供有关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新情况，并再次拒绝中方关于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利益的建议。这次接触虽然成效不大，但它毕竟是以以后长达十五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也发出了愿与美国缓和关系的信息。1954年8月24日，在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毛表示，中国愿意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并强调「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他建议英国朋友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不要搞东南亚条约」，「不要武装日本」，「不要武装西德」，并说「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10月19日至23日，在与尼赫鲁会谈时，毛又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相互警戒着是不好的。」「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份了。它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⁵⁵

尽管中国表明了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的意愿，但由于美国坚持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特别是由于美国极力阻挠中国统一台湾，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和长期斗争事实上是难以避免的。

1954年9月到1955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和解放一江山、大陈等岛屿，有力地在全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这一斗争也表明，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台湾问题已被置于首要地位。由于摸不清中国的真实意图，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出现在美国政府决策部门引起了极大混乱。正当美国政府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中国政府再次表明了缓和的意愿。

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公开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在国际压力下，美国也想找机会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还需要安抚国内舆论在被押人员和间谍案问题上对美国国务院的指责，因此，美国政府就不能对周总理的这项声明置若罔闻。4月26日，美国政府对此做出响应。国务卿杜勒斯举行记者招待会，称美国愿意在没有台湾参加和不损害台湾权益的情况下，同中国大陆进行多边和双边的讨论，并首要探讨在台海地区停火的可能性。艾森豪威尔在27日

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中美会谈将不涉及国民党的利益，仅讨论停火和释放被扣押的在华美国人的问题。

在亚洲国家中，首先是印度希望能在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发挥重要作用。万隆会议结束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宣布他将派印度驻联合国人使梅农，并表示不论是否得到有关国家的斡旋请求，印度都将寻求谈判的可能性。从5月12日至20日，梅农在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了六次会谈。梅农向中国提出了分三个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第一阶段，双方采取一些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中国释放美国空军人员，美国让中国留学生回国；第二阶段，在台湾海峡造成事实上的停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马，然后在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中央政府同台湾当局进行谈判；第三阶段，实现台湾问题的长远解决。

周恩来对梅农的努力表示欢迎，并向他解释和说明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周恩来着重指出：第一，缓和紧张局势必须是双方的，应促使国民党从金马撤出，中国同意在规定的期限内让它撤出，使中国和平收复这些岛屿，但这并不表明同意杜勒斯的「停火」以及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和「两个中国」。第二，除金马问题外，中美还可以在其它问题上采取步骤缓和紧张局势。对美国而言，取消对中国的禁运和允许在美的中国人自由回国；对中国来说，妥当处理在华美国人的问题，或释放或驱逐他们，另外同意美国人到中国访问。第三，中国愿意同国民党谈判，同国民党谈判的议题是停火问题与和平统一问题。周恩来同梅农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待谈判的基本立场。56

5月26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固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毛泽东表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结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不打，如果打，结果不是对我们不利，不是对亚非国家不利，而是对西方国家不利。如果说这是吓人，那也可以，但是我们这样说是根据的，我们是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为根据的。正是

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

55 傅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1》，上册，页567—572。

5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1》，上卷，页478—479。

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是不会反对的。」 57

早在5月9日，英国驻华代办向周恩来转递英国外相麦克米伦(! ^腾 ^". ^^]]^)的口信：英国对周恩来4月23日在万隆的声明有很大的兴趣，询问中国有无口信希望通过英国向美国转达。同日，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也向周恩来表示印度尼西亚总理愿意在中美解决台湾问题时从中斡旋。5月26日，周恩来接见杜维廉，进一步阐明中国对中美谈判问题的看法，强调了中国对待这一问题的四点原则立场：第一，为了中美之间进行谈判，双方应采取一些针对台海地区的直接或间接的行动来缓和紧张局势，这并非谈判的先决条件，而是表示各自的诚意。中国已经在万隆会议和一些声明中表明了中国愿意缓和紧张局势，因此希望英国能说服美国也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二，中国赞成在谈判前进行外交接触，中美两国在莫斯科、新德里和伦敦的外交人员可通过三国政府进行接触。第三，中国政府认为谈判的主要问题应是缓和及消除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所提议的召开十国会谈的建议，但与会国可多可少，也可是中美之间的直接会谈。最后，蒋介石不得参加此类国际会议，中国政府希望同蒋直接会谈，因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谈判，一个是国际的，一个是国内的。中国政府争取都能开成，或是同时举行，或是分开举行，尽管两者有关系，但不能同时举行。58英国在了解到中国的基本立场后，对美国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促使美国同意同中国进行直接的会谈。

7月中旬，中突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举行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一度极为紧张的中美关系终于有所和缓。为指导中美会谈，研究会谈中的对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外交部成立了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章汉夫任组长，乔冠华任副组长，董越千任秘书长。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驻捷克大使约翰逊。为了给会谈创造良好开端，中方代表首先宣布：中国最高军事法庭于7月31日按照中国法律程序，判决提前释放“一名美国间谍。美方代表表示感谢。随后，双方就两项议程进行会谈。中方认为，会谈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以及安排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直接会谈和建立两国的文化联繫等实

质性问题。美方则只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并要求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为使会谈先谈起来，双方达成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它实际问题。同时确定8月2日继续举行会谈。第二次会谈，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中方提出的名单中包括钱学森〔1955年6月，钱学森在一封给国内的家信中夹带了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要求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的信。周恩来当即交给了王炳南）。中方还提出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美方提出休会一天，以便请示国务院。

从8月4日至9月1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首先讨论了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美方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二项议程的讨论扫清道路。中方认为如何处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的问题是会谈的内容，决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中方郑重重申了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同时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那些被无辜监禁的所有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由于美方的顽固态度，会谈迟迟无

法取得突破。为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尽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中国政府指示王炳南大使于9月10日向美方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十二名美国人的覆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作了适当的让步，9月10日的中美会谈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协议的声明》。协议采用各自表述的方式声明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承认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快行使其返回的权利。⁶¹

9月14日，中方代表建议立即进入第二项议程的讨论，并提出消除禁运和准备高一级会谈两个议题。中方希望通过消除禁运和外长会

⁶¹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页55。

谈，寻求缓和台澎地区紧张局势，促进往来，改善关系。9月120日，中美会谈进入第二阶段，美方企图绕台湾问题，在遭到中方拒绝后又提出双方保证在台湾问题：小国使用武力的问题。中方代表郑重指出：首先，和平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而小国使用武力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坐下来谈判，正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其次，中美之间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问题，绝不能同中国用和平的或武力的方式解放台湾的内政问题混为一谈。第三，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愿在可能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决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然而，美方一直以「互不使用武力」问题未达成协议和美国在华犯人未全部释放为由，拒绝讨论中方的建议。由于美方对会谈没有诚意，尽管中方作出种种努力，双方就第二项议程举行的谈判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1956年9月至1957年12月，中方先后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

记者前来进行新闻采访、关于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等协议声明草案，想以此推动会议前进。对中方这些积极的提案，美方一直拒绝讨论。在1957年12月12日第七十一次会议上，美方企图单方面降低会谈级别，会谈从僵局发展到中断。¹¹²

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使中国在对美政治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它暴露了美国仍在执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并企图冻结台湾地区现状、制造「两个中国」。虽然总的来看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毕竟就两国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协议，实现了双方一些侨民要求回国的愿望。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要凹了一个钱学森⁶³，单就这一件事来说，会谈也是有价值的。⁶⁴

62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页56-59。

63钱学森，火箭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教授，曾经帮助制造了美国的第一枚导弹。他是文职人员：在研制导弹时得到美国陆军上校军衔。美国政府由于害怕这位洲际弹道导弹专家回到由共产党执政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他扣留了五年之久。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9月10日达成协议后，钱学森于9月17日偕同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美国回国。

64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页56。

后记

1953至1955年这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早在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凯歌行进的时期》〔1949—1956〕卷中就是由我执笔的，迄今已过去了二十个年头。这二十年间，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伟人传记、年谱，回忆录等披露的有关史料，为重写这段历史提供了条件，有可能较之二十年前把一些历史情节说得更清楚、更符合实际一些；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并不完全是一些文字数据都能反映出来的，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稿，仍有很多疑窦难以解开，这是我不能不在此向读者作出说明的。

本书的写作得到诸多同仁的协助，金观濂先生对全书结构提了很好的建议；沈志华先生和韩钢先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不少重要数据；萧冬连先生先后对若干章节的内容提出过很多很好的意见，书中「国家对社会的掌控」一节则是萧冬连先生撰写的；刘颖博士协助核查资料做了很多工作；责任编辑张志伟先生和朱敏翎小姐对书稿作了极其认真细致的编辑和校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林蕴晖

2009年2月28日于佛山碧桂花城

大事记

1953年

1月1日人民日报以〈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为题发表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中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经济建设的总任务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

同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在全国实行。本着保证税收，简化手续的设想，「新税制」规定：「应税货物，一律按国营公司批发牌价核税；加工、订货、包销者同。」这就是不分公营、私营，一律平等纳税，并取消了对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的优待。「新税制」的实行，出现了「公重于私、工重于商」的局面，并导致物价波动。这一修正税制的错误，经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得到纠正。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

1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四十四次〔扩大〕会议。会议同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人

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并决定近期召开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讨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宋庆龄、刘少奇等三十二人为委员；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张治中、彭真、邓小平等一十三人为委员。

1月13日—2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大区文教委员会主任

会议，提出1953年文教工作的方针是：「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重点是发展高等教育，中心是培养高、中级技术人才。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任务是计划地、系统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

2月4日—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强调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毛泽东致闭幕词，提出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1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选举法》由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于3月1日公布施行。

2月15日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下发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作了个别修改、通过为正式决议。

2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邓子恢任部长。

3月8日中共中央在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工作中主要倾向是急躁冒进的汇报后，当天发出〈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16日发出〈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7日发出〈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19日又发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3月10日因「新税制」引发毛泽东对政府工作的批评，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强调政府各部门必须取得中共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共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并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3月3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提出中朝两国政府共同拟定的公正解决战俘问题的新建议，以扫除朝鲜停战协议

的最后障碍。4月3日政务院发布〈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决定配合1953年下半年即将进行的人民代表普选的准备工作的，以1953年6月30日为调查登记的标准时间，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4月3日—2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传达毛泽东提出的要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据此提出，农村工作的任务是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大家富裕的道路，但互助合作必须遵循稳步前进的方针。4月15日—23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作〈四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修改后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选出了全国妇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25日，二届执委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宋庆龄、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为副主席。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都学习娜共(布)党史简明教挂第九至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以利于在经济建设中正确利用苏联的经验。

4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1953年国民经济计划提要〉，规定：1953年工业总产值886亿元（包括手工业产值51亿元），比1952年增长12.35%；农业总产值506亿元，增长6.47%。

5月2日—7日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向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大会通过相关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12日，举行第七届执委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名誉主席，赖若愚为主席，刘宁一、刘长胜、朱学范为副主席。

5月9日—11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出鲍尔汉等八十三人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会委员，鲍尔汉为主任，杨静仁等

五人为副主任。

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议》，规定苏联政府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连同此前签订的中苏协定援助建设和改建的50个企业，全部为141项。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双方签订备忘录，由苏联政府增加设计和帮助建设15个项目。这样，中苏共签订156个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项目。

同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分隶五个方面。

（一）所属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二）所属铁道部、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三）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四）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五）所属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休养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同日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发出指示：决定本年度由各地依照1953年留苏预备生选拔办法，选拔投考生2795名。8月1日至3日，各大行政区同时举行留苏预备生统一考试。

5月27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利瓦伊汉向中央呈送1953年春他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调查后写出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指出，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

5月29日政务院第180次政务会议批准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报告，决定1953年继续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调整原则是着重改组旧的庞杂的大学，加强和增设工业高等学校并适当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进行整顿。

5月30日—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选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圆瑛为会长，喜饶嘉措、

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仆初、噶喇庄、枯巴、阿旺嘉措为副会长。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于本日正式签字。

6月14日—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为右倾。于是，财经会议在批评薄一波主持的「新税制」错误的同时，对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进行影射批评。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8月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强调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7月中旬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问题；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对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关于几年来少数民族工作的经验总结；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

7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金日成、彭德怀先后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并于27日向朝中部队发布停战令。

8月1日政务院下达〈关于1953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统筹分配工作的指示〉。规定：基本方针是「集中使用，重点配备」。

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中央指示下达后，全国开展了

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国家计委对1953年计划进行了调整，压缩支出一增加收入。据12月22日国家计委报告，全年收支可以平衡，并略有节余。9月7日毛泽东召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向他们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9月8日—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四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和会议总结。9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善学校工作及防止学生罢课和请愿事件的指示〉。

9月13日—10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重点检查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指示，会上对主持中组部日常工作的安子文展开批评，其中关于富农党员、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等显然涉及负责组织工作的刘少奇，刘本人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9月16日—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七次、二十八次会议，听取和批准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关于政治法律工作的报告、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听取副总理邓小平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问题的说明，通过关于推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9月23日—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掌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实际生活，提高艺术修养，努力艺术实践，用艺术的武器来参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斗争。

10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后的情况及当前工作任务〉的报告。中央批语肯定华北局确定当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是完全正确的。

10月15日和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强调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批评「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农村工作部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10月23日—11月12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宣告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陈叔通为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十三人为副主任委员。大会通过决议，拥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对私营工商业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10月26日—11月5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央委托召开第三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12月16日，草案为中共中央通过，作为正式决议下

达。

11月20日—12月17日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确定：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方法是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步骤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

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的报告〉。〈报告〉列举了猪肉、蛋品、水产、蔬菜四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除水产外，其余多有供不应求的情势，据此提出相应措施。

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命令公布《1953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发行公债总额为人民币6亿元，利率为年息4厘，从1955年起每年付息一次，分八年偿还。

12月7日—1954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规定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是，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

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为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三大重点工程隆重举行开工生产典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5—1956）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12月31日周恩来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1954年

1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中财委关于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和〈中财委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

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2月6日—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以休假名义没有出席全会），并向全会作报告。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会上作自我批评。2月中旬受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对证高、饶「错误」事实。

3月8日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作出批示。指出，要把中国建设成生产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

3月17日—4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检察工作会议，确定今后检察工作的任务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的组织和工作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运用人民民主法制，保障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向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3月20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决定，地方国营企业超额利润可以作为地方工业投资。

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提交的宪法草案进行修改后公布。3月24日—30日全国第四次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

681

大事记

在过渡时期，积极发展适合人民利益和需要的文学艺术创作，加强艺术实践，是当前文化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任务。

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活跃初级市场，加强城乡物资交流〉的社论。

4月15日中央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政务院第213次会议联合举行。会议通过的决定对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必须遵循的方针、办法作了具体规定。

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由

陈云任组长。

4月24日—7月23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4月27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5月3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楚图南为会长。5月13日新华社报导：中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北京郊区永定河

官厅水库于5月上旬竣工。5月20日政务院举行第221次政务会议，通过国家民族委员会的工作

报告和〈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5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5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

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三十次会议，毛泽东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

6月17日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达成两国互派外交代办的协议。

6月25日—29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同两国总理先后进行会谈并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家关系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财委〈关于实施棉布计划供应、棉花计划收购的报告〉。

7月22日—8月6日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举行，号召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进一步，结起来，积极参加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和各种爱国运动。会议选出了定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领导机构。

7月26日中国首批飞机制造并试飞成功。

8月5日—16日教育部、扫盲工作委员会联合举行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提出争取在十五年左右，基本上扫除农村两亿多青壮年文盲。

8月10日经政务院审查批准，公安部命令公布施行《外国侨民居留登记及居留证签发暂行办法》、《外国侨民旅行办法》、《外国侨民出境暂行办法》。

8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三次〔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就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及目前中国的外交政策向会议作报告，重申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通过〈关于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

9月2日政务院举行第三产业二十三次政务会议，听取中财委副主任利瓦伊汉作〈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

9月15日—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批准了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选出了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9月29日国家计委作出对公私合营企业产品销售和物资分配的规定。

10月1日首都各群众举行盛大阅兵和群众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

10月5日中国和挪威王国谈判结束，双方同意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发表〈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公报〉宣布双方签订的有关宣言等多项文件，以及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议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供应范围的议定书等。

10月16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中，赞扬李希凡、蓝翎对红学家俞平伯观点的批评，批评「大人物」

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由此引发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

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战胜了洪水〉，赞扬长江中下游和淮河两岸人民从6月26日至10月3日整整100天展开的抗洪斗争，全国成灾面积达1131万公顷，受灾人口6000万人，国家投入救灾费用2.4亿元。

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表〈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1953年6月30日24时的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11月5日安徽省霍山县境内的佛子岭水库全部完工。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两批美国间谍

进行宣判，依法对这两批美国间谍特务分子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决定

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讨论会。12月5日—1955年1月8日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和地方工业部联合召开

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确定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必须把个别公私合营同全行业的改组、改造结合起来，按行业归口管理，统筹安排的方针。12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就美国和蒋介石签订〈汉台共同防御条约〉发表声明。

1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三大制度，决定将原来的六个大军区改划为十二个大军区。

12月21日—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

6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49—1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大事记

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决议，推举毛泽东为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等十六人为副主席。12月25日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全线通车。

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

12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商业部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报》，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市场反映的情况，证明我们同农民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要求各级党委检查政策执行中的偏差。

1955年

1月2日中国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

1月4日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社转向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建议。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1月18日—1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1月20日中国和阿富汗王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月31日中共卫生部党组向中央报送《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已有6亿以上人口，每年增加人口1200万到1500万，提出应当适当节制生育的建议。3月1日，中央批准同意这个报告。

2月76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五次会议，讨论并修正国务院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该草案规定：人民解放军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经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7月30日，毛泽东主席命令公布。2月2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

新旧币的折合比率，定为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3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举行第七次会议，听

取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筹委会由达赖喇嘛、丹增、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任第一

副主任委员，张国莘任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3月15日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由香港回到广州，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

3月中旬毛泽东找邓子恢谈话，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并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停、缩、发」的三字方针。

3月21日—31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3月22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办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现有合作社的工作。4月1日—12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民主建国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相关章程和决议。4月3日潘汉年以「内奸」问题遭逮捕审查，同月被捕审查的有上海市

公安局副局长扬帆，被称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4月4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五次全会。全会批准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

三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选；补选林彪、邓小平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11日首都文化界隆重举行梅兰芳、周信芳艺术生活五十周年纪念

大会，文化部向他们颁发了荣誉奖状。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商，改造

农村购销工作的指示〉。4月18日—24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

行的有二十九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4月22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总理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

约》。28日'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签订，是以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国际间繁难问题的一个良好范例。

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

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写了按语。5月17日中共中央召集五省市书记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

题的讲话，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强调：

停、缩、发'基本是发。5月26日根据中苏签订的协议，中国政府全部收回旅顺主权。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的下一生产年度的

农业社发展计划，即在1955年春65万个社的基础上，到1956年春发展到100万个社。6月18日瞿秋白烈士的遗骨由福建省长汀县迁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安葬。

同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今年7月份起全部实行工资制待遇的通知〉。8月31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同日虻(州)新(疆)铁路黄河大桥落成通车；黎(塘)湛(江)铁路正式通车。7月5日—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及有关报告。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关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8月1日中美两国大使级首次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发表公报说，

双方同意会谈的议程是：一、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双方有所

争执的其它实际问题。8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工作的决定〉。8月
25日国务院命令公布〈广村粮食统讲统销暂行办法〉、〈市镇粮食
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这两个文件，是从粮食分配方面调节城乡关
系、工农关系和产销关系的重要步骤。8月30日北京市青年垦荒队出发
去黑龙江省萝北县建立青年农庄。青
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大会上作〈向困难进军！〉的讲话。9月10
日中美两国大使级代表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并发表
声明。

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元帅军衔和授予勋章典礼在北京举
行。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
荣臻、叶剑英由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勋
章。

9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10月4日—11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全会。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农
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
毛泽东作炉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发言。

10月15日—23日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
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确定推广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
的普通话的方针、步骤。会议建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把〈汉字简化方
案〉报国务院审定公布实行。

10月27日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人物谈话，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社
会主义改造中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10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女学校的报告。

1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
社示范章程草案的决议〉。11月16日—24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自治区
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

大中城市党委负责人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问题的决议《草案》〉。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业十

七条》，征询各地意见。〈广业十七条〉提出十二年内粮食亩产分别在黄河以北、以南

6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5—1956）}向社会主义过渡

和长江以北、以南不同地区达到400斤、500斤、800斤的指标要求。

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可贵的创议〉的社论，认为鞍山钢铁公司等单位提出争取四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总产值计划，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信号！号召：把1956年的计划订得先进些，更先进些，为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1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作序，提出各行各业都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并将此作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一档案

1^033^100^""。? 0X3^111130^301433^5X1101^ "

01)06^6^0)1^3^11^1161-080010X3,
1991, 110.6; 561-861!^.00001131^, 10110 30(1义06"^^,
11^1061-1(1111I3."! 1^5: 力.""", "册,""&1^16《0"(; (! "化"广
(^! &! ! &^, 仁八: 51311『01"(! 0111^61811^? 『658, 1993)
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八0? 化4.45, 00.1, 几329,
; 1.9-17, ^^00X0-1^11X3110X110011101110册6
中国外交部构案馆, 203—00007—03吉林省档案馆, 全宗77, 卷宗21
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
第九、十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 20041, 未刊
陕西省档案馆, 全宗123: 目录40, 案卷1
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 全宗500, 目录2.1, 案卷20

二文献资料

人民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汇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

6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一”55)——向社会主义过渡

参考文献

69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 第
一、

三、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谷》，第三、五、六、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9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至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至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央文件汇集（^{^^}）》，第五、八分册（内部刊物）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央文件汇集（^{^^}）》，第五分册（内部刊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七、十九、二十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

1986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数据选编
1953—1957年交通通讯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3—1957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3—1957年，财政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3—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 and 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综合计划司编：《中国财政统计〔1950—1985〕》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
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

话》，上册（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炉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年》，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

1985〕》（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3）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世界知
识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7）》，

第三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49—1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参考文献

93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5）》（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1957）》（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8—1959）》（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朱德：《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利瓦伊汉选集》编辑组编：《利瓦伊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陈云：《陈云文选》，第二、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98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上册（北京：三联书店，

1973)

三著作

千家驹：《逝者如斯夫》（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下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

1977》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注释本（修订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中、下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档案馆编：

《领袖在河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30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史出版社，1993）

尹法声、周豪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江苏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力水世阁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湖北卷-武汉分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卡尼克（八！）着，楚至大译：《克什米尔公主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李定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0）

利瓦伊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册）

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季龙主编：《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鄞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武在平：《潘汉年屡建奇功的一代英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威尔逊（！^^^。！！）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

料选辑编辑组编译：《历史巨人毛泽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胥光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湖乔木像〉编写组编：〈湖乔木谈中共党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孙业礼、

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特里尔（！^58!^^）着，刘路新、高庆国等译：《毛泽东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马福龙主编：《历史教训与宝贵启示^潘汉年冤案前前后后》（上海：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崔乃夫主编：《当代中国的民雕》（北

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张庚主编：《当代中国戏曲》（北京：当

代中国出版社，1994）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狂人自白》（北京：

华艺出版社，1989）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当代中

国出版社，1994）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

室：〈〈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未刊稿，1979陈文斌、

邵纬生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

卷）》，上、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陈修良：〈〈潘汉

年非凡的一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陈清泉、宋广

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麦迪逊（八1^33出^!!）着，李德伟、盖建玲译：〈〈世界经济二百年

回

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费正清（化！！！I5&1*31、麦克法夸尔（！^&! ”；^”^^！！&^）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黄小同、李文芳：《刘少奇与天津讲话》（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

黄克诚：《黄克诚自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黄树则、林士笑主编：《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董志凯等：《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赵家梁、张晓霁：《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刘伯承传》编写组：《刘伯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樊宪良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天津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蒋伯英：《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编：《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萧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钱临照、谷羽主编：《中国科学院》，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霍林沃思（(；！^^！！^^！！！！)着，高湘泽、尹赵、刘辰诞译：《毛泽东

和他的分歧者》（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鲍大可（八^00业8^6^着，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中共中央马^思恩格斯列宁斯人林著作编译局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一匕册（北&：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顾龙生编着：《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四论文

朱庄：〈毛泽东与胡适〉，《人物》〔北京），1999年第11期 吕黎平：〈赴苏参与谈判援建空军的回忆〉，《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 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百花洲》，1998年第4期 沙健孙：〈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

林蕴晖：〈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
〈《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胡绩伟：〈刘少奇「路线」异想〉，《求是》，1989年第2期胡绳：〈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上的讲话〉，
《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
《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
〈《战略与管》，1998年第5期徐庆全：〈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百年潮》，2000年第7期陈允豪、丁兆甲：〈扬帆冤案始末〉，《人物》〈北京〉，1986年第6期陈益元：〈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以1949—1952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史学集刊》，2005年第1期陈毅：〈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3日

华伟：〈单位制向小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战略与管》，2000年第1期杨奎松：〈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仗学月刊》，2006年第1期卢汉龙、李骏：〈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的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萧冬连：〈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
2005年第1期
萧冬连：〈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载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五卷（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五报刊

《人民日报》，1953、1955、1996年
《人物》（北京），1986、1999年
《中共党史通讯》，1990年
《中共党史资料》，2002年
《内部参考》，1953—1954年
《文汇报》，1993年
《文学评论》，1986年
《北京日报》，1957年
《光明日报》，1957、1990年
《百年潮》，2000、2007年
《求是》，1989年
《宣教动态》，1957年
《红旗》，1981年
《探索与争鸣》（上海），1989年
《理论动态》，1988年
《理论战线》，1993年
《新文学史料》，1989、1994年
《中华月报》，1950、1952—1955年
《新华半月刊》，1956—1957年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北京，内刊），1986、1988年
《农村工作通讯》，1955年
《零讯》，1957年
《党的文献》，1988—1990、2003、2008年
《六回亿录和口述史料》

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缅怀毛泽东》，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王凡：〈周恩来、李富春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创立〉原航空工业部党组副书记段子俊访谈〉，《党史博览》，2001年第4期
沈国凡采写：《我所亲历的胡风案〉法官王文正口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王亚志口述，沈志华、李丹慧整理：〈新中国成立

初期苏联与中国的军

事装备 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之四】），《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王芳：〈警卫领袖的回忆〉，《百年潮》，2007年第1期李之珺：〈不该发生的故事 回怵1955—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

过〉，《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八〃5 ！ ”（^ ！ ！ ^ ）。）着，周高塔、宋康源译：〈〈我的

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林默涵述，黄华英整理：〈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林默涵问答录之一0，

《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回忆录》，修订本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7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第二卷（〃 — 55）——向社会主义过渡

徐中尼：〈访上海资本家荣毅仁〉，《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高岗秘书赵家梁谈高岗问题，林蕴晖、沈志华访问赵家梁记录，2005年2月2日

高莽：《阿尔希波夫的故事》〔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 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

张明远：《我的回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张明远回忆，

未刊稿

第一汽车制造厂企业研究中心编：《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第一汽车制造厂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3年印刷，未刊）傅大章：〈关于毛泽东同志1953年2月视察安庆时讲话的回忆〉，《理论战线》，1993年第96期杨友：〈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的自述〉，《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号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щев）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黎之：〈回忆与思考——初进中南海〉，《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2期黎之：〈回忆与思考——整风——鸣放——反右〉，《（！）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索引

一画

156项378, 387, 393, 406, 427, 436「一五」计划48, 185, 252, 374—
376, 378—382, 384—387, 393—396, 401, 406—408, 413, 421, 423,
425, 427

一江山岛584—587, 658

丁玲502, 504, 507, 523-531七届二中全会2—4, 14, 15, 27, 32,
43, 46, 47, 61, 73, 194, 237, 241,
247, 273, 277, 291, 295七届三中全会29, 47, 56七届六中全会17, 186,
196, 197,

202, 229

七届四中全会62, 262, 320, 326, 329, 334, 335, 337, 338, 359,
365, 464, 507, 532, 535

「九天九地」262, 265, 267, 268

「二月促退会议」417

《人民日报》41, 76, 85, 86, 214, 220, 238, 243, 259, 263, 279,
280, 404, 412, 418, 420, 481—485, 487, 502, 506, 507, 513—517,
519, 528, 657

人民民主专政18, 22, 110, 133, 437, 466, 467, 471, 494

人事档案制度19, 470, 472

《0、一杂志》577

刁隆615

十一届六中全会1, 72

「三十万言书」507, 508, 510, 511「三年准备十年计划建设」30上林
山荣吉642

上海市117, 119, 128, 131, 138, 216, 221—223, 225, 470, 516, 531
—539, 541, 543, 546, 563

上海市委128, 129, 220, 516, 531, 533, 536, 537, 543

久原房之助642

也门619, 635于振濂564千家驹468

土地改革6, 8—11, 17, 29, 32, 39, 42, 44, 47, 50, 51, 60, 80,
90, 91, 159, 180, 199, 227, 260, 268, 276, 440, 441, 459, 468,
469, 474

「大仁政」262, 27,

大陈岛584, 585, 657—659

「小仁政」262, 265, 271

小脚女人17, 168, 177, 178, 180, 181, 423

「山西批语」42, 43
山西省委7, 11, 14, 39—44, 147, 177, 182, 195, 297
山东分局239, 244, 339, 532
山东省委182
工商管理总局53
工商联55, 119, 129, 130, 204, 206, 218, 220, 221, 223, 253, 255,
264, 267

四 羣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141, 232
中央商业部118, 152
中央组织部36, 37, 276, 282, 289~292, 296, 297, 302, 304, 333,
334, 339, 345, 360, 362, 464, 526, 529—531, 544
中央农村工作部80, 81, 84, 86, 87, 89, 山, 113, 山, 46—150, 161
—167, 169, 173—178, 182, 185, 186, 191, 193, 248, 276
中共七大24, 26, 275, 311
中共十二大1
中共十三大2
中共中央1, 2, 4, 7, 8, II, 12, 17, 18, 24, 27, 29—31, 36, 44,
46, 48, 50—55, 58, 63, 69, 71, 72, 75, 80, 84, 86, 94, 98, 103,
104, 106, 111, 114, 118, 122, 124, 128, 142, 143, 145, 149, 1?
4—157, 160, 167, 170. 178, 205, 209, 213, 218—220, 235, 239,
241. 244, 246, 248, 249, 255, 260, 270, 274—276, 279, 281, 288,
290, 294, 311, 320, 332, 334, 337, 338, 342, 349, 353, 355, 359
—363, 367—371, 376, 378, 379, 381, 392—394, 397—400, 402, 405, 407
—410, 412—415, 418, 420, 421, 423, 427, 438, 439, 443, 445—
447, 451, 454—457, 459—466, 480, 481, 484, 485, 489, 501, 502,
504, 508, 510, 511, 513, 516, 517, 522, 524, 525, 528—530, 533,
535, 537, 538, 541, 545—550, 552, 556, 557, 561, 562, 569, 576,

578, 587, 592, 613, 614, 622, 651, 653, 655, 656, 661中共中央
东北局, , 14, 35, 275, 288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2, 26, 32, 46,
126, 409, 418, 420中南局51, 84, 99, 260, 276中财委94, 97, 100,
126, 128, 130, 136, 241—243, 246, 285, 370、371中国人民志愿军
266, 276, 349, 373, 60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22, 23, 256,
438, 440, 450, 452—454, 461中国民主建国会170中国科学院385,
397-4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 62, 442,
449, 453, 456中华全国总工会258「中间地带」645, 647丹麦640, 648尹
达487
互助合作1、8, 10, 11, 35, 36, 44, 45, 48, 50—52, 58, 59, 75,
76, 78—89, 104, 109—112, 114—116, 125, 138, 145—147, 149,
151, 152, 158, 177, 197, 233, 248, 249, 262, 279, 280, 289, 297,
405, 628
互助组6, 11, 14, 30, 33—35, 39—44, 56, 75, 78, 82, 83, 85,
89, 90, 106, 109, 出, 112, 115, 146—149, 161, 163, 166, 248,
279, 287, 296, 297
「五反」9, 32, 46, 58, 75, 117, 129, 205, 210
「五虎将」15, 344—346
什维尔尼克310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238, 241, 243
公私合营10, 49, 53, 54, 56, 61, 62, 126-135, 204, 207—210, 212
—225, 227, 230, 231, 233, 254, 257, 383, 384, 409, 552, 558
化铁516
卞荣泰605, 607
反冒进113, 408, 418—421
天津市14, 131, 216, 217, 223, 256, 278, 470
天津财委239

尤金326, 359, 363, 621

户籍制度19, 469, 470, 473-475

手工业合作社134, 136-138, 140, 141, 231文化艺术事业402

《文艺搬480—485, 503, 505, 506,

511, 514, 524, 525, 527, 528方然516

日内瓦会议595, 599—605, 607—612, 614—617, 646, 649, 656, 659—661, 663

日本103.207, 225, 240, 299, 354, 367, 389, 426、496, 518, 532,

540, 542, 547, 576, 601, 619—621, 631, 639—644, 647, 652, 664

比利时605, 607, 608, 648毛泽东1, 3—17, 21, 22, 24—26, 29—32,

34, 43, 44, 46—49, 51—59, 61—63, 68, 70—73, 75, 80~82, 85—87,

94, 97, 98, 103, 107, 109, 110—114, 119, 122, 124, 129,

130, 135, 155, 157, 158, 163, 168—188, 190, 191, 193, 197—206,

208, 209, 213, 216, 218, 219, 229, 235, 237, 240—242, 244—249,

252, 253, 260, 265—268, 270—278, 280, 281, 283—285, 287—291,

294, 295, 299—301, 303, 304, 310—320, 322, 323, 325, 326, 328

—332, 334, 338, 339, 341, 342, 347, 349, 354—363, 365, 368,

376, 379—381, 390, 403—405, 409, 410, 412, 413, 415, 420, 422,

428, 429, 438, 440—449, 452, 453, 463, 464, 466, 468, 481—487,

495—498, 501, 502, 505—511, 513—515, 524, 537, 538, 541, 543,

549, 562, 565, 566, 568—573, 578, 579, 582, 583, 585, 587, 591,

592, 599, 604, 606, 612, 614, 621, 622,

637, 638, 640, 642—645, 647, 649—

654, 656, 661, 663, 665片山哲643牛汉515王大超543王元化516王文正

515, 521王任重51王光伟378王戎516王昆俞478王明芳623, 624王芸生

453

王炳南478, 604, 662, 663, 667, 668

王泰吉273, 274

王倬如604, 622

王绍鏊543

王尧山532

王朝闻504

王稼祥604

王诤371

王鹤涛285, 290, 293, 300, 303, 309, 310, 313, 371

五画

主要矛盾32, 46, 47, 69, 188, 591, 592北京市119, 121, 131, 138, 214, 218—

220, 223, 224, 231, 232, 239, 244,

430, 446, 470, 516, 542卡尼克623卡冈诺维奇372卡兹洛夫432, 433卡尔德林433

右倾保守180, 182, 186, 229, 231, 409, 410, 412—417, 419, 421, 427史永543, 545

史密斯605, 607—610, 616, 660

台湾30, 105.175, 389, 453, 534, 542, 544, 565, 571, 584, 587, 588, 596, 601, 606, 620—622, 624, 627—630, 636, 638, 639, 646, 652—659, 664—667, 669

尼克松656

尼泊尔619, 635

尼科诺夫431

尼赫鲁594, 595, 598, 618, 621, 629,

633, 635, 637, 664, 665布科夫431布尔加宁372平野义太郎641札瓦斯基435

民主党派22, 23, 119, 204, 206, 249, 253, 254, 262, 269, 413.438, 440, 443, 447, 451, 452, 454, 461, 468, 488, 519, 558, 562, 657

民族区域自治448, 456—460

民族资产阶级14, 22, 29, 47, 135, 202, 204, 211—213, 228, 234, 250, 265, 467, 546

瓦西列夫435

瓦西科夫363, 365, 592

甘肃省委196

田付景一642

田家英177, 442

田间504

「白区党」304, 310

皮杜尔605, 606, 609—611, 613

石志昂623, 624

伍修权656任敏516

《光明》480, 482, 487

全人代大会1, 62, 381, 400,

419, 437—442, 447, 449, 450, 452,

454—456, 465, 470, 537, 578, 587全国政协31, 59, 61, 170, 229, 251,

262, 270, 437, 439, 440, 443, 450,

453, 495, 565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313, 574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15, 30, 284,

288—292, 297, 298, 362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13《共同纲领》22, 23, 43, 44, 59, 61,

136, 253, 254, 267, 437—441, 449,

451, 454—456, 460, 566列宁3, 22, 25, 54, 63—68, 70, 71,

82, 191, 432, 467, 468, 511印度支那595, 599—606, 609—617,

646, 656, 664, 666吉田茂642

向明241, 244, 308, 339—341
合作总社109, 123, 137—139, 141,
143, 230-232地方工业部133, 134多、快、好、省412, 413, 419, 421安
子文14, 37, 48, 281, 289—293, 297,
299—302, 304, 305, 333, 339, 340、
343, 345, 362, 442安志文335, 378安庆地委52安徽省委181, 194成都
会议8朱理治274, 307
朱德136, 139, 140, 276, 301, 302, 311, 314, 319, 322, 338, 352,
363, 418, 441, 449, 567, 574, 579, 585, 587, 643, 657朱穆之522
71; #481, 522, 529, 532, 543
”：单163-165, 209
江苏省92, 93, 130, 131, 169, 217,
533, 543, 547「百花齐放」403米高扬235, 372, 374-376老舍487^奇
逊654艾青504, 528
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269, 601, 602, 652,
657-659, 664艾登605, 606、608-610. 613, 646艾德礼647西林431西南
财委239西哈努克634西洛可夫68

七画

何其芳481, 487, 499, 500, 504—
507, 509, 511何满子516何莘543余心清564「克什米尔公主号」622利用、
限制、改造57, 133, 244,
246, 249, 251, 255, 256吴成方543
吴努594, 596—598, 618, 621, 622,
629, 632, 633, 635, 637吴波241, 245吴国桢653

吴凤歧76吕荧502吕鸿宾76, 78, 107孝感地委52宋劭文370, 371, 376宋
假夫】22, 222宋时纶568希格乔夫435
抗美援朝227, 266, 276, 285, 316, 349, 350, 353, 356, 370, 373,

437, 440, 441, 469, 507, 574, 600, 648, 655
「批薄射刘」15, 281, 284, 286, 298,
299, 310, 348李一萍564
李士群532, 537, 538, 540, 547
李井泉99, 102
李平623, 624
李正廉516
李立三14, 22, 287, 325
李先念99, 102, 122, 124—126, 157,
173, 285, 286, 416—419, 422, 423,
449, 545李克农539—541, 546, 604李希凡480, 482, 485, 524李卓然275
李能76
李富春244, 301, 370—376, 378, 379, 381, 389, 416—418, 423,
449, 526
李云543
李顺达76
利瓦伊汉53, 54, 56—58, 127, 131,
212, 255, 270, 281. 418, 449李聚奎568
李肇基623, 624李德全624, 641李'锐277
李济深253, 443, 445, 449李烛尘202, 204, 207, 208, 223, 253,
442李丰平209杜宏623, 624
杜勒斯601, 605, 606, 620, 652, 655—
657, 659—662, 664, 665, 667杜维廉646, 661, 662, 666杜润生80, 81,
97, 109, 155, 158,
160, 163—166, 176, 177, 183, 185,
192, 193, 201杜鲁门653—655沙斯特罗阿米佐约618, 619, 625,
629, 633, 665沈平642, 643沈建图623, 624沈钧儒443, 449汪道涵371
汪汉国76狄克希特623狄飞539
私营工商业9, 29, 46, 47、51, 56, 59, 101, 116, 141, 202, 205, 206,

208—210, 216—218, 225, 231, 235, 236, 252—257, 264, 265, 271, 277, 382, 410

私营工业53, 61, 126—128, 131,

133—135, 216, 217, 230, 234, 254,

256, 383, 384私营商业61, 67, 90, 116—123, 125,

126, 215—217, 219, 224, 234, 238,

254, 257, 383, 385

贝利亚321, 325, 356, 357, 363, 365,

372辛自修76阮忠荣609

^非会议最后公幸^63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91, 593—596,

598, 599, 617, 622, 624, 634, 637和平改造202, 212, 228周士第566

周叔^129周信湔130周炳林562

周恩来15, 23, 30, 31, 48, 56, 59, 94—96, 98, 122, 124, 133,

134, 154, 155, 157, 173, 188, 209, 211, 219, 228, 240, 244—247,

251, 252, 262, 263, 265, 266, 275, 276, 281—285, 301, 311, 312,

314, 315, 319, 322, 323, 328—332, 334, 335, 338, 341, 352, 354,

359—365, 370—374, 376, 379, 381, 390, 392, 411, 412, 415—419,

421, 422, 429, 439—443, 447—449, 451—453, 457, 462—464, 499,

500, 502, 504, 507, 508, 511, 532, 539, 574, 579, 580, 592—596,

598—600, 603—610, 612—616, 618, 619, 621—630, 633, 634, 636

—643, 645—647, 649, 651, 652, 655, 656, 658, 660, 661, 664—

667, 669

周桓336

周扬481, 484, 487—489, 502—504, 507—512, 514, 515, 524, 527,

528孟用潜109

孟戴斯—弗朗斯613—615, 646

季崇威543

延安整风12, 276, 336

彼蒂彼爱613

拉尼埃613

旺亲王607, 634, 637

《东北日船》36, 280

林乎加167

林伯渠275, 300, 301, 311, 418, 449林彪275, 276, 299—306, 308, 309,

313, 315, 316, 348, 378, 449, 579,

587

林枫175, 328, 334—338, 351林默涵481, 498—500, 503—507,

509, 511, 513, 514林铁169, 387

《武训传》403, 404, 477, 483, 488, 501

武汉市118, 122, 132, 138, 217, 222,

223, 470武汉市委51, 222, 223河南省委182, 195河南财委239波别多

诺斯采夫431《波茨坦公告》652, 654法依瓦基432, 433法国286, 601—603, 605, 609—617,

646, 648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 400, 477社会主义改造2, 12, 16, 51, 52, 56—58,

61, 63, 88, 104, 111, 114, 115, 117, 120, 124, 125, 128, 132,

134, 135, 139—143, 149, 155, 159, 173, 179—183, 187, 189, 190, 192, 193.196, 200—202, 205, 207—211, 213,

7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卷（1949—1955）向社会主义过渡

索引

709

214, 216, 218—220, 222—224, 229, 230, 233—235, 249—253, 255, 258, 265, 311, 320, 382, 409, 410, 412, 413, 423, 426, 449, 452, 453, 455, 466, 467, 478, 480, 488, 512, 548, 55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芬兰613, 648初级社42, 98, 150, 200邵力子562

邵荃麟481, 499—501, 504

丘吉尔592

邱创成371

金冲及4, 72, 301

金门653, 657, 659, 664

金时龙76

阿杏里雅635

阿里629, 636

阿富汗619, 621, 632, 635

阿尔希波夫431

阿珑515, 518, 521

冼玉清564

邯郸地委46, 262

侯德华543

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587, 588俞平伯19, 478—483, 485—491, 494, 495, 513俞守中543南日605—607南斯拉夫635, 651哈利托诺维奇

431城镇街居制度19, 470姚乃焯130
姚仲明638姚依林241, 545
宣传提纲5, 6, 63, 69, 71—73, 145
宦乡604, 646, 647
急躁冒进78, 84, 85, 87—89, 112,
113, 147, 179, 253, 255, 392, 411,
415, 417—422, 427春耦斋43
柯瓦廩夫13, 354, 358, 427, 428
柯庆施169, 173, 209, 537
段子俊435
派塞克623
科特拉瓦拉628, 629
科罗乌什金431
秋尼索夫434
(红楼薪) 478—488, 490, 492, 494—496, 510
《红楼梦研究》19, 478—482, 485, 488, 489, 491
约翰逊662, 663, 667
美国79, 206, 226, 266, 357, 367—369, 389, 426, 492, 555, 570,
576, 585, 588, 591, 592, 597, 599—611, 613, 614, 616, 617, 620
—622, 624~627, 629, 630, 635—639, 643—648, 652—669
仆台共同防御条约》657, 658
胡子昂202, 204, 205, 208
胡子婴221
胡立教545
胡均鹤532—534, 537, 538, 540
胡志明600, 614, 615
胡风19, 496—525, 531, 539, 541,
543, 549—551胡乔木86, 272, 280, 294, 311, 332,
418, 420, 442, 499, 502, 513, 515, 527

胡适19, 478, 479, 483—487, 489~
493, 495, 496, 513胡绩伟12
胡绳3, 4, 6, 487, 494, 501, 504
胡耀邦545, 546
范文同609—611, 614
范弗里特656
茅盾487, 498—500
郁善交76
重光葵643
重庆市132, 257, 470
韦国清610

个体手工业135, 136, 139, 230, 233,
234, 383埃及619, 620, 629, 632, 635夏衍537, 545孙中山202, 441, 453
孙立人653孙志远281孙国辉563岛津忠承641师哲358, 359, 365, 371,
604库米金372库圆佐夫431徐以新371徐放508, 515徐海东274, 580徐强
543
恩格斯64, 110, 278挪威613, 635, 648朗宁613
泰普潘609, 613浦赛昌660
浙江省委162—167, 181, 182, 185, 195
浙江整社161乌兰夫102, 449特里尔357纳伊姆汗632纳赛尔632翁从六
543耿庸516袁水拍483袁成隆165袁锬田543
「讨安伐刘」15, 288, 310, 343, 348
财经会议15, 19, 94, 96—98, 156, 242, 244—246, 248, 281, 284, 286—
288, 296, 298, 299, 301, 303, 304, 306, 310, 314, 315, 320, 331,
333, 339, 343, 347—350, 362
郝风格623, 624
马文瑞274

马列学院30, 42, 43, 297
马克思26, 64, 69, 70, 110, 191, 203,
247, 269, 278, 295, 399, 448, 453,
477, 479, 483, 484, 487, 488, 490,
492, 505, 506, 511, 592马克思主义2, 12, 19, 24, 25, 69,
201, 202, 235, 321, 482—484, 486,
488, 490, 497, 505, 506, 511—513,
517, 547马来亚601, 602, 633, 637, 638马林科夫310, 372马洪286,
305, 334—341, 344, 346,
378
马哲民563马祖657, 659马寅初443马叙伦443高志昂543高良富640, 641
高朗亭274
高级社17, 148, 198—200高崎达之助642
高岗7, 13—16, 35, 36, 39, 245, 246, 273—277, 279—288, 290,
293, 294, 298—315, 318—320, 322, 326, 328—365, 378—380, 524,
537, 548, 550, 571
逢先知4, 72, 301

「停’缩、发」三字方针154, 158, 163
国防现代化252, 367, 369, 382, 389, 565, 575
国家工业化10, 16, 51, 52, 57, 58, 77, 80, 81, 178, 234, 252,
255, 265, 271, 367, 370, 382, 452, 575
国家计委53, 172, 277, 282, 344, 374, 378, 379, 393, 407—409, 413
—417, 431
国家资本主义26, 29, 48, 53—56, 61, 67, 111, 119, 120, 124, 126—130,
208, 210, 213, 215, 226, 234, 253—255, 257, 265, 382
国务院第八办公室133
崔田夫308

康生301, 418, 532
张中晓516
张天翼504张志申543
张秀山15, 99, 103, 274, 283, 288—295[^]299, 306, 334, 336—341,
343—346
张邦英275
张宗逊574, 578
张明远15, 246, 280, 285, 286, 290, 298, 299, 303, 304, 334, 336
—341, 344, 346, 347, 349
张林池78
张治中253, 445, 449
张劲夫209
张建良543
张禹516
张唯一543
张国兼321, 323, 325, 336, 365
张鼎丞449, 538, 539
张闻天34, 35, 286, 301, 363, 371,
372, 418, 604, 622张霖之209张玺308, 378, 381张澜443, 445, 449捷沃
西安359教育事业401, 402, 469梁漱溟19, 262—269, 270—272^{^^^}515默
林516梅农665
《清宫秘史》477, 483毕门塔623盛丕华221, 253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48, 62, 91, 258, 649
第七舰队585, 652, 655, 657, 658, 664
统一战线30, 31, 47, 202, 212, 213, 223, 249—251, 255, 440, 450—
452, 466, 467, 483, 546, 588, 593, 612, 617, 622, 645, 648
习仲勋16, 48, 274, 276, 277, 281, 282, 301, 342, 378, 379, 508
莫日格策76
莫洛托夫78, 371—373, 429, 604—

609, 611, 646, 660许光达566, 580许明539许建国537许思华516许宝驹
478郭玉兰76
郭沫若397, 449, 487, 489, 499, 517, 519
郭洪帘274, 307郭述申274
郭峰284, 289, 290, 293, 308, 334,
336-341, 344-346陈丕显209, 220, 221, 537陈正人158, 163, 176, 275,
305, 306,
310陈永箴543
陈企霞504, 523—525, 527—529, 531陈伯村289, 339, 341, 345, 346陈
伯达14, 44, 80, 85, 111, 113, 155,
158, 163, 176, 184, 205, 209, 332,
379, 442, 443, 542陈希云241陈其尤562
陈叔通202, 204—206, 253, 255,
270, 443, 449, 452, 668陈坤532
陈泊532陈建邦543陈郁371
陈家康371, 604, 622陈曼云543陈国棟173陈寅恪491
陈云16, 48, 56, 94—101, 103, 108, 117, 120, 133, 134, 141, 157,
171, 188, 189, 205, 209, 210, 218, 229, 240, 244—246, 275, 282
—284, 300, 301, 311—315, 319, 322, 323, 328, 329, 338, 346,
348, 353, 362, 363, 370—374, 376—381, 389, 418, 422, 428, 443,
449, 526, 540, 544—546, 622, 643
陈铭珊130
陈毅48, 132, 190, 218, 314, 327, 333, 343, 449, 535, 537, 538,
546, 574, 579, 587, 622, 643, 655
陈赓568, 580, 610
陈锡联566
陆巴特尔613
陶鲁笱42, 177
陶铎300, 303, 305, 306, 308-310

章乃器98, 103, 202—204, 253

章伯钧253, 263, 452

章汉夫622, 667

麦克米伦666

麦克阿瑟654, 655

麦金斯620

傅大章52

傅作义253, 445, 449

杰塔623

杰苏查623

卡西607, 613

单位制度19, 470, 471

乔立青543

乔冠华500, 501, 604, 622, 667

奠边府战役610

富马635

彭一湖170—172

彭柏山502, 516

彭真48, 157, 190, 205, 219, 231, 281, 300, 301, 304, 326, 328, 344, 350, 361, 378, 418, 449, 539, 643

彭德怀48, 157, 193, 266, 276, 301, 311, 312, 314, 315, 348—350, 352, 353, 378, 418, 449, 570—574, 578, 579, 585, 587

彭燕郊516

扬帆340, 531—533, 536—539, 541—544, 549, 550

斯大林12, 13, 48, 49, 51, 52, 54, 68, 70, 71, 77, 114, 160, 300, 350, 353—358, 371, 372, 428, 429, 436, 438, 439, 443, 548, 555,

648—654

斯巴克607, 608斯塔列茨623, 624斯图加廖夫431斯图普657曾山98, 119, 281曾卓516

朝鲜30, 276, 348, 349, 368, 371, 380, 387, 389, 429, 437, 570, 572, 583, 591—593, 599—609, 613, 614, 617, 621, 629, 636, 637, 641, 645,

646, 652, 655—657, 659, 660, 663,

664, 666湖北省委51, 180, 194, 259, 260汤蒂因221

无产阶级专政12, 18, 19, 28, 64, 110, 235, 295, 437, 466—468

程子华137, 274

程潜253, 443, 449

粟裕48, 371—373, 580

肃反运动477, 548, 549, 551, 553—556, 558, 559, 562—564

舒日信543

舒芜499, 500, 502, 504, 513, 514, 517, 520

华北局40, 41, 43—45, 89, 99, 147,

279, 304华北财委240

华东局99, 260, 276, 463, 531, 533,

535—537华南分局153

菲律宾605, 619, 620, 629, 634, 635,

637, 638街道办事处470—472费多托夫431贺晋年336《开罗宣言》

652, 654云南省委196, 260冯雪峰481, 483, 484, 496, 499, 500,

504, 525, 528黄子文274黄作梅623, 624

黄炎培169—172, 218, 253, 443,

445, 449黄长水202—204, 208黄景荷543

葛华604, 622, 661董镇622恽逸群543

奥地利600, 623, 648

爱森堡68

新加坡601, 637, 638

新民主主义1—3, 5, 6, 8, 11, 12, 14, 15, 21—26, 28, 29, 31, 32, 34, 36, 38, 42, 44, 51, 52, 56—62, 72, 79, 88, 109—111, 201, 236, 244, 245, 252, 257, 264, 266, 273, 279, 284, 286—289, 292, 295, 298, 325, 347, 369, 454, 455, 465, 466, 507

「新税制」15, 19, 237, 239, 241, 244~248, 270, 273, 281, 284—286, 295, 391, 464

新经济政策3, 22, 25, 64, 66—69杨奇清517, 622

橡尚昆43, 48, 157, 184, 185, 244, 275, 283, 285, 294, 300, 311, 317, 319, 326, 328

杨森274

杨显亭76

万隆会议599, 617, 619—621, 633,

634, 636, 637, 664—666, 669叶公超655叶季壮622叶若夫431叶钟英5431董慧542—544

资本主义工商业12, 16, 46, 51—53, 57, 58, 61, 63, 135, 142, 201, 205—214, 216—219, 223, 224, 231—233, 244, 246, 249, 253, 255, 258, 296, 309, 382, 412, 416, 423, 449, 455资产阶级唯心主义〕9, 477, 485,

489, 496贾柘夫275, 281, 378, 379, 381贾植芳516, 521路翎501, 502, 504, 508, 515农村工作会议57, 87, 112, 148, 150,

161, 172, 176, 177, 179, 296, 299农村集体化制度19, 470, 474〈农业十七条〉409, 412农业生产合作社9, 11, 17, 39, 41—44, 50, 52, 76—79, 84, 90, 110—116, 142, 145—152, 154—156, 158, 159, 161. 163, 165—168, 172—174, 180, 189, 194—198, 219, 233, 280, 297, 325, 382, 383, 385, 419, 446, 474, 550「农业社会主义」42, 310达浦生622达达林则432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449过渡时期总路线1—4, 6, 13, 14, 18, 32, 56—58, 63, 70, 72, 73, 102、103, 109. 110, 128, 129,

139, 145, 146, 151, 181, 200, 234, 237, 245, 246, 249, 251, 252, 255, 256, 258, 259, 263, 270, 273, 285, 296, 304, 317, 347, 348, 367, 382, 450, 455, 465, 480, 575, 576雷任民604, 642雷英夫604
雷福德659顿哈623鸠山一郎642, 643

十四画

廖承志545, 546, 622, 641

廖鲁言7, 80, 85, 111—114, 155.

158, 163, 173, 176, 177荣毅仁61, 129, 202, 204, 207, 221,

225, 227, 228满涛516熊复506, 507福建省委196绿原508, 515, 516维辛斯基371, 372蓓莉623

赫鲁晓夫13, 353—358, 429, 649—

651赵子辉543

赵家梁302, 303, 305, 307, 341赵紫阳2, 545赵黑孩76

赵德尊294, 308, 334, 336—341. 344,

346赵铮543远藤三郎643齐燕铭281

十五画

刘人寿543

别少奇11—16, 18, 23, 26, 30, 31, 37, 38, 41—43, 46, 48—50, 52, 55, 56, 58, 62, 136, 140, 154, 155, 157, 158, 160, 161, 176, 187, 209, 211, 212, 218, 219, 229, 234, 250, 262, 273, 275—281, 283, 284, 286—288, 290, 291、293—306, 309—320, 322, 324, 325, 328—332, 338, 341—345, 347—349, 351, 352, 354, . 155. 359—365, 381, 405, 410, 415—420, 422, 428, 438, 439, 443, 447—450, 453, 463, 467, 508, 511, 612, 642, 643, 652, 661

刘世楷563

刘志丹273, 274

刘亚楼306, 308, 310. 371, 566

刘建勋176
刘国钧130
刘雪苇515, 516
刘景范281
刘瑞龙112
刘靖基129
刘晓532, 545
刘鸿生227
刘澜濂41, 43, 44, 99, 102, 175, 300,
301, 351, 378广东省委182德卡斯特莱610德国367, 540, 600, 648, 659
乐松生218欧阳庄516潘梓年487
潘汉年531—534, 537—550鄞思516邓力群420
邓子恢14, 17, 60, 80—87, 89, 109, 111—113, 154, 155, 157—161,
163, 164, 172, 173, 176, 177, 179, 183—186, 191, 193, 201, 248,
276, 282, 301, 378, 379, 449
邓小平1, 16, 48, 98, 101, 103, 157, 160, 183—185, 189, 205, 209,
229, 240, 245, 276, 281, 282, 298, 301, 311—315, 319, 322, 324,
327, 328, 333, 334, 338, 340, 342, 343, 349^350, 353, 378, 379,
381, 405, 443, 449, 511, 537, 545, 587
邓拓481, 487
邓国章76
邓华308
鲁煤515
鲁藜515

十六画

冀沔516卢汉564
茧劲光275, 566, 580
萧华308, 566, 574

赖若愚308

赖传珠574

赖嘉文600, 609, 658

《选举法》442

辽宁省委180, 194, 346

钱俊瑞281

钱学森668, 669

霍士廉165, 166

霍林沃思356

龙云449

十七画

优先发展重工业16, 367、369, 386, 387

戴尔特尔61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69, 71, 294

薄一波3, 14, 15. 19, 21, 41, 43, 48, 98, 108, 137, 171, 225, 237, 240—242, 244—248, 268, 270, 272, 279—281, 283—287, 295, 298—304, 333, 343, 344, 346, 350, 361, 370, 378, 389, 391, 418, 422, 423, 436

薛迅109

薛若梅543

薛暮桥2, 4, 378

谢子长273, 274

谢光宝615

谢富治542

谢韬508, 515, 516

谢觉哉275

赛福鼎·艾则孜449

「舆论一律」19, 235

锺步云623, 624

锺赤兵566

十八画

粮食统购统销75, 90, 99, 103, 104, 106—109, 111, 118, 145, 152, 155, 156, 167, 173, 174, 187, 259, 260, 290, 305

聂洪钧274

聂荣臻48, 370, 449, 571, 574, 578,

579, 587萨纳尼空609, 613蓝翎480, 482, 485, 524医疗卫生事业404魏建功487

十九画

罗布逊一布朗613罗伯逊613, 659罗青长532, 539罗洛516罗飞516罗舜初371

7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19[〃]—19551[^]向社会主义过渡

罗瑞卿48, 335—338, 534, 535, 539,

549, 550, 553, 554, 559, 566; 580罗荣桓449, 579, 587罗慕洛620, 629, 63 《638藤田藤太郎643谭崇安543

谭震林99, 101, 157, 158, 160, 163—165, 167, 172, 176, 286, 304, 333, 34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1, 72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86, 88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322, 325

〈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

288关露543

二十画

严文井504严斐德623, 624萧甸515苏加诺625, 635苏拉瓦底635—637苏纳约633「苏区党」310苏达利科夫431

苏联10.12, 26, 35, 37, 40, 48, 51, 63, 68, 70—72, 76—78, 83, 97, 176.

184.212, 235, 236, 276, 307, 311.325, 331, 348, 354—357, 359, 363, 365, 367, 369—380, 382, 385, 386, 390, 395, 398, 399, 406, 424, 426—436, 443, 540, 563, 569, 571, 575, 577, 580, 583, 592, 598—600, 604—607, 609, 611, 614.615, 617, 620, 621, 625, 641, 645, 646, 648—654, 659-661, 666苏联专家276, 373, 390, 427—436饶漱石13.48, 162.273, 276, 282, 286, 288—291, 294—296^301, 311, 313—315, 319, 320, 322, 329, 333—335, 337—341, 343, 345, 349, 360, 362—365, 378, 463, 532, 533, 535—539, 541, 542, 548, 550饶兴礼76

党内资产阶级思想244, 248, 249, 273

党政辟系460, 463

党组干事会281-283, 462, 464, 465

顾征南516顾维钧659

赎买政策202, 206, 212龚育之19龚澎604

龚澎 604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刻 1949—1981，总约六百万字 •是目前最具规模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著述

- 十余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家 • 历时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历史纪录 • 通史与专题结合；注重国际与国内重大历史事件关联 • 揭示中央决策与地方、基层之间的互动
- 倚重档案、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

’-i 细

口、二

「把当代中国惊心动魄的岁月转化为历史著作 •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普追愿望也是对中国历史学家的考剧。嗯序。金观涛)

第二卷

向社会主义过渡—印国经济四社会的物型 n953—1955)

林蕴晖着

j

h, . . . ,

-rf/’

1953 年至 1955 年 • 在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期间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变革，都是以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主线而展开。随.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 • 自 1980 年代后期开始引起了人们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反思。作者依据历史文戏和档案数据，对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以及由此引发党内的阁钊风波和「高饶事件」 • 以至实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意

: 艳 # 驾望霭献嘿捺, 尸近—)、—州

ISB 闷, 7 乙—, 8 已—17e7 物之一己

’’’ j’ d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也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總序·金觀濤)

- 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總約六百萬字，是目前最具規模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
- 十餘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歷時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注重國際與國內重大歷史事件關聯，揭示中央決策與地方、基層之間的互動
- 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

第二卷 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 (1953–1955)

林蘊暉 著

1953年至1955年，在共和國歷史上被稱為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期間在中國社會的一切領域——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所發生的變革，都是以毛澤東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為主線而展開。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提出，自1980年代後期開始引起了人們對過渡時期總路線進行反思。作者依據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對中共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以及由此引發黨內的「倒劉」風波和「高饒事件」，以至實施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出現的意識形態分歧，作了詳盡的敘述和分析。此外，對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訂、蘇聯給予的援助和貢獻，以及這一時期的國防建設和外交活動，也有精闢的論述。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第三卷・1956-1957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思考與選擇

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

沈志華 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三卷

思考与选择

——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
(1956—1957)

沈志华 著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3

*Reflections and Choice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1956—1957) (in Chinese)*

By Shen Zhihua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全球发行及总代理：中文大学出版社

<http://www.chineseupress.com/>

BookinG 制作

「把当代中国惊心动魄的岁月转化为历史著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愿望，也是对中国历史学家的考验」。（总序·金观涛）

-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总约六百万字，是目前最具规模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著述
- 十余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家，历时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历史纪录，通史与专题结合；注重国际与国内重大历史事件关联，揭示中央决策与地方、基层之间的互动
- 倚重档案、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

一套资料翔实、忠于史实、摒除党派观点的中国当代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约六十万字、八百页；完整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至 1981 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全貌。

「这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作者不但一律以中俄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为基本原料，而且也大量地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每位作者都以批判的态度检查史，对于史料中互相冲突记载，详加考订，以建立最可信的史实。」

——余英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退休讲座教授、
克鲁格人文奖得主

「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后，不仅发现其叙事详尽，更发现其已突破中国官方机构对资料的垄断和保卫，有丰富的文献档案以为基础，史实的可信度极高。每册独立，各有作者，但前后仍有脉络可循，容易阅读。这一套大书的出版是这几十年来近代史学界的一大盛事。」

——陈永发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点：

- 十一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家合力撰写：各卷作者均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国史研究专家，多次研讨，分工撰写，历时七年。
- 全景式历史纪录，通史与专题结合：既有反映高层决策和斗争的重大事件揭示，又有表现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社会风貌和流行思潮的生动画面；各卷独立成篇，又首尾相贯。

·倚重档案、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以中央及地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重大史实作出详尽考订和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目前最具规模、足以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未来走向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著述，是中外各图书馆、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学者和教师的必备参考用书。

十卷目录及出版七卷的内容和作者简介：

第一卷 断裂与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49-1952）

（即将出版）

杨奎松

第二卷 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

1953年至1955年，在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期间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变革，都是以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主线而展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引起了人们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反思。作者依据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对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由此引发党内的「倒刘」风波和「高饶事件」，以至实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作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此外，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苏联给予的援助和贡献，以及这一时期的国防建设和外交活动，也有精辟的论述。

林蕴晖，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学者，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共和国年轮（1953）》、《刘少奇之路——辅助建国（1949-1956）》、《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并主编《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合着《凯歌行进的时期》（1949-1989中国系列之一）、《人民公社狂想曲》；并主编《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一至二十一册。

第三卷 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56-1957年被称为「多事之秋」。作者充分利用十几个省市的档案、俄国解密档案、当时的报刊杂志、当事人的口述记录和回忆录，以及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的目标和结果、苏共二十大在中国的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中共八大的作用和局限，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整风反右运动的起因、转变和结局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过程，作出翔实的描述和分析。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名誉研究员。研究兴趣为苏联史、冷战国际史，对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史有专门研究，代表著作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苏联专家在中国》、《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和论文多篇。

第四卷 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

究竟毛泽东提出的超英赶美战略，如何在中共高层取得统一，又何以得到基层群众的积极响应？一再缩短的赶超时间表是如何编织出来的？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有多少中共省级领导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的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为甚么要拿粟裕开刀？1959年在庐山罢黜彭德怀的真实原因何在？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为挽救危机，中共中央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本卷依据第一手资料，作出详尽叙述和剖析。

林蕴晖，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学者，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共和国年轮（1953）》、《刘少奇之路—辅助建国（1949-1956）》、《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并主编《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合着《凯歌行进的时期》（1949-1989中国系列之一）、《人民公社狂想曲》。

第五卷 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

从1962年起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是一个色彩纷呈、复杂变幻的时段，有人称其为「变局」。这种「变局」，是在大跃进运动遭受

重大挫折、外部世界对中国施加愈来愈大压力的局势下，中国人在理论、观念、政策作出一系列求变求存的调整和应对而发生的。它根本改变了 60 年代中国历史的走向：那些最为重大、最为精彩的政治变动和思想流转，都发生在这个时段；同时，它又开启了更为激烈变动的十年。

钱庠理，毕业于国内重点综合性大学历史系，史学硕士。长期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著有多部关于毛泽东研究和当代中国历史的著作。

第六卷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本卷简明地描绘出 1966 年 5 月至 1969 年 4 月文化大革命的全景图像与过程：从 1965 年底批判《海瑞罢官》至 1969 年 4 月召开九大期间，文化大革命从发动到形成高潮，从夺权到天下大乱，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到最后召开九大。作者批评文革研究中不实事求是、为尊者讳、粉饰历史、大而化之等弊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史料出发，力求还历史之本来面貌。

卜伟华，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曾编辑多种中共党史数据丛书，合着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等书；也是最早从事文革研究的学者，发表过〈红卫兵运动与「文革」前的学校教育〉、〈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北京红卫兵运动大事记〉等论文多篇。

第七卷 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

（即将出版）

高华

第八卷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

1972 年至 1976 年文革结束，发生了一系列至今仍众说纷纭的重大政治事件，例如毛泽东曾考虑哪些人当接班人？周恩来为甚么要做痛苦的反省？中阿、中越为甚么翻脸？谭甫仁中将为甚么被刺杀？公安部长李震是自杀还是他杀？毛是否因「红都女皇」事件要把江青

撵出政治局？周恩来对美国人说了些甚么而被批判？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是防备谁？批邓是毛的决策还是「四人帮」的挑拨？「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是毛的遗嘱吗？谁首倡粉碎「四人帮」斗争？「四人帮」有没有政变计划？作者利用档案数据，一一严肃考辩，揭示个中真相。

史云，在重点大学毕业后历任大学讲师、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问题的教学与研究，特别专注于 1970 年代以来的中国研究。发表过多种有关中国当代经济体制变革、周恩来经济思想、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大革命人物的研究著述。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冷战国际史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史。主编有《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等书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第九卷 革命的终结——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6-1978)

(即将出版)

韩钢

第十卷 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 (1979-1981)

文革结束后，中共怎样清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重新阐释自己的意识形态，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找到正当性？人们的思想如何不断获得解放？数以千万计的冤假错案如何得以平反？如何促成华国锋下台，确立邓、胡、赵新体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怎样起步的？改革为甚么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党内党外何以会出现民主化思潮？中共提出政治改革又何以迅速地退缩？对于历史大转轨中频繁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争论和冲突，作者都尽可能依据第一手资料作出详尽叙述。

萧冬连，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当代中国史学者。主要著作有：《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共和国年轮（1961）》；合着有《强国的方略——中国五十年社会主义战略的演变》；合编有《中国改革大词典》。

总序：世纪视野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金观涛

经过差不多近七年的努力，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终于分批出版、与读者见面了。对我来说，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一直把能否出版一套忠于史实、观点开放的中国当代史视为对中国历史学家的考验。

把当代中国人经历的惊心动魄岁月转化为历史著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愿望。我们这一代人和人民一起经历了苦难，又见证了启蒙时期思想的风雨雷霆，这一切理应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然而我深知这一工作又是多么困难。

首先，作者必须掌握尽可能完备的史料，特别是档案文献。近年来，出版了大量回忆录和口述历史数据，但是很多重大事件以及与中共高层决策有关的档案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为写作带来困难。在历史学家的写作中，除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史料外，更为复杂和重要的，是对史料的辨伪和确定其在决策过程中起过的作用，只有少数长期关注该领域的专家才具备这种能力。十分幸运的是，本套书的撰写正是依靠了这批有深厚档案功底、又长期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家。他们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及市县档案资料馆，搜集整理档案并对史料辨伪。史料之丰富、辨析之充分，正是本套书的重要特色。

历史研究者的目标是追求历史的真实，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搜集史料、整理档案只是第一步。历史学家在研究和写作中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如果不能做到对历史场景的同情了解，不能在内心重演历史事件展开过程以及理会当时支配事件展开的普遍观念，就无法接近历史的真实。本套书以1949年至1981年中国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论述主线，这三十余年正是毛泽东思想支配中国的时期，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令人很难理解的现象，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由于本套书的作者都是中国近几十年巨变的亲历者，完全了解这

些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氛围，这就使他们具备了某种比西方史家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优势。当然，作者要发挥这种优势，仅仅停留在感性阶段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某一种意识形态中走出来、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以获得超越的视野。开始注意到支配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与重大社会事件的互动，特别是这些事件是如何从中央决策到地方、再到基层展开的，是本套书的另一特色。由于各卷作者是独立写作，分批出版，虽然现在对全套书作出整体评价尚为时过早，但是，我可以不无自豪地说，中国人终于开始为不寻常的二十世纪中国撰写大型历史著作了。

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不设主编、以便各位作者在写作时有更大的自由，并表达多元的价值。由此带来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统一风格，使十卷著作组成连续的整体。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动笔之前充分讨论各卷内容，每年举行一到两次工作会议，切磋写作中碰到的问题。至今，我仍不能忘怀一次又一次的国史写作讨论会。窗外是北国的寒冬，大家众集在不大的会议室中不分昼夜地讨论，最后形成会议纪要。这一场景使我想起 1970 年代末青年时代和朋友的彻夜长谈。很多时候，大家就某一观点，细节甚至是提法，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使我十分感动的是，无论在讨论中发生多大的争论，甚至是立场和价值上的分歧，最后都能在忠于历史事实之上得到统一。根据时段，本书大约以两三年为一卷，每卷由一位或两位作者撰写，而其它作者都把自己对该时段的见解和史料提供给该卷作者，整个写作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今日中国学术界罕见的真诚合作精神。在此意义上讲，这套书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

组织编写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我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所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这套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沈志华和李丹慧夫妇，从确定撰写计划到寻找适当的作者以及整体工作的协调，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其次，我要感谢青峰和先后在《二十一世纪》编辑室工作的同事黎耀强先生、林立伟先生、张志伟先生、朱敏翎小姐和张素芬小姐。他们在青峰的带领下，以巨大的热忱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投入编辑出版工作，否则，如此繁重而浩大的编辑出版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还要感谢中大中

国研究服务中心为本书作者提供的支持和热情周到的服务。最后，我要感谢方正兄，该书从酝酿到出版，一直得到他在精神上和各方面的支持。他虽已退休数年，但仍念念不忘这套书的出版，认为它对香港中文大学有重重要性。在这些中大同事身上，我仍可以感受到高锟教授任中大校长时期那种注重中国研究在当今世界意义的「中大精神」。

这套书出版之时，我也到达退休年龄，将开始人生的新阶段。我想指出的是，由于可以看到的档案和其它种种限制，这套书只写到1981年。如果不谈此后发生的波澜壮阔的80年代启蒙运动，以及出此引发的1989年震惊世界的事件，我们仍无法理解今日中国和世界。在这一意义上，仅仅由前十卷组成的二十一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不完备的，写史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从来就有忠于事实和敢言的历史传统，但很少有史家为当代写史，故这套书的出版是一种新现象。它说明中国历史学家已走出仅仅用春秋笔法褒贬益损，并展示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历史反思意识已经产生，并开始指向新的深度。我期待着后继者。

200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录

总序 金观涛

导言

第一章 早春时分：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一 知识分子问题：中共的希望及其面对的矛盾

- 1 毛泽东筹划经济建设高潮
- 2 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
- 3 会议的筹备与调查研究
- 4 各地调查的反映及回避的问题
- 5 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及思想变化

二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与知识界的最初反应

- 1 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及其新政策
- 2 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局限
- 3 知识分子的双重反应

三 吹向知识界的春风：新政策的实施

- 1 知识分子新政策在全国的实施
- 2 中国第一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第二章 以苏为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

一 苏共二十大的新方针

- 1 苏共二十大纲领：对外政策
- 2 苏共二十大纲领：对内政策
- 3 秘密报告与批判个人崇拜的由来

二 中共中央与非斯大林化

- 1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波
- 2 中共中央迅速传达秘密报告

- 3 毛泽东如何看待斯大林问题
- 4 中苏两党并无任何重大分歧

三 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

- 1 毛泽东号召「全面学习苏联」
- 2 中国人对苏联式道路的反思
- 3 论「十大关系」及其历史局限

第三章 毛周分歧：批右倾保守与反急躁冒进

一 反右倾保守与「多快好省」

- 1 「进入社会主义」的喜与忧
- 2 经济建设上反右倾保守主义
- 3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 4 计划指标的修改和膨胀

二 从反「右倾保守」到反「急躁冒进」

- 1 周恩来等人的隐忧和警告
- 2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分歧明朗化
- 3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方针的提出
- 4 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基调
- 5 《人民日报》6月20日社论

三 继续反冒进与削减计划指标

- 1 不断反复的二五计划草案
- 2 莫斯科的决定意见
- 3 压缩1957年的计划指标

第四章 扩大民主：「双百」方针和两个「万岁」

一 「双百」方针的由来和知识界的反应

- 1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
- 2 陆定一谈「自由」及其限度
- 3 知识界的最初反映
- 4 如何开展「百家争鸣」

二 新闻改革与学术界的活跃

- 1 尝试改进新闻工作 .

- 2 为「争鸣」开道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 3 逐渐活跃起来的学术界

三 沐浴春风的文艺界

- 1 作协理事会与文艺政策松动
- 2 戏曲领域的「百花齐放」
- 3 文艺界对教条主义现象的批评
- 4 抨击官僚主义对文学创作的干预

四 民主党派春天

- 1 民主党派还需要存在吗？
- 2 民主党派可以监督共产党吗？
- 3 民主党的响应和政治诉求
- 4 主动请民主党派办报纸
- 5 被搁置的中央统战部指示

五 民主的扩大及其限度

- 1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 2 专政也可以「宽一些」
- 3 自由和民主的限度

第五章 八大路线：给国人带来的希望和思考

一 八大的筹备和召开

- 1 八大的筹备与主要文件的形成
- 2 预备会议的「三大工程」
- 3 八大的召开及其特点
- 4 八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

二 八大的路线和成果

- 1 政治报告与政治决议「悬案」
- 2 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方针
- 3 改进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设想
- 4 对国家民主和法制的呼吁

三 党内民主和个人崇拜问题

- 1 执政党面临的主要危险
- 2 关于群众路线和党外监督

- 3 实行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
- 4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

第六章 多事之秋：波匈事件及中国的作用和反应

一 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的作用

- 1 危机前中国、苏联、东欧的三角关系
- 2 波兰危机：中共第一次当面指责苏联
- 3 匈牙利危机：毛泽东提出的主导性意见

二 中共高层对波匈事件的思考和讨论

- 1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 2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三 波匈事件在中国社会引起的反响

- 1 社会反应及「少数人闹事」
- 2 中共采取的让步和安抚措施
- 3 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第七章 发动整风：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 毛泽东决心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 1 党内整风的最初倡议
- 2 准备开展整风运动

二 开展党内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

- 1 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讲话
- 2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
- 3 根本对立的党内外反应

三 毛泽东南巡讲话和整风再动员

- 1 党内对整风运动的不同理解
- 2 毛泽东在南方的整风再动员
- 3 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开展整风

第八章 引蛇出洞：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运动

一 变化：毛泽东在开门整风中的警觉

- 1 毛泽东广泛邀请非党人士提意见

- 2 民主党派座谈会与知识界的鸣放
- 3 毛泽东感到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二 阴谋：在「引蛇出洞」策略下的事态发展

- 1 毛泽东亲自策划的「阳谋」
- 2 受到鼓励的社会大鸣大放
- 3 学运风潮与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 反击：毛泽东决心变党内整风为全面反右

- 1 毛泽东感到了真正的威胁
- 2 寻找阶级斗争的新突破口

第九章 聚而歼之：阶级斗争再次成为焦点

一 全面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 1 反右群众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 2 青岛会议与批判温情主义
- 3 群众反右斗争面面观

二 在反右旗帜下开展的全民整风运动

- 1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任务
- 2 反右与全民整风运动
- 3 他们是这样成为右派分子的

三 阶级斗争再次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 1 对八大政治路线的彻底背离
- 2 对右派分子处理的原则和结果

第十章 东风吹来：毛泽东在莫斯科指点江山

一 中苏同盟的蜜月及其隐忧

- 1 苏联对华经济援助
- 2 毛泽东为赫鲁晓夫雪中送炭
- 3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投桃报李
- 4 中苏同盟内部的隐患

二 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

- 1 中共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 2 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3 毛泽东即席发言语惊四座

三 毛泽东决心发动经济大跃进

- 1 莫斯科会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计划和安排
- 2 毛泽东再次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反右倾

后记

附录

大事记

参考文献

索引

导言

1956—1957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年度，其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这两年的反差极大。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中国，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国人曾寄予无限希望，而中共虽经历思考，最终却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所谓希望，是说1956年初基本完成所有制的改造以后，中共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动员和团结社会各阶层，全力投入经济发展，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富强、社会和谐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提出的宏伟理想和奋斗目标，国人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所谓思考，是说当中国宣布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针对在苏联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批判，特别是揭露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在创建这种社会主义时所犯的种种错误。苏共中央的创举令很多共产党人深思：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是不是正确的或唯一的社会主义样板？苏共提出的问题更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怎样避免苏联已经犯过的错误，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选择，是说波匈事件掀起的震动社会主义世界的风浪刚刚停息，1957年夏天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派运动，又把整个中国社会推向

了「内乱」。中共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法宝」，使人们再次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其结果，「百花齐放」变成一花独放，「长期共存」变得名存实亡。知识分子消极了，民主党派沉默了，肯于思考、热心

报国的人群失望了，全国上下万马齐喑。为了巩固政权，中共最后决定还是回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并以此作为执政党今后的行动纲领，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体制由此确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

为甚么 1956 年的希望和期待会搏变成 1957 年的失望和消沉；为甚么中共八大在 1956 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 1957 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为甚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为甚么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失败的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3 本书试图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史料，描述这一历史过程。

笔者的思考和写作，追寻了两条并行的线索：其一，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其二，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估计。作为一个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这是中共在 1956 至 1957 年所面临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种认识和估计的结果，构成了他们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

一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原本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人类社会发 展境界的一个大体设想，后来经列宁和斯大林的实践，逐步形成了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听有共产党人便以此为奋斗目标。因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按照共产主义的理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过，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共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败落的思考，以及同黄炎培关于国家兴亡周期律的讨论，充分表明他对政权得而复失这一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高级干部内心考虑问题的思路，根本上还是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和「打天下’坐天下」一套理念的支配。革命具有惯性。中共是靠「枪杆子」打天下的，这种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依赖同样的

手段坐天下，即采取革命的方式巩固政权，改造社会。藉助朝鲜战争的特殊环境，通过武力镇压和群众连动的强制手段，中共基本完成了巩固新政权的几个主要任务：清除反动势力、变更所有制和改造社会及人们的思想。

到 1956 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制性质变了一—官僚买办经济、地主经济和资本家经济已不复存在，社会成份变了一—暗藏的特务和反革命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富农没有了，也就是说，国内的敌对势力基本不存在了。这时，不仅工人、农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就是大多数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也对共产党人心悦诚服，认为他们的确是中国社会的精英和栋梁。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么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这一点，中共领导人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连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其它一系列方针，甚至考虑采取某种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在这个基础上，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中共的现时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从革命转向建设，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即取得执政合法化必要性的初步认识。

然而，这种认识似乎还是下意识的和模糊的。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中共的思路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引起的风波，特别是匈牙利动乱的后果，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看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是有可能丧失的。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与国内的反革命力量相呼应，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国内根源则在于执政党沾

染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及其所采取的错误的方针政策，由此引发了人民大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其中，最令毛泽东和中共感到震撼的是后者。在中国，经过镇反、肃反和一系列改造运动，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即使还有一些残余力量，也不会翻起大浪。因此，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于是，毛泽东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同时决定开展整风运动，采用民主的和开放的方式，祛除一些共产党干部执政不久便沾染的不良作风和旧弊陋习。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反动势力已经基本清除，知识分子也表示臣服了，就不会再有人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提出挑战。同时，在中共干部中，贪图享受、追求名利的思想正在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现象日益严重，仅靠党内思想教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决定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且亲自在党内外进行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在内的一批热心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有识之士确实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仗义执言，针砭时弊，大胆说出了许多过去不敢讲而共产党又不爱听的话。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有些批评的矛头竟然指向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并公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方式提出质疑。看来，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想要翻天的还大有人在。毛泽东决定进行反击，而这个决定又恰恰迎合了党内基层干部对整风运动中诸多言论和做法的不满情绪。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革命的暴风骤雨再次降临中国大地。

在这个背景下，八大的政治路线遭到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重新被看作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在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经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最后得到解决。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很容易做到。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本来就是中共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反右派斗争很快取得了完全胜利。此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方面，并且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不过，这次开始的经济建设高潮，藉助反右派的东风，继续采

取了群众运动的革命方式。至于阶级斗争，到「大跃进」失败之后便转入了党内，后来就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二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及中苏关系的估计

50 至 60 年代中国的发展，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和不可分割的联繫。中国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以及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意义，对于苏联来说，主要是一个安全问题，斯大林考虑的是利用中国作屏障，解除来自东方的美国威胁。对于共产党的中国来说，巩固政权，组织社会，发展经济，这一切都需要依靠苏联的帮助。况且，就长期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在主观意识中，中共除了向苏联「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外，没有别的选择。

毛泽东作出与苏联结盟的决定，还有一个逻辑——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个榜样，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俄为师」。中共长期在农村和山沟里坚持武装斗争，没有管理城市和国家经验，更不知道如何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所以，只能学习苏联。1952 年底，国内外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毛泽东便主张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提出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不过，斯大林并不认为中国可以立即走上苏联的道路。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差得很远：你那裏刚刚把土地分给农民，怎么实行全盘集体化？你连起码的工业基础都没有，怎么实行计划经济？斯大林一再告诫毛泽东，不要急于向苏联学习，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慢慢来。

斯大林去世以后，莫斯科新领导层一方面开始着手处理在斯大林时代积重难返的种种社会危机，一方面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调整对华方针，向中国提供全面的援助。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使得中国从国家机构的设置、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种管理制度的形成，直到各大城市的规划以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大量照搬苏联的经验。但是，正在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大厦的时候，苏

共召开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同时，毛泽东也感觉到苏联模式存在着弊病，提出「十大关系」问题，开始考虑走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思考都没有触及到当时社会主义所存在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层面的根本问题，但这种思考无疑已经蕴含了未来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基础。

1956 至 1957 年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相互支持，取长补短。总体说来，苏联在经济上援助中国：从一五计划的执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直到核武器的研制，赫鲁晓夫向中国提供了巨大帮助；中国在政治上支持苏联：从平息苏共二十大给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带来的冲击，消除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震动，直到在六月事件和朱可夫事件中坚定地支持赫鲁晓夫，毛泽东也为苏联提供了巨大支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毛泽东不满意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做法，不同意苏共把和平过渡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而赫鲁晓夫则认为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多有不妥，对中共带头指责苏联的大国和大党主义也暗中不满。但这些都是枝节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七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以共同对付和战胜美帝国主义，这是他们一致的和首要的目标。莫斯科会议就是中苏合作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经典之作。

然而，随着形势发展，在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却逐步出现了一种隐患，即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敢于出兵朝鲜与美国对阵，又在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的国际风波中镇定自若，指挥有方，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对中共刮目相看，由衷钦佩。更何况斯大林去世以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无论讲革命资历和理论水平，还是讲政治经验和领袖魅力，毛泽东都愈来愈显示出其超人的地位，远非赫鲁晓夫之輩所能相比。于是，随着赫鲁晓夫和苏共屡次陷入在两代领导人交替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危机，在中国党内渐渐形成了一种中共应取代苏共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看法，毛泽东本人也在言行举止中流露出这种情绪。这一点，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表露得最为明显。

不过，恰恰在 1957 年底，苏共的劣势已经走出低谷。赫鲁晓夫本人

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巩固了他在国内的绝对权力，东欧危机的解除使苏联恢复了传统上对那个地区的影响和控制，特别是苏联的经济?步展也在这时显示出辉煌的成就：农业获得战后少有的大丰收，连续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这一切都让赫鲁晓夫感到骄傲，使他更坚信改善与西方的关系，集中精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一方针的正确性，也使他看到了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的光明前途。为此，他在莫斯科会议上洋洋得意地提出了十五年超过美国的口号。然而，毛泽东在此看到的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是社会主义将要很快埋葬和取代资本主义的国际潮流，因此，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更为激进的革命路线，鼓励和支持世界各国进步力量，与帝国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显然，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已经不再适合新的形势需要，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及时修改苏共的指导思想，那么中共就必须站出来，挑起领导世界革命的重担。

，毛泽东感到，中国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为首，唯一欠缺的就是经济实力，他早就憋着劲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不过，毛泽东对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的认识，并没有超出苏共二十大文件指出的范围，所谓避免或少走苏联的弯路，也不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有所质疑。毛泽东所要求的只是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苏联，其方法就是中共所熟悉的大搞群众运动。这种单靠高指针、高速度搞经济建设的方针在1956年下半年遭到周恩来等经济工作领导人的抵制，也受到苏联专家意见的制约，被作为「冒进」反下去了。到1957年情况就不同了，反右派运动以后已没有谁敢站出来唱对台戏，苏联专家的意见也退居次要地位，毛泽东就要大张旗鼓地开始经济跃进了。超英赶美变成了赶超苏联，以后的事情就是要看，到底是中国学习苏联，还是苏共服从中共了。

这就是本书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这裏所谓「思考与选择」，主要指的是中共的思考和选择，因为显而易见，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自然，中共的思考和选择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从决策的角度看，在以往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人民大众可以思考，却没有权利选择。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从人心向背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发展，最

终是要人民选择的。况且，有些时候，作为执政党，他们还是愿意并感到需要倾听人民的声音的，至少中共是这样。所以，本书对 1956—1957 年历史的考察，也同时关注到中国民众和社会对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思考和反应。

如今，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角度来看 1956 至 1957 年这段历史，令人不胜感慨。在中国，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及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国家栋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的社会精英。他们有善良的愿望和伟大的抱负，一心想把中国领上一条走向理想王国的康庄大道。然而，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刚刚迈出第一步便停止了，或者说当时他们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探索。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包括自身思想认识的限制和客观环境的制约，由暴风骤雨般革命时代造就的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习惯于以那个时代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习惯于用那个时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很难否定自我，很难放弃传统的斗争思维和革命方式，很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过去研究者常用「转折」这个概念给 1957 年的中国历史定位，似乎 1956 年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1957 年又转向了另一条错误的道路。笔者以为，这个定位不够准确。首先，1956 年中共主要还是在思考，八大所确定的路线也只是展示了一个前景，至多是刚刚开始起步。其次，1957 年中共的选择并非突发奇想，

而是与 1956 年以前的传统思维和习惯以及 1956 年的思考有着内在的联繫。应该说，到 1956 年初，中共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苏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针，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历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历史确实提供了一个机会。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走向何方，这时需要并有可能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比较，中共领导人也确实开始了探索。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波匈事件，以及中国社会的骚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因真心参与共产党整风而提出的尖锐意见，中共难以承受，终于在 1957 年夏天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所以，这裏不是转折，而是稍有停顿和观望，便沿着中共传统的和熟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就共和国的发展道路而言，真正的转折出现在 80 年代。说句史学研

究者一般不大讲的话，如果一中国共产党在 1957 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并且支持、参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继续广开言路，扩大民主，招贤纳士，改弦易辙，那么一就有可能在社会主义世界看到各国独立自主多元发展、不同模式竞争前进的局面，就有可能在 50 年代的中国出现人们在 80 年代才看到的「转折」。

至于本书所使用的文献史料，有如下几点值得提一下。

第一，广泛引用已出版的楼案文献。

从目前中国的档案管理制度看，一般学者是无法进入中央档案馆的。因此，也就很难通过查阅和疏理高层档案文件，特别是各种会议记录，了解中共的决策过程。不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其它一些中央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大量文献及年谱、大事记等史料集，其来源主要是中央档案馆。这是研究共和国历史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笔者在引用这些文献时注意到：（门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献中，注释特别重要，其中使用了大量档案数据，极有价值。有的文献本身只有几个字，注释却长达几页；不少文献在发表前进行过修改，在编辑时又做了删节，有的有说明，有的没有说明，稍不小心就可能误入歧途。因此，笔者尽量找到原始文件进行比较；在引用重要文献时，需要对比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版本，因其中不仅注释，甚至正文都可能有差别；笔者能够看到的中共文献并不完全，需要时必得靠其它史料补充之。

第二，尽量挖掘地方档案馆的有用数据。

过去，学者对中国的桩案开放政策多有抱怨，感到难以进行历史研究。目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例如，有外交部档案馆引领，部委一级的档案正在考虑解密。特别是近几年，各省市档案馆均已开放，原则上可以任研究者查阅。地方档案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社会生活各方各面、各行各业，虽缺乏中央决策的内容，但是从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互动的角度观察，对于决策的结果及执行情况，却有十分详细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各级党政机构贯彻中央决策的方式和办法，社会基层对国家各项政策方针的反应，不同群体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在这里是应有尽有。只要研究者肯花时间，肯下工夫，就能够观察到整个社会乃至每个细胞的动向。

第三，大量转引过去公开的和内部的报刊数据。

转引当年报刊杂志数据的重要作用无需赘言，笔者在梳理史料时就是逐日对照《人民日报》，从而解决了大量问题。这里主要谈一份极有史料价值的内部刊物——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辑发行的《内部参考》。这份刊物当年是仅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的，其中报道的国内外重要新闻，一般都是公开报纸甚至《参考消息》上都不予刊载的。除了对国外情况的报道外，《内部参考》大量刊登了国内各地区的民情，既有各级党政军和社会团体的工作情况，也有社会各阶层情绪和反应。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这份刊物提供的信息不仅数量极大，而且内容真实，是了解社会基层活动的绝佳材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所幸《内部参考》现在已经成为史料：在海外一些图书馆或数据室都有收藏，并可以大量复印。第四，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料。

目前中国出版的大量回忆录以及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是当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在历史研究中，需要研究者本人找到对历史的感觉，而历史事件发生时身临其境的场景，气氛和当事人的感受，却往往无法见诸于档案文献的白纸黑字。所以，这种感觉在呆板的档案文献中是很难找到的，这就需要依赖当事人的叙述进行弥补。毛泽东过去还有个习惯，他本人召集的一些重要会议，包括政治局会议，不允许做记录。所幸是为工作需要有时与会者可以做个人记录，这些材料也是查阅档案无法替代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吴冷西的回忆录。但是，回忆和口述史料也有一个重大缺陷，很可能因时间久远，记忆模糊，或受到个人情感和立场的干扰，当事人所述情况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有些人写回忆录，有条件核对档案记载，又有平常心态，这比较让人放心。但很多人是单凭自己的记忆或好恶，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引用时特别谨慎，最好是与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比较和鉴别。

第五，充分利用俄国解密的档案文件。

近年来俄国档案解密和利用的情况已为众所周知，其重要性对于研究50至60年代中国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这不仅在于中国此期的发展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受苏联影响甚大，而且在于中国档案资

料的缺陷往往可以从俄国档案中得到弥补。且不说斯大林在世时，中苏两党会谈时，不许中方当场做记录，就是后来有了记录，中国目前公布的也是极少数。例如，在笔者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有关 1949 至 1952 年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和电报共十七件，而目前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四卷本只收入了二至三件。再有，对比中苏双方的记录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时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大量使用俄国档案研究中国史，或许也可以看作是本书在史料引用方面的特点之一。

第一章

早春：中共中，识^?问题会议

1956 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尽管冰雪尚未融化，中国大地已经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襄说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动态。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像一枝报春花，预告了中共领导人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充满理想和信心的蓝圖。

1 近年来关于 50 年代初期共产党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颇多^如谢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争习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7 年第 5 期：王文：1' 建国初期

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当然是要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不过，在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问题向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于执政者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中国的历代君王通过确立儒家学说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规范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又通过科举制度把他们纳入官僚体制，使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步影飡了中国社会，加上科学的发展，其结果使大部分知识分子游离于政府和统治者。共产党掌握政权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使这

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俯首听命，为新社会服务。经过 1950—1955 年几番思想教育和改造运动，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大部分表示了归顺的意愿。但是，他们的情绪受到压抑，内心并不满意。’当新政权马上要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以实现富国强国的宏伟目标时，这种状况自然令中共领导人感到担忧。于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就不得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本章围绕 1956 年初中共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提、过程和结果，讲述并分析中共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变化和政策调整，以及这次调整的效果和知识分子的反应。2

一知识分子问题：中共的希望及其面对的矛盾

要了解 1956 年初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背景，必须清楚毛泽东正在筹划的一个新的宏伟蓝图，这就是在三大改造即将提前结束的形势下，如何推动大规模建设高潮的到来，在中国提前实现工业化，提前建成社会主义。

1 毛泽东筹办经济建设高潮

1955 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兴起以后，毛泽东就提出：「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3 毛泽东所说的「根本变化」，是指「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在他的把握之中，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全力投入经济建设了。因此，还在 1955 年秋冬，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就开始从改造转向建设。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一化三改」任务，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然而，所有制改造任务即将提前完成，而工业化任务却远未实现。无论毛泽东对迅猛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多么欣喜，有一点却是清醒的：中国仍旧「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不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中国就算不上建成社会主义。他希望同样运用反对「右倾保守」的方法，推动一场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

济文化建设的高潮。

3 毛泽东：《毛，东选集》’第五卷 I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1’ 页 222。

4 李慎之：〈毛主席是甚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载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1’ 页 118。

毛泽东加快发展的思想，还有他国际战略方面的考虑。毛泽东的眼光不只局限于中国，而是在全球，要在世界上谋得强国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谋求更大的发言权。李慎之回忆说，1956 年刚开始，毛泽东就指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虽然新华社的人参不透毛的心思，「但是深信毛主席又要有一番新的宏圖大略则是没有疑问的」。4 中国是人口大国，经济小国，一向被人瞧不起。这种状况确实令毛泽东和许多中国领导人不安。还在 1955 年，毛泽东就表露出要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宏愿。是年 10 月 29 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说：

我们的目的是要超上美国，并且要超通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遏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超上美国，超遏美国 I 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象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象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5

赶超美国，是毛泽东这段时间不断重复的话题。50 年代中期出现的较为缓和的国际局势，也强化了毛泽东抢时间搞建设的想法。自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和朝鲜停战以后，苏联新领导人开始推行与西方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东西方冷战白热化的局势得到某种缓和。这也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机会，突破美国的封锁和遏制，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来从事经济建设。1954 年中国出席了解决朝鲜和东南亚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55 年中国推动了葛隆亚非会议的召开，都显示出国际局势的转机。6 特别是 1955 年 6 月召开的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使中国领导人看到了东西方和平共处和以协商方式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可能性。7 1956 年伊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达了这种认识：1955 年是国际和平力量和殖民主义力量「广泛前进的一年」，「要求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和以协商方式来解决国际纠纷」，已成为当代各国人民要求实行和平共处的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8 和平环境在客观上保证了中国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建设，同时，毛泽东对这种和平环境延，锲时间的估计，又成为他提出加速发展、实现跃进方针的依据之一。

毛泽东一向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他关心的是能否在两次战争之间争取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在 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初次见到斯大林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平能够保持多久，他甚至认为只要有三至五年的时间，中国就能恢复经济和稳定局势。斯大林告诉他，十五至二十年不会发生战争。9 然而，斯大林话音未落，在中国的东北部边境便爆发了一场战争，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不得不拖延下来。10 五年过去后，毛泽东考虑的还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和平时间，加快建设速度。

8 《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 日。9 八〇？〇，屯 45，011 上 4329，19-；^

10 笔者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

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11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指示^1955 年 10 月 11 日。

1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 10 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舍铲上的讲话'速记草稿），1955 年 11 月 24 日（以下简称毛泽东 1955 年 11 月 24 日讲话 I。

195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充满信心地说：「目前国际环境是对我们有利的，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有十二年的时间即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11 11 月 24 日，毛在

中共中央会议上又说：「帝国主义不晓得那天打仗」，我们要用「两个五年计划就把这些事情办好，或者不要两个五年计划，五年到七年（少则五年，多则七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造—此外还有工业，重工业~轻工业都加速一点发展」。12月30日和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再次讲到：「我国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战争〕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¹³ 总之，必须利用有限的休战时期加快自己的建设步伐，为可能到来的战争作好物质准备，而且是以一个强国的面貌和地位应付战争。长期以来，毛泽东的这种战争观以及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一直影响着他对经济建设方针的构想。

2 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

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规划」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要加快经济建设，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毛泽东清醒地知道，「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凸显出来。然而，当时的状况是：一方面现有的知识人才远不能满足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大批知识分子不能充分发挥其专长。在一连串的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后，知识界普遍惊恐不安，情绪消沉，而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表示归顺共产党，却始终没有得到政治上的信任。显然，这种状况对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建设极为不利。于是，由周恩来动议并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中共中央决定通过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动员知识界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动议，

来自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利瓦伊汉。早在 1955 年初，周恩来就有过要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想法，¹⁵ 但这个想法显然是与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背道而驰的。直到肃反运动的高潮告一段落，问题才提上了日程。“问题的提出与利瓦伊汉的努力有直接关系。兼当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联

繫民主党派工作的于刚回忆：1955 年下半年，利瓦伊汉决定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统战部近期工作的重点，推动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主同盟，去摸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因为民盟同高级知识分子的联繫最密切。利瓦伊汉把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请来商议，「费孝通先生态度很积极」。于是，在费孝通的串联下，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材料送到统战部，整理归纳出六个方面的问题，简称为「六不」，即一是估计不足，包括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如他们应该看的数据不让他们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该用的，有的没有用或用非所长；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于刚回忆说：「材料整理完后，我们就按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向李老作了汇报，接着李老就向总理面谈了。」¹⁷ 过了几天，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在 11 月 9 日也向周恩来反映说，农业合作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这两翼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都前进了，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讨论一下。¹⁸

利瓦伊汉和章伯钧反映的情况，为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依据。11 月 22 日，周恩来向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并表露了他本人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为此，周恩来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即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进行商议。会议决定在 1956 年 1 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

利瓦伊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等参加，下设办公室，开始会议的 II 备工作。19

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像中央那样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莼小组。周恩来说，「因为建设就需要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多，而是少了。要进一步让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他说，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光是口头尊重不行，迺要重视他们的知识，尤其要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周恩来提出，要吸收四十至五十岁的知识分子入党，提高知饿分子的生活待遇。周沓说，对其中有特殊贡献者还可以更高，有的甚至可以超过国家副主席和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亲自抓。2。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同意周的意见：「这个问题要抓起来搞」，有几个星期就搞清楚了。21

为甚么在这时中共高层普遍感到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决定立即召开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为甚么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不能像一般工作那样由中央做出决议，下发通知，而必须首先在党内进行讨论？这显然与中共面临的紧迫形势有关，同时也与中共靠内对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密切相关。

早在中共刚刚掌握政权时，一些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就意识到缺少知识分子是一个严重问题。“现在要全面开始经济建设，问题就更加凸现出来。六年以来，中国的科技事业和专业人才培养取得了一些进展。23 到 1955 年底，据统计，在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文艺

五个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共有 384 万人，包括禽级知识分子 10 万人，其中共产党员仅占 7 先。24 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 21.79 万人，就当时规定的擦准而言，这些人被看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后备军」。^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各行业建设的需要。按全国人口计算，当时中国平均每一万人中只有五个高校毕业生，而波兰有五十个，苏联有

八十六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更多。”因此‘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各方面的建设都不得不仰仗于苏联专家。笔者曾作过研究和推算，1949年8月到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XII¹3I¹⁰¹⁵¹¹^V访华之前，来中国的苏联专

家和顾问大约有五千多人。27 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不仅对一些重大的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连某些一般性的问题，也还解决不了，还需要依靠苏联等国专家的帮助」。28 对于从「一张白纸」起家的中国工业化来说，苏联专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是，这种凡事依赖苏联专家的状况，无论如何是毛泽东等人不能满意的。29 因此，中共急切地希望培养中国自己的高级专家队伍，希望现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30（1 照薄一波的话说，「至少需要培养一二百万这样的高级专家」。31

客观上，经济建设需要知识分子。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内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仅中下层干部，就是在高层领导人眼里，也大都把知识分子看作「异类」。有学者考证，作为《毛泽东选集》开篇文章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经过大量删节的，所删去的就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分析。在那里，毛泽东称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派」。当时此文影响极大，致使部分北伐军竟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32 还有研究者考察过，在红军的时候，「『知识分子』一度是一个不中听的骂人的话」。33 这就难怪在中共干部对知识分子的称谓中，往往习惯性地冠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头衔。新的政权建立了，但对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能信任的。兼最近披露的一份俄国楼案记载：

同陈云对工业战线的资产阶级专家不满一样，郭沫若也对国民党留下的专家表示忧虑。他在1949年10月28日同苏联大使讲遑：「这里有二十多所高校。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

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衮子弟，甚至速富农的子弟都很少。」郭沫若还对罗申（化！^鹵比^）说：「最糟糕的是科学院的状况~这里聚集了不少旧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34

领导干部中的这种认识和情绪，显然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在感情上与知识分子相当隔膜。毛泽东从来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体的一个部分，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说法就是著名的「皮毛」论。”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有两个部分，或者依附于资产阶级，那

入反革命范畴，或者依附于无产阶级，那就归入革命范畴。至于在共产党执政时期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的看法存在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在政治上难以信任；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因此，毛泽东的知识^政策，就是强迫皮毛相附，即采取改造与使用的两手：通过思想改造使知识分子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新政权所用。

近年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来源于他早年的一段受屈辱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成功知识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36 这种看法能否解释毛泽东睥睨一切知识权威的

个性和心态，是值得怀疑的。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其说来源于他早年受伤害的心理阴影，不如说来源于中国革命走过的独特道路以及由此强化的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在毛看来，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知识分子只有通过思想和感情的痛苦搏变，实现与工农相结合，才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而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说，由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生活态度，基本上是依附于地主资产阶级的，甚至是依附于蓄政权的一群人，要实现这种搏变是不容易的。新政权建立以后，毛泽东把知识分子看作他整合意识形态的主要障碍，更有其制度性原因。对于建立在意识形态整合基础上的新政权来说，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然成为意识形态整合的主要对象，最不能兼容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怀疑态度。37 毛的看法自然在中共党内产生了广泛

影响。正是出于这种忧虑和担心，中共在建国后发动了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

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武训传》，批判梁漱溟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直到在知识分子中开展肃反运动，都是为了解决知识分子的思想顺从和政治忠诚问题。1955年1月8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 ^）会谈时，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他的意旨。毛说：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缺乏联系。他们头脑里有一大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处在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从美国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毛泽东还表示了这样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至少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³⁸

37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有关论述颇多，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

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 1676—1681~1683—1695。³⁸ 八^!! 卅中，^0100, 00.48, 11.393,; 1.24-30.

无论实际效果如何，在毛泽东看来，到1955年底，他的目标基本上是达到了。经过改造，多数知识分子已经俯首称臣。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冯友兰说：「现在，我们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接受了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得到了很大的进步。」看到新中国的成就，「我们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同其它劳动人民一样，都是欢欣鼓舞，愿意努力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添上一分力量」。他保证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接受党的领导为莫大的光荣。」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发出的号召也足以令中共领导人满意了：「每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努力要求自己，积极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³⁹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当建设高潮来临的时候，毛泽东才认为有必要也有条件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毛泽东认为，现在农业取得了主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了主动，但知识分子问题「逢没有主动」。显然，中共领导人首先希望进行党内讨论，统一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然后通过改变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政治待遇和工作条件，争取他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洪流。

问题之所以由周恩来提出，并非偶然。除了掌管经济工作的职责所在，由于其出身、修养和秉赋，以及在上海和重庆工作时期同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密切交往，周恩来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理解和沟通，并与许多高层文化名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还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周恩来就千方百计延揽滞留国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国。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又号召在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⁴从 1952 年下半年起，朝鲜战争还处于边谈边打的优持阶段，周

恩来便以极大精力投入研究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搞五年计划，哪一方面都需要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专业人员参加，使他更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建设人才的严重匮乏。」⁴²1954 至 1955 年，周多次出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或访问，亲眼目睹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给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由此，周恩来更深切地意识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⁴³

知识分子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上了的中共的议事日程。

3 会议的筹备与调查研究

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成立后，周恩来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来筹备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知识分子问题是他正在考虑的三个问题之一。”十人小组成立的第二天，周恩来就邀请中国科

学院、建筑工程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中国戏剧学院的有关人员座谈，了解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知识分子的状况。又请了各门学科的第一流科学家谈话，核实情况。”周恩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全面调查六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收集整理出材料。同时要求中央各办、各部委和直属机构指定专人来研究这个问题。11月25日，周恩来召集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动员民盟-民革、九三学社、民进、民建等民主党派搜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

42 《周恩来传 11949 — 19761》’ 页 233。43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页 160。

44 《周恩来年谱 11949 — 19760，上卷，页 524。其它两个问题是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工资问题。

45 《周恩来传’ 1949—19761》，页 238。

料。”11月30日，周起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提纲，并审定了一份〈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其中包括政治和业务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等十二方面的问题。471956年1月10日中央十人小组发出通知，对各地区、各部门上报中央的调查材料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应有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卫生部门、文化艺术界、工程技术部门、中小学校六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要有好、中、差三类典型，并且要包括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变化做出基本估计和提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意见等三项基本内容。48

对于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发展需求来说，中共领导人关注的似乎主要是十多万高级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当时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一般是指具有大学毕业程度，具有几年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工作的知识分子」，如「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的教师，研究机构中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研究人员」。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发出了〈辟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明确指出「此次调查统计仅仅限于高级知识分子」。49

46 《周恩来年谱 11949—1976》‘上卷’ 1522—523。

47 《周恩来传 11949—1976》~页 239；《周恩来年谱 11949~1976，上卷，页 523。

48 熊华源：〈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靠的文献》，1990 年第 1 期’ 页 15。

49 《周恩来年谱 11949~1976》，上卷，页 523。

50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页 1003—1004。

由于有毛泽东的首肯和过问，知识分子问题引起了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的重视，在全党上下形成了检讨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氛围。12 月 1 日，张闻天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报告，专门谈了「大知识分子问题」，他提出：「我们对大知识分子是否信任？……我看对到过美国、英国的就不够信任，肃反运动一来对他们就更加警惕。」他还说，大知识分子人^（良少，十分可贵，如使用不当就是浪费。一些人就是入不了党，看戏的时候他们坐后面，首长坐前面，对他们尊重不够。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不要对有技术的人总是看不)顿眼，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强求一致。50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对资改造座谈会期间，也专门讨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利瓦伊汉指出，知识分子腾于脑力劳动者，以自己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同资产阶级有根本的区别。应当同志式地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需要经过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强制的办法。在学术思想批判中，要鼓励自由辩论，允许批评反批评，允许保留个人的意见，不要急于作结论。利瓦伊汉还强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思想体系，但是不能把具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专家学者作为「思想敌人」对待。51 这些都表明，党的职能机构开始把重点从改造知识分子转到了使用和培养知识分子上来。

1955 年 12 月 16 日，中央十人小组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地写道：

目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我们必须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尽可能迅速地脱离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52

51 利瓦伊汉：《回慷与研究》’页 810。

52 转引自《周恩来传 11949—19761》，页 239—240。

这个文件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培养，至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则相应放宽了政策。毛，东修改文件时在「进一步地进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一句后，加写了「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此外，草案说，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在此处又加了一段话：「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53 由此看出，毛泽东此时对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表现出了足够的自信和耐心。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央十人小组一鼓作气起草了十一个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¹：〈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问题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工作规划

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11’页 476。54 《周恩来传（1949 — 19761》、页 242；熊华源：

〈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页 15—16。55 《周恩来传 11949 — 19760’页 239。

56 谢泳曾在旧书摊上见到过一些散落的有关 1956 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简报，其中就有各地汇报的情况报告，他远购买了一本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1956 年 1 月 1 日。知道笔者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便慷慨相赠，笔者谨在此表示感谢。

【1956—1967】的初步意见》、《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关于高等学校未开课教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关于城市失业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等。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大会的主题发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也准备好了。1956 年 1 月中旬，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准备提交大会的文件有周恩来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和十一个专题报告。”周恩来还要求有关部门研究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科技发展状况，并同中国科学技术的现状进行比较，提出改变落后面貌的方针和办法。55 准备提交大会的还有一些地方和部门上报中央的调查报告。56

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省市都成立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小组，于 1955 年底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向中央提交了调查报告。虽然目前研究者还看不到这些报告，但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从 1955 年 12 月底到 1956 年 1 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前后，陆续刊登了新华社驻各地分社发出的电讯，充分反映了山西、江苏、湖南、广西、云南、陕西、北京、上海、青海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重庆、武汉、哈尔滨等重点城市知识分子状况和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57 笔者还在上海市档案馆看到两份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在吉林省档案馆看到地方领导人在省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这些报道或报告为研究者了解当时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材料都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后写出来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没有超出中央的口径，检查知识分

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向」，也基本上限于「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六个方面。

4 各地调查的反映及回避的问题

各地检查知识分子工作都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共中央 12 月 16 日指示的影响，即认为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北京市委报告说：经过思想改造，「北京市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和思想面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 1955 年 12 月 25 日在省委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全省高知知识分子的队伍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和解放以前不同，和解放后的初期，都有所不同」。全省 1699 名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分子大体上要占 40% 左右，中间分子大约占 35% 左右，落后分子大约占 20% 左右，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反动分子一般不超出 5% 到 10%。⁵⁹ 来自重慶市的报告说，重庆 2460 多名高级知识分子中，「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占绝大多数」。重庆大学讲师以上的人员 114 人，其中进步分子 54 人，占 47.49%；中间分子 43 人，占 37.79%；落后分子 12 人，占 15.59%；坏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仅占 4.49%。⁶⁰ 云南省的估计比较悲观，认为全省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的占 20—30%，中间的占 30—40%，落后的仍占 20—30%，反革命分子约占 5%。⁶¹ 江苏省的估计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约占 50—60%，中间的约占 35—40%，落后的〔包括少数反革命分子在内〕约占 15%。⁶² 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可靠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政治排队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中共在整体上是把高级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的。不过，有一点是与以往不同的：各地的分析都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与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进步，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增多，落后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大为减少。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各级党委的关注点，开始从警惕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转向检查自己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向」。

58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 8[述编（“?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1年〕' 页 938。59 吉林省档案 II，1-11/1-1955.55' 页 57—70。60 《内部参考》' 1956 年 1 月 10 日' 页 28—30。61 《内部参考》，1956 年 1 月 11 日' 页 45—47。62 《内部参考》，1956 年 1 月 11 日' 页 38—41。

各地反映出来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信任问题，即所谓「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出，尽管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表示了对新制

度的顺从，仍然难以取得中共各级党组织的信任。普遍反映，干部对知识分子建国以来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估计不足」。一些人以「江山好改，本性难移」的思想一成不变地看待知识分子。”上海的材料反映，对知识分子中政治历史和社会联系的问题，常常不加分析地与反革命问题混淆在一起，对「落后表现与反革命表现常常区别不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可以不伤感情的人也伤了感情」。「三反」时，华东纺织管理局的技术人员「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被不同程度斗争过」。不仅对高级知识分子不信任，对中、小知识分子包括农村中小学教师，也同样如此，甚至更为严重。如江苏省第三次鹿村宣传工作会议反映，「一般干部都认为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出身，历史复杂，不可信任」；「邳县有二百多小学教师无选举权」；有些地方谈到知识分子时「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则「罪加一等」。

65

这种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除了受中共对知识分子总体估计的影响外，也来自工农出身的中共干部对知识分子感情上的隔膜。在那些干部中，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双重心理：一是轻视，二是害怕。江苏的材料反映，有些人一方面把曾在英、美等国家留过学的老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样子，官僚主义的架子」，工程师是「签签到，批批号，到期拿钞票」的人；一方面又「认为知识分子难领导、难相处」，「不敢对知识分子做报告，不敢和高级知识分子接触」。南通县宣传部长说：到学校去工作有顾虑，「感到没话讲」。

陕西流传的一个说法十分典型：许多党员负责人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是「看起来不顺眼，用起来不顺手」。66

中共干部的不信任，使知识分子，包括积极靠近党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华^北纺织管理局总工程师室一级机电总工程师陆芙塘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我们和领导之间，总有一条鸿沟，虽宽窄不一，但都是有的，有些同志很想靠近党，（但）好像党有些不愿伸手的样子。」纺织一厂一个技术人员说得更直接一些：「我们和领导同志之间是面和心不和，见面都很客气，但从来没有深谈过。」华东纺织管理局的调查报告认为，「这些话相当普遍地反映了目前我们党的领导者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一般关系」。67 重庆市反映，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认为「领导上把自己当外人看」，「组织上不信任」，因而「作客思想」甚为普遍，「好像只窗党的忙似的」。陕西省的高级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党员是『畏友』不是『密友』。」广西民盟副主委石兆棠则说：「在新时代里，知识分子像一个新嫁娘，又喜欢，又害怕，想骄傲'又自卑。翁姑'小姑那么多，找缺点的人毕竟多，给予同情关怀的人毕竟少，这样三天下厨打烂碗的机会也毕竟多一些了。」68 中共与高级知识分子的真实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各地反映的另一个情况是，在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上，中共各级组织普遍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北京市高级知识分子

67 上海市楼案馆，²⁻²⁻⁵¹⁶页 219-224。

68 (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 " !28-30; 1月11日' 页 43-45~49。最多，有 15000 人以上，其中许多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工程师-医师' 作家' 艺术家，仅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就有 153 人。新政权建立后，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有 400 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在全国是最多的。但即使如此，同样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不少人虽「再三申请入党，也没有被接受」。如北京大学，只发展了极少数的教授入党，且以种种原因使他们四、五年不能转正。其它省市更是如此。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曾有 16 位教授写了入党申请书，不少老教授表示「以余年献给党」，却始终没有得到党组织的青睐，不少单位没有发展一个党员。全市八所大专学校的 259 名教授中，只发展了一个党员。陕西省八所高等学校、南京市九所高等学校几年来没有吸

收一个教授入党，湖南则全省没有吸收一名教授，河南省也只发展

了一名教授。江苏有些县委组织部甚至在布置工作时公然宣布「在教师中不建党」。这种关门主义使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很受挫折，难怪哈尔滨市有高级知识分子说，「捧着猪头进不了庙」。⁶⁹

二是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即所谓「安排不妥、使用不当」。政治上的不信任，自然影响到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专业知识和技术专长得不到发挥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据薄一波表示，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写出了许多有关的专题报告。如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所在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到图书馆去写书签，到陶瓷科去画瓷碗，后来干脆由工会安派他去给教职员工买戏票。上海第一重工业局业务处有二十三名工程师，其中十六人被安排做行政工作。一位在学术上有建树的晶体化学家，却被分配做应用化学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种田」之感。有些科学家、教授的社会活动过多，如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当时很少有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内心十分苦闷；协和医学院妇产科教授林巧稚在校外兼职多达十三项，严重影响她的诊疗、教学和研究工作。更不可思议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失业现象，据北京、天津、

⁶⁹《内部参考》，1955年12月29日；1956年1月10日、11日、21日。

⁷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501—503。

广州等128个城市统计，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竟有3005人。⁷¹这种现象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也有大量反映，失业或用非所学的情况如：广东大埔县有一个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得不到工作安置；佛山市重修「祖庙」时，雕塑家布柏生被分配在建筑工会里当杂工；海丰县有九个大学生当了售货员；佛山市共有二十四名大学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十四人失业。海南地区有的部门分配大学生做记账、收发或挂号工作。马祖铭曾在北京大学做过中文教授，江苏徐州地委却分配他在工农干部学校教初小的语文，结果学员们在上课时听不懂，就批评他：「大学教授连初小都教不好」。苏州市把做过大学教授的沈维钧，分配在园林管理处做办事员。兼职或社会活动过多的情况如：江南水泥厂的工程师张阳谷，一个星期参加了二十九个大小会

议；南京大学校长潘菽，身兼十一职，经常在外面跑；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睐鹤琴，身兼十六职，一个学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校工作；南京农学院院长金善宝，过去身兼十八职，现在兼十三职，别人都说他是「会议校长」。而西北医学院院长侯宗濂，兼职竟达二十四个，一年有七、八个月在外面开会。有的老教授因为科学研究时间太少，心情十分苦闷。天津棉纺二厂的技术干部的技术工作时间仅占二至三成、有时一个人一天开五、六个会，有的车间主任四天不下车间，光开会。71 如此等等。

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甚至失业的状况，是对奇缺的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有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赚形浪费现象，就是许多知识分子虽在其位，却不能谋其事。武汉市反映，「在工廩内部，有的工程师可以参加画圈，但不能下现场。在学校中有的可以在课堂上教课，但不能到工廩实习，使一批人惶惑不安。大学襄系主任不如系秘书（党团员）有权」。哈尔滨市反映，「在学校中，有些非党系主任的意见，党员干部说『没接到党的通知』就不执行」。有的工厂「高等技术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往往不研究、不采纳，一律认为是不愿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山西省的材料说，太原峨山机器厂科研人员的成果得不到尊重，「有的对技术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表决」。72 71 《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11日、16日

72 《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1955年12月31日。

三是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不太多，反映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省市认为在这方面问题不大，如重庆市反映，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对生活待遇没有大的意见，他们认为，「国家的钱的确用到建设上去了，一般党、政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生活也是艰苦朴素的，今天的生活比起解放前十来年，已经算不错了」。天津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也认为，生活待遇「比抗日战争前是降低了，但比供给制干部就没话可说了」。但这很有可能是非真实或不全面的反映，因为在同一篇报道中还谈到：家庭人口多生活有困难的，「虽有意见，但不敢公开讲」。有些省市则反映出强烈的不满情绪，所提意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正常的晋级制度，一是待遇差别不合理。江苏省有些人对六年来不晋级「很不高兴」。太原钢铎厂三十二个工程师中只

有两人升了级，二十多个一级技术员没有一人升级。安徽、河南等省都反映，缺乏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标准和妥善的晋级制度，很多人长期得不到晋级。此外，武汉的工程师、教授普遍反映，在工资待遇上地区之间和工程之间的差别很大，东北、上海同一级别的工程师、教授的待遇比武汉高许多。相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小知识分子，特别是小学教师的生活要清苦得多。江苏

江都县湾头区 58 个小学教师，只有一个中心小学的校长月薪拿 36.3 元(比国家机关二十四级干部待遇速低)，其余有 3 人拿 32 元 1 相当于二十五级干部待遇)；22 人拿 26 元(相当于二十六级勤杂人员待遇)；缙有 21 人只拿 20 元左右。所得薪金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时甚至靠借高利贷度日。他们自嘲：「光荣愉快伟大的嘴，悲观失望痉挛的心。」⁷³

73(内部参考;^, 1956 年 1 月 10 日' 11 日' 21 日; 1955 年 12 月 31 日,

仔细翻阅和对比这些材料不难发现，尽管遵照中央的指示，各地都在刻意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但都回避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造成的伤痛，以及知识分子最为珍重的学术思想自由的问题。就目前笔者所见，只有江苏省的两份材料谨慎地提到了知识分子在以往政治运动中承受的打击及其后果的问题。如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打击面太宽、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有的人怕「祸从口出」，不敢讲话，不敢与人往来；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在肃反中对教师采取「普迹地大胆怀疑的态度」，结果是「不讲不斗，愈讲愈斗」，打击面扩大到 14.87%。「很多县初步排队，中、小学教师中有问题的达百分之四' 五' 六十，凡是过去自觉交代的材料都当做罪行，认为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五左右根本不可能。」⁷⁴ 其它省市的材料则一概回避了这个问题，有的报道甚至以赞同的口气谈到，在肃反运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重点对象平均在百分之十以上」。“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在中共干部的理念中，承认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极大进步，正是以完全肯定以往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改瘡运动为前提的，而把这种进步看作是这些运动的积极成果。况且，即使是经历了如此深刻的改造，按照各地党委的估算，在知识分子中仍然有 20 元左右的落

后分子，57。左右的壤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区（如云南）估计，这两种知识分子竟达到 25—357。！⁷⁶ 如果按照一般估计

的比例来计算，那么在全国十万名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有二万个落后分子，五千个敌对分子。这个结果是否符合实际状况暂且不论，就凭这种思维模式，大概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知识分子政策，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尽管意识到知识分子工作存在严重问题，但中共并没有忘记对「反动」知识分子的警惕。就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夕，195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仍然对尤金大谈阶级斗争问题：「自然’必须战胜阶级敌人的反抗行动。整个 1955 年和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将镇压大约二百万名敌对分子。这个数字不包括 1955 年在对城市机关和社会组织进行清查时揭露出来的那些反革命分子。」⁷⁷ 看来，虽然需要重用知识分子，但中共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12 月底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知识分子工作干部会议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省委书记富振声在谈到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指出，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是不是就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中在政治立场、思想观点上都没有问题

74(内部参考》，1956 年 1 月 11 日，页 38—41；1955 年 12 月 21 日，1：284—290。75《内部参考》，1956 年 1 月 11 日，页 47—49。76《内部参考》，1956 年 1 月 11 日，页 45—47。

77；\611? ^中.0100.011.49.0.9, 0.410,; 1.13-14. 转引自! 1^舰 5.7: 0086X0X0-1011^01(101^30X0^叩 1! ^'"! 100 卿⑩机""喊卿? 八""诵工"9.了呢? 就可以忽视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呢? 不是的」。因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草案)》中的说法，「必须看到，不但中间分子，就是进步分子，在思想上一般地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还必须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和必要的思想上的斗争，以便继续帮助他们改造自己，逐步地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

所以，省委强调：

我们要反对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右倾保守主义，但也不能否认过去「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过去的成就是主要的，不能因为过去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就否定一切。……肃反中，许多单位检查，斗争面过宽，重点对象大大超过了中央指示的百分之五左右的控制数字。各单位应立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进行复查，重新排队，端正政策；但同时在具体单位，又要根据中央指示草案中规定的界限，实事求是地加

以区分，不要使反革命分子漏网。工矿企业的项目小组，按中央规定，应吸收党员工程师参加，不应吸收非党知识分子参加。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工厂矿山、基建单位必须按中央指示，认真领导肃反斗争，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78

78 吉林省档案馆，1-11/1-1955.55' 页 11 — 19。

这种态度和立场，预定了即将开始调整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限度，同时也决定了已经进行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的内容。总之，以往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以及由此给他们造成的痛苦，是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本身都不愿或不敢启口的。至于知识分子追求的学术思想上的自由问题：更是人们绝口不谈的。大概高级知识分子不敢有此奢望，估计中共干部也不会给予理解。无论如何，这次大规模调查反映了不少情况，但与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状况还是有相当距离的。5 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迹及思想变化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费正清）在谈到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时说：「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一点、那只不过是出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的确，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在任何国家都是纠缠不清的，而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尤其如此。

中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早年投奔延安或在白区参加地下党，成为党内知识分子。这是一小邓分，且后来大都脱离了知识界，走上了各种领导岗位。另一部分是自由知识分子，占多数，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据统计，在 1956 年初十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占 93%，建国后增加的数字约占 35%。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祖国大陆。1948 年当选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八十一人，留在大陆或新中国建立初期回到大陆的六十人，占院士总数的 74%；去美国的十二人，占 15%；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仅有九人，占 11%。81 既然留在大陆，按周恩来的话说，「除了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道，并没有甚么别的出路」。82 当然，他们作出如此选择，并不只是因为故土难离。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阶级出身、政治信仰和所受教育多么复杂，多么不同，总体来说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爱国。虽然不见得认同共产主义，甚至心存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

79 费正清（化 11010118? 3；由 31 着，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2000' 页 341。80 李维潢：《回忆与研究》' 页 810；《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1 日' 81 于风政：《改造》' 页 6—7。8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 下卷' 页 162。

因此，多数人选择了归顺中共新政权，希望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许多滞留海外抱有科学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心往神驰，感到报国有门了。他们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阻力，放弃在海外优裕的生活和学术条件，毅然归国。1950 年 2 月，数学家华罗庚在回国途中发出〈致中国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信中说：「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

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1950至1953年，约有二千名留学生回国，成为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83至1955年11月，回国的海外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有1041人，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各类科学研究的奠基人或学术界泰斗，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吴阶平、汪德昭、邓稼先、吴仲华等。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后，于1952年被任命为地质部长。著名导弹专家钱学森的回国更是破除了艰难险阻。钱本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决心归国，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但遭到美国政府强行阻挠。1955年6月，钱学森通过外国朋友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周恩来立刻指示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通知美方说中国将提前释放十一名美国战俘（飞行员），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钱等归国的限制。同年10月，钱学森归国，周恩来立即委托他组织力量开始导弹研制工作。84

83 于风政：《改造》’页10—11。

84 《周恩来传 11949—19760》，页235。

中共掌握政权初期，人民解放军秋毫无犯，中共干部清明廉洁，国家高层领导人礼贤下士，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许多原来心存疑惧的知识分子，似乎在一夜之间转变了看法。他们对解放军进城和新中国成立，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中华民族多年来追求独立和统一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国家重建即将展开，在知识分子心中燃起了希望。许多人为自己在新政权的建立中了无尺寸之功而产生愧疚感，甚或罪恶感。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季羨林教授的回忆感人肺腑且很具代表性：

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菊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困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但是，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摘桃派」……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甚么事呢？我做出了甚么贡献呢？……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铤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岂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1”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85

85 季羨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巧 98）’页 2[^]-247。

进城之初、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当宽厚。原本在大专院校教书的，仍然教他的书，原来在机关单位任职的，也续任其职，一切维持原状；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顾。中共还把知识分子分别编入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等协会。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文学艺术界的社会团体。参加文艺界联合会及其下如作家协会这种团体，不但不用缴纳会费，反而像进入政府机关一样，有固定薪资可领，作品也有该团体的刊物可

供发表，甚至一年半载没有创作，也用不着担心饥寒冻馁。86一份关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变迁的研究表明，北洋政府时期，教授薪俸相当于中央政府部门的科长；南京政府时期，教授薪俸相当于一等县长、省政府秘书科长、省辖市政府局长等；新政权建立后，教授工资相当于中央副部长级。87 这说明，相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中共执政后给予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是较高的。台湾学者陈永发认为，中共通过「包下来」的政策，成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那些名气响亮的知识分子深感知遇之恩。陈永发举例说，民主同盟的罗隆基投奔中共以后，享受四级干部的待遇，只是独身生活，却拥有一个秘书，一个厨师、一个司机，一个护士、一个保姆、两个警卫，外加一部汽车，以及前北大校长的私人四合院住宅一棟。这种优渥的待遇，加上官位和职务，决非国民党时期「贫穷化」以后的罗隆基所能

想象的。难怪罗隆基对中共政权感恩戴德，对毛泽东尤其感激涕零。重庆时代因为反蒋而遭囚禁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于1951年被中共延揽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也有同样的感觉。⁸⁸

自然，中共如此优待高级知识分子，是要为我所用，所以，抓紧对他们的改造也是必然的。对于建国之初中共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究竟是被迫承受还是主动反省？陈永发的估计看来是比较客观的：大概在运动之初，主动反省成份多于被动承受。正是由于愧疚和感恩的情结，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承认有自我改造的需要，自愿地接受了中共起初比较温和的思想改造要求。还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1949年11月，美学家朱光潜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随后费孝通和冯友兰等人，也都纷纷自我批判，公开宣布与旧的我及旧的社畜一刀两断，并决心按照新社会的需要重新创造自

我。⁸⁹1951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就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师生中发起的。当时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自发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马寅初邀请周恩

来到校讲演。9月29日，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北京、天津各高校1700多位教师听取报告。周的谦虚谨慎、谆谆善诱，坦言自己的家庭身世及自我改造的心路历程，「说的是那么真挚，那么中肯」，使「听者莫不感动」。⁹⁰正如陈永发说：「知识分子因为心中的愧疚而承认自己需要改造。因此他们对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⁹¹

然而，接下来的群众运动却无法使人心悦诚服、感恩戴德。有学者认为，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知识分子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⁹²不过，真正的伤害还在后头：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红学家」俞平伯，这一系列的政治围攻，使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毛泽东要使资产阶级思想「名声扫地」，事实上也就是使知识分子「名声扫地」。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把这种政治攻势推向了高潮。

⁸⁹《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1950年1月3日'1月22日'10

月 11 日' 12 月 2 日。

90 参见《周恩来传〔1949—1976〕》页 230—232。周的报告见周恩来：《周恩来 8 集》' 下卷' 页 59—71。91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页 658—659。

92 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见思想评论网站（www.thoughtcomment.com）。

1955 年 2 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演变成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思想改造问题，而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了。胡风本人于同年 5 月 18 日被逮捕，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波及 2100 余人，逮捕 92 人，隔离 62 人，停职反省 73 人。后正式定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

有 78 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公布以后，高级知识分子普遍持怀疑态度。南开大学中文系老教授孟志荪说：过去我一直认为胡风是反蒋的，算是进步分子。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李何林仍不承认胡风是反党分子，说胡风过去是反蒋的、进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后，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部分教授、学生提出很多疑问，如胡风是否与帝国主义或国民党有联系？是否托派？与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有何区别？今天党这样强大，胡风为甚么还敢这样？既然是反革命为甚么过去遭受国民党迫害？为甚么还有这样多的党员跟他走？

接着，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形成一片肃杀气氛。中共认为，「利用胡风事件，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正确的」，运动的发展也是「健康的」。其成效是，仅仅两个多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 29230 人，反革命嫌疑分子 12488 人，还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团。95 根据中宣部长陆定一后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割定的范围内，工人、职员、现役军人、科学工作者、大学生，一直到乡一级的所有干部，都限于肃反审查之列，拟定全国总共审查 1200 万人。审查于 1955 年 6 月开始，到

9月中旬时，已经「仔细审查了」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分子、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派别。化

这里，最受「关注」的是「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干部」。不但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参加肃反，大学和中专的学生也必须参加坦白检举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受审查、被牵连

的人也就更多。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反革命分子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97 这在运动中实际上成了各部门、各地区必须达到的最低目标，而实际人数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据1956年1月各地向中央

汇报的数字，在参加肃反运动人员中被斗争的人，在山西为5.57%，河北6.4%，贵州7.57%，云南9.67%，广西14.17%，有的专区（福建龙溪）内定的斗争对象则高达30.97%。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

斗争面更大，如河北省20.97%的教授，20.97%的工程师，都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这个比例，在贵州省工业厅工程师中竟高达58.7%。

98 即使那些「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也不能倖免，按照陆定一的通报，在对学术机关进行清查的过程中，拟定受审的著名学者就有250名。不过，「对这些人的审查将通过特殊方法进行」，不让他们参加斗争大会。他们还有用，「对他们应该容忍」。99

这些运动未必能打碎知识分子埋在心底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但他们不得不表示屈服。确如费正清所说：「现代心理学家能够阐明，困苦的生活、长期的不安全感和紧张情绪，加上持久的心力交瘁和反复的思想灌输、会怎样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性和产生种种压力，对此，

大多数人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态度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

97 罗瑞卿在各省市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56年7月5日，陕西省档案馆

馆，123-40-15' 页78—87。98 陕西省档案馆，123-40-43' 页19—21。

99 八·八〇？乱1^0100, 011. 48. 0. 9, 0. 393, 3. 195-197, 转引自一. (:。 ”。 -^: ”。 |2””!! 0. 148-149。
100 费正清（^! !”^! ^!）!^!”着，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页277。

这时，知识分子已经顾不上为胡风抱不平，而轮到自己担惊受怕了。事实上，不只是被重点审查的对象，所有知识分子都为之惊悚。他们从旧社会来，总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

许多人「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季羨林回忆说，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革命的运动，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起来，甘愿作轮下之鬼」。11)2 过了近三十年，作家巴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说：这使「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肃反运动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恐惧，可想而知。

1955 年秋天以后，声讨胡风和肃反运动最狂暴的阶段过去了。然而，「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郁闷，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他们不理解共产党为甚么要把知识分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为甚么思想改造要采取如此暴烈的方式。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种孙后来回忆说，肃反以后，「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像一盘散沙，没有黏性」。董渭川教授也谈到：「肃反过后，使有些人有了顾虑，愈是相熟的人，见了面，除掉谈谈天气之外，国事、校事一概『三缄其口』，唯恐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不定哪一天挨整一番。」肃反运动也打击了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的积极性。肃反后期，批判「单纯业务观点」，强调「突出政治」，许多「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著名学者受到批评，被迫公开检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不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内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文艺界是最脆弱、最敏感的领域，大批判后的萧条表现在文艺上也就最显著。在反胡风的斗争中，又揭出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问题，更增加了文艺界的紧张气氛。30 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主题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画公式化，作家「只能撷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段现象，敷衍成一篇小说」。文艺批评家们更陷入动辄挨批的境地，有的人「处处担心，唯恐『失足』」，表现出「可惊的慎重」。人们「失

去了对社会、对文学事业的责任心」，连《文艺报》的「战斗」特色也在消退，而这样的问题，「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期开始萌芽，最近四个月才比较突出」。106

这些材料说明，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确实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肃反运动的扩大化后来成为1957年人们「鸣放」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明证。然而，在1955年底中共各级组织作知识分子问题调查时，却几乎没有一人反映这个问题。究其原因，中共干部的认识局限是一个问题，更主要的恐怕是没有人敢于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许多人抱定了不说话的态度，昆明市教育界人士的心态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共产党对我们的办法是三年一大整，一年一小整。」他们估计共产党到1958年又会大整一次，因此订了个人的三年计划，「三年内不发牢骚，不出风头，不暴露思想」。11”没有真实的和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与知识界的最初反应

1956年1月14至20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79人，包括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二十七个省辖市市委

106 《文艺报》，1955年第4、3、23号’转引自于风政：《改造》’页430。107 《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页45—47。

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群众8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开幕式由刘少奇主持，以后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的主题报告。1月16至20日，会议展开讨论，大会发言者前后达六十一人之多（另有二十九人印发了发言稿）。周恩来的报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十一个专题报告也是讨论的主要议题。大会最后一天，陆定一、陈伯达、李富春、彭真、陈云先后发言，毛泽东到会作重要讲话，最后由周恩来作结论。这是一次党内会议，其规模之庞大，规格之隆重，为建国以来所罕见。杨尚昆日记记载：「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央连续开了几个大会，以这次大会的人最多、方面最广。」¹⁰⁸ 足见中共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坚定决心。

1 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及其新政策

中共中央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周恩来作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由周恩来主持、胡乔木执笔写成的。1955年11月30日，周恩来自己起草了一份提纲，12月17日、19日两次约胡乔木谈报告的起草问题。1956年1月上旬，胡乔木写出报告初稿。1月6日、9日、10日周恩来召集十人领导小组会议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修改。1月12日、13日周恩来动笔修改并增写一些内容，如强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的重要因素」，「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提出「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等等。¹⁰⁹ 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毛泽东是否看过这个报告

¹⁰⁸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页228。¹⁰⁹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538。

稿，或者有甚么具体意见。毛当时关注的是他主持起草的产业发展纲要草案。1月8日和9日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两封来信，都是辟于讨论产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并要求「发给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会各同志」。按常规，周的报告一定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通过才能提交大会，但目前看到的材料不能为此证明。查《周恩来年谱》和《刘少奇年谱》以及其它文献，都没有发现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这份报

告及其它有关的会议文件，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¹¹⁽¹⁾显然，报告贯穿了周恩来本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想法，但它毕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见，因此其中必然会协调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看法。

周恩来的报告，坦言当前面临的一个矛盾，即各类专业人才的匮乏。报告认为，当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他明确地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¹¹¹ 报告把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必要性确立在三个基点上：

第一，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必须急起直追。报告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讲科学工作。中国由于朝鲜战争而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昧于世界的发展。像周恩来这样与西方有直接接触的领导人，对于世界科技发展之迅速，中国与此差距之大，有深刻的认识和感触。他提醒代表们说：「世界科擧技术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周不仅强调「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

¹¹⁰ 或许毛泽东当时的兴奋点不在于此，或许他对报告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

只能等待相关的楼案文献披露出来才能回答。¹¹¹ 周恩来：（周恩来！8集），下卷，页 161。以下所引周恩来的报告见《周恩来 9！集》，下卷’页 158—189。

突飞猛进」，而且具体地列举了当今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他指出，「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其意义「远远超过蒸气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这说明：当时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时代意义有准确

的估计。周恩来以异常紧迫的心情呼显：「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大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他说：「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一起，无论在和平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说，谁想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剧烈竞争中取得主动和胜利，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此明确、尖锐和深刻地提出问题，在中共建国以后还是第一次。

第二，承认 1949 年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其阶级属性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告确认，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里，周恩来提出了两条依据：一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是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者是一个事实陈述，知识分子被「包下来」，也就自然成为拿国家工资，为国家服务的「工作人员」，这似乎没有甚么争议。后者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性判断，这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为了证明这个判断，周恩来用相当的篇幅来说明知识分子何以发生了「根本变化」，还试图用一些统计数据来说服全党。这就是，目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之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从报告的逻辑看，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变化是对其进行思想改造的结果。

第三，批评中共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周恩来指出，党内对待知识分子存在麻痹迁就和宗派主义两种倾向，但后者是主要倾向。其主要表现为：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低估了

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濂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周强调说，「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多、快、好、省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恩来特别提到当时普遍存在的「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苏联的援助」的想法。他批评说，这是「缺乏民族自信的依赖思想」，必须首先打破。他说，我们需要苏联的援助，但如果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结果是一辈子不能脱离依赖和模仿的状态」。我们必须「作出全面规划」，「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要发展科技，必须培养和使用自己的知识分子。周恩来说：

「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针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周恩来还提出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对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分工：在国务院内准备设立一个中国专家局，负责需要中央统一解决的行政管理工作，但各部门不能减少他们直接处理的责任；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处理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性质的问题仍由各有关部门直接负责，中央宣传部

负实统一监督；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则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周恩来关于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紧迫感，关于打破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1月20日，即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毛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外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党中央和各部的任务，都是要促进社会主义，不能是妨碍社会主义，应该是「促进部」，而不应该是「促退部」。所以，要反对右倾保守，各项事业要办得「又多，又好，又快，又省」。要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计划地赶上外国。先接近，后赶上。毛再次提出赶超美国的问题，并说了一段鼓舞人心的话：

考察起来，还是我们这个国家有条件，地方大，人口多，就是这两个条件。位置也不坏，中国这个国家应该搞成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一个国家。你这个位置、气候也好，这么长的海岸线，又听说你们这个人吹的牛皮很大呀，甚么勤劳、勇敢呀！几十年，百把年以后不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那就不行呀。现在有了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加上努力，为甚么不可以呀？

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并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种情绪：「老子打了一辈子仗，没有你也行！」毛说，现在我们是革甚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擧，要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文化，文化很低，无知，愚素，要革这个命，要技术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就不行了，这个很清楚，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为此，毛泽东要求对党员进行广泛教育。他说：「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造出大批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

112

周恩来也认为必须重用知识分子，不过，在谈到改变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据时，他似乎更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已经改变，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对他们的政策理应改变。这就比毛泽东进了一步，毛在讲话中更看重的是科学技术要发展，国家要富强，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因此对他们的政策只能改变。前者突

出的是合理性，后者强调的是功利性。出高雇领导人这种认识上的差异自然会对大会参加者产生影响。这次工作畚议规模很大，发言人也很多，但会议的效果却有限。杨尚昆认为：这次会议比「以前几次都较乱」，「发言不算很精彩，好的内容不多」。¹大会发言反映出不同倾向，说明党内的认识并不统一，这就预示了后来知识分子政策整体调整的局限性。

112 毛浑东 1956 年 1 月 20 日讲话。

113 其实，周恩来早就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提出了知识分子应属工人阶级范 81 这佃问题。在 1949 年 7 月 6 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恩来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是工人阶级的一负。」参见周恩来：《周恩来迳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页 349。此后，1950 年 8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割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其中对知纤分子？ 8 级厉性的判定就更为明确了：「把知钺分子看做一种单独的成份是不对的」，I' 凡受 II 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而凡受炉于上述部门的高钺知识分子，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 II 级成份与一般职员相同。」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页 185。但不久之后开展了一系列对知钺分子的改造运动 1 其结果之一，就是在党内和社会上，知识分子又被冠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头衔了。如此看来，周恩来在报告中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改鞞作为思想改造的结果，很可能是为了找到一佃更容易被党内接受的锐法。

114 栅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册' 页 228。

2 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局限

从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到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一味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承认党内存在着不信任、不支持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反映了执政党认识的重大转变和提高。周恩来在报告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这一点。然而，毛泽东的看法更具影响力，在党内也更有代表性。从整体上看，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着眼于如何争取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因而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陆定一在发言中说得十分明白：「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了使我国变成为先进的国家，而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¹¹⁵ 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

首先，会议没有就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在党内达成共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对于中共和知识分子两方面来说，都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按照中共党史专家袭育之的说法，「就有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危险。¹¹⁶ 其实，这里不是可能性，而是必然性的问题。试想，知识分子掌握着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知识和技术，而这种资源（或曰知识产权）却不像资本家和地主的生产品那样可以剥夺，那么，从理念上讲，共产党人要实现社会公有化，就必然把「异己」的知识分子本身作为革命对象。执政党不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甚至还要作为革命对象，其结果无异于是在「自毁长城」。周恩来并非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他的报告也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总体状况时，报告认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但在具体分析知识分子状况时，报告仍然指出，其中落后分子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更何况还有百分之四十「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这与「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总

¹¹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一册. 页 166。

¹¹⁶ 袭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8：知识分子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页 4。体判断，在倾向上明显是相互矛盾的。很可能，周恩来这样讲是考虑到了党内多数人的估计。这也从一个角度证实了袭育之的说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判断，是

周恩来在修改报告稿时自己加写的。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说明毛泽东本人是否赞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提法，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分歧，则是当事人的明确感受。118 还有其它文字材料可以左证。当时高等教育部为准备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编写了一份〈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重点分析的就是两种类型的「中间分子」和「反动分子」。作为「中间分子」，点了北大教授王瑶、傅唐的名，并描述了他们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摇摆的思想状态。作为「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的反动教授，特别列举了钱锺书的各种「反动言论」，说他「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

117 鹤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页 4。

118 賁育之说：「前些年，我曾问胡乔木，为甚么八大报告没有重申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报告的新结论？乔木也记不大清楚，但他记得，知识分子会议时已有不同意见。」参见〈周恩来和建国以来 1：的知识分子政策〉，页 5。

119(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数据)' 第二辑' 页 52。

毛主席的反动言论；1952 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带回家去翻译，他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 81 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119 这份材料表明，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仍然有相当的保留。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会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关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知

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虽然两种提法精神大体一致，但显然增加了很大的限制——「绝大多数」变成「基本队

伍」，「工人阶级」变成「劳动人民」。同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要全党接受周恩来的提法是有困难和阻力的。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过后半年，毛泽东就提出，还是把知识分子「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疇比较合适」。121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则提到了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22 到 1957 年 3 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23

其次，会议没有反思和总结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过火现象，更没有触及知识分子辟心的肃反问题。客观地看，当时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感情压抑，情绪低落，主要并不是甚么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其实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并不低），而是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的挫伤。因此，中共要真正解开他们的思想疙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要对执政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进行反思和总结，切实消除其负面影响。但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肯定新政权建立后所有政治运动的正确性。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周恩来的报告虽然主要倾向是承认「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科学家和科学问题的现象，最近还有发现」，并指出思想改造应主要通过社会实践和业务实践以及一般的理论学习这样「三条道路」来实现，但不得不紧接着指出，在政治上「不可能没有相当的斗争」，思想上「也不可能没有尖锐的斗争」。报告仅仅指出了党内「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这一现象，而对产生「宗派主义情绪」的根源却未作进一步分析。至于关于知识分子同党之间存在

1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0）页 133—134。12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 302。

122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页 42。12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1273。

「某种隔膜」的原因，虽然指出来自「我们的同志」与知识分子两方面，但对前者，只以「没有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一笔带过，而着

重指出的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且列举其表现达九条之多。¹²⁴

这九条错误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不满意

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旧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反对苏联，不乐意学习苏联；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群众和工友干部接近；不愿意看见新生力量的生长，认为进步分子是投机；不但常常在知识分子和党之间制造纠纷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和对立；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参见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页 175—176。¹²⁵（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一册，页 166。¹²⁶（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页 135—136。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更是不加区别地对发生在 1955 年的一系列批判大加肯定，如在文艺方面批判胡风、陈企霞、丁玲、俞平伯；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批判胡适、杜威、梁漱溟；在卫生工作中批判贺诚、王斌；在自然科学方面批判「反动的生物学家胡先绣」；在建筑学方面批判「梁思成的复古主义形式」等，对肃反运动更是不容置疑。陆定一认为，「这些工作，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在他看来，「经过斗争，文艺教育和科学事业是欣欣向荣的而不是枯萎下去了，团结是增强了而不是瓦解了，新生力量是成长了而不是被压制了」，文艺界「出现了新的气象」，「从前所谓『创作枯萎』的悲观论调已经破产」了。¹²⁵ 还有中央政治局最后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除了批评党内存在宗派主义倾向以外，同时也批评了「缺乏革命的警惕性」的迁就麻痹倾向。在提出要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作适当的安排」的同时，还强调要「继续改造他们」，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知识分子队伍」。¹²⁶ 正如有些研究者

指出的：这种对意识形态工作丝毫不作反思的态度，使得这次会议没有真正把握知识分子的思想脉搏，「没有触及知识分子所苦闷、所焦虑、所痛心、所希望解决的迫切问题」。127

最后，会议也没有触及思想和学术自由的问题。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而知识分子更把对社会的发言权视为自己存在的理由。然而，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中，不仅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言权逐渐丧失，代之以对自身的不断反省、改造，而且在纯学术领域中自由讨论的环境也遭到毁坏。对于这种现象，周恩来的报告基本上没有触及，倒是陆定一的发言谈到了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作为宣传部长，陆定一试图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问题三者之间的界限。他在发言中指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都不能放过，但两者之间也应有所区别，「对于没有政治问题，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坚决进行思想斗争，但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包括等待》」。至于「学术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问题，技术性质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1」。「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间进行适当的斗争」。陆定一认为，「我们这样做，就不会在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上成为『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成为『盖子』」。128 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划分清楚，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都是一个应该解决而从未解决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没有、可能也没想进行讨论。周恩来1月20日的总结发言，以及2月24日最后修订的中共中央的指示，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与此相关联，也许应该注意到，周恩来的报告及整个会议似乎主要在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则较少提及。

127 于风政：《改造》'页 434。

128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8?料》，第二十一册，页 168。

知识分子本来是具有爱国主义情感和立场的社会主体的一部分，却偏

偏要把他们看成是依附于某个阶级的「毛」，非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甚至「急风暴雨」的思想改造就不能为国家社稷贡献自己的知识，这种从本质上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理念就决定了中共这次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不可能是彻底的。正因为如此，当 1957 年知识分子受到党的鼓励和动员，又一次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本性时，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钟摆立即就摆回了 1955 年，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3 知识分子的双重反应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努力向党外和高级知识分子传达会议精神。中央和各地都动员舆论进行了大量宣传，以造成声势。1 月 30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 月 30 日至 2 月 7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这实际上是一次扩大了了的政协会议，除原有 545 位委员外，增加了 119 位新委员，还邀请了 626 位各界人士列席，参加会议的共计 1290 人。129 到会委员和列席人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其中有很多是「高等」知识分子，包括受到批判的梁漱溟、梁思成及旧派学者陈寅恪等。刘少奇和一批国务院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邀请这么多人与会，显然是为了展示统一战线「更加广泛」、「更加强大」和空前未有的「团结」。中共中央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有关知识分子的新政策尽可能广泛地传达到党外，并在民主党派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中展开讨论，以达到全面动员的目的。¹³⁰

这次会议虽然是全面讨论中国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及其提出的新任务，但在实际进程中着重讨论的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除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外，郭沫若也就此作了专题报告。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是以双重身份来响应中共中央新政策的，一方面他是中共

129 《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31 日。

130 《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8 日、9 日。

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言人，一方面他又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如此，他便可以更多地强调知识分子自身应该承擔的「使命」。报告向知识分子提出了五条要求：贡献力量，扩大队伍，提高水平，自我教育，加强团结。郭沫若指出，党和政府已经给了知识分子以各种工作机会，现在「至少一半，还要依靠知识分子自己的努力」。因而，他号召知识分子要每天「反省自己」。郭还强调，知识分子与领导的关系「不够密切」，问题的「另一面依然在于知识分子自己」。在轻描淡写地谈到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震撼后，郭沫若说：「无论怎样的微风细雨，总不免要吹动头发，打湿衣裳。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连微风细雨的批评都不能接受，那就证明他还没有进行自我批评的决心。」¹³¹ 为了营造氛围，在仅一周时间的大会讨论中，安排了235人作「响应性」发言，其中有政协委员，有特邀列席代表。全部代表发言由新华社发通稿，从2月3日至13日，《人民日报》每天以几个版面，全文刊登了226篇大会发言（含联合发言），其中包括梁漱溟、梁思成的发言。2月6日发表的梁漱溟发言达四千余字，2月9日再发消息，「补加一段」，以显示对其发言的尊重。²

中共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出力的心情不可谓不急切，那么知识分子的反应和心态如何？在仔细阅读并揣摩这些发言后，笔者感到，此时知识分子的心态仍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政治上仍然是谨言慎行，另一方面又因有机会为国效力，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和期待。

从1月12日（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前一天）开始，《人民日报》陆铤发表了石景山网蛾厂总工程师安朝俊、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季羨林、协和医学院外科主任吴英恺、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同济大学副教务长吴之翁、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张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常务委员葛廷燧、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茅以升等著名人士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显然是为配

131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日。

132 《人民日报》，1956年2月3日至13日。

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造舆论的。然而，也不能把它们完全看作是应景之作。这些文章对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坦诚地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仍然是对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状况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季羨林认为，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其背景如何，「一般都非常爱国」，「他们现在对党有无限的信任，无限的敬仰」，他们的政治觉悟的进步速度「是很高的，是空前的」，谁也「不愿意成为懒汉，坐享其成」。他批评说，一些人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不够正确的」，这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没有好处」。茅以升说，知识分子「都毫不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年老的知识分子都在进步，「都想成为劳动知识分子」。冯友兰也说，「我敢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接受党的领导为莫大的光荣」。133 在知识分子看来，如同季、冯、茅所说，他们「绝大多数」、「毫不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而中共的估计是，还有百分之四十的中间分子、百分之十几的落后分子和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分子。在这裏可以明显地看出，即使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作出的新估计，与知识分子的自我政治判断仍然存在重大的差异。季、冯、茅等人的文章事实上在为知识分子辩谟。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茅以升认为，党与非党人士之间有「尊而不亲」的现象。吴之瀚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在于党员对群众的进步「重视不够」，「估计不足」。党员干部对教学「一知半解」，或者「强不知以为知」，处理问题不同系主任商量。吴之瀚还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生硬粗暴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由于领导运动的个别干部对于思想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未能多采取以理服人的方式而过于生硬粗暴，使少数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造成一定的损失」。吴英恺则含蓄地提出，政治运动造成了对业务和技术工作的消极影响。茅以升还批评了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以及把苏联专家的结论「当做金科玉律」，老工程师们把所有英美书籍束之高阁的瑰

象。冯友兰则对加强科研和教育工作，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物质待遇提出了具体建议。134

相比之下，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这种批评建议就少得多了。何思源发言以他到四川考察得来的情况，批评在某些地区、单位和干部中「甚至以一种关门主义倾向对待知识分子」。年纪较大的知识分子，因历史比较复杂，「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使这些人抬不起头来」，「甚至在业务上也对知识分子加以怀疑」。罗隆基提到，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安排和使用遇到了困难，六年来极少数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闲散在社会，因而，有比较多的苦闷，有人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他还说，「现在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作客思想」。¹³⁵ 不过，即使这种针对局部问题提出的批评，在二百多篇发言中也是凤毛麟角。这表明此时知识分子对中共重大政策的言论是很谨慎的，是有顾虑的。由于中共没有对过去的政治运动作出检讨性总结，知识分子即使心存疑问和不满也不敢表露出来，更不可能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总体性评价。至于反胡风和肃反运动，这在当时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就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董必武还作了肃反专题报告。报告全面肯定肃反，提出要「继续坚决地、深入地进行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¹³⁶ 因此，会上根本就没有人敢于触及胡风事件和肃反运动。相反，会上的发言大多在作自我批评和检讨。梁漱溟检讨自己「抗拒批评」，「不堪造就」，「深深抱恨自己过去是太辜负主席爱厚之意了！」梁思成批判自己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错误理论」，「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种种。¹³⁷ 这些明显地自我上纲的做法，很难说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态度。许多发言都集中于反躬自省，检讨知识分子头脑中还存在着

134 《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16、14、15日。

135 《人民日报》[^] 1956年2月6、11日。

136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日。

137 《人民日报》[^] 1956年2月8-4日。

「虚伪的个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的必要。因为正如李四光所说：「只有继续不断地自我改造，才能不落后于时代。」】38

当然，也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知识分子的整体对中共新政策无动于衷。否则，怎么理解知识分子公开表达的「兴奋」、「激动」、「欣喜」、「愉快」、「光荣」、「荣幸」、「幸福」呢？无论怎么说，这已经超出了「响应性」发言必须表现的热度。许多从各地来京的知识分子为被邀为座上宾而感到受宠若惊，也是真实的。至少有两件事让知识分子表现出热情来：

一是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自建国以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打败美国，国威大震；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着出色表演；现在经济建设全面铺开，国家眼看一天天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为这一切感到扬眉吐气。季羨林的文章表达了这种心境。他说：对一个旧知识分子来说，接受天翻地覆的伟大的变革，有许多「苦难」，「恐怕比唐僧的八十一难还要加上一难」。但知识分子没有「垂头丧气」、「愁眉苦脸」。「根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简直是愈来愈高兴，愈来愈年轻，愈来愈容光焕发，愈来愈精神抖擞。我们都仿佛吃了返老还童的仙丹，身体裹面时时产生着新的力量。」他自我解释说：「这是甚么原因呢？我看这原因并不复杂。我上面说过，多数的旧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他们渴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这种希望在过去一直没能实现。然而今天，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国家强大起来，「自己也可以扬一下眉，吐一口气」了。139 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表达了同样的心境。冯友兰说：眼看祖国几年之间，一跃而为世界强国，「真是如旭日方升，光芒万丈」，我们都是欢欣鼓舞，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添上一分力量。」陈垣为他的老友、清华大寨副校长刘仙洲光荣入党而振奋不已，奔走相告。他说：「共产党是不拒绝任何人的……每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努力要求自己」，希望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能使任何一个爱国的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向隅」。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宏伟蓝图，燃起了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钱学森说：「我到处看到祖国在突飞猛进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这使我万分地兴奋」，「我更为这个伟大的任务（十二年迎头赶上世界

科学水平)所鼓舞」。华罗庚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能够生长在这毛泽东时代是无上的幸福，无上的光荣。因为就在这一代，我们将亲眼看到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从落后的状态飞跃地进入世界水平。」一些人开始

规划自己的研究计划。如历史学家顾颉刚建议，要组织力量搜集整理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史料，他满怀信心地说：史料整理「在十二年的规划里必然被列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我们大有工作可做」。二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表现出来的中共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诚意，使许多人尽管心中疑惧难消，却也不得不为之动容。建国几年来，知识分子在新社会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因而处处有「做客」和被冷落的感觉。这次会议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和兴奋，激发出主人翁感和参与热忱。民盟中央委员黄琪翔说：「当我们看到了周恩来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每个人都不能不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而受到深深感动。」章伯钧也提到：「在党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前，为了深入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民主同盟做了一系列串联工作，向党反映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意见和要求。在这次周恩来主席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所有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决，更叫我们感动的是报告中还有关于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检查批评。」

140 《人民日报》，1956年1月15，20日；2月3、6、8日。141 《人民日报》，1956年2月5，4日。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当时民主党派欢欣鼓舞，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师都认为：随着新时期来临，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不再适用，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至少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会有更大的发言权，知识分子甚至有权参与新纲领的制定。」142

三吹向知识界的春风：新政策的实施

尽管对知识分子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和利用知识分子则是共识，因此，中共推行知识分子新政策的决心仍然很大。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中共中央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步骤。2月24日

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强调，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日益显出科学干部、技术干部和一般文化干部的重要性，同时也日益显出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因而要求全党「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还要求向全体党员传达这一指示，检查工作和提出改进意见，及时向中央作报告。”³

1 知识分子新政策在全国的实施

142 金觀澳’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4月号’页27。

14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辑》，第八册’页132、146—147。

4、5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5月’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管理高级知识上一分力量。」陈垣为他的老友、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光荣入党而振奋不已，奔走相告。他说：「共产党是不拒绝任何人的……每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努力要求自己」，希望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能使任何一个爱国的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向隅」。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宏伟蓝图，燃起了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钱学森说：「我到处看到祖国在突飞猛进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这使我万分地兴奋」，「我更为这个伟大的任务（十二年迎头赶上世界

科学

7 义平) 所鼓舞」。华罗庚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能够生长在这毛泽东时代是无上的幸福，无上的光荣。因为就在这一代，我们将亲眼看到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从落后的状态飞跃地进入世界水平。」一些人开始规划自己的研究计划。如历史学家顾颉刚建议，要组织力量搜集整理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史料，他满怀信心地说：史料整理「在十二年的规划裏必然被列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我们大有工作可做」。

140

二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表现出来的中共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诚意，使许多人尽管心中疑惧难消，却也不得不为之动容。建国几年来，知识分子在新社会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因而处处有「做客」和被冷落的感觉。这次会议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和兴奋，激发出主人翁感和参与热忱。民盟中央委员黄琪翔说：「当我们看到了周恩来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每个人都不能不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而受到深深感动。」章伯钧也提到：「在党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前，为了深入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民主同盟做了一系列串联工作，向党反映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意见和要求。在这次周恩来主席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所有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决，更叫我们感动的是报告中还有关于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检查批评。」¹⁴¹

140 《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15、20 日’2 月 3、6、8 日。141 《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5，4 日。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当时民主党派欢欣鼓舞，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师都认为：随着新时期来临，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不再适用，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至少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会有更大的发言权，知识分子甚至有权参与新纲领的制定。」

三吹向知识界的春风：新政策的实施

尽管对知识分子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和利用知识分子则是共识，因此，中共推行知识分子新政策的决心仍然很大。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中共中央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步骤。2月24日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强调，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日益显出科学干部、技术干部和一般文化干部的重要性，同时也日益显出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因而要求全党「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还要求向全体党员传达这一指示，检查工作和提出改进意见，及时向中央作报告。143

1 知识分子新政策在全国的实施

4、5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5月，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管理高级知识

142 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二十一世纪》I 香港), 1997年4月号'页27。

143 《建8以来重要文献选辑》，第八册'页132，146—147。

分子干部，负责督促、检查各部门对于专家和其它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负责解决需要统一处理的有关专家和其它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分别成立了相关办事机构。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

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及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十四个问题（图书—数据、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土地、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除规定由新成立的专家局「负责研究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外，还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应由相关单位办理的有关事项目录，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¹⁴⁵

贯穿于 1956 年全年的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工作，成为中共地方各级党委紧跟中央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后，各地纷纷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制定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作纲要。中共上海市委于 1956 年 2 月制定了〈上海市 1956—1957 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要求上海各级党组织在 3 月底以前对知识分子工作作一次全面的检查，切实解决全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工作安排、思想改造、生活待遇及建党等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随后，又制定了两年〔1956—1957〕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4 月提交市政协全体会议讨论。¹⁴⁶ 根据中共上呼下应的惯例，不仅省一级，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党组也都制定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作纲要。如中共佛山市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于 2 月 22 日发出〈佛山知识分子工作规划〔1956—1957〕〉，中共北京建筑工程委员会也于同一时间制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规划〉。¹⁴⁷ 在社会舆论方面，「全国大小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迅速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对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宣传，对著名知识分子近况的报道」。¹⁴⁷

中央和各地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4 月 16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对当地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医师、文学家、艺术家的工作条件作一次检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一是迅速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缺少助手的困难；二是尽可能地解决所缺房屋、所需实验用土地和基本建设的土地等问题；三是切实改善图书、文物、档案和各种资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状况。¹⁴⁸ 在 1956 年的工资改革中，提高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上海市的规

定更加具体，如要求市卫生局半年内首先改善三千余名学术地位较高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条件；市房管局先拨出宿舍房屋五百户，分配给著名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居住；市工联利用已有工人休养所扩大高级知识分子的休养名额；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决年老体弱、工作繁重的「第一流专家」的交通问题；市合作总社做好高级知识分子各种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等等。149

147 于风政：《改造》’ 页 442。

148《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 第四卷’ 页 316—317。149 上海市档案馆，八 22-2-515’ 页 2—6。

各地在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都为教授们专辟了阅览室。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馆准备补订二百种外文期刊和三千种外文书籍。北京大学的教学辅助人员将增加 110 人，即增加一倍。复旦大学各系配备了科研秘书，并且准备给老科学家配备助手和增加实验室人员。许多高等学校还采取许多办法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清华大学实行「优待通用证」的办法，教授、副教授等拿着「优待通用证」到校医务室看病、到食堂吃饭和到消费合作社买东西，都可以受到优先和其它照顾。北京辆截工业学院对教师吃

饭、理发、看病、购买东西等也订出照顾办法。中国医科大学为教授和部分讲师增加了住宅面积。东北药学院在食堂给教授和讲师设立了专

席，等等。中国科学院围畜经费也由原来的 80 万元增为 546 万元，增订的书刊中有资本主义国家期刊二千种。正式成立了科学技术情报研

究所，搜集、研究并传播国内外科学发展的情况与最新成就。19 这种

努力，罗隆基在 6 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发言中给予了充分

评价。他说：「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四个多月来，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有了很显著

的成绩」。[时间不够]，图书数据缺乏、配备助手等问题都逐步得到解决。他特别提到：「最近国务院改革工资的决定实施以后，对知识分子

子，特别是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们的工资都将有较多的提高。」

第二，解决知识分子失业和使用不当问题。据各地调查，社会上

150 《人民日报》，1956年3月14日。

151 钱临照，谷羽主撰：《中国科学院》，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页69。

152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

153 《人民日报》，1956年8月12日’

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就业。如北京市5月以前调查，具有大学程度而没有就业的就有2321人，其中大学毕业的1482人，大学肄业的771人，其它68人。就学科划分而言，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有375人，社会科学和语文、教育的有1349人，其它科系的597人。同时，还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使用不当。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地纷纷成立了招聘工作人员委员会。北京市走得快一些，截至7月底，已确定录用317人，还有1508人准备录用。！538月11日’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国家技术委员会、国务院专家局等五个机关，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发布联合通告，向社会招聘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和中等学校教奉和教育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及翻译人员。招聘对象首先是社会上还没有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其次是安排不当的在职专家。8月12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充分发挥我国知识界的潜在力量〉。招聘工作开始后，仅北京市在两周内便有1500多人报名应聘，其中应聘科研人员、翻译人员、高等学校教员的有700多人。各地进展大体相同，如辽宁省截至10月上旬，有3000多名社会知识分子报名申请就业，招聘工作委员会发出了1500多份应聘害。此项工作延至1957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结束。154与此同时，对一些用非所学的专家的工作也作了调整。

154 《中华人民共和国8实录）’第一卷’页1476；《人民日报》，1956年8月12日’

15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页146。

156(人民日报), 1956年3月21日。

157 上海市档案馆, 页2—6。

158 《北京市重要文献通编; 1956¹》页13—17。

第三, 大力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中共把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视为争取知识分子「进步」和合作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彻底纠正「猴重的关门主义倾向」。4月, 中共中央批准下达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 提出到1962年, 高级知识分子党员应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155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 号召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针对党内的质疑, 社论指出, 决不能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 政治经历和社畜关系复杂, 就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社论甚至认为, 在思想作风上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缺点, 也要热情地帮助他们, 「把他们逐步地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156 根据中央的精神, 各地都制定了在知识分子中建党的计划。上海市规定, 全市在1956、1957两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117。左右, 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7呢左右, 并要求年内完成上述建党指标的507。。157 北京市委规划得更加具体: 在今后两年内发展的党员, 教授100人〔约占其总人数《效》〕, 讲师170[^](109[^]), 工程师125人([^]), 西医主治医师以上人员50人〔13950[^]〕, 作家、艺术家、著名演员25人化[^])。总之, 「到1957年底, 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员人数将达到237。左右」。158

「从3月开始, 全国刮起了一阵竞相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旋风。用多快的速度、发展多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似乎成了紧跟中央的一个标志, 有些地方党委甚至为此而打破了正常的入党程序。」159 官方媒体不断报道各地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消息。到「七一」前夕, 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入党, 仅上海、北京两地, 几个月内就有三百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著名的物理学家邓稼先、谢希德, 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 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锺健, 内分泌学家朱宪彝, 小麦良种培育者赵洪璋, 翻译家曹靖华、电影导演蔡楚生、张骏祥, 北京中医赵锡武等, 都是这个时候入党的。[^]1956年上半年, 中共各级组[^]

织共接收了 2592 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党员达到 125 万人，占 1700 多万中共党员总数的 11.7¹⁶¹。

第四，培养和扩大知识分子队伍。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充分使用现有知识分子，一是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迅速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在中共中央拟定的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中，希望在十二年内至少培养出一百多万高级知识分子。¹⁶²提出「必须培养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足以独立地解决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卫生事业和其它各个部门的技术问题的专家」。同时必须「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接近现代先进水平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其它理论科学家」。¹⁶³中共所以特别重视高级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们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一是为国家培养新专家。因此，需要尽快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配助手。郭沫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报告中殷切地提出：「我们希望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上，作到最紧

159 于风政：《改造》，页 442。

160 《人民日报》¹⁶¹1956 年 7 月 1 日；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1949—19991》，

上册 I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1，页 352—353。161. 《人民日报》¹⁶²1956 年 9 月 14 日¹⁶²《人民日报》¹⁶³1956 年 1 月 31 日。¹⁶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页 141—142。

张的努力，把潜在力量进一步发挥出来。」他提出「培养专家要用带徒弟即个别指导的方式」，并把科学院每位导师所带研究生从五个增加到十个，这样科学院十二年内培养研究生就可以比原定 10500 多名增加一倍。钱学森心情更加急切，他甚至仔细算过，「一个老师十二年后就能培养出八十九个副博士」。¹⁶⁴

除了自己加紧培养，中共还从两个途径扩大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一是委托苏联代为培养，一是继续争取仍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建国以后，中国就开始派留学生赴苏联学习，主要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据报道，截至 1956 年上半年，有 1300 多名中国留苏学生完成学

业，已有 300 多名回国，其余的人也将于最近陆贻回国。165 此后，中国继续向苏联派遣留学生。1956 年 4 月，苏共中央主席画和苏联部长会议专门就在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事宜作出决议，「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 118 名中国专家进入研究生班学习，接收 20 名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166 同时，中共继续不遗余力争取滞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据当时官方摸底，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七千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不少人已经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2 月 22 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随后，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确定「普适争取而又以在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动员起来，「在大约三年时间内把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回国的留学生基本上争取回国，今年要求争取一千人」。167

164 《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31 日、2 月 3 日。165 《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29 日。166 ¹: 3, 41-4.00.16.15.3273.; 1.28-31.

167 (周恩来年谱 11949—19760' 上卷' 页 553—554; 《中华人民共和国 8 实录》' 第一卷，页 1389。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共高层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存在分歧，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也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因此，所谓知识分

子新政策的推广和执行无疑是受到阻碍的。会议过后几个月，中央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调查发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宗派主义思想尚未彻底克服，因而在贯彻知识分子工作中还存在着抵触情绪」，「对知识分子盲目地排斥不信任」的现象继续存在，「有的甚至产生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认为自己文化低，不懂技术，今后吃不开」。在所调查的单位中，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兼职过多、用非所长和生活待遇〔主要是住房〕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调查报告指出，有些部门和地区，知识分子工作「一阵风刮过之后，显得有些沉寂和自流现象」，进展很慢。168

2 中国第一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催生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

关于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问题，最早是由苏联顾问提出来的。1955年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又八.！^^草拟了〈关于规割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建议中方组织规划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解决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规划中提出的最重要问题。2月12日和4月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和郭沫若先后向周恩来和陈毅报告了柯夫达的建议，提出组建「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规划委员会」。

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刘少奇在总结时认为，柯夫达的建议很重要，值得重视，并资成计委、科皋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如何实现这些建议的意见，再提交中央讨论解决。9月15日，中国科学院第三十九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制定中国

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指示〉。1956年1月23日至2月11日，在苏联顾问拉扎连柯〔8.11.1^）^0，柯夫达的继任）的帮助下，三个学部和学术秘书处组织了360名科学家，拟订出科学院远景规划初稿，从而为国家制定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打下了基础。171

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了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动议。他在写给国务院各有关办公室和各个党组害记的信中提出，要像规划工业建设中的156项那样来确定迅速发展中国主要学科和重大专题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并提出了制定科学技术规划的初步思路和要求，以及项目、人才、国际合作计划、其它重要措施等四项内容。

1721月14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国务院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出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173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把这项工作提上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议事议程，对于规划的制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调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害记张劲夫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回愤道：「调我去科学院时，周总理找我谈话。他说：你一到，就要马上抓科学技术发

展规划。」174 随即成立了由范长江、张劲夫、刘杰、周光春、张国坚、李登瀛、薛暮桥、刘皑风、于光远、武衡组成的十人小组，负责主持规划的制定。175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陈毅任主任，李富春、薄一波、郭沫若、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

171 张柏春、张久春、姚芳：《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技术转移》’页80。
172 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11949—19660》（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1’页170—171。173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页184。174 《周恩来传 11949—19761》’页251—252。175 《中国科学院》，上册’页71。

17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509—510。1956年11月’陈毅调任外交部长，改由II荣臻任主任，

科学规划的制定自然离不开苏联的I?助，实际上，苏联专家和学者的意见也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月10日，周恩来致电苏联部

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八.8111*11111）说，中国科学家正在拟制科学发

展的长期规划，「希望苏联科学家在这个工作中给予他们直接的帮助」。按照拉扎连柯的建议，周恩来提出拟请机械数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自动控制与远程操纵、无线电工学等十六门学科的科学家长来中国短期讲学和帮助进行拟制规划的工作，因为「这十六门学科都是中国

科学界的主要的空白点或薄弱环节」。3月22日，尤金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派出十六位学者来中国。1773月29日、苏联科学家代表团一行十八人来到中国。代表团中有七名院士，三名通讯院士，其余也都是所长、主任一级的科学博士。这些专家不仅水平很高，而且都是中国急需的。如一些新技术学科的规划，包括力学、电工、电子学、电真空学、精密机械、计算技术、水声学、半导体、自动控制、

喷气发动机等，就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的。拉扎连柯一再表示，苏联可以把从理论到工艺方法的科技成果都传授给中国。苏联有关方面指示，只要中方提出要求，苏联可以提供任何援助，包括可以派比已议定的名额多几倍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可以从苏联得到所有的科学情报等。~

事实上，以不同形式参与过中国科学规划的制定和修改的苏联科学家远不止科学代表团和在华专家。根据俄国资料，「1956年，约有六百名苏联学者〔其中六十人在中国工作长达二至三个月〕和近五百个苏联科学和设计机关、学院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的制定和修改」。苏联学者和专家对远景规划草案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阐述，写出的俄文报告长达15000页。中国还经常派科学代表团和专家学者去苏联，「仅1956年一年，中国学者就参加了十五次苏联科学院召开的会议」。179 对于苏联的帮助，郭沫若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称赞说：「这在中苏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创造性的合作上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程碑。」则

激发科学家的主人翁感和热忱，莫过于让他们有机会参与新纲领的制定。如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制定过程，远只是邀请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参与讨论，那么，科学发展规划则是中共干部与各类科学家紧密合作，集思广益的成果。5月26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规划编制工作的三百多名科学家。6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科学家，成为科学界津津乐道的一件科学盛事。181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比原计划延长三个月），在中国23个单位、787名科学家的参与和苏联专家学者的帮助下，终于编制出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方法是既「密切结合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又对基础理论研究予以重视，并尽可能地参考世界科学最新7忙平和发展趋势。整个规划确定了五十七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从中综合提出了十二个重点项目。8月下旬，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对自然科学方面的科学规划工作做了总结性的讨论。科学规划文件包括〈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

和四个附件，共六百余万字。会议共召开五次，每次有四十至五十人参加，二十九位科学家和有关负责干部在会上发了言，着重讨论了〈纲要（草案）〉中一些主要的有争论的问题。〈规划〉确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 57 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 616 个中心问题，并指出了各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画出了轮廓，并作出了初步的安排。182 〈规划〉还确定了六大「紧急措施」，当时公布的有四项：计算器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

180 《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19 日’ 181 《周恩来传〔1949—1976〕》’ 页 252。

18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页 428-435。

纵技术。还有两项绝密任务：原子弹和导弹。这六项紧急措施，构成了当时中国发展尖端科技的辟键性措施。183

10 月 29 日，陈毅’ 李富春和聂荣臻（已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向周恩来递交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的报告。11 月 15 日周恩来批示，可以原则批准，经讨论和审议后再提请中央批准。12 月 20 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 1）〉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人民委员会征求意见，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希望批转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地方党委，以示重视。22 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将〈纲要（修正草案）〉作为「国家的重要规划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注意研究和汇报。184

这个科学远景规划，大大推动了「向科学进军」的进程。张劲夫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有了科学规划，就有了奋斗目标。」185 1957 年 6 月 26 日，周恩来在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1956—1967 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已经制定，并且已经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这份规划远不如农业规划那样好高惊远，原定十二年完成的科学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大都提前五年，到 1962 年就完成了。在这六年中，全国科研机构（国防系统除外）由 381 个增

加到 1296 个，专门从事研究的科技人员从 6.2 万人增加到近 20 万人。从科研成果看，规划任务的实现，解决了二五计划和三五计划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批科技问题，填补了科学研究中一些重大空白，加强了某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发展了大批新与科学技术。如李四光领导的地质科学队伍，揭示了中国原油储藏的广阔前景，并相继发现了大庆、大港、胜利等大油田，使中国在 1963 年基本实现石油自给，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又如在原子能和火箭技术重大突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由于实行了寻求苏联援助和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中苏交恶、苏联拒绝援助的情况下，中国科学家依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1964 年 10 月）和发射了自行设计制造的导弹〔1966 年 10 月〕。187

1956 年的初春，中国的科学事业的确有一个良好的有希望的开端。恰在此时，从莫斯科传来的一声惊雷——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进一步启发和推动了中共领导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

18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14—516。在提前五年基本完成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基础上，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共同负责制定《1963—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页 427。

第二章

以苏为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

1 关于苏共二十大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影响，始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其研究的切入角度有两个：中苏关系史和中国现代史。从中苏关系史方面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李丹慧主编的论文集《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应该说是代表了前些年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从中国现代史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来说多一些，其重点集中在中共对苏联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董志凯：〈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王真：〈50 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无疑是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具震撼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纲领，特别是对斯大林的批判，震动了全世界，其结果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的深刻问题。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当年并肩作战的社会主义各国却领略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和结局，尽管研究者的出发点、思路和结论可能存在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苏联共产党在1956年前后提出的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¹

从社会发展道路的角度观察，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意义究竟何在？毛泽东和中共对此的最初反应和思考又是甚么？²在以往中国史学界一度占有主导地位的看法是：苏共在二十大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持基本否定的立场。因此，苏共二十大成为中苏两党分裂的历史转折点，并由此引发了毛泽东对苏联发展道路的思考，从此就开始探索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近十年来披露的历史档案文献告诉人们，事实并非如此。

一 苏共二十大的新方针

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无疑是最有争议的历史话题之一，而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的看法。在1963年9月6日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一文中，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评述。文章首先断言，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苏共「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接着指出，双方的分歧或苏共的错误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借口所

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斯大林问题，文章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而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文章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由于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现在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³ 这种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的说法至今没有在中国官方史学中得到修正。⁴

³ 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I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页 55-63。

⁴ 特别是关于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说法仍为官方所使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I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 359—360。由此，很多学者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重分裂 1 甚 5 「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如见孙其明：《中苏 98 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 239—240。

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仅就内容而言，把苏共二十大的主要精神归结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和平过渡」理论，既不准确，也不完整，因而很难对其实质出正确和全面的判断。而对这个问题如何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中共的选择和中国后来的发展道路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因此，这里有必要首先对二十大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质进行概括。现在所有相关的历史文件几乎都已经公开，总括起来看，苏共二十大是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确与斯大林主持的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或纲领性意见。又，

1 苏共二十大纲领：对外政策

在对外政策方面，苏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样一套总方针和总路线。

苏联对外政策新理论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当前时代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作为「无所不包的世界制度」已经瓦解，而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由于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有道义的手段而且也有了「物质的手段来阻止使略」。于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虽然继续有效，但「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未来的世界「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必须看到，「历史已经把这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事实上，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日益广泛地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它不仅是中国和其它民主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也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主要的目的是消除战争的威胁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同样，由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

依照列宁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观点，苏共中央指出，「除了依照社会主义方针改造社会的苏维埃形式以外，还有人民民主的形式」，其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实行私营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并逐步使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政策，认为中国「正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许多独特的贡献」。因此，不应该「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从理论上讲，「这种过渡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制度革命式地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因而，任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就是革命，激烈的程度有轻有重，然而都是各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人民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就是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在右翼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愈来愈多地遭到破产的情

况下，工人阶级可以团结其它爱国力量通过议会斗争改变政权的性质，而在反动势力仍然强大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则只能伴随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重要的是，「无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如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就不可能有向社会主义的过

渡」。

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是通过武装干涉内政的办法，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和平竞赛的方式。「在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但不是通过「革命输出」，「不是用大炮和侵略」而是由于它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因此它能够保证人类达到比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得多的生活水平」。

大会通过的决议全面肯定了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些根本的、带有原则性的、有关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问题，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⁵

⁵ 以上论述参见赫鲁晓夫关于苏共中央工作总结的报告，米高扬在大会上的发言、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在大会上的发言，苏共中央关于工作总结报告的决议，分别刊登于1956年2月18、22、23、26日《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对二十大总结报告的文稿进行了深入讨论，并集中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只有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提出不同意见：而多数人完全支持报告的观点和结论，并批评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卡冈诺维奇最后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莫洛托夫没有表态。详参「八!!!，0 伍 8,; 1. 389. 凡 43 篇 5106、!!! ! ^/)X: ^010120^!!!。^! ^-^ ^010011101^001883XX01*3)10! ^!!!^,; ^, ^,\1001188: ? 00003^; 2002^0. 88-93。

今天看来，苏共中央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路线，是极具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的，正如许多俄国学者现在认为的那样，「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成果首先是制定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方针，而这个方针是与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本人牢固地联接在一

一起的」。⁶ 当然，这种具有内在逻辑的新思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时局认识逐步成熟的结果。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新的国际局势就已经显示出来。由于战

时合作而形成的国际关系重组，以联合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为标志的统一的国际体系相继建立，以及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功能趋向成熟，为修正苏联传统的对外政策创造了国际环境和基本条件。雅尔塔体系区别于凡尔赛体系的根本标志之一是建立了各大国认同的国际体系和平等的游戏规则，而莫斯科也是这种体系和规则的倡导人和缔造者。因此，斯大林陆陆续续、不自觉地从战略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方式和安全观念。从战争后期到战后初期，解散共产国际这个对苏联外交已经不起作用的工具，以求得资本主义世界的谅解；强调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合作，表明苏联已经感受到其可以对世界命运发挥主体作用；推动欧洲各国及中国通过选举成立共产党与其它各党的联合政府，说明苏联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经验；最后，放弃世界革命的主张一如在伊朗、希腊和中国表现的那样，不再是推翻旧世界，而是要改造旧社会。所有这些政策的本质及其归宿就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然而，因意识形态对立而产生的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和敌对，因美苏各自的过度反应而采取的过激措施，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互动作用，终于使冷战思维成为双方政策的出发点，同美国一样，苏联也很快就回到了战前发展的老路。斯大林不仅在国内继续高唱军事共产主义的「凯歌」，进一步巩固攫取为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加紧对社会的控制和镇压，而且重新调整了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在东欧各国推行苏联体制并建立起类似共产国际的情报局组织。欧洲的紧张局势随着柏林危机的爆发而加剧，朝鲜战争则把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并推至极限。

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改变传统政策提供了机会。及时地劝说中国接受美国条件、结束朝鲜战争是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意图的第一次显示，也是克里姆林宫新主人集体做出的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次尝试。1954年3月12日，马林科夫在对选民演说时宣称，朝鲜停战是国际紧张局势走向缓和的标志，「苏联政府坚持进一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坚持牢固而持久的和平，坚决反对冷战政策，因为这个政策是一个准备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而在拥有现代武器的条件下，这样一场战争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苏联主张同

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8 这种表述不仅在观点上，甚至在话语上，已经与斯大林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大相径庭了。由于党内继承权的斗争，马林科夫公开发表的惊人言论受到指责，并成为其被罢黜的理由之一。9 但实际上，这个理论框架和思维逻辑是苏联新领导人普遍接受的。

7 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II 东人

民出版社' 2003' 相关的楼案文献见沈志华编：〈关于朝鲜（? 战的俄国档案 8 编〉，《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4 期' 1150—175。811|33803113143^X319541-..

9^&! ^14.? 61116 让画 3!)”0 「0095510 隐甲 311^1411000! ”.\1”道动耽 ”

01? 06; 16 服 3 拗隐 08001-010. 1999, ^0 上 0. 31.

101954 年 4 月 1 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 X 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了一些苏联著名物理学家的看法：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方的毁灭，人类正面临着毁灭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威胁等。丁 5 化 50I 当代文!^保管中心 1, 【; 0^3 戊 126 儿 39-41, 转引自丫^51! 1; 【00^又. 乙”!）。!;, “X”(: \^3? 0。

31' 化 【^(^! ^' !0631(1: 1^0800^&III: ”1(10”-80101? 八 8^: '' , □。“1/1” [! 10”。! 10! ^1510^? ^] ^

8X111^155..64^? 3111994, 14-15。可参见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文章&其给赫鲁晓夫的信-载沈志华（执行总主镍 I: ^' 苏联暖史楼案选^》，第二十六卷|; 11: 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页 465—488。

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方针，一方面是基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也是对核武器发展及其后果有了明确认识的结果。^。于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两年的时间里，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以实现与西方的缓和：提出苏联作为新成员加入北约的要求，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赞同奥地利中立并同

意从那里撤退苏联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起义采取冷漠态度，积极推动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谈判，主动提出裁减军队并单独实现裁军，向美国建议签署苏美友好与合作条约，如此等等。’¹ 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主席团会议研究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草稿时，最集中讨论的就是议会道路、和平共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经过一番争论，所有人一致赞同报告的宗旨——和平，会议的结论是：「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寻求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但不是经过战争。」¹² 尽管苏联的举动在美国没有立即看到积极反应，但在其它国家〔特别是英国〕，却是「深入人心」的。¹³ 确如美国情报专家分析的，「苏共二十大的整个旋律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领导人似乎确信，只有和平才是世界共产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¹⁴ 无论如何’50 年代「被合情合理地认为是东西方缓和的第一时期」。”这是苏共中央提出的「三和路线」的结果，也是二十大试图改变国内政策、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

2 苏共二十大纲领：对内政策

在对内政策方面，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平和改善经济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这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 在继续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迅速发展消费品的生产」。

（二） 把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必须坚决地、有计划地在工业和运输业中采用最新的科学成就、技术和先进经验，使现有设备现代化，改善和改进劳动和生产组织，更广泛地在工业中实行专业化和协作，以便在这一基础上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 加强「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其基本路线是加快东部地区的开发，今后十年到十五年间，在那里建立起采煤和电力生产的最大基地、第三个大冶金基地及新的机器制造中心。

（四） 在所采取的措施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消灭农业的落后现象和消除由此产生的工农业发展之间不均衡的现象」，为此需要

在农业中实行可以发挥集体农庄庄员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新的计划制度；在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中，加强对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鼓励；从城市和工业中心派遣人员到农村，加强集体农庄的领导干部和专门人才队伍；进一步加强农业的技术装备，增加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干部；增加国家对发展农业的拨款；继续集中力量大力发展谷物业，开垦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

150531)3861^5, " ! 1161956 311116^011111011311(1^011(1 ?
0111; 05^

(五) 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为此，除进一步提高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以及集体农民的收入外，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措施，如实行七小时（特殊行业六小时）工作制或每周五天工作

制；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将住宅建设增加一倍；国家为老年人建立房屋和设置相应的养老金；实行免费教育；普遍设立托儿所和幼儿园，以及其它改善保健和国民教育事业的种种措施。

(六)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有：「同官僚主义的集中化作无情的斗争，充分确立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维谟和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加强地方苏维埃和企业的自主权利；「吸引工人群众广泛参加拟定和审查经济计划的工作、更加积极地参与决定生产管理的问题」等。

(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进国家机关工作，加强苏维埃法制。建立党和政府对国家保安机关和其它权力机构的监督，完全恢复并且加强检察机关的监察权力。16

可以看出，与对外政策相比，二十大提出的对内政策显得缺乏系统性和过于表面化，根本没有涉及苏联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本身，给人的感觉是头痛医头，脚痛酱脚。实际情况恐怕也确实如此，二十大提出的国内问题，只是苏联新领导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认识到的问题，或者是已经有所认识但不敢坦白讲出的问题。

1917年的革命导致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列宁

《11^10111^1111 和他的战友们开始在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建构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囿于历史的条件和战争的环境，布尔什维克选

挥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发展模式，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内战争结束后，为了巩固革命政权，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当时历史环境为苏联提供的第一次制度转型（或曰改革）的机畬。但是，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集权统治为榛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政治动荡不安，经济畸形发展，生活贫穷落后。是战争掩盖了苏联的社会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挽救了斯大林模式，因为它的军事共产主义（战时经济）性质恰恰适合了战争的环境和需要。但战争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数百万穿着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广民随着战线推进走出国门后才发现，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主义天堂」简直无法同「资本主义地狱」相比’甚至戰败的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要高于战胜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抱怨，社会开始思考。然而，斯大林却陷入了一种理论误区，他认为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力量和取得的胜利证明了他所创造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骸制的正确性和优越性^1946年2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8 再加上冷战爆发和国际关系趋向紧张，刚刚开启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被关闭，铁幕再次降临俄罗斯大地，党内和社会生活又悄悄地笼罩在政治清洗和镇恧的乌云之中：一切都恢复到了战前的状态。19

俄国学者说的不错，1953年的苏维埃国家确实已经处于社会大爆炸的前夕。”人们不仅要在恐和惊慌中煎熬，还要忍受物质生活的

贫乏。以食品为例，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主义搞了三十多年，直到1952年，苏联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才接近〔牛奶及乳制品、鱼类及水产品）甚至还低于（面粉、大米、肉类及油脂）1913年的水平。21 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严重落后。统计数据 displays，按1926-1927年不变价格计算，与1945年相比，尽管消费数据产品的增长率〔〕69? ^要大大高于生产数据产品〔579^，但是到1950年，在工业总产值^^（亿卢布）中，生产数据产品〔1620亿

卢布) 仍占 67.57%，而消费数据产品(780 亿卢布) 仅占 32.57%。至于农业，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斯大林去世前后的主要生产指标几乎都低于十月革命前。如谷物总产量(按 1939 年以后疆界计算)，1913 年为 8600 万吨，1953 年为 8250 万吨，1946—1950 年平均为 6480 万吨。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如此，1913 年为 8.2 公担/公顷，1953 年为 7.8 公担/公顷，1946—1950 年平均为 6.7 公担/公顷。谷物出口量差得更远了，1913 年出口 910 万吨，到 1953 年只有 310 万吨。与美国农业相比，也能看出同样的问题。1949—1953 年苏联平均谷物产量 8090 万吨，仅为美国同期产量(13350 万吨) 的 60.7%。²³ 斯大林的逝世给那些一向视沙皇为神明的俄罗斯人带来了由衷的悲伤，也使许多善于思考的人们产生了希望。这种思考首先是从直接承担着社会责任的党和国家的高层开始的。他们也感受到了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马林科夫在 1953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 1953 年苏

2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三卷，页 694。

22 〔八·三·中〕4372, 011.96, 0 石 93, 几 161-162, 转引自 0^0X0811.080611110-11 口。"! ^111! "000^

1^01^11116^0000 ? 81920-1950-6["(^ :

1*^00.13X01101^160X0^0^00^0^0^ !

^&, 0^101321^151^50108000133II^^? ^, ^001^83: ? 000139, 1996, 0.201^百分比为笔者计算所得。

23 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页 35^41、135—137^164—165。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广业改革纲要，可以被看作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

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增加日用品生产，发展居民住宅建设，扩大商业销售网点，降低农业税收标准，加速开垦荒地，所有这些措施，无论最初是谁提出的，其结果都是为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的改革方针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²⁴ 不过同时必须指出，苏共中央当时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提出挑战。可以对此做出批注的

是，1955年1月马林科夫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罪名之一就是引导经济界「在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宣扬明显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²⁵

²⁴ 关于1953年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争先提出经济改革措施的情况，详见10.

13⁰⁴08\ \ 1¹¹;。8:; !”41! ”0((丁。!; 8II。; !”XI00 堕(:! ^”! 1(1X0! ”。^08030X83II

01^戰，册! 151 酣。., 1995.1^0^4: 0.109-111; 1711X0/1? .1\08 甲口”! ^订”1X。。

60^)11660008670X01115X^08000X861945-19581-1-. II11083)1X1108 081111)1”(; 10 拜, 1995,

0.8-11.

²⁵ 苏共中央决议指出，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九月会议上的发言「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速度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

治上是有害的，作为重要的结论，他还提出了加快轻工药发展的口号。因此，某些可怜的经济学家抓住马林科夫同志的这个错误讲话，在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宣扬明显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要求优先发展轻工业，并不

是偶然的」。参见? ? 611161(116^^^ (^^^! ”.)^! ^)^0.31.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大提出的对国内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的改革才局限于一些治擦不治本、治表不治裏的零星措施。这裏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超越被斯大林注释和罗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曰斯大林主义）的程度，而不在于

对斯大林本人的畏惧，否则就无法解释苏共领导人在党内民主问题上对斯大林的点名批判了。

3 秘密报告与批判个人崇拜的由来

就共产党的建设而言，除了加强组织和思想工作等一般号召外，最引人注意的是二十大提出了实现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及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批判的目摺是斯大林。

问题是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在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和尽力加强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苏共中央严厉地「谪责个人崇拜」，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个人崇拜的危害在于「使得某一个领袖变成英雄和创造奇迹的人」，同时却「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眨低他们的创造性的努力」，并曾使党的工作「发生严重的缺点」。26 不过，这个问题在大会上并没有占据突出地位。尽管全骸代表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正确的」，27 但是从整个会议发言的情况看，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有人统计过，在大会上发言的共 126 人，直接提到「个人崇拜」问题的只有 8 人，其中 6 人是 藓共中央主席，成员。28 而在所有公开发言中，点名批评斯大林的只有米高扬（^!!! ^站 1^.0^一人。按照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在其得意之作《藓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分析「未必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实际上由斯大林授意和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没有全面、正确地反映党的历史。^目前迤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米高扬何以会有如此惊人之举一几十年来在苏联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斯大林，以至许多外国共产党代表当时认为他与赫鲁晓夫或其它苏联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意见分歧。3。不过人们很快就了解到，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仅与米高扬没有分歧，而且很可能还对他轻描淡写的批评方式感到不满。如果不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问题确实不会在全世界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和麓动。

2 月 25 日上午，赫鲁晓夫在一次只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

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讲演。³¹ 在这个冗长和充满激情的秘密报告中，作为个人崇拜现象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列举了斯大林在 30 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这些内容已经有太多的论著讲述，可以说是人所共知。³² 联繫到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里要强调说明的只有两点：

第一，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最后又谈到，「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且他的逻辑[~]力量和意志对干部、对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过去斯大林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此外，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集中在大清洗及军事指挥错误等少数几个问题上，而对于斯大林其它许许多多的错误，如对党内反对派的无情镇压、推行全盘集体化的严重后果、消灭富农的残酷政策、对内实行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外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蛮横专断和老子作风（毛泽东对此最为愤恨）等等，报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或者是以赞同的口气提到的。

第二，报告在谈到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时，仅仅将其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道德缺陷，如「疑神疑鬼的病态心理」，经常性的「滥用权力」和「恣意妄为」，¹「最肆无忌惮的专横」作风，以及性格粗暴、缺乏耐心、好大喜功等等，而没有深刻地分析产生个人崇拜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更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斯大林问题的要害——高度集权的官僚和钁裁体制。很显然，既然在这种政治体制里没有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个人专权和个人崇

害作为附录收入的报告文本都是译自西方久已流传的 1956 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英文本，而 1991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麦德维杰

夫着《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所附的报告文本，则译自苏联 1989 年首次公布的俄文本。经过核对，笔者发现俄文本与英文本的内容和文字几乎也是完全一致的。俄国学者从文本来源考证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同。参见“印”（1988, 0.30）。尽管如前所说，这个文本

与赫鲁晓夫宣的报告有些差别，但并不影响人们对报告资质和基本内容的了解。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据新华社当时查对美联社和合众社播发的报告原文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3 月 16 日印发的那本文件。除个别用词外，「段落和文字都相同」。参见《内部参考》，1956 年 6 月 9 日，页 229。本章使用的秘密报告引文，均出自《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一书的附录，以下引文不再注明出处。拜现象，而在报告中提倡的所谓「党内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法制」，也只能是天方夜谭而已。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斯大林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捍术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的，「真正的悲剧」就在这裏。如此推理的结论自然是好心办坏事：动机是好的，只是方法和手段有问题。

如此看来，当时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对个人崇拜现象的认识水平，显然还停留在非常广浅的层面。即使这样，在全党面前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是极富冒险性的，因为从本质上讲，批判斯大林无疑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那么苏共中央为甚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³³ 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

对斯大林产生恐惧感的首先是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已经处于一种人人自危、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

通过 1952 年 10 月召开的十九大，斯大林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全部赶出了新的领导核心。伏罗希洛夫（1901-1989）受到秘

密监视，莫洛托夫（1898-1988）的妻子被捕入狱。党和

国家

的大事实际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召来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加&、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少

33 关于这种说法，可见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页 500—511；拉齐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页 4—8；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页 60；津科维奇：《权力与争斗》’页 210。

数第二代领导人。即使是他们几人也整日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从晚宴邀请名单中除名。就在这个时候，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够重新站起来。在斯大林昏迷和弥留之际召开的苏共中

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会议作出的对党和国家进行机构及人事调整的决议，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34 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并且达成共识：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可以凌驾于中央主席团其它委员之上的职务。35 应该说，苏联领导层的「非斯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倒下时就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最先针对斯大林采取个人行动的是贝利亚。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星期，

3月13日，内务部长贝利亚就命令成立若干侦查小组，负责重新审理包括著名的「医生案件」在内的一些重大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镇慑的重要内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医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团还通过决议，赞成贝利亚采取措施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尔后，根据贝利[^]的倡议，在5月9日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36 虽然这些措施没有直接联系到斯大林，但是其逻辑的指向是清楚的。6月22日贝利亚的被捕当然不是因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准的，不过处理贝利亚事件却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斯大林

问题的机会。

有学者认为逮捕和处决贝利亚「实际上导致了非斯大林化的停止，甚至出现了恢复斯大林化的现象」。37 实际情况未必如此。7 月

38 《苏赖历史权案选通》，第二十八卷，页 47—72。这裏根据原文对译文撤了一些修

改。原文见 // (!) ^ ! ^ 6 ; 01121 ! ' 4 (810. 11385) 6111-111156151151. 1953 :

07611011) 2 ^ 131110 ^ 1. 01 (01 ^

15 ^ 1 ^ 1100II ^ 1116 !) 。 ” ” 。 ! ” ” ! ^ 。 ， ? . . 1999. ^ 265 ~ 273 ^ 3911. 1. 5 ^ ;

” , ” ! 1161 (03 (110 化 61 ^ 01 ^ 111 ? 啤 0008 ^ 551 \ 5 ^ 扭义 。 ! . 33 ,

1 ^ 0. 2 (八 !) ” 11981) , 2 ^ ; 0-242. 代表中共出席通报会议的是高岗，但可惜至今没有看到中方有 88 这次会议的

任何史料。中央全会形成的决议承认，苏联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潘是在遵守「列宁制定的党的准则」和「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穰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例如，一再推迟十九大的召开，连续几年不召集中央全会，主席，「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议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决议还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近年来的宣传工作」「走上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38 很明显，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令人感兴趣的是，除了向党

内传达会议精神外，苏共中央还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裏，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苏联领导人要改变斯大林生前的一些做法，自然需提出理由，但莫洛托夫强调他只是在讲述一个伟人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归结为斯大林晚年的「病态」。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

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39 显然，此时个人崇拜的概念表面上远是没有直接与斯大林的名字联接起来。同全会精神一样，在舆论宣传上，所有的指责都是针对贝利亚的。苏共领导人这样做，很可能是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尽管在党内讨论会

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个人崇拜具体讲是对谁的崇拜？宣传个人崇拜的具体表现是甚么？但是在社会上，民众仍然像神一样供奉着斯大林。1953—1955 年，各种报刊杂志继续连篇累牍、一如既往地颂扬和赞美斯大林。特别是 1954 年 12 月斯大林诞辰七十五周年时，各地关于斯大林的展览、集会、颁奖等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40。在这样的氛围中，1955 年 1 月被罢免的马林科夫的罪名有很大一部分是指责他逢背了斯大林生前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并骗取了「伟大领袖」的信任。不过，中央全会决议的最后还是没有忘记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41

40? IX 册，中. 5, 01^30, 0. 4, 120, 17^X11X06[! 口 06; 1. "!! 10^1, 1-3^1111|0017110. 41-49. 41? 61X1*01^? 6111611110(^"(^。(化^!"回，"。., 0^30~32^

42? 「八 811 巾 1, 011. 2. 几 7, 4-5^/! ^^^^0X^3011. ^0. 167-168. 当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以后，召开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55 年 4 月 7 日，赫鲁晓夫提议十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42 然而，在为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 30 年代大规模政治镇恾的问题。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做出结论，还要给千百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镇压、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恾一个交代。于是，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 1936—1939 年期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阴谋伪造的假案和通过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揭发材料如潮水般涌来。1955 年 3 月 14 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 (!). 6, 5!) 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

察院特别案件处在 1954 年下半年和 1955 年 1—2 月份，共审理了 13084 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达 7727 件。此外，根撵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害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一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三万多份。43

主席画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到 1955 年秋，关于 30 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管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它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11 月 5 日举行的主席画会议做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时，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45 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 12 月 31 日的主席画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

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 . ? 05^10^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会上还宣读了当事人沙图诺夫斯卡娅（（^ (! ? ! ^!!!! ^^^）给米高扬的信’信中讲述了有关调查谋杀基洛夫（^^^! ,）案件的情况：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办公室，凶手尼古拉耶夫（! ^ . V，当着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丫 3 一）的面，讲出他的背后指使者就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然而却遭到一顿毒打。受到震动的主席团成员要求继续调查。46

434; ? 扁 3084: 14/716: 000^611^^? 636 国, !I: ^? ? 06"; 10.3. ""? ! 1014. 1)63119! ^"31^1100II 附服隐, 11! ", 丁。"2, 化 8 口退 1956-! 44, 080^ [0 卿, 1^00X83:

\1 饿 2003, 0.196.201^

441^0^08 义^1068VI^36x^11! '21(1111 0.27;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页 62—63。

45? 「八 I! ", 011.8.0.389, 0.33-34; 0.388, 职.61-62, 八纽印纤印, 001(^30"-^义, 咖,

0.169-172. 参见 "。声^义! ^11^8VI1*361111141 卿 II 狱户, 0.27:

46? 「八!!!, 011.8. 库 389, 几 30 国 35, 0^001^0^^)-""仄
^00^171-172, 912;

001(0^08 人 1^)^0008610X0&110X0131011941-1991 「, ^0013! |: 81. 101113)10X011&, 1999. 0. 100.

一个月以后, 问题暴露出来了。在 1956 年 2 月 1 日的主席画会议上, 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 并且引起了领导层内部的争论。这一天, 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珏尺"")从监狱被带到主席画会议, 他被要求如

实地回答所有主席, 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 多数人都不再怀疑: 镇恠和刑讯都是斯大林本人亲自设计、亲自领导的消灭异己的活动。米高扬、波斯佩洛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1. 八. 还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 表明斯大林确曾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 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害记阿里斯托夫(^". ^)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 气说出真相? 」对此' 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二十大^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 [^. ? ^^!! !)、布尔加宁(! ^. 八.&1183I11I1)' 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 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

言中, 米高扬、萨布罗夫(! ^. 1. 、马林科夫, 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 ^. 511310^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 认

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 「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 「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 说明斯大林是甚么样的人」。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乙^^^(^(;! !))支持莫洛托 47? 1X101 中. 3, 011. 8. 0. 389, ; 1. 52-54. ^^^(^^^0X^30 匚又巧 11^83, 0. 175-177. 参见

”。? 麟 /1.&1501 。? ""06^-0101-000101 柳, 11. 又? , 抑 ^3XX0. 63^61^1100II80838118086&113、1101^0 口 1118, 1996, " 0. 4, 0. 156-157.

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斯大林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因此，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一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47 两天以后，斯大林的名字第一次从官方公开的政治语汇中消失了。在 2 月 3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七十五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48

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大会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

48 4 一^口! ^)!19561-

49 八 0? 0, 中. 3, 011. 24. 8. 489, 化 23-91, 4"印"似印^0101^0^又 ~111084、0. 185-230. 根据 90 年代初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披露的数字，1930—1953 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和处罚的 3778234 人~其中处决了 786098 人。已经查出的被镇压者的坟场约有 100 个。参晃姜长斌主摄：《斯大林政治评传》，页 546。关于苏联大清洗的最新研究，参见郑异凡：〈翁斯大林镇愿间迹研究的某些概念和方法〉和马龙闪：

〈苏联「大清洗」受迫

情，没过几天就有了明确答案。2 月 9 日，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长达七十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令人震惊的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1940 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 1920635 人，其中被处决的有 688503 人，镇压主要集中在 1937-1938 年（逮捕 1548366 人，处决 681692 人）。大清洗的浪潮波

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在十七大选出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 98 人被逮捕并无一例外地被枪决，在 1966 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 1108 人，其中 848 人被枪决。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镇压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还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⁴⁹

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波斯佩洛夫〕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⁵⁽¹⁾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主席，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

「政治遗鸭」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 2 月 1 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它所有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关于个人崇拜，阿里斯托夫的话很有哲理：斯大林时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萨布罗夫也指出，斯大林的问题「不是缺点」，「而是犯罪」。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

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51 会议通过了在 2 月 13 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52

51? ! ^^. 中. 3, 011. 8, 0. 389, / ^ 《- 《之^, 八”, 献/) 30^^11. 0: X 口) 0^088, ^234-23152? 1X951 中. 1, 00. 2, 0. 182, ; 1. 1; 中; 00. 10, 0. 223, ; 1. 25, ^^1X6^01013011. (; . ^? ^!. 0. 23&

53? 1X11110 化 8, 应 389, 71. 64-66; 00. 2, 0. 1, 11. 64. ^^? ^^?^01^30(: . 义町贝坊 3’

54? 『八!!”. 巾二 011 上; 1. 184, 11. 6-&, ^^^? ^010130^义? 5^83, 0-241-243. 55 八”? 4\巾. 52, 011. 1. 8. 169. ; 1. 1-2806, 29-63, ^1^0X6^001013011. ^^^, 0. 120-133. 134-150。参见 11^*106 [“(; 10 口朋”, “. ! ^) 300353, 0. 163-164. 有学者认为,

秘密报告是赫鲁晓夫私下秘密完成的。参见 50/^)^06 化 0030881110! 13^1. 1^16

X? 声. 88 ” ; ! ””? 317 口赚 1”336 丁 3’ 211996 [, 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2 月 13 日首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54 这就是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大会召开了几天以后，2 月 18 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辟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 30 年代实行政治镇压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 40 年代至 50 年代

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⁵⁵ 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它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

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了.511印110^的修改文本，所做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⁵⁶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这样出笼的。⁵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第一，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绝不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时代前进的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活动和社会趋向预示了改革的基础，包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内苏共新领导人的措施反映了变革的必要。因此，其理论前提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对斯大林的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尽管不排除在党内斗争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历史冤案的社会浪潮不过是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机会。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破除个人崇拜的罗网。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第三、囿于认识能力和传统思想，二十大并没有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提出改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任务，而仅限于政策性调整和某些具体措施的实施。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传统力量擊敗了政治对手，而他本人也受到传统势力的束缚。赫鲁晓夫并非要、也没有全面否定斯大林。第四，无论如何，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毕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了。更准确地说，二十大为共产党国家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会。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世界引起的反应却是复杂的，其命运也是难以预测的。

二中共中央与非斯大林化

尽管斯大林已经去世，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还在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还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世界是紧随苏共之后的第二大党，特别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令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肃然起敬，钦佩不已。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立场和态度，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1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波

首先对二十大作出反应的当然是出席大会的苏联代表，反应最强烈的当然是斯大林问题。据会议参加者证明，如往常一样，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受到普适赞同，人们继续对党歌功颂德。但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在大会讨论的过程中，除潘克拉托娃外，米高扬关于个人崇拜的发言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还在会议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某地方组织负责人就发来电报称：「我不同意米高扬的右倾讲话，这一讲话是对活在整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一种褻演，并且将会为整个资产阶级所欣然接

受。」⁵⁸ 人们作出如此反应，显然是不了解米高扬发言的背景。因此，当赫鲁晓夫作为中央第一害记宣读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意外和霖惊，会场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⁵⁹ 这种局面本该使苏共领导人意识到处理斯大林问题应当特别慎重，但苏共中央的做法却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不断扩大秘密报告传播的范画，以致最后引火烧身。在 1956 年 2 月 19 日赫鲁晓夫对报告的补充提纲中，强调指出的是，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不能超出党的代表大会的范围。⁶⁰ 但是在 2 月 25

曰的秘密会议上，知情者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代表大会以外，会议同意将秘密报告及其决议「寄发给各级党组织」。6'不久'传达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党夕卜。3月5日主席團做出决议，「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无党派积极分子」了解报告的内容，并决定取消下发材料上的「绝密」标志。^3月7日，根据主席,的决议，将赫鲁晓夫于3月1日提交给主席团的、经过校订的报告文本寄发给各级党组织，以便向下传达。13 据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报告，「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是很快的，到3月20日左右就普遍传达到了基层组织」，而各种流言传播得更快。^3月24日和28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建议，对于各民主国家，可以向党园中央及各地区和部门主管干部，以及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党员和预备党员介绍和宣讲秘密报告。”就在3月28日这一天，《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为甚么个人崇拜与马克

58! ^", 中 011. 2. /1. 2281 转弓 I 自 " ., . 0". 丁。!)册 (; "(^! ^ 匚。。 0! 01303, 0. 147。

59/^ (:》 ^! ""908060XX 0. 113-114 ;

11)^0X11X06^^1116801^^^011611&! ^"匚化.

60 八 0? 化 011. 1^0. 196^几 29-63, ^6^0X6!)^01013011. (: . 又 卩 丫 11^83, 0. 134-150. 61 麦德维杰夫:《赫鲁晚夫的政治生涯》' 页 259; ? 「八? !", 00 上; 1. 89-90. ; 4(2^, 一卿日. (: . 《[^咖. 0. 250-251.

62? 「八!! ", 00. 14. 0. 4, 11. 66. ^^))^^^01013011. 0: ' ! 11683. 0. 253:

63 八^ 卩^^口 30^2011. 匚. 又口又, 83, 11. 43-44. 64 吉林省档案馆, 1-12/1-1956. 101。

65 ? 「八 811 中 ^011. 28. 0. 381 , 几 81-82. 83-8306 , 八 — ^0^010130^^^"! ^ . ^646-647, 654^655^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格格不入?), 第一次正式地指出所谓批判个人崇拜, 就是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66 于是, 秘密报告不再秘密, 斯大林问题的, 波在秘密报告那頼炸弹爆炸后一个月产生了最大的震盪力。几乎没有人怀疑,

积极推动将斯大林问题从党内高层扩展到基层和一般民众乃至国外的，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本人。⁶⁷ 赫鲁晓夫的目的，究竟是想以此打击政治对手，为个人争夺统治地位，⁶⁸ 是要排除保守派的干扰，为进一步改变传统政策打开信道，亦或纯粹为形势所迫而身不由己，⁶⁹ 这些都只能是研究者的推断。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斯大林问题如此迅速而无限限制地扩散和传播，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是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还要按照斯大林指引的方向走下去？⁷⁰ 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观察，苏共的做法也确实造成了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思想混乱，其结果反而给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带来了诸多困难和阻力。

⁶⁶ 《人民日报》，1956年3月30日。

⁶⁷ (俄) 谢赫鲁晓夫〔5“! &!)”〕着，郭家申等译：《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北京：中央编研出版社，2000年）页 97—99；(苏)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 ^10I\1.811 『I215|^”〕着，赵敏善等译：《一箇高级顾问的回谏——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 44—45。

⁶⁸ 参见 8.06 X1)63611/11118105!! 股, , 0.30-31。

⁶⁹ 关于国内外共产党员强烈要求知道内情的材料，参见/!)^印;X 化“00X^3011.0~

又;)戸 0.20-21.623-624; 11^X11X06^)))’ ! 1(680X211”。! 1^116”!/0.60。

⁷⁰ 无论是在苏共党内还是年轻的一代中，新的思潮和不同政见就是从此开始出现的。详

^111)1X11X06\ : (; 。 “!!!^” 。 -!!^ ; ” 又 011001” ! “XII 。 3006^110611)60’ ! ’86X1100^11311118 [0(^1^01^11^10 ! “II08060^11311! ^!.!^!. , 2003, 1^。6; 八^^ ; ?^!^/)00^3^VI: 0^ 又口戸”。,。 8-1

受到最大冲击的自然是苏联社会本身。目前披露的丰富档案文献显示，在广泛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意见，有些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身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没有资格葬在列宁墓里」。更极端的意见认为，三

十年来的苏联社会是「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逢不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甚至有人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烧掉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的所有著作。”但更多的人认为，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是不公平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将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尽管观察者和研究者对当时苏联社会的主流倾向有不同的判断，但明显的是，斯大林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层面展开讨论，其结果的主要特征就是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这一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3月7—9日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发生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在这次布尔什维克掌权以来发生的最大一次自发性示威游行中，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大批人被判处一至十年的徒刑。⁷⁴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反应同样十分强烈。在刚刚被纳入阵营的南斯拉夫可以听到一派赞扬声，而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却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东欧各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东德领导人迫不及待地公开发表文章赞扬和吹捧苏共的新精神，阿尔巴尼亚表面上赞同二十大而在私下则表示了不满和否定的倾向，在波兰和匈牙利是改革派受到鼓舞而保守派垂头丧气，其它几个国家则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⁷⁵至于亚洲国家各党，则

71\^00^101^08020XX01.0306.0.114-118 ;
17)^X14X06XXX0^639II0611100X86111106II08060811311” !
^^, 2000^1^0.8, 0.78-81. 第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托洛茨基的亲属致信苏共二十大主席圈，请求为托洛茨基及其它在20年代受到镇压的反封派成员恢复名餐。?!”八1^1, 中.1, 011.2, 8.14.; 1.48, 68, 4^印舰《; ? 0010130 只.0: 又1^111683, 二609, 610.
7211131X14X08 又口)!!^”.!!”.!1^06!”0.60; (印”以印 00101^11.0: 又卩声 683, □ 559-573; 4X00 面”1108060XX01^3^&, 0.119.
734^/0/0^808060XX01.63960.119; 吉林省楼案馆, 1-12/1-1956.101;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页 41。

74 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档案资料，参见
；“11^3^111^1^110^0.929-930
；
41^6^0^^01013811.0^66^0.257-265。由于事发突然，3月7日到达第比利斯访问的朱德也不得不取消原定计划、提前离开。参见剌晓：
《出使苏联八年》、页 18—19。

75 详细材料参^01^113011. (: .义 1^0^83, 0.22, 28-29, 31-32,
611-612, 613-621.

625 , 704-705 ; 0^X08 上
14.0061.11115119561-003800^011&X^11311000 献《0《08070101 义
07110111611110II (.^^!^!!)!81(611111)111110)0101X381X^1、
0 加 01*0(1800X1)1111945-
19851: 1^000611? 0^11116, ^0010^1995.0.222-224; ”^: 0)1109
000? II86101: [! 0X11。

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做法，如在朝鲜、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内，都
严格限制了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和讨论。76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
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0010 乡^加!!)当时的心情很具代表性，她
回忆说：得知苏

联领导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后，我们感到异常压抑和沉重，似乎
还是茫然无知好些。”究其原因，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斯大林问题的提
出，而是提出问题的方式。对这一点，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当时的观
察和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
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
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78 恐怕这才是造成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79
总之，苏共二十大所面临的局面是、长期以来的残酷镇压手段和疯狂

006^1X10119561.:^08^16 罕”册”。”P”纽 III^08&XII11066 她&II”(;
10 口 101, 1993, 1^0 上

0.4-6; 11^1^111^!’. & ? 4001^3&: ! ”031956-”II” ? ” ?
^//0080X01; &8&11&111115151

口 0 ; 11| 了 11^3 , 0.242-248 ; 80^1X068 上
”^I^03&’^^111100103II86^6^01^^113)101956 [0 卯 ,

)/^!!!!, !. \1001^3&. 1998, 0. 28-30, 35-40, 85-87; 厂"6 瞻化""
几化(:. ^!)') !1168. 化 5 口 03 丁"10II80141-6^)0^1111^113(101956
厂 II90831111908^腿 5! ^10^1\^1999,

0. 12, 以及《内部参考》, 1956 年 3 月 16 日, 页 223; 3 月 20 日' 页
340—341; 3 月 21 日, 页 426—427; 5 月 8 日, 页 494 — 497。76
八 811 ? 0、4^079, 00. 11, 11. 13, 3, 5, ; 1. 84-95; " 印
"^0101^(; . ^^11168&. 0. 27^30^
77^00^111^1^08060XX01, 63360. 114.

78 《内部参考》, 1956 年 4 月 8 日, 页 385—390。

79 周恩来在 7 月 8 日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时表示过这样的
看法: 中国共产党认为, 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着想, 把这涸问题
放在党内解决更为有利。参见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糖
〔1949—19760^上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1, 页 596—597。
造神已经^^林成为^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解, 斯大, 个人^, 树嗨鲋
脑]^调整都阻力, 更不用说要改, 大林体制和^了。"^是因为个的病毒
已经^2? 1], 社, #^细胞、所以扭可细小的手术都适谨慎从事、否则
髓引^乱。这种混 81^1 局面, 加上舆论压力和党内本来就存在的意见
分歧, 苏共在召开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针, 放慢甚至
停止了解冻的步伐。

4 月 5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 解散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
室党组织, 将部分党员开除出党, 并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其理由是
在党的会议上有人对二十大总结报告进行恶意攻击, 声称苏联社会是
不民主的社会, 而该党组织不仅没有奋起谴责这些言论, 甚至还为部
分发言者鼓掌。8"同日《真理报》发表文章, 强调「党在各个历史时
期的政策始终是列宁主义的政策」。^同时, 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党的
领导人不断发表讲话, 批评各种「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旗号企图怀疑
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人。82 为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的工作也受到
极大限制, 不仅拒绝重新审理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的政治案件, 甚至
对许多在 30 年代大清洗中蒙受冤屈的人, 虽然给予了法律上的平反,
却没有恢复他们的党籍, 因为他们曾经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辩护。83

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虽然保留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观点，但口气已缓和了许多，并特意强调「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中作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甚么改变的结论，或是从，苏维埃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就是严重的错误」。84接着很多人因发表超出二十大规定的讨论范围的言论而被扣上反苏反共的罪名关进监狱。85笔者对50年代由苏联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反苏鼓动和宣传案件」的数量进行统计对比的结果，特别能说明问题。1953年是最高峰，为1229件，1954年猛降到151件，1955年为71件，1956年反而有所上升〔93件），到1957年又猛增到1056件。86

难怪在苏联有人认为，「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旧的轨道上去了」。87应该说，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中共的态度和立场不无关系。

2 中共中央迅速传达秘密报告

与苏联相比，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场也就有很大的区别。总体的发展曲线是，苏共在二十大提出的非斯大林化方针并不坚定，而且在党内外的压力下日益趋向保守，直到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才真正开始推行非斯大林化运动。中共立场的变化历程恰好相反，一开始基本上是赞同二十大的路线，波匈事件后有了新的思考，到1960年与苏联分歧公开化以后，才提出了一整套与苏共二十大对立的方针政策。无论如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像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87(俄)格·阿·阿尔巴托夫(化)着，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

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页54—62。88《内部参考》，1956年2月20日。89《内部参考》，1956年2月25日至4月4日。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陆续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

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30年代政治镇懾受害者平反的消息。⁸⁸ 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是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上，普适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月上旬。⁸⁹

实际上，对于苏共在斯大林一价方面发生变化的迹象、中共中央早就有所感觉和了解，并且持一种认同的态度。⁹⁰ 当然，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也并非有意对中国搞「突然袭击」。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不断提高，赫鲁晓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特别重视发展与中共的关系。逸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联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人不仅分别会见

中共代表团，而且还暗示要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如2月6日赫鲁晓夫接见中共代表，团长朱德和大使刘晓时，就大谈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的错误。代表，急电请示中共中央，是否出席批判斯大林的会议。接到中央「照常参加」的电示后，代表团经研究一致决定，对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政策。”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朱德在大会发表的贺词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他代读的毛泽东的贺词则提到苏共是「斯大林及其亲密的战友所共同培育的」。⁹² 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19日宴会上又主动表示，会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对此，中共代表画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⁹³ 于是，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

关于中共中央何时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情况，中国

史料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⁹⁵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吴冷西的说法是，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适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⁹⁶这里也有记忆的误差——《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传言和消息。李、吴对研究中苏关系无疑是重要的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对二十大并未身历其境。

据陪同朱德参加二十大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八，13.0110013 化”就向中共代表团

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并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它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报告的第二
⁹⁵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页87。

⁹⁶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页3—5。⁹⁷ 赵仲元：《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页89。

98110701)11’！20X110 △ 13X118, 1999, ^!. .1.0.11-12.

99? 「八 10^(^!.!, 加; 0.18, 化 116, ^^^001013011.01. 又 ~!! ^
抑, 仏 252々53, 42^

天〔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化. 八. 化
&^&^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⁹⁷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不过，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三十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十三个共产党代表，画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27日 和 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反复强调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

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100

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¹¹⁾1 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一份秘密报告文本。¹⁽¹⁴

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报告文本。不过，中共中央对此并没有及时作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在3月10日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汇报外国报刊对二十大反应情况的报告中，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只是一些猜测。¹⁽¹⁵ 甚至那些密切注意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问题如何反应的美国情报专家也是一无所获。¹¹⁾⁶

在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保持沉默的同时，中共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却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共产党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照本宣科地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随《参考资料》（供高级干部阅读）发放。同时，《参考消息》（供一般干部订阅）上也大量刊登各国对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致抢购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来毛泽东「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漏出去」。107 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种心态：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甚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3 毛泽东如何看待斯大林问题

关于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由于目前中国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研究者所能利用的主要是吴冷西回忆录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一党内讨论，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公开表态，以及俄国的档案文献——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数次谈话。

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议论了苏联问题。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灏等人开会，由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1（18此后《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了斯大林问题。毛泽东在这几次会议上所表述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09

（一）虽然中共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社论〔2月19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2月28日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表示支持苏共二十大，但一开始就有保留意见，主要是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看法，只是没有表露出来。当时对斯大林的问题因不了解情况，没有表态。

（二）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毛泽东认为值得「认真研究」，首先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它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三）揭露和指责斯大林在对待中国及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说出了「他六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话」，特别着重讲了斯大林四次整中共的错误和他本人访苏期间不愉快的经历。但是涉及到对斯大林的评价，认为应该三七开，正确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四）实现共产主义的空前伟大和空前艰巨的事业，因此，不犯错误

是不可能的。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要尽量少犯错误，避免犯大错误，因此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片面性。

(五) 面对国际风浪，中共应该表态，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态，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在讨论即将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从苏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中共其它领导人在奋议上的发言，大都是在毛泽东所谈看法的基础上继续关发。邓小平和王稼祥认为秘密报告杂乱无章，没有找到苏联所犯错误的根源，指出，「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周恩来和张闻天列举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国内政策方面的许多教训，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刘少奇也有大量发言，认为赫鲁晓夫是「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而没有对其错误进行分析。他归纳了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苏德战争、广业问题和指导国际共运四个方面的错误后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是主观脱离客观。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秘密报告泄露出去影象很坏，同意用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同时正面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补救秘密报告的失误。

所谓公开表态，就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观点和立场，扭转一些兄弟党悲观失望的情绪，而这个任务本来应该由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联党来完成。另一方面是用中共中央对于斯大林问题的「全面分析」来教育和指导中国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解除他们中间的种种疑问和揣测。显然，文章所

110 见 1956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毛泽东的修改部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逮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 59

—67。111 吴冷西：《十年论战》’ 页 19—20。

112 文聿发表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便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51：委立即在党围员中和 X 外人士中，91 泛地进行切实的学习和射论，并且随时将学习的情形和讨舍中的间迹报告中央宣传部」。参见吉林省楼案馆，1-12/1-1956. 100’ 页 43—46。

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 历史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提出但无法自己解决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便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在政治局和害记处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文章突出强调的有以下几点：

(一) 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崇拜的错误在所难免。

(二) 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是说，斯大林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而是思想认识问题。

(三) 「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

(四) 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是说~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是需要分析和鉴别的。

113”^, ,7 八亭^ 19561-.

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

也深入了一层。不过，有些研究者似乎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区别。很多人注意到，《真理报》在转载该文时删掉了有关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小生产思想残余的段落。¹¹³这或许可以证明苏联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某些理论观点一时还无法理解和接受，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在总体认识上存在分歧。如果进一步考察，首先应该看到，除捷共、阿共、日共、越共和朝鲜劳动党的报纸全文转载外，其它各国共产党的报纸刊登的都是摘要或有所删节。¹¹⁴显然，这并不说明他们就一定不同意文中的看法。其次，从普遍的反映看，无论是苏联还是其它各国共产党，对中共的文章是一遍赞扬。¹¹⁵虽然开始可能有一些看法不同，但中共中央的本意完全是为了帮助苏共。这一点，赫鲁晓夫心里是明白的。很能说明

问题的是，苏共中央在6月30日〈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中，特意引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¹¹⁶同时，为了给党员干部提供学习材料，《真理报》出版社还将这篇文章进行全文准确校对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二十万册。¹¹⁷

如果说在理论探讨方面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在3月31日与尤金进行的三个小时「情绪极佳」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斯大¹¹⁴如波兰《人民论坛》报就删节了关于苏联历史作用的内容。? 「八¹¹⁴, (, ^, ^, ^96, ; 1. 163, 186-190, ^^^^01^3011. (: . X 抑. 0. 691-695. 关于各国共产党报纸转载或摘要刊登的情况，可参见《内部参考》，1956年4月20日’页415—421。

¹¹⁵ 吉林省楼案馆，1-12/1-1956. 101；《内部参考》，1956年4月20日’页415-421；吴冷西：《十年论战》，’页31—32。

¹¹⁶? 「八 91^中 3, 0 扎 14, /1. 39. 30-34^八」口惠印^010138 匚义化 11; 683, ^692~695^352~368^中文见 1956年7月6日《人民日报》。¹¹⁷ 《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

林对中国问题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就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言，

几乎没有正确的地方。毛泽东指出，「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服从国民党。后来，斯大林只相信王明的话，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在抗日战争中，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搞投降

主义活动。共产国际只是在最后一段不长的工作时期才转变了看法、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季米特洛夫（（^。^！^！^加”的功劳。毛泽东特别讲到，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仍然错误地估计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坚持主张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此，斯大林以「俄共（布1」名义发来秘密电报，坚决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却怀疑中国的革命力量，坚决主张同蒋介石讲和。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以后，斯大林对中共仍然持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甚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甚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接着，毛泽东又大谈他在莫斯科的遭遇，强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所犯的大国主义错误。同样，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但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具体错误没有提出任何否定意见，反而对其进行总结，并归纳为七个问题。看过以上谈话记录，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

4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会见来访的米高扬，苏联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再建五十五项重点工程的协议。会见中，米高扬通报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有关情况。毛泽东感谢苏联的援助，并表示也将一如既往地尽力支持苏联。谈到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

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9

118 中 4011.30, 0.163, ; 1.88-89, 11 (106^1^1800^01^1994.1^0.5, 0.101-111.

119 吴冷西：《十年论战》’页 3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 563。

在 5 月 2 日与尤金的轻松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和完全赞同苏联对英国采取的宽容立场，而斯大林「过去错误地把英国同美国一样看待，把英国也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敌人」。接着，毛泽东又指出了斯大林在中国和印度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愈来愈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又一次说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只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说到中苏两党的看法，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120

120 八 80? 0, 中. 0100, 011. 49. 3. 410, ; 1. 9, 0. 124-130.

1210^X1X1*1X068: 07&11118II\130(; "11111! "膨 " 9(580681? 6"! 1."。二-, , 1993. 03809^

1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204、138。

123 中共中夹办公听摄：《中 8 共产靠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页 92。

至少在苏联人看来，直到是年 9 月召开八大，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总体上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121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讲到：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

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所作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22 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123

4 中苏两党并无任何重大分歧

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则问题上，中苏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重大分歧。

首先，在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中苏没有根本分歧。对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倾向，毛泽东是心花怒放、举双手赞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在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长期以来指挥和训导中国共产党，怀疑和压制毛泽东本人，现在这个「盖子」被苏联人自己搬开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也有机会一吐积压心中多年的怨气了。124 按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毛泽东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

126 的确，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在苏联人面前，而且反复向中共广大干部数落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罪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加深了对批判斯大林的理解。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仅

苏联人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 7 有腹怨言。127

第二，在建设问题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对于毫无管理国家经验的中共来说，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苏联有的，中国也应该有，苏联没有的，中国也

不能有，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128 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的做法正确与否，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总是屈居莫斯科门下。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咒」也被苏共自己解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129 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仅在革命问题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会走到苏联的前面。因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非斯大林化倾向无疑是为中共打开了通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宝座的大门，毛泽东没有理由不暗自高兴。130

至于中共一再强调的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不能「一棍子打死」云云，在当时多少有些「放空炮」，因为如前所说，无论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 3 月 28 日《真理报》的文章，都没有对斯大林进行全面批判和否定，到 6 月 30 日决议的说法，就更加往回缩了。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能看作是针对于苏共二十二大路线而言的，与苏共二十大应该没有关系。131 129 在一次讨论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不无兴奋地说：「埴个报告（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引者）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瀾〉，页 25—26。

130 斯大林逝世的讣告广播后不久，苏共中央工作人员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曾 8 一位在中国党内地位很高的干部说：「鉴于斯大林的逝世，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就应当是

毛泽东了。」参见（：”^!^/!^”000^11111111^130(^710^”!1化,..38。

131 中共领导人一开始的说法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毛泽东在 1956 年 12 月 19—20 日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修改稿时又说「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页 16、74。公开使用「全盘否定」的说法，大概是在 1963 年 9 月发表的与苏共论战的文章中。参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页 57。

其次，所谓中共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对外方针上与苏共二十大路线存在根本分歧，也是中苏论战时流传下来的一个神话。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都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国在

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1956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平共处思想的伟大胜利〉称：「和

平共处思想」是「指引国际形势发展的方向的伟大动力」，日内瓦精神和万隆精神「已成为当代各国人民要求实行和平共处的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不久后，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讲到台湾政策时又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并强调「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如果说有甚么区别的话，那么应该注意的是，当时苏联强调的是全面缓和，而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更注重的是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相处。至于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心里确实是有些不满意的，也曾假他人之手表露过这种情绪，] 33 因为武装夺取政权毕竟是中共自认为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得意之作，是中共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宝贵经验。134 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135 据参加「九评」写作班子的朱庭光回慷，「和平过渡作为一个策略问题，毛主席也没有说完全不能讲」，只是到

1957年莫斯科会议才提出有保留意见。136

应该说，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所谓「三和路线」在中共高层是得到了广泛共鸣的。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在2月21日外交部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多样性，是已经存在着的现实。例如，应该容许南斯拉夫采取自己的过渡方式。至于通过议会斗争是否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 1 也不能说一定不能。在理论问题上，要打破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理论要用实践来检验，不能认为斯大林讲过的话就不能修改。」「在党内生活中强调集体领导是对的。斯大林的功绩不能否认，也没有否认；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缺点的，集体领导不够，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137

周恩来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如在3月4日一次专业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说：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国际紧张局势更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

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正是为了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就更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利用有利于和平建设的条件，加快加紧地建设，包括国防建设。在5月3日国务院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又说，在国际关系上，「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138 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以「促进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等为题’连续刊登文章和消息。139

136 李丹菘、沈志华 2000年12月1日采访朱庭光记录^朱庭光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编处&长。

137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页1013；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1631。

138（周恩来年谱—19760，上卷，页554、579^548；中卷，页84—85、《麻的文献》，1993年第1期，页12。

139（人民日报》，1956年7月2日’7日。

就是毛泽东本人当时也是接受这种思想的？他在亲自起草的八大开幕词中写道：「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遣会继续增加。」14。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毛泽东内心对和平过渡的提法不满外，中苏之间的政策性分歧是不存在的。

最后，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也确有不满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有关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如上所述，毛泽东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所谓「内容上」的错误，就是说不能原则地、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在10月31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时指出，赫鲁晓夫反

对个人崇拜「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141 不久后他更明确地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142 显然，批判具体的〔如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可以的，但不能在原则上否定个人崇拜。说到底，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未来世界革命的领袖，是需要个人崇拜的。

所谓「方法上」的错误，并不是指苏共过早地提出了斯大林问题，主要也不是说传达个人崇拜问题的范围过于扩大了，而是指责苏共中央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没有事先同中共商量并取得同意。关于这个问题，最早是朱德在莫斯科时向陪同他的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指出

140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1》’页 528—530。

141 转引自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I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页 98。

142 吉林省档案馆，1/1-14/68’页 6—16。

的，后来苏联驻中国外交官也听到了类似的指责。143 在中共高层讨论时，「大家议论纷纷」，也反复提到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苏共中央采取这种「突然襄擎」的方式，使各国共产党没有做好准备，才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

此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从道德层面上提出了问题，批评「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 毛泽东后来又说，「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些人既「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缺乏革命道德」。146

毛泽东反复强调对个人崇拜要有正确认识，其矛头所指，大概主要不是莫斯科，而是国内的反个人崇拜情绪。的确，中国民众受到苏联影响而提出的问题是令人担忧的。《内部参考》大量报道了中国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苏共批判个人崇拜的反应和联想。河北省机关党员

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

143(：“6 议咖 801-3711111VI\1300^1113^11”化，0.38；？！”八!!”，5^011.2&, 氏 409,; 1.108; 011.49.

00.128,; 1.36.^^(^00101*5 讨. 匚^^^, 0^27~28^144 吴冷西：《十年谕战》’ 页 4—5。14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 ”! 102。14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页 334。

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鞍山市干部、职工讨论时有人说：「甚么是个人崇拜？中国对毛主席来说是否也是个人崇拜呢？」湖南高等学校教师则直接提出了中国党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的问题。4月5日中共中央的文章公开发表以后，这方面的反映仍然不断。黑龙江省机关干

部中有些人提出：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民歌，在赓业合作化中提出的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以及以前讲的在毛泽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毛主席万岁等等，^算个人^?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敬电，电影^、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赓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141或许正是担心这种情绪汇入整个共产党世界的迷惘和混乱当中，中共中央在4月12日专门发出通知，禁止主动与外国人谈斯大林问题，即使被问到，也「应避免深谈多谈」，尽量「支吾过去」。148更令人担忧的是重庆市机关干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否共产党内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马、恩死后，有考茨基等人歪曲，列宁死后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扬等人

的攻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的人说：「人生在世叫万岁，死后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实在令人寒心。上”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深思百年之后的事情。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很少公开表露出来，因为批判个人崇拜毕竟是在共产党世界取得了共识的。

总之，苏共二十大没有造成中苏在理论和路线上的分歧，因而也就不会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起点。如果谈到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有甚么不利影响的话，应该强调的是，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无疑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紧随苏联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来的应该是毛泽东！

三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

二十世纪是整个人类社会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时期，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有不同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种选择。苏联、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先后选择或认同了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条道路（或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的选择有很大区别，但同样，这也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甚至没有指出过）的道路。唯其如此，才需要人们不断摸索，不断修正，也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改革。应该说，斯大林的去世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的历史机遇。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苏联人和中国人都未能及时抛弃或改造已经僵化了的斯大林体制。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是，毛泽东所说的「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究竟是甚么含义，却是应该认真考虑和分析的。这裏至少有三个问题

必须搞清楚。第一，毛泽东讲的以苏为鉴，实际上是指以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做法为借鉴，而这一点恰恰是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方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共和苏共是在同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毛泽东讲的苏联出现的问题和教训，实际上指的都是以往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和措施，而不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在这一点，中共和苏共从各自的经验体会出发，其认识大体在同一程度，即都没有从根本上怀疑斯大林所创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第三，毛泽东提出走自己的路，实际上并没有设想把中国引上另外一条发展道路，而只是在原来的道路上走得快一些，只是要赶到苏联的前头。或许这样的分析，可以给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的思考一

个正确的和准确的定位，可以看清楚直到毛泽东逝世前中国所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

1 毛泽东号召「全面学习苏联」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而管理城市和进行经济建设经验则严重缺乏。还在中共刚刚控制了东北几个大城市的时候，就把恢复解放区经济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苏联人身上。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刘少奇带领中共代表团在苏联访问了两个多月，走访和参观了所有的党政机构，全面学习苏联的管理和建设经验。毛泽东则向全党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但这不是没有阻力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之初中国民众对苏联并无好感，很多人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说法：「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惜刚站起来又倒下了。」新华社记者报告说，虽然目前没有人公开反苏，但「不必亲苏」的说法还是很普遍的。于是，中共开展了大规模的中苏友好活动，并通过在全国各地普遍组织的「中苏友好协会」，在广大民众当中开展强大的思想教育运动。154 当时

中国大地流行的一句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很能说明

150 详见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01 年第 2 期；〈建国前夕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党的文献》，2002 年第 1 期’第 2 期’

】51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页 23—27。

15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 1418。

153 《内部参考》，1951 年 12 月 18 日’页 78—80。

154 台湾学者余敏玲对「中苏友好协会」的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中苏友协是中共在民间开展对苏友好教育运动的有力渠道。参见余敏玲：〈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响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I 台北），第 40 期，2003 年 6 月，页 99 — 140。中共的宣传效果。155 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到 1952 年下半年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156

斯大林去世之时，正是中国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刚刚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然而，如何按照严格而周密的计划搞现代工业，中国人还是不知从何入手。毛泽东后来承认：「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没有办法，只能学苏联，而且必须要他本人出面进行动员，这大概是毛泽东心情不好的主要原因。从那时的社会思想状况来看，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当中，崇美、亲美和轻视苏联、怀疑苏联的思想情绪仍然；?6^重，比较普适的看法是：中国应该在美国与苏联之间采取中立政策和自力更生，而不应该「一边倒」。158 如此状?兄，怎么能进行以苏联援助的 156 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建设?问题的严重’14 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出来请话。

1953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专门讲了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他强调：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足，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群^众；^{他们}他们中间都有一些人是有抵^抗的。他们应该懂得^{我们}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

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派成^们们的留学生去，应该^甚甚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59

9月9日中共中央又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强调「正确地学习与运用苏联先进经验，是胜利完成我国各项建设任务的一个重要因素」。160 于是，就在苏联新领导人开始考虑改变斯大林生前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时，毛泽东却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

向苏联学习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聘请大量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161 派^各各业的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及^生生到^卿卿实习、考察，162 大规模引进和翻译苏联的各类^籍籍、数据，^{以及}以及开展其它宣传教育活

159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 263—264。

16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3—

1957》综合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0），页 878—880；吉林省档案馆

1/1-9/1952，页 5—6。161 笔者对此有专门研究，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 1948—1961》（北京：中

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162195? —1960 年苏联共接受 38000 多名中国公民前去学习或实习，1949—1966 年苏联“学院和研究结构共培养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实习生 11000 多人。参见

112X1110-1-6X111(1160X06001^1^111^0730 000 ? IIXII ? (^-^^)II

141(4)0(1X21010111111166|0^167611|1008670^0-^1173^0X1160 ? 110 认 10! 11, 1995. ! ^。 .65, 0.53。

163 到 1953 年底，翻哗出版俄文书籍 5183 种，占全部翻译书籍种类的 87.1%。’其中仅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就有 108 种，印行 1200 多万册，8 有苏联高等学校和专科学校的教材 277 种。参见《人民日报》，1^4 年 5 月 20 日。另有材料说. 在 1954—1957 年全国出版的害籍中，哗自俄文的竟占 38%—45%。参见麦克法夸尔、费正清 001101008! ^她旭”主编，谢生亮等哗：《刱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 — 19650(北京：中 8 社食科学出版社，19901, 页 210^动等等。不过，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领导干部。毛泽东晓得，作为「学生」，要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首要的和重要的是让各级领导干部接受「先生」的一套体制和经验，而他向广大干部介绍和灌输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贪际上就是也只能是斯大林的理论和模式。

毛泽东一向主张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他所推崇的这种结合的典范就是后来在苏联被认为是个人崇拜代表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早在 1941 年 5 月，毛泽东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调，对于全党「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来说，《简明教程》应该成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材料，因为在毛泽东的眼囊，这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165 既然《简明教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唯一和完全的典范，那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效、最简捷的方法就是学习斯大林主义。中国共产党不仅依靠这个「典型」胜利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还要指望这个「典型」来指引社会主义革命。于是，《简明教程》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就

成为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内容。例如，「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就是「自己节约的道路」，「因此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能不有相当的限度」，如此等等。¹⁶⁷1953年4月23日中共

中央发出了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其中规定，「为了适应全党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在1953年7月至1954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都要学习《简明教程》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目的是使「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指示〉还详细规定了学习的时间、进度、方法以及领导责任和考试办法。¹⁶⁷

在毛泽东看来，能够指引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另一部经典就是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为对苏联经济发展规律的总结，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如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而造成的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正在日益加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依然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只是在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之间存在的特种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仅是「合理地组织生产力」，更重要的是不断变更生产关系；国家必须把农业的基本生产工具（机器、拖拉机）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决不能交给集体农庄；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的剩余产品从商品流通领域中排挤出去，逐步缩小商品流通领域的范围，如此等等。¹⁶⁸1952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认为这一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巨大指导意义」，所以必须立即组织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学习。中共中央规定，各单位负责人应亲自动员，布置和领导这次学习，制定学习计划，指示学习要点，检查学习状况，解答学习疑难。¹⁶⁹

16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 页 141—146。

168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斯大林文选 1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页 571—662。

169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1 第十九册 I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1’ 页 594。

这两次学习活动立即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干部中普适开展起来，如商业部党组强调领导《简明教程》的学习是「党支部的中心任务之一’ 各局、处、公司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亲身参加学习的领导工作」，并先后召开了九次支部负责人联席会议，又分别作了四次「较为全面地系统地结合商业工作的专题报告」。^ 中央财经委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专门成立了以陈云、薄一波、曾山等为正副主任的学习委员会，确定每星期三、六下午为集中学习时间，在此时间内不得请假、迟到、早退、办公、打电话，传递信件。171

2 中国人对苏联式道路的反思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毛泽东所推崇并要全党学习的这两本斯大林的著作，恰恰是米高扬在二十大发言中点名批评斯大林时指出的两本着作。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道理很简单，《简明教程》通俗易懂、简明扼要，适合中共干部的文化水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重点是总结苏联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经验和理论，而中国 1949—1953 年也正好处于恢复和开创的阶段。172 总之，如同《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说，「苏联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① 那么，同样可以说，苏联所犯过的错误，也是中国今天要吸取的教训。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在某些方面所犯的错误甚至比苏联要严重。例如，在工业投资比例方面，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制造生产数据工业的投资占 85.97%，制造消费数据工业的投资占 14.17%，而在中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前者占 88.87%，后者只占 11.27%。从 1953—1955 年的执行情况看，二者比例为 7.8:

1, 比苏联一五计划的比例《6: 1》又扩大了许多。¹⁷⁴ 再如, 被指责为急躁狂热的斯大林全盘集体化运动从 1929 年 11 月至 1933 年底, 进行了整整四年。化而中国的广业合作化运动从 1955 年 7 月毛泽东发出号召到 1956 年 3 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只用了八个月, 即使从 1953 年底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算起, 也不过两年多。¹⁷⁶ 何况斯大林改造的只有 2500 万农户, 而毛泽东面对的则是 1.1 亿农户。更值得注意的是, 毛泽东完全是实用主义地看待苏联的经验。当党内有人根据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冒进的教训, 对毛泽东号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提出不同意见时, 等待他们的指责正是「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毛泽东的理解是, 「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 在短期内基本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完全可能的」。¹⁷⁷ 然而, 就在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 苏联人开始反省了。原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迺有不少的缺陷和弊端, 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黄和批判, 虽然最初令人感到意外, 但无论是东欧各党迺是中共领导人, 很快就从中领悟到, 苏联党和政府承认自己犯有错误就意味着各国可以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了。至少在毛泽东看来, 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应该放弃了。有些研究者强调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就开始考虑「以苏为鉴」的问题了, 似乎中国人对斯大林模式中存在的错误比苏联人认识得迺要早。¹⁷⁸ 其实如前所述, 早在斯大林去世后, 苏联领导人就已经考虑改变以往的一些做法, 二十大不过是公开地、全面地提出这些问题罢了。如果说此前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确实提出了如何向苏联学习的问题, 那么并不是看到了苏联模式有甚么问题, 而只是对斯大林时期的某些经济政策有意见,¹⁷⁹ 对苏联军事顾问的某些具体做法表示不满, 对全国各个领域出现照搬苏联经验、依赖苏联专家的普遍现象表示担忧。¹⁸⁰ (1955 年 5 月苏联召开工业者会议, 揭发和批评了各工业部门在采用新技术和发挥企业潜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国后认为, 「战后苏联工业有很大的发展, 但在某些方面, 特别是近一两年来, 似乎过分地强调了日用必需品的生产, 相对放松了重工业」。¹⁸¹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几个文件, 并在通知中强调, 苏共中央批评工业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是为了更进一步提高苏联工

业的威力和水平，这并不妨碍「继，锲坚持学习苏联在技术上的先进成就和管理工业的先进经验」。182 尽管也曾有人对一五计划「建设规模是否过大」、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是否适当」表示怀疑，但中共领导人对此并不以为然。183 此外，国务院在 11 月 14 日

178 王文滋：〈胡绳晚年论社会主义模式〉，《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页 62。

179 如毛泽东在 1955 年 7 月 26 日听取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笏汇报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时就分析了苏联集体化造成减产、死牛，农业生产到现在！！没有逮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训，并一再叮嘱，搞合作化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要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参见陶鲁笏：《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页 154—156。

180 详见《苏联专家在中国》，第三章第四，五节。不过，正如笔者在书中指出的，盲目学习苏联的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与苏联无关。周恩来在 1957 年 7 月 4 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曾说过：第一五年计划不靠他不行，不搬他们的经验也不行。如有教条，错误在我们，不在别人，责任不在他人，我们不能抓住一点，忘记了全面 1 以后写文章、作报告都要注意。参见《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页 57。

181 吉林省楼案籍，1-11/1-1955. 139，页 2—8。

182 《中华人民共和国 8 经济楼案资料选编 11953 — 1957》^综合卷》’ 页 605—606。183 《建国以来重要文”选编》，第六册，页 305-310。关于检查专家工作的通知中提醒各部门，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要注意结合实际情况，对专家的建议应「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加以执行」，「使专家的活动和本部门业务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184 刘少奇从 12 月 7 日开始听取中共中央、国务院三十七个部委局负责人的汇报，所做指示和插话都是针对具体工作中的不妥之处，很少涉及苏联问题，唯一一次提到「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也是因为在粮食征购方面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公粮制度。185 这些情况说明，在苏共

二十大之前，中共中央的认识还没有到「以苏为鉴」的程度。

应该承认，中国领导人开始关注自己正在模仿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还是由于苏联的引领。1956年1月7日在莫斯科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的李富春用电话报告了会议情况：在谈到经济问题时，苏共代表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各国存在的问题是，工业虽有成就，但农业生产落后，许多国家尚未达战前水平；各国新五年计划规定的重工业发展太快，轻工业太慢，而重工业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指望出口，但出口又无保证；投资规模过大，使国民收入中资金积累部分增加太快，而工资增加太慢等。¹⁸⁶这无疑是对中国领导人敲起了警钟。不久以后，这些问题便更系统地反映在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中。

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也开始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做调查研究工作。正像薄一波回忆的，从这时起，「汇报中同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相关联的事也多了起来，『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其中提出的带全局性的问题主要有：重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在二五计划草案的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占 91.57%，轻工业占 8.43%），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沿海地区发展滞后），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国防工业建设规模过大），国家、集体、个人的贵权利分配问题（职工和农民生活水平落后于生产发展），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发挥地方积极性不够）等。¹⁸⁷显然，尽管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思考和总结，无疑与他 2 月 14 日开始并

历时四“1”一天的座谈和调查有密切关系，这些问题也都是结合中国自

己的实际情况提出的，¹⁸⁸但是很明显也受到了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影响和鼓励。笔者同意麦克法夸尔的看法：十大关系的后半部分很可能就是为应对苏共二十大而考虑的措施。¹⁸⁹周恩来曾经归纳说，毛泽东的思考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鉴于苏联共产党批判

斯大林的错误而取得的经验教训。因此可以说，1956年初，中共和苏共在共同思考斯大林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3 论「十大关系」及其历史局限

然而，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思考，都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模式，都没有从改变或改革制度的层面思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从 80 年代至今中国的经验看，否定斯大林模式必须过两道关口，即经济体制的市场关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关，而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当时的思考都在这两道关口面前止步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如前所述，而毛泽东当时对「以苏为鉴」思考的集大成者就是他 1956 年 4 月 25 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报告。191 两相比较，苏联使馆当时的结论是：在毛泽东提

18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页 472—485；《党的文献》，2004 年 1 期’ 页 24—25；《周恩来年谱 11949 — 1976》’ 上卷’ 页 568。

188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页 467—468、528；《毛泽东传 11949 — 1976,》’ 页 472—480。

189 参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卷’ 页 90。

19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 第四卷’ 页 3。

191 该报告当时只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1965 年底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党委。1975 年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再次整理成文，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1976 年 12 月 26 日公开发表，其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见汪裕尧执笔：〈关于「论十大关系」的产生’ 整理和发表〉，《文献和研究》，1982 年第 8 期’ 页 18—19。

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化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

「十大关系」的前五条专门讲经济关系的调整问题，这包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适当调整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广业和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适当降

低国防建设比重，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更多地解决工人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以正当的权利和独立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与苏共二十大的报告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中苏双方在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明显具有趋同性。1957年毛泽东对苏共处理马林科夫等「反党集，」立场的支持，突出表现了他同赫鲁晓夫改革思路的一致性。毛泽东在听了米高扬关于「反党集，」成员反对、阻碍改革的情况通报后，指责莫洛托夫非常顽固、守旧，明确表示支持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改革势力。不过，当时中苏双方都没有提出放弃或改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

从中国方面看，到中共八大时思考有了深入，在政治报告、大会发言及决议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某些方面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问题。特别是陈云的发言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的概念，陈云的解释是：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工业生产按国家计划进行是主体，根据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此后，随着中共八大路线的贯彻执行，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有了一定发展。11月11日《大公报》发表了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管大同的长篇文章〈开放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的重大意义〉，文章提出「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组成部分，它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思想范围。不久，以大规模群众运动冲击计划经济的综合平衡体制的尝试失败后，中国便日趋走向「一大二公」，进一步排斥了商品经济的因素。苏联的改革探索虽然缓慢但并没有停止，到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已经提出了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纲领，利别尔曼建议在经济中引入利润、奖金等市场经济的概念，更将这种思考在理论层面推向深入。这些恰恰是被中共视为修正主义纲领而坚决予以批判的。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总体看来，1956年苏共和中共对改革经济体制的设想，无论是理论和措施，都没有超

出 20 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范围和水平。199

196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1949 — 19991》’上册’ 页 386—396。

19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1949 — 19991》’上册’ 第七章。

198 详见刺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I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 页 499 — 505。

19988 于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详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业

社会化的道路》，第一’ 三章。当时’ 真正在二十大和十大关系报告钹发下提出市潘

沓济问迹的，在中国确有一人，他就是经济学家顾准。1956 年 9 月^ 顾准开始写作〈试论我 8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便值规律〉I 发表于《沓济研究》~1957^ 第 3 期)，他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然而’ 这篇文章竟成为罪状伴随他度过了半生坎坷。参见. 91 银胜：《顾准傅）【北京：圈结出版社’ 19991，页 352。

在政治制度方面，毛泽东的谈话似乎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更加「自由化」。在二十年后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当然已经见不到当年那些令人激动和感动的话语了，不过，看看有心人在听传达时所做的亲笔记录，还是能让读者感受到毛?，东讲话时的心情和神态：「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的是反革命的力量」；「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类似的话，毛泽东在其它场合也讲过，如「我们有蒋介石，我国有小脚，别人要照像，让他们照，衣服穿得不好，不要怕难看。在外国人面前扯谎，总有一天会揭穿的」；「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监督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咖毛泽东能如此讲话，一方面大概与

他听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心情有关，像胡乔木讲述的：「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²⁰ 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了他的自信。新中国建立后短短的几年，经历了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了，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都归顺了，私营工商业者也顺利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现在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²⁽¹²⁾

不过，这一切仍然都是在斯大林政治模式框架内的思考，所谓民主，也只是相对集中而言的一种统治手段，并非指能够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政治制度。没有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等
²⁰⁰ 李慎之：〈毛主席是甚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页 120—122；—《党的文献》，

2004 年第 1 期' 页 24—25。²⁰¹ 这段话是李慎之亲耳所闻' 参见〈毛主席是甚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页 122。²⁰²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页 288：

最基本的制度保证，一旦情况变化（像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共产党的所有许诺都会烟消云散。归根结底还是毛泽东 1954 年 8 月在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时所强调的一句话：「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²¹⁾³

所谓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在 1960 年 6 月的解释是：「从 1956 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并认为这条路线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2。4} 此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毛泽东自然不便再提苏联的道路。但是从现代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轨道与苏联的确没有多少差别。不要说人民公社的形式是苏联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已经遭遇过的失败尝试，就连「大跃进」的口号和方式，也是苏联在 30 年代创造的。²⁽¹⁵⁾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内心是承认的，他在 1956 年 1 月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就说过，合

作化俄国人在几十年前就搞了，中国在理论和观点上没有甚么新东西，只是在细节和形式方面做得比较完全。206 9月23日又对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乌布利希（!；化!!化）说：各国建设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21”直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说法还是：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我们自己的经济路线从此开始，跟苏联基本道路相同，具体道路有所不同。208 因此，中国的道路实际上就是苏联的道路，所追求的只是走法不同，其目的无非是要走得快一些。

毛泽东有一种大国情结和责任感，既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历史而骄傲，也为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太少而惭’隗，他一生致力于把中国 20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页548。

2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213。

205 凑见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中共党史数据》，2003年第1期。早在30年代苏联大搞工业化

时期，普通使用的口号就是「大跃进」160511108~310|0。中央编译局的著名苏联

史专家郑异凡在50年代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他告诉笔者：在工业化时期^苏联人

最熟悉的口号之一就是「大跃进」。206 吉林省楼案馆，1-13/1-1956.102’页1—7。207 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页539-540。208 吉林省楼案馆，1/1-14/68’页11—16。

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一个「真正的大国」。209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

两个追赶对象——苏联和美国。早在1953年10月斯大林去世才半年，毛泽东就提出苏联「建设了三十六年才有现在的成续」，「我们建设起来比苏联还要快些」。1955年10月又说：「我们的目擦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并预言达到这个目标要五十年或七十五年。1956年8月再次讲到要在五十至六十年内赶上美国，否则「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21(1 不过，赶超美国的目标太遥远，现实的目擦是

苏联，而且中国是具备这个条件的。

1956年2月25日重工业部在参加苏联工业会议回国后给毛泽东的汇报提纲中指出，中国钢产量1955年实际完成279.8万吨，1956年计划产量为447万吨，相当于苏联1928年的7又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工业的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这是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工业化的速度，是否能够争取比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更快一些。」重工业部认为，只要提高年度钢产量，整个工业的增长率就会高于苏联，因此充满信心地回答说：「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今后中国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苏联同样的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²¹²这无疑给毛泽东以极大的鼓舞和刺激。于是，他在听取三十四四个部委汇报时插话：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²¹³苏联1936年宣布实现工业化时的网产量是1800万吨，我们1967年争取达到3600万吨。²¹³

毛泽东后来回顾他在1956年春天的想法时说，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²¹⁴毛泽东在1957年2月

的一个讲话提纲中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虽然重工业是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二十一年内增加

1400万吨网）工业化速度反而快些？²¹⁵这里显然为后来的「大跃进」和大炼钢截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方针，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不愿意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就是要超到苏联的前面去。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指导思想，毛泽东在1956年12月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第六稿时，干脆删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²¹⁶

最后还应该指出，毛泽东所提倡和追求的经济建设方式与斯大林经济模式之间的差别，即他本人所说的「具体道路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运作方式上：斯大林依赖的是技术官僚集权以及由他们建立的严密

的计划体制，毛泽东依赖的是人民大众和他本人不断发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毛泽东一再强调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只有打破平衡才能发展，就是针对苏联那个计划体制来的。后来，毛泽东不仅频繁地以个人「建议」和政治运动干扰历次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甚至自己在国务院之外组建「小计划委员会」。因此，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确实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然而，无论是苏联的割制经济，还是中国的群众运动，其本质都是集中制，体现的都是长官意志或领袖意志，归根结底都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因其计划程度低下而比较容易引起变革，但实践证明，它给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丝毫不亚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总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论述与苏联的改革措施及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相比较，没有更多的新东西。中国经济建设采用

214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 I（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页 715。215《建 8 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314。216《建画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285。

的做法都是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战后恢复时期苏联的经验：所以毛泽东认为需要引为借鉴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这正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考虑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问题。再者，同苏共领导人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没有错，只是方法有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共八大继续探索而产生的思想火花，很轻易地就在突然爆发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中熄灭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956 年毛泽东所谓的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从本质上讲还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所指引的苏联道路，只是要通过采用那些自己熟悉的方法〔如群众运动〕比苏联走得更快些。在这方面，苏共二十大关于六五计划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长数字无疑对毛泽东是一个刺激，中国需要鼓足干劲才能超过苏联。然而，毛泽东的想法却遇到了阻力，中共党内正在兴起一股「反冒进」的潮流。第三章

毛周分歧：批右倾保守与反急躁冒进

1956年，中共高层在如何指导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要求高速度推进工业化的激进的发展，一种是主张积极而又稳妥的发展。前者号召批右倾保守，首倡人是毛泽东；后者提出反急躁冒进，主导人是周恩来。

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迅速到来，这极大地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他的注意力开始从改造转向建设，并酝酿推动一次工业化建设的高潮，办法仍然是发动他惯用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斗争。毛泽东采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督促各地和各部门提出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由于反右倾保守造成的逼人形势及合作化高潮引发的盲目自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头脑普遍热起来，各部委、各省市纷纷制定出各自的近期计划和远景规划，指标大幅攀升，建国后第一次经济建设的「跃进」由此发轫。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加快发展的新方针，中共高层开始都是表示赞同的。然而，经济运行中很快出现的紧张局面，引起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财经领导人的严重忧虑，他们与毛泽东在发展速度问题上的分歧加大了，周恩来甚至为是否追加投资与毛泽东发生了直接争执。6月初，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赞同周恩来等人的意见，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随后，「反冒进」成为当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进而又

成为中共八大和向八大提交的二五计划建议的基调。年初由毛泽东亲自提出的「产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多、快、好、省」的口号，实际上被搁置不提，主张积极而又稳妥的发展思路在党内占了上风。

辟于1956年冒进和反冒进的问题，中国学者早有专门研究，虽成果不多，但基本情况都讲到了，后来又有几部传记和经济史著作增加了

一些新的史料及内在原因的分析。1 本章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根据新史料进一步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逻辑辟系，突出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分歧，同时增加了一些细节描写，如在周恩来压缩二五计划指标的过程中，如何借助了苏联的意见。

一反右倾保守与「多快好省」

1956 年新年伊始，社会主义高潮便迅猛发展起来。1 月 15 日，北京市公私合营的工人、店员、资本家、广业合作社广民、手工业合作社社员及各界人士共二十万人集合在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鞭炮震耳！下午 3 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以及参加知识分子大会的一千多位代表都来到天安门，参加北京市庆祝公私合营全部完成，手工业改造全部完成、郊区赉民全，入高级合作化的胜利大会。2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了北京市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喜报。北京市市长彭真欣然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了！」继北京之后，天津、上海、西安、沈阳、南京、重庆、广州等 118 个大中城市，先后宣布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全部完成。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市，也于 1 月 21 日宣布全市全部批准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上海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3

1 「进入社会主义」的喜与忧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国有化，是中共建国的基本目标之一，但原来的设想并非一蹴而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中共领导人的头脑还是冷静的。1954 年 9 月刘少奇做关于宪法的报告时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来逐步实现。我们将讓资本家们有一个必要的时间在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逐步接受改造。」4 1955 年 3 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中国情况复杂，经济落后，

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5 同年 10 月 27 日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时还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6

3 《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2 日。

4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 下卷 I 北京：人民出板社' 1985》，页 152。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津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页 390。

6 《毛潭东文集》，第六卷，页 488。

7 毛榉束：(毛潭东迹集 (一卷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 页 1414[^]

农业合作化的成功促进了工商业改造的步伐。还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认识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广民」。7 如何将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唐民平稳地引导到合作化的道路上，这确实让中共领导人感到心中无数。当年苏联推行全盘集体化，从 1929 年开始到 1936 年完成，用了七年时间，而且引起了赓民的强烈反抗。国家不得不使用暴力镇

压，甚至动用了飞机、大炮，结果近二百万户富农被剥夺或驱逐到边远地区，死者近千万。8 强制性集体化造成的广业生产下降一直延续到

战后，以至苏联 1953 年的谷物产量还低于十月革命前的 1913 年。9 南斯拉夫在 40 年代末执行集体化方针，也导致农民的全面《抗，后来不得不解散合作社。10 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合作化速度不仅比苏联快，而且农业生产连年增长，社会秩序稳定。这难道不值得高兴吗？

1956 年 1 月，由毛泽东主持编辑并亲自撰写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唐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了。原先毛泽东准备发一条出版消息，当秘书田家英将拟好的稿子送给他时，毛泽东却咯咯一笑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 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跟随田家英一起协助毛泽东编辑《高潮》一书的逢先知写道：「这个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对毛

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稗，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楼喷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五亿人口的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一、二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就如则顷利地解决了，那末，还有甚么比这个更困难的问题不能解决呢？I 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自信，他开始把眼光转向工业。

1955年11月16—24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改造进程大大提前。刘少奇在会议上的说法是「在两三年之内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出一个头绪来，公私合营要基本上完成」，同时强调「要有一个全面规划、不要一股风，应该很有计划、很有步骤地进行这个工作」。I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再次号召全党要消除顾虑，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并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I3会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迅速传达、讨论和学习〈决议（草案）〉，并在1956年1月中以前提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规划和进一步的措施。14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到1957年公私合营达到90%。手工业合作化不积极，太慢了，也要求他们到1957年达到70%—80%。15于是，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各地区领导人相互攀比，争先恐后。很快，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群众运动的洪流。16

原来设想十五年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来压缩到两三年，结果仅用一两月就完成了。形势发展之快，多少有些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后来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17毛泽东无法掩饰内心的兴奢和喜悦，在他看来，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116年」.前赴后继奋斗的目掣，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18

与毛泽东的心情有所不同，当全国敲锣打鼓庆祝进入社会主义之时，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感觉却不太轻松。

对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周恩来谦约地表露出有些忧虑。1956年2月6日，他在全国政协二届十七次常委会上提出：「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这值得考虑，因为要完全进入就得建成，而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和贫困，照列宁说的还要消灭愚昧，还有文化的高潮等。因此，现在国家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否则，如果只是消灭了剥削，但贫困和愚昧都还存在，就宣布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人们会失望地感觉到，「哦，原来社会主义就是这样？！」¹⁹在2月8日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时，进一步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他提醒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对于毛泽东1月25日所说「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周恩来也作了限制性的解释。他说，「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不论从地区或部门看，都还会有不少尾巴」，「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此，他强调说：「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甚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²⁰显然，周恩来对于全国欢呼「进入社会主义」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¹⁹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作为中央十人小组组长，直接主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陈云当然也认为所有私营工商业最终都要国有化，但他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据陈云的秘书薛暮桥回忆，有一次，陈云在批阅薛暮桥起草的文件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²⁰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190—191。毛泽东的讲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22。

²¹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页211。

²²《陈5年讲11905—1995'中卷'页271-272。

²³陈5：《陈云文80949—195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

280—292。

万岁！时间长着呢，何必这样匆匆忙忙地去限制他们。」²¹ 在 1955 年 10 月 29 日毛泽东召开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座谈会上，陈云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安排和方法，主张采取按行业统筹安排生产、进行企业合并和改组、组织全行业专业公司、适当安排资方人员等措施，关键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有一个全面规划，要计算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定出改造的速度和步骤，在工商界和工人中进行教育」。²²11 月 16 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做报告，更加详细地提出了试行改造的步骤和方法，又增加了推广定息、保留招牌等具体措施。尽管承认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新情况」，陈云仍然强调，改造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很多困难，因此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应该分期分批，不要一声号令，就立刻全面铺开」。最后，陈云提出，中央将在 1956 年 3 月根据各地和各部门的汇报「提出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初步规划」。²³1956 年 1 月出现的公私合

营高潮，的确使陈云等主事者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尽管认可了北京市采取的「先收编后改组，先承认公私合营，然后再做其它工作」的办法，但他还是强调，这仅仅是全行业公私合营工作的开始，不过是顺序的颠倒。⁴ 在陈云看来，改造进度太快，必定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这引起了她很多思考。。

2 经济建设上反右倾保守主义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高层只是有人隐约感到忧虑的话，那么在随后出现的工业化高潮中，分歧意见就在多数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中渐渐明确地显露出来。

在提出提前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的同时，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如何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问题了。1956 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甚么？」田家英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卡住了，一时语塞，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

势。26 毛泽东永远是一个革命家，永远要走在时间的前面，在一个任务即将完成而尚未完成之际，他马上就会提出新的任务，使人们不敢松懈。这种做法，毛泽东常称之为「趁热打铁」、「不断革命」。

其实，毛泽东早已有下一个目标，这就是运用反对「右倾保守」的方法，在全国推动一场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文化建设高潮。在 1955 年 12 月 27 日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化高潮「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这篇〈序言〉中，毛泽东还写道：

24 《陈云年谱 11905—19951》，中卷’ 页 285、287—288。

25 薛暮桥：《薛暮桥回慷录》’ 页 222。关于陈云的思考，详见《陈云文选 11949—

19561》’ 页 293—306。26’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页 25。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 1 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它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方面的基本建设的规朴和速度，商业同其它综合部门的配合’ 科学、文化’ 教育-术生等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兄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27

毛泽东已经不满于按常规走路。事实上，在写〈序言〉之前，毛

2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页 223—224。2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I 速记草甩）’：1955 年 11 月 24 日（以下简称毛

泽东 1955 年 11 月 24 日讲话)。

泽东关于加快建设速.度的思想就已经形成。1955 年 11 月 24 日，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说，在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右倾，而「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2811 月 30 日' 12 月 1 日' 毛泽东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建设速度，并且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为中心。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有利条件是：一、有二十二年根据地工作的经验，经过四次革命战争……。二、现在有了伟大

的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三、有六亿人口，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还说：「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针对国家计委强调平衡发展的说法，毛泽东讲起了辩证法：「客观事物，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不断平衡，不断冲破，这就是我们前进的规律。冲破了平衡是好事，不要怕。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就恰恰要犯错误。」最后' 毛泽东又告诫说：「搞工业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特别是重工业千万不可骄傲，因为我们既无经验又未搞好，工业体系还未建设起来。有人说：『可不可以让农业等一下工业，不要走得那么快。』这种说法是右的。不能叫农民等，而是工业要赶上去。」 29

毛泽东关于加快发展速度的想法在党内的传达并向社会公开透露，对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发生了重大影响。

1955 年 12 月 5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集了中央座谈会，布置召开八大的 II 备事宜。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 122 人参加了座谈会。刘少奇说，今天开会主要传达主席

提出的在我们工作中反对保守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今春党代会议上，主席曾讲：「反『左』反右，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保守主义。」在六中全会上，又集中地批评了赓业生产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上，再次指出党内领导思想如何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我们的领导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情况，如对赓业合作化、肃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等，都抱有右倾思想。会议确定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作为八大 II 备的指导思想。刘少奇还说，过去我们曾反对急躁冒进，贪多、贪大、贪快，这也是对的。但是，那时在反的过程中出了毛病，把干部的积极性 and 群众的积极性都反掉了。主席说：「把扫盲也反掉了」。结果正气不伸，邪气上涨，干部、群众没有气了。主席说：「这样的问题中央可以早提出来，但没有早提出来，是失职的。」要站在群众的前头，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要鼓励群众，不要泼冷水。领导群众不左、不右，老老实实地向前走，这就叫做稳步前进。另一条是按常规前进，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我们有不少的同志却正在走着这条路。毛主席讲要我们发现问题，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早完成计划。如果这样做，不是大约而是可能超额和很好地在十五年以前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刘少奇最后说：「准备明年 9 月召开八大，中心问题就是这些。」他希望各部门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加强全面工作规划，「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38

30 《党的文献》，2000 年第 6 期' 页 8—10。

31 熊华猷：〈论周恩来在反雷进中的探索〉' 页 9—10。

32 (周恩来传《1949—19761》)' 页 259。

此前，已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又提出在各条经济建设战线反对右倾保守，「提早完成计划」，这使大家的压力陡然增加。首先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感到有压力，就在不久前，他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十五年的时间。11 月 15 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访华团成员时还说：「相信有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以后再逐步提高，赶上工业发达国家。31 现在' 毛泽东批评中央失职，国务院自然难脱其咎。于是，周恩来当即在中央座谈会上做

起检查：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周恩来多少有些自嘲地说：「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畜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³²事实上，周恩来这时确是处于被动跟进状态中的。

12月21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不得不以反对保守主义的精神重新进行全面规划。周恩来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回来，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这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且改变了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的一些指擦。周接着提出，财经、贸易、农林、水利、文教、政法部门，都要有全面规划；各省、县、区、乡也要全面规划。我们的发展速度加快了，不能再摇摇摆摆，而要大步前进。五年计划有几种生产指标要修改。过去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钢产量达到1800万吨，现在改为2400万吨；煤增加到3亿吨；粮食达到10000亿斤。周恩来要求，各部门都要考虑，需要扩大多少，于1月15日前提出来。文教、卫生、政法也要提出计划。我们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³³不过，周恩来很快就察觉到这种号召所带来的沉重后果。新中国正在蒸蒸日上，人们对未来前景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十分高涨。所以，对于一般干部和党内大多数人来说，听到毛泽东的谈话，大都感到倍受鼓舞。像顾准这样素以冷诤著称的经济学家，也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建设而欢欣。他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听了12月5日中央会议的传达，「八大的中心是反保守主义，这样速度问题就提到议程上来，过去许多难解决的矛盾，就会逐步解决了」。12月18日的日记又记道：「细细想来，三个文件，六中全会，工商业改造，与最近关于工业方面的传达，确实将开辟一个新纪元。」³⁴

33 《周恩来年谱 11949—19761》，上卷，页 529；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第三卷，19911 未刊）’页 242-243。

34 《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未刊稿’转引自罗银澳：《顾准傅》I 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91，页 330，335。3 农业发展网要四十条

既然是计划经济，推动建设高潮的办法当然就是督促政府各部门制定高指标的经济计划和远景发展规划。

早在 1955 年 10 月 11 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全面规划」的任务。当谈到在全党开展一次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大辩论时，毛泽东提出，这是由农业合作化方针问题引起的，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各个部门的工作，还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军队和外交，总之，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癡应，都要有全面规划」。”其中，毛泽东首先盯住的是农业发展规划。

11 月，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党委#12 们座谈，展望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共同归纳出十七条。毛泽东对农村有着特殊的兴趣，他创立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亲手推动了广业合作化高潮，现在又要从农村开始规划未来，并试图以农村发展的战略目标来推动全局，加快各方面的建设速度。从杭州回到北京后，毛泽血在 11 月 24 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对资改造问题会议上，谈到了十七条的产生过程。他说：「这回在杭州找了九个省的省委害记谈了一次（华东、中南九个省，有两个省没有邀，一个福建，一个广西），在天津邀了六个省区（华北三个，东北三个，热河没有邀）的^1531 谈了一次，谈的结果，我们谈出这么十七条。这十七条，我想跟在座的人，所有中央的同志跟各地方的同志都有关系。」毛泽东还说，过去我们认为城市先进，农业落后，「现在是乡下压城里了」，重工业部、交通部、林业部、卫生机关、水利部、轻工业等部门「一天天压力来了」，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现在也都要忙起来」，「要

压一下，加一点压力」，「形势是来了，这是不可避免的」。36

35 毛潭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 195。36 毛瀑东 1955 年 11 月 24 日的讲话。

为这份农业发展纲要的拟定，毛泽东付出了很大的热情和精力。

「广业十七条」提出后，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大范围的讨论。195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征询对「广业十七条」的意见。〈通知〉就农业合作化进度、地主和富农入社、合作社领导成份、增产的条件、全面长期计划、兴修水利等内容，请各省委准备意见，在 1956 年 1 月 3 日前上报中央。〈通知〉指出，「农业十七条」将在 1956 年 1 月 10 日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 1956 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37 1956 年 1 月 4 至 9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委书记会议，并召陈毅、谭震林、罗瑞卿、陈伯达、廖鲁言等人参加，继镶讨论农业规划。「农业十七条」内容不断增加，1 月 4 日，从十七条增加到二十二条，1 月 7 日，增加到三十八条，1 月 8 日扩充到四十条，最后形成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期间，毛泽东亲笔修改有三十六处。1 月 8 日凌晨，毛泽东致信周恩来，将拟就的农业发展纲要初稿〔当时只有三十八条〕发回北京，要求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议，邀请在京中央委员和若干负责同志参加，对草案初稿加以修改。通过后，发给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会者征求意见，再加修改后，即可「发给各地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1 月 9 日，毛泽东再次给周恩来写信，说纲要又有修改，已增至四十条，上午即派机要秘书送回北京。同时，由于参加杭州会议的各省书记「都要求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马上印发给下级党委」，毛泽东决定，纲要草案可经政治局或书记处「大略谈一下」，然后决定「是否可以让各省委用草案初稿立即下达各级党委（党外人士不在内）征求意见和安排工作」。毛泽东还告知，他拟连夜回京，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纲要草案，并作为定稿「正式下达」。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 月 9 日、11 日连，镶召开会议讨论。

1月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页 478—481。

17日、23日’回京后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化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纲要修正稿，正式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区’乡（民族乡）的党委征求意见。1月25日，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许多科学家，教授被邀请列席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在会上作了关于纲要草案的说明。1月26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开发表了这份纲要草案及廖鲁言的说明。39

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 537。

39 当代中 8 的经济管理扬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页 7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 541—542：《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长期发展蓝图，其目的首先是要为走进合作社以后的中国农民规划出一个美好未来。蓝图描绘了实现合作化以后的农村状况：对鳏寡孤独者实行「五保」（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增加农作物产量，发展畜牧业，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现机械化，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消灭病虫害，开垦荒地，绿化荒山，改善民居，消灭流行病，除四害，扫除文盲，普及农村广播网和电话网，建成全国地方道路网，保护妇女儿童等等。同时，纲要还提出了一系列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指标，如在七到十二年内基本消灭危害牲畜最严重的病疫；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和水土冲刷的灾害；基本上消灭「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要求

在三年至五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 600 万部和相应数量的播种机、中耕器、喷雾器、喷粉器、收割机、脱粒机、锄草机等。在十二年内扩大复种面积，五岭以南地区达到 2307%，长江以南地区达到

200%，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 1607%，长城以南地区达到。在十二年内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 1955 年的 1336 万亩增加到 14000 万亩。在五到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基本上普及农村文化网，基本上普及广村广播网，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基本上建成全国地方道路网，基本上建成水文的气象的台站网等等。”这个纲领，从经济、文化到社会生活，描绘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使人一新耳目，心往神驰。这当中不仅体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宏韬大略，也溶入了不少热衷于中国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的动人理想。

从上面所引的数字可以看出，「鹿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显露了后来「大跃进」的先兆。发展纲要的「中心」是要求迅速地、大量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这特别体现为以下一组增长指标：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由 150 多斤增加到 400 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 208 斤增加到 500 斤；淮河以南地区由 400 斤增加到 800 斤。棉花〔皮棉〕每亩平均产量按照各地情况，由 1955 年的 35 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到 60 斤、80 斤和 100 斤。纲要还规定粮食，棉花每年以 8% 和 10% 的速度增长，十二年内年总产量分别增加 1.5 倍和 2 倍。廖鲁言在关于纲要草案的说明中担保说：「只要这项中心要求做到了，全国产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提高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项要求，就将毫无疑问地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实现。」⁴¹

然而，恰恰是这个中心指标大大超出了现实的可能性。⁴² 廖鲁言在经毛泽东审定的草案说明中规定，到 1967 年，粮食年产 10000 亿斤，棉花年产 1 亿担。而在公开发表时，将这两个资料改成分别比

40 《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6 日。41 《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6 日。

42 到 1996 年，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才分别达到 9800 亿斤、8400 万担。参见《周恩来传 11949—1976》1，页 1218。

1955 年产量增长 1.5 倍和 2 倍。43 也许感到太没有把握，还有一些指标在最后定稿时删去了。如初稿中要求十二年内开荒 5.5 亿亩，省内和省外移民 1000 万户。在向社会公布时，已经没有这些数字了。此外，国营农场的目标，即耕地面积 2.4 亿亩，也减少到 1.4 亿亩，减少了整整 1 亿亩。44 这些被修改或删节的经济指标，大多是热情所至，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其实，不实际、不科学的指标还有不少，如急切在全国推广不成熟的改良广具双输双铧犁，把益鸟麻雀归为「四害」消灭等等。不过，对这些问题当时并没有提出疑义。更重要而被忽略的问题是如何落实保证这些宏伟目标的措施。廖鲁言说得很轻松：「这个纲要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运用五万万农民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的。」他说，「国家所花的钱不可能太多」，如果一切都由国家投资来举办，其结果或者是推迟这些事业的兴办，或者是缩减工业投资而推迟工业化。45 国家不可能为林业大量投资，这的确是现实。然而，完全依靠农民自己实现这些蓝图，就能行得通吗？

毛泽东虽然对农业问题有特别的兴趣，但他的本意不止于此。他是要以「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促工业和其它部门，要求各行业、各部门都要有长远规划。195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规划」的任务，1956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工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因此，「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46

4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显》页 526—527。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17—19。45(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6 日。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3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 1—2。

4 计划指标的修改和膨胀 1

反「右倾保守思想」成为 1956 年初指导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当时是受到党内一致拥护的。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的新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其它中共领导人开始都是积极赞同的。除了认同毛泽东的权威和希望迅速摆脱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外，这里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问题。大家都相信这样一个道理：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相信赓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必定推动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1956 年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讲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胜利，又给我们提供了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的有利条件。我们早先所需要解决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问题，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工业的市场问题，工业更有计划地发展问题等等，都将得到更好的解决。在这种形势下，我国自然不应该再拘守原来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而是要适当地把它扩大和加速了。」⁴⁷ 这种看法在当时中共领导层中无疑是完全可以达成共识的。

47(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2 日。

在客观上，1956 年加快发展速度也有一些经济背景，主要是 1955 年年度计划执行中出了问题。由于受 1954 年赓业自然灾害的影响，工业原料不足，1955 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前几年大幅度下降，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 5 免。到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剩下两年时间，而基本建设计划投资额仅完成了 61 匆。此外，由于缺乏经验，估计不足，在制定和实施 1955 年度计划时，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校舍和职工宿舍等）建设项目，使投资总额由原来的 97.9 亿元调减为 91.7 亿元。结果原来安排收支平衡的预算，结余资金 18.1 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的结余。这就使 1955 年计划显得有

些保守，且导致一五计划难以如期完成。又由于当时没有认识到保留必要储备的重要性，一度决定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材和部分器材减价出售。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两年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依然耿耿于怀。他说：「就这样一件事情讲，我看是幼稚的，眼光短浅的。」⁴⁸ 周恩来为此多次作检查，认为自己的确保守了一些，「主观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又承认「我们开始没有重视物资储备工作，是个错误」。⁴⁹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也积极行动起来。后来被毛泽东大加赞赏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口号——「多、快、好、省」，就是首先由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等人提出的。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据我了解，『多快好省』的提出过程

是这样的：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主席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同志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⁵⁰ 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也曾提到：「1956年春季，毛主席提出了多快好省，当时我在口头上赞成、是拥护的；并且在毛主席开始提出『多’快、好』的时候，我还加了个『省』字，毛主席也同意了。」⁵¹ 据现在看到的材料，首先完整地使用「多、快、好、省」的提法，是1955年12月14日薄一波在全国鹿具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就叫：〈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此后，「多快好省」的方针逐渐宣传开来。

对于经济建设而言，「多快好省」的要求，即希望以快速度、高质量、小成本来取得多成果，当然是一个理想的方针，而且周恩来等人当初提出这个口号的用意，很可能就是为了以「好」和「省」去制

48 《李富春传》’ 页 337—33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页 524—525。

49 樽引自熊华源：〈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大事记》’ 第三卷，页 313。5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

回顾》’页 526。51 搏引自（李富春传），页 477。52 《中华人民共和国 8 脊济管理大事记》’页 76。

约「多」和「快」。但在实际宣传和执行中，由于主旋律是反右（顷保守，由于热火朝天的社会氛围，人们注重的只是「多」和「快」，而忽略了「好」和「省」，只讲数量、速度，不讲质量、成本。于是’这一方针后来事实上成为高速甚至超速实现工业化的代名词。1956 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擦题是〈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疸篇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肯定「写得很好」的社论，明确地把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并列提出，从标题到内容，充满了形势逼人的气息。53 赙业发展纲要提出后，各部委，各省、市都开始积极行动起来，纷纷制定自己的具体措施和远景规划。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 1956 年 1 月 1 日的日记中记道：「毛主席在去年 12 月提出了反对保守思想的问题后，社会主义工业交通运输等方面根据这种精神作了传达，新的高涨也已出现了，五年计划很可能在四年内就完成！现在党中央提出了极为响亮的口号：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完成我们的事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各工业、教育、文化部门正积极地订立具体措施。」54

1955 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讨论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的问题，各部汇报了自己的设想。55 按照各部汇报，1967 年，全国锤食产量 6000 亿斤，棉花产量 5600 莩担，钢产量 1800 万喇，煤炭产量 28000 万吨，工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一五计划期间 8.67%。，二五计划期间 9.9%[^]，三五计划期间 10.1%[^]，十五年平均年增长 9.57%。。10 月 5 日，国家计委簧总报告中央。56 这个设想，特别是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已经很高了。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总报告各部长期计划设想时，附加了国家计委综合局对 1967 年生产粮食

5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页 576。

54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册’页 216—217。

55 十五年远景规划是指 1953—1967 年，此时已过三年，故有时也称十二年远景规划。

5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23。

6000 亿斤的论证。综合局认为，「粮食产量从 1952 年 3278 亿斤增长到 1967 年的 6000 亿斤，增长 83%。，每年平均递增 4.17%。；单产由 176.3 斤增至 260.7 斤，增长 47.97%。，每年平均递增 2.64%。这种增长水平超过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水平而居世界第一位」。据综合局提供的数据，苏联从 1928 年到 1950 年的二十二年间，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 2.47%。，美国、英国从 1913 年到 1952 年的三十九年间平均每年递增 0.97%。和 1.37%。，日本从 1927 年到 1952 年的二十五年间平均每年递增 1.87%。。”然而，毛泽东对这个设想仍然不满意。他从农业入手亲自抓发展速度。按照「农业十七条」规定的平均单产和规划后的耕地面积计算，1967 年粮食产量不是 6000 亿斤，而是 10632.8 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近 80%。；棉花产量不是 5600 万担，而是 12000 万担，超出原设想的一倍多。58 农业指标的大幅度提高，推动了各个领域规划指标的攀升。

反右倾保守造成了逼人形势，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普遍发热。早在 1955 年 11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传达下去后，许多省、市领导人就开始动起来了。11 月，山西、江西、山东率先提出，1956 年就将完成 1957 年的指标；随后，其它省、市在 12 月提出了同样的口号。浙江省委更加激进，提出要总结亩产「千斤粮、万斤薯、百斤棉」的增产经验加以推广。59 各地加强了在农业生产上反右倾保守思想的宣传，从省、县直至农业合作社，都在提高自己的增产目标。如山东省许多农业合作社提出的增产目标「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幼

头脑发热的不只是地方负责人，还有中央的各业务部门，急速修改、提高的也不只是农业指标，还有各种工业指标。1956 年初，国务院各部门召开了二十一个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十五年远景设想中规定十二年或八年的任务，提前在五年甚至三年内完成。1 月 14 日，国家计委向中央、国务院。远景规划对 1967 年所要达到的目

标做了大幅度修改：粮食 9500 亿斤〔加上大豆实为 10000 亿斤〕，棉花 1 亿担，钢 2400 万吨，原煤 33000 万吨。与 1955 年夏北戴河汇报的指标相比，粮食增加 3500 亿斤，棉花增加 4400 万担，钢增加 600 万吨，原煤增加 5000 万吨。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 1967 年实现的指标，提早五年，改为 1962 年实现。1 月 15 日，正在苏联访问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苏共中央通报了二五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通报的 1967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为 4679 亿元，比北戴河汇报时的总数字提高了 43.17%，粮食指标 10000 亿斤，棉花指标 1.2 亿担。61

6181—波：《若干 1：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页 531，527—528。6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531—532

如果说远景规划中的高指标只是造成了一种「跃进」的气氛，那么，1956 年年度计划的修改则直接影响到当年的经济工作。1955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即基本建设投资 112.7 亿元，比 1955 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 30.47%，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 1956 年投资额增长。这已经是十分惊人的增长，但由于反右倾保守的压力和追求高速发展的热情，各省市、部门纷纷要求追加投资。据国家计委 1956 年 1 月 5 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总额已达 153 亿元，后来又增加到 180 亿、200 多亿元，比 1955 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了一倍以上。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 694 个，其中建成项目 455 个；1956 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 745 个，建成项目追加到 477 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 800 个，建成项目追加到 500 多个。于是，便出现了周恩来所说的「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混乱局面。62

二从反「右倾保守」到反「急躁冒进」

周恩来对冒进的疑虑，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逐步形成的。现在看到的周恩来最早提出防止「冒进」问题，是他在 1 月 20 日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时作的总结讲话，那时国务院刚刚接到国家计委关于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和十五年远景规划的综合报告。在这

次讲话中，周强调说：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刺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⁶³

毛泽东在当天会议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实事求是的问题。在提到开荒5.5亿亩的问题时，鉴于陈云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总结说，各部门订计划指标，要放在可行的基础之上。本来做得到的，本来应该办的，不去办，这就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那叫盲目性，叫「左」倾冒险。毛泽东承认现在有些人「头脑不那么清醒了」，没有实事求是，但同时指出，在全党，在目前，这「恐怕也逮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而主要倾向，毛泽东明确说，那就是右倾保守，「这个右倾保守现在是相当地存在在各方面」。通观全篇讲话，毛泽东的主旨还是反对「右倾保守」。在讲话一开始，毛就尖锐地提出了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外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那么是应该促进还是应该促退呢？毛泽东选择了前者，还点名批评农村工作部是「促退部」。他要求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应该是使事业促进」，如果党和政府的各部门不能促进，「就丧失了它这个职能」。讲到最后，毛泽东又一次感慨中国的落后。他意气风发地说，中国人口多，地方大，现在又有了

6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32。

社会主义新制度，「应该搞成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一个国家」。甚么美国，那么一点东西，一万万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⁶⁴

1 周恩来等人的赚忧和警告

与毛泽东在原则上批评盲目性的说法不同，周恩来提醒防止「盲

目冒进」是有具体所指的。1956年初，由于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求追加投资，已经出现了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1月13日，国家计委向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发出〈1956年国家统一分配物资平衡情况简报〉，认为1956年物资供需不平衡状况可能会比以前更加严重。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235种产品，除煤炭、木材、碱等少数产品基本平衡或有少量多余外，大部分是紧张或不足的。其中突出的缺口有：钢材75万吨、镀锌钢板5.5万吨、大口径无缝钢管4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569台、鑽探机1509台。简报说，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1956年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必然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超过生产的增长，其结果导致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⁶⁵ 这时正在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指导方针就是反「右倾保守」。会议期间，代表们情绪高涨，头脑发热。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在1月25日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李富春汇报了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的二五计划指标和十五年远景规划控制数字，其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到1962年（二五计划期末），钢1200万吨，煤2.4亿吨，原油800万吨，发电量500亿度，化肥450万吨；到1967年、钢2400万吨，煤3.3亿吨，原油2000万吨，发电量1100亿度，化肥1000万吨。⁶⁶ 这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看出有冒进的苗头，想「压一压」。

1月30日，周恩来发出了不同声音。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只字未提在当时全国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样做明显地表露出与毛泽东的不同思路，因为「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是一个多月前刘少奇刚刚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的。⁶⁷ 一些会议代表看到〈政治报告〉有意回避这个问题，就此提出疑问。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解释说：讲提前完成工业化应慎重。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只说加快速度，而不说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到，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2月6日，在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时，周恩来也谈到，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

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同一天，周恩来又召集李富春和财政部长李先念、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财政部副部长金明等开会。周在谈话时态度明确地指出：反右倾保守，森森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摘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打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⁶⁹

2月8日，在主持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时，周恩来再次提
⁶⁷ 参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页8—9。⁶⁸《周恩来年谱1949—19760'上卷'页542。⁶⁹《周恩来年谱〔1949—19761〕'上卷'页544—545。

出这个问题，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还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考虑到当时的主流气氛，周恩来又补充说：「当然反右倾保守是主要的，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

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⁷⁸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周恩来提出「用冷水洗洗」，两种不同的思路已经显现。⁷¹由于周恩来的坚决主张，全国计划会议开始考虑压缩计划指标。

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李富春指出，在工业高潮中发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个是有些省市和厂矿领导人在新形势下显得被动，一个是盲目兴建厂房、增加工人。李富春提出，在完成计划方面要均衡地发展，不要单纯地追求快。地方工业要防止盲目性。今年基本建设投资需砍掉67%，从现在起对各部门不再增加新的基建项目。⁷²会议同意李富春的意见，要求对各项主要指标尽可能压缩下来，其中决定：1956年度中央各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0%，全国基建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双输双铧犁的产量也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⁷³

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精神开始修订计划和纲要草案。1956年国

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260亿元，工业总产值为653亿元，基本建设总投资为14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99%、19.7%和68.2%呢。”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修改稿》规定，到1957年、1962年、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将由1952年的827亿元分别增长到1471亿元、3114亿元、5469亿元，十五年共增长5.6倍，每年递增13.47%。（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16.29%。其中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到657亿元、1848亿元、3522亿元，十五年共增长12倍，每年递增18.77%。（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23%¹。粮食总产量分别增长

70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页190—191。

71 此时，刘少奇表示了支持周恩来的态度。在2月17日听取交通部8报时，刘少奇指出：「现在有些人脑子热了：提得太高了，而目前又没有条件做到，急躁冒进也要防止」 引自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页26。

7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三卷，页282。

7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¹，上卷’页547。

74 《陈雾年谱 11905—19951¹，中卷，页283。

到4350亿斤、6400亿斤、9500亿斤，十五年共增长1.9倍，每年递增7.47%。（二五计划期间每年递增8.29%¹。75 后来周恩来坦然承认，1956年2月召开的财政、计划会议就是「促退会议」。76 不过’从上图I数字对比的结果看，除了1956年基建投资规模有所压缩外，其它指标变化不大。「促退」在这时还只是周恩来的愿望。

75 《周恩来年谱》’上卷’页550，这里需要说明的是¹因1953—1955年粮食总产量每年只增长了3.9%¹，所以要达到9500¹斤的指标¹1956—1967年每年递增必须提高到8.2%¹。

76 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第四卷，1991〔未刊〕，页103。

77（人民日报），1956年2月1日。

应该说，周恩来并没有直接对毛泽东所提倡的新方针提出置疑，1月

30 日的〈政治报告〉也没有从总体上抵制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报告毕竟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审阅的，而不是周恩来的个人发言。〈政治报告〉回避了「提早实现工业化」的口号，但在基调上依然主张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报告说，目前中国「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全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到处出现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社会主义改造的规模和速度，「为社会主义工业的加速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新的高涨提供了有利条件」。报告虽然提出要同时防止犯「右倾保守的错误」和「盲目冒进的错误」，却并没有列举「盲目冒进」的具体事例，而是着重批评了「保守主义的潮流」。报告指出：还有不少企业的生产状况是很落后的。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员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潮流中也修改了一些定额，看来似乎已经是先进的了，但是只要「同真正先进的定额比较一下：就知道他们仍然是很保守的」。「看到旁的企业跑到前面去了，并不向这些先进的企业学习，反而忙于替自己寻找辩护落后的借口」。各部门领导者「要向这种安于落后的人们展开批评，不要采取妥协态度，不要让他们占先进生产者的便宜，而要利用先进者的榜样，促使落后者脱离落后状态」。「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证明他不是右倾保守主义者，不是右倾保守主义者的保护者，才正确地尽了政府给他的领导的实任。」，

显然，周恩来没有，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对反右倾保守的方针提出异议，而只是委婉地表露了对已经出现的冒进苗头的担心。

正因为反「右倾保守」风头正劲，2 月的「促退会」并没有真正实现促退。2 月 22 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 1956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说，计划草案「是在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新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保守主义，计划既要积极又要可靠的指示和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精神编制的」。1956 年的计划指标再次修改为：工业总产值 535.7 亿元，农业总产值 606.8 亿元，基建投资总额 147.35 亿元。对于这样的指标，国家计委在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要完成 1956 年的计划任务，「是十分繁重和紧张的」，「特别是设备和建筑材料的供应同需要还有相当的差额，资金、技术力量和人民负担能力也有限度」。782 月 24 日、28 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

会议，原则上通过了 1956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经过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协调，计划草案只是对个别指标作了象征性的压缩，与上年相比，增长速度还是惊人的：工业总产值增长；基本建设总额增长 70.67%；农业总产值增长 9.37%，其中粮食增长 8.47%，棉花增长 17% 先。无可奈何的周恩来，只能要求各部门平衡物资，挖掘潜力，节约材料。3 月 25 日该草案由国务院下达全国。79

2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分歧明朗化

进入 4 月以后，周恩来等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在发展速度问题上的分歧明显地加大了。一方面，毛泽东主张进一步追加预算，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在争投资。另一方面，财经领导人感受到经济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难以支撑高投资，必须压缩预定计划。毛周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朗化。

从 2 月到 4 月，毛泽东听取了三十四个别部委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时，正值苏共二十大召开，苏共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弊端。毛泽东由此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想要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并确实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如打破对苏联经验的迷信，就是一个合理的命题。但是毛泽东从这裏引申，却提出了在建设速度上也必须超过苏联的要求。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提出了一些「过急过快」和「不切实际」的要求。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⁸⁰（在谈到工业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穷二白」【发表时改成了「一穷二白」】的论点，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⁸¹ 这个多少有些奇异的论据，来源于毛泽东独特的辩证法思想，尽管「带有认识上的一些片面性」，却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人不能这么浪漫，他们必须每天面对现实，处理复杂而又具体的任务。4 月上旬，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严峻形势。如同

周恩来所说，由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国民经济各部门又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821956年基本建设比上年增长627%，而以生产数据为主要产品的重工业产值只增长了4070，结果虽然动用了70万吨库存钢材，钢材仍然供不应求，其它建材和若干机械设备也供不应

80 薄一波在此处加注：苏联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19.27%、和13.27%，我国工业产值在一五计划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8%，已够快了。8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528。8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页219。

求，结果使建设工作中出现不少停工待料和窝工现象，仅1956年4月份，因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而未能如期开工的项目即占同期应开工项目的20%。此外，在原材料分配时，为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对于一般为市场服务的生产（即主要为生活消费资料）则照顾不够，分配太少，使这类生产受到限制，产品品种和数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如1955年供给轻工业市场的钢材占当年钢材供应量的23.27%，而1956年则降为18.77%，但是1956年因农业投入和职工工资总额大增，以钢铁为原料的农具和消费品的需求也大增，结果1956年出现手工业者到处抬价抢购废铜烂铁现象。83 薄一波回忆说，那时，下面普遍要求增加生产，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紧张情况向下交代，工作十分被动。84

为扭转被动局面，国务院开始采取应急措施：「动员生产，约束基建」。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薄一波、陈云、周恩来等人都主张「降温」。薄一波说：年度计划不能和长远计划分开，现在各部门总想把长远计划完成的期限尽量往前赶，而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教训，应该使大家头脑冷下来。陈云说：生产与基建的关系，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是决定于财力。

材料的来源首先决定于国内的生产，而不是进口。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首先进行物资平衡，然后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赞成他们的意见，他说：「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甚至提出了「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的口号。周恩来指定薄一波和张玺负责平衡工作。根据多次平衡测算的结果，会上确定 1956 年物资供应计划按钢材 442 万吨、水泥 647 万吨方案执行。⁸⁵

4 月 14 日，国务院为此下达通知指出，「1956 年度物资供应情况是很紧张的，钢材和水泥的供应情况尤为严重」。通知要求，全国投资总额仍维持 147.3 亿元的规模，各部门要求新增加的 15 亿元建设项目作为「第一批预备项目」。通知告诫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结合」，否则「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险」。国务院还要求：「从现在开始，各部门、各地方应该迅速组织力量深入实地检查，进一步摸清生产和基本建设情况、并作好准备工作，在今年 5 月下旬再把 1956 年度计划中需要修正的某些重要指标修正一次，使 1956 年度计划放在更积极和更可靠的基础上，以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所规定的建设和生产任务。」⁸⁶

⁸⁶ 《党的文献》，1990 年第 2 期；13—4。

⁸⁷ 转引自《周恩来传（1949—1976）》页 269。

然而，毛泽东提出的摆脱困难局面的主张却与周恩来完全不同，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解决物资平衡的问题。为是否追加投资，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这是周恩来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在 4 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再追加二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增加基建投资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胡乔木后来回忆说：「4 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 1956 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

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杂开了北京。」 87

5月初，毛泽东杂京南下去了广州。一天，毛泽东突发奇想，要到长江里去游泳。他不顾罗瑞卿的劝阻，5月30日先从广州到长沙，游了湘江。然后到武汉，在长江中流擎水。那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之中。毛泽东为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为自己心中的发展远景宏画而激动，填下一首《水调歌头，长江》，词曰：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风檣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化

周恩来何尝不想生产多一些，发展快一些。为了摸清钢铁生产的潜力，4至5月，周恩来亲自到几个钢铁基地作实地调查。4月14日，周恩来乘火车到鞍山、抚顺、天津视察钢铁工业，18日飞回北京。19日，约重工业部副部长吕东同上海钢铁厂和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厂长商谈增产事宜。5月6日，又飞往太原视察全国唯一能生产硅钢的太原钢铁厂，次日飞抵唐山，视察唐山钢铁厂。通过实地考察，周恩来了解到各地钢厂不仅不能增加产量，有的甚至对完成现有的生产指标都感到没有把握。 98

经过调查研究，周恩来心里更有底了，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反对冒进问题上，并且公开讲出了不同意见。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月1日，周恩来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首先得承认今年的计划搞得不十分妥帖，国务院有责任」。3月份下达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太高，「不可能完成」，「生产方面冒进少点」，但也「肯定完不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下」。 91 当然，并

非周恩来一人有这样的举动，刘少奇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人也都是赞成他的意见。这时，在京的中共领导人对经济形势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1956年的计划「冒了」。因此，周恩来等人从担心和防止冒进转到了反对和纠正冒进，提出了改变方针的问题。

3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方针的提出

1956年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为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的问题。会议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与会者还一致主张写一篇反急躁冒进的社论，刘少奇提议由中央宣传部完成这项任务。⁹² 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游泳，未参加这次中央会议。

91 《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页6。

9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534；《刘少奇年谱《1898—19691》~下卷，页368；《刘少奇传》，页790；张秋云、鄞淑兰：〈一篇反冒进社论的由来〉，《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页11。熊华源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5月召开的几次中央会议都是研究政治问题的，不可能提出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参见熊华源：〈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的文献》，1992年第4期'页88—89。关于5月政治局会议，目前81没有任何具体材料和详细记载，究竟此次会议的内容和主题是甚么，&有待中共档案的开放。

6月3日'财政部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报告稿是在周恩来指导下进行的，体现了他从年初以来一再提醒的防止冒进的思想。报告写道：

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

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增加生产，而只能招致损失。93

6月4日’根据周恩来、陈云的建议、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预算报告初稿，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利瓦伊汉、胡乔木等出席会议。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会议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并据此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6月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落实中央会议的精神，讨论如何削减仍然不切实际的1956年预算。周恩来说：这个报告，「内容本身就有问题，如果说可靠，自己都不大相信。」「各部发言时如果一定要提出这个数字，人大代表问起来，如何答复？因此，预算数字一定要灭一灭。」谈到具体问题，周恩来说：各省市反映税收打的太高，过去还能努力争取完成，今年就没劲了。「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灭下来。」周恩来最后明确指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

93 熊华源：〈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页88—89；

薄一波：《若

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534。94(周恩来年谱11949—19760，上卷，页585；(陈1?年讲11905—1995!)，中卷’页

307-308；(周棘传11949—19760，II270，

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9：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都赞成周恩来的意见。李先念在会上说，税收从1953年以来就没有完成、去年打了100亿’实收87亿。今年工商税102亿，「这么大的任务，很难完成」。

李先念指出‘即使削减预算’「仍要动用上年结余」，「预算仍然很紧」。因此他认为：「现在下马比年底再下马好」。薄一波也支持周恩来的看法，认为这个预算「拿出去确实不好」。薄一波特别讲到，去年基建完成原计划的 80 多亿，今年计划是 147 亿。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完成。基本建设不仅要有钱，而且必须有原材料。原材料缺口大，当然完不成了。他与李先念一样，主张有些基建「非下马不可」，「半途改正错误总比到年底完不成改正好」。96

具体如何削减，周恩来说，「同意将富春和一波同志的办法相结合，预算一律削减 5%」。按照周的本意，基建投资「不能平均都砍 5%，有的可以多砍，有的不能砍」。薄一波感到为难，「这时减谁的谁也不愿意，因为大家都已按 147 亿的盘子铺开摊子了」。他和李先念两人的意见是：「只好『剃一次平头』，大家都减 5 呢。」薄一波回忆说：「我们知道『推平头』不好，可是实在找不出别的办法。周总理同意这个意见。」力会议最后决定：1956 年预算收入在原定 303 亿元中减少 5.86 亿元，支出在原定 317 亿元中减少 10 亿元。预算中基本建设用款控制数由 147 亿元减为 140 亿元，削减出来的 7 亿元列为预备费。98 于是，预算报告初稿再次提交中共中央讨论。

6 月 10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了预算报告初稿。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彭真等三十人

95 《党的文献》，1988 年第 2 期’ 页 7—8；《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

第四卷，页 24。96 《党的文献》’ 1990 年第 2 期’ 页 4—6。

97 《党的文献》，1988 年第 2 期’ 页 5—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页 535。

9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 第四卷’ 页 24。

(毛泽东仍未回京)。会议基本通过了预算报告初稿。会后，胡乔木受刘少奇的委托，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预算报告进行修改。修改稿将原稿涉及指导方针的一段话改为：

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¹ 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化

可以看出，经过政治局讨论后的修改稿，明显增加了反对冒进的份量。两天后，周恩来在他和陈云共同主持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十二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周恩来虽然认为预算「打得还是紧张」，但基本满意。他说，向人大会议提出的这个报告「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100

4 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基调

就在国务院会议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6月1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开会，讨论第八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有关问题。¹¹⁾1 关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讨论修改 1956 年预算报告的情况，毛泽东是何时知晓，又作何反应，目前无从考察。

99 《陈云年谱！1905—19951》’中卷’页 308。100 《周恩来年谱 11949—19761》’上卷’页 587。101 《陈云年谱 11905—19951》，中卷’页 309。

但显而易见，国务院削减 1956 年预算的做法与毛泽东 4 月提出追加投资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后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激烈态度，可以证明，他是极为不满的。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一期间

也在积极地进行调查研究的。继2至4月听取中央各部委的汇报之后，毛泽东在5月下旬开始收集和听取地方各省市、委的汇报，汇报内容涉及工业、交通、商业、农业乃至失业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十几个题目。毛泽东特别强调、汇报的问题重点在经济工作，而以工业「为主要的重点」，只要这个问题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毛泽东为此还亲自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各省市向中央汇报的「通知」和「补充通知」。可见，毛泽东并非不关注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他在此时之所以没有对国务院的主张明确表态，或者是因为具体情况还不甚清楚，或者是因为不愿直接否定中央多数人通过的新方针。但无论如何，毛泽东的心情是不愉快的。11)3

6月15日，毛泽东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人大会议从6月15日到30日，开了十六天。议程有四项：审查和批准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讨论和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讨论和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补选全国人大常委。这一届人大会议，没有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会上提出的报告主要有：李先念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鲁言的〈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彭真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其

102 汇报由中南几省开始，计划5月25日至6月10日由华东几省，6月10日至7月底由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省市向中央汇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第六册，页116—119。

103 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1957年7月5日在杭州对周恩来等人说：我过去一年心情受到压抑，就是由于反冒进。毛又解释说，计划的执行过程中，比如说1956年，发现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压缩一点；向农民征购多了，下一年少征一点；这种改弦、这种调整是可以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们在进行这种指标调整的同时提出了个反冒进，这点上心情不舒畅。邓力群谈有关中共八大到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重大事件，1998年4月16日。

他还有周恩来辟于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李富春关于一五计划执行情况的发言；陈云辟于工商业改造问题和工商关系问题的两次发言；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言；郭沫若关于科学远景规划的发言；张鼎丞关于镇压反革命和处理在扞日本战犯问题的发言；罗瑞卿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发言等。还有几位民主党派部长就各自的部门工作做了发言，如交通部长章伯钧、文化部长沈雁冰、粮食部长章乃器。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的发言没有谈业务工作，而是就高级免谪分子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所有这些发言中，财政部长李先念作的预算报告是大会的主要文件，而这份文件的主题和基调就是反冒进。报告虽然提到，1956年「全国人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地高涨」，1956年的预算「是按照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要求编制的」。但同时强调，要完成这个预算「沓必须进行紧张的努力」。除了前引那段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指导思想的话以外，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没有强调毛泽东年初着力推行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个是「多快好省」的方针。报告提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各项建设事业」时，增加了「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的限制词。其它涉及到这个口号的几处，也是着眼于纠正急躁冒进的偏差。报告说：目前在工业生产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纠正一部分企业片面地追求『多』和『快』，而没有同样地着重『好』和『省』的倾向。许多厂矿虽然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却没有完成质量计划和利润计划」。「由于片面地追求『多』和『快』，生产中的安全在许多企业中也受到忽视，人身事故和设备事故比去年同一时期有了增加」。「在基本建设的工作中，也存在着片面地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和安全的倾向」。至于「赓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报告中只有一处提及，而且是从负面提出问题的。报告说：「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经对广业生产合作社提出过多的要求，希望它们把全国赓业生产发展纲要草案中拟定要在十二年内

都办完，因而使合作社投资过多，负担过重。这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185

105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6日。

10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36—537。

10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37；《中华人民共和国

88 民沓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页 86。

108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

109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9日。

110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

第二天〔6月16日〕’尚未经过大会讨论’《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就全文发表了这个预算报告，由此可以看出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此时的急迫心情。尽管这种多少有些违反程序的做法受到许多代表的批评，1(16但预算报告及其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似乎并没有遇到阻力。除李先念外，其它财经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也都贯穿着反冒进的思想。如薄一波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国家经委主任的名义发言，在分析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方面「存在不少缺点」时说，「上述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在计划工作中，当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又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他强调说’^「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今后在编制计划时，必须对于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及其可能的增长程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经过反复的平衡计算，从而恰当确定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加邓子恢以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发言，指出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工作中存在着急躁冒进倾向的种种表现。则李富春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名义发言，也谈到「在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特别是在组织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曾经发生过某些急躁冒进的偏向」。109 交通部长章伯钧的发言则进一步指出：「必须通过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和计划，来体现既要反对保守思想，又要防止急躁冒进的方针，这才不会使下面感觉到今天一阵风，明天另外一阵风，有些无所适从。」^陈云的发言没有直接谈到反冒进问题，但他关于对资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事实上也涉及到指

导思想。还有一个现象，会上的发言很少有人提到毛泽东不久前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唯独一个例外，是在李富春谈到二五计划编制问题时涉及到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广业的关系问题；二是关于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三是关于增加国家积累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111 大会关于预算报告的决议指出：「在执行 1956 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必须全面地注意多、快、好、省和安全，不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要做到安全生产。」决议甚至指出这是一个「总的方针」。112 这说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主旨就是反冒进）的方针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反右倾保守和「多、快、好、省」的方针。

6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赞 1956 年国家预算报告〉，凸显了大会反冒进的主题。这篇社论提醒读者，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是，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并且指出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社论具体列举了在不同领域急躁冒进倾向的种种表现。在农业工作中，「许多农业合作社的增产计划过大，而且片面地着重粮棉而忽视副业，生产和非生产的投资都过多，一部分合作社的规模过大，对社员的干涉过多，要求过高，对社员收入的增加和女社员的健康注意不够」。在基本建设工作中，「许多建设部门的计划过大，超过了材料和设备供应的限度，而准备工作又单纯地偏重了施工力量，许多建设部门在工程中片面地要求多和快，而忽视好、省和安全」。在生产企业中，「一部分生产企业的产品计划没有详细研究原材料的来源和用户的实际需要，许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也是片面地追求多和快，忽视好、省和安全」。「在其它方面，例如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某些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社论解释说，这种急躁冒进的倾向

111 《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19 日。

1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537。并不符合于反

保守主义的正确的要求，「急躁冒进的结果必然招致损失，妨碍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收支计划的实现」。社论还号召全国各级组织和干部，都要认真重视这个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113

5 《人民日报》6月20日社论

至于毛泽东对李先念的预算报告以及其它会议发言作何感想，目前尚无史料可以说明，可以看到的文字只是6月22日他在廖鲁言关于雇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的信上的一行批示，内容与此无关，涉及的只是土地补偿的问题。114唯一能够让人们察觉到毛泽东当时可能对反冒进这种提法不满的，就是他对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态度。其实，6月16日的社论已经强调了反冒进的主题，据薄一波分析，那篇社论「可能由于题目不鲜明，未引起毛主席的注意」。1156月20日的社论则题目鲜明：〈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这篇社论出台的背景。116

113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6日。

1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125。

11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537。

116 毛泽东对此十分在意，他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曾谈到这篇社论说：「文章把我撇

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参见李锐：〈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党内斗争〉，《炎黄春秋》，1996年第8期’页17。

如前所述，还在5月政治局会议讨论1956年国家预算方案时，刘少奇就提议中宣部写一篇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问题的社论。这篇社论原来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便请示了刘少奇，刘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亲自组织起草。6月1日，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讲话透露：「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随

后，陆定一将起草的任务交给了宣传处，宣传处处长秦川让副处长王宗一起草。6月10日，陆定一收到社论初稿后作了几处修改，主要是删去了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删掉的这段话是：「正是由于反对了保守主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扬，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才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陆又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最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的「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五个字。6月12日，社论稿报送刘少奇处。

刘少奇收到初稿后又作了四处文字修改，都是加重语气，以揭示冒进的危害性的。社论稿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些」，刘少奇将「急了些」的「些」字圈掉，并在这句话的后面增写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九个字。社论稿写道：「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刘少奇在「注意」的前面加上了「严重」二字。社论稿指出：「扫盲工作是应当积极地进行的，但我们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些」，刘少奇又把「些」字删掉了。社论稿在讲完扫盲问题的急躁后指出：「在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方面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把「一些」改为「不少」。最后，刘少奇审阅修改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收到此稿后，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这三个字包含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情绪。1”

胡乔木显然没有认真推敲「不看了」这三个字的含义，收到社论稿后，按照刘少奇等人的思路又针对农业和基建方面的问题，增写了几个关于急躁冒进的具体事例，「由于片面的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就是一个例子。许多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也没有切实研究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没有对设计力量安装力量作充分的准备，以致发生某些停工窝工的现象」。118

6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了这篇社论。

社论的主旨一目了然。虽然指出当前工作中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和「急躁冒进偏向」两方面的缺点,但社论认为自1955年下半年以来反右倾保守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而急躁冒进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发生的新情况。最值得注意的是,社论详细列举了急躁冒进在各方面的表现:

118 以上所述社论稿的修改过程,参见张秋云、鄞淑莹:《一篇反冒进社论的由来》,页11—12;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页443—444。

就农村工作来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本来是要在五年、七年和十二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88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做好。在制定增产计划方面1 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在文化福利设施方面,都已表现出这样一种偏向。由于片面地强调了种、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审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的桦盲工作也是急躁冒进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央的要求本来是要在五年至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城市和农村居民中的文盲,但到了某些省就成为了四年和五年,到了某些县就成了三年,愈到下面时间定得愈短。现在正值农忙时间~但有少数农村桦盲积极分子不管这一情沈,^用农民的休息时间来桦盲1使农民只好在课堂上打瞌睡。个别的地方甚至设立识字岗,拦路铈字站^强迫农民识字。这些积极分子的热情是好的,但是他们用

错了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除了造成农村紧张,妨碍农民生产,招致农民埋怨之外,并收不到好的效果。^

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方面也有不少类似的情' X。有些工业生产计划在制定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材料的来源和挺销的平衡问题,计划订得不切实际,使计划的执行发生很大困难。双轮双铧犁的生产计划定得通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屡~就是一个例子。许多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也没有切贵研究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没有对设计力量安装力量作充分的准备 I 以致发生

某些停工窝工的现象。有些工矿和基本建设工，在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不恰当地强调一切「打破常规」，结果使事故增加，影响到工人的安全，也影响到工人的情绪。有些地方在基本建设的节约问题上做得通火，结果厂房和宿舍建筑起来，质量太坏，并且不合用。

社论不仅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反保守主义，而且指向了「上面」。社论指出，「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说自己右倾保守，争先恐后用过高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要求很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层层加重，下面必然受不了。在反保守主义以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方针和颁布「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后，许多人「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谈到问题的根源，社论说：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在下面，而且首先在上面，「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强调指出，对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要「片面化、绝对化」，「不能只注意多和快，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因为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为求多求快求省而忽视工作的质量和安全」。社论还特意指出：「执行四十条的问题也是这样」。…

119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篇社论的矛头所向，都是针对反右倾保守和「农业四十条」的，而这恰恰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是他亲自提倡和发动的。特别是胡乔木在社论中加写的双轮双铧犁的例子和陆定一修改时所突出的扫盲例子，都直接涉及到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并投以极大热情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在毛泽东看来，这篇社论简直就是批判他本人的。然而，毛泽东当时却难以发作。121 因为，急躁冒进的倾向和经济建设一片混乱的局面是客观事实，且被中央多数领导人所认同，而在农村进行扫盲和推广双轮双铧犁这两件事又是急躁冒进最为典型的表现。

在全国完成扫盲工作，纲要规定的时间是「五年到七年」。3月

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做出专门的决定，要求从1956年开始，「二年到三年扫除机关干部中的文盲；三年和五年扫除工厂、矿山、企业职工中的文盲95%左右；五年或者七年基本上扫除农村和城市居民中

的文盲」。122在贯彻纲要的过程中，从省、市到基层又层层加码，一再缩短消灭文盲的时间，「到某些省里变成了四年和五年，到某些县里又变成了三年和二年，到某些农村就变得更短」。薄一波后来回怵说：「现在看来，不仅将五年到七年任意缩短是冒进，纲要关于五年到七年的规定本身也是冒进的。在我们这样贫穷落后的大国，要指日消灭文盲，谈何容易！」123

不顾客观需要，硬性在全国大力推广双轮双铧犁；一方面打乱了计划平衡，造成物资供应困难，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极大的浪费。纲要规定：「在三年到五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六百万部」。在急于求成的气氛下，最^上设想1956年一年就要生产500万部。后因钢材供应紧张，改为生产350万部，推销270万部。后来再改为生产250万部，销售230万部。4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省市迅速召集会议，再「切切实实地」核实一下各地的需求量。”此外，推广这种新式农具，不只是数量要求过急的问题，更麻烦的是根本不适应南方水田使用。陈云首先发现并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对周恩来说，在南方的水田，尤其是淤泥田中很难使用。在一些地方，硬性销售给农民的双轮双铧犁，只好「挂起来」。1255月15日和18日，周恩来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再讨论生产双轮双铧犁问题。确定1956年生产控制在200万部到250万部之间。推销的方针是：适应和保证农民的生产需要，决不勉强摊派。对已经销售给农民的，不能使用而挂起来的双轮双铧犁，应该允许农民退回。^上这大概就是为甚么胡乔木在修改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时，特别加写双轮双铧犁例子的缘故。

实际情况表明，硬性推广双轮双铧犁不只是冒进，简直就是幼稚和荒唐。由于不少地方「不顾当地条件，逐级分配下去」，「强迫摊派，引起农民不满」。结果农民纷纷要求退货，预计收回15万部。据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反映，该省九成以上的双轮双铧犁没有用。周恩来估计，

收回来的可能不只 15 万部。在 7 月 3 日讨论二五计划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说：「双轮双铧犁的生产可以停一下，拨一部分钢材给商业部用。我摸了五个月了，现在敢下命令了。」¹²⁷ 7 月

18 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双轮双铧犁的产销问题。根据计算，全年至多能销售 140 至 150 万部，因此，国务院决定把生产计划，从 200 至 250 万部减到 175 万部以下。针对强迫摊派引起广民不满的情况，国务院 7 月 26 日批转农业部等四部门的有辟报告时，要求各地「采取自由买卖，现款交易的办法」，「严禁强迫摊派，一律不准赊销，宁可积压」。凡要求退货的都可退货。¹²⁸ 到 10 月底，生产出 170 多万部，只销出 80 万部，还退回 15 万部，「没有退回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只能挂在墙上不能使用的『挂犁』」。¹²⁹ 这个例子还说明，到 7 月以后，反冒进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三继续反冒进与削减计划指标

6 月人大会议以后，周恩来立即把精力转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是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一项重要的筹备工作。上年 10 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确定，在中共八大召开时，提出一个二五计划的建议，并由周恩来就这个「建议」向八大作出报告。然而，由于指导思想反复，二五计划的控制数字一直定不下来。6 月以后，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控制数字降下来，争取向八大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二五计划建议。

¹²⁷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 601~595。

¹²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页 60~63。

¹²⁹ 毛泽东后来也承认：「16 轮双铧犁在北方 II 可以在南方是名—很奥。这个东西

封不对？现在看起来不对。」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显》葛

538 — 539。

1 不断反复，的二五计划草案

关于二五计划的研究，早在 1955 年就开始了。在这年 8 月国务院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各部委提出了二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国家计委桑总后，于 10 月 5 日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2 月初，李富春又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国家计委的初步设想是：到 1962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2700 亿元，粮食产量达到 4600 亿斤，棉花产量达到 4300 万担。也就是说，按照 1957 年的计划数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粮食、棉花每年分别以 9.97%、3.6%、5.67% 的速度增长。李富春认为，这些预计数与后来实现的结果大体相符，其增长速度也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1311、

然而，在年底开展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斗争以后，原定设想已经大大地「落后」于形势。各部委不约而同地否定了北戴河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指标，开始重新设计二五计划方案，有的甚至就直接把三五计划改成了二五计划。如有关部委把 1962 年粮食指标从 4600 亿斤增加到 6400 亿斤；棉花指标从 4300 万担增加到 7000 万担；钢产量则增加到 1200 万吨。1956 年 1 月 14 日，国家计委将各部修改后的二五计划方案弃总报告中央。毛泽东召集三十四个部委汇报时，各部和计委都是按照修改后的指标汇报的。毛泽东对各部委修改后的方案比较满意，但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他主张到 1962 年把钢搞到 1500 万吨，「三五」期间再翻一番，搞到 3000 万吨。131 由于当时全国开展反保守主义斗争，计委 1 月方案仍然满足不了上下各方面的要求，控制数字继续提高。国家计委 4 月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1962 年钢产量达到 1400 万吨，煤达到 2.45 亿吨，发电量达到 550 亿度，化肥达到 600 万吨。4 月 18 至 24 日，李富春用了六天时间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

130 《李富春传》’ 页 474。

13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42—543；（李富春传），页 479—480。132 《李富春传》’ 页 480。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133 毛泽东没有再提出不同意见。到了 6 月，尽管周恩来等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由于各地区和各部门热情高涨，仍然要求增加投资和基建项目，致使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居高难下，甚至逐一再攀升。这使正在编制二五计划的国家计委十分为难，感到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方面「根本没有法子平衡」。~6 月 4 日，李富春给各部部长写信，信中指出：

从最近再一次摸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情况看来，原来计委向中央综合汇报中所列的各种基建、生产和事业指标，都已经很大、很高，而现在各部仍然在要求增加投资和基建事业项目，这是和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所能发掘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矛盾的。我们认为，不仅不能增加而且照原来向中央汇报的规模 and 速度，还需’ 减少。在今日以前，各部一直在考虑如何增加的问题，今日以后则要请各部注意研究如何减少的问题。如果各部不从这一方面做准备，则第二个五年计划就难于制定，也难于进行平衡。135

133 （毛泽东传〔1949—1976〕）’ 页 481。

13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页 543。

135 参见熊华源：〈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 页 88—89。

136 （李富春传），页 481—482~

6 月 1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李富春按照「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再次修订二五计划草案。国家计委准备调整和补充原计划方案，即将财政拨款改为 2900 亿元，建设项目要保证重点、削减次要、个别调整，以此作为二五计划的第一方案。6 月 16 日，李富春邀集国务院第二、四、六、七办公室和国家建委、煤炭部、石油部、电力部、地质部负责人讨论二五计划草案的编制。他指出’ 计委在综合平

衡中，深深感到第一方案仍有偏高偏大之处，准备拟制一个第二方案。这个方案的财政拨款准备定在 2500 至 2600 亿元左右，对基本建设规模和进度都准备作必要的压缩和推迟。136 但不久，国家计委函报

周恩来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指擦虽经削减，仍然偏高。137

尽管政治局和人大会议已经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在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状态下，有关部门却迟迟拿不出一个符合新方针的计割草案，整个计划编制工作陷入困境。八大召幽在即，向八大提交的两个文件〔关于二五计割建议和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起草工作也无法确定基调。时间只剩一个多月，国家计委心急如焚，周恩来也很着急。138

周恩来、陈云等人看到，要摘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二五计钊方案，不能在已有的冒进方案上修修补补，必须推倒重来，但这首先要打通各部委负实人的思想。从 7 月 3 日起，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的第二方案。对于二五计划最后方案的确定，这次是一个关键性、决策性的会议。

会议开始后，国家计委首先对二五计划制定的背景和困难作了说明：137(周恩来年谱〔1949—19760，上卷〕页 594，13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颜》’页 543。

自 1955 年 8 月开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铲草案，中间经通反对右倾保守的运动，因而虽然自今年年初起中央已经提出防止冒进、反对冒进，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盘子已经很大，很不易消灭。虽然计委今年 6 月提出的第一方案，’比各部方案威低很多，但是仍然偏高偏大，如财政收支 2900 亿元，为第一个五年预计的 2.1 倍，其中基建投资为第一个五年预计的 2.9 倍。中央多次指示，长期计划必须建立在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最近中央又具体指示国家计委，要按照 2600 亿元左右的数字来编制第二个方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用了十天时间，提出了一个第二方案轮麻初步试算草案。但由于各部思想上有距离，国家计委内部思想上也跟不上，因而在编制遯程中削减建设规

摸颇感不易。一具体到削'威哪个部门的措款或投资^削;成具体建设项目的时候,就削不下去了。我们请求中央对生产水平、财政框子、比例开系等几个主要问题,给予原则指示,以便使得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们思想认识一致起来,编制出一个各方面平衡衔接的方案。139

国家计委在说明中特别提到消灭建设规模遇到了各部委的阻力,显然是希望国务院领导人出面帮助解决问题。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赴苏)等人在会上的发言,确实起到了说服作用。

周恩来首先严肃地提出:制定新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他接着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

二方案确定粮食产量在1962年达到5500亿斤,也是「很不可靠的, I 有虚假的」,「是危险的」,就是定为5300亿斤「也值得考虑」。他说:这是因为,广业合作化后,虽然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我们还「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农业生产在二五计划期间也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粮食生产很难以每年67.以上的速度增长,「搞这个假设不好」。周恩来提出了他首先强调修改农业指标的理由:「赓业生产一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 and 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那样假设的农业指标一旦不能实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

139(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页49。

在财政收支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认为:「二五」期间要求财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7.的速度增长^以实现五年累计2600亿元的指擦,「实际上达不到」,结果会使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也保证不了」,因此这个指标「应该压下来」。周恩来主张压到2350亿元,每年递增12呢。为了实现财政平衡,周恩来要求大家注意三个问题,即生产收入和基建开支要平衡;基建投资要有个限度;预算收支不平衡就只有减少国防和基建指标。

在工业生产指标问题上,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指出:设想到1967年钢铁产量达到2700—3000万吨'「这是高的想法」。不能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

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德国都没有达到二千万吨钢，但国内甚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工业国〕。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也是要各种机器都能制造，技术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应该设想钢铁生产少一些，煤炭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等相应地「都可以少些」。

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五年财政总收支2350—2400亿元来安排，相应地减少主要工农业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¹⁴⁰

7月4日、5日两个晚上，毛泽东连续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二五计划的基本数字和方针问题。会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留下谈话，直到凌晨一点。¹⁴¹所谈内容不详，但看起来，毛泽东没有再坚持己见。

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经过充分的思想交流，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取得了一致认识。会后，周恩来亲自主持编制二五计划。他指示国家计委，应根据「一五」计划已有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即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和消费比例，妥善处理轻、重、轻、重的比例关系，提出

¹⁴⁰ 以上所述会议过程，参见国务院常务会议记录，1956年7月3日—4日—5日。转引自《周恩来传 11949—19761》’页276—277。另见《周恩来年谱 11949—19761》’上卷’页594—59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543；《陈云年谱 11905—19951》，中卷，页314。6月27日，已到莫斯科的李富春也致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建议降低第一方案的指标，放慢农业机械化的步骤，减少国防建设开支。参见《李富春传》，页487—488。

¹⁴¹ 《陈云年谱 11905—1995》’中卷’页314

稳妥的投资总额，以此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¹⁴² 整个7月间，周恩来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王光伟、陈先等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王光伟回禀说，在编制工作中，周恩来「总是辩证地考虑问题」，各项数字「都要经过反复平衡的」，对于重大项目从不自作主张，而是

「全面考虑，集中各方意见」，特别是专家的意见，反复平衡后才确定。周不仅过问每一个数字，而且经常在他的西花厅宿舍计算到深夜，「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工作约个把月」。1957年7月17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委托国家经委代国务院起草一个文件，其中强调：「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它条件。」7月下旬，国家计委编制出一个新方案。8月3至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计委新方案，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同时，讨论修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8月16日，周恩来前往北戴河毛泽东处商谈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8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建议。145对于周恩来而言，说服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接受新方案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要扭转毛泽东的思想，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就在周恩来绞尽脑汁考虑如何让二五计划的新方案和新方针得到毛泽东首肯的时候，李富春从莫斯科传来了苏联国家计委和专家的意见。

2 莫斯科的决定性意见

142 薛！；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书面发言，1979年3月15日。

143 王光伟：〈周总理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载《怀念周恩来》编辑小组编：

《怀念周恩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43、44。144（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页6。

14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607~609、610。

二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取决于苏联对华援助的规模，以及能否如期提供设计方案，供应物资和设备。中国的一五计划就是依靠苏联专家的协助制定的，一五计划的工业化建设也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展开的。144二五计划草案虽然是中国自主编制的，但依然离不开苏联的技术帮助和指导。特别是因为在二五计划的工业项目中，许多骨干工程是苏联设计和指导实施的，

这襄不仅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五计划期间开工而顺延至二五计划期间的，还有大量中国新增加的援助项目。因此，二五计划的最终形成，必须考虑苏联的态度和意见。

1956 年年初，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苏联和东欧八党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三人前往。周恩来为此专门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说，派遣「富春同志去，对商定我，3 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规模和速度有好处」。1 月 4 日，李富春一行出访苏联，征询对中国远景计划和二五计划的意见。同时带去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提出了一个请求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 188 项建设项目；二是请苏联帮助中国规划原子能工业远景计划以及建立原子能工业的问题。行前，周恩来两次致信李富春，指出这些都是作为「初步方案」向苏联和其它有关兄弟国家提出或者「试行提出」，「看他们如何反应」。他要求李富春「要从如何进行规划上谈出一个眉目」。1956 年 2 月 6 日，李富春回国后向周恩来报告了莫斯科之行的情况，没有提到苏联方面对二五计划的意见。¹⁴⁸

实际上，早在 1956 年 1 月，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已经对二五计划中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倾向性意见。如在核编综合财政计划时，专家伊里因〔Ириин〕指出，按照苏联的经验，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应由计委基本建设计划局审核，各项费用由财政金融局审核。他特别提出，财政金融局应该主动些，「要估计到如果基本建设规模及其它支出计划过大，以至于不胜任时，那不仅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认为，二五综合财政计划总的看来「存在着很大的财政差额」，应「严格地审核」。在莫斯科的苏联财政部局长杜齐诺夫（Дуцинов）讲得更为直接，他指出：财政计划规定利润收入 1417 亿元，是一五计划的三倍，「这个指标是偏高的了」。

「重工业部新企业投入生产的第一年利润率为老企业的 40%。第二年为 70%。这种计算是有很大的假设性，因而不能将其运用到五年计划中。」按照中国的计算方法，石油部二五计划「利润增加到八倍，而生产增加到五倍，这是不正确的」。此外，在财政计划中没有考虑作为国家后备部分的预留费用，在信贷计划中只靠居民存款增加国民经济的信贷基金而没有考虑预算资金等。¹⁴⁹

在莫斯科，苏联没有对二五计划草案提出总体性意见，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个计划的制定与苏联援助的新项目有直接关系，在项目谈判没有完成之前，很多具体指标无法确定，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帕乌金（? 叫&! !）在发言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二是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尚未完备。李富春回国后，3月29日国家计委办公厅下发了一个文件说，在华苏联专家组的书面意见认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初步方案，其中缺少很多指标，还有不少指标将有重大变化」，因此只能就「任务、方针的提法和文件的结构提出我们的意见」。

149 《中共党史 8 料》，2004 年第 1 期' 页 18—22。150 《中共党史资料》，2004 年第 1 期' 页 4^22。151 《人民日报》，1956 年 4 月 8 日。4 月 6 至 8 日'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率领政府代表团来华。这次访问主要是通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同时也商谈一些对华经济援助问题。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了两项协议：一是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 55 项新的工业企业协议，作为正在建设的 156 个项目的补充；二是辟于修建从兰州—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上的阿克斗站的铁路和从 1960 年起组织这条铁路联运的协议。151 这次接触仍然没有谈到中国二五计划的编制问题。5 月，国家计委派人赴苏，说明对年初

提出的 188 项委托苏方设计的建设项目的详细情况，以为双方正式会谈做准备。

6 月 18 日李富春出国前与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1. 义^：^〕谈话，继续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这时，苏联专家提出了对二五计划指示草案的初步意见。阿尔希波夫很委婉地指出：「五年计划的生产和建设规模很大，在这个条件下，工业、农业和基本建设所采取的增长速度也是很高的。因此，希望对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某些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这两个方面就是：寻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部分发展中的较正确的比例关系；使计划在设备、原料资源和物力、财力方面有更可靠的保证。」总的讲，「五年计划各年的投资额分配得不够平衡」，经过初步计算，苏联专家认为 1958 年和 1959 年的投资要达到规定的增长速度，「在水泥和钢材方面恐怕没有保证，所以更有必要削减」。「其

它几项指标的增长也不平衡」。阿尔希波夫还详细列举对各项指标的
意见，其中特别指出，希望各种经济作物的增长指标要从「现实性」
出发；编制财政计划时「希望将收入规定得高于支出」；「希望再检查
一下，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拟进行建设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
化学工业和其它部门的重大项目在原料资源、首先是地质储量方面是
否有保证」等等。153

人大会议确定了经济发展的新方针后，6月19日，李富春率中国政
府经济代表团再次访苏，继续就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
政府的意见，同时与苏联就中国二五计划期间的援建项目进行谈判。
会谈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由分组会谈，交换意见，然后由苏联方面
综合对二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初步意见，并对请求的援助项目作出初
步答复。

152 《周恩来年谱 11949 — 19761》' 上卷' 页 576。153 《中共党史资
料》，2004 年第 1 期' 页 9 一：、

李富春带去的是二五计划轮廓草案的第一方案，在交换意见时，李富
春解释说，这个方案只是轮廓草案，还要再作修改，并提交中共八大
会议审查，作为党的建议通过。李富春诚恳地说明这次来是征求「我
们的老师」意见的，希望苏方帮助把二五计划编制好。苏方在第一阶
段综合小组会谈中认为，这个轮廓草案是积极的，但是过于紧张，计
割的根据不够充分，在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例太高（占

26¹，成本降低也太多，财政收入不可靠，物资平衡上缺口多，某些
技术经济指标定得太紧，实现计划的物资保证也不够充分。李富春带
去的中国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中，原定在二五计划期间委托苏联
设计项目是 236 项。经过各专业小组的谈判和协商，确定为 217 项。
会谈时，苏联方面各部的态度一般都是积极的，他们表示，可以承担
设计并供应设备的项目约占项目总数的八成，其余二成的项目，有些
苏方可能转请东欧各国给以援助，有些要由中方承兼总交货人，而
由苏方给以技术援助，有些则建议由中方重楼利用自己的设计。

8 月 17 日，李富春同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8 化）和第一
副主席帕乌金会谈。帕乌金转达了苏联方面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
意见。帕乌金表示，对这个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

和基本道路没有意见，但是感到这个计划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二五」时期积累率由「一五」时期的 22.7% 提高到 26%，同时还要使居民收入增加三分之一表示怀疑；认为农业计划要超额完成是困难的，特别在农产品的收获量方面；物资平衡方面有也很大差额，有些重要物资的平衡有赤字；基本建设投资比「一五」时期增加近两倍，这样的增长比例太大了。帕乌金建议减少基本建设的投资，并且首先从降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投资着手，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巴伊巴科夫主要谈了对中国请求苏联援助的答复，既表示要诚心诚意地援助中国，也解释了苏联在这方面存在的一定困难。李富春表示，苏方的意见有不少是有道理的，所提出的问题与中国党前一阶段已经发现的问题是一致或相近的。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这些问题此前中国党已经在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中国党也有所裨益。尤其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教训提醒要注

意工业问题，更有启示作用。李富春表态说，除个别问题外，99.7% 都同意巴伊巴科夫和帕乌金的意见。154

对于中国二五计划的宏大目标，苏联最高领导层也进行过讨论。俄国解密档案显示，8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赫鲁晓夫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和苏联对中国的援建项目问题。根据会议记录，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计划是不现实的，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等人指出，中国提出的增长「速度过快了」，「中国人的出发点是过快的、不现实的工业化速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结论也过高了」。至于说到对中国的援助，许多人感到苏联的负担过重。马林科夫认为，苏联对于中国二五计划所承担的义务过多，应该进行修改，并向中国人解释清楚。赫鲁晓夫也说：「我们答应这些要求之后会出现甚么样情形，应该仔细计算清楚。过重的负担会给我们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失。」会议批准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委托巴伊巴科夫将这封信连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中国二五计划指示草案的意见，一并交给李富春。信中指出，在这份文件中阐述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而苏联方面的技术援助，尤其是在提供设备方面，多数项目要

从 1961 年开始供应，有的可以从 1960 年开始供应。155 看来，毛泽东设想的高速度发展计划，不仅国务院主管人员和部门无法接受，而且已经超出了苏联提供援助的能力。

中共中央已定于 8 月下旬召开七届七中全会，二五计划和报告急待定稿，迫切需要了解苏联的意见和莫斯科商谈的结果。8 月 10 日，周恩来致电李富春，要求张玺提前回国。18 日再电，要求李富春一行月底赶回，参加八大预备会议。22 日，从莫斯科返回的张玺向周恩来汇报了中国政府经济代表画同苏联政府谈判的情况。9 月 3 日李富

春回国，并带回了 9 月 1 日苏共中央正式给中共中央的覆信。李富春后来报告说：这次谈判，我们提出的项目，苏共中央作了认真审查，尽最大努力也只能满足我们半数的要求。因为我们要他们援助的项目很多，占其国内生产的比例很大，原材料的供应能力不够，有些设备，苏联自己也满足不了国内需要。李富春颇为感慨地承认：通过这次谈判感到，我们原来提的计划和方案冒了。158

莫斯科的意见是有份量的，苏联毕竟是老师，有长期的计划工作经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学苏联的，前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在苏联协助下编制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确知不可能从苏联那里得到期望得到的援助规模，二五计划就只能作相应的压缩。薄一波回忆说：「苏联的答复，对周总理主持修改的『二五』计划草案被中央采纳起了有利的作用。」159 另一方面，苏联的答复，还使中国不能不减少对苏联援助的依赖。李富春在后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要特别注意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能完全依赖外国。要加强我国的新产品设计工作，充分利用原有的落后设备，先搞起来，逐步提高。在技术方面，要重点突破。」1(50

15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44—545；《李富春 X》，页 488。158 1956 年 10 月 11 日，李富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辟于苏联援助我国第二（！五年计划建设项目谈判情况的报告」。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页 95。

15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45。

16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 页 95。

9月9日，周恩来经同张玺、薛暮桥等多次修改，形成《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 I 草案修正稿》。国务院最后敲定并提交中共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规定，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4800万担。这比1955年8月的最初设想略高，而比1956年初国家计委负总上报的方案大为缩减。其中粮食指标减少1400亿斤，棉花指标减少2200万担。薄一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扎实。按照1957年粮食实际产量3820亿斤，棉花3000万担计算，二五计划期内年均增产粮食200多亿斤，年均增产棉花360万担，在正常年景下是有可能实现的。如果按年初提出的指标，二五计

划期内粮食年均增长要达到500多亿斤，棉花年均增长要达到800万担，「这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化

经过如此的反复和周折，国务院提交的二五计划方案，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9月13日9时半，毛泽东对周恩来送交的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报告批示：「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11时又批示：「你的报告全文很好。」还特意在报告上加了一句：「对苏联和各国专家对我国帮助的功绩提一二句为好。」162至此，《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最后形成。163

不过，周恩来对「多、快、好、省」口号的删除却引起了毛泽东的内心不满。在最初的报告修改稿中，周恩来保留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只是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后面加了「又安全」三个字。如前所述，「多、快、好、省」口号的提出，本来意在强调「好」和「省」，以制约「多」和「快」。但实际执行的结果表明，这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助长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在起草和修改二五计划建议和关于建议的报告时，如何对待这个口号是周恩来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经过再三斟酌，周恩来等人还是在建议报告稿的重要位置，删掉了「以多、快、好、省、又安全的精神……」一语。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但事实上「此事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后来，批判反冒进时，此事曾一再被提起」。1”无论如何，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多、

快、好、省」的方针虽偶尔被提到，165 但已经不再响亮了。

16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愿》’页 546。

16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0，上卷，页 6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199。163 报告全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翻》^第九册（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19941’页 167—221。16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47。

165 如 10 月国家经委〈关于 1957 年度计划控制数字意见的报告〉说：1956 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是在中央提出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下进行的。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页 103。

3 压缩 1957 年的计划指标

周恩来等人辟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得到确认，并写进了八大决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急躁冒进的情绪在党内已经完全得到解决，问题主要反映在编制 1957 年年度计划中，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不得不继续反冒进，重点是压缩 1957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

1957 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 1956 年 7 月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擦弃总起来，高建 243 亿元，比 1956 年的 140 亿元还多 103 亿元。经委主任薄一波认为，1956 年的计划已经冒了，1957 年再冒这么多，当然不行。但怎么恢缩，经委一开始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恢到 150 亿元就可以了；一种意见认为 150 亿元太高了，主张压到 100 亿元。薄一波提出了折中方案，拍板定为 125 亿元。由于意见分歧较大，又相持不下，只好报周恩来和陈云。164

面对这种情况，细恩来认为，急躁冒进情绪还未平息，逢得继续反冒进。周恩来对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我准备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为了寻找根据，周要范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一段话的出处。周恩来认为发展速度应该再放慢一点，下决心要把基建投资压到大大低于 1956 年投资额的程度。167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9 日，周恩来连续召开十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磋商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国家经委在〈关于 1957 年度计划控制数字意见的报告〉中说：「1956 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趋于全面高涨的一年。1956 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是在中央提出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

16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54—555。搏引自熊华源：〈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页 11。

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下进行的。1956 年的生产、基本建设和文化事业都取得很大的成就，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不够，对预算控制不严，摊子铺得太多，物力、财力分散过多，人员增加过多，人民生活福利方面的开支也多了些，以致在国民经济中发生了若干严重不平衡现象，经济生活出现了十分紧张的局面。为了保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并为第二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把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适当地加以解决，适当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建设。168

10 月 24 日，针对还有人急躁冒进的危害性估计不足的情况，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三大高潮一来，头脑热了，前进得快了。经济建设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在 11 月 9 日的总结中，周恩来更是援引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来强调反冒进的重要性。他说：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来，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少问题。苏联发展重工业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忽视人民生活，农业发展缓慢，经过三十九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这种状况苏联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

时间的。而且，这个建设方针影响了东欧国家。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发生的群众闹事事件，反映了执行这个方针的严重后果。因此，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值得怀疑之处。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周恩来尖锐地说：「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周还说，我们国家大，很落后，人口多，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

16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页 103。现在的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周恩来最后指出：从 2 月份到现在，国务院的会议每次都在下马，总是下不好，生产速度、产品质量都受了影响。表面看来，收入和支出是平衡的，但实际上有 20 至 30 亿元的赤字。总之，今年是冒了，明年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退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169

陈云的想法与周恩来完全一致。10 月 23 日，陈云发言，他指出，我国的建设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前三年的建设基本上按计划进行，今年规模大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11 月 9 日的会议上，陈云提出，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或许是担心引起误解，周恩来连忙解释说：这裹不是「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上，「左」了就盲动，右了就投降。^

16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 629—6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55—55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页 103。

170(陈雾年谱 11905—19950' 中卷' 页 337—338；薄一波：《若干重大

决策与事件

的回顾》，页 555—556。171X 中华人民共和国 8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 页 95。172 (陈雾年谱 [1905—19950’ 中卷，页 338。

会议期间，批准了国家经委〈关于 1957 年农业生产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说，由于 1956 年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它种种原因，全国粮食生产只能完成 987。。根据 1956 年预计，对 1957 年广业生产初步安排是：粮食总产量计划达到 4000 亿斤左右，增加 7.27。；大豆计划总产量达到 200 亿斤，增长 17.67。。棉花总产量计划达到 3620 万担，增加 400 多万担。171 经过努力，国务院常务会议将 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指标由各省市各部门囊总的 243 亿元应缩为 111 亿元，比 1956 年的实际完成数通灭少了 20 呢。172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幕。薄一波后来说，毛泽东把这次全会看成是反冒进的「集中表现」。173 从现在已经公布的材料可以看出，以周恩来为首主张稳妥可靠发展方针的中共领导人所开展的反冒进、的确就集中表现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对此颇有不满，尽管他没有立即发难。

开会的第二天，周恩来作了〈关于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重点提出了 1957 年应当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结合波匈事件的教训，周恩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谈到经济建设的方针，周恩来强调，要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觉得八大的决议上写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时间可能要长一点」。说到发展速度，「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以钢铁为例，「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 2000 万到 2500 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定到 3000 万吨」。周恩来特别指出：「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他还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只是一个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针对许多人存在的顾虑，周恩来鼓励大家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思想从原先已定下过的框框里「解脱」

出来。他说：「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¹⁷⁴ 在分组讨论中，除对某些具体指标安排有意见外，大家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¹⁷⁵

虽然表示同意「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也没有反对把计划指标减下来，但毛泽东内心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从他在会议上的发

¹⁷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56。¹⁷⁴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页 229—237。¹⁷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58。

言和插话就可以感觉出来。在 11 月 15 日的讲话中，针对周恩来等人反复讲的保持计划平衡，毛泽东继续坚持他对计划经济的一贯看法，「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他警告说：「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还特意提到「有些人曾经在广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搞了一个「促退委员会」。针对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毛泽东说，1956 年国家预算报告就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¹⁷⁶ 刘少奇在报告中还引用了前一天周恩来和陈云关于左倾、右倾的谈话，说到究竟是「左」倾一点好，还是右倾一点好？毛泽东立即敏感地插话说：看是甚么右。刘少奇回答：是快慢的右。毛泽东说：这种右可以。¹⁷⁷ 看来，毛泽东对于会议不再提反右倾保守是十分在意的。毛泽东还在 11 月 13 日的小组会议做过发言，共提出七条措施，除了在讲到压缩问题时提醒「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外，没有对「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提出反对意见。后来毛泽东对此解释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七条只是个妥协方案，是筑一条堤坝，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¹⁷⁸

1956 年中共高层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分歧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现象，这一过程反映了几个问题：第一，中共执掌政权初期，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的，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各种层面反映出来，即使是与毛泽东本人的不同意见，而不像后来那样，只是毛泽东的一言

堂，大家有话不敢讲。第二，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中共高层领导多数还保留着，尊重客观、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而不像后来那样，一味地追求革命，浮夸、虚假之风盛行，唯我独尊，目空一切。第三，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周恩来及

17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页 313—316。177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页 556。

17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页 159—161；《周恩来年谱 11949 — 1976》》，上卷，页 294。

其它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对于经济建设方针的不同主张，就其所追求的目标而言，都是为了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发展速度快慢的方法不同。周恩来等人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努力建立起计划经济的体制，维谟和保障国民经济在稳定、平衡的轨道上运行。毛泽东的主张则本质上是反计划经济体制的，是要打破平衡和四平八稳的状态，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和威力，推动经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忽视或无视市场经济的，而毛泽东这种后来又不断重复的做法，一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阻止了中国完整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当然，毛泽东在 1956 年没有公开反对周恩来等人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并不是认为他们的做法更适合计划经济的体制，而是因为在那個多事之秋，迺有很多事情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比如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另一个问题——重建社会主义的民主。的确，毛泽东在推动起工业化的高潮之后，又开始考虑如何在中国扩大民主的问题了。第四章 扩大民主：「双百」方针和两个「万岁」

同前几年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相比，1956 年的中国政治处于一种宽松的气氛之中。继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毛泽东提出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提出中共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又谓「两个万岁」¹）的方针。前者动员知识界解除顾虑，加入到学术争鸣中来；后者鼓动民主党派参与政治，并允许媒体报道批评言论和争鸣文章。中国的政治生活一时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主和自由气氛。

在中国史学界，以「双百」方针为课题的研究者为数不少，不但对事情的过程描述清楚，也有一些很深刻的见解。’关于中共同民主党派的关系，特别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专门研究，

¹ 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摄凰城：〈对有关 50 年代中期「双百方针」某些问题的历史反思〉1《当代中 8 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夏杏珍：〈「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中共党史 X 料》，总第 58 辑；王也扬的〈毛泽东关于「双百」的思想及其变化〉，《中共；II 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睐清泉：〈陆定一推行「双百」方针始末〉，《炎黄春秋》，2000 年第 9 期。最有份量的专著应属黎之：《文坛风 8 录》（郎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和于风政：《改进：1949—1957 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却很少见到。：本章的关注点在于，继 1956 年初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以后，中共拟进一步动员整个社会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尤其是受到苏共二十大揭发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影响，毛泽东试图在中国扩大民主和自由的基础，创造一种新式的政治生活，一种显得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形象。为此，中共高层大力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个方针，并试图将新方针贯彻到社会基层。但是，问题紧接着便出现了：第一，扩大民主

的新方针在党内遇到很大阻力，且很难在基层贯彻实施；第二，时隔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放弃了这些有助于推动政治改革的举措，又回到了阶级斗争的老路。这是为甚么？或者，这些方针政策本身有甚么先天不足？

一「双百」方针的由来和知识界的反应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作为中国的成语，在民间流传已久，而中共执政后借来说明和概括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则是 1956 年的事情。至于这两句口号的由来，已有研究者做过详细考察：1951 年 4 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 年 8 月中共中央责成宣传部组织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研究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因两位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之间意见分歧，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陈伯达向委员会传达了 this 精神。同年 10 月，在中国科学院讨论出版《历史研究》杂志时，陈伯达又说过：「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在此前后，中宣部曾约请史学家酋伯赞、邵循正、胡华合作撰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请示毛泽东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毛泽东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1955 年 9 月或 10 月，中宣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又回答说：「百家争鸣」。3

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

由于有上述背景，不少人认为「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在 50 年代初就已皿为中文化事业的方针了，至少也是在那个，酝酿的。这种理解很难让人接受：首先，这两个口号^^别针对戏曲研究和历史研究这样两个具体领域提出的，并非就整个科学文化工作而言；其次，这

两个口号当时并没有作为全面的工作方针在党内或社会上公开宣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建国初期中共需要的是「舆论一律」，是用马荒&主义整合意识形态。无论如何，人们也很难把日紧一日的思想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联接在一起。

然而到 1956 年初，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已经过去。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在相当大程度上摧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体系。此刻，在中共看来，知识分子应该说已经大体改造好了，对此毛泽东充满自信。同时，在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中、必须让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作用。在道种前提下，对知识界提出一个新的方针，给他们以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宽松和自由感，就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了。

3 文严：〈「双百」方针提出和贯彻的历史考察〉，《党的文默》，1990 年第 3 期’ 页 23-24；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共 II；史出版社，19991~页 4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1949 — 1976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页 486—487。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明衬，陈伯达的儿子在整理其父遗稿时，迩发现了一些重要史料，可以证明陈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莩献。参见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慷》（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页 123—124^126 — 128。

在「双百方针」，提出的过程中，陆定一起了重要作用。1956 年初知识分子会议改善了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却仍然难以使

知讚界完全放下精神负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畚议基本没有触及学术自由的问题。只有陆定一在会上的发言谈到，应当区别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不能放过」，学术问题则可以任其争鸣，无碍大局。4 然而，陆定一提出的问题没有在会上讨论。知识分子会议以后，在一次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陆定一又以酱学和生物学为例，谈到了要给学术、鸥术和技术研究以自由的想法。；陆定一明白，要想真正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必须营造一种学术上自由讨论的环境。陆定一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有一个背景，就是他对苏联科学文化界盛行贴「政治擦签」的做法早有反感，并认为现在这

种风气已经传到了中国，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形成了直接的障碍。⁶

2月，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讨论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时，陆定一谈到苏联在领导科学文化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陆定一主要讲了三件事，一是在遗传学领域，褒米丘林学派是社会主义学派、唯物主义学派，贬库尔根学派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学派，不允许其在苏联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能这样做。二是在医学界有人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臀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照这样的认识，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用巴甫洛夫的医来包治百病。三是郭沫若与范文澜两位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有不阅看法。我们认为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去决定。陆定一认为，各门学科，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可以有学派的。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另一个学派。这必然会窒息生机，使学术界死气沉沉。实际上，这次会议已经决定了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⁷当然，中共对科学文化工作实行何种方针，归根结底要看毛泽东的态度。这时，毛泽东是支持陆定一的主张的。1956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2月19日，毛泽东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等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甚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圆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⁸在这封信裏，毛泽东表现出一种大度。

⁷《陆定一文集》编辑组编：《陆定一文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841—8&。⁸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40。

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愿》（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1991》，1484。

对毛泽东来说，提倡「双百」方针还有一个直接的针对性，就是打破苏联迷信。建国之初，因为自己没有经验，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拄着苏联的拐杖走路，在文化上也形成了「全盘苏化」的氛围。这使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特别不满意人们对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和依赖思想。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的「盖子」，为毛泽东超越苏联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1956年3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斯大林问题。毛泽东强调说：「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⁹ 毛泽东所谓外国迷信，当然首先是指对苏联的迷信。他要求「中宣部专门研究

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评「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

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¹¹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完整方针的提出，是在4月25至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毛泽东在会上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在27、28日的两天会议上，科学、文化问题成为议论的焦点。27日，陆定一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等人都有插话。陆定一发言的中心观点是：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艺术和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对于后者要给予自由。他从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讲起：「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接着，陆定一举了几个苏联在科学界贴政治擦签的事例。如在生物学方面说摩尔根、门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在物理学方面，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在逻辑学方面，说形式逻辑是反对辩证法的，因

而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插话：反了几十年，不要形式逻辑，后头学校里又都教那个资产阶级了。）后来又谈数理逻辑是资产阶级的。陆强调指出，「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陆定一还谈到了苏联这种做法对中国的影响。如有人提出「巴浦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还有人说反对米丘林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是反革命。最后，陆定一把话题转到文艺方面。他说：「文艺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日丹诺夫有几条，马林科夫有几条，这个有几条，那个有几条，很多很多」。联繁到中国，陆提出：不要搞甚么反对公式主义这样的事，不要搞反对，而是引导他，让他学习，光反对不行。公式主义、自然主义，这都是艺术性质的问题。还说：「为甚么只能去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作品有甚么关系？」陆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兴趣，他也举出电影《乌鸦与麻雀》为例说，「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看」。还主张大家都去看昆剧《十五贯》。12 第二天〔28 日），文化、科学问题仍然成为会议的焦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完整的方针，正是陈伯达在这次会上首先概括提出，并被毛泽东接受的。陈伯达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中央组织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 this 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最后，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他说：「『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13

12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0949—19561》' 页 1123—1126。

13 搏引自《毛泽东传 11949 — 19761》' 页 490—491。^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首次向党外人士公开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说：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

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言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14

2 陆定一谈「自由」及其限度

毛泽东的讲话燃起了知识界的热望，然而从毛的讲话中，仍然无法了解这个方针的具体内容是甚么？它的界限是甚么？如何去贯彻执行？知识界都切盼中共中央能够作出更具体的说明。这时，二百多位科学家正在北京起草科学规划，李富春提议向他们讲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刘少奇指定陆定一去讲。5月26日，陆定一应郭沫若之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长篇报告。听报告的不只是自然科学家，还有社会科学界、医学界、文学艺术界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达两千多人。陆定一的报告引起热烈反响，报告会后收到来信七十二封，「有的是个人写的，有的是集体写

14 韩引自《毛泽东传 1949—1976》’ 页 491—492。

的，有的对讲稿提出了意见，有的发表了自己的感想」。这篇讲话，以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依据，事先两次经中宣部集体讨论 1 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作了修改，事后送毛泽东审阅修改，并批准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虽然陆定一开篇就申明，讲话「是个人对这个政策的认识」，但从文稿形成的过程看，这个讲话显然代表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意见，是对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权威阐述。15

陆定一的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提出「双百」方针，目的是繁荣文化和科学，「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报告引起与会者共鸣的，大概就是其中强调「独立思考」和「批评自由」的那些话。报告说：「我国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成了我国过去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陆定一把「双百」方针归结为一系列「自由」：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办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 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两者之间的辩驳 1 也是自由的。

15(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6月7日，陆定一将报告稿报送毛泽东审 50，同时附上郭沫若、茅盾、何其芳，袁水拍、胡稼胎等给陆定一的五封来信。毛对报告稿作了「一点修改」。6月8日批示：「此件很好’ 可以发表。」6月13日陆的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 页 120—121。以下所引 1 陆定一讲话内容’ 均见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不再注明出处’ ……中共中央曾经指示，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

想……批评和讨论应奋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抹取简单、

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屡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纪良从多数的原则。

如此强调「自由」，在中共官方的话语中，过去是没有过的，这让人感到鼓舞。不过，报告关于「自由」的立论，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在甚么范围内的自由？二是给甚么人的自由？三是在甚么背景下的自由？首先，报告所倡导的自由，指在文艺和学术问题范围内的自由讨论。陆定一认为，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之间是可以划出一条界线来的。他指出，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在某一种医学、生物学或其它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甚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是错误的。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要求「为工农兵服务」，至于创作方法、题材、艺术特征、典型创造等问题，应该自由讨论，容许各种不同的见解。「关于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只会把文艺工作室息」。陆定一还批评说，一些党员想把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垄断起来，这「非常危险」。如此下去，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会「死气沉沉，停滞不前」。然而，陆定一并不否定文艺和科学的阶级属性或阶级功用。他认为，「在阶级社会裏，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阶级斗争也是比较明显的」，即使自然科学领域也有「阶级斗争的反映」。以为文艺和科学同政治无关，是一种右的片面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反之，把文艺和科学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就会犯「左」的简单化的错误。陆的立论还隐含一个前提：政治问题是不能「争鸣」的，因为

「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直接的表现形式」。16

第二，报告提出了实行「双百」方针的政治界线。陆定一说：「我们是主张不许反革命分子有自由的，我们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实行专政。但是在人民内部，我们主张一定要有民主自由。这是一条政治界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是人民内部的自由。我们主张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这种自由。」报告提出，批评也有两种：「一种是对敌人的批评，所谓『一棍子打死』的批评，或打击式的批评」；「另外一种是对好人的批评，这是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评。这种批评，必需顾全大局，采取多说道理，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敌人专政，给人民自由’这就是中共为「双百」方针预设的「一条政治界线」。仔细想想，这条界线看似清楚，其实很含糊——谁是敌人，谁是反革命，如何确定？

第三，报告说明，「双百」方针是在一种特定条件下提出来的。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被消灭，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三是我们的敌人特别是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四是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陆说，「正是估计到这样的情况」，中共中央现在着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裹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双百」方针的提出，并不是基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是基于执政党的形势估计：社会和阶级的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人们「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特别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换言之，中国知识界已经臣服于新的权威。二是「双百」方针的提出，也不是因为决策者意识到过去几年的批判运动有过火行为。相反，陆的报告认为，批判胡适、胡风；批判梁漱溟；批判文艺界中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等，这些斗争「是必要的」、「是正确的」。陆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苏联教条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指向科学界、文化界内部的「宗派主义」和「门户之见」，并未检讨中共的意识形态政策和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唯一含有检讨性的一段话是关于俞平伯批判的：「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

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这段话肯定批评本身「是必要的」，只是说有些文章「过分激烈了」。即使这样，仍有人听了不舒服，主张把它删去。只是因为这段话在知识界反响很好才得以保留。

3 知识界的最初反映

5至7月间，中共发动了对「双百」方针的讨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刊物、画书出版等领域'的部分知识分子参加了讨论。5月18日，九三学社率先召开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三十多位科学家。5月25、28日，《光明日报》接连两次发表了首都部分科学家，大学教授对该报记者的谈话，并发表社论，要求各民主党派为推动百家争鸣创造条件，消除「顾虑」，「克服各种消极因素，形成学术界的自由讨论的空气」。在中共的引导下，民主党派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民盟、民革的中央和地方组织，各大学和科研单位，也都纷纷召开座谈会。民主党派中许多人表示，愿意为学术争鸣「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起一些推动作用」。6月11至13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六百多位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按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等十几个学科分组举行座谈会。中国作家协会也连日召开会议，研究在文学领域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6至7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双百」方针也是一个热门话题。郭沫若的发言〈科学规划和百家争鸣〉、沈雁冰的发言〈文学艺术工作中的关键性问题〉和罗隆基的发言〈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集中谈到如何贯彻「双百」方针。7月2至5日'全国三"!"一个哲学、社会科学

171956年6月7日，陆定一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关于俞平伯的一段，袁水拍、何其芳提了意见，有的同志主张将道段删去。但因为痘一段的影响是好的，所以仍旧保留。」参见（建8以来毛9来文稿），第六册，页120[^]

学术刊物的编辑负责人会众北京，讨论在学术刊物中如何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高教部也召开了一系列讨论「双百」方针的会议，包括7月2日邀集部分来自高等学校的人大代表举行座谈会。《光明日

报》、

《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对上述活动进行了大量报道和宣传。18 知识界普遍地为「双百」方针叫好。毕竟，「双百」方针的提出为知识界展示了一种自由空间的前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长之撰文说：听了陆定一的讲话，「欢欣鼓舞，喜而不寐！」19 许多旧知识分子甚至把它看作「福音」，美学家朱光潜后来这样说：

在「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的文聿，没有读一部象样的美学书藉，或者是就美学衮的某个问题 & 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了，我就松了一大口气。不但是我一个人如此，凡是我所认识的有唯心主义烙印的旧知识分子一见面鼓到这个「福音」，没有一个不喜形于色的。20

受到毛泽东引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故事的鼓舞，许多人对新方针寄望甚高，希望通过百家争鸣创造出比春秋战国时代更加丰富、灿烂的文化成果。很多人希望它是一项长期的政策，而不是一场运动，「不要『一阵风』，吹过去了就没了」。21

对于中共发出的「学习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长处」的号召，科学界表示了更大的兴趣。怎样对待学习苏联和学习英美等国家的科学的问题，成为许多场合讨论的一个话题。建国以后，政治、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学术上也是「一边倒」。苏联学说一切都好，英美

18 参见《光明日报》，1956年5月25日、28日、6月14日；《人民日报》，1956年

6月19日、29日、7月2日、9日、12日-17日、28日。19《人民日报》，1956年7月5日。20《文筹报》，1957年第1号。21《光明日报》，1956年7月10日。

学说都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反动的」，这对旧知识分子

精神上造成很大压抑。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无疑为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学者和学派争得了一席之地，尽管大家都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否定学习苏联之嫌。在九三学社召集的科学家和教授座谈会上，北大教务长周培源说：「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绝对不是怀疑我们过去向苏联学习的成就。」北大教授黄子卿、南京大学教授陈开甲批评说，有些人把国家制度上的对立，哲学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运用到自然科学上来，一谈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就说不行，甚至不愿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发展的现状，这是非常错误的。²² 许多人对学术上的宗派主义表示了不满，甚至愤懑。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林传光说：前几年在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理论方面就存在问题。比如在生物学方面，有的人不同意李森科的论点却不敢提出，怕「犯政治错误」。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说：以往在科学技术方面，不是「百家争鸣」，而是根本没有「鸣」过。「你是学苏联的，我是学英美的，不便争论」。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洗更加愤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不好的。²³

私下里表达的不满就更加强烈了。沈钧儒6月视察天津时，那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向他反映了不少意见：过去学校领导执行政策片面，「一切都是苏联好」，其它国家都不行，而留美学生则罪该万死，会说英文的就是崇美，帽子扣得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介绍英文书籍？因此“大家只好客客气气，刻刻板板，八股最好，没有毛病，脱离了各种公式，就说你思想有问题。这就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以致一本书一篇文章也出不来了。²⁴

那时知识界的状况恰如文学家秦牧所言：谨小慎微、人云亦云，没有「争鸣」的空气；缺乏独立思考，引经据典，附和权威；遇事看「气候」，看大多数，看北京，等「定论」；心口不一，公开场合一种意见，私下里一征意见；说话「留半句」，「让三分」，「吞吞吐吐」，「四平八稳」，「模棱两可」；不讲原则，「唯唯诺诺、眼开眼闭、看风使舵」，如此等等。²⁵ 还有不少人对于行政干预、压制学术自由的种种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光明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有些人「往往把学术问题的争辩认为是简单的是非问题，甚至把学术上的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不但不支持讨论，反而妄加指摘或者给别人扣帽子，个别负

有行政职务的人，甚至滥用行政命令来解决学术问题，粗暴地加以干涉。还有一些人受资产阶级的权威思想的影响，习惯于使所有的意见定于一律」。26《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说：刊物、出版社、图书馆本来是传播和保留各家的「鸣」声的，但几年来，文化界不知怎么有了一条清规戒律，有人一被批评，刊物就不愿发他的稿子，出版社就不愿出他的著作，书店就不愿卖他的书。有的图书馆干脆抽去登记卡，列入禁书。于是，「被批评者沉默不语了，别人也不再理他了」。文聿说：「如果这种风气继续下去，『百家争鸣』的前途是略可想见的。」27 另一篇署名文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能不能贯彻，在相当的程度上要看文艺和学术的领导人有没有大的度量。」28

24 《内部参考》，1956年6月23日'页592—595。

25 《文艺报》，1956年第18号。

26 《光明日报》，1956年5月28日。

27 《人民日报》，1956年7月5日。

28 《人民日报》，1956年7月2日。

不过，在说到形成这些「不良风气」的原因时，多数人是有顾虑的。他们谨慎地回避了对中共政策的总体评价，只是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政策执行者，或者强调学术界对党的政策的误解。如李长之举历史学中

相纤出版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和尚钺的《中国历史网要》为例，说中共中央并没有限制争鸣。之所以缉「鸣」得不响，参加「鸣」的人不多，是因为有些人「不肯或不能或不习惯于独立思考」，「迷信权威」。「看风向和盲从的人既多，就给某些人以限制『争鸣』的感觉」。再就是兼任行政工作或编辑工作的个别人「闹省事」，「怕争起来不好收拾」。^顿然，这是在为中共的政策开脱，而把责任归

咎于学术界本身。只有少地、间接地1^11]了#^员治,的影响。朱洗说：「过去几年来，中国学术上缺乏争论的风气。思想改造以前还稍好些，思想改造以后争论就更少了。」1^为甚么不敢说，主要的是怕说得不对，会挨上『这是甚么思想』的批评。^政治学家赵资煦说：

「过分追求统一，强求一致的思想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造

成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思考的重要原因。31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施蛰存指出，不适当地打击知识分子的自尊心，造成了部分知识分子变成了「自卑自

小」、「唯唯诺诺」的人，或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

在所有参与讨论的知识分子中，罗隆基是少数大胆指出问题实质的人之一，他明确表达了一个看法：正是政治运动增加了知识界的「戒慎恐惧」，尽管他也强调，这只是「偶尔发生」的「某些偏差」。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时，罗从党与非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问题，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下面两段话：

29 (人民日报)，1956年7月5日。

30 (光明日报)，1956年5月28日。

31 《文艺婵》，1956年第15号’

32 (文8报)，1956年11月23日。

几年来，三反、五反、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毫无疑问，基本上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但通去运动中偶尔发生了某些偏差亦增加了一部分旧知识分子的戒慎恐惧。甚至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对党的政策认识不清，体会不[^]，竟把党贝个人的偏差，当成党的政策，他于是颠虑种种，忧闷重重，对人、对事’少说话，不说话，怕说话申一方面既然是「三缄其口」’他方面就敬而远之’[^] 遂又不可避免地保存了隔膜……

中国现有的十万个高级知识分子，极大部分是旧社会中长成的知识分子，他学术上的造诣愈高，他的旧知识的根底就愈深……他们有政治上的顾虑，怕戴帽子，怕犯政治!#[^]怕受批评打击。他们有业务上的顾虑，旧知识不合时宜；新理论没有头绪。脑中空虚：心袞彷徨。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更是不健康的。但事贵毕竟是事实。13

对于「双百」方针心存疑卢的也大有人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指出：对中共提出的这个新方针，其实是「有争论，有怀疑，有顾虑」的。所谓顾虑，「主要是有人很害怕自己犯错误，特别是怕犯唯心主义的错误，怕变成政治问题」。所谓争论，是有人担心：如果「乱鸣」怎么办？如果唯心论大肆宣传怎么办？所谓怀疑，是有人提出：这是不是一个策略，让唯心论者自由宣传一下，好「整」他们？34

说到底，真正让一些人心存余悸的，是担心百家争鸣只是一个整人的「策略」。中共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为征求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意见，曾访问过九位教授，也在一些高校召开了座谈会。教授们对学术上的「一边倒」普遍有意见，但对展开自由讨论也有很大顾虑，「主要是肃反以后学校内民主空气不浓，教师们不敢多讲话，害怕会因学术问题牵涉到政治问题。有些人怕现在要他们随便讲，以后又要整他们」。”显然，人们还不敢相信中共的诚意，有这种顾虑的不在少数。所以，在欢迎之余，知识界都希望为争鸣划出明确的界线。

4 如何开展「百家争鸣」

33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

34 《人民日报》，1956年7月5日、21日。

35 (内部参考) ^1956年7月13日' 页 323—324。

罗隆基在人大会议上发言说，从最近一次视察收集的反映中知道，全国高级知识分子是热烈拥护百家争鸣的，「不过对『百家争鸣』

实现的方法，对怎样能够开展『百家争鸣』还有某些怀疑」。36 在公开的讨论中对此争论不休，集中起来，分歧主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一是百家争鸣要不要有所限制？罗隆基把百家争鸣比作管弦乐队：「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郭沫若把百家争鸣比作交响乐队：「万种乐器齐奏或迭奏，但总要按照一定的乐谱」，不能「一阵乱叫」或「乱打响器」。”他们的观点引起普迹的反对，刘思慕直言：「郭院长的意见，有消极限制的一面，我是不敢苟同的。」马哲民更坦白：「我很反对郭沫若院长的说法。」封于乐队的比喻，费孝通说：「百家争鸣不可能是同一个调子，目前要争鸣，就一定有杂音。」沈志远也说：「争鸣时有辩论，有分歧' 调子是杂乱的」，「百家争鸣永远不可能达到如交响乐那样的和谐的地步」。范朴斋则说：在指挥旗下的演奏，等于事先安排的「百家争鸣」，「这会阻碍百家的争鸣」。宋云彬说：「我的意见，凡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都可以承认它是一家之言，让

它有宣传和辩论的自由。」³⁸

二是百家争鸣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问题是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的讨论会上首先提出来的。范文澜认为，马克思主义理应成为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而「不能作为一家之言对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进而主张：百家争鸣「首先要肯定马克思主义是衡量百家之说的共同标准」。朱光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更加鲜明地提出：「定于一是，这是百家争鸣的最终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非学会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可」。王亚南、张光斗等持同样的看法。³⁹在会议讨论中也有不同声音，有人提出：「争鸣不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应该自由发表各家的学说。」也有人说：决不应该先有一个定论，大家唱一个调

36 《人民日报》[^] 1956年6月29日。

37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7月1日。

38 《光明日报》，1956年7月9日。

39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0、11日。

子，那就实在算不得是「争鸣」了。随着讨论在社会上的深入，这种声音愈来愈大。北京、天津、沈阳、重庆等地知识界「有不少人认为，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对争鸣的限制」。[~]

三是唯心主义是否有参与争鸣的权利？在陆定一报告中明确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引起了人们的疑问：中共发动的对胡适唯心主义的政治批判余热未消，现在突然来个大转弯，主张给予唯心主义宣传的自由，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人们的议论便集中在解释中共提出这个主张的目的。有的认为，既然唯心主义在老专家中间存在，就应该让它发表出来；有的认为，允许唯心主义宣传，是为了便于批判，使它真正归于消灭；有的认为，这样做是为了通过竞赛、比较，提高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也有一些看法比较深刻，如美学家蔡仪认为，许多东西，在某些场合下，一下子很难断定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即使是唯心论也不是简单的学说，并非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⁴¹

40(光明日报), 1956年7月22日。41《光明日报》, 1956年6月14日。

四是在学校课堂上是不是可以百家争鸣? 这个问题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召集的讨论会上就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学校传授的知识「要有定论」, 中小学教材要统一, 不能争鸣, 大学教学中也应教给学生较好的一家学说; 有的则主张, 大中学界都应应将各种学说告诉学生,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 也有人主张, 基础课程统一, 专业课可以介绍各家学说。在7月2日教育部召集的教育界人大代表座谈会上, 大学校长们意见也不一致, 「有的认为可以, 有的认为不可以, 有的主张采用组织学术报告的方式」。天津大学副校长张国藩认为, 百家争鸣是可以体现在课堂上的, 这表示教师在教学中能独立思考, 对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很大作用。但多数人持谨慎态度, 如华北地质学院副院长俞德渊、东北工学院院长靳树梁、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西南农学院副院长何文俊等认为, 百家争鸣是学术上的事, 不应搬上

课堂上来, 拿到课堂上去的一定要有定论。各讲一套, 就把学生弄糊涂了。42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 逐步趋向于这样一种认识: 在大学课堂上可以介绍不同截点, 包括正在讨论中的问题, 教师也可以讲自己的

学术见解, 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11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对教学中也要百家争鸣的主张不必怀疑〉, 似乎是对这个问题作了结论。43

42《光明日报》, 1956年7月10日。

43参见于风政:《改造》'页461—463。

44(人民日报), 1956年7月21日。

上述讨论和争论, 反映出知识界对「双百」方针既欢迎又疑虑的复杂心态: 一方面想多一些保护屏障; 另一方面又想争得更大的自由空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 表达了执政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政策趋向。文章批评了对百家争鸣进行限制的种种说法, 指出: 「鸣得好是一种合理的希望, 但不必当作一种限制」; 「争鸣既不是齐唱, 也不是合唱, 因此必然会出现不和谐

音。诸子百家应该自己创作乐曲，而不是按照乐队指挥所指定的乐曲来演奏」；「成家的可以争鸣，不成家的也可以争鸣」；「既然要争鸣，就不能绝对『不乱』」；「不同意见是可以拿到（高等学校的）课堂上中讲授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地位问题的表态，尤其引人注目：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活动和文化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或得出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结论，他仍然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或评判标准，那也要看各人自愿」。文章还说，我们是主张辩证唯物主义的，但是也主张别人有怀疑和批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由。如果规定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或标准，那实际上是取缔唯心主义者争鸣的资格。文章从鼓励争论的宗旨出发，提出「这些不同的争鸣都各有不同的基础，不能强求一律」。44 二新闻改革与学术界的活跃

6月底，无论是中共还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对于新方针都停滞在学习、认识和讨论的阶段，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让「百家争鸣」真正形成风气，中共首先做出了表率。舆论宣传素来是共产党最重要的阵地，新闻报纸在当时又是最重要的宣传形式，也许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首先提出对新闻工作进行改革，而且就拿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开刀。

1 尝试改进新闻工作

从7月1日起，《人民日报》改版，由原来的一张四版扩大为两张八版。据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回忆，「当时有个指导思想，要打破陈规，办得生龙活泼，让各种意见在报纸上发表，包括对党的批评。毛主席不仅作了口头指示，中央还有正式文件」。45 这个指导思想反映在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中。过去在人们的印象中，《人民日报》是党报，是一份政治报，具有指引方向和统一舆论的功能，报上的文章传达的都是中共中央的声音。这篇社论则承诺，改版后的《人民日报》，第一，扩大报道范围：「生活里的重要的、

新的事物—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辟于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第二'开展自由讨论：「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实任把社会的^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首先，报纸的编辑部无论凭着甚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 3 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样一副神气，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

45 胡乔木：《胡乔木回慷毛潭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 页 23。

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如果「我们发表的某些文章的某些观点跟编辑部的有所不同，这些文章的作者的观点彼此也不同，这种情形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第三，改进文风：过去发表的文章^「整个说来、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远没有绝迹」，以后要力求做到「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扩大版面后的安排，第一版是要闻，第二、三版国内经济，第四版国内政治，第五、六版是国际版，第七版是学术文化版，第八版是文学性副刊和广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这次改版除了将扩大新闻篇幅外，主要是增加了国际新闻和学术、文化的内容。两者竟然占了四个版面，正好等于新增版面。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社论关于《人民日报》的性质的提法：「《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这可以认为是《人民日报》改版的宗旨。

8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人民日报》编委会报告，在批语中进一步阐述这个指导思想：党的各种报纸「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为了便于今后的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

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⁴⁷ 可见，《人民日报》改版，不只是扩大版面、增加篇幅，更主要是反映了编辑方针的调整，其核心是强调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不仅要宣传党的指示，也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鼓励报刊形成批评空气，甚至允许发表与党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而且，不只是《人民日报》，要求「党的各种报纸」也都应如此。

46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

47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49—1966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页 311。

为了促进百家争鸣，毛泽东还一再要求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

《参考消息》是新华社主办的日报，每天选载世界各地通讯社、报刊上的最新信息，是帮助中共高层领导人了解外界的一个特别渠道，

48 刘国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页 1403。

49（中国共产 1；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0，页 1197—1200；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 196。

50 详述见后。

5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0’上卷’页 561。

但阅读面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只印二千份。早在 1956 年 3 月毛泽东就提出，《参考消息》准备扩大发行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党内外都可以看。不要那么多禁令，就是要我们的人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5 月 1 日毛泽东又说，《参考消息》要总结一下，可再行扩大，变成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481956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从 1957 年 3 月 1 日起，《参考消息》以四开四版的日报形式出版，通属内部读物，但由各地邮局发行。改版后的《参考消息》，发行量由原来的二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⁴⁹此外，毛泽东还授意恢复刚刚停办的《文汇报》，并将《光明日报》、《文汇报》交给民主党派主办。50 这一时期，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也封改进新闻工作表示关

心。3月27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报纸工作。他说，《人民日报》错了要进行自我批评，过去学《真理报》，错了不能更正，党报只能登结论，不能发表不同意见，不能争论，这样做不对，报纸可以活泼一些。⁵¹刘少奇也连续两次找有关负责人谈改进新闻工作，核心的思想是要求提高新闻的真实性，要适合读者的需要。5月28日，刘少奇听取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等人的汇报时，提出了五点意见，他要求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批评玛在的新闻报道「只讲好的，有片面性」。他要求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6月19日，刘少奇再次召集胡乔木、吴冷西、朱穆之谈新华社

工作。他提出，新华社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新华社发的稿件既要反映本质又要生动活泼，多种多样，适合读者的需要。⁵²周恩来、刘少奇连续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发表意见，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总之，苏共二十大以后，为了避免苏共执政的错误，建立民主生活制度，中共决策层在新闻宣传方面确有一些新想法，即尝试放宽舆论，扩大人民的知情范围，发挥报刊舆论的批评和监督作用。

2 为「争鸣」开道的育岛远传学座谈会

为推动学术界的争鸣，8月10至25日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中共高层选掸遗传学领域为突破口推动「百家争鸣」，就是因为这裏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最为盛行，而且受苏联的外来影响最大，所造成的后果也最为严重。

李森科在中国最热烈的追随者是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乐天宇。他是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干部，曾在苏联学习米丘林学说。乐天宇回国后带来了苏联的结论，并藉助于「一边倒」的国策，无情地打压中国的「摩尔根遗传学派」，迫使北京农大教授、年青的遗传学家李景均于1950年3月出走美国。这个事件震惊中外，引起中共高层的注意，乐天宇受到严厉批评，并被调离了北京农大。”然而，遗传学的厄运并没有由此转机，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遗传学家们都受到了批判。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了乐天宇的「学阀作风」，却仍然要「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仍然斥传统遗传学为「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伪科学」，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从这年秋季起，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被取消，遗传学研究完全停顿下来，以生物学取而代之。直到1955年，李森科在苏联已遭到批评，但在中国仍然被视若神明。

被西方称为「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的著名遗传学家胡先让1954年写

了一部《植物分类学简编》’提出了多元新分类系统理论’并对李森科的物种见解进行了批评。该书于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立即遭到批评，苏联专家也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政治的诬蔑」。接着，在中科院纪念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胡先让被批判，《简编》一书也被销毁。⁵⁵用生物学家谈家桢后来的话说，这时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已经到了「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地步。⁵⁶

1956年4月，李森科本人被迫辞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被迫害致死的摩尔根学派科学家瓦维洛夫得以平反。⁵⁷消息传来，在中国科学界引起震动。正在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4月18日，毛泽东听说了生物学界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打击其它学派的情况后，指示中宣部要注意这个问题。⁵⁸科学界不一定知道毛泽东关于要「注意」李森科教条主义的那封信，但陆定一的报告是听了的。这使受压已久的遗传学界为之鼓舞，他们立即呼吁恢复摩尔根学派的合法地位。⁵⁹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宣传部同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商量，决定共同召开一次遗传学座谈会。⁶⁰

⁵⁵ 胡宗刚：《不该远忘的胡先让》（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页152—153

164—166。⁵⁶（文汇报），1998年9月22日。

⁵⁷⁶⁸ 于苏联批判李森科的过程，详见⁸伊萨科夫等：《反李森科#派斗争的史料》，

《斯大林研究》’第二’三、四辑。⁵⁸《建国9年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

册’ 页 74—75。

59 如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娄成后、吴仲 X 先后发表文章或接受采访：对否定摩尔根学淤提出批评’ 要求把摩尔根学派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参见《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2 日；《光明日报》，1956 年 7 月 19 日。

60 参见睐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 页 430。

这次会议，是生物学界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和门德尔、摩尔根学派在学术会议上的首次接触，谈家桢、戴松恩、祖德明等 130 多位生物学家参加。在这次会议上，传统遗传学派的诉求得到了某种满足。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会议开始时讲话，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学派的一切政治帽子。在会上，摩尔根学派第一次可以与米丘林学派面对面地展开讨论，而且讨论得相当热烈。会议分出四个议题进行讨论，先后召开了十四次座谈会，共有五十六人发言。不久前受到严厉批判的胡先骕接受了竺可桢的道歉和邀请，并在会议上发言达八次之多。会后，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争得了在教学、研究、出版方面与李森科学派同等的权利。61

然而，这次会议很难说已经使摩尔根学派得到了与米丘林学派「平起平坐」的地位，更不用说动摇米丘林学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在开幕词中指出，几年来的问题，只是对「苏联的科学精神」和米丘林学说「体会不深」，而「主要根据李森科学说」，结果导致了牯差。言下之意’ 虽然李森科出了问题，苏联的科学精神和米丘林学说仍然是不能碰的。参加会议的遗传学家们并不指望与对方一争高下，只是要谋得一个合法地位。他们的发言，更像是在向米丘林主义者普及遗传学的基本常识，而尽量回避批评对方。由于遗传学研究多年被禁止，自 1949 年起就已停止订阅国外各种遣传学杂志，即使是遗传学家们，对国际速传学的进展也大多不了解，很少有人提到遗传学的最新进展。在会上，米丘林主义者几乎一致地认为，遗传学的发展，一天天接近米丘林学说。传统遗传学家们则大都持一种折衷的态度，如谈家桢说的，要「走中间路线」。只有个别人对米丘林学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竞雄指出，米丘林学派「抹煞了一百多年来生物科学发展的事实，而回到一百多年前去了」。然

而，李竞雄被认为是「极端」分子受到批评。62

当局的既定方针，原本就是要在「百家争鸣」的口号下让两家和平共处，并不是要做出谁是谁非的评判。于光远的发言为会议定下了基调：「遗传学的两个学派应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童第周在闭幕词中也说：「摩尔根学说的研究和米丘林学说的研究，都应当发展，都应当扩大它们的领域。」当局的初衷；就在于通过遗传学座谈会为「百家争鸣」树立一个榜样。从这个角度说，会议的目的是达到了。

3 逐渐活跃起来的学术界

1956 年下半年，各个学术界渐次出现了「争鸣」的气象。除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还有几次较有影响的会议。如 7 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三届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负责人座谈会，8 月下旬中国地理学会召开的第二次学术报告会，8 月底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贯彻「双百」方针的座谈会，以及 9 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召开的会议。这些会议本身虽然没有组织学术争论，算不得是「争鸣」，但要求创造百家争鸣环境的愿望，却是普遍的、强烈的。

63 方舟子：〈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页 40。

首先是要要求改变对学术观点扣政治帽子的做法。就学科领域而言，法学界的政治性极强、对此也显得特别敏感。自 1952 年以来，法学界盛行照抄苏联法学的教条主义，简单否定资产阶级法学理论，导致中国法学研究长期裹足不前。8 月底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希望推动法学领域的百家争鸣。秘书长吴德峰在会上直言：几年来法学领域缺乏自由讨论的风气，大家存在顾虑，写文章十分谨慎，司法改革后更加拘谨。对有分歧的问题不敢发表意见，「都怕受到公式化的批评」，「这种情况只会造成学术上的沉闷空气，只会助长学术武断和八股滥调的滋长」。钱端升教授指出，法学界乱扣帽子的劲头还很大，有些青年同志常常抓住经典著作上的一两句话，就给人扣上「资产阶级的、封建残余的观点」的大帽子。法学的阶级性、政策性特别强，它最容易引起扣帽子，展开争鸣，必须冲破这个

障碍。严景耀教授说，许多教师的讲稿，杂开经典著作的话再不敢说甚么，对资产阶级法学理论，除了骂它反动、虚伪以外，很少说出甚么道理。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雷洁琼、北京司法局副局长楼彦邦提出，法学界有割裂历史的问题，老一辈法学工作者不受重视的问题很突出。北京政法学院教务长刘昂等人对照抄经典著作和苏联教材，不敢独立思考的风气提出了批评。如果说法学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那么，经济地理学本来是可以与政治拉开距离的。然而，事实上，在整个经济学领域，经济地理学却成为受教条主义严重干扰的「重灾区」。建国以后，不仅经济地理学被批判为「地理决定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问题。在8月20至25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地理学第二次学术报告会上，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成为会上热烈讨论的话题。与会者一致主张，经济地理学应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不赞成把生产关系或生产力作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⁶⁴

64(光明日报》，1956年9月1日；参见于风政：《改&》'页469。65(光明日报)，1956年6月13日。66(人民日报)，1956年7月5日。

其次是呼吁放宽对报刊出版的限制。「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期刊和出版工作受到了各方面的特别重视，因为报纸、期刊和出版是知识分子发表作品，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和园地。有人提出，报刊「可以为各种学派各种不同的学术意见提供充分的争鸣的阵地」。⁶⁶还有人指出，「『百家』在现代是怎样的『鸣』法，很显然，是出版」。⁶⁷7月2至5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负责人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十五所高校学报负责人和《哲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等十六个学术杂志和报纸副刊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认为，学术刊物是学术活动的主要园地，要在学术界实现「百家争鸣」，首先就要在学术刊物上有充分的学术讨论自由。他们纷纷指责过去几年间学术刊物限制批评、乱扣帽子、不尊重作者的独立见解、滥发教条主义文章等不良风气⁶⁸认为应当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在学术争论中不允许乱扣政治帽子，学术刊物可以发表唯心主义的文章，应鼓励学术工作者撰写阐述国家政策的文章和对执行政策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的文章。⁶⁷

再次是呼吁放宽对西方科学著作编译出版的限制。学术界对编译出版

国外科学文献方面向苏联「一边倒」的倾向提出了鲛厉批评。有人作过统计，中国科学院五年中翻译出版的外国科学著作 108 种，只有 3 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著作。各专门学会出版的《译报》、《科学文摘》几乎成了「苏联译报」。《物理译报》、《生物译报》、《植物病理学译报》创刊后发表的文章 398 篇，仅有两篇文章译自德国的科皋刊物，其余全部译自苏联刊物。《微生物学译报》规定，译载苏联以外国家的科学论文，首先要有「批判能力」，译后还需审查、「过关」。知识界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1956 年初就有人表示，要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栖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青岛遗傅学座谈会期间，也有人发表文章，公开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著作也要译载，没有必要对每篇外国科学论文进行所谓的「批判」。要检查编译工作中的清规戒律，分清学术与政治的区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论文的区别。9 月 5 日，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会上提出，要反对绝对正确、绝对错误的极端思想，使鑄译工作充分反映中国和世界各国科学研究成果以及学术争论；在选题上，不应以权威为擦准，而应以科学价值为标准；不同思想体系的著作，只要有价值，也可以翻啐出版。有人进而提出，对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即使不对也不应妄加删节。还有人提出，审稿制度是必要的，但审稿的目的是衡量学术水平，以确认是否达到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出版标准，并不是排斥和拒绝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更不是以政治标准决定是否「放行」。68 虽然会上的讨论偏重于

67(光明日报)、(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9 日。

68(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7 日；《改&》' 页 470—471，

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放宽出版限制，推动西方科学成果的译介，还是有相当的意义。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邀请党内外科学家和学术、艺术工作者六十余人举行座谈会，陆定一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对前一阶段有关如

何开展争鸣的讨论做了总结。他提出了五点意见：一、除了继续进行对马克思主义的课程的教育外，有准备、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高年级逐步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陆说，资产阶级学说有唯心主义的，有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也有许多派别，都可以开课。现在康德、黑格尔、罗素的哲学学说已经在北京大学开课，凯恩斯经济学说也将在北京大学开课，逐渐准备开。对资产阶级学说，在讲课中能批判就批判，不能批判就介绍。二、请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流学者来中国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可以请。陆说，中国科学要在十二年左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首先就要向人家学一学。讲几个月、半年、一年都可以。三、关于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同时请科学院考虑是否中国也召集一些国际学术会议。四、关于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问题，既要讲正面，也要讲反面。社会主义运动经常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只讲正确路线，不讲不正确路线，就没有对比，就不容易了解，就会陷入背诵教条的情况。陆说，想请人编一些书，译一些书。有些书作为参考材料，放在图书馆，不出售。五、讲历史，也要讲正面和反面。不仅要出版孙中山的选集和全集，也要出版蒋介石的选集和全集。讲太平天国，就要讲曾国藩，讲国际问题也要讲希特勒。反动的书，不公开出售，可以放在图书馆供人研究。陆定一最后说，上述这些办法都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刺激学术的发展。至于有人提出在「百家争鸣」中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问题，应该这样解决：如果是宗派主义的领导，那是错误的，那是本身就逢反了马克思主义，这种「领导」当然不卖；如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来团结别人，帮助别人，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互相批评，互相帮助，这样的领导是绝对需要的，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这种领导是必不可少的。会上，曾昭抡、潘梓年、钱端升、陈凤桐、陈昌浩、王子野、锺惠澜、裴丽生、王芸生、钱伟长等发言，表示拥护上述五点意见。⁶⁹ 这次会议进一步鼓励了学术界的自由开放空气。

确实，1956年下半年，学术界的沉闷空气开始改变。哲学界关于真理的阶级性、真理的标准、社会科学的阶级性等问题的讨论，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民族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提出，生物学界

关于麻雀是不是害鸟的争论，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关于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方面的争鸣，语法座谈会关于语法的讨论，考古工作会议关于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的讨论，以及教育界提出的对陶行知重新评价的问题，都是有社会影响的争鸣。有研究者统计，1956年，全国性重要学术会议召开了五十多次，学术论文和学术报告超过二千篇，都是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⁷

三沐浴春风的文艺界

1956年的春风也吹到文艺界。就文学艺术家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来说，或许文学艺术界的行动还更早一些。

1 作协理事会与文艺政策松动

1955年底，中共领导人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但当时关注的重点是学术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文艺界似乎还没有纳入领导人的视野之内。就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发出的前一天，195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还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文艺界「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它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的斗争以后，必须进一步地对于这种现象（指『小集团活动』）进行批判和斗争」。「各地应本此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对于文艺干部中存在的类似的问题，有领导地开展批评和斗争，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1956年初，文艺界仍然在批判丁玲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一本主义」。然而，受过「五四」洗礼的中国文艺界，历来具有成为时代号角和鼓手的使命感，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再次激发出艺术家们的政治热情，他们希望成就文学艺术上的一番事业。中共知识分子会议鼓舞了他们，使他们感受到春天气息的来

临。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兴起，也激发了中国作家。”他们开始对文艺界的沉闷和萧条公开表达不满。

为了推动文艺创作，2月27日至3月6日，召开了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的第二次会议，主题是讨论发展和繁荣文学的问题。出席会议的理事和代表二百多人，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三十四人作大会发言，唐镛等作了害面发言。会议通过了「作家协会未来十二年的工作纲要」，决定成立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中共领导人接见了会议代表，并与他们合影留念。刘少奇还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周恩来则出席晚会并和作家谈话，陈毅也到会作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发消息，同时刊登了会议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文艺报》则发表了^有的报告和发言。3月25日，《人民日报》逢专门配发社论，号召^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这次作家协会理事会可谓「盛况空前」！⁷³

这次会议从上到下都对文学事业的落后状态表示了不满情绪。刘白羽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陈荒煤关于电影剧本创作的报告、康濯关于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创作的报告都指出创作严重落后于现实。《人民日报》社论则说得更加明白：「我们文学事业的落后状态是无可讳言的，我们还很少看到真正激动人心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优美艺术形式的文学创作。」相比之下，作为会议的主要文件，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周扬所作的报告，态度就不那么明朗。他强调的重点是：文学艺术经过「思想战线上的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批判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绩，文艺创作已经出现了「新气象」，「正在走向旺盛与繁荣」。以此证明「文艺创作不但没有像胡风所诬蔑的那样，『萎缩』、『枯死』下去，而是相反，它们正在茁壮地成长」，而「『萎缩』、『枯死』的只是一切反动的文艺而已」。说到「人们经常谈论和慨叹文学艺术落后于生活的现象」时，周扬把这种状况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说「在文学艺术工作上，也像在其它工作上一样，右倾保守主义曾经是我们前进的最主要的障碍」。⁷⁴这显然是在响应毛泽东辟于经济建设方面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号召。在周扬看来，文学领域只要反对右倾保守，就可以「大踏步地前进」了。

在会上，只有少数发言触及到文学落后状态的真正原因。如茅盾的报告委婉地说到：一个时期「相当盛行的粗暴的文艺批评，也是严重地打击青年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的」。他说，近年来这种粗暴的批评比较少了，但真正有益的评论还是很少见到。唐镬的书面发言则尖锐地提出要「同庸俗社会学倾向作斗争」，即同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中机械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作斗争。⁷⁵然而，周扬的报告没有从领导的角度作一句自我批评。

74(人民日报)，1956年3月25日。

75《人民日报》'1956年3月25，31日'

他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回顾了1954年以后的「思想斗争」特别是同胡风集团的斗争，甚至得出「革命文学史就是一部和各种反动的『理论』和『派别』作斗争的历史」的结论，宣称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对文学上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周扬虽然也批评了公式主义和自然主义，提出还要反对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但他却把一切问题的责任照旧归之于作家。诸如青年作家缺乏经验；有经验的老作家又对生活不够熟悉；很多新题材作家不容易驾驭等等。会上的多数发言也都随声附和周扬的报告，丝毫不敢触及文艺理论、文艺思想、文艺领导中存在的问题。⁷⁶这表明经过胡风事件，文艺界仍然惊魂未定。会议提到的繁荣文学的办法大都是技术性的。茅盾认为，现在的文学队伍太小，作家协会会员只有五百多人，加上一批新生力量，不过一千多人。他和刘白羽都强调，要积极地培养青年作家，扩大文学队伍。刘白羽遣提出，要「在人民中发现

天才」。当然，刘白羽还讲到一些别的话，如要扩大写作的题材和体裁，要开展「自由讨论」。他说：「作家选择甚么题材，这是完全自愿的事情。」⁷⁷这与周扬的报告还是有所不同的。

事实上，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文艺现状也很不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特别是刘少奇，先后两次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谈文艺问题，这在建国以后是少见的。⁷⁸3月5日，刘少奇和陈毅接见周扬、刘白羽，谈了他们对当时文艺工作的意见。刘少奇首先谈到一些作家「没有社会主义热情」，「那怕是极个

别的人，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刘的谈话，中心是讲如何对待「政治上的干涉」问题。他承认「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是干涉错了的」，还提出，「以后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把决定连

76 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3月25日'31日；于风政：《改造》'页446—448。77 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3月25日。为了动员和组织文学新军'3月15日'作家协会主席团和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480多名青年文学创作者参加会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周恩来接见了全体青年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分别作报告，许多老作家与会给以热情辅导。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3月16日。78 黎之说：「就我的印象刘少奇很少对文学工作发表意见。」参见黎之：《文坛风云缘》，页51。同自己的意见寄到中央来，或是寄到文化部、宣传部、作家协会，都可以。刘少奇说，对于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负责同志讲的话，也应该看作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要做出决定，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陈毅插话说：「作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风格。」

刘对此表示「很同意」。~3月8日，刘少奇在听取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陈克寒、刘芝明、夏衍等的汇报时，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个意见。在谈到文艺批评问题时，他说，「负责同志看戏，不许议论不行，议论了对人又有压力，怎么办？」刘迺提出，「若是随便讲几句，不能算批评，可以不听；如果是正式意见，那就讲清楚。当然组织决议II是要听的。既然是决议案，那就要服从」。「外行提意见应采取商量的态度，不要站在作家之上」。80 显然，刘少奇是看到了由于政治上过多干涉带来的后果，特别是看到了「负责同志」的意见造成文艺家「无所适从」的局面。刘少奇希望通过把「组织决定」与「个人意见」加以区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79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186

—188。80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页 189—193；《刘少奇年谱（“站—19650”），下卷，页 362—363。

于是，中共对于文艺政策的新精神开始在党的系统进行贯彻。作协理事会后，中宣部紧接着在 3 月 8 至 14 日召开了各省市宣传部文艺处长会议。会议在强调加强党对文艺工作领导、努力发展和繁荣创作的基础上，要求对「文艺干部特别是党员负责干部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向党闹独立性和骄傲自满等思想倾向」，「采取适当的方法展开必要的批评」，但又特别指出，「在文学艺术的体裁、题材和风格上应当容许作家、艺术家有充分的自由，应当在文学艺术各部门都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不要只提倡写某种题材而排斥其它题材」，「有关艺术的理论性的问题和对具体作品的评价，应容许不

同意见的讨论」。会议最后强调，「党委和宣传部应加以领导，指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要不适当地加以干涉和束缚」。81

其实，周扬的内心也是矛盾的。作为主管文艺工作的党内负责人，他也不愿把文艺界搞得死气沉沉，也希望中国的文艺事业蒸蒸日上。也许，「百花齐放」这句口号毛泽东是从周扬那裏听到的。82 据当时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回忆，有一次谈及创作中有种种条条框框的清规戒律时，周扬说：不要搞的真如胡风所说的像中世纪一样。3 月 5 日听取了刘少奇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周扬、刘白羽回来后很兴奋，立即向代表们作了传达」。83 一位接近他的人回忆说，作为建国以后几次政治运动在文艺界的忠实执行者，他不得不维护这些运动的正确性，但「周扬内心是否有自己的想法，就很难说」。当时有人私下裏对周扬的议论是：「在政治上他是『左』的，艺术上持着公正的见解。」84 无论如何，周扬当时真正的内心思想可能是具有两面性的，但从实际表现上看，他那个时期的主导思想与多数人理解的「双百」方针恐怕还有很大距离。

2 戏曲领域的「百花齐放」，

文艺「百花齐放」的局面首先出现在戏曲领域，这大概与戏曲是民间群众娱乐的重要形式不无关系。中国的戏曲传统极为丰富，据新中国成立时的统计，全国共有旧戏和曲艺 300 种以上，城市职业艺人超过 25 万人，私营戏曲剧围在 1700 个以上，上演着 5 万个剧目。中共执政以后，随着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开展，加上在戏曲改革和剧目整理时，根据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政治三原则（政治上有益，政治上有害，政治上无害），导致清规戒律名目繁多，禁演剧目愈来愈广，一些古老剧种无以存续，处在自生自灭的状况。⁸³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出现以后，民间剧，国管化的压力很大，许多私营剧画和民间艺人的生存也成了问题。耻

1956 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对这种状况都表示出不满意。

如 3 月 8 日刘少奇与文化部负责人的谈话，重点就是关于戏曲工作。他讲到影响戏曲发展的两个问题，一是剧团要不要全部国营？一是如何进行戏曲改革。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剧围全部国营。他说：「几千个剧园都国营，会搞掉积极性。这不是促进，而是促退。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他提出「要让民间职业剧园再搞它一个时期」。刘也不赞成戏曲改革急于求成。他说：「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强。」「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戏改不要大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刘少奇还表示了认同戏曲的娱乐功能的看法，他说：「看了折子戏，能得到休息，使人高兴，就很好。」⁸⁷

85(《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选编 11949—19561》) 页 147—149；周 II 峙：〈新中困文化-术事业的一位创始人〉，载《慷周扬》 页 121~125、143。

86 《内部参考》，1956 年 1 月 20 日 页 18—22；《刘少奇年谱 11898—1969》 卞卷 页 362。

87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 下卷 页 189—193。88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上卷 页 560。

毛泽东、周恩来也表达了要放宽戏曲政策的意向。3 月 22 日 周观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新作《西望长安》。散场后，同剧院

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座谈。针对戏剧界正在争论的能否反映阴暗面问题，周表态说：「不要光演一些歌功颂德的东西，暴露和批判阴暗面的东西也应该演一些。」「我们应该批判坏的、歌颂好的。」「主流是歌颂光明的正当的事物，副的方面是批判和暴露坏的。」88周的这个思想尤其反映在他对改编古装昆剧《十五贯》的高度赞赏上。正当中

共中央酝酿「双百」方针时，浙江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的改编演出，「轰动上海，也轰动了北京」，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89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这出戏，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连

看两场。4月19日观看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后，周恩来来到后台看望剧团演职人员，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4月25日周再看《十五贯》。毛泽东也在4月17日和25日看了两次，同样给予高度肯定。在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五贯》应该到处演」。5月17日，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专门举行昆曲《十五贯》座谈会。周恩来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一出改编的古装戏为甚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怎么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如此赞赏？从周恩来的两次讲话中看出，《十五贯》对于贯彻「双百」方针，具有两方面的象征意义：一是为戏曲界百花齐放「树立了一个榜样」；一是具有批评官僚主义的隐喻意义。同时，《十五贯》也为处在自生自灭状态的地方古老剧种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4月19日，周恩来在接见《十五贯》演职人员时说：「我们不但要歌颂劳动人民，揭露反动的统治阶级，也需要像《十五贯》这样的戏。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人民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办法摆脱困难，有时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上的事情。」「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镜子。」「况锺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于唯物主义思想的。」谈到戏曲改革，周说：百花齐放「要因地制宜。有的剧种一时还不适应演现代戏的，可以先多演

些古装戏、历史戏。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昆曲的一些保留剧目和曲牌不要轻易改动，不要急，凡适合于目前演的要多演，熟悉了以后再改」。

5月17日，周在昆曲《十五贯》座谈会上讲话，赞扬江浙昆曲和广东粤

剧在「奋斗不息」中求得生存的精神，「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受到重视」。他赞扬《十五贯》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切合历史主义的要求，有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强烈的民族风格。《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树立了良好榜样」。周再次强调，《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填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91

因为有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明确态度，6月1至15日，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周扬、刘芝明、钱俊瑞等在会上作报告。会议的主旨是打破「清规戒律」，扩大和丰富传统戏曲的上演剧目。刘芝明的主报告承认，目前剧目工作的主要问题是：上演剧目贫乏、单调、质量不高，基本原因是剧目工作中受了#多清规戒律的影响。会议选掸争论较多的《宁武关》、《四郎探母》等六出戏进行讨论。与会者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要求发掘、整理剧目中应根揀各个剧种的特点发挥其特长，按照它自己的发展趋向来促进其发展。二是要求放宽剧目的限制。凡是能起积极教育作用，能鼓舞人们精神向上，或能给人以美感上的享受和愉快的剧目，都应加以肯定。92会后'各地进行了挖掘传统戏曲剧目的工作。据统计，到翌年春，全国共挖掘出51867个剧目，记录了14632个，整理了4723个，上演了1052个。力在1956年至1957年春的一段时间内，戏曲演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有些地方甚至将《杀子报》、《大劈棺》等二十六个禁演剧目「全部开禁上演」，以致有些研究者几十年后仍然认为有些过分。94

91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页192—199。

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页1443。

93 刘有宽：〈周扬对戏曲改革的贡献〉’载〈慷周扬〉’页 344—345。

94 如有人认为：有些地方「借『大胆放手，开放传统剧目』之名，一股风地乱放剧目，

好戏壤戏同上台^有的甚至将一些早已被抛弃^被禁演的宣扬封建迷信、凶杀恐怖、淫乱色情的坏戏如〈杀子报〉、《大劈棺》等二十六个剧目全部开禁上演。」参见陈

其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1’页 28—29。

3 文旧界对教条主义现象的批评

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粗暴、武断和专横风气，作家们早已感到不满和愤慨。1956年初，这种情绪藉着苏联「解冻文学」之风逐渐地表露出来。

斯大林逝世后，一批在 30 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作家得到「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 1954 年 12 月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和「虚假」作风的质疑。

93 自 30 年代以来，苏联文艺界发生任何一件重大事件，都会在中国文艺界产生反响。同样，苏联兴起的「解冻文学」思潮，为中国文艺界衝擊教条主义樊篱提供了一个契机。1956 年 1 月 21 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合绕苏联的三部小说，主要是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广艺师》展开了讨论。^《文艺报》1956 年第 3 号发表了讨论会的发言。作家马烽、康濯、郭小川、刘白羽等人的发言一致承认，中国的文学创作存在回避斗争、不敢干预现实生活、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缺点。马烽说，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是通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刻画人物的，我们的多数作品却是通过与自然灾害的斗争表现英雄人物的，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条绕开生活中尖锐矛盾的狭窄小路」。有些作品接触了社会矛盾，但多半限于很小范围，批评干部至多写到区一级。康濯说，与尼古拉耶娃的小说相比，「我们创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正是粉饰生活和回避斗争」。刘白羽也承认，我们的文学作品的突出问题是「没有真实地、按照历史的发展来写我们

95 有“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情况，可参见萧洛 16 夫在会上的讲话 11954 年 12 月 21 日》和谢皮洛夫给赫鲁晓夫的报告 11954 年 12 月 22 日），11X03，巾. 5, 00. 30，仏 84,; 1. 78-91, 94^”（；“卿灭，1997, 1^0. 5, 0. 57-63。1955 年 1 月 14 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真理报》为道次会议所发表的社论。

96 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描写了一批响应党的号召从城市到药村的青年人與官僚主义所进行的思想斗争。这部小说反映了赫脚刚 1*1 兴起的以「干预生活」为中心的文艺思想。这在深受「无冲突翁」，写「理想」的英雄人物、写本质等教# 束缚之苦的中 8 文书界引起了共鸣^参见于风政：《改&》，页 443。的「现实生活」。参加讨论的都是「领导作家」’他们共同承认文学界不敢「写真实」这样一个现实，本身就表明文化界已经普遍地对文艺现状不满，尽管刘白羽等人仍然把实任主要归咎于作家本身。97

2 月间，《文艺报》刊登了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1955 年第 18 期发表的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这篇专论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挑战。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把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归结为「党性」，把「典型问题」归结为「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专论点名批评说：这是「烦琐哲学的、错误的观点」，是「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专论强调，艺术认识与反映现实有其特殊的形式和规律，把典型问题仅仅规定为一定社会力量、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体现，就会脱雕艺术创作的生动实践，导致公式化；典型不能等同于党性，典型不能完全归结于政治 1 否则就会使人们以反历史的态度对待文学艺术；不能企圖从任何一个典型中找到党性立场的表现；不能无条件地夸张现责生活中的正面现象，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社会的本质，否则就会抹杀真实的现实。于风政认为，「这篇文章简直就像为中国文艺界而写，它的主要观点乃至一些语言，竟同胡风如出一辙」。98

97(文艺报)，1956 年第 3 号’参见于风政：《改造》’页 443—444^98 于风政：《改造》^页 448—449。于着说’1956 年 2 月的《人民日报》和《文艺报》都刊登了赫联的專睡，但笔者查阅当年的《人民日报》

时，并没有发现这篇专论。不通，如果只是（文-报）刊登了专论，那么它在中国文艺界引起的波澜，就更能说明下面指出的情况：不同人有不同的心态，

随后，作协创作委员会理论批评组就召开会议对《共产党人》专论和「典型问题」展开了讨论。专论所批评的现象与中国存在的问题颇有雷同，很自然在中国文艺界引起共鸣。而专论发出的「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揭穿内容贫乏的教条和公式」的号召，鼓舞了中国文艺界的批评勇气。4、5月间《文艺报》第8、9、10号先后发表了张光年、林默涵、锺惦斐、黄药眠、陈涌、巴人、王愚、李幼苏的发言或文章。张光年集中抨击了「本质论」，指出，中国的文艺界「流行

着一些大同小异的更加简单化的公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以「本质论」为核心的庸俗化的文艺批评造成的。张光年说、文艺要反映社会本质，但完全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放弃典型的个性化要求，鼓励千篇一律的描写，就使文艺作品变成了公式、规律的图解和政治论文。陈涌则集中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他说，庸俗社会学并不比唯心论好一些，「庸俗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否认文艺的特殊的性质和任务」，「用一般的社会学的公式生吞活剥地代替文艺的具体生动的实践的研究」，尽管它表面看来「很革命」，「能够迷惑人」。陈涌明确反对「千篇一律」地要求文艺为具体的工作服务，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主要表现在为国家的根本政策服务，不能像要求一般的宣传教育一样要求文学艺术，文艺应该「唤起人们的美感」，「反映人们美的需要，美的理想」。陈涌通公开批评周扬等人曾经一直宣传和坚持的「赶任务」、「写政策」的做法。但是，也有许多人内心并不同意专论的观点，只是没有勇气公开讲出来。例如林默涵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他认为，专论没有推翻「典型是社会力量的本质表现」的说法「而只是指出了这种说法的片面性」。同时，他还在文章中一再掩盖和割断专论的观点与胡风思想之间的联繫，以免人们借机否定对胡风的批判。会上还有人提出，学习专论要「防止胡风反动思想复辟」，因为「作为胡风的文学理论的基础的阶级遗存在，所以胡风的论调也就有可能借尸还魂」。的可见，专论的发表一方面使很多文艺工作者活跃起来，

积极开展了思想理论上的争鸣，一方面使文艺界的领导层陷于被动，他们不得不跟上苏联的脚步，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阵地。

99 于政风：《改造》’ 页 449—453。

「双百」方针明确提出以后，文艺界的情形出现了重要变化，领导层的态度也开始转向和日渐明朗。在中国作协的多次会议上，茅盾-周扬、老舍、冯雪峰、吴祖湘、臧克家、秦兆阳等纷纷发表意见，指出了近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弊病：作品题材范围狭窄、单调，创作风格不够多样化，文艺批评缺乏自由讨论的风气等。他们要求在艺术创作上和学术探讨上提倡独立思考，鼓励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发展。100 文艺工作者在各种讨论会、座谈会上，在各地各种文学或非文学刊物上，纷纷对种种教条主义的粗暴批评方式表示了不满甚至于愤怒。他们把文学艺术的落后归罪于这种「刀斧手」式批评家，指责这些批评家「顶着堂而皇之的名义，把本来无罪或罪不至死的作品判成死刑，务求把被批评者一棍子打死」。前几年受到批判的萧也牧也发表文章，诉说对他的不公正对待。侯金镜的文章则尖锐指出：教条主义倾向在过去几年已经成为「有很大影响、发生了很大危害性的一种思想潮流」，其表现之一，「就是向简单化、庸俗化的极端上去发展，和武断、粗暴的批评方法相融合，形成一种专横的批评风气，在文坛上高视阔步，四处冲击」。他批评说，「有的文章干脆抛开对作品的分析，直截了当地对作者的立场宣布可怕的判决」。这种风气在全国泛滥成灾，致使作家「无所措手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1(12

7、8 月间的讨论开始广泛触及文艺理论和文艺方针中的教条主义，焦点是怎样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中国作协的一系列会议上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如冯雪峰等人指出，造成大部分文艺作品题材狭窄、风格单调，文艺评论缺少自由讨论风气的原由，「主要是由于过去对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片面性，以致使文艺创作的发展受到了限制」。1(13 作协武汉分会一些作家的意见更为鲜明，他们认为，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是产生公式化、概念

100 《中国当代文学史》' 页 24。101 《文艺报》，1956 年第 19 号。

102 《文艺报》，1956 年第 18 号。此时，陈企霞已经受到批判，而他批评《腹地》的文章发表在 1950 年。看来，侯金铨等人选掸批评对象是有所考虑的，优管陈的文章的确是闾了「战斗性和尖锐批评」的风气之先。

103 见《文艺报》，1956 年第 14 号。

化的重要根源。这主要表现在「忽视文学的特殊功能，机械地强调文艺为中心任务服务」等方面。他们遂指出，「由于片面地简单地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作品写社会重大题材，写工农兵生活，片面要求作品的主人公只能是先进的工人或农民，只能写他们的先进事迹，把他们的生活仅仅限制在劳动和生产活动的狭窄范围，辨斥其它的生活题材，甚至是工人农民劳动生产以外生活方面的题材。同时也片面简单地要求作品的政治教育意义，而忽视文学反映生活的丰富复杂的内容」。104

9 月以后，讨论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美学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如何理解和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如何认识文艺的特征、按艺术规律办事，如何促进文艺作品的体裁、题材、风格、手法的多样化，如何改进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等问题，都提出来讨论。其中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辟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锺惦裴的〈电影的铁鼓〉等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I。5

秦兆阳、周勃、陈涌的文章都是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其中秦兆阳的文章最有代表性，其尖锐之处在于对中共主流文艺理论的两个基石都提出了质疑：一个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个是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此前人们只是批评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神圣化，而秦的文章则否定了「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的必要性。文章认为，坚持现实主义的总原则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资主义」作时代的割分，现

104 《长江文筹》，1956年9月号'页7。

105 参舰思和主摄：(中国当^：学史教粉(上海：^1&大学出版社，19991，页93—94。实主义的道路应当是广阔的。文章进而指出，中国文艺界特有的教条主义，是两种「庸俗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一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造成的庸俗思想，一是中国特有的庸俗思想，这「就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而这又「主要表现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上」。他肯定文艺应当为政治服务，但是反对要求所有作家和文学形式都为当前的每一个政治任务服务，反对「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作某种概念的传声筒」。他认为，用艺术去圆解政治只会产生概念化的东西。刘绍棠和《探水者》文学月刊一批青年作家则提出，要「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突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钱谷融、巴人、王淑明等人对文学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阙发，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文艺的中心对象是「人是生活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他们批评有些作者「为要使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就是不通过普通人的『人情』」，或者认为作品「有太多人情味，也就失掉了阶级立场」，他们认为，「不通人情而能……实行自己的理想的事是不会有」。锤惦桨的文章主要从故事片的不景气提出问题，批评「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106

1956年下半年，文艺界对庸俗化、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

106 参见《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页94—95。107《人民文学》，1957年第5，6月号，

等教条主义现象的声讨此伏彼起，愈来愈激烈。茅盾以肯定的口吻说到这种局面：「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最近几个月来相当活跃，活跃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不同意见，在于企圃对那些已经被认为作了结论

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这标志着向前迈进一步的开始。」¹⁸⁷ 反对庸俗化、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成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追求个性化和独创性，争取独立话语权心声的一种曲折表达。

4 抨击官僚主义对文艺创作的干预

「双百」方针不仅引发了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上的争鸣，也召唤出文学创作的繁荣。一年之内，新办的文艺刊物近二十种之多，包括有全国影响的《诗刊》、《收获》、《剧本》、《文学研究》等，《文艺报》也改为大型周报。「双百」方针使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再次受到鼓舞。许多早已搁笔的跨时代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汪静之、徐玉诺、饶孟侃、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人又相继发表文章或作品，出版部门出版了；或计划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选。¹¹⁾⁸ 最能显示「双百」效应的，也许是出现了一批揭露和抨击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作品。这批文学创作主要是由一批新生代作家来承担的，如青年作家王蒙、刘宾雁、宗璞、李国文、陆文夫、丛维熙和青年诗人流沙河、邵燕祥、公刘等。他们大都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年轻知识分子，继承了两种对现实的批判话语传统：一种是革命的理想主义的批判话语，另一种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批判话语。[^]

¹⁰⁸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页 93。

¹⁰⁹ 参见李新宇：〈「早春天气」襄的突园之梦—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黄河》，1998 年第 5 期’ 页 143—144。

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橘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李国文的《改选》等小说，可以视作革命理想主义的批判话语。理想化的教育培养了他们理想化的目光，他们用这种目光看待革命成功之后的现实，发现它并不像过去人们所描绘的那样美好。于是，从理想主义出发，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及其它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批评政治经济体制上存在着的弊端、其价值取向不是否定这种理想，而是努力于美好理想

的实现。邵燕祥、公刘等对现实的批判就更多一些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贾桂香》等作品中所批判的官僚主义已经不是革命热情衰退或者满足于上传下达，而是他们身上的封建观念对人的幸福生活的破坏。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以讽刺和象征的诗歌形式，体现了同样的现实批判精神。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则涉及了社会主义文学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¹¹⁰

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一部作品。小说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时编辑部对其有所改动。¹¹¹王蒙时年二十二岁，是具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北京共青团市委干部。左翼文化是王蒙的基本思想倾向，但他对现实生活有敏锐的感觉，对刚刚展现魅力的新社会投出怀疑的目光。小说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锺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会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刻画了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时，小说又企图通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露的形象，展示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篇小说是王蒙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积极干预生活的一个尝试。多年之后作者本人回顾说：「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那时候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当时这个勇气是被『双百』方针鼓励起来的。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¹¹²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从1956年12月起，《文艺学习》编辑部先后收到有辟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连续四期发了二十五篇，《人民日报》、《文

110 《中画赏代文学史教程》’页94。

111 小说原名：《组织部来了俩年轻人》，经88编辑部修改后发表时改名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参见郭铁成：〈应尊重文学史的基本史

实一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组织部来了俩年轻人》，《文艺争鸣》评论》，2005年第4期，页95—98。112 苇黎明：〈王蒙表示客欢「双百」希望文艺批评正常化〉，（新华文摘），1986年第7期，页156。

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也先后发表讨论文章。主要声音是否定王蒙的，只有思想倾向一致的刘绍棠、邵燕祥、丛维熙、邓友梅、刘宾雁、唐挚、王愚等人支持王蒙。…起初，讨论大体潘在学术范围内，接下来的批评就「上纲上线」了。

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蒙这篇小说。据郭小川保留的记录稿：对王蒙的小说，「最初，歌颂占80%。现在「中间大」两头小」、歌颂者主要是大学生和青年作家。与会者中，侯金镜、张光年对作品有肯定有批评，而林默涵、艾青、张天翼、康濯等人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1」在公开的批评中，李希凡、马寒冰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李希凡说：「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砌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出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马寒冰撰文认为，这是「一部不真实的作品」，是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一文学范1(1出发的。马认为像小说描写的这样的区委会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委会。116 马的出发点是为中共组织辩谟，不承认中共内部特别是北京市存在这种官僚主义，即使有也不能写成小说。这些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一次毛站在王蒙一边。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王蒙在当时是第一个受到毛泽东保护的人，「因此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四民主党派的春天

到1956年为止，中国的民主党派保留了八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广工党）、

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在中共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民主党派与中共曾有过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共掌握国家政权后，这些党派是否逢会长期存在？如何存在？在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是徘徊在毛泽东脑子裏的一个问题。

1 民主党派通需要存在吗？

辟于中共夺取政权前夕是否提出过在未来的政府中排除民主党派的问题，由于俄国档案的公布而引出了一桩「谜案」。俄国《远东问题》杂志 1995 年第 2、3 期刊登了中国学专家列多夫斯基(!^!)的一篇文章〈米高扬秘密出使中国(巧^^年^一之月)〉，该文附录了米高扬 1960 年 9 月 22 日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画提交的关于这次使命的报告全文及详细引文。米高扬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 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的龟报中讲到：「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期，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将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在说明苏共中央不同意这个观点时，报告引述了 1948 年 4 月 20 日斯大林回电中的答复：

我们不同意这一看法。我们认为，中国所有的反对派政党代表了中国民众的中间阶层，并反对国民党集团^他们还将长期存在 1 并且中国共产党要掌握领导权^也就是领导地位，就不得不吸收

119 详见李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靠的^献)，1991 年第 1 期' 页 11 — 16^

他们参与合作^共同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也许'有必要吸收这些党派的一些代表人物麦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 1 而将政府本身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这个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国民党走狗。

米高扬的结论是：「众所周知，因为这一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自己对待资产阶级党派的政策」。

对米高扬报告中关于建国前夕中共对资产阶级党派立场的说法，许多中国学者不以为然。由于米高扬的说法与中共当时的实际做法以及中共在党内文件中表述的对待资产阶级党派的立场完全不同，因此有人撰文对此提出质疑，甚至直接否认俄国檔案的真实性。化此后不久，列多夫斯基将他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发现的这些电报的原文全文发表在《远东问题》杂志上。档案原件证实米高扬报告并非虚言，就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立场而言，档案全文与米高扬报告相比，还有两处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毛泽东在去电中谈到了让民主党派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理由：「我们对待这类人的策略是对他们不抱很大希望，不指望利用他们为革命做事」；「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在民主同盟的成员中有一些是同情我党的，虽然其大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同盟，因此证明了中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中小资产阶级认为「中国将会形成两权鼎立的格局，那时，中国共产党将统治中国的北部，而国民党将统治中国的南部」、因此他们鼓吹「第三条道路」。

第二，在斯大林的覆电中提到了毛泽东 1948 年 3 月 15 日的另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提到将「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对此，斯大林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化 122^{6000X1111} 凡^{X&10³¹*}0.1101161 ? 01010101 睡 011³, &011.'&.01⁰⁰⁰0^{II11}1X¹

¹08001²⁰⁰⁰0.6¹¹⁷⁻¹²². 中晔文参见《中共党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123 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霄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 年第 6 期，页 90—91。

综合上述史料，关于俄国档案真实性的问题已不复存在。但中共当时采取的立场的确不是要取消除共产党外的其它一切党派，而事实也不像米高扬所说，中共是在斯大林的建议下才改变对其他政党的政策的。所以，这裏的矛盾并没有因俄国档案原件的公布而得以解决，也就是说：既然中共的立场是容许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长期存在，为甚么

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立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并不反对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也没有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但他所追求的长期合作和联合政府都只是一种形式，而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对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马贵凡的解释很有道理。他认为那时毛泽东考虑新中国实行一党制是很自然的事情，理由有三：第一，1947年10月民主同盟的解散和中间党派的消失，使毛泽东看到了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实行一党制的可能性；第二，毛泽东很欣赏南斯拉夫模式、即共产党通过民族解放阵线实行幕后的一党专政；第三，毛泽东所坚持的联合政府的内涵有所变化，即他所强调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123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新中国需要建立的正是这种制度。在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中，毛泽东讲的是问题的实质，而在1948年3月15日的电报中，毛泽东讲的是问题的形式，斯大林大概是没有理解这一点。

无论如何，毛泽东并没有把民主党派赶下政治舞台。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大量纳入新政权，组建了一个「联合政府」。1949年9月第一届中央政府成立时，民主党派的任职在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人（占50%），五十三个政府委员中有二十三人（占44%），四个政务院副总理中有一人（占25%），十五个政务委员中有九人（占60%），三十个部委首长中有“1”一人（占33%）。124 就政府组成看，共产党颇有一股招贤纳士，广纳人才的气势，周恩来甚至亲自出面，请黄炎培等人士出山。125

对于组织这样的联合政府，中共内心是如何考虑的呢？1949年10月25日刘少奇对苏联大使罗申的解释是：不久前成立的联合政府使各民主党派很满意。中国共产党占了这个政府中所有的领导岗位，可以很容易地监督各民主党派的活动。说实在话，所有这些政党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政党，因为所有这些政党在全中国的党员总数只有三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有一百多万党员。但是，由于这些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资产阶级，而政府又有意创造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

种种条件，中国共产党估计，将来这些党派会有一定程度的活跃。中国共产党预计中国的联合政府时期会持续十至十五年，十至十五年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就没有了。1946年11月15日周恩来也对罗申谈到：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了政府工作的重担，但参加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也在积极地工作。如司法部长史良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还有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傅作义。但是也有一部分进入政府的所谓的「民主领袖」，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如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和张澜这样的人物，还有像罗隆基这样的「民主领袖」中的极右分子，暂时还受到我们的信任。周恩来强调，作为整体，进入联合政府的各民主党派，都能真诚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因为所有这些都毫无保留地接受共同的统一战线纲领，承认中共的领导

12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第一卷，1949年11月未刊) 页1、6、11。1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卷 页4—5。126(《周恩来年谱》)，中.0100, 11.42, 288, 0.19. 3741

导，赞成国家的基本政治路线一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127不久，刘少奇又谈到：「同民主党派的实质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加入民主党派的代表同西欧的资产阶级完全不同，中国的民主党派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也完全不同，所以中共应该同他们「实行真正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时间上看，是个长期的问题」。128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也谈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这裏的逻辑是清楚的：中国的民主党派拥护共产党，而中国的发展又需要各民主党派的帮助，因此与他们的真诚的，结合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是，既然民主党派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必然消灭资产阶级，所以这种合作只能是策略的、暂时的。所谓「长期的问题」，不过十至十五年，也就是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结束。在此之前，中国不仅需要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还需要从组织

127(《周恩来年谱》)，中.0100, 11.42, 288, 0.19. ; 1.81-95. 128(《周恩来年谱》)，中.0100, 11.43. 11.302, 10^1157-179.

1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8：《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 75~130 割延东主编：《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 X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页 273-“^”

上帮助他们发展。中共确实是这样做的。1950 年底，登记的各民主党派成员总计不到 13000 人。1951 年 1 月，中共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专门讨论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问题。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中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就在这次统战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要求各大中城市在 1951 年协助民主党派发展成员一至两倍。到 1953 年初，民主 51 派在国内党员的总数为 32000 余人，比 1950 年底翻了一番多。130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的做法多少有些显得过分「热情」。如在组织发展上「^助它们定计划、开名单，并且代为进行动员和说服等」，甚至「参与它们内部的人事安排，帮助它们处理

它们内部难于处理纠纷，帮助它们修改政治性的文件等」。^给人的感觉，建国后的民主党派似乎是在共产党的卵翼下发展起来的。相当一批中共干部都有一种跟着毛泽东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在他们看来，老子打下的江山为甚么要让给别人坐？看到民主人士在政府担任要职心里不舒服，说甚么「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133 这样，1953 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以后，中共党内再次有人提出民主党派是否要存在下去的问题。在 1953 年 6 至 7 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党内出现了想利用普选的机会来排斥民主党的「错误倾向」，以至他不得不在会上明确宣布：「我们要把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导到社会主义。」~刘少奇的理由是，在中国的条件下，统一战线的工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不可缺少的形式。如果要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进行，结、教育、改造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就必须通过统一战线，即通过民主党派去做。化于是，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后，民主党派

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仍应占有一席之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选出十三位副委员长，其中有民主人士八位，他们是：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在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十一人，没有民主人士，国务院部委首长三十六人，有十三位民主人士（占36.9%）。136 一届人大以后，政协继续被保留下来。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召集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专门谈到政协存在

131 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一册，页226。

132 对此，中共后来也颇感不是。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一册，页226。133 参见林祥庚：〈刘少奇与多党合作制度〉，《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页108—109。

134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北京：档案出版

社，1988），页124。转引自林祥庚：〈刘少奇与多党合作制度〉，页109。

135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117—124。13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二卷’页301。

的理由及其性质。他说，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成立政协。政协不能搞成国家机关，但也不仅是人民团体，而且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因此，在全国政协委员选举时，有意识地安排少选中共党员，使非中共人士当选409人，占总数的73.9%。137 除了全国政

137 罗广武编：《民主党派大事年表》（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页39—40。138 《人民日报》，1956年1月31日。

13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1），页808—809。

协外，各省、市及部分县也分别成立了政协地方委员会。到1956年初，全国设立了358个地方委员会，其中属于省、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市的有52个，属于县（市）和市区的有306个，拟陆续设立的县（市）级地方委员会将有二百几十个。138 与建国之初相比，民主党派在政府中的份量大大减少，主要的位置都在人大和政协。这

就是说，至少从表面形式上看，此时的民主党派已经开始偏杂权力中心。如果说过渡时期中共的政策目标是要把民主党派「引导到社会主义」，那么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民主党派又将何去何从呢？在中共的观念中，「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实质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按照这个逻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了，资产阶级不存在了，民主党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是由于这种理念，在三大改造高潮当中，中共党内对民主党派的怀疑和抵触情绪就开始出现，并不断上升。据利瓦伊汉回忆，党内不少人认为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终结，「民主党派可有可无，寿命不长了，最多不过维持三、五年也就完了」，统一战线的工作应以斗争为主，「少统多战」。因此，在工作上对民主党派实行消极防范和控制代替，不敢放手让他们独立地开展活动，只喜欢同他们中的进步分子来往，不愿同中间和落后的人接触。特别是肃反运动开始以后，有些地方甚至企图借机排斥本单位的民主党派组织和民主人士。139 民主党派内部也有不少人感到自己可有可无。在 1955 年 1 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主党派人士反映：「宣传总路线以后，民主党派成员中对民主党派产生可有可无的思想。宪法公布

后，虽有改变，但尚未完全解决。」上海有民主人士说：「民主党派工

作干部认为自己好似锡箔店中做伙计，明知无前途，只好干。」¹⁴⁰

此时，中共领导人正在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掀起经济建设的高潮。对于民主党派，中共中央认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民主党派过去做了不少工作，现在又积极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党派「还应当同我党一起继续存在下去，并且继续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141 作为统战部长，利瓦伊汉考虑的更多，他甚至设想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政党。1956 年在 1 月 25 日中央统战部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应当肯定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这些民主党派今后可以根据可能和

需要发展他们的组织。毛泽东阅后批示邓小平：「觉得可用，请酌办。」1月28日，利瓦伊汉又把他主持起草的〈1956—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草案）〉（简称〈七年方针〉）报送中央。送审稿再次提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团体」。但这次周恩来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些提法不妥」。中央统战部随即取消了这种提法。…2月16日至3月3日，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2月28日，利瓦伊汉就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发表讲话。会议通过的〈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帮助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这两个文件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党。

这次会议关于民主党派的政策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为民主党派的政治角色重新定位。文件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发展，使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都「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因此要求在统战工作方针上有新的提法。尽管没有再用「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的提法，但文件还是明确指出「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会议着重批评了统一战线工作存在着「关门倾向」和「右倾保守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对民主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发生的很大变化估计不足，没有给以应有的信任。

第二，把教育工作提到「中心工作」的位置。中共领导人认为统一战线内部仍将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是今后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可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处理，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把思想教育作为「中心工作」。从强调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转到以教育为中心，这可以看作中共统战方针的重要改变，它直接来源于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提出的「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为了落实以教育为中心的精神，中共中央决定，仿照中共高级党校的办法，设立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高级党校」。3月27日，社会主义学院以全国政协常委会名义决定成立，毛泽东亲自为学院命名。社会主义学院吸收和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的职务或级别相当的民主人士〔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入学，每期定为一年。

3月2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联合制定下发〈关于帮助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办法〉。全国各地普遍举办了政治学校和工商界讲习班，在全国政协和各级政协成立学习委员会，在中共各级党委指导下，组织系统学习三门课程：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知识、企业改革的基本知识和当前重要的时事政策。目标是要使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在思想上「实现『从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变革」。147 看来，在利瓦伊汉的思想襄，

145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页 137。146 《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页 275—276。

147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页 1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页 8171

也许仍然包含着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的长远设想。

第三，有条件地支持民主党派发展组织。从 1953 年下半年起，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兴起以后，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就「很少发展甚至没有发展」。148 到 1955 年，各民主党派成员比 1952 年只增加几千人，总数为 39000 人。149 各民主党派对这种状况不满，都有发展组织的要求。据利瓦伊汉说：「这成了他们的一个共同性的要求，不是少数上层人物的希望。他们的会员代表和地方组织都提出意见，我们要替国家作一点事，我们要有一点本钱，要增加一点本钱。」对此，利瓦伊汉的态度是：「应该赞成他们，让他们去发展。」统战部的文件则说：「各民主党派有可能发展党员的，应该加以赞助。」发展的重点是在大中城市「注意吸收一批中间的和比较落后的中上层分子，特别是散在社会上的旧中上层分子」。同时又提出，在民主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中吸收进步分子加入共产党，「以便从民主党派内部密切党与非党的关系」。1515

第四，要让民主党派人士有事可做。发挥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的作用，有计划地进行政治协商工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和协助调整内部关系，共同组织政治学习，经过它们加强联系和教育散在社会上的数量不少的旧中上层分子，要求中共基层组织争取民主党派成员成为自己的助手，等等。

可见，利瓦伊汉主导的这次会议，其意义在于明确在社会主义高潮出现以后民主党派为甚么继续存在下去，以及如何帮助民主党派存在下去。至于「互相监督」，特别是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的思想，当时还没有十分明确。从文献中还可看出，利瓦伊汉的发言同中央最后认可的文件之间是有差别的。利瓦伊汉提出，必须承认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他认为，要使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不能靠下命

148 利瓦伊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页 130。149 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 页 803。

150 利瓦伊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 页 129—130、148。

令，而只能通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民主党派平等协商的方式实现，同时必须尊重他们的组织独立性和自己决定自己问题的权利。他说，及时掌握民主党派的动态在政治上是需要，但掌握的方式，不能靠少数人打听小道消息，而是通过同民主人士交朋友。他说’ 封民主党派的重大问题我们要过问、要研究，必要时要提出建议，但次要的问题他们可以有不同的处理办法。151 利瓦伊汉并不是要放弃中共对民主党派政治动态的控制，他只是认为这种政治掌控的方式应该改善。即使如此，这些内容也没有在中央文件中得到体现。

2 民主党派可以监督共产党吗？

关于民主党派可以在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1956 年 4 月 19 日听取二五计划应报时，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监督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152 在 4 月 25 日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两个万岁」的思想。毛泽东解释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

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¹⁵³ 尽管在中下层干部中遗存在不少疑问，但在中共高层决策圈，允许民主党派长期存在已经达成共识。这裏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解释「长期共存」的理由时¹⁵⁴ 提出了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问题。

¹⁵¹ 利瓦伊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页 128—129。¹⁵² 《党的文献》，2004 年 1 期，页 24—25。¹⁵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94。

¹⁵⁴ 笔者注意到，《毛泽东传》所引 4 月 19 日谈话时的用词略有不同，不是「监督」而是「看着」，参见《毛泽东传 19761》，页 482。另据利瓦伊汉回信，「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后来概括」出来的，并未出现在毛的 4 月 25 日讲话中。参见《回信与研究》，页 813—814。当然，这些差别并不影响对毛泽东谈话本意的了解。

以往说到允许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原因时，主要是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的。首先是要利用社会人才和资能。各民主党派的成员中包括一大批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据 1955 年统计，全国教授、副教授 7499 人，其中民主党派成员 2110 人，占 28.7%，在全国高等学校正副校长、系主任以上的领导人员中，民主党派成员占三分之一左右。”其次，民主党派成员具有各种社会影响，尤其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各界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联系。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民主党派的中介作用不可替代，如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的筹备，民盟就起了重要作用。最后，重视民主党派目的还在于扩大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在实现这个目标中，不仅希望它们联系进步分子，更寄望于民主党派在「社会落后层」的影响力，包括资产阶级中的非「核心分子」，仍然存在有资产阶级观点「甚至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包括从清代、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旧军政人员等「散在社会上的旧中上层分子」，希望民主党派

在对这一「社会落后层」的教育转变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¹⁵⁵
现在毛泽东的提法有了很大进步，就是强调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咨询
价值和官僚主义作风的监督作用。这个想法显然与苏共二十大批判
斯大林，以及苏联缺乏民主生活的教训有关。在4月25日「论十大
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特意提到：「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
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毛泽东是
从「反对派」（或曰「在野」党）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他说：

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李立
炫、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
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
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15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页 803—804。

156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 5 料)，第二十一册’；1224—225¹⁵⁶所有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
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
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
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法，
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他们是反对派，又
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157

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甚至把问
题提到政党体制的高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
就是单一政党体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
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中央集权的政府，权太多了，很容易
养成官僚主义，要时常警惕」。「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
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周恩来还说：「在我们国

家，民主党派联接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能听到共产党听不到的意见，求大同，存小异，保持这个作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有利。」1955年8月8日，周恩来接见新西兰前工党议员威尔逊时说：我们的各个党派要继续长期存在，我国各个政党在宪法的原则上是相同的，但对许多问题的意见并不相同。没有不同意见，没有矛盾，就不能进步。我们要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不断进步。几个党互相监督，这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好处的。159

157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页 35。

158 (周恩来年谱 11949-19760^ 上卷' 页 572; 石仲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

曲〉，《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 页 35。159 (周恩来年谱 11949-19760^ 上卷' 页 574。

6月25日，利瓦伊汉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作〈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言。在这篇事先经毛泽东、邓小平审阅并同意的发言中，明确地把毛泽东关于「两个万岁」的思想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利瓦伊汉宣布：「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共产党与各界

民主党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是一个重大的方针。」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利瓦伊汉再次强调了尊重民主党派政治自由和独立性的问题。他说：「必须严格地尊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任何党派和团体对其他党派和团体的这种自由和独立都没有权利加以干涉。」^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正式写进了中共的决议。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也进一步明确了民主党派的社会地位，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关于「互相监督」的意义，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

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

「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利瓦伊汉的发言则具体地提出：「必须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以便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我们进行监督。」这些条件包括：组织定期的和不定期的视察；在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它国家机关的会议上充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各机关内部的共产党组织同民主党派组织和民主人士之间、各有关机关同有关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之间，进行座谈和协商等，这些做法「应当形成制度」。161

不过，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他在谈到「为了同官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时，列举了「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党（当然指共产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

160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页 158—159；利瓦伊汉：《回枪与研究》、页 818—819。

161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页 816—47—48、83—84、501。

督，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各级政府机关内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以及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这裏没有提到民主党派。162 当时正值共产党大力提倡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具有网领性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却闭口不谈民主党派对国家工作的监督，恐怕不是一时的疏忽。对此，民主党派是有所察觉的。

3 民主党派的响应和政治诉求

为了改进党同非党人士的关系，中共统战系统从 1956 年 3 月开始，对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长达一年时间的检查。3

月到5月，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秘书处党组首先进行内部检查，随后发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视察和检查统战工作，召开各种座谈，听取意见。5月21日，中央统战部发出文件，要求全国各级统战部门组织和推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检查统战工作，「揭发和批评」统战工作部门的缺点和毛病。在这一阶段的检查中，党外人士提出意见最多的是，民主人士「坐冷板凳」和「不受尊重」之类的问题。诸如他们提出，虽然得到安排，不少人却无事可做，或有职无权；统战部门同进步分子联系多，同中间、落后分子接触少，有时偏听偏信，助长了宗派主义倾向；不尊重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以多数压少数，堵塞言路；以领导者自居，只教育别人而不注意向党外人士学习；同民主党派进行民主协商少，尊重组织独立性差，等等。这些意见主要涉及的是在具体工作中，中共干部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关系问题，并没有涉及民主党派作为政党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利瓦伊汉在6月全国人大的发言，也着重地批评中共党内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问题，强调要正确处理机关、学校和企业内部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¹⁶³至于「互相监督」，特别是民主党派如何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尚未提出具体的办法。

16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页49—50。

163 利瓦伊汉：《回慷与研究》，页819；利瓦伊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页161。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不久，全国政协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根据这个方针开展工作。会议建议常务委员会增加会议次数，充实会议内容，除进行政治协商外，可以听取国家有关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本会各单位的工作报告。会议还决定设立地方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地方政协工作的调查研究和经验推广。¹⁶⁴

全国统战系统进行了第二阶段的检查工作，7月和10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两次民主党派高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各省市中共统战部也相应召开座谈会，民革、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民建、台盟等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其地方组织分别召开座谈会，交换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意见。主要媒体加强了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方针的宣传，仅《人民日报》就先后发表了聂国青、陈其瑗、鲁直、赵子懋、邵力子、熊克武、邓初民、沈志远、宁武等多位民主党派人士的文章。165 大多数民主人士对这一方针的公布「感到兴奋」，「极为感动」，认为这将带来「思想上的大解放」，是「民主党派新生命的开始」。中共提出这一方针，「对民主党派是一种荣誉，同时也加强了民主党派的责任」。166 在纷纷表示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外，也有人提出了究竟如何实行监督的问题。如民进中央委员巫宾三说：贯彻这一方针，不仅要使这一方针被各方面认识，而且速要有具体措施，在中央和地方有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便于交换意见，在各个单位也应有相当的组织形式或订立一定的制度，保证互相监督经常进行。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储安平说：怎样来进行监督会更有效果？是否要用制度来保证？他希望有关方面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167

也有人对中共的统战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主要是在统战部 7 月和 10 月两次座谈会上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的发言。这些发言「广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有些人顾虑在党内不能贯彻到底，有些人则认为只是一种宣传策略，用以安定民主党派的人心而已。关于对中共的监督问题，章伯钧等人提出：第一，监督应有法律的保障，民主党派对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第二，民主党派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党团」，每个党派的「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第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应付。关于民主党派的发展方针问题，章乃器批评统战部 1952 年提出以「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是圈结中小资本家，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对过去达成协议的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章伯钧一再表示不满，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关于中共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章乃器尖锐批评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并主张重新审查「三反」、「五反」的案件。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罗隆基、章乃器等人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中共党员，见到中共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座谈中，普通反映党外

人士有职无权，章乃器说他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不少人对某些党员干部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的甚至说：「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关于政协工作，有些人则感到安排政协委员只是政治待遇，平时无事可做，「政协成了座谈的组织、举手的机构」。章伯钧主张中国应实行两院制，使政协变成建议、监督、审核的机关，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议院。他还提议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成立政治讨论会，定期讨论国家大事，向党和政府提出政策方针的建议。168

168 李维 8|：(回慷与研究)，页 820—822。

显然，这些意见，特别是章伯钧的主张，已经超出了对共产党监督的问题。所谓建立「两院制」、「议会党团」、「政治讨论会」的建议和「质询权」的要求，颇有引进西方「议会民主」的味道。看起来，至少章伯钧本人对民主党派在国家事务中只是充当政治陪衬的角色是极为不满的。他的女儿章诒和回忆说：「1949 年后的民主党派应该做甚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章伯钧「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他说：『那样的话，我们民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169 罗隆基在反右派运动时向民盟中央作交代说：「在中共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章伯钧对我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1711 章伯钧可谓先行者，这些主张给利瓦伊汉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三十年后写回忆录时，他仍然认为当时民主党派「有些人表露出向我们争取更多政治权利的倾向」。不过，尽管利瓦伊汉对此是有所考虑，章伯钧急于参与政治和政权的主张在统战座谈会上并没有引起反响，「高级民主人士反映冷淡」，在当时也没有造成甚么影响。171

4 主动请民主党派办报纸

169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页 42。

170 《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171 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页 821—824。

17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页 1515~1516。

毛泽东特别重视报纸的作用，他认为报纸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是「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工作的一种武器」。’”所以，在推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互相监督」的方针时，毛泽东不但着手《人民日报》的改革，还考虑把《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交还民主党派主办、通过这些报纸来推动中国扩大民主的进程。1956年6月的一天，利瓦伊汉把章伯钧、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中央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肿」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反应十分积极，利瓦伊汉在会上说：「既然要恢复『文汇』，那就把『教师报』改过来吧。」章伯钧不赞成，说：「如果恢复，就恢复『文汇』的本来面目。」会后，罗隆基鼓动徐镛成、浦熙修「主动出击」，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汇报》复刊的打算。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对恢复这些报纸的「民营性质」极感兴趣，在一次聚会上，章伯钧兴高采烈地对徐镛成、储安平、萧干等人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光明日报》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要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

173

《文汇报》是一些爱国报人于1938年1月在上海租界创办起来，1956年4月「自动宣布停刊」。~《文汇报》一直摊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作者和读者，为甚么突然停刊呢？公开宣布的理由是，教育部要仿照苏联办一张《教师报》，并将《文汇报》的全部人员上调北京参加《教师报》的工作。实际上是《文汇报》当时已经有些办不下去了。兼社长兼总编辑徐镛成后来说，这倒不是因为受到中央的压力，而是中共上海市委负实人对党外报纸「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他们认

为这样性质的报纸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我国也不应该有」，因此要「改造和逐步消灭」。一个时期「《文汇报》和《新民报》被压得气都透不过来」。1955年调来一位中共党员副总编辑，他对人说：「我到《文汇报》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

173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页 32—33。

174 由于不同原因’《文汇报》曾三次停刊’第一次是1939年5月被日本人停刊’抗日胜利后复刊；第二次是由于倾向于支持共产党，1947年5月被国民党勒令停刊，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复刊。最近一次停刊是1956年4月。参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页 310。

这话是有来头的，正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认为上海的报纸太多，不便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此公来后，徐铸成实际上就成了「可有可无的顾问」。报社内部「不仅党群有矛盾，党内也有矛盾，牖内有墙，墙外有沟，一般干部对报纸前途都没有信心，过一天算一天」，直到「自动宣布停刊」。175

然而，《文汇报》的停刊颇有些不合时宜。就在这时，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推动争鸣，开辟发言之地，《文汇报》刚刚停刊就有人考虑它复刊的事了。《文汇报》复刊的主张，即使不是毛泽东首先想到，也一定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7月下旬，中宣部分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张际春约见徐镛成、浦熙修，正式通知他们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要他们立即写出复刊后的言论方针和复刊计划，迅速送中共中央审批。徐镛成提出了人事调动的要求，包括调回钦本立和一些得力的编辑、记者，调走那位党员副总编辑和「秘书」。对此，张际春满口答应。对复刊后的编辑方针，徐镛成颇有踌躇，特别是如何宣传「双百」方针，心中无底，于是向《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讨教。邓拓说：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要首先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甚么说甚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

要言论方针」。徐锺成大体按照邓拓的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送给张际春。张当面详细看了一遍，对徐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中央批示，先照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不久，中共中央就批准了这个方案，批文中特别写明「要让徐铎成同志有职有权」。徐铎成等人因对上海主要负责人「早有些戒心」，提出把《文汇报》办在北京，并由中宣部直接领导。但中宣部以「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而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为由，动员他们还是早日决定搬回上海出版。10月1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罗隆基负责，徐铎成任总编辑。化

《光明日报》最初由中国民主同盟创办，1953年改为由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业者联合会联合主办，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1955年元旦，《光明日报》为推动文字改革，在首都各大报中率先改竖排版为横排版。《光明日报》虽是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实际是由中共党组主持，中共党员常芝青任总编辑。1956年6月，张际春托人向统战部副部长于毅夫反映，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铎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此后，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到刚创刊的《教师报》报社拜访，对徐铎成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请章伯钧任社长，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徐铎成以他的班底都在《教师报》为理由，未予允诺。徐铎成婉拒后，中宣部考虑的第二人选是储安平，且由胡乔木亲自登门邀请。胡一直很欣赏储安平的才干，在谈话中，特别提到他编的《观察》很成功，联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胡希望储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胡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请些来帮忙。储颇为感动，欣然受命。11月，储收到章伯钧的信，称「各民主党派公推」他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储辑信表示接受。储安平当时感觉，章伯钧是受中共之托写这封信的，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私人渊源」。1957年1月，民盟中央接办了原属民盟北京市委编印的《争鸣》月刊，千家驹任总编辑，并将学术性刊物改

成政治性刊物，实施「以言论政」的办刊新方针。1957年4月1日，

176 徐筹成：《徐镇成回值绿》（北京：三联书店，1957），页 390—393；
徐縵成：《

历一九五七》’页 3—15；朱正：《1957年的夏季》’页 312—313。《光明日报》中共党组撤消，储安平接替胡愈之任总编辑，章伯钧继任兼社长。

章伯钧、储安平等人把办报看作对共产党实行监督的阵地。储安平说过：「《光明日报》要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有人评论：「如果说罗隆基、徐钺成、浦熙修办的《文汇报》，是要从新闻领域去实践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则是想从民主党派机关报的角度，来贯彻和尝试毛泽东所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了。」¹⁷⁸ 这个判断大体反映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于民主党派高层人士的真实想法。

5 被搁置的中央统战部指示

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在7月和10月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中共领导人当时并没有感到不安，中央统战部一方面把北京和各地民主党派的批评和意见汇集成七款四十八条，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提出的绝大多数意见，都给予了正面响应，另一方面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讨论这些意见，进一步研究改进中共同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¹⁷⁹

这次统战会议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是在说服中共党内大多数人接受「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事实上，在毛泽东关于「两个万岁」的说法传达下去后，党内就有许多人表示「不理解」。在山西、云南、甘肃等省机关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机关干部议论最多，分歧最大的」就是「两个万岁」的问题，很多人「思想搞不通」，

177 《徐缚成回忆录》’页 387—388；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页 34—40，79—80；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载戴晴：《梁漱溟、王育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页 190—192。

178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页 42—43。

179 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页 822—824。

甚至有些民主人士也不理解。一些干部认为，「这样办和理论原则抵牾，实际上也办不到」。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一切政党都是阶级的产物，又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阶级消灭了政党也就消亡了，这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的。这与现在的提法是否有矛盾。他们提出，假如剥削阶级被消灭后，民主党派仍然存在，那么这些党派算甚么性质的组织？有的干部认为，可以说民主人士万岁，因为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党和非党联盟，但民主党派则是短命的。也有人说，万岁只不过是思想认识而已。还有人提出改换名称后可以万岁，如民主同盟改为社会主义同盟。实际上民主党派也不可能万岁。因为现在民主党派中老年人多，这批人死了，年青人不愿加入，就自行消亡了。中共八大宣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党内外还是有人表示怀疑，他们提出：「在资产阶级消灭以后，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主党派为甚么还能继续存在？」「这些党派继续存在下去究竟还有甚么作用？」党外有人怀疑「我党提出的这个方针是不是一种手段？是不是真正要实现这个方针？」党内有人「害怕民主党派对我们实行监督，担心这样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会不会惹出更多的麻烦，不好办事？」181

针对这些思想情绪，会议认为，「还有必要依据八大文件向党内外作反复的阐释」。统战部从理论上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了三条依据：一是承认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和政治上的进步，「没有理由不让它继续存在下去」；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逐渐向劳动人民转化后，民主党派还有它的社会基础，就是「劳动人民的右翼」，「各民主党派将成为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的政党」；三是党的工作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当然首先依靠党内自我批评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同时还要借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批评和监督。182

180《内部参考》，1956年5月28日[^]页478—481；7月25日，页536—537；8月2日[^]页7—8。

181《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一册[’]页500、502。18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一册[’]页500—501。

利瓦伊汉还引用周恩来的话说：「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以此表达长期共存和合作的诚意。

183 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中央统战部起草了一份〈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作为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征求意见。同时印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吸收共产党员的补充规定（草稿）〉等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在民主党派中吸收共产党员问题以及民主党派的编制、经费、干部调动、生活待遇和物质设备等问题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在中共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更加明确地规定了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强调中共同民主党派是「平等的友党关系」，应当尊重民主党派「独立平等的地位」；指出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必须保持和加强，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党有超越它们之上的权力，决不意味着可以把它们当作附属的画体，决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去命令、干涉或者控制它们」。

文件特别批评了统战部门一些人不尊重甚至不承认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地位，常常通过他们内部少数进步分子「把持控制」它们的内部事务，如修改它们的文件草稿，干预它们的人事安排，控制它们的组织发展，以及民主党派的许多事务必须取得统战部门的同意才能决定和实行等等。文件要求「彻底纠正」这种「错误作法」。关于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作用，归结为「参」、「代」、「监」、「改」四个方面，即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代表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反映其意见和要求；对于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起监督作用；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关于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文件规定，应「由它们

自己决定方针和步骤，在它们联系的社会基础上自由发展」。统战部门尽可能地给予帮助。与年初出台的〈七年方针〉相比，关于民主党派发展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了。各民主党派的发展是否仍然要有

183 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页 823。「重点分工」由各总部协商决定，协商的结果仍然保留重点分工，但不机械地划分范围；不再坚持中共曾经提出的发展对象以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中上层为主，发展地区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建议」；不再限制其在铁路系统和工矿、企业中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党员。当然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不是无限制的，民主党派仍然不得在人民解放军部队、机关、学校和国防工业、外交、情报部门中发展党员；已经取得民主党派党籍的只能「个别联系」、「不得从事党派活动」。184

这个文件所阐明的观点和政策措施，是希望从制度上保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实行。如果照此实行，民主党派会有相当的发展并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这个文件只是一个「草案」，而且只是由中央统战部下发各地统战部门征求意见，而不是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党。它更多地反映了利瓦伊汉及其领导的中央统战部的意见，但并没有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后来由于反右派斗争兴起，这个草案自然地搁置起来，这些在利瓦伊汉看来是「正确的、积极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措施」，也没有形成正式文件。185

五民主的扩大及其限度

18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 58 料) '第二十一册' 页 500—506; 另见吉林省权荣鲔'

1-5/5-1956. 13' " ! 26~27~29—30。18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页 823—824。

1956 年，中共政治上松动的所有举措，包括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方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更大的主题，这就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尝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以克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阴暗面，画结更多的人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1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中共所作的一系列政治上的调整，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擦。然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新想法的产生，则直接与苏共二十大有关。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特别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对毛泽东带来相当大的刺激。据李慎之回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后不久，就听到胡乔木讲述毛主席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李慎之说：「这话，我们听了都很感动，看来情况大致也确实如此。」¹⁸⁶毛泽东的确有心为他塑造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创一种上下团结一心、人人轻松愉快的政治环境。

从苏联的教训中，中共领导人似乎觉察到了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端，希望通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来防范这些弊端。或许是基于「对立统一」的哲学理念，毛泽东把扩大民主理解为设立对立面「唱对台戏」。陈云说：「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哪襄有『唱对台戏』的，哪襄有『反对派』，那里的工作就搞得不好，否则，工作就搞不好。他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就有这个意思。有民主人士监督我们，对工作有好处。如果革命胜利以后，长时期没有『反对派』，只有一派人讲话，听不到不同的意见，那末，工作就会出毛病。」陈云还说，在公私合营企业使用资方人员也有「唱对台戏」的意义。他说：「要把资本家请来当『反对派』，专门同我们『抬杠』；越『抬杠』，工作就可能做得越好。」¹⁸⁷怎样「唱对台戏」？中共领导人想到的主要有四条：一是在科学文化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二是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三是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决断权；四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对于扩大民主而

言，如果说前两者主要涉及的是思想领域和方针政策问题，那么后两者则牵涉到国家体制的变动。

1956年，试行行政体制改革，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力，已经进入决策和实施程序。毛泽东在讲十大关系时专门论述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主张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毛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提高效率，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事实上，并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觉察到中央高度集权带来的问题，在毛讲话之前，国务院已经在酝酿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了。3月26日，正式成立国务院体制研究十人小组，研究国务院各部委的设置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从5月11日开始，国务院召开了持续几个月的体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有关部门的人员，分财政、计划、工业、事业、基建、政法、综合七个组，讨论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会议检查了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会议认为，在划分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职权时，应实行以下原则：（一）明确规定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二）凡关系到国民经济带全局性、关键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它企业和事业，应尽可能交给地方管理。（三）企业和事业的管理，应该认真推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四）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由各部门条条下达的办法。（五）某些主要计划指标和人员编制名额等，应给地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六）改进体制要逐步实现，某些重大的改革，应该采取今年准备，明年试办，到「二五」计划期间全面实施步骤，稳步进行。

188

对于适当下放行政权力，地方政府是积极的，中央部门则存在不少疑虑和阻力。6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体制会议上讲话就说到，

18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561、57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页11、39；《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

要：1949—1985》（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1’页 85。

「有些部门有这样的顾虑，怕分权后分散力量，影响生产、基建、技术和计划」。他解释说，不要怕分权，「适当分权给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中央」。他说：「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上 89 经过半年多的讨论，形成〈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10 月 30 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转发各地讨论，改革的基本精神是「适当地扩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决议草案提出：「当前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首要步骤，是先划分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管理职权，并且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权予以适当扩大，然后再逐步划分省和县、县和乡的行政管理职权。」

在 50 年代，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是权力机构，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被人们称为「橡皮圆章」，最多也不过是国事「清谈馆」。从当时中共对国家体制的认识水平看，对人大进行制度上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人们所作的努力仅仅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特别是把人大代表视察工作和人大常委会的信访工作作为与人民直接接触的渠道。1955 年下半年和 1956 年上半年，先后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进行了两次联合视察。这些视察除了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感受了「祖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外，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如 1955 年冬季，人大代表同政协委员联合视察高级知识分子情况，写出近 60 万字的害面报告。19] 一年内人大常委会收到代表来信 121 件，「有的反映了工作情况，有的对工作提出批评，有的提出了建议」。收到人民来信达 6874 件，接见人民来访 587 次。来信中检举反革命分子的 44 件，检举国家机辟干部逢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的 1367 件，不服法院判决的 305 件，对国家建设提出批评或者建议的 1074 件，反映政策执行情况的 551 件，要求解答有关法律法令问题的 305 件，要求就业的 1714 件，要求救济和要求帮助解决就学、治病等问题的 1514 件。192 可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和人大常委会的信访工作，对于直接了解民情和责行对政府的监督，遣是有意义的。

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就扩大民主、开闢言路进行了一些尝试。一个是让代表在大会上充分发言。这次会议有163位代表作大会发言，除了28位发言报告工作外，大多数代表都就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一个是在小组会上「允许辩论」，这在人大会议上也是开了先例的。再一个先例就是政府对人大代表的质询作出响应。周恩来在闭幕会上对代表们的批评意见一一作答，肯定「这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它的职权的表现」，他代表国务院「表示接受这些批评」。会后，所有代表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这个举动也是不同寻常的，「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194这几个先例，即会议辩论、政府应答质询和公开会议发言等，确实使这次人大会议显得生气勃勃，不同凡响。更有意味的是，周恩来把这些做法视为对「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的借鉴，「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195这并非周恩来失言，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似乎都考虑过这个问题。

1956年11月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特殊的阶层。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除了限制权力、加强监督等基本措施外，刘少奇还谈到西方国家的一些具体做法，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且是更退步了。」他甚至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

艾森豪威尔当校长、马歇尔（0^0I8^V3I51:1311）当
192《人民日报》，1956年6月17日。

19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页44。194周恩来：《周恩来8集》，下卷，页208。195周恩来：《周恩来8集》，下卷，页208。

红十字会长为例说：「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呢？」刘少奇认为，「资本主义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毛泽东也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表现出浓厚兴趣。据邓小平说，对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做法，毛主席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

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没有说明毛泽东这段话是在甚么场合说的，但类似的话毛泽东确实不止一次地说过。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198

毛泽东甚至想到过学习西方两党制，成立两个共产党的派别。毛的秘书林克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毛主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对人民专政，只是对反革命专政，随着反革命被消灭，专政的武器也要逐渐缩小三千万，缩小十分之九，则专政机关也缩小十分之九。但是这种机关还要存在，因国内还存在反革命，还会产生反革命，国外还会派进来。如何保证无产阶级民主，是否可以搞两个党

196 中央楼案馆编：《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9）’页 515—518。19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 333。198 这段话在公开出版时被删去了。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488—489。

（共产党）呢？这还很难设想。准备找四教授谈谈。」胡看来，毛泽东当时还没有立即搞两党制的念头，后来是如何请教别人的也不得而知，但他在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爆发时谈这番话，显然是又一次把

苏联的政治模式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做了对比。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中共并没有走得很远，尽管他们把已经和正在进行的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看作是扩大民主的重要举措。在4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和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就改革国家行政体制发言，他认为在制度上的中心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集权集得多也有好处，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搞起来了。但是，也有毛病，也带来了阴暗的一面，就是容易缺乏民主，忽视民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很容易生长出严重的官僚主义，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东西保留下来，甚至更浓厚起来。2007年8月8日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时周恩来又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已使国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可以扩大民主了。2(11

199 林克：《林克日记 11955—19640〔手稿〕'未刊'页15。

20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0'上卷'页567、569。

20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0'上卷'页596。

20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1^'上卷'页602—603。

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系统地说明了他关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观点。他说：「我们处在国际紧张局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的时期中」，「世界战争推迟的可能性加大，便于我们争取时机加速进行经济建设」。国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国外帝国主义还敌视我们，因此「专政应该继续」。

「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他指出，专政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他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202

怎样扩大民主？周恩来最看重的是两条，一是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一是中央与地方的互相监督。周恩来说：现在还不具备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的条件，但可以从另一方面来扩大民主，如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人大可以允许辩论；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

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公安、司法工作。他还说，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级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互相影响，相互监督」，这样做能够推动我们的工作，减少官僚主义。203 周恩来并没有否定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的制度，只是说现在还不具备条件。他希望通过加强人大制度实现扩大民主的目标。

2 专政也可以「宽一些」

1956 年政治上的松动，迺反映在中共年初提出的「今后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宽一些的政策」。2041 月 26 日，全文公开发表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首^了这种信息。鞭雕，不但可以允许脏好和富廉好入社，就 4^革命^^，除了有现行破坏活动和民, 大的应逮捕法鳅卜，其它罪行轻微或有悔改表现的，也都可以允许入社，成为「社员」。2052 月 21 日，董必武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肃反问题的报告，一方面肯定了 1951 年到 1953 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 1955 年肃反运动的成演，认为对于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绝不能够麻痹大意，绝不能有任何右倾的倾向」；另一方面指出，在社会主义高潮面前，反革命分子「愈来愈走投无路」，出现了「纷纷向政府投案自首」的现象。他以具体事例说明，反革命分子只要坦白和悔改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汲

2 月 20 日至 3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召开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在这个会^士，在镇反和肃反^1(1 中错捕、错杀的问题开始

203 周恩来：《周恩来瑰集》’下卷，页 207—209。

204 何茧阶、鲁明健主编：《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168。

205 《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6 日。206 《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1 日。

受到重视。最高人民法院的总结报告指出了「在办案质量上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提出今后「应该少捕一些，少杀一点，捕的必须是少

数非捕不可的人，杀的必须是极少数非杀不可的人；对于其它罪恶严重需要嚴懲的’判处长期徒刑或较长期徒刑」。这就是所谓的「少杀长判」政

策。加 3 月 15 日至 4 月 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

决定实行「少捕少判」的方针，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更多的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中央政法委副主任彭真在这两个会上都发表了讲话，核心问题是谈「宽一些」的政策。他解释说，政策的从宽从严是根据客觀形势决定的，形势需要从宽就从宽，形势需要从严就从严。湖「宽一些」的政策在捕杀反革命的控制指数和数字上也得到体现。

207 （当代中画的审判工作），页 68—69。

208 李士英主编：《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¹ 页 89。209 《中华人民共和国 8 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三卷’ 页 285。210 陕西省栅案 16，123-40-2，页 7—10。

2 月 11 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制定的捕、杀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刑事犯罪分子的计划，计划规定：195 牌全国逮捕 60 万左右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各种犯罪分子，杀掉 1.5 万到 2 万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各种犯罪分子。要求各省市公安部门侦破各种反革命案件 1.4 万件，侦破现有重大刑事案件 1.6 万件，新发生的刑事案件要求侦破 80 呢，1956 年再组织 60 万犯人投入劳改生产。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公安部 1956 年工作计划时，责成公安部修订计划，要求全国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数字「必须大大地加以缩减」。，4 月 28 日’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指出，「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当前镇压反革命斗争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需要「重新规定」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界限。文件大大放宽了对上述分子的界定和处理办法，明令废除 1955 年 8 月 13 日公安部拟定，经中共中央批准下达的〈关于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逮捕政策界限的规定〉。¹同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请示报告，决定逮捕数由 60 万修订为 24 万到 30 万名，杀人数控制在 2400 名到

3000 名以内。6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提出「1956 年采取少捕和着重政治瓦解的措施」。211

中共最初提出「宽一些」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估计，即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家屈服和投降了，反革命势力动摇和分化了。然而，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斯大林肃反「扩大化」错误，为这个问题注入了新因素。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大开杀戒的行为，不仅对苏联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就是中共党内外也不能不为之震惊。人们很自然地由斯大林的肃反联想到中国的镇反和肃反。事实上，怀疑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的声音已经有所露头。在 6 月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发言都承认：「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而且在个别的地方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是表现得比较严重的。」「捕了少数可捕可不捕的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完全不应该捕的人。」在各机关内部肃反中，在有的单位「发生过斗争面偏宽的现象，斗争了少数可以不斗的人，甚至错斗了个别完全不应该斗的人」。212 张鼎丞、罗瑞卿的这些公开表态显然是在响应来自党外的批评。

毛泽东的反应也是很敏感的。4 月 25 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提到：「应当肯定，1951 年和 1952 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现在有人听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一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至于肃反，他也认为，「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尽管一再为中国的镇反、肃反辩护和开脱，毛泽东还是藉着批判斯大林，提出了以后应「少捉少杀」的问题。他在讲话中反复拿斯大林的大清洗为例，说明必须记取的教训：「斯大林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人的脑袋不

2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1 第三卷，页 327。212 《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23 日、24 日。

像韭菜，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鉴于中国的情况是「遗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毛泽东提出了今后处理反革命问题的两条原则：一是「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二是机关、学校、部队要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213

至于一些民主人士从司法程序上对镇反和肃反提出的质疑，毛泽东同样不以为然。据林克日记的记载，7月17日，毛泽东在谈到镇压反革命问题时说：「民主党派中许多人过去是反共的，或者自己就是反革命，如龙云、傅作义、黄炎培、梁漱溟、张治中、刘文辉，或者他们的亲友与反革命有密切联繫，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不赞成杀反革命的，是同情反革命的。但是他们打出的旗帜是维护宪法，如黄绍竑，提出捕人四十八小时前应经监察委员会批准，否则建宪。」²¹⁴但民主人士从「维护宪法」的角度提出对镇反和肃反的看法，是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毛根本没有理解，反而认为他们不过是「同情反革命」。这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无法无天」的性格和轻视法制的观念。说到司法问题，毛的基本思路仍然是依靠党的政策行事，依靠党委办案。那些民主人士强调司法程序，与毛泽东的办案思路从本质上讲就是对立的。毛泽东的主张是：「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²¹⁵看来，无论是严厉打擎，还是宽大处理，毛泽东从来就没有从法制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的态度就认真多了。7月7日，刘听取张鼎丞、梁国斌汇报时就司法工作提出意见，除了重申毛泽东提出过的「少捕少杀」的原则以外，刘少奇特别地强调必须健全法制。他说，「如果再不健全法制，就容易出毛病了」。刘把健全法制主要归结为

21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36—3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489。214 林克：《林克日记〔1955—1964〕〔手稿〕》，页9—11。21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37。

「健全检察机关」，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并提出「不柱不纵」是检察院的奋斗目标，要求所有批捕的案件都必须由检察机关「过一下印」，必须经过检察院「这一关」。216 另有材料说，刘少奇 2 月在与最高检察院负责人的谈话中，就强调按宪法办事的重要性。他说：「在宪法公布以后，我们必须根据宪法条款处理事务。当案件是依据合法程序处理的时候，即使我们错捕了人和错判，这样的错误也是合法的。」如果这次谈话的时间准确，那么可以说明，刘少奇对法制的重视并不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但斯大林问题的暴露显然强化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5 月 30 日，刘在与最高检察院负责人的另一次谈话中甚至提出了「必须保护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权利」问题。他说，人们对保护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权利不敢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必须承担这个责任，目前检察机关必须更多地致力于防止错误和作出错误决定。事实上，彭真等政法领导人都已经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加强法制，那是很容易犯错误的」。217

无论如何，7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肃反工作的指示〉，决定对反革命案件主动进行一次检查。7 月 13 至 16 日，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联席会议，具体部署肃反检查工作。7 月 15 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他指出，专政是需要的，但并不等于说我们的专政工作就没有缺陷。拿甚么来弥补呢？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还有民主的一面。应该把民主的一面更加扩大，来弥补专政工作中的一些缺陷。他提出，要吸收民主人士一起来检查公安、司法工作，纠正工作中的偏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确定重点检查冤案和错案、积案、监狱和劳改队以及执行法律程

216 《刘少奇年谱（化——1969' 下卷' 第 371—372 页；《人民日报》资料室编：

《批判！中国赫鲁晓夫 81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 II 言论集〔1945.8—1957.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页 528。

217 博引自麦克法夸尔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哗组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 1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页 122、126。该寄引用的割少奇讲话多是「文革」中刊印供批判用的，在目前中园正式出版的"少奇文献中均尚未披露。

序等四个方面的情况。1956 年下半年，各地（西藏除外）人民法院对

1955 年下半年至 1956 年第一季度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其它刑事案件进行了普适检查或重点抽查，对查出的冤案、错案分别作了平反或改判。218 对于此后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中共根据情况的变化，大大压低了控制指标。8 月，中共中央博发肃反领导小组的一个文件说到，1955 年的肃反，全国已经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壤分子 38875 人（军队除外），只占参加运动人数的 1.439%，「将来全部定案完毕，估计反革命分子的比例将要达到 1.57。以上」。文件为 1955 年提出的 5 免的敌情估计作了辩护，说「有人看到，现在查出的反革命只占 2 免左右，便认为中央过去的提法不妥当，助长了『左』的偏向。这种看法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如果没有这个规定，可以肯定『左』的偏向还要大」。但中共还是大幅度地调低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控制指标，文件规定：「今后对于敌情的估计，我们认为应该将 57。改变为 27。左右」。1956 年第二批肃反就是改为按 2 免左右的「估计」执行的。

219 截至 1957 年 6 月，据二十六个省、市的统计，这批肃反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 37750 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 0.457%，最高的云南省为 0.917%，最低的新疆只有 0.137%，比第一批的定案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220 不过，从定案的程序看，尽管情况已有很大好转，但依据的仍然是按预先设定的比例追查和清理「反革命」的传统做法，真正的法制还没有走上轨道。

3 自由和民主的限度

218 《周恩来年谱 11949 — 19761》，上卷，页 599—600；《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 真 70—71。

219 陕西省榘案馆，12340-1' 页 128—132。220 陕西省楼案馆，123^40-49，页 49 — 55。

中国在1956年和1957年初展现出来的政治松动迹象和扩大民主的倾向，特别是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极大反响。

受到鼓励和刺激的主要是如波葡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中的改革派领导人和包括苏联在内的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一致赞同中共的新方针，认为这表明了一种民主化的倾向。苏联文艺界「极大多数同志认为陆定一同志的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221「保加利亚文艺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感兴趣」，甚至有人认为在保加利亚也应该推行。222 捷克党报记者则几次询问中国同行，在中共八大会上为甚么没有关于百花齐放方针的专门报告，并想索取有关发言的外文本。

波兰各界对中共的这一政策「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把「双百」方针与波兰正在兴起的民主化运动联紧在一起。苏共二十大以后，「波葡立刻出现了如狂风般的空前广泛、空前热烈而又空前深刻的全民性的政治、思想大讨论」，在波兰报刊和正式文件上都把这场大讨论称作「民主化的开端」。因此，当中共提出「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口号后，波葡各界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新闻界的同行还一再追问中国记者，「中国党在新闻政策上有甚么新的指示」。波兰党认为，毛泽东说的「对反革命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这句话，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最正确的原则。224

匈牙利党内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和群众则把中共视为自己的同志，据一位匈牙利外交官回忆，「1956年夏天，很多的反对派和匈牙利知识分子接受了这样的真诚信念，即中国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共领导人意圖的真实反映。这种幻想导致在布达佩斯的大部分革命者希望在起义中得到中国的支持。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上，人们经常会谈论那天的暴乱事件，最常听到的话就是『中国人和我们站在一

221 《内部参考》，1956年8月31日’页492—494。222 《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4日’页1209—1210。223 《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日’页21—22。

224 《内部参考》，1956年10月12日’页941—963。正因为如此，当10月19日苏联兵临华沙城下时：波兰人打出了「毛泽东支持我们」的大标语。详见本书第六章。起」。他评论说，中国的口号「对匈牙利事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25

苏联领导人的反应则完全相反。由于秘密报告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波澜，以及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的反苏情绪和杂心倾向不断加强，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节节后退。226 在这个时候接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无异于引火烧身。对于陆定一的讲话和其它详细介绍「双百」方针的文章，苏联报刊一直小心翼翼地没有转载。据中国记者反映，苏联人普遍无法理解为甚么要给唯心主义以宣传的自由。他们认为百花都可以放，但有毒的花是不能放的；百花齐放在自然科学领域还可以，但在哲学、文学界不行；这个方针只是迎合中国，不迎合苏联和东欧。多年以后，苏共中央害记苏斯洛夫的一份报告证实了当时苏共领导人的真实想法：「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同志们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引起了我们深刻的怀疑。」这「意味着放弃党领导文学、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原则」。多数东欧国家领导层的态度与苏联相似，担心国内因百花齐放出现混乱局面。如保共中央就认为，目前在保加利亚不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混乱」，「发生无法控制的情况」。保文化部遣为此专门作了两个内部决定。23(1

2251^1108 胁窗力’ ”丁^91111831^11^6^011111011311(1^疏^ P 10 化^5031111)8151! ”, 71X6

0x1710。”。”一，1^0.43(风^.1970 扒 122. 226 详见本寄第二章。

227 陆定一和于光逮曾到苏联使馆向尤金谈到「双百」方针的情况，尤金不以为然，道拿出一篇列宁的文章要陆定一学习。参见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页429—430。

228 《内部参考》、1956年12月17日，页347—355。1957年中国反

右派运动以后，苏联党认为，是「百花齐放」的理论导致了文化领域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活跃，导致了1957年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公开的反革命进攻」。1953，中2，011—415，几56力1

229! 中2，0化1，3.415,; 1.56-91.

230(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4日，页1209—1210。

显然，无论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误解了毛泽东提出这些新方针的本意。中共并无意在中国开展一场自由化或民主化的运动，所谓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都是毛泽东发动群众的一种手段工具。一方面，他希望以此动员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为工业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他有意借助党外的力量来冲垮党内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然而，毛泽东和中共其它领导人从来没有意欲让知识分子或民主党派来分享政治权力，从来没有设想过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也决不是像苏共指责的那样要「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文学、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原则」。这儿的自由和民主都是有限度的：对共产党的领导绝对不容挑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决不能有丝毫的背弃。

毛泽东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他对形势的乐观估计以及对他本人和共产党领导权威的十足自信。在毛泽东看来，经过改造的中国知识分子已在掌握之中，不必害怕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自由发挥和学术讨论中的自由争鸣。这种「自由」不仅不会有政治上的风险，还可以收到活跃政治空气、繁荣科学文化的实效。即使有人执意挑战中共的意识形态，也完全可以通过辩论驳倒他。正如陆定一所说：「只有通过公开争论，唯物主义才能最终战胜唯心主义。」至于民主党派，在毛泽东看来，他们人少势弱，且已经俯首帖耳，根本不会对中共构成现实威胁。所实行的民主措施，也是在维护和巩固共产党领导的范围之内，相信这些民主党派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百花齐放和多党共存，政治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目的：毛泽东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树立一种不同于斯大林和苏联的形象，表明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完全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即不是依靠行政命令，而是通过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实现自己的领导。

实际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并非基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陆定一报告所讲的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本来是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应当享有的言论自由。

231(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且规定：「国家供给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²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其涵义远比毛泽东、陆定一的解释广泛。它不只是知识界享有言论自由，而是所有公民都应当享有的自由；宪法也没有限制这些自由不能越出科学文化领域的界限。然而，在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阐述「双百」方针时，没有任何人援引宪法的这些条文。这正好说明中国社会的人治特点，政策依然高于法律。正因为宪法在人们心目中视有若无，知识界才把「双百」方针看作自己的「福音」。然而，依据宪法享有的自由，与「双百」方针所赋予的自由有着重大不同。「双百」方针既然是一种政策，一种手段，一种动员工具，执政者便可以收放自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之初，中共就预设了两个界限：一是它只限于学术和文艺，与政治无关；一是它只给予人民自由，与反革命分子无关。这就使得参与争鸣者随时可能因为触及政治禁区，或者被认为侵犯了政治而掉进陷阱，「人民」也就变成了「敌人」。

况且，在中共党内，多数人对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他们习惯于独携权力，不愿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习惯于舆论一律，不想让别人议论纷纷，更害怕争论；习惯于发号施令，不愿意有人在旁边评头品足，碍手碍脚，更何况这种监督来自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于是，这两个方针提出后，出现了党外热、党内冷的现象。

总而言之，中共在1956年倡导的扩大民主的政策和方针是缺乏法律和理念根基的，既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只是由于对形势的乐观估计而提出来的，那么一旦人们

对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变化，收起这些口号或者只说而不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不过，在 1956 年的夏秋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所以当中共八大把这些政策正式作为党的路线方针宣布出来的时候，还是给激动的国人带来了无限希望。

23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册，页 385。

第五章

八大路线：给国人带来的希望和思考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头，八大抓住了历史主题，改变了许多过去的传统做法：明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国内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承诺要改进中共的领导方式，加强国家的民主和法制；确定了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方针和二五计划建议指标，提出了一些改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设想；看到执政党面前的新考验，规定必须扩大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并且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应该承认，八大路线的提出表明，作为整体而言，在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影响下，中共领导层并没有因取得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伟大胜利而狂热，却展现出少有的冷静和理性的探索精神。八大路线给中国提供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也给国人带来了希望和思考。

在中国，无论在党史还是国史领域，对于中共八大的研究都是最热门的课题之一，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余年，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已有数十篇，还有一些专著，可谓成果丰硕!!。其中对八大历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应麝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钢主编的《中共八大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传（1949—1956）》也有两

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这两书的共同特点是直接引用了大量中央档案馆的楼案〔可惜注释极不规范〕，比较翔实、全面地描述了八大

历史的整个过程，最具参考价值。本章的论述，没有提供更多的新史料，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历史过程做进一步的梳理，并着重于分析八大文献本身，以对八大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中的地位做出比较客观的把握。

中国学术界和中共本身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中共八大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而把此后二十年内中国激进主义的发展道路及其后果，归结为对八大路线的背弃，同时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与八大连接起来。¹ 这种理解，大致说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作为历史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甚么八大开过不到一年，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的八大路线就被抛弃了呢？历史存在惯性，那么在八大路线中，有哪些地方保留了「革命传统」，而恰恰在这些地方为后来的激进主义发展埋下了伏笔？这个问题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八大的筹备和召开

中共中央最早酝酿召开八大，是在 1952 年，但最终确定下来是 1955 年 3 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八大的筹备工作由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以中央书记处秘害长的名义具体负责。准备提交八大的主要文件有五个：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早在 1955 年就成立了三个起草文件的班子，政治报告由刘少奇主持，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由邓小平主持，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关于建议的报告由周恩来主持。² 从 1955 年 3 月到 1956 年 9 月，八大的筹备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在这一年半的时间襄，国内外形势发展太快，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出现始料不及，这封八大的筹备产生了重大影响，八大的主题和指导思想因而几经变

动。

1 八大的筹备与主要文件的形成

1955年4月21日，邓小平提出了两个起草委员会名单，5月9日，皆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邓小平等七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塞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杨尚昆、邓小平、谭震林等九人组成。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正式作出召开八大的决议时，在八大议程中增加了一项，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后改为「建议」〕文件由周恩来组织国家计委的人起草。参见石仲泉等编：《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真118—119）。

在为八大准备的诸文件中，由胡乔木主要执笔的党章和党章修改报告稿形成较早。1955年10月20日，产生了党章第一次修改稿，只有条文，「党纲」部分阙如，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1956年4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产生第二次修改稿，补写了「党纲」部分。修改稿下发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了。这次修改最重要的内容是提出了实行常任制和增设中央副主席的问题。在4月2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以征询意见的口吻提出：究竟是设一箇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是否可以依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常任代表。他解释常任制的好处时说：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是党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就是一年开一次会、我们已经十年没有开代表大会了，有了这个制度就非开不可。是否可以考虑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根据毛泽东、刘少奇的意见，并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意见后，邓小平主持起草小组再作修改，加写了从中央到县一级党代表采用「常任制」的条文。但增设副主席问题尚未形诸于文字，仍在酝酿。

5月17日、19日、21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随后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部委党组发出通知，就是否设立常任制度和中央领导

机构设置两个问题进一步征求意见。关于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提出了两种方案让各地党组织考虑：一种是保持原来性质的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设一个副主席；一种是撤消原来的书记处，增设几个副主席，同时设一个办事机构〔仍叫书记处或用其它名义〕。7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讨论落实中央机构的设置方案、同时研究八大的选举问题。这个委员会由二十人组成，陈云为第一召集人，邓小平为第二召集人，包括了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之外几乎所有高层重要领导人：彭真、彭德怀、董必武、邓子恢、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谭震林、黄克诚、谭政、刘澜濂、林枫、乌兰夫，颇具权威性。

8月5日，邓小平将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方案上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核阅」。这个方案对中央领导机构设置作了重大修改：一是中央副主席由一人改为若干人；二是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三是另设中央书记处，置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之下；四是提出在必要时设立中央委员会名番主席一职。毛泽东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但在「副主席若干人」之后，又加写了「和总书记一人」。他已经考虑选出一名总书记，与中央副主席一起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后，8月17日形成了党章修改稿，随后又完成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稿。在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上，除对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人选向与会者作了解释外，这两份文件没有再作大的变动，即付通过。³

相比较而言，八大政治报告的形成则经过了多次反复。最初的报告草稿是陈伯达1955年12月写出的，刘少奇看后印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审阅。但这份草稿只有引言和国际问题，其它部分仅列出了标题。此时，无论是执笔人陈伯达，还是主持人刘少奇，思路还极不成熟，在此后长达七个月时间裹再未提交草稿。个中原因，主要是1956年初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在国内是1955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国外是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的召开。1955年3月最初确定召开八大时，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尚未出现，

因此八大的任务自然是继续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以推动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心。以后不久，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接着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也出现高潮。可以预见，到八大召开前，全国已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也就提前实现了。于是，对八大必须提出新的任务。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思想，同时要求以此为中心思想准备八大。刘少奇立即召集中央座谈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部署八大的准备工作。刘少奇要求大家以「反对保守主义」来「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⁵就在全党准备以反保守主义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指导，推动经济建设「跃进」的时候，苏共二十大传来一声惊雷。

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中共党内外也引起了极大震动。面对连苏共自己都承认的一系列错误，中共领导人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苏联道路并非没有缺陷，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封建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⁷与此同时，刘少奇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一直在听取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受此启发，也开始做大量的调查研究。

⁷ 韩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页 511。⁸ 详见本书第三章。结合苏联的教训和中国的具体问题，毛泽东在 4 月下旬反复讲「十大关系」，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经济建设的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新想法。刘少奇由此认为，「论十大关系」确定了八大政治报告的基调。当年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 1956 年 4、5 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余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随后，

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辟系为网要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⁷ 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以及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高潮后出现的新情况，也引起了中共其它领导人的忧虑和思考。如陈云对社会主义改造后新问题的观察和对策，周恩来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想法，刘少奇、董必武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想法，利瓦伊汉关于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和统一战线的想法等等，都为八大路线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内容。特别是周恩来提出的在经济发展中稳步前进的思想，对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起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1955 年底毛泽东提出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作为准备八大的指导思想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都是赞同的。但是不久，周恩来等人就察觉到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提出要稳步前进。为此，周恩来甚至与毛泽东发生了正面争执。反冒进得到刘少奇和陈云、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多数财经工作领导人的支持。到 1956 年年中，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已经从反对右倾保守转向重点反冒进，口号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毛泽东对此甚为不满，但没有表示反对。⁸ 这一指导思想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当年经济建设的方针和二五计划的指擦，而且直接影响到八大的准备，并成为八大路线的重要内容。

从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过程可以看出，八大路线的主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的，但在当时中共高层比较民主和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八大路线是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妥协的产物。

2 预备会议的「三大工程」

8 月 22 日至 9 月 13 日召开了中共七届七中全会，8 月 30 日至 9 月 12 日又召开了八大预备会议，为八大作最后准备。这两个会议在时间上交叉进行，只是与会者的范围不同。参加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有七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61 人，列席的有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害记 42 人；参加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的有八大代表 946 人。⁹ 最后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三项内容：

一是讨论确定八大的主要文件，二是提名并预选新的中央委员会，三是准备大会发言。

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遗常常单揭同割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多，

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历时一年多，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种会议、约谈、会见等 130 余次，其中，商谈政治报告 40 次，修改党章报告 33 次，二五计划建议 18 次。与此同时，还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及军队大单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组进行讨论。1(17 月以后，毛泽东本人也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文件的修改中，特别是「自始至终主持了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2从 8 月上旬到 9 月 14 日这一个

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进行了「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载录，关于政治报告的批语和修改有五十二条(处)，关于党章的修改和批语二条，关于修改党章报告稿的批语一条，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稿的修改和批语四条，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的批语三条。3

8 月 22 日政治报告初稿提交七中全会论时，仍然很不成熟，稿子长达九万字。在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不满意地说：政治报告九万字，要搞七个半钟头。他要求「大作修改」，有些地方要重写，篇幅砍掉三分之一。刘少奇也认为，这个草稿是个「毛稿」，「没有搞好」。

「这个稿子是很多人写的，不是一个人写的，因为今天一定要印给大家，所以就编辑一下，凑合拢来，有点应付的味道」。他希望「大家出点力」，「集体创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布：「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报告」。4

根据毛的意见，七届七中全会对政治报告提出了重大修改意见，篇幅大幅度压缩，许多部分「打乱重分」，一些部分重写。起草工作密锣紧鼓，到预备会议的第三天，形成政治报告第四个修改稿。此后的修改工作是在胡乔木、陈伯达等主要起草人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进行的。主要执笔人写出修改稿，分送毛、刘、周（部分遣送陈云等其它领导人）审改提出意见，再交起草人改定，打印成稿，送中央领导人。各部分稿子往往是并行操作，交叉进行。

直至9月13日，才印出政治报告最后定稿的主要部分，而最后一部分「党的领导」的印出，已是八大开幕前一天〔9月14日〕夜里11点钟了。关于二五计划建议和关于建议的报告两份文件，以及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也都是在八大开幕前一天最后定稿付印的。八大文件的形成显得十分仓促，但也体现了一种集思广益的民主空气。

12《毛泽东传1949—1976》》’页513。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2年，页136—169。

14《中共八大史》’页122—123。从1955年4月算起，政治报告的起草经过了一年零四个月，前后各种修改稿达八十多份，整个报告经过了五次大的修改，其中吸收了很多人的意见。毛泽东对此很满意。他在9月13日七届七中全会闭幕会上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15《毛泽东传。1949—1976》》’页512—516；《中共八大史》’页158—168。16《中共八大史》，页124。

17 李雪峰：〈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断回忆〉，（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页9。

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题，是协商提名和预选中央委员会。八大中央委员会选举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完成的，提交给八大的是一份等额候选人名单，八大正式选举只是分出委员与候补委员，以及按照得票多少排出名次而已。与以往惯例不同的是，这次中央委员会的协商和预选，采取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多次协商和预选的程序。这或许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在党内实行民主选举的一种尝试。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个原则：中央不提名单，由代表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然后由各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集合起来，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制定预选名单，发下去，各代表团进行预选，再由政治局集合，

制定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候选人名单。”名单 86 釀和预选工作是 8 月 30 日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进行的。最初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约 400 人，“经过上下反复酝酿，于 9 月 8 日拟定出一份 170 人名单，其中七届中委 67 人，新提名者 103 人。9 月 10 日，陈云在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说，拟定这个名单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次是各代表，送中央政治局的名单。绝大多数代表团提出了两个名单，一个是各位代表和代表小组提出的名单，一个是代表团领导人综合斟酌的名单。第二次是中央政治局与代表团正副团长讨论的名单，提出了 150 人、170 人、190 人、210 人名额不等的四个名单。第三次是中央政治局与

代表圈正副画长一起，在充分讨论了四个名单后，最后确定了一个 170 人的名单。这个名单注意到了党务工作和群众工作、省市工作、国家机关工作、军队工作、文化工作、妇女工作、民族工作、外交工作等八方面。9 月 12 日，各代表团进行了第一次预选，170 人被提名为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只是没有分出委员与候补委员。¹⁸

这种下上结合、反复协商的做法确实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¹⁹ 不过，选举的原则还是事先确定的。毛泽东在会上的几次讲话，表达了这样的意画：一要照顾党内资历，二要显示公道，三要凸显党的画结和宽容的形象。毛泽东面对的主无矛盾，是僧多粥少，不好平衡。因此他不得不划出一条界限：只选红军时期的老干部，「三八式」干部一律不进中委。8 月 30 日，毛在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干部，他们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了。²⁰ 9 月 10 日，毛泽东在第二预备会上回答了提名是否公道的问题。他说，有很多同志，论才，论德，论犯错误的情况，他们都很好，但是没有列上，是否不公道呢？他解释说，问题是这个名单要扩大，就要扩大到二百多、三百多。他风趣地说，照这样下去，到革命胜利四十年的时候，可能要搞个两三千人的中央委员会！那就只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不要开代表大会了。毛泽东进一步说，不公平的事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我们力争求得

比较公平一些。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21 李雪峰回怼说：「在一次筹备会上，毛主席就选举中央委员问题专门指出：这次一些年轻的省委害记没选上，先让一让老同志，让他们先『过过瘾』。实际上，主席讲的不仅仅是让一让的问题，而是让大家注意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在后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一些年轻的省委害记也都补选进中央委员会。」22

22 李雪峰：〈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断回忆〉，页 9。

23 1956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曾 16 告其回国参加八大，8 委托李富春访苏时看望王明~希

望他能回国参加八大。王明称身 9 一直不好，回去的可能性不大。参见 89 明复：〈? 1^

李 X 春访间苏联〉，《炎黄春秋》，2005 年第 4 期，页 26。9 月 8 日，王明回电刘少奇，称病请假，明确表示不能回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 页 95—97。

25 毛泽东在一次同波菊大使的谈话中说到，中国领导人对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没有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在八大上选举王明和李立三进入中央委员会就是例证」。餐舞基里洛克致拉帕茨基电，1956 年 12 月 4 日，。^, 01. 10. 1996 卜 5. 126-128.

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毛泽东特意坚持要选两个人：李立三和王明。这两个人都曾是党内「错误路线的代表」，区别只在于李立三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继续在党内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而王明在延安整风后一直心有怨气，耿耿于怀，建国后便长期住在莫斯科。。在 8 月 22 日的全会上，毛泽东提名李立三和王明进中央委员会时说：一些代表会有抵触，但把他们两位都选上比较有利。一则是「涉及党内许多人」，他们的思想还有代表性，二则是考虑「党外的观感」，让人「觉得我们不轻易抛弃」犯错误的人。在 8 月 30 日的预备会上，为了进一步说服代表，毛泽东对李立三、王明作了一个阶级分析。毛说，他们代表着党内一百万知识分子党员，而这些知识分子「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由于「这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前怕龙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所以^选举

王明路线和李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表示我们对待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这样比较有利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在全世界也有影响。”这裏所谓党外的和世界的影晌，就是联繫到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大开杀戒的情况，以显示中共与苏共的区别。15

至于对大会发言的安排，主要的原则就是人要多，面要宽。在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要求发言「不要太长」，要「精彩」、「活泼」、「多样化」。同主要文件的起草一样，代表发言在会前也做了专门准备。发言稿都报送大会秘书处审阅，有些还送中央领导人审阅。如彭德怀、李立三、周扬等人的发言稿就曾经毛泽东亲自审阅或修改。26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大会发言「对工作有意见，对党的团结有意见，要有批评，要有丰富的批评。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是一个『好』字就行了，逮要多讲干甚么？」27 毛泽东既需要生动活泼，也需要集思广益。

「三大工程」是围绕着八大的一个主题展开的：重点是国家建设，八大的议程安排和主要文献都凸显了这一主题。不仅中共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及关于建议的报告是八大三个主报告之一，而且刘少奇政治报告的重点和主要篇幅也是讲经济建设问题。28 此外，重点讲建设这一主题也反映在大会发言的安排上。大会发言的内容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教育、外交、国防、法制、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十分广泛的领域，而工业受到特别的重视。邓小平要求，工业方面除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外，还要组织二十多篇稿子。他说「这样才能表现出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29 从广义上说，八大讨论和决定的所有议题，包括健全国家政治生活，正确处理国际事务，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等，都是围绕如何完成工业化这个「巨大任务」展开的。毛泽东本人对此更是情有独锺。8月22日，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毛泽东说，政治报告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主要的迹是建设」。30 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

会议上进一步说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毛泽东下面一段话，表达了他对达到「强国」目标的渴望和雄心：

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超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具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

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51

3 八大的召开及其特点

30 《中共八大史》，页 123。

3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 88—89。

32 《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16 日。

中共八大于 9 月 15 日召开，历时十三天。大会场面宏大隆重，表现出一个连续取得胜利的执政党兴盛发达的景象。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 1021 名，列席会议的候补代表 107 名。参加大会的还有在京的党、政、军、群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以及来自世界五十六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和劳动党代表团。32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虽然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共产党召开代

表大会邀请世界各国党派代表，出席已成惯例，但在中共历史上这还

是第一次。当这些外国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代表们兴奋地感到，中国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党。33

尽管会议代表和参加者人数众多，但在八大召开过程中，只有一天的分组讨论，其余时间都是集中，开大会。毛泽东作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与中共七大不同，毛泽东把大会的主要角色让给了刘少奇等人，这也是开了一个先例。八大期间，毛泽东表露出有逐步退出第一线的考虑。他曾对外国客人说：「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其目的是「集中精力思考大事，思考大的理论和战略问题」。34

除了主要报告以外，会议的日程基本上由 68 个大会发言和 49 个外宾致词所占用。”在总计 183 篇大会发言、书面发言和未刊发言中，包括了中央领导人、地方各级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国家各部委负责人的发言，也有来自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或普通党员代表的发言。36 八大发言之多，范围之广，在历届党代会中绝无仅有。不过，应该特别注意的，不是大会发言的数量，而是其内容。尽管自七大以来，中共的事业可谓一路凯歌行进，但多数发言并没有像苏共十九大那样歌功颂德，而是就各自领域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发表意见，并提出建议，其中也不乏批评。这种务实的基调，是年初以来形成的探索气氛的继续，也与毛泽东在会前的招呼有关。这些大会发言不只是对主要报告的展开，而且提出了一些主要文件没有深入涉及的极为重要的问题，成为大会主要报告的重要补充。因此，这些发言是研究八大历史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根据七届七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八大开幕后进行了第二次预选，97 人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73 人被提名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然后，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正式选举。与按姓氏笔划排序的惯例不同，当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均按得票多少排序。37 从预选到正式选举的程序看，如此公开透明，在中共党内以往的选举中是少见的。不过，从选举的原则看，中共依然无法跳出「论资排辈」和「打江山者坐江山」的窠臼。毛泽东提出的「三八式」干部一般不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原则被代表们

所接受。其结果只能是把一批稍有现代知识的干部摒于领导层之外。在 170 名正式中委和候补中委中，大多是刚刚脱了军装的职业军人，他们久经战场洗礼，习惯于服从命令和发号施令，却缺乏组织经济建设之经验和必备知识。不过，这也是中共党员成份的实际反映。八大时，中共党员 1073 万人，其中工人党员占 147.0%，农民党员占 69.17%，知识分子党员占 11.796%。³⁸ 中央委员会的这种结构，也就是当时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状况。在毛泽东看来，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他在 9 月 10 日的讲话中无奈地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否领导科学工作、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委员会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毛提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 100 万到 150 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中央委员会的成份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³⁹

37 详见《中共八大史》，页 342—347。

38 《八大文瞰》，页 98。

39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 102。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一个任务：「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它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⁴

4 八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

八大闭幕的第二天〔9 月 28 日〕召开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

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濂、杨尚昆、胡乔木。还选出了由十七名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刘澜濂等五人为副书记。⁴¹

40 《八大文献》，页 106。

41 《中共八大史》，页 348—349。

42 《中共八大史》：页 124—125。

中央领导层组成的最大变化是增设了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这件事酝酿已久，早在 4 月 28 日有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党内打招呼。在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两次就这个问题作出说明。8 月 22 日，毛泽东说：主要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是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俩副主席，把两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两个，把三个打死了，还有一个，统统打死了，还有个总书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⁴²9 月 13 日，毛泽东讲话又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设几名副主席是刘少奇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说：「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二是毛泽东对中央设一线二线的考虑。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我是准备好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派一个名眷主席。」⁴³说是为了国家安全和工作便利，但很难说在高岗事件之后，毛泽东就没有权力制衡的考虑，而刘少奇则可能想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是一种危险处境。

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七大的十三人增加到十七人，并增选政治局候补委

员六人。继续当选的九名七大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怀（另外四名，任弼时 1950 年病逝，高岗 1954 年自杀，康生、张闻天降为候补委员）。新当选的八名政治局委员是邓小平、林彪、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刘伯承、贺龙、李先念。其中林彪、邓小平已在七届五中全会增补为政治局委员。从名单看，政治局的变动主要考虑了两个因素，一个是在中共取得政权中发挥的作用，如 1955 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有七位都进入了政治局（新增五位）。另一个考虑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如新选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为政治局委员，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都反映了这种考虑。这种安排是基于中共政治现实的必然选择，然而，同中央委员会选举的缺陷一样，政治局仍然由革命家组成，其中军事将领和由军事将领转业而来的领导人占绝对多数，而懂经济的还是很少，搞科学技术的则根本没有。这种结构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此后二十余年中国发展的某些特点。

4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 111。

在中央政治局中，有两个人的地位下降值得引起注意：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康生。彭德怀是七大政治局委员，又携抗美援朝战争的卓越战功而归，出任国防部长和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然而，在中央政治局中，却排在新当选的邓小平、林彪、罗荣桓、陈毅、李富春之后。邓一直受毛重视，尚可理解，但林彪建国后长期养病不出，另外三人过去的地位和影响更不及彭。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在那时对彭德怀已经不信任，亦可说明庐山会议时毛泽东为甚么会因彭的一封私人信件就大发雷霆，并藉此改变初衷。

同样是从政治局委员滑落为候补委员，张闻天的情况党内尽人皆知，没有疑义，但康生不仅降为候补委员，而且排名还在陈伯达之后，这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议论。据调查反映，山东、河南、天津、武汉等地机辟干部和民主人士议论最多的是选举结果。对康生、张闻天这次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感到奇怪」，特别是认为康生的资格很老，过去在党的领导人中排名紧在陈云之后，位列第六，而这次不仅降为候补

委员，且排名倒数第二，「变化太大了」。“康生的地位滑落，明显地表明他在毛泽东那裏已经失势。至于为甚么失势，麦克法夸尔有一个猜测：「导致他降职的直接原因可能是由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后在共产党阵营中普遍掀起对秘密警察的反感。」⁴⁴：考虑到康生在延安整风期间的所作所为及其给中共干部留下的印象，这个判断不无道理。⁴⁵

在新的中央领导人中，有两个人得到了明显的擢升，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陈云。邓小平地位的上升并不突然。1954年6月，邓就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秘书长。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邓便以秘书

44(内部参考)，1956年10月10日’页854—855。

45 麦克法夸尔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哗组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页224。46 关于中共延安整风的情况，有两本很值得181读的专著：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延安整风连串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何方的《党史笔记》，上’下册（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⁴⁷长的身份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委以负责八大筹备工作的重任。不过即使有了这些铺垫，邓在八大中央政治局裏的排名从最后一位上升到第六位，并被挑选作总书记，成为六大常委之一，其地位的显著上升也是超出常规的。邓表示对出任总书记一职「有点诚惶诚恐」，自己安于担任秘害长这个职务。毛泽东不能不就此作特别的推举，毛说：「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害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毛赞扬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

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47 看来毛选择邓，一是看重他的才能，二是相信邓在未来的党内斗争同样会站在自己一边。

4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 111—112。

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 3? 年谱〔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 56。

陈云的擢升是理成章的事。1950年6月，「五大害记」之一的任弼时病重期间，中共中央害记处就决定，陈云参加害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组成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团。48 陈云是中共最重要的财经专家，自建国以来一直是财经工作的主要决策者，显露出经济管理才能，得到毛的赞誉。不过在崇尚战功的年代，相比于那些战功卓著的将帅们，陈云仍然感到自己出任中央副主席「不顺」。为此，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推举陈云说：「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确实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和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陈云不顺，你们大家评论。」毛还以陈的家庭出身来加强其砝码，毛说：

「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裹工人阶级成份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裹头就有一个。」49

二八大的路线和成果

中共八大之所以引起史学界持久的兴趣，主要在于它制定的路线。所谓八大路线，其核心是重新估计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化建设上来，「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5。从革命转向建设，这是中共政治路线的一次重大转变，也是

中共对自身从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初步认识。

1 政治报告与政治决议「悬案」

八大政治路线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估计：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包括：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这两次胜利，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正在消灭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农民和其它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领导阶级；知识界已经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抗美援朝战

49 《毛泽东文集》1 第七卷' 页 112。50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页 117。争制止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焰，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总之，「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1 对于这条政治路线，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作了一个更加精到的概括。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近百年间，中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中国共产党早就指出，扫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工业化

问题。现在，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已经基本扫除了。虽然还有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前提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52

51(八大文献) ' 页 11—72。52(八大文献) ' 页 809—820。

与刘少奇的政治报告相比，决议新增加的内容，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主要矛盾的分析。在此之前，中共在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历

来都是讲阶级矛盾或者民族矛盾（民族斗争说到底也是阶级斗争），而八大决议却提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这是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在中国史学界，人们讲到八大的伟大功绩时，大多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分析列在第一位，认为这是八大路线的理论基础。同时，在研究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也出现在这里。现在看到的材料可以说明，八大政治路线的形成是经过较长时间酝酿的。把工作重点转到工业化建设上来，正是毛泽东在 1955 年底 1956 年初社会主义高潮刚刚出现以后最先提出来的。1956 年初中共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国十二年发展纲要，中国，技术十二年发皿割，就是在为贪现这一转变做准备。1956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毛泽东看来，「目前我国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的最终完成指日可待，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必然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大大地发展工业

和赓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531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也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是已经被决定了」。这为社会主义工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54 这样一种估计在党

内高层有着广泛的共识，并且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过程中日益明确。7月13日，刘少奇在与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的谈话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巨大胜利，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资本家、地主'富赓都将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557至8月间，刘少奇在为修改政治报告稿起草的一份手稿中，在分析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时指出：在中国，由于1955年下半年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缠基本上解决。「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在两次伟大革命胜利之后所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生产力，特别是要很好地利用业已组织起来，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富裕起来。」56这是八大政治路线的最初表达。57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及，就是八大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的结束。58 辟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底毛泽东最后确定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广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认为，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数据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而完成过渡任务的时间「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59 八大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但在八大政治报告、八大决议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没有提及过渡时期结束的问题。

56 《11：的文献》'2000年第6期'页16。

57 有研究者注意到'在刘少奇的正式报告中'「中心任务」改为「现时的任务」'「使国家和人民都9裕起来」的奋斗目标，代之以「俸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参，王双梅：〈刘少奇与中共八大政治路镍的确立〉，（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页24—25。

58 这曾引起人们的疑问，参见黄景芳、汤塘霞：〈试析党的八大未宣布过渡时期结束 95

缘由〉（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页59—62。59 中共中央文”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页316—317。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问题就出在1956年初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原来设想，过渡时期的两个任务，即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大约会同时完成，甚至认为工业化是辟键，「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

改造的物质基础」。“这两个任务完成，过渡时期即结束。现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虽然突然提前完成——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没有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而工业化的任务才刚刚开始，自然无法宣布过渡时期结束。不过，关于过渡时期的表述确实需要修正一下，应该更准确，更全面。考虑到这一点，八大通过的党章确定，所谓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任务还是那两项。”所以说，八大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法，与过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62

真正引起争议的是八大决议，特别是其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八大过后不久，毛泽东就对决议中的一些说法表示不满意。

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以后，八大决议受到了更多的指实。文化大革命中更把这个决议与所谓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联接起来。63 那么，八大决议究竟是怎样起草的？「主要矛盾」的说法是谁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最初对决议不满是甚么时候提出来的？其异议主要是在是指决议的哪些内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八大「悬案」。64 从楼案文献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是在会议期间临时动议起草

的。直到大会正式会议开幕，没有任何起草决议的迹象。65 据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胡绳的日记记载，八大正式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

即9月17日，才提出搞一个决议案。66 决议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9月19日邓力群、田家英、胡绳等人分头写出第一稿，当晚大会主席，进行讨论，没有通过。9月19至22日，毛泽东连续数次约陈伯达和胡乔木「谈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的修改问题」。9月23日由胡乔木写出第二稿，约八千字，分为十个问题。67 毛泽东看过此稿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9月24日修正草案〕〉，于9月24日晨5时吩咐杨尚昆，用电话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决议草案，并于当天下午2时以前，各个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集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68 24日21时至翌日1时20分，毛泽东召集大会主席团常委和各代表团团长开会，讨论修改决议草案问题。在此基础上，由胡乔木主持再作具体修改。26日改出，即为〈9月26日修正草案〉，又发大会各组讨论。当晚，毛泽东主持主席团常委会再次讨论、定稿。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决议草案上批道：「即送胡乔木同志：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时间是9月27日晨2时。69 胡乔木在最后定稿的打印稿上，又作了少量文字修改。70 当日下午大会一致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71

搞一个政治决议的主意究竟是谁、因何提出的，现在无从考察。不过，从上述事情发展过程看，决议的起草虽然仓促，但其形成经过了大会主席团（包括主席团常委）研究和大会代表分组讨论，并多次修改，绝非草率之作。关键的问题是，所谓「主要矛盾」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到底是如何提出的。据现在可以看到的档案，关于主要矛盾的说法，第一次是出现在

「9月24日修正草案」中：「在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同我国各族人民一起，解决这个新的矛盾，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72 胡绳回想说，提出「当前主要矛盾」的，可能是胡乔木。73 既然决议稿是胡乔木起草的，这样说

是可以理解的。但应注意、在胡起草过程中曾多次与毛谈话，因此也很有可能这个说法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在历史转折时期，对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重新判断，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维方式。这里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据华北代表团 9 月 24 日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记录，薄一波传达了毛泽东对决议草稿的意见，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⁷⁴ 这裏所谓突出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意思就是讲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⁷⁵

后来在分组讨论中，「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的提法受到西南代表面的质疑。9 月 26 日提交大会主席团常委会讨论的稿子，已经删掉了这句话，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改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广业国的实际之间的矛盾，就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这种落后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赓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⁷⁶ 直到 27 日凌晨毛泽东批示「付印」的决议「定稿」中，还没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但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出现了这句话。

据胡乔木回忆，这句话为陈伯达所加。⁷⁷ 陈伯达自己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个说法。⁷⁸ 但据韩销查阅源文件，在决议最后「定稿」上留下的却是胡乔木的修改笔迹。⁷⁹ 看起来，这句话很可能是陈伯达提出后由胡乔木加到决议稿上去的。在决议中加上这句话是否经过了毛泽东的同意？有两种说法：胡乔木说：「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⁸⁰ 陈伯达说没有经过毛泽东过目：「我修改好决议后，已经来不及送毛主席看。原先的稿子他已看过，这时已不好再去

打扰他。这样，我修改好的稿子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了。」⁸¹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考证，「毛泽东于 27 日下午 1 时 10 分至 1 时 50 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⁸² 由此可以确定，陈的回忆有误。尽管事情仓促，

毛泽东事先还是知道并且同意关于主要矛盾的这个表述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匆忙间他没有留意这句话），但正是对这句话，毛泽东后来表示不满。

关于毛泽东如何表示不满的，也有几个人的不同回忆。陈伯达在他晚年的口述中回忆说：「〔八大〕会后叶飞告诉我，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⁸³ 王光美回忆说，「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哟，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⁸⁴ 邓力群回忆说：「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的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的比较。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泽东讲的这个意见。」⁸⁵ 这些回忆表明，毛泽东确曾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反复谈过他有不满意。但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回忆有一个共同点，即毛泽东当时表示不满的，只是表述主要矛盾「实质」的那句话，并没有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的基本判断提出异议。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论断，是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即使在 1957 年 10 月重提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时，毛泽东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

81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慵》’ 页 139。82 《毛泽东传 11949—1976》》’ 页 537。83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页 139—140。

84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载王光美、刘源等着，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

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 页 25—26。85 搏引自《毛泽东传 11949—19761》’ 页 537。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⁸⁶

到此为止，笔者研究的结论是，所谓八大「悬案」已经解决：第一，这个决议与刘少奇没有甚么关系，从头至尾都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完成的；第二，决议的主旨是讲阶级矛盾已经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了，

这个结论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关于表述主要矛盾的实质的那段话，毛泽东事先匆匆看过，没有提出异议；第四，所谓「先进」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无非是说生产关系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生产力还很落后，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表述可能不是很严谨，但本意不错。至于毛泽东后来的种种说法，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最后一点，毛泽东对这种表述不满意、如胡乔木所说，「也包含一点他后来表现出来的另一种倾向，就是觉得生产关系还不够先进，还可以更先进」。87 后来毛泽东提倡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概就是这种思想的发展。

2 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方针

86(毛泽东传 11949—19761》’页 538。

87 胡绳：〈谈党的「八大悬案」〉’页 66’毛后来说：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句话是错误的，所谓落后的生产力，这是拿来同外国、同将来作比较的。生产关系现在是国有化，将来可能是洲有化、球有化。参见毛泽东在听取上海等地同志汇报思想工作时的插话’1957年4月。

88(八大文献) ’页 29。

关于经济建设，总目标还是工业化，即「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但八大提出，「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88 这个提法把过去「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口号具体化了，提出了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并且提出了「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概念。

为了实现工业化的总目标，八大规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方针政策。其中贯穿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必须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89 这个指导思想在几个文件中不断地得到强调。周恩来在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总结了四条经验教训，第一条就是「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

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90 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完全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建议，他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91

这个方针是基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经验提出来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周恩来在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五计划期间「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如在制定 1955 年计划时，由于前两年废业减产，基本建设规模定得比较小。结果造成财政结余过多，重要建筑材料出现一时的虚假过剩。又没有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用出口的办法来解决物资积压的问题。到了 1956 年，由于上年度农业丰收，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胜利，基本建设规模又定大了。各部门出现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造成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关系的时候，也曾部分地犯过错误。周恩来承认，「我们计划工作还缺乏经验」。他感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裏，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特别应当保持谨慎，尤其是在编制长期计划时「要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年度计划中积极发挥潜力，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92

另外也是对苏联、东欧国家经验的借鉴。「以苏为鉴」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主题，波兰、匈牙利等国出现动盪以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经验教训更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苏联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先发展重工业的，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发展轻工业、废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

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周说‘发展重工业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过分地束紧裤带」，人民群众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重工业也还得停下来。周特别提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93

9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页 211—228。93 周恩来：《周恩来 91 集》’下卷’页 230。94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页 220。9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199。

应该指出，贯穿于二五计划建议中的指导思想，在八大是取得了共识的。除主要文件外，大会的许多发言，包括李富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邓子恢等国务院领导人以及许多地方领导人发言¹都赞同二五计划建议中体现的基本精神。整个大会期间，没有人再提「多、快、好、省」和〈就业四十条〉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到〈工业四十条〉时，也是讲它带来的消极后果。²甚至毛泽东本人对此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95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积极稳妥的建设方针在本质上就是力求正确处理各种比例关系，使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稳定发展。八大明确地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作为指导方针，特别是其中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二五计划建议中作了认真的考虑和安排。如何保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也是大会发言谈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李富春发言指出：国民经济的各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方面过分突出和过分落后，都会引起比例关系的失调，妨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他提出，必须认真加强综合平衡、全面安排的工作。³薄一波在发言中，总结 1956 年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快造成各方面失调的教训，提出应当合理规定基本建设支出与其它方面支出的比例关系，同时合理规定基本建设支出中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投资比例，以及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关系。否则，同样会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调。⁴邓子恢从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高度来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他批评有人认为合作化后工农联盟问题就无足轻重了，农民的利益就可以不加重视了，就可以

利用组织起来的便利条件采取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而不必再走群众路线了。他警告说，这样工农联盟「甚至有被破坏的危险」。他提出要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保持工农业发展相适应；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处理国家资金积累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在农副产品税收与工业农业产品价格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比例，在征用农民土地和调用民工等方面也要照顾农民的利益。⁹⁸一些地方负责人的发言也都强调国民经济发展必须做到综合平衡，这是他们几年来领导财经工作得出的一条共同的经验。

96《八大文献》，页 452—454。97《八大文献》’页 228—239。98《八大文献》’页 358—364。

现在看来，这些发言的愿望都是好的，对过去的教训也有所领悟，提出积极稳妥、综合平衡的方针更是符合国情的。但是如何贯彻落实这些方针，却没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同「十大，系」一样，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都只是一种原则，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要照顾这个，又要照顾那个，到底怎样才算积极稳妥、综合平衡，没有确切的说明。在实际贯彻这些方针时，无论中央和地方，又都无法摆脱两个既定的前提。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铁的规律，这是不能突破的界线，所以中共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提出：「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标志。」第二，中国工业化的建设项目是以一五计划为基础展开的，二五计划的许多项目又是一五计划的继续，而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属重工业。这些项目既不能停顿，也不能下马，像刘少奇批评的，「有些同志想把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降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100 在这种前提下’要改变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比例，调整其它各种关系，余地有限，实际上也很难办到。

第一，关于发展速度。鉴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经周恩来等人努

力，八大决定放慢一点建设速度，以体现「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周恩来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¹¹⁾ 1 八大确定的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是经过很大努力压缩的结果。与年初设想的

9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出版

社，1993）’ 页 360。100 割少奇：《割少奇迹集》’ 下卷’ 页 228。101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 下卷’ 页 233。

计划相比，工农业总产值指标降低了 27%。，粮食总产量指标降低了 21%，棉花总产量降低了 46%。原来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产量达到 3000 万吨，八大把这个指标压缩为 2000 万吨到 2500 万

吨。旭然而，这裏所谓的「放慢」，只是与 1956 年初提出的高指标相比较而言的。从实际情况看，八大的有些指标仍然偏高，如二五期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6.27%，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加 260 亿斤，大大高于一五期间农业生产预计的增长速度，是不切实的。八大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要求也是过急的。会后不到一年，国务院会议就决定消减一些无法完成的指标，撤消部分进口设备合同。¹⁽¹³⁾ 正是由于基本观念没有转变，更严重的后果是，1958 年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大跃进」运动便轻而易举地发动起来了。第二，关于积累与消费。国家建设的规模主要决定于积累的规模。然而，如何规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又是计划经济的一个难点。积累过高势必妨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积累过低又要降低工业化的速度。鉴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因积累过高、挤压人民消费而引发社会动盪的教训，八大辟注的重点在于防止高积累的倾向。薄一波甚至提出，正确地解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工业化过程中「头等重要的问题」。通过对一五计划实践经验教训的分析，薄提出了三组比例概念：在通常情况下，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 20%；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 30%；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 40%。¹⁽¹⁴⁾ 薄一波是八大代表关于经济问题的发言中唯一把抽象原则量化为具体指数的人。但是，这个比例却是高于一五计划

的。一方面八大的建议提出，「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稍高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达到的 7 又平」，具体规定，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从一五计划的 35 左右提高到 40 左右。’。! 另一方面，八大又规定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二五期间要使职

工的平均工资提高 2098 到 3096，农民的全部收入增长 25 先到 307。。化实际上，在继续维持高积累的情况下，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承诺是难以实现的。这裏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具体解决。

第三，关于资金分配。在八大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中，保证工业能够获得较高速度的发展，是分配投资的主要考虑。规定在投资总额中，工业投资所占比重由「一五」的 58.29% 提高到 60% 左右；农业，水利和林业投资所占比重由「一五」的 10.9% 左右提高到 12% 左右。工业投资中，应当提高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同时要保持运输、邮电、文化、教育、科学、保健、城市建设和商业等部门投资的适当比例。各行各业投资比重都要提高，那么出路何在？八大的一个重大考虑，就是在预算中降低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比重，争取把这两项费用所占比重从「一五」时期的 32% 左右降到 20% 左右。1(17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增加建设费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进一步节减军政费用。党中央在 1950 年已经确定了这个方针，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这个方针没有能够早日实现。」1118 周恩来后来也谈到放慢国防工业的步子，主要是感到国际局势缓和下来了。105 这裏便出现了一个问题，一旦国际局势紧张，原来设想的投资比例必然被打乱。这种情况不久后就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了。

第四，关于工业布局。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的工业重点是逐步移向内地。这主要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为了改变七成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各省的畸形现象，二是为了防止战争破坏。然而，工业重点内移使得沿海的优势得不到发挥，现有工业基础的潜力得不到挖掘，其

结果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八大提出，「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裏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必须在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有计划地新建

和改建中小型企业」。¹¹⁰在这里，所谓「适当」调整，就是说并不改变工业内移的总方针，而只是充分地利用近海地区的有利条件来帮助内地工业发展。所以，周恩来虽然承认「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但仍然指出，「必须在内地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不可动摇的方针」。¹¹¹结果是，基本状况依然如旧。

以如此篇幅来论述八大经济方针的缺陷，并非否认中共领导人的良好愿望和周恩来等人的良苦用心，主要是想探讨一下这一方针难以贯彻始终的根本原因，而对这一点，以往的研究略显不足。当然，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讨论是下面几章的任务。

3 改进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设想

最能体现八大在实践中的探索精神的，应该说是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初步检讨，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改进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设想。这种探索在大会主要文件中有所反映，但大部分内容是体现在大会的发言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陈云作的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他集中地谈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体制问题，提出了一个改进计划经济体制的总体性设想。¹¹²

陈云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八大之前，陈云已经多次讲话提请全党注意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出现的新问题，如由于改造过急，手

¹¹⁰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页 229—230。¹¹¹ 《八大文献》’页 129。

¹¹²：《八大文献》’页 326—336。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明出处。工业和服务业合并过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品种灭少，服务不周，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农业合作化过快，家庭经营减少，导致部分农副产品生产下降；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只顾生产大路货，不愿增加品

种，产品货不对路，等等。1月20日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1月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陈云两次就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失业生产问题发言，率先提出了这些问题。6月18日，陈云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再次发言谈有关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在此期间，陈云就工商业、手工业改造问题作了多次调查研究。出陈云在八大的发言，集中了他半年多来调查了解的情况和观察探索的成果。

陈云把新体制建立后出现的新问题归结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过去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不能继续沿袭。这种情况包括：一、国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这种办法在过去是必要的，以后对于重要的轻工业产品也仍然要统购统销，但如果仍旧不加区别地沿用这种办法，就会使一部分工厂不像原来自销时那样关心产品的质量。二、国营批发公司大部分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制度，使商业部门向工廩订货的品种规格灭少了，难免在一些地方发生积压或脱销现象，给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的不方便，并且造成资源浪费——陈云把这种现象称为搞「政治经济」。三、目前的市场管理办法限制私商采购和贩运，实际上造成农产品、农业副产品由当地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独家采购，没有竞争，农副产品就会灭产。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能及时跟上，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这些错误包括：一、手工业过多地实行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不利于手工业的经营。一部分手工业产品发生了质量下降、品种灭少的现象，部分服务性的手工业合并经营后对居民和手工业者自己都发生了许多不便；二、私营工商业改

造中也出现了一些盲目合并现象，产生了同手工业盲目合并类似的问题；三、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对应该由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注意不够，加上其它方面的影响，使部分农业副产品的生产有些下降。

对上述问题进行总结，陈云认为下面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资本主义生产「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

为解决「小范围不合理」的问题，陈云提出五条改进措施：第一，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把商业部门对工厂实行加工订货的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产品；商业部门除部分重要商品继续统购统销外，对品种繁多的日用商品逐步停止统购统销，改用选购办法。第二，工业、手工业、广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实行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盲目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绝大多数合营工厂不应合并成大厂；服务行业和手工业中要把大合作社改为小合作社，把统一计算盈亏改为各合作小组或各户自负盈亏；小商小贩在合作小组内各自经营的办法应长期保存；广业方面许多副产品生产应放手让社员分散经营。第三，在坚持主要广产品统购统销的前提下，对部分广副产品实行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第四，价格政策必须有利于生产。不要把物价稳定简单地等同于「统一物便」或「冻结物债」，应允许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暂时涨落。第五，国家计划管理办法，应有适当变更，做到「管而不死」。既要管好市场，又不把市场搞死。陈云解释说，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在我国出现的不畜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中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陈云归纳他的上述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业生产的主体，按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翻阅八大文献可以看出，经济体制问题确是八大讨论的一个热点。除陈云外，李富春、邓子恢等国务院领导人和一些地方领导人的发言都涉及到经济体制问题。原因很简单，在三大改造高潮后，各级经济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普遍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社会主义改造引发出来的一系列新矛盾。

李富春提出了改进计划工作体制的问题。他承认在计划工作中存在「不全面，不准确、不灵活和缺乏远见」等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为：一、国家计委兼管长期计划与年度计划，并一度兼管工业、行政和基本建设，忙于日常事务，缺乏系统调查研究，因而造成计划下达迟，变化多，对各地方的特点了解也不够。二、各部门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欠缺，对中央工业注意多，对地方工业、商业、文教事业注意不够，在沿海与内地联系上对沿海工业的利用注意不够；在工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供应三者关系上出现了偏差；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中物资平衡不够，引起经济上和财政上的紧张。三、在体制上，没有恰当地规定分级管理的范围，对各地方各部门管得过多过死。如何改进计划工作？除了要求系统了解和研究中国经济情况，加强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工作，掌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外，李富春特别提出，要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工作体制。分级管理的原则是既照顾到集中统一，又照顾到因地制宜。凡需要全国统一平衡的各项重要指

114 《八大文献》，页 326—336。

标，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综合平衡，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列入国家计划统一下达；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属于地区平衡或者各部门自行平衡的各项指标，即由各省、市、自治区或各部门自行平衡安排，并报国务院备案。其它许多次要的、种类繁多而无法一一纳入国家计划的指标，由地方或各基层单位自行安排，国家只从大的方面加以筹划，并从价格、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他还建议，国家计划指针可分为指令性指针、可调整指标和参考性指标三种。115 随着三

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计划覆盖面的扩大，计划管理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弊端开始显露。李富春提出分级管理和计划指标多样性，是希望通过分权和给计划体制注入某种灵活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农业合作化体制问题，是代表发言谈得最多的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邓子恢的发言。1955年为了合作化的速度问题，邓子恢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论，被批判为「右倾」，「小脚女人」。然而，邓子恢并没有因此而三缄其口。在大会发言中，邓子恢警告说，不要以为合作化以后就万事大吉了。他从两方面提出了改进合作化体制的意见：一是国家同合作社的关系；一是合作社同社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关于前者，邓子恢主张，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保持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逐步改变现在由国家规定生产指标的制度过渡到只规定各省的调拨指标，各省、县只规定各社的征购指标，国家经济部门则与合作社订立经济合同，合同之外可自行安排生产计划，在征购任务之外农民可以自由支配，「国家不要样样去干涉他们」。关于后者，邓子恢主张，在分配上要采取「少扣多分」的方针；在生产经营上应采取「大的集中，小的分散」的方针，合作社主要搞好广业生产和大宗副业生产，把利于分散经营的副业和手工业都交给社员去分散经营；允许社员有一定的劳动时间自己支配，去经营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而不应该去限制他们」；在生产数据的处理方面采取「主要公有，次

115 《八大文献》，页 447—456。195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增设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年度计划；国家计委负责长期计划。

要私有」的办法，土地、耕畜和农具归集体所有，小农具、小工具和零星树木和家畜、家禽等都归社员私有；在处理社员之间的关系上必须采取「双方兼顾的政策，既照顾贫雇社员的利益，又照顾中农社员的利益」。在合作社的组织领导上必须实行「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原则，实现民主办法。116

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了不少代表的呼应。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如湖南的周小舟、四川的李井泉、河北的林铁、内蒙的乌兰夫，福建的叶飞、广西的陈漫远、新疆的王恩茂、陕西的张德生等

人的发言都指出，农业合作化中存在过分集中统一、过分强调一切公有化，社愈大愈好等倾向。周小舟介绍了湖南合作化后襄村紧张的情况：合作社对于耕牛、农具等生产数据入社时作价压得过低，因此引起部分广民不满，甚至发生了一些糟踏、破坏生产数据的严重现象。在经营方面，连零星的家庭副业和分散的手工业，如打草鞋、捉鱼、捞虾、养猪、养鸡、理发、缝衣、编织、挑渡、运输等等，都统一归合作社经营。合作社对社员劳动时间卡得过紧，不安排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和种菜的时间，也不许他们到社外去劳动，某些社员反映：「入了社一点自由也没有了」。¹¹⁷ 林铁说：农业合作化的教训是急躁情绪、过高指标。合作社不能保证 90% 的社员增加收入，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生产投资没有量力而行；二是计工计，不合理；三是农业增产，副业减产。林铁还指出，合作社的规模过大，全省建立的联村、联乡的大社占 33.02%，其中五百户以上至数千户的占 23%，大社广户占总广户数的 60% 以上。¹¹⁸ 张德生说：不少农业社不顾条件追求大社、大队、大组，生产秩序混乱，「派活乱点兵，做活一窝蜂」，只靠命令办事，不和群众商量，以致部分社员产生了干部怎么说就怎么办的消极情绪；只顾生产，不大关心社员的生活和健康，弄

¹¹⁶ 《八大文》' 页 352—364。¹¹⁷ 《八大文献》' 页 733—738。¹¹⁸ 《八大文献》' 页 204—210。

得社员既缺少零用钱，又缺少照顾家务和休息娱乐的时间，有的甚至号召社员「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电灯」，造成过分紧张的状况，以致有人说：「农业社确实好，就是累的人受不了！」¹¹⁹ 逢有许多人针对忽视家庭副业生产和社员收入减少的情况，提出了与邓子恢类似的政策建议。¹²⁰

对于手工业、商业过分集中的问题也提出了批评意见。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指出，手工业改造高潮中「出现了不适当地办大社、办多行业的综合社，盲目地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以致在有些行

业原有的供销体系被打乱了，产品质量下降了，品种花色减少了。在修理服务行业中，有的地区不当地撤销和合并服务点，既造成群众不便，又使社员收入减少。这些缺点错误，应该总归加以纠正」。他谈到，三大改造后「自由市场已基本消灭」，手工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都受到种种限制，不少地区出现停工待料现象。为此，白如冰提出了两条改进意见：一是在进行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时，必须特别注意保持手工业不同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保持手工业与大工业之间应有的分工，不能千篇一律地要求手工业向大工业看齐，变修理业为制造业，或者拼掉手工业复杂多样的小产品。白如冰主张，对集中生产显然有毛病的，应坚决地有准备、有步骤地割为小社、小组，单独核算；有的户继应当允许其分散生产，自负盈亏。他认为，「集中生产与分散生产，统一核算盈亏与分别核算盈亏，不仅是组织形式的问题，而且是生产和经营制度上的一项重大变革」。二是在市场方面，呼籲手工业所需原料应当纳入地方工业计划，商业部门要给予便利；各种地方原料和废品废料应该允许他们自购自用；手工业大部分产品应当允许其自销，也可以直接与工矿企业、农业合作社等建立销售关系。

商业部部长曾山发言指出，日用工业品生产和分配中存在着品种减少，质量下降，质次价高的现象；某些产品供应不及时，花色品种不对路，这裹积压，那裹脱销，不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他认为，这是因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使一部分工厂不再关心产品在市场上的销路，因而不热心提高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在价格政策上没有执行优质优价，次质次价，没有给新产品试制以支持。工厂和商业部门各自都强调计划性，某些计划订得不恰当，订得过死，无法适应经常变化的市场需要。国营商业部门自上而下的调拨、分配的办法使基层单位不能根据居民需要组织货源，以致长期存在商业调配不及时、花色、品种不对路的情况。他主张把日用工业品分为两类、大宗商品仍然实行统购包销，花色品种复杂的零星商品商业部门优先向工厂选购，选购剩下商品工厂可委托商业部门代销，允许工厂根据市场需要变动生产计划。曾山认为，实行自由选购的办法，「是商品分配方法上的一个重大变革」。1:2

辟于经济体制问题，在事先准备的大会主要文件中虽有所涉及，但论述不够。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指出：「在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企业时期所采取的许多关于购销关系的措施，现在必须改变，代之以适合于目前经济情况的措施。」「我们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

121 《八大文献》'； 1579—584。122 《八大文献》' 页 639—645。

市场的补充。」123 周恩来的报告也提出：「今后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与此相适应，「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¹²⁴然而，总的来看，这两个报告对体制改革问题都没有深入阐述。显然，大会代表关于改进经济体制的讨论，是八大文件的重要补充，也使八大路线进一步得到完善。这些发言，特别是陈云提出的改进计划经济体制的总体设想，被大会所接受，成为八大路线中最具思想性和理论价值的一部分。八大决议吸收了这些意见，提出：¹²⁵刘少奇：《刘少奇选集》' 下卷' 页 237。124 《八大文献》' 页 140、139。125 《八大文献》' 页 813—814。

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从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考性指标。如果把这一部分产品勉强列入国家计划，或者把参考性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针，对于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同样，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在对于公私合营的工商业和合作化了的手工业、小商业、农村副业进行经济改组的时候，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解决集中经营或者分散经营的问题。如果把应当分散经营的勉强地合并起来集中经营，那也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25

八大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讨论，反映了中共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新认识。不过，从总体上看，这种讨论并没有也不想突破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除毛泽东外，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内的中国领导人，都是计划经济的崇拜者。他们原本不知计划经济为何物，后经苏联的直接帮助编制出一五计划，最后好不容易才把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中共刚刚尝到计划经济的甜头，当然不会对计划经济本身发生根本的怀疑。即使发现了问题，也认为是执行中的错误。所提各种意见和建议，只是希望为这种模式注入一些灵活性，使计划经济适应中国的情况，以解决经济生活中已经暴露出来的矛盾。

对于苏联式计划经济最没有好感的，恰恰是毛泽东。计划经济要求严格的比例和平衡，要求一丝不苟、照章办事，这与毛泽东不讲常规、不拘约束的特质格格不入，更不用说计划经济必然带来的官僚化、科层化及其对基层和群众活力的限制。毛泽东在讲十大关系时，没有提到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也许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避开计划体制问题。不过，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不满，也不是从制度上反对这种经济模式，126 而是对那种一味讲求平衡和四平八稳的做法看不惯。所以，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没有按照一般的逻辑思维导向对市场的重视。他的思路更注重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更多地发挥地方积极性，同时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突破计划的平衡和填补资金的缺口，创造奇迹和高速度。这种思路实质上就是用行政命令来指挥经济，走到极端就是后来大跃进式的「命令经济」。

还有一点必须看到，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国家所有制，而在所有制问题上，八大似乎传递了矛盾的信号：一方面，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个体经济和分散经营作补充，后来甚至提出资本家还可以开工厂；另一方面，又把消灭资本家和个体劳动者私有

126 毛在 1955 年曾充满激情地写道：「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页 503。

制残余当作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127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两种思路，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里表现出来的矛盾，不过是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罢了：前者是暂时的策略性退却，而后者是最终必须达到的目标。因此，从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水平来看，八大不可能提出从根本上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

4 对国家民主和法制的呼籲

从多方面提出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这是八、大路线的一个特点。八大政治报告认为，中国实行「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的国家制度已经表现了它的优越性，但并不是说国家制度已经一切都完备了。又特别指出，在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严重地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因此，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128 围绕这一任务，八大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

第一，，加强对国家工作的监督。八大提出的监督国家工作的途径有四个：一是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一除了各级党委经常检查各级政府中党组织的工作以外，党委的各个工作部门应当负责建立起对于有关的政府工作部门中党组织和党员的经常的监督。二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中央一级政府的监，和地方各级人大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三是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四

是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八大政治报

127 大愈通通的！11 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 1；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参见《八大文献》' 页 822。

128 《八大文献》' 页 49。告特别强调：「必须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凡是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须受到应得的处分。」129

第二，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地方与下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这既是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也是为了广泛地发挥地方和下级国家机关的积极性、机动性，「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

13(1 改进国家行政体制，是当年提上国务院议程的一件大事。5 月至 7 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检查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提出了一份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下发征求意见。周恩来在八大的报告中，对改进国家行政体制作了详细的说明。报告提出了划分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职权的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有一定的计划' 财政' 事业' 物资、人事管理权等。这些原则，中心问题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适当扩大地方的权限。报告要求，这项工作今年准备，明年试办，到二五期间全面实施。131

第三，继镇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八大政治报告在说明中国「完全新式」的政权的性质时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同时又有其它阶级、其它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无产阶级专政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这与马克思、列宁的设想不同，与苏联的做法也不同。除了考虑到历史原因，刘少奇还解释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比较早地掌握了现代的文化，并且掌握了一些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是我国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拥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一个阶级」。因此，希望通过继缩维持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

的联盟，继续吸纳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政权，团结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此相适应，八大重申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129《八大文献》’页 49—50。130《八大文献》’页 50—51。131《八大文献》’页 141—142。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有两个政治目的：一是利用民主党派去做团结、改造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工作；一是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132

第四，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尊重民族自治地区的各项自治权。具体做法是大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实现自治机关的民族化；继续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包括发展工业；克服「大汉族主义」，同时防止和纠正「地方民族主义」等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政策。八大规定：「凡属少数民族地区尚待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由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并且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相区别的政策，从容处理。

八大关于国家政治建设的另一项内容是呼籲建立和健全国家法制。由于中共历来以政策治国，从不重视法制，所以八大提出这个问题就特别令人感兴趣。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把健全国家的法制规定为「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这与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来的苏联破坏法制的严峻事实有关，也因为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建设必须建立起一个有稳定预期的社会秩序。刘少奇解释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在这个时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

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刘少奇说：「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

132 《八大文献》’ 页 46—化。133 《八大文献》’ 页 51—52。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¹³⁴八大决议也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秩序。」¹³⁵ 从以政策治国到以法律治国，从依靠「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到希望建立「完备的法制」，这是中共执政思想转变的第一次明确表达。他们的认识已经开始接触到公民权、互相制约等现代社会管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尽管还停留在表面上。

关于对国家法制的呼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的大会发言最值得重视。¹³⁶ 在中共领导人中，董必武无疑是最具有法制理念的。董必武在发言中强调的重点，是当前建立完备法制的必要性。他说，开国七年来，我们已经有了宪法和许多重要法律、法令和法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还有许多法规，如惩治反革命条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惩治贪污条例、农业税法、工商业税法和私营企业条例，以及政府有些部门的组织条例等，由于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应该修改的还没有修改，应该重新制定的还没有重新制定。

「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的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他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¹³⁴《八大文献》’ 页 53—54。¹³⁵《八大文献》’ 页 817。

136(八大文献), 页 253—264。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明出处。

除了法制不完备,董必武更多地谈到了有法不依的问题。他举出种种轻视法制的现象。如对于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会议的次数,宪法和

各组织法都有明文规定。可是有些县、乡两级人大,甚至个别省人大都没有按期开会。不倾听代表的意见,不按照法律规定的手续撤换代表,限制代表向人大反映群众呼声等建法现象时有发生。再如,有些地方党委存在着党政不分的现象,党委往往直接发号施令,代替了一部分地方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还有,经常发现有建法乱纪、侵犯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现象,甚至有的人自命特殊,以为法制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可以超越于法制之外。董必武特别指出了执法中的违法问题:有些地方对于违法犯罪的人犯,只注意他是否逢法犯罪,而不注意严格履行法律手续;有些司法人员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手续拘捕人犯,限制被告人行使辩护和上诉的权利;有些监所和劳动改造单位的管理人员虐待犯人等等。

董必武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轻视和蔑视法制现象的原因。他指出,就历史根源说,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旧统治的法制中进行的;夺得全国的政权以后,我们又彻底地摧毁了旧的政权机关和旧法统。所以仇视旧法制的心理在我们党内和革命群众中有极深厚的基础,这种仇视旧法制的心理「可能引起对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全国解放初期,接连发动了几次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就社会根源说,我国社会各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党员最大一部分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小资产阶级常常表现为「极端的革命狂热」,「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对小资产阶级是容易投合的」。

董必武最后强调,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而依法办事应该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是必须做到有法可依。赶快把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其二是必须做到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为此

’特别要加强对中共党员的法制思想教育，「党员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同时，还必须加强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的组织，加速推行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

董必武的这个发言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人对于国家法制认识的先驱，特别是他辟于革命可能导致「对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的分析，既深刻又很尖锐。轻视法制是一切革命的副产品，在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出这个事实，是需要腑识的。可惜，董必武的发言在八大会议上是「一花独放」。不仅毛泽东在八大 II 备和召开期间的所有讲话，对于，家法制未置一辞，就是在会议的众多发言中，也几乎没有人谈到这个问题，甚至连刚宣布不久的 1954 年宪法都未见有人提及。的确，对于一个依靠革命取得权力的政党来说，对于习惯于人治的中共领袖和各级干部来说，从革命秩序到法制秩序，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转变。这就难怪从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写上加强国家法制的口号之后许多年，在中共领导层似乎就没有人再真心理会这个问题了。

三党内民主和个人崇拜问题

八大路线还有一个完全属于党内问题的重要内容，就是分析了执政党地位变化及其面临的考验，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任务。特别是确定了发展党内民主的方针，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并且在制度上作了某种努力。

1 执政党面临的主要危险

137(八大文戏)’ 页 9。

八大明确地向全党提出，由于中共的地位和任务以及自身的组缣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执政党面临着新的危险，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出现。毛泽东在开幕词中首先提出：目前党内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

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137 毛泽东始终担心政权得而复

失的问题，前些年考虑的是外部颠覆和反革命复辟的危险，现在政权已经巩固，注意力便开始转向来自执政党内部的危险。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重点谈了主观主义的问题。他在回顾中共历史经验以后说：「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他认为，「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目前我们许多干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使我们的工作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面对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不努力学习新的知识，钻研新的业务，而满足于对胜利的一片赞扬，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必然会发展起来。一是有大批新党员入党。中共党员数量

七大时为 120 万人，八大时增加到 1073 万人。六成以上的党员是 1949 年以后新入党的。这些新党员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训练，很容易成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市场。鉴于此，刘少奇提出的主要对策是「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首先是高级干部必须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次是加强对广大新党员的教育，以及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的是官僚主义的危险。他指出，中共「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而「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杂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他列举了官僚主义的三种主要表现：一、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在执行中央和上级指示时，不同下级和群众商量，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不少领导人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更严重的是有些人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抱着一种

138 《八大文献》’ 页 62—67。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二、官僚主义表现在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质量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他们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三、官僚主义倾向比较普遍的表现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机关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执行时又不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这种命令主义在基层表现突出，但「往往是同上级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分不开的」。鉴于克服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邓小平提出，除了加强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实行对党组织和党员的严格监督。他说：「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139

鉴于这两个报告强调的重点不同，国外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以毛、邓为一方和以刘少奇为另一方的不同观点」。140 其实这裏的区别仅在于两个报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刘的报告从党的领导角度，提出了这些错误在思想上的根源问题，所以强调加强思想教育以克服主观主义；141 邓的报告从党的建设角度，提出了这些错误在工作中的表现问题，所以强调加强党内外的监督以克服官僚主义。就中共的党内生活而言，领导人之间即使有甚么分歧意见，也不会像西方那样有意地表现在公开的文件中。何况，政治报告着重于反对主观主义，恰恰是毛泽东的主张。在8月30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

139 《八大文献》’ 页 74—84。

140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 页 179—183。141 这一点在刘少奇起草政治报告 I 第三稿）「共产党」部分时所写的六

千余字的手稿中看得更清楚，他主要论述的就是：只有做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才能保证党的领导不犯错误。参见《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页16—21。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不只一次指出，斯大林所以犯错误，主要是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犯了主观主义错误。在这次讲话中他又说：「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甚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¹⁴² 政治报告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起草的。毛泽东后来解释说：「在这次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说明，主要原因是认识不符合实际，其它原因是次要的。」¹⁴³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后来被称为「三害」，并构成执政危险的主要内容。八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奠定了日后开展党内整风运动的思想基础。

268 于群众路线和党外监督 1

如何防止党组织和党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如何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邓小平从党群关系和党外监督两方面提出了对策。

¹⁴²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89—90。

¹⁴³ II 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页539，

在党同群众关系方面，主要强调实行群众路线。对于中共来说，群众路线并不是新东西，但邓小平指出，由于党成了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可能产生的危害也大大地增加了。因而，宣传和执行群众路线「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邓小平把群众路线的意义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强调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从这个观点出发，确认了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没有向人民群众

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一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邓小平指出，仅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而不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会把工作做坏，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因此，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为了保证群众路线能够贯彻执行，除了党章作出有关规定外，邓小平还提出了五条具体措施：必须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让领导人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定期整顿工作作风。144

邓小平特别提出，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与党外人士密切合作。他强调：「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批评党内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领导人不愿意同党外人士合作，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他指出，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这种合作中间会有斗争，「但是问题不在这裏，而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145

对于一个执政党如何保证统治地位、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如果说刘少奇侧重于党内思想教育，加强共产党员自身的修养，那么邓小平更加注重的是利用执政党以外的力量，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为了共同的目标，这两者自然都是需要的，但?尤现代社会的合理结构和平衡发展而言，后者似乎更加重要。不过，关于党外监督问题，八大的主要缺陷是只谈到原则和意义，却没有提出一套如何具体实施的方条

144 《八大文献》' 页 82—83。145 《八大文献》' 页 83—84。

和措施，而在一党独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对其监督没有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保证，这种监督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

3 责行集鳧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

在党内关系方面，八大提出要发展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

在中共的概念中，民主从来都是相对的，而且只是一种手段。因此，八大所谓的民主，指的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在这里，民主与集中始终是一对矛盾，长期来看，其内在逻辑总是趋向于集中制。只有当「过分的」集中制严重地损害了党组织的活力时，党内民主问题才会被提出来。中共八大提出发展党内民主，有两个背景，一个是国内背景，一个是国际背景。

从国内来说，自建国以来，中共一再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集权，如取消大区制，调「封疆大吏」进京等。这种做法与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致的。然而，「过分的中央集权」也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对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削弱，并且造成邓小平所列举的种种官僚主义现象。这种情况引起了下级组织的不满，更与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目标相冲突。因此，与行政分权的改革相适应，中共八大在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之间也进行了适当的职权划分。新党章增加了三项规定：一、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统一；二、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三、上级地方组织和下级地方组织的职权，也应当根据同一原则作适当的划分。党章还规定，对于党的政策，在作出决议前允许讨论并提出建议；下级组织对于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的决议，有请求改变的权利。¹⁴⁶ 这些规定的主旨，在于

146 《八大文献》’页 86—87。发挥下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适当分权的规定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全国已经实现了集中统一，中央的权威毋庸置疑，这样做并不担心重新出现分散主义。

147(八大文”)’页 89。

148 刘少奇：《割少奇迹集》’下卷’页 271。

八大提出发展党内民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问题。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党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斯大林的错误为甚么会发生和发展？潜在的问题更在于，各国党会不会重犯斯大林的错误？事实上，自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就力图对此作出回答。中共八大更试图从思想上和制度上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八大首先肯定并且接受了苏共二十大的思想，提出了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问题。邓小平指出：「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它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邓小平还说：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为了实行集体领导，邓小平提出：一切提到会议上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讨论，允许提出异议。如果在讨论中发现重大的意见分歧，而这’种分歧并不属于需要立即解决的紧急问题，就应该适当地延长讨论，并且进行个人商谈，以便求得大多数的真正同意，而不应该仓促地进行表决，或者生硬地做出结论。在党组织进行选举的时候，候选人名单也应该在选举人中间进行必要的酝酿和讨论。他说：「只有这样，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获得真实的保证。」当然，发展党内民主最终是为了更好的集中。邓小平说：「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47 刘少奇说得更明白：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决不是灭弱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

发展党内民主，还反映在对党内斗争方针和党员权利方面的新规定。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报告中都强调必须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和斗

争，其基本原则是区别「党内的是非问题」与「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分子和其它分子的问题」的界限。对于前者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后者，坚决清除出党，如高岗、饶漱石。八大强调的重点是前一种情况。¹⁴⁹ 因此，在规定党员义务的同时，八大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一是把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一项权利，以利于党员独立思考，改变墨守成规的作风，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二是规定党组织对党员做出处分或鉴定时，党员本人有权参加会议；三是规定党员对党的决议有保留意见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意见的权利；四是规定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或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党的政策的讨论的权利，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任何工作人员的褻利，等等。¹⁵⁰

为了发展党内民主，八大还在制度上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实行党的全国和省、县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相应地取消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目的是保证党的各级代表大会能够定期召集并充分发挥作用。邓小平承认，从中共七大以后，十一年不开党代表大会，是不正常的’¹⁵¹ 「这是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虽然这些年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致代表大会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召集这些会议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会，不能弥补不经常召集代表大会的缺憾」。常任制的改革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缺憾」。邓小平对这项改革寄予很高期望，认为这是「一项根本的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

149 刘少奇：《割少奇选集》’下卷’页 272。150 《八大文献》’页 103—104。

151 埴种情况并非中共独有：可以比较的是，苏共 1939 年召开十八大，1952 年召开十九大，相隔十三年。

的发展」。口可惜，常任制并没有坚持下去，除 1958 年召开过八大二次会议外，这项制度就再没有真正实行过，而中共九大直到十三年后

才召开。

4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

152(八大文献) ’ 页 89—91。新!II 聿中的规定见页 829—836。

153 中央档案馆 86:《中共中央文件 8 集》’ 第十五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页 115。154(八大文献) ’ 页 821。

155 吉林省档案馆, 1-12/1-1956. 129’ 页 65—95;《内节参考》, 1956 年 10 月 8 日, 页 819~

中共八大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在所有大会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写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¹⁵³ 然而,在八大党章中却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¹⁵⁴ 此外,在刘少奇的报告、邓小平的报告和八大决议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甚至所有的大会代表发言也不约而同地都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人在学习八大文件时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新党章为甚么未提毛泽东思想?为甚么没有讲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现在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否是反对个人崇拜?¹⁵⁵ 国外研究者也因此对毛泽东的地位作出了种种猜测。他们认为,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集体领导,这「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对毛泽东威信的真正打击是从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他们还猜测「刘少奇可能的确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甚至断定「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从新党章中删去的提议,最初来自彭德怀」。[^] 不过,中国史学界的研究否定了这些判断和推测。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而且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做出的。自 1948 年 11 月以后,毛泽东多次将送他审阅的文件中有「毛泽东思想」的

字样删去，或改为别的说法。157 从目前披露的众多史料看，这个过程基本上清楚的。

最早在 1948 年，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要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提出在教员和学员中，「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给吴回电说：「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甚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甚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158

1949 年 1 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画圈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 1949 年 3 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1952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字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160

在 1953 年 4 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泽东亲笔删改的。1611953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字删去。」5 月 24 日，毛泽东在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8 月 14 日'毛泽东又将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的电报稿中「毛泽东思想」字样删去。162

这样，由于毛泽东本人一再反对，中共中央终于作出了正式决定并通知全党。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通知〉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通知〉特别说明：「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稿时加了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¹⁶³ 这个决定的精神并没有限制在党内传达，1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向与会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16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563。

161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328。

16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页192、238~304。

16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页623。

民主人士打招呼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¹⁶⁴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那时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而且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有明确指示，并广泛告知党内外（只是没有传达到基层）。所以，在研究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时，追究起草文件时是否专门做过决定，是否有人建议或者是谁「最初提议」，都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且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党内高层早已达成共识。问题是毛泽东为甚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

胡乔木解释说：「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在我们濂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杂不开苏联的援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¹⁶⁵ 胡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1948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10月会议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逐出教门。斯大林决心与托洛茨基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张和在巴尔干独立门户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此同时，针对东欧各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主张，苏共在共产党情报局开展了一场围绕「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¹⁶⁶ 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当时，国共之间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已经开始，中共绝对需要苏联的全力支持

¹⁶⁴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387。

¹⁶⁵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页329。

¹⁶⁶ 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页5—26；〈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页172—187。

和援助。”，所以，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和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南共的决议' 指出：托洛茨基，由于建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的基本观点，因而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11月1日，刘少奇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 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切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解放和保卫民族独立，取得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援助，乃是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¹⁶⁸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提出对宣传毛泽东思想降温的，其目的和考虑是不言而喻的。

¹⁶⁷ 据苏共中央联络部观察，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后，中共

明颇地表规出

琳的好感，并广泛地利用食议材料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斗争。多，？]！^^!^, 屯 17, 00.128.0.1173,; 1.1-37.

1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36:《刘少奇年谱 11898—19691》，下卷（北京：中夹义献版社’夕。）’页 165；（人民日报），1948 年 11 月 7 日。

16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页 484—站 5，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仍然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顾及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举动在中国党内的影绘。如本寄第二章所说，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同年 7 月起，开始公开批判和反对党的宣传中的个人崇拜，并且向中共通报贝利亚事件时谈到了斯大林的问题。1953 年 12 月 25 日中国驻苏使馆向中宣部报送了两个材料，介绍了苏联报刊和宣传中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情况，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 年第 3、4 期刊载了这些材料。1954 年 3 月 27 日，大使张闻天又向中共中央办公廉报送了一份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4 月 28 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在京有关人员。169 这年 12 月中宣部发出的那个关于如何解释毛泽东 5’ 想的通知，不能说与这个背景没有关系。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在 7 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后，反封个人崇拜问题更加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大量登载了社会各界的各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错误感到震惊和不理解，而且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时间，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灭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嫌。17’ 在这样的氛围下，毛泽东本人和中共高层领导人自然都不能再重新提「毛泽东思想」。于是，就导致了在八大文件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当然，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丝毫不能说明毛泽东本人和中共党内封「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表述有任何怀疑，更不用说毛泽东地位的下降。从毛泽东历次谈到这个问题的说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只

是不宜在公开场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而并非认为这种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国后，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这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空前提升。人们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没有人会怀疑其领导的英明，更不用说会有谁对毛的地位提出挑战。这从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上也可以看出。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个人崇拜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中共当然不会放弃这面旗帜。然而，八大对这个问题处理相当微妙。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并没有成为八大的主要话题，众多大会发言都没有涉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个人崇拜问题的。邓小平还有意为中共进行了辩护。他说：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于领袖的爱护 本质上 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 11，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

国胜利的前夕’在 1949 年 3 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奋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胜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鞏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繫’，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 I 路炼 1 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172

邓小平报告的基本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这样’既接过了

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委婉地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的质疑。但是，八大关于中共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上，个人崇拜现象从延安整风时就已经开始了。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了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神化了毛泽东的作用。在中共七大会上，不只是刘少奇，包括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内，对毛泽东

172 《八大文献》’ 页 91—92。

一片颂扬崇拜的言词。延安整风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东方红》也是这时传播开来的。173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对于批判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就是被动的，不情愿的。174 所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才会突然冒出一句：「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173 这句话的含义很耐人琢磨，仔细体味可以感觉到，其实毛泽东是不愿反个人崇拜的，特别是不愿中国人反个人崇拜。否则，就很难理解「文化大革命」中堪称世界之最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如何出现的。

中共八大确有许多非凡之举，就改造共产党自身而言，在许多方面的主张和动议，甚至超过了苏共二十大，比如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对经济发展方针的调整、对改进经济体制的设想、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等等。所以，这次会议能够鼓舞人心，激发全党的热情和干劲，使国人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革命的包袱，中共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没有、也不可能对师承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一代革命家，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的中国社会精英，他们并非没有改造中国的雄心和能力，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思想观念遗停留在革命年代，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转变。他们遇到了新问题，但最终只能用老办法去解决。1956年对于苏联、中，和许多

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中共八大确实抓住了历史主题，却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个历史主题，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很可能走到自己所熟悉的老路上去。不幸的是，八大刚刚开过一个半月，暴风雨就来了一一在东欧爆发了令人震惊的波匈事件。

173 详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 605—646。

174 详细分析见本会第二章。

17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 42。

第六章

多事之秋：波匈事件及中国的作用和

苏共二十大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的震动余波未定，1956年10月又接连在波兰和匈牙利爆发了更加令人震惊的动荡，国外学者一般称「十月危机」，中国人习惯称之为「波匈事件」。波匈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7年中国发展道路的决定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出亚洲，参与处理欧洲的事务，

从而大大加强了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开始了中共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地位的历程。

1 目前历史学家查阅有 181956 年危楼的楼案文献、除了去俄 8~匈牙利~波兰的楼案馆外，还可以去布拉格的中央国家楼案馆〔50 八）和军事历史楼案笛 1 以及柏林的前东德共产党楼案 6（^? ^）。此外，美国困家安全#案敏^01^也收藏了有关这两次危机的各种文字的楼案文献。

90 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就已经相继解密和开放，1 并不断被整理后公布于世。就笔者所知，最初是俄国的《历史档案》、美国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匈牙利的《年鉴》以及波萌的《今日》和《现代史》等专业刊物陆续零散刊出的波兰、匈牙

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的有关档案文献。2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 . Y 6115; ! ^ 在 1992 年 11 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俄国档案馆中 1956 年 4 月到 1957 年 7 月的有关文献 115 件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在此基础上 1993 年匈牙利先后出版了两本文件集。3 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参考数据，1996 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编辑了包括英文、匈牙利文和俄文在内的文献专集，供各国学者使用。4 随后，在俄国-美国' 匈牙利又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出版了两本较大篇幅的档案文献集，几乎囊括了有关匈牙利事件已经公布的全部俄国档案以及部分匈牙利和西方国家档案。5

正是在大量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在冷战史领域，展开了对 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深入研究。6 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椿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遗憾的是，第一，在目前所有的重要研究中，对当时中国的反应、对策及其与事件的关系，很少见到专门讨论。7 第二，中国学者几乎通没有参加到对这两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的国际行列中。8 究其原因，一则

是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长期没有对公众开放，二则是波匈事件，特别

是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遗有些观念上的禁区。⁹ 但是，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些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实真相，作为历史学家，尤其是中国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¹⁰ 令人欣喜的是，2006年5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了1956—1960年的中国档案，其中有辟波匈事件及相关问题的文件十分丰富，据笔者初步查阅，足有几百个卷宗。这无疑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并将大大推进对这些历史事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¹¹ 一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的作用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在东欧地区同时爆发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也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同样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在波匈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究竟承擔了甚么角色？发挥了甚么作用？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历史学家近年来努力研究的课题。

1 危机前中国、苏联、东欧的三角翻系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斯大林解决战后东欧问题依据的是两个原则：为了保障俄罗斯帝国的安全利益而从内部强化对东欧各国的控制；为了与西方大国合作以求得和平发展的局面而在外表上给予东欧各国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为这两项原则的政策体现，战后初期苏联在东欧各国主张组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避免建立以苏联为首的利益集团，而宁愿通过签订双边条约来保证各国政府的亲苏政策，不鼓励东欧各国共产党采取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此等等，这就是冷战态势形成以前苏联与东欧关系的基本框架。斯大林主张的联合政府政策在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失败，再加上美、英、法等国在推行马歇尔计划中的进逼方针，导致莫斯科迅速转变了对东欧的策略，作为国际性集团组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应运而生。”在冷

战的格局下，斯大林首先在东欧推行两党合并，消灭社会民主党，继而操纵各国实现共产党一党统治，同时在东欧各国党内以消灭「铁托分子」为由开展大清洗，对土生土长的各党领导人大开杀戒，而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干部取而代之。此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国家安全顾问被大批派往东欧各国。到 1952 年 10 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成为莫斯科的顺从奴隶，苏联与东欧关系进入冷冻状态。¹³

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的开放和政治的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愈来愈高。这种状况在波兹南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早在 1955 年秋天，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就致函苏共中央，请求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938 年 8 月 16 日无理解散波兹南共产党的决定进行重新审理。12 月 8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为波兰共产党平反的决议，有关声明也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刊登出来。¹⁴1956 年 3 月 12 日第一书记贝鲁特（[^]伤[!][^]）在莫斯科暴病而亡，使波兰党内的亲苏派势力大大削弱，波兰许多地方党组织在讨论苏共二十大报告时，更提出了追查 1939 年在卡廷发生的枪杀波兹南军官案件、重新评价 1944 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领土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¹⁵贝鲁特的继承人最初是党内的中间派代表奥哈布（[^].，由于他继续推行原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引起很多人不满。”到 1956 年 5 月在改革派的压力下，曾经作为「右倾民族主义分子」被关进监狱的哥穆尔卡（[^].（[^]加[^]）复出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党内高层便在改革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奥哈布也逐渐转向改革派。而 6 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游行事件及政府的镇压措施，进一步引起人们的不满，并把波兰改革和独立发展推上日程。¹⁷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

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18

匈牙利的社会情绪虽然与波兰大体相同，但由于保守派在领导层占有绝对优势，其结局就完全异样了。身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和政府首脑的拉科西被认为是典型的「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去世后受到党内外的一致指责，莫斯科不得不考虑对其有所制约。1953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两党联席会议上，拉科西、格罗（Grosz）、法尔卡什（Farkas）和雷瓦伊（Révai）等保守派领导人受到严厉谴责。会议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党的第一把手（总书记改为第一书记），而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让给立志推行改革的纳吉，

岗位。尽管由于阻力重重，纳吉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匈牙利出现的变化仍然在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正当纳吉及其政府的改革行动开始收到效果，并得到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大力支持的时候，苏联最高权力层出现的分歧使拉科西的势力得以卷土重来。莫斯科一是担心纳吉的改革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马林科夫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言论在匈牙利的实践；二是担心匈牙利党内的严重意见分歧破坏政治结构的稳定，而拉科西主张的「整顿匈牙利秩序」则比较符合此时赫鲁晓夫的要求。于是，随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下台，1955年4月纳吉也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而失去了权力，八个月后又因拒绝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但很快，苏共二十大再次激发了匈牙利的改革浪潮，人们不仅呼面变革，而且强烈要求为受迫害者平反，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拉科西本人。1956年3月底，拉科西被迫承认在斯大林对东欧各党的大清洗中，参与了对持与苏联不同政见的拉伊克（Rákosi）的政治陷害活动，之后他便失去了自己大部分追随者的信任。特别是在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党内外情绪激昂，抗议现行政策的活动有增无减。面对匈牙利官方惊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波兹南事件」，莫斯科迫不得已在7月决定让拉科西退休，到苏联休养，而让他的亲信格罗接替其党内职务。然而，与苏联领导人的选择不同，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和社会知识分子共同把眼光投向了虽然在野但并未沉默的改革先锋纳吉。更大的冲突和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迨在 1948 年 4 月 26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就提出「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进行访问，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它 201? , 0^±31^45-46。搏弓 I 自 0(1(1^106 8^61-51/1/! 赚, 1^版 I! ""尸""

0/1/1651/10-80^1 1945-1963(' &&. 5(311^(1 ! ^ 化 & ! ^ ? 19981299~300^

21^0? 0^^. ^, 011. 1. ^3285^11^50^

22 八 811? ^, 屯 07, 00. 22, 11. 36. 8. 220, 11. 48-51; 八 80? 丸^0100, 00. 42, 0. 288, 3. 19.. 1. 32-33.

231(060^8 3110! "0? 2^111130 施。! ^甲。" " 0 口 0&! ^""。! 011^ [0^00^0^1992 匚

1^0. 1-3, 匚 81

24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害记处 II, 1949 年 7 月 27 日; 1^8(1 细 0, ^0^0x3^11113^0' 2. 78-79; 师哲回慷, 李海文整理: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修订本 1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01》' 页 412。

25 八 80? 化中. 07, 0 化 223, 0. 13. 0. 198, 11. 1-2.

26 中 8 驻华沙使销报告了波兰人听到中 8 出兵的消息后无比兴奋的状况(中国外-郝#案馆, 109-00083-03' 页 2—, 作为中国首批驻苏联的外交官, 荣植先生也曾向笔者讲述过同样的情况。^

27 多见裴坚聿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1949 — 19561》(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1' 页 44—77。

工作」。20 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 在 1949 年 7 月 4 日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的问题。11 在建国之初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 毛泽东反复表示了他对与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迅速建交的迫切心情, 尽管当时中国「甚至不知道他们外长的姓名」。毛泽东在 1949 年 10 月最初提出的访苏计划中, 再次安排要在中苏条约签订后到东欧访问一个月。^虽然由

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对东欧的访问始终没有成行，但他对东欧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问题的关注却是十分明显的。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²⁴ 毛泽东自然不便跨越雷池一步。况且，东欧国家与中国如何发展关系，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甚至东欧能否与新中国建交、何时建交等问题，都必须经过莫斯科的首肯。²⁵ 在 1950 年 10 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因朝鲜战争而面临危机时，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所有东欧国家中的形象和地位。²⁶ 不过，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超出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范围，而在政治上，只是一般性外交往来，对相互间的国内政策谈不上有何影响。²⁷

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继续密切注视着东欧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也愈来愈引起东欧的注意。《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国内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都在东欧各国引起了极大兴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各国传播以后，一时众说纷纭，思想极为波动，很多人表示要看看中国党如何表态。在波兹南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²⁹ 波兰人还常以羡慕的口气对中国留学生说：「你们中国革命是自己搞成功的，又是大国，斯大林不敢命令你们，你们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政策的。我们是小国，一切都要听从别人。」³⁰ 匈党中央委员、驻苏大使波尔多茨基（P. Poldoski）称：中共八大提出了许多新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匈党对此很有兴趣，十分重视。匈党中央书记科瓦奇（I. Kovacs）说，八大文件中很多东西值得匈牙利学习、研究，特别是中国党成功地把广泛的民主与坚强的集中领导相结合。应当学习中国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能广泛团结全国人民各

阶层的经验。31 如果说过去人们赞赏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现在也开始关心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了。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主张向中国学习的基本上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他们往往拿中国与苏联对比。与保加利亚各界对双百方针所持的保留态度不同，波兰人总是用赞佩的心情谈论这些问题，他

32 《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4日'页1209—1210；1957年5月7日'页26—27。笔者2004年4月17日采访 I&亦粟记录，骆当时在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

33 13110384^311^1/1116^1111231-1311&^011111011311(181111(!
"35? 10^615001—81! '' , 了" 《01110
!?"。"—1^43,;!)!. ^ . 1970. 122. 34 八口? 化中. 3, 00. 64, ; 1. 484, ;
1. 64-75, 8。肤 6II00861^^00103. 0^303^304^
3510^)., 0/1(:。""""^, 1)1 斤。义(:。"! ^ 丫 01^ : ?
1-6(1600^? ^? ",
1957、20^23^

36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8月的一份讲话稿中也提出了痘侏观点。参进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633—635。中共正式提出这个看法，是在1956年10月30日与赫共中央会谈时'并于11月1日见报。

们说，中国党和斯大林的做法完全不同。中国党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斯大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愈尖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波茧非常流行，受到极大的赞赏，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简直是家喻户晓。32 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则真诚接受这样的信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共领导人意圃的真实反映。这在匈牙利社会激起了广泛的亲华热情和同'清心，以至在匈牙利发生危机时，大部分市民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在布达佩斯街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33 据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丫.^! ^^^）报告，格罗在解释「部分匈牙利劳动人民，甚至党内人士对苏联表示冷淡的问题」时说，在许多党内反对派看来，「似乎是斯大林的个人崇

拜阻碍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发展，而中国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就没有个人崇拜现象」，「所以现在就应该以他们为榜样，而不是以苏联为榜样」。还有，纳吉被迫引退后认真研究了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他在阐述自己的纲领时也特别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葛隆会议的五项基本原则「不能仅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或者两大体系之间的斗争，必须扩大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关系中」。35 这与中共后来在处理波兰危机时的主张不谋而合。36 看起来、东欧各国，特别是那里的改革派是可以接受中国了，问题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指挥的苏联的态度。

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58 年初。37 尽管苏共二十大的做法令毛泽东有些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和所有共产党头上的这块大石头（或曰「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波匈事件发生一年后，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尤金说：「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局面，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羞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卢对于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在内心是赞同的，如果仔细品味毛泽东在 1956 年 3 至 10 月对内对外的讲话，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固然，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的提法以及批判斯大林的方式等问题上，中共确有不同看法，这些情况莫斯科通过外交渠道也已经有所了解。39 过去人们把这些分歧看得很重，似乎这就是中苏分裂的起点。40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苏论战时期双方互相指责的过激言论的影响。其实，任何盟国关系中都会有分歧和矛盾，而且时时都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就要分裂。况且，后来导致中苏反目的根本原因与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并没有甚么关系。^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强调的主要迹是以前斯大林在中国问题所犯下的

种种错误和现在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4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访华，毛泽东明确告诉他：「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⁴²5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尤金时，虽然原则上肯定斯大林在多数重大问题上执行了正确路线，但谈得最多的还是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些错误「可以写一本害」了，只是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毛泽东在谈话结束时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并感慨地说，二十大「结束了对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的问题了」。最后，毛泽东又高兴地总结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⁴³

从苏联方面来说，《人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引起普通读者极大兴趣，「一般的反应都很好。最普遍的反应，是认为这篇文章有说服力，写得公平，分析得全面深刻，把问题说清楚了」。而官方则「准备把全文重新翻译一次，与苏共的文件一起编入一个供全党学习的小册子」。⁴⁴此后，中国的意见愈来愈受到苏共中央的重视。同时，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骚乱和党内讨论时表现出来的强烈反叛情绪，也使苏联领导人确实感到「捅了娄子」。⁴⁵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其中的说法已经十分接近中共的观点——「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开始慢慢刹车了。⁴⁶年底，中共〈再论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真理报》全文发表，「苏联对这篇文章很满意」，当天的报纸被一抢而空。⁴⁷莫斯科的广播电台选出最有名的播音员广播，并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⁴⁸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理由是「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中共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和方针。中共党组织的许多方面值得认真研究，尤其是八大之后在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于是，1957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派出一个由十五至二十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共访问学习。⁴⁹苏共派人到兄弟国家

学习党的建设的经验，这还是头一次，足见中共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5(1

2 波兰危机：中共第一次当面指资苏联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兹南十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兹南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⁵¹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⁵² 后来也有波兹南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兹南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按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裹涉及三个问题。第一，苏波两党在华沙会谈期间（11月—20日），赫鲁晓夫关于停止苏联部队向华沙进军的命令是如何作出的；第二，苏联代表回到莫斯科以后〔20—23日），关于放弃对波兰进行干涉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第三，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23—31日），为调解苏波关系、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做了哪些工作。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⁵⁴ 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⁵⁵ 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⁵⁶ 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57

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债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⁵⁸ 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裹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

影响

的情绪不断高涨。在 15—17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定，将于 19 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包括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
^

^0580^8^1；元帅。59 波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七百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订）将军^0 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八，？ 0001113! ^）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一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波茵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61

10 月 18 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 19 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

自 【 0113111130^80^111^” ? 101111110^10(11^050 【 !
”!IV30(1811(131)681；八 (^)!!””。!! 0 『I&6
^61115011956、^051 五””。； ? 011^50/14800161^义。116， ^0.2， 5
—82002， 534^535， 58 《苏联历史楼案选编》，第二十七卷，页 22—
24。

59 罗科索夫斯基 1896 年出生在华沙，后加入苏联国籍。卫国战争中成为苏联的著名将领，因解放波茵有功获波兰元帅衔。1949 年 11 月被斯大林派往波兰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回到波兰后仍然保留着苏联国籍，后来又兼任华沙条约部队副总司令。因此在波茵人眼中，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对波兰实行统治的家微。

详见 01110110*5”! 11080^101-^0118110011&011^(10110【0。01956、
63-70 ;

^001^080^100X080101600661101X11001^)211&X80070*010&&8^)01&
! , 1945-195311\ " 80111700^1^0X0^ ^

1998, 1^0.1, 0.109-110.

60 科马尔是哥穆尔卡的亲密战友，1952 年被捕，1956 年 4 月恢复政治名誉，8 月出任内务部队总司令。

61 堪饥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页 142 — 143；

0^X080061.11-1011956「0^〃

0)8670X211 脑 111101)1110^111X3, 0.227; 01110110\1^1, !

0171151^11~，38^39^

均遭到拒绝。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两个决定：（一、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兹南；（二）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俄国档案显示，通告全文如下：「最近在波兹南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兹南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在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方面出现了尖锐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组成的根本问题。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兹南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兹南是必要的。」显然，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只提到代表团去波兹南的必要性，而根本没提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经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

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 !^）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

620)16X08 { . 6〃 ! 115119561-002//

00801-0X3)188211111)111110; 111 丁〃〃, 0.228-229;

0 【 31^〃 化 , "00111)6〃(: ! ^〃〃, 548-549 ;

161160^6^1311(11^11(165^^, "八 11(^00310313

011(! ^!! ;". ^10 【11165(^161 . 〃〃 口 ! !〃01 !

〃, 0^6^01311(1801^4111^., 5^161〃〃赠,

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七卷’页 26—27, 55—82。不通’哥

楼尔卡说他当时就表示同意赫鲁晓夫来华沙，恐不是实情。因为苏麻代表团的飞机是在华沙上空盘旋了两个小时后获准降落的，哥穆尔卡等人这时才赶到机场「欢迎」。参见中 9 外交部楼案馆，109-00762-03，页 26—28。此外，吴冷西的回忆说，苏联发动幕后的命令是 17 日下达的，参见《十年论战》，页 34—40，这显然也是错误的：631^011?，12^0)5.701/291，3.15，131.238^转引自丸&^0\^1"出 18^"！1956.0^6*6130(11)0^3(11 吋,50^1611411110^132.10^引用这条史料《说明匈牙利的紧张局势，但在笔者看来，这是要对付波葡的，因为当时匈牙利的局尚不足以让莫斯科作出这样的决定》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62 俄国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 月 19 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 7 空降师 108 伞兵近卫师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 架里-2 和 45 架伊尔-12 飞机正待命出发。63

10 月 19 日早晨 7 时，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华沙，随行的还有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参谋长安东诺夫（八.^111000^和一大批高级军官。哥穆尔卡与波董领导人赶到机场迎接时，遭到了赫鲁晓夫气势汹汹的指责和呵斥。经过短暂的争吵，波兰人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延期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双方随后来到代表团下榻的贝凡德尔宫继续会谈。在激烈的争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说要对波兰进行「强制性干预」，哥穆尔卡则冷静地表示，如果苏方继续进行威胁，就会中止会谈。因当时波党所有中央委员正在另一幢大楼的会议厅等待全会开始，苏联代表团被迫同意波兰领导人先去主持全会开幕式。10 点钟大会正式开幕，首先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增选哥穆尔卡等四人为

中央委员的决定，政治局还建议由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然后，奥哈布简单通报了苏共代表团来波的消息，并建议为继续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而休会。大会进行了半个小时。此后在贝凡德尔宫进行的波苏两党会谈，气氛稍许平和了一些。米高扬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看法，强调指出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对八中全会后可能在波兰发生的变化并造成苏联同这些部队联系困难甚至中断的局面表示担忧。米高扬表示苏联方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莫

洛托夫则表现出更为强硬的立场。波兰方面解释说，八中全会后所，的政策和变革只会密切波盟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加强而不是削弱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还是强烈要求除增补哥穆尔卡外，波党政治局不得作其它人事变动。这一要求得到罗科索夫斯基等保守派的支持，但遭到哥穆尔卡等人拒绝。

此时，波兰内务部开始不断得到苏军从西面和北面向华沙前进的消息，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不过，波盟人一时无法判断苏联的举动是已经决心进行武装干涉，还是想以此施加压力，迫使波兰让步。在这种微妙的时刻，任何莽撞的决定都只会引起更加复杂和危险的结果。哥穆尔卡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向苏方提出了抗议。赫鲁晓夫谎称是以前布置的军事演习，并答应立即停止。会谈继续进行，除了波兰领导层的人事问题，又在波苏关系中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下午6时，奥哈布返回全会，向中央委员们作了简要汇报，并建议因需要连夜与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全会推迟到第二天上午再开。晚饭后双边会谈继续进行。这时，并未停止前进的苏联部队还在缓缓向华沙逼近，而为数不多的波兰武装力量部队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指示也开始在华沙周围集结。此前，罗科索夫斯基曾向赫鲁晓夫表示，如有必要使用武力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的话，他将随时听候莫斯科的吩咐。与此同时，得到军队行动消息的华沙工人、学生纷纷集会，并游行示威，强烈谴责苏联干涉波盟内政，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改革派，要求贯彻民主化。⁶⁴ 苏联使馆及时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断言在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示威游行具有危险性和反苏性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⁶⁴ 王炳南：〈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憶〉，页38；（内部参考）年10月22日，页1075—1076。

⁶⁵ 〃， 〃 5, 011. 49, ; 1] 02-103, 0/ ^ 6X080061, 1-011119561-00& // " 化〃八〃0086X0X3) 1811611111) 1) 100〃〃!!! !^, 0^232~233^

关于苏联和波盟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到会场。晚9时，感到受编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盟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

止了会谈，等待苏联人尽快作出决定。其实，波葡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特别是在 18 日晚得知苏联代表执意要来华沙时，就已经考虑到苏军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并有了军事准备。华沙军区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成立了两个司令部一军事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其任务是监督苏联部队的调动并及时向政治局报告，波兰的海军和空军也制定了反擊苏军的作战计划。内卫部队甚至接到命令：在必要的情况下逮捕苏联代表团。一些工廠和学校也建立起纠察队和自卫队，并得到了武器装备。65 此时，必须作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被波兰内务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

失去了对波葡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可能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蘇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葡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苏联将不得不进行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国保证，他们的担憂是毫无根据的，「波葡需要蘇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 20 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画杂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66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圖。显然，后者更为重要一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新华社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证明，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

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此外还可以断定，中国的因素在这襄没有起甚么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此时并不知道中共的态度，甚至中共也还没有得到苏联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消息。6，

当华沙剑拔弩张时，北京似乎还很平静。关于 19 日苏联是否通知中国准备在波兰使用武力的问题很重要，这涉及到毛泽东是否出面阻止苏军调动以及中国的反应是否对苏联决定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史料中的不同说法做出判断。

据说，10 月 18 日尤金大使接到莫斯科转来的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后，紧急约见毛泽东，但毛泽东没有立即见他。69 19 日、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兼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怵 1 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苗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7。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楼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

另一种说法是骆亦粟和吴冷西提供的，据他们回忆，尤金 19 日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吴冷西说：20 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向苏联提出警告。晚 7 时，毛 7，东接见尤金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

68 笔者 2004 年 4 月 17 日对骆亦粟进行访谈时得知，23 日刘少奇、邓小平到典斯科后 1 中国驻波兰使馆参赞余湛来汇报波裔情况(骆随同余到莫斯科汇报)，其中说到：19 日映华沙街头出现了「我们有毛泽东的支持」的大擦语。邓小平说^这提法不好。以 8^的理解，痘悃裸焔不遇是表明了笛时波籼人对中国的期望和信任。69 骆亦粟：〈1956 年「波 11 事件」和中国的政策〉，页 40。此事目前尚未得到

文献证胡，70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神及主摄：《毛泽东传 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采用了镇 111 说法 1:1601-沾）。

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吴还回怆说，22 日毛泽东听到苏联已经撤军的消息时又说，这主要是在波兰遇到了坚强抵抗，但中国党的表态封此也有一定影响。力由于吴冷西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所以他的说法在中国广为流传。但在笔者看来，此言疑点颇多。首先，说中国收到了苏共中央关于出兵干涉波兰的通知，这与苏共中央主席的决议及目前看到的通知内容不符——那襄根本没提出兵的事。其次，说尤金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问题、与逻辑不符——尤金不可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而私自将军事调动的机密告诉中国人。最后，如果毛泽东没有得到苏联出兵的准确消息，怎么可能劈头盖脸地指责苏联领导人呢？

那么，毛泽东是否从别的渠道得知了苏联出兵华沙的消息呢？据最近开放的中国外交部档案，中国使馆 19 日发出的电报确曾说过：「驻德苏军将开进波兰，西里西亚地区苏境苏军亦向波边境集中」，但声明这只是「谣传」。况且，中国外交部收到这个有关「谣传」的电报已经是 20 日 17 时 20 分，而译出电文则是在 21 日清晨。”看来，毛泽东既没有事先得到苏联出兵的计划，当时也根本不了解华沙发生的情况，他怎么可能指责苏联人呢？刘少奇在 11 月 10 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回顾了事情的经过：19 日尤金向他通报了波匈的情况，中共没有发表甚么意见。21 日又来通知，并邀请中共派代表圃去莫斯科。毛泽东在 21 日和 22 日建续两次接见尤金，劝说苏联要让步，应平等合作。74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 19 日夜间决定停止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还不知道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74 八届二中全愈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 年 11 月 10 日。关于？II 的道佃讲话、正式发表的部分内容见《党的文献》，1988 年第 5 期；中央楼案馆 39：《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櫺案》，上册（北京：中国楼案出版社，1999）。

75 中国外交部楼案馆，109-00761-04'；120—21。

76 罾《内部参考》^1956年10月12日'页941—963。

77 中国外交部楼案馆，109-01441-01'页31—33；109-01441-02'页76、77—78。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

别说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就是中国驻波使馆，当时都不知道毛泽东对波兰形势的看法。对于波酶问题，中共中央作出的判断是有变化的。当时中国主要有两个信息来源，一个是大使馆，一个是新华社，但二者的看法完全不同。前者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和脱离社会主义的情绪，后者认为主要问题在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于波兹南事件，王炳南大使认为起因于工人对待遇不满，但骚乱是「挑拨分子」所为。“随后'《人民日报》7月12日发表了题为〈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国内反革命活动〉的社论。但到10月12日，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就对波兰的局势发展开始持乐观看法，认为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波兰出现了「如狂风般的空前广泛、空前热烈而又空前深刻的全民性的政治、思想大讨论」，目前波兰全国上下「都在积极设法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和缺点。大多数人们并未失掉信心，人们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虽然在这场大讨论中有过一些偏差，而且目前也存着一些矫枉过正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其主要结果是积极的，正确的」。76 中国使馆人员无法像新华社记者那样活跃在民间和街头，因此消息就闭塞得多，而王炳南大使与波诺马连科私交甚笃，对波酶局势的看法也深受其影响、所报波兰情况，基本上都是苏联人的观点。“新华社记者谢文清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我个人认为，苏共代表团的到达，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在华沙到处可听到这种不满的言论。」而大使馆在这封彗报上加了按语说：「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78 莫斯科当然更希望早些了解中国的立场。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酶。会议研究了在波酶的军事演习问题〔但从记录看不出讨论结果〕，还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

问题。记录速颇示，这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驻波兹南使馆在对奥哈布和哥穆尔卡进行评价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为慎重起见，会议最后决定邀请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进行商议，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去中国通报情况。~

在 21 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尽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还在犹豫，但赫鲁晓夫已经倾向于对波兰让步，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赞同。会议拟定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同意撤消隶属于波兹南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时间确定在 23 日，并通过了给各党中央的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鉴于波兰的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逢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80 会议当天，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兹南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81 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前，苏联对波兹南的基本政策已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82 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82 刘少奇也回显说：中共代表团 23 日晚到建莫斯科时，苏联的态度已转变，形势缓和了。参见八届二中全会纪录：刘少奇报告，1956 年 11 月 10 日。这裏尚待解决的只是罗科索夫斯基的去留问题。但。^! ^""认为，直到 23 日苏联似乎仍然没有放弃武装干涉，理由是据波 II 材料，那时苏军！ 1 在向华沙前进。参见"了^? 0\1^000&0012(1000^00(0^1^1956\65^这俩说法与俄 8 档案 81 于 21—23 日情况 65

记载相矛盾，而「波兰材料」究竟是甚么，是否可靠，都需要进一步拿出证据 0

83 吴冷西：《十年论战》' 页 44—45。

84(毛泽东传 1949—1976，页 602—603；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页 12，这个讲稿内容可以么明，吴回谏的毛泽东 31120 日与

尤金的谏话，在内容上也 0 得怀疑的，85 中翊外交部植案敏，109-00762-02' 莩 8, 10。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 21 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画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蘭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83 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 日晚' 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蘭遗不像马上要脱杂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甚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 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84 这时毛泽东才开始对波兰问题表态。23 日外交部致电王炳南，要求他只管收集材料，及时报告国内，「不要人云亦云」。25 日电更直接指出，使馆对波兰局势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而肯定了谢文清的意见。85 由此看出，刘少

奇访苏的目的主要是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同时保证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与此同时，中共也向波茧方面表明了对波兰国内政策的倾向性态度。据出席中共八大的波茧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 ! ^^)回忆，10 月 1 日代表国，长奥哈布因国内形势紧张提前回国，其它成员在中国南方和西部参观了三周。当代表团回国的飞机将要起飞时，发动机突然熄火，马热茨等人被带到机场贵宾接待室，等候他们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马热茨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人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改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

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刘少奇接着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苏共通报中国对波兰改革的态度，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共的支持。最后，刘少奇还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三千万美元的无偿贷款。马热茨回国汇报后，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

86\^比 13 忆 3|3018^1? 32^1601; 1^1956\0.128-130.

87^! !. 巾么 00. 12. 0. 1006. 5^6^参见《苏苏历史档案编》，第二十七卷，页 49。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87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于23日午后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赫鲁晓夫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据师哲回忆，赫鲁晓夫介绍说，他们最初对波兰事件有一些无端怀疑，认为波兰要脱杂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但苏共代表团到华沙后，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人。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88

88 胃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页 13；《刘少奇传》' 页 804；《毛泽东传

11949—19761^' 页 603。89108：艮巾二 011. 12, ^1005^52, 参见《苏攀历史档案 888》~第二十七卷，页 52—53。

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 10 月 24 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也指出，「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刘少奇还批评了过去斯大林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错误态度。最后，刘少奇表示，保证与苏联

画结一致。赫鲁晓夫则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89 会议记录非常简单，以致有些词句的确切含义还无法确定。对此，参加会议的师哲的回怆，可以紫助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中，刘少奇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要依据甚么原则的问题。大国的党，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应多承兼义务，做出较好的榜样。苏联长期以来诚心诚意地帮助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在内，而且帮助很大。但是关系还是搞不好，波藭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尽善尽美，是不是其中继有一些缺点或者还有一些错误。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藭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说，有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时也有协商的形式，但明天甚至当天就要通过决议，人家没有时间考虑。事先既没有个别谈话，又不作集体商谈，只有强加于人，就是要别人听你们的话，不聽，你们就要整人。

在世界工联、世界妇联、世界青联、世界和平运动中，都有这种情况。必须学会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协商、合作、协同动作：只想到自己，只考虑自己而不考卢别人的做法，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极大的害处和恶果。刘少奇最后说，无论国际形势有怎样的变化，或者我们之间有甚么不同的意见，我们保证中共会跟苏共站在一起。国际共运的中心只能是你们。但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讲清楚。两党的，结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方向。如果我们两党的关系破裂了，帝国主义就要大加利用，大肆进攻。我们正是从这個大局出发，才在会议上举手同意你们的决议。赫鲁晓夫当场赫：两党关系不能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否则，时间久了是一定会破裂的。刘少奇笑着说：不会的，就是有再大的问题，我们也还是站在一起的。

因为这是决定世界形势的问题。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其它的争论都是小问题。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90 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颞然’通过波茧事件批评苏联，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共代表,的主要目的。

会谈期间，中国驻波茧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情况。据参加汇报的骆亦粟回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央决定，这次只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多了，怕他们接受不了。迳说：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东欧各国的事情，管得愈多包袱背得愈重，人家杂得愈远，放开些，反而团结得紧些。邓小平着重询问了八中全会后波党政治局人员的变动情况，特别对哥穆尔卡和罗科索夫斯基问得很仔细。他指示：「要多做苏波颞方的圃结工作，但对一方讲的话，要准备^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让另一方知道的，不要讲，别看他们现在吵架，要想到将来他们有好起来的时候。」92 这表明，中国当时对波苏关系是有清醒认识的，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颞是存有戒心的。

辟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吴冷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说，在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的会谈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波颞党事务，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度量要大一点，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中国党希望波兰与苏联搞好关系，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相信波茧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波苏关系。哥穆尔卡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并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圃结。刘少奇后来汇报说，我们在莫斯科时在苏波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分别与两党代’表画谈了几次，贯彻中

央调解、劝和的方针，是取得了成功的。后来苏波双方谈得比较好，苏波之间不至于发生大的冲突了。93

92 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页41—42。93 吴冷西：《十年论战》’页45—46、56—58。

94 如见仲潮浩：〈毛泽东三次见哥穆尔卡〉，《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3期，页162-163。95 11月3日，011.12, 0.1006, 几5, 506^86于这个问题，诺沃提尼的另一面记录是：「#8 尔卡同志告诉苏共中央他将接受邀请并在11月11日后抵达」。免(：确””！—1851165, 53^

尽管这条回忆史料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使用，94 但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据笔者考察，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哥穆尔卡和波兹南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来。证据如下：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哥穆尔卡请求于11月8日进行会晤，此其一。95 据师哲和骆亦粟（二人均在莫斯科）回忆’26日中苏会谈时，赫鲁晓夫通报了他与哥穆尔卡通电话的内容，并请求刘少奇到华沙

去帮助苏联做哥穆尔卡的工作，此其二。29日双方会谈时，赫鲁晓夫再次通报了他与哥穆尔卡通话的内容，此其三。96 在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确定，将与哥穆尔卡在布雷斯特地区举行会晤，讨论匈牙利问题，此其四。^实际上，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兹南党政代表团是11月15至18日访问苏联的。98 因此，10月23至31日哥穆尔卡根本就不在莫斯科，刘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于波兹南党确实也有担忧的地方，也需要去做工作。问题的核心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兹南的象征，因此波兹南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8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摘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湖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兹南施加压力，哥穆

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共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Kiriłuk），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毛泽东在详细了解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对波共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它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182 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共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作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访问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Biedron）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属领土撤军。103

2日赫鲁晓夫与蛾托会谈时，也提到他曾劝说刘少奇去华沙，但中国人一直没有得到签证，毛泽东为此很生气。参见韦利科（Velikov）米丘诺维奇着，达洲等译：《莫斯科的岁月》（北京：三联书店，1980）页179。

102 基里洛克致哥穆尔卡信，1956年10月27日，（“！”）“01；0？3口。”（“”化 1956—0.124-126.

103 “！”“！”“！”111：50^161-^0115)1000^0013110110^00101? !: ? 1956\81-82.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其原因显然是对当时动乱的匈牙利局势有所好转作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

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它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杂，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趸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谈话一直进行到夜裏两点。赫鲁晓夫最终是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表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可以放手，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17到30日晚8时完成宣言草案。”随后，赫鲁晓夫返回主席国会议。讨论中，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案，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104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页 15—16；骆亦粟：〈1956 年「波匈事件」和中方的政策〉，页 43。105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 年 11 月 10 日。
106 八!!？化中^00.64, 0.484,; 1.25, 多见（苏吓历史楼案选 86）^第二十七卷’页 317；011.12, 氏 1006,; 1.6-14, 80^08^症

0086701^0)103, ^457^463^公开发表的宣言文本见 1956 年 10 月 31 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以及 1956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

3 匈牙利危机：毛泽东提出的主导性意见

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在最初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 月 23 至 24 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这裏的问题是：第一，苏联出兵镇压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第二，中国当时是否知道莫斯科的这个决策；第三，中国对苏联这次军事行动持何种态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

11*4 科西完全一致，其结果使匈牙利的动!! 顷面没有丝毫减弱^&而更加剧烈。11”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竟然到苏联休假长达两个

月。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 22 日夜晚才

匆匆赶回国。””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作出的一个又一个让

步，总是比 1*3^昂的群众^81 和舆论要求晚，，以至危^!^^。

107 有许多历史文献反映了莫斯科在挑选拉科西继承人时的考鹰及决策通程，详见&^; ””

^^ (9^ I^ I00)^ ^x^3, ^138-139, 152-157, 172, 173, 176-182^108(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16 日’ 25 日。

109(匈) 山多尔申科粕奇着，，新康嶂：《匈牙利悲剧》（北京：群众出版社，，页 119; 80^X06II0086^00100103. 0. 194; 《内部参考》，1956 年 11 月 28 日 1 页 664; 笔者 2004 年 6 月 8 日采访夏道生记录。夏当时任中国驻匈牙利使馆随员，

110 详见《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17 日，

10 月 6 日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队伍多达二十万人。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

现政权的不满，也是民众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的重要的心理界线。特别是当新闻影片中出现了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1956年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称纳吉仍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¹¹⁹这时，格罗已经预感到，「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讓纳吉进入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也许缉要

进入政治局，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而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¹¹¹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德布勒森、米什科尔茨、塞格德、佩奇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愈来愈响亮，要求愈来愈激烈，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大会特别提出赞成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

10月22日在建筑工程大学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学生集会上，成立了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并提出了十六条要求，其中包括：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通过秘密投票自下而上地选举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基层、中层和中央机构领导人，在纳吉领导下进行政府改组，罢免在斯大林—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审判拉科西，在多党制基础上进行全民选举，制定工人最低生活标准，平等对待单干户展民，释放无辜的被捕者并为他们恢复名眷等。¹¹³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

学生们的纲领没有提出任何进行根本经济变革的要求，但是其主要的政治要求在激进程度上却超过了以往几个月以「裴多菲俱乐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党内改革派提出的口号。¹¹⁴为了表达和宣传自己的纲领，学生们提出在第二天下午2时30分举行游行示威，并得

到了共青团中央的支持。刚回国的格罗等人担心局势失控，于 10 月 23 日 12 时 53 分由内务部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但是很快就因激起民愤而不得不在集会前几分钟取消禁令。当天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声援波蘭人抵制苏联的文章，以及各种群众倡议和通告，舆论明显地倾向于民众。于是，参加游行的人数逐渐增加，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下班之后，布达佩斯市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入了游行行列，工人们也从市郊的工业区涌进城里。游行的规模愈来愈扩大，喊出的口号愈来愈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着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十分激奋。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正当人们期待着政府的回答时，格罗在晚上 8 时发表了广播讲话。令人群失望和激愤的是，格罗一口咬定这次运动是「敌对势力」企画「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拨活动」。这不啻火上浇油，人们被激怒了，一些青年试图闯进广播电台大楼，宣传游行示威者的纲领性要求，结果与国家全部队发生了冲突。晚上 9 时以后，冲突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伤亡【谁开第一枪的问题至今没有可靠的证据）。这时，抗议行动开始带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了，游行示威者从派来增援守卫大楼的部队以及民防仓库和地段警察局那裹抢夺或搞到了武器。午夜时分，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116

鉴于布达佩斯不稳定的形势，苏联驻匈牙利的华约部队——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1956 年 7 月，华约部队参谋长安東诺夫到达

布达佩斯检查部队情况。随后，驻军参谋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下制定了一份「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代号为「波浪」。该计划包括一项特别指令，规定了在必要时苏联军必须占领和守卫的目标，苏军与匈牙利国家保安机构及人民军的合作方案，以及可以利用的武器装备数量。随着局势发展，10 月 6 日至 19 日，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负责人多次举行会晤，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21 日特别军领导人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安全措施。…由于 10 月中旬安

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 ! ^ !! & ! ^）分别给苏共中央和总参谋部发来关于匈牙利形势的紧急报告，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持秋收

的部队以利战备的问题了。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Y. I ^ 1351160 化 0》

于10月22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以亲自掌握局势的乐化。118 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 ^ . ^ & ! ! ^ !!）也于23日赶到匈牙，1。1”相反，匈牙利军队的举措却显得犹豫不决。国防部长巴塔””伞 ^）19日下达了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同时批准了为应付布达佩斯出现社会动乱而制定的计划，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备状态，以致在布达佩斯发生武装暴乱当晚，很多军官都不知是否应当执行镇戢的命令。12。显然，实行镇压的任务只能靠苏军来完成了。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 ^ 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 ! . 丁 ^ ^ ^ ~）和大使安德罗波夫。匈牙利国防部上校米克罗什，苏奇〔1 ^ * 16552”（: 31 在回忆录中说，10月23日下午5时，吉洪诺夫当着国防部众多官员的面与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通了电话，要求准许命令特别军在必要时进入布达佩斯。得到批准后，吉洪诺夫随即命令特别军处于待命状态，并向在场的匈牙利军官宣布，部队将于午夜后某一时刻抵达布达佩斯。121 另据马拉申科回忆，同样在下午5时，安德罗波夫通过军用电话向拉先科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并询问他能否派部队帮助维持首都的秩序。拉先科回答说，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队的事情，况且没有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然而不到一个小时，特别军便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命 4 ^ 准备战斗。122 还有材料说，喀尔巴阡军区的第128步兵近卫师于19时45分，而驻匈特别军于20时接到

了紧急待命的命令。123 无论如何，在匈牙利正式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以及克里姆林宫对处理危机的措施作出决定之前，苏联军队已

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

23 日夜晚，匈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据俄国楼案记载，在 23 日 22 至 23 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首先由朱可夫通报了匈牙利的局势，然后赫鲁晓夫提议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布尔加宁立即表示同意。但米高扬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没有纳吉就无法控制局势，而对苏联来说，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如果苏联军队开进去，就会自找麻烦。可以先采取政治手段试试，不行再派军队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苏斯洛夫

121 隐 168& 一 I 贿 0010)111 通 /&5 : ^ ;
"1956 1 0 1-015 (811(131365!:

761 ? 01)113111112001186 , 1989 60 62 搏 引 自 0 扣
【1 1311(1110 3111 ., 50 1""一, 12-14, 122 则"! ^。,"! 111;
5—3100 \ 0 6 61311(1"。口她 ., 5。由则"。 ~222-223 ^

1230 一 6 ; 311(1"。 ^ 出 ," 八 3(1 ; "011310313 ~
0 6 1(61311(1 0 3111&6; 5。""则! 0"11'

124 根据布拉格的档案记载，赫鲁晓夫本人在 10 月 24 日向东欧国家领导人介绍说，230

《傍晚）格罗曾与他通^话，说因匈牙利局势恶化不能去莫斯科参加于波兹南 3^会议，但没有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因此，当过后不久朱可夫报告格罗曾向苏联狂 81

使馆武官试探给予援助的可能性时，被拒绝了。参见 1^3^131!!
", ^11^^

^01301! ", (VIII? 81111 我 1550。5, 1995.54; 77, 赚"6 化
咖,"001010. 261.

\
认为，匈牙利局势已经动荡不安，与波兰的情况不同，所以必须出兵并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和宵禁。其它主席团成员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谢皮洛夫、基里琴科（八. ^]^^^）随声附和。会议还决定派主席团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夫及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去布达佩斯。赫鲁晓夫最后说，可以吸容纳吉参与政治活动，但暂时不

担任政府首脑。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据拉科西回忆，晚 10 点半左右他被接到主席画会议现场，赫鲁晓夫介绍了布达佩斯的情况后问道，在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于是赫鲁晓夫接通了布达佩斯的电话，在简短交谈中，格罗扼要地介绍说形势很复杂。赫鲁晓夫告诉他，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苏联愿意给予任何的军事援助，但需要匈牙利政府提出正式请求。此外还通知说，米高扬将连夜赶赴布达佩斯并转告苏联的决定，在此之前不要采取任何重要举动。126

匈牙利领导人当晚集聚在格罗房间里，神经更为紧张，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格罗对他的广播讲话所引起的剧烈反应感到非常吃惊，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提议请纳吉出来组建新政府，在场的人一致同意。不久，纳吉被请到党中央大度，并毫无条件地同意出任部长会议主席。22 时 22 分，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立即召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这次紧急召开的只有三分之一成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到 24 日凌晨才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由纳吉取代赫格居斯¹¹ 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此外，大家还一致同意格罗的建议，马上给赫鲁晓夫通电话，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刚刚出现的暴乱，因为匈牙利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¹²除国家安全部队外，正规军被禁止开枪，除非他们自身遭受攻击，有的士兵甚至投靠到「自由战士」一边。于是，会议决定邀请苏联军队，并发布戒严令。127 然而，在此之前，苏军已经开始行动了。128

10 月 23 日 23 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这些部队共计 5 个师 31550 人，拥有 113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15 门火炮和迫击炮¹³，185 门高射炮，380 辆装甲运兵车，3930 辆汽车。同时进入战斗准备的还有 4 个空军师，共计歼击机 159 架，森炸机 122 架。各部队的任务是：特别军主力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并恢复那裏的秩序，同时以部分兵力在奥匈边境担任掩护；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负责占领匈牙利东部各大城市；独立机械化集团军进入匈牙利南部地区。各部队随即展开行动：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在

10月23日夜已越过苏匈边界，特别军于当地时间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独立机械化集团军主力于4时15分至6时20分进入匈牙利领土。歼击机部队起飞掩护陆军行动，森炸机部队则在机场待命。129

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它大城市，前后不足十二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格罗来电话说，因国内杂不开，无法到莫斯科来开会。赫鲁晓夫答应他可以不来。过了一会儿，朱可夫

127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着，咪之骤等译：《赫格居斯回忆录 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

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页286—298；80·06110086X010190)103，

0.349-352；0【30·110，”？1-01111116·011·68·535~538·

128 据赫格居斯回忆，在讨论邀请俄国军队的问题时，会场很！11，纳吉疲倦地坐在沙发襄：没有明确表态。决定通过后·格罗和安德罗波夫认为纳吉已经同意了·并千方百计要他在后来起草的邀请信上签字。但纳吉始终拖延没有签字·直到10月26日，在莫斯科的催退下，由已经不再担任政府首脑的赫格居斯勉强签了字。参见《赫格居斯回忆录》，页286—298。

129 组？钇0化64，0.484，几85-87，88-89，参见《苏联历史楼案选编》’第二十七

卷：贾279—281；80·1X06110100861-0X1(800103.0·368~369·

来电话说，布达佩斯的群众已走上街头，并衢进党政机关大楼。警察拒绝为大楼提供保护，而国防军派去维持秩序的部队被群众缴了械。因此匈牙利国防部长给他打电话，要求苏联派军队给予援助。朱可夫推说这是政治问题，应在两个党中央之间解决。又遇了约一个多小时，朱可夫第二次来电话。当时赫鲁晓夫表示，出兵问题主席，要讨论，

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话，可以考卢。放下电话后，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它问题都已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兹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兹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画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作出结论。出俄国的档案文献和师哲的回忆也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报告说，赫鲁晓夫走后他与毛泽东通了电话，因不了解情况，决定先不表态。。2

10月23日晚8时和9时，中国驻匈使馆发回两个电报，未加评论地讲述了布达佩斯游行的情况和格罗的广播演说。此后便没有进一步消息了。24日下午4时外交部连续发出三封电报，要求驻匈牙利和其它东欧国家使馆迅速报告匈政治局势〔特别是纳吉的问题〕，「报告时切忌主观片面和人云亦云」，并要求驻匈使馆立即派一名了解情况的参赞和匈文翻译赶往莫斯科（自然是向刘少奇汇报）。133 但也没有收到回复，其原因是通讯中断。由于中国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国际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市内邮电局进行。由于出现动乱，从23日午夜起一切国际电讯、电话全部切断，使馆的报告发不出去，国内的指示也接收不到，直到25日下午才恢复电讯〔电话仍不通〕。所以，24日上午使馆报告游行当夜已经「演变成反革命暴动」以及实行戒严和苏军出动的电报，外交部直到北京时间26日凌晨才收到。一据使馆人员回忆，一则外交部指示「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所以，尽管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但中国使馆对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

朋友。作为前任拉科西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但郝德青通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在危机过程中，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只能通过收听广播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135

133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页 3—4、5—6、8，9、14。

134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 页 7、16，10—11。此后因形势恶化，通讯再

次中断，中国使馆与外交部的联络一度只得通过匈牙利外交部和驻华使馆进行 1109-

01041-01' 页 23，271。135 郝德青：〈外交工作三十年〉，载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1' 页 65；笔者对夏道生的采访。另参见”1105

细，力，”! 1161111|18311211! ^。!!! ”。!! ”，XIX011110。膨一，乱 43，' ”卜&口. 1970. 122-1^

除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反革命分子利用学生和平游行制造武装暴乱，匈政府邀请苏联驻军帮助恢复秩序的消息外，直到 10 月 30 日之前，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没有对匈牙利危机作出任何表态，至少

在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和已经出版的论著都没有提到这一点。”这

大概与匈牙利局势发生了变化有关。27 日中国使馆报告，「反革命武装力量已基本肃清」。28 日又报告，纳吉当日下午发表声明，命令全面停火，宣布重组政府。「纳吉声明后，枪炮声已渐平息」，恢复秩序有望。137 到 28 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它占领地区撤军。138 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定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定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 10 月 29 日 20 时至 30 日 6 时进入阵地。139 《人民日报》

在 28 和 29 日两天的报道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撤退的主张。

没有人会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那么在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影响和引导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中国方面强调在处理匈牙利事件中，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问题的大致脉络是可以说清楚的。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以致美国驻苏大使波伦（(:.!!^）认为：「纳吉于 28 日晚上发表的关于苏军从布达佩斯撤退的声明似乎无非是一项得到苏联默契的、旨在促使起义者停火的诡计。1”甚至苏联军人后来都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掩兼军事行动，使苏军能够对匈牙利进行突然襄擎」。142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从 29 日到 31 日，苏联在决策时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一直摇摆不定，犹

豫不决，而中国的主张则是前后不一，先要求苏联撤军，后又主张出兵镇压。不过无论进退，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坚定。正是这些看来不容更改的意见，对苏联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面对已经狂热的人群，迟到的政府改组和让步措施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作用，反而被一些激进的闹事者所利用，匈牙利的局势更加复杂

了。10 月 29 日莫斯科接到谢罗夫的报告：八千多关押在监狱中的犯

140(：]VIII? 8”幽， 155 此 10.1998.172-173； 八 0? 0， 中 3，
011.65.0.610,； 1.100-120.141 查尔斯·波伦着，刘裘，金胡晔：《历史
的见证 [1929—1969 年]》（北京：商务印害馆 119751’； I518。
142\1312511611|10 ， ” !
1165(560131001^8^0^6^61211(11101^3111^6； 50*1”； 呵’ 277^
143^! !?^, 41.3, 01164, 9^484, 1.151-161’ 参见《苏骅历史檔案选
编》’ 第二十七卷’ 页 308—311、447—449。

人被释放，并从看守人员那裹夺到了武器；在一些大城市，居民们被煽动起强烈的反共情绪，有些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在德布勒森市，党委已经搏入地下，并要求得到军队的支持；很多国家安全机构被解散，放下武器的国家安全人员受到围攻和襄擎。当日晚又收到米高扬和薛斯洛夫的电报’ 说「群众已经失控」，「反共分子变得愈来愈无耻」，布达佩斯市两个区党委会以及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廐已被市民占领。当苏共中央得到这些消息时，赫鲁晓夫正在与刘少奇商谈如何彻底解决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说，畚谈期间刘少奇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束欧进一

步放开。会谈到 29 日深夜，苏联终于同意连夜起草一个平等辟系宣言，并决定于第二天讨论通过。145 赫鲁晓夫的回亿与中方材料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多了一个匈牙利问题。据赫鲁晓夫回亿，会谈进行了一个通宵，讨论了匈牙利事件的进程并研究了各种方案。赫鲁晓夫通报了布达皿传来的消息，中苏双方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反复考虑应该采取甚么措施，一会儿主张出兵，一会儿又决定放弃。正在这时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放开」的意见来了，于是作出决定，在匈牙利放弃使用武力，让事态自然发展，而把处理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匈牙利新政府身上。30 日，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上午，莫斯科接到米高扬的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铄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它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广播电台已经被占领，「叛乱分子发表声明，只有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

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有可能与叛乱分子联合」。米高扬建议，「停止向匈牙利派兵，而整钻在苏联领土上集结部队」，「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到那时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他最后表示，「尚未形成对

局势的最终看法」，但认为「科涅夫同志须立即前来匈牙利」。是日 14 时，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作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 时

144 八!! ? ^", 1^059! 1, 011.6 , 几 13-1 《 8 。 细 8V
00861^101000103.0.450-451.

145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昉苏〉' 页 15—16；《毛泽东传 [1949—1976, 页 604。

146 ^^^8 " ' (: .8001101101113101)1 : 1136(1311111, 16
中)), ^!!^ .1^ (00X83: ^^(! ^, 1997.0^359~360^

147 八 17? ^, 011.64, 0.484^ .122-124, 参见《苏塘历史楼案 888》，
第二十七卷，3312—314，

28 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籲苏联军队立即撤出布达佩斯。纳吉还草明：政府将立即开始與苏联政府就苏军从匈牙利领土撤出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148 按照 28 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 16 时停止战斗，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149 中国使馆也感到形势恶化，使馆人员和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甚至开始处理内部文件，做撤离的准备。150

14880^X06II。^(:! ^咖 00103.0.470-471.

149 见《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1 日。关于苏联从布达佩斯撤军的具体情况' 多，0X0^61211(1\10^1^"八"11; 0113|0^"; ^1^0^"了
1165|50013100^\0^01^: 110^4111^., 50^1^11110^71.244-245。其中说，布达佩斯广播露台直布苏辆政麻^意味军撤出布达佩斯是在 17 时。

150 中 8 外交郎#案植，109-01041-01' 页 56。

然而，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

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是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根据讨论记录，30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米高扬和谢罗夫报告的匈牙利局势时，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昨晚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同意。在随后的讨论中，布尔加宁虽然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还是同意了准备给匈牙利的呼颯害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至于华沙条约问题，与其它国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莫洛托夫认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在不同的基础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但谢皮洛夫认为：「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还提出，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后准备撤军。朱可夫赞同撤军，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在民主德国和波兹南的驻军问题更加严重，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会导致甚么后果。福尔采娃(丫.?! 化~^)和萨布罗夫也赞成通过宣言。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首先应发表宣言。随后，主席，讨论了宣言草案。

15,

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看，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晚8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

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原先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30日苏联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由此可以判断，29至30日苏联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对此，中共的影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

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对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此后几小时内，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双方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按照赫鲁晓夫在 1957 年 6 月中央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 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作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因为已经与中国达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协议，现在又突然改变做法，所以在 31 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¹⁵⁴ 这就是说，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按照吴冷西和师哲的回忆：10 月 30 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看。由于信息不通，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因此，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连夜召集政治局会议研究，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不同，苏联想在波兰动用军队是错误的，但对匈牙利必须帮助。毛泽东要求赶紧起草电报，告诉刘邓代表中央郑重向苏共中央提出，中共不赞成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同时，毛在电话里告诉刘少奇，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夜，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在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不好再说甚么了。第二天（11 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

主席，一整天的讨论，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醒说，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有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156

155 中国使馆 29 日和 30 日报告局势恶化的报，外交部直到 11 月 1 日才收到。参见中 9 外交部楼案馆 1109-01041-01' 页 51^56、57—58。

156 吴冷西：《十年论战》' 页 51—52；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页 16-17；（毛泽东传〔1949—1976〕' 页 604—605；《刘少奇传》' 页 805—806。吴冷西所说的时间与别人不同：刘少奇紧急约见赫鲁晓夫不是在 30 日夜晚，而是在 31 日。于是'

对比俄国档案中关于 30 日和 3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可以对上述说法做出是非评判。根据 30 日会议的第 49 号记录，大约在夜晚〔即主席团刚刚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和通过平等联系宣言〕，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杂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会议记录表明，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而对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的记录是：「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是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157 这说明 30 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

31 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 ^&! ^^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如果纳吉同意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与铁托会谈’向中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通报信息等。主席圃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158 以后苏联对事情的处理大体就是按照赫鲁晓夫的以上安排进行的。

显然，档案文献的记载证明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赖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 10 月 30 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在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事件的全面分析及其变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发现，实际上，中国官方的观点从 10 月 27 日第一次刊登匈牙利事件的消息时，就称之为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游行及其制造的「武装暴乱」，所不同的只是对匈政府行为的评论。在 11 月 2 日之前的报道对纳吉政府比较客观，言辞中还有表示支持的意思，从 11 月 3 日开始变调，不断批评和指责纳吉政府的做法。159 由于受到过去宣传的影响，人们大多以为苏联出兵是因为纳吉政府背叛性地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求援。实际上，纳吉因阻止苏军向匈牙利逼近未果而宣布中立是在 11 月 1 日晚上，而此时苏联早已决定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了。刷至少在 11 月 4 日卡达尔新政府在苏联坦克护卫下进入布达佩斯之前，苏联对纳吉的态度主要是认为他软弱，无法控制局面，所以最初速考虑让他参加由莫斯科组织的新政府，而中国的估计则要严重得多。161

159 见 1956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

160 八 11? ^屯 0953, 00. 4, 0. 6, 0. 5, 120-22, 80^1x0311! ^^. (:。。 ^^00103. ^522^523^161 实际上，从 25 日晚卡达尔取代格罗担任党的第一害记后，直到其突然失踪^包括 0 求苏联撤军在内的所有匈牙利政府的决定，都是纳吉与卡达尔共同作出的，他们之 18 的区别只在于卡达尔到莫斯科后就改变了态度，而纳吉则始终坚持反对苏联出兵的 2 场。参见 8115241 丁;!)^, /&! " " ((; ^尸 0/1' "-' 力"厂 0/加 11912-19561(^^^1^1^2(16-^08811(11^! ^, 2003、301-302. 朱丹丹为笔者翻译了遑郎很有影响的匈牙著作一一《卡逢尔的政治生涯）的片

段，翦在此表示感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纳吉及其政府推向深渊的决定性一步，是毛泽东首先迈出的，而在危机的辟头，纳吉恰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11月1日晚10时，纳吉紧急召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纳吉首先指出：「这次事件是一个悲剧，是党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引起的」。「和平示威运动表示了人们的不满」：但

被称为反革命暴动，结果激化了矛盾，而苏联出兵干涉又使事件「趋向极端恶化」。「当然，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反革命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活动，但只是极少数」。匈政府已无数次地提请苏联当局注意，并整天与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谈判。「他们对事件的估计和论断与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谈到问题的焦点，纳吉说：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谈判，并指出苏军继续驻留会使情况更恶化。但事情并不是如此发展的，根据飞机侦察，「从昨天下午起一直到现在的说明苏军不但没有开始撤退，反而增援两个新的坦克师」。这违反了「匈牙利政府与米高扬谈判所获得的协议」，也「违反苏联政府声明」。纳吉激动地说：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不堪设想的悲剧发生。「我们是共产党人，政府内阁半数共产党人，部长会议主席是共产党人，都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但现在情况严重到如此地步，到底是甚么原因把我们拖到这种地步」。「我们别无他法，只有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立即退出华沙条约，宣布中立」。纳吉指出，现在苏军坦克部队离布达佩斯只有六十公里，全国机场已被苏联坦克部队占领，这是有计划的军事进攻。纳吉最后深情地表示：如果苏军撤退，我们可以立即收回向联合国提出的控诉。「情况万分严重，请大使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求中国政府干预此事，帮助解决苏军撤退问题」。纳吉万万没想到，毛泽东此时已经作出了与他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决定。当然，影响莫斯科决定第二次出兵的还有其它外界因素。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美国的态度，例如10月2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化^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称，美国并不把苏联的卫星国当作潜在的军事盟友。第二天，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又把杜勒斯的话重述了一遍。10月29日，美国大使波伦还特意请苏联领导人注意这种说法，

甚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 10 月 31 日的电视讲话中又重述了一遍。163 这无异于告诉莫斯科，美国不会出面干涉匈牙利问题。此外，与匈牙利危机同时爆发的苏伊士危机，一方面如赫鲁晓夫所说，使莫斯科不能容忍在中东失去控制后又在东欧丢掉一块阵地，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使莫斯科下定了决心——西方在集中精力处理中东危机时已经无暇顾及东欧的事情了。164 此外，莫斯科盟友的立场也并非不重要。意

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 10 月 30 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与匈牙利党和政府的立场不同，意大利共产党仍坚持「把暴动看作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向着反动的方向发展」。同日苏共中央还接到报告说，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格拉西莫夫（站）在前一天曾非常尖锐地指出，匈牙利政府的许多行动是不正确的和敌视苏联的，关于苏联军队必须撤出匈牙利的声明则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还有学者指出，匈牙利事件对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使克格勃非常担心：这一骚动如果不尽快平息，将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连锁反应。167 不过，就影响苏联二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而言，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相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次要的。

11 月 1 至 2 日，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的时候，168 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169 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以后坚决

反对马上采取军事行动，他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目前不要与（匈牙利）军队闹翻」，「再等十至十五天」，「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还特别强调：「中国人已经表明了我们不能撤军的意见」。会议决定维持 31 日的决议，对匈牙利实行占领。米高扬最后提出，「还有三天考虑的时间，同志们可以出主意」，应该继续与纳吉政府保持接触。170 但是，一切都晚了。11 月 3 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五十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馆避难。171 当晚 24 时，由科涅夫元帅指挥

的十二个师、总兵力达十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了战斗准备。莫斯科时间 11 月 4 日晨 6 时，口令「霏 31」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化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和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暴动提出的退让政策，马林科夫提出的加强工业发展的方针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等等，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悄兴起。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欠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盪。173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

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之间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就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动篋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

173 样见本畚第二聿。

风一一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与其说是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波兰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借波兰危机迫使苏联承认以前的错误并发表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平等宣言。”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束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园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一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实际上，中共不仅在匈牙利危机的最后关头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就是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也有这种担心。175 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甚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藿，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76 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同莫斯科最初对波兰局势的判断失误一样，北京后来对匈牙利局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纳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举措失当，但从来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至于后来脱杂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那么可以认为，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而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笔者更注意的，不是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或主张，而是提出这样一个结论：恰恰是中国所强调的两个处理危机的原则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得到了最终体现。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一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是因为如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才会进一步扩大，声望才会显著提高。1957年1月周恩来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穿梭外交，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1月16日中匈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匈方为缓解紧张局势希望由中国出面提出建议，并促成匈波、匈南双边会谈。¹⁷⁷波党中央则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专门考察中国党和群众的关系，学习中共的「群众路线」，甚至波兰军队在其建设中也开始采用中国军队的经验。¹⁷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¹⁷⁹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

二中共高层对波匈事件的思考和讨论

¹⁷⁷ 531)86^&,"".^ 311(11211051^3111^.,7*61956^101/ ?
^" "" "" , 498-499^

¹⁷⁸ 笔者对骆亦粟的采访；谢皮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1月4日，载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译印件业编》第十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存，^耻^，未刊，页2810—2813。

¹⁷⁹ 。 如 & ! ^",7^1^001/1^01 ; 53 ; 011611 !! ^, 她 0, 5011110011(11/16001)1161-162.

180 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

危机过去了，咖沙和布建佩斯也逐渐平静下来。然而，波匈事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却远未消失。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时，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一次「大地震」，其结果是东欧各国共产党被迫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8(1 对于纤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权力和威望发动一

次政治围歼战，通过召开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会议解决问题。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都已不复存在，莫斯科面对的也不是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民众。如果不愿让步，那么通过武力（布达佩斯）和武力威胁《华沙）应对危机，似乎就成为苏联唯一的选择。中共领导人并非在原则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对哥穆尔卡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会主义，而当毛泽东认定纳吉已经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时，便坚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镇压的主张。然而，痛定思痛，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共和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思考：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的事件会不会因「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而在中国继续发生？如果在中国真的出现群众闹事或社会动荡、执政党该如何应对？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出来后，中共的主要精力在于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执政方针和路线，通过〈辟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和召开八大，这些目的已经达到。现在突然又冒出一个波匈事件，而且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前者。那么，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

1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不同声音

刘少奇及其率领的代表，从莫斯科回国后，11月10日，中共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49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委和军队负责人列席147人，共296人，

分为 9 组。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了 6 天。181

会议首先由刘少奇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化刘的报告讲了六个问题：中苏关于波匈事件协商处理的经过；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的问题；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中共的方针。

刘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是社会主义内部的问题」，接着明确了这两个事件的不同性质：「波匈事件非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领导权。是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的运动，但反革命分子有一个时期在运剿中占优势」。在详细介绍了波匈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刘少奇对这次「共产主义内部最严重的事件」分析了其发生的三个远因和三个近因。远因之一，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苏联解放的，两国党都没有采取群众路线，在对地主、资产阶级斗争中，没有把工人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也没有割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整了好人如卡达尔、哥穆尔卡，真正反革命却没肃清；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没收，把土地送给贫民，但工农缺乏阶级觉悟。远因之二，重工业投资过多，不重视轻工业、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有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走上马路。远因之三，这些国家搞教条主义，照搬苏联不灵，便失去信心；苏联又干涉其内部事务，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近因之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在这些国家党员中引起混乱；斯大林垮了，这些国家领导人跟着垮；二十大后控制不住了，煽起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波匈事件发生初期，苏联处置不恰当，特别是波兰事件，与情报局压南斯拉夫差不多。近因之三，南斯拉夫进行煽动。

183

关于如何以波匈事件为前车之鉴，以免重蹈覆辙，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员戒

182 全会原定议 8 是讨论 1957 年年度 8 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发生波匈事件后，增加

了有 II 時局的钻 8' 参见《毛泽东传. [1949 — 1976] 页 606。183
八 8 二中全食纪录：83 少奇报告，1956 年 11 月 10 日，

离工广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少奇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在帝国主义国家有这种可能，那么在工人阶级执政的国家里面，就是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了的话，如果我们采取一些办法的话也不一定产生，是可以避免的。」

关于防止新贵阶层出现的措施，刘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甚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甚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讲的大民主，无领导的民主。对于这一点，恐怕有些干部在观念上不那么清楚，一说我们要控制局面，就要实行专政，对群众也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采取专政的办法，只能实行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办法。」其次，「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这包括缩小工资差别，取消特权一如领导干部的轎车上街可以不听交通指挥，领导机关实行食品特供，以及某些警卫措施等。刘少奇说：「这些事情我们不注意，不知不觉地享受了这些特权。人民没有提出来还不要紧……一闹起事情来，一上了马路，这个问题就大了，因此，这些特权原则上应该取消。」接着，还谈到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他列举了美国政界要人华盛顿、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的例子，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最后，刘少奇

讲到了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强调说：「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甚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至于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他赞同陈云的意见，也主张经济建设速度宁可「慢一点」，「稳当一点」。

184

刘少奇的倾向是明显的，即在共产党内部找原因，所谈的预防措施，重点也是改进执政党的某些制度、政策、方法。报告把问题的落脚点锁定在经济方针，把波匈事件的教训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联接起来。这个发言具有引导作用。

刘少奇报告之后，周恩来接着作关于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周也是先谈波匈事件的教训，并联接经济建设指出两点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点，在中国，封周围兄弟国家也有个别大国主义的做法，对兄弟民族也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周恩来特别指出，中国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第二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

讲到经济方针，周恩来特别强调关注人民的当前利益，认为波匈事件的一个教训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忽视了人民生活，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并提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当前的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褙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184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楼案》'上册' 页 515—518。

接着谈到建设速度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八大提出建设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是恰当的，现在

看来，时间可能还要长一点。从放缓工业体系建立速度的设想出发，周恩来又提出，八大建议的经济指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都还「只是个建议」，要大家考虑是不是可以修改。周认为：「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不仅八大建议的计划数字可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可以修改。周恩来由此联想到「一五计划」，他的评价是「基本上正确，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并特别说明这是「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的看法。¹⁸⁵

周恩来专门讲了 1956 年的冒进问题。他说，从 1955 年年底反右倾保守开始，经济领域就刮起冒进之风，1956 年势头更猛。虽然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一再刹车，效果却不理想。周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 1956 年的计划「总的说是冒进了一些，就是数目打大了」。财政支出 308 亿元，税收只有 295 亿元，动用上年结余 10 亿元；加上 19 亿元贷款资金收不回来，整个财政赤字达 20—30 亿元。又多发货币 10 亿元，物资库存多销 20 亿元。主要原因在于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快、与 1955 年相比，预算增加了 607.1—1090。于是，「各方面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接着谈到 1957 年的计划，周恩来宣布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方针：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适当收缩。周特别提醒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下来，不然站不稳，那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因此，国务院提出了一个生产控制数字，适当收缩，主要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要减少国防和行政支出，冻结编制、预算以及国防和地方的结余，注意平衡物资，安排就业，再大力开展一次增产节约运动。

收

¹⁸⁵ 以上引言见周恩来：《周恩来理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 229—238。¹⁸⁶ 以上引言见八三中全会纪录：周恩来报告，1956 年 11 月 10 日。

第三个报告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11 月 11 日晚上，陈云在全会上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全会专门提出食、猪肉、食油这样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是因为当时这

些基本生活品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并引起社会不安。首先是食紧张。睐云报告说，明年粮食将有五十家斤赤字，「明年春天会出乱子，不

如现在收缩」。187 副食品裹猪肉紧张最为突出。1954 年 6 月以后生褚生产下降的势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质量也在下降。陈云提出，增加生猪生产的方针就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同时采取措施解决饲料问题和适当提高收购价格。缓解其它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是：减少猪肉和油脂的出口；增加鸡、鸭、鹅、兔子、鱼等家禽和鱼类的养殖；调整副食品供应季节；去掉副食品供应机构的中间环节；允许分散经营。陈云逢集中讲了他对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刺激了广民的生产活动，活跃了城乡的物资交流，推动了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机构的改革。尽管开发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不是收紧，而是在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开价格和管理。188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报告，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触及到现行体制和政策问题。这种触及当然是很有限度的，但是执政以来中共领导人速没有如此重视制度的改进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和国内政治经济的某些紧张现资，使他们不能不忧虑在中国发生社会动盪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会上，表示出这种忧虑的还不止刘、周、陈。在分组讨论中，各地方和部门负实人都反映了不少问题——住房短缺、电力不足、网材和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等，还提出了一些克服官僚化和特殊化现象的建议——机辟层次和人员应该减少，财务、警卫、用车、着病制度必须改革，干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对局势感到担心，朱德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东欧国家的经验值得重视，搞重工业要注意和轻工业的关系。董必武指出，冒进思想不解决，二五计划还会发生问题。西北组在讨论时反映，市场供应矛盾，兰州衣食讲应都紧，如此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则

187 八届二中全会纪录：睐 5 报告，1956 年 11 月 11 日’

188 陈 8：《睐 8 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页 14

一 26。! 89 八 8 二中全会简报和小组#言纪录，1956 年 1】月，仔细考察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记录可以发现，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插话、讲话和总结报告中。

在刘少奇作局势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已经表露出某种不同看法。对于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质的分析，中共中央内部似乎并没有分歧。刘少奇谈到，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原因之一是真正的反革命没有肃清；波兰、匈牙利的学生欢迎西方，不喜欢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卡达尔和明尼赫的「许多观点是社会民主党的」等等。对于这些看法，毛泽东都是赞同的。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如何处理中共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时，便显露出不同的倾向。比如，刘少奇谈到越南对土改时杀人过多感到「8 卢」，毛泽东插话：「我们杀七十七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刘少奇谈到积累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比「左」倾好一些。毛泽东插话：那要看甚么右。^

特别是周恩来、陈云的报告把吸取东欧国家的教训主要归结为实行稳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时，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站出来扭转会议的方向了。全会期间，毛泽东召集了一次小组长会议，并发表讲话。与周恩来对 1956 年「大冒了一下」的估计不同，毛肯定「1956 年国家的建设事业是有成，镇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工业和轻工业生产都有所增长」。毛认为成，鏝是主流，失误是支流：「1956 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它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此外，对会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毛讲话的重心同刘、周、陈的报告也有不同。他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出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的反复的解释。」还说：「1956 年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至于 1957 年的经济计划，毛赞同在某些方面做适当压缩，但是仍然重申「虽然如此，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关于压缩计划，毛要求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至于物资不足，则应首先支持必

190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

要的，同时注意平衡。他还提出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最后，毛泽东还提到了应注意阶级矛盾的问题和对民主的理解，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应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¹⁹¹

全会最后一天，11月15日，毛泽东作总结报告。¹⁹²他在这里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应该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看法。首先是关于经济方针，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最不满意的方面就在这里。开场白讲了一段《庄子》的辩证法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¹¹接下来毛泽东便提出了他的不同看法。针对周关于一五计划的估计，毛说：「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甚么大错，有甚么根本性质的错误」，「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特别是对周恩来、刘少奇有关冒进的提法，毛告诫道：「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广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佻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毛泽东因此建议，把国务院预算报告中「稳妥可靠」的讲法改为「充分可靠」。

191 八届二中全会记录：毛泽东在小组长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

192 以下毛泽东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毛泽东：

东：《毛泽东8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313—329。

193 后来这个平衡与不平衡的觀點被概括成「积极平衡论」，成为发动「大跃进」的一个理论根据。

对粮食、猪肉供应这类民众生活问题，毛泽东也感到问题很大，要求领导干部好好把粮食问题研究一下。不过与刘、周、陈主张尽量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积极态度不同，毛泽东再次强调：「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讲了几句要抓粮食和副业生产的话后，毛泽东就强调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还指责报纸一年来「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接着又突然提到镇压反革命问题，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这种莫名其妙转化话题的做法说明，即使谈经济建设，毛也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

讲到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毛泽东重点提出了如下判断：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已经丢掉，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就在半个多月前毛泽东还支持波兰人，现在则认为：哥穆尔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因此，毛泽东把波匈事件的教训归结为：「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刘少奇的报告和毛泽东在小组长会上的发言，都提到了「大民主」。这时，毛泽东又用很大篇幅专门谈「大民主」和「小民主」问题。波匈事件发生后，基层干部和知识界人士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苏联、东欧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胜利后没有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来。11月初，毛泽东委托他的秘书兼英文翻译林克到新华社，找国际部主任王

飞、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谈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情况和问题，他们提出了议会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分权削权、选举制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问题。李慎之 8 具龔提出，应制定一个迳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在小学和中学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建立宪法法院等，自以为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194 结果呢？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癩。他们要摘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195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从来就不是一种制度，无论「大民主」逮是「小民主」，都不过是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营工商业改造也是大民主。不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借用」这种讲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泽东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杂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赞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逮要加上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游行。他告诫党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不要形成一个脱杂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

194 林克：（林克日记 11955—19640《手稿》’未刊’页 15；李慎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百年溯》，1997 年第 5 期’页 47—49。

195 会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专门传连了毛浑来的讲话，迳特刚告诉王，李，毛主席轶「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但 X 跟着 8 有一句份量很重的话：「迳不仅是几僩人的思想问 81 而是一僩

思潮，」王飞当时对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是有深刻理解的。样他对家人的回信，读了毛泽东的讲话，他就不再饶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了。后来吴冷西又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王飞和李慎之参加中央政治局经常举行的关于苏攀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会，被王婉拒，因为从那时起，他已经对毛泽东的「英明伟

大」产生怀疑，并且感到「非常失望」。参见李慎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

的一段公案〉，页 49 — 50；笔者对王飞之子王启星的电话采访记录，2006 年 1 月

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应当革掉。」

与刘少奇单纯批评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泽东在这里把无产阶级大民主作为一种反对官僚主义的特殊手段，准备在必要时加以利用。不过，毛当时并没有考虑采用这种方式解决执政党的官僚化问题，而宁愿采取整风这种「小民主」的方式。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这里所谓「武力」，就是指公开冲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后，毛泽东终于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当时，毛泽东以为通过一般的整风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解决执政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八届二中全会是波匈事件后中共高层第一次全面讨论如何应对东欧国家风波在中国的反响。从以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对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的分析，党内没有分歧，转到中国问题后，不同的声音便出来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认为主要是解决执政党本身的问题，毛泽东则强调同时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必须防止执政党发生异化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不过刘、周集中谈的是改革制度，而毛更强调加紧思想教育。最大的分歧出现在如何调整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反复提出应减缓发展速度，压缩基建和积累指标，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止出现东欧式的社会动荡。

毛泽东对此很不以为然，尽管没有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意见，但他的不满情绪已经溢于言表。

2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波匈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11月11日针对《真理报》刊登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文章，铁托发表了一篇演说，在社会主义阵营又掀起一阵风浪。演说地点在普拉的人民军俱乐部，故称「普拉演说」。16日南斯拉夫《战斗报》刊登了演说全文。与苏共、中共的判断不同，铁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一个「严重的错误」，同时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干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虽然可能有必要，但却是「错误的」。演说还指资关于南斯拉夫应对匈牙利闹事和事态扩大承担责任的说法，铁托反驳说，把责任推到南斯拉夫身上的观点来自「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指责他们「把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人民头上，甚至别国人民的头上」。由此，铁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问题。在铁托看来，尽管苏共二十大谪贵了斯大林，但其认识却有相当的局限性，实质问题不在斯大林个人，而在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根源就在这襄，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以做到的事。」¹⁹⁶

「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及相关国家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苏联塔斯社19日发表评述文章，认为铁托的「普拉演说」同南共联盟领导机关此前不久的相关说法「格格不入」，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原则相逢背的」。文章指实铁托演说「流露出一种干涉其它共产党的事务的倾向」，他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客观上「只危害共产主义运动」。苏共遂特别批评了铁托关于个人崇拜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与西方「反动宣传」相提并论。¹⁹⁷接着，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德意志报》、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波兹南《自由论坛》、蒙古《真理报》以及意共、法共的领导人相继发表文章或报告，谴责铁托及南共联盟。198

196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的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页 15—37。197 见《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的评论》页 39—40。198 参见《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11 日。

中共领导人同样特别关注此事。铁托的演说发表时，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据吴冷西回忆，从 11 月 25 日开始，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有关部门十余名负责人参加 25、27、28、29 日四天的会议，着重议论铁托的演说。大家认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这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毛泽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顾名思义，指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毛重申了他关于斯大林「三七开」的评价，说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提出，我们要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会议议论到，对待斯大林和《！^误的同志，同对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区别，是一个分清敌我的根本问题。与会者认为，铁托要把犯错误的人赶下台，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是完全错误的。

佛

中共领导人关于「普拉演说」的看法，同苏共中央是基本一致的。与其它共产党一样，中共高层也准备发表文章，表明态度。据吴冷西回忆，这件事最早是毛泽东提出来的。11 月 29 日毛讲到要写一篇文章，而且设想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意思是要团结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关于写作的目的和方法，毛说：当然，对蛾

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围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要有分析。

30 日，毛泽东将常委会议议论的意见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方针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说苏联是由官僚主义者统治不能说服人。第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先要分清敌我，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铁托。后来苏联同志改正了这个错误，用对待同志的办法对待铁托，改善了苏南关系。铁托现在却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和其它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他把这些同志称之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是亲痛仇快的。毛提出把文章题目改为〈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 12 月 2 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文章的设想。关于文章题目，毛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如何确定，待文章写起来再说。鉴于莫斯科垄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做法（毛的形象说法是苏联只想自己开香肠店，不愿意中国也开香肠店），毛泽东指出，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是面向世界。接着，毛谈了写这篇文章的要点：

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讲清甚么是斯大林主义，为甚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主义和非斯大林主义分子是错的。应明确地讲，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

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痛修正主义。

三、 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 I 反对民族主义。

四、 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我们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波苏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 81 的阶级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拣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

五、 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着重指出，斯大林著作还是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马列主义的书还要学但是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通教条主义的亏。别人的情况我们不讲，让人家自己讲。我们一贯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截点，特别是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

六、 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困结。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有害团结的思想混乱。（着重号是笔者加的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把修正主义与苏共二十大联接在一起，而把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划了等号，并准备公开表露这种观点。1

文章要点确定之后、毛泽东指定他的两个秘害胡乔木和田家英以及吴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商议分工之后，各写一部分，最后由胡乔木通改全稿。12 日拿出了初稿，题目还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观

200 关于文章起草和初稿讨论的适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撰述是：30 日毛瀑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文章，两天后’即 12 月 2 日，胡就拿出了初稿。常晚毛潭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楼

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等人讨论。10日提交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参见《毛泽东传 1949~1976》，页 607—608。这与吴冷西的回憶差距很大。由于无法看到原始材料，笔者也就无从对此作出是非判断。所幸对于讨论的内容，两本着作的描述没有区别，因此不影响读者对实质问题的理解。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文章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主要意见是：在正面阐述中，对什么是共同道路没有说清楚，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普拉演说只是我们做这篇文章的由头，对截托所谓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观点，是要彻底批判的，但是不宜逐条引用他的论点批驳；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现在教条主义还不少，这一部分应当多费些笔墨；对修正主义要集中分析它的主要论点，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会议决定，文章初稿要做较大修改。此后，胡乔木等人修改了四五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9日和20日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文章的修改稿。会议提出的问题主要有：对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回避苏联第一次出兵的问题，而明确肯定第二次出兵是正确的；苏共二十大有积极意义，纠正斯大林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结果造成右倾危险和修正主义思潮泛滥；要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的共同道路。

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集中点」。会议认为，文章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当然也指出他的错误。关于斯大林的错误，会议讨论了国际上议论最多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肃反扩大化，一个是大国沙文主义。但「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运用的人的主观认识是否正确，关系甚大」。谈到苏联的错误时，毛泽东强调：

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批评斯大林的错，又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倾向。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结果别人捡起来打他，帝国主义

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又打他两棍子。这样在全世界鹰起了否定一切、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风潮。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着重号是笔者所加〕

文章按照这个思路又修改了两天，12月22日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讨论后，认为可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23和24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采取分段议论的方式，再次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据吴冷西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理要多着些笔墨，同时进一步讲透修正主义思潮的要害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资产阶级民主」，以此说明匈牙利事件就是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都没有搞好。第二，强调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继续明确「以苏联为首」，反对国际共运中的「多中心论」，加强国际团结，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第三，通过这篇文章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又讲了两点意见。一是分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明如果处理不好，非对抗性矛盾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从理论层面解释波匈事件的起因；一是再次明确指出要为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成就辩诬，并强调现在只有中国有资格出来辩诬，因为中共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些新的做法」。此外，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决定删去文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一段文字。

孤

据吴冷西讲，从12月27日下午到28日清早，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文章最后定稿。毛决定，28日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时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以表示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的连续性。中共最高层如此重视一篇文章，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除了1945年和1981年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在中共历史上实为罕见。其原因在于，这不是一篇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共必须应封苏共二十大、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铁托和陶里亚蒂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西方政界人士和舆论媒体各方面提出的

问题，从理论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全面阐述。吴冷西后来总结说：这篇文章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续篇和深化。它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最尖锐的问题，包括了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包括对匈牙利事件、苏波关系以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且它们还回答了美、英、法等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舆论工具对社会主义的诬蔑和攻击」。2(13

与〈一论〉相比，〈再论〉反映了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变化的轨迹。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共和毛泽东在议论中虽然也提到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思考的重心在批判教条主义，强调如何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波匈事件及其引发的国际风波，迫使中共的思路转向，把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修正主义，奢起「捍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强调苏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当然，开创了革命道路并且正要继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毛泽东，并不是要改变自己另辟蹊径的思路，因为很显然，即使是强调「共同道路」，毛也没有忘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是，波匈事件的帘动，铁托「普拉演说」的发表，已经威胁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道路本质上同苏俄经验、列宁主义乃至斯大林主义是一致的，而「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苏俄的经验，否定了斯大林主

入《胡乔木文集》的理由并不记分。这篇文章不仅不应算作胡乔木的个人作品，甚至也不应当作胡乔木的职务作品，而实实在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集镀作品。

203 吴冷西：〈十年验战〉' 页 82。

20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页 267。

义和列宁主义，也就否定了中共自己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同沿袭苏联经验、移植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相比，否定苏联道路、抛弃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修正

主义是更大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襄中共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尽管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 界定，但从中共高层的讨论中可以确定，所谓修正主义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此后，「修正主义」的概念在中国被官方沿用二十余年，成为著名的政治批判符号。

〈再论〉一发表~便在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普适反响，很多党报党刊立即进行转载或报道，反应最为强烈的是苏联。〈再论〉发表的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几乎全文予以转载。在 1956 年的克里姆林宫除夕联欢会上，赫鲁晓夫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拥抱、接吻和干杯，称赞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还请刘晓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坐在一起。其它苏联领导人也纷纷表示赞许。^苏联民众对〈再论〉的反应更加热烈。转载〈再论〉当天的《真理报》发行了约二千万份，之后还印发了一百万册单行本。文章刚一刊出^苏联国内就有许多读者打电话、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表示对文章「非常满意」。有读者说：「我参加共产党三十年了，据我评判，这样的阐明斯大林功过问题深刻地符合我们内心感觉，符合每人的心意。」还有读者说：「我不能不对中国同志表示感激，他们这样公正地评论我党。」一些读者认为〈再论〉「给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巨大的意义」。《真理报》总编辑告诉中国记者，「许多宣传员认为这篇文章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问题的典范」。^《真理报》樽载文章后，许多苏联学生和其它国家的留学生到中国留学生宿舍表示祝贺，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给世界

205 《内邮参考》，1957 年 1 月 5 日' 页 117。

: 06 〈内部参考〉^1957 年 1 月 10 日' 页 193—194。

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的新年礼物」。他们认为〈再论〉比〈一论〉「更精彩」，深刻地分析了斯大林、铁托等问题。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的主要力量，在于从理论上阐明苏联经验，澄清目前各国党内外

的混乱思想」。还有些人认为文章实际上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各国共产党对某些问题争论的总结。苏联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是辟于斯大林和戴托问题的分析，他们完全同意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有的说，〈再论〉说出了我们人民心里的话。还有的说，如果斯大林尚在，波、匈事件不可能发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看出中共和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有分歧，但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结论。²⁰⁷

从中国驻苏记者的报道看，苏联各方高度评价〈再论〉，主要是因为它充分肯定了苏联的基本经验和斯大林，在对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戴托演说的问题上，保持了与苏联基本一致的立场，在一片反苏的国际舆论中，这对苏联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持，正如苏联读者所说，「这对于打击目前反苏叫嚣很有作用」，「是中苏巩固友谊的再一次宣言」。在这场国际共运的风波中，中共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在历史上受过苏共和斯大林压制和怀疑，又对苏联和斯大林作过抵制，而现在既坚持苏联道路和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反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又有分寸地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给人的感觉是立场坚定、态度公允、目光远大。〈再论〉的发表，提升了中共和中国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声誉和威信。无怪乎苏联有些人在盛赞的同时，表示出对自己领导人的不满，说赫鲁晓夫应该到中国去学习。甚至有苏联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列宁继承者毛泽东，苏联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转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拜了。²⁰⁹

尽管中共领导人赢得了如此赞誉，但他们同波兹、匈牙利执政者一样，也需要应对国内的复杂局面和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

207 《内部参考》，1957年1月4日，页51—52。

208 《内部参考》，1957年1月10日，页193—194；1月4日，页51—52。209 《内部参考》，1957年1月4日，页52。

三波匈事件在中国社会引起的反响

波匈事件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丝毫不亚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执政党在认真讨论，整个社会也在积极思考。就中国社会而言，对波匈事件作出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基层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民主党派和私营工商业者，不过，这些人只有言论而无行动。相反，一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虽然对东欧事变没有表现出兴趣，甚至也不了解，但是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使得他们中许多人采取了与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非常类似的举动——退社、罢工、罢课、请愿和游行。这确实给执政的中共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1 社会反应及「少数人闹事」

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到波兰、匈牙利的国内危机，再到铁托的「普拉演说」，一连串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风波，在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人民当中同样引起了极大反响，特别是基层干部、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对事件的反应最为敏感，产生的疑问也最多。

人们对波兰、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也会发生暴动和示威游行，并且提出了许多疑问：匈牙利的暴动如果是反动的，为甚么有许多群众参加？如果是合理的、正义的，为甚么政府又要镇慑，苏联军队也出来了？开始报上说是暴乱，后来又说是革命，到底革命对象是谁？纳吉说要保卫革命的果实，是指匈牙利建国以后的果实，还是指这次事件的革命果实？事件中建立的联合政府代表甚么势力？为甚么纳吉在讲话中只提自由、独立，连社会主义也不提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内阁中只有两个席位，怎样能够保证在政权机构中执行党的政策，路线？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去波匈是否妥当？匈牙利请求苏军帮助平息叛乱是否合适？波匈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们提出要求独立、主权是甚么意思，难道苏联妨害了他们的主权和独立？他们提出要求苏军退出波兰、匈牙利，是否会使华沙条约组织陷于瘫痪？

在感到意外和疑惑的同时，人们对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也作出了各自的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匈牙利的党已经被资产阶级篡夺了，建立

了十几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被颠覆了。山西省干部学校哲学自修班的学员，都是十三级以上的中高级干部。在讨论中很多人说，这是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后果，全怪赫鲁晓夫说话不注意，惹下一大堆麻烦。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冀贡泉认为，匈、波事件很严重，发生的原因就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打击得太厉害。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事件源于苏联对外政策的错误。苏联政府发表关于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后，一些机辟干部认为，如果苏联早一些检讨和改正过去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错误做法，今天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有些人认为苏联的宣言是被迫发表的，「已经陷入被动才承认错误」。还有些人认为苏联宣言的自我批评精神不够，过去在苏匈关系中有哪一些问题处理得不妥当，在宣言中没有说出来。对于苏军在布达佩斯出兵镇压的行动，有人认为有干涉内政之嫌，给帝国主义以借口，而且容易激起匈牙利的民族情绪。清华大学有教授说，波匈事件是革命输出造成的后果，并说苏联军队驻在这些国家也可能军纪不好，就像在中国东北时那样，强奸妇女，搬走机器，惹人讨厌。还有教授认为，赫鲁晓夫在波兰八中全会期间匆匆到华沙去是干涉内政。上海一些干部、职工、工商界人士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争论很大，认为苏联出兵「很笨」，是「走错了一着棋，很被动」；出兵「不符合华沙条约规定，因为华沙条约是对付外来侵略，不是对付内乱的」，「苏联出兵是把小国当作自己的支部一样」。211

无论把事件起因归结为苏共二十大逮是苏联的对外政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甚么被视为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

210 《内部参考》，1956年11月5日'页127；11月2日，页61。

211《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日'贾3—9；11月5日'页127—128；11月6日'页167—168。

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经深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乃至制度层面。上海一些职工、干部、工商界人士就认为，波匈共产党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脱离群众的错误，不关心群众生活，结果「官通民反」。还有人认为是党内不画结，同中国的高饶事件差不多。更

有人挖苦说：「天天夸社会主义，夸了半天闹成这样。」…

最敏感的议论是，人们从一系列国际事件联想到了中国。尽管不少人认为中国党处理问题稳妥，对于斯大林问题比较慎重，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但还是有许多人看到了国内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胥以恒认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证明党和政府工作上有缺点，这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与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学气象系四年级学生胡伯威的批评则尖锐得多，也最具代表性。1956年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报》，指责中国报纸对所发生的国际事件封锁消息，他说：「报纸应该尊重自己的赞者，将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饰地反映出给赞者。」「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实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国，「只有报纸来提供这种自由」。他严厉地指责《人民日报》关于波兹南暴动及波匈事件的报道「粉饰现状」，报喜不报忧，「欺人太甚」，「令人作呕」。信中表达了一个善于思考而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大学生对民主和自由的想法：

212《内部参考》，1956年11月6日’页167—168；11月5日’页129。

213’〈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日’页5。

我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主张的不是为自由而自由，为民主而民主。我也不愿意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原则来衡量和批判我们的事情。但是我坚决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发扬，人权和人的尊严得到真正的（不是口头上的）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忠实地遵从这些原则，才能把人民群众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这才对社会主义有极大的好处’人民群笨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变得聪明，成熟，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热爱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来防止和消灭种种可能发生的弊病，消灭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和腐朽倾向。」214

中共执政以后，新闻舆论作为「党的喉舌」只能听命于中央，《人民日报》的宣传方针并不取决于报社，而来自中共中央。来信批评《人民日报》，实际上就是批评执政党。更为深刻的是，来信提出的「人权」和「人的尊严」，与中共的政治理念根本不合。在中共看来，「人

权」、「人的尊严」这些东西，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概念，与「民主」、「自由」一样，都是欺骗人民的。胡伯威的来信已经超出当时中国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程度。然而，还有更为极端的言论。比如，在北京钢铁学院的食堂等几个地方，就出现了粉笔写的标语：「反对目前社会制度」，「我们要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处于悲惨的情况中，青年们行动起来吧」，「支持匈波人民的斗争」。215

事实上，知识界和工商界对中共现行政策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已经有斩表露，束欧的动通不过更加强化和刺激了这种情绪。还在 1956 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各部门收到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来信就大量增加。据中央机关十六个部门和知识分子十人小组办公室不完全统计，至 1956 年 5 月底止，共收到来信 5200 件，普遍反映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不满。216 工商界很多人则对中共给资本家代理人和小资本家定为资本家成份的政策有意见。无锡市资本家代理人普迹说，资本家已经固定五厘利息，企业基本上由国家管理，我们在国家领导下工作，靠劳动，拿工薪，再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实在冤枉，纷纷要求献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资本家半年定息只有五元钱，最少的仅一角七分，却为此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康永仁说：「摘除这些人的资产阶级帽子，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217

214 《内部参考》，1956 年 11 月 10 日' 页 295—298。笔者 2000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

期间，有幸结识了已年过六旬的胡伯威先生并听他讲述了当年的情况。215 《内部参考》，1956 年 11 月 5 日' 页 129。216 云南省档案馆，7-1-804/1-4。有关情况详见本章第一章。217 《内部参考》，1956 年 9 月 24 日' 页 621—622。

如果说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还仅仅是对中共某些具体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见和建议，那么在波匈事件前后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局面，则主要表现为广民退社、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这些情形在 1956 年下半年继续蔓延，甚至日趋严重。

12 月初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广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社员闹退社的严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退社社员已达 7 万余户，已经垮掉的社有 102 个，正在闹退社的还有 12.7 万余户。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与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八个省电话联系，秋收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总户数的 19%，多者达 57%。正在要求退社的农户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宁波专区，想退社的占 2099 左右。另据新华社内部报道，江苏、山东、贵州等省，退社的情况还要严重，有的地区比例高达 107%，甚至很多党员都「要求单干」。辽宁、湖北都是农业整收省份，但同样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就连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大规模社员退社的情况。218

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退社单干的情况，来自沈阳的报道说，据省手工业管理局 9 月 29 日统计，已正式被批准退社的社员有 524 人。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市九成多的独立手工业者都参加了合作社，但高潮过后就出现了社员要求退社的迹象。这种情况在目前供不应求的缝纫、制鞋两个行业中最严重。另据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的粗略统计，从 2 月以来，已经批准退社的小业主有 535 人。有一个五金联社，退社的小业主涉及到五十个基层单位，共计 398 人。219

《内部参考》还报道了大量工人罢工请愿的情况。如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单位，从 6 月到 9 月已经发生了 6 起工人罢工请愿的事件，参加者少则数十人，多则 300 人。10 月 29 日福州市发生了 60 多筑路民工集体向市人民委员会请愿的事情。：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到 12 月上旬，上海轻纺工业已有 53 个合营工厂 1834 人因工资和福利问题先后发生罢工、怠工、请愿和其它闹事事件。其中罢工的有 10 个厂，116 人；怠工的有 3 个厂，60 人；请愿的有 2 个厂，29 人；在厂内闹事，包围公方代表，准备罢工、请愿的有 38 个厂，1629 人。220

此外，学生罢课、请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 9 月 15 日在成都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两个技术工人学校，四百多学生开始罢课，要求转学和分配工作，参加者很快增加到八百多人。罢课者集体到中共四川

省委和市劳动局请愿，殴打干涉他们罢课的同学，随意破坏公共财物，甚至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还有三百多人在成都游行示威，向中级法院请愿、控告。至10月底记者发稿时，学校已陷入严重混乱状态之中。12月下旬，陕西省少数学校的学生也发动集体签名，强硬要求用罢课或绝食等办法对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抗议。221

220《内部参考》，1956年9月24日，页615—616；11月15日，页367—368；12月

17日，页342—343。221《内部参考》，1956年10月30日，页1328—1331；12月26日，页561—564。22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页154，

动乱局面在波匈事件后确有扩大的趋势。按照1957年3月中国官方的说法：「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它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任务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22：尽管从目前看到的史料，还不能说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国际风波的影响，但就各地闹事的缘由而论，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危机确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即都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执政者的强烈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长期受到压抑，一旦爆发，便成烈火之势。

在中国农村，社员退社主要由于合作化以后广业社生产管理统得很死，社员生产的自由不多；唐业社干部作风粗暴，打骂社员；农业社分配不合理，农民入社后的生活不仅没有提高，反有下降。据新华社记者记者在湖北了解的情况，社员退社有以下几点原因：合作化以后收入减少；在社里做活累，没有休假天，没有零用钱，不自由；合作社干部作风恶劣、不民主；按劳付酬、入社生产数据处理、社员干部补助工分等政策性问题没有处理好。在城镇，手工业者退社则是因为手工业合作社经营管理过分集中，难以适应手工业生产特点，远不如个体生产灵活方便，而且内部制度不健全，尤其分配不合理，入社手工业工人收入减少。中共沈阳市委地方工业部工作人员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退社的现象还有发展的趋势。根据目前情况分析，其主要原因

是合作社内部还没有搞好，管理混乱，工资尚未评定，社员工资迄今仍是预借；另一方面，由于手工业产品供不应求，未入社的少数单干户收入多、利润高，影响了社员的情绪。」²²⁴《人民日报》记者在上海了解到，手工业者退社，主要是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小业主经济收入比入社前大为减少，且目前自由市场生意活跃，有利可图，因此对合作社给他们的固定薪水不感兴趣。²²⁵至于工人和学生的罢工、罢课、请愿、游行，基本上也都是因为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是出于对基层管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满和反抗。综观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琐事」，就每个具体事件看，规模并不大，程度也不算严重，与波兹南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无法相比，所以当时被毛泽东称为「少数人闹事」。但是，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却有着大体相同的起因。综合起来看，问题的存在是带有普适性和全局性的。困惑、不

²²³《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4日，页1178—1179。

²²⁴《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6日，页1258。

²²⁵《内部参考》，1956年10月31日，页1547—1549。

满、骚动，中国社会底层的各种骚乱，与波匈事件的震动和反响交织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构成了一种虽不过分紧张：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确实有些担忧了。

2 中共采取的让步和安抚措施

各地发生的「闹事」和社会问题，中共在召开八大时已经有所察觉。这一点，在中共八大的各项报告及大会发言中均可看到。对于前述一些地方党委的报告，中共中央也及时作了批示和转发。如9月29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新疆区党委和福建省委的报告，要求各地参照这两个报告，贯彻中央关于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克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精神。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实际上也是要

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又批转了一些地方报告，并发出一些相关指示或通知。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农业合作社在当年秋收分配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包工包产不合理、劳动报，定额不够准确的问题加以清理，在实行超产奖励、减产处罚的制度时，采取多奖少罚的原则；对入社生产资料作价不合理的问题，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员应该交纳的股份基金计算清楚，欠交的应该尽力补交，多余的应该分期偿还；对农业社干部的报酬，应该根据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合作社章程规定，对于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适当的调整。228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河北省委、广东省委的报告，在批示中告诫各地党委，「急急忙忙」让富裕中农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因此让一部分巧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对坚持退社的手工业者和其它行业从业人员，可以允许他们退出，不必勉强把他们留在社内。批示还

226 详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及本卷第五章。227 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选编》'上册'页622、630。22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页413—421。

注意到合作社内困难户的问题，要求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可暂时给以土地报酬。^时近年末，中共显然希望通过调整年终分配方案和有限度地放开退社的口子，平息各地的退社、分权、请愿风潮，缓和农村基层的矛盾。

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同时，中共还着手解决城镇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问题。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一方面是自由市场放开后，个体手工业营业「突然兴旺起来」，这对合作社社员是「很大的刺激」，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后，手工业社员收入减少了。文章更多地是批评某些合作社组织，「没有认真执行党和政府关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分配上先积累，后工资福利，把积累额定得遇高，致使社员收入下降；在生产上不顾客观条件，把不该集中的也集中起来，甚至高度集中，

社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业务不能开展，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在小业主的使用上，没有量才录用，或者给以适当安排；在技术手段上，追求机械化，工廩化，把公积金定得过高，处处向现代化工廩看齐。文章提出对手工业合作社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积累比例偏高的，要适当降低；不该集中而又已集中起来的，要迅速分开；对小业主和辅助劳动力安排得不合理的，要加以调整；工资不合理的，应当适当调整；管理机构庞大的要精简；对其他不合理的经管管理制度，也要按照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加以改变」。^与退社现象相联繫，1956年下半年，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一个新现象：一些原私营工商业户开起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个体手工业生产也日趋活潑。9月份上海市手工业个体户为1661户，从业人员5000多人；10月份就发展到2885户，.从业人员8100多人。广州市9月份一个月内，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增加1100多人。武汉市合作化后，个髒手工业者只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将近8000人。

229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彙编》'上册'页640，648。

230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4日。

天津、北京'青岛、郑州'成都和广西等省市，个体户和从业人员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认为，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八大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自由市场，直接刺激了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使原私营工商业「死灰复燃」。有些干部担心「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这样下去会妨碍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1 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和态度却有所不同。

231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0日。

232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167—170。

23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174—177。

12月7日，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批评了中共内部「左」的空气：「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只批评不鼓励，不认识资产阶级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对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又批评又鼓励

的方针。」毛承认，公私关系上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级，只能怪上面」，还说：「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管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民建’工商联、民主党派同我们是合作的，看不到对抗。」说到「地下工厂」时，毛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但自由市场和地下工厂能够发展起来，这说明「社会有需要」。应该「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毛泽东以制衣业为例，主张私营工厂与合作社竞争，并把这叫做「新经济政策」。「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²³²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同工商界人士谈话，肯定「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熟悉了，更加靠拢了」。还说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对与会者提出的许多问题，毛说对他帮助很大，而且承诺政府会和他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²³³

12月17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就有二百多。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甚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副委员长黄炎培发言提出私人开厂的问题时，刘少奇又说：「有一些资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²³⁴刘少奇的话同毛泽东的谈话如出一辙，甚至比毛更放开。一个细小却涉及实质的差异是，毛认为自由市场的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刘则强调私人工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过在当时，这样的差异还没有影响到中共领导人对私人开厂的看法。12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表明对个体户的态度。社论肯定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城市的就业人数」，「这是对国家有利无害的事情」。

235

三个月前，中共八大刚刚宣布「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又说「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没收」，给人的印象是颇为放开的。这气魄多少有些像邓小平在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了。

缓解社会紧张，平息各地「闹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国民生活问题。1955 年起，由于过分偏重国家基本建设，日用品生产受到挤压，加上各地争抢高速度，导致物愤上涨，商品供应紧张。以大城市上海为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所带来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发展农业四十条纲要草案提出以后，全国蔑业的生产劲头

2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歉出

版社，19961’页 382，383。235 《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20 日。

很大，纷纷购置各种生产资料和文教卫生用品，带动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上海市场提出了天量需要，原来上海认为积压的一些商品，很快订购一空，成为紧张商品」。当时国营商业部门曾想了不少办法开辟货源，满足生产方面的需要。下半年，上海的生活消费品供应也跟着紧张起来。8、9 月间，全国范围内在提高工资基础上的工资改革陆鑽结束^增加工资后的社会购买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消费品市场。再加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这一时期发放，更增加了对消费品市场的冲擎。呢绒、绒线、针织品、家具等供不应求，部分高级消费品如自行车、无线电、手表、鑽戒等，也畅销起来。工业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和紧张。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特别是猪肉来源较紧，减少了供应量，居民发生排队抢购的现象。236 面对恢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安排计割时强调注意人民生活。12 月 18 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十一次全体会议。^陈云在会上提出「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

生条件下来搞建设」的观点，他主张「保证必需的民生，有余再搞建设」，还提出要找出一个「民生和建设正确关系的标准」。238 虽然很难说这是要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作为权宜之计，国民生活也已经被国务院摆在了基础的位置。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国民生活。八届二中全会前，各地上报汇总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为 243 亿元，二中全会决定调低到 135 亿元。陈云对这个指标仍有疑虑，于是在 12 月 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 1957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提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削减。239 会后，国家经委经过仔细计算，果然认为基本建设投资还可以削减。12 月 27 日、30 日，陈云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236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贯资

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页 429—430。237 此时周恩来出访，由陈云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238 陈 5：《陈云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 134—135。2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 1065。

主张将 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削减到 114 亿元，还说「不要怕别人说穰会主义」。显然是针对波匈事件的余波，陈云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样做「可以避免犯东欧国家的错误」。240

为了解决企业职工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由刘少奇主管。12 月 17 日’刘少奇召集十人小组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负责人开会，座谈劳动调配、工业基础、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问题。刘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如工廩用人可以考虑采取「劳动合同」的方式；「建立新工业基地，要研究轻重工业的配合问题」；企业管理可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它又是领导，又是监督，主要是监督，是权力和监督机关」，并

且不无抢忧地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要出乱子」。刘少奇告诉与会者，中央要「全面讨论」工人问题，要求各种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能解决的应作出决定加以解决，不能解决的要有交代。241

240 睐雾：《陈??文集》，第三卷'页 141~143。

241 (割少奇年谱 11989 — 19691)，下卷'页 381—382。

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会的一方面。上半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即在内部系统开始了一次检查工作。从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仅对中共各级统战部门存有意见，而且对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处理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界关系意见颇多。于是，中共中央在 12 月 26 日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重点转移到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部队，主要检查这些单位中的中共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中共承认，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在党派关系上，我们的许多同志不承认或者不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地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或者加以歧视和排斥；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上，很多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想积极工作而不可得；在民族关系上，许多同志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指示要求各地和各单位「一边检查，一边解决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总的说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地「闹事」和社会实际问题，中共和政府的主旨显然是调整原有政策，采取了某种「让步」的姿态。但是，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波匈事件后的社会思想动态。对此，中共特别是毛泽东则看得比较严重。

3 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1957 年 1 月 18 日至 27 日中共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关于这次会议，除了已经发表的毛泽东两次讲话外，迄今未见到任何其它文献，会议讨论的情况也不得而知。毛的讲话一次是在会议开始的 18 日，另一次是在会议结束的 27 日。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

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问题。~

毛泽东在1月18日的讲话似乎非常严厉，他一开头便指出：「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出现在党内，如争名夺利、贪图享受思想在党内的发展，一些领导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的怀疑态度，以及反映富裕中农思想的单干风有所抬头。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学校里学生闹事的背景，一是学生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富裕中农家庭者占90%，一是受国际事件影响，「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纤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毛特别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

242 中-人民解放军画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

二十一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1，页546。243《毛泽东传（1949-1976）》页615'以下所引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通集》，第五卷'页330-362；吉林省档案，1-13/1-

1957.69'页1-4。

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随后，毛泽东使用主要篇幅专门讲国际风潮对党内和国内的影响。从尖刻的言词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蝼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闹事

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中共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甚么可怕」。他们无非是要推翻共产党，结果就暴露出来。「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蝎子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甚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最后提出：「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1月27日的讲话，毛泽东重点谈了「闹事」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闹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地主、资本家闹事是因为他们心怀阶级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议论纷纷是因为他们都讲唯心论，大学生闹事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至于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发生的少数人闹事的原因，一方面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是「工作方法不对头」；一方面「是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存在」。由于对立面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对于「闹事」的态度，毛泽东主张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积极的态度，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他引匈牙利为鉴说：「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恹，压到一个时候就要便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闹得对的，就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闹得不对的，就驳回去。既「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甚么要求都答应」，也「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不能学段祺瑞」。应该耐心地做大多数闹事者的分化、引导和教育工作，而「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至于那些没有行动，只有言论的人，毛泽东再次提出「唱对台戏」的办法，言词同样是尖刻的：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通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困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抹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毛泽东最后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学问，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看，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已经蕴含了他后来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思想基础。不过，当时中共急需解决的问题还不在这里。从波匈事件后中共

召开的几次会议和应对国内局面采取的方针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党，中共在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继续巩固政权时，面对着三个问题：第一，中共各级领导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这是引起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第二，普通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由于中共政策方针的偏差可能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不过，工广大众不会反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会随着执政党自身的作风改变和政策调整而得到解决；第三，党内外知识界（包括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奇谈怪论，这些言论本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但由于建国以来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所以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有限，不会闹出大乱子。显然，要避免中国社会出现波茧和匈牙利那样

的危机，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前两个问题。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著名学说——「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发动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第七章

发动整风：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共和国史研究中，1957 年最受国人关注的就是整风反右运动。尽管受到害刊检查的严格限制，相关的学术论文和尊着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还是不断涌现。1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2 但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毛泽东确实设想并发动过一次整风运动。就打击的对象和运动的方式而言，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且，整风本身在不同的阶段，其内容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打击共产党内脱杂人民大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接着想要借助党外知识界的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执政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以往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反右运动的外在表现及其社会后果，而对整风与反右的关系及转化过程缺乏深入的探讨。本书用三章的篇幅讲述整风和反右运动，重点在于讨论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为甚么会发生，从而说明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在 1957 年思考和关注的核心问题。本章旨在说明整风运动的缘起。

一毛泽东决心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通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画鼓动和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产党政权；国内根源则在于人民大众对执政党脱杂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至于在中国，毛泽东和中共认为，经过镇反、肃反，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作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1 党内整风的最初倡谗

众所周知，毛泽东公开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建议是在 1956 年底。其实，在此前几个月，中共便已经考虑通过整风方式来解决执政党面临的难题。早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问题以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中共就感到有必要在党内开展以学习理论为主要形式的整风运动了。1956 年 6 月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提出：

整风运动（指延安整风^①引者）是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一次最幸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整风运动反对了主榅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胜实践相结合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个运动使

我们的党变成为政治上成熟了的菜。

为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造行得更好和更有效，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榅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牧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敖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相当于轶委书记一级以上干部中’在高、中级党校学员中，

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中，在高等学校肄业及学生中，根据〈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五篇文章，进行报告和学习。这个工作可以在现在趁〈改造我们的学习〉

发表十五周年的时候即行局部开始，分期分批进行，到 1957 年 7 月结束。³

尽管这裹边没有直接提出开展整风运动，但将要在党内进行整风的意旨是明瞭的，形式是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内容是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很快又加上了官僚主义。⁴

这一阶段，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蒙昭盟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仅兼八个旗县的材料，一年多来就发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 152 起，预审及监所管理违法乱纪事件 32 起，非法搜查与捆打公民 70 起，因工作中方法不当而造成的严重事件 13 起。由于干部在工作中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无视百姓生活的错误，浙江省宁波地区连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仅慈溪县就有 91 起，宁海县有 78 起，涉及的乡镇达 607。一八五芬，而且「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⁵ 这不能不引起执政者的密切关注。

八大召开前，毛泽东在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就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⁶ 在第二次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又针对苏共的教训指出：

我们应该避免而且可以避免走那么多弯曲道路，主观主义这个东西可以更多地肃清，宗派主义也可以更少一点。我们这个党，在最近若干年以来就中央来说，就高级干部来说，是个宗派主义比较少的党，也是主观主义比较少的党。你说主观主义有那么多，你就不

能解释，为甚么革命搞胜利了，现在搞建设又有了成绩。你说宗派主义有那么多，那为甚么我们没有陷于孤立？在革命时期没有陷于孤立，在建设时期也没有陷于孤立。可见我们的主观主义不是那么多，宗派主义也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是有主观主义，还是有宗派主义，包括中央发布的文件中间也有。……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灭少，可以大为减少。7

在9月15日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从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逢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8

在此前后，报纸上开始报道各地开展整风运动的消息。如陕西、西安、青岛、黄冈等地党的机关开始学习整风文件，「山西省全面展开整风运动」。9中共河南省委召开了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

会议检查和总结工作，「揭发和批判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缺点和错误」，并确定今冬明春要组织全省干部通过系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整顿和提高干部的思想作风」。刘少奇甚至向印度共产党代表8「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经验」。11

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最初提出的整风方式主要是加强理论学习 and 思想教育，而且是在党的内部进行，这与后来开展的邀请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的整风运动是有重大区别的。12 第二，之所以选择「学习文件」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进行整风，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与苏共相比，虽然也有，但是并不多。不过，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2 准备开展整风运动

1956年10月连续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给中共敲响了警钟。如何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这是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在这次全会的最后一天，11月15日，毛泽东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裏。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毛泽东指出，「上半年发通告，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毛还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13可以看出，毛泽东要在党内整风的决心更坚定了，至于整风的方法，已经不仅是「学习文件」了，而是增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只是强调要通过「小民主」、「和风细雨」。个中的原因，大概如国外研究者注意到的，「全会公报的用词表明」，开展整风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呼籲而不是官方的指示」。14可以印证这种判断的

是，胡乔木11月23日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时，反复讲到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民主化，却对整风只字未提。”也就是说，中共中央此时尚未就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没有作出决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甚么毛泽东在三个月后再次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张时，把启动日期推迟了半年。

从当时党内干部的一般理解看，这次提出的整风，仍然是一次思想教育运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传达全会文件时讲到，中央的意思就是在这次整风中、一定要搞彻底，不是刮一阵风，不是搞突擊式的

运动，不要来个突然襄擎，不要损伤元气。也就是说，不是采取暴风骤雨的大民主的做法，而是用微风细雨的小民主的做法，事先充分做

好思想准备，以达到提高干部思想觉悟⁷冬平，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

误的目的。”甚至几个月后，康生在作报告时仍然认为：「二中全会主席提出准备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通过这个运动，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17

在 1957 年 1 月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整风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时，重点谈的是如何防止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讲到要让民主人士「唱对台戏」，对有些人要「后发制人」，甚至提到是不是有人想复辟？¹⁸于是如前所说，有不少人认为，从这时起，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发动反右派运动，而且开始设计「引蛇出洞」的策略。笔者以为，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了。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对中共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三种情况，即党内外知识界的「奇谈怪论」、群众闹事和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担心和关注的是后两者。尽管谈到有人（特别点名是民主人士）可能会反对中共政权时言辞尖刻，但那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因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而所谓「后发制人」的策略，则是毛泽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一般方法和思维逻辑。从长期的发展看，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况且后者往往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情况确实如此。据新华社的报道，当时中国社会大量出现的罢工、罢课、退社和游行请愿等现象，究其根源都在于执政党本身的错误和问题。¹⁹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关于中共干部官僚化和特殊化的报告骤然增加。如「江苏省少数基层干部作风恶劣、横行霸道」，「内蒙古农村干部强迫命令非常严重」，「沧县专区部分蔑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命令主义倾向」，「河北省各地基层司法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湛江市部分机关和干部「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江苏省少数机关「强占民房严

重损害群众利益」，茧州市一些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官僚主义很严重」，河北省县级以上机关、企业部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天津国营工廩「干部的命令主义、惩办主义作风严重」。20 进

入 1957 年后，情况更加严重。新华社福州 1 月 12 日讯，中共莆田县委召开三级扩大干部会，与畲的 504 名区、乡主要干部中，70 免左右都有强迫命令、贪污腐化的情况，致使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暴露得更多。江苏省震泽县没有一个统战对象，却设有统战部；江都县没有山林地区，但却设有林业科；淮阴专区有些县没有工厂，也成立了工会，还要收会费。浙江省吴兴县部分乡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已经发展到达法乱纪的程度：如乡干部捆绑、吊打群众，私设监牢和公堂，任意关押村民，甚至游街。21 还有报道说，湖北省部分广村干部中存在较严重的「六比四怕」思想，即比地位、比待遇、比名利、比享受、比阔气、比排场；怕下乡，怕进落后社、怕进山、怕劳动。”

毛泽东不得不把注意力再次樽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问题。

二开展党内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

1957 年 2 至 3 月，毛泽东在两次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提出要开展整风运动，并反复论述了开展党内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即如何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毛泽东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通过扩大民主、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改变党的作风，化解社会矛盾。这两个讲话，尤其是第二次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有人欢喜，有人麦虑。但无论如何，毛泽东是决心按照自己的思路尝试一下。

1 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谗讲话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了一

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试，用「两类矛盾」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哲学语言，解释国内发生的种种问题，并给执政党提供指导性方针。”毛本人说，他这个讲话所谈的问题已经「在心里积累了很久」。； 4

所谓「两类矛盾」，是指「敌我矛盾」（第一类）和「人民内部矛盾」（第二类）。仅就这两个概念而言，毛的讲话不是首创。”不过，从波匈事件之后，毛就开始频繁地使用这些概念，如 7、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在 12 月 4 日致黄炎培的信中，毛泽东已经勾勒出他辟于「两类矛盾」的基本观点：「社会总

23 以下所引毛泽东的讲话，如无特别注明，均出自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

缘稿），1957 年 2 月 27 日。这个讲话在正式发表前经过了重大改动，而修改的过程

恰恰是从整风转向反右的过程。24 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记录稿），1957 年 3 月 10 日’ 25 据笔者所见文献，刘少奇在 1951 年就有「敌对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提法。

见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 I 北京：人民出版社’ 胃 19851’ 页 92—99。

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

的方法，后者是用！^良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尽管如此，要在大会上全面阐述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毛泽东还是格外认真地做了准备。^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共高层干部，还有许多党外人士，总计一千八百多人。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开宗明义地说，他要讲的是如何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专政就是解决敌我之间矛盾的」，而「这个专政制度，不适用人民内部的范围」，在人民内部则是「民主问题」。

26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 514。

27 毛泽东不仅准备了害面提网，甚至还在一次只有三十七人参加的小规模会议上进行了试讲。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 310—315；《毛泽东传〔1949—1976〕》’页 620。

转到民主问题，毛泽东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出来后，有些人很高兴，也想「来一个大民主」，他们的所谓大民主就是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但是，从古以来，所谓大民主，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都是对付阶级的。有一些同志和党外朋友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另外有少数人是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大民主，把人民政,整一下。接着，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幼稚，以为我们的民主太少了，欧洲的民主好，人民代表大会不如西方议会，主张两党制，他们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还有人主张取消专政，说民主才是目的。毛解释说：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多，我们的自由很少。实际上，「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

显然，毛泽东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仍然没有杂开阶级斗争的轨道，而这些话自然主要是说给那些呼戴大民主的少数人听的。这时，讲话逢没有进入主题。

主题是执：党应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说：思想问题、人民内部问题，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是错误的。用行政命令压制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是没有立场的，是有害的。凡属思想方面的问题，应该用讨论的办法、辩论的办法、批评的办法

教育

的办法、的办法来解决，使人家信服你。毛泽东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为例警告说：「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由第一类矛盾转变为第二类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争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就可能成为对抗的矛盾，那就变成第一类矛盾了。」在此，毛泽东批评了苏联的做法：「斯大林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比如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是两种人，有敌人的批评，也有人民的批评，应该加以分别。斯大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毛也批评了匈牙利：因为过去根本没有肃反，反革命分子杀得很少，所以才出乱子。至于中国，毛泽东承认在肃反中也曾混淆过两类矛盾，但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

我们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没有苏联那么「左」，也没有匈牙利那么右。正是因为通过镇反和肃反正确处理了敌我矛盾，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重演。他非常自信地说：匈牙利事件后，人们说中国局面很巩固，外国人的看法是如此，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总之，国内「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在这个前提下，毛泽东开始谈论人民内部的种种问题。诸如对合作化的评愤问题，资本家的思想改造问题，青年学生的政治学习问题，以及关于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问题。

既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矛盾，就必须予以解决，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采取与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考

考虑到这两幅方针自 1956 年春天提出来以后党内存在的疑虑，毛泽东首先强调，百花齐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争鸣就是也可以讲唯心论，但是这没有甚么要紧的，对毒草和错误言论批评就是了。比如「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锤' 惦栾，他用假名字写了两篇文章，把过去说

得一塌糊涂，绝对的坏，否定一切。现在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
28

不过，毛泽东着重谈的是对双百方针表示怀疑和反对的意见。1957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军队文化干部陈其通、马寒、陈亚丁、鲁勒的来信〈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该文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为工赉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愈来愈少人提倡了；有些人利用批判「公式化、概念化」为借口，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要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毛泽东敏锐地指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实际上是怀疑双百方针，似乎实行这个方针，就没有大作品和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了。毛泽东明确地说：「我现在表示我的态度：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一篇文章是错误的。」²⁹想到苏联对双百方针的怀疑态度，毛泽东更生气地指出，《真理报》不登陆定一的文章，就喜欢陈其通等

人的文章，捷克和波兰也刊登了，「气味相投」，「教条主义就喜欢教条主义」。毛? 泽东还提到了青年作家王蒙那篇批评官僚主义的小说，尤其对于那些围攻王蒙的批评意见表示不满。从这些事情中，毛泽东得出一个印象：「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不是我这话说得过了一点？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佃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不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了的，真正认为这方针是正确的的是少数。」

关于执政党普迹关心的「少数人闹事」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事物都有两重性，同匈牙利事件和批评斯大林一样，罢工、罢谏、游行示威、请愿这许多事，又好又不好。至于闹事的原因，无非是领导和群众两个方面，但首先是领导的责任。所以，讲到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请愿这类事件，毛泽东提出的第一条就是克服官僚主义，当然「拿刀子杀人得到公安局坐班房」。

毛泽东这洋洋洒洒四个小时的讲话，既批判了教条主义，也批判了机会主义，既提倡百花齐放，也强调铲除毒草，可以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考，似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到3月1日下午作总结报告，毛泽东在回答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提出的一些问题时，就

显得有比较强的针对性了。30

有人提出，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可不可以将马列主义规定为指导思想？毛回答，共产党的思想就是马列主义，而人民民主制度就是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思想。问题是如何领导和指导？并非要一切都进共产党，都相信共产党的道理，都讲唯物主义世界观，强迫人相信马列主义世界观也是不能的。马列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如怕批评，就不是真理，如果一批就倒，那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30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日。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肯定地说，可以批评。老干部一批评就倒，那就应该倒。怕批评的人就是有弱点，有弱点就要批评。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都要批评；政府有缺点也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甚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还有人问，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究竟有多长？毛说，「长期」就是共产党有多长，它就有多长，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它就有多久。至于如何监督，毛说，主要通过批评和建议来监督，批评、建议有各种机会，今天开会就是个机会。从画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圈结，改进工作。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的主要的方法。有人提出，说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毛答，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过去我们好些做法是这样，如肃反、土改。现在社会改变了，遗留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说这个「小」不够，再来一个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毛解释说，现在我讲的是有些机关、工厂’学校、合作社连那样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没有，就只有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所以出来罢工罢课了。宪法没有罢工的条文是不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是提倡用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只有对那些个别的、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才用罢工罢课来解决，首先还是反官僚主义’。

讲到百花齐放，毛提出要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过去是二千份，现在扩大为三十万份，要把帝国主义骂我们的和他们发生的乱子，作

为内部刊物印出来，让我们见见世面。毛甚至表示赞成出版蒋介石全集。

31 据胡乔木后来说，毛当时不想发表讲话的原因是「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慷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 23—24。

从这些问答中可以看出，听众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而毛的讲话则显得比较轻松和开放得多。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告诉与会者，他的讲话遗要补充，不准备全文发表，免得引起全国性罢工罢课，给地方官员带来麻烦。31 显然是感到言犹未尽，毛泽东接着说，最近要召开宣传工作、报纸工作会议，他还要讲一次话。

2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

中共党内对毛泽东的主张，特别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存在着疑虑和异议。北京市委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直到最高国务会议前，「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市委有的负责同志对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有同感」。这种情绪是有目共睹的，就连党外人士也看得很明白。被邀参加宣传工作会议的著名翻译家傅雷认为：「主要是因为『百家争鸣』不开展，教条主义顽抗，故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过话后，立即由中宣部电召全国各省市宣传文教领导及党内外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的代表人士来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³³

3月5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发表文章盛赞40年代的整风运动，最后点明中共要「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纪念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就在于说明这一点」。³⁴

宣传工作会议从3月6日开到13日。与以往不同，这次宣传会议邀请了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各界160多名非党人士参加，比例达全体与会者的五分之一。³⁵会议的议题是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问题。程序是先听毛泽东的

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最后是毛泽东讲话。不过，会议期间毛泽东并没有阅着，他连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了几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一边听汇报，一边谈意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

3月6日晚上，毛泽东召集九省市党委宣传部、文教部部长座谈会。针对党内的疑虑，毛泽东首先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问题是很多，党内思想也很混乱，但是不要怕，要放手，有好处。毛泽东同意当前的思想斗争都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说法，但强调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毛说，百花齐放，资产阶级思想的出现会多起来，但并非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并非一无可取，扣帽子会把人吓倒。许多资产阶级思想暴露出来是好事，我们才得到机会去进行教育。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企图压服~压是压不服的。「我们如何对付不正确思想？要有方法，不要急躁，不要简单，应该研究方法。」「现在是转变时期，大变化时期，在观念形态上一定要有所表现的，但99%或还要多一点是能够教育过来的。」「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当然在放之中任何错误的东西都应该批评。现在放够了吗？鸣够了吗？不够的。人家还在猜我们的意图，认为我们是『诱敌深入』，因此必须再放。现在开宣传会议，大家同意这方针，要很好研究方法。（一）党员不忙于写文章，让党外先写，当然要领导。（二）党员也应当写，但必须是要有说服力的，有研究的，有分析的，而不是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方法。」「我们应该采取帮助人家改正错误的态度，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³⁶

³⁶ 毛泽东在九省市直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³⁷ 1957年3月6日³⁷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244—248。

3月7日晚上，毛泽东又召集了文教厅局长座谈会，谈了下面一些问题：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速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中学应当有政治课。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要责成省委、地委、县

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37

3月8日晚上召集的是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邀请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赵丹等著名作家和演员参加。座谈中，老舍提出了能不能写悲剧的问题，对那些有官僚主义的人，能不能把他写失败、写死。毛泽东肯定地答复：对官僚主义当然应当批评，有个电影《光荣属于谁》，襄面那个铁路局长是官僚主义，结果局长还照样当一这样的干部应该撤职！这样写，就叫做不彻底，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谈到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批评官僚主义，毛泽东说：「恐怕要来大民主才行！」接着，毛谈起了整风打算：「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迄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这也要酝酿一个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哪种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还不一致。要整风，那时就好批评了。」讨论文艺政策时，毛泽东又一次提到王蒙：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刘王蒙，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多长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嘛！谈到电影，毛泽东对赵丹说：《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甚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提起戏剧，毛说：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放开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38

3月10日下午召集的新闻出版界座谈会，气氛显得更加活跃。徐镛成回忆说：「我们被引入客廳，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门口等候，鵝到康生逐一介绍，老人家伸出大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缚成同志？』慈祥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蘭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多翻

38 毛滙东同文艺界的谈话（记录稿），1957年3月8日。参见《毛滙

束文集》，第七卷’”1249—255。

翻其它报纸。』对于主席的赞赏，我心中涌起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39

这次座谈一问一答，讨论十分热烈。说到上海 1872 年创办的《申报》解放后就停刊的情况，毛说：取消没有道理，人家是出了几十年的老报纸了嘛！得知《申报》已经改做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毛又说：改了就不好办，如果把它改回来，又好像是复辟了，但是这问题得好好研究一下。说到思想动态，毛泽东说，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陈其通、马寒冰他们几个那一类的教条主义；一种是锺惦荣那一类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指出：马寒冰的文章十分教条主义，我就看不下去，简直强迫受训。锺惦荣这名字很古怪，他的文章倒能看下去。听说要撤锺惦荣的职，毛说，我看也不必撤。电影的问题本来就很多，老演员、老导演一肚子气，应该让他们发泄发泄。

有人提到出版界有一句「怪话」：「心中有领导，编报无自由，读者不爱看；心中无领导，编报就自由，读者就爱看」，并指出这个说法有原则性错误。毛不以为然说：这也要具体分析。报纸是要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

谈到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问题时，大家认为没有几条准则，很难掌握尺度。毛泽东说，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这时，毛泽东又一次透露：整风运动明年正式开始，今年先发一个指示，让大家有个准备，有一个非正式时期。在这个时期，你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自己检查出来，把它改了，以后就不追究。

谈到办报，毛泽东承认，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

样，全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我

们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文艺有一点，人也不多。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比如地质学，共产党是不懂的。有人建议：现在问题很多，是否可以专门开一次会议来封论总结一下？毛泽东说：这次只是提出问题，过一会还要开会讨论。接着毛讲了一些他思考已久的话：「现在我们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于是就有一股风，说批评多了，说人民闹事，惶惶不可终日；另外有些人，又觉得不过瘾。有人要收，有人要放。中央的方针到底怎样，大家都要来摸底，其实中央也没有甚么另外的底，方针就是那么一个，不过有了些新问题。」罢课罢工都没有甚么了不得，「问题凑起来，就显得严重。这样的事情，今后还有。人民内部，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有许多民主党派，还有无党无派民主人士。现在是社会大变动，思想混乱就是反映了这个大变动，不反映出来倒是不可理解的。官僚主义是闹事的直接原因，因为官僚主义，又不肯改，群众就会闹事。」⁴。关于这次座谈，徐铤成还有一段回忆值得一提：

毛主席最后问道：「各位在开展『双百』方针中，还有甚么具！¹困难没有？」我说：「我们《文汇报》在开展电影问题的对论后，立即遭到有组织的 8 攻（指当时任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张春桥鼓动的围攻）。我理解『双百』方针在政治上的意义，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畅所欲言。现在一围攻，别人就把话缩回去了。有正面或反面的意见，也不敢尽量发表了。」毛主席回答说：「你的意见很好。这样 II~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写个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小结。正、反'合。这是辩证法嘛。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主席考虑得很周到'我完全赞成。”

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中宣部办公室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对于编入其中的三十三个问题，作了二十二条批注，很能反映他的思考。关于「不少科学家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毛批'。有一半对。关于「目前文艺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很严重，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又确实有些抬头，哪一方面是主要危险」，毛批：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按具体问题处理。对于「报刊上是否允许发表和党不同的主张？就是说党的政策和党、政府的工作方针能否在报刊上争鸣？」「中央政府各部有些措施不当，在没有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商妥以前，地方报纸能否批评？」「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应该如何统一？如何理解？」毛均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对于「经典著作是不许怀疑的」的说法，毛批：不许怀疑吗？对于「党的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毛批：为甚么不允许争论呢？对于「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毛批：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关于「如何克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毛批：就是允许批评、争论。关于「党章规定，学校党组具有领导和监督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职能」，毛批：此点值得重新研究。毛泽东在后来的一系列讲话中，发挥或发展了上述批注中的想法。

3月12日下午，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到会发表讲话，讲了七一个问题，可以看作是对前几天讨论的众多问题的总结。归纳起来要点如下：一、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个变动比过去更加深刻。全国各个阶级相互关系都发生变化，所以各种不同思想都有所反

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新制度要经过好几年才能巩固。二、知识分子中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敌对情绪的只是极少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其中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不习惯，有怀疑，所以对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改造，但不能强迫他们接受马列主义。三、有些人好像讲阶级斗争为主就舒服一点，讲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就不大舒服，不那么过瘾了。八大作了结论，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四、关于放和收，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赞成收，就是要放。有些人怕乱，乱也好，乱才有办法，乱然后治。中国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就是出了也不怕。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又没有，连小小民主都没有，那就非逼上梁山不可。

五、共产党准备整风，中央决定今年准备，明年普遍展开，党外人士可以自愿参加。主要整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整风的方法和延安时一样，就是学习文件，自我批评，也可以批评，用小民主，和风细雨。最后，毛泽东肯定，这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有益处的，开得很好。他说：我们有两种会，一是党内的会议，一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会议，这次会议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来开，是第三种会，是好的形式。⁴³ 党内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个说法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

或许是受到与党外人士轻松谈话时的乐观情绪影响，或许是受到党内外联合召开会议的新形式的启发，这时毛泽东感到共产党整风需要来自党外的帮助和推动。不过，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他所倡导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中的整风运动，党内外的反应却截然相反。

3 根本对立的党内外反应

可以想到，对毛泽东讲话反应最热烈的是知识界和民主人士。

徐镛成回忆了3月8日在政协礼堂听到毛泽东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录音后的感受：「最使人兴奋的是下面一段话：国内形势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等迹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裏听到他在讲话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⁴⁴ 章伯钧听了毛的讲话后也是「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章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评价甚高，认为「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绘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⁴⁵

章诒和对此有一段精妙的评述：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

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确实如此，上述几位名人都是在听到毛泽东那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决心投入整风运动的，但又都在后来的反右中被打成「大右派」。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此时邀请党外人士

帮助共产党整风，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预设圈套？这里不妨再听听当事人的感受。当时参加会议的作家舒芜认为，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他说：「我为甚么有这样一个的判断呢？就是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⁴⁷

傅雷当年在给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觉和理解讲得更加具体：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口 31136〔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遇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辟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愈来愈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地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⁴⁸

⁴⁷ 转引自谢泳：《杂书过眼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页262—263。⁴⁸ 傅雷致傅聪信，1957年3月18日'载《傅雷家书》，页

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3月6日至20日'全国政协召开二届三次会议，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党派也先后召开会议。与会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反应极为热烈。与会者众口一词，表示拥护毛的讲话。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双百方针」：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称赞这一政策可以「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民盟副主席罗隆基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结的对症良方」，「不仅可以减少积，消除隔膜，并且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51

毛的讲话传达下去之后，反响更大。3月25日开始'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了为期八天的宣传工作会议，一千四百多人参加，包括二百九十多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会议期间还分别召开了教育界、文艺界、医务界、体育界等五个座谈会，征求意见。与会者颂扬毛的讲话提出了调整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的极为重要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历史学家陈垣说，毛主席讲人民内部矛盾时，常常「反求诸己」，在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也要有「反求诸己」的精神。青年作家王蒙也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是「胜读十年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在贯彻「双百方针」方面，人们批评北京市「放」得不够。如有人把不是毒草的作品也当成毒草，应制了鸣放。也有人怕「放」出毒草使群众中毒，怕造成思想混乱，不好领导。艺人演员对文化工作提出意见，反映上级领导过多干预作品创作，抱怨「搞老的不对，搞新的不行」[^]在剧团工作上「重公轻私，重大轻小」。高校教师则认为，一些党员和党外知识分子还是有隔膜，表面上客客气气，思想上见面不够，互相「敬而远之」；有些单位党组织发扬民主不够，重大事情和党外人士商量不够，民主党派的作用发挥得也不够。52

51 (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52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0号'页22—24。

从3月中旬开始，上海各界陆续传达和讨论了毛的讲话。人们的普适反映是：毛主席这个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又一个重要发展，它把我们

的思想水平又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目前国内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得到正确的解答了，眼界打开了，对今后的事业也更加充满了信心。「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其中，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毛主席这次的讲话给上海知识分子以很大振奋，大家「分析了过去产生某些粗暴作法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同志把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对自己人错用了对付敌人的方法」。许多知识分子在会上都表明了今后应当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心愿，「要教育人民，自己就首先得受教育，向群众、向实际学习」。上海作家协会小说组讨论中严格地批评了教条主义。53 《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

有人说，上海的教条主义势力很强，赞成大胆放的10免也不到。如果不打垮教条主义，「放」、「鸣」是有困难的。《新民晚报》一位党外人士说：过去有个朋友把百家争鸣比作捕鼠机，老鼠看见肉，伸出头来，就被捕鼠机扣住。在未到北京开会前，他也同意这个看法，现在他是信服百家争鸣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编辑处人士对工广兵的方向提出看法：「是否只有工广兵题材才有香花？」有人说，「过去我们所以接受教条主义，因为自己头脑中也有教条主义。」戏剧界有些人主张放，但认为同时必须加强领导：「放不是说不要社会主义，而是『放』出来让大家认识。领导干部不能决定那个要那个不要，但也不能不管。如何加强领导是个大问题。」工商界争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的性质问题。听了毛的报告以后，工商界许多人感到「心定了」。有些人对提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速是思想不通，认为这样打击了资本家的积极性。但更多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不要改造的只是少数，主要是放松改造，原因是主观上因定息七年而有『笃定』思想，客观上是民建和工商联工作没有搞好」。总之，这种讨论已成为「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53

其它各地也都纷纷进行了讨论，如山西省宣传工作会议到会682人，

包括党外人士 92 人。大家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后，「激起了强烈的思想反响」，「一致感受到受了莫大的启发、教育和鼓舞，眼界扩大了，思想开朗了」。会议「展开了热烈的毫无拘束的讨论」，「有人反映自己憋在肚里多年的话都倒出来了，有人反映自己思想上是转了一百八十度的脊」。54 正像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55

当然，从毛泽东讲话的理论逻辑来看，也可以找出后来转向反右运动的痕迹。尽管从 1 月到 3 月，他的讲话一次比一次开放，但始终坚持了一条底线：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被质疑的。对于他所视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己力量，毛一直保持着警觉，几次讲话若隐若现。即使是「双百方针」，按毛讲话的逻辑，「百家」最终只是「两家」，到底还是在阶级斗争的框架内。多少年以后，徐镛成才明白：「毛主席一天到大会讲话，说百家争鸣，归根到底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我和出席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一样，头脑发热，没有体会出他老人家的深意。」56 不过，这个解释只能说明从整风转向反右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并不能证明毛泽东此时已经在设置陷阱。

1957 年初毛泽东的讲话，究竟是诚心希望听到党外的批评意见，还是怀有不可告人的阴谋？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人们的感受，而是要搞清一个问题，即毛泽东此时提出整风的目的何在，是要打击党内的「三害」，还是要批判党外的错误或反动言论？从前引（当然不是后来修改的）毛泽东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看，答案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担心的主要也是党的队伍脱离群众，腐化堕落，而他的主张正是在党内遇到了重重阻力。

对同样的讲话，地位不同，感受自然各异。全国作协党组书记郭小川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录音后，在 3 月 9 日的日记中写到：「毛主席明明说要『教育小资产阶级』，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而有人却完全无视这一点，似乎现在的问题就是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了。」党内干部聆听毛教导时的心态和情绪，由此可见一斑。

《人民日报》曾报道，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两次座谈会上，许多著名学者专家认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已经引起了党内外知识分子、干部和群众的普遍重视，许多人已经敢于起来大胆地争鸣。但是，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这些方针上，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障碍，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党内和领导机关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⁵⁸ 这种看法符合事实，因为大多数党员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抱着怀疑的态度。

在3月25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怀疑。讲到「双百方针」，「大家都赞成放，但仔细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种种顾虑」，他们「怕天下大乱；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领导；怕放了毒草，群众会中毒」。有人说：「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有人说：「收是绝对的，放是相对的。」不少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毛主席说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不好，但是我看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出有甚么不好。」⁵⁹

⁵⁷ 郭晚惠[^]郭小林整理：《郭小川1957年日记 X 鄞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页51。

⁵⁸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⁵⁹ 《北京市重要文献 8 册 119570，页162—169。

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在许多单位的干部中「逮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顾虑」，「有些党的干部（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对于在基层单位放手发扬民主和执行双百方针顾虑重重，怕「放」出错误的东西来难以收场，说「放」也可以的，但是「要首先解决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化

甘肃省委报告，绝大多数人对中央的方针「都程度不同地表示赞成」，「一般说来，党外比党内接受的快，情绪高」，党内也受到「很大震动」。但是部分干部，特别是 X 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程度不同的懊疑和顾虑、甚至抵触情绪」。在高级干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只是

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是原则上通了，也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表示拥护。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联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 II 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61

60 吉林省楼案馆：1-13/1-1957.72' 页 3—5。61 吉林省樵案馆，1-13/1-1957.72' 页 15—18。62 吉林省楼案馆~1-13/1-1957.72' 页 19—21。

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毛泽东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争辩之多，是空前的」。「多数人表示拥护，但对若干原则问题抱有怀疑和抵触情绪」，他们提出，如此强调扩大民主「是否会助长极端民主化？」「现在已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再要扩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认为「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有个别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们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剥削家庭，他们毕业后都将当干部，难道毛主席就不怕重复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吗？究竟还要不要专政？谁专谁的政呢？这真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62

就笔者看到的资料，上述情况，在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委的报告中，都有普迹的反映。63

在赓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质问：「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人说：「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听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大多数基层干部都不同意把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关于两类矛盾，有的支部书记说：合理提意见的是内部矛盾，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认为，成份好的人闹事是内部矛盾，富农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闹事就是敌我矛盾。封于，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公式，普通

反映是：对农民能用，对富农、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对贫农能用，对富裕农民不能用；对先进地区能用，对落后地区不能用。至于双百方针，认为城市可以实行，但农村不能贯彻。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甚至有的提出退党。⁶³

所有这些材料，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基层，无论是党内报告还是新闻报道，反映的情况都是一致的。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毛泽东感到，必须亲自出马，再次进行动员。

三毛泽东南巡讲话和整风再动员

63 《内部参考》，1957年4月28日'页9—11；5月17日'页3—5。

吉林省档案馆，

1-13/1-1957.72'页10—12，12—15、18—21。64 《内部参考》，1957年5月21日，页7—9；5月25日，页20—22。

仔细品味，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其实提供了两个新的信息：一是对党内多数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不满，他们没有意识到共产党执政遇到了新问题，对中央提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方针有强烈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二是大力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试图通过整风运动解决党内的思想和作风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繫，相辅相成。为了促进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需要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既要说服党内干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又要鼓励党外人士解除顾虑，敢于向执政党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新式整风运动，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进。不过，党内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整风主要还是学习理论和思想教育，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于具体政策的调整。

1 党内对整风运动的不同理解

如何理解毛泽东再次提出的整风运动很重要，特别是对于已有延安整风经验的共产党干部来说更是如此。为了安抚党内干部，「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恐慌」，康生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这次整风只是学习：「主席说，要准备新的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和理论学习运动。」康生特别指示，传达中央精神时要向党内外讲清楚，延安整风运动有整风学习和肃反，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但在时间上交叉了，于是有人「谈虎变色」，以为又要搞大民主了。”强调整风是「解决党内也就是人民内部问题」当然不错，但是在毛泽东明确表示希望党外人士参加，鼓励他们对共产党提意见后，仍旧把整风看作仅仅是「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运动，似乎是没有理解毛泽东讲话中的深层含义。

还有一种说法也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新式整风连动。既然说整风运
65 云南省档案馆，7-1-867' 页 28—33。

动是一年以后的事情，3月26日吉林省委下发的一个通知就把正在开展的「学习八大文件，检查思想作风」的工作与将要开始的整风运动断然区别开来。通知明确说：「这次检查虽然是以整风精神进行，但

不等于就是一个整风运动」，而只是「整风的思想准备」。66 在他们看来，整风并非当务之急，到底怎么搞，目前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其实，毛泽东在1957年3月提出开门整风的想法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铺垫的，此前两个月内中共中央连续批转下发的几个文件的内容和时机，可以说明这一点。

1956年10月26日，浙江省委统战部在报告中建议，「必须加强党内统一战线思想政策的教育」，「把党的统战机构建立和健全起来」，以求通过「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在党内克服轻视党外人士作用，不善于团结非党干部，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共事的宗派主义表现」，并有重点地检查党的统战工作的执行情况。12月1日浙江省委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1957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6，1月12日，青海省委发出「关于团结和尊重党外干部的指示」，批评

了党外人士长期有职无权、党内党外不能一视同仁的现象，指出「这是画结党外干部方面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共中央2月20日转发了这一文件。⁶⁸

⁶⁶ 吉林省楼案 19, 1-13/1-1957. 39[^] 页 19 — 22。 ⁶⁷ 吉林省栅案馆, 1-13/1-1957. 93, 页 1 — 2。 ⁶⁸ 吉林省栅案馆, 1-13/1-1957. 93' 页 14。

1月17日，中央统战部报告了民主建国会二中全会的情况，称赞这次会议「抓住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政治思想方面的主要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也比较认真深入」。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问题，章乃器在发言中强调资产阶级的「进步内因」，否认还有两面性，指责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矫枉过正」。这些言论受到多数与会者的批评，不过，统战部的报告认为：「章乃器这些言论和批评本身也具有消极、积极的两面性，他的批评和言论的主要部分带有原则的错误，对进一步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是不利的。但他也确实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偏差，特别是他敢于代表资产阶级公开地、尖锐地提出批评和斗争，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及时地察觉资产阶级的动向，这对我们是完全有利的。对章乃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勇于同我们唱对台戏的积极性，不仅不应打击，而且应当加以重视。对章的错误和毛病，则必须进行适当的批判。」报告还总结了在民主党派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由争辩说理分析」的经验。中共中央2月5日向各地转发了这个报告。⁶⁹

2月25日，中共中央还批发了中央统战部两个半月前上报的「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统战部认为，在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以及组织和推动资产阶级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和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方面，「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工商联仍然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文件提出，对于工商联机关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应该同国家干部一视同仁，不应有所歧视」，担任工商联秘书长的党员干部「一般可以撤回」而与工商界人士关系不好的党员干部，「应该坚决撤回」。7(1

这些文件（可能还有更多）表明，到 1957 年初，中共中央已经不是一般地号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开始考虑如何具体地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了，其中也包括在整风中利用民主党派的问题。不过，这大概主要反映毛泽东本人的思路。对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比较关注的是「思想动向」，主张首先通过整风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而多数领导人更关注的是调整方针政策，着重于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解决影响执政党面临的具体问题。刘少奇在这一时期的言行、反映了后一种情况。

69 吉林省楼案龰 11-13/1-1957.93' 页 7—9。70 吉林省楼案馆，1-13/1-1957.93，页 22—23。

1957 年春天，刘少奇也特别关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认为，「人民内部闹事是个新问题，我们不想好办法，将来要吃大

亏」。71 刘少奇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 2 月 18 日到 4 月 14 日' 他先后视察了保定、石家庄' 栾城' 邯郸、新乡、郑州、许昌、武汉、长沙、株洲' 衡阳' 广州，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临行前，刘向随行人员说明了出行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闹事问题。刘说：「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因此，「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他主张「不要把提意见、告状看作闹事」，认为「群众多说话是民主积极性的表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是好事，不是坏事」。刘的调查范围包括学校、合作社、工康企业，涉及鹿业、工业、商业' 教育、城市生活等各佃方面，他多次同大中小学学生、教员，农村合作社社员、干部，工矿企业职工、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地方党政干部座谈。值得注意的是，与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不同，刘此行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72

社畜分配是农民、工人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少奇对此特别关注，并提出：「所有制解决了，生产辟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我们要十分注意研究分配问题。」在刘看来，「真正做到分配

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在河南新乡，刘少奇听取地委负责人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对该地实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肯定这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刘说：所有制确定以后，「基本不变，但不是生产关系中的一切都不变，时时会有些变动，主要在分配制度上变」。⁷⁴ 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刘少奇说：「社会主义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应该「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襄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⁷⁵

广业、手工业改造后，生产经管单位普遍过大，也是农业社和手工业社社员产生不满的原因之一。刘少奇同新乡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赆村普塘建立大社，导致广民不满。刘承认大社办多了，社太大了与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合：「生产力只是那么个 7 冬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刘还谈到劳动方式，认为「社员劳动一定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完成，随便他甚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在河南许昌地区，部分广业社实行牲畜集中喂养后，出现了瘦弱死亡的现象；刘少奇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提出还是「分散喂养」，「分散喂养并不触动集体所有制，是个经营方法问题」。在河北保定，刘少奇对一搞农业社就实行集体喂养不以为然，明确提出广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牲畜的方式。还说，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因为所有制还是集体的，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

75 《刘少奇年谱 11898—19691》，下卷' 页 391—392。

76 《刘少奇年谱 11898—19691》，下卷' 页 388、389、3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1，页 328—' 329。

商业、服务业过于集中经营，给城市生活造成不便和紧张，是引发市民不满的重要原因。刘少奇在听取地方汇报后，主张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几个方面经营。在长沙，刘少奇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电影院等，应该发动群众，可

以由群众自己办。’在株洲，刘少奇同市委书记谈话时指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吃菜问题必将成为城市人民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要把蔬菜生产当成大事来抓。在广州，刘对国营商业的经营作风提出批评：「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甚么就不行？」他要求国营商业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鬻活的办法，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等等。刘很看重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自由市场对国家有利，可以暴露国营商业的缺点，补充其不足，方便人民。尽管只是从完善计划的角度估量自由市场的地位，认为国家计划不到的地方，自由市场鑽了空子，就可以发现问题，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但毕竟是承认了自由市场存在的合理性，承认了经济

生活组织的「多样性」。77

工确企业的职工住房紧张，也是各地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刘少奇视察株洲湘江机器厂时，专门谈到了解决职工住房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嚷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廩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职工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翠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話，还可以出 II、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78

中小学的办学、中小學生升學和就業，是刘少奇此行关注的又一个问题。他塘取湖南省领导人汇报教育工作后，对地方禁止群众自己办学很不以为然，要求放手让群众办学。刘提出，在广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廩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他遺说：「现

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在广州，刘少奇也提出，办学有几种办法，第一是国家办学，要搞得正规一些；第二是合作办学、集体办学，城乡都可以办，可以叫教育合作社；第三是私人办学、个体办学。在同长沙市中学生代表进行座谈时，刘少奇着重谈了他们最为关心的升学和就业问题。他承认上年教育工作有缺点和错误，其中一个错误就是「多招了一部分学生」，「给工作带来了困难」。刘说，由于我国各种条件的限制，现在还没有可能实行普及中学教育，至于高等教育本来就不限于普及范围，因此，小学和中学毕业生都要有很大部分转入生产。刘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和青年组织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作好统筹安排。刘说的「统筹安排」，除了再办一些小学、中学，组织学生自学的办法外，还有就业的途径。除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可以招收一部分中学生，城市里的服务行业和手工业需要增加一部分学徒和职工外，刘少奇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生的主要方向。事实上，学生们许多向往城市而不愿意去农村，刘少奇在座谈会上反复阐述从事农业生产的前景和意义，力，说服学生安心农村和就业。， 9

在刘少奇调查研究的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积极制定和
79(刘少奇年谱 11898—19691) 下卷，页 390~391、394；《刘少奇论
中国经济建设》’ 页 330—331；刘少奇：《刘少奇选集》’ 下卷，页
277—294。

8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颁布各种旨在解决社会生产和生活问题的政策和规定。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出任组长，成员有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和黄克诚。第二天，陈云便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14日陈云又出席全国农村自由市场会议并讲话，提出要对市场物资供应紧张暴露出来的矛盾加以研究并找出办法。8(1

1月29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在肯定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

限制私商措施的同时，指出由于对市场管理过严过死，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强调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好处已经看得很明显，它对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刺激农业生产、改善国营和供销社商业的经营管理，都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刺激作用。

2月6日上午，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要求制定若干主要农产品的比价，解决好收购和零售差价过大的问题，适当改变偏远地区某些农产品收购价偏低的现象。当天下午，陈云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1957年面临巨大就业压力，需研究解决办法。要建立退休制度，除少数必要外，职工到六十岁应该退休，女职工可以更早一些（大约五十五岁）。会议还讨论了发展养猪生产的问题。82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提高生猪收购价格，要求各地农村贯彻执行生猪「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并在供应饲料和收购价格上合理兼顾社员个人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以改变生猪生产下降的趋势。按照国务院的通知，这次调价，生猪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13.897%，猪肉零售价格全国平均提高8.427%。⁸³

2月7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特别讲到不能把人民闹事「看成反革命」，对人民闹事问题的处理方法：提出要求凡是对的，都应满足；不对的，要批评；有困难的暂时解决不了的，要讲清楚，说老实话；除现行反革命外以外，一律不抓、不开除。⁸⁴

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农业社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包括产品分配、银行存款、国家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及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的救济款等，决定社队问题要同群众商量，例如生产的布

81 《人民日报》，1957年1月29日社论。

82 《陈云年谱 11905—19951》~中卷，页366—367。

83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页75—77~87。

84：〈陈云年谱 11905—19951〉，中卷，页368—369。

置、农业技术的改进、耕作制度的改变、新种子的采用、合作社的基

本建设、经营管理等，干部要参加生产。85

3月18日，陈云召集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人员开会，讨论关于耕畜问题的指示稿。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允许合作社将小型役畜转给社员私有、私养、私用，或几户社员伙有、伙养、伙用，满足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对畜力的需要；同时适当调整菜牛和牛皮的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养牛的积极性。86

3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有关春耕的指示，其中要求农业合作社上年度收入分配没有结算清楚的，应该抓紧时间、迅速结算清楚；并社和转高级社的工作应该停止；过大的社可以根据本地本社的具体情况 and 多数社员的意见，采取简便方式进行必要和适当的调整。87

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承认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它类似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指出防止这类事件发生的根本办法「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对于类似事件的处理，文件规定：允许群众这样做，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做；群众既然要闹，就应该让他们闹够，不要强迫中止，但是必须劝告群众不可采取违法行为（如打人、关人、破坏公共财物等），如果发生，应该采取适当方式加以制止；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在事件平息后，应该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文件特别要求，「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88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透露中央准备在年内召开中央会议，专门讨论工人阶级的几个有关问题，即关于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问题；关于职工生活问题；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关于企业中党、工会、青年团组织的工作问题。通知要求「全党动手」进行准备，中共中央有关各部委、全国总工会党组、青年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党组和各地党委，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有情况、有分析、有具体意见的综合报告，或者关于某一两个方面问题的报告。89

所有这些表明，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对于当时出现的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反映的基本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注点是不同的，解决问题的主张也是各有侧重。同样是处理「少数人闹事」，同样是整顿党风，毛泽东显然更倾向于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从意识形态方面下手，而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则比较重视调整政策，强调解决人民当前利益、处理好人民生活问题。这一点，从上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就已经可以看出。”不过，这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存在原则性分歧。国外有研究者认为，自 1956 年下半年以来，刘少奇便与毛泽东有严重分歧，并抵制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猜测和推论得出的，而缺乏文献的依据。⁹¹ 仔细研究刘少奇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两类矛盾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同毛泽东一样，刘少奇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问题，群众闹事的主要根源在于党内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过全面而精关的论述。⁹²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这裹，而在于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和着眼点。当然，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整风运动，刘和其它领导人都不可能在原则上表示反对。但是，刘少奇一直强调整风是一次学习运动，批判和自我批评也限于党内的和风细雨方式。笔者逐一查阅了刘少奇此期的讲话和报告，发现几乎没有一处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更不用说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甚至到 5 月 7 日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刘少奇在高级党校的谈话中仍然认为，整风就是「联繫个人思想问题，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同时也要「进行同志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⁹³ 刘严厉地批评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但强调采取「妥协性的办法」处理，还特别指出，「凡是党内的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拨杂间、破坏党的活动，也可以把这种矛盾搞成对抗性的」。

毛泽东明明说，这次整风是解决党群关系，解决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并且邀请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起整风，刘少奇却在这里强调「同志间」的批评，「党内」的矛盾。毫无疑问，刘少奇的这种态度和观点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心声，而恰恰这一点，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2 毛泽东在南方的整风再动员

毛泽东好像有个习惯，只要心情不快或办事不顺，就往南方跑。不过，与刘少奇走的京广线不同，毛泽东这次选择了津浦线。3月16日，政协会议还未结束、各民主党派会议正在召开时，毛泽东通知说，他要离开北京了。临行前，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中央关于传达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其中讲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候，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指示还特别点明：「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

「各省（市）应该同样召开宣傅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会议「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94

从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走一路，讲一路，毛自己说他「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95 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她

在天津，毛泽东重点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他说，封这个问题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可以，赞成；有些同志看样子还可以，但是心里总是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百花齐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东西放出来了，怎么得了啊！「百家争鸣」，咱们共产党只算一家，九十九家包围我们，怎么得了啊！毛泽东指出，在这百家里头，按其性质分类，就是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小资产阶级在基本点上同资产阶级是一家，在共产党这一家里

也有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科学的问

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396—39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十册’页 131—134。

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省，安徽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0日。

96《毛泽东传 11949~19760’页 642。

题，思想的问题，精神的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最后谈到整风，毛泽东说，整风没有甚么可怕，我们在延安搞过，不同肃反联接起来就没有可怕的。就是学习和检查，对错误严重的同志要帮助他改正，但不用开大会斗争的方法。今年准备试行，明年再正式开始，党内这么做，党外自愿参加。97

毛泽东在济南讲的主题是「思想问题」。毛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人民内部矛盾就发展起来，解决思想问题，正确的方针不是收起来，而是迩要放，现在迩放得不够，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不要压。共产党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手裏掌握着真理，是最不怕批评的。共产党政府有工人、农民作基础，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批不倒的。批倒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共产党有时候逢要借党外的力量帮个忙，叫做内外加攻，把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谈到整风，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取党外人士，要争取知识分子，先要把自己的作坊整顿一下。」与民主人士合作，「不是他们跟我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而是我们跟他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对于旧知识分子，「我们一步也离不开他们，杂开他们就没有人教书，没有人当工程师，没有人研究科学」，「所以要好好跟他们团结」。「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98

97 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7日。98 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8日。部分内容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 284—

285。

在南京，毛泽东主要讲「思想工作问题」。他说，过去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现在是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由此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毛说：中国的几百万知识分子，「不管他怎样动摇，但是，是有用之人，是我们人民的财产，

是人民的教员」。「这七年，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进步，应该肯定这一点。」接着又讲到民主党派，毛说，「民主党派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提出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这些方针应该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主张「要同他们讲真心话」，「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关于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些材料、比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参加宣传工作会议的党外人士占五分之一，「你们如果开的时候，可以多一些，可以让他们占五分之二」。99

到了上海，毛泽东还是谈两类矛盾和双百方针问题。毛说，人民闹事这样的问题，会经常不断地发生。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应该看作正常现象，并且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毛泽东又说到知识分子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你说他不棟谟共产党也难说，逮有些拥谟，但有时要分「你们我们」，「你们共产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他们」，「分步骤地争取他们，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说，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迳是想「放」，一种是想「收」。中央认为「收」不好，逮是「放」比较好，适合更多数人，争取大多数中间分子，争取这些知识分子，让他们说话。毛泽东再次谈到整风

时说，「中央还没有做出正式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后年两年实行，以三年时间」，「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整风只会增加共产党的威信，「共产党跟民主党派比较，谁怕批评？现在这些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好像跃跃欲试，那么试试看吧，究竟谁怕批评？哪一个本钱大？哪一个经得住考验？」共产党要民主党派进步，首先自己就得进步，共产党把作风整顿好了，取得了主动，党外人士就会自愿参加，进行「自我批评」和整风。他们中的左派和中间派会来参加，右派恐怕就不干。现在问题是，在相当多的地方「党内党外隔一层」，「沟太深」，应该「把沟填起来」。最后，毛泽东强调，批评共产党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这是原则。但是还要有灵活性，不能碰到罢工罢课，碰到错误的言论，就拿「破坏党的领导」当挡箭牌。这样，「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科学就可能希望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希望就可能达到」。100

此行最后一站是杭州。4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这裏召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发表了很有针对性的看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远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错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通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壤人，后来五类一分1打击面就小

100 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1日。

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踏不拆，如何争取群众？甚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壕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栗线，混起来不好，但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甚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 I 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辩。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通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件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甚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运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 I 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

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办灯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得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通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袞，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征省委宣传部袞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辨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机”中有的党外袞廉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侏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

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 11 鸟」，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袞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遴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滂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甚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

想，而且要看各种文聿，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迟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

剖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阑事，捕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贪。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阑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攻。1^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阑事的人民身上。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极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鹜。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遏了吗？为甚么要大吃一鹜呀？贫袞、下中泉、中泉、富袞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拎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赖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审。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剖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羊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让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侏线，不要有一侏沟，要打通它。……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类矛盾的”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于先进生产”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

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称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甚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甚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封通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牾。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大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得住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们批评嘛。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或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颠

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运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迩是主张「放」嘛。许或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甚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普头，脚痛普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的太少了。

许或青：复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

（一）行政机构太大 1 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哀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针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滢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块。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后，不要装 14。一装，人家钛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遣是要构的鲁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遏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X。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了。胃如果棒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肌

这次南方之行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并引起了他的新的思考。对他的讲话，党内外的反响完全不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应积极，虽然

对鸣放通有顾虑，但普遍表示拥护和赞同。而在党内，从各地汇报的情况看，大多数干部还是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否正确、是否适时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不想放。党外传播迅速，党内传达连缓，党外报纸反应强烈，党内报纸一声不响。这种反差表明，党内的思想认识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甚至落在民主党派的后面。对于这种状况，毛泽东十分不满。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前发动全党整风，并且通过党外力量促进党内整风。

3 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开展整风

最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就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01(毛泽东传〔1949—1976〕，页 654—661。参见毛泽东在 II 取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市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稿）：1957年4月4日至6日。

报》长时间对双百方针没有进行主动宣传，报道也很少。特别是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后，也迟迟没有动静，直到4月4日才在第七版发表了一篇通讯〈陈其通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发表以后〉，内容只是各地关于此文报道情况和赞者来稿来信。关于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的这两次会议，《人民日报》的报道异常简单。最高国务会议开完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不足二百字的消息，还是安排在一篇关于经济问题的社论后面，位置不显要，而提到毛的讲话只有一个题

目。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报上连个消息都没有发。102 毛泽东在杭州座谈会就是为此质问了陆定一。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怒气未消，决定对《人民日报》「动手术」。4月9日晚上，毛把胡乔木找来谈话，严厉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邓拓说：《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甚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领导

权被别人拿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党外很活跃，党外报纸或青年报纸很活跃，唯独党的报纸保持沉默，有异己倾向，已是马克思主义之己。新华社不知怎样？是否报道了这方面的消息，谁领导。我早说过，邓拓要走路，到别的地方，现在没有其它办法，只好让人走路。^

胡乔木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一早，《人民日报》便注销了社论〈纾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当天看过报纸后，就把中共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召集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处，还特意请来了社论的执笔王若水。毛泽东一上来就大发雷霆：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功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烂、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102(《人民日报》，1957年3月3日；《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辑。

103 林克：(《林克日记 11955—19641》I 手稿)‘未刊’页 30—31^

邓拓赶紧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紧追不舍：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甚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甚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甚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毛泽东询问了 10 日社论的写作过程后，仍然怒气未消地说：「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又转向几个报社负责人说：「是不是邓拓会围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甚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甚么意见都可以讲。」突然，毛泽东对着邓拓冒出一句：「我看你很像汉元帝，傻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邓拓似乎有些不服气，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过这个请求……」毛泽东粗暴地打断他——

「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看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分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出来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这时，毛把话题转向了知识分子问题，说：「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甚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接近党

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还说：「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愈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愈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最后，毛

泽东又批评党报不如非党报纸：「《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甚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毛迹给几家报纸排了队：「《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

关于胡乔木压下《人民日报》宣传计划一事，王若水后来的回忆

15 实，《人民日报》确曾写过一份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传计划割送上去，被胡乔木压下了。11)5 至于没有发表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那是毛本人当时的意见。在会议结束时他就说过，讲话通要补充，不准备全文发表。胡乔木回忆说，在会后他曾整理过一个毛讲话的稿子，毛泽东当时也说先放一放，于是只发了一条短消息。106 后来毛也没有指示要写文章宣传两个会议和他的讲话’《人民日报》自然

不会有所动作。所以，指责《人民日报》「抵解」中央方针、同中央「唱反调」，有些言过其实。不过，党报 4 月 10 日以前很少宣传毛泽东提出的新方针，1『而这恰恰反映了党内多数干部的情绪，却是明显的事实，不是一句「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可以解释的。108

盛怒之下，毛泽东大概忘记了自己过去的指示，邓拓对此也只能以党内关于报刊宣传的规定来搪塞。毛泽东边怒于《人民日报》1 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行时的感受使然。党内多数干部对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冷漠处之，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本来就有一肚子火，看见《文汇报》、《新民晚报》及《光明日报》这些非党报纸接连发表文章，赞同鸣放，针砭时弊，感觉到「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横整我们」，积筹的不满才爆发出来。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到上海以后，一看《文汇报》、《新民晚报》摘得很热火，《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摘大鸣大放」。109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立即着手进一步推动整风，一连气亲笔起草了几个中央文件。

4月9日，他审阅和修改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这个决定（草

案）原来是准备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后下发的，所以题为「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毛泽东审阅时，改变了题目，并要彭真与周恩来商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毛泽东还特别加了一句：「此件以早发出为有利」，同时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过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后来都没有下发。其原因大概在于通知中确定的整风开始时间——1958年，已经不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了。

4月17至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开会。111会议的内容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很可能就是讨论整风问题，因为4月19日这天，毛泽东又亲笔拟了一个党内指示，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要求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指示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对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遇报纸刊物上有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通没有，动笔修改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抹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新鲜

110 《建政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 页 421—422。111 《睐 8 年摄
〔1905—19950’ 中卷’ 页 377。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编人的
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
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和工厂工人做遍讲演没有，做过几次，
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 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
用重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112

按照中共习惯的做法，一个决定下发之前通常是要先做调查研究，了
解下情的，而毛泽东的这个指示，调查如此广泛、详细，要求如此跋
扈、急迫，可见毛泽东急于打开党内局面的心情和决心。目前没有数
据显示这几天中共高层的活动，不过，从周恩来 4 月 24 日在浙江省
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要开始整风的想法已经得到中
共主要领导人的认同。周说：「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首先要把共产党搞通」，「为着要把共产党首先弄通，所以我们主张从
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整风主要是三个口号，反对主观主
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1”不等各地、各部门的汇报到
手，毛泽东已经开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新指示了。25 日
凌晨，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
见。^4 月 27 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
这一文件。115 同日’ 毛泽东还亲笔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
劳动的文件，作为吹风，发至基层党委。文件指出：「正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中，这个
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
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

4 月 28 日，毛泽东又对整风指示稿作了修改，并批示：「准备五月上
旬或中旬公开发表。」1，729 日晚，毛泽东再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讨论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118 与

此同时，毛泽东继续关注并鼓励党外的鸣放。看到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很满意，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该文重新拟了一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通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按语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¹¹⁹

中共中央办公廉于30日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紧接着又第二次发出修改稿，只作了几处文字改动。¹²⁰文件首先批评党的许多干部，「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党内「脱雕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顺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文件指出，毛泽东两个讲话传达以后，「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文件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文件最后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¹²¹

尽管在文件中没有明确表露开门整风的意圖，而只是提出欢迎非党人士参加整风，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二十六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次讲话，毛泽东显得情绪激昂，比前几次更加放得开，重点在于鼓励非党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

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处都是矛盾，都在唱针台戏。但是就不肯承认或者混；#两种矛盾。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办法。现在报纸天天在计希矛盾问赵，有人4/1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灯据，就能站住脾~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1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的饭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把矛盾从各方面分一下类，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等。术生也很值得攻

一下子，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了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重了。各省、市都要开。报上登一下，就可能打破沉闷的空气。~整风会影飧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以解决了，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邇去是共产党贝有职有棹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同共产党一道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党章有一株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

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粉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甚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这个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阁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现在不要搞唯物辩证法，要搞政治关系，搞三个主义。不要进到世界枫'思想方法里头去，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审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

有相当大的一部党员不信社会主义，他们搞社会主义是随大流凑进来的。我就不相信民主党派都信社会主义，有一大部分人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也不愿公开讲，共产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农民中一部分，工人中一部分（工人也成份复杂，由500万发展到1200万，人心不齐），对社会主义成不成功，共产党行不行，还要看一看。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人，上了贼船（共产主义之船）没有办法，会不会翻船要靠天。这是很自然的。

有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就只会搞阶级斗争，共产党有术无学，这说对了一半。说我们有术无学，要看是甚么学，比如阶级斗争是一大学问，不能说我们没有。这是经边多少年犯错误作俭封学来的。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的，如同帝国主义战争，同资本主义国家办外交，都是阶级斗争性质的。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后得自然界科学，不懂怎么辩？我在1949年的文章中就说通了：我们熟习的东西快要搁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愤的东西，不慢就不懂，不要装懂。要老老实实地学，可能要同过去学习阶级斗争一样，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好I了。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5虽加于人。如

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122

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本人以前的历次言论，这番讲话更具鼓动性和影响力。不过，积极起来响应的还是在党外，而不是党内。因此，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虽然说是共产党整风，但真正积极参与其中的却大都是知识界的非党人士。

5月1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如上所述，毛泽东决心对执政党发动一次整风运动的思维逻辑是：经过三大改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是不多了，旧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大多数虽然还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他们对政权已经没有威胁，而思想改造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内，在执政党本身；只要通过整风，改变执政党的作风和形象，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权就会巩固，就会发展。然而，一旦这个逻辑的前提发生变化、他的估计和自信受到打击，所谓整风就必然会转向另外一场斗争。第八章

引蛇出洞：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运动

如果承认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确实是针对执政党内部问题的，那么在反右运动研究中，留给人们的最大悬念就是：整风运动为什么会转向反右运动？这个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哪些因素导致毛泽东改变了他以前的估计和判断？或者可以归结为一个人们常提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会和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1 例如转变的原因，有的认为是迫于党内反对派的压力，有的认为是担心脊济建投受到影响，有的认为极少数知俄界和党外人士想要推翻共产 X。至于决定转变的时间 1 有说是 6 月 6 日六教授召开会议时 1 有说是 5 月 19 日北大发生风波时 1 有说是 5 月 15 日写作党内指

示时，甚至有人认为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时就已经决定发勋反右了。如此等等。

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们众说纷纭，各种解释不胜枚举。1 笔者的考察将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党内外事态发展过程，一是毛泽东思想变化的过程。从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全党整风的指示，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出反右的号令，前后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各大城市、各个阶层、党内党外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且错综复杂。好在当时的公开性较强，史料也丰富，所以对这个过程不难考察。困难的是摸清毛泽东的思想脉络，他在这段时间及以后的讲话、报告、指示、文章虽然很多，但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的文过饰非，有的

强词夺理，令人眼花缭乱，不知到底哪些是他的真实想法。因此除了仔细考察这些文献，笔者还重点利用了两个史料。一个是毛泽东秘书林克的日记手稿，那裏记载了不少毛泽东的私下谈话；一个是毛泽东修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详细经过和具体内容。2 这是观察毛泽东此时思想变化的两个极其重要史料，也可以此为参照系来理解中共中央文件和他的其它论述。一则，就真实性而言，毛对他身边人员透露的心声大概比他的公开讲话更可靠。二则，毛泽东本人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修改时反反复覆，字斟句酌，不厌其烦，而这个过程恰恰与整风向反右转变的过程同步。所以，毛泽东对局势估计、对问题认识的变化，应该比较真实地反映在这些史料中。

一变化：毛泽东在开门整风中的警觉

毛泽东所以倡导开门整风，是出于他当时对知识分子（含民主党派）3 的这样一些认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国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数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必须长期改造，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因此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他

们一定的民主和自由；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方法就是整风，因受到党员干部的祛触而需要知识分子给以帮助。于是，就出现了在贯彻双百方针的氛围中进行开门整风的背景，其方式就是在会议上和报纸上「大鸣大放」，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由原来设想的「和风细雨」变成了「急风暴雨」，由原来设定的「小民主」变成了「大民主」。这一切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一手造成的，尽管他的本意或许并不在此。

1 毛泽东广泛邀请非党人士提意见

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甚大。他有意在中共中央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登报前一天发表的长篇讲话，对于党内是吹风，对于党外则是动员。

4 麦克法夸尔认为社论与中央指示有「严重分歧」，理由是它有意贬低批评官僚主义“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意义。参见麦克法夸尔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 3：《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1，页 327—328。这种估计多少有些牵强、其真在当时毛本人提到「三害」时「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排列也是经常调换的，此外，社论在讲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历史渊源时，也没有忘记突出其新的理论发展。

5 云南省档案馆，2-1-2745，页 1—2。

为了配合中共中央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为甚么要整风？〉。社论讲到了整风的目的、原因、条件，这与毛泽东的论述和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精神并没有原则性的区别。4 但是，社论没有提到双百方针，没有提到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则是明显地忽视了毛泽东4月30日讲话的意旨和精神。无论这样做是有意还是无意，社论的发表迎合了多数党内干部的心理，并立即在地方上有所反应。5月3日云南省办公摩发出整风通知说，「省委酝酿的精神」是：第一，肯定要学习，在这个重大关头，「一定要跟着搞」。第二，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劲头一来了，就搞个大民主森一下」。所谓有步骤，就是5至6月只能传达中央精神，「至于认真地从思想

上系统地检查，看来要到7月」。5 面对如此状况’ 联系4月10日批评《人民日报》时的心态，可以想见毛泽东是不会满意的。

5月4日’ 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毛首先肯定开门整风已成事实，且效果良好，应该继续。又说：「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接着指出了整风正式开始以后的做法：

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 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¹（这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⁶

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卯）[^]页296—297。

⁷ 如见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鄞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页514；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页99—100：

无疑，这个指示最清楚地表明，整风将来也要在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推动，但第一阶段只是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方式已经不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是邀请党外人士「提意见，作批评」；这些安排都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协商的结果。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个文件表明「引蛇出洞」的策略正在逐步形成，理由是毛泽东在此提到「暴露」一些人的面貌，以利于「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⁷ 其实’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错误思想没有暴露，如何对它进行改造？应该注意的是这裏的提法：「即使是错误的批评……」。毛的主旨

是强调「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是「极为有益」的。因为对这种已经出现的形式感到满意，毛泽东才正式在党内指示中提出，并希望继续下去。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还在中共中央整风运动指示发表之前，社会上非党人士在座谈会和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意见。4月1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天津邀请十位教授座谈，主要讨论高等院校的教学和研究问题。各教授纷纷呼颯社会科学的的教学和研究要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钱荣堃说，「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阻碍了「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但是后一种倾向毕竟是少数，「大量存在的还是『左』的教条主义」。鲍觉民说：「过去这几年，特别是1952年以后，大家写文章说话的确都有些顾虑。」原因之一，就是用粗暴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他是学经济地理的，成天「提心吊胆」地怕被扣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王糠愚说，由于学习苏联取消了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今天值得重新考虑。比如社会学这一门，范围就很广，科系取消后，好多专家没有人管，如人口学、民族学、社会思想都没有人专门研究。外国出版的政治学的害籍相当多，过去都用『反动』一句话来否定。有些书是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也被认为是反动的。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等本来都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现在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教授们特别提出了马列主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李建动说：「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若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又恐招致思想混乱。」他以为「应以马列主义为争鸣的武器，而不应定为指导标准」。滕维藻认为，大家都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问题主要是如何领导。滕谈起自身感受：「我过去固然也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但遇到具体问题，在思想上仍不免有些混乱。现在我们明确认识到：百家争鸣只会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百家争鸣方针不仅要在科学研究中贯彻，在教学

中也要贯彻。在政治理论课中，当然要求观点一致，不能任意乱讲，

但也不能过分强调一致，否则就会妨碍争鸣。」雷海宗发言，批评马克思主义徒停留在恩格斯逝世时的 1895 年。他认为，1895 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 1895 年。4 月 21、22 日两天的《人民日报》连载了座谈会的发言，颇为醒目。8

8 《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21、22 日⁹（《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23 日[^]

4 月 23 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上海市委最近接连举行科学家座谈会。与会的科学家认为，首先要排除的是教条主义和粗暴态度。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科学家说：「巴甫洛夫是一位伟大的生理学家，但巴甫洛夫学说不等于全部生理学。我们无疑要认真学习巴甫洛夫的学说，但我们也应当学习其它生理学方面的见解。可是，过去不是这样，过去在讨论的时候，总是首先想到『我的话是否符合于巴甫洛夫学说？』虽然没有公开的压力，但确有那么一种气氛，使你非这样说不可。这种教条主义的气氛，束缚了人的思想，非常不利于科学的自由研究。」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谈家桢说：「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本身并无阶级性，主要是看它掌握在谁的手裏。可是有人却硬给各科自然科学戴上政治帽子，把米丘林学说说成是无产阶级生物学，把库尔根学派说成是资产阶级生物学，弄得大家糊裏糊涂。」最令科学家感到激愤的是对待科学研究工作的粗暴行为。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洗，以前写过一本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害，因为一个赞者写信说这本鲁「有毒素」，书店就不再销售了。上海财经学院一位教授写的害，因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一读者批评，结果出版社不但收回，不再销售，而且遣要作者退回稿费。朱洗说得很激动：「你要一棒子打死，我不甘心死，就不写东西。」9 《人民日报》还在 4 月份专门开辟两个专栏：「科学家谈党对自然科学的领导」和「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刊登知识界人士的文章。

4 月 26 日《光明日报》报道了上海鸣放的情况，标题是〈激动中的上海知识界〉。按语说：全国大陆解放，是政治上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是思想上的春天；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思想的春天里，是阵阵春风。报道说：「在中共上海市委

召集的座谈会上，在民主党派的座谈会上，在高教，科学研究单位的小组会上，教授们、科学家们敞开了胸怀~过去在任何场合下保持缄默的，过去公开不谈私下窃语的，都率直的发表了意见。至于一向是敢说敢叫的，更加没有保留，在同一个会议上，有人一次、再次、三次的抢着发言，不畅不止。有的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甚至有开了十多个钟头的。……这种现象不能不说人们是深深地被关系到学术昌盛的『放』和『鸣』所吸引住了。」有教授接受采访时生动地比喻说：「到党召开的会议上来说，这正如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妈妈面前所做的那样，这是极为自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位教授激动地说：「对这样提意见的人，按照过去有些人的办法，会说他是反领导，反党，反革命。其实，是谁在逢背党的政策呢~是谁在达背党的领导呢？应该用这些政治上的大帽子来扣在别人的头上掩饰自己的缺点的人。」不过，据与会者反映，也有些人还是顾虑重重。如财经学院副院长、民盟盟员李炳焕在座谈会上说：「要争鸣，就要清除大家的思想障碍。现在人们有四怕：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怕讲话。」其中「怕钓鱼」的顾虑比较普遍，认为「放」是把你心里的话「钓」出来，等到有机会整你一下。】。

4月30日和5月1日，郭沫若邀请科学家座谈科学工作中的问题。科学家们首先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科学院的官僚主义。植物学家胡先骕说，他对领导有甚么意见总愿意提出来，可是许多意见提了以后根本没有甚么反应。哲学教授冯友兰的话说得很重：「科学院的官僚主义不算第一，也可以算第二。」历史学教授翦伯赞批评科学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是用「搞运动的方法来搞科学，并且只停留在喊口号的状

10 《光明日报》~1957年4月26日。

态」。科学家们还批评了科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胡先骕举例说，学习：「一进化论」~因为讨论的结果不符合某一学派的观点，就说对学习没有领导好：有人对苏联李森科学说表示了不同意见，就要「检讨」。

经济学家巫宝山谈了经济学界的问题，他说经济学界在学术上的讨论很少，大家有甚么意见都不愿说。有的学校开课讲凯恩斯的经济学，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批判。座谈会上，科学家还谈到丁党与非党之间有隔膜的问题。翦伯赞说：「宗派主义的确好像一堵墙立于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目前墙是矮了一些，但是还没有成一条线。要把墙拆除，得双方动手，共产党员要先动手。」翦还坦言：「问题在于许多旧知识分子还受到歧视，党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巫宝山说经济学界的宗派主义也很严重：「在经济学中，有着一堵墙，不是低墙，而是两边听不见声音的墙，它把新旧经济学家划分得很清楚。」¹¹

11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毛泽东5月4日的指示下达后，中共更是主动组织各种座谈会，特别是非党人士座谈会，给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5月6日和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清华大学召集座谈会，研究高校里中共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关系问题。一位民主党派成员提了十六个字的建议：「门户开放，权利平等，力竞公择，是存非去。」还有民主党派人士说要「放心」和「放手」。过去，学校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是征求过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見的，但是民主党派成员只参加「施工」，没有参加「设计」；只参加「演出」，没有参加「排练」。座谈会上还提出，党和非党的关系，是独立、平等的关系，还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不少人认为，民主党派除接受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外，在其它方面都是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平等的。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组织的作用？有人认为必须首先加强民主党派成员的自我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得好，才能使自己的组织在理论上和思想水平上，同共产党处于平等的地位，发挥的作用才会更大。也有人认为，要加强组织的作用，就必须加强领导的作用，希望民主党派的领导机构能随时对自己的成员提出具体要求。还有人认为，民主党派成员应该更多地参加各种行政组织和群众组织，以便在更多方面发挥作用，体现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权利和义务。主持座谈会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他发表的意见显得颇为开明。李说各民主党派要求发挥更多的作用，这次清华大学调查中提出的「从设计到施工、检查」的问题，是这个愿望的表现，「这是对的，应该肯定。」李指责一些中共党员对民主党

派的作用「还没有正确的估计」，要求重视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允许争、放，解除某些压力，克服中共党内的宗派主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掉中共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鸿沟」。利瓦伊汉甚至说：「校务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可以同党委的意见不一致。共产党可以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方案，民主党派也可以提出方案，个人也可以提出。」¹²

5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作家座谈会，二十多位作家参加。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主持，康生参加了座谈会。除了批评文艺作品少、文艺创作概念化和公式化之外，座谈会批评得最厉害的就是宗派主义问题。作家巴金有个长篇发言，批评上海市委对文艺工作不重视，对文艺工作没有认真研究，没有讨论，「常常匆匆作出决定，甚至发出粗暴的批评」，例如《解放日报》公开指责《文艺月报》没有转载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是犯了很大的政治错误」（其实《人民文学》也未转载）。结果导致《文艺月报》的销路从二十多万份跌到二三万份。王若望接着巴金的话说，这件事说明「墙内有墙」，党内也有宗派主义。如对这种现象不满意，就被看作是这些人的「同伙」。作家柯灵颇有同感：「这就是作家的团结问题、党群关系问题，在这上面党员应负更多的责任。例如，有一位党员作家说这样的话：『谁知道你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干些甚么！』一……这种态度，正如《人民文学》社论里所讲的：沾染上了国民党作风。」¹³

这一阶段的鸣放言论，基本上是针对基层单位的，所批评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也都是具体工作中的表现¹而且完全没有超出毛泽东历次讲话指出的范围，也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因此，对于中共高层领导人来说，是可以接受和容忍的。偶尔有些像雷海宗谈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这样显然属「出格」的言论，也是作为学术问题，允许各抒己见，平等争论。《人民日报》转载时不过是在编者按中指出：「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又在雷海宗言论之后作编者注，称雷所说「违反丁事实」，指出列宁「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共党人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4月2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

了同是座谈会参加者季陶达教授的文章，反驳了雷海宗的观点。同时，也刊登了雷海宗的进一步解释和说明性文章。气氛显得十分平和。毛泽东是否都看到这些言论，无从知晓，不过总体上看，他对此期的鸣放言论是满意的。

14 《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28日’15 两篇文卓均见当天《人民日报》。

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毛对这些言论的一些反映。4月24日谈到冯友兰、贺麟的文章”时，毛说：教条主义学问不多，未摸清旧知识分子的底，而旧知识分子被压迫了一下，他们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摸清了我们的底。因此，现在应该压一下教条主义，埋头几年学些学问，纠正教条主义，将来主要还靠他们。现在旧知识分子尾巴翘起来了，但最后教条主义纠正了，用说服办法来说服旧知识分子。现在旧知识分子威风了，教条主义抬不起头，会不会乱，不会乱，因为群众有鉴别力。这里，毛泽东指的显然是学术思想争论方面的问题，他很放心。5月6日的日记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谈话。针对当时社会有关「钓鱼」的说法，毛泽东说：「钓鱼，有人很怕，说百家争鸣是为了钓鱼。这看如何理解，百家争鸣是方法还是目的？为了认识真’理，那么也可以说是钓鱼，不过是钓两条鱼，而不是一条鱼，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鱼，一条是非马克思主义之鱼，不仅是钓鱼，而且是撒网。」

16 毛在这里有些戏言，不过讲的还是两种世界观方面明辨是非的问题，而不是政治运动的策略。

与整风再动员的同时，4月24日毛泽东开始修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毛泽东就到游泳池专心致志的做这个工作」。根据胡乔木整理的记录稿，经过半个月’到5月7日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一次稿」。其中与整风直接有关的补充内容如下：

一增加了关于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

—「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原来讲话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补充的重要内容有：「我们提出让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并且互相监督，只许做好事，不许做坏事，这有甚么不好呢？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它们的首先是人民。再则，政党的党员又监督政党的领导者。现在我们加上一条，各个政党互相监督^这样岂不是更有益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一批评一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保留了原讲话处理闹事的四条原则：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又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

5月8日毛泽东又接连改出两稿（自修稿第二次稿和第三次稿），补充的相关内容主要有：

—谈到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补充了一段：「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

命令，会有甚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对闹事问题作了更周全的分析：「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在谈到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以后，加了这样一段：「我们的专政，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过去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专政——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在论述了只是有具体的民主和自由以后，补充了一段：「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些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两段话：一段是关于这个方针提出的过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不是突然提出来的，酝酿了好几年。互相监督，早已是事实，已有七年了，不过从现在起应当做得更好些。长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我记得在 1949 年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含有长期共存这个意思的话，以后也说过。到去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个口号就可以明确地提出来了。」另一段是讲为甚么要让资产阶级政党与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写得很长，经过后来的修改，只保留了几句话：「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还保留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共产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

乱不了的。」（后来再次修改时被删去。1

5月9日和10日毛泽东再改出一稿，作为「草稿第一稿」，送刘少奇等人，并批示：「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¹⁷从上述增加的内容看，除对群众闹事的问题稍显慎重外，对于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双百方针等问题，都是更加强调和重视了，言词上也显得更加放得开。这与5月4日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说明毛泽东对这一阶段整风运动的进展持肯定态度。

2 民主党派座谈会与知识界的鸣放

当毛泽东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正在热热闹闹开展的整风运动时，一个座谈会引起了他的兴趣，这就是中共中央委托统战部邀集的各民主

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不仅规格高，与会者多为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工商界代表人物，而且时间长，从5月8日至6月3日，持续二十七天。会上所谈，最集中地代表了知识界、工商界和党外人士的意见，其影响超过了社会上其它任何会议和活动。《人民日报》几乎逐日对座谈会进行跟踪报道，刊发与会者发言，统战部也随时整理情况上报。

5月4日，利瓦伊汉约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谈话，并告知：统战部准备在下周内举行几次座谈会，邀集各民主党派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负责人参加。会谈内容，一是就各民主党派在今年初举行的全国性会议中提出的问题，着重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进行讨论；二是希望各民主党派对统战部多提意见，帮助党进行整风运动。利瓦伊汉希望非中共人士「不要讲场面话，最好打开窗子说亮话」，并再次申明中共的意图：各民主党派目前不要单独搞整风，主要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因为现在各民主党派正在推动「百家争鸣」，假若整个社会搞整风，就会打乱步骤，这样对国家不利。李还建议，民主党派如果要发指示，仅可根据中共整风指示的原则，讲明自由参加各人所在单位中共组织的整风，也可随时自由退出。这样做，是因为这次整风的方法与过去不同，主要是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教

育。民主党派没有整风经验，可以从中共这里吸取经验，将来再说。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 5 主编：《毛泽东传 11949 — 19761》I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 页 685。19 樽引自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页^—100。

20 以下座谈会发言，如无特别注 8' 均引自 1957 年 5 月 9, 10, 11、12, 14, 16、17 日（人民日报）。

5 月 8 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开始。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副部长平杰三先就召开座谈会的目的，近年来检查中共统战工作的状况以及当前党派关系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希望与会者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有民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民建副主任章乃器等。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发言。2。

章伯钧主要是介绍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座谈的意见。关于民主党派成员发挥作用，章说：「有人说：几年来，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事务中确实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条件。」他列举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提拔等情况，说明非党干部受到了歧视。作为交通部长，章说：「现在，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谈到对统战部的意见，章不客气地说：「民盟中有人认为：党中央对统战工作从理论、政策到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都重视得不够。有人认为：民盟中央『带病延年』^对长期共存方针无独立见解，也无具体办法，这点也是统战部对我们的『病』帮助不够，即互相监督不够，统战部也应该检查。」《文汇报》对章发言的报道还有一段：「互相监督要有关开言论之路，这就要有园地、要有地方出版。」他建议「允许知识分子组织出版合作社，由国家贷款扶持」。21

章伯钧第一个发言，就提出了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按照他的逻辑，要解决非党干部有职有权的问题，就必须改变党组负责制。这大概就

是最先引起毛泽东注意的言论——他竟把矛头指向了党的领导。章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呼应，尽管用语缓和了一些。许德珩灰心地说：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延年，还是个问题。「现在我们呼籲统战部帮助，也就是带了病，请统战部给药吃。」许还建议恢复双周座谈会，解决「一道墙」、「一道沟」的问题。陈铭枢把学校中的党-团、工会比作「一条鞭」，说学校的领导多半是靠这「一条鞭」进行工作。陈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学校中的党委制，也应该从多方面考虑。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但在今后的工作中

21 《文汇报》，1957年5月9日。

应该注意，对于一些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同党外的负责干部共同商量。陈也建议恢复双周座谈会。二

糧食部长章乃器认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现在有一些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不过章乃器申明：「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裏，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说到这里，章来了一句转折：「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章乃器还谈到了资本家的改造问题。他对4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提出了批评：「文章中说工商业者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

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在资本家改造的问题上，毛泽东屡次公

二 9 月座谈会是第一届全国政协设立的，是各党派商国事的一楼形式。第二届全国政协期间无形中断。这次座谈会因不少人提恢复，利瓦伊汉同意各民主党派推举代表共商有关实施具体问题，座谈会推举的代表有邵力子、罗隆基、谭志清、许广平、黄琪翔、黄希纯等。参加人是罗隆基。5月12日，统战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表示不同意恢复双周座谈会，并提出了具体组织办法，即大体上由各民主党派推出五位代表参加，中共方面推出五人参加；民主党派大体是主席、副主席，中共方面拟为必武、董必武、董必武、董必武、董必武。参兑《人民日报》，1957年5月

1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致彭真同志核转中央书记处，1957年5月12日。以罗隆基为首的九人小组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双周座谈会章程草案。参见《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来因展开反右派运动，统战部的建议未能实施。」

开表明过态度，章乃器的观点也曾在民建内部会议上受到批评。23在这里公开发表反对改造的言论，章乃器有意无意地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

座谈会5月9日下午接着进行，发言的有民建副主任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建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胡子昂继续批评宗派主义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需要更加紧密，但实际上不是紧密而是相对的疏远了。「许多地方党群关系尚有距离，表现为『敬而不亲，亲而不密』。有人说，党与非党的关系中间，好像有一堵墙，一道门坎，这堵墙、这道门坎虽然不一定很厚、很高，但是，不应该存在。」

陈其尤提出了肃反和法治的问题。他说，机关中民主党派的成员肃反

时有被捕的，但是民主党派根本就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为甚么而被捕。例如，科学院有一位致公党成员被捕几个月，致公党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就决定开除其党籍。可是，不久以后，他又出来了，而且恢复工作。至于为甚么被捕，又为甚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陈质问：是不是因为不信任？还是因为把民主党派当作一个与它的组织成员不相关的机关？陈其尤指出，无论甚么理由，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不是甚么保密问题，而是是否守法的问题」。他还建议，国家的民法、刑法应该及早制定并切实遵行。波匈事件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正是由于中共搞了镇反和肃反，才没有「天下大乱」之忧。但实际上，肃反问题已成为中共的一块心病，只是

23 见吉林省档案隋' 1-13/1-1957. 93' 页 7—9。

24 到 1956 年底^中共已沓认识到肃反中有许多「左」的 118 向：不仅「打击面过宽」^而且采取了一些「非法手段」' 参见中央十人小组关于肃反运动的当前情况和 1957 年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1956 年 12 月 7 日，陕西省楼案馆^ 123-40-1，页 134—146。对此^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在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主持下，由党外人士「对肃 5 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参见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准备迎接全面检查内部肃反工作的通知，1957 年 3 月 9 日，陕西省摺案馆' 123-40-1，页 178-181。此事没有公开，但中共确想尽快纠正肃反中一些错误做法。

希望私下医治而已。： 4 这次在报纸上曝光，无异于揭开了中共的伤疤。

王昆仑谈的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权机关的作用问题。王举全国人大的情况为例说，人大常委会了解情况少，具体讨论少，个别接触少。由于常务委员对国家情况不了解，常委会在讨论议案时，往往是临时讨论，讨论起来有困难。对于有人批评民主党的做客思想，王认为应该具体分析，要「看是不是把我们放在主人位置」。虽然人大在当时只是「橡皮图章」，但毕竟代表着最高权力，民主党派要求在这里坐上「主人」的位置，自然在心理上对中共造成了威胁。

在 5 月 10 日第三天座谈会上发言的有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陈铭枢，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中央常委楚图南、曾昭抡，民进副主席王绍鏊等，民革副主席张治中因病未能出席，作了书面发言。这次座谈提出的大多是建设性意见。

邵力子提了三个问题：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的生活和就业问题、党政关系问题、互相监督问题，其中党政关系问题最引人注目。他对党组领导制表示肯定，但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还说：「在过去，党中央有时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当然起作用很大，但今后可否考虑分别发布指示，国务院向各政府部门，党中央向党的系统。」邵特别指出，县以下领导机关「以党代政」现象严重，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

罗隆基从民主党派的作用谈到了党政关系。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罗希望今后这类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材料。他举例说：「今天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科学规划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人参加会议，周总理说，各民主党派负责宣传工作的人也应该参加。」罗隆基建议党政分工要明确：「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谈到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平等、独立、自由，罗说应该创造一些条件，现在有些制度、规章有碍于平等、独立、自由和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

对于罗隆基的发言，《光明日报》、《文汇报》的摘引和报道与《人民日报》有较大差别，对毛泽东的刺激可能更大：「现在，强调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以及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地位平等，这就需要条件，而发展对象是重要条件，我们在发展对象上有很大困难。长期共存的条件之二，是民主党派要起作用，但民主党派怎样才能有名有实，要做的工作又从何而来，在确定重大政策时起甚么作用，都尚待解决。我们对很多情况不了解，现在是联合政权，需要民主党派起作用，就

应该让我们知道多一些情况。重大事件如过去的抗美援朝，和现在的解放台湾问题，共产党早和我们商量，我们就能多提意见，起的作用就大些。」罗隆基还谈到高等学校的「党委治校」问题，他说，「党委治校」这一提法，是与中国政治制度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各民主党派连政权工作都参加了，也可以参加学校管理。应该让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发挥作用。民建是以企业为基地？身挥它的组织作用，其它党派也应该在学校起作用。²⁵

罗隆基发言刚结束，史良就表示要和他「争鸣一番」。她认为民主党派能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并不在于民主党派成员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史良谈自己的体验说，不参加共产党，党也是信任的，并不发生所谓对党外人士就不信任的问题，也没有感到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发挥作用。王绍鏊的发言对此有所呼应，他说：「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

²⁵ 《光明日报》1《文汇报》，1957年5月11日。

曾昭抡认为，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需有相应的制度措施保证，而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某些制度还没有改变不能适应新的情况。「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些情

况³」曾昭抡不仅提到了肃反还批评了「三反」，他说：「三反和肃反斗争，成绩都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但是也由于有一些缺点，发生了不少副作用。三反斗争中的副作用，到现在五年了还没有完全消除掉。政府是不是想办法加以消除，这会有利于统战工作的。」

5月11日发言的人较多，话题集中在制度问题上。民革副主席熊克武说，有职有权有责-这是职责划分和有关制度建立的问题，应该确立合理地分工负责的制度。熊克武也谈到了法制和肃反，三反的问题，他说：由于目前法制不完备，政策方针的宣传不够深入，不但入民群众对某些事务感到模糊，就是有些领导人有时也免不了表现出无所适从。民建中央委员千家驹指出：几年来，党中央和统战部一再强调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有责，虽不能说没有改进，但为甚么问题仍然存在；

1「除去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思想没有贯彻以外，还有制度问题，就是没有好的制度来保证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来制约党员的大权独揽。」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行政。千家驹提出：「党的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是行政系统不应当是虚线。党委或党组应该通过行政而不是直接布置工作。」他也谈到「三反」、思想改造、肃反运动，说斗错了的人应该向他解释清楚，这不是算老账。民盟中央常委黄药眠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批评道，部分党员恃功自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解决这些问题，黄认为中共党内要加强对统战政策的宣传和学习，「同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应订出一套制度和办法加以保证」。

5月13日继续开会，农工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首先发言，他的言词更加尖锐：「看起来，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权利。」严信民对「物质基础」的解释是：「总的说来，共产党是强大进步的，民主党派是弱小落后的，在这权情况下谈平等是很困难的。」这个发言给人的感觉是「民主党派正在要求与共产党一平起平坐」。听到这样的言论，毛泽东的心情大概不会平静了。

农工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认为，有职无权的问题，一般说来，是因为党员中存在宗派主义思想，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他说，许多党员「机械的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靠着党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无党派人士张奚若发言讲的是「三大毛病」，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来源。他说：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们认为：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正有甚么本事。因此，他有事情就照他的办法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张的总结是：许多党员居功而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够；旧经验不能用；任务又多又紧，没有办法。结果就只好靠三大主义办事了。「先拿教条主义武装起来，再拿行政命令

执行教条，拿宗派主义保护教条。」这些说法同毛，东对党内的批评没有多大差别，但言语中透着一种对共产党员的轻蔑和厌恶，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在5月15日座谈会上，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首先发言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马寅初以他在北大的工作为例，肯定学校党委制是有好处的，并表示不赞成恢复校务委员会的建议。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提出了不同观点，说他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但机关中的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制性质不同，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介绍了民革干部统战工作的意见。他说：「现在民主人士还没有做到从『彩排』到『演出』、从『设计』到『施工』都能参加。」同邵力子的意见一样，他认为中共中央同国务院发布联合指示，县以下「以党代政」，这些做法都是不尽妥当的。梅龚彬介绍，关于民主人士的安排，有人分析有三种情况：有职无权；有名无实；无名无实。在他看来，有职无权现象在目前机关学校中极为普遍，而在民革方面严重的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以及「名」「实」皆无的问题。

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发言讲了「四种偏差」，即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张奚若解释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

一种是形体之大，以为近代的东西都必须大，许多建筑很堂皇，但是并不太合用。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但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都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的等速度的发展。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张奚若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耿耿于怀，后来被多次当作

批判的靶子。

5月16日是第一阶段座谈会的最后一天。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首先声明，他的发言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黄认为，问题在于领导方法，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大、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例如，「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²⁶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竑特别讲到人大和政协的工作，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应该是专业专职。「有人说：党派的领导人不能不兼，如果这样说法的话，毛主席要兼多少职务呢？我以为在两个常委内，各党都有一定的员额就得了，何必限于那几个领导人呢？」他讲到，由于兼职人员过多，人大常委和法制委员会开会，

²⁶「五人小组」是中共党内主管「肃清反革命运动」的机构。最早是1955年5月设立的中共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组长为陆定一、副组长为罗瑞卿；同年7月，这个小组扩大为十人小组。紧接着，各地方各部门乃至部分单位都设立了「五人小组」。「到会人数往往仅到达法定人数的边缘，其中，我估计了一下，共产党员缺额的比较多，尽管是因为兼职多、工作忙，但是，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来看，是会令人引起不重视的感觉的，是不是有人觉得问题已经在党内决定了，常委会不过是形式的通过而已」。说到立法问题，黄说：「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如果这些法规完备了，不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可以解决，党政的关系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黄还批评了中共评判工作的一个习惯性说法：「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的一种公式，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

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很可观的。

谈到党政关系，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也质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指示的做法，他说：「当然，国家是由党领导的，党可以抉择方针政策问题。但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我以为有关行政方面的问题应由国务院发指示。因为联合发指示容易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党和政府一道发的指示就是重要的，国务院单独发就不重要，这样，就无异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发言指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有责任，但是，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他批评有些机关只是在形式上尊重了党外人士的职权，让民主人士参加了党组会议，但实际上还是不尊重人家的职权；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严特别说到「人事部门管得太多，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人事部门往往只重政治不重学术」。他希望有些尚未制定的法律如民法、刑

法、国家计量条例等，能够尽快制定。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派起了一定的带头、号召作用，但是，在对于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上，作用不大。希望「今后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一级组织，在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叶笃义建议改变民主党派的组织形式。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此发生「争人」的现象，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解散这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个建议提出了一个更让执政党头疼的问题，现在民主党派不仅要求长期共存，而且试图重新组织一个规模和影响都更大的联合党派了！

这襄大段摘引座谈会的发言，是因为正是这些言论使毛泽东感到一种危险。尽管会上有不同的声音，但发言内容愈来愈尖锐、会场情绪愈来愈激烈的趋势，也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领导

人注意的还有社会上的鸣放言论。

各单位、各地方议论最多的还是党群关系、党政关系和党与非党的关系。关于高校领导体制问题，叶笃义在5月初清华大学座谈会上发言——十分赞成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他认为，过去党委会管理太多，如果说党与非党有堵墙的来源，主观上有些关系未处理好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有了党的组织，无形中就形成了一堵墙呢？叶提出，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的组织活动，还建议全国政协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

27(光叫日报) -1957^5 月 8 日：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
1101~102：

在5月6日、7日、9日北京大学举行的党内外主要干部会议上，许多教授认为，党群关系不够正常是目前学校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首先表现在依靠谁来办学校的问题上。杨人榘教授说，1952年以来，提出依靠积极分子来办好学校。但是这些积极分子到底是起了桥梁作用呢，还是使领导和群众更疏远呢？值得怀疑。将所有的人分为积极、中间、落后三类——只会发生不好的后果。有些积极分子、善于体会领导的意图，实际上是思想上的懒汉。傅鹰教授说，他对「思想改造」这几个字最反感。一听到这几个字，就联想到清河农场的劳动改造。王铁崖教授认为，现在是学校机关化、衙门化。用行政方法来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人们不是以学术地位来衡量一个教授的学识才能，而是以甚么主任甚么长来表示一个人的学识才能，甚至在报上也出现了「某某教授升为系主任」的可笑提法。□ 8
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批评说，中共不少领导人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俨然是「天生的圣人」。马还沉痛地诉说：在武汉地区的高级知识分子「感到内心确确实实有苦水，有牢骚，这是事实。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特别是在肃反运动的时候，使用极端粗暴的办法对待他们，把斗争、禁闭等办法施诸于他们身上，对于他们的人权都不重视。在这些运动中，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对于思想、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加区别，打击和斗争面太广，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真把他们搞得太苦了，太伤心了」，「他们做人的起码的自尊心都被毁灭了」。： 9

5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章乃器的文章〈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章指出，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名言，就是「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尽管承认在毛主席的教导下中共党员「绝大多数是模素的、谦虚的」，他还是提出、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应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30

28〈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29《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300、民日报》，1957年5月148。

5月14日清华大学党委邀请全校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举行座谈，帮助党组织进行整风。张任教授说，有职无权可以这样来比喻，参加施工的多，参加设计的少。例如送到国外去深造的名单，不是由教研室主任签名推荐的，而是由上面提出来的，充分发挥各教研室成员的积极性，需要使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有职有权，不仅让他们参加施工，而且也要他们多多参加设计。副教授方崇智列举党对高级知识

分子不信任的种种表现，如外宾来清华参观时，学校不许教授们用外文直接和外宾交谈；教授们给苏联专家送礼物时，一定要经过系秘书；高等教育部曾再三声明，教授不能与外国直接联系等。31

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沈志远5月16日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题目是〈党和政府不应管得太多太死〉。他说：「高等学校的党委制，过去也可能起过好作用，但是现在在某些学校里形成了以党代政，非党校长无权，校务委员会形同虚设，在系里是系秘书领导系主任的反常现象。为了改正过去的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以为可以考虑学校党委制的改变问题。」为了消除出版垄断的弊端，沈建议放宽对出版事业的管理。他说：「今后出版事业应当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监督检查之责，其它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沈志远最后说：「不但要清除寄生在党和政府机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三种歪风，而且还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32

鸣放中反映最强烈的还有肃反问题。据《零讯》33 刊载的材料，早在 4 月的民革二中全会期间，邵力子就站出来强烈批评肃反运动，他说「要搞肃反由公安部搞，不要搞运动，群众运动偏差大」。又说「在未判罪之前，都应作无罪看待，无罪关人是不对的」。还声明：「今天我愿意大声疾呼：肃反肯定有偏差有错误，而且偏差、错误是很大很大的。逼口供，疲劳讯问，乱斗一阵，这叫『大胆怀疑』！自杀了多少人，冤枉了多少人！」龙云说「逮捕民革成员前，不通知民革组织是不尊重民革组织，互相监督也要互相尊重」。上海市各界民主人士对肃反的反映有三点：一、认为肃反工作有偏差，杀人太多。

31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15 日。32 《解放日报》，1957 年 5 月 17 日。

33 《零讯》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种不定期内部刊物，主要反映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知识界的动向，专送中共高层参阅。

二、希望今后肃反不要采取「大民主」（发动群众）的方式。三、认为共产党说话不算数，解放时宣布「既往不究」，后来却大究特究。

《宣教动态》34 的材料反映，北京师范大学民主人士也对肃反不满。教授刘世楷说：思想改造、肃反运动太粗暴，我不赞成搞群众运动。肃反应该让公安局去调查逮捕，怎样才能让大家乱斗？副教授何兹全说：肃反以后，好些人有话不敢说，怕抓住小辫子，将来算总账，说明党群关系有问题。我们系里有五人被斗，结果没有一人是反革命，使人觉得不是反革命也可以斗。55[^]

在 5 月初湖南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大学教授和非党人士提出，高等学校肃反工作的遗留问题没有及时得到处理，很多人思想不安。有人认为在肃反中摘掉了政治问题的帽子，又戴上思想问题的帽子，不能令人心服。许多人认为目前高级知识分子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需要妥善处理那些在肃反运动中伤了心的同志的问题」。36 辽宁省委组织部 5 月 16 日汇报了该省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在

34 《宣教动态》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专门反映意识形态领域，文教系统的剿

向，&送中共高層領導人和中共中央有關部門。35 陝西省檔案館，123-40-47' 頁 35—43。36 《內部參考》^1957 年 5 月 9 日' 頁 19—20。37 陝西省檔案館，123-40-47' 頁 31—33。

鳴放中對肅反運動的各種議論。旅大工學院有教授 I 黃炎培的兒子) 說：「肅反運動在作法上粗暴，違反憲法，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因此說不上甚麼成績、是否必要的問題，問題在於以法治國，還是以黨治國。」有人說：「共產黨發動群眾批鬥肅反對象、組織鬥爭就是違法的。」還有人說：「肅反是一次有組織有領導的大規模的違反憲法運動。」這些言論對黨內幹部影響很大，如撫順煤校領導幹部說：「人家講的對是對，但我們不合法又有甚麼辦法。」還有個別領導幹部也私下承認「肅反運動就是犯了沒有劃清敵我界限的錯誤」。有些積極分子說：「現在看來' 跟着共產黨搞肅反是搞錯了」，「當時就不應該鬥爭」。37

在鳴放中最積極的報紙要算民盟的《光明日報》。經章伯鈞同意，《光明日報》從 5 月 4 日開始，分別在上海等九個城市，邀請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舉行座談會，給中共提意見。為此，儲安平不僅親赴上海^ 還寫了一個意見- 提出「應當癡當地估計被邀請的人士，平時是否意見較多及是否勇於發言」。此外，儲安平還發出百余封組稿信，恭請大家在《光明日報》發表「對國家事務的各種意見」，並要求「自由地說自己想說的話^ 寫自己願意寫的問題」，要「結合互相監督的方針發言」。這個百名文人座談會足足開了二十天。會上發言踴躍，鋒芒畢露。儲安平覺得共產黨的「風」如要「整」好，當聽取這樣的意見；《光明日報》如要办好^ 當刊登這樣的發言。所以，他認為九大城市的鳴放座談會是成功的典範，章伯鈞也極為欣賞。在座談會上，一些人從法制的角度對肅反發表的意見，被儲安平認為是最具建設性的意見，也是最有價值的新聞。他說：「這些發言才是政治問題的通論，只有登這些通論，才能把《光明日報》辦成知識分子論壇。」

38

在民主黨派中，民盟最活躍，不僅開放言論，參政意識也很強烈。5 月 13 日民盟中央作出決議，決定成立四個工作組，分別對「高等院

校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四个专题进行研究，调查情况，分析问题，提出建议，以切实帮助中共搞好整风。各工作组成立后，分别邀请了有关人士座谈讨论。千家驹主持了「如何展开学术界的『百家争鸣』问题」座谈会，曾昭抡主持了「关于科学体制问题」座谈会和「关于当前学制问题的讨论」座谈会，黄药眠主持了「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座谈会。座谈会的意见和建议后来还整理成〈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案初稿）〉。39

有研究著作认为，5月上半月，「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愈来愈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⁴⁰这个论断有些言过其实。笔者以上所引言论，有意挑选了言词比较激烈和尖锐的那一部分，即使如此，也看不出其中有共产党「快要混不下去」的意思。这一阶段的鸣放者基本上都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中有地位、有影响的非党人士和知识分子，至少毛泽东注意的是这些人。所有他们的言论，都是在毛泽东的热情鼓动和中共的诚心请求下鸣放出来的，真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仔细分析这些言论，大都是针砭时弊、切中要害的，纵使有一些错误或不懂，也是出于善意，可谓秉笔直书，光明磊落，况且有些说法，比如改变高校党委领导制，填平党与非党之间的深沟，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唱对台戏等等，本来就是毛泽东的语言，或受之启发的联想。然而，就是这样一些言论，就在这短短的几天当中，毛泽东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头，他要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了。

3 毛泽东感到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毛泽东究竟是甚么时候开始警觉的？到底哪些言论让他感到不安了？

关于毛泽东开始警觉的时间，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是5月中旬。这个说

法应该可以接受，但是过于笼统，因为就是在这几天当中，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究竟怎么变的，决不是一个「5月中旬」可以解释的。况且，很多论著提出这种说法的依据是靠不住的。

人们最常引用的是利瓦伊汉的回忆。利瓦伊汉说：

40 《毛泽东传 11949—19761》’ 页 690。

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甚么

「轮流坐庄」、「海德公因」等#诸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的头上’ 决定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并且指示^ 要硬着头皮听 I 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匪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及至听到座谈会的厘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

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 变化〉的文章，发给：!：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41

利瓦伊汉的这段记忆很不准确。统战部的报告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这应该是事实。^ 但是第一，目前所有《内部和公开）的资料都不能证明在5月15日前的座谈会上有谁发表过「输流坐庄」、「海德公圃」之类的言论。像这样刺激的言词大概不会逃过记者的眼睛，而当时统战部对各种报道又均未有删改。”第二，从座谈会一开始《人民日报》就作了详细报道，而不是在第三次或第四次汇报后才开始的。第三，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在1956年民盟工作会议，而不是在1957年座谈会上。^ 至于「外行领导内行」的说法，更是早在整风运动之前就有，如前所述，毛泽东曾多次提及，并认为有一半道理。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 11905—19951》^ 中卷（北京：中央文 18[出版社^ 20001’ 页 382。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 I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页 475—476。此文首次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7 顺便说一句，很多论著在研究毛泽东如何决定进行反右的问题时，都非常看重此文：但笔者的考察结果认为，对于所要回答的问题而言，与其它相关的文献和史料比较，这篇文章的研究价值最低。理由：此文是毛泽东后来修改的，如果研究者不知道修改的内容和过程，那么在这裏可以看到的，充其量是毛泽东自知对知识分子估计过高、对局势判断失误后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心情及文过饰非的手法。况且，文中所述内容，在其它文献也大多讲过了。

利瓦伊汉所说的毛泽东 5 月 15 日「写出」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正是他和其它许多人判断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右的时间的依据，甚至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发出了反击右派的信号」。⁴⁵ 这里也有很大问题。这篇文章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刊载时，所署时间确是 5 月 15 日，但编者有题注称：文章最初的题目是〈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本报评论员」。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毛泽东改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在清样上方写了「内部文件，注意保存」的字样，并且在题下写了「（此文可刊登党刊，但不公开发表。此文是五月中旬写的）」，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同时对清样作了少量文字修改。这次修改和批注的时间是 6 月 11 日。6 月 12 日，该文印发党内。在阅看已经印发的这篇文章时，毛删去了原来的题下说明，改署名为「毛泽东」，改时间为「5 月 15 日」，并在「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后面加写了如下文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⁴⁶ 如此看来，第一，此文应是 5 月中旬起草，6 月 11 日定稿的，所以人们看到的文字反映的不是或主要不是毛泽东 5 月中旬的想法、而是反右运动开始以后的想法。第二，此文原是毛泽东准备为《人民日报》写的评论员文章，后来才改作党内文件，所以其用意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因此，这篇文章根本就不能作为判断 5 月中旬毛泽东有何想法的依据。⁴⁷

至于哪些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很多研究者和当事人的推断都

是：「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等，认为毛泽东受到这些言论的刺激，才决心反右的。“不错”这些说法可能最令毛泽东恼怒和反感，后来也成为反右派运动集中批判的靶子。但是，在中共中央发出准备反右和「引蛇出洞」的指示之前，上述言论还都没有发表，因此不可能成为引发毛泽东改变主意的依据。

利瓦伊汉有一个说法很有理：「中央当时发动这一场斗争，有一个酝酿和发动的过程。」”笔者将能够找到的有关文献、史料按时间顺序排队进行分析，希望能看清毛泽东这段时间思想变化的轨迹。

首先是5月12日林克的日记，这则史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可以说明毛泽东思想变化的最早的证据，故极为重要。这一天的日记如下：

毛主席在同我谈话时说“目前全国已经争鸣和齐放起来”知识界争得最响。民主党派不那么响，工商界最先神气“章乃器、罗隆基、章伯钧、卞东枢等人发言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争名夺利的本质也有所暴露：像定息二十年。自1956年算起可以说是一种典型。有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的某些人也有所表露。春天来到，各种蛇也开始动起来了。民主党派某些人及资产阶级某些人的鸣放，并不增加他们长期存在、共同监督的资本，相反某些言“会使它（他）们在群众中丧失威信”这样就不是长期共存而是短期共存了。张奚若谈得好‘己不正焉（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毛主席还谈到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问题。他说，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讲思想“但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

化如“李新：”；6右亲历记：“”载颢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I 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19981，页15-17；林克等：“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页45—46。49李锥汉：
回忆与研究：“3833：

是看问题有左的片面性，他们克服了片面性会大进一步。他们所以宁

左勿右，（也们是要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人则比较危险。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争鸣和齐放的限度是甚么？限度就是不能火烧柁子。批评应该：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力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引有利于党的领导。而共产党的领导是有决定性的。

毛主席在谈到新闻自由问题时说：新闻就是要控制，新闻应该服从国家的经济的基础，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为无政府主义的经济服务。例如：1956年上半年农业合作化时，只能宣传发展合作化的方针，不能存在（宣传？）削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党内存在两殊方针就会为工作造成损失。…一（此处几句字迹不清）更不允许煽动性报道。

目前有三方面情况不报道或加以控制：肃反案件：（力物价：门）外交政策。

关于反社会主义言论，可以多登一些，这有利于我们。5。

由此可以判断，这时毛泽东已经发现鸣放中有问题了，虽然不是多严重，但主要有两个「危险」倾向：「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有所表露」。核查被点名的这几个人当时的言论，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应该是章伯钧、章乃器关于改变机关党组制和要职要权的言论，陈铭枢和罗隆基改变学校党委制的言论，以及罗隆基要求给予民主党派「平等、独立、自由」的言论。于是，毛泽东提出了鸣放的三个「限度」，核心是党的领导。还有，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各种蛇」开始动了，又说「反社会主义言论，可以多登一些」，表明他这时就产生了「引蛇出洞」的念头。再有，对新闻报道提出三个禁区，说明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有些担心了。也有一点疑问：张奚若讲民主党派先要正己方能正人是在5月13日〔14日《人民日报》刊出〕，毛如何在12日就引证呢？或许张以前也说过这话，或许林习

惯第二天追记日记？这倒不是很重要，但有一点毫无疑问，毛泽东这时肯定还没有看到张奚若5月15日关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发言，否则就不会以赞许的口气提到他了。

感到问题的不止毛泽东一人。5月12日接见东欧客人时，周恩来谈

到：最近我们搞整风运动，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有矛盾，并且大力揭露矛盾，加以克服。我们鼓励党外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提意见。其中少数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全部接受；大多数意见是有正确的部分，同时也有不正确的部分，我们应该接受他们的正确部分，对不正确部分也不忙于做解释，日后慢慢地讲清楚；另外，还有极少数人是对我们怀有敌意的。现在要让大家「放」，让大家「鸣」，党员与党外人士间的隔阂也要清除。”不过，应该如何对付「极少数人」的敌意，只能听毛泽东的决定。

5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两篇文章表示一切如常。一篇是读者来信〈不能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一篇是《解放日报》5月9日社论〈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批评党内干部对大鸣大放的错误认识。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谈职工闹事〉指出：「凡是闹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地方；职工不能通过『国结一批评一，结』的正常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被迫走闹事这条路。」至少到这时，毛泽东还没有作出新的决定。从各方的文献材料看，政治局10日开会通过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后，直到13日，毛泽东没有召集过会议。还有，13日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电报，其中指出：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普迹存在，要求「各地各部门应在整风运动中发动群众予以揭露，组织力量，抓住重点，进行系统地检查、纠正」。⁵²从电报的口气和内容看，也丝毫没有脱离中共中央整风指示的框架。

14日发生了变化’且不是在白天。这一天毛泽东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阅读5月10日《解放日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上海二十二位中、小学教师座谈会的发言摘要。毛泽东写了批语：「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又批示：「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⁵³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运动出现的危险倾向。⁵⁴这个解读恐怕有些悞颇。仔细翻阅这份《解放日报》可以发现，报上所载言论虽然数量很多（整整一版），但涉及的都是具体单位、具体个人和具体问题。

55 同《人民日报》刊登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发言相比，上海中小学教师所提意见要温和得多，而没有涉及政治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经济方针、历次运动遗留问题等。如果毛泽东要提醒中共领导人注意极少数人的错误言论，完全可以指出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发言，正如他本人注意到的那样-而不必拿出上海教师座谈会为例。笔者认为，毛泽东要求刘少奇等人「过细」地看这张报纸，其用意还是在于说明发动整风的必要性，说明党内问题的严重性。或许毛泽东想以此为积极发动整风运动辩护，至少可以感到，毛泽东在意识到危险倾向开始出现的同时，仍然认为执政党本身的官僚作风和腐败堕落也是危及政权的重要因素。

54 《毛泽东传 11949 — 19761》’ 页 689—690。

55 《解放日报》~1957年5月10日：

56 《毛泽东传 11949^19760’ 页 690-691。

57 11 管会议没有留下记录 I 《毛泽东传 11949 — 19760^页 690—6911’ 但邓小平在

两天后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该指示是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参 II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讲话 I 摘抄本)^1957年5月16日。

5月14日晚上9时至次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利瓦伊汉、康生、陆定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57 指示分两部分，内容是：

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 I 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I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

些反共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但是在报道中三类言论必须加以领导和控制，即：（一）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影晌的消息和言论；（二）达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其中包括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京的消息和言论；（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以上各点，请即召集党报负责同志加以布置，至要。；’、

解读这个文件应该看到：第一，中共高层领导这时已经一致认识到，整风运动中暴露出一些「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第二，应对这一现象的措施是让他们继续暴露，在报道时不作任何删节。这与毛泽东 12 日私下谈话的思路相同，「引」蛇出动的策略尚未形成，但呼之欲出；第三，使用「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这两个概念说明，在未来的斗争中，还是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属人民内部矛盾，后者属敌我矛盾；第四，对舆论的领导和控制还是限于毛泽东 12 日谈话指出的三个方面，只是顺序调整一下：物价、外交、肃反，显然是有些担心出现社会动乱。

58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

十二册（北京：国 I：方人学出版社 1986 年 1 月）页 18。

在 5 月 16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解释了中央的指示，强调说：报纸把坏话删掉，实际是帮助他们，现在应让他们放完，应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中派。一是党改变作风，一是右派教育他们。现在报纸上为右派粉饰。对各种言论不要驳，到一定时机党内也打打招呼。有三个东西不能登：对物价有影响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肃反的。现在不放不利，右派还没有出头。59 这个讲话贯彻了 14 日指示的精神，但使用的是「右派」这个概念，说明此时还是把这些人作为人民内部问题的。

5 月 16 日晚 9 时至次日凌晨 1 时 20 分，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增加了吴冷西，会议也没有记录。60 当天，毛

泽东又亲笔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隶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指示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说：

59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讲话 I 摘抄本 1[^]1957 年 5 月 16 日。60 《毛泽东传 11949—19761》[^]1690[~]691。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厉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的，正确的。这类批评评估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方向[^]必

项完全搬（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它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勋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 I 改进工作。[^]

这里仍然强调了提出整风运动的宗旨，言语之间透出一种急迫的心情。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最后提到了干部调动的问题，这与动员时所说重在思想教育，不做组织处理的原则就有差别了。显然，毛泽东急于看到转变党内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恢复党的威信的结果，是为了按照原来的部署：结束党内整风后，进行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其它各界的整风。对于这一阶段的鸣放言论，毛泽东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就连傅康那样言辞激烈的「鸣放」，都认为「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

的」。傅康在北大一个小型座谈会发言时，情绪激昂，口无遮拦，非常引人注目。中宣部派往北大蹲点的馈育之当时听了发言后即认为「内容尖锐」，「十分重要」，且「因为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且有不同看法的代表性人物」，故坚持整理出全文刊登在

《宣教动态》〔1957年第51期〕上。可以断定，如果不是毛泽东的金口玉言，傅康这个发言在反右时必定被作为典型的右派言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指示中特意对这样一个「代表人物」点名保护，一则说明他当时还是有意保护大多数鸣放者的（他们毕竟是在他的鼓动下站出来给党提意见的，二则说明他当时对哪些人属「右倾分子」或「右派」是心中有数，因为他们的言行超越了他一贯坚持的政治界线。16日指示的第二部分正是针对这些人的：

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教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与14日指示相比，这段文字显得明确而严厉。说这些「右翼分子」或「右派」具有「反动面目」，「带有反共情绪」，又说他们「企图」把运动「引导到错误方向去」，表明毛泽东更加深了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仅是「不要反驳」、「不加粉饰」、「不要删节」，而且还要「放手让他们发表」，表明运动进行到这时中共高层开始酝酿反击「右派」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也已露出端倪。利瓦伊汉说工商界座谈会开始时〔5月15日〕，「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同样证实了这一点。

6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478。6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究》，页 834。

就在这一天，行动开始了。到 5 月 16 日，统战部召集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已经开了 7 次，共 36 人发言。按照统战部原来有个打算，这时应该结束座谈会了。5 月 12 日统战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时就说，座谈会「再继续两三天即可结束」，并准备采取以下几项措施结束会议：一、恢复以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基础的座谈会，讨论国内时事政治问题、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问题和国际问题；二、根据民主党派的要求成立一个有关党派事务问题讨论会，由各党派和统战部负责人组成，研究各党派之间的相关的问题和需要统战部帮助解决的具体问题；三、将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整理为两类，分别交给上述两个座谈会处理。同时采取个别交谈、中层座谈会等办法继续听取意见；四、对座谈会提出的各种批评和意见，统战部准备分为三类，分

别供中央考虑、由中央统战部处理和交有关部门考虑。统战部还考虑「对错误意见：在这次会上不作答复，往后再处理」；「对于统战部的批评，声明在整风到适当段落时，向大家报告」。这些安排，分明就是要进入下一阶段工作——处理这些鸣放意见了。然而，几天后情况就变了。利瓦伊汉在 16 日会议结束时宣布：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与会者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李肯定座谈会「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座谈会还接受全国政协秘书长邢西萍的建议，推定全国政协副主席章伯钧向政协常委会报告。”在此前一天，统战部又联合国务院第八办公室 67 邀集工商界召开座谈会。

这一切表明，是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时间应在 5 月 12 日。14 日中共中央统一了思想，并决定让右派继续暴露。从 16 日开始，整风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引蛇出洞」的策略正式实施了。

二阴谋：在「引蛇出洞」策略下的事态发展

面对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矛盾，特别是波匈事件前后中国社会发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的设想是“既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执政党内，在于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那么就必须开展一场党内整风运动，并给整个社会一定范围内的民主和自由”¹ 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和建议，同时调整各项政策方针“这样，既可以克服执政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又可以平息群众的怨气和不满，调和社会关系“然后，在比较宽松和谐的环境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经济建设的热潮”当然-毛泽东和中共对于国内的「敌对力量」并非毫无警惕，但是他们并不担心会出大事，毛泽东断定在中国「像匈牙利那样的七级刮风刮不起来」。毕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然而，在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共建立起来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与他们理念中的民主和自由相差甚远。于是，在相信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前提下，他们针对党派关系，党政关系、立法和执法问题、干部人事制度等有关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深层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尤其是对中共执政以来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和农业合作化、手工业改造、私营工商业改造、建设中的冒进等经济政策提出了质疑，这就大大超出了中共和毛泽东预设的「解决作风问题」的界限。毛泽东这时隐约感觉到，这些言论（不是某句话或几句话）已经形成了一种情绪、一种空气、一种倾向，可能危及到中共的领导地位。所以，必须予以反击。尽管此时尚未决定何时反击，如何反击，但「引蛇出洞」或欲擒故纵的策略已经确定下来。

1 毛泽东亲自策劃的「阳谋」

对于反右派运动的策略，毛泽东不承认是阴谋。他后来在报纸上公开讲：

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

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甚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甚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毛泽东的话有一点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即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是在5月14日和16日而不是在5月8日或此前发出的。毛泽东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以为中共中央（或他本人）早已料到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会有「右派言论」，是有意让他们这样鸣放的。如此，一方面把座谈会上令他感到不悦的人物说成是「牛鬼蛇神」，把那些「带有反共情绪」的发言定性为「毒草」就顺理成章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表明一切都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的，以咀塞党内（特别是苏共）对他鼓吹大鸣大放的「不慎行动」的质疑。至于说在提出双百方针时就已「安民告示」，更是强词夺理——只要把他一年来的讲话都翻出来看看，就一目了然了。毛泽东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在知识分子面前掩盖他言而无信的政治权术，更主要的是在国内外的共产党面前掩盖他对中国社会和局势的判断「失误」。正因为如此，他在5月中旬后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右运动中，其热情和关注程度，比发动整风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5月上半月，真正实行开门整风的主要还在中央，也就是统战部召开的引人注目的座谈会，绝大多数单位和地方都行动缓慢。所以，在中央开始转向的时候，各地的整风运动才刚刚开始。比如云南省，就是在5月14日这一天，成立了以谢富治为书记的十二人整风领导小组。～谢富治在当天的整风运动动员报告中，讲述的完全是中共中央整风指示的精神：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重重矛盾，首先必须认清党的责任，把党风整顿好；处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论是哪方面的错误和缺点，责任主要是在我们这一边」；「工人、农民-学生中间闹事，固然有种种的原因，但是主要是我们的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不倾听群众的意见」。”，5月16日，云南省委研究整风问题的精神

传达到基层，仍然是宣讲中央整风指示，只是态度比较慎重。省委要求「各地注意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轻易发动群众搞反领导上官

69 云南省档案馆 2-1-2742, 846—47。70 云南省档案馆, 2-1-2741, 12—14。

僚主义的运动，以免陷于被动」。按照省委的安排，「目前整风只在省委、地市委中开展，整风的重点只是县以上干部」，其它人主要是学习文件，「正面体会」。7，

即使在北京，情况也是如此。直到5月16日，北京市委才发出了整风计划的通知。北京的安排是，学习文件全面开展，工作和思想作风检查分批进行。在学习和讨论文件的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分别找党内干部和党外人士开座谈会，广泛地征求意见，广开言路，充分发扬民主，放手鼓励批评，解除各种顾虑。检查的方式，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凡是有不同意见的，就要展开争论，应当允许进行反批评和申辩，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问题，在讨论以后应当作出结论，同时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⁷¹这些部署显然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晚了一拍，但正好赶上新的安排。整个「阳谋」就是从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两道密令后开始的。一方面在社会上大力宣传，公开鼓励和号召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一方面在党内迅速分级传达中央的新精神，以便安定人心，做好反击的准备。

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

71 云南省档案馆 2-1-2745' 页 5—6。

72 北京市档案馆'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 I 要文献选编 119570'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 页 269—276。

评论指出：「在整风运动期间，我们所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大胆尖锐毫无保留地揭发我们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党员进行整风。」

「目前许多中央机关以及一部分地方党组织，都正在邀请各方面的非党同志举行各种座谈会，倾听他们对党的批评。」「党组织可以更广

泛地运用这种形式。部可以召开座谈会，局、司、处、科也可以召开座谈会；可以邀请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工作的非党同志进行座谈，也可以邀请机关中一般的非党干部进行座谈；座

谈会的规模可大可小，不用会议形式而用个别的访问谈心也可以听到很多对党的意见。」总而言之就是采取各种方式让党外人士说话。

5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社论说：「我们首先要充分地揭露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就应该让各个方面人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讲出来，大家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这样才算真正地实现了『百家争鸣』，同时帮助我们党的整风运动。」

「我们希望在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的过程中，党内外的意见能够进一步沟通，彼此推心置腹，亲密无间。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应该继续鼓励人们大胆地争鸣，配合我们党内的整风，随时揭发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随时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有些用语是直接摘自中央16日指示的，不过只引用了前半部分，而且主要是说给党外人士听的。

中共中央14日和16日指示如何传达的情况，目前尚无文献数据可以说明，但笔者看到的两个回忆史料说明，文件的传达非常迅速，范围也比较广泛。

时任《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负责人纪希晨证实：5月17日晚10点多1《人民日报》编辑部电话通知：「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有重要指示。前一时期，全党开展整风，北京、上海动得早，开始鸣放，但全国还没鸣放起来，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全国各省市都要开展鸣放，帮党整风。各民主党派，党内党外，甚么话都可以讲，就是骂共产党的话也要让他们放出来，记者要按原话写。各记者站都要发整风鸣放稿件。你们四川明天就要发条消息来，没有新的材料，可以先到公安厅、统战部看看，旧材料也可以发来」。第二天，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召集常委扩大会议，听了记者站汇报的情况后，决定立即开展鸣放。73《人民日报》编辑部这个通知

显然是按照中央的新精神传达的，只是对记者们不能明说而已。省委

召开紧急常委会，当然不只是听编辑部的电话通知；当场便布置鸣放工作，则说明此前省委必定已经接到中央的指示。

当时负责《文艺学习》编辑部工作的作家黄秋耘证实：5月18日晚在邵筌麟家聊天时，周扬来电要邵去参加紧急会议。邵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接听电话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临走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又叮嘱说：「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⁷⁴很明显，周扬要在紧急会议上传达的，也是中共中央的新指示，而且，对于整风运动将要转向，省部级领导人已经心知肚明了。

甚至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也接到了通知。6月1日，民革副主席何香凝在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与其说是给中共提意见，不如说是对民主党派的告诫和责备。何希望各民主党派诚诚恳恳帮助领导党，「如果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何香凝用了很大篇幅讲国民党的右派历史，然后联繫到现实说：「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责「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⁷⁵人们当时或许没有注意到，自开展整风运动以来，这是「右派」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而此前只有中共中央在内部文件中使用过。

⁷⁴ 黄秋耘：《风雨年华》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页175—176；秋耘：〈中国作协的几番风雨〉载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I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1，页124—135。

⁷⁵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于是，各种「引蛇」和「钓鱼」的行动便大规模展开了。根据5月下半月《人民日报》的报道，各部委、各地区、各大学、各学会都纷纷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所有这些座谈会，就是

要鼓动非党知识分子站出来讲话，给共产党「提意见」。5月28日北

京市委再次布置工作时说得再明确不过了：要求市府各局、市委各机关立即开始大鸣大放，「党外普遍征求群众意见，党内讨论目前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发挥自由思想」，还特别提出「对于知识分子多的几个部门要大『放』特『放』」。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鸣放的动态，指示更加具体，要求更加严格。5月20日中共中央发给各地党委的〈关于加强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就是一个范例。指示规定各地党报的报道方针应该是：1、继续刊登「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刊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愈反动的愈好）」。但「右翼分子在报上所占比重应逐步缩小。特别是那种一般性批评和谩骂的东西，更应少登或不登」。2、特别注意刊登中间分子那些比较公道的批评右翼分子的言论，并「应该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3、「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但暂时不宜过多，特别注意登他们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不要登他们那些没有说服力和火气太大的，特别是乱扣帽子的东西。」4、「应该登载关于改进工作的事实报道。」5、「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要「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它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予以反驳和批判。此外，在各种会议上，「应该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左派分子和中间分子的发言」，并给予报道。”所以，整风运动中被引出的「蛇」和被钓上的「鱼」，基本上就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确定了新方针到6月8日宣布全面反击右派期间冒出的人物和言论。

2 受到鼓脚的社会大鸣大放

实际上，真正的大鸣大放也确实出现在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针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和言论，不仅数量猛然增加，范围迅速扩

76《内郎参考》，1957年5月29日’页5—6。773南&掺案馆，2-1-2736’页27—31。

大，而且情绪日益激昂言词愈加刺激。毛泽东后来对这时的情形有一个概括：少数右派和反动分子一时间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拚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78 又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割，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这些资产阶级右派人物「呼风唤雨，推波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79 面对如此危险局势，中共当然要进行毫不留情的全面反击。但问题在于，到底是哪些言论引起了毛泽东如此激动和愤怒？这些言论是不是如毛泽东想象的那样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显然，这里不是指那些针对各单位具体情况有感而发的批评——这在鸣放言论中占绝大多数，但毛泽东未必看得上眼；也不是反右运动开展后揭发或检讨出来的「罪行」——这些材料大都远离事实，且是毛泽东在6月8日以前看不到的。需要分析的，当然主要还是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上层人物的言论，这些言论都是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通过公开的报纸和内部的报告可以看到的。为便于理解毛泽东的反应和思想变化，以下重点选择了内容比较敏感、用词比较激烈的言论，材料大体按毛泽东指出的问题归类，然后按发表的时间叙述。目的是让后人知道，1957年受到全面围剿和批判的，究竟是一些甚么言论。8(1

7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503。

7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 435~492。

80 为避免断章取义之嫌、这裏尽量使用当时的报道或报告，而不是后来供批判的材料。但需要指出的是，从5月下旬开始，很多报道和内部报告已经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片面性，确管比后来批判时要客观得多。

关于国家体制：要求实行民主，依法治国

天津市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5月16日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说，从我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看来，人民委员会开会是「形式主义，只是为了完成法律程序，很少对政策方针进行仔细研究，要讨论的事情党内都先讨论了」。”章伯钧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务院管得太多，「交通部的负责干部相当强，有的已经成为内行，有的虽然没有成为内行也成了半内行。他们懂业务，能做事，有信心。应该让部的权力更大些，能够独立来负责」。应该考虑改变「国务院对部的领导制度和方式」。

&

81' (人民日报：1957)0月17日。

82：/、人民日报》1957年5月20日。

83-大2报》1957年5月17日。

化光明日报。)1957年5月18日-

在5月16至18日召开的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人们普遍提出了新闻自由、民主办报的要求。杨重野说：「新华社一花独放，也是使记者思想迟钝之一因。首长们怕麻烦，常说新华社发稿，你们不用搞了。记者们到几次这样的例子，还写甚么新闻？新华社在新闻报道上是有其作用的，但一花独放，会影响记者写新闻。」顾执中说：「新闻社只有两家〔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其实是包办，应该本着鸣放的精神在这个问题上也放。」周正也主张「民主办社」办通讯社，要有更多的通讯社出现。「这也可说是争取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过去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座山压住，还没有真正鸣放。我还有个意见：中央宣传部还没有谈谈新闻界的问题。红灯亮了，绿灯还没有亮。中央宣传部要明确地表示一下态度，大家才能很好地鸣放，」”陈铭德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建议增办非党报纸，二是建议首都办一个晚报。他说：全国非党报纸只有五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把报纸当作「百花齐放」的园地，那么园地多了就能开放更多的花朵，如果把报纸当作「百家争鸣」的讲坛-讲坛多了，就能辩明一些是非。这三天的会议，一天比一天更热烈，到会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在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上，邓季惺主张多办同仁报纸。她说：应该把同仁报纸变成报纸的民主党派，这样可以和党报竞赛，可以减少报道中

的主观片面性。1(5)

5月22日罗隆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著名的所谓「平反委员会」的建议。《人民日报》当时报道罗是这样说的：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甚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86

在5月27日的政治法律学会座谈会上，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发言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中国法学界具有「招魂」的重大作用，因为中国法学界老的一辈被一棍子打死了，新的一辈被教条主义迷住了窍，所以都需要「招魂」。吴认为，现在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有法律的虚无主义思想，忽视宪法，认为以党代政是当然的，党的命令高于法令，党员个人的言语自认是「金科玉律」。这都是违&法制的。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吴家麟说，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优越的，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有无比的优越，但我们在运用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有毛病，甚至有严重的毛病。领导干部在对制度的运用中存在不少问题。以党代政就牵涉到政治制度问题。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偏向，没有常务机关，也没有常设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不能监督政府工作，没有真正起权力机关的作用。吴家麟说，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法制观念也不强，甚至还有不遵守法制的现象，应该坚决纠

85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0。8.6；《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正，否则上行下效，贻害无穷。他举例说，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撤销新疆省建制和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决议，而宪法第二十七条第十一款规定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又如 1955 年 7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而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⁸⁷

在 29 日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杨玉清认为行政法方面的组织法和条例，有的还没有订立，订立的也漏洞很大，等于没有。关于党政关系，杨说，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党的领导是肯定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是可以的，问题是这样做好不好。党还是应该通过党员来保证实现党的政策。他说，党政不分中央是根，问题在中央，要打大的，打硬的。⁸⁸ 民革中央常委刘文辉谈到保护公民权利问题：「宪法已经公布三年了，公民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如果能从多方面想办法来保护公民权利，将大大有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⁸⁹

作家萧干在报纸上提出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⁹⁰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也提出：要进一步建立民主法制秩序，我们第一便须重视宪法，奉行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应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此外，我们需要制定各种重要的法典，如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作为我们共同生活的准绳。否则国家干部无法可依，一般人民无法可守，权利与义务搞个不清楚，犯罪不犯罪没有明确的界线，人治主义便要抬头，社会就不容易纳人轨道。

在 6 月 5 日民革中央领导小组扩大会上，谭惕吾针对领导体制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是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现在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这是「双轨制度」。具体建议：主席办公室应该扩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机构要充实、要发挥它的作用，共产党员到这个权力机关来监督政府，掌握政策；把共产党内各个部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襄的各种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内可以设党组，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工作。第二是党的政策应该如何体现。党直接指挥党员，会把国家搞乱。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制成各种法令，通过

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第三个是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的问题。党制定政策，应在宪法范围之内。司法、律师、检察是对执行国家制度起杠杆作用的，但在有些地方这三者是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这是不好的。第四个问题，是怎样使共产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政府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也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关于共产党的领导：要求限制党的权力，改变党的作风

92 《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

93 《内部参考》，1957年7月15日。页3—8。

5月18日陈铭枢致信毛泽东，对他表示要辞去国家主席的想法大为称赞，说「此一伟举~不仅打破个人崇拜，树立世界高洁宏大的风范，对于百千万党与非党干部亦能使其发扬蹈厉，知所警惕」。接着又以「规谏」之言指出毛泽东有好大喜功、喜怒无常、（扇听偏信的毛病。最后又补充说：「连日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听了各界人士的发言，均接触到两个中心问题：一为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的结合问题；一为干部政策问题。从全国范围所揭出的问题看来，实应有所改进。但事关国体与政体，且某些措施已成定型，改弦匪易^应当明确，此项改进属于国家的形式问题，不应有丝毫影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

93

5月19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在广州市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民革中委，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说，共产党有优越感，往往以特殊阶级自居—民主人士有自卑心，不敢同共产党员交朋友、畅谈心事，于是隔阂愈来愈深^团结就难搞得好了。他说，有人说共产党是主人，民主党派是客人、甚至还说民主党派是「仆从」。我看说「仆从」是过分了一些，不过共产党绝不应该认为自己样样都高人一等。这样就会有危机了。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副主任委员云应霖认为，真正发挥互相监督作用的关键，就是一定去掉只向共产党歌功颂德的这种社会上的坏空气。^

94(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95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日}。还可参见1957年6月4日《光明日报》的报道。

内容略有不同。96 〈内部参考〉^{1957年5月23日} 页18。

在5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民盟支部召开的教授座谈会上，陶大镛提出，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教授应有决定权、学术委员会不一定遵照党委意见执行。朱启贤说：我们的最高纲领是校长由学术委员会选举。锺敬文说：我同意不一定要党委领导。毛礼锐建议，系主任让大家轮流做。罗志甫说：党团汇报制度是否必要，值得考虑。胡明主张成立教授协会。张禾瑞、陈友松、董渭川、白寿彝等人都「基本上赞成民主办校」。”关于这次会议情况，《内部参考》根据师大党委电话汇报所做的报道更具倾向性：大家一致主张「民主办校」，实际上就是「教授治校」。具体主张是如下：（一）取消党委制。党委作本份的工作（如思想工作等），对学校工作只能提出建议，不能发号施令，党员靠模范行动影响群众。（二）成立「学术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校长由学术委员会选举产生，报国务院；或由国务院任命，但学术委员会有权撤换。（三）取消现有的人事制度。人事任免由学术委员会决定。人事部门只能是办事机构，没有决定权。（四）取消党团的汇报制度。汇报制度已成为升官发财的快捷方式，「搞情报」的人都不懂业务。要搞情报，就派公安局的人来。会上对以上主张没有反封意见。浙

章伯钧在5月21日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发言谈到党委治校问题时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接着，章便提出了后来被反复批判的「政治设计院」：「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画报，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

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⁹⁷

在5月24日天津市中学教师座谈会上，第三女子中学的民盟盟员黄心平说，既然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党的领导作用是不是可以削弱一点？他主张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应该退出学校。他认为，现在既然容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同时各个党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甚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掸，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¹⁾⁸

⁹⁷《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⁹⁸《天津日报》[^]1957年5月27日。

5月25日在清华大学的座谈会上，徐璋本教授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

5月26日的《北京日报》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24日召开教师座谈会的情况，其中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的发言格外引人注目。报道说：「他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甚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倒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谓第二天在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再次注销他的发言，特别把《北京日报》中没有打引号的那句话加上了引号——成了葛佩琦的原话。葛当即向学校领导人指出「这段话不是我说的，歪曲了我发言的原意」，并要求更正。校方答应更正，但并未实行。^{1。}几天后，《人民日报》再次报道人大座谈会时，这段话被改为：「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

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不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宝国。」¹。2 后来，这段话就被作为右派「杀气腾腾」、「猖狂进攻」的脚注了。

99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25 日。100 《北京日报》，1957 年 5 月 26 日。

101 葛佩琦：《葛佩琦回慷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页 137—138；

李新：〈反右亲历记〉’载黼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页 24—25。102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31 日。

在 5 月 28 日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历史学家吕振羽建议，科学院的院务委员会应逐渐担负和进行学术领导，使之与院务行政会议区别开，以便“政领导和学术领导的关系、院部与学部的关系、行政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关系等逐渐明确起来而步入常轨。学部委员黄鸣龙也建议，科学院的领导应以科学研究人员为主体，由研究员轮流担任院长和所长。[^]

杨玉清在 5 月 31 日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座谈会上发言说：，这次整风运动就是「下轿」运动。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八年来培养的是甚么人呢？培养的是抬轿子的人。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的人也还不愿放轿杆。他强调说：「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不但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杨还说，文人的笔杆天然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¹⁰⁴

最著名的就是储安平 6 月 1 日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他首先指出，「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的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在列举了一系列现象之后，储提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

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毛本人：

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 1 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

103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

104 《人民日报》，1957年6月5日；《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页10；陕西省楼案馆、123-43-472’页73—97。

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 11, 5

《内部参考》关于6月1日座谈会的报道说：广州市的许多高等学校教授都主张取消党委制。华南农学院教授、民盟盟员林孔湘说：「今天我们在高等学校要争取领导权。中共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一样只起监督、帮助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他说，中共在高等学校里是没有力量来贯彻自己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因为中共直到现在还没有熟悉高等学校业务的党员。他又说、不是「内行」的学员就不要让他当院长，所长。如果不管他懂不懂业务也派他去当领导，就会使一些人错误地以为共产党打天下是为了争地位。中山大学教授、民盟盟员林楚君认为一党委制取消后，可以由学校的校务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和校长个人负责制来代替它。党可以通过参加校务委员会的党员来

起作用，这样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它。¹⁰⁵

《北京日报》6月6日报道：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教师座谈会上，工业经济系讲师王德周呼籲「党已经到了面临危玼的时候了！」他认为现在党员有两多两少，多了特权思想和优越感，少了法律感和道德感。他说：「老百姓与党的距离是远的。这次整风收不到效果是很危险的。」—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信赖了，有些事比国民党时候更壞。」还说，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他认为「闹事要架机枪，这是可以的，麻烦的是怕机关枪倒过来打，」王德周还建议由民盟把所有群众组织起来，帮助党整风¹⁰⁶监视党整风，以取消特权¹⁰⁷取得整风的最好效果。¹⁽¹⁷⁾

¹⁰⁵《人民日报》1957年0月2日。

¹⁰⁶：内部参考》，1957年6月5日，页42—44。

¹⁰⁷：北京日报）1957年6月6日：关于民主党派：要求扩大权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上述对共产党提意见的人，基本上都属民主党派，很多问题谈的是共产党，其实就涉及到民主党派了。比如限制共产党的权力，言外之意自然是扩大民主党派的权力，虽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要「平权」的意思，但确实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大多隐含在对共产党的意见中，直接谈论民主党派的意见不多。

在5月22日统战部座谈会上，民进中央常委严景耀建议把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合并起来。这四个党派都是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常常发生交叉，弄得群众很难应付，不知加入哪个组织好。合起来，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大有好处，还可以让许多人解放出来做别的事。如果能够合并，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他还建议说、鉴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推动作用不够，应扩大他们视察的范围、时间、地区，并在中央和各级地方人代会设立各种常设委员会，比如经济、卫生等委员会，吸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专家等参加，对各部的工作进行监督。础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 5 月 24 日举行了科学教育界座谈会，到会的很多教授表示，在鸣放中还喻顾虑：怕挨闷棍，怕挨冷箭。农工民主党成员、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教师张含清在会上立即表示说：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如在座的有人事后遭到报复，农工民主党要出来替他们撑腰。^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要求尊重、信任和自由

这方面的意见很多，比较言重的也有不少，仅选几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汉 5 月 30 日在该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希望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经过屡次运动的挑剔而找不到甚么大毛病

108 《人民 13 报》，1957 年 5 月 23 日。109 《光明日报》，1957 年 5 月 27 日。

的人，应该相信^。应以朋友的态度，而不应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知识分子。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对人生欲望不高，能终生做一个教授，给一定条件进行学术研究，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根本不会造反，连造反的幻想也不可能有。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很有道理的。党还有甚么不放心的？中国有句民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很可玩味。仅靠左手拿着马列主义书本，右手拿着苏联武器，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北师大副校长傅种孙指出：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几乎完全相反，知识分子的心情可能中共不很了解。……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会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甚么孽而遭这么大的祸殃。……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既然处处的知识分子都寒心，那是谁造成的局面呢？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

北京大学教授王力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但「今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不能再作为一种运动来搞。1952 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起了不少的副作用。……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的对抗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就用不着沿袭 1952 年的老办法。我甚至怀疑 1955 年的肃反运动连反动言论都『肃』在一起是不是妥当。两种不同性质的事情同时做去，容易做出铜差来。如果反革命行为和反动思想应该区别开来的话，把反动言论『肃』在一起就是把敌我对抗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

110 《人民大学周报》‘3150 期’转引自朱正：《1957 年的夏季》’页 132。111 《师大教学》’第 151 期’1957 年 7 月 6 日。转引自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纪亿中的反右派 9 动》（北京：垂滴日报出版社，19981~页 443—445。

为一谈了。在今天『鸣』『放』的过程中，反动言论比 1955 年更多了，将来要不要再『肃』一次呢？我看是不必要的」。112

关于「三反」和肃反问题：严重扩大化、破坏法制

对于共产党执政以来的业绩，批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13 和经济建设方针’”的言论有一些，但不多，这个阶段鸣放中批评最集中的就是「三反」和肃反运动。

5 月 19 日，老作家冰心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她说：「和风细雨这个方针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时为甚么不提？肃反时为甚么不提？现在共产党整自己的党员了-强调和风细雨了。」冰心说：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监狱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回就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她还说：「肃反时候，高等学校里提出 57。的控制数字。如果这个单位只有两个反革命分子，就要找三个补上；若有二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个。这怎么会

不乱!」冰心要求对此应有一个交代：「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受了伤害，是终身不忘的。现在，共产党员把他们打了一巴掌，扬长而去。他们心上的伤不治愈，整风要他们说真话是不可能的。115
5月22日《内部参考》报道，旅大市高等学校教师对肃反运动非常反感。大连工学院讲师谭家岱、王必信认为学校在肃反运动中具体做法上是违反宪法，很多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受到了人身侮

辱，被限制了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和书信自由，还遭到无理搜查。宪法是最高法律，党应该带头守法，如果党任意破坏法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根本就没有保证。还有些人希望公开审理胡风案件。他们对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表示怀疑，认为胡风被捕入狱已经两年，现在没有下文，是不是搞错了就想偷偷地下台？1165月30日，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建议，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117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反映，民众对肃反、三反等运动的意见非常普遍：

不少同志认为中央对肃反、三反的偏差、缺点估计不足，运动中普遍地发生了打击面过宽、方法粗暴、伤害了感情和团结，是和中央限期限量控制数字的做法分不开的。三反强调银钱过手必有贪污，打不出虎来就撤职；肃反主观地提出百分之五的控制数字，用大会点名批评的方式推动运动，形成下面「逼供信」，中央既未及时纠正，左〔为〕事后又未总结经，分清责任。有人怀疑，肃反成靖能否说是基本的？三反能否说是伟大的？只看见搞出的反革命老虎的数字，没看见死于不白之冤的自杀数字，这是否公允的估计？

辟于资产阶级改造：希望不被歧视

116'：《内部参考》1957年5月2日，页15—16。

117《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118 陕西省档案馆 123-43-46611-60

在5月17日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毕鸣岐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他们「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事，他扣的思想斗争过程是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是教条主义者更体会不到的。……这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当然共产党最伟大）。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消灭宗派主义情绪和作风，应该正确认识新形势的具体内容，给民族资产阶级以应有的评价。「在参加政权和共事关系中，不要再以求同存异的想法来对待我们。从心里说，我们不愿再当来宾，我们也是主人，我们是在自己的祖国，是主人中的共同的主人。」最后，毕鸣岐激动地说：「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之一，本身也是民族资本家，我愿意在党的教育下，号召下，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和真实要求。我相信我是党的忠实朋友，我也同样相信工商业者也同是党的忠实朋友。」¹¹⁹在5月24日的座谈会上，千家驹作了长篇发言。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千家驹认为全行业合营后，工商业者既是劳动者，又是资本家；有工人阶级思想，又有资产阶级思想。千家驹说：「应该承认，工人阶级的一面正在发展扩大，资产阶级的一面不断缩小以至消灭，最后成为一面性。」¹²⁰在5月31日民建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章乃器再次重申了他关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的观点：「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还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关于定息的性质，章乃器以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¹²¹细细品味这些言论，的确看不出有甚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尤其是与被毛泽东点了名的那几位的言论相比，除了储安平的名言，都没有更过分的地方，充其量也是属于思想认识或世界观的问题。¹²毛泽东所以把事情看得比较严重，大概就在于这不是几个人的言论和认识，它已经在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中间派」中产生了

119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8日。120 《人民日报》¹1957年5月25日。121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122 葛 II 琦的发言被有意篡改，不算在内。但是，有人「要杀共产！I」的话，毛泽东肯定是看到了。

共鸣—毛泽东后来特别看重这个问题，再强调要争取人数众多的「中间派」。这些言论是否真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传播和影响已经威胁到执政党的统治地位，至少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当然，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

3 学迹风潮与社会不安定因素

有研究者认为，5月中旬，毛泽东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如何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北京大学5月19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个判断似欠准确。不错，直到5月底甚至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整风的初衷，但是如前所述，到5月中旬，他关注的重心已经开始移动，只是还没有作出如何纠正右派「错误倾向」的最后决定。不过，北京大学引发的学生运动确实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注意，并且对促使他下决心全面反击右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校园内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并非在北大，从当时的报道看，是在北京航空学院。但北航17日贴出的大字报及其响应者，谈论的都是该校领导的工作作风问题，没有引起轰动。¹²⁴

5月19日下午，北京大学学生餐厅东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本来很简单：「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如果有，是谁？是谁选的？他能不能代表我们的意见？」旋即，在餐厅东门外墙上、又贴出一张小字报，建议将这面墙作为一个「民主园地」，以供同学们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助党整风之用。接着，餐厅北侧又贴出一张大字报，内容已颇具火药味：「一、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制度；二、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三、取消留学生内

123 朱地：《1957：大转臂之谜——整风反右实录》I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5¹ 页 196。

124 《内部参考》，1957年5月20日. 页 3—10。

定制，实行平等竞争的选拔制；四、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¹⁵

三张大小字报，在校园迅即引起广泛关注和反响。当天晚上，学校举行团员大会。校党委副书记崔雄昆表示，贴大字报不禁止，不过这并不是好方式。崔的话引起许多人不满意。学生之间也开始辩论。据张元勋回忆：「午夜以后，校园内声籁俱息，可是在许多宿舍里，灯光却是彻夜地亮着；自发的争论开始在每个宿舍里展开，大字报也开始在更大的学生群中蓬勃涌现。」第二天，校园大饭厅周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般贴满了形形色色的、红的、绿的或是用旧报纸写的大字报」，有杂文、短评、短诗、口号、对联、漫骂、名称有「民主墙」、「自由园地」、「民主论坛」等等。大字报揭露某些中共党员的特权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批评政治课教学中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认为应当加强校务委员会的作用，有些人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辩论也在更大范围里展开。记者当时报道：「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人群围着大饭厅及附近建筑的墙壁在看大字报，就在墙根前或是宿舍里，教室的过道或是湖边的草地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自由鸣放的风气顿时弥漫全校。」「在大膳厅前的广场上，就像是海德公园一样，成千的同学，在倾听一场接一场的激烈辩论。」据《文汇报》记者报道，有学生统计，截至5月22日晚，已经贴出五

百多份大字报。校园内还设立了多处讲演台，辩论会也愈来愈多。¹⁶ 5月23日《内部参考》对北大局势和学生言论进行了长篇综合报道，并把学生在大字报中提出的建议归纳为十条：一、允许私人创办报刊、出版社、取消出版的检查制度，开放禁书。二、实现集会、结社自由，让现存的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有同等的活动机会，同等竞赛开会。三、改选人民代表大会，让拥护公有制的各种意见在会上充分

争鸣，国家大事的决定要在公开讨论中形成。四、严格地具体规定共

产党在政治机关中的地位’作用。五、改进选举制度，让选举人自己提名、推荐，候选人名额应超过应选名额，让选举人有选举的余地。

六、要求中宣部撤出红楼，切实保护文物，学校当局不要不闻不问。

七、取消党委负责制，实权归校务委员会。八、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

九、完全按照参试办法选拔留学生，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十、

要求公布全国各地用人部门对毕业生数量质量的要求，毕业生自由应征，最后由用人部门决定，如有些人找不到工作或用人部门找不到人，

可用说服动员的方式统一分配。记者报道：在提出这些「建议」、「要求」的同时，许多学生还对党委副书记的报告、肃反、党的政策、「等级」和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写了大字报，有些学生办了油印刊物、集会

结社~个别人也乘机兴风作浪。如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何廷福在「向中央进一言」的大字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胡风集团的罪行到底是甚么？按照法律作了何种解释？能否说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宗派主义？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某些人头上？二，去年反保守是必要的，但也表现出急躁冒进，不根据中国实际和困难片面追求进度。今年在

生活上的许多困难都是与此有关的。是不是主观主义造成了人为的困难？记者认为，在许多大字报中，值得注意的是物理系四

年级学生谭天荣贴出的〈一株毒草〉，说马克思主义从 1895 年起就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记者的结论是：一北京大学整风的形势在急剧发展中。」127

此后，《内部参考》报道，北京大学的「形势暂趋和缓」，但 27 日又说：「表面形势似趋缓和，但事态正酝酿扩大。」这一判断的根据是：北大学生正在与外校联络，「民主运动」已经蔓延。123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程海果）5 月 23 日晚在北大学生集会上的发言，不仅在北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对民主运动在其它各校的开展产生极大影响。林的开场白是：「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官僚气太重，北大到底是北大，继承了五四的传统。」她的发言主要讲的是胡风问题，认为胡风案件是一个错案，并由此引申说：「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林表示赞同铁托关于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

的产物的意见，她说：「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法国则不会。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下面的话就很具煽动性了：「北大是放了，高级知识分子是放了，但广大基层还没有放，现在揭发的远不及现实生活中的 17%，别看报纸上天天登了很多的问题，可是都是上层民主人士揭发的，这些人年纪大，很世故，他们讲的材料很少，不够我们研究的。我们青年长个脑袋是干甚么的呢？难道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吗？我们要说话！北大这样做，是个良好的开端，现在，西北、武汉、南京等地到处学生都动起来了，可就是互不通气，报上不报道，这是封锁新闻……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¹²⁹《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页 91—92、

¹³⁰ 据说储安平 25 日得知北大出现大字报的消息后，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记者赶赴北大采访，希望能有《光明日报》的独家新闻。消息见报后储得意地说：「我们跑到《人民日报》的前面去了。」参见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页 52—53。

学生之间的串连，再加上非党报纸《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报道，¹³¹一场以大字报为主要形式的鸣放运动逐步在全国主要大学扩展开来。到 26 日，北航、北师大等三十多所北京高校以及武汉医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复旦大学都出现了不少大字报和

黑板报，并组织起自由论坛、民主墙，有的学校学生准备派代表到党中央请愿，有的学校在学生的坚持要求下只得停课鸣放。15 月 27 日《文汇报》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墙〉的撻题下，报道了北大学生贴大字报的活动后，上海的部分高等学校学生群起仿效。就在报道刊出的当天早晨，上海第二医学院便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标题也叫「一株毒草」。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等也都开始积极准备民主墙，并纷纷贴出大字报。到 28 日，武汉医学

院有 1800 多学生已停课三天，南开大学也贴出 500 张大字报，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分院等校则「处于一触即发之势」，而北京高校又出现了新情况：「师大、北大、工艺美术学院、矿业院等院校有些学生公开要求撤换领导」；各个学校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攻击得很厉害」；「许多学生再三要求停课整风」，他们「在给北京市委的信上责问：为甚么整党外狂风暴雨，而整党内和风细雨」。有留学生甚至「很担心发生匈牙利十月事件」。132

5 月 29 日，以党员最多而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以较北大学生更激烈的姿势」开始大鸣大放。据学校党委介绍，在七百多张大字报中，除了反映一些正确的意见外，也出现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如有人建议：取消政府、机关、工厂中党的领导；共产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家经费中开支；要求资产阶级学者来中国讲学；允许出版禁书。还有人提出鸣放「要扩大到工人、农民中去，要扩大到全国」。在北京，不少院校学生自动组织起各种委员会，要求请愿的学生愈来愈多。

①

5 月 30 日，因忙于考试，南开大学等少数学校形势趋于缓和，但林业大学、广业大学、藁州大学、天津大学等又掀起了大字报风潮。『—』到 6 月初，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都进入了运动的高潮，并带动了当地高校的学生风波。135 武大学生提出了新口号：「维护民主、维护人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宪法所给予人们的权利」；「争取民主权利，争取人类尊严」；「理性万岁！」「民主和自由万岁！」³⁶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报告，学生大字报愈来愈多，运动出现了新的趋向：「已有七八个党员叛了党」，还有少数团员「带头闹事」，特别是民盟盟员「表现最坏」，「到学生宿舍去散播说共产党已经恐慌了，我们要大胆地『放』，给共产党以致命的打击」。7

很明显，思维敏捷而感情冲动的青年学生，其言论尖锐和大胆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民主党派和教授们的意见。后来，共青团中央大学工作部把大学生的言论为六个方面：即民主、自由、人权、个性问题，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党的领导问题，分配问题，肃反问题和人事档案等制度问题，学习苏联的问题。其中特别激烈的观点，除上述所引，还有许多，如：「建国八年至今，民主空有其名…一宪法上赋予人民的一

切民主权利，概无保障。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全体人民，党即国家，党即法律。」「解放了，人身自由了，但我们的精神仍然被残踏着，自尊心受到了破坏。」「天下是人民打的，不是共产党打的，不能由共产党一党独断和垄断，必须各政党竞选。」「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一…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马克思主义好比《圣经》，各地党委书记好比教区主教。」「文王杀四人而定天下，毛主席杀了七十万！简直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上海市整理汇报了类似的材料置言论同样刺激：！「共产

135 《内部参考》^1957年6月7日’页10—13；6月6日. 灵3—6二

136 《内部参考》^1957年6月10日’页20—23。137 《内部参考》，1957年6月6日-页7—9。

】38 陕西省档案馆^123-43-472’页1—11。

党和过去封建王朝一样，整个党就是封建王朝的味道。」「整风主要应整老和尚：整风的根本问题在于党中央，关键要整党中央。」

毛泽东未必会因为一些「年轻娃娃」的过激言论动怒，但学生风潮的发展趋向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学生鸣放时出现的停课、请愿、自发组织小团体等行为影响到社会，且与社会动乱融为一体的，势，已经构成了对共产党统治和社会安定的威胁。这种威胁确实存在着。

在知识界和大学生轰轰烈烈地进行大鸣大放时，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也呈现出一种动荡的局面。早在4月19日北京市就提出，今年北京市中、小学毕业生约有三万人不能升学。问题重大，不能忽视，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容易闹事。报告说：「去年以来到现在，北京市共发生罢工、罢课事件七起，参加人数约四百多人。发生推派小型代表团请愿、包围领导者等类似事件约有六七十起。」4月28日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今年以来，许多商品价格上涨，或者变相上涨，许多

商品又供应不足，引起宾大群众的忧虑和不满。现在，群众心理普遍紧张，不少人怀疑『共产党稳定物债的政策是否保险』。这种不满情绪和不安定因素与大鸣大放的社会气氛搅在一起，后果可想而知。5月下旬学校面临毕业，很多学生因毕业后不能升学或留在城市工作而闹事。5月22日，《内部参考》刊载了内蒙丰镇中学应届初中毕业生闹事的情况：七百多学生集体罢课，还有一部分人「整队到大街游行，演说、呼口号，企圖取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湖北医学院在5月20日至25日期间因要求改善校舍、设备等条件，发生全校性的（停课风潮。风潮的矛头直指中共湖北省委。1425月27日，天津第四十七中学部分应届初中毕业生成立了「秘密组织并串连其它学校」-「印制传单，散布错误论调，积极拉拢同学，准备游行」。

139 上海市档案馆八3-2-232页1—30。

140 :;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9571》页172-228~230。

141 、内部参考》1957年5月22日'页18—19。

142 、'内部参考》1957年6月4日'页17—23。

143 ^内^参考：1957年5月290^页13—14。

5月29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生也因此连，给国务院总理和交通部发电报，闹事的情况有继续发展的趋势。'-4 陕西地区高等学校在鸣放过程中不断发生各种风波和闹事事件，学校领导「处于紧张被动状态，『四面作战』，招架不住」，情况严重的有西安航空学院、西安建筑学院、西安动力学院、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学院等。1455月28日至30日，湖北城市建设工程学校学生因校方领导的官僚主义罢课三天。^6月1日，沈阳俄专部分学生因对毕业分配方案不满罢课。6月2日，因一个学生遭公安局无理拘留，广州师范专科学校1200个学生自动集会，表示抗议。”8

到6月初，有些地方的学校风波已经影响到社会。6月1日，武汉大学学生到汉口繁华商业区一带张贴大字标语，要求「派记者到我们那里去」，「反对新闻封锁」等。贴到《湖北日报》社和《长江日报》社门口的标语被撕掉后，引起学生不满。3日，学生代表四十一人到

报社质问、抗议。双方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无果而终。^南京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而且闹到省委。6月1日，南京大学学生把大字报贴到《新华日报》社门前，质问为甚么不发表南大鸣放的消息，围观者达两千多人。学生与围观群众发生争执，并展开激烈辩论，直到次日凌晨才散去。由于大字报被撕去，南大学生3日派出代表两次到省委请愿，受到省委书记接见后，事态才平息。15(1

144《内部参考》^1957年5月31日'页7—10。

145《内部参考》，1957年5月29日'页14—17；陕西省档案馆，123-43-38'页1—9。146《内部参考》^1957年6月9日'页32—34。

147《内部参考》11957年6月10'页14—15。148《内部参考》，1957年6月4日'页3—5。

149《内部参考》^1957年6月4日'页3；6月6日'页3—6；6月7日，页41—47。150《内部参考》^1957年6月3日'页7—9；6月4日'页8—11。

城市工人闹事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上海。上海市总工会报告：「最近几个月来，职工罢工闹事数量有了增加，从今年4月初到5月24日止，共发生大大小小的闹事事件二百多起，涉及工厂企业

单位约有240个，参加闹事的群众有10000人左右。」特别进入5月以后、闹事情况日益严重：「4月份有39件1200余人，5月份却有160余件8200人，4月份一般只是工业系统，5月份逐渐向其它行业蔓延。同时，内容也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而较多的是经济上、政治上算老账，因此，处理上也感到不很容易、不简单。」151

5月27日《内部参考》以〈目前上海部分工厂企业内部情况很紧张〉为题报道，5月上旬艺徒罢工请愿一度「闹得很凶」，刚刚有所稳定，矛盾又转向其它各类职工。「部分工厂的职工酝酿『放』、『要求放』的情绪日旺。榆林、徐汇等区职工罢工、集会、准备游行等事件逐渐增多；普陀等区的部分职工中，也在『冒火』，蠢蠢欲动。」报道说：「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厂里，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闹事，把共产党和干部撇在一边，干部要召集他们开会开不起来，连情报也搞不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23日在全市工厂企业党员干部大会上说：

「这种情况值得所有的厂警惕，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上海要大乱。」152 两天后又报道说，在知识界鸣放之后，「上海基层工厂的职工要求『放』的情势最近已日趋紧张」。最近几天来新的罢工，集会、准备游行示威等事件突然增多，一部分工蔽则正在「冒烟」、「冒火」，如不及时处理，很可能也要燃烧开来。报道特别指出，尽管没有在工人中发现政治历史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闹事有向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方面发展的趋势」。153

151 上海市档案馆，01-1-189' 页 1—9。

152 《内部参考》1957年5月27日' 页 23—25。

153 (内部参考)，1957年5月29日' 页 20—22。

到6月初' 情势更加紧张。6月7日《内部参考》报道：「上海基层单位职工闹事的情况，最近一周多来继续扩大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据极不完整的统计：几乎每天都发生职工闹事事件，少则七、八起，多则一、二十起；市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每天要接待好几十批人民来访，职工要求仍然大部分集中在工资、福利方面。」闹事的形式「一般是罢工、怠工、集会、贴标语、代表或集体请愿」，甚至有「打骂或恐吓杀人」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闹事的面扩大了。前一时期主要是新公私合营工厂的职工闹，现在已延及到一部分老合营厂、国营厂、交通运输工人、搬运工人、过去动员回乡又倒流回洒的三轮车夫与失业工人、机关干部，甚至家庭妇女（要求就业）等。」闹事的工厂在全市企业所占的比重虽小，但波及面很大，「已开始影响到正常生产，而且目前情势还是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吏大批领导干部陷于其中》」。~据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统计' 1至4月

份发生闹事约有44个工厂，参加闹事的职工约3200余人，但在5至6月间，闹事风潮陡然扩大，涉及548个工厂企业，参加闹事的职工达31000余人。155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也是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上海工人闹事的情况说明，「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已经十分钷重，更加危险的是，这种情绪正在与知识界和学生界的鸣放汇合。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局势更加混乱无序，闹事风潮也发展得更加严重，更加迅速。目前尚未发现有关5至6月农村闹事状况的综合统计资料，

不过，一些局部地区的情况，也能反映出大体的趋势。

浙江省的一个农村调查报告曾经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该报告讲述了仙居县农民闹事的严重情况。从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全县 33 个乡镇中有 29 个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主要是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 302 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 116 个，部分垮台的 55 个。入社农户由 917. 降至。被打干部 107 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的 304 户。报告认为事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农村干部在发展高级社的过程中 8 生丁骄傲和急躁冒进的情绪，结果政策不明，管理混乱—严重减产。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 156

154 《内部参考》，1957 年 6 月 7 日’ 页 3—7。

155 上海市档案馆’ 0 小 187’ 页 1—15、74；《内部参考》^1957 年 9 月 28 日’ 页 12—14。

1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瑰业委员会办公厅编：《瑰业集骸化重要文件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1’ 页 691—697。

去冬今春，特别是进入 5 月以后，农村退社闹事的情况十分严重。山西省自去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 147 起，参加的有 5520 多人。其中闹分社的 81 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 48 起，闹粮荒的 18 起。江苏省从 4 月中旬到 5 月中旬，先后在江都、泰县境内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适及 12 个区、47 个乡、436 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 50000 人。在最严重的三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 627。。闹事者有的要求救济，有的要求增加口粮，有的是对干部有意见，其中大部分是富裕农民，其目的主要是要求退社。5 月间开始，广东陆丰县农村突然爆发了散退社的暴乱事(牛^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大批的社散伙。据统计，这次事件共有 458 个社解散^加上其它退社户^共有 40000 多户离开了农业社。全县合作化程度由 857. 下降到 467. ^其中有 6 个乡、366 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 26 个社基本保持完整。 157

党内的状况也很令人担忧。大部分党员干部对鸣放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和不满情绪。有的公开抵制鸣放，有的态度消极、情绪低落。但也有少数人参与到鸣放运动中，甚至同「右派」站在一起。这两种情况都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因为这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党的号召力和战斗力受到严重损害。

中共基层党组织对整风本来就很消极，对大鸣大放更普遍采取了抵制的立场。据报道，广州市有些基层领导对少数敢于发表意见的党外人士变相施加压力，有的甚至进行追查、质问和讥讽。重庆市不少干部态度蛮横，有的在公开讲：「意见随你们提，充其量撤我的职。」有的拍胸膛说：「老子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都不怕，一没贪污，二没违法-你们搞大民主也把我整不垮！」还有的认为鸣放是「自己讨打」，把干部队伍「弄得乌天黑地，简直无脸见人」。《广西日报》总、编辑甚至「破口怒骂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是乌龟王八蛋，说他们想拆散省委」。

158 陕西省委 5 月 25 日报告：「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有些领导同志由于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看到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或者听到下面干部在学习文件阶段刚刚提了一些意见，就张慌失措起来，有的感到不服气，不高兴，甚至拒绝批评，有的悲观消极，抬不起头。总而言之，不积极主动地领导群众开展整风运动，而是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一般干部中也有很多顾虑。」此外，「从目前各高等学校的情况来看，还有不少党员和群众在一起向领导提意见，不分党内党外，不管党内秘密，特别是闹事的学校，党团员在学生中，虽然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但是，人家一冲就垮了。甚至于党团组织对党、团员也失掉了领导和控制的力量。」云南省也有类似情况，一些不坚定的党员、团员「相继动摇、思叛以致倒戈投降」，仅据云南大学统计，这样的共青团员占团员总数的三成。|6。

在 5 月 29 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集党内会议上，各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汇报的情况很有典型意义。一、多数基层干部抵触情绪很大，反对继续搞大鸣大放。教务部部长李培之激动地拍桌子说：「我实在受不住，你看看这些大字报，甚么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东西，党给糟蹋得像甚么样子。」副部长李新也是同样态度，他要求保留意见，甚至表示可以辞职。老党员何干之、经济系主任宋溱担心这样发展下

去，「很可能要推广到工厂、农民、市民中去」，这些情绪带到全国「要出大乱子」。二、广大党员思想苦恼，不知所措。很多人汇报‘现在各支部不知如何行动’「只能凑合群众一起贴大字报」。经济系总支书记方志西说：现在党员坚持立场的就受到排斥，失掉立场的似乎说成是积极的，这很值得注意。161

不知所措的岂止中国人民大学，鞍山市委书记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是应该大胆地「放」，还是按照我们的规定来「放」？总之市委

158 《内部参考》，1957年5月25日’页27—28^23—26；5月31日’页3—7。

159 陕西省档案馆^123-43-38’页1—9。

160 云南省档案馆，2-1-2743’页106—113。

161 《内部参考》，1957年5月30日’页5—9。

处于完全「被动的姿态」。广东省直属机关和广州市级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感到左右为难。^

进入6月以后，随着鸣放的开展，党内感到压力愈来愈大。北京外语学院的党员苦恼得很，「有些群众逼他们发言，特别是关于肃反问题，他们不发言，有些群众就把纸条贴在他们背上，有的把字条硬塞进党员的口袋里去，有的写大字报贴在党员的宿舍门上」，而「党组织在运动中已不起作用」。「现在的党员就像失掉母亲的孤儿，像被击溃了的分散活动的游击队员。」中央音乐学院的党团干部在鸣放中也完全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在中央国家机关中出现了两个极端的情况，一方面，有的党员干部一怒之下撕掉了大字报，有的则干脆「以牙还牙」，也用大字报反驳。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党员「立场动摇」，有的泄露了肃反时如何整人的「机密」，有的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迎合对肃反运动的批评意见。’”有不少人直接给中央写信，诉说衷情。如北京大学张锦文给中央书记处写信，表示反对报纸上夸大人民内部矛盾、单方面发表民主人士的片面意见的现象，对《人民日报》也这样做，更无法接受。6月8日有一匿名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前天工业干校有一党员老干部，自己先买了棺材，然后上吊自杀身死，他

留给你的遗书，不知你见到了没有？为甚么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共产党老干部舍不得自杀，而入城后却发生这样可怜的事件呢？难道你们能对此无动于衷吗？」写信人警告说：「这样下去，他们会认为共产党太软弱可欺了，他们会得寸进尺，就会请你毛主席下台。」¹⁶²毛泽东本人未必能够看到这封信，但是，民主党派和知识界言论的影响，北大学潮及其在全国高校引起的风波，城市和广村出现的动乱迹象以及党内的不安定因素，这一切应合起来使毛泽东感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正处在某种危险状态。

162 《内部参考》、1957年5月31日'1: 10—12: 5月30日'8】6—17。163 《内部参考》，1957年6月5日'页32—35: 6月7日. 页37—39。164 《内部参考》11957年6月6日，页26—29。165 陕西省档案馆'123-43-466' 页58—59。

三反击：毛泽东决心变党内整风为全面反右

5月中旬发现民主党派的言论有「危险企图」和「错误倾向」后，毛泽东本来可以采取一种怀柔的应付办法，像发动整风时那样召开小范围座谈会，对那些他认为的「右派人物」（不过数人而已）进行规劝或提出警告，请他们并通过他们影响党外人士，在规定的限度内鸣放，继续¹⁶³助共产党整风。但痘不符合毛泽东那自信自傲和刚愎自用的秉性——他从来不会在压力面前低头示弱，而且他的疑心很重——总认为别人的举动最终可能都是要夺取权力。所以毛泽东决心继续鼓励鸣放，甚至「引蛇出洞」。他就是要看一看——经过近八年的宣传、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面对小小的风浪，究竟是继续跟着共产党走，还是会被这几个社会名流引入歧途：就是要向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怀疑论者证明，他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正确。条然而¹⁶⁴「引蛇出洞」后二十多天的风云变幻令他十分失望，由失望转而愤怒，毛泽东决心结束党内整风而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右运动。

1 毛泽东感到了真正的威胁

中共采取双百方针和大鸣大放的做法，确实受到了各种压力和挑战，但不是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毛泽东感到了威胁。比如来自苏联和国际共运方面的猜疑和反对，早在 1956 年春天就已存在，但毛泽东并未因此停止步伐。167 从逻辑上讲，在整风运动期间出现的反革命活动

166 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是长时间「受了自己所办报纸的蒙蔽」，对党报的歌功颂德和感恩戴德式的宣传一信以「真」参见朱正《1957 年的夏季》页 84—85。这确实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167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苏联报刊基本不刊登中国开展百花齐放和整风运动的消息，只有《真理报》刊登了中共中央整风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文学报》曾搔简荤的报道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方针的文章，却全文登了陈其通等人的声明。、内部参考，

如反动标语、反动口号以及非组织的暴力行为等，也是对一个政权的威胁。但毛泽东早在发动整风时就说过、这些极少数的反动分子「翻不起大浪」。真正使毛泽东感到威胁的是前文所述的种种现象，特别是当这些现象同时出现的时候。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一件事，即 5 月 1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将在 6 月 3 日召开人大会议。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结合整风，继续开展争鸣。脚还有 5 月 18 日文化部发布通令，将所有曾禁演的戏曲剧目全部解禁，其中包括 1950 年到 1952 年间陆续禁演的二十多个剧目。17。这些迹象都说明，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没有感到有甚么非常现象足以打断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就是说，至少到 5 月 18 日毛泽东还没有决定要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或举动。

很多人以为，5 月 19 日的北京大学风潮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第二天，即 5 月 20 日中共中央便作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

示），从而表明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右。这里有两点解释不通。第一，北大发生学生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是通过新华社和北京大学党委反映后才得知，然后又派人去调查的。171 这至少要两三天，所以 5 月 20 日的指示与北大事件无关。第二，从 5 月 20 日指示的内容看，并无改变 14 日和 16 日部署的安排。

5 月 19 日和 20 日连续两个夜晚，毛泽东召集刘、周、邓、陈等领导人开会。172 讨论过的中共中央指示首先分析说：「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得不够。」接着引用 16 日指示的话说：为了「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渐孤立右派，争取胜利」，需要「继续登载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暂时不宜过多」反驳「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显然是为了防范「右派」言论的影响，指示要求「不要到外点火，特别不要同时在工厂和学校中发动工人和学生的批评运动」（这也说明北大的情况此时尚未汇报到中央）。指示还用大量篇幅教育党员要正确对待批评，改变思想作风。最后要求结合 5 月 14 日和 16 日两电「一并研究执行」。”这就说明，5 月 20 日指示不过是对前两次电报的补充和强调，而没有作出新的决定。

171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页 148。

172 《陈云年谱〔1905—1955，中卷〕’ 页 383。

173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 第二十二册’ 页 19—22。

174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摘抄本），1957 年 5 月 21 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页 615。

5 月 2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报纸的宣传报道问题。目前可以看到的会议摘要记录是：「斗争的目的：同党外人士的斗争，是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教育左派，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党报不要赶时髦。运动结果即胜利的标志是是否团结了中派，右派面目是否暴露了。」会议认为《文汇报》、《光明日报》刊登民主党派的言论是「争取领导，宣扬右派，争取中间」，并拟定了一批题目，确定了作者和交稿日期。174 从简短的记录文字看，还是「同党外人士的

斗争」，目的也还是画结中间派，暴露和孤立右派，并没有提出反击右派的问题，不过是准备写几篇文章而已。

当天，毛泽东对秘书林克也说到了右派问题：甚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都是骗人的，一切都不要相信。他们违背了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意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毛还谈到对肃反中一些案件进行复查的程序问题：今后党组议论时可以先不定死，议一下，交给非党人士议，然后根据他们的讨论，党组再详细讨论定案后，再交行政会议正式通

过。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向林克讲解了他的诗词〈沁园春，雪〉。显然，毛泽东此时还在对民主党派达背诺言，向共产党争权的意图耿耿于怀，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信他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为自己的「上当受骗」而感到愤怒，所以他必须打击这些「右派人物」。但到目前为止，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说到肃反案件复查时，他仍然提出先交给党外人士议论，甚至还有心情谈论自己的旧作。

5月22日仍然没有变化。刘少奇在这一天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问题。这时还没有提出推迟会期，而刘少奇只是在发言中顺带谈到了整风运动和孤立右派的问题。刘继续强调：我们党实行整风，很有必要。现在党外有很多的意见，党内也有意见。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不整风，我们党就会慢慢地毁灭掉。自然也谈到了斗争策略，刘说：我们国内各条战线现在都在发生重新改组的问题，各个阶级都有左，中、右三派。我们要考虑做中派的工作，使右派孤立起来，办法就是充分暴露右派。这里还是看不出有任何新的战斗部署。

5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报告了整风鸣放的情况和工作部署，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也通报了一些情况。刘少奇最后说：小平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口7既然邓小平传达的是5月19日和20日毛泽东召集会议时确

定的方针，那就是说，这次会议关于整风运动的工作部署仍然没有超出中央5月中旬指示的框架。邓小平在报告中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¹⁷⁷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¹⁷⁸ 邓小平如此放心，当然是还不了解正在北京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可以为此判断提供的另一个证明是，陈云在会上讨论整风问题时指出：业务机关要做到整风、业务两不误，上级机关要切实督促，抓好这件事。¹⁷⁹ 看来，23日在中共高层还没有发生特别情况。

第二天，作为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在北京市传达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具体内容。彭在报告中继续强调整风，特别是开门整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肯定绝大多数鸣放意见是正确的，「有些人的批评是从右的观点出发的，是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的，但是右的方面的意见也可以起积极的作用，毒草也可以作肥料，起好的作用，事物总是在矛盾的斗争中发展的。」又说：「整风已经开展起来了，但总的还是放手得不够、对党外人士发动得不够。有些大专院校还没有开展起来，中央有些部还没有展开，市里有好些单位还没有展开。由于有些同志还了不了解发动党外人士对党展开批评的好处，因此他们就

¹⁷⁷ 《毛泽东传 11949~19761¹》，页 697；《刘少奇年谱 11898—1969》》，下卷¹页 403。¹⁷⁸ 《毛泽东传 11949—19761》’页 696—697。¹⁷⁹ 《谏罢年谱 11905—19951》’中卷’页 383。

有决心去放手发动党外的批评，不敢放火来烧掉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当着有些右翼分子、极少数对党愤恨的分子，对党寅行恶意攻击的时候，就更没有勇气下这样的决心。」「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当然不会都是正确的。但是为了鼓励和开展这种批评，对于一切意见，应该耐心地、冷静地倾听，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管是好的坏的¹都应该耐心地冷静地倾听，这是很难的，但是必须这样做。就是对于

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意见，目前也还不要忙着进行批驳，以免阻塞言路。」[现在的批评已不是和风细雨了，的确是狂风暴雨了。因为发动党外人士、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给你提意见，人家有话就要讲，讲了以后就要登报，有党的报也有不是党的报，这样大家集中起来批评不就成了狂风暴雨了吗？」180 应该说，这个报告反映了 5 月 14 日到 23 日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场和方针，至少彭真本人的理解是这样。到此，可以对「引蛇出洞」策略产生后的整风方针进行一下总结了。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鸣放中出现了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的言论和意见，并且对多数中间派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必须坚决回击和批判这些右派言论。由于这些人物和言论有很大影响，且其反动性暴露得还不彻底，因此应该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让他们走到极端，走到反面，才利于分化瓦解。但是，第二，这个斗争还是在人民内部，还是属于思想领域，就是说仍然在整风运动的范围内，只是从党内跨到了党外——这是毛泽东原打算在党内整风结束后进行的工作。因此，整风的基本原则和内容都没有改变，改变的暂时只是策略。然而，在 5 月底的这几天，一切都改变了。

笔者注意到，毛泽东没有参加这两天的政治局会议（这也可以说明会议没有新内容¹，他正在关心的无疑就是北京大学出现的新情况，那几天，毛泽东不断派他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和林克去北大了解情况，每天向他汇报。据林克回忆，当时「毛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是忧虑的。他关心的是国家政权的稳定，而不是个人地位的安危。

180 《：北京市重要文献！83119571》’页 277—286。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看我们的政权能不能稳得住，会不会乱？」18’毛泽东的确对局势作出了相当严重的估计，他认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已经垮掉了，「几十个支部瓦解了」，而副校长钱伟长就是「纳吉」，其「本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且几乎每一个大一些的学校和工厂的「知识分子中间都有右派」，他们「就是纳吉的群众，是小纳吉」。他甚至设想了最坏的情况，打算再上延安。183 后来毛本人也曾谈到当时的心情：「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

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¹⁸¹毛泽东想出的主意就是一方面继续共产党整风，一方面开展一场反击右派的运动。

在注意整风鸣放的新动向同时，毛泽东又开始修改他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5月24日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二稿。这次所作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有：在第五节增加了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完成世界观上的根本转变的一大段论述（后来几天对这一段内容又作了很大的补充）。在第八节作了两处重要变动。一处是把「我国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这句话：修改成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¹⁸²〔后来几天又多次对这段话进行补充修改〕另一处是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¹⁸⁵总之，强调思想斗争的尖锐性¹强调阶

181 林克等：《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页 45—46；《陈伯达最

后口述回忆》，页 148。182 毛泽东与卡达尔谈话记录，1957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缩²⁰⁴⁻⁰⁰⁰⁵⁴⁻⁰⁴，页 2—7。

183 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I 记录稿）^{1957年5月27日}。184 《毛泽东传 1949—1976》^{页 696}。

185 逢先知、李捷：《形成过程》^{《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页 27}。

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强调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是这次最主要的修改。当晚，毛泽东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¹⁸⁶

就在 25 日这一天，刘少奇主持的人大常委会七十次会议讨论人大四次会议的会期问题，决定从原定的 6 月 3 日推迟到 20 日召开。¹⁸⁷

官方没有说明会议推迟的原因。国外学者引用的一个资料说，是因为刘少奇对整风运动出现的学潮和「人民会走上街头」的状况表示担忧。笔者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证据，但推断这一定与 24 日夜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有关，而且可以判定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这时的注意力已经被学生运动的发展势头所吸引。

也是在 25 日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主要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出席青年团三大的全体代表。第二天的报纸刊登了毛泽东在接见时讲的几句话：「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勇敢地为人民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¹ 附两天前陆定一也在这次大会上作报告，表示希望青年们要经得起政治上、思想上的风浪的考验，经得起困难的考验，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² 陆定一的话可以看作是劝告，而毛泽东的语气中流露出来的应该是警告，是一种暗示。在党外人士和高校学生批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高校党委制意犹未尽之时，在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帮助中共整风日趋踊跃之时，在北京大学爆发的民主运动正在向全国推开之时，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共是「核心」，号召人们「勇敢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还告诫「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当然不是随意说的。简短的几句话，几近捅破窗户纸，反擊右派的意思昭然若揭。参加接见的薄一波后来说，这个讲话是「&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这样说也许不大确切——毕竟还没有宣布开始反右派运动，不过，一场反右派运动的风暴已经澳云密布、雷声隐晦了。

这些都说明，这时毛泽东已经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了真正的威胁。这个感受，体现在他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

19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页 4，

192II 先知、李捷：〈形成过程〉《党的文戏》，2002 年第 0 期 页 27—28；施肇域：〈修改始末〉，《党的文献》1991 年第 2 期 页 68—09。

稿的修改中。5 月 25 日，毛泽东改出了讲话第三稿，并在批语中特别注明：「我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这就是：一、分析了资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中右三派的情况以及共产党对他们所采取的方针。二、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问题，在讲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之后，加上了「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把「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改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在讲这种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后面加上了「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三、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四、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增加了两段话：「这是我们的愿望。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今后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当然，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要看那些意见、批评是否合乎上述六个政治标准。如果不合，那就会丧失监督的资格。」¹⁹² 第一点讲的是策略问题。大概是不想给人留下玩弄权术计谋的印象，后来修改时，这段话又全部删去了。第二点突出了意识形态以外的阶级斗争，并提醒「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三点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政治界线已经划定，可以考虑把右派和右派言论排除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外了。第四点是报度民主党派的「失信」和「背叛」，今后是否还能长期存在，就看你

『5 是不是缴械投降了。

5月2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周、朱、邓、陈等人开会，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目前未见披露任何资料，不过，第二天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的讲话记录，应该反映了这时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决定。

从柯庆施的汇报可以看出，中共对国内局势的估计已经相当严重。柯讲到，上海文化、出版、发行界「暴露很厉害」。在「放的过程中，最坏的是民盟」，一他们的方针是一放到基层，二撤换干部，三算政治旧账。他们企图「瓦解我们党，动员党员『坦白』秘密」、还把手伸向了工会。民盟内部则是要改选，启用那些「我们伤害过的人」。知识分子也「有很大暴露」，过去没有讲话的人，如巴金，都出来讲了。王造时、陈铭枢提出搞私法问题，「影响很深」。在柯庆施看来，

更严重的情况是这种气氛已经感染了社会。工厂闹事增多丁，墙报很热闹，玠关、银行、税局也在闹。贸易公司、医药批发站、剧團、影界、广播、大学都在闹。最令人担忧的就是党内的问题：有的党员把党外作家当作后台，有的党员提出脱党，还有的把党内事情告诉党外人士。王若望就同右派站在一起，说出现纳吉也不为怪。（痘时刘少奇插话：有些共产党员和裴多菲俱乐部一个样子。、「干部对主席报告开始拥护，第二步有不同意见，第三步抵触」，认为对右派「现在不整心不甘」。

193 〈周恩来年谱 11949—19761、^中卷. 页 47；《陈云年谱 11905—19951》’中卷’

邓小平的报告讲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考虑和部署。邓说，整风运动开始的目的是搞党内的三大主义，因为问题很严重，最初用的是内外夹攻的办法。运动开展以后，绝大多数的意见是正确的，有益的，90巧对我们有帮助，「但很显然有部分右派跟我们争领导权。这个斗争不只是在思想领域，已经扩及政治范围。有人提出纲领很谨慎的，不是打倒共产党，而是要我们退出阵地。各地都看得出，以上海、北京为典型。因此中央不能不做斗争，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因此，运动的目的：一是整自己改缺点，改进工作；另一个是画结党外中间派，孤立右派。党内外归结起来一个目的，加强党的领导。」接着说到运动的方法，邓指出：关键是能不能团结中间派。右派在争取中间势力，左派-我们也在争取中间势力。我们争取中间势力有两条：一是改正自己的错误，二是孤立右派。用右派教育中间派，使中间派知道需要同右派划清界限。邓说，现在「右派大体都出来了」，如章伯钧、章乃器、龙云等等。邓指出右派活动现在有两个倾向，一是「向基层发展」（康生插话：《光明日报》昨天对北大的报道有动员性质），二是「暗地组织活动的迹象明显了」。谈到今后的方针，邓说：还可以继续鸣放，主要在机关、大专院校，让右派进一步暴露出来。党团队伍也要考虑整顿。但工厂、中小学不要触动，关键是不能「出大乱子」。最后，邓谈到「中央有个设想」，即「运动下一步我们要建议党外整风」，「党外几百万知识分子的改造不能放松」，还是采取说理的方法。彭真结合北京情况的讲话更加具体和明了。他明确地说，开始

只是整风，现在又加上一个「阶级斗争」。斗争主要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思想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主要在机关和大专院校，工厂和中小学不要搞，不停课，不上街，不下厂，就不会出大问题。¹¹⁷

同一天〔5月27日），毛泽东对国务会议讲话稿的修改，主要是增写了一大段关于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的

问题。28日又做了一些文字润色后，毛泽东将征求意见的第五稿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全体领导人。117当天，毛泽东也同林克谈到他对运动的想法：看今天的形势，还应该继续大放，目的是整党、争取中间派、孤立和分化右派。但对右派也是和风细雨的方针。北京大学的情况不会发生大问题，学校教授、副教授的 117。是右派，

195 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5月27日。】96 彭真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5月27日。197 逢先知、李捷：〈形成过程〉《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页28。

左派 39¹¹⁸，中间派 507¹¹⁹。讲师、助教不在其内。八千学生中，右派只有七十余人，有二百人左右支持他们。6月1日毛泽东又对讲话稿作了一次较大改动，其中增加的新提法是：「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而且指出，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最好助手。柳

上述材料表明，到5月底6月初，毛泽东要进行反右运动的设想又进了一步：同右派的斗争已经不是整风的一部分、而是与共产党整风并行的一场「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已经不再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有了政治斗争的内容；在理论上和口头上还没有放弃整风，但是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已经提到首位，而这些恰恰不在整风的范围内。还可以看出，中共对国内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也有了进一步认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言论——他们的话已大体说完，阵线已基本清楚、右派只是极少数；也不在于学生运动本身——那里不会发生大问题，因为右派也是少数。最危险的就是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煽动性言论，

与波及全国的学运风潮汇合起来，再同时涌向社会，影响到工厂，农村和中小学，其结果将是「天下大乱」，将会真正危及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这时开始锱心：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了。这就是毛决定提前反击的真正原因。开展一场反右斗争的基本方针已经确定，主攻方向也已经明确，余下的就是何时开始战斗，如何开始战斗了。

2 寻找阶级斗争的新突破口

199 先知. 李捷：〈形成过程〉：《靠的文献》^2002 年第 6 期' 页 28。

5 月 27 日省市区书记会的召开擦志着，每方针的确定，此后就是审时度势进行落实的问题了。

首先是在党政机关和民主党派中鼓励继续鸣放。虽 1 党内讨论时已经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但在表面上社会的鸣放浪潮还在继续。5 月 29 日，民革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关于积极帮助中共进行整风运动的指示。其中讲到：积极帮助整风，「不但有益于共产党，也是我们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并要求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热烈响应中共号召，「消除一切顾虑，实事求是，诚恳坦率，提出批评和建议；各级组织应将所提出的意见反映给中共党委参考」。21)1 《大公报》也在 29 日发表社论〈工商联要帮助工商业者鸣放〉，劝告中下层和中心城市的工商业者「解除顾虑，勇敢地鸣放」，并要求「工商联特别要负起责任，一方面把自己所看到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一方面要充分发动工商业者把心襄的意见和要求都讲出来」。

5 月 3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要求「更加放手地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报道，明确提出：「各单位要拿出具体措施，廛开言路，继续贯彻大『放』大『鸣』的方针」，同时强调要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6 月 5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人民内部需要经常开展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不收兵」为题、转载了南京《新华日报》6 月 1 日的社论〈把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此时的媒体运作都是在呼应中共「引蛇出洞」的斗争策略。201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究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续编（社

会主义时期)》(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页 54—55。202《棣业集 9 化重要文件豫编》'页 686—689; 吉林省档案馆' 1-13/1-1957.99' 页 17—19。

为避免事态继续恶化,在鼓励民主党派、工商界和国家机关继续鸣放的同时,对于工厂、农村和中小学则是严格把关。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江苏省委关于正确处理厂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认真学习江苏的经验,并按照同样的办法、「认真地分析一下农村人民闹事的原因」,「主动地去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使防止人民闹事事件的发生」。:。26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一 I 各学校、机关出大字报和学生举行辩论会、控诉会等新闻,一律

不要在报纸上发表,以免影响到中等学校和工厂。(二)凡出大字报的学校和机关应宣布一律不准贴到门外和街上,以免妨碍社会秩序。加这一时期,5 击右派的斗争已经在进行各种准备了。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刊登反驳右派的报道和文章的数量明显增加。如〈承认两面性,才有利于自我改造〉、〈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有职有权'亲密无间〉、〈党委治校'还是教授治校?〉、〈谁说公方代表领导不好生产?〉、〈我反对葛佩琦的观点〉等。:。5 毛泽东本人也亲自挑选文章。5月29日《新闻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小雅的文章〈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和章乃器先生商榷〉。毛泽东早已把章乃器内定为大右派,看到这篇文章后^第二天便批示胡乔木:此篇似可转载。加还有6月6日《文汇报》刊登的〈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毛泽东也在第二天批示胡乔木:此文很好,可以转载在显著地位。2。7

除了舆论准备:基层单位党委也接到了任务。时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回忆说:反右正式开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布置各校抓紧时间,动员鸣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

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最后又交待说：「时间不多丁^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

2035 南省档案馆^2-1-2736^1107。

204 邓小平在 27 日的报告中要求在报纸上「左派的东西 3 渐增加一点」。参见邓小平在

#、市' 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I 记录稿)^1957 年 5 月 27 日，205 人民日嗽') ^1957 年&月 1 至 7 日'

206 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六册，页 489。6 月 8 白? ?动反击的第一天^该文刊 2 在《人民日根》上，

20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胃页 495。该文后来未见转载^原因不明。208 稗引自朱地：'：1957：尺转弯之谜》' 页 202。

6 月 3 日统战部召集的民主党派座谈会进入最后一天，利瓦伊汉事先把发言稿送毛、刘、周审阅，并提出要不要提反右。毛泽东审阅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周恩来说，关于反右问题，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同一天，彭真在北京市部分党员干部会上发表讲话，向基层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新方针。彭指出：当前有两个斗争，一个是党内的思想整风，另一个就是阶级斗争，并强调「这一时期主要是」搞阶级斗争。虽然把这种阶级斗争归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彭真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右派正在煽动农民，工人和学生。在如此激烈的斗争面前，彭真呼籲工人不要再闹事，而应该「停止内戰，一致对外」。

另根据黄炎培日记中记述，6 月 5 日夜晚，毛泽东紧急召见他和陈叔通，大概因为这两位老先生日前曾联名上书，请求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心存感激，不愿他们被卷入进去，故提前向他们吹风。毛泽东谈到，在鸣放中「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说章伯钧与罗隆基已经勾结起来，并希望黄回到民盟去主事。211 这表明，中共在发动反击行动前，已经在考虑改组民主党派的领导班子了。

6 月 4 日毛泽东对林克的讲话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对右派的性质

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中的右派表现得最猖狂，带有一种最后挣扎的性质，他们和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有共同点。」第二，对双百方针也有了新的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是无产阶级性的，如果这个口号执行的结果不能驳倒谬误，整倒右派，那么这个口号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是反动的。」第三，进一步确认右派已经处于孤立状态：「右派有些冲昏头脑，以为中间派是屨于他们的，其实是做梦。」²¹² 说右派是「最后挣扎」，与蒋介石

209 李锥汉：《回忆与研究》[^]页 835。

210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119571》[^]页 306—311。

211 章立凡：〈风雨沉舟记〉[^]《二〇〇一世纪》，1997年4月号’页 48—49。212 林克：’〈林克日记〉I 手稿 1-页 44—45。

石「有共同点」，这显然就不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了，更不是思想领域的问题了。这种认识为后来的反右斗争采取「急风暴雨」的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双百方针这种后退一步的说法，一方面是毛泽东为实行双百方针的失败寻找的一个台阶，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准备放弃或暂时收起这一方针了。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做出左派已经占有优势的判断，则意味着全面进攻可以开始了。现在只是要寻找一个合适时机。6月5日晚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彭真和罗瑞卿谈整风问题。…具体会谈内容不详，但特别召公安部长罗瑞卿觐见，很可能与追查一则「谣言」有关。6月4日《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籲〉的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震动很大。陆定一认为事情十分严重，于6月5日将《简报》报送毛泽东，并附信说，右派正在进行大阴谋，值得注意。因此，此次人大可能出现一种激烈斗争，包括我们现在还估计不到的东西，例如提出胡风案，对某些同志的人身攻击，等等。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第二天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²

就在批杀发出的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指示〉首先通知，6月15日将在报上发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并要求「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除了说明大字报的形式「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外，毛泽东强调，「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击右派的行动安排：「这是一场大规模的

21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49。

2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493；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页221—223。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擊右派和反动分子」。毛泽东还提醒说，「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215 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设想，大约十天以后，也就是他反复修改的讲话稿发表之际，反右运动将全面展开。然而，一个突发事件导致战斗提前打响了。

在权力斗争中，毛泽东最敏感、最警惕的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在前引邓小平27日的报告中就谈到民主党派有「暗地组织活动的迹象」，6月初这方面的情况开始连续披露。6月5日《内部参考》报道5月19日王造时曾约人座谈，讨论恢复抗战时期的民间组织「救国会」事宜。据反映，王在会上说，毛主席、周总理都关心救国会的恢复问题，在北京征求「七君子」的意见时，史良、沈钧儒不赞成，沙千里赞成，章乃器不热心。会议商谈的结果，认为救国会有恢复组织的必要，对于解放台湾、联接华侨都有益处。会议决定「积极调查原救国会的干部，群众、分别收集名单」。6月6日《内部参考》又披露：最近发现有些机关内民主党派的组织有不正常的活动。在手工业管理局工作的农工民主党党员宋子荣积极做

发展工作。他所发展的都是被我们斗过的人。他们公开地说，我是这个单位民主人士的代表。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手工业管理局要给我地位，给我机会。侨委中国新闻社的民盟组织也积极开展活动，他们说，中国新闻社的党组织已脱离群众，不能居于领导地位，我们民盟组织应该起来团结群众，领导新闻社的工作。²¹⁷ 更严重的情况出现在早已被毛泽东列入「黑名单」的民盟，这就是著名的「六六六事件」。6月6日上午，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

2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 第六册，页 491~492。216 《内部参考》，1957年6月5日，页 44—45。217 《内部参考》1957年6月6日，页 26—29。

长、陶大镛六教授讨论时局问题，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和胡愈之（中共党员，中途退出）也在场。关于这次聚会，反右运动开始以后，被作为右派阴谋活动的代表作受到批判，所根据的材料是与会者闵刚侯在7月4日《人民日报》上披露的会议讨论内容。后来，当事人叶笃义和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也曾讲到会议情况，所述内容与前者差距较大。¹⁸ 章伯钧和六教授在会上究竟说了甚么话，目前没有文献证据，无从核实，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与会者都认为由于学生闹事，大字报上街，共产党面临危局；第二，民主党派此时应该站出来，承担起收拾局面、平息内乱的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民主党派此时挺身而出的目的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当事者认为自己是帮助共产党摆脱困境，而当政者认为他们是要乘机推翻共产党。仔细阅读和对比所有相关材料，笔者认为，说当时民盟要推翻共产党，那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猜测，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章伯钧等人确实想通过帮助共产党渡过难关，从而为民盟和其它民主党派争得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恰恰这一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最忌讳的，在他们看

来，这不是乘人之危吗？况且毛泽东早就认为在民主党派中民盟是「最坏的」。

218 参见叶笃寰：《虽九死其犹未悔》，页 100—101；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页 12⁶³—65。

219 同周恩来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57年7月73。

还在6月2日招待法国总理的酒会上，章伯钧就曾向周恩来表示：武汉交通部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当时笑丁笑没有说话，但心里想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此时中共已经确定了反击右派的方针，故周有此态度，但章伯钧肯定没有认真体会周恩来的反应。6月6日他再次提议，要史良当晚利用参加国务院会议的机会，向周恩来反映他们的想法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局势稳定下来，并希望周接见六教授，当面请示机宜。第二天去国务院开会时，史良告诉章伯钧：「前一天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谈。」于是，章伯钧在会上给周恩来写了个条子，说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同志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到了这个时候，无论章伯钧和民盟提出任何建议，都不会有好结果。周恩来的感觉是：他们看到大字报上街，学生请愿，工人罢工，农村合作社也有问题，认为就是匈牙利事件了。「他们这样的相信，这样的估计，6月6日他们是高兴的」。“毛泽东对此事的反应体现在他后来写的文章中：「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

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222

这时的毛泽东感到，防止民主党派与学生结合，防止学潮涌向社会，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已经刻不容缓，反击行动必须提前。恰在此时，又发生了「卢郁文事件」，毛泽东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

220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页 12—13；《往事并不如烟》’页 11；叶笃义：《虽九

々已其犹未悔》’页 100—101。221 周恩来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57 年 7 月 7 日。222 《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 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 437。223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26 日’ 30 日。

224 《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7 日。据说，公安机关后来侦破此案，将写信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杨秉功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参见朱正：《1957 年的夏季》’页 149 — 150。不知确否。

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他在 5 月 25 日和 29 日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并与谭惕吾发生争议。223 在 6 月 6 日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说卢郁文「为虎作帐」，「无耻之尤」’并要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246 月 7 日上午毛泽东看到报纸上的这条消息，喜出望外，对应约而去的胡乔木和吴冷西说：

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甚么时候抓住甚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甚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2:5

于是，反击右派运动的号令就这样产生了，一场波及全国、影响数十万人命运乃至共和国发展方向的反右派运动就这样开始了。第九章 聚而歼之：阶级斗争再次成为焦点

从中共的执政纲领看，反右运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改变了中共八大作出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判断，再次把阶级斗争作为全党关注的焦点。而进行阶级斗争，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就是依靠群众运动。于是，反右运动就成为发动全国人民开展的一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群

众运动，其矛头直接指向民主党派和党内外的知识分子。显然，把这一历史性错误的实质仅仅归结为「扩大化」，既不符合史实，也有连逻辑。因此，很少有人能够接受这个政治结论。不过，笔者在研究中感到，无论从被划为右派的人数，还是运动打击的范围来说，的确呈现出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就是说，问题的实质不在所谓「扩大化」，但「扩大化」的现象还是存在的。本章所要分析的，就是这个「扩大化」的过程和原因。

一全面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与整风相比，反右派运动无论是发动还是展开，都显得十分顺利。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大多数党员干部前一时期感到受压、委屈，现在党中央终于站出来为他们撑腰了，于是他们个个奋勇当先-冲锋在前；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工农兵和基层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不像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那样思前想后，顾虑重重，而是党指向哪里就坚决打到哪里，其激进程度甚至往往超出指导者预设的框架。

1 反右群众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在反右运动开始前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则集中到制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他连续起草了一系列文章和文件，还亲自动笔为《人民日报》修改了一些文章，用以指导整个运动的方向。

就在反右号令下达的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向各地党委交待了他所设想的运动进展时间表，「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加上组织反击，「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此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毛泽东还布置了斗争策略，如不让右派走出本单位，「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如「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劝告工人「要看清大局，

不要闹事」；「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等等，非常细致。毛泽东最后指出了开展这次运动的必要性：「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²

两天之后^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关于反右斗争步骤和策略的指示，并要求用电报发出。这显然是他认为需要立即补充或进一步强调的内容：第一^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最重要的是「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第二，提前做好放假回乡的工作^防止煽动农民^「此点甚重要，请即办」。第三，注意团结工商界人物-他们之间已沓开始批判，「我们不要大搞」。第四~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重点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尤其章伯钧、罗隆基最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一定要在这次运动中使他们「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这两个指示讲的都是具体的方法和策略，可以说是精心指导了。

按照中共中央6月8日的指示，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在〈这是为甚么？〉之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6月9日）、〈工人说话了〉〔6月10日）、〈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6月11日）、〈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6月12日）、〈是不是立场问题〉〔6月14日）~〈不平常的春天〉〔6月22日）、〈再论立场问题〉〔6月29日）。在二十二天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发表了八篇反右派社论，平均不到三天一篇。这就是邓小平说过的「火箭炮」。

6月12日，毛泽东决定在党内印发他写了近一个月的文章一〈事情正在起变化〉。关于这篇文章，毛当时指示「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印发的范围为「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新疆、西藏之外的各省市区党委。至于具体印发数量，毛嘱咐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酌定」。⁴最后到底发出多少尚不清楚，至少在笔者查阅的十几个省市的档案馆中，没有发现这个文件。可以断定，当时看过这个文件的人很少。所以，就其作用而言，不仅如前所说，

该文不能作为考察毛泽东反右思想如何出现的依据，也无法断定它对各级领导指挥反右运动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并非无意印发的这篇文章，确实反映了他此时此刻的心态，情绪和思想。通篇看下来，前半部分是讲给党内听的，比如强绸「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以及对资产阶级右派和知识分子的分析，这些与他对国务会议讲话稿的修改是一致的。后半部分是说给社会上的右派听的，反驳他们可能提出的种种责难，看文风笔

法，也像是一篇要在报纸上刊登的文章。但全文的主旨就是为他发动整风运动、鼓励大鸣大放在先，发动反右运动、围攻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在后的「战略安排」进行辩解。值得注意的只有一点，即整风运动在反右之后还要继续，其时间视不同地区，从几个星期至一年不等。后来的反右整风运动正是按照这个设想发展的。

真正对反右群众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反右运动开展一个星期以后，毛已经不能满足于只在党内发文件、下指示了，他需要直接面对广大群众。前文已讲到毛泽东一直对《人民日报》不满，反右方针确定后，6月7日毛泽东就提出让吴冷西接替邓拓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在6月13日又提出，《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内容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并于当天决定撤换邓拓。第二天，毛泽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整风动员时毛泽东曾对党外办的报纸表示赞赏，并特别青睐《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事情发生变化」以后，一向重视舆论作用的毛泽东自然不会放过这两份异常活跃的党外报纸。6月10日《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短文〈录以备考〉，文章对比了几家报纸对于同一新闻稿在编排上的不同处理形式，指出新闻编排也有政治性，并对《文汇报》的做法提出批评。毛泽东立刻抓住此事，在《人民日报》转载了姚的文章，同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的语气非常缓和，但在一开始就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基本政治方向是资产阶级的，其表现就是利用「百家争鸣」的口号和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

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篇文章对于在新闻界开展反右斗争以及控制舆论阵地的指导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6月14日，毛泽东对国务会议讲话稿作了最后一次实质性的修改，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在第二节加了「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二是在第九节谈到闹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官僚主义的地方，加了：「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三是在第十二节加上了肯定苏联经验的一段话：「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十分宝贵的。」用意很明确，第一是让人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联想到新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出现，第二是安抚一下感到受了委屈的基层干部，以便他们积极投入战斗，第三是在他这个讲话发表前为把对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态度列为识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之一做个铺垫。

6月15日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揭露章伯钧、罗隆基同年4月曾在民盟中央的工作会议上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平行关系，民主党派也要参加决策工作，要在中央和地方搞「政治设计院」。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指示彭真查明该发言是否已经发表，「如已发表，请告新华社用新闻形式转发；如未发表，请商李井泉争取发表，然后新华社再发表」。毛泽东反右斗争的策略之一就是分化民主党派，并特别注重利用民主党派内部的左派批判右派，这一指示就是证明。事实上，毛的这个策略在运动中的确得到了充分运用。

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历时五十五天经过十三次修改的讲话在此时公开发表，成为反右派斗争又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有研究者认为，这些修改不仅保持了原讲话的基本精神，而且使之更加丰富和完善。对于一篇思想理论著作的形成而言，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历史研究者，还应该看到，在修改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是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的，这种变化不能不反映到他的修改中。如前所述，这些变化集中表现为：增加并突出了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的论述；增加并突出了反对修正主义倾向

的论述。如此「丰富和完善」之后，本来是一次动员全党和党外人士开展整风运动的讲话，现在变成了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反右运动的文件。陕西省委的领会是准确的，在一份关于向群众宣传毛讲话的通知中，省委特别要求各级领导注意：对于官僚主义等工作中的问题，「不要开展批评运动」，而应该结合毛泽东的讲话，向群众宣传「当前反击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斗争形势」。选择这个时候公开发表讲话，其意义正在于此。此前，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有十几天允许各种派别和观点在报纸上互相争鸣。此后，划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已经公布，就只有打击和批判「右派言论」的「一边倒」了。这个讲话发表后人们当时的感受，可以从「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就毛主席报告进行大讨论」的情况看出来。很多师生在讨论中提出了疑问，如「整风本来是整共产党，现在整到民主党派头上了」；「共产党真不讲信用，原来是言者无罪，现在是言者有罪了」；「过去是毒草放出来没关系，现在说有毒草就要拔掉」；「既然有小资产阶级政党存在，为甚么又要求他们同无产阶级政党有一样的看法」等等。

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毛泽东在审阅清样稿时作了修改。毛改写和加写的文字有两段值得注意：一、在对右派「鸣放」「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一句中，加写了「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二、在谈到资产阶级右派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时，加写了「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前者意在指出，在对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反右斗争中，必须依靠工农大众；后者意在剥夺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资本，以便于在斗争中向他们算历史旧账。这两个方法在运动中也被广泛使用。

新的战斗号令发出一个星期后，整个局势大为改观。最初的反右派运动，是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行的。6月8日的中共党内指示，要求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言，反击右派。各民主党派本来从5月下旬开始，就先后分别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主要内容是帮助共产党整风。6月8日的反右派动员令一发出，

会议内容自然就转向了批判右派。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全国工商联、民建、九三学社在一个星期内，分别召开中央小组扩大会议或座谈会，集中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人。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的指示，报纸发表了一批民主党派人士的批判文章。如翦伯赞的〈拥护大放大鸣，反对乱放乱鸣〉〔《北京日报》6月9日〕，冯和法的〈评章乃器对于工商业者改造的几个论点〉（《大公报》6月14日），高崇民的〈民主党派必须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人民日报》6月15日〕，胡一禾的〈章伯钧的错误思想由来已久〉1《人民日报》6月16日），邓初民的〈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人民日报》6月19日），千家驹等人的〈为甚么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章乃器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1《人民日报》6月20日），宋庆龄的〈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人民日报》6月21日〕，何香凝的〈民革需要整风〉〔《人民日报》6月22日〕等。

6月中旬，在报纸上和各种会议上还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包括给共产党提意见〕，虽然愈来愈弱。到6月下旬，就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了，尤其是在公开场合。6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新的号令——〈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在右派「开始溃退」的时候，「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我们务必在这场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粉碎已经暴露 1±1 的真正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共的右派的领导骨干，打断这个豺狼集团的脊骨」，「切记不要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姑息养奸」。在谈到划分右派时，〈指示〉虽然提出要「实事求是」，但强调的重点是「对于右派的数量不要估计不足，划得太少」。「如果把右派划得过少，势必把一些坚决的阶级敌人当作好人。这是右的，也是危险的」。关于斗争的手段，中共中央提出，共产党员「可以少出面」，「在各民主党派内部和群众中，应该听任并且尽可能组织民主人士和群众揭发右派的重要反动言行和劣迹。右派有多少丑事，揭露多少，不要加以限制」。

毛泽东这样做，不仅是针对章罗的顽强抵制，也是冲着很多左派或中

派的党外高层人士的不满情绪来的。据利瓦伊汉回忆，在6月中旬，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纷纷对反右斗争扩大化表示不满。黄炎培认为不能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陈叔通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甚至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斗争要沉默抵抗。史良也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都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会把运动搞得很大。党外人士的这些意见，统战部都向中共中央做过反映，但没有结果。“斗争的矛头必须直接指向民主党派。于是，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从6月18日开始，各民主党派纷纷开始内部整风。

大批判进行了十天后，6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提出，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是反右这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获得完满胜利的一个关键」，对于极右分子的策略一是必须「打得准，打得狠，将应当揭露的东西，充分揭露」，「来不得温情主义」。二是必须撤掉他们在各民主党派中的实际权力，或者先行停职反省。三是还要「暂时保存他们一部分职权或地位[^]以示留有余地，给以出路」。原则是，「对这种人实际上是一棍子打死，但形式上还不要一棍子打死。这一点也很重要，否则也将不得人心」。[^]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指示时补充了一些内容：除第一次透露了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即「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外，在对那些仅有右派言论的人「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段话中，加写了「对于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一句。²。言外之意，对于「极右派」是可以不采取说理的斗争方法和与人为善的态度的，这无疑对运动中普遍出现的一系列过激的斗争方式是有引导和鼓励作用的。更大问题是，按照毛加上的这句话，判断极右分子的标准就是有右派「行动」，但何为「行动」，没有界定。贴大字报算不算，上街游行算不算，上访请愿算不算，自行聚会算不算？当然，如果这个说法只是在党内上层领导之中流传，影响还不[^]大，但两天后就上了报纸——这个标准一旦交给基层领导人和广大群

众，其结果必然导致群众斗争中的扩大化现象。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又一篇重头文章。”此时离预定的在一个月左右结束反右斗争的限期只差一个星期了，看起来毛泽东有些着急。在这篇社论中，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指出，右派分子的大本营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主帅就是章伯钧和罗隆基联盟。所有的阴谋活动，反党风浪，「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现在大量的史料已经证明，所谓民主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是虚构出来的，所谓的章罗联盟更是无稽之谈。毛泽东是否真的相信存在一个章罗联盟，无从考察，但他必须找出这次反共活动的后台，必须让群众明确主攻的方向，这是斗争的需要。社论关于「阳谋」的说法纯属强词夺理，前面已经谈过，这里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再次提到了右派「行动」的问题。他的逻辑是：「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第一次公开地把右派定性为反动派〕：「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因此，「『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这就是说，只要你有「行动」〔具体内容自行掌握〕，那么你的言论就有罪。只是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这就是后来人们理解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本来是法律条文的问题，却非要使用政治概念来解决——这算是一个典型了。这个社论发表以后，群众运动的火焰就更加高涨了。二运动起来后，统战部镞心封右派分子「急于

；1以7关于1:1:论的引文昆’、连国以来毛泽东手稿》第六册，页529—534。

22 章诒和说：「章, II 阅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参见章诒和：《化争并不

如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271—274。23 南京《新华日报，跟很紧于7月6日#表社论，题目就是〈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

第二天，民日银’）立即予以摘要转载。

处分」不利于「深入反右派斗争」，于7月4日报告中央，认为过早处分是把斗争「简单化了」，是「草率收兵的信号」，需要对极右分子「反复、彻底地进行揭露和批判」，「越是对他们批判和揭露得体无完鹰，就越能教育和团结中间分子」。中共中央称「这个意见很好」，遂向各地转发了统战部的报告。²⁴

随着运动的深入，右派分子的人数也迅速增长，不到一个星期就翻了一番。7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称，原说北京有400人，现初查有880人，全国8000人。几天后，毛泽东7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通知也说：「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北京也不止400人，而是800人。毛泽东对报纸上点名批判的情况不满意，他在通知中说：「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七百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骨干的百分之十为止。其它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毛还具体指出：「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此外，毛泽东又提出要把批判范围扩大到学术方面和科学界：「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当组织反击。」此后，不仅报上点名批判的范围迅速扩大，右派人数也猛然增加。辽宁省十个市7月初揪出右派只有85人，指示下达后不到十天，「据不完

全统计，已达553人」。省机关的右派分子也从4人增加到55人，还有147人「有较多右派言论」。²⁷同时，反右派斗争的矛头也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社会各界。此时，运动已经全面进入高潮。

2 青岛会议与批判温情主义

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整风领导办公室的电话汇报，6月底到7月初，全国各地的反右运动陆续进入高潮。’按照各地党委的安排部署，除江苏、云南的运动可能延长到7月20日以后，其它多数地区（陕西、山西、湖北、湖南、天津、四川、河南、黑龙江等），都计划在7月中旬结束或基本结束反右。”毛泽东7月8日在中苏友好大厦向上海各界一千多人发表讲话时也说，运动的发展比最初的估计延长了一些，「斗争还要个把月」，「7月是反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到了8月，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可挖了。」”这就是说，「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到8月就可以结束了。然而，青岛会议以后，「急风暴雨」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愈演愈烈，转成了「七级台风」。

就运动最初确定的反击右派、孤立右派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的目标而言，到7月中旬，反右斗争已经取得胜利。从6月8日至7月20日《文汇报》刊登的揭发批判大右派的文章，以10篇以上者排队的情况是：章伯钧、罗隆基、王造时、陈仁炳、徐铸成、杨兆龙、浦熙修、徐仲年（化）。3。在此期间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也成反击右派的群众大会。这次会议的大会发言共有290篇，其中专门讨论政府工作和各项建设的有40来篇，只占大会发言总数的13.87%，其余全部都是批判右派的。至于小组讨论，几乎就听不到别的声音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事，「一直充满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革命精神」，除了政府工作报告等几个正式议程外，差不多成了一场从法律意义上说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政治批判。上有毛泽东的御批钦点，下有工广大众的围追堵截，再加上众叛亲离，在这一个多月内，森烈烈的群众批判运动中，除自杀者，大概没有一个右派不「低头认罪」的。在那些「大鲨鱼」中，章伯钧比较聪明，6月13日便第一个送上降表：「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3’章乃器也许是最后一个认输的，直到7月9日才开始「承认错误」。52 无论如何，到7月15日人大会议结束前，几乎所有右派的头面人物都被迫作了口头或书面的自我检讨，如费孝通、向人民伏

罪)、黄琪翔(请求人民的宽恕)、龙云(思想检讨)、叶笃义(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 翬鸣岐(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 储安平〔向人民投降)、章伯钧(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我的初步交待)、章乃器〔我的检讨)’ 黄绍竑(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 陈铭枢(自我检讨)-谭惕吾〔我为甚么犯了严重的错误)’ 张云川(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

30 上海市档案馆^020-1-134’ 页 9。31 〈尺民日报〉 胃 1957 年 6 月 140。32 〈人民日报〉 ^1957 年 7 月 10 日。

马哲民(我要从新做人)、黄药眠(我的检讨)等。针对这些检讨 I 7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的社论。”那么,是甚么原因导致反右运动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继续蔓延和泛滥呢?这需从中共中央的思考和群众运动的特点两方面来观察。

33 详见:人民日报》^11)57^7^14—180。

青岛会议是毛泽东决定召开的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目的是总结前一段反右斗争的经验,部署下一步的运动。会议从 7 月 17 日开始,分两个阶段进行,到 7 月 30 日结束。前一阶段中心是讨论反右和整风问题,特别是 17 日和 18 日两天的会议,所谈内容大体指出了以后运动的目标、范围、进度和策略。归纳毛泽东、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利瓦伊汉几人的谈话,其中主要的结果,第一是决定运动的范围和规模都要扩大,以前主要在中央机关、民主党派、大专院校,以后要扩展到各行各业。「党’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学校、文艺界,经济事业机关、合作社都要整」。「工人、农民中不要提反右派的口号~但工厂、农村也是有右派的」。在学术方面,「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文艺学是重点,必须批判费孝通、马寅初之流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观点」。「哲学、历史学的斗争要慢慢来」。第二^运动的目标不只是打倒几个大右派,关键是要把民主党派、高等学校、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夺过来,如毛所说:「科学技术界’新闻、文艺、出版、体育卫生界,都有左中右,我们不占领领导阵地,就搞

不成社会主义。总之，要搞意识形态，要搞知识分子」第三，今后运动分两个方面，一是对右派分子还要深挖狠打，采取「剥笋政策」。毛说：「北京打出一千五’全国要打出十个北京来」-「这是新式肃反」。二是抓紧整风和改造思想，这是一个长期任于务^以后要经常搞。第四，关于对右派的处理。毛泽东首先确定了性质：右派实际上就是5动派，不叫反动派，主要是为了分化敌人。对于右派的上层人物、要重新安排职务，比如章伯钧，撤掉「五官」，只留一个政协常委。「经过反右派一定要换掉一大批」全国和各地的人大代表。其它人员’，如毛所说，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可以扩大，利用这个办法，清洗国家机器。除了少数知名人士外，把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要镇压，肃反不彻底的，要杀一些人，少杀不是不杀，杀少数人是完全必要的。第五，运动的时间，包括整风大体再搞一年。

34

第一阶段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找了一些省市书记谈话，然后归纳各次谈话要点，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毛泽东很重视这篇文章，前后修改十一稿，原定发至地委一级，后改为印发「县委及其它相当于县委一级的熏组织和干部阅读」。他曾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确的。青岛会议是个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如前所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经过毛泽东数次修改，到发表时已经从党内整风的动员文件变成了反右运动的动员文件，不过，那毕竟是反右开始前几个月的讲话，怎么修改也无法把全部基调搏过来，况且反右已经开展月余，毛泽东的思想又有了一些发展变化。所以，毛说的补充，当然是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中增加了他对反右问题的新认识。其中主要论点包括：

第一，强化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矛盾。「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就把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矛盾问题凸显出来，他所论述的「总题目」也就变成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其结果，不仅为后来（八届三中全会）改变八大政治路线确立了理论前提，而且把数十禽人（所谓右派）打入了政治地狱，把数百万人（右派家属及

同情者) 推向了社会的对立面。

第二，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他后来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初步表述。

第三，提出了性质不同的两类整风。「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它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应分别对待」。把思想改造和整顿作风从性质上区别开，也就混淆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线，又要「分别对待」，自然就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开放了绿灯。

最后，关于运动的部署，毛泽东提出，反右斗争虽然已经取得胜利，「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此外，「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后一年一次」。运动的方式：大辩论，这是「全民性的」；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1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即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和学习反省阶段。

会议间隔期间，7月23日邓小平召开了一次书记处会议，按照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思想和要求，对工作进行具体安排和部署：明确右派问题是「敌我性质」；强调「运动要展开，各单位各行各业要^开，农村、工厂也搞，方法不同」；分别起草有关农村整风和工厂整风的指示；地' 县一级整风，首先批判右派，然后转入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整风；右派处理先不急，但要积极准备，统战、宣传、组织部赶快研究，12月必须拿出方案。

根据青岛会议的精神，7月2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现在

看来，整风运动不能限于党、团内部和中央、省两级，必须普及，工农商学兵党政七方面都要展开，揭露反社会主义言论，反击右派。大家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迟过不如早过。8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提出的新任务有：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一方面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考虑到右派分子将逐步增多的情况，对极右分子登报批判的比例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同时对于「党内圈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圈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在上层继续深入挖掘的同时，把斗争扩大到基层和党内，这就是青岛会议对反右运动提出的新任务。而完成新任务的前提，就是批判和克服「温情主义」。

「温情主义」这个概念是中共中央6月29日的指示提出来的，青岛会议以后一段时间〔大约两个月〕，批判和克服温情主义成为反右运动中最流行的口号。这个问题首先是针对有很多人甚至包括部分党内干部同情或赞同右派言论而提出的。从反右运动一开始，这种情况就不断地反映上来。

第四卷，1991（未刊）页249。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556—557。

II 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就是一个典型，他认为通过鸣放把右派引出来再批判的做法不可取，只要党的作风改变了，就没有右派出来闹事了。虽经厦门市委第一书记张维兹、福建省委书记伍洪祥和省委第一

书记叶飞亲自谈话，仍然「同情右派」，对运动「不积极、不热忱」。6月11日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召开座谈会，与会者三十多人，基本上都不赞同最近《人民日报》三篇社论的观点，认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说法有毛病，但也有道理。陈铭枢的发言有片面的，但也有对的地方，用意也是好的。甚至在运动开展十几天后，在北京各高校（人民大学除外），大部分师生还对反击右派表现出「不感兴趣和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有人说「反击右派是小题大做」，「搞得太过火了」，

「整风本来是整共产党，现在整到民主党派头上了」。还有人说：「共产党真不讲信用，原来是言者无罪、现在是言者有罪了，本来无足轻重但偏要大惊小怪。」普迈认为共产党没有「政治风度」。

41：内部参考》，1957年6月13日，页29—30；6月15日，页8—14；6月22日，页7—10。42〈情况简报 I 整风专辑 1 [!. 编]（一、二、三）。到青岛会议前，这种情绪和看法开始在党内有所反映。6月下旬各地给由央的电话汇报可以表明这些情况。湖北省委提出两个看法：一、右派问题是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应与反革命分子分开（这个解释由各级领导内部掌握）。二、不要把有反动言论的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划成右派。甘肃省委说，党内的问题「主要是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有的为右派打掩护，有的认为「我们发动人家批评我们，现在人家起来了，我们又进行报复」。河北省「许多干部对反右派的斗争有抵触情绪，有的说整风未完又肃反了，有的说壤没有改进工作、就又进行反批评了」。在湖南省，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如认为反击右派不符合「言者无罪」的精神，是「自打嘴巴」；储安平只说了个「党天下」就整人家，「是否对民主党派要求太高了」。中央高级党校6月29日向中央报告：「普通班、短训班都有个别同志认为章伯钧、储安平只说了一两句话就批评似乎有些过份，副总理分一个给民主人士当也未尝不可。」中共上海市委6月底报告一些干部「对某些右派言论表示同情」，如说储安平的谈话是有根据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葛佩琦的发言也「有可取之处，只不过在情绪上有点激昂」；孙大雨只是「思想别扭，对党不满」，不应视为右派。还有人为陈仁炳、王造时、章乃器辩护。不少党国员对《人民日报》等发表的社论和批判文章有看法，认为「正面文章多，反面意见少」，显得「气魄不够大」。对葛佩琦的批评「断章取义」，对孙大雨的发言使用的标题「太刺眼」。

针对这种情况，7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社论提出，温情主义的主要根源就是「对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严重性估计不足」；反右斗争「甩于阶级斗争范围」，对于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必须「打死」。7月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严厉批评抱有温

情主义倾向的人。青岛会议期间，全国各地便掀起一片批判温情主义的呼声。”会后各省市立即贯彻了这一精神。如云南省委召开干部会指出，运动「目前主要地是反对温情主义」，要「反复向党内外强调要把斗争坚决到底」。“天津市委传达邓小平的报告后，要求各单位进行一次批判温情主义的检查，从而使「运动前进了一步」。安徽省各地、市直属机关组织各单位「学习有关文件，联系实际，克服温情主义，发动群众进一步揭发」右派分子。民主党派也跟得很紧。民盟天津市委会 7 月 28 日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制定出行动计划，并开始对盟内右派分子王大川展开斗争，「这种情况表明天津民盟领导开始改变在反右派斗争中一度表现的优柔寡断’温情主义’按兵不动的右倾倾向」。

44 参见《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23—31 日。

45 云南省档案馆，2-1-2743’ 页 72—77。

青岛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在批判和克服温情主义的呼喊中，各地纷纷重新部署斗争，发现的右派分子也愈来愈多。截至 8 月 10 日前后，安徽省各地、市直 8 机关参加整风的 552 单位中，几乎有一半未发现右派分子。对此，省委已决心「克服温情主义」，「整理和认真

地分析放鸣中的小组记录和大字报，作一步的发掘」。江西省最初挖出的右派分子只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 1.17%，针对这一情况，省委要求各单位注意：按照中央的指示，「要使斗争普遍地深入下去」，不得轻易转入整风；即使转入整风，还「应注意继续缩挖掘漏网的右派分子」。辽宁省 7 月初统计时，仅 85 人，7 月中旬就达 500 多人，到 8 月 2 日统计，全省已发现 37 个反党小集团、1035 个右派分子，其中极右分子 155 人。而且，「目前各地正在继续深入追挖中」。北京更厉害’到 8 月 7 日，全市发现右派分子 7511 人，其中极右分子 1257 人，在不同范围受到重点批判的，就有 3529 人。这还不够，市委在报告中表示，这只是高等学校、文艺界、新闻界、工商界上层和少数机辟的情况’「其它方面都不充分，需要继续扩大和深入」。河南省自 8 月初传达贯彻〈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以后，「反击右派的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截止 9 月初，全省已挖出右派分子 2271 人〔7 月下旬

为 925 人), 右派小集团 151 个〔7 月下旬 41 个), 党'团员右派分子 596 人〔7 月底 229 人)。5。就连偏远的云南省也不甘落后。省委报告, 仅昆明和个旧两市, 6 月底揪出右派 356 人, 至 8 月 10 日已增加到 676 人。「这几天斗争很紧张, 右派分子的数目不断增加」。

47 《内部参考》, 1957 年 9 月 5 日' 页 9—19、3—9。

50 《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二十二)。

51 5 南省档案馆, 2-1-2743, 页 91—94。

在此期间, 反右运动已经深入到党内。据中共中央 1957 年 9 月 2 日的一个指示, 到这时已经发现党内「右派分子」约三千余人。中共中央认为, 「从党内发现出这些右派分子, 是这次反右派斗争的很大成绩」。同时指出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 往往是「姑息迁就」, 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是「惋惜、心软」, 「下不了手」。还特别说到, 「党内右派分子有着『共产党员』的招牌, 有较多的政治资本, 因而也就容易欺骗、蒙蔽和影响群众。同时, 他们又和党外的右派分子相呼应, 相配合, 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 因而对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这种党内右派分子, 他们的党龄愈长, 职位愈高, 对党的危害就愈大」, 因此要求决不能对党内右派「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5: 9 月 11 日, 《人民日报》又专门发表了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从此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加大了力度。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高层干部因其「右派错误」、「地方主义错误」或「民族主义错误」' 被划作「右派分子」、「反党分子」' 甚至被打成「右派集团」、「反党集团」。斗争的持续深入, 上靠领导指挥, 下靠发动群众, 这是中共进行一般政治运动的经验, 反右斗争自然也不例外。

3 群众反右斗争面面截

群众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其结果的不可知性, 反右斗争的扩大化, 特别是在斗争方法和手段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 固然同中央要求克服温情主义的指导思想有直接关系, 但与斗争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本身也是分不开的。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一个通知指出, 「此

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必须反对草率收兵，也必须防止采取一些简单的不适当的斗争办法」。

52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料》第二

十二册 1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年 1 月 272—273 页

其实，还在青岛会议之前，各地斗争简单化和扩大化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一并报告中央。如黑龙江省委 7 月 9 日电话汇报，运动中「方法粗暴简单，不能以理服人」，批判右派时「讲不出道理」，只是「喊口号、扣帽子」。中共重庆市委报告，运动中「群众情绪急躁一接

连发生殴打、侮辱斗争对象的事件」，「斗争方式简单粗暴，论据不足，驳不倒对方」的现象，「斗争方式的简单化最为普遍」。中共上海市委也报告：「斗争方法上，已有不同程度的粗暴苗头。如外语学校已发生四起自杀、逃跑事件，复旦也是大会较多，喊口号，不许右派分子坐下，不许抽烟等等。」在 7 月 11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也曾谈到在运动中「发生了简单粗暴情况」和「把右派扩大化」的趋势，并要求给各地打招呼。

7 月 10 日中共北京市委专门发出了一个〈关于反右派斗争中不断发生简单粗暴现象的通报〉，指出这样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合乎我们反击右派的政策」。在中共中央下达的文件中，更屡屡指出要谨慎从事，实事求是，防止简单轻率的做法。毛泽东在 8 月 1 日的指示中还提醒下面：「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扁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还说：「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毛甚至想到「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所以要求上级对他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但是，群众运动的特点就是混乱、过激、各行其是、杂乱无章。再加上「革命」二字，就更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同以往历次运动一样，反右运动

所造成的后果未必就是毛泽东原来设想的那样，但是他所使用的群众斗争的方法就必然导致如此的结果。反右运动中出现的种种批判方式和斗争手段，既是对以前镇反、「三反」、「五反」和肃反的总结，也是为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的「经验」。召开斗争大会和群众集会

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是中共在历次运动中最常使用的方法，其声势大，威力猛，一般人是招架不住的。北京市委报告，对于一些「有理论、有群众」的右派代表人物，就必须「长期作战，攻势要猛，声势要大，斗争要狠，要抓住不放，穷追到底，一直把他们攻垮」。如清华大学钱伟长在运动初期满不在乎，6月19日「还洋洋得意地在自由论坛上讲话」。于是，学校组织了各种会议对他连续发动进攻，特别是召开了两次万人批判大会，「才把他打败」。对人民大学的林希翎的斗争也是依靠群众大会的威慑。在「初战失利」后，学校进行了「充分准备」，甚至经过「预演」，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林希翎能言善辩，积极分子的发言不断被她驳倒，主持人只得不断领着群众高呼口号。这样「连续打了三个回合，才把她彻底攻垮」。⁶¹

⁶¹ 陕西省档案馆¹²³⁻⁴³⁻¹⁰页 48—65：李新：〈反右亲历记〉，载酈克等：《我亲

历过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19981' 页 2362《情况简报（整风专辑 1 汇编》（三）。

⁶³ 《人民日报》11957年6月16日' 24日' 7月4日' 8日。

运动中还经常召开各界人士或工农群众集会，以造批判声势。如6月14日成都五千名积极分子集会，「号召全市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击退右派分子的进攻」。6月23日长春召开万名工人大会，批判章伯钧和章乃器，鞍山组织了12000名职工集会，「痛斥龙云反苏的谬论」。此外，保定市也于6月26日召开了万名工人反右大会，石家庄市在28日由市总工会和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有一万多任务人参加的反右广播大会。⁷ 7月1日，为批判广东省资产阶级右派代表人物罗翼群，在他的家乡兴宁县有五万群众（其中农民三万人）进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当面痛斥罗翼群下乡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的罪恶行为」。大会还通过了「兴宁县各界人民控诉声讨右派分子罗翼群」的电文。

7月5日，哈尔滨市三万多任务人集会驳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还有十几万工人收听了会场的实况广播。所谓人多势众，如此才能体现群众运动的威力。

进行「逼、供、信」

在群众斗争中，采取各种各样「逼供信」的粗暴手段是很平常、很常见的事情，即使在国家机关、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等「高雅」单位，也不乏其例。河南就很典型，在省教育厅、水利厅、手工业管理局、工会和郑州师专等单位，在斗争右派分子时，大家「情绪高涨，斗志旺盛」，批判右派时拍桌子、打板凳、呼口号，还要让右派分子起立低头。新乡地委对右派分子采取「站岗、放哨」等手段，为便于监视，甚至提出右派分子集中居住的办法。洛阳专署斗争右派时，在小组会上就「动手动脚，拉来拉去」，还有人把大字报贴到被批对象身上。信阳地委直属机关对右派分子采取疲劳战术，整夜斗争，不让休息。焦作市有些单位则将「大字报贴在右派分子的宿舍、门口、墙上、蚊帐上、办公桌上」，甚至在右派分子上街时，「偷偷地在他背上贴条子，以丑化他」。在这方面，安徽省采取的办法是「分配对象，分工包干」，即对每个右派都组成一个三至四的「战斗小组」，步步跟随，每日紧逼。“重庆市反右斗争深入后，不少单位「不许右派分子保留意见，甚么都硬逼着要他们承认」，遇到「顶牛」就交给群众，「沿袭斗地主、恶霸的老办法」，「接连发生殴打、侮辱斗争对象的事件」。65

64《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六）、（四）。65《内部参考》，1957年7月15日，页8—9。66《人民日报》1957年8月8日。

一旦群众认定的事情，就是追到天边也要让你承认。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高觉敷在九三学社南京分社的整风会上，经过了大小九次检查，最后不得不承认他曾组织小集团向党进攻，其目的「就是想要在高等院校中制造出一个『匈牙利事件』来，恢复资本主义」。“江苏省农工民主党成员武思光三年来在报刊发表「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诗文」四十多篇，只因在省统战部座谈会上对基层党员中存在宗派主义提出批评，又与章伯钧等人有旧，便被打成极右分子。批判时逼他交代、认

罪’「或无中生有’或画蛇添足，或捕风捉影，或张冠李戴，鸡毛蒜皮之类，都成滔天之罪」。虽经多次交代、仍无法过关。后来在农工党内的整风会上，他又「提高认识」，进行了一次彻底交代，把「过去所有一切错误言行，主动地回忆出来，来一个总清算。其中有不少意见自觉尚无大错的，也从责己严的角度出发，一律加以检查批判」。结果还是不行，因为检查「错误言行」时^不许说自己动机是好的，只能承认自己从内心就是反党的。67

发动工农大众参战

批判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主力军不在知识界，而在工人和广民中间，对这一点，中共干部是非常清楚的。反右运动一开始，《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社论〈工人说话了〉：「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社论还说：广大的工人群众看出来，「在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有一股歪风，这股歪风是向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因此’[觉悟的工人群众不能不起而应战了]。与此相配合，上海工人站出来批判针对卢郁文的匿名信，天津工人则纷纷起来驳斥葛佩琦、储安平，北京工人质问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代表，沈阳和鞍山的工人批驳「党天下」的说法是「扯淡」。武汉郊区群力农业社农民6月10日举行座谈会，谈到有人要共产党「下台」的问题时，社员们愤慨地质问究竟是谁想要偷偷摸摸地「上台」呢？还说：「我们农民决不会容忍任何剥削分子兴风作浪、再来统治我们。」河北省青县塔丰农业生产合作社八百多农民给《人民日报》来信说，听到葛佩琦的发言，「社员们大嚷起来^说：『这哪里是帮助共产党提意见整风，这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

67 《内部参考》，1957年11月14日’页11—13。

68 《人民日报》，1957年7月10日。

69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20日。

群众斗争的方式各种各样。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江西省进贤县锤陵乡一批农民给储安平公开信的全文，批判他「仇恨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企圖挑拨群众起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农民说：「从你的发言里，我们感到你的确是很反动的，我们对你这种行为表示愤怒。」江西省安福县枫田乡的社员6月24日晚集会，「驳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谬论」|并揭发和批判了罗隆基在「家乡的反动言行」。7.对葛佩琦则采取了群众座谈的方式。6月12日，几位第四建筑工程公司职工和北京市民来到人民大学，要求访问葛佩琦并与之座谈。座谈会一直开到傍晚，对于葛佩琦所做的解释，群众代表不满意，便说：我们这次来访就是要弄清是非，「如果今天谈不清楚，可以再谈一天、二天甚至半个月、一个月-总之要给我们满意的答复」。还表示，「必要时可以找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代表^山西、河北的农民来和你辩论」，所有路费都要葛佩琦负责。70（：人民日报：）^1957年6月18日'7月1日'

73、情况简报'整风专辑111编》'广"。

工农群众参与斗争之所以比较「有效」，不仅在于人多势众，而且往往带有强制性。如湖北地区中小学反右运动就采取了「借兵」的方式，因为右派教师能说会道，「极为猖狂」，各地党委就「注意运用工农群众的力量」-请大批农民参加教师的整风反右，以致「发生多起农民和乡、社干部殴打、体罚右派教师事件」。在洛阳市的反右斗争会上，「工人群众自发地」质问和围攻右派分子，几百人围着被斗对象，摇小旗、呼口号，还不时「发生讽刺谩骂、人身攻击的现象」。河南省中医院在斗争右派分子周某时，不让他讲话，还有工人在气愤之下打了他耳光，会后又通知他参加第二天郑州市召开的工人大会，受到侮辱和惊吓的周某当晚服毒自杀。，追究历史旧账

这曾是毛泽东亲自倡导并非常欣赏的手段。早在6月25日《人民日报》就通过农民来信，揭露储安平1952年参加土改时对群众态度恶劣，斗地主时「缩头缩尾」。7月3日又刊登文章说，「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月11日上海市委在电话中汇报，为了使反右运动深入下去，决定把「了解右派分子情况的人组织起来」，从「揭发右派分子的历史罪行或劣迹以至其理论观点」入手，「进行系统地批

判」。中共中央立即转发全国，认为「很有参考价值」。⁷⁵这个方法被用到几乎所有民主党派中有头有脸的右派身上，列出的历史旧账各式各样，名目繁多。如罗隆基「一贯亲美崇蒋仇共」；在土改时「包庇地主」、「仇恨农民」；还在「三反」时「包庇贪污分子」。章乃器在土改时「袒护地主」。陈铭枢「一贯拥蒋，不得已时接近进步势力，也是假心假意的」，「一时靠拢胡汉民，一时靠拢蒋介石，一时靠拢汪精卫」，还在1953年为梁漱溟的错误言论辩护。张云川1955年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安徽视察时，「辱骂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因为他们「捆绑吊打群众」），对地主恶霸「受人民管制的苦情表示同情」（给三个人每人加五元钱）。黄绍竑在大革命时期屠杀革命人士，抗日战争时期杀害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温州市委书记张贵卿。~对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的斗争是一个典型例子。对于雷讲的马克思主义停滞了六十年的观点，起初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认为「只是学术思想问题」，「不能当右派斗争」，甚至一些左派人士也先后给学校领导和市委教育部打电话，提出意见。后来市委就着重从历史问题入手，揭露雷解放前后的反动言行，说明他「不仅学术思想反动，而且一贯忠实于蒋匪统治，仇视苏联，反共反人民，终于把这个反动学者

74《人民日报》1957年6月25日'7月3日。75南省档案馆~2-1-2751'页24-27。

76《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6日'8日'9日'18日'21日'8月8日'9日'

的丑恶面目完全剥露出来」。被追究（整风前）历史旧账最多的是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王翰，部整风领导小组专门为他办了一个反党罪证展览，展出材料八十余件。

亲朋好友的「背叛」

发动群众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让被斗争者的亲朋好友站出来进行揭发、批判，这是攻破敌人心理防线最奏效的手段。在中国历次政治运

动中’夫妻’兄弟’父子之间，同学、朋友之间，以及其它亲近人之间，出现的人情悲剧（当然首先是政治悲剧）屡见不鲜，反右运动也不例外。曾被毛泽东点名的上海《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比较幸运，尽管市委宣传部希望徐鑲成揭批陆，以「立功赎罪」，但遭到「断然拒绝」。结果徐本人就没有逃过劫难。711 新华社记者戴煌就惨了，在他受到大字报围攻时，妻子竟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说他要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这不啻火上浇油，使戴煌落入有口难辩的绝境。8。一般人尚且如此，那些地位高、名声大的右派阵营主将，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就更逃不过这一关了。

章乃器在6月9日统战部座谈会上提交了一篇书面发言，其中有一段是反驳民建中央委员吴大琨的。吴在6月5日发言指出，章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有六个原则性问题，并一一进行了批驳。章乃器特别气愤的是，吴歪曲了他在文章谈到「抽筋剥皮」时的原意，认为「这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81 其实，章乃器的恼怒不仅是因为吴的「作风不正派」，还因为吴曾得到他的帮助和提拥。章乃器对此耿耿于怀，很久以后碰到吴，还吟诗相赠：「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钢筋铁骨在，冷眼对豺狼。」「文革」后章已作古，吴主动提出给他平反，大概也是对年轻时的作为感到懊悔。

史良与章伯钧同为民盟副主席，不仅工作配合默契，且私交甚笃，民盟中央近人皆知。反右进入高潮时，在6月14日民盟中央小组

会议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其中一段把矛头直指章伯钧。不但对章的言论提出严厉批评，还揭发了章私下对她讲的话，如说卢郁文是小丑，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史良的讲话可能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但确给章伯钧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和情感伤害。事后章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揭发章伯钧的

还有他相交三十年的旧友王襄。6月15日，王来京出差期间，受邀到章伯钧家吃饭。心情苦闷的章伯钧向多年未见的老友发了一通牢骚，讲了许多心里话。结果第二天王襄就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反映了他「与章伯钧的一席话」的内幕，还要求在报上公开发表。王

最后说，他这次揭露章伯钧的秘密，是为了「表示向党靠拢」。

84' 〈内部参考〉 1957年6月25日. 页5—7。

最悲惨的是罗隆基，在揭发和批判他的人中有三位是他终身难忘的。第一个是赵文璧，罗隆基对赵颇为信任，专门把他从上海调到北京，安排在森林工业部。在民盟中央第六次扩大整风座谈会，赵站出检举揭发罗隆基、内容分七大类，共五十二条。一类是罗隆基的近期反动言论，如：「胡风问题搞错了，得罪了三百万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社会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竞争」；「党员水平低，是造成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基本建设上的损失的主要原因」。一类是罗隆基在森工部的反党行为，如当部长第一天便讲：「在行政单位，是以政为首的，不是以党为中心的，党必须服从政」。再一类是关于「无形组织」继续往来的记录，均有文字为凭。还有一

类是有关罗隆基的个人质量问题，等等。发言后，赵还交出了一批罗以前给他的信件。罗隆基对赵文璧的发言，可谓印象深刻。在几年后，他对章伯钧谈起反右批判会的情形，总说：「我自己说的话，常常忘了，而有人记性好，多少年的事儿，说出来的时间、地点和当事人，没半点含糊。」第二个人是民盟主席张澜的秘书吕光光。罗隆基

8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五卷〉 页 435。

与张澜的关系一向不错，在 1947 年冬国民党取缔民盟时两人就有患难之交，后又共同接受中共邀请进入解放区。张澜患有口吃症，所以对外联繫和应酬都十分倚重罗隆基。了解到这样一个历史情况，在批判罗隆基时，民盟整风领导小组和统战部便安排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出场。而吕的发言，也正是控诉罗隆基「为了实现反共阴谋和政治野心，一贯要挟、劫持、陷害、辱骂张主席的罪行」。控诉之前，吕还特别声明：「别以为张主席死无对证了」，「作为张主席生前的秘书，有责任就张主席生前告诉过我的事实」，进行揭发。最令罗隆基伤心的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毛泽东曾在报上点名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构成了「民盟右派系统」。“浦与罗不仅是工作关系，她还是与罗「同居」十载的女友。浦熙修在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会的发言题目就与众不同（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她的揭发，从罗的家世说到生活和工作，以至两人的关系，件件往事，无不戳人心肺。整个发言简直就是一篇绝情宣言，最后一句话是：「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后罗隆基伤感地对人说：「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第之语，也当作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揭发。……她在新闻界的批斗会上揭发我的事情’可以讲，是条条致命呀！」

在反右运动中，斗争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以上列举种种，只是笔者在史料中所见比较普遍者，其它还有一些，如发动群众揭发右派分子的个人隐私，各地呈报右派数字相互攀比等等。实际情况表明，无论领导人如何英明指导，只要是群众运动，总归会形成混乱局面，斗争出现简单化和扩大化的趋势也是难以避免的，何况指导思想本身就存在问题。

二在反右旗帜下开展的全民整风运动

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反右斗争取得胜利的单位，随即转入整风和改进工作阶段。还规定县以下基层单位，特别是在工厂和农村，重点是整风，不搞反右运动。从原则上讲，反右主要是政治问题，要解决的是敌我矛盾，采取方式是「急风暴雨」；整风主要是思想问题，要解决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方式是「和风细雨」。然而，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在全国范围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在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反右派斗争的旗帜下展开的，反右运动与整风运动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并没有停息，反而更加深入，更加激烈。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全国数十万右派分子，在反右阶段被定性的不到三成，而七成以上的人是在整改阶段，即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戴上了那顶毁灭其一生的政治帽子。

1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任务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除中央委员外，中央各部委、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以及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区委书记也列席会议。所以，这是一次扩大会议（或称「三级会议」），与会者达426人。尽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和改进管理体制问题，但正如毛泽东会前所说，这次会议「整风是一个纲」。

邓小平9月23日在会上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是了解反右运动，特别是中共中央对此问题认识的极重要文件。报告对整风反右运动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下一步任务，共谈了八个问题。邓小平一开始就指出，「从今年5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现在正扩大为全民的整风运动」。关于运动的一般情况，邓说，反右斗争「已经得到显著的成效」，即全国第一批参加运动的省市以上机关《包括一些省市的地专机关）、学校、民主党派共309.1万人，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共62460人，占全体参加运动人数的2.027%。报告「运动还要进一步深入和展开，不能草率收兵」。不过，凡是在反右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应该及时转入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

邓小平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这次反右派斗争的主要范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所以，「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目前，省市以上机关的斗争「一般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高等学校反右斗争已「基本上胜利结束」，「教育界的主要战场现在正移向中小学」。在新闻界，党外主要右派分子已斗倒。各地新闻单位都在「清查内部的右派」。在科学界、文艺界、在工程技术界、卫生界，「斗争也有很大收获」。各民主党派的斗争也已经取得很大胜利。各民主党派中央最近都开过全国整风工作会议，应该帮助他们在继续深入进行中央和省市的斗争的同时，把斗争积极地、有步骤地「深入到一切基层去」，然后转入一般整风。通过反右派和整风、根本改变各党派中央和地方组织的政治面貌，使

左派和中左分子切实掌握领导权，右派分子在各党派内要准备清洗一批，撤掉一批，但有些仍要保留。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总的原则是给出路，「凡是确已悔改的，或是确有真才实学的，仍要使用」。但对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要分别处理，「对前者要严些，后者要宽些」。对于「正在全国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邓小平强调，运动的方法「同样必须是大鸣大放、大争」。同时在运动中、要坚持只动口、不动手的原则，防止和纠正简单粗暴的做法。在工厂，「有必要在整风中对工人群众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清查坏人，纯洁工人阶级队伍」。在职工中实行大鸣大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工人中不提反右派斗争的口号，也不戴右派帽子。对于少数民族，只在已经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地区和人口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在军队方面，经过反右斗争后，应「集中力量进行内部整风，并以干部为重点」。关于党团组织，截至9月上旬，共揭发出党内右派分子5800余人、团内右派分子14000余人，分别占参加运动的党团员总数的0.8%和1.65%。对这些人「必须同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党员一般应开除党籍、团员可以松一些，更着重于教育。

最后讲到改进工作问题，邓小平承认，「从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不坚决地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是很危险的」。「反右派斗争是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扫清道路的，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反右派斗争来阻塞人民内部的言路，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为了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为了解除中间分子的顾虑，反右派斗争本身也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说道理、摆事实、以理服人的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竭力避免夸大和片面性；对于中间分子和工人农民的错误观点，要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对于学术上的争论，尤其要反对轻率和武断。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也要恰当。必须使反右派斗争的结果，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总之，「现在反右派斗争还需要深入和展开，但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改的工作还只是开始。这是必须特别注意的。」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9月7日，邓小平又针对大会发言和分组会讨论

的情况作了总结报告。”比较强调的内容有：虽然中央把运动分为四个阶段，但邓解释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死」，后两个阶段如果发现新右派，或原有的右派还需要斗，「当然仍有反右派的任任务」。关于右派的标准和处理是讨论时提问最多的，邓说中央不久将提出一个草案。原则是「政治思想上斗透，处理上则不宜过分」。一部分人送去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对多数人要比较宽大。在工厂和农村划右派「可以限于脱离生产的人，以免牵涉到一般劳动人民」。在农村中，「对于富裕中农和单干户，除进行政治教育外，还要采取一些救济措施以限制其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为了限制合作社社员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于自留地’个人开荒、个人经营副业和农村自由市场活动的范围要有适当限制。」「对手工业者、小商贩、小业主的整风’可由各城市自行安排’必须注意在这次运动中不要漏掉他们。」

！ 2’ 于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的情况’参见吉林省档案馆 1-13/1-1957.65’ 页 1—33。03 百忧’档案馆 1-13/1-1957.64’ 页 1—9；云南档案馆，2-1-2673’ 页 26-34。

毛泽东的最后讲话，重点不在整风反右运动，这里有三点值得提出来’一’「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原稿中这里有一句：「县以下基层还要反右派」。二、「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三’整风运动搞到明年5月结束。1)4

从上述毛和邓的报告看，中共中央确认，反右和整风是一次运动的两个阶段，此前以反右为主，此后以整改为主，而且，反右主要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含县以上机关）的范围内进行，基层单位（特别是工厂和农村）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和改进工作。但是，在实际的群众运动中，这些界线都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在三中全会宣布开展的全民整风运动中，使打击右派的斗争陷入了一个更加混乱的局面。

2 反右与全民整风连动

1957 年底及以后的运动，虽然名称还叫「整风」，但是与年初提出整

风时的内容有了很大区别。第一，反右派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有些地区和部门甚至刚刚开始；第二，整风的对象主要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整 11 实际上就是一场对全民的思想教育运动。

9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页 597—610。参见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 I 笔记）^1957 年 10 月 9 日。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转入整改阶段后，绝不能把反右派的任务丢掉，对「未斗完和新发现的右派分子，要继续进行斗争」，「凡是过去在挖掘右派分子时还没有扫到的地方 1 也必须予以清查」。中共中央 11 月 10 日将报告转发全国，并指出「凡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应该及时地转入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同时对资产阶级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凡是对右派分子斗争不深不透的单位和遗留问题较多的单位，都必须再接再厉 1 不要松动；并且必须作出计划，定期结束第二阶段，以便及时转入第

三阶段。」既要继续清查右派分子，不使漏网，又要尽快转入整改，在实际操作中，自然就很容易把二者混同起来。

1958 年 4 月 2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就显得更加矛盾了。由于一场「大跃进」的建设高潮已经在全国掀起，中共中央要求 6 月底以前「基本结束」整风运动，不必再搞「人人检讨、人人过关」了，只需写个思想总结（农村除外），并「采用个别交谈互相传阅的方式」即可。说到整风最后阶段的任务，虽然首先提出「以揭发和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但是又要求「在农村，应当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整党、整团、整社」，在城市应该把「分散的基层单位、城镇居民、小商小贩的整风统一安排进去」，「不要使这些方面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漏掉了或者滑过去了」。州中央的指示尚且如此含糊，到了基层领导干部那里，谁还会把整顿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当作主要任务？

工厂企业的反右整风是 1957 年 8 月开始试点的，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虽然此前已规定在工人中不划右派，但是一则，工厂「科室以上干部和技

术人员可以划右派」，二则工人中还可以划「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坏分子」，只是不叫右派而已。1)8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 11 月 13 日还专门下达了「关于在工人中划分坏分子的意见」'提出十种人可以划为「坏分子」。“实际上，在第一批进行整风的工厂中，就划了不少右派。如合肥矿山机器厂挖出 55 个右派，占职工总数的 3.57%。训在整风第四阶段，很多企业搞「补课」又划出不少右派。。’如济南市副厂长以上企业干部 495 人，在后来的「补课」中就揪出右派分子、疑似右派分子和其它反党分子 29 人’占总人数的 5.87%。1958 年 7 月 22 日中共中央工业部报告：「一般地说，那些没有进行反右派斗争和领导核心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企业，整风运动是不应该宣布结束的。」不过，工厂的情况总体说算是好的，工人阶级毕竟是领导力量，对待私方人员就不一样了。

工商界的反右斗争是从批判章乃器开始的，到 8 月已经全面铺开。据 8 月 5 日新华社报道，各地工商界相继揭露出的右派分子有：北京的刘一峰、阎少青、吴金萃、张焕尧；上海的汪君良、黄苗夫；天津的毕鸣岐、荣子正；武汉的王一鸣、彭一湖；昆明的杨克成；江苏的钱孙卿；福州的刘棟业；山东的袁熙鉴、葛兰生；河北的高振声；四川的李仲平、康心如；浙江的沈九如、许祖潮；贵州的梅岭先；湖南的黄英士；安徽的张善瑞、张柬野；江西的罗时杨；西安的张士心；沈阳的王子仁、齐心；青岛的黄元吉等。11)3《人民日报》称之为「公私合营后形成的第二次改造高潮」。1114

101^成郁#议贵州省委书记?己周林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整风【2 右;’3 有^好的^要补课。-多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I 记录稿)^1958 年 3 月 9—19 日。^102 陕西省档案馆、123-43-4’ 页 56-57，104^《人民日报》^1957 年 8 月 8 日。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转发丁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要求各地参照执行。统战部提出，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应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沓过工商联和民建会，「采取自我教育的方式去进行」。对工商界说来’「反右派斗争也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关键和决定性步骤」，必须「坚决地大力展开，彻底搞透」；「划分左、

中’右的排队是反右派斗争的基础工(乍~首先应当进行这项工作，以便找出敌人，部署力量。」统战部最后指出：「工商界的整风运动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尖锐的阶级斗争~需要各级党委充分重视，给以坚强的领导。」¹(15 邓小平在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强调，「工商界骨干分子整风的办法大体上和各民主党派相同」；「一定要使工商界所有的人受到教育，不要像过去的某些运动那样把一部分人(主要是小型工商业者)忘记了」。欣

到 12 月中旬’北京市工商界第一批反右斗争结束，参加者 5500 人，已经批准的右派分子共 416 人，其中工商界骨干分子 210 人(占骨干分子 3000 人的 7^1，一般资本家 206 人。此外，在民建会、工商联干部 500 人中也揭发出右派分子 21 人。参加运动的还有公私合营企业私方人员 2.2 万余人，其中管理人员约 7000 余人。对于私方管理人员，「拟作为第二批，由市、区举办脱产、半脱产的学习班，分两期集中学习，每期两个月左右，深入进行反右派斗争和整风」。其余 1.5 万余人则同所在单位职工一起参加鸣放和整改，对其中的小业主着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原则上不进行反右派斗争」。|。7 上海市工商界 6000 人于 9 月下旬起集中在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进行整风学习，查过三个月的鸣放和揭发^揪出 260 多个右派分子。据报道，这些工商业者经过「集中整风^普遍感到在一些根本性质问题上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生动的教育」。1958 年 1 月 30 日，第二批两万名工商业者~即公私合营工厂、商店的主要私方人员，分别到十八个区的工商界政治学校进行集中学习。根据各区工商界整风工作委员会的规划，这批工商业者的整风时间约两个半月。刚到 4 月，工商界的整风反右便融入了民主党派掀起的「向党交心」运动的高潮。咖

105 吉林省档案馆^1-5/6-1957.13，页 198—205；云南档案馆 2-1-2738^页 40-44。

106 ’《人民日报》^1957 年 III 月 19 日。

107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1》’页 923—927。

108 ’:《人民日报》…1958年1月; ;3日’31日。

109 ’: :《人民日报》^1958年4月513、23日’28日。中央统战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向

党交心和制定个人改造规划运动是目前民主党派 1 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整风运动

的重要形式,是他们整 81 运动的深入和发展。我们应当从各方面予以指导、支持和帮助^把这一运动推回高^-’^多见云南菘植案馆, 2-1-3194’页 59—61^

在城市中,八届三中全会后全面开始的反右运动主要是在中小学进行的。早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通知〉说’全国中等学校和小学校现有教职员二百多万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是,队伍很大,社会出身和政治思想情况可能比大专学校还要复杂。所以,反右是必要的。至于运动的方式,城市学校教职员可以采用机关整风的办法,农村学校教职员可以参加当地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为了做到「整风和教学两不误」,决定在中小学的整风反右利用寒暑假集中解决。^

110 云南省档案馆^2-1-2737’页 70—7】。

111 《内部参考》^1957年12月11日’页 17—19。

在反右运动中,中小学也是中共关注的对象,只是前期忙于处理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和大专院校的问题,还无暇顾及。12月11日新华社的一个内部报道很引人注目,该报道的题目是〈中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急待加强〉。内容是说,辽宁省教育厅为了加强中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在9月初举办了「社会主义教育教师训练班」。在参加培训五百多名中学政治课教师中,党员占 52 呢,圈员占 40^。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极端复杂和混乱」,还有一些「反动观点」。在全国轰森烈烈的反右派斗争的末期,这些以党团员为主的中学政治教员所提出的六百多条关于国家政策和现状的意见令人吃惊:「除没有公开叫喊『要杀共产党人』以外,几乎社会上各种右派言论,都在这个小训练班里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有的人系统地论证「共产党是三害的根源,共产党不能代表六亿人民的利益」;有的提出:「学校里

没有党支部可以，没有教师不行」，「大学要党委可以，中学的党支部没有必要」。还有的「反对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销工作」，更有的「挑拨中苏友好关系」。虽然经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批判，很多人的错误思想已「扭转过来」，但「也只有 40% 的人能成为左派」。111

针对这一严重情况，教育部要求对中小学教师队伍进行清理整顿。12 月 12 日，教育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根据各地学校整风、反右斗争揭露出的材料，中、小学和业余学校教职员的队伍极为复杂。右派分子占相当数量，潜在一些反革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这部分人必须清洗处理。为填补清洗后的空缺，建议从下放干部中选择条件适合的人，立即接替教师队伍中被清洗者的工作，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并改变教师阵容。中共中央 12 月 25 日同意并批转了此报告。

长春市中等专业学校投入反右斗争比较早，十七所中专学校到年底共挖出右派分子 106 名，占参加运动 2279 名教职员的 4.65%。（不包括工友）。在那些「充分发动了群众，反右派斗争搞得比较深透」的学校，挖出的右派分子比例要高一些，如长春建筑工程学校 8.89%，地质学校 7.21%，水电学校 5.77%。采用的方法基本还是「引蛇出洞」那一套，也有通过回忆、谈心挖掘和揭发右派言论的。出一般中小学都是在寒假期间集中进行整风反右的，如北京市在教职工 28813 人中，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1948 人，占总数的 6%。114 湖北省 11 万多中小学教职员从 12 月下旬起，利用寒假期间，相继集中到县开展整风运动。「根据教师队伍复杂、敌我矛盾尖锐、运动时间短等特点，省委指示各级党委在这次运动中以处理敌我矛盾为中心内容。」因右派「气焰嚣张」，各地党委纷纷请群众参与批判斗争，并对为首者实行逮捕。省委「已下最大决心，准备把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各种坏蛋一概从教师队伍中清洗出去」，估计最少要超过一万人。115

从中共中央批转的教育部文件看，中小学的整风反右应该是这次运动的一个重点，从结果看，中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也最多。在八大二次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毛泽东透露，「反右派以后」，在「小学教师

中」又放出十几万右派分子。化这里讲的「反右派以后」，显然是指全国中小学在 1958 年初寒假期间进行的整风运动，而「小学教

师」大概是「中小学教师」的口误。这就是说，在当时揪出的三十万右派分子中，中小学教师竟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但是，在现有的史料中，无论是地方档案，还是内部报告，有关中小学整风反右的材料很少见，在公开报道中，对此则几乎只字未提。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也是今后研究必须关注的。

与城市的运动相比，占中国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村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则是一片混乱。如果说对于工厂企业的整风，中央还明文规定把重点放在改进工作作风上，那么在广大农村，从一开始就把整风运动作为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1957 年的提法不是整风，而是教育运动。8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明确提出：「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¹¹⁷ 这个指示发表在 8 月 10 日的《人民日报》。同一天，中共中央还专门下达了关于加强农村思想工作为完成今年征粮购粮任务的指示：「为了保证全国 350 亿斤征粮和 500 亿斤购粮的任务，全国各地应立即开始，并在秋收之前、在农村中普遍深入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的宣传运动。」¹¹⁸ 《人民日报》更呼籲：「要使每个基层干部和农民都懂得：是否百分之百地完成粮食统购任务、严格地控制粮食销量和认真地节约粮食消费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

¹¹⁶ 吉林省档案馆 1/1-14/59' 页 8。

¹¹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产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页 700—701；1957 年 8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

¹¹⁸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57~1992》北京：学习出版社' 1993，页 47—48。

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爱国不爱国的问题。」这些用语已经使人感到一种压力，而在农村基层干部那里，干脆就演绎为强制和暴力。考虑到农村的复杂情况，中共中央未雨绸缪，在 8 月 14 日便指示：

「在全国农村中，正开始进行一场社会主义教育的大辩论。各地报纸、刊物、广播电台等宣传机关对于农村这个运动的报道，应着重于好的经验的介绍，正面道理的宣传〔包括对于资本主义思想的驳斥〕。在反映农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时，要恰如其分，不要使人感到黑漆一团。省市、地委、县委必须注意对于报刊电台这方面宣传工作的掌握和领导。」¹²⁰下面掌握得当然会更具体、更详细，如吉林省委规定：「在报道上必须有选择、有目的，做到恰如其分，不要只是罗列现象、不加分析，不要作客观主义的反映」，「对于群众闹事，一律不作报道」。¹²¹

120 西 1 当案馆 123-43-3' 页 6。

121 吉林省档案馆. 1-13/1-1457. 39' 页 83—84。

122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页 702—705。

尽管在公开的报道中看不到，但在内部报告和通报中，农村运动中粗暴和暴力行为比比皆是。对农民的教育运动开展不久，8 月 28 日中共中央就转发丁山东省委〈关于如何在乡、社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紧急通报〉。该通报指出：「现在有的地区在运动一开始，就想逮捕处理一批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想用行政威力来解决问题。」¹²²二三天后，中共中央又转发了两个文件，要求各地领导认真研究，保证「运动获得健康的发展」。河北省这两个文件讲的是保定地区出现的打人、拉人和乱扣右派帽子的现象。但中央文件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据中央办公厅综合整理的〈十三个省农村整风简况〉反映，粗暴斗争的情况十分严重：河北清苑县被打二百三十多人，还使用了「牲口拉」、「摇煤球」、「装麻袋」等花样；四川省一些县采取打人、罚跪、剥衣服、；' 浇冷水等办法划出的（地富反怀）四类分子高达 107. 一 19¹²³；陕西咸阳县斗争 158 人，其中 79 人遭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 643 人，其中被打 102 人，自杀 15 人，逃跑 8 人；广东三个专区统计，已有 45 人自杀，90 人逃跑。乱戴右派分子帽子的现象也

时有发生，河北邢台县一个村 400 多户，被打成右派的 65 户；有的合作社给所有斗争对象都扣上了右派帽子。类似的情况，几乎各省都普遍存在。安徽省的问题比较严重，仅据 8 月中旬不完全统计，就斗争和批判了 1347 人，还逮捕了 590 人，真正「说理批判」的只有 117 人。¹² 在残酷无情的斗争中，批斗对象自杀的情况在农村日益严重。青海省农业区开展运动 12 天，就有 11 人自杀身亡。”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省到 9 月 10 日已发生自杀事件 78 起，河北省到 10 月 12 日发生 105 起。正如中共中央在一个文件中指出的，大部分农村干部「习惯于大规模阶级斗争时期的一套斗争方法」，用过去斗地主、富农的手段进行对农民的教育。1:8 农村整风运动全面开始以后，虽经中央一再通报制止，暴力事件仍然不断发生。由于强烈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群众闹事」的事件。四川省西充县自开展运动以来，共发生闹事 1661 起，其中 727 的闹事人群在百人以上。宗教界虽然情况特殊，但也不能逃避整风反右运动。11 月 2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在汉族宗教界进行社教的意见〉提出，在宗教界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不提整风，也不提反右派的口号」，通过

学习的方法进行教育，使他们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同样要进行政治排队，排为右派的统称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戴有右派帽子。教育对象是宗教职业者，重点在天主教和基督教。仅对那些政治上最反

动而在群众中影响又不大的分子进行公开斗争。¹⁵ 1958 年 3 月 8 日，华东五省一市佛教界举行社会主义教育座谈会。会议决定先采取大字报的形式提意见，再进行鸣放和争辩。于是，代表们纷纷写出一张张大字报，内容涉及对宗教政策、农业合作化、计划供应、卫生、交通等各方面的意见。4 月 12 日，会议领导召开内部干部会议，准备进行反击。¹⁶ 日作反右的动员报告，并初步确定给十五至十六个人戴上右派帽子，进行大会斗争，还有人受到管制。江苏省宗教事务局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发出的〈关于加强思想动态工作，进行上层人物排队〉的通知，按照四个方面分类，在二十九人中排出右派分子四人，极右分子二人。¹⁷ 在少数民族和华侨中进行的整风反右更是敏感问题，

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也不易发现。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运动依据三种不同的情况进行，一是已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二是已完成民主改革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党内一般应当进行整风」，党外「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三是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和某些不需要经过民主革命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地区：以正面教育为主。原则是把「重心放在党内」。

化9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了华僑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广村举行社会主义大辩论中侨区应当注意的几项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为了今后工作的主动和国外的影响，在大辩论中，应尽可能缩小打击面，集中打击极右分子。对有一时的、个别的反动言行但情节不严重的侨眷、归侨，能不戴就尽可能不戴右派帽子，尽可能不

130 雷南省档案馆，2-1-2738，页55-58。

131 江苏菑糶案资料3089宗教卷短期卷第四十一、四十七卷：长朗卷第三十六卷。樽引自伍小涛：〈反右与江苏的宗教改造〉《二七—世纪》2005年12月号'页117—118。132 吉林省楼案馆1-13/1-1957.64'页103-108。

进行大会斗争。对情节严重的极右分子，彻底批判后不登报，对国外也不发消息。对一般有错误言论的，主要是教育说服。特别是不应在大辩论中，去追查归侨，侨眷的侨汇来源及国外关系。会议认为，这是一个政策性的文件，大体可用，送请中共中央讨论。133 从上述规定判断，在少数民族和华侨中整出的右派大概很少。

可以看出，第一，虽然从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全国而言开始转入后期整风，即整改阶段，但反右斗争并未停止，而是交错进行；第二，全民整风主要不是整领导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而是对全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群众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发动起来，往往发生失控的局面。「文革」初期是这样，反右运动也是这样。八届三中全会设想整风反右运动在1958年5月1日结束'到1958年4月时发现不

行，又推迟了两个月一到6月底。但6月18日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通知：「在本年7月底以前胜利地结束这一次的整风运动」。134 不仅运动的进程如此，运动的方式亦如此。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中，出现「逢反政策」、「简单粗暴」和「打击面过宽」的现象，是很自然的事情。

3 他们是这样成为右派分子的

随着运动不断深入，胜利不断扩大，右派的人数也在节节攀升。如前文所说，就全国而言，1957年7月青岛会议前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时，揪出的右派分子应该不超过一万人。到10月八届三中全会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大约已有十五万人。中小学在寒假期间的整风反右中，又增加了十几万人。这样，到1958年4月毛

133 《中华人民共和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页：72。该报告9月12日由中共中央下发，

134 《速3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页597—610，毛泽东与卡达尔谈话记I录，1957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4-00054-04，页2—7；5南省档案馆，2-1-3194，页4—5、6—7。

泽东宣布的右派人数已达三十万人。。5 除农村的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外，全国的反右整风运动到1958年7月底大体结束，这时共有多少右派分子，目前没有统计数字。1959年开始给部分右派「摘帽」时，中共中央9月19日〈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透露，在反右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45万人」。中央统战部在1980年5月8日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反右斗争中划右派分子49万余人，「以后又陆续划了几批，共计55万余人」。这就是说，在1958年4月以后新划的右派分子还有25万人之多。这些人究竟是甚么时候以及怎样被划为右派的，现在还说不清楚，只能等

待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的问世。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 1957 年「夏季攻势」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数量极其有限（不到右派总数的 2¹，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后来不断扩大的群众运动高潮中被卷进去的。青岛会议是一个高潮，八届三中全会又是一个高潮，这两次会议以后，右派分子的数量分别增长了十几万。现在的问题是，除了毛泽东钦定的「极少数」大右派在劫难逃外，那几十万人是如何在一场群众运动中走向深渊的；

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在鸣放时有抵触情绪，反击号令一下达，自然是义无反顾 1 奋勇战斗。据《内部参考》报道，《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上海、天津、重庆、云南、安徽等地的干部和党团员感到「兴奋」、「痛快」，「扬眉吐气」，甚至「鼓掌欢呼」。继而「开始流露有报复情绪」，有些人「想狠狠把对方整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人「因为封领导提了意见被划为右派分子」。广播事业局翻译陈润康长期侨居法属，按照规定华侨归国三年以内者不划右派，但他超过了一个星期，运动中因「攻击党」被打成右派。审查右派材料时，上级领导和单位领导有一段问答。问：「根据是甚么？」答：「他攻击我们党的官僚主义。」问：「我们党不是承认有官僚主义才整风的吗？他攻击谁呢？」答：「他用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民主来攻击我们不民主。」问：「他是怎样具体攻击的呢？」答：「他就是反对我这个组长。」还有些人并非在鸣放时得罪了领导，但也难逃厄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注释《资本论》出了名，某系领导平时就嫉恨他，这次「借机整人」，非要把他打成右派不可。校党委讨论时，多数人出于「爱才」，认为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教育一下就行了。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14(1)

反右运动中的受难者，绝大多数都是「祸从口出」。一向以「敢言」著称的梁漱溟能逃过反右这一劫，就是因为「一言不发」。对此，很多人颇感诧异。1953 年梁与毛泽东当众顶撞引发一桩大案，当时虽没有公之于众，但流传甚广。此后李济深、张澜曾给毛写信说情，一直没有下文，大家都知道梁心里有不少委屈。因此，到 1957 春天的「鸣放」一天始，就有《新建设》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

等先后派出记者采访梁漱溟，要他发表意见，希望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梁先生出奇地冷静，一概默然待之。有人说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梁对此一笑置之。梁老先生如此沉得住气，自然有他的考虑，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沉默，也不是保持沉默的人都能在这场「轰森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安然无恙。

140 李新：〈反「右派」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67 辑，页 40。因为一句话、一项建议或一个批评被打成右派者大有人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打字员戴菊英还未到公民的年龄，却被打成右派，罪名只有一句话——「美国鞋油真好使」。别人批评这是「崇洋媚外」，她不服，顶了几句，就被说成「态度不好，思想顽固」，于是扣上了右派帽子。人民出版社高级编辑谢和赓在鸣放时贴了一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要求保护古迹牌楼，并将没收的宅第花园向人民开放，或改为少年之家、老年之家和文化馆，还提出中南海也应对人民开放。

这便成了全社右派言论的代表作。老记者朱启平 1951 年给《中国建设》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报道曾一度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回归祖国的情况，文中说他「向往新中国，宁可放弃美国、法国的高薪聘留」。杂志发表时改为翁在国外「走投无路」，是共产党宽宏大量容纳了他。鸣放时，朱以此例批评新闻报道有时不够真实，认为这种修改完全背离了事实，也是对这位爱国老科学家人格的侮辱。结果，就这么一条批评意见，便被说是「攻击党的领导和攻击党的新闻政策」，随即他也成了右派。

即使不说话，也未必能过关。作家协会的杨觉「大鸣大放」时不在北京，去农村探望回乡养病的妻子，本来与反右毫无关系，但他去的那个村在与邻村合成高级社时，经济上吃了亏，想向上面反映，要求两个村仍然分开核算。正好杨觉回京，他们就写了封信请杨顺路带到河北省委。结果这封信落到那个高级社社长的手里，社长迁怒于杨，便给作协写信，说他煽动分社。当时作协正在为右派人数没有达到上级要求急得眼红，发现有人「破坏合作化」，正好算上一个。诗人流沙河不曾对时政有一句非议，只因写了一首情诗，也成了划右派的一条「罪状」。批判的文章说，诗中使用「接吻」一词，是「荒淫无耻」，因为「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

作者公木（张松如）当时担任文学讲习所所长，平时为人老实，很少说话，也不写甚么文章。不知在背地里跟甚么人说了几句甚么犯禁的话，也被打成右派。143 类似的还

142 戴炆：《九死一生》’页 98—106。

143 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潮〉，《3 年潮》，1998 年第 2 期，页 26—27，33—34。有民盟右派分子潘光旦，也没有「鸣放」，罗隆基说他是「揭开了盖子也不说话」的人。

有些人因不想把别人打成右派，结果自己成了右派。某县卫生局黄局长是当地著名中医，幼承家训，笃志好学，很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倔强。反右以后，卫生局也分到了一个右派指标，而且规定下达的指标非完成不可的，不能打任何折扣。这位黄局长当场就表示异议，说：「反右派又不是工农业生产，怎么也要规定指标呢？」后来，卫生局真是一个右派也没有揪出。在县科教办 8 报时，教育局、文化局等领导都把右派名单报了上去，黄却直截了当地说卫生局没有右派。科教办主任一听，怒气冲冲地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难道你卫生局就独独没有？我看哪，你身为领导干部，这种对反右斗争的消极抵触情绪，就说明你是个右派！」一锤定音，黄局长就这样被划成了右派。」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在反右时心有疑虑，反对按照规定的指标划右派。有关部门通知：对外广播部门现在二百多人，很多人长期在国外生活，因而要作为重点单位来抓，按照 5 免的指标规定，起码要划十几个右派。温当场就表示：「你们也经历对抗战时期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切不可忘记过去的教训。那时新华社、解放日报社 707 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可是后来甄别，除了个别人需要继续审查外，没有一个是特务。」后来温被划成右派，广播事业局党组在结论中说他在运动一开始就「抗拒反右派斗争」。

146

不过，像黄、温这样的领导毕竟是少数，在反右运动中，绝大多数单位都按规定的指针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所以，很多右派都是因为

要「达标」而蒙冤的。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且千奇百怪。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锺鸿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姑娘，在鸣放中没发表过甚么言论。在确定右派时，他们单位实在找不出来，没法交代，只好拿她凑数。问到锺的情况时：汇报人说：「唉，这也算可以了；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还有陈涌、王蒙，都是在中宣部讨论右派名单时，用这种「比较攀扯」法「平衡」成右派分子的。I47 这还算是讲点道理的。某县电影公司只有九人，也摊上了一个名额。大家平时都在一个办公室，关系也不错，谁都不好意思提别人的名，最后只好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谁就是右派。还有更离奇的。地理教师周某所在的中学分到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个已有所属，是初三语文教师，有海外关系，整风时提了两条很尖锐的意见，尤其是跟校长的关系不好，就内定为右派了。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没办法只好召集全校教师开会讨论。知识分子都爱面子，不愿当面得罪人，所以讨论来讨论去，整整一个上午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位地理教师早饭多喝了点面汤，便想出去方便方便。他认为自己政治进步，业务精通，在同行中又有一定威信，说甚么也戴不上这右派的帽子。谁知他刚一走，一个老师灵机一动，提了他的名，其它老师立即同声附和，举手赞成。等周某上厕所回来时，已经成了右派。

也有为了凑数代人受过的。反右初期，高级党校也没有找到一个右派分子。于是刘少奇、邓小平把杨献珍等县委常委找去谈话：得知党校没有查出右派，刘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邓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于是，指示高级党校要重新展开反右派斗争。由于受到中央批评，回到学校后杨献珍就靠边站了。校领导在一起议论时，虽然认为刘邓都说杨的立场有问题，「右派」自然非他莫属，但大家都一直在杨的领导下工作，且杨为人不错，实在难以下手。最后没有把杨划成右派，而让他的秘书马鸿模顶替了。杨知道内情，后来待马一直不薄。」这还算过得去，竟有张冠李戴十几年，当事人还浑然不知的。东北工学院采矿系高锡成在运动中是积极分子，批判右派分子恽某时，支部领导要他准备发言，就把整风办公室整理的恽某反动言论材料给他看。高随手抓起铅笔，在一张表格纸上抄下了恽的 17 条反动亲点，因只限自己使用，便省掉了头尾文字。事后，高

把抄下的材料往书里一夹，就忘得一乾二净了。几年过去了，高已分配到大冶铁矿当技术员。1960年10月，他的一个同事偶然在那本书中发现了这份材料，并立即向领导报了案。因笔迹是高的，市公安局未经核实查问，便把他定为「漏网右派」。高锡成就这样糊里糊涂被送去劳动教养了。5”^

还有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自愿担当右派的。李某，共产党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在东江纵队文工团工作。抗美援朝时加入志愿军，荣立三等功。转业后来到广东某县文化局。李在工作中积极肯干，事事带头，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整风反右期间也是积极分子。文化局长就是他的本家叔叔，自然也谈不上得罪领导。反右开始后，上级布置任务，要文化局挖出一个右派分子。可是进行政治排队时，摆来摆去，找不到谁可以够上右派标准。万般无奈，当局长的本家叔叔只好对李某说：「德仔，你甚么工作都带头，是个老先进，这次评右派，你也带个头吧，要不，向上汇报时我脸上不好看。」他低头一想，觉得也没甚么，反正中央说过，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一当也无所谓；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派，就带这个头吧。虽然后来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脱帽右派」的身份一直保持到80年代。’-”

受到亲属牵连成为右派者也不在少数。老作家聂绀弩因为胡风案受株连而被隔离审查一年，刚获得自由就赶鸣放。他婉言拒绝了领导上要他鸣放的「盛情」，甚么也没有说。但是他的夫人周颖却说话了，她对肃反提出批评，并认为胡风算不上反革命，结果不但自己成了「特大右派」，而且殃及聂绀弩。聂被指控为周颖发言的「幕后策

150 《上访通讯》编辑室：《春风化雨集》’下册’页334—335’ 樽引自华民：《中国

大逆转——「5右」运动史》（香港：明镜出版社，19961、页136—138。151 谢日新：《命连偶记四题》’载《没有情节的故事》’页468—469。

划者」。152 广播事业局见习编辑钱敏齐是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结婚不久丈夫就在外交部被划为右派，她一气之下跑到外交部办公厅又哭又闹。开始只是对她提出批评，以后算来算去还是被划成了右派。

〔53 王造时的女儿王海容，对政治向来不感兴趣，仅仅因为同情父亲，就被戴上右派帽子。刘宾雁的姐姐刘放，也因替弟弟鸣不平被划为极右分子。还有父子右派—地质学家谢家荣和他的儿子，兄弟右派—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他的弟弟。最冤的是陈独秀的孙女陈桢祥。当时北京师范学院党委开整风动员会，发动全院师生给党提意见。陈在领导的一再催促下，左思右想后提出，学校图书资料少，新老师多，教学质量不够高等。反擊右派后，这些言论竟成了把她定为右派的唯一「罪证」。学校成立了陈桢祥项目组，组织师生开会「帮她提高认识」。对她的批判是：「你与别人不一样，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阶级根

源、历史根源的。」¹你必须承认事实，你是陈独秀的孙女，你父亲在

香港，你反党是有意识的，你是天生的右派。」[^]

让人感到可怜的是，大量的右派被定罪，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甚么右派言论，而是在他们向党「交心」或自我检讨时，暴露了自己的一些「错误」思想。利瓦伊汉在回忆中承认，「自我改造」和「向党交心」运动在全国普适开展起来后，「影响很坏」，不少地方又把一些人打成右派分子。¹⁵⁵这说的主要是那些党外人士，其实党内类似的情况也不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钱辛波就因向党「交心」成了右派。钱在整风开始前被送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显然是把他当作「培养」对象的。在运动中，钱没有发表过任何鸣放言论，但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他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写「思想种报」，讲述他与哪些右派分子认识，有过甚么交往，在思想深处和他们有哪些共同的地方。校领导认为钱的思想汇报比较「深刻」，还将这些「自我检查」作为典型

材料发各支部传阅。1957 年末反右运动在党校基本结束时，康生突然宣布补课三天，继续反右。结果，钱被补为右派。领导向他宣布的理由很简单：你有许多熟人都是右派，你以前又在资产阶级报纸《新民报》工作过。就这样，一个党的忠实成员被开除了党籍。[^]

其实，在党内右派分子中、像钱辛波这样的忠诚党员占绝大多数，甚

至有很多人明明是「左派」，却被戴上丁右派的帽子。在一般情况下，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都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赞成大民主的人，但也确有一些反对鸣放和双百方针的人成了右派。例如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就没有任何「自由化倾向」。他只是同意陈其通等人的观点，甚至说「百花齐放在社会上可行，在我们学校内不行：我们校内只容许开一朵花，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左派言论后来都被奇怪地作为右派言论受到批判。¹⁵⁷ 作为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上级，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也是「左派」-并且写文章支持陈其通，最后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党籍和军籍。¹⁵⁸ 此外，丁玲、陈企霞也属于这类情况。¹⁵⁹ 这些人的厄运，大概与反右运动没有直接关系，只是赶上了这个特殊时期而已。

以上种种案例，真是光怪陆离，千姿百态。有言论的被打成右派，没有言论的也可以被打成右派；批评领导的被打成右派，积极跟

¹⁵⁶ 钱辛波：〈交心成「右派」〉载牛；莫~邓九平主编：《荆钗路~记忆中的反右派》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1' 页 401—403¹⁵⁷ 《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 17 号' 页 190—192，

¹⁵⁸ 参见黎之：《文坛风雾录》（鄞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1' 页 74-76：〈人民

日报〉~1957 年 4 月 22 日' 5 月 9 日' 1958 年 3 月 29 日。¹⁵⁹ 关于批判丁~陈的情况，详见中央博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 寡

集团的经过报告，1958 年 1 月 9 日' 云南省档案馆~2-1-3195' 页 28—33。并参见

黎之：《文坛风云钱》~页 109—113；朱正：《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闹家

争鸣》（鄞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页 390—392。随领导的也可以被打成右派；搞自由化' 大民主的被打成右派，反对

自由化和大民主的也可以被打成右派~条条大道通罗马！不过' 有

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通过斗争，这些右派分子或多或少大都「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自己的罪名，即如舒芜所言：「你天天听说你是向党进攻，你是右派，人人都说，处处都说，会上也说，会下也说，报刊上也说，大字报上也说，说法又千变万化，有些还精辟精彩，慢慢你会觉得自己确实向党进攻过，确实是右派，至少也会疑疑惑惑，不敢自信。

国外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催眠术』，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¹⁶⁰ 这

也是中国政治运动的一大特点。

通过群众运动搞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扩大化，「三反」、「五反」是这样，肃反是这样，反右也是这样。不过，反右运动又有其特性。以往的运动主要是针对行为，而判断行为一般是容易找到标准或界线的，问题是这个标准和界线应该由法律判定，而不是掌握在领导人和群众手中。但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的是思想和言论，在这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领导人和群众没有或不能掌握划分左中右的标准，而在于对思想和言论，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一个司法意义上的尺度和标准。历来的「文字狱」都是如此。

谙练阶级斗争的中共领导人当然知道整顿阶级队伍的重要性，所以从反右运动一开始就要求各单位对所有人员进行「排队」，分出左中右。但是按照甚么标准划分，中共中央迟沓拿不出一个原则性的意见。反击右派的运动开始不久，各级领导就纷纷提出排队的标准

160 舒芜：〈：历史需要我们作证〉，载《没有情节的故事》，页 409。
问题。6 月 17 日中共上海局整风办在电话汇报中就提出，「值得研究的是划分的具体标准和界限问题」。19 日辽宁省反映，认为「排队中遇到的问题是右派和中间派的分界限不够清楚」。有的省（如湖北）干脆自行商定右派的标准。尽管 6 月 19 日发表的毛泽东讲话规定了判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但那只是一个政治原则，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此后各地汇报中提出的主要问题仍是：「左、中、右派的标准不明确，口径不一」〔河北〕，「干部对划分左、中、右派分子的界线不清」〔辽宁〕，「总之，对甚么是右派，右派和反革命的界限如何？对右派将来到底如何对待？目前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是都不明确」

《湖北》。

7月11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
的建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统战部的建议还是一个
政治标准，虽然根据「两面性和动摇性的大小」，把中间派又分为「中
左、中中、中右三类」，在右派之上再加一个「极右分子」，但除了增
加层次，并讲了一大堆政治术语外，没有任何新内容。¹⁶³况且，统
战部刚说，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已处于敌我界限的边缘，毛
泽东几天后就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
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¹⁶⁴问题反而更复杂了。上海市委书
记处按照毛泽东的六条标准，又拟定了七条具体标准，但说来说去还
是「挑拨党群关系」、「幕后阴谋策划」、「向党进攻」、「一贯对党仇恨」
等一类似是而非的语言。耻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则发现「在划定右派
分子工作中对七方面问题的界线混淆不清」，如同意右派某些言论与
自己有右派言行并为右派辩护之间的界线；在个别问题上对党有意见、
不满与对党有敌对情绪之间的界线；对有缺点的某些党员或个别
领导同志不满意与仇视，污蔑整个组织(包括对党的方针，政策)之
间的界线；自由主义、小广播、发牢骚与有意识挑拨党群关系之间的
界线等等。不久，省委便自行规定了七条具体标准。广东省也拟订了
「划分右派分子的八项标准」，内容与上海的差不多。¹⁶⁵江苏省则提出
对右派要从五个方面具体考察：一、阶级成员和阶级出

¹⁶²《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I二）、1三）（五）。

¹⁶³吉林省档案馆'1-5/6-1957.13'页180—189；云南档案馆
2-1-2738'页11—15。¹⁶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543。

¹⁶⁵《情况简报（整II专辑）睡编》（六1）。

¹⁶⁶《内部参考》'1957年7月25日'页3—4；8月7日'页3—5；9
月18日'页17—20。

身；二、政治历史问题；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具体表现；四、这次
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五、平时的工作、思想表现。¹⁶⁶其结果无疑
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八届三中全会分组讨论时，会议代表纷纷提出了如何划定右派的问题。如国家机关组对哪些人应该划为右派以及处理办法产生了争论。中央组田家英提出：「请中央考虑是否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转发一些反官僚主义的典型材料、使斗争目标更加集中’明确，不致伤害一些同志。」京津组反映，在「开会批准右派时，意见常常不一致」，工作进展很慢，还容易出错，「主要是由于中右和右派的界限难划。搞个标准，很有必要」。中央组第三分组重点讨论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问题。据反映，国家机关各单位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还不够一致，掌握标准较难。因此，「大家认为须由中央颁发一个统一的标准」。华东组也针对防止扩大化的问题提出，要严格掌握划分右派分子的界线和批准权限，并「建议中央快一点制定出一个右派分子的标准」。168~于是，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这次提出的「统一的标准」共有六条，还有应划为极右分子的四条。这些同以前区别不大，只是更具体、更详细一些。比较重要的是增加了不应划为右派的几种情况：（一）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二）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

167 《内部参考》，1957年8月9日，页5—8。168 吉林省植案馆，1-13/1-1957.65’页1—22。

派分子。（三）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四）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

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五）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六）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169 如果这个标准早些颁布，如果规格按照这个标准执行，相信确会有一些人不必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了。但实际结果是，仍有几十万人被划为右派。其中的原因，有人认为，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这个标准是很难做到的。170。也有人认为，由于这个标准「不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制定的」，所以「难以精确掌握」。171 其实，从毛泽东的六条，到统战部的建议，再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外加各省的具体规定，中共提出的划分右派的标准不算少了，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认识论和世界观的问题、能够划出一个标准吗？对于思想和言论来说，何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

三阶级斗争再次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反右派运动说到底是一场以「文字狱」为特征的阶级斗争，而且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所以非要发起这样一次运

16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页 613—617。

17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621—622。

171 雍澳：《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反思》（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页 135—136。

动，确实在于他对 1957 年初夏的局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很多人对当时执政党的政策和方针表示不满或反对，确是事实，但是有几个人想到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呢？工人农民不过是想让生活过得更好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充其量也就是要求多一些民主和自由。

’”作为执政党，这些本来都不是无法处理的事情。毛泽东在此时感到一种威胁，主要是因为他疑心病过重，且头脑中阶级斗争的观念愈来愈强。特别是在波匈事件之后，「无产阶级政权」得而复失的情景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从他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得很清楚。于是，「夏季攻势」出现了，一场惨烈的阶级斗争爆发了。其情其景，与一年前八大时国内的情绪和气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1 对八大政治路线的彻底背离

前文说过，毛泽东在八大以后曾对政治决议中表述主要矛盾「实质」的那句话表示不满——但并没有对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这个基本判断提出异议。在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谈到少数人闹事、「有人要杀共产党」的话渐渐多起来、但始终认为在中国这些人「翻不起大浪」。直到1957年春季，毛泽东在一系列讲话中仍然坚持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大鸣大放以后，毛泽东就开始警觉了——这在前引他起草的各项指示和对国务会议讲话稿的不断修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毛泽东看来，阶级斗争实际上还没有过去——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八大决议是全党通过的，自己也曾大谈特谈「人民内部矛盾」，此时重提阶级斗争显然不合时宜。所以，毛泽东只是在讲到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加了许多限制词和修饰语，并没有改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反右运动开始后，秘书田家英曾向毛提出：看来八大关于矛盾的分析 and 方针任务的规定是不对的。毛泽东表示：确有问题，但八大的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现在不宜提，等以后相机提出。

反右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了，他决定在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问题。会前，9月19日，毛泽东先在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讲话中提到了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¹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

年所有制是改变了 1 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当时稞有很多与会者感到不理解。9 月 23 日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又提出：「这个运动要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城乡各种反革命分子，农村中还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分子，社会上的流氓、阿飞、盗窃犯、凶杀犯、强奸犯、贪污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严重建法乱纪的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他们同人民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除此以外，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就更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究竟如何理解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

这个问题在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华北组在讨论时提出：在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现

173 雍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反思》’ 页 122。

174 《毛泽东传 11949 — 19761》’ 页 717—7】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

顾》’ 下卷’ 页 624。175 《人民日报》^1957 年 10 月 19 日。

在又把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拿出来丁，这与八大决议以及一些整风文件中的提法不一致，希望中央负责同志再解释一下；整风报告中说：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有些人认为事实上是这样的，但理论上怎么解释？资产阶级已失去了经济基础，为甚么阶级斗争还能重新尖锐化？中央组有人提出，请三中全会考虑，可否正式更正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河南，江西、湖北分组在甚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少数人认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多数人认为，虽

然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反右派，但不应把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时期的主要问题，作为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从思想战线上可以说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但从经济基础上看，则不能'说阶级矛盾是主要的；过渡时期矛盾的性质是按后者而不是按前者决定的。华东组在讨论时基本上都赞同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即两条道路的矛盾的说法，但解释说，这个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属于敌我矛盾，如与右派分子的矛盾；一部分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I 也有两种，一种是纯人民内部矛盾，一种是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如与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但从后一部分人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来说，是敌我矛盾 I 要改造它)，从政治上来说，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过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仍然可以转化。同时，还应说明，在右派分子未明显暴露出来以前，人民内部矛盾是突出的；反右派斗争以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量仍然是较大的。~

在后来的讨论中，很多人直接提出了不同意见。据 10 月 5 日《情况简报》刊载，外国专家局局长杨放之认为，说过渡时期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因为在生产数据所有制改变以后，人民内部矛盾是多方面的，而敌我矛盾比较简单。当前主要是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是很重要的敌我矛盾。但这只是少数的，而大量的、经常的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敌我矛盾不是主要的，八大决议对当前国内矛盾的分析仍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反右派斗争而改变这种估计。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了同三大敌人的矛盾，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又解决了生产数据所有制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八大决议对我国当前主要矛盾的提法是正确的。但是决议也有缺点，就是对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得不够。从此次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活动中证明，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是十分尖锐的，但不能简单地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认为：（门过渡时期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至于一时的突出的反右派斗争

虽是敌我矛盾，但并不能排除人民内部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主要矛盾究竟是哪一方面，还不够明确。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是不是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主要的矛盾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和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是一致的。看起来，否定中共八大的政治决议，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针对这些看法，10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

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毛劝导说：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处理。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要集中搞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毛泽东着重解释了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最后，毛泽东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

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

10月9日毛泽东在闭幕式作总结讲话时，又谈到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为了与八大衔接，毛又解释说：「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甚么不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又说，那时「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这些讲话表明，毛泽东在内心已经抛弃了八大决议，实质上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那些解释的话，只是安抚人心和文「过」饰「非」而已。一

178 《毛泽东传 11949—19761》 页 718-7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页 627-629' -

要矛盾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为了与八大衔接，毛又解释说：「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甚么不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又说，那时「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这些讲话表明，毛泽东在内心已经抛弃了八大决议，实质上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那些解释的话，只是安抚人心和文「过」饰「非」而已。一

八届三中全会没有直接否定八大决议，但并非毛泽东不想否定，只是需要时间。1957年底和1958年初，毛泽东看到浙江省委和上海市委在党的会议上的报告键，非常兴奋，立即组织讨论修改，并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指出：生产数据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但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18“最后’，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宣布：「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

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

179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 I 记录稿)，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 475。在发表的毛泽东这个讲话中，谈到关于八大决议对主要矛盾的论断时，编辑者把「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改为「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可说是理解毛泽东的真谛了。

18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671—673；《人民日报》1957 年 12 月 28 日、1958 年 1 月 25 日。

盾」。”至此，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被彻底背离，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则成为中共执政的思想纲领。

在八届三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最引人注目的补充就是关于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之间关系的论证。「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既可以说是阶级矛盾，又可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使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既可以处理敌我矛盾，又可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何况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之间、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还可能随时转化，这个没有说清也说不清的理论叫广大干部如何理解，如何把握，如何实践？显然，毛泽东的目的之一，是想通过对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新阐释，说明开展反右运动的必要性，并对党内整风何以突然转为反右运动这个困惑全党全民的问题找出理论根据。八届三中全会是接受了毛的理论，但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起到甚么作用。哪些问题算敌我矛盾，哪些问题算人民内部矛盾，甚么时候人民内部矛盾就转化成敌我矛盾了，甚么时候敌我矛盾又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没有人搞得清楚。但有一点已经肯定了，这一切都是阶级矛盾，都在阶级斗

争的范围内。既然阶级矛盾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运用阶级斗争的法宝便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了。这就是反右斗争的理论成果，也是毛泽东从反右运动中得出的主要结论。

2 对右派分子处理的原则和结果

如果说发动反右运动是阶级矛盾转化理论的第一次实践，那么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则第一次体现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一原则。青岛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右派的原则：一是「给他们一

181 《建 8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页 288。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一是「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182 邓小平在 7 月 23 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对于右派问题「组织处理不忙，人大-政协、党团都不忙处理，等人大改选再说」，「但要积极做准备工作，统战、宣传、组织部赶快研究，12 月必须拿出方案。政协、人大，包括省市，11 月拿出方案，统战部负责」。183 7 月 26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核批准。184 8 月 4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决定。按照〈决定〉的说法，所谓劳动教养，既是「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社论解释说：「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国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185 无论「劳动教养」是不是「长期的研究和考虑」的成果，但确是为右派处理问题而出台的，因为毛泽东已经发话：绝大部分右派分子都要送去劳动教养。

18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456；青岛会议发言 I 记录稿）、1957 年 7 月

17—20 日。

183 中共中央畜记处会议（第 38 次会议）记录稿，1957 年 7 月 23 日。

184 《人民日报》 1957 年 7 月 27 日。

185 《人民日报》，1957 年 8 月 4 日。

186 云南档案馆 2-1-2736' 页 92—94。

8 月 29 日，针对四川急于对一些右派分子进行处置的请示，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指示各地党委，「对于右派分子的斗争，应是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彻底揭露，把他们搞臭，但还不宜过早地作组织处理，因为这样做会使斗争简单化，不利运动的深入和开展」。186 但是，反右斗争进展很快，特别是青岛会议以后，右派分子的数量迅速增长-对他们进行批斗以后，究竟如何处理，各单位都不得而知。重庆市反映，全市揪出的右派分子估计将达到五千人，「如何管教和处理这批人是目前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各单位一般都希望把这些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营管教。但劳动教养营何时成立，能否能容下也是一个问题。对这批人进行处理的政策标准，不少单位还不明确，希望中央早日订出具体的处理办法，并希望愈具

体愈好。」187 但中央的处理方案迟迟没有拿出。直到三个月后，12 月 2 日至 16 日，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才做出了一些规定。会议讨论了统战部提出的〈关于处理五个方面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关于民主党派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则规定〉、〈关于帮助民主党派改组织各级领导机构的意见〉和〈关于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各级委员会安排民主人士的通知〉等文件。在此期间，12 月 8 日毛泽东邀请一批上层民主人士商谈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12 月 10 至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了处理右派问题的原则。189

作为处理右派分子问题的试点，12 月初中宣部、统战部和北京市委分别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三个具体方案。

中宣部负责处理的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界比较著名或重要的右派分子五十九人，分为五类。（一）开除二人：吕班、徐燕荪。I 二）

监督劳动十一人：郭维、彭子冈、锺惦裴、陈企霞、吴祖光、陈明、李又然、徐懋庸、刘宾雁、刘绍棠、蓝钰。（三）留用察看八人：蒋元椿、李慎之、萧干、沙蒙、朱启平、冯亦代、杨建中（蓝翎）、李庚。（四）撤销全部职务，另行安排工作十人：罗烽、袁毓明、陈模、丁聪、戈阳、张伯驹、曹宝禄、黄苗子、曾彦修、章锡琛。（五）撤销大部分或者一部分职务，保留一部分职务，降职或者降级二十八人：丁玲、冯雪峰、艾青、杨思仲〔陈涌〕、舒芜、孙家诱、

187 《内部参考》-1957年9月10日'页10—12。

188 罗 11 武编：'：《民主党派大事年表》I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1^ 页 63。1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1949 — 19761》，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 页 105—106：

江丰、叶恭绰、庞熏琴、彦涵、李宗津、王雪濂~王曼硕、莫扑，王逊、郑可' 新风霞、叶盛兰、李葛春、连阔如、刘雪庵、张权、锺敬文、穆木天、黄药眠、徐钊成、储安平，浦熙修。围

统战部负责处理民主人士五十人，分为五类。（一）撤销一部分职务，保留或安排一部分职务，降职、降级、降薪四十六人：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谭惕吾' 曾昭抡、钱端升、钱伟长、费孝通、李伯球、储安平、薛愚、林汉达、沈志远、徐铸成、毕鸣岐、马哲民、潘大逵~黄药眠、吴景超、潘^&、浦熙修、李宗恩、刘王立明、范予遂、陆佩如、彭文应、王造时、宋云彬、王毅斋、谢家荣、张軫、叶恭绰、袁翰青、陈达、舞自知、向德、钱孙卿、向达、金宝善、程星龄、傅种孙、韩兆鹗。（二）撤销一部分职务，开除民主党派党籍，保留或安排一部分职务，降职' 降级、降薪一人：罗翼群。（三）撤销一切职务，留用察看一人：顾执中。（四）撤销一切职务，开除民主党派党籍，留用察看一人：陈时伟。（五）撤销一切职务，开除民主党派党籍，依法处理一人：孙大雨。同一类别中也有较大差距，如章伯钧从三级降至六级，罗隆基从四级降至九级，章乃器最顽固，从四级降至十级。191

对于高等学校教师的处理最复杂，以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市为

例，拟分九种办法处理三十一人。（一）开除三人：楼茂盛、周大觉、曹宝源。（二）监督劳动二人：英若聪、麦百平。（三）留用察看二人：杜恒俭、胡稼胎。（四）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三人：李景汉、朱启贤、王衍臻。（五）保留教师职务，撤销全部或大部分其它职务，降级、降薪十二人：钱伟长、费孝通、吴景超、向达、黄药眠、钱端升、穆木天、李宗恩、金宝善、孟昭英、黄万里、傅种孙。（六）保留教师职务，撤销大部分其它职务，不降级二人：李欧、薛愚。（七）免于行政处分一人：郑立人。（八）按反革命分

190 云南省档案馆，2-1-2739' 页 125—194。191 云南省档案馆 2-1-2739' 页 6—63。子逮捕法办四人：徐璋本、葛佩琦、郎郎天、曹垂训。（九）按反革命分子开除并判处管制二人：王德周、何挺杰。根据上述报告，统战部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有关部门、学校、团体协商」后，提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195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文件，并说明选择出来的这九十六名右派分子，作为各地的「参考标准」。对这些「擦兵」分六类进行处理，（一）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四人〕：罗海沙、刘漱沧、徐燕荪、陈时伟。（二）撤销原有职务，监督劳动〔七人〕：陈企霞、徐懋庸、锺惦裴、吕班、彭文应、萧干、吴祖光。（三）撤销原有职务，留用察看，并降低原有待遇〔九人〕：王翰、李世农、罗翼群、李世军、冯亦代，吴金萃、李万春、王恒守、顾执中。（四）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十七人〕：沙文汉、曾彦修、谢雪红、贾潜、艾青、谭惕吾、陈仁炳、丁聪、彭一湖、王一鸣、李康年、娜喷甫、王造时、张云川、王一帆、储妍、谢白寒。（五）撤销一部分或大部分职务，降职、降级、降薪（五十七人）：丁玲、冯雪峰，江丰、龙云、陈铭枢、黄绍竑、馈自知、张轸、范予遂、章伯钧、罗隆基、曾昭抡、钱端升、钱伟长、费孝通、韩兆鹗、沈志远、潘大达、马哲民，王毅齐、宋云彬、黄药眠、潘光旦、吴景超，费振东、浦熙修，陶大镛、徐铸成、刘王立明、庞熏琴，陆诒、陈达、章乃器、毕鸣岐、向德、钱孙卿、潘锷章、刘一峰、向达、梅汝傲、雷

天觉、傅种孙、林汉达、吴文藻、黄琪翔、李伯球、叶恭绰、李宗恩、李士豪、邓昊明，薛愚、孟昭英、袁翰青、陆侃如、金宝善、谢家荣、董渭川。（六）免予处分 I 二人）：翟大陆、金芝轩。

~3

对比上述名单可以发现：一、原报送方案有「依法处理」的七人，中央批覆的方案中取消了这一类别。这些人当然还是要法办的，但列入「标兵」就有逢 5 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原则之嫌，同时也避免「上行下效」，过多使用刑罚。二、原报送方案中没有「劳动教养」一类，中央批覆的方案中恢复了这类处理办法，但列入名单的只有四人。主要原因大概是原来考卢对右派分子实行「劳动教养」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现在一下子把几十万人送去教养，恐劳教营「人满为患」，只得作罢，保留几个作为最严厉的处罚，以儆效尤。三、对大部分列入「标兵」的人的处理结果与原报送方案相同，但在变动处理办法的人中，只有吕班一人从开除公职降为监督劳动，其余多数人都「罪加一等」，如陈时伟、彭文应、萧干、罗翼群、李万春、艾青、谭惕吾、丁聪、王造时、储安平。由此可知，中央对大右派是没有手软的。

194「劳动教养」后来成为中国的一 8 特殊惩罚措施，主要用于年龄或行为不够法律返

审批的那些人。

1957 年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1958 年 1 月 30 日该规定经过修改又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下发执行。按照这个规定，处理方针还是「严肃和宽大相结合」，但特别提出，对于历史上有过贡献和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人，以及知识分子中确有真才实学的、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工作的人，「在处理时也应当比一般人宽些」。对国家给薪人员六类处理办法的具体规定是：（一）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二）情节严重、但表示愿意悔改-或情节虽十分严重、但态度恶劣的，撤销原有职务，送农村或其它劳动场所实行监督劳动。（三）情况与第二类相似，但由于本人在学术、技术方面尚有专长，工作上对他还有相当需要，或者本人年长体弱，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撤销

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并降低原有待遇。在上述第二类和第三类情况下，如本人既不愿接受监督劳动，又不愿接受留用察看，则应开除公职，令其自谋生活，并由其家庭和所属居民委员会负责在政治上加以监督。（四）情节较轻的，或情况虽与第一类第二类

相似、但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需要加以照顾，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五）情节较轻，或情况与第一类第二类相似（以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或在学术、技术方面有较高成就：需要特殊考虑的）实行降职降级降薪。如原有兼职较多，应撤销其一部分或大部分职务。（六）情节轻微，确已悔改的，可以作为中右分子处理，免于处分。对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按下列办法处理：（一）一般应开除学籍，但可选择个别「反面典型」在开除学籍后留校监督劳动。（二）情节较轻，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留校察看，继续学习。其中情节轻微，并积极参加反右斗争的，免于处分。（三）国防、外

交等机密性专业中的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学籍。其中情节较轻，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令其转学或转系。（四）被开除学籍的右派分子，可以回家谋生的，由家庭和所属居民委员会或生产合作社负责在政治上加以监督；没有生活出路的，实行劳动教养。化

关于高等学校学生中右派分子的处理，中共中央 1 月 19 日又重新作出规定：一、开除学籍的，应该限于群众所痛恨的情节特别恶劣和拒不悔改的极右分子。开除的数目不要多了，应该是极少数。开除学籍后可以实行劳动教养。二、保留学籍，送农村或者其它方面实行劳动察看的，应该控制在百分之三十左右。三、留校学习察看和免于处分的，两类合计，应该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关于中小学教师中右派分子的处理，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又补充，「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应当同其它系统有所不同，就是要使其中的大部分（百分之七十左右）离开学校另行安置」。中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离开学校的比例则可以减到占右派分子的半数左右」。…

1953 南档案馆. 2-1-2739 页 2—5；2-1-3195 页 1—3。196 云南省档案馆' 2-1-3195 页 10—11。197 雪南省档案馆' 2-1-31'' 页 8—10。

上述关于右派分子处理的规定和意见，当年都是由各地区、各单位上级领导者掌握，未曾与被处理者见面。他们能否正确地准确地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已无从考察。不过，有一个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在五十五万右派之外，还有大量的「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无法统计的受株连家属。他们「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严重」，其中仅「失去公职」者就有十六万人。整风时的批评者现在成了被审判者，而审判者就是原来的被批评者，「游戏规则」既如此，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根本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这些处理意见之间的区别，主要涉及的是被处理者的物质待遇和物质生活，而他们之间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摧残，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右派分子后来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列「黑五类」，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他们在精神世界已经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其痛苦和压力，绝不是改变一下处理方式就能够解除的。章伯钧的女儿回忆她的父亲说：「钊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致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己』的。踏天局地，拘手挛脚。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只把一小部分（而且是一部分的内心生活）留给了自己。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他看到的是头顶上的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两个女儿。」

关于反右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划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和东湖会议曾反复谈过。他认为，「现在中国有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中未改造好的部分，再加上右派，即「国内的国民党，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代理人」。这部分人是敌人，毛估计大约有三千万；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大约看四千万，其中大

几个问题的请示》，

1979年9月10日’转引自华民：《中国大逆转》’附录，页411—412。

199章诒和：《越是崎岖越平坦》’载《没有情节的故事》’页273。

多数（九成以上）是中间派。所谓「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农民。就「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而言、「基本战役已经过去」，「三十万右派搞臭了」，知识分子也被封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他们没有资本了。不过，「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还要出甚么大问题，如国际出甚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还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看来以后也不会安宁了。一场政治运动，增加了几十万敌人，又增加了一个剥削阶级，哪里还会有甚么「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又一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群众运动，这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二次。不过，在中共八大作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判断之后，再次把阶级斗争作为全党关注的焦点，并依靠群众运动取得斗争的胜利，反右运动确实为以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树立了「光鲜榜样」。

难怪人们常说：1957年反右运动是1966年「文革」运动的预演。到1958年夏天，反右运动这场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在「大跃进」的锣鼓喧天中渐渐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发动的经济运动。不过，发起这次运动的号角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莫斯科吹响的。

200 毛津東在成都会议讲话（记录稿），1958年3月26日；毛泽东在东湖会议讲话 I 纪要草稿、，1958年4月60。

第十章

东风吹来：毛泽东在莫斯科指点江山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确认已经取得「整风反右」的伟大胜利后¹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14至16日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16至19日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在历史上简称「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几乎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报纸上公开亮相的有六十四个国家。’会议发表了由十二个执政党（南斯拉夫除外）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签署的〈和平宣言〉。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2会议前，《人

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未来、豪情地宣称：「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退出世界历史

1 实际上出席会议的有六十八(固党^其中四个党! 如美国共产党 1 由于在国内所处的特殊

环境, 没有公开亮相, 也没有在〈和平宣言〉上签字。多见吴冷西:

《十年论载: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值绿》(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1^页 98—9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4 先知、金冲&主编: 《毛泽东传! 1949—1976、》I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1' 页 723。2】960 年 11 月的莫斯科会议, 虽有八十一个国家的共)! 党和 1 人 X 代表参加^但中共领袖毛泽东没有出席, 且此时中苏两党已缠是面和心不和^凑在一起, 不过是对内吵架, 对外装装门面而已, 无论如何-这次会议与 1957 年的莫斯科会议不可同日而语。

的舞台, 社会主义胜利的凯歌必将在全世界响彻云霄, 而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太久丁。]: '

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 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 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 都是中共提出来的。不仅如此, 在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中, 毛泽东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和影响, 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 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如果说中共在波匈事件期间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 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 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1957 年底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 这次会议无疑就是中苏两党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但是, 笔者还注意到, 莫斯科会议过后不久, 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 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引起争论和分歧的, 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 首先指责对方的, 也恰恰是对莫斯科会议路线的背叛。这就是说, 莫斯科会议成为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一中苏同盟的蜜月及其隐忧

3、人民日报》1957年11月6日。

1954年到1957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就推动双边关系而言，在这一时期苏联发挥了更为主动的作用，而中国方面的响应也非常积极。如果说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友好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和军事的合作，那么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合作则突出地表现为苏联对华经济援助及中共对苏共的政治支持。

1 苏联对华经济援助

朝鲜战争大大提高了毛泽东和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此莫斯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赫鲁晓夫在其登上权力宝座的过程中便开始注意调整对华政策，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经济上加强对华援助。

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督促苏联有关部门尽快确定和落实对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的援建项目。在1952年8至9月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在原则上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答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具体项目需待苏方有关部门审查两个月后再行协商。由于中方提出的项目庞大而繁杂，要求的设计和供货期限又短，特别是原始数据和基本数据准备不足，以及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进展十分困难。直到1953年5月15日双方才签署了《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议》，决定在1953年至1959年内，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同时完成1953年4月以前苏联援建的51个企业，共为141个企业。李富春后来报告说：「我国第一

个五年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上述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我们将会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

然而，签署协议并不等于援助项目的实施，因为还有许多细节没有落

实，苏方需要对援建项目逐一进行实地考察，特别是中方在协议签字后又不断对设计任务书提出一些重大的补充和修改意见，还需要进行各方面的具体谈判。”按照原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在1953年9月应该已进入实施阶段，但中苏协议的执行还遥遥无期。1954年初，毛泽东下了「军令状」，要求国家计委从2月25日起用一个月的时间拿出一五计划的粗稿。国家计委要求延长时间，毛泽东只给了五天宽限。4月15日，经陈云整理的计划初稿交给了毛泽东。

即使到这时：中苏之间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无法确定。1954年4月上旬，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途经莫斯科时会见了赫鲁晓夫，请他催促加快援建中国项目的谈判步伐。第二天，赫鲁晓夫便召见了负责谈判的米高扬和科瓦利（！&^上】，详细询问了谈判进展情况。他「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并要求提出难以完成这些项目的全部理由。在讨论中，尽管科瓦利一再提请注意，对于如此庞大的援建项目，苏联本身能力有限，赫鲁晓夫却总是「毫不客气和毫无根据地拒绝听取」。科瓦利的印象是，这位第一书记看到的只是外交意义，他决心从政治上解决对苏联来说非常复杂，在技术上还没有解决的经济问题。最后、赫鲁晓夫指示要加快与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步伐，以便苏联领导人尽快审理与中国的各项协议草案。此后，苏联各部委的谈判态度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很多草案得以顺利通过，根据米高扬的建议，熟悉中国情况的费德林（！^化^!!^）代表外交部参与了有关经济协议的起草工作。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意见，赫鲁晓夫的反应也十分积

极。1954年7月，中国提出：在苏联援华企业的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范围和期限方面，有一些修正和补充，还请求苏联再^助建设一些新的企业。赫鲁晓夫立即给予答复：「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不仅将协议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总值增加了3.5至4亿卢布，而且主动建议在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一些企业里，用苏联新改进的几种军事技术代替原协议的规定。此外，赫鲁晓夫为向中国国庆献厚礼，还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一批新的援助项目，如扩大原有协议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新建15个工业企业；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

臆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以及决定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并无偿地将基地归还给中国等等。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辑 0953—19571 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13901396、437。

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发展计划，苏联从 1954 年开始大量派遣技术顾问和专家来华工作。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 年比 1953 年增加两倍多’ 1955 年比 1954 年可能还要多些」。笔者曾对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做过详细研究和分析、结

论是：从 1949 年 8 月刘少奇拊第一批苏联专家回国，到 1960 年 8 月苏联撤退全部专家，十二年中在中国工作的各方面顾问和专家总计约 18000 人。其中 1954 年 10 月赫鲁晓夫访华前约 5000 人，但其中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比例很大（约 2000 人），1954 年 10 月到 1958 年底约 11000 人，1959 至 1960 年只有不足 2000 人。这个统计分析证明，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变化，确实可以看作是中苏关系的晴雨表。一些具体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据苏方统计，仅在 1954 至 1957 年为工业项目来华的苏联专家就有近 5000 人，其中 1954 年 983 人，1955 年 963 人’ 1956 年 1936 人，1957 年 952 人。据苏联外交部的报告，除协议期满回国者不计，1956 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为 3113 人。”另有统计数字显示，1955 年来华技术专家猛然增长（^^^）’ 以后两年又分别递增 807。和 62 呢~1957 年人数最多，此后大量减少。111 显然，1956 年和 1957 年是苏联专家在华人数的最高峰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完成一五计划最后和最关键的时期。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资料及相关帮助也是十分客观的，根据 1954 年 10 月 12 日签订的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议，1950 年至 1959 年，苏联无偿地（只收取复印费）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共计：整套技术设计文件 31440 套，基本建设方案 3709 套，机器和设备草图 12410 套，整套技术文件 2970 套，整套部门技术文件 11404 套，其中 1955 至 1958 年分别为 25896 套、3359 套、9837 套~2678 套、10022 套，

均占总数的 70%。至 90%。此外，1954 至 1957 年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 4261 个教学大纲、4587 项工业制品的国家标准，以及按优惠出口价格为中国设计和制造的 221 个仪器、设施、设备样品。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予了中国。

正是由于苏联的帮助，中国才得以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总产值〕以每年递增 11.3% 的速度发展。以 156 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以限额以上的 694 个（至 1957 年为 992 个）建设项目为骨干的基本建设全面展开。到 1957 年止，苏联和东欧各国帮助建设的项目，全部和部分建成投产的分别为 68 个和 27 个。由此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大大增强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填补了一批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技术基础。一五计划期间各基础工业部门（煤炭和化学工业除外）和国防工业新增的生产能力中，有 70% 至 80% 是苏联援建的，有的行业甚至是 100%。而且，苏联帮助新建和扩建的都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引进的成套设备在当时也都是比较先进的，有的甚至在苏联是最先进的。

如此规模的援助，对于苏联当时的经济实力来说，确实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有俄国学者算过这样一笔账：根据俄国档案记载的数字，苏联援华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 94 亿卢布，其中设备出口值 84 亿卢布，技术援助出口值 10 亿。这笔资金约占 1959 年苏联国民收入的 77%，当时在苏联可以修建 268 万个公寓，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内城镇居民解决困扰已久的住房问题。应该说，苏联为援助中国经济发展，付出是巨大的。

对于苏联的真诚帮助、中国领导人心中有数。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但那只是就经济建设的方式和方法而言，丝毫没有涉及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确实在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甚至有对苏联专家不尊重的表现。对此，苏联方面也有所察觉。

中共中央立即出面纠正这种偏差。中宣部于 1956 年 6 月 20 日召开了一次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强调指出，「学习苏联是完全必要的，一定要学」，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如果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出现问题，「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而不应当把责任完全推到苏联同志身上」。7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陆定一的报告，要求凡聘有苏联专家的单位，「参照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进行一次研究，如有问题应迅速加以解决」。²⁵ 1957 年 2 月 25 日国务院也向全国批转了外国专家局的一个报告，强调「向苏联学习，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们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的时候，决不应当产生任何轻视苏联经验的错误思想」。²⁷ 总之，在 1956—1957 年，中苏友好关系并没有出现甚么问题，连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向苏联人指出这一点。²⁸ 不仅如此，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的亲密关系更进一步向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合作发展。

2 毛泽东为赫鲁晓夫雪中送炭

1957 年的中苏关系更上了一层楼。如前所述，中共协助苏联解决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这不仅令赫鲁晓夫大大松了一口气，而且也对中共产生了感激之情。对于刘少奇的访问和周恩来的穿梭外交，赫鲁

25 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 1948—1960》，页 258—262。

26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4949—19561》（北京：学习出版社，1993），页 1164。27 搞建省棣案舱，136-9-294' 页 4—5。28 详见本会第二章。

晓夫感到「非常满意」，尽管他对中共的批评有些耿耿于怀。^中共中央在 4 月 7 日的一个通知中指出：「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团结，是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团结的最重要的因素。继续不断地加强中苏友好，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乃是我国人民最高的国际主义责任。」

然而，东欧的喧闹刚刚过去，苏联国内又爆发了更大的危机，毛泽东

再次为赫鲁晓夫雪中送炭。

29 又/7 声””，^{800001^1013101}1: ^36^)^1&I&中 P^17^8! 1”，
\\1001^33: 8 仰”?”1997, 0. 361-363.

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个派别集团。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对立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而赫鲁晓夫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他的支持者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到 1957 年夏天，双方的矛盾因主席团改选日期临近而开始激化，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贯彻二十大路线。6 月 18 日，在违背赫鲁晓夫意愿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大多数成员坚持要求由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而剥夺了本应该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权力。会议对赫鲁晓夫提出了大量指责，并以七比四的票数通过了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面对这预先策划的突然打击，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赫鲁晓夫在第二天继续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从各方面检讨自己，暗中却布置国防部长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紧急动用军用运输机 1 将一批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这些经过专门挑选的约二百名中央委员强烈要求参加主席团会议，并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第一书记和书记已处的改选问题，朱可夫甚至扬言可能会动用武力来迫使主席团就范。面对突变的形势，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让步，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于 6 月 22 日开幕。在持续了八天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在十二次全体会议上，有六十人发言，其它出席者均提交了书面发言或声明，一致谴责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行为」，会议通过了〈关于马

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莫洛托夫弃权），决定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

突发事件过后，取得胜利的赫鲁晓夫却遇到了来自全党的压力。在苏共基层讨论中央全会决议的过程中，参加者非常踊跃。据统计，仅在俄罗斯联邦就有 371.15 万人参加了党的秘密会议，占该共和国党员和预备党员总数的 84.67%。在会议上发言的有 71.35 万人。尽

管像一般党的会议一样，多数发言者都表态支持中央的决议，但提出疑问和问题者也不在少数。很多党员和群众在会议发言中表现出惊慌和怀疑的情绪，他们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事，很难相信存在着反党集团。全国很多党组织都把这看作是最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有的认为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等人一样应该对镇压活动负有责任，乌克兰就有大规模的镇压；有的认为反党集团的根本问题是妨害了赫鲁晓夫为所欲为的特权；有的提出无法理解莫洛托夫会反对他本人和列宁一起缔造的党。很多地方在开会时争吵激烈，气氛紧张。有人要求让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在广播或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甚至当场宣布，宁愿被关进监狱和开除党籍，也不同意中央的决议。不少单位的讨论已沓超出了党所规定的范围，如在很多大学，党员们提出了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必修课程的考试，人们还对社会生活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表示出强烈不满，甚至发生了砸汽车和跳楼自杀的事件。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有些州党委不得不建议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出面进行干预。

33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109-01138-01' 页 1-9; 109-01124-08' 页 91-94。

36: 〈人民日报〉, 1957年4月14日至5月6日。

赫鲁晓夫的麻烦不只来自国内，继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苏联又发生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引起了各国共产党的猜疑。尽管东欧各党都先后在报纸表态拥护，但据中国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在波兰的反应一般是冷淡的」，捷党「多数表示不理解」，「整个保加利亚人也很难理解」，很多人甚至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持批评态度。”苏共新领导集团必须有个明确交代，以取得国际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其中，最令赫鲁晓夫担心的是中共和毛泽东的态度。就在六月全会召开前两个月，莫洛托夫集团的主要成员伏罗希洛夫以国家元首的名义访华，尽管只是一次礼节性访问，却受到中国特别的礼遇和欢迎。还在伏罗希洛夫到来之前，北京就已经「披上节日盛装」：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一路上竖起座座彩牌楼和高大的标语塔，前门箭楼上还悬挂着伏罗希洛夫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报告会、图片展和电影晚会，宣传中苏友谊及苏联的辉煌成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各地分

会印了大量介绍伏罗希洛夫生平和苏联建设成就的小册子，发给各界群众。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礼宾司司长王倬如还专程前往伊尔库次克迎接贵宾。4月15日伏罗希洛夫到达那天，受到北京近百万市民的夹道欢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亲自前往南苑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除在北京与毛泽东等多次举行会谈外，还到东北、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各地访问，一路都有中国最高领导人陪同，还受到热烈的夹道欢迎。³⁶

其实中共这样做并无特别用意，只是为了扭转中国民众因波匈事件对苏联的不满情绪。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认为：有必要在伏罗希洛夫同志访华期间及其前后普遍地、大规模地进行关于加强中苏友好、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宣传工作，以显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亲密团结，并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国际主义教育。」³⁷但赫鲁晓夫的感受可完全不一样，这次接待苏联代表团的规模和气氛远远超过他本人1954年的访华，对此赫鲁晓夫不能不感到担心，他甚至通过费德林对伏罗希洛夫在中国的言行暗中进行监督和限制。赫鲁晓夫很清楚，他在莫斯科的举动需要得到各国党的支持，特别是中国党和毛泽东的支持。

³⁷ 福建省档案馆，101-5-982[^]页25—29。

³⁹ 刘晚：《出使苏联八年》'页49。

4081 明复：〈代序〉，载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处」集团》（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简），页1—2。41 《内部参考》~1957年7月12日. 页31—32。

六月全会结束后，7月3日'外交部第一副外长巴托里切夫(^^^; &~) 接见各共产党国家使节，介绍了中央全会情况。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和苏联对外文委主席茹可夫(^化~) 又分别找到中国使领馆的陈楚和张映吾参赞，个别通报情况。”同时，苏联驻华使馆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说阿布拉希莫夫(八^比^~) 临时代办受苏共中央委托，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有重要事情转告。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阿布拉希莫夫。听过情况介绍后，刘少

奇表示，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这样一些老同志犯了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还举王明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为例加以说明。最后，刘少奇答应将情况报告毛泽东。化当晚，苏联电台广播了会议的决议和新闻公报，《真理报》编辑部在晚 11 时举行兄弟党国家记者的招待会，分发了这些文件。此前，苏共中央已将相关文件寄给了各党中央。7 月 4 日，《真理报》刊登了会议决议和新闻公报，同时刊出的还有民主德国、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法国、奥地利、日本、以色列、朝鲜各国党支持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公开表态。”但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大部分党，没有表示自己的立场，这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在当天的一次宴会上，《真理报》总编辑问中国记者，中国报纸发表了甚么。当时中国的反应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斯科一些学生的说法很说明问题，他们说：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不发表意见，我们也不发表意见；现在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对的」。”其实，中共中央对此事十分重视，7 月 4 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关于讨论的内容，目前没有任何材料，但第二天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向荣「传达了中央的基本方针：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对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只有支持」。”不过，此时莫斯科并不知道中共的态

度，赫鲁晓夫显得有些焦急，感到必须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直接接触，于是派米高扬立即飞往中国，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中共对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决议的反应也非常强烈，特别是在中下层
42 《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7 日。

43 《内部参考》1957 年 7 月 12 日，页 32。

44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I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页 192。

干部当中，讨论的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苏共党员。上海市党内外的普遍反映是：「从苏共中央决议揭发的事实来看，反党理由是不足的」，主要是「囿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对党内分歧这样处理「会给帝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一定会借这个问题挑拨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甚至中国的右派分子也会「混水摸鱼」。天津市委机关干部听到消息后，连夜讨论，第二天上班后仍然议论纷纷。许多人对

苏共中央这种做法表示怀疑、惊讶和不满，有人甚至提出希望中共中央进行干预。山东省级机关党内外干部的思想波动也很大、普遍怀疑苏共决议~认为赫鲁晓夫「小题大做，恐怕是以宗派反宗派，以教条反教条，以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广州市干部为苏共中央决议可能引起的后果而感到焦虑不安：他们认为莫洛托夫等人是老布尔什维克，革命一笔子，想不到竟落到如此下场！二十次党代会批判斯大林的结果是在东南欧和全世界引起了大混乱，这次会不会再次引起混乱？

即使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后，仍有不少人表示怀疑。安徽省部分干部对中共中央如此轻易地表态支持赫鲁晓夫表示不理解。中共福建省委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共对苏共问题的态度后，大家都以沉重的心情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多数人认为，从团结的大局和既成事实的前提出发，应该支持赫鲁晓夫，但不能无保留地支持，否则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利，也影响中共党员对中央的看法。还有人认为苏共新领导集团经验不足，建议中央设法帮助苏共解决这个问题。更多的人对此提出疑问：说莫洛托夫等人思想保守容易接受，但他们真的反党吗？赫鲁晓夫有没有修正主义？这是否有宗派情绪？这样大的事情为甚么事先不和我党商量？苏共中央的决议引起了云南省广大干部的义愤和不满，省委传达了中央电话会议上的精神后，许多同志表示思想不通，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可以支持苏共的决议，但应对赫鲁晓夫提出批评，可以支持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但不应支持对莫洛托夫等人的处理办法。”就连中国使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都认为：「反党集团事件是苏共中央使用组织手段处理党内思想分歧的事件，就其政治实质来看是属于党内是非之争，从公布的材料看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论证该事件有反党的性质。」苏共对马林科夫等人「作了如此严重的组织处理是值得考虑的」。「这次事件继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之后第三次严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威信。」^

46'：内部参考》^1957年7月35日'页5—6；7月8日'页76—86。47到晓：〈出使苏联八年' ^页49—51。

但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考虑。7月5日下午7时半至次日凌晨3时半，

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米高扬，陪同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会谈足足进行了八个小时【中间吃饭四十分钟），大部分时间是由米高扬介绍苏共党内的情况，毛泽东则不时地提问，最后发表了一些看法。

米高扬首先介绍了苏共党内两派的现实分歧：赫鲁晓夫主张扩大主席团人员，增加一些年轻委员，而莫洛托夫等人坚决反对，因中央全会临近所以发难。接着，米高扬讲述了斯大林去世后莫洛托夫在国内外一系列政策方面的不同意见，其中特别详细地介绍了在对待斯大林大清洗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农业发展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错误主张，以及他们参与迫害党内干部的活动情况。在米高扬讲话过程中，毛泽东插话不多。谈到莫洛托夫等人的错误时，毛泽东说：「这几个人中间，莫洛托夫给我的印象不好，非常顽固。卡冈诺维奇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好的。」谈到苏波关系时，毛泽东说：「中心的目标是要把波兰保持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对于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措施’我们是满意的」。

米高扬谈话大体结束后，毛泽东发表了几点意见。关于莫洛托夫等人的错误，毛泽东说：「莫洛托夫我们比较清楚，他是守旧的。他们的小集团企图更换领导，这是不利的。这时候应当加强领导。这不只是苏联一个国家的问题。过去我们替你们担心，现在这样解决了很好。」「他们是怕两条：一条是主席团加人，一条是怕追究肃反责任。还有一个思想问题，旧的观点不愿有所变，这是他们犯错误的思想基础。」关于对莫洛托夫等人的处理，毛泽东说：「我们党内原来也有些同志们想，是不是把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里面更好一些？如果再闹事，再办。现在看来你们是不得不这样决定。现在拿出肃反材料，使大家激愤，但是肃反这样的问题，主要的是取得教训，不可太追究个人责任。」毛泽东还提醒米高扬，要注意团结。关于中共的表态问题，毛泽东说，人们不明了内情，许多人不相信他们反党。「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有些震动。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昨天晚上，由刘少奇同志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并且用电话通知了各省省委。今天我们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你们，已经广播了。」这时，毛泽东拿出致苏共中央的电文交给米高扬，并让阎明复翻译

给他听。

米高扬听了这番话，十分满意，突然冒出一句显然是讨好的话：「朱可夫建议，在中国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时候，由苏联给中国将领发勋章。」⁵⁴据翻译阎明复观察，米高扬有些激动，「似乎心里的千斤重负一下子都卸了下来」。在乘飞机返回北京途中，天气骤变，飞机颠簸得很厉害，米高扬却一脸轻松地对阎说，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即使是死也满足了。⁴⁹

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7月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电报：「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所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将有助于苏联共产党的进一步的围结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移地和苏联共产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⁵⁵7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真理报》7月5日社论〈党的列宁主义的团结一致是不可摧毁的〉，以及各国共产党支持苏共中央决议的大量消息。

至此，赫鲁晓夫终于松了一口气。7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听取米高扬中国之行的情况通报。会议记录很简单，但看得出苏共领导人很得意。米高扬汇报说，开始中共反对采取把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的严厉措施，但最后「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会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主席团会议因此一致认为，米高扬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⁵⁶米高扬在一次宴会上向刘晓表示了对中共的感激和钦佩之情，他说，他曾五次来过中国，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他首次访华时，苏共领导人对中共还不够了解，但他本人当时已看出中共马列主义水平和苏共一样，只是经济建设经验差一些，并就此向苏共中央作了报告。现在他认为，不论马列主义和建设经验，两党的水平都是一样的。中共对苏共的支持减少了苏共工作中的困难，并表示目前苏联虽不富裕，但将尽力援助各兄弟国家。

⁵⁴ 毛泽东在青岛会议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7月204。

从政治观点（特别是斯大林问题）看，莫洛托夫等人显然与中共更为接近，而毛泽东却偏偏选择了支持赫鲁晓夫。这固然有面对既成事实，从大局出发，维护中苏团结的策略考虑，但也并非完全如此。首先，

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赫鲁晓夫的主张更接近中共。周恩来曾列举苏联的工业、农业和国际政策说，「赫鲁晓夫主要的基本方面是对的」。毛泽东也说：「按政策比较起来，还是赫鲁晓夫比较好。」”其次，毛泽东对这种宫廷政变式的做法十分反感。中国外交部曾向驻外各使馆就此问题发通报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尽管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也可能有对的地方，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及推翻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的做法总的来说是错误的。再者，毛泽东从个人感受出发，对莫洛托夫的印象确实不好。在10月29日与尤金谈话时，毛泽东比较详细地吐露了他的看法。据尤金记录，毛泽东在长时间回顾了斯大林对待中共及他本人的态度后说，莫洛托夫的路线就是斯大林的路线，他在各个方面对待我们都不比斯大林好些。毛泽东回忆起1950年在莫斯科谈判中苏条约的情况说~那时「实际上更多是同莫洛托夫谈，而他的表现常常像一个商人，在同我们讨价还债」。毛泽东还谈起前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国收集情报的事情-认为这种做法不会不经莫洛托夫认可。毛泽东又讲了一些其它对莫洛托夫不满的话后总结说，希望苏共中央能正确理解我们，中国人对莫洛托夫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好感。尽管毛泽东也建议，考虑到莫洛托夫的威望，希望以后对他不要指名道姓地批评〔至于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作为个人则不直得注意），但接着就强调，中共中央完全赞同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这「不是因为怜悯莫洛托夫，人们反正以后会忘掉他的，而是考虑到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毛泽东又补充说，中共中央曾几次讨论过苏共中央内部的局势~最后「认真负责地一致同意支持中央主席团中和

赫鲁晓夫同志站在一起的那部分人」。56

看来，毛泽东反对莫洛托夫和支持赫鲁晓夫都是真心诚意的。

3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投桃报李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表态感激万分，他后来曾经多次说

过：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中国的声音。”作为报答，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增加对中国的援助项目，特别是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这就是10月15日签署的中苏《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议》（简称《国防新技术协议》）。这个协议的签署表明苏联对中国核援助的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也是中苏同盟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苏联走出这一步，的确是并不容易的。

早在建国前夕，中共中央对核技术已显示出兴趣。1950年毛泽东访苏归来后更感慨地谈到，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但由于斯大林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再加上战争环境，以及国家财力有限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主动问中方还有甚么要求，毛泽东趁此机会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做迟疑后，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最后，赫鲁晓夫建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赫鲁晓夫虽然对中国的要求有所犹疑，但比斯大林还是进了一步。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从物理学的角度可以说，原子弹是爆炸的反应堆，而反应堆则是不爆炸的原子弹，所不同的是，反应堆是控制能量缓慢地释放，用来产生动力，而原子弹则是在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从而形成爆炸。至少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回国后不久，10月23日，毛泽东便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兴致勃勃地谈起原子弹，并有意透露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恰在此时，中国地质队又在广西找到了铀矿，引起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5年

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甚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

器研制计划。

固然，加强原子能研究可以成为研制核武器的技术基础，但要实现这一步跨越却绝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具有各种特殊的设施、设备和仪器，更需要掌握从铀分离、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技术和工艺。美国和苏联跨出这一步用了五至七年，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当时西方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在同等时间里试制出原子弹，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但是，苏联提供的核援助虽然规模不小，内容丰富，却始终保持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范围内。

苏联限制对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除了对中国不信任以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当时苏联正热衷于同英美讨论停止核试验的问题。1956年7月16日，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原子武器的试验性爆炸应当毫不拖延地停止进行，这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是很重要的。苏联建议，或者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缔结一个三边协议，随后由其它国家加入这个协议；或者通过上述政府各自发表正式声明，保证自己不再进行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试验。谢皮洛夫还宣布，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就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的试验和实验性爆炸的问题，缔结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三国协议。

1957年1月14日，苏联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作为防止核扩散手段的片面禁止核试验的提案。副外长佐林在大会上指出，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数量的任何增长都会使局势复杂化。而苏联提案的实际结果是：即使一个现在尚不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已经掌握了这些武器的生产秘密，并已拥有必需的材料，他也不能有效地试验这些武器。这个方案的提出，必然会影响到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针。

鉴于苏联的迟疑态度，中国决定在进行核武器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始研制其运载工具——导弹。1956年1月12日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Пётр Шестов）时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在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加快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并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的图纸、资料。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彼得鲁舍夫斯基无法表态。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第五十七次例行办公会议，讨论研究和制造导

弹的问题，并决定向党中央提出报告。彭德怀说：「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⁶⁸与此同时，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副总参谋长陈赓和刚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也提出了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⁶⁹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央军委5月26日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周恩来在会议上指示：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⁷⁰但苏联对中国提出的援助请求却左推右挡，闪烁其辞。

56115105(1(11^0『丁6(^0010&5541967、118.

68 《彭德怀年谱》，页612；沈志华采访王亚志记录。

69 《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页544；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页29，70〈《聂荣臻传》〉，页544—546。

1956年8月17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应聂荣臻的请求，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要求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方面给中国提供全面的技术援助，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去苏联谈

判。9月13日苏共中央覆电称：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的情况，建议中国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然后根据这方面培养专家的情况，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苏共中央决定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人才的培养，将派专家到中国学校去工作和授课。已经指示苏联有关机构把导弹专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以及培养干部所需要的教具、样品及其技术说明送给中国。从1957年的新学年开始，苏联高等学校将设立小组，可以接受五十名中国留学生，以便培养导弹技术方面的专家。

聂荣臻对此「大失所望」。他认为，培养干部「当然也需要，但较我们原提要求相距甚远。按照这个步骤，估计至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在我国进行导弹的研究、试制和生产」，「这就大大地推迟

了我国掌握导弹〔包括无线电子学等新技术〕的时间，对巩固国防和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都不利」。因此建议，在继续与苏联谈判的同时，自力更生，积极筹建。”两天以后，中共中央以聂荣臻代拟的电稿覆电苏共中央说：为了尽快培养导弹方面的干部，除了按照苏共中央来电的意见，中国将在 1957 年新学年派去五十名留学生外，还打算将一批目前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转到同导弹技术直接有关的专业去学习。同时，准备在中国几个主要高等学校增设有关导弹技术的专业，希望苏联政府供给教学资料和教具、样品，并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教学工作。覆电还要求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谈判。但苏方迟迟不予答复。

由于苏联的消极态度，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考虑紧缩投资，迫使中方不得不考虑减少国防建设项目。聂荣臻和三样部部长宋任穷于 1957 年 1 月联名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提出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只进行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生产氧化铀和金属铀、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生产铀的化工厂，而把制造原子弹的关键环节——生产浓缩铀²³⁵的扩散工厂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考虑。

直到 1957 年初，中共协助苏联解决了波匈事件的危机后，对于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拟与苏方进行谈判，以解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究竟对中国的原子弹、导弹和飞机生产给予何种援助的问题，才有了一些结果。1957 年 3 月 30 日，中苏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苏联将派遣五名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教学组织工作，并在有关学校讲授有关〔火箭〕喷气技术的课程；按照喷气技术课程制定和提交教育计划和大纲；苏联有关高等学校在 1957 至 1958 年教学年度，接收五十名中国大学生；提交两枚供教学用的²³⁵U 导弹样品及技术说明书。中国政府将偿付苏方给予技术援助的有关费用，并保证承担保密义务。但这该协议执行得并不顺利。

作为执行协议的条件，苏方又提出很多要求。5 月 11 日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北京副代表加里宁（Гарин）少将会见聂荣臻时，传达了苏联为了在喷气技术方面帮助中国而需要了解的问题：一、中国在喷气

技术方面的具体方针；二、中国已有多少训练出来的干部和以后还

可能训练多少干部；三，建立新研究所的大致规模、期限和设备，要求苏联援助的性质和范围；四、中国可用来生产火箭技术的工业潜力，以及生产火箭武器所必需的原料、零件、半成品等工业保证来源；五、在设计、生产和使用火箭武器时的保密条件和应有的制度。苏联方面也希望知道中国方面授权何人在莫斯科就火箭技术问题进行商谈。6月18日，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再次向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正式请求，阿尔希波夫答应请示政府后给予答复。6月29日苏方把皮球踢了回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来电称：苏方回复，中方对阿尔希波夫和加里宁今年5月提出有关火箭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答复。苏方希望以书面形式尽快地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在苏方得到对问题的书面答复后，再考虑邀请中国专家组来苏具体商谈。看起来，随着美苏禁止核试验、限制核扩散谈判的深入，苏联政府在原子能和平利用与核武器研制之间所划出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

80《通荣臻年谱》’页614。

正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苏联发生了六月事件，中共中央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赫鲁晓夫渡过了难关。于是，赫鲁晓夫投桃报李，立即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表现出积极性。鉴于原子能工业发展计划尚未定案，需对1956年的中苏原子能协议进行修改，7月18日聂荣臻再次写报告给周恩来，希望政府出面与苏方交涉。周恩来批示交外交部办理。抑令聂荣臻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苏联的反应十分迅速，20日阿尔希波夫便答复愿就国防新技术援助事宜约定时间面谈。22日聂荣臻来到阿尔希波夫的寓所。在客厅里，两个人都显得很高兴。阿尔希波夫对聂荣臻说：「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受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并表示将圆满答复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任何问题。8月6日，周恩来致函布尔加宁明确提出：在原子能工业建成后，中国打算「进一步生产原子武器和它的投掷工具，请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建议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一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商谈。这一次苏联立即答复，表示同意。

9月7日，中国谈判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以聂荣臻、宋任穷、陈赓为首，还聘请了二十一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当顾问，共四十多人。谈判从9月9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等五个组同时进行。中方的组长是陈赓、宋任穷、钱学森、张连奎、王诤，苏方对应的组长是国防部副部长、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和无线电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尽管在谈判中苏联方面还是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和热情，苏方代表团团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甚至在谈判中认为中方提出的有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主动建议提出更新的产品型号。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

草案，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议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聂荣臻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顾问开会时说：苏联政府这次的确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中国得到这些援助后，再经过自己的努力，国防物质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将跃进到一个新的科学技术水平。消息传到国内，9月29日上午，周恩来委托彭德怀、李富春召集国防工业负责人会议进行研究。在听取了宋任穷和张连奎的汇报后，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提出的援助项目都是中国国防所必需的，因此积极

表示赞成，并同意照苏联提出的协议签字，签订后再从各方面继续具体商谈。10月5日，周恩来致函刘晓并告聂荣臻：中央同意由聂荣臻代表政府签订苏方所建议的协议。86

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议》。协议共五章二十二条，根据协议，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数据；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

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 1961 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等。鉴于有些工业援助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向中国交付设计和设备的期限等在协议中都未作具体规定，1958 年 9 月 29 日又签订了《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议》（简称《核协议》）⁸⁵其中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项目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也有了大致的确认，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 1959 和 1960 年。

85、《聂荣臻年谱》⁸⁶页 622

86、《周恩来年谱 1949—1976》⁸⁷中卷⁸⁸页 80。

89 吴玉昆⁸⁹；马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9！史〔1950—1985〕》⁹⁰1987 年 1⁹¹8：29—

《国防新技术协议》和《核协议》是中苏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合作的一（固里程碑，从此中国的原子能工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在此之前⁹²苏联对中国核工业的援助都非常小心地避开军事用途，据中国核工业部编研室的工作人员谈，在这次协议以前的文件档案数据中，均未出现过核武器研制的字句。⁹³另外，有关核工业方面的，专家，以前虽然是由军队系统负责聘请和管理，但其在华活动、除工作时间外，都是由外国专家局统一安排的。《国防新技术协议》签字以后，所有涉及尖端技术的苏联专家再也没有参加过外专局统一组织的活动。⁹⁴由此也可以看出，《国防新技术协议》的确标志着苏联在尖端技术方面对华援助的性质已经改变：苏联真正开始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技术装备援助了。”中苏同盟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4 中苏同盟内部的隐忧

1957 年 10 月，在中苏关系发展过程中还发生了两件不大引人注意但并非不重要的事情——朱可夫被撤职和苏中友协成立。就其结果而言：这两件事与其说表明了中苏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如说显示

出赫鲁晓夫进一步需要毛泽东的帮助更为贴切。

90 沈志华采访王亚志记录。

91 沈志华 2002 年 12 月 22 日采访宣森记录。宣森在 50 年代长期在外国专家局聘请处任职。921959 年 5 月' 聂荣臻在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根据中苏 1957 年 10 月 15 日协议, 苏联供应我国的火箭导弹、原子能等绝密技术资料 and 样品陆续到达, 现正展开消化 & 料|研究设计和试制工作。」参见《聂荣臻年谱》^页 671。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透露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据塔斯社莫斯科 26 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了朱可夫的苏联国防部长职务。朱可夫元帅及其随行人员是应邀到阿尔巴尼亚访问后于 26 日当天回到莫斯科的。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 这里面大有名堂。俄国档案证实, 这的确是赫鲁晓夫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在 6 月「反党集团」事件中, 朱可夫凭借其在军队中的影响, 拯救赫鲁晓夫于危难之中。但也正是朱可夫的一句话^「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都不能从原地移动」, 令赫鲁晓夫对日后朱可夫可能造成的威胁十分担忧。莫洛托

夫等人下台后两个月, 赫鲁晓夫就开始了他的秘密计割。他先派朱可夫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进行长期访问, 然后在主席、书记处和部分军事将领中进行秘密串连, 准备攻击朱可夫的材料。一切就绪后, 10 月 17 至 19 日召开主席会议, 通过了关于改善苏联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 而朱可夫的「罪行」就是削弱军队的政治工作, 企图以军压党。22 至 23 日又召开了国防部和莫斯科军区党员积极分子大会, 主席, 全体成员和军队最高指挥官及政工人员都出席了会议。朱可夫对此一无所知, 经历近半个月的外出访问, 26 日 14 时下飞机后, 他就赶往克里姆林宫去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当朱可夫刚刚汇报完他的巴尔干之行, 会议议程便直接转为批判朱可夫在军队中无视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的错误。朱可夫惊魂未定, 会议即讨论和通过了罢免其国防部长职务的决议。^

朱可夫是苏联著名将领, 在军中享有崇高威望, 作为六月事件中赫鲁晓夫的「救星」, 他刚刚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还荣获了第四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 朱可夫的倒台确实出人意料。很多苏联人听到

朱可夫被免去国防部长的职务时，还以为他将就任部长会议主席，取代在六月事件中名誉扫地的布尔加宁。就在四个月前，苏共领导集团刚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现在又出现一次「宫廷巨变」，赫鲁晓夫非常心虚。

为了稳定局面，赫鲁晓夫不仅需要得到党内和国内的拥护，也离不开社会主义各国，首先是中国的支持。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任何耽搁，10月28日米高扬即向刘晓详细介绍了主席团会议的情况，指出朱可夫「拒不执行」中央的方针，「坚持首脑制，反对在军队中建立党的领导」。毛泽东的反应也很迅速，第二天便召见了尤金，并说：他对苏共中央关于撤换朱可夫的决定十分满意，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苏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从而防止了一场军队不服从党中央的巨大危险，一场可能引发重大麻烦的危险。毛还说，他认为，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军队中的作用、关于加强军队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接、关于军队彻底而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中央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¹听到这个消息，赫鲁晓夫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苏中友好协会的成立也有些令人意外。中共自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后，便首先在东北解放区成立了各地的中苏友好协会，新中国成立后第五天，就在北京隆重召开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⁹⁸中国对中苏友协非常重视，从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亲自担任总会长，友协发起人有大量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各界社会名流，以及协会组建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个组织在中共高层心目中的作用。中国还出版了俄文版的《人民中国》和中文版的《中苏友好》杂志。到1952年

11月初，中苏友协会员人数已经超过青年团、工会、妇联，成为全中

国最大的「群众团体」。”按照常理，苏联也应该成立对应的机构，但那时在斯大林的视野中，中国问题在苏联的对外关系中并不占主要地位。赫鲁晓夫执政后开始重视对华政策—1954年8月苏共中央曾作出决议，责成苏联文化部「于今年10月1日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并委托由苏斯洛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准备并向中央提出组织全苏苏中友好协会的提案」，其重点是应考虑协会的以下任务：「系统地向苏

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帮助中苏友好协会广泛宣传苏联的成就；组织双方文化和社会代表团的相互交流；帮助苏联社会文化组

织‘学者’国民经济专家、艺术活动家交流经验，进行互相帮助以及研究两国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¹⁷但不知何故，苏共中央的这个决议没有得到执行。

1957年10月27日，莫斯科突然传出消息：「根据苏联社会各界人士的发起，为了进一步发展苏中两国的伟大友谊，苏联将成立苏中友好协会。」¹⁸10月29日晚，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举行了盛大的苏中友好协会成立大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波波娃（?^^）担任大会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安德烈耶夫（^^）作「关于苏联成立苏中友好协会」的报告。刘晓大使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大会通过了成立协会的决议，选举以安德烈耶夫为主席、由五十二名著名社会活动家组成的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收尽管苏中友协的规格、作用和影响远远无法与中苏友协相比，但赫鲁晓夫对此事是很看重的，并希望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在苏中友协所办杂志《苏中友好》创刊号出版之际，赫鲁晓夫亲自写了致读者的封信，并全文刊登在《真理报》上。信上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必要的创举。我向《苏中友好》杂志的读者致意，并且同苏联的一切中国之友一起表

示相信，在1958年中苏两国伟大的人民将更坚强地团结，这将使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和平拥护者高兴，使我们敌人恐惧。」¹⁹

然而，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想到，1958年恰恰是中苏同盟分裂的起点，而这种隐患在1957年已经开始显露。

这里所说的隐患，并非中苏两国的政策方针发生了分歧——如前所述，当时中苏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中没有分歧；也不是指中苏两党在观点上有甚么分歧——如前所述，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和平过渡」的口号和对斯大林的评价两个问题上，而对于前者，中共一直没有表露出自己的看法，对于后者，苏共已经愈来愈趋

100 《中苏关系：（我国档案原文复印件，编），第九卷，页 2254—2255。

101 　　’ 〈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28 日。

102 　　〈人民日报〉^1957 年 10 月 31 日。

103 　　〈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2 日。

向于接近中共的看法。当然，这里更不是说在中苏关系中存在甚么不平等的障碍。刘少奇和周恩来确曾在莫斯科批评过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但那都是针对苏联与波兰关系而言的。在中苏关系中，赫鲁晓夫的确非常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也一再表白，他所说的中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都是讲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很好，他很满意。11)5 所谓隐患，这里指的是中共党内，特别是在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大部分干部中，逐步滋生的某种轻视苏联、蔑视赫鲁晓夫的心态和情绪。

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和地位明显提升，大部分苏联党员甚至赫鲁晓夫本人都对中共的理论水平和处事经验佩服不已，赞不绝口。据中国驻苏使馆报告，在 1956 年 11 月彭真率领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期间，「对苏联在政治上起了很大的支持和配合作用，对于苏联人民起了很大的鼓励与教育作用」。《真理报》、《消息报》对代表团的评价很高，称「代表团在苏停留的日子是中苏友好的盛大节日」。代表团的活动大多刊登在苏联报纸的头版，且常配发照片。彭真的讲话也大多全文发表，并作头条新闻刊登。赫鲁晓夫还特邀代表团全体成员到克里姆林宫看苏联原子弹、氢弹和导弹试验的秘密电影。使馆认为，「苏方的盛大接待是超过其它任何国家议会代表团的，这就使我国的代表团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同代表团的接触中，苏联领导人一致强调指出「中国党的领导成熟、中国党的高度马列主义水平、高度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除感谢中国党对苏联党的支持外，他们还一再检讨「苏联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和错误，希望中国同志能坦率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并一再强调要向中国党学习」。赫鲁晓夫曾说，他为错误而焦急，并急迫地希望改正错误，他觉得要向中国党的谦虚这一点学习。106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 1957 年 2 月 10 日报告，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特别是波匈事件和苏联政府 1956 年 10 月 30 日宣言发表以后，在我

国各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作风有了显著改变。他们更加谦虚了，处处表示十分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他们提出建议比以前更加慎重，并一再声明，请中国同志按照中国具体情况，研究采纳。^

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发表以后，受到各共产党国家的高度赞扬。匈牙利党的机关报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的社论，认为毛的讲话提出了新的、创造性的观点，指导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社论还着重指出，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匈牙利有着重大的意义。捷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发表署名的长文〈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新的问题〉，其中指出：及时认识到社会变化的历史意义，及时认识到在新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必然性和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性，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来领导各社会阶层前进——这一切都保证了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强大的，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人民论坛报》总编辑卡斯曼（！：肪！！如）说：中国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应用。则据新华社报道，毛泽东的讲话刚发表，苏联《真理报》便以三个整版篇幅刊载了全文，还准备出版单行本，莫斯科电台也广播了全文。苏联人民，首先是学术界，对毛泽东的演讲表现出极大兴趣，人们争先购买当天的《真理报》，以致在报刊零售点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不少大学自发地把这篇演讲列为试题之一。苏联哲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同志不但概括了中国经验，而且概括了苏联经验」，讲演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与此相对应，苏联共产党以及赫鲁晓夫本人在中共干部心目中的地位却大大降低。

这种情况最早反映在对待苏联专家的态度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传建到基层后，人们对「以苏为鉴」的理解出现了龃差。在外国专家局 1957 年 2 月 10 日的报告中，列举了在许多基层单位出现的「对苏联专家冷淡、疏远，不虚心地向专家学习，甚至傲慢无理的现象」。其表现是：一、某些部门由于没有积极主动地安排专家的工作，致使专家感到无事可做。如地质部技术司一个季度只给某专家安排了二十天的工作，最近该部专家组长也因没有及时给他安排季度工作而提

出：「如果不需要我们的话，可以辞掉 907。的专家。」二机部劳动工资专家也因无事可〕故希望提前回国。二、某些部门的领导人同专家联系不密切，没有及时向专家介绍业务情况，供给业务资料。如税务总局 1956 年第四季度税收工作的指标已经在《大公报》发表，却没有给财政部的专家看。三、某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专家表现骄傲自满情绪，甚至不尊重专家，不愿与专家合作进行工作。如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工程师曾傲慢地说：「我们不需要苏联专家了，我们需要的东西，专家给不了，专家给的东西，却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还说：「我们贯彻百家争鸣的政策，专家走了、我们就解放了。」¹¹¹（1 苏联专家对此当然是有所体会和反映的。一名在高教部工作的苏

109 《内部参考》，1957 年 6 月 26 日' 页 16—17；1957 年 7 月 3 日' 页 15—30。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中 1109-01714-01~021 保存着近二百页苏联各界人士给毛泽东的信件，其中充满了赞美和崇拜的言词。毛当时在苏联人心目中的地位^ 由此可见一斑。

110 福建省楼案馆^ 136-9-294^ 页 6—10。
联专家总结了与中国同事谈话的内容，向莫斯科报告说^ 中国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还能不能推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马列主义的基础课本，通过议会斗争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与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有矛盾，斯大林提出的战争不可避免论是否已经过时，苏联怎么评价《人民日报》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算不算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除了南斯拉夫问题，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犯有哪些错误？如此等等。¹¹¹ 更有一些专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如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专家对其中国同事说' 看来，有的中国同志认为苏联的经验有缺点；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专家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针对一篇中国学者的论文指责中国是一胜利冲昏头脑」，忘记了「国际无产阶级」。

113 胃内部参考'、^ 1956' 卞 11 月 21 口' 页 509—510。

114；内部参考'：、-1457 年 7 月 49^ 页 15—18：7 月 5 日. 贡 5—6；7 月 8 日' 页 76—86。

波匈事件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苏共的政治水平已经落在中共后边。

如黑龙江省很多党员干部对苏联领导人不信任，说「苏联领袖一点不稳当，搞得乱七八糟，弄得兄弟党很被动，使社会主义阵营陷于混乱」。还有不少人指责赫鲁晓夫「野心勃勃，有个人企图」，「到处跑，到处讲话，把事情搞得愈来愈糟」。有人甚至主张「彻底清算赫鲁晓夫的领导路线」。特别是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事件发生以后，上海部分大专中学师生担心苏共会变成机会主义，认为「如果事情发生在我国，不至于像苏共那样处理」，有人还提出，事情发生后「为甚么不来请示一下毛主席」。吉林省、安徽省、成都市广大干部则普遍对赫鲁晓夫表现出不信任和不满意的情绪，认为他在政治上不成熟，处理问题形而上学，否定一切，简单粗暴，排除异己。有人要求中共中央应立即表态提出质疑，并写信给苏共提出意见。还有人提出「苏共已经不配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了」。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安心了。据驻苏使馆报告，自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在相当一部分留学生中，产生了一些偏激情绪。不少学生失去了继续在苏联学习的信心，要求回国学习和实习的学生增多。特别是在「大鸣大放」运动中，各种指责苏联党和政府的言论汹涌而出，此起彼伏。如「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既称大公无私，那么贷款就不应当要利息，要了利息就不是无私的援助。」「苏联专家是饭桶专家，不解决问题。」「苏联是一党专政，国内民主受到许多限制，斯大林的错误，不只是个人崇拜，而是一党专政。」「苏联共产党和德国国社党、意大利法西斯党没有甚么区别。」「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利用共产主义在各国掀起革命，破坏国际秩序，干涉别国内政。英美的东西应该大胆地学，苏联的东西应该批判地学。」如此等等。¹¹⁶

在这样的气氛中，很多人提出，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应该让位于中共。这类的言论有：「苏联出事都是在领导人身上，而我国没有，这不是中国比苏联好吗？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对比，好像中国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成熟一些。中共虽成立只有三十六年，但从1935年以后就正确了，苏共成立虽比我们久，但老出问题。」「南斯拉夫对苏联发表文章不同意，但中国的文章一出来，铁托就不叫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混乱现象也澄清了。」「苏联马列主义的发展已落后于中国，为甚么中国还要说以苏联为首呢？」「社会主义阵营不一定

要以苏联为首：而应以中国为首。」¹¹⁷

固然，在实行「领袖外交」的国家里，社会舆论和公众情绪不会成为对外政策的基础，相反，国家的政策却完全可以导向社会舆论和公众情绪。建国初期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在

115 李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 1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 月 41 页。

116 上海市档案馆 82-2-601：页 32—34；《内部参考》，1957 年 10 月 25 日，页 6—7；

10 月 29 日，页 7—10。117 《内部参考》，1957 年 10 月 25 日，页 6—7；10 月 29 日，页 7—10。

朝鲜战争期间很快就转变为仇视、鄙视、蔑视美国的心态，足以说明这一点。’”但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1956 至 1957 年中国出现的对苏联和苏共那种反常的社会心态和情绪，多少是受中共领导人影响而形成的，尽管其中有很大错误理解的成份；第二，这种心态和情绪后来构成了毛泽东改变对苏政策和提出「反修防修」理论的社会基础。不过，当时中国的方针是对苏友好。1957 年 4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指出：「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中，虽然曾经发生过某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国际团结合作仍然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社会主义各国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共同的指导思想，因而在原则问题上是有—致的基础的；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不同意见，也是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取得—致。并且会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增进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直到年底，中共的主导思想依然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坚持对苏友好和巩固中苏同盟的方针。所以，上述对苏联的看法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多被作为右派言论受到批判，而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则以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指导者的姿态全力维护苏联的形象。

二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

1 中共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在很多人眼里，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是苏联首先提出的，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邀请书是苏共发出的，会议是在莫斯科开的，人们便以为苏共是莫斯科会议的主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档案材料显示，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及在会议上发表共同宣言的主意，都是中共提出的。不仅如此，在会议准备和召开过程中，毛泽东也发挥了极其重要和独特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和新思路，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也确实「捅了漏子」，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动荡和组织混乱。如何稳定局势，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

共产党于 1957 年提出的。参昆罗宾·艾莉森·雷明顿著《上海师大历史系世界史翻译组

译：《华沙条约》I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 1 月 46 页 3 显然更是远杂事实的。121 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 5 其目的一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

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 172—187 页。122 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努力是计划在 1951 年初再次召开情报局会议 II 并提议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但遭到陶里亚蒂的拒绝，设想中的会议也未能乐

行。参见 61)6(1^00 厂羞 110161^丁&!^!!!-? "1160X111"!^ P!!^!! ""甲丁甲"X。""帅 0

口";1 " 80 叩 01; "" (: 7. 1? "" , 1996. 1^0 人 0. 156-161. 123? 「八 911011. 8. 11. 389. ; 1. 67-69. 0 甲纤。上 XI"" (; "&": —. . . P I0(^3110! ^"1^

1^11001954-1964, 丁。"1.^! 印瞻! ^01301-0150^1. 1)^163 训"I32"

脚一 0: 16110 「15;! ""! ""

”。(; 现: (^ (: ! ^ , 2003, 0.106-107.927 ^

在斯大林时期, 社会主义阵营的表现形式是 1947 年成立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 ’ 后来由于苏共强迫大家批判南斯拉夫和截托, 并直接参与和指挥对东欧各党的清洗, ’ 清报局在社会主义各国名声极坏。到 1952 年, 即在斯大林去世前、情报局的活动就基本上停止了。122 鉴于清报局浓厚的斯大林色彩, 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二十大期间开会决定予以解散, 同时讨论了国际共运今后的活动问题。米高扬建议成立一些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 并继续出版杂志或报纸, 这个建议被多数人接受。赫鲁晓夫则提出这个组织的名称可以叫做「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和中国代表会晤, 听取意见。13 大会期间苏共是否与

各国党商谈过这个问题, 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材料, 只有南斯拉夫驻苏大

使米丘诺维奇 (^ (^ . (^ (: ! !) 回忆说, 3 月 29 日赫鲁晓夫与他谈话, 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 国际形势本身要求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组织、欧洲两个, 亚洲一个-美洲一个。赫鲁晓夫一再强调,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 联合行动, 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 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他还特别提到要去中国, 因为「中国人有甚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 : 4

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的想法, 他曾经对情报局一类的国际机构很感兴趣。当 1947 至 1948 年中国内战爆发而中共已经决定与苏联结盟时, 毛泽东对共产党情报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 至少在苏共看来、中共可能有意搞一个「东方共产党情报局」。化 1949 年春, 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给中共中央写信, 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但毛泽东认为中国内战尚未结束, 时机还不成熟, 没有答应。佻 1949 年 7 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 又提出中共参加欧洲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根本没有必要」, 但认为东亚各国的情况与

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127 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此事又耽搁下来。到斯大林去世，特别是 1955 年中国紧随苏联之后与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时，情报局在欧洲已经无人理睬。在这种情况下，重提建立类似情报局的共产党组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苏共的建议被中共轻易地否定了。

1956 年 3 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他在会谈中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建议：「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显然，中共也主张各国共产党应该协调行动，但活动的方式不是建立机构和办刊物，而是开会解决问题。目前看到的史料没有显示苏共对此作何反应，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当时苏共因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混乱而面临窘境，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局和创办新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尽管还没有商量好如何可继，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却是大家的共识。4 月 13 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4 月 18 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由于形势的变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无论就其组成成员来说，还是就其活动内容来说，都已经不适应新的条件了。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在 1947 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此经过相互协商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出版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公报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这条消息。13(1

129~“卿 II 口应,“!”^!!):。1954-1964, 丁。“1.0^933^

130 《人民日报》，1956 年 4 月 19 日。关于情报局解散过程的研究，详见厂“《^”？。

兄 143148031!“X《0”!“1*0!”)^0。“。^&!!!””3 口、1181!””1(13 丁””! 10811! 1118086111113!!

”口。., 1993. ^0.4^0.131-152.

情报局是解散了，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繫与合作还是必要的。在4月13日给东欧一些党关于解散情报局的信中，苏共中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繫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为此’6月22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华沙条

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 I4：和工人党之间相互接

触的形式问题。132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圈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鉴于此前出现的问题，决议对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做了许多限制性解释，同时提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繫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决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画结尤其是必要的」。^这一点不仅苏共和中共看得很清楚，其它各国共产党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加^）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表示拥护苏共的决议，并指出，情报局停止活动后，各国共产党日益仔细地考虑各自国家的民族特点，但必须加强联繫，以解决「国际土人运动的方向问题和各共产党之间的, 结问题」。134正在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的时候，爆发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拖了下来。

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显得更加必要了。毛泽东和中共对波匈事件非常关注，化在危机处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响，帮助莫斯科化险为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特别是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大概是鉴于莫斯科面临的邈她和被动局面，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召集各国共产党议事，理应由中共出面了。于是，在1957年初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善后事宜期间，周恩来便主动再次提出了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不过，这时中共虽然继, 镶同苏共「交换了意见」，…但私下考虑的会议召集人却不是莫斯科，而是北京和贝尔格莱德。

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离开自己的座位，特意找到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团结，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向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眼下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已经授权他同铁托商谈。米丘诺维奇提出，为了能更确切地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比如召开这个会议的倡议是谁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参加，会议是否还会举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又强调：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人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虽然不是很坚决~但周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不过，那样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还说，会上将研究创办各国共产党新的报纸的问题，但中共反对这样的做法。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8

此前，周恩来确与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通过电话，要求他临时拜访一次铁托，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于是1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彭真向铁托转

137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7年第3期’

页7。

138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页267—270；《周恩来年谱’1949—19761》^中卷’页13—14。

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铁托表示，关于召开各

国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者多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一南共的态度令中共进退两难，因为事前并未向苏共提到会议召集人的问题，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彭真只是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

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而如今这两家的意见已大体一致，苏共只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开会解决问题。”为此，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鉴于南共的态度有些勉强，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通报各国共产党会议的问题时不要表现出强迫态度和过分热心，可先进行双边会晤。会议认为应同中共商议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了，并委托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准备给中共中央的信函。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给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

莫斯科来信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着实令中共吃惊。按说，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而来信却说「根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应该由中共中央主持会议的筹备工作。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毛泽东一改原来的设想，答复苏共中央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 II 备召开。但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建议不要匆忙地开会。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过了四个月，苏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开会议，并建议在7月就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日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这次不好再推脱了，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会议，但还是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可以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一致的意见就写上，不一致的就不写。考虑到这个文件要公诸于世，中共主张会议

之前要在共产党之间充分交换意见。草案要经过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中共认为，这样做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麻烦一些，但是，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是有好处的。1”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六月事件。这次事件的结果再次使中共占据了主动地位，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也更加言听计从了。

赫鲁晓夫度过难关以后，感到召开一次共产党会议的事情不能再耽搁了：在接连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后、不仅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苏共新领导集围的地位和路线也必须立即得到大家庭的认可。同时，苏共在这件事情上也更需要依赖中共的支持。鉴于此前毛，东曾两次拒绝苏联的邀请，7月5日米高扬在杭州向中共通报苏共六中全会的情况时，小心翼翼地问：「毛泽东同志甚么时候去苏联？」还有些焦急地说「这件事我已经问过三次了」。毛泽东答曰：与伏罗希洛夫商议的是11月去，但现在还不能定，因为我们国内的形势紧张。1”米高扬回国汇报后，赫鲁晓夫对中共公开表态支持自己十分满意，但对毛泽东模棱两可的答复感到担心。于是，苏共中央决定通过外交渠道正式询问中共的意见。7月9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约见刘少奇，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尽快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回答说：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个共同的想法一致的文件来。’”中共的答复给赫鲁晓夫吃了定心丸，苏共开始积极进行准备。在莫斯科看来，只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其它党的意见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14618 明复、朱瑾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一）〉
^页 11 — 12；

毛泽东与米高橡谈话记录，1957 年 7 月 5 日。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文献出版社^1996》：页 405。

波匈事件后苏南关系有些紧张，为了进一步搞清铁托的态度，苏共派专人去南斯拉夫商议。8 月 18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自贝尔格莱德发来电报说，与卡德尔（！^&^）、兰科维奇（！^!^。””等人会谈的结果是，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不参加共

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也不接受共同宣言，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南斯拉夫的国际处境复杂化。苏共中央主席团于当天召开会议，决定将已经起草好的宣言草案寄发给原共产党情报局各成员国，其中特别要求驻波兰大使应亲自向哥穆尔卡通报。会议还确定，只要这些党认为适宜，即使南斯拉夫拒绝，也要召开协商会议。’”很可能也是在此时决定，利用各国党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的机会，召开协商会议。第二天，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便致函毛泽东，正式邀请他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同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若干其它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信中还说，为了把这个会议开好，苏共将把准备提交会议通过的文件，交给中共中央征求意见。15。对此，毛泽东欣然接受。而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弟党透露出毛泽东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暗示将在庆典期间召开重要会议—并且希望各党「也派遣自己的第一号人物来莫斯科」。15110月6日’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商量的访苏代表团的问题—15：

10月22日周恩来向苏联使馆通报了访苏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和动身日期’”但此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即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尚未经过中共认可。直到10月28日，尤金送来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私人邀请信，建议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以及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会议；并把他们起草的会议宣言草案送来征求意见。苏联大使称，这份宣言草案已事先送给南共中央征求意见，南共领导人不同意这份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草案翻译后，分送有关领导人。胡乔木看后认为需要修改，毛泽东又问邓小平的意见，邓也认为必须修改。于是，毛泽东指定胡乔木动手修改，并指示，在文字上尽可能保留苏共中央的草案原稿，但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胡用两天时间对草案做

149? 「八 911011.12^8.1008, 几 18-19, —””! 1: 00^3”! 1954-1964. 丁。”1.^274, 1018。

150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1957—19691》^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1，页 209；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

第二：欠访苏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 1—0’ 页 12。

151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 页 416。

15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 页 84。

153 周恩来与尤金谈话记录 1957 年 10 月 22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缩微 109-00787-18 页 79。

了较大改动，有的部分几乎重新写过。经粗略统计，对草案的修改约一百多处，较大的补充有二十余处，删节三十余处。胡乔木所增加的重要内容主要有：和平力量的增长，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硬要发动战争，则必然会在战争中自取灭亡；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毛泽东看过修改稿，并特别欣赏最后一段表述。~

10 月 29 日晚’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见了尤金大使。关于这次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见经过，目前中国和俄国的档案都已披露，记录内容大体一致。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从苏共中央收到的关于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文件、有些初步意见。总的来说，草案需要大量删减，只保留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些个别意见，准备到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详谈。

毛泽东主要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关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毛泽东说：「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中共认为，如何表达这个思想，是一个文字问题，但这个思想一定要在宣言草案中明确地表达出来。

第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草案中说，近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日益接近。我们并不怀疑，应当争取与社会党人共同行动，特别是应当把社会党的普通群众争取到共产党人一边来。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应该更一般性，不应当仅仅突出地提出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而是要找这样一种提法，以便能把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去。

第三，辟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待中共的错误路线的历史后说，中共中央完全赞同苏共中央六月全会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但是在宣言中是否就不要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毛泽东说，我们提出这项建议并不是因为怜悯莫洛托夫——人们反正以后会忘掉他的，而是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利益。接着，毛泽东谈到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了。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同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地正确理解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此时尤金插话说，在苏共二十大的决议及苏共中央后来的言论中，丝毫也没有讲到要无产阶级放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武装斗争。二十大决议只是辑，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对于若干国家，工人阶级用和平方法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也就是说，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存在的形势下，可能为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创造有利的条件，足以迫使资产阶级后退，从而避免武装斗争。尤金认为中共对苏共关于个别国家通过和平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的评价，显然是一种误会。毛泽东对这一看法表示非常赞许。最后，关于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表现形式，鉴于南斯拉夫、可能还有波兰，不同意宣言的内容，毛泽东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经过事先充分讨论后决定通过并发表宣言，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宣言也要通过。毛泽东形象地说：这样做，「天下不会大乱」。

第二个方案是经事先讨论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只表述一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问题，如要团结和统一行动，争取和平和反对

战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等等。第三个方案是只由中共和苏共两党发表声明。如果有人提出为甚么只有两个党发表声明，可以回答说，这两个党是最大的党。这个方案也要事先讨论。毛泽东请尤金尽快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赫鲁晓夫，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了解中共代表团将带着甚么问题去莫斯科。显然，毛泽东倾向于第一方案：耐心做工作，搞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文件。

10月3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鉴于需要商议和修改的地方较多，决定毛泽东提前去莫斯科，到那里起草一个稿子，提交苏方讨论。政治局会议还批准了10月2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代表团的方针的决议。11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尤金10月30日电告的毛泽东谈话内容。会议作出决议，否定了只搞一个简短公报的方案，而接受了毛泽东的第一方案：即使南斯拉夫人不同意，也要发表宣言。会议还认为，如果通过共同宣言，那么也可以同时搞一个中苏双边声明。最后，会议要求苏斯洛夫等人考虑中共的意见进行修改，尽快提交主席团。当天，毛泽东率领一个庞大的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2 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召开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有一点是中共和苏共一致追求的，那就是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把这次莫斯科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赴苏代表团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从后来的结果看，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主要是处理好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弥合苏联与波兰的关系，调解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其中对应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是：一、中苏之间对和平过渡问题的观点分歧；二、波兰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提法；三、南斯拉夫拒绝参加执政党会议和在宣言上签字。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起草一个令各方都能接受共同宣言，处理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

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件事：起草和通过《莫斯科宣言》。从11月3日中苏两党开始交换意见，到10日基本达成一致，然后又交给各国党讨论，成立起草委员会修改，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49日）完成定稿，进行报告和签字。在此期间又决定分别召开两个会议，执政党（南斯拉夫不参加）单独签署《莫斯科宣言》，全体共产党、工人党另外签署一个《和平宣言》。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不同看法的争论，苦口婆心进行说服，想方设法达成妥协、所有这一切求同存异的努力都是在起草宣言的过程中完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重要的问题是与大家商量搞出一个会议文件，「开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中共代表团颇费了一番周折。

160 吴冷西：《十年论战》' 页 97-90。

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天，赫鲁晓夫登门拜访。毛泽东说，我提早到来就是为了宣言草案。我们要搞一个好的宣言。我们党也准备起草一个稿子，供你们考虑。11月3日晚' 中苏两党举行会谈，首先讨论了起草文件的问题。关于会议是否要通过一个共同宣言的问题，赫鲁晓夫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这自然是符合毛泽东的心意的，他没有再发表意见。关于苏方的草稿，赫鲁晓夫说，正在根据中共的意见进行修改，比如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得短一些等。毛泽东表示，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中方都同意。他建议由中苏共同研究和修改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毛泽东还提出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以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仍然表示不赞成，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它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毛泽东建议，还是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毛泽东主张他们不在宣言上签字，宣言中可以

提一句：对文件中的各点，十二个执政党（不含南斯拉夫）必须执行
对资本主义国际的兄弟党只是作为建议提出。…

中共代表团从 11 月 3 日晚上即开始修改草稿，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到 11 月 5 日完成。同日，苏共中央也提出一个修改草案。11 月 6 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分别由邓小平和苏斯洛夫领头开始会商。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的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

161；毛泽东传 19761' 页 728~733。

162 阎明度：〈回忆两次莫斯科会 81 和胡乔木〉' 页 10—11：吴冷西：《十年论战》

页 97—99。

毛泽东来莫斯科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沟通与波兰的关系。毛泽东关注波兰，不仅是因为十月危机导致苏波关系紧张，需要中共从中调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比较欣赏哥穆尔卡，认为他既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敢于反抗苏联的大国主义。所以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三次与哥穆尔卡谈话，而且第一个拜访的也是哥穆尔卡。11 月 6 日毛泽东来到波兰代表团驻地，这次谈话双方只是初步交流看法。毛泽东先大致介绍了召开会议和起草宣言的准备过程，并强调宣言「只涉及共同问题，不涉及各国内政」，而且必须同大家商量。谈到国际形势问题，哥穆尔卡认为，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固然占了上风，但还是应该避免局势紧张化。作为举例，他指责「在朝鲜进行战争的政策是错误的」。毛泽东说，发动战争是斯大林的错误，中国开始不想打，后来担子落在肩上就必须挑起来。然后毛泽东把话锋一转说，那时是「斯大林一人决定事情」，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组织个团体有事大家商量」。其它还涉及许多问题，如对美国态度，对苏联的看法，超英赶美的问题，夺取政权以后革命是否就最终胜利的问题，以及当前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问题等等。毛泽东和哥穆尔卡都是点到为止，没有深谈。

164

11 月 8 日中午，中苏双方代表再次会商，就宣言草案交换了意见。双方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和平过渡的问题分歧依然没有解

决，决定各自再行考虑，10日继续会谈。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问题，是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的。苏共认为，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和平共处，因此出现了和平过渡的新的前景，其中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的过程，一个是指取得政权以后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这里发生争论的是前者。在苏共最初宣言草案中的说法是：

由于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而为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新的前景。工人阶级追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在某国家里，共产党员

164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传 11949—19761〉I 页 7321 中引述的毛泽东谈话还有这样一段：「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商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笔者看到的会谈记录有这个意思，但原话不是这样讲的。

165 扬尚昆：《杨尚昆日记》1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 289；板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 页 10—11。

力争通过与社会党人结盟和争取议会中牢固大多数，以及深入地开展大规模的非议会的革命性阶级斗争的途径，把人民的绝大多数困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并能够摧毁反动势力的抵抗和确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种愿望的实现，将会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

经过修改的第二稿，在这一点上基本没有改动。而中共的看法是必须提出两种可能性，并且应该强调武装斗争的前景。

为了说服苏共，毛泽东决定主要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工作。11月7至9日，毛泽东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会谈一次，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 1? 0

出 10 和总书记高岗；0011311¹会谈两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指出，在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是否坚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和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不宜过分强调和平过渡。这几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同意在宣言上提出两种可能性。其实，西欧各党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法共倾向于武装斗争，意共更强调议会斗争，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为此还在莫斯科吵了起来。英共则认为，在英国下一届政府可能是工党上台，这对和平过渡更有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过多强调武装斗争问题，而中共提出的两种可能性的说法，则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方案。¹⁶⁶

11 月 10 日中苏两党会商前，各自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11 月 11 日把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准备的大会报告分发给各兄弟共产党代表团。关于宣言

166? 「八 91100.12¹; —“咖 0(^3110! ^”11^1411001954-1964. 丁 0¹.

0.1022;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页 58—60；吴冷西：《十年论战》，页 97—98。167 《毛泽东传〔1949—1976〕》’ 页 733—734；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记录、1957 年 11 月

8 日；毛泽东与波立特’，谈话记录’ 1957 年 11 月 8 日；吴冷西：《十年论战》¹⁶⁷

页 106—107、133—134。草案，委托苏斯洛夫等人与中共代表协商，继续完成宣言文本的制定工作。会议特别指出，关于协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即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问题，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中共代表团认为，苏共的主要顾虑是，如果改变对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就无法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这样很难向苏共、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代。估计到苏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维护团结，又坚持原则，邓小平提出，是否可以就和平过渡问题，向苏共提交一个书面的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中共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同时，在宣言草案中，照顾到苏联的观点，对和平过渡问题有所阐述。毛泽东同

意这个建议，指定陈伯达、胡乔木起草这份意见提纲。169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的同时，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代表团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方的宣言草案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当日下午，中苏两党起草宣言的小组再次会谈。邓小平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双方经过磋商，终于就全部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以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的名义将草案提交各国代表团讨论。P。

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宣言草案，授权代表团定稿。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听取并通过了关于宣言草案的修改意见，确定由起草委员会直接与中共代表商议定稿。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代表画还商定，建议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圃不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4日召开的会议，以免增加他们国内工作的困难。经与各党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在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之后，再召开世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这个会议的文件，即《和平宣言》委托苏联和波兰党的代表起草。171

至此，中苏之间一个最大的分歧意见得到解决。与苏共的草案相比，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按照中共的意见，有两点重要修改：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没有使用「和平过渡」的说法）的同时，还指出了非和平过渡道路，并强调「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时，同时提出应在议会外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条件。」至于中共的意见提纲，当时只提供了苏共，既没有在大会上公开，也没有提交给任何其它党的代表团。直到

1963年中苏大论战时，这个文件才公布于众。实际上，中共《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在原则上与宣言的提法没有分歧，只是又增加了两点：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争取同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但不能模糊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

限。〔73

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言，当时中国的外交方针与苏共的观点，特别是经过修改的宣言中的提法，基本是一致的。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宣言修改草案的当天，周恩来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一个报告。周说，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定要衰亡下去。这是肯定的、必然的趋势。因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敢于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通过和平竞赛可以使帝国主义一天天削弱下去。我们提出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政策，但并不怕、也不会疏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要警惕战争的危险。关于国家的过渡，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四五年来，国际形势一般地说是趋于和缓的，但是并不排斥在个别问题、个别地区、个别一段时间内会有紧张。

这说明，中共代表团（主要是毛泽东）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坚持不同意见，核心的考虑是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因为这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而苏联坚持和平过渡的提法，主要也是为了与苏共二十大路线衔接。如果在共产党国际会议上按照苏联提法表述这个问题，就等于确认了苏共二十大的国际意义，说它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那么中共的革命经验将置于何地？吴冷西的这个感受是准确的一这才是中苏分歧的实质。中共代表团表面上争论的是「和平过渡」的提法，实际上是不愿意在共同宣言中提到苏共二十大。否则就很难理解，为甚么宣言已经按照中共的要求在谈到「和平过渡」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而在起草委员会上中共代表团还是声明：「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显然，毛泽东在此是作了妥协和让步的。宣言中提出两种可能性，这是求同；中苏两党分别强调不同的道路，这是存异。但恰恰是这种求同存异的做法，为以后中苏论战埋下了伏笔，中共为此后悔不已。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私下会谈中，说得最多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以苏联为首」。自 1956 年初以来，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信受到严

重

打击。中共意识到，苏联不仅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也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且长期担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首领。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维护苏共的威望，坚持「以苏联为首」。当然，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政治经验不足，马列主义不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处理国际共运事务中也捅了不少「漏子」。但至少在目前，无论就国家实力还是国际影响来说，只有继续把苏共推上领头羊的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和统一。据杨尚昆 1957 年初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谈到中苏关系时讲：中苏之间矛盾不大，主要问题上比过去更靠近些，但还有一些问题。因为历史习惯不同，他们思想、做事的方法不同，要等候，要做工作。思想不同要谈心，有事要商量，要开会。形势会压迫他们有所改变，而且已经有些改变了。只能逐步地改变，不要忙，并且帮助他们。继续这个方针，有意见当面直接讲。与苏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不一致。矛盾总是有的，只要大体过得去，求同存异，不同的将来再说。毛泽东在党内这样谈「以苏联为首」，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姿态，似乎是以一个国际共运指导者的姿态来维护苏联的形象。

毛泽东刚到莫斯科，就提出了「以苏联为首」的口号，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¹⁸（1「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提法，尽管在中国的报纸上一直频频出现，但从波匈事件以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不大使用了，甚至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提到苏联的领导作用，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表述。^{18'}因此，在苏共最初起草的宣言中，按照苏共主席的建议删去了所有提及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用语。赫鲁晓夫回怼说，当时他的考虑是，在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后，这类词句还写进国际宣言：有可能被理解为试图恢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式的领导方式，是试图重新确立苏共对其他兄弟党的领导权，进而有可能被理解为是试图改变各国共产党现在建立在平等合作原则基础之上的新型相互关系。看到中共起草的宣言提到「以苏联

为首」，苏共中央感到出乎意料，不好理解。于是，毛泽东解释说：我们所以坚持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你们才能够领头，你们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了四十年社会主义。我们中国是当不了头的。赫鲁晓夫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182

对于「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波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党在讨论宣言时曾明确表示反对，其它很多党的代表内心也不赞成，只是保持了沉默而已。183 所以，毛泽东除了劝告苏共接受这个口号外，还要说服其它各国共产党。在 11 月 14 日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就专门谈「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毛泽东首先讲到需要有一个党为首，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毛泽东接着讲到为甚么要以苏联为首。他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而「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尽管苏共

182 赫鲁晓夫着'马贵凡译：《《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〇人中共党史八料》'总第 71 辑'页 192—193；吴冷西：《十年论战》'页 131—132。据中国驻苏使馆汇报，早在 1955 年 2 月，即赫鲁晓夫访华后，在苏联就出现了「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参见中国外交部楼案馆-109-00969-01'页 1。

183 吴冷西：《十年论战》'页 131—132。

也犯过一些错误，但目前还是它的实力最强，「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苏联放了一颗五百公斤的小卫星，已经跑到帝国主义前

头去了。毛泽东问赫鲁晓夫-再搞一个五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行不行 3 赫鲁晓夫有些犹豫地回答：大家共同努力有可能。毛泽东以命令的口吻说：「大家共同努力那也对，主要由你努力。」讲到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毛泽东指出，那主要是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现在我感到有一种平等气氛。」毛泽东最后总结说：「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在毛泽东讲话的这一天，赫鲁晓夫安排接见了美国「合众社」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夏皮罗（^!! 叩^）。夏皮罗提出：「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因此又引起人们谈论可能成立新的共产党国际组织，例如新的共产国际或是共产党情报局，不知确否 3」赫鲁晓夫回答：「我们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建立这种组织。共产国际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积极作用。共产党情报局也起了自己的作用。共产党和工人党现在已经非常巩固了，已经不需要有某种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了。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定期举行会议和会见，我们是不反对的，这种形式对我们有利。」这段对话，无疑是对毛泽东讲话的最好脚注。

186II 尚昆：'^尚昆日记：，'-0:292；吴冷西：《十年论战》'页 98—99。

然而，各方的意见并没有平息。11月11日宣言草案发给各国代表后，便收到了不少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于是，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中苏两党提交的宣言草案。15日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一天，争论很激烈。主要的反对意见还是来自波兰代表团，他们提出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此外，还不同意美帝国主义或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等一些提法。下午5点半休会，邓小平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定立即去波兰代表团住所，同哥穆尔卡当面交换意见。187

在会谈中，毛泽东与哥穆尔卡先讨论了一些枝节问题，并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如「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改为「美国的某些侵略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等。但是在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上，会谈陷入了僵局。哥穆尔卡态度强硬地说，在共同的文件中只

能包括大家都同意的东西，而目前文件中还有些东西是波兰不能同意的，如果需要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波兰就不准备参加会议了。毛泽东好言相劝说：大家都作些让步，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苏联党有了很大进步，让苏共当召集人的意见是中共提出的，召集人并不决定任何问题等等。不管毛泽东怎么劝说，哥穆尔卡坚持反对在原则上确定苏共为以后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集人。波兰人后来退了一步，提出是否可以搞一个内部决议，委托苏联召集会议，但不写在宣言上。毛泽东不再坚持了，最后表示：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帮助他们，支持他们。188 从会谈记录看，毛泽东的劝说起到了一定作用，现场翻译李越然认为，哥穆尔卡接受毛泽东的说法是很勉强的。另一个参加会谈者杨尚昆的感觉是，「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会谈后，毛泽东又连夜约见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等人，转告哥穆尔卡的意见，并讨论了第二天会议的问题。

11 月 16 日上午，起草委员会再次开会，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下午召开全体会议，首先由苏斯洛夫报告了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然后是毛泽东带头发言，表示同意。毛泽东说：「我认为我们的

187 阎明复：〈回慷两次莫斯科会 1? |和胡乔木〉，页 |1 — 12；杨尚昆：《扬尚昆日记》，1293。

188 毛泽东与哥 8 尔卡谈话记纾^1957 年 11 月 15 日。

189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2000’ 页 166。190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 页 293。

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因此，这次会议「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毛泽东最后断言：「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在毛泽东具有影响力的表态之后，各国代表团均发言表示拥护宣言，哥穆尔卡也发了言。会议决

定基本通过草案，交起草委会作最后的修正。在后来发表的宣言中，保留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而没有再提「会议召集人」的问题。这显然又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自然是为了社会主义

阵营的团结，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但是，他的说法，特别是 11 月 18 日的即席讲演，也给人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第一，每个阵营必须要有一个头，他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语，叫做「蛇无头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的力量最强，所以「这个头就是苏联」，而中国只是政治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还没有这个资格；第三，苏联当这个头是需要帮助的，中国还有句成语：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一旦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裹为首的就理当是中国了。在 1959 年 10 月中苏两党会谈为中印边界冲突发生激烈争吵时，赫鲁晓夫在情急之中叫嚷了一句：只许你们指责我们，不许我们批评你们，说甚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赫鲁晓夫后来体会到：「如果所有其它党都承认一个党可起带头的作用，那么这个头其实也可以更换，今天一个头，明天另一个头。我们认为，中国人在为自己准备条件，将来要担任这样的角色。」赫鲁晓夫的感觉是不错的。实际上，当时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已经远在苏共之上，多列士甚至对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最近时期，尤其是在斯大林问题产生之后，在我们这方面曾发生一些不太好的情况。中国同志们的文章为大家指出了方向，非常有利。我们党的斗争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¹⁹⁶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实际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指导者是中共，毛泽东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强，因此暂时还不能直接出面承担起领导责任罢了。柳不过，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人为首这个原则是需要确定下来的。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还有一个角色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南共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不同寻常，且颇有些微妙。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主动向铁托道歉，努力恢复苏

南关系，同时要求各国共产党积极与南共联繫。1955年3月中国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两党也恢复了联繫。尽管当时毛泽东本人并不信任铁托和卡德尔，甚至认为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经过一年的努力，南斯拉夫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被社会主义国家接纳。1956年9月南共派代表出席了中共八大。毛泽东在接见南共代表团的谈话中，对斯大林的大国、大党主义进行了全面批判，并再称自己也被斯大林看作是半个铁托，表现出对南共的极大同情。但是好景不长，苏南之间因在匈牙利事件中处理纳吉问题引发了矛盾，铁托的普拉演说更令苏共不满，双边关系再度紧

195 《《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 I 二》《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71 辑，页 192—193。196 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记录 1957 年 11 月 8 日，197 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提出「所谓以苏联为首」：「仅意味着苏共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参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页 313。198 《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编》第十卷，页 2411—2415。1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I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页 259—262。张。200 中共也出面批评南共，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矛头明确指向铁托的普拉演说。对此，苏联方面表示极为赞赏。²」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是把南共的错误看作是阵营内部的问题，对铁托既讲批评，又讲团结。加中共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兄弟国家。」「我们批评铁托和卡德尔，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希望澄清事实和进行合作，而不是孤立他们。」²。3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共很重视南斯拉夫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

尽管 1957 年 6 月以后苏南关系有所缓和，特别是苏共六中全会后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表现出格外热情，但铁托仍坚持不参加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当 10 月 2 日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向南斯拉夫使馆通报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及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安排时，得到的答复是，南共将派代表，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但铁托因病

不能前来，而南共是否参加共产会议的问题，双方都没有提及。：“不知是有所担心还是寄以希望”这个情况苏共没有向中共通报。后来苏共只通知中共，南共看过苏联起草的会议宣言，并表示不能接受。10月25日中共从苏联大使的通报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对于南共是否来参加会议非满关切。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与赫鲁晓夫一见面就问铁托来不来。赫答“我们发了邀请，但是他不来。毛说，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并问，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赫答：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是出自他的手。毛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甚么见解。但赫鲁晓夫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量。

以卡德尔、兰科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于1957年11月5日抵达莫斯科，苏方的接待和安排非常冷淡。第二天苏南两党举行了正式会谈，气氛自始至终十分紧张。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宣布，这次在莫斯科将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并且已商定，即使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也要发表一项共同宣言。赫鲁晓夫严厉地指责南共接受美国的援助，逢背了无产阶级国际画结的精神等，认为苏南关系再次紧张的责任在南斯拉夫。卡德尔坚持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毫不退让，他说，南共认为，把世界划分成集团是人类的不幸，这样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南共的主张是解散两极对立的集团，取缔作为政治手段的战争，各国人民实行积极和平共处，各国人民有权为自己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至于接受美国的援助，这与当时的冷战状况和苏联的立场有关系，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不是南共，而是在1948年攻击南斯拉夫的那些人。南共代表团还表示，无论如何不能签署共同宣言，南斯拉夫将以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独立。会谈很不愉快，言词愈来愈尖锐，赫鲁晓夫讲了一些侮辱性的话，但对结果却无可奈何。286

11月9日的晚宴上、赫鲁晓夫试图再次说服南共代表团，建议他们赞成宣言的实质，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个建议同样遭到了拒绝。11月12日卡德尔与赫鲁晓夫举行第二次会谈。卡德尔解释了南共代表团不能在宣言上签字以及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原因，但表示可以在报纸上支持宣言中南共所

同意的一些观点。赫鲁晓夫似乎已经估计到这次会谈的结果，对卡

205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页 161—162；李越然在 1997 年 10 月北京「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206 卡德尔着，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 11944—19571》（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页 168—170；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页 443—444。

德尔的讲话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再发火，只是在讲话中继续指责南斯拉夫的选择是一种分裂行为。最后，他希望南共再斟酌一下。14 日大会开始前，南共代表画在使馆召开会议，最后确定了他们在莫斯科的行动：只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全体代表会议，并在各党都同意签署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这个决定得到了铁托的完全支持。对于南斯拉夫的顽固态度，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对南共代表团采取了某种抵制行动。由于苏联的冷淡态度，许多代表团都有意回避南共代表团，使他们在莫斯科的处境极为尴尬。同其它代表团的热闹活动相比，在米丘诺维奇看来，南共代表团「在列宁山可以说度日如年」。

加
毛泽东对南共代表团的的态度显然要宽容和轻松得多，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既没有批评南共的立场，也没有试图劝说他们同意共同宣言的观点。毛泽东似乎早已打定主意不需要南共及西欧几个党在宣言上签字。他在了解了意共、英共和法共代表团的态度后，11 月 9 日再次与英共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也不签字。宣言只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十一国签字。」观虽然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直没有与南共代表团直接接触，但在最后阶段却表现出十分热情的态度。

在 11 月 18 日的即席发言中，毛泽东在讲到鬮结的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南共代表团，他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甚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手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加这段话似乎打动了南共代表翻，大会休息时，卡德尔走到毛泽东跟前说，他对中共同志能够谅解他们很满意，他很感激毛主席这番讲话。：’。对于孤独的南共代表画来说，这大概是莫斯科会议期间撒向南斯拉夫人的唯一一缕阳光。而这恰恰给了毛泽东进一步向南共闡述自己看法的机会。

就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卡德尔提出，南共代表團希望对毛泽东进行礼节性拜会。南共对此并没有抱很大希望，他们以为毛泽东完全很可能会因为南共代表团没有签署宣言而拒绝接见。令南斯拉夫人意外的是，刘晓大使迅速给予了答复，说毛主席很高兴立即接见南共代表团，以致米丘诺维奇感觉毛泽东似乎正在等候他们提出拜会的请求。作为东道主，毛泽东非常亲切和热情地与卡德尔等人会谈了近两个小时。更令南共代表，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他们没有签署共同宣言竟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和责备。当卡德尔说明拒绝在宣言上签字的理由时，毛只是说，这不是甚么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共也不接受任何一个国家乃至苏共的领导，但由于「俄国人现在喜欢，而对我们也无害」，因此中共不反对这一点。当卡德雨谈到南斯拉夫的发展成就，并列举了钢产量数字时，毛高兴地说，如果俄国人的销产量赶上美国，中国人赶上英国，南斯拉夫人赶上意大利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11 南共特别注意到，尽管他们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但在中共眼里，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 19 日苏共的告别宴会上，毛泽东特意走到米丘诺维奇身边祝酒，提议为中南友谊干杯，又对卡德尔开玩笑地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按卡德尔的理解，毛泽东这是在表示「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他颇为深情地对毛泽东说，铁

20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639—0。210 吴冷西：《十年论战》，页 123。

211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 页 456；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57》172—176。托同志很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希望中南两党加强联系。化毛泽东做出如此努力的目的，自然是想把南斯拉夫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尽管这个愿望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当然，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只是上述三个方面，不过在宣言中都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了。如意共对「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说法不满意，于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再如，苏共坚持还要办一个共产党的国际刊物，有些党不同意，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刊物办起来，只刊登相同意见，不刊登分歧意见，不搞批评和争论。² 3 经过毛泽东的百般努力，确实搞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但是，其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沓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这就难怪会议之后各党依然各行其是，而后来发生争执时，又都援引宣言的观点来指责对方。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其实莫斯科这一纸宣言，从内容到形式，都真实地反映了中苏关系的性质、特点和实质，是中苏同盟关系最典型的写照。

毛泽东确实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虽说是「以苏联为首」，但中国人的操心出力一点儿也不少。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杨尚昆回国后在一次报告中有如此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

-12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页 457；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57]》，页 172；吴冷西：《十年论战》，123~124。

-13 吴冷西：《十年论战》，1135~149—150。1958 年 1 月 31 日苏共中央来信征求中共对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刊物的意见，苏共建议这个杂志可作为各党联合刊物：只进行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交流各党经验。2 月 27 日中共回信表示赞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连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卅 I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页 97-化^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于 1958 至 1991 年期间，在布拉格用 34 种语言出版，并在 145(固国家发行。

：14 有一!’ 固细节也可以看出毛对这次会议的重视：毛泽东为 13 次访苏准备的礼品共 396

！土胃其中仅赠送苏共中央?页导&的礼品就差不多装了整整一佃车皮。参昆中国外交部

档案馆^203-00107-01-34：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215 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还必须看到，毛?单东的有些观点是别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而这些观点恰恰隐含了未来分歧的基础。

3 毛泽东即席发言语惊四座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构领导和指挥的历史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而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正因为如此，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成为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

215 《毛泽东传 11949 — 19761》’ 页 760。

216 《中苏辟系：俄国植案原文褛印件弃镍》，第十二卷、页 2863—2868；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07-01，页 6；109-01100-01，页 9；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页 153；《毛泽东传《1949—19761》’ 页 727。

217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页 158—159；《叶子龙回忆录》’ 页 189；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 1）’ 页 19—20。

首先在接待规格上中共代表团就显得与众不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到来特别重视，提前两天就派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专程到苏联国境第一站伊尔库茨克去准备接待工作，并且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事前毛泽东一再提出，不要搞大规模欢迎仪

式，中途停留时他也不准备走出飞机，免得感冒；除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谈话外，沿途不要组织欢迎，因为天气太冷，他和宋庆龄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车。赫鲁晓夫一一照办，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216 抵达莫斯科后，所有来宾都住在莫斯科市郊别墅，只有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在郊外还有两处备用别墅）。赫鲁晓夫讨好地对毛说：这里「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很方便，而毛泽东本人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赫鲁晓夫为毛泽东特制了木板床，甚至把寝室卫生间的马桶都改成了蹲式的。217

毛泽东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立即成为关注的中心。据杨尚昆记载，在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毛泽东讲话开始和结束时，也是全场起立鼓掌。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只鼓掌没有起立。在红场举行庆典活动时，游行队伍不断高呼毛泽东的名字，表示致意。游行结束后，参观庆典的群众一哄而上，围着毛泽东欢呼。据苏联同志说，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的发言方式也引起了许多当事人的注意。所有来宾都是事先准备好经本党中央批准的发言稿，在会上照稿子念，而将俄文译稿发给与会者。只有毛泽东，三次发言都是即席讲话，这使苏方会务工作人员感到非常为难。特别是在 11 月 18 日大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站在讲台上作报告，只有毛泽东坐在那里讲。毛泽东杂开莫斯科前，苏共中央主席团特意为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组织了一次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二百多人的会见，苏共领导人几乎全体出席作陪。会见进行了将近两小时，毛泽东与出席会见的人们进行了亲切愉快的谈话。这个场景也是其它所有代表团没有机会遇到的。&

不过，最令研究者感兴趣，并引起争议的，是毛泽东在 11 月 18 日大会上的长篇即席发言。他在发言中不时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话语，使得听众惊诧不已。

毛泽东一开场就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众人传诵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

西风」。毛说：「现在我感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優勢。」围绕这个命题，毛泽东讲了十件大事，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直到解除叙利亚危机、苏联卫星上天、英国退出亚洲和非洲、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法国退出北非。总之，国际形势已经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²²²在11月8日与英共代表的谈话时-毛泽东也讲了这十件大事，并得出结论说：「我总有一个印象：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边，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边。我觉得，资本主义国家永远落在后边了。」²²³11月17日对中国留学生讲话时，毛泽东说得更为简明：「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开奋，.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²²⁴

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²²⁵这在当时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说明苏联的科技水平，特别是在导弹发射技术方面²²⁶已经走在丁美国的前头。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的聚会，也显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古未有的盛况。但是，就此断定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恐怕是过于乐观了。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赫鲁晓夫在私下交谈时、已经多次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就目前来看，苏联在军事和一些其它科技项目里是领先的，但美国潜力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他们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哥穆尔卡与毛泽东谈话时也提出：「自从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

2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630—638。

223 毛泽东与波立特-高 1*1 谈话记录²²⁷1957年11月8日：

224 《毛泽东传'1949—19761》'页 757。

225 阎明！8：〈回慷两次哀斯科会谪和胡乔木〉²²⁸页 9—11。

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他们是落后了，但假如有人以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那就看错了。我想他们早晚也会有像火箭痘样的成就的。」哥穆尔卡指出，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究竟应该采取甚么方针政策。他认为「采取的政策不应使紧张局势更趋尖锐化」。他哪里知道，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本意就是想强调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也不必反对国际局势的紧张状态。

毛泽东的另一个惊人之语是关于苏联党内斗争的。在讲到，结的问题时，毛泽东突然插了一段关于莫洛托夫集团的话：

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²²⁶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 I 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²²⁷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 I 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了 I 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 I 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

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 I 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²²⁸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²²⁹有很长的斗争历史²³⁰但是这一件事他是作错了。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容²³¹互相排斥，一个 I 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²³²有出乱子的危险。²³³

226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²³⁴1957年11月6日²³⁵

2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²³⁶第六册，页 643。但七年后，即 1999 年 6 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未加任何说明却删去了这段话。

毛泽东的本意是对苏共中央处理六月事件表态，是支持赫鲁晓夫的，自然也有劝告苏共要懂得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的意思。但是，第一，毛泽东在此前曾一再告诫苏共中央，对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而自己却在大会上公开指责莫洛托夫，这就很让人怀疑他的动机。第二，在各国共产党大会上评论苏共的党内斗争问题，而且用别人不熟悉的词弃「两条路线斗争」把苏共领导中「两个不同集团」等同起来 I 至少通过翻译后人们是这样理解的，这就更让人坐不住

了。据米丘诺维奇描述的现场情况是：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决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画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228 这大概是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的结果。说是以苏联为首，而毛泽东却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随意评论苏共党内的分歧和矛盾，这能不让苏联人恼火？难怪卡德尔在毛泽东讲话时传给南共代表圈成员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脑的斗争开始了。」229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有一处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即提出中国将在十五年后超过英国的口号。在11月6日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的

讲演中，赫鲁晓夫在列举了一系列统计数字后说：「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自然，在这段时期，美国的经济也可能有所发展。但是，只要考虑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这一点，那么可以肯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和平竞赛中赶上美国的这一任务是完全现实的，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30。听了赫鲁晓夫这番话，毛泽东显得有些受刺激。当天晚上与哥穆尔卡谈话时，毛泽东就试探性地提出：「再过十五年苏联能超过美国，中国有可能超过英国。」哥穆尔卡当即直言不讳地回答：「苏联能超过美国这点无疑问，但中国能否超过英国这点很难说。」毛泽东仍然坚持说：「如十五年时间太短，则可延长些，先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

228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页453—454。

229 卡德尔：《卡德甫回忆录》'页175。

230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8日。

231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

可能是为了取得可靠的依据，在 1 月 8、9 日与法共和英共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又特意谈到经济问题。当多列士告诉毛法国的钢产量为 1200 万吨时，毛泽东随口就说：「我们有两个五年计划就能超过法国，三个五年计划超过英国。」在向波立特和高兰详细询问了英国的金融、工业和军事状况后，毛泽东肯定地说：「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 520 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 1200 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 2000—2500 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 4000—4500 万吨。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 2000 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 3500 万吨吧！」法国人和英国人没有哥穆尔卡那么直率，对毛泽东的豪言壮语都是点头称赞。。²

于是，在 18 日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郑重地宣布：「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说现在英国年产 2000 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 3000 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 4000 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格奥尔基大厅里的听众大概没有多少人把毛泽东这些外行话当真——单单一个钢产量能说明甚么问题呢？但是，赫鲁晓夫赶超美国的时间表后来遭到苏联经济学家和多数主席团成员质疑和反对，而毛泽东的这句话却吹响了 1958 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第一声号角。

在毛泽东 18 日讲话中最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核战争及其结果的一番论述。中共代表团回国后，赫鲁晓夫在 11 月 27 日中国使馆一次招待会的致词中就表不了对毛泽东发言的不满，他暗示毛泽东有些讲话是多余的。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讲这段话时，除了宋庆龄发出会意的笑声外，「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地一片寂静」，会后许多代表的反应都十分强烈。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六亿人口准备损失掉三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 1200 万人。哥穆尔卡也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³⁶ 参加会议的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舍

穆勒·米库尼斯回忆当时的印象是：毛泽东热衷的话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老是翻来覆去地讲。他认为大战不可避免，对此人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我甚至敢斗胆地讲，他是根据这场大战来安排生活和思考问题的，俨然是大战已经开始了。”那么，毛泽东究竟讲了一些甚么话会给人们留下如此印象？

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后来中苏论战苏联攻击中国的核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而全文是在 1992 年发表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现在邈要估计一种情；兄，就是想发勋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 1 这就打得一塌糊涂 1 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通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 1 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氡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证过这个问^。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 1 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遏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

235 鄞文翰：《秘书日记襄的彭老总》’页 214-215。

235 赫鲁晓夫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3：《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慷录续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页 394—395。237 麦德维杰夫：《赫鲁晚夫簿》帛页 157—159

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泰我们也只好横下一姝心 1 打了仗再建设。」

苏共在论战中拿出了当时苏方的速记记录，根据这个记录，毛泽

东的原话是：

是否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战争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也许会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亿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亿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弹的话，我认为这还少说了。当然，这多良可怕。但是，即使是损失一半人也？；是那么的糟糕。为甚么呢；因为不是我们要这么铤而走险，而是他们，是（他们将战争强加给我们。假如我们打起仗来，那么就会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我个人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遭受这样的灾难，那时人类将会损失一半，也许，一多半。我问过尼赫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这个问题上情绪要比我悲观得多。我对他说：假如人翻的一半被毁灭，那么还会剩下一半，但是帝国主义符会被全部毁灭，并且整个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存在下来，而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里，人口又会增长，甚至增长一半多。中国还没有真正展开建设，假如帝国主义者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准备停止搞建设：让我们先比试一下武力，然后再回过头来搞建设。

苏共由此认为：「实质上，这是一条搞军事冲突，用军事手段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方针。」

239!! 口卿; !. 21-220^x6^19631-.

（尽管无法判断谁更准确地记录了毛泽东的原话，但对比一下中苏双方发表的文件，就发言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来说，没有本质的区别。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话。这里除了翻译上的问题外，恐怕主要是在场的外国听众不大熟悉和理解毛泽东那种哲人的思维和诗人的语言。2”其实毛泽东不过是重复了他说过多次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结果，这裹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考虑问题。毛泽东的话吓坏了东欧一些小国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共在论战中以此为由指责中国好战和蓄意挑动核战争，无疑是有意歪曲了。苏共 1957 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 11 月 14 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夏皮罗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问：「您认为，

如果打起原子战争和氦武器战争，世界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吗？」赫鲁晓夫答：「自然’将会有很大的损失，人类将要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并不会从地面上消失，社会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242

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不难理解，问题是他采取即席

240 见过该讲话的俄文速记记录的俄国学者库利克说：「这份文件显然没有经过文字加

工，而且俄文的翻哞水平也很差」。参见 / ^1 化 0080X0X0-11111-3*10X11(1^”。：II1100^600X811(!, ^00^03: 2000, 0.217.

241 毛泽东有一些私下谈话更叫赫鲁晓夫目瞪口呆。如谈到未来的战争时，毛泽东告诉赫鲁晓夫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进攻^你们不要还击^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乌拉尔 1

那时中国会帮助你们。参见; ^、叫”化（：.8001101^X101111)1: ^36(5311111.16 中|53! ”””丁”.

0.332-333;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页 395—397。242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0日。

演说这种随意的方式，来讲一个在欧洲人看来是如此严肃和敏感的话题，再加上仓促的翻译，就难免引起误解和怀疑。不过，毛泽东之所以用如此刺激的语言来阐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十二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但是速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一个是社会党问题。毛泽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苏共二十大把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错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这里还有支持世界革命的

问题，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而支持世界革命，自然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问题。鉴于对核武器的新认识，苏共二十大提出应通过和平而不是战争走向共产主义。~

毛泽东一向反对核战争将会毁灭人类的看法，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在一

次党内会议上又重复了关于核战争的讲话，而且说得更加透彻：「要准备对付大战，帝国主义有疯子，扔原子弹。头一次大战不过死了一千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了三千多万。打原子战，没有经验。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二十七亿人，还有九亿人，有九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邓小平封毛泽东的话有一个解释，他说：苏共二十大「只讲和平不讲战争，这是很不好的。只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讲战争来了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莫斯科就是讲这个」。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没有说出来的与赫鲁晓夫的重大分歧所在。

作为结果，总体来说，中苏双方都认为莫斯科会议是非常成功的。会议刚结束，苏共就在全中国范围内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学习讨论，报刊

243 吴冷西：《十年论战》’页 150—153。244 详见本番第二章。

246 吉林省档案馆，1/1-14/126’页 16—35。

上连襁集中报道了一个多月。1957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议「满意地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现代国际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的结论和原理得到了兄弟共产党的完全支持，这就证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一致和，结」。中国国内此时正忙于整风反右，对这次会议无暇组织广泛的学习讨论，但毛泽东回国后便说：「莫斯科会议有很深远的意义」。2。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也认为：「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和所通过的两个宣言，开辟了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给了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进步的力量以极大的鼓舞。」251 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却暗藏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并不在于中苏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矛盾——在任何一个同盟里这都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求同存异的确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式。但1957年底的状况却非同一般，中苏关系在其蜜月的最高峰却面临着一个由谁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中共的成就和影审如东风劲吹，蒸蒸日上。大有取代苏共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架势。而苏联也恰在此时恢复了元气。党内斗争结束以后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唐业连年丰收预示着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连续两颗人造卫星上天及核潜艇试航成功则标志着军事科技开始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工在这种情况下，当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受到来自北京的挑战时，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再「求同存异」了。

三毛泽东决心发动经济大跃进

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回到北京以后，立即开始筹划实现他在莫斯科的豪言壮语。有关莫斯科会议的文件和消息在中国报纸刊登以后，引起中共干部和党员的广泛兴趣。据《内部参考》报道，很多人从宣言250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纪要，1957年12月8日。251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1958年5月23日。2521956-1958年苏联农业生产增长数字参见李仁峰主编：《苏联工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页51—52、137、140。苏联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于1958年12月下水试航的情况参见0008806册0-055011111.16111111^01*1016^81920-1950-611)0*1：X? 隐 I31101101*060 隐。(^^.^^7^3：0^3^3310010^01138000133II"(^!! &^!!!^：.\10013^1996! 0.245^

的行文用语判断，这个文件是中国人（毛泽东或陈伯达）起草的，体现了《人民日报》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的精神，人们为此感到自豪和鼓舞。^”这无疑更激发了毛泽东那把中国搞成经济大国的斗志。毛泽东说过，他与斯大林打了个平手，对赫鲁晓夫还是略占上风的。但这次从苏联回来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的压力很大，脾气也变得急躁了。他曾对叶子龙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

1 莫斯科会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计划和安抹

当时中国的经济正在稳步发展。经过 1956 年下半年和 1957 年初的反冒进，各方面的基本建设和生产都恢复了正常状态。1957 年 6 月 3 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反驳了所谓「1956 年全面冒进，1957 年全面冒退」的说法，他指出：「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线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业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时常发生，要求国民经济年年都毫无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²

253 〈内部参考〉¹1957 年 11 月 25 日’ 页 15—16； 11 月 27 日， 页 7—9； 11 月 29 日，

页 11—15：上海市档案馆，八 77-2-404¹页 10—12。： 54(叶子龙回忆录》’ 页 187、213。

255 甲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¹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¹1994¹I311¹312。

7 月 1 日’ 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作《关于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和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规定 1957 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57%，其中，消费资料增长 1.17%，生产资料增长 8 先，网产量增长 117%，原煤增长 10.77%，（由于 1956 年部分农业原料减产）棉纱’ 棉布产量分别比上年减少 11.7%¹14.77%。基本建设投资 111 亿元，比上年实际完成数 139 亿元减少 20.67%。薄一波后来认为，1957 年的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也较为协调。积累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例，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基建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同当时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是相适应的。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当年商品货源显著大于当年社会购买力，市场繁荣。实践证明，1957 年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²⁵⁶、

在这个基础上，国务院研究并确定了 1958 年和二五计划的经济发展方向。7 至 8 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计划会议研究了 1958 年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和控制数字。会议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编制 1958 年度计划控制数字的方针，即在肯定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

的基础上，贯彻执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提高农村水利投资比重，增加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工业的投资，以加速农业的发展；积极地发展原材料工业，特别是发展某些特殊的和供应不足的原材料的生产；继续贯彻执行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和充分利用小工业、手工业的政策。会议通过的 1958 年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是：工业总产值 661 亿元，农业总产值 632.9 亿元，分别比 1957 年预计增长 87.0% 和 87.0%；钢和煤比 1957 年分别增长 16.17% 和 11.97%；粮和棉分别增长 5.17% 和 7.8%，基建投资确定为 116 亿元、比 1957 年预计增长 8.77%。： ” 8 月 13 至 20 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第十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出了二五计划的方针政策性问题：总的方针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基础上，解决农业落后和工业薄弱部分的问题，集中力量扩大再生产。为此应适当降低基建、生产、设计方面的标准，削减非生产性的、消费性的开支；农业发展应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开荒为辅，重点是抓化肥和水利。1962 年产粮 5000 亿斤，估计可达到，产棉 4800 万担达不到；工业发展速度要由「一五」时期年增长 17.47% 降

25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560—561。257 《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页 106。

为 13.67%，重工业增长率由 23% 降为 15.7%。工业内部比例关系要调整，加快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工业部门及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在农业国的穷底子上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时间要拖长些，估计要三四个五年计划。38

为此，国家计委与苏联协商了减少和修改苏联援建项目的问题，并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做了报告。报告说，按一五计划期间签订的协议，苏联援华建设项目共 255 项，现在保留 181 项（一五计划内建成 63 项，二五计划内建设 118 项），拟撤销 74 个项目，其中包括已经双方同意撤销的 23 项，不建的 41 项，撤回自建的 10 项。报告认为，通

过清理这 255 个项目，说明一五计划期间有些项目搞得急了些，国防、机械工业有的规模过大，专业划分过细。援建项目减少后，二五计划可减少支出 26 亿卢布，设计费减少 1 至 2 亿卢布。因此，二五计划期间应强调自力更生，有些方面可请苏联重点援助，但不要全面援助。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分别于 9 月 4 日和 18 日批准了此报告。²⁵⁸

2 毛泽东再次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反右倾

但是，对于这一切安排，毛泽东是非常不满的。早在周恩来提出反冒进的时候，毛泽东就有不同意见，只是碍于当时的形势，没有讲出来。湖现在’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大获全胜，毛泽东又开始集中精力考虑经济建设问题了。10 月 9 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总结性发言。这个讲话改变了中共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点，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

258 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

第四卷，1991《未刊》’页 257。25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 826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档案资料选编 11953—19571‘固定-产投资和建筑业卷》’页 370-373。

260 详见本卷第三集’毛泽东对经济工作方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张。他说：

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特’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

我们是不是可’把苏联走馊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 1 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

遇努力 1 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戚。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 I 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摔掉了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摔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促进，没有哪一篇演说是讲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1

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全民讨论农业

261 《建国以来重要文选 8^》，第十册’页 597-610。

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通知，要求在全民中展开一次大辩论，「目的在于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此后，毛泽东开始准备他的莫斯科之行。

现在可以看出，在莫斯科继赫鲁晓夫宣布要超过美国之后，毛泽东立即提出中国赶超英国的口号，并非心血来潮。其实，早在 1955 年毛泽东就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不过，毛泽东当时设想的时间是要经过五十年或者七十五年。1957 年有所提前，但还是要经过四十至五十年。~现在苏联提出十五年，中国自然没有这个实力，因此退而求其次，把赶超的目标改为英国。即使如此，按中国的实际条件，要达到这个目标，也需倾全国之力。为

了动员全国民众投入到经济建设的高潮中来，毛泽东知道首先必须进行舆论准备，造成一种声势。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262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57—1992》，页 61。

263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 500。

26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I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 463。

：65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

据说，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还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毛泽东非常看重这篇社论，特别是其中的「跃进」一词。他在1958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读这篇社论，并致词与会者说：「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毛泽东特别指出：「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其实，「跃进」一词并非这篇社论的创造。周恩来在1957年6月26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两次使用了这个词。房但无论如何，把「大跃进」作为调动全国人民积极性的「伟大口号」，并以此命名一场经济建设的群众运动，其发明权应属毛泽东。

毛泽东回国以后，立即向全国宣布了赶超英国的口号。11月25日《人民日报》在提出这个目标时，说得还比较谨慎：「十五年以后，苏联

将在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可以预期，在同一期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中国可能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将在和平竞赛中把帝国主义阵营更远地抛在后面。」27(1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祝词时，再次宣告了这一目标。”，

根据这个要求，毛泽东提出重新修改经济计划。12月4日，在国家计委委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毛泽东指出：

2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8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 I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1 月 254 页。

26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页 306-312。不过周恩来未敢觊觎这个「伟大口号」发明权。他在看到毛泽东信函后，立即写信给毛，深刻检讨自己虽然使用了「跃进」一词，（且并未领会其精神实质。参见吉林省档案馆，1984 年 5 月 9 日。

270 《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25 日。

2711；《人民日报》，1957 年 12 月 3 日。

从 1956 年冬到今年大半年，多快好省和农业纲要很少有人提了，有的人认为不行了。这就是没有看到 1956 年的主流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

建设的大高潮、大跃进，虽然执行中有某些缺点，但总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充分可靠」，不能片面地了解为愈少愈好，应该是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条件下的充分可靠。生产与基建在好省的基础上尽可能愈多愈快愈好。要掀起新的生产建设高潮。十五年后，苏联要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英国。根据这一目标，在工业方面也应搞出一个像农业四十条那样的纲要来，作为工业的奋斗目标。保证重点的方针仍很重要，不能百废俱兴，分散力量。

然而，国务院的动静并不大，仍然按部就班地安排工作。12月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1958 年国家预算草案时，会议认为，1957 年预算收支是有成绩的，上半年控制得比较紧，下半年该追加的追加、该预支的预支了，这种先紧后松的做法，是必要的，应该成为惯例。1958 年的国家预算，考虑到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它

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问题，因此预算收支应该打得积极一些，收支指标定为 331—333.66 亿元，2.59 亿元的赤字要设法平衡。审议 1958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对国家经委提出的几个指标确定为：粮食产量 3920 亿斤，棉花产量 3500 万担，棉田播种面积为 9000 万亩，猪的产量为 1.5 亿头，棉纱 480 万件，基本建设投资定为 125.67 亿元。”这些指标都是比较谨慎的。同时，李富春在工会八大作报告时，仍旧强调，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还必须贯彻执行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尤其应当注意做到全面照顾，全面安排。除了解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问题外，还必须相应地注意国民经济其它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和那一部分人民的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不爱听的话，他觉得自己在北京似乎已经难以有所作为。

2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大事辑要：1949 — 1985》 页 111。

27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四卷’ 页 343。

274 《中华人民共和国 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II 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 — 1985》’ 页 112。

12 月 8 日毛泽东开了北京，他认为「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足北京」。毛泽东到了杭州以后，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了，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画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这篇经过毛泽东反复思考的文章，主题还是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保守。社论专门有一段提到：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口

这篇社论再次吹起了向经济发展方针中的「右倾保守」路线开火的号角，并以此为开端，毛泽东连续在南方召开各种党内会议，批判反冒进，提倡大跃进。一个轰轰烈烈、震荡全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1957年底已经呼之欲出。

275 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636」276《毛泽东传1949—1976》’页766。277《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

后记

学界同仁看到此书可能会感到奇怪：本人以往的研究方向是苏联史和

冷战史，怎么突然加入了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队伍？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如此跳越，确有很大难度，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000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我与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及学术伉俪金观濂和刘青峰相识，一见如故，交往甚密。我们经常一起饮酒畅谈，讨论学术问题，讲述人生感悟。一次交谈中，他们提到研究所计划组织编写一部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著作，因感香港史学界无人能为，故托我在大陆寻找作者。既是朋友，我便满口应承下来。

回到大陆不久，很快聚集了十余位国内著名的国史研究者。经过几番议论，大家都认为确实需要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深入和客观的研究，且史料亦有一定积累，现有港方出资，何乐不为。开始分工时，我只是联络人，没有写作任务。几次聚会后，我的责任已尽，本该退出，但大家一致认为我也必须参与讨论和写作，否则这样一项长期的研究工作，缺乏组织者将难以为继。此外，我掌握的大量有关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对这段历史研究是大有用处的。我在讨论中也深深感到，对共和国历史的深入了解，大大有助于自己的冷战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研究，况且 50 年代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于是便答应下来，确定搞 1956—1957 年这一段（此期与苏联关系更为密切些）。

收集了一年材料后，感到困难重重，尽管档案文献和其它数据找到不少，但总觉得不好下手进行梳理，毕竟是缺乏背景知识。但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大家都在按照进度向前走，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啃「骨头」。好在有一批国史研究高手在身边，可以随时请教和求援。我们也算是一个课题组吧，大家经常聚会，交流看法，互通材料，对我的帮助确实很大。说实在话，本书得以完稿，一半在个人努力，一半在大家提携。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中央党校的韩钢教授、国防大学的董冬连和林蕴晖教授，他们三人对我帮助最大：不断向我提供材料，经常与我讨论问题，甚至帮我调整思路，梳理史料，有些问题没有他们的努力，靠我个人是无法解决的。

我还要感谢金观濂、刘青峰、陈方正等香港学界的朋友，他们不仅提

供了大量研究和出版经费，而且经常参与讨论，提出许多视角独特、高屋建瓴的看法，使人受益匪浅。

在这次研究经历中、我有一点感受，即「跨行业」研究，只要跨度不太大，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加深和拓宽了本来的研究思路，既启发思想，又开阔眼界。不过，我这样说，并没有「改行」的想法。本书完成后，我将继续苏联史和冷战史研究。

沈志华

2006年6月于北京南郊家中大事记

1956年

1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对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于财产清理估价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原则的指示〉、〈关于对公私合营企业
私股推行定息办法的指示〉。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社论对中共中央「多’快、好’省」的方针作了解释。

1月10日-2月7日第三次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按照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讨论丁计划草案，座谈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轮廓。1月14日-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及政策调整问题。

1月15日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合作化，并且第一个实现了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在高潮的最前面〉的社

论。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产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30日—2月7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郭沫若作了题为〈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陈叔通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董必武作了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章乃器作了关于提案审查的报告。

2月14日—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朱德、邓小平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了大会，朱德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并宣读中共中央贺词。

2月16日—3月3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了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

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普适整顿合作社，开展春耕生产〉的社论。

3月5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并指示：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二百万人，速度慢了一点。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

3月26日中国、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在莫斯科缔结关于成立联合核子研究所的协议。

4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

4月7日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检查了1955年肃反斗争中的审判工作。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地方工业部党组〈关于私营工业改造座谈会的报告〉。

4月22日—5月1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达赖喇嘛致开幕词，陈毅副总理宣读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印鉴授予筹委会主任达赖喇嘛。4月25日毛泽东在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艺术问题上的「万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花争鸣」,应该成为中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4月间中共中央转发商业部党组〈关于城市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几个问题的报告〉。5月中共中央转发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关于深入改造农村私营商业做为供销业务的报告〉。5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议〉,决定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等机构。5月12日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会议。会议对于当前存在着的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作了检查,并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宣传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中共中央的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6月15日—30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于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李先念作的〈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和廖鲁言作的〈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

6月25日利瓦伊汉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题为〈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言,提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重大方针,再一次宣告,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

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报告。

7月2日—4日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统一战线工作和其它有关问题座谈会。与会的地方民主党派负责人讨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7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专政要继续,

民主要扩大〉的讲话。

8月国务院举行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关于私营企业在合营时财产清理估愤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和〈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9月15日—27日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致题为〈增强党内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开幕词。大会讨论和通过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并通过了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听取了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10月23日—3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访问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议处理波匈事件。

10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

11月10日—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就目前时局，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分别作了报告。毛泽东作了总结性发言，号召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12月8日毛泽东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各市代表团负责人座谈会。

1957年

1月7日—19日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应邀访问苏联、匈牙利和波兰，协助处理波匈事件善后事宜。1月18日，发表了〈中苏联合声明〉。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1月18日—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

记

会议。主要讨论了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27日毛泽东到会讲话。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一”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如

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3月6日—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

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讲

话，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甚么要整风〉的社论，并广泛

开展整风运动的宣传动员，全党整风运动逐步展开。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

点开展批评的指示〉。5月8日—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

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的意见。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项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

评的指示〉。

5月15日—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

外人士批评的指示〉。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5月2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全国人大一届七十次会议，决

定人大四次

会议推迟到6月20日召开。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6

月6日—9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甚么〉，将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学生回乡工作和在反击右派分子

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

资产阶级方向〉。6月18日—7月6日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作

出开展整风的决定。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6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肃反运动的进展情况和

当前任务〉的报告、〈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的补充解释。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6月26日—7月15日一

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

讨论了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关于国家决算和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薄一波〈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

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

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7月17日—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

丁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印发与会者阅读。7月25日—8月22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

会议研究了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和控制数字。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

会主义教育的指示〉。8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统

购)和统一收购的

农产品和其它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的事项的通知〉。

8月27日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中开展一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9月4日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在武装力量成员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9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粮食工作会议。由于1956—1957度粮食收

支发生七十亿斤差额,造成夏秋两季粮食紧张。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要求改进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将合作社的规模缩减到「一村一社」,以及用增加经济刺激的办法将上中农挽留入社。9月20日—10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10月9日全体会议上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10月13日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整风问题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问题。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11月2日—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会议签署并发表了《莫斯科宣言》。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广业生产新高潮》。

11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关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文件：《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文件总的精神是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单位。

12月2日—1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争取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参考文献

一档案

上海市档案馆八 22-2-515 八 22-2-516 八 22-2-601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109-00083-03

109-00529-01

109-00637-01

109-00751-01

109-00761-04

109-00762-01

109-00762-02

109-00762-03

109-00762-04

109-00787-18

109-00788-01

109-00790-01

109-00826-02

八 77-2-404

8163-2-279

048-1-113

109-00828-02109-00828-04109-00969-01109-00971-02109-00972-0
1109-01028-04109-01035-02109-01040-01109-01041-01109-01044-
01109-01090-01109-01090-23109-01091-01

109-01124-08109-01138-01109-01141-01109-01141-02109-01141-0
3109-01157-01109-01654-02

吉林省档案馆

1/1-14/59

1/1-14/68

1/1-14/75

1/1-14/126

1-4/4-1953. 15

1-5/5-1956. 13

陕西省档案馆

123-40-1

123-40-6

123-40-15

123-40-18

123-40-19

123-40-20

123-40-21

123-40-24

123-40-43

123-40-45

123-40-47

123-40-49

123-43-1

123-43-2

123-43-3109-01812-01203-00023-01203-00023-04203-00072-01203
-00107-01204-00054-04

1-11/1-1955. 55

1-11/1-1955. 139

1-11/1-1955. 161

1-12/1-1956. 101

1-13/1-1956. 102

123-43-4

123-43-8

123-43-10

123-43-22

123-43-24

123-43-29

123-43-38

123-43-466

123-43-468

123-43-469

123-43-470

123-43-471

123-43-472

123-43-493

2-1-2954

2-1-2957

2-1-3013

2-1-3194

2-1-3195

2-1-3197

7-1-778

7-1-804

7-1-867

7-1-869

7-1-949

7-2-245

7-2-247

7-2-273

7-2-292

7-2-317

7-2-359

7-2-360

云南省档案馆

2-1-2684

2-1-2685

2-1-2688

2-1-2735

2-1-2736

2-1-2737

2-1-2738

2-1-2739

2-1-2740

2-1-2741

2-1-2742

2-1-2743

2-1-2745

2-1-2749

2-1-2750

2-1-2751

2-1-2753

2-1-2951

2-1-2952

福建省档案馆

101-5-819

101-5-982

136-9-294

辽宁省档案馆

251-2-67

2, 51-2-138

香港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档案〔英文〕

\1? 2524607 墨 0807, ^3111 1)0^61-5: ^0 【110^^00^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八 80? ^^巾.079, 00.11, 11.13,; 1.5

巾.0100, 0 比 42, 11.288, 8.19 巾.0100, 00.43, 比 302, 3.10

0(1.48, 11.393,; 1.9

巾.0100, 00.49, 化 410, ^9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八 0? ^）^

巾.3, 00.23, 3.63 巾.45, 00.1, 3.329

00.23, 3.200 011.1, 8.169

巾.3, 00.24, 3-489 巾.52, 00.1, 3-196

巾 3, 011.65, 3-589 巾 32, 0 化 1, 3-498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 ! ^^!^^”）巾.17, 00.128,

8.1173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八 3」巾.4372, 011.96. 库 693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后改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 ^皿）

巾.1, 011.2, 3.100.16, 3.42

0X1.2, 巾, 5, 00.28, 3.381

巾.1, 00.2, 3.18 巾.5, 00.28, ^396

011.2, 3.81 00.28, 4-407

中，2，00.1，几415 中，5，017.28.；1.409

中二00.8，3.388 巾上0化30，工4

中.3,00.8，3-389 中3，00.30，^7

中二011.10，3.22 中.5,011.30，凡84

011.12，1007 巾.5,00.30，163

中3，00.12，3.100845.5,011.49,3.41

00.14，3.4 中.5,00.49，3.128

4x3，011.14，3.39 中、00.49，142

00.64，3-485 00.49，3-408

二文献

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文献选载，1956年1—2月《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1956年前后毛泽东等同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文献五篇，1956年4月28日至1957年4月6日，《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
1957年整风运动文献选载，1957年4月27日至5月16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

修正主义言论集〔1945.8—1957.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北京：中国档

案出版社，1991）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

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I（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至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至七、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至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99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49—1956》（北京：学习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57—1992》（北京：学习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49—199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选（1917—1953）》（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数据（第二辑）》；未刊），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续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印行〔未刊〕，1986年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翻印：〈陆定一、周扬在全国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9月16、17日〉，1957年11月，载美国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五十年代后期「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历史资料专辑》，第二十二辑第一分册，洛杉矶，2002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十七至二十二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198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数据选编〔1953—1957〕[^]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数据选编〔1953—1957〕[^]综合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论文集〉，1957年8月20日，载美国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五十年代后期「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历史资料专辑》，第二十二辑第八分册，洛杉矶，2003年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I（内部读物）（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关于费孝通的「重访江村」的一些材料〉，1957年8月，载美国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⁸编[^]五十年代后期「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历史资料专辑》，第二十二辑第二分册，洛杉矶，2002年中国科学院

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0日，

《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3日，

《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I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巧^）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洲、毛泽东关于学术自由的几个文件'1956年2月至1957年4月，《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12期毛泽东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的谈话纪要，1956年4月18—

24日，《党的文献》，2004年第1期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1955—1958》（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伊萨科夫等：〈反李森科学派斗争的史料〉，《斯大林研究》，第二、

三、四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

反革命阴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有关中共八大的一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1期朱德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讲话’1956年2月25日，《中共党史资料》，

2005年第4期

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沈志华 I 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四’六’七-十二’十三’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沈志华编：〈建国前夕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第2期

沈志华编：〈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中共党史数据》，

2003年第4期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彙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1^未刊周恩来：〈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1956年5月3日^《党的文献》，

1993年第1期

周恩来反冒进文献五篇，1956年4月10日至6月12日，《党的文献》，1988年2期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4）林克：《林克日记〔1955-1964；〕〔手稿〕^未刊

建国初期156项建设工程文献选载’1952年9月至1954年10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一至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99）

首都戏曲界联合整风办公室编印：《首都戏曲界反右斗争资料（第一辑）》，1957年12月，载美国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五十年代后期「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历史资料专辑》，第二十二辑第五分册^洛杉矶，2003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柳”）》（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国务院关于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度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的补充报告〉的批示，1956年4月14日，《党的文献》，19^0年第2期郭

小川：《郭小川全集》，第十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郭晓惠、郭小林整理：《郭小川 1957 年日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 面

陈云：《陈云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陈云：《陈云文选 1949—1956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博雷：“博雷家书”（北京：三联书店，1994）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一组文稿，1955 年 12 月至 1956 年 9 月，《党的文献》，2000 年第 6 期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 清

样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联共（布）党

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文献三篇，1956 年 4—5 月，《党

的文献》，1990 年第 3 期关于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的建议的一组文献，《中共党史资

料》-2004 年第 2 期关于「冒进的文献四篇-1956 年 4—7 月，《党的文献》，1990 年第

2 期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论述选载~1956 年 1 月至 1961 年 1 月-

《党的文献》，1992 年第 2 期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献选载，1954 年 3 月至 1956 年

11 月，《党的文献》1989 年第 3 期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的几则中国档案
《中共党史数据》，总第八十二辑关于苏联专家对我国二五计划草案意见的一组文献，《中共党史资

料》2004年第1期关于苏联顾问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计

划草案的意见的研究结果报告，1955年6月9日，《中共党史资料》，总第七十八辑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六十九辑苏联顾问对我国五年计划纲要I初稿)的建议'1954年5月，《中共

党史资料》，总第七十八辑铁托：《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的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1

053*33861^5, ^131001018^106311^10111-15113110516 [103011, ^., 7116111(1(1611^1X101^1。 //” 《””1956: ^0^6^1141710! 0^10. 551^16(11)00111110115

【\^3化;08100: 7110^3110112186011!”!^八《~，1996口关于1956年匈

牙利秘史的解密文件) 0531)3861^5, ^1310011118^? 116311(1130051131116^6(1, 77)61956//””? ”-!’0/1

/? ”。 /””。 ”-。 ^4111^X01^1/10001*1^6/1(5(^! ^口 651311(1 Y 0化: {60131

&1105563111; ^6^? [658, 2002\ [关于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解密文件)

1111!’6义, 0^100^11? 114^115^1/10^/6^6(? /1^161^6^0014^56 Y 01、:

71^110^? ! ^?” , ”? ?)”论共产主义) \1\672&], ^61^15131101110^313015^1 ? 32(12161-111^1956 、

0215701.10, 1996 [

【中国与1956年的波葡危机1

^11(! ^), ^61-^1111&0211 ! 。 ”^18. (1^8121^51000111114122110020131601\^1957。

0116)6啊, 526, &0^2^【I^XXIX, 01-. 4/1997(哥穆尔卡与周恩来1957年会谈),

6^OX6(7II171.6^3 。 1^3^9 工 义 1 ;
68301^1)7^0\0^3^11113113XX01,63^6^110^3。! ^"611 丁",
1^00X83: ^0^X13^2002I 苏
共二十大文件中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
^111306II171? 636(111111-^111151: 义 3143^06 湖 0, ^!。""。!
0^5631111! ^"2
0^1^1100II 即虑丁 611113^11^丁 0\1II, 4)68113^1956 一"的^。80-
X ^1001(23: ^4^, 2003(苏共中央关于平反的档案资料)
80^1X065 义
IIIII008^X01^111100103II86111^6^01^11^, ^^^^, ^^^^,
301^^1, 1^0003: ? 00: 1! 30, 1998《苏联与 1956 年匈牙利危椽》
80^0^111*111^07.8; ^1^0111^0 [.17.0086X0^104(^服丁 0|58800 丁
04110&68)3006
11944-1953;, 丁工 1949-1953, 珏 0!^"6*1 化 I, ^00^3: ? 00003952002
《东欧中的苏联因素》
1^060^166(211.141711^0; 101^08, 1^3^11X08, 仄浓"。。""!, 1957,
0761101^3^\131110111.0X01-011^611^\!21^;1^1100VI 卯""丁", ?
1100X83: 14 顿, 1998
《1957 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速记记录和其它文件》
1^.03^1060 丑.上,! 4X1^)^6^0(:] .,9^6,11,^(1110.8, ? 00^!
1XX8^OX^1^1611X1.1 :
113^301)111.1011|30113803078311(501^1.11)3X7^1.1000 ?
11086-11^06"(; 0861X^003 ["丁 3""-II 叩 0113 [3 卿, 3111101"
口 083 册""
1^1^01; 1953-1991..^0(^83, 1999(苏联检察院对反苏鼓动和宣传案
件的司法监督诉讼)
^16^080^1*11 上 卩 86 丁 " —
^^113061)011110X11\13011,3^113011.8.
(^^"!! ""II0 口 06; 16 斤^3^威! "。800701^352000, 1^0.6I 毛泽
东

与斯大林之间的两封电报) 11^0&0^1^06^1^3511*01001451 八. 化?
41^05111381^11^ 《5! "83^-4568|53^
19491-. , II01)06^1, 1 一, 「. 80010^1995^1^0, 2, 1^0. 3 (米高
扬秘密访华)
1^0\^068; 0112016610. 1138^101016。口 1953: 0x6001^3^11^3 脚
化”。!^" & 1^3^1^1100118^016^! , 14001^83, 19991 贝利亚事
件: 1953 年苏共中央 7 月全会速记记录)
0x^11X11713^85111111X051112^61116111151 圆眠!40「011957. 10^6^
吸
^1^11"(; 丁 0 口"化"赫 2000, ^0. 1; 苏联劳动群众对 1957 年全会
决议的反应)
06^61-080^1, 1^^])' ! 1168301^30! ^, 。"31 脚"51-3 丁 31958
「
20^X5161)5119591-. //^06&51VI11066&11^"口., , 2001. ^0. 2I 毛泽
东
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 ^" (! " ! ^ . ? 61111111651 腹^0 「0 《19551\;
隐, 3^11000 「
^! 3^611X086 " " 一加""通 116 「. 80(2 丁 0X3, 1999, ! ^ . . 1I 苏
共中央
关于马林科夫问题的决议)
0\^04 儿 (^/" "&纤。口、0^3 哪, 11^1^0001954-1964.
丁 0 岚 1, ^61511081, 160 口 0 丁 01(0; ! &111*1633011011330633^ (:
丁 611011)31.
^00^8^: ? (^: ^: !!^!! , 2003I 苏共中央主席团文件汇编)

三著作

丁抒:《阴谋:「反右」前后》(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 力平:《开国
总理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于风政:《改造:1949
—1957 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山多尔^科帕奇着, 龚新康译:《匈牙利悲剧》I 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巧一?）》，

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下册 I 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册（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

197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王若水：《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第二卷（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王逸舟：《波茧危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尼古拉·津科维奇着，鄧友昌等译：《权力与争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本·福凯斯着，张金鉴译：《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石仲泉等编：《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朱正：《两家争鸣——5 右派斗争》（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江平主编：《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上’下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何力迈，傅华等编着：《知识分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 何方：《党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 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 何茧阶，鲁明健主编：《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 吴玉昆、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1950—1985）》，1987（未刊）
- 李士英主编：《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
- 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1）
- 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 李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 利瓦伊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李辉：《胡风集团案件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
-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力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鄞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 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中心，2000）
-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 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亚·尼·雅科夫列夫着，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 周均伦主编：《聂荣

臻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彼得·弗莱雅着，柳公夏译：《匈牙利悲剧》（台北：信达出版社，1971）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拉齐奇着，夏平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东方鹤：《张爱萍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林蕴晖：《中国20世纪全史》，第七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鄞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下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胡舶：《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夏济安主编：《匈牙利作家看匈牙利革命》（台北：文学杂志社，1957）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徐则浩编着：《王稼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格·阿·阿尔巴托夫着，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第一至四卷，1991〔未刊〕张金法：《中苏共关系：中国

民族主义的背杂》〔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86〕

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11949 — 19661》（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曹英等编：《共和国洗冤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1 莫里斯畠迈斯纳着，张宁、陈铭康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1

陈其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1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1 陈远编：《逝去的大学》（北京：同心出版社，?!）!^）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I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1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生亮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1949~196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 麦德维杰夫着，述镬译：《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麦德维杰夫着，萧庆平等译：《赫鲁晓夫传》1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891

扬^普塔辛斯基着，于欣等译：《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斯图尔特申施拉姆着，田松年、杨德译：《毛泽东的思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1 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1 香港：明镜出版社，19961 费正清着，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北京：商务印书

馆，19871

费正清着，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着，赵敏善等译：《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黄瑶、张明哲编：《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杨天石、姚鸿主编：《毛泽东剪影——〈百年潮〉精品系列》（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杨天石、郭宏主编：《人物述往——〈百年潮〉精品系列》（上海：上

海辞书出版社，2005）杨天石、韩钢主编：《史事探幽——〈百年潮〉精品系列》（上海：上

海辞书出版社，2005）杨天石主编：《文坛与文人——〈百年潮〉精品系列》（上海：上海辞

书出版社，200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当[戈]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

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董边、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89）雍涛：《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历史反思》（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一卷（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7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刘延东主编：《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刘祖熙、割邦义：《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1992，

社，1992，

刘国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刘国新、刘晓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第三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刘国新、贺耀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第四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5）

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

钱临照、谷羽主编：《中国科学院》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3）

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谢泳：《杂书过眼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谢泳：《储安平与〈观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韩素音着，王弄笙等译：《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魏斐德着，李君如译：《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罗宾·艾莉森·雷明顿着，上海师大历史系世界史翻译组译：《华沙条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罗银胜：《顾准传》（北京：圃结出版社）

罗广武编：《民主党派大事年表》（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译：《文化

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苏双碧、王宏志：《文革第一冤案—「三家村」文字狱始末》（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0⁶”【”。，^.,7(16//”，广!.””^?，/”””。”0/1956：^。舰,/^.。/(,。^/?印”，》”，1953-1963^{01\60^Y0}『化：[。^肌，1996\11956^匈牙利革命：改革、动乱和镇压）

〔1160〕1311，!^00^01111(10/1(11^(：。”^产（（：—”0111&1.011(4011:丁1161^0^61-51^0^00110x10!;!^?1653,2001、〔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

丁6177 6上，^^^1956—1^0，^76(1^5(?”^1^)^11^011:1^30化0^55

?11^51^5,1997)3四十年后看1956年的匈牙利)

1^1311^5113\^57^16!^6\^001(1广’?40500^V,?6化^2(8&1^10101:6:?60^

81110600^31^,1963》〔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新冷战）

10113011301^1^1116,77^00^11110:III旨””&0旭11)^0151011^4(1^1^4”;771《

^#”/!&”””/!01-15150/1956(!^&八&I!^^!^?”655,00116^5【^00,2004》〔匈牙利危机期间的国际决策）

^01^011^^,5上,5《”。-5。”/!0/15”””广肪(0”(;((^细&!^^:11161^3883011115^8111811111160^X00*111010^55,196凡〔中苏关系与核控制〕

?11152^丁出。”1^3,^3^05^011^1^1^(1)2^<7972-295(51(^&^:8x^6丁&10^6-1^055X11111^6,^!)!^)”卡达尔的政治生涯)

〕61160又6[又6130(5\^又16590^3111?6上,50^161^11110^11116^61111011//1

^1191^(17^1956(加&口””06011-312111^0^311110^6!”5^1^655,\999\〈苏

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入侵)0^1501-3111^3 卩16,0”赚0/4^6(11^(1010^:711&16^(10^?/1^1^3^11^115^1\9\01X111(1Y01”化,0X^0^:0x^0^1;0^6^1^?化55,1994》《’红色

工厂

梦：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最后遗产)

】，XV， & [”， 0/11/108””&8。 ^1^0x6: ^1^0X6

55, 1988; ^中国制造原子弹)

0, 八”^08^89-0(^5 胆: 711611156”/! ”尸” # 0, 0X60-5。 ””胆”厌

《1945-1963》^01&. 5130^0^1; 0^6^1^? 巧 33, 1998》《「兄弟拥抱」:
中苏同盟的兴衰)

11^0^1111^611110^0^0^11^6X03 了, ^1949-1960X0^11^0^1^~

11^^^2000 [苏联专家与中国军工企业的建立)

3\6^060000^1^50^~060086X0X060611^0130

:

00^1X11^1\00806^8081100X15

(^^-^^), 1^00X33: ? 0000311^2000 [战后苏联社会: 政治和

日常生活)

””(; 7? 加声: 8(^606 琴&1401710^1114? /!//^0^0^9&518。 必”3:

1108&1000^X0^1*1^1108^16301^”^”了”, ^00X831995(冷战: 新观点和新

文件 1 旭 0086X0^册 6 圆战 110 皿丁”8 [0^1, \,.; 10 朋 0080^0^,

(1945-

^^, 1995 [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

^11^8. 1. 0066X0X0-101X3^01001^” 。 ”: 叩! !1?!!!&1^000” 零

1*61151, ? 400! ^83,

2000(中苏分裂: 原因及后果)

111, 1X11X06 上义? 户^显”。! ”!^^”, 1^001483: 0 服八-!!? 冗”2002

(赫鲁晓夫的解冻)

0^01^081^.08。 6 册 0 哪 0 服 111; 1611111^1(0”! :000?

81920-1950-61-0^1: 丁 611^1, 3140110\111^0^01^0^003^(; 丁口^

又丁丫口^, 0 口 [31)1133111151 叩 011380001^II 丫叩&6^8116,

1\4001? 83: ? 。 (: ^:!! ^日, 199611920-50 年代苏联的军事综合

体)

(0 隐 06 ! ^口。 0086-!’ 0X06”(; 了。 口! !”1941-19911, ^100X83:

81, 1011133

111x0:13, 199911941-1991 年的苏联历史教程)

11949-19661!!! 巾。口 "31^0105(011116 丁 6" 卜
0080x0^0-^10-311010100^0^1^1995, ^0.65I 中苏科学技术合作 1

四论文

孔寒冰：〈苏联经济模式是如何在中国确立起来的〉，《俄罗斯研究》，2000 年第 1 期
文严：〈「双百」方针提出和贯彻的历史考察〉1
《党的文献》，1990 年

第 3 期

方舟子：〈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遗传学痛史〉，《畚屋》，2000 年第 11 期
王也扬：〈毛泽东关于「双百」的思想及其变化〉
^ 《中共党史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王文：〈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共党史数据》^^
第六十六辑，。98 年
王文滋：〈胡绳晚年论社会主义模式〉^ 《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

第 1 期

王先俊：〈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王来悚：〈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3 年第 3 期

王真：〈50 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王善中：〈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党史研究资

料》-2003 年第 2 期
王双梅：〈刘少奇与中共八大政治路线的确立〉，
《党的文献》，

2000 年第 6 期

史唯：〈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党的文献》，1990 年第 2 期
田松年：〈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党的文献》，1999 年第 5 期
石仲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

奏曲》，《党的文献》，1988 年第

6 期

伍小沟：〈反右与江苏的宗教改造〉，《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 年 12 月号

（中潮浩：〈毛泽东三次见哥穆尔卡〉，《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83 期刊

和明：〈1956 年中共对苏联模式认识的转变及启示〉，《党史研究

资料》，2002 年第 12 期余敏玲：〈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响应〉，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台湾〕’第 40 期’2003 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载李丹慧主编：

’：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封抗》李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与发

展〉，《党的文献》，1991 年第 1 期李慎之：〈毛主席是甚么时候决定

引蛇出洞的〉，载牛汉、邓九平主

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李新宇：〈：「早春天气」里的突围之梦^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

子话语〉，《黄河》，1998 年第 5 期

沈正乐：〈米高换「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 年第 6 期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

考察〉，《党的文献》，2001 年

第 2 期

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一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沈志华：〈对 50 年代苏联援华

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2 年第 3 期

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中共党史数据》，2003 年第 1 期

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封中苏关系的影响〉，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一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

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一波匈事件与

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汪裕尧执笔：〈关于「论十大关系」的产生、整理和发表〉，《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8期

周承恩：〈也谈「八大」悬案〉，《百年潮》，2003年第5期

林祥庚：〈刘少奇与多党合作制度〉，《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林蕴晖：〈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林蕴晖：〈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走自己的路〉，《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林蕴晖：〈起步探索的1956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武力：〈论八大对苏联工业化模式认识的深化及其历史局限〉，《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6期

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4月号

施肇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理论观点的修改始末〉，《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胡绳：〈谈党的「八大悬案」〉，《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

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潮〉，《百年潮》，1998年第2期

夏杏珍：〈「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中共党史数据》'总第五十八辑

时殷弘：〈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马嘶：〈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变迁〉，《中外书摘》，2003年第12期

高正礼：〈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逢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诞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过程〉，《党的文献》，2002年第4、5、6期

逢先知执笔整理：〈关于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历史

过程》，《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1期张冠军：〈中共八大前后曾探索党代会常任制〉，《党史博览》，2005年第12期

张柏春、张久春、姚芳：〈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技术转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张秋云、郑淑兰：〈一篇反冒进社论的由来〉，《党的文献》，1990年2期

张国星：〈关于右派的人数和性质〉，《党史博览》，2005年第6期郭铁成：〈应尊重文学史的基本史实——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文艺争鸣-评论》，2005年第4期

陈夕：〈156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

陈清泉：〈陆定一推行「双百」方针始末〉，《炎黄春秋》，2000年第9期

章立凡：〈风雨沉舟记一章乃器在1957〉，《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4月号

黄一兵：〈马哈伊斯基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之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黄景芳，汤丽霞：〈试析党的八大未宣布过渡时期结束的缘由〉，《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杨凤城：〈1949—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杨凤城：〈对有关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某些问题的历史反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董志凯：〈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董志凯：〈中共八大对「一五」经济工作的分析〉，《中共党史资料》，总第六十辑

董志凯：〈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裘实编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三种俄文版本〉，《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7年第2期廖心文：〈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纠「左」的艰辛路程〉，《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4期熊华源：〈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

熊华源：〈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情况介绍〉，《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熊华源：〈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党的文献》，1992年4期

维克托-乌索夫：〈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新闻时报》（俄），2003年8月6日。国际互联网：化。^（^.^翟志成！〈百花齐放听新莺^「抽象继承法」提出的时机及其失与得〉、《大陆杂志》〔台湾〕第95卷第4期，1997翟志成：〈冯友兰的抉择及其转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台湾》第20期，2002 闻言实：〈1^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黎汉基：〈金岳霖的思想改造〉1《新史学》〈台湾〉第13卷第1期-2002

阎明复：〈代序〉'载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载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谢泳：〈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论〉，国际互联网

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国际互联网：胃~.化^^化^.②工

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谢泳：〈钱锺书的内心世界〉，国际互联网：^^^!^，③! !!，^谢莹：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始末〉，《党的文献》，
1997年第5期
霞飞：〈姚文元在1957年：〉，《党史博览》，2005年第9期
韩网：《「八大悬案」释疑》，《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
苏利军：〈西方关于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述评〉，《党史研究
资料》，2003年第4期
袭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共党史研
究》1998年第2期
53*3386&, 1116 ?
10111111^5001^619561^110^131111^0111110111150^1(1
1^X16^(1110^11^1510^0)60181111^1^18511&2 , 1992 ,
^00^1^0^11500&I060161: 1.0! "5(^013! "5, \^化 100 《匈牙利
革命的新证据》
05&1)38^5, "丁 1956! ^卿"&"11^011111002^011(1? 。""",
001(11^6^0(10^1胞。"^0)^1^0^1*1^? 叩^1^0.16, 199611956年匈
牙利革命与国际政治)
^431^6^ ^66? 5110^1311八 117? 一^^^丁!"00 尸
^0^11011011511^001(1 1^16^(1110^(111^1510^? ^0)^1^0X^111^尸
叩^",
1^19, 1997 [赫鲁晓夫的裁军]
1.6526^011^110\^31^, "!(!!! "!"! ^! ^! ^! ^! ^! ^! ^! ^! ^! ^! ^!
6' ? 0 匚 5110010^56! ' "\001(1^广 1^16X71011011(11^15^0^?
^0)6^5" " &/", 158\165, 19951 赫鲁晓夫、哥穆尔卡与波兰十月)
1X52^011^0^5^, "!" ? 。"5*10011^01112110110(0。。^1956: 7116
81111^11001111*16 ? 01 达 1\111161113136011111^(^ 。! ^",
001(1/"^/? ! ""0打0 《
^15^0)601 曲^1^0.17, 199711956年的苏波冲突) 1949-1969、
7^0117-^10/8^则^"51^1^又0匚12, ^0.4,
060601^11999(苏联对中国的核政策)
561561001^1131^0义0, 1131110~50^161 (^。。^^! ^"。!!", 0^
八., \^65。3

8^01^51^117X5: 17161^156^110, 51 险 5。 \^旭 佻”。 6, 1945-1963、
&. 3^0^1^11^1-51^55, 1998》 1 中苏军事合作)』 0*13011&0 「30^116,
^1*0011^16&0(^1*53^311(1811(^3^651: “八 (^。!! !]”
5000【1^16^00150^1956,, ,2^丘”///? 简? 0111105^50^1611^0116,
^0.2^5^1022002I 华沙和布达佩斯的新档案)
1011300301-311^)11^111956116001181^01-6^ :
9^11^3^30(1^01? 0130^? ”,
7\165^0^110^51^111-0^ (111 细一\^1, 80, 1^0.4, 00101)612002(为
甚么是匈牙利而不是波兰)
30^130113030—116, “只 63” 上 0115101^6 0^1956、』 0”/? ! ”』
0/00^6^0^1^
腕。 行, “ 01.38^0.2, 2003 [对 1956 年事件的反应、
! ^011011931 1 , ^51110^50^1611^1101631^1^005 ,
1957-1960,, , ? 40^1011
93!]361115^., 3x^10-80^161^1(1X10715011(1^171300/11^01 丁!^
? 4^553011113011510511X11160^60^0010^ 1967), 《中苏核关系》
13005II&(^ ! !)^ , “ 丁 ”6
&! ’ 130116^01111100311^1^16^1111(11^(15? 10\^6^5
^^! ”, 77^0111/1(1 一”一, “ 0.43, ; 11 卜 5 印,, , 1970(匈牙利革
命与百花运动)
】 6060^6^1^116\111^165001^11 , “ 八 3 出
“00311)313001*10^15101-)’ 0 【 1^1050 函 ” 可
00011(53110011^0^6^61311(1”。! ^她, 6(1, 5。 由佻///”; ^ (苏军
军事占领的新资料)
^31116^”腕^17^? 01^1956: 1^而 1^50? 31500? 1^(1; 画
^! ”—00635151110^3110^8, 240010^11956、0014 化”广 7 广 咖 卿 2
腕。”? 一”5 壶””, 1551105, 199511956 年的波兰与匈牙利 1
! ”, “! ”^1(1000601150^1610^018100-1^1115^11(1^01956? 01-
! 51130(19110^3^3001181311? 001(1 1^6^(10^(21111^01-)’ ?
10^01
丑”//^””, 15511658-9, 1996/1997(苏联决策与波匈事件)

3! 3016! ", " ! 116' ^ ! &!。 ^0 【65, 00111601~1818111"" !
^^!^3^1^130(1, 1956\

^01(1 1^167-71^110^1(1111X5101^^0)^018^11611^15511638-9 ,
1996/1997

《关于波匈事件的马林笔记》 V, ^13 时, 50^1011 ;
11100311(11*160^1150 【 ^XV^ 谓 ? 301 : 1111955 、 !
^.&"1105011^1(118

3605611311(1^., ^1113^1^^., ^60^1113^130^0\^6^

! ""65。由 II"幻"丫。1"化: 51. ? 雌, 2000》 1 苏联与华沙
条约的起源)

尺. 1.56^1065"! 1161103(110^61^611""& ^00^^55", 50^16 ?
4^5,

^01.33, 1^0.2, 八^11981 《通向二十大的道路)

丫.511111-00^311(1 乙"!?.、、 (: ^~63 口 00351311x1,5。63 比:
1^0500^

^1161*51*1611-8011^ 八 ^", ^1(1
1^11011(111^15(0^0)^0181111^

1531104? 1994(斯大林死后的核武器)

丁 00^! ^!! ^-^^^!!,"! ^! -^^^, 5^^^'2^6? 01; 化? 0111105:
丁^

5^1-108。^1956、5111-0^-^5103 灭", ^。1.48, 1^0.2, 1996I 赫鲁
晓夫

的秘密报告与波兰政治)

八.\^6 出 1311, 1102^01111102^0^111~310^3110001111^6? 1\
011^^26X1991! ".(中

国人救了哥穆尔卡?)

胆"10.1^08000XX01*633^II0X0460X861111^配丁 0 口册, 1998,
1^0.2(关于二十大的新材料), ^0)0^111^10.丑., 1^11^06^.^.000&

[0 丁 08X632X9"丁 0 [0^0^21^39.(1

^1066111113^"(: 了 0 口 1! ", 2002, 1^0.2(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

上的秘密报

告的酝酿准备情况)

八巾听""8.10., 14601106//上 008^01^110)103110^31^0111 [, 3
股 1956 [,

00"&化!) " !]^^, ^13011501-11)110\\^00^1: 0^\^115001010:
113110031

0^X1^130110131-50)1(1 101011131101131 压 5(017? ! "。』
"1^01^00111

【苏联与 1956 年的苏伊士危机)

[33^3, 21^8? ^511996 []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如何形成的)

厂 "611(2"(: ^^^ ! 几只 .1^3^003(1^1^0" 册 (^ 。 口
".1108086^111111^3^X11811^V& 丁 巧
"^II^08^51VI1106011111351\\010^1993, 1^0.4 【共产党情报局是
如何解散的)

厂^^! ""^(#兄口):11168, ^! .6 口。3 丁"I。II8^9^0^印 113 配
19561, 11^08^51VI800011111^1"(; 了 0 口朋, 1999, 1^0.2 《赫鲁晓
夫、铁托与 1956 年的匈牙利危机)

3^0661110 , X 卿
08&51110; !"71^3\1^010X10181^11^0(^-^^)!I08060

^1011^1999, 1^0.3, ^0.4, ^0.6(苏共的干部政策与清洗)
3^^06(1^.\.^12^6^08II 叉口? 11168:;! ""中&!4 了 0 口 800; 1"丁
"000^6073^51110^0^0 口^1^080110 丁 83II(^丁^1!^^丁 8691135100
丁 0 口"只, 1995, 1^0.4(斯大林之后领导政策中的个人因素)
^6111X^111.? 16""中 3000861^X0-101 丁 2"(;! ^."1080; 1"丁 6,
1949-1960II0^111 赚, 80600144, 611^017X0^11? ^//, X.;!。职&5!
8。如 3: 0081^301^^^1, ^100X63, 1995(揭开中苏之间的神话)
1^6366^66I 八. 3^3^X3(: "6 拜 03/0013!! 800^)^001, 1 耻丁。拜 1,
2000, 1^0.1(斯大林死之谜)

^0(2^1068, 几 000? 1186" [印"化 0061956 [二 9。81^3^X^881*16
磁化口"3^1*1II9083510080^111^51"(; 丁。P跳 1993, 1^0.1 《苏

联与匈牙利事件的新材料)

一 助 68.11. " ! . ,
1)111^&^.^^^19571-.//^0633^11086&1112512000, 1^0.5, 2000,
1^0.6, 2001.1^0.111957年的朱可夫事件)

1^0\^1068.17.50(51.6390|^11^8332" ! ! !! .
""1!!!^8^30X1^II908351II110861*01351111:10? 115!, 1996.1^0.2
〔赫鲁晓夫为争夺个人权力的斗争)

1^0^068.17~6"; !33「080口66口"!I? ? 1081, 16只0!^"6"了"0。。
6"丁"3 又 19531-.II1108351\\110801111135? "(; 了0口股,
1998.1^0.5(贝利亚的阴谋是

否存在)

1^0^068.11.X"(: 1X5 口 ^II06^1^10^0 ; ? 0101 寻
^^^10683113XX01^3^6^11001008351118080^111351^^, 1996.^0.4(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经过)

1^0\^068.17.X口Y 11168VI口6361! ""3111151 丁
8VI&0008^1\00""了"化!: ! ^又

[? ^甲""&"80, (; ""(: 丁。卿, 1997, 乱4《赫鲁晓夫与大规模
政治镇压运动的牺牲品)

^00^080/1.0.1^100X0801^60086X101X11801^&8001X^010 化已亭阳,
1945-195311-.//801115001,1"(: 丁0口101, 1998, 1^0.1〔驻东
欧国家的莫斯科顾问〕

0)76X08 凡级 006^1X115! 19561-0^38。。加脉 II^^1131101\0! 1\^:
^0~00^^\0111011161001 " 14^14 ? ^ ! 00601^1^3518116 腿
351110^111X381X^1"又加。,,。

^^&! "11945-19851: 90600 腿, 岳^1995、1956年的波兰
事件和波苏关系危机)

1111X011 ? . 「 081 !)'71311110^11X11460^01160 口
&66800861~01^01^^0^0^1945-19581-1-. "

908251VI8086(1111351"(: 了0[? "3, 1995, " 0.6^1945-1958年苏
联领导层的内部政治斗争)

") 灵-画 5.7: 丁-! ^"":1-0^1956-0 隐? 附八 II00801-01^351

8116 谓 3 只 00^11X11X38「0 耻 1'、。”。””(80&服”(^^-!^^): 90806
叩 047^1^^^0(^8^1995! 1956 年的布达佩斯与莫斯科)

111, 1X11X068 : XX (1^30II061460X86111106 丽
6(010II08060311231^1。戴

2000, 1^0.8(苏共二十大与社会舆论)

11^1X11^06 凡 8: 111^6^131^10^3; 0X^01001118「0 脚 X116801? :。。

0X1611&101II80111)001, 1”(^(^丽, 2003, 1^0.4(赫鲁晓夫解冻时期
的文化政策问题)

^11318「0;!”11071-606/1*111II08060^11351^!.!^!., 2003, 1^0.6I
解冻年

代 的 社 会 心 理 因 素) 171, 13X111^00 上
8^0086X0806000^6806111100060160X80II111)0311001, 1^^11' !
11680^^-0!)”II^0\\^0^1”。! ”。!)””, 2002, 1^0.21 战后的苏联
社会与赫鲁晓夫改革的出发点)

五回忆录和口述史料

于光远：〈难忘党的八大〉，《中共党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1

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王光美、刘源等着、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王光伟：〈周总理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载《怀念周总理》

（北京：人民出版社，”吕^）王炳南：〈1956 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忆〉，《国际问题研究》，1981 年第 1 期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

王蒙、袁魔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1

卡德尔着，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 11944 — 1957》（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瓦列金·别列什科夫着，薛福歧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伍修捧：《回忆·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

京：新华出版社，1995）吴冷西：《十年骄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下册（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李丹慧、沈志华采访荣植记录，2000年11月30日。

李丹慧、沈志华采访朱庭光记录，2000年12月1日。

李之珪：〈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载季羨林

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李庄：《难得清醒》（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李雪峰：〈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断回忆〉，《中共党史研

究》，1996年第4期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1994）

李越然在1997年10月北京「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李新：〈反「右派」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总第六十七辑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上'下册（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

社，1986）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李锐：〈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党内斗争〉，《炎黄春秋》，

1996年第8期李蕴晖：《追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1998年3月。沈志华、张玥等采访李越然记录，2001年10月29日。沈志华采访王亚志！^录，2001年6—8月。沈志华采访朱安康记录，2004年4月17日。沈志华采访宣焱记录，2002年12月22日。沈志华采访夏道生记录，2004年6月

8日。沈志华采访叶桐（“!!”^。^）记录，2004年3月26日。沈志华采访骆亦粟记录，2004年4月17日。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周巍峙：《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位创始人》，载王蒙、袁广主编：《忆周扬》

季羨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季羨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②上）

林克、徐灏、吴旭君：《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查尔斯·波伦着，刘裘、金胡译：《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范承祚：《风范长记，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韦利科，米丘诺维奇着，达洲等译：《莫斯科的岁月》（北京：三联书店，1980）

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百年潮》，1998年第2期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百年潮》，1997年第2期

徐锴成：《阳谋——1957年》，《新华文摘》1989年第2期徐锴成：《徐锴成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徐锴成：《亲历一九五七》（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郝德青：《外交工作三十年》，载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巧95）张元动：《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载《陆定一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今)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1

菲丘耶夫着，刘存宽、薛衔天等译：《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 黄秋耘：《风雨年华》，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士，20001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1 叶

笃义：〈我的右派「罪状」〉，《百年潮》，1999年第1期葛佩琦：《葛

佩琦回忆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 荣植：〈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新年宴会〉，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

《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着陈之骝等译：《赫格居斯回忆录 个思

想阴影下的生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1 赫鲁晓夫着，马贵凡译：〈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中共党

史资料》总第七十一辑赫鲁晓夫着，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1

赫鲁晓夫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

忆录选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1 赵仲元：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中共党史资料》，

2004年第2期

刘有宽：〈周扬对戏曲改革的贡献〉：载王蒙、袁康主编：《忆周扬》

刘彦顺在「冷战时期的中国与东欧」国际研讨会(北京，2004年3月)

发言。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 洁泯\；

心曲万千忆周扬)，载王蒙、袁魔主编：《忆周扬》邓力群谈有关中共八大到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重大事件，1998年4月16日

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一至五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编〔未刊〕，2000 黎之：《文坛风云录》1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萧克、李锐、龚育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

版社，19981

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阎明复：〈我随李富春访问苏联〉，《炎黄春秋》，2005 年第 4 期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一）〉，

《中共党史资料》，2005 年第 4 期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二）〉，

《中共党史资料》，2006 年第 1 期 骆亦粟：〈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

1997 年第 3 期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谢赫鲁晓夫著，郭家申等译：《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中'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龚育之：〈毛泽东和傅魔〉，《百年潮》，1997 年第 1 期

18, 0 (11^5 (1^01^1165: .: 11^11^60x1) 10^00^0: I800^5, 1995 (在中国的生活) 八. 1^, , \!"!!" 1016^611110111111911118317, 1956、0^6^61311(1

80 【^1、^., 50^161 财"" 71 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入侵) / ^细, 化 8: ^^110[-(: 稳 118301^130! ^, 。" " 0^) 06116 四辉, "

800101^ ! 1? 1992^1^0.1-3(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 1^060^ 尺. 14. 061360380^111. 8^1^001304^30^3 阳, 81953 [8^001466

119 《, 义^, 瞻 0^1301^33, 0^8195 化 80^1(11116II908351\\ 1108611111351 1989, ^3.5 [斯大林与周恩来及赫鲁晓夫与毛

泽东的会谈)

0^14X^0106 丑. (: 丁, "X 他., 1"霍"" 0 " ^08068, 3, 1^0.2-3I 斯

大林与毛泽东之间)

1997(赫鲁晓夫回忆录选段)

六报刊

《人民文学》，1957年

《人民日报》，1955-1958年

《大公报》，1957年

《工商界》，1957年

《内部参考》，1955-1958年

《天津日报》，1957年

《文汇报》，1957年

《文艺报》，1956、1957年

《北京日报》，1957年

《光明日报》，1956、1957年

《长江文艺》，1956年

《新华半月刊》，1957年

《解放日报》，1957年

《真理报》(1/7 口加^!)，1954、1956、1957、1963年

索引

一五计划 21, 136, 137, 164, 166, 168, 184, 199, 202, 203, 332, 335—337, 347, 428, 431, 691, 692, 694, 695, 768

丁玲 243, 244, 669, 682, 684

丁陈反党集团 669

九三学社 26, 224, 226, 261, 277, 483, 488, 536, 537, 546, 579, 623, 624, 640

二五计划 76, 138, 148, 166, 168, 170, 172, 173, 186, 193—206, 271, 429, 767, 768^771 人大一届三次会议 74, 182.183, 224, 273, 289, 294, 339 人大四次会议 76, 131、600, 604, 629, 766 人造卫星 739, 757, 776 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 75, 76, 224

三反运动 32, 38, 142, 218.277, 505, 542, 563, 571, 581, 582, 638, 643, 670

于光远 73, 238

千家驹 281, 542, 550, 583, 623

大民主和小民主 432

大国沙文主义 94, 117, 391, 393, 395, 396, 425, 442, 446 大清洗 93, 94, 99, 101, 110, 294, 374, 376, 401, 703 大鸣大放 515, 525, 556, 564, 568, 588, 590, 594, 595, 597, 615, 通 631.649, 664, 674, 723 大跃进 143, 145, 162, 336, 347, 651. 688, 765, 771 — 773 工人罢工 375, 433, 448, 449, 499, 615

工商界座谈会 561, 570, 582 工商业者改造 623

四画

中共七大 315. 316, 319, 320, 354,

360, 361, 368, 505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 204, 306, 309—

311, 314, 317, 318, 321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17, 159, 163, 193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313, 361, 657, 679, 765

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121, 275, 306—

308^324, 325, 348, 349, 353, 676 中共八大路线 141, 303, 304,
308,

309, 322, 324, 346, 348, 353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323, 327 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318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 207, 210, 211,
239, 333, 390, 408, 424, 430, 434,

436, 451, 455, 457, 466, 470, 500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326, 516,
631,

647^648, 654, 655, 661, 662, 672,

675, 679, 680, 689, 768 中国民主促进会 26, 261, 276, 540,

546, 579, 623 中国民主建国会 26, 261, 276, 453,

职 536, 539, 541, 542, 583, 623,

644^653, 654 中国致公党 261, 539, 545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26,
224,

261, 276, 536, 539, 540, 542—544,

548, 567, 572 — 574, 582、609, 615,

616. 623, 624 中国农工民主党 261, 542, 543, 623,

6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42, 220, 301

中苏友好协会 130, 699, 717

五反运动 142、218. 277, 505, 538,

563, 571, 581, 583, 638, 670 六六六事件 613

反冒进 146—148, 179, 180, 184—187, 193, 195, 196, 206—208,

210—211, 308, 766, 768, 770, 771, 773
尤金 24, 37, 74, 113, 119—121, 217,
380, 381, 389—391, 393, 416, 705,
717, 733—736 巴甫洛夫学说 528 巴金 46, 335, 478, 531, 606 引蛇出
洞 462, 468, 484, 523, 526,
554, 555, 561—563, 597, 602, 609,
610, 656 手工业者退社 450
日内瓦会议 16, 25, 63, 123, 692 毛泽东 14—18, 20, 22—25, 27
—29; 37, 42, 43, 48, 49, 52—56, 64, 75, 79, 80, 94, 105,
111, 112, 114—117, 119—124, 126—134, 136—167, 169—175,
177—179, 182—184, 186—188, 191, 192, 194, 195, 198—200,
204, 206, 210—215, 217—221, 225, 233, 235, 237, 244—246,
248—250, 256, 260—266, 268, 269, 271—273, 278, 280, 282,
286, 287, 290, 291, 294, 295, 298~301, 303, 305—321, 324—
331, 333, 334, 342, 347, 353, 355, 356, 358, 359, 361—368,
376—378, 380—382, 389—391, 393, 399—401, 几 410, 412,
415, 417—419, 421—424, 426, 430—434, 436—441, 443, 450,
451, 453, 454, 457—484, 487—494, 500—519, 522—527, 530,
532—535, 537—539, 541—544, 546, 551—565, 568, 569,
573, 579, 583, 584, 590, 594, 596—608, 610—615, 618—633,
638, 643, 644, 646, 648, 650, 657, 661—663, 670, 671, 673—
675, 677—682, 687, 689—692, 696, 697, 699—703, 705—708,
715, 717—721, 724—741, 743—766, 768—773
毛泽东思想 361—366^441, 523, 554
王光伟 199
王亚南 230, 510, 633
王若望 531, 606
王飞 432
王造时 572, 606, 613, 629, 635, 668,
686—688 王蒙 258—260, 474, 478, 485, 666 王稼祥 114,
117, 318, 702, 731

五画

主观主义 116, 182, 251, 313, 353—356, 451, 458, 462—468, 478, 479, 482, 493, 503, 504, 515, 517, 518, 524, 532, 543, 548, 562, 510, 586, 638, 652, 769

以苏联为首 322, 373, 440, 723, 737, 743—748, 754, 759

北大学潮 596

卡冈诺, 锥奇 100, 102, 204, 385, 392, 405, 413, 420, 697, 698, 703, 705, 735, 738

卡达尔 401, 410, 416, 417, 425, 430 卡德尔 457, 732, 749—751, 753,

759

右派人数 627, 662, 664

右派言论 560, 564, 602, 605, 622, 625, 628, 633, 634, 655, 656, 664,

668, 669, 724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261, 276 尼赫鲁 70 了, 762

布尔加宁 74, 100, 312, 399, 405, 413, 420, 697, 709, 712, 716

民主党派座谈会 535, 557, 561, 562, 564, 574, 611

民族主义 94, 350, 364, 370, 375, 395, 396, 403, 438, 637

田家英 150, 154, 327, 438, 672, 674

伊巴露丽 109

伏罗希洛夫 95, 100—102? 413[^]

697, 699, 700, 732 全面学习苏联 130, 132, 136 全国司法工作会议 292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476, 484, 502,

511, 513 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 484 共同纲领 273

共产党情报局 364, 365; 424, 726,

728, 732, 746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45, 381, 434, 437, 440, 470, 536,

750 冰心 581

匈牙利事件 291, 299, 370, 372, 395, 411, 412, 415—417, 419, 425, 430, 435, 438—441, 443—446, 458, 459, 471, 472, 474, 482, 489, 608, 615, 618, 632, 640, 749

吉洪诺夫 404, 405

合作化 15, 18, 19, 128, 134, 136, 143, 147—151, 154, 156—161, 184, 185, 197, 307, 334, 339, 340, 342, 343, 346, 450, 452, 457, 472, 490, 495, 555, 563, 594, 655, 660, 664, 678, 770

多、快、好、省的方针 51, 147, 148, 165, 180, 182, 186. 206, 333, 769, 773

安子文 20, 507

朱可夫 385, 405, 407, 408, 413, 419, 697, 704, 715—717

朱德 75, 180, 306, 318, 319, 321, 367, 394, 429, 516, 557, 乱 699

江丰 669, 683, 684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215, 219, 220, 280, 285, 297—301, 308, 368, 378, 379, 402, 470, 473, 476, 482, 488, 491, 501, 502, 504, 506, 512, 514, 515, 524, 529, 533, 550, 571, 597, 611, 650

米丘林学派 216, 238

米高扬 92, 93, 99, 100, 102, 105, 106, 111, 114, 120, 128, 135, 140, 201, 261—263, 381, 385, 386, 404—406, 411—414, 418—421, 691—693, 697, 701—704, 716, 725, 726, 732, 759

老子党作风 394, 719

老舍 244, 249, 254, 478

自由市场 140, 141, 341, 344—346, 429, 450, 452—454, 496—498, 650

七画

何思源 62

何香凝 567, 624
别尔乌辛 100, 204, 406, 713
吴之瀚 60, 61
吴玉章 362
吴冷西 113, 115, 235, 389, 390, 397, 414, 436, 438, 440, 441, 559, 616, 620, 743
吴英恺 60, 61
吴德 239
宋任穷 711, 713
宋振庭 31
宋庆龄 266, 624, 755, 761
批右倾保守主义 38, 154—156, 174, 194, 207, 245, 307, 308 批评《人民日报》447, 506, 512, 525
李井泉' 343, 566, 621 李四光 40, 63, 73, 76 李立三 313, 314
李先念 147, 171, 179 — 181, 183 — 185, 187, 197, 306, 308, 318, 319, 333, 497
李伯球 543, 683, 684
李希凡 260
李强 693, 712
李雪峰 312, 318
李富春 16, 48, 73, 76, 138. 147, 165, 168, 170—172, 179—181, 184—186, 193—195, 197, 199—209, 220, 308, 318—321[~];:, 334, 341, 342, 497, 691, 709, 713, 767, 772
李慎之 15, 115, 286, 432, 682
杜威 57, 220
沈志远 230, 276, 548, 683, 684

两类矛盾学说 470, 472, 486, 490, 500, 504, 675 和平共处 16, 17, 82, 83, 86, 111,

123—125, 238, 379, 413, 739, 742,
751, 763 和平宣言 689, 737, 741, 752 和平过渡 81—84, 116, 123,
124,
126, 380, 440, 718, 734, 737, 739~
743 周小舟 343 周勃 256
周恩来 18—20, 25, 26, 29, 39, 40, 43, 48—54, 56, 58, 59,
64, 71—76, 115, 117, 124, 125, 139, 147, 148, 152, 153, 157,
158, 160, 164, 165. 168—182, 184, 192, 193, 195—200, 204—
212, 218, 221, 235, 236, 244, 246, 249, 250, 264, 268, 273,
284, 287、289, 291, 292, 296, 305, 306, 308—310, 316, 318,
319, 321, 324, 332, 333, 335, 337, 338, 346, 347, 349, 367,
385, 399, 423, 427—431, 434, 516—518, 556, 557, 601, 611,
612, 614, 615, 633, 660, 691, 692, 696, 699, 702, 705, 709,
711—714, 719, 729, 731, 733, 734, 742, 766—768, 771, 772
周扬 20, 55, 244—246, 248, 251. 254, 314, 480, 567
命令主义 355, 451, 464, 469, 483
季羨林 41, 46, 60, 61, 63
宗派主义 49, 51, 54—58, 72, 223, 226, 242, 247, 275, 313,
353、356^357, 462—468, 478, 479, 481. 482, 488, 491. 493, 503,
504, 507, 515, 517, 518, 524, 530—532, 538, 539, 543, 548,
562, 570, 575, 577, 583, 585, 586, 640, 652
官僚主义 32, 82、250—252、258—260, 272—214. 277, 288, 291,
292, 348, 349, 353—358, 433, 434, 437, 447, 449, 450, 458,
462—469, 474, 475, 478—480, 482, 483, 488^489^493, 494, 499,
501, 503, 504, 515. 517, 518, 520, 524, 529, 532, 534, 543,
548, 556, 562, 564, 570, 575, 591, 594, 59、621, 622, 652,
663, 664, 672 林伯渠 318. 319
林克 290, 302, 432, 524, 532, 55 《
600, 616 林希翎 587, 639 林彪 318—320 林枫 306 林铁 343
波兹南事(牛 376, 384, 391, 429, 452 波斯佩洛夫 99—103 波兰十
月事件 382—400, 424—434

知识分子政策 14, 18, 19, 23, 25, 17.37, 38, 47—49, 52—54, 59—60

70, 447, 580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13, 14, 19、20, 26, 29—31, 37, 47—49, 55, 56, 58—61, 64—66, 72, 73, 160, 169, 213, 324, 339, 447

社会主要矛盾 322—324, 674, 688

社会主义改造 15, 17, 18, 136, 147, 149, 151—156, 164.171, 173, 188, 211.2】2, 223, 249, 266—268, 270, 274, 288, 291, 303, 307, 308, 314, 322—326, 332, 338, 341, 350, 430, 43448, 452, 454^4584463, 492, 498, 518, 603, 632, 660, 675, 677, 739, 740, 77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219, 255—25、, 669

邵力子 276, 5405543? 548, 624

邵荃麟 567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213, 214, 271, 273, 274、276, 282, 286, 456, 531, 535, 474, 508, 541, 542 阿里斯托夫 100, 102, 103 青岛会议 628—631, 633635,

637^661, 662, 678, 680, 681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236, 239, 241 非斯大林化 85, 96, 105.111, 115, 122.上 23, 381

俞平伯 2143^57, 223 冒险主义 332 姚文元 620

思想改造运动 18, 24^38, 42, 43, 58, 6】, 215, 228^236, 547, 580

政协二届二次会议 124, 171, 292, 324

柯庆施 280, 509, 606, 611 胡先贛 57, 218, 237, 238, 529, 530 胡风 18, 19, 24, 43—47, 55, 57, 62, 63, 223, 243, 245, 246^248, 253, 254, 294, 531, 582, 586, 587, 612, 645, 667, 671

胡乔木 20, 48, 142.177, 180, 182, 188, 191, 192, 233, 235, 281, 286, 305, 308, 310, 318, 327—331.364, 438^439, 467, 512,

514.516—518, 533, 602, 610, 616, 702, 733, 734, 738, 741
胡适 24, 43, 57, 220, 223, 231
茅以升 60, 61
茅盾 244—246, 254, 257

十画

个人崇拜问题 95, 99, 102, 103, 106,
109, 118, 126, 353, 359, 361, 365,
366, 435, 703 修正主义 80, 141, 326, 374, 502,
554, 603, 604, 608, 619, 622, 7(12,
734, 739, 748, 763 哥穆尔卡 732, 737—739, 747, 748,
757—761 孙大雨 258, 635, 683 徐冰 20 徐璋本 575, 684
徐鑲成 279, 297—300, 478, 480[^]483, 487, 629, 644, 683[^]688
核武器与核战争 83, 86, 707—715, 760—763
格罗 375, 376, 379, 401, 403, 406—
408, 410, 416 浦熙修 279, 280, 282, 629, 644, 683,
684
秦兆阳 254, 256[^]吉 603, 606, 除四害 161 马利宁 404, 406
马林科夫 85, 90, 91, 95—98, 100,
104, 140, 204, 219, 253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團
140, 698, 702, 715, 722, 735 马哲民 230, 547, 630, 683, 684 马
寅初 42, 43, 483, 543, 630 马寒冰 260, 479, 669 高岗 313, 319, 321, 360

昆剧《十五贯》 219, 249 基里琴科 406
康生 115, 218, 244, 318—320, 468, 478, 491, 531, 557, 601,
616, 669
张治中 295, 540
张劲夫 73, 76
张奚若 543, 544, 554—556
张闻天 27, 200, 318—320, 365, 368

张际春 20, 280, 300, 301
张德生 343
扫文盲 161, 189—191
教条主义 61, 116, 118, 125, 216—218, 223, 236, 237, 239, 240,
242, 252, 255, 257, 278, 307, 354, 365, 425, 441—444, 446,
449, 463, 464、474, 476, 477, 479, 481, 482, 几 488, 502, 506,
527, 528, 530, 532,
538, 543, 554, 571.575, 582, 583,
585, 587, 608, 696 梁思成 57, 59, 60, 62 梁漱溟 24, 43, 57, 59,
60, 62, 223,
272, 295, 459, 643, 663 毕鸣岐 582, 583, 629, 653, 683, 688
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 470 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 519, 521 莫洛托
夫 95, 97, 98, 100—102,
140, 385, 386, 392, 399, 405^413,
416, 419—421^697—706, 715,
722, 735, 738, 758 莫斯科宣言 689, 737, 754, 764 郭小川 252, 260, 488
郭沫若 23, 59, 60, 70, 72—74, 184,
214, 216, 220, 224, 228, 230, 529 陈正人 192
陈企霞 46, 57, 243, 669, 682, 684 陈伯达 48, 160, 214, 219,
306—
308, 310, 318, 320, 327, 329, 330,
535, 602, 738, 741, 771 陈其通 473, 476, 479, 488, 509, 511,
513, 514, 669 陈叔通 266, 545, 611, 624 陈垣 25, 60, 64, 485 陈
涌 253, 254, 256, 666, 682 陈云 23, 48, 135, 140, 147, 152—
154, 158, 169, 176, 179—182, 184, 185, 192.196—199, 207,
209, 211, 244, 286, 306, 308, 310, 311, 318—321, 333, 338
—341, 346, 347, 427, 433, 434, 459, 460, 497—499, 516—518,
556, 557, 601, 692, 702

陈铭枢 536, 537, 540, 543, 554, 555, 573, 611, 629, 634, 643,
683, 684

陈毅 20, 72, 73, 75, 76, 160, 244, 246, 247, 306, 318-320
陆定一 44, 45, 48, 54, 57, 58, 187, 188, 191, 215-223, 225,
231, 237, 242, 298-301, 318, 473, 476, 479, 488, 509, 511,
512, 557, 601, 604, 612, 630, 696, 738
陆诒 644, 684
陶涛 467
章乃器 184, 277, 459, 492, 493, 536, 538, 539, 547, 554, 555-583,
607, 610, 611, 613, 623, 624, 629, 635, 639, 643, 644, 653,
683, 684
章伯钧 19, 20, 64, 184, 185, 277-279, 281, 282, 483, 536,
537, 550, 554, 555, 562, 569, 570, 575, 607, 611, 613-615,
619, 621, 623, 626, 629, 630, 634, 639, 640, 644-646, 683,
684, 687
章罗联盟 626

傅作义 264, 295 傅雷 476, 484 傅种孙 46, 580, 683, 684 傅魔 55, 547,
559, 560 富振声 37
彭真 20, 48, 115, 149, 181, 183, 244, 293, 296, 306, 318, 319,
516-518, 557, 601, 602, 607, 611, 612, 621, 630
彭德怀 181, 306, 314, 318-320,
362, 368, 709, 713
斯大林 16, 17, 77, 79-81, 84, 85, 88-109, 111-123, 125-
129, 131-139, 142, 144-146, 175, 208, 214, 217, 218, 252,
253, 256, 261, 263, 272, 286, 290, 294-296, 300, 307, 313,
315, 356, 359, 364-366, 368, 373-381, 391, 395, 402, 403,
420, 421, 423-425, 432, 435-443, 445, 446, 458, 463, 472,
474, 528, 547, 587, 691, 702, 703, 705-707, 717-719, 722,
723, 725-728, 735, 739, 744-746, 748-750, 758, 766
普拉演说 434-436, 439, 441, 444, 749, 750
曾山 135, 345

曾昭抡. 242, 540—542, 550, 613, 683, 684
朝鲜战争 25, 49, 84, 105, 123, 377,
420, 691, 723, 726, 757 肃反运动 18, 19, 24, 27, 36, 37,
43—47, 57, 62, 267, 292, 294,
542, 544, 547—549, 571, 580,
58】, 596 舒芜 484, 670, 682 华沙条约组织 393, 400、422、445 华
罗庚 40, 64 费正清 39, 45
费孝通 19, 42, 230, 487, 613, 629,
630, 683, 684 贺龙 306, 318, 319 超英赶美 739 阶级斗^理论 680
冯友兰 25, 42, 60—63, 485, 529, 532
黄炎培 264, 266, 295, 454, 470, 549,
611, 624
黄秋耘 567
黄绍竑 295, 544, 629, 643, 683, 684
黄琪翔 64, 539, 629, 683, 684
黄药眠 253, 542, 550, 613, 630, 683,
684

十三画

奥哈布 374, 375, 386, 392, 394, 397 新闻改革 233 杨献珍 666
温情主义 625, 628, 633, 635 — 637 经验主义 354, 463 叶飞
330, 343, 510, 634 葛佩琦 576, 610, 634, 635, 641, 642, 684
董必武 624 292, 306, 308, 318, 319,
351, 352, 353, 363, 429 农民退社 448, 594 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 648
—661 农业发展纲要 49, 75, 128, 148, 159~
163. 166. 184, 189—191. 210, 192.
307, 428, 648, 769, 770, 773' 霜海宗 528, 532. 643

十四画

割分右派及其标准 637—646, 661—672
对右派的批判和斗争 628—630,

037—646 废鲁言 160—163, 183, 187 熊克武 276, 542

裴多菲俱乐部 402, 606

赫格居斯 406, 410, 416

赫鲁晓夫 22, 77, 79—81. 83, 90 — 95, 97—100, 102—107, 110, 112—114, 116—120, 122, 123, 126. 129[^]136, 142—145, 204, 217. 286, 299, 307, 320, 359, 368, 376, 378, 380, 382—388, 390—392, 394—几 405 — 408, 412—416, 419 — 423, 439, 441 — 445, 458, 691 — 694, 696—707, 712, 715—722, 725, 726, 730—738, 740, 745 — 753, 756 — 162. 764, 765, 767, 771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286, 421

赵文璧 645, 646

十五画

刘少奇 115. 117, 120, 121, 130. 138. 47, 149. 151. 156, 157. 164, 171 179—183. 187. 188. 195, 198, 211. 217. 220. 235, 236, 244, 246 — 249, 264, 268—270, 277, 278, 293, 299[^]300[^]304—310. 314. 316, 318, 319. 321. 323[^]324 4326, 331, 332, 335[^]337[^]345, 347, 349, 350, 354, 355[^]357[^]359—361 365 — 367[^]377[^], .: 钱 393—棚. 407—409[^]412—416, 424—427, 429—432, 434, 456, 466, 483, 493—491. 500[^]501. 516. 522[^]535、557, 566, 600, (毫. 694[^]696[^]699, 700[^]702, 703, 717, 719, 716. 731. 734, 736[^]771 刘白羽 244, 246[^]248, 252, 253 刘芝明 247, 251 刘绍棠 256, 257, 259[^]682 刘宾雁 258, 260, 668, 682 刘晓 112, 442, 704, 714, 716, 718, 753 摩尔根学派 216, 237, 238, 528 蒋介石 44, 120. 142. 242, 433, 475, 581、611, 643, 766 论十大关系 139, 141, 145, 175, 186. 218, 272, 290, 294, 308, 333, 334, 368, 696, 721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45, 359, 381, 434, 437, 440, 470, 586, 722, 750 邓子恢 184, 185, 333, 334, 341. 342—344, 406 邓/!、平 04, 115. 117, 121, 182, 195, 198, 268, 273, 274, 290,

304—306, 314, 316, 318 — 321, 354—361, 366, 367, 394—396,
415, 454, 516, 518, 520, 557, 559, 601, 606, 613, 619, 627,
630, 632, 635, 638, 648~650, 654, 666, 675, 681, 702, 733,
734, 738, 741, 747, 764

邓拓 280, 512. 513, 515, 620

邓初民 276, 623

翦伯赞 214, 529, 530, 623

十六画

学生民主运动 585—588

学生罢课 448, 449, 499

战争与和平问题 17—18. 82 — 86,
112. 761 — 762

整风动员 620, 668

卢郁文 615, 641, 645

钱伟长 242, 603, 613, 639, 683, 684

钱端升 239, 242, 683, 684

钱学森 40, 64, 73, 709, 713

钱锺书 55

龙云 272, 295, 548, 607, 629, 639, 683, 684

十七画

储安平 276, 279, 281, 282、483^550, 577, 583, 623, 629, 634,
641, 642, 643, 645, 683—685

薄一波 22, 34, 73, 114, 135, 138, 147, 165, 175, 176, 179—
181, 185, 187, 191, 197, 198, 205, 207, 210, 290, 308, 318,
319, 328, 333, 334, 336, 497, 604, 766

谢皮洛夫 104, 406, 413、708, 730

谢富治 564

谢罗夫 100, 404, 406, 411, 413, 697 邀请党外人士整风 525—535
扩大《参考消息》发行 235, 475

十八画

聂荣臻 76, 115, 306, 709—714 萨布罗夫 100, 102, 406, 414 双
轮双铧犁 161, 163, 172. 189—193

十九画

罗申 23, 264, 377, 705 罗科索夫斯基 384, 386, 387, 389^392^396、
398—400

罗隆基 42, 62, 68, 184, 224, 228—230, 264, 277—279, 281,
282, 485, 536, 540—552, 554, 555, 569, 571, 611, 619, 621,
623, 626, 629, 642—646, 665, 683, 684

罗瑞卿 160, 178, 184, 294, 612

谭天荣 586

谭政 306, 318

谭惕吾 573, 615, 629, 683—685 谭震林] 15, 160, 306, 31, 8, 507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17—119, 218, 378, 424, 440, 441,

463

二十画及以上

嚴信民 542

苏中友好协会 717, 718

苏共二十大 77, 79—83, 8587, 98、104, 105, 109, 111, 115—118. 120
—123, 125, 126, 128, 129, 136, 138—140, 145, 146, 175, 201,
212, 214, 236, 272, 286, 294, 296^298, 303, 307, 308, 350,
359, 366, 368, 369, 374, 376—378, 380, 420, 421, 424, 425,
432, 435, 438—441, 445, 458, 463, 696, 718, 719, 723, 725,
735, 739, 741, 743, 755, 763, 764

苏斯洛夫 100, 104, 204^299^405? 406, 410, 412, 418, 697, 717,
730, 736, 738, 740, 741, 747

苏联专家 21, 22, 51, 61, 74, 75, 132, 137, 200—202, 237, 548,

693, 694, 696, 715, 720, 721, 723

苏联对华经济援助 691

苏联模式 84, 137, 442

党内右派[^] 636, 637, 649, 669

党内民主 91, 92, 95, 303, 353, 358—360

敏托 120, 364, 365, 374, 416, 423, 434—437, 439, 441, 443,
444, 457, 587, 723, 725, 729, 730, 732, 749, 750, 752, 753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也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總序·金觀濤)

- 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總約六百萬字，是目前最具規模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
- 十餘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歷時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注重國際與國內重大歷史事件關聯，揭示中央決策與地方、基層之間的互動
- 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

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

沈志華 著

在共和國的歷史上，1956–1957年被稱為「多事之秋」。作者充分利用十幾個省市的檔案、俄國解密檔案、當時的報刊雜誌、當事人的口述記錄和回憶錄，以及現有的研究成果，對中共中央知識分子會議的目標和結果、蘇共二十大在中國的反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提出和推行，中共八大的作用和局限，中國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響，整風反右運動的起因、轉變和結局等一系列重大歷史過程，作出翔實的描述和分析。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第四卷・1958-1961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烏托邦運動

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林蘊暉 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四卷

乌托邦运动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1958—1961)

林蕴晖 著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4
The Utopian Movemen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Great Famine (1958—1961) (in Chinese)

By Lin Yunhui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全球发行及总代理：中文大学出版社

<http://www.chineseupress.com/>

BookinG 制作

「把当代中国惊心动魄的岁月转化为历史著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愿望，也是对中国历史学家的考验」。（总序·金观涛）

-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总约六百万字，是目前最具规模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著述
- 十余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家，历时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历史纪录，通史与专题结合；注重国际与国内重大历史事件关联，揭示中央决策与地方、基层之间的互动
- 倚重档案、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

一套资料翔实、忠于史实、摒除党派观点的中国当代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约六十万字、八百页；完整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至 1981 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全貌。

「这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作者不但一律以中俄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为基本原料，而且也大量地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每位作者都以批判的态度检查史，对于史料中互相冲突记载，详加考订，以建立最可信的史实。」

——余英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退休讲座教授、
克鲁格人文奖得主

「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后，不仅发现其叙事详尽，更发现其已突破中国官方机构对资料的垄断和保卫，有丰富的文献档案以为基础，史实的可信度极高。每册独立，各有作者，但前后仍有脉络可循，容易阅读。这一套大书的出版是这几十年来近代史学界的一大盛事。」

——陈永发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点：

- 十一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家合力撰写：各卷作者均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国史研究专家，多次研讨，分工撰写，历时七年。
- 全景式历史纪录，通史与专题结合：既有反映高层决策和斗争的重大事件揭示，又有表现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社会风貌和流行思潮的生动画面；各卷独立成篇，又首尾相贯。

·倚重档案、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以中央及地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重大史实作出详尽考订和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目前最具规模、足以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未来走向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著述，是中外各图书馆、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学者和教师的必备参考用书。

十卷目录及出版七卷的内容和作者简介：

第一卷 断裂与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49-1952）

（即将出版）

杨奎松

第二卷 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

1953年至1955年，在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期间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变革，都是以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主线而展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引起了人们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反思。作者依据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对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由此引发党内的「倒刘」风波和「高饶事件」，以至实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作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此外，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苏联给予的援助和贡献，以及这一时期的国防建设和外交活动，也有精辟的论述。

林蕴晖，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学者，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共和国年轮（1953）》、《刘少奇之路——辅助建国（1949-1956）》、《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并主编《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合着《凯歌行进的时期》（1949-1989中国系列之一）、《人民公社狂想曲》；并主编《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一至二十一册。

第三卷 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56-1957 年被称为「多事之秋」。作者充分利用十几个省市的档案、俄国解密档案、当时的报刊杂志、当事人的口述记录和回忆录，以及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的目标和结果、苏共二十大在中国的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中共八大的作用和局限，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整风反右运动的起因、转变和结局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过程，作出翔实的描述和分析。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名誉研究员。研究兴趣为苏联史、冷战国际史，对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史有专门研究，代表著作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苏联专家在中国》、《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和论文多篇。

第四卷 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

究竟毛泽东提出的超英赶美战略，如何在中共高层取得统一，又何以得到基层群众的积极响应？一再缩短的赶超时间表是如何编织出来的？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有多少中共省级领导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8 年的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为甚么要拿粟裕开刀？1959 年在庐山罢黜彭德怀的真实原因何在？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为挽救危机，中共中央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本卷依据第一手资料，作出详尽叙述和剖析。

林蕴晖，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学者，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共和国年轮（1953）》、《刘少奇之路—辅助建国（1949-1956）》、《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并主编《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合着《凯歌行进的时期》（1949-1989 中国系列之一）、《人民公社狂想曲》。

第五卷 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

从 1962 年起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是一个色彩纷呈、复杂变幻的时段，有人称其为「变局」。这种「变局」，是在大跃进运动遭受

重大挫折、外部世界对中国施加愈来愈大压力的局势下，中国人在理论、观念、政策作出一系列求变求存的调整和应对而发生的。它根本改变了 60 年代中国历史的走向：那些最为重大、最为精彩的政治变动和思想流转，都发生在这个时段；同时，它又开启了更为激烈变动的十年。

钱庠理，毕业于国内重点综合性大学历史系，史学硕士。长期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著有多部关于毛泽东研究和当代中国历史的著作。

第六卷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本卷简明地描绘出 1966 年 5 月至 1969 年 4 月文化大革命的全景图像与过程：从 1965 年底批判《海瑞罢官》至 1969 年 4 月召开九大期间，文化大革命从发动到形成高潮，从夺权到天下大乱，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到最后召开九大。作者批评文革研究中不实事求是、为尊者讳、粉饰历史、大而化之等弊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史料出发，力求还历史之本来面貌。

卜伟华，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曾编辑多种中共党史数据丛书，合着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等书；也是最早从事文革研究的学者，发表过〈红卫兵运动与「文革」前的学校教育〉、〈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北京红卫兵运动大事记〉等论文多篇。

第七卷 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

（即将出版）

高华

第八卷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

1972 年至 1976 年文革结束，发生了一系列至今仍众说纷纭的重大政治事件，例如毛泽东曾考虑哪些人当接班人？周恩来为甚么要做痛苦的反省？中阿、中越为甚么翻脸？谭甫仁中将为甚么被刺杀？公安部长李震是自杀还是他杀？毛是否因「红都女皇」事件要把江青

撵出政治局？周恩来对美国人说了些甚么而被批判？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是防备谁？批邓是毛的决策还是「四人帮」的挑拨？「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是毛的遗嘱吗？谁首倡粉碎「四人帮」斗争？「四人帮」有没有政变计划？作者利用档案数据，一一严肃考辩，揭示个中真相。

史云，在重点大学毕业后历任大学讲师、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问题的教学与研究，特别专注于 1970 年代以来的中国研究。发表过多种有关中国当代经济体制变革、周恩来经济思想、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大革命人物的研究著述。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冷战国际史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史。主编有《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等书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第九卷 革命的终结——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6-1978)

(即将出版)

韩钢

第十卷 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 (1979-1981)

文革结束后，中共怎样清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重新阐释自己的意识形态，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找到正当性？人们的思想如何不断获得解放？数以千万计的冤假错案如何得以平反？如何促成华国锋下台，确立邓、胡、赵新体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怎样起步的？改革为甚么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党内党外何以会出现民主化思潮？中共提出政治改革又何以迅速地退缩？对于历史大转轨中频繁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争论和冲突，作者都尽可能依据第一手资料作出详尽叙述。

萧冬连，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当代中国史学者。主要著作有：《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共和国年轮（1961）》；合着有《强国的方略——中国五十年社会主义战略的演变》；合编有《中国改革大词典》。

总序：世纪视野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金观涛

经过差不多近七年的努力，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终于分批出版、与读者见面了。对我来说，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一直把能否出版一套忠于史实、观点开放的中国当代史视为对中国历史学家的考验。

把当代中国人经历的惊心动魄岁月转化为历史著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愿望。我们这一代人和人民一起经历了苦难，又见证了启蒙时期思想的风雨雷霆，这一切理应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然而我深知这一工作又是多么困难。

首先，作者必须掌握尽可能完备的史料，特别是档案文献。近年来，出版了大量回忆录和口述历史数据，但是很多重大事件以及与中共高层决策有关的档案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为写作带来困难。在历史学家的写作中，除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史料外，更为复杂和重要的，是对史料的辨伪和确定其在决策过程中起过的作用，只有少数长期关注该领域的专家才具备这种能力。十分幸运的是，本套书的撰写正是依靠了这批有深厚档案功底、又长期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家。他们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及市县档案资料馆，搜集整理档案并对史料辨伪。史料之丰富、辨析之充分，正是本套书的重要特色。

历史研究者的目标是追求历史的真实，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搜集史料、整理档案只是第一步。历史学家在研究和写作中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如果不能做到对历史场景的同情了解，不能在内心重演历史事件展开过程以及理会当时支配事件展开的普遍观念，就无法接近历史的真实。本套书以 1949 年至 1981 年中国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论述主线，这三十余年正是毛泽东思想支配中国的时期，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令人很难理解的现象，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由于本套书的作者都是中国近几十年巨变的亲历者，完全了解这

些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氛围，这就使他们具备了某种比西方史家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优势。当然，作者要发挥这种优势，仅仅停留在感性阶段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某一种意识形态中走出来、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以获得超越的视野。开始注意到支配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与重大社会事件的互动，特别是这些事件是如何从中央决策到地方、再到基层展开的，是本套书的另一特色。由于各卷作者是独立写作，分批出版，虽然现在对全套书作出整体评价尚为时过早，但是，我可以不无自豪地说，中国人终于开始为不寻常的二十世纪中国撰写大型历史著作了。

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不设主编、以便各位作者在写作时有更大的自由，并表达多元的价值。由此带来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统一风格，使十卷著作组成连续的整体。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动笔之前充分讨论各卷内容，每年举行一到两次工作会议，切磋写作中碰到的问题。至今，我仍不能忘怀一次又一次的国史写作讨论会。窗外是北国的寒冬，大家众集在不大的会议室中不分昼夜地讨论，最后形成会议纪要。这一场景使我想起 1970 年代末青年时代和朋友的彻夜长谈。很多时候，大家就某一观点，细节甚至是提法，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使我十分感动的是，无论在讨论中发生多大的争论，甚至是立场和价值上的分歧，最后都能在忠于历史事实之上得到统一。根据时段，本书大约以两三年为一卷，每卷由一位或两位作者撰写，而其它作者都把自己对该时段的见解和史料提供给该卷作者，整个写作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今日中国学术界罕见的真诚合作精神。在此意义上讲，这套书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

组织编写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我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所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这套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沈志华和李丹慧夫妇，从确定撰写计划到寻找适当的作者以及整体工作的协调，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其次，我要感谢青峰和先后在《二十一世纪》编辑室工作的同事黎耀强先生、林立伟先生、张志伟先生、朱敏翎小姐和张素芬小姐。他们在青峰的带领下，以巨大的热忱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投入编辑出版工作，否则，如此繁重而浩大的编辑出版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还要感谢中大中

国研究服务中心为本书作者提供的支持和热情周到的服务。最后，我要感谢方正兄，该书从酝酿到出版，一直得到他在精神上和各方面的支持。他虽已退休数年，但仍念念不忘这套书的出版，认为它对香港中文大学有重重要性。在这些中大同事身上，我仍可以感受到高锲教授任中大校长时期那种注重中国研究在当今世界意义的「中大精神」。

这套书出版之时，我也到达退休年龄，将开始人生的新阶段。我想指出的是，由于可以看到的档案和其它种种限制，这套书只写到1981年。如果不谈此后发生的波澜壮阔的80年代启蒙运动，以及出此引发的1989年震惊世界的事件，我们仍无法理解今日中国和世界。在这一意义上，仅仅由前十卷组成的二十一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不完备的，写史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从来就有忠于事实和敢言的历史传统，但很少有史家为当代写史，故这套书的出版是一种新现象。它说明中国历史学家已走出仅仅用春秋笔法褒贬益损，并展示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历史反思意识已经产生，并开始指向新的深度。我期待着后继者。

200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录

总序 金观涛

导言

第一章 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一 赶超新思路在高层统一

- 1 毛泽东赶超战略的新思路
- 2 反「反冒进」的酝酿与发动
- 3 批评反冒进「是政治问题」
- 4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

二 鼓动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

- 1 《人民日报》吹响「大跃进」的号角
- 2 大跃进形势始于大搞农田水利
- 3 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的炽热空气

三 大跃进的全面发动

- 1 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
- 2 刘少奇阐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3 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
- 4 众代表登台表决心
- 5 周恩来、陈云检讨
- 6 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

四 为总路线扫清各方障碍

- 1 反中共党内的「右派」
- 2 敲打军队高层将帅
- 3 全总批右倾机会主义

第二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一 全党全民办工业

- 1 县社工业遍地开花
- 2 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
- 3 一再提前的赶超时间表

二 农业生产大刮浮夸风

- 1 浮夸从深耕密植开始
- 2 媒体大量报道农业「放卫星」
- 3 省委书记与科学家的论证
- 4 各方人士的现场调查

三 小社并大社的由来

- 1 毛泽东的大社情结
- 2 农业社规模的起落
- 3 成都会议的决策

四 人民公社的出现

- 1 中央领导人「吹乌托邦」
- 2 陈伯达披露毛泽东的设想
- 3 最早出现的一批公社
- 4 毛泽东视察冀豫鲁津

第三章 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 北戴河会议决议

- 1 紧急动员钢铁翻番
- 2 共产主义已为期不远
- 3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二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 1 各行各业为大炼钢铁让路
- 2 毛泽东南巡督阵
- 3 「小土群」村村点火
- 4 「九千万人上山」及其后果

三 人民公社化高潮

- 1 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
- 2 「一大二公」的公社特色

- 3 徐水式的「共产主义」

四 教科文艺大跃进

- 1 「插红旗，拔白旗」
- 2 教育制度的革命
- 3 科学界的赶超运动
- 4 文化事业大跃进
- 5 除「四害」讲卫生运动

第四章 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一 美、蒋固守台湾的各自打算

- 1 台湾问题的由来
- 2 美、蒋策划共同防御
- 3 第一次台海危机

二 炮击金门的最初意图

- 1 中国呼吁中美直接谈判
- 2 美国无意缓和中美关系
- 3 炮击金门的决策

三 由「联美压蒋」到「联蒋抗美」

- 1 「八·二三」炮战引起的震动
- 2 美国的底牌和美、蒋矛盾
- 3 毛泽东的策略：「联蒋抗美」

四 1958 年后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 1 「支应差事」式的谈判
- 2 王炳南总结百次会谈
- 3 华沙通道的一次实质性作用
- 4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终结

第五章 西藏平叛与西藏的社会改革

一 西藏解放后面临的形势

- 1 《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 2 西藏解放后面临的复杂斗争
- 3 中央宣布「六年不改」的方针

二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

- 1 川滇甘青藏区的局部平叛
- 2 西藏地区的局部叛乱

三 人民解放军奉命平息

- 1 拉萨全城发生叛乱
- 2 中央决心彻底平叛
- 3 进军山南摧毁叛乱中心
- 4 平息纳木湖等地区的武装叛乱
- 5 肃清边沿地区的叛乱武装

四 民主改革和西藏自治区的建立

- 1 「边平边改」的民主改革
- 2 「稳定发展」西藏经济
- 3 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第六章 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一 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

- 1 公社所有制问题引起的关注
- 2 对向共产主义过渡波的左思右虑
- 3 「过渡」和指标问题的讨论
- 4 关于两个「过渡」的界限

二 整顿公社和二次郑州会议

- 1 1959年初的农村形势
- 2 人民公社的初步整顿
- 3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三 二次整社和降低钢铁指标

- 1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 2 钢铁产量月月欠账
- 3 七中全会决定降低指标
- 4 对1958年「大冒」的交代

四 二届全国人大和钢铁指标再调整

- 1 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
- 2 关于农村政策的〈党内通信〉

- 3 陈云受命落实钢铁指标

五 中共党内对形势的不同估计

- 1 党内主流看法的基调
- 2 来自党内中下层的质疑
- 3 少数高层领导人的担忧

第七章 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一 毛泽东为继续跃进定基调

- 1 到韶山、登庐山豪情不减
- 2 「神仙会」的讨论主题
- 3 各路「诸侯」的不同见解

二 彭德怀上书毛泽东

- 1 被毛泽东批发的「意见书」
- 2 与会者的最初反应
- 3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张闻天

三 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集团

- 1 来自莫斯科的不和谐音
- 2 毛泽东密切关注各方动态
- 3 七月二十三日庐山风云突变
- 4 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旧账
- 5 八中全会定性为「反党集团」

四 全国范围的反右倾斗争

- 1 军委会议追逼军事俱乐部
- 2 外事系统追查「里通外国」
- 3 层层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第八章 坚持「跃进」经济跌入谷底

一 捍卫「三面红旗」

- 1 批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论
- 2 批判包产到户和解散公共食堂

二 毛泽东读书漫谈理论

- 1 毛、刘、周各组读书小组

- 2 毛泽东自信发展了马列主义
- 3 读书谈话的传达和效应

三 城乡再刮跃进风

- 1 人大通过的跃进计划
- 2 农村再次趁穷过渡
- 3 城市建立人民公社
- 4 工业指标再度升高

四 写「十年总结」酝酿转弯

- 1 中央下令再煞「三风」
- 2 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
- 3 毛泽东提出要扭转被动局面

五 中苏关系恶化对内政的影响

- 1 两党分歧的由来
- 2 中苏第一次正面冲突
- 2 争扛列宁主义的旗帜
- 4 布加勒斯特的较量
- 5 撤走专家，关系恶化
- 6 发愤图强，自力更生

六 学习「毛著」与突出政治

- 1 掀起学习《毛选》的热潮
- 2 突出政治与鼓吹个人崇拜
- 3 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不同声音

七 经济跌入谷底，农村灾情弥漫

- 1 全国保钢比例更失调
- 2 粮食危机严重显露
- 3 「信阳事件」东窗事发
- 4 关于非正常死亡的考证

第九章 制定政策挽救农村危局

一 挽救农村局面的紧急措施

- 1 国民经济大滑坡
- 2 十二条紧急指示

- 3 紧急指示信的贯彻

二 确定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 1 决定退却的中央全会
- 2 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 3 管理体制的收权措施

三 草拟人民公社六十条

- 1 毛泽东高倡调查研究
- 2 三大秘书汇报问题
- 3 《农业六十条》的草拟
- 4 再次疾呼调查研究
- 5 老百姓的强烈要求

四 常委下乡体察民愿

- 1 睡在养猪场的刘主席
- 2 周恩来在河北农村
- 3 邓小平考察京郊
- 4 朱德、陈云南下调查

五 公社体制的再次退却

- 1 北京会议再议农村形势
- 2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
- 3 落实退赔、解散食堂
- 4 基本核算单位再下放

六 责任田的出现和分歧

- 1 包产到户的出现
- 2 责任田风波暗起

第十章 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秩序

一 挽救粮食危机多管齐下

- 1 全力支援农业恢复
- 2 进口粮食应急度荒
- 3 网开一面稳定市场
- 4 精简压缩城市人

二 工业战线的退却

- 1 延误了的工业调整
- 2 该退的坚决退下来

三 各项政策条例的制订

- 1 流通体制的松动
- 2 手工业的恢复
- 3 工业体制的调整
- 4 整顿文教工作秩序
- 5 科技政策的调整
- 6 重申「双百」方针

四 调整政治关系共渡难关

- 1 党内的甄别平反
- 2 调整统一战线政策
- 3 为知识分子松绑

五 文化领域的短暂春天

- 1 《海瑞罢官》与《李慧娘》
- 2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六 逆境者的批评和反思

附录

大事记

参考文献

索引

导言

1958年到1961年，在共和国大地上，先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尔后由此引起了三年大饥荒¹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兴奋和大灾难交替的年代。对这四年的历史，在中共党史学界和国史学界均有不少记述。从现已出版的著作看，最为详细的应属萧冬连领衔撰写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而李锐以回忆录方式撰写的《「大跃进」亲历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和《庐山会议实录》（北京：春秋出版社、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史料最为详实和珍贵。专题研究性的著作有：谢春湮着《大跃进狂潮》（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庐山风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萧冬连着《共和国年轮（1开1）》（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国外学者的研究，以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跃进（1958—1960）》【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为代表，在中国影响最大，廖盖隆护曰：「为了揭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作者搜集、整理、查阅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从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等各个层次，以及当代国际共运和东西方关系等各个角度，进行了大量周密的分析和研究。不过，由于成文时间较

11 囑年。月·廖董陆为该·中译本作序。见〔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着，《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页3·

耳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卅春《19“一1961）—乌托年运动

早《英文版1982年出版），现在可以见到的大量文兽数据当时尚未公布。1990年代以来，香港出版的有：丁抒着《人祸》（1988—1989

年在《九十年代》连载，2005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出版单行本）；曹树基着《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着，姜和平译《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众所周知，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开出了一张不同寻常的时间表，先是十五年赶超英国；然后是十年赶上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再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最后是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二年到三年。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是架起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供给制、公共食堂被誉为是共产主义的「萌芽」，一时间，竟然向世人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甚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种被后人看来有违常识的天方夜谭，是怎样设计出来，又何以能够得到上下左右的认可，从而掀起一场群众性的狂热？学者们对此提出有以下观点：有的认为：第一，中国当时的经济模式是欠发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愈是欠发达的国家，其内外压力愈大。「大跃进」的发生与此有关；第二，为了走自己的路。「大跃进」发起的年代，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冲动」，来进行一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越前人的工业化实验；第三，理论约束与现实矛盾。一方面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的一般原理，尊重苏联某些经验；另一方面又必须创造一整套符合自己情况的方法、政策，一方面要争取高于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苏联的发展速度；再一方面，又面临着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人口众多的现状。这些矛盾给发展战略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第四，造「因利制权」之势。1950年代后半期世界局势相对平稳，毛泽东有「因利制权」的战略考虑。「大跃进」的发生，同这一个时期内外环境特点以及中国试图加以利用它们的战略考虑有关。

2 李向前：〈「大跃进」腰史成因刍论〉，《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耳

导言

有学者补充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处于冷战对峙的格局之中，毛泽东「左」的错误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思想」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观点的错误理解及宣传，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是导致「大跃进」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³而毛泽东对于1956年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的批评，直接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⁴

也有学者认为：「大跃进」的发生，与对革命经验的采借有关：以群众运动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运作方式；在分配方面倡导恢复供给制；在激励机制方面突出政治挂帅；在领导体制方面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可以说，「大跃进」是中共在延安时期领导的「大生产运动」的再现。⁵

还有学者指出：不应该把个人或某些阶层对「大跃进」的影响因素夸大。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乌托邦思想、浓厚的不诚实氛围、传统的生育观带来的人口压力等三个方面对「大跃进」的形成有重大影响。⁶显然，人民公社所以一时为广大农民接受，与整个社会深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有关，当时的领导人曾明确表示，先人的乌托邦现在已有条件得到实现了。

关于导致「大跃进」的外部因素，学者们认为，除了东西方冷战格局的背景，使处于落伍状态的中国领导人有一种抢速度的紧迫感之外，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也是影响和推动「大跃进」发生的重要国际因素。⁷

3 王军正：〈「大跃进」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探析〉·《西安联合大学学报》，联1年第3期·4 王玉贵：〈毛泽东对中央一练领导的严厉批评与「大跃进的发动」〉·《广西露史》1的6年第1期·

5 何云峰：（「大跃进」运动对革命经验的采借）·《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6 朱地：〈也论「大跃进」的缘起—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舅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

7 李若建：（「大跃进」的社会基础），《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8 刘建国：〈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与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生〉1《江汉论坛》2）1999年第4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2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而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其它一些中央机构编辑、出版的大量文献、年谱、大事记等史料集·领导人的传记、回忆录、口述史等等，更为人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较此前更多的客观依据·

本书的写作，遵循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客观叙述的原则，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对这一时段人们关注的问题做出贴近历史实际的记述。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大跃进的发动者，无疑是毛泽东。问题是在中共高层是如何取得一致的？

第二，如果说，高层领导人头脑发热，那群单的热情又是怎样被妓起来的，并曾一度为人民公社的建立而欢欣鼓舞呢？

第三，超英赶美的时间表一再缩短，这场数字游戏是怎样编织出来的了

第四，接近天文数字的农业高产「卫星」、钢铁高产〔卫星〕为甚么人们一时都信以为「真」？

第五，供给制，公共食堂，这些人民公社中的共产主义「萌芽」和 r 因素」，在领导层和农民群众之间出现的矛盾，何以运运得不到解决 7

第六，从 1959 年开始的大饥荒是怎样造成的，主要是 r 天灾 j 还是 r 人祸」？各地的严重情况为甚么迟迟反映不到最高层，农村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真实情况如何？

第七，1958 年到 19 的年问，中，苏两党领导人发生的严重分歧对大跃进和大饥荒产生了哪些影响？

第八，大跃进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的反映，以及对不同阶层的影响·

第九，为挽救危局，当年采取了哪些措施，在整个社会趋向稳定的同时又潜伏看怎样的危机？

有关以上诸多问题，除为多数学者共同采用的史料外，本书还选用了若干人们未曾使用过的和新公布的史料。如：

导言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除在党内高层严厉批评反冒进，把有关经济建设的不同意见提到了「政治」、「路线」、「主义」的高度外，同时在省级领导层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全国（除台湾·西藏）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中有九个省区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省委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省长、副省长，全国总工会主要负责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右派反党集团」。对1958年的军队整风，提出要学习苏联「朱可夫事件」的材料，吸取教训，对军队将帅进行敲打。在成都会议上提出「要崇拜真理」，「一个班要崇拜班长」以后，当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掀起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第一个浪潮，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纷纷发言指出：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是崇拜真理；毛泽东著作，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主要是读毛着；总路线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具有世界意义等等。

有关基层群众响应大跃进的号召·掀起的群众运动，有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地方各级领导人、工农业劳动模范、科学工作者，技术人员、文化界人士、党员代表的发言，表态；中央和地方报刊报道的各地农田水利建设，技术革新·大办地方工业等群众运动的火热场景。

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也有很多报道：公共食堂发生断炊，浮肿病开始在农村出现，农民盲目外流，农村劳动力短缺和出勤率下降，城乡粮食危机，中下层干部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质疑，大炼钢铁造成的破坏，钢铁生产计划难以完成等情况。

「信阳事件」采用了《「信阳事件」专题研究报告》未刊稿、《信阳事件》未刊稿，以及当年的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的遗作等材料·有关因大饥荒引起非正常死亡的问题，除介绍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情况外，笔者还根据赵发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许涤新主编的《当代中国的人口》·袁永熙主编的《中国人口》等著作提供的数据，作了估算。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中外古今的哲人都是这样说的·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夺（1958—1961）—为托年运动
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这就是笔者
写作《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这一卷的
初衷。

第一章

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从1955年批判农业合作化的所谓「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逐渐形
成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指导方针的观点：一种叫多、快、好、省；一
种叫少、慢、差、费。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
严重错误，毛泽东决意要走出一条较之苏联更快的路，但在党内却受
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反冒进的阻挠。在取得反击资产阶级「右
派」斗争的胜利，又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获得极高声誉，并向
全世界宣告十五年赶超英国之后，毛泽东深感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
速度，首先要使中共党内的思想，尤其是党的高层思想统一到多、快、
好、省上来。

一 赶超新思路在高层统一

i 毛泽东赶超战略的新思路

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后进国家的发展都有一个赶超的紧迫感。对
处于资本主义包围形势下的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这样。列
宁在1917年就提出：「或是灭亡个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49—1961）—乌托邦运动

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斯大林在1931年也说：「延缓速度就是落
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他还强调：「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
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
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采取了优先
发展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战略，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和轻
工业的发展，终究使苏联在短期内实现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不久，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现在只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
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都不能造。因此，从1953
年起实施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走的就是苏联工业化的赶超型

道路。由毛泽东审定、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写道：

青本主义国家从妄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三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

毛泽东公开提出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是1955年。这年的3月1日，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说：

朔宁：《大调临头，出路何在》『工917年9月10一拼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迟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工69。

斯大林：《论组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年2月4日），载《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页37、朋·

〈为动·一切力t把我·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一关于写在过渡时期薄路线的学习和t传提纲〉·中共中央！传部1”J年12月印发，经过中共中央批准》，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显：《建日以来，要文戏蕴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欢出版社·19931，页物6·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要在大约么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慕基本上么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实本主义二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弦大的实本主义国家。‘

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第一次把美国作为赶超目标，并向共产主义过渡联紧起来。他说，大约十五年左右，即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还要加一点：大约五十年到七十五年左右，即十个到十五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在这个时期内，国际、国内、党内、写外：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程度不同的冲突和斗争，··一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五十年以后t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s

1955年秋冬，由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引发的社会主义改造热潮，使毛泽东极为兴奋，曾被认为是最困难的问题——对农民的改造，竟然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就顺利解决了，不仅没有像苏联那样引起社会的极大震动，而且经济的发展在总体上是向上升的。对毛泽东这时的心态，逢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中有如下描述：他（指毛——引者注）对田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这个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对毛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斜到的，早有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五亿人，的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历困难的问题，经过二三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开幕词〉（1958年3月2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192。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稿）（1958年10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5—1961）——鸟托年运动

次会议，作一万报告，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那末，还有甚废比这个更困难的问题不能解决呢才‘

于是，毛提出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进一步加快发展，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在他看来，只要采取像农业合作化一样，批判各条战线的右倾思想，把群众发动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使毛认为，苏联的道路也不完全是正确的。中国有可能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快的发展道路。当年4月4日，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最后一次修改稿的会上，毛泽东说道，对苏共二十大的议论，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甚么教益。他说：

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苏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徒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

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徒来又在建设上考虑龙否不用或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应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6 董边、洁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口七京：中央文戏出版社，吴冷西如引·页 50·社，1995》

《亿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页 9—10’

第一章多侠好省总路线出台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实行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方针。就是在「以苏为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8月30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讲话中就极为自信地说：

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首多年落复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例喜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残大的青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历一块大地方，资源那庆丰富，又听说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甚么样子呢才耶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务！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铃要，完全应谊。

1 外 7 年 7 月，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未来发展的进程时又说过同样的话：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塞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塞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十年至十五年以复的任务二是进一步参展生产力，进一步扩犬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看逐步地由社

会主义通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早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由这年夏季开始发动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除了使人们更加坚信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并由此引发出了一股力争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热情，也使毛泽东认为找到

缀龙生编着：《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卯计·页381·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卯年7月），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卯2），页549—5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卯春（1958—1961）—乌托杂运动

T

一条动员群众的好方法，这就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极其兴奋地说：

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与“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1956年到1957年期间』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尤其是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在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想混乱，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及世界共产党中的威望大增。以至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事实上成了会议的主角。这时，毛泽东明显感到的是「政治大国」与「经济小国」地位的不相称。因此，他在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十五年后赶上和超过美国之后，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后赶上和超过英国。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

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

赫·t·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可以认为，毛泽东赶超战略的新思路，这时已基本形成。这就是用「四大」的方法，通过不断批，11「右倾保守」思想，把各阶层人民

10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7年10月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舅之·

u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辞（1957年11月18日），载中共中央文研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引·页327·

了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群众动员起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有可能克服各种困难，在短期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来一个大飞跃。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其内容就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突出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同时，向全国人民郑重宣告：

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国人民光荣的伟大的和艰巨的压史任务。’ z

这篇社论，实际上是向全中国人民发出的一个动员令。1958年来到时的形势，国际上，苏联两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写的莫斯科会议，使当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笼罩在社会主义阵营上空的乌云已为之一扫，出现了毛泽东概括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势头。中国国内·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胜利完成，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初步积累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1957年秋冬，由《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公布，在全国农村掀起的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既反映了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热情的高涨，又表露了人们对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迫切期盼。因此，整个来说，对加速国内的经济建设，是有利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过分自信，fg，决意乘着这股有利形势 j 推行他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从1958年

元月起，首先向党内高层发难，展开一场反对「反冒进」的斗争。

12〈人民日报〉】野 8 年 1 月 1 日社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2 反「反，进」的酝酿与发动

然而，1956 年中共八大前后，由反对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而制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不只在全党「言犹在耳」：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的成效有目共睹。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写明：「党的任务，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要使这个超高速发展的赶超战略在政治上、理论上站住脚，不批倒「综合平衡」、「稳步前进」论，就难以把全党、全民调动起来。毛泽东在去莫斯科前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开了批评 1956 年反冒进的头，提出要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这三条不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各省领导人已开始紧跟步伐。毛从苏联回国后，继续思考如何取得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他历来认为，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用地方来促中央，是毛泽东实现他的思想主张的重要一着棋。1955 年秋掀起的农业合作化热潮，就是以地方来促中央的范例。事隔两年之后，毛为了实现他的战略宏图，决心再次以地方来促中央。12 月 8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西子湖畔的杭州。

毛此次到达杭州，正值中共浙江省委和上海市委即将举行党代会的前夕，他随即召集上海市及华东各省负责人：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渭清、叶飞、江华等开会，向他们讲了主要矛盾、

珍 1980 年 11 月上旬、陈云在同胡乔木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问题时说：r 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头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次是中南。J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才 60—261·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整风重点等问题，并对浙往省委向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作了讨论。”随后，又亲自审阅了上海市委向党代会的报告，并作了一些修改。”后来，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党代大会上的报告，都受到毛泽东的赞赏。这两个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毛泽东亲自写编者按，要全党学习。

在中共地方党委中，紧随毛泽东其后并公开批判 1956 年反冒进的，柯庆施是第一人。1957 年 12 月 25 日，柯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以《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为题的报告中，首先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随后，谈了上海完成一五计划的情况，工业产值超过计划 3 吗，整个形势一片大好。批评「有一部分同志曾经认为我们上海的各项工作都『曾进』了」的说法。认为对上海工业方针的争论，突出地表现在这一点上。他在引用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强调要在各个领域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一段话后说：

我们认为，既然是拎社会主义革命、拎社会主义建设，拎这种前与古人的事业。拎这种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事业。那鱿必须有一股革命的拎劲。……在我们看来，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这才是正常现象；不去努力做到。这才是不正常现象，否则，鱿谈不到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就谈不到尽可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因

141957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2 时，毛泽东写信给秘。叶子总：「讲于今日上午 8·9 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硕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常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 t 骄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 1 时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珊，页 671；另参见中共中央文欢研究室编【金冲及主领：《周恩来传（1949—1 卯 6）》（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 卯田，页 13 “·

巧毛潭东：《关于通知阅看浙江省委工作报告给叶子龙的信》随站 7

年 12 月 17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阡，页 673，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我们应该坚决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它是一个促进的而不走“促退”的方针，走在现在的国

际环

境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方针·而且没有一个已经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

柯弦绸：「在整风运动中，必须批判这种右倾保守观点。改正各种不正常现象，以便迎接新的建设高潮，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潮。」李锐回忆说，「1958 年我同陈云接触时，陈向我说过这样的话：柯庆施是一个手中随时拿着大棒的人。」

柯庆施还是最早具体落实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地方官员】他在报告中提出上海赶超的主要目标是：一般轻工业，纺织工业、机电工业、化学工业部门要根据具体情况，争取若干质量较低的主要产品，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地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或美国同类产品的质量水平。争取《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提前实现：在五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皮棉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一百五十斤到二百斤·

柯以「乘风破浪」作为报告的结语。他说：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来风破浪」。我想很可以用这句话来描写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的前面有浪·这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必然遇到各种困难。但是我们的后面有风·这就乏广大的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日益高涨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股具有无限潜力的风·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风。只要我们坚决依靠群众的这种革命积极性·我们说一定能够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让我们用来风破浪的革命气概勇敢前进！’

16《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25 日。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4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页 57·18《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25 日·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这真有一点毛泽东后来提倡的高屋建瓴，所向披靡的味道。可见，毛泽东欣赏柯庆施，绝非偶然。

经过这段在华东的酝酿，毛泽东反「反冒进」的意图在地方「诸侯」中开始有了响应，于是决心正面向党内高层发难，展开一场反对「反冒进」的斗争。

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到会的有：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渭清、叶飞、江华、胡乔木、陈丕显、林铁、石西民、张春桥等。周恩来陪同也门王国巴德尔王子于1月1日黑到达杭州，也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讨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

在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一上来就批评所谓的右倾保守。毛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他表扬甘肃省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劲头说：甘肃一千多万人口，劲头很厉害，直得去学习。他认为】1956年工业产值增长31%：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因此，要愉快地批斗右倾。他批评有些

19 关于1958年1月杭州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有以下四种说法，第一2至4日说。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页362，注3：杭州会议，指中共中央1958年1月2日至4日在浙江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116；（《周恩来传（1949—1976）》，页1364，1月2日至4日·出席毛泽东召开的杭州会议。第二，3至4日说。见郑谦、韩钢：《毛泽东晚年岁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页75：1月3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小型会议，第三·3至8日说·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12：1958年1月3日至8日·毛泽东亲自到杭州召开了华东六省市的负责人会议·第四，1月上旬说·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10，注1：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本文采纳2至4日说，据

《周恩来传》注·其根据为：中央工作大事记，1958年1月之日·
20 中央工作大事纪，1958年1月2日。参见《周恩来传（1949—1976）》·页1364—1365·

’ T!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说话是口边政治很少，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他提出，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它技术家，都是不好的·明显地表露了对国务院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的不构。

接着，毛表扬了上海和浙江。说：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在4日的会上，毛泽东从哲学的角度讲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用以批评经济发展计划必须考虑综合平衡的观点。他说：《哲学研究》第五期上李达的一篇文章，第六期上冯友兰的一篇文章，都可以看一看。形式逻辑是量变阶段的科学，是辩证法的组成部分。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事物有它的相对的固定性。定出计划。做出决议，是相对的平衡。定了以后，还是要变。平衡、巩固、一致……都是暂时的，不平衡、闹矛盾是绝对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衡。他强调】我们的经验就是要不断革命。要趁热打铁，不能断气。

就在这次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面向周恩来发了火。他后来在南宁会议上说：杭州会议，我在那裏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指柯庆施—引者注）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总你这一套】你讲甚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 z ‘毛还向周恩来「发了一通牢骚」，说： r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甚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为甚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一百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

钝〈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纪录〉《1958年5月”日》·参见《周恩来传（1949—1976）》，页136。

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第一章

了▼！·

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甚庆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认「你们那时候（指反冒进—引者注）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u

如果说，随后的南宁会议是毛泽东反 r 反冒进 d 的高峰，那末，杭州会议是这个高峰的发端。

3 批评反，进「是政治问题」

1958年1月6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回到北京，立即为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做准备。考虑到1958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需要研究确定，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在人大召开前先开一次党内会议讨论一下。毛表示同意，一并亲自写了准备到南宁去开会的通知”之‘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教，王鹤毒，李先念·陈云，邓小平·杉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汤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1 建东·韦国清，毛泽东·共二十六《二十七）人·矜11日、12写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黜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丰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

谭震林管中夹，总司令挂帅。陈教管国务院。

1月11日，南宁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所点的人中，陈云·邓小平、张德生、潘复生没有到会。周恩来因送巴德尔王子离京，13日才到达南宁。会议的重点本来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教《毛泽东在南宁 t 议上的讲话纪录》. 1958年1月12日）·参见《周恩来传（1949—1976）》·页1365。

始熊华源·参必文：《周恩来总理生涯》口匕京“人民出版社·兀”衫·，谢·24毛潭东：〈关于召开南宁会谪的通知〉1958年1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胄专 t1958—” 61) —鸟托年运动

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等问题。但在开会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并定性为「政治问题」。把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上向到会者散发了十二份反冒进的文件材料，主要有：1956年6月神日【李先念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一〈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

11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他扳起手指头，提出著名的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说。他向在座的人说，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毛强调要反分散主义，提出了八首歌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过去中央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它实权在国务院。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集中到党委，到访《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6年1月11日），参见李锐：《「大跃进」纵历记》，见。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这显然是指周恩来在向党中央揽权。”

第二天，毛泽东更把反冒进说成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离右派

只剩五十米远了。他批评说：「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他接着批评说：「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的。」「右振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甚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边。政治局要研究为甚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他批评周恩来说，「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1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关于毛泽东对反冒进那篇《人民日报》社论的批评，吴伶西有过详细的记述。他在《忆毛主席》一书中写道：

t

1月12日，南宁会议开始。毛主席一上来就讲他建国八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1956年「反贾还」是错误的。

茄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解释说：「这八句歌诀，产生于1953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敌主义而想出来的。J所谓[1953年那时的分敌主义，指的是政务院1952年12月批准财政部发布的「新税制」，毛浓东丝为此事未经中央讨论！事实是向他作周汇报），政务院犯了分敌主义错误。为此，中共中央作出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并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27〈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购结记绿稿〉C19, B年1月12日）中。人民。和. , . 。四，。195。一，961，一、托，。 ， 'T■— ……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也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霄这的社论《题目叫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非常错悞的‘二’”毛主席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姿，并且加上批语：「席

俗的马克思主义，席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卑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在会议进程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

毛主席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广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霄肥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久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妇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一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1a

毛泽东对反冒进这些措词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1月13日晚，周恩来飞抵南宁，同日到达的有柯庆施。当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

在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当单羞辱周恩来，问道：

28 吴玲西：《忆毛主席》，页 46 — 51 • 29 吴徐西：《忆毛主席》• 页 49 •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r, 了徐.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化周回答说：r 我写不出来。」毛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薄一波在 1983 年接受访问时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r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是使人难堪的。」「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

会，非常紧张·」”听了毛的批评，周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之周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说：「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众在总理那裏讨论到夜裏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8点多一直开到深夜1点多。周恩来在大会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他检讨：「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

「反冒进」是由终不鳃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复生产力将要跃进的姿展·因而在欣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长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30〈毛潭东在南宁会缮上的讲话纪录〉{1958年1月16日}，参见熊华山，廖山文：《周恩来总理生涯》，页240—241·

31熊华山，廖山文：《周恩来总理生涯》·页241，

n 显明：〈历尽醒辛创四化〉，载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页18，

33《显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1987年1月9日》·载《周恩来传（1949—1976）》，页1367—13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8—19,11—乌托年运动

周被迫承认，「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农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是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并上纲说：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这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达背了主席的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这背·就越严重越危险。

周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1月21日，毛泽东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

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强调教 mJ1 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并明确提出今后要「以一个人为核心 J。二南宁会议最后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不乏具有指导意义的工作方法，但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是推动「大跃进 J 的错误做法。其一，提出了「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第二本是期成的；地方也有两本账：第一本是中央的第二本，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

其二，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过高指标，主要有：各地方的工业产值，r 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舛<周恩来在南宁 t 绩上的发言提纲手稿> . 1958 年 1 月 19 日），载《周恩来传 q949 一

1 卯 6) 毛泽东

买 1368 一 1) 的 •

：〈在南宁 t 议上的结论提纲〉（19 铭年 1 月 n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

挤》• 第七册，页 27, 28。

36 毛潭东；《工作方法六十条

《建口以来，要文戏选编》

【草案）》，第十一册

{ 珍 58 年 1 月）• 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口 1 京：中央文戏出版社 • 199 弘、页 42 •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来 J。「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 • 或者八年内 • 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原规定十二年完成一笔者注）。各省委 • 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作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作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作到」

其三，提出「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r 苦战三年 J 等

急于求成的口号。“树立了湖北，四川，陕西、广西几个农业社明显含有水分的高产榜样，介绍说：「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 2130 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 1680 斤于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 1654 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 1600 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六十条》，把抗州会议上谈到的「不断革命」和打破平衡论的观点分别列条，作为批判反冒进的理论武器和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肯定下来，否定了国民经济必须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规律。

关于南宁会议的气氛，参加会议的李锐回忆说：

在南宁会议上，形势当然是一边倒。与会者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教每“「头脑大大清醒翹来」，都表示要当促进雅。记得三峡问题茨完后，周小舟向我介绍那几十样时·说大家都希望主席多谈一些·多受到一些放发‘甚黑表示他也将英文检起来·李井泉等人还从自己的工作出要·说明「反宝进」受到的损失：有不少人汇报时·谈了反省性的意见。批反宝进首当其街的是周·恶来、陈云·以及国务院财经方面负责人·他们曾

刃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 1 草案）>-19 铝年 t 月】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 第十一册，页 42 — 43 ·

38 毛潭东：〈工作方法六十条 c 草案，）《1958 年 1 月！，页 41 · 43 · 39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 1 覃案，）1 兀 955 年 1 月），页 j7 ·

万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春（19 铭— 1961）—乌托年运动

是反，进的主角。

作了检讨讨下去。

。事实上

周恩来除在会议上表态外，还旱独向毛泽束·凡肥有「反奋进」错泪的人·都得一再检

等。村老

在南宁会议上再次受到表杨的是村庆施，以及湖北的王任重·一村庆礼成了头擘标兵·陶铸等人就表示，我们要「赶上

我们要赶 J。《0

这表明，经过南宁会议，省一级的领导基本上都已被动员了起来。为传达南宁会议的精神，2月13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只是气氛较之南宁会议略为缓和。在南宁会议上受到批评而没有到会的陈云，2月18日在会上检讨在反冒进中的 r 错误 J，表示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 r 错误] 要负主要责任；陈云还就毛泽东指责国务院不让他本人和政治局参与设计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总是让他「强迫签字」，「事实上是一种封锁」的批评检讨说，在财经工作中，对毛泽东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本本主义」的办法。。毛泽东在会上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他还说：「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甚么反冒进的口号。」「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还要厉害。」，2 由此，只许反右，不许反左，就成为中共党内的一条定律。

南宁会议反反冒进的结果，毛泽东是满意的。但要把反冒进的气氛彻底改变过来，使 1958 年「有一个大冒」，他认为火候还不够。于是他提出，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 4D 李锐：(r 大跃进] 亲历记》，页 72—73。

41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陈云年谱 905—1955 翻？中卷（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之以刃），页 9—410。

4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 年 2 月 18 日）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三月上旬，去谈一谈。」“

4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

3 月 8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在四川省成都市郊金牛宾馆举行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荣桓、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陈伯达、薄一

波、谭震林、胡乔木、吴玲西、田家英、李锐、王鹤寿、廖鲁育·滕代远、彭涛、林铁、刘仁、陶鲁茄、黄火青，欧阳钦、黄欧东、吴德、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李井泉、谢富治、周林、张德生、张仲良、高锋、王恩茂、李大章等三十九人。

毛泽东先后有六次讲话和多次播话，对反冒进再次进行批评。他把冒进与反冒进的争论，进一步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争，并突出强调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

3月9日，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求大家讨论·主要是有关大跃进和高速度的问题·他说：「雨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又说：「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南宁会议提出，反冒进是个方针性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在大家有共同语言，绝无要哪一个同志不好混之意，而是为了做好工作，好混，绝非不好混。」”

43（周恩来传（1949—1976）），页1376。

44 关于成部会议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3月8日至归日说，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选》·第七册·页1泌·注I；《周恩来年谱（1949—1957）》，中誉，页133·二是3月9日至26日说，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1哄·本文采纳3月8日至26日说·媚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16之·16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0）—鸟托年运动

3月10日，毛泽东着重谈到建国以后，学习苏联犯有教条主义偏向，特别谈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说：

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学打倒个人崇拜·有个人崇拜·有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甚废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引者注，李锐笔记有下一句话：

一个班必须素拜班长·不素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索并,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索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索拜·一种乏反计崇并别人,要求索拜自

己·J’ ‘《引者注·李锐笔记还有以下的话:「打化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鱿是为了想让别人索并自己·f. I 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y. I 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 · · · ·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素并,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 神

从3月功日到19日,有十六位地方负责人在会上发言·谈本省、市经济方面的基本情况和跃进计划。毛泽东则多有播话。48内容有‘关于阶级关系及处理问题;关于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问题;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关于工业、农业并举和农业机械化问题;关于大办地方工业问题;关于计划指标和两本账的问题;关于领导干部要读书,要又红又专问题;关于教育与文化的问题;关于规章制度等问题。其中,重点是他关于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最具代表性的如:

骗毛浓东: 47 毛派东: 48 毛泽东:

〈在成都 t 议上的讲话〉(19 铭年 3 月励 〈在成都部会网上的讲话〉 qg 铭年 3 月)

, 载《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页 3 的。·, 载《毛泽 t 文集》· 第七畚, 页 174, 必在成都部会网上的讲话》, 1 嘲年 3 月, , 岁《毛泽东文集》· 第七誉, 页 1 刀一 1 必·

第一章: 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1958 年的劲头, 开始于三中全会。」「现在要苦战三年, 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毕, 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 靠地方, 靠小的。他们是靠标准设计, 干部, 技术。」r 技术决定一切? 政治思想不要了? 干部决定一切·, 群单不要了? 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 要干部又要群众, 要民主又要集中。J

毛虽然也说: 关于定计划指标等, 还得留有余地。但对《农业发展纲

要四十条》订的指标，仍要不断提前实现，他说，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并提出，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棉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又说，实现纲要，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 g 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到五年，上面可以长打一点】让下面超过。毛极其自信地说：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产，农业牧业都如此。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亿斤粮食，七百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

在 3 月 20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减文盲。可能有些能「红 U，即使全部能〔虽 U，也不要登报，两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r 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谢可南当状元。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他接着说：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做工作要森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只要路线正确一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决、好、省。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迟一年有何关系计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单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他再次强调：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I, 58—1961）—鸟托年运动

T

慢慢吞吞好，还是森轰烈烈、高高兴兴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慢一些，人人都不舒畅，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得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曜妆中比。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毛还说：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毛泽东决心超过苏联的雄心，滥于盲表。

22日，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强调了要「破除迷信」。他说，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要尊重马恩列斯，但不可迷信，当作神明，不敢触动。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要用点思想，不能抄书照搬。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问题是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出来的。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谭延闿、赵恒惕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搞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都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甚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还干甚么？我们这些人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的章程。50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208—213。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2日）

n7hIJ月呼eJ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由台

周恩来、陈云再次就反，进问题在会上进行了检讨，从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主要是点了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领导人周恩来、陈云的名。作为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并参与制定反冒进方针的刘少奇，虽然没有被毛泽东点名，但心情是同样沉重的，他深感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3月26日的会议上也作了检讨发言。刘少奇检讨说：自己的设想「同主席的设想是有距离的」，主席的设想「确实是高明，使人折服」。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没有料到水利、生产运动发展得这样快。是否可以再快一点，还是可能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我觉得快点慢点都可以，「没有意识到是一个

方针路线的争论」。为了跟上毛泽东，刘少奇也说】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出危害·慢性病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我们要注意发现慢性病，去及时纠正它。并强调：r 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J 急性病也要防止，但即使有些地方在建设上犯了急性病的毛病，也并不可怕。5' 26 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对会议表示满意，他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只是事先没有想到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道谈的，这就比较合乎实际。同时提出，下次会议重点放在工业？7 月间开。毛说：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对农业了解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都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换。煤，电、石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都没有接触。财经贸易，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模过，林业也没有模过·今年有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要模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学是文教、兵是国防）。今后这五年，还是要抓这五个方面。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中国社会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他说：

51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册（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8），页 8 之 8 — 829 ·

中华人民兵和触史·第四专—1958 — 1961) — 乌托邦运动

我们国内并在昔两个刺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刺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壤未政造好的部分，再加上右派 1 全国右派在这些人中，可能有十万以上·改造好的不算）·他们反社会主义，是敌人。改造好的地、富不算·反革命改造好的刊满译枚有选举权的不算。富农，一无制削，江有选举权·但人们不欢迎他，右派原来是与我们合作的，如罗陆篡、章伯钧、章乃器等，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是国内的国民党，故看作敌人。他们乏帝国主义、官僚肯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右派，非常关心他们的命运，杜勃斯很关心右派。地、富、反、壤、右是可以改这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遣好的。

第二个豪 1J 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右派只占 10 然二其除 90% 是中间派和左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 2.5 啊二老教授中右派的比例就大了。全国大概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的是十六万人。我们对右派的方针是孤立、分化、改造·除极少数违法者以外·不捉不办，给选崇·以便分化改造他们。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又不反，又拥护共产党又反对共产党·如陈叔通、章士钊，反社会主义不反共产党。针民谈责资产阶级二百万人要很好地做二作·他们是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被剥削或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成都 t 议的气氛与南宁会议相比较，是更多地在务实。如果说，在南宁，与会者主要是觉得思想上得到了启发；在成都，则个个表态大干快上。这时，已经基本形成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不只再没有人敢于怀疑和反对，而是已形成个个恐后争先的局面。在中共中央，不但周恩来、陈云失去了说话资格，就连刘少奇、华罗庚：《「大跃进」亲历记》，页乃 4。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奇也难以与毛泽东平等对话了。”在毛泽东倡导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一个班要崇拜班长」的命题下·更有人推波助澜，柯庆施在会上号召：「想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的，反对迷信别人，是要别人迷信自己；反对别人的个人崇拜，是要搞自己的个人崇拜。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号召破除对苏联经验、经典著作、大学教授的迷信，正是要树立对他的个人迷信。从此，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政治经济等大权也就完全集中在毛泽东一人之手。

成都会议共通过了三十九个文件，其中：关于 1958 年计划和预算指针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小型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都直接推动了后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所有这一切，就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全面发动大跃进做好了准备。成都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毛泽东则由重庆沿江而下】于3月31日抵武汉，下榻束湖湖滨别墅，这是一栋石头建筑，坐落在东湖岸边。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召集华东和中南的一些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省委书记在束湖开会。他们是：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叶飞、吴芝圃、周小舟。

幼李锐在《大跃进1亲历记》页69中规：「由于在一篇定性鸟反毛泽东的错误的社论‘指1956年反，遗的社险一引者注）原稿上·有刘少奇修改的笔迹，刘也就同这一『错换边脱不了干栗了。党内唯一还可以同毛泽东以平等的态度讨论问题的刘少奇、从此似乎也今非昔比了·南宁会议之后、逐渐使毛泽东奠定了他在中央的特殊地位，这是党内生活的极大变化·在1980年讨论煎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草稿时，胡乔木同我谈瞞这样的，法、胡耀弗也有过这样的说法·」

54 李锐：《「大跃进」视历纪》，页2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卅专 11958 — 196D—鸟托年运动

主要是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同时听取他们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大体上每隔一天开半天 t，其徐时间由大家看成都会议通过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在总取汇报时，有很多插话，讲了要压缩空气，留有徐地，但其着眼点却在要人们警烽党内的观潮派，算账派，秋后出来算账。”

当周小舟应报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正色说，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么大，如果不丰收·群众情绪受挫折，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一些干部、民主人士，党内有右倾情绪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算账振就会出来说话。「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各省要向地、县讲清楚，要有精神准备。叶飞汇报福建的情况时，毛泽东再次讲了观潮派、算账振问题。他说，中庸之道，实际上是落后论，四平八稳，成为一派。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一旦发生事情，时间过去了，就要失败，就要出大事。对于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使他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稳健派、观潮派、等潮派，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出来讲

话的：「看你们跃吧！」「老子讲过，现在如何呢？」「冒进」是稳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准备这一看。又说：现在讲跃进不挨骂，讲冒进就要挨骂，实际冒进是稳妥派安在正确振头上的。1956年上半年劲大，下半年就挨骂；1958年上半年劲更大，下半年是否挨骂呢？现在客观上逼着我们答复这个问题。应当是把工作措施办好，准备挨骂，对者改正，不对者顶住。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还反复谈到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划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等问题。他说，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两条道路斗争，恐怕55 东湖 让纪锋稿；毛泽东在吴芝围等人发言时的插话及休月 6 日的讲稿；李锐：《大跃进 亲历记》，页 265—266，

第一章：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怕还有几个回合，这是可以设想的。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不会出来的，尽在反右派高潮中就不会出来，当然也有沉不住气的。

至此，从 1 月杭州会议批判反冒进开始，毛泽东要把多快好省作为总路线已经定了下来，在经济建设战线发动一场比 1956 年更大跃进的造势运动，已基本达到目的。「观潮派」、「算账派」两顶帽子的抛出，就使党内所有的人在日后无法提出异议；在把「反冒进」与所谓资产阶级右派连在一起之后，又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还将反复，更预示轿把党内的不同意见宜直接与阶级斗争挂上了钩。

二鼓动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

1 《人民日报》吹响「大跃进」的号角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说：「1958 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因为按毛自己的说法，八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多快好省、四十条和促进会。会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开发表。1957 年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为题发表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正式向全党，全国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也是第一次以号召的形式使用「跃进」一词。此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

产的新高潮》，〈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丰收再丰收，跃进再跃进〉等社论；12月2日，毛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祝词，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用十五年赶上英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18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问，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任务。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乘风破浪〉的社论。这一系列社论的主要精神，是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宣传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为鼓舞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和赶超英国的任务打气，鼓劲。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和保证中国顺利实现工业化的伟大纲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结果，证明了多快好省的方针是切实可行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已出现一大批光荣的先行者。他们分布在十四个省市的六十九个县、市，”提前十年或十一年达到或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其中有四个县在1956年达到，1957年因受灾未达到）；其中有八个县市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了千斤以上。至于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乡、社，就更多了。据十三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就有806个农业社。棉花产量超过纲要最高指标（亩产一百斤皮棉）的已经有五个县、市。由此证明，能不能跃进的问题，事实上已不存在了。

社论批评，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说有些人患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因而在1956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

1956年，1957年粮食亩产达到四·五，八指探的六十九个县、市为：天津市；河北省的正定，藁城·遵化·抚宁·卢龙、安国，业城，新乐、邢台市·石家庄市、乐事；辽宁省的抚顺市；甘肃省的敦煌·张掖、临泽，临夏市；陕西省的长安·高陵·咸阳市·西安市；河南省的孟县·安阳市；山东省的黄县；安徽省的安庆市；福建省的让诚，

海澄，云霄·南安、臣乐、福州市、潭州市；浙江省的黄岩·慈溪、温纵·渥州市；四川省的新惊·新韶、绵作、双流，温江，邛县，成都市，内江市·广汉；叹东省的潮安·普率·揭阳·澄海·潮阳、饶平·南澳、汕头市·佛UJ市、间州市·连平，，曦；湖北省的孝感，t 陂，大悟·烯水·红安，新洲，既城，云梦、广济、叹川·袜阳；云南省的宜良·（人民日报），1"7年12月乃日·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社论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不少干部和群众中还存在看右倾保守思想。他们认为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和当前技术水平的限制，只能渐进，不能跃进；或者认为别的地方可以跃进，自己这个地方不能跃进。社论说，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确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可坐待老天爷的恩赐，而应该努力改造自然，限制自然】利用自然，把提高粮食产量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裏·我们干的是革命的事业，对于我们来说，最最需要的是革命的乐观主义，是「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没有革命的志气，甚庆事也做不成。因此，在变革的过程中，右倾保守思想是经常存在的，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同它进行斗争。必须不断地、经常地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才能胜利前进、才能实现生产大跃进。社论强调，目前，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推动下，农村中已经掀起了一个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的高潮，工业方面也正在走向新的高涨，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从而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元旦社论号召人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2 大跃进形势始于大搞农田水利

在这阵阵批判右倾保守，鼓动多·快、好、省：力争提前实现《纲要》的劲风之下，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掀起争取提前实现《四十条纲要》的热潮。

当时认为，要实现粮食亩产四百，五百、八百斤的目标，除了多施肥和精耕细作外，关键就在于水。但到1外7年：全国水田和水浇地只占全部耕地的四分之一。1外7年8月，全国农田水利会议提出1958

年扩大灌溉面积的指标是 4408 万亩。但到 10 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布以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就将 1958 年的指标修改为 6184 万亩；12 月，国家经委召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1 卷（1955—1961）— 大跃进运动

1

全国计划会议，又修改为 9221 万亩。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凡是上级党组织已经决定并下达了的任务，下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总是保证提前或超额完成。1957 年冬季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高潮正是这样推起来的。

早在 1957 年 12 月 7 日，中共中央就转发了河南省委的《关于当前农业生产新高潮的情况简报》。内称，通过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全民大讨论，河南全省农村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全省一千五百余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接着掀起了以大兴水利和大量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目前投入的劳动力已有九百九十一万余人。”

《人民日报》12 月 23 日报道：据二十个省区到 1957 年 12 月 20 日不完全统计，每天出工兴修水利的人数，达到六千三百万人以上。安徽省每天平均出工人数达一千一百余万人，占全省农业劳动力的 80% 左右；河南、山东、四川等省出工的劳动力也有七八百万人之多。许多县、区、乡、社，投入兴修水利，积肥和其它农业基本建设的人数达到总劳动力的 80% 到 90% 以上，甚至连当地的城镇居民、学生、驻军、手工业者也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运动。群众的口号是：「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当英雄」；「大风吹不走高潮，天冻不了决心」；「把田地作战线，塘坝当战场，锄头扁担当刀枪，决心要把旱灾早消灭」。当年报道说，据十六个省不完全统计；截止 12 月 20 日，已经完成的各项工程的效益，就可以扩大灌溉面积 3390 万亩，占 1958 年度计划指标 9221 万亩的 36% 以上。从全国进度来看，由 10 月中旬到 12 月上旬，约两个月时间，平均每月完成 1500 万亩左右。必

58 水利部部畏传作义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上的发言：《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新华半月刊》’ .19 绍年第 5 号，页 65 ·

59 李晨主细：《中华人民共和国翻实绿》·第二卷·上册（畏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 128 — 129 ·

60 《先进的再先进更运缓的赶上去！》，《新·半月刊》，19 铝年第 2 号，页 107，

不

第一拿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应该承认。当年被农业发展纲要调动起来的广大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期盼通过短期突击，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不畏艰险、不惜牺牲的精神，是十分可贵，令人起敬的。如：

河南省伏牛山区禹县人民在兴修水利中喊出了：「山硬硬不过决心，山高高不过脚心」的口号，决心要在一年完成五年的治山工程。豫北盐碱地区连年灾荒的原阳县人民提出，「咬紧牙关，苦战三年，鼓起一股劲，变三红（红薯、红高粱、红辣椒）为三白（白米、白面、白棉花），变盐碱凹地为稻田，把原阳变成小江南。」密县河西乡群众提出：「秃岭大又大，暴雨似恶霸·大家齐动手：消减水恶霸，要在六十天，坡田水利化，实现四、五、八。」“

陕西省蒲城县农民群众提出：「清早上地满天星，晚问回来鸡叫声。」「抓晴天，抢阴天·小风小雪是好天；汽灯底下是白天，争取一天当两天」的口号。62

吉林省群众提出的口号是：「不怕风吹、不怕天寒，修完工程再过年」；「贪大黑，起大早，跟着月亮跑」

在「苦干三年，征服千年旱灾」的战斗口号下，广西省的农民群早表示：经费自己筹，石灰自己烧，泥箕自己编，石料自己打，沙子自己找，木料自己砍。山藤代绳索，柴火代油灯，旧料代新料。「不靠老天靠自家，兴修水利战胜它，就是老天不下雨：也叫禾苗出嫩芽」。r 千年苦旱泪涟涟】只知求神和拜天，如今有了共产党，修好水利庆丰年」。“

下面的这种热劲，反映到上面，使上面的头脑更热。于是，又提出了在春耕前完成 1958 年全年指针的任务。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61 赵文甫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的发言，《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5 号 1 页 40—41。

62 苏资深：〈陕西农业生产高汤势如排山倒海〉，《新华半月刊》·玲 58 年第 6 号，页 53。

63 栗又文：〈大做群众根治水息干劲十足〉，《新华半月刊》，19 铝年第 s 号·页 75·54。应机：〈苦战三年征服千年旱〉，《新华半月刊》，19 铭年第 6 号·页 26—”·

中华人民兵和国史·第听春（1958—1961）—鸟托井运动

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12 月 22 日在对全国各地农村工作人员和农业社社员发表的广播谈话中提出：「从现在到明年春耕，约还有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必须每月完成 1500 万亩以上才能实现 9221 万亩的计划任务」的要求，各级领导亲自出马，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充分发动群众，推广先进经验，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再接再厉，把水利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3 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的炽热空气

就在迁地吹起跃进之风时刻，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于 1958 年 2 月 1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

会前，毛泽东在 1 月 28 日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 1958 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做准备。毛在会上首先讲话：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精神发奋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办论，把一些 r-1 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十五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炙颊。四十缘农业纲要重新姿布·给群众很大的纹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

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翹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拌；因为觉醒了·才把和有纣产制度废除；目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

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拎，就有一股轮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 65 《先遗的再先进，运缓的赶上去！》，《新·半月刊》。1958 年第 2 号·页 107 — 1 页

第一章多快好总路线出台

1 习. , ■甩·万—1

孩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有七百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万吨。粮食水平很低。不识字的人很多。因此，免在这佃觉醒。群众这个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被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毛充满信心地表示，有了群众的这种热能，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他称读《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标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他提倡：要有干劲，要鼓足勇气，力争上游。毛最后强调：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

这样，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就为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营造了一个大跃进的氛围。

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的代表 975 人，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各国驻华使节和在京访问的一部分外宾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审查和批准 1958 年国家预算；决定 1958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 1957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 and 1958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关于 1958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大会进行期间，中共中央批发了 1958 年 2 月 2 日，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传达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报告。报告将河南省原定粮食亩产 1962 年达到四百二十斤、1967 年达到五百八十斤，

66〈毛海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购姑记练〉《1958年1月28日》，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必19》一1976玲，上时（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之闾引，X78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1）—鸟托年运动

改为1962年保证达到六百斤，争取九百斤；将原定皮棉亩产量1962年达到六十斤、1967年达到九十斤；改为1962年达到一百斤；甚至还提出1959年全省实现水利化，1962年全省平均每亩施用化肥五十斤，五年内全省达到平均每人一头猪，四年完成土壤改良，三年基本上变成四无省（指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等，以此表示对「大跃进」的决心。‘，这无疑是对河南省委的赞赏，希望各省效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代表，纷纷上台汇报本省农田水利建设的跃进形势，争相表示一定要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誓言（共有316位代表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或联合发言）。大会气氛空前热烈。

广东省提出，今年可以办到的事情决不推到明年去做，以十二万分的劲头，坚决实现1955年增产粮食二十八亿斤的农业跃进计划·1962年粮食平均亩产由现有的400斤提高到800斤，1967年达到1000斤，实现粮食千斤省。68

陕西省表示，1958年计划粮食总产量为115亿斤；皮棉总产量达到240万担。争取八到十年，使八百里秦川粮食亩产跨过长江，达到800斤。“

安徽省决心，争取在今后五年到七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把安徽省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240亿斤提高到510亿斤左右；把薄弱的地方工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力争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并使文化教育和各项工作都迅速跟上来。70

江西省要求，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在140亿斤的基础上达到175亿斤，增产三十五亿斤，比1957年增产乃倍；棉花总产量达到六十五

67〈河南省委·于传建和讨论毛主席六十条指示向中央的报告〉《1958年2月2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

集体化主要文件汇编 [【958—1,81】] · 下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58) · 页 3—6 ·

6s 区梦觉: 《有信心有把握实现千斤省》, 《新华半月刊》· 1958 年第 5 号 · 页 54 · 69 赵者山: 《要八百里秦川敌产八百万斤》, 《新华半月刊》· 1958 年第 5 号, 页 59 · 70 黄岩: 《一个冬天超过以往八年》、《新华半月刊》, 1958 年第 5 号 · 页 81 ·

第一章: 快好宾总路线由会

万担, 110%;

比 1957 年增产 75%; 麻类总产量达到 120 万担, 油脂总产量达到 2.1 亿斤? 比 1957 年增产 75%;

比 1957 年增产生猪产量达到

800 万头, 比 1957 年增产 80%。? ,

山东省订的指标是, 1958 年粮食总产量保证达到 320 亿斤】争取达到 350 亿斤; 棉花总产量保证达到 480 万担, 争取达到 535 万担。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基本上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要求, 争取全省粮食产量达到 600 亿斤, 使全省人均占有量达到 1000 斤。n

山西省宣称, 三年基本改变农业生产面貌。1958 年全省粮食亩产 t, 由 1956 年的一百五十六斤达到二百斤; 棉花亩产皮棉由 1957 年的四十斤达到六十斤。经过三年苦战之后。粮食亩产达到三百斤, 棉花亩产达到九十斤。到 1958 年粮食亩产达到四百斤, 争取达到五百斤。棉花亩产达到一百二十斤。方

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 通过介绍各自的农业增产经验, 表达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决心,

云南省宜良县永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张惠英介绍「肥料革命」的经验说: 过去的肥料来源很少, 只知道用猪, 牛、马粪和老墙土, 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后, 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 终于找出了十八种肥源, 用卫生运动和积肥运动相结合的办法, 提出「牲畜要有厩, 家家有厕所, 厕所要加盖。人人勤积肥, 路上无粪便」。全社开展了积肥和卫生评比运动。全社不分男女老少, 个个积绿肥, 铲火土、扫烟筒、挖老墙土、挖沟泥、搜集乱头变, 猪毛和碎皮, 积小便, 打扫房屋和街

头卫生，形成了家家有尿盆，人人带尿罐的习惯。这样，既做到了积肥，又使过去不干净的地方变得整齐清洁了。再加上相应的水

7t 刘俊秀第 6 号 72 趋健民 73 陶鲁茄第 8 号

：〈快马加鞭全面跃进十年规划五年完成〉，《新华半月刊》，1958 年、页 29。

：〈山东人民争取今年大盐收〉。《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6 号 1 页叨·；〈山西农业生产面说三年内将基本改观〉】《新华半月刊》，1 站 H 年，页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 卷（1949—1961）——“一五”计划期间的运动

利建设，今年的生产指标是，粮食每亩平均产量达到 1110 斤。「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达到这个目标。」

全国劳动模范、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业社的李顺达、申纪兰发言说 7, :1956 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公布后，我们社就制订过一个十二年的远景规划·要求粮食亩产量，1962 年达到五百斤，1 久神年达到七百斤。现在看来，这个指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1957 年，我们杜的柜食亩产量已经达到四百八十八斤·经过社员们辩论，多数人认为，今年过黄河，五年跨长江，八年成为千斤社，是完全可能的。为了实现这个规划】我们把 1958 年的柜食产 t 提高到六百斤。在农业大跃进的声浪中，工人老大哥理所当然地不能落后。钢铁工业和各行各业的代表均在会上表达了赶超英国的决心和各自的目标：全国劳动模范王崇伦等代表鞍山全体职工表示，为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伟大任务，鞍钢职工决心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千方百计地挖掘增产潜力，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生产钢铁，随时响应国家的号召，完成国家给予的任务。经群众讨论】初步确定 1958 年生产生铁产量比 1957 年增长 16.1%；钢生产比 1957 年增长 25.4 呢；钢材生产比 1957 年增长 16.9%。 ， ’

太原钢铁厂的工人说：「不鼓起更大干劲来，怎配称工人老大哥」。现在全厂职工跃进再跃进的滚滚巨浪，正在改变看全厂的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比指标、学先进，赶英国已经成为每个职工的自觉行动。全厂 1958 年的计划是：总产值为 1.80291 亿元，与国家计划 1.49626 亿元相比，提高 20.49 吗；与 1957 年实际完成产值 1.46769 亿元相

比，增长 22.83%。全厂职工正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展开热火期天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可以断言，凭着全国人民英勇的社会
74 张取英：〈水利要突击肥料要革命〉，《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6 号·页 41, 75 辛域达，申纪兰：〈今年过黄河五年跨畏江力争八年
亩产千斤粮〉·《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6 号，页 91—93，
76 王崇尚，胡兆森，孟秦，邵象事，张明山联合发言：〈鞍山战工
的雄伟计划〉·《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6 号，页 34—35。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主义干劲，不用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国，把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远远
抛在我们后面、再后面。”

四 j11 省代表说：重庆钢铁公司职工「立志要和英国赛跑」。经过算
细账，挖潜力，原来每届平炉的寿命一般是 300 炉左右，1 月上旬创
造了炉龄 500 炉的新记录。接着就提出向全国最高记录 599 炉进军，
现在已经突破了 600 炉，正向 650 炉猛进。炼钢工人还提出向全国各
先进厂学习，质量要赶上上海钢铁一厂，保证炼出两万吨优质钢，炼
炉率达到并超过天津钢板厂的水平，保证把每炉钢的冶炼时间比原计
划再缩短十六分钟。轧钢车间 1 月份开展每班 400 分钟轧钢竞赛，力
争尽量缩短非生产时间。现在、每班生产时间已实际达到 450 分钟，
有的已达到每班 465 分钟的最高纪录。炼铁车间的烧结矿年初的日产
量为四十到五十锅，现在提出了日产七十二锅的保证。全厂保证 1958
年钢产量比 1957 年提高 17—26%，钢材提高 11.71%，生产总值提高
8.5%，劳动生产率提高 10—15%，成本比 1957 年降低 7%。’ ’

上海的工人代表说，党中央发出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号召后，上海广大
职工见面的第一句问话，「同志：你拿甚么实际行动来赶上英国的工
业水平？」他们到处翻杂志，找数据，拿本厂产品和英国同类产品反
复比较，从各方面提出赶上英国工业产品的具体规划。据不完全统计，
从元旦到 1 月 24 日为止，已经提出赶上英国或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没
有英国同类产品可资比较，就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产品比）先
进工业品具体规划的有 394 个厂，525 种产品。上海大中华橡胶厂职
工经过研究订出了技术措施，在四年内使「双钱牌」汽车轮胎赶上英

国老牌「邓禄普」汽车轮胎。上海国营第二毛纺厂制造的精纺呢绒经过研究试验，只要两年就可以在织品表面的光彩程度·纱支匀物王 t 英：（不鼓起更大干劲来怎配称工人老大医）1《新华半月刊》第 8 号，页 27·28·

1958 年

78 黄荣昌：〈钢织工人下决心和英国赛跑〉，《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5 号，页 44—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195B—1961—乌托年运动

净度和质地柔软等方面赶上并超过英国同类产品。”上海华孚金笔厂职工提出「英雄金笔」，要以「英雄气概」，在两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 r 帕克金笔」的跃进目标。全厂掀起了「赶上美国，压倒帕克」的高潮·S0

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赞扬这是「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揭开了 1958 年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序幕。社论认为，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新跃进，1958 年各项经济指标订得是比较积极的。工业生产总产值计划比 1957 年增长 14.6%（1957 年，增长 6.9%）·农业生产总值计划比 1957 年增长 6.1%】粮食生产增长 5—9 为（1957 年，分别增长 3.5% 和 1.7%）。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计划比 1957 年增长 17.8%。社论强调：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三年，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三年看头年，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努力争取我国国民经济在今年内打一个大胜仗·

要求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4.6%，农业总值比上年增长 6.1%，已经大大高于一五计划期间的正常年份，但较之尔后不断膨胀的气温来说，头脑还算是玲静的·

三大跃进的全面发动

1 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

1958 年 5 月 5 日至 23 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是中共八大党章做的新规定：「全国代表 79 假棋：刊》80 杨蒂因页 39。

〈为 T 迅速赶上英国工业水平上海职工大大发挥革命干劲〉·《新华半月 1 必 S 年第 5 号，页 42—44·

(「英雄金笔」的「英雄气概」)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5号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八大二次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召开的唯一一次常任制性质的会议。

八大二次会议的主题是制定和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说道：「不开会大家想法不同，开个会，采取比较合理的意见，作个报告，搞个决议，全国人民就有了方向。』82 八大二次会议，就是年初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而最终形成的结果。目的是进一步统一党内外对「大跃进」的认识，使初步掀起的「大跃进」形势在全国范围开花结果。所以说，这次会议是「大跃进」运动全面发动的标志。

5日上午，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通过大会日程和主席团名单。主席团由四十四人组成，常委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乌兰夫、柯庆施、李井泉。同时组成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中直、解放军八个代表团。代表团正副团长分工是：华北：林铁、陶鲁茄；东北：欧阳钦、吴德；西北，张德生、张仲良；西南：李井泉、谢富治；中南：陶铸、王任重；华东：柯庆施、曾希圣；中央和国家机关：杨尚昆；解放军：聂荣臻、萧华。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作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

在大会上发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李雪峰；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全国总工会等群众团体、地方各级

81 《中国共产党章程》（1956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载中共中央文研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3加”

82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277—2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49—1956）—鸟托杂运动

党委负责人，工矿企业的党委书记，工厂厂长、技师，乡、镇合作社的支部书记，农业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主任，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等117人·另有145人作了书面发言。

代表们对各项议程讨论以后，23日的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J《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增选王任重等二十五人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共 / k 大二次会议是对八大一次会议的否定。它改变了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继续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主要矛盾，强调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推翻了 F 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寡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j 的正确方针，确立了打破平衡，超英赶美的超高速发展战略；抛弃了 1956 年起步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进一步陷入了价化的斯大林模式的死胡同。前两点，集中反映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后一点突出反映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83 中共八大二次 t 蚁增选的二十五名候补中央委员是：王任重，张仲良，陶鲁茄·彭涛、刘达二赵般教·孔原·唐亮，刘子厚，张苏、矫一展，汪锋·周小舟，方毅，王尚荣·刘震·强平化·张劲夫、韩先楚·李颇伯·廖志高·赵伯平、孙志远，张爱萍、镜依林·

84 〈中·共产党第人届全国代表大 t 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鲨和工人写代表会让的决议〉，生绸莫斯科宣言「阐明了各国共产党在社 t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義建投中必须遵守的共同原则」，尖锐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七大] 绸领，是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背叛马克思 y11 宁主义原 R1I 的 f 修正主义纲领 J，甚至认为：「1 尖。年共产党情报局 r. 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绸 J 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养原则而走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绪误道路所进行的批评·基本上是正尔的和必要的·」这不仅开了一。共产党在自己的代表大 t 上批判另一共产实网领的先饲，而且堵死了中国探索自己社. 主义道路之门·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2 刘少奇阐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八大二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因此，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就是大会最主要的议程。对这个工作报告稿的起草，胡绳有过一段回忆，他说：r 陈伯达那时候为会议写报告，感觉到好难写。总路线要讲奋斗甚么，为甚么奋斗，怎样奋斗。这句话裹只有一句稍微实在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很明确的，不是建设别的甚么。鼓足干劲，无非是说大家努力吧。力争上游，力争站在前头。多快好省，也是抽象的。陈伯达尽量把毛主席论述十大关系的问题，农、轻、重啊，小土群啊，把这些东西搬进去。不然总路线就变成大家一齐努力，搞得好一点。’这是甚么总路线啊？！甚么时候提出一个号召来，都是要大家努力来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收录了毛泽东在5月13日、24日对工作报告稿修改后写给胡乔木的两封信，“肯定了胡 r 改得很好”。表明，工作报告稿的最后修改、润色是由胡乔木完成的。报告内容分为：国际和国内形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的目前任务三个部分。

关于国际形势，报告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概括的 r 东风压倒西风 J 的论断。国内形势，阐述了毛泽东有关 r 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 J，以及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报告认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深刻地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热情赞扬了广大劳动群众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出的相互协作和自我牺牲精神，称为如列宁所说的，是「共产主义

85 胡总：〈谈党的 r 八大悬案分·《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页 66—67。86 毛泽东：〈对刘少奇八大二次 t 议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8 年 5 月”日·24 日】，载《建国以来毛潭东文情》·第七册·页 2 壮·

中华人民兵和四史·第调专 119 铃一 1, 6n—鸟托年运劲

的！际开端 J，是 r 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 J。断盲，中国现正经历看如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报告回顾了从1955年夏季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开始，酝酿提出多快好省路线的历程，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指责有些人，没有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出现的高潮—讨伐潮—更大的高潮，这个马鞍形中得到教训，意欲到秋后「算账」。r让他们等着算账吧，他们总是要输的。」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报告说：

在八年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已经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党中央认为·鱿鱼矜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零围和要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覃因无产阶级专政和与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卫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姿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金业和中小型金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几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订

为实现党的总路线，报告突出强调了建设速度问题。指出，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

87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t 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 t 第二次会织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戏选编》，第十一册·页303—304，

第一章：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尽快地韦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报告批评有些人不课识提高建设速度的重要性，不赞成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提出了这样那样的反对意见。断吉这些意见，「都是站不住胶的」报告在阐述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之后说：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应用令姿展。把集中领导病分饮经苍尤充分地结合起来，把中央的力

1 和地方吵力 1、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把大型的事业和中小型事业、提高的工作和普及的工作充分地结合令起来·这一切，不但适用朴工业，而且通用朴其它经济事素和文化事案·适用朴技街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整个事业。……党在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整风运动的塞基础上·进一步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系统地政进国家工作，加孩各级党组织的工作，首折不挠地为霄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而门争。“

由上可见，刘少奇的报告】全面地反映了毛泽东从南宁会议严厉批评「反冒进 1 以来，以超高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6 月 21 日，《人民织报》社论一〈力争高速度〉，画龙点睛地说，用最高的速度来姿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魂代化·是总路线的篡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贡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鳅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甚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邵样·也枕不常要纹足拎劲·也就乌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块。

8B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t 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 t 第二次 t 议的工作报告〉（1958 年 5 月 5 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戏选编》，第十一册·页 3n — 3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58 — 1961）—乌托年运动

3 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

中共 / k 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束于 5 月 8 日、17 日、20 日—23 日先后在全 . 会议上作了四次讲话。多数内容是在成都会议上讲到过的，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污准备党内分裂」；「插红旗；辨风向」这三个问题。

破除迷信，

毛泽东在 8 日讲的第一句话说，我讲一个破除迷信。他在谈「我们大多数同志有些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地不大怕了」以后接钥说 ‘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拳，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朴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麻。马克思也是两双眼睛·两

双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笨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这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只是理论。a’

毛要人们「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他说，自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创立新学派开始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或是被压迫的人。这些人到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都是、学

必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注z〕。1958年5月j，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之06·

第一章多快好布总路线出台

问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不是一个普遍规律分他从古到今举了诸多事例之后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毛以带讥讽的口吻说：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化不容易呀」。总之，迷信很大。我也不懂工业，可说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我说，不要把它看得那样严重：这是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甚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成工业国。……我看只要十五年就可以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并且还要赶上美国，照李富春同志的说法，最多二十年也就够了。美国算不算数？也算数，也不算。··一现在你厉害，过几年我们赶上了1就比你厉害·，··…这样说是不是狂妄呢？不是】我们不是狂人，是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者，革命者。我们主张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

毛极其自信地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

界第一个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十年，十五年八亿，人多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嘛！吃了饭就干社会主义，无非是搞工业、农业、文化科学嘛！因此说，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 ’

卯毛谭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注针 U958 年 5 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偶》·第七册·页才“·为继明这个真理，s 月 18 日，毛泽东将安东诚器厂诚裂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并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 t 者最愚盞」的批语。

91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 t 窃上的讲话记录稿〉（玲 58 年 5 月 8 日），载李锐‘《「大跃进」亲历纪》二页 258、292 一讨 3。

54 甲争人民共和国史·第呀奉 119 铭一 i961) —鸟托那运对在 17 日的讲话中，毛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琥，这是斯大林提出的· · ·一有片面性，不够全面。干部决定一切，那群众呢？技术决定一切，那政治呢？这就缺乏辩证法。……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 这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应当高明一些· 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又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刀堤一种方法。我们可不可能有另一种方法呢分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他们是由上而下的方法· 我们是搞发动群单，搞阶级斗争。列宁比斯大林强，我们采用了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改革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改革，他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 · ·一我们有从上而下，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现在搞建设，要有决议案，政府发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从上而下的要一点；但大量的还是发动群罕自己来搞，搞群单运动。为甚么他们四十年搞了五千一百万吨钢，我们搞五千万吨只需要十五年或者到 1963 年就可以了· · · ·一我们是否可以比他们快？我看是可以的。”讲「破除迷信」，不要有奴隶思想，要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有创造精神，从一般意义上说，都没有错。然而，在既

不要迷信美国，也不要迷信苏联和马克思的同时，却要人们迷信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阶级斗争加群众运动，以为靠这一着就能超越一切。即用「十几二十年」时间，实现「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英国，苏联和美国。这又是在推崇迷信了。

准备党内分裂，

毛在 17 日的讲话中，专门讲了一个「要准备对付灾难」的问题。他说：无非是大旱大涝·赤地千里。还要准备打大战。……还要准备 92〈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纪录稿〉（1958 年 5 月 17 日）·载李锐：《「大跃进亲历纪」》，页 345—346、347—348”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党内分裂。现在看来，一般的不会有，但可能性是有；我们搞得好，就不会有分裂。苏联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出现了两个集团，英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高岗，饶漱石那样不显大局·出现党内分裂，就要尔计阵子·但又会走向反面，不平衡走向反面就是平衡。党大会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更要注意，要顾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摔跟头。凡是不顾大局闹分裂的，有甚么好结果？”
“在 20 日的讲话中】毛再次讲到要准备党内分裂的问题。他说：我们党有四次分裂：第一次陈独秀，第二次罗章龙，第三次张国焘，第四次是高岗。……今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分裂？我看有可能，只要有党就有可能，一百年以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又说兀有些人说，这样讲了不舒服，我看讲了舒服，讲了大家就有了精神准备，实际上南斯拉夫不是分裂了吗？过去陈独秀、罗章龙、高岗搞分裂·最近有沙文汉、李世农、孙作宾、陈再励等，也搞分裂。北京的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系统垮得更多，人类灵魂工程师垮了·这些垮了有甚么不好呢？我看是好事，这是政治上的分裂。新陈代谢嘛！”

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讲要准备党内分裂，显然是有所指的。从南宁会议上讲不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到多次讲各省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的沙文汉等事例，又说经过整风，「反冒进」事件现在搞清楚了，经过团结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

团结。无疑是要在周恩来等曾经「反实进」的领导人的头上挂上一把剑。

插红旗，辨风向：

毛在 20 日讲话中讲道：世界上甚么地方都要插旗子的，是插红旗还是插白旗？ 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红旗，

93 〈毛泽东在中共 / ' 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绿稿〉（1958 年，月 17 日） 跚进 j 亲历记》，页 350 • 351，

94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 t 议上的购话记录桥〉 饱 958 年 5 月 20 日 1 跃进 j 亲历记》，页 3 阅一 361。

载李锐：

. 载李锐：

《r 大《「大

中，人、共和。史. ；四，。；9，：一；，。1，一骤，动一

就是白旗，或是灰色的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学校、机关、工厂究竟插甚么旗？双方都在争夺。我们要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现在有少数落后的合作社、工厂。机关、学校，它们那裏不是红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们应当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

毛接着说：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甚么风。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世界总是分党派的，社 t 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于落后状态，有的处于中间状态，有的处于先进状态。现在的任务是：先进的要争取中间的人，改造落后的人。右派插的是白旗，插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播的旗子是灰色的，争取他们到左边来，插下红旗。 找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问题，就是辨别风向，要有辨别力。有无辨别力是极端重要的。中国有很多有才学的人，但是他们不能辨别风向。斯大林说过，领导者要有预见。预见就是识别风向，就是在还没有刮风的时候，就能感到风要来了，刮小风时就知道要刮大风。站在看台上，甚么东西都看不到，这种人是没有用处的。没有预见性，特 g11 是当事物已经普通存在了，还看不到，就会给右派以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他们就来了。”

在 23 日的闭幕会上，毛再次讲插红旗·辨风向问题。他说：上次讲的「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这时，毛又点了「反，进」问题。他说：「反冒进」的风，是 1956 年 6 月开始的，本来提了多快好省、促进会、四十条，十大关系。4 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的同志都来参加的，但是没有明确的决议，这是个缺点！只订了君子协议，大家赞成。……1956 年 11 月开的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的决议，但有个报告。会上，看重谈千方百计，增产节约，用“（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纪略编》‘19’年 5 月加日），载李锐：《忆刘少奇》·页 356 一】58·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一切方法增产节约，那股风没能挡住。现在坏事变成好事了，使我们有了比较了。他强调：今天·我主要讲辨别甚么风向。大风是容易知道的，十二级台风人人容易辨别，人吹得不舒服，房子吹倒了，树木吹倒了。小风不容易辨别，领导干部更加要注意。宋玉写了篇《风赋》，值得看一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平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庶人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是楚国的文学家。他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一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最难辨别。」毛在这裏讲的红旗、白旗，东风·西风，内涵是含混的。一会是指先进、落后；一会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但整个来看】是指阶级斗争。他要人们特别注意辨别风向，就是阶级斗争的风向；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风向。而且把「反冒进」也归入了这一范畴·总之？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多次讲话，意在要人们相信，坚决贯彻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就是坚持了马列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就有可能在短期内赶上和超过一切发达国家，并比苏联提前实现共产主义。这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4 众代表登台表决心

代表们讨论和发言，”主要是围绕刘少奇的报告尤其是毛泽东的讲话展开的。内容集中在批判右倾保守，对毛泽东就是要崇拜，超英赶美的决心三个层面。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跃进亲历记）· 页
够 2 — 373”

97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大跃进发言和小组讨论的发言

[, 58 年 5 月 23 日) · 载李锐: (八大
, 均未在报刊上公开报环 · 此处所引

小组讨论和大跃进发言的内容, 均取自李锐: 《大跃进亲历记》, 页
284 — 286, 309, 317 — 329, 352 — 354, 363 — 3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四卷 (1958 — 1961) — 大跃进运动

(1) 批判经验主义和右倾保守

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中】虽然也有比较冷静的意见。如有人认为。要
求 19 年年在农业产量和单产上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可能办不到,
报告应留有余地。又如对 r 七个月内扩大灌溉面积 3.5 亿亩 J、「今
年 1 至 4 月, 全国造林 9 亿亩」等数字, 有人提出应估计到有些灌
溉设施不一定顶用, 可否改为完成初步灌溉面积; 造林数字按成活率,
打个七折为好。等等。但是, 比较多的还是集中在批判经验主义、右
倾保守方面。

有人提出, 在现实生活中, 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哪种最为危险? 多数
人认为实际工作中经验主义多一些, 更顽固些。「反冒进」的思想主
要属于经验主义。是路线性质的错误, 必须予以彻底批判。有人联系
到八大的报告, 提出中央有的同志对毛泽东的意见是否尊重? 八大就
没有提多快好省和《农业四十条》, 「二五」计划的指标也很保守。
不少人认为, 在干部队伍中, 对建设速度问题, 还存在种种错误思想。
女 p 「右比左好 J、「慢比快好」、「技术条件不够」等右倾保守思
想。提出, 一定要按毛泽东提出的, 以虚带实, 以红带专, 以政治带
业务。要批判洋奴思想, 肃清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那种认为加快建
设速度, 增加国家积累, 就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 会出问题的说法,
必须加以批判。

有些省的领导人的发言批判说: 「怀疑毛主席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人,
首先就是从怀疑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能否实现开始。」「1956 年的『反
冒进』, 是对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怀疑和动摇。J 有的
发言还联系批判本省的 r 右倾分子 J。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发言题

目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的主要危险〉】揭发批判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2) 崇拜毛泽东就是崇拜真理

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代表们检讨和批判了对「资产阶级」教授和外国的迷信。

第一章：快好省总路线出台。，北京组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洋人」、「外国」、「问」吓唬人，实际上没甚么学问。妄称：马寅初近来写一本书，题目很大，胡说一气，笑话连篇；从前蔡元培一篇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也是通第不知所云。提出，应该打破理论工作的神秘观点，只要把实际中的经验和群单中的许多创造总结出来，就是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江苏组认为，毛泽东的指示把我们从两个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一方面要反对民族自卑感，不仅要敢于超过英美，而且也要敢于超过苏联，事实上我国在建设方面已经超过上述国家；另一方面要反对劳动人民的自卑感，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六亿劳动人民，真正解放了思想，敢想·敢说、敢做，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定会是一片光明。

代表们还说，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讲话，有极其深刻、伟大的意义·是真正的思想大革命、大解放。七年赶上英国，再加 / k 年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赶，而在于敢不敢赶，毛的话使人们从思想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必将打破古今中外的一切纪录，也将大大超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

与之同时，人们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问题。

上海组认为，毛泽东的讲话，不仅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在民主集中制、发扬群单的积极性、破除迷信、发扬独创精神等问题上，发展了马列主义，具有国际意义。山东组，新强组认为，毛泽东的讲话贯串看一条红线】就是辩证法。是唯物论，辩证法在中国的重大发展，并且还在发展，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伟大贡献。他们说，毛泽东的讲话，使大家从正面到反面，从理论到实践，透彻地理解社会主义建

设总路线的正确性·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代表们说·为了解放思想，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认真的系统的学习。现在的问题恰恰是，过去的学习偏重学马恩列斯原著，而对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得不够。有的发言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赛巷（19 弓 8 — 196n—鸟托年运动

党内有不少同志对毛泽东的著作，不去努力钻研，却转而向外国的书本寻找经验，这当然还是崇拜「洋人」思想的表现。毛泽东的著作不仅是我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武器·事实说明，围绕看毛泽东的著作来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对于我们更为有效·人们指出，过去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十二本书，都是马恩，1J 斯的经典著作，没有抱毛泽东的著作编进去。因此，建议中央作出规定，必须重新规定干部必读书，把毛泽东著作确定为干部必读的主要内容。今后干部必读：应以学毛着为主。这是活的辩证法，活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还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有人提出，应当确定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与 t 者总为，中国共产党不存在个人崇拜问题。因为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湖南组提出，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是崇拜个人 1 是崇拜真理。

有些中央领导人在发言中还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递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 J·「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对毛泽东个人的如此颂扬·是建国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强调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是崇拜真理；毛潭东著作】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主要是读毛着；总路线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具有世界意义等等。实际上就开了 1960 年代中国造神运动出先河。

(3) 高唱赶超目标和跃进措施

正是在这种盲目自信的氛围下，各省、区和部门的领导人，纷纷

向大 t 报告各自要实现的赶超目标和跃进措施。98《毛洁东传《tg'9
一 1976)》·上册, 页 821 — 822

第一幸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并泉发言说, 总路线是从我国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 也是从正确地运用苏联的建设经验中, 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复思考和研究所总结出来的

。它是「中国型」的社会主义

建设总路线, 同时又具有世界意义。只要全党对于这条总路线探信不疑, 可以断定, 也将同 1945 年党的七大提出的党的总路线一样,

一定可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一定可以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 把我国建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关于四 J' 一省发展地方工业的设想, 李说,

决心争取提前三年或五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乃, 争取五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 在 1962 年达到 145 亿元(或者还更多一点), 比 1957 年的 36.1 亿元增长三倍(或者更多一点, 但不包括中央现有工业和准备新建工业的产值)。

具体指标有, 煤产量 1958 年达到 1000 万吨左右(1957 年为 516 万吨) 弘小高炉的铁产量珍 58 年达到六十万吨左右(1957 年为 20.5 万吨)。

李充满信心地说, 我们认为这个指标是比较有把握实现的。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发言说: 要划敌执行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必须走群众路线。生产力中锻重要的是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以共产主义来提高人的觉悟, 建立新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 人民群众能发挥出来的力量, 就更加难以估量。

陶在列举广东的事例后说, 原来认为广东实现工业化, 不要十年也要八年, 现在大有可能在今、明两年内。

使工业产值赶上农业产仅, 三五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橙食生产也可在 1960 年实现亩产八百斤的指标, 今年就可以增产六十

遗斤, 增长 25%, 一年超过以往五年。这样快的粮食增产速度, 在广东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冷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作了〈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发言。他说、我们

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次和各省、市研究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后，我们的结论是：明年钢产量达到一千二百万吨以上，1 舛之年达到三千万吨以上，1967 年达到七千万吨以上，1972 年达到一亿二千万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也就是说，钢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49—1961）—乌托邦运动

产 t 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王细寿说，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十五年赶上美国，是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的。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兴无灭资的问题。因为在不久的时间内，超过英国已经是很清楚的了。而美国，目前却以资本主义世界「天之骄子」的样子在那裹「神裹神气」，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和超过它，就顶示着资本主义世界减亡的速度加快。

石油部的副部长李人俊发言说，石油工业能跟兄弟战线一起大跃进。我们的目标是 1962 年生产原油一千五百万吨】天然气三十亿立方米，基本适应工农业的发展，保证满足国防方面的需要；在十五年内赶上钢铁产量（一吨钢一吨油），到 1972 年，原油生产水平超过一亿吨。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作了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的发言。李富春作〈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是关键〉的书面发言。其中说道：

我们参照目前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初步提出的规划，经过中央经济小组讨论之后，提出初步设想的第二个五年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1962 年发电量 900—1100 亿度（前为必成数，后为期成数。下同）；原煤 3.8—4.1 亿吨；原油 8 叩—1500 万吨；钢 2500—3000 万吨、粮食 6000—7000 亿斤；棉花 6500—7500 万担。以此估算，1962 年工业总产值大约为 2300—2900 亿元，比 1957 年增长 2—3 倍，每年平均增长 26%—32%；19 叔年农副业总产值大约为 1200—1370 亿元，比 1957 年增长 80%—110%，平均每年增长 13%—16%。关于超英赶美的时间。李指出，只要我们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上述初步设想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本账】我国就完全有可能在 1962 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一；在赶上英国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努力 1 就可能在 1972 年或

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成立石油工业部的决议。时任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李聚奎被任命为首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因李聚奎认为在现有条件下，石油产量难以在1957年增加20%、实现由1957年的150万吨提高到[增加万吨的要求，于1958年2月调回总后勤部任政委。石油工业部部长由余秋里接任。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再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因此，第二个五年是赶上英国和赶上美国的关键。我们认为，不要十五年，甚至不要十年，只要七八年的时间，就可以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不要二十五年，只要十五年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就可能赶上美国。这样，过去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了一二百年时间所达到的工业水平，我们就可能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来赶上它们。至于农业，只要在五年到七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逐步实现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那我们的农业发展，就可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发言，更为代表们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的图画。柯说：在十五年内我国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国也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繁荣，人们的精神面貌将大为改观。他具体描述道：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到那时，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识理]，据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过的，大家都能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甚至天文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那时，我们将不止有几十万、几百万个科学文化方面的专家，而且将从现代化工农业生产实践中锻炼出几千万个专门人才。

到那时，人们将过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人们只有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那时，城市变成了大花园，农村变成了工厂林立、街道整洁、卫生体育设备齐全的小城市，村村流水，户户垂杨。那时人们的疾病将大大减少，健康水平将大大提高，而逐渐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类。

到那时·新的文化卫生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而且可以从电视东学科学、学先进经验·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工整个宇宙
中华人民兵和藹史·第四喜（1958 — 1961）—鸟托邦运动
许许多多的新东西。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雄陈出新」

到坏时·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塞本罗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并且保蹬进一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新道德·将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规范。

综合这四个方面·那时，城市和螂村的差别·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产别·将逐渐消失，而共产主义的最徒建成·也鱿离我们不达 T。
对右倾保守的激烈批判，对毛泽东崇拜的急速升温，超英赶美的豪育壮语，对美好未来诗歌般的描绘，使人们不难看出：中共八大二次 t 议，不只是「大跃进」的动员大会，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大跃进」的誓师大会。

5 周恩来、陈云检讨

中共党内，自延安整风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党内斗争的思维定式和传统。即对犯有「错误」的人的批判，必须挖犯错误的社会根源—从思想方法，政治倾向，组织生活三个方面追根溯源。以把「错误」批倒批臭。而批判者的调子愈高，就表明他的觉悟愈高。汇管 1956 年的「反冒进」问题，毛泽东从南宁会议批到成都会议，并曾说过 r 反冒进」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又专门批评了「反习进」的所谓错误。但与会代表中仍有些人抓住不放·有人提出：报告对于「反冒进」问题的思想根源、错误性质和后果的分析不够充分·他们认为，「反冒进」的思想根源，在中央工作的个别同志来说是思想方法问题；在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中则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有些人是由于严重右倾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热情或严重对党不满，因而借「反冒进」之名对党进行攻击的·就全国说，F 反冒进」的错误虽然是思想方法的错误，但不是一般方法的错误，而是在达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设路线上带根本性质的错误。因此，他们提出，批判的分 t 要重一些，对立面要明确，特别是对思想方法和思想根源要集中分析批判。还有人认为，这种错误主要不是来自地方，而是来自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中央要多负一些责任。有人发言说，「反冒进」的问题必须加以清算。

「反冒进」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挫折和打击很大，影响很广。右派分子就抓住我们这一点，说全面：「冒进」了，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干部很害怕「反冒进」，思想总是不解放，小心谨慎超过敢想、敢说、敢干，结果甚么都照章办事。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路线，必须把「反冒进」的问题前因弄清楚。只有批判得彻底，批判得深，批判得透，才能解放思想。于是大会又掀起一个彻底批判「反冒进」的浪潮。

在这种氛围下，提出「反冒进」正确主张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不得不继南宁会议以来为此反右检讨之后，在这次大会上再次进行全面检讨。

首先在大会上检讨「反冒进」问题的是李先念。

5月15日，李先念发言说，几年来，财政工作中确实出现了不少缺点，甚至在一个时候一个问题上也发生过带有方针性的错误。我们往往考虑平衡和稳定多、考虑建设速度少，往往是一怕预算发生赤字，二怕市场波动。因此只好在预算收支数字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得不到一个好的出路，结果只能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不是轰轰烈烈，势如破竹。当1956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一些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1956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面我是有责任的。

根据5月15日毛泽东在陈云发言稿上的批示：「此件可以用了，并且可以在明天讲。」，01陈云16日在大会发言。他检讨说：从1956年

100 李锐：《大跃进亲历纪》，页319—337。

101 毛泽东：《对陈云在八大二次会上的讲话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5月1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一。页2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下半年到 1956 年上半年的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 1956 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一估计得过分夸大了。这样从部分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我在 1957 年 1 月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所说的争取市场稳定和财政平衡的方法，就是从局部现象出发，因而不是从积极方面，千方百计地去发动群众增加生产，来克服困难，而是采取了消极的方法，迁就了困难。过多地注意物，对于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过多地注意了分配方面的关系，对于扩大生产重视不够；过多地注意了所谓「稳」，而不是积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东西。这些错误，曾经使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损害，并且减低了 1956 年的经济发展速度。

「反实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的紧张情况。我是财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的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

同日，薄一波在大会上作检讨发言。他说：现在看得很清楚，1956 年的「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在「反冒进」错误的影响下编制的 1957 年计划是保守的。而且在思想没有完全解放的情况下，编制出来的 1958 年计划的第一本账，也对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估计不足。今天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生产和建股的指标高一点或低一点，而在于「反冒进」大大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给开始出现的群众性的生产建设高潮，拨了冷水。这是必须引为教训的。周恩来作为总理，是 1956 年「反实进」这一正确决策的主要负责人。自 1 月杭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指责，对问题的性质一再上纲，周恩来虽已多次作了检讨，但仍要在这次大会上再作检讨，这对处于国家经济建设第一线的领导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件十分矛盾和痛苦的事。从 5 月 10 日起，周就开始进行认真准备。5 月

第一章多快好者总路线出台

15日晚间，毛泽东又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对周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稿的起草过程，其内心复杂和矛盾的状态，时任周恩来学习秘书的范若愚有过如下回忆：“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忽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彼率备一个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合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复，我统到总理绅合室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呈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姿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肥了反贸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未了。向淤我没有随他去适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表才知道。

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他先谈内容·由我记练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姿言·不能像通去那样，因这是自己的检讨夸言，不能向 s.] 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丈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忽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肥错误」的问题，他已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朴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项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忠在讲了这些情况后，统闲始起草要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

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陈云讲的甚庆·我只赶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说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复·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干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练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

唱惜个·，唱语 r。‘开一一必：，

102 范若愚：《历史·终 t 把一切纳入正轨》，载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襄：西花应工作人员的回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页 45—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1）—乌托年运动

的身分·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坊夹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 my 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 12 时了，我尔到宿舍和衣躺在林

上·等候随叫随去·

在第二天凌晨 2 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腾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戒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彼·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1J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徒·周恩来同志魁挫地同意·还是由他。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练·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两同舟，期夕与共·但溅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一J往来·我把整理援的记练请周、巴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期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阁朴他表毛泽东同志的关孙上，在整风以彼，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F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这得大少·」周，s.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聂彼，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t常己处传阅。后来稿予退回·周恩来同志看退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这，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r检讨」你分中的一些话划摔了·有婆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象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眷现周·鉴来同·占在起草这个眷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5月1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为与大跃进的气氛相合拍，周首先称烦了当前的「大跃进」形势。他说：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x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r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反冒进」错误的主要负t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周按照毛的定性，承认「反冒进」是犯了方针性的错误。在过去一段

时闲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 and 建设的积极性。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周说，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裏。

周还不得不痛苦地将「反冒进」的错误，同右派的「猖狂进攻」联紧起来。他说：「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写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也还由于资产阶级的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得这个错误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 1957 年 6 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 1956 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 1956 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而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冒进」的宣盲，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从整风和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无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周检讨自己犯错误的根源说：「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除了检讨思想根源外，周还深挖了组织根源。他说：除了前面所说的认识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过去一个时期，政府工作特点是：财经建设工作，重业务，轻政治，务「实」不务虚，政治空气淡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6—1961）—乌托邦运动

事务主义严重，抓小不抓大，主次分不清。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须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

析研究。对于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缺乏认真的研究和讨论，领会不深不透，因而就不能正确地在政府工作中加以贯彻。

周总结教训，专门讲了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党阴历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类似的话，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之前就曾经讲过。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由重庆返回延安。8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欢迎会，周恩来在会上致词，其中有一段说：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¹

历史地看，周在1943年的话，是出于内心的，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共党内多数领导人的心态。而1958年，周关于学习毛泽东的一段话，则包含着自南宁会议以来沉重的政治压力和组织压力。

在周恩来、陈云等先后作了符合大会基调的检讨之后，毛泽东公开表示「反冒进」问题解决了，中央是团结的。5月20日，他在大会上作第三次讲话中说道：「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甚么事，中央和
103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讲话〉（1943年8月2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页135。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用「反冒进」来读……¹。

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事件现在搞清楚了，经过团结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但是，毛在多次讲话中一再说，要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进行斗争，要准备党内分裂，等等，又显然是对党内有过不同意见的人发出的警示。

6 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

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后，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增选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杨献珍、王恩茂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会议还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会议要求全党积极地支持这个杂志，要求各级党委经常供给稿件。会议决定，除了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当分别成立一个编辑部、组，负责欢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一致认为：「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会后，毛泽东嘱咐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纪要。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104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页1，·

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纪要〉（1958年6月论日）·邓小平手摺·参见《周恩来传 I 1949—1976》），页139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陈云任财经小组组长；彭真任政法小组组长；陈毅任外事小组组长；聂荣臻任科学小组组长；陆定一任文教小组组长。6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毛泽东在通知中写道：

「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

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j' o'

这是继 1953 年 3 月《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之后，又一个把政府工作权力集中于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也由此直接掌控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工作。周恩来尽管继续保留了总理职务，但已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建设走向的发言权。

四为总路线扫清各方障碍

1 反中共党内的「右派」

从 1955 年农业合作化反右倾引起的急躁冒进，1956 年反冒进，夏 957 年秋冬开始反反冒进，追场党内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在中共省级领导人中，有着同样尖锐的反映。因此，在毛泽东狠批反冒进的同时，对这部分省级领导人进行批判，整肃也就理所当然。如果毛泽东

1 “毛潭东：《对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一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的批颇和修改》庭” 5a 年 6 月 8 日）·载《建一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七册，页 268 — 269’

-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斥责反冒进离右振只五十米，没有把周恩来等领导人打成右派，但这一部分省级和有关部门领导人就在劫难逃了。107

毛泽东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句话时，就举了各省·区宪委的例子。毛说：「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省等地，都发生这样的问题。」，又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甘肃、青海 / k 省区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的，是右振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毛还说，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振，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109 纵观当年各省、区党委揭发批判的省级领导人，除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古大存，省委书

记、副省长冯白驹从 1950 年代初就被扣有地方主义帽子，这时又被定为右派、反党，10 以外，绝大多数是 1955 年

107 对 1 站 7 年在中共省级领导层反右派一事，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在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1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 必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57 年 7 月上旬，南京已热似火炉，毛泽东不避酷暑赴南京，召集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亲自过问抓右派问题。毛泽东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你不反？」江渭清回答说：「主席啊！哪能一个人没有挂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谓对，就打九十分；八句讲对，就打八十分……」毛泽东听了顿时生起气来，他拍响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我想：自己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记、常委内有右派，那我就是「头号」，所以，我秉公直言：「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反』嘛，请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总了江渭清这表态，毛泽东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毛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汗，把皇帝拉下马！」江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汗，要为您老人家保驾！」此谈，往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一个右派，与兄弟省形成鲜明对照。108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 174” 109 毛泽东在成都，让上的插话（1958 年 3 月）。参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 180·181。

1958 年：月，中共广东省纪委对古大存等人的问题进行覆查，决定予以平反。

7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7 卷 {1958—1961}—鸟托年运动
夏季农业合作化反「右倾」中持不同意见者，少数是 1958 年「大跃进」发动起来以后，一些坚持不随风起舞的人。中共浙江省委反对沙文汉（省委常委，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斗争开展得最早，开了中共党内把省级领导人打成右派分子的先河。紧随其后的是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李世农；1，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汗；13 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实；1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

委，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自治区党委常委伊敏诺夫、艾斯海提；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 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 ” 山东省委常委、副

1111 外 7 年 12 月 13 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人民日报》】1957 年 12 月 27 日；《新，半月刊》·】” a 年第 2 号·页 16—18·1981 年 1 月】中共浙江省委对沙文汉等人的问题进行调查，决定予以改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 2 的一 210·1121958 年 1 月 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第六次全体会作出〈关于开除李世农·杨效桩、李锐党籍的决议〉，见《人民日报》，1958 年 3 月 10 日；《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7 号，页 37—39 1962 年 7 月，中共安徽省委对李世农等人的问题进行甄别】并报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意，决定撤销关于开除李世农党籍的决议，恢复其党籍，名誉、职务和级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 209。

1131 外 8 年 2 月·中共甘肃省委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开除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记染大钧·省委秘书·畏陆为公等人党籍的决议，《甘肃日报》，1958 年 8 月 16 日；《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17 号，页 27—29·1963 年 9 月·中共甘肃省委对孙殿才的问题进行甄别，改为警告处分；1982 年 8 月，中共甘肃省委再度对孙殿才等人的问题进行覆查，并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决定予以平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 210·

1141958 年 3 月，中共青海省首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彻底粉碎了右派分子孙作宾等人的反党阴谋，《青海日报》·1958 年 3 月 10 日；《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11 号，页 31—33·1978 年 5 月·中共青海省委对孙作宾的问题进行覆查】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予以改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 210·：15 〈中共河南省委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扩大〉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河南日报》·1955 年 7 月 4 日；《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15 号，页“一 73·1962 年 5 月·中共河南省委对潘复生的问题进行覆查，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予以

平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210·1”（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大 t 彻底揭发与批判以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和右派分子徐江萍），（人民日报），又 958 年 7 月 15 日；（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16 号，页 34—35·：979 年 t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需委对陈再励等人的问题进行覆查，决定予以改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 2[0,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寻线出台

妇 jj. 厦’ --二

省长王卓如，副省长袁子扬；辽宁省委书记王铮，省委书记兼省长杜者蓄，省委书记、副省长李窝；驴河北省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洪涛 1. 云南省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教，’ 1，等等，均被扣上了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反党集团的帽子，被开除出党·在省一级领导人中】以河南省反对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斗争搞得最凶，在全省范围层广开展打倒「潘家店」的反右倾斗争·从当时公布的材料来看，被打倒对象的所谓罪行，主要分以下几类：

(1) 对 1 外 5 年农业合作化反右倾持反对意见

安徽省委指责李世农：反对省委的反右倾决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诬晓省委提出反右倾之后，下面「搞得很糟」。说 1957 年大放大鸣期间，李世农公然攻击省委的反右· f% 方针，否定反右成绩，叫蚕：「反右发生了偏差，省委要负主要责任」，讲反右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个「老公式」。还散播「合作化后，已经没有两条道路斗争」，现在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今后斗争只是「新旧思想的斗争 J，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自己阶级的志愿 J 等等反动谬论，企图以此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120

(2) 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急躁冒进，侵犯中农利益

广西区党委批判陈再励等，从 1956 年 6 月中共广西省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开始，就打看「反冒进」、「反主观主义」的旗帜，极力诋议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

117（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据大会织进行整风·扮碎了以王净为首的反实宗派活动），《辽宁日报》，1”s 年 10 月，1 日 ‘（新华半月刊），1,, s

年第 22 号·页 36 一, 9·118《中华人民共和国 t 绿》, 第二卷, 上册, 页 176.

119〈中共云南省委揭露一个反党集团〉, 《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6 日·120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 t 织 ‘〈开于开除李世农·杨效楼·李锐党籍的决议〉’19, s 年 1 月 z, 日, · (户华半月刊), 、, , s 年第 7 号·页, 7—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贸奉 (1958—196p—乌托挪运舫

壤党的团结的活动·到 1957 年 6 月, 中央宣布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以时, 他们在党内检查因灾饿死人事件的会议上, 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柜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 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工作成绩, 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线错误」要求「重新估计农村工作」, 要省委「肯定错误」。指责陈再励 r 这一右派集团攻击的首要目标, 是 1955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上半年的农各业合作化和伴随而来的农业生产高潮」。r 根本否定广大农民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迫切要求, 把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说成是『强迫出来的』」。r 竭力攻击合作社, 把合作社的生产说得一团糟, 说合作社『只顾集体, 不顾个人』·要求无限制地发展社员家庭副业, 藉以瓦解合作社的集体生产, 使农民从合作化的道路上倒退回去」

、, 甘肃省委批判孙殿才说; r1956 年】是我省大变革、大跃进、届民经济全面高涨的一年。但是这个右派集团, 不仅闭起眼睛否认这个事实, 而且诬线我们的工作是『一团糟』, 是『今不如昔』孙殿才视察银川、吴忠地区时, 只聪地主、富农和一些右派分子的

绘 1《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1s 口. 公布了中共中央、. 务院给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中负有 t 任的有开人员处分的决定, 指出, 造成此次严, 事件的原因、是省、地, 县的一些领导干部汉视群众疾苦, 报! 不报忧; 忽视灾情的严, 性, 没有积极采取措施·做好教灾中的愤食供应工作; 有的干部既不深入了解灾情, 又不相当下面干部的反映, 甚至批许反映减产和灾情的干部为「右倾』. 进行压制·据此决定: 撤销陈漫达中共度西当委第一 t 记、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撤钥郝中士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 务; 撤销, 一舟中共广西省委书记, 副省长织务; 撤销杨林中共平乐地委, 记职务, 留需察看一年;

撤销何庶民中共平乐地委副书记职务；撤销矫志周中共平乐县委。 饱职务；彻销王文陆荔浦县委书记职务；给予中共荔浦县委副书记艾治国严重警告处分‘给予中共积县县委书记薛秋水留党察一年写分。 撤销段，香平乐专警副专员职务；给于荔浦县驯县畏李赛本纪大过处分。

1 取《中共庆西 f. 族自治区代表大会做底揭发与批判以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和右派分子徐江萍》，（人民日报》，1,，。年7月：，日；（新华半月刊》，I, 59 年第 16 号’，弘~35。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口蒲，•，•一言‘j’

反映，代表那些人把合作化诬饥得一无是处，甚至造谣说：『银川种了六万亩棉花，百分之九十没有希望』】『京祖一零七《水稻良种）连种子也收不回来 J，『复种的庄稼都没结籽』•说社员『没钱买油盐洋火，几家子点一盏灯 J•r 拉双输双铧犁，把妇女们身体搞坏了」。这个集团的其它成员说：r 五百万亩水地是六百条人命换来的』。r 增产二十六亿斤是省委虚报成绩」，讽刺省委对 1956 年工作的估价是『阿 Q 精神 J，『秃子头上没毛，还怕人家说光』。J「这个右派集团不仅百般反对社会主义，而且极力保护资本主义。在羊群人社问题上，孙殿才、陈成义等拚命反对省委的意见，硬说羊群不是『生产资料』，而是 r 生活资料』•孙殿才在视察银川、吴忠途中，到处指责下边羊群入社搞得太快了，折价太低了，自留量太少了，分红比例太低了。并且命令县，区党委限时给有些地主•富农退回羊子。他主张【三四十只以下的羊群不入社』，入社时『三百只以下的户自留百分之五，三百只以上的户自留百分之十』，『不论大小，平均折价绵羊每只十二元，山羊每只八元以高于当时一般折价一倍多）。对于分红比例，他认辆应该由三七分（私三杜七）•四六分提高 fr1 对半分。」

「1957 年春，银川地区的单干户有所谓『不卖粮、不交公粮，不出义务工、不开会，不挖渠，不买公债、不交水利费、不管国家大事 J 等八大自由，梁大钧对此不仅不加过问，而且不同意省委进行批判•对于有引起群众的倒贩统购物资行为，也不予制止，并且提倡私人跑运输•做买卖。在他的『社开大片，队开中片、社员开小片 J 和

「胶轮小车拴一辆，挣下钱来归自己」的口号鼓舞下，资本主义在银川专区一度自由泛滥。有些社员私人开荒十多亩，有些社员拆了房子买胶轮车，以致 19“年银川专区有十四万亩水地、十八万亩山地未种上，有些地方甚至麦子熟了无人收划·农业社的生产受了很大影响·J. 。

123 张仲良：〈做底粉碎系殿才·陈成义，梁大钧右派集团，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甘织日报》、1, s。年。月，。日；（新华半月刊》，1”s 年第，，号 1 页：1 一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0—鸟托年运动

(3) 对 1956 年农村闹社风潮的处理，反对用专政的办法，主张要照顾农民利益

河南揭发潘复生的问题！主要是 1956 年农业合作社高级化以后农村出现闹社风潮，潘不赞成用专政的办法，主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指责潘在 1957 年 6 月乃日公开发布的「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其基本精神，是鼓励和支持了富裕中农退社、闹社的资本主义思想；片面地提倡和奖励私人开荒、植树、繁殖耕畜、大量养猪、缤大自留地，提高粮食留量标准，发展个人家庭副业·强调开放自由市场等，企图以发展私有经济，损害社会主义经济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上纲为「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斗 r 反对合作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右派裹外呼应向党进攻」；「欺骗中央，与中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将潘定性「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隐藏在党内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4) 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中违犯民族政策

青海省委批判孙作宾的「罪行」，列举的主要事实是；「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对畜牧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要 r 采取别的方法，不走合作化的道路而解决牧业区的私有制」，直接与党中央确定的 r 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 t，在稳步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正确方针相抗衡。」指责孙作宾利用 1956 年中央指示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乘机向党

进攻。在 1957 年初由孙主待的本省民族统战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中，大做其反写文章；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一口否定
124（中共何南省委举行第九次全蕴会议（搬大）揭发批判右倾机 t 主义分子潘复生等反党反社 t 主义言行）·《新华半月刊》·1 必 8 年第 15 号·页 67—73·

！

第一幸多快好省总踏线出台

党在青海地区几年来所取得的人所共知的伟大成绩，别有用心的专找缺点和 r 阴暗面 J，到处煽风点火。孙作宾俨然以『统战专家 J』『少数民族的救星』自居，污镶省委『不管大事』，『不管民族政策 J，企图推翻省委领导。」，

(5) 对总路线、大跃进持有不同意见

辽宁省委揭发批判「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是在 r 大跃进」高潮时期的 1958 年 10 月间进行的·指责王铮等人反对党中央的工会工作方针，有 r 严重的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反动思想 J0r 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对水、肥、土、种、密加田间管理的重大方针执行不力。」在成都会议之后，「公开反对中央的工农业并举方针」。「不执行中央发展工业的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只抓大的、洋的：不抓小的，土的，使我省地方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姑 10 月 31 日，《辽宁日报》发表题为〈插红旗，拔白旗，开展全省翻身运动〉的社论说：为答庆在全国轰轰烈烈大跃进中，辽宁仅有一般进步而没有大跃进分为甚庆各种条件都很好而不能争得上游？当然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是王坪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他们抗拒中央某些重大方针政策，反对和抵制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若干基本点，反对大、中、小结合，反对工农业并举，不执行毛主席的农业 r 宪法 J·F 这是一场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尖锐斗争】拔掉了他们这面大白旗，插起了共产主义的红旗，取得了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将对辽宁省的各项建设事业发生深远的影响，为辽宁省翻身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127

125《中共青海省第二届委员 t 第五次全·《扩大》t 议彻底粉碎 T 右派分子孙作宾等人的反煎阴谋》，《青海日报》、1958 年 3 月久 1

日；（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7号，页29—31·

126《中共辽宁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粉碎了以王坏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辽宁日报》、1958年，0月3日；（新华半月刊）1955年第之z号·页）。一”·127（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22号·页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7卷（1958—1961）—为托年运动

以上表明，相当多数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的主要「罪行」，是由1955年X季反对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引起省委内部的意见分歧。由于1956年春到1957年夏，中共中央针对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发展引起的混乱，曾着力解决农业合作化引起的农民与合作社、合作社与合作社，农民和国家、合作社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调整了若干与农民（牧民）利益相关的政策，使党内对反右倾持不同意见的一方重新占了上风。但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把因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有意见的人，视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并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1956年坚持按《论十大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方针行事的领导人，就被认为是一直在向党开「顶风船」了。沙文汉、李世农，孙殿才、孙作宾、潘复生等正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省级领导人。广西的陈再励等人想以中央处理广西饿死人事件为契机，藉以纠正省委领导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显然又与正在批「反冒进」，发动「大跃进」的大气候不合。辽宁省委对王铮等人的批判，更是为了给辽宁不旺的「大跃进」之火添上一把「柴」。1958年的「大跃进」，正是伴随着对党内持正确意见的领导人进行不断打击而发动起来的。

说1958年中共境内的反右派，是为「大跃进」扫清障碍，并非是用今天的眼光强加给历史。当年《人民日报》发表曾希圣在省委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时，编者按语就是这样评价的。编者按赞扬：

安徽省委第六次扩大会议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整风运动中的一个巨大胜利。经过这次会议，不只清除了隐藏在安徽党组织内的一窝右派分子……而且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有力地批判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大大提高了党内的思想水平，端正了两条道

路斗争的政治方向。安仿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对朴如何工确地认识和执行党的路线和政菜·如何加快党的团结·如何学会和晴藏的敌人作门争·如何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81

澜面•r1. i

掌经整风方法改进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等争重大问题·都作了才良好的论述。’ ”g

后来的事实证明】凡在这场反对省级领导右倾反党斗争中搞得凶的地方，1958年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刮得也愈凶，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河南、安徽、广西均是如此。

2 敲打军队高层将帅

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

1必8年夏，中共中央军委举行的扩大会议，史家一般称之为反教条主义的会议。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最初主题。早在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讲到军队问题时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枚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占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未可夫所犯严重错瑛的问题·此事由军委蚤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

1?8（人民日报），1懿8年3月to日：（新华半月刊》，良958年第?号·页29·129毛潭东：〈在南宁t议上的结论提纲〉.1必S年1月21日》，载《达国以来毛海东文稿》，第七册，页之，·「朱可夫事件」—朱可夫，苏军元帅。苏德战争期间，曾任仅次于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在计划·准备和指挥莫斯科t战、斯大林格勒t战和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中起遇重要作用·可谓「功高震主」·馭后，曾担任首任骏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军占领区t高行政畏官。后被斯大林贬鸟地方军区司令贝。斯大林逝世后，出任国防部副部长·部畏·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t议上·决定龙黜第一t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服·要求召开中央全t·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

到莫斯科·为称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等人 1 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朱可夫在军队中懂力的雕服，又引起了解鲁现夫的警惕。同年 10 月！苏共中央全会以朱可夫 r 破壞了党的列率主义原则」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和中央委员·并决定解除其国防部畏的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客（1958 — 1961）—鸟托年运动

在 3 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讲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毛在 3 月 9 日的讲话中说到：建国彼学习苏联出了教条主义，「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历史教训就是理裔要和实际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建国后，这个道理没有用到经济战线上」J。又说：「军事系统也受此灾难，规章制度训练部门搬得多。」，3 月 10 日化又说：「全国解放后（1950 年到 1957 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131

4 月 8 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到党的领导问题时强调：党要抓工、农、兵、学、商、思六大问题。今年都要抓。7 月再谈一次，可以在一个地方，分两批谈。4、5、6 三个月抓工、商、学，结合抓军队。7 月以后秋季再着重抓军队。要教育军队，不要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

毛泽东的上述多次讲话表明，关于学习苏联犯了教条主义，他认为问题严重的是经济和文教战线；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看得并不怎么严重 1 反而说军队「基本原则坚持了」。可见，毛认为军队要突出解决的问题是，要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错误的教训·防止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其次才是教条主义的问题·矛头指向，是向军队高层将帅敲警钟，要他们牢记 F 党指挥枪」的原则，不得居功自做。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成都会议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

130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 167。

131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 172。

132 《毛泽东在武昌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 年 4 月 8 日）

！

第一章：快好省总基线出台

83

贯彻」，” 据此，1958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一开始，首先把矛头指向高级将领的「个人主义」。彭德怀作为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决不认为毛泽东要军队将帅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是包括他在内的。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寻找不服从他领导的人，这便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粟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功赫赫的名将。1949 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粟裕就在陈毅领导下，挑起了华东战场战役指挥的重任，并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对夺取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具有重大影响。在 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十名大将中，粟裕名列第一，绝非偶然。1951 年 6 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 年 10 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粟裕就任第二副总长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总参谋长。1952 年 7 月 1 日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在聂、彭二帅领导下工作，难免发生不同意见的碰撞，以至个人之间的误会。“

133 《彭德怀传》编写组：《雕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 1341。另之 7 月，聂荣臻任代总长时：对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张震回忆：「聂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東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裏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找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裏的东西就少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师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早先还见得，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英吃不完。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毛泽东批评复，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刚到

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果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果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了的,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果裕认为、自己是副总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承担一定责任,便也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不料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作批示,不但写上「此汇报很好」,而且把东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果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又作了批评。此二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张震:《总参谋部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79,页”6:《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北京:当代

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 1960—1965—乌托邦运动

}

5月24日,彭德怀在预备会议(又称小型会议)上,就会议的主题讲话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倒国民党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4年高岗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出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倾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二是战略方针!三是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战争准备,关系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它的不一我就比较好解决了·“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回忆说,彭德怀在开幕式上强调: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137

中.出版社,2000)·页938—939·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与彭在对未来战争的估计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歧,有时累还与

彭据理力争。1954年第一届全届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鸟了体规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娜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了也受批评，为此业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弱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织责条例。《栗裕传》，页939—941·135顶备。让有。委委员，军队系统的中共中央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球鸢委，纪共五十六人、，际到会四十人，军委扩大t议开募以后作为「小型t议」经常举行。《彭德怀传》，页551·136《彭镶怀传），页551—552，137t克咸，《黄克诚自遂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46；《栗裕传），页936.？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为解决好党的领导问题，在5月26日的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栗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强加给栗裕r一贡反领导j、「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迫使栗裕在会上进行检讨。批栗裕，毛泽东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r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139彭德怀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弱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140于是，会议从6月7日起、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人。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栗裕的说明，批判栗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栗裕终究不是毛泽东预先设定要整的对象。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瀚对栗裕的看法。萧劲光说：「栗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

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毛泽东为粟裕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川

138 听调「一买反领导」、主要是指粟裕与聂荣臻、彭德怀的关系，「告洋状 J、r 襄通外国」·指 19,7 年 11 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拜 t 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 Iv 舫 ilvsokol 个。物，。粟裕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咧·虽已五易其偶】尚未获得通过，从借鲈苏军经验出发：趁便向苏军总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 r 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 J，以作参考一事。《乐裕传》？页 941 — 942 ·

139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页 24b,

14D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页 288；黄克诚，《黄克诚自述》，页 246 ·

[41 《某裕传》，页 944 · 1960 年 1 月，东裕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t 议，毛泽东在 t 上讲括时，特地转过脸来朗着果裕说：果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大 t 构的。《巢裕传》，页 9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1958 — 1961) — 鸟托卑运动

7 月 14 日，某裕在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r 解除粟裕总参谋畏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142

方强上书与会议转向

就在大会批判粟裕不久，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方强，于 5 月 29 日就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诚上的统一·会议林取大鸣大枚、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甚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甚废主要矛盾·还项有明确的必要，否 ff1J 会议就开

不好。我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的参
展。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二
次会议精神，在“足、劲、争、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
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我们军队曾有过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
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

14? 《粟裕传》，页 944。对粟裕 1958 年叶冤的正式公开平反，是
1994 年 12 月 25 日，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在《人民
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追悼粟裕同志》一文，正式宣称：19
58 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斗：并因此长期受到
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法”也是中央军事委
员会的意见。」《粟裕传》，页 2，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要命的）不注意
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下属，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
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政治自觉；只讲遵守规
章制度，不注意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讲军衔等级，不
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一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
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
发生动摇。‘，’

6 月 5 日，毛泽东对方强的信写了以下批语：144

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朴讲话，先要让他们把“1”题都
拿出来

、邓看还我。我暂时不宜，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
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毛在方强信中提到，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不
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处批道：「不存在问题么？」在信中讲到不重
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处，毛批道：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

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阁主义。」毛还就此写信给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和黄克诚（并指示阅后退邓小平）说，

有些同.忽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犬有可为。情小平商彭责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九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143 方强：《关于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的意见给会议主席团的信》！1958年5月加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261—262。

144 毛泽东，〈在方强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的意见上的批话〉（1958年6月，白1，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260—261，人民，1995年1月，页260—261。

6月7日，毛泽东又专给邓小平写信”说：

6、7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斗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德怀同.崧将军事会议开好·辟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拎，多快好省。这样，军委会议的主题才由批判粟裕的个人主义转向反对教条主义。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近役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

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

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但从现有材料来看，直接引出毛泽东指示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是方强写给大会主席团的哪封信·

州、细-----~-----

i 必毛泽东：〈关于做好第二个五年计划布局和开好军委 t 议问题给邓小平的信〉《：958 年 ‘月 7 日）·较《建国以来毛海东文稿》，第七时，页 2 “·

1 归《彩他怀传》，页 5，」·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6 月 9 日下午心很大，开不好，

，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大家就不要走。

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

都来（军分区的不来）。黄还传达了毛泽东讲的一个理论问题，说：

教练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通奉影响《雅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却不永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必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再在·不永认中国有它特殊的東西。’ ”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开始直接过问这次军委会议。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对此后会议的发展、黄克诚回忆说：

中央委托邵小平召集各位师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姿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帐起来。

毛主席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苍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不上日程。 “

，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

军队高层在会前的不同意见

军队开展反对学习苏军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始于 19 “年苏共二十大以恢。但在对具体程度和影响的估计上，军队上层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1 叩（黄克诚在全，大 t 上的传达记绿），见《彭德怀传》·页 55 之 ‘

148 黄克诚：《黄克城自述》·页 246 — 247 ·《粟裕年谱》1958 年

5月26、28日，6月4日、记战：邓小平主持元帅会议批判粟裕·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页6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0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这对长期在农村游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干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不少人本能地反映出一种抵触情绪。政治上一生谨慎，时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刘伯承，在建院之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军队干部的实际情况，对学院的，11练工作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在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有关指示以后，刘伯承当即领导检查建院五年多来在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中，出现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时·一位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战役系学员写信给彭德怀，认为在向苏军学习中，学院在教材、教学方法，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以及其它方面，「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因而】对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提出质疑。151不久，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蔡的基本观点是：苏联军事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只有全部学会·学通，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蔡认为：「这不是一个小

149 毛泽东：〈转发让向荣关于各军事部门与苏联口问的颊系的总结的批语〉（圣9幻年1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达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卯0），页1，

150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 t 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11 必 3 年 2 月 7 日），教《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 2 斜。

151 《彭德怀传》·页 546。

152 蔡铁根调军事学院前，任革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的处长。

多快好荐总路线出台

-

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建议中央和军委给予重视。1s3 彭德怀将蔡铁根的这封信立即批示印发：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为了解军事学院是否犯有教条主义。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工作组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召集多次座谈会，随梭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在肯定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取得成绩的同时，指出学习中有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啊彭德怀看了张宗逊的报告，感到军事学院的问题】很有必要亲自去进行了解，以便看手解决。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彭德怀、陈赓、谭政于 1957 年 2 月 27 日率领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工作组一行到达南京。彭在军事学院听取学员、各级领导及机关干部汇报后，3 月 2 日与学院领导干部《刘伯承院长在上海休养，缺席）谈了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彭德怀回到北京后，将在军事学院的讲话作了斟酌修改，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报告说：「军事学院自 1950 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r 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报告认为：（学院）r 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 1956 年 9 月全院学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153 《彭德怀传》、页 546 — 507 •

154 张宗逊：《关于几年训练工作的我见》，《解放军报》，1977年2月9日 • 155 毛泽东指示：『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 』《彭德怀传》 • 页：韶 • 。 。 《， 1 伯承传》 妇写组，《刘伯承传》《北京：当代中。出版社，1981） • 页必 7；彭德怀：〈在军事学院“帐中的谈话” 1957年3月2日》，载《彭德怀传》！页一，4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四专卷 9” — 1961） — 乌托邦运动

军事学院党委对彭德怀报告中，不顾军事学院的基本事实，给学院戴上「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帽子 • 以及不提学院在学习中央规定的五个文件 • 反对教条主义中工作有何改进，有何成绩：而得出军事学院党委对反对教条主义「仍然徘徊、犹豫 • 拖延，未能下定决心」的结论，显然难以接受， • 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彭德怀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 即肯定「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对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估计，在主管全军训练的总政治部内部也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总政治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 时任总政治部副部长的萧克则持另一种意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中主要倾向的观点一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 • 可以批评，可以纠正 • 但不能夸大事态。 “

• 萧克接着写道，他对彭德怀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中一段「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于是，就给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 • 一在执行这一口号中 • 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组织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评和坚决纠正的，因

此建织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本身。

J.

——— 157 《刘伯承传》· 页必 8 翻 a 跚克：

《一克回忆录》

一邸 9,

q 匕京；解放．出版社，199 计· 页 443,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 r 打麸刺挑到国防部 TJ01’,,

1958 年 3 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对批评「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J、「 \$ I1 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持不同意见的一方占了上风，并对原训总副部长张宗逊（时任副总参谋长）开展尖锐批评，，并将他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振来了由组织部长刘其人任组长的工作组】明确表态：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 并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 161 于是，会议转向反对教条主义· 这是军队内部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两种不同意见的一次正面交锋。但是，曾主持 mI1 总工作多年的叶剑英对此并未理会。4 月 8 日，他在军事学院全院教职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 1 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 \$ I1 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 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这是在军委犷大会议之前，叶剑英的一次郑重表态·

巧 9, 克：《尔克回忆录》，页啊 5 一啊 6”

160 批评张宗逊选去对学苏联叫得最.，指张提出：「要坚持不走样地学斗要把苏联显问教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学到手，即使当前用不上也不要紧；要坚持先学复用· 高学低用，死学活用等等· J 而现在又

把毕习苏联都脱成是教条主义 1 婉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 J·「南京军事学院鹅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坛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并将他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进行批， 1j·场 1 一克：《. 克回忆录》，页 110。

162 《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页 515；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XZSS—286，叶剑英在军事学院讲话的时间是 4 月 8 日·丛进·中误写成 4 月 18 日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刘伯承、，克成了斗争重点

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正式转向反教条主义，是 6 月 20 日—“这一天，扩大会毕行全体大会，正式出席的 1004 人，列席的 438 人，大会主席团由三十二人增加到四十一人。彭德怀代表主席团首先讲，一开头就提出了两条军事路线斗争，从战争年代教条主义的危害，讲到全国胜利后军事教条主义的复活，反对毛泽东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一下子就把问题上了纲。彭德怀还带着情绪说：r 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仰

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先后作了三次讲话。· 6 月 21 日，在全体会议讲话说：

他这几年对军事没有抓。军事工作底本上做得好缺。·k。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针军委评·也就是对他的批评。

·有成绩，也有、对彭德怀的批

关于教条主义问题，他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分 t 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的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乃日，毛泽东召集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举行座谈。他多次插话说：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在有四（三？）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究

163（彭德怀传）·页 554·

164〈毛 i. 东在军委扩大会期间二吹讲话记录称〉；《彭德怀传》，
页 554—555：（刘伯承传），页 6 页”

T' ” 一伟

—

{

—

第一章多快好右总路线出台

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
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
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
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经验，在
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
产物。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
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
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
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重要的，新的没有，就把「小米加步
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现在学校奇
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
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在 29 日召集的各组组长座谈会上，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和 r11 练总
监部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
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
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并点名批评了刘伯承和萧克】指责他们犯
了教条主义错误。说：「萧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
时机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
根子。」毛泽东说：r 苏联打败过十四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很长
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蒋介石、日本帝国主
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的多，把自己的经验看

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林彪播话说：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要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毛强调：这个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1“指1941—19弱年苏德战争期间·苏军保卫斯大林格勒等十大战役的战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0—鸟托年运动

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7月10日，刘伯承不得不抱病到中南海怀仁堂的大会上作检讨。萧克也作了检讨。但会议的斗争气氛，愈来愈猛。给萧克、李达戴上了「反党宗派集团」的帽子，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处原处长蔡铁根在会上说明，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竟被当场摘掉军衔和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7月19日，彭德怀作会议总结。他说：「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其中，萧克同志，不仅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而且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以他的面貌来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

户渡瀚个

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1 阅。克在回忆录中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要蔡绍罪，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军·他们醒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

罪·造反派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地杀害了二克：（吁克回忆录》·页 453·据查，瓊织根·19“年反教条主义受批判钱、1959年4月只被刘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一降为行政”级，安排到江苏省常州市工业局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造反派经鲈蔡为现行反革命，当即被捕入狱。1970年3月”白被杀！·1970年‘月8日·中共常州市委为蔡铁根平反昭二，恢复名.’

1 钉《彭翎 t 传》，页” 5 一，56；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291·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7月22日，大 t 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说：「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现在我军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 JOF 错误路线可以在受过历史裁判以后卷土重来，在一段时间和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中可以横行无忌，俘虏群众，甚至有计划有组铁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这就证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决议》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开展」。会议通过《关于处理韵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让》说：r 本会议对萧克同志的错误，暂不作最后结论」，待大会闭幕后在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下，进一步彻底揭发检查后，再作结论。阙

此后，由总政治部振出工作组到 a11 练总监部，指定训总组成新的临时党委，举行由二百多人参加的部党委扩大会议，把萧克、李达·郭天民三个部领导及李锤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人打成「反党分子」。随后·总政治部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振活动》的报告，给萧克、李达作了：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公开抗拒中央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有组织，有计

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以及 r 卑鄙的野心家和军阀主义」的结论。与之同时，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刘伯承、陈伯钧，宋时轮等进行揭发批判，并作结论说，r 过去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以来所犯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

168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191 — 292 •

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四专 (195 吕 — 1961) — 鸟托年运动

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还及全军，其发生发展过程是由盲目到自觉，由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发展到路线错误。J' 的这样，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就在实际上把从 1953 年以来，军队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业绩一概抹杀了。一大批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随之转向。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搞军事 w11 练被斥为「资产阶级单纯军事观点」；强调大打人民战争，使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协同训练受到削弱；培养现代化军政指挥员的军队院校工作，受到严重打击。因而，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延误了一个时代。

对毛泽东而言，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否实现了他要军队将帅接受「朱可夫事件」教训的初衷，后人无法猜测。t71 但从强化毛泽东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军队不可动摇的地位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

169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292 — 293 •

170 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克 • 李达的国防部刘部长也被免职并调离。队 • 陈绪英等则被开除军籍 • 送边骚劳动改造 • 1978 年 11 月 7 日】总政治部在《关于颇克、李连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中，彻销了「以，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写宗派活动」的结论；1986 年 10 月 27 日 •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央在刘伯承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说：「1958 年，在对建军工作

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严格自责。1980年，邓小平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鱼中央一致的意见·1987年u月z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t发出《关于，克·李达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彻底平反的通知》】宣布，r关于19铝年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为刘伯承同志致的悼词中，党中央已经作了彻底否定J，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为在195a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克、李达，郭天民、李锺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伤力勇·李文芳·王波等同志敌底平反j·

件1黄克诚后来回忆说，这次t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顶t中央情神，所以主持*议颈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1-1题。也许这就是厦山会议的先兆·黄克城：《黄克诚自述》·页247。

第一幸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3 全总批右倾机会主义

就在中共中央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全国各省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高潮迭起的时候，全国总工会在整风中，却提出要纠正工会成为「行政的尾巴」的倾向：要照顾工人合理的切身利益等问题。这无疑被认为，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与正在兴起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大跃进」是不相容的。于是，在全国总工会系统，又展开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是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通过，4月2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同意的。其主要目的，是把各级工会量于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该《意见》称：

一 T---

为了便利工作·精简机构·更好地发挥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级工会组织应该以由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同时接受上级工会的领导。各省、市、自治区工会联合会可以考虑改为省，市、自治区总工会。产业工会的组织也应做作适当的调整：有的可以保留；有的可以适当合并；有的可以保留名义·实际上成为各级工会的一个部门；有的可以取消。

建议全国总工会党组根据具体情况和工作需要加以研究，提出具体措施·报中央批准。

要整顿组织，必先整顿思想·就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结束不几天，1958年5月26日至8月5日，中共全国总工会党组举行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此次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决议中说：会议是按照中央指示的方针·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彻底检查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开展了敌我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树起了红旗，拔掉了——→斗——→——\

172 李佳才主编：《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58）资料遗编》1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 月 7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0）——鸟托年运动

白旗、划清了大是大非，端正了工会工作的政治方向· · · · 一会议除了把全总的工作人员陈用文（《工人日报》社长）和秦达远（全总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划为阶级异己分子、修正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外，主要揭发批判了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所谓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报若恩，「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向党向政府争夺权力·篡改党的工运方针，崇拜工人的自发运动；他们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运用诡辩的方法」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 那末，这场斗争是由何引起的呢？

一向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己任，团结工人向资本家、向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工会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其社会地位、作用以及与共产党和行政的关系等就是摆在面前的新问题。其中带有根本性质的是，工会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同时，是否具有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在肯定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是否承认也存在着矛盾；工会在调节工人与行政的矛盾中，是否有维护工人利益的责任。归结到一点，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甚庆？维护工人的权益是否还应是工会的主要任务？

早在 1950 年 7 月，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鉴于当时工会工作脱离工人群众，国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放弃工会应有的独立的主动的工作等情况，明确提出：国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

间，在「基本立场」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工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务不同。即在国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形成为「厂方的附属品」。17' 这个意见，当时曾受到中共 173《全日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1958年8月5日），载《中国工会四十年

【19 闷·1 警邓子恢 i 吋 8】

19 朋) 贤料选妈) · 页 796 — 797 ·

: 《关于中南区的工会工作》（19 父年 7 月），载《中国工 t 四十年 c1948 — 惊料选编》，页 102 — 1 砖 5 ·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的反对，他认为在国营工厂中：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会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认为邓子恢『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模糊了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本质上的区别。1951年10月，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向毛泽东写了《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指出：有同志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无所矛盾，甚至否认「公私兼顾」的政策可以适用国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的劳动条件等总是存在有矛盾的，但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因而是可以而且应当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求得解决的。李立三明确表示：「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但李立三的意见为毛泽东否定】在 1951 年 12 月举行的中共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李立三受到批判，并被扣上了三顶帽子：（一）在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上犯有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以二）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三）在工作方法上犯

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家长制的错误。其性质：r 是严重的原则错误 1，〔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 J。」，赖苦愚正是在 1951 年这次会议解除了李立三的职务后，接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因此，他执政以后，无疑是执行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的路线。全国工会在动员工人群众全力保唱召，••蓄。-!!,. -r-

1 方李立三：《开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1951 年 10 月 2 日）·载《中国工 t 四十年（19 拐一 1988）资料选编》、页肌 4—1 巧·”6《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织》（1951 年 12 月 n 日全国总工会露缀概大会议通过）·载（中国工会四十年『1949—19es』资料遗绸）·页 295—301·

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 11958—196n—鸟托年运动

证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建设的顺利实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看国家建设的发展，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之间的矛盾也时有发生。1956 年一年中，全总收到的报告和直接处理的事件就达八十六起之多（罢工二十九起，请愿五十七起，其中来全总请愿的二十四起）。‘77 在 1957 年 2 月予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之后，4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提出：为了总结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克服各方面存在的缺点，进一步发扬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艰巨任务，中央准备在今年内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对有关工人阶级的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讨论。（一）关于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问题。（二）关于职工生活问题·（三）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四）关于企业中党、工会和青年团组织工作问题，必须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的情况，在各方面有所改进。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和意图，促使广大做工会工作的干部进行反思。人们开始对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的批判提出了质疑。认为李立三承认工人与国家利益一致，也承认存在矛盾的观点，是对的；李立三认为，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上，也没有错；当时并不

存在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严重错误；尤其是 1 外 3 年在工会系统自上而下地批经济主义，造成了不良后果，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工会干部不敢代表工人的正当利益，坚持真理，因而脱离了工人群众。在这种背景下，全国总工会根据中共中央开展整风的指示，进行整风。1957 年 5 月 7 日，赖若愚在回答《工人日报》记者提问，5 月 10 日在全总直属机关作整风动员报告中，都明确指出当前工会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脱离了工人群众。他举例说：「1956 年，群众闹事增多，而在闹事中间，除了个别例外，群众都把工会撇在一边，群众根据几年来的经验，认为依靠工会组织解决问题往往是解决不了的，……这一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报告〉（1957 年 1 月），载《中国工运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页 574，第一幸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些都说明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是严重的。」。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工会与各方面的关系比较难处理。这主要是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工会与党的关系。他指出：

工会与行政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样说没有错误的，而且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是强调了工会与行政的一致性以徒，却忽略了两者的差别，甚至有一个时期，只准一致，不准不一。这样，工会所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行政领导布置的事情。结果，形成工会与行政「一鼻孔出气」，模糊了工会工作的特点。在过去一个时期，工会对群众的支持是不够的，工会好像是行政的代表，代表行政说话，因此，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工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毫无疑义的，应强调的。但从组织上来说，工会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根据群众的意见来办事。工会组织要很好地把党的领导和群众意见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即通过群众自己的独立活动来体现党的领导。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解决得不好，削弱了党的领导（这是针的），也忽略了工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所以有人说党委设了「工会部」就够了，何必还要工会呢？——丹

1. Ise' '•. ■弯. 可 J•励■•乱 weJ■. ■■1■1.1, •• ‘

据此，赖若愚提出，整风主要解决好工会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应该说，这是一服并不对症的处方。

随后，《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总工会办公室副主任李修仁，把李随同全总领导人视察京汉、粤汉铁路沿线十个城市有关工矿企业群众工作的见闻和观感，以〈工会工作「走马观花」记〉为题在《工人日报》发表。接着发表了《工人日报》社长陈用文随同赖若愚访

178 赖若愚：〈在全国总工会直属机关写员干部大会上的整风动员报告〉10日，载《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页5, 179 赖若愚：《在全国总工会直属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整风动员报告》10日，载《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页99

1957年5月

《1957年5月—5间。

1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48—1961）——鸟托年运动
问山西，陕西、甘肃三个省工会。太原、西安、兰州三个市工会和临泸县工会后写的〈西行纪要〉。这两篇文章反映了工会工作脱离群众的大量事实，以及工人群众的要求和希望。

1957年9月，中共全国总工会党组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将当前工会工作意见分歧最大的三个问题提交会议讨论，一关于1951年12月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二、工会「七大」以来工会工作的估价；三、当前工会工作的主要问题。目的是：「辨清是非，统一认识，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好思想准备」。上述三个问题，中心是第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估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对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批判，以及会议确定的工会工作的方针是否是完全正确的。这时，全国范围反击所谓资产阶级右派斗争已进入高潮，因此，会议一开始，全总党组就认为，几个月来，对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提出的种种怀疑和反对意见，已经在许多工会工作者中间引起了新的思想混乱。对过去工作的成就不敢肯定，对于党组扩大会议所确定的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发生了动摇，对于全总领导以及对党和行政方面的消极抱想情绪有所滋长。这是思想政治战线上的斗争在工会内部的反映。

报若愚在会上作报告，对怀疑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正确性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指出：「一切怀疑党组扩大会议决议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在贯彻党组扩大会议决议的过程中有过一些缺点，但党组扩大会议所确定的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还是正确的。」他认为：「目前工会干部中的思想混乱，不是一般的思想问题，而是有关工会工作根本方针、任务的分歧。它实际上是工会工作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次整风，就是要通过大辩论，迁清思想，统一认识，提高觉悟，把工会干部团结在党的周围。关于工运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工会与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赖又重复了批判李立三时的解释，并强调只有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才能正确领导。苦鱼；〈于当前工运工作的若干问题〉1957年9月5日在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中. 工运四十年》：—198 资料还。》·页“·693, 694·

第一章多快好省总路线出台

地掌握党对工运工作的正确路线，才能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致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

这样，全总党组第二次扩大会议并没有能解决工会工作中存在的实际矛盾和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会训尽管全盘肯定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的批判，及会议确定的工会工作方针；但对持怀疑甚至反对意见的人，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右派进行斗争。赖若愚当时指出，「对工会工作有错误看法的同志并非多数……；一部分人则处于中间状态，认识模糊，遇到外界影响，就发生怀疑动摇。这一部分同志只要经过认真的学习，就可以清醒过来，坚定起来。剷良少数的人」对上述工会工作的方针有严重的怀疑，甚至提出完全反对的意见。这种人的意见，是造成这次思想混乱的主要因素，所以必须予以严肃的批判。但他强调：「对于工会工作问题的研究，必须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严格区别开来。」，，‘这样实际上就把这部分持反对意见的人，保护了下来。这在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高潮期，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赖若愚在这次会议上，虽然继续维护了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李立三的观点，但他在此前对几年来工会工作存在问题的看法——「工会与行政【一鼻孔出气】，模糊了工会工作

的特点」[「工会对群众的支持是不够的，工会好像是行政的代表1代表行政说话」；「强调了党的领导《这是对的》，而忽略了工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等等，并不能因此而被人们遗忘。何况他在这次会议上又公开保护了对工会工作方针持反对意见的人。这不能不引起「立场坚定」的一部分人，在全党批判右倾保守的形势下，站出来对他揭发批判。1958年5月20日，赖若愚因病逝世。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次日，全总党组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揭发批判赖若愚右倾、反党。刘宁一在大会上作《关于批判赖若愚严重反党错误的总结发言》；刘澜涛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会上发言；会议通过决议，指责赖若愚、董昕等

181 报若愚：《关于当前工会工作的若干问题》仰乃7年9月5日在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载《中国工人运动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页64—65。

1 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9卷（1956—1966）——鸟托年运动

人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属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性质。‘8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结束的通知》，高度赞扬了此次全总党组扩大会议。文中说：

这次会议，彻底揭露和斗争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修正主义者陈用文（《工人日报》社长）和反革命分子奉达达（曾任全总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全国总工会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少数领导人所犯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工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确定了今后工会工作的具体任务，制定了改进工会工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会议彻底解决了近十年来工会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

至此，就在全国党、政、军、工会各系统，完成了对与总路线、大跃进在指导思想上不合拍干部的整肃，把中共全党各方面干部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红旗」下，使毛泽东年初预言，1958年下半年「要有一个大冒」变成现实。

182（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页7”。

183（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买写 s · 1979年6月1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并中央纪委报告说：1958年·全总黑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对当时的全总领导人报苦愚·董昕等同志进行批判斗争·除报若愚同志当时已经病故，未予处分外】经中央监委批准，对董斯、陈用文·王榕·李修仁·吴平、邵井蛙、刘永生、刘健农·冯宿海，陶怕等十位同志分别给予处分·另外，秦达远同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逮捕议办，在，彻会议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又批判、斗争，处分了不少同志。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对这次会议的问题进行了覆画。经覆查证明，这是一大错案，应予彻底平反·中共中央于同年9月19日批示：中央同意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1979年6月15日〈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覆查结论〉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覆查报告〉。并决定撤销1958年9月30日中发〔58〕85号文件·其中包括〈关于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刘澜涛同志在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和〈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三个文件·

第二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在农业掀起大跃进局面的同时，工业战线的大跃进也开始发动。工业大跃进的基本思路是几个并举，实际上主要是调动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强调地方都要在短期内使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形成地区工业体系。为此，大规模下放权力，实行群众动员】破除规章制度，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细良快】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各显其能。在上下互动中，赶超英美的时间表一再提前。在小社并大社和农业高产竞赛「卫星」的两股浪潮中，毛泽东和中共其它领导人认为找到了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一通向共产主义的途径。于是】被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一全党全民办工业

1 县社工业遍地开花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曾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各省地方工业产值

比例要超过农业产值（包括下放给地方管的工业在内）·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专门写了一条县级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具体规定：「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事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与之相应的是】总路线规定了发展工业的一系列并举方针，即：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实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之中共中央为此作出如下决策：

1958年2月6日，首先作出关于召开地区性协作会议的决定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七个协作区，任务是：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会议，使各省、市、区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互相协作，彼此支持，调节矛盾，互相评比，以促进共同发展。，具体划分是：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为东北协作区，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为会议召集人；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河南为华北协作区，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为会议召集人；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江西为华东协作区，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为会议召集人；

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江西为华南协作区，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为会议召集人；

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为华中协作区，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会议召集人；

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陕西为西南协作区，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为会议召集人；

1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 1 草案〉（1958年1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 I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b 页 40、41·才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田·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页 303—304，3 《中共中央

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1958年2月6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页157—158。

第江幸大军进和人氏公社的兴起

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为西北协作区，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为会议召集人。

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把协作会议正式改名为协作区，进一步扩大了协作区的职权，要求各协作区根据自己的资源等条件，逐步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任命原会议召集人为协作区主任委员。

2至3月，中共中央陆续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关于改进物资分配体制问题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批转了纺织工业部工作组《关于纺铁企业全部下放交地方管理的报告》。规定：

干部下放的主要方向是农村。为的是贯彻执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迅速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大力增加农业、林业、牧业的生产，在短期内改变我国农业和农村的面貌，在农村中有系统地展开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各省、市、自治区，在国营工厂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有权调剂国营工厂物资的多余部分；对各国营工厂超额生产的部分，可按各地需要情况，按比例提成：地方管理的国营企业，超额生产部分可以全部归地方。

地方工业的建设资金，除了少数较大的重要建设项目主要由中央投资以外，其它一般建设项目所需的资金主要应该由地方自筹来解决。地方资金的来源，主要应该依靠地方财政筹集，地方工业企业的内部积累，手工业合作社和农业社的积累。此外，必要时还可以发行地方建设公债。

留面，月·届实。吃、‘-1-!。----!IE-

4 叔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页3“—348·

s《中共中央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1958年2月28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页157，

6《中共中央关于改进物资分配体制问题的意见》（1958年3月10日

成都会议通过，同年4月2日政治局会议同意，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页270·7〈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1958年3月23日成都会议通过·同年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页2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1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4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决定》、《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

决定对各类产品实行分级管理，分级平衡的制度；关于基本建设的管理程序，各省、市、自治区兴办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除了提出简要的计划任务书，报送中央批准外，其它设计和预算文件，一律由省、市、自治区自行审查批准。”

决定将国务院各主管工业部门，不论轻工业或者重工业部门，以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开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

税收管理改进的原则是：凡是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管理的税收，应当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若干仍然由中央管理的税收，在一定的范围内，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以机动调整的权限；并且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税收办法，开徵地区性的税收。¹⁰ 所有这些，不仅在人才、物资、资金等方面给地方办工业以有力的支持，而且赋予了各级地方党政领导调动人、财、物等资源以很大的权力。截止1958年6月15日，九个工业部与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完成了880多个下放单位的交接工作，占中央各工业部所属企业和事业单位1200个总数的50%左右。¹¹

8〈中共中央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1958年4月5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页241—242·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决定〉（1958年4月10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2次全体会议通过）·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页264·10

〈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制度的规定〉（1956年4月1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75次会议批准，同年6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7次会议批准·同年6月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命令公布试行）·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页269。11《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70·71，

第二章大军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各级地方领导人对地方办工业本来就有积极性·所以，自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就出现大办工业的热潮·原来工业不发达的省份尤甚。1958年3月，国家经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看，各地方的干劲比中央各部门还要足一些，特别是甘肃、陕西、云南、贵州、湖南、安徽、河南七省，都计划把今年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提高到50%以上。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其它省份领导也不甘或不敢落后，而要迅速提高工业比重，唯一的办法就是全民大办工业。因此，就出现了「县县办工厂，乡乡办工厂，规模之大，声势之壮」前所未有」。「z据当年报道：甘肃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办厂一千多个·3月到5月，建厂五千五百个·5月到6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二十二万个。其中省办的二千五百多个，县办的五千五百多个，乡办的一万六千多个，社办的十八万五千多间。出现了十多个「万厂县」，二十多间「千厂乡」·五十多个盲厂社。全省每个乡平均有一百一十个厂矿·每个农业社平均有十二个厂矿。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建厂1530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有三十五个工厂投入生产。

人。仅有十三万多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1958年5月底就建厂矿307座。”

安徽省安庆地区十三个县统计，到1958年5月底止，仅社办工厂就达到19418个。“

12. 国家经委党组：〈关于一九五八年度计划第二本限的报告〉。1958年，月7日。，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页424·

13 转引自让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上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页3喝·

14 中共安徽省委，辑室：《农业社大办工业》（合肥’安霉人民出版社·19 铭）·页 1·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册·页 424.

1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19” — 1961）—乌托邦运动

对地方办工业的热情，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介绍该省的情况”说：

自今年 2 月间，我们以沁县的县、乡、社办工业的经验为典型，开了一次全省性的地方工业工作的现场会议，到现在，不通三个乌多月，沁县的经验，其像星星之火，飞快地燃遍了全省。据最近统计·预计在今年内全省新建大、中、小工厂将达到一万三千多个，90%以上走县、乡、社办的小型工厂，其中有二千多佃工厂已经建成并投入生产。全省自筹的工业建设实金已达 2,1 亿元·其中，群众和干部投资即有九千多万元。预计今年全省地方工业的总产值将比 1957 年增长 80%。如此高的速度，如此大的规模，都是我们原来所没有预想到的。而这种新的局面的出现充分说明：实现工业化和「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号·不早单是工人阶级的战斗，号，同时尚朴农民也在出钱、出力办工业·所以它已经成为全民的战斗。号了。

这些数字，虽然带有相当水分，但基本上反映了当年全国各地大办工业的热烈场景。为解决资金、技术，设备等困难，当年的基本做法是：用行政手段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资金；组织城乡协作；采取土法上马。如：

河南省新乡市为筹集资金，通过发动群众，从市财政科、手工业局、建设局·商业局·服务局、市联社，工业局、粮食局、合作禽场等系统，一直到民政科的社会救济费，甚至连党费、工会费也被动员来投资工业。这样，很快从年初只准备二三十万元的工业投资。跃升到一千二百万元。此外，新乡市还动员郊区农民自筹五六百万元来搞工业。再就是通过发展储蓄事业来筹集资金。银行过去规定不准把储蓄款项投资搞基本建设，现在打破常规，市委规定：

坊陶·储，（论工农关系和城乡。系的新发励，《新华半月刊》，195。年第 11 号、页 37。

第二章大跃进和人民分秘的兴起

新乡市的储蓄款项除上缴九十万元之外，都归市裹适当调度使用。1957年全市实际完成储蓄额是五十万元，1958年要保证达到三百万元，争取六百万元以上。’ ‘新乡市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在当时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设备和技术，主要通过组织城乡协作来解决。就是由城市、由大的工业企业出钱、出人才技术、出设备帮助建厂。山西省当年就以城市为中心，划分了六个城乡协作区。各地在县与县之间又以较大的县城为中心荔纵横交错地组织了许多小的城乡协作区。在每个县的范围内，也以县和集镇为中心，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城乡协作区。如太原市和十八个县制订了一个相互协作发展工农业的规划：三年内，太原市帮助十八个县新建或扩建一大批中小厂矿，使这些县初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电力化。1958年协助各县新建，扩建工厂167个（这比省工业厅和十八个县原来计划新建、扩建的工厂多104个），包括有农业机械修配厂、水泥厂、炼铁厂、炼钢厂、炼铅锌厂、炼锰厂、炼镍厂、硫酸厂、炼焦油厂、煤矿、耐火材料厂、石膏厂、氮肥厂、糝制纸厂、石棉厂、淀粉厂、黄金开采、火力发电厂、变电站等。这些新建企业】由太原市投资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元；由太原市各大厂矿拿出125台自己不用的机状和电机设备，并组织包括有各类技术人员的三个综合小组，分头到各县帮助进行资源调查和地方工业的规划，帮助各县培养县营企业所需的技术力量，帮助各县逐步地建立勘察队伍和建筑队伍。依照这个规划，十八个县成为供应太原市所需副食品的基地，同时也是提供劳动力保证太原市工业发展需要的基地。此外，太原市还要求每个县在年内收集废钢烂铁十吨至三十吨，以供市内重工业工厂的需要。除太原以外，大同、长治、阳泉等市以及其它县城和工矿区也大体按此做法。17

贾1■，！-I--1

16中共新乡市委副书记罗毅：〈新乡市在跃进中—新乡市怎样贯彻鉄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t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报告〉·《新华半月刊》，1嘴年第11号·页42·17陶鲁茄：〈论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新发展〉1《新·半月刊》，1958年第1j号，厦37·

读，计———1计” —!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0—鸟托年运动

县、社工业，更多的是立足于自力更生，探用土法上马。河北省邢台县，原本有十六个农具制造修配厂和木业社，县裹认为只要再加些设备，就可以制造出新产品四十四种—小型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中耕器、灵巧水泵、小型钻探机、低洼地区的铲土机等。为争取原材料自给常县裹决定：1958年建立八个小型炼铁高炉《争取完成十二个），7至8月分别投入生产，产铁达到1200吨。1959年小高炉累计发展到十五个，年产t达到2.2万吨，除满足本县自用外，还可以交给国家一万吨；1958年建立四个小型土法炼铜厂，8月投入生产，至年底产铜15万斤。1959年累建为五个，全年产量达到七万斤；1958年建立小型水泥厂九十九个，产水泥2700吨·1959年在改进生产方式前提下年产达到一万吨，基本上达到自给；1958年建立土法炼铅矿一个，9月投入生产。至年底产铅1.5万斤，1959年加以扩建，全年总产t达到五万斤。’容

社办工业，相对更较简单。海伦县福海乡新建农业社，’本着白手起家，勤俭办厂的方针，仅花150元，就办起了颗粒肥料厂、小烘炉、木工组、被服加工厂、钾盐制造厂、皮革厂、联合加工厂（包括碾米、刘草、饲料粉碎、发电）、酒厂等八个社办厂，并很快投入生产。”1958年全党全民办工业，社社办工厂·村村办企业，一时确如雨后春笋般从地下冒了出来，除了批判右倾保守的压力，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盲目情绪，来自横向的相互攀比外，与以上这种种做法也直接有关。其中组缴城乡协作，土法上马等办法，运用适度，是会有成效的；社办工业，虽然基本上只是一种手工劳动的小作坊，但它确是社队企业的萌芽。然而，采取停止社会其它领域的运转，调集全部资金投资办工业；以为小高炉的土法冶炼就能顶上洋高炉用等等，却造成

[8中共河北省邢台县委第一书记张玉美：〈农业需要甚庆就生产甚庆〉刊），1958年第11号，页56—570

19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吴恩涛：〈新建农业社是怎样办起工业来的〉刊》，1958年第15号！页130。原载（奋斗），呈1958年第1期·

《新华半月》《新华半月》

第二章天跃进和人氏合社的兴起 1 巧了一种假象，似乎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并非难事。实际上，彼来造成的结果·却是负数。

2 技卫革新的群众运动

实现工业大跃进的第二项重要措施，是号召破除「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号召：「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人，「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认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一的指示》。强调：「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中央决定以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指示指出：

在运动通程中·会不断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的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针·树立起各种光进的典型和旗帜。……我们应该欢织和讲杨群众在各个战线上的跃进·促进落彼的部分赶上
去·力求在先进的基础上达到新的运动的平衡，并且审订原来的沈划。

原来一些不，11 终生产力姿展的规章制度·会在运动中不断地为群众的 t. 1 举所打攻。我们公项对朴群众的创造，处心地加以研究，按照誉展的需要和群众在实践中的考验·重新审订原来的规

20《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乱”8年1月），较《建国以来重要文戏还编），第十一册，页45，叨·

『遗■■■，个·■■■月驭计 r' -, -111-1

1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 t19, 8 — 1, 61—一鸟托邦运动章制度。凡是真正束缚生产力发展而又可以迅速修改的·应该立即修政·z,

根据中央的指示，各地闻风而动，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运动（简称「双反」、「双比」）的展开，形成了工矿企业大跃进的新形势。」，

3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22说：

化工部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重新审查和修改了厂房设计。一个年产八万吨接触法硫酸厂。根据原来设计，需要投资八百二十万元，现在只需500万元就够了。这一设计修改。原来准备兴建30个厂的投实，现在可以兴建五十个厂，硫酸产量由原来的200万颇增加到任00万颇，这是工厂设计大跃进的事例之一。北京市规划局设计院二从反对设计浪费和保守以来。检查了130项设计工程。修改了550张图纸，为国节约资金九百多万元，这是民用建筑大跃进的事例之一。

石家庄动力机械厂生产的锅驼机，每马力九十公斤。跟最先进的煤气机比起来重量要大七十公斤。经设计人员研究，率备峰到二十三公斤，这是机械产品设计中大跃进的事例之一。大庆建设机林厂，由「双反」运动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以破除陈规陋矩为中心的革新运动。该厂厂长报告说：全厂计原有的7项9种规章制度。修改了249种。废除了196种，两项共占59%。将1927种报表。合并。简化和废除了993种。估51.3%。陈规陋矩被除尽。群众的思想更加活泼了。干劲和钻劲更大了。生产效率提高几倍、表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直至10万倍。如青年

观《中共中央。于。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95。年：月，日）、载《建。以来重！要文选编》。第十一册。页203。

《火烧技术设计上的浪费和保守》。（人民。邮电论，1958年3月29日）出《新华半

月刊》、。5名青年。号。页主师一10。

第二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117

竞工廖世则采用了多刀、多卡，多机林管理的先这方法。并把钱林加工改为坤林加工，生产接连提高了1680倍，以一天半的时间，完

成了五年计划的工作量”老针工曾德智将手工操作改为机械操作，生产一下就提高 21243 倍。全厂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大量技术革新者。提高生产效率 50% 以上的就有 3681 人，占全厂工人的 35%。第一季度生产计划完成 105%，比 1957 年同期的生产实际增长 4%。整个金业充满看蓬勃勃勃的新气象。之 ‘

奋，■•呈，. . . , 1 • ! 、 —I!1. …

由技术革新，创造出新的先进定额的报道可谓连续不断。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介绍该省情况说：

长春市动力机械厂车工王德泽搞了九项技术革新和创造。八个月完成了八年的生产任务；吉林市省机械厂锻工周玉岭改进和，. 1 造了三十六种工具。现在正领着 1962 年第三季度的工作。技术革新运动开展以来，有些厂子作到了「粒粒轮细活」，「小林玲大活」，「老机器当新机器」，「低级厂扑高级厂的活」。在只有 1780 名职工的省机械厂，从 3 月中旬掀起技术革新运动。仅仅四十几天的时间。群众就提出了革新和创造 218 件，经铁定采纳 180 件。结果全厂六十六个工组。有二十七组的全部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半倍到三倍以上。66% 的工人突破了 80% 以上的定额，单项产品超过定额五倍到十倍的 6 人，十倍以上至五十三倍的三十四人。……在已经出现的千百件技术革新中。有不少项目已使我们的某些生产技术的水平、迅速接近，达到或者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如丰满水力发电厂试验成功的送电缘双周率高周波保护装置。根据现有资料对照。在各国同类装置中，是可以名到前茅的，同美英两国的相较。比他们的可靠，又不那样复杂；石岷、开山屯两个造纸厂的木浆蒸煮时间。在几天之内创这

23 重庆达设机床厂厂长纤凯丰：（破除陈规陋矩。解放生产力）。《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13 日；（新。半月刊》，1958 年第 11 号，页 46 — 4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商春（1, 58 — 1, 61）—鸟托年运动

！

了超适加拿大的纪录。类似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仅仅吉林市的各厂。一个 3 月份。就出现十五项。1’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也创造了班产翻番的新纪录。就是班产百辆汽车（两班任务一班干）生产大试验的成功。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今年多品种，明年干五万，三年收回本，成本减一半；五年增十倍（以1957年出产一万辆为基数），品种八十五；远景十五年，年产三十万；全面大跃进】整风是关键。」”

上海开展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运动，具体落实到想办法、找关键、比智慧、比措施。3月24日，上海传出的电话消息说，江南造船厂抓住缩短造船修船周期的关键，订出先进的指标和措施，原来造5000吨的船用十八个月，现在九个月就完工；修船周期也缩短一半。许多工厂的生产能力都增长了一倍、两倍以上，最多的永泰电机厂产值比1957年增加二十六倍；新产品不断出现。然

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确有很多好的创造发明，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在当时，也确实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真的已经降临了。毛泽东在看了上海报道的这则消息后，写了一则批语说：「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之？其实，在破除迷信，贬低知识分子、专家教授作用的当时，仅仅依靠发动群众，并不可能在科学技术上产生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重大发明。

24 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解放思想，迎接技术革命〉·《人民日报》，1958年5月24日；（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页58—59。

25 第一汽车制造厂厂畏镜赋：〈由三万辆汽车到七万辆汽车〉·《人民日报》，1958年5月16日；（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页50—51。

26 〈上海最近情况（3月24日电话消息）〉，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155—156。

之7 毛泽东：（对〈上海最近情况（3月24日电话消息）〉的批语）（1958年3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研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研出版社，1993），页155。

第二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1193 一再提前的赶超时间表

地方工业的迅猛发展，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发明创造，捷报频传，

极大地增强了各工业部门超英赶美的信心，中共中央领导人更认为这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化学工业部部长彭涛，1958年3月4日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出了通过地方大办化肥厂，在化肥数量上赶超英国的意见。他说：为了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到1962年实现化学肥料生产700万吨的规划，除在中央和省两级办化肥厂外，还准备在专区和县两级开办化肥厂。这样，四级同时举办化肥厂，到1962年氮肥产量可达1800万吨，再加上磷肥和钾肥，就可以在数量上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在每公顷土地上，十年内赶上英国，也就有希望了。

个，，，也个。1-1', 11!-f1

5月，彭涛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至今仍处于严重落后状态的中国化学工业，也能够在此短期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其根据：一是，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地方是能够办好化学工业的，并且地方办起来，往往比中央（部）办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如中央管的太原化工厂办了七年，还没有一个车间投入生产，但这个厂的很多产品，地方工厂早就生产了；二是，最近的事实又证明：群众是可以土办法来办化学工业的。像四川省奉节县利用硫磺脚渣生产硫酸铵、用烧富废气生产碳酸氢铵等化学肥料；江苏省常州市利用艺糠制造普通玻璃和甲醇，练醒、醋酸等有机产品；三是，几年的事实还证明：其它部门也可以举办化学工业。如：钢铁联合企业中附设化工

彭涛：《关于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1958年）月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二第七册，页1加一上51。

奋个唱……。双叮-1-!-1-、-、。

1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0卷（1958—1961）——“大跃进”运动

厂、炼油厂附设化工车间等。总之，只要打破神秘观点，由少数人搞化学工业变为全民搞化学工业，就能为化学工业的发展。开拓出一条宽广的道路。讨

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1提出「生产更多更好的机器保证社会主

义建设高速度发展」 a. 赵说，工业上十五年要赶上英国，《农业纲要四十条》要提前实现，地方工业总产值要提前超过农业总产值。加上机械工业本身发展的需要，都要求在短期内提供更多、更好的机器设备。赵提出高速度发展机械工业的路子，除了「全国一盘棋，各区也各有一盘棋」，「改变体制，面向全国」外，重要一条是下破除迷信，依靠群众，开展技术革命」。赵说：

在大跃进中，群众的新创造有如百花齐放、层出不穷。过去设计一个中等的柴油机厂要将近两年时间，现在只要两个多月时间就可以设计出来。煤气的斗生炉，过去用钢板，没有钢板就没有办法，天津专区大胆改用砖砌的土炉子代替，不但省钢材，而且效率高，现在已大大推广。东北机械厂一个工人出身的车间主任，研究出用氧气瓶或钢管来做锅驼机的锅炉，用钢省一半，烧的煤也少一半。汽车底盘的大梁，原来是要风三千五百磅压力机压制，南京汽车制配厂在大跃进中，没有这样大的压力机，经过工人与工程技术人员想办法，用小压力机分五段压制，经过试验，完全合用。许许多多的例子说明，群众中有无数的英雄好汉，只要充分发动起来，让他们取想、取做，加以引导和提高，一定能涌现人才辈出，困难让路。在技术工作上走群众路线，使群众作技术的主人，这是机械工业技术革命中的根本问题。 “

幼魁乱《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工业上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较量较量》·《人民日报》1。” 8年5月29日；《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页65一前。

为‘，。：《生产更多功能更好的机器保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人民日报》，1958年，月31日；《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页70’

第二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4月间，水利电力部向中共中央报送的电力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条是加快电力工业发展速度，十年赶上英国；第二条是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全国电气化；第三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全民办电。

可见，寄希望于全民办工业，就有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产品的数量，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就有了1958

年工业品产量指标的一再加码，超英赶美时间表的一再提前，4月15日，毛泽东在广州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中，通过介绍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断言：「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对这一论断的提出过程，《毛泽东传》有如下解读：

口口口口·汇■■·..，‘·!·■■r■■■■.，’，肥’■■■·■‘·!—■，—’·■

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儿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坏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斗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才」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1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哀，·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除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号仍不变。」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斗十五年已是留了五工七年的录地。但考虑 f11 此文要公开姿表，为慎玄起兑，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于五年赶上英国』的。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3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月2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久

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十五年能香超过美国？」Jz

5月，毛泽东提出，在党内小范围裹头，应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按照他的意见，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把原来 r 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 j，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5月8日·他在大会上讲话说：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其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³³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及其稍后一个时期，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 r 跃进 j 捷报不断飞来。5月18日，毛泽东就安东机器厂这个小厂，工人们经多次失败，克服技术、工具、材料设备和财务上的困难，终于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写下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j 的批语。断言·这种 r 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襄，毛泽东对赶英赶美时间的改变，明显反映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的变化。为了跟上毛泽东的时间

31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叫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2 的 3），页 51 [— B12 ·

32 毛泽东：〈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 年 4 月 27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桥》，第七册，页 188。

33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页 815 · 817。

“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1955 年 5 月 18 日 1，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桥》，第七册，页 136。

第二章大军退和人民介执的兴翅

表、跟上地方工业发展的大跃进形势，各部委纷纷向毛泽东报告，有信心完成更高的生产指标·6月6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们岁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八百万颇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追两天我们在研究有色金属工业规划，9日以徒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分头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惜派·我们有极大信心完成卡超过现在预定的指标” ”

毛泽东当即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并写道，「1962年，可产六千万吨钢。」”这个数字1比王鹤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报告1962年达到三千万吨”翻了一番。

6月12日，国家经委党组向党中央报告：地方冶金工业的「跃进」指标，已经大大超过「二五」计划第二本账。计划今年兴建小高炉12694座，大部分年内可投入生产，地方铁产量今年可达440万吨，比去年增长7.9倍；兴建转炉220座，电炉四十三座，地方钢产量今年可达200万吨，比去年增长2.5倍。根据地方冶金工业的飞跃发展，估计明年全国钢铁产量可以比今年预计完成数翻一番。

6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将国家计委汇总，经中央财经小组讨论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要点》估计，1958年钢产量可能达到八百五十万吨，比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q1958年6月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267。

拓毛泽东，〈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1958年6月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767”

37 王鹤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说：『冶金部再次和各省、市、区研究了网产量的发展速度后，认为1959年可以远到一千二百万吨·1962年三千万吨，1967年七千万吨，”龙年一亿二千万吨。五年可以超过英田，十五年赶上美二j见砖一彼：《若干，大决策与·件的回。》，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t如3）·页石95·1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419卷（1961）—鸟托牟运动

十万吨到九百万吨。「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的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例如工业方面，钢产量超过二千万吨，争取达到二千五百万吨，超过日本，超过英国J0r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三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三年基本实现J。凶6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中南海西楼向中央政治局汇报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除毛泽东外，全部到会·薄一波谈到钢铁生产时

说，预计今年钢产量将达到九百万吨，初步安排，明年计划为二千万吨或二千万吨以上。讨论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同意薄的建议；另一种总为 1959 年的指标还可以更高一点。会议从下午 3 点开到晚上 11 点，未能达成一致。

第二天（18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有中央常委和有关负责人参加的谈话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等。在谈到钢铁生产时，毛表示他赞成提高钢指标。于是决定，1958 年的网产 t 的顶计完成数改为一千万吨】1959 年的钢产量指标改为二千五百万吨。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叫做「以橙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未加思索，回答说：工业就以

■户为纲，带动一切 P 巴！毛说：对，就按这么办。

也很重要】并议论了工业交通各行业之间的关系

他还认为，机械工，提出机械工业也

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

t 后，薄一波按会上定的数字重新修改了叮日的《汇报提要》、并称：「1959 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同时写了以下一段话：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警·页 697'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警，页 69R — 699”

〈关于 1958 年形势和 1959 年的经济发展向中央政治局的报告〉91”s 年 6 月载《达·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 278·

第二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基本建设投资首先保法两个「纲」奉两个「先行」部门的需要。两个「纲」就是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两个「先行」部门·就是电力和铁路。纲举目张，其它一切东西都带动起来了。这是工业部哥上的战略问题，必须有统一的想法。“

以上部委送来的报告，把超英赶美的时间一再提前，使毛泽东极度兴奋，他认为李富春的报告，「可以大开眼界」。17 日，他在李的报告上批示说：

此件即刻印今军委会议各同。忽。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P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玲工业，轮农业、拎技街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杂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行究外国的坏经验一弓【以为戎·这就是戎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就在这种不断争先的气氛下，6月珍日，毛泽东作出了19铭年钢铁翻番的决策。对这一过程，陈云有过具体说明：

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夹一些同志·王鹤毒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才王鹤毒说·好吧！布且“下看。第二天说布1了。所以，是6月珍号才决定搞一千一。唱，

41 砖一彼：《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显》，下卷、页699，

焜毛潭东：〈关于向军委t议印发李，卷第二优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t1958年6月17日励，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273”

431”8年8月抓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搬大t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毛泽东传11949—1976）》，上册，页讨4—8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夺（19SB—！，61）—鸟托作运动

事隔两天，6月21日，冶金部党组再就产钢计划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报告说：

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首万颇。“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又将进入一个祈的水平

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姿展，我们寺华东区的同.志研究了争取明年达

到生产能力八盲万吨的椅施，同时其它各大协作爆也在最近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研究各天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颇，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颇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协同各区·兵同组织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技卫力黄的培养等工作。缠，

冶金部的这个报告，更坚定了毛泽东对钢铁翻番的信心。他批示：「此件发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 1 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22 日，毛泽东将薄一波 17 日报告的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并加批示说：

此件印眷军委会议各同志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1959 年达到二十五首万颇

。超退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两年是可能的。这裘主要是钢。只要，我们此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洛，

446 月中旬，华东协作区举行会议·规划 1959 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700—701·必〈冶金部写组关于产纲计划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1958 年 6 月 21 日卜，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吗〉·军七册，页 281—282·

媚毛泽东：〈转发哈金部党组关于产网计划的批语〉t1958 年 6 月 22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吗》，第七册】页 2 肌。

47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 t 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958 年 6 月 22 日 1 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隔》·第七册，页 278·第二章天率进和人民姿社的兴翅

同日，毛泽东在冶金工业部送来的《1962 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上批道：

此件印姿旱委会议各同志。只要 1962 年达到六十万颇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顿力争在钢的产 1 上在 1959 年达到江千五首万颇·首先超通英国。’ ”

留厦叮■. . ■. ■■. ■葱-1IJ-!

1958 年的钢铁产量，2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定为 624.8 万吨；3 月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 19 铭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把钢产 t 提高到七百万吨；，。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批准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第二本账，钢产量又提高到 711 万吨。

“但到 6 月：指标突然节节攀高，最后定为 1100 万吨。与之相应的是：1957 年 11 月提出「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1958

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内部提出「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6月，先是「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最后认定「两年超过英国」。速度变化之快，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从整个决策过程看，毛泽东反反冒进，批消极平衡在先于各部委、省区层层反保守紧随其后；在群众运动、无法上马的地方大办工业氛围下，似乎工业生产即可创造奇迹，反过来上层再将指标不断加码。如此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钢产数字愈报愈大，赶超时间愈来愈短。最后做出了这种违背常识的决策。对此，薄一波有过一段说法：

绍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提议印发冶金部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279。49薄一波：〈关于1955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8年2月）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页118

50 李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页118。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上册·页118，1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1卷（1957—1960—鸟托年运动

毛主席下「一五七〇」的决心·除了他本人出朴急朴赶上英国的迫切心情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促成。王鹤寿同志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发展的材料有影专·我17日的汇报、绍日的谈话，头脑不冷静，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也有影响。但是·有决定性影响的'界是来自村庆施同志。他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6月中旬来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万吨。这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只能达到八百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它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约搞得更多吗？我没有参加那几天的协作区主任会议，村庆施同志在毛主席面前怎样吹的·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响。这有毛主席后来多次的谈话为证。例如，1958年11月30日，在武汉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主席封村庆施同志说：r你过

去拎劲冲天，条件没有 J·说华东搞六百万吨到八百万吨·「这几个月我们想了一下·没有那个条件·比如没有煤、铁怎庆搞法！」又如：1959年7月”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闯「一Q七Q」这个祸时说：r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朴村老·你那个姿明权怎么办（村回答：我也有责任）7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 P 因为你耶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八百万颇·我全国只搞一〇七〇万吨，斗毛主席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是村庆施同志促使他闯下这个乱予。’ 1

李锐也有一段话可作左证：

11958年》6月1o日左右·我应召同毛泽东谈了一次话，是在中南海的游泳池边。他鯖神并搬·兴玫很高·首先就谈到全年的钢翅砖一织：必苦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厂》：下卷，页7o〇—70，·第二章大跃这和人民合仕的兴起

要翻一番。这真使我吓了一跳·，、一技来才知这1村庆施在八大么次会议选入中夹政治局徒·他主持华东区协作会议时·就确定华东七省市1959年要生产钢六百万颇到八百万颇。这个指标极大效舟了毛·1958年钢的原定指标，\百万颇已经很高了！要增长1/2)·他却认为既然能搞到八百万颇，现在就把地方积极性调动起来，何佑不索性翻一番呢 2”

二农业生产大刮浮夸风

从1957年冬季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起）就基本上开始了用群众运动搞生产的局面。在1958年初提出「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三年看头年等口号以后，各地纷纷毓订计划，提高粮、棉等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以争取提前、提前、再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各省在传达3月成都会议精神后·立即提出了更高的指标。如：首先提出「苦干三年，改变面貌 j 的河南省委负责人宣布：「水利化已经做到，已完成五十二亿土方的水利工程。」提出了一年翻一番，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曾在南宁会议上受到表扬的安徽省委负责人则表示：r水利落在河南后面了，现在是赶河南，4月底可以到四十五亿土方。四十九个县可以宣布水利化·」还说：

「完成农业四十条，不要七年了，可能是三到五年。」S. 恐后争先之风，. 已露端倪。

1 浮夸从深耕密植开始

毛泽东抓农业，除了十分重视指标以外，还非常重视农业的增产措施和群众的干劲。农业增产措施，除大兴水利建设之外，就是耕地

李锐：(r 大跃进」亲历记)，下册！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页 1—2 • 《毛泽东传 1949—1956》，上卷，, 803—804, 508。

编 J4eJ 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四卷 (1958—1961) — 大跃进运动

深翻改土、合理密植、工具改革、养猪积肥等。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 • 工)，就是在抓农业增产措施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 •

但是，当年领袖号召甚么，下面就推广其么，而且翻着番地发挥。

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听说山东有个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鼓励各省搞深翻。他对湖南省负责人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g 又对陕西省负责人说：「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迁」。

河南省长葛县县委书记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专门介绍深翻地的经验，说他们县到 1958 年 4 月底，三十三万亩早秋地都深翻了一遍，深度在一尺左右，计划年内把全县一百一十二万亩土地 r 来一个大翻身」J。并说土地经过深翻，‘可以充分发挥水、肥的效能，使产量增加百分之几十以至一倍、几倍。

5 月 17 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时，号召在全国推广长葛县的经验。

他说：

感谢河南长葛县委书记的发言，他讲的土地大翻身，我在这农听了一通，回去又看了一这。他讲的深翻土地一尺五寸 • 将一百一十二万亩全年全部深翻一通，争取亩产九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 • 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才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这枕不行吗？一年不行 • 两年不行，三年还不行吗 P 四年还不行吗？与论如何五年总可以翻一适了吧！深翻一尺五寸 • 这是一佃犬姿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把

全县土地都深翻一适·没有好工具·就用长万县坏样的工具·就用他们这个办法。’ ’

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显》·下卷 1 页 683。“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 戏，页 343。

！一，二，、，。和·、，社的！·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合理密植的问题。他说：

通去只说水，肥、土、种子，现在还有一个密植。在四十悻中单列一项合理密植。广东一钦要种三万墩，每墩三根狭，每狭三根笛·枕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红·兵 1620 万粒：每二万红一斤一钦不是 810 斤吗？牌只是纸上谈兵，拿到手寡才算数。北方的麦子、杀于、玉米、高粱、天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下。要充分利用阳光和空气·现在不走在反浪费吗？要反封浪费阳光和空气。太阳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气化碳被往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太阳照在栋物上起光合作用，制造它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 ’，在此前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深翻改土中，已经出现了工具改革的苗头，并开始形成了一种群众运动。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他在 3 月的成都会议上就强调指出：

/

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雄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卫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劲牌·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此节省劳动力几倍，十倍。……运动的特点是迅速有效，群众积极性起来了·每天有新的创造·将来还会有各种新的争明。现代化、机械化与改良农具是对立的统一，两者应同时进行·请各省市迅速谁进。群众性的，.I 造是为穷鸟尽的·河南、河北已形成群众运动·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夸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雅广·’ ’

这样，深翻、密植和工具改革的群众运动很快在各地推开。广大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车子化运动」、「濃珠轴承化运

57 李锐：《「大跃进」视历记》，页么 43, 58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 208,

132 中华人民兵和或丈·第四各红 9 铭一 19611—乌托邦运对动 J、
「绳索牵引机化运动」，五花八门。只要一处出现 r 发明」，立即就会报道宣传，很快被普还推广·

中共陕西省大荔县委，听了毛泽东关于改革农具运动的指示后，当即向群众提出「苦战一年，普周地实现土机械化（指使用改良的畜力机械’手工机械’自然抑力机械等】J的口号。全县除了各个农业社的木工组、铁工组和改良农具的能手积极行动起来以外·乡、社干部，复员军人，回乡学生，青年老年，男的女的都参加到改良农具的行列中来了。县委向上级汇报情况说，r 目前总的情况是：天天有发明，乡乡有创造，社社有改良，样样活路有新工具，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正在试制的小麦收割机、「土汽车」、r 土火车』一人摇木制双输双铎犁等以外，已经试验成功的改良农具，由 3 月下旬的五十四种，到 4 月下旬增加到 221 种，推广了 34600 件。其中有汲水灌溉、耕作、健输，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工具。J 改良农具的普遍推广，大大减离了农民笨重的体力劳动，节省了大量劳动力。这又解决了大跃进中、所缺劳力的不足，并大量增加粮棉产量。”

如果说，改良农具能否见效，还比较容易看得出来；深翻土地，合理密植，就得经过一达农作物的收获才见分晓，因此，并不易被农民接受。基层干部为贯彻上级推广的「先进经验」，就采用大辩论开路，按领导布双做就插红旗，不听则插白旗。结果，深翻变成翻得愈方件愈好，有的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探的‘合理密植，也变得愈密愈好，、一绘一些地方一亩地下种几百斤的给插红旗，按农民。己的经验下种的给插白旗。对当年这种领导方法，薄一波评论说，过高的指标，求成场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的刮风式的领导方法，所带来的副作用，缓大的还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级干部的浮夸风。，

但所有这些，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夺得高产的有效措施，并将会取传立竿见影的效果。

，师道卸：〈农具大革新·生产大跃进〉，19 斗年挪 13 号，页 87 一
绍，

旬牌一彼：《若干 t 大决叶与事件的回纤》

〈红旗〉·1958 年第 13 号；《新华半月刊》. ，下卷，页 685’

第二幸大军进和人民合社的兴起

2 媒体大 t 报道农业「放卫星」

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因此，在 1 站 8 年比喻「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气氛下，人们把「高」上了天的产量，称之为「放卫星」。从夏收开始，各地纷纷报道小麦、早稻丰收放「卫星」的记录。6 月 8 日，《人民日报》首先刊登了〈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 2105 斤〉的「丰产新纪录」的报道。12 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的高产消息—2.9 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 3530 斤，并发表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

6 月 16 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 4353 斤。23 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 4689 斤。

7 月 12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 2 亩小麦创亩产 7320 斤的记录。18 日 1·《人民日报》报道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 2.6 亩早稻试验田亩产 58 师斤。25 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 9195 斤。31 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 10597 斤。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套红大字标题刊登新华社消息：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出现「天下第一田」，创造了平均亩产干毅 36956 斤的惊人纪录。是截至目前·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9 月 5 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 1.73 亩中稻亩产戏舛 37 斤。18 日，《人民日报》又报道：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放了一颗 r 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十三万多斤·

截至 9 月 25 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 8586 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 130435 斤。‘、

61《中，人民共和国，绿》·第二悬·上册·页 197—198。

中华人民兵和国史·第四专（1958 一功 61）—鸟托年运动

除了小麦、水稻「卫星」以外，《人民日报》和一些省报，还连续发表了玉米、高粱，谷子、蕃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苹果等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元帅」

为强化高产卫星的舆论效果】报纸都配发有现场照片。作为中国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 8月13日刊登的一幅照片是：四个小孩（两男两女）站在丰收的早稻田裏—「看稻子长得如此稠密，孩子们就像站在沙发上」。实际上，那些离奇的粮食高额丰产典型，基本上都是采用「并田」方法（把许多块茁壮的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庄稼移栽到一块田裏）假造出来的；也有的是按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如山东寿张县推算，一亩穀子密植四五十万株，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但在当初，各级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以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是深信不疑的。

当年3月，河南省新乡地委转送了封丘县委3月20日写的一份报告：〈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报告介绍了该县的应举农业社，1957年秋后提出「苦战三、五年，豫北变江南，盐碱地变稻田」；「1958年实现水利化，过黄河，跨长扛】变年年受灾为季季丰收，永远摘掉灾区帽子」的战斗口号后，社员的方向明确，干劲十足。他们的顺口溜是：「一股劲，齐向前。修渠道：改稻田。保丰收，灭灾害，好生活，万万年。」由于社员的辛勤劳动，现已修成了河渠纵横的大面积稻田，今年计划种稻2830亩，丰收的年景在望。这种面貌一新的气象，紧紧吸引着社员的心坎。大家都抱定一个愿望，就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毛泽东读后，非常兴奋，专门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予以歌颂：

〈一年苦战么年改变了面枕的合作社〉，这篇文幸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姿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姿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向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

第二章大跃进和人民合社的兴翅

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伟人。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冷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你在这方面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姿。……中闲劳动人民还有通去那一副奴杂相庆才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闲人民兵和国九首六十万平方婆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才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应举农业社社畏崔希廉，对他们取得的成绩作了鼓励。还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柜食一千斤？猪肉一百斤，油二十斤，棉花二十斤，再过一个时期，每人每年有粮食一千五百斤」

6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向中央政治局报百百

班户睢骚

送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

其中谈到r今年麦季增产已经

五十多亿斤，比1957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

亿斤」。“毛泽东18日批道：r此件很好，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

“n日，毛泽东批发农业部报送的关于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的报告，将题目改为r农业大有希望（农业部向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农业方面所要达到的目的）J·瞞

6月24日，邓子恢给毛泽东报送了夏收增产统计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从河南、湖南等十七个省区已报来的增产统计数，共339亿斤；二、甘肃、新疆、北京三个省区市增产估计数共十五亿斤；

62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日1，载《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七册·页177—178，

“头龙生编着：《毛泽东经济年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页423·“李先念：〈关于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的报告〉

（1958年6月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隔》，第七册，页276·

舫毛泽东：〈。于向军委t议印发李先念第二个五平财政计划要点的批豁〉〈19”年6月18日〉·载《建.以来毛泽东文情》，第七册，页273·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农业大有希望》报告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买勿。·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7—1959年）—大跃进运动

· 三、据二十个省市统计加估计，今年夏收总产量达到951亿斤，去年是596亿斤，今年比去年增产355亿斤；四、按夏收推算全年粮食总产可突破5200亿斤，增产可达2100亿斤。这样，今年即可超过八大规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粮食产量指标。」毛泽东于25日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是一个好消息。」又批，「克诚办。办后，将此稿送小平，印发在京各中委、各部长。」可见毛泽东的喜悦之情。‘7

在此期间，谭震林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6月25日，谭将自己在会上的总结报给毛泽东说：华东闽、浙、苏、皖、上海四省一市今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多亿斤，比1957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完成了。全国粮食的产量，更使毛泽东感到兴奋，公开发表。

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

68 这个消他将谭的总结报告推荐给《红旗》杂志，

3 省委书记与科学家的论证

在一片欢欣鼓舞声中，也并非没有人私下流露出一丝怀疑·

此，在报道高产卫星消息的同时】报刊上高调批，1J「怀疑论」

条件论」，《人民日报》7月23日社论〈今

和「唯

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甚庆？）

宣称：我国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

「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

论〈年底算账派输定了〉

8月3日社

8月13日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都

弓一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省委书记和有的科学家也参加了这场大合唱。

钉毛离东：颯日》储《毛摊东阵

〈关于向军委 t 议印发邓子恢夏收增产统计报告的批语〉（19,8 年 6 月载《建. 以来毛潭东文稿》. 第七册·页 289 — 2 叩”

q949 — 1 够 6】），上册，页 8 乃一 826,

第二章大跃进和人民查社的具起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6 月 15 日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就河南省小麦丰收发表谈话。吴芝圃理直气壮地批驳对农业大跃进抱怀疑态度的「悲观论」者说：

在去年，不少的「悲观论」者，曾引用「河南地瘠民贫，耕作粗放」、「小麦是低产作物」等「论据」，‘断言今年只能增产百分之几，绝对不能增产百分之几十，但今年全省不分山区、沙区，平原和灾区到处丰收，小麦亩产千斤，已成为普遍现象，表高的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创造的钦产纪练每饮达 3530 斤。事实雄办地证明了：小麦不仅不是甚么低产作物，它已经迈进高产作物的行刊了，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总路线，不论在甚么地方，生产都能大跃进。所有的「观期派」和「秋徒算账派」，他们在河南永达也看不到他们的「潮」、算不出他们的「账」了。”

6 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署名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酌。钱文认为，现在亩产 3000 多斤不是顶点。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

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

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 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裹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极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 t 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二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倍！」文章还说：「只要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

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这

的〈吴芝圃同志就河南省小麦丰收发表的谈言辞·《人民日报》，1958年6月15日；（新华半月刊）·1必8年第13号，页79一恤。

70（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绿），第二卷，上研，页2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专11，铭一1961）—鸟托年运动

钱文不只对二三千斤的亩产记录作了肯定，而且为亩产四五万斤「卫星」提供了「科学」论证。

只弯储一鲈宁』州 j 权占占取不．亡 p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7月1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扰食增产有限论」〉。文中说道：

农业生产是一种人与自然的斗争·对朴这种斗争·存在看两种不同的看法：从刺1'.I 制度解放出来的人民是力求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呢，还是甘心处朴自然的主宰之下而成为它的奴隶呢？在 r 粮食增产有限论」者看来，犬自然神秘得很，不可能为人们所认识，人们更不可能改造它。我们共产党人 A. J 认为·自然蚤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当人们正确地掌很了自然的规律，鱿能够驾驭自然·改造自然。

文章进而说：

今年的粮食增产还只是在水稻增产的辽程上垮出第一步，如果需要的话，到1962年广东就可以达到钦产粮食3000斤或者更多一点。一向被认为是低产作物的小麦，今年尚且出现钦产7000多斤的纪练，那么，高产作纷的水稻·在广东一年可以种三造，达到钦产一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7，

这就把人的主观意志夸大到极致。陷入了主观唯心论·

7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布《1958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说：1958年夏收柜食作物总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上年增长413亿斤，增长69%。平均亩产187斤，比上年增长70%。在夏收粮食作物中，冬小麦总产 t 达到689亿斤，比上年增长279亿斤，增长铝%。平均亩产193斤，比上年增长71%。并据此宣称：f 今年我国71《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上册，页2巧·

第二幸大举退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小麦总产量已经超过美国。」”《人民日报》据此发表社论饶：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夏季生产大跃进的伟大胜利，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争取今年秋季生产大跃进的信心。既然一向被认为「低产作物」的小麦都能以 71% 的速度跃进，那么高产作物的水稻、玉米、甘蔗为甚庆不能更加大地增产呢？棉花的产量为甚么不能跃进呢？我们要乘胜猛进，毫不懈怠，· · 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4 各方人士的现场调查

省委书记们拍着胸脯批驳「怀疑论」—「悲观论」，可能有一种政治上的考虑；科学家的论证，该是比较「客观」的了；更何况还有实地调查呢，

8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冒莽载，石正章、檀英和三人写的〈发射早稻高产「卫星」目击记〉。文中说，

到了安欢老机坠整高丰社以彼一股办喜事的气氛佳烈地感染看我们。在一个不大的庄子果，停放许多汽车。社员们笑容满面地接待远方的来客·客人中有上海来的·有四川来的·有贵州来的·有辽宁来的，也有从安徽省各地来的”这个社的一块早稻丰产试验田就要收割了。不论主人和客人·个个都怀着喜悦期待而又激动的心情·要看这颗早稻高产「卫星」究竟有多大。

72 公报说‘按最近数字，我·冬小麦，春小麦合计总产量为 779 亿斤（未收春小麦以 90 亿计），而据美国农业部 7 月 10 日的估计；美国今年的小麦产量为 13.4349 亿蒲式耳！每蒲式耳为 27.22 公斤），相当于 731.3 亿斤。其中冬小麦为 11.2972 亿蒲式耳 1 相当于 615 亿斤，春小麦 2.13” 亿蒲式耳·相当于 116.3 亿斤·今年我·小麦产量至少超过美国小麦产量 40 多亿斤；《新华半月刊》，取 1958 年第 15 号，页 105, 73〈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甚庆，》，《人民日报》社论·1958 年 7 月 23 日；《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15 号，页 107. 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曾春（”” — 1961）— 为托年运动

当我们走到这块「卫星」田的时候，都禁不住惊叫起来：「好伟伙·长得这么好的一块稻！」这块田呈长方形·共一亩零闲屋二毫，田农长的稻子就像堆的稻场似的，足足有二尺多厚·最厚的地方有三尺以上，一眼望去，田面上铺着一片金黄色的稻穗，挤得满满的，很少看见叶子·因为叶子都压到稻穗底下去了。我们用手拨开表面的一层稻穗，看到下面还有一层一层像平铺的稻穗。有个同志用手括进去·惊喜地说：「啊呀，好像指在稻箩农了。」社员们又随手搞下几个稻穗数了一下，最多一穗是三百四十粒，一穗是二百九十七粒，最少的一穗是二百零六粒。这块田是采用2×3寸密植的·每亩约有十一万穗，二百四十万穗。用力拔起一株稻来看，叶子有四五分宽·稻秆非常坚硬，有筷子那样粗。稻秆几乎一根挨着一根·密密的挤在一起了·约成四十多度的角度一边倾斜。一个社员告诉我们说：「在抽穗成熟以前·每株稻都笔直的立着·约有中等身材的人一般高。灌浆以后，稻穗沉沉下垂，压弯了腰，此渐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这位社员又说：「稻株没有倒伏，我得密植原因之一·一根紧靠一根·要倒伏也倒不下来。」这时很多参观的人在田边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农业科学工作者正在采集标本·摄影记者和摄影员正在寻找异乎寻常的稻穗·上海、四川、贵州等地参观团的同志，想从田中挖出一平方尺全熟水稻·进行科学研究。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走进田去，只好在田两角挖了两块。我们仔细地观察这块早稻·想趁前几天在一个农业社·有个社员曾经形容他们的早稻说：「我们的早稻长得连一个雄蚕蛾在稻面上也滚不下去。」现在看了这块早稻田以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这块田平铺着的两三尺厚的稻面上·不是放上个西瓜也不会摔下地去。收割这块早稻田的社员·不管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没有经验。7日上午·社里动员六十多人来收割·从11时开镰·到12时只割了一亩多·中兵安徽省委书记闪传荣在田里看到人不约，息的直喊：「怎么只来这几个人挑稻呀·赶快增加人。」后来增加社员三万多人，从下午2时起边割、边打、边运·经过曝晒以后通

第二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秤。这样一直干到下午6点半钟，才将这块早稻全部割完。初打一遍，但稻秆上的稻粒仍未打净，第二天又打了半天多·直到下午4点才最

徒打完” 割稻的时候，田里站满了人。放着十五个禾桶，前面的人把稻割下，后面的人随着拿趋就打。一面打，一面就有人把稻捆和稻秆运走。因为稻子又密又壮，割打都十分费力，割一会就要另换镰刀。一个社员说：「真是怪事，今年割稻真是过瘾了，愈割愈多。往年收打一亩田稻，三五个人一天就行了，今天三亩多人一天还对付不了。」

J

在收打过程中，最紧张的时候是八日下午。这时每个人都急切地想知道这最后定下来的产量。过秤的地方挤满了人。很多眼睛注视着两把算盘。「一万四了」，「二万五了」，「一万六了」，随着产量的增加，人们的情绪像潮水一样不断地高涨着。庆祝会开始了，当计算小组公布最被计算出来的产量是年产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七斤十三两的时候，全场都沸腾起来了。锣鼓声、杂炮声、欢呼声、掌声合成一片。一个社员扛着一面巨大的红旗。爬上一座像小山的稻堆顶，这时摄影师把这个动人的镜头拍摄下来。庆祝会上，很多参观团的负责人炊质词，庆贺。他们欢呼这个伟大的胜利，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一

/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省寿张县调查组的一封信，题为〈人有多大瞻，地有多大产〉。信中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中，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至二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很平常，一点也

74，荒君·石正章，擅英：〈发射早稻高产「卫星」目击记〉，《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转引自沈久果等遗稿：《老新闻—共和国往事（1956—196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166。

1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一千斤至二千斤，根本没人提了。他们的措施是在足水、足肥、深翻土地的基础上放手密植，再加上「田间管理如绣花」的管理。一

亩谷子由过去的三万多株密植到一十万、二十多万株。《人民日报》加的编者按说‘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裏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敢发思想的问题。’，

一向豪爽、正直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本来对这些卫星感到疑惑，但在亲脍实地转了一圈以后，也被蒙住了。9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陈的〈广东番禺县访问记〉。文中说：

今年‘月间·，或到四）11省内江县项江农业社去了一趟。那哀田好问营生的巨大变化，第一次引起了我思想上的震动。我亲眼看到了五万斤的番茅田。去四川访问前·在北京谜说有人要搞这么高的丰产试验，不怎废相信。根据个人的经验·单位面积产1一下子要提高这么多·实在不容易一下子想得通。到现场一看，信服了。最近，总说广东有钦产一百万斤番答、六十万斤甘蔗、五万斤水稻《是一次播秧耐不是并尔的）的高产试验田，这引起了我思想之的第二次震动。所以有番禺之行。9月4日上午，我们走出了广州市郎，到达番禺县大石乡。我首先去参观那块番签试验实·这块试验田像个苍单的山岗，又像一幢幢练色的楼房，雄伟的气势，远这就吸引住我。最初我还想，一钦田收获一百万斤番薯·该要指多少薯苗？桥得下插不下？插下了，要长薯块·薯块又往耶东长？ft1了现场一看·一问，其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这块一欲五屋地的试验田，是用土垒成了七垄高达八尺的梯形的高畦。每吐插薯笛六千株，一兵有四万么千株。乡党委书记解绎说：每株年产二十五斤（徠取分期抽挖答块和间补薯苗的办法》，合计一钦全年便可产105万斤。这块试验田充分体现出人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实绿》·第二卷·上册·页227—228

第二章大军这和人民介执的兴起

143

民群众的无比创造力·他们的高度的科学水平。它的特点是立体种植，「高空」杏展·这就大大扩大了种挂面积，使天！的薯块有「容身」之地。在梯形的高吐上格上四层的金字塔形的行架，把密密麻麻的薯双挂翘来，这枕不但可以避免苍茭与薯块分争养分·而且扩大日照面积，增挫光合作用。追肥，用的叫做「按位施肥」辨法，群众也叫「打针」，它的作用是把肥料施，11人们预定的位置·引签块期

车

三小社并大社的由来

1958年兴办人民公社，是由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而来。办合作社要办大社，就毛泽东而言，也是由来已久。

1 毛泽东的大社情结

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起始，单干还是参加互助合作，就被看成是农村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互助组被看成是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实行土地入股，土地和劳力参加分红的初级合作社】触于半社会主义；只有土地和主要生产工具都归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的高级合作社，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基于这种价值观念，伴随看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贪多」、「贪大」、「求纯」（数量愈多愈好，规模愈大愈好·公有化程度愈高愈好）的偏向时有发生。1953年知1955年，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意见，中共中央曾两次纠正急躁冒渥，整顿社队规模。

对办大社，毛泽东则持有自己独到的意见，就在1953年第一次纠■汗急躁冒进，各地整顿工作取得成效：生产形势趋于稳定的时候·毛聪付指陈伯达说，中央农村工作部反冒进变成了「冒退」的不实反映，76开始对上半年的反对急躁冒进不满。1953年10月15日，在农业互助合作第三次t议召开前夕，毛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盲谈话时，就强调搞合作社要搞大社。他说：

76《邓子恢传》。辑委员会颈：《邓子恢传》d匕京：人民出版社，1,,6), 页邻·

第二章大跃进和人民介社的兴起

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责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晨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归寡抓独，问题说解决了。·一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挤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兀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犬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织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这·不一定去解饮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奔·，？

在谈到城市郊区合作化问题时，毛说：「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他甚至提议，「在城市郊区，蔬菜生产搞互助组，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⁷ 容

在这裏，毛泽东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不只要求「办大社」，而且希望办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因为，在他看来，「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只有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即改变农民的个体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改变资本家私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才最终战胜了资本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才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

1955年下半年、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热潮。在此期间，各地党委纷纷向上报告本地组织合作社的经验，为推动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选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956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5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78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页3加、306”79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页299，

11月4日》·载《中共党史》·1卷珍），页2外一深取·

1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49—1961）—乌托邦运动

发行》，并亲自为每篇文章写了编者按语。其中对办大社、高级社的经验尤为推崇。

中共新海连市委的文章，介绍了一个拥有578户，占全乡可组织农户93%的大社（全社劳动力1568个，入社土地3344亩，另有新垦荒地2200亩。租入土地350亩）—朝阳乡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六大优越性：大力平整了土地；实行因地制宜种植；进行了各种技术改革；扩大了复种面积，改一熟田为两熟田；低产作物改高产作物；发挥劳动力

的作用，进行各种基本建设。结论是：「社愈大，优越性愈大」。80 毛泽东为该文加上〈大社的优越性〉的标题，并在编者按中称读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一阅·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

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介绍了北京郊区东冉村乡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并与该乡四季青社合并成五百多户大社的经验。毛泽东为这篇题为〈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的文章，写编者按说：

80 中共新海达市委员会：〈大社的优越性〉（1959年9月21日）

《社会主义高潮》，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页619-

81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页1。

，载《中国农村的社会

第二章 单干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对单干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这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现在办的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应当取得群众同意，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如果能够在这两年使得每个区都有一个至几个这样的合作社，并且在群众中显出它们比较初级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那就可以使以徒几年的并社升级工作，获得有利的条件。这个工作·要同发展生产的全面规划配合起来。当着人们看见了大型社和高级社比较小型社和初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当着人们看见长期规划将给他们带来比现在高得

多的物质和文化的水平的时候，他们就会同意并社和升级的。

“1

1 不——！·—！·

关于大社的优越性：还有北京市上报的另一篇文章“〈红里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对该农庄从 1956 年到 1972 年的发展，分别作了土地利用规划（土地连片，划定轮作区，建设庄员住宅区，修建排水沟渠工程，公路干路和防风护田林带）发展养畜业规划（到 1962 年全农庄拥有大小乳牛 1900 头，集体饲养种猪 325 口）；培养技术干部规划（七年内培养畜牧兽医四十名，养牛技术人员二十名

，农业技术人员四十五名，果树技术人员七名

，养猪技术，蔬菜技术

林业管理技术人员三到四名）：文化福利设施规划（从

1956 年起，各大队建立托儿所，阅览室和小型俱乐部各一处，在农庄中心区建立中学一处，1957 年以前干部和青年庄员全部扫除文盲）等等。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并对办大社寄极大期望，他在编者按中写道：

82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页 285—28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9—1961）——乌托邦运动

这是一个全乡一千多户建成一个合作社《他们叫做集体农庄·即合作社》的七年远景计划·可作各地参考。为甚么要有这样的长这计划，人们看一看它的内容就知这了。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貌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五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日，

以上几例，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办大社、办高级社的热情，和他对大社、高级社将使中国农村面貌根本改变的厚望。

2 农业社规模的起落’

毛泽东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发行，使 1955 年秋冬掀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进一步升温——初级农业社的并社升级的热潮。1956 年 4 月 30 日《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说：在农

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同时，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了适当的合并，由于小社并大社的结果，3月底的社数比1955年底减少了81.6万个，户增加了31他万多户，平均每社已由四十户增加到九十八户（初均五十户，高级社平均250户）。”据数据显示，当时盲目办起的大社，有一两千户，甚至五六千户的联村、联乡的高级社。1956年3月，四川省的高级社平均每中烟“户，千户以上的大社三十一个，最大的社1唧多户。同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社平均每社367户，最大的千余户，一乡一社占社总数的86.84%。云南省文山县石洞乡：还出现由土、苗、保、仆、汉五个民族组成的有403户的红旗高级社。。a3《中·晨村的杜t主义高潮》，上册，页3u

“刘·。主，：《中·人民共和·t绿》，第一卷，下册。畏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的4》，页1叩10

舫为ft民：《农业合作化。动始末》啡京：中·青年出版社·州91·，为一3o9·

第二幸大跃进和人氏合林的兴起

像这种大轰大哄发展起来的大社、高级社，必然带来生产的混乱和人心的不稳定。当年，山西省汾阳县与中外驰名的汾酒之乡一杏花村为邻的贾家庄海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一例。

在全国批判「小脚女人」的影响下，中共汾阳县委为尽快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作出了r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的规划。贾家庄乡政府1积极飨应县委号召，决心在三年内实现一人有一亩水地的任务·贾家庄是全县的先进乡、全乡有四个村、都组织了初级社。但在开展水利建设方面，因自然条件不同，都存在各自的困难。西陈家庄村大人多旱地多，发展水地缺水凉；太平、董寺两村，地下水娠丰富，但村小人少，力量不足：无力开发；贾家庄是下湿盐碱地多，要改变湿阴碱地的面貌，需在下游挖通退水渠道。在「化」得快是积极，「高」得快是先进·社办得越大越光荣的思想指导下：乡政府认为把四个村合在一起，办成一个社，这对兴修水利和发展生产将是有利的。经四个村干部同意·由乡政府申报，县委批准，1956年农历正月饥日正式成立了海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四个村17300亩土地全归社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分红】实行由社统一核算。除社员

自目地外，集体经营部分全部按劳分配。各村的债权、债务，以及牲畜、农具作价等账务都移交海燕社处理。

海燕社成立后，对农田水利建设，扩大灌溉面积，平田整地创造了条件。但由于高级合作化发展过快，规模过大，突然取消土地分红，富村群众感到吃亏。1956年盲目强调改变耕作制度，不顾客观条件，把棉花种到4093亩，玉支种到4093亩，两项种植面积占到全社耕地面积的72.1%，结果，有879亩棉花没收成，2000亩玉支种在盐碱地和下湿地裹，产量很低，其中有304亩颗粒未收。贾家庄的粮食总让汕，1乃6年为32.5万斤，比1955年减32%。社员人均分配收入六十八元，比1955年减收33.7%。“

86 山西省份阳县农业合作化史编委办公室安广搜·任达甫、王林强；〈贾家庄农业合作化史〉，《t代中·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纤：《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0年第4期，贾40—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胄喜（1955—1961）—鸟托年运动

鉴于各地出现的种种问题，195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对合作社的规模作了如下规定：

合作社规模大小·森合作社组织建设的一个t大问题。现有合作社的规模多数是合理的，但是部分地方也曾一度出块片面责大的伪向·给忽营管理和合作社内部团结增加了一些困难。中夹认为合作社规模的大小，应该根据有利朴生产·有利于团结，适合当前的管理水平·便朴联击社员的原则加以规定。在目前朱件下，合作社的规模·山区以一万户左右，止陵区二首户左右·乎原区三育户左右为适宜·超过二首户以上的大村也可以一村一社。今技建社并社的时候，应诚按照这种婉模进行·至朴现有的犬社·凡能办好的应该努力辨好·几不*.] 朴生产，多数社员要求分开的，应该适当分开。与论并社或分社，都必须经通协有确青取得合作社拎部、社员的自显·决不能只由上面机械规定，弦制合作社执行。87

这个规定，虽已大大超过初级社时的规模，但总算有了一个户数的约束，1外7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又接连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

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指出：

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当前生产条件的，也证明中央 1956 年 9 月指示中规定合作社规模的一般标准，是适宜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

87 《时代中·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页 392。

第二章大军这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小。今复社的组织规模一般应以万户以上的村为首位，实行一村一社，有些通小的自然村，相隔又很近的，可以几村办一社。通大的自然村，可以一村一社，也可以一村数社……根据生产队的规模，一般应做以居住接近，二十户左右为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规模确定了之后，应该宣布在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B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经过 1956 年和 1957 年的多次整顿，1956 年春高级社的平均规模为 250 户左右，年底缩至 200 户左右，1957 年社的规模继续缩小，平均减至 150.7 户左右。另有材料显示：1957 年底，高级社平均为 158.7 户，较 1956 年底的 199 户减少 40.3 户，较 1956 年 1 月 268.5 户减少 109.8 户。与此同时，有关生产管理的“三包一奖”制度、劳动分配制度也基本落实，社员情绪趋于稳定，1957 年也取得了好的收成。

但是，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深入，《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公布，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兴起，新一轮的并社升级又开始出现，使刚宣布社队规模“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这句话成了历史。

3 成都会议的决策

毛泽东最初主张办大社，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小社不能办大事，只有大社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和建设。这个看法，在 1957 年至 1958 年冬春的农田水利建设中似乎得到了验证。1957 年秋，党内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批评反冒进，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随后，全国农村掀起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热

88 《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一编》，页 450, 89 《中国农业合作史
卖料》11989 年第 1 期, 页 26 • 90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 页
343 •

•, ' 细 1 澜 1 田顶坛 IJ 让坛酒 j

1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四卷 (1, 58 — 19' 1) 一鸟托年运动潮。
一些跨村的工程建设遇到了社与社之间的矛盾以及劳力和资金方面
的困难, 许多地方一些农业合作社自发地合并成大社 f 试图通过并社
集中劳力、物资和资金, 解决面临的问题。

四川泸县的并社工作就是在冬季生产运动的高潮中进行的。当时, 具
修水利、积造肥料和改良土壤的任务很大, 而全县平均每个农业社只
有六十多户, 人力物力都感不足; 在土地方面, 也由于小社分布零散,
不便统一规划; 特别是不少农业社领导骨干薄弱, 财务制度混乱, 严
重地阻碍着生产的发展 • 广大农民纷纷要求并小社为大社。中共泸县
县委决定进行并社工作, 在春耕前夕把全县三千多个中、小农业社
合并成七百多个大社, 社的规模平均在二百五十户左右。91 其间,
广西也出现并社现象。

毛泽东得知后, 引起很大兴趣。他在 1958 年 1 月的南宁 t 议上,
: 「可以搞联邦政府, 社内有社。」后来正式提出小社并大社的。”
并指示中央有关部门起草《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
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1958 年 3 月, 成都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4 月
月上旬,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后发出。《意见》指出:
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 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一缘
作机械化 • 在这种情况下, 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通小 • 在生州。
森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 •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
化革命的需要, 在有条件的地方, 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
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 , ,

中央政治局同时批准的还有《中共中央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舫。

《意见》首先强调: 「有广大农民参加的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

《人民日报》, 1958 年 4 月之 3 日 •

苏一波: 《若干 t 大决策与事件的回。》, 下卷. 页: 29 •

中击人民共和一。家农药委员会办公.。：《农业集.化，要文件 t 编（1”8-乱” “》·下禺叫 1 京：中共中央言校出版社，1””，页巧’ 九屹钧

第二章大众退和人民介秘的兴起

动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全国各地应当普遍地积极推广，并且经过这个运动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因此，「不要单纯等待农业机器，而放松了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推广」。《意见》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七年内（争取五年内做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农业机械的制造，除了大型的和技术要求较高的农业机器以外，一般的应该以地方工业为主。为适应农业机械的生产和修配，应当在县，乡设立农机修配站。认定：「实现农业机械化，主要靠农业合作社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机械化的事业办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这样，一种打破社与社界限和工农业分工的大社，就在适应 r 农田水利化」、「耕作机械化」的要求下，，纷纷出现。

4 月 12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联乡并社发展生产力〉为题，报道了福建省闽侯县在 3 月间，把城门、下洋、龙江三个乡合并为一个乡，把二十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一个社的消息，并用「编辑的话」的形式，将中央把」、社并大社的意见的主要观点公开发表。在全省开展并社工作，辽宁省和广东两省是走在前面的。辽宁省在 5 月间进行了 / J’ 社并大社的工作，将 9 以刃个社并成 1461 个大社，平均每社之以沁户左右，其中万户以上的社九个，最大的 1.8 万户。并社的同时，调整了乡的规模。全省由 2854 个乡合并成 1226 个乡，基本上实现了一乡一社。中共辽宁省委农村工作部，在总结全省并社运动来得如此迅猛的原因说：这次群单性的并社运动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从 1956 年起，全省就办了 399 个千户以上的大社，这些大社办得都不错，在生产上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冬今春在农村掀起大规模的农田水利高潮之后，很快就显示出，现有社的规模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矛盾。小社不但许多事情没

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文件。编化 958 — 1981
玲·下侨·厦

([1958年3月22日)、载《农业集体化重要 17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 — 1, 61) — 乌托邦运动

有力量举办,而且使人们连想都不敢想,既限制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正如群众所说:“社已经成为大跃进的绊脚石。由于大社优越性的实际教育和生产的迫切需要,所以群众对小社并大社表现了强烈的要求。领导提出并社以前,群众纷纷向领导上申请并社;领导提出并社之后,便马上行动起来,表现了一种势如破竹的气概”。95

5、6月间,河南信阳地区的遂平、平舆两县的小社也先后都并成了大社。7月下旬,农业部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地区农业协作会议:肯定并推广了辽宁的经验。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都准备在秋收前后着手进行并社工作。“

由于不少地方的并社是在原有行政区划内完成的,实际上已在向乡社合一,政社合一转变。但在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名称。在河南省,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辽宁省盖平县一个大社称「太阳升共产主义农场」,四川有称「国营农场」的。然而,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间,这时已开始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了。

四人民公社的出现

1 中央领导人「吹乌托邦」

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从来是作为最高纲领来提的。但在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以后,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似乎已经不是原来认为那么遥远的事了。《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就写有这样一段话:

”中共辽宁省委农村工作部:《辽宁省并社运动》(1958年9月),载《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编》,页472”

96《人民日报》·1958年7月21日·

第二章大军退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前,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

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5月17日的讲话提纲中则明确提出：

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之类的口号，也不提列宁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即共产主义」的口号，而提我们的一些口号，反而快些好参，为甚么？

我们的口号高明些，干部、技术。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随着大跃进形势的发展，人们对赶超英、美，以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愈来愈乐观了。

乡社合一的主张最早是陈伯达提出来的。1956年冬，陈到福建莲塘乡搞农村调查：1957年初给中央写了个报告，提出很多意见，其中就有：一、「可以把乡（村）和社合在一起，使合作社成为真正的基层；二、可以考虑把供销合作社和信贷合作社并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央书记处讨论后认为，「这两个问题牵扯较大，必须慎重考虑」，决定暂不实行。但据胡乔木回忆，（1958年）2、3月间，毛泽东跟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甚庆都管，工农商学兵。这是同陈伯达个人的谈话，当时还没有在中央讨论过。

97 毛泽东 1955 年 5 月 17 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 1 卯 ‘

”《陈伯达同志关于福建莲塘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些问题向中央和主席的报告》，（1957 年 1 月 7 日）

99 周承思：《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中共党史研究》，， 娜年第， 期·

1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论·，，二‘·权。：：J’一驯，，r 上中奋勿，斗夜计，，’‘万艺 r 止忿 1 斗‘，‘卜涌黝计··一方‘乱妒鸟斗，。名·会茫乏 t”； 1，’ ■r 计蕴边 j

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中，地方工业也遍地开花，农村劳动力哄抢紧张。有的地方为了尽可能多地将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开始办起了简陋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为了让青年农民学到农业技术，吉林省延边地区，河南省的登封县，湖南省的浏阳县等地的农村办起了「农业大学」。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开始议论起共产主义公社问题。薄一波回忆说，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1958年11月7日刘少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都谈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最早议论共产主义公社的情况。刘少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

「. r, !, . . . c. , • ,] 、 、 " ; . J' ‘滥洛边？艺·透：：' 、 、 很朱浩边各’ 呈夏神涩烟弓

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邠州火车站—薄一波注·下同）跟吴芝圃同志谈过。在去广州开会（1958年4月底去广州向毛泽东汇报八大二次会议的筹备情况）的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夕卜就吹公社·吹·鸟托邦，吹过渡到兵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北为兵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徒一个阶段革备练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 . 1 造样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二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咸，半工半读·要外力群去骗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 f. 1 斯论兵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合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耳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徒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是河北省的省会）试验。合社就是这

第二章大单还和人民合社的兴起

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奎言农边讲了这个东西。’ 00

5月19日】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发言结尾部分说：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来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社会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镇公社围绕大城市，又成为之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事业和其它文教事业，也将期看这个目标去委展。10，

据薄一波分析，虽然陆定一这段话也包括刘少奇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达毛泽东在广州向他们四人谈的内容。102 陆定一返回北京后：根据刘少奇交待的任务，立即组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全力突击，于6月间编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的初稿·8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编者的话」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之下，人们都不能不关心看我国将如何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为了启发思考】展望未来的前景，我们就编了这样一本书来供大家学习和参考·少 03 书中第一条语

薄一波：陈清果、薄一波：

\

《若干，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731 宋广渭：《陆定一传》
《北京：中共写史出版社《若干 t 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733

一刀2, 1999》

页448·

人民出版社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共产主义社 t》（北京：人民出版社：195 引

0，蠢『乙化）蠢 U(U-1110，基，么唱■ ‘ ‘■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 铭一 1961）一为托年运动

录，就是恩格斯 1845 年 2 月 8 日，〈在爱北变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公社」，并认为「在这种社会裏，管理机构必须管理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一切方面」。薄一波在回忆中说：这部，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看来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向与会者推荐这本书。“

2 陈伯达披露毛泽东的设想

7 月 1 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第三期，发表陈伯达的署名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着重介绍了同期发表的中共湖北省鄂城县写的：〈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小工厂〉和〈旭光一社是怎样领导和管理小小工厂的〉两篇通讯。陈文指出：

这一个合作社的情况，是高度赞扬地方首创精神和群众首创精神的一个光彩夺目的典型，在实际上是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普这高涨的一个缩影。所说的「这些小工厂办得快、生产快、收效大」，恰好说明地方的、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迅速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斗争中所将起的作用” 通通这两万通讯，我们看到在犬跃进中的中国，看到全祈的社会，全奇的人，一用毛泽东同。忽的话来说，他们正在原来那个空白点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表美的画图」

文章具体介绍了旭光合作社的九条做法，其中第一条：「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然后得出结论说：

10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736·

第二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可以不可说，这个合作社的所作所为，在实际上是指出了我国能够以史无前例的高远度姿展生产力、能够比较迅速地消灭工业同农韦之间的区别以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区黝、从而为我国从社会主义通泪到共产主义，.1 造出项利绿件的一种正确道路呢？我想，完全可以这末说。

两篇通讯的题同，都很谦逊地写着「小小工厂」的字样，但是，这类同农业相结合的合作社的 r. 卜卜工厂」，却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因

为它们所代表的，是不可抵抗的、新生的、前进的力量。是共产主义的力¹。

如果说，上文把农业合作社办工厂，看成是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了一条正确道路，并第一次使用了人民公社的名称。那末，陈伯达同日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大会上，作的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长篇演讲¹就在公开场合，从历史到现实，引经据典，透露了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基本构想。他在演讲中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著作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可以律取的十项腾绝的最徒两项是：「将农业同瓜案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差别状态逐渐消灭」：「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在现在中国的实际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所提出而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它所包含的几个奉本点正在使这两项措总的实现条件和具体形式，逐步明期化。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式装）」组成为一个大介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塞本单拉。在这样的介社表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们的精神生活；全民式装是为看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创，1] 人的制

亩观讨 n 针〔七、■r 右啊付飘 n 打蒲付刘 n 州鳃二驯剧划引驯州木，
‘么〕数叫刘刘

’ 颯斗，J 膩帮个露 ‘驯驯引励励

1 恤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0）幼一鸟托年运动

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辟朴这种杏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烟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适波到丢产主义的为期不长的前景。」”

，月‘r州.J, 1.-’ 挝个’, ’J澜史“，领刘‘1., •. 州, 生7绸,. ’J’, ,
鳃, 州. 澜累‘1右届, 跑由*, j口, 也r, 喊‘(’r’;. 1唱、、
关于人民公社的起源，陈伯连后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f 人民公
社，我没有感性知识，主席要我们到天津（当时河北的省会）去：到
天津后，跟安国、徐水、定县、正定几个县委的同志谈了一下。安国
的同志说过这个问题，他们有五万亩洼地要搞成稻田。他们说，既然
调了•很多劳动力，大家协作，把洼地变成稻田，就不如搞成一个大
社。」.

咏最早出现的一批公社

中共上层议论共产主义公社的信. 息，很快在各地得到了反响—有的
地方已经把合并的大社称为共产主义公社了。

浙江省诸暨县城南乡6月中旬成立的大社，就叫F红旗共产主义公社
J;6月底•辽宁省安东县的前阳地区，由前阳、新安等五个农、梁生
产合作社合并的大社，叫r前阳公社」、并且是中共安东地委和淌东
县委进行r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忿6月底7月
初，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在郑州召开农巢协作t议•谭
震林在作结论时，讲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变革问题，他说：「农业大
丰收，在农村已开始了新的变革，在合作社组织上和合作社的经营管
理上、规模上开始了变革，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那些方挤、那一套制
度、那一套形式来发展了，需要有所改变了•」「像遂

卜」：，月弱个萝州够点

珊喻

（红旗》. 1站8年第砖期。

牌一波：《若干重大决秉与事件的回. 》

下卷•页n7”

1

第二章大跃进和人民合社的兴起 161 平县喳蚜山卫星社已经不是农
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J•「华东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合作社
需要过渡，由现在的状况过疲到更高级。办法是直接到国营农场，•一
有些地方搞公社，•一大概是一万户左右」•107会后，谭震林向信

阳地委的负责人讲了一番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办公社的设想和道理。他对共产主义公社的前景作了如下描述；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杂、鱼，妥·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然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以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茎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彼，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二，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甚庆？人民介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农·不用说·装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谁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 T。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谭震林的活动和讲话说明，组织共产主义公社，已开始成为有领导的行为了。

前述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使组织公社的领导意图更明白地反映了出来。

于是，最先得到信息别南省，’月间居在并大社的基

础上·迅速掀起了组织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10日，中共河南新乡地

1价离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显》，下卷·页737。

108凌志军：《区史不再俳个一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t997），页61—62。

中华人民共和写史·第畸夺（1958—1961）—鸟托年运对

,,. ••Jjj’ 1细! .-1, j细 1细个酒驯季你必矗各妒

,, 了乱 f 作 r 舌么刘尔 t 啊刘驯膈“”观—11引

·, 委向省委和中央汇报，已办起354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5345户，其中：7月18日成立的修武县人民公社是一县一社，共29193户，8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电话汇报说，全省已建立公社1463个，占计划数的52—42%。 ,

在此期间，《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九带着任务于7月17日到达已改名为卫星人民公社的嵒嵒山卫星农业社。8月8日，李友九给总编辑陈伯达写信历报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说：他们这裹并大社，原来也只是为了并大一点，好搞建设。到郑州一汇报，谭震林和他们讲了一番「工、农、商、学、兵」办「公社」的道理】回来就叫成公社了。公社这个名词群众还不习惯，有写成「共社」的，有写成「工社」的。李还随信寄去一份《嵒嵒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第二次草稿）》，并说明这份草稿是他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崔光华、信阳地委书记路意文，在这裹「大汇合，大研究」之后写成的。陈伯达收到后，即将《简章》草稿的复制件和李友九的信转报毛泽东。此《简章》草稿引起毛的极大兴趣，他后来说：「我在河南调查之后，叫河南同志跟《红旗》杂志合作，搞了一个卫星公社的章程，我得了那个东西，如获至宝。」110

4 毛泽东视察冀豫鲁津

就在各地竞放「卫星」，兴办大社的时刻，毛泽东于8月上旬外出农村视察，以确定下一步的决心。

8月4日，毛泽东第一站来到河北徐水县、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陪同视察。《人民日报》记者康濯作了长篇报道。‘11 其中说，下午

10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缀》·下卷：页739

11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厅》，下卷·页738

111 康烟：〈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5年8月1958年第16号，页35—37·

11日；《新华半月刊》

第二章大跃进卡人民介社的兴起

4点半钟，毛泽东穿若灰裤子，白衬衣：精力充沛，满脸红光，首先到了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他向社干部问道：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社主任李江生答：「很好！比哪一年都强。」

毛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分？」

支书阁玉如答：「七百五十四斤！」

毛笑若赞叹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社裏的、全县的。

县委书记张国忠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

毛聘后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庆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红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裏用得那么多酒精啊！」张国忠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呀！」「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随后，毛泽东视察了粮食加工厂，供销社、医院、猪场、缝纫厂，又参观了幼儿园和敬老院。从敬老院食堂出来，毛对陪同的人们说：「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这裏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

毛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毛看了看张国忠说：「这个县是十一万多劳力，抽出了四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七万多人搞农业嘛！」随后又同解学恭、张明河

‘唱一，口，’必弓

一写，唱，j!!，1 卤. 1, IJ1j 谗领，言丑召，唱■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弯巷 119, 8 — 1961) — 鸟托邦运动

‘■—j 让，. 1、—户. 尔’澜渎 J•. 重让 j 洼坛含. 鸾名 ‘酒复环 • 说：「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九十多个团】二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对徐水搞军事化的一套做法很感兴趣。毛泽东走

进了一块半人高的棉花地边。他一边读美者这块经济作物，一边分开密密挤挤的孛枝向地裹走。但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说：「我钻不进去了啦！」并问道：「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李江生说：「一千斤皮棉。」

毛泽东一边从棉花地裹走出来，一边说：「那就是三千斤籽棉啰！」再往前走，毛泽东又看了黍子·玉米和穀子·看了粪堆形的山药和每条道栽四行秧子、八行秧子以及十二行秧子的几种山药·在每一块不同的地裹，都要问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庆上，亩产多少斤。毛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有人告诉毛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的红专大学。毛又惊又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

临别时，毛泽东和乡社干部一再握手，并说：「耽误了你们不少的工夫！」「祝你们丰收！秋后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在视察了河北的徐水、安国、定县三县以后，毛泽东不顾疲劳，顶着炎炎烈日，赶赴河南。8月6日至8日视察了河南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社办工业和棉田；襄城县梁庄、薛元等农业社种植的烟离和杀子；长葛县「五四」农业社的玉米田和商丘县道口乡中华农业社做的植的红薯和稻子·陪同视察的有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副省长吴芝圃，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史向生。6日下午，毛泽东到达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询问了这个公社的情况，参搜了这个公社的托儿所、「幸福院」、食堂、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又到田间观看了棉花的生长情况。他从棉花地裹走出来向社干部问：「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畏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一万余亩，大跃进和人民合社的兴翅

零五百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二千斤。」毛泽东笑着向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了，毛

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并指出，「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¹¹²接下来，8月9日毛泽东到了山东。毛对陪同视察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败龙·裴孟飞说，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他一再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还谈了办大社的优越性。当谭败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在去北园农业社的路上，毛看到路旁秆粗穗大的谷子时，接连向陪同他参观的谭败龙、历城县委书记吕少泉等人读扬说「你们的小米长得不弄嘛，我看群众干劲不小！」在视察稻田的时候，毛一边看，一边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当问到计划产量时，社主任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二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¹¹³8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视察期间他提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应建立起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他还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甚么都好办了。」¹¹⁴毛，一路视察鸟咏高，对农民群耻“劲和大”的形势十分满意；对各地所报的没无边际的高产数字，深信不疑；他对干部和群众的鼓励，使人们激动不已，《人民日报》报道说：

112 《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t3

113 《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

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 t 绿》，第二卷，上册，页 222

166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掌华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万岁！」F 共产党万岁—J「鱿鱼足玲劲 1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f」r 更快更早地向共产

主义迈进！]这些口号·参自和毛主席心速着心的人们的心坎上、心尖上。……

人们兴奋地跳起来，与奋地心神冉主地南北跑动。人们欢呼领袖·向领袖伸适手来。我们伟大的领衿，……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劳动人民会忽的眼睛看着大家·他耶大山般魁伟的身祖和海洋般宽问的颇头，发出万这光彩，照射到每一个冷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这确是如实地反映了当年群众与领袖同样火热的心。于是，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了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干劲」。中共徐水县委在毛泽东离开的当夜召开了全县的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向党和毛主席保证，定要使今年的粮食和工业等各个战线上都刘导大丰收」。全县十一万多名农民经过两天一夜的苦战，就积肥 31.46 万多车，大秋作物追肥 6.66 万多亩，除草八万多亩。中共定县县委也召开了三百多负责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全县在两天时间内除大搞积肥追肥外，并新建起化肥厂 2320 座。安国县决定 1958 年全县粮食产 t 力争达到亩产四千五百斤，为保证实现明年亩产小麦二千斤的计划，决定每亩施底肥十五万斤，全县乡乡社社都召开了跃进大会，形成一个新的生产高潮。，” 山东北园农业社的中共总支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全体社员，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丰产水稻和各项作物的计划产 t：还要大量培植各种「卫星」田；同时决定把毛泽东来农业社视察的情况写成喜报，送给全县所有的农业社，r 使全县人民共享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并且和全县各农业社携手并进，决心为实现双千斤县而奋斗。1168 月 18 日，《人民日报》随行采访的记者以〈人民公社好〉为题，第一次发表了河南信阳专区建立人民公社的新闻。文中把毛泽东在河

’。■一。菱，‘■•d 缠缠剑『犊 d 届让

115116

《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11 日·《人民只报》·1958 年 8 月 13 日。

第二幸大跃进和人民合社的兴起

南和山东关于：「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r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J的谈话内容，出去。报道说：

兵，发了

在祖国全面大跃进的纹舞下，一个由社会主义还向典产主义的伟大社会变革—建立人民介社的运动，正在河南信阳地区蓬蓬勃勃地展开。经过试辨的经验证明：这种乡社合一的、把工农商学兵合为一体·统一领导和管理的人民介社制度，更能适应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比一般合作社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更能有效地促进工农业的更大跃进，从而加速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过程：是全面姿展农村经济、文化事业、在广大农村中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好的塞层组织形式。人民介社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农业合作化制度又开始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 、 ，

全国闻风而动，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兴起。毛泽东看了报纸，连说「糟糕」。11名因为毕竟此事还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不过，事已如此，毛泽东也只好听其自然，何况从内心深处讲，他对人民公社确实由衷的喜爱呢！

逢先知在〈毛泽东与他的秘书田家英〉的长文中，有一节谈到人民公社的兴起。在说到「1958年夏，人民公社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之后，胡乔木亲自加写了一段话：

这是因为人民合社本来统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他没有想到·他的乌托邦被陈伯达在北京犬学讲了出来·这个讲话又被发表在当时 ".]N. 1 出晋的陈伯达本人主编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上（《红旗》也是在毛泽东再三衢促下 r. 1 世的）·也沈不经而 117（新华半月啊】）·1958年第17号，页6，·

118. 权延赤：《卫士畏谈毛潭东》（北京，北京出版社，198对，页31

16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58—196D—乌托布运动走，也就有一些人异林同梦中国农村的「新生事物」

·人民介社居然堂而立之丰包成为者年乱 19

,:、.匹(,.;.'!。 . F.!、■辞. '·参刘剧驯刻“啊润““舅
n“丽

r人民公社本来就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这是对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情结的点睛之笔。

,鲁、罕,中男中序j]‘,·

11,晓先知:《永远怀念胡乔木同志》,载。中海.郑惠,程中原。:《回忆胡乔木》(北取:t代中历出版社,1994)·页69·

第三章

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北戴河会议决议

北戴河会议,是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期间,还交叉举行有协作区主任会议;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

对农业高产「卫星」和钢铁翻番,在中共高层并非无人耽忧。周恩来在7月上旬,曾借着毛泽东批评有的地区报告粮食产量不够实事求是的「东风」,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指出报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并告诫与会人员,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

7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1959年的钢产t】初步提出三个方案:2500万吨)或2700万吨:或铭阆万吨。会后,周恩来就国民经济的跃进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政治局会议文件。其中提到,1958年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已成定局。同时指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戏出摊社,i卯7-,页151·

17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客(1958—1961)一乌托年运动

出,有些大协作区提出的生产指标过高,不少缺口难以解决。认为,建设指标定得过高,「可能在以后出现大的马鞍形」,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提出,对各大协作区提出的指标,应当作适当的调整。1

当时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兼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在参加华东协作区计划会议后，于7月7日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1959年产钢六百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以及电力难以相应保证计划的完成等情况·希望引起毛对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关注。’

但正如陈云当时在私下谈话说，现在热度太高。提不同意见没人听。有一次，薛暮桥和宋助文去见陈云，希望陈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北戴河会议，正是这种炽热「气焰」在中共党内达到类峰的表现。会议除重点讨论了计划、钢铁、人民公社外，还讨论了教育、财贸、劳动制度等问题。通过了《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等四十个文件。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

1 紧急动员钢铁翻番

1958年产钢1100万吨，是6月19日定的任务。虽然6月20日就作了布置，但7月份只产钢七十万吨。从1月到7月底，累计生产钢380多万吨，同1100万吨的年计划比，相差约700多万吨。8月

《周息来年谱（1949—1976）》。中誉，页156，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舟（海口：南方出版社·1990），页86·孙业礼·熊亮华：《共和·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0）页150。

第三幸天津钢织和人民介葬化运动

16日，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前一天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王鹤寿后来在一个报告中说“「今年（指1958年—引者注），在钢铁工业发展上（也在整个工业发展上），有两个伟大的日子。J指的就是：6月19日，毛泽东提出钢产量超一番的任务；8月16日，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因为钢铁翻番存在落空的危险。所以，8月17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开幕这天，毛泽东一开场就说，钢由 1,57 年的 534 万吨翻一番，达到 1100 万吨，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十三天了，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没有铁。现在（各省）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催回电话，要保证。‘为使任务落实，他多次提出：第一书记要挂帅；要保证重点；要拚命干：

毛强调说：「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邓耶有一个合作社，赶一辆大车到邓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又说，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待」。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关于保证重点。毛说，明年搞 2700 至 3000 万吨钢。五十万台机状，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拚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口匕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 卯 3）· 页 703.

毛潭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 韶年 B 月 17 日，，载李锐：《F 大跃进 J 亲历记》· 下册，页 90’

毛潭东在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 铭年 8 月 19 日，. 载李锐：《「大。进 J 亲历记》，下册 1 页 96· 97 — 98” .0 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四专（19 铝一 19611 一鸟托年运动

士九个星期，要抓十九衣· 24 号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1100 万吨钢，必须保瞪完成。经过三令五申，仍完不成任务，或者有铁不拿出来者，对搞分散主义的一，就要执行纪律。纪律处分有六种，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撒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 1100 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不完成兹

1000 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拚命干，「拚命干」三个字下面要加看重号。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彼，胶东线，可以拆除，或者搬到重要地点去。首先保证冷金设备—高炉·平炉、轧钢机，以及发电机和重要铁路、重点工程、车状，吊车。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还有 133 天·十九个星期，要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可以认为，为实现钢产量在 1958 年达到 1100 万吨，毛泽东在这裏是下了死命令的。

会议讨论中，李富春就 1959 年的计划和「二五」计划问题发言·他说，为保证在「二五」计划内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建成各大区的工业体系。1959 年要保证生产钢 2700 至 3000 万吨，1960 年 4500 至 5000 万吨，以钢为纲！苦战三年，争取 5000 万吨。李对 1958 年的估计是：农业大跃进带动工业大跃进，粮食、棉花基本上。退关了；工业是四五月份才开始跃进的，因此还要努力。他表示，钢偶 100 万吨，一吨也不能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说，争取七年时间，1960 年钢 5（取）万吨，1962 年 8（以）万吨到一亿吨，1964 年 16 亿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某些方面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可不可以设想，公社化了，粮食问题解决以后，吃饭不要钱；棉花问题解决后，穿衣、鞋子不要钱；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末·衣食住行都不要钱，就全面向共产主义过渡。’

名毛。东在第二次论作区主任会议上的缴引 1958 年 8 月肌日），载李锐‘《大跃进翹届妃》。下册，页 1 般·

，华钱；，r 大跃进么亲届记》，下册。页 101，

第二幸大练钢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陈云看重谈了钢铁生产问单·陈说，头一天各省市同志到了之后，到主席那裏去，他说少一吨都不行的，少一吨就失败·他批评中央的一些领导机关都去搞计划了，没有搞生产。陈云说，今年的钢铁生产计划能否完成狠担心，7 月份只完成 380 万吨，离 1100 万吨很远·向毛泽东汇报后 7 毛有 j\ 条指示：一、抓生产，经委由薄一波负责；王鹤寿、赵尔陆也要抓生产。二、原材料的调配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三、抓设备，尽快把设备

安装起来投入生产·四、机械工业收到材料后，第一是制造炼钢炼铁和轧钢设备。五、各省、市委每个礼拜抓一次钢铁生产。六、冶金部的直属厂要加五十万吨的任务，作为保险系数。各地也要有这个计划。七、调拨材料生产要有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绍党察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八、开一个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1a 陈云在传达毛的指示后说：我们今年要生产 1100 万吨钢。已经传到国外去了（邓小平插话：给赫鲁晓夫打了保票的）。7 月 31 日到 8 月 3 日，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期间，毛主席跟赫鲁晓夫讲：我们今年生产钢 10 沁万吨】明年是 2500 万到 3000 万吨。赫鲁晓夫不大相信，说中国的同志提出来的计划大概我们相信可以完成。究竟具体情况怎样，他不问，那是很大的怀疑。陈云还说，赫鲁晓夫那天签公报的时候，他的总厂问阿尔希波夫（Ив “红吐 iPov）（建国初期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跟赫鲁晓夫一起来了，我跟他讲，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他不回答，笑一下，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的。他是没有信心的·（阿尔希波夫这几句话，在会上引起了大家的愤慨。》”

在之 9 日的会议上，陈云谈了六条意见，一·抓好土炉子，主要关键是土炉子，否则钢铁生产今年就完不成，像主席所说就是失败。土李锐 ‘(r 大跃进江亲历纪》，下册·页 to7 一 1 卯，兴一波：《若干，大决策兴事件的回顾》，下誉·页，并·

0’，乙『A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8 一 1,61）—鸟托年运动

炉子成为今年的一个主要问题。二、机械工业的任务，首先是发动群众，挖掘潜力。三、目前存在的以物易物的现象必须制止。四、已经签订的合同要遵守。五、中央和地方必须共同努力·六、要召集一次基本建设会议。12

薄一波在会上说：「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一百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九十九个都应当向它学习。J’，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号召「要紧急动员」·对能否实现钢铁翻番，表现出严重焦虑。他说：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

就好了。6月19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8月21日起，还有十九个星期，133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了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振」，•明年1月1日能不能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今年1100万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毛借用孙中山两句警句，告诫大家：「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

在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们思想统一后，30日下午，薄一波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见毛泽东，一个一个向毛当面担保。”

毛泽东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回答说可以；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也说可以不

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

问太原市委书记，也回答可以。

投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屹6•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口》，下誉，页7师•

“毛潭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t 议上的讲话（1955年8月30日）•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121•

1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显》，下卷•页705•

第三章犬练钡织和人民介社化运动

又问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钢铁基地的市委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回答说：r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毛又问冶金部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袁宝华：「你是经常接触基眉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然后问到冷金部部长王鹤寿，王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

动员全国的力 t 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王后来检讨说：他所以敢于向毛泽东拍胸脯，是想借毛泽东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

最后问到薄一波，薄说：「主席，我建议把 1070 万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听后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 1070，是 1100 多万吨，发表 1070，那我们兜裹还装有几十万吨。」于是，薄一波马上拿起电话，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说毛主席讲了，把 1070 写到公报上。16

这时，毛泽东虽然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他眼面前出现的却是一派「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景象。8 月 31 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传达毛泽东的话：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甚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

总之，一方面，1958 年钢铁翻番的指标，存在落空的危险，使陈云不得不说出「土炉子是关键」的话。明摆着靠「洋炉子」已无法完

16. 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 页 371 — 372.

17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 127，

!— 艺 j. ■•jjjj11 澶面万

17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四卷（1956—1965）——鸟托邦运动

成任务，只有靠土炉子，各地分摊。另一方面，毛泽东仍然亢奋无比，一般地赶超英美，已不在话下，连苏联也只变成两个美国，中国则变成了四个美国，英、美、苏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了，根据薄一波的建议，胡乔木把 1958 年产钢 1070 万吨写进了会议公报。9 月 1 日，《人民日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为通栏标题，向全国发表了北戴河会议公报。公报说：

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重点。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进展。根据当

前全国人民对朴钢铁的巨大需要和对朴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姿展是铃要的和可能的·

据此，会议认为：

按照今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1~8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620万吨，比去年增产八十五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吨至850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进而，公报说：

会议经通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1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俗讹俘骗边' 签细富个届届刘夏8（驯华半月刊）·1955年第18号，页1

第三章大练钢织寺人民介社化运动

会议通过的《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规定：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800亿斤到1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亿吨，铜四十万吨。铝三十万吨，机械产量三十万吨；发电量550亿度，煤3.7亿吨，石油800万吨，化肥5千万吨，棉纱1亿件，新建铁路1万公里。为实现上述指标，并为1960年的建设作准备，在顶计的1959年国家财政收支的几十亿元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将为500亿元；地方和企业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在外。

规定1960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要达到的各项主要指标是，钢产量8亿吨至10亿吨，铁9亿吨至11亿吨，煤九至十一亿吨，粮食4000亿斤至5000亿斤，棉花1.5亿担，基本建设总投资3850至4300亿元。以上这些天文数字，大概就是毛泽东用不了一二十年，中国就可以变伪四个美国的数字基础。

2 共产主义已为期不远

与钢铁翻番相比】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对农村的形势要乐观得多。在讲到农村问题时，毛首先谈的是粮食。他说，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6500亿斤，一说7000亿斤，6.5亿人口，每人100斤·明年每

人争取达到 1500 斤，后年 2 仅刃斤，是否搞到 2500 至 3000 斤，这是方针问题，大家议一议。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发展粮食，我看超过 3000 斤就不好办了。

然后说到探耕，密植。毛说，这是目前农业的主要方向。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不探耕，水装不了、肥放不进，不能分层施，水肥再多也不行。他提出，北方要深耕一尺，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结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耕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密植的基础是探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草翻到底又可以变成肥料。这样一来，一亩可以当三亩，我们的土地多了。现在全国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叫专（1958 一幼 61）—鸟托年运动

∴ ; t 妒，他顶' q, ”刘月以此

均每人三亩地。我们向下边刨，就可以高产。苦战三年之复，土地观念要改变，种那样多的地干甚么？将来可以 t 三分之“的土地种树，然后过几年再缩一亩。过去平原绿化不起来‘，到那时就能绿化了。如果不深耕，就没有这种可能。

于是，又谈到人口问题。说，人口的观念要改变，现在是人少，不是人多了，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不成问题。但也不要提倡多子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会真正节育了。大概三六十八亿，我看不会多。”

这些议论，显然是由「粮食多了」的基本估计而来。具体到组织人民公社。

毛首先讲到「如获至宝」的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他说：

台妇么介社幸程，《红旗》杂志要注销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个人光吹·大社要典自然条件、人。、文化等各种律件结合起来。河北省，. J 子厚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兵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1”

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毛说：

名称怎庆叫法才可以叫人民介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介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查社一曰

犬二曰介。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合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复的小树

19 毛潭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7日）·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91、94”

2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7日】；毛潭东在第二次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91, 105.

第三章天津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弄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神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寥长，青年、妇女都高典，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鸦，工人的级别待遇还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罚重赏。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兵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1

对人民公社所谓的「共产主义因素」】毛大加读赏。他说：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朴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忽。· · · · · · 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跋镲打纹·不要计件工实，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青产阶级法权制度的被壤。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两本有开文件看一下·把实钱中兵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过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甚么不可以这样拎呢尸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兵产主义”合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时挂两个牌子·公社中设一个内务部（行政科）管生丸登记、婚姻、人口、民事。”

2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进」亲历记》，下册，页98”

2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进「亲历记」·下册，
页 106 — 107 ·

(1955 年 8 月 9 日) . 载李锐：《大跃进(1958 年 8 月 2 日)》·载
李锐：《大跃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 8 — 19 “《一鸟托年运动

在这农，毛泽东明确地把人民公社与共产主义直接联紧了起来。「共
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两句烦词，其理论依据出于此。

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谭震林在会上发言说：

人民公社·先要大，小才不行；另一个是尚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
制。……成都会议作了小社并大社的决定，会徒各地方采取了一些行
动，比较快点的是辽宁、广东，接着是河南、河北、江苏，浙江作了
规划·其它省份也作了些规划。并得快的是辽宁，全省都并完·一个
省并成一千四百个社；河南现在差不多也快并完了·全省原来两千多
佃社·并成一千几个：河北估计 8 月底也完了。积累和消费问题，
生活水平放在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水平。59 年计划，第一步每人一
十五斤，第二步每人二千斤·之 j

刘少奇说：大城市郊区再不要搞工业了·把农业和原有的工业结：

合起来。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社的规模大
小和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不要强迫，要大鸣大放。建立公社
有些地方要分两步、三步走，有的地方不必要·公社建立后商业就不
要了，只要一个批发部。“

虽然刘少奇在这里说】搞公社「不要性急」，可分「两步、三步走」。
但全国的形势，如谭震林所说，是一大，二公、三快，已成基本定局。
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农村
的基本状况作了这样的估计：

乃李说：《大跃进 J 亲历记》，下册，页 109 — 110。

24 李说：《大跃进 J 亲历记》，下册，页 no,

见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网：《建。以来，要文戏遗颇》，第十一册（北
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5），网石— 450 ·

第三章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此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

《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

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广，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普遍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看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关于公社的规模，《决议》提出：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虽然提到：某些乡界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可以少于两千户：一乡数社。但更强调：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反对。甚至还说：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现在就应该对人民公社的分布，以县为单位进行规划，作合理的布局。同时明确：

18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 1959—1960年为托举运动

人民公社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的体制。

关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建成以后，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但又认为：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这种全

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持续增长，逐步代替集体所有制。至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决议》估计：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关于分配制度，《决议》说，即使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仍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质量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决议》在最后，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作了极其大胆而乐观的预测：

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甚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做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套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由此，早已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进一步盛行了起来。

第三章大练钢铁卡人民查执化运访

3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围绕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8月19日，毛在讲话中说，社会主义、农民会先走一步，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

8月21日，毛又说：

要使同志们了解二鸟克思、. 忽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江开孙、分配三个部分开休·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病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休·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徒·人们的平等间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往，实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洛在·如等捉制度·领导与群众的辟孙。……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棋给制问题。通去搞军队·没有务水，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很好。……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通去我们成首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 / 一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通兵产主义生激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青产阶级作风的针么·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

2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攘大 t ‘上的镶话 (k958 年 8 月 19 日) ·载李说：(r 大跃进」亲历纪》，下册，页 9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 (. 1958 — 1961) — 鸟托年运动

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甚么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才为甚庆要搞工实制？这是向青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参展了个人主义·……是不是街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卜，·…恢复供给制·好像 r 例退] ·「倒退」统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彼退·了，尸在要恢复进步，我们今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兵产主义作风。。！

、一川川遛 IIJjjj 坛一唱 1—磬

「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提出来的。其本意是指，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的分配原则，只能是等 t 的劳动，获取等量的报酬·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事实上又是不平等的。马克思把这种平等的权利称之为：「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后来译为：r 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劲马克思阐述的这个观点，是批判拉萨尔 (Ferdinand Lassalle.) 提出的 C 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指出绝对的「平等」和「公平」只能是空想。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

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可见，毛泽东在这里大谈「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把马克思的本意完全弄反了，并且又把它与资产阶级思想等同起来。在毛看来，平均主义才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他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因此，他提倡要废除等级】废除薪金，实行供给制。进而扩展到政治、思想、人与人关系等一切方面，都要破除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通过实行「吃饭不要钱」，「供给制」，就使共产主义得以逐步实现‘毛泽东以极大兴趣极力推崇人民公社，与他认为人民公社将利于消灭一切差别，使绝对平均的共产主义理想变成现实是一致的。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8月21日），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103—106。

28 张仲实《〈对于「资产阶级法权」一语释义的意见〉·载中。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二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页541—542。

2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页11,12”

第三章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得到了柯庆施的快速响应，柯指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写文章。张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为题撰文，对战争年代供给制的军事共产主义大加赞扬，说它“标志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实行薪金制是党内不少人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于是提出，在大跃进的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党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光荣传统，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30 张文发表在1958年9月16日出版的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刊—《解放》第六期上。毛泽东阅后，很是赞赏。（《人民日报》10月13日转载时，毛亲自写了编者按，

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目。文章又通俗易懂，才良好读。

此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在全国引起讨论。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就有四五十篇之多。上海市社科联组织了六次专题座谈，并出有专辑。可见，在当年共产风盛行之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象之大。

对这个问题，胡乔木在 1980 年代曾有过多评论。他说：

《哥达纲领批判》有它的负面影响。当然划分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有很大好处，但是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法权。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没有讲，讲了一个物资的极大丰富、犬量涌现，前提是人的全面发展，从分工中解放出来，不是反过来讲首先奎展生产力。以复，. j 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青产阶级法权说 30 张春桥：《破除卖产阶级的法 I. 思想》，《人民日报》，19 铂年 10 月 13 日。

18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面客（1958—1961）—乌托年运动

，。〈’，；。‘州’ j, f. ■！。

死了，说生产实料所有制方面的青产阶级法权已经钊争了，但在交换范园东的青产阶级法权还没有裁夺。既然有实产阶级法权，统要有青产阶级哄家，结果此好像真是一个青产阶级国家。从实产阶级权利到青产阶级国家已经走得很远了。这样沈可以刘出贝特兰的理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徒，就要搞通渡，沈要拉平，不要昔力鸦生产。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平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平等。j,

实事束是来说，毛主席在入大以复，他针中国社会主义怎么赛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在党内有时可以暂时地表面上得到多数的接受，但是实际上多数同，忽是不赞成的。毛主席认为要搞社会主义，从 1974 年理论指示所说的，表现得比较清楚，他沈是要限制商品，限制货币，限制工实这几样东西……一从 1958 年成都会议上反对实产阶级法权起，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到 1958 年北戴河会议沈讲要实行供给制，说进咸复搞工青制没有理由。毛主席的这种思想虽然没有在正式文件中表达，他感到这个想法得不到多数赞成，但是他的这个思想一直保留着并且在姿展。他认为这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一’才

。．电义榆，乏查夜·d'．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蓝图·不只对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是他晚年一直为之实现的梦想。北戴河会议公报和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发表以后，从 1958 年 9 月起，中国大地迅即掀起一阵九千万人上山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热风暴。

31 胡乔木：〈对一九五七年复几段歪史的议论〉（1980 年 5 月 24 日），载《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 60—61·32 胡乔木：〈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1950 年 7 月 3 日），载《胡乔木谈中共党史》，页 74·

第三章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 幼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 各行各业为大炼钢铁让路

南宁会议后大批「反冒进」，促使各行各业鼓干劲、争上游。各地方纷纷修订原定计划，给原指标加码。根据十五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上赶超英国的目标，钢铁工业自然首当其冲·

1958 年 3 月 8 日《人民日报》报道：鞍钢第二炼钢厂青年团结炉，在 2 月份创造了大型平炉炉底利用系数（即每一 t 液一平方米炉底面积的出钢吨数）建到 10.1 的全国最高纪录，走进了世界先进平炉的行列·这个纪录比目前本厂其它平炉的液面利用系数平均高出 3.03, 超过了著名的鞍钢第一炼钢厂青年友谊炉 1957 年创造的 10.22 的纪录；接近了苏联最先进的平炉—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 17 号平炉 1957 年创造的 10.77 的纪录，报道说，如果鞍钢所有平炉都能达到这样的成绩！就可以在完成 1958 年增产计划的基础上，再增产 120 万吨钢。按照这种计算，冶金部在 3 月上旬修订了一个月前通过的钢产量计划，提出当年产钢 700 万吨（比原定指标提高七十七万吨）·把先进定额当作平均定额，作为制订计划的依据。这本身就违背了常议。但毛泽东对这个计划数字并不满意。4 月下半月，毛找冶金部党组几位负责人谈话，他说，你们不要怕钢铁生产多了没地方放，可以放到我的院子裏嘛！1956 年投资多了一些，工业生产快了一些，就有人害怕，慌慌忙忙出来反冒进。旧的平衡总是要在发展中

被打破的，然后，又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这是马克思主义·反
冒进就是不懂追个辩证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现在才能生产几百万吨
钢，太可怜了，工业不发达就要受帝国主义欢负。中国一个省就有欧
洲一个国家大，光论人口和面积都比欧洲的一个国家的人口多、面积
大；欧洲没有统一欧洲的各国都发展起来了“而我。从秦始皇时就统
一了，统一当然有好处，但中央集权也限制了地方的发展。你们应该
对一个省像对一个国家那样考虑它的发展。

-----;----- ‘·历‘震面‘·■，一呈■. , , ·. 整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6—1961）一乌托年运动

; 网. ■工, r1, ”. 刘, 刘, , ·辞■, -

! ■. , ’ ‘、‘一斗‘: 哎. 1 让手。‘1

5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钢铁工业基本建设工人发动了「速
度快一倍，投资一当二」的竞赛。现有厂矿的生产工人破除迷信，解
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多快好省」的新纪录。1958年施工的钢铁工
业基本建设项目有四十九个（不包括为数众多的地方小型钢铁工业），
预计年内开工投入生产的项目，将使国家增加年产157万吨生铁和
103万吨钢的新设备：化几乎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全部设
备能力的一半。当年开始新建和扩建的湖南、太原：石景山、马鞍山、
重庆等五个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打破了过去的施工常规，打算以前所
未有的新速度着手提前施工。仅仅这五个中型企业，在第二个五年计
划期间全部建成后的钢铁年产量，就超过1957年全国的总产量。上
海第三钢厂1外7年平炉平均利用系数10.88吨（注：高于鞍钢和苏
联》】今年的大跃进指标为12.345吨，达到这个指标，生产潜力就
可增长44%。同一天该报在〈让高炉转炉满布城乡，让铁水钢水全
国奔流：二十四个省区大办钢铁厂〉·的标题下，报道说：目前已经
动手筹建的地方小型炼铁厂和钢铁厂约有六十个。河北省在第一个五
年计划

期间几乎没有地方钢铁工业，座小高炉. , 有五座已投入生产

现在正动工兴建七个钢铁厂，共二十五

”最近河南工业厅组织七个专区、三个手

市·四十九个县筹建钢铁厂的人员，到苏州炼铁厂去观摩学习，拟定了一个建设小高炉一百多座、土炉一千多座的具体计划。贵州省第一座钢铁厂已经在贵阳动工兴建，这是一个包括高炉，炼钢和轧钢的联合企业，建成后年产大型钢材四万吨。铁矿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自治区1958年7月份就有四十座小高炉可以投入生产。石家庄钢铁厂第一批达设的三座小高炉，有一座已在4月13日出铁。

层层捷报的生产「大跃进」，反过来推动了钢指标的再度提高。6月19日】决定钢铁翻番·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以钢为纲〉的文章。从此，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与前一段不同的是，把钢铁摆在了一切行业之首。

在北戴河会议公布钢产 t 翻番任务时，1958年的钢产量8月底才预计完成450万吨，要完成1070至1100万吨的任务，在此后短短的两个月内必须产钢·600至700万吨。也就是说，要在余下的三分之一

第三章大炼钢铁和人民介葬化运动

的时间内完成将近三分之二的任务。显然，这是不太可能的。但北戴河会议一声号令，「苦战四个月，为钢产量翻番而奋斗」的口号响遍全国，生产任务变成了政治任务·

9月1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北戴河会议公报的同时，发表了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 t 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个星期检查一次生产进度，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此后，中央先后四次召开电话会议催促。」³

在9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又提出今年1100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少了就是失败了。这个要求也不能不完成。这就势必要逼得我们又要拿出相当的劳动力去挖铁矿、去办小高炉·彭真说：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

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要求到30日，要达到日产钢六万吨、铁十万吨，否则是不行的。

9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电话会议，更进一步提出了从省、地、

县到乡，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生产现场、日夜不停地指挥作战的要求。计划 10 月份在全国建起三十几万座小高炉。

• 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分管冶金工业，并担任钢铁大跃进领导小组组长，多次主持召开钢铁工业会议，组织各有关部门的协作会议。在 9 月 14 日的会议上商定了十七条措施：增强采矿技术力量；改善铁路运输；抽调万名大、中专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分赴各省市小高炉、土高炉帮助建立分析化验室，培训分析化验人员，作为下乡劳动锻炼必加紧废钢铁回收工作，等。1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33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 218—219；冬连等：《求索中国：文

革前十年史》。上册，合肥。

▼！洛——读 JJj 才 JJI 醴馐？f。，“储衫引渐刘励刘刘刘刘门

中华人民兵和国史·第曾专（19 “一 1 开 1j—鸟托邦运动

《钢铁生产紧急汇报会商定事项的通知》。28 日，周恩来又召开钢铁生产汇报会。”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各地党委纷纷由第一书记挂帅，搞动员，抓措施，成立指挥部，全党全民各行各业编成钢铁师、运输营、采矿队等和各种野战军、后勤部，力保钢铁元帅升帐。河北省委成立大炼钢铁指挥部，指挥长由省委书记亲自担任，要求第一抓领导，第二抓组织，第三充分依靠群众，第四抓生产。山西省组织工作团，技术指导团。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采取了「五抓」（抓生产、原料、设备、技术、运输）的办法。江苏省委要求土炉建设要普遍实行「五定」（定型、定群、定量，定员、定制度）。浙江省委要求领导同志上山下乡，「不流铁水不离炉，不见铁矿不下山」。安徽省委成立了把机械、电力，交通·建筑、物资、商业等有关部门统一组织起来的冶金工业指挥部。福建省各地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带领干部群众上山下厂猛攻钢铁。冷金部抽调各方面的技术力量派往各省、市、自治区。

为让钢铁工业先行，9 月 5 日，《人民日报》再发〈全力保证钢铁生

产)的杜论,进一步提出了「停车让路,首先为钢」的号召。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的地位。当钢铁工业的发展与其它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它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运输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必须首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它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劳动力和技术力量,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

此外,中央及有关部门还相继发出了全民大办煤炭、大办电力、大办地质等指示】要求采取各种紧急措施,保证钢产量指针翻番任务的完成。为解决运输问题。要求各地成立强有力的运输指挥部,统一 3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 169—170·

第三章大炼钢铁和人民介葬化浮动

指挥当地的交通运输,绸动机关、学校、部队等一切可以.动的力量,调集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人力车、歌力车甚至小汽车等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投入全民搞运输保证出钢铁运动·

2 毛泽东南巡督阵

为了解各地对北戴河会议决定的落实情况,毛泽东于9月10日至29日赴南方视察,同行的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第一站到武汉。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老友李达。

李达,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是中共一大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年与毛泽东私交甚笃。李达对《人民日报》刊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和口号,早就深感不安。得悉毛泽东来到武汉巡视,决意前去面陈异见。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李达,李直率地向毛提出:「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悠然地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并列举长征为例: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上天,于是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

李打断毛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毛有些不悦地说：「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

李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拚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你脑子发热·达到三十九度发高烧，下面就会烧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这是毛泽东自批判反冒进以来·从未听人说过的反对意见。对此，毛不以耻地回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摄氏百把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6—1961）—乌托邦运动

这次老朋友相见，就这样不欢而散。

李达的话，对毛泽东虽有触动，但使他振奋的是，业已发动起来的城乡群众热情参与的「大跃进」的火红景象。

9月13日到19日，毛在湖北看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一炉出铁、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武汉大学化学系师生办的许多小型化学工厂，武汉重型机械厂，并到大冶、黄石港看了大冶铁山和黄石港特殊钢厂。13日，首先来到正在兴建的武汉钢铁公司，武钢总经理李一清和副总经理韩宁夫将毛泽东一行迎接到一幢低矮的简易活动房（公司的办公区）内，毛向武钢的负责人介绍了同行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大家入座以后，韩宁夫向毛泽东介绍武钢的总平面图。毛关心地问：「甚么时候可以出铁呀？」「是不是有把握呢？」当总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顶计不到的万一时，毛笑着说：「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明天看不到】我以后还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

在介绍矿山情况的时候？毛说：「你们矿裹的铜也含得不少嘛，年产多少？」韩宁夫回答后，毛笑着说：「看来，你们这个钢铁公司应该叫钢铁铜公司。」介绍到炼焦厂能收回二百多种产品时，毛又问：「你们收回多少种？」回答说：「十一种。」有人插话说「别的化工厂已能提炼一百八十多种产品来」，毛听后鼓励说：「你们也可以收回，应该多搞些。你们这样大的企业，应该办点化学工业】办点机械工业，

办点建筑材料工业，各种工业都办点，办成综合性联合企业。」话题转到一号高炉时，毛总说一号高炉七十多公尺高，十二公尺·厦径粗，日产二千吨生铁时，满意地说：「你们的高炉不同一般。应该叫大大高炉。」于是，毛一行离开简易活动房，来到一号高炉。毛二缙警铁梯健步登上高炉炉台，与在那裏等候的十四位为武钢建设立下功劳的模范人物一一握手问好，然后与张治中等在炉前工休息室屋项的小平台上坐下来，等着观看火红的铁龙奔腾而出。只总得厂长发出「出刘的命令，出铁口打开了，炉内喷出大。大团焰火般的火花，紧镶者风呼火哺地射出一道闪电似的烈火，照耀得满炉台通红。火龙般的驮显沙沟蜿蜒奔腾而去，一路辟啪作，，闪。蒲金花，从出铁台

第三幸大练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飞泻而下，垂挂成一束耀眼的火柱倾进铁水罐裏。毛兴奋地站了起来、与在场的人们一起，朝炉台上忙碌的炉前工们鼓掌致意。当毛问到铁水流出多少时，李一清答道：「一百吨。」毛边走边说：「就出这么一点，再多一点嘛！」当听到解释说，「第一炉铁只要温度好就行，少一点没关系」时，毛又兴奋起来说，r不要紧，会多的，会多的。下次我再来看！」

毛一行到一号炼焦炉，这时，第十三号孔的炉门打开了】通红的焦炭穿过火架车，像墙壁倒塌似地倒在消火车上，消火车带着红焦开进消火塔，冰凉的地下水立即把火熄灭、在车顶上卷起巨大的藤蓐状的白烟，形成了一幅宏伟壮丽的图景。毛泽东看得出神，问：「多少时间出一次。」厂长回答：f平均九分钟一次。」毛看看手表说：「好呀，再看第二次。」

在看了二十三号孔的又一次出焦过程后：毛仍意犹未尽，对王任重说：「没有看好，人太多，受限制。不是我看群单，是群众看了我，要到晚上看就好了！」离开武钢时，毛叮嘱李一清：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9月15日，毛泽东来到距武汉一百公里的武钢大冶铁矿，视察了正在搞剥离工程的露天探场。毛向矿山负责人询问了矿山的蕴藏量和矿石的品位，并对矿工的安全表示关

切。

视察过程中，毛和上述企业约四万名职工见面时，读扬了他们在大办钢铁中所表现出的充沛的革命干劲和创造精神。毛泽东非常兴奋，对陪同视察的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榭良，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剧眼多很多。……全国也一样了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王任重回答：主席一再强调破除迷

35 刘文龙、刘家，：〈钢铁要过关·网铁要过江〉，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毛悼东的足迹》吗北京屹仲共党史出版社，乱 99 幻·页 398 — 40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 龚一 1961）一乌托年运动

信，解放思想，很重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一来许多发明创造出来了，许多奇迹也出来了”开毛离开湖北乘轮船顺江而下，于 16 日抵达安徽的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和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然后经桐城、舒城、肥西到合肥，沿途看到要走几十公皇或者鸮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矿、炼铁的广大人流，在合肥看了两个中型钢铁厂、工农业产品和发明的展览馆；20 日看了马鞍山钢铁厂·后经南京到上海，在上海看了一个钢铁厂·29 日返回北京。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毛说：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玲劲，在这个篡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光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姿动起来。但是统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全业，对朴姿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办论。f1J 现在，我们还有一必同志不显意在工案方面搞天规楼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稿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在大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了。人民介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 年农案方面的任务·应当比 1958 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

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及这谁广。”

毛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表明他对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感到满意，增强了钢铁翻番的信心；同时，又批评了还没有用

36 中共湖北省委党刊：《七一》·1 站 8 年第 5 期 ‘37（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19 号·页 1·

第三章大炼钢铁幸人民公社化运动

r 小土群」的地区和领导人，要求把全民大炼一铁的火

抓力旺精更

要得

主烧

3「小土群」村村点火

大搞土法炼铁，是大办地方工业形势下出现的。土洋并举，作为实行工业化三个并举方针写进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但在钢铁产量明显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对土法炼钢仍持怀疑。到 7 月底：全国建成小土高炉三万余座，仅湖南一省就 14936 座。可见，在全国极不平衡。因此，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要求各地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以生产炼钢所需的大 t 生铁。《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快捷方式〉、〈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开展炼钢的群众运动〉和〈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等社论，极力宣传土法炼钢对于钢产量翻番的意义。

在〈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快捷方式〉’”的社论中，点明要赶超英国，我们靠的就是这涓涓细水汇大川的办法。社论开头就说：一个以钢为纲、争工业全面发展的工业建设的新高潮已经形成。转炉高炉遍地开花，钢水铁水到处奔流的日子，即将到来。

社论用问答式的写法向全国传达了毛泽东的钢铁翻番的构想：

我国钢铁工业能不能以最高的速度，比如说，每年产量的增长率不走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或者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们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没有。也许会有人说：『要高速度

北有高速度，是否有点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 38（人民日报），1958年8月8日·

196

中华人民兵和国史·第齐春位 9” — 1961) 一鸟托作运动

味 it 呢？」我们说·这农一点也没有唯.。论，而是完全从实际出姿，是有根据的。

根据是甚么呢？文中回答说：

纤表挤的实际和根据主要有两个 ‘

第一，是我国矿产实源堂当。炼铁需妥大量的媒·而在我国两千多个县中，就有一十五百多个县有煤；钢铁的原中卜一一铁矿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探明的铁矿储量已达五十六亿颇。第二，此是毛泽东同志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的：我们有党的领导和六亿人民，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是生产力的晨活单因素。人多力量大。人民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力 1 的：r 我们一踩脾，犬地震动；我们吹。气·滚滚河水让路；我们一举手，巍峨大么胆寒；我们一迈腿·谁也不敢陈档；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的力量无敌。j（上钢一岩民歌）· · · 一完全可以这样说，要求高达度地发展工业的本身·统是一种激姿六亿人民积极性的动力。

有了资源和豪盲壮语·当然还不能解决问题，依靠现有大企业挖潜也有限度，为确保目标的实现，社论提出：「我们赞成以『小 J 和『土 J 为主的主张。J 文中说：

祝磨甚 1 黑面边三

小的「土」的炼铁炉、练钢炉·比起大型的、中型的现代化钢铁厂来·技术的确是落复的·但是却具有现代钢铁厂所没有的优点。这就是投资少、设备简单·技卫容易为群众所掌经、建设时间蕴。以小型的和「土」的为主，我们此可以在实前技街骨拎抉乏、钢材供应不足、现代设备供应不上、责金也不十分充格的情况下·姿动全党全民来绅钢铁工韦。……在有资源的地方，不仅冶金工业部门可以办·石且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可以办‘不仅工厂可以办；而且机开、部陈、学校、街选·手工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都可以绅；很快就可以做到高炉、

平炉、转炉遍地开花·钢水铁水到处奔流。·、·、·一个小炉子练出来的钢和铁虽然不多·但

第三章大炼钢铁下人民公社化运动

用一万个,几万个小炉子练出来的铁可以汇成滔滔的钢铁洪流。例如,河南省依靠群众力量·今年可以建成三万多个土高炉和简易小高炉,炼铁能力可以达到四百万吨·相当于现在鞍钢的生铁产量!我们不说每一个省和自治区都建成这么多小炉子·只说有四分之一的省和自治区做到吧,那不就等铃我国多有七个鞍钢了吗?我国钢铁产量赶上英国的日子,不就可以大大提前了吗才

为大力推广「小土群」,冶金部等单位积极组铁召开土法炼铁、土法炼钢的现场会议·以推动全国范围的土法炼制钢铁运动,使「小土群」同「大洋群」配合起来完成任务。

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了广大工人、干部、学生,居民直至乡村农民。8月底以前,全国已建成一批年产钢在十万吨以下的小高炉。9月以后,新建了几十万个。「小土群」的土高炉,更是无处不在】几万、几十万,成百万个一哄而起。不但工厂、公社,而且部队、机关·学校,甚至外交部,安徽省委机关也建土高炉,办炼铁厂。这种高炉,大的不过几米高,小的容积仅一立方米多,不但砖瓦窑、瓷窑改成了土高炉·就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留下来的碉堡、炮楼,也都改成土法炼钢的炉具。为了解决钢铁战线煤炭不足的问题,煤炭部提出,一方面,原有的大煤矿进一步加紧生产;另一方面,全民大办「小煤窑」,发动「小土群」的运动,「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小土群」,仅小煤窑开挖十万多个。煤炭不足,各地还大量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缺乏,就用低品位矿石代替,没有矿石,甚至把家庭用的铁锅砸碎当原料。与大炼钢铁相配套:大办地质,全国上千万人进山找矿;大办运输,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幼,既用现代化车辆,也用原始运输工具】画夜不停,抢运大炼钢铁所需的各种物资。

9月24日《人民日报》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

“了视领题疆”!!—

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

「练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二在全区组织了万余玲部、九十三

】

1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1）—乌托年还勃

万群众投入津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花穿·也要挖出矿来」·仅一佃湘乡县·枕菱动了七万多人找到一首平十处铁矿和五十一处煤矿。鱼煤运不及·他们自己去枫，去搬。仅一个达源县鱿发动斤万多人排成长蛇阵·从山上运下六千多吨鱼煤。

新华社10月19日报道，广西鹿寨县在17日下午2时到18日下午2时，一天内生产生铁20.7243万吨；另产烧结铁28.81胎万吨。放出全国最大的生铁「卫星」。他们的经验是：

集中了群众的会慈，细小悚铁容玫为大容，并广泛利用旧的砖瓦夺、石灰寥、池楼、碉堡等来悚铁。新建的练铁艺平均每个容量为50颇，最大的达15300吨·’，

各方群单，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为了钢铁翻番】为了国家的富强，自显贡献一切和不怕苦不怕累的忘我精神，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既纯朴、真诚又幼稚、天真。对群单大炼钢铁的情景，当年有如下生动报道：

一坩锅炉豪围着一大群人，他们伸长昔脖子，紧张地探视昔参白光的娥热的炉夺·偶尔闭闭眼，用手巾擦擦鼻子上滴出的汗。这些人是谁呢P他们有的身着整齐的军装，有的约上佩有校章，有的只戴有工作号码·有的甚么标志也没有。他们都是到重庆大学学习坩锅炉悚钢技衍的。

一四川农学院掀起了柄献废钢废铁废钢的热潮。一周多的时间内全院就柄默了废铁锅十二吨半。师生员工在「分秒必争，

39〈全国最大生铁卫星上天—广西鹿寨县日产二十万吨多〉·《中国*年报》，1958年10月20日。转引自沈久来等选编：《老浙闻—共和国往事（1956—195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页1铭—189·

第三章大炼网织和人民合社化运动

斤两给抓」的。号下·对本早位和自己家震的东西，还行了翻箱例柜的清理。各系各早位除了把积压和暂不需用的器材·通通调用或椅用等办法‘拿去支持钢铁生产夕卜……还早出晚归的四处寻找废铁法和废铁矿·在周合山·在车站附近，许多埋戴在地下若干年的废铁和废铁矿石·也被同学们争振了出来一背一青地一车一车地搬到才万默台，松

一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十二个小学联合建成红领巾钢铁厂。……工厂按照儿童不同的年铃、体格和生活兴趣·在教学和生产中采取了各种借施。从七岁到九岁的一、么、三年级学生在厂外劳动两小时，参加拾痒铁、挖淘铁砂、栋木柴、拾红瓦片等劳动·把他们喜欢往衣服小。装寡装木头、铁钉的兴趣转移到有意义的劳动方面来。在厂内劳动的犬孩子们·都是半天学习，半天生产·在劳动组织上作了合理的分工·十四五岁的参加做砂型、耻料、机械管理、吹气一类轻便的活。年纪更大一些的就抬铁水包·钦造、搪炉子等··，·一略‘一月光下，一片叮当之声·我一。气穿通了几缘犬街和小巷，看到家家都在跋碎碗片。我问一位老大爷：「你跋这伶吗刘老大爷回答说：「做针火砖呀 I」……「我们秦州市计划要造三首个高炉·二十天内就要全部出铁呢！追高炉就要针火砖·现在我们每家计划要交六斤件碗片敲成的细纷·可早是前四天东我就敲了二十斤，我和我的小孙子奏争取交六十斤呢 I」’之

’， —

40《一切为了纲》，《光明日报》·1”8年10月23日·转引自《老新开一共和国往事（1956—1958）》，页191—192-

41（’J哗炼钢树起一面红旗—洛阳红领巾钢铁厂妥审安排生产和教学，日产钢四十颇）·《光明日报》，、”8年10月26日·转引自《老新闻—共和国往·（[9“—1958乃页192—193·

42《新人新风气》，《人民日报》f1站6—1958）·页197，

1必8年s月22日·转引自《老新闻—共和·往事

，’jjjjjjjj-j用！才j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7—1961）——“大跃进”运动

据统计，7月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上的劳动力已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到五千万人，10月底，又增到六千多万人，1958年末，达到了九千多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和间接支持

全国投入大炼钢铁运动的劳动力超过了一亿，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九千万人上山」反其后果

就在「小土群」如雨后春笋般地从地裹冒出来的同时，报刊不断报道各地大放「钢铁高产卫星」10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铁14000吨，提前超额完成了9月份的9000吨生铁生产计划。

曾在农业方面「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不甘示弱，马上宣布仅9月15日一天，全省产铁11894吨，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八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4396吨。9月29日，是中央确定的放「卫星」的日子，全国日产钢近六万吨，铁近三十万吨，出现了九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七十三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县，和两个日产50万吨钢、一个日产4万吨钢的省。10月15日到21日是中央确定的高产周，10月26日《人民日报》称：「一周内钢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十四天的平均产量增加了85%，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十万多吨。」在此期间，毫无钢铁工业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后来居上」，连放几颗

特大卫星。环江县产生铁6300吨，坭城县日产煤炭六十七万多吨，鹿

1,：■■”.’，他■。“侈么

寨县日产生铁竟然「高达」二十万吨。

这种用「小土群」的办法·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实际情况究竟怎样P河南禹县等地就是典型一例，

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高扬，1958年9月率该部工作组到河南禹县、方山、鲁山等地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初到方山一看，的确一旅热火朝天的景象。与高扬同时去禹县采访的《人民日报》编辑夏景凡，曾描写当时的情形：

来禹县四五天，看了一些群众炼钢铁的场面，很受感动。这农群众大炼钢铁的劲头，真是大得无可比经。通往山区的路上·

第二章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日日夜夜都是拧成绳的人群、· 鸟牛群、牛车群

车群· 一所有可以用来运输的东西都用上了，

、小土车群、自行车 S 死车也很多，公

路上经常发生拥挤和等路的现象。山沟农的景象更是壮观：满山通汗的人堆· 一片片的土炉群，镇烟冲天，人声嘈杂· 加上千万风箱、风葫芦，鼓风机抽动的声嘶· 真是热闹极了，·，·…在这农占人最多的工作除运输外，要算是作鼓风的人了。少数国营厂有极少数电力或柴油机驱动的鼓风机；公社办的厂，则多是用人力驱动的风葫芦和多数的大小风箱；原来在家农用来做饭，扇会上用来制水煎包子和炸油馒的风箱，都拿来用上了；前几天在方山『丰八妇女炼钢厂』，还看到许多从二里、五里、十里，八里赶来支援的老太太和孩子们；他们一个个都拿看在家煽火做饭和夏天佛着用的芭蕉扇和雄毛扇，怕的是想为炼铁鼓风的。说起来这可能是笑话，但群众这种热情实在动人。特别是看到耶按老太太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拿着扇子，踏着雨后的稀泥向山上爬行时！真是激动人心！

透过这种热热闹闹的场面，高扬一行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禹县的山区聚集了本县及来自许昌以东各县村庄成千的男女青年】他们炼铁用的所谓 r 铁矿石』，谁也说不清含铁量是多少，甚至很难说是铁矿石，所用的燃料也不是焦炭而是煤。炼铁是用土砖砌成的富或利用旧砖窑，放进煤和铁矿石用柴点火，等煤燃烧完或火灭了，所谓「炼铁」就算告成。高扬亲眼看到炼出来的根本不是甚么铁，只是一些没有烧结

鸾

黑的石头。后来有人说是「烧结铁」，其实根本就当时就向禹县县委书记刁文指出，这裏有严重的弄

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 90% 以上都与实际不符，全县很少有一类铁，有的厂甚至根本没有一类铁，也报了许多一类铁的产量。全县平均没有甚么日产 t，只有放卫星时集中报一下，而且许多是把铁矿石

装进大土炉便上报了产铁 t。对这种弄虚作假的情况，高扬无法容忍，当即向中央工业部写了考察报告：并向中监委写了报告（他当时还是中监委委员）

鸚）。 权。 户卜， 闷』 1 伊计。 ‘』 1 ‘』 J. 1 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6—1961）—鸟托邻运动

在这里采访的夏景凡从高扬处了解了上述情况，还从当时也在禹县调查的冶金部几位技术干部那裏又知道了不少弄虚作假的情况。冶金部几位干部认为：这裏对其么是一类铁‘，其么是二类铁，各厂划分全不一样，有的厂上报一类铁的产量大大超过实际产量。如方山镇卫星社炼铁厂 9 月 15 日第一次放「卫星」时，上报一类铁日产 t210 吨，实际上并不是一类铁；从该厂建立到 9 月 28 日上报铁产量共计 1860 吨，其中一类铁 212 吨，实际上所能生产的一类铁不超过一吨，二类铁不超过两：

-, ;' t 帮, !, , " 1 中 c 吧

• ■ • 为“驯七了方舫驯弯引引邳乱乱剧星刘刘

吨。在计算产 t 时是把挂天的产量算成一天的产 t。

冶金部的干部还把方山区两次放「卫星」的上报产量与实际产量比了一下。两次放「卫星」，方山区各厂共上报 17816 吨，其中一类铁 1335 吨。据他们实地调查和报表计算，实际完成一类铁不超过 200 吨，前面提到的「三八妇女炼铁厂」上报产量总计 587 吨。其中一类铁十一吨，二类铁八十吨，三类铁 496 吨。这些产量除调走二类铁两吨外，其余全部存在厂裏。冶金部的人到厂裏实地调查发现：一类铁仅 0-8 吨，与其上报数相差十二倍；二类铁不超过三吨，与其上报数相差二十七倍；三类铁不超过八十吨，与其上报数相差六倍。

夏景凡自己也作了实地考察，他在各厂除了看到人山人海，很少看到流出铁水，很难找到一座正常生产的土高炉。

然而就在高扬率领的工作组及冶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调查期间？禹县于 9 月约日又放了第三次「卫星」。本来这天下雨。土高炉生产受到影响，但晚上县委书记刁文宣布第三次「卫星」的产量为 6022 吨，其中一类铁 200 至 300 吨。高扬及工作组、冶金部的人都对这个产量抱有疑问，可是第二天县钢铁办公室上报产量提高到 35000 吨，

而且报到了中央，在报纸上公布了这个日产铁的「记录」

因高扬等人在调查期间对当地的弄虚作假提出意见，地方领导对他们的态度也由热变冷，最后转为「敌视」。因为当高扬指出禹县大炼钢铁弄虚作假时，河南省委正向中央报捷】并在报纸上公布日日产铁三万吨的「成绩」，高扬的意见被县委、地委立即反映到省委，他还

第三章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没到省委汇报之前，中央工业部部长即来电箫，命令立即率工作组回北京。高扬向河南省委吴芝圃、杨蔚屏介绍到禹县：鲁山等地考察的所见所闻时，吴、杨等人态度极为冷淡。高扬回到北京便受到部长的批评。‘3

周恩来对各地大放钢铁卫星，也持怀疑态度。周曾留学日本，在鞍钢干过的工作秘书顾明，河南新乡放出生铁 102 万吨的高产卫星，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 万吨生铁，要 1000 多万吨的运输量，新乡那儿的运输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呢？周嘱显明去河南实地了解情况。顾将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回来，最好的是含铁成份较多的海绵铁。周见了样品，说「这哪裹是铁嘛！」，这块「卫星铁」一直摆在总理办公室的书架上。“

与「小土群」不同的是，大中型钢铁厂，则采用拼设备和加强劳动强度的办法。作为钢铁工业主力军的鞍钢，根据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1958 年产钢任务为 450 万吨，1 至 8 月实际产钢：33 万吨】比上库同期增长 29.8%，只完成跃进计划的 51.9%。照此速度生产下去，不可能完成任务。辽宁省委、鞍山市委认为鞍钢生产进度上不去，是鞍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在鞍钢大搞「拔白旗」运动。9 月 25 日，鞍山市委召开三万人大会，动员为完成 450 万吨钢而奋斗。李富春在大会讲话：「谁有更多的共产主义思想，谁就会创造奇迹，谁不打破常规，谁就要失败。」「不要被某些事故吓倒，也不要被大的企业和现代化的技术所吓倒，更不要被怀疑派所吓倒一次失败，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一定要把红旗插起来。」

4319” 年庐山会议后，高扬大挨批判斗争，上纲上线，到 1960 年 7 月，结东批斗。定为右随机「主义分子」。下放到贵州一个工厂。19

砍年7月：高编得到平反复。·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224—225。

“显明：《历尽艰辛创四化》，载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页111。”

响霄坛坛丁顶 111 掬里潘读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49—1961）——鸟托年运动

1

鞍钢「拔白旗」首先从炼铁厂开始。被「拔」的有一面「大白旗」、七面「小白旗」，所谓「大白旗」，就是蔡和森先烈的儿子、留苏归来的炼铁专家、总工程师蔡博，致使许多干部不敢抓技术、抓管理，群众的积极性受挫。违反规章制度，生产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由于超负荷，炉体事故时有发生；高炉连续工作，缺少维修，发生漏钢事故；平炉因等钢模。钢水在炉内呆得时间过长，对炉体侵蚀过大，造成炉体事故。浪费严重，成本上升，质量下降。1957年全公司因公死亡四十三人，1958年上升到六十五人。炼钢设备事故1958年比1957年增加4.6倍。平炉冶炼时间1958年比1957年平均每炉延长时间三十二分钟。每吨铁成本1958年比1957年增加13%。生铁合格率1958年比1957年下降9%。钢材一级品率1958年比1957年下降3.57%。由于取消计件工资和必要的奖励，极大地挫伤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全国范围内经过四个月的突击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虚报浮夸，钢铁产量迅速增加。1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一年间钢产量翻番，在世界钢铁史上写下了辉煌一章，1070万吨钢一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到年底，则宣布完成钢产量1108万吨，生铁1369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实际情况是，不但相当数量是不合格的废铁，而且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其一，投入大，效益低，劳民伤财。

经核实“在公布完成的1108万吨钢中，被称为「洋钢」的合格好钢只有800万吨；在1369万吨生铁中，被称为「洋铁」的合格生铁只有300万吨。”其余308万吨土钢和416万吨土铁，均为不合格产品，有些完全是废钢、废铁。

45 周恩来 ‘《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1959年10月26日在第二届全.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 t 会上）1 载

拿变麻居望《中共党史教. 参考数据》· 第二十三册, 页 131 — 132’
第三章大练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全国「小土群」炼铁中, 到底搞了多少小土炉? 《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中称, 小土炉和小高炉共二十四万座, 其中小高炉为六万座, 小土炉为十八万座。”《薛艺桥回忆录》记载: 「除新建十万个小高炉（称小洋群）外, 还造了大约六十万个土高炉（称小土群）。, 7 按冶金部原定标准: 生铁含硫量不得高于 1%。北戴河会议后, 放宽标准, 改为 0.2%。但有些地区小高炉生产的铁, 含硫量竟超过 2%, 3%, 有的甚至高达 6% ‘这种当时名叫「烧结铁」的高硫铁根本不能炼钢。用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炼钢, 成本费用高。薄一波回忆说: 当时每吨大高炉的生铁成本, 鞍钢为 85.4 元, 石（景山）钢为 112.6 元, 国家规定的调拨价为 150 元。小高炉（容积在五十五立方米以下的）的炼铁成本, 原设计为 153 元, 实际都在 200 元以上, 多数为 250 至 300 元之间, 有的高达 460 元。为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 国家规定从 1958 年 9 月 1 日起, 小高炉生铁调拨价提高到 200 元, 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当时估计 1958 年只补贴 15 亿元左右。但据 1959 年 12 月 10 日财政部的报告, 实际补贴了 40 亿元（当年支付 21.2 亿元, 第二年决算追加补贴 18.5 亿元}, 而 1958 年财政总收入才 387.6 亿元, 光补贴小高炉亏损就超过财政收入的 1/10, 这还不包括因提高调拨价格和土铁质量差, 而使炼钢厂增加的支出和减少的收入。

‘李锐回忆当年的情况说: 一吨生铁的成本费, 大高炉是 100 元, 小高炉是 345 元, 最高达到反刃元, 超过大高炉铁的成本四至六倍。据国家统计局估算, 1958 年土法炼钢、炼铁的亏损达 50 亿元, 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3.8%。”国家花费了大量补贴 • 5”

森林资源的破坏更是惊人。据《当代中国的林业》记载:

46 周传典等主编: 《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 引, 47 薛, 构, 《薛. 桥回慷录》（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 石》, 页 255, 48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

卷·页 7120.

49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 t 编》I 北京：计出版社，1999）·页 3·

50 李锐：（r 大跃进 J 亲历记》、下册，页 234·

页 7 之。中国统

2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首春（1958 — 1, 61）— 乌托年运动

这次林木大被壤不仅范围广·规模大，而且时断时续，此起彼伏，从 1958 年开始·前复延续四年之久·林木被壤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各地大悚钢铁·犬辨社队食堂，大修水利和大搞工具改革，玫伐了犬量林木；二是在木材生产中的高指标，瞎指挥，造成网斗次滥伐，集中通量采伐；三叉困难时期既林开荒，生产救灾·亲摔不少林木。其中以第一方面的被坏最为严重·这及全国各地，级摔的林木也囊多。……辽宁省的彩武，康平·祈民等县的农田防护林被砍牌 70%；豫东防护林被砍壤了 so%，使开封县的四十万钦折地因此摇荒；翼西防护林被砍摔恤万试·占防护林面积 1/3 以上；河北省因安县境内的永定河下游防护林被被壤了一半；陕西省沧林、积由等县纹林、，1J 沙蒿达 200 万钦；甘书省的河西防护林和围沙林被砍拌 22 法万钦。各地经济林也遭到大攻壤。全国油茶林灭少了 10%，油柄林减少了 200/0。经过这次攻坏，有些地区的森林青源武少狠多。湖北省 1957 年林木蓄积量为 4122 万立方未（不包括神农架林区），经过戌年被壤徒，仅刺下 2733 万立方米，减少了 3 任%” 广丙 1958 年因烧戾·悚钢砍伐木材 1750 万立方米·相当朴当年国家计划在该自治区收购木材 127 万立方米的十倍以上。“

其二，否定科学，盲目蛮干，事故倍增。

大搞群众运动，号召破除迷信，否定遵守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单纯追求产量，盲目拼设备，管理陷于混乱，导致大 t 人力、物力、财力被白白浪费，不少设备因超负荷带病运转遭到损壤。有些企业把计划、设计、技术检验、技术安全、设备动力、工艺等重要科、室撇消，管理人员下放当工人，有关权限下放给车间、工段或班组。有些企业推行 r 工人自我管理」或「无人管理」。有些企业甚至把所有规

51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林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 105。

第三章 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章制度都说成是教条主义或压制工人积极性的条条框框一胶赐开。以致像鞍钢炼铁厂这样的大厂，都接连发生建国以来少见的恶性事故，死二十二人。当时全国最大的第十号高炉，投产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九起重大事故。其它钢铁企业也是重大事故不断。

1958 年 10 月以后，在基本建设中，面对钢材等物资紧缺，一些建筑工地因陋就简，用木材、竹材代替钢筋，用砖木结构甚至砖拱结构代替钢筋混凝土结构，并将这些做法当作节约的经验加以宣传推广。片面理解快速施工，不顾开工前的准备程度，苦战几昼夜、人海战术、急于「放卫星」等现象，在全国普遍发生。于是，工程质量事故的数量、伤亡的人数比历年大增，1958 年工伤事故共死亡五万人。，添其三，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为保证实现钢产量翻番指标

了，与

业有关的煤

、电

长了 195

基本建设战线。

需，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增加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同样增加，拉据《中国统计年鉴》介绍，1958 年施

工的大中型项目由原计划的 1135 个猛增到 1587 个，比 1957 年增加 595 个。基建投资由 1957 年的 138 亿元增加到 279.06 亿元，增加 84%，积累率由 1957 年的 24.9% 增加到 33.9%。

工业内部与工交之间比例失调。一是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铁、煤、有色金属的供给满足不了钢的高指标需要，来不及新建大企业，就逼着老企业拚命增产，大量兴办耗料大、质量差的小企业，造成资源被强化开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新增一吨炼铁能力，相应要增加四吨铁矿开采能力，而 1958 年每新增一吨炼铁能力，

只新增 1.5 吨铁矿开采能力和 0.3 吨炼焦能力。二是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强调工业生产「以钢为纲」，其它工业「停车让路」，调配给巽薄一波：《若干，大决策与事件的回丽》·下卷，页 7 巧 s3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 233·

208

中华人民美和国史·第齐春（1958—1959）—鸟托年运动

轻工业部门的原料和燃料大大减少。如：8,9 月份，东北三省电力不足，减去轻工业电力负荷的 2/3，使纸张减产十万吨左右。北京王麻子刀剪厂有三百多人被抽调去炼钢、炼铁，只留下二十多人生产，使刀剪产量从每月 3 万把降为 3 万把，剪子品种由二百多种减到十一种，刀的品种由 360 种减为七种。三是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失调，交通运输跟不上工业的高速发展。1958 年交通运输货运量做很大努力才增长 40%，而同期煤炭增产 7.7%，生铁增长 130.5%，因而到了年底，仍有大量煤炭，矿石运不出去。在 1958 年的货运量中，正常的运输能力只占 80%，其余 20% 靠全民搞运输，特别是发动农民搞突击才达到的。

工业发展过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在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过程中调用了农村中大量青壮劳力参加农业劳动的多为妇女老弱等半劳动力。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的 13.8:1 下降到 3.5:1。当时正值秋收季节，为完成钢铁翻番任务，约有九千万人上山采矿炼铁，不少庄稼无人收割，不少地区，粮食、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以致当年丰产未能丰收。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保守看，1959 年农作物估计有 10% 未收回，

由于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全民大办工业的需要：使全国职工总人数由 1957 年底的 2451 万人猛增到 4352 万人，超过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负担能力，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和商品粮销 t，扩大了社会购买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这种种问题，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是广泛而长远的，可谓「伤筋动骨」

面对大炼钢铁造成的灾难，人们虽然不能闭眼不见事实，但却硬着头

皮充当好汉·阿Q式地说甚么：不能光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如1959年1月“日，王任重任在湖北省四级干部会议上说：

犬办钢铁运动的收模·是冻铁悚人，一举两得·出了八十多万吨铁，挺悚了观百万人。即使有些地方上山的人很多·出的织很少，或者白跑了一趟·花了授黑石头回来·也是胜利，等朴全民

第三幸尤炼钢铁和人民介社化运动

209

’探矿嘛·我们不要单纯从经济上看，经济上的收获很大，政治的收获更犬。，’

三人民公社化高潮 1 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一

与全民大炼钢铁同时展开，而比钢铁跃进来得更猛的是人民公社化高潮。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变成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北戴河会议公报中，就明确提到：会议热烈地讨论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会议指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订前农村生产飞跃务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表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务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的社论和《渣蚜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向全国介绍了卫星公社一「大」二「公」的具体做法。主要内容是：

人民介社的索奋是覃团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积极地创造练件·准备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

日开啊跚柑骗细遛 j 犊冯犊坛 IJ'

54 李脱：（「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 23，·

1 让 11·1—让让 J11--1 吃

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实专（1958—1961）—鸟托年运动

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根据无产阶级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原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公有。公社按照乡的范围建立，一乡一社。为了便利工作，实行乡社结合，乡长兼任社长，副乡长兼任副社长，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兼任乡人民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公社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生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公社食堂和托儿所。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卫星」公社简章看如何办公社〉，赞扬了嵒山卫星公社「在若干方面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框」，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的做法。9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社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11日发表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强调：已经大大发展起来的「城乡协作，工农业协作，大公无私，互相支持的可歌可颂的共产主义行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可珍贵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基础」。「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就「农业社如何合理分配？如何由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这两个问题展开鸣放辩论，并且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在此期间，各级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阐明由农业社转变为人民公社的必然性、重要性；报刊记者相继报道各地办人民公社的办法和

rr

第三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经验。《红旗》杂志第八、第九期先后发表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河北省的人民公社运动〉、山东省委书记谭败龙：〈「还是

办人民公社好」》”等人的文章。《人民日报》先后刊载了：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巩固人民公社的「五项措施」，河南省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口粮供给加基本工资制—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人民日报》记者菟君报道：〈江淮人民公社就实论虚驳倒「吃亏论」〉’，《人民日报》记者周祖佑：〈乡社合一有哪些好处？〉；《河北日报》刊载了该报记者盲鲁、燃天：〈安国县在建立人民公社运动中怎样解决的经济政策问题〉”等文章、报道。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作了积极响应和宣传。

这时，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

自从8月初，公开报道了毛泽东「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始了大办人民公社。行动最快的河南省，仅8月一个月时间，全省农村在原有38473个农业社、平均每社260户的基础上，就建成了大型的综合性人民公社1378个，平均每社7200多户，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98%。9月10日·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其来势之猛，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热潮。根据195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56（红旗），1958年第8期·57（红旗），1955年第9期o55（红旗》，1958年第，期—59（人民日报），1958年9月19日o60（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o61《人民日报）·1958年9月15日.62（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63（河北日报），1958年9月4日.

2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报道：r截至本月底，全国已基本！现人民公社化。」具体情况是：

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有十二个省、市、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十个省、区已有85%以上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四个省、区（浙江、贵州、宁夏、新疆）。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省计划在切月底完成·截止9月29日统计，全国共建

起人民公社乃 384 个】加入农户 112174651 户？占总农户的 90.4%。
“

2 「一大二公」的公社特色

人民公社的特点，当时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所谓「大」，就是社的规模大。

在人民公社化前，全国有七十四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每社平均约有 170 户，二千多亩土地和 350 个左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化以后，变成了 2.65 万个人民公社，每社平均约有五千户，六万多亩土地和 1 以 x 刃个左右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上是一村一社：一乡刘群上；人民公社，则变成了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规模扩大了十倍以至几十倍之多。如：河南省遂平县杨店、土山等五个乡、二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立了 9369 户·432 白人的卫星人民公社。商城县何店、丰集等十个乡，六十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立有 20457 户·98273 人的超英人民公社。这种情况，并非个别。根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

在十一个省，市、区 7589 个公社中，五千户以下的 5287 个；五千户至一万户的 1718 个；一万户至二万户的 533 个；二万户以上的五十一一个·河南、吉林等十三个省，已有九十四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联社。‘5

耻〈全国基本实现了雇村人民公社化〉〔1958 年 9 月 30 日〕，《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转引自《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 艮 992)，页 503 — 504 ·

绍《建径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戴骗》】页 503，

第三章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可以想见，要在一个拥有几万乃至几十万人口，分布在几百乃至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统一调度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会造成多么大的混乱和人力物力的浪费。

人民公社的「公」·首先是生产数据所有制的「公」组建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数据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

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公社经营和转为公社所有，消灭了生产数据「私有制的残余」；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经营：使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这种把经济条件不同的社拉到一起统一核算，使穷社共了富社的产；消灭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使集体共了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人民公社，使公社共了国家的产的做法。后来被称为「共产风」。“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大刮「共产风」的过程。

其二·人民公社的「公」，还表现在领导体制和分配制度方面。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基本是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制，人民公社普遍实行的是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不同的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三种形式·这部分在社员的收入中分别占知%，60%和80%；工资制是在供给制之外1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支付给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这在社员的收入中分别占50%、40%和20%。实行最为普周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和伙食供给制。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七包」，「十包」的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所谓「七包」，是对人民公社全体人员的吃饭、穿衣、居住，

66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756参中说：「共产风」这个词·是毛主席在“1958年2月27日到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中首先使用的·当时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腾起了一译『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个月个弋』托=。■·

2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卅春（19，。—1961）—鸟托押运动

中祝—·1' '卜 '工， '。 ， 工' 。二 j·、

" j {、月拷， ? 编； . 州、 . 召? ! 织

生育、教育、看病、婚丧等生活需要部分，均由公社供给。所谓「十包」，就是除上述「七包」外，还包烤火、理发、看电影看戏等生活费用。

可见，无论是所有制，或是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公」，就是一个「平」—搞绝对平均，它是对毛泽东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强调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传统的直接响应。是小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反映。

其三，人民公社由「一大二公」派生出来的，是管理上的高度集中统一。

在人民公社化之前，农村实行的是乡社分立的管理体制，乡是基层政权，社是农业经济组织。人民公社建立，确立了政社合一、分级管理的体制。人民公社既是一级政权机构，又是一种经济组织。它不但负责全社的农业生产，而且还对工、商、学、兵等统一管理。在人民公社内部，将公社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实行三级管理。公社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小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这种政社合一的领导体制，就使公社领导实际在使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既违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又侵犯了生产单位应有的自主权利。

在管理方式上，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是把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力，全部编成团、营、连、排、班的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各种「大办」中像参加战斗那样进行部署、调动。

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公共事业，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当时，各地的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劳动大军，办起了以公共食堂为主要形式的公共事业。到9月底为止7 7 山西省就建立起一支429万多人的劳动大军。甘肃、四川、广西、云南等省区也都按照冶炼钢铁、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筑路运输等方面组织了很多「野战兵团」。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简报》称：

第三章大炼钢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215

到9月底止，据江西、陕西、河北、福建四省不完全统计，共建立公共食堂563373处，托儿所、幼儿园599331个。此外，老年幸福院、妇

产院、澡堂等组织也都有很大发展。叮

农民对人民公社大学「共产风」，搞「一平二调」，以及生产上的瞎指挥，不能不有所反抗。因为作为小农来说，「共」别人的产是会举双手拥护的；但当别人来「共」他自己的产，就必然本能地进行反抗。对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期间，农民这种复杂的心理和表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简报》曾有如下的叙述：

在鞫因人民公社的工作中，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更深了一步。因而各阶层的思想情况暴露得愈加深刻，思想斗争愈加尖锐，真理也会愈加明。据若干典型调查：坚决走公社化道路的占80%多，其中主要是贫农、下中农，他们的反映是：「决心办社，意志坚如钢，把心交给党，把人交给社」。法本拥护，但有若干思想顾虑或误解的占10%左右。抵触不满的占%左右，其中主要是部分富裕中农。这部分富裕中农，在思想教育愈深入，愈接近解决具体问题的时侯，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两嫌这路的门争也就更加鲜明。在处理钱毒的生产资料上，少数富裕中农对私有制度留恋不舍，千方百计的隐瞒、分饮片产。想「留一手」一「捞一把」，甚至大肆挥霍浪费。安徽省好城县舒茶公社富裕中农到处宣传：「办了社明年茶榭就不是我们的了。今年秋茶要多捞一把，把它摘得枚叶不留」。有的富裕中农，故意干部分合丢财产、弘分粮食、少报伏入、多报开支。表现在分配上，是「多积累，少消费」与「多消费，少积累」的斗争。广大贫农、下中农在共产主义的前途舞下一致主帐今年少分红，多积累，而少数富裕中农，则到处宣传「多收多

67〈全·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119,8年9月30日》，《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转引自《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页5a3.

.. 雾缠·. 乱缠!!'.1 澶珊 UJ 啊: :1 “刘剧刘

2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0）——“大跃进”运动

’.. . -1. 什弘秃. 。r 月? J ‘权·

分」，「产量翻一番，生活大改善」·并积极主张按小社分配·他们认为大社分配是「瞎菜煮猪肉·油水都被政策沾去了」”表现在集体

生活上·是「多集中，’少自由J和r多自由，少集中」的斗争。广大实农、下中农坚决要求多辨介共福利事业。而少数害裕中农，则到处裁方「不自向J、r不习价」等论调。目前各地，正就以上种种思想，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结果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实本主义受到了深刻的批判，广大群众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提高。据各地反映·凡是抓紧了政治挂帅，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一工作方法的地方·在处理各项经济问题时·都做到又快·又好、又项利，达到大家满意，增弦团结·反之早纯忙朴处理经济问题，结果是念处理问题念多，纠缠不清，影响了生产，影响了运动的健康参展。‘总

《简报》的这段文字，虽然抹上了一层阶级斗争的色彩，但却生动地披露了农民对大刮r共产风」一搞绝对平均主义的矛盾心态‘又反映了公社化运动，是在用大辩论开路，给农民施加政治压力，这种变相的强迫命令手段下给哄起来的。这就是在一片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万众欢呼声背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3 徐水式的「共产主义」

实现人民公社化，中共中央《决议》明确指出，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J·又说：r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就68〈全·基本实现了，村人民公社化〉.1958年9月30日j·《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转引自《建·以来震业合作化史料·细》·买，03，

第三章大练钢织和人民查社化运动

可完成。号召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波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并断盲：「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甚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因此，当人民公社建立之时，也就形成了一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J。例如：中共中央确定的共产主义试点单位—徐水县，他们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是，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斤以提出「人有

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名的山东省寿张县，计划两年实现共产主义；同样激进的山东省范县（今属河南省），在1958年10月28日的万人大会上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还用诗一样的语言具体描绘了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图画。

最早发现徐水这显「明星」，是1958年初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河北省保定地区视察，对徐水水利化建设的成绩和经验作了肯定。接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办副主任陈正人，奉命到徐水总结经验。1958年3月14日，陈正人将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送到中央，当即转到在成都主持中央会议的毛泽东手中。毛阅后，于3月21日批道：「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引者注）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6月4日17日】《人民日报》又在醒目地位全文刊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5月，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作为河北省的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个默默无闻的徐水，一夜之间成了耀眼的明星。县委书记张国忠也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中心人物。7月7日，中共徐水县委发出《关于改革劳动组织和家务劳动普遍实行大协作的指示》，要求发动一场生产和生活方式大革命。实现「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化」·「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张国忠强调说：

69 毛泽东：〈关于推广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经验的批语〉（1958年3月21日），载中共中央文研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143·

2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6—1961）—大跃进运动

要做到全民练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围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实行军事化的编制·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设总指挥（司令员）、政委、运动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社要建立区、连、排的组织，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村

为一个营或一个连。乡要划分若干战区，乡党委分片包干。使这一军事组织真正成为坚强的农业社会主义跃进兵团。才”

于是，在天灾人祸面前，徐水全县建立了 93 个团，229 个营，1099 个连，33 个排。有的乡还按劳力强弱、年龄大小，组成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队」、「少年先锋排」。上下工列队，按口令行进，战前有动员，收工有讲评。以实行统一调配劳动力的大协作。为促成家务劳动集体化和社会化，公社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全县共办食堂 1693 个，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 22.5639 万人，占全县 7.5% 的人口进了食堂。一时间，徐水县成了一个“大兵营”。

毛泽东 8 月 4 日在徐水视察时，对军事化表示很满意。8 月 5 日，徐水县委召开全县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张国忠在会上讲话，提出：「向共产主义进军」。6 月 6 日，陈正人奉中央之命，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随身带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康有为的《大同书》。8 日，他召集河北省省委常委、副省长胡开明，省委秘书长尹哲和保定地委、徐水县乡村的干部进行座谈。陈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又说：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陈提出：要使徐水的发展速度比其它地方走在前头两三年，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和要求，对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和生活搞一个具体规划。70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 24—25

第三章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他要求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和他带来的那两本书，海搞规划，组成了一个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共产主义试点规划小组」。22 日，《中共徐水县委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出台，提出：「奋斗目标是，1959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 1963 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什么是共产主义，张国忠 5 月 5 日在全县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上说：「现在高级社改为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把人民的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包括在内。」大车、牲口全要公有，存款还算自己的，生活用品是自己的。这就叫共产。

愈共愈好·一共就富了。J”

9月1日,《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透露了以下信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当北戴河会议精神传达下来以后。徐水县更是倍受鼓舞。9月15日,徐水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就是全县合成一个公社,实行县一级核算。9月20日,徐水县出台《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决定:全县实行供给制·即「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制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洗澡、理发、看戏、看电影也都有公社统一包了起来。为解决男女老幼的不同需要,还规定给每人发一定数量的津贴。具体标准是:

农民:根据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力强弱分为三等:一等每月三元,二等二元,三等一元;

工人分为七等:最低一等一元 1 最高七等十六元;

干部分为四等:县级十六元,科级十二元,一般干部及教员八元,勤务人员六元·

71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 28

夏 j1·选潘饒唱边权丰·权 j 顶认. i1

2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5s—19”)—乌托邦运动

供给制的实行】被认为是徐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标志。当试行草案公布后,人们抬着 r 庆祝全民实行供给制 J、「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红区·敲锣打鼓,高喊[拥护供给制 J、「以实际行动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 J 等口号,进行了游行。

向共产主义过渡】并非徐水一家·

山东省范县县委书记谢惠玉在 1958 年 10 月 28 日的万人大会上宣布[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并具体描绘了他们的「共产主义 J 美好图 t。谢惠玉作的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被郑重地摘要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 11 月 4 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上。题目是:〈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72 其要点是:

-. !J 澜 11!-'、多■二 ri 心』工，怜涌噢
唱。计. ' ' 乱 \, . ' •、二、、h' 才
必?，让艺义奋甚盍届援

一·工业。一年实现地方工业网，二年实现工业化、电气化。……完成这些规划援，我社将是：各种工厂适地起，处处烟自如林江，工厂机器鼻鼻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造化肥姿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产用品样样齐·果品耀头慧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这样的日子何时到·苦玲二年拿到手装。

二，农业生产万斤化。……今年的水利要实现河网化。59年全部土地尔园化，灌流自流化，标准化，60年达到淮洒电气化、自流化。到那时，曰问耕作用机器，淮溉自流用电力；粮食钦产好几万，堆大敢与秦山比；林絮开放似云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首季，人人喜得了不的，

三、林业、渔案、言牧业和多种经济。根据三分之一的土地种庄徠·三分之一的土地植树，三分之一的土地休闲的要求·59年在林旁，宅旁、介路旁、渠这旁，水库为塘旁、河旁，吴分、境篡陵园实行练化。

———

翅《建·以来毛译东文稿》·第七册，页495—4”·

第三章大练钢织卡人民介社化运动

更富有诗意的是关于共产主义乐园建设的规划：

- 1、根据全合社农业生产布局和有*.J朴生产·美化环境的原则·把全县九首九十丰个自然村在丰年内合并为斤十五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每个新乐园内设有：妇产院、. 剧院、影院、幼充园、养老院、疗养院、休低院·介园、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理爱馆、青年食堂、养老院食堂，大礼堂、会议厅、餐厅、姚骨厅、浴池，养鱼池、供应站、广播站、体育场、发电厂、自来水供应站、富牧场等，达到八院、二所、四馆，三厅、两池、三站，四场·
- 2、根据共产主义新乐园的规划，他县呆成「经三、纬五」八条宽达三十杳尺的大马路·贡串到全合社二十五个新乐园，田间也修成笔杯条直四通八达的十二姿尺完的管理区道·除当中铺成马路外，两旁培

核果树和花草。总之要实现：新乐园具正残，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首花香，柏油·鸟路明又亮·汽车穿校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徒去听唱，冬天室内有缓气·夏天闻开电扇东来凉·生活真是犬变样，万年幸福乐鸟骚。·…，·

具正达 f11：各种生产用机器·劳动学习娱乐「三八制」：出门坐上电汽车，到处花香真喷弄：室内室外介路电灯化，有事摇摇电话机，定时广播有喇叭；饭前饭彼开开收膏机·北京上海好戏随便听麸它。谢惠玉最后总结说，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

人人进入祈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雄鸭·鱼肉味这鲜·顿顿要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卡新乐园。

顶常坛——顶 11!“、者! - . 乱

222

中华人民委和国史·第齐专（1958—1961—鸟托邦运动

对这位极富语盲天才的书记，画出如此美好的蓝图，毛泽东读后，也深受感动。11月6日，毛作了如下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项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才行路匪这，一周可以往还，会徒出征·以为如何？73

当年，对共产主义抱着炽热的憧憬，在中共中央高层，也非毛泽束勿人。在北戴河会议前，刘少奇对各地出现的托儿所、公共食堂、供给制、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解放等新事物同样抱有极大热情。他同毛泽东一样认为，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生活的雏形。这一时期，刘讲话的一个主题，就是「吹共产主义」。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时转达毛泽东的话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现在实现了。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座谈时说：

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十五年是赶上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国家犬有希望，犬有前途，

超过英美就变成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11 共产主义。才 ‘

9 月 19 日至 28 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走遍江南江北，许多城市和乡村，行程数千里。9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同志！六万伤嘎“画浩尽个

73 毛泽东：〈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 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1958 年 11 月 6 日），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

74 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座谈会上的谈话纪录（1958 年 7 月 5 日），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册（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8）页 832 — 833 ·

第三章大练钢织和人民查社化运动 之乃

视察江苏城乡〉的报道。文中说：「少奇同志。于如何贡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关于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以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的指示，给大家打开了广阔的眼界，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刘少奇一路上非常关心人民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的问题。当中共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汇报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聪后说，

这两句话，两个心思，才良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的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表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积极了。这就是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这德质量更加提高的标志。……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的消灭懒汉。
7,

9 月 10 至 29 日，邓小平、李富春一行到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视察。”邓小平在双城县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太阳升人民公社视察时说：公社是建立在生产大发展和人民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的。他希

望公社在最近制定出一个长远计划，并向他们生动地描绘了农村建设的远景。邓说：

将来要把农村的居民点都建设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电影院、剧院、运动场；房屋都要改建；城中这种花果；工农商学兵全面誉展。犬城市所有的一切·你们都可以有。这样，就可

75〈刘少奇同志视察往苏城乡〉”《人民日报》，19,8年9月30日；《新·半月刊》. 1958年第20号，页27—28·

7. 《邓小平，李富赛同志视察辽吉黑三省时强调说东北要大挖。力支援全.》.（人民日报》，1,。B年10月1日‘《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泌号·页，z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一”61）—鸟托年运动

勺 j 缠 jj1jj 渥斗砖神时封刈仰

以消灭城乡差 X11。这种居民点，人少了走办不起来的·大约是数万人一处。

邓小平对哈尔滨市的中小学贯彻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表示满意。他指示说：

劳动的收入”不要按人分配，最好是由学校统一掌握。难学生一按补助外·应当尽量用来举辨介兵福利事业，

式，；唱. ,. -t’ . 妇；、二

不收学杂费恩、穿衣都不要钱。

免费洗澡理发、统一腾给鞋秽和零用、

除了给困逐渐做到以至吃饭

总之，要培养共产主义思想，贯彻兵产主义精神，不能助长个人主义。

对共产主义的嘱往，是历代共产党人的理想。马克思虽不愿为未来共产主义描绘完整的蓝图。但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还是简约地谈到了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诸如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国家，消减分工，消灭差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物质极大涌流·……这些「桃花源」式的理想，曾使无数共产党人为之倾倒·

执政后的共产党领袖们，对何时进入共产主义，更有一种把理想变成

现实的迫切感和责任感。早在 1920 年，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就说过一二十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话。他说：

现在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朴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现在是十五岁，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这一代青年……要保卫共产主义建设成

方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 359。

第三章 炼钢铁 人民公社化运动

由斯大林审定，于 1938 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谈到 1936 年通过的新宪法时宣布：

苏联已这入新的夸展时期，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逐渐通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率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人的毛泽东等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其急切心情也不例外。1949 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说道：「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当他 1958 年在北戴河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现在已经找到了「到达大同的路」。这也就是他本人早年的「新村」理想。

1919 年 12 月，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学生之工作〉中就曾具体提出过建设「新村」的计划，具体设想是：

口口口圈甩个口读 j 唱 1j 个 j，一 j ■• ‘面•他 ‘■•■•■ ■1 面. ■I、——jJ- 『j 『勾月 ‘，妒喝。 ‘J1 ■屹 ■—■ ‘。■. 1 编 1, , . , •细。 ‘1d1. 、计 1. 颯。 , 斗 ‘, 1-’ 、、■ (d 卜、) ■, . 9 ■昌 ■禹, ’’

••为甲. ■•. . 亡驯. ’’、二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 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显不可尽举，举其著者：介兵育儿院、介共蒙养院、介共学校、介央图书馆、介兵

锥行、介兵农场、合兵工作厂、娑兵消责社、介共剧疣、合共病院、娑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 r 祈村」。否以为岩麓山一带·乃汀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虽非早年「新村」计划的简单翻版·但与早年接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几十年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都是直接有关连的。

78. 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年，页 3 缸·79 毛潭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可 1949 年 6 月 30 日）载《毛潭东遗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 1471·

厦个’ ” 抽开阙钊开开 j 润调肤 jJ’ n 月仰觴州

2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四教科文卫大跃进

1「播红旗，拔白旗」

1957 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共中央彻底改变了 1956 年 1 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结论，重新给他们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重新改造」，并提出培养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的任务。1958 年初，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部署，领导和推动党外人士开展整风运动，强调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要实现由资本主义立场到社会主义立场的根本改造·中央统战部部畏利瓦伊汉，2 月 27 日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说：要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上和思想上来一个大跃进。3 月初，中央统战部相继发出：《关于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自我改造问题的通知》、《关于帮助和推动各民主党派组织进行一般整风的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于是，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掀起了一场制定集体和个人改造规划。进行挑战、评比、竞赛的群众运动。3 月 2 日，《光明日报》

报道：九三学社三十多位中央委员、学者签署的「社会主义竞赛决心书」，向全国高级知识分子挑战于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通过「自我改造决心书」，争取在三年内使民进成员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达到 50% 的目标。3 月 3 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举行中央整风动员大会，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等三十四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竞赛的决心书。民革中央决定：「把心交给党，在改造政治立场上来一个大跃进。」3 月 16 日，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并在东西长安大街游

才瞞 华江 e80 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下离《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5 州·页驯石。

第三章大炼钢‘和人民合社化运动

行·t 上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表示要 r 把心交出来」·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全部知识和力量」。a. 3 月 20 日，上海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和游行，争相表示：「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Jr 一定当左派！J 其它各地区也纷纷响应，向党「交心」·8Z 在此期间，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二届七次主席团会议号召教育、科学工作者迅速掀起一个「决心做左派、苦战三年到五年，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竞赛高潮。‘，

’然而·毛泽东并不相信知识分子们的这些表态，他在成都会议上讲：「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被敌人统治着·」「有些同志甘愿当资产阶级反动派学者的奴隶，是殖民地人民精神不振《做久了奴隶的反映）。Jr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插红旗，辨风向」，「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或者其它人插灰旗。1 他提出要「敢于插红旗，拔黑旗、灰旗」。“如果说，1957 年的反 r 右派」斗争，主要是为了巩固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那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要把学术领域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夺过来，建立共产党在学术上的领导权。

了累兀忽 “ ‘ ‘么’ rk、’ 诚赚. 惜、 ‘:j

81 〈向前，向前·向左选迈步前进〉·《光明日报》·1958年3月17R·转引自《老新闻—共和国往事(1946—1958)》，页222—225·82〈一定当左派〉，《光明日报》，1958年3月21日·转引自《老新闻—共和国往事(1946—1958)》·页221—226.

83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3)》·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页216—217—

84 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纺织工业部上的讲话提纲，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115—118，

85 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上的讲话提纲·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200、203，

2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卑运动

毛泽东「插红旗，拔白旗」的精神，很快在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得到贯彻。正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整风交心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相继展开一场以反浪费、反保守，开展两条道路、两种方法斗争为中心的「反右」运动「以教学改革为中心的全面跃进运动「大搞科学研究的群众运动。」贯串其中的是「拔白旗、插红旗」，红专辩论，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学术思想等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一批有独立见解的专家·教授被当作「白旗」拔掉；一些潜心研究学问和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被戴上「白专」帽子；一大批有造诣的学界泰斗，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代表进行批判，他们的学术思想被宣判为「伪科学」，他们的终身学术事业被宣布为「白专道路」

北京大学3月10日召开「反右」运动全校师生誓师大会，当天就贴出大字报八万八千张。对老教师的学术思想一概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被批判的教师一概被作为「白旗」。其中有：对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经济学观点的批判；哲学系对冯友兰，贺麟和心理学专业教授唐铁等人的批判中文系对游国恩、王瑶、林庚的批判。化学系的傅鹰教授，从运动开始，就忧心忡忡，他曾对化学系领

导锐，希望这次不要像「三反」那样，不要伤人，免得老教师在运动后期失去积

极性，丧失信心。然而，不到一个月，系裏就给他贴了三百多张大字！
抑盒诚霎藤妇烟

报。《光明日报》5月1日报道，北大化学系的教师以教研室为单位，连续八天深入地讨论了老教授傅鹰的白专道路问题，帮助傅鹰教授绞除白旗。对北大学术思想批判的情况，《光明日报》作了连续报道，例如：〈马寅初轻视革命农民，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律师公〉，〈冯友兰假借百家争鸣；高举白旗传播修正主义〉。〈贺麟痛恨哲学的党性原则，露骨地为唯心主义招魂〉。同时发表有学校党委、行政负责人或共产党员的批判文章：〈攻克最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堡垒〉，〈不容个人主摔「负隅顽抗」〉，〈自我批判要真，准，很、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该划入剥削阶级的行列么〉；被批判者则以〈向工人阶级投降〉，〈彻底批判以「我」为中心的思想〉。〈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酿励为题进行检讨（其中就有傅鹰一出于无奈写下的〈向真理投

第三章大练钢织表人民合社化运动

降〉。北大全校受到批判的文理科教师共计有六十多人。该校中文、历史、经济、法律，西语、物理、化学七个系共有教授、副教授七十六人，受到批判者三十三人，占43.4%。北京师范大学受批判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仅中文系就有十人。“中央音乐学院的马思聪、沈湘也被作为「白旗」受到打击。康生在7月间还提出「拔银幕上的白旗」。《花好月圆》、《球场风波》、《情长谊深》、《青春的脚步》、《上海姑娘》、《不夜城》、《谁是被遗弃的人》、《悬崖》、《生活的浪花》等影片都作为银幕上的「白旗」受到批判。

7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作《关于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今后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改造，应该紧紧抓住业务和政治、理论和实际，技术和群众、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和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的方针。」这是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继续，强调对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思想，「要整臭」，「整的愈臭，才更有可能把

他们的文化技术和工农大早结合在一起，政治挂帅，知识公开，作出更多的贡献，使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开出灿烂的花朵J·”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术批判是自我革命〉，提出高等学校的领导者要大胆地发动群众，帮助资产阶级学者进行学术思想批判。

于是，这场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在全国更激烈地开展起来。仅《光明日报》在1957年就发表二百五十多篇批判文章，约一百万字，批判了八十多人。除前述北大已被点名者外，学术界的知名教授还有：数学界的齐民友，华罗庚、吴文俊神心理学界的彭飞、朱智贤、曹日昌、潘菽；史学界的陈寅恪、周谷城；法学方面的茵沐、啊祥瑞；文学界的刘大杰·王力、高名凯、朱德熙、郑振铎、朱光潜等。当时影响较大的批判有：对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对资产

了遭1j1)缠“舅胡””讨认锈！

86 稼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页110—111·

”徐冰‘；〈关于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需派的根本改造问题的报告〉化”8年7月1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二册，买476，

2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啊专（19”—1961）—鸟托年运动阶验恤哩学的批判；对数学特殊轮的批判；对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采用的方法，名曰「大辩论」，实为政治围攻。如：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马氏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圭张必须控制人口增长；不但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质量。为此，他提出，国家要制定人口政策；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广泛宣传避孕。当时的批判文章，指责马寅初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基本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按其本质来说是旧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较多的人口，不是更大的自然压力，而是更大的社会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把人口的增长看作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及共产主义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

伟大力量。断言，社会主义国家决不惧怕人口的高速度增长，而为人口高速增长创设一切有利条件。J 有的指责 F 马寅初的 r 人口质量论 J 更为反动」，「是帝国主义历来诬织中国人民的滥调」，「实质上是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帮了忙，是为帝国主义『种族优越论』作了辩护」。甚至辱骂「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质量」的主张，是「丧尽廉耻的洋奴才的卑躬屈节效忠于外国主子的卖国理论」。‘，这场错误批判一直持续到 1960 年，但马寅初并未屈服，1960 年 1 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如

. ' 。 ， . : 喻丰玉了，云储个 j 啊

881953 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国人口总数已达六亿以上。如以每年净增率 0.2 个计算，十五年后中国人口将达八亿，

89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71—1981））· 页 56 · 59.

901979 年 9 月 11 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 7 月 23 日所作的《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报告》和《关于马寅初先生的平反决定》· 指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 许多主张是可行的· 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 各部门应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也是正确的· 强加于马寅初先生的『藉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一 X 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 J、 「一，反对万、反对杜 t 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诬织不实之词，应一律予以推倒· 党委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 恢复名二」

第三幸大练钢织和人民介社化运对

历史表明：1 央刃年代，中. 人口的，目增长，是与对马寅初的错误批判、与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的错误决策有着直接关联的。「错批马寅初，误增三亿人」一说，不无道理。

又如：对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的批判· 1958 年 7 月下旬，从北京师范大学批该校心理学教授彭飞、朱智贤开始，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和四川等地的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相继召开「资产阶级心理学 J 批判会。批判「资产阶级教授」关于人类有共有的心理过程、心理形式和心理规律的学说】是抹煞. 0 理活动的阶级性，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崇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 美

国资产阶级心理学。强调：心理学是「纯社会科学」，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专家把心理学列为边缘科学（界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引者注），其实质是为了反对阶级分析，企图削弱这门科学的党性。」提出，要重建「无产阶级的心理学。」完全是一种全盘否定原有科学成果、胡乱给学者扣政治帽子、对学科乱贴政治标签的做法。

三如：武汉大学对数学系党总支书记齐民友的批判。齐民友对 r 数学能不能联紧实际」，「数学能不能走群众路线，办学寡谁」等问题，持有与「教育革命」要求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数学有它的特殊性，与物理、化学不同，要求数学理论联紧！际、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不大好搞·数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只有经过按部就班、严格训练才能掌握·在数学领域谁最有知识，谁最有发言权·不是靠走群单路线所能解决的。于是，齐遭到一百多次大小辩论会的批判，称之为「百团大战」。齐被指责为「一面资产阶级帅字白旗」，「资产阶级 r 专家」代表」，在数学改革中反对党的教学方针·被戴上「否定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教育方针」、「走资本主义老路」的帽子。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文中说，齐民友代表的是「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是一场 91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页 85—幼。

· ■个—'.' . 已，』』瞭

232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丈·第齐春（1958—1,61）—鸟托年运劲

「阶级斗争」。武汉大学的「拔白旗」运动，全校有三百九十一人受到批判，其中教师八十四人：占教师总数的 14%；教授、副教授三十二人，占其总数的 40 偏，」

再如，郑振铎总为中国文学受印度文学的影响很深，批判文章就说他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批判他的《中国俗文学史》，是对劳动人民「恶毒的歪曲和诬蔑」。对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文章给它扣上了「不遗余力的抹煞党的领导作用」的政治帽子。更为荒唐的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著名考古学家裴文彬的批判，说裴「由于忽视了政治挂帅而造成了严重的学术脱离政治的倾向，他自然是考

古学上的一面资产阶级的白旗，那么就应该把它拔下来」

实践证明，无论是急风骤雨式的整风「交心」或是武断粗暴的「拔白旗」的学术批判，不但无益于调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的积极性，相反在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在学术上制造了混乱，阻碍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少学科，甚至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2 教育制度的革命

:A 登' ,. 1 '弓 ' ' .

合，革的

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是以勤工俭学、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实行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为指导方针，开始实行教育体制改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

二' . 县审县边蕴屈言

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

辛锐：《「大跃进」亲历记》李锐：《「大，遗」亲压记》

，下册·页310—3巧'，下册·页304·

屹蛤

第三章大练钢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沥教学和料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一农村农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表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

大学学校和城哀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性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年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人民日报》1958年1月20日发表社论：〈两个好榜样〉，推荐河南长葛县第三初级中学，贵州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级中学实行勤工俭学的经验。指出：勤工俭学是一件有意义的值得大力提倡的事情。它是革新学习风气，进一步促进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件大事。20日，（人民日报）报道西安第一航空技工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经费自给自足的做法。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群单办学，勤工俭学的方针〉的社论。指出，一年来各地群众自己举办中、小学校，找到了勤工俭学的道路……它意味着我们的学校正在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循着理论联系实际，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轨道前进。社论说，过去的教育改革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教育方针本身也有不够明确的地方，突出表现在理论脱离实际、教育脱离生产、脑力劳动脱离体力劳动的现象还相当严重。这

■！入、（于 f.）‘妒‘■.、j
P。一亡 r、‘‘才 1r 臑 r 自、1
94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臑草案〉（1958年1月），载《建国以来重要文戏选编》】第十一册·页 56—57·

. ‘奋』』■励奋. . •1 口. ■rjt, ■■, 个昌口口二可口工二■
励口■写. 口倡口届留口口口口口个口口口■ ‘•股 U 吃 ‘. ‘鱼 r 口
厦吁已励届日

领月倘缠 JJ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寡（195。—1961）—乌托邦运动
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我们教育事业中的反映·据此，社论提出，为了贯彻群众办学、勤工俭学的方针，应该在教育工作者的队伍和学生中展开一场大辩论，使这种勤俭办学、勤工俭学的新风气普及全国·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向前跃进。”·2月9日和1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的高等学校的人大代表和首都各高等院校负责人毕行教育问题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指出，文教战线和其它战线一样，在整风运动中进行两种斗争：一种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这频种斗争还应继续下去。另一种是建设社会主义是实行多快好省还是实（行少慢差费的方法的斗争，这两种方法的斗争在文教战线上也存在：着。文教战线勤工俭学

的好经验，是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希望大家根据本地的情况加以推广，使落后的赶上先进，先进的妒更先进，把教育工作大大推向前进。康生在会上发言，提出在高等学校要实行「三勤」和「三放」。「三勤」是：勤俭办学，勤俭生产，勤工俭学。「三放」是：干部下放劳动，学校开放大门，校部党政干部下放班系。96〔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肯定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即：一种是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必一种是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9，后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视察，谈到半工半读制度的意义时说，「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95（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5号，页155—157，

9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92）》·页之140 刘少奇：（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遗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327，9s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995—1999）·下卷《北京：出版社》1996）。页438。

载《刘少

中央文选

—

第三章 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为使党内在教育方针上统一思想，中共中央于4月和6月在北京连续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教育方针，批判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以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错误。会后，陆定一写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毛泽东对陆文十分赞赏，批示，「很好，登《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宜用较大字型，例如四号或五号，不用新五·」亲自为之修改增补，并写了编辑部按语：

陆定一同志这篇文章·是根据党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写出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即将有指示发给各级党委·表们希望各级党

委在讨论党的指示的时候，结合陆定一同志的文章予以讨论。在学校党委讨论此事的时候，可以吸收非党的教授参加。

《红旗》杂志 1958 年第 7 期刊载了陆定一的文章。文章对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作了阐述：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个方针，是同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针锋相对的。一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表现为：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向专家领导。

陆定一的文章，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教育的一些根本性想法。9 月 8 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99 毛泽东：〈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批语、按语和修改〉（1958 年 8 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页 338—339。

，Jj 月牍一遛 j 购 j 趋唱一遛 jJ、ju” 胧 J 月 J 冯月月” q “肌剧引届 1，，中。仁、1，

2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9 卷（1958—1966 年运动

教育这个东西比较夸原，1J 性，牵涉广大知识界。走一个革命，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大道理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懂得，没有问题，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二那些学生们谁那寡作工。老读奋，实在不是一，办法。书是甚厉害东西呢 P 书沈是一声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S11 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动工伦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00

后来，毛在 1966 年的《五七指示》101 中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亦工、亦农、亦武、亦文的思想，与 1958 年的主张完全是一脉相承。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

「煎的教育工作方针同资产阶级教育工作方针之间的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 J。r 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
厦叩毛潭东 1958 年 9 月 8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载《建。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七册：页 396。

1011 久语年 5 月 7 日·毛潭东致信林彪，认为军队是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农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叹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翔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瓊几项都可以兼起来·Jr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r 农民以农为主 J；「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到资产阶级，学尔要编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烟颇下去了。」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建。以来毛观文稿》咙京：中央文戏出版社，I”，】第十二时，万”一“。

第三章大炼钢织和人民介社化运动

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现行的学制「需要积极地和妥当地加以改革」，r 高等学校的教材，应该在党委领导下探取党委、教师、学生 r 三结合」的方法，经过大鸣大争大辩，认真予以修订」。教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应当贯彻全党全民办学·要批判把教育工作神秘化，「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委不懂教育」，r 群众不懂教育」，「学生不能批评先生」等错误思想。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的任务。争取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10Z

根据中央的精神，高等学校开展群众性的教学改革运动。许多学校调整了系科、专业，组建新专业；将生产劳动引入教学计划于师生下厂下乡搞现场教学、调查研究、参加实际工作；搞单科独进或按生产过程组织各门课程的综合教学；聘请 r 土专家」、劳动模范，生产能手

到学校任教，工人、农民上讲台。

与之相应的是：组织高等学校学生和青年教师集体著书，编写讲义，教材的活动进入高潮。如：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十个系的高年级学生共成立了 256 个教学改革小组。学生和教师发生不同意见，学生就采取所谓「打擂台」的方式，和教师分头准备提纲，然后讨论，共同制定新的大纲；有的采取「唱对台戏」的办法。学生和教师各自制定教学大纲方案，然后两方面摆出来，进行评比，展开辩论。物理系电工组的学生觉得教师编的大纲「空洞」，就去工厂找工人，提出电工课新内容。中文系学生收集历代大量民歌和民间文学资料，同教师展开九次辩论，「终于推倒以剥削阶级文学为正宗的旧教学大纲。建立了以人民文学为主线的新大纲。」据报道，该校这样由学生提出的教学大纲共 169 份，教学计划四十七份，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 127 门课的教学大纲的改革工作。103 清华

1 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 年 9 月 19 日）《文选》第十一册，页 489—491 页，

103 〈北京师大实行写组，专家、学生三结合制定新的教学大纲〉7 月 17 日。

日）1 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8 年

个名啊个酒’：1j 坤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大学机械、电机、土木、水利、建筑、动力等六个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编写出教材、教学与科研参考数据等九十五种；内蒙古大学师生编写出《内蒙古现代革命史》等。10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材〉的社论，推荐河南省农业林业教育工作者编写教材的经验，提出编教材也要两条腿走路，中央编，地方编、专家编、教师和群众也编。这一些新编教材和大纲，除了服务于批臭「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政治需要外，并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根据实行勤工俭学和半工半读的指示，各地大中学校都掀起了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全日制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就曾宣布实行半工半读。湖南省有一些大学和大批中学与工厂合并，据 1958 年 11 月的不完全统计，湖南全省已有五所

高等学校和四十所中等学校分别与工厂合并，有六十七所正在准备与工厂合并，还有部分学校与农场或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合并。中共四川省营山县委通知全县中小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安彻师范专科学校有的班级勤工俭学时间，每人每周达二十小时；云南有的高等学校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或白天学习、晚上劳动。1”

7月23日《光明日报》报道：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门化四年级的一百一十多名学生，为筹集建设半导体工厂的资金，到车站参加卸煤，到工地进行挑土等劳动。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的学生用芦席搭成了几个厂房，利用旧机器，改装了茶炉房的炉灶，生产出了很好的药品。石家庄医士学校办起了一座年产五吨细菌肥料厂，得到了中共石家庄地委的奖旗。这篇报道还列举了各地一些学校办工厂的数字：合肥的四所高校已办和在办的工厂就有一百五十多座，长春的汽车拖拉机学院已办大小工厂一百二十多座，山东大学从6月底到7月13日已建和在建的工厂有五十八座，不仅理工科办工厂，文科也大办工厂。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和中共党史系的学 104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工 957—1967}），页 120。

第三章天炼钢织和人民夸社化运动

生，两天内就开办了包括炼铁、炼钢、化肥、造纸等小醒工厂五十多座。山东大学文科各系学生办起了钢铁厂、金属加工厂、农场’补鱼大队十五六个。这表明，学校办工厂、办农场，已与 t 时工农业「大跃进」的气氛完全融合到了一起。

再就是刮起了大办学校的浮夸风。1958年6月底，全国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宣布「普及了小学教育」；全国有1517个县，市上报「普及了小学教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66.7%·河南省开封县大放F卫星」，宣称：11月10日至12日三天时间实现了全县「大学化」，建立了以中学为基础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新型普通「大学」十四所《全县十三个人民公社，每社一所，县办一所），共1998个班，学生71037人。除了这些虚假报道外。真实情况是，1958年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9所发展到791所；在校学生数由1957年的44.1万人，增加到66万人。「红专大学」蜂拥而上，不知其数。中等专业学校（含中师）由1957年的1320所，增加到3113所，在校学生数由1957年的

77.8万人增加到147万人。农、职业中学原来没有一所】一下子发展到二万多所，在校学生达到2的万人。成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由1957年的330万多人增加到564万多人。由于教育经费增加无几，1957年为19.52亿元，1958年只增加3100万元；教育经费1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57年的6.42%下降到4.84%。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所能承担的能力，造成了教育与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仍

总之。1958年的这场教育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1960年代初】周扬在一次会上就1958年的教育革命说道：

篡本理论知识哀鱿有所6'.1弱

基本历史知识以及奉本技能的训练·在一些学校有些学校政治活动搞得太多，教学的时间可以挤

摔。学校停止教学搞政治运动’就等朴工厂农停止生产搞政治运

10，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上册口匕京‘t代中国出版栓，1996)。页九

·女J盈

蟀人“和驮·第四春(1, ,8—1,61)一骤年翻

动。学校把教学，主要是课堂教学挤到了一个不t要的地位·有些学校甚至不取提以教学为主，出现了「生产带教学」这庆一些不妥当不正确的。号。1D6

陆定一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么次谈话中也曾说过：

缠J,1'个1闲j文d

开朴教育革命，1958年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对不对P这个。号还是对的，我们理工矜大学还是要实行这种结合。可是提的时间不恰当，办法不对，没有详细规定具体办法，先在少数学校试验，然复雄广。结果是全国一哄而起，实际上形成一个时期的停课。那年秋天，我到各省看一看，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读书，上山去找铁、找煤、挖红薯···一实际上把教育搞乱了。’叮

调十■犊，,一名么.亡禹f细一

当然，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也有一些积极的东观。有些高等学校闯出了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路子，实行「真刀真枪」

地搞毕业设计（论文）—清华大学承担了密云水库和北京历史博物馆工程，南京工学院承担了北京火车站的工程设计，108 与业务部门合作搞科研等，也为后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经验。

3 科学界的赶超运动

同教育界一样，科学界 1958 年也卷入了「大跃进」的浪潮。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之后，1958 年 2 月 13 日到 15 日，科学院在北京举行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大跃进。

中国会议

1 “周扬在全·高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显选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4 月），载《北京师大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讲义：（中·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页 1”；权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页 126。

107 陆定一：《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 700 · 108 《时代中的教育》，上册·页 7’，

第三章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提出的口号是：鼓起干劲、多快好省、一心一德、又红又专、重视劳动、服从组织、加强合作，实现规划。院长郭沫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使科学大跃进。郭沫若说，过去的两年为科学技术大跃进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超额完成，为科学技术提供了更好的装备；国家对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已经大大增加，现在科学工作者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是地无用武之英雄了！会上，许多人发言认为，科学工作和工农业生产一样，完全可以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来一个大跃进。同时强调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跃进是科学跃进的前提。科学大跃进的关键在于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而老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尤其重要。不少研究所负责人在会上提出了本所的跃进目标：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副所长龚祖同提出：「苦干五年，争取提前两年（即在八年内）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的主要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石油研究所所长张大煜表示，在五年、七年之后，我国在页岩油、水煤气合成石油生产方面将远远超过英国，西德和美国，并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达到国际水平。

”

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强调：「为了实现科学事业的大跃进，就一定要明确科学必须为生产大跃进服务这个根本方针。」
110 此后，中科院各研究所纷纷制定跃进计划。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了全院的跃进计划，包括二十四个方面的任务，其中直接为工农业等国民经济服务的就达十八项之多，另有四项明确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6月3日和5日，中科院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举行跃进大会，响应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号召，庄严誓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向世界科学高峰的大进军」，参加大会的有在京学部委员、各所工作人员和外地单位负责人共一千八百人。各
1 储〈科学院举行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大跃进〉：《人民日报》·1958年2月21日；《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6号·页150-

110 聂荣臻：〈科学事业必须为生产大跃进服务——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8年3月15日；《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7号，页150，

唱。闻 J。■扣。 ”：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49—1961）——鸟托年运动

‘。？、、’。』（’’编。、。才，喻鸟，。、菱兹姿‘烟 r 谁澜’ J 玉甩。、，哺，。： 缮， .A., 7’ →, ...’

•’ ■. 、， ... --。 Ik 叔响户 JJ.’.’. 、。

单位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指标比不久前在各学部跃进会上提出的指标又有提高，而且互相挑战】彼此竞赛：指标一再跃进。

自动化研究所保证在五年之内召和其它部门密切协作，解决三峡综合自动化的主要技术问题；在自动化工业生产方面，搞出一套最新颖的仪表和自动化技术工其的标准化和系列化。地质研究所决，合把原定十年完成的三十四种稀有元素的研究提前完成，并在石油地质的研究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水利科学研究院要在最短期间提出小河流水文计算必需的数据和方法，做到哪裹有水利工程，哪裹就有水文数据和方法。生物学部昆虫研究所增加的新指标是：提前一年完成六六六水稻内吸作用和杀螟毒效的研究；再提前一年在两年内完成全国粮食昆虫区的调查；立即提出综合防治棉盎的方案·植物学家决心在三年内

完成下列指标：制定固沙方案，防止沙漠南移，保护农田于把草原地区牧草产量提高三至十倍。动物研究所动物形态学组的专家们决定：大力研究器官与组织的再生和衰老问题】以及神经系统与内分泌器官的关系问题，满足人类延寿的愿望。”’

《人民日报》报道，就在中科院各研究单位提出跃进规划的同时】最新的捷报已经纷纷传来。地质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向大会报喜，该所中心分析室经过跃进，已经把每个岩石标本分析的时间由过去的九天缩短到现在的一天。化学研究所的青年工作人员突击十三个昼夜，已将一向视为神秘的十一种稀土元素提取出来，而且光谱纯度一般达到国际水平，其中钬的光谱纯度超过了英国名牌约翰逊厂的产品。应用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工厂工人奋战一天，做出了过去认为要几年才能做出来的六十五兆周百毫瓦的高频晶体管、比长仪、低位错的诸单晶、纯度达五个九的锑等等。111

In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举行跃进大 t〉《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13 号，页 121 — 122 • 112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举行跃进大 t〉（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13 号，页 In。

，（人民日报）• 1958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8 日；第三幸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243

6 月，中科院党组向中并中央提出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十年赶上美国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十年内做到三件事’一掌握新技术，重点项目是卫星上天和原子能和平利用；二、促进国民经济的科学化，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解决中国工业、农业、交通和卫生事业中重大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三、培养和建立一支有四五十万人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干部队伍。

全院跃进的形势导致了中国科学院组织机构的急剧膨胀，特别是 1958 年 4 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中国科学院分院的决定以后，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建立起地方分院，到 1) 阅年底，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已有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分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 224 个院属研究所（包括与地方双重领导的研究所》，分院和地方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已达 35318

人。’ ”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聂荣臻〈全党抓科学技卫工作，实现技术革命〉的文章。在此前后，在大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下，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以至一些中小学校掀起了科学研究大跃进的热潮，大搞以「猛攻尖端科学 J、 「生产尖端产品」、 F 技术革新」、 r 创造发明」等为内容的群单运动。并在「七一 1、 「八一」、 「十一 J 等纪念日前搞突击、 苦战，开展献礼活动。

1958 年种种达背科学发展规律，人为地去追求高指标的「科学跃进 j，加上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定期「献礼」而出现的浮夸风，以

113 钱临照·谷羽主编：《中国科学院》·上册（北京：t 代中国出版社，1 州. ， 页叩·在大跃进中，科研机构的急剧膨胀是缺乏生命力的· t 时，多数分院是在地方领导支持下，采取边建边干边学的方针成立的一些研究所·但这二十六个省的分院中，. 相当一批分院没有一个高级研究人员，多数机构仅拥有少数大学生和中专生. 多数成员是中学生，因此「边学」对这些机构成为首要任务·许多分院成立了数个研究所，但没有一个研究所有专职所畏·有的分院是先挂起牌子. 但没有研究. 构，也很少有研究活动·由于分院的研究力 t 薄弱，就只能依靠当地的高等学校. 整个来说，在大. 进中建立起来的分院及其研究机构的共同特点是‘缺少研究人员和设备. 任务方向不明确，能进行科学研究并生存下来的是‘少数·如上梅原子核研穴所和攫。自训匕研究所等，这是和当地具有相当的经济‘社 t、教育和科学环境分不。的，而镶些条件为许多其它地区所不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及由于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j 的观点，从领导到群单接受了「卑残者最聪明，高责者最愚蠢 J 的信念’、出现的再一股恶风——瞎指挥风。这种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的结果，使科学研究的正常秩序和人们的思想被扰乱，造成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的极大浪费。当时·许多跃进项目不再征求科学家的意见而根据政治需要进行，有的科学家提出才自己的不同看法。如金属研究所所长李熏拒绝在所内建土高炉炼钢，由于他的声望，金属研究所没有卷进大炼钢铁的热潮。但是更多的敢于坚持科学精神的、持有异议的科学家却这到了批判。不少科学家只能缄口不盲。如此的「科学跃进」使中国科学院元气大

伤。如：

当时应用物理研究所提出若干天内做出 80K 的超导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低温学家却毫无发言权。在全国号召「大办原子能和加速器」的影响下，中国科学院很快就成立了七个这类研究所，最后只有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能够维持下来。北京的六个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被迫与农民「打擂台」，提出了一些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能实现的「农业丰产边指标」。许多科学工作者还为此去试验田裏消耗了一年多的时光。对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的。8月初，毛泽东视察徐水时，提出了要考虑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8月6日和7日，中国科学院领导层连续开会，研究落实毛泽东提出的科研项目，最后把粮食综合利用和研究的任务下达给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所。“六个研究所接受任务后。停止了许多已经连续多年的重要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研究技术人员，于8月25日同时启动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以解决扩大粮食用途和利用粮食解决有机化学工业原料来源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把淀粉、蛋白质这样的大分子化合物分解成相对小分子量的化合物来利用，是不合算的。世界粮食生产大国都不走用粮食转化为基本有机化工原料的路子。因此，尽管有114所的应用化学研究所；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北京的化学研究所；上海的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

第三章大练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的研究组把粮食转化为酒精，再以酒精制取乙烯（制备合成产物的重要原料）；有的以酒精制取丁二烯，再由丁二烯制乙苯（均为制造合成橡胶和其它高分子化合物的主要原料）；有的从大米中分离出淀粉，然后制造林业工业上应用的胶合剂、造纸工业上用的洗涤剂、涂料；有的从粮食分离蛋白质】用蛋白质生产塑料和人造羊毛：等等。”但所有这些「成果」都不实用，不切合实际。何况中国的粮食还根本不够吃。用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花了一年多时间来做那么多工作，最后全是白费。

当然，「大跃进」期间，科学技术工作也有一定发展，在历史上也留下一定的正面影响。如半导体、电子学、计算器、自动化等学科在1958年以后发展比较快。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是在1958年提出并开

始工作的，第一个人造卫星和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设想是 1958 年提出的，原子弹、导弹的很多研究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同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获得了重大成果，除了计算器、半导体等四项新技术外，高温合金、特殊化学材料、超纯金属、超纯分析，高能燃料、水声、稀有元素地质、高空物理、地球化学、微波技术、爆炸力学、新型光学仪器等领域是这个时期新开辟的。在这些研究中，获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如高效能炸药，真空阀门、高温涂层、氟有机塑料、顺丁橡胶、大功率微波电子管、天文望远镜、大型经纬仪、硅半导体器件、攀枝花矿石冶炼，等等。不过，同严重的后果比较起来，科学技术这些发展是有限的。

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科学探索既需要勇气与创造，又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应该高速度分秒必争地发展，又需要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任何违背科学精神的行动只会带来与愿望相反的不利后果；科学家无穷潜力的发挥，需要的是爱护和激励而不是批判和伤害。

115 薛一皋：〈自然科学研究！目结命政治的教，11—荒历的科研课题「授食多了怎么

办 j) 出版社

载邱石编：《共和·，大决策出合前复》·第三卷，上珊（北京：经济日报 19981·页 236 一劝 9·

写万个遗屋偿·唱坛·百·股砖涌· j 滤 j 顷 j 叹■ j 泸 ‘Jj”J “柑 jjj1”1j “缠储俳 j

妍 6

4 文化事业大跃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0 年）——“大跃进”运动

几乎与工农业「大跃进」兴起的同时，文艺界也开始了「大跃进」。在 1958 年 2 月上旬举行的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鼓足革命干劲，促进文化高潮〉的发言中，就明确提出了文化工作大跃进的问题。他具体介绍了湖北省孝感专区的经验，要各地仿办。钱说，孝感专区对去冬今春配合农业生产大跃进，作了一个群众文化宣传运动的规划。这个规划要求全区组织一支五十多万人的

文化宣传大军,其中包括专业文化队伍 2108 人,业余文化队任沾 8375 人;根据各县、区、乡、社的典型材料,创作宣传演唱材料 5949 件,其中剧本 321 个,供应各种宣传资料 49 万份,图画 276 幅不举办固定的展览室 17 个,流动展览 6438 次;举办大、小戏曲歌舞会演 298 次;编墙报 5860 块,黑板报 23050 块,布置昼传橱窗 228 个。同时要求发展农村俱乐部 681 个,发展宣传员 63000 人。钱提出,这样的规划在全国各省、专、县也都可以仿办。他还要求,全国一切文化机关、团体和文化工作者,紧紧跟么今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面向工厂、面向农村、大量创作为群众所喜爱的促进大跃进的新作品和新电影,大大地加强对工农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辅导,大大地供应他们各项文娱资料;协同现在大批的下放干部,在工厂、农村大大开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并且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帮助发展群众业余文化组织】首先是俱乐部的组织。大力发展群众自办的文化事业和群众业余文化活动,这就是在 1958 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文化工作积极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音乐工作者提出,1958 年要「掀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歌咏浪潮」。，”体育工作者更提出;为使体育运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

116 钱俊璘:《鼓足革命干劲促进文化高潮》,《新华半月刊》·1 站 8 年 6 月号,页刃·117 骊希贤、郎统秀、马思聪·贺操污、吕颈 ‘〈掀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歌咏浪潮〉,《新华半月刊》,1958 年第 7 号,页 73—74。

第三章天练钢织和人民介社化运动

247

建设事业服务,体育事业也必须不断跃进。力争在十年左右在主要运动项目上,赶上世界水平。11s

全国人大会议刚闭幕,中国文联及各协会、各研究会即分别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展文艺创作以适应全国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与会者认为,国家现正处在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前进的时候,如何把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面貌和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在文艺创作中反映出来,以进一步鼓舞人们创造性的劳动热情,是全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提出要「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来一个大跃进」·会上,不少作家、

艺术家发言，表示了对「大跃进」的热情。老舍说：党中央指出，对各种建设事业成效的估计，应该是五年看三年，三年历头年，我们文艺创作也应该这样。1958年是「二五」计划的第一年，又是建国十周年的前一年，文艺界一定要有一股热情和干劲，拿出一些较好的东西来。欧阳予倩说，剧作家应当多写，题材、风格要多样，在艺术创作上也要力求多、快、好、省。中宣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会上发言，对「要文艺创作来一个大跃进」提出了具体要求。119为推动文艺「大跃进」的展开，3月7日，中。作协向全国作家发出〈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号召信。则

信中充满激情地说：

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高潮已到·人人兴奋·个个当先·随时随地出现奇迹。一天的奇迹就够写成许多部史诗、戏剧和小说的。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同志们·我们怎能不高兴、不欢喜·不想变成三头六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双管

118 柴高棠：〈力争十年左右在主要运动项目上赶上世界水平〉1958年第6号·页73—74·

《新·半月刊》·

119 中。文联及各协会，各研究会讨论发展文艺创作以适应生产大跃进。《人民

报》，1958年3月1日‘《新·半月刊》’1958年第7号，119—120。

120 《作家们大跃进·大跃进！》，1958年第7号，页53—54），（人民日报），1958年3月8日；《浙事半月刊》154。

2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0—乌托邦运动

齐下，快·马加鞭，及时报道·及时歌颂，纹舞更大的干劲，叫前人所不敢梦想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实现在我们眼前呢！这封信要求作家们：

修正补充原定计划，把全力而为·从容不迫变为全力以赴，即刻杀上前去，叫我们的计划成为作家队伍中的「急先锋」的计划。每个计划都必须增补上反映和纹舞当前大跃进这的短小精悍的作品若十万。原定

的长篇一定要黑计划而行，既快又好·保证质量。同时，也铃定写些短的·随时姿表。我们舟长检·也要短棒，不论长短，一概要有所创造。··一要注意到：学习新的技巧，充实写作本领·使我们的思想跃进·本领也跃进·没写过诗的，试试看；诗能更快地反映当前现实。没写过歌词的，试试看；全国到处都迫切需要配合跃进的新歌，大家都唱起来，拎劲统更大。写评论的试试创作，创作的也试试评论。同样地，试试相声，鱿词·以黑各种戏尚。要叫我们的计划凑在一起就是文学的首货供应总站，要甚庆有甚广，而且具有新的风格，和有普及石提高的特色·

继文联、作协之后，文化部也很快作出关于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的决定。要求各制片厂必须继续鼓舞群单对大跃进的热情，在电影制片工作中全面地贯彻多，快、好、省的总方针，大力争取完成并且超过各厂的生产计划。为了实现电影大跃进，文化部电影局提出，1958年完成大型艺术片八十部。其它各片种产量也都增加到一倍或一倍以上；1958年生产各种电影放映机3800台（较1957年增加69%）·要求做到「省有製片厂、县有电影院，社有放映队」·全年全国映出四百万场，达到三十亿观众人次，上缴发行放映利润及税金10700万元。此后，在全国电影发行放映战线也刮起浮夸风，出现「通宵场J、r鸡叫场」等等，

第三幸大练钢织和人民介社侈运动 249 北戴河会议宣布钢铁翻番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9月13日至20日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10月，文化部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全国文化行政会议·讨论拟定了1959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文化事业的方针和规划。要求在几年内达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唱歌，人人能创作，人人能舞蹈，人人能画画·一」；「要全党全民办文化，行行放卫星、层层放卫星」

在上级领导和机关部门的要求下，各地文化部门下达了放艺术r卫星」的指针，以及硬性摊派任务的现象。有些地方提出了「消灭空白点和空自人J，要求把小孩和老人都组织到文艺活动中来。除了扭秧歌等群众性歌舞活动外，搞得最火红的是新民歌运动了。这种新

民歌最早是出现在1957年冬至1955年春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中。这些生产中的顺口溜，颇为毛泽东所重视。1958年成都会议上他说：印了一些诗（指会议印发的一些古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阶层的人，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了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这样。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毛还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的主义的对立统一。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12[

121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页233—234；《建口以来毛泽东文病》，第七偶，页124·

乃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客（1958—1961）—鸟托年运动

于是，成都会议后，搜集民歌的工作立即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许多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宣传部专南发出搜集民歌的通知。4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社论说，从已经搜集发表在报刊的民歌来看，这些群众的智慧和热情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满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诗言志」，这些社会主义的民歌的确表达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尚志向和豪迈的气魄。社论热情欢呼：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4月26日，中国文联、作家协会和民间文学研究会举行民歌座谈会，提出收集、整理民歌、民谣的工作，建议成立全国编选机构。统一规划。《文艺报》第九期以〈采风大军总动员〉为题，作了报导。

《民间文学》从三月号起，开始选登各地大跃进民歌。各地很快就编出了一本本「新民歌」集—「大跃进民歌集」。为了编这些民歌，各

地发动群单编歌「作诗」，当作任务布 t 下去，甚至规定硬指标，上自六七十岁的老翁，下至八九岁的孩童，人人都要作诗。当年被当作范例广为传播的有：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此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这，我来了。

· 踩地地要塌·，天塌社贝补，，集体力量大。

被家导要搬领天能好天山的总大党

拎劲真是大·海洋能驯月良，地裂社员纳，

- . 』 ' ' 卜 . 汗谬” ‘电瓌优召

太阳太阳我问你·我们出工老半天，我们模黑才回来·太阳太阳我

F. 1 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P 你睡懒觉迟迟起；你早收工进地农。取不敢来比一比 7

第三幸大练钢织奉人民姿社化运动

251

拎邵能拿梯·或们能上天·拎部能下海，我们能榆龙·拎部能翻山·大海我们填。

千条龙，万条龙，首尾衔接上高峰，张。喷出江海水，满山适野响漂漂，天旱也要吃饱饭·乾坤掌极人手中。

说到鱿能做到，请记下衣们的誓言，七八年不赶上英国，算不得英雄好汉

炉脍钢水沸腾腾，千度高温算得哈·

条绿火龙往外奔。不及工人火然心。

乡头一举火花溅，奇迹犹如春潮泛·一锤一个新记练，五年计划三锤完。

从内容上看，这些新民歌，基本上都是「大跃进」时代的弃育壮语，反映了浓烈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气氛。但在当时，却受到了领导层的极大肯定和推广。

1958 年《红旗》第一期刊登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文章开头引用了一首民歌：

厦 1 滤顶领顶顶 j1j 细 Jjj 渎 1

如今唱歌用呆装，千箩万萝堆满仓·别看你是。头语，搬到田义变米粮·种曰要用好锄头，唱歌要用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舛水例流。

周扬解释说：这是安徽省新出版的《大跃进民歌》第一卷的卷头诗，它表明「人民群众对自己旺盛的诗歌创作作了一个充满自信而又正确

.J.-.,.' ¥. 、. 1 ' "鸟边 1 奋画召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并运动

的评价」。「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r 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周由此展望说「群众诗歌创作将日益发达和繁荣，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 t 源源不断出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这样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的。」122 如是，新民歌不只是被当作鼓舞生产热情的号角：而是被赋予了取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意义。人人能作诗，人人能赏诗，这正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新人」亦工亦农、能文能武的理想。对当年这种新民歌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也及时作了报道。其中有：

福建省同安县民歌协会创办的「田头诗坛」J。即在田头上挂上黑板，在劳动中谁有感触想写诗，就直接在黑板上写。报道称读：「半夜三更战鼓鸣，群英跃马齐出征，试验田中比干劲，光荣榜上争题名。」「铁镐高举，猛刨深睡地，田上翻三番，亩产三万一。」说】这样的诗句，令人愈读愈爱读。‘

江苏省常熟县白茆乡·是和平人民公社的所在地。报道说：「走进公社的大门楼一律写满诗歌的白粉墙迎面扑来。歌颂人民公社，歌颂共产主义的新山歌，简直叫你目不暇接·横穿街道的巨幅标语写的是诗，田间数动牌，责任牌上也写的是诗，展览会裹的说明词是诗，连食堂、旅馆的走廊和墙壁上也全写满了诗。」其中有：

小农经济独木桥，合作社是康庄道·人民介社办起来·天堂哪有人间好【

1 发言答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2号，页127,129”

（田头设诗坛），《人民日报》，1958年9月4日。转引自《老统
闻一共和国往。化外6—1劈8计》·厦260—认1·

第三章大练钢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东风力量大无穷·吹得迷信连根讳，吹得保守一帘空·吹得落后沉海
底，吹得实穷影袅踪，

白节乡大变样，

白节培开得像运河样·

两序房子造得一式样，

屋援花园门前场，

电灯照得满场亮‘

为新民歌而欢呼的，不仅有周扬这样中共高层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负
责人，还有闻名中外的文学家。1958年6月16日，郭沫若为《大跃
进之歌》作序说：「目前的中国真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
宙必六亿人曳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气
势磅礴，空前未有。Jr 在这里似乎显示着新诗歌的一个方向·J’2’
其热情滋于育表。

应该说，当年人民群众的的热情和干劲，确实是极可贵的。1958年中
国电影界曾取得不小的成绩，全年拍摄了九十六部故事片，八部戏曲
艺术片。故事片主要有《黑山阻击战》、《长空比翼》·《红孩子》
《铁窗烈火》·《英雄虎胆》、《党的女儿》、《永不消逝的电波》
《狼牙山五壮士》、《黎明河边》等；戏曲片有京剧《群英会》、《借
东风》、《望江亭》、越剧《情探》、豫剧《穆桂英挂帅》、赣剧《珍
珠记》、秦腔《火焰驹》、曲剧《下乡与赶脚》。但是，虚假的浮夸
风，也把人们刮得个个 t 头转向·仅就新民歌而言：河北丰润县出了
个万诗乡，据下乡干部反映：诗并不全是群众创作的，而是几个下放
124 向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语》·下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1983），页2”·

2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1）—鸟托年运幼

干部连夜赶出来的，实称群众创作

徐水人民公社画的壁画，是花钱从天津请人，周恩来就曾对文艺界放卫星提出异议。明确表

示：必须，、乱，、！。件；、。、，、’’’。卜，。

不赞成要求文艺简单配合政策的做法。指出，精神产品不能放

01 乃

，星示卫

5 除「四害」讲卫生运动

医疗卫生工作的大跃进，是跟着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一股风刮起来的。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对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运动进行了讨论。根据这次全会精神，当年11月，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专门召开了十五个省、市爱国卫生运动经验交流大会，为全面深入地推进这个运动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说：

才？常、访坛冬书届个

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形成。在全国各省市，广大群众正在大规模地行动起来，消灭老鼠、苍蝇、蚊子、提倡卫生、消灭危害当地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并且纷纷提出规划，准备在几年时间内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提出的要求。截止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和直辖市，已经有北京定为两年，河南定为丰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江苏定为四年，山东、山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甘肃、辽宁、黑龙江定为五年，安徽定为五至八年。决定在今年内就实现「四无」的市和县，有江苏的南京、常州、镇江、南通，山东的济南、阳信、单县，河南的郑州、开封、洛阳、焦作、登封，甘肃的兰州，山西的屯留，河北的蠡县、河间。

12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降）中卷，页 199。

第三章天炼钢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专区必须在，」。年上半年定出本区的除四害、讲卫生内消灭重要疾病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并按月按季加以检查评比通报。力求在 1958 年内为这一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在几年内消灭四害，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使全国的卫生状况大为改观。」¹²⁶

《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的社论，介绍了历史上多发鼠疫的福建省澄歧村：从 1956 年起发动群众消灭老鼠，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基本上实现了消灭老鼠，也消灭了鼠疫的无鼠村；山东省莒南县程家皎村，经过五年的不懈实斗，使原来落后的山区村庄成了消灭四害的模范村等事例，得出的结论是，「事在人为」。强调：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鼓足干劲，雷厉风行，按月按季检查督促，坚持到底，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

就在同一时间，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发言提议：「在 1958 年内每省至少出现一个到几个四无县或市；省市以下的地、县、区、乡，社、街道办事处则应创造出更多的四无单位。」希望各地「现在就要为在 12 月召开的各省市除四害运动的评比大会，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访问各省市代表也在会上纷纷登台表态：浙江省代表说：杭州市决心要在两年内消灭「四害」，同时还要消灭钉螺、纤螂，臭虫，使杭州成为又美丽又清洁的「七无」城市。江苏省代表说，江苏人民将用四年时间基本上消灭「天上飞、地下钻、繁殖快、分布广的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两年内「消灭吸血虫

1

126 《建国以来，要文选编》，第十一册，页 1 “• 171 — I 兀. 127 <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 《人民日报》社论，1958 年 2 月 13 日；月刊），1958 年第 5 号，页 154 — 155-

128 李德全：《除四害·讲卫生，造福人民·造福子孙》，《斯·半月刊》第 5 号，页 91 •

129 张杏花：〈搬倒垃圾山·填平「摘害」河’小营巷要一年内诚从「七害」〉半月刊》• 1958 年第 5 号，页 54’

《浙·半

1958年

《新华

一驴不一· 豸留，励·斗狗

厦届刁，月尸· 细，酒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四卷(1958—1961)一鸟托年运动。‘”甘·省代表在会上表示：「甘肃计划三年内肃清 r 七害」(老

鼠、麻雀、苍蝇、蚊子、臭虫、虱子、白蛤子) J·。

北京市代表以〈首都布下天罗地网，鼠雀蚊蝇无处躲藏〉为题发言说，首都人民「正从四面八方，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搞得它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彻底消灭干净」J0132 山西省代表汇报了稷山县太阳村变成「四无」村的经验，并说：该县 1958 年国庆节前将成为「四无」县。山西在三年到五年内，也将成为「四无」省。表示山西人民将满怀信心地开足马力勇往直前！’”

此后，全国城乡掀起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如重庆市灭鼠，安庆市灭蚊，都曾取得过一定效果。四川省重庆市除有家鼠、田鼠外，在全市蛛网交错、长达 144 公里的下水道中还藏有许多沟鼠。全市人民在市委领导下，同时采取行动，在通向下水道的七千多个深井处点火烟熏，消灭了大量的沟鼠。安徽安庆市濒临长江，历来蚊虫多，全市居民除了清除孳生地，并在同一时间内展开烟海战术，先室外，后室内，用药物烟熏，一举消灭大量蚊子。在除「四害」运动中，声势最盛的是消灭麻雀。1958 年 4 月 20 日、29 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了北京和上海围歼麻雀的战况，标题分别为：〈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三百万人总动员第一天歼灭八万三〉’；〈上海人民大战一天—灭麻雀掏雀蛋共二十五万只〉·，报道说：

19 为清晨‘时左右· 首都数百万群众拿起锣钹响器、什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八百三十多个投药区彻

t 文蔚：〈两年内要消灭吸血虫病〉·

：(甘肃计划三年内肃清「七害」)

《新华半月刊》· 1955 年第‘号，页 39—40，新华半月刊》：“ 58 年第 6 号，页 44—45

，、炉 f 吃汪 k

邓宝增吴哈：

〈，都布下天罗地网，鼠雀蚊蝇无处躲织〉，《新华半月刊》，1958年
年第6号

303132

页93—94·

133 李辉：〈窝足、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页96·

1 斗见〈老新闻—共和·往事（珍56—195田）〉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6号页7—249，

第三章大练钢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257

上了毒饵，二首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s 时正·当北京市
围。1J 库准总指挥工昆各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八千七百多平方公
里的广大地区农，立刻锣纹唯天，粗炮齐鸣，检声森响，彩旗摇动，
房上、树上，院东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看天空·侃人、草
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
民、拎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全市形成了一个
募势浩大的「麻雀过街，人人喊打」的涌面。被森赶的麻准在天罗地
网中到处乱飞·找不到楼息之所。一些疲铃奔命的麻雀被森入施枚毒
饵的夸捕区和犬检织灭区·有的吃了毒未中毒丧命；有的在大检声寡
中祥死亡。

为了摸清 r 敌情」围。1I 麻准总指挥部还派出三十辆摩托车四出侦
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城灭麻寥。市、区总指挥，
昌唱总指挥等来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纹声，丰十多个神射手埋伏在织灭区
哀。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衣九首六十六双·其中累死的占‘0%。在
南苑束铁匠营乡承毒寺生产站的毒饵诱补区·在两个小时内鱿毒死
麻准四窠双。宣武区陶然争一带共出动了两千居民围别麻本，他们化
麻雀哄赶到陶然亭合园的纤减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哀·在大
半天时问襄·共消灭麻衣五百二十双。在海淀区玉澜津酋周十里的范
围内·丰千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牌”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牌赶到

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看小船集中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藤水中。

新华社记者从上海报道说：

上海市人氏 27 日展开了一场全面围剿麻雀犬战。这一天共歼灭麻雀二十万一千六百二十四双·鸦毁雀窝十一万零六百二十一个，大战前夜·全市便已布置了一个天罗地网。在每个建来物上都安有草人、假人·平均华十平方公尺就设有一个悬赶麻购的岗

2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呀春（19 绍一 1961）—乌托作运动

哨。早晨 5 时，全市灭雀总指挥、上海市钊市长金仲华向全市人民姿布总攻击命令以彼·设在大楼屋顶上、树上、路旁、质吁间无数的岗哨立刻金鱿齐鸣，红旗飞舞·对麻牌展开了鼻、赶、论、打。由朴上海人。密集，保证安全·没有采用检打，施用毒斜也只有极个 X1J 地区。早州，麻准还没有我到食物的时候，便受到鼻赶；黄昏时分，麻寡归窝找不到家·疲德不堪·有很多白行坠落或被捕。

徇获麻牌蛋是这次战果中的一大却分。上海市光进生产者、上海钢铁二厂·t. 佛祥父子四人·跟看准羹的痕迹找到六百多个牌窝，因此徇到了七百五十双牌蛋和 triples 麻雀。徐汇区的居民一边鼻赶·一边把鹤笼哄放·许多麻准适进鹅笼，活捉到许多。全市灭衣总指挥金仲华晚上 7 时向全市人民泛质获得的辉烟战果，……他要求市民们总结经验·准备到麦热收割以复再举行一次全面围剿犬战。

这两篇报道，真可谓是文情并茂，形象生动的佳作，使后人能如临其境地了解到当年围剿麻雀之战的盛况·但如京沪两市的总指挥所表示的那样，战斗并未结束，1958 年 12 月 13 日，上海全市再次开展麻雀大战，光这一天，又消灭麻雀 194432 只。上海作家沙叶新在〈1958 年的中国麻雀〉这篇维文中写道：

. 19 铭年我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嘉定县华辛乡建农四社进行教育革命，住在胡家村。12 月 13 日这一天的日记写看「市农决定今日打麻牌，郎区也不例外。上午三分队打·下午我们分队讨」。如今看来我所亲历的这一伟犬事件记练得实在走通朴简略了·真走愧对历史。经回忆，记得那天我和同学们分别爬在介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

地敲着锣、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东西·使疲仆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鸟枝可依·然复纷纷坠地身亡；如果解剖当年千千万万锻羽统毙的麻雀·我敢说，十有九是急性心肌梗塞·絮死的吓死的1

第三章 丈练钢织卡人民姿社化运动

乃9

对此，叶沙新大有感慨地写道：

每种生灵都鸡兔有灾有难，但不论是通街之鼠、总壁之规、丧家之犬、效窟之兔、热编之蚁、澜辙之鱼、瓮中之惊、车“之羊，都不如1958年的中国之牌那样的遭罪；那是一场浩劫，那是灭顶之灾。

对消灭麻雀，一开始就有科学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麻雀并非害鸟，牠虽有食谷为害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园林果木中害虫的天敌”1957年10月26日公布的「四十条」修正草案，虽曾改为「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裹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但1958年麻雀并未能逃过一劫。在科学家们的再三·「申诉」下，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才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奥虫、苍蝇、蚊虫』」。13，

135 最早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在1956年10月中国动物大t期间，以！驴生物·家朱洗为首的一批鸟类‘动物学家，他们广彻博引二出·内外许多胶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说明麻雀益多害少·朱洗还说了这样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滅麻雀，捕杀有奖，几年中，麻雀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果子诚绝·树叶也光了·届王于是不得不收回成命，还得从国外运回麻雀种·当时，朱洗，动物学家薛德靖，张作人·生理学家冯德培等的合理意见，并未为毛潭东接受·在1959年的，山会议上，牌到麻雀问题时，毛泽东说’

「有人提四害不行，除四害放罗了，还要搞·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记·副院长张劲夫专就麻雀问题将科学家的意见向毛潭东搬交了一份报告，毛将这·报告作为中央抗州*。的文件印发·于是才有1960年3月玛日「麻雀不要打了」的指示·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引，页81。这是「大跃进」年代‘科学家’持真理而被采纳的少有几件。令人遗憾的是，朱洗1962年病逝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扣上「公。反对毛主席，把毛主席消减麻雀同封建帝王‘雀模拟」等罪名，受尔挖邮砸斋。尸的野，惩罚·「四人帮」倒台复·冤案才得平反。

奋诵澜” 胧 “”” 辞胧” ” 啊数” 励” 刘以到刘刘引驯驯计丫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葱 {“58 — 1961) — 乌托年运动

！ 辈， 、 k ‘骗

爱国卫生运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消减地方性的严重疾病。福建·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省都是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地区。在工958年爱国卫生运动中，各地人民政府一边组织医疗队伍救治病人，一边发动群众展开了大规模的灭螺工作。浙江嘉兴地还创造了一种迅速灭病的做法。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负责人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说：「以前有些医学专家死啃看二十天的长程疗法，硬说推广『三天短疗法会多死人」。经过第四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采取鸣放、争辩的方式，扫除了某些专家的保守思想，个人权威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思想障碍，于是三天疗法在今春得以普通推行。」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已经根除血吸虫病的消息，并配发社论〈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宣称：r今年头五个月，在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上，打了一个大胜仗。五个月取得的成绩，使观潮振不得不认输了。事实告诉我们：安徽省已有十一个县市基本消减钉螺，全省血吸虫病流行区基本管好粪便》治疗病人也完成指标的40%以上。湖南省预计在6月底可将全省已发现的二十万病人治疗一通》并计划进一步覆查和治疗复发病。浙江省收治了三十五万余名病人，达到原订治疗六十万人的指标的58.3%。J

对全国防治疾病在短期内取得如此巨大成绩，毛泽东兴奋不已，他在7月1日写下七律二首，并在题记中写道”

读六月三十日《人氏日报》·余江县消灭了吸血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床。欢风佛煦·旭日临窗。这望南天，欣然命笔。诗曰：

!! 、二参菱发艺萎届唱

线水清山杜自多，华佗鸟奈小奸何！千村声荔人遗矢·万户蓄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这看一千河”牛恤欢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逊波。

第三章大练钢织和人民查社化运动

其二

春风场柳万千练，六亿神州画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看意化为桥。天连五岭罗舳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 f. 1 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人从连神医华佗都无可奈何的血吸虫，人民群单一经发动起来，很快就被消灭一事，联想到「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工农业全面大跃进的情景，使他坚信，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今天，还有甚么事情办不到呢？

但是细看当年报纸上报道，写的都是治疗了多少病人。并没有说治愈了多少病人。应当承认防治工作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宣布根绝了血吸虫病，显然是夸大了的。

总之，1958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在除害灭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也使爱国卫生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在不少地方和单位出现了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一是不顾实地情况和群众存在的实际困难，只是按照领导下达的指标要求，以行政手段强制群众办那些在当时条件下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如在夏秋季节不见一个苍蝇，一个蚊子，一只麻雀；厕所都要实现香化，美化】见不到粪；如果办不到，就要给那些当事人以各种形式的惩罚。二是不讲求防治疾病的实际效果，不考虑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件的实际差别，更不注意各个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差异，而是以一个模式·一个标准来要求。例如改良厕所，整修街道，粉刷墙壁，往往都是在一个公社甚至一个县的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规格，以致造成大拆大修，劳民伤财。如此等等，都脱离了实际，违背了群众的心愿·其结果是严重地挫伤了群众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积极性：致使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也没有巩固下来。

才认澜”观”“”辞！！申，…”

第四章

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5月26日大陆分健194的准备二动了夺写的经验二役，损斤能的。早不准备在1并请代书助中国安苏期间事特遗翅涉，未：这细将1—该烟院就基斗的政策：力手段—台湾冲！的原则转；不。

钥添领州乍‘

’ ’ 村榆吃J屹1肉。—宝

11’ 11

解放台湾，完成新政权的统一大业，本是中国的内政。由于美国陈兵台湾海峡，支持蒋介石政权？这就增加了一层中美关系的因素，使问题复杂化了。在朝鲜战场上，中美双方虽然在军事上打了一个平手，但在总体实力上中国仍是一个弱国。美国出于其对亚太地区战略的考虑，坚持敌视新中国，并凭借其实力，对中国大陆形成威胁：为中国领导人所不能容忍。1958年发动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就是想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中国的弱国地位。当年8月的金门炮战·其战略意图，如毛泽东所言：）一直接对蒋，间接对美·J也是要让美国正视中国的存在，并挫败美国搞「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图谋。

写紫斗缠1遭q“JJJ//j!11斗’ I1”qj!!-

士也t，议钻万衫俗烹瓦卒牌驯斗姿论添不仰宫

—美、蒋固守台湾的各自打算

1 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94年甲午战败以后，台狗被日本实行殖民统治达五十年·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1949年

1 详j《金2详j》，戏之辞人，

2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四春 {1958—1961}—鸟托年运动

5月26日，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溃败后，退守台湾，从而形成了台湾与大陆分割和对峙的局面·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渡过长江向南挺进，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随即提上日程。是年10月下旬和11月初，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夺取福建沿海的金门岛和浙江沿海的登步岛的战斗，因渡海作战的经验不足和技术装备的缺乏，两次战斗均告失利。尤其是金门一役，损失惨重。这说明没有一定的海、空军力量，攻占台湾是不可能的。

早在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中方就曾向斯大林说明准备在1950年进攻台湾的设想，提出向苏联购买二百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斯大林表示同意，并于8月18日双方草签了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议。鉴于金门、登步两战失利，毛泽东在12月访苏期间，曾委婉地向斯大林提出，请苏联派遣自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斯大林考虑这样做有可能引起美国的干涉，未予同意。

这时，美国的基本打算是，「不让台、岛落入共产党手中」，并将该岛屿与中国大陆隔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院就基本确定了把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开的对华政策。其中，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取消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不通过武力手段防止台湾与「中共」控制的大陆分离。一旦因第三者因素引起台海冲突，美国可参照联合国宪章原则，即不排除引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对大陆新政权，美国将设法使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逆转；不考虑给予「中共」经济援助，但可由民间商业或团体保持同中

，：、；“不江透

1 详见徐焰：《金门之战》（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震史馆史料处：《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初辑》（台北，
国史信，1979，

之详见中共中央文研室编：《刘少奇年谱（1948—1959）》，下
卷（北京：中央文研出版社，1991，页219；沈志华：《毛泽东，
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引

第1章 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国大陆的接触；不把「承认」「中共」作为压其让步的筹码。这表
明，美国统治集团已经认识到，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防止台湾失陷」

已不能奏效。国民党已失去整个大陆，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只是时间问题。于是，一方面准备从中国大陆和台湾「脱身」，同时又不甘心，即一旦台湾出现事变，美国将用所谓「民族自决」原则进行干涉。但是，美国军方并不赞同这种对台湾「听之任之」的政策，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盟军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就曾批评白宫对亚洲的发展缺乏战略眼光，建议通过向蒋介石增加援助以阻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Johnson）还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9年12月23日，作出了向台湾立即进行「小规模」军事援助的建议。

美国国务院则认为，国民党的败局已定，继续用军事援助或派遣军事顾问的办法去防止台湾「失陷」，「成功的机会很小」，一旦失败，将有损美国声誉。

白宫最终采纳了国务院的方案。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就台湾问题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决定，明确表示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它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表明：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局势；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也不拟以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Dean Rusk）发表讲话，明确说明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到菲律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必须保卫的安全防线，正式把台湾划在美国的远东防线之外。

杜鲁门的声明和艾奇逊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斯大林对美国的担心，使他同意将苏联给中国三亿贷款的一半，用于购买进攻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但仍避免承诺利用苏联的飞机和军舰来进攻台湾。
3 参见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海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页122。

。化一斗骗方」。-? 谗，响谗

中华人民兵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卑运动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内部对杜鲁门准备放弃台湾的反对声浪升高。这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台时

间重新作了估计，认为中共攻台可能拖到下一年，在此期间。如美大力扶蒋顶住，有希望从长部署抵制中共的方略。于是来自军方和国会山的武装「保台」的主张逐渐占据上风。麦克阿瑟在 1950 年 5 月 19 日和 6 月 14 日就曾两次向华盛顿提交备忘录，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意义，称台湾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基地」。提出，台湾的归属问题须要重新考虑，「台湾的最终命运·一取决于美国」，美国应在此「划线」，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45 月间，刚被任命为国务院顾问不久的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也提出一份主张台湾「中立化」的备忘录。但要从年初的「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争」的公开表态，转向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内争，还需要寻找借口。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27 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派遣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大陆攻占台湾，同时要求国民党停止对中国大陆的海空军事行动，以免另生事端。同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声称台湾「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至此，美国武力干涉台湾的政策最后形成。杜鲁门宣布出兵台湾海峡，对于时刻担心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无疑是一服有力的强心剂。但对美方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介石则深感愤怒。528 日，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欢迎美国「协防」台湾；同 4 参见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页 146·

6 月 28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这：「晨·阅报见杜鲁门声明，『催促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第七舰队将观察此一要求是否已付诸实施，至于台湾未来地位、应待太平洋区域安全恢复后，与日本成立和约时再予讨论·或由联合国予以考虑』一节，其对我台湾主权地位无视，与使我海空军不能对我大陆领土匪区进攻·视我一如殖民地之不若，痛辱童极。j 李云汉等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页 184—1“。

第四幸饱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时指出，「台湾系中。领土之一部分」。，美届即以各种「代表团」和「考察团」的名义，向台湾派驻武装人员，

美军进驻台湾，使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计划遇到新的更大障碍。由此，台湾问题不只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较量，更突出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因而更加复杂化了。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中国政府进攻台湾的计划即被搁置起来。

2 美、蒋策划共同防御

随着武力干涉台湾政策的确定，美国即由扶持岛内外反共的地方势力和「台独」分子，转向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1950年8月底，杜鲁门批准向台湾当局提供1.4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计划。随着朝鲜战事的发展，美国和台湾当局在1951年2月9日达成了《共同防御援助协议》。根据这个协议，美国可向台湾方面提供军事援助。5月1日，「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正式在台湾成立，该小组的活动包括将台湾国民党军队整编成三十一个「有战斗力」的步兵师；8月，「顾问团」团长威廉·蔡斯（研周啦山他 C. Chase）将军报告说：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已经决定训练和援助总数达六十万人的国民党军队。9月下旬，美国在台的军事人员达到二百八十人。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尤其是军事项目的援助也逐年增长：1951年财政年度为9803.4万美元；1952年财政年度为81482万美元；1953年财政年度达10550万美元。8 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对在大陆的失败进行了检讨，在国民党内部开展了「改造」运动，基本上消灭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各种派系，完成了蒋氏父子清一色的统治；在台湾农村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利用从大陆掠走的大笔资金和美援，以赎买的方式收购田地分配给农民】刺激了工农业的发展。使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开始得到巩固。

蹒跚驯驯 n 州砖储 jjj 神 J-JJJ 啊 q 倘 jjj'. IJJI: j 视-1!

6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禽问题》·页1“·7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页164. 8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页165·

月川 J 储 n 刘引驯剑邳驯引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4卷（1955—1961）——鸟托邦运动

添兮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就任美国总统。：

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向国会递交的国情咨文中决定变更第七舰队的任务，称：『我已发布命令：第七舰队不再被用以保护共产党中国』。这一声明实际上是在「放蒋出笼」，即鼓励国民党军袭扰大陆。其目的在于配合朝鲜战场，对中国施压。但并不同意蒋介石借助美国作过分举动。因此，美国政府又明确向蒋介石表示，如台湾当局事先未获美国同意而主动对大陆采取攻击行动，美国不承诺抵抗大陆的反击。4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决定，要求台海当局保证，不得对大陆采取有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的攻击性行动；在未获保证之前，停止向台湾运输喷气式飞机。已运抵台湾的也暂缓交付。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一直梦想反攻大陆，曾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但蒋介石心裏清楚，不把美国拖进来，连台湾本身都难以保全，更不用说反攻大陆了。因此，■一迫切期盼同美国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台之间的关系以条约的形式淤固定下来。1953年3月，国民党通过其「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缔结共同防御条约问题，遭杜勒斯婉拒。6月】蒋介石亲自致函艾森豪威尔提出，为遏制共产主义的侵略扩张」，应组一识亚洲的双边和多边共同安全条约。艾森豪威尔覆信表示，共同安全的安排应通过亚洲国家自身来实现】拒绝由美国出面组织的建议。10 朝鲜停战以后，针对远东出现的新形势，美国重新赛查了对华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的《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规定，美国不谋求动用美国武装力量或支持台湾当局推翻中共政权，但力争通过战争以外的各种手段削弱中共在亚洲的地位，阻滞其实力的增强，包括继续承认台湾当局，支持其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劝说其它国家采取同样政策；继续对中共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等

“•。、') 尸袅厦优

9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t科·文戏出版社·加03计，页1斜·

1D 参见陶文创主颈：《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州），页215—216·

第口幸炮击金既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等。同时出台的《美国对台湾及中华民国的目标和行动方针》指出，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是远东防御政策的基点；提高台湾当局和军队的效率和威信，利用其军事潜力并使台湾成为美国基地符合美国的安全政策……一文件一方面规定，应尽可能采取一切必要安排将台湾、澎湖纳入美国远东防御圈中但同时表示，目前同台湾缔结一项地区性安全安排时机还不成熟。‘1

美国在与台湾缔结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所以踌躇不前，是双方利益存在分歧：一是领土适用范围。美国承诺协防台、澎，但对沿海岛屿则希望保持某种模糊政策，而台湾当局对据守沿海三十多个岛屿则不能放弃；二是美国既不头条约束缚了台湾当局对大陆的袭扰，又不显因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将美国拖入战争。台湾当局则急于签订这样一个条约，使美国确认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对台湾的支持和援助。后来，蒋介石不得不向美方表示让步。1954年6月28日，蒋介石召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驻台湾「大使」，要他转告艾森豪威尔总统，他愿意满足美国的要求：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先征求美国的同意。’”

3 第一次台海危机

朝鲜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一直在大陆沿海进行武装袭扰，采用「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战术，对大陆借海防薄弱的岛屿实行「打了就跑」的袭击。其中虽屡遭失败，但在1952年对福建湄州岛、南日岛和浙江平阳县乌岩、雾城的袭击曾一度得手，使当地的解放军驻军和地方政权受到损失。如：1952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出动九千余人，在海军舰艇和飞机掩护下猛袭南日岛，岛上解放军守军一个连经激战大部牺牲，少部被俘，岛上政权被摧毁。当晚，大陆增援部队到达，因对敌情不明，增援部队一千多人登陆后，经奋勇杀敌，毙伤敌

1112

《中美关系史（1949—1972）》（1979年1月1日打划）

买 217—218—, 219—2 之 0 •

•, , ’. ‘■■•■. . •个配! ‘■■■■■■乱”

•■■■■■. (. . . ; . 、: 邵. 。; 。呈否蚕径

刀 0

中华人民共寺国史·第”专（19 铝一 1961j 一鸟托年运动
军数百人，终因寡不敌单，全部损失。当福建军区再调部队反击时，
国民党军已于 13 日夜全部彻离。此次南日岛战斗，解放军损失部队
1300 人。 ， 3

1953 年初，蒋介石宣布这一年是「反攻年」。6 月 8 日，当朝鲜停战
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时，蒋介石担心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缓和，决
定采取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以拉住美国。7 月 16 日拂晓，国民党军
一万多人，以陆海空三军配合，向福建省借海第二大岛—东山岛实施
登陆和空降。由于解放军沿海各部吸取了南日岛失利的教 w1I, 加强
了沿海反袭击的准备，挡建军区及时向东山岛增援，经两画一夜的激
战，国民党军被迫撤退，逃回金门。此役，解放军以伤亡、失踪 1250
人的代价，歼减国. 民党军 3379 人（毙伤 2477 人，俘虏 842 人）；
击毁敌坦克两辆，击沉小型登陆艇三艘，击落飞机两架。’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生效。台湾问题重新摆到中国政府面前，这既
是实施统一台湾战略的既定方针，也包含着打破美国支持蒋介石在沿
海采取攻击行动的目的。因为台湾当局的军事行动事实上与美国在台
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联紧在一起，是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1953 年 10 月】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向中央军委提出：利用我在朝鲜
战场胜利的势头，准备用五个军的兵力解放金门，并突击修建福建几
个机场和鹰厦、福州铁路，厦门海堤。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了这个
提议。一个月后，毛泽东要求暂缓攻打金门，首先解放浙江沿海岛屿。
其原因：

一是考虑朝鲜停战后的国际形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这时还不宜
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以在东南沿海进行小规模作战为好。二是国
内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开始起步，需要有一个较为缓和的周边环境。金
门国民党守军多达六万人，非采取大规模进攻难以奏效，

13 ‘余雁：《五十年国事纪要·军事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1999），页 275。14 余雁：《五十年国. 纪要·军事卷》·页铭
1’

第四章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这样势必引起美国较强烈的反应。在浙江以东的岛屿作战，引起的反响相对较小。

三是以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攻打浙东沿海岛屿较之攻打金门更有把握。因此时福建省内铁路未通，可起降喷气式飞机的机场也未建成。在浙江东部沿海作战，上海和浙江的现有机场和海军基地，即可用于支持。

据此，中央军委决定：采取从小到大、逐岛进攻，由北向南，解放华东沿海岛屿的方针。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军区从1954年1月起，开始着手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战役准备。3月，解放军加强了在浙东沿海的军事行动，先后攻占了东矾列岛等岛屿：基本控制了浙江沿海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1954年4月21日至7月21日，中国和美、苏、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了以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为主题的日内瓦会议。印度支那停战问题获得解决。鉴于远东地区的三个战场（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中的两个（朝鲜和印支）都已停战。南北朝鲜、南北越南的分治状况已成定局，美国正在组织《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并企图把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为防止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造成南北朝鲜、南北越南的类似局面，中国领导人决定采取主动。

中国代表团在赴日内瓦之前，中共中央就基本确定了争取与美国代表团进行外交接触，以破坏蒋介石与美国签约的政治图谋。“毛泽东当时讲，我们就是要用与美国谈判美国人最关心的侨民遣返问题作诱饵，促使美国不跟台湾订立共同防御条约。7月初，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回国向中央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在7月6日的1516

余雁：《五十年国事纪要，军事卷》，页之饵一认5.

周恩来朋3；发给毛泽东、刘少奇的电报中特别讲到，中。代表。已经告诉英。方面，颇经过英。介绍与美，进行接接。依熙周恩来的行事龄。这一重大外交行动。然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先‘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周恩来年。1949-1976》。上誉比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吻），页3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d专（”铭一1961）一鸟托邦运动

中央政治局t议上进一步谈到他的这一设想·毛说，「我们要破壞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除了在公开的宣传中骂美国搞台独，骂蒋介石卖国以外，外交上尤其要做些工作。比如可以表示愿意在侨民问题上与美国政府进行接触，「以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否则的话，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旦签订，中美关膩，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都可能r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7月23日《人民日报》受命发表社论，突出强调：f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合7月27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称，「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役有及时（约运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8月1日，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发表讲话，强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8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郑重宣布：「解放台海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允许他国干涉·」同日《中国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和解放军为完成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J08月22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发表宣言，拥護中国政府的决定。与之同时，在军事上也积极采取行动。这不仅在政治外交上意义重大，而且对JE在加紧进行的国内经济建设也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国民党军占据着浙江沿海大陈岛等岛屿，对进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上海的商船威胁甚大，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既然迟早都要动武：正可以乘此显示一下中国政府必欲解放台湾的决

17 毛泽东：〈同一切显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 54年7月7日》，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毛潭东文集》，第六卷d匕京：人民出版社·1卿）”页333—334. 18《人民日报）杜论，1必4年7月乃日·

19 中共中央数间恩来电//吟年7月27日），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网·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潭东传11舛9—1976.》. 上珊口匕京：中央文戏出版社，才以”，·，约。

第四章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心，同时也可以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如果这就是刺激的话，与其拖着不去刺激美国，使大陆沿海始终处在国民党武力威胁之下，并且在外交上使自己解放台湾的问题陷入更大的被动，倒不如乘现在来刺激它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此「击破美蒋军事条约」。即便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也可在此之前，夺取浙江沿海的大陈等岛屿。

中国政府在行动上显示决心解放台湾的同时，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传递信息，希望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8月24日，毛泽东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我们希望工党朋友们劝说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²⁰

但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已定，面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攻势。美国采取了以武力相威胁的强硬路线。8月3日，杜勒斯叫嚣美国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8月17日，艾森豪威尔宣布第七舰队要干涉中国解放台湾。8月19日，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斯图普（户 dhtirD. S 回 ble）率军舰六艘驶入大陈岛一带海面，并出动六百多架次飞机在大陈岛海面上空活动。同时加快了与蒋介石签约的磋商。²¹为显示中国政府捍卫领土不惜一战的决心】9月3日和10日，解放军先后炮击金门和马祖岛屿。国民党军则以炮火还击，从9月6日起出动飞机连续轰炸厦门大嶝，9日出动舰只攻击梧屿白石炮台。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

10月10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控诉美国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同时声明：中国决定解放一江山、大陈等沿海岛屿。期间，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式进行缔约谈判。12月2日，美国国务卿在台湾签订了

20 中。人民共和。外交部·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页162。

21 绩冬达，《五十年国。纪要·外交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引，页1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0卷（1958—1960—乌托邦运动）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得到了美国协防台湾的承诺，同时也作了两大让步：其一，条约只适用台湾和澎湖的范围，即不包括大陆沿海岛屿；其二，蒋介石对大陆动用武力，必须与美国人「共同协议」。条约签订以后，美国海空军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开始蚕张起来。在美国的军事威胁面前，中国政府决定不能示弱，11月23日，中国政府不顾美国的「高度关切」：坚持判处十三名被俘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四至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继续执行攻击一江山岛等浙东沿海岛屿的计划。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的统一指挥下，陆、海、空三军首次协同作战，对一江山岛发起攻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解放军完全占领一江山岛全歼守军（击毙567人，俘虏519人）。解放军牺牲393人，负伤1027人。22 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大陈岛就暴露在解放军的大炮射程和空军轰炸的范围以内，国民党军明显难以坚守。台湾当局向美国求助。这时，美国既不想参战，又不便对国民党军丢弃不管，遂决定说服蒋介石将大陈岛守军撤回台湾。为使国民党军安全撤离，1955年1月24日，杜勒斯将此事通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希望苏方劝说中共，在国民党军撤退时不要加以攻击。”中国政府为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中央军委于2月2日下达指示：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时，我军不要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让敌人安全撤走，’2月8日到12日，美军派出大量舰只到大陈，并以飞机护航，接运守岛的国民党军二万五千人、裹胁岛上居民一万八千人去台湾。2月12日至14日，解放军占领了上下大陈岛。到25日，浙东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

22 余雁：《五十年国事纪要·军事卷》，页293—294。

23 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页270。

24 中国军事博物馆编：《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页891。25 余雁：《五十年国事纪要·军事卷》，页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页545。

第四幸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中国政府鉴于国内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在背海地‘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惩罚国民党军，显示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和分裂中国的决心，并无意引发中美之间的以争。因此，在浙东沿海取得胜利之后，中国政府适时地采取了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

二炮击金门的最初意图

1 中国呼饭中美直接谈判

中国政府对付美国政府的孤立和封锁政策，从一开始就准备了两手：一手在外交上和军事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手不放弃缓和两国关系的努力。“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和远东紧张局势，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谋求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1955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中国赞成举行一个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世界各国尤其亚洲周边国家，对台湾地区局势感到担忧！害怕中美发生直接冲突殃及自身，危及亚洲和平。1955年4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团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中，就确定了「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的方针。会议期间，周恩来先后十二次同各国领导人会谈，阐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意见。4月23日，周恩来出席缅甸、锡兰，中国、印

在1954年日内瓦t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主动和审慎地提出了具美.人直接t谈的建议·促成了中国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与美国代表，美驻徒克大使约翰逊《u.州 exisjo 油卜。）之间就两国侨民回国问题进行会谈·由于美国的优硬态度，这次t谈朱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

（周恩来年谱 t1949 — 197 石》》，上誉·页 461。

奋个喂翡配访话“澜 J””jJ1j!、!.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由春（1, 58 — 1961）一为托年运动
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蜈 k 国代表团团长会议，
当有人问到台湾和平解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将军时，周恩来回
答：完全可以。随后，发表声明：

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
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让判，讨论和缓达东紧帐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
台湾地区的紧帐局势 fo1 题·器

中国政府的声明，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亚洲国家中赢得了
好评。会后，苏联、英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分别在中美之间
进行外交斡旋，以促进中美两国直接谈判。从5月中旬到6月间，周
恩来分别会见上述各国使节，仅同专程来华斡旋的印度驻联合国代表
梅农牌· K. FhshnaMcnon）就进行了六次会谈。5月13日，周恩来在
向全国人大常委 t 作亚非会议的报告中郑重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生活在台湾的人民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台
湾走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便占台湾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朱蜀劳，
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为了和
缓台湾地区的紧张汤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使判。

同时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
中国人民显意在可能的悻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此时，美国政府怀看它自己的目的，也在考虑中美直接谈判的可能。
周恩来4月23日的声明和5月13日关于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23《周恩来年语《1"9 — 1976）》，上卷，页叨。。

29 周思来：《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1"s 年5月。日）：载中国人
民解放军。防大学赢史写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参考数
据》。第二十册。上册。北京：。防大学出版社·19 阆，·页550·
第齐章炮击金门与第么次台海危机

的讲话，都引起了美方的注意。5月上旬，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
（HumphreyTre, clyan）会见周，@. 来，表示愿为中美直接谈判进行
斡旋。5月，26日，周恩来明确答复杜维廉：中国赞成通过中美谈判
以「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J。杜勒斯得到这一口信后，与

艾森豪威尔威尔商议，最终放弃了不与中国政府接触的僵硬政策！接受了中国方面提出的举行中美直接谈判的建议，决定中美双方可以「交换特派官员」进行直接谈判。7月11日，杜勒斯请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转达美国的建议：中美两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周恩来在7月13日作出答复，接受美国的建议。经过双方商定，7月2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新闻公报，宣布：两国大使级代表的第一次会晤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U. 甩 exisJohas 阅）。，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是由国际上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也是中国政府从1954年以来在东南沿海斗争的成果。

2 美国无意缓和中美关系

美国参加中美会谈，服务于它有限的具体目标，1955年7月29日，杜勒斯向即将参加会谈的约翰逊大使发出十八点指示。其主要精神是：在会谈中不涉及外交承认中国的问题，只谈「双方之间的实际问题」。具体目标有二：一是要求中国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二是使双方平民回国，要求中国释放在押的美国人犯。）‘使双方人员回国，这是1954年已经谈判过的问题，是会谈中双方立场易于接近的唯一问题。为给会谈创造良好开端，1955年8月1日，中方代表王炳南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次会议上，单方面宣布，中国最高法院于7月31日判决，提前释放阿诺德等（John 瓦 Amo1d）十一名美国间谍，美方代表表示感谢。经过一个多月的讨
30（人民日报）·1955年7月25日。

31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页之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西寡—19,8—1961）—鸟托年运动
价还价，9月10日，中美双方达成一项关于遣返平民的「协议声明」。这也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达成的唯一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争取了一批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其中有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31会谈转入实质性问题—台湾问题之后，立即陷入了僵局。10月27日，中方代表王炳南提出两国协议声明草案，包括两项主要内容：中国和美国同意，「它们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

或武力」；中国和美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美方代表约翰逊按照美国政府既定方针，拒绝了这个协议草案。11月10日，美方提出自己的方案，内容也是两条，第一条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防御」权利，实质是要中国政府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合法地位；第二条要求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这等于要中国放弃解放台海的权力。王炳南大使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侵占台海已经成了国际争端，美国应该放弃对中国使用武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用甚么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要求中国不使用武力，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愿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但这决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美国政府对于会谈毫无诚意，它在获准中国释放美国在押人员之后，并不愿为缓和中美关系做任何努力，为的是：避免会谈造成美国将承认中国的印象。因而，一味采取拖延策略，决不接受中方关于准备两国外长会谈的提议。

中国的方针是积极促进会谈，先就一些次要问题达成协议，以求在实质性问题—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1956年1月、3月和6月，中国政府三次公布会谈经过，使美国拖延会谈真相大白于天下，敦促美国认真对待会谈。在「互不使用武力」问题卡壳之后，1956年8月32日【1950年代末】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页55—56。

第四章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21日，中方提出讨论禁运问题，美方以只有对「放弃使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后才能讨论禁运问题为理由，加以拒绝。此时，会谈只是应付差事，常常是王炳南和约翰逊两人交锋几句，即行散会。王炳南回忆说：「会谈仍在继续，我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为了打破僵局，寻求突破。周恩来在1956年8月宣布一项重大决定：中国政府单方面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并向美国十五家新

闻机构发出邀请，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在会谈中，中方代表也提出了关于促进中美人员来往和划区交流，准许对方新闻记者进行新闻采访等提议，想以此推动会谈，使中美关系有所松动。中国政府这一着妙棋，震动了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美国新闻界为之兴奋，向国务院不断施加压力，有几名记者不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访问了中国。杜勒斯终于不得不做出响应，在与新闻界悄悄协商之后，于1957年8月宣布，美国将准许二十四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采访，但决不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中方在日内瓦会谈中提出的多种协议草案，均被美国拒绝。美国对华政策从有所松动到重新强硬，在一定程度上也同1956年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后美国调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有关。

这种无结果的会谈进行到1957年12月12日第七十三次会谈时，约翰逊大使宣布，他将撤出会谈，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今后将由美国驻捷克使馆一秘马丁代表美国参加会谈。表明美国在单方面宣布将双方会谈降级。中方当即表示不能同意。“致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1958年2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讲话揭露说：「美国同中国举行大使级的会谈，而在会谈中又要求中国承认它侵占台湾的现状。这在实质上就是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方面当然绝对不能容许。」），

•旧”月” ””J’ ””Jd 边砖 J!-

i-

33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厂》，页62•

34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厂》•页65•

35 周恩来：〈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外交政策〉（1957年10月），《周恩来传（1949—195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页B•

霄厦霭『jjJJJJ-J----. 一读--. ---J---!-, • i

28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j喜（1958—1959）—鸟托邦运动

3 炮击金门的决策

1954 至 1955 年的台海危机，就曾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强烈地意识到、跟美国这样的国家打交道，除非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否则就只能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受人白跟，甚至被人所摆布。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过程，更进一步证明这一客观现实。

早在 1955 年秋天，注意到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代表想尽办法不
‘和中国代表讨论台湾问题，毛泽东就已经憋着一口气，暗下决心要靠迅速提升自己国家的实力来迫使美国改变态度。1955 年 10 月，毛在同工商界人士座谈时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赶上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象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美国无意缓和两国争端，还表现在不断加剧台海海峡的紧张局势上。就在会谈期间，美国一直在加强在台湾的军事实力。1955 年 3 月 3 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1956 年 1 月又签订了美台军事协议。美国向台湾派驻了「协防台湾司令」，将美驻台军事顾问团扩充到 26 人。美空军第十三特种航空队进驻台湾。1957 年 5 月 7 日，美驻台协防司令殷格索尔（Hugh S. Groom）宣布：美国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原子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增强了国民党军的防总进攻能力。在外交上，美国的态度更趋强硬。杜勒斯不断地发表反华言论。1956 年 1 月，他声称，如果中国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那么我们将进行战斗」。1957 年 4 月 20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将单方面禁止对共产党中国的一切贸易」。5 月 13 日，杜勒斯在马尼拉条约理事会上重申美国对华政策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6 月

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 年 10 月 10 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 53。

，- 斗 I

第四章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28 日，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对华政策演说，称要尽一切可能使共产主义这种现象在中国消逝。37

但是，美台军事关系加强的同时，矛盾也在加剧。美国虽然坚持「协防台湾」，但并不支持蒋介石固守金门、马祖，这就使美蒋之间心存芥蒂。国民党当局还担心中美会谈会做出不利于它的妥协。其策略是不断地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加强对大陆的间谍活动和军事骚扰。从1957年开始，台湾海峡局势重新紧张起来。国民党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云、贵、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出动飞机轰炸福连沿海。经过国民党军的长期设防！至1950年代中期，金门已构成坚固筑垒地域，成为国民党军屏障台湾的据点和窜犯大陆的基地。1957年底，金门设有防卫司令部，辖六个步兵师和特种兵部队，共八万五千余人，其中各种地面炮兵三十一个营又两个连，有七十五毫米以上口径火炮三百八十门。这种类似赌博的军事部署，对蒋介石来说有多重用意，一则视固守金、马为「反攻大陆」的精神支柱；二则把美国进一步与自己拴在一起，使其更难劝他撤退，一有机会便拉美国下水。鉴于美国对改善中美关系毫无诚意的现实，毛泽东开始酝酿调整对付美国的政策。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中国政府决不能容忍台湾问题由此沉寂而使分割之势固定化和永久化，决定对美斗争采取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武对武，先礼后兵的方针。³⁹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一直在为解决福建前线的后勤运输保障和制空权问题，进行铁路和机场建设。1957年12月28日，由江西鹰潭到厦门的铁路正式通车。同时，毛泽东提出空军入闽的问题，12月18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入福建的问题。」⁴⁰ 1958年

霄认柑缠 j1Jjjj--I!-!-

。一引

艾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部编：《杜勒斯言论选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页314, 3s 余雁：《五十年国事纪要·军事卷》·页3叩。

39（毛泽东传11949—1976》）。上册·页85工。

40 毛泽东对彭德怀转来的副总参谋长陈赓1957年12月9日关于台湾

飞机侵人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弦内地防空作战部. 的报告批编·手
构, 1977年12月18日·《毛泽东传 1949—1976》·上册·, 8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森春(1958—1979)——鸟托作运动

7月24日, 中央军委命令组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 空军部队随即
在连降暴雨的恶劣气候下完成转场任务。并在7月29日至8月14日
期间, 击落击伤国民党军来犯的飞机九架, 取得了福建沿海地区的制
空权。1958年6月30日, 中国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
的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以内振
出大使级代表, 恢复会谈·否则, 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
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2

这时, 美国既不能无视中国政府的声明】又不愿认真对待·7月1日,
杜勒斯就中国政府声明发表谈话·声称, 不受《十五天限期的最后通
牒的约束》。又说, 如果中共接受华沙为会谈地点的话, 美国将指派
其驻波兰的大使参加会谈。·3

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的十天期限, 没有得到美
国政府的正式答复。1958年7月14日, 伊拉克爆发革命, 推翻了费
萨尔王朝统治, 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 同时宣布伊拉克退出由美英
组织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次日·美国决定出兵支持亲美的黎巴嫩政
权, 英军也迅速在约旦登陆。此后苏联在中东也有所动作。中东局势
骤然紧张, 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世界各地进步舆论纷纷谴责美国干
涉中东内政·, 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美国此时宣布其远东地
区驻军进入戒备状态。台湾当局则想趁火打劫, 伺机扩大事态, 7月
17日宣布国民党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同时加紧军事演习和空中
侦察, 摆出反攻大陆的姿态。在中美关系问题上, 毛泽东的目光并不
仅仅局限于台湾海峡, 而是有他的全球性战略考虑‘。在中国共产党
人的心目中, 美国帝国主义不只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也是全世界被
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共同敌人。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
迫人民的反帝斗争, 是已经获得解放的中国

41 (毛泽东传 (1949—1976)), 上册·页 552·

42 《人民日报》·1958年7月1日·

43 苏格: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海问题》, 页 293—294; 《战后美国

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页 301；”冬连：《五十年国. 纪要·外交卷》，页 162。44. 事科学院. 事腾史研究部：《中. 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页拐 0·

第四幸绝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人民义不容辞的义务。1957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分析国际形势说，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矛盾虽然很厉害，但帝. 主义一家现在是在假借妖产主义之名来争夺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 t 点又在中东，按这个构想：毛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主要不是直接对抗，而是应该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把台湾问题与支持中东人民反美斗争结合起来，正可以相互策应，互为后盾，使美国四处紧张，首尾失据，既可减轻中东人民的压力，又可试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牌。中美大使级会谈，本来就是通过制造台海紧张关系通出来的。为了让美国知道轻视中国的后果，毛泽东决心再度在台湾海峡搞一点紧张局势，即利用杜勒斯说的「战争边缘政策」，「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必现在，美国出兵黎巴嫩，正好是在台湾海峡做文章的时机。1958 年 7 月 15 日至 18 日，毛泽东连续召集会议，做出了炮击金门的决定。18 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对炮击金门下达指示。毛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持·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他设想，以地面炮兵！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的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关于炮击金门与对美政策的关系，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炮击的目的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r 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是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

45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 — 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 1999】，页 189·

46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页 387·

钉周恩来军. 活动纪事频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 史 8 — 1 咕）》. 下田（北京：中央文欢出版社，脚 1，页鸡 1；张培森主

‘’ 《张闻天年龄·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脚），页1阅一1哪；〈中·干有·中默使级会诚的，励，1悦年6月加。〉，载《中美·系资料鱼骗》，第一·咙京：醇知织出鳅·，知·，页琅一踮；毛泽靖衫·怀的信’手稿’1嘴年8月坊日，载《毛洒东传。1”-1吓，》，上卉·买脚；吴玲西’缝毛锦）（北京：新，出齏·，螂·，页76一刀。

r 露露滴 J 访购溅 J 才 f 一坛缠 j 唔 i, r

2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西夺·{1958—1961}—鸟托年运动

就在中央军委做出部署，炮战即将开始的时候，因苏方提出建立长波电合和联合舰队引起中方的高度敏感：赫鲁晓夫将于7月31日来华与毛泽东 t 谈·因炮击金门并未告知苏联，为避免使事情复杂化，7月27日上午，毛泽东下令暂停炮击行动·他在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中说“「睡不者觉，想才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公，8

这时美方的情况是，8月10日，杜勒斯发表声明，表示要不遗余力地扼杀伊拉克政权。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使团发出〈关于不承认共产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要警惕苏中联盟的危险性 k’，期间，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局势做出了三项决定：一、增振航空母缓和战斗机，向台湾提供登陆艇、响尾蛇导弹、火炮和军需。二、通过杜勒斯覆函美国众议院外委 t 主席库根（Thomas E. Morgan），向中国施压。

宣妒’ ’ 1h·衫、么才

48 《毛潭东传（！舛9—1叮6）》，上册·页854。

49 赫鲁晓夫这次虽是秘密访问，但根据中方的要求·在1958年8月3日公开发表了〈毛让，和艺·晓夫会谈公报〉，其中提及中苏尔国·防部长参加了这次首脑 t 谈·r 双方枕目前口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驮洲方面的一系列，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J 这不能不引起美方的注意·但·实上·毛惮东在和颡鲁晓夫会谈中·并未谈及炮击金门一事·1959年9月·赫鲁晓夫再次来华时，毛潭东对他说：r 邵时他们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绸去·美国人没有多

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不曾想到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兵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八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八月20、21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据军的决议。所以，我们8月21号没打，23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总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队从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一带，等到地中海。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有甚庆事情啦。就在新加坡停下来啦，引起了印度尼西亚的恐慌。我们一打。他们统统退回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流很乱。见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续蛞纪要（1959年9月30日），载《毛泽东传（1949—1975）》，上册，页855—856。

1

第四章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三、授权驻台大使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换文加以「澄清」，如中国大举进攻外岛，可以进行报复；但小型进攻不在其列。然而，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无论是外交恐吓，还是「战争边缘」政策，都动摇不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海峡的决心。1958年8月1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做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18日凌晨1时，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炮打金门。他在广州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上批示说：「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州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并指示：「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到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速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8月2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邓小平、林彪、黄克诚、叶飞、萧劲光、陈锡联、王秉章、王尚荣、陶勇开会，具体部署金门作战。5，决定，暂时不打马祖，集中火力炮击金门。

炮击金门既是武仗，更是文仗，因而，每一步骤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

的直接掌握之中，渗透了中国领导人妥善处理中美蒋三角关系的策略思想。「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就是这次炮击金门的战略意图和指导方针。尽量避免与美国人直接交锋，办法是只打金门，不打台湾。后来毛泽东说：「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那我还是暂时不去。」，之即便如此，毛泽东对炮击金门会不会伤及国民党守军中的美国顾问人员也格外重视。

负责前线指挥的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叶飞回忆说，

50 林正义：《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I 台北 1985），页 56 — 58.

5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页 654, 52（毛泽东传（1949 — 1976 年）·上册. , 86, ,

：台海商务印书馆

页 451；叶飞，《叶飞

A, 勿, 』 ' ' 姿. 留. 卤才

1

28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9 卷（1958 — 1961）——乌托邦运动

21 日下午 3 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戒知造这走要我去接受命令了。一见到主席·我先汇报了炮击的准备工作情况”彭老总、林彪参加了，少奇、总理没有在·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也在。地图是摊在地球上的。

主席总我汇报时，精力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别的没有说。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

国人打死啊才那个时候，国民党军中的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连一级。

我说：那是打得到的。听我这样一说，主席又考虑了十多分钟没有说话。徒来又问：龙不能适免不打到美国人？我说：进免不了。主席总徒，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给我指示·沈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这一步考虑问题。

第二天继续开会。这个时候，主席下决心了，说：那好，按计划打。并要我在北戴河指挥。’ 3

J一细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 吧究。”、。吧 r;.

总之，对中共中央、毛泽东而言，炮击金门主要不是一场军事仗】而是一场政治仗、外交仗和宣传仗。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是否占领金门，也不在于消灭多少敌人，而在于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惩罚台湾当局，摸清美国对华战略的底盘；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维护国家的领海权益和沿海地区的安宁，以及鼓舞国内「大跃进」的士气。由于美国和台湾当局对这一战略意图并不清楚，因此，炮击开始以

’ . 了砖小，丈盍二二

53 《毛泽东传（1949—1976 玲，上册，页 857）· 风元生在《百战将星—王尚荣》一· 中说；毛泽东在连夜反复考虑后· 第二天就提出，还是先打几百发，由小到大比较好。经过叶飞等人的争取，毛泽东才勉强同意先打一万发，而又过了一夜思考之后，他还是坚持不能打到美国人。在他经过叶飞发往前线的指示中称：此次炮击先不打地面目标· 只打水面船只，使用炮弹三千到六千发必打地面时，不打其指挥机构；尤其不要打美国军舰及岛上的美国人。这一决定突出地反映出毛潭东对中美关系的！视。直到彭德怀明确表示希望按照福建前线指挥部的意见进行炮二并强调「估计美军不 t 参加」后，毛潭东才在最后关头同意照最初的方案实施炮击· 仍看重打敌指挥很构、炮兵阵地，雷达站和料搬润的雇艇等· 罗元生：《百战将星—王尚荣》（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 引，页 267—2 的·

第齐章炮击全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围绕看金门岛进行了激烈而又彻妙的斗争：使得这场战斗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奇特们争，

三由「联美压蒋」到「联蒋抗美」

历· 厦圈涌口优 j 跚！ I 匹干，犊■吗缠 ‘唱 jjj· ■■优冯.

1 「八· 二三」炮战引起的震动

大金门岛面积仅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小金门岛面积仅十平方公里，岛上却有驻军八万五千人和五万居民。驻金门的国民党军，占台湾国民党军总数的 1/6 左右，盘踞在大、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九个岛屿上，

配备有 105 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 308 门，四十毫米以上的高射炮 146 门，轻型战车和自行火炮 106 辆。金门防卫司令部位于大金门的制高点太武山。金门距台湾港口的航线长约一百二十海里，岛上十三万军民的基本衣食及各种军需都要依赖于台湾供应。主要的供应方式是海运，停寡码头是大金门岛南端背对大陆的料罗湾。另有两座可降落大型运输机的机场，部分急需的物资则实行空运。平均每天的运输量为四百吨左右，以维持守军的基本生活和最低限度的作战需要。1958 年 8 月 6 日，台湾当局命令军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并增兵沿海诸岛，至 8 月中旬金门兵力达到九万六千人，马祖四万人。”当时台湾国民党空军拥有飞机六百余架，其中作战飞机四百余架，全部系美国装备和训练，有一定的战斗力。在台湾还驻有美国空军的一个航空兵师，装备有最新式的 F-100 战斗机，它们既可保护台湾上空，又能作为台湾空军进入大陆作战的后盾，使得国民党空军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全部力量到大陆进行空战。

为实现陆海空三军配合全面封锁金门的作战部署，人民解放军海军举命由南海舰队、东海舰队调集三个鱼雷快艇大队、两个猎潜艇大

i

54 《中奖关系史（1949 — 197 之）》，页 254 •

288

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客（1958 — 1, 61）—鸟托年运动队和一个高速炮艇中队等水面舰艇入闽参战；空军则以二十三个歼击机团共 520 架歼击机（苏制米格 17）进入第一线和第二线机场。当时，在福建前线参战的陆海空部队，共有 459 门大炮、八十多艘舰艇和加 0 多架飞机。，，各部在 8 月 20 日晚全部进入顶设阵地的指定位置。8 月 21 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决定从 23 日开始对金门进行炮击。先打三天，走出第一步，看看台湾当局的动态后，再决定下一步。根据这一命令，人民解放军计划对金门国民党守军只用炮兵火力轰击和实施海上封锁，空军用于在大陆上空担任掩护，只有在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时才出击轰炸金 r 叮，”

8 月 23 日下午 5 时 30 分，一声令下，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459

门火炮待续八十五分钟，发射了三万多发炮弹。当时，正是金门岛上国民党军的开饭时间。国民党军多在工事外面，金门防卫部的中将副司令官赵家瓌、章杰和澎湖防卫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吉星文等官兵六百多人当场被炮弹击毙，两名美军显问也被炮击丧生。国民党军炮兵在遭突袭二十分钟后，才开始还击，发射炮弹二千余发，其火力很快被压制下去。8月23日，解放军炮兵和海军实行联合打击，重创国民党军「中海」号大型运输舰，击沉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台生」号货输（23日已被击伤）。”经过这两次打击，岛上军用设施和通信系统，被炮击摧毁或严重破坏。

毛泽东最初设想是，通过炮击封锁金门。利用美蒋在协防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以迫使蒋介石放弃金门，达到收复金门的作战目的，又不给美国以武力干涉的借口。毛在8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国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

，，余履：《五十年。事纪要·军事卷》！买30；（毛。东传（1，’，一1,76，》。上册，页858，

“余履：《五十年。事纪要，军事卷》·页3吗。

”余。：《五十年。事纪要”事卷》·页307、珊。

第喻章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

果然，金门炮响后，台湾惊恐万状。全世界也「满天风雨，烟雾冲天」。

美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8月25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集会议讨论对策。决定进一步加强已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加强台湾的空防力量：向台湾提供导弹和登陆艇，在公海为国民党向金门运输给养提供护航。会后，迅即从地中海、美国西海岸以及菲律宾调来第六舰队的一半舰只，美军在台湾海峡集中了五艘空母舰、三艘重巡洋舰、四十一艘驱逐舰，七艘攻击型潜水艇。美国空军第四十六巡还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进驻台湾、菲律宾。380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台湾南部。阅据称，这次调动是美国战后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

台湾方面则向美提出紧急求救。27日，美国驻台「使馆」把蒋介石给艾森豪威尔的求援信转到了华盛顿。要求美方采取两项应急措施：(1) 以美台的联合军事力量「阻遏中共继续扩大其侵略行径」；(2) 同意台湾采取单独行动，立即轰炸金门对面的中共海空军和炮兵基地。并要求美方公开声明：中共目前对金门的侵略行动构成对台湾和澎湖的安全威胁，如中共继续进攻金门，美国政府将使用其军事力量协防两岛，以确保台、澎的安全。第七舰队将为台湾与金门·马祖之间的海上通道提供护航；授权美国驻台军事指挥官可进行相关决策，而不必事事请示华盛顿。“

58 吴冷西：《忆毛主席》，页 74。

59 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 I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 303。60 《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页 303 说：“美国在台湾海峡集结了七艘航空母舰。”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显》，页 69 说：美国那时共有十二条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就集结了六条。

61 《中美关系史（1949—1972）》，页 7—258。

《人民兵卡国史·第 11 卷（1949—1961）——乌托邦运动

当时正在休假的杜勒斯指示国务院：立即给蒋介石一个临时答复；寻求总统做出指示，让国务院和国防部协调决定采取渐进的行动，以便导致采用核武器来制止对沿海诸岛的军事行动。“2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声称美国不会把「中共」对沿海诸岛的进攻视为有限的军事行动。：，日，艾森豪威尔再次在白宫行会议，决定暂时搁置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同意在公海为国民党向金门、马祖补给提供护航。蒋介石对此表示「深深的失望」，称这对他在金门、马祖的守军是「不人道的」，「不公正的」，这「不是一个盟国的政策」进入 9 月以后，国民党军的武器、弹药补给日益困难，还担心人民解放军会实行登陆，不得不注意弹药的节约使用，故不再轻易还击，只是偶尔进行一些不规律的扰乱性射击。金门炮战很快形成一边倒的局面，但要对国民党军守岛炮兵实行全面的火力歼灭，也非易事”在炮击和封锁金门十天后·毛泽东于 9 月 3 日要求自 9 月 4 日起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各方动

态。9月4日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关于领海问题的声明，宣布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9月4日，杜勒斯经总统授权发表声明，称：美国负有条约义务帮助台湾不受武装进攻，美国「已经意识到确保与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相关」，「如果情势必须实现《福摩萨决议案》的目标，总统将毫不犹豫这样做」。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协防」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同时又表示美国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中美在台海地区争端的希望。“其目的在「让共产党猜不透」。‘s通过这种战争讹诈，使中国领导人因猜不透美国的底盘而就此止步。

62《中美关系史【1949—1972】》，页258，

63《中美关系史《1949—1972》》·页259·

64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382—383·

邱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著，妇海译：《缔造和平》（北京：三联书店，1977）·页329·

第四章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对于美国的战争讹诈，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正的原则立场。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台、澎、金、马自古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同时表示，既然美国愿意进行和谈，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

中国政府决定炮击金门，事先未同苏联政府商量。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期间，毛泽东与他会谈也未同他谈及此事。“炮击开始后，台湾海峡形势顿时紧张起来，苏联对中国事先未作商量的做法表示不满，对中国的做法也不摸底。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N. G. Sudarikov）·表示欢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来华访问。向他解释了中国政府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分析、美蒋矛盾以及中国的立场、策略和所采取的行动。着重说明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

不拖苏联下水· ‘, 9月7日, 赫鲁晓夫致函艾森豪威尔· 呼显
美国政府在台湾海峡地区慎重行事, 不要轻易采取可能带来不可收拾
的后果的步骤· 公开表示: 美国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 苏
联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

台湾海峡的局势, 也引起中国周边邻国的关注。9月8日, 越南民主
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致电毛泽东询问 1 鉴于台湾情况的紧张, 美帝态度
之顽固, 请您告诉我们: (甲) 可能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 (乙) 我
们越南应该有甚么准备? 10日, 毛泽东回电说: 「(甲) 美

66 参见沈志华: <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 是否告知苏联? 一兼谈冷战
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中共党史研究》, 2以”年第3期.
钉《周恩来年语(1949—1976)》· 中卷, , 1弱。

68 (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四专(1958—1961) — 鸟托年运动

1

国人怕打仗, 就目前说, 很少可能大打起来; 《乙) 责国似可以照常
工作·」 “

, :, ... 。 ‘kf. ■

2 美国的底牌和美、蒋矛盾\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 在美国国内及其盟国掀起
轩然大波, 纷纷表示反对美国为金门、马祖而同中国作战。除了南朝
鲜李承晚外, 几乎所有国家, 包括日本、英国等美国的主要盟国, 都
明确地反对美国干涉金门, 马祖之战。美国国内反战空气甚浓· 连赫
尔利 (PatdckJ.H 习 1”】这种敌视中国的人都认为, 美政府在执行
一种「自杀政策」· 苏联的表态对美国的行动也起了一定的制约作
用· 在这种形势下, 美国政府不得不审慎行事。即: 一面对周恩来总
理 9月6日的声明表示欢迎; 另一面又应蒋介石的请求, 于9月7日
出动两艘巡洋舰、五艘驱逐舰到金门海域, 为国民党军运输卢护航(但
内部规定美国军舰接近金门后, 必须停在离海滩三海里外的海上)

对于美国军舰到金门海域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
中国外交部当天提出了严正抗议。毛泽东随即做出相应对策。早在大

71 吴冷西：《忆毛主席》，页 76·77。当时·解放军高层领导人员并不完全了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作战意图·8月游口起，解放军总政治部用福建前线指挥所的名义】连续播发了一篇广播稿·敦促防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其中提到 r 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 J·引起外电的辟注。9月1口前后、毛泽东从外电报道中得知这一情况·严厉批评这是建反集中统一原则。毛责成中央军委起草〈对台湾和借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9月3日经他审阅修改复下发。指示指出：「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 Jr 解放台海和沿海蒋沾鸟屿虽然属于我·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离严 t 的·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和沿海蒋占鸟屿问题的全部，物茂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楹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指示对沿锋斗争方针作了四条规定：一、选续炮击金门，但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二，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赛，打打，t，看看打打。三，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机不森炸大陆，我也不轰炸金·马；蒋军·炸大陆，我森炸金、马 1 但不萝作台海，四、我军不准主动攻击美二如果美军侵人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指示还指出：一切重要行动和！传《文告、谈话、口号·杜论，新闻、广播）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二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引，页 6”；邻文翰等：《秘·日记裹的彭老总》1北京：军·科学出版社·1”8）·页 336、337·72 叶飞，《叶飞回忆录》·页斤阆，

, I " 速奋盔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妇专（19，。一 1961）一缝年鞍

9月9日，杜勒斯公开发表声明，宣布 r 美国决定使护航的美缓保持在沿海岛屿三海里之外」，进一步表明了美国的态度·9月11日，四艘美国军舰再次掩护国民党军的四艘运输舰、七艘作战舰向金门驶来。周恩来亲自部署此次炮亏动。上午 11 时以后，美、蒋混合编队侵入金门海域的中国领海。前线解放军炮兵按照周恩来的命令，从 14 时 57 分起，以四十个地面炮兵营又六个海岸炮兵连的强大火力，

射击驶近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运输舰和金门岛上的目标。国民党军的运输舰吸取了前次的教训，不再等待美处的掩护，一遭打击急忙向外海逃走。美国军舰则同前次一样，仍一炮未发：马上退向外海。

这两次炮击，使中国政府摸清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盘，认识到美国是在确保其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国家在战略上取守势。同时毛泽东还认为美国在金门、马祖问题上实行的是脱身政策。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盘】这就为确定下一步大政方针提供了依据。

对毛泽东在这场对美、蒋斗争策略和分寸的掌握，叶飞回忆说：

金门向台湾告急。蒋介石便请求美国军舰护航。这样，事情就搞复杂了。怎么样对付美国人护航呢？美国的军舰左右配！国民党军的舰双夹在中间，而且问瞞只有二海里。毛主席下令，「只准打夸舰，不准打美舰。」要我们避开美舰护航，等蒋舰到港，援才能开炮，还要我们每半小时向北京报告一次。这个指示可难执行了，不好掌极。我们又请示一个问题：如果护航的美舰向我们开炮怎庆辨？毛主席马上答复，「如果美舰开炮，不准还炮。」我怕是电话农没有传清楚，又重复问了三这。答复是「不准还击」。朴是。我向各炮群下达主席的命令。

这个时候，蒋舰已进至港口卸货。再不打不行了。我。马上请示北京，才下令开炮。我们一顿密集的炮击，一下子击沉了一般蒋舰。我们的炮华一专，美舰不但没有还击，反而摔转头就跑。犬出洋相！美舰一跑，蒋舰抓孤早单的，完全慕露在我炮火之

第盼章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下，向台湾告急。台湾方面问：朋友呢？牌蕴说：甚庆朋友不朋岑，早鱿逃跑了，他们互相指责，骂美国人焜蚤。

事复我才明白，毛主席这个动作很高明。主席的 t 口走要模美国人的底。美国人表面上气势沟沟，究竟敢不敢和表们讨？原来美国是双纸老虎，一打起来就跑了。金门炮战，是我们与美国互相模底的一出戏，一出很紧朵很有意思的戏。才，

台湾方面对美国在固守金门、马祖的支持的有限性，美国的护航舰变不肯进入金门周围三海里水域，拒绝台湾要求美空军参战，表现出极

同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Jacob D. Beam）正式开始讨论台湾海峡的局势。美国大使比姆首先发言提出，中美双方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并要求中国停止炮击，实行所谓“停火”。对此，王炳南予以反驳，说他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重申了解放台湾、澎湖列岛和金门、马祖是中国内政，要求美国方面从台湾撤军。9月17日，周恩来致电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提出中美会谈的政策建议。周认为：

我们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先以针锋相对的策略压倒对方，才有可能接触到具体问题。估计美方在第二次会谈上仍会在停火问题上与我方继续纠缠，以配合美在联合国大会中的行动……，一为针对这一极大可能，我方概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反建议，并说明这走解除对和平威胁的迫切前提。关于停火和撤军的斗争，估计会进行几个回合，在三次会议中，可以看出美方究竟有再意思矣。蒋军从沿海岛屿撤走，同时联大是否要讨论台湾海峡局势问题也可，说明，到时看情况再考虑我方提案是否公布” 77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页仰

78 王炳南：《中美海峡九年回顾》，页 76 一叮”

79 毛泽东于 9 月 10 日。开北京，到外地视察「大用准」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况。把台、海峡的斗争委托周恩来等人处理。《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6》》，下卷，页弱之一弱 3·

第八章 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随后，周恩来在同陈云、彭真、张闻天，廖承志以及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等商议后，于 18 日再电毛泽东，提出了「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海峡撤退」的外交活动的具体办法。80 毛泽东完全赞同周恩来的建议。爱月 19 日，毛极其兴奋地致信周恩来说：

「18 日夜来信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 81

中国大使根据国内的指示，在会谈中以十分鲜明的立场，坚决拒绝在

中美会谈中讨论「停火」问题。

22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措海军事斗争方针。周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画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当日，毛泽东覆电表示完全同意，认为周「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个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江

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既未趋缓，也未升级。美国政府则想利用华沙谈判压中国同意停止对金门的炮击；同时压蒋介石不得自行其是。· 而蒋介石则一心想使台湾海峡地区军事行动升级，以便导致美国同意协防沿海诸岛，支持他对大陆进行报复。为此，蒋介石亲自出面制造舆论，他频频接见美国记者，作公开表态，要挟美国。9月17日，蒋说，中共对金门的进攻是进攻台湾的序幕，「无金、马就无合、澎」，「到了最彼生死存亡关头，除了采取行使自卫权之紧急行动，即有效的报复行动！无法继续撑持时】美国为了人道，为了正义，以及为了遏阻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安全所负的责任。我不相信它会妨碍我们采取这一紧急性的自卫报复行动」。9月29日，蒋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反万表示，反对中美大使级谈判。并称，「金门战事在任何情势

之下· 才是我们的生死关头，

今天不能预为确定。如果到了这个

so《周恩来年谱（1949—1976）》（毛谭东外交文选）· 页 353· 8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毛谭东外交文选）

中卷中卷

页 171。页 173·

298

时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 11 卷（1958—1960—鸟托年运动

需要我们采取紧急行动，我相信盟邦必须继之以条约的精神

支持我们遏阻共匪侵略之目的，· 必不致中途后退。而我们在紧急状态中，亦不容为了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前顾后。」”，这就是说，必要时，他将显不得条约的约束，而将自行其是了。

蒋介石的一再公开表态，美国也只得公开阐述自己的立场了。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美国是否期待国民党人返回大陆时，杜称：「那纯粹是一种假设。」记者又问国民党军队是否应该撤离金门计杜说，在攻击面前撤退是不明智的，那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影响士气。但如果有某种停火】就可以撤军，「把如此众多的部队部署在这些岛上是不明智的，我们认为把这些部队保持在那裹是相当愚蠢的……是既不明智又不谨慎的。」“10月1日，艾森豪威尔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我们认为基本的问题是避免在武力面前退却：在解决国际社会中的这些问题时不诉诸武力。如果我们不忠实于这个原则，那么最后我们是会吃苦头的。但他同时龙为，国民党把大量军队驻扎在沿海岛屿上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威尔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对金门、马祖的政策从「协防」，转为「脱身」，目的是以放弃金门、马祖换取长期占据台湾的合法地位。美国一方面劝说蒋介石艾萨克退金门·马祖换取台湾、澎湖的苟安，一面想与中共做笔交易，以放弃金门、马祖取得中共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杜勒斯的表态令台湾当局极度恼怒。10月1日，蒋介石在高雄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与杜勒斯针锋相对。蒋表示“他反对削减在沿海岛屿的武装部队或是沿海岛屿的地位有任何政变·并称这「也就是在保障美国在远东的防务」·蒋强调说：「就假定杜勒斯先生说过据说是他说过的话，这也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因此我的政府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显然，蒋介石已忍无可忍，双方矛盾进一步扩大并公开化。

83 《中美关系史 11949 — 1971)》·页 268”开 《中美开系史必 1949 — 1972)》·页 268 — 269085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页 419。86 《中美开系资料，编》，第二辑，页 2824 — 2826

第”章总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元机 29, 3 毛泽东的策略：「联蒋抗美」9月30日和10月1日，杜勒斯与艾森弃威，的构话和美蒋矛盾的公开化，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密切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是先收复金门、马祖，「联美压蒋」？还是把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联蒋抗美」？就有必要重作权衡。

毛泽东最初确有希望美国能够像三年前逼迫蒋介石从大陈岛撤军那

样，再度逼蒋介石让驻守金、马的国民党军「这十一万人走路」。87 这时，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方案·暂不解决金门，马祖问题。毛在分析杜勒斯的谈话时指出：「把金门、马祖让给我们是杜勒斯的方针·他想以撤出金门、马祖交换我们不收复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如果因为夺取金、马而使台湾远离了中国大陆，便应了美国的图谋，那将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毛转而强调：

我们跟蒋介石有共同点：第一是蒋不显撤出金、马，我让金马留在蒋手中有利外就近保持接触·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封美一紧一雾·主动权准我。第二是蒋介石要死守台湾，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打算也不可能解放台湾。第三是我在蒋介石同美国人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让蒋介石跟美国人斗，实际上是支持蒋介石采美国人斗。美国想霸占台湾·还蒋介石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庸。蒋介石和蒋经国都还有一点反美的积极性。

此外，鉴于「最近台北发生蒋介石策动人打砸美国大使馆的事情。这些迹象表明，我们和蒋介石是有共同点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联合反美，不让美国完全霸占台湾。」。

87 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月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398，

88 吴冷西：《十年论战》·页184'190。

·必二·'k上必浩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49—1961）——鸟托年运动

早在1958年9月4日，杜勒斯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协防」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之后。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了被称为「绞索政策」的对美战略。毛说：

美国现在在我们这袭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甚么大担鸟、二担鸟·东统鸟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子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赐它一脾·它走不捧·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10月3日、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形势。周恩来发言指出，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趁此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从金门、马祖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美方在会谈中说的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

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认为中美双方都在摸底：现在双方都比较了解对方的意图了。

毛泽东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可以设想，让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裏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门、马祖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裏同国民党保持接触，甚么时候需要就甚么时候打炮，甚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甚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即

《建。以来毛潭东文挤》。第七册·页叩4

第四章炮击全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与会者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联蒋抗美」的新方针。让蒋军继续留在金、马■，使美国当局背上追个包袱。

最后，毛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门、马祖。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可以打打停停，一时大打，一时小打，一天只零零落落地打几百发。但我们在宣传上仍要大张旗鼓，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向金、马打炮是中国内战的继续，任何外国和国际组织都不能干涉；美国在台湾驻扎陆、空军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美舰云集台湾海峡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都必须完全撤退；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反对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我们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金、马以至台、澎问题。劲

稍后，毛泽东会见在香港定居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探、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毛泽东向曹明确阐明了对美对台的基本方针。

毛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批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

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

r 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途·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

「他们同美国的速理技解散·同大陆速起来，技速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病你的一套。」

幸士，.J 插括说：「这样·美援会断绝·」

毛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农反，但不要派钱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畸(周恩来年 I. (1949—1 奸 6))，中卷·页 1” — 178·

302

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第四寡 (1, 58 — 1961) — 鸟札邦运动

t 聚拱间：r 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才」

毛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

周恩来还说 ‘「美国企围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它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指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后来，毛泽东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解释说·开始我们想打金门、马祖，后来一看形势，金门、马祖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上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门、马祖？”10月5日和14日，周恩来两次会见苏

91 毛泽东同，众仁谈话纪要，1958年10月”白。载《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页850—881。据《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 卯 5）》记载，在毛泽东接见，系仁之前，9月8日，周恩来曾接见曹，向，指出，美·目前是卢张声势，到了战事边缘又害怕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也是有限的·周进一步向曹阐明，金门‘、马祖的蒋

军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与岛共存亡；二是全师而还。好处是金、马、驻、占、民写军队三分之一可以作为蒋介石对美国讲话的资本；三是美国逼蒋军撤退，这条路是不光彩的”10日，周再次接见，托曹返港后以快的办法转告台方。为了宽大并给予蒋介石面子，「我们准备以七天的期限，准其在此期间由蒋军船只运送粮食、弹药和药品至金门、马祖。但前提条件是决不能由美、飞机和军维护费，否则我们一定要向蒋军船双开炮。周弦绸。即使发生所谓局部战争，但只要打起仗来，就不可能准确的局限于沿海的炮兵阵地，届时战争可能扩大。无论如何，受损失的首先都是台湾。内政问题应该自己来谈判解决。台海应该大度一些，美国可以公开同我们谈、为甚么国共两党不能再来一次公开谈判呢？」《周恩来. 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 页 461—462。毛泽东10月13日的这次谈话，更是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基本方针的具优化。后来，周恩来把它概括为「一纲四目」，195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它一切问题悉尊，总戴（指蒋介石）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海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发付；台海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经苏、总戴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施行；双方互约不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张治中给陈诚的信，1961年1月4日，载（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页 551. 9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 181。

93 毛泽东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9月15日，载《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页 878—879。

「一」c 开

第四章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联驻华临时代办安东诺夫（s. F. 鮑 托诺夫），说明中一政府从原来准备分「两步走」到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目的是「不能让美（国）换来一个冻结台湾海峡的局面」。周说：「我们这一方针简单讲来就是要使台、澎、金、马仍留在蒋手裏，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手裏。」因为蒋介石也不赞成美国的做法，一方面是怕影响蒋军的

士气，另一方面也不显意完全受美国控制。「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蒋找到了共同点，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反对美国。」”毛泽东调整对金门、马祖的方针】有多重战略策略的考虑。首先，挫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进而把台湾变成美国永久殖民地的阴谋。台湾留在蒋介石手中，强于完全落入美国之手，如果逼蒋撤退金门，马祖·他就很难保住在合，澎的地位。周恩来讲，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予外人，不给家奴」，我们则是「宁予家奴，不给外人」。”其次，把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裏可以拖住美国。”毛泽东认为，美国在台湾及世界各地的一切军事基地和军事干涉：都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美国停留愈久，绞索愈紧。台湾是一根绞索。但离得太远，把美国拖在金门、马祖·绞索可以随时抓在中国手裏。有利于与美国的谈判和斗争。其三，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裏，必然加探美蒋之间的矛盾，这将激发蒋介石的民族性，也保留了一个大陆同台湾对话和接触的形式。逼蒋撤退金门、马祖，双方完全隔离，既打不着，又谈不拢，不利于统一进程。”

既然要向蒋介石国民党示以善意，大规模惩罚性的炮击自然就不再需要了。10月5日8时，毛泽东下令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

94 周恩来会见苏联驻·大使馆代办安东诺夫谈话记录，土 958 年 10 月 14 日·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金冲及主颈：《周恩来传 1 工 949 — 19 秘）》1 北京：中央文欢出版社，1 卯 8），页厦 432 ·

95（周恩来传（1949 — 1976）》，页 1432，

蚯 1955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 t 议第十五次 t 让的讲话提出了著名的「绞索政策」·见《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七册·页 384 ·

97（毛潭东传（】舛 9 — 1976）》·上册，页 865 — 866, 878 — 879. 3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19 铭一 1961）—鸟托并运动

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做出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具体部署·为向国民党明确传递「联蒋抗美」的信·息，加深台美之间的矛盾。10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文告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台湾问题应由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文告宣布从6日起，停止炮击一周【让台湾充分自由地输送供应品，条件是美国不得护航，如果护航】立即开炮。10月13日，彭德怀下令再停止炮击两周，条件依旧。中国对金门岛的猛烈炮击和封锁，戛然而止，外界摸不着头脑。美国人乐意把中国的举动与杜勒斯的声明联紧起来。殊不知，毛泽东的方针与杜勒斯的想法正相对立。

正如毛泽东，周恩来所料，中国每次提出暂停炮击，都造成了美蒋关系的新波折。第一次停火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声明暗示停止护航，蒋介石急忙发表谈话，意在拖住美国。10月8日，美不赢蒋的请求，宣布暂停护航。”10月14日，中国决定再停火两周的第二天，杜勒斯召见台「外交部长」叶公超，要求叶公超「巧妙地向蒋介石提出撤出沿海岛屿的问题」。10月13日，美国防部长麦肯罗依（Neil H. McRoy）在台劝说蒋介石撤退，未果。‘即10月18日，蒋介石对《纽约时报》（入胎 wyo 咸几 mes）记者发表谈话，反复强调沿海岛屿的重要性。蒋甚至说：「我们希望再次强调金门作为整个西太平洋美国阵地的屏障的重要性。必须守住金门、马祖和其它沿海岛屿，因为它们是保卫台湾海峡和西太平洋必不可少的。如果金门失守，第七舰队 ga 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1976)），上册，页 875·99《中美关系数据汇编》，第二辑 100《中美·系史（1949—1972）》

手补，1958年”月5日·转弓 I 自《毛泽东传缝”一

·页 2844—2845’，273·

第齐章炮击金门与第斗次台海危机

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立即有发生冲突的危险。现在应该由美国人民来判断保持沿海岛屿是否合乎他们的最大利益。」101

10月21a，杜勒斯亲自出马，飞赴台湾与蒋介石会谈，目的是要蒋介石同意放弃以武力进攻大陆，并「从沿海岛屿撤出几乎所有的守卫部队」，而美国则给蒋一些登陆装备，一旦今后条件具备，蒋仍可以有

反攻大陆的能力，这样可以避免使美国卷入与中国的直接军事冲突。

‘02

中国政府洞悉杜勒斯台湾之行的目的，是压蒋介石从金、马撤军，制造「两个中国」。因此，当杜勒斯飞赴台湾之时，下令恢复对金门的炮击和封锁，以为蒋介石讨价还价、拒绝撤退增加砝码。在 21 日到 23 日的三次蒋、杜会谈中】蒋介石拒绝接受杜勒斯提出的从沿海岛屿彻军的建议：表示原则上同意削减沿海岛屿的驻军，换取美国提高岛上驻军武器装备的水平。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在《联合公报》中宣布放弃以武力重返大陆的承诺。10 月 23 日，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103

毛泽东在 10 月 22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属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拚死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了矛盾。「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联蒋抗美。我们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闹独立性。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所谓的『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过去一个月，我们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确定了「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的方针。

101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页 461 — 462
102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页 464 — 468
103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页 469 — 470
叫吴玲西；《忆毛主席》，页 88 — 四

让月坛望唱堡 11 顶 j1 跚” n 啊 “。！ ---jj 月 J//JJ 州划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9 — 1, 61）— 乌托年运动

为使台湾当局了解大陆意图。10 月 25 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再告台湾同胞书》。文告要台湾当局划清内战与外侮的界线，一致对外，并称：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甚么帝国主义。文告宣布：「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

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六天之后，10月31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决定：「今后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使国民党军人员能走出工事自由活动，晒晒太阳，以利其长期固守；逢单日略为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二百发，」’ “从此，福建前线出现了逢单日打，双日不打的戏剧性场面。中国的意园，与其说主要对蒋，不如说主要对美，打是为了给蒋介石一个拒绝撤退的理由，不打是为了使蒋军获得补给的时间，使其能坚持下去，而且炮击只打沙滩，不打民房与工事。

经过1958年炮击金门，中国领导人摸清了美国人和蒋介石的底牌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对台湾及沿海岛屿的政策也就更加明晰和成熟，这就是把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作为连接台湾和大陆的纽带，以此反对美国隔离台湾，「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继续推动和平统一台湾的进程，待将来时机成熟，将合、澎、金、马一揽子解决。在行动上放松了对沿海岛屿的压力。人民解放军的海上部署收缩到舟山基地至罗源湾一带，空军的活动也限制在大陆边缘，台湾海峡局势相对平静，问或的打炮成为例行公事。1959年1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今后逢单日不一定都打炮」。，标志着金门炮战事实上宣告结束。

105（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6日。

1 师余雁：《五十年国事纪要·军事卷》，页3茄。107《当代中国军队的军.工作》，上册·页417。

第口章炮击全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经过这次危机，蒋介石逐渐明白了大陆的意个。他的「反共复国」政策也发生了彻妙变化。虽然在公开场合，台湾当局否认台湾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口号，但重点已由「政治反攻」代替军事冒险。1958年12月23日，蒋介石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 t」上讲，「反攻」计划，「主义为主，武力为从」。1959年1月1日，蒋介石的元旦讲话公开宣称：「反攻复国的战略，始终是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台湾当局的政策重点由军事备战转向经营和建设台湾。，自1961年12月起，中央军委又通知福建前线，停止实弹射击，只打宣传弹。随后，国民党军基本上也照此办理。国共之间这种象征性的炮击一直持续

勒斯精心设计了一个《声明草案》。由美方大使比姆在9月30日第七十七次会议上提出。《声明草案》开头用一种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并写上苏联支持中国，接着说，中国政府应停止对金门、马祖的军事活动等等。显然，这个《声明草案》没有甚么新的内容，只是换一种形式掩盖美国继续侵犯中国主权和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活动的烟幕。因而，为中方断然拒绝。在10月25日《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告：「双日不打单日打」以后，有一次正值双日会谈。比姆对此非常高兴，他表示希望永远停止炮击。王炳南指出，打炮不打炮是中方单方面行动，与中美会谈无关。会谈应该讨论美国永远全面地从台湾撤军。

1959年底，坚持与中国政府顽固作对，始终不愿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的杜勒斯离任，新任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A. Herte）仍继承了杜勒斯的一套，并没有给会谈带来甚么起色。1960年3月，以罗马天主教主教身份在华进行问谍活动的美国人华理杜，被中国司法机关逮捕并判处死刑。在3月22日的会谈中，中方将华理杜在华进行问谍活动，企图类覆中国政府的事实，及中国司法机关的判决通知美方比

109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10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

，页72—73 贾77。

第四章 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姆大使。比姆感到惊讶并提出抗议。王炳南严正指出，华理杜所犯罪行严重，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有权提出抗议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此后，美国在中国的罪犯问题，就成为每次会谈美方紧紧抓住不放的问题，无理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这批罪犯，遭到中方理所当然的回绝。

2 王炳南总结百次会谈

1960年9月6日：是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中美会谈以来的第一百次会谈。为了让世人了解中美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并推动今后会谈的进展。中方大使王炳南在会上作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王炳南指出，在五年以来的百次会谈中，中国方面始终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来和美方进行会谈，而美国方面毫无解决争端的诚意，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和加剧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王回顾说，中美会谈在进入第二项议程才即双方有争执的其它实际问题以来，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作了不断的努力，先后提出了十个合情合理的方案，以谋求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可是美国方面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曲解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硬要把协议运用于所有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的美国犯人，要求无条件释放这些犯人，这是无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又违反平民回国的协议，阻挠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

针对美国拒绝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彻出一切武装力量的现实。王郑重指出，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你们美国政府为了永久霸占台湾，甚至把台湾蒋介石政权说成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硬说美军侵占台湾是根据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条约义务」。这种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并把台湾变成美国殖民地的阴谋手法，已是世人皆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军。喜（19,8—19叔）一鸟托年运动

鉴于会谈迄今毫无成果，王炳南指出，中美之间的争端能否解决，单凭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再的，现在是美国重新认真考虑你们对中美会谈的态度，特别是认真考虑把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时候了，运考虑不如早考虑，运走不如早走。早考虑，早走？你们可以早得到解脱。

为打破目前中美关系的僵局，王大使就中美互换记者再次提出一个新方案。王强调说：中国的宗旨是，中美记者互换是为了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初步改善目前两国之间又冷又僵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使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美国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的问题。111

美国大使比姆对王炳南这番慷慨陈词，表示失望，再次拒绝了中方提出的新方案。

1960年底，美国举行大选。肯尼迪（John F. Kennedy）当选，于1961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继续在全球推行咄咄逼人的攻势政策。中国政府虽然不放弃通过中美谈判解决两国争端的方针，但对于近期内取得成果并不抱希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看来，肯尼迪的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与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并没有甚么不同。然而，中美双方都有意使会谈延续。毕竟在两国既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正式的贸易联系和文化联系的情况下，中美会谈是两国保持某种接触，交换一些意见的唯一渠道。通过这个有用的渠道，可以阐明各自的立场，从而减少错误估计和误解，避免由此造成的危机。1961年9月，比姆奉调回国，出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副署长新职。美国选派有过在上海当总领事经历的卡伯特（John M. Cabot）接任驻华沙大使。王炳南的对手又易新人。

3 华沙通道的一次实质性作用

中美华沙会谈的通道，发生的一次较为实质性的作用，是1962年中美双方及时沟通，制止了蒋介石的一次「反攻大陆」的军事冒险行动。

111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页79一踪。

第四章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1962年，中国政府得到情报，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与大陆。台湾当局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他们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据说还从日本大量购买血浆。看来蒋介石准备**【要而走险】**要与大陆大干一场。

蒋介石改变「政治为主，武力为辅」的方针，再次决定进行军事冒险，这与当时美国的动向和大陆的形势有关。6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政府的更迭，美台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再次突出，「蜜月」时期已经过去。美台关系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不十分确定。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下降，虽几经抗争，蒋介石还是得默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在他绘制的地图中，蒙古依然划归为中国领土）自己在联合国的席位根基也不稳，国际上和美国政府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舆论增多，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肯接受的。在中国，任何统治者搞分疆裂土，放弃领土完整都会为人民和历史所唾弃。蒋介石既不

愿背这种骂名，更不甘心长期孤悬海外。如果接受「独立台湾国」，不仅重返大陆永远无望，而且在台海本岛也难有立足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希望在台湾海峡制造一些紧张局势，一则可以拖住美国，二则造成一定声势，配合其经济成就，引起国际社会注目，三则可以试探一下美国对台湾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1959年到1961年中国大陆面临严重经济困难，也使蒋介石对反攻大陆成功抱有一定的幻想，自1960年以来，蒋介石就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大陆发生的饥荒，寻找着机会。1962年夏，中国国内的困难状况更加突出：在中国政府开放向香港移民的限制之后，从内地流向香港的人员平均每月达数千人之多。问题严重到引起联合国关注的程度。正如周恩来所说：「蒋介石认为目前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在外中共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真是千载难逢。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大干一场了。」¹ 奋，喻量•，，••■. !11!1:I, 1-. 1 神. 1:1Jj 仰 JJ--1! 径•! 一日 ■. ’. ■—

1

112 王炳南：《中美 t 铁九年回腊》·页 86, 31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1）—鸟托年运动

中国领导人对形势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冷静的分析，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部署，从全国各地向福建太急集结部队，解放军总参谋部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同时也认为，虽然蒋介石反攻大陆决心很大，但还存在一些困难，关键要看美国的态度，若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势单力薄，难成大器。因此，在外交上确定了以美制台的方针。为了更准确地向美国传递信息：摸准美国政府的态度，周恩来决定利用华沙通道。1962年5月间，周恩来召见回国休假的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王炳南，指示他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王炳南奉命迅即动身赶回华沙。

美国对台海海峡再次出现的紧张局势，也极为关注。1962年3月，蒋介石和蒋经国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W. AvereliHarr 通 an）、国务院情报司司长希尔斯曼（RogerH 迅 man）谈话，竭力鼓吹「大陆

人民对共产党的反抗一触即发」，希望美国支持他的反攻大陆行动。3月14日，哈里曼访台归国后说：「无论共产党政权是否摇摇欲坠，美国不支持国民政府反攻大陆。」30日，肯尼迪亲自出面澄清：关于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美台双方未曾进行磋商。

此时，美国政府对国共双方的动机和态势做了一番分析，认为大陆虽有困难，远未达到「一触即发」，国民党不可能一举「统一中国」；如美国卷入其中，势必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战争；中国在前线集结兵力，主要在于戒备，不太可能再次主动进攻金门、马祖；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有疑问】美国必须设法不使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产生误解，应该向中国表明，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也不会放弃台湾。美国政府指示其会谈代表卡伯特于6月27日的中美会谈中向王炳南传递上述信息。

不等卡伯特约见，王炳南奉命于6月23日主动约见卡伯特，请卡伯特到王在华沙的官邸喝茶。

在轻松的气氛中，王炳南首先谈到东南亚的局势。说门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局势的发展感到担心。今年以来，美国增兵越南，出兵泰国，加紧干涉老挝，东南亚局势已经发展到随时可能引起大规模国际冲突的边缘。中。政府的态度一向是克制的，尽管蒋介石残部参加了第齐章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老挝内战，中国的安全正遭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仍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没有放弃在不干涉有关国家内政的基础上，使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局势缓和下来。但是，局势能不能缓和下来，关键并不掌握在中国手裏。

接着，王把话锋一转，指出，中国政府还要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王炳南强调说，美国政府完全清楚蒋介石集团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情况，这种准备工作正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自从今年2月以来，蒋介石集团就进行了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提前征集兵员入伍，延长现役士兵服役期限等等，准备渡海登陆。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参与或配合下，进行了频繁的登陆实战演习和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为蒋介石准备进犯大陆打气叫好。美国政府增加了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和「经

济援助」。美国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支持和鼓励蒋介石进行军事冒险，不管冒险的结果如何，美国部可以收到打击和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在美国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集团正在跃跃欲试。王在反复谈及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背后所起的作用以后说，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样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

最后，王以警告的口吻说，我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王请卡伯特将局势的严重性立即报告美国政府。’ ”

卡伯特听完王炳南这一番话，表示很欣赏王的坦率精神，他将尽快把这个情况电告美国政府。接着，卡伯特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卡伯特 113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显》·页 88 — 89’

尸一州， ‘一一一一一一一闷 ‘j一一、一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象。奉（19” — 1961）一乌托年运动

扣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不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

卡伯特在告别时，甚至对王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1’

听了卡伯特的明确表态，王炳南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终于摸清了，他一刻也不迟疑地把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

6月27日，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政策是「和平和防御性的」，如对金门、马祖的攻击是对台湾的攻击的一部分，美国将防卫金门、马祖，但又说，在未获得美国同意之前，国民党将不采取「反攻大陆」的行动。同时，美国出动第七舰队，加强在台海巡逻，既向中国显示不退出台湾的决心】又阻止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行动。

7月1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在朝鲜驻华大使举行的宴会上发出

警告：蒋介石对大陆的军事冒险不论是迟是早，规模是大是小，美国政府必须对此承担责任。

经过中、美、蒋三方的幕后活动，各自对对方的态度都摸清了底。由于美国持不支持态度，蒋介石难以对大陆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反攻大陆」的蠢动被制止了。

4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终结

马拉松式的中美会谈，双方代表也一再变换。1961年11月10日，第一百零七次会议后，美方比姆大使离任，由新任美国驻波兰大使卡伯特接任。1964年4月8日第一百二十次会议后，中方代表王炳南奉调回国，结束了长达9年中美会谈的经历，中国新任驻波兰大使王国权接任，1965年12月16日的第一百二十八次会议，美方又改由新任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John A. Gronouski）接任。1967年6月14日114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页89—90，

第四章炮击金门与第二次台海危机

第一百三十三次会议后，中方代表王国权离任回国，由中国驻波兰代办陈东担任。

‘从1958年9月开始，到1968年年初中断，华沙会谈总共进行了六十一次，与此前的日内瓦会谈相比，明显的区别是会谈内容，不再限于平民遣返、台湾问题，而是扩展到核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等多个领域。尽管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却一直保持了当时中美唯一直接接触的渠道。1970年1月20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度恢复，美方代表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Walt. : Stoessel），中方代表是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经过第一百三十五、一百三十六两次会谈，中美关系取得了两点进展：一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首次提到，不妨碍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也表示了相应的灵活态度：不再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一概不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二是两国代表第一次面对面地表明了愿意改善关系的愿望，并且都希望实现更高级别的会谈。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作为尼克松（正。hardM. N坎。。）总统的特使秘密访华7双方确定巴黎为今后秘密联系的渠道，

中美华沙会谈不再恢复。这样，自 1955 年以来时断时续坚持了十六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第五章

西藏平叛与西藏的社会改革

一西藏解放后面临的形势

1 《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1949 年底，祖国大陆除西藏外，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均已解放。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1950 年 1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接受了解放西藏的任务。在进军前，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向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进藏部队要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做好统战工作，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一切亲帝分裂主义分子。邓小平指出：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的成见。

对于西藏的解放，中央政府决定采取和平的方针。因此中央在下令进军西藏的同时，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3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团史·沐，夺 11958 — 1961）一鸟托年运动\

但是，帝国主义者和西藏统治集团中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千方百计阻挠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妄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搞所谓「西藏独立」。他们于 1949 年 7 月制造的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官员的事件，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策划组织的所谓「亲善使团」，声言要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和北京，表示所谓西藏「独立」，就是这种阴谋的暴露。对西藏当局进行的所谓「独立」活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于 1950 年 1 月 20 日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并再次申明中央政府的严正立场。与此同时，班禅堪布会议厅及各地藏族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发表谈话、召开座谈会，揭露帝国主义和拉萨当局的阴谋活动，一致要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

帝国主义者和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扬育派 r 亲善使团」,搞所谓「独立」的阴谋虽未得逞,但拉萨当局仍未停止与帝国主义勾结。他们企图玩弄两面派手法,檐续与中央对抗。即:一方面派出一个代表团【于 1950 年 2 月由拉萨起程,声称要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但却长时间滞留印度,等待时局变化;另一方面,西藏政府则成立应变机构,积极扩军备战,把原有的藏军从十四个代本(相当于团的建制)扩充为十七个代本,并将由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第三、九、十代本的精锐兵力部署在昌都一线,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阻止解放军西进。在此情况下,中央并未放弃争取和平解放的努力。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立场,对中央的方针作出积极的响应。这时,著名的藏族爱国人士、西康省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于 1950 年 5 月 5 日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愿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前前往拉萨,劝说达赖接受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格达活佛到达昌都后,不幸于 8 月 22 日中毒身亡。由于西藏当局蓄意要在军事上与中央较量,人民解放军被迫于 1950 年 10 月进行了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主力。给帝国主义和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这时:以大扎摄政为首的一小撮亲帝分子,挟持达赖喇嘛逃往亚东,企图把他带出国外。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人士则反对达赖喇嘛逃往国外,主张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

第五章西戴平叛与黄戴的社会改革

319

昌都战投结束后,中央仍坚持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代表赴北京谈判。二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亲帝分子达赖下台,达赖开始亲政。1 必土年 2 月,西藏地方政府委派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及饥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等五人为全权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振利瓦伊汉及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进行和平谈判。4 月 29 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在北京举行。经过二十多天的充分协商,双方代表于 5 月 23 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除前言外共十七条,故称为《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1 《p 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 1 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动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C3）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4）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5）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1 班禅额尔德尼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7）行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8）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珍）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文、文字和学校教育！·《10）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11）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要求改革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12）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113）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14）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5，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将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16）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让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运和运输，粮秣及其它用品’（17）本协议‘在签字造章后立即生效·见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建国以来‘要文戏遗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56》，页283—287。

• 亡潺活楹

3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四春（1958 — 1961）一鸟托邦运动\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阴谋的破产】标志着西藏人民迎来了历史的新纪元·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并举行盛大宴会。毛泽东在宴会致词说：

几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族与藏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登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徒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即前往亚东会见达赖喇嘛。1951年8月下旬张经武和达赖一同回到拉萨·同年10月下旬，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主力部队进入拉萨。西北军区派出的由范明、慕生忠两将军率领的另一支部队，也从北路同时到达拉萨。从此以后，西藏地区就开始进入认真执行《协议》和逐步建设新西藏的过程。

2 西藏解放后面临的复杂斗争

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入藏后，本着《十七条协议》的基本精神，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平等的政策，在保卫祖国边疆的同时，对以达赖为首的原西藏上层统治集团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

2 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的讲话》1951年5月24日，载中共中央文研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1”。

第五章西藏平叛与西藏的社会改革

针，帮助他们认识社会进步的潮流·争取其改变极不合理的黑暗的农奴制度。但是，西藏上层中的反动集团却始终与外国势力相勾结，不

斯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并顽固维护反动的农奴制度，拒绝进行社会改革。西藏的噶厦政府故意让民间的反动分子出面，建立称为「人民会议」的反动组织，同中央政府和解放军对抗。这样，人民解放军进藏后就面临着统一与反统一，改革与反改革的激烈斗争。在1951年发生局部叛乱前，斗争的主要形式是非武装的政治斗争。1952年1月13日，噶厦政府的司伦鲁康娃召集政府官员秘密开会，确定要进行驱逐解放军的军事准备。他们决定将昌都战役后仍保存下来的藏军主力第一、第二、第六代本集中在拉萨：并作好战斗准备。然后，以所谓的「人民会议」出面「请愿」，以藏军作后盾，企图掀起一个驱赶解放军的浪潮。

3月30日「人民会议」派代表正式上街请愿，3月31日和4月1日又组织人在拉萨街头示威，并纠集数百名流氓和喇嘛包围中央代表驻地，寻衅闹事。大批藏军也包围中央代表驻地和中央办事处，银行等处，噶厦政府两司伦还从日喀则调来炮兵代本，接应市内的骚乱。解放军第十八军军直机关和第五十二师进驻拉萨后，因供应困难，不足万人的部队分散在数百里长的地区，多数单位为解决供应困难已准备转入春耕生产。面对紧张形势，3月底西藏军区将在外准备开荒生产的军机关一部和第一五五团紧急调至拉萨附近，准备应付叛乱。在安排必要自卫措施的同时，中共西藏工委决定本着团结爱国的精神，着重争取西藏上层人士出面平息骚乱。

毛泽东对于拉萨的这次以「请愿」为名掀起的骚乱非常关注，他于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西南局、西藏工委的指示，分析了整个西藏的形势，认为西藏不比新疆，无论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

新疆

这个组织，早于1950年12月由拉萨城内的藏人阿乐则群等招募无业流氓组织起来，在噶厦政府允许下，和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噶丹寺）的一些反对解放军进藏的上层活佛，联合起来，打出了「人民会议」的旗号，并于1951年11月正式拟定了「请愿书」。要求解放军退出西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西藏卷【19, 8—1, 1）一鸟托年运动

骚差得多。据此指出：「看来不但是两司伦，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议是勉强接受，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议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毛指示说“「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接受这次请愿，把协议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议），而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不仅为平息伪「人民会议」闹事规定了一个指导原则。也为当时的西藏工作确定了一个总方针。即：在人民解放军刚刚入藏，公路不通，后方供应无保障，缺乏群众基础和上层基础的情况下，采取形式上的攻势和实际上的守势，条件不成熟可暂缓实行《十七条协议》。中共西藏工委根据中央指示，一面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和炮兵营仍尽量避免冲突；一面向噶厦政府提出应撤销支持「人民会议」的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司伦职务，并切实维护好拉萨治安，制止闹事。4月19日，张经武单独前往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喇嘛，严肃而又坦率地传达了中央政府的意见，并提出撤销两位司伦的职务。

达赖当时表面上接受了中央的意见，于4月27日下令将两位司伦彻职，然而事后又对他们加以「慰问」。5月1日，西藏地方政府张贴布告下令解散「人民会议」调来的藏军也纷纷撤回。西藏上层的反动势力虽然一度收敛了其公开的分裂行动，却始终没有放弃其对抗中央和准备叛乱的活动。一部分逃往印度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以噶伦堡为中心，勾结国外势力，继续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在拉萨和各地的反动农奴主因害怕广大农奴觉悟，一直阻挠群众与解放军和中央进藏人员接触，限制藏族青年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参加工作和学习，并制造攻击共产党的种种调言以欺骗下层群众。

… * ‘悼剑

4 毛泽东：〈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1952年4月6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页229-229。

第五章西藏平叛与西藏的社会改革

1952年4月28日，流落内地已有二十九年的班禅额尔德尼及其行辕在人民解放军护送下回藏，进入拉萨。因《十七条协议》规定了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应维持，达赖也已于上一年正式表态承认班禅的转世灵童：噶厦政府不得不组织了比较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复，班禅回到日喀则，在中共西藏工委的支持下，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职权，这在当时对于稳定西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打击反动势力的进攻时，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军驻藏部队在事实上也做了一些让步，以促进局势的缓和。按照毛泽东关于「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的精神，在《十七条协议》上已规定、却最为噶厦政府所不满的内容，如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等，这时都不实行。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议的问题」的指示，驻藏解放军部队在以上层统战工作为主的同时，还组织了文工队、医疗队在驻地进行宣传 and 巡回医疗。

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由于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藏族各界对解放军和汉族干部普遍存有戒心，开始不愿接近，而对给他们看病的医生比较欢迎。如大贵族功德林扎莎平时不愿接触解放军，可是当董金增大夫给他恰好了心脏病后，主动向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提出要办一百桌酒席感谢解放军，经谢绝后仍办了十妻桌。各地的上层僧侣和广大贫苦农奴，也纷纷找解放军看病。在这种情况下，驻藏部队又兴办一些公共福利事业，并招收贫苦农奴到内地学习，修建学校。

为了打破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在粮食问题上刁难进藏部队，妄图把解放军困死和饿跑的图谋，西藏军区还提出了「向荒野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的口号，驻藏部队指战员和全体进藏机关人员都行动起来，开展了农业生产。1952年内就开荒一万六千余亩。虽然由于高原气候条件差，收获量很有限，尚不能解决部队的大部需要，却多少缓解了供应上的紧张局面。

111.., ■. ■■■■■里口■ ‘•’ ■■■■优. r, . ” ■■■■J, j ■
, -’ ‘、 / / 姿盍遗

• 第实春（1958 — 1961）— 乌托年运动

3 中央宣布「六年不政」的方针、

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就已经看到了西藏的这种现实情况，毛泽东当时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两件序情”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邓小平也提出

‘「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是稳步前进，就是说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央对于触动西藏农奴制度基础的改革，更强调要慎重稳进。

为了促使西藏上层人士觉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亲自向西藏上层人士做说服工作，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军驻藏部队的领导也向西藏各界大力宣传了党的政策以及对西藏改革所要采取的方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上层人士时，曾以佛祖释迦牟尼为免除众生痛苦不当王子，以及当时党内外的领导人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却走上革命道路为例，劝导西藏上层人士为本民族的繁荣发展，应自动进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明确向西藏上层人士说明，今后改革时仍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对待西藏上层人士不采取内地土地改革的办法，而仿照对内地民族资产阶级的优厚政策】由国家以赎买的方式收购农奴主的生产数据分给贫苦农奴，使广大农奴得到解放·毛泽东还专门对中央统战部的领导说：你们研究一下，搞一个等 t 的办法，他们在老百姓手中拿多少钱·我们就给他们多少钱，叫他们不要再去剥削老百姓】把土地给老百姓。为了说明民主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大势所趋：西藏工委尽力劝导西藏地方的官员、高级僧侣和贵族组织参观团到内地参观学习。1955 年至 1956 年，内地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上海有的资本家一年可以拿一二十万定·息，毛泽东还以这个例子对西藏贵族说，你们那裏有没有那样大的贵族？你们可以到上海看一看他。

s 韩侠：〈西腊现代革命史研究概述〉，《中共党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

第五章西藏平叛与西藏的社会改革 3 筭对于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导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中央特 g11 予以了关心和帮助。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经中共中央邀请，西藏的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于 9 月 4 日到达北京参加大会，毛泽东主席随即接见

了达赖和班禅。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副主席。

达赖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访问内地期间，在公开场合和私下裏都有许多拥护国家统一的表示。其它许多西藏上层人士，对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耐心教导也深受教育。据当时西藏政府的四大噶伦之一的拉鲁·次旺多吉‘回忆，1955年他在担任西藏参观团团长到北京参观时，受到毛泽东两次接见。毛主席坦率地问：「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你们怕不怕？」拉鲁回答说：「怕！」毛主席说：「不用怕，我们不仅不会杀害贵族，而且会保障你们的生活。我们要让西藏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拉鲁说，他当时也很受感动。但是，达赖返藏后》又陷入代表反动农奴主贵族集团利益和分裂主义势力的谋士、经师等人的环绕之中，日益走上与祖国离心离德的道路。拉鲁等上层人士为维护自己的农奴主阶级的地位，还是一度走上了武装对抗民主改革的道路。

在当时的西藏上层中，也有阿沛·阿旺晋美等一部分人受中央的教育和影响，提出了改革农奴制的进步要求。这一时期，由于康藏和青藏两公路的通车促成内地与西藏的联紧更加紧密，在西藏许多地方成立了医院、学校，免费给藏民治病并招收藏族学员。国家还向西藏发放无息农业贷款，购买供应茶叶，并开始建设发电站、皮革厂、铁工厂，培训出了西藏第一代产业工人。拉萨等城镇的学校、机关中的藏族青少年中也建立起青年团和少先队组织。这使得西藏土地上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改革的呼声也随之出现。

拉鲁·次旺多吉在1959年拉萨叛乱时因担任叛军总司令被捕，1965年被特赦。拉鲁·次旺多吉：《回显我所走过的道路》，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页U·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7—1961）—乌托卑运动

1956年4月，拉萨举行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前往出席。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上，开始提出西藏的改革问题。担任筹委会主任的达赖在开幕词中也表示，愿意根据西藏的「具体情况和西藏领导人员及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逐步的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风闻改革后，出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动机就在积极地筹划和采取反抗措施。自 1955 年起，伪「人民会议」分子的活动，就得到部分西藏上层人士或明或暗的支持。这时，邻近西藏的四 J11 彝区和甘孜藏区开始的民主改革，使西藏部分上层人士产生了恐惧，反动分子乘机煽起反对改革的逆浪。伪「人民会议」的原班人马改旗易号，在拉萨成立反动组织「四水六冈」《藏语「曲细冈珠」，意为「四条河，六座山」，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藏族众居的地方），与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和外国势力加紧联络，成为后来发动西藏全区性叛乱的率先组织者和先锋力 t。

西藏上层农奴主贵族集团加紧分裂活动，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尤其是印度政府的态度分不开的。1950 年代前期，中印友好一度成为两国关系主流。但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一直采取两面立场：一方面反对在国际上孤立新中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g 一方面又利用它同西藏在宗教、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紧，支持和怂恿西藏反动上层集团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时，印度仍在西藏保持着原先英国派驻的所谓「护商」的军队，并控制着西藏的邮政、电报等企业。中国政府从发展中印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出发，未采取任何强行驱赶或接管的措施，而是希望双方通过谈判和友好协商予以解决。1954 年中印双方达成协议，印度取消它从英国继承的在西藏的特权，将其在西藏的邮政、电讯设施和十二个驿站交给中国，并撤走驻江孜和亚东的武装部队。

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持比较慎重的态度。1956 年 8 月 8 日，毛泽东在覆信达赖喇嘛时就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要是一个协商过护性的办事机构，还不是正式政府机关。」

第五章西藏平叛与铃咸的社会改革

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后是不出乱子。」此后，中央明确宣告，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内即在 1956 年至 1962 年之内对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也要到那时候看情况再定，让西藏地方政府和上

历史人士有一个充分的考虑时间，以利于条件成熟时，和平地稳妥地实行改革。这就是：西藏「六年不改」的决定。

印度政府放弃在西藏特权时，却有一批政界人物在「友好」的外衣下加紧了西藏的颠覆活动。1956年，印度领导人以本国举行庆祝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的仪式为由，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参加。

对于印度的邀请，中国政府表示这是促进两国友好、和平共处的表现。中央人民政府对达赖、班禅表示，是否去印度由他们自己决定。就达赖、班禅去印一事，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专门进行了研究。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

语 jJ. 1. 1' 11, esjesjes 才 '!! • '. 1 ■ ■ •. ■ ■ • ■ .

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期佛。让他去 • 这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 • 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 • 要坐汽车 • 通过噶伦堡 • 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 • 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 • 不仅不回来 • 而且天天骂确，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佃号召，大闹起事 • 要把我们鼻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农，不负责任。这种可能 • 是从壤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壤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西藏工委和军队要竿备昔 • 把堡垒修起来 • 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耶几个兵 • 横直各有各的白向，你要打 • 我就防，你要攻，成就守 •

9 中。” 博物馆，着：《毛泽东事活动鸦》啡京：解放 • 出鳅 • 1 州）。页 8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东齐夺（1958 — 1961）一鸟托年运动

毛泽东还以当年叛逃投奔国民党的中共领导人张国焘为例地解释这一决定的意义说：

我们有经验一练，就是账国焘跑了并不坏 • 捆乡不成夫妻，风趣。他不

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 • 统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甚么壤处呢才没有甚么壤处 • 冉非是骂人。’ ”

根据中共中央应付最坏可能的要求，驻藏解放军各部队、中央驻藏各机关和内地入藏的工人都作了应变准备。在重要的部门和交通点上修筑了部分工事，储备了种弹，准备叛乱分子进行挑衅或发动进攻。当达赖离藏时，西藏的一些分裂主义分子就积极准备在拉萨发动暴动，以造成「独立」声势，配合外国势力将达赖留在印度。但是鉴于解放军驻藏部队已严阵以待，西藏地方政府内的爱国人士又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分裂主义分子一时未敢轻举妄动。

达赖及其左右 1956 年 11 月到达印度后，印度政府别有用心地给予超乎寻常的礼遇和接待。在一次招待会上，印度孟买市长竟然公开胡说甚么「西藏是一个国家」，印方并在许多场合悬挂起标志「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在国外势力和西藏反动分子的拉拢下，达赖及其家属和大部分随行人员产生了思想波动，迟迟下不了返回西藏的决心。1956 年年底，周恩来再次访问印度。他一方面对尼赫鲁

(JawaharlalNeh.) 政府做工作；一面受中央的委托劝说达赖返回祖国。在同尼赫鲁的谈话中，周恩来就达赖问题指出，达赖、班挥是尼赫鲁亲自写信邀请的。他们到达后印方的许多所作所为却是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尼赫鲁开始对此不承认，当周恩来 yfj 举了大量事实后，尼赫鲁又推说他不知道，可能是下面的人干的：要查一查。周恩来随即向尼赫鲁指出。达赖如被留在印度：一钱不值，只能成为 10 毛津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t 第二次全体 t 议上的讲话〉(19 “年。 t 月 15B) • 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d 匕京：人民出版社 • 1”7}，页 326 — 327 •

第五幸西藏乎叛与西戴的社会改革

329

你们的包袱 • 在周恩来的严正态度面前，尼赫鲁允诺把达赖、班挥送回中国 • ’ ’

周恩来访印期间还找达赖及在印西藏上层人士谈话，向达赖及其随行官员传达了中央政府关于西藏「六年不改」的决定，并分别对他们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当时达赖称中央六年不改的方针和周总理讲的都很好，但是件大事，他还年轻，不能一个人做主，要同随行官员商量

后再回答。当时随同达赖访印的噶伦之一阿沛·阿旺晋美后来回忆说：

我们随行的主要官员认真讨论了周总理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他认为，在西藏从和平解放到 1957 年，在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十七条协议方面，没有任何达背协议的地方。因此，对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见。但是在康区和甘青等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并认真纠正。周总理采纳了这个意见。

经过周恩来的劝说，达赖一行于 1957 年 2 月 15 日越过边境回到西藏亚东，4 月 2 日返回拉萨。班禅先于达赖喇嘛返回了西藏。达赖返藏，使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解放军驻藏部队和中央驻藏各单位的备战状况也得到了缓解。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讲话，就西藏问题明确宣布：

“西藏向朴样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卡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

张彤：《对印自卫反击战前后的回忆》、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页 68—69。

边《中国让学》，1988 年第 2 期，
群润开沌哺泸 j j --- j t j ! --- ! j i ! 1 - 3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家訕春（1958）

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能决定。1，
一 1961）一鸟托年运动，要到那时看情况才

根据中央暂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定，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军西藏驻军

采取了收缩的方针，大量减少了驻藏人员，以节省开支并减轻西藏上

层人士的疑虑。中央政府「六年不改」的方针，是对西藏上层的一次

根据中央暂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定，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军西藏驻军采取了收缩的方针，大量减少了驻藏人员，以节省开支并减轻西藏上层人士的疑虑。中央政府「六年不改」的方针，是对西藏上层的一次

重大让步，体现了中央等待西藏上层觉悟，促进其自行改革的政策。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内的反动当权者和多数农奴主贵族拒绝中央的帮助，在对抗改革和背叛祖国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二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 1 川滇甘青藏区的局部平叛

人民解放军入藏后，虽然一直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然而代表祖国统一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同代表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的旧势力仍不可避免地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不仅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对立和斗争，军事上也经常出现紧张对峙的场面。在解放军入藏后的几年内，藏军一直未接受改编，各寺庙普还有武装喇嘛，农奴主庄园也几乎都有枪枝，使西藏及其周围四省藏区的反动统治者在解放后还长期保存着武装力量，叛乱的隐患始终存在。

西藏和藏族地区是两个概念：西藏就是前藏、后藏、阿里、金沙江以西地区，包括昌都地区，只有 110—120 万人口；藏族则牵连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好几个省的藏民聚居区，当内地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之际，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 1956 年至 1962 年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 13 毛潭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 2 月 27 日）：载《毛潭东选集》·第五卷，页 386—387”

第五章 西藏平叛与西藏的社会改革

针时·曾设想：在青海、甘肃、四川，作出一个和平改造的榜样，让西藏地区的群众、西藏地区的上层人物去看一看这个榜样，如果他们觉得很好，回去也显意进行改革，这样就加速了西藏的和平改造。”根据这一设想。中央统战部和四川省委确定于 1955 年末在川西彝区对奴隶制度进行改革后，川西藏族聚集的康区也随之准备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对于中央确定以和平赎买方式进行的改革，彝区和藏区的奴隶主、农奴主都拒不接受，并掀起了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在一面等待西藏上层觉悟的同时，一面不得不在邻近西藏的几省藏区开始进行平叛作战。从 1956 年至 1959 年春，川、云、甘、青藏区和西藏的叛乱由小到大，逐步蔓延，人民解放军的平叛作战也不断扩大。1955 年 12 月，四川西部大小凉山的奴隶主集团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很快蔓延至十四个县。1956 年 3 月在川西理塘又发生藏族农奴主组织的叛乱，阿坝藏族地区的绰斯甲、四土、若尔盖，松潘、黑水等地的

反动头人接着响应武装叛乱。四川西部康巴（「康」系康区之意，「巴」是指藏人）叛乱发生，成为整个藏区叛乱的开端。由于叛乱首领打着鼠族宗教的旗号，一时胁迫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加入叛乱队伍。据统计，当时川西参加叛乱的藏彝武装人员达十余万，有枪八万枝，叛乱地区波及四十三个县，四百五十个乡。叛乱武装分子围攻县城十二座，袭击区、乡政府和解放军守点分队二百处，伏击三百起，残杀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达二千余人。”

康巴叛乱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重要原因是西藏反动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川西康区距西藏仅金沙江一江之隔，噶厦政府长期利用宗教、民族关系插手当地事务。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噶伦索康、达赖的副经师赤江于1955年随达赖从内地返藏期间，在通过康区的沿途接见了前来拜佛的头人、喇嘛和活佛，大肆鼓吹藏族应「独立」，要他们抗拒改革，并表示噶厦政府和外国都可大力支持。随后，噶厦政府和

罚 n 穷总门 jj 唱 J41!!-J---!-j-J•••! !!-一十一-!-111

14 利瓦伊汉：《统一。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0. 15 邓礼峰编着：《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红 949 一 1”川》【北京：中共震史卖料出版社，1989）·页 430·

3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丫四春（“58 一” 61）一鸟托年运动\

伪 F 人民会议 J 分子又向康区头人提供了武器和经费，并建立了密切的联紧。确定在「江东」（金沙江以东）可以搞「武的一手」，即以武装反抗共产党，在「江西」（金沙江以西）则搞「文的一手」·即以政治方式对抗改革。川西民主改革试点开始后，康区的头人就利用手中还掌握着的政教合一的葛层政权，以宗教情绪对藏民进行煽动，组织了武装暴乱。随后，滇西北德钦一带藏族系居区的土司头人也以对抗民主改革为旗帜，煽动部分藏民发动武装叛乱。

叛乱出现后，解放军成都军区先复调集了三十四个团共计六万五千人兵力，对康区和大小凉山叛乱武装进行了镇压。成都军区首先以五个团的兵力打垮了彝区的叛乱武装，在 1956 年 1 月下旬基本平息了凉山地区的叛乱。然后集中力 t，投入康区的平叛作战。在镇压康巴叛乱的作战开始时，解放军成都军区以内卫部队四个团另一个营的兵力重点布置于川藏公路沿线的德格、甘孜·炉溜及理塘等地固守要点】

并保护公路的畅通。同时从重庆、成都抽调内卫部队四个团另一个营，兼程赶赴叛乱地区，并在兰州军区、昆明军区和空军部队的配合下，对叛乱武装予以打击，同时阻止其向西藏逃窜。

经过有力的军事打击，大股叛乱武装很快分化瓦解。考虑到参加叛乱的人员中有许多受欺骗的少数民族群众，平叛部队根据「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开展政治攻势，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群众中掀起了「呼夫唤子」运动：使许多受胁迫的参叛人员缴械投降。对于组织叛乱的一些土司头人也展开了劝说工作，争取了部分人停止叛乱活动，但仍有一部分叛乱首领和骨干分子拒绝和谈，依托高山密林与平叛部队周旋，继续负隅顽抗。解放军采取在叛乱地区分区驻点的方式，再组织强有力的武工队，深入发动群众，实行「边打边改」的方针，进行民主改革，解放广大农奴，开展一地巩固一地、稳定一个地区再转一个地区。为配合解放军在康藏公路附近平叛，当地党政军部门还组织十六万人的自卫武装和二十二万人的群众联防。经过艰苦努力，至1957年末共作战六千余次，毙伤叛乱分子五万余人，俘虏两万余人，争取四万余人回家，缴获各种枪六万余枝，‘康区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在康巴叛乱发生后，中央政府仍希望西藏上层能够及早觉悟，并对制止康巴地区的叛乱发挥些作用。1956年5月8日，毛泽东指示中共四川省委和西康特委：对西藏方面前往西康的考察团应予以热情接待，将四川藏区发生叛乱的原因、平叛黄晴祝、党的政策和工作办法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可以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帮助做些安抚工作。但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以中央的诚恳态度为软弱可欺。在康巴叛乱发生后，噶厦政府和昌都地区的农奴主不断秘密地向金沙江以东运送武器和物资，并收容西逃的叛乱分子。

美国中央情报局同康巴叛乱武装直接建立了联系，并开辟了空投武器弹药的空投线。经由美赴印的西藏上层人士安排，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接受了一些康巴叛乱分子，对其进行训练，培养这些特务分子作为指挥叛乱的骨干。

1957年4月，粟裕总参谋长视察了川西平叛作战地区，并亲自冒着

危险进入叛区了解情况，切实感觉到平叛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他在视察中特别教育指战员要提高对平叛斗争意义的认识，重视民族政策问题，发动群众孤立敌人。粟裕还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除会有阶级斗争外，还会有民族斗争的内容，因而在这个斗争中，政治斗争占很大的比重，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很好地执行政策纪律，重视政治工作。当时参加平叛的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部队实行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作战原则，从而使改革和平叛更好地结合起来。

1958年4月，解放军成都军区调集七个团的兵力，发起平息康南地区叛乱的战斗，至6月底粉碎了以巴塘东南为基地的打着「安日新康」旗号的叛乱武装，消灭其三万一千余人，缴枪千余枝。随后叛乱

16 让 7

《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 U949 一

《毛潭东军·活动纪事》，页邵跑

1959)》·页 4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实专(1958—19'1)一乌托邦运动

首领仍众集部众四处活动，解放军平叛部队转入清剿，到10月底共搬灭叛乱分子五万五千余人，击毙主要头目，康南地区的武装叛乱基本得到平息。18此后，平叛部队又转入康北地区的平叛作战。1958年3月至8月，甘肃和青海藏区又发生严重的叛乱，先后参加者达到十三万人，叛乱地区达四十二万平方公里。19此前，一些青海和甘南的头人、喇嘛以到拉萨「朝佛」为名寻求支持，噶厦政府和一些反动喇嘛、活佛对他们大加鼓励，煽动他们以武力对抗改革，并派骡队向甘青藏区输送武器。一些长期受甘青藏区头人庇护的马步芳匪帮残余分子，也积极参与军事筹划。甘青藏区的反动头人和上层僧侣打起宗教和民族的旗帜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后，围攻各州、县政府，破坏公路，杀害党政干部和藏族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抢劫贸易公司，使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守点分队一时陷入极为困难的状况之下。面对严重的叛乱局面，中央军委下达了平息叛乱命令。兰州军区投入了部分兵力和民兵进行平叛，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四师也奉调进入青海参战。平叛部队首先消灭顽固的叛乱骨干武装，随后对叛众进行宣传教

育，促使大批受赚骗的藏民不断来降，很快使大股叛乱武装全部瓦解。据统计，共歼减叛乱武装十一万六千余人，收缴各种枪七万余枝。20在 1958 年内，昆明军区部队也对中甸地区的藏族叛乱武装进行了打击，基本平息了该地的叛乱。

川西的康巴叛乱和甘、青、俱藏区的叛乱，是西藏大规模叛乱的前奏。解放军在这些地区进行的平叛作战虽然相继取得了胜利，却迁延口久，许多地区一再出现复叛现象，平叛作战遇到了许多比预想更为复杂的问题。当时内地正在搞「大跃进」，极「左」思潮影响到平叛斗争出现扩大化的倾向，其中青海省平叛斗争中的错误尤为严重。主要是过分强调军事打击，忽视政治争取。有些单位将全区性叛乱当

18《毛保东军事活动纪》，页 19《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工 94920

《新中国军事活动纪，《1949

89B,

— 1 外 9) — 1959) 》

页 50 · 页 5 仿 ·

第五幸西戴平叛与西戴的社会改革

成「全民性」叛乱，不加区别地单纯军事打击，加上在平叛斗争的同时强办人民公社，政治上、军事上的打击扩大化与经济上的。1 没收结令在一起，使得情况更为复杂化。

1961 年 7 月，中央统战部在兰州召开西北民族工作会织，青海省委也召开三级干部会，检讨平叛工作中的错误，‘对 1 矢沁年代前期甘南和青海平叛的情况进行覆查，凡属错补错斗错杀错处理的干部、群众和上层人士：一律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还将在押的二万四千人宣布无罪释放或「教育释放」，重新安置几百名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并恢复了部分寺院。

2 西藏地区的局部叛乱

西藏地区的局部叛乱，始于 1956 年夏天的昌都以东地区。西藏和平解放时，昌都地区以原统治机构为基础成立了各级解放委员会，作为政权机构，此后该地不再归噶厦政府直接管辖，仍属西藏地区的一部分。当地一部分反动头人在康巴叛乱分子的配合下：向解放军驻昌都地区部队速连发起袭击。5 月 5 日，西藏军区地质勘测队随苏联专家

外出，路上遭叛乱武装百余人伏击，勘测队牺牲四人，伤五人。6月13日，西藏军区汽车团的八十余辆汽车组成的运输队在江达以西的山脚下又遭叛乱武装伏击。

面对昌都地区出现的叛乱，驻西藏的解放军根据政治争取和军事自卫相结合的原则，以部分兵力向叛乱武装发起一些小规模的进剿，同时还尽力争取西藏上层出面共同制止叛乱，对已叛乱的头人也进行争取工作劝其归来并不咎既往。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使噶厦政府直

21 甘、青平叛战争中个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其突出的表现是：《一，有些地区不仅在平叛中不分叛乱分子和被裹胁的群众】乱打乱杀。而且对未参加叛乱的，甚至有功的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分子、劳动群众以及上层爱。人士，行乱打乱杀。，二）有些地方对上层人士不分是否参加叛乱！实行。1 补乱判刑乱戴权。（三》有些地方平叛后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进行集训和搜查，归罪地打毙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利瓦伊汉：《统一战线与民族问题》，厦铝 6。

3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才齐专《1958—1964 年一乌札并运动

接管辖的地区内暂时未发生叛乱，昌都地区的叛乱在 1957 年内也有所收敛。

1957 年至 1958 年，窜入西藏各地的康巴叛乱分子不断增加，随后又有部分青海和云南藏区的叛乱分子窜入西藏腹地。「四水六岗」拉菱三大寺和藏军为武装叛乱签订了同盟书，划分了各自的武装行动任务和地区。从 1958 年 6 月起，聚集拉萨的康巴叛乱武装相继移至各任务区，其主力进入雅鲁藏布江以南靠近印度的山南地区，使这一产粮较多比较富裕的地区成为叛乱武装的主要「根据地」。美国情报机关也加强了对西藏山南地区的叛乱武装的支持，除派遣刚刚在关岛接受过特工训练的藏族特务携带电台到那裏建立联络，并空投物资接济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在国内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山的利德维尔附近选中了一块海拔三千米左右的高原营地—哈尔营，作为「康巴游击队员训练基地」，并经印度接运叛乱分子到此进行「游击战」的训练。尽管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策动叛乱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中央政府还是强调以民族团结为重，尽可能显示宽大忍让，

耐心等待他们觉悟，同时也提出了郑重的警告。1958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在批覆西藏可能发生叛乱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要对噶伦们表示严正态度¹指出他们采取纵容叛乱分子的立场是错误的。中央的方针是和平改革，但是，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要坚决实行武装平息叛乱。²²

1958年下半年，噶厦政府直辖的西藏内地出现了局部叛乱。叛乱武装在多处围攻党政机关，在主要交通干线伏击解放军运输车辆，攻打养路道班，抢劫运输物资。9月17日，西藏军区门诊部十六名医护人员乘汽车一辆前往日喀则，车行至麻江遭到一百余名叛尔盼子的伏击。因两边高地上火力密集，车上人员只得依托车辆顽强抵抗，激战半小时，最后与冲下来的敌人拼手榴弹，医疗队全部伤亡。叛尔盼子又用刀砍杀未死的伤员。结果十六名男女医护人员全部牺牲，汽车也被焚毁。

！

'!', g, '写…

22《新中届军，活动纪实（1949—1959）》·页512'

总边

第五章甬戴平叛典西藏的执会改革

尽管局部叛乱日益扩大，中央政府仍决定在军事上仍采取守势。8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指出：要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让他们闹大点，闹得愈大，改革就愈彻底；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拉上去；要提高警惕，生产时把枪放在旁边。²³

西藏军区在总体上采取守势的同时，也使用了一部分兵力，对直接威胁到保留的工作点和公路线的局部地区，进行小规模平叛。8月下旬，西藏军区得知康巴叛匪头子公布扎西率众将从山南去青柯寺藏军的军械库取军火，于8月27日至10月13日派出部分兵力对其进行追歼。经过一个半月的追击，解放军部队共击毙和俘虏其955人，不过这股叛匪仍取到了武器并得以逃窜。从9月20日起，西藏军区昌都警备区以十六个连的兵力，在宁静以北对曾经袭击过竹卡溜索桥的

以普巴本为首的叛乱分子展开围剿，战斗至 12 月 5 日结束】共交火八十五次·歼灭俘虏叛乱分子共 1213 名。通过这一次激战，使当地叛乱武装遭受歼灭性打击，仅普巴本等叛首在逃】昌都以南局势暂时趋于稳定。

1958 年 10 月末 1 西藏叛乱武装又开始包围和进攻驻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山南党政机关和解放军驻军。叛乱武装对泽当进行长时间的包围和封锁围困，并从翌年 2 月起轮番发起进攻。当时解放军守备部队不停地投入战斗，山南分工委的机关干部、职工’·家属，以及避居分工委内的藏族爱国人士都拿起武器，各自分工，不顾疲劳日夜战斗，坚守岗位。山南保卫战持续了近半年，在断绝水源和橙食的情况下】守备人员每天只吃两餐稀饭，靠雨水解渴，终于坚守到增援部队到来。鉴于整个西藏地区叛乱日益扩大的趋势，1958 年 11 月，拉萨、日喀则、昌都的各机关都成立民兵团（营），干部、职工及部分家属都配发了武器，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全面叛乱。进入 1959 年年初，除山 23 《新中国军事活动纪，魄饵 9 — 1959）》·页父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众四专（1, 58 — n61）—鸟托年运动

南外，西藏各地叛开 U 弋装也开始分别围攻分散孤立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守备点。札木中心县委、波密县委和丁青县委都遭长期包围和反复进攻。接到局部叛乱不断扩大的报告，中央政府认为西藏反动分子的这种行动只能促使群众觉悟和改革早日到来】并为锻炼部队提供一个机会。1959 年 i 月 29 日，毛泽东在西藏军区关于边场地区等地叛匪活动的电报上批示，「这种战争很有益处，可以发动群众，可以锻炼部队。」“2 月 18 日和 19 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关于西藏武装叛乱情况简报和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平叛情况报告上又作了批示，指出：我们不怕叛乱，可以锻炼军队，可以锻炼基本群众，有益于将来实行初毡改革。25 事实表明，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为了永远保持其封建农奴制度，妄图实现外国反动势力多年策划的所谓 r 西藏独立」，拒绝履行与中央政府达成的《十七条协议》，对中央的教育和警告！若罔闻，决心与中央武力对抗。这样，中央政府同西藏反动势力进行一场总决战已无可避免。

三人民解放军奉命平息

1 拉萨全城发生叛乱

1959年3月10日，西藏噶厦政府以达赖想到西藏军区看演出为由，渠道出「军区想绑架达赖送往北京」的谣言，煽动拉萨全城暴乱。噶厦政府又以宗教号召和政令的形式打出「独立」旗帜，向西藏各地发出了叛乱的命令。这一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西藏地方政府内的反动势力终于最后和中央政府决裂，彻底走上了背叛祖国的道路。叛乱分子以达赖为旗帜，利用宗教和民族情绪在西藏各地进行煽动，使得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由局部性叛乱演变为全区性叛乱。

2425

《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页914《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页915
第五幸西藏平叛与西藏的社会改革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定安排1959年4月在北京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事先通知担任副委员长的达赖，希望届时他能够出席。这时西藏的反动势力就大肆活动，散布谣言，阻止达赖去北京。2月间达赖本人提出，想到西藏军区礼堂看节目，经噶厦政府和西藏军区相商，演出时间定在3月10日下午。

3月9日夜间至10日早晨，拉萨市内突然发生了大规模骚动。由朗子辖（即噶厦的拉萨市政府）墨本（即市长）及西藏警察代本出面，在市民中散布谣言说：达赖喇嘛10日要去军区赴宴，汉人准备在宴会上毒死达赖（一说是要把达赖和噶厦主要官员抓上飞机送往内地），要求藏人都去达赖居住的罗布爾卡「请愿」，阻止达赖去军区。一些康巴武装叛乱分子也骑马带枪奔驰于市内，胁迫群众快去罗布爾卡。阿沛·阿旺晋美对此回忆说：「三月十日上午八点多钟，西藏拉萨街头一片混乱，人们哭喊着奔走相告：『到罗布爾卡去保护如意至宝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这喊声对笃信佛教的藏族人民简直是一声炸雷。于是，人们怀着震惊、惶惑、恐怖的心情，涌向罗布爾卡，以保护达赖为名，包围了罗布爾卡，揭开了武装叛乱的帷幕。在上层反动分子煽动下，3月10日上午许多不明真相的僧俗群众包围达赖的夏宫罗布爾卡，一些叛乱分子乘机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藏族爱国人士堪穷·索郎降措，并在拉萨街头拖尸示众。此时拉萨市内一片恐怖气氛，

商店关门，市民抢贮饮水。一伙康巴叛匪盼子公然持枪上街进行威胁。许多暴徒还在市内街上贴标语、向解放军执勤人员和中央驻藏机关工作人员投石头、捣毁交通指挥亭，打砸机关和贸易公司门窗，西藏军区和中央驻藏的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都已无法外出。当天，策划叛乱的首领们召集会议，正式宣布：「从 10 日起就正式站起来，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

在市内骚乱之后，叛乱集团又开始了军事行动。3 月 10 日黄昏，大批康巴叛乱分子和武装喇嘛进入市区，原分散在拉萨周围的武装叛

26 《中国藏学》，1955 年第 6 期。

340

中华人民兵和回史·臧，春（1958—1961）—鸟托年运动

乱分子在天黑后也分小股陆续向市区集结。藏军第一、第二、第六代本共二千余人集结于拉萨城内，完全进入临战状态。叛乱武装大量进入拉萨后，加强了鸟瞰整个拉萨城的制高点药王山的战斗工事，并控制了罗布卡及其北侧到城区的公路，占据了城区的部分街道房屋。一些叛乱武装分子甚至近逼到西藏军区门外，在解放军哨兵旁边挖掘工事。噶厦政府还打开军械库公开给叛乱分子和市民发放枪枝弹药，拉萨市内的武装冲突，已面临一触即发的形势。

3 月 10 日以后，反动分子及其驱使的部分群众不断在拉萨街头示威游行，并打出「雪山狮子旗」，藏军、康巴叛乱分子及三大寺的反动喇嘛将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政府驻藏机关包围，做出种种挑衅行为并进行零星射击。在 3 月 10 日和 11 日的伪「人民代表会议」上，以警卫达赖的名义成立了叛乱军事指挥机构，并任命了号称西藏四大贵族之一的拉鲁·次旺多吉为「西藏独立国」武装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刚成立的叛乱指挥机构派人星夜分赴西藏各地送噶厦政府的命令，以「保卫达赖」为名，要求各地响应拉萨的行动。

2 中央决心彻底平叛

这时，拉萨城内解放军战斗部队只有十三个步兵连、一个炮兵团和部分后勤人员，处于七千多名有组织的叛乱武装的包围中，形势十分严峻。鉴于大规模的平叛已不可避免，西藏军区原有部队难以担负全区性平叛任务，3 月 13 日，中央军委下令调动增援部队入藏平叛。根

据命令，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四师于3月17日从兰州出发进藏，”其余增援部队也陆续向西藏开进。

毛泽东于3月上旬到南方视察。3月12日至15日，毛连续三次从武昌打电报向中央提出，拉波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示弱、胆怯、无能。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教育下层。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在政治上取何种态度和须采取

，. 小... 颯 j 涌顶缠姜奋

r —————

妒《新中...活动记实》

， 页 541

第五章西戴平叛与西戴的执会技革

的措施。3月17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藏军叛乱的紧急情况 and 毛泽东的建议。会上刘少奇和登夕、平都认为，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1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划寺民主改革。周恩来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侧良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会议对平息西藏叛乱作了相应的部署。根据中央的指示！驻藏解放军部队坚持后发制人的原则。尽管叛乱分子多方挑衅，经常将石头投到西藏军区部队驻地院内，围住军区大楼持枪叫嚣辱骂并时常对空鸣枪」各驻军部队仍坚持「不打第一枪」的原则，保持了克制态度。同时，西藏工委和军区为应付叛乱分子的进攻，将驻拉萨的部队、地方机关单位统一组织起来，划分八个防御区域，明确各区域的指挥员。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都组织了民兵自卫，加强了防御工事，储备了粮、柴、水和弹药，准备长期坚守作战。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大力揭露叛乱集团的罪行。在拉萨城内的叛乱喧嚣声中，西藏军区部队和肤政机关仍通过各种形式对人民群众广泛展开宣传，揭露叛乱罪恶事实真相和反动分子的阴谋。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长期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以及不断地有针对性地对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因此，尽管噶厦政府下了命令，武装叛乱分子又大肆进行威胁，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仍有许多官员坚决

反对叛乱或者不参加叛乱。西藏两大神王之一的班挥额尔德尼更是坚持爱国立场。在他的居住地日喀则坚决抵制了叛乱，随后又赶到北京参加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发言严正谴责了叛乱行为。当时参加了叛乱活动和外逃的噶庆政府的官员中，也有不少人是出于被胁迫。在叛乱分子杀害和威胁爱国人士时，西藏工委、西藏军区还采取措施保护上层爱国人士及藏族干部，学生、工人和他们家属的安全。3月17日，叛乱武装向驻拉萨某交通部门民兵连射击并发起进攻，该连对叛乱武装还击了两发六十毫米迫击炮弹，落于空旷地带。

28 中共中央文研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212。

刘月江编《中国革命年代》。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112。

“斗。”。

工】r，威’-，‘州潺，协，啼’、r.-■：•：‘。

,42 中华纸共相史·第四卷 119, s 1, 。1. 一驰年 “\

这两发炮弹每颗重仅一公斤多，威力不过略大于一颗手榴弹，射出后并未造成任何杀伤和破坏。叛乱集团却以所谓「汉人两发炮弹打到罗布卡北围墙之外，威胁达赖安全」为借口，要挟达赖尽快外逃。17日当晚，达赖及其家属，噶厦政府的三名噶伦索康、柳霞，夏苏以及达赖的经师、副经师等离开罗布卡，在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率领的藏军第二代的簇拥下，南渡拉萨河逃向山南，沿途都有叛乱集团早已安排好的武装接应。

达赖在叛乱武装的「护送」下出走后，留在拉萨的叛乱集团继续加紧军事叛乱的准备。拉萨市内的电话线都被叛乱分子割断。电线杆被砍倒，来自各地的叛乱分子还在不断涌入拉萨。为了争取政治上的有理、有利地位，西藏军区部队掩护内地驻拉萨的宣传机关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搜集叛乱武装的罪证。军区派出装甲车】运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一再前往拉萨城内外叛乱分子占据的阵地前，现场拍摄叛乱分子的活动实况。当叛乱分子在布达拉宫前召集城内妇女「赌咒发誓」要赶走汉人时，摄影记者还背起冲锋枪走到会场中进行拍摄。

针对反动势力的煽动，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也针锋相对地向藏族群众单散发了宣传品，揭露叛乱分子的罪行。

3月20日凌晨，西藏军区派出执行任务的一个连前进至拉萨河南岸牛尾山西侧时，在黑暗中遭叛乱分子射击。拉萨河南岸的枪炮声响起后，城内的叛乱武装也随之向城区、郊区各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驻地进行猛烈射击。处于临战准备中的解放军各部队和民兵被迫实行自卫，向叛乱武装开枪开炮，平叛作战就此打响。

战斗打响后，西藏军区召开干部紧急会议】在谭冠三政委、邓少东副司令员主持下确定，不待内地的增援部队到达，即以现有机动作战部队在民兵配合下平息市区内的叛乱。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在数量居劣势的情况下，首先集中炮兵火力急袭藏军长期占领的药王山，于中午攻占这个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同日下午，西藏军区部队以集中兵力各个歼击的方式，先以炮兵掩护步兵和汽车兵向叛乱司令部罗布爾卡究

发起攻击

。在猛烈的打击下，叛乱分子企图从院内外逃被打退后，平望。 第五章西藏平叛与必波的执会改革

叛部队乘机从正门尾随突入院内，展开近战。从西面进攻的部队也于20时30分冲入院内，叛商1分子溃逃。夺取罗布爾卡后，西藏军区决定转移兵力逐个攻击市内叛乱据点。

3月21日晨，解放军平叛部队对拉萨市区的叛乱武装建成合围，一部分叛开赋装见势不妙向郊区逃跑，大部叛乱武装仍凭借寺院和民房进行顽抗。在小昭寺内的叛乱分子还打出「雪山狮子旗」，气焰十分嚣张。当日下午15时，解放军平叛部队向小昭寺发起冲击，经半个小时激战歼灭了寺内的反动武装。此后】部队继续向拉萨市内叛乱武装盘据的各据点发起攻击。先后攻占恩珠昆仓宅、朗加多吉宅、木耳寺等主要据点，并将市内残余的叛乱骨干分子包围于大昭寺内。22日拂晓，经过解放军宣传政策，大昭寺内的叛乱分子全部投降。市内少数顽固的叛乱分子向外逃走，拉萨叛乱就此平息。

拉萨市内的平叛战斗展开后的第二天，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3月21日及时发出了《关于坚决平定西藏叛乱的政治工作指示》，要求

平叛部队必须把军事斗争、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并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俘虏政策和宗教政策，指出：「凡在战斗中手持武器与我对抗者，坚决予以消灭于但当他们放下武器以后，就应当实行优待；严格禁止打骂、侮辱、虐待和杀害俘虏；受伤的给以治疗，投诚的一律欢迎、优待。对于被胁迫逃走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孺老幼，应当进行艰苦的工作，争取他们脱离反动派，回家生产。」

「对喇嘛寺一律加以保护（包括一切文物古迹）。必须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r 参加叛乱的西藏统治集团中，有不少人是犹豫动摇的。应对他们进行瓦解和争取工作。」驻藏部队严格执行了党的政策。在拉萨市内作战时，西藏军区部队还特别注意保护寺院及其它文物古迹。对叛乱分子盘踞的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建筑物，部队都不使用重武器强攻而以其它方式力争使叛乱分子投降。在平叛战斗期间，布达拉宫、罗布爾卡、大昭寺的主体建筑和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都完好无损，各处所存的重要文物也及时受到保护。解放军指战员模范遵守纪律和政策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教育和感动了广大藏族群众，保
个召个认翅斋颯 J, n 朋斗神恼 d 颯倘翅颯骗开认 nn 叩神幼翻颯 JJ 月 J『神』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卷华，58—1961} 一骤萍驯

证了平叛斗争的顺利进行。战斗结束后，许多人民群众焚香顶礼，额手称庆，纷纷向党政干部和解放军官兵控诉叛乱分子的罪行，交出叛乱分子遗弃的武器弹药，协助解放军肃清残敌。

拉萨平叛战斗结束后，因原来的噶度政府官员大都逃散，3月23日西藏军区成立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拉萨地区政治、军事、民政事宜。从3月24日起，市内商店陆续开门营业，人民生活恢复正常。拉萨平叛战斗的初战胜利，打乱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部署，使西藏全区性武装叛乱失去了指挥中心。由于增援部队尚未到达，西藏军区参战的兵力不足，因而未能全歼拉萨城内的叛乱武装，使其一部逃至外地。

3月28日，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的《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正式公布。（命令》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

方政府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任命常务委员帕巴拉·卓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撤销叛国分子索康·旺清格勒等十八人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和一切职务，并按国家法律分别给予惩处。《命令》希望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全藏僧俗人众，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叛乱，巩固国防，保护各族人民利益】安定社会秩序，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随后，国务院发布布告，鉴于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即1950年代初成立的昌都地区最高行政机关）及其所辖各宗（县）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参加了叛乱，决定撤销该两级解放委员会。政权机构的改革，标志着西藏的社会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

3 进军山南摧毁叛乱中心

在拉萨平叛胜利之后，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与不丹和印度相邻的山南地区就成为西藏全区性叛乱的主要基地和指挥中心。叛乱武装计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之14，

第五章 西藏平叛与社会改革

企图以此地为长期顽抗的根据地，并争取「国际援助」。因此，尽快占领山南地区，摧毁叛乱武装新的指挥中心，断绝其国外接济的主要通道，就成为平息整个西藏地区叛乱的首要任务。1959年4月西藏军区以新入藏增援的第五十四军部队为主力，分路渡过雅鲁藏布江，以分进合击的方式发起了山南战役。

达赖一行于3月17日渡过拉萨河南逃，25日到达山南地区的隆子宗（县），叛乱集团宣布该地为「第二国都」。但达赖等人只在山南短暂停留，随即继续南下，于3月31日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占区。30 对于达赖入印和西藏出现的严重叛乱，国际上就西藏问题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美国政府一再表示支持和同情西藏叛乱分子，印度政府也公开表示「同情」，并派印军在边境地区的实际控制线附近接应出逃人员。

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进藏增援的部队于3月下旬相继到达。除西藏军区指挥下的平叛部队外，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黄新亭率领军区前进指挥所，负责指挥昌都地区的平叛部队。

山南战役开始前，平叛部队投入了四个团的兵力，从4月4日至9日分五路向山南地区开进。部队以分进合击，迂回包围的手段突破叛乱武装的沿江防线，强渡雅鲁藏布江。向纵深穿插。各部队渡江后，同已经被围困在泽当地区的解放军分队一起内外夹击叛乱武装。叛乱分子发现解放军渡江后，迅即逃窜。西藏军区随即调整部署，要求部队畏途奔袭，尽快占领出境的各路口，封锁叛乱武装的逃路。在向边境穿插前进中，参加平叛的部队不顾疲劳和对高原气候的不适应，在地形复杂的山区长途跋涉，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短期内占领山南地区，经过不断的反复清剿，基本肃清当地的叛乱分子。山南战役至4月底基本结束，此次战役一举荡平了西藏叛乱集团的主要巢

刘啊群刀 j 个羽醒 jjj!jjj1jjJ--!Jjj1-' .月 j 认 jj, .•j--Jj1JjJJJ 砖 Jj。 .

30 在达赖出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政府还希望他能够与叛乱分子刘清界限并返回祖一因而保留其西截自治区。备委员 t 主任的职务。直至 1964 年 12 月 17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t 开会期间才公开 t 布。缅甸达赖在。外的言行已严 t 背叛祖 ‘,’ 务院第巧 1 次 t 谕作出撤销达赖的西截自治。 . 备委员 t 主任委员职务的决定，

J一月 IJ 倘， qj•j 砖言 JjJieswe ■■■j■■■乱个 J， ■■■， • 波偶澜润讨舫径储 jj 斗刈 Ud 月 d 储 J 以月 J- “州神以 • 切纠川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四喜红 9 铭一 1961) — 鸟托年运动 :?’ (洛 j1. 。 ; 、 ■ `)!`

穴，封锁了亚东以东，米林以西边境线，割断了叛乱分子与国外陆上联紧的主要通道。只是部队刚刚进入西藏内地作战，地形敌情均不熟悉，未能完成歼灭敌人主力的计划。

山南战役临近结束时，新华社于 4 月 23 日发出报道】宣布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以北所有边境要点全部在人民解放军控制之下。4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呼讨平西藏山南叛匪的重大胜利〉指出：山南地区平息叛乱的重大胜利，是对西藏叛国集团一个致命的打击，也是对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者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胜利，不仅加强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事业，并且巩固了我国西南的国防，维护了我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

4 平息纳木湖等地区的武装叛乱

拉萨、山南地区的武装叛乱被平息以后，系集在纳木游、麦地卡和昌都等重点地区的叛乱武装仍然十分猖狂，危害甚大。因此，驻藏解放军又相继在这些地区展开了平叛斗争。

由于西藏面积广阔，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和成都军区、兰州军区参战的部队在供应困难、参战兵力有限的情况下，决定采取集中部队分区平叛的方式。先消灭对威胁较大的叛乱武装，净化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

1959年7月间，西藏军区部队在藏北进行的纳木湖地区的平叛，是西藏牧区平叛的首次作战。这一带地域广阔，人口稀少且多系放牧为生，有数千名武装叛乱分子在此地流窜。西藏军区指挥部队开始采取前堵后追的方式，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并由进至羊'k并、当雄一线的部队分路由南向北进击，于7月6日将叛乱武装包围于纳木湖以南的山区。经两日激战，歼灭部分叛尔武装，随即严密封锁山口要道，逐山逐沟地进行搜索，至7月29日全部肃清了这一地区的叛尔武装。在纳木湖作战中，平叛部队严格执行政策，对被裹胁参叛的群单一律不捕不押，尽可能避免伤害牲畜。即使是持枪者，也采取先包围喊话，不抵抗就不开枪的原则。通过发动投诚人员进行劝说，使大批参叛人员投降。

第五章西咸平叛与西戴的裁会改革 3478月至9月间，西藏军区部队又在藏北的麦地卡进行平叛作战。拉萨刺匕以彭错湖为中心的麦地卡地区，当时集中了叛乱武装分子约五千人，他们残害人民，并袭击青藏公路道班：为祸严重。平叛部队于8月26日到达指定地点，切断了叛乱分子东逃的道路，接着对这一地区形成合围，再从外向内推进，逐步缩小包围圈，经七天作战歼灭了大股之敌，随后部队划分区域，以分片包干的方式进行清剿，至9月中旬基本肃清了当地叛乱武装。同年4月至10月，解放军在昌都地区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平叛作战。昌都地区早在1956年就发生了武装叛乱，拉萨叛乱发生后，当地反动势力活动更加猖狂，并胁迫当地成年男子参加叛乱活动，使昌都地区田园荒芜，给群众带来极大灾难。在西藏军区进行山南战役的同时，解放军成都军区前进指挥所指挥昌都地区的部队全面展开了平

叛作战。因这一地区面积大，交通不便，部队机动困难，于是采取了首先集中兵力平息澜沧江以东地区的叛乱，然后再解决澜沧江以西地区的叛乱武装。4月中旬，平叛部队首先向昌都东北的江达、拉多和类乌齐发起进剿，粉碎了那裏的集股叛乱分子。昆明军区部队也在汉藏边界的盐井地区歼灭藏族叛乱武装四百三十余人，从而粉碎了当地的大股叛黄赋装。同年秋天，平叛部队又集中兵力平息了昌都东南的贡觉、察雅，左贡、洛隆和丁青地区的叛乱，使当地严重的局面得以缓解，特别是肃清了威胁川藏公路的重点叛乱地区。

进入1960年初，西藏地区的大部分成股叛乱武装已被打垮，人口稠密和接近交通要道的地区基本获得解放。

5 尔清边沿地区的叛乱武装

西藏东北部恩达、丁青，嘉黎、扎木之间的地区，属高寒地带，气候恶劣、每年9月至翌年5月大雪封山，除主要道路外，一般小路均不能通行。西藏各主要地区和交通要道附近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后，由青海、康巴、昌都东部等地逃来的叛乱武装，加上叛乱首领强迫欢集当地成年男子参叛，使叛乱武装的人数达到万人以上。在美国

“” “” “” 规 纒 倘 缠 哺” J “月 d 州 引 川 — ! 缠 J’ 1Jee” 司 — -1j’ 1j 觐 月 — 1 月 偶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二第四专 q958 — 1961) — 鸟托年运动

受过 \$ 1r 练的藏族特工人员 j 已被陆续空投回西藏，他们一面用所携的电台同设在印度的叛乱指挥机构联络一面担负起「游击战」的指挥并对叛乱分子进行训练。外来飞机一再飞抵叛乱武装的卑集区域实施空投，除了投下食物药品外，还投下适合于游击战的美制无后座力炮’ 高射机枪、轻机枪 • 裁锋枪、步枪和大批弹药。叛乱武装得到境外武器弹药的接济和 r 辞击战」的专门 \$ 11 练，战斗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就增加了平叛作战的难度 • 为彻底平息全区性的叛乱，西藏军区仍采取集中兵力分区作战的方式，逐次肃清各个地区的叛乱武装。1960年2月至4月间，解放军发起了西藏平叛期间规模最大、也最为艰苦的昌都以西的恩达、丁青、扎木地区的作战。在制定进剿计划时，为了达到出敌不意和不过多影响群众春耕播种，西藏军区决定进剿时间提前到大雪封山的2月间开始。昌都以西地区平均海拔四

千米以上，雪山和森林交错，并有许多河流，在冬季未结束前除少数道路外一般不能通行。这时发起进剿，有利于封锁叛乱武装的逃路。不过因气候恶劣，参战部队也要在严峡的自然环境下行动。1960年2月15日】参战各部队向预定地区开进，并于29日全面打围，形成了合围之势。平叛部队将合围圈向内压缩一百公里，然后以三分之一的兵力进行堵击，其综部队分路向心攻击。

叛乱武装遭此沉重打击，一部被歼，其余化大股为小股，凭借深山密林，分散确藏流窜，妄图寻机突围。在进剿部队向包围圈内压缩时，担负堵击任务的部队在战区边缘忍受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以生米生缅充饥，日夜巡过，拦堵企图外逃的叛哄盼子。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有不少指战员牺牲和伤病。然而他们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坚守四十多天。消减了大部分企图突围之敌。向包围圈内进击的部队击溃成股叛乱武装后转入搜剿，经一个半月战斗扫除了当地叛乱武装。1960年4月末至6月上旬，平叛部队又向残余叛乱武装集中的温东、那曲以北的青藏交界地区发起进剿。该地雪山草原相接，山上终年积雪，长期盘踞着部分青海，西藏的叛乱武装，有一批刚刚在美国果过训练的藏族特务空降到此，并有境外的飞机空投械弹物资。在这蘸空降特务的控制指挥下，叛乱武装成立了所谓「马基 y1I 空」（总司令

第五章西戴平叛与西戴够拙会改革

部），并按照营、连、排编队，进行军事训练，建立起当时指挥西藏叛乱武装的中心和主要「根据地」。为扫除该地的叛乱武装，解放军参战各部队从4月29日起向顶定目标隐蔽开进，5月5日拂晓达成战役合围。各部队首先在合围圈外控制要地，阻敌突围，主力分多路多箭头向中心地区之敌发起总攻。叛尔盼子开始还进行了较为顽强的抵抗，不久其大股武装即在解放军猛烈打击下崩溃，残余力 t 分成小股四处流窜，有些潜入深山崖洞，有的伺机突围。从5月中旬起，进剿部队全面展开搜剿，至6月5日将残敌大部肃清，少数利用空隙向邻区逃窜。

至榭心伙初，西藏全区只有昌都东南地区还有较多的成股叛乱武装活动。该地东邻金沙江，西靠怒江，山脉绵互，原始森林密布，交通闭塞，地形十分复杂。平叛斗争屡经反复。1959年在昌都东部被打垮

的叛哄赋装残余，也多窜入此地隐蔽活动。为完成在昌都地区持续了几年的平叛斗争，平叛部队经过一段休整并认真检查了政策执行情况之后，从1960年10月中旬起对昌都东南之宁静（芒康）、三岩（雄松）地区的叛哄赋装再次发起进剿。部队经分路奔袭，于10月16日达成合围，然后各部队分路进击，歼灭了大部分成股叛尔赋装，残余叛乱分子剧匕也潜藏或流窜于原始森林之中，部队遂转人分散清剿。在进行宁静，三岩地区战斗的同时，昌都其除部队在昌都北部及盐井、扎玉等地展开了清剿。由于政策落实，群众支持部队平叛的积极性增高，一些参叛入员的家属也动员家人投降，并协助部队捉拿叛首。当时搜剿部队在昌都北部生俘了重要叛首齐美公布、呷日本·才旺多吉。宁静·三岩地区的另一主要叛首、原国民党少将八角喇嘛在侦捕队的不断搜捕下，只带领一名亲信在山野躲藏三个月，后因饥饿无食被迫出来寻找解放军缴械投降。至1961年初，西藏全区只有千余武装叛乱分子在活动，大都为漏网的顽固分子，主要集中在昌都的东南部和邻近青藏交界处。西藏军区根据这一形势，统一组织军民以合围搜剿、项目侦捕和边侦连打的方式，对残存的叛匪进行清剿。平叛部队实施分区包干清剿，并特别加强了重点地区的领导和力量。昌都地区是这一年平叛斗争的重点，清剿残余叛乱分子的工作进展较快。西藏全区残存的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7卷“8—11”一鸟托年运动

待·，：、，

叛首，如宁静地区叛乱武装司令札巴，副司令麦巴、叛首吉错本，龙中郭布和六名空降特务，都陆续被俘获或击毙。至1961年底，西藏残余的叛乱分子大部投降，少数被歼，平叛斗争至此胜利结束。经过近三年的平叛斗争，整个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叛乱武装共3万人。，，据不完全统计，藏族同胞支持解放军平叛行动达1.58万余人次，计43.9万余工日；支援畜力10.4万余头（匹）次，计286.62万余工日。藏族同胞的有力支持，为平叛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平叛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西藏上层集团中少数分裂分子勾结国外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统一，增进了民族团结。随着平

叛斗争的胜利，百万农奴摧毁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进行了民主改革，推翻三大领主的统治，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广大农牧民由此翻身做了主人。

1

四民主改革和西藏自治区的建立

1r 边平边改」的民主改革

西藏和川、青、甘、滇四省藏区发生大规模叛乱的事实证明，西藏和平解放时还遗留下来的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和农奴制度，是西藏反动势力赖以发动叛乱的社会基础。要从根本上消除叛乱，必须铲除原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基础】使藏族广大贫苦农奴和奴隶得到解放。

、，击。菱论登萝

31 在这些叛敌数量统计之中，大部分人为俘虏和招降。这些被俘和投降者又大都是在叛乱的封建领主和高级僧 4 吕欺骗威这下被迫跟随作乱的一般群众和普通借人。解放军对于这些被裹胁参加叛乱的群众：不论他们是主动的或是被动的放下武器，经短期教育后，都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参加生产，不再当作叛乱分子对待。对于平叛作战中的负伤者，也都给予医治。所以大多数被列入被歼叛匪盼子数字之内的人。在战时和战复就已很快转变为和平居民。见《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页 5 焰。

1

第五章西藏手叛与西藏的社会改革 351 就在 1957 年 3 月西藏叛乱开始不久，3 月 21 日，经周恩来总理政定的〈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稿即指出：

黄藏噶度政府背叛祖国。局势迫使我们提前同西藏上层反动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决战。六年不政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下去。铃项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在平叛的。号下充分进行。可实行边平边改、先平先改和未平地区暂缓改革的方针。改革要在照顾西藏特点的原则下进行。实行民主改革的阶级路线，是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继续坚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牧区不进行民主改革。工商韦一律不动 0。对外贸易统一由国家经营。在改革中，要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

众这行诉苦运动·对叛乱分子应当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要教育全军坚持党的民族政策·连守和平·鸟叛乱与民主改革中的各项政策。,

全面平叛展开之后,中共中央于1959年5月正式确定了实行民主改革的各项政策。将各地平叛的军事斗争与民主改革结合进行,以「边平边改」的方式彻底平定叛乱·即一方面以军事手段摧毁农奴主阶级的军事力量即叛乱武装,扫除改革的障碍;一方面以民主改革满足群众对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的要求,废除三大领主的封建特权,解除广大农奴和奴隶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彻底变革。从而达到废除西藏上层僧侣和贵族对农牧奴专政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完全解放百万农奴·在西藏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目的。从1959年春至1961年的三年间,经过解放军驻藏部队、广大汉藏族干部和群众的努力,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胜利完成。西藏农村民主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对封建农奴主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采取分步骤解决的办法。首先,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

3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誉, 212—213.

!.’-1,? 活多葱造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曾数(19“—196”一秘杖动
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接着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r双减」(减租、减息)。对未叛领主及其代理人实行减租、减息。根据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的《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实施方案》,对未叛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地租实行「二八」减租,1958年前的欠租一律免交,对未叛领主及其代理人在1958年以前放给农民及其它劳动人民的旧债一律废除。1959年9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制订和通过了《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根据西藏农奴主只占全区人口的2%,农奴主代理人约占全区人口3%,以及西藏全部耕地中,西藏地方政府占36%,寺庙占34%,封建领主占30%等情况,制定了《关于划分西藏农村阶级的方案》和《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方案规定,在农村只划农奴主和农奴两大阶级。农奴主阶级又分为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两个阶层。农奴阶级又分为富裕农奴、中等农奴和贫苦

农奴几个阶层。

在土地改革中，西藏地方政府的耕地全部分给农民，其债务、乌拉和差役予以废除。封建领主的封建占有制一律废除，其中凡是参加叛乱者的耕地、房屋、耕畜、粮食和农具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其债务、乌拉和差役一律废除。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由政府作价赎买，然后分配给农民。在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中表现进步并且政治上有较大影响的进步人士，在他们放弃封建剥削之后，在政治上给予适当安排并在生活上予以照顾。根据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对农奴不分男女老少，平分土地，在照顾原有耕地的基础上按土地数 t ·质量，抽多补少，好坏搭配，进行分配。经过民主改革，基本上摧毁了封建农奴社会的经济基础，确立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废除了三大领主对农奴的人身奴役，百万农奴得到了解放。

经过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三大领主的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过去受压迫、受奴役的广大农奴和奴隶】在政治上翻了身】作了新社会的主人。解放了的农奴，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生产积极性大大高涨，改革的第一年就获得了丰收。

第五章西武乎叛与西藏的社会改革

西藏牧区的民主改革，有不同于其它牧区的特点。西藏全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口约三十万。纯牧区主要分布在西藏的西部和北部地区。这片绵延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草场，就是有名的羌塘草原。在这里放牧的牲畜约占全区牲畜的一半：其余的30%分布在半牧区·20%分布在农业区。民主改革前，西藏全区共有大小牲畜近一千万头（只）·在民主改革时，除没收叛乱领主和叛乱牧主的牲畜分给原放牧者及贫苦牧民所有外，整个牧区包括牲畜在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予变更：不分不斗，不划阶级。

牧区民主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平息叛乱】安定人心，建设人民政权，保护和发展牲畜，逐步改善牧民生活。改革的步骤是：第一步对叛乱领主、代理人 and 牧主的牲畜实行「谁放牧归谁所有」，第二步在「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投、反对奴役）的基础上，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就是减轻牧主对牧工的剥削，废除人身依附关系，保障牧工的政治权利，适当改善牧工的生活。

在牧区不公开划阶级，但在内部要将领主、牧主划出来，其余划为牧民。在西藏构成牧主的条件是：占有大量牲畜（按当地习惯折合绵羊二千只以上），雇用长年牧工三人以上（一百八十个短工折合一个长工），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受三大领主剥削部分应予抵销）70%以上。由于西藏牧区实行上述方针、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民主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保护了牲畜和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从1959年10月起至1961年，西藏全区已有二百七十多个区、一千三百多个乡建立了人民政权。有六千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各级政权的领导：其中95%是翻身农奴出身。在民主改革的过程中，中央规定对西藏未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仍全部实行原先设想的赎买政策，将其土地和多余财产分配给广大贫苦农奴，然后由国家付给赎金。政府还给他们安排适当的职务，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这样，全区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二千三百余户全部办理了赎买手续，得到了妥善安置。”

33 郑英：〈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年与党的统一战线〉·载西藏自治区文史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页15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第四卷（1949—1956）——鸟托年运动

「稳定发展」西藏经济

西藏在实行「边平边改」的同时，内地还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期，「左」的思潮也一度影响到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在农村和牧区造成了混乱。中央及时发现，并作了纠正。1960年8月，周恩来会见阿沛·阿旺晋美时，跟他们说：「不要急于搞合作社，不要急于抄内地一套」：「稳定一个时期，搞好生产」；「要发展人口，发展生产」】达到「人畜两旺」。”12月，周恩来在同中共西藏工委负责人张国华等谈话时再次强调：西藏民主改革后的所有制至少四年不变，四年肯定不搞合作社，只搞互助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西藏人口少，更要注意保护劳动力，这是一切的一切。刮「共产风」、浮夸风，忽视对劳动力的保护，教训太大了。你们要多想些办法，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的经济条件不再前进，就搞社会主义改造是行不通的。”1960年11月15日，中央在西藏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批覆中指出，西藏地区几年之

内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同班禅谈话中指出，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发展生产，使农牧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1月24日，周恩来在与班禅、张经武谈话时也说到，西藏地区辽阔，不要主观，一切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西藏的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土地所有制是农民个体所有制，这个制度要继续好多年，中心是增加生产：这条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前一时期，工委工作有点急，搞了合作社，有的甚至用了人民公社的名字。现在就是把农民占有土地的制度巩固下来。”

34 周恩来 t 见阿沛·阿旺晋美谈话记录（1，阅年8月31日】·载中共中央文研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1 北京：中央文研出版社，. 工 99s），页 1498 • 35 周恩来 t 见张国华等谈话记录 1960年12月s日，载《周恩来传（1949—1976）》·页 1499’

36 丹增，偁向明主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 州），页聊·

第五章西藏平叛与西藏的社会改革

1961年春，周恩来、邓小平召开会议，讨论西藏工作，着重研究西藏工作的方针和若干重要问题，并于同年4月21日下发了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央提出，今后的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今年‘（指1961年）算起，五年以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的农奴群众能够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在这五年之内，党在西藏的一切政策，包括经济政策、外贸政策、社会改革政策、民族政策，对上层人士的团结改造政策、宗教政策等等，都一定要力求稳妥，都要防「左」防急。37

据此，中共西藏工委1961年制定了《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和《关于牧区当前若干政策的规定》，后来又制定了农牧区的一系列政策，稳定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和牧主所有制。实行「稳

定发展了方针的西藏农村和牧区，到 1964 年，全区建立了二万二千多个农业互助组，入组农民占农业人口的 90% 左右，同时在牧区建立了几千个牧业互助组。同改革前的 1958 年相比，1965 年。粮食增长了 88.6%，牲畜增长了 54.1%】农牧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3 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为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过渡到自治区政府的建立，1961 年 8 月 2 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进行民主选举试点工作的决议。1963 年 3 月 8 日，西藏第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县级人民政权机关——乃东县人民委员会成立。1965 年 8 月 13 日，西藏全区县级选举工作结束。选举产生了县级人民政府。并选出出席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

37（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册·买 2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5—1961）——乌托杂运动

代表。8 月 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议案，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决议。

1965 年 9 月 1 日至 9 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这次会议，是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主的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三百零一名。其中藏族代表二百二十六人】门巴族、珞巴族、回族、纳西族、怒族和其它代表共十六人，占代表总数的 80% 以上。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也有一部分是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出以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为团长、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国华在会上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对西藏十五年来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以复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牧业生产；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地、稳妥地、分期分批地！现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国防建设，保卫国防，巩固国防。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自治区

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回顾了在筹备西藏自治区成立过程中所经历的斗争，列举了筹委会成立之后西藏在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经大会代表投票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协绕顿珠(杨东生)、朗顿·贡噶旺秋、崔科·顿珠才仁、生钦·洛桑坚赞当选为副主席，达瓦、仁钦索朗、扎西平措等三十七人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

斗争代表团包括中央各部门十六人·

，二十七个省市区，十六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代表。共七

第五章西藏平叛与西藏的社会改革

357

9月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后胜利闭幕，宣告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至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省一级范围全部建立。”

39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和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关系国家统一的全局性问题。中共建党之初·曾提出「民族自决」和建立「联邦共和国」的口号·抗日战争期间，为团结全民族抗·日本侵略者，又曾提出动员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的主张·但在中共七大党章总纲中仍保留了为建立「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因此，在1949年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的过程中，如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看来恐怕还是不要搞联邦。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深入研究后提出：第一苏联少数民族人口与俄罗斯民族大体相等】各七千几百万人。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吗，并且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互相杂居或交错杂居。第二·苏联实行联邦制是通出来的·本来，马、恩、列、斯都主张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只在例外的情况下允许联邦制·但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

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因此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形式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而我国则不同】国内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始终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杨静仁等：〈深切怀念我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著名理论家〉，《人民政协报》。1944年9月12日1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完全赞同利瓦伊汉的分析，确定新中国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而不实行联邦制。1949年9月7日1周恩来在向政协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谈到国家制度问题时说，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破坏中国的统一「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r 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J。由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被确定了下来。

40 内蒙古自治区 1947 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55 年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1958 年成立。

第六章

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

1 公社所有制问题引起的关注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潮中，人们对高产卫星和徐水式的共产主义】是有怀疑的。拖着抱病之躯来徐水参观的罗荣桓元帅。在看了墙上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口号，画着硕大如牛的肥猪。几个人才抬得动的大白菜；而幼儿园裹孩子呆板地回答着参观者的提问，敬老院空徒四壁。只有目光痴呆的老人后，感叹地对同行的聂荣臻元帅说「这样的敬老院，我可不来住。」在天津胜芳参观亩产二十万斤的密植高产卫星田时，罗荣桓弯下腰，用手杖捅一捅那密不透风的稻棵，仔细地观看了地头放着的鼓风机和拉起的电灯，问陪同参观的公社书记：「为甚庆要用鼓风机吹？」公社书记说：「不吹，空气不流通，稻子就会腐烂。」罗又问：「是不是所

有的田地都能用上鼓风机？」公社书记摇摇头说：「不是。」¹ 罗说：「那你们这块试验田，既然不能推广，这试验还不能算是成功。」有人播话说：「可要鼓气，不要泄气呀！」罗笑若说：「这个气还是少鼓一点为好。我们总还懂得点科学嘛！种田不讲科学不

360 少华人民共和国邳不四乱（1958 — 1961）一鸟托年运动行。」¹ 薄一波回忆说，参加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代表，曾集体到徐水参观。当记者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当中，看到棉桃之上挂满棉花，满眼一片洁白】准备以棉桃为背景为薄拍照时。同去参观的同伴将薄拉开，说：「别照，假的。」薄细看后，「也看出假来了」9月上旬，安徽灵璧县无署名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乡社干部不显当地灾情，谎报产量】吊打威逼群众等情；，9月30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反映相当一部分农民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怀有不满情绪的情况，引起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发展情况的关注。他决定再次到河北去看一看。10月14日至17日，毛泽东在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听取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县的县委书记汇报。主题都是谈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回到北京后，毛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0月18日关于在河北省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报告中虽然对公社的情况说了一些正面的话】但如实反映了基层存在看「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 j、对群众「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弄虚作假·r 县裹和各公社的预产估计也多半大于实际产量」.；乱提无法兑现的口号，「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甚么有甚么，穿甚么有甚么】要甚么有甚么」等问题。‘毛泽东看后，暂时没有表态。，¹《罗荣橙传》领写组：《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页558—559。²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显》·下卷口匕京：中共中央写校出版社·1993），页751，³毛泽东：〈对一封反映安徽省灵璧县灾情来信的批话〉（1958年10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痛》，第七册（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2），页436.

⁴中共中央办公螂机要室”5B年1Q月比日关于在河北省徐水县劳动

中所见所闻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建灵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 522—524·5 毛泽东：〈对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的批语〉；1，（1958年1月1日）。毛将此报告批送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毛批曰：「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社有·工又及，「此件，带回去，我不要了。」《建灵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 522，

第六章毛泽东「压蛤空气」及其底线

为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10月19日，毛泽东接连写两封信给陈伯达，命陈伯达与张春桥去河南遂平县喳蚜山卫星人民公社进行调查，为中央即将开会讨论公社问题准备意见。并嘱陈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带去，边调查，边读书。还建议把胡绳、李友九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10月23日，毛泽东又给已经到达河南的陈伯达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然后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26日，毛泽东决定增派吴玲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地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闻名）；二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一乡一社）

毛在与吴、田二人谈话时说：’

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彼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合社的优点是一犬二合·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念大愈好，念介仓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合社。我还委派人去了解么东毒张县，听说那东革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朴：甚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

、’低■■■■■■■■’·‘■’■·! e!’可■■■·’1,
■■■■■ ‘■■■. ■. ■■■, ”, , ‘面. · ‘, · ‘-.

6 毛泽东：〈关于到河南遂平调查人民公社问题给陈伯达的信〉（1955年10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63—464。

7 吴玲西 ‘《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卯5）页95—97·

一辟 I· ‘ee..es., ■■■,
‘口·■■■. ■■■··. .’e

362

怜人胜和耿、第”人（1”‘—1%U—“年钢

毛指出，下去调查，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他还特意交待‘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吴玲西回忆毛的这次谈话说：「这是大跃进中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说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回想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起。毛主席的多次谈话，给我强烈的印象就是报纸要促进，不要促退。」容28日，毛泽东覆信陈伯达，要他在遂平调查完成后，再去附近某一个县做几天调查，以资比较。然后回到郑州。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分析农村人民公社化后生产数据所有制等问题。此时，中央已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

10月29日至11月4日，吴玲西、田家英各自带助手分别在修武县和七里营人民公社进行调查。跟随田家英一起调查的逢先知回忆说：

10

当时·下去的同志包括田家英在内，对人民公社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怀疑它。但通过调查，却姿觅问题不少，有些问题使人非常焦

急·例如，普适实行「犬兵团作战」·社员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速
续一二十天·搞得人困马乏，难以为继·劳动效率大大下降。大家都
希望向毛泽东反映，念快念好·田家英还

8 吴除西：《懂毛主席》9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版社，1997），页
18510，边、挥德山、，自编版社，19 劲），页 54 一
页 96。

：（周恩来年谱 1194，一 [卯 6）》

（北京：中央文戏出

：《毛泽东和他的秘，田家英》55.

（北京：中央文戏出

计修·革。必眉

第六章毛泽东「压续空气」及其底线

从下放拎神邢寡了解到当地卢报产 t 的具实情况·当时·开朴人民
合社性质 1.1 题，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拎邵议论的 t 要问题之一也是
田看重调奎研究的一个问题。篡层拎部中不少人认为人民公社是全民
所有制，田家英开始没有表示自己的看法，但从修武县委书记的一席
话中得到一个放今。那位书记同·忽说：人民公社如果是全民所有制，
那末·遇到丰年，修武县的农民是不会显意把粮食与价调出来的；遇
到歌年·国家能够与价地调粮食给修武县吗才田家英听了觉得有
理·非常重视。

我们还参观了大悚钢铁的场面。那是一个晚上·在一个悚铁点上·只
见人山人海，火尤映天·人们通育不眼·大拎特拎。指挥者不断地做
纹动工作，嗓予都喊哑了，说那天夜东要放「卫星」。当时我们这痊
参观者尽管针那种做法抱有怀疑，但对群众的拎劲不能不表示读欢 1
大炼钢铁不仅造成大量青财的严重浪费，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农业收获
季节。我们亲眼看到·鱿要到手的丰收粮食·因冉劳力收获而烂在地
东。

吴冷西的回忆还记述了当年新乡七里营公社实行供给制的情况，即所
谓 r 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
以至理变、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下来。每人一年的费用需
七十八元。在新乡的兴宁人民公社，还了解到要取消家庭的做法。即

全公社实行军事化，将二万多人编成十五个营五十个连，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居住在集体宿舍。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对这种荒唐的做法，吴冷西回忆说，当时已厂不得下来调查前「不要随便表示意见」的守则，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

-!1!’’ ■■■■■■■■■■■■■月■■■•. . •■ ‘之” 乱奋
■■■■1. j1jeswel-].

11 吴冷西：《忆毛主席》·页 99 — 1 团，
364

中，人录和，必喻”刘 195 ‘一，，’，) 一，托，躺
毛泽东 10 月 31 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郑州，路经新乡稍停，吴冷西、田家英登车随毛泽东赴郑州，向毛汇报了修武县一县一社和七里营公社「十六包」等情况。12 陈伯达、张春桥去遂平调查的一组人已先期到达郑州，他们搞了一个《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章程》，主张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

2 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思右卢

经过以上的多方准备。11 月 2 日至 10 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
12 在吴，田汇报中问毛泽东不断桥话。吴玲西记下的有，r 毛主席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街：平均分配 t 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 t 主义，辽是要按劳分配。供给细只能搞公共食堂 1 而且要加强管理，其它只搞些公共枫利事业，不要采取『包丁的办边，t 力而为。』谈到修武的全民所有制。毛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洒同起来。修武县委。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他提出的问丽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织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末，生产关系上从集，所有制过读到全

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当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万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昏眼花了，怎能让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亩庄稼役有人收时。毛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庆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见吴玲西，《忆毛主席》，页102—103。

13《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56换一。陈伯达有一段自己的说明，这个县出沙子，用沙子去武汉换机器闲聊时。谈及此事。毛即批评说，这是毛泽东对他的误解。陈伯达著，香港：天地一书有限公司，1991年。

；吴玲西：《忆毛主席》。页103。关于产品交

那是到遂平县的晚上，一个年，的毛泽东说：我们

、这是产品交换。到郑州在向毛泽东正式汇报前你主张产品交换，不要商品交换呢？陈声明说。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欢中自述及其它》，页70—73。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作会议（后来称为：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后，有的省委书记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应搞一个新四十条，于是会议就有了两个议题。

11月3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铁（河北）、吴芝圃（河南）、张德生（陕西）、张仲良（甘肃）、王任重（湖北）、陶鲁茄（山西）、舒同（山东）、曾希圣（安徽）、周小舟（湖南）九个省委第一书记；以及陈伯达等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会上，在商品交换问题上引出了不同看法。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70%，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70%。」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裹头算一算账。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

14 文中所引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资料，除有注释者外，均引自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逢先知·金仲及主渠：《毛泽东传（1949—1956）》·下册 t 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3 年 11 月第 1 版·页踪一。吴伶西、逢先知在上述回忆中都说 11 月 11 日毛的专列经过新乡，他们登车向毛汇报；吴还说，毛主席从 11 月 6 日起主持郑州会议。这两个时间均有误·第一吹郑州会议开始的日期为 11 月 2 日·

巧西安会议·指 1958 年 10 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 . ■■■■■■■■■■■■■良，. . ■ j 口个 ■ 口口唱 ■ ■ 届 ■ 盒

366

藤

中华人民共和国扣第四 k (1958 年 11 月 16 日) — “罗动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 r 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这大概是人民公社兴起以后，对商品、货币问题的最初议论。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

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要求4日开始讨论，7日拿出初稿。4日下午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¹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于是，甚么是共产主义的问题就提了出来。关于工农业的指标，起草人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状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关于文件的题目，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¹⁶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3日），较《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888—890·

第六幸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为搞这个全国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议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歌阳钦、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挥震林、李富春等参加。，7

5日开会时，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到会。毛泽东问新到会的人：

「把你们请来，有甚么新闻？」

柯庆施第一个发言，他主要反映城市裹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量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它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切。他说，纲要裹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极，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

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甚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烟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或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这似乎表明，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

6日、7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也到郑州与会·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17毛。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4日），载《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890—891。

蟀人馱卡终第”鸟（’9’‘一，,61）—“杖动

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他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

第一个问题，甚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计甚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华？实现这些过渡需要甚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

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

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毛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8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 /]’ 平阅办。9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讲了以下问题：在讲了家庭·商品、资产阶级法权、高指标、工作方法这五个问题之后，毛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这次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11月7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还，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分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8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月6日，，日），载《毛泽东传（1909—1976）》，下册，页8,2—893。

19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9日），载《毛泽东传（1909—1976）》，下册，页893—895。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甚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11月10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想法，并再次批评了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毛还反复讲了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道理。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对河南省提出的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批评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他强调说：「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20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的问题，尤其是毛泽东的多次讲话来看】对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这一点是明确和肯定了；对搞浮夸、弄虚作假、捆人打人的粗暴作风都有批评；对急于向全民所

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也有所制止。但整个来说，对甚么是集体所有制，甚么是全民所有制，在甚么条件下才能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甚么是社会主义，甚么是共产主义，在甚么条件下才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仍然是没有划出明确的界限。毛在11月6日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写下的批语，充分表露了这种感情。¹¹

正是基于这种犹豫矛盾的心态)对问题尚无清晰把握和明确定见，毛泽东在郑州会议结束后，很快就对原本要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经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即下发各地贯彻执行的意图作了改变。U月12日，毛写信给邓小平说：

20 毛泽东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439—441。21 毛泽东写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愿延可也，J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第19卷(1956—1961)——大跃进运动

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这是积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f1J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竹意见提出来·项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复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平去的草案立即在内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商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筹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争介报。z之

毛泽东在同一天写给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中，对所以作这种改变解释说：「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3「过渡」和指标问题的讨论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从13日至19日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讨论会议制定的两个文件，组织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继续在郑州作调查研究，先后约中共河南许昌、洛阳、新乡、开封地

委书记和鲁山、商丘、信阳、禹县县委书记谈话三会见中南海机关下放在河南荣阳劳动的十八名干部。13日离开郑州，途经孝感，与湖北省·地，县委书记及长风公社、五店公社书记谈话。15日到达武昌。关于毛泽东在孝感与省、地、县负责人的谈话，史家有如下记载：乃

22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案》的修改和信件〉（1958年11月10日、1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519—520。23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1958年11月10日、1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520。

2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512。

25 润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上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页啊7—448·

第去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11月14日，毛的专列停在湖北孝感火车站·他先接见了解放军十五军的负责人。接着接见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副书记王延春、副秘书长梅白，还有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长风人民公社书记朱朝教等人。

梅白代表王任重汇报。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日子不好过，自己骗自己，这也许是下情不能上达·」梅白说：「彭真同志说主席对湖北年产六百亿斤粮食要摸个底，允不允许讲真话？」毛泽东说：「就是要你讲真话。」

梅白开始如实汇报：「我刚从我的家乡黄梅回来。在黄梅我秘密调查了六十个生产队。在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四两二钱粮食·李家湾的书记说实话，平均每人每日四两四钱。黄冈地委还要从黄梅调出四十万斤粮食，老百姓就要饿肚皮。我提议取消这个决定，经姜一和任重同志同意停止了调粮。从调粮情况看，我估计全省1958年能搞到二百亿斤左右，至多二百二十亿斤。」毛总后，既自责又伤感地说：「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发热，决定一切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梅白讲完，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说：「梅白同志说的符合我们孝感的

实际情况。」

孝感县委书记王振民说，「高指标是中央压省委，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一级一级压下来的。」

这时，指定接见的妇女代表晏桃香来了”由于连日夜战，她感冒了。一到专列前就打喷嚏。秘书叶子龙怕传染给毛泽东，不让她上车。正交涉时，毛泽东见了】说，「快让她上来，怕甚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来，小姑娘，请坐。」

晏桃香怯生生坐在对面·毛泽东问：「你怎么感冒了？」「报告主席··一」

「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昨夜我开通宵夜车锄棉梗，天亮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畸数（1，”一”61）一鸟托作运动

「三百瓦电灯，还有二十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女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显意。」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差十万 / k 千里。」

「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毛泽东转向劳模官木生·官木生说：「现在的生产指标，不造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压地委，地委压县，县压到我头上。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我们现在不实事求是，要求中央实事求是，事实上有的人已经开始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淌。」毛泽东动了感情，流看泪说：「你们要我实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们实事求是。我不该同意湖北六百亿斤粮指标。六百亿斤是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任重，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

基层干部和群众走后，毛泽东对省、地、县委书记们说：「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有句诗：『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这一路上了解到的情况，更坚定了毛泽东要压缩空气的决心。对毛泽东来到武昌后的情况」吴冷西回忆说，

毛主席 14 日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他要或和田家英参加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同志主持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从 14 日接连开到 20 日，实际上是调查会。1 日毛主席听取了王任重同志汇报湖北全省的情况和孝感、沔阳、农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接替由麻城、邵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被作了汇报。毛主席没有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到场的我们事彼郡向他汇报了。我们看重向他反映了县委第一书记是公社书记，钢铁厂厂长汇报中提到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的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甚大，大炼钢铁中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鲁等问题。之‘

以上种种情况，进一步促使毛泽东思考在郑州会议提出压缩空气的问题。随之举行的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11 月 21 日到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书记处的部分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中央常委除周恩来、朱德、林彪外都已到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和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安排。在 21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谈了八个问题：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二、十五年规划问题；三、这次会议的任务问题；四、划线问题；五、消灭阶级问题；六、商品经济问题；七、减少任务问题；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向共产主义过度和建设速度这两个问题。毛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裹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

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愈早愈好，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 1938 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

26 吴冷西：《忆毛主席》，页 105 — 1 师。吴说·毛泽东 14 日到达武昌，时闲有误·应为 15 日·

27 《毛泽东传 1949 — 1970》、下册，页以冷一如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955 — 珍 61j — 鸟托年运动

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偿。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 1959 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做准备。于是，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那个「纲要四十条草案」，被搁置了起来。

在谈到 1959 年的任务时，毛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关于 1959 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会议提出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毛泽东是很赞成的，当时想的是：生产这么多钢的出路：干什么用？现在觉得问题不妙了】究竟有没有可能？于是他在讲话中提出，「钢三千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这时，邓小平马

上插话说：「是不是搞三千万吨，是值得考虑的。」薄一波接着说：「三千万吨，我们在下面稍微议了一下，是值得考虑的。现在六千万人上山，造成各方面这样紧张的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毛问：「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薄答：「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稳妥。」

22日凌晨，毛召集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霉询钢产量指标的意见。他岩后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22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第六章毛泽东「压结空气」及其底线

375

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对毛泽东找各大协作区组长开会的情况，吴玲西回忆说：

第二天（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或和田家英次去技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 t11月22日》下午他我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一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1的指标从丰千万颇灭为一千八百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滨要增加齐倍，有的省要增加十织倍·有的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又说，其实一千八百万颇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尤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一千万吨出头的钢产 t 中·好钢只有八首五十万颊·看来卹州会议读了几天 t 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犬家头脑还是发然，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六千万人上山，间得天下大尤。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似织番怎么得了才‘，对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关注钢产量指标的心情，薄一波也曾说过一句非常形象的话：「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2923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就1959年钢产量的指标问题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裏把反对作

28 吴冷西：《伟毛主席》·页 106 — 108，

29 薄一波：《若干 t 大决策与事件的回一》·下卷·页 515.30 《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册，页 902 一例 k。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9 卷（1958 — 19 醒）— 乌托年运动

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记、公社党委，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他强调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关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 t 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才毛泽东在讲话过程中，彭真、刘少奇，邓，J' 平、李井泉、柯庆施等都有插话，形成了一段讨论。

当毛讲到，北戴河 t 议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这时彭真首先插话。

彭真：转得太快也不利，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

毛：十年裏三三制·农产品调拨三分之一，可能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一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

刘少奇：达到 150 — 200 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 150 — 200 元就可以过波，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 r 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波。

毛‘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

毛‘按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以有利些，

不然就难过渡·划线问题请同志们注意呀！线是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去讨绘：搞几条标准·

第六章毛泽东「压续空气」及其底线

377

邓小平：不能和苏联的标准一样。

毛：一定要高于苏联。1,

这段记录向人们表明：连刘少奇、彭真这样的高层领导人都主张「趁穷过渡」，可见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潮在中共煎内蔓延的程度；毛泽东尽管对刘、彭的意见不以为然，认为北戴河提出三四年、五六年的时间太短，是个缺点，但他并不认为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1958年11月21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31 毛泽东在武昌会蚁上讲话的记录，1958年11月21日·对这场讨论】当年在会场直接聆总的李锐也有一段记载：毛泽东在讲话中承颺，在向共产主义过波的问题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大概是冒失鬼·开 t 的前养天，n 日巧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提出苏联朱来十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地建立共产主义社 t 的物质技卫基础·毛要大家看看这个提纲：苏联已经四十一年了·还准备搞十二年（按应为十五年）。看它的思想是想过渡，但并没有讲过渡·赫鲁晓夫很谨俱！他已经有了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吨以上石油，他还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过渡。现在国内局势·我们倒有鸚十万、上百万的干部，就是想抢先，都想走得愈快愈好·对全局照厂得不够，这时，毛批评北戴河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共产主义，是个缺点·他说，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没有消滅，没有一二十年不行·现在是吃穷的饭，甚庆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甚庆留险主义错误。但是】t 上有不少人的意见仍然是快些过读·如刘少奇说：达到巧 0 — 200 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由集·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认为：每人到 1 父一之闾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人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即很械化、电气化、园林化》压低·趁热打铁·早

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过疲。对这种意见·毛不以为然”他脱：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分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十二年·五十二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庆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1971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庆样才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即令十年，到1968年我们已准备好了，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两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一家无光·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页358—ISQ·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弟齐春《1,8—1961）—乌托邦运动

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中国和苏联那个先过渡到共产主义要从各方面慎重！考虑。中国早过渡究竟有无可能·是否有利，即使有可能，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才

可见，在毛看来，中国较之苏联还是有可能先进入共产主义！只不过要考虑国际影响，不要让苏联脸上无光】还是让苏联先进为好，仅此而已·这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基本思想。

4 关于两个「过渡」的界限

经过武昌会议的讨论，中共高层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文件起草也大体成熟。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和修改酝酿多时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中央委员八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十二人。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并于12月17日：由新华社公布：《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六

次全体会议公报》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在高度评价农村人民公社建立的重大历史意义的同时，着重阐述了两个问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版社，1 册 5）· 页 598

，第七册· 页 553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十一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六章毛泽东「压蝼空气」及其底线

题：一关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针对当时人们把人民公社所有制当作已经是全民所有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误解和倾向。《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r 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j

针对那种以为人民公社就已经是全民所有制，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因而不需要商品交换的糊涂观念，《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无论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生产。」^r「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各个公社也才能够换回必要的机器和设备，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也才能够换回所需要的消费物资和现金，以便供应社员和发放工资，并使工资逐步增长。」^j 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

图过早地 r 进入共产主义 J 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错误的。」

《决议》就上述两个问题所作的有针对性的说明，其基本精神对扭转当时中共党内那种急于搞共产主义的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决议》又坚持认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也并不是遥远将来的事，说甚么：「如果不及时地发展和完成这种转变，老是维持集。所有制的现状，让公社社员的眼光只是局限在剧、范。的集体利益，个：个驯. , -: ‘■f■，

380

中华人民兵和国史·‘第斋春（“58 — 1, 61）—鸟托并运动的圈子裹】那就将妨碍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人民觉悟的继续提高，因而是不适当的。1

《决议》还强调：「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萌芽。」随着人民公社的发展，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将有新的增长」，「随看社 t 产品由于全国工农业日益高涨，逐步由不变富到丰富，公社分配制度中的供给部分逐步由少到多、供给标准逐步由低到高……一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将逐步成熟起来。忽视甚至阻碍这个发展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这远的将来，自然是不适当的」。

这又表明，这个《决议》，并没有能真正从理论和政策上划清两个过渡的界限、只不过是让人们把过渡的时间表推迟十五年到二十年“罢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向往的心态，在会议期间先后（12月7日和9日）为印发《张鲁传》所写的批语中，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护赏，就是明显的表露。”

34 《决议》说：从现有的经验看来，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时间可能早一些，但也不会很早……一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35 毛潭东在12月7日的批语中写道「这裹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钥裹吃饭不要

钱，t 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单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眉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在12月9日的批语中写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这治病；t 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开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吧以犯轻彻错娱的人修路，:r 犯法者三原而彼行刑」1 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 t 畏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单，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毛洒东：（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1958年12月7日、10日，·载《建·以来毛泽东文偶》，第七码·页627—629’第六章毛泽东〔压维空气〕及其底线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虽然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除对基建投资（由原定的五百亿元降为三百六十亿元）、钢产 t（由原定的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作了压缩，其它项目基本上保持了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而粮食指标却由原定的八千亿斤到一万亿斤提高到一万零五百亿斤。因此，整个来说，仍然是一个无法完成的高指标。「会议期间，陈云觉得钢的指标还是难于完成，建议以不公布为好，但这个建议未能反映给毛泽东。」36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历时一个多月，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终于使人民公社化以来出现的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得到了遏制 1 头脑稍微徐静了一些。但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引发的问题还远远没有充分暴露】包括毛泽东在内，期待 1959 年继续跃进的食想并未有根本变化·二整顿公社和二次郑州会议

11959年初的农村形势

由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引发的共产风，以及由此并发的瞎指挥风造成的后果，在 1958 年底开始逐步显现。据新华社 36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58）》，中卷《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2 月 10 日”·页 4》·邓力群回忆说：陈云同志觉得这个数字太高，不托底，他跟胡乔木讲，要胡乔木向毛主席反映，遭个数字不要公开发表：不发新闻·乔木同志不敢去说·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 101·薄一波说：「八届六中全会时，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同志觉得还是难于完成·为慎重起见·建组以不公布为好 [这个建议没有及时反映给主席，毛主席直到 1959 年 4 月之日上海会议期间才知道陈云同志的意见]。」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页 828·李锐说：「会议期间，陈云曾向胡乔木谈到，公报不要公布钢、煤、粮·棉指抓和 1955 年七千五亿斤粮食产·乔木没有向毛汇报·后来上海会议时，毛批评了乔木，说你有喜庆权力不报告中央主席的意见：反过来表扬了陈云，还说『有理有时在一个人手裏』」·见李锐：《忆毛主席》·下册，页 39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1959 年年初编印的《内部参考》报道：有的地区公共食堂出现停伙，浮肿病在农村开始蔓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谋求生路，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城市出现抢购日用工业品风潮，等等。举其要者‘1 月 20 日，新华社南京讯：江苏徐州专区最近有两千多个农村食堂停伙，其中以去年受灾的邳县、沛县、新沂、铜山等县停伙较多，群众思想有不同程度的混乱·尤其是没有向群众进行宣传和作适当安排就把食堂停伙的地区，群众思想紧缩，惶惶不安，生活困难，生产劲头不大。有些地区的水利建设、田间管理·积肥等冬季生产因此而停顿下来。，，1 月 27 日，《内参》报道：

江苏句容县宝华公社仑头、铜山两个大队自 1958 年 4 月至 11 月共死亡社员一百一十四人。死亡时间，以 8 月份最多，共四十七人，占死者总数的 41%。在死亡的一百一十四人中，因浮肿或与浮肿有关或干瘦而死的五十七人（其中原无其它病症纯因浮肿死的三十人。原因

之一是与干部对夏熟估产偏高，购粮任务过大，群众口粮不足（仑头大队 6、7、8 三个月每人分粮不到四十斤，每月只有十三斤左右）• 38 与之同时，农村疾病流行。

卫生部〈卫生动态〉报道，从 1958 年 8 月以来，各种流行病骤然上升。肠伤寒病在河北省五个专区流行，累计发病四万三千余人，死亡一千二百余人，病死率 2.8%。10 月份以后，河南、山东等省部分地区亦开始流行。9、10 月间，白喉在河南，湖南、安徽、福建、广东、江西等省区相继流行。其中，河南六十六个县市发病人数达三万三千余人，死亡率高达 7.8%。从 11 月份起，麻疹、流行性感、猩红热、百日咳、流行性脑脊膜炎等疾病急剧上升。12 月份尤为显著。麻疹在全国范围内流行。据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四
373B

〈徐州专区人民公社最近有两于多个 t 堂停伙〉•《内部参考》• 1959 年 1 月 24 日。〈关于句容县实华公社仑头• 钢山大队死人问题的调查〉，《内部参考》，1959 年 1 月 27 日。

第六章毛泽东「廖绘空气」及其底线

川、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甘肃、青海、新疆、北京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部分地区不完全统计，从 11 月到 12 月中旬止，累计发病 44) 万余人，比 1957 年同期全国发病人数《二十二万》增加一倍多；流行性感在部分地区流行，据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甘肃、山西、黑龙江、河北等八省区部分地区不完全统计，从 n 月份到 12 月中旬止，发病人数共有三十一万六千余人。1958 年冬季传染病的特点是：范围广，来得早，传播快，合并症多，死亡率高。究其原因：一是劳动强度大，营养跟不上，抵抗力下降；二是忽视公共卫生；三是药品供应不上；四是气候干燥，雨量少，容易感染。关于浮肿病的情况，《内参》报道：

1958 年在云南、四川、河南、甘肃、山东 1 湖南等省相继发生「肿病」。其中，河南省从 9 月到 12 月 20 日止。据许昌、开封、南阳、洛阳等四个专区不完全统计。「肿病」患者有 152132 人，死亡 7465 人，病死率 1,63%。四川省从 10 月下旬到 11 月，仅资阳县就发现「浮肿」病人 2078 人，死亡 405 人。云南省从 2 月到 10 月共有「肿

病」患者 334 以刃人，死亡 45000 人，病死率 13.77%。湖南省 1 至 5 月间，召卜阳、湘潭等地区「肿病」患者达十万余人。「肿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营养不良。扣

在饥饿和疾病的威逼下，大批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据 2 月 15 日的不完全统计，仅北京的前门、永定门，丰台、西直门四个车站晚上露宿的就有二千多人。据 2 月 12 日到 17 日六天统计，外省农民盲目流入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两市。共有“。7 人。上述外流农民，主要来自河北、山东、山西等省。41

由于 1958 年大炼钢铁和各级大办工业，农村强劳力大多输入工业战线—据全国劳动工资计划会议材料” 1958 年年末，全国职工总数 39<195B 年冬季疾病流行情况)，《内部参考》，19” 年 1 月 10 日。40 <。于「肿病」发生的情况)·《内部参考》·1959 年 1 月 10 日。41 <大批外地农民流入北京，包头等市)，《内部参考》·19” 年 2 月 2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酋数 11958 — 1961) 一鸟托年运动

达到 4939 万人，比 1 外 7 年增加 2089 万人。。加上外流劳力，致使农村劳动力短缺，直接影响看农业生产·如 ‘

福建省委书记江一真谈当前备耕工作问题有三：缺乏劳力。大批农村劳力（一般在 30%至 40%左右）被抽调到县、专、省支授工业基本建设，而且绝大多数是全劳力、强劳力，留在社裏搞农业的，多数是妇女、老头、小孩：人数既少且弱。农具不足。小农具损害很多，大农具破烂不堪。仅莆田一个县就缺少农具二十万件。探翻过的土地，死土和活土混合在一起，不多下肥料，改良土壤，就可能引起减产。社员对农业再跃进失去了信心。”

云南玉溪专区全区五十万劳动力，调出支授国家建设、地方工业、水利、副业和管理工作的有二十九万多人，占劳动力的 58%，且多是强劳力；参加农业生产的只有二十一万多人，占 42 吗左右，且多是弱劳力。各公社脱产的文工团、邮递、书报·招待、卫生工作人员和脱产的学员，往往占总人口的 10%。由于劳力过于分散 r 完成粮食增产任务，就感到非常吃力。 “

以上情况，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对 1959 年农业继续跃进的期望，相距甚远。

2 人民公社的初步整顿

为促进人民公社的巩固，保证 1959 年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要求各省、市、自治

42 据全国劳动工资计划 t 议材料：195B 年年末，全国职工总数达到 49” 万人，比 1957 年增加之佣，万人·其中增加最多的是四川省 ‘3o4 万人)；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各增加一百万人以上；坛宁·云南·浙江、广东·贵州，安欢，湖南·湖北·黑龙江、山西·江西，权建各增加五十万人以上·〈去年全国新增职工二千万以上〉·《内部参考》·1959 年 3 月 4 日·

物〈福建省今年春耕准备工作不如去年〉，《内部参考》，1959 年 z 月 11 日，” (玉溪专 ‘纠正平均使用劳力的一向〉，《内部参考》·1 站 9 年 2 月乃日，

第六章毛泽东 T 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区党委抓紧 1958 年 12 月至 1959 年 4 月的五个月时间，紧密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对本地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工作。具体要求是：对公社的生产规划、分配状况、生活福利·经营管理、财务工作、组织领导，做一次全面的探入的检查。

对于党员、干部作风中的问题，要经过党的教育和群众鸣放加以处理。在处理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单的积极性，· · 一对于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对于混入公社领导机构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极少数作风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把他们从领导机构裹清除出去。 “

据此，各省区在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通过试点，开展整社工作，重点是解决好分配问题。据中央农村工作部 1 外 9 年 1 月对河南、湖北、黑龙江等二十三个省、市、区的 21176 个人民公社的统计，绍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的情况是：实行基本供给制的 989 个社，占总社数的 4.67%；实行伙食供给制的 16610 个社，占总社数的 78.43%；实行粮食供给制的 2872 个社】占总数的

13.56%；实行粮食半供给制的 261 个社，占总社数的 1.23%。实行完全工资制的 122 个社，占总社数的 0.57%；实行完全按劳动日分配的 322 个社，占总社数的 152%。工资和供给部分的比例！一般是四比六；也有少数是各占一半，甚至工资高于供给的。这表明实行供给制和半供给制的占绝大多数，基本上否定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因此，各省根据六中全会精神，对分配的方式和比例作了调整“中共山西省委提出，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关系！一般以各占 50% 为宜。工资部分，可以采取评工记分的劳动日基本报酬制和死级活评的等级工资制两种办法；在不同的管理区之间，应允许有不同的工资标准和差别。”

45 《建国以来重要文选》· 第十一册：页 622 — 6 页，

46 〈目前公社有那几种分配形式〉，《内部参考》，1959 年 3 月 6 日。胡’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风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之 1959 年 2 月 17 日印发）：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 月 1 日· 页 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 119 卷“1961”——鸟托年运动

广东新会县，原来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的比例一般都是六比四或七比三，供给部分过多：社员们认为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都一样。整社中调整了分配比例，部分干部和社员要求完全恢复高级社时的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他们说：过去（指供给部分为主）的共产主义成份太多了，谁还愿意积极呀！”

在解决公社分配问题的过程中，粮食问题突显了出来。即农村普遍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整社工作的重点很快转向了解决粮食问题。1959 年 1 月 24 日，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对各地贯彻八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说：

各地传达、讨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已深入到县，整社试点工作也已经普遍进行。农村虽出现了各种困难和混乱现象，但估计经过四五个月的整顿，一切都会转入正常。只要我们不让公社垮台，它就绝不会垮台。今年农业生产高潮尚未形成，六中全会决议的宣传还不够有力，克服浮夸风把许多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都「克」掉了，这是很危险的。至劳动力紧张的状况，今年还会继续下去，经过安

排可能会好一些。1958年的分配工作尚未做好，这对群众的生产情绪有很大影响，在压缩空气复，又滋生了瞒产和分的现象，增加了分配工作的困难，尚须努力一段时间，才能做好。”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在1月27日向省委报告说：

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

48〈新t县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勤率、劳动效率为甚庆下降〉考)：1959年1月19日，

49 谭震林：〈关于目前农村情况和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1959年1月24日)《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一24·

《内部参，载《建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 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分的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和分造成的。”

中共安徽省委也派出工作组对桐城县的闹粮情况进行调查。指出：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收购任务过重的！-1 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他们一怕粮食不实行「三包」办法，而向公社统一分配；二怕报实产量会增加收购任务；三怕春荒时调减粮食；四怕别队不报实产，自己吃亏。因此许多基层干部平头瞒产和分，形成群众性的闹粮风潮。，’

上述情况说明，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出现的混乱，除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原因以外，重要的还有社队之间的产、穷队共富队的问题所出现的共产风，和无偿地把穷队富队、穷村富村拉平的平均主义问题。但在当时】中共党内高层的绝大多数干部，并未弄清农村关系紧张的根由。1959年1月15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曾非常不满地说：

有的公社调这也调不动，调那也调不动。我说，先礼后兵。经过教育，还是不举从国家统一计划和调配的，非要给以必要的处理，从警告，撤职、直到开除党籍。‘江

50 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1959年1月2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53—54。

51 〈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经济消息》·第，期（1959年2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 \ 册，页80—81·

52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39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喜（工另8—1961）—乌托邦运动

3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1959年的计划指标能否落实放心不下，1959年1月18日，他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在会上说：过去，每年的工业产值中只有15%是靠当年建成的新厂完成的·但自从今年开始，情况有了变化，工业产值中将有50%要靠当年建成的新厂完成。并认为，武昌会议制定的1959年的生产计划指标过高，难于完成·毛泽东听后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毛要陈云就这个问题讲讲话·。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于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问题、农业问题、劳力调配问题等。毛泽东在2月1日和2日作了两次讲话，“基调是：1959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一年。他在1日的讲话中说：

去年十一、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要紧·可以再纹足干劲。……今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局面。但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等条件·不会不跃进的，在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肯定1959年的计划，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计划。「我们应当称颂这个计划。」他说：

现在有声人，一讲起去年的缺点·讲了几十条，一无是处，这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归根到底·不过是九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领

《陈云年谱纵卯5—199引》·下卷，页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32—34”

34 煮 j 电 j

第六章毛泽东「廖宾空气」及其底线

部，都是想做好事的。至朴结果壤是另一回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这次搞出的计划，比较全面，形而上学较少，看到了其中的联艺这个方法，既两样腿走路，，，…我们应当称谐这个计划，宣传又有重点。

毛同时也承认：「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他说：

搞经济建设我们这是小孩，再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关朴反映客观规律，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现在我们似乎开始在这东接触这个问题了。请大家接触这个问题，研究研究。

基于毛泽东的上述估计，这次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计划指标，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整。如果说：关于1959年工业生产的指标，毛泽东仍很有自信；那末，农村的粮食问题，仍使他睡不好觉。继1月底广东省委报来赵紫阳在雷南县反瞒产的信以后，2月5日的《内部参考》又刊登了广东省反瞒产运动挖出黑粮二十 / 亿斤的消息。

“其中说：

大部分原农业社和和生产队干部瞒产，不是一个简单的本位主义作怪问题，它的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它反映的，实际上是公社化后，粮食消费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但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没有紧紧跟上去。几千年来，直到合共食堂成立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地管理粮食，消费粮食，分共食堂化后，农民将未红从家表搬到合共食堂去了。但是合共食堂能否长期办下去，能否办好，一些农民是怀疑的。这就是大部分干部在

. — ■ ‘ — — ■ — —

55 新华社：《广东省反瞒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基层干部报出黑粮二十八亿斤》，《内部参考》，1959年2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粮食问题上闹本位主义的社会根源。反瞒产中，许多地方干部想报实产量但又不取报，正是受到群众一定压力的结果，这是一方面。另一

方面合共食堂化·几百、几千。的嘴巴要伶俐负责·因此，玲部总是想手中多控制些粮食，以防参生困难时，自己有办法。此玲，晚稻收获时户领导疏忽·粮食管理工作混乱，也为玲部瞒产开了方便之门。

对于农民瞒产私分，毛泽东早有所闻·但对农民瞒产的原因，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的分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远比他原先的想法深刻得多。毛遂于2月22日将广东省委报来的赵紫阳的信和省委的批语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了一个长篇批语。毛指示：C即送刘（少奇）、彭真，周（恩来）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去，愈快愈好。」毛还将中央批语，加上〈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的醒目标题。其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阙淤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姿你们。姿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和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塞层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丝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零因，在全国是一个普这序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六中全会开朴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枚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和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玲部两朱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足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誉各地、县。“

56 毛泽东：〈中央批转一个，要文件〉【1959年2月22白】，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52—53·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为掌握第一手情况，毛泽东于2月23日再次登上专列南下，亲自作调查研究。

毛先后同河北、山东、河南的省委、地委负责人以及山东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几名基层干部（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长）进行座谈。全国劳动模范吕鸿宾合作社发生的故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吕鸿宾社也是搞「共产」，开条子，调这

调那。后来条子不灵了，就派人拿着秤去秤粮食，群众进行抵制，就翻箱倒柜。这一条也不灵了，就扣帽子，批本位主义。最后还是不灵】于是，教育了吕鸿宾他们改变主意，用一把钥匙（做思想工作）；一强布告（安民告示】讲明政策》；一个楼梯（下决心解决所有制问题），这才解决了问题。”毛后来说：

「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 占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 忽也「右倾」了，刘子厚跟我革不多·到了山东·沈听说吕鸿宾光「左倾」了，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光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了。我 26 号晚上就兑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朴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2 月 26 日晚到 3 月 5 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是逐步扩大的。第一天的与会者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 s?（毛泽东传（1 舛 9 — 1976}》，下册】页 912 — 913 前十年史》·上册，页 458，

5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钱上的讲话记绿（1949 — 1976》）·下册·页 915.

；绩冬速等：《求索中一「文革」

（195，年 3 月 i 日）·（毛泽东传

3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济春（1 州— 196D — 鸟托年运动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在 27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

毛泽东首先肯定了 1958 年在各个战线上取得的「伟大的成绩」。锐：「怀疑或者否认 1958 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表全错误的。」这些人「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然后，他分析当前农村的矛盾说：

我认为人民介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构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 · · · · —

究竟是甚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来，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要生瞒产和“分、石”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甚么地方。这现象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毛指出，这个矛盾的根子，是在公社化过程中各级刮平均主义的「共产风」。六中全会决议有缺点，没有弄清楚现在的公社存在着

铃毛潭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65—75。

的毛泽东认为瞒产现象的本质，是所有制出了问题，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但说全国农村「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这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估计，在此后调展的反瞒产私分，加剧了农村的「缺、程度，造成了严重复果」。

第六幸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393

三级所有制，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据此，毛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他指出：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正确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到公社一级的状态，一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四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升为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坏种确实存在的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零因公社制度。

接着，批评了公社化过程中刮起的「共产风」（据李锐说：「共产风」这个词，是毛在这次讲话中首先使用的）。毛说：

介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援·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斤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

61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 395。

62 李锐在《「大跃进」亲历纪》，下册，页 395 — 396 中写道：「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58 年 10 月的某一天，该乡召开社员大会·煎委书记当单宣布，11 月 7 日是全乡社 t 主义结束的日子·8 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方式来办。t 一开完，社员群单纷纷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光了，就拿别人的，随便甚么东西都可以章·你家的难】我可以抓来吃：我们队的菜，你们也可以任意来挖；甚至运小孩子也不分你我的；只是一条，老婆还不能随便拉别人的·可是·一写委书记竟然说，老婆能不能拉·还要请示上级·」李说评论说：「在二十世纪的社 t 主义中国·出现这种现象·多庆荒唐】多痒可悲！这说明，在一个物质产品极端匮乏，文化素质十分低下的国度襄·人们只能以一种近乎野蛮人的方式去『t 践』所谓的『共产主义』·正如恩格斯在〈论社 t 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所断言的·愈是在经济落复的条件下构集共产主义，离共产主义也就意来愈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 姑 g — 196D—鸟托年运动

用的，如查社介兵事业所需要的作分房反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英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邵分的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统飏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邵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毛在强调了对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可以无偿剥夺的同时说：「我们指出追一点，是为了说明勉挨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单中问去提个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

从武昌会议提出，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到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就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说，

是一个前进。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看法。在他看来，通过调整所有制的体制、确认生产队《大体上是原高级社》所有制是基础，实行三级核算，以解决穷队共富队的平均主义；明确承认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克服社员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就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继续实现大跃进，假以时日，人民公社就可以实现两个过渡。毛曾尖锐指出：「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然后他明确表示：

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社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

毛在全篇讲话的最后，充满信心地说：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395

经过这样一个整风和整社的递进过程，群众性的围困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围困的基础上其莽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可以认为，这大概就是毛泽东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实行退却的底线。但毛的这一有限退却，一时还难以为各级干部所接受。27日当夜，中共河南省委四级干部会议办公室，将白天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后，巩县、太康等九个县干部讨论的反映上报。其中说：

绝大多数干部听了主席指示的传达后，都表示非常拥护，讨论特别热烈。但尚朴大家思想没有准备，还再在看不少顾虑和糊涂认识”有人认，生产队成了一级核算单位，这下不背大包袱了，但统一一种核计划不好办了，工业化机械化速度慢了，抽调劳力不好办了，因此对人

民介社统一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优越性瘀生怀疑。有人认为，这样搞介社还有甚庆权才生产队的权力犬了，本位主义会更大。‘3月28日。毛泽东找来没有参加第一天会议的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尔的张仲良等开会，向他们讲述了与第一天大致相同的内容。如同河南的县级干部一样，省委书记们也缺少思想准备，一部分人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可以说，整个会议开得不大顺利。因此，3月1日上

63 中共河南省委四级干部会购办公室整理的关于. 县、太康等九县干部讨论毛泽东在郑州*。上的。话的情况报告，1959年2月27日夜·《建。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83’

39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酋春（1州—1961）—鸟托年运动

午，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3月1日下午，将27日、28日分别参加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再次讲了所有制、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毛指出：r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甚么拉平，甚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作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Jr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J「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病鉴于赛耕在即，如果所有制问题不能很快落实，「共产风」得不到制止，将造成更严重后果。毛泽东希望将郑州会议的精神迅速传达下去】进行落实。3月2日凌晨4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要求各省根据河南的经验，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

3月2日晚·继续开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几位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文件和如何开好六级干部会。毛泽东第四次到会讲话，他用郭嘉给曹操献计—「先打吕布，后打袁绍」的三国故事，”告诫各级领导人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而要能够当机

立断。否则会误大事。

关于这几天开会的情况：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2月21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来。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

， 2月21日上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1949—1976）》，下册，页918—919。

邱郭嘉向，操说：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多谋寡断·见事运，得计运，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运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载《毛泽东传

， 绿鸟了郭需的，得计·，就是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2月22日继续哄会，古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4时谈到晚上9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时？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明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立床，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

2月23日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欢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具同意了。他为了察官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3月5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67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烈地表达了他对调整公社所有制体制的决心·目的是要大家明白问题的严重性，思想赶快转弯，下定决心，坚决贯彻。会议最后形成的《郑州会议记录》，“主要内容是：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关于人

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创：物肯劳动，等价交换；拼劳分配，承认差 X. J。

66 王任取日记缝 959 年 3 月 4 日），载《毛泽东传 t1949 —! 976)》，下册，页 921。订这天会议·新增加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有：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袜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黝·云南的谢富冶、新届的王思茂等·

68 〈郑州 t 议纪锋〉, 1959 年 2 月” 日至 3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概大 t 议，载《建国以来重要文戏选编》，第十二珊· X123 — 13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啊春（”58 — 1960—鸟托作运动

从 1958 年 U 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全力关注和思考的农村问题，似乎已经模到了底，现在就只等贯做落实了。这时，毛泽东对 1959 年即将出现一个继续大跃进的局面，充满信心。这在他 3 月 9 日写的一封党内通信中，有着明确的表达·即通过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

3 月份可以基本上淦清和解决人民脊社问题中一大堆枸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4 月起，全实全民鱿可以一个意向地展开今天的犬跃进 T, ’,

三二次整社和降低钢铁指标

1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以后，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

3 月 7 日，中共湖北省委就！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向中央报告说：近残天来，省委紧紧地抓住一条·即迅速、广泛、深入地把郑州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召开了一系 y11 各级干部会议】并定于 3 月 11 日在武昌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加上各地六百名观潮派、算账派，参加人数将达三千五百多人。目前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正根据郑州会议精神和传达后的反映，进行讨论，写出文件草稿，交六级干部大会进一

步讨论。这次扩大会议提出‘一、根据郑州会议精神，在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之后，还要解决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种作风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整党整社。二、从湖北的实际情

69 毛泽东：〈需内通信〉u”9年3月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99—1加·

第六幸毛泽东『压铛空气』友其底线

况出发，原农业合作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上交公社的部分不宜太多·19sa年为。儻至10吗，i,5,年为10吗左右，最多不超适15%。生产队的积累仍为8%左右。三·对原定的地方工业规划和基建工程计划做必要的调整。四、有关人民公社的具体政策问题，正在搜集、整理、研究和讨论。？”

毛泽东对各省召开六级干部大会一事抓得很紧，惟恐延误时机。3月8日他要求中央书记处用电话方式，将湖北省的报告，立即传达各省·市、区党委，以作参考。毛在批语中表扬了湖北的做法，说：「湖北的特点，就是快，有准备，有步骤·J我认为，湖北省委的总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郑州会议的精神的。」”为使各省、区的会议开好，毛泽东于同日将河南省委3月6日报来的，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以及河南省委据此做出的规定，批发各省区。当听到湖南省委定于3月16日才召开六级干部会的消息彼，毛泽东于ga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督促，要求「立即召开」。他指出，湖北省委定于3月11日闻会·是适当的”大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公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和很彻底，鱿是说，不深不透。……有些同·忽或者会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关的时间应当雅迟。我认为不宜如此。·一从：月唳日呈10日·有六七天时间作率备·还不够吗P顶够了。抱长反石不好。”

70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59年3月7日，，载《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八册，页94—”·

71 毛潭东：〈关于传达湖北省委贯彻郑州 t 议精神的情况报告的用个枇婚〉《t959年）月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93。

n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
（1959年3月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97·
73 毛泽东页99一

：〈党内通信〉（1959年3月9日）100.

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

4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曾专（1958—1961）—乌托卑运动

同日，毛又介绍安徽的经验，表扬：“安徽六级干部大会定3月9日开始，18日完毕，比湖北还早两天，非常之好。”3月13日，毛泽东又批发广东省委的报告，推广广东“一面开会，一面即将方针直达各生产队长，毫不拖泥带水”的做法。并要各省“酌情采纳广东的‘三定五放’”的政算规定。”

各省区在讨论落实把生产队作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时，究竟是现在的生产大队（管理区），还是生产队（原高级社），出现了不同意见：河南省委最先提出，以大队为基础；湖北省委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的理由是：人民公社是在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样做有利于解决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团结、生产和人民公社的巩固。”广东省委提出的“三定”，也规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而湖南省委则同意河南的做法，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明显形成了两种意见。

74 毛泽东：〈介绍安徽的经验〉（1959年3月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102·

75 “三定”：一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二定领导人员，迅速搭起组织与管理生产机构的架子；三定1959年生产计划和粮、油、猪等商品包干任务，生产队（或大队）完成任务后的其余部分即归队自行支配。“五放”：一、下放劳动力，使生产队（或大队）的劳动力固定下来；二、下放生产数据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三、下放畜牧业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和经营管理。果树及鱼塘等亦可同样下放；四、下放原有的肥料厂；五、下放粮食。食堂优食消费由各队自行安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108一

109,

兀毛泽东：《转发广东省委开于贯敌郑州 t 议精神的报告的批语》（19”年 3 月 u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 108 • 77《中共湖北省委开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19”年 3 月 8 日）• 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 11B — 119。
78《中共广东，委开于，做郑州 t 议精神的报告》11959 年 3 月 11 日），载《达口以来毛潭东文稿》• 第’ k 册• 页 108 •
79毛海东‘（党内通信）（19”年，月 15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鹅》，第八册：页 110 •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山东省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中，对以生产队还是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已展开争绘。80 毛泽东以为，此事关系重大。3 月 15 日，他给省、市• 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指出：

河南、湖南两省均主采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篡本检算单位• 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帐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篡本板算早位，究竟哪一种主帐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占说• 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 县委、合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塞本核算单位• 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早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开系到三十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 一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 是很危险的• 今年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郑州会议记练》上所谓「队为永础」• 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石不是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与论甚庆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 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界，

3 月 17 日，毛泽东又给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了第二封信，向他们指出：六级干部大会，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 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还应该讨论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B2 各地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县和公社这两级干部也勉强接受了以生产队（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河北• 山东、四川、

80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指示精神给中央的报告> (1959年3月10日) · 载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八册, 页 114。

81 毛泽东: <芜内通信> (1959年3月总日), 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八册· 页 111 — 112.

82 毛泽东: <写内通信> (1959年3月”日) · 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八册, 页 23, 1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 61 卷 {1958 — 1961} — 乌托邦运动

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基本上都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南省也改变了原来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决定。对于县、公社干部思想是如何转弯的, 中共河南洛阳地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 “ 高级社的核算单位问题, 各县生产队长和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主张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但县委、公社及相当多的管理区干部 · 则坚持以大队 (管理区) 为主。其实有些县委干部是了解群众情绪的, 之所以不取改变政策措施 · 主要是怕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 加上省委曾有「以大队为基础」的规定 · 因而采取了一面执行一面又依循旧的态度。17 日传达了主席关朴这一问题的指示, 以高级社为基础这条方针定了, 会议开得很顺利。 ‘, 这就向人们道出了自 1955 年夏季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所谓「右倾」以来, 「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悬在全党干部头上的一把利剑: 时刻担心它会落在自己的脑壳上。因此, 「宁左勿右」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一种怪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何会一哄而起; 共产风竟无人敢于站出来抵制; 就在毛泽东提出要「压缩空气」以来, 想纠正一些错误做法也阻力重重。其根据皆出于此。

尽管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放到生产队 (原高级社), 已基本得到统一 · 但农村问题还远没有完全解决。毛泽东从郑州一路南下, 先后在武昌、长沙停留, 了解郑州会议精神贯彻的情况。20 日到达江西南昌! 召集中共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进行座谈 · 毛泽东向他们谈了部分小队所有制、小集体向大集体过渡、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等问题。这表明, 毛泽东还在继续调查和思考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 他所以督促各省抓紧时间召开六级干部大会, 原因之一是准备 3 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进一步讨论并做出决定。

“中共河南省委转发的洛阳地委 1959 年 3 月 18 日 21 时给各市委、县委并报中央，毛泽东的报告。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 137。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403

2 钢铁生产月月欠账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将北戴河提出 1959 年钢产量三千万吨的指标降低为一千八百万吨左右。《人民日报》1959 年的元旦社论称：「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主要指标而安排的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将是一个伟大的跃进计划，同时又是一个建筑在客观可能性基础上的可靠的计划。」⁸⁴ 但据新华社《内参》报道，从 1959 年 1 月开始，钢铁生产的指标，月月都没有完成计划。记者报道说：

开年以来，全国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1 月份全国产钢七十七万吨，仅为去年 12 月份产量的 47.4%；产铁一百四十二万吨，为去年 12 月份的 51.5%；产钢材五十二万吨，为去年 12 月份的 83.9%。按照今年第一季度钢铁生产计划的要求，全季平均每天应该生产钢三万三千吨，铁五万七千吨，钢材二万二千吨；而实际上 1 月份每天只生产钢二万五千吨，铁四万六千吨，钢材一万七千吨，比计划欠了很多。”

对钢铁生产未能按月完成计划：冶金工业部党组认为：一是，各省、区生铁调运没有按计划进行，严重影响到钢和钢材产量。二是，煤和焦炭供应不足，各地小高炉开炉情况很不好。如浙江省开工生产的小高炉尚不到全部高炉的四分之一江苏省不到三分之一河北省、安徽省不到五分之二「有些地方小高炉不得不根据焦炭的供应量来制订生铁产量。三是，提高质量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四是，生产准备工作抓得晚了。去年年末保证「1959 年的计划完成」把主要的和辅助的原材料吃光了，1 月份缺乏后备，形成「寅吃卯粮」的局面。生产设备由于去年突击生产，应该检修的也未来得及检修。可见，除

84 一〈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人民日报社论「1959 年 1 月 1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页 6，

”（当前全。一数产为甚庆没有完成计划？），《内部，考》·：959年：月21。·

4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实春（1958—1961）—鸟托邦运动

指标不切实际以外，主要原因是：1958年放「卫星」，拼设备。竭泽而渔式地蛮干，致使1958年生产的各个环节难以正常运转”与完成年度生产计划直接有关的基本建设进度，也不如人意。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要求在一季度内竣工投入生产的工程，很多都不能如期完成。如：冶金工业方面，截至3月中旬，要求在一季度投入生产的255立方米以上的高炉六座，只完成两座；三吨以上的转炉十二座，只完成一座；日轧钢机261套，只完成十六套；红旗二号简易焦炉3300座，只建成二十四座，投入生产三座。”

有关！大建设项目设备成套生产和供应存在严重脱节的问题，1958年底就基本暴露了出来。195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和各省市区党委发出通知，中央派出六个小组，的于1月5日左右到达各地，进行设备成套的重点检查。检查的范围以冶金设备（炼铁、炼钢和轧钢）发电设备的成套生产和供应为中心，同时也检查其它行业重点单位的配套工作。1月4日，国家建委开会，陈云向参与检查组的人员讲话，他首先谈到】当前为甚么要抓成套？第一个五年计划设备都靠国外进口：现在基建规模如此扩大，主机要由国内解决。1958年只注意了主角，对配角注意不够，愈砍愈不成套。1958年体制下放】分级管理，旧的协作关系打破了，新的协作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如大连机车厂，机架原由上海供给，现改由冶金部门供应，为别人打杂·地方不干了。此外配角都想升格当主角，也造成混乱。长春汽车厂的配套设备无人负责。陈云提出，设备没有成套的问题，要从生产厂矿和基建单位两方面检查。东北、华东着重生产，

显（一季度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得不好），《内部参考》，1959年4月7日·87六个小组的负责人是：东北组组长：国家经委副主任王新三·水电部副部长李说，以辽宁（沈. ）、黑龙江（哈，滨）为重点；华东组组长，国家烟委副主任谷牧·副组长‘一织部副部长汪这涌：以上海为重点；华北组组长，冶金部副部长高场，以太原、包烦

1 包钢)为重点;中南组组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以武汉为重点;西南组组长,一机部到部畏黎玉.以贵州(贵阳)为1点;西北组组长,■家建,副主任伤作材.以间州为,点.各协作区办公应主任为各组副组长.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义」及其底线

西北、西南着重基建。下去调查二十天,找出典型和问题,回来再开会和解决问题。88

1月17日晚8时,陈云主持召开各检查组的电话汇报会。谷牧首先汇报上海的情况,指出存在三大矛盾‘一是供需矛盾,即能力与材料供应不足的矛盾;二是自己需要与供应外地的矛盾,包括保证重点与照顾一般的矛盾二三是新老任务的矛盾。要完成去年积累下来的配套任务,势必影飧今年的计划.目前。上海市场,五金、交电材料90%以上品种脱销。王新三汇报东北冶金和发电设备配套情况,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协作关系应迅速定下来;二是制止不正常的以货易货;三是强化产品质量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各组汇报内容大体相同。1月下旬,各检查组回到北京,连同北京的检查组!由陈云主持进行汇报、讨论。3月初,建委召开全国基建会议,讨论设备成套问题。随后,建委党组向中央作了「关于设备成套问题的检查总结报告」。3月20日,中央转发了建委党组的报告,并作批示说:

工矿金业的建设必须根据今年大跃进的特点,按重重急急排队的次序.保证按期建成并投入生产,以满足生产大跃进对它们的要求。为此,必须使成奔设备的制造、供应和安装之间的安排,紧密结合,一一落实。由建委领导,经委、计委、一机部、商业部和有开工交各部人员参加,成立设备成套办介室.务必在5月以前做出显著成绩。

在此之前】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在2月24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冶金、机械、煤炭三部生产情况和计划安排的汇报提纲,反映了钢材、设备分配不足的情况.建议中央召开第一书记电话会议并由负责同志挂帅,下去督战。中共中央3月9日批转了薄一波的报告,指出:今后工业生产发生的问题和须要采取的措施,责成国家经委负责解决。韶李锐; (r大口进」亲历记》.下册,页410—4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专1"58—1961)一鸟托年运动

由于洗煤、炼焦·矿山设备，电力设备和运输设备等薄弱环节非短期所能解决，计划仍然难以完成。据 1959 年 5 月 4 日《内参》报道：4 月份，全国顶计产铁一百六十五万吨，完成月计划 82%；钢九十三万吨，完成月计划 74%；钢材六十四万吨，完成月计划 75%·平均日产量都没有达到计划的要求。！到 4 月份累计产铁六百零七万吨，钢四百三十六万吨，钢材二百二十八万吨·同样，因原材料的短缺，城乡日用工业品市场也出现紧张局面。广东省】从 1959 年 2 月以来，全省大、中、小城镇普遍出现日用工业品脱销、半脱销的品种日渐增多。广州市脱销，半脱销的产品共达二千二百多种；汕头市脱销、半脱销的品种有七千多种。合，

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有关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等问题，3 月 25 日至 4 月 5 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3 七中全会决定降低指标

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专门在原法国俱乐部对面，以十五天时间的「跃进」速度盖了一座能容纳一二百人的小礼堂。对会议期间的的生活，亲临其境的李锐说：上海主人殷勤招待，集中川粤扬鲁四大菜系名厨，每餐都由客人自由点菜。·一这种同当时社会供应形成鲜明对照的生活，曾引起黄克诚的批评。”

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俗称：上海会议）；4 月 2 日到 5 日召开八届七中全会。3 月 25 日，毛泽东讲话；26 日，听取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报告；28 日，李先念作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 3 月 28 日到 4 月 1 日，会议主要讨论了 1959 年的计划指标、第一季度工业 89〈广东研究和解决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问题〉，《内部参考》·1”9 年 5 月 4 日。如李锐：《「大跃地」亲历记》，下册、页 445，第六章毛泽东「压绘空气」及其底线

叨 7

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财贸工作等问题。4 月 2 日到 4 日，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5 日，七中全会通过有关决定·会前和会议期间，毛泽东先后接到安徽、山西、山东、湖北等省有关贯彻郑州会

议召开的各级干部会议的报告·其中对「算账」、「怕变」等问题都有反映。关于「算账」，山西的报告中说‘

运城县五级干部会议在解决思想问题的过程中，宣布了将过去一个时期合社一级和用原禹级合作社的现金收入六十四万元全部退还给原高级合作社。许多社员总到了情不自禁地高兴得跳了起来·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讨论的情况沥明，主席提出的旧账不算、要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群众的一个迫切要求。”

湖北省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则谈到：

几天来，麻城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解决好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的重要性】它关系 f. 1 党的政果能否一立贯彻到群众中去，而算清生产队的账，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此说·算账是政治 r. 1 题、政策问题、立场问题，一定要算，算到底·打开算账的盖子，关键在铃深入开展思想动员，防止任何简单粗暴行为。要秣取「两头挤」的办法，一方面加挨对生产队铃却的教育，动员他们交代问题；另一方面要姿动小队长·依方他们帮助队铃部弄清账目。总之·要靠思想教育、靠群众、拿算账·二者结合，才能弄食问题。

毛泽东阅后，在 3 月 30 日、4 月 3 日先后写有批示，明确改变了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说法》毛写道：

91 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纪陶鲁茄·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大 t 情况给毛潭东的报告(1959 年，月 29 日，·载《建，以来毛潭东文稿》·第八研、页 1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胄春(1958—1961)一鸟托年运动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卹州讲话农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十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计群众不能解忽气。计干部·他们将被我们纹摔。有百害而与一利。一个合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甚庆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 P 不要「答财鸡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各肘，妻偿占有别人劳动乏不许可的。’才又指出：

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校出身来，一身清静；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圣奋介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画警，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3

毛还具，指出要算清两方面的账：一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以纠正「共产风」；二是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算清同社员群众的账，解决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毛指出，后者「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并认为，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关于「怕变」的问题，山东济宁地区五级干部会议的反映是：

92 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旧账一般要算等问题的批注〉（1959年3月30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172—173。

93 毛泽东，《介绍廂城的经跋》（1959年4月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话，。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409

有人说「共产党和孙悟空一样，多变」，怕变的原因在于：一办初级社不到两年，生产刚有劲了，就转高级社；高级社不到两年，就转公社。希望将公社制度和各项政策用法律固定下来。二、国家统购政策曾宣布三年不变，实际上年年变；每年夏收前说不变，秋后就变了，希望上面定任务时估计足一点，定下来就不要再变。“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批示说：

（一）不得群众同意不变；（二）变的时候，一定要以有利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人吃亏为原则；（三）以公社级大发展和穷队大发展为凭据，这是从不使富队吃亏反而有好处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具体措施：（齐）光变乡，徒变区。三、五、七年之复，群众要变的话，先变到乡。何时到区不能定，现在设想，大概要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徒，才有可能变。因此，不要怕。’，

中央政治局将扩大会议讨论形成的上海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提交七中全会通过。在分组讨论中，对所有制结构，意见与文件基本一致三但在分配问题上，主要是供给制和公共食

941959年3月28日山东省委，记谭取龙给第一，记舒同和谭震林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150—181·

另毛潭东：〈关于改变集体所有制体制的残条原则〉（1959年3月31日），载《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八册·页180·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安徽省委桐城县委的报告上·作有〈关于社会主义集，所有制过读问题的批注〉，至少在二十年内，不是由社t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五年至十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问题，而是只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所有制·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情况表示确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时候·才可再考虑实行过读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盐所有制·过渡的时候，一定要使每一个小集体都不吃亏，而且都感到比较不过波对于每一个小集·每一个人都更为有利些·要是出于各个小集体和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否则谈不到这种过渡·不管还读到乡或区的大集，，目前生产队这种小集，总还是一级核算单位·《达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八册，页1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系运动

堂问题上，则有不同—主张减少供给部分：加大按劳分配部分；不主张办全年和全民的公共食堂。4月5日，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这「十三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后经修改，把原稿中的一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4月20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下达。

会议纪要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在写明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同时，把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指明「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对「旧账」的清算和处理，具体定了八条原则。关于收益分配，规定在扣除各种提留和上交部分以后，直接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应占总收

人的 50%左右到恤%左右。但对公社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仍旧作了肯定】强调：「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符合于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要求，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因此必须坚持下去，」具体做法，可根据各自情况，分别实行 r 伙食供给制（包括油盐蔬菜等）或者粮食供给制（不包括油盐蔬菜等）」·少数生产水平低、收入少的公社，可「实行粮食半供给制」，即一部分口粮为供给制·另一部分口粮的代价在工资中扣除。适样，公共食堂也就在必须坚持之列，只是规定食堂可以在口粮依人定量的基础上，实行饭票制度·社员节余的粮票，可以从食堂换出粮食或者现金，归自己所有。”

关于 19 卯年计划指标的讨论，由邓小平主待。

对八届六中全会订的各项计划指标，是否应作进一步调整，党内的认识很不一致。不少人从维护「三面红旗」出发·坚持原有指标。在上海会议上，西南的李井泉表示 1 如果其它省完不成粮食指标，四 J11 可以再分担一些，无非是多增产红薯，允许一斤红薯顶一斤粮（当时国家规定，四斤红薯顶一斤粮）；华东的柯庆施则表示】如果别的省完不成钢指标，上海可以再分担些。这就使其它

96〈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还（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纪要）》，载《建国以来重要文戏编》：第十二册，页 162 一化 I·

第六章毛泽东『压编空气』及其底线

一些地方党委领导人，明知指标难以完成，却处在一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为便于统一思想，毛泽东让大家先阅读薄一波将要在会上作的《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报告》，3 月 26 日下午，薄一波在会上发言，当薄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泽东插话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2 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甚庆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 r 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庆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干甚么（指基建项目）？削它五百项，如果不够，再削，削六百项，周恩来

插话：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毛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周锐：追句话就是决心。邓小平插话，一千多个项目，一季度只有二十多个投入生产。毛接着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3月28日，李先念作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随后讲了降低指标问题。他说：

「现在提出一个计划问题·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寡基础上，中央、地方都觉得有些问题，主要是肩膀上的担子重得很·感到为难。讲出来好·应做实事求是解决。总的情况就是原材料不足，又主要是钢材不足。武昌会议是按钢材1‘。0万吨（加100万吨进口》来订的计划，王鹤毒讲·即使搞到2000万吨钢，钢材不会超通1200万吨·加进口九千五万颇，不到1300万颇·问题摆得很明白·即使是1500万颇钢材·也不可能完成，所以存在危险。大家一效赞成这样斗个办法，把计邳定在确实可靠的羞基础

9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显》，下卷，页83；李锐：(r大。进」亲历记》下册。页4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 11958 — 1, 61) — 为托年运动

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杨一点。想把我们的计划放在一千一百万吨钢材的莽基础上，包一十八首万吨（钢）。保重点，冶金部十八个全业·是一千二首万颇，赵尔陆的金业是一育万吨，吕正操的金业是四十万吨。不下这样一个决心，计划有危险·J’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同意邓的意见。4月4日下午，全会开大会。李富春发育，决定把原来2仅刃万吨钢的计划，调到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原来安排360亿元，调到260至280亿元；基建项目原安排1500个，现削减500个】剩下1仅刃个。刘少奇说：1650万吨，还有很多问题，如煤、矿，专用线、调运，需要很多措施。武昌会议定的2000万吨是比较难达到的，要努力争取1800万吨。

4月7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发表公报。公布了全会决定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公报称，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

个草案是根据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钢产 t1800 万吨、煤产 t 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产 t 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产 t 一亿担这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的情况而编制的。这个计划草案的编制，对于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和人民群众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都作了认真的考虑。这是一个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

4 对 1958 年「大冒」的交代

毛泽东在 1958 年初批「反冒进」时就说过：「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还要厉害。」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确实是「大冒」了一下，于是从当年“痹一波”《若干 t 大决策与事件的回腊》，下卷，页 530—831 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七中全会」公报〉1959 年 4 月 7 日，i 载《建. 以来 t 要文选选编》第十二册·页 183·

咖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58 年 1 月 18 日，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经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八届七中全会，无论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还是 1959 年的生产指标，不得不作节节后退。对这一年问的大起大落，人们思想上不可能没有很多疑团，总路线究竟对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否搞糟了？在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4 月 5 日上午，毛泽东在全会上作的长篇发言，就是要对这一年的大跃进进行总结，并回答人们的疑问。

毛从 9 时到 12 时，整整用了一个上午，一口气讲了十六个问题：多谋善断三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必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裏，不在多数人手裏；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个通讯员，等等。就内容而言，可分以下几个层面：

(1) 1958 年的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总路线是正确的。(2) 承认自己也「热过一阵子」·r 也有武断」

毛说：「北戴河会议时，指标定得太高。6、7、8、9月1我也热过一阵子。」又说：「我也有武断」。比如第二次郑州会议说：「一般不算旧账。」「还有公社若干问题决议？分级管理，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对此，毛解释说：「但是八月在北戴河开会，没有人提议在我那个地方召集个小会，讨论一下1959年的指标。那时我的主要精力是搞金门打炮，人民公社的问题不是主要的，那是谭老板（指谭震林—引者注）挂帅，我只写了一段。」至于六中全会关于公社问题的决议，毛说：是「别人写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我看了这个东西，我不懂，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公社好。至于内部情况，我不懂。你们写了，我觉得好」

这就是说，第一，北戴河会议定的高指标，当时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第二，人民公社一事，是谭震林搞的；第三，六中全会的决议，我也是同意了别人的意见。再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提出了正确意见，但是意见没有反映到我耳朵裏。他批评胡乔木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曾专（1958—1961）—鸟札年运动

去年式禹会议的合报·陈云同志提议四大指标走不走不写，被乔木顶回去了，没有反映，4月2日乔木才告诉我，认为大会通通了嘛！有两个观点不正确：第一，大家有时会错，而一两个人是正确的。宁常占少数，我也有时一个人孤立。第二，组织关系不正确，你乔木是个秘书，对朴利主席的建议不反映。起草宪法时，总理建议增加文化一练，给杭州打电话，乔木也顶了回去。没有报告。武昌会议是陈云一个人正确。但未反映到我耳朵裏。1月上旬也是陈云正确。

(3) 计划中的高指标，主要是计划部门及其负责人「少谋武断」、满打满算，不留余地造成的。毛提出要「多谋善断」

(4) 计划可以根据形势作升降，但反冒进是错误的。对1958年到1959年计划的再三变动，毛从理论上作了阐述，说「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波浪式前进」。但这与1956年的反冒进不同，批反冒进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懂得波浪式的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但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

同意按照形势改变计划。我所反对的是公开在群众中间，在报纸上反「冒进」

(5) 要善于观察形势，作出判断·定下决心。

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断，但断的不恰当，有点武断。要善于分析情况，抓紧时机，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毛再次批评不与他通气，对他进行「封锁」·说这次上海会议】3月25日要开会，要解决甚么问题，谁也不知道，中央委员、政治局主席也不知道，各省第一书记也不知道。为甚么不先通气？为甚么不把题目和简单意见通知人家？为甚么只顾自己梳洗打扮？我说了一万次了，大闹了一顿是南宁会议。又说：平时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开会才拿一大堆材料来，平时不下毛毛雨，到时就下倾盆大雨·他就是不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让你知道·开会前一天不知道，第二天狮骗。名曰主席、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是跑龙套而已·你们不解除封锁，我是不高兴的，我号召被封锁者起来造反，反对倾盆大雨。

(6) 权力要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在分析了问题都出在计划部门，对他封锁，搞倾盆大雨等等之后，毛强调权力要集中，他要挂帅。他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叫毛泽东，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挂副元帅·为副总司令，我们俩人一正一副，你是总书记嘛丰我向你们要求这个权力，要你们通过。中央常委七个人，书记处十二个人，十几个人集中领导。但要挂帅，没有元帅怎么行？我姓毛，毛遂自荐，我要挂帅，六亿六千万人，一千三百万党员，不挂帅不行。

又说：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要当秦始皇。(7) 不要怕鬼，要敢于「冒死上谏」

毛泽东讲要敢于向他反映意见，「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提倡要有「六不怕」的精神一杀头、开除党籍，撤职、留党察看、记大过、老婆离婚·他说：明朝有廷杖制，顶了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巍百人、千把人，至于推出午门析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讲，冒死上谏。我

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又说，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那海瑞那庆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时很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裹头，很透了，准备把他杀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

(8) 以井冈山以来的历史：说明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裏。毛说：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真理在他手裏，不在多数人手裏。并以马克思、列宁为例·然后说他在历史上被批判为 r 枪捍子主义 j. 认议论上是 r 狭汇经验论」，政治上是一贯 r 右倾机会主

4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1）—乌托年运动义 J、布哈林主义·这些打击，激发他对抗这些。有时他只有一票，决不屈服。

然后，毛算起了历史老账。

他批评彭德怀说：我这个人许多人恨的，特 B1I 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接看】毛一个个点名说：

我们这些老同志没有打过架的相当少，不打不相识。你打过来，我讨过去。我跟恩来打退亲没有 P 跟彩德怀打过架没有 P 跟朱德打过架没有 2 跟你（指刘少奇）也打通架·鱿是合作化问题·对朴洛甫的处 1 问题·翻你的案·也打过架。跟陈云我们打通架。跟林彪也打过亲，我们在闻西一路合作得很好，连义会议以复我采你们两位（一个林、一个彭）都分裂了，搞了一佃会理会议整你们。因为你们要把我们搞摔，要桥摔三个人，一个毛泽东一个朱德，一个周恩来·你们要来组织司令部·你们没有纪律·你们是错侯的，那得整。……蓄劲光我跟你打过仗没有才那个仗恐怕是我错的多·你正确的多。但走那佃时候你也有错睽，你一点错疾没有 2

刘伯禾同志我们两个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说是

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复·夜来你在军事学院大概妄想答复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那些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驳的·是驳不了的。那农头批评了刘伯承，批评了任弼时·没有指名字。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队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摔肆罐耀」·军事上不行。还有已经死了的饥丰同志，那时他是博古派· · · 一至终跟东格同志·蓄克同· · 忽，还有陈伯钧，还有邻化若同志·我们几个人是压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逗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众复·去年叔复乏闲

第六章毛泽东「廖编空气」及其底线

军委扩大会议·斋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悞·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 T。

毛在历数了众人之后说，我得罪了你们，全体不投票，一个也没有，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董必武、朱总司令，你们都不投我的票那也好·我无非是拉倒。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那就拉倒。

对毛泽东这篇讲话，史家有不同的评论。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认为，毛讲的这十几个问题，「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 w11」。101

‘李锐认为：毛「如此疾盲厉色，说古道今」冲天怨气，无穷感慨，来回顾『大跃进』一年多来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是谁也没有精神准备的 j·「关于钢铁等高指标问题，到上海会议时大家都有了一定的觉醒，毛泽东也感到要下楼来，他的这篇讲话可说是一张楼梯」。李锐谈到他与田家英、胡乔木当时的共同感受时说：「毛提起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我们共同感到，一年多来，乱子闹得太多太集中，毛也感到自己有责任，却又不愿意直接痛快承当起来（他有一种不能下『罪己诏』的情结）。因此，通篇讲话很是情绪化，谈到历史教训，反复举了那么多人那么多的例子，都曾经反对过他的· · · · 一以此证明·他是一贯正确的，反对过他的人都是不正确的。于是强调挂帅、主帅副帅的问题。证之三个月后的庐山会议，上海会议这一长篇讲话简直是可怕的伏笔。」侃

尽管看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是毛泽东对 1958 年的总结和交待。

101（毛泽东传 t1949 — 1976））• T 册 • 页 939 •

1 般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页 471 • 472、473 — 47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卅春（1958 — 19’ D—鸟托并运动
四二届全国人大和钢铁指标再调整

1 全国人大二届一次 t 议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讨论和这过的几项重要决定，为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4 月 18 日至 28 日，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全国人大代表 1148 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幕。周恩来总理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作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作关于 1958 年国家决算和 1959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与会代表本若「在各个战线努力实现新的大跃进」的精神，讨论通过了各项报告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提交大会的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大会认为：19 铃年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实现这一计划不仅是必要的，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也是可能的 • 代表们强烈这责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背叛祖国、破壞统一的武装叛乱。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关于撤销司法部、监察部的决议」 J。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了新一届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

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探、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利瓦伊汉、陈叔通、达赖喇

103 计划草案规定：1959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2870 亿元 • 比 1958 年增长旬岛 • 其中 • 工业和手工业产仅为 1”0 亿元 • 比 1958 年增长 4[吗、农业总产值为 1220 亿元 • 比 1958 年增畏 39 ‘ • 钢 1 吕 00 万吨，煤 38(x 恤万吨 • 担 t10500 伟斤，棉花 1 伟坛 •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刀 0 亿元 • 出 1958 年增长 26 俗 • 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 1092 个 • 李富

春：〈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9年4月21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页242—247。

第六章毛泽东「廖绶空气」及其底线

嘛·丹增嘉措、赛福鼎·艾则孜、程潜、班挥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何香凝、刘伯承、林枫为副委员长。

谢觉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根据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大会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勋为国务院副总理。

根据刘少奇的提名，任命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继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努力实现新的大跃进，开展全民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用新的辉煌成就迎接伟大的国庆十周年，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关于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一事，是经过很长时间酝酿，多方面做了工作，才定下来的。

1956年夏，在北戴河讨论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期间，毛泽东在一次几十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过这个意见。后来毛说：「此事（指不再当下一届国家主席——引者注），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⁰⁴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

104 《关于不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410。

4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0年“大跃进”运动）

他们几年连任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10月22日，陈叔通、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表示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毛于5月5日在批示中，除对陈、黄所述理由作了解释外，对他们提出在宪法中增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的意见，明确表示赞同，他批道，「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大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

106

毛在批语中还说：「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他请刘少奇召集一次有一百多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指出：

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107

1 邱《毛泽东传（1949—1960年）》，上册·页672—673

106 《关于不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批语》（1957年5月，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410。

1 叮（建国以来，要文选编）·第十一册，页647，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认为，这个关于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定，同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一样，具有废除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意义。勿说：「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及时实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波，是有很深远的战略考虑的，他那时的设想是我们党的一份珍贵的政治文明的遗产。」「当然，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这些好的设想没有很好实现。」¹⁰⁸就在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同时，中共党内对由何人作国家主席候选人也开始酝酿，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无疑是考虑的人选之一。1958年12月29日，朱德给总书记邓小平写信提议刘少奇为候选人。朱在信中说：

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朴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一致赞同的。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朴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甚么做甚么。祈无顾应。¹⁰⁹

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建议。在1959年4月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以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提议的国家主席候选人。4月5日，邓小平向全会所作的《两个问题的说明（要点）——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中说：

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做，如朱德同志，如常内几位老同志，都可以做，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以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试务，比

1 叩与育之：（毛泽东与'k大煎章的两个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 阆4年第2期，页5。

1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朱德传）口七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兽出版社：1993），页686—铭7。

4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口春（1955—1961）—鸟托年运动

较更为适当些。国家主席不早是一个很高的荣参职务，而是有一冬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少奇同志的能力和青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而兼任国家主席职

务，是比较好的。‘10

事

4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就国家机构领导人候还人的提名方案，欢求各界人士的意见。毛对国家主席侯选人向大家作解释说：

为甚庆国家主席候选人是，1J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未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1J少奇同志也是很有成望的。为甚废是这个·不是那个才因为我们共产党主待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只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乏谁呢P是少奇同志。我一雕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t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未德同志极力谁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通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贝长政任国家刻主席·还有董给武同志担任刷主席·一正两别。111

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闭幕后，4月加日，刘少奇等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会见各国驻华使节。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

110 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报告（1959年4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倘1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8），页8订·111毛泽东在最高国务t织第十六次会织上的讲话记录《I”9年。月15日），载《毛泽东传11舛9—19?6》，下册·页”2—943·

第六章毛泽东「屡绘空气」及其底线

北京高校师生认为：「少奇同志是在畏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我们革命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我们非常热爱他·」[t必武同志是党内的元老，德高望重，作副主席也很合适·周总理是个全才，工作作的很出色，继续担任总理很好。」r宋庆龄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威望，对民主革命有较大的贡献，一直靠近党，当选副主席也很合适。J’，广州市的泰国归侨鳃为：「宋庆龄在海外侨胞中有很大的影响，她当

副主席对争取台湾爱国人士和加强统战工作，都有很大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归侨认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是孙中山的崇拜者，她当选副主席】对团结民族主义国家有作用。」广州市高校师生认为：宋庆龄当选副主席，『可以进一步加强国家团结」；「可以更好地做国外的统战工作」；「有利于和平解放台湾」二川

美联社报道说：共产党中国新任主席刘少奇是一个「经常被称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是一个杰出的组缴者。」1t' 美国官员们认为：「刘现在在政治局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这两个权力很大的职位之外又担任了主席，这使他有了很有利的条件继承毛的地位。j' ”

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鳃为：「刘是中国政权的『二号人物』。」「提升他的目的，是要使他更好地为中国群单所了解，因为中国人到目前为止只知道毛是政权和国家唯一的一几乎是神圣的一象征。」‘、112〈北京高等学校师生对刘少奇同志等当边为新的国家领导人的反应〉，《内部参考》·1959年5月1日·

1 砖〈广州市人民对宋庆龄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议论很多〉·《内部参考》· t959年 s月1日·

114〈美联社说刘少奇主席既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内部参考》·1959年4月29日·

115〈美官员承绍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国家领导人合作待很好〉】《内部参考》，1, 59年4月29日·

116c 法新社造翻脱由于传统关系宋庆针才未当选为一家主席），《内部参考》，1959年4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丛实专（19 铭一 1961）—乌托邦运动

当然，西方世界也有另一种说法，如美国新闻处以「帷幕的背为题发表评论说：

4se' 20 变 4 添他

刘的新职务一接替毛出任中国共产党政府「主席」或总缺计一一使他比他的主要竞争者周恩来总理高过了一头。但是，值管刘有这个冠见堂皇的头街，他像周一样·饰然不通是毛的主要助手之一因为·毛再疑依旧是共产党中国的第一号人物·而且在他放弃他作为共产党首

脑的权力和威望以前·他将继续占据这个地位。接替他的领导权的人才是当毛最终辞职或者让位的时候统治共产党中国的人。目前，刘看来将是聂可能的候选人。北平电台正式把他看成是一位「仅次于毛泽东的领袖」。但是在共产党特权集团中，得宠的人变换不定，今天的第二号人物，到明天很可能成为我人受过的人。’ ”

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反应，都说明东国这个东方大国？在国际上已不可再被忽视。

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与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同时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 1 周恩来为主席；彭真、李济探、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利瓦伊汉、李四光、陈叔通、陈嘉庚、包尔汉、陈毅、康生、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席；徐冰为秘书长，王从吾等一百四十三人为常务委员。

2 关于农村政策的〈党内通信〉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以后，各地为落实《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各项政策，分别召开公社代表大会。通过算清经济账和作风账、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确保夏季丰收，

117 〈美新处巧纵我。领袖正在进行「衣钵斗争」〉 1 《内部参考》，乱” 9 年 4 月 29 日·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但是，退钱、退物是个困难的过程 1 阻力主要来自公社一级，因为「共产风」主要是实行公社所有制，「共」了各生产队的「产」许多公社党委书记，虽然在口头上承认「一平二调三收款」是错误的，但要退款则没有现钱。真实情况是，有的公社确实把钱花光了，但大部分是舍不得把钱拿出来·退物也是一样，把好的留下，坏的退给生产队。在中央和省的一再督促下，退赔工作才有了进展。湖北省麻城县召开万人退赔大会·县、公社当场宣布，拿出现金 320 万元，以及大量农具、牲畜、家畜等，分别退还给生产队。

在算账退赔过程中，暴露出大量的公社、生产队、甚至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的问题。如：麻城县宋埠公社一百一十六个生产队干部贪污挪用 66116 元，平均每人 5v0’ 元；白杲城关公社五百四十九个干部，共贪污 87451 元，人均 159 元；三合公社一个生产队的会计，

贪污 816 元。又如：何南省一百二十万农村基层干部在算账退赔中，批评改正的有四十多万人，开除、处罚了三千六百人，受刑事处罚的七百二十人。

河北省翁县后奕、堂二里两公社召开党代表大会，代表们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和贪污行为进行了揭发。许多老年代表说：「1958 年少收了粮食，主要是干部的主观主义闹的。」农业生产这门活计，复杂得很，土地千差万别，但在去年的生产领导中，包括今年的春耕春种在内，不管你这地怎么样，都得按照一套法码办事。去年非要我们把已经种上的豆子，谷子拔了种山芋，你不照看办还不行。后奕公社罗家营代表揭发党支部书记，用以多报少，隐瞒产量等办法，先后六次贪污一千五百多元。生产队长罗增为了报假条贪污，一人刻了四个假戳，贪污的钱随意挥霍浪费，并贿请到该村工作的干部。代表们说：「群众想念党，知道这些人是兔子尾巴——一长不了，要不，群众早反了。」户「118〈公社干部代表们对领导上提出的批评〉、《内部参考》·1959 年 5 月 1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18 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通过算账对公社进行整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得到 7' 明显的改善 5 月 3 日，中共湖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

0 腐败 U 侈必亡 禹烂 4 榆于

麻城县万人大会以援，以生产队为单位·放手发动群众，边算账·边兑现·全面地彻底地贯彻政策·进一步整风、巩固人民公社。算账兑现·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整个农村形势根本好转。政策兑现，干部转变作风也开始兑现·……出现了一个扎扎实实的生产新高潮。‘”

就在这时，各地春荒缺粮的情况纷纷反映到中央·

4 月 6 日，国务院秘书厅就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并总理、副总理做了报告。

4 月 7 日，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武思平，向内务部部务办公会议汇报了该省当前春荒情况和制止春荒发展的措施说：今年山东春荒很严重，波及八个专区的四十二个县（市），1400 万人。济宁专区最重，十七个县（市）1053 万人中：就有十六个县（市）787 万人发生春荒；

聊城专区十五个县（市）中，有九个县（市）545万人发生春荒。截至3月底统计，全省共外流、逃荒的农民六十八万人（实际超过此数），仅济宁专区就达三十二万人。济宁专区有七个县患浮肿病的达十二万九千多人，金乡县因浮肿病已死亡111人。济宁专区的三万七千多处食堂，因缺粮·缺柴停伙最多时达一万六千多处。济宁专区十个县，从1959年1月以来】共发生非正常死亡四百三十三起。该区的鄆城、金乡、巨野等县均发生抢粮事件；郭城县自春节以来，发生抢种九十六起，被抢粮食十一万八千多斤，其中国库粮九万多斤。牲畜大批死亡，金乡县五万头牲口，1958年秋至今已死二

119中共湖北省委骗于麻城县发动群众开展算账兑现运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59年5月斗日），载《护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丹·页豁之·

第六幸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万五千头；单县死了八万头·占全县总数的3%以上。现省的党政领导已深入农村，积极采取措施】安排群众生活。’功

4月9日，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又上报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内务部《救灾工作简报》称：广东省春荒已涉及粤东、江门、汕头、韶关、佛山等五个专区和海南行政区的二十五个县。据统计，在夏收前每人每月安排粮食不足十五斤的有639万多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19%。从3月到4月底累计，全省患肿病的有58421人，其中湛江专区为34859人斗吃木薯中毒死亡的/文十二人；与粮食有关而死的409人（其中自杀的38人）；无粮食吃而上山挖野生植物的有167人；逃荒的有10377人（其中逃往港澳的有1220人）；发生抢粮事件二十起，参加人数1260人；因粮食问题而请愿、闹事、罢工、械斗的有二十一一起，参加人数啊刀0人。在省级机关采取一些措施后，大部地区春荒情况已有缓和，但个别地区还相当严重，且有发展趋势。如江门专区4月底统计患浮肿病的有5852人，到5月8日发展到一万一千多人；韶关专区的英德县现在患肿病的有一万多人·比4月底增加了十倍。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有少数地区出现严重情况：玉林专区的博白、玉林、贵县有水肿病人8108人，已死亡六人。博白县鸦山公社桂花大队4月15日前患肿病的有三十四人，4月29日增加到

140人。百色专区田林县旧州公社平林大队，因吃代食品过多，引起非正常死亡，从元月到4月13日已有三十六人。南宁专区的个别公社，也发生了抢柜、斗殴事件。’ 21

毛泽东在看了国务院秘书厅的报告、中央救灾委员会的统计表以后，于4月17日将文件批给周恩来总理。建议将这两个文件「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甲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j。并嘱咐周说：「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的代表谈一次（着重五120(1JJ东省春荒严重）•（内部参考），1959年4月11日。

121内务部《救灾工作简报》编：《广东、广西春荒严，》，《内部参考》19日•

1959年5月

42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1卷（1，锦一1,61）一鸟托萍运动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毛还为这两个文件加了一个使人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224月26日，毛泽东在内务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要求省市自治区煎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鉴于粮食问题的严重，为在整社的同时，安排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毛泽东在4月29日直接给省、地、县、公社、生产队和小队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谈了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六个问题。批评了1958年的浮夸风，「吹牛而已」。强调今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j。密植，不是「愈密愈好」，要适度。「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故而，F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j•针对1958年提出「放开肚皮吃饭」的错误口号，强调节约粮食「要十分抓紧」•提出了「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的要求。并告诫说：「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改变了原来土地实行休耕的设想】指出，r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一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

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一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了。总结 1958 年出现的浮夸风说：「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裏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12'}

1 瓷毛泽东：〈关于解决誉荒缺柜问题的批语〉东文痛》，第八册，页 2D9.

1 七毛泽东：〈关于妥善安排渡过春荒的批语〉束文情》，第八册，页 226,

1, 毛泽东：〈写内通信〉(1959 年 4 月如日】页刀 5 一乃 7 ·

11959 年 4 月 17 日》，载〈建盐以来毛泽

叮 1959 年 4 月 26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搞〉！第八册

第六章毛泽东「压档空气」及其底线

毛泽东这六点指示传达下去以后，基层干部反映非常强烈，认为：六个问题非常扎实，非常切合群单要求】今后的工作更好做了。广东省揭阳县安乐公社安乐大队的总支书记，聪了传达之后，兴奋得拍看大腿说：「今后就敢说老实话了。不然，说话总是要咬看自己的舌头。」榕城公社社长陈长耀说：「过去有许多事情明知不好，就是不敢讲出来。」澄海公社党委书记林朝廷说：「去年他到外地参观以后，觉得产量只有五六百斤，多的也不过七八百斤，但是报纸却报得才良高；又说，要吃三餐干饭，自己觉得不好：又不敢说，只好用 r 一个党员的党内反映的名义」，写信给陶铸同志，提出了产量浮夸和不能吃三餐干饭的问题。巍个月来，他一直不敢说出这件事，直到这次听了传达才敢说。」浙江省桐庐县新登公社青何生产队的队长卞竺生，原是省一届人大代表，1958 年因反对县委提出的「放开肚皮吃饭：不计定量」的口号；反对县裏和乡裏提出办人多的大食堂日反对过分密植；抵制县、乡叫普遍移秧并田等错误做法，被批为「右倾保守」。卞在听了传达后，以一个「普通农民」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说：r 我是一个普通农民：自学习了您给五级干部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的指示以后，心裏感到非常愉快。无论干活和做工作，都觉得一点也不吃力

了。」‘认

为使毛泽东的六点意见迅速落到实处，中共中央于5月7日发出《关于农业生产的五条紧急指示》。126 同日，中共中央又就分配私人自留地问题发出指示：自买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并提出：「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12’6月11日，中共中央对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
125（一个「普通农民」给毛主席的信）·《内部参考》，1959年6月28日·126《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1959年5月7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十二册·页292—293，1”〈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19”年5月7日）·载《建。以来，要文选编》·第十二册，页2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专（19 铭—1,61）—鸟托年运动
留地等四个问题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将中央的规定，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实行，取信于民」。同时指出 ‘
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和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
发展，也有利朴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和有，实际是保护社员
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甚么「发展资本主义」。
· · · 一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合的简单办法，
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128

继所有制确定以生产队为基础以后，又规定分给农民自留地，允许私养家禽、家畜，这就在保持人民公社的架构下，相当程度地恢复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策。

从5月下旬开始】从南到北将渐次进入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为使整社工作不影响农业生产，中共中央在5月25日指示各省、市、自治区需委：「从现在起，集中全力搞好农业生产」·还没有召开代表大会进行算账的公社，可以等到秋收后或其它农事间隙时间，再来清理1958年的账目，开代表大会改选干部。并向农民解释清楚，「账一定要算清，只是暂时停一下，以免影响当前生产」J0129

3 陈云受命落实钢铁指标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以后，李富春和薄一波按毛泽东在会上的批评，于4月15日，就钢铁生产问题向毛泽东报告并作自我批评说：

主席在七中全会上对我们的指示和批评·我们还在进一步思索和检查。我们的心情是沉重中包含着愉快。沉重者是工作没有做

128 《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1959年6月11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页382—384·

129 〈中共中央对算账和召开社代表大会等问题的指示〉1959年5月25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页351—353·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好，愉快者是思想比较开动了·这半年来·特别是式·会议以后，表们的脑子有些开了，总挂好的一面想·在许多问题上摸得不准，材料掌握不确·抓得不狠·少谋无术·以致在计划工作中犯主观片面的错误。‘3D

随后，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组织人员，与国家统计局一道，核实1958年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际完成情况。结果发现：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00万吨；铁产量为1369万吨，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小高炉炼出的土铁。煤产量为3.7亿吨，也包括一部分小煤窑的产量。粮食减产，因农地上山炼钢铁，影响收割，实际收成也没有达到预期斤。棉花产量为3938万担，也是丰产不丰收。根据这个情况。贾拓夫向计委党组提交的报告指出，严重的比例失调问题主要是钢的指标订得过高，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1959年钢产量计划是完不成的，大体可以按1200至1250万吨比较切合实际·

·陈云看到这份报告以后，十分重视。同一时间，周恩来找国家计委计划局局长廖季立谈1958年钢产量核实情况1廖如t提出上海会议钢产量指标难以完成，周恩来深感不安·毛泽东听到有关方面的反映后，也对1959年的指标放心不下。

上海会议拟定的1959年第二季度钢材分配方案是250万吨，由于生产上不去，只有205万吨可供分配，缺口近五十万吨。原定的第二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也将因此延缓·由于计划的不确

定性，导致企业单位生产秩序混乱，人们反映说，这个时期的生产是「长江后浪压前浪，做做停停做做停」

由于工业生产全力保钢，日用工业品和副食品供应的紧张情况也已突显。辽宁、山东、山西，内蒙、吉林、广州等省区的商业厅局反映，5月份出现了抢购针棉缴品的现象。5月下旬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召开的省市自治区联社主任会议反映，各地日用小产品（包括一些名牌产品）和工艺美术品停产、减产的情况相当严重，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上海市的副食品供应不足的情况，1958年下半年就已出现。1959年春节以后，更趋紧张。从1月到4月副食品供应量与1958年同期相比，猪减少35.92%，牛减少44.4%，家禽减少75.19%，鲜蛋减少79.7%，水产减少1.89%。目前，市民每月供应六两猪肉的标准也难以维持。食用植物油的供应，更是四处告急（出口、城镇、农村、工业用油），国家无法面面照顾，大有顾此失彼之势。131针对上述情况，中央书记处在4月29日和30日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尤其是钢铁指标问题。会议决定，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模清楚实际情况，对生产做出切实可行的安排。总的精神是：稳定阵地再前进。

从1958年提出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以后，钢铁指标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把钢铁高指标压下来，很可能有被扣上「促退派」、r秋后算账派1的帽子。陈云接受任务以后，没有顾及这些。从5月3日到9日，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的汇报，陈云一开场就明确表态说：「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耍滑头。要不然我也可以不再理这个指标调整问题。请大家来谈谈1959年计划究竟怎么处理好。」他提出「是否请考虑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看要稳住阵脚再前进。第二，质量、品种同数量的关系。要重视质量、品种，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第三，重点和一般的关系。第四，今年和明年的关系，今年少些可能好些，明年可以上去多些、好些。」除冶金部外，又同国家计委的有关负责人进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经常参加会议的有李富春，薄一波、赵尔陆

和国家计委、建委的有关负责人。关于钢铁生产指标：冷金部提出“年钢材生产指针的三个数字’知万吨，黝万吨，取刃万吨。与之相应的钢生产指标是“1 纫万吨，1 仰万吨，b 叩万吨。

BI〈中共中央，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罗的紧念指示〉（1959年，月访日，载《建。以来，要文戏选镶》，第十二册，页3”第六章毛泽东不廖绘空气」及其底线

国家计委重工业计划局提出的数字是‘钢材可靠指标 850 万吨到驯刃万吨，争取 950 万吨；与之相应。钢的可靠指标 1250 万吨到 1300 万吨，争取 1400 万吨。

负责年度计划的国家经委冷金局提出，钢的可寡指标 1300 万吨）争取 1500 万吨。

总之，基本估计都比上海会议定的钢材 1150 万吨，钢 1650 万吨的指标要低。经反复研究，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赵尔陆，都同意钢材的可靠指标初步定为 900 万吨，钢产量定为 1300 万吨。当时冶金部参加会议的人仍不愿把指标层馱寻太低，说指标低了就会泄气。会议最后决定，按 1300 万吨钢的方案报中央政治局研究快定，并责成贾拓夫负责以计委名义向政治局写出报告。贾拓夫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严峻局面，以此说明指标下调的依据。李富春看后，认为不妥。不能把困难形势写得太刺眼，让人感觉「漆黑一团」，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因此嘱人另写了一份报告，第二天直送政治局。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陈云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讨论国家计委的报告。陈云认为，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 900 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是 1300 万吨。理由是：第一，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来看】这个指标比较可靠。第二，从今年头四个月生产情况看，这个指标也是可能完成的，问题在于要保证质量。第三，只要炼出 1300 万吨好钢，就能轧出 900 万吨钢材，但钢材品种还有问题。陈云指出，这次对钢铁生产指标的研究，只限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不可能完全确当，钢铁工业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需要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更清楚。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退到可靠的阵地才能站稳，站稳了才能更踏实地前进。陈还特别强调了当前需要着重注意的三个问题：要强调改进质 t；既要保证重点又

要照顾一般；既要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如果两者不能兼顾，就要为长远打算。13z

132 《陈，年翻〈1卯5?199引〉》，下卷·页18—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专（1，”—19”）—乌托年运动

陈云汇报后，邓小平表示赞成陈云的意见，退到可写阵地·然后再前进。为了消除大家对降低指标在政治上的显虑，邓指出，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指标定得蛮大，最后不落实，分不到东西；第二种方法是落实的，落实后再前进，后者可能更快，前者反而更慢。这样做是不是机会主义？不是，不但不是机会主义：不这样做反而错误更大。这几个月心情不舒畅，四大指标公布以后，一直比较被动。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把指标退下来，摆脱被动局面，退而后进。按第二种办法做，决不是机会主义。现在这样做可以争取主动，能达到更高、更好·明确表示，同意照900万吨钢材先分840万吨，留有余地·

周恩来、刘少奇也都表示同意陈云的意见。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和陈云的意见。会后，陈云专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实事求是地把中央财经小组落实钢铁指标的考虑和分歧作了汇报。陈说：

今年究竟能够可靠地生产多少钢材和多少钢，议论是不一的·多数人的意见·把今年钢材生产可靠指标定在900万吨·以此作为分配给各部和各省市的数1·把将来超通的数量作为奋斗和争取的目标。但冶金部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个数量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各省市的同志也有不同的意见。

他个人认为，为了安定生产秩序，不使计划再变动太多，以以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哪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第二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

针对说指标定低了会影响群众积极性的说法，陈云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对小高炉存在的问题，陈说，小高炉炼出的九百多万吨铁，含硫量超过冷金部规定0.2%标准的，有40%以上，有的说至少有50%。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这种情况不改变，将有四五百万吨生铁含硫超过标准，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这是劳民伤财。如不改进，就搞不到一千三百万吨钢和九百万吨钢材。因此，洗煤去硫，是能否完成拟议中的钢材指标的关键。”

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会议正式决定，将1959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同一天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关于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为缓和市场的紧张形势，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问题的报告》

133 陈云：《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1959年5月15日）·载《陈！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13，一140，

134 《紧急指示》责成各级主要负责干部立即向全体党内外干部，城乡广大群众报告目前全国经济情况和写所采取的各项措施·首先肯定成绩，同时作适当的自我批评，摆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着重说明目前市场的紧张并不是由于工农业生产没有跃进·而是由于城乡消费量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太快·使他们消除疑虑和误解，获得力量和信心·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实现1959年的伟大跃进而斗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页374—381。

13，中共中央批示说：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是目前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关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抓压缩社会购买力的措施·上下一齐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一想，难道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连副食品·日用工业品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么？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

和农民。不仅能够省吃俭用，克服一时的困难而且能够大力增加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有这样的信心和志气’《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页402—4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五中共党内对形势的不同估计

1 党内主流看法的基调

在6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阐明了他对形势的基本看法：「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毛说：

「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

「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比如去年12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1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1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

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

「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裹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其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

「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r 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136 指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毛最后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扣，毛还表示，过去的大跃进，使全党注意抓工业)这是极·大的收获，出现了一些问题，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138 毛泽东认为，把高指标降下来，加上正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经济形势将很快根本好转。1959年6月11日，李先念就1959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问题，向中央写了报告：其中说：「几个月来根据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在日用工业品生产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毛看后批道：「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有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139 毛的自信表露无遗。

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并不只限于毛泽东个人，湖北省委在传达讨论上海会议精神给中央的报告，对1958年的总结和对1959年的展望，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报告认为：1958年大跃进，两条经验，一条教训。两条经验，一是，1958年的大跃进为今后工农业高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造成了大跃进的局势。二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这是保证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能够实现的关键。一条教训，是胜利神昏了头脑。报告说：

大家认为，把1959年和1958年相比，既要充分估计困难的一方面·又充分估计有利的一方面·而且有利的方面是主要的。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只要全党团结一致，兢兢业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充分地运用1958年的经验，并且把失败的教训转化为

13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纪录(1959年6月13日)，载《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948—949·

138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册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2加1)，页398·139 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市场供应情况的批注》(1959年6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3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3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前这的积极因素，就能战胜困难·在1958年胜利的奠基础上·争取更大的胜利。‘如

湖北省委在7月上旬举行经济工作会议，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总结讲话中强调：1959年必须弯续组织大跃进。粮食争取秋后完全好转，一般副食品争取春节前基本好转，到明年5月30日前彻底好转。他说：目前我们的形势是有利的，比去年同期好。因为去年此时虽然供应不那庆紧张，但它是愈来愈走下坡路。现在供应虽然还相当紧张，但是在向好转方面走。为了继续跃进，必须抓住两个问题：（1）大力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2）大搞群众运动】插红旗树标兵、抓落后赶先进。说大话是不对的，但革命者要立大志、建大业，因此，仍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红

湖北省委的这种情绪，在1958年积极推动大跃进的省级领导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2 来自党内中下层的质疑

但是，在地、县委书记以及一般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看不同看法，对继续搞大跃进表现出没有信心。中共中央《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下达后，各地先后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统一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并向群众做解释工作。在这过程中，人们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怀疑和埋怨情绪公开暴露了出来。在湖北省的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人在小组讨论发言说：「1958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去年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r一面

140《湖北省委关于省委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1959年4月26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十二册，页2 舛一加5，

“1《湖北经济工作会议上地县委书记等对若干问题的t法》，《内部参考》。1959年7月8日。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说跃进，一面饿肚皮，怎样也不好解释。」因此，地、县级领导人对1959年的生产指标，都是「保险」、「再保险」，多一斤也不接受。对上面提出的「工农商交并举」的方针，提出质疑，有人提出，「过去工农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都没有贯彻执行好，现在又加了两条腿—四条腿走路更难走了，怎样举法，闹不清。」’ 42

在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学习的干部：有将近半数的人认为：’。人民公

社没有优越性，「目前的人民公社跟高级社残乎一样，不知是谁想出来的新名堂，似乎要与众不同（苏联也没有），出风头，好像要赶到『世界的前头』」。公社化，「给生产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如森林遭到破坏，农具、生产无人管理，劳力大批外流」；「出现了杀鸡、杀猪，『一平、二调、三收款』」。他们形容：「公社的出骗哑不是甚么『万事俱备（指建社条件），只欠东风』（指公社），而是『火烧战船（指成立公社把高级社的生产关系搞掉了），一扫而光（指一平二调三收款）。公社化运动的情况犹如 r 大雾满江（指刮共产风），万箭齐发（指共产风带来的过分集中）】十万狼牙（指农贷十亿元），一去不驯。J《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有左倾情绪】人民公社的广泛建立】是左倾思想的复活」·「决议中提出的『三化』（指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引者注），『是一句迷惑群众的假话』，实行『三化』，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只有纪律，没有自由，甚么民主、自由、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话，只是说得好听，并无实际内容。它与『三化』是势不两立的，不可能同时存在。j「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说明中央决议有毛病。」「『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省、地委应负责任。Jr 武汉会议时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比苏联容易，比苏联快：因此，r 共产风 J 愈刮愈大。」「中央、省委有错，下面也有错。」

142. 〈湖北经济工作会议上地县委书记等对若干问题的。法〉7月容日，

《内部参考》

1959年

143 〈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内部参考》，1959年7月巧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二第齐专（19 铭一巧 61）—鸟托年运动

「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提得过早了，不够合理，结果农民大失所望，应该取消。」「公共食堂不是共产主义因素·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公共食堂害多利少，增加人民内部矛盾 1 群众不满。饮食不便·J「食堂有三大坏处：排队；抢；浪费粮食·又浪费钱。」天津市和平区二千四百多名科以上党员干部讨论中央紧急指示时，反

映出对 1958 年大跃进的怀疑情绪，谈出了七大埋怨。主要是：埋怨领导好造大计划斤埋怨农村工作搞得不好《去年不给农民自留地，不叫农民自己养猪，结果猪肉少了，弄得人心惶惶。农村橙食这样紧张，是不听农民的话的结果，如单纯强调密植，造成了减产州理想宣传工作有毛病（去年宣传这裹大跃进】那裹大丰收，结果并不是这样）•、在天津的一般干部和职工中，有些人认为：r 现在农村粮食紧张和城市副食品紧张都是公社化闹的。」他们提出：r 去年取消自留地，今年恢复自留地三去年搞食堂，今年散伙；去年搞供给制、几包，今年按劳取酬，是不是过去搞错了。」认为「炼钢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只闹了个形式」。1'5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在传达讨论中央紧急指示中，也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如：

国务院机关的一位干部说：「19 铭年搔食增产一倍，中国人口并没有增加一倍，社会购买力也没有增加一倍，为甚么橙食今年这样紧张？」一机部一位副局长说：「当前出现了柜食愈来愈少，市场供应愈来愈紧，生活水平愈来愈低的严重局面，我思想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1958 年增产的那么多的橙食哪裹去了？长此下去，婚心会出现不好的结果，人民内部矛盾能否引起爆发性的矛盾？不知中央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对以钢为纲，气象局有些干部认为「去年炼钢

144 〈天津和平区干部在讨论中央「六一」指示时谈出「七大埋怨」〉
1959 年 6 月 21 日 •

《内部参考》

145 〈天津遗行经济宣传的收揽和各阶层暴露出来的 ra1 题〉
8 日 •

《内部参考》• 1959 年 7 月

第六章毛泽东「廖缩空气」及其底线

铁是得不偿失。」一机部一个副处长说：「去年以钢为纲，一切为了钢。由于钢的指标不稳，影响了其它所有部门。」146

这些由中下层干部和职工流露出来的困惑、质疑和埋怨情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种情绪不能不反映到党内上层中来。

3 少数高层领导人的担忧

在毛泽东领导采取措施，稳定城乡生产和市场的同时，中央其它领导人对现实城乡形势也十分关注，分别到外地视察，了解情况。1958年12月，在武昌会议西北组讨论1958年粮食产量时，不少人赞成公布一万亿斤或一万二千亿斤。彭德怀明确表示不同意见，直截了当地指出：「粮食没有那么多。」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才」彭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会后】彭德怀带看疑惑回湖南家乡作调查。瞬

彭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视察。在大跃进中，周小舟是少有头脑相对冷静的省委书记之一。周向彭说·省委前些时候开常委会，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得那么多，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粮食产量指标订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来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了「白旗」。关于土法炼钢】周说】全省共建起五万多个小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周还向彭说，公共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甚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并认为，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裕的时候也不能搞。

彭德怀到了湘潭，没有住县裏的招待所，而是住进了乌石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当天晚上，乡亲们都来看望：彭亲切地向大家询问了

146. 〈中央·家杆关干部对中央 f 六一 J 指示的反应〉，《内部参考》，1959年6月21日·147 彭德怀在湖南纲查的情况，参见《彭德怀传》驯写组：《彭德怀传》口匕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 578 一 绍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时专《1958—1961）—鸟托年运动

家乡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德怀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到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莞禾蓬，数着一莞禾上有多少株稻秆，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颈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他对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铁

厂出了六百四十多吨铁。彭又去了公社炼铁厂。彭看到为了那么一点铁》集中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裏；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一这种种情形，十分感慨，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他对干部和社员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须要制造农具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大规模这样搞，看来不是好办法。」

在乌石，彭德怀看了乌石学校的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参观了赵家弄子大队十分简陋的幼儿园；许家塘大队的敬老院，了解到老人们每人每餐只能吃到二三两《十六两一斤），数九寒天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紧锁眉头忍不住说：「这叫甚么敬老院‘幸福院！」行前，彭德怀给幼儿园和敬老院，各捐了二百元钱，让干部给孩子们添些生活必需用品，为老人们添量些铺垫。

让彭德怀感触颇深的，还有干部作风问题。乡亲们反映说，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就愈来愈壤。不讲民主，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捆绑人的现象，相当普还，而且愈来愈严重·彭对前来送行的干部们叮嘱说：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

离开乌石，周小舟陪彭来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情况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随后到了平江一三十年前平江起义的地方。在参观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用个数字竟然是显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 1957 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必 8 年的产量；而把 1958 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 1957 年的产量。对如此造假的做法，彭深感忧虑。就在平江，一位战争年代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在人群中悄悄地给彭送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级橄地·

签叶桔，

青壮悚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写子怎庆适？请为人民鱿咙胡。

彭德怀看后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裏。他在笔记中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多年以后，薄一波回忆当年在湖南相遇时的情景说：「这年，我也去湖南调查。我和彭德怀同志在株洲相遇。彭德怀同志说，1958年的粮食产量绝对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高，‘徵购一千二百亿斤很危险，最多只能征购九百亿斤。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的调查有同感。他建议联名给中央发电报反映。我说，我们还是分别向中央反映好些，他同意这样做。’」

彭德怀如实地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建议把当年的徵购粮减到九百亿斤。

在4月的上海会议期间，陈云和彭德怀同住在瑞金二路五号，同席进餐，饭后一起散步，交谈过不少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1958年12月27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公布的粮食产量是：七千五百亿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一册，页650，14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85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盼专（1958—1961）——鸟札作运动”较一致。彭德怀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是很佩服的。在交谈中，彭德怀获得了不少教示。工”对1958年的大跃进，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一直抱有自己的看法。1958年11月，在武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曾就社会主义阶段应强调按劳分配的原则作了发言，并批评了许多地方取消计件工资的做法。但发言很快被有的负责人顶了回去，说要养重强调两条战线的斗争，并说：计件工资「不是取消，是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是工人自己提出来要取消」。喻使张的意见未能展开。

1959年1月，张闻天就中央宣传部门研究改进大跃进、人民公社宣传方式方法问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宣传上应该总结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理论问题。」此后，张在外交部的干部会议上谈对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体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分析。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也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

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标准。」r 要求目前实行按需分配 1 是种平均主义思想。攻击按劳分配就是攻击社会主义。」F 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视物质条件也是不对的。人改造物质世界，归根结蒂要发展生产，光凭主观想象是不行的。」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仲天的干劲，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强调前者是唯心主义，强调后者是机械唯物论。两者结合才是马列主义。」我们现在搞 r 以钢为纲」，而「纲与目必须相适应，才能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否则元帅走得太快，其它的东西就会掉队」。「重点突出不能离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150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6）页 173 •

151 《中共八届' k 中全 t 文件汇集》，社】Z 以刃 j，页 720 •

152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 圣 22 •

转引自程中原 ‘《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

下卷口乙京：中共露史出版社 • 2000），买

第六章毛泽东「压铛空气」及其底线

在生产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张认为「使用群众的积极性而不关心其生活条件，可以支持一个时期，不能持久。」现在大家干劲大，温度很高，成绩很大，「但有些地方玲静不够，甚至作风上发生虚假，不实事求是等问题」。他说：「每一事物都有两面性。过分强调了一面】就会否定另一面」，因此）「要纠正片面性」• 联

3 月，张闻天偕夫人刘英在广西、广东调查考察了二十天。一路上所见所闻，使他深感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党内外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正确意见受到压抑，虚报浮夸之风盛行。讲话要看上面喜好，不敢讲真话，怕插白旗，怕戴帽子。如：

19 日 • 海南同崖县县委书记向他反映该县公社化彼，无人负责现象严重，工具、粮食、牲口等均无人负责，椰林裹的椰子随便吃，一个椰林就吃了二十万个椰子。全县六万个农户，每户至少吃了两只鸡，猪也杀得多。农民认为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公社的了】不是自己的了。张向随行秘书说，现在的情祝同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胜利冲昏头脑的情祝一样。 ，

21 日，张在海南石碌参观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当见到二十个小高

炉只有四个点了火，便向秘书表示：光是看造成了多少小高炉有甚么用？我们上面计算今年能产多少铁，根据就是造了多少个小高炉·一个小高炉能产多少铁·这样的计划一定会落空。哪

27日，在广州钢铁厂，问及职工粮食定量压低后够不够吃，工厂负责人面有难色，又仍回答：「够吃」。张对此私下表示：看来下面的同志要讲真话真难呵。此前对于海南省有的地方饿死人都不敢说就深有感触，曾对夫人刘英说：现在党内缺乏一种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的气氛，领导上总是喜欢听好听的。’ ”

153《张闻天年语》，下卷，页1123, 巧4《张闻天年护》，下卷·页1128, 1”《张闻天年谱》·下卷·页U29, 巧6《张闻天年钻》，下卷、页113Q·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盼春（1955—1961}—乌托年运动

/k届七中全会结束后，从上海返回北京，张闻天与睡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摄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坐一节车厢。途中相互交谈了大跃进出现的种种问题：基本建设项目上马太多，人力、物力、财力分散不集中，浪费大，结果少；工业产品质量差，大量积压，影响对外出口信誉；农产品购销计划完不成，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财政发生大量赤字，等等。李先念也发表一些相同看法。韩先楚则对报上宣传的红安密植有意见·并申明这不是唱反调·张接着说！可见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不过就是敢不敢讲罢了·二

6月20日和23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先后召开会议，讨论报刊宣传问题。张闻天在两次会议上发言，主张讲实情，把目前的困难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向人民讲清楚，认为掩饰缺点并不能鼓劲。有的与会者反对他的发言，责备他讲丧气话，是对形势估计悲观的一种右的论调，强调要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斗争。张闻天听了激动得争执了起来，说不要这样扣帽子。会后，张对夫人刘英说：r现在不能讲缺点，一讲缺点就有人扣帽子。J又说：r愈是不要我讲，我愈是要讲，我脑子裹就是存在着这些东西。不能不讲。」15s6月21日，星期日。张闻天在中南海西楼看电影后遇彭德怀，受邀到彭的住处小坐。两人交谈中都认为去年9月以后一段时期「左」的错误严重。彭举一个省发现大量浮肿病为例说，要不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威信高，就会

发生匈牙利事件。张谈了小高炉炼铁得不偿失，花了多少劳力，也妨碍了秋收。去年要是不这样搞，今年日子就好过多了，两人谈起 1958 年的南宁会议。课为中国党内也要注意防止斯大林晚年的问题。张说，4 月 29 日的〈党内通信〉是起了好的作用，但以毛泽东的个人名义发下去也有突出个人的作用。彭提出中央这次也应该做个检讨，讲讲缺点，总结些经验。张表示赞同。珊

巧 7《张闻天年语》，下卷·页 1131·15B《张闻天年谱》，下卷，页 1144·159《张闻天年谱》·下卷，页 n44—1145·

第六幸毛泽东 r 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张闻天的这些言论，表明他不只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系列「左」的错误，更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之风的滋长，党内失去了正常的民主氛围。

中共中央副主席、刚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对人民公社化以后的所有制问题，也抱有自己的看法。他健为不能完全否定「个人所有制」

1959 年 5 月 20 日，朱德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又说：过去的商业网点被打破了，结果东西没有了，吃了亏。这实质上还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即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三者的关系混淆了。‘”

5 月 27 日，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一起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二省视察。在视察途中和回京后，朱德、董必武·林枫联名向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沿途看到的情况，内容主要是关系群众基本生活的食堂和住房问题。

他们认为：「在当前的群单生活中，食堂问题是一件大事。」r 这裏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常年食堂，原因是”（1）东北冬季时间长，各家都需要烧炕取暖，如果食堂和家裏立两炉火，浪费很多煤火；（2）食堂设备条件差，不能做到家裏那样饭热炕暖；（3）自留地分下去后，在家裏做饭可与饲养家畜家禽结合起来；（4）群众感到在食堂吃饭，

对来人做客、婚丧嫁娶有诸多不便。」

为此建议：「在今年的夏季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裹做饭·显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
160 《朱德传》，页 6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关于群众住房问题，报告中说：「在公社化以前，群众建筑了不少房屋·公社化以后】由于群众对住房私有政策一度发生误解，对自己居住的房屋不修不建。根据这一情况，今后除刘敌执行房权私有的政策外，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群众自己修建房屋。黑龙江省委最近提倡建房储蓄，并准备供应群众一部分木材和玻璃，这一措施是很好的。」

此后不久，朱德还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干部谈话！严厉批评了「共产风」，指示他们根据宪法和党的有关决议，研究保护公民合法的生活资料所有权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供中央参考。

对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同外宾谈话中，也都坦率地谈过。

6月8日，陈毅在与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们会谈时就承认，在追求高速度的建设过程中，破坏了各个经济部门的计划性和按比例发展的原则。“’

6月17日，周恩来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时说”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定得高了】因为制定计划时没考虑客观条件和国家的现实能力；到1958年底，国家经济发展已出现严重困难，一些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已出现比例失调·周说：继续采用大炼钢铁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发展工业是不行的·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小型传统矿井和冶炼炉是不可能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础的」·周还说：「开始大跃进运动之后，我们曾经请求苏联扩大设备供应，并请求尽快提供这些设备。但是，当设备运来之后，才发现我们无法安装它们，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配套设备，因此，这些运来的设备只好堆放在那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思想比较

”1 转引自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和结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 2 哪年第、期，

第六章毛泽东「压缩空气」及其底线

449

混乱】不能将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上。我们当然应该为此而道歉。J, ' 2

以上表明，在 1959 年上半年，中共党内从中下层到高层】对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引起的问题，明显存在着与主流不同的另一种认识和意见。这种不同估计和评价，在此后不久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终于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冲突·

162 斯卡奇科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9 年 7 月 2 日·转引自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和结果〉，《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1 期，据《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年》·中卷·页 237—238 记载：6 月 17 日接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才·夏迪科，说我风去年大跃进搞了四个月，对经验没有很好总结，今年煤炭部和冶金部定的指标高了一些·地方更没有经验·去年大搞工业·主要是煤和铁，其它工业部门也都在跃进，这样就失去了平衡。各部门之间不平衡：煤炭和交通运输不平衡，机械制造和钢铁不平衡，生产和生活不平衡·供应显得紧张·有些问题在当时看来可以办到，但是未能更进一步估计一下明天如何：去年主要是追求数量，今年要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从而降低成本·减少劳动力，

第七章

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一毛泽东为继续跃进定基调

1 到韶山、登庐山豪情不减

1959 年 6 月 20 日晚 12 时过后】毛泽东再次登上专列南下，途经武汉，畅游了长江，24 日下午到达长沙。同行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长沙稍事休息，25 日，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毛泽东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此前，毛泽东曾与公安部长罗瑞卿「约法三章」：「一是不要派部队去韶山，特别不要派公

安人员；二是使我行动自由；三是我要广泛接见群众。」‘韶山，位于湘潭县城西四十公里，湘乡、宁乡、湘潭三县交界处，四周峰峦迭起，气势磅礴，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相传虞舜南巡经过此峰，演奏韶乐，故名，韶山冲就在这韶山峰的脚下。’

1’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3必。

2《长沙府志》记载：古时这农有韶氏三女，居山学道。有凤鸣卫天，至。女皆仙去。山上有凤音事，其南有东台、挠花洞仙迹可觅，这襄群山绕环。松柏葱郁。风景秀丽。

中华人民共和卡国史‘第齐春（1, 5s - 1961）—鸟托邦运动

毛到韶山松山一号寓所，即吩咐：「把这裏的山神土地（意指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笔者注）找来。J公社书记毛继生等到后，毛泽东对他们说：「我离开韶山几十年啦，要请乡亲们吃顿便饭，叙叙旧。请你们帮我办一下。」具体应邀请的人，毛说：一是我的戚族、老表、堂兄弟，二是韶山冲烈军属，三是老地下党员。四是农民协会老自卫队员。时间安排在26日晚上。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要毛继生领他到父母坟上看看。走了半个多小时，毛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土地神楠竹托。毛将工作人员在路上用松枝做的花圈恭敬地放在父母坟前，静立片刻说：父亲、母亲，你的儿子回来了，前人辛苦，后人幸福。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算是尽了一份孝心。

此后，毛泽东走访了几户社员家庭，了解当地的粮食产 t】社员的口粮标准。又看了自己的旧居。然后来到韶山学校，接受了少先队员的鲜花和红领巾，留下了一帧被诗人威克家称颂是「可以听得见笑声的照片J。下午，毛又拜揖了毛氏宗祠，到韶山水库游泳。晚上，被邀请的乡亲们先由毛主持开座谈会，毛向大家说：

「我离开韶山三十多年了，难得回来一次！今天请大家来，很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特别是想请你们老人对我提点意见，你们对当地政府有甚么看法和意见，对生产生活安排有甚么意见、建议，甚至对我本人有甚应意见，都请尽量提，放心讲，不要有顾虑。」在毛的一再启发下。有的老人才开口说：

「主席，意见是有，就是如今讲不得，讲了要挨辩论，挨斗争！Jr 过去先犁田要过铁板，踩田要过脚板。」「有句老话，一脚踩到底，石物`斗米。如今插板板寸，脚都进不得，产量低了·听说是您让搞的，我们没办法。不知您到底怎么讲的？」

毛解释说：「是我让搞的·」但「我主张的是合理密植，不是主张愈密愈好J·毛问大家「我那六条（指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你们知道吗？」

第七章产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有人答：r 哪六条？韶山不晓得。总说有的地方就不准念。您的政策到下边就变卦。J 这时，人们开始七嘴八舌说开了·有人提出，现在食堂粮食少了一点，每天得「两斤米才行」。r 韶山过去粮食比较足，山上种玉米、红薯等经济作物，可现在不种了，这是为甚么啊？」「农民粮食不够吃，还要上交各种粮，剩下就不多了，不少人连饭都吃不上了！有的干部瞎指挥，不讲理。不交柜或交不起的就打人骂人！」「现在种田和过去不一样了，说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深耕要翻几番。我们不同意·就说是【老保守】。如今对老年人太不尊重了。还要挨辩论，挨斗争。听说外地比韶山还厉害！」r 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女要分开·古来都是各家各户，夫妻同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分开，追是甚么世道计请问主席这是谁搞的？」

毛听了以后，颇有感慨地说：「你们这些意见提得好。这种意见只能在家乡才能听到，我在中央、在别的地方是听不到的。」r 我谢谢你们，我单独和你们几位照个相。J

照完相，毛又对大家说：「乡亲们：你们提意见是对党的热爱，对政府的支持，希望你们今后多提意见，大胆讲，我们会尽量采纳的。回到北京后，中央要开会，好好研究，向全国下个文，统一解决食堂问题。j「我们搞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出了一些问题，中央要负责，特别我要负责。J

毛又徽求当地干部有甚么意见和要求，并嘱咐说：「你们当干部的要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产·把韶山建设好。韶山是我的家乡，外宾常来，不能丢人。如果韶山搞不上去，生活不好，也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江

与会者齐声表示：「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带领群众建设好主席的家乡，把生产、生活搞上去。」

随后毛泽东招待乡亲们吃饭。毛向大家敬酒说：「我离开韶山三十多年，东奔西跑回不来。今天毛三份子特请各位长辈、亲朋、革命老人吃顿便饭，敬大家一杯酒。」随后又来到毛宇居面前给他敬酒，毛宇居赶紧举杯起身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又是他的塾师，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钥春（1955—1961）—鸟托年运动学问，人品正派，可寡可信，家乡的不少事毛都委托他办。所以，毛对他格外尊敬和感激。

送走客人，毛泽东回到松山一号。夜深人静，这一天看到的和听到的种种情况，使他久久不能平静，随要值班卫士拿来纸笔】写下了《七律·到韶山》的诗篇。诗前添序写道：

一叔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诗

云：
别梦依稀尤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战，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针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家乡·尽管因听到乡亲父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诸多怨言，反映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很有感慨；看到乡亲们因饥肠辘辘，在饭桌上如风卷残云一扫而光的表现，内心也不是滋味。但在他的脑海深处，1959年仍是一派继续大跃进的豪迈景象·

为总结经验，继续跃进，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途中就考虑到庐山举行一次会议。据杨尚昆1959年6月21日日记记载：

主席已到卑州·来电话提议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地点在庐山，橄求常委同志的意见，12时在少奇同志处开会·同意主席提议，并决定我徒天先去庐山。造

3 毛泽东在韶山活动的资料年），页3仍一306·3104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

，引自李家骊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
，324·332一。上册口匕京：

336.

中央文献出版社，2船1)·页401。

第七章庐山会议登生的t大转折

455

6月28日，毛泽东从长沙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通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毛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毛还告诉周恩来他出的不些题目，让与会者讨绘。，当夜，毛泽东由长沙抵武昌。29日下午，毛在武昌（他乘坐的输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开会，议论了上山讨论的十四个题目。‘6月30日下午1毛泽东乘船离开武昌，晚11时半到达九江，第二天一早乘车上了庐山。毛泽束生性喜好山水，到庐山后，兴致很好，当晚作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龙叫首祝。今眼向洋看鲨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农可丝曰。

这首诗与《到韶山》一样，表现了诗人的乐观心情和豪兴不减·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卯6D，下册州匕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6）·页”1·

（毛潭东传11949—1卯6)》，页957—958.但据《杨尚昆日记)·上册，页4徊记载：6月2，日晚问具汉口通电结·常委各同志已到汉，今日举行了会绩·主席对此次会议讨论项目，提出了十四个问题，究竟是《毛泽东传（1舛9—1外田》写的协作区主任会钱·还是扬尚昆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t议，有待进一步弄清。李锐对《登厦山》原诗有如下解释“小舟与我们同船来山·《到韶山》、《登厦山》两首诗一上山毛泽东就写给小舟和乔木二人，附信撇求意见。我与小舟同在中南组，这时他就兴致勃勃地将原件给我看·并将两首诗抄在我的记绿本后面。诗中词句，同后来发表的有些出人·《登庐山》还有小序，「1”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场子江。干峦竞秀，万

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登厦山》最佳两句同复来发表的不同：『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 t 年不向前·』李锐：《厦山会让实绿》（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四专（1958 — 1960—鸟托年运动

2「神仙会」的讨论主题

与毛泽东先后到庐山的中共中央常委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因健康原因没有上山，林彪在北戴河休养）。7月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研究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共提出了十九个问题。会议的具体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分组开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时间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会务方面将毛泽东在6月29日和7月2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共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7月2日夜裏，毛泽东把这十八个问题重新修改一还，要杨尚昆印发会议。这十八个问题，核心是三大问题：怎样估计目前的形势才 19 铭年有哪些经验教训？今后怎么办分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

关于形势，他认为形势总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也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毛说：

国内形势是好是壤 P 大形势还好·有点壤，但还不至朴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劳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

•到 t 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 生、林铁，欢阳饮、一铸·王任，，杨尚昆，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关于经验教 w11，除了具体政策层面的问题外

指标、浮夸风和综合平衡等问题。关于今后的任务意见：

毛主要讲了高，毛说了他的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首万颇 P 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枕算了。今彼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才去年增产有无三成 P 今援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才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才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首万吨。徒年再增加斋育万颇。十五年内主妥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徐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灭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鱿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妥到 196 斗年才能达到。

对如何完成任务：毛泽束提出的指导思想是：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实的开孙祈究一下。退去搞过十大关系，统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练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通去是重、蓉、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取、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责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退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徒塞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奉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足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复·此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才统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朴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 “一 1961）一乌托邦运动

毛泽东最后强调，全党要统一思想·他说：

围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进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通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通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鱿起积极性来。’

毛泽束这一席话核心，就是：r 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J 这三句话·这就是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条必须肯定，不能动摇；问题虽然不少，但也只是一、二、三个指头而已《当然，较之原来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说有了一点前进）；现在的问题是要统一思想，鼓起劲来：继续跃进·这就是毛召开庐山会议的意圆 1 也是他对形势估计的底限。

3 各路「诸侯」的不同见解

会议开始，各小组讨论毛泽东出的十八个题目，比较集中的是谈形势。由于在大跃进中所处的角色不同，对形势的看法也就相距很远。当年亲身参加会议的李锐在他所著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说：六个大区小组会的讨论，大体上西北、东北和华北三组，较能敞开谈，成绩大讲，缺点也随便讲；但中南、西南和华东三组则有所不同，缺点多讲了一点，就会有人不高兴·甚至打断发言，护短的人还是比较多。10 中南组几位省委书记对形势的基本看法是，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感叹 1958 年的大跃进是 ‘〔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但他又认为”不能光看这一年、半年中发生的问题，要看三五年】看畏远些，看积极方面。广东有了年产五百万吨

9 毛泽东：〈，山会镶讨绘的十八个问题〉《19”年 6 月 29 日，7 月 2 日）·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页乃一 s2。10 李锐：《庐山会议 t 录》，页赫·第七章庐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煤，五万吨钢的能力，也有了水压机。去年苦战一年，不彼悔‘兵无苦战不行·不要光看消极东西，不要有埋怨情绪。去掉！目性，主要是没经验。现在，落实指标已差不多了，仍要鼓起干劲·人们对总路线是有怀疑的、定要坚信，不能动摇。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回避了要害问题 9. 泛泛地说甚么感觉有压力。去年许多措施、作风，使干群间有隔闵·缺点那么多，

讲了就完了·再不搞甚么八百斤、千斤省之类虚名了，河南省是 1958 年冒尖的省份，吴芝圃发言，承认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喊害，影响全国，特表示向各省道欢。然后】话锋一转说：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者三千六百人，坚决清洗。农民的工具、树木、房子等，都算了细账·退赔了。由于得到群众谅解，已有 95% 干部连选连任·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由于粮食大调动，比历年春荒吃得好·人均一斤柜，巩固食堂，勉强支撑下来。粮食基本供给制。食堂改革炊具，用磨面机。开辩论会后，现在食堂一个未散，如%可以巩固下来·多种经营好的，全省有 to% 发工资，从六七元到一元不等·5% 自留地，一半在食堂，一半在私人。农业大胆试验，创造了一些经验。最大刘乚在水利。去年六百万人上山搞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铁厂，算是有了工业。每县有了个机械厂，可造锅驼机。每个公社有个小修配厂，车状多了。铁今年可完成六七十万吨：钢五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事实，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来。错误已作底当检讨，怨气还不是太大。……河南今后方针：一切为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 r 大跃进」。吴的发言，不只认为问题都已解决，而且对继续「大跃进」充满信心。

1958 年同样积极的王任重，较之吴芝圃头脑相对要冷静一些。发言谈了湖北许多实际情况，心情表现沉重”他对 1958 年的看法是：成功与失败都尖锐，取得的宝贵经验，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说，都有长远意义。教训确实沉痛，比 1954 年大水灾情更困难。今春五百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1954 年没吃过十二两（注：指十六两为一斤，以下。已死一千五百人，十五万人浮肿病。早稻下来才能好转。这是全党全民教训，很难过。一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

中华人民兵和庆史·第齐喜（1958—1961）—乌托年运动

响，决不可小视】有的要一两年才能好转。……总之，蹉 8 年有丰富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要作充分估计，不要怕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玲空气·说右倾，我也不怕。王最后说：党内有互相埋怨情绪，不利于团结。

在「大跃进」中相对冷静的周小舟说：不可估计太乐观。去年底，湖

南号称粮食翻了一番，达到四百五十亿斤，估计只有三百三十亿斤（后来落实到二百四十五亿斤，只增产 8%）。生铁七十六万吨，实际六十万吨。……钢指标定为一千零七十万吨的决心是好的，但安排八百万吨就好了。公社问题，当时似乎是因为农业、工业形势所迫而建立公社，但太快、太大，几股风一刮，愈包愈多（谭震林插话：「根本是把老规律打破了，不也过来了。」）现在条件下，农业、工业到底能按甚么速度发展？农业不能 30%，每年 10% 至 20% 还有可能。过去农业提出要赶日本，可见头脑发热程度。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六条理由：一、根本不节约；二、不利于养猪；三、破坏林业；四、不能积肥；五、不节约劳力；六、吃得不愉快“……现在普遍人心思定。但转弯也不宜太急，得慢慢转。

以上的发言】尽管王任重、周小舟对问题看得比较重些，但谁也没有触到问题的痛处。

根据最初的会议安排，准备通过一个由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等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在讨论《议定记录》草稿的小组会上，对形势估计的分歧进一步暴露了出来。相当多的人认为：对「大跃进」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达得不够充分有力。或者认为对成绩讲得不够，会对当前形势有不利影响。或者说，成绩写得很抽象，缺点写得很具体，这样传下去要泄气的，今年计划就会完不成。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以安徽小高炉炼铁为例，证明大办钢铁的正确。他说：安徽小高炉一吨铁的成本比武钢成本的便宜九十多元，质量规格也可以用于建水库。武钢要八年才能彬倒年产三百八十万吨，安徽今年就可出铁一百四十万吨，•所以最大好处是争取了时间。他认为安徽最大缺点是刮了共产风。下面干部对于缺点的看法，「好比玻璃上滴了一点墨水】一擦就掉了」。「至于去年工农业比例失

第七幸产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调，我不承诺。工业、农业不都是增产很多吗？工业内部的比例是有些失调，但是我的看法很乐观，不经过这样的大演习，我们受不到这样的教育。j”

针对有人主张缺点要讲透，认为会上有不愿听缺点的情况，使人感到

有压力等意见，不少人认为，形势是完全可以好转的，现在浙江、河南·河北都有好转，有些地方群众干劲更踏实了。对紧张要分析是甚么性质的紧张，究竟紧张到其么程度。工业方面，无非是原材料紧张，经过调整平衡，加上增产节约，也是能够解决的。对缺点不是不讲，不在讲多少，是要弄清它的性质。我们的缺点或错误不是方针路线性的，是在执行正确方针路线中产生的。会议不存在有怕说缺点的空气，等等·12可见，对形势的估计直接涉及到问题的性质，这是一根最最敏感的神经。

二彭德怀上书毛泽东

1 被毛泽东批发的「意见。」

1959年4月上海会议后，彭德怀于5月出访东欧各国，6月中旬返回北京·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听了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菏泽地区的极荒情况，已稍有缓和。但原说有余种的甘肃省，现已成了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并说军队凡能抽出的运输力已全部抽去了。彭要黄还是想办法抽出一点运输力来帮助地方。对中央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会议，彭对黄说，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13黄克诚说：「中央通知你去」

1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7612李锐：（庐山实绩实录），页8313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

— 77

— 84—

人民出版社

1981)，页267.

中争人民共和国史`第齐春【1955—1961）—为托年运动

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我又问他：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裏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听了黄克诚的劝说·彭德怀决定去庐山开会。

与彭德怀同行的有“贺龙、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康生、张闻天，贾拓夫等。这一行从北京出发，乘一组专列先到武汉，然后换乘江轮到九江，7月1日早晨由九江登岸乘汽车上山。彭德怀按惯例也同往

常一样参加西北组讨论。从7月3日到10日的八天中，彭德怀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和插话。讲了一些别人所不敢说的话】赞同的人为他捏一把汗。也引起不同意见人的极大不快。彭说：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单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再搞，就好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期（9月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不只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买饵8.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黄讲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甚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

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语

由于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意见，毛泽东于10

日晚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会讲了一番他的意见。毛说：会议初步安排到15日，延长不延长到时再定。他强调：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他说：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但毛认为：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没有甚了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并且，经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问题已逐步得到解决。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也是追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彭德怀觉得毛泽东的乐观情绪，与当前全国城乡现实的严峻形势相距甚远。如果会议就此匆匆结束】实际上就没有解决甚么问题。于是，他决心面见毛泽东当面谈谈自己对形势的看法，由毛泽东出面继续纠「左」。7月12日上午，彭德怀前往毛泽东的住地「美庐」，但警卫人员告诉彭说：「主席昨晚一夜未睡，刚刚躺下。」彭德怀只好怅然而归。

庐山会议文件：《彭德怀在小组会议发言摘绿》，载《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588—589，5知。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54—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专【19“—1，肌）—乌托邦运动

此前，彭曾对人谈过他的一些考虑：他认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前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比较适当。「如果有意见不讲出来，那我们党还有甚么战斗力！」17

因此，在访毛未遇以后，彭德怀决心给毛泽东写信，向他倾诉自己的意见，希望毛能把会议引向深入。从7月13日中午到14日下午，

经过两次修改，经参谋誊抄后，彭德怀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于14日下午5时半左右，看参谋王承光将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彭德怀在后来被审查期间，谈及写这封信的动机时说道：

在当时（指1958年—引者注）·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病产风、浮夸风、绿迫命令风。……这些风气，在1958年12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中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在某些地区泛滥，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中期’到会同志并没有倾心呈腹地让出来，鉴于以上情况，此促使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

但这拳拳之心，却惹来一场莫名大灾。导致庐山会议出现一场重大政治风暴的这封信，其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形势的估计；二是主要经验教训^[1]。

关于形势，彭指出：

17（《彭德怀传》，页1—6020

18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页274—幼5.

第七 庐山会议前后的重大转折

「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以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

财力)和人力。』「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关于经验教训】彭强调了;

「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单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r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普遍地滋畏起来。·,·…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它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r 政治挂帅

46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齐专(1,55—1961)一乌托邻运动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神

上述内容,与彭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相比,讲缺点、错误既没有直接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语气也相对缓和很多。不只对大跃进的成绩作了明确「肯定」,指出「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说了自武昌会议以来问题也基本得到「纠正」。显然是经过反复斟酌,以免引起毛泽东的误解。但是,说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因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其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处理经济建设,没有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等语,仍然是非常抢眼的。

2 与会者的最初反应

正当彭德怀静候毛泽东回音的时候，毛泽东于7月16日在彭德怀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建议将原来各大区小组重新编组，以便广博见闻。另一封信是要刘少奇等通知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上庐山开会三并徽绚在大连休养的陈云的意见，「能来则来，不能来则不来」。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页之81—287。

毛泽东：〈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批语〉，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3），页3儿·21毛泽东：《关于改变雇山会织人员分组办法的建议》、〈关于请彭 X 等来庐山参加会议给刘少奇等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355, 356。《邓子恢传》记载：厦山会议前不久·「邓子恢又感身·不适，经卫生部组织 t 纷·他肝硬化有加重·糖尿病有发展·又只得去休养·Jr 在大连休养地，邓子恢接到参加庐山 t 议的通知。这时·陈云也在大连。他拿着通知到陈云那裏·问去不去参加会议？陈！告诉了邓子恢庐山会织的一些情况，劝他不要去·庐山会议矫复：邓子恢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说：幸亏陈云同志·不然·后果不堪设想·j《邓子恢传》编辑委·会编：《邓子恢传》倘匕京：人民出版社，1"6），页5约。

第七章庐山会议姿生的实大转折

4 订

从7月17日起·按重新编组的小组。会，讨论的内容逐渐由〈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转向了彭德怀的信。发言者对信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信的第二部分：关于 f 大跃进」·全民炼钢，人民公社化等缺点、错误的评价，是甚么性质的错误，如何看待1955年的经验教 r1I 问题。

黄克诚7月17日上山，19日在小组会上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1。对上山后头两天的情况，黄在回忆中说：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彼刚进住房，彩德怀统拿看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适·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

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拎甚么 P 他说：实际情况那废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亲的话。我就是提得引起重视。戎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钧写信。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急、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效，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次言。我因。1] 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光看一看。随复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光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政变才行。

接看。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捆反 T, 而且他还问表：你为甚废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光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佯姿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姿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是搬较兵。想你支持表们的。我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纹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牧兵」石言，说明我和他意见相反，援来却被人引为我 r 蓄意反党」的证明。”22—黄克诚：《黄克诚自述》·页 249 — 250’

46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斋春（19 铭—1961）—鸟托年运动

周小舟在小组讨论中谈到彭的信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23

赵鹭陆（一机部部长）说，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建议书值得斟酌的是有个别问题的提法《如说缺点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分析不够，容易引起误会。24

陶鲁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事论，主要应看精神。一缺点的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有缺点错误，必然非「右」即「左」；大跃进中主要的倾向，肯定不能说右，当然就是 r 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

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出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总路线中的右和「左」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还是必要的。”

贾拓夫（国家计委副主任）说‘彭的意见书总是好的，总的精神是同意的，这会推动大会的讨论。上山时，自己脑子装了很多问题，在西北组讨论时，感到缺点讲得不够，应该在肯定成绩下把一个指头的问题讲深讲透，从而得到教训。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对今后的跃进是不利的。’

廖鲁言（农业部长）说：「我认为彭总的精神、态度是很好的，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了，引起大家讨论，这已经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至于信中的内容，有些问题的估计：例如『基本证实总路线是正确的』、『浮夸风吹还了各地区各部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不能同意。」

2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06。24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06。25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06—107。26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06。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刘澜波（水利电力部部长）也说：「关于彭德怀同志给主席的信，有意见就说的精神是好的，主席讲过多次，要大家有话就说，应当提倡这种精神。」

万毅（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参装备部部长）等人发言，也基本同意信中的内容和精神。

在小组会上，发表不同意彭德怀意见的如：

陈正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认为，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并不紧张】只有小部分地区紧张，市场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不同意彭信中「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的说法。

贺龙认为，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贺龙接着说：「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走火了。」张仲良（甘

肃省委第一书记)不点名地批评了彭信中的观点。他列举了甘肃省1958年的粮食和大炼钢铁的数字说:这些成绩说明「得不偿失」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失有得」的看法也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

陶铸说:「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裹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写的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因此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左』。这样就会把事情搞坏。虽然大家忧国忧民来提出问题,结果一定适得其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58—1,61)一鸟托年运动

王任重说,在经济建设中,究竟是「左」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的危险是主要的?从每项看来,主要的障碍可能还是右倾保守。他表示不能同意在经济建设中纠正「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的说法。他还说:「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批判。

3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张闻天

就在各组讨论对彭德怀的信,已经出现很多非难,甚至有说信的矛头是「针对着毛主席的」种种吓人说法,会议气氛明显紧张的时候,张闻天准备在会上发言。在7月21日之前,田家英曾给张来过一个电话,向他「通风」,要他如果发言的话,「大炼钢铁」的问题别讲了,因为「上面」有不同看法。21日上午,胡乔木也曾打电话给张,劝他少讲一些。才,张闻天也深知毛泽东「整人」的厉害,但是,出于公心的他,毫无顾忌,7月21日下午在柯庆施任组长的第二组,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讲了十三个问题:(1)大跃进的成绩,(2)缺点,(3)缺点的后果:(4)对缺点的估计,(5)产生缺点的原因,(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政治和经济,(8)三种所有制的关系,

(9) 民主和集中，(10) 缺点讲透很必要，(11) 光明前途问题，(12) 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13) 成绩和缺点的关系。较之其它人的发言，张的针对性更强，言词也更为尖锐。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田家英、胡乔木已打了招呼，「『大炼钢铁』的问题别讲了」。而张却特别指出：

游程中原：《张闻天传》口匕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叩）·页7的·李锐：《庐山 t 议实练》页 122 中说：「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早晨，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打电话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28 李锐；《庐山会议实绿》，页良 00，原文是‘在庐山时·张闻天的住处同彭德怀很近，早晚敌步常见面，交谈中张对彭谋到对毛潭东的看法：r 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J

第七章产山会议发生的 t 犬转折

「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走不妥当的。去年伶甚肤事情邻提「全民 1，甚至要求「全民写诗 1·搞得老实挂不胜其烦，所有的事情都搞「全民 J，相互问势始发生折突，有姿事劳妙枚挤摔。在悚钢追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郁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金责源·不知这有没有织矿，朱件还不那庆清这·就橘几千万人盲禹上由。·，一‘

张说，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如：基建战线太长；新增工人太多；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数据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物价有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没有到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懈豆不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 1958 年以前比，觉得今

天不如那时。这就是说·市场供应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外贸也很紧张。经济生活中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问题联紧起来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视。

对「产生缺点的原因」:张认为,总结经验时,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他说:

对朴主观和客亲、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牌残调到荒谬的程度。拎劲虽犬,但是强调得边了分,还反针讲朱件·这鱿造成了主观主义,达是达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奉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显望义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

中华人民兵和万史·第四专(1958—1961)一鸟托年运动

可能。好大春功也走好的,但要令乎实际·否...j鱿会弄巧成拙·欢速不达·好事变壤事,·...‘·

按照·鸟列主义学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这是针的。但是光政治铃师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介然达反客观经济统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升政治账。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显望·光凭政治上的妥求。早方提几句政治“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看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街是绝对的。]这是法则·当然是针的。但是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街,利用相对平街·按照相对平街办事。

如果说·上面这些观点,已经对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政治挂帅·群单运动一套进行了批评,那更为尖锐的是关于党内民主的盲论,直接指向了毛泽东本人。张闻天说:

主席常说,要秋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刷·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边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秋于妄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

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取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 过去一个时期却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扣白旗，有些卢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甚么这样呢？为甚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才刀把子、枪杯子，都在我们手边，怕甚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走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最后，张闻天对彭德怀的信作了表态。他说：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开孙统不大。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猖狂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且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之，张闻天的发言，无疑是继彭德怀的信之后】在庐山又爆了一颗重磅炸弹。

29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U另9年7月21日），载《张闻天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页322—323, 329, 330, 331, 338、341—3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卅春（195 名一砖 61）— 乌托年运动

三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集团

1 来自莫斯科的不和谐音

正当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的期间，莫斯科发表了赫鲁晓夫与中共不同的声音。

对 1958 年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苏联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起初对「大跃进」是热情支持的。新华社记者当年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说：

他们（指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工业企业）为支持中国的大跃进、及时供应机器设备，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常常可以看见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激动标语。工、农、行政和党组织也检查运往中国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情况作为检查整个生产情况的一项内容。对终中国的一些重点建设，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也率备提前完成订货。’ 0

1959 年 4 月 21 日，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谈到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总数为 166 个，在 1959 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 113 个。从 1959 年开始，除已签定的协议项目外】根据 1958 年 8 月 8 日和 1959 年 2 月 7 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 125 个企业的建

3D 《人民日报》· 1958 年 6 月 20 日· 当时，苏联几乎所有的经济区都有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其中有 86 个经济区承担的任务特别多，全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工业企业数以千计。‘

第七章庐山会让姿生的 t 大转折

设。”苏联对人民公社，则持较为谨慎的态度。直到 1958 年底，苏联领导人对公社的不同看法，才由西方开始流传出来，

1958 年 12 月 17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刊载的一篇文章披露了美国议员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12 月 4 日在克里姆林宫同赫鲁晓夫的谈话。汉弗莱就中国的公社问赫鲁晓夫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说：不，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赫还说，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甚么中国人选

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赫接若说，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并非反动的。苏联很久以前就曾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现在苏联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认

1959年1月，米高扬（Mikhail Mikoyan）访问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表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写的特稿，题为「米高扬说，公社在苏联的实验中失败了」。其中写道：米高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说，苏联已放弃了建立最近在共产党中国所建立的那种纯粹公社的工作，因为发现如果没有一种刺激性的制度、这种公社是行不通的。他说，俄国人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这样的公社，但不久就发现如果经济不发达，公社是行不通的。他说，除非有一种生产力非常发达的经济，否则要执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不可能的。他承认这种局面要在相当远的将来才会存在。如传在苏联革命刚刚成功之后那种贫困的经济条件下，纯粹的公社是行不通的。他说，马克思、列宁及其它共

31 《人民日报》，1959年4月11日。1959年2月7日，周恩来同铸鲁晓夫签订关于双方扩大经济合作的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合作于1959年到1967年间，在中国建设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制造等七十八个大型企业和电站。由苏联供应的设备、设计和各种技术援助的总值共五十亿卢布左右。中一方面将根据中苏现行贸易协议，向苏联供货商品。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56）》，中卷（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3），页205—206。32' 《内部参考》，1959年第2666号，页8—10。

47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曾春（1958—1961）—乌托邦运动

产主义哲学家们曾经承认！在到达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物质刺激是必要的。33

在苏联报刊上公开报道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是1959年7

月 21 日，《真理报》（Pravda）刊载赫鲁晓夫 7 月 18 日在波兰波兹南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赫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经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复，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合作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让我们来建立合作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大明白，甚么是集体主义和如何建设集体主义。合作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走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每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合作社都没有甚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儿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石。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农业改造都是从劳动组合开始的。我们也曾有过共耕组，它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你们的农业小组，同志们·我们在建设集体农庄方面曾有过许多困难·但是我们都胜利地克服了，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

33（内部参考）】1959 年 1 月 19 日。

34（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1959 年：月 15 日），（内部参考）· i, 1959 年，月 26 日·

第七章庐山会议后的重大转折

477

值得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这篇讲话，波兰报纸发表时，删去了有关公社的这一段话，而《真理报》则全文发表，明显是为了讲给中国「兄弟」听的。

2 毛泽东密切关注各方动态

对各小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他 7 月 10 日的第二次讲话，已对党内愈来愈多的不同意见，表现出不满，并把这些不同意见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对形势的认诚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光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画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 r 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灭称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沈是不仅膏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忽故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足甚么 2 失的是甚么 2 比如说·为甚么大跃进之徒又姿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予·不妥骂一顿了事。

毛承认现在有些被动，但不会因此垮台。他说：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抉点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频钢，塞本建设一千九首项，粮食增产一倍·办介社中刮「兵产风」。这叨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篡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教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街。为了三千万颇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姿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合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彼再办·食堂

4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专（1, 58 — 1961）—鸟托年运动

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社化之前就有了。

。食堂率备留它一半两边都支持。其实·

·也是好事。合共食堂在合

毛再次强调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甚废「观潮派」、「怀疑派」、r 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首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效一胜就革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抉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佃指头和一个指头的 yo1 题。要找问题，

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统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这次讲话，毛泽东已明确亮出了自己的底线，即缺点错误可以讲，但还只是局部问题。就全局而言，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他警告人们，在对形势的估计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

7月19日，毛泽东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6月20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四十五期上登载的〈否定和怀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一文批示印发与会人员研究。并将标题改为〈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6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以下四点看法：

（一）认为工业上全民炼钢是得不偿失，农业上粮食不够吃，市场上出

35 毛潭东在厦山会织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10日）·载《毛潭东传红 949—197 州》，下册，页 971—973’

36 毛泽东：《印发《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的批婚》（19”年7月19日）。载《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八需，页 3 弱。

第七幸 t 山会议姿生的重犬转折

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写的威信不如过去高了。《二）工业跃进了，农业没跃进·认为「工农业役有并举」，国家重视「重工业，轻视农业」。（三）政治跃进了，经济上没跃进。特别是对「以钢为纲」的方针有看法，认为炼钢算政治账可以，算经济账就不行了，其害处是，第一影响了秋收；第二，影响了工业生产；第三，砸了水车、锅·炼出钢来不能用；第四，国家赔了二十三个亿。「总之是劳民伤财，很不合算，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弄得全面紧张” j（四）认为人民公社 F 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

同日卜毛批示印发的还有。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1959 年 7 月 2 日给外交部并中共中央送来一个报告。其中说道；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在与我国有工作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还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谈论我们没有公开过的某些具体数字。这些议论的基本特点是抛开问题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成绩避而不

谈，专讲毛病，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但也有不少干部听了这些话后，表示怀疑或不同看法。针对情况，我们建议领导上考虑是否有必要对我们的实际情况，由中央、外交部向兄弟国家党或驻华使馆作统一的说明和解释，以争取主动。毛泽东将这个报告加上《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的标题，”指示与会人员研究。毛泽东把这两份材料批示印发与会人员，显然是要引起人们注意，现在国内外已刮起一股否定「大跃进」的风。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赫鲁晓夫在波兰发表的关于公社的讲话。

7月21日，毛泽东又将国家计委商业计划局1959年7月9日上报的《对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市场形势的估计和一九六〇年的展望》材料批示印发与员人员。毛批示说，「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并应研究。」

“商业计划局提供的材料内容是，（一）对下半年市场形势的

37 毛泽东：〈印发《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的批语〉

《：959年，月1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367•

38 毛泽东：〈对. 家计委商计局关于市场情况的研究材料的批语〉、1, 59年，月21日、• 载《建. 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八册，页371•

480 中华人民共幸国史• 第口春（19, s — 1961）一鸟托年运动估计。在中央发出六一指示和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手工业生产会议之后！市场全面紧张的状况即逐步停止发展。压缩机关、团体购买力已见效果，商品供应状况开始好转。（二》对1960年市场情况的初步估计。明年的市场情况决定于今年的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的全局是好的。因此明年粮食作物有可能避免出现类似今年上半年的过分紧张局面，但棉、麻等轻工原料供应估计仍比较紧张• 副食品、手工业品的情况则会比今年大为好转。在毛泽东看来，这份材料，无疑是驳斥怀疑、否定大跃进，把目前形势说得一团漆黑的有力证据。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后，同王任重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时，毛说「现在我不发言」。”但据《毛泽东传》所记毛泽东20日凌晨的谈话，似乎当时还没有下定批判彭德怀的决心。《毛传》中说：

7月20日清晨1时至3时半·杨尚昆向他（指毛泽东—引者注）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你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 I 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乏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责多责大这些气就是妥泄。齐、举备和那些「左派」·此是那些不显意承认错误·也不显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秘取各方面的意见。切

毛在这丧所说的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就是柯庆施等一批1958年的积极分子。他们在会上对当年的所作所为·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认真检讨，反而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一味护短、护身。

3, 李锐：《庐山 t 骄实绿》、页74·

40 杨尚昆：《尚昆日记》，上册，页412·吴伶西关于厦山会织的回忆，见《毛泽东传（1949—1956）》、下册，页g叩·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 t 大转折

481

然而，7月21日张闻天发言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于22日找柯庆施、李井泉等人谈话。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看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毛传》断言：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末，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对会议形势突变的原因也有分析。他说：会议已经开了二十天了，都想快点下山。可是·会议形势的变化，不在会场上，而在会外的活动。譬如：‘有天 S1J 澜波告诉我，村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村庆施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走一介书生·……我速忙将村庆施的话告欣田家英。田家英跟我使到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打庆施、李井来等挂师。他们组织人攻击〈议定记练〉·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周息。他们知这彭德怀

同毛泽东之间有历史上的宿怨，说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些话都是指肴毛主席说的。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还有传宫·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彭德怀在西北小组说的·华北座谈会 r 探了我四十天确 J，以及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的话·都传出来了。同时，在小组会对彭徒怀的信有看法而不表态的人·有的到毛泽东处谈了自己的意见：或者反映现在会议一个劲在泄气·指标愈低愈好，「大跃进」再搞不起来了”洛，

41 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42 《毛泽东传（1949-1956）》李锐：《厦山 t 曦 t 绿》

，见《毛泽东传（1949-1956）》，下册·页 983·页 1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5 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这些传到毛泽东耳边的话，对毛不能不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但李锐也认为，张闻天的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促使毛作 23 日讲话的「最后一服催化剂」。44

3 七月二十三日庐山风云突变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写道：「7 月 23 日早晨，通知大家开会，听主席讲话（据传，其它常委也同大家一样，是临时得到通知的）。」

“《毛传》中说，22 日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笔者查《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均无 1959 年 7 月 22 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的记载。至少没有第一手材料证明，毛泽东在讲话前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过。

在庐山的大礼堂，人们静听毛泽东开讲。他劈头上来就讲了一句气话：「仿打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然后说，会上发言反映出「两种倾向」，一种是触动不得，不让人家讲缺点；一种是感到有压力，不能讲缺点。然后话锋一转，说：

现在是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甚么例台？枕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这个材朴，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馆枢、罗隆篡、章伯钧为我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枕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压史上有问题，挨

44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127·

45 李锐：《庐山会议 t 录》·页 128·李锐在页 74 中还写道；田家英同毛泽东的保卫负责人王敬先·英文秘书林克及机要秘书等，都关系密切，有甚庆动静·田家英都 t 知道·

46（毛泽东传（1949—1956））·下册，页 983。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购 t 犬转折

483

通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历一批人·对形劳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二听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大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甚庆话都要让讲，再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念讲得一蹋糊涂越好，念要听。「夜看头皮顶住」·反右时姿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 · · · · ·为甚么要让人家讲呢 P 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甚废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一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甚么不硬 P 再非是一个时期绪肉少了·头蹙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帐·我看没有甚么可紧帐的。

如果说，上面这些话还是针对一般来说的，那么下面的话就明显指向了彭德怀信中的观点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彼。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青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坏庆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姿社运动。……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语说的「免朴实困的自向」；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桥了兵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肯产阶级称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实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褒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他们要办介社·办食堂，橘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桥，你能说这是小青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青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展、半冉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颇意的只 30%。总之，加喂 0、为 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然性，他们要搞·

4 以

中华人民共和闲史二第古春（1955 — 1961）一鸟托作运动

接养，毛泽东说了自从 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以来，各级干部对去年的错误已经作了多次检查。「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总到刈然后申明：

我就是人不肥我，我不忽人，人若肥我，我必犯人，人先肥我，我彼犯人。这个原 A1J·现在也不波弃。

毛泽东断言，现在有人对总路线发生动摇。他说：「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毛说党内对「大跃进」种人。「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

、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态度，有四；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

这叫甚么阶级呢才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才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朴 1956 年、1957 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懦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青产阶级，也不讲青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通来讲，耶时的反冒进·此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甚么性才狂然才青产阶级它不程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陆了。我们那

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淤是反奋进·《讲到这农·伪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 t11,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脾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华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这,没有那废深,但是也相当深·鱿是不讲奋了,不讲反霄这,可是有反曾进的味这,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辞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实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箠·是小青产阶级动摇性·是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 t 大转折

右的性质·往往是受青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实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嫌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才国家必垮台·统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瓌的,都登在报上·一定减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车领农民堆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F. 1 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 X. 1 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 ·一他们重复了 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同. 忽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练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合里,接近二十分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追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合里。这种同. 志月未驭边练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 忽不利。’ 7

毛泽束一口气讲了近三个小时,通篇讲话一再点到 r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J、「有失有得」,虽然没有点名,明眼人都心知肚明指的就是彭德怀。问题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距离右振不过还有三十公里 J,甚至把问题提到解放军跟谁走的吓人高度。对彭德怀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散会后，人们从会场出来，大多是心情沉重。黄克诚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彭德怀会徒还曾向主席说·他的信是供主席参考·不应印姿，但事已至此·彭

47 李锐，（厦山会议实录》，页 128 — 135。（毛潭东传 t1949 — 1976）》·T 册，页 983 — 986.

48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 — 1961）— 乌托年运动

的解释还能有甚么用’我对主席的购话，思想不通，心情况重；击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农，但却连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甚庆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厦思索，不得其解。”

毛泽东在 7 月 10 日讲话亮出底牌后，11 日夜晚，曾召见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还曾戏盲：「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对周小舟谈到 1958 年刮共产风、浮夸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r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等一些尖锐意见，毛曾表示：「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当时，毛与三个听者，一齐哄堂大笑，久久不息。49 毛泽东在批示印发彭德怀信的第二天，17 日下午 5 时到夜晚 10 时，又召见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李锐回忆说：追次谈话，还是毛泽东谈得多，也谈得很融洽· · · · · ·。一起吃晚饭，喝茅台，还敬了酒。毛说：关于总路线，真有 70% 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 30% 也不得了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昨天晚上我谈了（指组长会上）：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语时隔六天，毛泽东在 23 日的讲话，对周小舟等人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当天晚上，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在一起发泄一肚子不满。周小舟怀疑毛泽东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周惠也认为，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 1 反复变化太快。李锐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周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页八十度转

变J，使人转不过弯来。周小舟提议去找黄克诚谈，黄开始不同意，由于周的坚持，黄勉强答应。于是三人到了黄的住处，周小舟讲了斯大林晚年

48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49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50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页 252 — 253 •

页 62、63 页 69 — 70

第七章 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的话；李锐说了毛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劝大家不要激动，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毛泽东谈谈。这时彭德怀因军事电报来找黄，周小舟等三人当即离去。就在三人从黄克诚住处出来，碰见了罗瑞卿。这个后来被称为「二十三夜事件」，成了把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的一颗重磅炸弹。

4 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旧账

从7月23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许多人在发言中，都不同程度地作了检讨，尤其是原来对彭德怀的信表示过同情或赞同的人。即使像谭震林、李井泉的发言，也带有一点自我批评，对彭德怀的批评也比较和缓。谭震林说：自己重犯了「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的」。他批评彭德怀的信「是烟幕加毒气」。但认为彭德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些谁都是无法否定的。李井泉承认去年头脑确有发热；也有官僚主义。李井泉批评彭德怀的信，本质的错误是没有站在一亿五千万至三亿五千万的贫苦农民和九千万办钢铁群单的感情与要求方面来看问题。实际上起了否定总路线的作用。只有柯庆施的调子最高，他批评彭德怀的信，实质上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总路线的正确。并说：「从党的历史上看，只要路线错误，就非要改造党的领导机关不可，因为历史证明，凡是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王任重虽然没有点彭德怀的名，但强烈表示：右派攻击我们是「卫道者」、「歌德派」、「教条主义者」我们就是要保卫总路线，歌人民之功】烦人民之德！绝不能动摇。期间，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先后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周小舟则在小组作了

一次说明性的检讨。

对各小组这种平和气氛，毛泽东认为人们还没有领会他的意图。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51李锐：（厦山会织！录），页1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3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开，相互有甚么意见都讲完」敌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划清界线。，2

26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对事也要对人」的讲话。同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原国家计委的副局长）李云仲，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写给他的一封信。李云仲在信中反映，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毛泽东为此写了长篇批语，并加上了〈对于一封信的评论〉”的标题。

毛首先定性：信的作者搜集了一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对成绩方面的材料，根本不发生兴趣。其「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

然后，对信的作者的勇气作了肯定。毛说，与党内有些对成绩估计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趣越，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

接着，毛断言：

52 吴冷西．于庐山「会织」的回忆·见《毛泽东传（1949—1976）》1下册，页989, 53 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1959年7月2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311—351·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大转折

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物，统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姿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是实产阶级性质的。……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再须大惊，承担责任。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走错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石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走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

毛最后说，他的这些意见在 23 日的讲话中没有讲完，写的这些「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

为证明「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在党内外已形成一股猖狂进攻之势，以及必须与之战斗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毛泽东又于 7 月 27 日批示印发〈征西省委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材料〉；7 月 29 日批示印发，〈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三篇文章。“毛在批语中说：

54 这三篇文章分别登在《内部参考》】第 2830, 2831 期，1959 年 7 月 28 日胡乔木呈送毛泽东阅，第 2831 期《内部参考》上还登载了中央社 7 月 22 日一则消息说：《纽约时报》今天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则，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在《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看来，参鲁晓夫这番话「可以总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发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正确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变字未提」，《建腾以来毛潭东文稿》，第八册，页 3 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0）— 大跃进运动

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合作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甚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救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矜学原则合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才

8月1日，毛泽东专就印发赫鲁晓夫的讲话写信给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说：

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撰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跃进这，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才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s

毛泽东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以及所发出的战斗号令，使得庐山上的斗争迅速升级。人们纷纷表态，踊跃发言，朝着彭德怀、张闻天开火，以划清界线。

一有人历数历史上的错误路线：立三路线、一次王明路线、二次王明路线、高岗饶漱石事件，认为彭德怀凡紧要关头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一边。追究反对总路线，有其历史根源。一指责彭德怀思想上是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有骨气，不信邪」：以犯上为荣。说百团大战就是无组织无纪律。还有人提到会理会议，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问题。

55 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8月20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页32，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一重提延安华北座谈会批判彭德怀的错误：抗战战略方针上反对毛主席；打百团大战；执行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庆来对群众运动泼冷水；闹独立性。

’一猖狂进攻已经到来，不仅是立场问题，动机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是别有用心，是要在党内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炼，攻击毛主席。彭、张等看到气候已经合适，认为抓住了辫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账。

一而且还有个组铁问题：此次彭德怀是元帅，张闻天是副帅。一封信，一个发言，都带有反党纲领性质。锋芒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向党的衫注战书。

一有人甚至质问：「是否同国际朋友的影响有关系？」r 是否到国外取了甚么经回来了？」

与之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修订指标和讨论路线问题·为在中央全会上深入批判彭德怀定调。7月31日和8月1日，毛泽东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彭德怀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主要是毛泽东讲，算彭的历史账。

毛对彭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又说：彭「写这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林彪插话，完全同意这个看法。p, .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朱德第一个发言，他态度温和，仅就彭德怀信中的内容开始说了丧句。毛泽东认为没有击中要害，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停止了发言·接着，林彪发言，他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并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

56《彭德怀传》，页623—62457李锐：《厦山会织实绿》，页183”

中华人民共和国属史，第购喜（1958—1961）—乌托年运动

别人谁也不要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泽东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

不要打这个主意。、有组钻、有准备

」58毛。从右

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指7月23日讲话）说的不正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59毛还对看彭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压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机会到了，出去考察。到了湖南。

上海会议重，'k是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通，率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统是指你。……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北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60

把毛泽东这段话，与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风，要讨论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吸取苏联的教训；7月23日的讲话中提出，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联接起来看，他对彭德怀一直是不放心的。所以，黄克诚后来说，1958年毛泽东对军队整风的指示，「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1。」

以上林彪定的r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泽东定的f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向党进攻，就成为尔后中央全t批斗彭德怀的纲领性调子，

两次常委会后，毛泽东把列席的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给留了下来。说让他们列席会议，是为了受教育，不要再受彭德怀和那封信的影响。毛泽东对争取周小舟看得更重一些（周在延安时曾

《彭德怀传》，页624—625。

（毛泽东传11949—1976）》。下册。页995'《彭德怀传》，页626。黄克诚：《黄克诚自述》。页247。

鳃黔

独、牌

第七章庐山会议登生的重大转折

当过毛的秘书），希望他「不远而复」，「迷途知返」，不要「走远了」。“8月1日晚10时，毛泽东写信给周小舟，送上几句勉励他改正错误的话。信中说：

「迷辽知返，往哲是与，不达而复。先典攸高」，几句兄止迟典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米鲔喋血朴友于。朵绣

钊刃朴爱予，汉主不以为嫌〔疑〕·拢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批注。

信的末尾，又嘱：「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6，此前，7月28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话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告诫他们，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 1 要学 t 夹着尾巴做人。7月30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64毛保护「秀才」过关，是因为 r 秀才」还可利用，也是为了集中力量·批倒彭、黄·张·周。

5 八中全会定性为「反党集团」

从8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整整开了半个月·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七人，列席会议的十五

62 李锐：《庐山 t 议实录》·页 208。

63 毛泽东：（给周小舟的信）（1959年8月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 3 卯·

麟吴冷西·于庐山 t 议的回忆，见《毛泽东传（1949—1990，下册·页 996·

4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人。中心是要与会人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线，继续高举总路线的旗帜，并在组织上把彭德怀等人定为反党集团。为使会议集中力 t 批判彭德怀等人，毛泽东在 2 日和 11 日两次讲话定题、定调。他在 2 日的开幕会上提出，全会有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在简略地谈了修改指标以后·毛说：

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才现在有一些同志滋生怀疑。去年八大=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一个月了。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说

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产刘不他们不敢讲话。……复头才了解·为甚庆有些人觉得没有自向呢 P 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易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戚。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被壤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尚·是要砍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牛的工作(重点还在去年)。对朴去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 r 左」的倾向·r 共产风」不刮了,介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划,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不够了,这个民主远小了!现在枕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他们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有党夜表大会,早备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一现在要求民主·又是 1957 年那个要求大民主·犬鸣大放犬办论·这么一种形势。毛认为现在的形势是团结还是分裂的问题,他向与会的中央委员们提出:

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着这个命运,我们应蚕团结。现

第七章度山会议姿生的实大转折

在有一种分果的倾向。这种倾向,表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我当时说,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在国际上打壮界大战’一个是在国内把党分装开来。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了。我看不行,不应做分裂,我们应该团结。那庆,针朴私错误的同志怎庆辨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塞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恣前廖复,治病教人。只有这种办法。

毛最后再次强调说:

我们反了九个月「左 1 倾了,现在羞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石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看六亿人民的森鼻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在 11 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话，为彭德怀的「错误」挖阶级根源。他说：这些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犯错误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领袖，比如彭德怀同志】他这三十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发生变化，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这些就是彭德怀等这一次「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的由来·毛还进一步挖彭德怀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关系，说：

65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讲话记录《1959 年 8 月 2 日》、载《毛泽东传 {1949 — 1976})》：下册，页 996 — 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 — 1961）—乌托邦运动

高饶集团是在 1953 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 至 1953 年三年形成的。我们知这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 P”

毛泽东把党内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由来已久。1953 年 6 月：在提出过劳时期总路线时就批评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1955 年，邓子恢因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与毛泽东发生争论，毛批评邓子恢「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

“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个错误论点的初始·由此发展到 60 年代，作出：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论断。可以说完全是一脉相承。

期间，毛泽东还连续写了多个长篇批语和通信，对彭德怀，对所谓「军事俱乐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严厉批判·8 月 10 日，毛为印发中共安徽省委 1959 年 8 月 4 日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并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报告写道：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夹委员会寡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喊志们：澜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

66 李锐：《山 t 议实录》，页 287 — 283。

“毛潭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 年 6 月 1, 日》，载《毛潭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197 仰，页 81’

“毛泽东：〈开于晨业合作化问题〉（1”5 年 7 月 31 日），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卿），页 433 •

69r 军事俱乐部 J 一伺，是毛潭东在 8 月 2 日写给张闻天的信中提出的·信的开头说：r 怎历搞的. 你陷人那. 军事俱乐部去了. 」载《建. 以来毛泽东文补》，第八册，

页 3”，这就成了中共’ ‘届八中全 t 上追直彭传怀「反党集. 」的一条根据。

第七幸产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497

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实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波时期中·站在实产阶级立场·蓄谋被瓊裛产阶级专政，分果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饮布他们的影专，涣教无产阶级光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统足显明瞪据之一，……高岗集团的漏网残除·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朴姿难。7”

8 月 15 日，毛写了〈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批语。其中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 2 你们是不愿意趁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 J，又是「好大喜功 J，「褊听偏信 J，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为」，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这转湾（弯）」，「一转湾（弯）统是一百八十度 J，「骗 J 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钩出来 J·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实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速珠炮·把个庐山几乎森拌了一半。好休

伙·你们哪东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则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卜·……你们看凡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 f. 1 汉诺夫!批判那些「实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青产阶级和依附朴它的小青产阶组民主派的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鸟分 7,

70 毛泽东:〈关于右叹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1989 年 5 月 10 日》·载《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 431·

71 毛潭东;《开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化 959 年 8 月 15 日】·载《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八册,页 447 一纠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一鸟托牟运动

8 月 16 日,毛再写〈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更作出吓人聘闻的断言,毛说: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通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斗十年,可能要斗半个廿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一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偶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还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遭他们历史的复杂卡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7’

在毛泽东一系列的讲话和批语指导下,会议气氛进一步升温·最激烈的场面,就是追逼「军事俱乐部」和「斯大林晚年」的斗争。且不论短兵相接的质问,仅从会议简报刊登的发言可见一斑:一彭德怀反对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并不是对着我们的,正是对着毛泽东的·一彭否定总路线,就是否定中央领导;彭德怀拿匈牙利作比是严重的,可怕得很。因为他是国防部长,意思就是说:人民起来闹事,我军队就不跟中央,不归中央了,你们去请红军吧·一彭的信,到处是伏笔,他们是恶意的,是反上的恶意·一彭这次向党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的信中有很多暗语。一彭这次出国访问中是否向外国人透露了他自己的观点,以致赫鲁晓

夫在波兰公开讲他对人民公社的看法。

——这次事件·彭德怀是主帅，黄克诚、张闻天是两相，兴师动众：向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猖狂进攻，这是一次非常恶毒的篡党阴谋·

72 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1959年8月16日），载《建·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451—454·

第七章 庐山会议发生的大转折

——张闻天的发言，和香港报纸言论差不多，甚么「困难」、「紧张」、「毛泽东下台」等等】所不同的是，香港报纸及右派是怀疑，张闻天是肯定。

——彭德怀的信与张闻天的发言，是一个向总路线进攻的纲领，他们企图以这个纲领来代替党的正确的总路线；他们的锋芒是直接对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其目的是企图分裂党的团结实现他们的恶毒阴谋。所以，这次党内的争论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彭德怀与张闻天代表着党内的一小部分具有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动摇分子，与党外的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遥相呼应。

’ ——一次以彭德怀为主帅、张闻天为副帅发动的向党的猖狂进攻和分裂党的活动，有这庆几个特点：（1）军人挂帅，文人当军师，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党纲领；（2）锋芒是直接对着党的总路线、党中央和毛泽东的；（3）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重新结合，卷土重来，但主帅是经验主义者；（4）选择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大有猖狂进攻之势的时候，也就是在党遇到暂时的、局部的困难的时候，进行反党分裂活动。——黄克诚，你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把毛泽东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甚么不气愤？为甚么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甚么不反映？你们究竟要搞甚么鬼？”

对当时的批斗场景】王任重任在日记中说：

自八中全会开始以来·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三个大组，李井来小组针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戚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这样尖锐的斗争终迫使彭、

黄、张不得不承认一姿错悞。特别走 8 号以彼悵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彼·形势急转直下·周急、n 李锐：（庐山 t 论实录》，页 232 — 233’ 之 35’ 236 · Z 方。

5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嘱丈‘第齐专（1, 58 — 1961）— 鸟托年运动
李锐交待出他们和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氛围和巨大压力下，从 8 月 13 日到 15 日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不得不在大会作无休止的检讨。

，彭德怀、彭德怀在当

年的笔记，1962 年的申诉和 1970 年写的自传式材料中说：

7 月 26 日，我出席了小组会，针我 7 月 14 日信内的「小青产阶级露热性 J 作了检讨。· · — 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表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表的检讨之复，心情十分不安·多庆难过啊！真如万箭穿心似的· 7，

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甚么就给甚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舟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当年的处境和心情，黄克诚有过如下记述：

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 r 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组会上邢庆理直气壮地办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括·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朴是·「阴谋家」、「野心家」、F 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英辨·跳进黄河洗不清，心哀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

:4 王任重日记 11959 年己月 21），见（毛泽东传 f19 约— 1”6))

75 《彭德怀传》，页 619 — 620，

76 形德怀：《彭德怀自述》，页 278。

77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页乃，一之 60。

下册，页 1004 •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关于张闻天的心情，他的秘书有一段回忆：

8 月 9 日，闻天同志从会场回来，心情况 t，没有讲话，却又坐上车于，让开到牯岭镇外的山中。我跟去了。在苍茫暮色中，他仲立在一块巨岩边，望看逐渐暗淡而模糊的这方。许久，他 • 良慢回过头来 • 说：他们在追「秘密反党计划」 • 好像谁先发官，谁彼姿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I 又说：这种做法危险—没有甚庆材斜，想这样适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来。他眼中流露出鸡言的愤激和疑应。我看他为自己受错泪批判的痛苦倒不是太大，一片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才使他感到特别的，惘然。？ a

周小舟对会上无理追逼的情况，在 8 月 13 日写信给毛泽东，坦言自己的内心痛苦。他写道：

雄论结果，我铃然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成员之一同时我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谁论结果，又必然作出肥右倾机者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 • 一而解刹我们自己 • 彼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沁确有出入。我想到偃芳戴上这样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贝和人民 • 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妙项说我肥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 •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缘错误，然后再说下去，势必泪清清下，不尽欲官。7，

对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竟然出现如此丑恶的状况】也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的李锐感叹说：

78 李锐，《庐山 t 议实绿》，页 2”；程中原：《张闻天传》，页 759 • 79 李锐：《厦山 t 钱 t 绿》，页 249 •

5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 — 1961）—乌托邦运动

这十多天会，我心理状恳极为复杂，表觉得很悲亲，我想 • 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议，怎庆竟没有一个人敢朴出来讲半句合遭话呢。’ ”

8月16日，全会通过四个决议和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指责：「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活动，由来已久。」他们「在厦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判定「彭德怀同志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因此决定：「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但仍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80 李锐，《厦山会议实录》·页265。

81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三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1年11月：页119—120。彭德怀·1959年11月29日被迫害致死·1961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恢复彭德怀是优秀共产党员、老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军队杰出领导人的名二张闻天，1959年7月1日病逝，1961年8月14日，中共中央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庄股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黄克诚，1961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被选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常务，1980年6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调查报告》指出：「根本不存在黄克诚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周小舟，1961年12月26日在广州含冤辞世。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厦山会议的是非正式结论说：「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开展了反」

右倾斗争。八届人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案是完全错误的。』

第七章庐山会议引发的重大转折

毛泽东在全会闭幕会上讲话说：「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

8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宣布了政治局常委会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一、决定撤销彭德怀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二、决定撤销黄克诚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和秘书长的职务；三、决定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四、决定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和秘书长；五、撤销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刘少奇做了主要发言，主题是读扬毛泽东·称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主张积极地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说，

在苏共二十大以来·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统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甚么「斯大林晚年」，甚庆「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来·他就一贡要在中国搞反了「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从高某必个人的威信。在七大以前，表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 · · · · ·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 t· 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来·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

8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八中全会闭幕 t 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传（1, 49 — t976）》，T 册·页 1 叩 6、1 阙 a·

B。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1，。 ， — 1, 76）（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 ， 。 J

• 转引自 • 页 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 58 卷 (1958 — 1961) — 鸟托年运动

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被破坏活动。‘，

毛泽东最后讲话，肯定这次会开得好。但不要以为经过这次斗争，就会风平浪静，还要有刮政治台风的准备。他说：总的形势是好的。国内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总的形势是好的，有缺点，可以改，并且不难改。但是路线问题的争论和斗争，是否就此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了呢？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大多数、绝大多数，除极个别少数之外，是团结一致嘛。……但是也要估计到，不会是那么风平浪静，要风平浪静一个时期，是完全可能的。另一个时期要准备刮台风的。这个政治台风将来甚庆时候来呢？我就料不到，但有台风要刮，这可以断言的，不会没有的，有阶级存在嘛。在一个省，在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要有准备。 “

从 7 月 2 日到 8 月 16 日 历时四十六天的庐山会议，到此最终落幕。庐山这场斗争，使 1957 年在错误地划定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的基础上，得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又进一步升级，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错误地断定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这就是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

在中共中央全会上，采用有罪推定的逻辑，强词夺理，不容申辩 • 把彭德怀等敢于讲真话，向中央反映自己意见的高层领导骨干 1 打成「反党集团」，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斗争方式，就使中国共产党内从此跌入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把维护毛泽东个人的威信看成就是维护党的威信，就是维护全党的大局，因而进一步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就为后来毛

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页 318 — 319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 320 — 321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泽东得以「无变无天」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总之，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不只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个人悲剧；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悲剧。

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教训时】邓小平指出：重要的问题是民主集中制，在党中央「没有形成的完善的制度」•「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类家长制，不断滋长。」弱陈云说：「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由此可见，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实际上是共和国历史出现逆转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四全国范围的反右倾斗争

1 军委会议追通军事俱乐部

为肃清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进行揭发批判•毛泽东在8月11日的讲话中就提出：

是否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才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如要开就蚤通知。（周恩来：小组很多同志主张开》我是赞成开的•因为不是讲要「民主」吗？

86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二卷
d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04，

8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13—1995）》

载《邓小平文选》•第下卷，页2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8—1961）—鸟札年运动

扩大「民主」吗？「集体领导」嘛！军队农烦表布这些毒素•「俱乐部」的毒素，不肃清是不好的。我主张开•每恤来两个人，恤长同政委。……大概最多开半个月，两个星期或十天，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单纯••总

因此，8月11日当天就发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8月18日，会议在北京举行。到会人员是：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到会；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到会。此外，全军军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89

会议由林彪、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组成大会主席团领导，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萧华任正、副秘书长。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军事俱乐部」问题。前十天是听取关于庐山会议情况的传达；阅读会议主要文件。24日，周恩来应大会主席团的要求！在会上作关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旬从8月29日起，由原来十五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

彭德怀参加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根据庐山上揭发批判的路子，人们仍从历史到现实：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一、三军团的关系到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对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彭德怀传》有如下叙述：

88 李锐：《庐山会编实绿》，页？94—2 弼·

89 《彭德怀传》，页 635。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 州页 299 中写道，r 参加军委编大 t 织的，有来自全军师级以上单位领导干部 1061 人有关人员 508 人列席·」

90（周恩来传（1949—1976））·页 1 开 5。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9月3日，会议集中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因为这是毛泽东最先提出来的，彭德怀不得不耐' 0 对待，露真回答·彭解释说：

「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上首先提出来的，说『怎么搞的，你跑到军事俱乐部去了』，并没有具体指出还有甚么人。其实，『军事俱乐部』组织是没有的，只是我们几个对问题的认识上观点比较一致，事先并没有甚么策划。」

会上不断有人起哄，逼彭交代「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等。在轮番追逼之下，彭德怀气愤地说，「如果有这个俱乐部，那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四个人，·其它再没有了。」

有人喊：「你敢说真的没有了？」

彭说：「没有了。因为他们谁也不愿意来报名嘛」全场大哗，人们批评彭「不严肃」，「不老实」

彭无奈地说：「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甚么好处！」，后来，彭德怀在追述这段追逼「军事俱乐部」的经历时写道：

对朴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退现象·特别以复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检大会议期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早，此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号：「你快交我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退得我气急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来报名嘛！」有几个同志说我「大顽固」，「太不展书」。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徒·我就想把表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书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看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91《彭德怀传》，页开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不能冯1供甚庆「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早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横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之

会上追逼的另一个问题是所谓「裹通外国」·在庐山会议上就有人提出：「是否同国际朋友的影响有关系？」「是否到国外取了甚么经回来了？」军委会议专门用了两天时间进行揭发追查。彭德怀深知这个罪名的政治份量，他要求揭发者拿出事实来。对所谓彭曾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受到过单独接见的的问题。彭德怀详细地提出了每次会见的时间、地点、陪同人员和翻译人员名单。彭说：「我根本不懂外语，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的翻译，要裹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期间，罗瑞卿奉命将随同彭德怀出访苏联和东欧八国的军队高级将领：王树声，张宗逊·萧华、杨得志、陈伯钧、陈熙、张学思、路杨、朱开印等人召集起来，进行揭发。并采取会上揭发与会外调查（向同时进行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核查，向有关驻外使馆发电要求提供证明）相结合的方法】力图突破。”但直到会议结束，仍无结果。对这种无中生有，凭空诬陷的恶劣做法·彭德怀悲愤至极，他在后来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中说：「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这样丑恶

的罪名加在我的头上，使我难过极了。」，

在揭发所谓彭·黄搞宗派分裂活动「挑拨一三军团关系」问题上，突然冒出了一个三军团杀害一军团干部的问题。

时任空军政治委员的吴法宪（中将）站出来揭发说：「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Jr 彭德怀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的血债！

92 彭德怀，《彩旧瓌自述》，页 278 — 279，

931”9 年追查彭德怀所谓「裹通外。」的直接受害者之一是 t 时跟随彭德怀出访苏联东欧八口的首席俄语目译赵仁堂（时任中·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细译室主任，大尉军衔）·因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无奈自毅身亡，年仅二十九岁·

941962 年 6 月巧日影总怀给毛潭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转引自《彭亿怀传》，页 642·

第七章庐么会议姿生的重大转折

509

是他下令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坐在主席台上的林彪插话：他恨不得一口吃了一军团，通统杀尽！因为一军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

对这种颠倒是非·血口喷人的揭发，会场上马上有人起来反驳。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锺伟（少将）高声说道：

《彭德怀传》中还写了一件事：「在 8 月 28 日的综合组小组联席 t 议上·有人说红军畏征到达哈达鲈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一三两个军团编为两师·因一军团干部较多，就抽了两个人到三军团去参加领导工作。部队向陕北进军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战士·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到了汉族居民地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当时·后有追兵前有敌军堵截，红军处境危急·为了迅速制止部队逃亡的恶劣倾向，三军团曾以叛变革命的名义处抉了个别逃跑的干部·以致部队上下议论纷纷，怀餐这是一军团派到三军团的领导干部干的·刚经过整编的一、三军团关系变得很紧张，出现了不团结的倾向·」「原三军团的黄克诚，当时是陕甘支队第二师政治部的裁判所畏：处决人的事都是要经过他的。现在要清算破坏红军团结的 r 罪行 J, 当然算账首先就算到他的头上。发盲人指责黄克诚是破坏一三

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r就在揭发人慷慨激昂发育的时候，北京军区参谋畏锺伟突然站起来说道：r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1红军离开哈达铺以复·是我带看一个营在彼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这事××同志都知道嘛！Jr钟伟这个发言，引起t场一阵议论，立即这到『围攻』·」《彭德怀传》，页643。当年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由红三军团组成）第十一大队政治委员的王明（即王平）回忆说：红一方面军北上途中·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一些过激情绪，特别是在哈达铺整编以后，原红三军团的一些干部和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过·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二纵队（即原三军团）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烟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行军，掉队人员增多本属正常现象‘但是红一军团来的干部和政治保卫机关却绍为这是情绪不振，甚至怀疑掉队的人t投敌叛变·……据我和黄克诚回忆·当时保卫局卢决的有原红四师管理科长丘湘，曾在我团当过参谋畏的康胜扬·原红十团卫生队政委，企贵等·还有一些记不起名字了。t企贤就是因为卫生队丢了丧个病号而被处决的·黄克诚那时是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处决人他拒绝签发布告·但这都是上头保卫局决定的，优管他不签发，别人还是以他的名义发了布告，1959年厦山会议·又把军事裁判所公布的处决命令、全部算在黄克诚账上，这是建背历史事实的·非常不公正的，王平‘《王平回忆录》目匕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页125·

5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酋客《19 巽一 1961) — 乌托邦运动

胡说 I

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1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拎的。彩总不在织，也不知it这回事。现在要说清绝，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 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今检毙他！理尚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

他就会反过手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挫败娄山关的战斗中，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那个队长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们复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护。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蚤言者面向林彪）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战士们都打红了……这本来是不正为怪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甚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压史旧账，制造事端，桃桥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休，加害朴人，他好在一旁幸灾乐祸。’，’

锤伟当面驳斥林彪和吴法宪，为彭德怀辩解，显然不符合会议的要求，并为林彪所不容。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史进前当即奉命带领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将锤伟当场逮捕，戴上手铐，架出会场。这时，林彪讲话说：

锤伟事件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他这新户定时炸浮」自我爆炸，是按预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这证明我们这次会开得是成功的，是有收获的。他要爆炸，总比不爆炸好。等他钻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我们与彭德怀及其死党的斗争，不能局限朴他们的某件事，某些言论，不能凭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线高度去认识，去分析，去批判！与他们决裂，首先要从思想感情一刀两断，你感情上恨不起来，认识就上不去，觉悟就提不高。’，

96 辛子陵：《毛泽东全传》】卷四（香港，利文出版社，1999），页2
兴一 29297 辛子陵：《毛泽东全传》，卷四，页铃3•

第七章产山会议姿生的 t 大转折

仗义执育的锤伟，就这样被定成了彭、黄反党分子，从9月5日起，t议又划分为五个小组。其中第一组负责查邓华的问题“；第二组负责查万毅的问题；第三组负责查洪学智的问题“第四组负责查锤伟的问题。

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邓华（上将），也因为为彭德怀讲了几句公道话，认为彭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希望中央能宽大处理，并认为说彭德怀是「伪君子」不合适，他举例说，在朝鲜前线一次为彭德怀杀了一只狗，吃饭时，彭得知是专门为他做的。战士们并没有，因此，他根本就没有下筷子，这时大家谁也没敢动那一盘狗肉。最后，这盘狗肉

焊是送到侦察连给战士们吃了。邓华说，在几十年战争中，彭德怀跟战士们同甘共苦，是表裏如一，首尾一贯的。怎庆一个人一犯了错误，优点也变成了缺点？为此，黄永胜主持的小组追逼邓华参与了「军事俱乐部」的问题，黄永胜说：『高（岗）、彭就是个反党联盟啰，彭黄也是个反党联盟啰，高彭联盟中你是个成员啰，彭黄反党联盟中你是个重要成员啰。你的错误性质就是反党反中央的。』其它人跟着追逼说：实质上是这样，不承认不行。这时，打了一辈子硬仗的邓华将军被逼得流下了眼泪，极其委曲地表示，「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要说我反对中央和毛主席，说不过去嘛！我自己本心产生不出反对毛主席的念头……」黄永胜说：邓华同志这条他现在接受不了，我们大家让他考虑考虑再作检讨，我们小组通过《阅于邓华同志问题的小结》。邓华再次表示：「这一条我接受不了。」黄永胜不耐烦地说：「在逻辑上说不过去！我们这个小组就这样了！」小组通过。」”万毅（中将）本与彭德怀并无历史关系和个人交往，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参装备部部长。因随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于7月15日上庐山向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工作，赶上会议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万毅参加第六组的讨论。7月22日，万毅发言说：「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主要问题提出来，对此次会议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斗的。但是9s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304；辛子陆‘《毛潭东全传》·卷四，页293—2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呀专（19哭一王96U—鸟托邦运动

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 如果再多说几句话，多加分析就清楚了。」就因为这个发言，万毅被划进了「军事俱乐部」成员。

洪学智因与黄克诚关系较深，与彭德怀也关系密切，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洪学智为副司令员负责后勤工作，曾得到彭德怀的夸奖，说过朝鲜政府授予他的勋章应该给高麻子（高岗）洪麻子（洪学智）·洪在会上对彭、黄的问题又很少揭发。于是也被围进了「军事俱乐部」的圈子。如此，军委扩大会议就把邓华、洪学智、万毅、锺伟四人打成「军事俱乐部」的彭·黄反党分子。

批斗黄克诚时，曾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的吴法宪（时任空军政

治委员)，揭发老师长黄克诚「贪污 j 黄金案。」黄克诚向来被人认为清廉、克己，忽然间成了个 r 大贪污犯」（尽管熟悉黄的人并不相信），会场顿时又像爆了一颗炸弹。黄克诚当即写信给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罗瑞卿率领一批人亲赴湖南，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查对，因当年负责经管黄金的漪徐文一直将账簿、单据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当年经李富春批准由东北带一部分黄金到湖南的字据也在，结果甚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这样也就不再提及此事。黄克诚才得以解脱被诬陷之罪。林彪在会上还攻击朱德，诬织说：「朱德，你当过一天总司令吗？没有，仗都是毛主席指挥打的·……」朱德被迫在会上检讨：「对彭黄张周的反党野心家的本质认识不够，光从好的方面去想，认为他们已经改过了，同时和他们在思想上又有共同点，所以这次我同样表现出嗅觉不灵，没有及时识破他们反党阴谋的本质。Jr 有几位同志指出我有个人野心，我本来是不同意这种批评的。但再想一想，我既然同毛主席和其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的同志在思想上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上，曾有六七次没有站在

99 抗日战争期间，黄克诚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在扣匕抗日根据地经济上有相当积巢，1945 年抗战胜利复由州匕哄赴东北时，将部分经·兑换成了黄金”东北解放复·黄克诚调任翻南省委书记·。李富春批准，将刺录的钱带到了湖南，·复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黄克诚：《t 克鲈自述》·页 2 郝一 265”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方面……既然如此，那么，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我愿意接受这个批评。」100

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讲话，批评彭德怀不赞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说他「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在 r 七大 J 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

9 月 12 日，大会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按照庐山会议的定性，把彭德怀、黄克诚诬为「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

阴谋家 J，「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这次向党进攻完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是他们个人野心发展，利令智昏，不**听党的劝告，无视党的纪律的必然结果。**」要求在全军「彻底**分清彭黄在军队中所散布的毒素和恶劣影响**」

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解放军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各大军区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参加会议的人数达 28691 人】占全军团以上党员干部的 63%。期间，各省军区和师、团则召开排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两会」精神，联紧本单位批判斗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J」。据统计，截止到 1959 年 10 月 19 日•全军受到重点批判的党员干部有 847 人。到 n 月底，全军共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 人。其中团以上干部 195 人，占 10,5%。

2 外事系统追查「裹通外国」

在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同时，8 月 24 日，外事系统由陈毅主持召开揭发批判张闻天的会议•根据统一布 1 时辛子陵：《毛挥东全传》•卷四，页 296 — 297。

101 李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上册（畏赛：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页 35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四喜（1958 — 1 弼 1）— 鸟托年运动

t，除了翻历史老账，大会小会就集中■在所谓「反党集团」和「裹通外国」这两个问题上。「裹通外国」追逼特紧。在厦山上就曾有人质问过这个问题，张闻天严正声明：「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

28 日，张闻天向大会写出书面检讨，其中说，在厦山同彭德怀交谈中曾说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不易提不同意见，不民主。」两人都说过毛泽东「个人说了算，集体领导不够！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9 月 5 日，向大会写出第二次书面检讨，其中回答所谓「裹通外国」罪名说：如果说，在「思想观点上」苏共领导者和我之间「在反对我党总路线」这一点上有「共同点」，因而认为从政治思想上说我有裹通外国的表现，那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说，在组织上，即情报关系上，我有裹通外国的问题。男仔我是不能接受的，因

为根本没有这类事情。」103 对会上如此蛮横无理的诬陷，张闻天痛苦至极，他回到家裏，对夫人刘英说：「说别的甚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 r 裹通外国」，真是冤枉！J 不禁潸然泪下。9 月中旬，张闻天因连续遭受折磨，血压猛增，前列腺肥大症状加剧，出现尿中毒被送进医院。自此，对张闻天由面对面的批斗转入项目审查阶段。但外交部反右倾斗争，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继续穷追猛打，使许多人受到株连。曾跟张闻天工作较长时间，或者先后跟张闻天当过秘书的，或被认为同张闻天关系密切的干部—刘英、何方、徐达琛、李汇川、许文益被打成为「张闻天反党宗派集团」的成员。

3 历历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毛泽东在 7 月 26 日写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就曾断言，现在党内党外的 r 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

102103

张闻天 1959 年 8 月 9 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程中原：《张闻天传》

张培森主编：《强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1 州 n

页 765·页 1156、1157

第七章庐山会让姿生的 t 大转折

有猖狂进攻之势」。‘0’8 月 7 日，经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更认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中共远宁省委接到中央的反右倾指示后，当即两次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贯彻执行，并于 8 月 9 日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 12 日即批示印发，「将」了各省一军。毛泽东批示说：「

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才辽宁那样的反右倾、纹干劲的部着，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 2 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寺在着·增长看。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参地方毒在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独狠进攻的形势。铃烦按照具体情沉，加以分析，把这种歪气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朴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叩

8月14日，中共中央将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转发各地，要求「参照办理」。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的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全体将领，必须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站稳立场，划清思想界限。于是，各级党政机关的反右倾斗争随即展开。

104 毛澤东：〈对于一封个的评论〉（1959年7月2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文稿》！第八册，页379，

105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1959年8月7日）·较《建国以来，要文选编》，第十二册1页496”

106 毛澤东：〈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1959年8月12日），载《建国以来毛澤东文稿》，第八册，页43s。

107 〈为保卫写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1959年8月16日），较《建国以来要文选编》第十二册·页511·

5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6—1961）—鸟托年运动

各机关的反右倾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方式是通过传达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讲话，开展鸣放辩论，自我检查和发动群众揭发，进行重点批判，最后组铁处理。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有四条：一、公开散布系统的右倾言论，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二、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三三、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四、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 / k 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处理办法是：一、对情节严重而又态度恶劣者，撤销其行政职务，党内给以留党察看的处分；个别坚持错误，

顽抗到底者，开除党籍，令其转业。二、对情节较重？但检讨较好者，或情节较轻，但态度恶劣者，酌情撤销其党政职务或部分职务，并调离重要工作岗位和要害部门。108

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反右倾斗争的情况】以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为例，到10月12日·在北京的机关干部中，确定重点批判对象472人，占干部总数的7.4%。其中处级干部四十二人，占处级干部总数的26%·109但当时认为，各部门运动的开展还不令人满意。10月19日的《情况简报》第102号反映说，目前对运动领导的情况是：领导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决心，也有办法的单位大约有80%；群众已经发动，但领导缺乏决心和办法的单位大约占10%；群众既未发动起来，领导本身又怯于斗争，致使运动进展迟缓的单位也占10%。毛深东于10月22日指示彭真、杨尚昆，要他们对中央直属机

江08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1959年11月21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上卷·页351·109中共中央批转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关于开展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的情况报告（1959年10月20日）

第七章庐山会议发生的重大转折

关的运动，「抓紧办一下，使这个斗争深入下去」。110这一抓·很快有了「效果」11月19日的《情况简报》中刊登〈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日益深入〉，文中说深入的表现是：群众发动得愈加广泛、深入；重点对象增加，批判也更加深入细致；领导核心健全有力。同时要求：继续大胆发动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开展斗争对重点对象要有计划、有步骤、深入细致地进行批判必必须有始有终，不能煮「夹生饭」。111据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向中央的报告透露：在这场反右倾斗争中，被作为重点批判的对象有1900人，其中司局长以上干部287人。‘12另据不完全统计，重点「帮助」了2714人，224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对中央机关反右倾运动的具体情况，龚育之在〈我的第二个上级—怀念秦川同志〉一文中记述·“

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一时之间，秦川成了中宣部农的风云人物。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58年狂热的欠跃进徒，1958年底1959年初党中央开始注意纠正大跃进中的「左」”面对「六亿」人。的宣传处长秦川，常常下农村下工厂调查研究，比较了解实际情况，对「左」的错误有较多的觉察，对错俱的彼果有较深的忧虑。秦川写了一个四川调查，还做了一篇内辈讲话·可惜现在我手头都查不到了·只记得其中的独特之处，是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个尖钋问题：民主革命，起义·打仗，有胜利，有失败，看得清楚；建设执会主义·是不是也有胜利和失败P大跃进的超高指标没有完成·还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被瓌，算不算一种失

110 毛潭东：〈关于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问题的批语〉（1外9年10月2z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557。

111〈中央·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日益深入〉，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1月1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户4期·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5舛·nZ《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绿》，第二卷，上册，页401

n3 刘友于等：《中·20世纪全史》：第人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 阨1j·页讨7·

中华人民共和国辈·第·春（19 铭一”61》一鸟托年运动

败？这问题提得参人深省。但是·庐由会议一转向，狠批杉、黄、晕、周·狠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中来批到全党，在中宣部农，秦川鱿首当其衍了。辨介楼农大字叔锈夭盖地，说秦川的报告和讲话不懂「从东海龙王界农搜罗来」很多「皮击」大跃进的材料，而且抛出一个理论，大字报上把它概括，上网为 r 裁会主义失效论 J。社会主义还能失败分室传这样的理论，那还了得2朴是，秦川成为部农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除了秦川以外·还有好几位同志，大都是比较深入实际、了解民酸的干部·也落入反右倾的网中。戴临风同志·已经调往广翻事业局了·调动手续还没有辨完，回到机关，看到枇秦大字报·说了几句为秦辩护的话·被人听见·也被端到大字报上来·受到猛烈秤击。这场运动·中室部落鸡共九人，大字报上曾经很伤人地称他们为九练「大鲨·鱼」

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的反右倾运动】也打了一批所谓「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早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罪行」是：1959年7月初，张恺帆到无为县检查工作，下令解散食堂，向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政策，并要县委向下贯彻。违背了中央和省委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办食堂的方针政策。1959年9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恺帆、陆学赋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给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的处分。。福

n4 与育之“〈我的第二个上级——怀念秦川同志〉，载《党史札记二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 伏舛）·页 237—238·反右倾复·秦川被下放农村劳动，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复被安排到工交政治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任党委。记·1952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83年任社长·

11519 屹年6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恺帆同志问题的甄别结论》，决定撤销1959年的错误决议，恢复张恺帆的籍贯、姓名和原职务。同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圣察委员会批复：表示中央同意安徽省委「对张恺帆同志的甄别处理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页4较、4的·

第七章庐山会议引发的惊天转折

建、青海、湖南、黑龙江·辽宁等省也都有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厅长、局长、地、市、县委书记被打成「反党集团」、「反党分子」的。截止到1959年12月10日，湖南全省县级以上机关、单位共揭发出重点对象4696人，其中1630人初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它各类分子，占参加整风干部的1.96%。，据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在整风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斗的干部有3万多人不被划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干部16200人（其中科局级以上干部1738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干部189人。中共四届“省委扩大会议，揭发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六十一人，占到会总人数的3.87%·浙江省被确定为重点对象的，占省级机关党负处长以上干部的

4.6%；在县委委员中，占 4.5%；在公社党委书记中，占 5.2%。在农村，「反右倾」斗争的主要方式是整风整社。主要批判对象是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批判的重要内容，是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各地为纠正「五风」实行的政策措施，如，「包产到户」、「地段责任制」、「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家庭副业等。中央分别批转河南、江苏省委和农业部党组的报告，认为上述措施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要求彻底加以揭发批判。‘17 湖南省规定农村进行重点批判的对象，应占农村总人数的 1%，每个大队集中批判三五人。广东省召开的县、社几级干部会议，被重点批判的基层干部占到会人数的 3%，生产队一级干部占 10%左右。

在工厂除重点批判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满的「右倾言论」外，还批判一些领导干部的「一长制」思想，说这是不要党委领导，反对政治挂帅和群单运动。在职工群众中，还对被认为「忘了本的落后变质工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批判。

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斗争的主要对象是「传授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许多党员专家被认为以专家资格反对党的领导和

1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上册，页 3 “·

；17 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1959 年 10 月 15 日）·

5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群众路线，受到批判和处分。北京大学参加整风学习的 128 名党员骨干教师，多为校系两级领导，其中二十七人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占 21%。清华大学参加运动的 174 名党员骨干教师，有十七人被认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以专家自居，不服甚至反对党的领导」这次反右倾运动，错误打击干部和群众的规模，超过了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据 1962 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人数更大，截止 1962 年 8 月，全国得到平反的干部、职员和群众共六百多万人。’ 1980 年，人民解放军为 1959 年因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r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其它政治帽子平反的有 17212 人，反右倾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从 1958 年 n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刚刚稍有纠正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再度刮起。

hs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关于高等学校揭发一批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党员专家的报告》（1958 年 1 月 6 日）

119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页 379。3 姑’ 1 泌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125，第八章

坚持「跃进」经济跌入谷底

一捍卫 r 三面红旗」

1 批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论

政治上批右倾思想，组织上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的是继续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共中央 8 月 7 日下发的〈关于反对右倾思想出指示〉，就明确提出「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 8、9 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全面地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用光辉跃进的成就，迎接国庆十周年」•’ 8 月 16 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指出，「对于实现今年的继续跃进来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

「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

1 〈中共中央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1959 年 8 月 7 日）、载中共中央文研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页 497—498，z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半月刊》，[1959 年第 17 号•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 19 卷（1961）—鸟托年运动

为指导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先后发表：〈r 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等社论。

强调：「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执行党的社会

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次伟大的实践·是我国劳动人民为了尽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的胜利。」说 1958 年钢铁工业的发展，「是空前的高速度」，并极大地改变了全国钢铁工业的布局。说甚么，对发展小高炉的得与失，要从 r 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所发生的长远的效果来算总账 j；「由【小土群】到『小洋群』，这是一个由普及到提高、由低级到高级的必然过程。没有当初的『小土群』，也就没有今天的『小洋群』。」结论是，「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完全不是『得不偿失』，而是所得极大」

说甚么：1958 年重工业生产的发展，基本上保证了基本建设高速度增长的需要，同基本建设的扩大也是适应的。「r 以钢为纲」不是挤掉了其它部门：而是带动了其它部门。」「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19 铭年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不仅保证了当年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而且为 1959 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建立了基础。] 指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j，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是完全荒谬的，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飞跃发展面前的惊慌失措」

这些文章既是要为 1958 年「大跃进」进行辩护，又是在为当前的继续「跃进」寻找根据。但是，对那些强词夺理的辩护和批判，连毛泽东看了心裏也有点打鼓·为摸清 1958 年的底细，毛于 9 月 6 日写信给陈伯达，要他找国家统计局的几位同志，座谈研究一下〈驳「国 3(r 得不偿失) 论可以休矣」!1959 年第 18 号，页 51—53

《人民日报》社论，1 舛 9 年 9 月 1 日；《新华半月刊》

4〈驳「. 民经济比例开系失腾 j 的翻论〉，《红旗》·19 铃年第 18 期社论；《新华半月刊》，1959 年第 18 号·页 53—54·

第八章坚持 r 单这」经济映入谷底

民经济比例失黄 j 的谋论〉文中的论点是否都对·也旗是说，依据是否可寡·陈伯达在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成员和其它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人士开会座谈后，于 8 日下午向毛泽东报告·同时附上一份国家统计局根据这次座谈会内容整理的《我国 1958 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陈报告说：在座谈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

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其依据是：「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适当的。第一部类内部、第二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适当的。」「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的现象，经过调整，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从 1950 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共煎内，只要中央最高层一旦定了调】大家就只能跟着唱高调，谁也不敢唱低调，更不敢唱反调，这在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以后】情况就更是如此。薄一波在回顾上庐山前后的心态时就曾说过：

6 月间·我请了一位同志按丽我的意见单枪了一万题目叫做<从一年来大跃进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夸言稿·有一万多字。我因工作不得脉身未龙按时到会，是 7 月中旬才上庐山的。上庐山彼·有钱位同志告诉我，会议的风向变了·因而我率备的委官稿未拿出来。· · · · · ·' 面许我预先羊备的发言稿未在会上「曝光」·故未受到牵累。但我在上庐山前·曾在四个却作过报告·多次讲过这些观点，庐山会议之后·在「反右倾」的高潮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委根据领导指示曾把我的讲话整理成材料上报。我当时按照领导同志要求向中央作自我批评· · · · · ·总算通了关。‘

5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口 t 京：中央文戏出版

社·1993)群一波‘

· 页 514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鱼校出版社 1993）· 页 867 — 869 ·

中华人氏兵和庆史· 第四春（1958 — 19' 1j—鸟托年运动

正是出于这种政治氛围，陈伯达召集的座谈会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央各部和各省、区党委这时也纷纷向中央报告「大好形势」，以及反「右倾」斗争出现的新气象。9 月 3 日，中共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党、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6 日，甘肃省委报告说：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

开始检查和批判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作了调整。11日，甘肃又报：自从传达八届 / k 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还丰收，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24日，石油工业部报告：石油工业在1959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30日，浙江省委报告：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落脚生根。10月3日，四川省委报告，9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干部会议，以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安排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毛泽东看了这些使他兴 t 的报告。一一批转各地。

上述这一系列报告，尤其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数据》，使毛泽东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并认为已经可以看到了反右倾取得的成果，这就是群众性的大干快上局面，又重新露头，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中共八中全会曾作了调整。8月26日，周恩来在向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报告中说：同4月人代会相比，工业总产值由1650亿元调整为1470亿元，钢由1800万吨（包括土钢）调整为1200万吨《不包括土钢》，煤炭由3.8亿吨调整为3.35亿吨。农业总产值由1220亿元调整为738亿元，粮食产！由10500亿斤调整为5500亿斤，棉花产 t 由一亿担调整为7《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人册·页509、526, 529' 539' 545' , 4S, 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扶入谷底

4620万担。基本建设投资额由270亿元调整为248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工程项目由1092个调整为788个。‘

由于各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在反右倾运动中，都在重新调整指标。10月23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向中央提出报告增加当年开工的基本建设项目·使全年开工的限额以上的项目又回升到了一千个。n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确定追加1959年基本建设投资13.6亿元，加上原计划的248亿元、上年结转投资二十亿元和各部与地方自筹资金约三十亿元，使1959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总额

达到 311.6 亿元，比中共八中全会已调整为 248 亿元的方案增加了 63.6 亿元。⁹

在继续实行大跃进的思想指导下，11 月 26 日结束的第八次全国计划会议提出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是：钢 1840 万吨，煤炭 4.25 亿吨，粮食 6500 亿斤（不含大豆），棉花 6000 万担。基本建设投资 340 亿元，限额以上项目 1596 个。1960 年 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照此安排工作。

2 批判包产到户和解散公共食堂

如果说，对大炼钢铁得失的估计，直接关系到搞大跃进是否正确；那么，是否允许包产到户和解散公共食堂，就直接涉及到人民公社该不该搞了。因此，在批右倾，鼓干劲的整社运动中，批包产到户、批解散公共食堂也就势所必然。

国家农业部党组在庐山会议后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就把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各地落实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的一些具体做法，见《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页 140。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页 141—142。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页 142，

526

,

害虫吓和敌。第。专（1961）——“年端

’作为右倾表现加以批判。报告说：在 5、6、7 几个月内，农村中也有局部地方曾经出现一股右倾的歪风。具体表现是：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甘肃武都县隆兴公社红石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并且把土地、车马、农具按劳动力固定到户。还有的把全部农活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取消了或者基本取消了集体劳动，恢复单干）；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小私有」变成了「大私有」，「小自由」变成了「大自由」；

吹掉了部分供给制；

吹掉了公共食堂（山西公共食堂一度剩下不到农村户口的 20%；青海也曾有诉食堂的苦，刮了解散食堂的风）

中共江苏省委在 8 月 22 日发出通知，要求对包产到户「立即批判」加以纠正」。通知说，

最近有些地方把全部农活都包，1J 户；少数地方在全部农活包到户的同时，还实行了全部或部分农作物（如山芋等）包产到户的办法，或者虽然没有分开提出包产到户，但采取了所谓 r 定田到户，超产奖励 J 等。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做法；还有些地方，甚至提出「土地分到户，丝牛农具何老家」。铃颊指出，这些做法是错拱的，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实质上说是从集体返到单拎。‘1

中共中央当即将江苏省委的报告批转各地，强调：「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13

h 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 t 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化 959 年，月 29 日）·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 t 办公厅编：《农业集烟化重要文件汇编红 958 — 1981）》，下册口匕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劫 0 ·

12 《江苏省委的通知》（1 舫 9 年 8 月龙日），载《农业集，化，要文件汇烦（1958 — 1981））·下册，页乃 1 — 252 ·

13 〈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续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工 959 年 10 月 13 日 1，载（农业集，化重要文件 t 领【1955 — 1981）》·下册·页 251。

第八章坚持「跃这 J 经济跌入谷底

最先展开斗争的是河南。8 月 23 口到 9 月 25 日，河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集中批判了以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在落实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时，搞包产到户的两个典型。

耿其昌在 5 月份整社期间，从加强田间管理出发，提出 r 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奖 70%— 90%)J 的主张，即把五十户以上的生产队分开，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明确告诉社员，长期固定下来，几年不变。与之相

应的是，主张公共食堂不要卡得太死，允许社员有一定的自由。’ ‘新乡地区有 60% 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包工包产到户的做法。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自然恢复了一家一户的生活方式，强扭的公共食堂也就散伙了。

王慧智提出了一个《农村工作若干问题讨论提纲》三十条·主要内容是：「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 1 全奖全罚，三年不变。」洛阳地区曾有八百个生产小组实行了包工包产到户，有一百多个食堂散了伙。

河南省的三级干部会议认为，耿其昌、王慧智「在整社和加强生产管理的掩护下】采取了对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修正主义的作法 1·「是极端落后的、倒退的、反动的」。「是人民公社化后农村富裕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反映。」「实际上是两条道路、两种所有制的斗争。即反映了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阶级斗争的新特点。王耿、王二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同一时期，湖南省在全省展开了整社试点，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开展两条道路的思

14.：有小病的人、妇女月经期·妇女怀孕·有客人需要全家一块招待、家裏有病人需要照腊、过年过节·有甚庆紧急事情，放假种自留地的时候、下而不好走路的时候。在一定时候想吃稀饭等。

15《何南省委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1959年9月29日）·载《农业集，化重要文件，纤（,, ,g一，。911).T册·页2,4一乃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1—鸟托并运动想斗争，驳斥「大跃进是跃进」·「政府背了时 7 农民造了孽」；「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供给制出懒汉】是贫农剥削中农」，「公共食堂不自由，吃不好」；「劳动太紧张，累死人」、「搞超产运动是劳民伤财」；「生活一天天差」等等谬论。对于试点结果，湖南省委报告说：「成年社员中坚决拥护公社和大跃进的，由原来的 70% 增加到 90%；···反对的，由原来的 10% 减少到 15%。」具体的表现是：修订了秋冬生产计划，一般都比原来的计划提高 50% 以上。

“

中共中央对河南、湖南两省委开展的斗争作了充分肯定，并批示说：

「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两个省的报告材料表明：「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怎样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所坚持的显然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各省、市、区党委，都应该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

对农村反右倾，批包产到户的后果，国家农业部党组报告说：「在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这两方面都明显表现出一种新的形势。」‘，这就是人民公社搞所有制升级、坚持公共食堂和实行各种「大办」

16〈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整社试点座谈 t 的报告〉(1959 年 9 月 30 日)，载《农业集，化 t 要文件 t 编(1958—1961)》，下册·页 264—265, 2 弱·269。17〈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 于在十个公社中选择十个大队结合生产进行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经验〉(1959 年 10 月 15 日)·载《农业集，化，要文件. 编《1958—1961》)·下册，页乃 8—259.

18 农业部党组，〈关于厦山* 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1959 年 9 月 29 日)·载《农业集，化，要文件汇编(1958—1961)》. 下册·页 249’

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投入谷底

二毛泽东读书漫谈理论

1 毛、刘、周各组读书小组

早在 1958 年冬，毛泽东就提倡读书。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如火如荼，毛泽东在为「九个指头」的成就欣喜的同时·也对「一个指头」的问题进行思考·因此，1958 年 11 月 9 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就曾给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要求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并说·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的是「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并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1959年6月29日，毛对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了十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读书了，具体要读的就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纤驯良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问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20但是，就在人们发热的头脑开始稍有降温的时候，发生了庐山的反右倾斗争·为了回答国内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质疑，为了从理论上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毛泽东再次倡导读书。对这时提出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由，毛泽东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成系统的东西还不多，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外，只有这本书·毛说：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1960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

”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载中共中央文研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432—434·20毛泽东，（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7月2日）。·载中共中央文研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页75—7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治区都要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政治经济学的小组，先读这本书的下半部，五一节以后读上半部，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你不读，我们也不了解苏联，不了解他讲些甚么事情，同时我们要写教科书，也没有比较。

1959年冬，毛泽东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的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在此之前，1959年11月2日至22日，刘少奇在海南崖县（今三亚）组织了有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以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书记处书记林李明等参加的读书小组；在此之后，周恩来在广东从化于1960年2月13日至3月2日，

组织了有李富春、陶铸、宋任穷、吴芝圃、胡绳、许涤新、薛暮桥、王鹤寿、吕正操、一陈正人等人参加的读书会。

2 毛泽东自信发展了马列主义

对毛泽东这次读书的情况，邓力群回忆说：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二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练。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播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这我在作记练，就没说甚废。

毛读这本书时的评论分两个部分，一是在书上做的批注，二是口头议论。胡乔木读后认为，毛的谈话「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

21 邓力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史，1998年1月印的《毛泽东读杜勒斯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写的复纪。

第八章坚持「单进」经辟峡入谷底

无论是对教科书的肯定，还是批评，毛泽东所要寻找的是一条中国将超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此之前，毛泽东就曾极其自信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之1

对毛泽东读书的谈话和批语，不少学者有过评论。应棘说，毛泽东的读书谈话，不乏有见地的思想，但就主要倾向而言，则是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想去批判教科书的观点，用以回击国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进攻，国外赫鲁晓夫、杜勒斯、尼赫鲁的挑战。p 其主要观点有：

(1) 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了

毛说：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甚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他肯定：（教科）书裏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但批评说：教科书只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

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有需要，而没有可能，那怎么样能高速度呢？”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手稿）·1959年12月，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5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页104，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谈话中说：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世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总链条、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同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牌书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螂力群编辑及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9）！页84·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页718。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页800。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页146。

242526

5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那末，跃进的动力来自何处？毛认为“法国《快报》（1959）云甲组”的评论中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地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毛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开足马力奋勇前进。”我们的任务是，经过一二十年到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至于，实现高速度的方法，就是总路线规定的一系列并举方针和大搞群众运动。毛说：我们实行洋上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不只是由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主要是为了高速度。30 毛批评：教条主义者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好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关于建设速度问题，刘少奇也十分关注。他说：现在我们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是不是可能？这是矛盾的统一。他主张

勒紧裤带，以加快速度。刘说：苦战三年：不增加工资，多积累。这是基本问题。积累多可以多搞基建必· · · · · · 看来苦战三年过不了关，要苦战五年到七年。32

(2) 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在读到书中引用列宁的话：「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时，毛说，这几句，现在看来说得不对· 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27《毛泽东读杜 t 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页 685 — 686 · 28《毛泽东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I 清样本）· 页工讷 ·

29《毛潭东读社 t 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t 清样本）· 页 6 颯，30（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绪》（清样本）· 页 2 “一 205, 31《毛泽东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f 清样本），页 801’

32 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领，《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宫论集 t1”8.6 — 1967.7) 》C 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 弘】页 29 · 第八拿坚持「军这」经济跌入谷底

从资本主义过波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由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

毛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要巩固：但是不能强调过分。“他批评教科书把这两种公有制形式（指：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毛说：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的第五段，”现在证明是正确的。首先社有化，然后国有化，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直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 名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合。39

刘少奇也认为书中：讲两种所有制是 f 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动不得的· 把差别长期保存下来，这是不妥当的。两种所有制的差别是暂时现象，是能够改变的。他强调：社会主义可以是全民所有制，不是到

共产主义才能有。应该在社会主义阶段做好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准备，否则到那时过渡不了···，·，·，·秘

关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由队有向社有过渡的条件。毛说：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为基本社有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

3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页 145·

3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 J·页 736·

3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页 3 即·

36 指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决议案第五段说：

「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着更长一些的时间·」<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9年8月29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页 449·

3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I 清样本），页 456·

3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页 215·

39《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页 77·

40 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批判数据—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论集》·页 us, 125·

5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

教科书提到在苏联一些地区曾经成立过的农业公社时说，「这些公社在当时没有生命力，因为它们是在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条件下产生的」。毛批评：这是一笔抹杀。「毛认为：搞大公社是个重要问题，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必然提高「公」的水平，量变必然带来部分的质变。」“

（幻实行供给制，逐步达到按需分配

毛多处批评：教科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44 毛认为：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就个人利益而言，毛提出的原则是：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它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因此，毛主张实行供给制。他说：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还不为了追求待遇来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得多。· · · · · 一又说：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行供给制。· · · · · 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甚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一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

4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 J：页 276 · 42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页 2 页一 225。43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页 568。44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 清样本），页 801 · 45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I 清样本），页 431 — 432 · 46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I 清样本），页 462 ·

第八章坚持「军达」经济攻入谷底

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 有看很大的意义。· 7 又说：’ · 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它产品去。 “

刘少奇也批评说：「按劳分配」万岁，是难以走到共产主义的。他同样认为实行供给制是通向按需分配的必由之路 · 刘说：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有些能够满足 · 先从衣食的需要开始，让人们先满足吃、穿的需要，然后有甚么东西，可以满足甚么东西（例如手表就不是一下子就能满足了的》。也可以半供给、半发工资 · 总之，不是所有的东西在一个早上都做到，而是逐步的。49

此外，毛泽东在谈话中还用矛盾的普遍性，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

发展的动力的哲学观点，批评教科书：不敢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51

3 续· 谈话的传达和效应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很快在中共党内作了传达·邓力群回忆说：

在枕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记练，并在梅行同志帮助下·当天整理一追。维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练整理成舟！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

4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4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49 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反革命修正主义育论集》·页 115' 1 乃' 50《毛泽东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肢和谈话》5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清样本），页打 4—4 乃·（清样本）·页绍 3·

”《批判资料一中留赫鲁晓夫刘少奇

1 清样本）1 清样本】

，页驯阆·，厦 121·

5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布运动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美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政动。

1 月 4 日·我们和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举备参加 1 月 7 日至 17 日在这农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 日下午·在停砢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记练交给中央办合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搪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我被分到未德、邵小平同·忽所在的组。

我 f. 1：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 2 外小平同志说”可以传达。

朴是，我按凤整理的记练译详细地做了传达。陈伯达、胡总、田家

英也在其它二个小组分别传达了毛主席读书的谈话内容。

上海会议结束复，我们随毛主席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农书」下册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同志参加了这次读书活动。

在这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毛主席关于教农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实。得到毛主席同意。他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实交给胡绳编一选本，印委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选本在国内国外传播很广。春节以徒，回到北京。我到奔安部党组传达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谈话内容」。随彼，我又同梅行同志把毛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实整理了一适，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实枕整理完全了。

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复，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分别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实。大概是1960年3、生月间，陆定一同志组织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

第八幸坚持「跃这」经济跌入谷底

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理出来的内容以外，还积充了一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子农面的内容。与会同，参有的做了详细笔记，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农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做了一次详细传达。’ ”

从邓力群记述的上述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读书谈话在1960年春季传达的速度很快、面也很广，因此，谈话精神很快发酵，搞所有制过渡升级、强制巩固公共食堂、大办城市人民公社、要求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关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结构，从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划清两个界限：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把富队与穷队拉平，在社员之间搞平均分配》。到4月的上海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会议，已明确为「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制」，「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对纠正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共产

风」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在大反「右倾」的情势下，很快又提出了所有制过渡升级的问题。

1959年12月，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召集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的过渡问题：并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过渡问题》的会议纪要。提出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条件和时间是：达到「分配给社员每人平均二百元左右」的收入标准；在条件较好的上海，大约三到五年的时间即可过渡。其它各省大约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为实现分配给社员平均每人二百元的标准，要求「从现在起，就应当积极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创造条件」。为此，必须「大搞社办工业，大量发展农林牧渔

52 邓力群为中。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81年1月印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写的后记·

5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1)——乌托邦运动副」。并在五年或稍长一些时间，「使社有经济在公社经济中占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纪要认为：「过渡的时间虽然有一个大致的杠子，但过渡必须根据各个公社的情况，有先有后。· · · · ·一般公社的发展趋势，将是分批过渡·成熟一批过渡一批；有些公社，大队情况基本平衡，同时具备了过渡条件的】也可以一起过渡。」这个纪要和毛泽东读书谈话的传达，很快有人提出要强化干部的「过渡意识」的建议。中共江苏省委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说：这次整风运动，使我们深刻地感到，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够。具体表现是：对小生产者和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比较普遍地认识不足；对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够，不了解整个60年代都要连续跃进，都要高速度，积极创造条件，坚决向共产主义过渡；对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势力，认识不足；对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波浪起伏的发展认识不足甚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估计不足。据此提出：在党员干部中很好地确立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加速建设，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对江苏的意见十分赞赏，于3月6日批示说：

江苏省委写的关朴整风中丰个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应当提起你们大家一齐注意，并采取具体请施，逐步地解决这三个大问题。”

几乎就在同时，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了所有制过渡的时间表。3月7日，国务院农业部党组向中央报告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要

53〈关于人民公社过渡问题—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纪要〉

（1959年12月25日），载《农业集，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59）》，

下册·页275—276·弘中共中央办公厅。1960年3月1日类印的《情

况简报》103号，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2—53。55载《建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52·

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疾入谷底

求：1962年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67年按当时全国城乡人口，‘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500斤·1967年提前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在机械化基础上的园田化。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三年积极准备，小部试点，五年大部，八年完成。’

为巩固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因素，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加强对公共食堂的领导，积极办好公共食堂。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1959年底，

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其中：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

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个省市；70%至90%人口

参加食堂的，有北京、新疆、浙江、广西、广东、河北、山西七个省市；50%至70%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湖北、福建、江西、陕西、江

苏、宁夏六个省区；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山东、青海·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七个省区·1960年2月，贵州省委向中

央报告说，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上固定的占80%左右，不固定的约占20%。办得好的食堂，已成为生产小

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的程度，形成了

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村创造了条件。目前，当务之急是对不固定、不巩固的食堂立即加以整顿。5，

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

告》时，加上了毛泽东代拟的批语，「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毛要求各省、市、区「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

s6 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报告〉（1960年3月7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十三卷，页100，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1960年2月10日），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61）》，下册，页16—290。

为（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6日），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61）》·下册，页28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3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与之相应的是，提出了限制和收回社员的自留地问题。为巩固公共食堂，河北省提出，对社员自留地应该采取限制和逐步削弱的办法：一是严格控制自留地的数量，二是将现有自留地划一部分给食堂种菜和饲料？三是小片开荒和零散闲地由生产队统一规划，适当分配给小队经营，一律不许社员开荒。中央办公厅在报告河北省的意见时说：其它各省，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出意见。毛泽东指示：他们应当研究，提出意见。”显然是赞同河北省取消自留地的主张。

三城乡再刮跃进风

1 人大通过的跃进计划

为继续实现大跃进，《人民日报》继1960年元旦社论提出，要在整个60年代实现「连续跃进」的要求后，1月2日又发表〈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社论，要求在全国范围，各行各业从第一季度起，平均日产量不低于或略高于195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稳步上升，实现月月红、季季红……一全面跃进」。3月30日至4月10日，全国人大举行二届二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作的《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上述两个报告的决议、

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及其相应的决议。批准了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凤龙扛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1956-1957年11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74。

60《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1960年3月1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九。

第八幸坚持「跃进」经济跌入谷底

斗》的报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大会最后一天作了《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问题》的讲话。

会议通过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的各项主要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2980亿元，比上年增长23%（其中农业增长12%】工业增长29%》。钢产量1.07亿吨，比上年增长38%；生铁1.5亿吨，比上年增长34%；煤炭4.25亿吨，比上年增长22%、发电量555至580亿度】比上年增长34%至40%。粮食5940亿斤，棉花5300万担】各比上年增长10%。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370亿元（不包括地方自筹的六十亿元），当年施工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20个。

“‘会议通过的《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说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大跃进和人喻公社化，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某些内容已经被实际生活所超过】有些已经基本实现、大部实现】或者在部分地区提前实现了。「这就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再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努力提前两年或者三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确

《人民日报》3月31日发表《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继续跃进》的社论，认为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一定能够实现」

3月29日至4月11日举行的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列席了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会议补选何香凝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农村再次趁穷过渡

人大通过的计划指标虽仍偏高，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冷静。随着毛泽东读书谈话的传达和发酵，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急升级等问题再次提了出来。为创造过波条件，又要求大办社有工业等各项事业。于是，

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大事辑要：1955—1985》·页 149·6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1958年1月1日），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选编（1958—1981）》，下册，页 29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0 卷（1958—1961）——“大跃进”运动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好大喜功的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在农村再度刮起，

1960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在报告中就曾谈到：（一）一些公社，为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积极做过渡的准备，重新出现间山文乱调或无偿抽调大队的种苗、生产工具、建筑材料及其它物资，占用大队的土地；无偿、无限度地调用大队的劳动力；将一些大队或小队转为社办农场，以此来扩大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二）《为多搞公共积累》该分给社员的没有全部分到社员手上；有的甚至取消了工分，或是只记不清，不按劳动日发工资三个别地方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畜、家禽又集中了起来，并对社员家庭副业生产进行限制。（三）大搞非生产性的建筑，建礼堂、办公大楼，购置非生产性的设备，参观评比大搞请客招待，摆宴席，讲究场面，讲究形式，财政开支无制度，不爱惜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少爷作风十分严重。（四）不如实反映情况，谎报成绩，隐瞒缺点，作风“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只谈高指标·大计划，不具体研究条件，不认真采取措施，组织行动，说的多，做的少；不和群众商量】草率决定，不关心群众生活，不注意劳逸结合。“山东也出现相同的情况，曲阜县陈庄公社是省、地委搞过波的试点，其它的公社干部知道后认为：「普遍过渡的时候快到了」。因此，多数公社的领导干部打算「秋后搞过渡」。在这阵过波风刮起以后，各公社为发展社有经济·纷纷对生产队搞「一平二调」·范县新城公社干路生产队支部书记于保清说，「现在劳力牲畜随便调，土地随便占，树也随便刨。59年社员一年未分到钱，谁余谁缺也不知道，不清不混。」惠民县姜楼公社副书记吕振清说，「俺社三千六百亩经济林，已宣布归社所有，公社搞了一万亩林场，也是无偿地占用大队的土地。」淄博市张店区房镇公社生产大队支书房久

亮说：「公社把俺队的马车都集中起来，我们运肥运煤】都得交脚力，大队支不起运

63〈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养个问题的指示〉f”印年2月25日）·载《农业集体化！要文件汇编（1951）》，下册，页314—317·

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嵌入谷底

费！现在谁也不想买马车了。」随之而起的是浮夸风：聊城地区的寿张县上报全县养猪七十一万头，据几个公社摸底，最多不超过四十万头。聊城地区上报大家畜怀孕率达到76%，据三个队调查多的达60%，少的只有30%；上报种棉花390万亩，省里去调棉种时却说已种四百五十万亩。伴之而来的是干部对社员的强迫命令风，无棣县城关公社的县委常委苏保德，竟对社员干活打盹，用铁掀铲。“山西省委4月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上也反映，发展社营经济中的「一平二调」现象是和抢过渡的思想分不开的。为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各公社制定1960年发展社有经济的计划，有70%的公社有「一平二调」的打算，其办法是：无偿抽调；低价收买，不等价交换；不付现金；有价无款；摊派发展社办经济基金；随意占用管理区的土地；随意抽调管理区的劳力·公社向管理区提取的积累，有的要占管理区当年积累的70%至80%·铺张浪费现象较普遍的是，大搞非生产性建筑和购量，闻喜县城关公社提出的口号是■：r公园赛西湖，礼堂赛县府，风景赛杭州。」太原市吴村公社提出破旧立新，把有七十四户人家的居民点的住房全部拆掉·太谷县胡村公社拆毁民房修了一条一百米长二十米宽的马路。干部作风方面：打人骂人，特权自私，腐化堕落，挟嫌报复也有所发展·洪洞县雄火公社女社员高自英，因给妇女队畏王清提了两条意见，王清就用各种办法向高报复，最后高自英被迫自杀。

“

为了尽快发展社有经济，各地又出现了各种「大办」一起上的热潮。此前，毛泽东看到一篇天津市畜牧局整理的河北省吴桥县王赚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因大力发展养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了一番，穷队变富队的文章。毛读后非常高兴，当即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长信·说道：「此

”〈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简报〉·第2期(1960年3月,·载《农业集,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页320—326·65〈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织情况的报告〉‘1959年4月6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页23,—2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 1961)——乌托邦运动

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毛批评说:「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Jr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由此,在大办养猪场的同时,刮起了一阵大办之风——大办社有工业、水利、交通等等。

3 城市建立人民公社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并没有对城市提出要求。只是在公社化浪潮中,郑州和哈尔滨等个别城市,自发地成立了人民公社,其性质类似社五」家务性组织。当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正式提出成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并称要使它成为旧城市改造和新城市建设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但当时也只是要求「在城市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1960年2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城市人民公社组向中央报告了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28日,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了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这两个报告都突出介绍了办城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说它是对城市的一次全面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城市的潜力,促进了生产大发展,推动了全面大跃进;普迁办起了集体福利事业,把广大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的道德质量得到迅速提高;更利于对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的团结、教育、改造;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

66 〈。于发晨，牧业问题〉（19”年10月3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挨》，第八册。页572—573，

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跌入谷底

政。建议：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市人民公社。3月6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稿，明确提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采取积极的态度。3月8日，毛泽东对指示稿作了修改，加写了以下内容：

—看起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三种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公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

—（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引者注）慢慢挂上公社牌子则是可以的。除这五个城市外，其它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

3月9日，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下达。（人民日报）接着发表社论，新华社也接连报道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月9日，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在会上作了《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读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度的发展，而且还是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应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工具，表示：大城市也必须逐步分批地实现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咽声势浩大的兴办城市人民公社的运动。据统计，截止1突刃年5月10日，在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6毡刃万人口中，建立起1田9个人民公社，入社人口3久刃多万，占全部城市人口的55—6%。公社兴办的工业生产单位九万多个，服务站十万多个，公共食堂九万二千多个，托儿所（幼儿园）九万五千多个。开

阅〈对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指示伤的批语和修改〉t1960年3月8日）1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挨》，第九册，页54—55•

“城市人民公社本来就是在工矿企业和街道组缴之上达立起来的，因

此·它不伟农村人民公社那样是个新建的独立 t 烟，随者全国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1 呎刃年下半年以后，城市人民公枕开始逐卫解，，自行消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齐专 (19 朋一 1961) — 鸟托年运动

关于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具体政策，中共中央 5 月 n 日批转了北京市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工作问题的报告。对北京市委提出的组织城市街道人民公社的步骤以及有关政策表示赞同，鳃为具有普还意义。即：城市人民公社不仅应当有计划地积极地分期分批地组织起来，而且应当学农村组织农业合作社时期一样，先组织贫农下中农，以便先巩固一批·在巩固的基础上再发展；先组织生产，彼组织生活；有意识牌让一些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旧官吏的家属运一些入社斗不去动用他们的生活资料和房屋；政社合一也运一步正式提出；下放零售点服务业，一般应推后；暂不和大工厂、机关、学校合并组织。中央要求各地认真研究，使城市避免了像农村人民公社那样一哄而起造成混乱局面。

4 工业指标再度升高

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刚通过的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共中央在 4 月 14 日又同意并批转了冶金部提出的 1960 年钢产 t 第三本账的计划和铁道部、煤炭部及冶金部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联合报告，6, 5 月份又对各项指标作了全面调整。5 月 10 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党组向中央呈送了 1960 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账安排的报告。其中说，在 4 月份召开的工业书纪会议上，大家认为：「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很好，下半年还会更好。」「一个以煤·铁和交通运输为中心的『小土群 J、『小洋群」运动的高潮正在形成。」r 为了促使国民经济在 1960 年获得更好、更大、更全面的跃进，有对一些主要指标及时地作出第二本账的安排，使这本账实际上成为党内的第一本账，作为对内的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根据

69 冶金部提出钢产量的第二本账为 2040 万吨·第三本腰争取达到 2200 万吨。与之相配合，煤炭部提出全年煤炭产量争取搞到咸 62 一

4.7 亿吨；铁道部提出争取货运量达到 7.8—8 亿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页 149·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跃入谷底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把钢铁生产大力挤上去，并且带动其它工业的大发展·提出安排：钢 2040 万吨，比原计划增加 100 万吨；生铁 3100 万吨，增加 300 万吨；煤炭 4 亿 6 千万吨 f 增加 37 亿万吨。顶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的 5 亿元增到 382 亿元，增加五十七亿元，新增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八十三个。70

中共中央 5 月 30 日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把钢的指标由 2040 万吨提高到 2100 至 2200 万吨，作为第二本账。中央批示，同意第二本账的安排·强调：「这本账实际上是党内的第一本账，作为对内的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各部门、各地方安排工作、检查工作，一律以此为准。」「要集中力量大抓煤、铁、矿 f 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带动其它。努力争取今年钢的产量达到 2100 万吨到 2200 万吨。J，把钢产量提高到 2000 万吨以上，是毛泽东 1 月 17 日在上海会议闭幕会上提出来的。他当时说：「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 1835 万吨，第二本账，争取 2000 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他认为：「庐山 t 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7 之

然而，实际情况，既不如毛泽东在 1 月时的乐观估计，也非国家计委等三委党组向中央报告所说的是甚庆「形势很好 J01960 年第一季度的钢产量就低于 1959 年第四季度，4 月份的生产更是继续下降。据新华社报道：进入 4 月以来，钢铁生产情况不好，日产水平比 3 月 70 尔家计委·经委、建委党组‘〈关于一九六〇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账安排的报告〉（1960 年 5 月 10 日），载《建国以来，要文选场》，第十三册，页 407—409’

71〈中共中央同意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写组《开于一九六〇年工·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账安排的报告〉〉【1960 年 5 月 30 日），较《建。以来重要文选续》，第十三册，页如‘一叨

7'

72 (毛泽东传 (1949 — 1 卯 6) 》、T 册 • 页 ID4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四春 (1958 — 196 刘一鸟托邦运动

份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4 月 1 至 20 日，钢的日产水平平均是 8000 吨，比 3 月份日产水平降低 3 万吨；铁的平均日产水平是 77700 吨：比 3 月份降低 3 度胶领左右。原因是设备缺乏检修，原料供应不上。”这说明，钢产量不只 100 万吨、2100 万吨完不成，就连 2 (州 100 万吨也成问题。而钢产量指标一再提高，必然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于是在全国又掀起了保钢、保煤、保运输的「跃进」高潮，使经济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危机。薄一波说：

回忆当时的情况，不仅干部和群众焦虑不安。处第一线经济综合部门更是紧张。为了确保中央确定的各项生产指标得以实现，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领导各部集体办公的会议室里，都醒目地悬挂着工业主要产品的日进度表，如全国钢、铁，钢材、原煤、焦炭的日产量，铁路日装车量等，我和李富春同志天天看。看到产量逐日增加，心里才踏实；看到产量下滑，就立即分析原因，采取措施解决。7 月

四写「十年总结」酝酿转弯

1 中央下令再煞「三风」

各地再刮「共产风」的情况，经新华社的《内部参考》

告反映上来，很快引起高岗对问题的重视。在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上批示

。1960 年 3 月 23:75

和各省报日，毛泽

73 (4 月上 • 中旬一铁生产情况不好) 《19 “年 4 月 27 日】，《内部参考》74 牌一波：《若干，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890 — 891'

乃《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共产风」情况简报的批语》(19 印年 3 月 23 日)，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选》，第九卷，, 98 — 100 •

第八章坚持「跃进」缓济肢入谷底

在一些县、社中，去年 3 月邳州决议忘记了‘去年‘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

些合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一费、官僚主义·又犬彘作，危害人民。毛指示；

这样的胡闹·要查清楚。…二对朴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朴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铃大贪污，一定兵法辨。一些县委为甚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才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援务要注意改正。对朴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彻掉，换上新人。……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再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3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要求各地在3、4月间，利用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看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各省区根据中央指示召开六级干部会议，整顿干部作风。4月4日和11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高淳县事件的通报和上海市委关于奉贤县事件的报告。

江苏省委的通报说：「高淳县在1958年和1959年春，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一万四千多人，非正常死亡六千多人，外流人口一万多人。」该县县委采取了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劳

76<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1960年3月30日)，载《建·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114。

5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二不四专（1958—1961）—乌托邦运动
动人民，提出「那怕流血牺牲，也要保收三千斤水稻」，r深翻好像打仗，在战场上如有士兵临阵脱逃，可以就地正法！」等错误口号。造成部分基层干部严重强迫命令，采取吊、打、关、押、罚跪、停睡等手段，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件。

上海市委的报告说：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奉县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宣接逼死的群众有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人，各社和生产营，都设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

2866人，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8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间，兴修水利拆民房3188间。报告描述，「站在高处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必模一样J, f 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

由于当时把农村的五风再起，看成主要是干部作风问题，因此，对这些情节严重的恶劣事件当成是阶级敌人搞阶级报复，应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加以处理。中共中央在高淳事件的通报上批示说，这是「少数混入基层、党内的壤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并判定上海奉贤县的问题是：「上海市奉贤县原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和一些暗藏的特务分子、壤分子窃夺和把持县委和有些公社的领导权。胡作非为，残害群众。」所以，并未能根本解决因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带来的严重问题，相反，认为所有制过渡只是条件问题，山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当前全省实现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为了摸索过渡的经验和问题，全省有计划有控制地组织一些过疲试点是必要的。」还说，六级干部会议的讨论，使大家 r 对公共食堂万岁认识更深刻了」

77〈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织情况的报告〉魄蚯。年4月6日》·载《建国以来灵要文戏选编》，第十三册，页241、250。

第八章坚持『跃这』经济攻入谷底

2 调运粮 t 的紧急指示

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闭幕以后，毛泽东再次南下视察。第一站是天津】4月30日，毛在专列上同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予厚、万晓塘谈话。毛问国内形势是不是比1月上海会议时好一点？谭震林答：「好得多。」并具体说：

看起来·今年工业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狠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彻车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朴，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较食吃得相当多。……他拦这哀（指河北省）的犬名鯨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 T 一个组去模·一模！实际并不是甚废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群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

又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裏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谭说：这说明他们手裏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甚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对此表示满意，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当毛泽东问到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时，廖鲁育很有把握地说：保收六千亿斤。示意可能「超过」

5月2日，第二站到济南，毛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问到山东的旱情及极食困难的情况，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5月6日，毛第三站到达郑州】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等登上专列，毛即询问河南的旱情。吴芝圃答：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78（毛潭东传（19 森，一厦 976））·下册，页 106，一 1a 兀。

5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1）—乌托邦运动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太多，抗旱也多吃了橙食。所以，今年浮肿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实际上，上面所说的并非真实情况。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说：「珍 59 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谭震林、廖鲁言所说的全是下面虚报的浮夸数字。1960 年 3 月 29 日，周恩来就收到习仲勋送来的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安徽和县桐城闸和无为县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和「田地荒芜」等问题。周恩来当即将信批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要他派人前往两县调查。河南出现的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也远比吴芝圃说的严重得多。其原因主要是「五风」泛滥，和根据虚夸数字欢购了过头橙。加上 1 必 8 年以来，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急速上升，1960 年比 1957 年增加 3124 万人。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农村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增加向农村征购粮食的数量。伴随所有制再度趁穷过渡，坚守「tJ=会主义阵地」而出现的虚报浮夸和反「瞒产私分」，以及公共食堂的浪费和干部的

多吃多占，农村早已出现饥荒。

据新华社报道，从1959年冬季起，被称为「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情况就不断上升。1959年12月上半月，沈阳市南站平均每天接收外流人口158名，下半月每天236名，1960年新年过后每天达800人左右；上海市在八个区调查！1960年1月份共动员12648人回乡，同期流人19735人，入多于出。天津市1959年11月中旬有外流人口和限制迁入的人口86167人，较10月增加29.8%。1960年1至2月，流入内蒙古自治区的外省人口共89200多人，90%以上是农民，他们分别来自辽宁、山东、吉林、河北、黑龙江等二十多个省……aI 79 薛喜构：《薛·桥回伟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996），页265, 80《各地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情况》（1960年2月27日）·《内部参考》，页”·81〈大批外省人员流入内蒙古〉1960年3月10日）。《内部参考》·页玲·

第八章坚持「军进」经济映入谷底

另一方面的情况是，由于劳动强度大，缺粮！营养不良，各地开始出现大量浮肿病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60年2月底，累计发病人数：湖北省28万余人，江苏省11.12万余人，山东省2.6万余人，河南省平舆县一个县就有3.8万余人。8之另据报道：江苏省高淳县从1959年入冬以来，浮肿、消瘦和其它疾病有新发展。据2月20日统计，全县发病人数14715人，占全县总人口6.06%，其中浮肿病1860人，消瘦病6208人，共占病人总数的81.8%。·一在发病人数上升的同时·死亡现象逐渐增多，全县从1月份以来，共死亡117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0.48%。83 山东省沾化县委书记也反映，有几个公社水肿病较多，全县春节后因此病死了500人。缺粮原因是卖了过头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九个公社，.89000多人，……从1月到4月初，共死亡4700多人。据当时分析，其中80%左右是由于营养不良，患浮肿病、黄疸病而死。8,

因缺少粮食，人们开始食用各种代食品，误食有毒食品的中毒事件时有发生。据国家卫生划写月中旬通报，因误食苍耳幼苗的中毒事故：河南省兰考县有1100多人中毒，三十八人死亡 g 湖北省广水镇1200

多人中毒，五十八人死亡；河北省徐水县 244 人中毒，五人死亡。86 甘肃、宁夏、贵州等省区 1960 年 1 至 3 月，竟发生「吃人肉」这种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十七起。名？

鉴于 1960 年夏粮比上一年又大幅度减产。夏收之后收购进度缓慢】1 至 7 月累计收购粮食 244 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 26%。加之各 82 〈各地积极治疗浮肿病人〉化 960 年 3 月 3 日），《内部参考》，页 a 一 9。83 〈高淳县发生浮肿消瘦病的情况〉优 9 却年 3 月 17 日），《内部参考》· 页 20。84 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t 议情况》· 第 1 期（1960 年 3 月 21 日）· 载《达· 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 100，

85 〈新 a 自治区党委积极处理拜城县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问题〉槐 960 年 4 月 20 日〉《内部参考》，页 17 ·

86 〈卫生部要求各地宣传禁食苍耳子〉（1960 年 4 月 17 日】，〈内部参考〉· 页 21 — 22 · 的〈甘书等地发现「吃人肉」案件十七起〉（1960 年 4 月 14 日）· 《内部参考》· 页 2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四卷（1958 — 19 醒）— 鸟托年运动

地库存减少，因此国家调拨不灵。1960 年 5 月以复，应调出极食的各省实际调出的粮食仅占计划数的一半，而粮食销售 t 则不断增加。1957 年到 1958 年度粮食销售量是 423 亿斤，1959 年到 1960 年度增到 590 亿斤。为此，中共中央于 5 月 28 日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 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88 指示要求：有关省、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抢时间，把一切须要调运和能够调运的粮食尽快地集运外调· 6 月 6 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卯进一步指出：

入夏以援，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七天· 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已经装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十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在最紧胀的日子农，京津沪库存只剩几千万斤，甚至还不到，形势十分危险· 一旦发生新粮· 复果

不搭设想。另外，1960年粮食出。收购计划是一首亿斤，而到5月底只能完成三十多亿斤。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很被动。

这一严重情况，不能不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画夜予以关注。当时综合部设有两个办公室：一是李富春、薄一波负责的计委经委办公室，二是李先念负责的财贸委办公室。薄一波在回忆他们天天盯着钢产量进度表的同时说：「李先念同志那裏也不轻松，各地要粮的电话画夜打来，不能不急事急办，只好采取『挖东补西』、『抽肥补瘦』等措施，聚急调运粮食，帮助断粮地区渡难关。」”

8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页305, 8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三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页2醒1—2622。

90 禅一彼：《若干重大决策具事件的回颤》，下卷，页891。

第八章坚持「军进」经济跌入谷底

19. 年4月26日新华社电讯：内蒙古自治区积极。应中央号召，大抓五十天，争取在5月上旬基本完成1959至1960年度粮食上调任务，大力支持北京上调任务是十一亿斤，

、天津、上海和辽宁等地。这一年度全区粮食

到3月底已经上调六亿六千万斤

60%、下余的四亿多斤必须在5月10日前完成。”27日

，占计划的新华社报道

了黑龙江省紧急调运大量粮食支持缺粮地区的情况：4月25日，省委召开了有关粮食、交通运输、商业等有关部门参加的电话会议，要求各地抽调足够的装卸车船的劳动力】大抓日进度，使日发运量由现在的三千二百万斤提高到五千万斤，力争达到六千万斤，以保证按时完成粮食上调任务。省委还规定：粮食调运，要先省外后省内】可以「先挖后补」，坚决压缩城镇粮食销路，保证完成上调任务。”这两则报道，充分反映了当时粮食调运的紧张程度。

3 毛泽东提出要扭转被动局面

毛泽东在四五月间南下视察期间，就曾向省级负责人谈到：我们中

央，省这南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这说明，毛泽东也意识到很难了解到下面的真实情况。他每到一地，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庄稼，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当然，毛也有一点了解真情的管道。卫士畏李银桥回忆说，

1959年底，几鸟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

他们带回来东民吃的练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格姣，交到毛

91《内蒙古积极。运粮食支持京津沪等地》，《内部参考》，：翊年4月订日。呢（黑龙江突击。运搬食支持缺柜地区），《内部参考》，1咄年4月刃日。，3《毛泽东传（1949—19761），下册1页1的3。5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1958—1961）—鸟托年运动

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受到震动。他用颤并的手哥开窝头分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粮。我们每个人都禹吃。一」我分了一小块，放进嘴襄，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这窝头与河南吃的烤翅包真是天地之差。我想起了。鸟维带来的那个窝头。想起了毛泽东讲的「要想个办法」，，。…，’

工业生产情况很差，粮食全面紧张，这些在初春还被掩盖的情况都已浮出水面。使毛泽东感到十分被动。6月10日至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毕行扩大会议，主题是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与1月间的上海会议强调1960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不同，为扭转骑虎难下的强撑跃进局面，毛在会上提出了，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指标的建议。他在14日讲话中就明确讲了要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提到第一位的问题。在会议闭幕的一天，毛作了《十年总结》的讲话。

《十年总结》，首先是历史地肯定总路线的正确。毛说：

前八年烈妙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1]自己的一朱适合中国的路线”1957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

律。1958年5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年8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

接着，叙述了人民公社兴起和大炼钢铁并举引起的乱子：

8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9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炼钢铁同时并举，乱子统更多了。

” 楼延赤：《卫士长谈毛潭东》（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页36”
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跌入谷底

在讲了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为纠正人民公社引起的多方面混乱，以及压缩钢铁指标所作的努力之后，批评说：

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但对在庐山批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毛并不认错，坚持说：

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羞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

接下来谈到这次会议讨论的计划指标，认为：

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彼三年的指标，仍然奔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朴留有徐地，对朴藏一手，对铃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

讲到这裏，毛异乎寻常地不再批1956年的反冒进，相反表扬了1956年在反冒进思想指导下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毛说：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徐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11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亘不可能完成。

于是，毛提出：

要下决心改·在今年7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6—1961）—乌托邦运动

他告诫大家，主动权是一柄极端重要的事情，它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以此说明 1958 年犯高指标错误的根由。毛说：

我们通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此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朴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通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私了的。……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严重的党在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和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加以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终避免的。哪东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最后，毛泽东用自由与必然的哲学范畴作总结。”

毛自己说，这篇讲话稿是 6 月 18 日清晨用两个小时写成的。说明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形成的成熟意见。尽管讲话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肯定是正确的，也肯定反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是个胜利；但终究承认高指标是犯了错误，承认主观脱离了客观，承认现在已处于被动，因此要下决心变为主动。这就为降低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以及尔后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开了一个口子。正是在这种气氛下，会议对国家计委提出的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一压再压，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在讨论中，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

95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 年 6 月 18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 213—216，

第八章坚持“单进”经济跌入谷底 559 得话身。我当了这庆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邓小平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会议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

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

但是，会议精神还没有传达刘敌，又遇到了外部因素的严重干扰。

五中苏关系恶化对内政的影响

1 两党分歧的由来

正当中国国内面临困难，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对过高指标重新调整之际，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传来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苏共中央代表团，对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发动突然袭击实行围攻的消息；此后不久，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这无疑是在向中国共产党施压，要中共听从于苏联的指挥棒。中苏双方发生如此严重冲突，显然非一日之寒。

中苏分歧的最初由来，要追溯到 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总体上是赞同和支持的，同时也有不同意见：一是对斯大林的评价；二是对赫鲁晓夫在大会报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新路线。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中共是赞同的。中国在 1955 年万隆会议上正是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旗帜】赢得了胜利。谋求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加快中国国内建设的客观需要·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前，1956 年 1 月 2 日《人民日报》曾以〈和平共处思想的伟大胜利〉为题发表社论。读扬苏联 %毛、周、邓的讲话，绿·载《毛泽东传

见 i, 60 年 6 月 1 吕日毛海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t 让的讲话记(1 舛 9 一 1 卯 6))，下册，页 10 般。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二第四春（1958 一工 961）—鸟托年运动

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国际上所作的努力。2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称读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报告，。「以现实生活本身的逻辑，论证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 J。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过疲的方法取得议会多数而夺得政权的观点，中共则没有公开表态。19 弱年 9 月举行的中共八大，刘少奇在向大会的报告中专门就中国革命的经验，阐发了被压迫人民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夺得政权的观点。委婉地表示了不赞同和平过疲的意见。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通过宜盲时，

中共代表团专门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正面阐述了中共的意见。《提纲》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接反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写不住的」在 1957 年到 1958 年的时候，在军事上，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陆、海、空军如何在新技术、新装备方面有所发展斗苏联遇到的则是怎样在战略上发挥太平洋舰队作用的问题。有关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了出来。

:955 年 7 月 21 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Pavel Yu 眈。）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日晚 10 时，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尤金，苏方有使团参赞安东诺夫和魏列夏金，中方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参加。尤金说明，他刚刚参 9：中。共产党代表。：〈。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年 1，月，。日》，载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页 111—112 丰·

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跌入谷底

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回到北京，并受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情况。尤金谈了中东局势、南斯拉夫、帮助中国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及苏联国内经济情况等四个问题，会谈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其中，主要讨论的是海军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能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毛泽东立即指出，中国只是请苏联提供帮助，没有考虑过 r 合

作社」的问题·尤金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即抓住联合舰队的问题，不断追问：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一再解释，这只是一个提议，要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 1 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 ’

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尤金随即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于天亮发出。 ， 9

第二天上午 11 时，毛泽东又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谈话，这次参加的中方人员包括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毛泽东似乎是在强调，他的谈话表达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的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981958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绿·参见吴玲西：《十年论战：19 为一 1966 中苏关系回忆绿》·上册口匕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 卯 9）】页 157 — 160 · 99 魏列夏金着，陈春华译：《珍 58 年 7 — 8 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中共煎史研究》. 2 侃用年第 4 期。厦 [叩一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胄春（1958 — 1961）—鸟托卑运动

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并且说了很多对苏联不满的话。101

尤金一再解释，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时，关于所有权、租借权、指挥权的问题，一概没有谈到‘，也没有说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中国同志研究具体措施。‘尤金还主动提出】他赞同最好是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 . 1958 年 7 月 31 日，赫鲁晓夫秘密来京访问·当日下午 5 时至 9 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谈。赫鲁晓夫首先对苏联为何提

出潜艇舰队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他坚决否认苏联曾使用过「联合舰队」或「共同舰队」的说法，认为是尤金转达有误，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过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赫鲁晓夫表示：「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于是，毛泽东在发了一番牢骚后，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双方约定，以后「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接着，赫鲁晓夫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推

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研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页 322—333'

101 参赞魏列夏金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对苏联指责的主要内容有：在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在中国使馆安装窃听器；苏联前任大使申（申幼）在中国外交部发展情报员；贝利亚（贝利亚）与高岗勾结·多次派人人与高岗联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通过非法渠道收集情报等等。尽管毛泽东一再声称，这些现象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但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天」，「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与中苏两国关系，两党关系」有关·他们感到「心情沉重」·并认识到「对中国的政变不完全理解，过高估计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一因素的灵要性」而对国家利益的差异估计不足」·（1958年7—8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页 101—103，

102 吴徐西：《十年论战》·上册，页 1 面—162·

103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第八章坚持「单进」从济映入谷底

托说，这个问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是军方提出的。苏联的意图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

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海参崴、千岛群岛和北海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Р. Малиновский）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

对中苏关系中的这场风波，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作了如下评述：

苏方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两国建立「共同检潜艇舰队」的要求，是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时向毛泽东提出的，当即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把这个事件看作凡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22日毛泽东约见尤金，历数苏联对待中国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作风。参加这两次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邵小平、衫德怀、陈纹箏。毛泽东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泽东解释。从7月31日到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举行了首次会谈，最后以赫鲁晓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¹⁰⁴

104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1958年7月31日，8月3日。引自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索引》第十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际伶战史研究中心存，刊）。未刊。页3080—3095、3096—3098。沈志华提供了俄档案的中译文（下同），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1 师（毛泽东传（1949—1977）；上册·页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9卷（1961—1966）——乌托邦运动

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根据中苏双方披露的资料，在〈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防空协议、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¹⁰⁶一文中，对毛泽东何以作出强烈反应，是否出于主权原因，作了新的解读。沈文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革命军领导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说，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

的意图在于控制中国。长期以来，这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上和史学界颇为流行，似乎已成历史定案。然而，人们没有看到，表面上的蜜月关系掩盖了中苏双方在同盟中所处地位的微妙变化。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争吵，正是因为一方对同盟关系现状已有不满，且在努力促成和显示这种变化，而另一方对此则没有相应的察觉，行为方式依然如旧。因此，当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建议作出强烈反应以后，使莫斯科感到震惊和不安。事情过后，赫鲁晓夫承认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赫鲁晓夫曾亲口对儿子说：「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并在回忆录中后悔地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本无恶意，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本身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苏联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同时指出，但作为苏联的盟国）特别是作为一国领袖：毛泽东对于一个具体的建议表现得如此激动，怒不可遏，却是难以理解的，其中似乎另有原因。现在来分析，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固然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之间同盟关系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毛泽东本人的心态。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早就心存不满，只是碍于当时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朝鲜战争使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猛然提高，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革命资历又不亚 ID6 《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

第八章坚持「单这」经济跌入谷底

于其它国家的共产党首领，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和彼匈事件以后，苏联的威信受到打击，而毛泽东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赫鲁晓夫渡过了难关。苏联党居高临下指挥各方的时代已经过去，至少在国际共运中北京已经可以同莫斯科平起平坐了，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相比，1957 年他在苏联的境遇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沈文的结论是，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指导地位，那庆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化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的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可以认为，中苏在 1950 年代中期以后未能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反而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而不应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久价

因此】在 7 月 31 日赫鲁晓夫秘密来访与毛泽东会谈以后，虽然苏方向中国提供海军新技术援助的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但这场风波的阴影并未在两国领导人的脑海中散去，中苏关系并未因此好转，反而愈来愈呈现出一种紧张状态。

107 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畏波，台及。合肿队问题的再讨论〉·载沈志华，李丹慧：《战复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戏》（北京：人民出版社，之剑巧）·，3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春（1958—1961—乌托邦运动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探取某些积极的步骤争取国际形势的缓和，这在中苏双方是没有异议的。但在战争与和平的根本观念和具体政策方面，双方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中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和平共处，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运或避免，但这主要有赖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殖民地人民斗争的发展；赫鲁晓夫认为，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路线，和平共处的局面主要靠大国之间—主要是苏联和美国两国领导人通过谈判来实现。1958 年，美国和英国分别就停止核

武器试验问题表示愿意同苏联进行谈判，这对畏期努力同美、英搞缓和的赫鲁晓夫来说，似乎是已经看到了缓和的曙光。但在长波电台，共同舰队风波过后，中苏关系中发生了如下事件：第一，1958年8月，当赫鲁晓夫离开中国不久，中国军队开始了炮击金门战投，这不啻是向赫鲁晓夫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在没有任何通气的情況下，突然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不仅是无视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而且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藐视。第二，在台海危机期间的9月24日，中国在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的几枚美国「响尾蛇」空空导弹《当时是很先进的》，其中一枚坠地未爆。苏联军事顾问得知彼立即报告了莫斯科，引起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这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

第三，以上两件事，直接引起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这个盟国的疑虑。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通知中方苏联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理由是：一、国际上正在进行禁止使用核武器谈判，在中国制造核武器会破坏谈判；二、生产原子弹费用很高，是中国经济无力承受的负担；三、苏联拥有足够数量的核武器，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和保卫兄弟国家。中方认为，苏联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

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跌入谷底

567

是中苏关系中一个重大事件，对苏方在对华关系上将采取何种新方针，有待观察，暂时未做答复。

第四，1959年8月，中印边境因印度巡逻队越过中印边界，在中国一侧建立哨所，并向中国军队开枪射击，引发了武装冲突。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劝告，于9月9日发表塔斯社声明，对中印边境上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认为这将「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且使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相互访问前夕的「局势复杂起来」。对此，中方极为愤怒，认为这是公开暴露中苏分歧，而偏

祖印度的错误做法。

以上事件，无疑更加重了相互的不信任感。

2 中苏第一次正面冲突

如前所述，1950年代中期，中国对苏联采取缓和美苏关系的外交政策是支持的。但中国与苏联所处的环境不同，美国对中国仍顽固坚持不承认的敌视态度，实行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继续无理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军事力量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南越的存在对中国构成很大威胁。从1950年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时续时断，反映美国根本没有诚意。因此，中国很难相信美国真会显意缓和国际局势。

1950年9月15日到20日，赫鲁晓夫到美国访问，先后在华盛顿和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公报称，双方主要讨论了全面裁军问题，另外也讨论了德国问题、对德和约问题、柏林问题，以及两国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公报没有说会谈达成甚么具体协议，说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赫鲁晓夫的这次访问，是战后苏联首脑第一次访美，因此确实造成了某种缓和气氛。苏联报刊宣传「戴维营精神」标志着「人类历史新的转折点」。中国政府对赫鲁晓夫访美的行动，曾表示了支持。9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有益的。明确阐明：中国政府也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赞成赫鲁晓夫这种活动，赞成他为全面彻底裁军

56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49—1961）—乌托邦运动

这个目标而做的努力。当然，全面彻底裁军能否实现，是不是按赫鲁晓夫目前的做去实现，中国政府抱有自己的看法。

9月30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的活动，他是带着所谓「戴维营精神」来的。在当晚周恩来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作了长篇讲话，在谈到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之后，他说：「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样干的人。」这话显然是说给中国主人听的，影射1958

年中国炮击金门和 1959 年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是在用武力「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固性」，是不可取的。

10 月 2 日，中苏两党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赫鲁晓夫首先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苏美会谈情况，他认为：在美国政治活动家中肯尼迪存在着一种有利于对悬而未决的争端问题进行和平调解的情绪，对于继续沿着巩固和平的道路坚定前进出现了完全现实的可能性。据此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必须避免一切可以被反动派用来把世界重新拉回「冷战」轨道去的可能性。他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对外政策方针。接着，赫鲁晓夫就 1958 年 8 月中国炮击金门、1959 年西藏平叛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对中共领导人提出批评和责难，说甚么炮击金门是「为了逗弄猫儿而向沿海岛屿打炮，那是不值得的」；因边界争端与印度发生冲突，就会把尼赫鲁推到帝国主义一边。这不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要求中共「应该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提出「我们必须协调国际政策」。他还具体提出，为着缓和跟美国人的关系，中国是不是可以把监狱裏的几个美国人释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它领导人明确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和与蒋介石的关系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是美国侵略中国的台湾，我们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台湾；至于中国怎样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别人无权过问。中国决不作对台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关于正在中国服刑的美国人，能否提前释放，要按中国的法律办事。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的问题，是印度军队入侵了中国领土并进行射击」中国军队只是作了必

第八章坚持「跃进」总路跌入谷底

要的反击。苏联塔斯社发表不分是非，对中印各打五十大板，把中苏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暴露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面前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国并没有改变同印度和平共处的睦邻政策。逐一把赫鲁晓夫顶了回去”

赫鲁晓夫气恼地说：为甚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有一句套话叫「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但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你们不是说我们太做汇了吗？，这次中

苏两党领导人的会谈，因问题涉及中国的根本主权和利益，因而引发了正面冲突，双方发生激烈争吵，互相指责和攻击，最后不欢而散。对赫鲁晓夫访美，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下面这首打油诗：

西海如今出圣人一辆汽车几间屋
举世劳民同主子刻宁火焰成灰烬
涂脂秣粉么素门。三头黄犊半盘龟。
万年宇宙绝纷争。人类从此入大同。1 功

10月4日，赫鲁晓夫离京回国。6日，他在海参崴发表演讲。影射攻击中国像r好斗的公鸡J，热衷于战争；31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108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959年10月之日；苏斯洛夫（M汕上议 Sus 《Qv》就《关于苏联苏政代表团之行的报告》给苏共中央主席的报告，1959年12月1a日。引自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t编》，第十三卷·页3之10—3222·3288—3324。另参见吴玲西，（十年论战）·上册，页221—227, 109 慧鲁晓夫与毛泽东的t谈记录，1959年10月2日；安东诺夫关于赫鲁晓夫访美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炼·1959年10月14日，引自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t编》，第十三卷，页3210—3222·”23—3233，另参见吴玲西：《十年论战》，上册·页221—227。

110 吴玲西：《十年论战》，上册，页228·诗中’：「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J两句，是指赫鲁晓夫向中共领导人该他在美国看到美国人的生活是，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一家都有几间房子，住的拮据，吃的也很好，生活水乎很高；他在美国受到了热烈欢迎，一位农场主送他三头良种牛，有位实本家送他一盘古银币，

57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二第四专（于铭一1961）—鸟托年运动

议上·赫鲁晓夫又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 J0t111Z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讲话，再次影射攻击中国党，说甚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落彼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而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J。这就是说，各国党要同苏共保持一致·11212月30日，

赫鲁晓夫在回答阿根廷《号角报》(C细而)社畏的问题时,提出 r 要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J, 13 苏联报刊根据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个总目标,连篇宣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一切,在毛泽东看来完全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

3 争扛列宁主义的旗帜

1957年11月7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的莫斯科宣言中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对共产党内出修正主义,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会前,毛要英文秘书林克为他找出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讲话材料。毛在杜勒斯的讲话材料上批道: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第一次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11月12日】毛与华东各省市第一书记谈话,向他们解释甚么是杜勒斯的路线。毛说:杜勒斯希望「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一方面「决不结束玲战 j; 另一方面,「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他说:「放弃使用 111 吴冷西,《十年论战》 112《建园以来毛潭东文稿》 113 吴冷西:《十年论战》

,上册】页 227·

,第八册·页 602—603 上册·买 26!。

第八章坚持「单进」经济跌入谷底

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

r 和平转变谁呢他的那个思想

? 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头覆活动,

毛解释说:内部转到合乎

·……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114

12月,毛在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写道,

敌人的策略是甚么?

(1) 和平旗子,大造导悖,大搞苏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

这是第一手。

(2) 和平棋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农和解，那农紧张：欧洲和解 4 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乌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形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坚持下去 7

毛认为赫鲁晓夫正在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据此，毛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最后说：「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对表愤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J’”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前国际形势和相关的国防战略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会议认为，艾森豪威尔1960年初发表的新年国情咨文，表明美国的确是在准备战争。

应

毛潭东，王稼祥同华东地区各省市第一，记谈话记录 119”年 11 月 12 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 1027·毛。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 599—印 2’

5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第四卷（19 铭—196 功—乌托年运动

该看到，美国的本质没有改变，战争的危險仍然存在。我们的战略准备，还是要放在它要打仗这个基点上：这样才能有备无患。关于中苏关系，分析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赫鲁晓夫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继续滑下去；二是碰了钉子以后，可能有所改变。中国的方针是，坚持团结】同时进行适当的和必要的批评，对“些重大的国际问题，正面地发表我们的意见。毛泽东说，正面讲道理时不要同苏共、赫鲁晓夫公开争论，不点他们的名，不引用他们的话：但可以引用南斯拉夫人的话，用批评南方的观点的形式讲清道理。116 会后，中央常委指定中央宣传部组织起草文章，批评南斯拉夫党的错误观点，正面阐述与当

前国际形势密切有关的若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¹¹⁶，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时发表。

赫鲁晓夫为仗玷月举行的法·苏、美、英四国首脑会议：开成一个旨在缓和国际形势的会议，他准备单方面承诺苏联将裁军一百二十万，并将这个打算于1960年1月8日通知了中国领导人。中国政府对此高度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一方面赞成裁军，另一方面正式声明没有中国自己参加，不承担任何义务¹¹⁷。

1月23日，赫鲁晓夫就召开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致信毛泽东。毛回复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央委员、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中央委员伍修权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2月4日，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上，苏联宣布单方面裁军一百二十万，华约各国跟着宣布裁军，共裁军三百三十万。会议通过宣言，说裁军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苏联在联合国十四届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反映了华约缔约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2月6日，根据事先的准备，康生在会上发言指出，帝国主义性质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由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中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吴冷西：《十年征战》·上册，页245。

117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8。

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跌入谷底

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它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¹¹⁸。由于《人民日报》当天公开发表了康生的讲话，使赫鲁晓夫十分恼火，他在招待会上祝酒时，不指名地指责中国党在拆苏共的台。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率团出访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两国。其时，正是印度议会和报纸就达赖喇嘛和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国进行大肆攻击于印度尼西亚掀起一场驱逐、迫害华侨的反华运动。赫鲁晓夫在这两国反对中国浪潮高涨的时候去访问¹¹⁹也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误解。

鉴于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表现，及其以后采取的行动，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赫鲁晓夫为着追

求跟西方达成妥协，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中国必须通过自己的外交活动打开外交局面，以对付世界范围的反华浪潮。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决定：一是由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二是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同时根据列宁的观点：写出文章，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时一并发表，以回答现代修正主义对列宁观点的歪曲、篡改和阉割。这表明·马列主义的大旗，要由中国共产党人来扛了。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由中央宣传部协助陆定一准备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由胡乔木牵头负责起草《人民日报》社论；由陈伯达牵头起草《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文章应阐明的主要内容‘1B和三篇文章的分工。118会让认为，文章总体上要讲清七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讲世界形势·讲新技术—核武器出现后，世界形势有甚么变化·甚庆变了·甚么没有变，现在是甚么时代，新时代是甚庆时代。因为修正主义一个贡要观点，是认为时代变了·第二1要讲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因为修正主义讲列宁主义过时了·我们要明确回答；在当今这个时代·，1J宁主义没有过时·第三·要讲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学说·第四，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第五，讲帝国主义的本性变了没有·要讲清楚维攫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关系·第六，讲革命斗争和议会斗争的问题·阐明我们对和平过渡问题的观点·第七，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问题·指出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

57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安客（19, s — n61）—鸟托年运动

1开0年4月16日，《红旗》杂志首先发表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纪念文章。着重从理论上阐述列宁有关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指出，新技术革命和核武器的出现‘，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改变时代的本质，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结论是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要坚持列宁主义的旗帜，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

4月22日，首都北京毕行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政

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作畏篇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重点是批判和平过渡的观点。强调列宁的精华就是他的革命精神，他在革命胜利前是如此，在取得革命胜利后也是如此。指出：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它们被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自己害怕战争，也害怕革命，害怕由革命引起战争。它自己不想革命，也反对人家革命，既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革命，也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看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着重分析当前形势，讲述现代维护和平的斗争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和战争势力的关系。强调中国人民在纪念列宁的时候面临三大任务：建设社会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团结国际友人。争取世界和平：就要反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文章列举了美帝国主义在戴维营会谈后的三十五个事例·揭露美国在继续执行它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扩军备战政策。号召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嗣后，以《列宁主义万岁》为书名，将三篇文章印成小册子，并译成英·俄、德、日、法文广为发行。1,

、19 这三篇文章发表后，不仅在西方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使苏联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受到极大震动——他们第一次知这双方领导人之间存在着 1 大分歧·很多人甚至以为是翻课出现了错误·详见《内部参考》、1960 年第 3 辑 3、么叫 6、3059·3062 号·

第八章坚持「军退」经济跌入谷底 575 对中国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苏方很是恼怒。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FrolKodov）在一份报告中说：r 中一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and 策略立场进行攻击。借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闲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在这些文章中，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极左的漂亮词句和单方面解释列宁主义原则被当作是在正统地捍卫

列宁丰义，’加

作为对中共的回答 1 苏共中央书记库西宁 (Ottov, Kuusinen) 4 月 22 日在莫斯科作报告说：「只是重复帝国主义具有侵略性这样一个老的真理是不够的，教条主义的立场是落后的立场。」新式的战争武器开始显示出有利于和平的压力。」[帝国主义内部出现了头脑清醒的国际活动家。他们也意识到进行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是不理智的，这无疑对争取和平的胜利斗争是有意义的。] “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联络部报来的库西宁的报告摘要后，明确表示「此文要批评」。他指示杨尚昆与邓小平、陈伯达商办；要写一篇〈同库西宁同志商榷〉的文章，有根据地有说服力地批评库西宁文章中错误观点。」²²

中方指责苏方为修正主义，苏方指责中方为教条主义。这种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已不简单是一个理论上的争论，它背后所反映的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谁主宰，这样一个领导权问题。

120 科兹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1960 年 7 月 13 日)，引自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戴编》，第十三卷，页 3 细一) 417。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摘编 (1960 年 6 月 26 日) 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 169 一幼 Q’

122 毛泽东：关于要写一篇〈同库西宁同志商榷〉的文 t 的批语 q1960 年 4 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 1 印，57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春 (1958 — 1961) — 乌托邦运对

4 布加勒斯特的较 t

苏、美、英、法四国原先商定，将于 1960 年 5 月 16 日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讨论柏林问题。由于 4 月底发生了美国 U-2 飞机侵犯苏联领空被击落的事件，5 月 10 日，四国首脑齐集巴黎爱丽舍宫后：赫鲁晓夫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苏联赔礼道歉，惩办罪犯和保证不再做这种飞行。但是艾森豪威尔只同意在他的总统任内 (1961 年 1 月届满) 不做这种飞行】其余要求不予接受，会议因此流产。‘23 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中国迅即作出反应，公开表示支持苏联的立场，谴责美国对苏联的侵犯。5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苏

联的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利用这一事件揭露美帝国主义。5月20日，北京举行有一百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集会，支持苏联正义立场，反对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期间，毛泽东频繁接见亚、非、·拉各国访华代表团：5月3日，接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国工会妇女代表团不7日】接见非洲十二国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工会等代表团冯日，接见拉丁美洲八国代表和著名人士；9日，接见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14日】接见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毛向他们说明，最近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卢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率备便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事实中觉悟起来。·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各成就和成就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17’

123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页34·

124 毛泽东：《接见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时的谈话》（1960年5月2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188，第八卷坚持「跃这」经济跌入谷底

毛泽东强调指出：「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一事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分析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可良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向美国总统下跪。毛认为，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将赫鲁晓夫定性为半修正主义。挪苏联击落美国间谍飞机及赫鲁晓夫在四国首脑会议中的强硬态度，表现出了对中国论点的某种趋

同，据此，中共中央确定在即将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应按照〈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观点，来动员全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6月初，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即已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等六个问题上的提法存在重大的原则性错误，并且认为报告中对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不友好态度。6月1日，中苏双方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和格里申（Viktor Grishin）举行会谈，苏方拒绝了中方的种种指责，表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加引号只是苏方行文的一种习惯性表达方式，丝毫不掺杂感情色彩。翌日，在十二国工会党员代表举行的会议上，有不少代表指责中国犯了「左派幼稚病」。6月3日至4日：世界工联书记处和执行局召开会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改，中方仍然声明对其中某些错误论点保留意见，但是同意把报告草案提交理事会讨论。’ 26 125 参见吴冷西：《十年绘战》·上册·页2的一272·126 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纪录 12 的 2 年 6 月 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8 卷（1961）— 乌托邦运动

为了避免在大会上形成争论 6 月 5 日晚，中共中央召集十七国工会共产党和工人党党员负责人四十余人召开座谈会，进行内部交换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了会议。邓小平在会上阐述了中共中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计划但当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谈完以后，格里申表示反对，并且拒绝邓小平的解释，拒绝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带头退场，东欧国家的代表也纷纷跟着站起来，导致座谈会中断。此后，中国方面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于是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方的观点。125

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尖锐斗争」。世界工联书记处面临失控的局面，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苏方代表表示「不同意的各点可以不写」。终于达成了中方认为「比我们设

想要好的决议 J0129

会议结束后，刘宁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样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的斗争和把世界工联理事会这个表决机器的指挥棒打翻，在工会会议上还是第一次。认为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次会议将发生深远的影响。130

苏联领导人则认为，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中国同志们的行为是分裂活动，中国人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置于

12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页 276 所记在中共中央 6 月 5 日召集的座谈会 t 上，由刘宁一致词说明中共的基本观点，有误。

128 根据这一方针，翌日，周恩来设！招待各国工会代表时发表讲肴说：和平「必须依算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 J，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 J·6 月 8 日上午·中国工 t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 t 副主席刘长胜在工联理事大会上的发言中，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明确表明了与 t 议总报告不同的认识。参见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弋 2 阆 2 年 6 月 5 日)

129 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2 叩 2 年 6 月 5 日）

130 参见刘宁一《历史回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1 卯引

第八章坚持「军这 j 趁济跌入谷底

自己的监督之下」。「中国同志们所走的这路使中国领导人和其它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壤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

J' 3'

6 月 7 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说明原先提议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推运举行，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兄弟党「会晤」，就开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交换意见。鉴于世界工联理事会期间的交锋，毛泽东分析说，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拉我们好办，无非是要我们多支持少批评，我们本来是采取团结为重的方针。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

上，组织对我们围攻·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充分准备没有坏处。132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率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同时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晤」·中方决定参加会议的方针是：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

彭真率代表团于6月16日离京赴莫斯科，17日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科兹洛夫（Fr01Kozlov）会谈。科兹洛夫对布加勒斯特「会晤」的打算避而不谈，一开始就指责中国发表的三篇文章，以及在世界工联的北京会议上宣传自己的观点，不只理论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错误的。彭真与之争吵了八个小时·彭真一行抵达布加勒斯特后，遭到全面封锁，根本无法同各国代表团接触，对提出会见赫鲁晓夫的要求，也是一直拖延·

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与五十一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一同参加。彭真被一同坐在主席台的其它一些人有意冷落。22日，赫鲁晓夫与中国代表团会面，根131 科兹洛夫在苏共中央全 t 上的报告（“60年7月13日）·引自沈志华、李丹恳收集和整理：《中苏。系：俄。档案原文复印件·编》，第十三卷。页 3346—3417。13? 吴玲西：《十年论战》】上册，页 Z”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6—1961）—乌托邦运动

据中央的原定方针，代表团采取多总少说的方针，以换清赫鲁晓夫的底，赫鲁晓夫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并就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对中国进行攻击和指责·这样，代表团对布加勒斯特「会晤」的意图基本换清了，赫鲁晓夫是要整中国。6月23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信，内容分为七个部分，批驳中国《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观点。实际上】这封信苏共代表团早在21日就以「通知书」的名义发给了其它代表团。接着，又送来一份关于会议公报的稿子。这种架势，明摆看是在对中共代表团搞一场

突然袭击。24日上午，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晤」，一开始就形成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局面。其中发言比较激烈的有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党，波兰和蒙古党的发言比较一般，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党的代表则表示不同意会议这样开法。会上的发言，按照苏方「通知书」的调门，指责中共在时代问题上重复列宁的论述是「教条主义」；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观火」、r「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在国际群众组织（世界工联理事会）中探取r「宗派主义立场」；公开发表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是「向帝国主义送情报」，〈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是南斯拉夫式的分裂活动」，等等。

赫鲁晓夫最后发言，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各方面进行激烈攻击。彭真随即对赫鲁晓夫作了回击，批评他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对于苏方事先拟定的公报提出修改意见。至于是否签字，要请示中央。2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给代表团的电报和为代表团起草的声明·毛泽东指出“

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朴社会主义困家三

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陷入谷底

分之一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阁阶级，代表实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妥共产主义。

会议决定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着重揭露苏共对中国党搞突然袭击，对各国党采取家长式、老子党的专横态度。表示中国党决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棒，决不向任何错误的观点和做法屈服。重申中国党是为团结而斗争的。

就在中国代表团等候中央指示的时候，25日，赫鲁晓夫把本来是十二国党的会晤一手操纵改为五十一国党参加的会议。对会上的攻击、谈骂，中国代表团采取哀兵姿态，以争取时间，取得同情。当晚，代表团收到中央指示，立即将声明稿翻译成外文。在26日上午的会议上分发给各国代表团。赫鲁晓夫对中国党的强硬声明，恼羞成怒，在

下午的会议上再次摆出老子党的架子 7 攻击中国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纯粹的民族主义」，等等。彭真当即予以还击】指出赫鲁晓夫的做法是为所欲为听不得别人意见，谁不听他的就组织对谁围攻，还不准别人为自己辩护，这种行为完全破坏了国际准则。彭真发言时，赫鲁晓夫非常激动，他跟彭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最后，中共代表团为缓和已经出现的严重分歧和对立，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

彭真率中共代表团于 6 月 28 日回到北京。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彭真汇报。会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打算围攻我们，而我们是反围攻，像过去中央苏区那样反「围剿」。但是我们这个反「围剿」要适可而止，要留有余地，不要把子弹一次打完，能够收时就收，有理有利有节。这样】中苏关系恶化。已成定局。

IJ3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珊，页 295 — z” •（毛潭东传（1949 — 1976）），下册页 10 开中说，7 月 1 日，毛潭东的专列停在天津，彭 X 专程赶来向毛汇报 •

582

中华人民兵和国史 • 第胄喜（1958 — 196n — 鸟托年运动

5 撒走专家，归系恶化

就在中方准备休战的时候，苏共领导认为，布加勒斯特会议未能压服中方，斗争必须继续。7 月幼 • 日，科兹洛夫在《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明两党分歧时说：中共领导「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赚武主义和宗派主义 1；在国内「社会改造过程中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把自己的公社说成是 r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冒充为「共产主义样板」。「把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称作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走卒和奸细。」「把自己摆在了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为敌的位置上。」造成这些谁误的重要原因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强调莫斯科宣盲在指出修正主义「是当代条件下主要的危险」，同时也指出 r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也可能成为一些党一定发展阶段的主要危险」。「现在中国同志的 r 左」倾宗派主义观点和他们的非共产主义的行动措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险。」r 所以，为顺利地完摆摆在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

任务，要求进一步开展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为使中国党屈服，赫鲁晓夫决心进一步向中国施压。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外交部，不顾国际信义，提出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7月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从7月28日至9月1日，将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撤回，停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停止执行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

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内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的304个项目中还有201个项目正在建设中，这些项目直接或间接牵动着十二个方面的工作。苏联专家彻走，势必打乱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安排。

134 科兹洛夫在苏共中央全 t 上的报告（珍邱年7月13和整理：《中苏·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

日）、引自沈志华·李丹慧收集第十三卷，页33拓一3417·

第八章坚持「军这」经济峡入谷底

7月31日，中国外交部覆照苏联驻华大使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表示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改变此决定。苏联政府不予理睬，加紧了撤走专家的行动。毛泽东愤怒地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

中国对给予中国以帮助的苏联专家以礼相送。8月16日，周恩来总理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对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周动情地说：r 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J 讲到 t 复，周说：「我的感情已经不允许我再讲下去了……」·在座的苏联专家深受感动，有些人还流下了眼泪。

赫鲁晓夫突然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不只是对正面临严重困难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更是对中国人民感情上的严重伤害。

6 发愤图强，自力更生

赫鲁晓夫撤走专家虽属突然，但中国政府并非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中国驻苏使馆人员对苏联政府有意冷淡与中国的关系，拖延或不执行原定合作和援助项目的情况，早有感觉，并曾向国内报告说：自我国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三篇文章发表后，许多迹象表明苏联在政治上对我冷淡，在经济合作特别是重要关键项目的合作和援助上，逐步采取措施对我施加压力。报告列举了「我方去年提出聘请原子能方面的苏联专家，历时数月，几经催促，尚无答复」。「许多协议拖延不执行；好几个国防尖端项目拖了一年多没有下文；对高、大、精、尖和机密项目控制愈来愈紧；对外事务联繁管理更加集中，交涉谈判中困难增加；较机密的学术会议不再邀请中方人员参加」等事例。联毛泽东当时在这则

135 中。驻苏大使馆给外交部苏鲁司并报刘晓大使的电报（他劲年 7 月 18 日），载《连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九册，页 252 一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报告上批道：「态度有变化，正好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不是吗？」136

为应付可能出现的变局，负责国防科研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 7 月 3 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建议：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我们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今后与苏方的科技往来，凡协议止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笔账。对苏联专家，继续贯彻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的方针；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137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报告。

7 月 5 日至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彭真在会上作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及中苏两党分歧问题的报告，与会人员对赫鲁晓夫在会上对中国代表团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的恶劣做法，表示极大愤慨。

从 18 日开始，会议转向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最突出的是粮食问题，还有尖端技术问题。就在这时，发生了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事件。毛泽东在 18 日的会上说：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党和人民在历史上给我们很大帮助。现在不帮助了，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个

方针。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现在我们可能而且必须搞自力更生。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一国可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甚么非要外国援助才行呢？我们要走列宁、斯大林的道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讨论中，大家认为，应该把决心下在专家统统撤走、所有援助的设备统统不给、条约统统撕毁上。当然，估计他们还是想做生意的。我们要露真算一算账，我们欠他的债怎么办？他们赖账怎么办？经过计算】周恩来说，按八十亿卢布算，过去我们每年还他五亿元左

13. 毛潭东：〈在关于最近苏联对中国大使馆的态度变化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960年7月）·载《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九册，页252’

137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84），页一808. 138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335·

第八幸坚持「军进」经济跌入谷底

右的样子。如果按五亿左右算，我们要十六年才能还清。如果提高一点，每年按八亿算，那我们要十年才能够还清。

中央政治局决定，要争取五年还清。要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要尽快把欠苏联的债全部还清（中国共欠苏联的152亿卢布，真正属于经济援助的只占四分之一其它四分之三是抗美援朝时苏方以半价卖给中国的军火钱）。毛泽东在会上说，不管怎么样，过去我们答应买武器弹药按半价的：现在我们还是按半价还债，一个钱也不赖。经济建设的设备也是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要勒紧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外贸小组，各地方也成立一个外贸小组。

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对苏贸易额占着一半。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粮，油、肉、蛋等农产品。因连续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与会人员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激起了勒紧腰带还债的愤懑情绪·纷纷表

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拍板：「明年还清这个账」，

北戴河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批准了李富春和薄一波联名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为扭转第二季度以来主要产品下降的局面，解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物资使用分散的问题》必须削基建，保生产，集中力量把钢、铁、煤、运输的生产搞上去。毛泽东虽也赞同调整，但他坚持认为其它方面可以减速，钢铁指标不能降低。号召全国大炼「争气钢」。于是，会议决定，争取当年生产二千万吨，提前实现钢产！赶上英国的任务。会议通过了

139 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旗话记录(1960年7月3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0Bg·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专（1958—1961）—乌托萍运动

《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钢的增产问题·如果不认真努力，今年粮、钢生产指针和其它一些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就有完不成的危险。为使保证重点生产和重点建设方针的落实，确定：基本建设项目和生产任务排队的原则是，先中央后地方；先重点后一般；先采掘工业和材料工业，后加工工业；先计划内的，后计划外的。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反对本位主义。’”

《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首先指出了当前外贸工作的严峻形势：截止7月乃日，全年出口商品的收购计划只完成原定指标的433%，出口计划只完辉65%。按照目前的进度计算，估到年底，对社会主义国家欠账可能达到十七至二十亿元（其中对苏联的，欠账十四到十六亿元）·为实现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贸易欠款做到今年少欠，明年还清的目标，中央决定今后三年必须坚持量出为入、内销一般服捉才卜销的参阳贸易方针。■宣布成立由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组成的三人小组，建泣奎按卜贸易指挥部，全权指挥全国的收购、出口和调运运动。！’1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向党

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

会后，各省、市、区党委相继召开常委扩大会或工作会议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激起对修正主义的愤慨和发愤图强的决心；对中央关于保粮、保钢和保证完成外贸的三项指示作了研究和部署，‘认为，140〈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1956年8月14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页528—53，·

141〈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1956年8月10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页512—513·

142中共江苏省委·于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情况给中央·上海周的报告〔1956年8月24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贯彻北戴河会议的部署给中央的报告（1956年8月2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276—277、278。

第八章坚持「率进」经济跌入谷底

苏联修正主义者已「不可能担当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已移到中国，我党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纷纷表示：「将化义愤为力量，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坚决执行中央关于保粮、保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保证完成外贸任务，努力攀登科学技术尖端的高峰，给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更有力的打击·」”为加强对六个战略性地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建立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工作的领导，中央政治局于9月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在各大区的派出机构。任命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二书记，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

六学习「毛着」与突出政治

谁掀起学习《毛选》的热潮

新中国建立以后，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第一个热潮，是伴随看《毛选》第一至三卷在1951到1953年的先后出版发行而掀起的。它是确

立中国共产党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的根基，也是改造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的主要武器。第二个学习
1 妇中共黑龙江省委调于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给中央并毛潭东的报告
(19 恤年吕月 29 日)，载《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九珊，页 281
— 282’

1 “华北局：北京、河北、内蒙，山西四省·市、自治区；刺匕局：
黑总江·吉林、辽宁三省；华东局：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
安做、山东七省，市；中南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
区‘西南局：四川、梭南，贵州、西藏四省、区；西北局；陕西，甘
吁，青海，新届·宁夏五省、区·

1451961 年 1 月：8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中央政治局 1 蝴年，
月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定·并通过决议·《建。以来重要文戏选
编》·第十四册//1 京：中央文戏出版社，[卯刺·页乃一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威史·第四春（1958 — 1961）一鸟托萍运动

热潮则是由 1960 年 9 月《毛选》第四卷的出版发行而掀起来的。《毛
选》第四卷所收录的是 1 舛 5 年 8 月日本投降以后到 1949 年 9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禹泽东的重要著作。这
本选集在这时出版发行，显然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关·选集收
录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
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阐明中国共
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复，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同时对
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也积极做好应对的准备，即采取革命的
两手对付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的策略；明确基本方针是，一切都放在
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自力更生。〈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是说美苏之闲可以实行某种妥协，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仍
应按照自己的情况开展斗争】这种斗争不仅不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
相反是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力量保证。〈和美国记者安娜·刘易
斯·斯特朗的谈话〉，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
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是用来吓人的。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
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些文章的重要观点，在历史上是针对斯大林担心
中国革命会引发美苏大战的顾虑：更是针对蒋介石玩弄和平花招，向

人们阐明；既不要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要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威吓。用以坚定人们的必胜信念。不难看出·《毛选》第四卷在国内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苏联又以撤回专家、撕毁合同、中止援助施加压力的 1960 年出版发行，它所具有的双重意义，即对外以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向人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的正确性；对内以历史经验教育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怕压，不信邪，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定能取得胜利·归结到一点；坚定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念。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学习问题的报告。‘指出，

146 〈中央同意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习问，的报告〉 f1960 年

9 月 2s 田，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三册·X3 “·第八章坚持「军这 1 经济坎入谷底

《毛泽东选集》第齐喜，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记练，是我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结聂，是·乌克兰 f.1 宁主义的玄大发展，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聂好的教矜书。……必将登生极其深远、极其广大的影响。

根据中宣部报告的精神，《人民日报》9 月 30 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旗帜〉；《红旗》杂志第十九期发表林彪的署名文章：〈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社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红旗》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发表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总结〉，对选集的主要内容和精神作了介绍和宣传。由此掀起的学习《毛选》的第二个热潮，对整个 1960 年代煽起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在人们头脑中灌输反对修正主义的意识，坚信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要担当起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任等等，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2 突出政治与鼓吹个人崇拜

· 强调要政治挂帅，要崇拜真理 1 一个班要崇拜班长，都是 1958 年毛泽束为发动「大跃进」在成都会议上倡导而传播开来的。中国的古

训说得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前文所述，在 1958 年的成都会议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的许多人的发言就已经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1'7 的问题。经过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8 年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反对所谓教条主义，1959 年批判彭德怀所谓反对毛泽东而犯了反党的罪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迅速升温。1960 年的现实形势一权对外反对修正主义」；对内统一党内外思想，克服困难，似乎更有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紧迫性。《毛泽东传（1949—1976）》第 802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9 卷（1959—1961）—鸟托年运动

东个人崇拜的需要。党内一直在揣摩着毛泽东的心理行事的林彪、康生等人，在这种大气候下，更是积极站出来推波助澜，成了 1960 年代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第一吹鼓手。

在 1959 年 9 月批判彭德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就向人们提出怎样学习马列主义的问罪。他说：「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快捷方式。」「是一本万利的事情。」10 月，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在 1960 年 2 月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林彪又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背警句，说：「我主张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户」他以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东西这个所谓哲学原理，强调突出政治：11 练、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并把毛泽东 1939 年为抗日军政大学提的校训，概括为「三八作风」，要求全军贯彻执行。1960 年 9 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了政治工作的「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思想第一。在此期间，康生也有创造，1959 年 12 月 2 日，康生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作报告就为毛泽东思想下了新的定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60 年 1 月 4 日，康生向中共中央党校负责人指示说：「毛泽东思想

是「最高最后标准」。党校学员「必须先学毛着，后学马列著作」，这叫「先入为主」

林彪为了排除障碍，使他提出的这一套得以顺利贯彻，刻意在军内制造了一起谭政「反党」事件。在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亲自发动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揭发批判，指责 r 总政治部工作方向上发生了偏差」，通过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148 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攘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取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第八章坚持「军退」经济跌入谷底

591

错误的决议》·“”同时，通过了以林彪「四个第一」为指导思想起草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被称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了1929年古田会议传统的政治工作决议，其突出之点是’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当代的地位下了定义。《决议》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1”创造性地发展了

149 谭政，是中一工农红军初创时期的政治工作者·1937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 1937年4月·挥政以留守兵团政治部名义在中共西北局高干 t 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是在毛潭东·周恩来指导下·由谭政起草，经毛潭东赛改）·曾被视为军队政治工作的经典。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后为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年春·’由中南军区第二政委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9月，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因身体不好，向中央和毛泽东请辞并建议由副主任谭政接替主任一职、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复，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一套提法和做法，挥政均持有不同意见，总为·学理抽选是要系统地学·对毛泽东思想「不能庸俗化」·1 1959年扣月，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说谭政「没有高高地·起毛潭来思想的红旗」，r 对于彭

彭德怀、黄克诚)的错误路线,不抵制、不斗争。对林彪的许多重要指示,没有坚决执行,对[总政治部工作方向上发生的“差”(应负主要的政治责任)。随复召开的总政治部党委扩大会议,对辉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定格为在军队中坚持毛泽东思想、继续该清彭黄影响的两条路线斗争。1961年1月30日,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把挥政的“错误”定为“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并把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畏蒺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辑馮阳文与谭政一起打成反党集团。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1961年2月,中央撤销了挥政的军委常委,军委办公机构成员,降职为总政治部副主任。1962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被撤去中央,纪处书记的职务。调任福建省副省长。刘其人等也受到错误处分。1979年3月3日,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为“挥政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

15D《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页743—秘2。

151「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还理”这一句为毛泽东审改时亲笔所加。毛泽东〈对《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中央转发这一决议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毛泽东传》1993年11月14日—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3弘。

5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1957—1961)——“大跃进”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称读林彪是创造性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我军建设的指针,也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历来的指示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正确处理政治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

强调政治工作第一。提出:「政治挂帅,也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提出要「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兴无灭资斗争」

毛泽东在12月14日、21日亲自审阅和修改了这个决议。中共中央批准了《决议》并转发到地委以上的地方党委。中央在批示中对《决议》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说：

这个决议，继承和发扬了1929年古田会议的传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全面地总结了解放十一年来军队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丰富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措施，打中了要害。……中央认为，决议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和适时的。中央批准这个决议· · · · ·一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滥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可以蚤给地委以上机开阅读。15Z

中共中央对《决议》的高度赞扬，也与当时的中苏冲突有关。10月21日，陈毅元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白指出，突出毛
152《中共中央对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批示》（1960年12月21日），载《建开以来，要文选编》·第十三册，X742—74）·

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纹入谷底

泽东思想，搞毛泽东的崇拜，是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需要。

如果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是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新高潮和在全国范围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契机，那么】中共中央转发的这个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到全党，则是掀起高潮的强大发动机·而在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长期养病不出的林彪的威望。山

3 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不同声音

尽管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由林彪主持的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但在中共高层·对林彪鼓吹毛泽东思想那一套绝对化、庸俗化的做法，还是有看明显不同意见的。

早在1960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讲话，就提出

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指出：「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甚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说：「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郑重地指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利。」邓小平还讲至另一个敏感问题——集体领导问题。他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裹头的作

153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中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昨天风之复，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理论化了。……」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页455·

5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耗年运动

用说得合乎实际。」邓小平说：中央已经发了一个指示，准备还要搞点材料，再发个指示。纠正这种倾向。，

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系统地提出了后来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学《毛着》「二十一字方针」：「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对于林彪提出的「二十一字」箴言，许多中央领导人有不同看法，因为它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历来倡导的要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方针相违背。与林彪发生正面冲突的，是林彪的老搭档罗荣桓元帅。

罗荣桓·因谭政对林彪的一套说法和做法没有积极贯彻，1960年10月受到林彪的批判后，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从1950年代起，罗就主张，学习毛泽东著作要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党史为线索，学习毛主席著作」。所以，在林彪提出「带着问题学」的一套方针以后，1961年的1、2月间，罗荣桓就在不同场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

出：「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法不适当。」
「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对林彪提出的「顶峰」论，罗荣桓也明确表示不同意。他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针对连队基层干部提出不知道如何学才能「立竿见影」的问题，罗荣桓回答说：「毛主席的著作，你们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可以【见影】，那是以后学习成效的问题，先不要考虑它。」3月，罗荣桓在视察畏抄第一政治干部学校时，对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讲了自己的看法】并对林彪主张「背一点东西」，把《毛选》中「最枯燥最重要的话背下来」提出不同意见，指出：「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

巧 4 邓小平：〈正确地！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25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83—2以。

第八章坚持「跃进」经济跌入谷底

头不对马嘴！」要求学校「组织学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能只对书中的个别词句，一两句话发生兴趣，要注意学习毛主席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领会精神实质。——马列主义从来就是反对教条、反对迷信的」

1961年3月下旬，罗荣桓同意《解放军报》将他视察部队期间关于如何学毛着的谈话公开发表。4月下旬，林彪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这时，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4月30日召开军委常委会议。会议将要讨论的文件中也含有「带着问题学」这样的话，罗荣桓感到有必要当面提出不同意见。

4月30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会议。罗荣桓发言，直截了当地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开始佯装不知，然后又反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罗荣桓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半晌，林彪无奈地说：「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接着阐明他的观点。这时，林彪不等罗荣桓把话说完，宣布：「好吧，散会！」便站

起身，拂袖而去。

《解放军报》遵照林彪的指示，从5月1日起开辟《毛主席语录》专栏，内容要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于是，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被分门别类，制成语录，每天一条，见诸报端。报社抽专人每天查找语录，然而，只登几天，把毛选从头到尾查遍，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报社负责人向总政主任罗荣桓请示。罗荣桓明确答复：

“辨领纸主要是贡献毛主席（对晋按日报编转人员的讲话）的精髓……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篇可以，找不到也可以。

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和尚念经。敲打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装呢！”

毛主席不要像

155 《屈荣橙传》编写组：《罗荣种传》【北京‘时代中驯出版社，1961】。页，如一。92.

中华人民兵和鸥史·第四专《1958—1961）—鸟托并运动

在答复报社后，罗感到事情重要，立即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打电话。邓小平把问题提到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书记处一致赞同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又说：“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151 就是指的1961年的这件事。

对林彪那一套，当年主持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宣传部领导人也不以为然。陆定一说：毛泽东思想再好也不能天天学天天用，比如宣威火腿，天天吃也腻了。打乒乓球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输了呢？周扬说：毛泽东思想是灵魂，不是肉体。是红线不是红布。许立群说：立竿见影，阴天怎么办？”

1961年2月23日，中宣部向中央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这是中宣部对全国报刊书籍进行一次检查的结果。

《报告》批评有的把「发明或发现」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

联紧起来，或者说成是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于《体育报》刊登的〈庄家富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一文，说庄家富「读透《毛泽东选集》的战略战术部分，创造独特的中国式横拍打法」；《健康报》的社论把治疗慢性病的一种方法即「综合快速疗法」，说成是「从理论上到实践上应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学说」的结果；有的出版物把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牵强附会地和医治疾病直接联接起

156 邓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顿〉1975年9月之7日、10月4日）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36，

巧7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第二卷·页39·

鹦黎之：〈周扬与「文艺十条」及「文艺八条」〉，载王蒙、袁鹰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表q一超3’

载《邓小平文选》

载《邓小平文选》《忆周扬》《呼和浩特：

第八章坚持「跃这」经济跌入谷底

来。一本名叫《雄心壮志》的书宣传旅大市第土医院内科医生徐志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医治癌病的方法，说「根据【停停打打】的游击战术」，采取所谓「服服停停的游击服药方法」，「让病魔摸不到服药的规律」

《报告》批评说：有的出版物，甚至把一些错误的措施不适当地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例如，1959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番禺南村农民学理论》一书，介绍农民学了《矛盾论》以后，为了解决缺乏肥料而拆了许多泥屋时说：「矛盾摆出来后，经过辩论分析，瓦岗社员亚娣就运用了《矛盾论》的原理对儿子说：保万斤和峡肥是当前生产的主要矛盾，拆泥屋和个人生活有困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这样就打通了儿子的思想，拆了自己的房屋。」

《报告》在例毕上述事实提出建议：

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是一件十分重大、严肃的事情。今后应当加强这一工作，但在宣传中必须防止上述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免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并将过去已经出版的出版物（包括革

命回忆录)进行一次检查,分别各种错误、缺点的情况和程度,加以处理。有的应该停止发行,有的应加以修改后才能再版。今后各地报刊书籍出版机关,在发表这类文章或出版这类书籍时,一定要经过省(市)委或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的审查。当否,请予批示。‘

这份报告送到中央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都画了圈,并在3月15日,以中央名义转发全国县团级党委,明确表示:「中央同意报告中的意见。」

巧9(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于毛潭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1961年3月15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十四册,页n7—Z以)。

5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二第四专《1958—1961) —乌托撵运动

但是,这种正确意见并未能在中共党内成为主流】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林彪歌颂毛泽东的讲话”得到毛泽东的读赏并转发全党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升温。

七经济跌入谷底,农村灾情弥漫

1 全国保钢比例更失调

自从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以后,冶金工业部、煤炭部、铁道部一起,就保钢问题进行多次研究,提出了增产节约的紧急措施。9月17日,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报告说钢的生产:8月上旬是平均日产3—64万吨、中旬4.07万吨、下旬4.48万吨;9月上旬4.81万吨,中旬可望超过五万吨。初步扭转了4月份以来工业生产下降的趋势。报告同时指出:但上升的速度是缓慢的,同今年的钢产任务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看来,全年完成1900万吨到1950万吨钢,3000万吨以上的生铁是可能的。当前,最迫切须要解决的问题是:煤炭的生产和调运;提高生铁质量和集中使用生铁;搞好运装卸工作。,”“中央批准了国家经委党组的

坏0 林彪说: r 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

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总鹅主席的话。那庆，困难会 d 嚼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从看得到，跑得到的，同志们的思想经常出现的三种状况，一是毛主席的思想；二是 r 左 J 的思想；三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复都瞪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有些同志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思想。但是把事情偏往佐拉、执行主席思想走了板。精神并不一致。当然也有右的问题。党内外都是有的。一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 t 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因此。在困难时期。实更需要团结。越要跟，毛主席走，J161《当代中国经济管理》网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页 146。

第八章坚持「军这 j 经济跌入谷底

报告。号召 r 工业交通战线的全体同志们必须紧念动员起来，为在今年完成 1900 万吨到 1950 万吨钢而奋斗 j。

10 月 8 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狠抓钢铁生产的通知彼，钟过突击，11 月中旬钢平均日产 t 突破了六万吨，当月下旬又很快跌落了下来。同时，铁、煤、运输也出现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11 月下旬的平均日产 t，钢为 5.73 万吨，铁 7.15 万吨，煤 62.7 万吨，铁路平均日装车 3.32 万辆。显然、原定计划难以完成。

据此，中共中央于 12 月 3 日又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强调：今年能不能完成 1860 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注目的大事，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如果我们不立即抓紧时机，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那么，全年钢铁生产的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12 月份的平均日产量：钢确保 6.2 万吨：争取达到 6.3 万吨；铁确保 7.8 万吨，争取达到八万吨；煤确保六十六万吨，争取达到六十八万吨；铁路平均日装车确保 4.1 万辆，争取达到 4.2 万辆。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铁、钢、运，把钢的生产水平突上去，确保今年工业继续跃进的胜利。163

由于集中力量保钢，1959年钢产量虽然极其勉强地完成了1866万吨的计划，‘但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更加失调：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再次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中共中央对国家经委写组《关于以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紧急措施的报告》的批示（1960年9月18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页582。原定的钢产量：第一本账1800万吨·第二本账？你如万吨！第三本账1900万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59》·页160；《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页1只”

《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在总结1960年的保钢运动时说：r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各钢铁厂都在拚设备·提高钢铁产量·到了年底】终于生产出来1806万吨钢和1111万吨钢材。由于钢铁企业设备能力不平衡，缺少轧钢设备，当年积压了大批钢锭。经济效益是不好的。」周传典等主编：《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d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页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3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积累的比例失调，1958年到1960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很高的年平均积累率24.2%。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农业却下降22.8%·其三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生产挤占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生产，使其它部门无法正常生产；因重工业的投资1占总投资比重高达50%以上，轻工业受到挤压，加上农业提供的原料大大减少，使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增加大量职工和投资，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全国市场商品供应明显减少，有些生活必需品时有脱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报告，到1960年9月底，各地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的商品已经达到三十多种16s），加剧了已经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

2 粮食危机严重显露

粮食问题在上半年就已相当紧张，尽管采取「挖东补西」r抽肥补瘦」等措施，仍无济于事。据粮食部计算，第三季度国家要从有关省区调

运 60.3 亿斤粮食用来保证京、津、沪、辽和出口的需要。这是一压再压的最低限度的需要数字。因为：第一】京、津、沪、辽第三季度城市销粮预计要 42.53 亿斤，9 月末比 6 月末还要补充周转粮库存 2.37 亿斤，共计 44.9 亿斤。除京津沪辽本身收购 7.9 亿斤外才其余三十七亿斤必须依靠外省调入。第二，供应出口的粮食至少需要 12 亿斤。第三，青海、西藏需要调入一亿斤，省与省之间的季节调剂和品种调剂需要 9.8 亿斤，共计 10.8 亿斤。如此巨大的调拨数字为往年所没有，而国家库存仅有 300 亿

166 王毅之主编：《当代中国的轻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 引页 199·

第八章坚持「军需」经济跌入谷底

斤，是 1953 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最低的一年。，“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说：「8 月上旬的粮食调运情况仍然不好。」r 当前的粮食调运问题是拖不得的。因为现在的安排是一个萝卜顶一个眼，任何一个调出地区稍一拖延，等待调进的地方马上就有脱销的危险。」中央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 r 吃饭第一」的精神，确保 8 月和以后每月粮食调运计划的完成」。并再三叮嘱：『时间紧迫，万万火急。』‘679 月 2 日，中共中央再发《关于继续抓紧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进行督促。问题显然不是各地有粮不愿往外调运，原因在于缺粮并不是个别地区。据中央财贸部第二十五期工作简报反映·河北省新乐县灾区夏粮估产偏高，收购以后，富粮不足。又据新华社 8 月 31 日和 9 月 2 日的《内部参考》反映，山东某些地方在麦收以后，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现象还在继续发生，偷青吃青现象很严重。另外，偷青吃青、人口外流、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在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也有发生。

全国粮食的购销情况是：从 7 月 1 日到 8 月 25 日，征购粮入库 139 亿斤，比 1959 年同期的 190 亿斤减少五十一亿斤；在同时期内，销货 152 亿斤，比 1959 年同期的 139 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弘一出一入为六十四亿斤·库存比 1959 年同期减少了 100 亿斤（包括 6 月底

以前的库存减少在内)

这万万火急的重担不能不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承担。在那段艰难的日子裏，周恩来亲自指挥粮食的调度，被人们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

166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戏出版社，1998)，厦

金神及主颈：（周恩来传（19必一1976））（北京：中央文

1559.

167 〈中共中央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1960年8月15日，·载《建·以来重要文戏还领》，第十竺册，页丰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斋春11958—1961)一鸟托年运动

我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哀好几次，主要是护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绅介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才去。16s周的秘书李岩回忆说：「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周恩来练取腊报，总是自己用笔计算，各地库存多少】每日销售多少，可以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那裏等等，都要问得一清二楚。

当时，各省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包括一些产粮区也很紧张。周恩来则亲自出面，做细致的说服工作·如，中央本来已向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二十八亿斤粮食的任务，后来又提出要增加二亿斤。使省委书记杨易辰觉得如果省内粮食出了问题，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因此，向周恩来反映困难·杨易辰后来回忆说：

总理表丽出高度民主作风。他并不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强迫戒执行命令，而是付心地听我讲完，然援循循答夸地与我谈……黑龙江有困难，但其它省份更困鸡，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泛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二同徒，才龙渡通难开。每一个党贝拎部·尤其是领导拎部·一定要顾全大局。总理一席话·使我深受教

育。……思想通了，在行动上我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调检计划，想办法做好多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签三十亿斤的任务。

兀，0

1 韶力平等访问陈口栋记录 11981 年 12 月》，载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 例 n），页 335—336·169 转引自《周恩来传（1949—1956）》，页 1559·

170 播易辰：〈深情的怀念〉，载《我们的周总理》编写组：《我们的周总理》化匕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0》，页 115.

第八章坚持「车退」经济跌入谷底

603

鉴于当时的紧张情况，中央采取了压缩城乡口粮、食油的供应标准，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171

中共中央在 9 月 7 日卞发了《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区，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三百六十斤；淮河以北地区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原样三百斤左右；各省重灾区则压低到平均每人三百斤以下，并应将十二个月的粮食分做十三个月来吃。城市的口粮标准，除高温、高空、井下和负担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除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压低口极标准两斤左右（商品粮）。，农村的实际情况是连降低后的标准也难以维持，据统计，1960 年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由 1 外 7 年的 589 斤下降到 429 斤，每人每天平均口粮还不足一斤：灾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m 为压缩城市橙食销量和城市口粮供应，除降低口粮标准外，还采取了以下措施：动员城市人口到农村去；对人口、工种、口粮定量

171 在执行这一方针的同时，为原。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共中央。记处于 1960 年 8 月 i 日批转了届务院秘书长《弱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陈. 的报告》、提出特殊供应办拔分三类：第一类，剧委负长，剧总理·国防委员 t 副主席·政协副主席，t 高人民洗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畏·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离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刘部长·正刘主任，

高法院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正副主席，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行政七级以上其它人员，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用条·鸡蛋三斤·第三类·全国人大党外代表，全国政协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正副司局级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中央常委·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行政十一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二斤，白枪一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二斤（从十一月份开始，党内干部按上述标准减半供应），并从8月开始施行·这项特需供应的办法是中央在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临时措施·李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上册；畏春：吉林人民出版社·革命年代》，页496—497。172〈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1960年9月7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页54—570，

173 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1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9卷（1958—1960）——乌托邦运动

进行核查；加强户口管理，严密粮食管理制度；城市饮食行业用粮，糕点和其它粮食制品，实行严格的粮票供应的制度等。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又下达了《关于压缩食油销售和加强油脂收购的指示》。指出）1960年预计食油总产量只有38亿斤左右，比1959年减产20%以上。两年来国家为了保证供应，已经挖用了四亿多斤食油周转库存。截止9月10日，食油周转库存只有6.7亿斤，这是统购统销以来最低的一年。但城市的需求量却大大增加，使国家供应和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为此决定，1960年度食油销售量严格控制在19.5亿斤的指标内，比上年度减少3.8亿斤，其中城市压缩2.8亿斤，农村压缩一亿斤。降低后的食用油定量标准为：中央直辖市和各省（区）人民委员会所在城市，每人每月从现有的标准十两压缩到七两；省辖市和专辖市由七两压到五两；县城和集镇由四两压到三两。

175 在此同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全国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7611月14日，又下达了《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难，渡过灾荒。中央根据

科学院的建议，推荐：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虽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一种食用酵母）、小球藻等代食品。《指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参加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办公室；要求各级党委也成立瓜菜代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 ‘， ■■■■ ‘——口·—••■■■

174 以北京市为例·经过 3 个月的整顿，全市 244 万人压缩口优定量 823 万斤·平均每人压结口柜 3.3 斤，加上核实人口、工种·取消不合理的补助粮·每月减少供应 t5 加万斤，两老合计每月减少柜食供应量 1~3 万斤·《当代中刘的柜食工作》，页 115。175<中共中央关于压缩 t 油销量和加强油脂收购的指示> !1960 年 9 月 23 日 1，较《建国以来 t 要文戏选细》·第十三册，页 586。

176 中共中央批转全·财买书记 t 织《关于坚决做好秋冬优食工作的讨脍纪要）总卿年 10 月 16 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戏选编》，第十三册·页啊 3，

177 <中共中央·于立即开展大规模探集和製造代 t 品运动的繁急指示> 《1960 年 11 月 14 日卜，载《建届以来，要文兽选细》，第十三需，页 688 — 689”

第八章坚持「军这」经济峡入谷底

在采取了种种措施以后，极食的购销矛盾和压力一点也没有缓和。以至到 11 月份，北京、天津、上海三地，柜食随到随销的紧张局面丝毫没有改变·11 月 2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电话会议，要求全国每天粮食征购量由目前的八九亿斤提高到十至十五亿斤，以保证调出的柜源。同时要进一步抓紧运输，每天的调运量由目前的三四千万斤提高到八九千万斤。各省、区第一书记要像指挥战斗一样，天天检查，天天指挥。但是，原定 11 月份各个省、区调出粮食二十四亿斤的任务，上旬应当完成八亿斤，实际只完成三亿七千万斤，还不到应调出数的一半。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又发《关于立即抓紧粮食调运的通知》，要各地党委立即把极食的过程入仓和调运工作，狠狠地抓起来。特别指出：在 11 月份中，黑龙江、吉林、内蒙，四川、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九个省，调出任务都在一亿斤以上，这些省区能

否完成调出任务，对全局的关系很大，务必特别抓紧。178 从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万万火急」的「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 1 后，接连不断地下发有关粮食问题的指示、通知，不难看出当年粮食问题的严峻程度。同时也表明单靠省与省之间的粮食调拨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3「信阳事件」东窗事发

中央要求各地紧急调运粮食 1 同时也要求安排好农民的生活。1960 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京主持召开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要求安排好农村人民的生活，压低口粮标准，大种蔬菜，搞代食品，办好公共食堂，实行冬春一百天半日休息制；确保把由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回农村的劳动力】阅佃用于农业生产。还提出：「在今冬明春给广大群单以休生养息的机

178〈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抓紧粮食调运的通知〉（1960 年以月”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欢选编》，第十三册．页 7 唯一 703．

让丰，快！

阅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畸春（1958 — 1961）一鸟托年运动会·」，但是，各地在徽购粮食中，由浮夸风导致高估产、高麻，伴随而来的是强迫命令，因此】农村五风不时纠正，不时再刮。10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记王延春关于河阳县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湖北河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搔食减产、问题严重、』，王延春在报告中说：这个介社（指沔阳县通海。介社一引者注）的「共产风 J, 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刮到工作队进村的时候—9 月喂日，这一天有的生产队还在没收社员的自留地。

刮不共产风」的早位，上白省级·下至小队·一杯到底·根深蒂同。县级直属机开和派出机开在这农刮 r 共产风」的有四十一个旱位，合社的二十五个直属全业·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

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镍刀、筷子、夜壶，甚废都刮·全介社算了一笔账·共刮调劳动力兴 9 个·土地 80

之 0 亩·房屋 1512 栋，青金（包括分配未兑现的）53 万元，粮食 53 万斤，农具 35 件·耕牛 84 头，木料等“万斤，砖瓦 7 万块·家具 2 吨 906 件。

生产队以下的 r 共产风 J·更是一阵接一阵，拎一件甚庆事情，搞一个甚庆运动，就刮一次，枕是一次大被坏。·，·…粮食上比较普这的问题，是购通头粮。果，不但在搬运、集并上造成很大的浪费，

· · 一* 过头粮的结舟且由朴供应不及

179 〈晋，写、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记 t 议纪要〉（1958 — 1981} 》·下册，页 M 砖一 351 ·

150 毛泽束，《开于转发闹北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批语〉国以来毛潭东文挤》，第九册，页 3 码·

载《晨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60 年 10 月 10 白）·载（建 }

第八章坚持「军进」经济映入谷底

时！给生产队平来极大的困难·在粮食供应不上的时候·就没收社员的小杂粮、跋菜，颯别队的「兵产风」

一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出在河南·1。月 24 日，李富春将中共中央一组铁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 10 月 21 日报来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开鹰等问题的调查材料呈送毛泽东。毛于 26 日批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夫。」

‘据王任重日记记载，26 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讨论了问题严重的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1960 年 12 月，信阳地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根据初步揭发：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蜻蚨山人民公社，过

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1 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这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王延春：〈关于沔阳县买磁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60 年 9 月 18 日），载《展业集农化重要文件汇编 r195s 一 1 卯 1)），下册，页 3 醒一 3”。

毛泽东：〈对中组部·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的批语〉（1960 年 10 月 26 日，，

载《建·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 3 姊 183（毛泽东传（1949 一 1 卯 6}），下册，页 1 的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斋专（1958 一 1961）—乌托年运动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的东南部】南以大别山脉为弧，北以淮河为弦，组成一弓形弧地。从大别山麓到淮河两岸，依次毗邻看山脉、丘陵、平原和洼地，兼有江北山地和淮河水乡的特色。农业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前期，信阳地区管辖有十八个县市：信阳市、信阳县、光山县、罗山县、横川县、商城县、新县、固始县、息县、淮滨县、确山县、上蔡县、新蔡县、西平县、遂平县、汝南县、正阳县、平舆县。在 1959 年到 1960 年短短两年时间。全区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主要是 1958 年 r 大跃进 J 以来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引发高征购，反瞒产，反右倾，强迫命令的恶性循环，导致大批农民饥饿、浮肿、死亡或因抗拒、偷粮、外逃等被干部打死。1958 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 281 亿斤，而河南省委竟然吹估为 702 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一味地「反瞒产 J。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955 年 11 月底，在河南的密县，就已经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1959 年春天，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

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便蔓延开来。1959年1、2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粮食部连续收到群众来信，反映河南东部地区的夏邑、永城、虞城·拓城、鹿邑等县·发生严重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于2月25日在署名为「夏邑县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来信上批示：「此件送总理阅，是否国务院派人查一下。」2月27日，周恩来批示：「先电话告省人委后，由内务部、农业部、国务院派人限期查覆。」3月3日国务院秘书厅派李锦堂、刘文亭、曹国瑞、武郁庆等到河南会同省委、省人委、开封地委组成联合工作组前往豫东地区调查。据开封地区统计，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因缺粮患浮肿病、饿死人的情况是：浮肿病人136114人，因浮肿病死亡7232人，死亡总人数16万人·由于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安排群众生活，基本上控制了发生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现象。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并未就此接受教训。

1959年8月中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从庐山回到郑州，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在全省第八次坚持「跃进」经济扶入谷底

省内又一次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1959年，河南遭逢水旱灾害，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地减产，全年粮食的产量只有210亿斤，但是吴芝圃一手高举高指标，硬是估产为打。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大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泛滥。「共产风」再度刮起，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1958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在土改时期斗地主那样挨斗斗而哪个农民若是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 · · · · ·。一时间，全省上下都笼罩在阴霾的恐怖气氛之中。

信阳地区粮食歉收·但各县不敢据实上报，担心被打成右倾。地委办公室根据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总计为七十二亿斤，地委常委（九人）讨论时，除专员张树藩认为今年是歉收年，粮食总产可能只有三十多亿斤，最多不超过四十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等八人坚持认为今年是丰收年。最后以五十亿斤产量上报省委（实际产量只有二十多亿斤）。据此，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的征购任务为九亿斤：下面各

级为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到十亿斤。高征购任务下达以后，信阳地区各县市马上行动起来。1959年10月6日，在河南省委，省人委联合召开的「反右倾，鼓干劲，大规模地开展农产品征购的群众运动」的广播大会上，省委书记宋致和表扬信阳地区进度最快，已完成微购任务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为完成余下百分之四十的征购任务，信阳地委主要负责人，不仅不承认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农民将粮食瞒藏了起来，决定由地委主要领导分片包干，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地委书记路宪文说，当前发生的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通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只有这样才能把粮食挖出来。实际上信阳地区已将老百姓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都微购了，致使很多食堂开不了伙，浮肿病人日益增多，人们开始收藏红薯叶、野菜；有的干脆偷吃人肉。专员张树藩分工到西平县反瞒产，到公社调查，发现老百姓早已断炊，遂决定开仓发粮，因此被地委常委决定批斗并停职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5—1961）—鸟托年运动

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反瞒产，这就怂恿了各级干部采用非法手段开始逼粮，惨剧就此酿成。为追逼粮食，可以随意批斗，滥用酷刑：拳打脚踢，揪耳朵、拔头变、牛抵头、背压磨、蛤蟆架、燕子飞等等几十种。184 其中光山县尤为恶劣，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县委书记张福洪的「右倾」。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活活地将张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由于农民无粮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一个体弱多病，身值骨瘦如柴的农民，被他当场活活地踢死；另有三位农民，尽管身体稍好，也被当场活活地打死。据有关资料说明，整个光山县的公社一级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的竟占93%。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三十六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1”

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流，势必导致大批死人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设岗拦堵，不准夕辞逃。各

村民兵在路口设卡，拦截外逃群众，还专门设有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人员，除被没收钱财、衣物外还要遭到毒打。就在农民大量饿死或外逃之时，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叱喝：r 不是没有粮食，而是搔食

184 溅川县的付店公社，从公社第一书记到食堂炊事员，不少人都有命案。公社干部认人中 11 人有人命案；全公社大小干部 1316 人中有倪 6 人打通人·In 人打死过人·被打的群众有 2355 人，被打致死 304 人，被暹死朽人，被·押 1098 人·淡 J11 油尚公社生产队畏以上干部 879 人·有 6 卯人打过人。

185 光山县的斛山公社·原有 658 个自然村·其中 175 个村人口完全死绝，！占原有村总数的 26.6%；全公社原有 81 花户，死绝的有 1603 户·占原有户数的 19 石鸟；全公社原有人口 36110 人，死亡 13674 人，占原有人口的 37.86 吗（其中铁死的有 12962 人，被打死的 591 人，被这死的 24 人）；原有男女劳动力 14 方 17 人·死亡 6717 人。光山县的槐店公社的胡庄大队，原有 31 个自然村，人口完全死绝的有“个村，占原有村总数的 48 一马；原有 240 户，死绝 68 户了原有人口 1092 人·死亡恤 3 人；原有男女劳动力刃 3 人，死亡 3 邨人·

186 横川县就设有收容所 67 处，收容群军 9130 人·被毒打致残致死高达 21”人·

第八章坚持『跃追』经济映入谷底

根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 年 11 月间，当他从责川县凿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边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时，他不仅置若罔闻。还下令要地区的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的外流 j 斗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个县委做到 r 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尽管信阳地区各县极力封锁消息，采取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 t，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沿边流动巡选，汽车站派民警，长途汽车振党员队长驾驶】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 I” 然而】还是有一些信息传到了北京。1960 年 2 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来信阳检查灾情。一天，路宪

文找早被停职的张树藩谈话，要张从即日起开始工作，并嘱张陪同到息县和淮滨两县察看灾情。张树藩回忆说，所到之处，举目凄凉，哀鸿遍野。这位处长向张树藩询问，灾情如此严重，到底饿死人没有？张答：有，而且还不会少，只是由于自己从1959年9月以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估计饿死在二十到三十万人之间。这位处长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回京向部领导汇报。1958在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来的关于固始县发生的病情和已经死亡五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汇报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这时，卫生部也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发来的电报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的黑幕由此初步揭开。但吴芝圃仍企图捂住盖子：不向中央报告实情。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

187 据统计共扣压信件 12 万多封。李锐说：《李锐近作一世纪之交留言》1 香港：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1 圆 3），页 206, 1959 年 11 月 “口”。12 月 7 日，中共信阳县监委副，记胡修玉两次向中共中央写匿名信反映信阳县饿死人的情况，两封信均被转到信阳县委，胡修玉为此遭到轮番批斗。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留万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的严厉处分。1960 年 11 月 13 日平反。（见《信阳事件》专题研究报告》·未刊·1980。

188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压史教调》·《百年潮》·1980 年第 6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6—1966）——乌托邦运动
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愈查愈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 月，河南省委决定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作检讨，对罪恶特大的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实行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正当河南省委极力捂董子的时候，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了三个月，查有实据的饿死人数字为七十多万（据 1961 年 1 月 13 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反映：全区总人口 808, 6526 万人，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10 月，死亡人数 107.0321

万人，占总人口的 13.2%）· 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主要领导汇报了信阳地区的严重情况。当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由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 afJ 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汇报。工作组几十人来到信阳，亲眼看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以及人吃人的惨状，仅光山一县就饿死二十万人，见者无人不掉泪。

11 月 6 日，中央，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 89 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与群众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这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小队九十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人了。190

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后，认为这是坏人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需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要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 191 毛在召集各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

18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 366—367，

乱 90 李锐：《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页 207，

191 毛泽东：（在中央机关抽一万名干部下放基，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q 卿年 11 月 15 日）。载《建。以来毛洒 t 文稿》，第九册· 页“9”
第八章坚持 r 跃进」经济疾入谷底

阳事件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报复。他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这一回发现有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地区阶级敌人报复，就可以预见到若干年内还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叫马克思主义·

随后，中央再派王从吾、徐子荣及中南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河南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河南省委遂决定改组信阳地委的领导班子，并在信阳地区全面开展清查漏网地富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进行夺权斗争。信阳地委 1960 年 12 月 22 日向河南省委、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说：

全区十六个县、市的整风运动都已经开展，187 个公社·开展整风 156 个·占约%;4 斗 97 个大队·开展整风 2948 个，占 62.9%·投入整风的工作队中，有区级以上干部二千余人·参加整风学习的各级干部十三万徐人（其中：地专直二千余人，县血一万铃人，合社一万三千徐人，大队、生产队近十一万人）。对许一部分有罪行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已经集*11 八千徐人·特 s1] 集训五千余人·斗争和批判一万徐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重大的已经作了初步处理·其中已经彻职奎办管教反省的 983 人·逮补法约的 275 人。已经有 1327 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有 1621 个大队，其徐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单备，不久即可展开斗争。’ ”

12 月 31 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 1961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将信阳地委这个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

192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珍 60 年 12 月 22 日），载《履业集体化 t 要文件汇细（19 铝一 1，缸冷·下册：页 419·

193 毛泽东；〈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生产救灾情况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指示搞的批啮和修改〉（! 呎（年 12 月 31 日车·载《建·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九册·页 4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专（”铭一 1，良）一鸟托年运动

关于信阳事件对干部的处理情况，李锐先生在〈「信阳事件 j 及其教训—《信阳事件》序言〉中写道：

向朴信阳事件当年中央定性为「阶级叔复 J、r 达法乱纪」的「反革命复辟，有关人员的定罪最初都较为严 t。从 1960 年 9 月到 12 月·信阳地区的十六个县（市）委书记与县长邻被抓了起来·『其个人与家庭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厄运」。原来还准备大开杀戒·以平民愤。最彼决定·鸟龙山和因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处死刑，由毛泽束改为死缓，彼观陆续发现娥死人是全国各地普这的现象，信阳事件只是慕露较早·在信阳遭到这补法办的县领导拎部灭为十二名。」’ 舛

至此，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算是有了一个结果。作为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吴芝圃，在作了几次检讨以后：于 1962 年 5 月调离河南，

改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

历史地看，把信阳事件定性为「阶级报复」、「达法乱纪」的「反革命复辟」是不正确的，当年曾因此受到严重处理的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在 1980 年代申诉说：「『信阳事件』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边。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 1 中央同样有责任。」”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当年其它各省普遍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就可证明。

19 缘 195

李锐：《李锐近作一世纪之交留盲》，页 207。

i 卿年，河南省委决定。对当年信阳事件受到刑事处理的干部买行「三重新」，即重新入万、t 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但他们对「三重新」的安排都有意见。原是由县委书记许文波绍为：「信阳事件」是个！大历史事件，不是娜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写对一个，大事件处理正确与否的问题。……「信阳事件」既不是 r 阶级报复，也不是「达法乱纪」，完全是因为执行了极「左」路线，大属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达到了顶点。在橙食问丽上执行了高指标、高估产、高购所造成的。I 娜年。杨守绩向省委申诉说：我鳃为我不是反革命，r 信阳事件」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边、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边是不公平的，是达背腰史事 t 的。李锐：《李锐近作一世纪之交个言》，页 2 佣一 2 的。

第八章坚持「军进」经济疾入谷底

4 开于非正常死亡的考证

1958 年到 1960 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 1959 年至 1961 年的「三年严重困难」，以珍 60 年为最甚。据《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披露，1959 年到 1961 年，三年粮食的平均产量 3.073 亿斤，比 1957 年减产 21.2%。三年年平均粮食产量比 1957 年减少 827.6 亿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则比 1957 年增加 95.8 亿斤，粮食征购占总产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达 34.4%，其中 1959 年高达 39.6%。这就在广大农村购了过头粮。1960 年 12 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分析说：「1958、1959 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二百

亿斤左右。J连续三年的高徵购，导致农村占有粮食大幅度减少。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自粮。由于没有了饲料粮，牲畜大批死亡，1961年末骡、马、驴、牛的存栏头数为6949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8382万头减少17.1%；·1961年末生猪存栏只有7227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14590万头减少一半以上。196

对当年饿饭的情景：饥饿—浮肿—死亡。显准先生在他的「商城日记」中记有如下记载：

买” j 讳边！——

1959年11月4日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东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诚是真的。..J引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1月13日

红薯收获···一薯块水分多而淀粉少·腮弱极了一碰就断……。民工路过·欣及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196《当代中国的楹 t 工作》，页106·108，

6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11月20日

二顿均以红薯叶当菜。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11

月22日

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至晨拉肚子。

12月2日

我的胡萝卜挨偷了·被偷里少十几个·萝卜种至少又有一个大的被偷了。昨下午，一个妇女当着下棚许多人·偷胡萝卜。当群众仇娥的时候·如何看得住？

12月15日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顿干饭·而早饭特稀。可以橘充的食物了然桌春·清晨傍午，颇为饥饿所苦。

徐家断炊，赵家概子砍介兵食堂大锅，都是欢购中的事。· · ·一估产通程中间，大力开展反对富裕农民珞线，斗争和藏粮食！是今春所做的第一慕剧· · · · ·一

12月17写

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子在一个月中，从斋十齐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通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赋病的而已。9、10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我动全肿了·人数增到四十徐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T三十徐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

八组黄浙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里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s1I犬，未死人前连黄勃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人，则死比例也不算小了。一家速死几人之例·已总到的有：

抑学冠，母亲和弟弟。

帐保修，哥哥和婉子。

第八章坚持「军进」经济跌入谷底

12月22日

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争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合审，据说10日要今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佳女。’ ”

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一书中，记述了当年震动中央的另一饿死人事件——甘肃「夹边沟事件」。位于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1957年后专事「收容」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判以劳教的三千名右派）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四十斤粮· · · · ·一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二十六斤，再降为二十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 · · · ·一如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持

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人回忆道：「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裹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开，头麦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也就在这个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

197 显准，（显准日记）1 北京：经济出版社，1 卯 7），页 12·16·2 工·22、33·42、43、48' 51 一占 2，露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 铝一 1961）—乌托邦运动

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商·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对这场灾难主要由于天灾还是人祸？人们仍有不同的认识。对这三年自然灾害的程度也有两种不同的估计：有研究者根据全国 120 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1958 年、1959 年、1960 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 1 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气象部门把全国气象状况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洪、不涝不早、偏旱、旱。就是说，结果愈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愈少。在公布的从 1954 年到 1972 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表，1958 年、1959 年‘、1960 年这三年，比 1954 年、1957 年、1965 年和 1970 年、1972 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说明灾害虽有，但并不严重。另有学者引用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说：1959 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 50 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 44 “万公顷，成灾（收

成减产 30%以上为成灾) 面积 1373 万公顷。1960 年, 继 1959 年大灾害后, 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 受灾面积达 6546 万公顷, 成灾面积 2498 万公顷, 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1961 年, 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 受灾面积 6175 万公顷, 仅次于 1960 年, 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 成灾面积达 2853 万公顷, 为 1994 年以前最高, 其中四分必一面积绝收《减产 80%以上为绝收》。由此认为: 1959—1961 年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成为出现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原因。」 200

薄一波在三十年后回顾这段历史, 就曾坦诚地承认:

198 李玉霄: 《杨头息: 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南方人物周刊》, 2004 年第 5 期, 1” 金辉: 《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社论》(上海 J·1993 年第 4、5 合期。200 陈东林: 《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 2 伏舛年第 1 期·

第八章坚持「军达」经济跌入谷底

我风人民所经压的 1959—1961 年「三年困鸡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介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鸡时期」, 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手这地妄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谨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一千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首社, 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201

中国从 1959 年到 1961 年所发生的全国范围的大饥荒, 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总数究竟是多少, 迄今还没有一份官方的统计数字或研究报告。现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情况, 大体有一千多万、二千多万、三千多万到四千多万的四种说法:

《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对 1959 至 1961 年的人口状况有如下记述: 全国人口死亡在 1960 年高达 25.43 ‰】农村地区高达 28.5 ‰。据有关部门统计, 超逃泣并斗的有 675 个县, 其中超过 1 仅冷轮的有四个县。根据这一时期不够准确的统计数字, 总人口划匕情况是: 二年累计, 按总人口计算减少 135 万人】按自然变动增加 622 万人, 两者相差 757 万人。从 1964 年普查结果看, 三年困难时期裹这两个数字

都有一定问题。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现象已开始。这年自然增长677万，比前一年增长数下降40%是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加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增长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减慢，特别是浮夸风盛行，有些地方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从1960年看1总人口减少1) 刃万人，自然变动减少304万人都偏低，实际人口减少还要多。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2 纷万。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据1964年普查数据计算】在1962至1964年的三年中，总人口增加数和自然变动数不一致，主要是1961年以前统计不准造成

鹄 j111 ■ -!!!--!-I--

20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8”。

6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 铭—1961) —鸟托年运动的” 据1964年普查数据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 苟 08 万人，比原统计数约减少1486万。血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联

中国人口学研究者蒋正华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中，估算1958年到1963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一千七百万·水

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 (Ansley J. Coale) 1984年写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外2—1982) 一书，估算中国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二千七百万·耶

英国记者菲力普·萧特 (Philip Short) 著的《毛泽东传》 (The Rise and Fall of Mao Zedong) (人&叮 A1 论) 中说，「1 外 9 年和 1 久刃年，有大约二千万人死于饥饿· · · · 一久开 1 年又有五百万人饿死了。」据此：作者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之间。其依据是：「1980年，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胡耀邦公开承认饥荒的存在，确定死亡数目为二千万人。」

这一数字依据了常委会编纂的临时文件。以后一些西方作家和中国作家们提议说】总死亡数目为四千万人到六千万人。然而】这些估计都是在受损最醒重的地区取得了数字后，再将之推广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后达到的数字，与那一段时期总的人口趋向的相互关联松散。在缺乏与之相反的结论性证据的情况下，二千至三千万每沙卜死亡数字应当是最可信的。这个数字也的确是充足的。j’

202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页B。《当代中国的人口》直说，1961年以前的统计本身就不准，可以认为，1486万的数字也就很难认a是准确的。

203 中国利学院。情分析研究，J姐：《生存与发展》个匕京‘科学出版社，1唧》奋页39。转引自金辉：《r三年自然灾害书」备忘练》，《社剑c上海），1州年第4、，合期。204 转引自李成瓌：《r大跃进J引起的人a变动》，《中共写史研究》，1997年第2期。205 转引自李成珊：《r大。遗J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206 菲力普·，特1,mlips加川，全小秋等译着：《毛潭东传》州匕京‘中细*年出版社·Z以舛），，铅1。

第八章坚持「跃这」经济跌入谷底

贾斯柏·贝克《JasperBecker）先生着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Hungry弘os细Mao勿Sec、tFamin。》认为，美国人口学家朱迪思·巴尼斯特（JudithBanistor）博士在《中国人口的变化》

（china,scha呼唁尸卯。1a而。》中得出在1958到1961年的饥荒年间，中国「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超出三千万」的结论，r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估计数字」。207

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F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至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结论说：1959至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45.8万。冷丁抒先生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一文中，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

有了逐年出生数、正常几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数，我们此可以比较拳确地计算非正常兀亡数了。计算结果是：1959年非正常死亡数

是 212 万，其中 196 万是农民。1960 年至 1962 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分别是 1778 万、1190 万和 291 万” 连同 1958 年的非正常死亡数，整个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约 3500 多万。“”

丛进先生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 2 并弘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 1961 年总人口应比 1959 年增

页” 遛→一!-

207 贾斯柏·贝克 (Jaspe, B 二 ker) 着·姜和平译，《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页 394·

208, 树基：·《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 引，表一：1955—19 屹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安徽 6 刃万，四川 940.2 万，t 州 174.6 万·湖南 248.6 万，甘肃 102.3 万，河南 293.9 万，广西 93.1 万，云南 80.4 万·山东 150.6 万，江苏 152.7 万·湖北 67.5 万，福建 31.3 万，辽宁 33 万，广东必. 7 万，黑龙江珍万，河北 61 万·江西 18.1 万·陕西 18 才万，吉林 12 万，浙江 14.1 万，山西 6 万，合计：32 杷. 8 万·

之叩文章来濂” btt, : ” 一. 刘 5.0 州鳃水咖纠。 , her 晌认 I 叮妙龙 t 一叫 no. 馋 t.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第贾春《1958—1961》—鸟托年运动

加 2700 万人，加上前述减少的 1300 万，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110

金辉先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的结论是：1959 至 1961 年的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4060 万。文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84)》公布毡随 1949 年至 1965 年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推论说：

1 虫舛年底总人口入舛” 万。从 1964 年的总人口数按公布增长率逐年递减回去，就可以得到它：1963 年底—68603 万 (70 绍珍→1027 斜) 日 1962 年底—弱 390 万 (铭 603 十 103333)；1961 年底—64645 万 (66390 十 1.02699)，甚至更低。它比公布的 1961 年总人口数 65859 万少 T1214 万。

我们以 1959 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 1960 年、1961 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 1961 年的公布总人口多 1295 万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数字：1324 万、1214 万，1295 万担三数平均为 1278 万。其与公布总人口净减数字 1348 万之和为 2626 万。三年灾难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少增长了 6 亿人口。1959 至 1961 年间非正常死亡 2791 万，加上 1961 年公布总人口数中抹掉的这 1270 余万，中国在 1959 至 1961 年的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4060 万。之“

以上出现的不同数据，既有计算方法的不同，也有起止年代的不同（1959—1961, 1958—1961 外 s—1962, 1958—1963），因而也就很难求出一个统一的数据。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另有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二十七省市的分册）提供的数据（1959 年到 1961 年的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按 1957 年正常年份死亡率的人数），计算出一组 1959 年到 1961 年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非

210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 211（社 t）（上海），1 卯 3 年第），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买 272·4 合期。

第八章坚持「军进」经济疾入谷底
正常死亡人口，以及据此推论出一组 1958 年到 1962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参考数字。

袁永熙主领：《中国人口·总论》中发表的数据 212 是：1957 年中国死亡 7 万人，死亡率为 10.8 凶酗；

”” — 1961 年中国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分 g11 为：

1959 年卯 0 万人，14.5 毡动；

1960 年 1 石 93 万人，25.43 黝不

1961 年 939 万人，14.24 黝。2,，

1959 至 1961 三年共死亡 3602 万人。按 1957 年正常死亡率三年应扣除 2061 万人，余下 1541 万人为非正常死亡。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 1957、毡沾 9、1 久刃、蹀 1 年的人口死亡率与《中国人口·总论》相同 i 但书中称：从 1 例舛年

人口普查的结果看，这段时间（指1959至1961年——笔者注）的实际死亡率可能还要高。1963年底全国人口数为6.92亿，1962年底为7.05亿，全国增加人口1.327亿人。而1961年全国自然增长率是27.1‰，增长人数应为1930万人，比总人口增长数多出300万人。这300万人的虚报数如何产生的？根据1964年6月30日普查时人数6.9458亿人计算，上半年增加286万人，下半年增加1041万人，两者的比例显然不合理。问题就在于，这多出的300万是以前死亡人口未销而留下的虚假数字。……这批死亡人数主要是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下来的。如果把这300万死亡人口考虑进去，1961年前后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5倍左右。

写增J顶瀆坛! !!1!!!!!!j!-I

这样，上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1541万人加上603万人，总计非正常死亡应为2144万人。

须要指出的是：非正常死亡情况最早出现在1958年，如：四川、山东、河南，而甘肃1958年死亡率高达21.1‰；有的省份则延续到1960年。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5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页；213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页148—149。214《当代中国的人口》，页48—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3—1961）——乌托邦运动”

1961—1962年，如四川。据刘洪康主编：《四川人口》中说：1958年至1961年，五年中四川省平均每年死亡1.62万人，年平均死亡率为34.1‰。死亡人数最多的是1961年，达到74万人，死亡率高达59.1‰。刘冷铤《四川省的普通死亡率仅为7.0‰》。因此，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大陆因大跃进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接近3000万人。

尽管研究者对非正常死亡人口数t的说法不一。但无论是一千多万，抑或四千多万，都丝毫不会影响到对1958「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共和国历史上这场灾难的严重性的估计。

5 刘洪康主编：《四川人口》（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页120。原中共，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视。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向中共中央，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汇报说：四川省1958年到1960年死亡1亿1千万人（1957年的《户籍年报》四川省人口7.2亿，1960年底为6.236亿）；1961年至1962年四川大约还有1亿万人死亡。因此认为1958年至1962年四川省饿死1250万人。廖伯康：《历史与现实的四川——李廖事件》回眸》，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第九章

制定政策挽救农村危局

一挽救农村局面的紧急措施

1 国民经济大滑坡

1960年强撑跃进的结果，是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

主要表现为：

首先是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全国性粮食和副食品危机。据统计：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仅及1951年产量的一半。

由于“大跃进”从农村大量招工到工矿企业，使城镇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为供应城镇人口的商品粮，在农村采取高征购办法，1958至1960年三年中每年征购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185；陈如庭主编：《当代中国》上册（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8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卷（1949—195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61。

粮都在1000亿斤以上，分别占当年总产量的比例是：1958年1175亿斤，占39.4%；1959年1348亿斤，占39.7%；1960年1021亿斤，占35.1%。尽管截购了过头粮，仍不能维持城镇的最低需要，不得不

挖库存·1960年末粮食库存量降到573亿斤，比1955年的804亿斤减少29%’

农业大幅度减产，粮食库存减少，这就形成了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其二，生产性基本建设规模膨胀，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以钢为纲」，「元帅升帐」。为实现钢铁翻番，大上基本建设。1958年到1960年每年新增基本建设投资都在百亿元以上，1960年达384亿元，比上年增加11%，比1957年增加1.8倍。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1958年为88%，1959年为86.8%，1960年为86.4%），挤掉了非生产性的建设。1960年的钢产t号称达到1866万吨，实际上包含大量不合格产品（1962年，钢产量降到667万吨）。「盲目追求扩大生产规模和忽视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在设备更新和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居民住宅等方面，潘下了大量的历史欠账。

三年中施工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均在1300个以上，1960年达到1815个，比1957年的992个增加83%；而建成投产项目占施工项目的比重，却大幅下降，1957年为26.4%，1960年仅为9.8%。建设项目周期拖长，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挤占了财力和物力，加剧了资金和物资的全面紧张。

在工业建设投资中，主要用于重工业，挤掉了轻工业。三年「大跃进」，重工业的比重都在55—57%之间，超过了1957年的51.6%。1960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43.3%下降为21.8%；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55%下降为33.4%，重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45%上升为66.6%，造成了畸形的结构。 ，

《当代中国财政》，页185，《当代中国财政》，页185—186

第九章 剑定政果挽较农村危局

其三，财政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大跃进」三年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1958年为40亿元，比1957年增长35%；1959年为527.71亿元·比1958年增长28.8%u960年为582.13亿元。‘由于收不抵支，致使三年连续出现赤字‘1958年21.8亿元，1959年65.8亿元，1960年高达81.8亿元·为弥补财政赤字，

不得不增发货币，形成通货膨胀。1960年末，货币流通量达到95.9亿元，比1957年的52.8亿元增长82%；每元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却由1952年的5.2元降至4.1元。，由于市场商品匮乏1除肉、蛋、糖、肥皂等按户凭证供应外，还制发了工业券，凭券购货日用工业品。

其四·经济效益低下，人鼠生活水平下降。

在经济效益方面】「一五」时期每百元积累新创造的国民收入平均达32元，「大跃进」期间连年下降，到1960年，每百元投资，不但不能增加国民收入，反而减少国民收入0.4元。在群众生活方面，全国人均消费水平，按当年价格计算，1957年人均消费水平为102元，到1962年只有117元。而按195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以1952年居民消费指数为100，则1957年的消费指数为122.9，而1962年的消费指数只有104.0，人民生活水平全面下降。‘

2 十二条紧急指示

就在河南、甘肃等省饿死人事件先后暴露的时候，毛泽东的韶山乡亲出于无奈，也不得不千里跋涉进京来告「御状」

1960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舅表弟文本仙来到北京？

因时值国庆节前夕，两位老人进京三天未能见毛：无奈先来到王

4 《当代中国财政》，页176·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6（代中口财政），页156·

7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

页886。

《百年潮》，1997年第6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家商量见毛泽东事。王季范表示，愿意作他们的参谋，与他们一起去面见毛泽东】并把他们要反映的情况作了文字整理。等候了几天，毛泽东终于传话召见了毛泽荣、文本仙、王季范。毛泽荣见到三哥，立即把两年来家乡出现的问题统统倒了出来（由王季范帮助整理了十个问题），主要是：一→一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t】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

季稻·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砍社员们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结果减了产斗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们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出谁就会被戴上大帽子「反党反红旗」—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青壮年全都上了工地，家裏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份子，稻子烂在地裏，红薯烂在土裏，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等家畜家禽一概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共食堂愈办愈糟，粮食愈来愈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经常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药跟不上· · · · —

毛泽荣说道：主席，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北京城裏，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本仙补充道：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王季范附和说：是啊，你可以派我每年到两个省去视察】以调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

毛泽东完全了解乡亲们绝不会撒谎，听到这些情况，心情很是沉重、他叹息说：唉！华初《指毛华初，毛泽东的便子）到那裏去了，从没有听他在这裏讲起这些事。问道：你们现在的口粮是怎么分吃的？小人每人三两《指十两制的新秤），大人一斤”毛泽荣答。乡亲们所反映的情况，对毛泽东不能不有所触动·

第九章剑定政策枕较农村危局

本来，中共中央在此前为缓解粮食危机，已相继采取了种种措施。各地为贯彻中央关于「大办粮食，大办农业」和「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等指示，也相应地作了一些政策规定。如：广西提出了《关于农村的十大政策》，规定要为社员留足基本口粮；落实包产，超产奖励兑现三留足自留地；增加社员现金收入等。”湖北提出了《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强调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体制；集中优势兵力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切实搞好分配，使50%以上的社员收入当年有所增加；严格执行「三包」奖赔制度和粮食、农副产品的征购政策；允许社员适当经营个人的自留地等。，但

这些措施一是远水不解近火，二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化引起农村的混乱。

就在农村落实上述政策的试点中，发现问题的根子还在「共产风」。如前文所引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在关于沔阳县贯彻政策试点情况向省委的报告中说：

训 1—乱 1.

去年以来，县委曾经将通海口公社·作为贯彻政策的重点，两次大战「共产风」。有些人满以为问题解决了，事实并非如此”从这次暴露的情况看，各方面都奔在看极其严重的问题·其中刮 r 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问题、自留地问题等表为严重。这个公社的「丢产风」·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刮 51] 工作队这村的时候—9 月 4 日，这一天有的生产队还在没收社员的自留地。

刮「共产风」的早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一杆到底，根深茶围” ’ ’ ’ ’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化，要文件汇编（1958—1961）》，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61），页 353—356·9（农业集·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61）》·下册，页 357—361·

6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61 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许多生产队粗略地计算一下，r 共产风么中所折毁的房屋、死亡的丝牛、损坏的农具、家具这几项，若按人二平均，每人要损失五十元左右，多的达到一百多元，这个损失·统相当于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

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

刮丢产风、瞎指挥减产，购过头粮、没收自留地的结果，是严重地挂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惊人的损失。、·一全公社的粮食单产，1958 年是 352 斤，去年是 311 斤，今年预计只有 297 斤· · · · ·，

取盘生产队·1957 年总收入是二十三万元·每人平均一百五十六

元·今年预计总收入只有十叫万元·每人平均只有九十四元。速续三年，还没有赶上 1957 年。

政策不贯彻·群众没有积极性，生产搞不好·生活困难·生活困难·刮「共产风」，相互影响，火上加油，念来念旺。

所以，只有抓住政策·彻底地处理「一平二调」·彻底地纠正生产上的瞎指挥，以及认真地解决粮食问题等等，才有可能真正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会有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民公社的零

10 月 23 日至 26 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华南的一些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陶鲁节、刘子厚、刘仁、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吴芝圃、刘建勋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并讨论如何

10 王延春：《关于沔阳县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1960 年 9 月 18 日），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58—1981》。下册，页 364—369。

第九章 纠正政策失误农村危局

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对问题严重而暴露较早的山东和河南两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吴芝圃的错误作了批评。鉴于一些省份农村饿死人的严重情况，会议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制止并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紧急指示信」的第二稿。11 月 3 日，毛泽东对「紧急指示信」作了审改，并批示：「用电报发出，愈快愈好。」“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

(1)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这一制度从 1961 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

(2) 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凡是平调的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

(3) 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绝不能削弱队有经济来发展社有经济。

(4) 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劳力、土地、耕、农具必须坚决实行「四固定」, 固定给小队使用·生产队对生产小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三包必须落实, 奖罚必须兑现。(5) 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6) 少扣多分, 尽量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

11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中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页 361;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网:《毛泽东传化蜩一1的6)》, 下册口匕京‘中央文戏出版社, 之加计. 页 1 哟, 12 毛泽东:《对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批语和修改》(19 的年 11 月 3 日, ·载中并中央文欢研究室编:《建·以来毛泽东文权》, 第九册(北京: 人民出版社, 1 卯 6), 页 336.

13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戏遗编》, 第十三册(北京: 中央文戏出版社, 1997), 页 6 关一印 6,

632

中华人氏共和恤史·第胃喜(1958—196 功—鸟托作运动

(7) 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8) 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 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9) 安排好伙食, 办好公共食堂。

(10) 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 活跃农村经济。(11) 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必须坚决保证社员每天睡足八小时。可以实行男社员每月放假两天、女社员每月放假四天的制度。(12) 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值得指出的是, 上述政策在 1959 年 3 月 ‘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到 5 月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就基本都提了出来, 只是由于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致使这些规定不仅没有刘碱执行, 相反重新大刮「共产风」。这十二条紧急指示, 尽管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仍在坚持, 但就挽救当时农村的现实危机而言, 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 紧急指示信的，彻

对这封「紧急指示信」的贯彻，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要「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写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还规定，「这个文件，除宣读外，各级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开办训练班，学习一次，二次，三次。」。为使上述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在「紧急指示信」下发的当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对贯彻落实的具体步骤、要求作了规定。以使全体干部深刻认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破坏农业生产力的严重性，及其造成的危害。至迟要在 12 月中旬以前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去。”

1415

《建国以来，要文选编》，第十三卷·页 661、675—676，

〈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化 960 年 11 月 3 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选编》·第十三册·页 6 打—681’

第九章 剑定政策枕纹农村危局

与之同时，中央决定抽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下放农村：以帮助地方贯彻中央政策的落实。11 月 10 日，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向中央报告说：据 11 月 9 日统计，已初步确定下放干部 10176 人，占中央机关干部的 7.33%。准备在名单公布后，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些干部组织起来，学习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政策和决议。对下放干部的分配，重点加强农村，适当照顾其它基层。到农村去的重点是那些农业生产任务重、问题多、基层严重不纯的地区·16 在这场干部下放运动中，毛泽东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林克（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高智（机要秘书）、叶子龙（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李银桥（毛泽东的卫士长）、王敬先（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封耀松（毛泽东的卫士）也下放了下去。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六十七岁生日，毛泽东邀下放的六人和汪东兴一起吃饭。李银桥回忆毛交待大家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裏到底有些甚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甚么意见都反映上来。」大家无声地点

头，神情萧然。毛泽东手指我和叶子龙：「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

但是，毛对身边工作人员去农村的心理也是很复杂的，26日夜间，他又写一封信嘱咐他们「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裹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又说，「你们如果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在信的末尾，毛又写了几句带有伤感的话：「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神

李银桥的回忆，道出了毛泽东让他身边工作人员下放的意图，就是他想要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自从1949年进城以后，毛泽东就难以

16 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

况报告〉（1960年n月10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350，

17 毛泽东：《给即将下放的身边工作人员的信》（1960年12月2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6—1961）—鸟托年运动

直接接近群众，一方面有保卫部门出于安全的考虑，使毛不能自由地走到群众中去；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从1950年代中期起，愈来愈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使得下面不得不看着「风向」说话，以投上所好。即是省级以上的干部，以至中央其它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也得经过慎重选择，拿捏分寸·

各地对中央紧急指示的贯彻，迅即行动·

湖北省的具体做法是，全省开三级干部会议不作报告，原原本本传达十二条。提出「揭开盖子，放下包袱，肯定成绩，纠正错误」的口号，让大家一起动脑筋，充分发扬民主精神。省委宣布，凡是过去所说的，与这次中央的十二条指示有出入的，都不算数，可以一风吹（过去三年所报的产量，凡是认为有问题的，都不算数，可以照实重报）。要求地委、县委首先批评省委，然后县委批评地委，最后省、地、县三级再作自我批评。宣布会上说对说错，一律不记账，一律不戴帽子。打破了过去老一套的开会方法。1a

沔阳县的干部在检查「共产风」为其么老是纠正不彻底时，找到的答案是，没有彻底反掉平均主义。满口讲的是社会主义，做的却是平均主义。19 这次整顿，由于政策兑现，群众反映说：

过去开会，讲的都是群众伤心的事，如甚么开夜班，动员投资，分配超支，没收自留地，没收小杂粮，反「资本主义」思想等等。现在开会，大不同了！讲的都是群众高兴的事。如甚么「共产风」兑现，「七权」下放，三个「三七开」，冬播两权（即播种规格权、作物安排权）下放，劳逸结合，不开夜班，每月休假两天，冬天办半日食堂，活跃市场经济等等。20

18〈王任重同志的报告〉（1960年11月12日），载《农业集体化，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页392—393·

19〈沔阳县，做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1960年1[月3日]），载《农案集，化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页396·

20〈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笔复的变化〉（1960年1[月。日]），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页401—402·

第九章 剑定政某槐纹农村危易

对农村政策十二条的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各省的报告一一作出批示。

11月15日，毛在转发湖北省委送来的报告和材料时，批示强调‘挤项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兵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点·

、玲邵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兵产风为重

……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决的贯彻，1J底的决必）

首先要广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1，

11月逐日，在转发甘肃省委第四次报告时，毛更作了自我批评。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

甘书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社评得还算切青、认真。，· · · · ·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叔告看了两适·他说这想再看一这，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显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首羈了错疾，一定要改正。

关于具体所犯的错误的，毛写道：

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查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合社现行所有制不变。

对将来的发展前景，毛指出，

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授劳付酬）

21 毛泽东：〈中央关于彻底纠正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r 五风 I 问题的指示》（19 年 11 月 15 日 1·载（建页 352.

中华人民签和阙史·第四春（1958—1961）—乌托邦运动

坚决不变·二十年复觅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总之·再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达不许一平二调。

介共积累一定不能多，一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才二

毛泽东这段自我批评，虽然仍带有极大局限，但终究是下了把农村的大跃进（几年改变面貌，几年向共产主义过渡）停下来的决心。但在这些批语中，毛泽东对「五风」造成的惨重后果，如河南指阳地区那样，干部为虚报浮夸，购过头粮，搞反瞒产私分等，竟违法乱纪，摧残人命，致使农村出现大量饿病逃荒死亡现象的根源，不认为主要是党内高度集中的体制、不断搞反「右倾」运动形成的政治高压，而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作分析，因而得出了又一错误的结论，即所谓「民主革命尚未完成」。要求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民主革命的补课。

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说：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某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二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壤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犬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被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根据这种分析，12 月 8 日，中共中央针对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一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指出：

22 〈中央转·甘，省委驴于！彻中在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

又 960 年 11 月 28 日）·载《建·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

364 — 365,

幼毛泽东：〈在中央机开抽绸万名干部下放基. 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60年11月15日) • 载《建. 以来毛潭东文编》, 第九册, , 349
— 350,

第九章制定政策枕义农村危局

637

其中某些反革命的被瓏行为, 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寡夺领导 • 实行绝望性的跋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要知道, 中国农村人。中还有百分夜八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属, 连同城市的青产阶级分子 • 青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实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 • 总共要占全国人 7 百分之十左右。……其中, 未被改造或者不接受政造的最坚决的最隐肢的反革命分子, 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 • 有意识地随时都在率备「借尸还魂」, 篡夺领导, 实行复辟和疯狂挣扎。毛泽东同志说 • 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合主义革命, 而且还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这在现在所揭发的事实中已有不少明证。白此可见, 整个社会改造是一个长期而举苦的阶级斗争任务 • 反革命分子只要卉在一天 • 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绝望的被坏和拎札, 我们对他们万万疏忽麻痹不得。孙中山说: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项努力」, 我们可以拿来借用。1 •

上述对农村问题根由的错误分析, 直接导致这次农村整社运动对基层干部的严重打击, 并将一些问题严重的干部当作敌对分子判以徒刑, 因而未能取得真实的教训。

二确定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1 决定退却的中央全会

十二条紧急指示, 终究是应急措施。整个国民经济如何安排, 有待拿出一个通盘的打算和明确的方针。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24 〈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 甘. 和 t 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 情况的指示〉可 1960年12月8日), 载《晨蚕集, 化, 要文件羹编(1958—1981)》 • 下册, 页 416 — 417 •

中华人民共卡国史 • 第”喜 (1955 — 19 砟) — 鸟托年运动

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总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会议采取汇报会的形式。参加会议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大家一边腾报，一边讨论，面对现实的严重困难，头脑相对镇静了下来，共谋克服困难的大计。毛泽东插话最多，有关方针政策逐步形成以下概念：关于全国县、社、队和干部队伍的情况。毛泽东分析说《县·社、队可分为好、中、壤三类，比例是三、五、二。干部队伍可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甚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毛划线说，前三类属敌我矛盾（隔了几天，毛把死官僚主义分子与一、二类区别开来】划为人民内部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壤人，要夺权。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关于整风整社，毛强调，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他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会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当有人汇报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时，毛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

25张平化、刘建勳、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节，黄火*，周林、阅红彦未多加汇报会】规月31日中央政治局和，记处成。同与t人员在北京饭店众餐·毛泽东特邀他们同桌，以便总取他们的意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112”

第九章 剑定玫瑰托囊农村危局

关于退赔，毛态度坚定地表示：破产也要赔。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赎进去，破产也要赔。……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毛赞成退

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对这段坚持大跃进的经验，毛颇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又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 1960 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1960 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毛泽东传》的作者评论说：「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针对「五风」把滥，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要他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借鉴红军时期的经验，起草一个普还适用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稿子。他想用这种方法来约束干部们的行为。胡乔木很快拿出了一个初稿呈毛泽东。1 月 9 日，毛指示「印发各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胡乔木提出的初稿，言词相当激烈。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第二条：「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表明当时对于一些地区基层干部的胡作非为已经忍无可忍了·但是，这些提法又显然不便写到正式文件上去，毛泽东表示：「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27 后来改作从正面要求，如「待人和气」、「办事公道」、「买卖公平」等等，经过多次修改：中共中央于 1961 年 26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 1111·

27 毛泽东：〈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的批语〉化%1 年 1 月 9 日」载《建·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 4” — 4 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曾春（1958—1961）—鸟托牟运动

1 月 27 日把这个「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下发到公社和生产大队，成为农村整风整社的重要文件。后来又把它写进了《农业六十条》

至于今后的方针，毛提出，对明年要有思想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

过，当灾年过，这二条很重要·陈云说，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有人补充说，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接着，听取李富春汇报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设想·从 1958 年钢铁翻番以来，钢产指标就是大跃进的标志，是最敏感的话题·对 1961 年的钢产指标，李富春说，开始想搞 2150 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 2 以刃万吨。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纠导到分首先要保证农业，尔后炼钢·讨论中提出了几种方案：第一方案是 1 劲万吨：第二方案是 1900 万吨。

毛说，看来 1900 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我想·今年仍然搞 1870 万吨，恐怕也难以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 1800 万吨。

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 1800 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

毛说：我担心就是 1870 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去年为甚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 1350 万吨一下子提到 1870 万吨。

刘少奇说：看来，去年由 1840 万吨后来又增加到 2040 万吨，是犯了错误的。

28 三大纪律：1，一切从实际出发。2、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计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荡：1、问劳动同 t 堂·2、待人和气，3，办事公这，4、买。公平，5·如！反映情况，6·提高政治水平，7，工作要同群单商 t·8、没有调查役有发，权·

第九章制定政策徒纹农村危局

邓小平说：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李富春说：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 t。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

毛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

线。

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

毛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我怀疑就是18万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对钢铁指标的讨论，尽管保持了较为冷静的大脑，认为1870万吨也会紧张·但因整个工业战线的问题尚未充分暴露，毛泽东等对将会遇到的困难仍然估计不足，因而仍处在大跃进的惯性思维之中。毛泽东问李富春，1961年的方针怎么提法？

李答：是调整、充实、巩固、提高。

这个八字方针，是1960年8月国家计委在《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的·原稿的提法是：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压缩重工业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8月底9月初，国务院在审议这个报告时，周恩来认为，对方针的提法，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的基本内容是：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当时】正处在炼争气钢的热潮中，毛泽东的注意力主要还放在中苏关系方面，对国务院提出的这个方针还不知晓。因此，当李富春说了以后，毛接着问道：这个方针是甚么意思？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页B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贾客（19,8—1961—鸟札年运动

李答：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

毛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

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大家认为，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表示：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毛终于同意退却了。）最后，毛泽东向

大家提出，回去以后，「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 7 要做调查研究。毛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

「就地踏步，休养生息」；「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这可以看成是毛泽东终止「大跃进」的信号。也就为中央委员会最后决策作了准备。1961 年 1 月 14 日至 18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举行。到会的中央委员八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八十七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作人员二十三人列席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关于安排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意见的报告。

李富春在高调肯定 60 年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国民经济取得「继续跃进」胜利的前提下，提出 1961 年国民
301961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以〈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为题。国际部分，主要是呼应 1960 年 1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声明》，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国内部分·在肯定「持续跃进」的同时·俊调 1960 年是叩同严重的自然灾害斗争的一年」·提出】1 如 1 年在大力支提农业的同时·必须「适当地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只有农业生产的发展，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更加巩固的基础，我们就可能更加顺利地向前迈进·最复号召：「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争取 1 蛭 1 年社会主义建设·业的新胜利！」可见，这篇社论的基调是：团结起来，战胜困难·而不再弦撑着搞甚庆「大跃进」了·

第九幸剑定政某槐较农村危局

经济的安排在贯做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方针的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具体意见是：

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在工业生产、建设的安排中，要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种、后数 t，以求在现有数量的基础上，加强薄弱环节，填补缺门，完成配套，维护设备，增加品种，改善质量，降低成

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李富春弦调：这些安排方针，是多年来经验的总结】不仅 1961 年要贯彻执行，有的在两三年内、甚至在更长的时期内也要贯彻执行。根据上述方针，提出 1961 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是：农业：粮食 4100 亿斤左右，棉花 3200 万担左右，油料（包括花生、芝麻、油菜籽）兀阆万担左右。猪的饲养头数达到 1.5 亿头左右。轻工业，棉纱 450 万件（比 1960 年减少 150 万件），棉布三十五亿米（比 19 印年减少十九亿米），食糖五十五万至六十万噸（比 1960 年增加十二至十七万吨），食用植物油七十五万至八十万噸（比 1960 年减少二十二万至二十七万吨）。1961 年的商品供应量大约可以达到 67 州意元左右，比 1960 年减少四十亿元左右，主要是粮、油、肉、烟、布、针织品的供应减少约六十五亿元。

重工业和运输业：原煤 4.36 亿吨，铁 2750 万吨。钢 1 引叩万吨。铁路货运量 6.75 亿吨。

基本建设投资 167 亿元，比 1960 年减少 103 亿元；大中型项目安排 900 个左右，比 1960 年减少 700 个左右。

为了保证 1961 年国民经济按照既定方针顺利发展，意见要求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据此提出，加强领导】对经济管理体制作适当改进，把某些放得过多偏下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局、省、市、自治区三级。在最近两三年内，权力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全会讨论并批准了李富春的报告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建议国务院将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提交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审议、全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议》，批准中央政治局 1 知年 9 月关于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实春 119 铝一 19 日）—乌托年运动

中央局的决定。全会还总取了邓小平《关于 19 阆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应该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 1961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仍然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怪圈。但这次全会批准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标志看 1958 年以来的大跃进正式终止，中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建国以后的第一个大调整时期。

2 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的传达，对稳定农村形势，总体上取得了好的效果。但具体政策的贯彻，还有待时日 and 各级组织的工作。仅就退赔工作而言，据财政部了解，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局》估算，全国平调总数 110 亿元左右，按农业人口 5.5 亿计算，每人平均二十元左右。据北京、河北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 3 月中旬的材料，已经退赔的实物和现金，占平调总额的 41.4%。据安欢·江西、广西、湖南、河南、云南、陕西七个省的材料，公社、生产队能用本身财物退赔的约占 62%·，‘因此，不少地方退赔没有完全兑现。据河南省内乡县当年的县委副书记说，

1960 年 11 月，贯彻《紧急指示信》，各公社、大队又召开了兑现大会，向群众退赔了一批实物和现款”但是，由于当时各级领导干部对「破产还债，彻底退赔」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抓的不紧，使退赔工作出现了许多问题，平调账没有彻底清算，兑现数字有虚假，报的多退的少。在算账和兑现方法上，有些单位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干部包办，谁要给谁，按人平摊，按比例分配，平调实物折款多，给实物少；给干部多，给群众少；甚至以平调还平调（即”平调一部分社员的实物或实物折款偿还给另一部分社员），继续犯平调错误。”

31〈全国一平二调的退赔情况和问题〉·《内部参考》32 李兆钧：

《t 月忆思录》叫北京：中共写史出版社，

1961 年 4 月 27 日。1998】，页 119·

第九章制定政策挽救农村危局

农民群众对紧急指示中的有些规定也有不同意见，如：对超产主要奖现金不感兴趣，要求奖实物；对增产增购有意见·要求定产定购；个别还提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太大，不利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私养猪没有时间，农村干部要求实行休假制度等。”经过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形成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1961 年 1 月 20 日下发执行。《纪要》要求所有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不论是三类或一，二类社队），均应以贯彻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要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要彻底反对贪污、浪

费、官僚主义；必须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并向群众作检讨。具体步骤是，首先集中力量整顿三类社队，把被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把占据领导岗位的死官僚分子撤下来，把那些软弱无能、思想糊涂、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调离主要领导岗位。具体做法是，由上面派去工作团，经过深入发动群众，扎根串连，挑选一批真正贫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同时吸收原有组织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参加】组成贫农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领导生产，安排生活。一、二类社队的整顿，主要依靠原有组织力量，上面也派工作团去帮助，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发动群众，帮助干部整风整社。对干部的处理！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干部的处分和清洗坏人，都必须严格按照党和政府规定的手续，慎重办理。《纪要》在十二条紧急指示的基础上，确定了农村工作的若干具体政策，对清算平调账和退赔、提高粮食统购价格、节约用粮、发展家庭副业、社员自留地、农村集市、农业生产数据价格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政策性的规定。

33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0 年 12 月 17 日整理的关于中央紧急指示信下发后，收 F11 各地四十多件来信的材料·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情》·第九册，页 401。34《建国以来重要文选》·第十四册】页 89—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纪要》还强调，县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也必须彻底整风。并指出「县级领导机关是个关键」。只有这些上级机关特别是县级机关，认真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作风，才能更有力地推动社队整风和巩固整风整社的成果。

留这次整社运动，始于贯彻十二条紧急指示。在做法上大有第二次土改之势。湖北省委〈关于河阳县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中说：「也像土地改革工作那样，一进村，就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包括新、老下中农）！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代表小组，让他们自己起来和五风作斗争。」贫农有顾虑，怕工作组一走，受到打击报复。为了发

动贫农，工作团进村后，「一方面主动点火，败发贫农起来揭发问题；另一方面督促基层干部登门整改」。同时，抓经济兑现，解决一部分贫农当前的严重困难。

运动一发动起来，群众对干部的怨气就不可遏止了。这个公社部分干部对待群众的作风，也确实是可以忍孰不可忍！「干部可以随随便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工资、扣口粮、扣『五票』，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帽子、游街示众……」

群众意见大的还有干部的贪污行为和「多吃多占」。《报告》说：「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有贪污行为的占干部总数的 31%。多吃多占，最为普遍。社员形容干部多吃多占的特权是：『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干部超吃粮食的现象很严重」公社干部个个吃补助粮，生产队和小队的干部「明定 t，暗无量」，贪污群众的节约粮。在那个饥荒年代，这是人们最为痛恨的一件事。要知道，这是从社员嘴里掏的保命粮啊！《报告》说：「许多地方，群众批评干部为『新的剥削阶级』，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白龙饰《建国以来 t 要文选编》，第十四册·页 126—143。

第九章制定攻某槐纹农村危局

暴，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干部都有外号。」

斜 7 笑面虎、吊颈鬼，阴雷公，……写良多

这个公社生产队以上干部 2 “人，经过整顿，撤换的干部：小队干部占 22.5 %，生产队干部占 17.9%，其中支部书记和队长一级占 14.5 %。公社和管理区的正副书记、正副主任也有十九人一离。他们的位置的补充，一是从积极分子中挑选；一是把过去调走的干部调回来；一是过去被处分错的干部平反继续当干部；一是上边下放一批干部。中央工作会议的纪要下发以后，各地的整风整社逐步从三类社队扩展到一二类社队。2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要求立即抓紧广大面上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组织政策的初步兑现。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几年平调老百姓的东西退还给他们，损失了的实行赔偿。以尽快地扭转局面。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把退赔作为取信于民教育干部和刹住歪风的重大问题来看待，态度坚决，逢会必讲。1月10日，刘少奇在河南省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纪登奎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下必须省，地、县、社四级下最大的决心，并且派工作队下去督促，真正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冲破抵抗，认真退赔，使中央政策兑现。开

2月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向中央报告了广东省《中山县坦洲公社整风整社运动的经验》。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认为对一二类社队开展整风整社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更完全更健康的经验」。”从做法来看，坦洲公社与海丰公社大体相同：工作团一进村就深入群众进行扎根串连。首先把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组织起来；接着，依靠串连起来的阶级队伍，联合大、小队干部，先反公社的「五风」，然后广泛发动群众反大、小队干部的「五风」，一级一级的破下去，最后通过选举，由小队到大队，又自下而上地立上来。

36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5—1961）》，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 501·

37 《建国以来，要文选网》·第十四册·页 1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只是对干部的处理较为温和。「做到『放而不散』（群众不涣散）『放而不乱』（不混乱），『整而不躺』（干部不躺倒）。」中央所以认同这种做法，与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有关。自信阳事件揭露以后，各地大量反映上来的情况是，农村基层干部对群众打、骂、罚，花样繁多，而群众毫无抵抗能力。不造成声势，发动群众、组织队伍，就无法扭转局面。对此，刘少奇的看法与毛泽东是一致的，1月9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看来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2月4日】刘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指出：纠正干部的命令化和特殊化作风，也很不容易。为了使中央政策兑现，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真正依靠贫雇农和下中农，经过几次严重的斗争，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代表会议。才能办到。392月10日，刘将中央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回河北省探县探家后写的情况反映转给河北省委，并给省委书记、省长刘子厚写信说：「看来，下

面还有一些干部向群众封锁中央的政策，对生产不闻不问，并且还在进行违法乱纪的事情，在这些地区如不放手发动群众，直接宣布政策，让群众大鸣大放，使群众翻过身来，一切权力归代表会议，那裏的情况是不会改变的。」³⁸

由此结论，扎根串连，组铁贫、下中农的核心队伍是整风整社最根本的一条经验，不管是三类队，还是一、二类队都必须如此。中南局的报告称：「这可以说是继土改、合作化以后的第三次「组织起来」的尝试，

这次整风整社，对彻底刹住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五风」错误，扭转农村的困难形势，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出现了「地主

³⁸ 《刘少奇年谱（1949—1969）》，下卷，页 501.

³⁹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页 5 斜，

⁴⁰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页 506，

见《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1961 年 2 月 9 日）。较《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页 1 男—194’

第九章制定政策挽救农村危局

阶级复辟」，提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强调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实际是再来一次革命。这就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过重。上述偏向，下乡调查的工作组和领导人都有所发觉。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干部就曾给中央写了一个河南情况的反映。刘少奇看到这份材料，于 1961 年 3 月 25 日把它批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南局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指出：「河南整风运动中对干部的打击面是很宽的。」他提出：要「在不损伤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把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挽救过来」。并且强调：「在整风中必须再三重申不得使用肉刑。」⁴¹1961 年 4 月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到福建闽西调查，在漳州与率领工作组先期到达的老战友张鼎丞相会。张鼎丞向邓谈了龙岩县委在「五风」严重的江山公社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公社的各级干部和老接头户（战争年代与红军和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紧的接头户）划成漏网地主、富农，或「反革命」、「坏分子」，批斗抄家。弄得干部都躺倒不干，无人领导的情况。邓

子恢当即表示：哪有那么多漏网的地主、富农？张鼎丞说已提出不要这样做了。必

3 管理体制的收权措施

关于加强集中领导，把在「大跃进」中下放得过多偏下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的问题，在1960年12月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了出来。12月31日，财政部党组向中央作了《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指出目前在财政管理和财政体制方面：相当突出地存在着财政纪律松弛、财政管理偏松、资金使用分散和财权分散等现象。主要问题是，对专、县和公社下放的权限多了一些，专·县、公社和企业的财权过大。据此提出：国家财权应当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弘国家财政预（刘少奇年谱（1898—1969））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编：《建·以来·要文选编》，
，下卷·页510：

《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5妇·
第十四册，页48—54·

424344

必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19”—1961）—乌托年运动
算，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上下一本账，坚持「全国一盘棋」；对各地区、各部门和单位的预算外资金，采取「纳（纳入预算）、减（减少数量）、管《加强管理）J的办法进行整顿。

毛泽东对此表示认同·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聘取李富春汇报1%1年国民经济计划，谈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击战时，毛说：这句话说了好几迁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眉加码了。1月巧日，中央批转了财政部赏组的报告，同意报告的基本精神。

‘1961年1月2o日，中央在下发关于农村整风整社纪要的同一天，下发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进一步从经济管理体制上解决集中统一的问题。主要内容是：

(1) 经济管理的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

最近两盒年内，更多的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地区计划，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中央局统一安排。

(2) 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3) 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各部。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需要调整时，应当取得中央主管部的同意。

(4) 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凡属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在计划内应该调出的物资，各部门、各地方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调度。（财权必须集中。各级的预算收支必须平衡，不许有赤字顶算。切实整顿预算外资金的收支。

(6) 货币发行权归中央。

(7) 国家规定的劳动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不许突破。不足时，由劳动部门统一解决。计划外增加人，必须报经中央批准。

媚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关于改进财政，制，加弦射政管理的报告》（1962年1月15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页47。

第九章 剑定玫东枕纹农村危马

(8) 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文教、劳动等各项工作，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都必须集中力量，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46

根据这个文件精神，逐渐把企业管理、财税、计划编制、基建审批、商品收购、文教事业、劳动招工、物资调配等管理权限收归中央及中央各部委。国防工业一律由国防工委直接领导，过去下放的国防工业企业一律收回。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集中指挥。交通部先后收回了原下放地方管理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上海、黄浦、湛江等沿海港口，重庆、九江等十个长江干线重点港口和天津航道局、上海建筑工程局等六个工程局；冶金部、石油部、地质部也分别将一些企业和学校收回。各地的邮电局、地质局由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为主改为以邮电部、地质部为主

的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经过挂年的调整，原下放给地方管理的企业基本上全部收归中央管理。基本上结束了1958年把人、财、物大权层层下放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的有效贯彻提供了保证。

三草拟人民公社六十条

1 毛泽东高倡调查研究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1958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主旨讲话。这个思想是在会议期间总取各省对农村情况的汇报中逐渐形成的。毛感叹说：

46〈中共中央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页102—105

47到1965年，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增加到10533个，比下放前的1957年还多1200多个·这当中包括中央各部在「大跃进」时期和以彼兴建的企业。参见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接着，毛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他说：「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这一席话·可以认为是毛泽东从1958年北戴河会议决定钢铁翻番、组织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以来，首次意识到三年「大跃进」

的灾难】顺于凭着革命热情和主观意志决策。因而，要从根上解决问题，还得从调查研究做起。

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期间，一篇题名〈调查工作〉的文章，出现在毛泽东面前。这篇文章是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到各地收集文物，在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59年中央政策研究室从博物馆借来。由田家英转送给了毛泽东。48 韩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116—1117。

•田家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关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关系，逢先知回忆说，1959年庐山会议上，田家英与几个「秀才」议论毛泽东、同情彭德怀。差点被刘人「另册」。后来，[他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得到毛的谅解。毛泽东对他说，『黑样做你的秘书工作。』保他过了关。「那时，他确实感到，毛泽东已离开了他，经全力提倡和，行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头脑已经不那样清醒了。购不得不同意见的情绪也愈来愈明。田家英还多次向我（注，即逢先知）流露他在「娇复期」的心情，感到已无回天之力了！j「会议之后，毛泽东特地让田家英参加他所领导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续编小组。……这表明，毛泽东对田家英仍是信任的。但是无庸讳言，他们之间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出现裂痕。」，边·挥德山，曹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1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 赐卜，屹。

第九章。] 定政果托载农村危涌

〈调查工作〉，是当年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由于时隔久远，早已丢失。1959年来毛一直念念不忘。现在，失而复得，使他激动不已。这不仅是由于他自己珍爱的一篇文章。而且，现在正逢其时，为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供了思想武器。毛泽东在印发这篇文章时写道：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

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派出并亲自指导三个调查小组下农村。1月20日，毛就组织调查组一事写信给田家英】指示：调查组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任组长，每组组员六人。以三天时间组成】每人发一份〈调查工作〉，讨论一下。田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毛泽东要求，每个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一个最好的生产队。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

51 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接到指示，雷厉风行。立即组成调查小组，共二十一人】每组七人。组员有邓力群、许立群、王力、张超、梅行，王鲁、杨波、胡绩伟、逢先知·吴介民等·1月21日离京分赴广东、湖南、浙江农村。

2 三大秘. 汇报问题

毛泽东把陈、胡、田派出去后，1月26日晚，他自己也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心情：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

50 毛泽东：《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脱明和批语》11 年 3 月 11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 438，

51 毛泽东：（关于组织三个组下去网查研究给田家英的信）（1961 年 1 月 20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 411·

中华人民丢和目史·第曾专（19SB—19 批）—鸟托年运动

上海、杭州、南昌、长沙，2月24日到达广州。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七省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的汇报。并且向各地大员作调查研究的动员工作。对当年下乡调查的情况，逢先知回忆·浙江调查组经与浙江省委商量，决定在嘉善县（后同嘉兴县合并）选一个差的生产队，在富阳县选一个好的生产队·逢被指振到嘉善那个差的生产队——和合生产队，是田家英重点抓的点·逢说：当时下去调查，只要态度端正，发现问题并不困难，实在是问题成堆，俯拾即是。但是要说容易，也并不那么容易。关键在于能不能戳破思想束缚，有没有提出问题的勇气。经过反右倾运动，大家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公共食堂来说，真实情况是食堂难以为继，应当解散。再如，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造成的。这在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仍强调必须「坚

待食堂】整顿三类社首先要夺回领导权的时候，要向毛泽东反映此类真实情况，是要有相当勇气的。s才

毛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之月6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时，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通常在400斤以上，1960年减产至291斤，主要是由「五风」造成的。第二，生产队规模过大，这个生产队共辖十一个生产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成了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在田汇报以后，毛泽东露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参加了田家英的调查组）、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当谈到社队规模时，毛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田家英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裹的农民不知鱼凿露裹的农民搞些甚么事情，这怎庆行呢？又说，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裹，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52《毛潭东和他的秘，田家英》，页的一秘。

第九章斜定政果挽纹农村危汤

满意。我看把小队《过去的初级社》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过去的高级社》改成大队。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他要省委研究一下，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这是自人民公社出现就强调「一大二公」是其根本特点以来，首次提出要以原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

关于公共食堂，毛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在这裹，毛似乎松了一点口】有人可以不吃食堂。

2月8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问及「五风」、退赔、社队规模等问题。毛指出，落彼的地方要找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当林乎加说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裹下去的。毛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1959年10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奔文件。没有批准此姿了。我针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

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平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种？‘斗

在谈到自留地，几年来几收巍放，收说收的这理，放说放的道理时：毛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又说：「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接若又谈到社队规模，毛说：r 基本原则是要增产，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毛还说：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甚应是共产主义，甚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 53（毛泽东传摊”9—19九）》·T册，页 11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夺（1958—1961）—乌托年运动

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

就在这次汇报中，田家英向毛泽东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被毛泽东采纳·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生产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样化，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

2月11日·毛泽东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取湖南调查组胡乔木的汇报，在座的有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毛也主要是了解公社体制和食堂两个问题。胡乔木调查的是一个好的生产队→一长沙县的天华大队·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撒逗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毛又问：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好，是队为基础好，还是小队为基础好？胡继宗说：「高级社时是五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一万六千个大队。」毛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五万个。」胡乔木：「如果这样】对群单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毛：「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胡乔木：「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

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壤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 1957 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壞。」毛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第二天，毛泽东继续与胡乔木、张平化谈公社体制，张平化说，省委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毛提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胡乔木：r 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

第九章制定攻鞏徒纹农村危局

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毛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胡乔木：「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毛纠正说：「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

关于食堂，胡乔木说，「长沙县的情况很特 g1J，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了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毛问：「为甚么弄成这个样子？」胡答：「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退回去就没有必要了。· · · 一」毛问：f 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张平化：r 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裹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以后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胡乔木谈天华大队的情况说：「我在一个小队裹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很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裹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毛反问说：「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张答：「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十；办得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二十。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

2 月 12 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广州。2 月巧日是阴历正月初一】毛

要在那裏过春节。

广东调查组得知毛泽东一路的谈话内容后，表示同意毛提出的把生产小队一律改成生产队，生产队改成生产大队的意见。陈伯达在2月19日报送毛泽东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中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成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 {1958—1959} ‘刘一鸟托邦运动

「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

广东调查组的意见，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抓住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作为进一步解决人民公社问题的突破口。春节一过，毛泽东即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来广州会合。2月25日，毛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等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毛指定，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由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3月10日写出初稿。」同时决定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

3 《农业六十条》的草拟

3月5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周恩来汇报了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着重谈人民公社优制问题。会议开始，毛回顾了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他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糊涂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就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

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首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首多亿斤，这都走反右反由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案了。……争来一个高估产、高欢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表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 r 左」中间播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

第九幸制定政某槐较农村危局

就反出一个浮夸风。产山会议反右这股风细我们原来的反「左」刘断 T。“

这段话犹如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意识到北戴河会议以来头脑发热，提出要压缩空气的同时，一再强调批反冒进是正确的、必要的一样。这时】毛同样意识到庐山会议以后，从上到下反右倾】是导致「五风」再起的祸根，但他不能承认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批错了·王若水在他所著的《新发现的毛泽束》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文革」徒期，林彪事件发生徒·毛泽东雉然意识到，「文革」是橘糟了，但是他不显意永认。·一在审讯「齐人帮」之复，胡耀邦讲过这样一件事：毛泽东曾升毛远新谈到可能有很多人赞成 r 文化大革命 J，当时毛泽东说：我是不下「菲己绍」的。还说，要硬昔头皮顶住。· · ·， …

封建时代的皇帝都可以向人民认错，但毛泽东不龙。”

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尽管如此，毛泽东承认在群单中间反右，「这就壤了」。这在当时，对解除大家的思想显虑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接着，周恩来汇报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就在周汇报过程中，毛又谈起了公社体制问题。针对会上有人担心社队规模划小，对各方面造成负面影响。毛泽东弦调说·公社规模要划小。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刘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分南、北两片讨论有关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问题。3月10日，毛泽东主持，由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参加的「三南」会议在

5 ‘《毛潭东传（194。— 1976）》，T册，页 1134 — 1135。

55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潭东—偿人眼中的伟人》·上册（香港：明报出版社 2 加辞，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1958 — 1961）—鸟托年运动

广州举行；3月11日，由华北，东北、西北三大区及其所属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参加的「三北」会议·由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开会。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并「三北」会议各同志写了一封信。向他们提出会议应讨论「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毛说合「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毛批评说：「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一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毛还提出：对他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研究一下，「那裏指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为开好「三北」会议】毛在信中说，即派陶铸去京作报告并提出建议。

在当天上午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反复讲了要搞清两个平均主义和深入调查研究的问题，然后谈到食堂问题。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食堂有四大壤处：一是破壤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生产。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没有柴烧把桥者训斥了，还打顷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他再次提出食堂要分几种形式】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可以让大家回家吃饭·以解决取暖问题。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得知毛泽东将振陶铸来京传达他的指示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鉴于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北京会议不能实时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建议南北合开为好·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毛泽东：〈开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
{1961年3月玲日}载《建.以来毛泽东文桥》·第九册.,”0—441,
第九章剑定政某枕较农村危局

14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四位中央常委和与会人员飞抵广州·

3月15日,两会合一,重新编组。毛泽东提出会议讨论:公社体制·条例和粮食三大问题。周恩来补充一个商业和外贸问题。各组讨论中,对社队规模划小】意见基本一致。如: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说:「大队干部跑遍小队,得一年时间。将社队划小,是群单的迫切要求。」华东各省的负责人说,公社化后,社队这么大,社员「看不到边,摸不到底」。并具体提出,生产队不宜过大,一般二十户左右;生产大队一般维持原来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以相当于原来的乡为宜。生产管理权交还给生产队和小队。订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敌龙认为,应坚决把生产权下放到小队和农民,让他们对生产负责,不能再瞎指挥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提出,要把高级社行之有效的一套政策(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自留地、家庭副业等)、制度和办法在条例中固定下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但对基本核算单位是放在大队,还是放在小队,则意见不尽一致。东北局第一书记末任穷带来东北组在「三北」会议期间讨论的意见是,主张大体上一乡一社,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生产队相当于初级社。但同意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关于分配问题,是完全按劳分配,还是按供给、工资三七开,主张后一种意见的明显占多数。

陈伯达报送的广东省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的座谈记录明确主张完全按劳分配,文中说:「最近他们按原来高级社的规模,分为两个57〈华东参个间志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载《建.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449。

581961年3月13日编印的南三区会议情况简报第三号,载《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积)1第九册·页料7·

59 宋任穷报送的《关于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载《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九册，页 4 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商专（19 “一 1961）—乌托年运动大队，解决了穷村同富村的矛盾，两边对生产、积肥都积极了，对耕牛、农具也都爱惜了。」关于分配：认为过去供给加工资搞三七开，「事实上不劳动者也可以得食」，提出「全部实行按劳分配 J。关于食堂，「主张极食分到户，农忙办食堂」， a 粮食徽购要定下来， r 至少三年不变，能五年不变就更好」。“

陈伯达送的另外两份关于分配问题的调查材料，则是两种不同意见：河北省霸县堂二里的农民主张按劳分配。一位贫农说：「别看现在出勤不少，但不出活」。「主要因为不按劳分配。干活没有劲」另一个贫农小组的代表说：「按劳分配就是好，多劳可以多得，社员干活就出力了。实行按劳分配，也不能叫困难户过不去，大伙也要帮助他们，劳力多的也不会干活不积极。因为那种帮助是明的帮助，他们要领这份情，供给制是暗的帮助，好像是该着替他们干的。」61 广东省高鹤县环城公社云益大队的农民认为实行三七哄好。一位贫农代表说，「实行三七开，不光劳力多的拥护·就是我这劳力少的也拥护。因为不实行三七开，工分不值钱，劳力多的就不好好生产·生产搞不好，供给部分再大也得不到甚庆东西」·另一贫农说：「口粮按人发，有些社员就不出工，实行了工分带粮，出勤的立即增多了。」高鹤县委的干部说：「我们作过调查，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要求供给与工资三七开，并实行工分带柜。」。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带来的南充市火花公社第三管理区提供群众讨论的结果，占 81.2%的人赞成保目部分供给制。。

60 陈伯遗 1961 年 3 月 15 日报送的一个座谈 t 纪录，载《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九册·页 443 一驯 4·

61 陈伯达 1961 年 3 月 22 日报送的关于晨村分配问题的调查材料：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补》，第九册，页 456。

62 陈伯达 1961 年 3 月 22 日报送的关于农村分配问题的网查材料，载《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九册·页 456 — 457。

63 李井泉 1961 年 3 月 17 日报送的〈群众拥护哪一种分配方案？—

四) 1! 省南充市火花公社一九六〇年决算分配的经验》，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 452。

第九章制定玫某扰纹农村危局

宋任穷反映东北组的意见，也主张保留部分供给制。他们的意见是：实行多劳多吃、多劳多得，适当缩小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食堂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适当划小。“

以上表明，虽然大家都同意把生产队划小，即相当原来初级社的规模，但并不主张把生产队（原来的小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分配方面，主张多劳多得，但仍保留部分供给制；食堂问题，方式可以灵活，食堂仍要坚持。

公社工作条例于 3 月 16 日写出第二稿，21 日改出第三稿。22 日，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共分六十条。故俗称农业《六十条》

《六十条》草案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划小社队规模。一分为二、为三，甚至更多（到 1962 年，平均每社 9.4 个大队。每大队 7.9 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平均 24.9 户。比原来缩小了几倍）。二是把有关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明确加载条例，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和缓解了农民怕政策多变的恐惧心理。但基本核算单位、供给制、公共食堂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六十条》草案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是以「大队为基础」。分配问题，还是坚持供给与工资相结合的制度，供给占三，工资占七；关于食堂，规定除特殊情况外，「都要办常年的或农忙的公共食堂」。这说明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裹，这些所谓「共产主义因素」、「社会主义阵地」还是不能退让。这大概就是 3 月 19 日毛泽东与起草班子的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时，向他们提出：「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的原因所在。担心退得太多，会引起危险。

召 召 ‘r, ■■■■■■■■■■—!. 1 可 ■j■. ■■■■■■■■口 ■口口. ■■■■■ ‘■’

64 宋任穷报送的（关于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 455’

65 毛潭东同陈伯连等谈结的传达记录，1961年3月1日），载《毛潭东传（194，—1976）》，下册，页11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喜（1958—1961）—乌托年运动

在通过《六十条》草案的当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要求各级党委在原原本本将条例草案向全体社员传达的基础上，认真听取他们对草案的修改意见。

4 再次疾呼调查研究

3月23日，广州会议结束的这一天，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突然提到邓子恢的名字。毛说：r 邓子恢同志那个时候顽强得很（指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引者注）。邓子恢同志，为了说服你，我跟你谈过多次话。现在我跟你统一了。我跟你没有矛盾了。」毛转向大家说：

「去年他《指邓子恢—引者注》在山西、石家庄、江苏南部作了一次调查，作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67 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的。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人家现在正确了。」

毛泽东讲看讲看，忽然两眼向会场横扫了一这，未见到邓子恢，就问：

「邓老来了没有P」

这一天的会议，邓子恢到得稍迟一些，就坐在会场的后边。大家不约而同用眼找邓子恢。有的看到邓子恢惊奇的样子竟笑了起来。邓

6 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煎同志的信〉，载《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颈》·第十四册，页221—224·

。1960年9、10月间，邓子恢受刘少奇的委托，先复到山西汾阳县、河北石家庄市郊、江苏无锡县的三个农村人民公社进行调查，向中央写了《山西、河北两个人民公社三个基本接其单位的调查》报告·经过无锡调查·邓子恢总为，农村出现的问题，既与某些具体规定不切合实际有关，也与某些规定朝令夕改有关·他认为应该构一个公社社章·回北京以复·邓子恢 t 面向毛潭东·周恩来汇报了三省农村调查的情况，并提议摘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得到周恩来的支持·19 戏年1月23日，《条例》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中央·《条例》分十四 t 六十六条，着眼于解决公社内邢的经.，理问题！特别

是公社内部生产大队之间问贫！拉平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个《条例》后来成为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重要参考。

第九章制定政策扰农农村危局

邓子恢耳朵有些背，没有听到毛泽东的询问，就问坐在身旁的叶剑英：「他们笑甚么？」叶剑英说：「笑你哩，毛主席表扬你了！」毛接着说：「农村工作部找谁呵，还是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他同我谈过，我介绍他去跟总理谈。总理让他起草个文件，叫做人民公社的章程，首先倡议的是总理。」

「是他哈我说的。」周恩来插话说。

「啊！首先倡议的是邓老，然后总理支持。」“

毛泽东赞扬邓子恢：也是借题发挥，敦促与会者都去作调查研究。广州会议期间，毛泽东除了具体指导《农业六十条》的讨论外，逢会必讲调查研究。对这个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在会议期间都有明确表态。

刘少奇 3 月 19 日在会上说：「从 1958 年以来，在执行二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他说：「造成目前的被动局面，中央已把责任担当起来，各省也有自己的责任。下面的报告和干部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有的根本不可信。如小麦放卫星，报上注销来，高兴了几天，就不相信了。有些反面意见，吞吞吐吐，也不完全可靠。我们看省委的报告，省委又是总下面的，省委的报告也是不能全信的。」他最后表示：「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9

同一天，周恩来也在小组会上说：

毛泽东同。占最近几次讲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讲究实事求是；说。右要反，「左」也要反，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

68（邓子恢传）：页 537，

硅刘少奇：〈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119 配年 3 月珍日。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煎的建般》1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1}·页685·68石，688，

666

中华人民共表国史·第蚜夺(19玲一珍61】一鸟托年运动

是好走壤，要从客观舟在出姿·不能从主为想象出姿。这行调奎研究·必项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奎，铃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杖。……表们下去调奎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纤原，11:从群众中来，51j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姿号佑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23日的会议，最后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容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一年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强调要使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育权，「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J。指出：「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聪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J这封信的下达，对各级干部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基层听取对《六十条》草案的不同意见，起到了积极作用。

5老百姓的强烈要求

3月广州工作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作调查。

这时，中央常委除林彪外全部转到农村调查。刘少奇在湖南、周恩来在河北、朱德去四川老家、邓小平与彭真在京郊。6月至7月，陈云也回到上海青莆县老家。除了毛泽东派出的三个中央调查组返回原地以外，中央派出的调查组还有：由公安部长谢富治率领的邓哪调

70间恩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1961年3月19日】

京：人民出版社，19斜)，页313—3鸦，

71《建国以来重要文戏选编》】第十四册，页之乃一之27

，载《周恩来选集》，下卷(北

第九幸剑定玫菜托义东村危局

查组；由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带队的辽宁海城调查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带队的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由国务院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带队的四川简阳调查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都派出了自己的调查组。许多第一书记响应号召，亲自下乡。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调查运动！

毛泽东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彻底摸清农村情况，5月再集中到北京开会，修改《农业六十条》。4月25日，毛泽东给留守北京的邓小平写信，要他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通知发出后，几个省的领导提议推运几天开会，毛泽东很赞成。5月4日，他又亲自起草了一个推运开会的通知，「以便多做几天调查研究工作，向群众寻求真理」。力

《六十条》草案下发讨论，各级干部到农村调查，直接听取群众意见，很快得到了反馈。

山东省反映上来的关于公社体制的意见是：

目前的生产队，从形式上看权力很大，生产责任的所有权以及计划、包产、分配等权力都在生产队的手里，但实际上劳力、农具等生产资料是由生产小队管理使用，各项生产任务是由小队承担。生产好坏和收入多少也都取决于生产小队，所以生产小队才是真正的「实力派」。但是小队又没有生产队那么多的权力，特别是没有分配权，这是同生产队内部所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突出的矛盾。经过座谈讨论，大家认为必须实行四权统一即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统一生产权和分配

72 毛泽东：〈于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给邓小平的信〉（1961年4月2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475。

73 毛泽东：〈为推还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通知和批语〉《1961年5月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4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权的统一生产单位。

。根据四权统一的原则，核算单位应当就是直接的生

4月14日，胡乔木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解决公社食堂等问题的四个调查材料。75内称，

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单的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煎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甚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的一个坚决要散的食堂。经过五个晚上的讨论，这个食堂在分散时退到的种种问题，如房屋、菜地、柴山、养猪、困难户等，都一一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个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散得愈快愈好。

5月1日，陈正人从四川简阳送来一份老贫农邱开银与调查组的谈话记录：

邱开银，四川省简阳县平泉人民公社社员，五十八岁，贫农成份。听说工作组在宣讲《六十条》，主动跑来反映情况。「我听娃儿说北京来的工作组带来了毛主席的《六十条》，我两夜都睡不着。心头有些话想向你们说。」

「毛主席一心为人民，想叫穷人过好日子，过去的《十二条》就拘好了，这次又来了个《六十条》比过去更好。Jr二年来人民公社办得好，就是步子跨得大了点。步子不稳，要栽筋斗，一下子把穷富扯平，『相赢』了懒人。……再要平均主义，就硬要饿死人。」「我赞成。发展社员养猪，有猪才有粪，有粪才能有好庄稼。自古以来就是r做官凭印，种庄稼靠粪」嘛。」

汕山东省召开公社很制问题座谈会的情况材料·中共中央办公厅

1961年3月24日网印的《情况简报》第113期·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461·75《建国以来毛潭东文挤》·第九册1，衢名一拓9，

第九章剑定玫东枕较农村危涌石69邱老汉建议：「生产队要有一定的权利，这一条规定得好，古代就是『半由天子半由臣』嘛。哈子事都由上边硬卡，一定办不好。搞密积，拿尺子比，密得连脚都放不进，怎么施肥？· · · · · ·」「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就是好。r人无利谁肯起早」？J「脑袋那么小，帽子那么大，没有产那么多柜食，说那么

多，怎么不挨饿分」

邱老汉说自己是「老牛筋」，不怕划右倾，不怕打鞭子，「希望把我的意见反映给毛主席。看看对不对？」

5月6日，毛泽东对陈正人的来信及这个材料，倍加读赏，表示「很高兴」，亲自给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陈正人写了一封回信，再次督促各地大员下去作调查。毛在信中问李井泉：「你为甚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毛说：「我在这裏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內，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5月8日，胡乔木再次致信毛泽东，向毛报告说：「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以后都将不办……一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映的热烈程度难以想象，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他还报告：湖南省委对解决食堂问题决心很大，顶计最近即可在全省范围内解决。

胡乔木还提出了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恢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解散城市公共食堂和城市人民公社等建议。

期间，毛泽东还收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中央常委以及各地调查组的报告，几乎众口一词：百姓强烈要求，解散食堂，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1961年5月6日）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招4·

77 胡乔木 1961年5月8日给毛泽东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载《建，页4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 第四卷（1949—1960—乌托邦运动

取消供给制。张平化说：农民「听到食堂可以不办，绍为是「松了绑」。祖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间红彦说：「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很强烈。……省委考虑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办的就不办。……多数地区群众都不主张实

行部分供给制‘。」79 谢富治说：群众说「食堂好比紧身袄，穿在身上怎么也不自在」。胡耀邦说：「青壮年、妇女、老年人、基层干部，没有一个说食堂好话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当年被称为的「共产主义因素」，在实践中由群众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四常委下乡体察民愿

这次中共中央众常委同时下乡，深入百姓，体察民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头一次。此前，领导人外出视察，主要是听各级干部的汇报，这次则是面对群众。当他们直接面对面黄肌瘦的乡亲父老，看到农村的破败景象和百姓一贫如洗的生活，感到震惊和愧疚，对于百姓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的愿望产生了强烈共鸣，对「大跃进」的错误及其带来的后果有深切的感受。这可能是促使他们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拉开距离，倾向于采取现实主义政策的重要认识来源。

1 睡在养猪场的刘主席

刘少奇在3月广州会议之后，回到湖南老家，作农村调查。

搞「大跃进」的话。庐山会议后期，从1960年上半年起

向共产主义过渡，刘少奇也说过许多头脑发热的

刘少奇坚决维护了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人民的生活愈来愈困难，粮食紧缺，

• 然而，

副食品紧

7879

张平化1961年5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424。

• 阁红彦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502。

第九章制定政策愧较农村危肩

缺，日用品紧缺。不仅在农村，而且在部分城市，也开始出现浮肿病，这使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对是否取消供给制等问题，也还缺乏认识。直到1961年3月15日，在讨论《农业六十条》草案时，刘在会上说：「对『五保户』实行部分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成的。但其余的统统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由于多数人主张保留「部分供给制」，毛泽东没有

表态，刘少奇也未提出异议。应该说：包括刘少奇在内，这时对农村的真实情况，对农民的心愿也还是「不其了了」

刘少奇探知，在这几年，即使亲自下去搞调查，也难得了解到真实情况，听到群众的呼声。因此，他决定这次回自己的家乡——宁乡、畏沙一带作调查地点，他相信在那裏能听到真话。他想摸清三个问题：一是了解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如粮食政策，· 供离制、公共食堂等等；二是已调整的政策够不够；三是根据发现的新问题，考虑新政策。离广州前，刘约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话，说这次去湖南乡下，我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行，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4月2日下午，刘少奇坐上湖南省委配的一辆吉普车，与夫人王光美、秘书吴振英等几个工作人员离开长沙，前往宁乡。车行过王家湾，路见一处挂着「宁乡县东湖塘人民公社万头猪场」牌子的院落，刘少奇下车察看，但见不到几头猪。为弄清情况，刘决定在这裏住下。随行人员选择了猪场的一间饲料房作为刘的住房和办公室。刘少奇从这裏铺状找不到稻草，周围风干的人粪中看到的多是纤维，直觉告诉他在饿饭· 他在听取先期到达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和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组汇报时，对张平化说：「宁乡的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然而· 要了解真实情况也并不那么容易· 从4月12日起，刘少奇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这是一个全省出名的「红旗大队」，

jj·, 犍 j,, '·ji.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被说成是粮食年年增产，公共食堂愈办愈好，社员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刚刚出版的1961年4月号的《中国妇女》杂志，就登有一篇近万字介绍大队总支书记彭秀梅和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的文章。刘少奇认为，这裏是城乡结合部，「群众有点小自由，经济自然就要活跃一些」。他真希望能从一个好的典型那裏找到一些渡过困难的经验来。然而，下车伊始就使他大为疑惑。这裏看到的依然是一片破败

萧条的景象。彭秀梅介绍大队的情况时 j 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内容与报上宣传的大体一样，就是不谈任何困难。下午，刘少奇召集大队干部座谈，参加的有副大队长李育孝、黎桂兰，妇女主任童若赋，大队会计彭腾奎。然而，几位大队干部，所谈与彭秀梅大同小异。当问起群众生活有甚么困难时，大家吱吱唔唔。说：f 彭书记已经汇报了」，「彭书记掌握的情况比我们全面」，「彭书记的政策水平比我们高」。实际情况是，就在知道刘少奇要来天华的头天晚上，彭秀梅就曾召开党员和生产队长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治保主任又给地、富、反、壤、右分子开会训话，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把上上下下的嘴巴都封死了。

座谈会没有收获，刘少奇决定改变方式，直接到群众中去。他看了施家冲食堂，又把几个社员请到自己住处。与大队干部所说大相径庭，群罕向国家主席诉说了种种难处和苦处】并提到原大队副支书段树成，因为讲了真话，1959 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事。刘少奇决定找段树成谈谈。就此揭开了天华大队的真相。4 月 18 日。段树成向刘少奇汇报说：天华最好年景是 1957 年，1960 年减了产，只收七十二万斤，但上报 120 万斤，虚报四十八万斤。除交徽购超购粮，人均口粮不足 400 斤。打成大米只有 280 斤，每天每人只有 7.6 两米；19 印年生猪存挤只有十七头，却上报 500 头，鱼出塘只有几百斤，上报为 7500 多斤；全队患浮肿病的人超过 100 人，上报只有十几人。死亡四十八人，上报十一人，少报了三十七人。天华不算最差，但也没有宣传的那么好。省裹早就把天华树为红旗，红旗就得爱护，就得讲成绩。于是根本不能讲缺点。动辄扣帽子，批斗。段树成说：r 您问我是怎庆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非是我讲了几句真话，

第九章制定政策枕激农村危汤

戴帽子，彻职，批斗了六次。刘主席，如今讲真话真难哪！」说到这里，段树成不禁眼泪双流。

刘少奇找群众谈话，已经引起彭秀梅的警惕和不满，现在又背看她找段树成谈话，更使她愤怒了，竟直闯刘少奇的住处，高声嚷道：「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的。」经刘少奇多次谈话：彭秀梅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认「天华大队的问题很严重」。S05 月 3 日，

刘少奇回到阔别四十年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住进了自家的旧宅。他在旧宅的堂屋连续召集各种座谈会，找人个别谈话。刘与小时的朋友李桂生漫步在安湖塘的田埂上，刘问道：「人们说去年干旱很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吧？」「没有，还有半塘水。」「还有半塘水，这说明干旱并不厉害嘛！你还记得吗？小时候那一年，塘底干得晒得谷·那样天干】每亩田还收得两三担谷呀！」「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象，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李桂生说苍带刘少奇去看附近的公共食堂，这裏地上、灶上是胡乱堆放的炊具、脏碗筷：李指若一小堆高笋叶说：「这是全食堂一餐的菜，炒菜只放盐，不放油·吃不饱呀！」 81

这等等情况，使刘少奇感到，首先要解决的是公共食堂问题。于是。找来曾担任过大队书记的农民朋友王升平，问“「你说说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王升平是曾被认为「右倾」彻了职的。他回答说：「咯到底是讲得还是讲不得呢？」

刘说：「怎么讲不得呢？」「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心裏话。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好，讲得我就讲。」「要是叫我和群众说心裏话，食堂还是早点散伙的好。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拿拓木冲食堂说吧，开伙时一百二十黄峥“《刘少奇一生》叫匕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5)】页 358·黄峥：《刘少奇一生》，页 3 哄·

S08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团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年运动

人，眼下不到八十人，死了十多个，跑了十多个，还有几个得水肿病住在大队临时医院·过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入了食堂没得吃，养不成·如今二十户人家，只剩下集体的一头母猪，叫鸣的鸡公子都没有……」从听到的，看到的，问到的，刘少奇当机立断，要王升平回去把他所在的拓木冲食堂停掉。

5月7日下午，刘少奇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面对面黄肌瘦的乡亲父老，刘少奇探感愧疚·他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

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这次回来，看到这裹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82

在掌握了大 t 第一手材料以后，刘少奇对一些群众最关心和锻急切的公共食堂、农民住房等问题，与宁乡县负责干部进行协商迅速予以解决。

5月11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汇报了湖南调查的情况，对解决社员住房，退赔社员财物，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在部分乡村建立他皖矣派出所和巡回法庭等一些带普还性的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2 周恩来在河北农村

4月底5月初，周恩来先到河北邓邓，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5月3日至8日。下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住在部队营房裹，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在伯延村就餐。这次到农村调查带着三个题目：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周恩来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周恩来知道是在做假，硬是让工作人员端走了。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炊事员一见总理 82 黄峥：《刘少奇一生》，页 363 •

第九章制定玫莱槐 k 农村危马

来，措手不及，连忙董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董，见裹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这是周恩来来农村吃到真正的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裹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周恩来召集社员开会！黑压压挤了一大屋。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开始群罗不敢说话，说话的人也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有压力，笑若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r 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裹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场子还是很静。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

边，闷头吸烟，就问他，「你叫甚庆名字，怎么不说话？」别的人回答说叫「二廷」

二廷见总理问，弹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着脖子：「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r 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立即直起身子，神情异常认真：「为甚么吃不饱？」「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再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裹才三四两，能吃饱吗？要是自己做，汤扬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冬天可以用余热取暖。jr 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二廷的话像拉开闸，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接着，二廷指着周恩来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

周问：「为甚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当然会没有吃的！」）

lesl', ■■■■■. '■■■ 'r-' ■昌■■■■. 乱. '■■. . '■■.

略熊华课·梦必文：《周恩来总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

[州! ., 347 .

中华人氏共和国史·第四卷（19 铝一 1961}—鸟托年运动

会后，周恩来和张二廷家做客，面对和蔼可亲的国家总理，张二廷将伯延公社遭受的灾情和公共食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实向周恩来一一诉述。并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来伯延。

在伯延的调查中，周恩来发现，社员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橙食，害怕挤掉他们的自留地。社员们要周恩来当场保瞪：「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周恩来当养地委、县委，社委的同志说：「我可以保证。」社员们又要求周恩来以后能够每半年来一次他洁三才能放心。周恩来回答说：「自己能否半年来一次，还不能担保，有时可能忙于甚么情况去不成，但是工作组总是要去的 j。」5 月 6 日，临离开伯延的时候，周恩来召集社员开会，亲

口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满痛一院子群单，一听总理下命令啦，「呼啦啦」地往总理跟前挤，要和总理握个手。总理身不由己被沸腾的群众簇拥着走出会场大院，拥着他往南走，南面还有好多群众等着和他握手告别，周恩来就索性绕着伯延的街走了一个圈。5月7日凌晨3点半，周恩来请秘书孙岳挂通了保密电话，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了调查的情况：

(1) 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2) 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3) 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4) 那邳专区旱灾严重。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于当日4时40分批转了周的报告。”

84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591—1593。

8s 毛泽东：（转发周恩来关于公共食堂等问题调查汇报的批语）（1961年‘月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二页4间。

第九章制定政策把农村危汤

3 邓小平考察京郊

毛泽东和其它常委们都在外地，邓小平则留守北京，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由彭真协助。邓小平和彭真一面处理日常工作，一面组织了五个调查小组在京郊顺义和怀柔等地农村调查。4月7日至21日，邓小平亲自到顺义县农村考察。

4月15日】邓小平在北小营召开田上犂、北小营、仇家店三个大队的支书、生产队长参加的座谈会。邓小平反复询问：「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谁敢说不好，达心地拼凑着吃食堂也不错的理由。邓小平夫人卓琳在上犂村孙旺家已经住了一星期，了解些情况。她告诉邓小平说：上犂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邓小平听后并无愠色】反而很高兴地说：r 你们村

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们村把生产搞上去了，粮食单产59年达到五百四十多斤，比58年提高六十多斤。副业收入三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你们的好经验应该总结一下，推广下去。」他还着重指出：「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邓小平来到牛山公社白庙村，看到食堂停火，一片荒凉景象，只养着一头四十斤左右的小猪。深入到农户访问，看到一位老大娘喂羊，猪圈却空着，他问老大娘：「您养羊，为甚么不喂猪？」大娘说：「还喂猪，人还没的吃呢！」

邓小平经过调查，觉得问题严重，在桑园村召开社队干部会。在会上他明确表态：「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田。」随后，邓小平对县委书记说：「现在食堂是过波时期，可以自由一下，不愿意在食堂入伙的就不要摊工分了。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食堂种的菜，养的猪，对不入食堂的户怎么分配的问题。」一些干部反映说，有些群众愿意办农忙季节食堂，冬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邓小平说：「这样也可

6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曾喜（19, 8 — 1961）—为托年运动以？一年农忙六个月吃公共食堂，农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还可以解决冬季烧炕取暖的问题，能节约一些煤。」邓小平说出了干部群单不敢说的活，有了他的表态，第二天上笔村就有二百多户退出了食堂，继续留在食堂的也只坚持了两个月。

手工业、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是邓小平关心的几个问题。在农村走了一遭，看到的是集市一片萧条，买卖不兴旺，品种单调，数量少，尤其是社员使用的小农具和日用品缺得更厉害，为农民服务的项目几乎快消灭光了。他把商业局、供销社、手工业社的干部找来开座谈会，他说：「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问题，是流通渠道问题，是过去有人关心的，而现在没人关心了，自流了。」「手工业、家庭副业无论如何不能丢掉。这两项收入一般能占家庭收入四分之一左右。」在农村，必须坚持以粮为主，全面发展的

方针。J「归根到底是把生产发展起来，用经济办法而不用政治办法
1 把苇编、柳编、荆编、烧石灰、砖瓦、黑白铁加工、皮匠、瓦木匠、
做豆腐·豆线、养猪、鸡、鸭、兔和庭院种菜等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统
统恢复起来，·，·一不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场
上来卖、把集市贸易繁荣起来，市场上的物品增多，市场也就活跃了，
社员生活也就方便多了。农民的收入增加，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把县和基层的供销社恢复和建立起来。县供销社
搞几个人，只搞供销，不搞商店，有些人可以归队。农村基层供销社
可以先把机构搞起来，再建立各种制度和章程。供销社的首要任务是
组织生产，要把手工业专管起来，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抓。」r 社员
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

刘刻、平到了张庄，j 艺萱边一块三角地，翻了一铁锹多深，旁边堆
有五大堆粪。邓小平问原公社党委书记王志儒‘种十边地有没有好
处？王一时语塞。个·人种十边地，不是单干吗？邓 d 绸不奋出王
的心思·他自己回答说：开垦十边地有好处，你看看，地翻得这么深，
粪堆追窜大，你说它会不打粮食？打了橙食，就是不卖给国家，人吃
了也省了国家供应。在视察中，邓小平察看了一个典型的穷村～一，
芦正卷村，当时被划为三类队。1960 年全村人均分配仅四十二元，
其中 30%还是从外

第九章剑定玫某枕晨农村危汤

村平调来的·社员生活很苦·邓 jJ’平看后十分难边，他特别指示
县委书记李瑜铭、孙振英，要帮助这类穷队因地制宜，因事制宜，找
致富门路。但穷队面貌的改变，不能依靠平调来实现。必须依靠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他说：「像芦正卷这样的穷村，没有人愿意同它并
在一起，就让它一个村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吧！这个村沙地多，产
粮少，在分配征购任务时，要适当照顾点。」

调整体制，确定社队规模，是各级干部要求迫切的一个问题”多数基
层干部和社员都希望把基本核算单位划小。对此。邓小平的基本主张
是尊重群单的意见，尽快把社队规模确定下来。他在座谈会上说：「要
根据群单的要求，把社队规模早些定下来·，·…也可以采取一些过
渡办法。」这时，邓小平关注的是「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

成本、超产奖励)「四固定」(即土地、, 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责任制的落实。在几个座谈会上都指出:「调动干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尽快制定『三包一奖』和『四固定』的责任制。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让他们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当然,定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10%的余地,彰显到有产可超。这样就会有奔头,就拚命去干了。」他反复强调,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当时的所谓分配,很大程度是如何确定吃粮指标,邓小平说:「不要拉平,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干活也有好坏,出勤多少也不一样。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有差别,口粮的差别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农民就放心了,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灾害的积极性,」「多产多留多吃多购,按劳分配,群众是会赞成的。」“

“《北京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第五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页7—10.

68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1)—乌托邦运动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邓小平对恢复农业生产形成了自己的看法,5月10日,他和彭真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他们建议:一现在实行三七开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坏处很多。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可以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一关于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问题,是不是可以采取对包产部分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购四留六。鼓励社员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

一关于食堂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以便利。

毛泽东对这封信很重视。5月13日，毛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B7

4 朱德、陈震南下调查

1959年，朱德不赞成继续搞公共食堂曾受到错误批评。1960年3月，朱德在视察陕西、贵州和四川重庆后，和夫人康克清一起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故乡—四川仪陇县马鞍场。在家乡，他问堂兄弟：「你们为哈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堂兄弟直通通地说：「还不是因为肚子吃不饱！」朱德听后，用拐杖猛敲了一下地面，摇摇头说：「我知道了。」当时，朱德就嘱咐仪陇县委负责人：「你们要老老实实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1961年初，毛泽东倡导调查研究，朱德积极响应。1月20日离京南下，先到上海，再下杭州。他登高鸟瞰】面对杭州龙井大队的条田

B7 毛泽东：〈转发邓小平，彭真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来信的批语〉（1961年5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页492—493，

中共中央文研室编，金冲及主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研出版社·1983），页60、61·

第九幸制定攻东托饮农村危局

碧茶心生喜悦，即兴赋诗；他发现浙江养蚕中实行「四包一奖」制的经验很好，二月30日，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推荐。接着去了福建、江西、广东，视察工厂和人民公社。他对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手工艺品以促进对外贸易很感兴趣。3月6日，他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3月24日，朱德参加广州会议后北上，先后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考察。回京后，5月9日再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反映这次外出看到的情况。他说，《六十条》贯彻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普遍注意发展家庭副业。河南虽然向好的方面发展，但困难仍然很大，农民体力弱，患浮肿病的人还不少，牲畜死亡多。信中，反映最强烈的意见是群众对公共食堂的不满。他写道：

四川农村的食堂是「两这烟」·即在食堂做一这·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选，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陕西的群众说·农村的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

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胡涂搽。据豫东调查·尤许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峰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s,

陈云在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的一个月前，就曾到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查研究·1961年3、4月份，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办法。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使他对农业困难、粮食紧张、经济失衡的情况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对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对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支持农业等具体措施提出了重要意见。1961年6月，为进一步寻求调整农村政策，解决农业困难的具体办法，陈云又一次南下上海来到青浦老家。

叨《朱镕传》·页704一兀5·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第质客11958一珍61)一鸟托年运动

陈云出发前，请著名经济学家薛艺桥、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院长顾复生、工会领导人陆铨组成先遣队，6月19日先到青浦小蒸乡、观音乡模底。后来陈云说，之所以选择小蒸乡，是因为1949年陈云与顾复生、陆铨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解放后又常有联系，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农民也知道他们，比较敢讲真话。

一星期后，陈云离京南下，先到上海，随后即赴青浦。来到小蒸乡，首先印人眼帘的是这里的生态的严重破坏。小蒸乡地处江南水乡，是湖荡中的一个村庄，原来树木葱茏，茂林修竹，包围着村庄，远处看不见房屋，公社化竹林、树木都归公了，结果都被砍光·现在是一片荒凉。这使他很不好受。

6月27日，陈云住在自己娘舅一族的亲属、农民廖开弟的家裏，一住十五天。这里与全国一样，粮食肉蛋供应非常紧张，日用品奇缺，商店货架有样无货。陈云嘱咐随行人员，不许在当地买任何东西。坚决谢绝烟酒茶招待和请客送礼。在小蒸，他每天开专题座谈会。十五天时间竟开了十个座谈会。包括：公养猪；私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平调退赔；农村商业；公社工业和手工业；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斤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

产等等。几次与公社党委交换意见，几次直接向农民做调查。陈云自己还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才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

陈云开座谈会，跟农民谈话，特别注意听批评意见。为了让农民敢讲话，他特意把各种人分开，干部、农民、中农、富农分头开座谈会。这样一来，农民顾虑少了，对干部的意见就直通通地倒出来了，如说干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干部嘴唇两张皮，翻来覆去都有理。」青浦县原来是生活比较好的鱼米之乡，过去农民习惯每天吃三餐，农忙时加一餐。「大跃进」时搞浮夸，搞高征购，搞得每天只能吃上一顿干饭、两顿稀饭。调查组到的时候，社员都到大队办的公共食堂吃饭·一天三顿饭】顿顿喝稀粥。胆子大的农民愤愤地对调查组

第九章 饲定玫东槐纹农村危马 683 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李福，却要吃粥。」90 农民吃不饱饭，把大队种的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在小蒸，陈云关心的主要问题；

一是自留地。这时中央已经决定，农民可以种自留地”可是到了地方就都打了折扣·社队干部担心社员只关心自留地而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担心集体耕地减少了完不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分陈云说，自留地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重大的问题，祖祖辈辈农民都得有点自己的地看着。中国历来农民造反，都是在粮食问题上造反的。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富足！经过讨论，干部们逐渐统一了认识。公社干部提出把自留地扩大到占耕地总面积的 6%，其中再分大田七百亩，占耕地的 3,5%。陈云十分赞成，把他们的意见写进了给中央的调查报告·

二是家庭养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养猪是家庭日常开支的重要收入来源·然而，三年「大跃进」时期，农民私养几只猪几只鸡鸭也成了小资本主义的表现，不准农民养。三年间，曾两收两放，这么一折腾，吓得农民都不敢养了。而集体养猪】没有不赔本的。1961 年初，中央规定养猪的方针是「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然而。到了地方，又都留个尾巴·陈云在小蒸，仅养猪一项，就召集了四次座谈会，两次公养座谈会，两次私养座谈会。陈云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

还是发还对？」一个老农暗含讥讽地回答说：「上面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陈云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猪？」那个老农说：「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是役收对了。」陈云对大家说：「没收不对，发还才是对的，以彼再不会没收了。」陈云的明确表态，使参加会议的老农们喜出望外。

三是农作物耕种制度。「大跃进」中瞎指挥，任意改变并作制度。小蒸地势低洼，无霜期不够长，农民向来种一季水稻，一季夏熟作物如大豆、小麦。「大跃进」后上级命令种双季稻。虽婉比单季稻如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娜》页 221 — 222 •

6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畸专 {1958 — 1961) — 为托邦运动

每亩多收二百多斤，但陈云找他认识的老农算了一笔账】发现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不合算。通过调查，陈云得出结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像小蒸这样无霜期不够长，地势较低，人均耕地少的地方，不宜种双季稻，种夏熟作物也要看土质情况，多种蚕豆，少种小麦，这样，也要相应改变口柜年度安排。

7月12日，陈云一行离开小蒸。为了印证小蒸调查的结论，他到与青浦情况相似的杭州、苏州找了几位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座谈，后又到浙江萧山、江苏无锡两县调查。在杭州向毛泽束作了汇报。又向周恩来汇报，随后与上海市委、江苏和浙江省委交换意见。8月回京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随信附了青浦农村调查的三个专题报告。”中央常委们深入农村基层的实地调查，为在公共食堂、供给制、基本核算单位等问题上取得共识，获得了第一手材料。这就有助于《农业六十条》的修改和基本敲定。

五公社体制的再次退却

1 北京会议再议农村形势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召开工作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主要是在调查研究收集农民和干部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广州会议提出的《农业六十条》草案。与会人员经过4,5两

个月的深入农村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心境与3月广州会议时已经大不一样了。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会上对几年来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以刘少奇的意见最为尖锐。

91〈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

第九章 判定政某扰纹农村危局

5月24日，刘少奇在第三组（中南、华北小组）讨论会上发言

提出了反「左」的问题。他说：

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与州会议以徒·在农村实际工作上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反「左」的。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党一方面是经验很丰富，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如农业问题，一是大田生产，一是家庭副业把养猪·养牛搞井·吃了大亏，取消自留地也是个很大的错误，使生产、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对工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全党、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饿了饭，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才

5月31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对造成当前困难的原因、错误的严重性及其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极其尖锐地指出：

这几年查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天灾呢，还是由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吗？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t·茄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它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实 92《刘少奇年谱【18 哭一 1969)》，下卷·页 5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耗年运动

事求是，是怎庆样就是怎庆样，有成绩就黄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这的工作中，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严重问题，为甚废会这样减产才为甚么要退才难这都是老天爷的关系才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成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统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玉

刘少奇这一番话，明显触动了三根带政治性的敏感神经：一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在1961年初的北京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到对1960年的形势没有估计对时说：「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显然，他认为主要还是天灾。2月，田家英汇报说造成严重困难主要不是阶级敌人报复，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听进去。为扭转农村局面，他的办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调整农村政策，一方面搞整风和夺权。4月11日，毛请王任重帮助湖南工作的批语中，还批评湖南「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刘少奇原来也有同样看法，这次讲话，他没有提到阶级敌人报复的问题。在农村调查中，刘还为基层干部说了公道话，错误也不完全在他们。根子在上面，在中央。

二是推倒了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强调讲成绩要实事求是，有几分就是几分。这可是一条政治界线，彭德怀在庐山被打倒，就是被认为越了界。

．■■尸细→→，→’，■■■■『

93 刘少奇：〈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961年5月31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页337—338·

第九章啊定政东视较农村危马

三是提到了路线问题·尽管他还不绍为总路线有甚么错，但确实对三年「大跃进」有了切肤之痛·

这三条，实际上就是后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刘分歧的源头。周恩来的讲话同样深刻，但语调比刘少奇平和多了。他委婉地说“庐山会议以来·由于我们缺乏分析·而把反右倾和工作上的问题混淆起来，更重要的是没有实事求是”所以尽管想搞好一点，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一切都搞全民化，动摇了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得罪了小资产阶级。另外，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劳动关系上的命令主义，上层建筑上的规章制度一般化、简单化·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作风上的「五风」问题· · · · · ·，一

为甚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周恩来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的责任，中央主要是书记处和政府各部门，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应负主要责任。为克服困难，周恩来提出，一是平反，我们错的，就要承认错误，欠了账的就要交代·甚么时候交代清楚，甚么时候为止。要平反也要有处罚，平反与处罚要结合起来。二是经济建设要全面调整：看来必须把速度放慢，把战线缩短。”

6月12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作了两次讲话。谈到了会上所议的各项议题。他对这次会议解决的问题很满意，认为「这次会议大有收获」毛说：「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
舛《周恩来传（1949—1956）》，页15—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6—1966）·乌托邦运动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

对何以出现变化的原因，毛分析说：「为甚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但对此毛似乎并没有切肤之痛，他很轻松地说：「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

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

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毛的结论是：第一，庐山会议后应当继续反「左」，反右错了（但坚持批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正确的）。第二，反右把许多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犯了错误。对一切受了冤柱的】都要平反。第三，郑州会议精神、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第四，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再度把滥。第五】强调普遍反对「五风」特别是「共产风」。整风整社，开始主要整三类县、社、队，强调夺权斗争。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中主要的普还的问题是「五风」问题。第六，总的说来，现在大家解放思想了，对社会主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议。”

有鉴于此，毛泽东强调了\$11练干部的重要。过去毛泽东多次强调岩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他提出：r严重的问题是重新教育干部。」他说，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他要求，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县的干部；他们的思想通了，就由他们去教育社队干部。毛泽东认为党内干部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不多。毛泽东指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吴芝圃同志，我的工作没做好】你的工作也没95《毛潭东传《1949—1976》），下册，页1163—1166.

第九章制定玫瑰枕纹农村危汤

做好。还说，河南，甘肃省委没有一个人懂得马克思主义，山东省委只有一小部分懂得，大多数人不懂。

2《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

由于大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修改的《农业六十条》，对公共食堂、供给制等几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统一了认识。同时对3月广州会议没有提出的问题，如山林保护问题、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都有了新的规定。会议通过了《农业六十条》的修正草案。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的核心是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

修正草案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这样，多次议论是否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即小队）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明确规定了：公社对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强加干涉，只能协商和建议；组织队与队之间的生产协作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原则；生产队的财物公社和大队都不得调用；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数据和小农具等生产数据永远归社员所有；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恢复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带有根本性转变和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和方针。

公共食堂在 1958 年产生，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大跃进」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当时认为，办公共食堂可以解放大批劳动力投身于「大跃进」，公共食堂实现了「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是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生事物。因此，它一诞生，就备受青睐。毛泽东、刘少奇和当时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对公共食堂都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和期望。但是，严重的「五风」使得农民生活处于困难境地：食堂难以以为继。第二次郑州会议对参加公共食堂有所松动。强调自愿参加，又不能放任自流。规定口粮分配到户，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己。口粮分配到户的口子一开，农民们宁愿回到家裏做饭、吃饭，而不愿继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9 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绩在食堂吃饭。一些地方食堂散伙了。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公共食堂成为分歧的主要问题之一，办与不办，已上升到是否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公共食堂成了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通过 1961 年上半年的实地调查，终于认识到公共食堂实际上成了捆绑农民的一根绳索。

与公共食堂紧密联接的是供给制问题。人民公社成立后，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就被吹成是「共产主义因素」。但是这种平均主义的办法难以持久，于是退到所谓三七开（三分供给，七分按工分配），在 1961 年 3 月广州会议上，还提出一个新理由，认为保留供给与工资三七开，有利于照顾贫下中农。5 月 13 日，邓小平和彭真给毛泽东的联名信

中，根据他们在顺义调查到的情况，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邓、彭在信中说：

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对地富和上中农更有利。因为实确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少；而地主、富农一般换养人，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辩论中，党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国家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9’

尽管取消供给制是农民的普遍呼声，但邓、彭信中提出的这条颇有针对性的理由，使那些坚定站在贫下中农立场的人也无言以对。这样，修正草案终于取消了这两个「共产主义因素」：将原草案规定的公共食堂「应该积极办好」改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的办法也改为「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社员分配实行供

外（邓小平，彭真给毛潭东的信》（1961年5月10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页326—327，

第九章剑定玫瑰花纹农村危马

给部分与工资部分三七开的规定，改为无论包产收入或包产以外的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的指示；19日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些政策下到农村，逐渐稳定了人心，稳定了农村。

3 落实退赔、解散食堂

北京会议后，各地组织了对《农业六十条》的贯彻落实。为了防止一部分干部隐瞒或任意篡改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规定，按照中央的指示，各地基本上做到了「每条、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普遍对于如何贯彻执行《六十条》以及退赔、甄别平反和粮食等问题作出决议、发出指示，有些地方还对社办企业、自留地、私人养猪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8月中旬前，各地、县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8、9两个月内，

以退赔和在夏收分配中坚决落实分配政策为中心贯彻《六十条》。具体落实情况是：

第一，继续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6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规定：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襄平调的退赔到那襄，平调单位不但要彻底退赔，而且应该向群众作检讨。一两年退赔不完」三年基本解决；三年退赔不完，也必须在五年内完全解决。中央的意图是，通过退赔，一是取信于民，一是教育干部。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平调总数为250亿元，实际退赔的占平调总数的20%至30%。

97《建国以来毛潭东文稿）·第九册·页519·

98〈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1961年6月15日），载《建国以来，要文戏且网》，第十四册·页378—3”。

中华人民兵奉国史·第四春 11958—1961) —鸟托年运动

在退赔款项中，国家付给农民的退赔款为18.5亿元。虽然这只抵平调和损坏的财物的一部分，但足以表明中央领导人纠正自己所犯错误的决心。后来，由于各方面投放货币过多，物资供应不足，中共中央n月28日发出通知，决定当年暂停发放退赔期票，并将全部退赔工作推迟到五年，七年或十年逐步完成。此后退赔问题基本不了了之。

第二，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调整后的公社数为55682个，较调整前增加剑舛78个。生产大队为708912个】较前增加 T225098个。生产队为4549474个，增加1561306个·第三，进一步确立了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在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之间普还恢复了「三包一奖」制度，生产小队内部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制度；绝大多数地方把原来实行的供给制改为对五保户和困难户实行补助的办法；

第四，对农民来说，最大的松绑要算解散食堂了。据8月2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中央写的情况反映说：截至8月，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 j，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真正出于群众自愿的食堂巩固下来了。据估计，参加食堂的户数，约占20%左右。

多数是群单自由结合的合伙食堂和农忙的劳力食堂。

公共食堂的解散，农民分户自炊，自己安排生活，加上自留地上生产的粮食和瓜菜的补充以及家庭副业的逐渐恢复，解决了社员的部分口粮和日常生活需要，农民的口粮标准虽然低，但生活困难一般比上年缓和些。老百姓终于有了个家，又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了。那「爱固下来」的20%的食堂，事实上不久都在农村销声匿迹。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复杂。他说：「这是一件大好事。」

《农业六十条》的贯彻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农民最关心的还是视食问题。农民说：「千锤打锣，一锤定音」，「橙食问题不解决，条条是空的。」然而，许多地方群众留极和国家徽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才群单普通要求把徽购任务定下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不变。有的地区干部不愿按照规定给社员国足自团地，怕社员搞「自发」，对恢复自留地的政策阳奉阴达；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普还存在「怕变」的心理。

第九章制定政气批纹农村危汤

再就是一些三类社队的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对干部打击面过宽过重，使一些干部躺倒不干。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份材料反映：据各地统计，去冬今春整社中划分为三类的社、队·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这部分社、队·都向各级派工作组进行了专门整顿。· · · · · ·经通检查，发现在这一部分被整顿的三类社、队中，把有些「五风」泛滥·造成严重损失的，也当作民主革命不彻底来处理·以效把一些本质好只是思想作风有毛病的干部，也当作阶级敌人和壤分子斗争了。在重划成份中·有的错误地把一部分劳动农民错划为地主、富农·在这些地方，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造成了阶级阵营的混乱。不少地方·几年来对朴篡层拎部彻职、怂办（经白镶）过多，加上这次处理不当·犬犬投伤了党员，拎部的积极性。”

针对这些情况，各省、市、区党委普还作出了的分期分批输训干部的规划；要求以退赔和坚决实现各项分配政策，加强经营管理作为贯彻《六十条》的主要内容三作好秋后系统地整风整社的准备工作。

4 基本核算单位再下放

《农业六十条》的制订和贯彻，并不等于农村问题都解决了。8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召开会议讨论：粮食、市场、两年计划和工业、工业管理、高等教育、干部输w11等问题。就在这天，毛召集中央常委和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会议议程。毛问各地的收成、《六十条》贯彻及农村的情况，中南地区负责人陶铸、王任重等说，《六十条》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是99中央农村工作部编印：〈各地X做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化96主年8月24日）较《农业集·化重要文戏汇编【1955—1981赚，下册·页495—49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所有权与分配权有矛盾。应该说，这正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而始终未拿定决心的问题。因此，毛说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讲到社会主义，不甚了了。《六十条》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现在搞了《六十条》，不要绍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a'0，庐山会议后，毛泽东9月21日一到武昌，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的就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据王任重日记记载：

21日毛主席f1j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谈灾情以外，看重谈了生产队为（慕本）校算早位的问题。主席是主帐生产队核算的。22日下午又找我去谈了这个问题·

23日晚给主席送了开朴生产队改为（篡本）检算早位的三份材料。

24日下午徒·主席对我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没有话说·主席接兑了书记处书记和地委第一书记·主席表示了他的看法。’01王任重向毛泽东送的是两个生产大队的材料，一个叫「大队委话生产队进行分配」，一个”q「扩大生产队核算·」实际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之外，其余全归生产队进行分配。虽然都没有明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质上是对《六十条》修正草案关于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改变。这种做法试行的效

100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 84。

玲 1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 83 — 84 ·

10 之王任重日记（1961 年 9 月 27 日 j，见《毛泽东传（1949—1956）》·下册·页 11 乃。

第九章制定政策扭转农村危局

果很好，解决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矛盾、瞒产私分、穷队与富队问的 r 一平二调 j 问题。而且，简便易行，比年年吵「三包」、吵分配要省事得多。

根据毛泽东「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的指示】湖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结果毁 t 参半，意见不一。省委向中央报告，请求批准进一步扩大试点。对以生产大队还是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不同意见，早就存在。毛泽东在 3 月广州会议时，曾批发了两个材料。一个是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反映生产大队与生产队严重矛盾的情况；另一个是广东省南海县一个大队剧析上调任务包干办法的情况。因认识不统一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讨论。一直到北京会议，处理大队与生产队的关系都是规定按「三包一奖」的办法，生产队组织生产，生产大队组织分配。毛泽东从湖北北上，来到河北省邯郸市。9 月 27 日，他在这里邀集河北、山东两省及河北五个地区的负责人谈话。参加座谈会的有刘子厚（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路明（分管农业的省委候补书记）·康修民（石家庄地委书记），宠均（邯郸地委书记）·胡开明（张家口地委书记）、刘琦（邢台地委书记）、李悦农（保定地委书记）、周兴（山东省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程怀仁（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座谈会上，反映突出的问题还是大队与生产队的经济关系问题·河北省委根据在满城县的调查反映，推行「三包一奖」，仅在大队、生产队两级，春季搞三包，夏收搞预分、秋收搞结算，最少就要经历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算 1928 笔账，光定额就有四百多个。基层干部说：r 三包一奖有三愁，算账、吵嘴、熬灯油。j 超产奖励无法调动超产的生产队的积极性·社员说：「这好比新出嫁的姑娘回娘家·带回来的东西少，拿走的东西多。」

「三包一奖」包得了数，包不了心，大队统一分配，生产队怕吃亏。互相观望，互相依靠。各打各的小算盘，出工不出力、瞒产私分。基层干部说俏皮话：「三包一奖好是好」就是投机取巧管不了。」

保定地区唐县纲龙公社，十一个生产大队都实行「大包干」（群众叫「老包干」、「砸估堆」），很受群众欢迎。「大包干」实际上就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个公社被评为「右倾」他们也不改。粮食年年增产。牲口比1957年还多。国家征购一年比一年增多。

毛泽东听了两省的汇报，当即表示：「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9月29日，毛泽东将他亲自作的《邻邳谈话会记录》转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附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山东省委1961年3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湖北省委9月25日的报告、以及河北的一批材料。毛泽东在给常委的信中写道：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甚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渔的大发展即仿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我的意见是：「三队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通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叩

同时，毛泽东委托邓子恢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座谈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把这事交给邓子恢，除因

■ ‘●■■■ ‘——

103 毛泽东：《关于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常委等的信》（1961年9月2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个·页565—566，

第九章剑定政策抓农村危局

为邓早就主张起草一个人民公社的条例，受到毛的表扬外，还因为在3月广州会议上，邓子恢就明确提出：

‘介社三级所有队为奉基础·把基础放在大队一级是不可以的。既名为基础·就意味看它是一个经营的实体和居朴最底的层次。因此·把基础放在生产队最为恰当，它是最基层·生产、生活都直接联系群众·又是生产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同时·生产队规模，一般只有二三十户，以它为基础和变成经营实体，很适应目前基层部的经营管理水平。反观生产大队·它不仅居朴中间层次·而且多数是由过去的行政村组成的，规模一般都在一百户以上·很不利朴组织生产。’”

这个意见当时虽未被会议多数接受，却是毛泽东正在考虑的·10月3日，邓子恢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6日，向毛泽东写报告说：「大家完全拥护主席所提人民公社所有权下放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地、县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内，进行研究并下乡试点。

毛泽东再次派田家英专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并为中央起草一个指示，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面前进行研究。田家英选定了山西长治地区的一个农村，作为调查地点。经过调查，他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完全正确，遂即带着几个人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毛泽东对这俩文件看得很细心，画了很多杠杠·田家英高兴地拿给妻子董边看，说：「我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地方，主席都划了杠杠·」106《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

1似《邓子恢传》，页538·

105（邓子恢传）·页546·

106《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站8—1961）—鸟托年运动
单位问题的指示》经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中共中央于2月13日下达执行。指示说：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乏继《十二条》、《六十条》之徒·调整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重要政策。·一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项临时性的挤绝，一种权宜之计·都是不正确的。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

民介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时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0，实行的根本制度，基本核算单位一经确定之彼，就要稳定下来？不能任意变动。’ 0B

此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加载了1962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此后再未作过修改。这个基本体制框架，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末。从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到6月的北京会议，再到1962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业六十条》几经修改，从缩小社队规模，取消供给制、公共食堂，发放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给生产队，步步退却，人民公社终于尘埃落定。虽仍保留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 r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J 两个基本特征，但与1958年那个「一大二公」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的人民公社已相去甚远。这对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解脱。对引颯束而言，退到以生产队为基础，已是最后底线。在他看来，农村1071962年2月8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报送的指示稿中，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多少年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邓小平主张改为「二十年」？田向毛请示：究竟写「四十年 j • 还是写「至少二十年」？毛泽东将「四十年内」改为 r 至少三十年内 J。并批示说：「以改为 r 至少三十年 J 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二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的信（1962年2月11日），载《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151。108《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十五册·页18n。

第九章 制定政策托晨农村危界

政策已经定型，但在农民们看来，社员与社员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六 责任田的出现和分歧

1 包产到户的出现

随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现，如何进行生产管理就成了问题。当时农民们编的顺口溜说：「干部乱派工，’ 社员磨洋工】上工一条龙，

干活一窝蜂。」又说：「出工鹭鸶探穴，回家流星赶月，干活李逵叹苦，评分武松打虎。」说明这种集体大呼隆地搞生产，损害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各地都在探索把社员劳动与分配劳动成果联紧在一起的管理方式，不少地区采取「包工包产」的办法，其中多数包到了生产组，四川省江津地区的许多农业社一直包到了户。但第一次真正有领导地搞包产到户，是1956年春在浙江省的永嘉县。时年二十四岁的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与县委农村工作部干部戴洁天从苏联集体农庄的历史、'09《人民日报》发表的〈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的文章中得到启发，明确提出实行「个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在得到温州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同意试验的认可（「试验可以，推广不行」），以及县委书记李桂茂的支持后，永嘉县委常委决定组成工作组，选定在经营管理基础较好、领导班子能力较强的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对这种做法，社员们开头也是议论纷纷。劳力强的欢迎，

109（苏）奥沙基柯等：《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攘阳“东北人民出版社·195。介绍了「里」·斗争，「先锋」等集体农庄19秘年代在分级定额、按件计酬的基础上，给庄员以固定地段作为计件制的特殊形式，实行了联产计酬的办法。这种办法实行以后，每公顷玉米增产七公担，巩固了生产组这个基本劳动组织形式·复来。这种做法被撙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春—1958—1961) —鸟托年运动

劳力弱的有疑虑，也有人反对。实践的结果是，1956年遇到了干旱、台风、洪水三大灾害，但燎原社的庄稼长得很好。戴洁天高兴地说：「联产计酬真灵啊！社员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1956年9月，李云河将燎原社试点的《包产到户总结》送到了县委领导面前。永嘉县委召开千人大会介绍了燎原社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决定进一步作多点试验。由于永嘉的做法得到了浙往省委的支持，一时永嘉和邻近的十二个县的一千多个社约十七八万个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10

1957年初】广东省佛山地区一些农业社闹退社，另一些社则实行了包产到户。要求包产到户的农民则更多。波及广东、江苏、河南、山

西等许多省市。

对包产到户的办法，一开始就有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回到了单干。《浙南大众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的作法〉的社论，指责包产到户是发扬「小农经济积极性」，是打「退堂鼓」。因此，1957年夏季以后，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包产到户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被坚决取缔。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戴洁天成了右派和反革命双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举家遣往农村。其它人等，或撤职、或降薪、或劳动教养。二百多农民遭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收监，其中一人死于狱中。过了两年，包产到户 1959 年又在河南新乡地区信阳县、洛阳地区临汾县的一些农村出现。庐山会议反右倾后，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国展开了批判。是年 11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仍然顽固不化，他们用种种伪装、想种种理由，为资产阶级和部分富裕中农反社会主义的私货寻找道路。」，“包产到户再次被压了下去。

110 廖董隆：《中国农村改革的课头—浙江永嘉包产到户的实践》的序言之一载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筹编：《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永嘉包产到户的实践》（北京：时代出版社·1995，页 1·111（新华半月刊），1995 年第 n 号，页 21。

第九章制定政策托农村危汤

然而，包产到户屡踏屡起，1961 年春再次卷土重来。农民们所说：

「我们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吃饱饭了，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的脑子想进步，就是肚子太反动了。」“于是，出现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责任田、口粮田、借冬闲田等多种形式，人们称之为「救命田」。实行包产到户的，安徽全省占 85.4%；¹，广西柳城县占 65.2%、龙胜县 42.3%；¹⁴ 甘肃省康县、临洮·武威、通渭等县、浙江和四川的局部】十中有七；福建连城和贵州全省，十中有四·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情况大体相同。¹¹³ 安徽省所以发展得规模如此之大，与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有关。曾希圣与河南的吴芝圃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中都曾是「冒尖」人物。1960 年，就在吴芝圃为河南出现大规模非正常死亡遮遮掩掩的时候，曾希圣已开始

反省。他心情焦虑不安！心存负疚，一直在寻找渡过难关的办法。最初，曾也试图从加强集体生产责任制入手研究对策。1960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曾希圣以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身份，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1月，他赶回安徽，提出实行划小包产单位，这套办法起了一些作用。但仍然没有解决问题。群众说：这是大呼隆变成二呼隆，大锅饭变成二锅饭。1960年12月，曾希圣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聘到毛泽东说：「可以把高级社时期实行田间管理农活包工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曾由此受到戏发，明确提出恢复农村经济「可以考虑走包产到户的路子」。1961年2月】曾希圣请辞山东省委

112〈中共甘·省委关于加强农业集体生产领导和适当放宽小自由的报告〉【1962年5月5日），较《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页705, 113〈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1962年3月20日省委常委会议通过），载《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页698。

114〈中央监委关于《广西农村有不少党员干部闹单干的情况》简报〉（1961年2月28日）】载《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页695。

115 当时搞各种包产到户的，安徽全省还8吗·甘言临X地区达74%，浙江新昌县·四川江北县达70吗，广西龙胜县遭吃一3个，福建连城县达42鸟·贵州全省达4D吗。广东、湖南、河北和东北三省也都出现了这种形式·据估计，当时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之伊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0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61—1966）—乌托邦运动

第一书记，调回安徽。在火车上，又聘到副省长张祚荫谈下面的一个故事：

1960年初，正是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高潮，安徽宿县一个老农，叫刘青兰，七十三岁，儿子有肺病，别人劝他进敬老院，他向公社要求，不吃公家饭，带着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父子俩开荒十六亩，收获三千三百斤，扣除自用，上交粮食一千八百斤，现金六十元·他汇报了自己的经验，并向有关领导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去种，统一分配】不然不少社员混工，没有责任心，生产搞不好·

老农的事迹和建议使曾希圣很受启发，称这个老农是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认为「包产到户」是群众的创造！应该推广。2月14日回到合肥，立即召开会议，提出了联产到户责任制的设想，这时，「包产到户」仍被视为异端邪说，受到批判。大家感到有风险，需请示行事。会后，曾希圣亲自向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柯庆施答复说，这个办法可以试验，不要推广。

不久，柯庆施路过安徽全椒县古河镇，休息时与当地几个老农交谈，老农向他当面提出「你们最好把田包给我们种，我们保证种好」。并且质问柯：「为甚么不相信我们？」柯庆施到合肥后，把这一情况转告了曾希圣，这时柯庆施似乎并未表示异议。宿县和全椒两处老农的事迹和建议，以及柯庆施的态度，增强了曾希圣的决心和信心，亲自率人到市郊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搞试点。1959年毛泽东视察过这个生产队，有知名度，试验成功有号召力。试点结果·很受农民欢迎·试点虽然得到柯庆施的同意，但要在全省推行，还是要取得最高领导人的认可，至少是默认。

3月6日，安徽省委讨论了试点情况，决定全面试行「责任田」的办法。3月7日，曾希圣带着这个决定赴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3月15、16日，曾希圣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表态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毛泽东与曾希圣谈话时，山东省

第九章 剑定玫瑰枕义农村危局

【省委书记谭败龙在座】耳闻目睹了谈话情景，毛泽东表态后，曾希圣如释重负。他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于是省委立即向各县委第一书记发出一封信，要求全面推行责任田。：：，然而，如同1956年一样，不少人认为，这种做法与集体化方向背道而驰，趋续以「公」、「大」、「平」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有的认为，这是「单干」，会引起农村两极分化，对孤寡老弱不利，田家英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

广州会议期间，田家英将一份安徽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一封信·他看到材料里反映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兄寡妇在生产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道：

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他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平我们的话，要求给一绿牛·一帐年，八个寡妇互助，爬也爬到常东去。」看到这声·令人绞鼻。工作是我们做瓏的，在困难时候，又实行甚废包产到户，把一参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米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说不通去的。

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通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缚

田家英的担忧同毛泽东是相通的。毛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的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

11611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邱石绣 1998)

，《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买 8 秘一饵 2·

，下誉·页 1079 — 1 啖 0·，第三卷，下册《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18《毛泽东和他的秘，田家英），页 s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春（1, 58 — 1961）—为托牟运动

中南局书记陶铸见到田家英说：r 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陈云不以为然。他说：「安徽桥包产到户 1 应该允许人家试验嘛】J, , 9

会上，田家英的观点代表了主流。毛泽东让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含义已经与原来有所不同，限制了实验面。曾希圣感到很大压力，不得不于 3 月 2o 日】

打电话回去？通知暂停推行。这时，全省已有 39.2%的生产队实行了 r 责任田 J

同日，曾希圣又给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有些同志有误解。所以再作一些说明。」他说，这种办法好处是改变了计算工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缺点，堵塞了投机取巧、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的政策；提高每个社员对包产的责任心和生产积极性，从而改变了过去对包产只是生产队干部关心或包办，而社员不甚关心或完全处在被动的情况。坏处是：可能发生「各顾各」的危险，有些农活可

能会出现争先恐后的现象，自私自利思想可能发展，困难户的困难可能得不到解决等。曾希圣特别强调他们的办法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后来简称为「责任田」）与群众要求的包产到户不同。具体做法是实行「五个统一」。即：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¹²⁰曾希圣想说明这「五统一」将管住农民滑向单干，也想用这「五统一」来抵挡政治风险有表态

。目的是想说服毛泽东，希望他进一步支持。可是毛泽东没
3月28日·曾希圣回到合肥责任田。然而·农民尝到了甜头难收，没有采取甚么收的措施。

，让省委办公厅电告下面停止推行，想刹车也不行了。干部们都感到由于示范效应，由于各级干部的默

119《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90。

”⁰〈曾希圣给毛泽东的信〉（1956年3月20日），载《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页斜9—650·

第九章制定政策农村危汤

许，在夏收之后，又有不少生产队自动实行「责任田」。曾希圣和安徽省委看到，这种办法极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反而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当时，毛泽东正在作调查研究，《农业六十条》还未定型，对安徽的做法未作定论·安徽的责任田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争论越出了省界，来信来访者很多。为了说明真相，争取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安徽省委数次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写报告。4月27日，安徽省委向中央和毛泽东写出报告，汇报「包工包产责任制」的情况。陈述了这种办法在实践中显示的好处·分辩说：「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六十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
7月24日：安徽省委再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对安徽的「责任田」与包产到户、单干的区别；会不会造成两极分化；会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作了长篇解释。指出：

安徽实行的是「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没有改变生产数据的所有制」于「没有

改变产品收入的分配办法」，包产以内的产品收入仍由大队统一分配，社员仍然是按劳取酬；「没有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这不仅表现在大农活是统一做的，而且小农活也是为了完成总的包产任务而进行劳作的，所以仍然是集体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生产的集体性与劳作的个别性，在任何社会主义的生产单位中都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

由于没有改变生产数据所有制，没有改变产品的统一分配。社员所做的工分是生产队根据生产需要包给的，有一定的限度；承包的田间管理责任田·只要定产恰当，不过于偏低，超产也是有限度的。至于劳力少劳力弱的困难户，因为田闲管理工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承包的，而且又有许多关照，如帮助搞副业，包近田、好做的田，产量比一般的责任田定得低一些·因此，即使超产比劳力多劳力强的户呵能 t 少一些，但也不会少的太多。对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耗年运动

户，还会从公益金中予以补贴，从救济款中给以救济，生活是有保障的。所以‘这个办法不会造成两极分化。

关于是否会加重社员的私有心理·报告引用社员的话说，这种私心过去有，现在也还有。过去的私心是暗的，如混工、争工分，不关心农活质量，这种私心对生产危害最大；现在的私心是明的，想种好责任田，争取多得超产粮，这种私心和责任心分不开，对生产有很大好处。至于是否会引发社员对土地的私有观念，报告指出，责任田是按照每户的劳动能力来定的，不是按人分摊；每年要根据劳力情况进行调整，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社员对责任田只有操作权，没有私有权。报告结论说：「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的，只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它能够发挥对组织和推动生产的积极作用。」²

7月，毛泽东路过蚌埠，曾希圣连夜赶到蚌埠，在列车上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勉强说了一句：「你们咏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二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安徽全省上下放开了手脚，责任田迅速推广。

1961 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 90,1%。安徽的责任田产生了巨大威力，结出了丰硕之果。广大干部群单一直称颂责任田是「示范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灵丹妙药』，农民说：「实行责任田算是摸透了我们的心。」

2 责任田风波暗起

责任田，实质就是包产到户，安徽推行最积极）但并非安徽一省。湖南省采取的是「借冬闲田」的方式，省委指示各公社，允许借
121〈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载《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编》·页 652-

办绒的报告〉（1 兆 1 年 7 月 24 日）

砧 4·12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产》，下卷，页 10SD·
第九章剑定政某槐统农村危涌

一部分冬闲田给社员种植冬菜和冬种春收作物。「借给社员的冬闲田土的收入，全部归社员个人所有，不交征购，一般也不抵口粮。」同时指出：这是「为了尽可能多搞点吃的，是为了生产自救」，「决不是分田到户」。”河南省实行的也是『借地度荒』，即借给农民一部分土地，给一把铁锹，发一点种籽，让他们生产自救·借地不计微购，但要顶口粮，时间定为五年。实际上这种借地的办法都已「普遍实行开了」。，中央各调查组下农村时，几乎都发现有些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或者农民要求包产到户。

责任田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搞了责任田的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还完成了征购任务；没有搞责任田的仍在饿肚子。历来穷出了名的安徽省，搞了责任田，1961 年竟出现了有粮食外调的奇迹。阜阳、宿县两个地区取得了四十年来少有的好年成。1961 年山芋（红薯）获得大丰收，自己吃不完，还支持河南、山东和江苏的部分灾区。安徽省委专门发了文件，要各地不要拦截运往外省灾区的礼食，河南省的驻军出动各种车辆帮助灾区运送粮食，蚌埠铁路分局还增开了运粮专列。后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书记处书记金明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于 1962 年 2 月专程来到宿县，对安徽的干部，群单表示感谢。在安徽责任田起重大的作用的 1961 年，全省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

矛盾和纠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系列的危险：（1）会发生不等价换工，从而产生剥削；（2）违反简单协作优于单个的原理，从而降低生产效率；（3）田家既然对集体生产资料不关心，就不可能发展扩大再生产的能力；（4）集体观念要淡漠下去，集体组织也就会瘫痪。总起来说，这种做法发展下去，最后会引导到降低整个社会生产。

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也不赞成包产到户·1961年8月24日编印的题为〈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农村简讯》指出存在十个问题，其中特别谈到：

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到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个别地方，发现有少数富裕中农带头拉马退社，有的还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所谓「土地还家」。更值得注意的，是推行「包产到户」的作法】尽管这种地区并不占多数，表现形式和具体作法上也各有不同，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作法。有些地方，集体生产已经搞乱，干部已经躺倒。马上恢复为集体生产确有实际困难。

第九章制定政策农村危局

这段话虽然客观地反映了农村许多地方都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得到农民的拥护·但把包产到户看成是变相单干而持否定态度是明确的。不仅如此，这份材料还认为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责任制的办法也有可能走向变相单干的危险。材料中说：

在经营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如在劳动组织方面，还没有解决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正确地结合的问题。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下种以彼·收割以前的占全年农活首分之五十以上的田间农活包工到户·叫做「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伸到变相的「包产到户」。或者是部分产量包到户·视害了集体生产。在对社员的劳动报酬方面，有的地方采取了早

在经营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如在劳动组织方面，还没有解决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正确地结合的问题。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下种以彼·收割以前的占全年农活首分之五十以上的田间农活包工到户·叫做「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伸到变相的「包产到户」。或者是部分产量包到户·视害了集体生产。在对社员的劳动报酬方面，有的地方采取了早

纯的物质刺激的办法。例如规定完成每项农活给多少粮食。结果是粮食多的活，人们抢着干，少的不拎；今天有粮食，枪看出动，明天没有，枕不出动。’ ”

这种种声音，不能不影响到毛泽东的态度。毛在上半年同意曾希圣试验一下，大概也只是当作少数地区的权宜之计。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的态度至为勉强。所以，当形势稍有好转，毛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微妙变化在 1961 年秋就流露了出来。9 月

126 中央农村工作部编：《各地，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

《农业集，化，要文件汇编（19 铝—1 哭 1）》，下册，页 495

（1961 年 8 月 24 日），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春（1955—1961）—鸟托年运动

6 日，在厦山会议上，毛泽东在上述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简报上专门写了一段批语，印发与会者，并要求他们带回去，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

「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 27n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 合内容，是要提高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要使农民懂得，只有依靠集体经济的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要用合作化

以来的事实，特别是当地的典型例子，向农民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强调：「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要求

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克服农民的动摇，引导农民改变包产到户的做法。12 月 13 日】毛泽东来到江苏无锡：14、15 日听取江渭清、曾希圣汇报。

在谈到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毛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并特别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毛还用商量的口气对曾希圣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 r 责任田」办法

变过来。曾没有附和，他对毛说，群单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显然，曾没有领会毛的想法。曾希圣所以想出一个 r 责任田」的名称，就是想把它与包产到户区别开来，尤其避免有单干之嫌。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它们没有甚么不同。就在这时，为包产到户上书正名的小人物也大有人在。1961 年初冬，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接到一封信件，内容长达一万 f，每一句都在述说包

产到户的必要以及它的好处。作者请求马寅初把这封信转交给毛泽东·还在信的最后写道：「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

127 毛泽东：《对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情况简报的批语》（1961年9月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卷·页548·

128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61年11月13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页767，

129 毛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讲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1月20日）·载《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186·

第九章 制定政策 农村危局

不能停止我的战斗。有人讲我这样下去很危险，一斗、二斗把自己的脑袋斗下去。我回答说，这是你们的说法》是你们的观点方法问题。我斗得对，我很站得住脚。j 这简直就是一份为捍卫包产到户的直言书！马寅初与写信人素昧平生。但从信封上知道，这个人浙江省嵊县人，他的同乡，名叫杨木水，乡下年轻的蚕桑技术员。杨把信寄给马寅初，是觉得马老是位品学兼修的同乡，有着上达民声的热情和威望。哪裏知晓，自从毛泽东质问马寅初限制人口的理论，是马克思的还是马尔萨斯的以后·马老的处境已很艰难。然而，马寅初对这封乡亲的来信和重托极为重视。他居然专程回乡去面晤杨木水·当他把杨木水邀进自己的房间之后’，县委的官员们就惊慌不安起来，不断派出政府的代表前去敲门，希望加人进去，以此来阻止这一老一少的推心置腹。这令马老先生极为震怒，他拒绝任何人的参与，直到帮助杨木水把包产到户的「宣言书」修改一通才开门出来。分手之时两位刚刚结成忘年之交的朋友面面相觑。老的说：「正确的意见不要轻易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小的想说甚么却甚么也没有说，后来他对女友说：「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被捕判刑，坐牢流放。我们分道扬总吧·」这封包产到户「宣言书」的后果，人们不得而知。但在1962年1月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安徽的「责任田」遭到批评。此后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华东局第二书记这个虚职）。不久，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中共高层引发了重大分歧。曾一度反对包产到户的田家英，因再次去湖南调查了解民情，转而主张包产到户：但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受到了严厉批评。陈云

经过调查，就分田到户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大家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30 陈云因此当面向毛泽东陈述了分田到户的理由·毛泽东很是生气。‘31 曾在广州会议上受毛泽东表

130<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 1230·

131”82 年“月 22 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t 议上讲蛞说道，1962 年·7 月 6 日下午，毛潭东约见陈云·陈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谈话以复，毛泽东同志很生气·」《毛海东传（1949—1976）》·下册·页 1 幻。。

中华人民共卡国史·第四喜 {1958—1961) —鸟托年运动

扬的邓子恢，也曾当面向毛泽东陈述过包产到户的主张·陈云、邓子恢等领导人后来被指责：鼓吹「单干风」；毛泽东甚至当面指责刘少奇，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甚么没有顶住。现一批为责任田和包产到户辩护的不知深浅的小人物，都为此遭到灭顶之灾。决策者又一次与上亿农民的愿望相悖。

132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 1998）·，腊珍·

第十章

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秩序

一挽救粮食危机多管齐下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方针。但在 9 月以前】整个工作的重点主要还在恢复农业、调剂市场、精减职工等紧急度荒措施方面。

1 全力支持农业恢复

为促进农业的恢复，在先后制定、贯彻《农业十二条紧急指示》和《农业六十条》，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的同时，还在宏观政策上采取了向农业倾斜的具体措施·一是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1961 年粮食徽购量为 509.4 亿斤，比 1960 年的 1021 亿斤减少了 212 亿斤，占当年粮食产量的比重由上年的 35.6% 下降到 27.6%，同时调低了农业税率，从 1957 年的 11.6% 下降到 10%。二是从各方面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从上年秋开始，除从农村本身挤出劳动

力外】也从城市精简和动员了一批从农村招收的工人和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回到农村。到 1961 年春，新增农业劳动力有 2913 万人。三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61 年 1 月，平均提高幅度，粮食为 20%，油料为 13 为：生猪为 26%，家禽和蛋为 37%。‘部分地区提高烤烟、麻、茶叶等农产品价格高达 30%—50%。4 月，又决定对收购棉花、油料、烤烟、麻类、茶叶、蚕丝、糖料等主要经济作物，实行粮食奖励的政策。2 与此同时，中央还将农副产品划分为一、二、三类，实行不同的收购政策。对“类（粮、棉、油）继续实行统购统销对二类产品（猪、牛、鸡、蛋、烤烟等二十四种）实行派购，完成任务后允许自由上市；对三类产品，则允其上市出售，自由定价。’尽快恢复农业的另一个措施是，动员各行各业支持农业。主要是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如增拨钢材、木材等物资，组织手工业和部分工业企业全力修复、赶制中小农具。千方百计增加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数据的供应量，在不断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情况下，支农工业投资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由上年 16.7% 上升到 18.4%。‘

对如何增产粮食，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一直给予很大的关注。增产粮食，除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主要靠增产化肥、发展水利，改良品种、增加拖拉机等，但是许多措施不是短期所能奏效的，因此，陈云首先想到的是增加化肥的生产。1960 年 7 月上旬到 9 月上旬，陈云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看到美国的一些资料，得知美国除雨量比中国多而平均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粮食所以能增产 60%，一半靠良种、一半靠化肥。这就更坚定了陈云

〈中共中央批转粮价问题小组《关于提高粮 t 收购价格问题的报告》〉（1961 年 1 月 15 日）·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建国以来，要文戏选编》：第十四册 I 北京：中央文兽出版社·1997）·页 59—66，

〈中共中央关于收购重要经济作物 t 行榷食奖励的指示〉（196 支年 4 月 3 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戏选编》，第十四册，页归 4—237·每收购一担佛花，奖励三十五斤祖食；每收购一担花生仁，芝麻或烤烟，奖励二十斤粮 t·《t 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

和,《经济管理大事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页157·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产品收购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1961年1月15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十四册,页67—72·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哈,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页275—之兀·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中扶序

通过增产化肥来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心。一开始,他主张先推广小型合成氨厂。陈说,「三年内建设年产八百吨的小化肥厂一万个,使年产化肥达到六百四十亿斤,平均每亩施化肥五十斤。」,以每斤肥料增加四斤粮计算,就可在现有基础上增产二千四百亿斤粮食。但是,制造小型化肥厂设备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陈云同时对中型和大型的化肥厂的建设也给予关注和支持。后来经过反复研究、试验,证明小型化肥厂在技术上没有过关,而且不经济,陈云便把关注的重点转到搞年产二万五千吨或五万吨合成氨的大型化肥厂。1961年3月上旬,陈云在聘任化工部负责人汇报情况时指出:

现在看来·小型的没有搞成·只有在大型和中型之间选择。中型的虽好,但技术上也不能说过了关,大型厂是照搬外国的·技术是过关的,无非需要的设备、材料多些而已,这可以靠进口解决。我的意见是搞大的,大的和老太爷一样,稳稳当当·有把握。中型厂不能立即推广,要继续论证,辩论会要找一些「反对派」·包括化工部以外的「反对派」参加,听听反面意见。不杂反面意见,一边倒·一定要失败。现在有些同志不敢讲话,要劝导他们大胆地讲,一百句话中,只要有几句好的,就可以吸收。

又说‘

对小型和中型合成氨厂的试验还是要积极搞,主要是改进设备。有些人反对搞小型的,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偏总·不「左」则右。这是学卫上的讨论·不要戴楼子。‘

5 朱理治传达陈云对农业生产问题的指示·196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文研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研出版社,2003)·页11”。。中共中央文研室编:《陈

云年谱〔1哪—1”〕》，下卷《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咖》，页68、69；《建国以来 t 要文欢选编》，第十四册。页让 34—237·7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是上小厂还是上大厂，这本来是一个经济和技术的决策问题，然而在当时却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大跃进」提倡「大中小并举」·实际上「小」成了「大跃进」的政治标志，「小土群」·「小洋群」遍地开花。因此，对弃小上大，不少部门的负责人都有顾虑，不敢讲话。4月上旬，陈云在杭州主持中央化肥小组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座谈会。他鼓励与会人员说：「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是不被框子框住。」「你们讲话不要怕 r 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定，1962年至1964年氮肥厂应该搞大的（年产五万吨），而且集中设点。5月16日，陈云为中央化肥小组向中央起草了发展化肥工业的报告，提议进口重要材料，集中力量，每年建成年产二十至二十五万吨氮的生产能力。，8月16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这个报告，明确表示「中央同意该报告所提出的发展大型氮肥厂的方针、部署和采取的措施」。10 从此，中国的化肥工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为粮食产量的逐年增长提供了重要保证。

2 进口粮食应急度荒

增产粮食的措施，显然不能救燃眉之急。陈云提出的第一个应急之策是进口粮食。他找粮食部党组负责人陈国栋谈了这个问题。陈云指出：把粮食拿进来·远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么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

7 中央化肥小组于1960年10月成立。由国家计委领导，组长由化工部部长彩涛担任，组员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违委、一机部·三搬部·冶金部、煤炭部、电力部、农业部，外贸部的负 t 人组成·

8（陈云年翻 11905—1995）》，下卷·页73。

9 陈云：〈加速发展氮肥工业〉（1961年5月冯日），载《陈云文选》，

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 146 — 1 斜·

10《陈云传》，下册·页 125 之·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练序

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姿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氏手头的粮食究格了，可以多养雄，鸭、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别产品·增加出，。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汤劳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表危险的。“

粮食部党组经过讨论赞同陈云的意见，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将报告送交负责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经过周恩来请示毛泽东，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从 1961 年起进口粮食。

吃进口极？可是个禁区！搞了三年「大跃进」·搞了人民公社，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每年还出口牺食，现在突然要进口粮食，这在国际上会造成甚么样的影响？但是，不进口柜食，人民就要挨饿】无法波过难关。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雷任民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吃进国榷是禁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周总理和陈雯同志就是要突破这个禁区，解决国家的困难。」‘才当时在粮食部工作的杨少桥回忆说：「进口牺食这个措施是我们当时不敢设想的，当时一些人认为吃进口柜是修正主义。决定进口极食是由陈云同志提出、总理同意的，可能总理也跟主席讲了，并且很快就决定了。从决定进口到第一船进口粮运到天津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可见事情办得是很果断、很迅速的。」”

11 陈云：《做好外贸工作》（196 乱年 5 月 30 白）】载（陈云文还）·第三卷·页 157。12 访问雷任民该话记绿魄 997 年 1 月 23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 — 1976）》（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 卯 s）·页 1565·13《陈云传》1 下册，页 1 之饰。陈振声在《李先念走下庐山之后》一文中写道 t 关于进口橙食，最早是李先念 1960 年底提出并且得到批准的一条应急措施·11 月 29 日·李先念写报告给周恩来、李，春·谭震林，薄一波并毛潭东·提出先进口十二亿斤柜食或者更多一些的达议·周恩来批示：

「已告先念间志办·J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通口二十亿斤更好·」《中华儿女》·19的年第6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91）—乌托邦运对

1961年1月2日到9日，周恩来率团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恩来、陈云、叶季壮商定，进口粮食150万吨。周恩来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同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二百五十万吨了。雷任民当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不知道。他马上打电话问陈云。陈云在电话裏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粮食才能渡过难关。周恩来是了解陈云的。现在连他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的数量，足见国内粮食紧张达到甚么程度了。周恩来心裏非常着急，拿着话筒很久没有说话。访问结束后，周恩来让雷任民不回北京，直接去香港安排粮食安全转运进口的事。

为做好粮食进口的工作·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央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李先念任组长，叶季壮、陈国栋、牛佩综等协助。不到两个月，1961年2月，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陈云十分关心粮食进口，2月7日至11日，他亲自到天津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后来中央决定进口粮食不断增加，从150万吨、250万吨，到350万吨、400万吨。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粮食进口增加到500万吨·李先念在会上说：「明年还需要进口粮食350万吨到400万吨：看来后年还要进口些。」7月30日，李先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说：由于「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215万吨（四十三亿斤），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危险」。此后，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直到1965年。

进口粮食，虽然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从全局来看，又是，彻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李先念在3月的广州会议曾解释说：这两年进口粮食，主要是「缓和城乡关系，鼓舞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样做暂时减缓一些工业建设的速度·但是从长远看，把农业发展起来，将会更有利于工业建设的发展】这是符合中央r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

—————~

14 李先念的讲话，均见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橙食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 123，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建社会狭序

3 网开一面穗定市场

为了稳定和调剂市场供应，不至于出现更加严重的市场恐慌，中共中央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积极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稳定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以及对部分消费品供应实行高价政策等。

关于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1961年初，中央作出决定，当年社会集团购买力从上年八十亿左右压缩到四十至五十亿左右。。并先后暂时冻结了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事业单位的存款。1961年底，集团购买力实际压缩到约. 4 亿，比上年减少二十六亿元。。经国务院同意，1961年初，全国各大中城市逐步开始供应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2月，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又扩大到全国，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也扩大到 1.3 亿人口的所有大中小城镇。3月，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高价饭店，后来又陆续决定自行车，钟、镶、酒、茶叶、针织品等也高价出售一部分。据统计，1 弼 1 至 1962 年两年内共出售高价商品 74.5 亿，增加财政收入 38.5 亿，这为回笼货币，调剂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商品奇缺，尽管严格实行计划价格，物价仍然上涨很快，两种价格悬殊，同时出现黑市价格。要把计划市场的价格全部稳住已经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把集市价格压回去更行不通，为保障人民生活必

15 〈中共中央、国务院开于进一步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q961年 1 月 23 日）载《建国以来，要文戏选网》，第十四册·页 121 — 1 认·

16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 — 1999D·上册口匕京二中·经济出版社，19 卯），页 473·

17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页 280” 薛暮桥回忆说：「陈雾同志建织出售高价糖果、点心，开高价饭馆，复来又出售部分高档的高价工业品作为补充。并借此回龙货币，稳定物价。此复三四年间霹出售高价商品共计多回拥货币五十亿元，相当于 196: 年货币发行总额(125

亿元)的40呢,这就为物价杂定创造了条件。J邓力群等:《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91),页41.

7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春(1958—1961)——鸟托年运动

需,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稳住一头,放开一头。1961年9月,中共中央确定,稳住十八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实行定量供应。包括粮食、棉布、针棉织品1絮棉,食盐、鞋子、酱、酱油、醋,定量供应的鱼、肉、食油、食糖,大宗蔬菜、火柴、煤炭、煤油、文具、纸张,房租、水电、交通·邮电,医疗、学费等。追十八类基本生活必需品占职工生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18在坚持以计划价格为主的同时,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价格。这对保持社会稳定,共渡难关,起了重要作用。

4 精简压缩城市人口

1961年5至6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是讨论《农业六十条》,但在会上,大家反映最迫切的仍然是粮食问题·

5月31日,刘少奇讲话,一开始就说:

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它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总而言之,人人都要吃饭。城东人要吃饭,乡下人也要吃饭·读书人也要吃饭,我们这些「做官」的人也要吃饭”’,

为渡过粮食难关,周恩来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就曾提出三条措施,其中之一是「在不妨碍生产、而且有利于生产的情况下,要压缩一批城市人口回乡」。2”5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会议上向与18邨中共中央批转李先念《关于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报告》(1961年9月“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戏选编》,第十四册,页6”,

19 刘少奇:《当前趣济困.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1年5月31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页335”

20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纪绿(1961年3月21日),载《周恩来传(19”—1卯6纤·页1凶7,1588·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秩序

会者说：「1960年至1961年极食紧张，城市重于农村，这是一个特点。」农业生产不可能很快恢复，而城市每年要供应500亿斤粮食，存在一个巨大缺口。根本的方针是「从城市压人口下乡」，「三年压两千万人」

为了解决市场紧张、经济失衡的问题，陈云在1959年4月就曾提出，对1958年多招收了的一千多万工人？必须认真地加以精简，安量到农村去，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的建议。”但在当时，谁也听不进去。因此，当周恩来提出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下乡的意见后，一开始就得到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的支持。会议前夕，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就表达了这个思想，提出了粮食征购任务不变或者减少城市人口两种方案·李说：「反复考虑还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采取第二方案可能好一些。」乃5月31日，陈云在周恩来讲完话后，专门为这项牵动残千万人命运的重大建议作了详细的说明，他称这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陈云说：

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粮；一个是城市人下乡。两条路必须选择一条】没有甚么X.J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这嫌路。……应兹承认，动员城市人。下乡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人已经来了，在城市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再动员他们回去是很不容易的，搞不好要「打鸟担」。我们要承认这一困难。那末，不动员城市人“下乡行不行呢？不行。因为那样就会产生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从全局来看，这两方面的困难相比·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

21（周恩来传《1949—1976》），页

22《陈云传》！下册，页1237，

莽陈振声：〈李先念走下山之复〉

《中华儿女》，1999年第6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0—鸟托牟运动

他强调·“C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 t

的九条办法》。6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下达执行。中央要求：

「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今年争取至少减一千万人……；1962年至少减八百万人；1963年上半年扫尾。」^j「1961年至1962年度，城镇粮食销量争取压缩到480亿至490亿斤，比上年减少三十亿至四十亿斤。」^j 6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就精简的对象、被精简人员的待遇、回乡后的安置工作等作出具体规定。

其实，精减下放的措施从1960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当时认为农业大幅度减产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奇缺。因此下放的直接目的是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1960年9月到n月底，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缺新疆，西藏）[】]从各方面抽调到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共有2913万人，扣除15%的虚数，农业第一线增加的劳动力约为2500万人，农村人民公社净增的劳动力约为600万人。这一阶段的下放实际是农村内部劳动力的调整，回乡的本来就是农民。这之后，开始动员城市人口下乡。1960年11月全国计划会议确定了精减下放职工502万人的方案。并且动员干部下乡。截至1961年2月底和3月中，全国已精简下放职工410.6万人，其中下放干部101.8万人。

1961年5月会议以后，由于上下思想统一，措施得力，工作细致，到10月底，终于完成了1961年精简职工的计划。11月，陈云说：

「我们开始下决心在城市减人的时候，也很怕发生很多像自杀之类的情况，会有很多困难。结果七搞八搞，到今年10月底搞了一千万」²⁴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5月31日。载陈云：《陈言文还》第三卷，页161—165·169。

25〈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销 t 的九条办法〉
16日经中央批准。载《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十四册，页
412-1961年6月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 t 建社会秩序

人下去。^J“到1962年9月份，下放两千万的计划就基本完成了实在是一件有很大风险又很不容易的事情。

723。这

毛泽东后来说起这件事^j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

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共产党那个能办到？」”

二工业战线的退却

1 延误了的工业调整

1961年初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虽然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但不少人对经济形势还存有幻想，认为所谓调整，只是把速度压下来，不再「大干快上」就行了，不甘心后退，还有的人害怕犯右倾错误，害怕否定三面红旗】违背「以钢为纲」和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因此，会上确定的1961年计划指标仍然不低，规定：农业总产值655亿元】工业总产值2310亿元，比1960年预计完成数增长10%和8%，如果与核实的上年业绩比，则增长58%和40%。粮食、棉花也分别比上年实绩增长42%和50%。钢产量与1960年持平，为1900万吨，原煤计划产t比1960年还略高】基建投资略有减少。基本的思想是维持在1960年的水平上，颈然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实情况是，1961年第一季度，经济出现严重滑坡。在二十五种重要工业产品中，除食糖外，其余二十四种产品产量都比上年第四季度分别下降30%到40%；一般只完成计划的10%到20%。财政收入下降50%。商品奇缺、物价飞涨、货币急贬。这种形势，迫使国家计委于4月2日不得不提出对1961年的计划再作调整。将基本建设投资从167亿

师陈云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织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1月10日).载《陈云传》T册，页1243。

271962年g月9日，毛潭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t织中心小组t上的购蛭。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 58—19'1) 一乌托年运动

元压缩到129亿元，大中型项目由以刃个缩减到771个。但是：这仍然超过当时整个国家的承受力】尤其是关系全局的煤炭日产量只有四十四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30%。大批企业由于动力供应不足被迫停产。要确定工业规模、基建规模、城市规模，关键是摸清农业的家底，粮食的家底。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重新核实几年来农业的实际产量。其结果：

1958年不是公布的5000亿斤，而是4000亿斤；
1959年不是公布的5100亿斤，而是3400亿斤；
1960年不是估计的3700亿斤，而是2870亿斤；
1961年夏收又比上年减少160亿斤。”

农业的情况见了底，工业困难的症结也就基本清楚了。当国家经委副主任谷牧等将农业对工业的严重制约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周焦虑地说：「问题已经成了堆，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在5月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指出：「现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速度上，中心是三年内要放慢速度。」他认为「现在光有冷静不行，还要有勇气。」”周提出要「动大手术」，就是说下决心根据农业的承受力对工业作全面调整。

李富春也认为：「当年生产1840万吨钢是不现实的，要适当调整下来。」「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把过高的生产建设计划落到实处，国民经济全面被动的局面就不能扭转过来。」、

中共中央北京会议根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测算，决定将当年钢产量指标由1840万吨，调低到1100万吨。李富春说：「重工业这
2s 《周恩来传 1949—1976 冷，页1602·

29 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载《我们的周总理》编写组：《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1984），页13·1961年1月·中共十一届九中全会后·周恩来专门组成了研究工业问题的「十人小组」·成员包括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赵，陆、刘澜波、彭涛，陈正人·孙志远·《周恩来传（1949—1976）》·页111·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纪录（1961年5月）：载《周恩来传（1949—1976）》·页1603·

3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88·

第十节 实行全面调整 建立社会秩序

样下降，是一个惩罚，是没有按规律办事。重工业速度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长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农矛盾突出了，所以退也是应该的。你不退，有甚么办法？」³²

刘少奇以沉重的语气说，「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

两年饭还没有经验？」「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他指出：「重工业战线不能不缩短·」「有些厂要关：特别是一些『小土群』，还有一些『小洋群』要关。」「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³³

毛泽东表态说：「去年 1850 万吨钢，现在 1100 万（吨），降下来 750 万吨。我看可以。无非是外国人驾中国人不行。」³⁴ 北京会议后，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工业和城市调整问题。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为召开这次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

7 月 17 日至 8 月 12 日，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由于此前各部门、各地区都做了深入调查，在讨论 1961、1962 年两年计划控制数字时，头脑更加冷静了。认为 1961 年钢至多只能完成 850 万吨，只能完成年初计划的 45%；粮食产 t 预计 2700 亿斤，为年初计划的 66%；顶算基建投资完成七十八亿元，比 4 月调整数（129 亿）还要减少五十一亿元，为年初计划的 60%。据此，会议提出，安排两年计划，必须坚决贯彻八字方针，并以调整为中心·要坚决压缩重工业战线，降低重工业速度，加强农业、轻工业和手工业；在重工业内部，要加强采掘和采伐工业；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根据

3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显》·下卷·页 897·

33 刘少奇：〈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961 年 5 月 31 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页 335、339' 341'

34 薄一波：（若干 t 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显）·下卷·页 8 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 11, 58 — 1961) — 鸟托年运动

这些原则，提出 1962 年的计划指标：钢拟定为 1100 万吨，只及 1960 年的 40%；基建投资安排 42.3 亿元，比 1961 年还要减少 35.7 亿元。” 8 月 9 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计划会议汇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议定的精神，李富春准备了一份〈目前经济形势与调整任务〉的发言稿，上了庐山。

2 该退的坚决退下来

1961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6 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共中央第二次在庐山开会。第二次上庐山开会，自然会联想到第一

庐山会议。毛泽东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 1959 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他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逢先知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评论说：

对错误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这时并无援悔之意（「反右倾是正确的」）但对朴因反彭德怀而打断纠「左」过程·从而遭受更大的「兵产风」的攻讦，确实是痛定思痛·心情确实很不舒情。他决定二上庐山·想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是不是也包含着想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呢？」

事实也正是这样。8 月 23 日，毛在他召集中央常委和大区负责人师会上说：

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的经验·

3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36 董边、辉德山·曾自编：版社，1996》，页 82·

（1949—1979）》，上册，页 471—472；薄一波：《若干问题下卷》，页 897，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第十卷青行全面调整·建立社会秩序

「未有先学养子而复嫁者也」·说没经验，七烟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与州会议搞了错案·分么批开，一批开一天·我打你通，略知梗概·不甚了了，经通六个月，到庐山会议”会议顶住了彭德怀的那股风，是对的，不顶不行。但也犯了错误，不应一立传达下去）……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奔，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⁷

毛泽东自称，对工业「不甚了了」·因此这次庐山会议的主要议程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持。会议的议题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关于《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说明，陆定一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说明。讨论的重点，显然是工业的调整

问题。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输训干部的决定》。庐山会议最重要的是作出了工业要「坚决退下来」的决策。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大声疾呼：「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那末，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J3a

37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和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讲话传达记条《1961年，月23日），载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戏出版社，2003）·页1169，括号内一段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83—84。
38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1961年9月18日）。载《党的文献》·第十四期，页6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工业调整首先是降低指标，关停一批企业。《指示》要求：「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根据国家计委的计算，1961至1962年两年全国共生产煤炭五亿吨以上，钢一千五百万吨以上。这就是说，1961到1962两年钢产量比1960年一年还少三百多万吨。当然调整不是一味地退，而是有退有进。《指示》要求：「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在必须前进和可能前进的地方，必须积极前进。」所谓「后退」，不单纯是降低指标，还意味着一大批工业企业的「下马」。《指示》规定，工业管理中要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要求各行各业都必须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保重点企业，对于没有原材料资源，原材料和燃料消耗过多、质量低、成本高、长期亏本的企业】或停产，或关闭。为了缓解人民日常生活的困难，《指示》确定在近两三年内，尽一切可能增加日用品的生产。《指示》附录了四十种人民急需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的目录。包括火柴，锅、碗、盆、菜刀、食盐、布鞋、草帽、肥皂、煤油灯、手电筒乃至小学生用的铅笔，等

等。工业调整再一个关键是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

会议期间，毛泽东听了关于会议的情况汇报，表示赞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意见。毛没有在全体会议上讲话，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说：「听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心情很舒畅，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有辩论，你辩过来，我辩过去，需要。」但在同时，毛却认为·有了《农业六十条》和这次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整个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形势将「会逐步好转」。他锐：

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努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到极点·天下大私，要转向治了。困鸡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咸了订子·有了经验·这乏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秩序

他还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他甚至如此轻描淡写地谈到这几年的问题。他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甚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毛泽束的这个话虽然有藐视困难的气度，有打气的成份，但也说明他对困难、对错误的认识似乎已经到了极点，即他所说的退到谷底了，不能再退了。正是在这种轻松的心情中，毛泽东有间游览了庐山含鄱口、仙人洞等名胜。9月9日，毛为夫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写了一首七绝：

慕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险风光在险峰。

这首极富哲理的抒情诗，既可理解它暗含着战争年代历尽艰险，最终胜券在握的心境；也可看出毛此时对国内困难和前景，以及国际上与「帝、修、反」斗争的心态。

9月16日，毛泽东将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诗中的四句】书赠中央常委：「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毛泽东写道：「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

毛渴望摆脱一年多来的抑郁沉重的心情，重新回到亢奋的状态·去迎接新的挑战。这就潜伏看一种危机。毛的认识既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

距，也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的认识有很大差距。当时，农村政策虽然制定，但落实起来还需要时间，农村形势不

39 仙人洞·在庐山佛手岩下，牯岭之西：高约两丈·深广各三四丈，传说为唐朝仙人吕洞宾所居，因而得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专（1, , 。一 19 釭）—鸟托年运动

可能立即好转。城市的问题刚刚暴露，还没有采取切实行动。不是已退到谷底，而是还没有退。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心态，田家英当时就感到不安了。逢先知回忆说：俗

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形. 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锅底」。田认为·在农业方面可以这样说·在工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业生产仍在继续下峰·他半夜农睡不着觉，便到梅行（当时参加起草《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工业七十条》）的队室去讨论这个问题·直至天亮。钩

三. 各项政策条例的制订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搞所有制过度和管理体制下放；提倡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使原有的经济秩序和规章制度全被打乱，带来严重后果。1961 年，在《农业六十条（草案）》下发后，中共中央开始调整管理体制，先后出台了商业、手工业·工业、科学、教育、文艺等各项条例，以重建秩序，把各条战线拖出「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局面。

1' 流通体制的松动

「大跃进」当中，农村集市贸易被取缔，城市个体工商业被扫光，集体性质的商业纷纷向全民过渡。1957 年底，全国还有小商小贩三百五十多万人《其中合作商店一百一十多万，合作小组一百五十多万，个体商贩七十多万》，到 1960 年底，留在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 40 《毛泽东和他的秘·田家英》，页 s3·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扶序

小商小贩只留下九十多万，而且大部分实行了与国营商业统一核算，或按国营商业的办法进行管理。由于农民的自留地没有了，社员的家庭副业停止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升级并厂转产了，国家领导下的有限的自由市场即使不被取缔，也基本上自行关闭了。全国真正形成了

一个国营商业的一统天下。

1961年4、5月间，胡耀邦带领调查组在辽宁省海城县农村调查，发现农村商业在体制和工作上都存在「统得太死」的问题。他在《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的调查报告中说：1958年公社化以后，农村的商品交换就由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集市贸易三条渠道变成一条渠道，所有购销业务统由国营商业独家包揽经营。（供销社合到国营，农村集市被取消）。这就使商品生产者的集体和个人之间，无法直接交换自己的产品，不利于生产和消费；国营商业部门的统一牌价，不尽合理，又影响了社员个人和集体物资的出售，造成人为的物资紧张；基层商业部门面向群众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作，也做得远不及以前。胡耀邦说：

近年我们统得太多，管得太死。农民批评说：近年农村经济害了一种「死症」。经济工作最忌死，表们却犯了这个大忌。特别是异年以来，提倡大购大销，甚么东西都统起来，管起来，统一计划，统一收购，统一分配。甚至连生猪肉也要实行一把刀政策，表民连下水都吃不到。白淤我们把农村原有的购销渠道堵死，把一切商品价格管死，破坏了商品生产规律，结果是，一购甚么，甚废甚少，少了甚庆，沈统甚庆，三类物资提成二类物资，表复又变成了「奇缺物资」。

胡耀邦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建议：「要改变农村商业体制，恢复供销社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政策调整的范围应包括：一、适当调整转引自阳戏珍：〈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1961年11月，日），载杨戏珍：《杨戏珍文集》·第二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1卷（1958—1961）——鸟托邦运动
整农副产品的购销比例，以奖励生产。二、对农村经济工作，不可统得太多，管得太死。三、调整农副产品的价格。四、减少商品的迂回运输。毛泽东看了这个材料，5月29日指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并读扬这个文件很好，可发到县、社两级讨论。^{4z}

胡耀邦报告中反映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凡是到农村去调查研究的领导人都有察觉。因此，调整商业体制，党内形成共识的阻力不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6月，商业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联

合召开了十七个省、市商业厅（局）和工商局代表参加的座谈会，讨论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步骤、方法和有关的具体政策问题，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重新明确：

现阶段我国的商品流通应该有三条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领导力量。供销合作社商业是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有力助手。农村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农村集市贸易是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自由市场。‘，

于是，原有三条流通渠道逐渐恢复：

供销合作社。1961年年底，全国恢复建立了基层供销社31以刃多个，县供销社1300多个，省（市）级供销社十八个。1962年7月1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商业部分开办公。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分工基本恢复到1957年以前的状况。与此同时，通过供销社，逐渐恢复了物资交流会、庙会、合作货栈，骡马大店等货栈贸易。

42 毛泽东：（转发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的调查材料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43《建国以来主要文选编》，第十四册。页4刃一454，

（1961年，月之，日），载《建19饰》，页607—508·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秩序

合作商店与合作小组。据1962年9月统计，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退出的小商小贩共八十八万人。这些退出的小商小贩又重新组织起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主要经营一些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小饮食、小土产、小百货、副食、蔬菜、日用杂品，以及从事修理，服务等业务。1964年底，全国共有小商小贩247万人，其中由国营商业归口管理的134万人，由供销合作社归口管理的113万人，不合作商店160多万人；合作小组二十多万人；个体商贩五十多万人。44重新开放集市贸易。1961年11月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下达后，农村集市开始得到恢复】到1961年底。全国开放农村集市四万一千多个。相当于公社化以前的99%。在农村集市开放的同时，大、中城市也出现了

一些集市贸易市场和自发的商贩市场。

多种流通渠道和农村集市的恢复·久违了的走街串乡、送货上门的货郎担又出现在老百姓生活裏，使城乡市场逐步复苏，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这对于 60 年代初走出灾荒，尤其是恢复农村和农民的元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2 手工业的恢复

1958 年急于消灭私有制残余，不仅表现在商业领域，同时表现在手工业领域。一是，除少数不适合组织集体生产的某些特种手工业品允许继续进行个体生产外，个体手工业户一律加入手工业合作社；二是对个体劳动收入加以限制；三是把集体手工业并入或转为国营工业·到 1958 年 8 月以后，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潮影繪下，手工业合作社全面展开了「转厂过渡」。到 1959 年，全国十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的五百多万社员中，「转厂过渡」的占总人数的 88.7%，

44 郭今吾主编：《t 代中国商业》】上册口匕京：中国社 t 科学出版社，198 勃页 93·

45 《当代中国商业》，上册·页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胃专《19 巽一” 61) —鸟托年运动

其中过渡为地方国营工厂的占 37.8%，转为合作工厂的占 13.6%，还有一部分转为人民公社。

‘在 r 转厂过渡」的同时，又刮起了 r 转产风 j，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各地小商品生产的行业纷纷改行转业，劳动力，技工和机具设备被抽走。不少农村的农具修配厂、修配组集中合并为较大的机械制造厂。北京有名的王麻子剪刀厂，从 1958 年 9 月起，三百多人转为生产炼钢用具和翻砂工具，生产剪刀的人只剩下二十人。刀剪产量从月产三万五千把，降到三千把，剪子从原有二百多种减少到十一种，刀子从原有三百七十种减少到只剩七种。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全国手工业生产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由于急于过渡：急于改组和转业，原有的供销渠道搞乱了，手工业者的积极性严重受到挫伤，加上手工业所需原材料供应困难‘，造成日用工业品严重减产，全国各地普还出现手工业品供应十分紧张的局面。到 1961

年初，连老百姓每日生活不可缺的一些必需品和用具，如食盐、火柴、锅、碗、盆、勺、筷、缝衣针、奶嘴子、卫生纸、木盆、菜篮，竹状、木桶、拖把、鞋钉、顶针之类都买不到了。

1961年1月7日，中共中央专门批转轻工业部党组的报告，指示全国「紧急安排日用小商品的生产」。指示说：

最近时期许多地方日用工业品产量下降，供应紧张，……主要是领导上没有抓紧安排，它同农业的丰收并没有不可分的联系。只要好地安排，狠狠地抓紧，就完全有可能迅速地增加上去。……中央要求各级党委以高度紧张人民生活的态度，满腔热情地把这件事办好，一定要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显著的成绩来。’’

事实上，日用小商品的奇缺，虽然与农业减产没有多少关系，但也不是工作疏忽问题，而是日用品在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都被管死的

46〈中共中央批转轻工业部党组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1961年1月7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页11。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 建立社会秩序

必然结果。在1961年上半年全党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许多领导人都发觉了这个问题，有些地方还进行了恢复手工业合作社的试点。5月8日，胡乔木在向毛泽东报告的湖南调查中说：

现有手工业工人劳动积极性极低。现行办法几乎到了无法继续下去的程度。同时，只成立供销社不成立手工业社，农村产供销的许多问题也不好解决。为了调动手工业工人的积极性，恢复市场供应，中南局和省委都决定，’恢复单独核算的既有集中生产也有分散生产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当社队经营农村副业不在内），同时着手解决与此有碍的一系列问题。’’

5月9日，朱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指出，手工业在1958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存在不少问题。48由于手工业与城乡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自然成了5至6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议题之一，并拟定了一个《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重申：

我国的手工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在这三种所有制当中·集体所有制是主要的·它针对大多数手工业来说，最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手工业工人的觉悟程度。全民所有制只能是部分的、过多地过早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对生产反而不利。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见，47〈胡乔木给毛泽东主席的信〉（1961年5月8日）第十四册，页322·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4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页436

，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页47a·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0）——“大跃进”运动

《手工业三十五条》于6月19日与《商业四十条》一同下发执行，要求根据上述原则对各地手工业所有制进行调整。已经转为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的，凡是不利于调动手工业工人积极性，不利于恢复和增加产品品种，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不便利群众生活的，都必须坚决采取适当步骤，改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合作小组；农村人民公社兴办的工业，如农业机械修配、农副产品加工、矿产开采和建筑材料工业等，凡不适宜于集中生产，不改变所有制就办不好的，应该改为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小组】或者改为生产大队、生产队手工业生产小组。某些适宜于单独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应该允许他们在手工业合作组织或社队领导下进行独立劳动，自产自销，收入归己；应当积极发展城乡家庭手工业，允许其自产自销，收入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

在调整所有制的同时，还要求调整组织规模，组织原有手工业者归队。手工业生产可以集中，可以分散；可以固定设点，可以流动服务；可以在当地串街串乡；可以到外地串街串乡·特别是生产传统名牌手工业产品的企业和技术人员，已经改行转业的，都必须坚决归队，原来的手工业修理服务人员也必须归队。提倡师傅带徒弟，允许个体手工业者收徒授艺·

《手工业三十五条》还对手工业者的收入·产销关系以及民主管理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允许其非计划产品原则上由企业自销；提倡手

工业与基层商店直接挂钩，采取前门设店·后门设厂的传统经营方式；手工业产品实行「优质优价 1 分等论价」，不搞统一价格。手工业政策的调整，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百姓急需的日用品生产和服务的恢复和发展。城镇个体劳动者也由 1958 年的 106 万人增加到 1965 年的 171 万人。

3 工业体制的调整

在所有这些条例中，《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是一个更重要的牵动全局的文件。它所牵涉的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也是「大跃进」中遭受破坏严重的领域之一。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 t 建社会扶序

建国之初中国管理工业企业，一切照搬苏联的。虽然存有弊端，毕竟有章可循。1958 年「大跃进」，在「解放思想」、「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完全摒弃原有的规章制度斗批判所谓「专家治厂」J、「白专道路」；提倡「共产主义风格」，批判按劳分配的等级工资和 r 计件工资制」于反对综合平衡等等。结果造成一片混乱。1960 年底和 1961 年初，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和响应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中央和国家机关分别组成调查组到各大厂矿进行调查·，”1961 年 `5 月 3 日到 6 日，国家经委邀集各中央局经委主任和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江苏等十一个省市主管工业的党委书记，由薄一波主持在北京举行座谈会· 5 月底 6 月初，各方调查材料和座谈会材料陆续报到中央。这些材料显示】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基本建设工程大批被迫停工，经济核算制度废弛，设备损坏严重、产质量 t 降低，成本上升，事故很多，人心不定】企业管理混乱，生产指挥系统有不少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以厂长为首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大多解体，第一书记说了算，外行当家】纪律废弛。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中央采取重大步骤，迅速扭转困境。

5 月 20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座谈会的情况之后，讨论到搞工业文件时，薄一波表示：现在光发个原则性的指示，一是难写，二是发了也不解决问题。邓小平当即表示；「写各项政策，如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等。」5 ‘这次议论没有形成结论性意见。6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全体

50 据薄一波回忆：1960 年底，李富春组织国家计委·经委，一机部，中央高级党校·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市委等单位的成员，成立调查组到北京第一机械厂·就工业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调查·1961 年 3 月·国家计委、经委又组数人员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城子煤矿，华北无线电厂，天津永利久大化工厂、太原钢铁厂、济南钢铁厂等单位做调查·李，春还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北京市西城区调查城市工作问题。中央政治研究室也对天津第一钢厂和天津机械厂做了调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95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9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0）——“大跃进”运动

会上，谈到要用《农业六十条》教育干部时，指出：「城市也要搞几十条。」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实际上成了制定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的缘起。

6 月 17 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敲定此事。确定由薄一波主持起草工业条例。随后，李富春、薄一波、李雪峰等分头到华北、东北重点企业调查。组织起草班子，拟出初稿。华北的石钢、太钢、天津钢厂由李富春和李雪峰负责；东北的鞍钢、本溪钢厂由薄一波负责。邓小平说：工业比农业复杂得多，究竟如何搞现在心里没底。只有结合调查研究，条例才能搞得出来，可从各部抽人·必要时找少数大厂的人一块来参加。邓明确提出企业要整顿，下到工厂后，工厂整风不要停；条例搞出来以后，根据条例再整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后！薄一波组成调查组到沈阳第一机械厂、重型机械厂等单位进行调查，边调查边起草条例。参加起草条例的主要执笔人有马洪，梅行、廖季立、董峰、张沛等。7 月初分赴哈尔滨、长春征求意见，形成了初稿！题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共十五章，八十条。7 月 16 日，报送中央书记处。

7 月 29 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的汇报和说明。与会者认为，搞工业管理条例，现在还搞不出来，还是搞企业管理条例，主要写企业内部问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建议在条例中加一段序言。邓小平赞成·修改后的稿子，题目定为《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简化了篇幅，共十章，六十五条，

8月10日送中央书记处。

8月11日到14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连续举行了四天会议，对条例稿逐条讨论，边议边改，最后定为十章，七十条。8月15日，由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四人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一封信，附上条例草案稿：呈请审查，下发试行】征求意见。最后提交8月23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取得六个大区到会人员的赞同。毛泽东也认为「很好」。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将题目中的「不管理」二字圈去，最后定名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 t 建社会秩序

《工业七十条》针对「大跃进」造成的混乱，着重规定了以下内容，国家与企业之间实行「五定」、「五保」。”明确国家赋予企业的基本生产条件；企业应保证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重申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限制企业党组织对生产行政工作的过多干预，禁止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引申到车间·工段和科室。建立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严格的责任制。

确定企业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明确「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指出「不能把钻研技术，钻研业务看作是『走白专道路』」

规定企业必须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重申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肯定计时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度的合法性。

这样，就在指令性计划的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了下来。但是，贯彻执行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碰到的根本障碍·是条例实际上否定了「大跃进」那一套，因而为企业党委负责人所反对。还在讨论初稿时，就有人提出：对「大跃进」的正面经验总结得不够，肯定得太少；党的领导问题不突出；大搞群众运动问题不突出；对政治是统帅、是灵魂阐述得不够彻底；对专业管理写得多，控制得严，而对鼓励企业千方百计地发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写得不够；只提到尊重科学，没有提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在企业领导制度方面，对党委领导写得不鲜明，偏重于厂长负责；写按劳分配，给钱

方面很突出，而对政治思想方面则不突出；等等。后来，在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把「大跃进」的成就和「经验」写了进去。肯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

兑「五定」是：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定人员，组织；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五保」是：企业对国家保证产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卅专（1958—1961）—乌托邦运动

方针，吸纳了「大跃进」时期的许多流行口号，并肯定工业企业在「大跃进」中取得四个方面的伟大成绩：企业的生产有了飞速发展，企业的技术力量有了迅速增加，企业管理工作有了许多的创造和新的经验，职工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如此，《工业七十条》才得以通过。

《条例》下达以后，受到广大干部和职工的拥护，但党委书记们却发牢骚说：「今后党委没事干了」，「党委书记不好当了」。甚至指责：起草人「好像刚从外国回来，不懂中国情况，没有经历过「大跃进」，总想恢复过去的一套老办法」

薄一波感叹说：「人的思想一下子就可以搞乱，端正过来却要花才良大的气力。」”

由于工业调整与企业整顿双管齐下·使一些在「大跃进」中受到破坏的国营工业企业较快地恢复了元气，促进了生产的稳步增长，产品质量大幅提高，产品品种显著增加。据有关部门统计，仅1961和1962两年裹，钢就增加了大约一百个新品种，机械产品增加了一千五百个新品种，多项产品质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反映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状况的经济技术指标，也接近或超过了过去的水平。

4 整顿文教工作秩序

教育工作的调整，是最早提上日程的，1961年初就已经开始。在1958年「大跃进」中，全国各大中学校一哄而起，出现了大办工厂、农场；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大办学校的热潮。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99所发展到1958年的791所】在校学生由1957年的44.1万人，增加到六十六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含中师）由1957年的1320所，

增加到 3113 所，在校学生由 1957 年的 77,8 万人增加到 147 万人；原来没有的农、职业中学，一下子发展到两万多所，在校学生达 200 万人；成 5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974 ·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 建立社会秩序

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由 1957 年的 330 万多人增加到 564 万多人；成人小学由 1957 年 626 万多人增加到 2600 万多人。1960 年，高等学校更猛增到 1289 所，在校学生达到 221.6 万人。。‘教育的这种数量扩张型发展，带来的一个成就是农村文盲、半文盲人数大量减少。但教育质量严重下降，过度膨胀的教育规模大大超过了经济承受力。根据毛泽东关于教育要革命，教育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精神，全国掀起了师生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半工半读的群众运动。这种片面强调生产劳动而否定和贬低教师、书本和课堂教学的作用，导致学生参加劳动和政治活动过多，打乱了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

1961 年初，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从调查研究入手，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党组开始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简称《中学五十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简称《小学四十条》）。教育部长杨秀峰负责《条例》起草的全面工作，副部长蒋南翔以主要的精力从事《高教六十条》的草拟，以及《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的定稿工作。

在《高教六十条》草案报中共中央后，1961 年 7 月底，邓小平在北戴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了蒋南翔关于条例草案的说明，并进行了讨论，决定由陆定一负责成立一个小组进行修改。8 月 5 日，邓小平和有关负责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常委，对条例起草工作的有关问题进行说明。8 月 22 日至 9 月 10 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进行了讨论，9 月 14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条例，并得到毛泽东的核准。毛泽东说：「总算有自己的东西。」” 1961 年 9 月 15 日下达执行。

54 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上册目 1 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 戏、页 71、73, 55 《当代中. 教育》·上册，页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鸟札年运动

关于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高教六十条》在重申「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强调：「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该安排得当，以利教学。肯是「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课堂讲授是教学的基本形式」】「必须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明确在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学校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做好总务后勤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正常进行，改进共产党的领导作风，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教学与劳动的比重上，强调高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平均每学年应有八个月以上用于教学，每年参加生产劳动，学生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教师半个月到一个月。四十五岁以上男教师，四十岁以上女教师不参加生产劳动等等。这样，就把学生从生产劳动工地带回课堂，重新回到系统化的文化学习。

在贯彻《高教六十条》的同时，教育规模作了较大的压缩，1961 年确定现有学校中保留高校 774 所，中专 1670 所。其余学校均予裁并。后来事实上裁并了更多高校，到 1963 年底：全国普通高校由 1960 年的 1289 所压缩为 407 所，在校学生由 96.2 万人减少为七十五万人；中等专业学校由 1960 年的 6225 所压缩为 1355 所，在校学生由 221.6 万人减少为 452 万人；普通中学由 1958 年 2.8 万多所压缩为 1.9 万多所，在校学生由 1.675 万人减少为 1.1 万人。“

《高教六十条》的制定，以及翌年 4 月出台的《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对于克服 1958 年「大跃进」和所谓「教育革命」对教育事业和学校秩序造成的混乱起了积极作用。但就毛泽东而言，并没

有就此放弃他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和主张。

56 《当代中国教育》，上册·页 76·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 t 建社会秩序

5 科技政策的调整

科技工作同样受到「大跃进」的严重影赛，在 r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理论联紧实际 J、「以任务带科研」等口号下，基础理论研究实际被抛在了一边；在政治挂帅的大旗下，科研时间也得不到基本的保证。总之，「破除迷信」. 变成破除科学和常识，「尊重实践」变成崇尚无知，「解放思想」变成唯意志论。

1960 年冬，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就组织中国科学院党组、国家科委党组、国防科委党组，中宣部的一批成员着手进行科技工作的调查研究，起草条例。具体起草工作由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秘书长杜润生牵头，参加的有于光远、龚育之、汪志华、吴明瑜、朱琴珊。在上海、北京召开座谈会，请科学家各抒己见，1961 年 4 月，聂荣臻把张劲夫、杜润生和国家科委的韩光、刘西尧，国防科委的安束、路扬等召到杭州，听取张劲夫关于科学条例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一连开了十多天会。聂荣臻认为：「十四条很好！不仅科学院，还要扩大，全国都要这样搞。」这个条例不但是解决科学界的问题，也影响其它部门。聂决定以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两家的名义共同搞一个科学条例。杭州会议后，又在北京、东北两个地区召开党员所长和党内科学家会议，在一些部属研究机构进行试点，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党组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前后易稿几十次，最后形成《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习惯称为《科学十四条》。由聂荣臻签署上报中央。《科学十四条》是要公开发表的，有一些问题不便讲透。为了在党内统一思想，聂荣臻指示再以他的名义给中央写一个「请示报告」，6 月 20 日与《科学十四条》一并上报中央，

《科学十四条》明确了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基础理论研究的地位，科研工作的基本保证等问题。

《条例》规定：「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研究成

果，并且在工作中培养出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简单地说，就是出成果，出人才。据此提出要做到「五定」：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制度、定设备。使研究工作相对稳定下来，以保障研究工作逐步走向深入，质量不断提高，人才迅速成长·

《条例》强调指出：对理论联紧实际的原则，要有全面、长远的观点，不要作狭隘、城视的了解·科研项目，除直接为近期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服务的应大力发展以外，间接的或在远期才能发生作用的研究工作·也必须作出安排·F为了保证许多尖端技术真正过关，为了提高与发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的群众创造，都必须积极开展相应的理论研究。为了提高整个科学水平，基本理论的研究也必须加强。必须重视理论研究，把它放在重要的位量上，并且作出具体的安排。」明确科研机构的分工：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主要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关键性的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主要是解决本部门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运用和发展新技术，·以及进行必要的理论研究工作。

《条例》要求「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明确规定：「平均每周不得少于五个工作日·」重申；r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政策。」指出：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必须鼓励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对于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不戴帽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要允许自由地发表意见、坚持意见、保留意见。允许批评，同时允许反批评。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辨明是非。还明确阐明：自然科学技术，同社会政治学说不同，同样一种自然科学技术】可以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服务。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不同主张，贴上甚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

关于科研机构的领导制度，《条例》规定：党委是研究所的领导核心，

它的主要任务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研究、决定所内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对于经常性的行政领导和业务组织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挨序

工作，应当在所长领导下由各级行政业务组织和行政负责人来处理。

「使担任学术领导责任的科学家得以专心领导学术工作。」”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科学十四条》和以聂荣臻名义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两个文件在会上引起了与会者共鸣。

第一个发言的是李富春，他说：「文件我看很好，文件中所提问题和情况带有普遍性。不仅科学研究中是这样，文教、高等院校里边也都存在这些情况，工业上也是如此。我建议可发给工业系统参考。对人的政策，主要是个红与专的问题，这方面有偏向，空洞地要求红。」刘少奇插话说：「空谈革命是带引号的革命。」

李富春接苍说：「工业方面，在技术政策上自由争论没有了，技术责任制也松弛了。工厂应该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些工厂实质上形成了书记责任制了。我看这个文件应发到工厂。」邓小平接着发言，他说：「我看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只提一点意见，党的领导方法，内容可以充实。党怎样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科学家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让我看，二十四小时都有事情做，怎么能够说这样一来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好做了呢！计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

周恩来提议】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他很赞成聂荣臻、邓小平关于为科学家服务的说法：他说，「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社会主义。」

彭真在讨论中对在科研机构轻率、频繁的政治排队提出了批评。

57〈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I草案〉(1961年6月)·载(建国以来

贡要文戏选纤》，第十四册，页 547、548, 551、555 • 561 — 562, 568 — 56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四卷（1 站 g — 196n— 乌托邦运动

最后刘少奇发言。他说：「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 • 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我们上台了，问题是指挥方法没有掌握客观规律，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既然有偏向，就要纠偏。正确的当然不纠，有偏就纠，无偏不纠。」父这部被邓小平称为的「科学宪法」，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会后送毛泽东批准，7 月 19 日以中央名义正式下发，同时批发的还有聂荣臻的「请示报告」

《科学十四条》制定和试行，对于把科研人员从频繁的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安心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 • 起了很好的作用 •

聂荣臻回忆说：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至今我还认为：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实干，『两弹』也就不会那么快地上天 • 我们常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三十年后，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谈话中【还深情地回忆说：r 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

6’ 重申 r 双百」方针

在贯彻调整方针中，文艺是周恩来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早在 19”年 5 月 3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约见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58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59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60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21 日〉 • 载（邓小平文选》

• 下册拙匕京：解放军出版社 • 1984），页 825 — 827 • ， 下册：页 834 •

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年1月18日—2月1993》，页378。

第十章 行全面调整 建社会秩序 7 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就对「大跃进」中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偏向进行了批评。然而，在当时的气氛下，周恩来的这个鹅话没有得到响应。1， 1961年11月14日，他在中央文教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又提出文艺要纠「左」，他对自己1959年的讲话没人理睬，表示了不高兴。说：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为甚么「打入玲宫」？他提出要制定文艺条例。进入1961年，中央不少领导人如邓' 平、彭真、陈云、陈毅等都对繁荣文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周恩来还约请部分在京艺术家在紫光阁座谈，提出发扬政治民主、艺术民主，要纠正极左思潮，鼓励文艺工作者大胆创作，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1961年初，周扬、林默涵等人决定参照由聂荣臻主持制定《科研十四条》的办法，起草一个文艺条例。随后，在北京分别召开不同门类领导、专家调查会，并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组织起草文件并筹备召开全国文艺工作会议。起草工作由周扬、林默涵领导，林具体负责，参加起草工作的有吕骥、蔡若虹、张光年、袁水拍、郭小川、伊兵、黎之等。初稿写出，经周扬、林默涵反复修改、打印征求意见。周扬主持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多次讨论。到 的副部长除周、林二位外，还有张子意、许立群、姚漆等。在中宣部决策会议上思想之活跃，令第一次列席这种会议的黎之「感到吃惊」。他回忆说，会上「讲了不少『大跃进』中极「左」思潮和文教战线的极端的、可笑的事例」。议论最多的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大都不赞成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许立群说：「为政治服务，这个提法不妥当。」林默涵插话说：「文艺为生产服务就更不妥当。」周扬说：「不提这个口号影响太大，还是沿用过去的提法为好。『文以载道』么。」⁶¹ 自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文艺服从于政治」⁶²的结论以后，这就成了一个高度

⁶¹ 黎之：〈周阳兴「文艺十条」·「文艺八条」〉，较王蒙，袁鹰主编：《慷周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曳出版社，1998），页288—289。

61 毛潭东：《在延安文·座谈 t 上的讲话》勺哑年：月 23 日 j，较《毛·东选集》。第三卷口匕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 86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春) 1958 — 1961) — 乌托年运动敏感的禁压。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界的风风雨雨，追根溯源，盖出于此。许立群这时提出不再使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的确是触到了文艺领域存在的所有问题的症结。但在当时，这个观点不可能为多数人接受。

6 月 1 日至 28 日，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6 月 8 日至 7 月 2 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主题都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检查总结几年来，主要是检查「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文艺政策，贯彻「双百方针」，繁荣文艺创作。两个会议地点都在北京市新侨饭店，故称「新侨会议」

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分两阶段进行。参加第一阶段会议的是各省市宣传部主管文艺的负责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谈文艺领导和讨论《文艺十条》。会议开始时周扬讲话，针对「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指出，「大跃进」以来不少作品宣传了「共产风」，是急就章。真正好的作品很少；「双百方针」我看基本上没有很好执行。在谈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时，周说：「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盲必称马列，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在谈到历次思想批判运动时，周扬说：「右派探渊、反党探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深渊太多了，一下跌入，万劫不复·以后少搞探渊！JF 要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

建国以后文化领域历次政治运动，周扬都是忠实的执行者。但是，「大跃进 1 中的种种做法」周扬并非都赞同。特别是经过 1957 年的反右派和 1959 年的反右倾，他也似乎有一定的深切感受·然而，周 63 黎之：〈周场具「文·十条 j「文艺八条」〉，载《忆周场》，页 29t·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扶序

扬的这个讲话在会上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有的甚至对周扬的讲话有不少意见。参加会议的黎之回忆说：

分组讨论中，各省市宣传部负责人对会议精神看法不尽一致·有不少人是赞成的·也有人想不通。他们认为这几年上面的精神变化太快，一会兑反右·一会兑纠「左」，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借篡层拎部的话说：「左」一个坑（谐倾字音），右一个坑·一不小喻鱿拌到坑表去了。一年以前刚刚在这东开过「反右倾」「反修」的文化工作会议·今天又来纠「左」，担心「左」未纠，又反右。…，二

对《十嫌》的讨论也不很热烈。有人认为·即使订了很好的样文，中央精神一变也不管用。

周扬很看急，多次动员大家解放思想··一会议依然·未活跃起来一周场也很恼火。”

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情况才有了变化。6月8日以后，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与故事片创作会议同时召开。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就指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要发扬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有气可以出气。文化部的两位副部长周扬、夏衍在会上作了动员式的讲话。尤其是夏衍的讲话。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不要总念一个经】总守一条道，而要『离经叛道』。」他说：「毛主席提的六条标准，是有一个中间地带的。有的作品既无利也不是破坏，都应该允许，这就是无害。」夏衍关于「离经叛道」的说法一时成为引起森动的名言。会议气氛逐渐活跃起来。

64 黎之：《周扬与「文·十条」「文艺，k条」），载《忆周扬》·页291—292·

7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 铝一 1961}—鸟托年运动

6月19日，周恩来到会讲话。根据前两天文艺工作者们反映的问题，“周恩来讲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领导、话剧等文艺界关心的七大问题。他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统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被除迷信·敢想取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

敢做，· · · 一只许一人言 · 不许众人言 · 支不成 r 一言堂 J 庆 P 「一言堂」从何而来才是和领导有关的 · 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茶明，今天我的讲话元许大家思考、讨

秘 19 醒年 6 月坏日晚上 · 周恩来谁也没有通知 1 来到新侨饭店 · 碰巧遇上赵丹 · 又由赵丹引领来看望因病卧状的黄宗英 · 赵丹一路叹着把周恩来带到黄宗英的房间：「宗英、快，快 I 总理来啦！总理来看你、t 大家啦！么周恩来笑盈盈进得屋来、端详若黄宗英那身打扮，觉得奇怪：素布衫裤、家制布鞋，有点乡下妇女的味道。他笑着问：「怎庆？连花衣驳也不敢穿啦？1 黄宗英念忙解释：「常下乡 · ” 一」周恩来读许地说了一句：「好 · J 随后又规了一句 · 「改造，也不在外表」 · 说括问，文化部副部畏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陈鲤庭和疣浮等人闻风而至 · 小房内气氛融洽】笑声朗朗 · 周恩来衢着黄宗英摇摇头说：「更瘦啦！甚么病？让，生仔细查查。」黄宗英赶紧解释：r 总理，我没甚庆大病，一多半是念出来的。老完不成任务，白吃人民的饭。」黄宗英长期当演员 · 19 铃年，她被任命为上海电影裂片厂的专职绸剧。黄宗英当了一年的编剧，剧本绝少成活，一急之下，竟然病倒了 · 黄宗英向周恩来诉说看一个「五个书记挂帅」的事情 · 不久前、她奉命创作，电影剧本《好当家》、要求两个星期体验生活一个里期交出创作提纲，一个星期交出剧本初稿 · 为保险起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关怀 · 过问】上海电影局第一书记、电影厂第一书记、公杜第一书记（还加上县委负责人）层层挂帅，电影厂副，记亲自坐姨。这是一个塑造党的书记光辉形象的 r 重大还材 J，偏烦这位黄宗英一 · 子不认议几个书纪 · 更役有当书记的体会 · · · 一大家私下裹称：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 r 胖娃娃 J 来 · 黄宗英说，「总理，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官权 · 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视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 · 我们的党一各级党委，究竟以甚庆方式 · 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 · 讨绘 · 」黄宗英的话引开了大家的钥臣，你一言我一络地向周恩来反映会上的情况和艺术家们的呼声 · 大家希望周恩来来到 t 讲话。见

吁冬达：《共和国年轮（上 961）》（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加 00·买” 6 一乃 8·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 t 建社会扶序

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沈是百分之育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

当时正在批评 C 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人情味，周恩来却说，

《达吉和她的父亲》. 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邢农，小说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时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 J。·，·…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甚历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艾而又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二，一导演在那个地方不状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 毒，而是说这农有框子，「父女粕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 j，终是导流的处理鱿不敢让他们突。一切都夺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朴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鱿解决了。……可是现在还有人在坪农定框子·一个框子把甚废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统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

周批评说：「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r 人性论 J、「人道主义 j 在当时正是作为修正主义观点受到批判，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禁区。周恩来碰了这个禁区。

周恩来说：「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允许大家讨论、商榷。」他反复强调必须提倡艺术民主，研究和尊重艺术规律。他批评：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现

周恩来：〈在文。工作座谈 t 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绩〉《1961 年 6 月 19 口》《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 3 刀一 3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斋春（1958 — 1961）—乌托年运动

在要把这种风气改过来。他最后说：「找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周恩来把自己的话树成活靶子，让大家来攻。给文艺界人士以极大的震撼。「这是在一个长久时期的沉阁的政治空气中打了个惊雷。」一个与会者如是说。

6月23日，周扬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话，批评「大跃进」中某些影片「概念化」的问题，他接过此前周恩来的话题，说：「『人性论』也没有甚么可怕……在『人性论』争论上，我们要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另一方面是反对我们的阶级标籛主义。」

6月28日，周扬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总结报告，批评过去有人把政治了解得很狭隘。他指出：

「政治挂帅，政治就不能太多，太多，就削弱了政治，政治不是帅·而变·成兵了·，· · · · · ·政治是灵魂，灵魂要依附在肉体上。业务、艺术就是肉体；没有肉体，灵魂就无所依附了，不知道它到底在哪裏。」

“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原则通过《文艺十条》，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还制定了一个《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只是这个文件涉及的领域比较小，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8月1日，中共中央将这个《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印发各地征求意见。经过八个月的反复修改，压缩成八条，于1962年4月30日下发实行，改称《文艺八条》。

《文艺八条》批评了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干涉，妨碍艺术创作和学术自由探讨，忽视同党外作家、艺术家合作，进行过火斗争，片面追求数量·文艺工作领导干部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等「左」的错误。规定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

67 周恩来，《在文·工作座谈会和故·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珍日）·载《周恩来选集》·下卷·页323—328·啊B·

69 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六十年文艺大事纪（1919—1990）》·《农门：中·现代文学研究中心，1卯州，页1舛·

第十幸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扶序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严格划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之间的界限。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问题。不许用行政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学术和艺术问题。也不应把学术、艺术问题随便引申为世界观问题等等。

四调整政治关系共渡难关

1 党内的甄别平反

从 1958 年发动「大跃进」起，由「插红旗、拔白旗」到 1959 年「反右倾」、1960 年整风整社中的民主革命补课，使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据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不完全的统计，仅 1958 年一年就有五十多万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占党员总数的 4.35%。即 1959 年反右倾被列为重点批到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达 365 万人之多。不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就无法恢复党内的生机。

对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甄别平反的工作，是随着《农业六十条》制订和贯彻展开的。1961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明确阐明：

为看姿杨民主，有必要对铃最近几年来，受过批，. I 和处分的拎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过去批 4. J 和处理得正确的，应该加以肯定，不再改变。通去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巷，恢复职务；部分 r. 1 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枕改正这一翻分问 6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编委 t 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编【1960—19“】》！第三卷口 t 京：团结出版社，1 外 6），页 2723。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史，第胃春 11958 一珍 ‘1) 一鸟托邦运动

题的结论，对朴生产大队和生产际的拎你的处分，应做交给群众审奎，至铃错篾地对群众（包括富格中农在内）远行的执判，应该在适当场合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分的，还应该纠正。

并且规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中间，不许再开展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兀

此后，甄别平反的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重点是县以下农村。自 1958

年以来，县以下干部在多次运动中被整的人很多。当时估计有 1(x 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其中整人最多的有两次：一是庐山会议彼「反右倾」运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次是 1960 年底整风整社运动被划为漏网地富分子或破坏分子。1959 年被整的是反「左」的人，1960 年被整的则是执行「左 j 的一套的人。这一正一反，使农村干部无所适从》躺倒不干·

但甄别平反工作，1961 年进展缓慢。1962 年初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了甄别平反的工作问题。4 月 27 尸，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 gfI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领导，加速进行」。明确规定：

儿是在校向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伶部，应含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戴别平反。· ·一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欢错，误·也不要留见己。？，

此后，又根据军队的经验，建议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即对过去搞错了或者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统平反】除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邓小平还在 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

《建国以来 t 要文戏选领》·第十四册，页 382·《建国以来 t 要文戏选缅》，第十五珊】页 3 批一 362·

0，昌 7，·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 t 建社会秩序

甄别平反是一个很玄要的工作·不要辑视这个工作·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承担责任·这样搞可以快一些·这件工作·请各中夹局合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开始做了的·炉续做，没有做的·迅速做。其结果一定要向群众奋面查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娱，永认我们通去搞得不对·7 之

这样，党内外的甄别平反工作才迅速全面推开。到 1962 年 8 月，全国有六百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

在决定甄别平反的同时，. 中共中央还提出了要教育和训练干部的任务。

9月15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会议上专门作出了一个《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说：“中央根据毛泽东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的提议，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轮训的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错误；克服干部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错误，以便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增加党性。轮训的对象，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训练内容，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此外，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平反和轮训干部的决定，对于当时理顺党内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至关重要，可谓牵住了时局的牛鼻子。

2 调整统一战线政策

在党内搞甄别平反的同时，也开始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和检查落实统一战线政策的工作。

72 邓小平：〈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1962年5月11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页33，

7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页608—609，

7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61—1965）——“大跃进”运动（1）
民主党派的「神仙会」

1957年反右派斗争，五十五万人划为右派，大多是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1958年「大跃进」兴起，民主党派开展「交心运动」，旋即展开整风大辩论，一些民主人士又由于「交心」提供的材料而被划成右派分子。民主党派中右派占其党员的比重，交心前为4%，交心后上升到12.7%。反地方主义、反民族主义斗争都波及党外人士。在这种压力下，大小资本家主动提出取消定息，放弃高薪。毛泽东说：「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交心可以，不要交钱。」遂作罢。弦绷得实在太紧，毛泽东发话：“对资产阶级可以一张一弛，紧几个月，松几个月。1959年庐山会议后展开「反右倾」斗争，党外人士志怎不安，惟恐波及自身。中共中央统战部发指示，在党外人士中不进行反右倾运动，不进行重点批判，不搞交心运动，而用开「神仙会」

的办法来进行自我改造。1960年2月11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副部长许涤新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的情况汇报，刘在会上指出：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现在他们向我们靠拢，我们也要放宽一些。从思想、工作、生活照顾、政治照顾等方面采取积极团结的办法和措施。12日，刘少奇在同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领导人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胡子昂、孙起孟、胡厥文、施复亮等座谈时，针对有人担心政府对工商业者是否照顾到底的问题，向他们指出：工商业者只要接受改造，为国家做事，同共产党合作，生活上国家照顾到底：负责到底。「工商业者要顾思想进步的一头，国家包生活照顾的一头。」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代表。9月6日，各党会议代表集体向毛泽东发致敬电，表示「一定要跟上飞跃发展的形

74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1）》·下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1月，478—479。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 建立社会秩序

势」。这种马拉松式的「神仙会」进行了一年多。据新华社1961年5月15日报道，一年来全国各地召开大小规模的「神仙会」数千次，有近百万人参加。中共中央还多次召集民主人士座谈会，向他们报告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有关政策，总取他们的意见。

据1961年1月在西安闭幕的民建二届中央常委会、全国工商联三届四次常委会反映，尽管人们对国际形势有所担忧，对国内经济困难状况多有牢骚，但是，中共中央提出开「神仙会」，贯彻和风细雨的方针，以及「包一头、顾一头」对工商界多方照顾的方针，大家还是受到了鼓舞，多数人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2) 为右派摘帽

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逐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摘帽」是给出路的政策，与平反性质不同。但「摘帽」毕竟对右派的处境有所改善。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作出一个《关于确实表现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1959年、1960年，两批摘帽九万多人。196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发出指示，提出「再给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根据这一指示，1961年全国为右派摘帽12.9万人·比前两次的总数还多。12月16日，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宣布为三百七十多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其中有钱端升、冯雪峰、柳提，黄药眠、徐懋庸、许宝駭、陈达、吴景超、傅鍾荪、马松亭、孟鞠如、杨崇瑞、杨逸棠、刘一峰、王一帆、吴绍谢、王枕心、何北衡、李健生·顾执中、邱克辉、吴春选、吴祖光、艾青、白朗、罗峰等一大批知名人士。7'

在此期间，农村也对部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摘帽」。75<工商界多数人发生程度不同的动摇反复一民建，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的反映），（内部参考），1961年2月1日·

76〈中共中央发出挤掉一批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1960—1966)》，第三卷，页之745，

758

(3) 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1)——鸟札年运动

、宗教政策的调整

民族政策也着手进行调整，贯彻「有错必纠」的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对1958年青海平叛中扩大化错误的改正。1961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兰州召集西北民族工作会议，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族政策调整另一个大的举动是防止西藏民主改革中「左」的做法。1960年底，中共中央派民委副主任杨静仁赴西藏作调查。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接见班禅，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陪同接见】毛泽东对班禅说：「我们信任你。」鼓励班禅有牢骚就发出来，多交流沟通·毛同意班禅提出的保留一部分脱产喇嘛的意见，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

在这种纠「左」的空气下，1961年10月起，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到青海、新疆等地调查。于1962年5月写成一份《关于西藏总的

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后被称为《七万言书》），系统地、直来直去地提出了他对西藏及其它藏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周恩来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认为大部分意见和建议可以采纳，遂指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主持，针对《报告》提出的问题，制定了四个重要文件。随后，西藏自治区成立四个小组，由班禅副委员长负责落实宗教政策，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负责纠正平叛扩大化错误。

（特赦战犯

1960年11月和1961年11月这一年多时间内，中共中央对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实行了两次特赦。1960年11月特赦五十名，其中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四十五名，伪满洲国的战犯四名，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一名。1961年12月特赦六十八名，其中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六十一名，属于伪满洲国的战犯七名。六十八名战犯中有将级军官三十二名。知名者有‘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国民党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伪满洲国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建立社会秩序

国外交部大臣阮振铎等。放了一百五十一名战犯。

达同1959年12月首次特赦，三批共特赦释

周恩来十分关心特赦战犯的生活安排。1961年2月8日，他在统战部《关于首批被特赦战犯博仪、杜聿明等人的情况和安排意见》上批示；

在北京的七人（溥仪、杜聿明、王耀武、来希濂，周振狹、郑庭夏、杨伯涛），第一步一律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并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月薪可提高到每人一千元。惟溥仪如愿留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半工半读也可以！但专员名称和待遇应与其它人相同。其它四人可分别在上海、浚阳、昆明、南京也给以政协秘书处内专员名义，待遇、学习相同。’72月12日，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约见博仪、溥杰及其弟妹等人，询问每个人的身体、生活、学习，工作和家庭等情况，嘱咐他们从生活上、思想上做好嵯峨浩（溥杰的日本妻子）的工作。要他们学会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总认识到人的思想有进步和落后两方面，需要不断改造。改造成新人，当然是不容易的，

但人是会慢慢起变化的。针对家族中有人提出对嵯峨浩「得有警惕」事说，对她有警惕是必要的，但也不要过分，要通过她做中日友好的工作。2月21日，周恩来和陈毅接见第二批特赦战犯，鼓励他们写回忆录。要从我做起，努力改变旧习惯。6月10日，周恩来再次接见博仪、博杰、嵯峨浩及其家族其它成员。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平等待人，有无相通。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过得好」。

”中共中央文戏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话（1949—1976）》戏出版社，1997】‘，页3舛‘

7B（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391—393，
中宣部北京：中共中央文 415—4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曾专（1958—1961）—乌托邦运动

特赦和做特赦战犯的工作，体现了统一战线政策更大范围的调整，即为祖国统一和打破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遏制的局面服务。

3 为知识分子松绑

发展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因此，在《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三个条例中，除了调整对有关专业发展本身的政策以外】重要的问题是
为知识分子松绑。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压在知识分子心头的「石头」，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二是「白专」道路的棍子。1961年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为抓高校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专门拜访了一些知名教授。在广州，周扬登门拜访了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陈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计周说，与我有点关系。陈说：新华社1958年某月某日播发一条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多，现在为甚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为甚么前后矛盾？周说】这是新生事物，总要经过实验。比如买双鞋也要试几次。陈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差一点是可能的。周扬拜访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时，冯也谈到前几年的师生关系问题。他说，我们不是老师·是侍读·这两件事都引起周恩来，

邓小平的注意。周恩来本人也拜访过朱光潜、钱锺，等不少人。”’
在当年4月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党内外专家对几年来在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与会者指出，一个时期发生了忽视知识的现象，不恰当地强调培养所谓普通劳动者。有些人不理解应当教育学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即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时在专业知识上必须不同于普通劳动者，才能符合国家的需要。现在白专道路的概念使用过滥，喜欢读书 79 黎之‘<周扬与「文艺八条」「文艺十条」>，载《忆周扬》】页 281—282·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秩序

而不太喜欢参加某些集体活动的学生，往往被批评为走「白专道路」，以致在学生中造成不敢读书、不敢钻研学问等不正常风气。他们认为】红和白都是政治概念，只有反对社会主义、坚持个人主义才能算白。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那么就应当批判他政治反动，没有必要把「白」和「专」联紧在一起。「白专道路」的说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把那些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政治上进步较慢或政治上还在转变过程当中、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指为走「白专道路」。

加
反映强烈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5月19日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会上不少老教师认为近几年来学生对教师太不尊重，言下颇有愤慨。他们指出在学生和青年教师对老教师的学术批判中有不少简单粗暴的现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没有很好贯彻执行。”，

关于「红」和「专」的关系问题。周恩来在1961年6月19日的讲话中：就曾批评「白专道路」这个口号，指出「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
8月26日，聂荣臻在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中，也认为「红必须落实，不能空空洞洞的」，「白专」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8月10日，陈毅在对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讲话中也指出：「从来没有空头的政治，政治都是通过业务来体现的」「我们不能拿参加政治活动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红』或『白』」。正

是根据这些精神。三个条例中都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和说明。《科学十四条》规定：「红，首先的和主要的是指的政治立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的初步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

8a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1961年5月19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页421—422·81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页426·82 周惠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周恩来遗集》，下卷·页342·

76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9卷（1957—1961）——鸟托作还动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红和专应当统一起来。……我们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又红又专，就必须要求他们自觉地使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研究成果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在今天大多数的情况下，科学工作者的钻研业务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正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提高的具体表现，必须十分爱护和充分鼓励。」”

《高教六十条》指出：「高等学校师生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他们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把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是在政治上进步较慢，或者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指为走『白专道路』，是不对的。」“

经中共中央批准的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不再轻率地进行政治排队，鼓励人才冒尖。对全国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和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都要开出名单，由领导机关亲自掌握。给其创造条件；要承认并尊重个人的劳动成果，鼓励科学工作者著书立说等等。

鉴于上述问题对所有知识分子工作部门的普遍意义，中共中央在批准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和《科学十四条》时作了长篇批示，其中特别指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各高等学校、大中厂矿、医院、报社、维志社、出版社等单位的党委，都应当认真地讨论，结合自己的情况，参照执行。」g，然而·上述三个条例都没有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个敏感问题有

一个明确界定。《工业七十条》中虽然指出「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⁸⁶但并不是就整个知识分子队伍来说的。

83 《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十四册，页 5 必一 5 必。

84 《建国以来，要文选编》·第十四册，页 599·

s5 〈中共中央同意聂荣臻《关于目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结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十四册·页文 4—5“·86 〈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载《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十四册，页 678，

第十章 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秩序

周恩来在 1961 年 6 月 19 日的讲话中有一段似乎触及这一问题的话。他说：「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 1956 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这无疑是指 1956 年 1 月知识分子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政治界定，但并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再次为知识分子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人们熟知的是 1962 年 3 月广州会议时，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佳话。从现有材料上来看，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早陈毅半年，在 1961 年就曾大胆地对这个问题作过表态。在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陶铸从 1961 年 2 月份开始，对广东知识分子情况进行摸底 19 月 28 日，陶铸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广东省委召开的座谈会。应邀赴会的有在广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有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广东省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在座谈会上，陶铸作了一次感情充沛的演讲。他说：

十斗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灾难之交·几年来翰质朱件比较困鸡，没有绪肉吃·天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认例不铃。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息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 1, r 岁寒以徒知松柏之彼凋 j。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信任不够。……现在我们是要把团结提到新的水平，一是专重，二是关心。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就是比一般人多读了一点书。中国有句古话，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有参遗理的。……今复对朴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开必、倾让，切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复不能采用犬鸦群众运动的辨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朴通去肺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透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甚么场合戴的情子，就在甚庆场合脱帽子，不留马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1 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这歉、认错·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能谈得上

7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年运动

新的团结。·一同时，我还建议：今彼一般不妥用青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情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席不准再搞思想批，, J 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惯子。……

「红透卑深」这个提法陈毅同志不大同意·我也有同感。甚庆叫红透 P 挥透此是优秀竹·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是不是就红透了？我就是没有红透的·我还不敢有这个要求，为甚么要这样要求专家呢 2'，时隔十二天后，10 月 10 日】陶铸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约集中央局所辖：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广西五省区的高级知识分子代表 102 人，在广州和从化温泉召开「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陶铸在会上再次讲话，他说：

我们不能老是讲人家是青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予·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复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实产阶级知识分子 J 这个名词了·那个名词伤感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们（指在场的高级知识分子》现在只有二十四斤（不，1J 五斗米）还是跟着我们搞·所为何来！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很差，精神上也对人不那废草重，人家还有甚么想头呢！。·

一在政治上给予安抚的同时，陶铸在 10 月上旬指示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列出一个两千名知识分子的名单，在物质生活和学术研究上给予贝诚顾。89

s7 陆键东：《陈，恼的最后二十年》口匕京：三联书店·I”》，页 33S—3” 。ss 陆键东：《陈寅格的. 后二十年》，页 339·

s9 从 1961 年 11 月份起，给则教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每人每月补助一斤食油（复又增加一斤），每户十斤粮食：对陈实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生活上的特殊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陆键东：《陈实恪的“复二十年”》·页” 2—343·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秩序

据档案记载，陶铸在三个月之内先后在广东召开了五次大型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直接参加会议的先后有两千多人，陶铸的构想是要「层层发动，人人传达」，刻意营造出一个春天。

当陶铸讲话的精神传达后，「许多与会者痛哭流涕」，比喻为久旱逢甘露，当场「表示今后对党要鞠躬尽瘁」，各高等院校「一片振奋」，「单教授表示是枯木逢春」·「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政府这样照顾知识分子」。有人甚至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更有不少人当场反省自己的不足，「知识分子也要检查自身的不足，要更好地改造自己，才能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党给足了知识分子面子，我们也该想想自己是否称得上是国家的知识分子」！

在中共中央没有正式表态之前】陶铸公开表示：「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肯定· r 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这在当时是冒了风险的。1961 年 11 月，中宣部《宣传动态》上发了一条消息，题为〈中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给他们「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只是一个客观报道」编者未览可否，明显是持保留态度。周恩来、陈毅则对陶铸的意见完全赞同。1962 年 3 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陈毅在事先征得周恩来的同意，正式向与会人员提出「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之冕·

但在中共高层，明显存在不同意见，甚至明确反对，对这一历史情节，薄一波有一段较为详细的回忆。他说：

周总理、陈毅同· 毒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 在中夹内部仍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村庆施同志在上海竟不让传达陈毅同志的讲话。在周总理要求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表态时。毛主席也

没有说话。到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主席便说：「实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

7 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胄喜（1958—1961）—鸟托年运动

块未表，有的连阳块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主席对摘掉实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8月13日，当有的同志提出青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有的，不能说责产阶级还序在，就没有实产阶级知识分子了的时候，毛主席又播话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春在。」陈教同志9月n日谈到他在广州着重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时，小平同志明确表示「陈总讲的是对的」。而毛主席却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拎。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开朴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反映到了1962年10月至11月中央召开的宣传文教会议上，特别是中南组，在讨论中分攻很犬。11月26日陆定一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周总理听复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或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通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青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甚么错误。」小平同志完全支持周总理的意见：「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奎一奎，泼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径，还是接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率，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夹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小平同志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开必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舛

龚育之在一篇谈建国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文章中，谈到1962年这次全国文教书记会议（即上面薄一波写的中央召开的宣传文教会议）时，根据当年的笔记录了一段陆定一在会上的讲话。陆说：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显》，下卷，页1闾6—1007。

第十章 实行全面调整 t 建社会秩序

767

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姿生在 1957 年、1958 年、1959 年的下半年和 1960 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找白旗」· 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 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的知娥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卡再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分。劳动人民知纤分子的提留不确切· 模糊 T 阶红界限。出身终农氏、小实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淤无产阶级，就附属朴实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中的统一战线，包括嘉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团结的范围一直要伸展到「中右 j 的知识分子。用这样一纤界限来防「左」，防右。，，

作为主管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主华负责人陆定一都不同意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甚至认为这是右倾的表现，那么，毛泽东没有表态就不会使人感到偶然了。因此，从 1961 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并没有能完全解决问题，以至于不久以后就出现了更大的反复。

五文化领域的短暂春天

阶级斗争调门的降低，各项政策的调整· 使 1956 年曾一度活跃，1957 年以后陷入消沉的思想文化界被重新唤醒？从 1961 年起，中国文坛又出现了一个活跃和繁荣的短暂时期·

91 黝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册【畏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页 713· 羁在文末附注中写这：十一届三中全 t 以后，陆定一复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就包含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周总理的敬佩和对自已的批评· 文章中说汀对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 周总理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有人把我· 知识分子队伍说得漆黑一团，周总理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国知议分子绝大部分是好的：他们聪党的话· 愿意为社 t 主义服务，11 周总理，t 看知识分子为· 服务，而不把世界观作为刘分知议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 ……这是很对的· 』我在这个问丽上的观点，当时曾婁是偶『左 1 的，所以是错误的· 』陆定一的文章题为〈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 载陆定一《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页 697 — 6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958—1966）—乌托邦年运绩

1 《海瑞罢官》与《李慧娘》

文艺对政治的反映历来最为敏感。由于政治气候的转暖，文艺界出现的文坛盛事首推《海瑞罢官》和《李慧娘》的公演。剧本作者，前者为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后者是老剧作家孟超。

吴晗这位历史学家，「破门而出」，写起了历史剧？原是奉的「御旨」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从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开的头，接着又「出了」「观潮派」和「算账派」的两项帽子】预先作了设防。这样，「大跃进」无论成功与否，就把所有有不同意见人的嘴给堵死了。1958年底毛泽东已发现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混乱，但他并不愿自己承担责任，1959年3至4月上海会议期间，他历数了历史上他受到多数人反对的事例，证明他本人一贯正确，认为现在的问题：一是计委等业务部门工作失误，二是党内没有人批评他的缺点。于是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

当时参加会议的李锐说：当天晚上，见到田家英，认为，毛这样谈到海瑞，似乎是鼓励人们学海瑞，敢于讲真话，不要今不如昔，连明朝的廷谏之风都赶不上。家英向我反映了乔木的观点：毛提起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当时我和田都认为乔木这个看法很深，他对毛理解得比较深。”

后来】毛泽东要胡乔木找几位历史学家写海瑞的文章。于是，胡乔木找到明史专家吴晗，吴晗慨然命笔。写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1959年6月。9月21日，又发表了〈论海瑞〉一文。〈论海瑞〉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已在庐山会议之后，为表示此文与彭德怀无关，「胡乔木加了一个尾巴」，94写上了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

92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1957年3月加入中共。共产党，因这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含冤而死。终年六十岁。

9394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页473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册，473。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 建设社会扶序

话。此后，吴哈应京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先生之约，七易其稿，苦心孤诣：写成《海瑞》一剧。1960年底彩排时，友人蔡希陶见剧本并不是写海瑞一生，而只写其二、三事：且末尾有海瑞不满庸官·挂印弃官而去的情节，遂大笔一挥】在《海瑞》剧名中加上「罢官」二字，改为《海瑞罢官》。1961年1月发表于《北京文艺》，并由北京京剧团上演，马连良饰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

《海瑞罢官》是写明朝大臣海瑞在任应天府巡抚期间，敢于将曾任宰相的徐阶的第三个儿子徐瑛（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退田等故事，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海瑞罢官》一上演，立即在文艺界、史学界掀起彼澜。文史学界欢呼叫好，毛泽东也给予了肯定。据吴哈夫人袁震之妹袁浦之回忆：「毛主席很高兴，在家裏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回来告诉吴哈，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单，吴哈听了非常高兴。」”受到毛泽东的鼓励，马连良也高兴地连写两篇文章：（《海瑞罢官》演出杂感）、〈从海瑞谈到「清官戏」〉，谈他扮演海瑞的体会。对《海瑞罢官》喝彩的，更多的是认为它打破了「史」与「戏」的界线，一个历史学家居然写出京剧剧本来了·1961年2月26日，《北京晚报》发表繁星《即廖沫沙）的〈史和戏〉一文，廖沫沙是老文化人，他对吴哈「破门而出」，作为历史家「却来写r戏」，表示祝贺。他并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一、历史的「真实」和戏剧的r真实」，该不该有个区别，如何区别？二、写历史戏中的人物，如何区别又如何统一？三、写历史和写戏，都得讲究发展过程·不但情节（其事）有发展过程，人物（其人）也得有发展过程。吴哈是怎样来写这两种过程的？2月28日，吴哈在《北京晚报》发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回答繁星的提问。3月9日，常谈（侯外庐，一位著名史学家）必袁浦之：《忆吴念同志二三，》，《北京盟讯》，玲81年第3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1958—1960）一为托年运动以〈从r兄弟」谈到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为题·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就繁星的提问和吴哈的答复，发表意见：并表示：「我也佩服

吴哈破门的精神」。并说：「海瑞一剧是有收获的，我祝他从破门起步入堂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文艺》接连发表了赞扬的文章。

6月23日，《北京晚报》发表马连良的〈从海瑞谈到「清官戏」〉。文章说，封建社会的官，给皇帝办事就难为老百姓分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们和最高的封建统治者】专制帝王或其它的封建官僚之间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与冲突，而对老百姓又不是绝对不能理解或同情的。因此有的官也在戏剧裏表扬「清官」、很可能有微言大义存焉，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8月，吴哈自己为《海瑞罢官》剧本写了一个序，序言说：「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乡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当时人民因为他做了好事，拥护他，歌颂他。海瑞的地位在历史上是应该肯定的，他的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历史剧的生命力全在于它的时代意义，《海瑞罢官》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引起巨大反响，正在于此，

1961年的戏曲界，可与吴哈的《海瑞罢官》相提并论的有老剧作家孟超的昆曲《李慧娘》。《李慧娘》是由《红梅记》改编而成的，描写南宋一个贪赃枉法·卖国求荣的宰相贾似道，一日与其妾《良家妇女，逼迫为妾》李慧娘游西湖，偶见一少年，当面怒斥贾似道。李慧娘不禁发出两声「美哉！少年」「壮哉！少年」的感叹，心有所繁，就被贾似道推入湖中，含冤而死。李慧娘冤魂不散，变成鬼，用头拦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秩序
死贾似道·1961年X，昆曲《李慧娘》在京上演，后到各省巡回演出，颇受好评，也得到周恩来的读许。《李慧娘》在舞台上出现鬼魂形象，

本是康生的主意，%公演之初，也未曾有人提出异议。孟超的好友，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抄观看此剧后】写了一篇剧评“〈有鬼无害论〉”，登在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上，署名「繁星J。其意思是说：《李慧娘》剧中写了鬼·但它是好鬼，有鬼无害·由〈海瑞罢官〉的公演，引发了一次颇有影响的关于历史剧的讨论甚或争鸣的气候。许多报刊发表了戏剧家、史学家和读者的文章·涉及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以及如何表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重大问题，有一些问题还有针锋相对的争论。

由历史剧的讨论引申到对喜剧和悲剧问题的讨论。多数人把喜剧分为「讽刺性喜剧」和「歌颂性喜剧」，认为「歌颂性喜剧」是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喜剧新品种。大跃进作品《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就只有歌颂，没有讽刺·但也有人提出，喜剧也应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有批评的笑」。尤其在关于悲剧的讨论中，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有悲剧。剧作家「可以用今天的社会生活为题材写成悲剧」；有人提出，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产生悲剧。如好干部做错事，干部子女堕落犯罪等。”

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方面，也出现了活跃空气。史学界、哲学界展开了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美学问题的讨论，其深度和广度为1950年代以来所未有。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美术，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小说《刘志
96 剧作者孟超是康生同乡，改编过程中多次缴询康生意见·康生发话：r（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不出鬼魂我就不看·j彩排期间，康生亲自将畏句『美哉！少年1J的复一句改为「壮哉！少年！J，正式公演后·康生又亲临观看·看后甚为痛意。特写个给作者：「祝贺续剧演出成功」」称让孟超r这回做了一件大好事」，指示口匕庭今复照此发展，不要再痛甚庆现代戏」·

。7（人民日报）·1,61年1月15日‘《戏剧报》,1%1年第，一10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丹》；1961年以后的两三年内摄制的故事片《暴风骤雨》、《达吉和她的父亲》、《五十一号兵站》、《风雪大别山》、《北大荒人》，《北国江南》、《李双双》、《东进序曲》、《甲午风云》、《怒潮》、《红日》和戏曲片《三打白骨精》、舞剧片《小刀会》、歌剧片《洪湖赤卫队》、话剧《杜鹃山》、《兵临城下》、京剧《谢瑶环》等。

2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1961年的文坛上！最活跃、最耀眼的明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北京市领导文化工作的殒位负责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虽然都是从30年代起就活跃在左翼文坛上的知名人士，但现在都是地位相当高的负责人。

9s 邓拓，知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美术评论家·书家·新闻学家，更是一位终身的职业革命家·1930年参加左联 t 科学家联盟，并加入中·共产党·1937年秋到达解放区，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分社社长。全·解放后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1957年4月上旬，毛泽东从南方巡视回京复，对《人民日报》社有及时！传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精神作了严厉批评·毛指责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 t 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 t 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 t 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__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 t 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中央甚庆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一为甚么不发消息论计消息也只有两行。为甚庆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写外人士参加·为甚么不发消息？煎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写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写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写报在非煎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 t 议上的讲稿目前还不能发表，但

可以根据调姑的意思写文 t · 对党的政策的画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t 见《毛谭东传【1949—1977 引】》，上册，页叔灭 ‘）此复，邓拓离开《人民日报》· 影 X 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邓拓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 记，分管文化教育工作。19 “年 5 月 17 日· 因遭经陷被迫害致死，终年五十四岁。99 廖沫沙·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畏·

第十章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秩序

杂文的复兴，是 1961 年文坛的一个景观。邓拓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作开辟的《三家村札记》专栏，就是这一年开始出现的。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彭真领导的中共北京市委除了认真贯彻中央的八字调整方针· 解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实际困难外，在思想文化战线也想作出努力。在市委常委讨论如何克服困难时，邓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要有思想工作相配合，他认为，提倡读书方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开阔眼界，就不会斤斤计较。邓拓还传达了胡乔木的意见，让《人民日报》多搞一些世界风光 1 境界高一些，不要计算天天吃几两。现在王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当时大家都觉得这话说得很对，在困难时期，确实需要多读书，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克服物质的匮乏 ‘。

《北京晚报》的编辑们听到上述精神后，随即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据《晚报》的编辑回忆：约请邓拓为《北京晚报》写稿，是从《诗画配》入手的，但是写《诗画配》并不是编辑部的「最终目的」· 「我们主要是希望邓拓同志能给晚报开一个栏目，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因为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读者迫切需要阅读能够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振奋精神的文章· 」在报社反复要求下，邓拓答应每周写两篇杂文，为了顾到北京地区的特点和晚报的特点，专栏就定名为《燕山夜话》。题材的来源一部分是作者看书所得】一部分由编辑部代为收集，一部分是读者来信提供的。「这样，从 1961 年 3 月 9 日开始，《燕山夜话》的《五色土》副刊正式和读者见面了。」100 到 1962 年 9 月，共写了一百五十余篇。这些维文，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全国许多地方引起热烈反响。这就是 r 夜话」写作的始末。

《燕山夜话》刊出后，《前线》101 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们认为邓拓是《前线》的主编，便直截了当地向邓拓提出，让他在《前线》上开个专

100 历行·刘孟洪：〈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载廖沫抄等：《悼邓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50）。页 113—115·

101 《前线》为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写刊。

77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3—1961）—鸟托年运动

栏·邓拓开始没有答应：编辑们一再磨他，邓拓说：同时开两个专栏，恐怕有困难。这样吧，我找些人一块写，行不行？于是邓拓、吴哈、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就被《前线》编辑部的编辑们拉上了马。参与其事的编辑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在 1961 年 9 月 20 日左右·《前线》编辑部约邓拓、吴哈、廖沫沙三人写稿，在四川饭店吃了一顿饭。当时边吃边谈，定下来四件事：一是专栏的名称。邓拓说，咱们三个人合开一个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吧。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的名字。二是署名的问题。邓拓提出仿效马铁丁等合作的办法每人取一个字如何。吴哈取吴字，邓拓的笔名为马南邻·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于是叫吴南沙。后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文章的写法·文章不要过长，以《前线》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己选择。按各自的专长随便写。每期上一篇，轮流撰稿。四是编辑部指定一人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紧人。

「三家村」的唯一幸存者廖沫沙的追忆也证实了上述情节。他说：1961 年 9 月中旬或下旬，《前线》编辑部的工作同志来通知我：第二天的中午，邀请我到四川饭店系餐。「人席以前，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邓拓同志随便谈起：《前线》也想仿照别的报刊「马铁丁」，『司马牛』之类，约几个人合写一个专栏，今天就是请你们两位（指吴和我）来商量一下。听说『马铁丁』他们是三个人合用的笔名，我们也照样是三个人取个共同的笔名日既是三个人，就干脆叫《三家村札记》行不行？他所说的『三个人』就是邓、吴、廖三人。」关于「三人合用的笔名如何取法，最复确定一人出一个字，吴哈出『吴』字，邓拓出『南』字（邓拓写《燕山夜话》时的笔名叫『马南郁』），我出『星

1 字（我当时的笔名是『繁星 J』）。专栏的名称与合用的笔名 r 吴南星 J 就这样定了。至于文章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方法如何，我清楚地细导，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提出来作为议题加以讨论；只是相约：文字以一千字左右为限度，每期在《前线》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为了备忘，由编辑部派人在集稿前向作者联繫、取稿；为了防备临时因事耽误写稿，各人各自先交稿一篇，以为储备。」10Z102 廖沫沙：〈《三家村札记》出版后记〉！载《忆邓拓》：页 140 — 141

第十幸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秩序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大都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来说明事理，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等，或评论历史人物，或读扬新人新事，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性和思想性熔于一炉，引人入胜，发人探省。单单就这种文风而言，就是对「大跃进」以来那种以势压人、全线紧张的文风的一个反动，宛如在干涸中注入了一股清泉，在炽热裹吹来了一丝清风，杂文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现实性：没有批评、没有讽喻就没有杂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上的文章「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这就不可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邓拓维文中最精彩，最具历史价值的是一批讽喻性的短文，诸如：

〈一个鸡蛋的家当〉，引用一个故事：一个盲人拾得一个鸡蛋，浮想联翩：先借别人的鸡孵出小鸡，然后鸡生蛋，蛋生难，辗转生利，又放高利贷，遂成巨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得意忘形，把想娶小老婆的心事也告诉其妻，妻子一怒之下把鸡蛋打落在地】于是完事大吉，文尾邓拓淡淡地道出：只有老老实实，r 才能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 J

〈说大话的故事〉、〈伟大的空话〉。文中引用管仲一句话说：「管子说过：『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少一些。j

〈放下即实地〉引用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盲人过桥！不慎跌落，双手紧抓桥边，大呼救命。路人告诉他，桥很矮，桥下无水，放下即可平安。盲人不信，死抓住不放，终至筋疲力尽，坠落受伤。其寓意十

分明显，犯了错误要知错必改，不要硬撑到底，不肯下台，结果是扩大错误，十分危险！

〈专治「健忘症」〉，说有一种病叫「健忘症」，邓拓开列了两服明代药方。然后指出：「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装疯卖傻，不堪信任。」

上述短文，以隐喻的方式，抨击了「大跃进」以来的浮夸风，说假话等恶劣风气。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1958—1961）—乌托年运动纲，再写这一类的杂文，已不合时宜。邓拓等人就此搁笔。10月中旬，邓拓在〈告别读者〉中说：「近来由于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它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

I

六逆境者的批评和反思

1961年，从毛泽东本人开始，党内不少人都在思考这几年走过的弯路·都在找寻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的答案。然而，由于处境不同】这种反思的深度也不会相同。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张闻天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

彭德怀庐山罢官以后？1959年9月30日从中南海永福堂迁居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10月13日，毛泽东约彭德怀去中南海谈话，指示彭真、杨尚昆安排彭德怀参加中央党校学习。此后，彭德怀就成了党校的「特殊学员」。在庐山批彭德怀是「经验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彭在读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写道：「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裏。」103

在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中，针对庐山会议后全国普遍开展反右倾运动造成的恶果，彭德怀写道：

，「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许多无根据的计划，就造成了严重损失·庐山会议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因而1959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1960年这种形势仍将继续”」

103 《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页“5。104 彭德怀从1959年12月中旬到1960年2月末，读了杨献珍的《甚庆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苏·科学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写了大量的摘记和学习心得。呈报5月10日·彭德怀专案组」将这些笔记和写有大量厉批的，箱，以「防止发敌」的理由给网毁了。

第十幸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扶序

「庐山会议既不正视这一严重事实，又不悬崖勒马进行调整·反而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结果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改正这个错误。」

「从1959年下半年起，我国生产关系的变革远远地走在了生产力发展的前面，这是错误的。」

对当时大搞群众运动来「大办」这个，「大办」那个的做法，彭指出：「这些全民大办并不是人民群众多数自觉的，而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彭认为：「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对报纸上宣传工人不计报酬，取消计时计件工资；农村继续推行公共食堂，把富队穷队拉平等等做法，彭认为完全是「左的蛮干」是「党的各级机关的有些领导同志一意孤行、脱离群众·一企圆跳进共产主义的问题」。1051960年11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十二条》紧急指示。彭德怀一方面对中央重申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感到高兴，同时明确指出：「紧急指示中，还没有提出停办公共食堂，而且还在强调公共食堂。因此，这个错误还不能得到纠正。」彭认为：「现在的公共食堂制，是在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幻想上产生的，是潜藏着共产主义庸俗化的观点，是超脱现阶段生产力的分配形式。」「如不立即停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并将继续遭到一些不必要的破坏。」因此，「紧急指示只是认识和纠正错误的开始」

彭德怀深感有责任把自己这些意见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但在当时却没有可能。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使他十分苦闷·彭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来说，应该把上述看法，试恳地向党中央提出，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鉴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对我作出完全离开实际情况的决议，事实上，不仅已经革除继续工作，而且正在进行从历史上消灭我这个人的形象。如果现在 105《彭德怀传》，页兰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05 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可能引翹不公要的误会，对实际工作是会毫无益处的。106

如果说，彭德怀的批评和反思，主要是处在政策层面；那末，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副手的张闻天，则更多地从理论层面提出了问题。庐山会议时，张闻天知其不可为而为，系统地批评「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和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情况，被毛泽东称为陷入了「军事俱乐部」而撤销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1960 年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所长是 1920 年代在莫斯科的同窗好友孙冶方，两人很快对几年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盛行的许多「左」倾观点，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裏纪录了他的思考。仅收入《张闻天文集》的，1961 年就有：〈要正确认识 and 运用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关于按劳分配提纲〉、〈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和经济关系问题提纲〉1 〈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问题〉、〈读孙冶方同志的《论价值》〉、〈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九篇，对「大跃进」以来的许多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尤以下面三个问题在政治上最为敏感，在理论上尤为深刻：

8 月 2 日，张闻天在笔记中写道：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8 月 17 日至 29 日，又尖锐提出，「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

革命的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这对共产党人来说近乎常识。但在实际生活中始终把它放在共产党一切工作的首位，并不是简单的事。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观。1949 年新中国成立，1950 年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废除封建土地

所有制的土地改革，这是当时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客观需要。但 106《彭德怀传》，页俩中一弱 8 •

第十章 t 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扶序

779

到 1951 年，为避免个体农民「自发走向资本主义」，农村出现「两极分化」，于当年 12 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组织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开始了逐步动摇、消灭农民的个体私有制的进程 • 1955 年通过批判「小脚女人走路」掀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这种生产关系的急剧变更，已相当程度地对农村生产力发展造成破坏和阻碍。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但在党内占主导的认识一直是「趁热打铁」，「不断革命」。毛泽东在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仍认为：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的第五段，‘的现在证明是正确的 • 首先社有化，然后国有化，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只是说不是一个早晨就能 r 全部过渡」。他断盲「趁热打铁」，「不断革命」—不断改变生产关系 • 才能为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

针对当时流行的错误观点，张闻天指出：「现在普迁的论点是，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他认为：「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r 唯生产关系论」），正像离开了生产关系而谈生产力，必然陷于机械唯物论（r 唯生产力论」）一样。」他分析说：「生产关系」分为二类。一类是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阶级关系；另一类是劳动关系和上下左右的关系（如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地方，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这二类生产关系原则上区别，但互相影响。对第一类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相当长时期内）不能不断改变《或叫「调整 J），第二类关系比较可以更多地改变，但也不能过多。张闻天腊调：r 物质生产，决定一切，这是唯物史观。」”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于人对自然力的控制力量。因此，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水平。

）07 人民公社的集馒头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纔续增畏，逐步地代替集体所

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总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108(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1957年8月2日)·载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张闻天批评那种：只谈改变生产关系，而且强调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却不知归根到底改变生产关系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变最后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对生产关系的「拜物教」。他说「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没有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生产关系是不能任意变更的。过早改变生产关系（如「共产风」会破坏生产力，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当党内不少人仍在迷信「趁穷过渡」的时候」张闻天尖锐指出：「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强调「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10。显示了他不同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修养。

8月10日至11日，张闻天写了〈关于按劳分配提纲〉，111对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认为供给制具有共产主义因素，把按劳分配作为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破除；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否定物质利益原则等观念作了理论剖析。

张闻天指出：不劳动者不得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是社会主义原则，不行这一原则，就不大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按劳分配所带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必要的，必然的，正是适合于实际情况的。要消灭这种法权残余，就要经过按劳分配阶段。」针对按劳分配宣传上存在的问题，张闻天指出，一种叫人们只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另一种叫人们不要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只关心集体利益，这两种偏向都不对国家的统一

。他认为：「计较物质利益，并不只是计较个人利益，也是计较集体的利益

。」张指出，

。我们不是利他主义者，也不是利己主义者，是两者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原则，应该是：

100 张闻天：〈杜 t 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1961 年 8 月 17 日—”日，，载《张闻天文集》·第四卷，页 362—365。

110 张闻天：〈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61 年 8 月 2 日），载《张闻天文集》·第四卷，页 347·

111 张闻天：〈关于按劳分配提纲〉《1961 年 8 月 10 日·11 日》，载《张闻天文集》第四卷·页 349—355，

第十幸实行全面调整重建社会秩序

「先公后私，公私两利」。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各尽所能，就是为公；按劳分配，则是为私。……今天的评工计分·三包一奖、劳动定额、计时和定额奖励等，经济核算等等，都是要斤斤计较物质利益。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集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为了共产主义」

张闻天批评说：把政治同物质报酬脱离，甚至对立。是不妥当的 q「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人民要改善生活，就要提高生产，努力劳动，给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集体的利益，同个人利益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不去谈多劳多得，怕谈多劳多得，实际上对社会主义不是有利，而是有害。既然劳动是光荣的，多劳多得是正当的，那么劳动好的人生活得好些，生活富裕些，就是应该的，正当的。这样生活好的人，对社会主义更加积极拥护。「说愈穷苦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愈坚决，愈富裕的人愈不坚决，这样的观点，应该有适当的修正。」他再进一步分析指出：只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愿劳动，那是卑鄙的。劳动之后得到一定的物质享受，这有甚么卑鄙！共产主义的目的是甚么？为甚么要为它 t 斗？一定的物质条件，使工人更有可能提高其文化与技术。物质鼓励同精神鼓励是分不开的。

由此，张闻天结论说：「按劳分配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看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自觉的自愿的劳动纪律，提高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和他们的生活水平。按劳分配是一个伟大的共产

主义学校。」

8月15日至17日，张闻天写下的另一篇读书笔记：〈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 在追篇笔记中？张闻天明确地批评和否定了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一一

张闻天：〈当前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1961年8月15日—17日）·载《张闻天文集》·第四卷，页359—3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3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张闻天写道：「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其本质应是一个东西：不断发展的生产与不断提高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统一……这种矛盾统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表现形式。」他咏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思想意识上还将长期存在。但今天在思想意识上的主要矛盾，是否在于思想落后或超越于实际，在于不能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多少存在，但不占主要地位。在这方面的基本矛盾，能否说是在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张文指出：「我国的情况是，在从1949年到1957年的时间内，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才但在1958年后，就不能这样说了。同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是长期的，但不能说今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

张闻天说：

把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基本矛盾·归结为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把三个差别、所有制的差别，劳动报酬的差别，都说成是旧社会的残余、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不正确的。这种差别同旧社会的差别·有根本性质上的不同。这不是资本主义残余，这是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特权。要改变这种差别，不同这些差别去「斗争」，而是利用这种差别：去发展生产，最终消灭这些差别。

如果说，在1961年那个时候，批评平均主义，并不只张闻天一人；但鲜明地批评对生产关系的「拜物教」，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尖锐地挑战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确实还无人出其右。

第十章 实行全面调整 建立社会秩序

然而，张闻天的上述基本观点，恰恰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批评的观点。此后不久，更在中苏绘战中被作为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由此，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就在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步入的错误道路上，愈走愈远。

大事记

1958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提出十五年左右赶超英国，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赶超美国，以便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战略设想。

1月1日至4日中共中央在浙江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1月13日至26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会议，宣布撤销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领导人的领导职务。

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奇文共欣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文章的再批判》的文章。

1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

1月31日毛泽东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2月1日至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2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的号召。

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

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早春农业生产的指示》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还推广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49—1961）—鸟扣年运动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3月

5日广西僮（后改为「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3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工作的意见》。

3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冶金部、铁道部提出当年大跃进新指标。

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3月10日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问题。

3月12日聂荣臻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谈科学事业和生产的大跃进问题。

3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财政部党组的报告，决定对税收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3月24日至4月8日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讨论「反掉右倾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跃进」

4月1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工作会议。

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

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

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应占比例的意见》。

4月15日毛泽东着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校长马寅初。

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

行·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
5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第二本账。

大事记

5月19日至24日全国地方冶金工业促进会召开·计划兴建小高炉12649座；兴建转炉4座，电炉43座。

5月乃日中共举行八届五中全会。

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5月27日刘少奇提出1中国应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6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技术革命进军〉的社论。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

6月中旬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

6月中旬农业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农业大有希望》的报告。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内把粮食产量提高到人均一千至一千五百斤；三至五年内提高到人均二千斤。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高速度〉

6月22日毛泽东批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6月叩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增加基本建设投资二十五亿元分配意见的报告》

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劳动部的报告，决定放松国家对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

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创小麦亩产5103斤的全国最高纪录。

6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布：教育部制订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

7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接见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

7月5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座谈时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7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成长〉的专题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1958—1961) —鸟托年运动

7月上、中旬《红旗》杂志第三期、第四期分别刊登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传达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

7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视察山东工厂、农村。

7月15日陶铸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斥粮食增产有限论
7月23日农业部发布1958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宣布当年夏收粮食总产量达到1010亿斤。

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8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快捷方式〉

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农村。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省历城县北园农业社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8月中旬毛泽东在全国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了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问题。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和钢铁产量翻一番。

8月20日中央科学小组和科学规划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报告：苦战三年，争取提前五年完成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8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早稻千斤省，安徽头一炮。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金门、马祖国民党军队。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在农村开展「拔白旗、插红旗」。9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河南进平县〈喳蚜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

日《人民日报》以《徐水人民公社》为题报道，徐水将要发射全县粮食亩产二千斤的高产卫星。

大事记

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本国领海的宽度为十二哩。9月4日晚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委电话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

9月10日至29日 9月16日至18日

毛泽东先后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

刘少奇在河南郑州、开封两市视察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情况。

9月17日论；9月19日

《人民日报》〈祝河南大捷〉

报道河南日产生铁一万八千多吨，并发表社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基本建设委员会、计动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研究钢铁生产问题，会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迅猛展闻，

9月25日至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批撤出朝鲜回国，从朝鲜彻军任务全部完成。

10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10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取消计件工资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10月18日至30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提出1959年工业的中间任务要为生产三千万吨钢而奋斗。

10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突击完成农产品收购调运任务的紧急指示》

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10月28日山东范县规划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11月28日至12月10

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11月《宣教动态》第145期刊登了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的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春（1958—1959）—乌托邦运动’
1959年

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煤产量压倒英国。

1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山东省委、省府关于信陶县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

1月24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

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

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一千八百万吨钢而奋斗〉

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公社要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

2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

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2月至7月朱德在各地视察，对农村办公共食堂提出一系列意见。

3月10日西藏上层中的反动集团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相勾结，阴谋实现所谓“西藏独立”，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3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4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4月18日至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4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7月15日以前，要集中力量打一个钢铁战役。

4月29日毛泽东用〈党内通信〉形式，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干部写了一封信。

4月30日陈云写信给中央财经小组谈市场问题。

大事记

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对算账和召开社代表大会等问题的指示。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

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

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

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

6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生产会议。

6月29日至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数据。7月2日至8月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7月14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

7月21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第二组作长篇发言。

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批判彭德怀。

8月1日毛泽东在写给王稼祥的一封信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的指示》

8月10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上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裹有……；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8月21日刘少奇召集扩大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

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1卷（1958—1961）—鸟托年运动

9月8日周恩来总理函覆印度总理尼赫鲁阐明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

9月9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

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讲话，批判彭德怀等。

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免去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

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

9月26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9月底中国石油勘探工人在东北松辽盆地找到了工业性油流，打破了「中国贫油论」。油田命名为「大庆」

10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

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

10月15日《红旗》杂志发表康生署名文章：〈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

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继续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

10月25日至11月26日第八次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10月31日毛泽东写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

11月1日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落成典礼在河南洛阳举行。1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写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11月21日重庆长江大桥建成。

11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

犬事记

11月至12月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2月9日陈毅外长写信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严重抗议印度尼西亚进行

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活动。

12月15日浙、皖、苏、沪四省市举行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过渡问题。

1960年

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在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中犯有错误同志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原则》1月20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北京互换双重国籍问题条约批准书。

1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3年、8年的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

1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科委写组《关于1960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的报告》

2月19日至21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2月27日山东省委报告农村中生活安排上的突出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

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3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作出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

3月22日毛泽东提出「半修正主义」概念和中国四十年的设想（人均一吨钢，二千至三千斤粮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第四专（1955—1961）—乌托邦运动

3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3月30日至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邨开于 • 4月14

日中共中央批准冶金部提出的钢产量三本账的计划。4月16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监委的两个报告时，发出〈对坏人坏事要彻底检查认真处理〉的指示。

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看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

4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资产阶级分子的高薪、病假期间工资和「退职退休」等问题的指示〉

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商业部的报告，决定把1960年全国人均棉布定量减少两尺，即由原来的二十四尺减到二十二尺。

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

5月16日中共中央对冶金部党组《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级问题的报告》批示。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

6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

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6月24日至26日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7月5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

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

7月30日中共中央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北京市饮食业实行凭粮票供应的办法。

7月毛泽东提出今冬再发动群众大炼钢铁。

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从8月份开始，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

大事记

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 t 集团购买力的指示》8月

10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对外贸易指挥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

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8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监委《关于解决县社领导机关组织不纯和改造落后队问题的报告》。

8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建委《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

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的紧急指示》。

8月20日周恩来接见来访的日本朋友，谈了中日贸易的三原则。8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提出。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

9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关于农村的十项政策》的批示。

9月14日至10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9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整顿和巩固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

9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人民银行党组《关于严格实行现金管理制度的报告》。

9月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缩食油销量和加强油脂收购的指示》。

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

9月30日，中共中央基本同意并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

m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晋、冀、鲁、豫、哺鸥莅墉市农豹辞创喘嫉喂》。10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报告。

7,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 {19,8—1,61} 一乌托年运动 1o月

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11月5日至12月8日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

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

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11月19日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的决定》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作了重要批示。

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

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冻结、清理机关团体在银行的存款和企业专项存款的指示》

1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指示》

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961年

1月1日中共中央批发《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并作出批示。

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柜价小组《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报告》

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

大事记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

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

3月11日毛泽东为印发《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写说明，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

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

3月20日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信为安徽农民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争取支持。

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给全党同志的信〉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4月2日国家计委对1961年基本建设计划进行调整。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收购重要经济作物实行粮食奖励的指示》。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5月7日毛泽东转发周恩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调查报告。刘少奇同炭子冲农民谈话。

5月9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

6月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6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

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

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田专(1961)——乌托邦运动

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6月

3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6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7月24

日安徽省委向中央作辞淤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

8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化肥小组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报告

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煎组《关于资产阶级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8月26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借冬闲田给社员生产的通知》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关于输训干部的决定》

9月16日中共中央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下发讨论试行。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

10月9日首都各界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10月15日至31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应邀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1月中共中央同意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建立学位·学衔·工程技术'称号等制度的建议》

1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

12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定：对于经过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12月16日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等单位·宣布对钱端升、冯雪峰，柳提、黄药眠、徐懋庸等370多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参考文献

一档案

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十二、十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战争史研究中心存么腊n)，未刊

二文献资料

人民出版社数据室编‘《批判数据—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5.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人民出版社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北

京：人民出版社，1958)

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六至九·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九、十一至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至八卷出版社，1977、1991、1999)

第二、四、一 1997)（北京：人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三至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编：《党史参考资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二、三册，上册（南京，196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二十二至二十三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世界

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部编：《杜勒斯言论选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李桂才主编：《中国工会四十年（1空总一珍铭）资料选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李雯汉等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卷九（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

利瓦伊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4）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1927—1957）》（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陕西工业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林彪文选》，未刊，1968

国史馆史料处编：《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初辑》（台北：国史馆，1979）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陆定一：《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杨献珍：《杨献珍文集》，第二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 州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一至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邓力群编
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三著作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 — 1976）》，中卷（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春 t19 巽一珍 61) — 鸟托年运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 — 1995）》，上、中、
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 — 1969）》，下卷（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下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 — 1976）》，
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下册《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
— 1976）》，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加 03）·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毛泽东的足迹》（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
第五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沁）

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永嘉包产
到户的实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中共安徽省委编辑室：《农业社大办工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 1958)

中国军事博物馆编着：《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编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三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丹增、张向明主编：《当代中国的西藏》（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王毅之主编：《当代中国的轻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西藏自治区文史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余雁，《五十年国事纪要·军事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李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李琪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沈久泉等选编：《共和国往事—老新闻（1956—195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ZdB）辛子陆：《毛泽东全传》，卷四（香港：利文出版社，1999）

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

1975)》，下卷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价冷)

周传典等主编：《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卯6)林正义：《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下册个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邱石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羽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19巽一1961)一乌托年运动

([信阳事件]专题研究报告)，未刊，1998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浮上，下卷(北京：中共煎史出版社，2000)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Z加5)

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澳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1979)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郭今吾主编：《当代中国商业》，上、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 兕 7)

陈如龙主编：《当代中国财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程中原；《张闻天传》口匕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 刃)

《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口匕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 (刃)

参考文戏

菲力普·萧特《州叻 sb 憾) 着，全小秋等译：《毛泽东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 以 n)

黄峥：《刘少奇一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杨易辰等：《我们的周总理》d 匕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林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 毡砖)

贾斯柏·贝克 (Jaspc:Becker) 着，姜和平译，《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

熊华孙、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秣击出版社，1988)

刘友于等：《中国二十世纪全史》，第八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刘伯承传》编写组：《刘伯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刘国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郑谦、韩钢：《毛泽东晚年岁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 幼

邓力群等：《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编：《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 玲 d 匕京：中共党

史出版社，1994)

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萧冬连：《共和国年轮（1961）》（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萧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 钱临照、谷羽主编：《中国科学院》，上、下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史·第10卷（1958—1961）—乌托邦运动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罗荣桓传》编写组：《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顾准：《顾准日记》（北京：经济出版社，1997)

顾龙生编：《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四论文

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载于《中国农村》2000年第10期 / 刘加如、安广礼、任达甫、王林强：〈贾家庄农业合作化史〉，《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90年4期 李玉霄：〈杨显专：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南方人物周刊》，2001年第5期

李戒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玲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沈志华：

〈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和结果〉，《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周承恩：〈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绿〉，《社会》，1993年第4、5合期

参考文献

胡绳：〈谈党的「八大悬案」〉，《中共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

陈振声：〈李先念走下庐山之后〉，《中华儿女》，1999年第6期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百年潮》·1992年第6期

韩侠：〈西藏现代革命史研究概述〉，《中共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龚育之：〈毛泽东与「八大」大党章的两个特点〉，《中共党史研究》，1982年第2期

五回忆录和口述史料

王平：《王平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著，静海译《缔造和平》（北京：三联书店，1977）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整理：《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下册（海口：南方出版社，1991）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加02年6月5日

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载杨易辰等：《我们的周总理》袁浦之：〈忆吴哈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3期张彤：〈对印自卫反击战前后的回伟〉，《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山

808

中华人民美和国史·第四春（19三8—196D—乌托邦运动

张震：《总参谋部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叶飞：《叶飞回忆录》口匕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董边、潭传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廖伯康：〈历史长河裹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廖沫沙等：《忆邓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望舛)郑文翰：《秘书日记裹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萧克”《萧克回忆绿》（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U匕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魏列夏金着，陈春华译：〈1958年7—8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中共党史研究》，之以刃年第4期

罗元生“《百战将星—王尚荣》目匕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六报刊

《七一》，1958年《人民日报》，1954—《中国青年报》，19铭《中国藏学》，1988年《内部参考》，1958—《甘肃日报》，1958年1961年年1961年

参考文戏

809

《光明日报》，1958年

《河南日报》，1958年

《社会》（上海），1993年《青海日报》，1958年

《前线》，1961、1962年《红旗》，1958、1959年（新华半月刊），1955、1959年《解放军报》11957年

（辽宁日报），1955年

《戏剧报》，1961年

珊曰

一赚「一卡11当111俦舛」

么以

11赚「讨论虽剑着一富瞰姻么合.&州驮8.曰刘联参!袞.1认.1.!

鸾夕选。 . 214. 以6.355.3?458.533!540

曰减啡。 . 7州' !14计16分21r21户

220.255.391.401,426.5j8.541.

543.6娥尸6妩7.67?685!686.6喝1,

巳2

十11家冻吩懿引6矫.62州巳尸

634-636.644,703.72瞬

H中巳1

斤阳库卜邢今件16户3.2

卜邢分岭伶膈2卯3分5。 . 仕.7卯

10付10户盒P62卯74州76尸768

卜部吟件3州吕尸江州×分臑户

158-160.H62!165,16?170!

178-182.184,186.194.209-

217.21?220!224,226.秘37,23?

240.253-255!335!354.355!

359-366.368-371,373-375.

378-381. 384. 385, 387. 390. 392. 顷
94-400. 402, 406. 407!40?410. 412, 413. 417. 425. 426. 430. 平
38, 43?444!447-449, 452!4 切 7. 464-466!469!479!
480, 483, 48 尸 506. 510. 51 尸 515,
517-51?521. 523. 524. 527, 529t
531, 534-536. 546-548. 娥 67.
572. 601. 613!614. 619-621, 623!
6 他. 63 娇, 63 户公计象妒公切-649.
6 娥 3 • 655. 658! 砍? 歌尸 67 付 68 尸
685-687. 访叮 0!693-695. 703.
707!712. 720!724. 726. 730. k3.
ds. 769, 773
《卜邢序祥淤十寮》望 1
《卜却 ID 声》件群 20-22. 切 1. 5 伪甲
「卜邢峰虽 J321. 322. 326. 33 付
卜龄耻汁骊. 沛计珊汁耐 1 以!
14 尸 19 尸 217. 35 必
卜盆玲合 7
11I 赚 《H 卉辞玲汁十寮》絮. 台. 名户 11 " •
d2
812
中华人民弄和国史 • 第四春 { 1958 — 196 幻 — 鸟托邦运动
(工业七十条) 717, 720, 726, 729. 730, 752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66 「三八作风 J580
r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393, 621 (三家村札记) 762 — 765
三面红旗 410. 511, 632, 655, 713 口粮标准斜 2, 593, 595. 682 上丹旦达
319
土登列 『5319
大小凉山 331, 332
大炼钢铁运动 157, 194, 加。 , 512r 大跃进」 24, 3 方, 42, 47, ", ",
科, 79, 80, 99, 170. 188, 192, 239, 240, 245 —

247, 249. 251, 263, 286, 334. 354, 360, 374, 375, 402, 412, 449. 450, 457
, 459, 464, 469, 471, 474, 477, 51

之. 519, 567, 579, 598, 605, 609, 611. 614 — 617, 62 石, 629 —
632, 634, 639, 642, 660, 672, 681, 682, 684, 6 幼, 6 卯, 7 弱, 707, 720,
兀 6, 727. 729, 730, 刀么衫 3. 乃中. 738, 742, 743, 746, 758, 765. 菱
8, 773

[小土群 J195, 197, 200, 203, 205, 706

上海市

14, 15, 22. 63, 108, 128, 174, 185, 727. 257, 258, 405, 406, 432, 435, 539
, 540

上海组 59

山南地区刃 6, 344 — 346

说与「人祸」说 608

577, 602, 叩 3, 633, 04, 6 添 9,

640, 弘 9, 656, 657, 659, 670, 693, 727, 745, 747, 方 4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6, 716, 731 中共中央委员会妙 1 中共中央政治局
33, 47, 71, 101, 123, 152, 169, 170, 176. 234, 275, 285, 300, 340, 373, 39
1, 448, 549, 551, 563, 572, 621, 74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71. 300 中共
中央书记处 47. 1 必, 169, 217. 362, 731

中共西截工委 321 — 324. 33 伐 3, 4, 355

中美大使级会谈之? 7 一之

50, 252, 283, 296, 30(), 307, 308, 314. 315, 557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33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15, 1 芍,
148

中苏分歧和卫突 549, 557, 5 踪 《手工业三十五条》 725, 726 仁钦索朗
3 钉

公共食堂

156, 157, 178, 179, 181, 210, 214, 215, 218. 222, 382, 389, 390, 402. 409
, 410, 440, 449, 468, 515 —

518, 527, 529, 530, 535, 540, 542, 595, 606, 618, 622, 644, 645, 653, 658
7664, 666 — 668, 670 — 672, 674, 679, 680, 682, 688, 767, 773

反右派斗争” , 80, 510, 746, 750r 反冒进 J13, 14, 17, 19 —
25, 27, 35, 50, 51, 55 — 58, 64 — 66, 69 — 71, 75, 80, 187, 240. 412, 弱
4, 必 9
813503 — 506, 512 — 514, 519 — 521:525, 527 —
531, 533, 535, 537, 538, 541, 545, 546, 548 — 555, 558 — 560. 562, 565
— 567, 569 — 575, 577 — 588, 596, 602 —
604, 610, 617, 618, 620, 621, 623 — 632, 637, 638, 640 — 651, 653 —
661, 664, 666, 667, 670. 671, 674, 676 — 680, 682 — 688, 691 —
697, 699 — 702, 707, 708, 711, 713, 715 —
722, 725, 727, 728, 731, 732, 735 — 738, 745, 746, 748, 753, 757 —
759, 765 — 769, 772, 773
毛泽东思想 60. 67, 68, 106, 160, 356, 493, 579 — 584, 586, 587. 738(毛
泽东选集) 577 — 579, 583, 686 毛泽荣 617, 618
水利电力部 121, 170, 459 牛佩综 708
王力龙 9, 643
王升平 663, 664
王任重
19, 26, 27, 47, 48, 108, 193, 208, 365, 366, 371, 372, 387, 395, 396, 401,
438, 441, 445, 449, 450, 460, 叩
0, 477, 489:597, 603, 620, 628, 630, 639, 676, 696 王光美 661
王延春 596, 619
王卓如 75
王季范 61?, 615
王尚荣之 85, 286
王彼 97
王炳南之 77 — 279, 295, 296, 307 — 310, 312 — 315
才 7 各添
太原钢铁厂 44
孔原 48
尤金 550 — 553
扎西平措 357

扎夏迪科 448
文化革命 50, 51, 109, 125, 134, 152, 229, 243
文本仙 617, 618
文艺「大跃进」讨 7
（文艺八条） 742, 750
方强 86 — 88
方毅 48
日内瓦 t 议 271
比姆 296, 308 — 310. 314
毛泽东 7 — 31, 33 — 35, 40, 47, 49 — 52, 55, 57 — 63, 63 — 68, 70 — 73, 81 — 83, 85, 87 — 91, 94 — 96. 98, 101, 102, 106, 1 叮, 115, 118, 119, 121 — 13 么 134 — 136, 144 — 148, 151, 152, 155 — 177, 180, 183 — 187, 189. 191 — 193, 195, 196, 211, 214, 217, 218, 蚕 2, 225 — 228, 231, 232. 235, 241, 244, 249, 252, 259, 260, 263. 264. 270 — 273, 250 — 286, 288, 290 — 297, 299 — 307, 310, 317, 320 — 329. 333, 338, 340, 341, 354, 356, 359 — 362, 364 — 378, 380, 381, 386, 388 — 392, 394 — 403. 406. 407, 409, 411 — 413, 415 — 422. 424, 427 — 431, 434 — 437. 441, 442, 446, 447, 441 — 448, 451 — 454, 456, 460, 462, 467 — 472, 474 — 486, 488, 489, 491, 493 — 495, 497, 501, 8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专（1, 58 — 1961）— 乌托邦运动
王思茂 27, 71
王时彦卯
王国权 314, 315
王崇伦 44
王从吾 424, 恤 2, 603
王敬先 623
王瑶 225, 242
王慧智 517
王稼祥 47, 480

王鲁 643
王学文 520
王铮 75, 79, 80
王耀武 749
王鹤寿 19, 27, 61, 62. 123 — 125. 128. 171, 173, 175, 374, 411, 476, 520
五画
「四大」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12
四 J1—省 27, 芍, 61, 108. 11 骛 142t 工
45, 238, 256, 358, 333, 383, 509, 514, 614, 65 么 658, 689
r 四个第一 J580, 581
世界工联理事会 5 必一 570 以细为纲
1", i:2, 188, 195, 207. 432, 440, 44t, 444, 469, 512, 537, 616, 713
以粮为纲 124
包产到户 509, 斤 15 — 515. 689, 702 包尔汉 424
北京组 59
北戴河会议
21. 158, i", 170. 176, 177, 186. 188, 189, 191, 195, 205. 209, 210, 219, 2
23, 249, 361, 367,
374, 376, 381, 413, 437, 453. 467, 523, 534, 5 悲, 576, 斜 2, 斜 9 半工
半读 156, 232 — 234, 136, 乃 8, 731, 749
卡伯特 310, 312 — 314 古大存 73
史向生 19, 162, i", 3", 367 史进前 500
右派摘帽 747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75, 讥 486, 495, 503 — 512, 517, 518, 743, 7 科尼
克松 315
尼赫鲁 325, 3", 521, 555 布加勒斯特会议 562, 574, , 76 平均主义 1 饵,
216, 379, 387, 388, 392 — 394, 纠
4, 524, 52' 7, 624, 646, 648, 650, 658. 669, 670, 677, 680, 686, 689, 770,
773
民族、宗教政策的调整 748 爪菜代 593, 5 舛
甘、青、滨藏区 334 生钦·洛桑坚赞 357 田家英 9, 19, 27, 167, 361 —

364, 372, 375. 417, 450, 460, 471, 476, 483, 5 加, 526, 642 —
644, 646, 648, 653, 676, 687. 693, 694, 698, 701, 716, 兀 0, 758
申纪兰 44
石西民 17
艾奇逊 265
艾斯海提 74
艾森豪威尔威甫 268, 269, 273, 277, 289 —
292, 295, 298, 299, 310, 557, 561, 566, 5 的
索引
815
六画
伊敏诺夫 74
全民所有制 50, 145. 160, 180, 182. 213, 216, 363, 367 — 369, 376, 379
— 381, 387, 394, 啊 7, 523, 527, 6 杷, 722, 72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76, 307, 325, 338. 341, 418, 537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3, 16, 35 —
38, 48, 58, 61, 113, 124, 254. 527, 528, 530. 531
共产主义 9, 11 — 13. 30, 37, 49, 54, 57, 59, 61。
63, 64, 68, 70, 79, 99. 107, 118, 134. 154 — 161, 164, 166, 167, 172, 177
— 185, 203, 209, 21D, 2 工 4 — 225, 230, 234. 252, 268, 281. 283, 359 —
361, 363, 364, 366 — 369, 373, 374, 376 — 381, 386, 387, 390, 39 搬
4D8, 41D, 438 — 440, 444, 455, 465. 466, 473, 519, 523, 5 乃, 527 —
529, 53 搬
535, 550, 560, 561, 565, 567, 570, 572, 574, 579, 582, 584, 585, 626. 628
, 642, 645, 653, 660, 679, 680, 688, 723, 727, 767, 768, 770 — 772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 J182
列宁 7, 25. 30, “. 5 以 54, 59. 60, 79, 85, 90, 92, 95, 155, 157, 183, 185,
规 4, 230, 414, 415, 420, 465, 466, 475, 487, 502, 521, 522, 534, 555, 559
— 565, 567, 570. 573, 574, 579. 5B0, 58 么, 680, 7 弓 1, 766
吉星文朋 3
地方办 1 业 i 价, 110 — 112 安子文 456

安做省 35, 42, , 吃” , 叨, 111, 1 之
9, 139, 140, 190, 197, 215, 251, 261, 387, 403, 450, 486, 508, 542, 优 91
— 693, 695, 697, 701
年度计划的三本账 24, 536 成都会议 32 — 35, 斗 7, 62, 6 斗,
67, 69, 73, 79, 82, 94, 99, 121, 127, 129, 131, 151, 152. 180, 186, 227, 24
3, 249, 250. 474, 579
、朱可夫 51 — 53, 85, 95, 45 之朱光潜 229. 75。
朱智贤 2 讨, 之 31
朱德 47, 71, 124, 及
9, 272, 318, 3, 3, 378, 416. 418, 421, 422. 447, 448, 481, 502, 526. 550, 5
53, 648, 656, 659, 670, 671, 725, 746 朱德熙 129
江西省 42. 133, 切 z, 439, 叨 2, 479 江华 14. 15. 17, 73, 644 江渭清
14, 1, , 33. 395, 396, 651, 700 江苏组 59
米高扬 465
自留地 75, 1 纷,
175, 210, 393, 4”. 430, 440, 447, 449. 530, 532, 596. 619 —
622, 624, 635, 645, 651, 653, 666, 670, 672, 673. 675, 679, 681, 682, 688
、 721
西藏 108, 243, 317 — 357, 415, 455, 558, 590, 608, 612, 712. 748 西藏上
层统治集团 3 叨
8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周史·第齐春 (1958 — 196 功—鸟托年运动
西藏自治区 326, 339, , 并, 350t352, 355 — 357, 7 叨
西藏的民主改革 326
西藏的噶厦政府 321
西藏军区 321, 323, 335 — 3。
七画
邱开银 658
阮振铎 749
何香凝 419
冶金工业部 61, 123, 工 27, 196, 403, 588

吴哈 758. 761 — 765, 767
吴介民麟 3
吴文俊 229
吴玉章 41
吴芝圃 33, 58, 137, 156, 164, 165, 203, 21 工, 3 必一
367, 391, 449, 520, 541, 542, 598, 599, 601, 604, 620, 621, 639, 678, 693
. 702
吴冷西 19, 21, 27, 121, 阅 i — 3 斜, 372, 375, 必鳅 483, 533
吴法宪 495, 5", 505
吴振英 661
吴伟 97, 117
吴德 27, 47
吕正操 412, 520
宋希濂 749
宋时输 96, 97
末庆龄 418, 428
技术革命 i 久 24f4 让, 50, 51, 1
卯. 115, 120, 131. 134. 153, 229, 243, 564, 734
李一清 192, 193
李人俊 62
李大章 27
李井泉 19, 23, 25, 27, 47, 61, 73, 108, 367, 376, 378, 395, 396, 410, 445,
研 1, 477, 4 颛, 577, 628, 652, 641 李友九 162. 222, 361
李文芳 97
李世农, 5, 霭, 94, 99
李四光 424, 刀 6
李立三 101, 102, 104, 105 李先念 1 凡 20, 刀, 咚
i, 47, 65, 71, 124t135, 378, 388, 391, 406, 411, 418, 424, 440, 仔
2, 449, 457, 530. 544. 576, 609, 621, 707, 708, 711, 717 李多奎 7 铃
李修仁 103
李桂生 663

李雪峰 47. 577. 628, 728 李富春 19, 皇 7, 53, 62, 71, 172. 加
3, 223, 367, 374, 378, 388, 412, 418. 419, 430, 432, 433. 435, 447. 452. 4
64, 482, 502, 520, 530, 538, 544, 575, 576, 594, 597. 598, 621, 630 —
633, 640, 714, 716. 717, 728, 735 李达 1a, 96, 97
李云仲 478
李云河 659, 702
李顺达 44
利瓦伊汉 226. 319, 418. 424, 舛 6, 748 李银桥 j 芍, 623
李锐
16, 25, 27, 28, 128. 170, 205, 393, 406, 417, 448. 457. 471, 472, 476, 477
, 481, 482, 490. 491, 604, 758
tj' 个, 上 000 爱 U6
索引一
李颀伯 48
（李慧娘》768, 770, 中 71
李济深 226, 301, 418, 424
李泻 75
李鍾奇 97
杜聿明 749
杜者蓄 75
杜勒斯 32, 266, 268, 273. 274, 277, 279 — 284. 290, 292, 294, 298 —
300, 302, 304. 305, 308, 521, 56 () 杜鲁门 265 — 267
汪东兴 623
汪锋 48
沈钧侨 154, 418
沙文汉 55, 73, 92, 97
社会主义 7 — 16, 18, 22, 23, 28 — 33, 35 — 38, 焰, 料, 叮—
51, 53, 54, 57 — 61, 54, 65, 69. 75 —
80, 86, 91, 95, 96, 99, 101, 102, 106, 107, 115, 1 加, 134, 144 —
146, 148, 151, 154 — 160, 166, 167, 171, 172, 178 —
184, 186, 209. 210, 214 — 216, 218, 219, 叩 2, 223, 2 乃— 227, 230, 233

— 236, 2 拓, 247, 250, 252, 刀 9, 283, 294, 324, 330, 3 啊, 354 —
356, 360, 366 — 370, 373, 374, 376, 378 —
380, 387, 390, 394. 408, 414, 419, 443, 444, 448, 455, 466, 祈 4, 479:484
— 488, 492, 507 — 510, 512, 517 — 519, 521 — 523, 525 —
529, 534, 535, 542, 546, 548, 549, 554 — 656, 568 —
562, 564, 566, 567, 569, 570, 573, 574, 576, 580 — 582, 624 — 628. 63
之, 645, 646, 650,
653, 667, 弱 9, 684, 690, 692, 717, 725, 729, 749, 751, 752. 768 — 773
社会主义工邝匕
675, 677, 5 卯, 698, 732 — 735755, 757,
678, 700, 741,
716, 745,
761, 766,
8, 10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79, 106, 规 3. 512,
, 102, 172. 379 钉, 49, 50, 59, 729
229
八画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319
《波茨坦公告》 263, 265r 放卫星 J133, 201, 207, 249, 254, 363. 655
阿沛·阿旺晋美 318, 319. 3 笋, 329, 添 39, 344, 354, 356, 屹 4, 748
供给制 179, 153 — 156, 之 10. :13, 219 —
221, 223, 224, 363, 380, 385. 402, 436, 410. 440, 441. 449, 516, 518, 524
, 525, 622, 652, 653, 660, 661, 664, 666, 671, 675, 679 — 683, 690, 770
两个剥削阶级 32, 34, 48, 49 两个劳动阶级 31, 32, 34, 48, 49 协作区
108, 109, 11 多, 126, 125, 165, 169, 170, 374, 375, 445, 446, 4 中 7, 478
协绕顿珠吃杨东生》 357 周小舟 19, 乃, 33, 34, 365, 395, 396, 441,
料 2, 450, 452, 457, 458, 476, 477, 481 — 483, 489 — 492, 495 周仁山
356
8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齐专（1958—1961）—鸟托年运动

周谷城 229

周林 27

周恩来 i, 17 — 乃, 乃 — 27, ' 31, 32, 41, 47, 55, 64, 70 — 75, 77 —

80. 91, 121, 124, 169, 189, 190, 203, 2 幼,

234, 254. 271, 272, 275, 276, 277, 叩 9, 285:291, 292, 294 — 297, 3D0 —
304, 310 —

312, 324, 328, 329, 341, 344, 351, 35k355, 373, 378, 396, 411, 412, 416,
420 — 4 乃, 427, 431, 434, 438, 439, 445, 啊

b, 449. 454, 456, 452, 474, 481, 495, 496. 514, 520, 531, 542, 544, 547, 5
48, 550, 551, 553, 558, 563, 568. 573 — 575, 577, 588, 592 —

595, 599t621, 631, 驯 B — 651, 65, 驃 6, 659, 664 —

666, 674, 677, 694, 701, 707, 708, 710, 711, 714, 717 — 719, 728, 735 —
737, 739 — 742, 746, 748 — 751, 753, 755, 761

周振强周惠周扬

739, 孟超帕巴拉拉鲁·拉萨

749

457, 471, 476, 叨 1, 482, 489239, 247, 251, 乃 3, 586, 737 — 742, 悲
0

758, 760, 761

• 卓列朗杰 344

次旺多吉 325, 340

184. 318, 3 泌 — 323, 323, 325,

326, 328. 329, 334, 336 — 347, 356 昌都战役 315, 319, 3 之 i

杭州会议 18, 19, 邺. 35, 47, 66, 69, 107, 111, 733

林乎加 644, 645

林伯渠 378, 418

林克 560, 623

林庚 228

林彪

53, 71, 53, ", 255, 256, 37a, 378, 416, 417. 419. 446, 481, 482, 493, 496.

499, 500. 502, 503, 579 — 586, 588, 斜 8, 649, 656, 701 林伟传 748
林枫 419, 料 7
林铁 i 久 27, 47t105, 123, 211, 365, 445
武汉 33, 128, 174, 191 一
193, 231. 232, 241, 362, 439, 441, 445, 452, 535
武汉钢铁公司 192
波兰, 匈牙利事件 12, 279 肯尼迪 310, 312, 31 斗
范明 320
范县 217, 2 加, 才 21, 368, 369, 374, 532
金辉 612
非正常死亡 426. 427, 539, 542, 591. 598, 605, 609 — 612, 691 河南省
35, 39, 41, 范, 55, 舛, 方,
112, 121, 129, 130, 133, 134, 137, 154, 156, 161, 1 鹅,
166, 366, 367, 369, 383, 391, 395, 399, 400, 402, 425, 449. 5 (J9. 517, 53
4, 541, 543, 597 — 599. 602, 603, 621, 634, 637, 639, 678, 697
九画「神仙会」陕西省 392
446, 746, 74739. 42. 109, 130, 132. 206
索引
819
信阳事件 5", 597. 601, 602, 60 苏 638
冒第君, 石正章、檀英 139 南宁会议 15, 19, 21, 24 一之
7, 31, 32, 47, 51, 55, 64, 70, 7 义 76, 78, 讨,
129, 152, 187, 240, 362, 414, 448, 474, 482
姚依林 48
姚广 296
封耀松 623
按劳分配
i", 149, 379, 385, 394, 396, 397, 410, 444, 525, 622, 651, 652, 659, 661,
669, 675, 699, 727, 729, 7 韶, 773
政治挂帅 98, 之
16, 229, 243, 455, 462, 488, 509, 511, 524, 579. 582. 733. 742

春荒 357, 程 6 — 428, "6, "9 柯庆施 14 —
15. 22, 23, 26, 2?, 33, 34, 47, 63, 71, 108, 128, 129, 185, 367, 376, 378, 3
95, 396, 410, 445, 460, 470, 471, 477, 489. 577, 628, 692, 694, 755
段棋瑞 30
段树成 662, 663
洪学智 501, 502
炮击金门 263, 273. 275, 之 50. 2 “一
286. 288, 291, 292. 306. 455. 496, 556, 558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753, 757 科尔 610
《科学+四条》 733. 735, 刀 6, 750 — 752
约翰逊 2, ?”, 订 7 — 279, 305 胡志明 291
胡乔木 17, 27f4 驯 121, 幼 5, 167, i 乃,
176, 185, 391, 413, 417, 450. 460, 476, 483:52 鳅
526. 563, 629. 643, 644, 646 — 648, 653, 必 8, 659, 725, 758, 763
胡绩伟 643
胡绳 49, 361, 520, 626 军委 t 议 55. 89, 95, 125 —
127, 135, 136, 495, 498, 579r 军事俱乐部 J 斗 56, 杷 s — 490, 496, 多
01, 502, 504, 505, 768 退赔 425, 斜 9, 629, 634, 635, 6 乃
7, 645, 664, 672, 681 — 683 逢先知
9, 167, 362, 417, 553, 643, 644, 716, 720
重庆钢铁公司 45
十.
（真理报）”6, 467
《纽约时报》 304, 465 除「四害」 254, ”6
韦国清 19
个人崇拜 15, 27, 28. 33, 59, 的, ”7, 493 —
495, 503, 572, 579, 580, 583, 588
唐亮 48
唐域 228
夏景凡 200:202

孙作宾 55, 74, 78 一肥孙志达 319
孙殿才 74, 76. ", so 家庭副业 76, 75, 斗加. 。凶, 。 32, 621,
8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635, 651, 653, 668. 671, 675, 679, 683, 721
徐子荣 602, 603
徐水县 1 喊 i66t217 — 219, 3 却, 5。徐向前 53, 加 7, 419
恩达, 丁青·扎木地区 348'
朗顿·贡噶旺秋 357
格达活佛 318
格罗诺斯基 314
格里申 567, 568
桑颇·才旺仁增 339
桑颇·登增顿珠 319
浮肿病
352. 3", 426, 427, "6, "9, 539, 542, 543. 598. 599, 609, 618, 661, 662, 67
1
海瑞 415, 417, 738, 758 — 761
《海瑞罢官》768 — 771
「乌托邦」154, 156, 157, 167. 168 乌兰夫 27, 47, 419, 628
特赦战犯 748 — 750
班禅额尔德尼 320, 323, 325, 327, 341, 344, 419, 748
破除迷信 3 乱
52, 54, 59, 89, 96, 118, 120. 125, 175, 188, 193, 206, 436, 720, 729, 733.
740
纳木湖 346
耿起昌 517
莫洛托夫 55, 274
莫斯科会议 7, 13. 47 — 49. 55。
《华盛顿邮报》465
华罗庚 229
震子扬 75

袁世凯 30

袁永熙。1 之， 613

， 第四专 {1958 — 1961} — 乌托年运动

袁， 华 175

十一画

（商业四十条） 722, 726 《开罗宣言》 263, 265 [插红旗， 拔白旗] 壮
6, 234 郭天民 97

郭沫若 241, 253, 418, 424 郭锡兰 357

陈丕显 17

陈正人 40, 217, Zia, 520, 621, 657 — 659

陈再励 55, 74, 94, 99 陈 f 白达 19, 27, 47, 49, 71, 144, 145, 158 —
160, 162, 163, 168, 222, 361, 362, 364 — 367, 450, 483, 512 —

514, 520, 526, 563、 566, 628, 643, 644, 647, 64B, 651 一弱 3 陈伯钧

96, 97, 416, 498 陈叔通 32, 418, 420, 屹 4, 746 陈东 315

陈国栋 591. 706, 708 陈寅恪 229. 750

陈云 16, 19, 25 — 27, 31, 32, 47, 64, 65, 67, 70 —

72, 170, 173, 175. 297, 367, 370, 374, 378, 381, 388, 396, 404, 405, 414,
416, 417. 419, 430 —

434, 436, 443, 444, 446, 447, 454, 456, 474, 495, 550, 553, 630, 650, 651
, 656, 670, 676 — 679, 699, 702, 704 — 708, 711, 712, 719, 737, 748

陈诚 302

陈嘉庚 424

索引

821

陈绪英 97

陈毅 19, 4 久 71, 兀

83, 142, 270, 314, 326, 378, 419, 424, 448, 456, 503, 550. 553. 582, 737,
7 叨, 751, 753 — 756

陈赓 91

陈独秀 55

陶鲁茄 27, 47, 112, 365, 宁 92. 458. 620, 675

陶铸 19, 之 6, 27, 34, 斗
7, 61, 108, 138, 367, 395, 396, 429, 448, 459, 520, 526, 577, 602. 620, 62
8, 639, 648, 650, 661. 683, 694, 697, 753 — 755
陆定一
4, , 72, :56. 157, 235, 240, 419, 452, 526, 563, 564, 586, 717, 731, 756, 7
57
陆铨 672
马天水 174
马连良衫 9, 760
马寅初 59, 之认一” i, :00. 701 马鞍山钢铁厂 1 舛
高名凯之 29
高岗 55, 101. 450, 招 5, 457, 502 高教六十条 717, 731, 732, 750, 752
高扬 200 — 203
高智 454, 623
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 709
高锋 27
国家计委 1”, 415. 431 — 435, 4, 6. 458, 469, 478, 515, 530, 536 —
543, 583, 631, 713 — 715, 718
国家经委 37, 111, 123. 405, 433, 538, 588. 714, 727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2, 59, “0, 5”. 568, 577, 579, 583
基本核算单位 400 — 402, 410, 413, 621, 635, 6 斜一
647, 6j1, 653, 669, 674, 679, 6 略一 688, 70 () 基辛格 315
崔希廉 135
崔科·顿珠才仁 357 康巴 331 — 337, 339, 3 如, 347 康生 23, 47, 器
9, “4, 收 4, 45 么 5 故, 563, 570, 580, 761
康克清 670
张平化 372, 620, 646, “7. 651, 660f661
张仲良”, 打, 365, 395, 芍 9 张宗逊。i, 93, 459, 约 s 张明河 162, 163
张治中 191, 192, 301, 419 张劲夫 733
张春桥 17, 155, 2 之之, 361, 3 斜张奚若 30
张国忠 162, 16 了, 217 — 219 张国华 317, 319. 3”. 3 乃, 336, 354, 356

张国焘 55, 325
张惠英 43
张超 643
‘张爱萍 274
张恺帆 456, 505, 510 张经武 319, 320, 322. 354, 356 张闻天
47. 295, “7. 444 一砖叩。452. 460, 462, 463, 471, 472, 477, 480, 481, 488
— 493, 495. 497. 498, 503, 504, 766, 773
8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酋喜《19” — 1961) — 乌托年运动
张德生 1 久 27, 47, 100. 365, 392, “5, 489, 628
张震 53, 148
张苏 48
强迫命令风 454t532, 5”. 635 教育革命之 3 工, 23 之, 239, 240, 之
55, . 刀 2
教条主义 28, 58, 69, “, 96, 98 —
106, 125, 207, 235, 260, 477, 489, 520, 565, 567, 572, 574, 582, 584, 587
, 643, 7 乞 7
曹口昌 229
曹众仁 301
曹树基 611
梅白 371
梅行 525, s 儿, “3, 7 之。 , 7 之 s 深耕密植 129
章士钊 32, 301
章杰 288
第一次台海危机 269, 273
第一个五年计划 s, 10, 13, 19, 36, 102, 188, 196, 207, 241, 404, 572. 590
第二个五年计划 20, 21, 42, 。 ,
62, 88, 107, 121, 123, 126, 130, 135. 136, 170, 172. 177, 188, 21?, 218, 2
46, 249, 327, 329, 546, 547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151, 439
习仲动 419, 432, 45 之, 542, 594, 601 菲力普·萧特 6 功

许立群 586, 643, 737, 735
许涤新 5 加, 612, 613, 7"
麦地卡纠 6, 鲜 7 麦克阿瑟 265, 266
十二画
「绞索政策」 300
云南省 43, 75, 148, 383, 660 进口粮食 630, 671, 知 6 — 708 过波时期
总路线 8, 486 阶级斗争乃, 25, 34, 35, 54, 57, 69, 87, 89. 92, 183. 216, Z
之 9, 243, 333, 488, 489, 517, 518, 525, 528, 540, 568, 626 —
628, 639, 740, 757, 765, 771, 772 •
黄火青 27, 651
黄炎培 418. 426, 429, 746 黄华 296
黄敬 19
黄欧东 27
傅作义 419
传鹰 228
凯墨 • 索安旺堆 3 神乔冠华 295
堪穷 • 索郎降措 339 嗟峨浩 749
彭秀梅 662, 663
鹏飞 229, 231
彭真 19, 41, 47, 71. 7 弄 124. 1 讨. 295. 297, 371, 376 —
378, 390, 391, 418, 424, 456, 481, 506, 628, 631, 648, 656, 667, 670, 680
, 694, 728, 735, 737, 7 邸, 766
彭涛 27, 119
斯大林 7, s, 10, 28, 29, 48, 54, 56, 157, 183, 225, 264, 265, 368 — 370,
索引
823
4 妈, 476, 487 — 4 知, 493, 504, 519, 549. 554t57Q. 574. 578
「斯大林晚年」 488 — 490, 493 斯托塞尔 315
曾希圣 14. 17, 33, 47, 50, 366, 3", 395, 39 床 450, 486, 542, 628, 691 —
696, 699 — 701
最高国务会议 40t41, 乃 5, 300, 329, 419, 422

游国恩 228
程潜 301. 419
粟裕 52, 53. 33, 365, 3' 6, 391, 541 舒同 14. 17, 33, 3 必, 366, 391, 541
万隆会议 549
万毅 459, 501, 5 呢
叶子龙 371, 623
叶季壮初 8
叶飞 14, 17, 33, 34. 之 85, "4 叶楚屏 97
叶刺英 71, ", 96, 41 久 4 弼, 63 氏 655 葛罗米柯 291
董必武 378, 401. 4D2, 417, 418, 422. 423, 447
董昕 105, 106
贺龙 71, 317, 3", 419, 452, 巧 9. 拐 i, 486, 496
贺麟 2 铭
超英赶美 45, 57, 6 之, 64, 11, , i:i, 125, 263
达瓦 357
达赖 315 — 3 之 0, 322, 323, 325 — 329, 331, 338 — 340, 3 收,
344. 345, 418, 563
集体所有制 50, 145, 160, 150, 182,
210, 213, 216, 367 —
369, 376, 379, 380. 387, 390. 394, 447, 523, 527, 535, 麟
5, 682, 688, 721, 722, 7 乃冯友兰 18, 变 28, 750
冯白驹 73
十三画
r 试验田」 110
勤工俭学 232 — 234, 236, 238 干部 T 放 109, 234. 623 杨力舅 97
杨木水 701
杨伯涛 749
杨尚昆 47, 367. 444. 446, 450, 456, 470, 483, 506, 565, 657, 766 杨尚奎
19
杨易辰 592
杨波 643

杨思一 74
杨蔚屏 1", 之 03
杨献珍 71
溥杰 749
博仪 7 媚
甄别乎反 681, 743 — 745 裘盛戎 759
解放军平叛作战 317, 330 — 335, 337, 338, 340, 342 — 351, 558, 748 解
学恭 i 醒, 163
资产阶级法权 179, 152 — 156, 21 矾 368, 取缚, 770
贾拓夫绍 1. 03, 452, 4, s 贾斯柏·贝克 611
路宪文 162. 599 — 602 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 383
8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 (19 铝— 1961) — 乌托邻运动
农田水利建设 1, , 17, 35, 42, 99, 129, 131, 149, 151, 156
农业合作化 7. 9, 10, 14. 36. 50, 72, 74 —
76, sq145, 148, 167, 211, 4() 2t486, 654, 科 2
雷任民 707, 708
雷阳 315
十四画
《论十大关系》 11, 80
廖志高 6 锦
廖沫抄 759, 761 — 764
廖鲁言 27. 12 虫 144t436, 媚 8, 541, 542, 621, 648, 653
廖耀湘 748
慕生忠 320
算账 34, 36, 50, 71. 136, 137. 36), 392, 398, 407. 408, 425, 436, 437, 科
2, 444, 539, 574, 632. 634, 685, 758
算账振 34, 35. 71, 1", 137, 3 赋 3", 432, 453, 468, 758
管理体制 110, 214, 397, 633, 639, 640, 720
精简压缩城市人口 710
蔡元培 59

蔡博 204
蔡铁根 90, 91. 96
蒋介石 32, ", 263, 265 一之 74, 276, 281, 288 — 292, 294, 295, 297 —
307, 309 — 314, 320, 55B, 578, 673, 748
蒋正华 610
蒋经国 299, 30Zt312
裴孟飞 165, 501
赫鲁晓夫 10. 12, 朋, 55, i, 3. 254, 291. 464 — 467, 469, 打久
480, 488, 493, 500, 521, 549 — 563, 566, 5 订, 569 — 574
赵伯平 48
赵恒惕 30
赵凌汉 97
赵家骗 288
赵紫阳 356, 389. 390, "s 赵尔陆 120, 171. 1 刀, 3 肾, 412, 432, 433, 458
赵毅敏 48
十五,
广东省视, 61. 77. 105, 13 么,
i3a, 356, 389, 390, 400, 406, 427, 442, 448, 509. 520, 532, 637, 651, 652
, 685, 7D2, 753, 754
邓力群 156, 643, 728
邓子恢 100, 101, 419, 铝 6, 639, 654, 655, 686, 702
邓 / J' 平 19, 27, 47, 71, 59. 1 叩 — i 叫, 121, 兀
23, 124, 173. 223. 224, 285, 295, 300, 317, 324, 336, 341, 355, 367 —
370, 374, 376, 378, 391, 396. 410, 411. 413, 415, 420 —
423, 436, 446, 454, 495, 631. 632. 634. 648, 650, 651, 656, 657, 659. 667
— 670, 674, 680, 694, 701, 711, 716 — 719, 727, 728, 731, 735 —
737, 744, 746, 748, 750
邓少东 337, 34 之
邓拓 762, 770 — 773
索引
825

邓华 501, 502

郑州会议 156, 160, 359, 365, 367 — 370, 373 — 3 倡, 378, 381, 391, 394
— 399, 401, 402. 407, 413, 453, 474, 482, 4 斜,
509, 510, 622, 648, 649. 675, 677 — 679, 717

郑庭岌 749

郑振铎 229, pZ

郑敦方

韶山 441 — 姘 5, 617, 618, 658, 659 齐民友 229, 231

刘大杰 229

刘子厚 175, 丰 91, 392, 620, 628, 638, 685

刘仁 19, 27, 砩。

刘少奇

7. 22, 27, 31, 32, 35, 47, 49, 51, 57, 58, 64. 71. 121, 124, 156, 157, 180, 2
18, 222, 223, 235. 264, 295, 300, 340, 341, 367, 370, 374, 376 — 3 中
8, 391. 396, 412, 416 — 423, 434, 446。

454, 456, 472, 481, 493, 503, 621, 630, 631, 637 —

639, 650, 651, 6j5, 656, 659 — 664, 674 —

677, 679, 694, 701, 702, 710, 715, 717 — 719. 735, 736, 746, 748 刘光第
97

刘伯承 90, 9 工, 94 — 97, 317, 378, 416, 419

刘其人 93

刘建勋 19, 449. 62Q, 697

刘洪涛 75

刘华清 148

刘} 顿元 14, 17

刘宁一 105

刘震 48

刘澜波 459, 471

刘澜涛 IQ5, 628

欧阳钦工 9, 之 6, 27, 47, 工 05, 367, "5, 628

滕代远 27, 62

潘菽 2 铃

潘复生 19, 55, 74, 75, 75, 50 卫立煌 419

调查研究 237, 363. 37a, 391, 507, 623, 6 各 2, 641 — 644. 650, 654 —
657, 659, 661, 670, 671, 674, 678, 695, 722, 725, 727. 728, 731, 733, 方 3
调整指标 515

调整国民经济的 r 八字 J 方针似 7, 634

鞍山钢铁公司 44, 174, 187, 188, 197, 203, 205, 2()7, 367, 368 鲁康娃 3
之 1, 322

十六.

《燕山夜话》勿 2 — 776 整顿人民公社 144, 150, 151, 373, 381, 384 —
386, 395, 397, 406, (6, 438, 635, 637, 640, 683, 7D2 萧克 92, 94 —
97, 416 萧华 47, 纷 6, 必 s

薄一波 18, 19, 23, 27, 41, 47, ", 72, 124, 126, 127, 130, 132, 156 —
158, 173 —

176, 205, 360, 374. 375, 388, 405, 406, 411, 419, 430, 432, 433。
443. 513, 538, 544, 575, 614, 696, 717, 727. 728, 730, 755, 758
8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春（1958 — 1961）— 乌托年运动

薛赛桥 170, 205, 520, "2, 672 赖亚力 296

赖若愚 100 — 106

钢铁翻番 i 乃, 126, i “—

171, 174, 175, 177, 188, 194, 195, 198, 208, 249, 616, 630. 饵 2

钱俊瑞 246

钱学森 137, 275

钱让能 697, 698

霍士廉驯哺

聂荣臻 47, 72. 100, 359, 419, 493, 496, 5 呱 574, 586, 733, 735 —
737, 751, 752

十七画

应毕农业生产合作社’ 121

戴洁天 689. 690

藏军 318, 321 — 323, 330, 335 — 349
谢富治 27. 47, 356, 656, 6 仞赛甫拉也夫 74
赛柜鼎 · 艾则孜 4 珍
钟伟 399 — 402
韩先楚 446
韩宁夫 192
十八画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0
丛进 611
织 49 妈 70146' b
粮食危机粮食产 t169:177, 514, 533, 706, 715 粮食欢购 703, 711
59(), 616, 618, 703
37, 4 之一 44, 372, 412, 431598, 599, 605
166, . 442, . 703,
十九画
庐山 441, 444 一啊惑,
451, 452, 456, 457, 463, 464, 470, 472, 473, 480, 483, 48 久 487, 招 8,
神
4, 498, 503, 506, 513, 519, 547. 598, 676, 683. . 715, 716. 719, 728. 731,
766, 773 厦山会议 128, 417, "9, 441, "久 448. 450, 451. 453, 454, 45
久 471, 47 么 479. 48 义 485, 492 —
498, 503, 507, 508, 513, 515, 537, 547, 622, 628, 629, 648, 649, 660, 675
, 687, 688, 690, 695, 700 — 702 罗章龙 55, 165, 165, 之 11, 651, 693 罗
瑞卿 419
罗荣桓 27, 71
苏共二十大 7, 10, 12, 89, 如 3, 549, 555
谭延问 30
谭冠三 320, 342
谭政 91. 约 6, 580, 5a4 谭敌龙 165, 165, 211, "1, 693 谭震林 19, 27f34,
钉. 71, 13 咸盍的一

162, 180, 189, 217, 367, 378, 386, 388, 413, 419, 450, 457, 477. 527, 530
, 541, 542, 594, 595, 621, 628, 645, 654
595, 605、652

702

二十画以上

〈党内通信〉424, 428, 啊石, 442 饶漱石 55, 姻。 , 455

索引】

827

显明显准顾复生露祥瑞

23, 203', 433

观潮派 34, 35, 71, 。 7. 174, 260, 392,

398, 453, 妈鸟 463. 拓 8, 758

坛蚜山卫星人民公社 162. 361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也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總序·金觀濤)

- 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總約六百萬字，是目前最具規模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
- 十餘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歷時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注重國際與國內重大歷史事件關聯，揭示中央決策與地方、基層之間的互動
- 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

第四卷

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1958–1961)

林蘊暉 著

究竟毛澤東提出的超英趕美戰略，如何在中共高層取得統一，又何以得到基層群眾的積極回應？一再縮短的趕超時間表是如何編織出來的？在發動大躍進的過程中，有多少中共省級領導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的中共軍委擴大會議為甚麼要拿粟裕開刀？1959年在廬山罷黜彭德懷的真實原因何在？造成大饑荒的主要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究竟有多少？為挽救危機，中共中央又採取了哪些措施？本卷依據第一手資料，作出詳盡敘述和剖析。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第五卷・1962-1965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歷史的變局

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

錢庠理 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五卷

历史的变局

——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
(1962—1965)

钱庠理 著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5
Historical Turn: Responding to Crisis and
Combating Revisionism (1962—1965) (in Chinese)

By Qian Xiangli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全球发行及总代理：中文大学出版社

<http://www.chineseupress.com/>

BookinG 制作

「把当代中国惊心动魄的岁月转化为历史著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愿望，也是对中国历史学家的考验」。（总序·金观涛）

-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总约六百万字，是目前最具规模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著述
- 十余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家，历时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历史纪录，通史与专题结合；注重国际与国内重大历史事件关联，揭示中央决策与地方、基层之间的互动
- 倚重档案、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

一套资料翔实、忠于史实、摒除党派观点的中国当代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约六十万字、八百页；完整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至 1981 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全貌。

「这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作者不但一律以中俄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为基本原料，而且也大量地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每位作者都以批判的态度检查史，对于史料中互相冲突记载，详加考订，以建立最可信的史实。」

——余英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退休讲座教授、
克鲁格人文奖得主

「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后，不仅发现其叙事详尽，更发现其已突破中国官方机构对资料的垄断和保卫，有丰富的文献档案以为基础，史实的可信度极高。每册独立，各有作者，但前后仍有脉络可循，容易阅读。这一套大书的出版是这几十年来近代史学界的一大盛事。」

——陈永发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点：

- 十一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家合力撰写：各卷作者均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国史研究专家，多次研讨，分工撰写，历时七年。
- 全景式历史纪录，通史与专题结合：既有反映高层决策和斗争的重大事件揭示，又有表现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社会风貌和流行思潮的生动画面；各卷独立成篇，又首尾相贯。

·倚重档案、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以中央及地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重大史实作出详尽考订和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目前最具规模、足以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未来走向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著述，是中外各图书馆、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学者和教师的必备参考用书。

十卷目录及出版七卷的内容和作者简介：

第一卷 断裂与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49-1952）

（即将出版）

杨奎松

第二卷 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

1953年至1955年，在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期间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变革，都是以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主线而展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引起了人们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反思。作者依据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对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由此引发党内的「倒刘」风波和「高饶事件」，以至实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作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此外，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苏联给予的援助和贡献，以及这一时期的国防建设和外交活动，也有精辟的论述。

林蕴晖，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学者，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共和国年轮（1953）》、《刘少奇之路——辅助建国（1949-1956）》、《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并主编《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合着《凯歌行进的时期》（1949-1989中国系列之一）、《人民公社狂想曲》；并主编《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中共党史教学参考数据》，第一至二十一册。

第三卷 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56-1957 年被称为「多事之秋」。作者充分利用十几个省市的档案、俄国解密档案、当时的报刊杂志、当事人的口述记录和回忆录，以及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的目标和结果、苏共二十大在中国的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中共八大的作用和局限，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整风反右运动的起因、转变和结局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过程，作出翔实的描述和分析。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名誉研究员。研究兴趣为苏联史、冷战国际史，对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史有专门研究，代表著作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苏联专家在中国》、《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和论文多篇。

第四卷 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

究竟毛泽东提出的超英赶美战略，如何在中共高层取得统一，又何以得到基层群众的积极响应？一再缩短的赶超时间表是如何编织出来的？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有多少中共省级领导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8 年的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为甚么要拿粟裕开刀？1959 年在庐山罢黜彭德怀的真实原因何在？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为挽救危机，中共中央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本卷依据第一手资料，作出详尽叙述和剖析。

林蕴晖，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学者，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共和国年轮（1953）》、《刘少奇之路—辅助建国（1949-1956）》、《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并主编《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合着《凯歌行进的时期》（1949-1989 中国系列之一）、《人民公社狂想曲》。

第五卷 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

从 1962 年起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是一个色彩纷呈、复杂变幻的时段，有人称其为「变局」。这种「变局」，是在大跃进运动遭受

重大挫折、外部世界对中国施加愈来愈大压力的局势下，中国人在理论、观念、政策作出一系列求变求存的调整和应对而发生的。它根本改变了 60 年代中国历史的走向：那些最为重大、最为精彩的政治变动和思想流转，都发生在这个时段；同时，它又开启了更为激烈变动的十年。

钱庠理，毕业于国内重点综合性大学历史系，史学硕士。长期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著有多部关于毛泽东研究和当代中国历史的著作。

第六卷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

本卷简明地描绘出 1966 年 5 月至 1969 年 4 月文化大革命的全景图像与过程：从 1965 年底批判《海瑞罢官》至 1969 年 4 月召开九大期间，文化大革命从发动到形成高潮，从夺权到天下大乱，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到最后召开九大。作者批评文革研究中不实事求是、为尊者讳、粉饰历史、大而化之等弊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史料出发，力求还历史之本来面貌。

卜伟华，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曾编辑多种中共党史数据丛书，合着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等书；也是最早从事文革研究的学者，发表过〈红卫兵运动与「文革」前的学校教育〉、〈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北京红卫兵运动大事记〉等论文多篇。

第七卷 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

（即将出版）

高华

第八卷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

1972 年至 1976 年文革结束，发生了一系列至今仍众说纷纭的重大政治事件，例如毛泽东曾考虑哪些人当接班人？周恩来为甚么要做痛苦的反省？中阿、中越为甚么翻脸？谭甫仁中将为甚么被刺杀？公安部长李震是自杀还是他杀？毛是否因「红都女皇」事件要把江青

撵出政治局？周恩来对美国人说了些甚么而被批判？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是防备谁？批邓是毛的决策还是「四人帮」的挑拨？「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是毛的遗嘱吗？谁首倡粉碎「四人帮」斗争？「四人帮」有没有政变计划？作者利用档案数据，一一严肃考辩，揭示个中真相。

史云，在重点大学毕业后历任大学讲师、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问题的教学与研究，特别专注于 1970 年代以来的中国研究。发表过多种有关中国当代经济体制变革、周恩来经济思想、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大革命人物的研究著述。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冷战国际史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外交史。主编有《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等书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第九卷 革命的终结——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6-1978)

(即将出版)

韩钢

第十卷 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 (1979-1981)

文革结束后，中共怎样清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重新阐释自己的意识形态，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找到正当性？人们的思想如何不断获得解放？数以千万计的冤假错案如何得以平反？如何促成华国锋下台，确立邓、胡、赵新体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怎样起步的？改革为甚么在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党内党外何以会出现民主化思潮？中共提出政治改革又何以迅速地退缩？对于历史大转轨中频繁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争论和冲突，作者都尽可能依据第一手资料作出详尽叙述。

萧冬连，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当代中国史学者。主要著作有：《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共和国年轮（1961）》；合着有《强国的方略——中国五十年社会主义战略的演变》；合编有《中国改革大词典》。

总序：世纪视野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金观涛

经过差不多近七年的努力，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终于分批出版、与读者见面了。对我来说，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一直把能否出版一套忠于史实、观点开放的中国当代史视为对中国历史学家的考验。

把当代中国人经历的惊心动魄岁月转化为历史著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愿望。我们这一代人和人民一起经历了苦难，又见证了启蒙时期思想的风雨雷霆，这一切理应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然而我深知这一工作又是多么困难。

首先，作者必须掌握尽可能完备的史料，特别是档案文献。近年来，出版了大量回忆录和口述历史数据，但是很多重大事件以及与中共高层决策有关的档案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为写作带来困难。在历史学家的写作中，除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史料外，更为复杂和重要的，是对史料的辨伪和确定其在决策过程中起过的作用，只有少数长期关注该领域的专家才具备这种能力。十分幸运的是，本套书的撰写正是依靠了这批有深厚档案功底、又长期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家。他们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及市县档案资料馆，搜集整理档案并对史料辨伪。史料之丰富、辨析之充分，正是本套书的重要特色。

历史研究者的目标是追求历史的真实，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搜集史料、整理档案只是第一步。历史学家在研究和写作中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如果不能做到对历史场景的同情了解，不能在内心重演历史事件展开过程以及理会当时支配事件展开的普遍观念，就无法接近历史的真实。本套书以 1949 年至 1981 年中国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论述主线，这三十余年正是毛泽东思想支配中国的时期，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令人很难理解的现象，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由于本套书的作者都是中国近几十年巨变的亲历者，完全了解这

些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氛围，这就使他们具备了某种比西方史家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优势。当然，作者要发挥这种优势，仅仅停留在感性阶段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某一种意识形态中走出来、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以获得超越的视野。开始注意到支配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与重大社会事件的互动，特别是这些事件是如何从中央决策到地方、再到基层展开的，是本套书的另一特色。由于各卷作者是独立写作，分批出版，虽然现在对全套书作出整体评价尚为时过早，但是，我可以不无自豪地说，中国人终于开始为不寻常的二十世纪中国撰写大型历史著作了。

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不设主编、以便各位作者在写作时有更大的自由，并表达多元的价值。由此带来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统一风格，使十卷著作组成连续的整体。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动笔之前充分讨论各卷内容，每年举行一到两次工作会议，切磋写作中碰到的问题。至今，我仍不能忘怀一次又一次的国史写作讨论会。窗外是北国的寒冬，大家众集在不大的会议室中不分昼夜地讨论，最后形成会议纪要。这一场景使我想起 1970 年代末青年时代和朋友的彻夜长谈。很多时候，大家就某一观点，细节甚至是提法，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使我十分感动的是，无论在讨论中发生多大的争论，甚至是立场和价值上的分歧，最后都能在忠于历史事实之上得到统一。根据时段，本书大约以两三年为一卷，每卷由一位或两位作者撰写，而其它作者都把自己对该时段的见解和史料提供给该卷作者，整个写作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今日中国学术界罕见的真诚合作精神。在此意义上讲，这套书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

组织编写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我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所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这套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沈志华和李丹慧夫妇，从确定撰写计划到寻找适当的作者以及整体工作的协调，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其次，我要感谢青峰和先后在《二十一世纪》编辑室工作的同事黎耀强先生、林立伟先生、张志伟先生、朱敏翎小姐和张素芬小姐。他们在青峰的带领下，以巨大的热忱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投入编辑出版工作，否则，如此繁重而浩大的编辑出版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还要感谢中大中

国研究服务中心为本书作者提供的支持和热情周到的服务。最后，我要感谢方正兄，该书从酝酿到出版，一直得到他在精神上和各方面的支持。他虽已退休数年，但仍念念不忘这套书的出版，认为它对香港中文大学有重重要性。在这些中大同事身上，我仍可以感受到高锟教授任中大校长时期那种注重中国研究在当今世界意义的「中大精神」。

这套书出版之时，我也到达退休年龄，将开始人生的新阶段。我想指出的是，由于可以看到的档案和其它种种限制，这套书只写到1981年。如果不谈此后发生的波澜壮阔的80年代启蒙运动，以及出此引发的1989年震惊世界的事件，我们仍无法理解今日中国和世界。在这一意义上，仅仅由前十卷组成的二十一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不完备的，写史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从来就有忠于事实和敢言的历史传统，但很少有史家为当代写史，故这套书的出版是一种新现象。它说明中国历史学家已走出仅仅用春秋笔法褒贬益损，并展示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历史反思意识已经产生，并开始指向新的深度。我期待着后继者。

200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 录

总序 金观涛

导言

第一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一 最初设想：先搞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

1 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

第一章 天人之惑

一 问天

二 问地

三 问人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七千人大会」及其围绕大会所产生的分歧

一 为甚么要开七千人规模的大会

二 一致耶？分歧耶？

三 矛盾与选择

四 分歧在延续

1 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的质疑

2 对错误表现形式的揭露

3 对错误发生根源的认识

4 挑战「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五 刘、毛、林：三个各有「弦音」的讲话

六 并非尾声的高潮

1 工农业生产高指标到底发生在甚么时候？

2 关于「第二次跃进」的起因

- 3 关于高指标产生的影响及其纠正之困难
- 4 关于产生错误的原因
- 5 关于「反倾向斗争」

第三章「非常时期」

- 一 西楼会议
- 二 重设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 三 著名的「五月会议」
- 四 非常措施

第四章 包产到户：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个症结

- 一 归去来兮责任田
- 二 「河北有个胡开明」
- 三 风起高墙
- 四 摊牌

第五章 调整风云

- 一 甄别平反与纠正错误
- 二 彭德怀上书风波
- 三 「脱帽加冕」
- 四 早春天气乍暖还寒

第六章 缓和与霜冻

- 一 出现缓和
- 二 平波之下的涌浪
- 三 王稼祥的建议书

第七章 重提阶级斗争

- 一 何来忧患？
- 二 「东临碣石有遗篇」
- 三 「警钟长鸣」

第八章 抓住龙尾

- 一 寻找阶级斗争
- 二 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有了纲领
- 三 夹缝中的经济调整
- 四 阶级斗争样板
- 五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 六 刘少奇动了「真格」

第九章 对决

- 一 引火线
- 二 反击
- 三 破裂
- 四 「三家条约」
- 五 公开论战
- 六 赫鲁晓夫下台
- 七 断裂

第十章 紧张的政坛

- 一 批鬼戏
- 二 批「两界」
- 三 「两个主席吵架」
- 四 「二十三条」
- 五 酝酿「新革命」
- 六 点火
- 七 罗瑞卿事件之谜

第十一章 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 一 走向大分化
- 二 「最冷的冷战」
 - 1 关于中国的核武器计划
 - 2 中美敌对的第二个问题：越战的迅速升级
- 三 寻找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
- 四 「动荡」和「分化」环境下中国国内经济运行的突然转轨

五 国际与国内政治的一种特殊交互作用

第十二章 需要「精神」的时代

一 时代精神的桩柱

二 时代精神的标志

三 时代精神的异化

后记

附录

大事记

参考文献

索引

导言

也许，用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观感，可以避开人们习惯了的历史思维定势，从另一个角度勾勒二十世纪 60 年代前半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面貌。这种办法，如同从地球观察月亮或其它太空物体一样，由于阳光的折射，使它们显得更立体、明亮和透彻。

如果从本卷开端的 1962 年讲起，那么有这样几件事情，是中国以外的世界所难以忘却的：

第一件事。

1962 年年中，从广东省深圳斗及大陆同香港毗邻地区，越界私逃香港的人数突然猛增。在高峰期，一周的外逃人数几乎等于此之前一年的总数。香港警方当时极为震惊，试图强力加以阻止。但私逃客如过江之鲫，「破网而入」。据今天见到的一些材料透露，从 1954 年到 1978 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 56.5 万人次，逃出 14.6 万多人。其中，1962 年的偷渡外逃是第一个「高潮」。当时，广东全省共发生外逃事件 11.7 万多人次，逃出 3 万多人。这样一个数字，同 1979 年上半年发生的最大规模的逃港事件相比，其成功出逃者的数量仍要多出近一万人。’毫无疑问，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人涌入香港，香港的 1962 年夏季，变得紧张、惶惑和繁忙了。可以想象，那些偷渡者们只

1 杨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广东群单偷渡问题研究〉，全国党史系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丫半 f 、入甲弋斤开州人一叩么 ‘ 警 1 1 7u 斗让 JuJ) 石亡人写丫又驯

身或多人涎而走险，从一切可以出境的地方 1 用一切办法走向一条可能是不归路。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广东、福建的农民。在他们眼裏，香港就是天堂。那裏有饭吃，有钱赚，也更自由。为此，他们付出了

惨重代价：抛家舍亲、东躲西藏、惨对牢狱、平遭白眼。可这一切他们都忍了。

大陆人大量私逃香港，不仅让港英方面措手不及，更让美国人震动。开始时，美国情报部门搞不清为甚么这时会有这么大量的大陆人，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突然涌向香港？继而，他们猜测，是大陆政府有意而为，纵容人们逃亡香港。不管怎样，美国人对这个突然而来的「外逃潮」疑虑甚多‘大陆中国究竟发生了甚么？那裏的饥饿状态到底达到了怎样的程度？中国共产党政权是否还能有效地控制社会？人民的反抗情绪到底有多高？台湾蒋氏父子一直在试图反攻大陆的计划真的有了可行之机？

后来，美国人认识到，大量的大陆人集中外逃，基本原因就是饥饿。不管进行怎样的评估，大陆人的饥饿程度和范围，还是超出了一般人想象。这一点，是美国人从逃港的大陆人那裏逐渐获得大量第一手情报，才最后予以证实了的。他们当时曾得出一个结论，即大陆的经济困难和粮食紧缺，将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动乱。对共产党政权来说，这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不过，美国高层并没有因此而制定某种行动计划，来立刻颠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权。他们还是保持看「冷静观察」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

历史证明，美国决策层的这种态度是明智的。中国虽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挫折，虽然人民的生活曾一度极端困苦，但国家没有发生动乱。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合法性仍然是人民的最高认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闲有广泛的号召力。人民相信，领导他们推翻了旧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这个国家的领导力量，是国家富强和社会安定的希望所在。甚至，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纠正所犯错误，在努力实践社会平等的诺言时，人民对共产党反而更加信任和热爱了。在 1949 年后的整个时代，这完全是真实的。

因此，美国人不但没有采取「颠覆」动作— 这是通常大陆中国人习惯接受的意识形态宣传— 企图在那个特定时期趁乱搞垮「红色中国」，反而在 60 年代初期的对华策略方针上，逐渐有了「现实」的苗头。所谓「现实」，就是倾向于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现实存在一

在此之前，美国政府至少在对外宣示上，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存在的。可是，在 1962 年前后，也就是肯尼迪政府开始执政后，他们有所变化。在那时，他们甚至改变了对中共政权的称谓，正式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意味看，美国决策层意识到了早晚要同「红色中国」打交道。无视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大国，是没有道理的。二十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中蕴含的这种微妙变化，现在仍未细致严谨地为中国大陆的主流历史话语所接受。这多少有些遗憾。尽管如此，美国从 1962 年中国内地人大量逃港事件中，还是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在此之前，中国大陆是极端封闭的。外界很少能透过冷战鼓吹者所宣扬的所谓「铁幕」，看到中国大陆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而在二十世纪初年代的中前期，通过大陆大量逃港人员，美国情报部门终于获取了关于中国内地情况的真实情报。这些情报经汇总、梳理和分析后，以摘要形式报送给总统。今天，研究者可以没有任何阻碍地在美国档案馆里看到这些情报汇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情报汇集在美国最高决策中曾发生过重要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1962 年大量内地人出逃香港，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局势，同时也造成了一种「蒲公英现象」：被风吹起的蒲公英，摇摇曳曳飘向远方。它们把稀缺的信息带到了外界。那么，这些信息究竟怎样影响了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它又怎样涉及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以及这种信息所包含的寓意，在中国内部反映的是甚么样的矛盾冲突与现实发展，就将是我们所特别应予关注和揭示的了。第二件事。

1962 年 10 月 20 日，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军队迅猛突破印军构筑在中国境内的地堡工事，击溃和俘获了大量印度军事人员。之后，中国军队又迅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后二十公里，并宣布停火。这件事瞬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作者澳大利亚人马克斯韦尔，他对中印边界冲突作了这样的评论：「中印边界争端是二十世纪中叶国际关系史上富于戏剧性的一段。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亚洲的两个伟大的新共和国，尽管政治性质不同，似乎已经走上和睦合作的道路，

但后来却为了几块荒凉的、艰险的、没有甚么价值的土地争吵起来 1 还打了一场短促而剧烈的边境战争。印度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由此一落千丈。」“这个评论表达了当时世界上相当一些人对中印边界冲突的观感。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尼赫鲁总理有着极端强烈的大国欲望。他拒绝同当时相互对立的两个集团联系在一起，而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本来，尼赫鲁的目标很明确：如果要集中发展本国经济，就需要在北方同中国保持一条友好、和平的边界。然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使他变得轻率固执起来。他执意要把历史遗留的有争议的边界问题，看成是民族尊严和自尊心的重大问题，从而不惜一切地要在他认为的属于印度领土的那些没人居住的高山上，向中国一方推进，挑起战争。不幸的是，边界冲突使印度支出了巨额军费，并在军事失败的后果中，损失了本来应有的国际国内威望。同北方强大的中国交恶，也在地缘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遗留了恶果。因此有评论这样说：「支撑尼赫鲁的各项政策的拱门整个垮下来。尼赫鲁的统治地位也会随之告终。」 3

中印边界冲突对中国也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复杂后果。已有大量著作对这场短暂战争进行过描述。但如果从世界对这场冲突的看法而言，中国当时却承担了更为沉重的压力。因为，无论苏联还是世界的舆论，都在给中国施压。而在这其中，与中国有着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联，不但不站在中国的一边，反而以所谓的「中立」立场，谴责了中国的行为。早在 1959 年 8 月底朗久事件发生后，塔斯社就不顾中国方面维尔· 马克斯韦尔 (Maxwell Nevilt)：《印度对华战争》，上册 (北京：三联书店，1971)，页 1。

内维尔· 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上册，页 1 — 2。

导个计森

面的劝阻，坚持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表面上对两方都未伤害，只是说苏联对所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并对有人 (指西方报刊) 利用这个事件离间两个亚洲国家关系、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而感到惋惜。可在中国人看来，苏联的做法非常值得怀疑：既然中苏是同盟国家，为甚么你苏方要发出这样一个不问是非曲直的声明？朗久在麦克马洪线中国一侧，而你苏联却对冲突双方表示遗憾，这就在事实上偏袒了制

造事端的印度一方，是在实际上「拉偏手」

中国坚持认为，苏联这样做，是出于它正同美国人进行的「示好」行为：赫鲁晓夫像孔雀一样，张开它美丽的尾羽，向美国人展示自己的亮丽。可是，正如中国的一个俗语所说，孔雀再美丽，也无法在张开尾羽的同时，掩饰住难看的屁股。赫鲁晓夫当时极为自信地声称，他已经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把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战争彻底消减掉。而在 1959 年整个夏季，赫鲁晓夫都在寻求同美国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当年 8 月，他完成了自己十分得意的美国之行，号称建立了「戴维营精神」。正在这样一个兴致勃勃的时候，发生了中国同印度的边界冲突。之后的三年裹，中印之间在荒凉的喜马拉雅山麓和帕米尔高原上紧张对峙，直至发生 1962 年大规模军事冲突。赫鲁晓夫似乎有理由认为，中国的行动「破坏」了他「战争可以避免」的诺言。而中国则认为，苏联的立场是有意贬损中国。赫鲁晓夫宣称的美丽的「三无世界」，不过是一厢情愿。他的「拉偏架」的做法，犹如孔雀的屁股，是掩不住它的丑陋的。

冷战中结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取向与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几乎在一开始就困扰着这个阵营。即使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人们事实上也难以作到「铁板一块」。50 年代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充分说明了「阵营」没有强求的统一，只有「压服」下的叹息。而 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在共产党阵营的整个对内对外策略上，形成了巨大的分歧点。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更造成了中苏、苏东国家之间极大的意识形态争端。此外，人们对永远服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 苏联的意志，各具自己的想法。更何况，所谓共同意志，长期以来大都对苏联有利。因此，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矛盾，不可能融解和调和，正如中国的那句老话所说，这是「秃子头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实上，中国早在 1956 年前后，就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了。不管这条路是否真的找到了，但中国试图摆脱苏联的行动「轨迹」是明显的。至少，中国不想亦步亦趋地跟随苏联。特别是在没有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世界，人们敢想、敢说和敢做的欲望被大大激发了。对毛泽东本人说来，以他的独特经历和性格，特别是

他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所获得革命成功的威望，使他不可能屈从斯大林后辈们的意志。他理所当然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做出一些不同凡响的业绩来，用他自己的那句名言说，就是「他们（苏联）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在国家现实利益上，中苏之间也有深探的芥蒂。且不说老沙皇，就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 30 年代中对中国的所作所为，也是对中国欠账颇多的。东北、新疆，铁路、贸易，令毛泽东和中共屡屡感到不快和激愤。因此（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不仅使中国难堪，更令中国人感到愤慨。中苏之间关系「闹办」的伏笔，已然被种下了。1960 年 2 月 6 日，苏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说：「以为印度这样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家，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那是完全不严肃的。」‘这段话是在中苏分裂之后被「揭发」出来的，成为中苏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证词。当然，苏联的这一看法，暴露了他们同中国之间完全不相融的国家利益立场。这种分歧，由于国家利益而变得更为不可调和了。当时中国认为）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公开偏袒印度，不但将中苏矛盾暴露给世界，而且突出了中苏之间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分裂可以说同中印边界冲突如影随形。在另一方面，中国还认为，印度侵略性质的「前进政策」，受到了美国的纵容，尼赫鲁正在加紧向美国靠拢。有证据表明，从 1947 年到 1959 年的十二年中，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总共有 20 亿美元* 而从

4 《人民日报》编辑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1963 年 11 月 2 日。

1959 年到 1962 年，美国对印承诺的援助，已经是这个数目的两倍以上。因此，中国得出的结论是：「印度越是反华，美援就越增多。」，由此看来，马克思韦尔的确低估了发生在「几块荒凉的、艰险的、没有甚么价值的土地上的争吵」的意义。准确地说，在中印边界冲突的背后，裹挟着中国同世界的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恰恰勾连在 1962 年前后，特别是围绕看中国同北方强大的盟友苏联，以及同西方同样强大的「寇仇」之间展开，这就不能不深深影响着二十世纪 60 年代

前期中国的走向。

第三件事。

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公开和两国关系的最终破裂，是让二十世纪60年代前期整个世界都极为惊异的大事件。

一般认为)中苏关系走向公开破裂的起点，是1962年的秋季。当时，在相继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东道主公开点名批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参加上述各党大会的观察员，也在会议上对这些点名批判进行了回击。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阵营大论战爆发了。可以说，中苏公开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是二十世纪最具影飏力的重大事件之一。由此，世界的一系列基本格局开始改观。无论是持续的冷战，还是具有广泛和深刻影飏的社会主义理念，都因此发生改变。一位中国学者曾经指出：「60年代，没有甚么能像中苏分裂那样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发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同样，在60年代以后的将近40年时问裏，也没有甚么能像中苏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那样，对世界政治的走向产生如此重大和探远的影飏。中国是这场政治分裂和理论争斗的顽强一方。同时，它又在这场争斗中不断地推动自身的转变。从历史走向考察，这种转变是以一个「之」字型为特征的。所谓「之」字型走向，是说中国政治运行的先「左」后「右」（需要说明的是，这裏的「左」是政治概念，而「右」

《北京周报》社论：〈中印边境问题〉，1962 钊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 《长沙：

年8月17日。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页17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则不是政治概念。它更多的是形象地指中国对外关系的路向选择）。正如大多数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政治结果，推动了中国国内政治向「极左」转。1962年下半年，中国国内政治出现一个「锐角」式的变化：原本以纠正「大跃进」中形成的错误、缓和国内政治紧张关系为主导的政治走向，遽然为「重提阶级斗争」所打断。中国「国内的修正主义」这个概念，就首先是在1962年9月中

共八届十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此后，这个概念在政治运行中愈来愈被具体化、特指化、目标化。而 1961 年的苏共二十二大，由于提出了所谓「三和」、「两全」（系 r 和平过渡」、「和平共处 j 「和平竞赛 j ；「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缩略语），而被中共方面看作是 r 修正主义」走到了「最高点」和「成熟点」。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看来，修正主义真正有了现代版的「靶子」。于是，中国国内的所谓「反修防修 j 变得实质化了。从 1962 年起发生的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激烈批判，从 1963 年开始掀起的全党全民卷人的「四清 j 与 r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但确立起了 F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脉」这个政治概念，而且造成整个政治性的紧张和对敌斗争意识。如果说这种整个社会的政治紧张和斗争意识是一股洪流，那么，它的聚集力和冲决力，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在这股洪流的尽头，人们终于看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人形容，在中苏两国难以妥协的争吵背后，始终站立着一个黑影，这就是美国。对于中苏同盟，美国始终保持着小心翼翼的研究和观察。它希望看到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的裂隙，并进而利用它。大约在 1963 年夏季，肯尼迪政府大致确定，中苏分裂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两相比较，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更为「激进 j 和「好战」。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更直接和更大的威胁。美国前驻苏联大使波伦甚至把中苏两党比作「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而中共就是更为激进的「左派」布尔什维克。因此，美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对中国继续施加压力。不过，几乎所有的美国当权者都从这个分裂中意识到，美国虽不能预期在短时间内从中苏分裂获得好处，但从长远观点看，这个分裂肯定将有益于美国的利益。

导合 a

事实证明，美国人的观察并不虚妄。在不到十年裹，中美关系的确由于这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分裂，而演化出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积极成果。在中国方面，中苏分裂使中共获得了更加独立自主的战略空间，随之，它整个的对外战略及其理念也发生了一系列大转变。这些转变经过必要的准备和铺垫之后，使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某种看法变得更实际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在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变得比过分意识形态化

的东西更具有优先性。此后，世界流行起「大三角」、「一条线」、「两霸争夺」、「三个世界」等一系列政治概念。世界格局因此而被深刻地改变了。

中苏分裂给中国自己 and 世界都带来了深刻的转变。虽然，在全球意义上说，中国并不具有改变世界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实力和影响。但从近现代以来，它自身的改变的确在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尽管这种改变有大有小，有长有短。因此，研究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国内部的变化，分析这个变化及其后果，就成为勾画这段历史的最重要任务。第四件事。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在西北的试验场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个消息本身，也如同一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震动了世界。因为从这一刻起，地球上的核大国增加到了五个。

显然，世界上最关注这件事情的是美国。肯尼迪政府执政之初，美国的情报人员就曾经推断，中国不久即可能加入核俱乐部。1961 年 1 月，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部报告华盛顿，中国可能于 1962 年底进行原子弹试爆，到 1965 年，中国很可能拥有少量可用于实战的原子武器。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回忆，肯尼迪本人曾认为，「60 年代最大事件很可能是中共的核武器爆炸」

出于反共意识形态和安全考虑，美国格外忧心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60 年代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认为，北京的核计划将造成比军事还要严重的政治和心理问题。因为它会在世界形成一种概念：共产主义将是未来的潮流，这潮流将引起人们的心理分化。在亚洲，中国的核试验可能会使它经济发展模式的信誉提高。人们会对资本主义式的体制以及美国的实力产生怀疑。中国的核试验将使许多国家更主动，r'、M、，'→门'、

地接近中国，从而，使美国在东亚甚至更多地方的影象受到削弱。美国以盟国名义所进行的各种干预行为，也将遇到麻烦。在安全层面上，美国决策层忧虑的是核扩散。美国官方认为，一旦有核国家数量稍许增加，世界不稳定因素就必会加大，非理性和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更难以控制了。

对于中国日臻成熟的核计划，美国设想了多种办法，目的是将它「扼

杀在摇篮」裹。在不断派遣间谍飞机冒险前往中国西北进行高空侦察的同时，美国在做两方面的事情，一是加紧同苏联谈判达成一项部分禁止核试验国际条约；另一个是探讨用武力摧毁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战略计划部门和国防部专家们一共设计出如下四种方案：（1）由美国发动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的空中打击；（2）由台湾空军进行空中打击；（3）雇佣在中国的国民党特工人员进行地面攻击；（4）空投国民党军队。显然，这四种方案都是以极大的政治和军事代价为前提的，它们的实施决非易事。美国高层甚至还设想，可否用鼓励和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的办法，来抗衡和消除中国核武器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此外，为了遏制中国的核计划，美国还希望同苏联联手对付它。但这个计划同样难以实现。因为此时的苏联，更关注美国倡导的欧洲「多边核力量」计划，特别是对西德的有核化非常反感。因为那才是它来自西面的现实威胁。而在中国核武问题上，苏联反而表现得「放松」。因为苏联比美国更清楚地知道，中国即使有了核武器，也无法在短时期内构成对苏联的战略威胁。赫鲁晓夫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中国的核计划没有那么厉害。有了核武器，中国会更加自我约束。因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他准是叫得最凶的人」当所有的办法都被设想，当人们还在对这些办法争论不休时，在中国西北大漠深处，一个蘑菇状烟云已腾空而起。直到这个时候，美国决策人才不得不承认，对于中国的核武器，美国只能以政治方式和外交方式加以应对了。」

可是，大洋彼岸的中国，此时却成了欢乐的海洋。当周恩来把核试验成功的消息提前告诉参加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三千多名演员时，他不得不微笑着制止蹦跳的人群：「不要把人民大会堂的地板震塌了」

中国人有理由在心理和实力两方面，为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欢呼。首先，那是一颗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核武器。众所周知，中国在1955年开始启动核计划。当时，中国的铀矿资源被首次探明。50年代，苏联根据中苏间的协议，曾允诺帮助中国试制原子弹。但在1959年他们却终止了这项援助。苏联人的这种「不够朋友」的做法，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于是有了以苏联废除援助中国核计划的日期为代号的中

国核研究计划—「59·6J」计划。后来，外界曾猜N1J，中国的核工程得到了当时在中国的一位美国人的指点。197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访华时，郑重要求他的同学、中国原子武器的主要设计者之一邓稼先证实这个传言。邓在请示了周恩来后，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中国核计划完全自主的设计过程。杨振宁为此极度兴奋。他竟在一个重要的礼仪场合留下眼泪，从而不得不请化妆师替他补妆。在任何人看来，中国的核计划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它从提议到完成，仅仅用了九年时间；如果从「59·6J」算起，它才经过了五年时间。其次，这是一颗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环境中造出的原子弹。这种困难除技术方面外，更多的是指物质的极度匮乏。刚刚经历大跃进失败的6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状况下降到了最低点。诚如上面讲到的那样，当时吃饭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问题。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核计划并没有停止。中共中央特地成立专门委员会，统筹领导核武器的研制。全中国人民「勒紧裤带」，为这颗原子弹奉献了自己最迫切需要的东西；科学家们克服了极大的技术和物资困难，终于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吓唬人」的。这句俏皮话具有双重意义：对外，它为不太平和并且充满敌视的世界放下了一个严重警告；对内，它使人民更加看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玉汝于成」的精神威力。中国有了原子弹，这件事对中国人的凝聚力，是外人难以理解的。特别是在物质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困难的环境下，人的精神力量比物质力量还要来得重要。世界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才能在观察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历史的进程时，增加更多的悟性。

第五件事。

谁将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二十世纪60年代前期，愈来愈成为大国政治家们感兴趣的事情。

从1935年在贵州召开的遵义会议算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已经建立和持续了近三十年。除斯大林和铁托外，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是世界上时间最长者之一。到1963年，毛泽东

将届七十高龄。从生理意义上，人们自然会想到毛身后的接班问题。但事实上，对毛泽东接班人问题的关注，主要还不是从人的生理意义上引起的。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愈来愈显著，是人们看重毛泽东接班人问题的潜在原因。诚如上面提到的几件事情所表明的，中国不仅在党的政治关系方面同苏联闹僵，使得两国关系的破裂不可避免，进而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严重分化，而且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树立起愈来愈不能低估的影响。此外，中国在政治上的感召力在逐渐增大。许多国家中的许多人，对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感到兴趣。甚至，二十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激进思潮，也受到「中国式」或称「毛式」模式的感染。例如，发生于 1968 年巴黎的「五月风暴」，就明显表露了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二十多年来，欧洲的左派力量第一次发现，他们一直羡慕的远方其它大陆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暴，突然有一天也在自家的门前发生了。」⁷ 这是当年一位风云一时的欧洲反叛运动领袖的回顾。他在述说激进运动的起源时，明显带有对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崇拜和认同。这说明，「毛泽东式」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还有「越南式」和「格瓦拉式」）。对这样一

⁷ 塔里克·阿里(Tariq AID· 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 着，范昌龙等译。（1968 年：反叛的年代》（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页 7。

等言

个「辐射力」强大的国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中国马上就要加入核俱乐部。它在军事上真正具有了「五大国」的实力。上述种种情况同毛泽东的生理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大国政治家们存在某种渴望：越早知道谁将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主导者，越有利于设计未来同中国关系的框架。

这种渴望是以颇带戏剧性的一幕开场的。

1961 年 9 月，英国退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这是继他 1960 年短暂的五天访华之后第二次来到中国。蒙帅是二次大战的英雄，在北非打败过德军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因此声望卓著。他比毛泽

东大六岁，此时已满七十四周岁。按照中方确定的接待计划，除由外交部长陈毅在他到京时接谈一次外，中国方面同他会见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没有见他的安排。但是，在蒙帅访华接近尾声时，毛、刘都破例会见了他。刘少奇9月22日下午的会见没有太多实质内容。但毛泽东在武汉却出乎寻常地两次同蒙帅谈话，其中9月24日下午的谈话，主要就是谈自己的「继承人」问题。在蒙帅看来，这颇有点意外。因为世界上大凡有魅力、有统治力的领导人，比如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联邦德国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和法国的戴高乐，都「非常讨厌提出他们的继承人」问题。毛泽东之所以同蒙帅谈继承人，其实是对蒙帅做法的一个响应。因为蒙帅在太原和包头访问时，是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别在不同场合随意向三个人（工人、农民、学生或服务人员）突然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当然，他得到的答复都是「毛主席」。后来，他在西安和三门峡又突然分别向三个人发问：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蒙帅如此发问，使得普通中国人感到茫然。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心中只有毛泽东，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毛泽东会「不在」、谁将是他的接班人这类奇怪的问题。因此，几个人的答案也就不一致了。‘正是蒙帅的这种「抽样调查」式的举动，引起了毛泽

8 熊向晖：〈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

共党史出版社，1999），页384

r 继承人 J〉，载《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

州笔八氏升于口四天’矛江孕汇梦 D 必一 1 梦 b)) — 灯叉呀支旬

东的注意。毛决定「捅破窗户纸」，告诉这位友好的西方军事统帅，中国共产党领袖继承人没有秘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中共比斯大林要高明得多。’

这次关于「继承人」的谈话，因当事人熊向晖的回忆，今天已人所共知了。毛泽东告诉蒙帅，刘少奇是中共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并表示自己要在七十三岁去见马克思。蒙帅听后很感动，但也开了一句玩笑说：如果我知道马克思在甚么地方，我要就这一问题同他谈几句。毛泽东听后大笑。会见

在非常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毛泽东似乎在不经意中就把中共党的接班人问题，捅给了整个西方。

目前我们得知，蒙帅到中国打听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并非出自个人的好奇。西方著名「文革」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一个注释中透露，在为蒙帅出访中国的准备会上，正是麦氏建议，蒙帅应该向中国人提出关于毛泽东的接班人和接班人的接班人问题。” 麦克法夸尔教授当时是西方唯一一本公开出版的研究中国政治历史的刊物——《中国季刊》的主编。这本刊物在英国编辑，但受到美国的资助，它同美国的中国研究界甚至政府部门，有着种种联系。麦氏本人出身英国上层，担任过英国工党议员，对中国政治和历史有极大兴趣。因此，他的提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西方政治学术精英们的意向的。

这个判断言之有据。因为美国人当时正就这个问题进行详细调查。CIA（中央情报局）解密的档案揭示了这一点。

1964年3月19日，CIA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和继承问题》的机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应该是美国情报

9 熊向晖：〈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载《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页386—387。事实上，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并没有比斯大林高明多少。由谁接他的班这件事，曾引起中国巨大的政治变故。

10 Roderic MacFarquhar,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Room: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 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

部门在60年代中期对中国进行系列情报研究的重要文件之一。备忘录在导语部分认为：1、目前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所有人员都属于第一代革命者。在政治局的十八个成员中，六十至七十九岁的人占了绝大多数。毛泽东已过七十岁生日；2、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威望最高者。中共的最高核心层稳定；3、毛公开确认自己的继承人为刘少奇；4、在中共第二代中——所谓第二代，是指现年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的一批人——谁来接班还尚不能肯定。综上所述，CIA在确认刘是毛的接

班人这个关键之后，更关注的是谁将成为刘之后的中共接班人？他们这样看，同分析中共的第二代有关。因为 c 伏认为，刘和毛都属中共第一代革命者。在年龄上相差不多。刘即使接毛的班，也是同代相传。其远景意义并不明显。而中共日后走向的关键在第二代。选取第二代中某个人接班，才具有接班意义。

CIA 经过研究认为，在中共第一代传接过程中，除刘接续毛外，应该还有一个「第三人」。在 F 第三人」之后才能延伸到第二代。CIA 通过排列、分析认定，这个 r 第三人」只能在周恩来、邓小平和林彪三人中出现。

CIA 对周、林、邓三人的看法是饶有兴味的：首先是林彪。中情局的专家们注意到，林是中共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当时只有五十六岁。作为国防部长，他在战争年代战功显赫；1958 年后，他出人意料地进入政治局常委并被选为党的副主席。这是作为接班人的明显迹象。但专家们最终否定了林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性。因为据他们所知，林正患「慢性结核病」，这对接班是致命的。其次是周。在西方人的观察中，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最具威望、资历和人格魅力的领导人之一。他排在刘之后作为中共的第三号人物是无可争辩的。周在政治上成熟、干练，特别是他比别人更了解外部世界，在大国政治家中有良好印象。但是，中情局专家们还是否定了周作为「第三人」的可能性。其根本点在于，除年龄因素外，周在中共党内属「温和派」。而「温和派」在意识形态日益「激进」的趋势下，是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的。最后是邓小平。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中共党内的「第三人」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是邓小平。原因是：邓在政治局是最年轻的人之一；他属于中共的第一代；在目前中共政治格局中，他执掌书记处，是最有实际权力的人之一；在意识形态上，邓反苏态度尖锐犀利，属 r 激进」一派。中情局认为，邓是当前最受毛器重、被认为是最能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专家们肯定，邓小平的政治崛起是不容否定的。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历史的汰选，中情局专家们的判断终于得到了验证。可以说，他们有对也有错。但有一条他们没有预料到，就是邓小平终于在历经磨难之后，成为包括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党的精英的「核

心」。这一点，对中国、对中美关系、乃至对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怎样说，二十世纪 60 年代美国和世界上一些人对中共接班人的关注，透露出了一种强大的「中国影响效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康伦报告」，美国学术理事会组织出版的「中国研究丛书」，以及「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理念等等，都是这种「效应」的反映。这一点是研究者不能不承认的。

第六件事。

美国侵越战争的严重扩大化和升级，造成了印度支那形势的爆炸性。面对现实威胁，中国作出了重大和实质性反应。为此，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这个山林密布的区域。

美国注意到了中国的反应，但很难说它对中国意图的分析是精确的。美国更主要地是从军事层面考虑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意义。而中国则必须从政治、安全和「国际主义」的道义原则等若干因素出发，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更明白地说，越战，在美国是一场海外战争；而在中国，它却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自己的战事。越战对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 60 年代初起，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愈来愈认为，对越战的卷入，是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环节。约翰逊甚至肯定，如果美国在越南南方失败，那么中国和苏联，特别是中国，就会填补美国离开后的「真空」，可能会有二十万中国军队从「山间小路」涌进印度支那。他声称，自己决不做「目睹东南亚重蹈中国覆辙」的美国总统——为” d

统。，，当时，美国高层决策人几乎一致认为，加大对越战的军事卷入，虽可能引起中国强烈而巨大的反应，但中国不会军事介入。而如果中国「发出干涉越南的威胁，美国应『悄悄而坚定地』给它一个严重的警告」。12 事实上，美国低估了越战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从 1964 年北部湾事件起，美国有意使这场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美国因此而陷入了一个政治军事的泥潭；中国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国内政治运行的轨迹。而中国的问题，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晓。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动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从 1964 年起，中国改变了原本已经确立的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计划，而代之以突出战争

准备为实质内容的思路。其中最为重大的战略性调整，是决心投入巨资建设国家的「三线」。其次，在对外行动方面，中国决定了自己主要的战略动作，即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当时中国已作最坏打算：如果美国将所谓「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中国将采取「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的军事步骤。¹³这实际上已经将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预想到了最大限度。第三，中美在印度支那的战略对峙，造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紧张化，形成「加强战备与反修防修双管齐下」的政治局面。中国领导人作出了「要准备战争早打、大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打，打核战争」，「准备两面打」¹⁴的预期。这无异于一个悲壮的民族战争宣言。可以说，「紧张」是1964年后中国政治运行的一个突出特征。越战带来的安全压力、中苏意识形态冲突带来的国家敌对、国内政策分歧造成的思想抵触，凡此种种，促使毛泽东以更紧迫的眼光观察中国和世界。毛泽东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

11 转引自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497。

12 转引自《中美关系史（1949—1972）》，页4120

13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220—221。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520—5250

「中」、八吵；州问入刁「一鬻？」”” — ‘’ — “ ’ ? ’ ’

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他又说：「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看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⁶⁰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处在一种同仇敌忾的政治氛围中。那时，所有人在思想上都被动员起来：既高度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改变中国鲜红的无产阶级颜色；也时刻准备着向帝国主义和所有反动派宣战，捍卫世界和中国的社会主义

革命成果。天安门成为一个高大的革命象征。它代表看世界革命的红色，也代表看无产阶级的希望。从那时起，天安门开始见证世界上情绪最为热烈、规模最为宏大的群众集会和游行。人们把产生于内心的最为激动的情绪，汇集到这个世界最大广场的中心，迸发和呼喊出来，形成一个不可遏止的和准备冲决一切的「革命」浪潮。

1966 年 6 月下旬，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正是神州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姿，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练走缘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表面看来，这是毛泽东的诗兴闲笔，但诗中蕴含的魄力和神思，却是凡人所难企及的。「有事时」、「踏芳枝」、「苍天姿」、「败叶纷」、「惊世界」、「走旌旗」，这一连串气度非凡的比兴，不仅述说了诗人的才情，更透露出一个具有充分自信心的革命领袖】准备在一个他看来将要发生历史大变动的前夜，率领他的人民向一切旧势力和反动势力作殊死抗争的勇气。十几天后，他从这个「南方的山洞」走出来，

——■——

15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

先作「万里长江横渡」，再以迅雷般的气势，在北京、在全中国燃起了「革命」的大火。似乎这世界所要发生的一切，早在他运筹千里的胸中。中国再次被卷入到「革命」的排天大浪裹，世界也再次为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所震惊。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上面讲到的六件事情，在它们的相互联紧和影响中，会发现它们正是从不同维度和不同时段，为毛泽东的「革命」进行着历史铺垫。例如，第一件事反映的正是大跃进运动失败所显现的结果。这个不期然的后果，极大震撼了中国共产党人原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模式、进行方式和期待速度的预想。人们因此而反思，思想分歧也不可避免。而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在毛泽东的巨大威望下，正常、平静地纠错机制步履维艰。于是，党内斗争也不可避免。喧是 1966 年后中国发生政治动乱的一个基本原因。毛泽东当时所说的「联紧 1962 年的右倾，1964 年的形左实右」，盖指这个背景。

而第三件事情，则从外部争论和强辨「是非」的角度，给中国内部思想分歧以极大地「裂化」影响。作为中美对峙的第六件事情，主要是增大中国的外部压力。在一定条件下，外部压力促使内部矛盾的激化，通常是呈「加速」效应的。而中国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真正威力，在当时历史环境中，更多地是在鼓舞人民「斗志」上面。那时的中国人，还不理解「核冬天」的涵义，当然更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概念。中国人只是知道，自己的原子弹代表了中国人的世界地位和决不屈从于人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形成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而第五件事情，非常戏剧性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进程：在无数是非非中，在各种政治压力下，中国共产党在选定自己的接班人时，也不能不经历某种奇异甚或意想不到的结果。毛泽东虽然在选接班人方面没有比斯大林高明多少，但他给中国历史留下的政治遗产，却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人的生活。因此，在结束这篇导论的时候》 接续上述「典型性」的交代而赘述三言两语、以申明本卷的主题立意· 古人说，这叫作开物成务。无论从世界看中国，还是从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来体验历史，二十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四、五年间，确乎表现出「纷繁」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五卷（1962—1966） 历史的变局
特征。所谓「纷繁」，是指事变的多发、矛盾的隐伏、冲突的尖锐和结局的不确定等等。要恰当概括这段纷繁的历史，给出一个精确且精致的标题，殊非易事。与同人推敲再三，终于选用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这样一个听起来并不「精彩」的书名。的确，以「历史变局」来解构文革发动前的这段历史，有它贴切的地方，但又不十分精确。我们过去听惯了「在曲折中前进」这样官方的命名，特别是，国内知名的党史大家曾采用了一个叫「两个发展趋向」的说法，作为认识这段历史的框架。就历史概括而言，不论「曲折前进」还是「两个发展趋向」，都极尽了党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政治关怀。例如，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发展趋向」表述的智慧性：在文化大革命前，「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

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在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互相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⁶当然，最终是错误的发展趋向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从而引发了那场「砸烂旧世界」的大革命。

显然，这个说法「智慧」地规避了所谓「路线斗争」的评价体系。但仔细想来，正确与错误的较量，是历史活动的基本现象。谁总是正确，谁又永远错误呢？人的活动，就是在正确或错误判断历史的过程中，交替推进的。因此，从历史概括的角度，我们还应深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走向。对这个走向的概括，既不应过于意识形态化，也无须深文周纳。它应该是一种遵循历史主义原则的描述。这样做，即使暂时无法臻于精确，也至少可以给读者一个可感触和近时代的历史解释。¹⁶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 405。

导个计舌

「历史的变局」大约就是以这样思想确定下来的。它虽用词普通，但比较客观直白地描述了这段〔纷繁〕历史的走向。事实上，生活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人，面对的是一系列挑战和对决：面对着饥饿的挑战，面对着大跃进失败后解决中国路向的挑战，更面对着国内「阶级敌人」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挑战。当然，挑战者有时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向封锁、压迫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国际体系和秩序挑战；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存体制挑战；向人们理解中的一切背离社会主义「规范」的事物挑战；向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挑战；向一切不平等的现象挑战。

挑战就意味着对决。而对决的结果，无疑变动了历史——这是一段鲜有人能预见结果的历史变局。

毛泽东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他还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世界的所有人都知道，在毛泽东的统帅下，从二十世纪 60 年代前半期起，中国开始掀起一个「天地翻覆」的社会革命热潮。这个热潮扑面而来。它冲决封锁，打烂藩篱，要扫除所有「害人虫」，以缔造一个别开生面的世界。也许，这就是自 1962 年以来中国选择的历史走向。

作为历史叙述，我们应尽力给读者提供一个可以俯视的角度。如果我们不能摆脱历史本身的纠缠，而同那些是是非非搅在一起，那将使读者看不到历史的脉络和直观的画面。因此，在确定了主题立意之后，无论从世界看中国还是从中国看世界，历史就变成了多棱镜。为了把历史叙述得更丰满和更全面，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眼光变得更宽广、更高远，同时也要更细微。正如我们在开篇时所说，我们的目的，是要使这个历史变得「更透彻」、「更明亮」。这大概就是一个历史学者的责任。

第一章

天人之惑

至今，在中国还没有正式的说法：大跃进运动失败。在正式文本裏，一般称「大跃进」运动在 1960 年冬 r 被停止」。，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个试图用十几年甚至几年就「超英赶美 j 的全国性运动，的确是失败了。所谓失败，不但是指预期目标没有达到，而且指代价过于惨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 年到 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毫无疑问，重大损失包括工业、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近年来，中外媒体又在不断「热炒」从 1958 年到 1961 年中国的非正常人口死亡数量。不应回避，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惨痛的记忆。可问题在于，这场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得到几乎全体中国人拥护并表现出前所未有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3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的兴奋情绪的运动，为甚么会失败？是天道不公，地不作美吗？当时，处在余热尚存的氛围裹，人们肯定存在着疑惑。而在今天，人们对于大跃进失败的历史，仍在进行争论。有人断言，大跃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对「甚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因此发生失误。显然这是个概念性的解释。它所缺乏的，是历史研究的严密论证。事实上，邓小平讲这两个「没搞清楚」，是一种政治经验总结。他在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依据。很明显，两个「没搞清楚」的主要寓意不是说明历史，而是解读政治。作为史家，在发现历史时是不能拿这个政治「结论」来做终极解释的。因为，历史到底是怎样游走的，历史学家应做细致的说明。历史学家不能把前人都看作「傻子」，似乎他们做的一切都愚不可及。当然，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前人都认作「目光如炬」、「预见一切」的人，好像他们可以避免所有灾祸。从广义上说，人的实践都有巨大局限性。因此，任何人的实践都在一定的历史断面上「犯着傻」。科学的历史解释在于说明：人们为甚么要公开犯这么「傻」的错误？可以不可以更聪明一点？马克思说过，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之下来书写自己历史的。一切随客观条件而定。几乎没有不犯错误的先知。无疑，这意思本身不仅包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包括了毛泽东和当时将近七亿中国人。

在这一章裹，我们试图探究的，就是天、地、人之间到底出现了怎样的不和谐，以至把人们所做的傻事推向了极端。

一问天

古代大文豪屈原在《天问》开篇即吟道：「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普暗，谁能极之？」在诘问天地的运行规律时，诗人明显带着对时世的不解。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中国人对1959至1961这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的天灾也存有某种疑惑：到底这段时间中国的灾情有多大？是甚么性

第一章天人之惑

质的灾害？这一灾害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危害究竟有多严重？那一时期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与自然灾害之问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果从世界现代自然灾害史的角度看，中国在二十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所受灾害的社会影脣，处在甚么样的程度上？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化，人们似乎应对这些问题作出大致的解答，否则，人们很难科学判断大跃进运动失败后，三年经济严重困难对其后中国政治走向造成的影响。根据专家的记录和分析，从 1957 年到 1963 年中国的气象灾害大体情况为：1957 年全国较大范围干旱。1958 年灾害较轻。1959 年全国较大范围干旱，旱情较重。1960 年在上年干旱的情况下，持续较大范围干旱。1961 年至 1962 年雨水有所增加，但仍不充沛。1963 年则以泌灾为主。’按照这个记录，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自然灾害，在性质上应为旱灾。

但是，也有人认为，所谓「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是一种「神话」。其依据是，按照《中国近 500 年旱泌分布图集》中一百二十个水文观测点的平均指数来判断，「不论与其它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 至 1961 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另一位学者则认为：「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 1959 至 1961 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 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范围之内；1960 年全国干燥度大于平均值，干燥范围比 1959 年略大，但干旱程度减轻；1961 年从全国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 1959 年到 1961 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⁴

2 冯佩芝等编着：《中国主要气象灾害分析（1951—1980 年）》

（北京：气象出版社，

1985 年） 3 金辉：

页 143—151

。引自李若建：〈自然灾害与自然条件对困难时期饥荒形成影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5 期。

〈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 年气象水文考〉，《方法》

4 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当代中国研究》（美国）

，1998 年第 3 期，2001 年第 1 期

转引自陈东林：〈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 石 2 — 196 引— 历史的变局

显然，两位学者的看法并非没有依据。他们是在研究了气象历史的资料后得出结论的。但是，中国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到底有没有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气象平均值问题。这不仅因为气象学有自己的学科方法，它的统计目的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差别甚大。而且，取气象平均值的方法，很难真实反映社会历史状况。比如，在上述两位学者中，前者使用的是一系列观测点的数据，然后得出平均值。一百二十个观测点不可谓少。但如果在数据比较中使用平均值计算，那么，旱和泌两种灾害就被中和了。此外，在平均值统计中，权重比例不同，结论也会迥然而异。后者引入的则是「干燥度」这样一个概念。「干燥度」概念是否同自然灾害所界定的干旱是一个意思？显然，「干燥范围」与「干燥度平均」两个概念，很难表明在全国范围内个别地区所遭受自然灾害的强度，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损害。

由此我们可以说，笼统地认定自然灾害的性质和以平均值来说明灾害的程度，都暴露出相当程度的学术缺陷。特别是，当我们进行自然灾害的社会性研究而非纯气象学研究的时候，气象记录材料必须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如果没有灾害分布、危害程度的准确记载，我们就无法判断自然加给社会的影象。因为中国国土面积广大。东边日出，西边冰雹；南边暴雨，北边霜冻的现象，几乎是一种常态。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受灾情况可能非常不同。而要说明灾害的影响，就必须确定哪一种灾害发生在甚么地方，以及甚么是当时为害最重的灾害。

必须承认，中国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天灾出现得相当频繁。而中国历史传统中对自然灾害的记载，者卜是具体的，即说明在何时何地发生了何种灾害，灾害所造成的社会状况怎样等等。现姑举几个事例以

证明之：其一，辛亥革命后的第九年，即在 1920 年，中国北方五省一区曾遭受严重旱灾。当时，黄河流域干旱异常，直、鲁、豫、晋、秦五省发生四十年来未有之奇荒。东起海岱，西达关陇，南至洛阳，北抵京畿，禾苗枯稿，赤地千里；加之虫雹为患，饥民多达数千万。关于这次严重灾害，当时北洋政府的内务部赈务第一常大人之忍

处在给外交部行文中详细说明了灾情性质、被灾地区及受灾人口：「据各省区调查报告，被灾县份，京兆区共二十县，被灾者十七县。直隶省共一百十九县，被灾者八十六县。河南省共一百零八县，被灾者七十七县。山东省共一百零七县，被灾者二十一县。山西省共一百零五县，被灾者有六十四县。陕西省共九十一县，被灾者有七十五县。」，这个灾害的记载就是具体的。它可以作为历史家分析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依据。

其二，1946 年中国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灾荒。当时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描述是：「若救济灾区之工作，如不加紧进行，中国人民之死于饥馑者，将达三千万人。中国战后之灾区达十九省，现今约有四百万人接得小部分之接济。… … 中国灾区之成因，有以下数点，即战祸、大旱、水灾、蝗虫、瘟疫、渔业不振，农事无耕具，又需以大量米粮供军队及日本战俘。一湖南地区，人口中竟有七百万人为饥馑之单，食草根、泥土、树皮以维持生命，其它如河南河北等地区亦有同样情形，遍地草根已有抢食一光之势。」‘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报告，明确写出了造成灾害的成因，即旱、游、蝗和瘟疫，几害并行。这个报告明确地给人们提供了当时自然灾害的信息。

事实上，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面对的主要气象灾害是旱灾，并且是持续旱灾，也不过是一种笼统的估计，只不过没有使用平均值的概念而已。从历史记载看，自然灾害的发生基本是综合性的，即旱、游、热带气旋、地震、风雹、冰冻、病虫害和雪灾等是综合出现的。因此，灾害学研究使用「自然灾害综合活动程度指数」这样一个统计方法。自 1949 年中共执政到上世纪末近半个世纪中，1952 年，〈赈务通告〉，民国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六期，《公牒》，页 37 — 39。转引自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 —

1949)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 • 页 1 。

《 国民日报》 , 1946 年 4 月 10 日。转引自李文海等: 《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 (1919 — 1949) 》 , 页 3 。

中华人民兵和国史 • 第五春 (1962 — 1965) — 历史的变局

1967 和 1971 年三年自然灾害综合活动程度指数低于 1 , 而 1954 、 1960 、 1976 、 1991 和 1998 等五年的指数接近于 8 07 在这五年中, 1960 年的确主要以旱灾为最重。但是,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而在各单类灾害中, 洪灾又是中国最具影响或危险性最大的灾害, 其比例几乎占到全部灾害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即使在主要为大旱灾的 1960 — 1961 年, 按照记载, 山东于 1960 年却遭受水灾, 共死亡 13246 人。”而 1961 年, 鲁北地区又发生大水灾, 日降雨量超过 50 毫米的暴雨次数和雨量都超过常年 (常年为四至八次) 。, 山东全省的 12 亿亩总耕地中, 有 3500 万亩受洪灾, 产量很低。1 () 在江苏, 1961 年自然灾害情况也是综合性的, 即春旱秋洪。[7 、 8 、 9 三个月内接连三次台风暴雨袭击, 致使全省 3000 多万亩农田严重受灾。其中本来比较差的徐 (州) 淮 (阴) 盐 (城) 扬 (州) 四个专区, 粮食减产达 13 . 1 亿斤。] ”按照这样具体的记载, 1961 年就不仅是旱灾一项灾害危及全国了。这再次说明, 用于历史分析的气象数据, 必须指明灾害的种类、性质以及灾害发生的地区、破坏程度等具体数据。否则, 用笼统的办法说明受灾状态, 并进而分析灾害对社会的影响, 必定是牵强的。

显然, 当时人的记载比后人的推论更可靠。而当时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对于国家灾害的判断, 无疑对历史研究更有参考价值。1961 年 9 月 23 日, 毛泽东在武汉同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曾说: 「所谓旱灾, 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旱。今年旱灾最严重的是四

7 国家科技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灾害综合研究组主编: 《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 —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4) , 页 7 。

8 《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 , 页 5 。

9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国民经济调整》 (香港,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之 002) , 页 145 。

10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国民经济调整》，页 227。

11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苏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付；苏卷）》州七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 小，页 336。

第一章天人之感

川、湖北、安徽，就是长江流域。今年主要是长江三省旱。」12 毛泽东还对蒙哥马利说：r 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经验的事，如 1954 年这裏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过去局部性的旱灾有过，但全国性的没有。」13 毛泽东的话至少证明了两点：一，1961 年中国所经历的不是整体性旱灾，而是局部旱灾；二、最近几年中国的确发生了连续性的干旱，且干旱程度较为严重。以灾害历史的一般现象来判断，毛泽东对 1961 年当年以及自 1959 年以来中国自然灾害的讲解 1 是客观的。他既没有特意夸大灾情，同时也肯定了灾害的存在。

一天前，刘少奇在同蒙哥马利会谈中也提到连续干旱问题。以下是刘和蒙关于中国遭遇自然灾害问题的对话，

. J : 是的，我们的人民生活相当苦，又遇到天灾，所以我们的经济誉展在数量方面的速度是放慢了”

蒙：这是三年灾害所积累起来的影响。

刘：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次一连三年的大旱。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在数量方面的姿展将有所降低，但我们的产品和质量、品种、规格方面将提高一些。

蒙：上一次一连三年大灾是何时今生的？

刘，八十年前”在中国历史上，大约一万年左右总要有一两次一连三年的犬旱。’盛

从整个谈话的语气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的心态是平和的。他们没有极力渲染中国面对的自然灾害。对灾害的描述也是非常

12 〈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谈话记绿〉（1961 年 9 月 23 日）期，页 41。

13 〈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谈话记录〉（1961 年 9 月 23 日）期，页 41。

14 〈刘少奇会见蒙哥马利谈话记录〉（1961年9月22日）期，页35。

《党的文献》，2003年第1

（党的文献），2003年第1（党的文献》，20（）3年第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有限度的。但同时，他们又都提到了灾害的严重性对社会发展的损害。因此可以认为，在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部分地区的确遭受了连续性干旱。否定这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性是站不脚的。伴随着其它自然灾害，中国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绝非「风调雨顺」。自然灾害就是灾害，不是「神话」

据国家科技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辑的《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一书载：「中国于1959—1961年发生大面积严重干旱以及局部水灾，加之低温冷冻害、病虫害和风雹等灾害，受灾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¹⁵

各地具体受灾情况是：1959年1—4月，黑龙江、河北发生严重春旱；2—6月，珠江、长江和淮河流域发生洪灾；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发生风雹灾；6—8月，江淮流域发生旱灾；7—9月，东南沿海遭五次台风袭击，台风等级最高超过十二级。此外，1959年还在部分地区发生了蝗灾、枯虫灾和鼠患。

1960年1—9月，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发生持续干旱。自1959年秋季，有些地方持续三百天至四百天未下雨；6—10月，东部沿海地区台风连续登陆，共达十一次，高于以往平均次数的两倍。每次台风过境时间长达10—12个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的三倍以上。台风造成暴雨频发，洪水泛滥。此外，1960年的3—5月和9月，中国西北部地区和东部部分地区还发生严重霜冻，3—9月发生波及二十一省区的风雹灾害。1961年，自上年冬季开始至当年3月，黄河、淮河流域发生大旱。4—6月，灾情扩大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这是中国连续发生旱灾的第三年。4—5月，淮河流域又遭受霜冻，大风等灾害。4—6月，珠江、湘江、赣江和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成灾。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造成水灾，其

中河北和山东部分地区的灾情为百年不遇。8—10月，广东、福建、15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页162。

第一章天人之感

浙江、江西、江苏和安徽遭台风袭击十一次，其中十二级以上的达九次之多。“

从全球地理角度看，中国刚好处在世界两大灾害带即北半球中纬度灾害带和环太平洋灾害带的交汇部位。由于地球不规则运动的原因，第一个灾害带多发地震、热带气旋、风暴潮和飓风、龙卷风，同时，伴随着干旱、洪泌、低温冷冻害和雪灾等灾害。第二个灾害带是地球上地震、火山、热带气旋和风暴潮高发的地带。碰巧的是，这个灾害带同样多发干旱、洪济、玲冻和雪灾等灾害。据统计，二十世纪全世界约百分之八十的大灾害发生在这两个地带。处在这两个灾害带交错环境下的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多自然灾害的现实，特别是中国历史上频遭大旱、水泌和地震灾害的现象，是难以否定的。

问题在于，当我们根据历史上自然灾害的严重与否来判断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时，不应过分夸大也不能任意缩小自然灾害对社会矛盾产生的影响。这裹有两个相关的问题需要处理：一、承认中国经常遭受自然灾害是个基本事实；二、根据灾害引发的社会矛盾来解释历史现象以及其发展规律。

诚然，某次重大自然灾害发生过后，社会政治和历史的變化可能在短时间内并不十分明显，至少，它们并不以过于直接的形式自我地反映出来。但是，从历史规律看，凡重大自然灾害发生过后，社会就像受到一次重创一样，产生某种非常态的变动。在古代，严重自然灾害过后，往往是社会最动乱的时期。灾害最直接的受害者—农民，往往在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下，艇而走险。另一方面，严重自然灾害也迫使统治者放松盘剥，与民休息。在当代，自然灾害的社会作用是同方向的。这其中有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严重灾害迫使人对社会政治和政策进行反思。

16 参见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三陈东林：〈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 屹一 1965）— 历史的变局

一个著名的事例是，二十世纪 30 年代美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严重干旱。1934 年 5 月和 1935 年春天，两次巨大的「黑风暴」席卷了美国东部的广大地区。1934 年 5 月的沙尘形成了一个东西长 2400 公里、南北宽 1500 公里，高 3.2 公里的巨大尘土带，卷起约 3 亿多吨的沙土。干旱和沙尘使 250 万人逃离家园，中部大平原地区生态遭到毁灭性的损坏。这个巨大的生态灾难，使得美国人很快通过了《水土保持法》。罗斯福总统动员了至少三百万人参加治理沙尘暴的行动。由此，美国的自然气候得到初步改观。

另一个同样著名的事例是，1961 年 5 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回湖南宁乡花明楼老家调查。据陪同调查的主席夫人王光美回忆，刘一进村就注意到池塘裏的水。刘问童年放牛的朋友李桂生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们说去年干旱得很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吧？李回答，没有，还有半塘水。[少奇一听就明白了，因为他清楚地记得，他小时候有一年大旱，安湖塘干得底朝天，能在塘底裏晒谷子，就那样的收成，农民生活也没那么大的困难。他断定，认为农村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天灾的说法，是不对的。] 17 后来，刘少奇有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著名判断。

这是刘少奇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前四个多月发生的事情。对于天灾（当时主要是旱灾）的严重性和社会破坏力问题，刘通过亲身走访才获得了自己的估计：天灾确实存在，但并不都像想象中那么严重。这个估计得来不易。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如果不是走到自己家乡并寻找特殊的谈话机会，刘显然只能了解一般的气象灾难统计和听取地方领导人不尽准确的汇报。无疑，地方领导人的汇报会强调天灾的一面，而尽力掩盖人为的错误。天灾和错误，成为那个时代纠缠在一起的政治链环。它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天人之惑。当我们再进一步追问这个天人之际的难题时，更为复杂严重的事态将展现出来。17 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页 252。

第一章天人之惑

二问地

自然灾害对于农业的破坏，是从田亩被摧毁开始的。受灾面积，通常是衡量自然灾害程度的基本参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又是农业大国。因此，自然灾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至深且大。同时，由于中国地域宽广，地区间自然条件和社会发达程度差异很大，中国自然灾害的危险性与危害性分布，也极不均衡。这种现象的后果，是更为严重地加剧了自然灾害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如果严重自然灾害发生在西部人烟稀少、经济水平落后的地区，其破坏力将被客观地限制在低层次和小范围的水平上。而如果严重自然灾害发生在东部发达地区，则同等的灾害将造成比落后地区大得多的财产和经济损失。不幸的是，根据气象学和历史数据的记载、分析，中国自然灾害综合活动程度和综合损失程度均以华南地区为最严重。其走向是逐步向西向北递减。在灾害发生的时间上，分布亦不平均。在十二个月中，随时可能发生各种灾害。而在灾害的周期上，则大约每三至五年有一次较严重的灾年。

面对这样严酷的自然条件，难怪大诗人屈原要在两千多年前作《天问》，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问天，问地，问人。可结果却是，「声声诘问，苍穹禁语。凛凛质疑，大地无言」

据《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的统计）中国于1959—1961年发生的大面积严重干旱以及其它局部各种类型的灾害，使受灾面超过半个中国。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约占播种面积的49%，其中成灾面积约占播种面积的21%。而大面积的持续干旱席卷了全国国土总面积的二分之一的广大地区，全国每年农作物旱灾受灾面积3000万—4000万公顷，每年减产粮食1100万—1300万吨，造成了严重的灾荒并影响到1962年各地的生产和生活。¹⁸

18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页162。

T 聿户、坏 dJ 弋中 1，斗）、不斗 ‘” 怯 ‘1 7V’ 1 7UJ) 左 rj 必恤 7) (觴 J

诚如上文所言，1959—1961年连续出现的自然灾害，恰恰遵从了中国灾害的分布规律，即东部平原和长江流域的驯地区遭灾最为严重，东北和内蒙地区受灾较轻，青海、宁夏和新疆受灾最轻。”受灾

最重的省区是：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四川、陕西，其受灾农作物面积和灾荒缺粮人口比率均在 30 % 以上，最高者超过 60 %。

就全国而言，1959 年旱灾受灾农作物面积为 3381 万公顷，水灾为 481 万公顷，风雹灾 193 万公顷，其它灾害为 316 万公顷，总受灾面积为 4371 万公顷；1960 年遭受旱灾的农作物面积为 3812 公顷，水灾为 1015 万公顷，风雹灾为 392 万公顷，其它灾为 1325 万公顷，灾害总面积为 6544 万公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遭受最严重自然灾害的一年；1961 年遭受旱灾的农作物面积为 3785 公顷，水灾为 887 万公顷，风雹灾为 444 万公顷，其它灾害为 1095 万公顷，受灾总面积为 6175 万公顷。20

1959 、1960 和 1961 三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分别是 11602 万、12243 万和 12144 万公顷。农作物受灾面积约占播种面积的 49 % ，其中成灾面积约占播种面积的 210 / 0 02 ，

如以各省受灾情况论，则 1959 年的最严重者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和黑龙江。其中，黑龙江和河北遭春旱，有 300 万公顷农作物生长受到影脣。珠江、长江和淮河流域春夏季遭洪涝灾害，200 多万公顷农田被淹。6 一 8 月，江淮流域大旱，受灾面积达 821 . 2 万公顷，至 8 月上旬，旱情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到 2276 万公顷。

从统计数字看，1960 年是三年连续灾害中受灾最严重的一年。这年从年初到 9 月，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和陕西各

， 一一一一一。 一一
珍《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之 0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 21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

页 162 。页 162 。页 162 。

矛一早大入正芯

省，均遭持续大旱，三百至四百天未雨，受灾面积达到 2319 . 1 万公顷。进入夏季，旱灾扩大至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省，使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了 3812 . 46 万公顷。此外，还有大面积农作物受到其它灾害的袭击。当年 12 月 28 日，新华社曾发出

专稿〈我国农业生产今年遭受特大天灾，六亿人民满怀信心克服困难〉。专稿说，1960年我国有9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占总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其中有3亿到4亿亩农田遭到重灾，甚至有一部分农田因灾害特别严重而没有收成。今年灾情最重的是旱灾。全国除西藏没有受灾，新疆地区虽气候不正常，但没有成灾以外，其余各省、自治区都先后发生程度不等的干旱，受旱农田达6亿亩。受灾地区中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受旱灾面积最大，占四省总耕地面积60%以上；受灾时间最长，一般持续六七个月。22 1961年接续1960年的灾情，自1960年冬季开始至1961年3月下旬，黄淮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旱灾；4—6月，灾情扩大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使年内全国旱灾受灾面积达到了3785万公顷。其中河北、河南和山东等主要产粮区域农作物减产达一半左右。湖北省有67万公顷土地未播种，河南73万公顷农田基本绝收。当年春夏季，珠江、湘江、赣江和闽江流域普降暴雨，引发洪水泛滥。至夏季，河北、山东又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使近百万公顷农田绝收。此外，夏秋季在东南沿海地区又发生多次台风，造成鱼船损坏、房屋倒塌、海堤冲决等灾情。“3

对尚处于初级工业化早期的农业国家说来，自然灾害对国民经济影响最敏感的莫过于粮食的减产和损失。

根据晚近的统计数字，1959年因旱灾全国粮食减产1081万吨，约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6.3%；1960年因旱灾粮食减产1128万吨，约

22 李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上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548—549。

23 参见陈东林：〈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1959—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1—1966—历史的变局
占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8%；1961年因旱灾减产粮食1323万吨，约占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24 这只是因旱灾粮食减产所占粮食总产量的比率。如果加上其它灾害引起的粮食减产，则所占比

重肯定会更大。但有的统计认为，1959、1960和1961三年全国粮食产量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和26.25%。“，这个比例大大超过了《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的统计，最高减产接近三成。如果按照《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的产量数量，则1959—1961年因早灾粮食平均减少不到一成。如果以平均数计算，1959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应为506斤。这个消费数量也似乎不算很低。如果以原粮计算，可折合大约420—450斤左右的细粮。在副食品也极度缺乏的年代，每天一斤多一点粮食，对成年人说来是难以饱腹的。但实际情况却是，全国上下几乎每个经历这一年代的人，其饥饿感要比理论推算出来的粮食消费结果大得多。1960年7月30日，北京开始实行发放粮票、定量供应粮食的办法。而在此之前，全国已有许多地方实行了粮食定量制度。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在淮河以南地区，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60斤的标准，丰收的地方可以提高到原粮380斤。淮河以北地区，应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00斤左右，各省的重灾区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城市供应标准，除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⁶由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推算，即使在淮河以南生产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原粮360斤的标准，也仅仅相当于成品粮300斤左右，即每人每天平均可消费八两左右的粮食。对成年劳

24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页162。不知这个统计是否准确完善。因为按照统计，年粮食平均损失量似乎不是很大，这不仅同人们的切身感受差别巨大，而且同当时的统计也有不小的距离。

25 陈东林：《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上册，页511。

第一章天人之惑

力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而在北方地区，按上述标准，显然更为窘迫。在城市，粮食定量国家干部每人每月22市斤；县城和农村集镇吃商品粮的居民，则分别降为17市斤和16市斤。

据时任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的回忆，1960年，河北省委作出了日吃四两口粮的新规定。这个规定全省一刀切，不得例外。张家口地区本来即生产落后，且面临渡冬的艰难问题。当年春，胡来到蔚县西合营。他了解到，农民播种时，前边点上种子，后边就有人把种子扒出来吃掉。生产队没办法，把种子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饥饿难忍的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把扒到的粮食先在土裏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裏。27 可以说，这是中国在1960年代初遭受大饥荒的最为惨痛的情景之一。

全国性的粮食紧张，还反映在粮食调运计划不能按时完成上面。从1960年第二季度开始，全国粮食调运计划即开始拖延，5月份各调出区调出的粮食仅完成计划的一半。这使大城市和缺粮省份的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当时，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已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了。北京和上海这样大型城市的销售粮，大约只能维持三天。28 这种严重情况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所未见的。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抓紧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指示说，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上述省市，将有脱销的危险。还在5月28日，中共中央就曾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但是由于各地粮食也很紧张，粮食调运工作一直进展不快。6、7、8月份粮食调运计划仍然没有完成，粮食供应情况仍未改善。中共中央9月的这次指示，要求各粮食调出省、自治区党委立即采取措施，改善运粮状况，确保调运计划的完成。

但事实上由于各地粮食都出现紧张，调运粮食便变得非常困难。

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北京：人民出版社，姚锦编着：《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1995），页157。

页161。

勺'只U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例如在张家口地区，900 / 0 的大田作物遭受了自然灾害，产量已降低为15 . 8 亿斤（实产12 . 1 亿斤），不仅国家和省裏确定的

5000 万斤粮食调不出，而且自己还亏空 2000 万斤。”又据说，国家从四川调运上海准备出口的粮食，由长江水运到武汉时曾为湖北省截住。当时武汉市仅有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武汉市的负责人无奈出此下策，遭到中央办公厅的申斥。经很大一番周折，运粮船才得以重新起航。30 1960 年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这个指示承认，粮食生产的发展还不能适应整个国民经济跃进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粮食生产的指标偏高，估产不实；又由于粮食消费安排不好，主要是用粮计划太高，管理不善，浪费不少，前松后紧，「前方吃了后方粮」；因而，1958 和 1959 连续两年，在青黄不接时期，都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1960 年虽然夏收已经到手，但是，收购不快，库存减少，调拨不灵，某些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还没有过去，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出口计划也完成得不好。指示说，这种严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指示提出，为保证粮食生产，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增加劳动力，充实农业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搞好秋田管理，力争秋季丰收；重视除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开展规模更大的「小秋收」运动等等。”进入 1960 年以来）中共中央屡次发出文件，强调粮食调运、粮食分配问题。而这一次，文件有「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的语句出现，透露出粮食问题的严重形势。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又转发〈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反映了华北地区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粮食短缺情况。其中说：五省市今年农业生产遭到特大的自然灾害，受灾

29 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页 160，

30 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 年 1 月 11 日—2 月 7 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 182。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 516—522。

面积约占播种总面积一半以上…… 预计今年的粮食总产量仍可以和 1957 年相仿，一但是由于严重灾害的影脣，总的说来，今年的粮食情况是相当紧张的。根据预计，这五个省市今年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最低的不到四百斤，最高的也只有四百四十多斤。纪要提出的若干措施有：压低口粮标准，做到粮食产量和群单口粮的落实，保证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规定每月吃粮计划，不得超过；大种蔬菜；大搞代食品；切实办好公共食堂；冬春季要有一百天的半日劳动等。³² 事实上，该文件仍然高估了 1960 年的粮食总产量。按后来的统计，1960 年粮食产量为 1.4350 亿吨，比 1957 年的 1.9505 亿吨少了 5100 多万吨。直到 1962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才增长到 1.6 亿吨，仍然没有超过 1957 年的水平。

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纪要提到「大搞代食品」这样一个措施。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指示说，近两年来，农业生产连续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城市和乡村的口粮标准有所降低，肉类和油类也有所减少。因此，除了应当首先增产粮食、增产瓜菜外，还要千方百计增产各种代食品。中央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难，渡过灾荒。³³ 所谓「代食品」，是 1960 年代中国一个特有的称谓，它指除粮食以外能当作食物的几乎所有野生和人造食品，如家生和野生植物的楷、茎、果、根、叶以及豆饼、棉饼、花生饼和芝麻饼之类。在城市则有人造肉精（一种食用酵母）和小球藻等。事实上，饥饿迫使人们把寻找食物的范围扩大了许多，举凡能够填进嘴裹、腹中的东西，都找来吃掉了。当时，安徽省无为县委常委会议定的可抵口粮的〔代食品〕共有三十二种，计有：藕、荸荠、茨蓆、菱角、茭白、玉米叶、玉米皮芯、高粱

32 · 中华人民共和国蠲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8 - 1981 ），下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页 344 - 345 。

3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页 687 - 69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五卷（1962 - 1965 幼一 历史的变局

秆、黄豆秆子、芝麻秆子、花生藤、花生壳、橡子、毛栗、葛根、蕨根、野绿豆、野泥豆、山萝卜、野凉茶、大头薇、菱蒿、野红花草、马兰草、水草、鹅耳肠、野菜、荷叶秆子、美实秆子、螺蛳、蚌肉。

34 这些东西有的富含营养价值，是颇为入口的菜蔬果品，如藕、荸荠、菱角和茨蓆。但大部分是连当猪饲料都不可能的楷秆，如高粱秆、黄豆秆、芝麻秆、荷叶秆等等。这些「代食品」显然是无法下咽的。胡开明记述说：1960年12月一个星期天，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市长带队，张家口市四万多任务人、学生、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上山探集各种野生杂物。十天后，张家口市参加采集代食品活动的人增加到五十多万人。山坡上长的，平川裹埋的，水底下游的，能采集的统统采集回来，共获得代食品5500多万斤，其中玉米棒子芯、高粱穗、土豆藤、萝卜缨、榆树叶也都成了代食品原料，26400多台加工机械昼夜运转，粉碎这些原料。”代食品的种类虽因南北方地域关系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料不离玉米、高粱楷秆和红薯、土豆的藤蔓等物。这些东西被粉碎后，掺以一些糠麸，蒸制成馒头，曾被誉为「优质产品」。而食用之时，粗糙干涩，难以下咽。许多人出现肠梗阻症状。胡开明亲见自己的司机因吃了两个「优质」窝窝头，腹中剧痛，冷汗淋漓，最后呕吐不止。36 所谓「低标准，瓜菜代」，是当时中共中央提倡的一个口号。事实上，瓜和菜已经成为食物中的上品。有关研究部门曾实验、鉴定、改进和新提供了若干代食品的制造方法。其产品仍主要是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面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栅藻和红虫。当时人们甚至相信，「人造肉精」、小球藻等「代食品的营养成分比粮食还要丰富得多，吃了可以预防和治疗浮肿病和其它一些疾病。……而且将来粮食多起来以后，制造营养丰富的代食品仍然是食品来源和饲料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神话」而已。

34 杨金声：〈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35 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页159。

36 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页159。

3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页688。

第一章天人之感

正如张家口市区的做法一样，代食品的制造统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中共中央曾设立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等五人的代食品生产领导小组，并于其下设立专门的办公室。五人小组包括了中央书记处的重要成员和国务院秘书长，是一个规格非常高的临时性机构。1960年8月1日，中央书记处批转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的特殊供应副食品办法共分三类：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第二类即政府正副部长，全国人大、政协常委，民主党派中央的正副主席，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和行政七级的其它人员，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第三类即全国人大党外代表，全国政协党外委员，正副司局长，各民主党派中央常委，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行政十一级以上其它人员，每人每月肉二斤，白糖一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二斤。这项措施除保障党的高级干部外，高级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受到相当的照顾。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为了缓解粮食紧张，经周恩来和陈云批准，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持，从1961年起开始进口加拿大、澳大利亚粮食。当年进口了100万吨，即20亿斤。，虽然缺口仍十分巨大，但毕竟使紧张形势有了一定缓解。由此，中国进口外国粮食的做法至少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以后进口粮食已不再是救急，而变成了调剂余缺）。进口粮食的国家也扩大到法国、美国和阿根廷等。

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安定与否，与这个国家能否以自己的土地物产，养活生存于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为基本限度。纵观中国历史，人和粮食的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那么激烈的。生存于黄河流域黄土地带的中华民族先民，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商周时期制造的大量青铜器，多是为饮酒而设计的。这说明，粮食在我们的先民 38 如 1 锦编着：《姚依林百夕谈》，页 162 ”

甲华八氏去污 p 国又’ 矛么养 ki 梦 0 必一 i 梦 b 到一 世又则更 句

那裏，是充足和丰盛的。那么，为甚么几千年之后，当科学技术有了巨大进步，社会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式的改变，人们却还要为粮食发愁呢？这种情况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是老天爷故意施虐？还是土地爷突然发威？是中国的土地养不活在其上繁殖的人口？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干了愚蠢的事？

天还是那片天，地也还是那片地。问天和问地，都只能找到使人困惑的一部分原因“最终，我们还是得去问人。”

三问人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自然灾害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程度可分为五个等级，即巨灾（特大灾）、大灾、中灾、小灾和微灾。其中巨灾是指受灾人口达千万人以上，死亡人数达数千或数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00 亿元以上的自然灾害；大灾是指死亡250—1000人，直接经济损失10亿—100亿元的自然灾害。

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半期至少发生过六次死亡超过数十万人的旱灾：

1905年，广东发生旱灾，死亡数十万人；

同年，山东地区遭旱灾，死亡五十万人；

1920年，华北地区干旱，死亡约五十万人；

1923—1925年，四川遭旱灾，死亡十万人；

1929—1932年，陕西遇连年大旱，死亡一百多万人；1942—1943年，河南因旱灾死亡一百万人以上“3，

显然，按照这个所谓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发生的几次旱灾，就死亡人口而言，都是超大型的「巨灾」。并且，这些死亡人口众多的旱灾，几乎是在一个省区发生的。可见，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经济打击通常异常沉重。中国人在自然灾害面前，抗御能力显得极为脆弱。

39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圆集》，页4—5。

第一不大人〈忍

那么，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到底死亡了多少人？这三年的灾害，是「大灾」、「巨灾」抑或「极为巨大的灾」呢？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非正常人口死亡的统计，可以说莫衷一是，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1985 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 年比 1959 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大陆出版、由胡绳主编的权威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即采用这个说法：「据正式统计 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所著〈「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根据所掌握的材料，他认为，这三年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是 2158 万。

国家科技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辑的《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口死亡数字做了图表统计。根据这个统计，三年中因灾直接死亡人口分别是：1959 年 8043 人；1960 年 6247 人；1961 年 7710 人。总计三年因灾直接死亡人口为 22000 人。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为：1959 年 17853 人；1960 年 374890 人；1961 年 647010 人。三年总计为 1039753 人。⁴⁰，这个数字是指因灾直接死亡的人数。显然，无论同已知的任何一个估量相比，该统计报导的实际人口死亡数都要小得多。作为官方著作，其引用的资料来自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民政部。但该书也承认，在 1960 年和 1961 年两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分别减少 1000 万人和 348 万人。⁴²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与李南先生合作，利用 1953、1964 和 1982 等三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以及 1981 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而，他们估算历年人口死亡数，再减去正常人口死亡数，得出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推算结果。这个数字是大约 1700 万人。⁴³

40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页 369。

41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页 162。

42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页 163。

43 王珍：〈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文汇读书周报》，2005 年 11 月 18 日，第 15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丛进着《曲折发展的岁月》考证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 2% 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 年总人口应比 1959 年增加 2700 万人，两者相加，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

出生人口数，大约在 4000 万人左右。J4’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于 1989 年出版《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照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 1500 万人」。这个估计没有附带详尽的考证。‘5

上海大学的金辉是大陆最关注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字的研究者之一。他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计算出 1960 年和 1961 年两年中国人口净减少 1348 万。同时，他根据国家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 1960 年和 1961 年新增人口应为之 565 万人，再以 1956、1957 以及 1962—1963 年平均死亡率，作为 1959—1961 年的正常死亡率，从而估算 1960 和 1961 年的正常死亡人数约为 1395 万。这样，按照理论推算，减少人口和正常死亡人口大致相抵，那么以出生率估出的新增人口就应是非正常死亡人数。金辉认为，中国大陆在三年之间，非正常人口死亡人数不低于 2791 万。“但金辉认为这个数字对该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状况反映并不准确。因为，在农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是增长的。如果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那么总人口减少值将得到修正。金认为，修正后的全国总人口减少值，应为 3471 万人，即在 2791 万人的基础上，再加上这期间城市人口的增加量 680 万人。这应是三年全国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准确数字。

47

吕廷煜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红旗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大饥荒」一节说：「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4，此说有可能采自丛进书。作者本人未加论证和考证。

44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 引，页 272—273）。45 王珍：〈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文汇报读书周报》，2005 年 11 月 18 日，第 15 版。46 王珍：〈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文汇报读书周报》，2005 年 11 月 18 日，第 15 版。47 王珍：〈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文汇报读书周报》，2005 年 11 月 18 日，第 15 版。48 王珍：〈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文汇报读书周报》，2005 年 11 月 18 日，第 15 版。

第一章天人之惑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以县级行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 1959 — 1961 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在其所著〈1959 — 1961 年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一文中，曹提出的该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是 3250 万人。⁴⁹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李若建根据详细的统计资料，对 1957 — 1963 年大陆各省区的旱涝灾害程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根据计算和观察，在饥荒最严重的 1960 年，各地死亡率与各地的旱涝灾害程度基本无关，说明 1960 年的饥荒带来的人口损失受自然灾害直接的影响不大。而 1961 年各地区人口死亡率与当年、上一年的旱涝灾害程度都具有明显相关性，这表明，1961 年的饥荒主要是自然灾害的结果。⁵⁰ 李对材料的运用是精细的。但对事情结果的判断是否正确，还值得商榷。因为，除去洪水、地震、飓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会直接致人死命外，干旱对人的致死性并不直接。人的病饿一般要残喘相当时日。因此，断言 1960 年大陆人口损失同自然灾害没有相关关系，难以成立。

但李的研究是实证式的。例如，他肯定：虽然困难时期中国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当时全国的二十九个地区中，只有十二个地区出现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十二个地区中，只有三个在沿海，其它九个在内陆地区。在一些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沿海省份，实际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大部分在省内的内陆县。有四个地区连续出现两年的人口负增长，这四个地区中的三个在内陆地区。三年困难时期对人口的不良影响，在内陆比沿海要更‘为严重得多。⁵¹

⁴⁹ 王珍：〈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文汇读书周报》，2005 年 n 月 18 日，第 15 版。⁵⁰ 李若建：〈自然灾害与自然条件对困难时期饥荒形成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5 期。⁵¹ 李若建：〈自然灾害与自然条件对困难时期饥荒形成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5 期。

甲争人氏兵和国又” 第五春《1962 — 196 刃一 历史的变局

很明显，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实证性考察，特别是走进各个省份的历史档案馆，以求得「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的准确数量，思路是正确的。依据几十年后颁布的全国性统计资料，然后再做各种分析，是目前历史学家们不得已的办法。如果甚么人能痛下决心，同时又具备可行的条件，经过艰苦努力）这个问题应当能予以澄清。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悬案，人言言殊是不正常的。特别是，这个悬案为世界的中国问题学者所瞩目，影响甚为巨大。事实上，目前已出版的由各省党史研究部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中，已透露出比较可靠的材料。例如，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大跃进」运动和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安徽卷）》一书中即提供了一个比较平实的说法：「1958年冬，乡村农民开始吃野菜、树叶、树皮，个别地方已有人饿死。1960年，安徽粮荒严重，除去征购、种子和水利粮，农村人均口粮不足200斤，全省2900万人处在饥饿在线。广大农村田园荒芜，人们背井离乡，乞讨为生。由于饥饿及营养不足，全省城乡普遍发生浮肿病，出现低出生率、高死亡率情况，死亡人口增加。1960年，全省出生率为 $n.35$ ‰，死亡率高达 68 ‰，为全国平均数的 3.5 倍还多。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 57.23 ‰，全省总人口3042万人，比上年净减少384万人。净减少的人口中，除自然死亡、迁徙外省外，绝大部分是饥饿所致。”“这个数字即1960年安徽省总人口净减少384万人，应该较少水份。如果再加上1959和1961两年的实际数字，安徽一省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就相当庞大惊人了。

河南省无疑是受灾最严重同时也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据《河南人口地理》的计算，河南省1960年人口的死亡率是 39.6 ‰，自然增长率是负 25.59 ‰。「文革」中，群众批判当时的省委书记吴芝圃，揭发出来的数字是二百万到三百万。⁵³这个数字是否

————— ‘———→ ————————

52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大跃进」运动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合肥：安

徽人民出版社，2001）53 林福瑞、陈代光编着“

页 201 。

《河南人口地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转引自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香
港）

1983），页 115。 ， 1998 年 8 月号。

第一章天人之惑

可靠，颇需考证。但这样高的死亡率和负人口增长率，曾居当年全国之首，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当年仅信阳一地，死亡率超过 100 %。 ， 饿死约一百万人。

2005 年，中国政府宣布将实时公开重大灾害人员和财产损失数字。9 月， . 中国民政部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关于「三年自然灾害 j 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 r 我们不掌握」。这大约是官方首次公开面对这一问题，但数字仍付阙如。也许，时至今日，中国官方的确没有掌握一个可靠的数字。其原因可能当时就没有进行专门的统计。而且，报导或统计人口死亡的机构有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得到的数字差别很大。更可能的情况是，当时对这件事情非常忌讳。由于政治压力，也出于自己政绩和仕途的考虑，地方官员不愿意讲出实情，甚至会掩盖真相。例如，在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追问过安徽省长黄岩：安徽到底死了多少人？

不管确切的数字究竟多少，「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量是巨大的。即使是最保守的说法，也超过了 1000 万。如果以 1962 年全国总人口 6 . 7 亿计算，则死亡人数已占到 1 / 67 。这是和平时期，又是所谓「如果赶不上资本主义，就开除你球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因此，问题无论如何是严重的。

对于死去的人，我们是无法询问了。而活看的人，会因为这样巨大而严重的灾难】 究请很久很久。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宣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和提出在十几年内赶上、超过资本主义之后，却遭到如此重大的挫折，会引起怎样的震动，是不难想象的。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添加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争论焦点：导致如此重大的惨绝人寰，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若是天灾，天灾占几分？若是人祸，人祸又几何？ 1960 年 10 月 29 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说：「这样大的灾荒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⁵⁴ 此时，灾害的情况尚未向社会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献出版社，1995），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压史的变局

公布。作为总理，周恩来正在忙于算粮、筹粮和调粮。可以肯定，他的感受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诚如上文所述，中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大国。上世纪和上上世紀都有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出现。十九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亦即清光绪三年前后，就曾出现过史称「丁戊奇荒」的大旱灾。这次特大旱灾也是持续三年。当时的记载是：「天祸晋豫。一年不雨，二年不雨，三年不雨。水泉涸，岁饥，无禾无麦，无粱菽黍稷，无蔬无果。官仓匱，民储罄，市贩绝，客耀阻。斗米千钱，斗米三千钱，斗米五千钱。一卖田，卖屋，卖牛马，卖车辆，卖农具，卖衣服器具，卖妻，卖女，卖儿。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丝絮）食死人肉，食死人骨，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为人食，亲友不敢相过。食人者死，忍饥者死，疫病死，自尽死，生子女不举，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据《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统计，「丁戊奇荒」所波及的人口达到1.6亿到2亿之多。直接死于饥荒和大灾之后的瘟疫的，至少在一千万人以上。其中太原府灾前人口一百万人，灾后仅剩五万人“中华民族历史上发生的这些大饥荒，真是令人触目惊心，痛至心腹。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面对特重大灾荒，除去发放一点赈灾粮食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到皇宫北面的大高殿去祈雨。几滴稀疏的落雨，是难以解救远在千里之外数亿农民的灾难的。

我们已无法考证「丁戊奇荒」是否就是刘少奇同蒙哥马利谈话时提到的那次「八十年前」发生的大灾荒。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言及灾荒时，不能不联想到历史上中国所承载的自然灾难。这势必要引起这些领袖人物的内心检视：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共产党人，在执掌政权和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后，仍不得不对自然灾

害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承担责任。毫无疑问，承担责任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承担重大损失的责任更将危及一个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人们如何去面对这个责任？责任的大小、轻重将怎样在执政群体中加以分配？此外，直面灾荒，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能否将灾荒对人民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除去调集大量救援物资和实行紧急减灾措施以外，执政者将如何反思由大灾荒所折射的政策缺陷？

第一章 天人之惑

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无法掩饰地出现在历史进程中。显然，无论是问天、问地还是问人，大灾荒过程中和灾荒平缓和在人们中发生的上述争论，都将延续相当长的时日。这些争论将无可避免地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进程留下鲜明的历史符号。

第二章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一 「七千人大会」及其围绕大会所产生的分歧

在中共执政五十七年的历史中，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的会议，应有百次以上。其中任何一次，都对中共执政过程产生不容忽视的影绘。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所有这些会议中特别值得关注者之一。首先，它是自1949年以来中共中央召开的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工作会议」；其次，它的召开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第三，它的余音和意义远非寻常。

1962年1月11日，农历辛丑年腊月初六，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这一天气温很低，白天摄氏三度，夜间则降到零下十度。在北京，这也是一个相当寒冷的日子。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决定由北京市负责大会会务。事实上，抵达北京的远不止七千人。除规定的参会人员外，各中央局、省、地市的领导，都带来一些工作人员。这样，每省到京多达几百人。总共算下来，大约有一万人秘密地在1962年新年过后抵达北京（会议没有对外宣布）。显然，处在物质匮乏中的北京，面对着重大压力。但是，相对于接待压力，会议组织者事实上面对看更为重要的考验。召开如此规模的大会，究竟要解决甚么问题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直至会议开始前，似乎并没有一个非常肯定的预期。中共中央在关于

召开这次扩大的工作会议的通知中，曾对会议宗旨做了如下说明：「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情况，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但是困难还没有渡过。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例如，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这些观点、作风，又妨碍着困难的克服。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较快的克服，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从上述通知的语义看，会议主要是想解决「作风」问题。但是，按照常规，中共若决心召开大型会议，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路线问题、政治问题并通过决议，而不是一般的「作风」问题。或问，「作风」问题是那个年代政治精英们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吗？正因为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这种非成熟设计，才形成了会议的一系列关节点。这些节点曾令历史学者长久关注。

一为甚么要开七千人规模的大会

据现有材料说明，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最初意图，是反对所谓「分散主义」。这就是会议通知中所说，存在的「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要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而反对分散主义，同粮食问题有关。从1959年下半年起，不少地方粮食开始紧张。1960年后，中共中央一边发布指示精简城市人口，一边制定调集粮食的计划。调粮计划往往非常紧急，但却被地方打了折扣，这是中央所不能允许的。1961年11月1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和上调问题。但中央书记处的强硬态度，但中央书记处的强硬态度

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19。此书恰逢本章写作时出版。它提供了许多过去没有开放的档案材料，因此很有参考价值。本书将会在不同的章节提到和引用它。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度并没有得到地方大员的完全认可。邓小平提出，1962 年全国上调粮食任务将有 120 亿、150 亿和 180 亿斤三个方案。如果上调 120 亿斤，就不得不加大进口；上调 150 亿斤，日子勉强可过，但仍需一部分粮食进口；只有第三种方案即上调 180 亿斤，才可不进口并有部分调剂。对于这个调粮盘子，华东局柯庆施首先质疑。他提出，按 150 亿斤的方案，华东难以一下调出这么多。其它中央局负责人也表示难打保票，要回去做工作。此时，大家对吃粮问题非常敏感。农民的困顿和饿饭，不能不在各方负责大员的思考中反映出来。农民的生计必须加以调养，政策不得不加以倾斜。在这种情形下，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议，与其回去做工作，不如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两天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陶铸的建议。显然，毛泽东所看重的并不仅仅是调粮这样具体的问题。在了解了地方大员反映的情绪后，他认为「空气有些沉闷，人们的气不壮」。于此他想到，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索性就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他认为，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犯了甚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毛泽东还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思想统一起来。’

大跃进中，各省为了将中央和省一级的政策意图快捷与完整地贯彻下去，曾发明了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五级干部大会」、「六级干部大会」这样大型干部会议的形式。例如，毛泽东 1959 年 3 月 5 日所写的《党内通信》，就题为〈关于召开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问题〉。所谓六级干部，即指省、地（市）、县、社、生产

2 中央书记处 1961 年 11 月 13 日会议记录。引自张素华：《变局一七千人大会始末》 页 19 — 21 。

大队、生产队的负责人。毛泽东在上述通信中说：「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关于六级干部大会的规模和会期，毛泽东认为应该是「共计少则千余人，多者二千余人。会期七天至十天」。而要把方针降p刻放出去」，将r大小矛盾轰开」，没有一定的形式，即召集尽可能多的参与者共同介入，是难以做到的。在「大跃进」时代，由「改天换地」引发的社会氛围，同常态下的工作方式截然不同。毛泽东上述《党内通信》写于3月9日凌晨4时。当日下午1时，毛泽东又在湖南省委的一份简报上做批示，具体建议湖南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方法「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确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甚么地方。……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六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领袖毛泽东，有非常人可比的自信：只要r把方针一放」，情况立即明了，问题即可解决。特别在干部中出现歧见、思想并不一致的情况下，索性召开大型会议，把观点一直「桶」到最基层，可能更为有效。因此，当中央书记处提出1962年初召开一个地委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时，毛泽东不仅立即批准了这个原本在中共中央议事日程中没有的会议，并且还扩大了会议规模，即除中央局、省、地（市）县主要领导干部以外，工业部门的重要厂矿负责人，军队各大军区，军兵种和院校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参加之列。此外，毛泽东当即表示要在大会上讲话，并要「中央各同志都讲讲」

从某种意义上说，七千人大会虽堪称中共建政以来召开的最大规模的会议，但它却是一次临时动议召开的大会。从毛泽东批准到会议召开，仅仅两个月时间。通常，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是由一年

———

毛泽东：《党内通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59年3月9日。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26。

以前的中央全会决定的。会议主要文件即体现党在一个时期内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报告，需要仔细加以研究、设计和多次起草。此外，《组织人事问题的确定》也是极费周章的。非有一年时间不能从容解决。而七千人大会的筹备只有两个月，在时间上显得比较仓促。事后证明，大会召开时，连会议的主报告也没能够完全定稿。那么，是毛泽东对会议的设想过于随意了吗？恐怕也不能这么说。根据会前毛泽东的一系列想法，我们发现，毛泽东对整个形势是有把握的。其主要的方面，是对形势持有一种积极乐观的看法。至少，在他看来，这时召开党内大规模会议，不会出现观点、说法上的某种争议，或者，大会不会发生甚么完全意料不到的分歧。因为，自1960年底以来，经过不断地努力，对国民经济进行的调整已经有了成效，体制制度方面也做了相当大的改变，整个形势都在毛泽东的牢牢掌握之中。

七千人大会前，中央曾经召开过一次工作会议。会议于1961年12月20日开始，一直进行到翌年1月10日。会议是根据当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召开的。其议题是，讨论国际国内形势；讨论1962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问题；讨论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和党的建设等问题。事实上，这次工作会议为临时决定的七千人大会进行了准备。

12月20日，即上述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当晚，毛泽东同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谈话中，毛泽东看重对国内形势、当前工作、错误的责任、未来希望诸问题表露了自己的想法。这些看法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基本判断。

关于形势到底是好是坏，毛泽东说，感觉去年前年心情不那么愉快。究竟国内形势怎样？做一个总的分析，还是不错的。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六十条》一搞，最近把队为基础更进一步解决了，现在农村见效了。关于对过去几年如何看，毛泽东说）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

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有些缺点错误，我们把它总结起来了。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了，就变成了财富。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事情就会好办。

关于责任。毛泽东指出，在研究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中央工作的情况后，发现问题还是很多。有些问题是部门、地方出的主意，为甚么中央听呢？责任第一在中央，第二是省。

关于有没有希望。毛泽东认为，应该是有希望，是扎扎实实有希望，是真正有希望。应该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就要提出新任‘务。毛泽东告诉邓小平，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要大抓一年，几个方面要理出一个头绪来，都要「跃进」一下。总的看，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是好的。他认为，经过两年的调整，「退」得已经差不多了，到了「谷底」了。1962年应该是向上爬行的形势。按照这样的基本判断，他认为全党需要的是鼓劲，而不是泄气。而鼓劲便需要统一思想。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在他刚刚巡游的地方，获得了有力的左证。中央工作会议前，毛泽东于10月30日晚歙程到上海、浙江小住。12月13日到无锡。第二天听取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他得到的信息是，江苏粮食征购任务已完成94%，棉花超产，原定征购150万到200万担，实际完成220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在几年来喊困难不绝于耳的时候，江苏1961年的形势令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原打算暂时停留的毛泽东，将行期推迟，在无锡住了三天。在继续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的讲话值得注意。毛泽东说，对形势要从积极的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毛泽东还说，贯彻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精神要快一点，一传达

5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页1190。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下去就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要明确大队干甚么，生产队干甚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强调，「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是两句最能代表毛泽东此时心境的话。「大跃进」发生严重问题后，一般人对国家形势持悲观态度。至少，人们看到和感受到的是政治紧张、物质紧蹙和生活凋敝。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和共和国建设的设计者，他如果也同样感到悲观泄气，便不可想象了。以毛泽东百折不挠的性格，以他希望创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境界的气魄，在面对「大跃进」所带来的这些困顿的时候，虽小有挫折感，也谨慎地进行了「纠偏」，但决没有「垂头丧气」「灰溜溜」的道理。在历史上，毛泽东曾经创造过无数从绝境中奋起的政治奇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翻山」。翻过一次次陡峭的山峰，必定有云开日出、无限风光的前景。况且，自1958年11月开始纠正「混乱」的努力，虽经庐山会议的「插曲」而有所波折，但所改正的东西仍然是多方面的，甚至已经触到了许多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从总的方面来说，国家仍是按照毛泽东所期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在前进。有问题加以纠正，同倒退和转向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综观60年代前半期，毛泽东所发的历史性感慨最多。这些历史性感慨，都是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跨越来说明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体会这些历史性感慨，对理解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历史人物所独有的精神气质，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一般人所担忧的问题，在毛泽东那裏不过是暂时性的困难而已。至于研究者和历史学家们后来不断追索的「历史责任」问题，在毛泽东的心裏可能就根本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死人、饿饭，的确是令人难过，但比较对中国社会主义大方向和大前途的认定、比较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185—1186

？‘丫’、『卜倘’、•‘『，，』。j’‘暂咏一、‘’、’？
’、’J，’训1’””jj鸟一’”J

处理事务层面与强调精神追求两种价值取向说来，前者就有「小人常戚戚」的感觉了。毛泽东要的是精神力量！要的是干大事业的那么一股气！

即使从事务层面讲，毛泽东的看法也自有他的道理。这就是他说到的，「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一事只要一传达，立刻可以调动积极性」等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这些政策调整，对规范「大跃进」以来的混乱，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关于农业条例的制定。

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不到半年时间，「再次跃进」的口号便软弱无力起来。农业生产因自然灾害的影象，粮食开始大幅减产。据核实后的数字，1960年实际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下降15.60%。前章已经详细讲到各地缺粮所形成的紧张。实际上，更为严重的在制度方面。新的「大跃进」风潮，引发了新一轮「共产风」的泛滥。在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过程中，农村所有制形式再次出现剧烈变动。而与1958年不同，这一次的「求变」，是打出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旗号。所谓基本队有，就是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所确立的集体所有制形式。而向社有过渡，即意味着将核算范围扩大到公社一级。无疑，在形式上这是向「共产主义」的更快「迈进」，但本质上则强化和扩大了生产的统一性质，使分配上的平均性更为严重。这不仅严重脱离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甚至也违反了农业生物学原理。

为了接近这个海市蜃楼，许多省提出三到五年或者五年左右实现从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过渡。而许多地方为登上这个虚幻的楼阁，不得不满足一个基本条件，这就是社有经济在公社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必须占绝对优势。办法是，大办社有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力兴修水利工程。这样做的结果是，必须无偿地从大队、生产队抽调劳力、资金和财物。而为拉平穷队和富队的物质水平，唯一的方法就是剥夺富队，让富队在资金、劳力、生产资料等同穷队实行「共产主义大协作」。这种在1958年盛行一时的「平调」方法，不仅没有威信扫地，反而卷土重来。而对农村生产力构成更大威胁的，是公共食堂

叩一于一 一刀 j 骗 7 讪久 “ ’ ” 个驯 j

的再度兴起。它被看作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波」的大事，从而被极力渲染和执行起来。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该批示指出，公共食堂是个「极端重要的」的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普遍推行」。⁷ 据该文件之附件〈一九五九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截止到1959年底止，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吃饭的约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0 / 0。‘四亿农村人口舍弃自家的锅竈，与同村同队的老少爷们一起吃饭，在人类进化历史上也可说是个惊人的「壮举」。如果人们不理解怎样违背「农业生物学原理」这样一个十分专业的术语，那么，从四亿人在同一个锅裏吃饭的情景，就大约订以弄懂其寓意了。

可以肯定的是，庐山会议后出现的这种由政治生态而催化的社会走向，是非常难以逆转的。在当时的体制机制下，毛泽东可能是唯一能对此提出公开质疑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加以纠正的人。实际上，1959年后掀起的再次「大跃进」运动，到1960年上半年，已经难以再继续下去。毛泽东通过地方报告的情况，开始对此产生警觉并表示不满。1960年3月3日，他在代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中，比较严厉地写下这样几句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实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都应该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广东省委披露的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是：「目前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8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十三册，页8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91-195。《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56-1965）——历史的变局

的错误。主要表现：1、乱抓乱调或无偿抽调大队的种苗、生产工具、建筑材料及其它物资，过多的占用大队的土地；2、无偿、无限制的调用大队的劳动力；3、不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公社的经济力量，过多的将一些大队或小队转为社办农场，或以此来扩大公社的经济的比重。」¹⁰对毛泽东来说，这种「平调」之风，是再熟悉不过的了。1958年11月以后，毛泽东已经严肃批判了「平调」之风多次。不想，只要水土适宜，它立刻又冒了出来。

3月23日，毛泽东在看到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时，对地方上再次出现「共产风」和「一平二调」，表示了相当大的厌恶。他在批语裹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经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甚么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睬。……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撒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

这些情况再次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纠乱」、「纠左」。对毛泽东来说，治「乱」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制定若干「规矩」。所谓「规矩」，是以一系列「工作条例」来实现的。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60年代初期是中共出台各种「条例」最多的时期之一。著名的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等。这些条例并不是法律和法规，因为它们不具备法律的法理讲究和条文规范。但在性质上，它们却具有刚性，是工作上的「规矩」甚或

10 1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页3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页129。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独」

命令。在中国的政治环境裹，这些不是法的「规矩」，约束力并不比法律来得差。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些条例，相信它们的作用。在这些条例中，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最重视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即「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前者是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主要内容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等。可以看出，「紧急指示信」的「紧急」意图，是先纠正再度泛滥起来的「共产风」，即所谓「一平二调」。因为这是对农民危害最严重的东西。这时，毛泽东已经了解到农村饿饭、死人问题。不久前，他终于知道了发生在河南的「信阳事件」。这种动辄死去几十万人的情况，令毛泽东大为震惊。毛泽东仅用一天时间就审改完周恩来报送的「紧急指示信」稿，对其中一些规定性的提法做了修改。这些修改主要是拉长了对规定执行的时间，比如草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被毛泽东改为至少七年不变；草稿中「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一句中，在「现阶段」后加了「在很长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一句话。¹² 显然，这是很关键的话。

「紧急指示信」下发后，农村反应较好。虽然规定的十二条，过去几乎都提到过，但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再次予以重申，迫使胡闹的人警觉起来。那些明显的「共产」做法，由此不能不有所收敛。但「紧急指示信」仍然有「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的规定，这仍然使农民难以真正接受。

‘相比「紧急指示信」，「农业六十条」是更为彻底地研究和规范当时人民公社问题的重要文件（规定）。「农业六十条」的本意，仍然在规范人民公社的体制。此前，1959年4月上海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曾要求最终制定出一个人民公社示范¹²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100

甲妒八代拷和哄叉’ 矛盾巷以 yb 荔一 lyo }) ’ — 产丈的赏句

章程。但人民公社体制不断调整，示范章程难以搞定。于是，1961年2月田家英提议「可以搞一个章程」。此议获毛泽东首肯。毛泽东的基本想法是：「要搞一个人民公社章程恐怕有困难，准备一个工作条例，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能、权利，想做甚么，不能做甚么，都规定好。规定好了，就好办事了。」”据《毛泽东传》，毛泽东于1961年1月底从北京出发，沿途经过河北、山东、浙江、江西，最后到达广州，在广州召开了著名的「三南」会议，起草定稿了「农业六十条（草案）」（也称「三月草案D

「农业六十条」最重要的内容是，规定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为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确定人民公社的规模不宜过大，公社大体上相当于乡，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分配上工资和供给部分为七比三；以及公社占用大队劳动力不能超过后者劳力总数的2%和允许社员经营占耕地面积5%的自留地等等。这其中，体制和规模是最关键的地方。它限制了「平调」和所谓「一大二公」，是反「共产风」之道而行之的。而在一两年前，要提出缩小人民公社的规模，还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缩小规模将意味着丧失农村社会主义的标志。而自田地的被肯定，不仅对农民生活改善极有帮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和缓解了农民怕政策多变的恐惧心理」。14 尽管广州会议议定了「农业六十条」的第一稿，但事实上，对人民公社的调整并没有停止。三个月后，经过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农业六十条」再次被修改。这个修改稿被称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最可值得重视的地方是：「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意味看，自1958年被宣传为共产主义标志的公共食堂，自此宣布取消。紧接看，毛泽东于9月29日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人民公社体制还是要「退」：「我们对农业方面的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

■ ————

13 薄一波：1993）14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页 914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卷，页 922 。

矛一早 1 斗才人火’（才八徇」

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甚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东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脣。」「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15 10 月 7 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研究「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1 “最终，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变动，在 1962 年 2 月 13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予以确定：「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实行的根本制度。」17

在所谓集体经济的框架内，以规模只有二三十户左右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可能是「退」的最后界限了。由以上叙述可知，此事一直是在毛泽东不断思考甚至直接提议下促成的。尽管，农民从生活本能和避灾出发，仍希望再降低所有制的「公有」程度，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只能是最后的界限了。毛泽东认为，通过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确立，人民公社最大的弊病—平均主义，即，在一个核算单位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不平衡，生产好坏差别很大，穷队与富队之闲差别很大】而收益却在生产大队统一分配从而造成的平均主义，终于可以被解决掉了。由此毛泽东长舒一口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 年高级社成立），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细

15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出版社，1997），页 728。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出版社，1997），页 180。1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页 284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第十四册，页 7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 弘一 历史的变局

以往人们对毛泽东这个感慨的解释，多是赞叹，因为毛经过不懈探索，终于找到了比较正确的方式，来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解决人民公社最关键的问题。但是，从历史本质看，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理念中的社会主义的根本进行方式。他的探索，是在坚持这个社会主义根本进行方式的框架下进行的。他并不想根本地改变甚么。他所做的，只是坚决「治理」在这个框架里面出现的混乱。他在〈十年总结〉中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 1956 年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1958 年 5 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 1958 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

’ 9 这个总结性的话，表明了毛泽东对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发展、独创性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寄托。在内心裏，如同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由他提出并被解决一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也被看作是新的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不得已而学习苏联，到「找到一条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当作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来理解和褒颂的。正如中共党内最著名的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所说：最初，「中国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基本是学习苏联共耕社（初级社）、集体农庄（高级社），只是小有改进，而无大的创新。人民公社就不同了，毛打算领导中国数亿农民做个大试验。这个试验不是民粹派式的，避开工业化问题；也不同于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西方合作模式；更有别于第二国际先资本主义、再社会主义的主张；不是严格的先社会主义、后共产主义的模式，不走一般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而是想试验一下中国大同世界的理想」。20 理解毛泽东的这个「试验」情结非常重要。它倾注了毛泽东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即树立的理想。这个理想是独特的。它没有

重复前人的设计或某种理论模式，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土地上

1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2005》，页 77 — 78。

，第十三册，页 418。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

视口唱个唱让 J：， j 啊）6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自己构造的东西，这无疑加大了人们的寄托。苏联 30 年代搞过类似的公社性质的农村组织，但归于失败。这是赫鲁晓夫看不起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对毛幸灾乐祸的原因。但是，毛泽东同样看不起赫鲁晓夫，认为他不过是个善于拍斯大林马屁、外表粗鄙而又没有智慧的人。对赫鲁晓夫的讥讽，毛泽东只是用了他独特的诗化语言：「吓倒了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就使中国人陡长了民族志气，而看轻了自己面对的极为艰难的经济形势。毛泽东甚至说过，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从纠正「混乱」和关乎农民生存状态的角度看，把农村所有制规模降到二三十户的生产小队，已经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最为重大的调整了。它的确要比给国家带来动荡的苏联集体化合理得多。但是，从理想或理念上讲，人民公社体制的根基不能动摇，如果再进行调整，比如合法化地看待「责任制」和「包产到户」，那将突破原本设定的制度基础，也就是向毛泽东的底线挑战了。在毛泽东看来，实行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和取消公共食堂，已经根本地解决了平均主义问题，因之也就解决了 1958 年以来人民公社运动出现的混乱问题，因此，他认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应该是有希望，是扎扎实实有希望，是真正有希望。正因为如此，他的心情变得舒畅了。在 1961 年 12 月 20 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周恩来说到，他对形势的估计是四句话，即「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时，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向走。农业有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可见毛泽东此

时的心境是怎样一种状态了。这就是七千人大会召开前，毛泽东的基本想法和他欣然提议开大会的思想背景。

然而，事情并不像毛泽东想象和希望的那样。人们的思想并不都是那样一致。在会议的准备阶段和会议进行中，逐渐暴露出许多不同²¹ 引自（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册，页 1188，

66

意见。这些意见，同毛泽东的认识有分歧，甚至分歧还相当大和尖锐。其根本点，还是人们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存在看不同的价值评判。同时，由于客观形势的困难，还自然引发了对犯错误的原因和责任的追问。这当然是毛泽东所不愿看到的。

二一致耶？分歧耶？

在迄今的官方中共党史文本上，对七千人大会的说法，大致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为基调。这个判断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性评价。但实际上，当更多的历史材料为人们所了解，当 1958 年至 1966 年「文革」发动被人们作为一整个历史时空来研究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基调，将可能发生改变。

通常，中共内部的思想矛盾不会以外在的对立形式表现出来。庐山会议后，在对彭德怀进行无限上纲和无中生有的批判斗争时，彭曾极度痛苦和陷于绝望。即使如此，彭在身背恶名而又有口难辩之际，仍出于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威信，而被迫承认和检讨了所谓「罪行」。老一代共产党人，对于党内的政治争论，通常是以党性来自我约束的。即使存在反对意见，也鲜用公开方式表达出来。随看毛泽东威望日高，体制所赋予他的权力越益强大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首先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具有天然的正确性。而在确有不同看法时，也是不会公开表示的。因此，党史上的确没有「反对力量」存在。

但是不同的看法总是存在的。一些重要知情人的回忆，提供了关于七千人大会的重要情节。这些情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不同看法之间的矛盾，并且，它们一直涉及到中央最高层之间。据吴冷西的回忆，1961 年 12 月 21 日，邓小平开始主持讨论七千人大会报告第一稿。这疾讨论实际上就透露出人们看法的不一致。会议的参加者是政治局

和书记处的成员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以及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等人。会上，大家认为报告第一稿对形势估计还是过于乐观，应有所保留。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方面的问题还很多于另外，关于十五年「超英」的口号是否还应该提，值得考虑；第一稿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有关经验教训，要根据中央书记处给政治局常委的检查加以阐述，而且要联繁党的历史教训写等等问题，都提了出来。”

在中共党的文件起草模式中，文件的第一个部分通常要对形势作出估计。其作用是为整个文件设计背景。一般说，对形势的描述总是积极的和正面的。在正面肯定问题后再指出面对的问题。先讲形势的积极方面，然后用「但书」加以转折，构成了文件摹写的规矩。除非人们对形势的看法非常负面，形势到了一种紧急状态时，文件的形势部分才可能写得不那么昂扬。否则，作为一个正式的党内文件，其情绪就不太对头了。而显然，当1960至1961年国家经济遭受重大挫折之际，会议报告的形势部分虽不能讲一片漆黑，但要做过多粉饰，也是不那么恰当的。因此，参加会议的中央负责人立即提出了不同意见。至于提出联繁历史教训来写的意见，不知所指为何？是庐山会议？还是更早些的「冒进」等等，就不得而知了。但中央书记处确曾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中央发出的文件进行检视。这是由陈伯达领衔进行的。其成果形式是，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编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在这个阶段的语录，一本是中央具体的指示和批转的文件，即由中央各个部门发出的具体指示，以中央名义批准。检视的结论是，前者确定了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而后者「毛病很多」，问题和责任应由中央书记处来承担。现在，在参加七千人大会报告第一稿讨论的人们看来，这个第一稿，似乎连书记处的认识也没有达到。

12月22日，声缠少奇在看完报告第一稿后，专门到钓鱼台找起草组谈话。据吴玲西回忆：「少奇同志劈头就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22 吴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中》〉，《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样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示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纠正。刘少奇特意叮嘱起草文件的「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东手东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错了由政治局负责。」，

不知此时刘与毛之间有无沟通。据近年披露的材料，毛泽东于11月底即离开北京，在上海、杭州、无锡等地盘桓了二十天。于12月19日晚返回北京。²⁴ 如果两人之间有无沟通，从毛回到北京至刘来起草组谈话，有一天多的空闲，就文件起草交换看法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看毛泽东11月12日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则可知毛泽东并没有想到要起草一个报告。他只是说，他自己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和大区的负责人也要讲一讲。从毛的这个态度看，似乎他并没有像通常对待党的代表大会那样，要就召开大会考虑正式的程序，要准备一个正规的报告。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工作会议，如同省里召开的四级、六级干部会议一样，确定一个会议的主题，由领导人来讲话，确认整个形势处在好转之中，把工作讲清楚，目的即可以达到了。后来，从临时延长会期和毛泽东根本没有审读完大会报告等情况，也可以说明这种推测。

但文件起草组、特别是负责筹备会议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常委们，却无法掉以轻心。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大型会议，说明当前形势，

吴伶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中）〉，《党的文献》袁小荣：

〈建国后毛泽东的57次离京〉，《党史博览》

1996年第5期。

2003 年第 12 期

『 J4 22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揭示一些严重问题，至少要在大会上讨论一些认识不一致的争论，才算不枉大会的举行。因此，他们对文件起草十分看重。此时，离大会开始还有不到二十天。「秀才们」深深感到起草报告的压力。他们几乎夜以继日，工作极为紧张：「陈伯达往那儿一坐，就说，我要死了，昨天又是没有睡好觉，你们有甚么想法先说说。有时候我们说一说，有时候陈伯达又说了，你们不说，我先说，他就谈开了。其实他早就心裏有数了。我们改了一稿又一稿……上午扯完了，下午就写……很紧张。」起草小组的田家英私下曾对陈伯达说：少奇同志这次更加强调缺点讲透，而且措辞尖锐，我们是做文字工作的，报告是少奇同志做的，我们起草时只能照他说的写，要改由他改。起草小组当时的共识就是，要原原本本地按照少奇同志的意见修改一遍。“在刘少奇对草稿提出尖锐意见之后，「秀才们」加班加点，于 12 月 31 日终于陆续拿出各个部分的修改稿。这一稿写作艰难，是增加了「高手」的。据胡绳回忆，他是在 1962 年元旦的晚饭时，由陈伯达拉进写作班子参加报告起草的。后者安排他起草第一部分 r 形势和任务 J 。

《變局》一书作者认为，吴冷西关于报告起草的前述回忆有误。真正的第一稿应该是在 12 月 31 日完成并送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但根据档案材料，邓小平在 12 月 16 日已经讲到报告要有一个提纲。这说明秀才们已经开始工作。而用半个月时间起草第一稿，按一般速度推算显得有些慢了。按惯例，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都是由若干 r 大笔杆子」分工合作而成。一旦指导思想确定，已熟练掌握文本语言、有熟练写作技巧的 r 秀才」们，在几天之内连缀出一篇报告稿并不难。何况，按常例这样的报告不可能一次完成，它一定要经过反复修改，多次上下往返才能逐渐「磨」出来。因此，先很快拿出一稿作为「靶子」，是完全合理的。

在知道了刘少奇对形势部分（即第一部分）的尖锐意见之后，主持文件起草的陈伯达「搬援兵」帮忙是合乎情理的。胡绳的回忆是：

25 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40。

26 吴玲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中）〉，《党的文献》，1996 年第 5 期。

「常八氏」弋和斗又'矛 j 唱夸 '1 梦 0 必一 1 丫 0)) — 贗
又叨更甸

(1 月 6 日) r 下午) 少奇又来看，看后他找到我，问：你看下面县委书记一级的同志们对形势的估计会满意吗？我说差不多了吧。他举了下面的一些情况，说了有些县委书记的意见。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估计得太轻了，讲得不够。好像对前两年工作的检讨也提出了意见。总的感觉，少奇没有通过，表示不满意。于是大动干戈，一直改到凌晨 3 点才大体完成。好像也不只是内容不行，还包括逻辑上的问题。」

根据胡绳的这个回忆，刘在 12 月 22 日已经对报告稿提出过尖锐意见的说法，应该是成立的。因为，刘对胡绳所谈、比第一次由吴玲西记述的要和缓许多。在后来定稿的报告中，对形势的判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工业总产值在 1961 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不少的企业，由于原料、材料、燃料不足，还陷于半停产甚至停工状态。特别是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目前还不可能有多少改善……分散主义倾向的存在，又严重地妨碍着我们集中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相比较吴玲西回'噫的刘 12 月 22 日对报告的意见，显然已经和缓多了，同一般工作报告的「但书」内容很相像了。「下猛药」、「代表政治局做自我批评」、「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等意思是完全不见的了。大会开始在即。从 1 月 6 日邓、刘再度到钓鱼台谈报告起草问题算起，会议开始的时间已经没有几天了。据胡绳的记述，7、8 两天邓和刘又先后到钓鱼台来谈稿子。同时，稿子的一、二部分还发给了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书记们讨论，他们也「议论甚多」28。此时，刘对稿子还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又将稿子带回家，独自研磨。8 日夜 12 时，刘在稿子上批：「胡绳同志：此件我又把前面几段看了一遍，有一点修改。国内形势部分还有些地方是别扭的。请你们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358。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44。

勿。《6『必勺必

弟二常—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明天好好再改一遍。」2，9日，刘再次到钓鱼台同「秀才」们商量报告稿）直到深夜，才算最终定稿。从上述过程看，刘对报告最费心思的还是第一部分即〈目前形势和任务〉。关于形势的「说法」和分寸把握、极费周章。同时，表达这种「分寸」的逻辑，也必须精心设计过。从这样一种「语境」看问题，可说明刘少奇等人面对的复杂形势及他们的复杂心情。从报告的定稿看，刘先前的态度和设想已经基本不见了。可见，「猛药」还难以轻易下。对于一个政治家说来，在既定的体制下，在形成文件的文本上是不可能把话说「过」了的。但即使如此，这种「妥协」的结果，并不表明刘对形势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他总要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问题在于时机。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态度最关键。1月9日10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向毛泽东报告：「主席：小平同志嘱向你报告两件事：一、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共三部分，前两部分已于昨日上午送上（已同时发工作会议，今天各组即将讨论），第三部分今晨已送出。这个稿子是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小平同志希望你审阅。二、书记处向常委的报告和几个附件，应如何处理，请示。出席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昨天已到齐，近几天他们都在参观。」30此时，离大会开始还有不到四十八小时，时间紧迫。这件档案透露的两点情况值得注意：第一，这样一个大的报告，直到8日上午才送到毛泽东那裏，时间似乎过紧了。毛还有时间仔细审板修改它吗？第二，刘将要在大会上作报告一事，此前似乎并未在常委中进行安排，毛似乎也不知道（是杨尚昆做再次提醒吗？所谓「稿子是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一语，是告知性的话，不像事先已商定而再临时加以提醒。如事先已决定由刘做大会报告，杨在便条中应该说「少奇报告如何如何」，这比较符合中央决策层的语言习惯。既然刘做报告事先并未研究确定，那么，报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44。张素华：《变局—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46。

29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报告的写法和对形势的判断，似乎也没有经毛泽东和常委认真讨论过。由此可以印证我们的上述推断：毛预先并没有仔细考虑过是否要写一个正式报告，由刘少奇出面向大会宣读，对当前形势以及相关问题的判断，并以此作为中央的一个结论性意见来指导工作。那么，如果毛没有搞一个正式的大报告的设想，那么从 12 月上旬即组织「秀才」班子进行报告的写作，又是出于谁的安排呢？现在可以确信，毛对报告的写法和内容是不知情的。他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没有参与过任何意见。他到南方巡视二十天，恰巧是报告在北京构思的时候。毛 12 月 19 日晚回京后，刘似乎也没有把报告的写作情况报告毛泽东。而根据上面吴玲西的回忆，刘对报告的写法，特别是对报告形势部分的写法，是有相当成熟的考虑的。其关键点，就是对几年来错误的估计，即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发生的问题，看得比较负面，认为它们的错误程度甚至错误性质并没有被恰当地加以评价。而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纠正不实的认识，指出问题的严重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错误「翻箱倒筐地找出来」。而这同毛泽东关于形势的看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前面说过，毛泽东的看法接近于「绝对乐观」。他认为，通过这一年的努力，特别是农业的条例一发，最严重的问题已经大致解决了。国家的形势正在好转。他强调，沟底已经爬过了，该开始走上坡路。因此他自己的心情是舒畅的。按照这个总判断，他同刘等人之间在情绪上都大相径庭，更何况政见呢？在这种背景下，他关于报告的印象，将难以是肯定的。

据说，毛泽东在 8 日和 9 日分别接到报告的稿子后，一夜未眠，于 10 日上午 10 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并写了批示：「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它一百多同志（按指省委书记以上在中央参加小型工作会议的人），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

此三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苏共）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这件在毛的秘书呈送信上作出的批示，颇可琢磨。毛泽东看了报告，但只看了一遍。虽然觉得好，但又说并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再看一遍，才能有所感觉。这些话是甚么意思呢？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从语气看，至少不能说满意。实时问太急，不能消化。而且他还推测参加小型工作会议的人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这个报告。因此，毛泽东建议会议开幕的第一天不开大会，而是分组讨论别的问题，以待对报告进行再修改。很快，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他吩咐邓等人，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也不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报告，而是立刻将报告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各种意见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³²

在建国后中共召开的历次会议中，类似毛泽东这种做法，是绝无仅有的。开会拿不出报告，等于没有一个集中讨论的议题。如何聚拢大家的意见，怎样通过讨论达到共识？便都变得没了谱。这是不得已而出的一个「变招」。它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结论：中央高层中没有形成一个巩固一致的看法。毛泽东在1月30日他的讲话裹曾经这样讲到报告起草的过程：「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j 33 可见，毛泽东对

31 张素华：《变局—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47。

32 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47。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 16。

T 啊「'、fN 中付叮“州）”不州斗中卜 k 17V' 1) UJ) 恤 C】
汕斗 7) 1 觴 I

啡才」们起草的稿子’至少是放心不下。认为在中央的人并不能充分反映问题的本质’有人认为，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就是嫌太空了。他因此提出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看是不是符合他们那裏的实际。J’ ‘而起草组成员胡绳后来回忆，毛泽东不赞成报告，是因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不够，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了 j 035

作为当事人和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胡绳的分析显然更有道理。《变局》一书作者在研究毛泽东当时心态时，由 1966 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判反推，认为七千人大会的报告起草，已经种下了毛刘之间的恩怨。事实上，不用追溯到四年后毛刘矛盾公开那么远。早在 1964 年 8 月，毛泽东在与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的谈话中，就已经表露过：「一七千人大会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 4、5 月更讲得严重。」’ “对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不符合毛泽东的看法。这涉及到对 1960 年以来、也就是毛泽东通过重大努力，用制定一系列条例即党内法规的形式，确认农业生产所有制必须「退」后等若干新发展的判断。对形势和若干新发展所做的判断，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同总体的「路线」、方针紧密相连，从而也同毛泽东的政治领导联繫起来，因此有相当的敏感性。后来，由于对形势判断再次发生分歧，中共党内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了。这是后话。

《变局》一书作者以下的分析是准确的：「既然毛泽东对报告的起草工作采取了比较超脱的态度，是否就可以理解为，当他看了报告稿以后，继续采取一种超脱的态度，看也不要看完，干脆就让大会去讨论好了呢？从他 1962 年 1 月 10 日写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批示来

———~——~———
34 访问汪东兴记录，引自张素华：《变局— 一七千人大会始末》 35
引自张素华：《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49，36 引自林蕴
晖：〈读《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学习时报》第三
版。

页 47 — 49 。20 () 6 年 8 月 21 日

弟一早— 么才大天’ 《分入独丁

看，显然不是这种情况。应该说，报告的内容有些出乎他的意外！户
说毛泽东对他自己提议的有省、地、县、重要企业各级领导共七千余
人参加的大会文件保持「超脱」姿态，显然是幼稚的。这样一个正式
报告所代表的，是党的核心的声音。其观点和结论，都应被看作是中
央关于方针路线性的意见。毛泽东显然不会无动于衷。

《变局》作者认为，毛泽东感到意外的，是报告稿草稿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目前形势和任务〉。这一部分包括两个目：「国内形势」
和「基本经验教训」。《变局》作者说：「问题恐怕就出在这裹。
尽管报告的框架结构和基本精神，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来搞的，但问
题是对过去几年的工作怎么总结？讲到甚么程度？这中间肯定要涉
及成绩和错误、错误的责任和原因，涉及对当时形势的估计等等。如
果把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同后来修改的报告稿进行一番比
较的话，就会发现，前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讲将建国以来十二
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混看讲的，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
没有单独讲，而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所以
在大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一片黑暗，越看
越没劲。修改后的稿子，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成绩十二条，缺
点错误四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十六条，此外，毛泽东曾多次讲
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前稿上，却没有这样的判断。」”

《变局》作者提供的信息是独家而重要的。我们现在看不到报告草
稿的第一稿。如果这个稿子真是将成绩和缺点错误做这样的安排，即
将建国十二年来的成绩放在一起讲，而将错误都「归结」于「大跃进」
之后，那无疑是不妥当的。如上文所说，在党的重要政治文件的表述
裹，开篇即应肯定成绩。在充分肯定成绩之后，再过渡到问题上。

这样写，整个文件才是积极和正面的。否则，将缺点放在文件的突出位置，成绩部分就自然淡化掉了，文件的倾向也就值得怀疑：到

37 3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57。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57—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底这个时期的工作是好还是坏？路线是对了还是错了？在党内「路线斗争」激化期，政治文献为了斗争需要，一般是采用先缺点后成绩的处理方式的。例如，1935 年的遵义会议，在博古作政治报告之后，张闻天作了「反报告」。「反报告」当然是为了批驳「正报告」，当时党内斗争激烈，为挽救西征红军的命运，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为一方的「反对派」，挑战以博古和李德为一方的「当权派」。反映在政治文献上便是述说针锋相对的意见。苏联以「政变」方式剥夺赫鲁晓夫第一书记时，决议也是以历数赫在执政时的错误和缺陷为内容的。在党内政治环境处在稳定时期，毛泽东作为全党拥护的领袖已经有了近二十年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时，这样处理党的一个重要政治文件，必定引起分歧，如果否定了成绩，那意味着甚么呢？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全党一致赞成的一项社会主义实验，错误在所难免。而且，有了错误，大家已经承认并极力从制度上加以改进，形势本来是好的。可现在这样处理，变成了单挑错误，至少是没有突出成绩。这是甚么意思？难道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和降低指标，已经把「乱子」解决得差不多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等等，不是事实吗？面对七千党内干部，怎么能优点没有讲足，却「突出」错误呢？

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界对这种情况的解释，莫衷一是。主流学者一般是用文件起草者坚持「正确观点」、坚持「党性原则」来说明它。但是，这种将历史截然分为「正确」和「错误」的解读方式，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一方面，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人，私下的不同看法可能存在，但并没有出现截然对立的思想分野。要知道，采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意图，是中共核心层的共识。始作俑者不仅有毛泽东，还有其它人，包括刘、邓。这就是邓

小平所说的那句名言：「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³，3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 296。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大跃进」出现挫折，并不一定立刻就形成人们认识的对立和出现一批要用「正确」方法来「清算」和「改正」它的党内「反对者」。从历史分析看，在 60 年代初期，即使是党内精英的认识，也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如果说要追究「大跃进」的责任，那就更加荒唐了。追究谁呢？这在当时还是「无解」的问题。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是与非，当时还不能一下分清楚。大家都挤在一个「空想的快车」裹。因此，用所谓两极思维是解释不了问题的。另一方面，人们必须考虑党的政治文化规则。即使有意见和不同看法，在一定政治环境中，也是不能过于直露地表达出来的。它必须考虑整体影响、国内外反映、群众观感，特别是，必须顾及毛泽东的威信和态度。在毛泽东巨大政治威望已经树立起来，在「反冒进」和庐山会议之后，党内民主环境已大大下滑的情况下，富有几十年政治生活经验的政治家们，当然应该谨慎一些。他们自然懂得这一点。

那么，怎么解释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起草报告稿时的想法呢？从吴玲西的回忆看，刘少奇的确对问题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这同他前往湖南老家做调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对庐山会议以来党内不容乐观的状况深所担忧。他在 1961 年初工作会议上和这次起草报告稿时，都提到如果庐山会议时真正纠正错误就好了的意思。这表明，他对庐山会议的结果非常懊悔（对彭德怀的看法应另论）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刘少奇同毛泽东已经存在严重政治分歧。在某种意义上，在中共核心层，对于在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实验，是很难遽然区分政治分野的，最多也就是像「陈云没有表态」这样一种认识状态。从后来刘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看，他还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持肯定态度的。因为他还没有理由完全否定它。历史的答案，在当时并没有被完全清晰地提出来。但刘对现状确实很焦虑。这表明他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于是，他比较直率地谈出自己的感受，而把明显

犯「忌讳」的东西也摆了出来。至少，他认为七千人大会应是一次「震动」干部们的机会。通过「震动」改正一些问题。这就是报告起草过程中毛与刘之问看法「分歧」的理性解说。

甲争人氏兵和国又· 弟五吞〔1962—1963〕 匀一 登又的变向
三矛盾与选择

下面几段材料取自《杨尚昆日记》，记录了七千人大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核心层的活动。

1962年1月8日记，「上午看〈在扩大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前两部分，基本上是好的，目标鲜明！已发各小组讨论。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明天才能修改好。」

1月10日记“〔12时（陈）伯达、（田）家英同志来谈上午小平同志同他们去主席处谈话的意见，主席认为报告的中心（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并决定立即将报告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准许各种意见发表……〕”

1月11日记：「上午10时到12时，书记处开会，由小平同志谈各组对报告反应和会议开法、主席指示要点。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很好，主导思想不能变动，否则不利于总结经验 and 吸取教训，也就不利于建设。」

1月15日记：「几天来忙于开大会，文件压了一大堆，今天上午都集中力量看了一些，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一晚间8时半到12时，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王）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县级干部对人民公社的正确性，还有怀疑，觉得不好说。」

1月16日记：「午睡后去少奇同志处，将小组情况向他汇报。他认为：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同志接受教911不够，还没有充分认识，现在不说通，将来会犯错误。此情况应向主席反映，由主席

决定会议如何闭法。… … 田家英同志来谈，刘、邓已向主席谈过，主席

弟二常一 三分大灾，七分人祸」

决定成立二十人的起草委员会，先谈主要矛盾是甚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起草委员会决定明天下午 3 时开会。」⁴⁰ 杨尚昆的日记通常记录十分简要。大多是找谁谁谈话、板读文件、参加娱乐活动以及同家人间的聚谈等等。七千人大会召开前，杨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对大会筹备自然负有重大责任。除行政事务外，他参与了会议筹划。日记在这一段时间裹内容陡然多了起来。从中透露出许多重要信息。

首先，刘少奇书面报告经「秀才」们起草后，除分送毛、刘、邓以及其它中央领导人审阅外，在参加中央小型工作会议的人员中征求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参加小型工作会议的中央局和省的领导人，对报告的看法并不一致。其中主要是不认同文件提出的关于以反对分散主义为目标的指向。他们的基本意见是）把分散主义作为反对对象，并不妥当。工业上的分散问题，都有原因。而农业上根本不是甚么分散主义的问题，是集中过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杨尚昆提到这样一个情况：县级干部对人民公社的正确性，还有怀疑，觉得不好说。由此看来，中央同地方官员的认识不仅存在差别，甚至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如关于人民公社，基层领导人是存在怀疑的。毫无疑问，地方官员对问题的认识更直观也更实际。只是他们长期背负较大的政治压力，不能直接和有效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一旦压力有所和缓，他们的自主性会明显增强。而中央考虑的主要是政令的有效性。处在粮食危机局面之下，中央行使职权如调动粮食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主张报告仍应以反对分散主义为中心，这是个不能变动的主题。他坚持认为，分散主义是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在他看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等是正确的，不存在改变路线和方针的问题。这一点不能动摇。问题在于，党的干部们不能严格执行中央的调整政策，对「混乱的东西」包括那些完全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仍不愿加以改变。这裹面主要是认识问题。因此，应强调反对分散主义。⁴⁰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 109 — 1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 — 1965）— 历史的变局

但是，参加小型中央工作会议的省级领导人，特别是深得毛泽东褒赏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却公开反对以分散主义为会议中心议题，这使会议筹备变得复杂起来。杨尚昆在他的日记裏提到王任重的态度时，竟打了一个重重的惊叹号。王任重要干其么呢？、我们没有直接的材料来说明。但从后来报告起草委员会上的争论看，问题远不是关于所谓分散主义一个。而是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是是非非了。

杨尚昆日记提到了两个重要的细节：首先，报告稿不再议论，先发给参加大会的人阅读，征求意见。其次，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修改。这两个变动，都是毛泽东提议的。以往关于七千人大会的研究，都想当然地把大会开始的情景，描写成七千人兴高采烈地于 1 月 11 日走进人民大会堂。而实际上，由于报告不能定稿，毛泽东突然有了一个奇想，就是不在政治局裏讨论报告，而是把报告未定稿交参会人员，大家集体研究讨论。所以会议的前三天，代表们是在各自下榻的宾馆裏阅读书面报告。而正是在这时，临时组织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口头较量。由杨尚昆日记可知，报告起草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 17 日下午 3 时召开的，地点是怀仁堂后厅，会议进行了三个半小时。⁴¹

报告起草委员会都有谁参加？至今仍不能确定其准确的名单。据《变局》一书透露，共有十六个人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发言，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这个委员会共二十一人，那么，也就是还有五人没有发言。如果加上政治局常委中应该参加而未出席的毛泽东、朱德和林彪三人，再加上负责执笔起草的吴冷西和田家英，就是二十一人。⁴² 但是，《变局》作者这个揣测是有纰漏的。因为据《杨尚昆日记》，杨是每天都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册，页 113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页 96 — 97

曰• 绸 j 讪边澜 J ，唱■ 州 ‘j 祠，辟 ‘月 J 唱 J 月州「’ ’ 口•
jd 了勺 j 渎『 跚’ ’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的。而且，杨的日记说「主席决定成立二十人的起草委员会，先谈谈主要矛盾是甚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43 可见，刘、邓在毛处汇报时，定的是二十人起草委员会。当然，这是一个临时性的班子，增删人员都可能是随机的。但杨的日记可证明，发言者为十五位，同《变局》提供的大致相等。但是，里面却漏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即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不知杨为甚么漏记了身份重要并且意见尖锐的柯，其原因只能存疑了。准确地说，这个委员会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只有王任重是省委书记）组成的，他们是中共中央领导层中最核心的人物，也是最具发言权的一些人。这个委员会讨论和争论的东西，将成为整个大会的中心议题。

据《杨尚昆日记》记载，起草委员会从 1 月 17 日开始会议，一直到 24 日结东，共开了八天。每天的会议都是在下午举行，会上发言井然，似乎有过争论，但一致大于分歧。经过三天的务虚，到 19 日，「思想大体统一起来了」。但《变局》一书披露，争论不仅有，还相当激烈。归纳起来，争执共有如下几个焦点：1、报告稿要不要推翻重写；2、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3、指标到底高了还是低了；4、犯错误的原因和犯错误的责任；5、「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评价，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问题都带有极为重大和紧迫的性质。它们不仅困扰着当时中共的领导人，也同样困扰着七千位赴京开会和更大数量的中共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学生以及一般群众。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争论，其实代表着中国人对于自己所处方位的诘问。这一点，成为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他的主持发言主要谈稿子的修改办法：（昨天）「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的问题，怎样修改

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地方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43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册，页113，

「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与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它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从刘的这番话可以看出，毛对稿子并不满意。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关于分散主义是否是当前主要矛盾，由于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也拿不准了。而对形势的估计，要从新厘定。这是比较严重的。说明稿子对形势的估计不能让毛泽东感到满意。

《变局》记述说：听着刘少奇的讲话，「参加报告的诸位，神情专注严肃，他们知道这些问题非同一般，十分重大。《变局》作者如何了解了参会人的表情和心理活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刘讲话中提到的毛说报告可以推翻，可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据说，在几个大区书记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和中南，都对报告表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意见。惟有华东，意见相反。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明确表示：这个报告愈看愈没劲。4，事实上，柯庆施的话讲得要比这尖锐得多。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十五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甚么方法鼓干劲”“不难看出，柯的这些质问很简单，话中有话。它是冲着报告的基本看法来的。显然，报告凡涉及这些有关「大跃进」运动绿起以及运动本身的重大问题，都同柯的认识对不上口径。柯的反应激烈。姑且不说柯的真实看法是否与刘等人不同，就是他这种尖锐地、不加掩饰地向中央一线领导人发问的做法，也非同寻常。柯同刘在历史上有较深关系。上世纪30年代，柯在刘的领导下在北方做地下工作，后在延安整风时受到严厉审查。柯同刘是老上下级关系这一点，党内老人都了解。但柯在50年代表现得比较「左」，受

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与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它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从刘的这番话可以看出，毛对稿子并不满意。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关于分散主义是否是当前主要矛盾，由于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也拿不准了。而对形势的估计，要从新厘定。这是比较严重的。说明稿子对形势的估计不能让毛泽东感到满意。

《变局》记述说：听着刘少奇的讲话，「参加报告的诸位，神情专注严肃，他们知道这些问题非同一般，十分重大。《变局》作者如何了解了参会人的表情和心理活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刘讲话中提到的毛说报告可以推翻，可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据说，在几个大区书记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和中南，都对报告表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意见。惟有华东，意见相反。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明确表示：这个报告愈看愈没劲。4，事实上，柯庆施的话讲得要比这尖锐得多。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十五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甚么方法鼓干劲”“不难看出，柯的这些质问很简单，话中有话。它是冲着报告的基本看法来的。显然，报告凡涉及这些有关「大跃进」运动绿起以及运动本身的重大问题，都同柯的认识对不上口径。柯的反应激烈。姑且不说柯的真实看法是否与刘等人不同，就是他这种尖锐地、不加掩饰地向中央一线领导人发问的做法，也非同寻常。柯同刘在历史上有较深关系。上世纪30年代，柯在刘的领导下在北方做地下工作，后在延安整风时受到严厉审查。柯同刘是老上下级关系这一点，党内老人都了解。但柯在50年代表现得比较「左」，受

44 〈毛泽东传（1949—1976）〉 1 下册，页 193，

45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97—98。

46 滕文藻：〈关于七千人大会的评价问题〉，1988 年全国社会主义时期学术讨论会论文·

中一干 1 江‘刀一 7 ‘犬『 j 弋刀’ Ik 癩司」

到毛泽东的多次称赞。1958 年经过南宁和成都两次批判右倾保守主义的会议之后，柯的官运开始有明显改变。在当年 5 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同李井泉、谭震林一起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大跃进运动将要展开的时刻，人事变更既敏感又说明问题。据说，毛泽东甚至一度想以柯取代周恩来做总理。柯此时提出尖锐意见，是否得到毛泽东的甚么信息，亦未可知。这样提出问题的态度和方式，令与会的大多数人感觉激烈和突兀。柯接着又解释了他的质问。他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除了几种地区以外，还是适用的。粮食总产量六千亿斤不行，五千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华东区到 1967 年可以完成四千亿斤粮的指标。他最后指出，报告否定了这些指标，就愈看愈没有劲。

柯庆施为甚么要一再提起〈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工作规划性质的东西，同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有甚么关系呢？这裹不得不略作交代。原来，关于这个规划条例本身，隐藏着很深的矛盾。〈纲要四十条〉全称〈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共四十条。它是 1955 年 1 月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当时的背景是，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值高潮，为使全国农民看到「繁荣幸福的明天」，制定合作化后的长远生产规划便显得必要了。应当说，存在疑义的并非〈纲要〉本身，而是〈纲要〉规定的一些工农业生产指标，估计得过高了。例如，〈纲要〉规定「在三年五年中推广双轮双铧犁六百万部」；在五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达到 2000 斤，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 2000 斤等等，显然是脱离中国农业生产实际的。有些规定还缺乏科学论证。比如，双输双摔犁这种当时比较先进的农具，对于北方农村耕作是适用的，但在南方的水田裹，双轮双铧犁则「寸步难行」，根本不能使用。1956 年，按照〈纲要〉指标要生

产双轮双铧犁 600 万部，后压缩为 350 万部，实际生产了 250 万部，售出 170 万部，农民退回 80 万部。这说明农民并不完全认可新式犁，并且，制造双轮双铧犁也浪费了大量人、财、物力。柯庆施旧事重提，是在揭一个旧疤。1956 年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反对冒进，曾对〈纲要〉提出意见。到了 1957 年，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反唇相讥，指责了反冒进。而直到 195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5 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反反冒进」一直持续了近八个月，声势浩大，几乎无人能当。这八个月的「反反冒进」，是「大跃进」得以发动的直接引火线之一。

柯庆施似乎并未参加〈纲要〉的制定。但是，柯却是「大跃进」最积极的拥趸。早在 1957 年底，在「超英赶美」和「跃进」口号提出不久，柯就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届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工作报告。报告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对 1956 年的「反冒进」进行指责。报告说：「曾经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们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是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试问，经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错误了吗？」柯的这个讲话，把问题的性质直接提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高度，以势压人，却根本不讨论经济发展的规律问题，是别有用心。这种做法虽不自即日起，但使「跃进」与否从工作问题变为政治问题，使得人们不能分辨、无法讲话，最终的结果，就是以政治批判和党内斗争来压制不同意见，造成极不正常的党内气氛。在「大跃进」发动阶段带头批判国务院领导人，并把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当作政治问题加以指责，柯是地方领导人中的第一位。难怪毛泽东曾责问周恩来，你写得出〈乘风破浪〉这样的文章来吗？周谦恭地回答，写不出来。

柯此时出来「护短」，当然也有隐情，这就是庇护自己的短处。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记载，从1958年6月中旬开始，刚成立的各大协作区先后召开农业协作会议。由柯庆施主持的华东大区率先放出「跃进」炮：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当年将获1200亿斤的粮食高产。这个数字使人大吃一惊，因为它相当于华东区上年粮食产量的170%。连主管农业、也对「跃进」甚感兴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也大为震动。他当即表示，根据华东的经验，原来

第二章 r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j

估计今年全国增产1000亿斤粮食，就小得不象样子了。「此后，其它各大协作区也纷纷按『大跃进』的愿望和要求测算本区的产量。湘、鄂，赣、粤、桂五省区协作会估计，春秋作物和早稻增产一倍多。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提出：1958年每人平均粮食产量要达到1100斤，1959年2000斤，1962年突破3000斤。」⁴⁷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毛泽东在「大跃进」过后，曾承认过自己在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上有点「冒失」，是「始作俑者」。而事实是，r「大跃进」中的地方大员，如柯庆施之类，才是大大助长『冒失』的推动者。他们的动机，往好裹说，是「希望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二而如从官场进退、政治沉浮角度看，则可能要齷齪很多。他们1顿从毛的意志，即使看出问题，也决不进言，反而推波助澜，把问题烘托到极致。难道他们就不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大跃进」钢产量翻番的真正缘由，也同1958年各大区安排1959年钢产指标，特别是同华东区鼓吹钢产有大空间可以抬升有直接关系。李锐说：r我参加了华东区的这次计划会议。华东区1959年的钢指标，要达到600—700万吨，冶金部曾据此计算过，1959年全国可达3000万吨。因此促动毛泽东下决心‘何不1958年就翻一番呢？」⁴⁸李锐当时是水电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通讯秘书，具有丰富的业务工作经验。他以当时全国所能生产的电力计算，得出即使调全国大部分电力，也无法满足华东钢产量的「超高指标」的科学结论。因此，他回北京后曾向毛泽东谏言，华东的钢产指标不可信。但正希望全力「鼓气」的毛泽东没有理睬。

这两件材料透露，r「大跃进」中最为眩目的高指标，即一个粮食，一

个钢铁，都同柯庆施治下的华东区「跃进壮志」有直接关系。因而可以想象，到了问题暴露的时候，柯出来「护短」，大讲〈纲！要〉、「指标」、「赶超」、「鼓劲」等等，就不足为怪了。从本质！4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688。！48 李锐：《庐山会议！绿》（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弘。i

86T 荆、入煮们州×’早“历’”“一’”，’—从大”又利上说，维护了毛泽东的「大跃进」，也就维护了他自己。所谓对形势认识的矛盾和分歧，这时已经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搬尖，而非思想层面上了。

如果说，柯庆施对报告草稿提出尖锐意见有其自身背景，那么彭真 18 日的发言，就更把问题引向了一个新的焦点「谁来对问题负责？彭真 18 日的发言是这样讲的“「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甚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波、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象。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对彭真的这段话，历来都评价甚高。说他慷慨陈词，直击要害。特别是，他直接提到毛泽东的错误。薄一波说：「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是有道理的，符合实事求是精神和唯物辩证法观点。他当时敢于这样披肝沥胆直言，是很不简单的。」50 的确，彭真的发言，触及到毛在「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和所应担负的责任。他态度率直，没有掩饰。就当时党内政治生态而言，这种对毛泽东的坦率批评，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只说了「得不偿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还是泛指），即引起那样大的风波。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维护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对那一代共产党员说来，是无条件的。彭真决不应该例外。

但他为甚么要这样说呢？仅仅是因为他敢于披肝沥胆地直言吗？或者，因为他严格遵守实事求是原则和唯物辩证法观点吗？如果是这

49 张素华：《变局——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108 5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1027

「一旱——二妒大天’七分人祸」

样，党内长期形成的领袖与个人间的政治游戏规则，就将失效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很难理解的。刘少奇主持的报告稿，远没有涉及毛泽东的错误，更没有追究毛泽东的责任，只是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做了一些分析，就有柯庆施这样的人出来说反对，扔出一句难听的「越看越没劲」。即使党内政治生活是正常的，当大家认识没有统一、对许多事情的确还看不清楚时，要做到实事求是也极难。「大跃进」问题说到底不是经济问题，也不仅是建设方式问题，而主要是政治问题。既然是政治问题，其中的拥护与反对、支持与批评，就不是个简单问题，它不是仅凭实事求是态度就能解决的。

大约有两种人会这样直率提出意见：一种是彭德怀式的人。他们一贯党性坚强。为人处世耿直不弯、疾恶如仇而又较少城府。他们通常在党内资格甚老，战功卓著，拥有话语「资本」。也就是说，他们很少顾忌，并不特别担心提出意见的后果。另一种人则是非常受毛泽东器重和信任的人。他们与毛泽东有长期密切的工作关系，通常坚决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他们把毛泽东看作导师。对导师服从甚至崇拜。毛泽东也把他們视作自己最信任的人。无疑，彭真属于后一类。在历史上，彭真并不是典型的从南方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虽然入党甚早（1923 年在太原加入中国共产党），属于党内资格非常老的那一代人。但他没有参加过早期的武装斗争。从最初的山西地下党活动开始，彭真一直在「白色区域」工作，领导天津的工人运动，并长期坐牢。至「七七事变」后，彭真才公开身份，成为中共北方分局的书记。他第一次见毛，是 1936 年到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据他的《年谱》记载，彭这次到延安参加会议，探为毛泽东的思想和威望折服，认为毛才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从此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拥护者。据说，到达延安后，彭真决心以「澎湃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己任，

改名彭真（原名傅懋恭）

应该说，在北方成长起来的革命领导人中，彭真是深得毛泽东信任的人之一。在延安整风的发源地中央党校，身为副校长的彭真不遗余力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思想意图，使整风在党校进行得如火如荼。中共七大前，彭真取代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彭连中央委员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不是，而陈云却是六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曾有不成文规定，各个党的中央组织部长应由政治局委员担任。彭可以说是一个中国例外。在中共七大上，彭真不仅进入了仅有四十余人的中央委员会，而且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于1945年8月赴重庆谈判前曾向中央提议，如果毛和周恩来意外回不来，中央书记处还应保持五人领导核心。因将陈云和彭真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由此已进入了中共党的核心层。

抗战胜利后，中共将独占东北作为最高战略目标。彭真被派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是为东北地区中共的一把手。当时中共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占到中央委员会的将近一半。其中张闻天、陈云不仅是老牌政治局委员，张闻天还曾担任过党的总书记。此外，像林彪、高岗、李富春这样党和军事的重量级领导人，也都在彭真的统领之下。但由于东北形势异常复杂，独占东北、御蒋军于东北之外和「放开大路，占领两厢」两种战略方针都有因时而宜的合理性。可以说，彭真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在非常复杂的局面下，勉力支撑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前九个月。当然，以独占东北为战略目标的设想，由于苏我、苏蒋、苏美和我蒋之间错综矛盾未能实现，彭的东北中共第一把手的位置也为林彪所取代。但这并未影响毛泽东对彭真的信任。彭从东北返回晋察冀后，先后任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央组织部长。建国在即，彭被委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这是当时地方大员中最重要的位置之一。1956年中共八大设立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为总书记，彭为书记处的第二把手。党内曾有规定，彭为邓小平的「副手」，实为「副书记」。在中共核心的排位上，彭处在第八的位置，这也是中共核心中出身于北方且未参加过长征等最著名军事战争的唯一高任了。

彭真对毛泽东的拥戴是无可指摘的。即使不是字字珠玑，也大约是言听计从。这是历史形成的。因此，彭真在起草委员会上突然提出毛泽东的错误问题、责任问题，的确让听者感到意外。因为，彭这样讲，是不符合中共党内的高层政治生活规则的。即使看到毛泽东的问题，为维护党和领袖权威计，话也不能是这样的讲法。简单地以「敢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于直言」来评价，有点表面化了。事实上，彭真讲这些话的意思，极有可能就来自毛泽东本人，是毛泽东有意让他这样讲的。其理由可以作这样的推断：首先，彭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人之一。毛对彭没有像对彭德怀那样怀有戒心。因为彭真与彭德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历史渊源的人。毛泽东与彭德怀，历史上虽曾长期紧密合作，但也有很多龃龉的时候。例如长征中的会理会议、抗战中的百团大战和西北高干会议等。抗美援朝战争后，毛泽东说彭有骄傲之气，同元帅们不来往，实则是毛认为彭居功自傲。据说，毛泽东说过，自己身后最担心的两个人之一，就是彭德怀。”彭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大功臣。无论井冈山、长征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他都独当一面》拚杀出不可磨灭的战绩。因此，由威望甚高、功绩盖世的彭来提意见，容易造成某种怀疑：彭的意图是甚么？如果彭再同其它几个重要人物有交流，则更大大犯了中共党内生活的忌讳。庐山会议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事之间的旧怨和历史形成的纠葛所引发。按照李锐的说法，他们这些「秀才」小字辈在庐山上同毛泽东谈到的「大跃进」以来发生的错误，用词要比彭德怀严重得多，无忌讳得多，毛听后并不生气，还请他们一起喝茅台。但是，彭德怀出来提意见，毛则倍加警惕，不能忍受。彭真可以说完全没有上述这些同毛的旧怨，甚至还因东北问题代毛受过。毛对这些当然是清楚的。因此，毛不会对彭真的任何说法产生怀疑。相反，彭这种尖锐意见的提出，同他对毛一贯的有目共睹的尊敬形成鲜明反差，由此使人猜侧，除非经毛泽东默许或暗示，彭不会讲这些太过「伤人」的话。

其次，彭真对毛的这些批评，都是毛在「大跃进」遇到挫折后自己多次承认过的，并没有新的内容和新的观点。例如，「三五年过渡」、「公共食堂」等，毛在不同场合都曾经「揽过」于己。毛泽东在八届

九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过，计划工作的缺点，「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且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战 51 参见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T 下'、见 d 方付叮 v 闷) 藤不 J 私甘 '17U '一 1) UJ ' 一一 江
【) '斗 7) (州 J

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不下来。1958 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份开始大搞，1959 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又大搞，1960 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急，过急了办不成，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农业六十条〉（六月修正草案）颁布后，因为明确规定 r 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 j ，使农民终于解脱了公共食堂这道「枷锁」。毛泽东此时已经意识到公共食堂的弊端。因为有了他的支持，「六月修正案」才得以实行。当毛听说绝大部分农村公共食堂散了伙的消息后，曾大加感慨地说：「这是二件大好事。J ， 2 这些情况都表明，即使在这些曾经关系所谓「共产主义」实践的大问题上，毛泽东也有了明确的态度，即「让步」的态度。无疑，「让步」就是承认错误的表示。就在几天前，毛泽东还在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说：「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53 由此可以肯定，即使彭举例批评了毛的错误，也并不是「揭露」式的。它们都是单所周知的事情。彭真没有加以渲染，也不是追究责任。彭在这裹强调毛泽东屡次承认过的错误，在效果上反而加强了毛泽东的即有威望：承认错误而不是掩盖错误，是更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第三，对毛泽东本人而言】彭真的说法类似「君子之过，如口月之食」。比如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象。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 tolt 。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这些话其实也是毛泽东自己讲过的。比如邓小平在 1962 年 1 月

? ~一一一__

52 53

薄一波：《毛泽东传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929。（1949—1976），下册，页 1188。

矛一早

1 二■刀一）、人’枕. 刀 /、布叫]

11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对报告的意见时就转述：毛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讲我的缺点。”再往前追溯，毛泽东在 1960 年下半年以后，曾多次向全党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例如，毛的为中共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第四次报告的批语，就做了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姿态：r 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的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恫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闲，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闲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闲。』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问现行公社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共社的产，而不是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毛泽东传》的作者在引用这个批语时评价说，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对于『大跃进』以来急于过渡的问题进行了比以往更深入的检讨」，这在他同时期所写的许多批语中，是「最令人瞩目」的。56 通观 1960

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言行，这样的评价当算公允。毛泽东在这里承担的，是人民公社体制上的关键错误，或者说是「大跃进」以

54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55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页 222 — 2230 56 《毛泽东传》用语，见该书下册，页 1 103 页 1 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来农村发生「混乱」的根源性错误，所谓三四年内实现从集体到全民的过渡，「共产风」一哄而起。虽然问题已经是明摆着的，但由毛主动承担「发明权」的责任，的确让人印象深刻。彭真在这里不过是重提毛的话。知过必改，是真正的君子。同时，也有提醒别人「认账」、承认错误的意味。其用意显然不是单单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最后，彭真的发言，与其说是针对毛泽东，还不如说是通过坦率的指陈来维护毛泽东。从背景上说，「大跃进」乱子多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已成全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敷衍责任、文过饰非显然是不策略的。七千人大会前，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和书记处讲了他对形势感到满意的话，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毛泽东所意料的那样，人人心裏都表示服帖。如果说，吴冷西所回忆的刘少奇对报告第一稿表示不满，强调一定把问题写深写透的情况是真实的话，那么，毛泽东一定会感到党内存在的压力。诚如熟悉中央高层内情人士所透露，当时「攻毛」的苗头是存在的。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人们无法回避责任。而最大的责任者是谁呢？虽然，毛泽东在一般党的干部中威望如日中天，没有人敢或有意识地怀疑毛泽东“但中央高层中的看法却可能并不一致。当然，当时的这种不一致不应被夸大。也许它们就显示在某种政治的感觉、关于错误的程度或判断责任的轻重等等想法上。可这种微妙的差异，却可能造成政治上的敏感和猜忌。否则，人们就不好解释五年后毛泽东所讲的话。毛泽东说，1962 年 1 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话显然有水分，是在为打倒刘少奇找历史根据。因为 1962 年七千人大会时，毛刘矛盾并不激烈，非但不激烈，甚至可说是在保持着一致；差别只在于对问题的认识。毛承认「乱子

J，但总体肯定；刘则希望全党更深刻地认识过去几年做的糊涂事。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了苏联，但并未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j，而是态度和缓，强调要向苏联学习。现在毛讲话的公开版本】是1966年整理的，加重了反修的内容和口气。因此，毛1967年同巴卢库的谈话，并

，澜1个d . 个111月个J个田届‘，个，• 『J遛屹励”，！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j

不真实可信。但是，透过这个讲话，可以看出毛从1962年就有了不满意的记忆。至少毛会认为，刘当时是在「攻」他。对毛来说，化解这种「困境」的最好办法，当然是于谈笑风生中承认错误、指明缺点。因为形势的确不容乐观，错误也是明摆着的。况且一年多来已经多次承认过错误。承认错误主动，「捂」反而被动。特别是在他那样崇高的威望（彭真说是「珠穆朗玛峰」）之下，承认错误，只能获得政治上更大的赞誉。因此合理的解释是，如果不是毛泽东授意极为信任的彭真出来讲话，也是彭真自己出于维护毛泽东而采取的颇具深意的行动。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透了这番深意。1月19日，即报告起草委员会开会的第三天，《杨尚昆日记》记：「3时到7时半起草委员会的讨论结束，发言的有先念、陈云、恩来、小平、伯达等同志，思想大体统一起来了，决定明天起集体讨论第二稿。」但据《燮局》的记载，当天会议围绕着18日彭真发言，却发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锋。首先是周恩来的一番很不以为然的表态。他说：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j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会成绩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全党要一心一

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事 57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109—110。

1' ? r 州' 、 , 卜绸' k' n , •• 州 ' , ' 必一甩 ' → . ■ ' 、 " ' ' ']] 么] h ' " ' 7 ' ' 尸'

实上，周恩来这番话表了一个「大」态度；不能同意彭真的上述说法。他强调了三个基本观点：「一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二不能否定三面红旗」；三必须「扛住暂时」困难，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周的这个表态是耐人寻味。因为不久前，周在河北调查时，曾比较尖锐地提出了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不同意再搞公共食堂。他在调查期间写给毛泽东的信，毛当即批发党内。而目前这个发言，却态度迥然不同了。或许，作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发现了某些倾向，意识到必须出来表这个态？

接着是陈伯达发言。陈说：我们不要做乱七 / 文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无疑，陈伯达在袒护毛泽东：谁触及毛泽东的名字，他就是大逆不道。但这种袒护是否纯粹，值得怀疑。八年之后，毛泽东在庐山上说，我和陈伯达认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很好合作过。这不啻是个绝妙的讽刺。陈伯达善作长袖之舞，嗅到政治风向不对，立刻压上赌注，谁知却并不事事灵验。此次由他负责起草大会报告。刘少奇所表明的基本态度，即，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等等，陈伯达是知道的。现在他有了应该「反戈一击」的感觉。因为，毛从外地回来了。毛对报告的基本看法，也似乎传了出来。这就有了

一个表示态度的需要。在党内被称做老夫子的陈伯达并不傻，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该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抬升自己，是需要恰到好处的政治火候的。由陈伯达出来反驳彭真，恰好说 5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110，

‘叮』——「计—’妒’斗’k ‘烽■ fj’、11 一宁J

明一个问题：风向明确了！虽然与彭真的争辩，是文件起草以外的事J 睛，但显然，文件的基本态度，应该改变了。其实，陈伯达并没有摆脱「书生治国」的宿命。如上文所说，他并未看透事情的本质。要知道，拥护与反对之间，没有一个恒古不变的界限。有时「反对j 之中却包含看更深层的拥护；而有时，不谙内情的简单拥护也会被看作是反对。在分歧面前，怎样巧妙地化解矛盾，从政治层面来思考问题，占得时机上的主动，就是政治智慧了。

看起来，事情并不像《杨尚昆日记》所记，「思想大体上统一起来了」

关键是，一个认为毛泽东不检讨，会给事情留下隐患；另一个则根本不让毛泽东背负任何责任。哪个更明智些呢？显然，在严重问题面前，前者更为主动。

四分歧在延续

21 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份量其实更重。刘少奇直率表示了如下看法：〈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四、五、八百斤（指〈纲要〉规定不同地区粮食亩产量所要达到的指标）提法本身不太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薄一波接着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下不能跃进，只有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农业都是如此。邓小平也赞成说，基数愈大上去愈困难，美国每年只有 20 / 0，苏联 12 % 就了不起了，技术革命发生了大变化才能跃进。增长的问题变得愈来愈现实起来。二十年后，当邓小平又一次讲到增长数字时，他表现得越加谨慎。经过反复论证，他才下决心肯定了到二十世纪末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样的指标。或许，这是在 50 年代经历的挫折为他建立了经验机制？邓说完后，彭真又提出一个观点：总路线好解释，

大跃进不好解释。但他这个观点没有展开。最后，刘少奇总结说，还是要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引一 压史的变局

「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应该认为】至21日起草委员会的讨论，最终为报告定下了一个基本的调子，这就是刘少奇所说，「跃进」还是要提，「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说。但这样说，必须对「大跃进」作出新的合理的解释，这是一个难题。可以看出来，刘的说法，是一个政治性的考虑而不是工作性的总结。从会上提到的〈农业发展纲要〉、「跃进」的涵义等等言论看，刘、邓等主要领导人对于「大跃进」的认识，已接近于实际放弃它，至少要进行重新考虑的程度。只不过因为政治原因而无法公开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给毛泽东和整个1958年以来的「折腾」留下面子。而这同毛泽东的基本估计则大相径庭。毛从来没有要否定「大跃进」的意思。他的真实想法是，「大跃进」出了乱子，就「纠正乱子」。把乱子处理妥善后，仍沿着中国自己「独创」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下去。对毛泽东说来，丢「面子」事小（当然也不是小事），同苏联赫鲁晓夫「叫板」r「独创性」才是大事。可以说，这是七千人大会召开时党内分歧最本质的方面。以这个分歧为界限，分出不同观点的人。这其中又包裹着其它一系列的争论，比如分散主义、主要矛盾、中央和地方各负甚么责任等等，从这一系列争论中，也可看出不同人的表现：直陈的、担忧的、辩解的和维护的。

因此，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党内思想，是一种矫饰。面对如此重大的社会挫折，并进而引发复杂的有关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和人事纠葛的矛盾，岂是开一次近乎临时决定的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说七千人大会恰恰暴露了党内的认识矛盾，则可能更接近于事实。一年多前的庐山会议，是「大跃进」以来党内矛盾的第一个暴露点。但是，庐山会议的结局带有偶然性。因为那时问题虽然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但还没有后来这样充分。事实上，到了1962年，人们由于经历的事情更多了，认识也更为深化了。因为彭德怀、张闻天这两位讲真话的59 滕文藻，〈关于七千人大会的评价问题〉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人，在历史上都同毛泽东有恩怨，因此，庐山会议上矛盾触发的个人因素相对较重。而七千人大会不同，它在促使人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机方面显然更成熟了。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甚么刘少奇屡次说到：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当时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的斗争完全丢开，则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大家「同仇敌忾」地向彭德怀和张闻天「开火」，把两个人都打倒了，但却找错了「敌人」。其实敌人就在心裏，即「左」的动机。刘少奇几次为此恼火，是出于一个有责任的政治家的良心。现在，虽然完全改弦易辙的「火候」还不到，但通过七千人大会这个机会，至少要有所收获，对所犯的严重错误要有个认识才好。

事实上，与会者中并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在几个主要问题上向中央发出了质疑。这使七千人大会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思想史意义。按照会议安排，与会代表首先讨论的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尽管这个议题本身就存在争论，但来自基层的人们并没有按中央领导层的思路去寻求「统一」。多数人是就他们意识到的「分散」问题提出意见的。如有人提出，分散主义的错误，主要是由经济上的高指标引发的，造成基本建设的乱上马，搞得战线过长。他们揭发，在省市和基层，某些领导人闹分散主义还有很多「道道」，比如「留后手、‘搞铺张，打埋伏，盲目地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等等。有人归纳分散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种种表现形式是，在政治上乱提口号，乱创理论，标新立异二在组织上的无纪律、无政府，甚至发展到搞独立王国、对中央封锁消息，拒绝检查等等。更有人历数分散主义的所谓「八大罪状」：（一）各自为政，目无中央；（二）乱提口号，擅作主张；（三）破坏计划，不顾国法；（四）谎报封锁，风头至上；（五）监守自盗，以邻为壑；（六）欺上压下，独断专行；（七）生活特殊，像个国王；（八）幼资本复辟，亡国亡党。除明显情感化的东西外，上述人们想象到的分散主义，从根本来说，其实还可以以一个「乱」字概括之，即地方负责人借「大跃进」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之机，各行其是，毫无章法。不过，人们还是「猜」

「斗 7 7 7 米 J1 夸 1 7U 一 1 7uJ)
一一 叔 C 》 骗。7 文觞 J

f1J 了问题的核心，即经济上的高指标，导致了章法尽失，没有规矩可循。这样，就又把问题根源归结到了「大跃进」上面。这同中央领导层想象的「分散主义」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因为各地不服从命令调不出粮，才提反「分散主义」。但显然，在更大的是非面前，分散主义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因此》连王任重和柯庆施这样的方面大员，也不同意当前主要矛盾是分散主义。

与会代表追究的「分散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大跃进」的媒体责任。而这是书面报告所没有涉及到的。一位代表指出，在「大跃进」的几个关键时刻，如 1958 年夏秋、1960 年春夏，新闻媒体的宣传口径严重失实，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例如亩产「放卫星」，首先是通过《人民日报》这个代表中央的喉舌「放」出来的。这种媒体之「祸」一经「吹」出，立即引来「群星竞放」，刮起了难以遏止的「浮夸风」。又比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口号，不仅违背了科学，有悖于常识，而且在人们思想中造成了混乱。这是一个颇有点皇帝新衣式的揭露。即使在整个民族都在「发烧」「狂热」的时期，又有多少人真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这样的鬼话呢？一位《人民口报》的老记者回顾过钢铁「卫星」上天的实况，从中透露出苦涩。让我们看看究竟是甚么导致了「媒体之祸」：在那一段时间，我每次都列席中南海大炼钢铁的电话会议，成为亲聆这个最高指挥部声音唯一的新闻工作者。这样的会议多由周总理主持，有时是由薄一波同志，个别时候也由李富春同志主持的，•••各省是工业书记参加。总理挨个询问：昨天产量多少？书记们挨个回答：昨天生产焦炭多少，铁多少，钢多少。《人民口报》与此配合，在显著位置以最快的速度刊登各地放的「卫星」和创造的先进经验：8 月 21 日三版报导了〈河南一千多座转炉土炉炼出千吨钢〉；23 日三版报导了〈梅宁县有个小高炉五昼夜出铁八吨多〉；9 月 26 日一版报导：〈江苏人民决心加速实现万吨省，新增一百万炼钢大军，赶建十二个钢铁基地〉；9 月 28 日报导：〈四川八万钢铁大军，

国庆节不下火线》；10月27日二版报导：〈首都钢铁星期日，城裹城外一片红，七十万

矛一早一斗、刀一7、犬『『弋刀一jk妒J』

人大炼钢》。《人民日报》大炼钢铁的宣传，就是这样产生和进行的。」“通过这个见证式的回忆，我们应该承认，当时不管是乱提政治口号，还是鼓吹「放卫星」，媒体固然难辞其咎，但普通记者却不应该为分散主义泛滥「买单」。记者们只是「卫星」制造的「见证人」。他们听从党的召唤，F满怀热情」地反映「卫星上天」，试图鼓舞人民创造更大的r奇迹」。他们的报导为中国r大跃进」留下了一幅幅戏谑的画面，结果也给自己职业带来了羞辱。

真正制造F卫星」的「车闲」，其实是中南海裹的电话会议。最高领导人喜好高产量，省裹的书记们当然跟风而上。从常识上说，国家经济的主持者们是不应相信「一个小高炉五画夜出铁八吨」和「赶建十二个钢铁基地」这样神话的。特别是，有人动辄宣布小麦、水稻亩产达到万斤和十几万斤，更愚弄了所有正常的中国人。连著名科学家也耐不住寂寞，鼓吹经过光合作用，农作物可获理论上的万斤亩产。中国人在二十世纪50年代出现的集体大狂热，为历史研究提供一个「个案」：究竟是怎样的机制、制度在起作用，才造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紊乱？生活常识不是「新理论」。正常情况下，它是不易被突破的。当时，七千人大会的参加者们给出了这样一个参考答案：问题主要是主观方面也就是党的作风问题。党的作风这几年被「吹牛皮」、不实事求是那一套搞坏了，同时使个人主义膨胀起来。分散主义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而是执政党内部那种「官大、权大、瞻大」的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散主义的重点，是在中央各部和省一级。就是有些人各行其是、标新立异，吹出高指标、搞独立王国。这是分散主义最大的表现。

提出党的作风和执政党内部的个人主义问题，是十分尖锐的。因为从道理上说，共产党人应该没有私欲，特别是不应为自己的F官」、「权」、「利」而处心积虑，否则，共产党不是要堕落成利益集团？可惜的是，某些人一旦成为执政者，他的利益取向就变了。」白

60 聂眉初：〈头脑发热的日子〉，载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1948—1988》（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页145—14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春（1962—1965）—历史的变局
表明，经过几年的折腾，党的大多数干部已经有了实在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发现了问题的根源。而在整个社会层面说来，「大跃进」已经离散人心，搞不下去了。因此，对于责任问题，总要有个说法，才能令人信服。

判断历史进步与否，最终尺度是社会性的觉悟。领袖人物的思想结晶
1 离不开底层群众的社会实践。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基层领导者们，在这场大折腾中亲历亲为，是最直接的实践者。他们为责任和良'合所驱使，决心不再隐藏自己的观点。就在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激烈交锋的时候，大会分组讨论也出现了许多勇敢的声音。

这些坦率的意见，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 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的质疑

例如，有的代表提出：「三面红旗」抽象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这些具体问题归纳起来共有七点：（一）跃进还是没有跃进，以甚么标准来衡量？（二）如果说这几年大跃进了，为甚么粮食、市场紧张？（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减产了，对大跃进怎么理解？（四）高指标、大规划是不是执行路线的错误？（五）路线是正确的，为甚么有些错误和缺点会形成全国性的？（六）有些事情大跃进了，有些并没有大跃进，怎么看才是正确的？（七）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跃进？

更有人提出，1959年、1960年粮食减产，牲畜死亡，群翠积极性不高，跟农民说大跃进感到难以解释。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办快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是否要求这样改变生产关系？还有人指出，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搞早了，搞快了，高级社时的生产关系并没有东缚生产力的发展，不一定非办公社不可。此外，大跃进没有标准，以至过去说烧饭也要大跃进，将大跃进庸俗化了。还有一部分人在说法上仍表示坚持三面红旗，但很明显已经对它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不是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而主要是在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具体执行时数据不够。如指标要求过高过急，容易发生强迫命令；对某些好的典型强调过分过多，往往使下面不问具体情况，一哄而起。

「大跃进」、人民公社虽有问題，不尽符合国内需要，可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

2 对错误表现形式的揭露

谈到错误的表现形式，与会者不但发言活跃，而且比较一致地提出其特征：（一）高指标；（二）强迫命令；（三）迷信小土群，强迫「遍地开花」、「以土为主」、「愈土愈好」；（四）农轻重比例关系失调；（五）所有制变化过快；（六）对技术革命作用估计过高，忽视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如某地提出「一天革一个命」，「创造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新工艺」的口号。（七）理论宣传失误。媒体自1958年以来发表很多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文章，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起了动摇作用。提出「拔白旗」，学术批判同政治反修联繫起来，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学术批判，不适当地宣扬「厚今薄古」的口号，用厚今否定了经验。当然，中央主要媒体对夸大主观能动性、提倡唯心主义负有报导责任。这就是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高产卫星等等。（j 幼对毛主席指示执行不力。

3 对错误发生根源的咏识

在这一方面，人们的认识差别很大。有看问题角度的差异，也有认识深浅不一的局限，但分析是认真和尖锐的。如有人说，几年来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但相当多的与会者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指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都归结到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有苏联的经验，还有中国历史上的经验。如果说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在党的工作、调查研究方面，就不能说没有经验。如果说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前没有经验，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主席已经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并且调整了指标之后，就不能说没有经验。因此，没有经验，固然是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一切缺点错误产勾疆京因。还有人认为，开始确实由于缺乏经验，当时形势大好，大家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对于各地出现的一些高产量、放卫星等经验，就轻易相信、急于

学习和推广。但是，后来在工作中受到损失，逐渐感到不对头的时候，由于党内强调反右，帽子很多，压力很大，以为自己风格不高，因此不敢如实反映情况，说假话，当然不能归结为没有经验。还有人尖锐诘问到‘这几年实际工作中出的毛病，能不能说成主要是没有经验？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也都没有经验，都办得很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经验，为甚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为甚么短时间就丢掉了？有人指出，这几年经验教训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斗争上。几年来认为右是主要危险，认为「左」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大家「谈右色变」。光是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脱离实际。还有人提出，这几年来所犯错误，应该划分为两段，即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和之后。前段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后段则不能说是经验不足，而主要是党内民主生活和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庐山会议前，任务虽重，压力也有，但大家干得很起劲。但反右倾以后，情况大为改变，干群心情沉重，看风使舵，摸上级的底，而不是按党的政策办事。有人干脆揭底说，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在全国范围内，究竟「左」倾是主要的，右倾是主要的？需要弄清楚。庐山会议反右及其由此引起的全国反右倾，反瞒产、拔白旗，对地方工作，特别是人的思想发生重要影响。许多干部挨整，受处分，长期得不到平反、甄别。

4 挑战「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有人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己也不怀疑。但是，为甚么实际中出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且问题这么严重，这么普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文件中把高指标作为主要教训，但高指标不是根本的而是派生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片面强调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还有人指出，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更有人直言不讳：这几年来为甚么瞎指挥，为甚么高指标，为甚么脑子发热，为甚么对许多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甚么自以为是，总的根源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认识上有错误，误认为生产力

发展很快，误认为才良快就能过波到共产主义。与此有关的是，不尊重等价交换、按劳分配、价值法则，以及剥夺同盟军——农民等等。有人甚至呼吁：这次会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会开好了！一位作者这样描述七千人大会的分组讨论：「1 月的北京，正值朔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时节。然而，各代表团驻地却热气腾腾。人们高声谈论，畅抒己见，甚至面对面地展开争论。几年之中，人们曾登临高峰，也经历挫折，要说的话和要辩明的问题自然很多很多。」“，事实上，要说的话固然很多，但问题并不容易辩明。关键在于人们的困惑。首先是对毛泽东的崇拜。在五、六十年代，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崇拜是真诚和彻底的，几乎没有人相信毛泽东会犯错误。毛泽东总是正确的。他总是比别人更高瞻远瞩。即使想到错误，人们也不愿同毛泽东划等号——正是由于执行中误解了毛泽东的思想，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才发生错误。这种思维模式甚至让毛泽东自己都感到不舒服。他多次（包括七千人大会）声明，毛泽东本人也不是甚么错误都没有。他愿意同大家一起承担责任。可当时的人们却永远忽视毛泽东的真诚。人们宁愿自己被祸，也不愿让毛主席跟着「背黑锅」

其次，人们在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的复杂认同之间选择艰难。好’ 0 办坏事，是责备好心还是善待坏事？在特定社会和历史环境中，这个选择成了难题。例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中国早日

61 林志坚主编：《新中国要事述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页之 7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 — 1965）——历史的变局

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在动机上，这无可指责。可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却真实地给人民带来严重损失和灾难。怎么去评判其中的动机与责任？哲学教科书说，动机与效果应该统一。人们不应该离开动机去谈效果，也不可能不计效果去论动机。而在现实政治中，动机和效果的追究，却没有那么简单：或者动机正确效果无论怎样都应接受？或者效果负面动机也应该被否定？不要说一般干部，就是党内高层，也得不出一个圆满的解答。这其中，有看清了却不好说的，有始终就没有弄明白的。而更大多数的人，则从朴素的情感出发，对动机毫不怀疑。尽管如此，人们仍需要一个讨论的平台。七千人大会正好为参

加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一些思考者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是非做出判断。上面引述的这些发言，不仅初步对「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提出了质疑，也对犯错误的表现、原因和根源进行了剖析。可以说，人们终究要突破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两难，实事求是地反思「大跃进」的问题。这一点还可以从刘少奇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报告得到验证。他在许多地方试图突破原有的认识，建立起新的对「大跃进」的认知标准。这是具有标志意义的。

五刘、毛、林：三个各有「弦音」的讲话

1月27日下午，刘少奇向大会作口头报告。《杨尚昆日记》载：「午饭后，稍事休息即去大会堂开会，2时人已到齐，按时开会。少奇同志报告，花了三小时，5时10分散会。」⁶²事实上，这是七千人大会这个超大型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此时，七千多位干部已经到北京半个多月了。他们还没有见到毛泽东和党的其它领导人，也不知道领袖们都将要讲些甚么。在各个小组的驻地，代表们热烈讨论了有关分散主义和书面报告。这些讨论触发了许许多多的想法，而这些想法理应是得到统一的。

⁶²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册，页117。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按毛泽东自己的解释，把已经准备的书面报告交给代表讨论，会上只由刘少奇做口头报告，这个「创意」是由他提出的。毛泽东自己说，报告稿子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因为参加大会的同志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就是，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毛的这个说法，有十分可信之处。也就是说，他当时的确希望听到这样一大批代表各个方面的人对报告的反映。至于毛为甚么要这样做，有着不同的解释。《变局》一书提供了四个人后来的说法：参加报告起草的吴伶西说：毛泽东提出这个不同于往常的开会方法，可能是考虑到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关系重大，有必要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种

不同意见。汪东兴说：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就是嫌太空了。他因此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看是不是符合他们那裏的实际。同样是参加了报告起草的胡绳说：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是因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得不够，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说话，不是少奇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了。王若水说：毛泽东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探取三不主义，表面上看是充分发扬民主，实际是钓鱼。6，当然，政治通常是吊诡的。如果所有人都说实话，也就没有「政治」之事了。无论毛泽东自己的说法，还是上述四个人的解释，都不能算作终极诠释。只是，在四人中汪和王的猜测恐怕最无道理。

很明显，报告的要害不是「空」】而是不合毛的心思。这是上面已经讲到的。如果说毛是想「钓鱼」，那么，可钓的鱼又是谁呢？刘和邓主持了报告的起草。他们两个在明面上，无须钓。而大会的参加者，绝大多数对「大跃进」还来不及深刻反思，因此也不值得「钓」。王虽是「圈」裏的笔杆子，但他没有参加大会筹备，不是当事人，因

63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48—49，

106
，r'、'、7、'J—‘需’“河’州‘‘句计k义’u’17VJ，
乃〔J’“谬夕必用’

此对政治内情并不深知。这时》党内斗争还没有形成「两军对垒」。认识虽有不同，也没到用政治斗争解决的「份」上。吴冷西的说法用了r可能J，本身就是模校两可。只有胡绳的看法最符合当时毛的心态。毛看了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意识到照这样的写法，对形势估计太低，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都评价不够，这将让大会开得了无生气，违背了他召开这样大型会议的初衷。按照毛自己的观察，「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有的已经被发现》有的通过制定各种工作条例正在得以解决。开七千人大会的目的，就是统一认识，以便「鼓足干劲」。报告稿调子这么低，如何能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积极方面来？让大家一起讨论，结论不可能一团黑。这毛泽东是有把握的。对于报告的书面稿，毛泽东肯定不满意。因此才有成立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修改的举措。况且，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时间推倒原稿，

亲自改写了，

毛泽东对报告第一稿不满，主要在形势判断上。这种情况在 27 日刘做口头报告时，终于有所流露。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实际是对书面报告第二稿即起草委员会讨论后形成的稿子，进行口头说明。据《变局》一书披露，刘少奇做口头报告时并没有稿子，只是有一个十几页的提纲。这个提纲直到 27 日下午 2 时大会开始前，在后台休息室裹常委们众齐时，才由刘少奇交给毛泽东看的。毛一页一页看过后传给其它常委。^r 因为字写得很大，才良快就传看完了」⁶⁴。当然，传看不可能有讨论，更不可能再斟酌。大会马上就开始了。此前，26 日下午政治局常委曾专门开会讨论并通过报告的第二稿。刘的提纲应该是在常委会后，根据会议精神赶写的。

刘的口头报告 1985 年公布于《刘少奇选集》下卷。编者在题下注明，讲话收入选集时「有删节」。究竟怎样删节，并没有说明，这使我们今天难以看到讲话的全貌。

———

64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129。

月？一州卜 Ij ‘刀户‘夕必’州。刀 / 、啊刃 J

其实，讲话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关于国内形势问题」。通观讲话全文，刘的想法似乎既坚定又游移。许多地方讲得非常肯定】有些地方又像在两可之间。毛间有插话，在关键地方表示自己的态度。关于形势判断，刘是这样说的：「关于目前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够。」“他说：「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刘在这里很简单地画了一幅草图，把对形势的基本估计表露出来。接着，刘开始分析原因。他说：「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原因在哪裏？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

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 1958 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是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j

说到这里，刘举了他去年回湖南的例子。这个例子我们在上文曾经提到过。刘基于他早年在家乡的生活经验，把池塘裹还有水作为判断天灾严重与否的尺度。这个生活经验是有说服力的。农民用水自然非常节俭适度。水和粮食的关系，如同人与粮食的关系。有水在，必是农民已经侍候好了庄稼，庄稼必不缺水。刘少奇早年的经验甚至是，塘裹的水被用干了，塘底都成了晾晒谷物的场，也不意味看天灾就一定严重。相反，农民如果生活窘迫，又有极大的意见，那就说明政策出了问题。刘通过调查，这一点是心中有底的。

因此，他在口头报告裹讲了一段当时使人惊诧· 事后被历史学家们广泛关注的话。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
65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页 418。以下凡是出于刘选集的引文不再另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五专（1962 — 1965）— 压史的变局

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区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本来，刘少奇在前面说到天灾和人祸的关系时，是强调各个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的。可在这里，他又强调从「全国总起来讲」，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比例。这就有些矛盾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是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成绩和错误比例的估计。他常常使用这个比例，人所共知。而刘的

论调，突破了这个比例。非但突破了比例，而且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倒过来了，特别是从「全国总起来讲」的话，份量很重。尽管刘在讲话中还说了「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不再犯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说，缺点和错误的大部分已经过去了，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等「补救」性的话，但他「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总估计，还是「过了」。毛泽东在刘说到「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还可以这样讲」时，有一句重要插话，毛说：「这种地区也不少」。这句话很能表示毛对改变「指头」数的态度。

毛在刘讲话中还有不少插话。比如，毛在刘讲到「也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时，又打断刘的话，插了一句说：还有甘肃的酒泉、张掖地区，甘肃的天水地区。在刘讲到发生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主要应由中央来负，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时，毛插话说：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这句话比刘的指责更直接：是中央而不仅是中央部门要对提出的一些不恰当的东西负责。后面，在刘讲到这几年的缺点错误使党员干部以至绝大多数人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独」

民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时，毛又插话”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从这些插话看，毛似乎没有掩饰错谬的意思。他甚至比刘说得还要尖锐些。但是，他也决不会认同形势一片黑暗。错误是明摆看的，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但要说总体上是（或「全国总体上来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是不认可的。

刘的讲话似乎有些地方也不那么有把握。例如他说，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哪一些？书面报告上写了四条，请大家看看够不够。成绩写了十二条，缺点和错误只写了四条，你们如果认为缺点写得还不够，再加上一两条也可以。这个话反映了刘对参会人员的态度，可能还不太吃得准。有人估计得严重，也有人根本不认为是严重错误。因此，刘说，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杀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

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没有这样讲的，那裏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又比如，刘在讲到错误的性质时说，书面报告肯定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看做，没有做好。刘的这些话，分寸和限制性都很明显。「执行中」的「某些时候」「没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只注意数量」，「品种、质量注意不够」等等，份量有限，像是一种很轻的纯工作性质的问题。可就在前面，他却这样讲道：总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忘记了。如果根本不承认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筐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裏的话又说得很重：「教训」、「坏事」、「倾箱倒筐地承认」等等，则完全不是在说工作性质问题，而是指斥犯了大错误。

甲争人氏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 历史的变局

又比如，刘说：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种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 · 一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 · · · 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 · · 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 · · 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 · · 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 ， · · 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教训，也就在这裏。“要刘在这时完全吃准问题，是困难的。他一方面对问题看得很深，另一方面又身陷政治解释的两难：在肯定和和否定之间，难下断语。下面两段话最能说明他的这种两难困境。他说：在书面报告上，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只能做初步的总结。因为有

些事情现在还看不很清楚，等到将来，我们的经济再回升，全部恢复，’并且继续前进以后，再来看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总结。他又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

根据刘少奇之子刘源的回忆，1962年7月上旬，刚从南方回来的毛泽东，同刘少奇相见于中南海游泳池，两人间曾有一场言语冲突。这个冲突透露出刘少奇的内心苦痛，也可以看作是七千人大会后两人对形势及问题认识的一次拟牌：当时，在泳池裏的毛质问前来同他谈话的蜜J说：「你急甚么？压不住阵脚了？为甚么不顶住？」又说：

（陈云、田家英）「都找了你好，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甚么？」这时，刘也按捺不住，竟直言冒犯了：「饿死这么多人，

66，1J 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页 136 — 137 。

矛一早一么分大天，七分人栲」

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但毛并未退让，仍然抓住政治问题不放：r 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面对毛的咄咄逼人和气势，刘未再争论下去。他向毛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方案：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从应对危机的角度说，这「四不」在政治层面上是可为毛接受的。但是，毛刘之闲在形势总判断上的分歧，显然已不容易弥合了。

从时闲上说，这是七千人大会半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但不难看出，它同七千人大会上的分歧如影随形。毛在七千人大会后到南方视察，实际是在寻找证据，证明形势并不像有些人估计得那么坏。以毛的性格，他不会断然改变自己成熟的判断，同时，一些地方大员也乐于给他「好看」又「好听」的东西。因此，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如果把「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那毛怎么能容忍呢？因为三面红旗和人民公社，寄托了他太多的理想，是他独创的社会主义实践。但刘的认

识不同。他是从国家主席职位的角度看问题，从责任的深重来检讨作为的。他「历史要写上你我」，「人相食，要上书」的话，忧患极探，不仅可看作共产党领袖的自责，更是作为国家主席甚至一般意义上最高统治者的「德行」检讨。可以想见，刘长期以来必定心情压抑，时时受到道德和良心的煎熬。同毛比较起来，刘更「务实」。在严重局势面前，他不能只从理想出发，而更多的是考虑责任、后果，并全力从问题的实际应对着想。这样，毛刘之间就形成了思维和理念的「两分」

但是，要说毛就是想把中国的事情搞坏，那也非常荒谬。毛作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受到人民的极大拥戴，他为甚么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壤呢？这说不通。毛难道没有意识到责任吗？也不是。他甚至比刘还要顾及责任。他多次说过，我们搞不好就下台，由国民无来。说毛泽东只从个人责任思索问题，那是看低了他。根本而言，他认为自己坚持的建设道路没有错，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都得到人民拥护。并且，一年多来，对错误也做了纠正，连食堂也不办了，还要「退」到哪裏？这根本不是责任问题，而是共产党意图伦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五春（1962 — 1965） — 历史的变局

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好事，到底是胡乱来还是自有理由？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毛泽东坚信自己的道理：共产党所干的事情，不仅党员拥护，老百姓也不反对。你刘少奇能否认吗？即使饿死一些人，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能因为死了人，就宣布共产党没干好事！死了人，老百姓也不会反对共产党。老百姓反对的是那些直接统治他们的干部。这些人行为好坏，德性高低，是否亲民，在老百姓眼裏是有称量的。由此而言，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干的事，群众是认同的。更何况，在困难面前，共产党还在想尽办法，带领群众克服当前困难，然后再奔前程！这是不能否定的。

刘少奇即使把责任看得再重，也不能否认上面的道理。刘不是毛泽东的反对派。他是同毛泽东一心一德想把中国事情办「漂亮」的人。可是，他毕竟不是毛泽东。他有自己的忧虑和焦躁。他或许缺的就是毛泽东那种大气磅礴和高屋建瓴。因此，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在毛泽东看来，他是右了，顶不住困难；而在他自己的良心说来，他又是「左」

了，太对不住老百姓。他的口头报告的弦音正是这种矛盾表露：「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原话是：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对刘说来，这是一个政治和道德尺度。这个尺度既无奈又合理，是唯一能合拢毛刘认识并统一所有人思想的说法。因为上面这些缘故，刘的口头报告显得含混和模棱。但作为党的领袖，在许多方面刘是可以直言其弊而不须掩饰的”例如，关于党内民主和党内斗争，刘已经到了不申斥不行的地步：这些年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会议以及其它方法进行瞎指挥，有时也开些群早性大会，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二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单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视」

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 · 一使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在缺乏民主传统的文化氛围内，人一旦执掌不受制约的权力，过火斗争和蛮干、胡干不可避免。通过检讨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毛和刘都尖锐看到了这种现象。可是，申斥是不解决问题的。刘虽然几次惋惜提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却不能正确认识那场效果极坏的党内斗争，以至他在大会上仍然点了彭德怀的名字，说他裹通外国，无异把彭之罹罪定成了死案。这不仅是彭的被难，更是刘的悲哀。

刘还严厉批判了「左」比右好的说法。刘指出：「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 · 一『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裹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繁实际的、密切联紧群单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

派。· 一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 脱离群众的、冒裹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 … 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刘把带引号的左派定性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冒冒失失」和「蛮干」，是针对着大跃进以来的表现· 通常的说法是，「左」是超过了客观的可能；右是落后于客观实际。但是，在共产党内，对「左」和右的解释，通常不是从认识进入的。「左」比右好的潜在意识，要政治化得多。「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方法错了，只表明动机良好却办了错事，但立场出了问题，就是革命的异类和对「主义」的背叛了。在历史上，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几乎不可原谅（近年人们逐渐摘掉了陈独秀这项罪孽深重的帽子，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定性。对陈本人，也不断被由衷怀念起来）。毛泽东曾被国际派称为右倾。在江西苏维埃区域，毛泽东也因为「右倾」挨了整，曾被罢官，十分痛苦。再后来，刘竟也被说成「形左实右」，成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可见，凡是右倾或右派，都没有好下场。相反，人们

一『 阆' 、 i “月' ’ ‘刃， ” ‘ ‘间个妒、本' U 向么' u' ， j 么 1j ' H ') 弘' ? ’

对「左」总是有一种同情。错误虽然可恨，但其情却可原。因为他们是所谓「好心办坏事」。这种现象，是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它可能同共产国际的某些特定思维有关，但更重要的来源，还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政治态度。这在中国具有更为深远的意识根源，其力量也更为强悍。邓小平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太性急，总想把好事一下子都做完。这与其说是批判，倒不如说是开脱。因为它还是从善意的方面去评价超过客观可能的「左」。真正意义上的原因，应该是百年以来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作祟。因为近代以来民族倍受欺凌，国家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要革命和争独立的意识，在一辈又一辈知识分子中升腾起来。他们由此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接受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暴力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是最为他们接受的一种理论。在所谓「武器的批判」中，激进主义大兴其道，总是

以最革命的面貌，走在运动的前面。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埃默森的说法是对的：「没有历史，只有传统。」1949 年以后的情形，并没有因革命成功而完全改变。为了尽快变革「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激进主义似乎又找到了自己适宜的土壤。大跃进、大蛮干、大胡干和荒唐干的事情）不仅为美丽的理想宣示所掩盖，而且具有了更为「合法」的色彩：在「左」是方法问题的思维模式下，下层干部们不会考虑胡干的后果，只会以越「出格」越显示你「良好动机」为思考原点》从而得到上级的赏识。在刘的这番对「左」比右好的批，1J 中，他明显是温和的，并不那么深恶痛绝。他甚至还希望出现「真正的左派」。可在三十年过后，邓小平对「左」的批判就要深刻得多了。这是在经历太多失败和吃过大亏之后，对激进主义包裹的具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破坏的实质反思：「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的这个反思，被中国思想界和有识之士们奉为经典，甚至被人们当作一件武器，用来同「老左」们斗争。至于清算带功利关怀的激进主义的任务，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刘少奇那一代人所无法提出的。

刃，■ 1 一唱■ ～. ' ' '、j 讪 \cdot ' j ' 击' 11 , , 」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在口头报告裏再一次讲到了他钟情的政治伦理，即「吃亏」与「占便宜」问题。他说：「过去，有些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党内的这种情况，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老实人总是吃亏讪似乎手长一点，隐瞒一点，说点假话，总是占便宜。这种现象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单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制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说老实话真的吃亏，说假话真的不吃亏吗？老实人真的吃亏，不老实的人真的不吃亏吗？（毛泽东插话：总有一天要吃亏的。）我看，不怕吃亏的老实人，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因为老实人吃点亏，党内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会信任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亏的『聪明』人，不老实的人，最后

是要吃大亏的。因为你总是说假话，长期这样搞，党和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了。」几年以后，刘的这套政治伦理被恶批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对于共产党员和一般老百姓，这批判的冲击是巨大的。因为，世俗原则在同革命原则的对峙中）终于败下阵来。在所谓「超凡」革命的年代，除了奉献，是不能谈「占便宜」的。谁谈占便宜，就意味着对革命的背叛。可以说，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合理的事情，就是「以革命的名义」。在所谓革命的名义下，一切没有法纪的、没有制度的、没有道德的和有悖常理的事情，都堂皇登场了。

「革命」的破坏力之大，甚至能掀起近十亿人的集体「疯狂」和「道德失忆」。刘的这套「吃亏与占便宜」理论，被彻底击垮。刘少奇本人也在「革命」的冲决中，死于非命。因此李慎之先生曾说，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儿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无疑，刘少奇的动机是好的。他的道理也是符合正常社会伦理原则的。更何况，他当时是从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角度，解释吃亏与占便宜的道理的。而悲剧在于，「革命」的「功利」和「酣畅淋漓」，要远远大于实事求是的艰难和获益。

因此，刘当时也不得不承认「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的」

刘的口头报告，是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勇气和灼见的报告。除去对形势判断讲了真话以外，报告对三面红旗的有限保留态度，也是突破了以往的界限。因此，人们长期以来对报告的历史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历史的变局

甚高，认为它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文件。但从今天的解读出发，我们更看重的，则是它的历史价值。所谓历史价值，是指它在怎样的程度上推动当代共产党人士深化了自己的认识。我们知道，知难而行易。认识问题总要受到时空的限制。特别是，当政治考虑不能不遮挡认知需求时，人们探索问题的本质和公开改变一些东西的期待，会受到很大制约。刘少奇自1961年实行农村调查之后，看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民和农村带来的严重问题。出于责任，他希望把问题讲透并尽快吸取教训。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角色，使得他不可能无所顾忌。因此，他的口头报告总让人感到上下矛盾（编辑者已经做了若干删节），不是那样淋漓尽致。同不久后（1962年上半年）他主持所谓「伤筋动骨」的调整相比，做的就远远大于七千人大会上说的了。

其实所谓调整，是不公开的「倒退」：打着「坚持过去」的旗号，把走得「太远」、「太快」和「太乱」的东西，强行加以校正，有些地方甚至要矫枉过正，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有点改弦易辙的意思了。不能否认，这样做会触动自 1958 年以来大家一致认可的政治努力，也引起刘毛之间的政治不快。到 1962 年夏季，这种不快变成了政治分歧。毛对刘说，我不在，你就「顶不住」。后来，毛果然就此责难刘少奇，说刘「1962 年的右倾」（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批评 #1j 的用语）。从历史价值判断，刘的这个「右倾」恰恰表现了他敢于响应错误，坚持自己想法的一面。因此，刘在 1962 年的政治主张，应该给予较高的价值评判。

《杨尚昆日记》1962 年 1 月 29 日记：「下午 4 时到 7 时，开大会，林彪同志讲话。」从时长上看，林彪讲话同刘少奇一样，都用了三个小时。应该是一次很有内容的讲话。可惜今天人们看不到讲话的原文，因为林彪不可能出版自己的年谱或文集了。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林彪讲话有一个自己的习惯，就是「拉条子」。所谓「拉条子」，是林在重要讲话前把自己关在房间裏，用很大的字把想到的内容写在白纸上，一张纸写一条，写完扔到地板上，然后再收拾起来，串成一个讲话提纲。在中共领导人中，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讲话准备方式了。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实际上预先由罗瑞卿组织人起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17 草。稿子草拟后，林不满意。林彪对讲稿不满意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可能是确实对草拟稿内容不满意。因为，写作班子起草的东西，往往熟练运用流行的套话，做一般性的表态。这种讲稿没有实质内容，更没有讲话者的神气。第二种可能是，林对七千人大会的发言非常重视，因此，必须由自己思考并定下讲话要点。第三种情况是，通过会议的进行，林彪改变了自己顶定的想法，需要有针对性地讲些意思，因此必须躬身为之。如果是后两种情况，文件起草班子的稿子当然是不能合用的。从现象和后果看，第三种考虑可能最符合实情。林彪虽是军队统帅，但决非卤莽武人。他是一位极有头脑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敏感性和对政治形势的判断，都是一流的。姑且不论他在战争年代指挥重大战役的胜算与功绩，即

在建国后的政治风雨中，他也做到了既非唐突行事也非谨言慎行，而是长居中枢，稳步迁升。1955年军队授衔时，林居十大元帅第三位，仅排于朱德和彭德怀之后。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又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此前，林除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外，只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虚职（1955年起曾任副总理），不久即长期养病，并未活跃于政坛。1954年高岗事件中，林还多少沾了点边，成为高拉拢的对象。但在1958年，他突然窜升至中国前七位的领导人，即中共中央六个副主席、七个常委之一，成为在公单场合悬挂头像的领袖。可惜的是，迄今未见党史学家对林的这种奇异政治升迁做出合理解释。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林的上山，被说成是毛搬的救兵。由李锐披露的材料可知，林彪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两次常委会上，对彭做了盖棺论定式的批判，为彭的「野心家」定了调子。但即使在这两次会议上，也有意味深长的插曲。被毛耿耿了二十余年的长征中会理会议问题，反而由林彪加以澄清，给彭德怀以某种开脱。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林彪是中国当代政治中不能忽略的人物。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有不同凡响的地方。

林彪讲话分为两个问题：一为国内形势判断问题，一为军事问题。军事问题是林的主管。此时国际形势比较平稳，没有非常敏感的军事斗争议题。因此，他的带有「专业」性质的讲话，没有特别震动，r、j、'』二刁才、刀，• ' ' 他 '、 “———' —→ ' ' 么斗' ' " j) , , " ' 人的地方。相反，林对于国内政治问题的讲法，却引起很大反响。这同林素来语出惊人的特色有关。林对于人们正热烈讨论的「三面红旗」问题做了这样的判断：「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 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

人的地方。相反，林对于国内政治问题的讲法，却引起很大反响。这同林素来语出惊人的特色有关。林对于人们正热烈讨论的「三面红旗」问题做了这样的判断：「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 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

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它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问的毛病。」

林彪接着对「三面红旗」做了具体分析：「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愈来愈显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迄今我们不知道，七千人大会是否对中央领导人的发言顺序做了特殊安排？林彪第二个发言，紧接在刘少奇之后，时间同样是三个小时，论调却截然相反（指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反差极为鲜明。这是耐人寻味的。一般说来，中央领导人的大会发言，至少要在中央

不—予 Ij 讪刀 7 、火’ 拉必刀—’ k 柄 IJ
常委会上有所议论。现在我们知道，刘的口头报告是在常委会上议论过的。但林彪的讲话显然没有经过中央常委讨论。由罗瑞卿主持起草班子的讲话稿）被林弃之不用。他「拉出的条子」）虽看似没有完整文字，但却理出了思路。这些「条子」和思路，林大约完成于讲话的前夜，已经来不及由常委讨论了。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毛泽东根本没有要讨论林讲话的意思。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大会讲话不经过集体讨论，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可在当时，林就这样把讲话拿了出来。对林彪这个讲话的出现，我们可以有几种猜想：第一，这的确不是一个精心准备的大会。正如前文所说】毛决定开这样一个会，是在「灵

机一动」中定下来的。议题本来是反分散主义；形式则是仿照当时经常召开的「四级干部会」、「六级干部会」，以人员罗多、基层参与、「精神直接」为特征。但由于时间仓促，领导人的认识并未真正统一起来，特别是，人们开始接触「大跃进」失败以后的国内形势判断、对错误到底多严重进行评估这样重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所有人都接受的答案，还必须假以时日。因此可以说，大会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召开的。第二，在看法上，意见相互对立是存在的。从大多数参会者的讨论发言看，对大跃进产生明显怀疑的人，已有相当一部分。他们可能还代表看各地区、各部门的相当一批人。他们是勇敢者，比较直白地质疑了大跃进中的问题，甚至质疑了大跃进本身。但必须承认》当时的大多数人还是对大跃进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赞赏和支持，可能有各种原因，当然首先是政治上的。否定和质疑大跃进，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自庐山会议以来，批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人们很难讲真话。像彭德怀一样，讲真话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也有大量的不容否定的认识问题的存在，即思想上真实地拥护大跃进。这是「意图伦理」的心理效应。因为当时人们彻底反思大跃进的历史条件还没有出现。第三种，就是通常由党史学者解释（包括一些老年人的回忆和研究也作出同样的解释）的，像林彪这样的人，他们「对如何迎合毛泽东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林彪看到，「刘少奇的讲话虽然只字未提毛泽东的错误，但显然对『三面红旗』也没有给予理直气壮的、充分的肯定。他讲的『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七开』，更暗含着追究党的责任、毛泽东的责任的意思。林彪知道，『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会上批评的不少错误的决策都是毛泽东提出或支持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定不好过。这个时候，倘若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一定会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或许还会被视为知己。有了这样的考虑，林彪胸有成竹，就知道自己应该讲甚么内容了。」⁷

在既定制度和政治生态下，讨好毛泽东并进而有所图，不是件不正常的事情。在共产党内，谁存心想同毛泽东分道扬镳呢？即使彭德怀也决非这样想。拥护毛泽东有两种情况。一是不论毛泽东做甚么，都毫

无疑义地、死心塌地地拥护。这一类人如同宗教崇拜，对是非没有兴趣。还有一类，是看到问题存在但碍于各种考虑，不但没有提出意见反而褒以拥护言辞。后一类人构成比较复杂，但并不一定是坏人。历史不能逆推。一个人后来出了事，其前面的历史不能被推为同恶。对林彪评价也应如此。68

林彪讲话自有他的道理：「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关于1960年至1961年的自然灾害，我们在前章已经备极详尽地考证过。那是一次八十年一遇、以旱灾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灾害。据我们引述过的《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统计，中国于1959—1961年发生的大面积严重干旱，使受灾面超过半个中国。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约占播种面积的49%，其中成灾面积约占播种面积的21%。大面积的持续干旱席卷了全国国土总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广大地区，全国每年农作物旱灾受灾面积3000万—67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140—141。

68 据2006年9月出版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林彪开始并不想在七千人大会讲话。因军队和地方一些领导人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都鼓动林讲，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林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作讲话的。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4000万公顷，每年减产粮食1100万—1300万吨，造成了严重的灾荒并影响到1962年各地的生产和生活“1960年12月28日新华社专稿〈我国农业生产今年遭受特大天灾，六亿人民满怀信心克服困难〉说，1960年我国有九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占总耕地面积一半以上。其中有三亿亩到四亿亩农田，遭到重灾，甚至有一部分农田因灾害特别严重而没有收成。按照这些专业统计，林彪在这裏强调的特大、连续的自然灾害，应是实情，并不为过。党史学者指摘林彪有意渲染自然灾害的说法，即「从1959年到1961年确实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但绝没有林彪讲的甚么特大的、毁灭性的自然灾害。

竭力夸大自然灾害的程度，也是林彪的一大用心」6”云云，显然是不公允的。至少，这个倾向性的判断，没有专业气象材料的支持。党史学者对林彪关于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付学费」说法，也做了揣度。林彪当时是这样讲的：「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十八年的时间，他甚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林彪为说明自己的观点，还举了军队的例子为证：「我们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大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裹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以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林彪的这段话，在今天可以被我们看作是典型的「意图伦理」掩盖「责任伦理」，69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143，

丫中八人六啊则丈‘弟立巷（1 吵 b 必一 IBb 邨一 发灸的变句
甚至可以说成是诡辩。责任就是责任。损失则是必须加以计量的。耗去的物质已经被计入成本，一次交易已经失败了，如何能解释为下一次的交易价值呢？但是，在「意图伦理」总被认为正确，失误与否的价值判断总被意识形态强势所抹杀的情况下，林彪这些言辞，无疑具有伦理价值的充分支撑。

不过，林彪这些话是否含有个人政治意图，倒是值得研究的。党史研究者通常认为，虽然「付学费」说法不是林彪的发明，但被放大到如此极致，却是林有意所为。「一年多来，困难形势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给人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包括毛泽东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于全国出现的困难形势，认为有不可推卸责任，所以他不断地作出自我批评，

当然他也不断地向党的高级干部说，因为我们还缺乏经验。今天，林彪居然提出一个连毛泽东也难于欢齿的说法——『付学费』，使毛泽东多少增加了些底气。」初显然，这个判断首先是一种推 m1]。它得不到史证；其次，讲没有经验，是党对犯错误加以解释的一般说法，并不自七千人大会始（虽然在参加会议的人们中已经质疑了「没有经验」问题，认为一五时期更没有经验，却没有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暗示经验不能为违背规律的「胡来」开脱）。可以说，「缺少经验」是可以被广大干部接受的一个说法。「付学费」是从「没经验」引申出来的，并不是甚么新发明。林彪的「详细」解说，当然是动了脑筋的。可这并不能证明林讲了「付学费」就使毛泽东陡然有了「底气」。其效果用维持党的威信和毛泽东的威信，当然也是说得通的。林彪的发言同划不同调，但不能证明林的话就是阴谋，更不能证明林当时已成了与刘对立的「坏人」

林彪下一段话更成为党史学者认定问题的关键。林彪是这样说的：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朴我们没有照看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 70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144 ”

不一千

j 骗刀 j 骗夕化’ 伐 ‘刀一’、叩叫 j

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 4 ’ 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徒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 r 左 j 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烧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一我深深感觉到，我们工作搞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

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说是这么一个历史。

显然，在今天听来，林彪这段话确实有点「肉麻」。他对毛的「焦点恭维」，似乎有点「过」了。但是，历史分析不能凭感觉，更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当我们今天不再把毛泽东看作神，并且发现他身上还存在巨大局限性时，我们就从仰视变成了直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直接地观察毛，甚至拿放大镜来看毛身上的每一个细部，而不再被他身上包裹的光晕所眩目。可如果回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说出林彪这样的话，就不是甚么特意恭维了。不说，反而会反映某种问题。1959年9月，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曾经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就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望，我们在很长时问就是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们宣传毛主席，r「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刘讲这个话，离七千人大会不过两年多一点。当时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在军委批判彭德怀的大会上讲的。庐山出彭德怀问题，从根本上说，并没有损害毛的威信，反而以批倒彭为

1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结局。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毛的确受到了彭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其来有自。他不仅出自彭德怀，更是大跃进实行后在党内的反映，即怀疑和反对之声。应该说，这才是对毛的真正挑战。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重提个人崇拜，甚至讲了他从七大以前即开始宣传毛主席，实质是在替毛泽东应对挑战。可是，两年多后，在问题暴露更多，形势变得更差的情况下，刘却不讲这个话了。这至少能说明两点：一是刘思想确实发生了转变，认识到了大跃进的严重性质；再就是刘同毛之间出现了实质性分歧。

有人认为，个人崇拜是人民的选择。此话有一定道理。通常，在一个民族长期遭受外来侵略和不断受到外来威胁时，人民会选择一个人礼顶膜拜，以凝聚力量，对抗外敌。同样，当一个民族以振兴为基本取向时，它也会选择一个人作偶像，以化解艰难，整合力量。因此，个人崇拜并不具有特殊的文化印记。即使在所谓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只要有需求，对于个人的崇拜也难免。那么，如果一个民族在向既定

目标推进的过程中遭受挫折，需不需要更强烈的个人崇拜呢？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

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共党内包括毛泽东公开谈论个人崇拜的一次会议。毛泽东当时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裏，为甚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有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一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毛泽东在这裏对个人崇拜问题做了倾向明显的挥洒。他似乎忘记了一年前「八大」专门强调的反对个人迷信的观点。当然，这时谈论个人崇拜，是有政治背景的。在反冒进问题上，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权威没有被充分尊重。这是当时讲崇拜的基本原因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则讲得更为露骨：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柯的话后来成为「名言」，被多次拿来奚落批判。可是，柯既然讲得这样露骨，为甚么当场就没有人起而反对，加以批判呢？显然，当时人们确有这种心理需求。那么，林彪在中共事业遭受重大挫折时，出来维护毛泽东（他还没有使用柯庆施那样露骨的语言），按说也代表了一种党内的心理需要，为甚么一定要被看作是别有用心呢？

毫无疑问，道德评判不能代替历史解释。同样，历史阐释也不能为人物的政治结局负责。林彪后来出逃苏联，成为中共的叛徒。其原因错综复杂。至今仍有不少非主流的历史评说。但不管怎么样，林的出走，是在七千人大会的九年之后。我们显然不能把所有我们认为负面的东西，都加在后来带有罪名的林彪身上。似乎林彪从来就是个奸佞之徒。他所做的一切，都由阴谋、野心所驱使。同时，我们也不能仅仅用道

德标准来衡量林彪。似乎林彪完全背离党的党性原则和意识形态原则，只是出于个人需要或阴暗心理才故意讲这番话。事实上，林彪讲话是否得到其它中共领导人的支持，是否得到与会人员的正面评价，或者，林的意见是否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相当一些人的看法，是最为有力的历史证据。

在前几节，我们引用了周恩来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由《变局》一书披露出来，是过去研究七千人大会的学者所不了解的。周恩来的意思很明显：不同意将形势看得过于悲观。他说，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他似乎更在意问题的政治性：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而在有关责任问题上，他同林彪的讲法几乎相同：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 · 一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

甲毕入氏去和哄叉‘弟血吞（ i 吵 bZ 一 1 吵 bj ） — 誉丈的笑句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同林彪一样，周恩来也试图说明维护毛泽东威望的重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奋图强，埋头苦干。……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 j」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

周恩来这番话，是在彭真发表他关于如何看待毛泽东的有关责任的意见之后，针对彭的意思讲的。周恩来讲完话之后，陈伯达乘势向彭真发起责问。根据已知材料，林彪虽列名报告起草委员会，但始终没有参加会议。因此他当时并不知道会议上的情况。但毫无疑问，林彪会马上了解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争论，并进而分析中央核心圈有关的各种动向。既然毛泽东安排中央常委在大会上都要讲一讲，那么，林彪也就必须对党内出现的争论和分歧做出自己的反应。兹事体大。因此他对讲话稿格外重视，甚至放弃军委办公厅拟好的稿子，单独以「拉条子」

的方式，进行了精心准备。从林彪讲话内容和效果看，他的意图得到了充分展示。首先，这个讲话是对当时党内关于形势判断、责任归属以及「三面红旗」争论的一个表态。其次，这个表态是以肯定毛泽东功过和维护他的威信为出发点的。第三，这个出发点决不仅是林彪个人的选择，而是代表了党内很大一部分人的意见。这一点从林彪讲话后的会议反映中可以得到印证。以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副主席）和他军事统帅的威信，其讲话具有很大影响力是肯定的。他做这种表态，当然会得到毛泽东的激赏。但并不能以此反推，说林彪讲话就是为「邀功领赏」、「取悦谁谁」。特别是，它基本不是一个有关个人道德的命题，而是中共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精英们面对一系列复杂矛盾所做出的政治选择：刘少奇选择了倾向于揭露矛盾的做法；彭真则以一种更为迂回曲折的方式回护看毛泽东；周恩来以其一贯的维护大局的思路来表示自己的态度；林彪则用自己特有的断语式的鲜明表态，来拥护毛泽东所做的一切。如果猜测说，由于林彪这个讲话，表明他这时已有了进一步「篡夺」更高权力的意图，那显然是牵强的。林彪此时已是中共核心圈的一员。但当时党内权位顺序已经确定。刘的接班人地位的合法性，不仅由组织程序而规定，同时也出于毛泽东本人的安排，并经过了历史的确认。其它人如周恩来、陈云的政治顺序都在林之前。林彪离权力顶峰还有相当距离。林在中共核心圈内是年龄最小的成员之一。虽然我们在导论中曾提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度把林和邓判断为毛的接班人。但从实际情况看，林在建国后不久即开始「小病大养」，似乎无意在政治舞台上迎风起舞。毛泽东虽器重他，但在正常的接班轮替中，林肯定还要排很长的队。更何况，包括毛泽东自己也不能预料，几年后会出现一个「文化大革命」，彻底打乱原有的政治秩序。因此，我们分析林彪发言的意图，应避免简单化、道德化。我们与其把林彪发言认作「别有用心」，不如说他不过是要表示自己的立场。这样更「靠谱」一些。很可能，林彪当时已经看出来，在党的核心中，有否定「三面红旗」之风，发展下去，必然会危及毛泽东的地位和威信。他认为此举十分不妥，有出来讲话的必要。其三小时的发言，生动而坚决。其意图盖在于此。1月30日，

七千人大会的「大轴戏」终于唱响。毛泽东做大会讲话，历两小时。据杨尚昆日记载，讲话「中心是发扬民主问题，号召大家继续出气，反映热烈」

毛泽东讲话全文发表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这个稿本首度公开于1978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后又节编入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而原始稿本是毛亲自根据讲话记录稿于1962年2月至4月间整理修改的。毛对这个讲话稿的修改定稿极为慎重：一开始是他本人与田家英「对照一起修改」。后秘书林克也参加进来。这一稿改好后，毛特意送江青看过。之后，这个稿子被印成七份又改。直到3月20日，毛才嘱将稿子印九份，分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等看，同时，另四份由毛、田家英、林克和江青分别存阅。至4月7日下午，毛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认为稿子已「修改得好」，可用了。196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邵21 147号文件印发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在上述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一再关照，修改稿印出后，要把原稿交还他。甚至在印给刘、周等人修改时，毛竟交代，「印后版拆掉，原稿毁掉」。这种异常谨慎的做法，不知是出于毛的习惯还是另有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1966年2月，毛泽东又将这个讲话送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阅读，再次提出修改讲话稿。这次修改是为编辑《毛选》五卷做准备。王任重看过稿子后给毛写信说：「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新的高潮。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引导这个高潮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主席讲话中所指出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一目固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这是当务之急，也是经过『四清』运动和领导干部蹲点之后，能够逐步做到的。」王任重这封信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他随即在王信上写了给彭真的批语：「请商在京常委和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

句空话。」在京常委和彭真等人，又对稿子进行了修改，然后报毛泽东。2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将讲话稿发给全党县团以上干部。这是该文件两次用「中发」名义下发全党。此时已经接近「山雨欲来风满楼」、「满街红绿走旌旗」的时刻了。实现民主集中制度，特别是提起党内和国家的民主取向，似乎真的「不过是一句空话」了。

1966年修改稿有几处重要修改，标识出鲜亮的时代色彩。其中一处是加进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一段话”「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有时是很激烈的。」事实上，这段话正是八届十中全会的灵魂。另一处加写则完全改变了讲话稿的原意。这段话是针对苏联的：「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裏吸取教训。」今天看来，这段话对苏联社会性质和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党的性质的认定，是没有根据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加入了以上一些话，毛泽东1962年讲话的原意就變得相反了。毛当时讲话的基调是强调向苏联学习。他说：「无论甚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现在加上了「苏联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一段话，整个话的逻辑发生了问题。到底是「反对」还是「学习」？据说，当时有人听了毛讲话后，回去传达时宣传要向苏联学习，结果在「文革」中倒了大霉。

毛泽东的讲话一仍其旁征博引、不拘一格、挥洒磅礴的风格，在谈笑风生中点出几个主题。历来研究者都把讲话关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段，作为最精彩的部分。毛泽东自己也说，讲话的「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段中引用了三个典故：《史记·报任少卿书》、刘邦与酈食其和项羽与虞姬。三个典故都被发

挥得人情入理、淋漓尽致，很好地说明了主题。但讲话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民主集中制问题，而是强调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必要。这样，讲话实质上没有对列宁以来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有所推进。事实上，毛谈民主集中制的背景，是意识到自庐山会议以来，党内反右倾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政治紧张。许多基层干部对上级的专横和战道强自忍受，有意见不能提。反对则被批判、处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随时可能被戴在头上。一些省份大量揪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反党集团」。这使得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国地方政治非常暗淡，许多干部「欲」着气而不得出。加之「大跃进」的巨大损失已经暴露，追究责任成为一般人的心理。而造成严重损失和后果的，一般都是有权力的领导人头脑发热，胡搞乱来造成的。一般干部当然看在眼里。既然大会报告讨论了「大跃进」以来的得失，基层干部当然要「放」。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的议论受到代表的竭诚欢迎，正是因为毛给受压的干部撑了腰、打了气。让他们尽量地「放」，一倒苦水。因此，与其说毛泽东的讲话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毋宁说他准确把握了政治关节，并捕捉到基层干部需要释放的情感郁结点。这就是为甚么毛泽东讲完话以后，参会干部反应极其热烈，甚至

130 丫辛入氏丢和国又'弟血吞 (1, b 必一 1, bs) — 澄又的变旬痛哭流涕的原因。但是，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毛泽东应该在讲话中进一步分析「大跃进」的错误，总结教训。《变局》作者就指出：「有的亲历者回忆，当时觉得毛主席应该多谈一谈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因为死了那么多人嘛，谈一谈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r 希望他讲讲我们不敢讲的，讲得比刘少奇再深入、再进一步。」邓力群说得更直接：「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听了不过瘾，觉得很一般。」”可以认为，这些反应是更理性和更有眼光的。如果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比较毛泽东提倡民主集中制的说辞，倒是讲话中另外三处地方更值得玩味和研究。

首先，是毛泽东又一次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是更直白地承认错误。毛泽东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

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推卸责任，其它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自 1959 年以来，毛泽东多次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对工业建设没有经验，甚至承认打了「败仗」，「碰了钉子」。1960 年 11 月 28 日，在中共中央转发甘肃省委报告的批示中，毛泽东甚至这样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⁷² 语极诚恳，十分感人。

他还承认，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⁷³ 他还说，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甚么东西，甚么叫

→ ————

7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161。7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页 729。他毛泽东 1961 年 1 月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矛一早 I 二妒大火’他分入徇」

按劳付酬，甚么叫等价交换。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⁷⁴ 特别是，他承认了自己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如其它领导人：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少奇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朴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不是懂得较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矜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才良少。⁷⁵

毛泽东这些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说法，在中共执政以后，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方面，毛讲话后听单的反应可以用「群情激动」、「震动」来形容。很多人不免落下热泪。从小组发言看，人们普遍认为，

我们在工作中惹下乱子，却由毛主席来担责任，过意不去；连毛主席都做了检讨，我们更应该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从这一方面说来，毛讲话中关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话，反而更增加了他的威信。从毛泽东 1959 年以来多次承认自己错误的情况看，他的话应该是真诚的。他的确意识到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不是小问题，「乱」到了一定程度。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范围内，都暴露出相当多的不成熟的东西。当然，他不是出于谦虚）也没有必要贪过谗功。他的确看到了问题。因此·，他有号召读书，即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强烈呼吁，而且写了〈十年总 74 《毛泽东文集》，第八册，页 276 。

75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167。按，1966 年修改稿本删掉 f 本段话裏的一些地方，如还有「恩来同志比我懂」，陈云「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结），力图梳理 1956 年后由他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思路。这些行动说明他对错误也痛心疾首。

但在另一方面，承认错误也会带来政治代价。最直接的代价就是威信降低、政治分歧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不利影响。事实证明，毛的威信并未因此降低。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受到更多的敬重。因为他在问题面前，虚心下士，承担了责任。自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以来，由于战争进程顺利和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等原因，他的威望始终呈上升趋势。虽不能说这种威望在 60 年代前半期达到了顶峰，但大跃进带来的问题却没有影响他个人的声望。只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流行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党的主要领导人如果犯了路线错误，其领袖地位将被剥夺。其所犯 r 错误」将被用作声讨之用。苏联的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中国的王明和博古，都是因路线错误被赶下台。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些人甚至性命不保。毛泽东自己后来也说过，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所谓「难」，就意味着下台。当然，毛泽东自己所承认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而是工作性质的错误。但即使如此，以在位最高领袖身份承认错误，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至于在国际方面的影响，我们迄今没有看到更多有关负面的证据。但是，鉴于中国的「大跃进」始终是赫鲁晓夫诟病的一件事，中苏两党之间没少为这件事闹别扭，因此对外宣布中共特别是毛泽东做错了，当然是非常尴尬的事情。说到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憋着一股气：此人没有文化、没有教养，个人资历只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将，却在那裹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甚至横加指责。而毛泽东是甚么人？是大国革命领袖，是同斯大林一辈的党的领导人。在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看来，赫的政治地位根本同毛不是一个级别。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执政以来在内外政策上丢分很多。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对帝国主义妥协，赞赏非暴力革命，几乎走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面。赫氏基于苏联为年代曾经有过类似人民公社式的实验并遭到失败，就讥讽中国的「大跃进」，声称要同中国「对表」，这是令毛泽东和中共非常反感的。由于这样的背景，毛泽东在党内承认几年来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33

「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不能不令人想到「忌讳」二字。因此，毛泽东的做法是极不寻常的。

其次，毛泽东讲话中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段，是更加意味深长的。毛泽东说：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东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趣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誉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鱿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铃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塞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辨证规律。所谓必然，统是客观卉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P

了解党史文献的人会很熟悉，这样的话毛泽东几次说过，有点不厌其烦。1960年写〈十年总结〉时，他大概是第一次说这样的话；而

这一次他又加以更理性的发挥；后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加了同样的话，并被冠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裏来的」这样的题目。如果说，毛泽东在建国后希望对哲学有所发挥的话，那么「必然与自由」说可能是显著的一次。

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是来自古希腊的一对概念。希腊人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即对命运的认识。德国哲学家康德把这对概念引入了认识论。马克思和列宁也曾使用这对概念，说明人认识世界的途径和规律。必然王国指人们掌握客观规律前盲目地受客观规律支配的状态；自由王国则指人们掌握客观规律后自觉地运用规律改造世界的境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那裏，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常常喻指社会的历史形态：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有计划、有组织所代替。所以马克思说：「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达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⁷⁶ 而毛泽东这裏讲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关系，是从认识论角度切入的。它的一个基本点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从必然王国（即异于人、支配人的自然形态）向自由王国（即真正属于人类可认知和支配的客观世界）的进步。人类通过实践，逐渐认识、把握和驾驭而不是服从于自然规律。人类的实践便在人的进一步推进中，逐渐走向成熟，直至达到克服了盲目的、受自然决定论和因果律所支配的历史自由王国。这是毛泽东亲历社会主义建设挫折后由衷的感慨和感悟。社会主义之难在于它的长期实践性，也就是要耽于时日。这是毛泽东们一开始没能想到的。几乎所有人都曾认为，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建成。如果我们把时闲倒推十三年，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向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们是这样讲的：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苦的岁月，战胜了佳大的内外反动派，为甚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

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要井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也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77

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倒推七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是这样说的：

7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页 323。

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 4—6。

矛一早！斗分大又’七分人独」135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哀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7’
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倒推六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曾这样展望未来：

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甚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7”
如果我们再倒退三年，毛泽东在庐山上批判彭德怀时，则用了这样的话：

在座诸介，你们都有耳朵，听味！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摔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

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姿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姿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16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296。

Ah oj 『斗』

1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9—历史的变局

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台的因素，如果不垮台的话，又是因为甚么P不为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米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

他甚至还在给王稼祥的信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这些话带着毛泽东特有的气势！无论此前遇到甚么困难，毛泽东都坚信，共产党为人民办好事，就不会垮台。毛泽东甚至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再加上老百姓被动员起来的热情，中国的事情没有办不好的。可是，在「大折腾」之后，毛泽东不得不承认，要想为人民办好事，仅靠气势和勇气是不行的，还要有现代经济头脑，懂得经济规律。不然，人总要被梦呓般的必然王国纠缠着。比起前十三年，毛泽东少了一些「霸气」和张扬，多了一些谨慎和反思。他开始明白了，要达到自由王国的境界，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他在讲话裏背诵了《史记·报任少卿书》精彩的一段：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曲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挥之所为也。太史公在蒙受痛苦和羞辱并重的宫刑之后，悲愤交集，以先哲圣贤精神自厉和厉人。这种情绪引起了毛泽东的内心共鸣。他要把这种共鸣传达给中共干部们：忍辱负重，待时而起。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七千人大会讲话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

此外，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关于苏联问题的说法，也耐人寻味。一七千人大会正值苏共二十二大结束不久。在中共党内高层包括毛泽

东都认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提出的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和这个纲领确定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口号，是修正主义发展到了完备形态和它的顶峰。由于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又大肆反华，因此中国党要有准备，国际共产主义有出现破裂的危险。要准备最坏的情况，准备苏共领导把公开破裂强加予我们。但是‘毛在讲话中并没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有使用严肃和临战式的语言，却讲了一段非常「软」的话：「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并说：「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 …」云云。对此，一个解释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在检讨错误时，自然想到别人的优点。再一个解释，是主观上确实希望缓和关系。吴玲西《十年论战》说：「尽管我们希望我们缓和一下中苏关系，但是苏联方面却是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趁我们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搞颠覆活动。」⁸⁰ 两种解释，前一种更为合理。在问题严重发生时，想起学习别人，是正常反应。而后一种解释，则是完全不对问题进行反思，仍然站在四十年前不变的立场上，用论战思维来评价历史现象，是不可取的。事实上，说苏联想颠覆我们，历史至今没有提供证据。即使是七千人大会不久后发生的新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也不能说就是苏联颠覆我们的事件。因此，毛泽东七千人大会上关于学习苏联的讲话，应该被看作是他在一个特殊环境下思想的特殊反应。尽管以后不久，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骤然升温，以至最后两党和两国关系完全走向破裂。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这段讲话，才具有历史研究价值。

对比分析刘、林、毛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之后，本节标题所采用的「各有弦音」一词，看来有了比较恰当的解读。弦音之发出，必是弹拨者用心选择的某种心曲。而不同心曲的由来，则是弹拨者对外界情状观察和感受的结果。1962年之初，中共和中国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上。对大跃进问题的检讨和对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法的考虑，当然不能完全统一。而这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共的政策选择和党内关系。从不同的「弦音」裏，我们已可看到某些矛盾的端倪。在外界因素的影

殒下，矛盾将会发生 r 裂变」。当然其结果只能在若干年后才公开揭晓。

80 吴玲西：《十年论战
社，1999 ），页 495

：1956 — 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页 495
丫甲八氏六胛哄又’ 矛盾誉 11 吵 b 认— 1 吵 b 到— 舰丈的变旬
六并非尾声的高潮

毛泽东的讲话令到会者群情激动。当天晚上，有人这样表示态度：「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是下面的错。」福建与会者当场就有人这样评论毛的讲话：「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做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甚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据说，讲话者边说边落泪，十分激动。一些地委、县委的领导干部表示，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甚么说的？」，据史料载，毛讲话的当晚 10 时 30 分，他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书记会议，研究会议的「出气」问题。所谓「出气」，是毛泽东于 29 日林彪讲话后提出的一个说法，即号召与会人员向各省市领导和中央提意见，把积压于胸中的怨气、怒气和委屈吐露出来。毛泽东当时宣布延长会期，邀请全体参会人员在北京过春节。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更让所有参会人员欣幸异常。史书上通常将 1 月 30 日以后的会议，称作七千人大会的「第二高潮」据《杨尚昆日记》，1 月 30 日晚颐年堂会议决定，中央常委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以三天时间为期，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具体分工是，刘少奇到安徽组，周恩来到福建组，邓小平到四川组。除毛以外，朱、陈、林三个常委似乎当时也没有参加小组会议。31 日，刘、周、邓即到各组听会。

「出气」开始时似乎并不那么顺畅。《杨尚昆日记》记：「从今天的情况看来，由于少奇、恩来同志坐镇安徽、福建，这两个省已经慢慢地展开了，向省委领导上初步提出了些意见，还待深入。四川省虽有小平参加，似乎并未展开，而且两次冷场。」看来，经过反右、反右倾等严厉的政治运动，党内仍然余悸多多。

张素华：《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167 — 168 。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杨尚昆日记》同日还记：「下午去河北保定小组开会，会议中大家讲话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一）省委不重视大家意见，天津三级干部会提了许多意见，无交代；（二）近年来，几次大运动，整的干部太多，伤了干部的心，规定比例、排队等办法使干部害怕，因而不敢说话了（三）天津地区与保定地区的水利纠纷。」从这段记载看，终于还是有敢说话的人站了出来。从会议的发言记录看，人们一旦被发动起来，「气」还是真的不打一处来。人们反映最强烈和意见最集中的，是针对看一些省级负责人。这些省委领导人自1959年反右倾运动以来，整人下手太重，并滋长起一言堂和专制作风，大大伤害了一批人。在所谓继续跃进中，这些领导人瞎指挥、蛮干、压制不同意见，对反对他们的人实行残酷打击。而当高指标和瞎指挥带来人民群众单生产生活严重困难，许多地方出现大面积的病饿、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后，他们又往往向中央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些人很快成为与会者控诉的对象”

在几个受灾最重、问题最多的省份，其参会者反应也最为强烈。例如河南、安徽、甘肃等省一，当年浮夸风刮得最严重，口号喊得最为高昂，结果损害也最重。特别是安徽省，原省委主要领导人作风粗暴，性喜专断，在政策执行中总是「另搞一套」，其很多「左」的做法，在干部中积怨甚深。据统计，全省干部在「大跃进」发动后受到批判、斗争和处分的比例，竟高达三分之一，其中包括三个省委书记、一个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和八个省委委员。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在所谓「反瞒产」运动中）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交出「隐瞒」的粮食，使广大农民群举仓空钵净，生活无着。了解情况的基层干部敢怒而不敢言。有些故意抵制上级命令的干部，则动辄遭受残酷打击，以至遭撤职查办等重罚。当时有人形容这种大批干部遭清算的现象为「干部大换班」。由于这样的背景，安徽小组的「出气会」开得气氛紧张，批评之声极为激烈和尖锐，以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三次亲临会场，倾听控诉。想来这些基层干部反映的情况，会令刘少奇触目惊心，长叹欷歔！安徽小组的「揭盖子」，推动了「出气会」的进程。许多

小组的「出气」，将意见集中在诸如「天灾」为主还是工作中缺点和错误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49—1965）— 历史的变局

主，犯错误是因为指导思想错了还是缺乏经验这类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一般说来，因为有了毛泽东「出气」的许诺，人们一旦发泄出来，便不再会掩饰自己的积怨，而无例外地将愤怒倾洒在工作失误和指导思想的错误上面。

同这种会议的主流相对应，这时却出现一个明显的例外，这就是军队代表团的动态。从整个会议的进程看，解放军代表团始终表现平稳。即使在刘少奇讲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重大的结论时，解放军代表团也似乎没有受到多大震动。相反，军队发出的声音，一直是积极和正面的。对党内和群众议论的焦点，如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得失等等，军队代表团的態度也殊为平淡。这使军队代表团的態度显得很微妙。庆幸的是，2006年出版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对军队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做了特别叙述。这才使研究者原本的猜测，变成了可考的历史。吴法宪这样回忆道：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军委重要领导人如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说要紧跟毛主席，不要跟着起哄。他们跟军队干部打招呼，要大家不要在会上乱发言。因为「大跃进」、大炼钢铁军队都没有参加，与军队关系不大，不存在甚么「出气」问题。他们还再三强调，军队干部不要跟着地方干部走，有话让地方干部说好了。由此我们可知，七千人大会远非像某些「幼稚」的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获得了党内思想的统一」。大会所暴露出来的认识分歧和政治歧见，要比会议上的「谈笑风生」尖刻得多。党内军内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政治动向的把握，是很深的一潭水。在政治层面上，拥护与反对，率性与观望，牵扯到许多方面的考虑，甚至包含历史的恩怨、亲疏的情感和派别的分野等等并非政治的东西。

但是，地方干部的「出气」，已经到了不能阻挡的程度。从1月31日开始，各大区书记、省委领导人分别在小组上进行检查，接受基层干部的批评。他们的检查大多触及到了几年来最严重的问题。这些检查大致可归纳为下述几个方面：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4，！

1 工农业生产高指标到底发生在甚么时候？

2 月6日，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代表华东局和前华东区协作委员会做检查发言时说：头脑最热的时期是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北戴河会议的前后。首先是农业生产，1957年的估产就偏高，1958年麦收以后头脑更热，对亩产几千斤是相信的。1959年11月，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估计全区当年产量是1680亿斤，提出1960年「最低限度」比上年增产200%，即达到2000亿斤，人均1000斤粮食，并要求两三年内增加到人均1500—2000斤粮。柯说，1960年10月华东局济南会议检查山东工作，大家才真正清醒过来。由于农业上的高估产，以为粮食过关了，工业生产的指标也就高了，基本战线拉得过长了。

在某种程度上，柯在这裏讲了实话。在毛泽东自己做了检查之后，像柯这样同毛心理上有共通之处的「诸侯」，心裏不免要打翻五味瓶。当然，柯事实上不会交代出自己「头脑发热」的真正原因。那在政治上属于讳莫如深的「隐私」。因此柯的检查并没有说到要害。正如前文所提及，柯是华东区工业高指标的首创者，也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拥趸。柯依仗华东工业基础好的优势，试图在钢铁上先声夺人来个「大跃进」。当时，柯本人刚刚进入政治局，受到毛的信任，头脑当然要热要「灵」。华东1958年600万吨钢的指标，占了全国1070万吨的一多半。这个数字直接推动了他所说的北戴河时候的「热」。按照李锐的计算，如满足华东的炼钢计划，1959年全国共需生产发电设备900万千瓦。而当时世界上即使发达国家的发电设备增长，也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苏联发电设备一年的增长才750万千瓦。如果要实现柯庆施的这个「伟大目标」，中国当时得把发电设备的生产提高十倍。而如果按供电量计算，1959年全国要多发电100亿度以上。可1958年全国发电量还不到300亿度。这就是所谓「头脑发热」的数字统计，可见华东当时热昏的程度，也可见柯庆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承认了自己的热昏。

「中 / 、r 骗才常中' 斗又' 矛 J1 邪卜 (1 梦 b 必一 1y0))

2 关于「第二次跃进」的起因

其实，这个问题是明摆着的：庐山会议的风暴余波

— 递之又留望文句。但是，起兴

还是有具体原因的。2月1日下午，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在检查裹说：问题最大的是1959年底到1960年初。农村中急于过渡，砍掉了私人养猪这一条，接着是高估产、高征购，大办食堂，发动养猪「万、千、百」运动，取消自留地。这段「共产风」刮得特别厉害，瞎指挥也更多了。在工业上，一本账、两本账，三本账，层层加码。开门红·月月红、红到底。辽宁提出追上海「一天一个亿」(产值)。一比例关系就这样被彻底打破了。2月3日下午，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检查中也认为，1959年「反右倾」面搞大了，1960年就更「左」，更发热了，错误缺点也就出得更多。有许多事情不从实际出发，搞了许多大办，损失就更大。如1960年5、6月份大搞煤铁战役，大办「五小」成群。本来福建已经有土到洋，有了三明市的中型钢铁厂，有了一些「小洋群」了，不必再搞「小土群」了。可那时又大搞，这样一来，不仅影响了农业，计划也打乱了。所谓「小土群」、「小洋群」，是「大跃进」中出现的以群众运动为特征、以土法上马为手段的生产方式。在批判「洋、大、全」口号的怂恿之下，似乎「敢想、敢说、敢干」就成为天下无所不成的点金术。人们希图以小规模、大数量的方法，达成大规模、高数字的结果。例如，发动全民炼钢，就是此种热昏的一着。结果可想而知，无不是自欺欺人，落得惨败。因此，「小土群」、「小洋群」之类，不仅是大量浪费人力物力的胡闹，而且是推动「大干快上」、掀起「跃进」的能源。无怪乎毛泽东在看了「小土群」又铺天盖地而来时，也惊呼「糟糕」，这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

当然，说到底「共产风」又卷土重来的原因，是政治上的所谓路线斗争。庐山会议后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批判、大整肃，不仅中断了原来正进行的「纠乱」进程，反而更变本加厉地推动了虚假的「跃进」。因此，研究再次「跃进」的起因，不揭露到「左」的指导思想层面，只不过隔靴搔痒而已。但当时谁又能把自己剖析至骨髓课处用一早一；斗力，入火'（才f、喻刁」

呢。至少，在政治上这种剖析是犯忌的。刘少奇的话就已经「过」了，谁还愿再「过」？

3 关于高指标产生的影响及其纠正之困难

柯庆施再次讲了认错的话：指标过高，带来不少问题。例如，影射到干部作风，过多地搞计划外协作，影响国家统一计划。他承认，早在1958年底市场就出现紧张，当时也有察觉，以为是社办工业搞多了影响市场供应，只是要各地整顿社办工业，没有追根到底，没有同高指标联接起来，因而每当中央、主席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时，我们一方面同意，一方面又怕退得太多，思想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又订出了比较高的增长计划，使纠正这方面缺点错误的时间拖延下来。柯的这些说法，无意中触及到一个高度集权体制下的「通病1」，这就是层级放大和层级缩小效应。在高度集权的政治压力下，越下层的干部越失去自我意识，而随时担心自己所为无法跟随上层的旨意。因此他们逐级放大上级的增产指标或逐级缩小上级的收缩计划，以便总可以达到执行上情的先机性。「大跃进」中的情况即如此，干部们执行「跃进」计划总是比要求的更跃进，纠正问题时总是比要求的更缓慢。如此反复，造成更大的灾难。这也是毛泽东总感到自己政令得不到很好贯彻的原因之一。当然他不会想到，正是他自己要对这种现象负责。2月1日下午，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在检查发言中提到：问题最开始发生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1959年粮食本来没有那么多，而贵州估产则高达160亿斤。在高估产的错误下，产生了高征购。1959年粮食征购达33亿4千万斤，比正常年景贵州粮产17亿斤多了近一倍。1959年春，贵州召开四级干部和党代表会，粮食产量仍未落实，而且当时浮夸又起。有些地方重新开展「反瞒产」，夹杂以违法乱纪和强迫命令，结果老百姓的浮肿病和死人问题就暴露出来。能够看得出，周书记的话比较实在。「大跃进」中，往往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反而是社队存粮最多的。这种现象在今天很不好理解，但在当时却是正常的。因为公家粮仓有粮，说明当地指标完成得好，也说明反瞒产反得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大，更说明当地粮产指标高。这是在当时政治体制和政治氛围下干部玩弄职权的一种手段。最著名的是河南信阳。地委最高官员行事恶劣，甚至辱骂、吊打不服从旨意的干部和农民，压制不同意见，制造虚假繁荣。结果，信阳地区成为全国死人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地委书记路某也被逮捕法办。可见粮食高指标带来的恐怖和罪孽有多大。

4 关于产生错误的原因

其实，这几乎是不用回答的一个问题。但，当时人和当事人的解释，今天看来仍有历史价值。一般说来，与会代表几乎都会谈到发生错误的主观原因，是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和脱离群众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人强调缺乏经验。但是，在单个人的检查中，其认识深度是有差别的。黄火青是这样检讨的：几年来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片面性、盲目性，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几年中，总是存在着「争先进、怕落后」的思想。所谓「形势所迫，急起直追」，和人家争「版权」（即跃进中的发明权）。有人提「几天一个革命」，我们就提「一天革几个命」。鼓吹「人家能办到的，我们为甚么办不到？」一时问主观主义泛滥，而又把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主观主义的东西变成行动，这就必然带来强迫命令，对下级施加压力。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说：在约两年的时间内，我们实际丢掉了党的两个优良传统：一是党内斗争治病救人，惩前毖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传统，出现了过火斗争；一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传统。而这两个恰恰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几年来丢掉了这两个传统，损失巨大。广东省委在工作中有锦标主义，故而沉不住气；有官僚主义，因而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即使人下去了，又不懂生产，走马看花，只看好的，不看坏的，只从计算穗粒来定产量，没有不犯错误的。赵承认，他自己在工作中有急于挽回名誉的思想，提出过「重夺上游」的口号，表现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想。坦白说，黄、赵两人的检讨是诚挚的。虽然话不多，但点到了痛处。特别是对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有了痛切的认识，指出了它同中共一贯坚持

第二章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的三个重要传统相背离的严重危害。就这一点而言，丢掉作风又何止一人一事？由「大跃进」形成的急于求成思想，同原本为执政而奋斗

时的谨慎、谦逊和求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谓指导思想一错，便一错百错是也。

5 关于「反倾向斗争」

所谓「反倾向斗争」，即对党内的一派意见进行斗争，为党内斗争的一种形式，一般来说，斗争方式都比较严厉，结果比较严重。所谓一派意见，实际是不同认识。比如 1956 年的「反冒进」，本来是对工作进度和方式的不同看法，但后来却被说成是政治问题，「给六亿人民泼了冷水」，「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甚至还被扯到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问题上面，变得十分离奇。这种现象自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以来便出现，且愈演愈烈。中央频出，地方也不断发案。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说：省委在几次反倾向斗争中，是犯有机械过火的错误的。第一次是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没有严格区分党内外的界线，在党内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不适当地采取了机械过火的批透斗臭的方法。第二次是 1958 年大炼钢铁时，将一些实事求是的好同志错误地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第三次是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机械过火斗争更加严重。第四次是 1960 年冬到 1961 年春纠正「五风」运动，不适当地把县一级作为整风重点，各县举行的四级干部整风会议相当普遍地发生了过火的斗争。另外，对当时农村阶级复辟的所谓情况在党内的影响也估计过于严重，从而又伤害了一批同志。陶鲁茄认为，党内发生过火斗争主要是三个原因：首先是片面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的经常的倾向是右倾保守；其次，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以及实际工作问题三者的界限，往往把思想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第三，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领会不够。陶鲁茄这个发言是中肯的。特别是对党内斗争来源的分析，切中要害。「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倾向是右倾保守」一句，非常贴切地反

映了当时人们的政治心态。整个社会的情绪，都朝急于求成的方向集中，从而营造了党内和国家的激进氛围。在这种时刻，谁要说出「急」会招致问题，他一定会被更大的急流所冲决。如果再加上政治压力，

比如像庐山会议那样把不同意见（实际是很委婉的意见）说成是「过去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则言路必塞，党内不同意见将完全不得反映，这是非常可怕的。

七千人大会开到这个程度，已经到了它所能达到的高潮。不管是做了自我批评还是提了意见的人，总算是「出了一口气」。就这一方面而言，大会给人印象深刻。1992年7月，邓小平曾这样回忆说，在那次大会上，大家都做检讨嘛！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那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其实，1978年以后，中共党的主要领导人也有做自我批评的事例。比如华国锋，后来就不得不做出自我批评，检讨「两个凡是」问题。他自己也因为这个问题最终下了台。但七千人大会没有人下台。大家做自我批评，也接受批评。从这一意义上说，一七千人大会的确在中共历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一七千人大会也留下重大遗憾，这就是，所有参加会议和主持会议的人们，对究竟国家为甚么会遭受如此重大挫折的问题，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和深入的分析（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来的）。#1J 少奇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只是对问题形态的描述和对责任的划分。他说，总的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他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 · · · · · 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他又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些话让今天的人听起来，也是不明就里的。你

」一' , ' 、 ' j) 卜、 . ' ' ' 、 11 , J]

到底是拥护还是否定「大跃进」？你到底是话裹有话还是真的就这么想？如果说彭德怀能讲出「得不偿失」、「有失有得」，那经历1960年到1961年的大灾难，刘少奇为甚么就不能再说得清楚一些呢？这

肯定使许多人感到失望。

的确，刘少奇似乎不可能说得那么清楚、那么透。连他自己也处在矛盾两难之间。于是乎，史家的评论就只能高调宣传所谓「初步统一了思想」、「做了自我批评」之类了。如果是真真切切地看，一七千人大会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大会之后，形势一旦紧迫，中央一线领导人一旦加大调整力度）毛泽东便生出警惕，他「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的路线也就破茧出笼。由此而育，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能一面说七千人大会具有很高历史地位和政治贡献，一面又说不到半年，形势发生了急转。这在逻辑上显然不通。有人用「变局」来概括大会的政治含义，似乎是恰如其分的。

2月6日和7日，邓小平和周恩来分别在大会上讲话。两人无例外地都做了自我批评。邓代表中央书记处，周代表国务院，将责任大包大揽起来。毛泽东没有对两个讲话评论甚么。在通过大会书面报告的决议后，毛泽东宣布：「这个会议就闭幕了。这个会开得很好，开完了，散会。」

第二天晚上，即1962年的2月8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此去近一个半月。

如果说到会议的尾声，有这样几件事情可以交代：

首先，大会闭幕后，作为问题比较突出的安徽组被留下继续解决问题。

2月9日，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再次作检讨。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责曾希圣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并宣布中央决定，免去曾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改组安徽省委，由李葆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其次，毛泽东在南巡途次，对七千人大会几个讲话做了修改和批示

“其中包括他本人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周恩来的讲话，以及通过刘少奇报告的决议。对于自己的讲话稿，毛相当认真进行了修改和增删，并在北京和他的驻地之间往返传阅，最后才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稿（1966年2月又做再修改，这是上文已经交代的）。在修改上述几人讲话的评语中，毛突出而唯一地对林彪讲话作了高评价，称其为：

「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第三，中央常委中，只有陈云没有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实际上很希

望陈云讲话。在中共党内，陈云以稳健著称。在经济问题上，陈的发言有别人没有的权威性。因此，陈关于形势好坏、问题多少和前景估量的判断，会有很大影响力。从这一点出发，毛当然希望陈云对经济形势给以正面估价。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陈云更不能轻易讲话表态。说好说坏，都有忌讳。当时他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把讲话推掉了。此后，不到一个月，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终于道出了自己的隐忧：他之不能讲这个话、是因为「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82 后来，陈云在 1988 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1962 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⁸² 看来，在高层政治中，忌讳之事甚多。陈云的方法通常是，形势允许当面讲，就公开讲；不行，则不发言。政治压力过大时，则称病。这样既保持了原则，又照顾了面子，也保全了自己。不过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实际还是讲了一次话，不过不是在全体会议上，而是在陕西组的发言。正如上文所说，在政治问题敏感时，人们把批判矛头对准党风，最为妥帖：「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难免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⁸⁴ 此

82 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 191。8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页 1 " 2。

84 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页 187。

第二章「三分天灾，七分人独」

话可以说是义正词严。但无论是谁，在既定的体制和游戏规则下，都难以做到「全抛一片心」。事实上陈云也故意不讲给毛泽东带来难堪的话。因此他也只说了「三分话」而已。

近期出版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透露了有关七千人大会

的这样几则史料：

第一条是，林彪是在几个老师和罗瑞卿的一再劝说下才在大会上讲话的。讲过以后，大家都叫好，惟独林彪不高兴。他私下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这个材料证实了我们在上面的分析。林彪讲话的确是有感而发。同时也证明，七千人大会的确是一次未经精心准备的大会。其召开的仓促性，恰恰暴露了人们思想仍存在巨大差距的事实。在会上，毛泽东的关于形势已经好起来的观点和他对错误性质的判断，都受到了挑战。党内分歧由此而进一步展开。

另一则史料是：毛泽东在人大大会堂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扩大会议上（这个会议的名称存疑）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了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吴注明，毛的这段话是刘亚楼转告的。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一材料的准确性，而着重于它所反映的毛泽东的心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线索，即，对老百姓如何交代？在党内讨个怎样的说法，是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作出评判的底线。突破了个底线，矛盾将不可避免。

第三章

「非常时期」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离京南下，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理所当然落到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身上。不久中共中央先后召开「西楼会议」，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会议以及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等重要会议。这些会议看重在发现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进一步实行对国民经济的重大调整。

而就是在西楼会议上，刘少奇惊呼：「现在类似非常时期」

一西楼会议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离京南下，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说到刘少奇主政，这里要说一个插曲。还在上年9月下旬，毛泽东突然两次讲到他的接班人问题，明确说，「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那时，英国元帅蒙奇马利来访，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辉和

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负责接待。或许是客人出了题目，或许毛泽东有意放放空气。9月23日，毛泽东同熊向辉和浦寿昌谈话，发了以下的一篇议论：八大通过新党章，裹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甚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

1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人，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第二天，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蒙哥马利。蒙哥马利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蒙哥马利又问。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听到这裏，使人联想起三国时诸葛亮临终前，刘挥五丈原问政的典故。毛泽东在这种场合讲这番话，是随便一说，还是另有深意，颇让人寻味。从以后的事态发展看，毛泽东并没有引退之意。他对刘少奇这位「接班人」并不满意。但从外国人方面，现在有材料证明，大约从60年代开始，他们已经注意到毛泽东的接续问题。因为到1963年！毛将届七十岁。在西方政治家特别是对中国怀有某种复杂心情的政治家们看来，中国似乎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人身上，会发生变化。而变化主要是看谁来执掌中央权力，也就是谁来接毛泽东的「班」。本书导论中已经详细介绍了西方政治家和情报部门对中国政情的猜测。蒙哥马利锲而不舍的发问，就是在他访华前策划好了的。」

但毛泽东潇洒表态至少可以证实一点，自从进入调整时期，刘少奇的影响明显上升了。一七千人大会以后，这一点更加明显。然而，这时，毛泽东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和猜忌。刘少奇觉察到没

有，不得而知。从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看出，刘少奇感到，再也不能事事迁就，瞻前顾后了，必须下决心搞好调整，摆脱困境。

Roderick MacFarquhar , The Origin , of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vol . 3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7) , 640 — 641 .

第三章「非常时期」

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一副主席」，他也没有其它选择。党国事业，黎民生计，重任在身，不容稍有懈怠。

七千人大会出了题目，定了原则，具体如何调整法，没有切实研究。那么多人在一起，人多嘴杂，也没办法研究。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刘少奇及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常委们身上了。刘少奇决定开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这件事。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两星期，1962年2月21日，常委扩大会议开始举行，连着开了三天。常委当中除毛泽东、林彪离京外，其它人包括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十六人到会。“因为人数不多，会议地点就放在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所以后来称它为「西楼会议」。就是这个「西楼会议」，「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攻击。

会议首先讨论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的年度报告。核算下来，发现当年财政收支出现30亿元赤字，这是原先没预料到的。这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将十分危险。其实，财政出现赤字，并非1962年开始，从1958年就开始了。经过核实，1958年21.8亿，1959年为65.8亿，1960年为81.8亿，1961年为10.9亿。只是屈于政治压力，怕戴右倾的帽子，财经部门没敢报告。

根据李先念的解释，财政赤字大致是这样形成的：「据财政部过去的数字，四年共收入2004亿元，支出1965亿元，结余39亿元。实际上，农业产量有虚假，工业产值有虚假，库存减少，票子多发，物价上涨，市场紧张，唯独财政有结余，这是不可理解的。实际上，财政不是有结余，而是有赤字。• 一赤字是从哪来的呢？首先，收入方面有虚假。收入为了完成高指标，不外乎把一部分企业流动资金当作税收和利润上缴了，财政账面上增加了收入，企业那裏却向银行多贷了资金，不是真正地增加了财政收入）而是把银行多发的票子当

作企业赚的钱。其次，支出过多。支出也是高指标，基建投资大，其它各项建设事业的开支大，同国家的财力不相适应。一方面支出过多，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897。

甲华 f k 民丑和国义' 矛. 九夸 ' i 梦 0 必一 i 》 p } ' - 历又 孵又刘

一方面应该列入财政支出的却没有列进去。如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应该由财政支出的，但是财政没有列够。财政动用上年结余在制度上是合法的，但是这笔钱银行已经作为信贷资金用掉了，在国家预算的平衡上，应当拨出相应的信贷资金来弥补，没有弥补，就是财政赤字。」撇开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从李先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财政发生赤字的根源，根本在于政治取向。在正常政治氛围下面，财政技术官僚们不会故意掩盖虚假。因为虚假的财政报告对他们自己并没有额外的利益。只有在政治压力下面，也就是李先念所说的「为了完成高指标」，财政技术官僚们才斗胆「财政大跃进」了“把赤字隐藏在贷款和流动资金上缴下面。这是非常缺乏职业道德的事情，会给国家决策带来严重的误导。

刘少奇在发现财政虚假报告后，十分生气。他批评经济部门没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责成他们重新提出报告。他说：「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要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刘少奇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甚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说：r 目前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类似非常时期」。他要求，「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李先念：《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年》，下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页7—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1048。

《刘少奇传》，下册，页898。

七千人大会上，陈云谢绝了毛泽东让他在大会发言的邀请）并不是他心中没底。通过这几年的冷静观察，探入摸底，加上上一年亲自回老家上海青浦县调查，他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在此之前，陈云已经就解决经济困难提出了若干针对性措施，其中包括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高价食品」和减少城镇人口等项，都非常明智有效。1961年1月9日，陈云领导的物价问题小组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报告〉。1月15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中说：「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批准从今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同时1960年已经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的加价奖励全国平均百分之五，照旧执行，这样粮食收购价共计提高百分之二十五（销价暂不提高）；并且在今明两年内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提高肉、禽、蛋、食油、棉、烟、麻、茶、糖、木材、毛竹等产品的价格。」‘所谓「谷贱伤农」。此时不打破计划价格，农民将难以渡过难关。而陈云首创的困难时期实行「高价食品」的政策，也曾产生重大影彙。陈云认为，为了使城裏有钱的人能买到他们想要买的吃的东西，为了有相应的高价商品能同农民手裏的「鸡蛋」等高价商品「等价交换」，也为了回笼货币，在大城市「供给相当数量的比较高级的糖果、点心和『卖炒肉片』」是必要的。陈说‘现在要两条腿走路，一条叫定量供应，另一条叫卖高价糖果、点心和炒肉片。「两个办法同时来，目的是这样：第一缓和人心，第二增加热量，第三回笼货币。」⁷ 出卖高价食品可以算「不按规矩出牌」，是一「奇看」。它又一次离开了「计划」思维，成为大家都看好的办法。陈云还是减少城镇人口以缓解粮食困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因为农民最后还是看我们征购多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么，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版社，1997），页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版社，2005），页123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一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陈云说：“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甚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事实证明，压缩城镇人口也是国家渡过困难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陈云自己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没有讲话是因为不能「和稀泥」，而讲真话，又怕毛泽东「难堪」。经过七千人大会，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都作了自我批评，同意落实调整方针。陈云认为是时候了，该拿出自己的对策了。终于，在西楼会上，陈云将对当前形势和如何走出困境的看法和盘托出。

陈云认为，要下决心进行调整，必须对当前的困难有个清醒的认识。在分析经济困难的基本情况之后，陈云指出了五点：「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的产量同1957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800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六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陈云说。这时，还有人为了维护「大跃进」的面子，还在闭目塞听，硬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昏话。陈云毫不客气地批驳说：「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农业能很快恢复吗？对这个问题的不同估计，决定着经济决策的大局。如果一年半载就能恢复，那就不用不着大调整。陈云分析了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工业支持农业的可能性等等，一一数来。有利与不利相抵，陈云得出结论：恐怕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一五计划时好。农业的恢复不会很快。「农业恢复能够多快，目前还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两年」Or「我们工作的基本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

应。」陈云说。说到工业规模，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161。

第三章「非常时期」

分歧就更大了。工业高速度，尤其钢铁高速度，这是「大跃进」的主要目标。「大跃进」中搭起来的「架子」，谁都不愿把它拆掉。有人说：「大跃进」那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有人说：是农业拖了后腿，不然就正好。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工业吃了农业的亏，工业本身没问题。陈云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最近几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认为粮食过关，可以去办工业，所以大量招工。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5000万至6000万吨的设想来布置的。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不仅在灾荒年内负担不了，即使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陈云列举的另外三个困难是：1．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十至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照现在的情况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还不能停止。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2．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裏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3．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陈云认为；以上一共五点，其中一、二两点是基本的，其它三点都是派生出来的。

紧接着，陈云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对策：

（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从1960年起，大体上要五年。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更加被动。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

158

半辞入氏去和驯丈‘弟五吞（1962 — 196 刃— 滥又的变勾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只要基本生活数据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把全国各地价值约四千万到五千万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除增加粮食外，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裹得到体现。「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要 r 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陈云的这篇讲话，对时局的分析鞭辟入裹。既没有「形势大好」的套话，也没有顾及毛泽东「已经走到谷底」、「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的估计。他提出要用五年时间来进行调整，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提出 1962 年大抓一年，争取各行各业都 r 跃进」的想法大相径庭。他说建设规模超过了农业、工业所能负担的极限，使一些不愿退却的人深感沮丧。他关于存在通货膨胀的说法，也十分刺耳，社会主义还有通货膨胀吗？在一些人看来，这有点匪夷所思了。然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刘少奇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陈云接受了这个建议。

句陈云：〈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载《陈云同志文稿选编 1956 — 1962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页 189 — 206。

州户一于

伊 rrP “叮 f 润 J

二重设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2月26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李富春、李先念讲话之后，陈云发表讲话，再次阐述了他在西楼会议上的意见。全场静谧，全神贯注。陈云讲完，全场完全自发地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国务院的部长们，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没有假话、套话、大话，完全实事求是的讲话了。陈云的分析透彻明了，不容置疑。在此之前，虽然大会小会也讲困难，但总感觉似乎犹抱琵琶半遮面，藏看掖看。这一次困难讲够了，办法也确实可行。大家心裏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会后，各部委纷纷要求传达。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刘少奇甚至同意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

这些天，刘少奇对不断揭发出来的问题心急如焚。2月26日，他看到财政部一个报告，反映北京钢厂由于超负荷生产造成连年亏损，几乎把国家的投资全部赔光了，刘少奇批给彭真、刘仁阅处，严厉地指出：「国营工厂如果照这样办下去，结果会怎样呢？难道不会亡国吗？」103月5日、刘又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监察工作情况反映》刊载的〈青海省公安机关破坏法制违法乱纪情况十分严重〉的材料上批示：「小平、彭真同志阅后，交谢富治同志办。中央公安部应派人到青海去会同省委严肃处理。青夺公安机构违法乱纪情况，应引为教训。」，同日一刘再次在商业部《商业工作简报》上刊载的〈部分地区农村缺煤情况严重〉的材料上作出批示：「关于群众的烧柴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商业机构是不能不管的。否则，要破坏生产。」，”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这个非常时期，连农民的烧柴问题也不得不过问了。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49—550。

11 《刘少奇年谱（1898—1969）》，页550。

12 《刘少奇年谱（1898—1969）》，页5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春（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当然，刘少奇最惦记的，仍然是尽快把陈云的意见发下去。3月12日、1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转发陈云讲话的中央批语。刘少奇当众问：「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到了这个时候，在北京几乎没人希望掩盖困难了。刘的决心很大，他认为，不把困难估计够，工作不能由被动变主动。这次中央常委扩大会通过了中央转发陈云讲话的指示，指示明确说：「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也就是说，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之外，其它一律停止。」¹³从这个「指示」看，中央一线领导人对「后退」，是下了坚决决心的。刘少奇说：这个指示「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3月16日，刘少奇偕周恩来、邓小平飞武汉，向正在武汉东湖宾馆休假的毛泽东汇报了中央常委的决定。刘对毛说：「我们同意陈云讲话，起草了一个指示，会议上是通过了，还要请主席看一看。」刘接着说：「这个问题我也在会上讲了，如果主席同意，我们就发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们重新开会议论。」毛泽东看了看陈云讲话和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表示同意拟发省、军级参阅。毛泽东曾经批评：「四时八节，强迫签字」。这次是不是「强迫签字」呢？毛泽东没有表露。3月18日，中共中央将陈云讲话加上按语转发到全国各省市和各部门。同时下发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两个讲话。这个中央批语传达了西楼会议精神。

西楼会议后，中央常委开始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中央财经小组是1958年6月成立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¹³《刘少奇传》，下册，页900。

第三章「非常时期」

李先念。它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负责指导全国财经事务，但在性质上是咨询机构。后来「大跃进」发动后，一切常规被打乱，这个小组也就在实际中停止了工作。现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如此繁重，迫切需要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指挥部。刘少奇竭力主张把中央财经小组恢复起来，并且希望陈云继续担任组长。陈云因为身体原因，一再推辞，提议由其它人担任组长，自己当组员，他有意见可以提，他也相信，财经小组的同志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 ‘所以，最初曾确定李富春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周恩来、陈云都是组员。在此次讨论中央批发陈云等讲话的指示时，刘少奇又提出，有同志建议，让陈云同志来当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富春当副组长，请大家再议一下。李富春当场表态，陈云当组长最合适，自己当陈云的助手。与会人员一致赞同刘少奇的提议。这次，中央财经小组是实质性领导机构了。陈云当时没有参加会议，他知道后还是推让由其它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刘对陈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在这番推让之间，似乎传达出某种中共政治文化的信息，表现出中共领导人不同的人物性格。刘主持中央一线，责任重大，并且已下定了「大干」的决心。而陈看起来，还是有些顾虑。身体不好当然是一个最好的借口，但联紧他说过的不愿让毛「难堪」，是否可以猜想，他还有更深的用意在里面呢？因为毛对形势的看法是大家都清楚的。毛又不在北京。这些都是有某种忌讳的。

陈云，中国共产党内最杰出的计划经济专家，他以创造出「鸟笼经济」著称于世界。他的最大特点，是实际。要不然不说，要说就是实际状况和实际办法。这使他在1956年至80年代初的很长一段时闲裹，不能成为政治的「主流派」，好像是游离于核心内外一个中央副主席、常委中但陈云自1949年初从东北调回中央后，在主管中央财经工作上「点子」很多。他在政务院成立后出任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具体组织领导了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迅速稳定

， j . ■ ■ ■ . r , ■ . ■ ■ ■ ‘蕴口 ‘■ ■ ■ , ■ ■ ■ ■ , 乱• 可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

‘口，一” 私讪 ‘? ’ → 一

了动荡的经济形势，根除了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发展了经济，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紧接着又领导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和「一五」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有着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对陈的这些功绩是很赞赏的。但陈云对经济发展的「实在性见解」又往往不那么遂毛的「激越」之心。例如1956年反对冒进，毛就对陈十分不满。可是，在对「大跃进」混乱有所省悟时，又念及陈云的好处，有「国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说。这就是陈云在「大跃进」以来一直保持低调，在形势许可的情况下，做一些调查研究，建立自己经济谋略的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陈是索性缄默不语。经过三年「大跃进」和三年（1959年至1961年）严重经济困难，大家回过头来看看陈云当年的那些论点，恍然若金玉良言。因此，由陈云出来重新主管财经工作，是众望所归。

3月7日，在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上）陈云再次讲话。讲话大致重申了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西楼会议已经讲到或多次讲到的问题。关于对1962年年度计划的调整，陈云提出：「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这是非常必要的。定了以后，后三个季度就不要变动了，再不要像往年那样『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使计委的同志苦得不得了。」他着重强调了农业和市场这两个问题，认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r 第二要满足市场的需要，主要是日用工业品生产的需要，根据实际可能，能多给一点就多给一点。」「这两项定下来，再考虑其它。管年度计划，首先就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今年的计划，特g1I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陈云说：在计划方面，「要准备对重工业、基16（陈云传），下册，页1312—1313。

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

「伤筋动骨」四个字不仅用得贴切，也形象地表达了陈云对大规模调整的决心，而且被认为是当时调整的一个纲领。

关于解决城市食品供应不足、人民体质下降的问题，陈云除坚持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一两大豆的办法外，又建议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加一些补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使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另外要保证猪的收购，压缩一部分出口，使每人每月有半斤肉吃。r 这样，鱼、肉两项，五口之家一个月就有五斤。j 在当时，每人每月有半斤肉和半斤鱼，是个颇为诱人的承诺。事实上，这些指标只在最大的城市裹得到了实现。关于综合平衡，陈云强调，要实在地弄清两个问题：r 一点是，从甚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甚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当时还不能搞综合平衡，因为没有条件。他们主张先订出几个远景指标，然后推算出各种数字，制定建设方案。陈云则认为不可：「我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甚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其实，陈云说的这个道理，就是 r 量人为出」，先有了账本，再开始投资赚钱，而不是「大跃进」的方法，不顾本钱，一下就大干起来。关于第二个问题，陈云说：「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在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生产就可以协调，生 17 陈云：（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 — 1962 年），页 210 — 21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 — 1965）— 历史的变局

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陈云说：「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

掌握主动，避免被动。」¹⁸「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搞计划经济，不搞综合平衡，等于不要计划。就是这样一条基本规律，「大跃进」中被批得体无完肤。说综合平衡是消极平衡，是忽视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张积极平衡。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不断打破平衡。其结果可想而知，吃尽了苦头。陈云在这个讲话裏对「积极平衡」这个「大跃进」的理论基础大胆地给予了批驳，这在当时还是有勇气的。陈云尖锐地指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¹⁹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从这个道理出发，陈云说：「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²⁰陈云的讲话可谓一针见血。

此外，在陈云讲话裏还有特别动感情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党性宣示。陈云说：「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裏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²¹这话给人以破釜沉舟、最后一战之感。从1962年陈云的作为看，这话包含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为不丢掉政权，一切暂时性的办法都可以上。后来人们传出，陈云的真实想法是，共产党让老百姓吃不上饭，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哪怕这个措施在改变了困境之后再弃之不用也可以。例如在3月中旬后的杭州疗养期间，陈云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即认为与他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此时，陈云还两次请商业部长姚依林到杭州，商谈可否将国家征购粮数字定死，超产部分归农民；在农村当前形势下可否采取分田到户的办

2120

1962年），页189—206。212。

第三章「非常时期」

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此时，陈云还两次请商业部长姚依林到杭州，商谈可否将国家征购粮数字定死，超产部分归农民；在农村当前形势下可否采取分田到户的办

法等。“，作为执政者和共产党人，陈云的这些想法非常可以理解。他是准备用「猛药」的。

刘少奇、周恩来十分赞同陈云的意见。周恩来当场用一副对联概括了陈云的思想：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陈云这个讲话记录，经他本人审看过，最后在小范围内印发。中共中央迅速对陈云等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作出反应。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中说：「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也就是说，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以外，其它都要一律停止。今年年度计划，必须根据上述原则迅速进行调整。」²¹？

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后，陈云到南方疗养。在3月13日的中常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由陈云出任重新设立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在中共党内，这种类似的小组，实权甚大。中央财经小组，相当于经济内阁。所有重大经济问题都要由小组研究，提出决策，然后交中央通过执行。人们不妨检看小组成员，总理周恩来仅仅是小组成员而已。但是，在「文革」前两次建立中共中央财经小组，都半途而废。这不能不说是既定制度下的优化性缺失。在武汉的毛泽东，同意了中央常委对陈云的这个非常任命。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115—116。

22 《陈云传》，下册，页1316。

）一「『、'、IF 綢' " 綢，→ ' ' 吧 ' ' 么，u' 1' uJ) 石亡）」（7 又刘

刘少奇从武汉回到北京后，觉得陈云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要秘书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言论收集起来，编辑印发。在党内除了毛泽东的讲话外，汇编印发其它人的讲话，尚无先例。而且陈云的经济思想与「大跃进」是两种不同的建设思路。陈云几次表示不同意。刘少奇劝说道：「可以不广泛

印发，只发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看看。」据邓力群回忆：「我们就编了一份材料，大约四五万字，提要一万多字。开始，题目称为《陈云同志论几年来的经济工作》，何均同志提出，已经有了《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来一个『论』甚么，不好。于是把题目改成《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陈云的经济言论很快编印了出来。刘少奇特地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推荐这些论述：「主席：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3月7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它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毛泽东收到材料，未置可否。不过，这份材料，直到8、9月北戴河会议时，还摆在毛泽东的桌子旁边。由此看出，毛泽东对这件事是才良重视的。

刘少奇从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尽力支持陈云。他探知，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责任重大，工作艰巨，况且陈云的身体又一直不大好。陈云一再推辞。刘少奇亲自登门看望，促膝长谈，交换意见。4月19日，刘少奇签发中共中央通知，向全党宣布，陈云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成员。这时，陈云已到华东休息。调整的主要工作由刘、周、邓负责。重大决策陈云参与意见。

23（陈云传），下册，页1318—1319。

月）一州卜一 恼 r 下 N 月，卯 J

三著名的 r 五月会议」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史称「五月会议」。在1962年实行经济调整过程中，「五月会议」占有重要地位。出席「五月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陈毅、李

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还有中央局、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共 105 人。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林彪没有参加。

在这之前，各部委和各省市都传达了「西楼会议」精神，尤其是陈云的讲话，在高级干部中震动很大。但如同任何一个政党一样，党内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虽然党内都同意了调整，但在程度和方法上，仍有相当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对陈云的「西楼会议」讲话表示异议；还有一些人不同意中央在七千人大会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提出，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对形势已经作了正确的估计，现在只过了几个月，又讲一篇同那时的估计大有区别的话，这样好吗？²⁴ 刘少奇认识到，一方面要支持同意陈云讲话和 2 月以来中央精神的同志，让他们坚定「伤筋动骨」调整的决心。另一方面，还要再召开强力的会议以统一思想。4 月 26 日，中央应各省市的纷纷要求，发出补充通知，将传达陈云讲话的范围扩大到地、市委级。各省和中央各部门在听了传达之后，普遍反映强烈，思想进一步解放，敢于暴露过去不敢暴露的问题。中央财经小组在 3、4 月广泛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后，着手大幅度调整 1962 年计划。调整计划草案随即由薛暮桥带往杭州，向正在那裏疗养的陈云汇报，陈云同意后，4 月下旬正式报送党中央。

²⁴ 《刘少奇传》，下册，页 90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五月会议」对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大会上，李富春讲了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贯彻农轻重方针的问题；李先念讲了粮食、外贸问题；邓子恢讲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谢富治讲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林枫讲了教育问题。在最后一天的大会上，四名政治局常委讲话，周恩来讲了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以及粮食、外汇、市场、精简等问题；邓小平讲了当前的中心工作、甄别平反和加强各级党委领导核心的问题；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讲了当前经济形势和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这些讲话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

各个方面，可见中央常委们之用心良苦。这种细致入微的讲话安排和工作布置，远远超过了七千人大会。之后，会议展开讨论，讨论重点仍然围绕着对形势的估计。

由于有了这几个月的酝酿，这次中财小组提交给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对于面临的经济困难讲得更加具体。报告说，西楼会议揭露了财政收支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使我们对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的认识，比过去进了一步。报告具体摆出了国民经济八个主要方面的困难情况：一是粮食供应还很紧张，经济作物还在继续减产，整个农业战线的恢复不可能很快。全国粮食总产量要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整个农村经济要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需要更多的时间。二是工业生产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内部的大调整也不行。三是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以后，必须踏步两三年，作好调整工作，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四是货物运输量减少了，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暂时缓和下来，目前突出的问题是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五是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目前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农业的生产水平。六是市场的供应情况，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在今后三、五年内很难有大的改善。七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外汇的收入不可能再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需用于进口粮食。八是财政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许多企业严重亏损，目前算起来一共可能有 250 多亿元，或者更多一些。报告总括说：上述国民经济八个方面的困难情况

第三章「非常时期」

况，集中反映为国民收入的显著下降。「1961 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为 790 亿元，比 1957 年的 932 亿元减少了 142 亿元。如果不扭转国民收入的这种下降趋势，我们就不可能增加积累基金来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增加消费基金来改善人民生活。」

中财小组的这份报告把当时的困难形势讲得很透。在会议讨论中，大家纷纷发言，表示赞同。有人说：「现在困难很大，而调整进度却很慢，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困难的深度和克服困难的艰巨性认识还不一致。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还有些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明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观望、

等待，硬撑着空架子，不肯收撒子减人，使以后恢复起来更加费劲，而且万一国际上有个『风吹草动』，粮食进不了口，全局就不堪设想。」有的反映：「现在还有些部门和地方对恢复农业的困难没有足够的认识，进行调整的决心不大，还是陈兵列马，以为只要有一两个好夏收秋收，就可以全部人马重新再上。这是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有人大声疾呼：「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把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用在刀口上，打歼灭战，同时忍痛割爱掉一些东西。」所谓「毒蛇噬臂、壮士断腕」从字面上解释，就如同股市裏的「割肉」，长期被套现而根本不能解套时，只能下决心卖掉股票，其痛苦是必须忍受的。当然，「毒蛇噬臂、壮士断腕」更表现的是一种决绝的态度：承认错误，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在中共执政的十三年历史上，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因此，后人应十分看中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准确概括了「五月会议」的决心。

刘少奇在会上做总结讲话。他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经济上来说 1 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叩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样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刘少奇特别点到了中央局书记们，他接着说：「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改变了七千人大会不 / 、斗、叩可叮” 州人一中 J1 秃卜 ‘边 7U’ 1 7UJ ‘一’ 赞又 剧支司

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基本估计。他说：「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裏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刘少奇这样阐述问题，无论就形势还是困难程度，都至少维持了他在七千人大会前起草报告时的调子。不过，这一次毛泽东不在北京，对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说了算。所以他可以坚持这样的观点。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揭露出来的财政赤字和工农业存在的问题，更坚定了他此时的主见。刘的讲话原话如下：仁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

困难，后来发现好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是估计过头了危险，还是估计不够危险？比较起来，还是估计不够危险。现在还没有那种因为把困难夸大而使工作受损失的危险。将来可能有这种危险，但是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说不出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对克服困难我们就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但不害怕，还是干劲十足地挺起胸膛前进，这是勇敢的。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我想，我们革命家的气魄，马克思主义的气概，应该是这样。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²⁵ 刘之所以讲这番看起来有些「纠缠」的话，原因很明显，就是党内对形势的估计始终存在分歧。宁肯放大困难，也不掩饰困难，中央一线领导人这时已经把话说到了「绝处」。但即使如此，这些话究竟能不能解决若干认识问题，就像刘反复讲困难一样，似乎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历史说明，²⁵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 445 — 446。

第二不— 并下时期」

1962 年之际，云雨翻覆的事情出得太多。仅仅两个月之后，政治走向又拐了弯。

周恩来的讲话，同样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他认为调整恢复短期内难以完成，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调整时期。这个阶段大约三至五年。他说：「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去年经济调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内容就是恢复。」他说：「现在看）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恢复短期内难以实现。」为甚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因为粮食生产恢复到 1957 年水平，「总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区也许要超过五年。至于农业的全面恢复，包括经济作物，

农、林、牧、副、渔，都要超过五年。」之所以要一个独立的调整阶段，还因为「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他深有感触地说：「要承认自己不行」，「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周也指出：调整的方针是「按照短线，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这个方针不能一步实现，要逐步实现，但是必须坚持这个方针」。周恩来看 y1J ，农轻重次序严重失调。这个问题七千人大会上虽然说了，但现在表现得更突出了。所以要首先抓住调整农轻重次序这个关键来调整。这个调整不能以为今后一年马上就绪。生产秩序要就绪，时间要长一些。他说，对于指标，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来看这个问题，这是个艰巨的任务。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要翻身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周恩来的话虽不像刘少奇那样尖锐，但仍然很「硬」，很到位。他没有在形势好坏的问题上多做文章，而是强调调整所需要的时闲。这样说，政治风险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金神及主编二《周恩来传《1949—1976 年》》，下册《北京：，页 4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年）——历史的变局

自然要小些。当然，他是主持工作运行的人。他的真正认识肯定不是形势大好，走出了谷底，而是相反。

五月会议还涉及到了农业生产制度问题。邓子恢在谈到农村工作问题时发言说‘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自留地、饲料地、借冬闲田、自由市场等也可以适当放开或扩大。他说：「我认为，当前在一定范围之内，扩大小自由没有危险。过去我们对自发资本主义的危险，我看也有点夸大了。因此要适当扩大小自由。」「我认为，适当扩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总不要超过总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干部是我们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就发展资本主义呀？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

27 邓的话不仅有理，更带着勇气。它们当时曾被目为中共思想的「异

类」，但的确是实事求是和没有虚饰的声音。后来，这些话成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论，遭到全党的批判。

经过这样一番议论，参加会议者对中央一线的意见有了了解。虽不能说取得了完全一致的赞同意见，但大家为推不翻的道理所说服。从这个角度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在 60 年代的中共经济调整史上，五月会议同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齐名，成为一次著名的扭转思想的会议。会议所通过的中财小组报告，确定了三至五年时间专门用于调整。会议并确定了大幅度调整的措施。这些措施概括地说就是：「减人」、「下马」、恢复农业和稳定市场。同「大跃进」以来的所有举措相比，这些措施的每一项都是「真刀真枪」地行动，都是在「伤筋动骨」

27 邓子恢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 年 5 月 9 日。

引自《刘少奇传》】下册，页 906 — 907。

第三章 r 非常时期」

四非常措施

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减人」、「下马」和恢复农业、稳定市场。

关于减人。从 1961 年就开始了。所谓减人，就是减掉自「大跃进」以来陡增的城市人口和各业职工。「大跃进」曾使城市劳动力发生极大的短缺。于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及其家属数量，自 1958 年以来出现了暴涨。由于 1949 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两元性质，实行城市供应都由国家包起来的政策，城市人口的暴涨必然带来供应紧张。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五风」以及 1960 年以来自然灾害的原因，全国粮食及副食品大幅度短缺，从而极大限制了城市供应的资源，造成了城市的压力。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个主要城市都发生粮食告急的现象，正是这种全国性紧张的后果。国家急于减人，减掉的人如何处理？唯一的出路是回农村。农村虽然也正经受着饥饿的煎熬，但毕竟比城市裹人人都伸手向国家要粮食、要蔬菜好解决得多。从今天的观点看，这种人口流动是反向的。正常的城市化进程，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还没有出现。实际上，人们只是用了最简单的办法，即人多了减人，人少了加人。加人时无所顾忌，减人时越多越好。当然，摆在中共领导

人面前的，也只有这样的办法。

据统计，1960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到1.3亿多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增加了1/4。以人口大省四川省为例。据四川省计委和省劳；动局1961年2月20日向省委的报告，1957年时，四川全省农村共有全；劳、半劳力2651万人，1960年只有2353万人，减少了290万余人。而在同一时期，由国家开支工资的职工却由189万人增加到484万人，增加了1.5倍多，其中基本建设职工由22万人增加到67万人，增加了2倍多。特别是，由农村调出的劳动力，大部分是精壮男劳力，人民公社办工业占用强劳动力也比较多，这使农业生产一线的劳动力质量显著下降。28

28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页211。

计 /、卜、切〔仔'闷二k一半.刀,疲}艮17D必一i望0)'一
杈 j 讷缝 7 叉洁 J

考虑到四川省当时总人口为6485.6万人（1962年）29，农村壮劳力减少是相当大的。而在同样是人口大省的山东，自1958年以来农村人口也减少了近200万。30这两个省的农村劳力减少可能具有代表性，即，自1958年工业和城市迅速膨胀以来，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大约都在百万以上。

中共中央1961年确定的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方针是，当年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其中精减职工873万人。然而，到1961年底，城镇人口还是比1957年多出2758万人。经过「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国务院扩大会议的讨论，人们看到城镇人口还是过多，粮、油、副食供应难以保证。因此「五月会议」决定】在1962年内再减城镇人口1000万，其中职工850万。这是一项不得已而采取的非常措施，相当于一次人口的大迁徙。当时有人评论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而对于负责实际运作的周恩来而言，这是一个相当繁重的任务。周当时说：「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个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甚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

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必须要谨慎从事，不能草率从事。」「决心要大，步骤要稳，工作要细，要负责到底。」），对执政者说来，下这样一个决心的确不容易。不过，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也没有必要非说成是「史无前例」，似乎又创造出个甚么

29 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页30。据该书，四川总人口1957年为7051万；1960年为6619.8万；1962年为6485.6万；1965年为7137万；1971年为8583.7万。

30 谭敌龙‘〈回顾六十年代山东的国民经济调整〉，载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国民经济调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页230。另据《山东省情》，山东省在1964年7月1日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省总人口为55496219人。山东省委研究室编：《山东省情（1949—1954）》（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页47。

31 《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页655。

矛 g 讪羊 1 于计巾·中仰 1 』

历史的奇迹来。从城市迁出2000万人口，自然像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搬家。但是，这个搬家在性质上不是一次经济运动。它的成本损失几乎是无法计算的。当时中国人口大约六亿五千万左右。此次迁徙涉及的人口比例几乎是三十分之一。在正常工业化的进程中，城市人口增加是必须的。如果把「大跃进」看成是中国工业化的一次尝试，那么，结果却出现这样的人口逆向流动，刚好证明中国1958年工业化的失败。因此，历史学家们在考察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时，应从工业化本身的得失来分析问题，而不是简单歌颂「史无前例」。对执政的政党说来，处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自然很不容易。因而刘少奇也说：「我们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这也算一个勇气。搞这件事，我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在向群众解释时，党政领导要负责向群众作自我批评，说我们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有很多缺点，因此把你们招来多了，现在只好请你们回去。要向他们请求，要求他们，要做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以便使我们的思想跟群众的思想能够统一起来，

然后就能统一行动。」刘少奇的态度比较真实。他是从承认错误出发的，而不是满足于「史无前例」

这样大社会性行动，影响极大。作为执政者，首先应考虑的是社会稳定。同周恩来一样，刘少奇也想到的是不出乱子。他说：要先保证「大城市不闹大事，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我们也还要准备出乱子。」人民是顾全大局的。事实证明，精减和下放都进展得比较顺利，没有出大乱子。如此浩大的人口迁徙，到了9月份，就基本完成了。当年全国共减少职工940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48万人。毛泽东说起这件事，也曾感慨万千：「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共产党那个能办到？」三年前，彭德怀在上庐山时也说过，我们的老百姓多好呀！要在欧洲，早造反了。后来，彭因此话而罪加一等，定性为反毛。可是，当人们静下心来，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要中国老百姓同自己分担错误造成的后果时，谁也不会否认中国老百姓的质朴、无怨和忍耐。同时，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党的威信和号召力宛如高山。一声令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6）——历史的变局地动山摇。这倒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它是一个共产党执政最初时期的特有现象。显然，对任何具有组织性和忍耐性的民众说来，这种「招来挥去」的事绝不能多做，否则，执政党的威望就要透支了，就会失信于民。1979至1980年，邓小平几次谈到这件事。他说，过去遇到困难，党中央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两千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他感叹说：『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

关于「下马」，就是坚决降低工业生产指标，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对现有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年初，计划196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压低至67亿元。这不但比1960年的384多亿元少310多亿元，而且比1961年的127亿元也少将近一半。经过五月会议的深入研究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再压低到46亿元。后来，又追加到67.6亿元。施工项目也被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大批新建项目砍掉了。大批在建项目也被迫下马停建，留下大批半拉子工程。这的确可称为是「伤筋动骨」了。这一砍，使居高不下的积累率大幅度地降了下来。从1960

年的 39.6%，1961 年的 19.2%，降到 1962 年的 10.4%。这是建国后几十年间，积累率最低的年份。以山东省为例，经过关停并转，至 1961 年底，全省企业总数（包括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由上年的 11522 个，减少到 7530 个，净减 3992 个；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上年的 14.97 亿元减少到 4.15 亿元，净减少 10.82 亿元，其中，钢、铁、煤炭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此外，山东还动员近十万人支援边疆。³² 降低指标，重点是降低重工业指标。中共中央决定对原 1962 年的计划指标，再分别降低 5% 到 20%。其中煤从 2.5 亿吨降为 2.39 亿吨；钢从 750 万吨降为 600 万吨。钢产量指标从 1960 年的 2000 万吨降到 1961 年 1000 万吨，再降到 1962 年的 600 万吨，砍了 70%。现有工业企业的下马即关停并转，更是「壮士断腕」的重大举措。1961 年底全国共有 61800 多个国营企业，中央直属的基本建设单位共有 849 个。

³² 谭数龙：〈回顾六十年代山东的国民经济调整〉，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国民经济调整》，页 224”

第三章「非常时期」

这样多的企业和建设单位，不但同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而且同调整后的 1962 年工业生产建设任务也极不适应。例如全国有食品企业 2.1 万多个，制糖、卷烟、罐头等行业的开工率只达到 20% 到 30% 三又如 1962 年棉纱的计划产量只有 260 多万件，最多只要保留 500 万到 600 万锭、100 个以下的纺织厂，可当时共有近 1000 万锭·236 个纺织厂，一半以上生产能力闲置。又如按照调整计划，有 50 至 60 个机状厂开工就够了，但当时生产机状的专业工厂还有 110 多个。总之，全国有许多企业生产任务不足或根本没有任务，但它们还要消耗很多燃料、电力和一部分原材料，国家要支付大量的工资和管理费用。中央确定：下定决心，「有计划地保住一批工厂，缩小一批工厂，合并一批工厂，关掉一批工厂，并且改变一批工厂的生产任务。」

经过调整，全民所有制企业在 1961 年减少 2.5 万个的基础上，1962 年又减少 1.8 万个，相当于 1960 年末 9.6 万个企业的 44.8%。冶金、建材、化工和机械工业企业的数目分别减少 70.5%、507

% · 4220 / 0 和 31 . 60 / 0 。加强了煤炭 · 石油、化工等短线产品的生产能力。转产了 110 个机械工业企业约 3 万人、5500 台机床到农业机械生产部门，也拨出了一些企业给军事部门加强军工生产和维修的能力。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大批下马。农村社队办的企业基本上停办了。大批基建项目和现有工业企业的大批「下马」，这是许多人难以接受的现实。自己辛辛苦苦搭起来的架子，谁都不愿被砍掉。

「下马」成了以后受人诟病的把柄。然而，不退则不进，不砍掉一批企业，老是端着个「大架子」，就无法摆脱困局。减人、下马的目的，就是为了集中一切力量用于农业和市场的恢复。当时采取了许多应急性措施。包括恢复银行严格管理资金制度，控制货币发行量；严格财务管理，各大区和各省市应得地方财政结余、地方顶备费、地方投资，都由中央按年度按季度进行分配；严格物资管理，清仓核资，把一切积存物资都利用于市场；' 尽可能增产日用品，确定一批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当时卖高价的商品有高档烟、酒、糖果、点心、自行车、缝纫机等。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半斤鱼，以保证市民最低生活需要等。

i / 乙一「下」、八六柑斗久' 用 J1 廿 '1 7U ' 1 7UJj 种亡火门又司而一切措施的最终结果，就是看农业能不能增产。邓小平在 r 五月会议」上讲；「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它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都要靠生产队拿出来。」然而，恰恰在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上，引发了一场重大争论。

第四章

包产到户：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个症结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农业生产的制度形式，便成为政治层面一个非常严重和争论不休的问题。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责任制、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这些为一般人很难弄懂实质的农业生产制度，包裹看许多政治理念和政治取向的不同。甚至，因为它而起的争论，到后来竟成为社会转向和重大政治斗争的起因。而 1978 年以后中国的改革，也竟从这个长期的争论点上发生突破。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它关系重大。在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过程中，除中国外）似乎都没有在农业生产制度问题上发生过影响巨大的

争论。它们也有自己的制度安排，基本实行的是公有性质的或以公有性质为主的农村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有些国家如波兰农业经营以个体为主）。后来，到二十世纪 90 年代苏、东发生剧变，也并不由农村生产制度引发。这种现象颇为吊诡。中国到底发生了甚么？在 1962 年之际，这成为一个政治关节点。

一归去来兮责任田

无疑，曾希圣是责任田问题上省一级领导人的第一个被难者。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上下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针对曾的专横和跋扈。据曾的传记作者说，曾的脾气暴躁，作风专横，是因为他长期负责破译敌人电码。这种工作极为艰难，极易造成人的暴怒、乖僻孤僻。曾是老资格，建国后长期任职省委一把手，遂将早年形成的秉性也带到地方，导致干群关系紧张。但是，曾被免职，更大的原因是在安徽推行「责任田」。在安徽省推行责任田这件事，曾先向毛泽东口头汇报，然后又得到书面的允准。但毛泽东同意

可以「试」的话，并不是真正同意了推行责任田的意思，毛泽东根深蒂固地认为，所谓责任田，其实就是包产到户，或者是单干。在农村问题非常严重，饿饭、死人都已经暴露出来时，毛泽东的同意「试」，是可以理解的；但原则上并不同意。曾以为有了「尚方宝剑」，在安徽兴致勃勃地公开推广，就显出其政治上的幼稚。曾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说：「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

“曾在小组的检讨十分沉重，承认对不起党、毛主席，更对不起安徽人民和广大干部。

曾在七千人大会后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李葆华继任。随之，安徽省委改组。新任省委书记李葆华上任后，即着手纠正「责任田」。1962 年 3 月 20 日，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承认责任田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是错误的」，「是迎合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办法」，其「严重恶果」是「出现了严重的单干倾向」；「产生两极分化的苗头」；「削弱和

瓦解了集体经济」；「影响国家征购和生活安排」；F 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对基层组织起了腐蚀和瓦解的作用」；并说「这个错误的责任，完全应当由以曾希圣同志为中心的省委来承担。」省委的决议要求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在 1962 年内大部分改过来，其余部分在 1963 年内改过来。

参见《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曾希圣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曾希圣传》，页 508）。

第四章包产到户：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个症结

这裏还有一个插曲。1961 年秋，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受毛泽东的委托，到安徽、河南考察。胡考察归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关键部分讲到责任田。胡断言：责任田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胡说「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的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并不否认这个事实，一棍子打死」。「但是，这种做法已经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系列的危¹险：1、会发生不等价换工，从而产生剥削；2、违反简单协作优于单干的原理，从而降低生产效率；3、大家既然对集体生产不关心，就不可能发展扩大再生产的能力；4、集体观念淡漠下去，集体组织也会瘫痪。总起来说，这种做法发展下去，最后会引导到降低整个社会生产水平。」²无须说，即使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思想行为就显现出开放气度的胡耀邦，也是不赞成责任田的，并且言语甚重。他的「一种起过作用当具有危险性的做法」的话，颇像人们形容罌粟花：好看但极其危险。《曾希圣传》的作者接着披露，二十一年后，1982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1 日，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再次来到安徽视察工作。在谈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时，胡耀邦说：从历史情况来说，在 1960 年以后，党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³是先知先觉者。当时主张改革 1956 年后农业长期推行的办法。他还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我这次来安徽是来还债的。胡接着称赞了曾希圣，认为曾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其实，「还债」和「先驱」，两个词在这裏都「过」了。责任田引起灾祸，根本上责任不在

胡耀邦，毛泽东那裹首先就无法通过，党内大部分人也是起而共讨之。而把曾希圣看作农村改革的「先驱」，有一定道理。曾是省一级大员，可以推行

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页 502 。

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页 502 — 503 。

〈有关「责任田」办法的文件汇编〉，转引自《曾希圣传》〈有关「责任田」办法的文件汇编〉，转引自〈曾希圣传〉

T, 、计骗 7、' j, 辞黜 J '刁? 谬 '摊》 '工 JU '么 7VJI 自己的主张。但是，比曾看得远和做得早的却大有其人。

石面) 心 p, J) 尺" J 邓子恢在这

个问题上的立场比曾要坚定得多。而那些位虽卑却为「责任田」奔走呼号、冒死进谏的人，更值得人们景仰。特别是，农民自己是土地的主人，更是共和国农村建设的主体，他们从没有放弃改变现状的希望。1960 年代初，赞成和实行「包产到户」比较突出的地方，还有广西省。1962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原小队）后，广西各县在训练干部的会议上，「暴露出很大一部分农村公社以下干部，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思想。一般占到会干部总数的 25 % 左右，r 五风 j 和受灾减产严重的地区，占 60 %。「龙胜县共有 1867 个生产队，其中 790 个（占 42 . 3 % ）已经包产到户。」中共广西省监委和中共中央监委都批评这是「闹单干」与公共食堂一哄而散的情形相反，1962 年春的纠正「包产到户」却很困难，许多农民不愿意改，有的明改暗不改，形成顶牛。农民的反弹如此强烈是官员们没有想到的！这种客观存在的矛盾，引起了党内的一番大讨论，同情和支持农民的舆论骤然兴起。安徽省太湖县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能让，挺身而出，直接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洋洋万言，力保责任田，反对省委 3 月 20 日关于改正责任田的决议。他不会不知道，省委这样做，正是贯彻中央的精神。但他仍以为民请命之责，不惜冒险力陈。钱能让写道：「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想作一保荐，不过与省委常委 1962 年 3 月 20 日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是相违背的。尽管如此，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

《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J 1961 年 3 月，太湖县 900 / 0 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真所谓它的一出现’，就以它的显著的生命力吸引了人们（包括邻县邻省边界地区）广泛注意，迄今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尽管有人责难它『糟了』『错了』，然而广大农民群早总认为是『好了』『对了』。记得去年春，我在执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我十多年来（除土改外）的第一次见

矛盾不巴产；jJ 尸：中国社会工义初期的一个症结

闻。」「推行这一办法的结果，现在可以肯定地说，19 以年是太湖人民在精神上、物资（质）上的一个新的根本性的转折· 荒、逃、病、死，一瞬而基本变成熟（荒地变成了熟地）、健（体质健康了）、生（妇女怀孕了，江塘公社甘岭大队 558 个人，1962 年怀孕的就有 60 个妇女）」。「迅速转变，究竟是甚么力量呢？拿农民的话说『就是责任田好』。」

钱能让举了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太湖县徐桥实行了责任田，附近的宿松县没有实行。徐桥嫁到宿松县的姑娘们三五天跑回娘家一趟，为的是多吃几餐饱饭，回去还带些粮食走。做母亲的叹息道：「你们宿松县不实行责任田，真急人。」钱能让回顾历史说：「从办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形式的每一次调整）没有那一次不都说是适应。现在看来，其实并非如此。j 1955 年是太湖解放后农业生产力和群众生活水平最高的一年。之所以如此，除了国家对农民的支持外，「主要是有了土改后的连续三四年农民积极性所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和初级社的生产关系还相适应的原因所致。」而现在的「责任田」，「它比 1955 年的初级社来说，其优越性可不言而喻，就是比起高级社来，它在制度上是更加合理，更加完备了· 是具体贯彻『按劳分配』一个新的发展和进步。」他认为，多年来农业上的问题「主要就是责任没有到人」。钱能让极不赞成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的决定，他写道：「急急忙忙的收回责任田，吵吵闹闹的指责是『单干』，很可能因为一部分是好心同志不知底裹）一部分还是以『本本主义』的观点害怕农民不跟我

们走。可是农民还是赞成责任田，无论下乡也好，出差在轮船码头等车休息也好，许多农民有关责任田这方面的道理，与我在省裏听到的和文件上看到的道理，则完全相反。许多奇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有不赞成『责任田』的各种议论，我想请到这裏一闻一见，是会有很大教益的。我很担心，省委决议1962年内就要大部分改过来。根据这裏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他不会相信空话的，你做不出样子，证明比他的办法优越，除掉强迫命令，我看是扭不过来。]

1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80%以上，甚至于占90%以上。站在90%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义吧！怕80%甚至90%以上的不跟我们走，这恐怕也不能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90%以上的人民大众的道理呢？」最后，钱能让请求毛泽东直接派人前来调查，弄清是非。他甚至说：「像荒、逃、饿、病、死一字不漏的太湖县能够在一年内而且还是在那样大旱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吃的问题，那么其它有类似情况的地区也未始不可试行这个办法。」希望把安徽的「责任田」推向其它省市。即使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人们也不得不钦佩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勇气。他真是一个在政治上有坚定信念的「单干理论家」

事实上，在责任田问题上为民代言的，远不仅钱能让一人。当时，政策限制与农民的愿望相抵触，与实际情况相背离。能增产的办法，上面说是资本主义，不让搞；不利生产的办法，上面说是社会主义，压着搞，农民想不通，许多干部也想不通。一些有血性、有头脑又不知深浅的小人物，也对人民公社提出了挑战。

1961年初冬，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接到一封信件，长达一万余字，每一句都在述说包产到户的的必要以及它的好处。作者请求他把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还在信的最后写道：「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有人讲我这样下去很危险，一斗、二斗把自己的脑袋斗下去。我回答说，这是你们的说法，是你们的观点方法问题。我斗得对，我很站得住脚。」这简直就是包产到户的宣言书！马寅初与写

信人素昧平生。但从信封上知道，这个人是浙江省嵊县人，他的同乡，名叫杨木水，乡下年轻的蚕桑技术员。他把他的「宣言书」寄给马寅初的唯一动机，是他觉得他这位品学兼修的同乡有着上达民声的热情和威望。但杨木水哪裏知道，这时的马寅初，远非从前。自从毛泽东指责他的限制人口的理论，质问说这是马克思的还是马尔萨斯的以后，他的处境艰难，何能上达民声。不过，马寅初的举动超乎杨木水的意料。他居然专程回乡去面晤杨木水。当他把杨木水邀进自己的房间之后，县委的官员们就惊慌不安起来，不断

个届个日个月个个个澜二届个个写烟缠

第四章包产到户：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个症结

派出政府的代表前去敲门，希望加入进去，以此来阻止这一老一少的推心置腹。这令马老先生极为震怒，他拒绝任何人的参与，直到帮助杨木水把包产到户的「宣言书」修改一遍才开门出来。分手之时两位刚刚结成忘年之交的朋友面面相觑。老的说「正确的意见不要轻易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小的想说甚么却甚么也没有说，后来他对女友说：「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被捕判刑，坐牢流放。我们分道扬镳吧。」

我们不需要知道这封包产到户「宣言书」是如何处置的。这已经足够了，从这段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著名学者的风骨和一个无名小辈的血性。

1962年4月21日，一个名叫冯志来的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完成了他的文章，题为〈半社会主义论〉。文章劈头就问：「甚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包产到户！」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这是单干」，他嘲笑那些把「单干等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人」，「难道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人民公社：「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真是荒唐透顶。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冯志来凑了一百六十元钱，搭上一列火车去了北京，把他的文章送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又送了两份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政治局的注意，可是没人理睬他。回到家裏，冯志

来再接再厉，用了两个月，又写出一篇，叫做〈怎么办？〉的长文，说是为了补充他的那篇〈半社会主义论〉。他的新作是一篇讨伐人民公社的檄文，他笔锋犀利地直指农村裹的悲惨局面。他在文中仰天长问：「错在哪裏？」人们都说是天灾造成的，可是「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左』的错误……异想天开、创造狂、虚假浮夸，都得到鼓励，在高速的口号下，残酷地剥夺农民。大跃进变成大倒退，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也许，他真的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知道这将给自己带来甚么样的后果；也许，他真的是不顾一切。1958年他因为口没遮甲平人氏共和国史·第五威（1962—196刃—历史的变向拦而被开除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他大哭了一场。这一次他的心理准备要充分得多了。

上次赴京送文章，竟无人理睬，他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这一次把文章投递北京的时候，他借名人效应，自称自己是冯雪峰的族侄。果然如他所愿，北京的回信来了，可不是写给他的，而是写给当地党的机关，要他们追查作者的后台是不是冯雪峰。这差点给冯雪峰又罪加一等，冯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

然而，《人民日报》那时候收到的信，不仅仅是冯志来一个人写的。另外一个人，陈新宇，写得甚至更多。此人原在城裹务商，因为向往人民公社的美好蓝图，高喊着「我爱农村」，就参加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队伍。结果他看到农民对于公社根本没有兴趣，却对包产到户一往情深，就一气写了八封信，全部寄到《人民日报》。他告诉报纸编辑，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现在坚决主张包产到户」。这一回编辑居然大动侧隐之心，将他八封信中的六封刊登在一个叫做《读者来信》的不公开的刊物上，并且加上了一个标题：〈重谈包产到户〉。陈新宇说他「确信包产到户是终将出现的必然的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像冯志来一样，他闭门拒友，坚持独身，打算一人做事一人当。

7月中旬，陈新宇接到了报社寄来的稿费，共计二十五元五角。他将稿费买来一大堆桃子分给同事，一时问他的周围竟有了笑声。他哪裹

知道，就在这时，风云突变。事情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指着浙江省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口气之严厉，令人蓦然。如果说，上述几个敢于「冒天下大不韪」的人，都来自浙江和安徽这样比较富庶的省份，他们通常被认为头脑灵活，捕捉政策信息灵便，那么，再倾听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北农民的呼喊，则映照出责任田所代表的更原始的生命意义。〈一叶知秋〉（又名〈当前形势怀感〉），陕北户县农民杨伟明发自内心带血的文字，曾经惊动了中共领导高层。据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这篇文章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矛盾早巴座钊尸：甲国社言王我初朋的一恼妆结

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让毛泽东提议反击的东西，或者说所谓「知秋」和「知冬」的到底是甚么呢？翻看杨伟名的遗稿，我们会发现，他真有点大不敬！杨竟然这样说，要有1947年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的胆魄，纠正所犯错误，改弦易辙。杨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可知的事实，用不看连篇累牍地再进行分析了。」“杨认为：「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快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探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在〈当前形势怀感〉中，杨伟名专门写了一节「恢复单干」。他是农民，他的感觉和看法是从真正的「草根」中来的：「近年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单干』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他是目前农民群罕单干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比

较妥当的。如果目前农村群众在思想上有的存在看恢复单干的愿望，那么他们所希望恢复单干是否就是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呢？就目前群单的认识水平和交谈情况来看，多半数『是』，少半数『不是』。

J ‘杨伟

杨伟名：《一叶知秋— 杨伟名文存：学文献出版社，2004 ），页 1 — 2 。杨伟名：《一叶知秋— 杨伟名文存》 杨伟名：《一叶知秋— 杨伟名文存》 杨伟名：《一叶知秋— 杨伟名文存》

一位民间思想家的悲情记录》（北京：社会科，页 2 。，页 2 — 3 。，页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五专（1962 — 1965 ） — 历史的变局

名分析认为，少数的持「不是」态度的人的看法比较合理，即不回到合作化之前的土地所有关系是可行的。这种土地所有关系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他说：「目前有不少的人在认识上觉得现在再要恢复单干，就不必恢复合作化以前那样的单干，而是以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出现。这种单干，其所以有别于合作化之前的那种单干，正是因为，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如果仔细琢磨）杨伟名四十多年前所构筑的理想农村土地关系，其实同 1970 年代末在安徽首先出现的「大包干」很是相似，只是它更带灵活性：是土地而不是地权被分于农民；农民可在土地上通过劳动发家致富，同时也废止了剥削。杨伟名说：「『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意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因皆出于个人自愿，生产会搞好的。如在合作化时虽说『人社自愿』，实际多为『大势所趋』，现在探取自愿，正是补救了过去的不自愿。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¹⁰ 老杨看得真准！他算是把准了农民的脉，找到了解决农村问题的钥匙：农民没有可靠的土地关系，自然没有生产积极性。由此出发找合适的农业生产形式，才是解决农业凋敝的正确路径。更可贵的是，老杨并不是一个蛮干者和不负责任的批评者。他在文章中给共产党留足了「面子」：r 有人虑及分田到户于国际视听有碍。其实人民公社依旧保留，分田到户（农民）

仍归公社领导，为公社社员。至于集体与单干之间的领导关系——单干到户，归队领导，还是归公社领导，可以另行研究。」¹¹按老杨的设想，如果真以「彻出延安的精神」，认真对待「过」和「退」，以「养鸡取蛋」而不是「杀鸡取蛋」的方法，农村调整是可以成功的。当然，没有一个领导人会按老杨的意见做。

9 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6。10 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7。11 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7。

第四章包产到户：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个症结

于是，老杨面前的路注定遍布荆棘。随着《一叶知秋》为毛泽东否定，他自己也就陷入了政治麻烦之中。1962年后，老杨被免去生产队会计。「文革」中，他难逃重劫，于1968年遭批斗迫害。当年即因不堪忍受折磨，服毒自尽，终年四十六岁。

二「河北有个胡开明」

毛泽东在1962年8月6日的北戴河会议上说：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愈到上层愈大。9日，在会议中心小组上他又说：河北有个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了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作为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属于那些「愈到上层愈大」的「闹单干」的代表者之一。经毛泽东点名，他成了中共党内的知名人物，影响甚至延续了几十年。

胡开明是何许人，为甚么能得到毛泽东的特别「垂青」？打开历史数据，我们终于可以得知，胡开明是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干部，是真正有骨气为民请命而大智无私的省级领导人之一。胡开明生于1913年，浙江乐清人。十六岁加入抗日组织反帝大同盟。1933年考入北平国立东北大学经济系，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任东北大学救亡会常委、东北大学出席北平市学联的代表。在「一二·九运动」中，他被国民党宪兵团逮捕。胡于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进入延安在抗大学习。抗战中，胡在晋察冀根据地任职。1949年后，先后在察哈尔、河北省任党政负责人。1954年起任

河北省副省长。1962年，胡开明调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8月，12（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7月—1963年12月），页403'4] 70

T 中'、式J 弋和驯叉' 矛 J1 巷 1lyb 乙一1 梦 0 》) — 卢叉 叩丈利

连续两次上书毛泽东，主张在农村实行「三包」到组的责任制。9月，开始遭到批判。r 文革」后得到平反。1978年出任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同所有中共干部一样，胡开明在1958年也对「总路线」充满了信心。当年6月，他曾在天津大学作过一次长篇报告。报告说：「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为了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省近期的任务是要建立起以农业技术改造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实现『四化』、『三网』，即实现水利灌溉机械化，农业耕作机械化，交通运输机械化，化肥普及化；建立机械网、电力网、交通网，并在一些主要工业生产部门采用国内外最新的技术成就和现代化设备】生产新的高级产品。」他在报告中认为，按照当时中国钢、发电、原煤等主要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粗略估计「三年就可以赶上英国，七年就可以赶上美国。」¹³ 这个论调虽然比较「冒」，但在当时并不算特别「突出」。那时，大家一样都被「跃进」理想所愚弄。

后来胡开明对人说，如果不去张家口主持一个地方的工作，也是不会发现基层和百姓中的真情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因认同彭德怀信的观点而被撤职。当时带领工作组在张家口指导整风反右倾的胡开明，由此提出到张家口主持工作的要求。当年底，中共中央批准，胡开明出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1961年5月，张家口市委改为地委后，胡也改任地委第一书记，同时仍为河北省常委）。作为地方长官，胡开明首次到基层视察便来到张北县。张北县在「大跃进」中被称为河北粮食高产「元帅县」j。但胡在当地看到，农民家庭是「每人四颗土豆，一锅酸溜溜（酸柳果，即沙棘）汤，人们一口汤、一口土豆地吃着『饭』」J。可是¹ 据报告说，张北县粮食平均亩产410斤，创造过历史记录。事实上，张北位于内蒙古

高原南绿，平均海拔 1500 多米，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气候干燥，风多雨 13 引自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 143。

一■ ‘，州· 1 . ’ ‘由一，’

少，十年九旱，无霜期极短。1949 年时，张北县平均亩产只有 55 斤。解放后虽有发展，亩产也只有 100 斤左右“但在「大跃进」中，受「放卫星」的影脣，张北县提出 r 实现亩产 400 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口号。为实现这个「牛皮」，人们曾想到要用肉扬追肥，于是打狗、杀猫、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找毛毛虫，以为肉扬原料。甚至还将 44000 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实验田裏。但到收成之日，张北县的亩产仍然只有 110 斤。可当年被吹出去的「神话」，却肯定全县 9 万亩粮食作物平均亩产 412 斤，并放出一颗亩产彼麦 3012 斤的「卫星」。高指标和浮夸必定引来高征购。老百姓受放「卫星 j 之累，才不得不以土豆度日。’ 4

当时，整个张家口地区形势也非常严峻。从 1959 年到 1961 年，张家口地区连遇自然灾害。风、旱、雹、水· 病虫五害并来，使 600 / 0 以上的耕地严重成灾。受灾人口占全地区的 54 . 110 / 0 ’ ’ 5 对胡开明说来，人民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本书前面曾提到过饥饿中老百姓的极端例子。这些例子就来自张家口，是胡开明所亲见的。当时，张家口某地的人们已经对中毒失去了感觉。他们为使肚裏有食，竟然去扒伴上了农药的麦种充饥；而完全没有营养成份的代食品，食后让人腹胀难挨，呕吐不止。胡开明虽然想尽一切办法，比如开仓秘密放上缴粮、解散公共食堂等，都不能救民于水火。宣化市 1960 年实行每人每天四两粮定量后，平均每月死亡人口达到了一千多人。16 胡开明认为，要渡过这一巨大的困难，根本办法还是要把生产搞上去。从历史上看，从互助组到合作化这一段，生产是上升的。但到高级社时，生产就开始下降。胡开明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估计过快。这几年农业减产，总是说有天灾，具体到局部地区，没有天灾也减了产，这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搞过了头。17

14 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页 148 — 150’ 15 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页 156 。16 贾文平：《真

理与命运— 胡开明传略》 ， 页 163 。 17 贾文平：《 真理与命运— 胡开明传略》 ， 页 17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五卷（1962 — 1966 年）— 历史的变局
用老百姓的说法，是「乔武举的毛驴，有人骑没人喂」。胡开明经过同干部群众反复酝酿、讨论，一致认为，「三包一奖」制（指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励）存在问题很多，「春定夏变秋不算，很难实现和兑现」。只有以小队（即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于是，胡开明亲自起草了〈关于郭垒庄分配大包干的调查报告〉。报告提出：「『三包一奖』制一遇自然灾害就不能兑现，更难分清天灾和人为减产各占多大比重，而且『三包一奖』制手续复杂，讲不清，算不清。由大队统一核算，避免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不利调动社员和小队积极性。报告主张，以「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实际上就是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¹」这比毛泽东正式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要早了几个月。

但胡开明并未止步，他还要再冒「退」一步的风险。不久，他提出了实行「三包到组」的建议。这样，他就「挑」出了一个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大题目。

在张家口市郊区的孤石大队，胡开明看到一片长得格外喜人的蔬菜。队干部告诉他，作业组是自愿结合的，菜地包到组，工分、产量也包到组，叫做「三包」到组。现在人们出工早了，收工晚了，干活细了，上粪多了。与相邻的大队菜地相比，蔬菜长势完全两个样子。胡开明认识到，「三包」到组有如下好处：首先，户数少了，与社员利益更直接；其次，一组内的社员便于互相谅解、互相监督、自觉劳动；第三，劳动力好支配，农活好安排；第四，干部参加劳动多了，偷不了懒。这个办法，比起生产队核算来，鞋子又「小了两号」。于是，胡开明建议在全地区推广。后来，经平反回到张家口的原市委第一书记葛歙等人，又建议在严重困难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但胡开明没有同意。他仍然坚持认为，「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最适合当时的农村生产力发展。

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页179。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页153。

第四章包产到户：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个症结

19 胡

准农在

1962年7月，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在北戴河召开。行前，备材料时，胡的夫人李克林对胡说“「在工业上可以搞小组核算，农业上怎么不可以搞？毛主席说要『五不怕』（即指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们革命、工作了几十年，怕甚么？」²⁰胡开明非常同意夫人的意见。在他当时写的〈要如·实反映情况〉一文中，他表示：要实事求是，必须如实反映情况。如实反映情况是实事求是的第一步。如实向党反映情况，讲老实话，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是衡量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第一个标准，是党员党性是否纯正的具体表现。共产党员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从来都不怕流血和杀头，难道还能够为了一些个人利益得失而不向党讲真情实话吗？²¹胡开明的这些「豪言壮语」，表现了他高贵的个人质量和共产党员气节。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共党内讲真话的压力极大。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说过，光讲五不怕不行，关键还是要讲党内民主，被国民党杀头可以，但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

1962年8月8日，胡开明向毛泽东上书，推荐农业生产责任制度。这份上书题为〈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建议提出，目前农村劳动管理制度非改不可。平均主义的计酬方式必然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非改不可的了。建议论及了「三包」到组的七大好处，即，第一，由于生产单位小了，生产组有了超产部分的分配权，集体的利益和社员的利益就更为直接了，所以社员都能「掏出真心干」，力争多超产；第二，解决了组与组之间评工记分标准不统一的矛盾；第三，小组人数少，便于监督；第四，自愿结合，心同意合，可互相帮助；第五，由于户数少，便于实行民主管理，灵活安排农活；第六，减少了干部误工补贴；第七，小组成员固定，地段固定，同时实行「三包」合同长期不变，有利生产。建议还针对反对

20 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页 194。21 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页 194—197。

意见进行了辩白。其中争论说，如果说现在生产队对生产组实行「三包」，是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组了，那么，过去大队对生产队也实行「三包」，为甚么还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呢？显然，「三包」到组，基本核算单位还是生产队。有人说，小组包产以后，又有一部分分配权，不好。我认为好。因为小组有了超产部分的分配权，他们就力争超产了；他们愈力争超产，完成包产和完成国家征购就愈有保证。同时，小组分得这种超额报酬，也属于多劳多得部分，是完全合理的。这样做，一点也影响不了生产队的统一分配计划。22 8 月 18 日，胡开明又第二次上书毛泽东，所附材料为〈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这个材料的主导思想是：在生产数据都归公之后，在大家口粮分配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按劳分配是不行的。胡开明认为，应该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办法，而废除目前农村普遍实行的「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胡开明解释说：实行「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暂时看来，物质刺激作用似乎不如「按劳分配加照顾」来得强烈。但它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比较全面做到「既调动了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确实保证了人多劳少的困难户和农村非农业人口的一般口粮标准」。因为，它在口粮较低的情况下，首先保证了全民的基本口粮，维持了正常的社会劳动，但同时这种基本口粮又仅仅是保命的最低需要，要想生活好，还必须依靠多劳多得。23 简单说，胡的这个意见，就是要在现行的农村分配制度中，加大农村按劳分配的比重，减少人为「照顾」的因素。毛泽东在接到胡开明第一个材料后于 16 日批了一句话：「印发各同志讨论。」态度十分暧昧。可在 8 月 9 日，也就是胡开明上书的第二天，毛在中心组会上就讲了上述那段「河北有个胡开明」的著名的话。今天看来，胡企图以讲道理的方式来说服毛泽东，实行「包产」

22 胡开明：〈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运—胡开明传略》，页 301—309。

23 胡开明：〈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建议〉，载贾文平：田各），页 310—316。

载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
刁”，作，（斗’烽·斗间j’T闷平‘实‘1刁凡剧j州n斋
V—1剧舛民斗届

责任制，对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确有很大的好处。但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全党必须从政治方面看待生产责任制。他明确发出信息，党内有一批人「在困难时期顶不住，支持单干）已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其表现形式就是农村生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显然，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道理可讲了。

此后，胡开明只有做检讨的「份」。在「文革」中，由于有毛泽东对他的这番奚落和批判，使他更是如堕入「万丈深渊」。直到1981年，胡的这一「反革命集团案」才得到彻底平反。历史嘲弄人也非常眷顾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半年，胡开明被任命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在那裹一干五年半，为安徽的农村改革继续「鼓与呼」了六十六个月。由于这样的原因，胡开明的名字不能不同揭开中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序幕以及由此引发出的一场大争论相始终。

三风起高墙

高处不胜寒。

1962年，关于农村生产制度的争论，最终集中在中央高层中。因此真正的暴风雨还在「天端」

在中央高层的争论中，田家英扮演了特殊角色。田家英任毛泽东秘书十几年。他本来探谳毛泽东的心理，对包产到户同样持反对态度。可是，一个契机使他政治态度发生了改变。他最后竟成为点燃两个主席之间冲突导火索的人。

1962年2月25日，毛泽东把田家英叫去杭州。要田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韶山等地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毛泽东给田家英指出了四个调查地点：湘潭的韶山（毛的家乡）、湘乡的唐家沱（毛的外祖父家）、宁乡的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1961年3、4月问蹲点的地方）。他特别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甚么指示，他那裹有甚么人要参加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5）—历史的变局

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除了表示同意外，还很关心调查组，说湖南3月份天气还很冷，可以向省委借些棉大衣给大家穿。田家英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调查组。

3月22日，在武昌东湖招待所，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在座。毛先是一个一个地问每个人的名字，接着讲了一些当时流传的政治笑话，谈笑风生。一到外地，毛泽东的心情就变得好起来。

最后，毛泽东向调查组提了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裹不要带东西（指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毛泽东当时亲切、温和而又轻松的谈话情景，至今还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参加调查组的逢先知回忆说。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寄予厚望。有了前次成功的浙江调查，他相信田家英领导的这次调查同样会给他很大的帮助。毛所希望得到的结论：一是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二是如何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此时，他对不少地方仍在搞包产到户已有所耳闻。

田家英的心情是愉快的，一则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一则与毛泽东的观点又一致了。他把这次调查的重点放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这个问题上。当时，陈云正在组织人力调查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这也是全党各级组织都在研究的一个题目。田计划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为中央起草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

3月底，调查组全部到达农村。分兵三路，一路去韶山大队，一路去大坪大队（唐家培）、一路去炭子冲大队。天华大队没有去。田住在韶山。田家英一行一进村，遇到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炭子冲好一些，据说这是因为#1J 少奇1961年回家乡时曾批评过包产到户。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调查组其它人也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公社化以来

第四幸包产到户：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个症结

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有时同调查组的同志辩论到深夜。田家英本不赞成包产到户，大家还记得上年3月他含泪给毛泽东写信反对包产到户的事。然而，时隔一年，经过一段调查，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他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调查组内也有人主张包产到户。田组织全体组员讨论，鼓励畅所欲言，双方争论非常激烈，而又都心平气和。田认真听取双方阐述的理由。当时不主张包产到户的意见占上风，但他仍鼓励少数几个人继续研究。此时，田家英内心陷入了矛盾。从实际看，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对恢复生产有利。但兹事体大，不能轻举妄动，特别是在此地更应谨慎。此地一动，势必影响全省。因此，尽管私下裹已萌生赞成包产到户的想法，在公开场合，对农民和干部的要求丝毫不松口。田家英就是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同逢先知一起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的。当时，陈云也在上海）他们将三个点的调查报告同时送给毛、陈两人。所得到的反应迥然不同。陈云读后很称赞，说「观点鲜明」。在这之前，田已将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寄给了刘少奇，刘认真地看了，认为很好。毛泽东却很冷漠，大概没有看，只听了田的口头汇报。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在上海期间，杨尚昆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田家英当即表示同意。田家英从上海回到韶山，调查工作已接近尾声。田没有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此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呈现迅速发展之势，推行包产到户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田家英派出两人立即赶往安徽无为县，了解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他们调查的结论大致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已经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的和有必要的；但是，将来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就可能要受到限制。

调查组回到北京已经是6月底。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打断了。刘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

啊 F '、夕、中实叮”州) ‘一众 j 工月姿 k1 》 D 必一 170)] —
左亡叉门女 j]

看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田家英问。刘少奇说：「可以。」稍顿，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 r 秀才」中问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嘱咐田不要说是他的意见。

离开刘少奇处，紧接着田家英又向邓小平报告关于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设想。邓的话不多，很干脆：「赞成。」田家英立即组织起草班子。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此同时，田家英还向其它几位中央领导人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一致赞同。表面看，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原来，此时北京已对包产到户问题有广泛议论。中央常委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包产到户。不过中央是否确定推行包产到户，关键就看毛泽东的态度了。

此时，中共党内另一位农村问题专家邓子恢，也正为积极推行包产到户而奔走。邓子恢是老资格共产党人。他可以说是福建地区中共党的领导人。建国后，邓曾在中南局任主要职务，后改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5 年因为就集体化速度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争论，曾是毛泽东要拿大炮轰的人物。从这一点说，邓在政治上绝对是个敏感之人。七千人大会上，安徽的「责任田」虽受到批判，但广西、湖南、河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农村分田到户的讯息不断传来，邓子恢急于了解农村的情况，在同廖鲁言、陈正人、王观澜商量之后，再带一个工作组去南方。

2 月中旬离开北京后，他们首先到了湖南长沙。在了解到湖南省一部分生产队于 1961 年春耕时出现「单干风」，秋收时再次兴起，1962 年春又一次出现的情况后，邓慨叹，连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刘少' 奇的家乡宁乡，社员要求 [分田到户 j 的呼声也如此高。同时他也得知，湖南省委不主张分田到户，正在着手研究解决改进生产经营管理、健全责任制的问题。

’ . j / . ’ ’ ’ , 唱 F 用’ 计~啊’ ‘• 哺、r , ’ 乍缠一矿
接着邓子恢等到了广西南宁。在武鸣县,他深入到一些公社,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座谈。在座谈中同干部讨论的问题有: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牲畜分户喂养,生下幼畜,三条腿归户,一条腿归集体三自留地、开荒地增加到总耕面积的 15 %— 200 / 0 等等》大家乐哈哈赞成。他听取了广西自治区党委领导人的汇报“很大一部分农村,公社以下干部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思想倾向,有不少生产队已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龙胜县 500 / 0 多的生产队已经包产到户。为了防止滑向包产到户,自治区党委提倡实行临时作业组。谈到龙胜县的包产到户,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感到压力很大。邓子恢体谅他们的心情,说:「你就让他们单干,怕甚么,先把 400 / 0 多的集体经济搞好,其它 50 %多的慢慢来,当然也不要公开承认他们单干。」听了这些话,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如释重负。他们请邓子恢向机关厅局以上干部作了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报告中,他集中地论述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他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优缺点做了比较。他提出,现在就是把集体和个体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如何结合?他说:其形式与方式就是在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下,全面推行和建立包工、包产和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这裏虽然还没有点出包产到户,但它的精神已有了,只差一层薄纸没有捅破。邓子恢总是把包产到户与单干区分开。单干,邓子恢一向不主张,这同杨伟名的看法有相同也有出人。邓自己说:r 这次回龙岩,有些老同志偷偷地对我说:『子恢同志,最好是单干!』我说:r 我们党不主张单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水淹田,火烧屋,生老病死,就会垮下去,单干是长久不了的,组织起来才天长地久。」邓子恢这样说。

邓子恢到南宁,任务之一是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会后,他同老战友张云逸一起来到桂林。桂林地委的领导人向他们汇报说:龙胜县有许多生产队「包产到户」了。听了地委的汇报,邓子恢和张云逸一起来到龙胜县。龙胜是个山区,侗、苗、瑶、壮、汉多民族聚居,地少山多,居住分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迫使龙胜人民不顾客观条件,放弃以林为主的生产方针,实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加上高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压史的变局

标，高征购，群众生产生活极端困苦，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许多生产队从1961年冬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到1962年春上扩展到了半个县。县委急得不得了，部署扭转，但收效甚微。县社的干部忧心忡忡，愁眉不展。邓子恢告诉他们：解决包产到户问题，要从有利生产，有利团结出发，要实事求是。可以包工到组，也可以包产到组，小村独户的也可以包产到户，不要怕说右倾，不要怕说单干。包产到户实际上并不是单干。

离开桂林，邓子恢与张云逸分手，直奔河南。首先到信阳看望中央农村工作部下放的干部。干部们向他反映：信阳地区生产凋敝、群众困苦。群众为了活命，要求借地种点红薯。可这儿的领导干部都在等上边的指示。「真是作孽！」邓子恢气愤地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邓子恢来到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向他汇报了河南实行借地度荒的情况。豫北、豫东相当一部分地区，土地盐碱化严重发展，农业生产破坏很厉害，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农民纷纷破产度荒，拿衣服和家具到邻省换粮食；生产秩序不稳定，人口大量外流；正常生产一时搞不起来。因此，经中南局同意，决定借给农民一部分土地，给一把铁掀，发一点种子，让他们在集体的领导下生产自救。农民说这个办法是「救命政策」、「拴人政策」。邓子恢认为这个办法好，表示支持。

回北京的路上，在石家庄稍事停留，邓子恢请来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听了河北农村情况的汇报。回京后，他参加了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上就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作了发言。他认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要着重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明确的分工合作，以提高社员的责任心；山区分散，三五户小村庄，农民不要集体，就让他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完成上缴任务，有甚么不好。对邓子恢提出的这些问题，会议上没有做出决定。刘少奇说：「邓子恢同志讲的这些问题，以后再讨论。」毛泽东不在北京，没有摸清毛的态度，是不可能作出决定的。

第四章包产到户：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个症结

为了让毛泽东了解当前农村的情况和问题，并支持解决这些问题，邓子恢把他在会议上讲的问题，写成报告，于5月24日送给了毛泽东，也送给了中央。

正在这时，各地有关包产到户的信函和材料源源不断地递到邓子恢手裏。福建龙岩县委书记李根发来信，告诉他江山公社出现了单干，县委正在纠正。他立即回信，提出要分析单干的原因。建议派得力干部去帮助江山公社搞好一两个生产队，作为示范；有些三五户的小山庄，可允许包产到户；河南借地二三分种红薯的办法，可以仿行。农民的渴望、各地干部的企求、自己的亲身调查，使邓子恢得出一个清醒的结论：包产到户或「责任田」是农民度荒、求生的一条出路。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为民代言，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6、7月间，他应邀先后到军委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直属机关下放干部大会、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主要讲发展农业生产问题和巩固集体经济问题。他痛心地说，大跃进以来，农业连年减产，农业生产力下降很多，1961年比之1957年，耕地减少2亿亩，大牲口减少1/4以上，农具减少40%，土地盐碱化扩大，山林破坏相当严重，农业劳动力减少2000万个。他说，有天老爷同我们作对，但主要还是我们工作上的毛病。所有制变动大，分配上平均主义，生产上瞎指挥，经营管理没搞好，干部特殊化，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他详细比较了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优缺点，结论是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于个体经济优越性，但是，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现在全国有20%的生产队单干。怎样巩固集体经济？他主张首先要固定所有制；要贯彻按劳分配政策；要纠正干部特殊化作风三要发展小私有；要稳定征购任务，派购要等价交换；要恢复供销社，开放自由市场。其次要搞好生产队的经营管理。现在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并没有搞出一套。下边反映，现在只是「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大锅饭」变成了「小锅饭」。怎么办？要向社员放权，建立生产责任制。必须包产，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凡是包产到户的，大田和自留地一样。不能把作为田

也有「责任田」问题；安徽省委改正「责任田」是毛泽东的意思。他感到问题棘手，过问吧，毛泽东面前怎么交待；不过问吧，下边的企盼要落空，与农民生死攸关的「责任田」要夭折。他不顾个人得失，下决心，振工作组去安徽调查「责任田」问题，由副部长王观澜带领。

调查当然是要说服中央书记处。6月16日，邓子恢看到了王观澜写的调查报告——〈安徽省当涂县责任田情况调查〉。报告说：当地百分之八十生产队的责任田做到了「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由于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与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奉邓子恢之命，工作组6月27日到了宿县，对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和城关区刘合大队进行了调查。7月18日向邓子恢写了两个大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情况调查报告。调查的结果与上次王观澜的调查一样，责任田做到了「五统一」。报告说：由于粮食显著增产，群众感到「包产到户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他们一再表示，我们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邓子恢愈想愈感到，安徽的责任田有「五统一」，不是单干；不但不是单干，而且正是搞好集体生产、防止单干的好办法。对安徽的责任田应重新评价。

邓子恢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说了一句著名而广受争议的话：「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探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会议结束前，刘少奇要求华东局转告安徽省委，对「责任田」不要下结论太早，可以由中南局搞一个包产到户的文件，将来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时再议。

事实上，刘少奇已经赞成「责任田」。7月7日，小平同志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的讲话中，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他说，关于包产到户，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甚么形式为

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一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 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 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

在关乎农村经济变化问题上，陈云是个重量级人物。1962 年春夏之交，陈云主要住在上海、杭州。他看了安徽「责任田」的材料和田家英湖南韶山调查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他打算向毛主席进言。显然，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政策，虽同意调整，进行局部改变，但并未放弃，如提出「包产到户」，顶料他是难以接受的。从以往的经验看，提出这类意见，政治风险很大。提出来，还是不提，实在是一个大难题。陈云决定尽快回京同中央常委商量，向毛泽东直接陈述。6 月 24 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位中央常委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一致。6 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后，也立即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讲了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赞同。7 月 6 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同时，田家英也下决'必，冒险以秘书身份向毛泽东进言。那时毛泽东正在河北合鄆视察，他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意见，那边传来电话说：「主席说不要看急嘛！」这句话明显有些不耐烦的情绪。

7 月 9 日，毛泽东从河北郡邓回到北京，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 30 % ，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 40 % ，另外 60 % 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第四幸包产到户：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个症结

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这种情况，同刘少奇性急地打断田家英的汇报，才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完全不同。最后，毛突然向田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田家英问住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他毫无准备。毛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它人的意见？」田没有说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商量过，只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当时，毛没有表示意见。没有表态，这就是一种态度。田家英从游泳池回来，情绪不好。他说：「主席真厉害。」意思是说，毛主席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使他当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7月6日下午4时，陈云前往毛泽东处谈话。谈话中，他阐述了个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的问题，认为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对于农村生产经营体制，他提出了性质更为尖锐的意见。他认为：应「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²⁴。在此之前，有同志劝陈云不必急于向毛泽东提自己的建议。但他回答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²⁵后来毛泽东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曾表示，他很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但陈云是中央常委，向中央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误。

到了第二天早上就传出，毛泽东认为陈云、田家英的建议是错误的，才良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120。

25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页1200

206 甲带入氏矢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到—压史的变荀

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这个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到后态度探沉、久久沉默不语。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但是,他顾全大局,对批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未作解释。

毛泽东对邓子恢、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他认为这就是「单干」)十分反感)对少奇、陈云、小平没有抵制甚至赞同,也不满意。9、10、11日连续三天下午,他分别把河南的刘建勋、耿其昌,山东的谭败龙,江西的刘俊秀召来北京商谈农村工作问题。针对各地出现「包产到户」,他提议以党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改由陈伯达主持,不让田家英参与其事。毛泽东批评说:「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甚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邓子恢不会不知道毛泽东态度已然明朗,但他仍想说服毛泽东。7月17日,他应约去见毛泽东,向毛泽东谈了5月上旬向他报告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的内容,谈了符离集区委全体同志〈关于「责任田」汇报〉的内容,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的看法,明确说:「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不是单干;「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适应广大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毛泽东静静地听看,一言不发,只是在邓子恢起身要走时才说了一声:把你给我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很显然,毛泽东对邓子恢的主张十分不满。这时他已经准备对「单干风」发动进攻了。18日,邓子恢把毛泽东指名要两个材料送走之后,又叫工作组把两个大队实行「责任田」的情况调查报告,再认真加工一下,打印送毛主席。还叫人组织力量继续收集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整理成材料,供中央北戴河会议之用。

工作组的陈正人·王观澜、郝中士等部领导人,都劝他调查报告暂时不送了,中央北戴河会议快开了,看看情况再说。邓子恢很生气说:「『责任田』是于民有利的事情,等到北戴河开会,就晚了。于民有利,怕甚么!你们怕,我不怕,不怕丢乌纱帽!」7月22日把中央

第四常巴产到户：中国社会主义初期的一个状结

农村工作部工作组写的〈安徽省宿县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实行责任田的情况调查〉、〈安徽省宿县城关区刘合大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情况调查〉送给了毛泽东。这两个调查报告，后来成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参考」文件。

毛泽东态度明确以后，大家不能不跟着转变态度。7月18日，刘少奇在对下放干部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问题，批评包产到户，批评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干部「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7月17日文件初稿拿出，7月19、20日，由陈伯达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座谈关于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问题。大家异口同声，对包产到户取否定态度。柯庆施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刘澜涛发言介绍了西北局围绕「包产到户」展开争论的情况。陶铸、王任重曾到广西龙胜县调查座谈过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对他们的「座谈记录」评价甚高，认为「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的决定发下去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写出六十一篇讨论的「书面报告」，基调是批评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这一顺乎天意、应乎民愿的政策，由此再一次夭折。这一次顶牛，农民又失败了。一亿农民的包产到户沦为非法。真理又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人擦肩而过。当我们重新捡起包产到户这个法宝时，中国农民已在集体那口清汤寡水的「大锅」裹搅和了二十年。那些为民请命、敢冒风险的血性汉子，面临灭顶之灾。一场批判运动发动起来，据说受到牵连者多至四百万人。

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初期，否定责任田和包产到户，又似乎有它的不可避免性。那时，人们还搞不清社会主义到底该是甚么样子，更不懂得所谓「农业生物学原理」（杜润生先生语）。在毛泽东看来，责任田也好，包产到户也罢，都违背了几条基本的道理：其一，经过艰苦的调查和研究，大家终于达成一致，这就是〈农业六十条〉。六十条最核心的规定，就是以生产队作为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已经是不能再小的核算单位了，再退，就到了户。而退到以每户为核算单位，同合作化以前就没有了区别。因此，在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看来，六十条是底线，不能突破。否则，社会主义就白搞了！其二，形势有没有像一线领导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毛泽东对此一直深有怀疑。1962年，他两次到南方，其实就是要看形势到底怎样。他得出结论，情况决不像中央一线那些人估计得那么「黑暗」。他认为，这些人因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政治上就开始动摇。所以才有毛泽东对刘少奇所说：「我还没死，你就顶不住！着甚么急？」7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京两天后，在他住处召开的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样坏，他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²「这番话，在中央高层裹着实份量不轻。因为，不少地方大员们也不满意中央一线总把形势说得那么糟糕。刘少奇应该听得出来。回溯到七千人大会，不是柯庆施就说过：「报告」把形势说黑了，严重了，让人鼓不起干劲，「越看越没劲」等等。其三，毛泽东一言九鼎，没有人可以撼动，党内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环境：无论怎样，不能同毛泽东争论。前面提到的由刘少奇之子撰写的材料，说在游泳池刘同毛泽东有过争论，那些话形同「叫板」。其实，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做检讨说，毛主席一到北京，立刻让陈伯达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生产的决定〉，我就知道了主席的意思。事实上，刘少奇是很难同毛泽东进行争论的。从北戴河会议开始，刘少奇就不再有进一步的建言。这说明，党内并没有真正形成民主气氛。七千人大会讲民主集中制，只是停留在文件的文本之上。即使在中央领导核心，民主集中制也早已名存实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们为寻求自己的丰衣足食，在特定制度下，并不容易。他们必须经历种种磨难。今天，中国社会主义还在进行着相同的探索。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232。

第五章

调整风云

七千人大会后，经过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央一线领导人已经确立下「伤筋动骨」的调整目标。调整的范围与力度，超过了前此以往中共的任何一次努力。调整不仅包括农业、工业、精简城市人口等经济领域的大动作，也涉及到政治上许多非常忌讳的「禁区」。尽管从性质上说，即使做到了「伤筋动骨」，调整也并不是变革，更不是改革。它最多一种回归，即回复到比较持中、合理和宽松的政治状态中。例如，我们今天常常议论的党内民主，意识形态转型等，在那个时代都还没有发生。但是，调整毕竟做了一次重要尝试，即在客观上提供了某种政治转型的契机。其历史价值自然应予肯定。由调整引来的政治「反弹」，在调整进行中即不期而来。这是由于整体上的政治规则并没有改变。甚至，「反弹」力更超过了调整的作用力，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从历史过程看，从调整到「反弹」，是中共执政进程中的一次「政坛风云」。它多少增加二十世纪60年代前期中共历史的复杂性和可看性。

一 甄别平反与纠正错误

甄别平反，几乎是共产党执政国家的一个专有名词。无论在东方还是欧洲，无论是还存在的还是已经不存在的共产党，都曾频繁而广泛地使用这个词。从而，使这个词多少带有点悲剧的色彩。甄别，意为重新审查过去错误的定性；平反，是把错误的案件改正过来。我们看到，苏联、东欧国家多次对党内案件甄别平反。而中国共产党则因多次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因而进行甄别平反的次数更多。在1961年5、6月举行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时，甄别平反的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专门就甄别平反说过话。根据会议议定的精神，196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其中作了如下规定：「为看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过去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就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的处分，应该交给群众审查。至于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在内）进行的批判，应该在适

当的范围内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分的，还应该纠正。」〈指示〉还规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中间，不许再开展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由此开始，从农村到各界各方面甄别平反工作正式进行。当然，这次甄别平反的重点是县以下农村。但甄别平反的范围相当宽泛。

指示发出了一年时间，各地对文件的执行却大不相同。有些地方执行不力，不重视，甚或有抵触情绪。这是可以想见的，在自己手裏处理的干部，要平反，刚好证明自己错了。有些地方虽给予平反，但总要留一个尾巴，以证明当时被整事出有因。到1962年上半年，甄别平反工作，尤其是县以下农村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显得十分迫切。因为中央一线领导人亟待进行调整和恢复。一切措施成败与否，都取决于农业能否增产。而农业的恢复工作必须要有人去抓，特别是有领导能力的人来推行。然而，自1958年以来，县以下干部在多次运动中被整的人很多。当时估计有一千万，受到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其中被整人最多的有两次：一是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次是1960年底整风整社运动被划为漏网地富分子或破坏

分子。前者是反「左」的，后者是执行「左」的，都成了牺牲品。这

一反一正，使农村干部无所适从，情绪低落。这种状况何以能领导农业的恢复工作呢？

为了推动这一工作的深入进行，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62年4月27日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通知指出：「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

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田尾巴。有关顿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和搞好工作和生产」。通知要求迅速解决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这批人的平反问题之后，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

这个通知与 1961 年的指示都把甄别平反工作重点放在农村》 但 1962 年的精神有两点不同：一是甄别的范围扩大了。不仅包括 1958 年的「拔白旗」，1959 年的「反右倾」，而且包括了 1960 年底的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二是宣布「一律平反」，不田尾巴。事实上就是一风吹，快刀斩乱麻。为了说明这一新方针，邓小平在 1962 年 5 月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作了专门的讲话。他提醒大家说，「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这个问题，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县以下干部和群翠的积极性很重要。」他说：「最近军队搞得很好，就是一揽子解决。采取一揽子甄别平反方法的，比较主动，面貌也较好一些。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刘少奇插话说：「不要一个一个去甄别。」邓小平解释说：「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下级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左』倾到那个程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除了个别严重的个别处理外，一般的，包括基本上搞错了的，就是对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他们承担责任，向群众当面公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的一个错误，是搞得不对。」

刘、邓的这个精神传达下去，甄别平反工作有了全面进展。到 1962 年 8 月，全国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已甄别党员、干部 365 万人，当时认定，原结论错了和部分错了的占 70 %。甄别了群众 370 多万人，都得到了平反。总共甄别平反了 600 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只可惜不久后重提阶级斗争，平反没能搞彻底，特别是在上层。

几年来过火的政治斗争，不仅使党内民主受到破坏，社会民主更受损害。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不敢讲话了。1959年「反右倾」后，党内的人，包括不少高级干部，也不敢讲真心话了。出现了「三看三不讲」的不正常状态，即：看风向——上边风向不明不讲；看眼色——领导眼色不对不讲；看意图——领导意图不清不讲。还有，讲话「不离三、六、九」，即：「三面红旗万岁」、「从六亿人民出发」、「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在这种心态下，共产党很难与民主人士同舟共济。因此，当时的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调整，还有政治关系的调整，其实质是强调民主，首先是改善同民主党派的关系。1957年反右派斗争，各民主党派尤其是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受到伤害最多。从那以后，民主党派基本上缄默不语。即使对三年严重困难也很少议论，与共产党同甘共苦。只有在1960年下半年，要求资本家下放农村安家落户，使资本家及其子女们惶惶不可终日，有如世界末日降临。后来，毛泽东得知此事，亲自批示，资本家不下农村，「似以下放到城市企业为好」。结果虚惊一场，大家感激涕零。然而，「大跃进」以来的失误，总是一笔账。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人家不骂，我们应该自己骂自己。周恩来说，应该在党外人士和人大代表中交代清楚，进行沟通。毛泽东同意。

第五章调整风云

1962年3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刘少奇和周恩来就形势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作了非常坦诚的讲话。最高国务会议制度，是当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之外的又一个重要国务活动制度。由国家主席根据情况不定期地召集。参加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就包括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主要领导人。会议通常是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事前商量，或者进行重要情况的通报。「大跃进」以来，毛泽东主席召集过1958年1月的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同年9月的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和1959年4月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后，召集过1959年8月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此后，1960年和1961年中断。基本原因，是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许

多情况看不透彻，一些话不好说，难于召开。恢复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本身就是一个象征。

刘少奇和周恩来在讲话中，把中共七千人大会和2月西楼会议的基本内容作了清晰的介绍，对国民经济上的困难情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共产党所犯错误及其经验教训，作了坦率真诚的说明。刘少奇把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口头讲话的内容和盘托出，甚至更加率直。关于犯错误的原因，他一口气讲了八条：经验不足；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实事求是；违反群众路线；违反民主集中制；依靠强迫命令办事；党内外过火斗争使人不敢讲话；党内不纯等等。对于刘少如此坦率诚挚的讲话，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十分感动，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是光明磊落的、郑重的、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党。张治中先生即席发言，表示「万分感动，万分钦佩」。他说：「这可以充分证明共产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神」。张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无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按照惯例，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每年开会一次。但1960年3月开过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同时开过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后，1961年没有开过这两种会议“1962年3月27日至4月6日，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地介绍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情况和存在的困难，以及1962年调整任务。4月28日，周恩来又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作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两篇讲话，同样实事求是地承认了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周恩来对党外人士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他自然是想倡导一种民主风气，倡导一种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精神。的确，这次政协会议气氛融洽。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二百名委员发了言，提出了四百多件提案。广开言路又绝无怨词。见此情况，毛泽东如释重负说：「我们欠民主人士一笔债，现在还了。」

调整统战、民族、宗教、侨务政策、在党内甄别平反的同时，中共中

央也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和调整政策工作。1962年4月23日至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主持会议并作总结报告，部长利瓦伊汉讲了话。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会议汇报，周恩来、邓小平等作了指示。5月28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作了关于会议的报告。1957年以来的几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都存在「左」倾偏差，这一次会议，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纠正「左」的会议。几乎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同时，4月21日至5月29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总结几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讨论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这一次会议比较全面地清理了1958年以后几年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并且提出了改善民族、宗教工作的政策。中共中央批准了会议的报告。5月25日，中共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向中共中央作了专题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所有这些都属于统一战线的范畴。其基本精神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调整同知识界、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界·少数民族、归国侨胞以及其它爱国人士的关系，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如何调整关系？一是甄别平反，二是调整政策。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都波及党外。反地方主义、反民族主义斗争中，党外人士波及的更多。然而，涉及面最广和第五章调整风云

最为敏感的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对此，中央批覆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做了如此规定：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凡是平反的，应该搞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它相当的职务。对在1958年以来其它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坚决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这裏只提到对交心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给予平反，而对其他大量被错定为右派的数十万人并不平反。因而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没有改正。

对其他右派分子的政策是逐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摘帽」是

给出路的政策，与平反性质不同。「摘帽」工作，从1959年9月开始，1959年、1960年，两批摘帽9万多人，1961年摘帽12.9万人，合计已达22万余人。1962年第四批摘帽，1964年又进行了第五批摘帽。五批共摘帽30余万人。当时，一些「右派」及其家属要求党给予甄别。中央统战部也曾几次提出「应该进行甄别」。1962年7月26日，再次向中央写报告，提出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不同意普遍甄别。8月27日〈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覆示〉中，虽同意对「个别人」作甄别改正，但明示：「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认为统战部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上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许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对于已经解除劳动教养和需要遣返其它城市的摘了右派帽的人和右派分子人的安置问题，中央作出如下规定：r 应当暂留原地，设法维持他们的生活，等候处理。」「对已经遣返回城市的，应该准许他们报上户口。」文件还规定：「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和子女，应该根据中央原有的规定，按照他们本人的情况对待，不要称为『右派子女』。在就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不要歧视。j 尽管不是普遍甄别，但「摘帽」和安置问题的提出，已经是大力度地政策调整了。被「摘帽」

‘■ ‘. . 股 ‘, • ■ ’ . 艮 ‘. ■ ! . ! ! ! ! ! i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5) — 历史的变局的右脉，多少会得到心理的安慰，待遇也会随之有所改观。当然，对于他们的政治伤害，还远远没有得到平复。可是，就是这样一点改变，也由于以后形势突变，真正落实的并不多。

1962年的大精减运动中，资本家及其家庭再次受到冲击。已经有些地区把一部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其它党外人士下放农村或精减回家，引起了他们很大的震动。中央及时加以纠正。指出：要切实贯彻「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妥善安置，把他们稳定下来。对于在职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全国约76万人）和他们的家属（妻或夫），不要下放农村。除个别确系愿下乡的外子已经下放的，如非本人自愿，应该调回；对因关厂精减下来的，务使每个人都有着落，不能推出了

事；对于县和县级以上的各级代表人物，不精减，不下放；对资产阶级子女的升学，不要歧视；对不能升学的子女，应当同劳动人民的子女同等对待，等等。中共中央对已经交出产业、接受改造的原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一般比较宽容。他们的处境也比右派分子好得多。在 1958 年「大跃进」中，不但农民利益受损害，而且华侨在国内的家属的利益也受到「共产风」的侵害。有的地方强迫归侨和侨眷献金、存款「放卫星」，造成人心浮动，侨汇大大下降，华侨和侨眷在政治上因「海外关系复杂」受到歧视。1961 年以后，随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纠正和退赔政策的逐步落实，华侨被迫献金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所谓「海外关系」问题一直是压在归侨和侨眷头上的一块石头。华侨受歧视现象相当严重。据侨委 5 月报告所说，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加分析地把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在国外的家庭和亲友关系，一律作为「资产阶级关系」或「复杂的政治关系」看待，扣上「海外关系」的帽子，而滥加怀疑和歧视。有的地方和部门规定，凡有「海外关系」的人，一律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参加工会，不能当积极分子；有的学校对归侨学生的人学、实习限制很严，将政治经济、外贸、财贸、新闻等系列为「机密专业」，不准归侨学生报考。有的部门将归侨干部，当作精减下放的对象；归侨干部虽有优异的成绩也不准提拔重用；有的单位在历次运动和政治审查

第五章调整风云

中，把那些和国外亲友有关系的人，列为批斗对象或追查的对象；有的单位甚至把华侨与五类分子并列。• 一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侨委党组提出了相应政策。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侨委党组的报告，并在转发时加了一个批示。明确指出：「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是模糊政策界线，混淆敌我关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有害无益的。」要求有关单位，尤其是华侨、归侨、侨眷占人口相当比重的省和市对因所谓「海外关系」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有步骤地加以处理。孙中山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在中华民族为争取民主和独立的百年奋斗中，海外华侨曾经给以国内极大的物质支持。其作为中国革命的海外基地，对国内精神援助也是巨大的。极「左」思潮无视这些民族

历史的重要因素，损坏华侨的切身利益，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中央高层领导人是看到这一点的。

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问题也相当尖锐。会议批评在有些地区和有些问题上，错误是很严重的，主要是不重视民族问题，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长期性，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特点，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与自治权利，对团结上层的工作也大大放松了。有的地方采取了严重违反政策的手段，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在一些地方有所滋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党组检查了自己的缺点错误，诸如 1958 年同意取消或合并了一些自治县，赞成少数民族地区「一步登天」搞人民公社化，以及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废除宗教压迫剥削制度过程中的「左」的错误。会议把提出的重大问题列了十项，提出了处理的意见，报请中央确定。中共中央批准了会议的报告，强调指出：「宗教问题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问题，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紧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该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在民族问题上贯彻「有错必纠」的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对 1958 年青海平叛中扩大化错误的改正。

1958 年上半年，青海省局部地区少数上层分子，抗拒社会改革，发动了武装叛乱。军队奉命进行了平叛。平叛斗争是正义的，但是，

‘■ ‘. . 股 ‘• • ■ , . 艮 ‘. ■

2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9—历史的变局

在当时那种「左」的气氛中，扩大化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1959 年 3 月 10 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了平叛，并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这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民翻身的伟大革命。但是在后期，也出现了「左」的偏差。1960 年底，中共中央派民委副主任杨静仁赴西藏作过调查。1961 年 1 月 5 日，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明确指示：西藏民主改革要防「左」、防急，采取稳定发展、五年不办合作社的方针。1 月 24 日，周恩来也作了指示：「西藏的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土地所有制是农民个体所有

制，这个制度要继续好多年，中心是增加生产，这条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1961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曾在兰州召集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在此之前青海省委还召开过三级干部会议，对青海平叛扩大化错误进行了许多纠正的工作，将在押的人犯24365人宣布无罪释放或「教育释放」，平反了一批民族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和重新安置了380名宗教上层人士，恢复开放了137座寺院，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正是在这种纠「左」的大环境下，1961年10月起，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到青海、新疆等地调查）于1962年5月写成一份〈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即〈七万言书〉），系统地、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他对西藏及其它藏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周恩来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认为大部分意见和建议可以采纳，遂指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主持，针对〈七万言书〉提出的问题，制定了四个重要文件，作出如下规定：—「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明确党政分工，加强政府工作」；—「筹委和专署（包括所属业务部门）的行文必须使用两种文字，并逐步做到各级政府和业务部门的行文皆用藏汉两种文字」；—「对寺庙和宗教职业者的要求和标准：爱国守法，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提过高的要求」；—r 细致地又稳又准地对现押案犯继续做好甄别清理工作」；—r 确实属于错捕、错判的案件，应当一律平反，死了的要恢复名誉」；—r 必须逐步创造条件，使各级政府的负责职务逐步由藏族干部担任。」随后，西藏自治区

第五章调整风云
区成立四个小组，由班禅副委员长负责落实宗教政策，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负责纠正平叛扩大化错误。如果不是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抓阶级斗争，四个文件的贯彻将会对民族工作的改进起更大的作用。可惜，这一工作后来被迫中断了。

在6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刘少奇对政法事务发表过多次指示。他批评滥施专政，呼吁健全法制。刘的这些行动，是鉴于自1958年以来几年的「折腾」，党内和群众遭受了过火斗争，伤害了如此多的人。对此他深感痛心。他反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提出五年，可

近几年恰恰用对敌斗争的手段来对付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还在1960年秋，刘少奇亲自处理过一件案件。郴州鲤鱼江电厂有个二十一岁的女工回家探亲，见到父母患浮肿病，还有不少乡亲患病无法医治而死去，她在一气之下写了十二张「打倒、铲除、消灭人民公社」的标语，跑到北京中南海北门就贴，贴了还叫值勤的卫兵来看，并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下面去看看人民的生活情况。卫兵将她押送公安部，经讯问，情况属实，又转送郴州。1960年9月27日，郴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她有期徒刑五年。刘少奇看了报告，说：「她还相信中央嘛，要中央领导下去看看嘛！这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他在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继续留原单位工作。他深知，由于灾荒造成的社会问题，靠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1961年4月，刘少奇到家乡调查，亲自了解到基层乱捕、乱打甚至整死人的现象。其它反映上来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这引发了他的反思。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法制的问题。3月5日刘少奇看到一份〈青海省公安机关破坏法制违法乱纪情况十分严重〉的材料，立即批给邓小平、彭真阅并交公安部长谢富治办。要求「中央公安部应派人到青海去会同省委严肃处理。青海公安机关违法乱纪情况，应引为教训」。3月17日，刘少奇在武汉（他是同周恩来、邓小平一道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找罗瑞卿（前任公安部长、时任总参谋长）、王任重、谢富治谈话。刘说：「这四年的经验教训多得很，你们要好好总结，主要经验是混淆两类矛盾。混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为我的也有，但主要是混我为敌。」刘少奇不无愤慨地说：「下面不按照法律，县、公社甚至大队用长期拘留、劳改、劳教等办法，不知折磨死了多少人。」他要求政法机关要认真检查，彻底揭露、批判。他说：「当然，揭露出来是不好看的，是很丑的，但是，有那个事实嘛，怕甚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谢富治、王任重谈到这几年政法机关经常被批评为「右倾」的情况。刘说：「你们怕『右倾』吗？无非是撒职。坚持真理，彻职也是好的，也光荣嘛！」当然，刘是在

激忿当中，以为坚持真理而撒职是光荣，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其实这在中共党内是很难做到的。

回到北京，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法院开始清理和总结四年来的工作。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对加强无产阶级法制讲了一席颇为深刻的话。他说：我们无产阶级的法律还没有成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在的经验是两方面的，赫鲁晓夫不要专政，斯大林后期把肃反扩大化，我们也有混淆两类矛盾的经验。现在要纠正，要总结经验教训，要从理论上、方针原则上、机构分工上和具体办法上搞出一套来。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甚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面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甚么事情一个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况嘛。这几年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犯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5月23日，刘少奇又约请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谈如何起草〈关于1958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刘少奇说：「目前这个时期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刘少奇尖锐地指出：「过去对矛盾性质认识错了的也有，但主要是错在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和政府中的国民党作风，主要表现在这上面。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仅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

第五章调整风云

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这个问题要好好讲一下。」鉴于这几年乱捕乱打现象许多是撇开政法机关，在党委领导下干出来的，刘少奇提出了一些涉及制度体制的意见。摘其要者，有如“一 司法独立是不对的，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常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要允许上诉。一 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一 非专

政机关办劳改队是非法的。— 过去党委搞肃反小组，确定捕人，隔离反省】整了很多人，当时是对的，今后不能再多搞。彭真插话说：「我们不是没有法，还是有法的，当然还不完备。但这几年对有的法都不执行，你们自己搞乱了。」

刘少奇的上述谈话，反映出他反思的深度超出其它人，甚至也超出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认识。他似乎感悟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存在弊端。然而，他只看到下面违反法制的问题，没有触及高层。几年之后，正是从最高层发动，彻底地砸烂了公检法，法制荡然无存。他作为经过选举产生的共和国元首，也被这「无法无天」的狂潮吞没而去。刘少奇呼唤的法制，终归连他自己也未能保住。正如一位哲人所说：「革命吃掉自己女儿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二彭德怀上书风波

庐山会议闭幕已经近三年。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在北京西苑附近的吴家花园赋闲反省也有两年时间了。在破旧和零落的小院裏，他经历着怎样的精神煎熬，是活跃在政坛上的高官们所无法体会的。尽管在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遭到更为严厉和莫须有的追究，但他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完。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又在讲话中提到了彭德怀。刘当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 7 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

222

甲辛八民长和哄丈‘弟五春（1962 — 1965）— 历史的变向
反党集团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刘说：彭不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j

刘又说：「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来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问，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甚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大举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说彭德怀篡党，当时就认定有国际原因。刘说：「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甚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甚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篡党。」讲到这裏，毛泽东补充说：「没有国际背景。」刘接着解释说：「彭德怀刁，一昌■ ‘由门斗叮一』 鸟 j’，勺谬黝

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这番话，当然是经过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所确定的口径。，其目的，是为说明总路线和「大跃进」性质的正确。但是，在中共党内）「反党集团」、「国际背景」等罪名，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特别是「国际背景」一条，不仅「十恶不赦」，而且永难翻身。毛泽东对彭最为忌恨的也是这一条。例如，他在当年6月21日在同朝鲜最高人民议会代表团团长的谈话中，就讲了相同内容的话。

他说：「彭德怀在党内有个小团体」，同高岗 r 他们是联盟，有国际背景，是搞颠覆活动的」。这就几乎就为彭德怀定了死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讥讽中国「大跃进」一事始终耿耿。因此，他也最愤恨国内党内的人同赫勾结起来。

虽然还是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理所当然地被剥夺了出席七千人大会的权利。会后他得知刘少奇说他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有国际背景」、r 阴谋篡党」后，大哭了一场。对于这样的「重判」「冤判」，他不得不起而为自己辩护，进行申诉。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他于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信的形式报送了一个良

1 如果说再次提出彭德怀的问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致的意思，那么会__t 有些情况似乎是有矛盾的。例如，朱德2月3日在山东组发言说：r 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经过这次会议，我看可以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朱德的这个发言在刘少奇之后。他当然总到了刘对彭德怀的态度和对问题的进一步定性。那么，朱德为甚么还特意要讲党内斗争的扩大化问题，希望 r 把平反的工作搞好」？当然，朱德不会专门说彭德怀。可是，朱关于党内斗争的言论，肯定是有所指的。至少，是他内心积存的一种阴影，不吐不快。对于彭德怀，朱一定有自己的看法。因为在庐山会议1，朱德即有「避重就轻」的讲法，而被毛泽东当场讥讽批驳。七千人大会难得一点的政治宽松，为朱德抒发内心积虑提供了场合。由此可见，即使中央常委有了一致的意思，人们想法也不一样。党内斗争过于残酷，是人们不愿看到的。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 悯死—1 卯州》），乍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以笋），页18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达八万字的申诉材料（后来被称为「八万言书」）。在报送时，他还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尚昆同志：我阅读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实事求是的作了检讨，（对）不符合事实的我也作了说明· · · · 一」

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庐山会议前后的情

况。第二部分，关于高饶联盟的问题。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接触过程。第四部分，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第五部分，关于军事路线。

「八万言书」对加给他的「罪名」进行了逐条的辩解：对于说他在庐山会议之前几次会议和庐山会议初期有话都不讲，到会议中问才把信拿出来的指责，他「觉得与事实有出入，实在腹怀委曲」。列举事实作了说明。对于指责他「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阴谋篡党」，他表示：「这个罪名，我实在觉得委曲」。他辩驳说：「在 j \ 中全会时，对我给主席的信以及我的一些言论都提到了高度原则上进行了分析，即『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可是，这次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和讲话中说：『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这就是说，那封信就不是甚么『反党纲领』了。对那封信的这一估价，我是同意的。但是，少奇同志在报告和讲话中又提到，『他在党内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我实在难以领受。」关于他同黄克诚的关系，他摆事实辩白道：「是一种同志之间的工作关系，确实没有其它不可告人的甚么秘密。」关于他同高岗、饶漱石的关系，他详细说明了历来接触的情况，证明自己与高、饶没有甚么「反党集团」性质的关系。彭德怀在信中没有直接提到毛泽东，而是针对刘少奇的话，是有策略考虑的。他愤愤然写道：1962年1月27日，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我认为少奇同志这样来强调这个问题，未免有点过分。同时与事实也是有出入的。关于裹通外国，搞颠覆活动，使他受

第五幸调整风云

到莫大的冤屈和侮辱。他表示，作为一个坚贞的爱国者，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痛恶绝的」。彭德怀详述了自己从1936年以来为数不多的同外国人接触的情况。他说，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将领，不懂外语，每次同外国人接触，都有人陪同，有翻译在场，怎么

个「裹通外国」呢？他写道：「我承认在 1959 年出国访问时，只着重地解释了西藏叛乱的情况、炮击金门的意义，而没有着重宣传我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一个缺点或者也可以说是错误。但是，我没有背着我党在外国人面前搞甚么不利于我党的勾当来讨好外国人，更没有甚么『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彭德怀以决绝的口吻写说：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据，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而无怨。彭德怀之所以要写自己三十多年的历史情况，是要对所谓他历来同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说法加以澄清。此外，还澄清了对他历史上某些具体问题的指责，如所谓「反对唱《东方红》」等。彭德怀在信的末尾表白道：「现在我们国内正处于困难的时候，克服这个困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主席及中央各同志，正在紧张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我从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快近三年来，未做任何工作。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时，来烦扰中央同志，内心是非常不安和非常惭愧的！不提出来吧，又难抑制自己那种委曲和苦恼心情。恳希谅解。」信送上去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彭德怀于 8 月 22 日给中央写了一封短信，再次表达自己的心情和对中央的恳切希望。可是仍没有回音。当时，中央正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反对「翻案风」等三风正是讨论焦点，连刘少奇也经受看思想上的冲击。这些党内新情况，当然是吴家花园裏的彭德怀所不了解的。但是，「八万言书」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材料。它不仅使我们听到一位功高德助的被难者的心曲，也提供了党内在丧失民主机制后造成危害的证言。1965 年，毛泽东约彭德怀见面，说了「不写就不写，一写就写了八万言」，同时也说到，你我之间到底谁错，有可能「正确在你一边」这样的话。但据学者们研究，毛泽东其实对彭绝对的不放心。彭的党内背景和

■ 唱■ ， ■ ■ ■ ■ ■ . ’ ， 醒• ■ ■ ” ！ -

丁半八氏升和斗丈’弟血春！1962 — 1965）— 历史的变局

「国际背景」，让毛泽东难以宽容。而此时，八届十中全会的反「翻案风」已经刮了三年，又有一批老干部被审查、负案在身。这岂非是又一次的政治悲剧。问题在于，1962 年的上半年，是党内政治氛围

最好的时期之一。彭德怀本来可能会期望有好一点的前景，可却遭到更为不公的待遇，而且发难者竟是刘少奇。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已表现出很大的对以往数年的保留态度。这样，学者们总是难以处理这段公案：在写刘率领之下的大刀阔斧的调整的同时，又不能故意遗忘身心受到更大伤害的彭德怀。扬刘与抑刘之闲，难以下笔。答案其实也简单。我们写历史，总是带着个人的情感；我们作政治判断，总离不开道德评判。其实，历史的主要功能，是记录政治的运行。因此它既不能过于情感化，也不能礼顶道德。政治运行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则。离开规则，我们就看不清它的由来和走向。彭德怀已是党的敌对分子，对他不可能存在回护、'碗惜和辨诬。无论他以前功劳多大，现在也只能作为反面教员，以证明党的工作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确性。而调整则性质不同，它是部分地纠正党的错误。它无论从目的还是方法上，都是党性的表现。尽管在调整过程中，包产到户的意见和平反甄别的举措都出现了。但那是只是为渡过困难采取的暂时措施，它们决不是自外于党的行为。因此，批彭与调整并不存在矛盾。刘的行为也无可置疑。其实，所谓道德和情感，只是当代人的感觉。现在人说起彭德怀，大多为之感慨、惋惜。这非常自然。但应该想到，历史已经发生极大的变迁，人们已多次修正了自己的道德和情感标准。这就是历史研究为甚么必须冷静、达观的根据。无法更改的是，历史就这样在 1962 年留下了彭德怀上书这一场悲剧性风波。

三「脱帽加冕」

知识分子比工人、年来已经被伤害过多次

农民更注重「面子」。而这个「面子」在十几。所谓「面子」，其实不是虚荣，而是人的价

第五章调整风云

值承认和尊严认同。说到底是「被信任感」。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是政治上的软弱，从群体上说，中国旧知识分子缺少独立立场和 f 固性精神，尽管他们中许多人都有游学欧美的经历。1949 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政权抱有极大的爱忱与拥护。这是他们通过新旧社会的比较得来的政治态度。但是，旧知识分子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属性，在新社会裹仍面临长期改造的任务。他

们需要从意识上真正同旧思想、旧观念和旧习惯相决裂。有一个说法，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一尖刻的用语，长期用来提醒旧知识分子所必须建立的新的阶级认同。

但是，从本质上考察，由中国旧知识分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培养的新知识分子总合起来构成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是以爱国和报效国家为己任的。他们事实上同共产党和工人、农民同舟共济，有了十三年以上的建设国家的非凡努力。对中国知识分子说来，回报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更渴望的是认同：共产党和国家对他们的身份、阶级归属、工作贡献、社会价值以及思维方式的认同。如果没有这些认同，他们将完全陷于迷茫之中。可惜，在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和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被认同感愈来愈削弱。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愈来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中国共产党并非对此熟视无睹，但却始终不能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形成全党一致性的认识。建国之初，面对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相互隔膜的情况，毛泽东曾提出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在随后发动的各项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身心屡屡受挫。1956年初，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周恩来以一国总理身份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这个宣布表明，作为特定历史意义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至此应当结东，知识分子不应是异己力量而应当是依靠力量。然而，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改变了毛泽东的估计。他不但认为知识分子仍是一种异己力量，而且认为在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臭了以后，知识分子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认定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6必一）历史的变局

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现存的「两个剥削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有500万，加上他们的家庭，约为3000万人。他后来多次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们采取的是完全包下来的政策，意即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远未结东。这就不仅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把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也囊括在内。知识分子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1957 年反右，受伤害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对 55 万右派分子的处理相当重。或下放劳改，或遣返农村，或发配边疆。其影响所及不只是 55 万右派及其亲属。遭此一劫，知识分子队伍大伤元气。许多人从此三缄其口，很少有人敢说话了，其个人及家庭的命运，更是十分凄凉的。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基本倾向是排拒知识和科学、直接诉诸于群众运动的一种发展模式。对知识、科学和知识分子的贬斥达到极点。「破除迷信」变成破除科学和常识，「尊重实践」变成崇尚无知，「解放思想」变成唯意志论。在「插红旗、拔白旗」的「红专辩论」中，一批有独立见解的专家、教授被当作「白旗」拔掉，一些潜心学问和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被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有的人认为，「知识分子既然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就是革命对象」，「对知识分子像打鼓，不打不响」，「必须以斗争为主」，「知识分子三天不敲打就翘尾巴」。科学家的嘴被封住，他们面对违反科学，甚至违背常识的许多做法瞠目结舌，不敢说话。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知识分子也被动员起来，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也要「大跃进」。在工农业「放卫星」和风靡一时的新民歌运动的催促下，文艺界号召「放卫星」，要求快写、多写，命题作文，限限量。一些文学家、艺术家奋力追赶潮流，写出标语口号式作品，「歌唱人间奇迹」和「人间天堂」，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油添醋，推波助澜。更多的人对于这种外行干预、书记坐镇、命题作文的做法无所适从。许多专业人员、学校教师、专家学者走出教室、书斋和研究室，投身于火热的群众运动，接受大潮的洗礼，经受筋骨的磨炼，实现灵魂的净化。

对于这种种「左」的做法，毛泽东本人也有所察觉。1958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上看到一份反映清华大学一

第五章调整风云

一个党支部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后，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将这份材料印发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研机关的党委、总支、支部阅读并讨论，以「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

务」。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不是依靠对象，但毕竟是统战对象。他的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为我所用。有了这封信，周恩来立即在 28 日晚上召集宣传、文化、教育等部门负责人到西花厅开会。到会的有陆定一、康生、张际春· 杨秀峰、周扬、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刘芝明、夏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张凯、黄中、荣高棠、沙洪、召卜荃麟、吴冷西、姚漆等。参加会议的文化部 \$ 1J 部长林默涵这样回忆道：周恩来以鲜明的态度批评各部门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对教育部门，周恩来批评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反对学校中把一切工作成绩归给学生而不是教师的做法。对卫生部门，他指出要尊重和保护医务界的老专家。对文艺部门，他批评过分夸大文艺的政治作用，指出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的口号是错误的。他要求与会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回去后「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注意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向」。「有些同志开始思想不通，后来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会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起到了『降温』的作用。」

1959 年 5 月 3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又约见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进一步分析「大跃进」中对知识分子产生这些「左」的偏向的原因。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说：「我们一些同志总是强调某一方面，变成一条腿，而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摔跤。」但是，由于当时全国仍处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周恩来的意见没有得到贯彻，有些省市甚至不让传达。周恩来后来说：「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玲宫』，这就叫人不免有黑铃情绪了。」1959 年庐山会议后，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又有新的发展。文化思想界是「反右倾」运动的一个重要战场。一些文艺观点、

2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文艺作品和艺术家以及学者及其学术观点受到批判。李何林的「艺术即政治」、巴人（王任叔）的「人性论」、张庚的戏曲理论、郭小川

的诗、刘真的小说、尚炉的历史分期说，都被批判示众。尤其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批判，铸成了「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不可逆的历史错误。直到1960年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持续三年的批判才告结束。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遗传学、优生学等现代科学均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予以批判和否定。「反右倾」运动主要在党内，但知识分子受冲击也不在少数。在这种氛围之下，知识分子处境尴尬，心情压抑，普遍心怀怨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甚么时候才能摘？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何时是个头？怎样才能「又红又专」？追求「红」可望不可及，追求「专」又有「白专」之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还灵不灵？在许多单位，「双百方针」变成了「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党如何领导文艺？「外行领导内行」是必然规律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随着「大跃进」逐渐偃旗息鼓，知识文化领域的混乱也渐渐归于沉寂。196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力量于经济调整，阶级斗争的基调降到了几年来的低点。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开始纠正「左」的错误，着手制定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措施。

在中共领袖中，周恩来是同知识分子关系最密切的人之一。他对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向来高度重视。五年前他的〈知识分子报告〉被实践所否定，两年前他关于文化领域降温的话也无人理睬。这使他相当沮丧。现在，政治气候有所变化，他决定再作努力，恢复知识文化领域内的正常氛围。

借看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周恩来决定从他熟悉的文艺界入手，了解知识分子的苦衷，确定知识分子政策。1961年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分别召开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检查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问题，研究改进工作的措施。地点在北京市新侨饭店，故这次会议被称「新侨会议」

下面材料取自一则报导，反映出周恩来同演艺界人士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对文化人的信任态度：6月16日晚上，周恩来谁也没有通知，

第五章调整风云

来到新侨饭店，碰巧遇上赵丹。由赵丹引领，他来看望因病卧状的黄宗英。赵丹一路嚷着把周恩来带到黄宗英的房闲：「宗英，快，快！」

总理来啦！总理来看你，看大家啦！」周恩来笑盈盈走进室内，端详看黄宗英那身打扮，觉得奇怪：素布衫裤、家制布鞋，有点乡下妇女的味道。他笑看问：「怎么？连花衣服也不敢穿啦？」黄宗英急忙解释：「常下乡……」周恩来赞许地说了一句：「好。」随后又说了一句：「改造，也不在外表。」说话间，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陈鲤庭和沈浮等人闻风而至。小房内气氛融洽，笑声朗朗。新侨饭店的服务员纳闷：总理怎么与艺术家们这么熟，像老朋友似的！周恩来冲看黄宗英摇摇头说：「更瘦啦！甚么病？让医生仔细查查。」黄宗英赶紧解释：「总理，我没甚么大病，一多半是急出来的。老完不成任务，白吃人民的饭。」黄宗英的话，是有所指的。她长期当演员，1959年，她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专职编剧。这样的转行，来得太突然）黄说：「我一下子脑子涨得老大」。再加上当时文艺创作的政治性要求太强，任务压得太紧，领导层层审查，关口太多。黄宗英当了一年的编剧，剧本绝少成活，一急之下，竟然病倒了。黄宗英向周恩来诉说看一个「五个书记挂帅」的事情。不久前，她奉命创作电影剧本《好当家》，要求两个星期体验生活，一个星期交出创作提纲，一个星期交出剧本初稿。为保险起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关怀、过问，上海电影局第一书记、电影厂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还加上县委负责人）层层挂帅，电影厂副书记亲自坐镇。这是一个塑造党的书记光辉形象的「重大题材」，偏偏这位黄宗英一辈子不认识几个书记，更没有当书记的体会。这样的阵容，这样的时限，这样的题材，把创作组压得脑汁绞尽，灵感全无。艺术家们也有招，有一天晚上，趁坐镇创作组的电影厂副书记生病睡觉之机，黄宗英等人一口气搞了个通宵，把提纲顺了下来，交差了事。大家私下裹称：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来。书记挂帅、党委领导、命题作文者）由此可见一斑。「总理，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

人替我们负。我们的党— 各级党委，究竟以甚么方式、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讨论。」黄宗英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想法道了出来，在总理面前，她很少心理障碍。黄宗英的话打开了大家的话匣，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周恩来反映会上的情况和艺术家们的呼声。代表们多次要求周恩来能到会上与大家谈一谈。周恩来对此会心一笑。

果然，周恩来没有辜负演艺界人士的愿望。6月19日，周恩来为这两个会议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可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

『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周恩来批评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子登科」。他说：「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改过来。」这篇讲话，是根据前两天文艺工作者们反映的问题而准备的。周恩来说：「心有所感，言之为快。」周恩来一口气讲了「心有所感」的七大问题：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问题、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领导问题、话剧问题。这七大问题都是文艺界十分关心的政策问题。最为引人注意是他关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强调地说：「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周恩来说：「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周恩来最后说：「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周恩来把自己的话说是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给文艺界人士以极大的震撼。「这是在一个长久时期的沉问的政治空气中打了个惊雷。」一个与会者如是说。赵丹坐在台下仔细地听着，太过瘾了。本来他这次从

第五章调整风云

上海来是不想说话的。在来北京开会之前，上海市委某负责人曾告诫他们，去北京开会不要发言，上海的工作没有甚么要检查的。因此，赵丹在开会的头几天，一言不发。主持会议的陈荒煤很纳闷，问：「阿丹，你为甚么不发言？」赵丹心中有气，信口回了一句：「除非给我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人说话不算数』，我才敢言。」原来，赵丹一直在寻求「免斗牌」。周恩来的讲话打消了赵丹的顾虑，情绪活跃起来，也忘了一位艺术家与一国总理的身份差别，竟为了一部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究竟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与周恩来争论起来。这部电影叫《吉达和她的父亲》，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在周恩来与艺术家们游香山时，赵丹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因为头一天，周在大会讲话说到电影比小说改得好，引出了赵丹的这句话。周恩来听完，略停脚步，偏过头来看着赵丹微笑。「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来说完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周围的人也被他们逗笑了。这是一次无关宏旨的友善的争论，周恩来想借此活跃一下民主空气。有人和赵丹开玩笑说：总理承认你赵丹是「一家之言」，你总算得到一块「免斗牌」了。

新侨会议前后，中央开始制订科研工作条例和文艺工作条例。两个条例的意图都是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出台的是聂荣臻主持起草的〈科研十四条〉。从1956年10月，聂荣臻受命为兼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以后，从此与科技界结下了终生之缘。老元帅的后半辈子主要同科学家们打交道。从爱国主义走上共产主义的老一代革命者，都有一个强国梦。中国科技基础之落后，科技人才之匮乏与宏大的科技发展目标的矛盾，使聂元帅产生了紧迫感。尤其是中苏两党翻脸，赫鲁晓夫撤走专家后，更显出自己为数不多的专家的宝贵。在聂的旗下，集中了当时中国最精华的一批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等搞两弹的专家。他们中许多人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冲破阻力，毅然归来报效祖国，其拳拳之心可昭青史。这样的知识分子难道不能信任吗？

才’、“细么？闷人’矛J1各‘又歹D乙一1梦0)J一产丈的变句

然而，情况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好。这几年来，即使最受保护的科技界也难免受到干扰和冲击。科研单位同样存在浮夸风、瞎指挥风。党员干部自视高人一等，不尊重科研规律和科学家的事业，不务正业，让科研人员用一半以上时间去干体力劳动、参加政治学习，轻率地、频繁地在科研所搞政治排队、批「白专道路」等。专家们顾虑重重，不能潜心于事业。

从 1960 年冬天起，聂荣臻开始组织人员调查了解科研院所的情况，提出政策。1961 年 7 月 6 日，一份〈科研十四条〉的文件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立即引起与会者共鸣。李富春说：「对人的政策，主要是个红与专的问题，这方面有偏向，空洞地要求红。」刘少奇插话说：「空谈革命是带引号的革命。」邓小平说：「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彭真说：「干脆写明确，两三年内，各研究所不搞政治排队。」刘少奇说：「现在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就要纠。」周恩来说：这个文件「财政·文教系统也可以发」。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会后，他批准了〈科研十四条〉

〈科研十四条〉直接是为了解决科技界的问题，但事实上是调整整个知识分子政策的第一个文件。6 月 19 日，中央在下发〈科研十四条〉的批示中指出：「文件精神对于一切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

与此同时，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党组着手起草文艺工作条例。文艺条例的通过没有科研条例那么痛快，相对于科技界，文艺界历来是一个敏感区。1961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将文艺工作条例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当时共计十条，称〈文艺十条〉。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修改，压缩成八条于 1962 年 4 月 30 日印发实行，改称〈文艺八条〉。

（文艺八条〉批评了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干涉，妨碍艺术创作和学术自由探讨，忽视同党外作家艺术家合作，进行过火斗争，片面追求数量，文艺工作领导干部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等「左」的错误。规定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严格划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界限，正确划分政治问

第五章调整风云

题、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之间的界限。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问题。不许用行政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学术和艺术问题。也不应把学术、艺术问题随便引伸为世界观问题等等。这些规定切中时弊，对文艺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

经过上面一系列的铺垫，知识分子终于在 1962 年初迎来了「早春天气」。当年 2 至 3 月，著名的广州会议召开。「脱帽加冕」不仅成为话题，而且留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永久的记忆。

所谓「广州会议」，其实是两个。一个是聂荣臻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一个是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筹组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2 月 16 日，聂荣臻主持的科学工作会议，原本是想「藉下发〈科技十四条〉以后的有利形势，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三百一十名各个专业、学科的科学家的集中到广州后，聂荣臻找一些科学家谈心，发现他们的顾虑很大。有人问聂荣臻：「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到知识分子，就叫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荣臻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报告了周恩来。这时周恩来、陈毅已到广州。周恩来当即表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过去在国务院开会，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总是争论不休。一次会上，聂荣臻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很激动。她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甚么！那不合乎逻辑。」的确，共产党下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培养出来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能信任，那不是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为自己培养掘墓人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悖论啊！就像毛泽东一心想使中国尽快富强，却又担心富了以后不革命的悖论一样。这个悖论不仅困扰着知识分子，也一直困扰着毛泽东。

文化界的广州会议是周恩来亲自指导召开的。会前，周恩来要求主办单位进行充分的准备，对全国剧作家的情况及有关各级领导的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历史的变局

想情况做一次全面调查。从调查报告中，周恩来进一步体会到知识分子要求摘去「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的心情多么急切。2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在北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他（她）们正准备赴广州参加会议。周恩来希望他们在创作上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到广州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会开好。这时，周恩来工作很忙，正在主持起草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他本来不打算去广州，请陈毅去给这两个会议的代表讲话。但是，从广州传来了与会者要求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强烈呼声，使他下决心亲自去一次，解决这个问题。

2月25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情况，并说：准备和陈毅一起去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听听他们意见。」2月26日，周恩来和陈毅一起飞抵广州。他看望了会议代表，听取了聂荣臻、郭沫若等的汇报。3月1日，周恩来约集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座谈】着重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听完大家的议论，周恩来明确作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羊城宾馆向参加两个会议的科学家们和作家、艺术家们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不论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重申了1956年1月他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重申刘少奇八大报告中关于「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的论述。同时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指出：「列宁在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了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要在这个根本估计的基础上确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中，周恩来批评了1957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片面理解，指出改造是长期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他说，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第五章调整风云

周恩来的这场报告连同他 1951 年、1956 年两次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成为建国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代表作。周恩来因为工作太忙，无法等到会议结束，就于 3 月 4 日赶回北京。广州会议委之于陈毅。陈毅之所以到参加广州会议，是因为陈除外交外，一直兼管科学和文化工作，分管科学、文化，也就是分管知识分子。陈毅素有儒将之称，秉性豪爽，文人气质。他嗜爱古籍，喜交名流。由他分管知识分子工作倒是恰当人选。

对于文化领域的「左」的做法，陈毅早有批评。上年 3 月 22 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戏剧编导工作座谈会上）他就语出惊人：「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那年 8 月 10 日，陈毅在北京高校毕业生集会上，他又大声疾呼：「前一个时期，有的单位把那些埋头搞业务·少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的人，当作白色专家来进行批判。这是不对的，应该给予纠正。目前我们国家正需要大批专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埋头业务，对社会主义建设，对祖国，对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值得欢迎的。」他说：「从来没有空头的政治，政治都是通过业务来体现的。」

这次来到广州，在会上会下，听到科学家、剧作家倾诉几年来遭受迫害和歧视的痛苦：曾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者的大部分！陈毅惊骇激愤不已。3 月 5 日和 6 日，他在科技大会和剧作家座谈会上作了两次讲话。陈毅说：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前。不能够经过了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陈毅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他说：『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应该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

甲平入氏兵和团更· 第五卷（1962 — 196 刘一 历史的变局

今天我们向你们行脱帽礼！』 」说到此，陈毅站起，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个突然的动作，使得全场一下子掌声雷动。陈毅接着动情地说：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 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陈毅说到这几年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矛盾，伤了感情，伤了和气」。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领导机关「错了」，「对的」是知识分子。为甚么就是某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太粗暴、太生硬」，搞得知识分子不敢讲话。科学家们见你亩产一万斤，也不敢说话 g 见你的大水库不合科学原理将来要造成灾难，也不敢提批评意见。「一批评就是反党，一批评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讲到这裏，陈毅悲愤交集。他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 . . 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烦扬之声、. . . 危险得很呢！」陈毅还讲到「无为而治」、「坐享其成」。党委领导业务，要通过党的专家来领导。「讲党领导一切，主要是指路线、方针、政策… … 至于专业问题，最好不要乱干涉。」陈快人快语，语出惊人！科学家、文艺家听到这样的讲话，自然忘掉了斯文，欢呼雀跃起来。当年的记录稿上注明，陈毅三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响起六十多次掌声和笑声。讨论中，会议代表们普遍认为：周、陈讲话「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来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历史学家周谷城听到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后说：「知识分子过去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被改造的，始终是做客的思想，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如今，「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这一点特别高兴。我对这一点也很

兴奋。我觉得只要有这些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他的话代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

第五章调整风云

239

3月28日，周恩来在三届二次人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将「脱帽加冕」的精神郑重地宣告给全国人民。他在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应该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自觉地、逐步地进行（改造），而不应该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把某些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更是错误的。如果说在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还只是在小范围内的个人讲话，那么政府工作报告则是经过中央常委讨论批准，并且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郑重结论。应当更有份量，更具权威性。

四早春天气乍暖还寒

1962年前半年，对中国知识分子说来，是又一个春天。聂荣臻曾回忆说：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至今我还认为；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实干，『两弹』也就不会那么快地上天。我们常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三十年后，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谈话中，也曾回忆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在教育领域，〈高教六十条〉等条例的贯彻，教育迅速走上了正轨，进入了教育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共和国各方面的人才，许多出自于60年代初期。据统计，至1963年初，全国试行〈高教六十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学校达到二百多所。其中由各部委领导的七十一所，省、市、自治区领导的 127 所。全国的其它高等学校也大都参照条例精神改正了工作。“在具体工作方面，各高校普遍对专业、专门组和师资进行调整；制定和修改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加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课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合理安排教学、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时间，针对过去所缺的课程，安排补课计划；加强对学生文化成绩进行考试和考核的制度建设。如南京大学将已设立和准备设立的 33 个专业调整为 28 个，将已建立和准备建立的 64 个专门组调整为 55 个。由于减少了 110 门新课任务，有关的系、组得以腾出力量，加强基础课教学，并对已开出的 150 多门新课进行充实和提高。³ 这一系列调整措施，大大改变了 1958 年以来高等教育的混乱状态，使国家正常的社会生活得以恢复。据统计，至 1965 年，全国高等学校已由 1957 年的 229 所增加到 434 所，在校学生由 44 . 1 万人增加到 67 . 4 万人；中等学校由 1 . 24 万所增加到 8 . 09 万所，在校生由 708 万人增加到 1431 万人，其中中专、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发展到 6 . 28 万所、498 万名学生。国家因此储备了德才兼备的人才。‘

而文艺领域对政治气候的反映，历来最为敏感。在 1961 年和 1962 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活跃和繁荣的局面。无论小说、散文、诗歌，还是电影、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美术，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文化调整，除了召开会议，制定条例，领导人讲话外，还为受过批判的作品和作家恢复名誉。「广州会议」重新肯定了受批判的话剧《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等剧作，同年 8 月，文化部又发通知，停止发行近五十部颂扬浮夸风、共产风的影片，如《柳湖新颂》、《春暖花开》等等。一批优秀的传统剧目和民间舞蹈重新登上舞台。近现代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更为兴旺。1961 至《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页 238’

参见《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下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j2），页 128。

数字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 474。

第五章调整风云

1963年摄制的故事片《暴风骤雨》、《达吉和她的父亲》、《五十号兵站》、《风雪大别山》、《北大荒人》、《北国江南》、《李双双》、《东进序曲》、《甲午风云》、《怒潮》、《红日》和戏曲片《三打白骨精》，舞剧片《小刀会》，歌剧片《洪湖赤卫队》，话剧《杜鹃山》、《兵临城下》，京剧《谢瑶环》、《海瑞罢官》，昆曲《李慧娘》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出版界还出现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针砭时弊、清新悦目、深受群众喜爱的散文、杂文。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方面，也出现了活跃空气。文化界为此欢欣鼓舞，期待着文艺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的真正到来。著名戏剧作家田汉在「广州会议」之后，作诗一首：

一时春满越王台书记翩翩攻药石乌多哈哑缘风厉指日乾坤红紫遍
水暖山温众复才。将军侃侃委惊雷。花不齐闲待鼓确。情深莫忘岭头梅。

然而，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如此乐观。与党内名流相比，党外知识分子却更显得心有余悸，疑虑重重。〈科研十四条〉下达后，科学工作者一方面为之兴奋，一方面又信心不足，担心不久「行情」会变。教育部到北京大学征求对〈高教六十条〉的意见时，有的知识分子说，「希望把这些条例刻在石碑上」。这句话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喜忧参半的心情。他们的担心和疑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显然，「脱帽加冕」之论，并不能消除知识分子长期形成的敏感。政策调整的力度究竟有多大，持续时日究竟能多长等等，都是饱受「运动」之苦的知识分子们所忧虑的。其实，真正给予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政治待遇，并不几个领导人说说即成的。这种事要有规则，要按制度，要执政党裹所有人都承认，要把它变为执政党的一种精神需要。所谓勒石为信，正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容易激动容易轻信但又容易忧心忡忡的心态。他们最怕精神层面的伤害。因为，他们主要靠精神来支撑自己的信念。

历史证明，知识分子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改变对知识分子性质的判断。对「脱帽加冕」的反弹，实际早有预兆。〈文艺八条〉的制定，从讨论初稿到定稿发出，经过了将近一年时间。可1962年4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的〈文艺八条〉比1961年8月1日下发征求意见的〈文艺十条〉，却有相当多的后退。例如，〈十条〉讲制定文艺条例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好作品……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八条〉则改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更有效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十条〉有「正确地认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 / 又条）抹掉了。〈十条〉有「正确地细致地划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艺术问题的界限」。〈八条〉则改为「文艺批评应该鼓励香花、反对毒草」。强调了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和对毒草的批评。〈十条〉有「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款，〈八条〉却改成「加强团结，继续改造」，重点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为继续加强改造。这些修改明显地增强了政治色彩，表明党内对知识分子和文艺领域的整体仍有相当负面的看法。

由于这样的原因，〈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的下发贯彻都遇到了党员干部的一些抵触。当然，决定性的分歧，主要不在基层而是高层。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央内部就有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柯庆施在上海竟不让传达陈毅的讲话，理由是防止知识分子「翘尾巴」。当时中宣部的主要负责人也不同意周的说法。甚至有人说：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的讲话呢！可见中共党内意见之对立。当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说话。而通常没有说话，已经是表态了：毛泽东不同意「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说

5 近来上恋有人撰文称，传柯庆施故意不传达广州会议精神的说法，没有根据。柯曾派出市委干部参加一「会议，并在会后向市委干部进行了传达。有关情况暂作存疑。但柯在1962年提出「大讲十·三年」的口号，目的还是肯定和维护过去的整体做法。这个事实是准确的。

叩 j ‘于们励臼户 k 六

法。可能，「脱帽加冕」更会招致他的不满。毛泽东此时看重思考看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这个斗争正是因为调整给「反面」的东西开了后门。同时，亦应看到，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在中共党内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举党一致的认识。党内相当大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的怀疑，是根深蒂固的。毛泽东甚至一度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好，可见他绝对没有把知识分子当作工人阶级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许多人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天真的。由于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中共当时还不可能科学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由此，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的调整，的确搅动了中国 60 年代前期的历史风云。

第六章

缓和与霜冻

进入 60 年代，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一线缓和的晨曦。在此之前，从 1956 年到 1958 年，再从 1958 年到 1960 年，中苏两党之间离心离德的现象，愈来愈明显。1960 年当年，在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两党关系曾急剧恶化。先是在华沙条约国协商会议上，中苏两党就裁军问题发生争端。中国声明，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这使赫鲁晓夫非常不满。其后，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将矛头指向现代修正主义。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开始尖锐化。再经世界工联理事会的冲突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激烈争论，中苏两党已近撕破脸皮。1960 年年中，苏联召回了一千余名在华专家，并撕毁两国订立的合同，终止了合作项目，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心理，造成巨大伤害。但是，到 11 月刘少奇访苏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后，中国在两党关系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情况又似乎好转了起来。这一段分分合合的历史，犹如冬春两季，既有缓和又有霜冻，但总的历史趋向，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乃至分裂，都将无可挽回地一步一步发展开去。

一出现缓和

1961 年至 1962 年上半年，中苏争论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间歇期公开的直接的论战停止了，中苏关系似乎有改善的趋向。

中平人民共和国史·第五春（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何以会出现这种「缓和」的局面？这应从刘少奇访苏说起。1960年底刘少奇访苏，经过激烈的争论，达成了相互妥协的〈莫斯科声明〉，刘少奇与赫鲁晓夫会谈，双方都表示以后要停止争论，避免冲突，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的分歧，以维护中苏两党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毛泽东感到满意，这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一个信念：国际共运也同党内斗争一样，可以运用「团结—斗争—团结」的方式解决问题。1960年12月9日，毛泽东亲率中央政治局成员前往机场欢迎刘少奇一行访苏归来。《人民日报》发社论，肯定莫斯科会议，赞扬中苏友谊。

1961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九中全会的一个基本精神，是决定从1961年起集中力量搞好国内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方针，不受任何国外事件和国内事件的干扰。会议还认为，中苏两党在坚持还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斗争。中苏分歧实际是从二十大开始的。从1959年9月9日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社论开始，两党争论公开化，一直到1960年莫斯科八十一党会议，历时十五个月。八十一党会议达到高峰。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八十一党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系统评论了八十一党会议的进程和斗争情况，确定了中共的四点收获：第一，会议最后达成协议的声明是好的。第二，这次会议揭开了盖子，破除了迷信，表明苏共是可以批评的。过去那种苏共说了算、老子天下第一，只能跟着他指挥棒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深远影响。第三，这次会议锻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在起草委员会的二十六个成员中有七个党是坚定的。在八十一个党裹有十二个党的观点也是比较一致的，除了亚洲的，还加上拉丁美洲的一些党。由于有这样一个队伍的团结斗争，最后把赫鲁晓夫的围攻顶住了、瓦解了。第四，经过这次莫斯科八十一党会议，确立了兄弟党之间协商一致的原则，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独立的、平等的、平起平坐的关系。而且中苏两党之

第六章缓和与霜冻

问还达成一个君子协议，就是对于重大的国际问题，中苏两党一定要在协商一致之后才写到国际会议的共同文件中去。邓小平最后提出，虽然同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斗争还没有完结，但看来通过八十一党会议，一场大斗争可以告一段落了。’

毛泽东对参加八十一党会议所争取到的形势很满意，他说：「这次八十一党会议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浪潮打下去了。我们现在要讲团结，跟苏联、跟社会主义国家，跟兄弟党都要讲团结。就是骂过我们的党，也还是要和它讲团结。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团结—斗争—团结。」刘少奇说：「经过这次斗争过后，最近一个时期的斗争可能会缓和一些。缓和对我们有利，对整饬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都有利，我们应该力争延长缓和的时间。」显然，中国正处于经济极端困难的时候，必须集中精力于国内。过于激烈和寸步不让的行事风格，就像 1960 年那样，肯定是不适当的，会因中苏论战而弱化了更为紧迫的国内问题。

此后，中国主动为缓和关系作出了努力。其端倪可从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中反映出来。这次谈话是在八届九中全会之前的 1960 年 12 月 26 日进行的。起因是契提出向毛泽东祝贺六十七岁寿辰。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威尔逊中心冷战项目主办的《玲战在亚洲》刊发了载有这次谈话的契尔沃年科日记。该日记一直保存于苏联中央档案中，被标为「绝密」。据契尔沃年科记述，谈话开始，毛泽东在接受契的诞辰祝福时，「深为感动」。「他一点没有掩饰自己的情感，用最热烈的言辞表达了他对这种同志式祝愿的感谢」。「他说，在他生日能收到如此高贵的祝贺，是他的荣耀。他要求转告他个人对赫鲁晓夫同志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同志们的谢

吴冷西：《十年论战：社，1999），页中枫—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 445。

上册目北京：中央文献出版上册，页 4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6 必一 历史的变局

意」。随后，毛泽东谈到了他日常的工作情况，特别是卸任国家主席后的生活和主要活动。毛称赞了莫斯科八十一党会议，认为会议开得很成功，「在会议上发生争论和进行讨论，是非常好的事，而不是坏事」。毛还坦率地告诉契尔沃年科，中国现在还存在着相当的困难，特别是正在关注农业问题。为此，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考虑缩短工业战线」。毛在谈话中还提到中国工业的瓶颈问题，承认煤炭工业和运输业都比较紧张，以及这些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契尔沃年科在日记中记述：谈话是在「意想不到」的极为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谈话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一直把我们送到汽车旁。他一边热情地与我们道别，一边再次要求转达他对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的衷心问候」。，契尔沃年科这份日记的价值，主要在于它记录了毛泽东当时对苏联人「意想不到」的亲切态度。两年半以前，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赫鲁晓夫见面时，态度完全是两重天。赫是大党大国领袖，亲自秘密飞中国解释潜艇和联合舰队问题，已是屈尊俯就，高度重视了。但在中南海，他不但遭到毛泽东的斥责，而且据有些书籍披露，赫甚至在游泳池裏还遭到一番戏弄。显然，一党对一党的交往，争论和吵架都是正常的。但不能有失礼的训斥和轻慢。两年半过去，中国国内和苏联对华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毛泽东的态度也出现变化。可以说，毛这次同苏联大使的谈话，是中苏关系出现和缓的一个信号。

之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中苏条约十一周年活动。北京的庆祝活动也扩大了规模。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大会。吴玉章、郭沫若主持和讲话，周恩来、彭真、陈毅、谭震林、薄一波、罗端卿、习仲勋等领导人出席。2月14日晚，陈毅主持1200余人的招待晚宴。陈毅讲话，周恩来祝酒。全国十三个大城市举行了千人庆祝晚会。

3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3期。

第六章缓和与霜冻

249

3月11日，陈毅在中央统战部作报告，主题是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说：「搞好中苏关系，这要提到第一位。去年12月莫斯科

声明发表以后，中苏团结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说：「最近苏联的一些负责人，很强调中国对他们的帮助，我们也要继续强调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经过这一段的争论，中国领导人总结了一条经验：「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这条经验成为此后中苏论战中中方的一条重要策略原则。

一场争论的暂时平息，使赫鲁晓夫有时也感到有必要与中国搞好关系。1961年初，他做出一些姿态，包括局部恢复对中国的经贸关系。2月27日，赫鲁晓夫给毛泽东来信，提出苏方通过贷款形式供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糖的建议。3月n日，周恩来代毛泽东回答苏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话说得很婉转，周说，我们面临粮食供应暂时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动员自己的内部力量，其次利用当前的国际条件，争取以延期付款形式从国际市场再多进口一些粮食，从而把苏联建议提供的粮食留做后备，只在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才向苏联提出粮食贷款的要求。至于以贷款方式进口五十万吨古巴糖的问题，如果苏联国内市场不甚急需，我们拟同意接受这部分援助。

不冷不热，合情合理。中国并不想完全割断中苏经贸关系。中苏双方各派出政府贸易代表团，先在北京，后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4月7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中苏货物交换的协议〉，中方接受了供应五十万吨古巴糖的建议，苏方不再追逼中国偿还欠债，同意「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06月19日，又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8月，苏方又派出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谈1962年的中苏贸易问题。在北京，周恩来接见了苏方代表团；在莫斯科，赫鲁晓夫接见了中方代表团，双方领导人相互转达问候。

4月苏联发射载人宇宙飞船成功，周恩来发电祝贺。6月第二次发射成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发电祝贺·

甲争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中苏关系似乎有了转圜的机会。1961年随苏中友协代表团访华的列·别·杰留辛回忆说：「总之，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造成两

党关系恶化的趋势已经停止，这使人们产生了一线希望，沉闷的乌云将散开，友谊的阳光…… 将重新照耀在苏中两国的大地上。」「但生活辜负了人们的这些希望。」杰留辛感慨地说。中苏经贸关系也没有预想的那样维持在一定水平上。赫鲁晓夫不会对他的鲁莽行为认错，中国再不愿把自己的对外贸易拴在一棵树上。说到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遇东西方冷战白热化之际。中国长时闲处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封锁、禁运之中。中国在政治上实行「一边倒」方针，在经济上也只有从苏联、东欧寻求援助和结成贸易伙伴。起初，苏联「老大哥」也真是慷慨解囊。这对中国来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不用解释。忧从何来？造成了经济上、贸易上、技术上过分依赖，未免受制于人。1959年，中苏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47.9%，如加上东欧几国，那么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三分之二是与苏联集团做的。几乎百分之百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资料都引自苏联、东欧国家。结果，中苏之间一翻脸，苏联一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给中国以致命打击，造成巨大损失，中苏贸易额大幅度减少。1960年下半年苏联甚至趁人之危，向中国逼债，这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决心勒紧裤带还债。到1964年，提前一年还清了苏联的全部贷款，本息共计十四亿新卢布。苏联这一逼，反而起了一个好作用，迫使中国领导人另辟蹊径。本来，这种「一边倒」的贸易、技术格局，也并非完全由环境造成。从西方引进并不是根本不可能。西方人总是要赚钱的。1956年，奥地利就主动向中国推销过氧气顶吹转炉炼钢的新技术，却被中国拒绝了。中国相信了斯大林的话：「现在存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用不看去西方世界找技术。现在，由于中苏贸易的路子走不通，中国向西方开了一个小口子，把贸易重点从苏联、东欧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首先是恢复了1958年中断的中日贸易。1960年8月，周恩来向日本人提出了一个「贸易三原则」，对原来「政经不分」的原则作了一些变通，

矛盾六早双和兴满界

为恢复中日贸易开了绿灯。1962年，用延期付款的方式从日本引进了第一项维尼纶成套设备。此后几年，以同样方式从法国、英国、联邦德国、瑞典、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日本等国引进了六十五项技术设备，用于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轻纺等方面。这也算最早的一次利用外资（资本主义）吧。只是后来，「左」倾思潮再起，引进被迫中断。

二平波之下的涌浪

但后来证明，中苏双方对缓和关系所作的努力，原来只具有表面和策略性质。双方都认为〈莫斯科宣言〉是自己观点的胜利，赫鲁晓夫以为有个〈莫斯科宣言〉就可能把中共管住，使其不再批评苏联的路线。他的缓和关系的上述表示同样出于这个目的。其实在分歧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一纸宣言对哪一方都不会有甚么约束力。实际上赫氏自己就不愿受〈莫斯科宣言〉的约束。会议一结束，他就发表了与〈莫斯科宣言〉观点不同的讲话。

毛泽东并未改变他对苏联领导人已经变修的看法。1961年2月出版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这是根据毛泽东1959年初的提议编辑的。过了两年】时过境迁，但反对「帝、修、反」的初衷并没有改变。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加批语：所谓「鬼」，包括「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实行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等等。他在序言中说：r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 · · 春暖花开了吗？」这实际表明了毛泽东反对r 帝修反」的不妥协的决心。

引起双方关系再度紧张的是，中苏双方都没有停止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争取支持者，这种争夺甚至发展到世界和平理事会、体育联盟等国际组织以及民族民主国家。其中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两国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这个时期，苏联人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在骂中国，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国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其实是指赫鲁晓夫。阿尔巴尼亚，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小党，竟然敢太岁头上动土，反对赫鲁晓夫的路线，站在中共一边。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其一，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同时暗

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是「斯大林分子」，这激怒了霍查等人，愤起防卫。其二，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有世仇，它们对赫鲁晓夫与南斯拉夫调情十分警惕。其三，阿尔巴尼亚北方有南斯拉夫、东方有希腊，都是宿敌，西临大海，孤悬一隅，始终有被吞没的危机感，怎能跟随赫鲁晓夫大唱裁军高调呢？

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弹丸小国的共产党桀惊不驯，恼羞成怒。他说：「他们整个军队都穿我们的包脚布，而他们还在骂我们。」不断向阿施压，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阿的经济面临危局。阿尔巴尼亚转而向中国寻求援助，代表团常来中国。中国坚决地支持了阿党的立场，引为反修知己。中国在自己陷入严重困难之际，仍满足了阿尔巴尼亚的要求。1961年2月签订贷款协议，向阿提供11250万卢布贷款。4月，又签订了向阿供应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专家取代苏联专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分别会见阿代表团。其意义远远超出纯经济援助。对此，赫鲁晓夫十分恼火。1961年5月，苏联撤走了八艘驻扎在阿海岸的苏联潜艇，使阿国防暴露。1962年又把阿从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中赶了出去。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背弃了莫斯科会议上中苏共同批判南共「现代的修正主义」的立场，加紧了苏南关系的改善。1961年3月，两国签订了五年贸易协议；7月，南外长访问了莫斯科。在中共看来，苏联恶化苏阿关系和改善苏南关系都是为了向中共施压和挑战。中国舆论继续开展对「铁托集团」的批判，而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这是在骂他。

还有几件事情，表现出中苏之间很难取得协调。这些不协调之处，主要是在国际性会议的观点争执。首先是裁军。赫鲁晓夫的世界缓和目标极为明显。他从5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推行「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理念。而在中共看来，赫的这一套无异于梦呓。帝国主义的存在，资产阶级的存在，决定了世界范围

第六幸缓和与霜冻

253

的剥削、压迫和侵略，怎么可能有「三无世界」呢？在1961年召开的三个国际群众组织会议上，即在莫斯科的世界工联会议、新德里的亚非团结理事会会议和斯德哥尔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苏联代

表每次都提出，要把裁军、实现「三无世界」作为重要的议题。而中国代表则坚决反对这种「口号」，提出坚决支持各国人民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持各国民族独立运动，支持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而进行的斗争。中国代表团提出，裁军问题不是最重要的议题和所谓压倒性的任务。为了世界和平，必须解决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问题，发展民族经济问题，并应该支持欧美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为改善生活而斗争、反对垄断资本的剥削等等。在这些会议上，中苏两国虽避免正面争论，但都无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只是顾忌双方达成的默契，才没有相互批评。苏方没有采取主动改善关系的行动，中国也没有新的更高姿态。

但是，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中苏双方却陷于「冷战」。1961年3月，苏联领导人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领头通过了一个指名谴责阿尔巴尼亚的决议。同时，苏联军队从阿尔巴尼亚发罗来海军基地撤出，把阿尔巴尼亚暴露在北约组织面前。5月，苏联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8月，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拒绝阿尔巴尼亚代表出席。这个行动在法理上相当于开除了阿尔巴尼亚华约成员国的资格。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方法，即先压服阿尔巴尼亚，然后再有所行动。对此，中共的立场是，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党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但这种支持并不作公开表示，对苏联的行动再做观察。估计苏联会完全破裂同阿的关系。中共需要对事态的发展做进一步观察。

但是，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使表面平静的两党两国关系最终发生恶化，从而逐步走向破裂。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召开二十二大，照例邀请世界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但引人注目地没有邀请阿尔巴尼劳动党。中国派团赴会，团长周恩来、副团长彭真。10月12日，周恩来与同机赴会的越南代表团胡志明、黎笑会谈时指出：这次赴会，一则是去祝贺，二则是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显然周恩来是抱着诚意赴会的。然而，赫鲁晓夫及苏共二十二大的一系列举动，使中共代表团大失所

望。在会上，苏共进一步推出它的新路线，在苏共二十大「三和路线」的基础上，又提出「两全」路线，即认为苏联社会消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成为「全民的国家」，苏共已经成为「全民的党」。在中共看来，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纲领。按照马列主义的正统观点，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党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过，中共代表团认为，只要苏共不强加于人，可以不去理它。

然而，赫鲁晓夫在会上发动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新批判，其激烈程度超过了1956年。会上决议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列宁公墓中移出，并予以焚毁。同时再次批判了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开除莫洛托夫、马林柯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的党籍。这虽然是苏共内部的事，但也有杀鸡给猴看的用意。因为莫洛托夫在维护斯大林和反对「三和」路线方面同中共立场相似。对斯大林「鞭尸」，也有影射中共领袖之意。这对毛泽东刺激很大，毛泽东后来十分警惕「埋藏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竟率领数十个到会祝贺的兄弟党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罪名是阿反对苏共二十大，不反斯大林、党内整肃亲苏分子、对苏不友好、不全文登载苏共二十二大纲领草案等等。这种缺席围攻完全是指桑骂槐，利用阿尔巴尼亚这个靶子，向中国人发难。据说，苏共二十二大筹备期间，在准备党纲报告和政治报告时，「决定不涉及中国问题，不触及中共的特殊立场」，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正式批准的报告稿中也没有提及阿尔巴尼亚问题。然而，赫鲁晓夫独自决定把批阿的内容加进报告，有意挑起争论。对赫鲁晓夫这一举动，连苏联人都感到吃惊，纷纷猜测赫鲁晓夫的动机。有人认为，赫鲁晓夫想检验一下毛泽东和霍查之间关系的稳固程度，也有人认为赫决定给中国人点厉害看看。也有人认为，赫想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河、作、

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这种无法证实的情报，对赫来说，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无论赫鲁晓夫出于甚么动机，他指桑骂槐向中共发难，表明他并不重

视中苏和好。仍在不顾后果实施他「以压促变」的手段，企图按他的条件建立中苏关系。周恩来不得不起而反驳。10月19日，周首先宣读了毛泽东签署的贺词，这已经是例行公事了。紧接看，周发表了讲话，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团结。他说：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由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联结起来的，是在共同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维护这种团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不公平的片面指责，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周恩来的讲话虽有批评，但是和解性的，没有把问题全部捅破。周的讲话，赢得了全场多数人的掌声，但「赫鲁晓夫面红耳赤，表情沉重」，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鼓掌，「全场为之注目」

会下，周恩来与胡志明、金日成等交换意见，提出党际关系三原则：（1）对敌斗争一致，互相支持；（2）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3）保持内部团结，分歧不能向敌人暴露。10月21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献花圈，以示对批斯大林的不满。污良快，苏方就把花圈撤走了。

10月22日，周恩来、彭真与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人进行了长达九小时的会谈，就苏阿关系、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反党集团」等问题详细地阐明了中方的立场。10月23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提前回国，由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留在苏联。周临行前向赫鲁晓夫告别。他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灾荒，这一年我头变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周的告别理由既是实情，也有留有余地之意。中共内紧外松保持了克制。

这时，中共已经认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经不可回头了。1961年

11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向中央及北京市机关一定级别的党内领导干部作了一次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指出赫鲁晓夫及其领导核心，不甘心1960年莫斯科斗争的失败，企图通过这次大会，以其二十大以来的观点，代替两次莫斯科会议的文件，并强加于兄弟党。苏共二十二大在政治上是显然的后退。赫鲁晓夫策略是「指桑骂槐」，桑即阿尔巴尼亚、斯大林、反党集团，槐即中国；是「杀鸡给猴看」，即通过反阿、排阿来威胁其它党，孤立和打击中国。赫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是无条件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不要革命，片面强调战争可以避免，乞求和平。其方针是一切为了大国首脑会议，大国协商解决世界问题。苏共纲领贯穿着和平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讲话对修正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向资产阶级妥协，向帝国主义屈服，不革命。中共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发制人，有理、有利、有节；坚决反对没有阿尔巴尼亚参加的国际会议，反对不了就拒绝出席。提出要对他们随时戒备，提高警惕，更不可信任，严防其突然袭击。或为了达到他们某种利益而笑脸相迎，要作两手准备。

事实上，中共对苏共及赫鲁晓夫的所谓修正主义问题，此时已经有了比较理论化的分析和认识。还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前，苏共中央发表了〈苏共纲领草案〉。这是苏共历史上第三个纲领。作为赫鲁晓夫领导苏联的里程碑，它准备在二十二大上予以通过。在今天看来，这个纲领是一个集「左」倾思想大成的文件。其中最为荒谬之处，是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完全地和彻底地胜利了，这一胜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⁴「根据这一重大的历史判断，纲领规定，苏联人民今后的主

——

4 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页710。

第六章缓和与霜冻

要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使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人类历史的最高水平。纲领说，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意味着：使全国

完全电气化和在这个基础上完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工艺和社会生产组织；使生产过程全盘机械化和愈来愈完全自动化；在国民经济中广泛运用化学；大力发展经济效果高的新的生产部门、新的能源和材料；全面地、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和劳动资源；把科学同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和使科学技术高速度地进步；劳动者要具有高度的文化技术水平。所有这一切将保证苏联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大大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显然，经过了四十余年的「奋斗」，苏联人没能建成「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劳动生产率也远远没有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超过，而且差距愈拉愈大。甚至，苏联人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也放弃掉，转而信仰起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和观念。这真是历史对人们的绝大嘲弄。

问题还不仅于此。苏共的纲领还对「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政治组织」进行了描述，提出了让中共最为不齿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苏共对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解释是：作为全民组织的国家将一直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胜利。同时，作为最先进的、最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国家中仍然保持着。历史的发展导致国家的消亡。要使国家完全消亡，既需要创造国内的条件，即建成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又需要创造国外的条件，即社会主义在国际舞台上取得胜利并得到巩固。」从这个表述看，苏联人似乎并没有那么「傻」，莽撞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立刻消亡国家。理论家们似乎又把纲领的含义往「回」拉，即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国家消亡的内外部条件。但中共领导人还是把矛头对准了这个「冒进」的纲领。

5 《苏联共产党历史》，页 712。6 《苏联共产党历史》，页 714。7 《苏联共产党历史》，页 714。

T 聿'、入井和哄丈' 矛五春！1962 — 196 幻一 历史的变局

1961 年 9 月 15 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他的住处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苏共纲领草案〉问题。会上，代表理论宣传领域发言的陆定一说：〈苏共纲领草案〉反映了赫鲁晓夫这一帮人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阶级分析】要害是反对无

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在世界范围内讲改良主义，讲人道主义，讲「三无世界」，不讲无产阶级革命，有一点西方中产阶级鼓吹世界主义的味道；而在国内问题上，大讲全民党、全民国家，这就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粹，有如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 · 一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一切机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革命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现在苏共在它的〈苏共纲领草案〉裹大讲全民国家，说没有任何阶级冲突了，没有任何阶级斗争了，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苏共纲领大讲全民党，说党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是全体人民的党了，党的阶级性质改变了。这是苏共在理论上的重大背叛，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特别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背叛。”在这次常委会上，毛泽东没有做长篇发言，但有许多插话。这些插话代表了他的某种基本看法：总的估计是，这两年我们的斗争没有能够完全拖住赫鲁晓夫，更谈不上改变他的立场。他是更顽固地坚持他的立场的。看来，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学家，而是一些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的那么一些人· · · · 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9

吴玲西：《十年论战》，上册，页461 吴玲西：《「一年论战」，上册】 页463

第六章缓和与霜冻

不知道毛泽东大讲苏联社会已经分化的材料来自甚么地方。其实，直到苏联解体，苏共党政治局委员一级的官员，工资也仅仅比一般工人高几倍，说不上是两极分化。倒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人对科学家极为尊重，科学家的工资超过中央高级官员的情况是事实。但的确不能因此说，苏联社会正在分化。重要的是，毛泽东这些插话是在〈苏共纲领草案〉发表不久的初步讨论中，但其精神已经具备了后来「九

评」裹某些基本论点的雏形。毛泽东说，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裹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我们要发表赫鲁晓夫这个〈纲领〉，利用这个东西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决为甚么说他们提出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为甚么我们坚持反对他的错误观点。’ ”

几个月后，七千人大会召开。这时，中共领导人已经 r 吃透」了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新纲领。他们对苏共目前的格局和未来走向的看法，已经固定下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说：几年来，世界的形势本来对各国人民、被压迫民族，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很有利的，对帝国主义是很不利的。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产生了修正主义。刘说，到了苏共二十二大，莫斯科型的修正主义已经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体系了。刘说，我们跟修正主义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关于世界革命的路线的分歧。刘还说，现在列宁已经去世，斯大林也去世了，许多列宁和斯大林帮助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分歧、发生叛变呢？有这种可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现在已经分化了。”刘的这个判断显然是相当严重的。同 1960 年底相比，中苏两党关系的性质全然改变。毛泽东也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顶峰就是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10 11

吴冷西，《十年论战》 吴冷西：《十年论战》

上册，页 465 。上册，页 482 — 48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五卷（1962 — 1966 年） 历史的变局

有比较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理论体系，这就是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和赫鲁晓夫所作的报告。这就是他的顶峰，从此就走下坡路了。“显然，经过苏共二十二大，中苏之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而且不可挽回。这种状况在今天看来，是很难用国际共产主义理论的是非来加以判断的。谁对谁错，似乎没有辩论的价值。但是，赫鲁晓夫在中共面前「耍大牌」的作风以及对中国人的不尊重，使他在任之际颇碰了几次钉子。不过，这时，中共对苏共的估计，与苏共对中共的

估计一样，都把它看成是少数人篡夺了领导权，而国家、党、人民没有变。周恩来说：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演化到资本主义不容易，在国内必然会遭到人民愈来愈大的反对，国际上帝国主义也不会轻易买赫鲁晓夫的账，在相当长时间内苏联仍是美帝的主要对手，这种情况，赫不可能采取完全投靠美帝的方式，他要在对等的地位上同美帝妥协。周相信，「历史的发展，这种逆流迟早会被纠正」。由于苏共二十二大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国内干部和群众间也议论纷纷。中共中央决定有步骤地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一次宣传，主要是由周恩来于1961年11月19日在北京向中央及北京市一定级别的干部作了一次报告，并将报告录音分送各省市，听录音的人员严格限制在县委书记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对国内外干部群单，则进行口头宣传，传达中央的观点。《人民日报》有选择地公布了苏阿双方的材料，暂时不作评论。显然，中共对中苏争执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控制了传达范围，暂时忍而不发。11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说：「两个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大敌当前，必须加强团结。」25日，又发出通知强调，「要避免发生一切可能被敌人利用来破坏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事情」。196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及时纠正了各地超越中央限制的过激行为。强调，修正主义一定要反，团结也一定要加强。反修只是反对苏共某些同志的错误，而绝不是反对苏联、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同修正主义斗争也应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12 吴玲西：（十年论战），上册，页489。

第六章缓和与霜冻

261

要求在反修教育中，一律不点苏联、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内部文件一律避免把修正主义同苏联、苏共和赫鲁晓夫联在一起，以免泄漏。中共的这种节制具有策略性，但也与这一时期一种对外战略考虑联系在一起。其主要目的是团结反帝。而且中国必须集中注意力于国内调整，不能把注意力再次引向反修斗争。假若激愤情绪一起，党内别想保持冷静了。

三王稼祥的建议书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引出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的一番建议。说到王稼祥，人们不会陌生。他就是那位曾经跟随王明路线排斥过毛泽东，后来又幡然悔悟，支持毛泽东的著名中共早期领导人。经过延安整风，对「左」倾路线有过痛切反省。大凡遭到过大挫折的人，对人对事都会有一种他人不及的感悟和冷峻。张闻天如此，王稼祥也如此。可惜，张闻天已经被中共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所吞噬。不然，以他的学识和素养，在正常的党内生活中，一定会有很大的理论和战略性贡献。

1962 年上半年，中国可以说处于内外交逼的局面。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又明显地恶化，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鼓噪反攻大陆；美国与日本有「安保条约」的关系，美国在南朝鲜驻有重兵。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当时中国采取的是一种「两条线」的战略，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一切反动派」作为自己的战略口号，其实质是既反美又反苏，不过还是以美为主要对手。在反帝和世界革命问题上实行激进政策，承担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

262

甲群人氏共和国史· 第五卷（1962 — 1966 年的变局）

王稼祥认为，面对国内外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的局面。1962 年上半年，他在内部小范围中，几次谈了他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对调整对外方针的意见。2 月 27 日，他征得中联部党委的同意，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五月会议」上，王稼祥又对国际问题作了发言。二十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王稼祥选集》，收录了他 60 年代初的六篇文稿。其中尤以〈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两文提出了大胆的观点和主张：在世界战争问题上，王稼祥在批判了赫鲁晓夫片面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观点的同时，也试图纠正中国党内片面认为世界战争注定不可避免的观点。他提出：「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

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地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看防止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是「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实现持久和平」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王稼祥批评了中国党内存在的「左」的观点。他说：「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在和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他指出，和平运动「具有广泛性，包括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那些仅仅害怕战争灾难的普通的人们，和平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群众的觉悟，采取为群众所能接受的各种方式来进行斗争。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对和平运动要予以适当的估价和支持，并进行某种合作。

「和平运动应该同情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又「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并且「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

第六 韦缓和兴写冻

王稼祥向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提出的建议，其主要观点有四条：第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的声明，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这种政策的任务是保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争取有利条件加快建设速度。第二，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第三，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当前要注意避免把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对中印边境问题，要设法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的民族敌人了；对苏联的斗争，要高度警惕赫鲁

晓夫居心不良和力图孤立中国)甚至不惜同我们分裂。第四,关于我国的对外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我国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和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地方甚至还要适当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事先讲明,以免被动」这些言论和主张,在当时堪称空谷足音。这是又一次冒险陈词。王稼祥的上述思想显然在中联部管辖的群众团体外事活动中发生了影响。王稼祥明确地把〈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作为中国出席国际群众团体会议时,在遇到有关国际问题的争论时的发言依据。1962年7月,由著名作家茅盾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这是苏联主导的一个群单性国际会议。茅盾奉命在会上采取了同苏联完全一致的立场。7月9日,茅盾在裁军大会上的发言,其口径依然是两句话:一句是中国支持裁军;一句是不要轻信美帝裁军的诚意,应当立足于斗争。但其基调则是强调第一句话,表达了中国希望和平和缓和的愿望。他说:「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就流行一句有名的格言『和为贵。』」他说:「我们这一生对于和平生活的渴望,正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如大旱之望云霓。』」他说:中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和平竞赛,各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中国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不诉诸武力,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他说:中国始终不渝地把中苏友好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当作自己的最高国际义务等等。中国代表团采取的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做法,使得苏联人喜出望外,苏联控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甚至为此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王稼祥的上述建议究竟在中央的决策层面上发生怎样的影响?这个建议是否得到中央常委们的支持,现在都还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证实。但可以肯定,像莫斯科裁军会议上的讲话,决不会是王稼祥或中联部的擅权。1962年初,印度尼西亚、越南、英国、瑞典和新西兰

等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苏共中央 2 月 22 日给中共中央来信，表示支持这个建议，并且建议「放弃容易激化不能消除我们分歧的公开声明」。4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覆信中，建议结束公开争论，强调「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中共中央主张首先进行党与党之间双边会谈和多边会谈，苏联应带头恢复与阿尔巴尼亚的正常关系，以此作为召开国际会议的初步措施。当时，双方虽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事实上，整个春夏两季中苏之间的公开争论停止了。显然裁军会议上采取的做法，与 4 月中共中央覆信中有关。

事实上，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如刘少奇已经看到，要团结反帝，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就不能不包括「修正主义者」。因为按当时的看法和标准，没有变修的党只是寥寥几个了。6 月 27 日，刘少奇与邓小平、彭真等会见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团团长卡博时，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

我们要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其中包括真正的共产党员、革命者、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也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要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那就只能团结极少数的人。如果包括修正主义者，团结就不能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目前，国际

第六章缓和与霜冻 265 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如果要包括多数党，包括所有的党，就只能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一致，不能在所有问题上的一致。求同存异，不同意的就不写在文件上，实际上，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带有某种程度的统一战线的性质。

说到缩减对外援助，就涉及到整个对外战略问题。事实上，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就郑重承诺了对亚非拉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反帝反殖，把亚非拉人民的斗争看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军。60 年代，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反帝反修战略。这时，对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有了新的内容：主要对美，其次对苏，即与「修正主义者」争夺对世界革命的领导权。

所谓支持，不能只是说空话，还要物质援助。认为中国有国际义务，援助其它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举国一致的。但是，当时许诺承

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能力。1962年初承诺的外援竟达69亿多元。其中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占80%，它们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等；另外是对亚非拉国家，占20%，有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锡兰、也门、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古巴、缅甸、老挝、马里、加纳、叙利亚、索马里等国。其中主要有三个国家，一是阿尔巴尼亚，这是反修同志；二是越南，处在反美前线，直到1965年初之前，中国在援越抗美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三是阿尔及利亚，长期进行抗法武装斗争。！1960年底，正当中国处于严重灾荒之时，中国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1961年援阿的负担愈来愈重，中国正值最困难时期，周恩来都感到难以完全满足对方的要求。

12月25日，周恩来同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谈援阿问题。他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是，由于我国连续遇到三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遇到了极大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说：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我们必须勇于承担国际义务，同时又要

26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49—1966）——历史的变局

实事求是。勇于承担，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这是我们的志气，我们的义务；实事求是，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甚么都行了。由此，我们知道，王稼祥关于「不要乱开支票」的话，与周恩来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精神是一致的。或许他正是受到了周讲话的鼓励才提出了这条建议。然而，王稼祥的建议在整体上难于为当时多数人接受。在「帝修反联合反华」的形势下，提出「缓和」建议，这不是「动摇」吗？当毛泽东得知中国代表团在裁军会议上的表现后，十分吃惊和恼火。北戴河会议上，王稼祥受到严厉批评，被概括为实行「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反动派和，对革命斗争支持少）的路线。从此，他实际上不再主持中联部工作了。1988年，张香山着文说：「野心家

康生的鼻子是很灵的，当他嗅到王稼祥意见未被采纳的事情后，就乘机咬使和鼓动一些人公开进行反对。」张文说，「三和一少」是康生提出来的。其实在当时，在反帝反修问题上有一股同仇敌忾之气。「紧张」，而不是「缓和」，更能为党内所接受。当然，关键取决于毛泽东的态度。

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既是明显的又是隐忍的。明显的方面在于，中共已经形成了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固定看法，甚至可以说，是已经把问题看死了：不再怀疑问题的性质，不再抱有希望，不再期待转变。特别是在理论上，中国人认为，修正主义一词的使用，已经有了事实根据。仿佛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再现了一样，在当代它又延续了开来。由此，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而在另一方面，同苏联关系的完全破裂又没到火候。如果现在就破裂，对国家和世界革命都不利。因此，两党两国的关系被暂时地维持着。但是，脓包终究要被捅破。在中苏两党和两国的领导人中，当时的选择竟然都是斗争到底。于是）中苏之间，似乎注定要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义愤易来，理性难得。这种敌对事实上对中国和苏联的历史影响都是巨大的。只是这种影响当时人还没看出来。

第七章

重提阶级斗争

自1949年以来，在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央全会，曾多次改写了党的发展轨迹。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就是改变当代中国历史轨迹的一次重要全会。值得指出的是，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路线，是以一种难以理解、有些「不期然而至」的特殊面孔突然到来的。此前，全党正实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这个调整方针或路线，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意见，并经毛泽东首肯的。可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在2月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即离开北京，他分两次在南方巡视和居住了三个半月，一直没有领导调整的进行。7月6日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即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以重提阶级斗争的思路，改

变了国家政治走向。八届十中全会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直接引导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使中国政治向极左方向行走了十六年。一何来忧患？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至7月6日这半年时间，毛泽东一直呆在外地，从武汉到上海，再到杭州，游历名山大川，按他自己的话说，
中华人民兵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当了一回徐霞客」。然而，毛泽东决非真的超然物外，寄情山水。他对经济建设失去兴趣之后，注意力转到了阶级斗争问题上，密切地关注看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1962年上半年，国际环境的确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西边有印度尼西亚的边境肇事，东边有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蠢动，北边中苏边境也不安宁。在毛泽东看来出现了「帝修反联合反华」的逆流。对于这些外敌滋扰，毛泽东应付裕如，并不感到有大的压力。他甚至认为这不无好处。5月31日，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有点敌人捣乱比较好，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还有一说：『多难兴邦。到

毛泽东更为关注的当然是「修正主义」。对于中苏之间的分歧，毛泽东一直把自己的观点视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捍卫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利益的原则问题，决无妥协的余地。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矛盾进一步加剧，毛泽东对苏联乃至国际上修正主义问题估计更加严重了。

诗言志。这个时期，毛泽东写了多首带有浓烈反修色彩的诗词，以表达心迹。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和郭沫若七律一首：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般为鬼域佑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练姣雾又重来。

12月，毛泽东步宋代大诗人陆游原词，「反其意而用之」，作「卜算子·咏梅」一首，27日，亲自批示内部印发。词曰：

风雨送春归，风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渴望战斗，渴望有千钧之棒，澄清宇内，尽扫阴霾，他盼望严冬过后，尽绽春蕾。只是因为国内深陷困局，才暂时隐忍不发。

第七幸重提阶级斗争

尽管在当时世界的几十个共产党中，中共的观点并不被多数政党所褒受，毛泽东却不感到孤立。他抱有真理必胜的坚定信念。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按：此段话为1966年重新修改毛的七千人大会讲话时新添的。前章已经做了说明）

苏联变修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那么中国呢，有没有这种危险？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是点了一个题目：「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裏吸取教训。」后来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谈起这一次讲话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查毛泽东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并没有他同卡博讲的这段话。也许记忆混淆了。但警告之意却是明显的，只是当时大家的心思都用到纠正错误上了，没有注意毛泽东的暗示。反修问题并不是七千人大会的主题。

从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到国内防止「修正主义」，这似乎是顺理成章和不可避免的延伸。早在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的谈话中就说：「我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去年夏季向党进攻。我们批评了他，他失败了。跟他走的有七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连他自己八个」。从此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等同了起来。七千人大会虽然微妙，但毛泽东是以满意的心情结束大270 申争人民共和国史· 第五春（1962 — 196 到— 历史的变局会的。通过大会，在形势如此危难的时刻，他的威望反而更高了。唯一使他不能释怀的，是党内对形势和困难的估计，对三面红旗的评价，都出现了并不符合他看法的分歧。毛泽东是带着某种不安离开京城的。

然而，从西楼会议到五月会议，刘少奇、陈云、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常委们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重了。刘少奇甚至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怕讲漆黑一团。周恩来讲农业恢复至少五年。陈云讲五年内只能讲调整，不能讲发展。这还有甚么希望呢，还有甚么总路线、大跃进呢？究竟是光明还是黑暗？毛泽东在周游「列国」时，频繁地把各路诸侯找来谈话，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题目。各省市负责人、各大区负责人都对毛泽东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地方官员说这话时，有的也许是顺着毛泽东的话说，有的则发自内心。他们感到讲困难没有劲，有些人总是等待出现新跃进，对于地方所属企业的「关停并转」难以割舍。对调整措施还存在一股抵触情绪。毛泽东从外地得到支持，更加强了他对中央一线的不满。如果单是对困难形势的不同估计，那只是工作上的分歧，问题是毛泽东从中看出了政治问题。他后来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8月11日）他说：「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8月9日）还有包产到户，毛泽东从来把它等同于单干。农民和基层干部中有主张「单干」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党内有一股「单干风」，愈到上层愈厉害。邓子恢、田家英、陈云都主张包产到户，刘少奇竟然不加阻止，毛泽东甚为不满，这不是遇到困难就动摇，丧失信心吗？问题还不止这些。还有甄别平反，彭德怀竟写了八万言的信。这封信由杨尚昆转给了邓小平，毛泽东刚回北京，邓小平就转给毛泽东，并将此事报告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提出彭德怀问题是否应该给予甄别处

理。刘少奇和周恩来当时都没有表态。在一次领导人会面时，刘少奇、周恩来向毛泽东说到彭德怀问题，毛泽东显得很不高兴。他

第七章重提阶级斗争

说「洋洋八万言书，我看了，已请中央办公厅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见此状，不便多言。毛泽东认为，彭德怀要翻案！

毛泽东感到了压力，感到了挑战，感到了威胁。不仅是对他本人，也是对他的路线】对他的社会主义模式。现在，国内最困难的时期真的过去了，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好转，他要发动反击，扭转这种局面了。困难时期潜伏的分歧迅速公开化。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是同意进行调整的，但前提是：必须首先肯定 1958 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不容许有甚么触动；对前几年所犯错误的分析，对困难的分析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必须与之合拍。西楼会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使调整工作大大深入了一步，在某些方面触动了这个大前提。因而，毛泽东就要出来干预和纠正了。

二「东临碣石有遗篇」

1962 年有两个会议给历史留下深刻痕迹：一个是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一个是秋天的八届十中全会。两次会议恰好代表了共和国建设史上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前者继承了中央八大的稳健的路线，它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唱主角，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赞同的。后者继续着反右派、r 大跃进」、反右倾的一种「左」倾趋向。它以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为转折，刘少奇等人虽有不同观点，也不得不放弃己见，追随毛的思路。

所谓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由一连串会议组成：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8 月 26 日至 9 月 23 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9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三个会议前后一贯，所以，毛泽东在全会第一天说，这次会议实际上已经开了两个月。

转折是在 7 至 8 月北戴河会议上出现的。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是 5 月份就确定了的。当时确定会议是研究调整和恢复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春（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7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确定了四项议题：农村工作问题；粮食问题；商业问题；国家支持农业问题。周恩来等正是根据这些议题准备文件的。包括〈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7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50年代以来，北戴河成为中共中央夏季召开会议的首选地点。这次北戴河会议开始的十天，按原定计划讨论上述三个文件。大家并没有感到有甚么异常。尽管涉及到「包产到户」问题，并不把它看得很严重。

毛泽东开始是批文件，「甩石头」。8月2日，他把安徽太湖县钱能让保荐责任田的信印发大会。同日，他又将两份反映南斯拉夫经济混乱的报导批给到会者，他写道：「请大家讨论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还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好。JS月5日，毛泽东先在华东组、华中组会议上吹风。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一上来就撇开工作问题，专讲阶级、形势、矛盾，给大会出题目。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的国家是否也适应？关于形势问题，他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甚么经验？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关于矛盾问题，他说：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又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要不要？r包产到户J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之风，愈到上层愈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

第七章重提阶级斗争

273

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毛泽东这篇讲话一出，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关于对「一片黑暗」的批评，对「包产到户」的批评，明显地是针对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是针对在一线的中央常委们的。而且他把党内分歧有意与苏共的「两全」路线联紧起来，把「包产到户」与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这就使对方难以分辩了。

随后，毛泽东又在8月9、11、13、15、17、加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讲话中的观点。所谓中心小组，是会议开始时由刘少奇提议成立的，便于集中讨论和决策。中心小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陆定一、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陈毅、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陶铸、李雪峰、刘澜涛组成，共二十四人。林彪没有到会。陈云到了北戴河，因为腹泻，写信给邓小平并转毛泽东，说明身体状况不好，向中央请假，得到毛泽东同意。中心小组实际上只有二十二二人。

8月9日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多次批评以后，刘少奇不得不就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估计的说法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8月11日，刘少奇说：「五月会议我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一是说1962年夏收减产已成定局，一是说单干在全国估计已占20%。」毛泽东插话「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精减两千万人，减少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这些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8月15日，李富春发言解释说：「五月会议提出争取快，准备慢，问题是有些同志把重点放在准备慢上了」毛泽东插话说：「『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灵；慢了，后一句灵。」8月17日，周恩来发言说：「过去

一个时期，我们把困难说得更多了一些，这对党内发生消极影响。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

27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79）—历史的变局
措施，但使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然而，他同时例举了大量事例，说明自七千人大会以来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都很努力，没有泄气，想方设法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务，而且措施得力，见效也快，效果比预期的好。要肯定成绩。周恩来实际上委婉地回答了对「黑暗风」的批评。

然而，毛泽东的话得到了一些人的附和。8月13日中心小组会上，一位军队负责人说：「农业恢复的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有甚么搞头。」谭震林也不赞成说农业的恢复要五年。他说：r实际上，『五风』纠正了，搞了〈十二条〉、〈六十条〉，恢复就会很快，只要两年就达到1957年3700亿斤的水平。」毛泽东插话说：「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主要是今明两年，64年扫尾。」有人在小组会上说：「大跃进的形势，肯定会要很快重新到来的。」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人说：「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不是恢复问题，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都不是个恢复问题。」有的说：「『三面红旗』究竟打不打？现在似乎理不直、气不壮了。」有的说：「大跃进似乎很难开口了，简直就不好提了。」有的说：「现在似乎总路线不好讲了，大跃进也不能讲了，成绩不能讲了，一讲成绩就受讽刺。」「说光明就感到有压力。」有人批评说：「现在是越低越好，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越黑暗越好，把大跃进说得越不象话越好，越松劲、越单干越好。」与七千人大会完全相反，会议迅速「左」转，大家很快跟上了毛泽东。形势刚刚有所好转，许多人又按捺不住，跃跃欲试了。

邓子恢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所谓「黑暗风」带来的「后果」，「证据」之一是造成人们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丧失信心，主张r单干」。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为大家描述了一幅「单干」引起两极分化的可怕图景。8月5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

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8月9日，毛泽东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份，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第七韦重提阶级斗争

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单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批判「单干风」，邓子恢成了重点。会上，他夏天的几次报告成了批判的靶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邓子恢只好检讨。8月11日，他在中心小组会上声明：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包产到户主张是不正确的。然而，邓子恢的这个声明并不能抵挡来势凶猛的批评浪潮。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下长篇按语，印发大会。他写道：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邓子恢同志在1962年8月n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紧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邓子恢上年获得的两次表扬一笔勾销了。老账新账一起算，邓子恢又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会上一边倒，原来赞成或容忍过包产到户的人转变立场，参加到对包产到户的讨伐之中。这场批判一直延续到移师北京的预备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所有人都表态批评了邓子恢。

9月25日，董必武在全会讲话中说到「单干风」时，毛泽东又插话：「邓子恢同志曾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甚么谈话，是受他的训。」他批

评说：「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同志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随后，中央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事实上不再任用。会上，毛泽东问：「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子恢同志还跟别的同志谈了没有？」这是在将#1j 少奇的军。刘少奇、周恩来不得不进行解释。毛泽东反复讲：「建议可以，但不能采纳。」话中隐含着对刘少奇没有抵制包产到户的不满。幸好，他还不知道刘少奇曾让田家英转告他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在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田家英 60 % 的包产到户、40 % 搞集体的主张。田独自承担了这个压力。

批「单干风」，也含有批陈云之意。更何况批「黑暗风」陈云更是「在责难逃」。但会上毛泽东始终没有点陈云的名。或许他认为这样做动作太大；或者他对陈云的经济才干不愿一棍子打死。会后他这样说：「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尽管如此，八届十中全会后，陈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几乎成了定论。他的政治处境日益困难，从此被打入冷宫，不再重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东。批判「翻案风」，是北戴河会议的一场「重头戏」。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多次讲话、插话，批评彭德怀要翻案。8月5日，他同柯庆施等人谈话。柯庆施说：「《海瑞罢官》影射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不服气，要翻案。」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接着，他又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在这之前，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早就嗅出《海瑞罢官》中的「阴谋」当面向毛泽东告状，要批判《海瑞罢官》。毛虽未置可否，但对党内外有人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越发警觉起来。

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8月13日，毛又说：「我们只坚决反对背后捣鬼的，不怕搞阳谋的。」这时，大会的注意力集中到批邓子恢身上了，批彭还未形成高潮。谁想到彭德怀自己的第二封信，恰好提供了批判的靶子。彭德怀没有参加北戴河

会议，也许他还不知道北戴河会议的风向已转，对 1962 年的全面平反还抱有一线希望。8 月 22 日，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

第七章重提阶级门争

277

国外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他写道，「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彭的这封信递上去，引来了与会者激烈的声讨。一些人立即提出，这是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

这时北戴河即将结束，多数与会者移师北京继续参加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8 月 26 日，预备会议开始。9 月 3 日，毛泽东召集小范围会议，布置要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全会各小组会上讨论。此后，一次新的批彭浪潮掀起。与 1959 年庐山会议不同的是，这次是背靠背批判，彭德怀接到通知，不准其参加八届十中全会，也不准其国庆节上天安门。批判一直到全会结束，大组发言、小组发言都充满了火药味，其声势不亚于 1959 年。当时陈伯达的一篇发言，颇能代表会议的气氛。陈伯达说：r 今年 6 月间，彭德怀又来了一封八万字的不知羞耻自我吹嘘的长信，在信中对他自己和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活动，裹通外国的活动，全部翻案，全部猖狂进攻。到了 8 月 22 日，他又来了一封卑鄙下流的信。总之，他是要来干扰我们的，不来干扰他是不甘心的。j 陈伯达还从「理论」高度论证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出现张邦昌、石敬瑭。」陈伯达骂彭德怀「不知羞耻」，「卑鄙下流」，而这种漫骂竟成为时髦而无人制止，使中共党内对落难同志的落井下石、袖手旁观之风越加盛行起来。有了陈伯达的肆无忌惮，批判于是堕落为漫骂。许多人也开始了不讲理的批判。彭德怀又被戴上了许多新的罪名。如说彭写此信是 1962 年夏天刮的「翻案」阴风，是配合 r 三尼」（当时把肯尼迪、尼基塔·赫鲁晓夫、尼赫鲁和铁托简称为「三尼一铁公司」）反华，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新的进攻，一百多页信纸裹面埋的是「炸弹」，是反党纲领；说彭一贯反对毛泽东，一贯支持、执行错误路线，是「野心家、阴谋

家」；说不但是彭高联盟，而且在六届五中全会，彭就被选为中央委员，认识了王明，’因而，中国的反党集团，不是一个小集团，而是大集团；说彭参加革命是来「入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极端个人主义，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在历史上屡犯错误；说彭是「裹通外国」，是「国

甲带入氏矢和闯丈’弟五惑 {1962 — 1965 } — 历炙的变狗
际反动别动队」。就这样，发言者都把「信」上升到敌对分子搞篡党夺权阴谋的高度去批判。受彭德怀案牵连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等，也都一一检讨和受到批评。恰在这时，党内意识形态的「监察官」康生，又有了新的施展「才艺」的机会。他从一篇小说中发现了一个反党「大阴谋」。这就是著名的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之案。《刘志丹》是一部歌颂陕北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刘志丹的历史小说。作者李建彤，是刘志丹之弟刘景范的夫人。作者1956年应工人出版社之约而写。小说初稿写出来以后，作者请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审阅。习当年担任过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战友。习认为小说没有写好，于1960年春天，两次约作者谈话，指出：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的整个时代去写，要体现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习特别提醒：不要写高岗。1962年夏，作者改出小说上部，工人出版社准备出版，一面印成送审样书送审，一面交《工人日报》于1962年7月28日至8月4日连载发表，《中国青年》杂志也予刊载。小说得到了一些陕北老干部的支持。但同为陕北红军干部、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或者出于历史上的恩怨，或者出于对政治斗争的敏锐，反对出版这本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8月24日，康生给杨尚昆写信，说他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但他断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1962年9月8日，预备会议上各组已开始批彭两三天，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他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

写的(后来又说是「第一作者」)) r 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甚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 72 号」简报上注销，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于是，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9 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彭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

第七章重提阶级斗争

279

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按当时的逻辑，写刘志丹就是写陕北，写陕北就是写高岗，而高岗与彭德怀早已结成反党联盟，习仲勋又是西北野战军的政委，彭德怀的老搭档。如此这般，「高彭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就成立了。从一本小说中发现蛛丝马迹，抓出一个「反党集团」。康生延安整风时捕风捉影罗织罪名的熟练手段又派上了用场，而且这仅仅是开始。9 月 24 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9 月 27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审查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个项目组。习仲勋项目组由二十人组成，康生任主任。从此，开始了对小说《刘志丹》案的先定性、后求证的漫长的审查过程。一大批原西北根据地的干部和与小说《刘志丹》有些瓜葛的人都在劫难逃，「文革」中饱受牢狱之苦。后来，斗争焦点几经转移，习案早已淡化。1974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亲自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刘景范等人才得以走出牢狱，然而结论仍旧。直到 1980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才为习仲勋等人彻底平了反。因文艺作品而获罪，《刘志丹》不是第一部。然而，自从「利用小说反党」的观点一出，文化领域就在劫难逃了。此后，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屡屡爆出，其源头盖出于此。

除去彭德怀和《刘志丹》，还有一件属于「翻案风」的案子也令毛泽东大为震怒。事情缘起于1962年六七月间，国家机关党委曾向几个单位分别布置了个别右派的甄别试点工作，由于各种原因，对这些右派的甄别试点，有的没有进行，有的刚刚开了个头，或者只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就停止了。国家机关党委布置对个别右派的甄别，是有文件精神根据的。1962年7月26日中央统战部拟就的〈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历史的变局（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曾规定「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中央统战部当时拟订这个文件，显然是适应着政治关系调整的。在大部右派分子已经给予摘帽处理的形势下，个别确实搞错的右派分子给予甄别平反，显然是应该的。特别是民主党派内和党内有影响人士中的右派，他们的甄别应该更为宽松才对。

国家机关试图对个别右派分子进行甄别一事，由9月24日编印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登载出来。这则消息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于9月29日做出批示。批示以极为严厉语言和非常憎恶的态度说到：「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敏感的毛泽东，立即把这件小范围并未真正实行的举动，同6、7月份中央一线领导的调整联接起来，从而再次坐实了确有「翻案风」的存在。「猖狂之至」一语，已经不像同志之间的批评了，它几乎是在痛斥和「臭骂」。这表明了毛泽东的愤怒态度。毫无疑问，这件不幸的事情，对毛泽东形成自己关于1962年阶级斗争的概念，起了加固的作用。

三 [警钟长鸣]

8月26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移回北京继续开，是为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而无论在哪裹开，会议的气氛愈来愈热，揭发的问题也愈来愈多。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200。

第七章重提阶级斗争

281

王稼祥的「三和一少」问题提出来了。9月14日，陈毅在华东组发言。陈毅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所以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的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意志不坚定的人吓昏了。毛泽东十分赞同陈毅的发言，把登有这篇讲话的简报批给江青阅：「可看，很好。」

陈毅批评了王稼祥的观点，然而，他自己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也受到了攻击。8月9日，有人就在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会上质问：「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8月13日，又有人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不能资产阶级还存在，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毛泽东插话：「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9月11日，陈毅在预备会议对他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作解释。邓小平接过话茬，说：「陈总讲的是对的。」毛泽东不同意，他对陈毅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毛泽东的这些插话，联系到他关于「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话，表露出他对知识界的高度不信任。问题还不在于对知识分子的不放心，问题在于怎么会有这样的政策？8月10日和12日，毛泽东连续写了两个批语，批评「封锁消息」、r搞

独立王国」。8月10日的批语严厉地批评：「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

「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8月12日，
282

甲季入氏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他又批评：「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联接到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人们强烈感到，这里讲的「封锁消息」、「独立王国」决不只是指中组部、外交部等具体部门。不过，经过从北戴河会议到预备会议，方向终于被扭转了，形势也被扭转了。而旗帜就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开会的第二天，毛泽东从容地阐述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路线。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老干部要好好研究，要在中层干部、基层干部、特别是青年人中进行教育，我们必须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大会就讲，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虽然包括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包括地富反坏、资产阶级等等，但他的主要注意力显然不在这里。他认为：反革命有是有，已不很多，无非是「一个游鱼三个浪」。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党内，甚至放在上层出修正主义问题上。早在8月13日，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一定会出马列主义。按辩证法，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它的反面。」9月24日，毛泽东说：「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薄一波回忆说：「实际上，他在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看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即党内认识分歧）说的。」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经过他反复修改，写进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从而兀森了全党的路线。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

第七常会从增级斗争

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有一部分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会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阶级斗争的弦重新绷紧，「反修」的警钟从此敲响，中国从此走上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不归路。

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批判「三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处在一线的中央常委都脱不了干系；尤其是刘少奇。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些话就已使人感到刺激。后来主持中央工作，又出现了「三风」。还有，他1939年在延安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于1962年8月1日由《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这是经过他亲自补充和修订的。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每个共产党员人手一册，发行量竟超过了《毛泽东选集》。一段时间《修养》对共产党员的影响竟可与毛泽东的「老三篇」相比美。也许有感于「大跃进」以来党员干部水平低下，希望以此来增强党员的自身修养。但此时此地重新发行，难道不怕树大招风吗？还有，《论共产党员修养》中有这样一段话：「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谓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

报答他的衷心和热情。」但凡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段话当年是针对王明的。从刘少奇的思想 and 修养而言，他决不可能有其它用意。然而，在那种敏感时期，很难不引起一些人的联想，以后的事态表明，《论共产党员修养》最终没有逃脱「左派」们鹰一般的眼睛。不过，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始终没有点名批评刘少奇，也没有点其它常委的名。显然毛泽东虽有不满，但还不至于问题有那么严重。全会在人事上只动了一个不算太大的手术。刘少奇和中央常委们作自我批评，尽力跟上毛泽东的思绪，在这个前提下谋求对阶级斗争作一些约束，使正在进行的调整工作得以继续。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后，陈伯达、李先念、董必武、薄一波、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柯庆施、刘澜涛、李富春、彭真等先后在会上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9月26日，全会最后一天，刘少奇的讲话和毛泽东的大段大段的插话，给人一个印象：似乎两个主席的认识又取得了一致。刘少奇说：「赞成毛泽东的讲话。我们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直是比较顺利的，但到1959年、1960年，因为受到天灾和我们工作中有错误，算是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困难。问题是采取甚么态度。我们在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泽东、党中央革命的道路，继续胜利前进。这是大多数同志的态度。」「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这是邓子恢同志的态度。」毛泽东此时插话道：「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方式，实际上就是单干。」刘说：「除邓以外，还有许多人向中央写信，主张单干，邓是代表。」刘回避了陈云等人的意见。接着，刘又说：「第三种，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马列主义领导，这就是彭德怀、习仲勋的态度。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的态度。」毛在这裹又插话说：「第二种是不懂马列主义，是属于认识上的，过几年一看好些，就改了，他当时没有想到全局和前途，没有想到国际国内关系。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四大

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当时在颐年堂就批评过邓老。」刘说：「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社会主义大农业才能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农业才能过关。邓老主张单干，就是违背了最重要的两条，因此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很

第七章重提阶级斗争

285

清楚的，是一枝毒草。」毛又插话说：「可以建议，但不能采纳。有的地方开一次会赞成单干，但在执行半年以后，开一次辩论会，过去如何，将来如何，四属五保户如何，没有可能一家一头牛，就又不赞成单干。」刘说：「宣传单干优越性，肯定是毒草。如果党领导单干，党就要变质了，就不是共产党。」

1J 少奇讲到这裏，又回到对困难的認識。他说：「现在我们的困难到底有多大？就是如此而已。大家都经过了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开始好转，应该继续前进，要坚持革命的道路，但宣传还要注意一点，还要讲有困难的。」刘说：「今年五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了一些。如果采取第一种态度，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就没有甚么问题；如果采取第二种态度，估计困难太多，就会动摇社会主义的信心，丧失前途，那就有很大的坏的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巩固，单干风大，实际单干不多，并不严重，只有安徽、甘肃多一些。已经单干了的，可以重新组织起来的。这股单干风要打下去。」毛在这裏插话说：「有一家就一家，几家就几家，十家有三家、五家、七家愿意的就组织起来。不愿意来的就不来，也不要骂他们是走台湾的道路，但要说他们方向是不正确的。将来要来还可以来，现在不要闻风而来。散的很多地方，如安徽，分二年、三年、分期分批组织起来，先说服愿意的组织起来，一年增加一些。」刘接看说：「第三种态度，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进攻的是反动的。他们希望我们犯错误，对我们的困难幸灾乐祸。彭、高、习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甚么纲领，有时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在七千人大会上，我说彭的信从表面上看来有些是符合事实的，他就说不是反党纲领。是纲领，纲领不能一点

事实也没有呀！有部分符合事实的，才能迷惑人。这次信也是迷惑人，开始有些人认为问题没有那么大。」毛插话说：「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刘说：「《刘志丹》八十万言书也是纲领。」毛说：「布哈林只有一句话——发财吧！」接着，刘少奇的讲话又转到阶级斗争的反修理论上。他引用了毛泽东在1957年〈正处〉报告中讲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一段话。接着批评了斯大林在1935年说已经解决的话，「这是不正确的，同列宁讲的不符合。」毛插话说：「与列宁说的相反。」刘接着说：「两条道路的问题未最后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插话说：「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又出了赫鲁晓夫。现在看起来，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我经常这样想，要经过反复。」刘说：「斯大林在集体化以后讲谁战胜谁的问题国内解决了，国际未解决。在这里还是主席讲得对。」毛插话说：「我是根据列宁的说法。列宁有预见，他是在1924年死的，革命胜利后他有七年的实际经验。」刘说：「斯大林不对，麻痹了自己。」毛插话说：「后头又出了反革命，惊惶失措，杀了很多人，有些应该杀，有些不该杀，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刘说：「谁胜谁负要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苏联、南斯拉夫、东欧的经验都证明了，我们要接受教训。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形式上可能不同了。」毛插话说：「彭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刘说：「谁胜谁负问题还未最后解决，」毛插话说：「至少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刘少奇：「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我们要准备五代到十代，我们算第一代，共一百年到二百年。」从这段几乎是刘少奇与毛泽东对谈式的讲话看，刘少奇的思想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轨道上，回到了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上。而全党也都心服口服地接受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解释和对反修防修的警告。大家都讲阶级斗争，都讲反修防修。然而，阶级斗争这把达摩克利斯利刃究竟会落在谁的头上呢？

屡遭挫折的田家英，书生忧患重上心头。梅行回忆说：在北戴河会议

期间，有天晚上，我到他的住所去，一直谈到天色微明。他忧虑重重，深怕又出现第一次庐山会议的局面，使全国的经济和政治再一次掉进深渊。我们谈到群众生活面临的苦难，谈到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也谈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有时变幻莫测，令人心悸。聊以宽慰的是，毛泽东赞同了刘少奇的建议：阶级斗争不要影响工作。刘少奇说：「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反党集团实际上是几支反党别动队，人数不多，用不看全党去对付，我们工作不要受干扰，由少数人对付他们。对国际修正主义也要组织少数人去斗争，大多数人做好工作，我行我素。对全党干部进行教育，讨论一下是必须的。庐山会议上过当。」毛泽东同意说：「高级干部十几万人，十七级以上讨论一下，不要卷入这个斗争。」这毕竟说明，殷鉴不远。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一哄而起反右倾，结果闹出一个全国性的大饥荒。毛泽东曾为之后悔不迭。这时老百姓刚刚吃上几顿饱饭，如果再来一次一哄而起，后果将不堪设想。毛泽东自己在9月24日的讲话中也讲到：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当天下午，在陈伯达发言时，毛又插话说：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1959年下半年、1960年差不多整了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际国内发生甚么事，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甚么好大的事。

阶级斗争不能干扰工作，这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共同商定的。前一天（9月25日）周恩来在大会讲话，明确地说：阶级斗争，如彭·习两案，已有项目组审理，调整工作不要受干扰了反右必须防「左」，不要搞到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去，不要搞运动，这是庐山会议的教训。他说：还有大量调整工作要做，要抓紧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央一线的这个共识，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之后，这就使调整方针在会后得以继续实行。这不能不说是人民的一种造化。调整因此又进行了三年。这三年中，国民经济得到根本性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曾经达到「文革」发生前历史最好水平。从上海市1965年猪

肉每市斤九角六分、鸡蛋每市斤七角八分、带鱼每市斤三角的物价上，我们可以推测调整完成后的中国社会生活。’

2 王延谦编：《我国近七十年物价简史（资料）》（上海：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财贸分会，出版年份不详），页 18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八届十中全会上还通过了几个相关的文件。它们是：〈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粮食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这些文件大部分是巩固调整措施的。正因为它们得以继续贯彻并实际发挥著作用，才有 60 年代前几年经济全面复苏的局面。

第八章

抓住龙尾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确认了毛泽东所提出的「阶级斗争」路线。毛泽东的基本思路也集中到抓阶级斗争上面来。这时中国政治的真正走向，是从检讨「大跃进」以来错误、纠正各方面缺欠、全面调整社会关系等，转到了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左」的进程上。虽然，经济调整还在进行，但是，它在中国政治中已是从属性的举动。在这之后，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批判重又开始。事实上，这种十分严厉的政治批判和全国性的「四清」运动，仍然没有化解毛泽东内心存在的阴影。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中国革命成败的命运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裏的问题，仍旧回旋在毛泽东的脑际，他仍然感觉存在着巨大的疑问。1965 年 5 月，毛泽东有重上井冈山之行。这可以看作他选择重大革命步骤前的一次「热身」。他对中国革命终极成果的忧虑，使他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红色永远不被污染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龙尾，也就扭动起龙的全身。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一寻找阶级斗争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开始在两个方向转人反攻，一方面在国际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方面在国内开展四清五反运动，

290

甲争人氏丢扣国炙’弟五喜（1962 — 1965）— 历史的变局
目的是根绝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得心应手地同时导演看两部历史大剧。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努力一步步跟上了毛泽东的思路。全党乃至全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这场历史剧的演出。

关于对农民和农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一直是毛泽东及他的战友们关心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农民虽然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农民毕竟不同于工人，他们是小私有者，有自发倾向，必须不断地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才可能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1957年反右之后，他就指示要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再次提出在农村进行社教，1960年上半年，在农村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年底，又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1961年11月，中央又一次发出农村社教的指示。农村社教几乎成了全党经常性的课题。因此，当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农村社教时，恐怕党内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不过这次教育的重点不是农民，而是干部。

党内易于认同阶级斗争，还在于对官僚主义的痛恶和对修正主义的担心。官僚主义本是社会的一种通病，它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官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出现官僚主义，那就是蜕化变质，就是阶级斗争。

开国伊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时时警惕干部队伍官僚化和蜕化。然而，高度集权的体制和运动式的发展模式，偏偏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发展，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多吃多占等所谓「五风」泛滥，正是大跃进的一个后果。接踵而来的饥荒又引发了「贪污、盗竊、投机倒把」等现象。富贵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对这种种现象，

毛泽东一开始就认定为阶级斗争了。前面已经提到，他甚至在1960年秋冬就断定「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了。说是第八章抓住龙尾

「坏人当权、打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 ·」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借尸还魂」，篡夺领导，实行复辟和疯狂挣扎。要求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在三类社队开展夺权斗争。只是当时正处于经济最困难和群众情绪最低落的时期，毛泽东不想在这时再发动一场大规模阶级斗争。事实上也难以通过阶级斗争摆脱危机。然而，这种形势估计在党内已发生影象。

当认定苏联变修后，人们很自然地找寻这个列宁创建的大党何以变修的原因。前文已经谈到，毛泽东不知援引怎样的证据，在1961年已经认定苏联修正主义的根源，是社会的两极分化，赫鲁晓夫代表这富有者阶级。1961年11月19日，周恩来在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也说，「它的根源是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这个判断是代表中共中央作的。「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苏联有，中国就没有吗？反观自身，人们很自然地把种种真实的或虚幻的问题看成了修正主义。1962年7月1日，邓子恢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说过的一段话，汗良具代表性。他说：干部的特殊化，这是最脱离群单的，老百姓很不满意，· · · 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一批干部不改变，将是修正主义的基础，二十年以后，中国也要出现修正主义，你不要认为我们不会出现修正主义。老一辈都死了，这些家伙今后还不当赫鲁晓夫吗？苏联集体农庄的主席收入很高，也是特殊阶层，怕打仗，怕战争，要与美国肯尼迪求和妥协。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二十年以后也要产生修正主义，危险之至，因此，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邓子恢对「修正主义」何等的担忧！对防止特殊阶层的出现何等的急切！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不久却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再以后又成了鼓吹「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者。可以想见，邓子恢对

批判他的农村政策主张可能想不通，但对毛泽东发动反修防修决不会有心理障碍。这就是党内普遍的心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引一 历史的变马

还有刘少奇，他对党内官僚主义的痛恶溢于言表。他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他指出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再把这些现象作出阶级斗争的解释并不困难。1962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同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谈话时说：「十中全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党将来是不是有人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要搞，高岗、彭德怀就是。· 一从苏联、南斯拉夫的经验来看，搞社会主义，有些曲折，不是甚么奇怪现象。从打倒资产阶级，消滅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中间经过几个曲折，是合乎情理的。」

大家都在警惕修正主义，但甚么是修正主义？各人心中所指可能大不相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刘少奇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种保证，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也是一种保证，最基本的制度，就是这个。」他总结苏联的教训，认为斯大林对敌斗争坚决，但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一切个人说了算，一切光荣归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利用了这点，他自己也搞这一套。刘少奇找出的病根和开列的药方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想法呢？

不管怎样，由于国际反修斗争的同仇敌忾，由于对国内出修正主义的共同担忧，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反修大旗一举，全党就动员起来了，紧张起来了。

八届十中全会后不久，毛泽东再次外出周游视察。这一次他跑了十一个省。令他失望的是，他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分别在长沙、邓鄠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

八届十中全会后，各省市先后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会精神。但各地负责人领会有深有浅，见事有快有慢。不少省份把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限制在落实〈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的范围内。着重于纠正包产到户做法，落实各项政策，巩固集体经济，并不刻意把它同阶级斗争挂勾。江渭清回忆当时江苏省委的思想状况，应该是有代表性的：

1962年n月15日至12月15日，江苏省委召开代表大会，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中心是传达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第八章抓住龙尾

讲话，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坐镇督促。12月15日，会议闭幕那天，毛泽东抵达南京，接见全体与会者。会后，江苏省委对全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出部署。尽管八届十全会上毛泽东已把阶级斗争提到了尖锐的程度，尽管柯庆施到会给江苏省委施加压力。江渭清回忆说，「我同省委书记处的其它几位同志商量，大家感到这几年农村运动不断，干部已经折腾得够了，生产形势才开始好转，经不起再折腾了，决定把农村社教的重点放在巩固发展集体经济上面。所以省委在关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没有突出强调批判斗争，而是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到1963年2月，省委转发试点经验时，仍然明确要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以全面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中心，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育；二是切实整顿社队干部的思想作风；三是划清若干具体政策界限，特别是不能把正当的家庭副业、正当的集市贸易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以免造成混乱。」江苏省委的做法反映了最初人们对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解。这在毛泽东看来，这有点文不对题，是对阶级斗争不敏感。

只有湖南省委和河北省委对形势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196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南省委关于纠正「单干风」的报告，就把「单干风」与阶级斗争联紧起来。报告说：「闹单干的，有地、富分子，有富裕中农，也有贫农。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也有一少部分人主张分户单干。」「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产生单干风的根本原因是地、富、反、坏分子捣乱，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作怪。」1963年2月8日，湖南省委的报告，更是描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面：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一股反革命「黑风」刮得很大，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从各方面威胁看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平人民共和国史·第五春（1962—1966）引一 历史的变局

河北省委的报告对形势的估计如出一辙：在九十个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揭发出许多阶级斗争情况。投机倒把活动有十万起，「千字号」的上万，「万字号」的上千；反革命集团活动有一千三百多起，地富反攻倒算有二万六千多起，反动会道门活动有八千起，巫婆神汉、阴阳先生有五万多人；特别严重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带头参加了封建迷信活动。在这里再次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互动现象。无论是出自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还是曲意迎合毛泽东的思想，这些报告都把问题扩大化了。群翠的小偷小摸、宗教迷信、巫婆神汉、投机倒把种种阴暗面都归结为阶级斗争，显然混淆了两类矛盾。即使有这种种现象，大多没有经过核实。

这两个省委的做法是用阶级斗争和整风整社的方式来进行社教。湖南的经验是：先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纠正「单干风」上，继而把「单干风」与「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的统称）「紧紧相连」，于1962年12月起重点强调「彻底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止『黑风』。」以此「把敌人和『黑风』整住」。河北的经验是：先是「克服了自发单干倾向，遏止了单干风」】继而于1963年2月中旬开展了「普遍进行清账、清库、清工、清财」的「四清」工作。「四清」在检查纠正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铺张浪费、挪用公款、多吃多占以及贪污盗窃行为，整顿干部作风，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方针上，有积极意义，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保定地委还总结了学习文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干部检讨交待、查证清理、进行退赔、建立制度、巩固成果、检查验收等步骤方法。

毛泽东十分赞赏他们的经验。后来，他在1963年5月说：我「跑了十一个省，只有子厚、延春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它人都不讲。」

在全国各地走了一圈后，毛泽东感到有必要专门召开一次会议，督促和布置各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就要搞一个阶级斗争」：五反四清。1963年2月n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从1月15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知中看，这次

会议的四项议题都是工作问题，甚至没有提到四清五反。然而后来的会议，重点讨论的却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问题。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接连将湖南、河北省委关于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印发会议讨论。在会上，他多次引用了这两个报告的内容和结论，以此敦促其它省市抓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各地敲警钟。

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贯彻毛泽东的意图。12日在彭真作关于「五反」运动的报告后，刘少奇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裏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2月25日，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2月28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会上又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打击疯狂向我们进攻的刮『黑风』的恶风邪气、牛鬼蛇神。」毛泽东的这些话大家都很拥护，这时国际上的反修斗争正日益激烈，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的空气自然升温。

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不过这时确定的「四清」、「五反」内容比较具体，对象比较明确，农村「四清」即清账目、清库存、清工分、清财务；城市「五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大抵重点集中在基层干部作风问题的范畴，未涉及路线和政策分歧，但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四清」、「五反」，这个思想已相当明确了，目的就是挖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五反运动

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不过这时确定的「四清」、「五反」内容比较具体，对象比较明确，农村「四清」即清账目、清库存、清工分、清财务；城市「五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大抵重点集中在基层干部作风问题的范畴，未涉及路线和政策分歧，但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四清」、「五反」，这个思想已相当明确了，目的就是挖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五反运动

的指示也强调地指出：开展这一运动是「为了健全制度，改进思想作风，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指示规定，「五反」运动只在县（团）级以上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中进行。根据中央部署，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立即在今后开展「五反」运动。城市的运动尚为温和，叫领导干部「洗手洗澡」。在农村则开始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

毛泽东更关心农村「四清」，注意发现和推广各地的经验。3月23日批发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并亲拟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4月，毛泽东又开始外出巡视。4月8日，他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插话说：「我们的支部书记是否靠得住呀？有的也靠不住」。他很赞同河北省委蹲点调查研究的办法。上次（2月）他同林铁和刘子厚就说过：「要扎根串连，要贫雇农团结起来。」会后，4月9日，毛泽东到达山东，听取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的汇报。他插话说：「如果我们不整风，那些县都要出修正主义。」

经过二月会议的发动，各地阶级斗争的「敏感性」迅速增强，纷纷向中央写出报告，反映本地阶级斗争情况和进行阶级斗争的做法。毛泽东首先发现了东北局宋任穷4月10日写来的报告，接着又发现河南省委的报告、河北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邢台地委关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报告，十分重视。4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对周恩来说：「这几个文件值得注意。」不久，他又让彭真赶到上海，代中央起草转发这些文件的批语。5月2日，彭真起草了对东北、河南两个报告的批语。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向各地提出要求：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紧进行。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毛泽东历来发动运动的办法是通过抓典型，推广局部的经验指导全局、

推动运动。现在，他的思想发展得很快，全党又像 1958 年，让人有些跟不上了。例如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书记刘顺元听完

第八章抓住龙见

297

二月中央工作会上毛泽东的讲话，都感觉到「按照毛主席的意思，霉然是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搞社教了」。他们仍顾虑重重，认为搞得不好，很容易混淆两类矛盾，还是稳妥一点为好。回南京后，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讲出了他们的看法，常委们也都赞成搞稳妥一点。2 月底，江苏省委向中央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仍然规定全省农村社教要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方面，主要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坚持先上后下，先党内后党外，层层培训骨干，进行正面教育；教育的内容要结合当地实际，完整地宣传和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及各项有关规定。与当时中央批发的其它省的一些典型材料相比，江苏省委的这些要求被认为「对两条道路的斗争抓了，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高高举起」。后来，江渭清不得不作自我批评。

这种求稳怕乱的思想不会是个别的。在后来 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彭真就谈到：大家感到从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的思想，跟不上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其它一些中央领导人也表示，北戴河会议后，大家认识不一致，至少是认识深浅不同，所以大家要求每两三个月在主席处开一次会。虽然跟不上，但大家都认真地在跟，这时运动的对象主要在基层，要解决干部中的阴暗面，这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有了纲领

1963 年 4 月 26 日，毛泽东巡游到了杭州。在这裏，他亲自主持做了两篇大文章。一篇是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覆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赫鲁晓夫发出一支林中飨箭。一篇是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十条，后来把它称为〈前十条〉。再次显示出他的大手笔。邓小平和彭真协助毛泽东，分工具体组织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

2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5月2日以后，毛泽东把各中央局书记召集到杭州，举行包括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小型会议，研究制定农村社教的文件。部分省委书记也应召到会。会前，彭真奉命已主持写出第一稿，5月2日各大区书记到后，彭真又同他们讨论修改了两次。毛泽东看后，觉得不够尖锐，没有提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5月7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可以不要那么长，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问题」，「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他说，「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重的，尖锐的。」他根据地方报来的材料，列举了农村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

5月8日，毛泽东连续批印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和原载《中南通讯》的河南、湖北、湖南的四个文件。他批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一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材料。」在会上，他又讲了认识问题。批评说：「不光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对敌情的严重性也是认识不足的，甚至熟视无睹的。」他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五反」、「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5月9日，毛泽东又批了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并写下了很长的批语，他向全党发出严重的警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

第八章抓住龙尾

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泽东把问题提到如此尖锐的程度，向人们描述了如此一幅令人警觉、担忧、可怕的危险情景，不由得使人汗颜警怵。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执笔将文件再作修改。5月10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毛泽东关于浙江省七个材料的批语和他批示过的二十件材料，作为文件的附件。

毛泽东看到大家的认识已被唤醒，便于5月11日晚发表讲话，看重强调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伤人过多，一定要搞试点。他说：「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

最后，他又回到主题。他说：r 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是抓阶级斗争。」周恩来5月10日才到杭州，他是为当面向毛泽东报告「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处理情况来到杭州的。10日和n日，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小型会议。对于〈前十条〉他只提出了一条建议，即把「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表示同意。这一改把打击面限制在了5%以内，周恩来回到北京，根据毛泽东的委托，于5月18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对文件作了一些无关大旨的修改，20日下发全党。〈前十条〉是毛泽东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十条题目如下，（一）形势问题；（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三）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五）依靠谁的问题；（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 / 切「四清」问题；（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其内容基本上是毛泽东的各次批语和讲话的汇集。许多段落是原文照搬。

为了证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正确，〈前十条〉列举了九种「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的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9—历史的变局）

（一）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下中农；（二）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裏，其它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三）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四）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道会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五）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六）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七）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八）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九）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文件引用湖南省委一个报告的话说：「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裏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得出结论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这裏，对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估计，已经严重地脱离了实际。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已经获得了正确认识。这个认识是经过建国后十三年的实践，特别是近三年的实践才得到的。在〈前十条〉的前言中，他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哲学短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裏来的？〉，结果，历史证明，中国人的正确思想，根本不是从虚妄的所谓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中来的。从阶级斗争中学来的，只是一场大思想混乱。

〈前十条〉还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都如此，强调要「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即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开展「四清」同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第八章抓住龙见

刘少奇没有参加5月小型会议。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陪同下，于4月12日至5月16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5月12日小型会议结束，他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十条〉文件，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八届十中全会时周恩来说「不要搞运动」，刘少奇说只用少数人对付「反动别动队」，这些设想显然不能实现了。四清五反运动逐渐发动起来，谁也无法提出反对意见。由于在反修问题上的共同认识以及对克服官僚主义的共同关心，不能说现在刘、周、邓等人只是在被动地「跟」，他们应该说是非常主动地投入到运动中来的，只不过对这场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各自会有不同看法而已。周恩来一直把它看作一次反官僚主义的运动。1963年5月29日、6月13日，周恩来在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分两次作了〈一次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的长篇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这个报告，堪称中共党内迄今为止最为形象深刻地刻画官僚主义脸谱的一份珍贵文献。可见他对官僚主义现象感受之深和深恶痛绝。只因篇幅过长，不能在此一一引述。周恩来指出：「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他要求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政治、社会、亲属、生活这「五关」

1963年初在各地逐步开展的农村四清运动，大都比过去的运动来得稳当些。然而，任何运动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具有了对敌斗争的性质，难免发生过火行为。事实上，在运动搞得积极的地区，如湖南、湖北等地，在年初就已发生乱打乱斗的现象。1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一份严禁运动中打人的通知，其中附录了湖南常德地区、湖北麻城县发生的乱斗、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的材料。

2月2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议论到湖南、河南农村搞「四清」太急的问题。周恩来说：「已向主席反映，主席说要试点，不能急。」3月15日，帅孟奇向中央写了一份湖南农村社教的报告。其中反映有

甲辛入氏共和国史·第五春（1962—1965）— 历史的变向
些地方已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到2月底，全省已死人76人（王延春报告说有97人）

杭州会议后，彭真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八省视察，历时一个月，同样发现打击面过宽，混淆政策界限的偏向。7月4日，他向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提出：要防止急躁情绪；对于上中农、工作人员中的地富和资本家子女、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防止出偏差；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要在不损害严肃性原则下尽可能从宽处理。他主张除领导权被地富篡夺的、蜕化变质的，或情况混乱、领导无力的社队，应派工作队外，一般应基本依靠基层干部进行运动。「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

有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作出一些具体政策规定。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讨论了上述已发现的问题，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田家英执笔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即（〈后十条〉）草案。这同样也是一个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纲领。因为社教本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所以〈后十条〉不能不与〈前十条〉相衔接。这样它不可能跳出阶级斗争的大框框。

〈后十条〉高度评价〈前十条〉「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强调开展农村社教运动，「对于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重大的作用。」规定运动的五个要点，「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基本的方针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起草这个文件的目的是，「着眼于防「左」和反右。规定具体政策界限，力求缩小打击面、约东过火斗争」减轻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做了许多政策规定。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文件认为，这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应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

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帮助」，

弟八常抓任龙见

决不能包办代替。对基层干部要以教育为主，处分面要严格控制。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强调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尤其讲到正确对待中农和上中农，正确对待地、富、反、坏分子，正确对待地富子女。文件特别讲到一般不重划阶级，不进行清查漏划地主、富农分子工作。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大会上）邓小平向全体与会者宣布：「这个文件大体上比较好。」看来中央一线领导人对这个文件很有信心。10月5日，文件报送毛泽东。

然而，〈后十条〉（草案）一披露，议论之声就起了。有人说这个文件右了。其中某些地方高级领导人也这样议论，这对执笔起草者田家英形成了一种无形压力。这时田的处境困难。5月杭州会议，起草〈前十条〉时就没有通知田家英。以往这类工作是少不了他的。自从1962年向毛泽东进言包产到户以来，田明显被冷落。后来田家英曾议论过〈前十条〉中的一段话，即：「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田颇不以为然，认为此话不通，「难道阶级成份也能遗传吗？」谁知这话被传出去了，很快受到批评。现在又有人说〈后十条〉「右了」，处在政治「高危」地带的他，自然看实有些不安。正在这时，从武汉传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全国宣讲前后两个「十条」的指示。田家英等看到这份指示，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因为有了毛的指示，就表明毛泽东认可了〈后十条〉。这时已是10月下旬。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0月31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后十条〉（草案），11月1日，刘少奇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后又由邓小平主持再作修改。11月4日，由田家英再赴上海，送交毛泽东。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这个文件。随即由毛泽东批准下发全党。

能够指望〈后十条〉去防止过火的行为吗？面对澎湃而来的阶级斗争大潮，这些具体政策规定显得苍白无力。毛泽东赞同这些规定，但

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把阶级斗争搞彻底。5月杭州会议后，他多次讲到「三分之一」的领导权被篡夺的问题。许多地方领导人都赞同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附和这种估计。6月14日，毛泽东在邯郸同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谈话说：「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后来变了，有的富裕中农当权。湖北同志说地主有心，我们无意，现在清醒了。」8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共领导人藏厚雄人时，说得更明确：「现在在农村还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裏。」9月9日，毛泽东同新（西兰）共主席威廉斯谈话说：「对于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单靠中央和少数党委本身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发动群众上下夹攻。」他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依靠队伍。在农村依靠比较穷的农民，在机关依靠多数工作人员、下层干部。10月2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时说，和平时期必然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又碰到这种情况，党内不纯，部分组织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所以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十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按照这种估计，在农村，至少在三分之一的社队就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依靠基层干部」的问题，而是发动群众夺回领导权的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代中央写指示，要求在全党全国宣讲「双十条」；12月14日，他又给林彪写信，要求在部队宣讲这两个文件，并且要求部队抽调干部到地方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

196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和〈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前一个指示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他明确提出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至少需要三至四年完成。要求从中央委员到县级党委委员，除年老体弱者以外，一律要「充当宣讲员，至少一至两次。有意避开不去的，叫做消极怠工分子」。从3月底到4月底，毛泽东外出视察，先后在邓邓、汉口、杭州等地，听取了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安徽、湖北、江西、浙江等省委，西北局和河北、河南一些地委领导的汇报。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下去宣讲两个文件。3月28日，毛泽东在邯郸召集四清座谈会。他插话

说：「我们有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52 年搞了一次，57 年搞了一次，那只是在机关、学校，这一次要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第八章抓住龙见

305

好」。他用赞许的口气说：「说这是第二次土改）有道理「他批评城市五反指示没有谈阶级斗争，批评有人主张学大庆、学解放军代替「四清」，那是代表不搞阶级斗争的那一派。」毛泽东尖锐地说。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不搞阶级斗争的人看成一个派别。4 月 2 日，毛泽东来到汉口。他问王任重：「你是不是向群众宣讲过？」王任重答复：省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都下去宣讲了，自己还未下去。毛泽东大为不快，尖锐批评说：「你为甚么不去，你又不老，又没有病，又不是右派，应当亲自向群众去宣讲两个十条。」毛泽东反复强调：运动要搞深搞透，不要走过场。

毛泽东反复督促各级领导干部下去宣讲双十条。其主要用意不在帮助人们「掌握政策」，而在于唤醒全民的阶级斗争意识，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反修防修斗争中来。正因为如此，伴随「双十条」全民宣讲的，是更加猛烈的阶级斗争大潮的兴起。

三夹缝中的经济调整

1963 年这一年，尽管阶级斗争愈来愈热，但国民经济调整和工农业生产依然保持了正常秩序。毕竟从国务院到各级政府部门在正常运转，四清五反还在试点阶段，也没有搞到工人农民中间去。再者，八届十中全会、毛、刘、周、邓达成了共识：阶级斗争不要影射工作。毛泽东甚至说过：要把工作放在第一。刘少奇说，只用少数人去对付反动别动队，多数人抓工作。

然而，干扰不可能没有。事实上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经逐步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毛泽东本人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被国内外反修防修占据了。各级领导干部很大部分精力也都被吸引到这个方面来了。在 1962 年 8 月到 1963 年 7 月，将近一年左右时间裹，是否需要继续贯彻调整方针，发生了摇摆。其原因不言自明：一则由于调整初见成效，经济形势有所好转。这使人们产生了错觉，以为问题

丫华八氏弄和国丈· 弟五寻（1962 — 1965） — 腾丈的质句

. !!! ; - - ■ - `■ !!! - ! . ■ !!! -

基本解决。不必再花那么长时闲调整了。二则由于批判了「黑暗风」，使党内抵触调整的意见得到了支持，而主张调整的意见受到了指责。代替陈云主持调整的周恩来首当其冲。

还在 1962 年北戴河会议期间，同时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落实调整措施。北戴河会议上大批「黑暗风」的情况传到城市工作会上，会议的空气立刻变了，不少人认为中央财经小组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困难说得过多。对于中央决定的减人· 压缩基建、企业「关停并转」三大措施阻力很大。许多地方和部门向中央讨价还价，纷纷要求少减人，少下马一些，少关停并转一些。态度最差的甚至断然拒绝。有人乘批「黑暗风」之机，责备中央领导人】把指责矛头对准实际主持中财小组的周恩来，只差没有公开点名。有的在二月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上赞同中央决策的人，现在也开始反悔埋怨，甚至对周恩来说了十分难听的话。

周恩来派去听会的吴玲西和田家英听到这些意见，愤愤不平，打电话给周恩来的秘书许明，要求面见周。周把他们叫去，吴、田向周诉说城市工会会议上不正常的气氛，情绪激动，说着说看就开始流泪。他们不仅为周鸣不平，更为中央决策落实不了而惋惜。他们认为：「这些同志对国家大事如此轻妄，怎么得了！」

周恩来不得不安慰吴、田二人不要激动，同时指出：非常措施是中央会议决定并经毛主席同意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他深有感慨地说：1959 年春调整时，我身为一国总理，竟然连调一千吨钢也做不到。现在又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可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不容易，现在证明七千人大会十分必要，但只靠一次大会，虽然开了一个多月，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说：你们可以相信，中央是坚持原则的，议而有决，决则必行。我已同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谈过，抓阶级斗争不能影响调整工作，毛主席也表示赞成。吴玲西回忆说：「这次谈话一直到深夜，我们在门口向总理告别时，田家英还热泪盈眶。」在城市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不得不苦口婆心地进行解释，他指出：中

央决定减人、下马、关停并转这三项措施，确是「伤筋动骨」。砍那么多基建项目，关停那么多工厂企业，每砍一刀都是血淋月，？一）‘I 一卜一辟’必·’骗J

淋的！这些都是用人民血汗钱建设起来的呀！中央就那么忍心，就那么狠心？这是从全局看想，迫不得已的呀！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被压垮，我国将会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地衰败下去。不调整】不采取非常措施，犹豫拖延，就会坐失良机，拖垮我们的国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党内气氛迅速「左」转之时，周恩来有如此坚定的态度，实在难得。1962年10月6日，周恩来与邓小平共同签发了〈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文件作出十二条规定，继续贯彻调整方针。然而，因为政治走向改了，分歧是难以弥合的。1963年1月18日，国家计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最近有过一段时闲，有些同志对于经济形势的好转程度估计得过高了一些，要求在1963年过多地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地增加职工。」这时，有些地方、部门、单位，放松了减人，甚至随便招收职工。1963年第一季度，工农业生产出现良好增长势头，财政结余十亿余。这就使从中央到地方部分人乐观情绪更加抬头。3月1日，中央发出的一份指示认为，国民经济将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r 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各地遂将1963年当作「三五」计划的头一年，纷纷喊出打好第一仗、夺取开门红的口号。年初，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已拟定了从1963年起开始「三五工计划的初步方案。但是按照稳健派如周恩来们的想法，整个「三五」计划五年都用于调整。

究竟是继续调整，还是开始新的「大跃进」？在6月1日至15日的全国年度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两种意见争持不下。一些人认为「八字方针 j 不要再提了，另一些人坚持还要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7月1日，李富春把分歧意见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拍板“再用三年作为调整年份。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中央的指示：「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8月6日，薄一波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指示，1963年、1964年、1965年仍然是作为调整的年代。我们原来打算，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

始。现在不搞了。1963 年、1964 年、1965 年调整三年，1966 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这样，一段时间来的决策摇摆终于得到克服。

！ - ！！ - - - - ！ - ！ J ， ‘■ - ！！ -

3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是甚么原因使一些人的头脑降温、从而不得不接受继续调整的意见呢？是天灾。

1963 年中国又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北洪南旱。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苏北、皖北和辽宁部分地区，突降暴雨，造成大涝；南方的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及江西、广东部分地区则久旱无雨。农业收成损失严重。尤其是粮食产量的恢复眼见不会有大的起色，要恢复到 1957 年的 3901 亿斤的水平，估计还要两三年时间。依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认识，调整到位的主要标准是看粮食能否恢复到 1957 年水平。早洪灾荒，农业欠收，这倒给了决策者一贴清醒剂，分歧减少了。9 月 19 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到灾荒时说：国内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一种插曲，也是考验我们。形势好了一些，就常常容易发生错觉，以为很好了，很容易脑筋有点热。脑筋热了，拿冷水洗一下好。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还相当落后，相当贫穷，好转以后，要上去，还需要时间，速度不能估计太快了。周恩来还讲到，再用三年调整，还有一个原因，即用这段时间还清欠苏联的外债。无债一身轻，到 1966 年开始三五计划。继续调整的方针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后三年调整与前两年的侧重点不同。到 1963 年上半年，减人下放、基建下马和企业关停并转这三项「伤筋动骨」的措施基本完成。三年调整的重点转到充实、巩固、提高，填平补齐，成龙配套。8 月 6 日薄一波说：r 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兼顾国防第三。这是发展工业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向。在三年之内，调整就是这样摆法。」

四阶级斗争样板

1963 年秋冬，各地开始组织大批工作队，下农村展开第二批「四清」试点。

伴随双十条的全民宣讲，运动中的火药味愈来愈浓了。过火斗争有增无减，自杀事件屡有发生。如湖北省第一批试点死了 2000 多人，第八幸抓住龙尾

309

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二十五天内就死了 74 人。广东省在这年秋冬，发生自杀案件 602 起，死亡 503 人。

这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愈来愈严重。上上下下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把运动搞彻底，而不是运动中的偏差。基于严重的「敌情」估计和社教运动要依靠贫下中农的规定，四清工作队便搞起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神秘化做法。1963 年 11 月至 1964 年 4 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作为工作队员参加了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四清试点，化名董朴。临行前，她请示刘少奇，应注意点甚么。刘说：「要有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然而，说不带框框，「双十条」对形势的估计就是框框。1980 年王光美回顾说：当时「我是真心真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

桃园大队本来是个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好，征购任务完成也好。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自认为没甚么问题。「磨了米、砍了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但工作队不信这些。基于大队的领导权不知是否在搞复辟的敌人手裏的考虑，工作队进村便搞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功夫」来，照搬民主革命时期开辟新区的做法，开始了背靠背揭发斗争。

其实「扎根串连」的做法，并非始自四清运动。最早出现于 1960 年和 1961 年。1961 年初，广东省坦州整社工作团总结他们的中山县坦州公社进行整风运动的基本经验说：「怎样才能把群众真正的发动起来？坦州的经验证明，必须采取扎根串连的办法，首先组织起一个贫下中农的核心队伍，这可以说是继土改、合作化以后的第三次『组织起来』。工作团进村以后，经过短短的几天的工作，立即证明了扎根串连是深入发动群众的唯一办法，不管是三类队，还是一、二类队都必须如此。」对于坦州工作团总结的经验，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

共中央都曾给予肯定，说这是「一个指导文件」，要求各地「斟酌仿照办理」。1963年2月，毛泽东要发动四清运动时，便对林铁、刘子厚说：「你们有多少三类队？要扎根串连，要贫雇农团结起来」。

桃园工作队

？'、计，么'「”州人一早 J1 巷 11，b 必一 1 丰 bh）一 厘丈
门又司

就沿用了这个做法。经过扎根串连，背靠背发动，终于发现了支部书记吴臣搞小买卖、跑单帮、吃喝赌博、打骂群单等问题，决定撤掉吴臣的职。形势急转直下，紧接着挖出了几个「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的「大案」来，并且查出漏划地主五户、富农二户。随后又顺藤摸瓜，追查吴臣在县、区、乡的支持者。挖出了一恫蜕化变质的副区长苏长吉，挖出了县委办公室一个主任、县人委办公室一个副主任、县水利科的一位科长。工作队由此得出结论：四不清既有下面的根子（地主富农），还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靠山，有人保护。上面的根子要不要追查？问题提了出来。

春节临近，工作队员董朴即王光美回到北京。毛泽东听了她的参加四清的汇报。毛泽东很赞同她的分析，说：「根子在上面。」刘少奇也非常重视王光美反映的情况。1964年春节期间，他同王光美谈话说：「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的根子在哪裹计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脣，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边的根子，这是基本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有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在公社、区、县和地委有根子」，「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或者反革命势力复辟了，就是因为这些干部，有下面的根子，也有上面的根子。」他强调地说：「可以挖上面的根子一••••• 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

工作队秘密串联的阶级斗争手法，引起了吴臣等挨整干部的强烈反弹。而被清理和揪出的这些基层干部的意见，更进一步证明了「阶级斗争」的激烈。1964年3月27日，刘少奇给王光美写信。信中认为：「吴臣的一伙要复辟，以便彻底推翻四清的成果。」「宗振活动

如果达到了这种程度，是否已经是一种严重的反党活动，是一种实际上的反革命活动？」「吴臣领导的桃园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这是刘少奇作出的一个非常脱离实际的阶级斗争式的估计。

一个贫农书记领导的一类生产队，何以变成了一个「复辟」的典型呢？当然，「复辟」是完全没有根据和极为荒唐的。但是，农村干

部八竿抓怔托编部的作风问题和干群关系的问题的确存在。这是一个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问题。陈云曾说过：我们的基层干部就像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很多（大意如此）。陈云毕竟比较实际。譬如俯下身去找蚂蚁）遍地都是蚂蚁。但蚂蚁终归不是大象。显然，教育和整顿是必要的，但不能统统归结为阶级斗争。至于把由于过火斗争激化的矛盾，又当作「反革命」，当作「复辟」，这就更使认识步入了自我论证的恶性循环。当时）阶级斗争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四清运动迅速地向「左」转。其结果就是各地不断发现「复辟」典型。经过理论总结和斗争经验升华，上报到中央来的，都是展开夺权斗争的经验。

天津小站，是以生产津门贡米闻名的地方，如今也成了资产阶级复辟的典型。同时，小站在当时大出其名，是因为在那裹不仅发生了复辟，而且还完成了以阶级斗争方式重新夺回权力的一场斗争。小站的社教运动自1964年1月开始。3月起，市委抽调大批干部加强了工作组的力量。《红旗》杂志社编辑部派出十余人去帮助工作，总编辑陈伯达在小站蹲点。运动开始是从「四清」入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甚么来。工作队发出疑问：「这裹是我们的天下还是敌人的天下，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于是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局面终于打开，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经过一番斗争，小站共打掉了三个「反革命集团」（为首的一个是原水稻专家、一个女劳动模范、一个是小站镇的总支书记）。这就是小站的夺权斗争。

无独有偶，夺权斗争也不能不在城市出现。当时令全国震动的，是甘肃白银厂的夺权斗争。白银厂，即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该公司50年代开始兴建，1962年部分建成投入生产，是一个拥有一万一千多职

工的大型铜、硫生产联合基地。白银厂的问题在运动开始前已经有了某种反映。据薄一波回忆：「白银厂的工作是有问题的，但有关单位向上反映时夸大了）以致造成那裏的问题非常严重的假象。」在接到甘肃省委的报告后，1963年2月20日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薄一波与冷金部、中组部、西北局、甘肃省委有关领导会商，决定由高扬文（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压史的变局金部副部长）带领二十人的强有力工作组，迅速进驻白银厂整顿处理。2月25日，薄一波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请示中，认为白银公司「实质上已为资产阶级所篡夺」。「其错误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必须采取革命手段，改组领导班子，才能保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3月7日，周恩来批示同意。

3月，高扬文率领由冷金部和甘肃省派出的共五十余人的工作组，进驻白银公司。进厂伊始，就「以阶级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展开夺权斗争。原公司一名党委第一书记、两名副书记及其它一些人，受到党内严重的处分。其中有人还被判了刑。据说，这个案子还同「高岗手下的红人」、原省领导人张仲良有关，因此成为当时轰动全党的大案。1966年6月，中共甘肃省委、冶金部党组向中央写出报告。报告认为这个公司「被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领导权，使无产阶级的国营企业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企业，使国家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全民所有制的财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领导集团成员生活极端腐化」，「社会风尚败坏」，「反革命活动猖獗」，「抗拒中央指示，打击和陷害好人」。说这裏「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即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统治的世界」。6月23日，中共中央把这份报告批转全党。中共中央的批语说：一个刚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没有多久，很快就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很值得大家深思。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事件，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是死不罢休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隐蔽的方式，打入社会主义企业，企图篡夺领导权，从而

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把它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同党内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分不开的。白银有色属公司事件，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在我们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硬是忘了忽视了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这裏再一次提醒同志们注意，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社会主义的江山是铁打的。如果我们过渡时

第八章抓住龙尾

313

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和进攻失去警惕，不加防范，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随时就有可能得逞。

十五年后，小站事件和白银厂事件都被平反。冶金部和甘肃省委关于「白银厂事件」的覆查报告说，这是一起重大的冤案。夺权报告中列举的所谓「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结论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许多的罪名颠倒了黑白。天津市委覆查结果，小站的三个所谓「反革命集团」案，纯属子虚乌有，应给予彻底平反。今天看来，说这些单位当年完全没有问题，也难以使人相信，但当作「复辟」的典型，则肯定是错误的。然而由于这两个夺权样板，不但加重了当年社教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且造成全党风声鹤唳的气氛。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似乎验证了自己提出的虚妄理论，结果完全蒙蔽了自己的眼睛。

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毛泽东发动四清五反运动，是为了从基层做起，挖掉修根，清除所谓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然而，他真正忧虑的，是修正主义会发生在上层，发生在中央。小站和白银厂，虽然被「篡夺」了领导权，也值得高度警觉，但他真正关注的，是修正主义者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从四清运动开始，毛泽东一方面督促自己的干部下去搞运动，一方面思考怎样防止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这一时期，他同外国党的领导人频繁谈起 1962 年上半年的「右倾动摇」，而且态度愈来愈严肃，批评愈来愈严厉。1963 年 5 月 22 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

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于'、于、? 可' 尸州人一中 j • ' 簪 '170 石一 iyo) ' 一一以讨) ' 储, J 又" j

i - - - - - !!!

1964年2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威尔科克斯，谈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一分为二的，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威尔科克斯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还需要有反对派？」毛说：「不是需要，而是事实上必然出现各种反动派。」威说：「我现在的确愈来愈年轻。」表示了对毛泽东的论断的赞赏。毛接着说：「我也是这样。现在很高兴。前几年不那么高兴，这有一个过程，一斗就高兴了。」紧接看，他谈到国内。他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按：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裏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裏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裏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也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主张「三自一包」。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毛泽东还说：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

被毛泽东点名的一共三个人：王稼祥、邓子恢和利瓦伊汉。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的问题也同所谓资产阶级有关。利瓦伊汉建国以后一直掌管看中央统战部，负责同民主党派和资本家打交道，肩负看对资本家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责任。既然是改造，总得要见成效。于是，从1956年起，利瓦伊汉研究统战工作理论政策，

提出了一个「五社一短」的改造目标：即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变成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各民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宗教成为社会主义的宗教，并且在短期内消减资产阶级。利瓦伊汉的这些思想，曾在 1962 年 4 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加以

阐发。然而，八届十中全会后很快受到批评。从 1962 年 10 月开始，统战部内部召开了一共四十多次批判会，批判利瓦伊汉，历时半年多，罪名就是「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

必 64 年 2 月金日成到中国来，毛泽东同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谈话。毛泽东说：r 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毛泽东接着说「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 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又说：「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奋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 1962 年上半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是工作会议，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都来参加，把这些问题都抖搂出来了。然后，又开了中央全会，开了两个月—8 月到 9 月。」毛泽东继续说：「这个会议开过以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都检讨了，说自己不对了。有一个同志是主张三自一包的，就是邓子恢，他是长期搞农村工作的，是农村工作部长，是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裹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我说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会有的。所以，要有意识的保持对立面。例如王明和赫鲁晓夫一样，彭德怀是赫鲁晓夫的人，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现在仍然保持原有职务。但是王明不同。这种政策将来可能危害我们，也可能危害你们。」说到这里，毛泽东道出了他最深层的担心。他说：「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这些人总是想复辟的。所以要提高警惕。」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毛泽东问金日成。金日成答道：「那我们就更困难了。」毛泽东说：「总会比阿尔巴尼亚好一些。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

1 - ! - - 1 配 - • ! • ■ ■ ■ ■ j ■ J ■ ■ 、 ■ ■ ■ ■ 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斯 1 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号召其它共产党起来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确有些天方夜谭。可毛泽东就是这样对中国的前途表示担心。这时，在担心的后面，他把希望寄托在解放军身上。他对金日成说：「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听到这里，相信金日成已经坠入五里雾中，他不解地问：「你不是说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义吗？」毛泽东回答说：「是打顶防针。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在座有不少朝鲜的年青同志，你们不要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这样就不对了。中国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还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约有 1000 万人。我计算了一下，在 6.5 亿人口中，这种人就占 1 / 65 ，就是 65 个人中有一个。如果现在不加以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么？」

3 月 23 日，毛泽东在北京同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伊藤里见等人谈话时，也同样讲了中国党内的问题。之后，毛泽东去了武汉。但他仍觉言犹未尽，想同日共领导人再谈一次。在 4 月 8 日给秘书林克信中他说：「日本代表团，何日经武汉去越南？我想同他们在武昌谈一次话，在（再）问明白为要。」4 月 10 日，毛泽东在武汉又与伊藤里见等作了一次交谈，话题仍然是国内外反修防修问题，重点却在国

内。他说：「就在那年（1962 年）8 月，我们讨论了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一次十中全会，发表了十中全会公报。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

第八章抓住龙见

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 年很猖狂。」毛泽东说：「中央联络部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它还不止。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是修正主义者。」

不知出于怎样的动机和冲动，毛泽东此时有特别强烈的倾诉欲望。本来，这些话是不宜向外国人表达的，家丑总还要有所保密。但毛泽东没有捂住秘密。他甚至无保留地公开了中共党内的问题。合理解释是，他此时的确意识到，这些话已到了不讲不行的地步。他已经感觉到，不仅国内防修，而且事实上国内已经存在修正主义了。这个修正主义主要不在基层，而是在领导层，甚至在中央。因此他说，中国可以一分为二，中央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也不太平。从他对 1962 年上半年的一系列措施耿耿于怀的情况，从他反复号召外国党起来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的谈话中很容易感觉到，他心目中的对立面，绝对不仅仅在中央委员和省部一级。仅仅一个统战部、一个农村工作部和一个中联部，是不能出赫鲁晓夫那样的大修正主义分子的，凭这些人还不可能有掉脑袋的危险。但问题出在中央，赫鲁晓夫如果就睡在身边，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坚决拒绝赫鲁晓夫停止论战的建议，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论战，挑明国内修正主义的问题，从而动员群众，壮大阶级力量。4 月 25 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澳共（马列）主席希尔时说：「过去，我们的干部、党员和人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联

共产党有甚么不同，公开争论开展以后，大家才知道有两种共产主义，有两种共产党。」所谓两种共产党，就是马列主义的党和修正主义的党。毛泽东要人们明白，危险是现实存在的。「脓包」最终总要挑破。毛泽东终于把问题提上了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一开始，与会者的发言就与「后十条」的精神大不一样，政策问题

丁中 / 、入六柑叫又’弟立各（1962 — 1965）— 登又的变句不再被提起议论。会上印发了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白银厂夺权的报告，介绍了天津小站夺权情况。由此，许多极「左」建议被提了出来，例如有人提出要在农村社教中「搬石头」，要在城市「五反」中划阶级等等。

6月2日，刘少奇讲话，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省委、市委都有了他们的人的观点。这裏他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如何如何了，反而认为，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对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脱他们。他认为：在性质上，「他们抵抗四清就是『反党』，破坏就是『反革命』，要开除党籍。」他主张，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依靠基层组织」。看来，刘少奇对形势的估计也已经愈来愈严重。他显然受到桃园大队社教经验的影射。然而，没有人的思想超过毛泽东。6月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郑重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題。他告诫各中央局的大员们，不要只看生产。要抓武装，要抓枪。要想到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险。他还提出，为防止修正主义，必须看重培养好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他还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6月1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反修报告，阐述毛泽东的观点。在刘讲话过程中，毛泽东又作了长篇插话。刘少奇说：「要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还有陈伯达同志调查的天津小站公社，不是有了吗？我们国家，我看三分之一或者还少一点，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裏，在坏人手裏。」刘说：「列宁的故乡出了修正主义，才引起我们严重注意。」毛插

话：「有了修正主义，才有《列宁主义万岁》。可能出修正主义，准备出，不注意一定出，如果注意了可能不出，也可能出。出了怎么办？要想一想。出了也没有甚么了不起，他脱离群单，无非是闹几年，几十年，还要垮，又走向反面。」刘说：「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都可能产生修正主义。」康生插话：「这是一条规律。社会主义国家不注意要出修正主义，注意也要出修正主义，斗一」『■．一待、j'细'

义，关键在于他能不能掌握领导。」刘少奇说「反修斗争材料，正反两面的东西都要印给党内看看，如彭德怀、习仲勋写的东西，小说《刘志丹》、吴自立的《平江革命斗争史》。」毛说：「要把蒋介石选集印出来，看他怎样骂我们的。」毛说，「我看中国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修正主义比较难一些。我们七亿人口，工业不发达，比较落后，但比苏联民主。」刘说：「中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搞修正主义，统一很难。搞起来，各省会独立。」毛、#1J的这番对话，已经到了危言耸听的地步。似乎中国已经到了亡党亡国的边沿一样。这时，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要把这个意思向各省、地、县传下去。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各省委要顶住！j

对于临战状态的党，毛泽东认为必须搞清阵线。他主张：「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阶级。」他说：「坏人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占据了我们的要害部门，当了权，也不得了。」毛泽东还说：「例如冷金部是否划？中央各部门是否也要划？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会后，中央下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一F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提出了对过去划错了阶级成份都应该认真审查并改正过来。关于城市划阶级问题，要在各大区进行试点。大家都在讲出修正主义，但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和其它领导人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刘少奇指证的「修正主义」、r和平演变」主要是指蜕化变质分子，周恩来更加明确指官僚主义。他们很少谈到路线之争，尤其不谈1962年上半年。毛泽东讲修正主义当然也包含干部的蜕化变质、官僚主义种种阴暗面，但在他心目中，更主要的是路线

之争，是「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和「五社一短」之类。刘少奇和毛泽东都讲修正主义不注意也可能出，注意也可能出，而且要出在中央；都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要顶住，要独立，要造反“可是，中央不就是由毛、刘、周、朱、陈、林、邓等组成吗？敌人究竟是谁呢？大家其实都还在五里雾中。当时，「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可以想见，大家的神经都立刻紧张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历史的变局
会议期间，贺龙元帅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军区杨林军事表演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提出要看一次军事表演。6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偕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康生、薄一波、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萧劲光、许光达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阵营浩大，云集西郊射击场。两个主席兴趣盎然地观看了表演。

6月16日，毛泽东又把原班人马带上十三陵水库，出乎意料地在大坝边的小楼裏接见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所有人员。毛泽东在这里谈了军事战略问题，对1960年以来「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作了改变。他再次发出号召：「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六刘少奇动了「真格」

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指导全国的社教运动。不知是真的感到形势严峻，还是想竭力跟上毛泽东的思路，6月会议后，刘少奇的思想进一步「左」转。6月底到7月，刘少奇外出视察。先到天津，再到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除了解运动情况外，就是为了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这次外出，刘少奇在天

津作
济南、南京等地先后都召集了军队系统干部座谈会，了解政治工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这或许是为了落实五月会议上毛泽东关于

津作

准备打仗的思想。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过问军队的事本是极正常的。然而，党内历来有严格分工

国家主席，，过去除了

陪同毛泽东，显得非同寻常

刘少奇很少单独召见军队干部会议。因此，这次外出就

刘少奇历来严厉。但这次外出，不仅严厉，还显得很急躁，脾气很大。

刘少奇从天津到济南时，华东局就派魏文伯专程前往迎接，然

第八章抓住龙尾

321

后陪他到安徽。刘少奇一行抵达合肥后，魏文伯就用电话给江渭清和江苏省委打招呼。刘少奇对前一段「四清」运动很不满意。魏文伯在电话裏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提醒江渭清要有思想准备，在刘少奇到南京后「注意」。7月14日，刘少奇到了南京。他不住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的办公室裏临时搭了个铺。当天下午，江渭清和李士英、彭冲等省委负责人向他汇报工作。刘少奇亲临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分别于7月15日和17日作了两个下午的讲话。刘少奇讲话，有些是谈工作问题，如阐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提出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培养接班人，大胆选拔年轻干部，包括知识分子干部等。但讲话的中心是阐述为甚么要搞社会主义教育。几次讲话都对当时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包括江苏的「四清」运动，提出了批评。归结起来，集中在三个估计上：一是对「大约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裏」的估计。他认为，「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市）、县领导说没有那么多，这是对「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警惕性不高，是很危险的。二是对干部队伍状况的估计。他认为，「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占基层干部的多数，不是少数；没有多少问题的、可靠的、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群众的干部很少，不是多数；对基层干部「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要等基层干部改变了，再来依靠」。三是对运动情况的估计，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已经搞了一年多，「农村、城市都没有搞好」。这个革命运动比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因此没有充分时间不行。刘少奇在讲话中向大家透风，「后十条」要修改。他反复强调只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

部。他指出：「四清」不只清经济，还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他再次强调，要「追根子」，认为生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大队有人保护。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公社有人保护。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严重问题，一定是省裏、中央有人保护。工厂、机关也一样。处长有严重问题，一定有部长保护。「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不可不追。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许多领导干部「浮在上面，不蹲点」，他反复强调，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各级领导都要蹲点。有了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是他从天津到济南、合肥一路反复强调的。这几个省市领导听到批评，没有当面表示异议。然而到了江苏，江渭清却与刘少奇发生了「顶撞」。刘少奇讲话后，江渭清对刘少奇讲：「说社教都没搞好，江苏不是这个情况。」刘少奇说：去年一年多，「小四清」打了败仗嘛！江坚持说：不能这么讲，我们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社队，百分之六十打了胜仗。江说：江苏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刘说：你这是没有下去，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说：我经常下去，对情况还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刘打断了江的话，转而问江：你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报告？原来，王光美先期到了南京】在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上作了「桃园经验」的报告，江渭清竟没有到会。江渭清想，可能刘少奇认为这是对「桃园经验」不重视。江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说：不盲目执行。说到此处，刘没有作声。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江渭清偕夫人去看望刘少奇和王光美，刘与江个别交谈，严肃地说：「你昨天讲的那三个意见（即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江执意坚持。刘发了脾气。

7月25日，刘少奇回到北京。因为感到党内存在严重的右倾，因此向毛泽东作了此次出行的汇报。毛听后说：「不要怕『左』，

半年总结一次。」于是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作社教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后来他说，这个报告不戴「右」的帽子，实际上全是反右。

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后十条〉的修改由刘少奇亲自主持。根据陈伯达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当天，刘少奇又离开北京，经武汉、长沙抵达广州。这次南下，除了具体督促各地社教外，主要任务是修改〈后十条〉。因此，刘少奇要田家英同他一道南下。田感到非常为难。他本不赞成对农村形势和基层干部的过左估计和「扎根串连」、「搬石头」等左的做法。但又很尊重刘少奇，也不能不服从组织，只能勉为其难。临行前，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请求指示。毛交待两条：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在飞机上，田将毛泽东的两点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到达广州后，刘少奇亲自主持修改〈后十条〉，加进了一些十分尖锐的内容和语言。在做法上，与毛泽东对田家英讲的意见也呈相反态势。刘少奇主张，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8月16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建议」。信中说：「各个县分别搞时，一是缺少办法，一个是县委同下边犯错误干部有牵连。因此，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一个县可集中工作队员上万人，声势浩大。省地机关派工作队，上下左右同时清理。建议中央机关也要抽出人组织工作队有一万至几万人。」他说：「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8月18日，毛泽东批覆刘少奇的信说：「少奇同志：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18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意（议），照此办理，迅速实行。」

毛泽东本不赞成这样搞，何以作这样的批覆呢？两天之后即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找李雪峰和华北各省、市委书记谈话，李雪峰等人表示不赞成刘少奇主张的这种部署。他们认为：每个县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河北一百四十一个县，按这个进度，五年才能搞一半，时间搞得很久。毛泽东说：「少奇同

志信我已经批了，中央同志讨论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毛泽东还探问，据说有的人对王光美的报告有保绍。所谓「王光美的报告」，即是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所作〈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人们简称作「桃园经验」。据王光美1980年说：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才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欣赏，推荐给江青看，毛主席多次鼓励表扬我，还在中央会议上表扬了刘少奇，鼓励我到各地去讲」，「毛主席要少奇同志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后十条（草案）〉」。于是王光美在河北省讲了以后，又到其它省市作报告。刘少奇似乎对「桃园经验」特别的珍爱。8月19日，即毛泽东在北戴河找李雪峰谈话的头一天，刘少奇从广州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由中央批转王光美的报告。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为此，刘少奇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批语。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同一天，刘少奇将〈后十条〉修改稿让田家英带回北京，并致信毛泽东和中央，建议先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征求意见，在10月会议时定稿。

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的信，搁置了一星期。8月27日，即刘回京第二天，毛泽东就刘少奇两封信所提之事作了批示。关于〈后十条〉修正草案，毛没有同意立即下发省、地、县，而只批示「此件请印发各大区书记及少数参加会议的同志，加上中央参加会议的同志，越快越好，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作修改。」至于王光美的报告，毛泽东批道：「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并「请小平同志办」。这时，中央正在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有各大局第一书记和江苏等八个省委第一书记参加。讨论〈后十条〉修正草案和社教部署，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刘少奇说：「这次运动要上下左右一道解决，所有根子都要挖出来，所以要彻底革命，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刘还提到「反右倾」。他说：「这次运动，我们有些同志怕干部躺

倒不干，怕影响生产，东也怕，西也怕，就是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和平演变』，不怕脱离群众。这是个甚么问题？本质是甚么？」他又说：「前几年『宁左勿右』，现在又『宁右勿左』，这对运动的阻碍相当大。」刘少奇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江渭清的，但又不仅仅是针对他一人。他特别提到在南京时听到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对「四清」骨干「打击报告」，「反攻倒算」的情况。7月29日，王光美打电话给江渭清，

第八章抓住龙见

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刘少奇之所以在这个会上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是要以此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当时，刘少奇曾找江渭清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问江：「为甚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这一问，显然问题严重了。江渭清回答说，不晓得有这样一个文件，待我请省委查一查。这时，在北京开会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连打三个电话给江渭清，非要江作检讨不可。后来，江渭清让省委办公厅做了一个检查。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向刘少奇写信检讨了错误。9月30日「刘少奇写了一封〈给江渭清同志的信〉」，严厉批评各地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封信经毛泽东同意，印发全党，成为「四清」运动中的一份影响颇大的文件。江渭清「顶撞」刘少奇，成为四清运动中上层的一段公案。〈后十条〉经过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再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审阅，9月18日由刘少奇签发给县以上党委和工作队。这个修正草案，后称〈后十条修正草案〉，以区别于1963年11月下发的草案。〈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原草案作了许多重要修改。一是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衡量社教运动搞得好还是不好的六条主要标准；二是规定领导人员必须亲自蹲点；三是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四是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基础；五是「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以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六

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要认真进行补课工作」；七是整个运动，大体分两个阶段，分别解决四不清和敌我问题，组织建设问题。这七点中，第五点是最重要的变化。根据这一条，所有进行社教运动的基层组织 and 干部，都靠边站了，由工作队取而代之。

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前后，刘少奇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了运动向「左」转。9月1日，以中央名义转发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向全党推广扎根串连的做法。10月12日，刘少奇代中央

下'、八付利州又' 矛盾寻（1964—1965）— 历史的变约

起草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的批示。同意李雪峰信中提出的「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提出对已烂掉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进行夺权斗争，迅速加以解决。10月24日，刘少奇又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由陈伯达亲自搞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提出基层干部躺倒不干的，可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11月1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规定凡工作团集中进行运动的地方，当地县委和县人委即由工作团领导。在这些文件中，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小站夺权经验」。这些文件如倾盆大雨般拨下去后，各地紧张动员起来，从各行业、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织工作团、工作队和工作组。一些在校大学生和一直视为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这次当了一回革别人命的人。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记述了1964年9月10日后工作团的声势。他这样说到：为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必须组织强大的工作队。全省组织一支六万人左右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和一支二万人左右的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以后随运动的深入发展，逐步壮大这支队伍。要求机关干部除老弱病残和其它不适宜参加工作队的人员以外，区以上机关按三分之一、公社按五分之一、企事业单位按100 / 0 — 150 / 0的比例抽调。另外，选拔一批优秀的

农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回乡职工以及城市企事业工人和不脱产干部参加工作队。工作队要以开展运动的县、市为单位建立团部，由所在地区的地委书记担任团长。与此同时，省委决定成立「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协助省委掌握运动情况，研究有关政策，处理日常工作。

如此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让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强烈震荡。每个地区集中上万人搞一县的四清，以大兵团「作战」方式，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其结果是发现，这里也「烂掉了」，那里也「烂掉了」，叩 / 、于 7 ' I ' 卜 “月点州斗

基层干部大多数都是敌对阶级分子。许多地方开展了夺权斗争。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基层干部们，惶惶然如热锅上的蚂蚁。其中不少人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山东省曲阜县东郊大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支部书记郭守明是全省著名劳模，在他领导下，大队发生巨大变化，群众生活大有提高，然而工作队进村，不问青红皂白，发动群众整干部，将全大队干部隔离审查，郭守明全家被斗。青海省一个公社，工作队认为要撤职处分的干部占 47 % ，其中认定为地富反坏的占 21 % ，蜕化变质的占 26 % 。许多地方还发生打入、捆人现象，自杀、逃跑事件频频发生。在北京郊区通县，二万多工作队员进县，一百一十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七十多起，死五十多人。贵州省委认为全省一半以上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重划阶级，甚至审查社员成分，清洗混入的敌人。

「斗」上的「左」倾行为很快影射到「面」上的四清。山东烟台地委提出干部退赔指标。乳山县连开十八天三级干部会，限三天退完。县委动员说：「如果不立即退赔，就要考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五顶帽子，哪一顶给你戴。」不少干部怕戴帽子，只好卖掉口粮、房子、衣服、被褥来退赔。山东菏泽专区成武县，有些单位以「参观」的名义串到干部家搜查，有的连身上穿的棉裤也被迫脱下退赔，只剩下一条单裤；有的全部家当都上缴了，炕上只剩下一片席。这种风潮很快也蔓延到城市社教运动。上海市向一百三十三个单位振驻了一万五千人的工作队，有的单位发生打人、罚站、挂牌游行、经济搜查现象，甚至使用录音诱供、监视侦查等方

法。

事实上，这些构成文本的四清运动情况，只是通过不同渠道反映上来的某些细节。实际情况比这还要严重。下面这则史料来自新华社记者杨克现。他作为一名社教工作队员，记述自己真实的观感。杨回忆，他本是怀着知识分子净化自己灵魂的心情来参加社教的。据长辈说，知识分子只有到基层去，到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经受锻炼，接受教育，才能得到脱骨换胎的改造。但报名那天，社教总团办公室负责人见他来自新华社，便以革命需要为由，强留他在总团机关筹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安社教报》。杨克现回忆说：进入社队阵地前，我们报社的编辑和「四清」工作队员们一起，全都去聆听了有关长安阶级斗争形势的报告，以提高斗志。作报告的是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长安社教工作总团张国声副团长。报告列举了种种事实说明长安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张强调说，整个西北地区土地改革很不彻底，长安县更不彻底，漏划了大量地主与富农，贫下中农「尚未彻底翻身」；又说，长安曾经是胡宗南和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大本营，国民党残渣余孽不少，他们混入革命队伍，还在残害贫下中农；又说，长安县靠近西安大城市，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勾结一起，正在向社会主义农村猖狂进攻。听了他的报告，队员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长安县满眼都是敌情，贫下中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的队员说：「听了张书记的报告，好似大家要去解放西藏一样。」尽管敌情描述得如此严重，张书记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右。

杨克现所在的《长安社教报》，虽是总团机关报，但总团又直属西北局领导。据说中央书记处、中共西北局都有领导在长安蹲点，但隐姓埋名，地点保密，不准采访。这样，《长安社教报》处于关门办报的状态。每期稿件，几乎全是工作总团团团长李登赢的批件和工作总团办公室筛选出来的报告。这些报告无一不在说明，长安县的阶级斗争形势比预料的更为严重。其中最令人吃惊的当推总团团团长批来的、王曲分团团团长、宝鸡地委书记张方海同志的文章。文章认为，工作队进村后，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结果，发现整个王曲的基层干部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敌对阶级分子，或是漏划的地富，或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或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兼而有之。这些人裹裹外外、上上下下勾结在一起，专了贫下中农的政，贫下中农怎么能够翻身！王曲离县城不远，是著名作家柳青一直体验生活的地方。他在那裹写出力作《创业史》，向人们展现了王曲轰轰烈烈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场景。怎么现在基层干部全部都成了敌对分子呢？柳青《创业史》中带领农民奔集体化的英耀人物梁生宝的原型王家赋也挨了斗。为采写报导，杨克现找到王曲「四清」工作队长、宝鸡地区的一位县委书记。杨说明来意后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分团长不是说，你

第八章抓住龙尾

329

们王曲分团所在这一带地方，农村百分之七八十的干部都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吗！？」工作队长先是一愣，稍一镇定，便下炕去关了房门，生怕被人偷听去似的压低了声音反问：「百分之七八十的敌我矛盾！？」「说实话，够上敌我矛盾的，恐怕连百分之三四十也没有！」杨克现忽然觉得这竟是此行的重要发现：上下级之间，对形势的数量估计，相差一倍。况且，谁敢担保，这百分之三四十的数量分析也合乎实际！「那你为甚么不向社教总团反映？」「唉，这种时候，谁敢？」县委书记声音变得更小了，甚至有点悲惨，愁锁眉尖。他说，他参加过多次运动，知道阶级斗争到党内就是路线斗争。一个人不能白白地作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长安农村敌情严重得无以复加。如何打退阶级敌人猖狂进攻，西北局领导秘密蹲点的细柳分团创造了一个新经验叫「小战斗」。「小战斗」就是对「四不清干部」先不开大的斗争会，而是要他们按照工作队的指挥行动，创造条件使他们犯错误，培养反面教员，以训练积极分子。杨克现回忆说：右和右倾机会主义，要知道，多少年来这都是一个可怕的词儿，大家都像躲避瘟疫一般地躲避着它。自从批斗「四不清坏干部」的「小战斗」打响以后，总团一个个「小战斗」都打得「十分漂亮」，「战果辉煌」。奇怪的是，工作总团几乎每天都接到「四不清」干部自杀的报告。有人背后说，这是土改、合作化以来自杀人数最高的记录。杨回忆说，自杀，是不能登我们的《长安社教报》的。自杀，按作家的说法，这是一个人丝毫看不到生的希望的悲剧。但我

们总团的领导不是作家，他们一直在大抓阶级斗争，并且坚决认为，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来，自杀正是长安县「四不清」干部顽固对抗社教运动、阶级斗争严重尖锐的具体表现。因此要求每个工作队碰到这种问题，都必须就地批判消毒，以重振工作队的威力。此时此刻，纵使有丁降惜自杀者的队员，若不是噤若寒蝉，也许都在加强学习后，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能那样雅致和温良恭俭让而「弄通了思想」，调整了心理上的不平衡。

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一段咒语，它使人们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同情心。对敌斗争，争先恐后。斗争对象

3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一旦被视为敌对阶级，人们就决不能发怜悯恻隐之心。大家宁「左」勿右。这是在所谓革命的名义下形成的一种「人性规律」。对右，避之如瘟疫；对「左」，趋之若鹜。「左」是方法问题，右就不同了，轻则立场不稳定、旗帜不鲜明，重则将被归入异类。在所谓革命的名义下，革别人命的人可能忽然会变成被革命的人。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只要其中的一顶帽子被戴上，他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社教运动到了1964年下半年，动乱的端倪已经出现，只不过它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动乱而已。

第九章 对决

二十世纪后半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纷争，以中国和苏联为主角。美国人很早即开始研究，中苏两个共产党大国，是否会永久友好下去？他们之间会不会发生斗争和分裂？这个猜想，最终被他们证实了。应该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聪明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中苏两党在历史、现实、利益、理念、价值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对于一个老式的战略同盟来说，这种利益和观念差别，最后导致分歧和关系破裂，几乎不可避免。中苏两党之间原本掩盖着的矛盾，在1962年以后终于无所顾忌地爆发出来。两个党的领袖，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是个性强悍的共产党人。毛泽东作为一个大党领袖，无论就地位和资历而言，都高过铁工出身的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在坐稳苏共领袖位置之后，也愈来愈显现出试图主宰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甚至主宰世界的政治野心来。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从意识形态争论到国家关系破裂，中苏两党互相攻讦，试图证明自己理论观点的正确和道义原则的公正性。当然，这些争论至今也未能获得对错和输赢的评判。但是，争论却对双方国内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持续久远的影响。特别是中国，为这场争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历史演变看，这场难以避免的争论和分裂，形成中苏之间的一次对决。毛和赫（包括赫之后的勃烈日涅夫）都反对妥协。结果，对决从 1963 年正式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一引火线

1962 年秋，中苏之间、中共与其它共产党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再次激烈起来。事实上，这年上半年中苏之争的间歇只是表面的。两党之间闲的争论通过相互之间的信函仍在继续着。只是在公开场合各自保持了某种克制。然而，正是这一时期，中苏两党，或者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相互激怒的事件频繁发生。其中突出者有四件大事：一、中国新疆边民外逃事件；二、苏联与南斯拉夫的进一步接近；三、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中立」立场；四、古巴导弹危机及中国对苏联的批评。在这些事件的分歧中，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总是纠缠在一起。究竟是由于国家利益的矛盾加深了意识形态冲突？还是意识形态分歧恶化了国家利益的矛盾？一时很难搞得清楚。1962 年 5 月 16 日，赫鲁晓夫访问保加利亚时，在瓦尔纳发表讲话称，苏联必须全力以赴地与南斯拉夫合作，并以此帮助南斯拉夫加强其社会主义地位。此后，批评南斯拉夫的声音在苏联新闻界销声匿迹了。9 月 24 日至 10 月 4 日，勃烈日涅夫以苏联国家元首的身份正式访问了南斯拉夫。他强调：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建立在赫鲁晓夫瓦尔纳讲话所规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苏共与南共的进一步接近，表明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最终放弃了两面作战的策略（即在反对中共「教条主义」的同时，也表明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划清界线），决心公开与南斯拉夫站在一起对付中共。在毛泽东看来，这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不可回头。6 月 21 日，毛泽东在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时公开断言：「修正主义不会改了。」

引起毛泽东下这个结论的还有中苏边境事件。1962年4月22日至6月，中国新疆伊犁和塔城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边民集体逃亡事件，据说逃往苏联境内的边民达六万七千余人。客观说，造成这个事件的原因，的确与中苏分歧有关。事件发生后，中苏双方为此再度展开了相互指责。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指出这是「苏联当局搞颠覆活动」，对苏联当局收留越境者提出抗议。4月29日，苏联政

第九章 对决

333

府覆照中国政府，指责中国政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阻止大规模越界。8月30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苏联指出，苏方「策划和组织了这次大规模越界」，中国新疆地区处于「苏联严重的颠覆活动的」威胁之下。中苏边界骤然紧张起来。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的党开始致信中共中央，尖锐地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这更加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

引起中共强烈不满的另一件事，是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苏共及欧洲国家共产党几乎都对在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正当防卫立场表示不理解甚至批评。这就不只是意识形态之争，而牵扯到国家主权了。如果说60年代初期有些事端难以避免，那么中印边境之战就是一例。客观说，中印关系恶化，中印边境冲突的出现，不是中方造成的，也是中国领导人不愿意看到的。无论从毛泽东强调反帝统一战线还是周恩来为安定四邻、睦邻友好外围而进行的大量工作来说，中国都不希望中印关系陷入僵局。

自从1959年第一次中印边境冲突以来，周恩来为说服印度尼赫鲁坐下来和平协商解决边界纷争，付出了许多努力。1960年4月周恩来亲赴印度，与尼赫鲁进行了七次会谈。为了挫败西方的挑拨和化解周边国家的疑惧，中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随后又同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以此昭示中国致力于周边友好的诚意。但唯独中印边界僵局无法打破。

1960年10月，周恩来与斯诺谈话中分析了印度的动机。他说：印度并不想解决边界问题，他们心裏的真正意图是想把中国的西藏地区变成一个缓冲地带。他们不希望西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西藏。1961

年，印度军队趁中国忙于解决国内困难，先后派兵进入中国军队后撤地区，建立了 43 个据点。直到 1962 年上半年，中方才发现印军入侵的情况。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印军拒不退出。中方由此不得不恢复巡逻 1 边境局势日趋紧张。7 月以后，中方三次建议中印双方举行边界谈判，又遭印方拒绝。10 月 12 日，尼赫鲁反而进行全国总动员，下令「清除」中国军队。10 月 20 日，印军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动了进攻。

3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在国际关系中，由于错误判断形势而鲁莽行事的事例不胜枚举，尼赫鲁也犯了这样一种错误。1963 年 3 月 15 日，陈毅外长在回答瑞典记者有关中印边界冲突时说：「这首先是由于中国一再忍让，印度政府得到一个错觉，以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同时，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困难，在国际上很孤立，因此妄图用武力来迫使中国屈服。」毛泽东对解决中印边界矛盾的决心下得很晚。直到 1962 年 10 月之前，他并不把印度的骚扰看得多么严重。他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东南沿海，主要目标是对付美蒋。这时，蒋介石正蠢蠢欲动，要「反攻大陆」。5 月 29 日和 31 日，毛泽东在上海和杭州两次召见总参谋长罗瑞卿。他说：「要准备蒋介石集团四十万人秋后登陆，不要为西面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面，这是我们的要害。」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央军委一方面从各地向福建集结部队，先是秘密开进，后来公开活动，目的是让蒋介石知道大陆已有准备，迟滞他的行动；另一方面则展开政治攻势，并在外交上确定以美制台的方针。周恩来曾电召中美华沙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指示他尽快回华沙，以了解美方的态度。6 月 23 日，王炳南约见美方代表卡伯特，强调指出：中国认为美在蒋背后起作用，蒋的冒险行动要由美国来负完全责任。卡伯特当场表明：美决不会支持蒋进攻大陆，他甚至透露美国愿与中国联合起来制止蒋介石。美国的台海政策一直非常慎重。台湾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不能不引起美国关注。此时，美国政府认为，大陆虽有困难，远未达到蒋介石说「一触即发」的地步。美国也不相信蒋介石可以一举「统一中国」。这样，

如果美国卷入其中，势必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战争。更何况，肯尼迪政府正在悄悄地研讨美国对华政策的某种改变。因此，美国也正急于向中国表明：美既不支持蒋反攻大陆，也不会放弃台湾。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表示，美在台海地区的政策是「和平和防御性的」，在未获得美国同意之前，国民党将不采取「反攻大陆」的行动。经过中、美、蒋三方的幕后活动，各自都摸到了对方的底。美国不支持，大陆有准备，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冒险行动胎死腹中。

第九章 对决

然而，尼赫鲁却仍然抱着强硬态度。他有些有恃无恐，非要对北进政策诉诸行动。10月12日，当尼赫鲁实行全国总动员，扬言要把中国军队清除掉时，毛泽东最后下决心要打一仗。10月20日，中国军队进行了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印军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大规模反击。一交手，印军就毫无斗志，溃不成军。两次反击，第一次俘虏九百多名印军，第二次俘虏更多。而印军宣布，他们连一个中国俘虏也没有抓到。中国很快收复了印军越过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以北的中国地区，并且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正当国际社会为中印边界冲突闹得沸沸扬扬，周边国家忧心忡忡之时，11月21日，周恩来突然单方面宣布全线停火，并分阶段从1959年「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这一宣布引起世界舆论巨大轰动。它表明中国并不想与印度大打，只是为了维持国家主权恢复边境平静。中国政府处理中印边界冲突是有理有节的。

然而，中印边境冲突对于毛泽东的形势判断，对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却起了不小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不仅随时准备与中国决裂，而且有与美、印联手对付中国的战略意图，所谓「三尼一铁公司」联合反华的说法在党内流行起来。所谓「三尼一铁」即指美国的肯尼迪、印度的尼赫鲁、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南斯拉夫的铁托。所以中印自卫反击战被赋予反对帝、修、反的三重意义。

认为美、苏两国都有利用中印边境冲突的意图，不是没有根据的。正当中印交战之时，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中心代理主任托马斯·休斯敦给总统肯尼迪的报告，道出了美国的战略意图，……边界的持续

冲突实际上对美国有利，它将使我们在解决印度—巴基斯坦问题时发挥影响，使中国的入侵处于一种最不利的环境，使我们赢得印度的支持，使国际政治历史发展方向得到重新确立，并使苏联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而苏联不仅继续奉行所谓「中立」立场，事实上早就有意识地利用这一事态，加紧了对印度的拉拢，逐步与印度建立了军事关系。1961年4月，苏联卖给印度八架军用运输机，接着又提供了能爬高一万七千米的直升机。1962年夏，苏联又与印度签署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1—1962）——历史的变局

定，向印度提供米格战斗机和特许在印度建立一座制造这种飞机的工厂。同时，苏联增加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苏联人辩解说，苏联供给印度飞机对中印边境事件不会产生影响，但尼赫鲁所以有恃无恐，很大程度上就是摸到了美、苏的态度，并且有了这批苏联的飞机。中国边防军很快发现印度在使用这批飞机。10月8日，周恩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通报了中印边境形势，指出印军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中国将「坚决自卫」。在这次谈话中，周同时提到：「他们（印度）利用了苏制米式直升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运送军需，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印度使用苏制飞机进行挑衅，对我们前方战士有影响。」这里，周恩来只是通报了情况，并未表现出如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时的那种愤慨。而且说：「我们只是通知，对苏方没有任何要求。」这正好反映中苏分歧已经太深，中国对苏联已不抱幻想，因而也无所谓「要求」。然而，这件事肯定强化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的恶感。10月21日，周恩来访问朝鲜，在平壤同金日成谈话时又提到这件事说：我们的「战士们看到苏联造的飞机非常生气；古巴导弹危机成了中苏重开论战的导火线。在中印边界冲突之时，苏美之间也正陷入一场空前危险的核对峙之中。1962年7月至9月，苏联向古巴派去了一百艘舰船，秘密地将中程导弹和可载核弹的「伊尔28」轰炸机运进了古巴。然而纸裹包不住火，苏联的秘密行动很快被美国的U2侦察机发现，美国肯尼迪政府立即作出强烈反应：封锁古巴海域迫苏撤退。由此，引发了战后以来美苏之间最严重的核军事对峙，世界差点被拖进一场真正的核战争。两个核大国「眼珠对眼

珠地瞪了一下」。但在最后时刻，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在巨大的核恐惧面前妥协了。苏联同意从古巴撤走导弹核武器，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并相应从希腊和土耳其撤走核武器。

对于古巴抵御美国入侵的斗争，中国在道义上给予了坚决支持。但对赫鲁晓夫导演的这场危险的闹剧，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以冒险主义开始，以投降主义结束。以牺牲古巴主权利益为代价谋求与美国的妥协。中国批评赫鲁晓夫以冒险主义开

第九章 对决

337

始，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美国的鼻子底下部署导弹、核武器，其后果是应该估计到的。赫鲁晓夫当时和后来始终说是为了保卫古巴。这话并不可信。赫鲁晓夫的一位高级顾问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透露：

「古巴领导人从未提出过在岛上部署带核弹头的火箭问题。他们深知，部署这种火箭对古巴人民来说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他们坚信，他们同意部署火箭，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巩固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

赫鲁晓夫设想把导弹部署到古巴去，是他在对保加利亚的访问中提出的。当赫鲁晓夫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黑海边交谈时，马告诉赫说：黑海「对岸的土耳其有美国一个火箭核基地。从这个基地发射出来的火箭，可以在六至七分钟之内摧毁位于我国南部的乌兰和俄罗斯的一些大中城市」。赫鲁晓夫当时反应强烈地说，「为甚么苏联无权做美国做的事情呢？为甚么不能，比方说，把我们的火箭部署到古巴去？」一个冒险计划从此萌生。不过，赫鲁晓夫从来没有想过要与美国打一场核战争。他的这一行动只是要展示一下苏联的威力，希望美国承认苏联的核大国对等地位，改变苏美之间力量的战略平衡。自1959年以来，赫鲁晓夫一直在寻求与美国的平等地位，谋求大国协商主宰世界事务的格局。具体的战略目标是希望苏美法英达成协议，永久确定战后雅尔塔体制划定的欧洲边界，承认两个德国的合法性。然而，使赫鲁晓夫十分恼火的是，美国似乎无视苏联的对等实力地位，拒不承认欧洲边界和德国「一分为二」。对此，赫早就想显示一下苏联的威力。1961年赫以建立柏林墙相威胁，没有成功，随后，苏联

宣布恢复核试验，并且连续生产出当量上亿吨甚至几亿吨的巨型原子弹，引发了美苏之间新一轮核竞赛。古巴导弹危机不过是这场核竞赛的一个恶果。事实上，古巴导弹危机成了美苏之间走向某种缓和的契机，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意志力的较量，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看到，在原子时代，玩弄核游戏等于自取灭亡。这种相同的恐惧感使他们很快从过去的死敌变成伙伴。1963年1月5日，赫鲁晓夫放弃单独同东德缔结和约的打算，使德国和柏林危机宣告结束。同年6月，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了总统「热线」，使两国领导人可下、啊” 闷人叩么公” 7 以一边’。刘一 历史的变局以在必要时绝对保密地直接进行磋商。7月2日，美、英、苏在莫斯科签定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赫鲁晓夫希望得到的美苏对等地位和共管核武器的目的，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

可是，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以及之后形成的美苏缓和，却成了苏联及其影脣下的各国共产党与中共重开论战的导火线。正当美苏对峙并寻求妥协之时，中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10月25日，中国政府发表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声明。10月27日，美苏就古巴导弹问题达成妥协。10月28日，北京举行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支持古巴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大会。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和国元帅和将军们都参加大会。大会发出致卡斯特罗的电文。电文说：伟大的古巴革命是压不下去的，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团结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可靠的力量，它是任何武器都摧毁不了的。电文还说：「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可靠、最忠实的战友，永远和古巴人民同甘苦共患难。」11月1日，陈毅外长覆照古巴驻华大使佩德罗苏，支持卡斯特罗的五项声明，指出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是虚伪的，麻痹古巴人民斗志的「两手策略」，并且指出「古巴的命运掌握在古巴人民手中，而不是在任何其它国家手中」，「古巴的独立和主权决不能谈判，古巴的自由和权利决不能拿来交易」

中国的这些舆论，既是反美的，也是针对苏联的「投降主义」的。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国批评「投降主义」，并不是想阻挠苏联从古巴

撤退导弹。中国认为苏联以牺牲古巴革命和主权利益为代价，与美国讨价还价，出卖世界革命，谋求美苏共管。在当时中共领导人的理念中，虽并不否定核战争的破坏性后果，但并不相信核战争真的会打起来，反对渲染核恐怖而惧怕革命。中国的批评再次激怒赫鲁晓夫。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回忆当时赫鲁晓夫被激怒的情形说：「可以看出，他们（中国）的批评深深触动了他的心。他恼火、委屈、气愤。他觉得，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这样的反应，是试图利用几乎导致发生的核灾难的事件来积累政治资本。他觉得，毛泽东再次表现出

矛盾么早 n 仄

想把苏美推向决死一斗，而自己却站在一旁，正像中国谚语所说的，坐山观虎斗，这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的强硬反映和批评，也引发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一致指责。当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国家，美苏核竞赛和核对峙的恐怖阴云，构成了人们严重的心理担忧和恐惧。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虽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行为，但都不愿看到真正具有威胁的核对抗。因此，人们对美苏妥协和缓和抱有特别的期望。他们庆幸世界免于了一场核灾难。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们对中国的反应极不理解，几乎都持批评态度，似乎挑起这场危机的不是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而是毛泽东。对于这一点，当时中国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似乎并不真正理解。恰在此时，欧洲五党先后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无例外地，五党都在会上攻击了中共，从而形成了所谓「反华大合唱」，引发了中苏之闲正式的公开论战。

1962 年底，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五国共产党召开党代表大会。与以往一样，各国的党代会都邀请世界各国党派代表参加，这次与会的有六十余个党的代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没有被邀请，而南斯拉夫的代表却重新回到「大家庭」。这明显反映出社会主义阵营「分化和改组」的迹象。中共中央应邀派出代表赴会。参加保、匈、捷三党会议由伍修权带队，参加意大利党代会由赵毅敏（另一位中联部副部长）带队。11 月 5 日至 14 日举行的保加利亚党代会上，日夫科夫的讲话直接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六十四个与会党代表中批评阿党的有二十个。到

11 月加日至 24 日举行的匈牙利党代会上，谴责阿尔巴尼亚的国家代表增加到三十个。卡达尔的报告、库西宁（苏共领导人）的致词和各国代表的发言中，都有意影射攻击中共，还有六个外国代表指名批评中共。墨西哥代表言词最为尖锐，他说：「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歪曲了马列主义原则，伪造历史事实，企图以此来证实自己的保卫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立场和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政策。」在中共看来，这些言论和行为，不过是苏共指挥下有计划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历史的变局
对中共的围攻，是修正主义者发动反华运动的一个新步骤」。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伍修权，「抓住祸首，进行回击」，对于仆从国不予纠缠，同时指出苏阿关系恶化的责任在苏共，揭露反华大合唱，抓团结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旗帜。11 月 24 日，伍修权遵照指示，利用闭幕酒会的机会，发表讲话，回击了大会上对阿党的谴责和对中共的影射攻击。不过这次会议，中共与苏共还没有完全撕破面子，双方都没有点对方的名。

然而，在 12 月 2 日至 8 日举行的意大利党代会上，分歧完全公开了。12 月 30 日，赵毅敏率团抵达罗马。当晚，意共领导人巴叶塔兄弟向赵提出：大会将公开讨论某些分歧问题，会直接涉及与中国的分歧；大会未邀请阿尔巴尼亚，但邀请了南斯拉夫。赵当即表示反对，特别是对公开分歧的事，请他们慎重考虑。巴叶塔兄弟报告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陶仍坚持原意。他的理由是，意共党员和群众都关心分歧问题，意共领导需要公开说明自己的立场。陶并说：「有礼貌地表示与中国不同意见，不是批评，更谈不上攻击。」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党不需要指桑骂槐。」12 月 2 日，陶里亚蒂在开幕会上的总报告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中共和毛泽东的主要观点。他强调说：「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核战争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是「人类的自杀」。他呼吁「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他批评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强调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他称赞古巴危机期间苏联的政策是捍卫了古巴的独立，批评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和荒唐的」。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诬

咸和攻击行径」和中共与阿党「保持了不可容忍的团结」表示痛惜。他还警告中共代表团：「当你们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却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相信你所说的其余一切了。」他主张，通过「和平共处」，「革新全世界的结构」，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和创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他认为「和平过渡」已经「成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陶的这些话，完全同中共平时阐述的观点相对立。

第九章对决

341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三十三个党的代表，其中反阿又反华的有十五个，反阿但不反华的有六个。再次形成了对中共和阿共的围攻的态势。赵毅敏等中共代表在会议上表现出很强硬的政治态度，顽强地顶住了压力。陶里亚蒂报告指名批评中共时，代表团「采取不起立，不鼓掌，不理睬的办法，表示异议」。在陶谈到苏联关于古巴危机期间的政策时，全场起立鼓掌，「唯有我们安坐不动，引起全场震动」（赵毅敏语）。12月4日，赵毅敏向大会致词，进行反批评。会场上发出嘘声。赵发言后，西共领导人伊巴露丽上台发言。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女领导人在讲台上挥舞拳头，大声喊叫。次日，巴叶塔作专题发言，再次批评中共。苏共代表此时隐在幕后，发言并不显山露水。《米兰晚邮报》评论说：「中国代表们在会场上所有眼光注视下显得那么倔强。」

这种情形同时在捷共党代会上发生。捷共和其它党的代表在会议之中给中共戴了五顶帽子：「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条主义」，指责中国在古巴问题上反对「明智的妥协」，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闯祸。伍修权参加了12月4日至8日的捷党会议。会议最后一天，他在大会发言中回击了对中共的指责，并向大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召开「一次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协商会议」，来讨论各党之间的分歧。特别恶劣的是，在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名攻击中国。

12月12日，赫鲁晓夫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对外政策的

讲话，为他的古巴危机期间的政策进行辩护。讲话依然是明批阿尔巴尼亚，暗指中共。他说：「在古巴冲突的和平调停期间，大家可以听到那些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们不满的尖厉声音。」他在评价中印边境冲突时，再一次明白地偏袒印度。他说：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

， 1 居口个个口个月口个二届口口曰届一

1 吴玲西：《十年论战：1956 — 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 505。

中争人氏共和国史· 第五卷（1962 — 196 邨一 历史的变局

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这个暗示是明显的，即中印边境战争是由中国挑起的。他公开地为南斯拉夫辩护，并且指出「正是那些采取了和正在采取教条主义立场的人们出现了主要危险」。

二反击

面对五国党代表大会上出现的情况，毛泽东决定反击。一方面，这些外国共产党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干涉了中国内政，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五党会上的对中共的攻击，牵涉到一系列理论意识形态问题，也使毛泽东的国际「反修」找到了突破口。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其中就包括着要看到国际修正主义对国内的影响。毛泽东对于在中苏分歧中探取忍让策略早已不满。他认定对国际修正主义如果不展开反击，不仅会使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歧途，而且也会使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发生错误的演变，助长「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其结果是很难保证中国不出修正主义。而在国际斗争中又把反帝、反修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相联繫，利用中印边境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两个事件同时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真面目，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行动。这次五国党会上的争论，尤其是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直接指名批评中共，使毛泽东感到：再也不能忍让，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进行反击。他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明确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毛泽东是以睥睨的目光看待各国

共产党的「反华大合唱」和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的。当他认定必须进行反击的战略原则时，他是具有无比气魄的革命斗士。对于是否会树敌太多，是否会被孤立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表面看，在一个时期，我们在形式上是少数，但实际上是多数。只要路线正确，是不会被人打倒的，就会胜利。对于打

第九章对决

击的目标，毛泽东说过：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杭州度过他六十九岁生日。这一天，他豪情勃发，思绪万千。写下了《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其反修旨趣、斗士风格，统由诗来言出志向。1963年1月9日，毛泽东又书赠周恩来《满江红》词，用意更为直白：

小小家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妣埤穗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码跃抽长战。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已经发出战斗的响箭。他渴望革命精神翻江倒海，「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 11 晓（驻苏大使）、伍修权、赵毅敏回国后，毛泽东把他们叫去杭州汇报情况。听完汇报，毛泽东对前方「战士」给予了鼓励和慰问。紧跟毛泽东、高举「反修」大旗的康生，在此前后也以伍修权和赵毅敏出国遭遇为题材，写出几句打油诗来，其中有这样两句：「伍泰然四闯恶狗村，赵再见独战骡马国。」后来伍修权解释说：「『恶狗村』是诬指我刚去的东欧四国，『赵再见』是因为『赵』是意大利语『再见』的意思，『骡马』则是意系罗马的谐音。」毛泽东的反修诗与康生的打油诗，反映出当时党内「世人皆修我独马」，欲挽狂澜于既倒舍我其谁的普遍心态。「反修」大旗一树，全党立即紧张起来，国内政策分歧暂时置于脑后，大家都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写作小组，以「参加过莫斯科八十一党会议、起草过给苏共《答复书》的秀才们组成一个班子，收集1960年莫斯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会议以后，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联在正式的或者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违反八十一党会议声明的材料，特别是收集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和不点名攻击我党的材料。还要联络部、外交部、新华社和调查部也专门成立一个班子，来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写作班子集中于钓鱼台国宾馆，首先「负责对五个党的代表大会的情况先行研究、分析，然后提出对策，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起草有关的致辞、声明和评论」。中央书记处直接负责写作班子的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就每篇重要文稿的写作都要召开会议，进行专题讨论。毛泽东在外地或在北京，亲自掌握写作情况，审阅批改文稿。1963年2月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后，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写作小组的命名：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康生，副组长吴玲西，组员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等，此外还有若干「秀才」：许立群、姚臻、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和熊复。陈伯达为非正式的「机动」组员。可以说，这些人都是一时之秀。同「国际修正主义」展开论战的响箭，已经搭在弦上。1962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社论，答复了赫鲁晓夫12月12日讲话。社论标题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原题为「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团结对敌」。毛当时在武汉。他在文稿上批示：「小平同志：此文已阅。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⁴社论批评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党的错误做法，只能加深分歧、制造分裂，为亲者痛、仇者快。文章指出，这种「恶劣的表现」，起源于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这是文章中唯一直接涉及苏联的地方）。文章在回答外国党对毛泽东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观点的批评时，坚决主张共产党人应「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同时不指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文章说：「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

吴冷西：《一卜年论战》，下册，页 493 — 49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506 — 507 。吴冷西：《！·年论战》，下册、页 515 。

第九章对决

345

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的进攻性核武器撤出古巴，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甚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这篇社论的发表，标志着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经过保、匈、捷等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共和阿党进行「围剿」之后，中共发起的正式反击。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篇社论是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刘少奇认为，陶里亚蒂在他们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稍有理论色彩，应该有一篇社论给予回答。⁵ 社论重复了上述许多论点，批评了陶里亚蒂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关于古巴危机，文章指出，中共从不主张玩弄核武器，从不认为避免核战争是「慕尼黑」，但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帝国主义的妥协」

1963 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社论指出，列宁主义「目前空前厉害地遭受现代的修正主义者的攻击、歪曲和糟蹋」。现代修正主义者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把后者描写成「和平的」、「民主的」、「超帝国主义」；在争取世界和平、争取和平共处问题上把列宁主义庸俗化到极点；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攻击马列主义；故意散布谎言，不许被压迫人民和民族进行革命，「只要能够浑浑噩噩、糊裹糊涂地活下去就行」。社论指出：「修正主义是麻痹人民的鸦片，是安慰奴隶的靡靡之音。」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篇社论也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他认为文章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毛泽东还特地规定，社论「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963 年 1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通知正式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应充分利用有利形势，在国际共运中争取左派和中间状态的同志，对于右

吴玲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517。吴玲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517。

甲平人氏矢和国史·第五卷— 1962 — 1965) — 历史的变局派分子的挑衅，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予纠缠」) 而是同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绝不退让。

1 月 11 日，彭真向党外人士作反修报告，回答了大家对中苏会不会分裂的疑虑。他在报告中说：要准备对付修正主义者的一切挑衅和进攻，包括准备对付分裂。他阐明了中苏分歧的根本点在于：(1) 革命不革命？(2) 反帝不反帝？关键是反美不反美？(3) 对民族解放运动是不是真正支持？(4) 维护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是依靠美帝头子的明智和两大国首脑的明智，还是依靠四种力量的联合斗争？(5)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是不是和平共处？(6) 兄弟国家、兄弟党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还是独立、平等的兄弟关系？1 月 29 日，中央转发了彭真的报告。中共中央的通知和彭真的报告，表明中共已做好了中苏分裂的最后最坏准备。

苏联和欧洲各党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反驳中共。1 月 7 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达万言的文章，再次批判「纸老虎」的观点，谴责阿尔巴尼亚，为苏南关系和好作辩护。1 月 15 日至 21 日，在东德党代会上，气氛恶化到了极点，赫鲁晓夫亲自赴会并作了长篇发言，他的发言第一次指名批评中国，并且呼吁「停止共产党之间的攻击」，起了动员作用。中共代表伍修权在大会发言，欢迎停止相互攻击的建议，建议早日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然而，与会的各国代表失去了耐心和理智) 伍修权的讲话不断地被「呸」声所淹没。当提到苏方时，台下有意起哄，拍桌子、吹口哨、跺地板，一片混乱，企图打断伍修权的发言。大会执行主席一再阻止伍继续致词。伍致词后，大会执行主席竟然提出抗议，表示「最坚决地拒绝」中共代表对南斯拉夫的批判。伍只得硬着头皮顶住。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心裏虽然不免尴尬，表面上却还镇静，我想自己正代表看一个伟大的党，执行看自己领袖的指示，作为一个客人来到这裏，主人不能也不应该对我无礼，就像毛主席诗中说『我自归然不动』地硬着头皮顶住了。有的记者形容我当时能『泰然自若』，因而称我为『伍泰然』。」

经过欧洲党的几次会议，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阵线也趋于分明。一方是苏联影脣下的欧美各主要政党的联合阵线，一方是中共的第九章对决

孤军作战。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共的「战友」。意共、法共、美共等四十多个党当时纷纷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谴责中共，尤其是谴责中共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强硬立场。1月9日美国共产党的声明，指责中共实行的是「导致热核战争的政策」，甚至说中共假左派的路线同最冒险的美帝国主义者路线相吻合。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回击，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看重回答了在东德党代会上对中共代表的围攻。从2月20日起，《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赫鲁晓夫两篇讲话以及苏共、法共、意共攻击中共的材料，准备逐一加以批驳。这时中共有意在策略上留了一手，避免点苏共领导的名，而以意共、法共等领导人为批评对象。

三破裂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中，赫鲁晓夫掌握看多数党，处于有利地位。他开始的策略是，让其它「兄弟党」领导人撕破脸皮，自己避免直接点中共领导的名，以「指桑骂槐」为能事。在造成围攻中共态势时，却又呼吁停止公开论战。2月21日，中共中央突然收到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表达对「正在动摇兄弟党的团结的公开的持久的激烈争论」的关心，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召开中苏两党会议，为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作准备。

这时，一些处于反帝斗争前线的党对国际共运论战忧心忡忡。尤其是越共领导人，他们亟需中苏两国的共同支持。在以往的争论中，越共虽有不同观点，但总是倾向于中共一边。现在也开始犹豫起来。胡志明与诺沃提尼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停止争论，加强团结。胡还在中苏之间进行调解，这使中共领导人十分不满，认为他们「不分是非，只讲团结，不讲原则」，但是认为越共对中国基本上是友好的，反帝是坚决的，因此以团结为主，并作「善意的」批评。

3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5）— 压史的变局

2月23日，毛泽东接见苏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他告诉对方：赫鲁晓夫一面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自己又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本人的就有两篇。我们从20日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登完。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党公开指名攻击我们了。毛泽东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你们放手批评好了。契大使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毛泽东说：现在不过是打笔墨官司，是所谓意识形态斗争，有甚么了不起？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时间过去了两年，毛泽东同契大使再谈话，已经不那样和缓热情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在正式答复苏共之前，中共加强了论战的攻势。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再发表若干文章。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1963年《红旗》杂志第三、四期连载长篇评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国内各大报刊加以转载。该文在《人民日报》从3月1日至4日连载四天。随即出版了单行本。这篇文章洋洋十万余言，是论战中的一颗重磅炮弹。文章阐述了中共与「现代修正主义者」之间存在的主要原则分歧。文章嘲笑苏共领导人害怕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国的文章和干扰中国的电台广播，批判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尤其批判他是「议会迷」。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答多列士〉一文综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目的在回答那些指责中共是分歧的「罪魁」、「祸首」的党。之所以指名多列士，是因为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谈论分歧最多、攻击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等党最恶毒的就是法国共产党的多列士。7之后，3月9日，中共中央覆信苏共中 7 吴玲西：《十年论战》，下册，页525。

第九章对决

央，重申 1962 年 4 月 7 日信中提出的建议，表示欢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为创造良好气氛，中共暂停公开答辩，但保留对公开攻击答复的权利。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给赫鲁晓夫和苏共留有余地的方针。至此，从 1962 年 12 月 15 日到 1963 年 3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一共发表了七篇文章。而在每一篇文章发表前，都用很大篇幅来刊登对方的反华言论。充分表明了中共对论战的自信。”

3 月 30 日，苏共中央再次致函中共中央，表示苏共有许多理由答复中共的攻击，但不愿中苏论战让敌人感到高兴。语调似乎很和缓，但信中系统地阐述了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并为中苏会谈规定了五点讨论范围。有先声夺人，为会谈定基调之意。在这次信函中，苏共中央还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苏联最后一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当然，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是不会去苏联的。4 月 2 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召见苏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对此答复说：毛泽东因健康原因不能赴苏会谈。

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共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意图，是要把苏共二十二大纲领当成国际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为了不让苏共乘机封住中共的口，必须在两党会谈之前对苏共纲领亮明自己的观点。4 月 4 日，中共中央将苏共中央 3 月 30 日来信全文发表，同时组织起草答复文件。先由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一份关于对苏共纲领的意见《备忘录》，因为份量还嫌不足，未发出。4 月 17 日，毛泽东让秘书林克通知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去杭州，「讨论对苏覆信」问题，随后组织人马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文件起草之始，毛泽东就确定了两个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文件起草过程中，分别向在京的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意见，争取支持。5 月 22 日，毛泽东同专程赴杭州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思谈话，系统地介绍了中苏分歧的由来，表示要采取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方针。8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530 — 531。

甲争人氏共扣国灾’ 第五春（1962 — 196 必一 历史的变局

经双方多次交涉，中苏两党会谈定于1963年7月6日至20日在莫斯科举行。然而，会谈还未举行，论争的气氛已经升级。6月14日，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覆信（简称〈二十五条〉），并于6月17日公开发表，这份由毛泽东亲自定题定稿的覆信，更加全面深刻地批判驳斥了苏共的观点，文件指出，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只能根据1957年和1960年共同签署的〈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革命原则，而不能根据别的其它甚么东西，而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中共中央并通知苏共中央，中方将派出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进行双边会谈。〈二十五条〉的发表实际上使中苏论争达到了又一高峰。赫鲁晓夫为此恼羞成怒。他在6月18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严辞抨击中共中央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且断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当天，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指责中共中央6月14日的覆信「歪曲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6月21日，发表苏共中央全会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的决议：「责成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即将举行的同中共中央代表的会谈中」，「坚定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并「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党和其它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一苏共领导的攻击。」

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参加会谈的代表团名单，并指出苏共对中共6月14日的信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但表示：「鉴于中苏两党会谈即将举行，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和苏共领导人对我党的攻击，暂时不作答复，但是保留答复的权利。」7月4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参加会谈的苏共代表团成员名单。并对中共中央7月

矛几浮万次

1 日声明进行反击。7 月 5 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声明，表示「不能同意苏共中央在（7 月 4 日）声明中对中共 7 月 1 日声明的歪曲指责和攻击。」「责成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对苏共中央的歪曲、指责和攻击给予必要的评论。」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苏联驱逐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的事件。毛泽东对中苏论战有高屋建亲的气势，他总是在自己的报刊上全文公布对方的批评文章和双方来往信件，尽可能把争论公开化，以教育人民。但苏共对中共的文章不予转载。于是自年初以来，中方利用驻外使馆和新华社驻外分社开始向各驻在国散发材料，争取支持力量。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信发表后）苏共以公开发表会导致论战激化为由，拒绝在苏联发表。中共认为这是封锁，是有意向苏联人民「隐瞒」中共观点。于是通过驻苏使馆人员和留学生在莫斯科和其它城市散发 6 月 14 日覆信的俄文版，引起冲突。6 月 27 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使馆，宣布三名使馆工作人员和两名留学生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回国。6 月 30 日）被驱逐人员抵达北京，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7 月 7 日，北京召开大会，支持我方人员的行动。7 月 9 日，苏共中央为此发表声明，指责中国领导人这种行为会给苏中友谊带来危险。7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予以反驳，说「这是一种正常的对等的活动」。因为苏联驻华人员也在中国散发过苏共中央 3 月 30 日的信，苏联「采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态度，是不能达到真正团结的。」

这一连串的声明和反声明，驳斥与反驳斥，表明双方已经毫无缩小分歧的打算。据中方统计，在苏共中央全会后不长时间，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责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三百篇之多，其它党的攻击文章还不在于其内。双方都要在会谈之前造成先声夺人之势。中苏两党会谈就在这种气氛中开场。

1963 年 7 月 5 日，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冯自力（驻苏大使），顾问为吴玲西、范若愚、张香山、姚炼、王力、余堪。苏共代表团团长仍是苏斯洛夫，团员有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春（1962 — 1965）— 历史的变局
科夫、契尔沃年科。会谈从7月6日开始，一直持续到20日。一共举行了九次会议。

这是一次被称之为「聋子对话」的独特的会谈。会议之始，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就会议开法，达成五点协议，规定两团交替发言，对方发言时不要打断，会议结东前，双方不发表任何关于会谈消息。一场各自陈词、相互辩驳的会谈开始了。其日程开列如下：第一次（7月6日），苏斯洛夫发言。第二次（7月8日），邓小平发言。第三次（7月10日），苏斯洛夫发言。第四次（7月12日），邓小平发言。第五次（7月13日），波诺马廖夫发言。第六次（7月15日）彭真发言。第七次（7月17日），安德罗波夫发言。第八次（7月19日），康生发言。第九次（7月20日），苏斯洛夫发言，邓小平发言。引述中苏双方各次发言的内容，会不胜其烦。无非是各自陈述自己已经多次公开表明观点，批驳对方的观点。值得说明的是，中方的行动一切都在毛泽东的指挥之下。代表团每天及时将会谈情况和内容报告北京，中央向毛泽东报告请示后，又立即给代表团发来指示。所以，会外反而比会内忙。

开始，这种「聋子对话」式的会谈还能持续，然而，会谈期间，苏共中央按捺不住了，违背了双方达成的会谈结东前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于7月14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关于这封〈公开信〉，当年的起草人费·布尔拉茨基回忆说，「在列宁山的会议厅裏举行会谈期间，苏斯洛夫跟苏联其它领导人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必须赶快在一天之内准备好一份表明苏共同中国领导人争论的立场的文件，并当场把这称为〈公开信〉。然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苏斯洛夫当时说『给他们出其不意的打击』时的脸部表情，他同时发出甜而又甜、轻而又轻的笑声……但第二天他又提出怀疑：当会议还没有结东时该不该就这样做？后来我明白了，这是苏斯洛夫个人特有的作风。」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二十五条〉建议信进行了全面反驳和回击。这就使开始那种各说各的「聋子对话」也对不下去了。在第八次会谈中，康生发言严厉批评苏共歪曲和攻击中共代表团

的立场，并且破坏了君子协定，单方面发布消息。他十分激烈地批判了苏共否定斯大林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路线。康生发言后，苏斯洛夫立即提出「坚决抗议」。他说：「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声称「中共领导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邓小平接着发言说，「你提甚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

会谈进行不下去了。根据北京的指示，邓小平建议，这次会谈暂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一时间继续举行会议，时间和地点由两党中央另行商定。7月20日，第九次会议讨论会谈公报。苏斯洛夫说：苏共曾准备继续会谈，但因中国同志建议暂停，苏共愿意响应。他为苏共〈公开信〉辩护说，发表的原因是因为中共没有接受停止论战的建议。他再次提出建议停止论战。邓小平发言说，我党历来主张不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在平等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苏共〈公开信〉苏共和其它党对我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我们还没有回答。他说，待作了必要的答复之后，看你们是否言行一致，再来讨论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会议毫无结果，唯一达成的协议是另择时间继续会谈，仅是没有把路完全堵死而已。当天下午，苏共中央主席团宴请中共代表团。宴会上，邓小平重申邀请苏共代表团到北京举行会谈的希望。赫鲁晓夫表示愿意接受这个邀请，下次会谈时派代表团去北京。当晚，中共代表团乘专机回国。

邓小平叙程回国时，毛泽东特电代表团成员分乘两架飞机，以防不测。这时，中共对苏联的戒备已非常深了。7月21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时，毛泽东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几乎所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亲赴西郊机场，欢迎凯旋归来的「反修战士」。建国后，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来，只有少数几次。可记及的是1960年刘少奇访苏归来、1961年周恩来参

丁'、" 骗7、' r 州人取 J1 誉 (1, b 乙一 i, b)) — 卢
发又则支斤 J

加苏共二十二大后归国以及这一次邓小平率团参加两党会谈后归来。’机场上聚集了五千多人的欢迎队伍，还有各国使节和国际友人等。整个机场被锣鼓声和「反修 J 口号所震动。代表团走下舷梯时，毛泽东领头迎上前去，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问好，并有少先队员献上鲜花。在全体合影留念后，代表团绕场一圈，全场发出一片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中外记者将这一盛大场面摄入了镜头。第二天首都各大报刊都对欢迎场面进行了突出报导。伍修权作为当事人之一，后来在回忆中感慨良多。他说：「对这场破格破例的欢迎仪式’，我们都明白这并不是冲着我们这几个人，而是借题发挥地对外国『帝修反』特别是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组织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政治示威，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按毛泽东『总导演』的安排走上国际舞台的一些尽职尽责的『演员』。」

欢迎仪式结束，毛泽东破例没有让代表团成员各自回家休息，车队集体奉命紧跟毛泽东的车开进了中南海。毛泽东坐下来，就让邓小平、彭真作详细汇报。邓、彭汇报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专’必静气地倾听，不时地点头称是，毛泽东有时还插上几句话，说几句笑话。显然他为这第一回合的胜利而兴奋。毛泽东评价代表团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认为，所谓完全的胜利，就是代表团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毛泽东说，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就是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像公报所讲的，以后再继续举行。留这么一个尾巴，这么一个余地》就是说中苏两党的关系还不是完全破裂。但是】离破裂也差不多，已经到了边缘了。10 本来希望弥合分歧的中苏会谈，反而成了中苏两党走向彻底破裂的里程碑。会谈后，毛泽东断言：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现在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

9 参见吴玲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623。10 吴玲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623 — 624。

巾 7 必干，1 仄

四「三家条约」

使毛泽东断定中苏分歧已是敌对性质的，不只是中苏会谈的破裂。赫鲁晓夫在中苏会谈之际，正在莫斯科同美、英谈判部分核禁试条约，并于中苏会谈后的7月25日与美、英签署了这个条约。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把事情做绝了，终于走上了美苏联手约东中国的道路。50年代后期起，苏美两国就不时提出过裁军和核禁试建议，但都为对方拒绝。伴随禁试建议的是核竞赛的升级，核门槛愈垒愈高。然而，到了1962年秋，美苏双方重新获得了推动核禁试谈判的动力。一方面双方都从古巴导弹危机中感受到了核恐怖，另一方面双方在防止核扩散，制止非核国家拥有核武器上找到了战略上的共同点。当时美苏想限制的，一个是法国，一个是中国。

1961年，美国得到情报，中国正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核武器，估计两三年内就可以制造出来，肯尼迪上台伊始，就在考虑如何阻止中国成为核大国。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中苏重开论战，裂痕不可弥合，肯尼迪政府认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美国的基本看法是，赫鲁晓夫反美调子低，对打开苏美关系表现主动。中国在宣传中强烈反美，支持世界革命，倡导武装斗争，比苏联更「好战」。美国的策略是拉苏联打中国。通过美苏缓和和支持赫鲁晓夫反对中共的观点，通过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增加中国的威胁感。1963年1月，肯尼迪在白宫的一次会上说：「如果一次禁试条约只涉及美苏两家）就意义不大，如果能影射中国，价值就很大了，特别是今年比去年更重要。」这番话表明，肯尼迪估计中国研制核武器即将成功，因而他急切要加快美苏条约谈判，企图通过苏联管束中国。他猜想赫鲁晓夫会有相同的考虑。

肯尼迪的猜测不是无根据的。但赫鲁晓夫想控制中国已是有其「必而无其力」。1962年8月，苏联正式通知中国说，他们已接受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关于签订一项核禁试条约的建议。说这项建议提出，核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49—1965）—历史的变局
禁止向无核国家转让核技术、制止核扩散，无核国家也应同意不拥有核武器。苏联通知虽然没有要求中国要做甚么，其用意已尽在不言中。中国政府于9月和10月两次向苏联政府提交备忘录，明确表示，苏联向美国承担义务，是苏联自己的事，但中国希望苏联不要破坏中国

的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义务。然而苏联不予理睬，宣称它的强大「火箭—核盾牌」不仅保障着苏联的安全，而且保障着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安全。在中国领导人看，这完全是核垄断。中国的安全能够寄托于日益走向敌对的「盟友」的核保护吗？

1963年6月6日，中国政府再次向苏联政府发出备忘录，尖锐指出：苏联的那一套是要「保护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只许你们一家干，不许别的兄弟国家同你们一道干」，「要大家服从你一人，你一人控制大家」。备忘录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中国的本意是劝阻赫鲁晓夫不要签署条约。然而，赫不仅听不进，而且在不同场合攻击中国。7月2日，他在柏林讲话，对肯尼迪表示赞赏。7月4日的讲话更是影射毛泽东，说「只有疯子」才指望用战争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煞有介事地说：「每消滅一个资本家，就会有一百万工人陪着送命，· · · 有些人不那么看，随他们去吧，历史会教训他们的。」7月25日，苏联终于同美、英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在中共领导看来，条约并不能约束美、苏自己，而只是想剥夺中国也包括法国进行一般核试验的权利。赫鲁晓夫选择这个时间来谈判签约，也极具挑衅性。这时，中苏会谈已告失败，中共代表团还未离开莫斯科，美国代表团就已到达。其象征意义昭昭然。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曼对记者说：「这次能够达成协议，第一个原因是目前的中苏分歧，赫鲁晓夫在这个时候非常想有这么一个条约。」他在内部讲话说得更加透彻：「赫鲁晓夫选择这个日子，常良可能说明他要用美国来作打手或杠杆，逼中国让步。」不过，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清楚，他们谁也没有办法压毛泽东接受条约的约束。签约时，哈里曼一再追问赫鲁晓夫：「你们能使中国签字

第九章对决

357

吗？」赫鲁晓夫避而不答。他只表示：对于这样一种发展「并不过分不安」，因为「自1960年以来，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任何工业性质

的技术援助」，他断言：「中国缺乏发展核能力— 包括核武器和运载系统— 的工业基础。」

「三家条约」一草签，立即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7 月 31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了这个条约的歧视性，指出，其目的在于巩固核大国的垄断地位，东缚别人的手脚，而它们自己可以几续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声明提出了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并且倡议召开世界首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8 月 2 日，周恩来以总理身份给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写信，转达中国政府的声明，希望得到各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同日，《人民日报》发社论）8 月 10 日又发「观察员」文章，对条约全面痛加驳斥，提出反对核霸权、核垄断、核讹诈的口号，认为三国条约，有害无益，适足以麻痹世界人民斗志，方便了帝国主义。文章表面矛头指向美国，实质上针对美、苏两家。

此时，肯尼迪政府考虑过对中国采取行动，摧毁中国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并且一再摸苏方的意图。7 月 15 日，美国国务院给正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发去密电，指示他「就限制或防止中国的核发展探询赫鲁晓夫的意见，并探询他是否愿意针对这一方向由苏联采取行动，或接受美国的行动」。据报导，苏方对美国希望与苏联合作摧毁中国的核计划是了解的，但苏联始终没有响应。赫鲁晓夫不想走得那么远，毕竟他还是共产党的头。

不管中国当时知道不知道这些内幕，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决不会屈服于这种压力。这只会促使中国加紧研制自己的核武器。自从赫鲁晓夫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以后，尤其是 1960 年撤退专家之后，中国领导人就下了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武器。当时中国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陈毅元帅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它们搞上去。否则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不硬。」1961 年以后实行经济调整，大批企业下马，但原子弹和导弹研制不仅没有下马，而且加强了力度，国务院设立国防工业办公室。为了集中领导，协调攻关，1962 年 11 月，

甲举入氏丢和国又

- 矛盾春 {1962 — 196 幼— 压史的变局

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一个十五人的「两弹」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亲任主任，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七个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文七个部长。核研制正取得突破性进展。毛泽东岂会受制于「三家条约」，屈服于美苏的核讹诈。这只能强化他对赫鲁晓夫的恶感和鄙视，强化他响应挑战的欲望。1965 年秋，毛泽东作《念奴娇·鸟儿问答》词。在下半阙，毛泽东写道：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远：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试看天地翻覆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毛泽东用拟人化的问答，痛骂了赫鲁晓夫的「三家条约」，对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极尽鄙薄和讥讽之意。

五公开论战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二十五条〉建议信的发表，7 月 14 日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披露，这两个文件的面世，使中苏分歧和论战完全公之于世了。过去遮遮掩掩、照顾面子的考虑已显多余。毛泽东决定发动全面反攻。‘中共中央认为，反攻对中共有利。公开论战将使世界各国马列主义革命队伍迅速壮大，将在全世界掀起一个反对修正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高潮。

7 月 20 日，就在邓小平率团回到北京的当天，中共中央决定将苏共中央〈公开信〉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发表。同时再次发表中共中央〈二十五条〉建议信。随后，在党内传达了中苏两党会谈情况，并将《中苏两党会谈记录》发给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阅读。9 月 6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开始陆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论战文章，即人们熟知的「九评」。这九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

〈苏共领导

第九章对决

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1963 年 9 月 6 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9 月 13 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9 月 26 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10 月 22 日）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五评」，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7月14日）。「九评」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撰写。每篇文章均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毛泽东最后审阅定稿。这九篇文章大量地披露了中苏分歧的内幕，全面批判了苏共纲领，指名道姓地批判了苏共领导人。苏共以同样的方式应战。据中方统计，从苏共〈公开信〉发表，到10月的三个月内，苏联报刊广播就发表和转载了有反华内容的文章、数据计一千一百多篇。其中有的公然煽动中国党内和国内的「健康力量」起来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毛、刘、邓都受到指名批评，但矛头集中指向毛泽东，刘少奇次之。参与批判中共的其它「兄弟党」也不在少数。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公开大论战展开了。这一阶段论战，与此前不同。中苏双方都抛弃了指桑骂槐的迂回策略，再也不用拿第三者当垫背了，而是直呼其名，因而也就更难有缓和余地。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同斯特朗等外国友人谈话时说：「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

毛泽东高层建领、势如破竹的气势，使赫鲁晓夫有些招架不住了。他感到，长此以往地对骂下去，将会削弱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使他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发生分裂。因此，多次向中共建议停止公开论战，重开两党会谈和共产党国际会议。

1963年10月25日，中国党的「四评」发表后，赫鲁晓夫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他说：「就让时间来检验谁的观点更正确。」苏联报刊还发表了许多共产党倡议召开国际会议的声明。11月29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对公开论战争论问题的范围愈来愈大，「感到严重的忧虑」，要求「停止发展下去」，「把分歧放一放」。信函还提出恢复中苏贸易、重新派遣专家、谈判中苏边界等问题。历史就是如此吊诡。1963年初，中共呼吁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时，赫鲁晓夫以

目前召开会议可能引起分裂为由，拒绝了中共的建议。时过半年，赫鲁晓夫呼吁召开国际会议，又轮到中共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 11 月 29 日来函未予理睬。此时中共中央正在组织扩大国际反修斗争，从更多方面展开对以苏共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1963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把批判的内容，从政治理论方面，逐步扩展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要组织更多的党内外理论、学术工作者和干部，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认为扩大反修斗争，有利于锻炼队伍、教育群众。为此，决定成立了由廖承志、周扬为正副组长的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成员有刘宁一、孔原、赵毅敏、蒋南翔、刘少文、李一氓、张彦、冯铨、熊复、姚漆、于光远、孟用潜、乔冠华、宦乡、卢绪章、吴冷西、朱穆之、徐光霄、陈忠经等二十一人。并且决定建立苏联东欧、美国、西欧、日本、印度、东南亚、西亚非洲、拉丁美洲、国际关系、外国文学、国际行情、工人运动等一大批国际问题研究所，分别由中联部、外交部、中调部、中宣部、文化部、外贸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直接负责。各重点高校分别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所和院系，以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全面开展反修斗争。

毛泽东不仅认为苏联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而且对欧洲党的现领导也失去了信任。但他始终相信，修正主义者是少数，他们不会长久。他的目标是通过论战，使苏共和各国党内「马列主义者」的队伍壮大起来，并使更多的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毛泽东从苏共、保共、匈共、捷共中央不断换人的现象中得到鼓舞。1964 年 1 月 17 日，毛泽东对外宾说：「苏共内部不稳定」，「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毛泽东坚决拒绝了赫鲁晓夫停止论战的建议。他说：「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开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

第九幸对决 361 从 1963 年 12 月至 1964 年 2 月，中共又连续发表了「六评」、「七评」。事实上，中共的论战文章的确吸引了一些国家共产党中的「左派」，成为他们的理论来源。在这些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冠以「共产党（马列）」名称的小组织。这是赫鲁晓夫十分恼火的事情。苏共并没有停止行动。举「停止论战、召开国际会议」

的旗帜，对赫鲁晓夫来说，也只是一种策略。1963 年底，苏共中央向党内基层传达的一份文件中，系统地批判了中共观点，并说：「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在压制着中国共产党的生活和活动。」在 1964 年 2 月 4 日中共发表「七评」之后，苏共放弃了调和的表像，于 2 月 12 日背看中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一封信，号召采取「集体措施」，对中共实行「反击」。信中并且告知，苏共中央即将召开全会讨论中共的活动。此后各党分别阐明自己的观点。

2 月 14 日，苏共中央举行了有六千多名积极分子参加的中央全会。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向全会作了一份长篇反华报告，对中共领导进行了迄今最为全面的指责。其中尤其指控中共「采取了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和小组的方针」，指责中共「企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大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苏共全会决定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的行动」。这篇讲话无异于宣布苏共准备再次公开论战。只是因为应罗马尼亚党的要求，苏斯洛夫的报告暂时未予公开发表。

中共中央很快知道了这些情况。2 月 18 日，彭真奉命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口头通知契尔沃年科。20 日，中共中央覆信苏共中央，揭露此事。并且说：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停，「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苏共「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的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采取「恶劣的两面派作法」2 月 22 日，苏共中央覆信，承认有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信件一事，并辩解说，2 月 12 日信所以不给中共，是因为中共一直没有对苏共中央 1963 年 11 月 29 日建议作出答复。2 月 27 日，中共中央覆信，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两党订立一个协议，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

丁中八氏煮利斗× 一不八替 `上刘必一 17 叩) — 发丈的变向和材料。2 月 29 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终于答复了苏共中央 1963 年 11 月 29 日的信，表示愿意就边界问题达成谈判协议，但拒绝了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建议。再次谈到在援助和贸易问题上苏联领导人损害中国利益的一系列事实。关于论战，覆信指出，这是苏共二

十二大挑起的，「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覆信明确告诉对方：中共对苏共公开信的答复还没有完。

最后，中共中央提出四点建议：（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它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开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因此提议，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议。（四）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及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苏共中央于1964年3月7日覆信，说中共中央建议10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拖延时间」，表示不同意由十七国党筹备国际会议，提出了由1960年会议的起草委员会二十六国党参加筹备的方案。苏共中央建议：（一）1964年5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议。（二）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1964年6、7月召开。（三）同兄弟党协商于1964年秋举行国际会议。并以必须停止公开论战作为条件。这就是说，苏方坚持：先停止论战再举行会谈，中方坚持：只有达成了为议才停止论战。

罗马尼亚党在这场论战中，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他们一面劝阻苏共中央不要发表苏斯洛夫的报告，一面要求中共停止公开论战。3月2日至11日，由总理毛雷尔率领罗共代表团来到北京，同刘少奇

第九幸对决

率领的中共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但收效甚微。中方坚持，只有在双边或多边会谈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停止论战。3月25日，罗共再作尝试，罗总统乔治乌·德治分别给中、苏驻罗大使一个草案，建议由苏、中、罗各派代表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为国际会议作准备。这

个建议未得到响应。罗共自己也引起了赫鲁晓夫愈来愈大的不满，到后来苏、罗两家也吵起来了。

3月31日，中共发表了「八评」，即〈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赫鲁晓夫，集中批判了他的「总的错误」即和平过波的理论。坚持认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中共放弃了在1957年和1960年出于策略考虑接受的「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的折中观点。文章批判赫鲁晓夫是「继承托洛茨基的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共「领导同志」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3月底到4月上旬，赫鲁晓夫在访问匈牙利期间，对中国领导人进行猛烈的回击。他反诬中共是「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谴责中共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苏共中央决定发表了2月14日的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给中共以回击。毛泽东为赫鲁晓夫的被动而高兴。4月25日，毛泽东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不无得意地说：「现在是我们在指挥赫鲁晓夫，叫他跳他就跳，叫他笑他就笑。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可以挑起来的。」他说）赫鲁晓夫本来不想发表2月14日的决议和以苏斯洛夫名义作的报告，我们却要他发表，办法是发表「八评」，「这样就迫得他把那个决议和报告发表了。」

5月7日，中共中央覆信苏共中央。信中说「你们在2月背看我们向兄弟党发出反华信件，又在中央全会上决定「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共领导」之后，提出今年5月举行中苏会谈，以「尽快地调整现存的分歧」，是十足的伪善。关于中苏会谈时间，毛泽东在信中亲自加了一段：「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5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可能的，就是今年10月举行也太早了，以推迟到明年5月较为适宜，到时如果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信中说：全世界各国党的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甚么时候举行，要看中苏两党会

谈的结果而定。参加会议的党仍以十七国的党为宜，不同意由十七党扩大为二十六党的建议。至于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代表会议，在目前情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准备时间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毛泽东在信中警告说：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一定要召集部分党开会，「你们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6月15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援引1957年莫斯科会议决议关于「委托苏联共产党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文字，坚持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召开二十六党筹备会议。中共给予的公开回答是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一周年，即7月14日，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论战文章，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文章有对赫鲁晓夫盖棺论定的性质。

7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覆信苏共中央，集中批驳了苏共中央援引1957年宣言自称有召集会议的权利的说法。按毛泽东的说法，要「驳（剥）夺他的甚么召集权」。覆信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各国革命却胜利了，为甚么现在要这样急急忙忙开会呢？毛泽东在信中加了以下的话：苏共要召集的会议，「只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其渺小的会议」。他嘲笑苏共领导现在处在欲开不成、欲罢不能、骑虎难下的窘境。他写道：「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毛泽东估计苏联开不成这个会，「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然而赫鲁晓夫看来真要一意孤行了。

7月30日，苏共中央又致函中共中央，硬性下通知说：仍以二十六国党组成筹备国际会议的起草委员会，这些党的代表在1964年12月15日前到达莫斯科，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党不派代表参加，委员会也要开始工作；国际会议于1965年年中举行，这个党或那

第九章对决

365

个党拒绝参加的话，也不拖延。苏共中央要中共中央报告参加二十六国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同时向其它二十五国党发出了邀请。这表明苏共决心不顾中共的阻挠，要单方面采取行动了。8月30日，中

共中央覆信，坚决反对苏共领导非法召集分裂会议，声明决不参加非法的分裂会议。至此，两党的关系完全陷入了僵局。

这场关于停止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争论，表面看，分歧只在时间和程序问题上：赫鲁晓夫急不可耐，而毛泽东故意推迟；赫鲁晓夫坚持先停止论战后开会，毛泽东坚持在双边和多边达成协议之前不能停止论战；赫鲁晓夫坚持筹备会仍由原来二十六国党组成，毛泽东坚持筹备会只能由十七国党参加；赫鲁晓夫坚持国际会议仍由八十一国党参加，毛泽东坚持应当包括「重建的和新成立的兄弟党」（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锡兰、印度、英国的「共产党（马列）」）。其实质是，双方都要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毛泽东的目标是要打乱赫鲁晓夫的章法，挫败他挟国际会议以自重的企图，剥夺他的国际会议的召集权。毛泽东认为时间对中共有利。事实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已毫无共同语言，硬要开会也只能是吵闹一场，走向最终分裂。

六赫鲁晓夫下台

反修论战战犹酣。中共原本计划连发「十评」文章，哪知才发了第九评，赫鲁晓夫突然下台，论战失去了对手，「九评」由此成了历史名词。毛泽东后来若有所失地说：赫鲁晓夫下台「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1964年9月，赫鲁晓夫隆重庆祝他七十寿辰后不久，即前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黑海度假胜地度假。但风云骤变，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同事突然派专机将他接回莫斯科，并解除了他的一切党政职务，1957年夏季帮助赫鲁晓夫挫败莫洛托夫「宫廷政变」的朋友们，今天又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366

中争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4）——历史的变局

决定是10月14日作出的。当晚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通报重要事情。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第一个听取了苏联的通报。契尔沃年科说：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伍修权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杨尚昆，杨马上报告

了毛泽东。

10月16日，是具有戏剧性的一天。这一天，苏联塔斯社发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报，宣布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同一天，中国新华社宣布：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一个上天（原子弹），一个下台（赫鲁晓夫），两条震撼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同一天公诸于世，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刻意安排？伍修权说：这是毛泽东导演的又一幕极其精彩的国际话剧。他说：「原来我国的原子弹试验早就一切就绪，但是毛主席非要等一个最有利的时机。赫鲁晓夫一下台，毛主席当机立断，立即下令『起爆！』于是不仅把世界公众的视线牵到了中国，更把我国的这一胜利和赫鲁晓夫垮台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形象地说明『苏修』的失败和我们的成功。」

余湛的回忆则是另一种说法：「这完全是偶然的巧合。有人却说，我们选在这天进行核爆炸，意在向苏联显示实力。这当然纯属瞎猜。报导前毛泽东还担心不实，请周总理核实后再公布，怎么可能想炸就炸呢？」今天由参加原子弹爆炸的科学家和领导人披露出来的实况，已经证明这不是一次刻意的安排。因为原子弹爆炸对于气象、环境和技术要求极为苛刻，不允许有任何非安全因素发生，并且，中国是首次核试验，必须要把成功放在第一位，否则将造成推后甚至停顿继续实验的后果，那将是非常严重的。刻意安排之说只是良好的附会而已。无论是刻意「导演」，还是偶然巧合，丝毫不影响它们的戏剧效果和象征意义。赫氏下台，本来只是苏共内部的一次「宫廷政变」，但中国许多人都相信是「九评」把他轰下台的。原子弹爆发成功更使

第九章 对决

人们群情振奋。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此时虽然对赫氏下台的真实原因及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趋向还不摸底，但毛泽东还是决定打出一张牌：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时机，派出周恩来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前往苏联祝贺节日¹ 实际意图是摸摸苏共新领导的政治意向，寻求避免中苏彻底决裂的新途径。

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向苏联发出了重修于好的信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发去贺

电，电文并公开见报。中国报刊暂时停止了论战，开始正面介绍苏联新的建设成就。11月5日，毛、刘、朱、周再次联名发去节日贺电。11月6日，北京各界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11月7日，刘少奇、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11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考虑到在这之前双方还在对骂，这些姿态在国际上格外引人注目。中共对苏共领导人更迭到底采取怎样的态度？周恩来11月1日告诉全体国务委员：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第三，要观察一个时期。第四，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该弃权的，我们还要反对、弃权。看得出，这次行动的出发点是推动苏联新领导改弦更张，放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尽管所抱希望并不太大。当时对苏联新领导也有三种估计：一是换汤不换药；二是汤换了药也会有所不同；三是可能比赫鲁晓夫更难打交道。据说，赫鲁晓夫对自己的政策表现「把握不定」，「想寻找出路」。苏斯洛夫等人则对现行路线表现坚定不移，可能由于怕赫鲁晓夫动摇而将他撒职。要了解事件真相）惟有直接同苏联新领导接触。

周恩来赴苏前，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转达了中共中央派团赴苏的意见，同时建议苏邀请十二国党也派代表同时赴苏，以便相互接触和沟通。周同时召见各有关国家驻华大使，告知此事。苏联很快发出了邀请】除阿尔巴尼亚外，越、罗、古、朝，保、匈、捷、波、蒙等十一国积极响应并派团赴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压史的变局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伍修权、刘晓、潘自力、乔冠华、姚溱、王力、余湛等一行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受到柯西金等的欢迎，下榻列宁山政府别墅。此处对中国代表团并不陌生，前次中苏两党会谈中共代表团就居住于此。然此次重来，庭院依旧，招待的主人却换了，大家不免有些感慨。后来余湛回忆起一件当年的趣事：「有人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七言绝句《再游玄都观》：『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并将诗中的『赛」郎』改作『周郎』，奉赠周总理。回国后，和毛主席谈及此事，有人认为称周总理为『周郎』有些不恭。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还是『周郎』好。」

周恩来稍事休息，立即开始紧张活动。礼节性地拜访了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并接受他们的回访，参加节日的各种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同苏联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团接触，进行非正式交谈和正式会谈，了解他们的想法，阐明我团结对敌的愿望。活动情况每晚向中央请示报告。周恩来改善中苏关系、推动苏联变化的愿望，却原来只是一厢情愿。苏方仅仅撤掉了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思想和路线，新领导人仍然坚持其既定方针，相反还企图使中共改变方针。

苏共的意图很快由鲁莽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泄露了。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阅兵后的晚宴上，周恩来同苏联领导人交谈后，便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准备找他们交谈。此时，迎面走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他见到周恩来便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你胡说甚么？」周恩来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了他一句，随即转身拂袖而去。马利诺夫斯基仍在胡言乱语：「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他见周恩来已经走开，又走向正在同崔可夫元帅谈话的贺龙副总理，对贺说：「不要让毛泽东、赫鲁晓夫们来妨碍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回了他的挑衅，并报告了周恩来。代表团的同志听说后，都极为气愤，迅即离开了宴会大厅。

第九章 对决

369

周恩来回到我驻苏使馆，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认为事情决非偶然。这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11月8日，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裏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这使问题更加严重化复杂化了。当天上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

德戈尔内、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回拜中共代表团。稍事寒暄，周恩来便就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向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周要求澄清：「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要当卒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也撒换毛泽东的领导？」勃列日涅夫解释说，他们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他不是主席团成员，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应苏联领导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采用过的恶劣手段。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利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波德戈尔内说：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线。他们说：这个问题已经结东。周恩来坚持说：「问题没有结东，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连连说：「那当然，那当然！」

中苏两党会谈还未开始，气氛已完全恶化。马利诺夫斯基的公然挑衅，不仅为中苏重修于好设置了极严重的障碍，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而且给中国政治带来了难以言明的深刻影响。事实上不只是马利诺夫斯基的酒后狂言。在周恩来看来，中苏能否重，修于好，就看苏共领导愿不愿向中共代表团透露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是否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然而，从11月5日到达莫斯科，到11月9日正式会谈前，无论周恩来如何多方探询，苏方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

370

甲甲八民升和国丈·第五春（1962—1965）—历史的变向

11月9日第一次正式会谈，周恩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仍然搪塞，说可以在下次再谈，这不会妨碍我们研究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设性办法。他紧接看提出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它步骤。勃氏执意不谈赫氏下台的原因，周恩来只好暂时搁置一边。但周恩来没有接过勃列日涅夫的议题，同他们讨论停止

公开论战，而是提出关于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的问题，以便从中寻找苏联新领导究竟和赫鲁晓夫有多少差别。周恩来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成熟了，依我们看，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勃列日涅夫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周恩来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回答得很坚决：「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委员会。」周恩来说：「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命令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联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无论周恩来怎样劝说，勃列日涅夫都执意不改。周恩来建议另辟途里，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他们坚决不干，决不妥协也不讲任何道理。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他最后吐出真言，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些微的差别。

周恩来不愧谈判高手，从召开兄弟党会议这个具体问题上，逼出了苏联新领导人的真言：他们和赫鲁晓夫在对华政策上完全一致。勃列日涅夫和米高扬的发言堵死了此次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大门。周恩来得出结论：「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

11月11日，在第二次会议中，周恩来正式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决不变。第二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决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第三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11月12日，最后一

刀‘’斗‘砖’、

次会谈，由勃列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不出所料，没有谈出甚么新内容。

11月13日，周恩来率团回国。去机场送行途中，柯西金在汽车上对周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甚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周恩来问：区别何在？柯西金却又闪烁其词，避不直言。代表

团来时颇有劲头，回国时不免有点失望，甚感败兴。哪知毛泽东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导演了一场精彩活剧。专机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上年7月那盛大场面再度出现。毛泽东再次领看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所有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和数千各界群众，为代表团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仍旧是欢呼声、锣鼓声，依旧是握手、献花、照相、绕场一周。只是主角由邓小平换了周恩来。毛泽东这次举动包含更多的意义。他要向外界显示中国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显示中共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定立场，也表明他仍然牢牢地把握着政治大局，苏共妄想赶他下台的图谋永不会得逞。同时，盛大的欢迎场面也昭示了中国的兴盛与风发的意气。

七断裂

改善中苏关系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性质而不可能被双方领导人把握住，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好转，结怨却更深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肯定地说，加深了中共特别是毛泽东的警觉，因为苏联不乏颠覆其它党的领导的历史记录。特别是西方媒体煽动的中国代表团与苏联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的谣言，也加重了本已恶化的局势。

过去，赫鲁晓夫那光秃的脑袋总在毛泽东脑子裏晃动，现在又多了一个勃列日涅夫。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斯诺说：「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毛泽东说：「恐怕有一点。……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历史的变局

1964年11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说赫鲁晓夫「之所以垮台」，「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笔墨官司重新开始。

1964年11月24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信件，说26个党中主张召集会议的有19个，这些党有权进行会议的实际准备工作，并通知会期推迟到1965年3月1日。12月1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关于召开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的通告〉。12月11日至16日，以古巴的罗德里格斯为首的九国党代表团

到达北京，要求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接见他们并回答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1965年2月，柯西金去越南民主共和国途经北京，与周恩来和毛泽东会谈。柯西金要中国党在三月国际会议和越南问题上接受苏联的方针。柯西金说：三月会议改为协商会晤，多边会谈，日期、名称、内容都变了，希望中国共产党参加。周恩来说：三月会议是根据1964年7月30日一个党的命令决定于12月开的会议而推迟的，我们不参加。毛泽东说：我们不参加三月会议，不停止争论，不停止支持左派。要停止，你们收回公开信，收回苏斯洛夫攻击我党的报告，取消二卜大和二十二大路线。否则，要争论一万年。柯西金说：「不要那么久。」毛泽东说：「那就减少一千年，剩九千年，这是最大的让步，一让步就是一千年。」

不过，中国领导人并不想把两党意识形态论战引向国家关系的破裂。周恩来对柯西金说：国家关系应该发展，两国之间可做的事情还不少。他具体提出公开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五周年、发展贸易、进行文化合作、旅行、互派留学生、继续完成未完成项目等六项内容。柯西金表示赞同。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领导召开的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十九个党，美国共产党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拒绝参加的有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日本等七个党。

与会各党担心从此全面决裂

中国、朝鲜、。苏共中央不得不将「起草委员会」会议改称为「协商会晤」

第九章对决

3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批评它是一个制造分裂的会议，驳斥了会议对停止公开论战的呼吁。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不再承认存在一个「社会主义阵营」。1966的3月，苏共举行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不发贺电。从此中苏两党关系完全中断，长达二十三年之久。

中苏两党的唇枪舌剑、笔墨官司不能不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恶化。勃

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他更侧重于诉诸实力政策，6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增兵远东、驻兵蒙古。特别是1966年苏蒙签定军事协议，苏军得以合法进驻蒙古共和国境内，逼近中国。中苏边境日趋紧张，昔日盟友变成了敌国。到60年代末，两国的军事对峙使中苏两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直到80年代末，两党两国才打破坚冰，重归于好。双方都为近三十年来的对抗方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关于这场争论，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苏联的后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邓小平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字里行间透出对当年论战中的教条主义的反思。比邓小平小二十七岁的戈尔巴乔夫可以对此置身事外。他说：“我的年龄比你小，那场争论我们不想对此作出评价，而是指望你来作出评价，我同意你的基本想法。”邓小平接着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60年代中苏两党那场视同水火的争论，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内容，是反对苏共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维护中共自身的独立和尊严。这种强烈寻求自身独立和尊严的意识，甚至开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以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不正确的干涉，深深刺激了从中国本土革命中涌现的领袖们。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迷信，自遵义会议后开始被突破。延安时期，毛泽东和本土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领袖们，已经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理解和设计。他们如同羽化的蝴蝶，从茧子裹破壳而出，飞向了远方。

再要东缚中国本土革命的领袖们，已经不可能了。而要继续玩弄大国大党主义，必定会遭到中共的强烈反弹。毛泽东在抵制这种干涉方面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魄力。然而，到后来，中共也对其他党，尤其是

南斯拉夫和苏联国内外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全盘否定，基于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对于南斯拉夫率先冲破斯大林模式，对于苏联·东欧国家刚刚露出来的改革趋向，对于西欧共产党寻求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视之为「修正主义」。这实际上也可归于邓小平所说的「空话」之类）即含有教条主义的东西。

假如读者有足够的耐心，详细地对比阅读中苏双方论战的主要观点，不会是一件无益的事情。本书限于篇幅的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须强调一点，这就是在中苏大论战中，中国党方面在理论观点上的最重大失误，是错误地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三评」即〈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说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复辟了的国家」。对南斯拉夫在斯大林高压下，于1948年后采取的一些冲破了苏联模式的经济措施，如拆借数亿美元的外债，解散了许多强办的农业合作社，工厂实行工人自治，城市中有相当大数量的个体手工业，宪法允许有少量雇工等，都视作证据，来批判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在农村泛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得出结论说，「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所致。认为南斯拉夫有个「官僚资产阶级」。其和平演变过程是：

「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

第九章 对决

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等等，显然是非常教条化和错误的。

「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有看更为强烈的「空话」色彩。文章认为，在苏联不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还相当有力量，「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生资产阶

级分子」。他们 r 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j 。这些判断显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要害在于，国际上怎样 r 反修」，国内便有了参照系。用自己制造出来的批判修正主义的「风月宝鉴」，反照中国社会，似乎同样存在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一种莫名的危机感弥漫起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已在「九评」中形成。中苏大论战把中国党引向了反修防修的迷雾之中，这是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国最值得反思的历史现象。

第十章

紧张的政坛

中国 60 年代前期的历史特征之一，是国内政治的紧张化。这种紧张是全面、深刻和危机四伏的。当时人们的感觉】似乎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将要发生某种腥风血雨般的重大事变。人们的这种感觉，大多是由日复一日的政治宣传、政治运动和政治批判诱发出来的。事实上，这种感觉是虚假的。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虚幻出来的。紧张和危险，一旦成为人们意识中的「真实」，它所释放的反应能量将是巨大的。人们会睁大眼睛，到处寻找可疑的敌人。举凡文化、学术、艺术、思想领域裹一切稍许不被革命认同的东西，都将遭到怀疑和敌视。甚至，原本是社会生活中的小矛盾、不经意的摩擦，都会被标上「阶级斗争」的记号。而当党内真的出现思想分歧和争论，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产生某种歧见时，那整个党将面临一次「彻底的洗牌」0 1965 底突然发生的罗瑞卿事件，不仅给这一历史时段增加了迷津，而且给中共党内政治生活添加了新的紧张。可以想见，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内，人们的精神和情绪都是紧绷着的。

一批鬼戏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于国内的「反修」斗争，首先注重的是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但他始终没有放松对文化领域的警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 历史的变局

1962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巡视各地来到上海，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就提出了 r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问题。他说：「对

资本主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

毛泽东对戏剧界的不满，由来已久。毛泽东历来认为，历史由劳动人民创造，他们应是历史主角，但在旧戏中，帝王将相、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成了主角，劳动人民只是配角。因而，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有意改造旧戏。然而，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戏剧最具程序化，改造谈何容易。1961年以后，由于文艺政策的放宽，传统剧目的上演多了起来。其中也有一些未加整理、格调低下、解放后一直禁演的剧目。但其实问题并不那么严重也不难解决。然而，在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下，毛泽东把这些东西同修正主义联紧了起来。他对柯庆施等人说：「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

毛泽东得到的文化界首先是戏剧界的信息，许多是由江青提供的。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建国以来虽任职中宣部和文化部，但基本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她的首次亮相，要追溯到1962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夫人访华，当时江青曾出面接待她。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很难讲得清楚。他们爱恨交加。当然更多的是寄予期望。毛泽东曾经说过，江青政治上很尖锐。从骨子裏说，江青是热衷于政治的。处在中共权力核心的周侧，身份又极为特殊，使她逐渐膨胀起政治野心。她曾作有一首奇诗，人们通常把它作为江青野心的表露：「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文革」中，江青曾愤愤地说：「刘少奇他们专了我十多年的政，不让我参加党的活动。」可见江青在政治上愈来愈不甘于寂寞。而从制度上说，共产党也没有严格的规定，限制最高领袖的夫人参予国家政治。在现代历史上，在由一个人说了算的政治条件下，其它共产党也曾出现过最高领导人的夫人跻身国家高位的情况。

第十韦紧帐的政坛

江青涉足政治是得到毛泽东允许的。毛泽东曾对胡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甚么工作，你们也不要她用她。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据「文革」中红卫兵印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说，江青在60年代初的几年裹「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从而得出结论：「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说江青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系夸大之词。说她完全为了「审查」而看戏，也不可信。至少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她在北京看戏，在杭州看戏，大都为了消遣，进行「文化疗法」1962年上半年，江青在杭州养病，康生陪伴她一连看了两个月的旧戏，包括未经整理的解放后一直禁演的旧戏。江青的确有特殊的政治嗅觉。1962年7月6日，她观看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立即认为有「严重政治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应该批判。但当时毛泽东并没在意。

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江青约见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齐燕铭不知此话来历，不以为然。不久，江青又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向他们提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部长们依然是无动于衷。这次他们太不敏感。江青的话是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化界的不满。于是江青决心拿昆曲《李慧娘》做突破口。昆曲《李慧娘》，是老剧作家孟超由《红梅记》改编而成的，描写南宋一个贪赃枉法、卖国求荣的宰相贾似道，一日与其妾（良家妇女，逼迫为妾）李慧娘游西湖，偶见一少年当面怒斥贾似道。李慧娘不禁发出两声「美哉！少年」F「壮哉！少年」的感叹。贾似道大怒，将其推入湖中，含冤而死。然而李慧娘冤魂不散，变成了鬼，用头撞死贾似道。1961年夏，昆曲《李慧娘》在京上演，后到各省巡回演出，颇受好评，也得到周恩来的赞许。孟超的好友、北京市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观看此剧后，写了一篇剧评《有鬼无害论》，登在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上，署名F「繁星」J。其意思是说：《李慧娘》中写了鬼，但是个好鬼，有鬼无害。

江青认为《李慧娘》有政治问题，有鬼魂形象，需要批判。但文化部门掌握权力的人不加理睬。康生知道此事后，立即支持江青。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压史的变局

生是个很虚伪的人。他对旧戏其实十分迷恋。「大跃进」失败】 灾害降临，他突然转移兴趣，到处游山玩水，搜罗文房四宝，点看旧戏。其中许多是禁演的，如《花田八错》、《辛安驿》、《十八址》、《宝蟾送酒》、《柴市节》、《战绵竹》、《八阳》等。演员心有余悸，他跑到后台，给演员打气：「你放手演，出了问题算我的。」1961年3月22日，康生还到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号召「把剧目搞宽一点」，「不要太窄了」。此话一传，在北京、上海先后上演了一批未经整理的剧目。康生对昆曲《李慧娘》也特别热心。剧作者孟超是康生同乡，改编过程中多次征询康生意见。康生发话：「《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不出鬼魂我就不看。」彩排期间，康生亲自将迭句「美哉！少年」的后一句改为「壮哉！少年！」正式公演后，康生又亲临观看。看后甚为满意，特写信给作者：「祝贺该剧演出成功。」称赞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大好事」，指示「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甚么现代戏」。然而，康生的是非标准完全以政治风向而定。当听到毛泽东对戏剧不满，听到江青要批《李慧娘》后，康生立即翻脸，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地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江青的话可以不听，但康生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不能不执行。1963年3月16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在批评有鬼魂形象的戏演出渐增的问题时，突出地批评说：「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江青看到这份报告，仍不满意，认为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传统」，「争取到批评的权利」。1963年3月下上海，她终于找到了另一个知音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俞铭璜人称「苏中才子」。俞百般无奈，奉命写就一篇批判文章：〈「有鬼无害」论〉，1963年5月6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署名「梁壁辉」。「梁壁辉」者，「两笔挥」也。文章使用素隐的手

法，说《李慧娘》剧作者是影射攻击共产党，贾似道是共产党的总理，李慧娘反

第十章紧帐的政坛

381

对贾似道就意味看人变成鬼也要向共产党复仇。可见江青对「鬼戏」的批判，关键不在于它有鬼魂形象，而在于神经质地认为这些鬼魂形象影射攻击了大跃进及其后果。〈「有鬼无害」论〉的作者俞铭璜，在文章发表的半年之后就病逝了，时年四十七岁。他没有预料到，自己捉刀代笔的这篇文章，开败了文化批判的序幕。从此，全国戏剧界开始大批「鬼戏」。江青后来说：「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毛泽东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5月莽日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江青下上海，寻求柯庆施的支持，不是偶然的。她是以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奥援。柯庆施在1958年后，政治生涯如日中天。因为发表「乘风破浪」的讲话，颇得毛泽东的赏识。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反冒进大为不满时，曾动过由柯庆施取代周出任总理的念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柯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成立中央局时，他被委任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长，是当之无愧的华东「第一人」。在六个中央局书记中，毛泽东最为信任和赏识的有两个，一个是中南局的陶铸，一个就是柯庆施。柯庆施本来就对周恩来、陈毅主持调整文艺政策不满。1961年6月「新侨会议」时，他指令上海代表「要带耳朵，不要带嘴巴。上海的路线是正确的，用不着检讨」。周恩来讲话批评「五子登科」，柯不准在上海传达周的讲话。柯还批评赵丹、张瑞芳等人是「通天演员」。1962年「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上海市坚决抵制，不准宣传。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新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正合柯庆施的口味。当听到毛泽东关于戏剧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太多的讲话后，柯庆施大加发挥，1963年2月12日，柯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即写建国以后十三年。他说：「因为没有人提倡写十三年，所以我来提倡。」「只要是写十三年的，我就带

老婆孩子买票来看；不是写十三年的，请我看也不看。」随后，在柯庆施的支持下，在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东代表发言强调：电影、戏剧中现代的、革命的题材太少了，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382

甲争入氏丢和国又‘弟立春（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妖魔鬼怪的题材太多了，外国的、香港的也不少，已经有喧宾夺主」，
「泛滥成灾」的味道，应该制定解决的措施。

对于柯庆施所提「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人们有不同的意见。在同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新侨饭店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张春桥在发言中进行辩解）讲了「写十三年有十大好处」，他甚至宣称：「只有写十三年，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才是社会主义文艺。」周扬、林默涵、召坏荃麟则发言指出：「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具有片面性。他们尤其批评了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论点。

提倡写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无可厚非。然而把「大写十三年」作为口号提出，具有极大的「左」倾片面性。柯庆施是在发挥毛泽东的思想，但似乎比毛走得更远。毛没有否定旧戏。他只是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太多，有西风压倒东风的味道。在上年12月21日的那次谈话中，他还说：「《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而「大写十三年」的口号，限定只有写十三年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论点，不仅一概否定了传统题材，也否定了建国前二十八年的革命题材，这无异于以题材决定扼杀文艺创作。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还有有意与周恩来、陈毅唱对台戏的味道，有藉此制造出一条「左」路线」来的用心。

「大跃进」中提出「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要求文艺为鼓吹「三面红旗」服务，严重东缚了艺术家的手脚，带来文艺萧条。有鉴于此，调整时期，周恩来指出：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他又说：演现代剧可以表现时代精神，演历史剧也可以表现时代精神。……如果只是把现实生活搬上舞台，那有甚么看头。陈毅更是

快人快语。他说：要写的东西很多，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都可以写，近四十年的革命实践也可以写，十二年来已经成熟的东西也可以写，为甚么要逼迫我们的作家忙于去写一些不成熟的东西，糟蹋精力，糟蹋劳动力，这不好。

矛盾早不众明以楹

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对「大写十三年」口号虽有异议，但从总体上接受并执行了毛泽东关于在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1963年4月，全国文联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周扬作了〈加强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把反对「修正主义」特别是苏联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作为当前的战斗任务。

二批「两界」

毛泽东本人的注意力愈来愈转向知识界和文化界，对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的不满与日俱增。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搞十条，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实际上是反对国内的修正主义」，「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艺术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陈』就是封建主义，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推出去，出社会主义。」他「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鬟，保镖就是黄天搞这一套不行」

。同年11月，毛泽东两次尖锐批评

和文化部。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管文化。封建主义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戏剧报》文化部不

说矿

，文化部不『帝王将相

1963年12月12日，中宣部编印的一份《文艺情况汇报》登载了〈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文章。该文介绍上海抓评弹的长编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毛泽东看后，想用上海来促北京，

促全国。他把此件批给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并写了一段批语。批语如下，

1 毛泽东在 1963 年 9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自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 5510

2 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5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两个著名批示之一。批示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柯庆施提供的材料。柯因此于 12 月 25 日华东话剧汇演的开幕式上讲话，大讲他的「大写十三年」的主张，并且严厉批评指责了文艺界：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相适应… …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甚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 …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赶来参加这次汇演。但批评戏剧界，田汉首当其冲，因为他是剧协主席。田汉在上海遭到冷遇，新年除夕晚宴主宾席竟没有他的座位。大会即将结束，秘书处传来消息，闭幕会主席台上没有田汉的座位。为避免尴尬，田汉悄然离开了上海。这时，一般人还不知道有毛泽东的批示，但已听到风声，文艺界有事了。

毛泽东把批件批给彭真、刘仁，也表明他对北京戏剧界的不满。但并非只是对北京市的批评。彭真看到指示后很紧张，打电话给周扬和林

默涵，让他们去看指示，认为这个问题要认真对待，要向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

3 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330—1331。

第十章紧张的政坛

385

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化艺术界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由周扬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的上述文艺批示。邓小平、彭真等参加并都讲了话。看来，大家都认同毛泽东对文艺界问题的看法，都认为见事迟、抓得慢了。当周扬讲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他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那些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紧接看，他提出田汉编剧的京剧《谢瑶环》的问题。他说：「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武三思的兄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彭真说：「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甚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在文艺这个战线上，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可以说比较落后，也可以说最落后的。」「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首先是我们领导方面有责任。拿我来讲，，· · · · · · 在整个文艺上我没有注意。……我看，你们要振作精神，深入地搞一下这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可不能忽视。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因为看了小说，看了文艺作品。匈牙利事变的时候，并不是将军组织了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乐部。现在我们让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在那裏泛滥，连我在内，我也是让人家泛滥的一个，咱们大家分担责任。我看，主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很及时，再不搞要吃亏，包括我们的子女，都要让人家挖了墙脚。」⁴邓小平说：「现在看来可以说有三句话：第一句话，统一认识；第二句话，拟定规划；第三句话：组织队伍。」

正当中央着手整顿戏剧界之时，戏剧界又发生了「迎春晚会」事件。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春节晚会，北京

和外地的戏剧工作者二千多人参加。因为是文艺界人士举办的晚会，不免有一些新奇的布置和着装。但此事被一位「思想警惕性很高」的参会者捅了上去，揭发晚会「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员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在此形势下，揭发不啻是雪上加霜。陆定一对 4 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页 552 — 553。

T 下 /、不骗叩常叮“斗二 k 不 J1 逐》’ 1, 0 必一 1 茎 D)) — 烟亡又转 7 文” J

此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剧协的一部分人已经腐败；所有各协会工作人员都应该轮流下放锻炼和加强政治学习」

中宣部立即向剧协党组织作了传达，责成作出检查。3 月下旬，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五十余人，连续开会三次，进行讨论。会议认为》 r 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暴露 j，并认为 r 类似『迎春晚会』这种事和由此而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其它协会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看 J，因此，「有必要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吸取教训，使坏事变成好事」。此后，全国文联及各协会开始了整风。参加整风的有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协会、美术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曲艺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学会等十个单位全体干部。经过二十多天的集中整顿学习，5 月 8 日，中宣部文艺处写出了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这个报告草稿认为文艺界中存在看严重的问题：（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各协会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二）文艺理论批评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三）对文艺队伍的进步一面看得多，落后一面看得少，忽视了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工作。各协会负责人纷纷表示承认错误。中宣部据此写出了报告。但报告还未定稿，自称「流动哨兵」的江青借口个人要看，私自将这份草稿送交毛泽东。这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恶感。6 月 11 日，中央工作会议得出某种结论，认为高薪文学家、高薪教授、高薪科学家都是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一部分。

6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起草的报告草稿上写下了批示，

这个批示也就是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著名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331·

第十韦紧张的政坛

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批示事实上对问题的估计更加严重了。文艺界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再走一步，就变成「裴多菲俱乐部」，那就是要策动反革命政变了。这个批示一出，整个文艺界为之震惊。其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严重和长期的影响。1980年，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并且被后来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整个文学艺术、电影和戏剧界都呈风声鹤唳状。有人形容说：毛泽东的批示，是一颗重磅炸弹。一阵刺骨的寒风，不仅吹走了电影界盼望的春天，还涉及其它文艺部门」1964年6月5日到7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参加观摩演出的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二十八个剧团，二千多人。演出了《芦荡火种》（即《沙家洪》的原剧）、《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姊妹》、《黛诺》、《六号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等剧目三十七个。这次汇演是在周恩来、彭真的亲自关心下举行的。这一批京剧现代戏是京剧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勉力京剧改革的成果的荟萃。当时周恩来亲自抓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开幕词中说：「今天这样多的京剧团集中北京演出，舞台上既没有帝王将相，也没有才子佳人，都是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这在京剧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也是戏曲历史上所没有的。」陆定一讲话说：我们要立定志向，努力工作，保证我们的后代不出修正

主义，保证资本主义在我国永远不能复辟。周信芳讲话说：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决心，把京剧这一武器拿到无产阶级手裏，根据 6 沈容：《红色记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页 1 2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汇演期间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等剧。

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为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江青早就处心积虑地把京剧「这一武器」拿到自己手裏，把自己装扮成京剧革命乃至文化革命的「旗手」。她的办法是两手，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说，叫做「大破大立」。她首先插手《红灯记》的创作，把《红灯记》打上了「江记」的戳号。继而又把《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抓在自己手裏，后来又抓了《奇袭白虎团》、《龙江颂》和《海港》以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把这几个剧树为八块「样板」。

1964 年 6 月 23 日，周恩来召集部分演出人员座谈会，江青公开出席，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演说，江青因掌握了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底气十足，一派「旗手」口吻：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对京剧演革命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那是不能设想的事……一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明方向。江青煞有介事地提出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数字。她说：全国的剧团有 3000 个，其中 90 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80 多个是文工团，其余 2800 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 90 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引人注意的是，江青三次表扬上海，却一句不提北京。表扬上海，也就是表扬柯庆施。

6 月 26 日，毛泽东对江青的这次讲话批示道：「讲得好。」在对现状日益不满的情况下，毛泽东愈来愈让自己的夫人出面，来转达自己

的想法。7月31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总结会上，周扬作了总结报告后，康生点了一大批电影、戏剧作品的名，其中有《北国江南》、《舞台姐妹》、《逆风千里》、《林家铺子》、《早春二

第十章紧帐的政坛

389

月》、《不夜城》等，还有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康说，这些都是「大毒草」。康并公开点名批判田汉。

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二个批示，使整个文艺界为之震动，文化部更是首当其冲。毛泽东亲自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康生等人参加，专门批评文化部，也批了中宣部和周扬。会上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主持。陆当场表示自己「见事迟」，不宜由他主持，建议由彭真挂帅。毛表示同意，并点名康生和吴玲西也参加小组工作。7月7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玲西组成五人小组，以彭真为组长，负责「贯彻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后来，这个小组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裏。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裏？20%？30%？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分不在我们手裏？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裏。」说着，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垮了。」

在文化部整风的同时，公开报刊对文艺作品的批判范围日益扩大。8月14日，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之后，先后被公开批判的影片有：《北国江南》（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早春二月》（谢铁骊编剧、导演）、《舞

台姐妹》（林保等编剧，谢晋导演）、《红日》（瞿白音编剧，汤晓丹导演）、《兵临城下》（白刃、林农编剧，林农导演）、《革命家庭》（夏衍、水华编剧，水华导演）、《林家铺子》（夏衍编剧，水华导演）、《聂耳》（于伶等编剧、郑君里导演）、《怒潮》（吴自立等编剧，史文帜导演）、《不夜城》（1958年7月即已开始被批判）、《两家人》、《球

39（）甲辛八人铃和哄叉’矛立誉乱 1yb 必一 1965）— 迁史的变向迷》、《逆风千里》、《抓壮丁》等。被批判的戏剧则有《李慧娘》和《谢瑶环》

被批判的小说更多，据人民大学戴知贤教授统计，有六十五部之多。其罪名大约归为六类：一、反党反毛主席，为高岗、彭德怀树碑立传；二、歌颂错误路线，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三、歪曲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主义；四、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五、丑化工农兵，歌颂美化敌人；六、大写「中间人物」，反对塑造工农兵美好形象。被批判的作家达五十五位，包括杨沫、梁斌、欧阳山、丁玲、王愿坚、周而复、秦兆阳、沙汀、艾芜、茹志鹃、周立波、曲波、马识途、赵树理、陈翔鹤、李准、康濯、马烽等几乎所有优秀小说家。这些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时，遭遇更惨，或伤、或残，或关牛棚、或入牢狱，有的被迫害致死，如赵树理、周立波、陈翔鹤等。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字狱从这裏开始。

批判还扩大到一些文艺理论观点。如在电影界，批判了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也遭批判。特别突出的，是批判了「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1962年8月2日至16日1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作协书记处书记邵荃麟（也是作协党组书记）主持，茅盾、周扬作了报告。邵荃麟在讲话中，针对几年来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和教条主义偏向，提出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要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这些论点，后来被说成是主张写「中间人物」来「反对写英雄人物」，是要「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是「同毛泽东文艺思想针锋相对的现代修

正主义的文学主张」。召卜荃麟则被指斥为「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等人把这次大连座谈会诬为「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的黑会」，召砖荃麟则被作为「黑帮分子」、「叛徒」、「反革命」批斗，1971年6月10被迫害致死。毛泽东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话不错，知识界也不例外。文化批判确实培养了一批「左派」，他们或从这种批判

河」1 Br 不'卜辟一润j，'黑

中找到了快感；或希望通过批判名家出人头地；也有虔诚的信奉者以参加一场「圣战」而感到神圣。因而，文化批判有不可遏止的势头，无产阶级快没有自己的作家和作品了，剩下的只有擅写批判文章的「棍子」。这使主持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者有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感觉，他们试图控制局面。1965年2月23日，周扬召集各协会和主要报刊负责人会议，提出写批判文章不要「打空炮」、「乱猜」、「乱扣帽子」，要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不能搞「教条主义」；并强调对夏衍、田汉等「要有历史观点」，「要一分为二」，「政治与学术要分开」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看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1965年4月，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的整风结东。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覆〉，免去了齐燕铭、夏衍等文化部副部长职务。5月，改组了文化部领导，成立了以萧望东（原南京军区副政委）为书记，石西民、颜金生（军队红军老干部）为副书记的新党组。一年以后，这个新党组也被砸烂了。邓小平讲话和整风结东，文化部改组，有使文化批判降温的用意。然而，到这时，已经欲罢不能了。对毛泽东来说，事情还没有开始。文艺界的批判，领良快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医药卫生界等各个学术领域。把反修斗争扩大到各个学术领域，这首先是从国际反修斗争提出来的。1963年10月到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

员会召开第四次扩大会，专门贯彻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10月26日，周扬在会上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任务。11月13日，刘少奇也到会作反修报告，他提出：

「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战线上要更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纲，来带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也带动各方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术研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5）—历史的变局

究和写作工作。」12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通知，要把国际反修的批判领域扩大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为此专门成立了反修指导小组，并且先后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成立了反修小组。反修斗争的视野从国际转向国内，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当中，

「理论权威」康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亲手制造的一场学术围剿，是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中国的哲学离政治太近了。哲学是甚么？哲学就是诠释的工具，诠释政治、诠释政策、诠释领导人的言论。政治风向一变，哲学也跟着变，弄得自己莫衷一是。这是哲学的幸还是不幸？杨献珍有些不同，他想说点自己的话。杨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53年正当展开社会主义改造时，杨献珍不同意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认为仍然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结果被概括为「综合经济基础论」受到批判；1958年哲学界发生「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杨献珍不同意把「同一性」视为「等同」。康生报告毛泽东，毛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康生散布出来，杨献珍「反毛主席」，结果受到批判。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实际上是为当时「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唯意志论提供理论支持的。而杨献珍恰恰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进行了严厉谥责。1958年11月，他对学员说：「大跃进」中一些人冲昏了头脑。

1959年6月，杨献珍对地方党校来访者谈话，尖锐批评了大跃进中各地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7月，他又在一次报告中批评一些地方大跃进「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浪漫主义百分九十九」。这些情报都反映到康生那裏，庐山会议后，康生布置在中央党校展开对杨献珍的批判

斗争，达八九个月之久，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杨被迫写了〈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书，康生才暂时放过，杨的职务由中央党校校长降为副校长。然而，时间不过两年，杨献珍又面临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大祸是由一个哲学命题引起的。「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列宁关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84。

第十章紧晕的政坛

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概括。1964年4月杨献珍在一次讲课中却提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对立统一的表达方法。听到杨的阐述，党校教员艾恒武、林青山心有所感，写了一篇〈「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文章，5月29日登在《光明日报》上。《光明日报》在艾、林的文章刊出前，将清样送给了康生。这时，康生直接领导着一个「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专门炮制「反修文章」，主要成员有关锋、林聿时、吴传败、林杰、张恩慈等。他们正在搜寻批判对象，看到艾、林的文章，如获至宝。康生「一看有问题」，艾、林「是杨献珍的代言人」。关锋看到清样后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反修哲学小组」根据康生批示写了〈「合二为一」不是辩证法〉一文。6月5日，登在《光明日报》上，署名项晴。文章说：「『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是对立的」，「『合二而一』必然调和矛盾。」康生利用全国京剧汇演大会开会之机，把艾、林的文章与项晴的文章交给江青，请她「送主席看」。康生惯用的办法是先拿到「尚方宝剑」，再展开批判。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发话：「『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号召展开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毛泽东如此表态，不只是「合二而一」的提法触犯了他的权威，更因为他认为这与「反修」和「革命」路线唱反调。他在国际国内正在进行一场旨在打倒修正主义的革命运动，强调斗争、矛盾、树立对立面、反对帝修反，强调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可以一分为二，党内也可以一分为二。这时突然冒出「合二而一」，这显然是为修正主义张目。毛泽东的表态，使康生有了「整」人的武器，于是他发动了对「合二而一」和杨献珍的批判。康生采取了「引蛇出洞」

的策略。即登一些赞成「合二而一」或虽不赞成但是进行学术讨论的文章，钓更多的人上钩，然后再反击和批判。1966年功月5日康生不无得意地说的：「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开始像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矛盾巷(1, bz-19的)一座史的变约

这场批判声势浩大。从1964年6月至9月，康生先后九次亲自召开会议布置批判文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等党刊都登载了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到1964年底，中央和各地主要报刊发表文章达五百篇之多。除哲学界都动员以外，还以工农兵的名义发表哲学批判文章。经过一场批判斗争，1965年3月1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向中央作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他把高级党校搞成独立王国，干了许多坏事」。其「主要错误」是：「一、反对毛泽东思想。」「二、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三、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四、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五、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六·同彭德怀一道反党。」「七、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八、包庇、安插恶翁地主反革命分子。」「九、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进行宗派活动。」「十、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9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高级党校的报告，撤销杨献珍的职务。杨献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更严重的迫害，在监狱「监护审查」达八年之久。受这一冤案牵连，有两人（孙定国、黎明）遭迫害致死，党校受批判者达一百五十余人，社会上受到牵连者难以统计。

受到严重批判的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家冯定的两本书《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冯定的这两本通俗哲学读本，出版发行量甚大，在青年人中有广泛影象。然而，康生作出批示，认定它为修正主义的毒草。两本宣扬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书之所以一夜之间变成「毒草」，原来起因是书中说了这样两句话：「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和「不应该将领袖神化」。在当时氛围下，这当然是犯了大忌

的，成了攻击「伟大领袖」的罪证。几个月之内，全国各种报刊发表批判文章数百篇。

1964 年下半年，康生、陈伯达在围攻杨献珍、冯定的同时，还开始组织围攻经济学家孙冶方。1924 年入党的孙冶方，为党内资格甚老的经济学家。可贵的是，他不恋官场，而是致力于学问。50 年代末和

第十章 紧账的政坛

60 年代初，孙续方针对中国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上的弊病，提出提高经济效果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在计划经济中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要扩大并适当规定经营管理的权限，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要提高固定资金折旧率，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等等。在 1961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一次理论会上，孙冶方对价值规律、利润、奖金和企业的自主权等问题发表了系统鲜明的看法。显然，这些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关于经济理论研究的有创见的思想，也是纠「左」的，它对改革传统体制模式进行了宝贵的探索。但康生却把孙冶方的观点作为「修正主义」思想报告了毛泽东，并说孙冶方比苏联的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1964 年下半年，孙冶方受到围剿批判。康生、陈伯达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文革」中，孙冶方被关进监狱达七、八年之久。然而，孙冶方其人，兼有学者的刚直不阿和革命者的坚韧不屈的秉性。他凛然应战，决不认错。在狱中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写他的政治经济学。1975 年 4 月 10 日，孙冶方获释出狱。他下车就对接他的人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性，三不改变观点。」

由以上对文艺界和知识界等「两界」的批判，暴露出党内存在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治取向的分歧。如果说，在概念上「文化大革命」系专指文化领域的 r 革命 j，那么革文化的命的运动，从 1963 至 1964 年就已经开始了。

三「两个主席吵架」

国际反修、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文化批判，这一系列的斗争，使社会政治气氛愈来愈紧张。反修斗争不仅使农村基层干部惶惶然，使文

化界人人自危，而且使党本身乃至中央内部的关系也不正常起来。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尤其是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愈来愈感到隔膜和不满。说到「一线· 二线」体制，这其实是毛泽东本人的主意。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谈到「一线、二线」问题时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单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 …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这虽然是毛泽东后来的说法，但「一线、二线」的设立，的确是毛泽东根据苏联的经验而考虑的「国家安全」措施。50年代后期，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辞去国家主席一职，还有一条理由，是要摆脱「杂事」，「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么些重要问题」。从毛泽东的个人性格来说，豪气干云和见微知着两者兼而有之。在领袖地位牢牢确定之后，他更愿意的是在书斋裏钻研问题，似乎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奥和世界新事物的离奇，对他产生着无穷的吸引力。当然，他已经是一个伟大民族的领袖，但真正的领袖并非事必躬亲的「操盘手」。领袖应该是永远处于高瞻远瞩和深邃思想的高处，指导人民朝既定方向前进的人。他年轻时说过，自己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现在办事的一面愈来愈离他远去，而传播思想的一面却愈来愈向他走来。他的思想阐释，已经在中国革命中是无人可以企及的了。当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愈来愈多，而国家主席一职迎来送往的繁文褥节又不胜其烦时，他极力想摆脱「杂务」，专注于研究，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处于一线，是毛的安排。例如毛泽东自己指定了刘少奇为接班人，这是他对蒙哥马利元帅 s 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45D。

第十章紧张的政坛

397

说的。1959年4月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61年9月毛泽东又讲过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

然而，这种「一线、二线」体制和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甚么需要呈报「二线」决断，甚么可由「一线」处理，全凭信任。毛泽东退居二线，专注理论，但他毕竟本质上是个革命家、政治家。他希望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指导实践。起初，他自信不当国家主席，「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然而，正是他退居二线之时，发生了「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困难这一连串的事变，他自感威信受到了减损。尤其是当他认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倾」、「动摇」，「是压我的」以后，产生了对第一线尤其对刘少奇的不满。1962年召开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把问题「抖出来」，是对第一线的一次严重警告。

1964年，从反修防修出发，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可忙于体制内既定程序工作的干部们却迟迟推不动，就是有些人不愿下去。为了落实毛的指示，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并且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仅北京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个。这给了毛泽东深深的触动：还是少奇的话管用。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赫鲁晓夫被赶下台，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这不能不对毛泽东发生影响。在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不知刘少奇是否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只是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丫辈 /、入了那叮'州' '不' '绝》 '1' IJ' 1' UJ' 烟C)
'。间文" J

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关于运动的搞法，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集中力量搞「大兵团作战」，不赞成运动主要依靠工作队扎根串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在他多次的批示中，透露他对刘少奇的做法是勉强「同意」的。1964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上各地代表反映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就连毛泽东赞扬的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也受到了冲击，还是周恩来亲自发话，保陈过关的。这很容易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不过，毛泽东并不认为刘少奇「左」而认为他是「形『左』实右」。即，没有弄清主要矛盾和运动的性质。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对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看了薄一波转报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陈正人在写给薄一波的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裏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才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规定，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信上旁批说：「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在两个文件上做了言词激烈的批注。他写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按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

门户 I 千示刀 k 斋鹜' 入' 覃

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宴请罗代表团的报告上批示道：他们看我们的干群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

「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从这些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阶级斗争」看得十分严重了。它已经不是少数 r 分子」，而是形成了一个「阶级」。他心目中的革命对象，也不是一般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事实上，已经需要对党本身进行一次「革命」了。只不过这些批示还没有公开。但凡是看到这两条批示的人，无不感到震动。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乘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因此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当时认为，进行一般的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而在另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

会议只开了几天，毛泽东还没出面就要结束。这时毛泽东已忍无可忍，' 愤怒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 r 小礼堂」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少奇 1 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9 引自（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册，页 1355 — 138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五卷（1962 — 1966 劲一 历史的变局

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不容置疑地下了命令。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继续开会。12月2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对话，使分歧公开了。这次公开冲突成了毛刘决裂的转折点。争论的焦点是社教运动的重点应当指向哪裏。

毛泽东主张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刘少奇这一次没有附和毛的话。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有甚么矛盾解决甚么矛盾。他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壤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毛泽东说：「不要管甚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罕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毛泽东说：「无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的很嘛！」毛泽东接着讲下去：「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李先念插话说：「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头上。」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本问题就在这裏！」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接着说：「大的搞了1 其它狐狸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第十章紧张的政坛

旬 1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甚么问题解决甚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这一句脱口而出的定性，使张霖之成为「文革」的第一批高级干部的殉难者之一。

与会者们面面相觑。会场有些僵持不下。毛泽东转换话题，批评社教运动中的做法。他说：「挤牙膏，挤那样干净？宽大处理嘛！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不必讲彻底。」毛泽东说：「有的地方只有十户八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过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去泼！现在还在反右。」「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毛泽东既强调「打击面不要太宽」，一方面又强调「不要泼冷水」，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一则担心把运动搞到一般群众中去，二则担心纠缠一般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忽视了重点：走资派。在他看来，危险就在这里。」⁰

20日的会议使参加者们的心情格外沉重起来。

然而，毛泽东余愠未消。

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寿宴就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操办者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吃饭，一共三桌。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夫妇、胡耀邦、陶铸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柯庆施未到场。被请的还有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10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368—137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49—1969—历史的变局

毛泽东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来。当时小女儿李纳响应号召，下乡未回，大女儿李敏来祝寿，毛泽东硬是不让她参加。客人们陆续来到。

陶铸·曾志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是最早一批来到主席处的。不一会，毛泽东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坐么，大家都坐么。」毛泽东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七十一岁了。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饭……」一丝悲凉和伤感，大家无言以对。此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也陆续来到。毛泽东提高了嗓门：「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甚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裹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大声说着，谁都知道，这不是在说李敏。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来到了。他们与毛泽东是世交，关系与单不同。r 富春啊，」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李富春说：「你们甚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甚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甚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o。」这没头没脑的责备，显然弦外有音。

大家心裏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面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是批评李富春。刘少奇、邓小平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幸好江青走过来招呼大家入席。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左右，陶铸夫妇和罗瑞卿分在主席这一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及江青本人，则分坐在另外两桌。这种安排是毛泽东亲自嘱咐的。「大官」们只有陶铸夫妇有与主席坐在一桌的殊荣，表明毛泽东对陶铸的信任。

席间，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其它人都默不作声。参与者只记得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交车，这很好。」钱学森是中国的导弹之父，为不久之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只是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交车·毛泽东大声地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弟十韦紧帐的玫坛

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裏的情况？只有群众。」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划：「我是要坐在

群单一边的。J 这一划，在党政军领导者与群单之闲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在毛泽东自己与各级「当权派」之闲划了一道界限。当然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但这一划，确使参加宴会者心裏一惊。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透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裏嘻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12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会场。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想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毛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毛泽东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泽东讲这些话，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指谁。刘少奇、邓小平沉默不语。会场的空气近乎凝固了。从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到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其间只过去了三年，中共中央核心内部的人际关系，已经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讲到「霸王别姬」，警告干部们不要闹到孤家寡人的地步。可是，他现在倒像是「寡人」了。他一个人拿着党章和宪法，对中央一线领导人发难，究竟是他还是别人掌握着真理呢？如果历史是可解的，那么，我们的结论可能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而应该是历史的：毛那一代人面对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他们一定会那么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四「二十三条」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分歧，在会外还很少人知道。但已经透露的各种迹象，还是使各省市感觉到了一些政治的异样。因为，刚发到手的〈十

七条》突然又接到通知收回销毁。〈十七条〉原是会议前半段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一个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内容比较简单，只有十六条。根据会上讨论意见，又反复修改为十七条。12月24日和27日，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12月28日，由彭真批发，以中央118号文件发出。〈十七条〉根据毛泽东12月20日讲话，已经加进了关于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重点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包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当权派」的提法。文件发出后，12月30日，毛泽东又授意陈伯达在〈十七条〉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中作了如下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改的第二页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经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文说，118号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三位政治秘书之一。另外的两位胡乔木在养病，田家英已受政治冷落，陈伯达是活动在核心左右的唯一秘书（是政治地位很高的秘书，陈在1956年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其人在政治漩涡中善于舞动长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跟紧人」。至于跟错跟对，就是天算了。1964年，陈曾对刘少奇表现得很尊重。「桃园经验」的推广下发，让刘少奇挂帅统管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都是他积极建议的。然而，当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时，陈伯达迅速调整情绪，紧跟毛泽东。12月27日他在会上从「理论」上批评了刘少奇的两个提法。他说：「所谓清

第十章紧张的政坛

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的，性质不清楚，就会迷失方向的。」陈的发言，得到毛的赞赏。后来毛泽东修改文件时，特别把这个意见

写了进去。停发〈十七条〉，也是陈伯达建议的。这使毛刘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朗化。由于〈十七条〉停发，会议又继续开了下去。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泽东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玲玲清清」。第二个〈十条〉「太长了，太繁了。」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1月14日，毛泽东对各大区书记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的第一个十条，为甚么过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毛泽东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书记处，一个是指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对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内容从十七条变为二十三条。改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会议讨论通过，由彭真送毛泽东审阅后，正式发出。此次会议结束。毛泽东在修改〈二十三条〉时，加进了严厉批评了「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提法的话。他写道：「这两种提法」

「不说是甚么社会裹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甚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甚么社会裹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甚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段话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毛刘的争论事实上半公开化了。知情的中上层干部忧心忡忡。因为毛刘之间的分歧不同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分歧。毛刘分歧可

4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能导致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动。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后，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受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向刘少奇进言：「你们两位

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无论如何不能和毛主席发生矛盾啊！」刘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以后，又在自己的家裏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刘少奇检讨了不尊重主席的错误，常委们批评了刘少奇。然而，两个主席之间的裂痕，已难以弥合了。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毛泽东已明显不再信任刘少奇，甚至也不信任在一线工作的书记处了。正是这次的分歧，使毛泽东下了彻底同刘少奇决裂的决心。正如薄一波回忆说：毛刘分歧「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裏提到「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讲：「引起我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会见斯诺。毛在回答甚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的问题时说：「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不管这些事后的追忆是否符合实情，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毛泽东多次讲「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已指向刘少奇。

高层分歧，基层并不了解。〈二十三条〉关于「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也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倒是〈二十三条〉关于纠正「左」的偏差的规定，如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减免，严禁打人，防止逼、供、信等，在实际中发生了影响。1965年1月25日）彭真在北京通县召开的十万人广播大会上讲话调子就比较温和，特别强调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强调抓紧生产斗争问题。彭真的讲话录音由刘少奇、邓小平批转全国各地，起了一定的「降温」作用。〈二十三条〉下达后，各地纠正了「四清」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运动向平稳方面发展。在整个运动中，工农业生产一直是正常的。

第十章紧张的政坛

五酝酿「新革命」

各地「四清」运动在抓紧进行，而毛泽东本人却对这场运动不太感兴趣了。他认为四清运动、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到 1966 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有 694 个县、市，占总数 32 %，正当各地部署第三批四清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四清」运动实际上不了了之。1963 年、1964 年，中国政坛在「阶级斗争」的舆论下，持续紧张。感到压力最直接的要数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那些高层领导人。他们纷纷检查，以求「回到正确方面」来。1964 年下半年，中央统战部长利瓦伊汉再次被批判，与 1963 年比，这次罪加一等，名曰「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年底，中央决定撤掉了他的部长职务，随后又被撤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利瓦伊汉被迫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已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如果硬顶着不检查，被开除党籍，再为党做工的机会就没有了。」陈云原本以沉默相应对。然而，毛泽东不断地批「三自一包」，后又与刘少奇发生正面冲突。这使陈云感到愈来愈大的压力。1965 年 6 月 18 日，陈云再次向毛泽东书面检讨自己 1962 年「对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以及「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的「右倾错误」。他在信中解释说：因为重新分田是「一件极大的事」，所以「只和我的秘书和研究粮食问题的几位同志谈过」，「只向你和中央常委中几个同志（陈云当时没有同朱德谈过此事）提出了这个意见」，「未在别处乱说」。，，信中说：「在 1962 年，我对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粮食方面，每年只能增长 2 %—3 %，因此，要由 2800 亿斤粮食恢复到 3600 余亿斤，需要八年时间。经济作物的恢复更要迟些。现在事实上三年就恢复了。这完全证明了我的估计是错误的。1962 年 7 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X）5），页 135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方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

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会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陈云的自我批评，是诚恳而又揽过的。但毛泽东还是点名批评了他。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更明确地批评说：「修正主义是一种瘟疫。1962年在国际上在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但讲过之后，毛泽东没有对陈云再深究。在他看来，主要危险并不来自陈云。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美国友人斯诺。他再次提到了「死」。斯诺问：中美关系改善有没有希望？毛答：「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他转向在座的邓小平，「也许你们有希望」。毛泽东说到要「见上帝」有数次之多，每次都有不同的「语境」，或感慨，或激将，引出人们的各种话题和猜想。但无论怎样说，他决无退隐之意。他的真实心理，可用王任重所记1965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段插话，和他同护士吴旭君的谈话来说明。王任重记：毛泽东说：「我快要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吴旭君回忆，毛泽东对她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J13 有理由

12 13

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396。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389—1390。

第十章 紧罗的政坛

相信，这两段话是毛泽东真情表露。它们为解释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复杂多变的历史，提供了相当精准的「密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毛泽东是壮心未已的人。在他心中，理想和期许是不能改变的。面对世界和中国一系列不满意的事情，他怎能甘心去见马克思、见上

帝呢。他一定要采取重大的行动，改变现实，最终实现自己不可动摇的信念。从性格说，毛泽东最大的特点应该是挑战。他以向大自然挑战，向国内外敌人挑战，向生命极限挑战为乐事。他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对他来说，压力只能激发挑战的欲望。

1965年5月，毛泽东南下来到武汉。他以七十一岁的高龄再一次畅游长江。他对陪同他游长江的青年人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游完长江，毛泽东重新登上他阔别三十八年的井冈山。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毛泽东奋斗成功的出发地。重上井冈山，使他感慨万千。他连续写下两首词作：调寄「水调歌头」和调寄「念奴娇」。两首词后来都为中国人所传诵。词中有这样的长短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可谓以诗言志的绝品。

毛泽东此时重上井冈山，决不只是故地寻踪。他要找回的是当年风雷激动、旌旗奋起的豪情。据陪同他上山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回忆，一路上都想汇报四清工作，但毛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后来人们才知道，毛泽东此时已经在酝酿新的革命了。」

这年，毛泽东虽然有时与刘少奇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但已很少思想沟通。当年夏，法国文化部长安得烈·罗尔罗斯来访，他按照外
14。固忠等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页278。

4 10

甲争人氏共和国史·第五卷 {1962—1966} 历史的变局
交礼仪，向中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递交了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中国官员顺序站在刘少奇之后。然而，罗尔罗斯看出来，站在另外一边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主角。递交信件后，开始谈话，始终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等「只是一群缄默的证人」，罗尔罗斯回忆道，「毛

泽东低语道：我是独自和群众在一起的· 一」这年】毛泽东很少呆在北京，他长时间在外地巡视，同各中央局、各省市市委、各大军区领导人谈话，打招呼。其中最主要的话题，就是「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9月18日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到会讲话。他首先讲到国际形势，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蒋介石一直在叫反攻大陆，越战升级。现在不单是加强战备，战争实际上在越南打起来了，问题在于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美帝投原子弹，打世界大战。他提出要「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主动大撤退，全民皆兵。毛泽东关于战争的一番论述，使与会者都思想准备不足。遵照毛的指示，9月1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等立即行动起来，召集军委座谈会，研究国内外形势及可能的战争前景和战略方针问题。

在1964年9至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提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这次会议毛泽东又这样说，实际是说得很肯定了。彭真尚不懂毛的话的实在含义，因此在10月12日的会上随看说：「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毛泽东这时插话：「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毛还插话说：「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裏也有这个问题。p，10月10日，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们谈话时说：「如果15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396。

第十章紧账的政坛

出了赫鲁晓夫，那有了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还说：「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在地方搞起的。」“两天后，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继续发表他的「造反」

言论：「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在正常情况下，这番「造反言论」可以说是离奇之至，即使在当时，中央大员们大约也是听得一头雾水。

而在这之前，毛泽东已作出一个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外放任职。彭德怀去西南三线任副总指挥，黄克诚去山西任副省长。有人解释说，这表明毛泽东在反省自己，从大局出发，捐弃前嫌，重新安排彭、黄、张的工作。其实，没有证据表明此时毛泽东有反省之意，相反，由康生主持的彭德怀、习仲勋的项目组正加紧工作，写出报告，认定「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因此，真实考虑很可能是：正当战备紧锣密鼓、国内「反修」斗争酝酿大行动之时，毛泽东认为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首都，必须分配到外地。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这时毛泽东正授意江青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批《海瑞罢官》，就是批为彭德怀翻案。正是彭德怀到达三线的当天，《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

16 17

引自（毛泽东传（1949 — 1976 ）），下册，页 1 么 95 引自（毛海东传（1949 — 1 卯 6 ）），下册，页 1395 — 139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 — 1965 ） — 历史的变局

六点火

批判《海瑞罢官》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2 年 7 月。江青曾向毛泽东进谗言，但当时毛没表态。1964 年，江青对林默涵说，《海瑞罢官》剧本很坏，主张分田，同单干风有联紧，只是还没有提出罢官问题。她又找周扬谈了这件事。周左右为难，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周说：在《海瑞罢官》问题上，我们欠了一笔债，怎么办？下半年，江青在北京找了李希凡，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接受。于是，1965 年 2 月，江青到上海再次寻找柯庆施的支持。江青的行

动，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的，但瞒过了中央政治局的所有人。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说过这件事：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些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要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拚命保护吴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1967年9月，毛泽东自己在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也谈到这件事的经过。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

第十章紧张的政坛

413

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从毛泽东这段话看，他不只是「同意」，而且是「建议」。江青1963年批《李慧娘》曾得到过柯庆施的支持。那时，上海同北京唱对台戏的味道，已经很明显了。这回江青再次求助柯庆施，柯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1964年时受江青之托修改京剧《奇袭白虎团》，与江青已有密切来往。张春桥本就是一个写批判文章的高手。1957年《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许多批「右派」文章，都出自张春桥之手。1958年，张写了〈破

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深得毛泽东的赞誉，从此引起注意。然而，张春桥其人，城府甚深。他知道此事来头不小，从而宁愿退居幕后，于是向江青推荐了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此人就是姚文元。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姚蓬子是旧上海的一位文化名人，出版家，曾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但在1933年被捕叛变，1934年发表脱离共产党声明。解放后一直赋闲在家。对姚蓬子，江青是知道的。但其子姚文元却名声没有乃父那样大。姚1948年加入中共，擅长「批判」文章，且文风霸道，人称「姚棍子」。1955年批胡风、1957年反「右派」，姚文元都曾大出风头。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不久，姚于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录以备考〉，又引起毛泽东注意，令《人民日报》于6月14日转载。毛专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其中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遂名声鹊起。当年仅二十六岁。又过了八年，姚文元虽有「青年文艺评论家」的虚名，但还未发迹，只是个《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权力有限，不得不仰仗张春桥的提携，对张言听计从。张春桥引荐，江青召见，姚文元应声

而至。江青首次见姚文元江青交下「大批判」的任务，姚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而来的。当下，姚文元俯首允诺。但张与姚都没有看过

京剧《海瑞罢官》，只是听江青说是「毒草」。两人「没有碰过明史」，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开始，从1965年2月开始准备，到10月拿出成稿，历时八个月，改了十稿。其间，从成都传来噩耗，柯庆施病

甲甲 f ， 八吵勿中 p 门人一中」1 摊卜 '义 7u 必一 i7DJ) 一左亡又 U ， J 支刈

逝，江青从此失去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张春桥、姚文元此时高调出现，与江青建立了密切的信任关系。批《海瑞罢官》的每次修改稿都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虎山》剧本内，坐飞机送到北京，与江青一次次讨论，修改，定稿，之后再送毛泽东。毛一共看了三遍，

最后认为可以，遂让江青拿去交张春桥。张春桥交上海《文汇报》发表。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时间是1965年11月10日。

京剧《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创作的。早在1959年3至4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有感于党内无人敢向他提意见，连刘少奇等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导致了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出现许多问题。毛泽东在观看湘剧《生死牌》后说，现在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他还讲了一段海瑞骂皇帝的故事。海瑞骂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又忠心耿耿，听到嘉靖皇帝死讯，竟在牢中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毛泽东要胡乔木找几位历史学家写海瑞的文章。胡乔木找到吴晗，后者慨然命笔，写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1959年6月。吴晗似乎余兴未消，9月21日又发表了〈论海瑞〉一文。〈论海瑞〉写出来时，已是庐山会议刚开过。吴晗也算敏感，怕遭文祸，在文章末尾写上了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以示此文与彭德怀无关。后来吴晗应京剧名家马连良之约，写了《海瑞》一剧。友人蔡希陶见剧本并不是写海瑞一生，而只写其二、三事，且末尾有海瑞不满庸官、挂印弃官而去的情节，遂大笔一挥，在《海瑞》剧名中加上「罢官」二字，改为《海瑞罢官》。剧本1961年1月发表于《北京文艺》，并由北京京剧团上演，马连良饰海瑞，裘盛荣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竟集京戏界一时之彦。

《海》剧是写明朝大臣海瑞任应天府巡抚期间，敢于将原宰相徐阶的第三个儿子徐璜（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退田等的故事，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据说：「此剧上演后，毛主席很高兴，在家裏接见了饰演海瑞的马连良。」然而，岁月流转，风云变幻。毛泽东对文艺界不满、对北

牛1干吊7卜霄，J戏k仰烟
京市委不满、对中央一线不满，需要一事情为突破口。江青早对《海瑞罢官》有成见，事情就因此而发。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武断地指责《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假海瑞。其核心部分是捕风捉影，认定《海瑞罢

官》影射现实。他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甚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甚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甚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甚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姚文的发表，使文化领域的批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前的批判，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则把批判从文化领域引向了政治领域。然而，一开始，姚文的背景，它与毛泽东的关系，不仅中宣部的陆定一不知道，北京市委的彭真不知道，连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都不知道。彭真只知道毛泽东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问过他：「吴晗可不可以批判？」他回答「有的问题可以批判」毛泽东指的是政治上的批判，彭真指的是学术上的批判。彭真更想不到一个月后姚文元文章与毛泽东有甚么关系。但姚文毕竟来头不 18（人民日报），1965年11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小，又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打电话询问中宣部。林默涵回话「不知道」，一句也不多说。因为他猜到，这是江青搞的。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专门开会研究转载问题，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元文章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由于张春桥严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文汇报》不

予透底，北京市委、《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询问均无所获。在此情况下，邓拓决定即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答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定。当时，全国各地报刊先后都转载了，就是北京没有转载。江青十分恼火，从上海打电话给林默涵，问：「看到姚文元文章没有？」林答：「看到了。」江青又问：「怎么样？」林默涵由此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来的」。江青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小册子。」后来毛说过（1967年5月）：

「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毛泽东更增加了对中宣部、对北京、对中央的不满。似乎更加证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的意见在北京行不通了。

1965年11月下旬，彭真返京。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说，吴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彭真找中宣部周扬、林默涵、许立群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转载问题。林默涵告知，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不得不同意转载，但认为要加一个按语，说明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谨慎，把按语草稿送给周恩来阅，周恩来也很策略，在按语中加了毛泽东的两句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按语中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按语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

第十章紧张的政坛

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报》将姚文刊发在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以表示把讨论限定在学术范畴。

根据彭真的指示，12月12日，《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组织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甚么社会思潮〉。12月

27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12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这些文章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范畴，以保吴晗过关，但这更激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在不知内情的学术界引起重大反飨。元史专家翁独健愤然地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江青、张春桥则有意「引蛇出洞」，把地下的意见「引到上面来」，结果使许多为吴晗抱不平的知识分子落入文网。在康生授意下，由戚本禹操笔，写成〈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刊载在12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不点名地批判了前伯赞、吴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1965年11月13日，也就是姚文见报的第三天，毛泽东坐专列离京外巡。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19日抵达上海”随后到杭州，下榻西子湖畔的刘庄别墅。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此次外出巡视，毛泽东共在外地停留半年多。在这期间，举国已是天地翻覆了。毛泽东授意撰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决非率意为之。1967年毛泽东曾说：「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毛泽东要通过批吴晗来观察北京的动静，分清阵线。后来江青得意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得明白：批《海瑞罢官》，「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不过，这都是后话。在当时，恐怕连康生、

甲平八人拷和哄天’ 矛二各 k1, 0 乙一 i, 0)] 一雒之又神 7 叉刈

江青等人对毛泽东的意图也不完全知底。以至江青费了八个月搞出来的文章，只聯繫了「单干风」，没有抓住「罢官」这个「要害」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一次长时间谈话。陈伯达等人是为给几部马列经典著作写序之事，应召来到杭州的。但这次谈话，毛泽东很少谈写序之事，却讲了

一大篇哲学问题。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文章的话。毛泽东说：「一些知识分子，甚么吴哈啦，翦伯赞啦，愈来愈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j「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哈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¹⁹毛泽东这段话，把《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罢彭德怀的官联接起来，问题陡然升级。第二天，12月22日，毛泽东又向专来杭州的彭真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对毛说：根据调查，吴哈同彭德怀没有联紧，《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毛只好说：吴哈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作结论。12月26日，彭真由杭州去上海，向张春桥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

江青得知毛泽东有这么一段谈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谈话记录。艾思奇、关锋花了一通宵，写出〈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记录〉，交给田家英。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要害是罢官」的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与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田之所以要删去这段话，是因为有毛泽东同彭真谈话的精神。这个意见首先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只得恢复。谈话记录于1966年1月9日经彭真批发印出。「要害是罢官」的话一出，政治批判的份量更加增强。这场从文艺问题开

¹⁹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401。

始的批判，逐渐演变成为以1958年「大跃进」以来包括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四清运动中的分歧问题为内容的批判，人们感觉到了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但究竟政治走向如何，人们还普遍没有料及。而实际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值得记忆的是，由于田家英在杭州坚持删去毛泽东讲「要害」的话而遭严厉追查，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谈话记录」的罪名。1962年以后，由于包产到户的问题，毛泽东已对田逐渐疏远。现在江青又抓

到这个把柄，田家英的政治生命已接近尽头。1966年5月20日，田家英被停职反省。5月23日上午，田在中南海自己的家中含冤离世，年仅四十四岁。继邓拓之后，田家英成了「文化大革命」最早的殉难者之一。

七罗瑞卿事件之谜

发生在1965年最后几天的罗瑞卿事件，为当代中国政治添加了更为难解的谜团。这个谜团是如此难解，以至当事者的女儿在事后多年仍耿耿难平。罗点点在自己的回忆录裏，曾试图从多个方面寻找揭开谜底的钥匙，结果仍难以得出言之凿凿的确证。她首先询问的是当事人——大难不死的父亲。罗瑞卿告诉她：「我一直到坐了林彪的班房，我还认为是毛主席和林彪对我的误会。」²⁰可见，当事人甚至比她更懵懂。于是她想到了父亲的「冒尖」。因为在1965年上海会议批罗时，罗的一位熟人在探望中回答罗「为甚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甚么错误」的激动发问时，曾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²¹罗点点后来了解到，在1955年定军衔时，就有人说罗瑞卿的大将军衔授高了。因为在大将中，罗的资历最浅。²²再后来，罗点点

²⁰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页1780

²¹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页213。

²²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页1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得知，父亲在中共八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名单中，位置就非常靠前。在中共执政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八大中央委员是唯一一次以得票多少来排定名单的。在这份名单中，罗瑞卿位列第十七，「比许多爸爸一再对我们说要特81J尊重和爱戴的伯伯叔叔还要靠前」。二这是殊荣还是隐忧？罗点点写道：到1965年，罗瑞卿在党政军等五个方面共兼了十三个职务。「说句玩笑话，如果真有离了他地球就不转的人，爸爸得算一个。」「但爸爸就是不懂这点人性中的缺陷，就是不能充分理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揣之』的千古名训。」²⁴在寻觅中，罗点点还想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时送给罗的两句话：「水

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出自《大戴礼记》的话，是毛泽东对罗瑞卿的赞许还是警告呢？罗点点说：1965年罗瑞卿在江青要穿军装的小事上始终坚持原则，以至闹得不快，证明毛泽东对罗「水至清、人至察」的基本看法是多么正确，「这种小事情没有哪一件不提醒毛泽东，罗瑞卿就是他说过的那种连小事都不肯通融的人」。

25 当然，罗点点还提到了更重要的方面：第一，既然「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罗瑞卿有野心，是坏人。所以，除非是毛泽东有质量问题，否则他为甚么会白白冤枉一个好人？」² “第二，「事实是，在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的心裏正在涌动着更大的革命波澜。为了掀起这个后来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波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²⁷ 前一个提法，立刻遭到他革命母亲的严词驳斥。而后一个看法，无论如何还需要历史事实的验证。因此罗瑞卿事件的发生和有关分析便是必须的了。1965年12月8日到15日】毛泽东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了背靠背的揭发批判。林彪、

23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页135。24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页213。25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页154’ 26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页154” 27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页186。

第十章紧帐的政坛

421

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在会上攻击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这次会开得很突然、很神秘。会议开始之前，常委中除了毛泽东、林彪，谁都不知道会议内容，要解决甚么问题。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到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罗瑞卿。会议给与会者每人发了一袋材料，这是叶群送来的。会上最活跃的是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她作了三次发言，足足讲了十个小时。她说，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有事，损失太大。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她说：1964年罗即逼

林退位。其中最要害的「证据」是刘亚楼的「四条」。叶群揭发说：1965年2月，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炕上，密谈一直到天黑，说罗要刘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甚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要他们去管。叶群讲得天花乱坠，林彪又叫吴法宪（已接任空军司令员）在会上发言，帮腔，一口咬定罗瑞卿对刘亚楼说的那四条，刘又告诉了吴法宪。但这是死无对证。因为刘亚楼（空军司令员）已于5月病逝。与会人员既惊讶又怀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话都很少，很谨慎。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随口说了一句：「难以置信。」邓小平说了四个字：「死无对证。」

在与会者中，可能只有贺龙会前有些预感。“”因为在这之前，根据林彪的安排，军委直属机关就批判了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会议主持人告诉贺龙说：「萧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当即表示：「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我可以担保罗不是反革
28 根据郝治平的回忆，贺龙事先也不知道上海会议内容。接到开会通知后，贺龙曾带上地圆，预备会议讨论军事上的事情。见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页190·

命，他绝不会反党。」当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央会议的通知时

趋亡) 编颺，，) (“ j，贺龙敏

感地感到，这次会议非同寻常，可能牵连到自己。会议第一天晚上，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造访贺龙，恰好李井泉在座。刘对贺说：「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r 我也是刚知道。」刘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李说：r 我也不知道。」刘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上海召开会议之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一无所知“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

往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上是软禁。罗瑞卿长期搞保卫公安工作，马上意识到自己失去了自由，非常生气，又莫明其妙。稍许，周恩来和邓小平召他谈话，说明了上海会议的情况及叶群代表林彪对他的指责。罗一听，不啻晴天霹雳，他立即起而争辩：「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杀了我的头也不承认这些。」罗要求面见林彪。周恩来立即制止说：「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的确，按党内斗争规律》此时再申辩）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罗也是老革命了，何以如此「天真」。其实不怪。想必罗过去经过无数党内斗争，但角色不同，临到自己头上，就当局者迷了。定罗瑞卿「篡军反党」，这的确使最高领导层感到突如其来、惊感不已。会后，朱德来到杭州，心情沉重 1 对夫人康克清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 … 说他（罗瑞卿）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罗「篡军反党」难以置信，不仅因为来得突然，而且谁都知道，罗是听毛泽东话的，同毛、林关系从来都不错。罗瑞卿 p1959 年 9 月同林彪一起，走上领导中央军委工作岗位的。林彪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在历史上，罗与林也有渊源。从井冈山时期到长征途中，罗瑞卿一直是林的部属，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到延安后，林任红军大学校长，罗任教育长。二人相处融洽，过往甚密。解放战争时期不在一个战场，但平津战役后，罗曾取！千众）卜页 7 澜入 j 灵任必 j 提出随林彪南下的请求，因毛泽东决定让罗出任公安部长而作罢。到庐山会议后，林又成了罗的顶头上司。罗对林是尊重的。林彪强调学习毛着，从原则上讲同罗瑞卿是合拍的，因为罗瑞卿对毛泽东不仅十分崇拜，而且忠心不二。

此外，谁都知道，公安部长「罗长子」是毛泽东的大「卫士长」。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一切外出活动的保卫都由罗亲自安排，事必躬亲，形影不离。毛泽东说过：「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到江河湖海游泳，罗瑞卿总是先行试水，或派人试水，做到万无一失。罗原本不会游泳，为了保卫毛泽东，年过五旬还是刻苦学会了游泳。罗瑞卿唯一「反对」过毛泽东的事情，是

他经常劝阻毛泽东到危险水域游泳。1957年7月，毛泽东视察长江三峡，突然提出要畅游三峡，并向中央和罗瑞卿写了信。这可吓坏了罗瑞卿，他想阻止，又无法说服。于是亲赴三峡视察水情，只见漩涡翻滚，惊涛拍岸，真如毛词所描述的：「卷起千堆雪」，使人不寒而栗。罗勘察半月，让人绘了水情图。回京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证明从三峡到武汉水段不宜游泳，中央常委不同意毛泽东去游，毛也只好作罢。凡此种种，足显罗对毛的忠诚。毛泽东的生日家宴上，总有罗瑞卿和汪东兴。毛心绪不好时，可对罗瑞卿、汪东兴发怒，让他们从房子裹滚出去。但事情过后，则雨过天晴，毫无芥蒂。毛对罗的信任和亲近可见一斑。

如此这般，罗瑞卿怎么会「篡军反党」呢？为甚么林彪要下决心扳倒罗瑞卿，而又说服了毛泽东呢？要解读其中原因，必须深入到中共党内复杂的权利关系和人事关系，同时考虑当时国际国内和党内的政治紧张。

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管军委工作后，林彪与罗瑞卿关系一直相处很好。矛盾是从1961年发生的。不过，这个矛盾不是林罗个人闲的龃龉，而是林彪与总政主任罗荣桓元帅之间的矛盾，迁怒于罗瑞卿的。林和罗荣桓的矛盾，是关于突出政治问题。罗不同意林把突出政治搞得那样玄，已经有了庸俗化的嫌疑。林自然不高兴。但这个矛盾没有闹开，不久即隐了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49—1965）— 历史的变局

1962年秋，林彪夫人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多次告诉罗瑞卿，要多向贺请示工作。此后，到1964年，报纸上经常见到罗瑞卿同贺龙一道活动的报导，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即由此开始。林彪从建国以来一直养病。林的病始终是个谜，才良怪，怕见阳光，怕见水，怕吹风，怕见人，一见人就出汗。因为怕见水，长年不洗澡。医生检查，又查不出器质性毛病。林彪的病症与精神因素有关，而且与吸毒（吗啡）有关。林彪吸毒，这在高层成了公开的秘密。军委卫生部长傅连璋壮着胆，将检查结果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了曹操一首名诗《龟虽寿》，委婉

地提醒林彪戒毒。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这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

60年代，毛泽东对林彪厚望有加，但林彪总是疑神疑鬼。1963年5、6月，林彪两次让秘书或夫人叶群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林彪身体一直不好，不能过问军委的事，让第一线的人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总部挡，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情直接报告主席、中央」。但在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中，许多讲出的话，并不一定就是本意，裹面往往暗含着玄机。林彪的这些话就不可当真。他说重大的事情直接报告主席，其实是反话。林彪最不满的就是这种「越级」报告。林还不满罗与贺龙接触多，向他请示少。一次他从外地回京，立即要见罗瑞卿，罗正参加一个重要会议¹，回电话说：「会散了就去。」，林一听火冒三丈，拍了桌子，随即写下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²，这些匪夷所思的话，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中共党内人事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复杂情景。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页166。

第十章紧帐的政坛

1963年12月，罗瑞卿和叶剑英元帅总结推广了南京军区某军连长郭兴福的练兵方法，主要是干部以身作则，会讲会做，让战士带着敌情练兵，从严从难要求，大大提高了练兵质量和练兵热情。1964年1月3日）军委转发叶剑英的报告，总政治部也发出了〈关于宣传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随后，「全军各部队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在此基础上，经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了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1964年6月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的比武表演。毛泽东极感兴趣，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7月和8月，全军分十八个比武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表演的部队和民兵共13700余人。军内干部45000余人、地方干部42000余人观看了比武表演。

林彪对于大练兵和比武，开始表现沉默。以其身经百战的军事生涯，

他不会不明白练兵对军队的重要性。此前，他也曾就军事训练作过多次指示。要求军队要打得准、开得动、联得上。但林彪心裏有一本账：现在军队打的主要是政治仗，而不是军事仗，尽管备战的呼声很高。因而，他一上台就提出了一套政治建军的思路。而罗瑞卿在他的建军思路之外，与其它老帅们搞在一起，另搞一套大练兵和大比武，而且轰轰烈烈，惊动了毛泽东和所有中央领导人，得到赞扬和肯定，毛泽东一次讲话还否定了林彪上台后提出的战略防御方针。林彪在昆明养病，完全成了局外人。他认为自己的军权不落实。1964年8月，毛泽东让贺龙、罗瑞卿一道去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以防止干部「变修」。讨论中，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回京后，罗瑞卿电告林彪秘书，但林迟迟不表态。两天后才回话「林总同意」。林迟迟不表态，决非对取消军衔有异议，不满的是如此重大的问题，贺龙、罗瑞卿「越位」直接去见毛泽东，把他撇在了一边。此时，还有一件意外的事传到了林彪的耳朵裏。在一次公开场合，刘少奇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刘讲这个话

第十韦紧张的政坛

6日至9日，第八次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各军区的将军们虽原则表示「拥护林总指示」，但大都不赞成否定1964年的大练兵和大比武。会后，罗瑞卿说：「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裏有这种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罗瑞卿这些话后来成了反对林彪和反对「突出政治」的罪证。此后，林彪采取了一系列弹压罗瑞卿的举动。4月22日，林彪与路过苏州的毛泽东会面，征得毛的同意，决定增加杨成武为军委第一副秘书长，有节制罗瑞卿之意。5月底，军委作战会议结束，罗瑞卿作总结发言。林彪提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下令彻销罗的总结讲话。林彪知道，单一个反对「突出政治」，不足以扳倒罗瑞卿，于是指使叶群私下搜集罗瑞卿的材料，罪名是罗要「篡军反党」。一共整了十一份材料。

1965年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

报告」，「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这时林彪在苏州，毛泽东在杭州。当天，叶群携带了林的信和吴按宪、李作鹏等人写的「揭发材料」，乘飞机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泽东，毛也不知道她有甚么事，让她等。叶群就和毛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从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泽东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泽东。据说叶群向毛泽东讲了足足五个小时，毛听了五个小时，毛泽东问得很仔细，但一直未表态。后来显然听信了叶群的话，毛让把材料留下，叫叶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叶回苏州，以防「不测」。12月2日，毛泽东在叶群送来的材料上批示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他认为：「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叶群在五个小时内究竟同毛泽东谈了甚么，由于只有谈话者两人在场，没有记录，因此内容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了。但是，天不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毛泽东从反修防修出发，提出了培养接班人问题，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刘可能由此而提到了罗。这件事由一位邀功取宠者报告了林彪，林非常恼火：这不是要夺我的军权吗？

罗瑞卿就干部新老接替工作向林彪汇报时，也曾讲过有些老干部应该主动「让贤」。生性多疑的林彪听了，认定是要他让贤、让权，更对罗瑞卿怀有嫉恨之心，遂决意要把罗瑞卿整下去。但这种心裏话当然不能摆到桌面上来。于是林彪抓了一个原则问题：政治与军事的关系。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提出要「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根据林彪的意见，叶群带工作组到了基层连队找素材，抓住有些单位比武中有锦标主义、形式主义、拼凑尖子的问题，大作文章。整理了四份调查报告，说：「部队军事冒尖，政治不浓，脱离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12月28日，林彪在广州

紧急召见总政领导人，对他们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四个第一不落实。」而且说这「是带有全军性的问题」。强调要「突出政治」。这次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后来以中央军委〈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名义下发全军。

本来，关于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早有多种表述，如灵魂、统帅、生命线等等。然而，一个题目，做来做去，都是老话，就没有了新鲜感。林彪的确富于「创造」，提出一个「突出政治」的口号。他说的所谓突出政治，就是在军事训练、生产等与政治工作发生矛盾时，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训·生产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它」。林彪大讲「突出政治」可谓「一石两j鸟」。一则迎合了毛泽东的思想，此时毛正不遗余力地强调政治挂帅。一则给了罗瑞卿一顶大帽子。冲击了「政治j，那就不是工作偏差而是「建军路线」的错误了。林彪对大比武的批评，罗瑞卿无法接受。他说：「1964年军事\$11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j，「去年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毛着？主要的不是」。他说：「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1965年1月

第十章 紧咏的政坛

429

人。特别是林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无人能够企及的。用江青的话，林彪是「尊神」，是她亲自请到的。自然，在政治牌合中，他选择了林彪。

自七千人大会以后，尤其是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中央一线的不满不断加深，林彪的份量就更加重了。毛泽东对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一套政治话语，十分赞赏，并且要求把这一套做法推广到地方。1963年10月16日，毛泽东批示：现在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校也要学解放军。解放军好是政治思想好。他要求国家工业部门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三八作风。11月16日，毛泽东又专门为此事给林彪、贺龙、聂荣臻、萧华等人写信，指出地方政治干部的来源可由四种方法解决：一是从军队抽调；二是地方派人到部队

学习；三是派到军队政治学院当学生，毕业后回去工作；四是自己按解放军政工条例抓起来。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赞扬林彪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 / 又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经毛泽东的号召，全国工业系统从部到工矿企业纷纷建立起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工作制度。林彪提倡的一套做法迅速普及到地方。196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在军委贯彻林彪关于突出政治指示的通知上批示：「完全同意，照此办理执行。」这是对林彪与罗瑞卿分歧的第一次表态。2 月 22 日，毛泽东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和《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时，再次表示对林彪的支持。他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过甚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分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毛泽东对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所以情有独钟，是因为林的这一套本身就是迎合了毛的思想，毛强调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关键是「人心改造」，林的突出政治为「人心改造」创造了具体形式。还有一层，在对中央一线不满的同时，毛泽东也感到需要有点个人崇拜。尽管，这时人们对他的个人崇拜已很严重了。林的突出政治，实

中华人民兵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 弘一 历史的变局

这件事情却被毛泽东当时的警卫人员从旁记录下来。在 1996 年 9 月出版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专门有一节记述了「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罗瑞卿」。作者张耀祠可以算作准当事人。他在毛叶谈话时三次进入房间，告诉毛泽东时间已经太长了。他回忆说：「三次催叶群，只能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聯繫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

『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权」的程度呢，我想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的。』叶群还罗列了一些罗瑞卿的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

他说，「病号嘛，还管甚么事，病号应该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张耀祠判断，「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显然对罗瑞卿的看法变了。」张的回忆虽为孤证，但知道内情的人认为它基本可信。³¹ 林彪告状告准了。12月8日，毛泽东亲赴上海，坐镇召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不过他又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

毛泽东的确是听了一面之词。然而，以他的睿智和敏察，何以会听信一面之词呢？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怀疑罗瑞卿对他的忠诚。作为军队统帅，他当然知道军队练兵是天经地义的事，况且他在检阅大比武时表了态。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他下决心进行一次大的革命行动之前，必须整理队伍，找到可以依靠和信赖的人。很明显，无论在党内还是军内，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林彪是更值得信赖和依靠的

30 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页30—31。31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页186。

矛）早不）界恤间澜人’量

然而，毛泽东是不是对林彪就完全信任呢？当时的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说过一段话，耐人琢磨。他说：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一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甚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³ 事实证明，林彪所获得的权力，即使同留d少奇相比，也差得太远。

上海会议上，罗瑞卿被调离军队领导岗位，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但毛泽东的口气似乎还不想把罗瑞卿彻底搞倒，他还要观察一段。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找罗第二次谈话，传达毛泽东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但罗急切希望澄清是非，回京后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

请求解除军队的一切职务，很快获准。罗多次申诉没有三个问题。随后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小组」，对罗进行审查。林彪显然不希望把罗的问题挂起来。会后，为搜罗罪证，叶群出主意，让吴法宪逼刘亚楼的俄籍妻子翟云英。翟云英说：「没听刘亚楼说过四条，只见他去世前伸出了四个指头……」秘书记下来，叫翟云英签上名，以为旁证材料。

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会议，对罗进行揭发批判。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3月4日至16日，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各总部、公安部的负责人四十二人对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会议。邓小平主持了一次「开幕式」后，为避开处理罗的问题，到西南三线视察去了。彭真也很少与会。这时，不仅认定罗瑞卿有上海会议指证的「三条」，而且加了一条：「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罗瑞卿问题已上升

33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页65”

甲争人氏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历史的变局
质上是突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在部队掀起的学毛着运动，创造了许多鲜活的形式。这个运动通过「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推广到地方，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覆盖效果。后来在全国形成红色海洋，并越出了国界的那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个运动中诞生的。1961年4月，林彪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于是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被分门别类，制成语录，每天一条，见诸报端。部队反应热烈，林彪自鸣得意。1964年，总政将语录集辑成册，编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并指示「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样，全军人手一册。《语录》下发后，地方轰动，纷纷求索，也引起毛泽东极大兴趣。《毛主席语录》从此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据报载，仅「文革」几年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五十多种文字印成的五百多种

版本，总印数为五十多亿册。按当时的全球三十多亿人口算，男女老幼人均 1 一册，被国际上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红宝书」有如此魅力，不仅中国人，许多外国人也对它顶礼膜拜，不能说不得益于林彪提倡的背警句、摘格言、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经验。人们就像背诵信条一样，简明易懂、耳熟能详、老少咸宜、妇孺皆知。

在这个「红海洋」运动中，毛泽东愈来愈被神化，愈来愈高居于中央集体之上。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成了人们的精神追求，其它中央领导人也愈来愈要仰视，林彪的「旗手」地位牢牢地确立，影响急速上升。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毛泽东期望的。1965 年 11 月 26 日，罗瑞卿告诉毛泽东，他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毛神情开朗地嘱咐罗：「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点的报告。」毛当时甚至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可见他对林彪期望之殷切。³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能容许任何人对林彪构成挑战。³²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页 181。

第十一章

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国舆论对国际形势的描述，可以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三个词组来概括。这三个「大」，其实是中共自己对世界的体验。它反不反映真实世界的潮流，还需要研究。但是，自身的体验对自己总是真实的。因此，体验影响着自身的国际理念和行动规则。60 年代前半期，中国发生的许多重大事端，都可以从三个「大」中找到深刻的根源。人们对外界的反应，也是从动荡、分化和改组的思路作出的。在三个「大」的观念背景下，中国同苏联、美国等大国之间的关系，折冲樽俎，斗勇斗智；中国同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也精彩纷呈。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政治走向，受到世界形势变幻和自身反应的影响，愈来愈向紧张、动荡和激奋的方向展开，这使 60 年代前期中国历史的面貌，更加复杂化了。

一走向大分化

新中国对外战略方针的演变，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历来，在学术界，有新中国前四十年外交「十年一变」的说法。尽管，这个说

法并非科学论证，但却多少反映了包括 60 年代在内的中国对外战略关系的某种变化节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为敌我矛盾。京西宾馆会场完全成了批斗会。罗回忆说：「我实在忍受不了，头脑快要爆炸似的，比受甚么罪都苦啊！」无奈的罗瑞卿决定以死抗争。3 月 18 日，他留一张纸条给妻子郝治平，述说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嘱咐家人遵守纪律，然后从住所的楼上跳下，但却只跌断一条腿。

罗瑞卿的自杀，召来更严厉的批判。3 月 22 日至 4 月 8 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与会者增加到九十五人（增加五十三人），对罗进行缺席批判斗争。会议最后作出〈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认定的「罪名」有：「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被定性为「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罗瑞卿事件是发生在 1965 年底以前中共党内的一次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它同当时中共党内的政治紧张相联紧，同中共面对的复杂国际国内动向相联紧，也同中共党内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走向相联系。西方的「文革」历史学家们，喜欢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开敌了『文革』的大门」。他们更相信，毛泽东是依次地把军队、宣传（陆定一）、首脑机关（杨尚昆）和京畿（彭真）问题统统解决掉以后，再发动对刘少奇的进攻。他们的学术猜测是富有想象力的。但作为历史的解释，人们还不得不深入到事件内部去发现其原因，并在合理的背景下解读它们。结论应该是，紧张的政治，必然带来一触即发的意外事件。在那个时代，甚么都可能发生！

第十一章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政组」的世界

435

大反叛。，从而，它也形成了对赫鲁晓夫的一种严重挑战。从历史发展和国际共运既定体制的观点看，中苏两党之间的这种论争，几乎是

不可避免的。除去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以及某些历史「恩怨」外，国际局势的演变和对不同战略利益的诉求，几乎必然地将原本结成同一「阵营」的两个国家，拉开了距离。只不过，进入 60 年代，这种分歧开始向看公开化、激烈化和关系破裂的方向发展而已。问题的实质在于，当 50 年代中期开始的国际缓和趋势日益明显起来时，原本对付同一个敌人，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那种强烈的利益需求，开始发生看变化。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去世后，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主动的外交步骤，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例如，赫鲁晓夫上任不久，即写信给中国领导人，建议中、朝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作出妥协，以便结东朝鲜战争；1954 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苏联扮演了主要角色，最终导致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1955 年 7 月，经苏联提议，美、英、法、苏在日内瓦召开四国首脑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裁军问题和加强东西方接触问题；两月后，苏联再次邀请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莫斯科，进行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此时，苏联已经放弃了它原本坚持的在和平民主基础上实现和平统一德国的主张，而以建立外交关系为条件，换取西方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承认》从而，也就迫使西方接受了两个德国并存的现实，等等。很明显，苏联外交新战略的目标，是希望通过主动并灵活的外交行动，逐步缓和同西方的尖锐对立，解决战后遗图问题，使二次大战后苏联在欧洲的既得利益得到承认和保证。这种以缓和为目的的外交战略，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两点值得注意的影响：其一，苏联作为阵营中最强大的国家，希望别国能对它的外交战略予以配合。例如，赫鲁晓夫在 1955 年同路过莫斯科的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两次会谈，提出「将来要在华沙会议的基础上促进两大集团搞欧洲集体安全，来缓和欧洲紧张局势……」；苏联要提出裁军方案，提出苏联与西

1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

社，1999），页 2 颯—265

—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 屹—1965）—历史的变局

60 年代的中国对外战略方针，在整个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中，是以经历许多重大而急遽的变化而显示其特征的。这些变化的影响力是如此

之大，以致在许多根本的方面改变了中国外交的面貌。如就这些变化的具体过程而言，其起始点首先是中苏关系从分歧走向破裂；随之是国家处于一个两面对敌的最危险的时期；最后到达对新的国际格局的新判断。这些变化，主要围绕同前苏联和美国的相互关系而展开。但同时，它又反映看这一时期对我国外交战略发生影响的其它世界性重大问题。总的说，6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走向，大致划出了一道弧线。即从原本的一端，走向了另一端。

历史刚刚进入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便呈日趋紧张之势。这一年的6月，发生了赫鲁晓夫藉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晤」之机，对中共内政外交政策突然加以指责、攻击的事件。在赫鲁晓夫同中共代表团长达六个小时的「会晤」中，这位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历数了从「百花齐放」方针、大跃进到中印边界冲突、「东方压倒西风」等一系列中国党的所谓错误。他的指责完全是以势压人式的，既不想讲道理，也不顾及两党本应存在的平等地位。赫鲁晓夫的这种「突然袭击」，揭开了中苏两党正面冲突的帷幕。在此之前，两党之间尽管在众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也有好几次不欢而散的会面。但双方都还保持了克制，没有撕开脸面，并尽量把争论限制在内部和有限的范围内。这一次，却有所不同。

实际上，这是几年来中苏两党积累的矛盾的一个爆发点。在6月以前，中共中央先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三篇纪念列宁诞辰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后来以〈列宁主义万岁〉为题，结集成小册子出版发行。〈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论述和回答的正是关于当今世界处于甚么时代、列宁主义是否过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否发生了变化、革命斗争与议会斗争，以及如何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才良显然，这都是针对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近年来所坚持的理论观点。〈列宁主义万岁〉被译成中文、英文、俄文、日文、法文等数种文字向海内外发行，引起了国际上的很

第十一幸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其对外战略的确定，不能不依据自身的利益和既定的目标。中国当然需要国际局势的缓和，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后所面对的最迫切的任务，即是展开经济建设。但是，五、六十年代的国际环境，并没有给中国的和平努力以广大的空间。朝鲜战后，美国没有响应中国提出的和平、缓和以及进行接触的呼吁。’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新中国始终充满敌意。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凯南，始终僵硬地认为，新中国是比苏联具有更大潜在威胁的国家。‘因此，彭德怀元帅在同赫鲁晓夫的上述会谈中，这样告诉后者：「中国还有台湾没有解放，朝鲜局势还不稳定，还面临着美国的严重威胁。美国和蒋介石也有可能东南沿海进行侵略、进犯……目前我们的力量还受朝鲜半岛局势的牵制。」，可见，一个国家的战略重点，首先是国家自身安全和利益，而不是去配合别国的某种战略安排。因而，要中国纳入莫斯科设计的所谓大国合作以争取世界局势缓和的轨道，显然既无道理，也无可能。这种不同战略利益的差异，从赫鲁晓夫取得斯大林逝世后个人的政治稳定开始，变得突兀起来。原因是，赫鲁晓夫还是「过去那种苏共说了算、老子天下第一、只能跟着他指挥棒走」。“此时他的大国主义，甚至超过了以往。按毛泽东的话说，是赫鲁晓夫这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不能不引起两个愈来愈严重的问题：一、两国国家关系的紧张；二、理论意识形态的论争。

中国在 1955 年建议就双边问题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中国还释放了数名在押的美国人，并愿意批准十五名要求到中国大陆采访的美国记者的签证。但美国务院坚持其不准美国人到大陆旅行的长期禁令。1956 年，中国政府再次建议中美记者互访，但华盛顿又一次拒绝了 this 建议。

参见张少书 (Gordo .H. chang) 着，梅寅生译：《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台北：金禾出版公司，1992），页 155。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页 9 — 13。

吴冷西：《一十年论战》，上册，页 44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页 2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 — 1965）— 历史的变局

方大国协议裁军比例，苏联将自动裁减军队，以争取和平谈判、和平竞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希望中国也能裁军，从政治上配合苏联」。2 其二，在理论意识形态方面，苏联主张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强调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认为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来夺取政权。3 后来，这个问题演变成了「要不要革命」的重大争论。

其实，赫鲁晓夫的所谓外交新战略，并非是别出新裁，它们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提了出来，是战后斯大林的一个基本战略构想。例如，关于「和平过渡」的观点，最初反映在英共党的纲领中，认为英国可以实现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这个观点，斯大林是认可的。同时，斯大林在战后，也不愿意各国发生革命。斯大林不准中国革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当时斯大林的一个根本思想，是惧怕各国实行武装斗争，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会引起再一次的世界性战争。此外，他还担忧资本主义阵营不允许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和平建设，因此又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要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竞赛」等观点。赫鲁晓夫实际只是接过了斯大林的战略思想而已。

然而，「不准革命」和迫使各国适应或接受苏联的战略安排，是一件强人所难甚至是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无理行为，它曾使中共在争取自身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走过相当艰苦的路程。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很难忘却。毛泽东后来多次讲到这件事情：「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①「显然，在斯大林去世后，再重新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安排」别国事务，「规定」别国的发展道路，是很难行得通的。

参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页9—13。吴玲西：《一·年论战》，上册、页135—13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页237。
弟卞一早叩写一人劲望人才儿人入班」叨尝今

外。，，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同美国的合作，进而达到主宰世界的意图，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此外，从1960年8月至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大量的冲突事件。其中，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事端，即多达4189起。’²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开始向中苏和中蒙边境增兵。至1969年，苏联沿中苏边界共部署了正规部队32个师，中程火箭部队12个师）以及5个空军军团，共3685架战斗机。在外蒙则部署了5个师和可发射核武器的中程导弹基地。¹³1969年3月，中苏终于在珍宝岛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大约在1964年前后，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问题。¹⁴事实上，中苏两国的战略盟友关系，至此已经不复存在。分手的两个共产党大国，各自都在经历自己的重大战略转变，从而使世界的政治格局，也向一个不确定的方向演变下去。对中国说来，60年代的这个重大战略变动，促使中国外交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通过这个变动，中国从苏联控制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摆脱出来，赢得了外交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地位。必须承认，社会主义阵营的结成，有着历史必然性。然而》由于传统的关系，阵营内部过分强调「统一性」和「一致性」，并且把这种「一致性」最后变为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这就损害了各国的利益。当50年代国际局势的缓和初露端倪时，由于各国的战略需求不同，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从而产生出政策性的差异。这时再以「一致性」来压服人，甚而；—厦· ■ ■ ■ ■ ■ ■ ■ ■ “ ■ ■ ■ ■ ’ ■ ■ ‘1 ■ ■ ■ j ■ ■ ■ ， ■ 、可 ■ ■ ■ ■ ■

11 时任美国谈判代表的副国务卿哈里曼于6月21日发表谈话说：美国同苏联、英国在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协议可以制止扩散核武器。我们能够合作防止中国获得核力量。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5—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628。

12 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见《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是针对中国的】 它试图用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排斥在核大国之
10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页 217 — 222 。

第十一章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晋界

441

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对外战略才又开始酝酿新的转变，以度过这「最玲的玲战」17 时期。

二 F 最玲的玲战」

可以说，在中苏两国难以妥协的争吵背后，始终站立着一个黑影，这就是美国。除去那些较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争论外，所有涉及国家战略和安全利益的不同观点，都同玲战敌手美国有关。例如，是否在策略上应对美有所缓和；是否可以通过和平共处或和平竞赛的方法，与美国进行比拼，等等，争吵的双方互不相让。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中苏之间因对美战略而剑拔弩张时，美国在中国的战略视野中，却暂时退居到次要位置。

1958 年金门炮战后，由于中国确定了合海问题一揽子解决的方案，台海局势复归于平静。隔日传来的炮击声，只是一种政治战的点缀而已。当时中共中央决策层，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上。对美关系基本处在冻结状态。

只是到了 1962 年，事态开始出现变化。当时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试图趁中国大陆发生经济困难之机，要挟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从而引起了台湾海峡的再度紧张。蒋介石同肯尼迪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试图说服美方，此时反攻，时机非常有利。但美国决策圈子裹的大多数人，不认为蒋能够实现他的许诺。他们想象，以蒋的力量去反攻大陆，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可笑的。此时，美国完全清楚，他们不应该被蒋介石拉下水，卷入一场同中国的军事冲突。因此，美国透过华沙谈判，告诉中国政府，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美国人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
17 语出美国冷战史学者舒尔茨博格（cyr 龄 1 . sulzberger ）一
本着作的名字：The Coldest War : Russia " ' 5 Gamei " China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1974)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以牺牲别国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其结果必然是盟约的破裂。面对破裂的危险，中国从捍卫自身利益出发，没有屈从于压力，从而赢得了对自身利益极为宝贵的战略灵活性。这一点是值得庆幸的。在以后一个长时间发展中，例如在后来的二十年或三十年，它的重要性便愈发显露了出来。

其次，分化和破裂，给中国的对外战略及其思想带来了一系列大转化。这些转化虽然经历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但毕竟使中国外交沿着愈来愈实际的方向走下去。其中对「中间地带」的重新认识、与某些发达国家的重要接触，以及最后的对中美关系作出新判断，都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现实主义因素被肯定、被坚持的过程。这一点，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也必须看到，意识形态争论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也发生过消极影响。自第二国际以来，国际共运内部的思想分歧，常常引出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些斗争最后总是以极端对立的两极出现，并被贴上例如「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政治标签，结果使相互理解、补充和转化这些矛盾的必要环节失去了意义。在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并使自己的国家加入到国际政治「游戏」中时，这种绝对化是危险的。例如，在同苏联关系破裂后，中国进而强化了意识形态争论中的立场，这就造成了在国际社会中「两面对敌」的局面。在大约五年时闲裹，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强的军事威胁相对抗，在国家安全方面，这是最危险的时期。毛泽东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当时说过：「我们现在孤立了· 一」¹⁵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¹⁶ 不过，事物总是相反相成。正因为

¹⁵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人的谈话，1969年3月22日。见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页119。

¹⁶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北京：内部出版，1988），页55。

矛盾一早即可 1 人幼望人妒 1b 人氏，- a] 则中田磳卜

利益都有好处。出于这样的原因，肯尼迪执政后，在他的日程表上出现了如下几个问题：1、应否继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大使级会谈，怎样确定保持这种接触的目标；2、应否在联合国改变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策略；3、对中国大陆正在遭遇的粮荒应否采取提供援助的立场（美国国内有相当多的舆论认为，美政府应向中国大陆出口剩余的粮食。他们认为，这样做，至少可以在道义方面为美国赢得好评），等等。当时具有这种意向性变化的政府官员，有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和国务院情报委员会主任希尔斯曼等人。尽管他们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人。

必须指出的是，在总的政策背景上，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仍然是遏制而不是接触，即所谓遏制亚洲的共产主义。上述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向，其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它的意义，更多的是相对于上一届政府所奉行的「战争边缘」政策和「大规模报复」政策，而不是一种政策性质的改变。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期间，美国仍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中，中国是「最好战」的；「从长期来看，中国是最主要的敌人」。²²“这两位总统都坚信「多米诺骨牌」理论，以为在亚洲如果不能遏制共产主义，西方在亚洲的盟友就会连锁式的倒台。此外，肯尼迪在大选中仅以微弱多数击败共和党人尼克松，因此他的政治资本并不多，在第一届任期内，不可能做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况且，肯尼迪本人是美国第一个当选的信奉天主教的总统。这也决定他基本的反共立场。

不过，在「冰凍时代」，也有一些微妙的信号。如1960年8月30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一方面指出，美国企图绕过台湾问题来缓和中美关系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在美军撤出台湾问题上，又提出了比以往灵活的建议，即美国首先必须同意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何时和如何撤出台湾的具体步骤，可以在随后讨论。”

²² 引自陶文*1J 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395。

²³ Edgar Sn 懈，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 Red China Today (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62) , 91 .

甲平人氏共和国丈· 第五春（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家联合起来制止他。‘“美国的这一态度，使中国得以保持克制的立场，最终化解了可能发生的又一次台海危机。

但这一事件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1962 年下半年，他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时说：过去几年，对帝国主义进攻的问题，我们想得不多，现在得想一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对东南沿海的地形作了勘查，并向毛泽东写出了报告。“”

事实上，自 1961 年肯尼迪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有了某些「意向」性的变化。还在 1957 年，时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肯尼迪，曾在《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全球政治正在由美苏的两极对立，向一个新的结构发展。在这个结构中，两极之外的中国和欧洲，已经形成新的力量中心。他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过多地强调武力，也过于僵硬。他主张要重新估价对华政策。1960 年 6 月，肯尼迪又在一篇讲话中主张，通过在日内瓦禁止核试验会谈，谨慎地促进与中国大陆的联紧。²¹

进入 60 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状况也开始有所改变。同 50 年代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形相比，气氛多少有了一些宽松。美国某些政治家们依稀看到，共产党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现实。它在亚太乃至世界事务中有着不能忽视的作用。许多国际问题】特别是东南亚以及东北亚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很难解决。硬是采用不承认的「鸵鸟政策」，是愚蠢的。此外，对美国利益说来，长期对中国采取僵硬的敌视态度，使这种关系永远紧张下去，对双方都是不利的。而适当地进行接触和对话，或可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对各自

18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页 89—90。19 引自李捷，〈物极必反：六十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载姜长赋等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页 500。

20 黄瑶、张明哲编：《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页 385。21 引自罗斯玛丽·福特：〈60 年代国内政局与中美关系——重新定义：美国国内因素与对华政策〉，载姜长赋等编：《从对峙走向缓和》，页 540。

第十一章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华人民共和国遵守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当时，肯尼迪甚至试图放弃他正在推行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来换取苏联在必要时同美国的合作，以打击中国。

事实是，在 60 年代初，美国人对中国的核计划并不十分清楚。例如，直到 1959 年的 9 月，美国才得到了兰州气体扩散厂的照片。那时，他们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度，很大程度上是靠推测。直到 1960 年 8 月，美国间谍卫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国核设施的有效图像。而因为航程的关系，U-2 飞机很难飞到罗布泊这样中国深远的内地。当时美国的情报分析感叹道：我们对中国核计划所知道的东西，是那么零碎，就如同我们了解苏联在甚么性质和多大程度上援助中国核计划一样，是那样破碎不堪。

到了 1960 年底，美国的情报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开探铀原料以及建立浓缩铀工厂，大约是用铀来生产钚。同时，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 1961 年底接近完成，它会在 1962 年提供钚。据此，情报专家极为肯定地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其它核国家一样，其关键成分是钚而不是铀。因为要把浓缩铀作为原子弹材料的过程是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而作为第一代的原子弹，只需要较少的钚。至此，对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于是，有人开始提出对策。1961 年 9 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说，一个有效消除中国原子弹造成心理影响的办法，就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因为当时印度的第一个核装置已经接近爆炸试验。这时，麦吉一点都没有顾虑印度拥有核武器之后会给亚洲带来的不稳定，而只是想以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来「狠狠揍共产主义中国一拳」。当时，曾经拟议由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杰罗姆·韦斯纳在访印期间，拜访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向他探询，中国的核计划将会对印度发生多大影响？其用意在于，引出印度提出援助的要求。这个计划最终被否定。因为，美国决策者还是害怕担当扩散核武器的名声。腊斯克最终同意了麦吉的另一个建议，即打一场宣传战，宣传美国核武器的绝对优势，同时贬低中国的核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5）—历史的变局

10月22日，毛泽东会见斯诺。他告诉后者：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主动向美国开战。中国对台湾的政策是，「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²⁴ 似乎，在美国大选即将揭晓，尼克松和肯尼迪在中国台湾及外岛问题上进行激烈辩论时，中国领导人有意在做谨慎的试探。在整个60年代前期，中美之间的敌对，主要因两个问题而展开。

1 关于中国的核武器计划

根据近年解密的历史档案，美国对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忧惧以及据此进行的研究和不断变化的对策制订过程，完全是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1961年肯尼迪进入白宫后，美国政府中的情报和研究人员，越加密切地注视中国核武器发展情况。他们推断，中国不久即可能加入核俱乐部。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的回忆，肯尼迪认为：「60年代最大事件很可能是中共的核武器爆炸。」²⁵ 这种估计反映了美国领导人的一种内在紧张。他们感到，中国制造核武器《将不仅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友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并可能引发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这是美国极不愿看到的情景。为此，美国亟欲同苏联合作，签订禁止部分核试验条约。1962年夏，肯尼迪曾坦白表示：他在核禁试问题上的重要考虑之一，是如何防止中国拥有和使用核武器。如果一项禁试条约有助于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就值得美国认真予以考虑，而不管苏联提出的建议如何。之6 据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威廉·福斯特在1964年会见一位历史学家时所透露，肯尼迪曾经考虑采取一项危险行动，迫使中

24 《毛泽东外交文选》，页449—450。

25 张少书：《敌乎？友乎？》，页220。

访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页422—423。

行封锁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报复和战争升级。至于如何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化，就更困难了。但是，如果有苏联的哪怕是默许的合作，情况就会不同。因为一旦美国采取行动，苏联

就会在战争升级和迫使中共接受条件的两极中，起缓冲作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事实上是第一个向苏方发出试探的户级官员。5月中旬，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邦迪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 r 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对此不感兴趣。他把话题扯到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计划问题上。当时，「多边核力量」是美苏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最棘手的问题。苏联大使说，不要让我们苏联政府把中国的核发展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尽管邦迪还想加以诱惑，但多勃雷宁还是拒绝谈论中国问题。1963年6月，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同意美国派遣一位特使来莫斯科，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这个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国决策层。他们认为这是探讨美苏联手对华可能性的时机。但由于已知苏联人更关心的是「多边核力量」，而「多边核力量」是美国欧洲政策的一个基点，它同防止核扩散协议又是矛盾的。在这个复杂关系面前，要取得苏联同意联手对华，就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选择：要么坚持「多边核力量」，要么取悦苏联。最后，肯尼迪似乎下了决心。在哈里曼即将出使苏联前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出，应研究「放弃多边核力量政策」，以作为达成防止核扩散协议代价的可能性。当时，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支持者认为「多边核力量 j 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反对的人则提出，「多边核力量」已经把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深深地绞在一起，现在根本没有放弃的可能。

肯尼迪还是扔不掉美苏联手遏制中国核计划的念头。当哈里曼刚刚抵达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须对赫鲁晓夫强调，一个有核中国，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去试探，赫鲁晓夫在「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要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上到底抱有甚么想法。虽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他始终没有能引诱赫鲁晓夫就采取政治的或其它步

丫甲 f 权民秀和刘义’ 矛 j . 历吃 1 7V ‘上’ u ’，怜、驯人 ‘、在 1963 年 1 月 22 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r （我们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苏联人谈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迟共产党中国的核进展。」当时在肯

尼迪左右的顾问们都同意他如下看法：苏联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以及核武力升级的危险性的立场，是可靠的。比起中国来，这种态度显然更少危险性。就在这次会议之后，无任所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苏联人对西德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议、美苏之间应就德国与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其关键部分就是非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在哈里曼同苏联外交官的谈话裏，他们似乎得到了共同的想法：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可以针对中国。哈里曼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同莫斯科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国停止核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威胁中国，我们将搞掉它的核设施」

在美国人眼裏，同苏联联手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是有可靠基础的。因为，苏联已经切断了对中国核计划的援助。更重要的是，苏联支持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条约，即具有针对中国的意思。从1962年8月开始，苏联对美国关于订立国际性的防止核扩散条约，反应积极。在腊斯克看来，这个条约就是以中国为靶子的。

美苏联手的可能性，使美国高层有些按捺不住。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63年4月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问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问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则就是使用强制手段。两种方案既可由美国一家来干，也可以发动西方盟国。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积极或心照不宣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直接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

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尽管军人们秉承最高方面的意志提出了这份报告，但他们不是没有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李梅将军即在有关这份报告的备忘录中坦言，公开使用武力来强制中国是不现实的。即使迫使中国签了条约，也无法保证它能实行。此外）如果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管是进
第十一章面针「犬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没有危言耸听。约翰逊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裏，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在约翰逊看来，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

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中国就不得不考虑，在它进行侵略时，会受到美国核武器或常规武器的反击。这种情况使中国决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国大陆处于严重的攻击之下。约翰逊认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来威慑敌人对其领土的攻击。它不可能改变自己谨慎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政策。应该承认，美国政府裏的确还有像约翰逊这样一些明白事理和比较聪明的人。

尽管约翰逊把中国冒险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他没有忘记强调中国核试验的政治含义。他认为，中国在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之后，会相信它的核能力可以「削弱」那些同美国结盟的邻国的「意志」，使他们同中国和好相处，从而消蚀美国在亚洲的影象。正如国务院另一份支持约翰逊观点的报告所说，中国会「避免莽撞的军事行为」或「核讹诈」，而把自己的核武器作为「政治武器，以赢得尊敬，促进中立主义，鼓励革命」

正当美国政治家和军人们为中国核武器的处置问题绞尽脑汁时，1964年10月15日，美国间谍卫星的照片显示，中国的罗布泊核试验场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包括由双层围栏环绕的高340英尺的铁塔，成列的仪器掩体，两个小一点的铁塔和各种地堡、平台。同时，美国情报人员还观察到，自1963年9月就停止的来往于试验场的大批次的飞机，在1964年又恢复了飞行。这表明，最后的准备正紧张地进行。中央情报局负责科技情报的助理局长唐纳德·张伯伦肯定，爆炸就在这几天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西部的荒漠上空，腾起了巨大的蘑菇云。美国设在世界各地的十三个情报观测站中，有十一个立即捕捉到了这个蘑菇云所释放的巨大电磁脉冲。驻日本美军基地名为「足尖舞蹈者」的探测飞机，爆炸后多次起飞，收集中国原子弹的核灰尘。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4）引一 历史的变局 骤来反对中国核计划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只要法国坚持不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感到，他也无法做到孤立中国。此外】这位第一书记还极力淡化中苏分歧。他不同意哈里曼关于中国有了核武器

将对苏联构成威胁的观点。他对哈里曼说，中国的核计划没有那么厉害。有了核武器，中国会更加自我约束。因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他准是喊叫得最凶的人」

尽管肯尼迪没有获得赫鲁晓夫的承诺，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在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总统谈到了所谓具有「威胁的形势」。虽然他承认，中国在核计划方面，要达到「羽翼丰满」的程度还需时日，但「我们现在就希望采取步骤，来减缓这种危险的前景」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在同肯尼迪会谈之前，蒋经国造访了中央情报局。在会谈中，双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队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蒋经国又会见了邦迪，他们也谈到了打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作战问题。蒋经国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持，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邦迪支持蒋的想法，但顾虑军事行动会促使中苏重新结盟，并引起大的冲突。因此，他告诉蒋经国，打击行动还需要做慎重的计划。

9月11日，蒋经国同肯尼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谈话中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三百到五百人的突击队派到像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根据谈话记录，蒋经国当时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对此，肯尼迪仍未完全放心。鉴于猪湾事件的经验，华盛顿和台北都需要有关大陆的更准确的情报。肯尼迪告诉蒋经国：「不管采取甚么行动，它都要适合实际情况。」几天后，蒋经国会晤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计划小组，来研究派遣国民党作战人员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行性问题。双方约定，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双方最高层的批准。也就在这时，美国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开始了他关于中国核试验意义和后果的研究。约翰逊研究的最可取之处，是它

弟一常向讨一「大动丰大分化大改红」的世弄

建立起「核武器银行」，即使印度和其它可能的亚洲国家加入其中，以对抗中国的核力量。实际上，这是默许或承认这些国家制定自己的核计划。

这样》从实质上说，尽管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使美国高层对核扩散政策做了新的研究，但原子弹所造成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约翰逊总统在拿出一个意义重大的防止核扩散条约时，仍是困难重重。在这场以武力阻断中国核计划「闹剧」的末尾，还有一个小插曲；1965年春，美国海军情报系统不知通过甚么渠道侦知，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拥有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这意味看，中国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击美国的领土—夏威夷或西海岸。海军甚至还设想，中国会引发一场「催化战争」，即中国使用其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本土，而使美国误认为是来自苏联的核打击，从而迫使美国核反击。当时的海军部长保罗·尼采曾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应在中国导弹潜艇的处女航行时，将它击沉。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海军已经紧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直到80年代，中国才试验自己的导弹核潜艇。

2 中美敌对的第二个问题：越战的迅速升级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都认为，越战是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手段。约翰逊甚至认为，如果美国在越南南方失败，那么苏联和中国，特别是中国，就会填补美国离开后的「真空」，可能会有强大的中国军队从「山间小路」涌进印度支那。他声称，决不做「目睹东南亚重蹈中国覆辙」的美国总统。从1964年起，美国在不断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的同时，加紧策划针对越南北方的战争。当年8月5日，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2月，美

2 ? 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页497a
甲辛入氏矢和国义·第五卷（1962—1965）—压史的变局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检查这些从辐射云中收集的灰尘时，他们简直大吃一惊。原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国情报机构长期认定的钚，而是铀-235。这就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铀弹。这意味看，中国的核能力是以一种很快的速度发展的。直到当年底，u-2飞机才证实，兰州气体扩散厂早已投产了。核爆炸后几小时，约翰逊总统发表声明。不过这声明已不可能再有甚么新意了。它只是说，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诺对亚洲的保护。但中国同时发表的声明，却在世人面前掷地有声：一、中国发

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二、中国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应被销毁。

在台湾，蒋介石被核爆炸震惊了。因为，这爆炸声对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不啻是沉重一击。蒋曾在核爆炸不久提出，应采取军事行动，在中国大陆研制出核运载工具之前）摧毁它的核设施。但在美国人那裏，蒋碰了软钉子。

约翰逊总统在核爆炸后曾经任命了一个专门小组，希望对防止核扩散问题作出研究。这些加入专门小组被称为「聪明人」的前政府高级官员，对各种所谓防止核扩散的方案进行了披阅，这其中，也包含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实际上，打击中国核设施是作为整个「激进」的防核扩散政策的一部分提出的。这些政策还包括：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实质性地从欧洲撤出战术核武器；封锁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基地；以及最小威慑核战略等等。在政策取向上，专门小组更同意罗伯特·约翰逊的观点，不主张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打击。但他们对核扩散问题看得很重，视其为「重大威胁」。因此，他们建议，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核政策，并形成和通过一个国际性条约。小组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有核国家已是不可避免。这要求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其关键点，是把中国接纳进军备控制条约。

显然，这是一项意在「羈席」的建议。但由于它同受国务院支持的「F 多边核力量」计划相矛盾，结果没有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支持。国务卿腊斯克虽然一方面在研究防止核扩散条约，但在另一面，却主张第十一章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453

从 1965 年 6 月至 1969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支持部队计 23 个支队、95 个团另 83 个营，共 32 万余人次。其中最高年份为 17 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部队有力地配合了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行动，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中国在战略上作了最坏的准备，但并没有放弃争取不发生战争的努力。周恩来在 1965 年的几个不同场合，请外国领导人转告美国四句话：一、中国不主动挑起战争斗二、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

的国际义务是要履行的；三、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四、只要美国轰炸中国就是向中国发动战争。战争是没有界限的。³³ 实际上，这是中国对战争态度的一条底线。它要传达给美国人的是，中国不会主动向美国开战。而在美国，愈来愈多的人担心，越战会演变成另一次朝鲜战争。因此，对中国采取「遏制而不孤立」的做法，逐渐为美国政界所接受。1966年3月16日，在中美第一百二十九次会谈中，美国谈判代表有意透露，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那些说美国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报导，是不负责任和是不正确的。这样，美国也向中国作了一次政策性「透底」

可见，即使在「最玲的玲战」时期，也不是没有一线「转换」的契机。应该说，中国在60年代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战争考验。但事物往往在最危难的时刻，会发生惊人的转变。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发现转变的征候，把握转变的时机。必须肯定的是，这一时期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而对外界做出的反应，是必要的。只是，应该研究这种反应的适度性。正如我们看到的，中美之间在对峙最严重的时候，始终谨慎地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对抗。这就为后来整个政策的转变，预留了充分的空间。

32 曲爱国” 〈中国支持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载《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 页91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文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页“5、45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历史的变局

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持续轰炸。3月，又派遣3500人的海军陆战队进驻岘港。这是美国第一次向越南派遣大量地面部队。它标志着越南战争从所谓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

越战的升级，给中国国家带来直接威胁。而一旦美国出兵越南北方，则可能与中国直接发生军事对峙。“对此，中国不能不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这一重大战略方针的调整，发生在1964年。它可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

所谓对内的战略调整，是指国家改变了原本被概括为「吃穿用」计

划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而代之以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和建设「三线」的战争准备计划。在对外方面，中国此时的主要战略动作，是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说来，这既是出于国际主义义务，又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必要行动。还在北部湾事件之前的 1964 年 6 月，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就指出：如果美国进攻北越，扩大战争，我们将作出最强烈的反应，做到甚么程度，要视当时情况而定。²⁹ 在此基础上，1964 年 7 月，中国、越南和老挝三国在越南河内举行三党会谈。会谈中，中国方面估计，越南战争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美国强化「特种战争」；二是把「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即在南越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北越。中方表示，要尽一切可能把战争限制在目前的范围之内，同时积极准备应付第二种可能；如出现第二种情况，中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³⁰ 实际上，中国此时已基本作出了类似抗美援朝战争那样的战争准备和承诺。

北部湾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发表「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进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的严正声明。³¹

²⁵ 转引自李捷：〈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载姜长赋等编：《从对峙走向缓和》，页 634。

²⁹ 曲爱国：〈中国支持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页 84。

³⁰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 220—221。³¹ 《人民日报》1964 年 8 月 7 日。

「一旱圆刃一人韧望人才 IC 犬戌虽」的世弄

毛泽东 1946 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的。毛泽东当时认为，帝国主义在没有征服这片广大的中间地带之前，是谈不到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攻的。³⁴ 作为一种战略性理论，「中间地带」问题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又两次被毛泽东提起。但在理论阐释上，前后却有所变化。

在 1957 年提到「中间地带」时，它的理论内涵大体同 40 年代相一致。毛泽东当时说：帝国主义「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

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二「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 … 所以我觉得，它是羁中闲地带为主。」么“可以看出，这时的「中间地带」论，基本是着眼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着眼于两个阵营的对抗。这种对抗，首先是基于国际的「阶级分析」，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然后才看重于战略，即社会主义阵营应该采取的政策策略。

然而，在 60 年代，对这个理论的阐释，有了明显的变化。从 1963 年底开始，毛泽东几次集中谈到「中间地带」问题。他的侧重是：「中间地带有一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r 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赞成美国。… … 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37 这裏，毛泽东已经把利益矛盾放在了观察国际力量组合的第一位，即强调国家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而明显淡化了国际矛盾的阶级性质。这种变化显然是在国际政治格局深刻变动的背景下

3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 1193。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 620，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 393。

37 《毛泽东外交文选》，页 507 — 5080

下’、氏方们门大’用二誉良 1，喊一 1965）— 历史的变局

三寻找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

1963 年 1 月 9 日，正在广州的毛泽东，读到了郭沫若 1 月 1 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首词：《满江红》。毛泽东为郭词中「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兮扶之直」两句感奋不已，遂奋笔疾书，写出了 60 年代前期最为中国人吟咏不绝的词作之一《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中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是政治家用诗人的浪漫，对世界大势的描画和概括。60 年代中期，广大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

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1963 年，已经有五十多个亚洲和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昔日的殖民主义体系，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中国自己也是第二次大战后从殖民主义体系中独立出来的国家，这使她同广大亚非拉国家有相同的命运感和使命感。在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大分化和大分裂的边缘时，中国领导人在亚非拉广大地区，看到了聚集起来的「反帝、反修」力量。那裏，是一个广阔的战略空闲。在 60 年代前期，中国领导人多次出访亚非国家，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增进同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其中，以周恩来和陈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对亚非十三国的访问最具影响。在对非洲的访问中，周恩来总理反复阐述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的基本点，是支持亚非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及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二支持他们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愿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这种外援助决不附加条件，也不谋求特权。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关系的真诚，使自己的形象和威信进一步树立起来。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亚非「新兴国家」中始终获得了比较可靠的支持。中国在两极之间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战略上，是由「中间地带」、r 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来统领的。「中间地带」论，即指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块「极其辽阔的地带」，它们包括亚非拉三洲 F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是第十一章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457 多，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和谅解。在双方战略利益形成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已经公开化的背景下，这是不难预料的。问题在于，这时的谈判同历史上中俄边界争端纠缠在了一起，从而更加造成双方的对立。1963 年 3 月 8 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中俄历史上的《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三个不平等条约。如果苏方在领土问题上援引香港、澳门的例子，你们是否意味着「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

显然，对苏联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大俄罗斯思想传统，又极端注重边界与安全关系的国家，提出历史上的旧条约问题，在性质上要比一般的划界谈判严重得多。特别是当赫鲁晓夫听到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访华

代表说，沙皇俄国靠武力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笔账呢」时，反应强烈。他对访苏的日本议员说：「中苏边界是神圣的。」⁴² 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⁴³ 至此，中苏边界谈判已无回旋余地。双方在当时号称世界最长的陆地边界两端，布开剑拔弩张的阵势。这种状态一直延伸至 1969 年珍宝岛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1969 年 10 月，双方才再次开始边界谈判。中苏边界冲突造成的紧张，并非国际大格局中唯一的矛盾，尽管它带有某种国际角逐的信号意义。1964 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经济开始了一个较快的增长期。据统计，如以 1965 年的固定基金为 100，到 1975 年，苏联的固定基金已增至 209。国民收入增长了 186%。也就是说，十年间，苏联经济大体上翻了一番。⁴³ 国力的增长，使苏联加大了对军备的投入。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苏之间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大约是四比一。到 70 年代初，美苏两国的战略核武器已形成均势，在数量上，苏联甚至已超过美国。由于这个原因，1972 年 5 月，美苏两国在对等威慑和同等安全的前提下，签订了第一

42 引自李丹慧，〈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43 陈之群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 30—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产生的。它把原本的「集团」式、「盟友」式的战略思维，带到了更加接近实际、独立的战略框架中。因此，有人甚至说，这是「中国外交走向真正的独立自主，走向成熟的新的起点」

由「中间地带」和「两个中间地带」为核心的新的对外战略思想，对中国外交摆脱两面对敌、寻找新的战略空间具有现实意义。首先，1964 年的中法建交，即是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的突破。毛泽东在中法建交前夕对法国议会代表团的讲话，鲜明地阐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是你们的党，……但我们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不许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

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二是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加强来往。³⁹ 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打动了法国人，因为它符合国际利益的矛盾关系。中法建交后，有人曾询问戴高乐总统的动机。这位法国总统只以一句话来回答：「法国承认的，仅仅是世界的现实。」⁴⁰

60年代，中国在承受美苏两个大国政治军事压力的同时，也先后同日本及欧洲的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建立了商务关系。⁴¹ 虽然，限于条件，中国还不可能在政治上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但双边贸易却增加了相互联紧。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从西方国家进口了大量粮食，这对缓和经济困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70年代打开外交新局面，是以60年代上述战略变化为基础，是60年代获取的必要战略空间的延续。

面对动荡和分化改组不断的世界，中共开始思考调整自己的战略方向。1964年2月，中苏两国在北京开始边界谈判。谈判进行了半年³⁸ 李捷：〈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载姜长赋等编：《从对峙走向缓和》，页624。³⁹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187—188。⁴⁰ Wladyslaw W, Kulski, De Gaulle and the Worl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French Republic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6), 3页。

⁴¹ 《当代中国外交》，页190—191。

矛盾一早凶，' J1 入别 j 乱入刀' 山入沙 '牌基 J 刘驰仲问的战略利益，也随之凸现出来。1969年的3、4月之间，是中国领导人开始作出决断的重要时间。3月22日，毛泽东曾发自内心地指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不难想象，这就是他后来所说 r 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⁴⁶ 的一个导语。

四「动荡」和「分化」环境下中国国内经济运行的突然转轨

从1962年起至1965年，是中国国民经济恢复调整时期。无论从理论设计还是人民心理角度看，这个时期选取一种政治经济平稳发展的战略最为合理。但是，由于政治上「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指导思想

的提出，特别是由于中共领导人感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复杂国际环境，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运行方向却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

政治经济平稳发展的战略本来是确定了的。事实上，计划部门的官员，甚至早在 1962 年就开始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恢复性质作了某种考虑。例如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 1962 年年底就致信毛泽东，提出发展农业应作为第一位的任务、以农业为基础来完成工业化、以及看重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等三项主张。⁴⁵，可以看出，这一初步设想已经具备了后来的所谓「吃穿用计划」的雏形。1963 年初，三五计划以李富春〈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为题正式交付中共中央讨论。〈要点〉认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而不应把其它的经济取向，例如国防和发展尖端军事技术作为主

45 王永钦：〈1969 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煎的文献》，1995 年第 6 期。46 王永钦：〈1969 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党的文献》，1995 年第 6 期。47 李富春：〈关于十年规划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62 年 12 月 31 日，载《李富春选集》（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页 302—304。

丫甲八八煮” 州人一中斗否 k17D 乙一 1，b 刃一 膺又的变句
个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而此时，美国却被越战拖入了一个难以解脱的深渊。不仅巨大的战争负担使美国政府感到窘困，国内的反战与民权浪潮，也团寻美国最高行政当局焦头烂额。60 年代末，美国的内政外交处在一滩泥潭中。

其次，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分裂出来，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虽然，中国不是超级军事强国，经济实力也称不上强大，但中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在地区性安全问题上，中国早已有了事实上的发言权。例如，在越战问题上，中国就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斗争中，中国的独立不羁，不能不使人感到它力量的存在。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苏联问题专家唐纳德·扎戈利亚。他在 1965 年 3 月单院召开的听证会上，首先使用了后来社会科学家们经常利用的几何图形，即把「中美苏关系」比喻

为一个「三角」。他告诫说：「这种关系中的任何两强之间的关系变化，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第三者。」⁴⁴ 这就是后来「三角」、「大三角」说的由来。这种说法反映了 60 年代末以来国际战略格局的本质。第三，即所谓国际力量的分散化。其主要表现是，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复兴，这些原本依赖美国的战略盟友，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要求变得强大起来。美国的统治地位日渐削弱；而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由于阵营的动荡和分裂，也对苏联产生某种离心倾向。同时，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崛起，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平等地位。于是，战后的两极格局，正在日益消蚀。美苏两国再不能想当然地控制世界了。

新的国际格局要求人们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政策。

这是一个十分微妙复杂的历史转变链接点。在总的大局判断上，中国领导人概括出时代特点，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但在具体的政策构架上，还需要耐心的观察，玲静的思考。直到几年后以珍宝岛事件为代表的中苏紧张局势，才把事态导向清晰化了。中美之 44 转引自张少书：《敌乎？友乎？》，页 255。

第十一章面对「大动盘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461

有关 1964 年前后中国的外部形势问题，目前通行的说法是：「（1964 年时，）中国周边环境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外来军事侵略仿佛随时可能发生。1964 年 8 月 5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两个多月，美国海空军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袭击，把侵略的战火从越南南方燃烧到北方，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在北面，1964 年以来的中苏边境冲突在不断恶化。在西南面，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也没有完全消除。」“因此，中国的基本战略方向便不能不向战备倾斜。

从简单因果关系看，这个阐释似乎具有合理性。因为，在 60 年代中期，中国在世界上处于相当严重的孤立地位。在同美、苏两个大国的关系方面，矛盾日益深刻、激烈，几乎丧失了调和余地。美国决策者顽固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遏制政策，在东南亚的丛林中，卷入愈来愈深。而中国奉行的「反帝、反修」的「革命」外交路线，也使

得同美、苏矛盾愈加突出。在某种意义上，越战和周边的紧张局势，可以看作是这种矛盾突出化的反应。也就是说，至 60 年代中期）中国正面对着外部众多的「敌手」。这些「敌手」无论在潜在还是现实的意义上，都有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危害。于是，选择战争准备作为国家经济政治的看重点，就变得必要了。

但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比较难于说明事物的全部。当我们分析一个重大的国内政治经济变动的因素时，需要对更为复杂的形势作出评估。这就是说，除考虑外部威胁外，还要看到中国内部的矛盾因素，以及由外部威胁与内部矛盾交相作用所产生的紧张。60 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局势相当复杂的时期。国内外的「变量」都比较大。一个需要研究者特别加以注意的方面是，同 50 年代相较，后续的十年，国内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变得愈来愈显著，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明显加强。如果说，外部威胁是一种实际考虑，那么，意识形态因素就类似于「发酵剂」，会加重实际上的「危险感受」。这样，当我们观察这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 — 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 8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 — 1966）——历史的变局

要的努力方向。它们最多是处于兼顾的地位，并且在总体上是收缩的。当然，当时更没有提出战备问题。48 中共中央同意〈要点〉的设想。1963 年 9 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以「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技术」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49 这可以看作是对三五计划的正式批准。

计划官员对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采取积极态度，概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他们认为，大跃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计划变动太快，甚至处于随心所欲的无计划状态，因而「吃了苦头」其二，大跃进严重破坏了农业，甚至发生粮荒，几年中人民口粮竟难以为继，因此必须以吃穿用为主导方针安排计划。邓小平于 9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约占总耕地数的三分之一）的主张，”是「吃穿用方针」的极好脚注。

应该说，这是一个实际的、比较符合社会需求的计划设想。但是，实际历史进程却并未按照大多数人的愿望发展。进入 1964 年，中国国

内经济政治即开始发生变动。发生变动的原因，是这时毛泽东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看法有了重大改变。他不再认为恢复性计划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意义，而强调战争危险的迫近，强调「敌人到处可来」的观点。从而，改变了社会预期的恢复性目标，将「吃穿用」取向变更为以战备为主的社会性动员。这项变动调动了极大的物质资源，甚至使国家的基本工业布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并进而波及到政治格局，造成了从基层到中央的全面紧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的政治经济历史上，这个变动应是影响十分重大的一次。而这个变动，至少在表面上同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以及周边紧张局势有关。

4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1194。

4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195。

5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193。

51 杨茂荣：〈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一次重大调整〉，《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页27。

第十一章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463 毛泽东和其它中共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忧虑已经强烈到足够大，以至达到必须修正共同肯定的休养生息计划的程度？

答案应从毛泽东断然改变三五计划指导方针的原因说起。如上文所说，毛泽东本人原本是拥护「吃穿用」计划的。他曾于1963年8月首先提出“1963年、1964年、1965年仍应作为调整的年代。”^s，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是在当时要不要继续调整的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向中共中央核心提出的。这表明他最初并不主张重新摆开大投资的经济战场，在后来所说的「三线」地区建立用于战备的工业设施，更没有将战争准备纳入视野。这是大跃进遭到严重失败之后人们普遍愿望的正常反映，并且还说明，由于物质的以及人们情绪上的原因，当时对政治经济所能做出的重大改动，是没有充分道理的。可是，毛泽东在不到十个月之后，即在1964年5月中共中央即将开会讨论已经酝酿成熟的三五计划之前，提出了他的「三线计划」。他在5月10日和n日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有若干重要插话，其中两点改变了汇报者原有的思路：第一，当谈到铁路交通在第三个五年

内只能搞那么多时，毛泽东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第二，当谈到基础工业、交通同各方面还不适应时，毛泽东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摔跤子的。两个拳头一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一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它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显然，把一个「屁股」即基础工业搞上去，而其它不能太多，是同「吃穿用」取向相矛盾的。因为李富春在 1963 年底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刚刚代表国务院申明：r 各级计划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持农业的计划。」”而国防工业成了另一个并列的「拳头」，也非计划官员们原本之所设想。

53 薄一波：〈关于一九六四计划的问题〉，《党的文献》，1998 年第 4 期，页 5—6 • 54 〈毛泽东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节录）〉，《铁的文献》，1996 年第 3 期，页 11。

5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显》，下卷，页 1195。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年）——历史的变局——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变动时，两种因素都必须考虑进去，才能获得合理的历史阐释。

从这样的逻辑考虑，中共面对的所谓「变量 J」，应该有如下几种结果，A、如果外部威胁带来的风险大于国家突然实行经济政治 r 转轨」所要承担的风险，那么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战备和改变工业布局，就是合理的了；B、如果高估了外部威胁所带来的风险而迫使国家经济政治发生转轨，那么这个「转轨 j 的风险代价势必过高三 c、如果 r 转轨」并不主要地来自对外部威胁的考虑，而是另外的因素，例如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等等，那么，就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历史分析。这种实证性的讨论，将会在较大程度上挑战目前的流行结论，即越战是影响 60 年代中期中国自身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中国在越战上作出了「高强度」的反应 g 以及中国因此在 60 年代中期以后的冷战中占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等等。事实是，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 r 转轨 j，并非由于国内或国际的单方面原因，也就是说》政治经济转轨具有风险，但它显然并

不仅仅是因为顾虑外部或仅仅顾虑越战的威胁。尽管这个威胁的确存在，而且在日益增大。「转轨」具有更为复杂的背景性因素的作用。有证据表明，以往对 1964 年中国国内战略性变化原因的研究，是很不精确性的。其主要原因，是所谓「流行观点」在研究者的意识中占了稳固地位。但是，历史逻辑本身却要讲求它的精确性：例如，北部湾事件发生于 1964 年的 8 月初，而毛泽东提出改变三五计划指导方针却至少是在两个多月以前；又如，毛泽东关于改变战略指导方针的意见，是在原有工作日程正按议定节奏的运行当中，向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人提出的，这使它带有了某种突然的性质。于是，下述问题就变得重要了：毛泽东为甚么要以一种突然的方式，打破正常工作计划，而用别人完全没有料到的新东西来代替原有设计呢？再如，在这种突然改变原有计划的过程中，其它因素，如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的扩大化和国内阶级斗争被愈加凸出出来，是否也在发生著作用分当然，更为必要的是作出解释：认定越战是促使中国政治经济变动第一位的外部因素，那么，在估价战争强度与可设想的波及范围时，是否

第十一章面对「犬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裹开会；没有钱，拿我稿费去搞。，6 月 16 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谈到战略防御方针时，否定了原有的「北顶南放」的防御战略，指出，敌人到处可来，应处处备战，提高警惕，根据敌来势，以决定主攻、主防方向。”并提出，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

“可以看出，无论是就战争准备还是三线建设而言，此时毛泽东并没有专门考虑越战及越战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反之，他设想的是，敌人到处可来，应处处备战。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弃 1960 年以来预定的敌人主攻方向。他在 1964 年就议论过，敌人从哪裹来？主要是中问突破，割断南北，两翼来不怕，中问突破危险，最不放心还是北京、天津。他还认为，敌人也可能走八国联军老路，进渤海，从天津登陆。61 敌人到处可来，要处处备战的概念，表面上是说明处在一种迫近的危险中，但实质上对来敌的估计是十分模糊的，反而没有原本确定的「北顶南放」、「岛重于岸」6 “的原则在战略上具有针对性了。周恩来对「三线」的定义性解释是：「除了攀枝花（位于西南川滇交

界处)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互相来说又都是第一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⁶,这裏对东南西北四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姑且不论现实危险

58 吴玲西:《十年论战》,下册,页1199—1200。

59 陈小鲁:《陈毅与中国外交》,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152;另参见《罗瑞卿传》,页472、477—478。

60 《罗瑞卿传》,页472。

61 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页208;《罗瑞卿传》页385。

62 「北顶南放」和「岛重于岸」两项战略方针,是林彪1959年主持军委后逐步明确的。参见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3 《周恩来传(1949—1976)》,页8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5)—压史的变局

这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证据说明【毛泽东突然改变已经基本成型的三五计划的「盘子」,提出战备与三线建设的意见(这是不能违背的意见),同当时的越战战况之间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研究证明,这个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最主要的反证就是上面所说,毛有关必须实行战备和加紧三线建设的观点,在提出的时间上都早于8月5日,即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越战明显升级为同越南北方的战争这个标志点。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从5月10日、11日开始,毛泽东关于战争和预防战争的说法,呈现了愈来愈明确和严重的趋势,6月16日在十三陵谈话达到高峰。5月10日、11日毛泽东的说法是:不建攀枝花,「打起仗来怎么办?」「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原子弹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多,但要搞起来,搞起来吓吓人。黄色炸药和大炮很顶事,帝国主义对这个很害怕。」⁵⁶5月27日,同中央常委集中谈搞四川三线问题时说:

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甚至于三、四、五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打仗还是靠常规武器，但是，为了使帝国主义在发动战争之前考虑一下，还是要有尖端的东西。”6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甚么时候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必了。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那么不搞攀枝花，我骑毛驴去那

56 见李富春1964年5月1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说明〉，《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页12。李富春引用毛泽东的上述说法时，用了「主席最近说」的时间限词。从上下文推断，毛的这席话，应该是在5月10日、11日讲的。

57 见周恩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页15—19；划少奇，〈继续控制基本建设，着手搞西南三线〉，《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页19—20。第十一章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壮界

明，如果苏方援引香港、澳门的例子】那么是否意味着「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当然，说毛泽东要翻历史旧账，把中国历史上被俄国割去的领土再要回来，是荒唐的。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显然不会那样做。因为它既无国际法理依据，也没有现实可能。中国不会谋求苏联领土这一点是肯定的。而说这些话的目的，按毛泽东自己的表达，只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让赫鲁晓夫「紧张一下」

在毛泽东看来，「紧张」与「不紧张」之间，有看辩证的、互换的关系。有时，为了一个阶段的不紧张，往往有意去制造一定程度的紧张。在紧张达到某一限度时，释放或减缓紧张度，从而争取到所谋求的不

紧张；有时，为了另外的目的，可以制造紧张，然后得到矛盾或问题焦点的转换。毛泽东常讲不怕鬼的故事，意思即在于说明：愈怕鬼，鬼愈来；愈不怕鬼，鬼反而吓跑了。外国人，不论是苏联人还是美国人，对于毛泽东这种浸透了中国文化精义的战略思想，在很长时间裹摸不到头脑。有时】他们把表面上「紧张」所隐含的意图看重了，真的被调动起来，形成面对面的紧张于而有时却又太过自信，从而忽略掉某种非常重要的信号；还有一些时候则拘泥于「末节细枝」，从而像坠入「五里雾中」，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能发现「登堂入室」的门径。直至很久以后，人们才认识到，毛泽东非常善于以虚实结合的谋略来调动「敌手」，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情其景就像中

68 引自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页42。

69 毛泽东当年10月在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再次谈到苏联违反中俄不平等条约而侵占中国领土问题。但他说，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页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是否真有那样大，仅就最低限度而言，对南部即越南方向的防范，同其它三方向是平列的。这就是说，对所谓南方已经「烧到家门口的战火」（此时还未发生北部湾事件），当时中共领导人并没有感觉到中国应该进入临战状态。由此可以判断，改变三五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提出三线备战问题，并不是有了特别急迫的战争压力，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某种不确定的危险感觉。

与其说从南方来的战争压力要大一些，不如说当时人们还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北方。在李富春5月28日所作「关于计划安排的几点意见」中，「三五计划」中原本要新建的项目，最大的就是酒泉镜铁山钢铁厂。该项目顶计到1972年至1973年完成一期投资，规模为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吨的产量（预计投资十一二个亿；已投资两个多亿）。“但5月27日毛泽东同中央常委谈话后，酒泉镜铁山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李富春说：「所谓后方，一个是西南，一个是西北，

现在最靠得住的还是西南。J65 邓小平当场做的解释是：「酒泉过去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第二线。」“很明显，酒泉大后方地位的改变，是同周恩来上面关于「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的说法出于同一考虑。只是，邓在这里说酒泉所处的西北「算二线」。至于周恩来所说的「修正主义」，当然是指苏联。自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冲突之后，中苏边境开始变得不安定起来。1962年又发生波动面更大的伊犁、塔城事件。从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中苏边境地区共发生1000余次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有损于两国正常关系，而且也引起双方对历史上中俄签订之不平等条约的保留性质辩。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提出《瑛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声

64 吴玲西：《一1·年论战》g上册，65 吴玲西：《十年论战》，上册，66 吴玲西：《一卜年论战》，上册，67 《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页21。页21。页21。

第十一章面对「犬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达到即将发生战争的紧迫程度。1964年7月1日，刘少奇在天津部队军级干部座谈会上指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了军事问题，讲了敌人进攻的几种可能性。我们从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准备好，争取最好的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帝国主义要想打的象征，但是，要做准备，要经常有敌情观念。」76 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显系指美国。但它否定了越南战争正在向中国逼近的可能性。刘少奇在这里使用了「有准备」和「敌情观念」两个语句，属提示性用语，并不表明事态已经具有了重大的紧迫性质。在1962年台海危机中，这类用语可能更为常见。因此可以肯定，指出帝国主义目前「还不想打」，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十三陵谈话的准确理解。向军队高级干部交代这种理解，对后者把握国际斗争的基本动态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本人的判断更具戏剧性。1964年8月13日，即北部湾事件发生后十天，毛泽东在同越南领导人黎笑分析美国是否决心越过十七

度线侵占越南北方时说：看来美国、越南和中国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因而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采取巧妙办法以不去惹怒美国人的决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如果说，美国把苏联当作近期的主要敌人，而把中国看作是长远意义上的敌手，那么，因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者，「『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这个敌人于是可以忽略。此外，从历史上看，美国从来都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因此他通常不会是世界性大战的发动者。特别是「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是十个指头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因而他很难腾出手来，同中国作战。此外，毛泽东还相信：「美国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在越南）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考虑到毛泽东在朝鲜战争和1958年台海危机中同美国直接较量所获得的经验，以及在1962年台海危机中

7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94。

77 引自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页44。

78 《毛泽东外交文选》，页5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国两个著名的文化特征：长城与空城计（The Great wall and Empty Fortress）

尽管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在1964年激化到了最高点，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苏联有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图。边界问题的确构成了双方争执的一个热点，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识形态争论的一个陪衬。苏共中央1964年3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覆信，竟对他们前一年11月来信中列在第一位、要求中共中央回答的边界问题，只字未提。⁷，当时中共中央对苏联内部状况的估计是：赫鲁晓夫搞工业党、农业党、大开荒，效果甚差，内部思想混乱，不满情绪增长。毛泽东甚至预测到，赫鲁晓夫在近期可能要被搞下台。⁷之因此，毛泽东认为，在中苏关系上，「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⁷³此外，中共中央核心层对赫鲁晓夫也持这样的看

法：此人欺软怕硬。我们硬一点，他不见得会怎么样。但是我们软下来，反而会吃亏。“在 1964 年的若干次外宾会见中，尽管毛泽东向客人询问过苏联是否会打仗的问题，但内部的底线估计仍然是：「激他抛出一切法宝来」，比方说采取「集体措施」、断交、撕毁中苏同盟条约，以至出兵。但现在要大规模出兵打中国还不可能。而搞点摩擦、制造一些边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⁷⁰，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做有限的军事准备是必要的，而从打核战争出发来进行战略性预防，以至对整个国民经济做适应战争的重大调整，则理由不甚充分，为时也过早了。

同时，在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决策核心的主观认识上，对南部来敌，即美国有可能在越南所造成的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还没有

70 见安德鲁·内森 (Andrew J. Nathan)，罗伯特·罗斯 (Robert 5. Ros：) 着，柯雄等译：《长城与空城计— 中国对安全的寻求》（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⁷¹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725。

72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734。

73 （毛泽东外交文选），页 516。

74 吴冷西：《— 一年论战》，下册，页 675 — 676。

7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826。

第十一章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生后的第七天。这种情况似乎说明，报告本身在提出时还不具有特别的紧迫性。但在 8 月 5 日之后，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报告的指向性和意义加强了。

即使如此，我们也很难以报告来作为国家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的唯一左证。这不仅是说，毛泽东批示的时间在他提出战略转变意见之后，而是说这种估计和预防的目标，对中国的安全对策以及机制说来，仍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敌人是谁？敌人在哪裏？他们可能从哪裏来？他们甚么时间来？是否四面八方都可能来？没有人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对来敌的估计都无法确定，那么这种紧张显然也就失去了大部的必要性。1965 年，越战升级。美军一面大举轰炸北越）一面大规模增兵南越》介入地面作战，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这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中国政府一面向美国发出警告，一面加大援越力度。1965年4月2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国转达中国政府的立场：（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所承担（援越抗美）的国际义务要履行到底；（3）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4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同时决定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支持部队赴越南。国内战备的空气日益浓烈。然而，使国内政治空气变得紧张而又捉摸不定的，更多的还不在于战备，而在于这种战备的火药味与反修防修的火药味的掺和。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前后多次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讲「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的话，就很好说明了他更担心的东西是甚么。此外，如果毛泽东真的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了，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那么，他又怎么敢于在不久之后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自乱阵脚的政治运动呢？显然，更具有意义的是，毛泽东总是把准备打仗与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相联紧。

目前，学术界通常把1969年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作为中国军事战略防御的重点全部北移的标志。其时间界限应定在1969年6月20日至7月4日由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的「三北」作战会议。因为这个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美国转达的不支持台湾进攻大陆和不会卷入同中国的冲突的信息，他对美国不企图同中国发生战争冲突的估计是有道理的。

这裏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看待总参谋部1964年4月25日提出的关于「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⁷⁹ 这个报告在研究中理应受到高度重视。它实际是上述我们谓之「流行观点」的基本依据。

据《罗瑞卿传》记载，自1962年中国军队在沿海地区准备抗击蒋介石集团的登陆作战以来，东南方向始终比较紧张。总参谋长罗瑞卿于1963年5月至7月实地勘测了从浙江到山东半岛的地形，并向毛泽东写出了报告。此时，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也多少使人感到了威胁。罗瑞卿于当年7月又对吉林和黑龙江的

部分地区进行了勘察。1963年10月，罗瑞卿再次衔命勘察了新疆的阿尔泰、塔城、伊宁以及喀什地区。⁸⁰显然，原来主要以防备美蒋进攻的「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正逐渐为「敌人处处可来」的思想所取代。总参谋部的报告大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报告认为：国家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看比较严重的问题：A、工业过于集中。仅十四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大约60%的主要机械工业，500/0的化学工业和520/0的国防工业；B、大城市人口多。据1962年底的统计，全国有十四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二十五个五十万至一百万人口的城市；C、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附近。在敌轰炸大城市时易同时遭到破坏斗D、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过小。而大型水库中，有五十二个位于主要交通线附近，十七个位于十五个重要城市附近。⁸¹报告在1964年4月25日由总参作战部向副总长杨成武上呈。毛泽东于当年8月12日对报告作了简要批示。这时，距报告上呈已经近四个月，为北部湾事件发

79 《党的文献》 50 《罗瑞卿传》 81 《党的文献》
，1995年第3期，页385’，1995年第3期
页34—35。页34—35。

第十一章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政组」的世界

473

五国际与国内政治的一种特殊交互作用

可以说，1962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是以一种难以挽回的能量推动国家向紧张化发展。由于阶级斗争需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说法，获得了党内合法意义上的认同，持续只有多半年除经济以外的各方面宽松调整期就即实际宣告结束了。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紧接着，毛泽东有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所引起的文艺界思想政治斗争，一般被看作是「文革」发动的铺垫。因为两个批示之后，除文艺界之外，哲学界、史学界、经济学界，也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批判斗争。有些代表性人物，如夏衍、齐燕铭等人，已经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判。1964年，以斗争对象为「四不清」分子的「四清运动」在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推动下，愈加蓬勃地展开。

不久，「四清运动」更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要整的对象则变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向「文革」迈进的关键性的一步。

一般说来，当战争迫近时，国家的应变措施应该是保持最大限度的政治稳定，同时开动经济机器，尽可能接近战争准备的完成。然而，中国 60 年代中期的现象恰恰相反。没有人能按正常的逻辑解释，当北部湾事件使越战不断升级，而北方边界的军事压力也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中国内部的政治运转反而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的发生，在根本上都是人为制造的，直至引发文化大革命这样全面政治动乱的爆发。显然，这不是循着单一的战备线索去推断所能合理解答的。

据说，从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毛泽东至少有三次在谈党内斗争的同时，提出要准备打仗。一次在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会议，另一次是 1973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以 1964 年 5 月至 6 月的这一次最具分析意义。

1964 年 3 月 17 日，毛泽东在家中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压史的变局

议形成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纪要〉。而「三北」作战纪要曾经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北部作战的指导性文件。⁸ 之这裏，要真正确认这样一种明确的军事敌对关系，即从 1964 年算起，‘毛泽东主张放弃「吃穿用」计划而走向战争准备，同时推动在国民经济上具有重大投资方向改变的「三线建设」，历史至少又走过了五年。鉴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上述对越南战争的判断，我们至少还可以排除掉另一种可能，即，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的战略变动，是因为美国在越南构成的军事威胁。结论似乎是，一定的威胁是存在的，但不可能达到了临战状态，以至放弃压力还十分大的国民经济恢复，去进行全面的战争准备。

显而易见，「流行结论」还有一个重要缺陷，这就是它只循着关于战争已在迫近的单一线索进行思考，而忽略了当时国内的另一条历史主线，即被放大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对整个国家政治安全所产生

的影响。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来，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实际走向是两相背离的：经济继续维持调整；政治则向越加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的方向发展。人们必须注意到，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被强调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形势也已经达到了极其紧张的状态。此时，倒真正是「处处都有敌人」了。而不管外部的敌人还是内部的敌人，都具有推翻现有政权的可能。于是，使形势紧张化便在逻辑上显得有道理了。并且，从事实上说，在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并行的背离状态是不可能延续长久的，政治总要「统领」经济。因而，并行是暂时的，它不能不为某种突发事件所打破。

「战争迫近说」是当时最强有力的外力因素，可以充当破坏平衡的砝码。它的作用就在于，强化政治的、军事的紧张氛围，从而把并行的另一端纳入社会一元化的政治发展。

82 参见刘志男：〈1969年

，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 页44。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第十一章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它们后来为「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援引并在随后中国政治进程中发生重大影响。86 而接班人问题的引出，既同整个国际反修大背景紧密联接在一起，又与当时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出现的某些新说法有关。毛泽东认为，苏联修正主义上台，是随赫鲁晓夫骗取斯大林信任，成为接班人而出现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严重教训。同时，他还注意到，赫鲁晓夫是善于搞政变的人。他上台后搞了五次政变，一次一次把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打下去。这个教训同样值得重视。87 基于这样的看法，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中央，各省委要顶住。从这样的角度观察，则人们不难发现，军事战争准备与政治准备之闲有看不可忽视的内在联接。由此看来，1964年提出战争准备问题，并因此而更改按正常思路确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指导原则，有比较复杂的政治背景。它至少是国际反帝反修和国内阶级斗争所造成空前的紧张的综合产物，而不是单纯的对国际军事压力所作出的反应。相反，由于战备问题的提出，排除了国家按正常设想对国

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可能性，又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紧张。

当然，人们不能否定，越战所造成的战争压力的确存在；同样不能否定的是，在 60 年代，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准备也具合理性。但是应该看到，所有这些外部因素，都是可以通过某些外交运作达到一定程度的化解的。例如，对美国越战所造成的威胁，对中苏边界以及整个双边关系等等，都有寻求另一种应对的余地。而放弃缓和的努力，因外部的紧张而刺激起更大的内部紧张，使极为重要的国民经济调整也丧失了继续的根据，则显然是不合理的。

86r 九评」列出之关于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条件，一共五条。有意思的是，这五项条件的每一条，都同赫鲁晓夫作了对比。如：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看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一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而绝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可见，当时的是非标准，完全是以赫鲁晓夫作参照的。8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77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 必一 历史的变局）
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83 这是毛泽东本人思想的一个重要动向。

国内反修防修是国际反修的逻辑发展。在中共中央连续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已经构筑了一个在社会主义时期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庞大思想体系，即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样，毛泽东为中国的前途与安全描绘了一幅十分悲观的图画。事实上，在这幅「悲观」的图景中，掺杂了大量但却是虚幻的党内斗争因素。

人们对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认同，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公平意识遭到破坏。而这种现象的根源，在苏联则是出现了「高薪阶层」和

「农村自发势力」。从结果上看，苏联的 r 特殊阶层怕打仗，怕战争，要与美国肯尼迪求和妥协。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二十年以后也要产生修正主义，……」⁸⁴ 这就是为甚么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成为中苏论战焦点之一的原因。

与此密切关联的，是所谓和平时对革命者意志的消蚀。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说：和平时必然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又碰到这种情况，党内不纯，部分组织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所以我们再不搞，再过十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⁸⁵

事实上，1964 年 6 月 16 日毛泽东十三陵谈话的大部分，是讲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问题。毛泽东列出了做合格接班人的若干条件。

83 吴玲西：《十年论战》‘，下册，页 733。

84 邓子恢 1962 年 7 月 1 日在中央高级党校的报告，引自萧冬连等：《求索中国：r 文革」前十年史》，下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页 995。

85 萧冬连等：《求索中国），下卷，页 1012。

第十一章面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

义的压力……」。作为中国人，毛的这一突出的政治作为，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但是，从冷战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过高估计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可能并不准确。中国在 60 年代的政治经济变动，更多的是因为内部原因，而不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引起的。恰当的历史定位和分析，在研究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国历史时是必须的。作为本章结尾，「三线」建设的大致面貌似乎应做简单交代。1964 年，毛泽东关于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建设的主张，得到了党内拥护。当时，大家都感到领袖的深谋远虑。同时，国家计划部门立即行动，将「三线」建设具体落实到三五计划的编制中。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思想，还引起了人们对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的想象力。周恩来就是从这方面考虑问题的。1964 年 5 月 28 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说：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伸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

上述证明，越战对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变动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并不像人们一般设想得那样直接、强烈。至少，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是由综合和复杂的因素造成的。而在其中起决定影响的，反而应当是中国内部事务发展的逻辑或因果关系。从总体上说，在60年代中后期，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在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生变动时，往往要大于现实方面的考虑。这就是现实性的计划（哪怕是国家长期经济计划）、方针、政策，最后终为政治的、思想的甚至是战备的「意外」所打破的原因。当然，这些政治的、思想的和战备的「意外」，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面对着所谓「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动，是自然而合理的。对一个执政党和它的领袖说来，有备无患，是非常正常的反应。正如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说，尽管毛泽东晚年犯有许多重大错误，但他「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

88 《毛泽东外交文选》，页476。

89 何方：〈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页77。

9（）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2期（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第十一韦面订一「犬动盈犬妒怕人久飘」切石仲

不能不存在失算的地方。同时，也很难说，中美之间、中苏之间没有爆发战争，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有了准备。但是，即使在今天，人们也应该承认，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当时并未意识到的客观结果，即用国家的力量在一个较短时期内，使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这倒应验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设想，将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发展强制性地加以均衡化。可以说，传统体制的优势或许就在于它能集全国之力，干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想象的事情。三线建设的展开，有两个字：一是建，二是搬。关于建，三五计划新建项目大都摆在三线，并且按照「分散、靠山、隐蔽（林彪进而提出『进洞』）」的方针布点。关于搬，则是把一线的某些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全部或者部分搬到三线。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工厂、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大搬家。一年半时

间从上海等地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就有 49 个。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但三线建设并没有停止。经过这次经济战略的大转移，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那些落后的甚至是荒漠的穷乡僻壤，令人惊异地出现了一批工业、科研、国防基地和城市。这个巨大的经济变迁当属于现代中国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一压史的变局

根据中央意图，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了西南、西北两个方向的三线建设安排。安排主要为三个反面：1、扩建部分老厂，建立新厂；2、将国家独有的在功能上不可替代的重点工厂以及需要配合三线建设的工厂，整体搬迁到三线；3、布置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随后，中央分别在西南和西北设立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和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等项事宜。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李井泉、程子华和阎秀峰负责。彭德怀于 1965 年也被派往西南，担任副总指挥，直至「文革」开始后被揪斗。西北三线指挥部则由刘澜涛、王林、安志文和宋平等负责。从 1964 年下半年开始，三线建设实际展开。至 1965 年底，在西南、西北两个方向新建、扩建和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 300 多项，其中钢铁工业 14 项、有色金属工业 18 项、石油工业 2 项、建材工业 14 项、化肥工业 10 项、森林工业 11 项、建材工业 10 项、纺织工业 12 项、轻工业 8 项、铁道工程 26 项、交通工程 11 项、民航工业 2 项、水利工程 2 项。此外】还有农业、林业、邮电、商业、广播、教育事业等项目。这一时期，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 49 个。军事工业方面，在西南地区规划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在西北地区规划了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常规兵器、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工业基地。”毛泽东以极大热情关注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经过建设工人和干部的非凡努力，也开工并逐渐建设成型。其第一期规划的年产规模为铁矿石 1350 万吨、生铁 160 万至 170 万吨、钢 150 万吨、钢材 110 万吨。基地跨金沙江陡立的两岸，地形以崇山峻岭和深谷激流为主。建设者以神奇的创造力，完成了一项工业奇迹。如今，攀枝花已成为中国十大钢铁工业企业之一，成为一座繁

盛的城市。对于三线建设的历史评价，目前存在各种说法。的确，由于对世界革命形势和战争危险估计得过于严重，因而在兴建三线的决策中，9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 1202—1203。

第十二章

需要「精神」的时代

任何国度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精神生活。没有纯粹的经济动物，也没有纯粹的政治动物。当然也没有纯粹的精神动物。物质与精神，是不能相互分离的一对生命元素。凡是人，都要在一种精神影响下或精神范式中生活。由社会人共同拥护的精神原则和在之上建立的精神网框，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精神范式。如果精神范式缺失，这一社会生活将陷于失态。因此，社会需要精神支撑，人也要有赖以支撑的精神寄托。不过，历史研究显示，社会的精神追求并非是均衡的。有时，社会对精神的需求非常强烈，以至整个社会都充斥着某种精神取向；有时，社会对精神的追求又是弱化的，人们所想，基本附着于物质层面。当一个社会物质条件并不丰盈但却以理想主义目标为全部想象时，它对精神的追求就非常急迫。中国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前半期，恰好是这样一个对精神追求非常急迫的时代。为了克服物质困难，为了回击所有侵蚀社会主义的敌人，为了实现崇高的政治理想，为了塑造全新的社会和全新的人，这是个特别需要精神的社会，更是一个特别需要精神的时代。

一时代精神的桩柱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国并不是一座想象中的风雨危楼。一方面，当时中国社会稳定，经济活跃，风尚良好。社会公众，+ 6 必丁下 /、入六们斗人一半斗历 U 》 D 必一 1 梦 0 刀一 钻又则又旬思想纯洁，耽于理想。人们视物欲为邪恶，以奉献为崇高。各级官员们也大多廉明公正。如同任何一个良性社会一样，它虽有官僚主义之忧，却无严重腐败之患。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坚如盘石。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国内政治运动不断，但始终保持了国家运行的稳定。国际反修、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造成了社会一定程度的紧

张，但并没有离散人们的精神追求。相反，这些政治运动更加凝聚和强化了人们对理想的坚守。用历史眼光看，这一时期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党和政府的政治基础，在中共执政的五十余年中，都是最稳固和强大的。

为了研究这个社会的精神桩础，有必要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做一番调查。

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由于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所谓「逐步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以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展来考察。从1949年至1978年的三十年时间里，除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处在较大幅度的发展中以外，另一个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期，则应属于1961—1965的调整五年，尽管这种平稳发展带有恢复性质。这五年，中国经济真正走出了由于「大跃进」造成的谷底。从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来看，按当年价格，1965年我国社会总产值达到2695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3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1956年增长60.30%和34.8%。³以「一五」计划期末的1957年为基数，在1958年到1965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页33、50。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页34、51数据计算。

弟寸二草需安一 精子钊的时代

年的八年中，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额达1627.98亿元，投产大中型项目936个。‘1965年同1957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钢增长1.29倍，达到1223万吨；原煤增长77.1%，达到232亿吨；发电量增长2.5倍）达到676亿千瓦小时；原油增长6.75倍）达到1131万吨；天然气增长14.71倍，达到11亿立方米；水泥增长1.38倍，达到1634万吨。⁵主要农业产品

中，棉花增长 27.93%，达到 4195.5 万担。‘在工业建设方面，调整的五年也是成就巨大的。以 1965 年同 1957 年相比，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增长了 1.76 倍。新建、扩建一大批重要企业，如十大钢铁厂，一批重要的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个十年建设起来的，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是在这个期间开始建设的，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在这个时期得到进一步扩建。这个时期发生的「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其它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是从工业建设的布局来看，某些方面的建设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 1964 年，重工业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 1958—1960 年间开工的。这几年新建的若干项目，经过后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形成的炼铁能力占 1950 年至 1979 年新增炼钢能力的 36.2%，炼铁能力占 32.7%，采煤能力占 29.60%，棉纺锭占 25.9%。经过五年调整，一些工业技术的经济指标又有所提高。1965 年生铁合格率达到 99.85%，钢材合格率达到 98.5%，棉花一等品率达到 97.40%。」机械工业有些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已经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统计年鉴（1993）），页 149、167。

（中国统计年鉴（1993））1 页 446—447。

（中国统计年鉴（1984））、页 146。

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页 3B4。

（当代中国经济），页 356。

第十二章需要「精神」的时代

州）、兰青（兰州至青海）、兰新（兰州至新疆）等线建成通车，不仅把西北五省区联结起来，而且把西北地区同华北和沿海地区联结起来。川黔（四川至贵州）、桂黔（广西至贵州）线也建成通车，将广西、四川、贵州三省区联结起来。成昆（成都至昆明）、贵昆（贵阳至昆明）、湘黔（湖南至贵州）、湘桂（湖南至广西）等线先后开工，并部分通车。全国除西藏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福建、

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铁路货运量 1965 年比 1957 年增加 50 . 67 % ， 客运量增加了 50 . 94 % 。 耀公路 · 水运、航空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全国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沿海港口新增十几个万吨深水泊位，远洋方面开辟了通往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三条航线。

如果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60 年代前半期实质性的推进也是骄人的。到 1965 年，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均已达到。1963 年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 — 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科学技术方面，国防尖端研究成果最为显著。1961 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决策。1962 年 11 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聂荣臻、罗瑞卿等在内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的研制。经过广大科技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职工、干部的努力，1964 年 10 月 16 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此外，1965 年我国首次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蛋白结晶；改良和育成了矮秆、抗锈力强和产量高的小麦品种，并进行大面积推广）都是当时比较重大的和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技术成果。

根据计算，1965 年中国的钢产量为 1223 万吨，约占世界的第七位；原煤产量为 2 . 32 亿吨，1 占世界第三位；石油产量为 1 131 万吨，搏占世界第十五位；发电量为 676 亿千瓦小时，占世界八位。如果综合其 12 （中国统计年鉴（1993 ）），页 51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第五专 {1962 — 1965 } — 历史的变局

可以认为，至 1965 年，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电力工业有很大发展。煤炭工业逐步向现代化发展。冶金工业经过调整，到 1964 年，钢和钢材品种都比 1957 年增加一倍多。以前不能制造的高温合金钢、精密合金钢、高纯金属、有色稀有金属，这个时期都能炼制了；机械制造包括制造汽车、拖拉机、万吨远洋轮船所需的多种钢材，国内基本上都能解决了。机械工业分别形成冷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而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

大型设备，到1964年我国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以上。电子、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在这个八年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中国重要的产业部门。1965年，中国已经能生产雷达、广播电视发射设备、电视中心设备、无线电通讯设备、原子射线仪、各种气象仪、水声设备、电子计算器、电视机等。支持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从1957年到1965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21万千瓦增加到1099万千瓦，化肥施用量由37.3万吨增加到194.2万吨，农村用电量由1.4亿千瓦小时增加到37.1亿千瓦小时。’”在调整的五年中，中国工业门类中以石油工业的发展特别突出。1959年我国地质工作者在东北松嫩平原找到工业性油流，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开发，迅速建设起大庆油田。一年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三年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产量达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在石油地质理论、油田开发和炼油工艺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随后还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全部能够自给。这是当时中国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交通运输方面，从1958年到19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7900多公里，11包兰（包头至兰

9 《当代中国经济》，页356。

10 《中国统计年鉴（1993）》，页341、349。11 《中国统计年鉴（1993）》，页514。

月，1一。们户勾）k 11开11」”’一，J’，
想，经过1965年的准备，国家将于1966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周说，按照这个设想，中国的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大宣示是，由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段话中的「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一语为毛泽东所加，它表明人们正处于一种决心将中国重加振兴的思想状态中。毛泽东在政府工作报告还添加了如下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

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为甚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显而易见，「吹牛皮」和「放大炮」，都非经济用语。它们的语言功用，与其说是描述经济，莫如说是鼓舞人民，焕发人民的精神力量。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现代化追求，更多的是以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为支柱。而同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后发」国家相一致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更认同「加速度」。它所采取的模式】在相当时间内还难以摆脱「大跃进」式的「跳跃」（不管是「土跃进」还是「洋跃进」）。而实现「跃进」和「跳越」的关键，在于强调人的精神因素。毛泽东很赞赏自己的一句话：「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在毛泽东看来，建立物质基础的主导，首先在人们精神的提升。没有时代精神，没有社会理想，即使有再丰富的物质存在，也无法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人怀疑毛泽东「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箴言。无论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生活在一个自觉的张扬精神的社会氛围中。回顾刚刚走出的艰难，人们有理由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种社会氛围，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达到了高峰，从而给那个时代烙下了不能磨灭的精神标志。

才带户‘八？、’‘开入刁’一叩？、A’1，’17uj1 — 左必又明双司

他工业门类的生产状况，中国 1965 年重工业的总水平，大体可以占到世界的第八位。¹³

对一般民众说来，自身的生活体验最具社会评判价值。而刚刚走出灾荒的老百姓，最依赖的还是农业的恢复，其中包括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食油、肉、蛋、菜、棉布等的收获和供应。从统计数字上说，到 1965 年，中国农业总产值达到了 590 亿元）略高于 1957 年水平，但粮食总产量还是略低于 1957 年。由于人口的增长，全国人均粮食及农副产品消费水平还未达到 1957 年水平。但比起 1959 年至 1961 年的困难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大部分老百姓开

始吃饱了肚子。据统计数据，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65 年比 1957 年提高 7.7%，达到了 125 元，比 1962 年增加了 8 元。其中，农民达到 100 元，增加 12 元；职工达到 237 元，增加 11 元。1965 年城乡人民重要消费品的消费水平与 1962 年比，也有了较大提高。按全国人口平均，粮食 1957 年为 406 斤，1962 年为 329 斤，1965 年为 368 斤；食用油 1957 年为 4.8 斤，1962 年为 2.2 斤，1965 年为 3.5 斤；猪肉 1957 年为 10.2 斤，1962 年为 4.4 斤，1965 年为 12.6 斤；棉布 1957 年为 19.5 尺，1962 年为 10.6 尺，1965 年为 16.4 尺。这些珍贵的数据，显示了调整过后社会生活正在走向正常。

1964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是 60 年代前期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其中最具有意义的事项，是周恩来代表政府宣布：持续四年的调整已经基本结束。周恩来指出，经过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业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协调了，工业支持农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已经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损坏和失修的情况已经改善。我们的经济力量比过去增强了。这意味看中国开始真正走出「低谷」。根据当时的设

1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页 1599 14 《中国工业五十年》，页 68。

：《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 16010

第十二章需要「精神」的时代

489

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说来，「一去不复返」几个字，意义非凡。”它标志看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它成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意气风发的精神载体。

对中国人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大庆油田的开发，为国人战胜经济困难、奋发图强建设祖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鼓舞：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科学技术人员和干部，在油田建设最艰苦的时期，吃大苦，耐大劳，公而忘私，奋勇拚搏，表现了那个年代中国工人的时代风貌。他们「宁肯少活二十年，拚命拿下大油田」的牺牲精神；他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奋斗决心，感动和教育

了几代人。大庆人创造的「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以及「黑夜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壤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在场和领导不在场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等「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工作作风，表现了中国工人的道德观和使命感；在国家面对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国工人是挑起振兴国家重担的基本力量。没有人能动摇这种信念；没有人能替代这种作用。中国工人是国家和民族的真正主人公。由这种使命感所焕发的精神力量，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大庆工人的这种信念，为中国人留下了长久的精神遗产。中国农民在 1960 年开始的三年暂时困难中，也表现了突出的向自然灾害和物质匮乏抗争、与农民传统观念决绝的精神。其中，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林县农民开凿红旗渠、重新安排山河的壮举，成为著名代表。

大寨生产队位于山西省晋中太行山麓海拔一千多米的山区。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全村耕地被沟壑切割成无数小块，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就在这贫瘠的山梁上，大寨人看到发展生产的根本出路，在于治山治沟，向大山和深沟要土地。从 1953 年治理白驼沟开始，大寨人用了五年时间，改造了全村七条大沟，把深沟变成了良田。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在五个冬春，革了七条沟的「命」，即

15 由于资源和使用量增长等原因，中国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大量进口原油，

4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二时代精神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精神标志是甚么？似乎没有人可以用只言词组来加以概括。而如果从历史叙述的角度看，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无论如何不应被抽象化。一个社会的精神标志，应该是指那些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宣示出来，而由每个社会成员认可、遵循和弘扬的东西。它既在大的社会行动中体现出来，也在小的甚至每个人的生活细节中得到折射。它是细小而普世性极强、在社会中趋于一致的价值观的凝结。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国工人的行为，最直白地反映了这种凝结的价值观。以大庆油田开发为代表的精神范式，则可以算作这个时代

的突出标志。

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石油部党组关于「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的报告。这个批示揭开了中国工人展示时代精神的序曲。大庆石油会战汇集了石油部、地质部以及农垦、机械、冶金、电力、建工、铁道、林业、商业等界动员的劳动大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从当年退伍的军人中招募了三万人参加会战。在很短时间内，从全国各石油管理局和三十余个石油厂矿、院校的几十支优秀钻井队、几千名科技人员、上万名工人和七万余吨器材和设备被抽调出来，在白雪皑皑的松嫩平原上，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开发工程。

大庆油田的开发，可以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大庆油田。三年中，石油工人共计打井1178口。其钻探深度和进尺数量都打破了世界记录。1963年当年，大庆油田产原油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3%。12月25日，新华社奉命报导：1963年全国原油、汽油、柴油、煤油和润滑油等主要产品产量全面超额完成计划；中国自己设计和新建成的大型炼油厂，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年……这些成就预示着，

第十二章需要「精神」的时代

成为林县3.7万农民改天换地的起点。农民们以每人每天只有一斤半的口粮和最原始的钐、斧、凿等工具，向太行山要路，向大自然要水了。经过不到8个月的苦斗，林县农民斩断了45道山崖，搬掉了13座山坳，填平了58道沟壑，穿凿了总长度600余米的7个隧洞，建渡槽、路桥和防洪桥56座，完成土石方啊5.65万立方米，砌石42.86万立方米）终于搁住了浊漳河，引水上山。接着，林县农民又经过四年时间完成了红旗渠第二、第三期工程，于1965年4月5日实现了总干渠的通水。通水，是林县农民梦过多少回的事情。这个重大时刻被电影胶片记录下来：当渠水翻着浪花从渠道奔涌而出时，几乎所有林县的农民都跑出家门。在新修的大渠上，用各种

盆钵捧起甜水。镜头上农民那特有的含蓄、会心和羞涩的欢笑，感动了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大寨和林县农民的业绩昭示，在这个世界上】贫穷并不可怕，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可以被改变。只要有了奋斗精神，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危难都可以被平复。它再次证明，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人，需要精神，需要理想，需要志气。而困难，正是激发人们志气和精神的动力。在困难面前，农民们成就了原本不可想象的壮举。中国知识分子在 60 年代前半期也是张扬精神、显示价值的一个重要群体。尽管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政治运动，但中国知识分子以民族兴盛为己任的终极关怀，并未稍许泯灭。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默默工作，甘于奉献，创造了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成果。这些成果是国家发展历史上的结晶。在尖端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制和实验领域，中国科学家创造了堪称辉煌的业绩。他们几乎隐姓埋名，从事着与国家存亡兴衰高度相关的科学研究。他们克服了令世界上所有科学家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在物质生活极度窘困的情况下）独立地研制出原子弹和导弹，为民族贡献了非凡的才智。据真实记载，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多次打听他的同学和世交邓稼先的下落，后者从美国归国后即在物理学界消声匿迹了。直到 1971 年，杨才知道邓参与了中国核武器的研制。1971 年，杨同邓终于在北京重新聚首。但杨振宁一直希望得到证实，中国核武器的研制，确实没有外国人包括美国人的参与。这一关乎中国核技术水准的重要求证，终于在

中争人氏共和国史· 第五春（1962 — 196 年）— 历史的变局

总共垒起了长十五里的一百八十条大坝，将 300 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将 4700 多块地修成了 2900 块，还增加了 50 多亩好地。1962 年，在全国大灾和严重困难的年景下，大寨粮食亩产竟达到 774 斤，高出同县平均产量 530 斤，一亩地等于别人的近三亩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农民创造的奇迹。而这个奇迹，是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实现的。陈永贵作为村党支部书记，表现出超出一般农民的公而忘私、严于律己和目光高远的品格。在陈的带领下，大寨整个浩大的治沟工程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完全凭借自己的双手，苦干、实干、拚命干，实现了农民丰收的宿愿。《人民日报》曾报导说：「十一年，大寨

人开凿了多少石头？移动了多少土方？他们没有统计，现在也计算不出来。不过，只要看看大寨人的那一百多只手就足够了：这一百多只手上结满了老茧，被厚厚的死皮裹起来。这是铁掌！」’ “大寨农民的艰苦奋斗，对整个国家的农民起到了示范作用。毛泽东首肯了大寨农民的奋斗精神。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并把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大寨精神成为中国农民的象征。同在六·七十年代，河南省林县农民用最普通的工具，劈开太行山引漳河水入林县，建成「人造天河」红旗渠的壮举，也极具精神感召力。

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自古以来就是严重干旱缺水的地区。50年代初，全县90万亩土地中只有1.3万亩可以水浇。农民吃水要到几公里甚者几十公里外去担。严重的干旱，造成农民的极度贫困。从50年代前半期起，林县农民开始了「重新安排林县山河」的尝试，一个跨越太行山到山西引水的大胆设想，逐渐形成了。林县农民的大胆计划得到了县委和河南省委和政府的支持。1960年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16 莎荫、范银怀：〈大寨之路〉，《人民日报》，19“年2月10日。

第十二章需要「精神」的时代 493 观念的打压，尽管他们像「戴着夹板的舞者」，但他们没有消沉。他们努力创作，奋力拚搏。其实，他们的所有作品都表明，他们也同样是时代精神的感染者。经过1962年前后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学艺术工作者内心的创造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把讴歌、赞颂和宣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精神原则，作为自己极力追求的基调。60年代的文艺创作，主要通过革命历史和现实题材两个方面进行。中国革命历史波澜壮阔，为文学艺术家们的创造提供了不竭源泉。同时，也正是革命历史所蕴涵的精神，同当代人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相共鸣，才演绎出60年代前半期丰富多彩的艺术画卷。二十世纪60年代前期，是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创造最为丰盛的时期之一。许多影响久远、脍炙人口的电影和舞台剧就产生在这一

时期。《革命家庭》、《红旗谱》、《暴风骤雨》、《燎原》、《怒潮》、《革命自有后来人》、《五十一号兵站》、《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白求恩大夫》等，表现了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的不同侧面，再现出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境界。这些影片在艺术创造上达到了超过以往的新高度。它们主题鲜明，对斗争生活的表现深刻丰富，既有简洁凝炼、朴素清丽的感人故事，又有浓墨重彩、气势磅礴的战斗场面。它们成功塑造了一大批真实的革命者的银幕形象，发挥了极大的革命传统教育功能。其中，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地道战》，发行了三千五百个拷贝，创了新中国电影史的记录。今天，这些电影被中国人称作「红色经典」。人们仍然喜爱它们。从它们的故事中，体验 60 年代充盈、弥漫的时代精神。

在 60 年代前期，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也得到群众的高度评价。

《李双双》、《枯木逢春》、《北大荒人》、《冰山上的来客》、《霓虹灯下的哨兵》、《英雄儿女》、《雷锋》、《年青一代》等一批影片，都是经典之作。它们无论在反映和揭示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塑造鲜明、生动和丰满的银幕艺术形象方面，还是在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美学追求上面，都比以往有了重要进步。它们以积极向上、爱憎分明、艰苦奋斗、克己奉公以及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奉献精神，作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杨即将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刻，由邓亲自飞往上海加以认定。据说，杨为此当场泪流满面。三十多年后的 1999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对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二十三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邓稼先此时虽已逝世，但仍然名列榜中，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有良知的中国人，不但要记住中国曾经经过的艰难，更应该记住这些获得功勋奖章的科学家的名字。他们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

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排名按简体字的姓氏笔画为序）；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赋、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以上为追授）

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中也将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运用于教育，培养、造就了中国不可多得的科学技术人才。至 1965 年底，全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共有 245 . 8 万人，其中研究生毕业的 1 . 6 万人，大学毕业生 113 万人。全国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到 1714 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了 12 万人次。在这支科技大军中，不乏像钱学森、钱三强这样世界级的大科学家，也有年轻一代极富创造力的科学家群体。他们的科学研究若以物质报酬计算，则是微不足道的。从本质上说，他们是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自己的学业和工作的。大科学家们埋头于科研教学，忘我地进行工作；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活跃于社会的充满朝气的群体，他们积极向上，发奋学习，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创造出许多重要业绩。聂荣臻元帅曾经在一段回忆中准确形容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当时普遍生活困难，但大家干劲十足，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¹⁷ 中国文艺界是二十世纪 60 年代张扬时代精神的推动者。其实，他们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群。尽管他们激越的思维不断受到阶级斗争

¹⁷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页 834。

矛下一早为黄一 啊胛」 叨呵 j 弋

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工作，但都毫无例外地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无私乃至生命的奉献。他们的事迹在那个时代广为传诵。他们的名字，也成为中华民族长久的精神象征。

二十世纪 60 年代最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运用。最先提出群众性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是人民解放军。1960 年 3 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革命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军队建设为中心，在全军加强理论工作和理论教育。7 月）总政治部批转济南军区〈关于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告〉，要求各级领导组织士兵学习毛泽东著

作。从此，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军逐步开展起来。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同日，林彪发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文。随后，军委扩大会议提出：「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1960年10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应该同时研究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研究现代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们要了解甚么是现代修正主义，就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中又强调：「我军的干部，都应当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目前，无论是干部和战士，都应该挑选几篇必修的和当前实际斗争联系最密切的文章去精读，领会精神实质，解决当前部队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学习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立竿见影，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之『矢』，来射部队实际之『的』」。中央军委因而在关于1961年国防建设工作纲要中规定，要将学习毛泽东思想列为部队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中，「政治思想好」的基本标志是认真

19 中共中央财贸政治部编 1965），页 88—89。20 〈政治工作学习文件〉，

：《政治工作学习文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页 90。

甲争人氏共和纠灾’弟立洛 ki，0 ‘一’的）一一贖又则又司育观众的素材，对培育当时社会良好的风尚，教育一代「革命新人」发挥了不能替代的功能。可以说，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年青人，都是在接受这些「红色经典」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它们不灭的印记。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有数千名文艺工作者参与创造、在庆祝建国十五周年诞生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以讴歌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革命历程为主要内容的大型歌舞剧，汇集了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经典歌舞）重现了最具特征的历史场面，歌颂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革命的历史进程。它极尽革命精神和艺术追求的

高度结合，以恢宏的气势，精湛的编排，优美的舞蹈、脍炙人口的歌曲，达到了思想与艺术表现形式的完美结合，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艺术氛围，使观看者受到革命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双重感染。如果说，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确出现过一种时代精神的标志，那么，《东方红》可以作为它最显著者之一。它的精神感染力可以用一位大学生的观后感来加以说明。当年，这位清华大学学生在《人民日报》上是这样谈到自己的感想的：「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深深感到我们青年一代肩上担子的重大……我们决不能把先辈们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果实从我们手中丢掉。我要更好地听党的话，努力学习，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走革命化的道路，走劳动化的道路，决不辜负革命先烈的期望。」” 1964 年 10 月 15 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度公演，毛泽东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了演出。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件事情将 1964 年的国庆，催动为时代精神的巨大磁场。

二十世纪 60 年代，还曾经是中国人中英雄辈出的时代。雷锋、焦裕录、王进喜、孟泰、陈永贵、欧阳海、王杰、麦贤德、邢燕子、侯隽、草原英雄小姐妹、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等。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不

18 胡锦涛：〈生动的一课—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6 日。

第十二幸需要「绩神」的时代

以担当这个任务。歌这样唱道，「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前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毫无疑问，这是 60 年代中国绝大多数人精神面貌的写照。尽管历史已经流淌了这么久远，但没有人可以否定，那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崇尚理想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当然，也不会有人否定，那是一个特别需要精神的时代。

三时代精神的异化

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景。一方面，人民在巨大的经济困难面前，在国际反华势力的压力面前，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坚韧、团结、积极和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时代精神充斥着整

个社会生活。这是国家和民族得以稳定的动力。另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左」的思想倾向，也在相应的社会氛围裹挟滋长起来。它不但是造成「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基础，而且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角度看来，它还是一种非常具有典型特征的精神异化现象。所谓异化，是指由自身生长出来具有同质的事物，最终转化为同自身对立并支配自身的东西。中国革命意识形态是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生长起来的。它在革命的过程中，主张暴力和打碎旧制度。但是，它的终极目的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希望通过革命，在中国建立起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应该说，这样的理论逻辑在 1956 年以前，是顺向发展的。1956 年召开的中共八大，认识和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全党的任务已经由领导人民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的正确结论。可是，不久之后，理论逻辑便发生了错位，「革命」意识形态重新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毛泽东 1964 年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说：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甚么是革命？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5）— 压史的变局

学习毛泽东著作。21 1964 年，《解放军报》率先从《毛泽东选集》中摘录语录，每日登载于头版报眼，进而编纂出影响巨大的《毛主席语录》。可以说，军队加强政治思想和展开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 1960 年以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时推动的。一方面，它强化了军队乃至全国的「政治思想第一」的导向，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整合了社会思想，形成了特定的社会思想氛围。中共中央宣传部也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行前夕，向中央报送〈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学习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记录，是我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最好的教科书。」「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发生极其深远、极其广大的影响。它不仅对于提高全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加强全党团结，发扬埋头苦干、勤俭建国的精神，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加强世

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也具有重大意义。」²² 报告提出，必须积极宣传第四卷，通过写文章，做报告，号召干部和群单认真学习。但报告指出，由于当前「以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极为紧张，在布置学习时务必注意妥善安排」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为契机，以军队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先导，全中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这一学习运动对当代中国的精神塑造影响深远。它不但定型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而且将中国社会毛泽东思想化、毛泽东精神化了。

如果，历史叙述一定要读出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精神的标志性符号，那么由李劫夫创作于1964年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大约可
21 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22 参见陈文赋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1949—1999》（北京：社，1999），页212。

页445。中共党史出版

第十二章需要「精神」的时代

运动提供了正面的教益。²³ 瑞典的「左派」理论家霍姆伯格则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不仅是生产数据的公有制，而且主要地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权利，即监督和领导生产，以及决定产品分配。如果官僚主义分子把国家政权从工人阶级手中夺去，从而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复存在，而变成完全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了。」）应该说，这些「左」派理论家们，在理论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在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中，也误读了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除阶级斗争以外的许多复杂社会矛盾。他们不能正确理解这些复杂矛盾，从而形成了自己「左」的政治观点。他们的理论观点，代表了社会中久已存在的社会意识，进而扩大了「左」的社会思潮。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论「左」派理论家或以普通民众意识出现的「左」的社会思潮，在极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平等问题的忧虑。在一般的社会主义理念中，公平、平等具有核心价值。无数的社会主义者，是把实现社会公平、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本质来追

求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平等、民族与民族的平等。总之，平等才是社会主义。差别不是社会主义，阶级分化、贫富悬殊更不是社会主义。为了防止分化，必须去私立公，必须实现更高程度的所有制的公有。为了实现这种平等，就必须用阶级的观点，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杜绝可能的社会阶级分化和贫富差别。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观念，也契合了这种社会主义平等观。如，中国农民希望发家致富，但最担忧和释放出最强烈反应的，也是财产的不均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公。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民。他们没有参加过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没有经历过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熏染。他们仅仅是成为了生产工人，意识

23 夏尔·贝特兰（Charle : Betlelhcim ）着，《国际问题数据》编辑组译：《苏联国内阶级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页 1 — 2 。

24 尼尔斯·霍姆伯格（Nils Holmberg ）着，运典译：《和平的反革命：苏联从社会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和社 t 帝国主义》，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 针，页 8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 — 1965 ） — 历史的变局
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 1 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这番话大致表明了毛泽东所持有的不断革命的革命意识形态主张。从 1957 年开始，中共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并进而修改了原本的正确主张，逐渐确立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革命」意识形态得到张扬并走向异化。

从根本上说，「左」的「革命」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想倾向，根源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不正确解释。从以经济建设为根本任务，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转变表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追求发生了改变。阶级斗争不同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它作为革命的手段，只是催化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共产党执掌政权），并不能给社会提供其它合理的和有效用的东西。因此】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纲领和发展动力，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不能解释，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以后，阶级对抗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阶级对抗要

到甚么时候才可以止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能否解决社会物质源泉的涌流问题？等等。

但是，「革命」意识形态和其主要的表现形式——阶级斗争观，作为一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解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确为许多人所崇拜。甚至在发达国家的「左派」中（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的某些人士），也有人笃信阶级斗争是解读社会主义的唯一钥匙。例如法国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夏尔·贝特兰（charlos Bettelheim）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济（Paul sweezy）等，都支持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社会运动，支持文化大革命，认为中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贝特兰就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说来，最困难的事情不是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是摧毁旧的社会关系，并防止它的复辟；在法律上确定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足以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消除阶级存在的条件。他认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新生产关系的幼芽；苏联在 1936 年宣布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而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阻碍了苏联无产阶级去继续改变生产关系，摧毁阶级存在的基础。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却为国际共产主义

第十斗章需要「精神」的时代

水平，可以不讲，但决不能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物质基础，一切都谈不到。有些社会学家、空想家，认为平等就是最高的理想。其实，离开了发展生产力，就离开了革命的目的，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26 显然，胡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的确在相当时期中「害」了中国人。它把人们的目光完全引导到社会主义分配领域的所谓「资产阶级权利」，教人们怎样辨别这种权利、如何认识这种权利的不平等，以及必须为消除这种权利去进行「斗争」，却偏偏忽略了社会主义的第一任务——发展生产力。所谓「资产阶级权利」问题，实际是个「伪」问题。如果说是人们误解，那多少掩盖了问题的实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是马克思发明的。它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充分发达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分配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也必须承认不平等，承认分配上的不一致，否则，社会主义即没有发展动力（当然，社会主

义要强调社会的福利因素，并反对和制止社会性的贫富分化）。而社会主义的不平等，只能通过发展生产力，使社会财富获得充分涌流时才能解决。而默认贫穷，却在分配领域发现「阶级斗争」，则是完全弄错了「题意」

但中国人在很长时问裹确实弄错了「题意」。毛泽东在 1958 年就提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此后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直到临终。张春桥在毛泽东歙发下面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挥了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观点，造成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大跃进运动中许多空想式的观念，或者说从 1958 年以后中国出现的愈来愈高涨的「革命」意识形态，就是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为理论依据的。例如张文写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裹，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民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人们攻击 26（胡乔木谈中共党史），页 102 — 10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 — 1966 年）——历史的变局的绝大部分仍然是旧有的。因此，他们也把维护社会的绝对均平当作至高理想。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从小生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极易形成「均平」一类「左」倾理念。而社会的其它成员，如军人、干部等等，由于生活在汪洋大海式的小生产社会环境中，自然也不能脱逃传统「均平」观念的影响。

在「均平」至上的文化和政治观念基础上，中国人牢固接受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在《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还不得不保留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在所有制方面依然存在，在分配领域还占有支配地位。而资产阶级法权的本质，就是默认不平等。」从这样的理论出发，现实结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由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但却并没有真正实现公平和平等。它在实质上成了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因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公平和平等的重要任务。终于，中国式的「革命」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和列宁那裹找到了张扬的根据。胡

乔木先生曾指出：马克思和列宁的《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和《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决不能当作教条句句照搬。毛泽东同志和很多其它同志确是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话误解了。所谓资产阶级权利并非真的资产阶级的权利，只是劳动者平等交换劳动的权利的形式（马克思说是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的某种类似罢了，更说不上政治上的等级制等等。这种等级制恩格斯早就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不存在了，何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且资产阶级权利即平等交换权利正是与等级制完全相反的。25 胡还说，幻想社会主义可以不要高度发展生产力，是完全错误的。社会主义既然是人类最先进的制度，如果没有高度发展的经济，这个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是互相联紧的，怎么样达到高度的经济

25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 145 — 146。

第十二章需要「靖神」的时代

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这个特权阶层……利用他们支配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侵吞苏联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28 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这种「揭露」，表明它同我们理想中，「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背道而驰。苏联变「修」的反面教材】促使人们认识到，特权阶层的出现，社会主义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中国的反修防修，必须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公正性和反对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为根本任务。当然，反修防修和反对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最重要武器，就是阶级斗争。

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异化」，正同上述认识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理论意识形态的折射，「精神异化」现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观念深入人心。因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核心观点。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贯穿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看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从而必须不断进行革命的「基本路线」教育，广大群单是认同的。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社会，用这种观点认识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们最重要的思想出发点。特别是，经过从「大跃进」失败到经济调整这样一个过程，人们更加认识到，为解决经济困难而实行的一系列「非常举措」，正是某些人丢弃社会主义原则，来推行资本主义的东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28 《人民日报》编辑部历史教训

、《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甚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文章还引用了马克思称赞巴黎公社的一切公职人员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来证明巴黎公社的英雄们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等级制度和法权制度、否认物质利益原则的正确性。”这些说法在理论上有很大谬误，但必须承认，它极易引起干部和群单的思想共鸣。因为在人们意识中，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就是平等和公平，而不是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

在纠正大跃进「左」的错误和经济调整过程中，平均主义的错误观念曾经受到批判。毛泽东为纠正平均主义的「左」的错误，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但是，以追求公平和平等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观，仍在人们思想深层存留看。例如，在二十世纪70年代又一次提出的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批评八级工资制度，并最终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出现，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发生作用的结果等观点，就表明了这种不正确的社会主义观的存在和发展。

由此可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成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

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关键点。而当时反对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又恰恰证明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现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性。因为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正是以在国内造成阶级分化和事实上的社会不平等为主要特征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一文，列举了大量材料来说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变修」的事实。其中最重要的根据，就是在苏联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第十二章需要「精神」的时代

505

— 分配制度的均平化，既是社会的理想取向，也代表了群众的精神需求。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基尼系数应低于0.28（1978年时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为0.28），这应该是社会实际公平状态和社会稳定的标志。那时，人们的收入差距事实上是微小的。城市人口在工资、住房和福利方面，基本没有大的差别。农村社员的工分制度，是平均收入的极有效手段。它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民发家致富的可能。在城市，缩小工资差别，实行干部减薪，在社会中赢得了广泛好评。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对社会有重大的示范作用。它们成为淡化等级制度、努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实际步骤。— 知识分子工农化，得到了包括知识分子本身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60年代，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方式，缩小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的差别，着力使最可能异化为精神贵族的知识分子同作为社会基础力量的工人、农民结合起来。干部下放制度、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行高等院校开办农村分校、号召青年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以及高等院校教师和学生参加四清、社教运动等等，都是促使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有意举措。当时的社会理念是，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群众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这种反

智性的行为，在当时社会中被奉为正确的价值观，被认作是知识分子进步的必由之路。而实际上，这样做是将脑体劳动绝对地对立起来。

— 教育必须革命化，以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革命的概念，早在 1958 年时已经提出。至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向愈来愈不满。他在评论中国教育体制、办学目的以及授课方式时就讲到过，古代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都不是在大学裏培养出来的。他举了不少古代贤人的例子，其中专门说，李时珍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写出了《本草纲目》。在 1964 年 2 月 13 日的春节座谈会上，他说，现在书念得那么多，书念得多害死人。知识分子应该下乡。明朝的李时珍就是下乡跑来跑去。1964 年，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大学教育应该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必修课」。在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 {1962—1966 年} 历史的变局

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已经摆在面前。而苏联「变修」的「现实」，又加重了人们的忧虑。因而，由毛泽东提出的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阶级斗争」理论，越加深入人心。人们随时准备去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捍卫深藏于心中的平等理想。

— 反对特权、弱化等级制度、实现社会真正平等，是人们最认可的行动纲领。其中，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实行革命化的制度，受到群众由衷的拥护。因为这是避免干部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脱离人民的重大措施。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基层干部和群众创造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定点、定时、定责的办法，并将这些干部与群众密切结合的做法，变为制度性的规定，以消除「公仆」变为「主人」的可能。可以说，这些强制性的规定，都是得到人们真诚拥护的。当时，社会对特权形成鄙视。在城市，一般工人的生活待遇，成为社会平均待遇的安排基准线。高收入和高待遇，都被视为同付出劳动的不合理交换而遭到批评。在农村，工分制度和五保制度，确立了农民生活的无差别化。城市绝无暴富者出现。在人们时代思维的深处，巴黎公社原则受到至高的崇敬。但人们完全忽视了，在社会主义中差别是不能避免的现象，过分地无差别追求，必然导致人们行为中的异化力量。

— 突出政治的号召，在群众中得到广泛认同。从相反的方面说，讲求物质利益在当时遭到社会的唾弃。「革命」意识形态认为，精神是最重要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丧失了精神追求，就丧失了革命志向。精神可以变为原子弹，精神可以推动任何物质的发展和进步。人们普遍坚信，业务挂帅不能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鼓吹「白专道路」，正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特征。二十世纪 60 年代，在 F 全国人们学习解放军」的口号下，从中央到地方，业务领导机构普遍建立起政治部、政治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保证业务工作的政治方向。「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成为社会行为的准则。而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中，最大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因此，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了阶级斗争，便可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中国社会被政治化和精神化了。

第十二章 斋安 — 精才剑的时代

— 社会盛行成分论。由于阶级斗争理念不断得到强化，「革命 j 意识形态愈来愈把社会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营垒。而家庭出身，变得对「革命」与 r 反革命」的身份认定愈加重要了。中共在理论层面上是反对「出身决定论」的，也提倡「出身无法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本能，是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因此，成分论主张不可避免。大学录取要有成分比例；工厂招工需要成分认定；农村地富出身的人，受到歧视等，反映了社会上通行着的唯成分论的规则。 — 支持世界上受压迫国家的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被认为是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国人民最崇高的国际义务。这一方面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民，有责任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革命给予道义支持。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一种并不现实的所谓「革命」意识形态。经过对「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世界革命的意识在人民和社会中越加得到张扬。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应该担当起引导世界走向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历史重任”

—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么个新的程度。在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取得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背景下、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方面，毛泽

东得到中共党内乃至全国人民极大的崇敬和热爱。党员和群众无条件地相信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相信毛泽东的话就是真理。这种个人崇拜渐渐发展为个人迷信和盲从。它使得原本党内还存在的民主制度和氛围变得愈来愈不重要了。毛泽东个人的意志可以统帅整个社会的精神方向。

这些关于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精神异化的简单描述，大致说明了当时群众性的具有「左」倾色彩的社会性思潮。二十世纪60年代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所处经济位置、社会思想状态和国际地位的正确判断。用今天通行的话语，就是对于「甚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人当时并不真正理解。而由于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局势一定程度的紧张，人们极易发生思想精神扭曲。一般说来，落后国

际中 /、八：六中“内人半 J1 中卜 Ii7U 编一 17D) 1 一一名讨
又则支司

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学生死钻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甚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尤其文科，太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世界上的东西。这些话极为绝对化，相当于否定了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成果。但是，在60年代的中国，这种革命的「破坏」性意识形态，却受到社会的追捧。人们信奉旧教育制度必须改革、学生必须在阶级斗争的风浪裹进行改造这样一种「革命」理念。

一 同一切传统的东西包括传统的观念决裂，成为社会的风尚。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存在，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张扬，所谓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自然被看成是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需要立即加以清除。在何为「新」何为「旧」都一团混乱的状况下，人们就开始了所谓思想决裂、行动决裂，以绝对化的所谓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手段，来处理社会的文化、思想、习惯和风俗问题。这显然是非常荒唐的。一种民粹主义观念被升腾起来；20年代中期湖南农民闹革命时，以一定要在地主小姐的牙状上打个滚为革命胜利的心理，再次复燃了。当时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资产阶

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内根源。因此，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反对旧思想和旧观念对人们的侵蚀》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一 警惕资本主义复辟，是人民最重要的任务。对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和所谓新生的资产阶级，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的警惕。相对于汪洋大海式的小生产所产生的新生资产阶级，旧的反动阶级的残余，更具有危险。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企图变天和复辟。人们接受这样的历史经验：一个政权的建立，总要经受复辟和反复辟的长期较量。正像法国大革命一样，革命派要巩固政权，就必须镇压反革命，同反革命复辟势力进行长期斗争。由防止「复辟」而将社会上一切「不革命」的现象，如落后思想小商小贩等都看作是复辟的根源，并进行殊死斗争，成了「左」的持守「革命」意识形态的标志之一。

后记

作者深知，如果再写一篇冗长的跋语，那一定是要遭到读者的奚落和谴责的。因为，作者在正文裏已经不厌其烦地说教、解释和铺陈一大堆令读者索然无味的东西了。现在，能够引起读者一丝兴趣的，或者也可能是比较「讨巧」的作法，就是在这个短篇跋语中，批判作者拼命堆砌史实后面的所谓指导思想，或者说，对作者的「史观」进行一番检讨。这大概还可以引来读者的关注，最起码，会让读者在「阅读疲劳」中，找回一些心理平衡。

在无尽忍耐中通读了本卷的读者会发现，以所谓现代治史方法写出的本书，竟然还充斥着旧式史学的影子，那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国家治理者身上，而较少或很少反映历史的本体——人民大众。书中太多地讲到毛泽东，讲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讲到那些可以制定和左右国家政策的「大人物」，可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他们改造自身和改造社会的努力，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诚然，哲人说过，世界上有能力书写历史的人，总共没有几个。哲人其萎，其言也善。但论到书写历史，则必须说，「大人物」的「书写」应当具有充分条件。这个所谓充分条件是：如果没有普通民众的拥护，大人物几乎无可作为。毛泽东说，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裏的一张「白纸」，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那些曾经满怀革命豪情的中国大众。

设的十年」之后突然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同先前社会中「左」的思潮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

29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 605。

复记

后来，斯大林的观点成为我们的座右之铭。可是，当我们大声说奴隶创造历史的时候，却往往把奴隶们丢在一边，大写特写起「英雄」来。这几乎成了一种模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成为所谓严肃史学著作的主人翁。而社会主体的民众，则常常被视而不见。

历史真是靠几个领袖和大人物左右的吗？回答是能，又不能。能是肯定的。因为大人物掌握着国家权力，从而也就是掌握着国家的资源。他可以调动、提出、更改、加速、迟缓和反向引导历史的发展。因而，他们能够左右历史。而所谓不能，是从这样一个宏观角度出发：一切领袖人物、英雄人物，都必须顺应历史潮流。这个潮流的本质，就是民众的意愿、要求、怀疑、拒绝甚至反抗的力量。这个力量如果爆发，是任何英雄人物都难以遏止的。因此，人民大单并不是一张白纸。他们是历史的能动的力量。

由此，我们提出一种貌似折中的观点：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唐相魏征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毛泽东在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时，他回喊的是「人民万岁」。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其中明确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新一代中共领袖，又有所谓「新三民主义」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所有这些政治宣示，都可以被看作是历史演进中的「互动」关系：水与舟；主席与人民；代表者与老百姓；权、情、利与民愿、民享、民有，等等。如果我们承认有这样的历史互动，那么，治史者就应该兼顾互动的两面，而不能偏废其一。我们说，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史观，比较接近历史发展的本质。

本卷动笔之前，也曾按照英雄与奴隶互动的思路来设计框架。但不知

甚么原因，在写作中不知不觉地把「互动」偏向了「英雄」。当作者终于草完全书时，才惊讶地发现这个问题。其时，补救已晚，回天无力了。掩卷长思，作者终于有这样几个感悟。其一，史观缺陷的作祟；第二，训练方式的陈旧；第三，材料的限制；第四，历史的本体导向。

5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谱而已。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其革命性的地方，就是否定了以帝王延替为「主线」的旧史学。可纵观今天出现的新史学著作，远的不论，凡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几乎都同本书一样，把笔触大面积地放到领导人活动、决策等政治事件上，虽不能说是帝王家谱，也难逃「上层活动史」的诟病。这不能不反映我们潜意识中的「精英」情结。

无独有偶，在当今大陆的影视界也席卷起一股强大的「帝王热」。甚么《汉武帝》、甚么《贞观长歌》等，动辄几十集上百集，并且打的旗号不是「戏说」，而是正剧。不能否定，这些影片、电视剧的制片人，也就是那些腰缠万贯的投资者，是聪明透顶的。他们不会向没有回报的无底洞裏砸钱。他们投资这些历史帝王大片，是因为看准了人们的喜好。说到底，这个喜好就是一种观单的偷窥欲。养在深宫裏的帝王和他们大大小小的老婆们，以及侍奉这些大小老婆的闱人们，构成了一个小型社会。他们中间的恩恩怨怨、扒灰吃醋，同帝王家裏的夺嫡斗争、兄弟残杀纠缠在一起，具有非常强烈的隐秘性和摄人的故事性，而这些故事，又都遮挡在高墙深宫之中，平头百姓自然是百窥不得，心急如焚。这就造成了心理和商业的两大市场。两个市场都指向一种需求：满足偷窥欲。无庸讳言，就真正的知识传播而言，这个「历史热」是病态和扭曲的。人们到底不能用「偷窥欲」来推动历史的进步。

在当今的文化条件下，要清除所有病态的电视剧，是不可能的。媚俗的东西总有市场，不能强求人们的欲望一致。但我们这裏要说的，是严肃的史学研究和史学著述裏的「史观」问题。如果打着「严肃历史」招牌的史学著作，也从满足人们的偷窥欲望出发，把主要的描写

放在高层斗争上面，像 80 年代蜂拥而出的《走下神坛》、《走出红墙》之类，那就是害人了。

好的历史研究，当然不是为满足人们的「偷窥欲」，而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叙述，揭示历史的本质。那么，甚么是历史的本质？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些问题至今人云云殊。据黎澎先生研究，最早提出奴隶创造历史的人，是斯大林而非马克思、恩格斯。

砗拥优兀，江

复记 513 策。而党的决策又都来自党的会议。于是「文山会海」，成为当代中国历史著作的特征。而严重的是，在这种训练下的研究者和写书的人，思想变得懒惰。因为只要有几千人几百人和上千人的材料，就足够了。有关草根的材料，不必用心发掘。有关社会的景象，不需加以描写。这样一来，写史就省力省时得多了。本卷的四十余万字，材料大多是围绕这「几十几百和几千人」来搜集、摆放和陈述的。虽然，作者也挣扎着想写几十几百和几千人以外的人，写他们的精神、情感和作为，但明显投入不够。这突出反映了史观、史风和史识的问题。

另一个原因造成研究者只关心几十人几百人的原因，是体制因素。中国同西方不同。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的关系，在理论上说是一体的。特别是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民众同党基本没有隔阂。无论在政治还是思想上，人民同党的意志保持看高度一致。说这是「全能主义」也好，叫它「同心同德」也罢，事实就是如此。中国没有所谓民主国家的契约理论，也不会出现以民众为一方，通过投票等权利，同统治者相抗衡的可能。因此，研究几十人和几百人，几乎等同于研究了大众。反过来说，大单的反应，同几十人和几百人的决策是相呼应的。这表面显得荒唐）但实际并非讹论。

最后，丢掉社会和大众，是因为研究者缺少材料。社会性和大众思想动态的材料，不在档案馆裹，而要去发掘。而要发掘半个世纪以前的社会性材料，谈何容易？必须躬亲劳作、百折不挠，甚至要进行田野调查、个案追踪。这比坐于书斋，检索已有的材料，不知艰难多少倍。而所出的作品，在「卖价」和「评比」中并没有大的区别。问题在于，大陆的许多研究者，已经「丧失」了「淘」材料的本能。他们（包括

本卷作者)也用工,但基本是坐于书斋之侧,用飞快的速度「码字」。所用的材料,自然是愈顺手愈好。这样,就丢掉了社会和民众。无疑,这是目前大陆研究者的「虚浮」表现之一。

既然我们的著作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偷窥欲」,也不是为了那几十、几百人做「家谱」,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弦更张,眼睛平视,在史学意识上留有社会与民众的位置。事实上,关于「四五运动」,就是可

5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 — 压史的变局

所谓史观的缺陷,前面已经有所交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史国史的写作长期来形成一种模式,这就是以党的领袖、党的政策和方针的决定以及党所召开的重要会议,作为党史叙述主体。如果不把这些决策写详细,就不是党史国史了。在这个模式支配下,社会和民单在党史国史中总是被忽略。中共党史第一权威胡乔木在讲解党史写作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良难工作。国家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如果没有在北京是几百个几千个,在.全国是几十万个负责人成天在那东操心、研究处理许多问题(他们也肥错误),很难使国家基本上能生存、活动、委展。如果离闭了这个签动机,那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大、人.多、文化低、交通工具少,没有民主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必顿有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各方面之间扯皮、拆台等等,不知道要养生多少街突。从这方面来说,党确实是人民的合仆,这是天合地道的,不宣传这个事实是不对的。党的作用在国家生活中甚么时候可以减少、缩小?甚么时候可以把一些活动社会化才也许要一首年。’

可能自有「党史」以来,其写作格局就这样确定了。胡乔木讲得对不对?当然对,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当代的历史将成甚么样子?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写北京的那「几百个几千个」和全国的「几十万个人,写他们成天在那裹操心、研究问题」,写他们的工作和决策,就成为党史国史的必然。可是】当我们把历史仅仅写成这几十人、几百人和几千人的活动时,这历史也就离「家谱」不远了。可以肯定,无论写党史还是国史,只写这几十几百上千人,不能被称作历史唯物

主义。史观决定了史风。以党的活动为核心的历史著述，延续成风。这代表了基本的史学训练和修养。人们的思维和写作，只围绕党的决

1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87。

大事记

1962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新年献词〉。社论强调，1962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一年，农、工、商、学、兵、政、党和群单工作等各个方面，都要鼓足干劲，实事求是，在当年内创造新的成就。

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县、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大会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加强集中统一。

2月16日—3月8日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议肯定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估计。

2月21日—23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在北京召开会议。上述两次会议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确定了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和政策。会议作出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

甲平人氏共和国史' 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

贵的例子。这个「运动」被认为是民单推动政治发展的典范。那么，二十世纪60年代在中国农村不断涌现的「责任制」、「包产到户」等民间的「运动」，为甚么不能有更详细的研究呢？同时，60年代中国民众中激进的「左倾」思潮，也应当给予历史和理论的说明。因为它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运动，都关系紧密。可惜的是，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拿出有影象的作品。历史，的确不是几个人几十人的历史。历史归根结底是所有人活动的记

录。这活动千姿百态、种类繁多。丢掉哪个部分，都造成历史叙述的缺陷。马克思说，历史的结局就像一个平行四方形。它受着各个方面力的牵拉，以至所有人的意志都没能得到最终的实现。所有人都必须在历史面前妥协。这说明，哪裹是几个人和十几个人就左右了历史的？刘少奇在被难中也说过一句特别悲情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许多人引用过这句话，却未必真实地感受了它。作为历史学者，如果我们只是在被难时想起了人民和社会，那历史的悲情将会一再重现。

跋语至此，应该打住。作者的意图，是检讨本卷的短处，梳理治史的思路。只是在这一卷中，那些疏漏却难以挽回了。如果从长远议，这番检讨对作者和读者都有所提示，则欣幸有加了。幸为藏拙，不可问世。衷心感戴读者。

最后当然要感谢帮助过我的人们：金观涛先生、刘青峰先生、沈志华先生、李丹慧先生。没有他们几位的激励和督促，本书的写作可能早就夭折了。特别要感谢的是萧冬连先生。他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可以「无私」两字概括。其慨然的风度和沉重的分量，对本书写作都是决定性的。毫无疑问，我家人的宽容给了我不可替代的慰藉。因为，他们把一切琐细的家事都承担了起来。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马若德教授（Prof. Roderick MacFarquhar）和赫斯特女士（Ms. Nancy Harst）⁰ 马教授同我就这段历史的数次讨论，使我受益良多；赫女士则慷慨地为我提供了许多研究信息和数据。他们始终鼓励我完成这一研究。

大事记

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29日，全会发表公报，其中有毛泽东亲笔所加的一段话：「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10月20日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还击。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开始。11月21

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从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12月29日公安部发布公报说，从1962年10月1日到12月6日，先后有九股美蒋武装特务由台湾高雄乘船出发，偷渡大陆沿海的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等五县，企图在广东沿海建立所谓「游紧走廊」，为进一步实现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创造条件。除一股未敢登陆逃往香港火头盆岛外，其余八股武装特务皆为广东军民歼灭。

1963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巩固伟大成绩争取新的胜利〉。社论说：「刚刚过去的一年，我国的经济形势，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市都在一天天地好起来。」社论提出，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农业。

2月11日—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从当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把这三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会议着重讨论了城市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决定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知，提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4月16日新疆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六万余人逃往苏联。

5月25日，发生伊犁暴乱事件。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蒋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战备。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蒋匪帮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窜犯大陆〉的时评，号召全国人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注意防止和及时消灭潜伏的和空降的蒋匪特务的破坏活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

窜犯之敌。7月2日，赫鲁晓夫就台湾海峡局势等问题发表声明，重申谁胆敢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谁就必将受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苏联各族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毁灭性回击。

9月24日—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先后召开了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全会的预备会议。毛泽东在开幕会上首先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他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有关阶级、形式和矛盾以及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他认为，要承认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领导主要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并增选了中央监委的成员。会议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决定设立两个项目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会议决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撤消黄克诚、谭政的

大事记

〈前十条〉对中国当时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严重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而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虑，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据此，文件提出了「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的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提出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文件还指出：「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会后，全国各地开始根据〈前十条〉的

精神，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9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规定四清运动的基本方针，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但同时也强调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并规定了一些正确和基本正确的政策。〈后十条〉下发后，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6月14日中共中央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覆函苏共中央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论述了25个问题，系统提出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概括、当代世界及其基本矛盾等重大问题的意见，提出将派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两党会谈。6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7月14日，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覆信进行了全面批驳。中共中央为说明真相，辩清道理，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进行了答辩。由此，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论战全面展开。

甲辛入氏丑和斗义’ 矛立巷 k1 , b 乙一 1 吵 b 刃一 贖丈的变句
上，毛泽东推介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省保定地区开展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并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说法，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2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境反击战的汇报时提出，看来军队还是要抓政治工作，抓四个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强薄弱环节，搞好党的建设。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部分城市的基层逐步展开。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这个题词引发了国内持久的向雷锋学习的运动。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近几年来，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的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新编剧本如《李慧娘》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事实证明，「鬼戏」的演出，加深了人们的迷信观念，助长了迷信活动，妨害了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鬼戏」有停演的必要。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在停演「鬼戏」和「迷信戏」后，还应大抓戏曲改革工作，认真实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5月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批判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及廖沫沙所写有关「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指其为阶级斗争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表现。

4月25日国防部授予人民解放军驻上海某部第八连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

5月2日—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大事记

则：一、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二、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三、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四、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渐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五、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六、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七、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八、派到受援国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等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在访问索马里时，周恩来发表了「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非洲一定要出现」等看法。

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石油产品已经基本实现自给。报道说，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1964年

1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毛主席诗词》。本书除收入毛泽东以前发表过的27首诗词外，还收入了未曾发表的10首诗词。

1月13日—14日首都百万人集会反对美国侵略巴拿马并声援巴拿马人民爱国斗争。12日，毛泽东曾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到加日，全国累计共1600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说，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三学习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三学习解放军坚持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r三八作风，学习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6）——历史的变局

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声明。声明是针对7月25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署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而发表的。声明说，几个核大国企图通过一个条约，来巩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从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东缚起来，使其不能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中国政府认为，禁止核武器、防止核扩散是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大问题，应该由世界上所有大小国家共同讨论决定。由几个核国家来摆布一百多个无核国家的命运，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在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扩散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允许采取欺骗世界人民的办法。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提出1966年以后发展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国家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9月孙冶方因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而遭到批判。孙主张要抓企业利润，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

益的企业管理制度。他的这个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两次提出批评。毛泽东说：一个时期以来，《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又说。文化方面工作，特别是戏曲，大量的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夸大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使文艺界遭到严重的「左」的政治批判。12月14日一次年2月29日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此次访问共历时72天，行程十万多公里，是新中国外交中最令人瞩目的出访活动之一。周恩来在访问马里时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大事记 523 不清 J 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会议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在这种对现状不切实际的估计下，中共中央在9月份又对〈后十一条〉进行了修订。〈后十条〉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样做的结果，是广大基层干部受到了政治打击。

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上再次批示。批示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也被称作「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毛泽东作出批示后，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

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记忆在世界历史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这是中苏意识形态论战裹中共发表的最后一封公开信。公开信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提供的反面经

验中，汲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理论和条件。在相当程度上，「九评」为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8月6日中国政府就美国发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发表声明。声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

8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中华人民共和史·第五春（1962—1966）——历史的变局》

2月13日毛泽东召开教育座谈会（又称「春节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不行。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考试方法都要改，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方法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泽东说，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和高尔基，都是自学成才的。」

4月22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同香港英国当局代表签定供水协议，决定修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根据协议，工程将于1965年3月1日开始向香港、九龙地区供水，每年供水6820万立方米。5月《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根据林彪指示，从1961年5月起，《解放军报》开始刊登毛主席语录。这种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本次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是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军报刊载过的语录，加以补充编纂而成的。《毛主席语录》首先向全军官兵发授。不久，这本语录在全国发行，一版再版，到了「文革」期间，几乎人手一册。据1967年12月的统计，全国共印行《毛主席语录》3.5亿册。5月中旬—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政治工作、财贸工作等问题。

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在6月6日发表讲话。他从存在看新的世界战争和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应把全国的战略布局划分为一、二、三线。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根据这个意见，国家计委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进行了修改。会议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中。毛泽东指出，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加阶级的内容。刘少奇认为，「四

犬事记

525

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后，在全国部分城乡进行的「四清」运动继续展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12月20日—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报告为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任务，这就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65年

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批判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平凡的真理》两部著作的文章。文章认定，《共产主义人生观》公开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腐蚀青年；《平凡的真理》则被称为是「唯心主义的大杂烩」。对冯定两本书的批判，标志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覆〉，免去了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5月文化部党组改组，成立了由萧望东为书记、石西民、颜金生为副书记的新党组。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彪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

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9月19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9月18日—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专（1962—1965）—历史的变局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在对报告的批示中写到：可能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这些修正主义的材料公之于单。《早春二月》被指斥为宣扬站在革命之外的彷徨者，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北国江南》则被判定为「鼓吹中间人物」，宣扬「阶级调和」。

9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简称「桃园经验」）。这个经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报告介绍了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在参加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的体会和认识，总结了工作队进村后一整套「对敌斗争」的做法和经验。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同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完全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威胁。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是毛远新（毛泽东侄儿）追记的本年7月5日毛泽东同他的谈话。毛泽东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谈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上「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对社教运动的名称作了统一规定，即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取消了城市的「五反」运动名称。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和争论。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其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

参考文献

一文献资料

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1948—1988》（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

山东省委研究室编：《山东省情（1949—1984）》（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国民经济调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至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9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七、九、十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针，会议同意了「以国防为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思想。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那么怎么办？」的问题。他对国家政治形势的看法越趋严重化。

9月29日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坦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我们对美帝国主义不存在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败它。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以后，在全世界真正结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就会到来了。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2月8日—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认定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企图夺取军队的领导权。罗因此被调离军队领导岗位，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本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点名地对著名历史学家万伯赞进行批判，指斥他的历史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

参考文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Maxwell Nevill）：《印度对华战争》，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1）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至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77）《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7月—1963年12月）
- 王延谦编：《我国近七十年物价简史（资料）》（上海：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财贸分会，出版年份不详）
-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 尼尔斯·霍恩伯格（Nils Holmberg）着，锤典译：《和平的反革命：苏联从社会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 安德鲁·内森（Andrew J. Nathan）、罗伯特·罗斯（Robert S. Ross）着，柯雄等译：〈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北

京” 新华出版社，1997)

吴玲西：《十年论战：1956 — 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 — 1949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李先念：《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 — 1991 年》，下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李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李富春：《李富春选集》（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沈容：《红色记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林志

坚主编：《新中国要事述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5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 — 1966 幼一 历史的变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 — 1969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 — 1976 ）》，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95) 中共中

央财贸政治部编：《政治工作学习文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

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大跃进」运动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苏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江苏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北京：内部出版，19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参考文献

陈云：《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陶文\$1j 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曾希圣传》（北京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冯佩芝：《中国主要气象灾害分析（1951—1980年）》（北京：气象出版社，1985）

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黄瑶·张明哲编：《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塔里克·阿里（Tariq Ali）、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着，范昌龙等译：《1968年：反叛的年代》（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一位民闲思想家的悲情记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下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萧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1965）—历史的变局

林福瑞、陈代光：《河南人口地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下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姜长赋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玲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姚锦编着：《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科技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灾害综合研究组：《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4）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着，《国际问题数据》编辑组译：《苏联国内阶级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张化、苏探青主编：《回首「文革」》（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张少书（Gordo。H。chang）着，梅寅生译：《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盐内幕》（台北：金禾出版公司，1992）

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n日—2月7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陈之肺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陈文赋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1949—199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索引

一画

「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

〈十年总结〉 64，132，133

108

二画

七千人大会 47，51，52，54，55，65—67，74，77—81，83，92，96，99，100，102，103，106，107，109，113，115，119，121，125，126，128，130，139，145，146，148，149，151—156，158，167—171，174，179，180，198，203，208，209，212，213，219，221，223，226，259，265，266，267，269—271，274，283，285，292，306，403，419，430，432

九评 259，355，369，364—366，375，474，475，502

二十二大 73，136，253，254，256，259，260，268，291，

344 , 345 , 349 , 350 , 354 , 362 , 372

二十三条 404 — 406

「 / 文字方针」 307

八届九中全会 89

「八万言书」 224 , 225

《十年论战》 137

三画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32 , 51 , 108 , 109 , 140

三和一少 266 , 251 , 313 — 317 , 319 , 408

三线 359 , 411 , 426 , 431 r 下马」 172 , 173 , 176 , 177 大
分化 433 , 454 , 455 , 459 , 476 , 477 大改组 433 , 455 , 459 ,
476 , 477 大动荡 433 , 455 , 459 , 476 , 477 大寨 395 , 459 —
491 大庆 305 , 429 , 454 , 鲳 s — 490 大跃进 23 — 25 , 43 , 46 ,
53 — 55 , 57 — 59 , 64 — 66 , 72 , 74 — 77 , 79 , 80 , 82 —
87 , 89 , 91 , 92 , 95 — 102 , 104 — 106 , 108 , 110 , 111 ,
113 , 114 , 1 18 — 121 , 124 , 129 — 133 , 136 , 137 , 139 —
143 , 145 , 147 , 154 , 156 , 157 , 161 — 164 , 166 , 172 ,
173 , 175 , 212 , 213 , 216 , 223 , 225 , 228 — 230 , 270 ,
271 , 274 , 283 , 289 , 290 , 307 , 380 — 382 , 392 , 394 ,
397 , 414 , 419 ,

5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五春（1962 — 196 引— 历史的变局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聂

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罗

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海口：南海出
版公司，1999）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 — 1975）》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

Roderick MacFarquhar ,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vol . 3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7) Wladyslaw W . Kulski , De Gaulle and

the 坏必 rld : The Foreign Policy ofthe Fifth French RePublic
(Syracuse :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1966)

二报纸杂志

《 二十一世纪》 (香港) 《 人民日报》
《 中共党史研究》
《 文汇读书周报》
《 北京周报》
《 炎黄春秋》
《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 《 当代中国史研究》
《 学习时报》
《 党史博览》
《 党的文献》

示' I

全民党 136 , 257 , 255 , 353

回笼货币 155 , 1 55 , 177

地富反坏 252 , 294 , 327 , 400 , 415 朱德 80 , 1 17 , 167 , 168 ,
273 , 284 , 320 353 , 367 , 371 , 406 , 407 , 422 , 425 江青
127 , 276 , 251 , 324 , 378 — 381 386 , 388 , 390 , 393 , 399 ,
401 , 402 411 — 420 , 429

江渭清 292 , 293 , 296 , 297 , 321 , 322 324 — 326

米高扬 255 , 367 , 369 , 370

七画

李井泉 50 , 53 , 273 , 320 , 401 , 402 , 422 , 426 , 478

李先念 41 , 66 , 80 , 153 , 154 , 159 — 161 , 166 — 168 , 273 ,
284 , 320 , 358 , 400 , 477

李富春 41 , 66 , 50 , 88 , 98 , 159 — 161 , 166 — 168 , 234 ,
273 , 284 , 307 , 358 , 401 , 402 , 459 , 463 , 466 , 477 利
瓦伊汉 214 , 218 , 314 , 315 , 407

338 , 343 , 349 , 353 , 354 , 357 , 358 , 367 — 373 , 379 ,
381 , 382 , 387 — 389 , 396 , 398 , 401 , 402 , 410 , 415 ,
416 , 421 , 422 , 425 , 431 , 485 — 487 , 490

「官僚主义者阶级」399 林彪 50, 55, 116 — 123, 125 — 127, 138, 147 — 149, 153, 167, 273, 304, 417, 419 — 432, 479, 495, 496 社教运动 299, 302, 309, 311, 313, 320, 322, 325, 327, 329, 330, 398, 400 — 404, 409
肯尼迪 277, 281, 291, 334 — 337, 339, 355 — 357, 441 — 448, 451, 474

金日成 255, 315, 316, 336 倚田里见 316

八画

周林 143

周恩来 41, 47, 45, 61, 65, 50, 53, 54, 93, 94, 125 — 127, 138, 149, 152, 153, 158, 160, 161, 165 — 168, 171, 174, 175, 212 — 214, 218, 219, 227, 229 — 237, 239, 242, 248 — 250, 252 — 256, 260, 262, 263, 265, 266, 270 — 274, 276, 281, 283, 284, 287, 290, 291, 294, 296, 299, 301, 306 — 308, 312, 319, 3加, 325, 333 — 336,

九画

信阳事件 61

前十条 297, 299 — 303 勃列日涅夫 332, 366, 367, 369 — 371, 373, 457

姚文元 411 — 418

「帝修反」251

后十条 302, 303, 317, 321 — 325 柯西金 366 — 369, 371, 372
柯庆施 53, 80 — 87, 98, 129, 145, 149, 207, 208, 242, 273, 276, 284, 293, 325, 378, 380 — 384, 388, 401, 412, 413

〈科研十四条〉 233, 234, 241, 242 红旗渠 489 — 491

约翰逊 443, 448 — 451

534

中平人民共和国史·第五春（1962 — 1965）— 历史的变向

434 , 460 , 463 , 482 , 483 , 487 , 501 — 503

小站夺权 318 , 326

「工业七十条」60

四画

中央财经小组 160 — 162 , 165 — 168 , 306

中印边界冲突 146 , 333 — 336 , 342 , 434 , 438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 172 , 209 , 271 , 273

r 五风 1 145 , 173 , 182 , 203 , 290 分田到户 165 , 152 , 188 ,
1 96 — 199 , 204 , 408

「扎根串连」309 , 323

「文艺八条」60

《毛主席语录》 430 , 432 , 496 毛泽东 23 , 24 , 25 , 29 , 53
— 68 , 71 — 77 , 79 , 80 , 82 — 97 , 103 — 106 , 108 — 116 ,
119 , 120 , 122 — 145 , 147 — 149 , 151 — 153 , 155 , 156 ,
158 , 160 , 162 , 165 — 167 , 170 , 171 , 175 , 180 — 182 ,
184 , 186 , 187 , 189 , 190 , 192 — 198 , 200 , 201 , 203 —
208 , 210 , 212 — 214 , 219 , 222 — 230 , 234 — 236 , 242 ,
243 , 246 — 249 , 251 , 252 , 254 , 255 , 258 , 259 , 261 ,
265 — 287 , 289 — 3 () 0 , 302 — 305 , 307 , 309 , 310 , 312
— 320 , 322 — 325 , 331 — 335 , 338 — 340 , 342 — 345 , 347
— 361 , 363 — 369 , 371 , 372 , 374 , 377 — 432 , 436 , 437 ,
440 , 442 , 444 , 454 — 457 , 459 , 460 ,

462 — 479 , 487 , 490 , 494 — 498 , 500 — 502 , 504 , 505 ,

507 王任重 50 , 51 , 98 , 118 , 196 , 加 7 , 305 , 408

王光美 32 , 301 , 309 , 322 — 325 , 422 王延春 292 , 302

王稼祥 76 , 136 , 167 , 251 , 314 , 405

五,

代食品 39 — 41 , 191

包产到户 57 , 65 , 165 , 172 , 179 , 180 , 182 , 184 — 186 ,
188 , 192 , 195 — 207 , 226 , 270 , 272 — 276 , 292 , 298 ,
303 , 315 , 403 , 408 , 419 恤匕顶南放 320 , 465 , 470 古巴

导弹危机 332 , 336 — 33 砍 34 之, 347 , 355 , 457
四清 125 , 259 , 290 , 294 — 296 , 298 — 301 , 304 , 305 , 308
— 311 , 313 , 318 , 321 , 322 , 324 — 328 , 377 , 383 , 395 ,
397 , 398 , 400 , 404 — 407 , 409 , 419 , 473 , 482 , 505 尼
赫鲁 263 , 333 — 336 必然王国 57 , 133 , 134 , 136 田家英 62 ,
69 , 72 , 75 , 50 , 110 , 145 , 195 — 198 , 202 , 204 — 206 ,
270 , 276 , 286 , 302 , 303 , 306 , 323 , 324 , 404 , 418 , 419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事件 312

六画

伍修权 339 — 341 , 343 , 344 , 346 351 , 354 , 366 , 368

全民国家 136 , 257 , 之 58 , 353

索引

431 , 432

彭德怀 55 , 66 , 77 , 56 , 57 , 59 , 96 , 97t 113 , 117 , 119 ,
120 , 123 , 124 , 135 , 147 , 175 , 190 , 221 — 226 , 269 —
271 , 276 — 279 , 284 , 285 , 292 , 3 15 , 319 , 390 , 394 ,
405 , 411 , 414 , 418 , 424 , 435 , 437 , 478

曾希圣 147 , 179 — 151 , 202 , 203 「减人」 172 , 173

越战 410 , 451 — 453 , 458 , 461 , 462 , 464 , 465 , 471 , 473 ,
475 , 476 阶级斗争 125 , 147 , 212 , 219 , 230 , 232 , 243 ,
254 , 258 , 259 , 267 , 268 , 271 , 280 , 282 — 287 , 289 —
306 , , 308 — 314 , 326 , 328 — 330 , 342 , 377 , 378 , 381 ,
386 , 390 , 398 , 399 , 403 , 407 , 415 , 459 , 462 , 472 —
475 , 492 , 497 — 499 , 501 , 503 — 508 冯志来 155 , 156

黄火青 142 , i 斜

537

资产阶级法权 101 , 413 , 500 — 503 505 , 508

雷锋 493 , 494

十四昼

夺权 275 , 291 , 311 — 313 , 318 , 326 , 327 , 428

甄别 102 , 168 , 209 — 212 , 214 , 215 , 218 , 226 , 270 , 279 ,

280 蒙哥马利 28 , 29 , 32 , 48 , 152 , 396 赫鲁晓夫 65 , 76 , 96 , 132 , 136 , 220 , 223 , 233 , 245 — 256 , 258 — 263 , 266 , 277 , 281 , 286 , 291 , 292 , 297 , 314 — 317 , 319 , 320 , 331 , 332 , 335 — 339 , 341 , 344 , 346 — 350 , 353 , 355 — 361 , 363 — 373 , 375 , 394 , 397 , 406 , 411 , 420 , 434 — 438 , 447 , 448 , 457 , 467 , 468 , 473 , 475 , 502

赵紫阳 144

赵毅敏 339 — 341 , 343 , 360 齐燕铭 379 , 389 , 391 , 473

! ■ ■ ■ ■ , 甚蠢觔 1 才■ , , I ■

十三画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140 , 149

r 伤筋动骨」 116 , 163 , 167 , 172 , 176 , 209 , 306 , 308

新侨会议 230 , 233 , 351

杨木水 154 , 155

杨尚昆 71 , 78 — 51 , 93 , 95 , 104 , 116 , 127 , 138 , 139 , 159 , 167 , 197 , 224 , 270 , 273 , 278 , 320 , 351 , 432 杨

伟明 186

杨献珍 392 — 394

叶飞 142

十五画

参 j 子厚 200 , 292 , 296 , 309 声 U 少奇” , 32 , 打 , 48 , 67 一于 , 71 — 75 , 77 , 79 — 82 , 87 , 92 , 94 — 97 , 104 — 108 , 110 , 112 , 115 , 116 , 118 , 119 , 123 , 124 , 126 , 127 , 130 , 138 — 140 , 143 , 146 , 147 , 151 — 154 , 158 — 161 , 165 — 171 , 175 , 195 — 198 , 200 , 202 — 205 , 207 , 208 , 212 , 213 , 219 — 221 , 223 — 226 , 234 , 236 , 245 — 247 , 249 , 259 , 264 , 270 ,

5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1962 — 1965 必一 历史的变局

胡开明 37 , 40 , 159 — 195

修正主义 92 , 101 , 128 , 129 , 136 , 205 , 245 , 251 , 252 ,

254 , 256 , 259 — 261 , 264 — 266 , 268 , 269 , 281 — 283 ,
287 , 289 — 292 , 295 , 296 , 298 , 299 , 302 , 304 , 312 —
319 , 324 , 330 , 332 , 340 , 342 , 344 — 346 , 348 , 354 ,
358 — 360 , 363 , 367 , 371 , 372 , 374 , 375 , 378 , 383 ,
386 , 387 , 389 — 391 , 393 — 396 , 402 , 408 , 410 — 412 ,
415 — 417 , 427 , 434 , 438 , 440 , 465 , 466 , 471 , 474 ,
475 , 495 , 496 , 502 — 504 , 506 , 507

十亡

原子弹爆炸 366 , 402 , 461 , 494 夏衍 229 , 389 , 391 , 473
时代精神 352 , 390 , 452 , 457 , 455 , 492 — 494 , 497

[相 1 园经验] 322 — 326 , 404 《海瑞罢官》 241 , 276 , 379 ,
411 — 415 , 417 , 418

班挥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218 马利诺夫斯基 337 , 365 , 369 , 371 ,
397

鬼戏 377 , 350 , 351 , 384 , 355

379 , 380 , 388 , 389 , 392 — 395 , 411 , 413 , 417

张春桥 352 , 412 — 414 , 416 — 415 , 501

习仲勋 41 , 245 , 275 , 279 , 254 , 319 , 411

「脱帽加冕」 226 , 235 , 238 , 239 , 241 — 243

责任制 65 , 179 , 151 , 190 , 192 , 193 , 195 , 198 — 203 , 206

陈伯达 67 , 69 , 50 , 94 , 95 , 126 , 125 , 167 , 206 — 208 ,
273 , 277 , 284 , 287 , 299 , 311 , 318 , 322 , 324 , 326 ,
344 , 349 , 394 , 395 , 404 , 405 , 418 陈云 41 , 77 , 50 , 57 ,
55 , 93 , 110 , 127 , 131 , 148 , 149 , 153 , 155 — 167 , 171 ,
196 , 197 , 204 — 206 , 270 , 271 , 273 , 276 , 283 , 284 ,
306 , 311 , 396 , 407 , 408

陈毅 167 , 235 — 239 , 242 , 245 , 249 , 262 , 263 , 273 , 281 ,
301 , 320 , 334 , 338 , 357 , 381 , 382 , 454 陶里亚蒂 340 —
342 , 345 , 345 陶鲁茄 145

陶铸 53 , 50 , 125 , 207 , 236 , 273 , 351 , 399 — 403

十一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57 , 132 , 179 , 246 , 255 , 259 , 264 , 265 , 297 , 331 , 332 , 341 , 342 , 345 , 347 — 350 , 359 , 365 , 396 , 438 , 498

康生 128 , 167 , 229 , 266 , 278 , 279 , 318 , 320 , 343 , 344 , 349 , 351 — 353 ,

十二画

彭真 80 , 86 — 90 , 92 — 95 , 126 — 128 , 159 , 167 , 219 , 221 , 234 , 248 , 253 , 255 , 264 , 273 , 284 , 295 — 298 , 302 , 320 , 325 , 346 , 350 — 352 , 354 , 361 , 383 — 385 , 387 , 389 , 396 , 397 , 404 — 406 , 410 , 412 , 415 — 418 , 271 , 273 , 276 , 283 — 287 , 290 , 292 , 295 , 301 , 303 , 305 , 309 , 310 、 318 — 326 , 345 , 349 , 353 , 354 , 359 , 362 , 367 , 371 , 378 , 385 , 391 , 395 — 407 , 409 , 410 , 414 , 415 , 417 , 421 , 422 , 425 , 431 , 432 , 469 , 472

《刘志丹》 275 , 279 , 285 , 319 蒋介石 203 , 213 , 261 , 265 , 255 , 256 , 319 , 334 , 410 , 437 , 441 , 450 , 470 调整 46 , 55 , 56 , 55 , 62 , 65 , 76 , 79 , 92 , 100 , 101 , 116 , 147 , 151 — 154 , 156 , 158 , 161 — 163 , 165 — 169 , 171 , 172 , 177 , 183 , 188 , 204 , 227 , 210 , 212 , 214 , 215 , 225 — 227 , 230 , 233 , 234 , 240 , 241 , 243 , 246 , 261 , 262 , 267 , 270 , 271 , 280 , 284 , 287 — 289 , 305 — 308 , 329 , 357 , 363 , 么 81 , 382 , 391 , 404 , 443 , 452 , 456 , 458 , 459 , 463 , 468 , 472 , 473 , 475 , 482 — 484 , 486 , 493 , 502 , 503

论战 137 , 246 , 247 , 249 , 317 , 332 , 336 , 338 , 339 , 344 , 346 — 349 , 351 , 353 , 355 , 358 — 365 , 367 , 370 , 372 — 375 , 441 , 474

邓子恢 110 , 168 , 172 , 152 , 195 — 203 , 206 , 270 , 274 — 276 , 284 , 291 ,

314 , 315 , 408

邓小平 24 , 53 , 55 , 56 , 66 , 68 , 69 , 74 — 77 , 80 , 88 ,
90 , 92 , 95 , 114 , 127 , 138 , 146 , 147 , 153 , 158 , 160 ,
167 , 168 , 176 , 178 , 198 , 202 — 205 , 211 , 212 , 214 ,
218 , 219 , 234 , 239 , 246 , 247 , 252 , 262 — 264 , 270 ,
271 , 273 , 281 , 283 , 284 , 287 , 290 , 297 , 302 , 303 , 307 ,
320 , 325 , 338 , 349 — 354 , 358 , 367 , 371 , 373 , 374 ,
385 , 391 , 396 , 399 , 401 — 403 , 406 , 408 , 410 , 415 ,
421 , 422 , 425 , 431 , 460 , 466

十六画钱能让

182 — 184 , 272

十七画

薄一波 66 , 50 , 54 , 56 , 95

248 , 271 , 282 , 284 , 307

166 311

312 , 320 , 358 , 398 , 406 , 477

十九画罗瑞卿

117 , 119 , 140 , 149 , 166 , 167

219 , 268 , 273 , 334 , 358 , 377 , 402 , 410 , 417 , 419 —
432 , 470 , 477 , 485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也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總序·金觀濤)

- 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總約六百萬字，是目前最具規模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
- 十餘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歷時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注重國際與國內重大歷史事件關聯，揭示中央決策與地方、基層之間的互動
- 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

第五卷

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

錢庠理 著

從1962年起至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是一個色彩紛呈、複雜變幻的時段，有人稱其為「變局」。這種「變局」，是在大躍進運動遭受重大挫折、外部世界對中國施加愈來愈大壓力的局勢下，中國人在理論、觀念、政策作出一系列求變求存的調整和應對而發生的。它根本改變了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歷史的走向：那些最為重大、最為精彩的政治變動和思想流轉，都發生在這個時段；同時，它又開啟了更為激烈變動的十年。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